

美国史

(全6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总目录

- [美国优先和美国梦，1900—2017](#)
- [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 [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
- [美国海：墨西哥湾的历史](#)
- [向和平宣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上下）](#)



〔美〕莎拉·丘奇威尔 (Sarah Churchwell) —— 著 ★ 詹涓 —— 译

美国优先和美国梦

BEHOLD, AMERICA

1900—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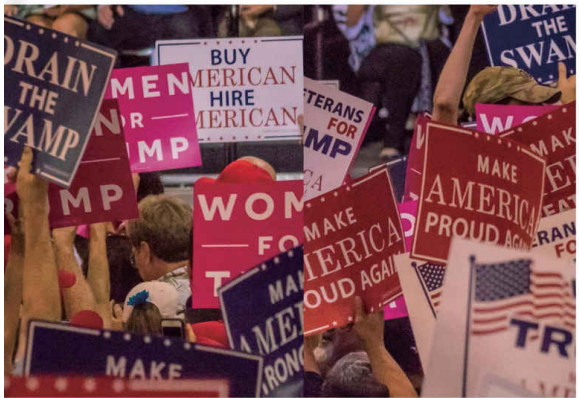
THE ENTANGLED HISTORY OF "AMERICA FIRST" and "THE AMERICAN DREAM"

在被美国中心主义笼罩的今天，
有必要对美国历史进行重新评估，
本书便是大胆的第一步，也是看清美国激烈政治对立的入门读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莎拉·丘奇威尔 (Sarah Churchwell) / 伦敦大学高级研究院美国文学教授、
公众理解人文学科协会主席。编著多部作品，现居于伦敦。



詹涓 / 武汉大学传播学硕士，毕业后任职多家媒体，负责编译及审校工作。业余主要从事二战和战后历史著作翻译，译有《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

图书策划人  视觉传达匠
联合创立



Behold, America: The Entangled History of “America First”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y Sarah Churchwell

Copyright© Sarah Churchwell, 201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获誉

这本书恰逢其时。这也是一本发人深思之作……丘奇威尔是一位优雅的作家，当“美国优先”和“美国梦”在她书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正面交锋时，意想不到（且令人震惊）的历史巧合开始像着了魔的风铃一样产生共鸣……《醒醒吧，美国：“美国优先”和“美国梦”交织的历史》阐明了有多少历史是在人们的言与行之间的鸿沟上发生。——《纽约时报》

“美国优先”和“美国梦”盘根错节的历史有了引人入胜的新视角。——《纽约》杂志

丘奇威尔在她的研究中撒下了一张大网，不仅网罗了政治家和专家，还囊括了记者、小说家、牧师和普通美国人。其结果可以说是有点混乱……但正如历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这种混乱说明这些短语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的事实”。——《国家》杂志

生动活泼，可读性强……丘奇威尔适时贡献了一本论述清晰的书，为二战前夕和我们的胜利之间的智力相似性提供了明确的例证。——《金融时报》

《醒醒吧，美国：“美国优先”和“美国梦”交织的历史》是一本迷人的书，可说是美国政治激烈对立统一的入门读物，灵感来自

2015、2016年的事件。毫无疑问，它将在受特朗普启发而出现的众多著作中占据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位置。它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在被历史扭曲得模糊不清的昔日洞穴的轰鸣中，发现了当下的回声。这本书充满激情，研究充分，内容全面，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录，也是对美国历史中一个几乎被遗忘和忽视的领域的令人兴奋的调查。——《卫报》（美国版）

关于现代美国两种相互交叉的隐喻的迷人历史……这两种思想的复杂历史，以及各自拥护者的个性……被丘奇威尔教授巧妙地娓娓道来。——《新政治家》，西蒙·温彻斯特（Simon Winchester）

有必要根据特朗普主义，对美国历史进行重新评估，而本书便是大胆的第一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英国），埃里克·劳威（Eric Rauchway）

对“美国梦”和“美国优先”这两种表达方式的一次丰富生动的叙述……《醒醒吧，美国：“美国优先”和“美国梦”交织的历史》读来极为有趣。丘奇威尔是一位细心而又敏感的读者，她的写作充满活力，对于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有着细致的洞察力。——《星期日泰晤士报》，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Dominic Sandbrook）

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丘奇威尔描绘了过去的“美国梦”为何较如今少了些物质主义，多了些集体主义……一个令人着迷的历史。——《独立报》

及时和有益的。——《经济学人》

- [前言](#)
- [序](#)
- [第一部分 1900~1920年](#)
 - [1 美国梦 1900~1916年：美国梦的精神](#)
 - [2 美国优先 1900~1916年：纯美国主义对抗全宇宙](#)
 - [3 美国梦 1917~1920年：除了社会主义，你还能管它叫什么？](#)
 - [4 美国优先 1917~1920年：我们已经走出梦境](#)
- [第二部分 1920~1930年](#)
 - [5 美国梦 1921~1923年：推销员的盛世](#)
 - [6 美国优先 1920~1923年：政府之简单](#)
 - [7 美国梦 1924~1929年：内心的意愿](#)
 - [8 美国优先 1923~1929年：一个爱国者，一个超级爱国者](#)
- [第三部分 1930~1940年](#)
 - [9 美国梦 1930~1934年：美元国](#)
 - [10 美国优先 1930~1934年：对现实的正式承认](#)
 - [11 美国梦 1934~1939年：历史的盛会](#)
 - [12 美国优先 1935~1939年：它会在这里发生](#)
 - [13 美国优先和美国梦 1939~1941年：美国人！醒醒！](#)
- [后记 1945~2017年：仍然美国优先](#)
- [结束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索引](#)

前言

措辞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任何意欲动用这种能量的人都清楚这一点。

2015年6月16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宣布竞选美国总统时宣布：“可悲的是，美国梦已经破灭。”一位总统候选人说出这番话，似乎令人大跌眼镜；参与总统竞选的人通常会美化其希望领导的国家，对选民大加奉承，以便争取他们的选票。但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只是让人们提前体验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因为特朗普展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技巧，能把对其他任何人不利的事情变得对自己有利。

待到特朗普赢得大选时，他已经颠覆了许多人对美国的理解。在就职演讲中，特朗普再次宣布美国梦已死，但他承诺要将其复活。我们被告知，美国繁荣昌盛的梦想正受到极大威胁，因此在总统任期里，他将高举“经济民族主义”的纲领。

对美国梦致以挽词，已经让世人震惊。而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特朗普还承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在2017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他重申了这一主张。对于一位总统候选人，继而是当选总统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用语。美国的全国性媒体和社交媒体开始讨论起“美国优先”这一说法的历史沿革。这些媒体告诉受众，“美国优先”的口号可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美国优先委员会力争

让美国摆脱欧洲冲突的努力。他们解释说，“美国优先”是由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等知名孤立主义者发明的，这些人对纳粹计划的同情与公开的反犹太主义往往密不可分。他们进一步称，“美国优先”是新纳粹主义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当作者们问起“美国梦”是否真的已经消亡时，其他一些权威人士也加入了进来。^[1]几乎所有这一切都始于对美国梦应该包含的内容的共识，即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国家对个人无限进步的承诺。但现在，由于不平等的普遍存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梦想受到威胁。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10年里，这个故事在国际媒体上无休止地循环着。他们说，特朗普把这种不平等变成了武器，让他的追随者相信，只有局外人方可挽救腐败的制度（他的追随者随时都会跳起来否认自己是富贵中人，以亿万富翁和企业大亨自居，而这显然并非他们仅存的认知失调症状）。

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质疑美国梦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在讨论它的相对健康状况。例如，《卫报》2017年6月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梦真的死了吗？》（*Is the American Dream Really Dead?*）的社论，不仅总结了每个人都在问的问题，而且总结了他们质疑的前提：

美国对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异乎寻常得高，这一点一直为世人所熟知，其原因在于美国社会的高度流动性。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梦的基础——这个理念最初由托马斯·杰斐逊提出，他设想每个公民都有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当然，美国梦并不是关乎铁板钉钉的结果，而是关乎追求它的机会……然而，如今实现美国梦的机会远不如几十年前那么广泛。^[2]

几乎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美国梦被广泛理解为个人机会的梦想，其中“机会”主要是用经济术语来衡量的，而这些机会正在减

少。美国梦由杰斐逊提出“最初构想”，这个说法同样是不言自明的，尽管事实上幸福和机会并不是同义词。

但杰斐逊所构想的——至少就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而言——是一个民主平等的梦想。他没有提到经济或机会，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事实上，杰斐逊借用了约翰·洛克的名言——“生命、自由和财产”，只不过把财产替换为幸福。尽管在18世纪“幸福”确实常常被用来象征“兴盛”，而“兴盛”显然意味着繁荣，但杰斐逊还是拒绝在美国的建国宣言中纳入具体的经济保障。民主平等和经济机会并不是一回事，但几十年来，美国梦一直把它们混为一谈。

《卫报》的这篇文章最后指出了这些术语所理解的“梦想”的自我毁灭性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问题的部分原因也许正出在美国梦上……事实上，美国梦把重点落在了在精英管理的社会中发挥个人的主动性上，这导致其对公众的支持极低，在安全防护网、职业培训以及对处境不利或运气不好的人的社区支持方面，要远逊于其他国家。”梦想成了个人资本主义者在自由市场世界里孤军奋战，而这有损于社会民主的“安全网”。同样，对美国梦的这种理解完全符合现今人们对它的典型理解——不仅是美国人，全世界都是如此。

尽管美国梦的含义无疑是由美国人传承下来的，但本书将表明，它与“美国梦”这个理念的初衷恰恰相反。2017年，一些作者开始注意到，美国梦曾经包含了更高层次的个人成就梦想，远不仅仅是住进现代化的百货商场（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1933年指出的那样）那么简单^[3]。不过事实上，将其降格为纯粹的物质主义，是表达意义变化中最少的。

《牛津英语词典》将“美国梦”定义为“每个美国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机会通过努力、决心和主观能动性获得成功和繁荣的理想”。当然，美国人总是将个人抱负想得神乎其神。但向上的社会流动性与

“美国梦”联系起来，事实上远远晚于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这一事实对于美国（实际上包括多数西方国家）现在所处的文化和政治斗争，对于美国如何看待自身和自己的承诺，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有关“美国优先”的流行观点同样遭到误解或有一定局限——包括著名历史学家提出的种种说法。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对“美国优先”做了极具代表性的描述。他解释说——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这么说过——“美国优先”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斯奈德说：“特朗普和班农（Bannon）的‘美国优先’理念从技术上讲是1940年开始的，但要是从怀旧的角度出发，可以追溯到美国在二战步入世界舞台和进入福利社会之前的那段时期。‘美国优先’运动包括了许多民粹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4]不过，虽然有许多民粹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参与了“美国优先”运动，但它的出现并不是对20世纪30年代创建的福利国家的回应，也并非代表了对20世纪30年代之前那段时期的怀旧情结。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它就已经非常流行了，它所代表的怀旧情结要比关于它的起源的反复传播、广为人知的缩略版本复杂得多。

到1940年，“美国优先”已经在美国政治叙事中纠缠了数十年。查尔斯·林德伯格和1940年的美国优先委员会并不是“美国优先”这个故事的开始——他们应该代表了它的终结，直至唐纳德·特朗普将其复苏。

美国梦也没有死——我们只是不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醒醒吧，美国：“美国优先”和“美国梦”交织的历史》讲述了这两个意味深长的短语的历史，它颠覆了我们对这两个短语的认知，甚至是对美国本身的认识。

事实证明，在一个正在寻找出路的国家里，“美国优先”和“美国梦”始终相互关联，相互竞争。作为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国家，或许有必要对这两个短语再次提出质疑。

历史很少在我们以为它开始的时候开始，也似乎永远不会在我们认为它应该结束的时候结束。它往往也不会照我们的猜想来说话。

“美国梦”和“美国优先”这两个短语是在近一个世纪前诞生的，并迅速被资本主义、民主和种族问题纠缠，这三种命运总是左右着美国的宿命。

沿袭的观点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装满骰子，操纵对话。如果摆在台面上的是国家价值观，而我们的语言模糊了这些价值观的重要事实时，风险就会格外大。回溯原始资料可以推翻那些常见的认知，暴露我们所说的历史和它实际所说的内容之间的差距。

《醒醒吧，美国：“美国优先”和“美国梦”交织的历史》提供了关于这两种表达的全国性辩论的谱系，其中大部分已经被人们遗忘。这两种说法——神话和事实——的演变，以人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塑造了现实。如果我们不理解其语境，就无法理解自己喊出的口号的潜台词；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所复兴或延续的表述的历史意涵，就有可能误读我们自己所处的时刻。不在狗哨^[5]的覆盖范围内，我们听不见它传来的声响。

短语可以形成关联链，即思维凭直觉甚至是无意识地遵循的概念路径，就像一个词或一个想法似乎会自然地引向另一个词或想法。这些关联链有助于定义政治和社会现实，只有通过追踪这些词，了解人们如何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从一个词跳到另一个词，我们才能理解这些观念是如何演化的。

再举一个例子，罗纳德·里根经常引用“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这个表述，借此来宣称美国是一个光辉的理想，值得全世界效仿。这个说法带有浓厚的冷战色彩，基本上与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在1630年布道时创造“山巅之城”的想法完全相悖。

温斯罗普在使用“山巅之城”这个表述时，并不是在暗示这个国家会成为一座光辉的灯塔。相反，它暗喻的是一个人人都能看到和评判的地方：美国实验的独特性意味着全世界都会予以关注。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将成为“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因此如果在我们所做之事上对上帝虚妄，并使他撤回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将成为全世界的谈资和笑柄。我们将使敌人开口说毁谤上帝道路的话语。我们将使上帝许多可敬的仆人心怀惭愧，使他们的祷告化为对我们的诅咒，直至我们离开正前往的美好土地。

可以把“山巅之城”理解为“金鱼缸”：温斯罗普敦促美国人努力追求道德卓越，因为全世界都将评判这个实验的结果。温斯罗普在“山巅之城”布道中所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已受万众瞩目，不能失败。倘若一败涂地，我们必将成为世人的笑柄、天下的丑闻。”这不是自我恭维，而是自我示警。

我们需要能够区分警钟和胜利的钟声。与温斯罗普相比，里根的演讲就像一条在人们的注视下，盲目地往玻璃上冲撞的金鱼。思想的退化对我们的社会至关重要：任何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都应该关注民间话语的现状——可以说是斯文扫地、乌烟瘴气。里根的“山巅之城”成了对美国例外论大而化之的扭曲说法。不能说正因为美国的公民心怀梦想，甚至因为这些梦想有时会成真，这个国家就那么独一无二。这个道理对所有人皆是如此。作为一个致力于帮助人们实现这些

梦想的地方，它理应与众不同——但这个国家的梦想也理应与众不同。

美国梦和美国优先也同样被误解和扭曲。“美国梦”——它远不是认可个人发展的简单意愿——曾发出原则性的呼吁，主张更慷慨的生活方式。而“美国优先”不仅仅是对罗斯福创建福利国家的暂时抵制。这句话中所蕴含的民族主义对许多美国人对其国家的认知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而它与对美国法西斯主义的担忧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始于1940年。

1941年，一位名叫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的美国记者写了一篇关于查尔斯·林德伯格的文章，在当时（如今再次）林德伯格成为美国优先理念最著名的化身。汤普森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法西斯主义兴起时被派驻到欧洲工作。

只有在人们未能记起这可能是一种政治策略时，林德伯格的行为才会令人困惑。如果有人认为林德伯格是在有意识地搅得人们一头雾水，那么他的行为就符合这种模式。林德伯格的行为确实符合一种模式——一种我们极为熟悉的模式。这便是阿道夫·希特勒设计的革命政治模式。林德伯格的手腕，他的整个竞选活动压根就不新鲜。这一切以前都有过。只要研究过那些致力于构建社会新秩序的煽动家的崛起之路，你就会知道，林德伯格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我完全相信林德伯格是亲纳粹的；林德伯格讨厌当今的民主制度；林德伯格打算重塑这一体系，一跃成为美国的救星；林德伯格打算成为美国总统，在他身后是一个贯彻纳粹路线的新政党。[\[6\]](#)

汤普森在1941年的讲话与今时今日我们的政治形势之间的相似之处，似乎只是一个巧合。但是，乍一看貌似纯属历史巧合的东西，可能只是我们尚未发现的一种模式。

对于当下，我们都有许多急迫的问题想问，但答案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多，也要更出乎意料。了解这两个充满争议的表述背后的故事，也许有助于理解今天我们为何面临着这些问题——甚至，也许还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思路。

冷战结束后，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众人甚至称这是“历史的终结”。许多人对21世纪前几年世界各地威权民族主义的突然崛起深感震惊，尤其是在美国，它喜欢宣称“这不可能在这里发生”。但是当然可能——而且已经出现。在美国，自由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一直存在张力。

可以公允地说，在美国，以“美国梦”为代表的观点和以“美国优先”为代表的观点长期争执不下。20世纪上半叶，关于国家价值体系的争论非常激烈，这两种表述开始表达对立的观点。大家恐怕总想称其为一场关于国家灵魂的战役，只是这么说难免显得落入俗套。因此，我们不妨把它称为一场道德经济之战，甚至是一场关乎国家未来的战争，这场战斗仍在进行中。

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到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休伊·朗（Huey Long），美国历史上民粹主义煽动者的势力一直显著且强大，如今这股势力已将唐纳德·特朗普纳入其中。美国保守民粹主义的爆发并不鲜见。在这个国家，神权宗教权力常常攫取政治权力，三K党周期性地实施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政策，麦卡锡和他的政治迫害势力生根发芽，美国远未能幸免于本土的威权主义。

正如这个故事所展示的那样，美国的反动民粹主义在历史上一直对抗着同样的敌人——城市精英、移民、自由主义者、进步人士和有组织的劳工；支持着同样的信仰——福音派新教、传统的“家庭价值

观”和白人至上主义。特朗普再次让美国人直面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始终反对所谓的“外国人”或“非美国人”群体。这种民粹主义一直吸引着煽动者和威权主义者。

因此，本书的主角不是人物或历史事件，而是这两种表述——美国优先和美国梦。20世纪上半叶，它们频频见于地方性和全国性报纸、杂志、书籍，以及在全国各地流传的演讲。

故事开始于100年前，上一个镀金时代即将结束。1865年内战的结束标志着美国现代化的到来，金融资本主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改变了美国人生理和心理的新工业技术开始出现。现代美国的力量建立在奴隶制的废墟之上；被称为“巨富阶层”的战后一代为美国注入了活力，激发了它的欲望，并开始颂扬美国人生活中永恒的唯利主义精神。

本书援引的大部分文字，其作者都诞生于这个年代，镀金时代被进步时代取代，此时纯粹而恣意的贪婪正成为美国的世俗宗教。

我只引用了少数的“重要”作家，包括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和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他们有关“美国梦”的小说对理解和传播这一表述至关重要。倘使我有意将他们排除在本书之外，恐怕会扭曲这则故事。[\[7\]](#)

然而，本书中的大部分声音并不是出自著名的权威人士之口。它们是普通公民在当地报纸上发表的匿名的、被人遗忘的言论。没错，当中不少是政治人物、报纸编辑——间或还会有报社老板——也有影

响力较小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其中许多人虽然在他们那个时代很有名，不过现在几乎都被遗忘了。但也有牧师、教授、商人、校长、家庭主妇、优秀毕业生、乡村集市和社交午餐会上的演讲者，来自各行各业、遍布全国各地的美国人，他们在为这些新兴思想发声，而当地报纸亦认为记录并与周围的社群分享这些思想，是恰如其分之事。他们中既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有白人也有黑人，有基督徒也有犹太人，有男性也有女性，有在外国出生也有本土主义者。这些声音还表明，当年对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美国人意义重大的这些表述，与大多数美国人今天所认为的意义大不相同。

在一个关于国家思想起源的故事中，文字很重要——尤其是因为它们修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自己的政治现实。此外，坦率地说，在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美国人当中，许多人要比我们更有思想和见识。他们常常敏锐地意识到辩论中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当谈到美国梦时，他们倾向于论及一个比我们所说的更丰富、更有质感、更广阔的梦想；当提到美国优先时，他们所说的远不止一个反犹飞行员对希特勒的暗中支持。

虽然美国国家政治动荡而复杂的历史是本书的背景，但我在此书中将主要援引原始文献，以试图抵制沿袭的观点。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细微的差别在传播中渐渐丧失殆尽；回归最初的文献，令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自己原以为知道的东西。

此外，传统的“历史叙事”免不了要暗示冲突和争论已经成为过去。但本书中讲述的斗争仍在进行，并没有结束，而这些被遗忘的观点和评论可能会向我们展示一种对抗的不同的方式。这些并不是遥远文化的决斗——这些是被继承和传播但没有为人们真正理解的传统。

这种方法的一个好处是，它提醒我们注意到美国政治话语在20世纪上半叶和21世纪上半叶的核心区别。100年前，美国人从统一的来源

中获取事实：先是报纸，然后是广播和新闻影片（这段历史在电视出现之前就结束了）。当然，他们对这些事实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但对事实并没有争议。这意味着在高度分散化、党派化、市场化的新媒体出现后，人们对政治现实有可能取得比当前更多的共识。我们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事实和新闻本身不断受到来自美国政府和媒体界最高层的质疑。正如大多数人认识到的那样，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人们常说，美国梦摆在那里，为的是走出现实的噩梦。美国社会就像一张彩票，每个人都玩，没有人能赢。我们非常清楚这个梦——既有它的保证，也有它的背叛——所以我们把它当成了能得到的唯一的意义，以为这些不断降格的承诺是美国梦的全部意义所在。而“美国优先”被视为一个突如其来的反常现象，一种法西斯幽灵的反常回归，在美国加入对抗希特勒的战斗之前，这个幽灵曾在美国历史上短暂潜伏了几个月。事实证明我们在这两方面都错了。

文化记忆的丧失是一种死亡，因为文化是由记忆维系的。我们不必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意义的狭隘理解。这是另一个版本，由过去的声音讲述。

[1] Peggy Noonan, “What’s Become of the American Dream?” *Wall Street*, 6 April 2017.

[2] Carol Graham, “Is the American Dream Really Dead?” *Guardian*, 20 July 2017.

[3] Robert J. Shill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 ” *New York Times*, 4 August 2017.

[4] “Taking Bad Ideas Seriously: How to Read Hitler and Ilyin?” Timothy Snyder interview, *Eurozine*, 28 August 2017.

[5] dog-whistle, 原指唤狗的高音哨子, 人类无法听闻其声, 用于政治术语中, 指在看似面向普通人的一般信息中加入针对特殊人群的隐性信息。——译者注 (本书的脚注均为译者注)

[6] Dorothy Thompson, “What Lindbergh Really Wants,” *Look*, 18 December 1941, pp13-14; original emphasis.

[7] 人们认为女性和有色人种不曾写过关于美国梦的小说, 因为他们的故事从来不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

序

优先，美国优先

1927年5月30日，星期一，天气凉爽，预报有阵雨，纽约人聚集在城市各处参加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距离欧洲大战——美国极不情愿地被卷入——结束仅仅过去了九年时间，欧洲突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10天前，查尔斯·林德伯格驾驶着“圣路易斯精神”号（Spirit of St. Louis）完成了穿越大西洋的首次单人飞行，到现在庆祝还没有停歇。根据英国各大报纸的头版报道，“幸运林德伯格”在伦敦，所到之处万众瞩目，受到15万名群众的热烈欢迎。而在美国，民众也在传诵着这位最新的民族英雄的事迹。但那天在纽约，人们聚集起来为的是不同的目的。

上午8点左右，一群住在布朗克斯区的意大利移民乘坐高架列车前往曼哈顿参加游行。但他们并不是去向那些为国献身的美国士兵致敬。他们是墨索里尼的支持者，计划加入400名美国法西斯分子的行列，这群人正在参加曼哈顿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这是在美国的法西斯正式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应游行组织者的邀请前来，这引起了许多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愤慨，其中包括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威胁称，如果不取消邀请，就会诉诸暴力。但邀请并未被撤回。

和所有打算在那天游行的法西斯主义者一样，约瑟夫·卡利斯（Joseph Carisi）穿着黑衬衫制服、马裤和运动皮靴，戴一顶黑帽子，手里拿着一根钢头马鞭。在他停下来买报纸时，卡利斯突然遭到两名男子攻击，脖子被捅，就这样死在了人行道上。另一名法西斯分子尼古拉斯·阿莫罗索（Nicholas Amoroso）当时在一路狂奔，可能是想追赶自己的组织，也可能是为了逃离杀手（报道不尽相同），他中了四枪，其中一枪正中心脏。据报道，这两名被杀的男子中，一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军队服役，另一人则在意大利军队服役。^[1]

他们本打算参加的游行，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照常进行。这是一个由数百人组成的法西斯代表团，由警察守卫以“避免混乱”^[2]。游行结束后，美国“黑衫军”回到位于时报广场中心的总部。在那里，另一个站在外面的法西斯分子被三人袭击。他拿着一根马鞭自卫，而他的“黑衫军”伙伴挥舞着棍棒和鞭子，在从戏院中涌出的人群里追赶袭击者，报道称“在黑衫军暴民冲散人群”时，袭击者趁乱逃脱。^[3]据《纽约时报》报道，100名法西斯分子冲向袭击者；随后的“混战”很快被警方驱散。

布鲁克林也发生了暴力事件，法西斯游行队伍从位于布什维克街区特劳特曼街274号的安吉洛·里扎法西斯联盟（Angelo Rizza Fascista League）出发。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当时有“几百人”游行，“其中有四五十人穿着黑衬衫”。支持者和抗议者在人行道上发生冲突，一名反法西斯分子躺在地上，背部被刺。他活了下来，并指认一名法西斯分子是攻击他的人。在30名防暴警察的陪同下，游行队伍穿过布鲁克林，在威尔逊大道站（Wilson Avenue station）停了下来，法西斯分子在这里立正敬礼。他们一直游行到罗马天主教堂，牧师在巨幅美国和意大利国旗下为他们祝福，而警察仍在维持治安。

然而，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皇后区，它的中心是另一个右翼团体，该团体的成员不是意大利裔美国人，而是自称“百分百美国人”的那类人。

12年前，三K党在佐治亚州死灰复燃，到1927年已经遍布美国。第一个三K党组织是在南北战争刚结束时成立的，当时田纳西州的前南方邦联士兵创建了一个秘密组织，宣扬白人至上主义，并在重建时期恐吓南方刚刚解放的奴隶（Ku Klux这个名字据信源自希腊语

“kuklos”，意为“圈子”，而“klan”则是指忠诚于神秘的凯尔特血统，据说这一血统是南方白人共有的）。在一二十年的时间里，第一代三K党被执法部门成功镇压，并在世纪之交消亡。但是在1915年，它在佐治亚州复兴，到20世纪20年代初，第二代三K党在美国取得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不仅在南方，而且遍及全国。

1927年时，三K党在纽约和长岛都表现活跃，他们甚至在不同的时期试图为自己喜欢的口号申请版权保护。那一年，三K党“呼吁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即它率先宣布了百分百‘美国主义’和‘美国优先’计划”。^[4]事实上，他们并不是首批采纳这些说法的人，正如本书将要展现的那样：在1927年，这两个短语已经问世100余年。

但在忙着将仇恨口号纳入版权保护的三K党看来，“美国优先”属于他们，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他们中有约1000人聚集在皇后区游行，其中许多人身着白色长袍，戴白色兜帽。陪同他们的是400名妇女，她们来自所谓的“克拉瓦纳”（Klavana，三K党的“女性分支”）。据报道，那天皇后区有2万名围观的群众，其中一些人反对三K党到场，其他人则捍卫其游行的权利。混战爆发了，继而发展为骚乱。“女人和女人打，围观群众和警察与三K党的男性成员打，由着自己的性子扭作一团。”最初的报道称，三K党旗帜被撕成碎片，“他们中的五人”被捕，还有一些人参与了混战。^[5]

尽管皇后区的警方事先收到了对三K党严阵以待的指示，但“在四英里的游行中，三K党人有四次完全脱离了警方管制，得意扬扬地冲向围观的人群，而且除了几个人的长袍和兜帽被扯烂、五人被拘留外，几乎毫发无伤。”^[6]

警察局局长宣布，美国法西斯分子和三K党一开始就不应该被允许游行。他还表示：“参与皇后区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骚乱的三K党成员‘显然辜负了警方的信任’。无论是三K党还是法西斯分子，都应被禁止参加纪念美国阵亡士兵的游行。”^[7]不到一周，纽约就禁止“身穿白色长袍的三K党”或“身穿黑色衬衣的法西斯分子”出现在任何公共场所。^[8]



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纽约皇后区，1927年5月31日

暴乱发生后，纽约地区的公众不止一次表达了对三K党的支持。一名长岛居民抱怨说，“警方对这一可耻的事件负有严重责任”，并称他们对冲突的“干预”是“可憎的暴行”。“三K党完全有权游行，感谢上帝，他们行使了这一权利。”^[9]不止一份当地报道暗示，三K党才是受害方：纽约州北部一份报纸发表社论称，三K党男女成员“经受了袭击的考验”，而“警方无力阻止”。“很多三K党成员的长袍被撕碎，很多游行被投掷物砸中。”^[10]

与此同时，三K党指责警方是天主教徒。在一份以“纽约市罗马天主教警察袭击美国人”为标题的通告中，三K党抗议称“土生土长的美国新教徒”在“自己出生的国度行使权利时遭到棍棒和拳脚的殴打”。他们把自己描述为警察暴行的受害者，并补充说：“我们指控罗马天主教警察部队蓄意引发了一场骚乱”，殴打“手无寸铁美国人，在难堪的环境下，我们仍然表现出绅士风度”。在第二代三K党看来，天主教徒不可能是忠诚的美国人，因为他们对教皇的忠诚度更高。

暴乱发生后的几天里，《纽约时报》披露了在皇后区被捕的七名男子的姓名。其中五人被确认是游行队伍中“公开承认的三K党成员”^[11]，因“拒绝按警方要求解散”而被捕。第六个人被警方错抓：他的脚遭到一辆汽车碾压，随即获得释放。第七个人是一名20岁的德裔美国人，媒体没有确认他为三K党成员。报道只说他被逮捕、传讯并获释。^[12]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在那里，但他似乎不愿离开。他的名字叫弗雷德·C. 特朗普（Fred C. Trump）。

这个名字在当时毫无意义。

^[1] *Tribune*, Seymour, IN, 31 May 1927.

^[2] *Los Angeles Times*, 31 May 1927.

[3] *Los Angeles Times*, 31 May 1927.

[4] *Ithaca Journal-News*, Ithaca, NY, 3 November 1927.

[5] *New York Times*, 31 May 1927.

[6] *Brooklyn Daily Eagle*, 31 May 1927.

[7] *Philadelphia Inquirer*, 1 June 1927.

[8] *Brooklyn Daily Eagle*, 4 June 1927.

[9] *Brooklyn Daily Eagle*, 9 June 1927.

[10] *Daily Messenger*, Canandaigua, NY, 31 May 1927.

[11] *Brooklyn Daily Eagle*, 31 May 1927.

[12] 并非所有报道都提到了弗雷德·C. 特朗普，部分报道只确定了六名被捕者：五名“公开承认的三K党成员”和一名不幸被碾压的男子（*Brooklyn Daily Eagle*, 31 May 1927）。然而，《纽约时报》查明在“近乎暴乱的游行”中有七名男子被捕，他们在牙买加社区法院受到传讯，其中包括“住址为牙买加德文郡路175-24号的弗雷德·C. 特朗普”。*New York Times*, 1 June 1927。

第一部分 1900~1920年

1 美国梦 1900~1916年：美国梦的精神

小心心怀怨恨的千万富豪，因为他们会毁了美国梦。

简而言之，这就是1900年《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一篇文章发出的警告。文章提醒读者，“不满的千万富翁”构成了“每个共和国”面临的“最大风险”。问题是，千万富翁“很少（如果有的话）满足于平等的地位”。但是，如果富人受到的待遇与其他美国人不同，“那将是美国梦的终结”。[\[1\]](#)

这篇文章在全国各地的地方报纸上广为转载。文章认为，千万富翁坚持享有特权、制定他们自己的规则，要求被视为精英阶层。它还说，以前所有的共和国都“被富人推翻了”，而美国似乎有很多人打算破坏民主而不承担后果，“嘲弄宪法，不受行政部门或公共舆论的谴责”。[\[2\]](#)

事实上，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创办的《纽约邮报》上这篇被人们淡忘的社论，看来是“美国梦”一词在我们能够认可的语境中最早用例之一。它没有假设千万富翁是美国梦的体现。相反，它认为，他们对共和国赖以建立的平等基础缺乏信仰，这将摧毁美国梦。

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恐怕都持相反的观点：千万富翁证明了美国梦的成功。但在1900年，《纽约邮报》的社论作者断言，每个人都会认同平等是“美国梦”，而财富会戕害这个梦想。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到堪萨斯州的加利纳，再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鲁斯，各地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表明他们接受这种观点。

大约1900年以前，在美国文化对话中，几乎看不到“美国梦”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任何一种集体的、普适的国家理想，更不用说经济理想了。

这个短语没有出现在美国历史上的任何建国文献中——它没有出现在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的全集中，也没有出现在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Hector St. John Crèvecoeur）和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这两位伟大的、早期生活美国的法国观察家的著作中。这个短语在19世纪美国主要小说家的作品中都无处可觅，比如华盛顿·欧文

（Washington Irving）、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或马克·吐温（Mark Twain）。甚至在一些按理说来更加感性的小说作品里，也没有出现这个短语，比方说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甚至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尽管他关于“白手起家”的小说经常被拿来作为美国梦的例证。它也没有出现在政治话语、报纸或公共记录中任何显要的位置上。

报纸文章或历史文献中提到的是特定的、具体的美国梦：海军霸权的美国梦或大陆扩张的美国梦（1877年，一份纽约报纸给出了很有帮助的解释，称这个梦“源于一种社会和政治优越感”）。^[3]新奥尔良的一份报纸报道说，人们对休闲运动新产生的兴趣标志着“美国梦

精神”的改变。^[4]1880年，当初拿破仑迫于压力一度想要逃亡美国的故事被美国各地报纸文章转载，标题为《拿破仑的美国梦》。^[5]

曾经有过改造中国的美国梦。^[6]在菲律宾有（令人惊讶的）“帝国杂种美国梦”，也有在半球旅行或征服对手的“泛美梦”。^[7]到1906年，“在古巴建立共和国的美国梦似乎宣告终结”。^[8]读者在1916年听到一种说法：“美国梦就是让墨西哥落入美国人手中。”^[9]一直到1922年，还有媒体称“穿过安纳托利亚的铁路项目就是美国梦”。^[10]

这些美国梦中的大多数值得注意，主要是因为它们与美国的生活、美国的价值观或美国的意义几乎没有关系。这个表述通常指的是帝国的梦想——但它始终是关于美国可能会从事何种行动的独特的、个别的梦想，而不是关于美国可能是什么或者意味着什么的集体意识。

在这个短语见诸报纸文章的前几年里，只有少数几次说的是“这个”（the）美国梦，而非“一个”（an）美国梦，因为可供选择的梦想对象太多了。而在提起“这个”美国梦的时候，其上下文几乎总是清楚地表明，这个短语完全没有被用来代表任何有关个人愿望或经济机会的事情。但这些都是今天这个短语的普遍含义，没人想到它可能用来指代其他任何事物。

当然，个人对富饶的追求、白手起家、各种成功故事，这些都是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理想，19世纪下半叶霍雷肖·阿尔杰关于穷孩子成长为中产阶级的一系列作品大受欢迎，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所谓的“阿尔杰精神”（Alger ethic）即白手起家、任人唯贤、自力更生的价值观与任何冠以“美国梦”名目的事物联系起来，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11]

相反，历史文献中曾提到代议制民主下的美国自由梦，自治的美国梦^[12]，或者是诗人骚塞（Southey）和柯勒律治（Coleridge）乌托邦式的美国梦。“美国梦”这一短语最早的版本倾向于用来描述制宪者的政治梦想，即自由、正义和平等的梦想。

美国的问题一直是如何协调这三者。自由与正义和平等存在冲突：个人追求财富或权力的自由很容易就会侵犯到社会正义和民主平等的原则。摩擦依然存在，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美国梦”将会调转方向。今天，这个短语专指个人对财富的追求，而当它最初悄悄进入美国的政治话语时，是用来代表正义和平等的社会梦想，反对个人的抱负和个人成功的梦想。

在美国历史的早期，这个国家的政治梦想也被称为“美国信条”，即广泛融合自由、民主、个人机会、平等和正义的信仰体系。考虑到这些原则经常发生冲突，问题不仅是如何协调这些原则，还包括如何平衡一种明确陈述的价值观与美国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后者会时常暗地里背离这些理想。

早在1845年，《纽约邮报》的另一篇社论广为流传，它反对名为“本土主义”的新政治运动，称其违背了美国主义和美国信条。文章写道：“真正的‘美国主义’（如果我们能用这个词的话）的伟大原则在于，美德造就人。”这是因为，评判人们的标准永远不应是“纯粹偶然”的区别，而只应是其个人的特质，任何形式的本土主义都是“可鄙的”偏执，它基于“低级而狭隘的偏见——即出生偏见；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宣称将摒弃这种偏见”。

为了将政治职能局限于本土出生的美国公民身份，为了建立与生俱来的贵族，甚至是政治贵族，令出生这种偶然事件成为获得政治权利的条件，他们付出了多少努力。这是美国主义吗？那些想要将这些装扮成美国主义的堕落的美国

人，你们不觉得丢脸吗！对美国信条不忠诚，谈何有一颗美国人的心。[\[13\]](#)

作为一个概念，美国主义在铭记其信条或拥有一颗美国心方面，显然不可能有长足的进步。但许多相信立宪者（至少在理论上）建立了一个包容各方的政体的美国人，会继续发出原则性的呼吁，主张宽容、正义和平等。这关系到现代美国的特性，无论它是由部落忠诚还是由宪法原则塑造的。

“美国梦”用于表达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一种类似于美国信条的旧观念——我能找到的最早的例子是在1895年，当时芝加哥举行了一场庆祝尤利西斯·S. 格兰特（Ulysses S. Grant）诞辰73周年的活动。庆典包括一个（相当长的）纪念演说，感谢格兰特无论是在内战中身为将军还是在内战之后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捍卫联邦统一。这位演讲人一度将他的泛泛而谈转向了格兰特所拯救的国家的品格：

哦，批评家和愤世嫉俗者，梦想家和怀疑者，看看美国吧，这一天，她站在了她的历史和她的英雄面前。看看她数以百万的人民，她自由的制度，她平等的法律，她慷慨的机会，她的校舍和她的教堂；你们看到了不幸和缺陷，因为美国梦还没有完全实现；你们定将看到她在实现自己的理念方面取得巨大的进步。[\[14\]](#)

未实现的梦想、未兑现的理念，其本质并不确定，被人们照单全收，但人们假定它代表了一种共同的价值。演讲人呼吁的国家理念显然不仅限于经济成功或社会向上流动：这是一场关于美国民主理想的演讲，“慷慨的机会”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与制度自由、宗教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教育普及并列。

当“美国梦”被用于指代经济繁荣的背景时，这个表达通常暗示财富的积累是“非美国的”，美国梦反对经济不平等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1899年，《布鲁克林每日鹰报》（*Brooklyn Daily Eagle*）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佛蒙特州的一位地主决定建造一座占地4000英亩、拥有60个房间的庄园，这将使它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庄园。记者抗议说：“直到几年前，在任何一个佛蒙特人看来，拥有这样一处房产都是一个疯狂的、全然非美国式的梦想。”佛蒙特州一直是“一个几近理想的民主平等的州，人人都有工作，没有人忍饥挨饿”。[\[15\]](#)

如果财富的集中是一种“非美国式的梦想”，那么维护美国梦就意味着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抵制个人成功。这个愿景看起来更像是社会民主而非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且这一愿景贯穿于使用“美国梦”这一表述的早期阶段。

1908年，堪萨斯州一家报纸发表社论，问道：为什么一个棒球投手的收入是一个移民安置服务人员薪水的20倍？为什么一家保险公司总裁比一个校长的收入高那么多？“为什么这个世界把财富分给了那些只会赚钱的人，却让那些教我们如何创造美好生活的人节衣缩食？为什么我们把放债的人推到最高的地位，把最出色的教师置于最低微的位置？”错误的标准使人误入歧途，但是“谢天谢地，美国梦的精神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国家开始不再仅仅关注“物质的东西”。

“解决了财富生产问题后”，“现在我们必须结束这种局面”！这篇来自美国腹地的社论说，美国面临比赚钱更重大的问题。是时候实现“财富公平分配”了。[\[16\]](#)

太多美国人一直梦想着物质财富，所以媒体专门发表社论来赞许美国梦的精神的改变；毫无疑问，美国人始终把精力放在获得物质上，但“美国梦”的理念并非一种激励，而是一种矫正。美国人的个

人梦想需要得到改善，才能配得上平等和正义的国家理想，否则有害的不平等将摧毁美国的民主梦想。

它是“进步时代”（约1890~1920年）的核心，以劳资冲突和一系列经济改革尝试（大多受挫），回应了镀金时代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衰退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骚乱随之而来。干旱正在肆虐上中西部地区：19世纪90年代的严重干旱，预示着40年后即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臭名昭著的沙尘暴。垄断资本主义对美国的控制愈发强大，国会因此在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在规范大公司对普通美国人以及政府所施加的权力方面，这是第一部主要的联邦法律。1893年，一场金融恐慌引发了全国对建立联邦救助计划的争论，美国至今未施行该计划。同年，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谴责政府的“家长式作风”，并告诉国民，“虽然人民在支持他们的政府时，会充满爱国热忱，出于自愿，但政府的职能不包括支持人民”。[\[17\]](#)

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于1900年当选总统，他以自由市场之名承诺创造更进步的平台，“限制托拉斯”——大型国内企业巩固工业力量，使小企业无法参与竞争，这被视为侵蚀了中产阶级的基础。在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富人越来越富有，穷人越来越贫穷，尽管中产阶级在不断壮大。

国内的讨论与工业强盗大亨和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状况高度契合。在西奥多·罗斯福宣布参选前几个月，广受好评的著作《为人民的城市》（*The City for The People*）提出：

100年前，这里的财富分配相当平均。现在一半的人几乎一无所有；1/8的人占据7/8的财富；1%的人口拥有50%的财富，1%中的一半拥有20%的财富，这是按照伙伴关系和兄弟情谊原则他们所应享有的公平份额的4000倍。100年前，这个国家没有百万富翁。现在，我们有4000多个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其中一个身价超过2亿美元，他的财富增加到10亿美元也只是时间问题。[\[18\]](#)

书中称，垄断从根本上反对社会公益。“传播乃是文明的理想，需要传播财富和权力、智慧、文化和良知。”但美国不是去传播，而是创造了“财富的私人垄断、政府的私人垄断、教育的私人垄断，甚至是道德的私人垄断以及生产条件的私人垄断”。[\[19\]](#)明尼苏达州德卢斯的《劳工界》（*The Labor World*）抗议说：“1%的家庭拥有的财富比其余99%的家庭都多，这真是蔚为奇观！”[\[20\]](#)

如今，在关于经济不平等的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1%”的象征，和与之相随的“美国梦”一样，脱胎于一个世纪前。不同的是，100年前许多人认为亿万富翁太不美国了。

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作为一种俗语开始的地方——在进步时代，人们用它来抗议不平等。几十年来，这个表述在零散地用于表达美国特定的主权或征服梦想，终于开始融合成一种越来越统一的方式，用来提醒美国人一个关于机会均等的共同理想——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个人成功的美国梦。但对他们来说，美国机会均等的梦想只能通过遏制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和保护集体平等来实现。

当他们提起美国梦时，这是一种道德不安的迹象，而非必胜的信念，折射出对美国正在迷失方向的恐惧。这句话是一个警示，提醒美国人要看看他们脚下的基础，不要走向个体发展的含糊不清的梦想，而是回归共同的建国价值观。

美国人的态度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改变，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财富不再是一种容易追求的美德，它已经成为对美国社会的一种考验。

很快就连《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也注意到，尽管汉密尔顿的联邦主义所平衡的“松散的个人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主义的主要内容”，但不断变化的环境“引发了一种改变，这种改变超越了美国梦的精神”。“普通人”的机会越来越受限制，而“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权贵则以托拉斯、老板、铁路、工会的面目或形式出现”，这意味着“富人的所有权和工人的处境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21\]](#)

人们再次感到，“美国梦的精神”正在经历一场危险的改变，而这种变化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有关；同样，“美国梦”描述的不是财富的积累，而是这种积累对正义和平等理想带来的风险。

随着“美国梦”开始成为一种表达美国民族集体理想的流行方式，这个表述也开始用来谈论阻止富人和权贵破坏民主平等，以及相应地为全民提供经济机会。

人们通常认为，今天的美国梦是对国家繁荣与和谐的黄金时代的怀旧和回归。在那个时代，幸福的小资本家经营着一个农业和轻商业社会，专业人士和农民挣得一样多，每个人都很知足。但如果你考察一下这个短语的实际历史就会发现，这个社会总是在与不平等做斗争，它不安地认识到，个人的成功无法挽救集体的失败。

1911年，一位名叫大卫·格雷厄姆·菲利普斯（David Graham Phillips）的作家在纽约普林斯顿俱乐部外，被一位名叫菲茨休·戈

尔兹伯勒（Fitzhugh Goldsborough）的人谋杀，后者（毕业于哈佛大学）认为菲利普斯在他最近的一本书里诽谤了自己的姐姐。菲利普斯当时正在写一本名为《苏珊·雷诺克斯：她的沉浮》（*Susan Lenox: Her Fall and Rise*）的小说，在他被杀六年后此书出版，现在它主要是作为1931年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一部电影的原著小说被人记起。但书中也提供了一个较为著名的“美国梦”的早期案例，收录在《牛津英语词典》里。该词条将美国梦定义为自主权的理想，并纳入该书的一个例句：“时尚和家居杂志……已经为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做好了准备……财富上升的可能性就是普遍的美国梦和希望。”

20世纪初，由于广告的爆炸式增长、名人文化的兴起、报纸中照片的使用，以及好莱坞在美国人想象力中即将占有的主导地位，消费资本主义——包括上文提及的“时尚和家居杂志”——开始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普遍的美国梦和希望”。普通美国人可以仔细观察有钱有势的人的生活，了解各种迷人和奢华的细节。他们可以看到有钱有势的人的房子是什么样子，而不仅仅是透过灌木篱墙或石墙匆匆一瞥。读者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家具、时装、汽车和游艇。炫耀性消费以复仇的姿态出现，它以巨细无遗的方式向人们传递拥有金钱的感受。不出所料，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有钱真好。

菲利普斯让他笔下令人生厌的女主人公苏珊·雷诺克斯拥有了这样的体验：

她的阅读——小说、回忆录、旅行书籍、时尚和家居杂志——给她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印象，已经为她做好了准备，也已为成千上万身处僻静的城镇和农村的美国人做好了准备。在那些地方，奢华甚至舒适仍然非常粗糙原始，财富上升的可能性就是普适的美国梦和希望。[\[22\]](#)

但菲利普斯这部长达900多页的长篇小说的全部力量，旨在颠覆那种认为精英统治或个人自主与实现这些梦想和希望有任何关系的观点。苏珊·雷诺克斯是私生女，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镇上长大，当地的每个人都觉得，以她的出身，最适合做皮肉生意——她也只好这么去做了。在经历了无数的不幸后，她最后又回归卖淫的老本行，爱上了一位富有的剧作家。不幸的是，她的一位皮条客杀害了这位剧作家；幸运的是，剧作家把他的财产留给了她。当她得知这一消息时，“狂喜”的表情让剧作家的男仆惊诧不已，“以他浅薄、守旧的本性来看，苏珊的表情只能意味着对财富的喜悦，她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从此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享受死者的钱财”。菲利普斯提醒说，不是这样的！这些假设只不过是“……低等头脑粗浅的想象”。^[23]对苏珊来说，财富仅仅意味着摆脱贫穷和性剥削的自由。

这似乎确实是“美国梦”最早用于暗示社会向上流动的说法之一，但这只是为了驳斥“低等头脑”的“粗浅”想象。在《苏珊·雷诺克斯：她的沉浮》一书中，财富的增长也许是美国人普遍的梦想和希望，但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希望得到的东西都不那么光明高尚。此外，是否能实现这个梦想，看来纯粹是命运的偶然，而不是对品格或美德的彰显。菲利普斯虽然严厉反对奢侈的财富，但因为苏珊·雷诺克斯的皮条客杀了她富有的情人而继承了一笔横财，这恐怕很难说是对清教徒职业道德的颂扬。当然，它显然没有提出“通过努力工作、决心和主观能动性来获得成功和繁荣”的理想，而《牛津英语词典》偏偏想用《苏珊·雷诺克斯：她的沉浮》中的这段话来作为例证。

无论如何，“美国梦”继续被更多地用于讨论民主平等而非个人愿望。1912年，《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发表了一篇题为《追求正义、平等和最崇高自由的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 of Justice, Equality, and The noblest Liberty*）的文章，这里说

的美国梦绝不是大卫·格雷厄姆·菲利普斯一年前书中所写的美国梦。^[24]至少，这个短语的意思仍然是不确定和多元的。

两年后，在一位有影响力的作家的一本重要著作中，首次出现了“美国梦”。这本书用这个短语来讨论实践中的民主个人主义，有时候这位作家也被当作已知最早使用这个短语的人。^[25]这个说法不对：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它既不是最早发表的，也与如今任何人都认同的美国梦的表述不一致。但它仍然是早期的一个重要用例。

1914年，一位名叫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年轻作家着手写一本书来为进步时代把脉，并提出解决方案。当时只有25岁的李普曼刚刚从哈佛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师从伟大的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后者将李普曼与T. S. 艾略特（T. S. Eliot）列为他教授的最杰出的两位学生。李普曼雄心勃勃的处女作《趋势与主宰》（*Drift and Mastery*）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令他成为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和进步运动的重要代言人。

作为对美国社会困境诊断的一部分，李普曼提到了他所谓的“美国梦”，但它既不是如今世人熟知的个人在经济上成功的梦想，也不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的梦想。

李普曼认为，美国近期的社会和文化革命，即制造、分配、就业和利润等旧模式的转变，意味着传统的制度和理论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新的工业世界令人困惑：变化如此之快，每个人都被从前的确定性和范式抛弃。

李普曼选用了——一个惊人的比喻来描述面对大规模技术颠覆时的感觉：“我们都是工业世界中的移民，没有可以依傍的权威。我们是背井离乡的人，刚刚抵埠，怀揣着新近赚到的钱财……现代人还没有在

自己的世界里安顿下来。”^[26]这是一个新世界，但美国人仍在试图围绕旧世界组织他们的政治体系。

李普曼尤其担心，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不受约束，相信市场有能力自我调节，相信人们有能力行使理性的利己主义，只会导致他所说的“趋势”——分散的自由所造成的漫不经心和不可预测。反常的结果将比比皆是。李普曼认为社会需要一种策略，他称之为“掌控”（有时这么表述不见得正确）。他构想了一种计划经济，不过这并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在不久的将来拥护的那种计划经济。

李普曼的社会计划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平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将是实证、理性、有前瞻性且进步的，秉持的信念是分享利益和能力，与此同时控制个人获取财富的途径，因此社会化程度很高。实际上，李普曼在《趋势与主宰》一书中，主张的是社会民主，呼吁政府监管大企业以保护小企业主和工人，而不仅仅是打破垄断并假设市场自我监管。当然，政府并不一定仅局限于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也可以监管和监督企业运作，但总的目标是经济民主化。

和同时代的大多数美国进步人士一样，李普曼并不反对市场力量，但他认为，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美国都需要一种道德经济。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这是一种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政府必须确保道德体系——或者称为正义——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没有它，人类肯定会“漂移”，回归丛林法则，而这正是人类创建政府时想要杜绝的可能性。（詹姆斯·麦迪逊有句名言：“如果人类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了。”）^[27]

对李普曼来说，“美国梦”是与破坏民主的幻想裹挟在一起的，它令资本家肆意践踏普通人。但是李普曼并不是单纯指责资本家；他认为普通人也应承担责任——这就是“美国梦”的由来。李普曼认

为，纯粹的民主是一种幻象，因为它导致了危险的民粹主义及民族主义、暴民统治和独裁者的崛起。

问题是，美国人一直被幻象引入歧途。他警告说：“美国人的性格普遍倾向于一种神秘的无政府主义，在这种无政府主义中，每个人‘天生’的人性都被奉为社会的救星。”^[28]“神秘的无政府主义”——后来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取决于对普通人的智慧和正义的充分信任，以及普通人拯救一个被知识分子和伪专家拖累的国家的的能力。

对李普曼来说，这种错位的信念就是“美国梦”。

不久前，一位典型的美国改革家对我说：“只要你放手让人们自己来，他们会好好的。”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相信人性的淳朴、善良和本能的务实态度。在改革者看来，批判性的观点是不人道的。他不信任专家的出现；他相信的是，普通人可能会犯的任何错误都可归因于某种马基雅维利式的腐败。他心怀美国梦，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不守纪律的人是世上之盐^[29]。^[30]

美国梦在这里暗示了民主的危险、民主的幻象和神话。李普曼抨击的是美国人对个人主义的盲目信仰，即认为散漫、粗鄙、未受教育、自然的人是一切智慧的源泉。这个美国梦不是有抱负的幻想，而是一种具有蒙蔽性和危险性的错觉：相信国家可以在没有专业人士的情况下蓬勃发展，相信每个公民都能对万事万物拥有足够的洞察力（尤其是在信息和宣传爆炸式增长的时代），成为他后来所说的“万能公民”。

李普曼担心，人们对过去的黄金时代心怀美国梦，认为那时淳朴的人们也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而这会诱使选民追随意民粹主义煽动

者，后者告诉选民，尽管生活在工业时代，他们仍然可以回到杰斐逊式的自耕农村庄的甜美幻想中。李普曼称之为美国梦：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笔下的“穷汉理查德”那样，是无所不知的普通人，是能为国家出谋划策的农民智者。李普曼强烈反对美国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所制造的“恐惧经济”（fear economy），他认为美国“无止境进步的梦想”需要受到限制，因为它从根本上是虚幻的，是另一种美国梦。李普曼认为，这种无止境进步的梦想和“那些梦想辉煌过去的人”一样愚蠢。

李普曼对美国以“村民之国”自居的形象提出了质疑，批评了杰斐逊倡导的农业田园式的怀旧理想。为什么农村生活必然会培育出更优秀或者更睿智的人呢？这个国家需要接受改变并适应它。“那些固守乡村生活观的人可能会偏离潮流，可能会稍稍打击托拉斯，但他们永远不会主导商业，永远不会赋予机械人性化的内涵，他们将继续成为工业变革的玩物。”[\[31\]](#)

李普曼认为，美国梦是一种天真的信念，认为在不需要有教育或监管支持的情况下，民主也永远能以最纯粹的形式运作。但事实上，相信民主能够自行运转，反而会破坏民主。平等不会自然发生；它必须受到保护、规划，并让人民受到相应的教育。社会必须为防范财阀和骗子，也就是那些影响民间风气并鼓励其听众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骄傲的妄人，建立防御机制。

在接下来的20年里，“美国梦”将与这样一种认识联系在一起：无休止进步的梦想可能会像不受监管的竞争或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一样破坏社会稳定。

当然，从来都不缺乏个人进步的梦想，也很难把个人理想同财产与自主完全分离开来。美国一直代表着一种轻松致富的幻想，这种幻想常常与民主政府的政治实验相冲突。但问题不仅仅是谴责贪婪——尽管这么做无疑是值得的。无论是好是坏，财产、自由和幸福之间的联系都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建国理念的修辞结构紧密相连。

当杰斐逊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奉为不可剥夺的权利时，毫无疑问，他改变了他正在绘制的人类事件的进程。人们普遍认为，这句话改编自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宣言——“生命、自由和财产”是基本人权。但事实上，杰斐逊并没有真正改写洛克的宣言，而是将洛克在不同文章中的两句话糅合在一起。在《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洛克宣称“追求真正幸福的必要性构成自由的基础”。只有把“真实可靠的幸福”与我们误以为是真正幸福的欲望区分开来，才能完善人类的“智力禀赋”。“因此，观照我们自身，不要把幻想误当作真正的幸福，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必要基础。” [\[32\]](#)

洛克认为追求想象中的幸福形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奴役；更高的自由来自对自身的认识和自我实现。杰斐逊随后将这一理念植入了美国人的想象中——但进步不断与财产纠缠在一起。两者都与个人主义、自治和平等联系在一起。同样，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19世纪广受赞誉的自力更生的理想也是以一定程度的共同繁荣为前提。普遍的贫困并不是每个人的民主幻想，但问题是，个人繁荣的尽头在哪里，国家不平等的开端又在哪里，因为这也会破坏民主梦想。

民主必须在每个人追求财产和/或幸福的权利之间找到平衡。事实证明，要达到这种平衡很困难——迄今为止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杰斐逊持有崇高的信念，相信自由乃人类幸福的基础，但这种信念被他愿

意将他人变成财产、拿来为自己的幸福所用而戳穿了。这一点经常提到，但有必要重申。

换句话说，富人获得的奢侈之一就是能认识到金钱不是一切。这是1916年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的小说《饶舌的温迪·麦克弗森的儿子》（*Windy McPherson's Son*）给我们上的一课。小说讲述了一个平凡的寓言：一个年轻人离开艾奥瓦州的小镇去寻找发家致富的机会，但在赚够了钱后发现这一切无甚意义。

当山姆·麦克弗森（Sam McPherson）意识到追逐成功之神让他误入歧途时，他决定抛下一切，重新开始。他说：“我要撇下饥饿的银钱，凭着行为得见真理。”^[33]这便是清教徒的职业道德最纯粹的形式：为工作而工作，因为工作是一种积极的善，将带来个人的智慧。他将寻求精神上而非经济上的富足。

但下定新决心后，山姆·麦克弗森自我讥讽道：“他，一个美国千万富翁，一个赚钱赚得如日中天的人，一个实现了美国梦的人，在盛宴上败了胃口，踱出了时髦的俱乐部，手里拿着一个包，口袋里塞着一卷钞票，满脑子却想着奇怪的追求——追寻真理，追寻上帝。”^[34]在这里，“美国梦”用来描述的是一个小镇男子通过努力工作和决心，白手起家成为千万富翁的故事。但这不是一个值得歌颂的理想，而是一个遭到排斥的幻想。

这仍然令人吃惊；在霍雷肖·阿尔杰的100多部小说中，他笔下的英雄从来没有想过财富最终是否值得。但同样值得记住的是，阿尔杰的大部分故事都是以主人公从穷人上升为中产阶级人士而告终，而不是这本书中提到的如此庞大的财富。

在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同时，“美国梦”也在成长。《牛津英语词典》中写道，最早使用“白领”这个词的地区是1910年的印第安纳

州：“他追随着白领的吸引力来到这个城市，在这里得到一份工作后，他可以整个星期都做白领。”随着教育普及和工商业转型创造了更多的办公室工作岗位，白领的吸引力是切实的，对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说成为可以企及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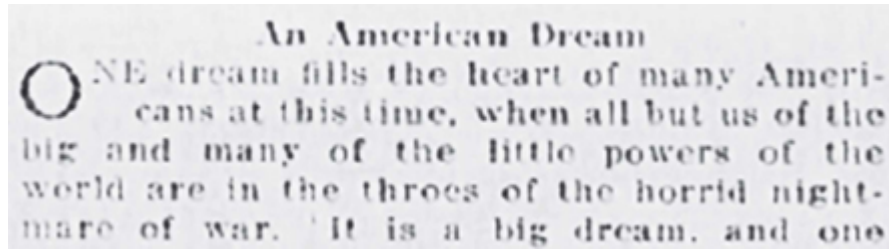
然而，就在“美国梦”与美国白领成功故事的兴起开始汇合之际，西欧冲突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尽管“美国梦”所蕴含的经济意味越来越浓厚，但仍然不乏将其用作民主自由代名词的例证。这个词仍未被固定表述为“这个”美国梦，考虑到它仍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使用，这也不足为奇。

1914年，弗吉尼亚一份报纸写的是“美国梦”。在这篇文章中，它希望美国能帮助终结“目前使欧洲陷入血海的可怕战争”。

在战争如火如荼时立下这样的宏愿，可能“看似是一个荒唐的梦”，但它充满了“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的想象力”。“愤世嫉俗者和悲观主义者没有这种想象力，因为它看起来太狂野。侵略者没有，因为他们的梦想太骇人听闻，向来与美无关。但威尔逊总统有这样的想象力。”作者断言，“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如此。如果和平到来，每个人都将分享它的荣耀；但不管它是否能实现，一切都将“因为梦想而更加美好”。^[35]暴政的前景总能激发对自由的追求。

然而，尽管弗吉尼亚这份报纸的社论抱有美好的期望，但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认为美国应该参加欧战。许多人认为美国应该保持中立，一场呼吁美国不干涉的运动很快采用了“美国优先”这一口号。

在自由的问题上，美国人从来就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在其他任何问题上也是如此。



-
- [1] *Semi-Weekly Messenger*, Wilmington, NC, 4 December 1900.
- [2] *Semi-Weekly Messenger*, Wilmington, NC, 4 December 1900.
- [3] *Brooklyn Daily Eagle*, 16 December 1877.
- [4] *New Orleans Bulletin*, 13 July 1875.
- [5] *Corvallis Gazette*, Corvallis, OR, 20 February 1880.
- [6] *Goodwin's Weekly*, Salt Lake City, UT, 9 May 1903.
- [7] “Bastard Dream” , *St. Louis Republic*, 23 September 1900;
“Pan-American Dream” , *San Francisco Call*, 12 June 1900.
- [8] *Minneapolis Journal*, 29 September 1906.
- [9] “Times-Leader” , *Evening News*, Wilkes-Barre, PA, 24 March 1916.
- [10] *Manchester Guardian*, 20 December 1922.
- [11] Cyril Ghosh, *Th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Dream: Democratic Inclus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30.
- [12] *Record-Union*, Sacramento, CA, 30 October 1899.
- [13] *New York Evening Post*, New York, 17 January 1845; original emphasis.
- [14] *Sunday Inter Ocean*, Chicago, IL, 28 April 1895.

[15] *Brooklyn Daily Eagle*, 9 October 1899.

[16] Grover Cleveland,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delivered 4 March 1893.

[17] Frank Parsons, *The City for the People, or, The Municipalization of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of Local Franchises*, Philadelphia: C. F. Taylor, 1900, p. 9.

[18] Frank Parsons, *The City for the People, or, The Municipalization of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of Local Franchises*, Philadelphia: C. F. Taylor, 1900, p. 9.

[19] *Philadelphia Times*, 22 April 1900.

[20] Duluth Labor World, Duluth, MN, 21 September 1901.

[21] *Manchester Guardian*, 29 March 1910.

[22] David Graham Phillips, *Susan Lenox: Her Fall and Rise*, Vol. I, New York: D. Appleton & Company, 1917, p. 439.

[23] David Graham Phillips, *Susan Lenox: Her Fall and Rise*, Vol. II, New York: D. Appleton & Company, 1917, p. 553.

[24] *Chicago Tribune*, 14 December 1912.

[25] 例如，在2011年一篇关于美国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艾尔斯（James E. Ayers）写道：“美国梦首次白纸黑字地为世人所知，是在1914年，记者和政治评论员沃尔特·李普曼的著作《趋势与主宰》中……从历史上看，这是这个短语首次发表。James E. Ayers, “The Colossal Vitality of His Illusion: 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Dream in 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 LSU Doctoral Dissertations, 2767, p. 20.
http://digitalcommons.lsu.edu/gradschool_dissertations/2767. 另见 John Kenneth White and Sandra L. Hanson, eds, *The Making and Persistence of the American Drea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Demetri Lallas, “‘From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to the People’: The American Dream (s) Debut”,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Vol. 37, No. 2, June 2014.

[26] Walter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 An Attempt to Diagnose the Current Unrest*, New York: Mitchell Kennerley, 1914, p. 211.

[27] Federalist No. 51, *Independent Journal*, 6 February 1788.

[28] Walter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 An Attempt to Diagnose the Current Unrest*, New York: Mitchell Kennerley, 1914, p. 177.

[29] 语出《圣经》，耶稣这样形容基督徒的高尚：“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

[30] Walter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 An Attempt to Diagnose the Current Unrest*, New York: Mitchell Kennerley, 1914, p. 177.

[31] Walter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 An Attempt to Diagnose the Current Unrest*, New York: Mitchell Kennerley, 1914, p.146.

[32]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24th edn, London: W. Baynes & Son, 1823 (1689), p. 196.

[33] Sherwood Anderson, *Windy McPherson's Son*, Book III, New York: John Lane, p. 257.

[34] Sherwood Anderson, *Windy McPherson's Son*, Book III, New York: John Lane, p. 257.

[35] *Times-Dispatch*, Richmond, VA, 20 August 1914.

2 美国优先 1900~1916年：纯美国主义 对抗全宇宙

与“美国梦”不同，“美国优先”始终是一个政治口号。这两种表述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试图确定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并在同一时刻出现在美国的历史上——正值美国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强国，并开始热诚地探讨自己应该在世界中扮演何种角色。每当美国面临如何应对20世纪每一场世界大战的紧迫问题时，人们也亟待对这两个短语做出界定，这一点并非巧合。

“美国优先”还有一点与“美国梦”相似，那就是它不是由某个人一时兴起发明的。不过，它也是由某一个人推广开来的。这个短语出现在美国的政治对话中，最早可以追溯到1884年，当时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一家报纸在一篇有关与英国进行贸易战的文章中以《美国优先，永远优先》为标题。

America First and Always.

1889年，威斯康星州的一名国会议员在一次演讲中宣称，虽然美国和德国之间没有战争的危险，但“德裔美国人对收留自己的这片土地的忠诚毋庸置疑……我们将在任何必要的时候为美国而战；美国是第一、最终和永远；不管是美国对抗德国还是对抗全世界，不管美国是对还是错，永远是美国。”[\[1\]](#)

1891年，《纽约时报》栏目《政治笔记》发表了一位署名为“吃西部野萝卜、来自华盛顿州的编辑”的评论。他说：“共和党一直信奉的理念是‘美国优先’，其次才是世界其他地方。”[\[2\]](#)共和党认同这种说法，并在1894年将这句话作为竞选口号。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

《早间新闻》（*Morning News*）描述了共和党庆祝胜利的“怪物大游行”，欢欣鼓舞的共和党选民戴着“美国优先”的徽章，纪念“从民主党的暴政中拯救国家”：“在街上看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佩戴着徽章，上书‘美国优先，世界靠后’。”[\[3\]](#)



同年，一位政治家在回应“政府为民而治”的祝酒词时表示，他“相信美国优先”，“爱国主义就是对美国优先的忠诚”。[\[4\]](#)到了1899年，一些地方报纸中零星提到了“美国优先委员会”，其官方目的尚不明确。[\[5\]](#)

到1906年，“快人一步，看到美国”已经成为新兴的美国旅游业中无处不在的口号。这个口号很容易就能打造成政治承诺，俄亥俄州一位名叫沃伦·G. 哈定（Warren G. Harding）的报业老板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14年他在竞选参议员时使用了“繁荣的美国优先”的口号，并且成功当选；时隔不久，他将会重提这句话。[\[6\]](#)

不过，直到1915年4月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发表演讲时，这个表述才成为全国性的口号。当时威尔逊宣称：“无论如何，我们目前的全部责任可以用一句口号来概括，那就是美国优先。”在这一刻，“美国优先”的口号突然流行开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欧已经持续整整一年，美国仍保持中立。尽管公众情绪强烈倾向于保护比利时等中立国免遭德国占领，但许多美国人认为，这场冲突是两个同样冷酷无情的敌人之间的帝国主义斗争。尽管人们对德皇威廉（Kaiser Wilhelm）赤裸裸的民族主义行径普遍怀有强烈敌意，但反英情绪同样强烈，足以两相抵消。当时大英帝国的太阳还没有落山，许多美国人也根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支持这个曾对其奋力抗争的国家（战争的记忆仍然刻在许多人祖父母的脑海里）。尤其是爱尔兰裔美国人，他们对效忠英国的想法出奇愤怒，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移居美国就是为了逃避英国的统治，在英国政府对1916年复活节起义做出野蛮回击后，这种情绪进一步滋长。中立还意味着美国公民可以为战争地区的受害者提供救济，美国也确实慷慨解囊。

换句话说，美国的中立并非总是出于纯粹的孤立主义；它掺杂着和平主义、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和例外论——而且广为传播。许多美国公民想要宣称美国“太骄傲，因此不可能参与战斗”，威尔逊刚好为他们提供了所要寻求的主基调。

威尔逊是民主党人，持进步主义的竞选主张。在发表“美国优先”演讲时，威尔逊已经当了三年总统，当时正着眼于一年后的连任。这句话经常被引用，不过几乎从来没有与一个世纪后它的复苏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引用时，通常脱离了威尔逊演讲的背景。细节往往是复制时的第一个牺牲品。

“我说这话不是出于自私，”威尔逊说，“当我谈到我们当前的全部责任时，无论如何都可以用这句口号来概括，那就是‘美国优先’。让我们在考虑欧洲之前先考虑美国自身，这样一来，在友谊受到考验的日子到来之时，美国或许仍然适合做欧洲的朋友”。威尔逊

主张，美国在展示友情时，最好不要对任何一方表示“同情”，而是做好“在斗争结束时帮助双方”的准备。

他坚称，中立并不意味着漠不关心或自私自利。“中立的基础是对人类的同情。它是公平的，本质上是善意的。它代表了精神和判断的公正性。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胞都能意识到这一点。”[\[7\]](#)

显然，他的所有同胞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句话很快被人简单粗暴地接受了，谁都没在意威尔逊的微妙之处——取决于你的看法，也可以说是虚伪之处。当然，在邪恶面前保持中立的决定可能是不道德的，历史将在20年内残酷地证明这一点。此时任《新共和》

（*The New Republic*）联合主编的沃尔特·李普曼极力主张美国干预战争，理由是旁观者无法影响结果的正义，也不能保护民主。

但威尔逊在1915年题为《美国优先》的演讲中还有一处值得注意——他警告人们不要被“假新闻”蒙骗。

Fake News Condemned.

威尔逊对全国人民说，越来越多的新闻“被证明是假的”，或者“它的潜台词是假的”，如果人民“信以为真，可能会打乱我们的平衡和自持”。这个国家不能让“不负责任的人发出的谣言横行。我冒昧说一句，对正义、公正和人类自由的热爱，是任何国家有史以来最宝贵的遗产，而我们是这笔遗产的托管人”，因此，美国人捍卫正义和自由的遗产，这一点至关重要。

“美国有一群自私自利的人”正试图破坏这一传统，组织“邪恶的团伙”。但威尔逊有信心，“美国之心”将始终如一，它应该置身于冲突之外，把美国放在首位。[\[8\]](#)

威尔逊明确地将“美国优先”与利己主义和漠不关心区分开来，称这篇演讲本身带有孤立主义色彩，这也未必说得通。尽管如此，他的竞选确实是以避免让美国卷入战争为基础。“美国优先”一词在问世之初，就立刻以孤立主义的名义出现。

威尔逊的一些批评者反对他在使用“美国优先”这个表述时的随意性。1915年11月，“和平与正义之友”（Friends of Peace and Justice）的主席质问威尔逊，“美国优先”实质上是什么意思，他追问道：“如果我们的总统不只是在措辞上要花招，那么‘美国优先’意味着什么？”这将意味着美国总统本应关心“众多如今陷入贫困或为了生存担惊受怕的美国人，这些人被现代金融的拦路强盗洗劫一空”。

他还说，“美国优先”只是一种伎俩，目的是挥舞旗帜，转移人们对“唯唯诺诺的政客”无耻腐败的注意力，这些政客只服务于美国“强大的金融利益”而非普通公民。^[9]“现代金融中的拦路强盗”和顺服于他们的政客建立的邪恶联盟，是“我们这个共和国整个历史上最离奇的巩固权力的阴谋”。

与此同时，美国教育部（Bureau of Education）正在发起一场“美国优先”运动，将同化主义明确列入议程。它宣称目的在于鼓励移民和新美国公民把对美国的忠诚置于对业已离开的国家的忠诚之上；但它也明确指出，没有人预期或希望移民为了接受美国的文化、语言或历史而拒绝自己原有的文化、语言或历史。关于英语是否应该成为强制性国家语言的争论爆发；在一个吸收移民的国家，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这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对许多人来说，答案是灌输美国的种族民族主义，也就是维护白人、新教徒和男性建制派的传统特权。

并非巧合的是，在大致相同的时期，有人开始用“大熔炉”作为同化的隐喻，将移民社群的融合比作将不同的金属熔化在一起以铸造新硬币——新硬币的价值和原先一样，只不过形式不同。这个短语在1889年开始使用。那年的《芝加哥论坛报》写道：“就目前而言，在我们的国家大熔炉中，凝聚而非分离种族元素的做法是可取的。最常见的‘美国人’一词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已经足够好。”^[10]

几个月后《纽约时报》补充说，美国是一个国家，“在这个神秘的熔炉中，所有的民族和种族都失去了同质性，很快就只剩下美国公民这一个身份”。^[11]六年前，埃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写下了诗作《新巨人》（*The New Colossus*）；1903年，这首诗被镌刻在自由女神像的底座上，它欢迎世界将那疲惫、困顿、被无情拒绝的芸芸众生送到美国。在接下来的10年里，“大熔炉”成为陈词滥调，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贬义词：1912年，随便翻出一篇报道，都会见到这样的标题：“欧洲的渣滓……各个种族都可以随随便便被倒进美国这个大熔炉里。”^[12]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同化和移民成为极具煽动性的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与政治孤立主义联手来。

战争加剧了紧张局势，即使是在一个表面上中立的国家，移民社群尤其是德裔、意大利裔和爱尔兰裔美国人，也被攻击为“连字符公民”^[13]，人们指责他们对美国的忠诚是不可信的，身份的分裂意味着忠诚的分裂。人们怀疑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会选择教皇而非总统，而犹太人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国中之国”的居民，“唯利是图——满脑子只有钱”，“无法融合”，“格格不入、不可同化”。^[14]1882

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试图彻底禁止中国移民，不久之后，其他亚洲移民社群也成了直接目标。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裔美国人首当其冲，受到反对“连字符公民”的排外情绪的影响。德国血统的美国人受到骚扰和迫害（作为回应，许多人给自己改了更英国化的姓氏，如同当年英国王室的做法）；德语在学校被禁。甚至德国酸菜也改名为“自由卷心菜”。

在美国各地，这种对“连字符公民”不断增长的敌意经常与“美国优先”联系在一起。例如，《纽约时报》在1915年谈到“欺辱连字符公民”的好处，那就是骚扰德裔美国公民，不准许他们在欧洲冲突中对德国产生半点所谓的同情（“欺辱”指的是自19世纪以来在中小学和大学里流行的老生捉弄新生的仪式）。《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以威尔逊总统最近对“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所做的一次演讲开始。在演讲中，他谈到了一种总体的印象：“在其他国家出生的同胞中，有相当多的人对美国理想没有给予足够的热情和热爱。”[\[15\]](#)

鉴于此种印象，总统呼吁每个美国人“表明自己的立场：究竟有没有把美国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上？”

《纽约时报》的社论衷心赞同总统的要求。文章称，但凡“配得上美国公民身份”的人，都不会反对总统的说法；文章继而支持总统所谓的“幽默”建议，认为欺辱是矫正一切“非美国习惯”的合理手段。德裔美国人从美国总统那里得到的信号是，如果没有通过任何随心所欲的忠诚度测试，就理应遭到同胞的恐吓——他们恐怕无法从这种建议中看到什么幽默感。

社论最后写道：“他们可能会留神的。如果他们还想继续生活在我们中间，在美国做生意，保持公民身份，那就别无选择。生活在不断的‘欺辱’中，活着也没多少意思。”^[16]这份全国性的报纸暗示，不得不诉诸这种做法或许令人遗憾，但以“美国优先”的名义骚扰他人是完全正当的。

地方报纸也赞扬了威尔逊的言论。堪萨斯州的一家报纸报道，他在“美国优先”的演讲中呼吁“纯美国主义”，“像开炮一样直奔主题”。“阻碍‘美国优先’的进程，就如同尝试阻挡海洋的潮汐。每个新移民都本能地知道这一点。”^[17]

“排斥连字符公民，”10天后一位专栏作家这么敦促道，“德国出生或有德国血统的公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该为这种分裂的忠诚、半心半意的忠诚以及对纯美国主义发展所受的阻碍而感到内疚。”他坚称，“所有‘外国出生的公民’都应该抓住机会，公开表明自己并不效忠于其原籍国”，并“坚定地、毫无保留地立下誓言，这就是‘美国优先’”。^[18]

“连字符公民”的歇斯底里症在短期内不会减弱，它继续与“美国优先”联系在一起。1916年，《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声称“不给连字符公民半点空间”，并愉快地报告称，两位总统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和共和党候选人、前最高法院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都在演讲中“提及将连字符公民排除在选战之外”。威尔逊再次谴责那些没有充分吸收美国精神的美国公民，至少在他们的同胞看来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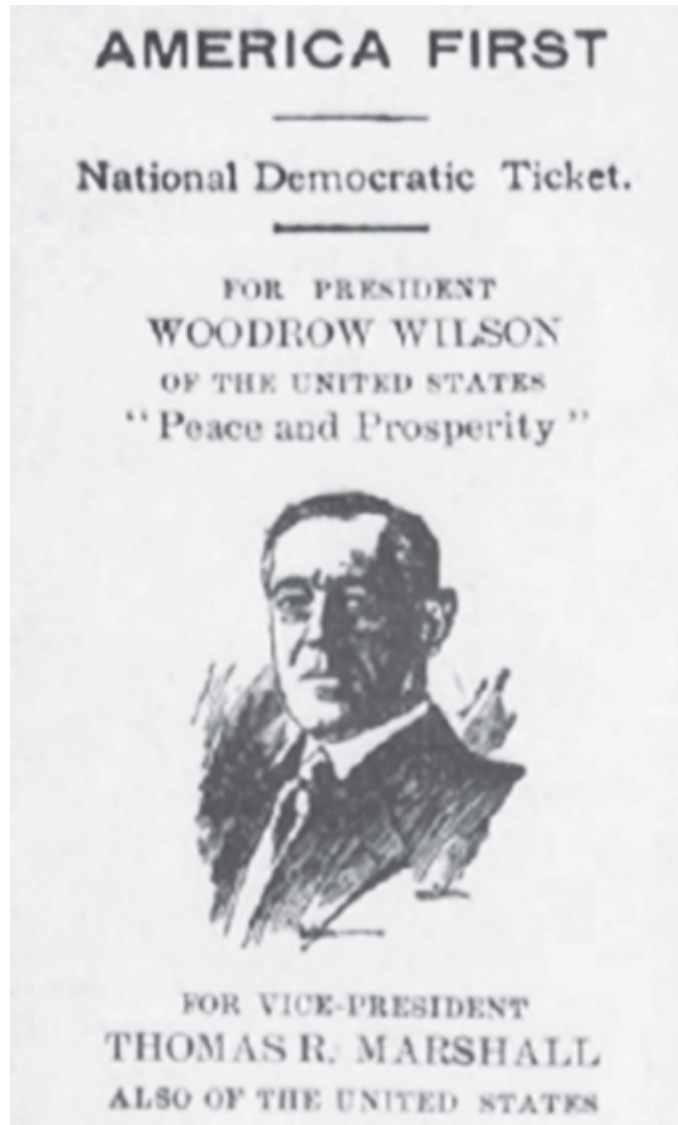
威尔逊说：“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任何没有把美国放在首位的人都不能与我们为伍。”《纽约时报》补充说，休斯的演讲内容与之大同小异，“他的态度是一种‘纯美国主义’”，因为纯粹已成为衡

量爱国主义的尺度。“连字符公民”是不纯的、掺有杂质的，以其可疑的外国方式玷污了真正的美国精神。

休斯承诺说：“任何支持我的人，都是在支持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支持彻头彻尾的美国政策。”《纽约时报》则对此给予彻头彻尾的赞美。他们警告说，任何试图“迎合连字符公民选票”的政党都将在整个东海岸惨败。两位候选人都“把连字符公民彻底排除在美国政治之外，毫无保留”。[\[19\]](#)

几个月后，一位读者问道：“我们要不要帮助和安慰不忠诚的连字符公民，要不要安慰德国人和他们的同伙？”作者进一步写道，威尔逊总统“代表美国优先，但也公平、勇敢、高尚地代表全人类”。[\[20\]](#)所有的人类，当然，不忠诚的连字符公民、德国人和他们的同伙不包括在内。

事实上，1916年，“美国优先”的政治口号在美国极其流行和强大，结果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将它作为竞选口号。休斯的口号是“美国优先，美国高效”，而威尔逊的口号是简单的“美国优先”。



“政府努力让美国远离战争，同时维护国家荣誉。”这是1916年夏天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国内纲领。而其“外交事务政纲则是全党紧密支持总统，无论国际国内的一切问题，都将依照‘美国优先’的原则解决”。[\[21\]](#)

“美国优先”的承诺有几个隐含的含义。这意味着他们将确保美国置身于欧洲冲突之外，具体到休斯，意味着他将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斯克兰顿共和党人》（*Scranton Republican*）在选举日写道：“我们向每一位选民推荐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的口号‘美国优

先，美国高效’。”文章补充说，有一个词比其他任何字眼都更能体现这一口号，“那就是保护。保护美国的劳工和企业对于保护美国市场来说势在必行”。[\[22\]](#)

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百货公司打出“纯美销售”的广告，专门销售美国制造的商品。它敦促道：“保持中立，美国优先。”[\[23\]](#)



不过，“美国优先”也强烈暗示它将承诺保护“真正的”美国人免受看上去铁定不忠诚的“连字符公民”背叛的威胁。一位参议员在演讲中表示，“对连字符公民感到遗憾，这个国家的人民无法承受两面国旗”。他批评所有站在“外国人一边的公众人物，而他们本应该首先、最终、永远站在美国一边”。[\[24\]](#)

《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在1916年10月对休斯参选表示支持，称休斯“终其职业生涯都在证明”他代表“美国优先”，“令人失望的是威尔逊先生代表的是威尔逊优先”。[\[25\]](#)在休斯于1916年10月发表演讲，表示拒绝任何“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美国之上”的人的投票后，有媒体打出了这样的标题：“休斯如是说：美国是优先，是最终，也是永远，‘连字符公民’走开。”[\[26\]](#)

休斯在演讲中宣布：“我是一个美国人，跟外国绝无半点纠葛。”这是一份深嵌着暗语的声明，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称为“狗哨”。

休斯说，作为个人，他没有“外国纠葛”，他是在信手为孤立主义找理由，这句话出自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他称美国要警惕“一切外国纠葛”。这句话常常被人引用，但一直被错误引用；没错，这句话应该是华盛顿说的，但事实上，它又并不完全出自华盛顿之口，他真正说的话对这段历史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我们的和平与繁荣要与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心情或任性纠缠在一起？

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免与外国世界的任何区域结成永久联盟；到目前为止，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这么做。不要把这句话理解为我们支持对现有结盟的不忠。诚实永远是上策，我认为这句格言既适用于公共事务，也适用于私人事务。所以容我再说一遍，各种结盟需要接受审慎的观察，了解其真实意义。但是，在我看来，延长结盟的期限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明智的。

我们要时刻注意通过适当的机制保持体面的防御姿态，
以便在极度紧急的情况下依靠临时联盟。（斜体系后加）

华盛顿从未说过“避免一切外国纠葛”，实际上他也无意于此。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清楚：华盛顿并不是说美国永远不应该加入任何联盟，只是警告不要在欧洲建立永久联盟。他还明确允许“通过临时联盟应对极度紧急的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被合理地描述为一场极度紧急的事件，这与1796年的一项声明是否有权永远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无关。

但休斯否认自己与外国势力有任何瓜葛，并不是在提出最高法院法官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可能性。事实上，他是暗中向听众保证，他不

是一个“连字符公民”，也就是说，他是“百分百美国人”，即土生土长的白人新教徒。

“百分百美国主义”这个概念起初作为“连字符公民”和“纯粹”美国人之争的暗语，后来迅速演变成暗示——但没有言明——其他类型的“非美国人”或行为的种种方式。^[27]根据《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报道，1916年共和党的一个备用竞选口号是“纯美国主义对抗全宇宙”，这显然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28]

“纯美国主义”和“百分百美国主义”反过来又成为一个长期被“一滴血法则”（one-drop rule）主导的社会中暗示种族和民族纯洁性的隐秘方式。“一滴血法则”声称，但凡有人带有一滴“黑人的血”，在美国就是法定的黑人。1903年，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份报纸称：“只要一个人身上有一滴黑人的血，他就是黑人。拥有百分百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才堪称白人，但拥有1%的黑人血统，那就是黑人。”

“一滴血法则”是许多州奴隶制和种族通婚法律的基础，用于确定个人是被奴役还是自由身的法律地位。它的逻辑来自宪法中臭名昭著的3/5妥协条款，即在计算人口以分配在政府中的代表席位时，将奴隶人口按3/5折算。奴隶当然不能投票；但是白人奴隶主也想把他们计入人口，这样他们所在的州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代表权，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想要鱼和熊掌兼得的最令人发指的例子之一。美国是一个长期习惯于用族群和种族构成来对人加以量化的国家，黑白混血、欧亚混血、四分之一混血和八分之一混血这些词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一个以比例和分数来计量人的国家，宣称某人是“百分百美国人”不仅是一种比喻，还是为了否认其中一些人具有充分的人性。

关联链循着优生学关于种族纯洁的观点发展，所有这些短语都可以相互暗示。人们会轻易把“纯美国人”“百分百美国人”“百分百盎格鲁-撒克逊人”混为一谈，20世纪前几十年，许多美国人都热衷于这么做。

1917年亚利桑那州的一篇社论说，“我们伟大的美国大熔炉中包含着热气蒸腾、烟雾弥漫、冒着气泡的混合物。这些半溶液中含有各种元素。一些观察人士对完美融合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文章进一步称，另一些人则认为“（战争）危机已被证明是一种神奇的元素，它可将这种泡沫混合物沉淀为透明、坚硬、闪耀的纯美国主义的结晶”。可悲的是，即使是战争的催化剂也不足以神奇地创造出一种纯美国主义。“我们中间还有人爱德国胜过爱美国的自由。”^[29]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呼吁一种“百分百纯正”的美国主义，一种“不给任何连字符公民留有余地”的美国主义，为此得到人们的喝彩。只有“对国家坚定不移的忠诚”，只有“超越一切种族差异、全心全意的爱国主义奉献”才能获得默许。^[30]纯美国主义拒绝任何少数族裔元素，但爱国主义的忠诚意味着超越种族差异：这其中的逻辑相互抵消，但并不妨碍任何人使用它。

因此，按照长期以来推行的“一滴血法则”的逻辑，任何非百分百美国人都可能被视为非白人、非美国人，或两者兼而有之。结合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地位因袭的本土主义创造了一个三段论，其中“百分百”既指纯白人，也指纯“美国人”，在修辞上可以互换。

在威尔逊发表“美国优先”演讲后，不出6个月，这几项措施之间的联系就已经十分清晰。堪萨斯州一位自称“南方民主党人”的读者向报馆去信，宣称“下一个重大的全国性问题是美国为纯美国人服务的问题”。他说，“主要议题”已经由威尔逊总统进行了界定，这就是“美国优先”，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决定“在其国家抱负、理想和

同情心方面，是由纯美国人决定，还是由拥有一半外国血统的人说了算”。[\[31\]](#)

很快，谁也无法解开这些暗语。这也是部署它们的意图之一。暗语创造了貌似可信的可推诿的责任，而且不仅仅用于公共场合。它们还能为用户提供一种逃避自己认知紊乱的方法。这些暗语是为了将水搅浑，以免人们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

作为“美国优先”孤立主义最著名的倡导者之一，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支持休斯参选。赫斯特的社论在全国各地被转载，敦促美国贯彻“美国优先”，避免“结盟的纠缠”，这是对华盛顿当年演讲的另一种流行的曲解。

外界常常提及赫斯特集团“对‘美国优先’的深切焦虑”。“赫斯特多次用加大的黑体字强调‘美国优先’。”[\[32\]](#)“‘美国优先！’是他的竞选宣言”，美国报纸上经常出现这句老生常谈，奉劝这个国家远离战争。[\[33\]](#)诸如艾奥瓦州的《哈定县纪事报》（*Hardin County Ledger*）之类的小型地方性报纸尽数转载赫斯特的社论，在好几个月里，他反复声称：“我们应该坚持不懈地避免‘结盟的纠缠’，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参与战争；用我们自己的钱财和人力来保卫美国。”[\[34\]](#)

因此，摆脱“外国纠缠”是另一种将“反连字符公民”的排外主义、本土主义、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混为一谈的方式。它们全都搅和在了一起，因为想要避免所有这些纠缠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容易。

伍德罗·威尔逊一直试图将他对“美国优先”的使用和孤立主义区分开来，坚称这一口号实际上是国际主义，意味着美国应该起带头作用。他后来说：“美国优先是一个不属于任何政党的口号。”他坚

持认为，对于民主党人（而不是奉行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每一个为人类利益服务的组织中，美国必须向其他民族传递它自己关于正义与和平的理想，借此来领导世界。” [\[35\]](#)



这是一个巧妙的策略，配得上老谋深算的外交家；但威尔逊在1916年竞选连任时提出的另一个口号——“是他让我们置身于战争之外”更加大胆。

人们通常认为，“百分百美国人”这句话出自西奥多·罗斯福之口，1918年他在题为《加速战争》（*Speed up the War*）的演讲中说道：“这个国家不可能存在五五开的美国主义。我们只能容许百分百

美国主义。美国主义只能提供给美国人，没有其他人的份儿。我们只能效忠于一面国旗，那就是美国国旗。”^[36]

但这个短语至少在1915年已经开始流传了，当时一位拉比敦促他的犹太教堂遵循“真正美国主义的十诫”，指示他们：“真正的美国主义意味着百分百美国主义。”^[37]1916年，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写信感谢罗斯福支持他，这封信后来在《纽约时报》和全国各地被转载。“没有人比我更真切地认识到，在鼓舞民族精神，呼唤彻底的——百分百的——美国主义方面，这个国家从你这里受益良久。”^[38]

西奥多·罗斯福在卸任总统后的确发表了许多关于“百分百美国主义”和“连字符公民”的演讲，其中包括1916年《美国为美国人》（*America for Americans*）演讲。在这些公开演讲中，他通常会强调，这个问题严格来说是关乎对美国的忠诚，而不是一个人的族群出身。他经常提到自己的荷兰血统，同时承诺自己将亲自投票选举“任何德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血统或其他血统、信仰的美国人”为总统。因为一个人的出身而歧视他，这“违反了真正美国主义的所有原则”。^[39]但在不断传播中，这些细节很快就被遗漏（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提到了北欧血统）。^[40]

不久，“美国优先”“百分百美国人”“纯粹美国人”“爱国主义”或多或少地互换使用。1918年，在全美发行的《巴尔的摩星报》（*Baltimore Star*）发表了一篇社论，将一个当地人形容为“百分百的爱国者，而不仅仅是百分百美国人，因为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百分百美国人甚至连百分之五十的爱国者都算不上。”^[41]

在检视美国主义的过程中，衡量标准是什么？不是爱国主义，因为如果爱国主义存在，百分之五十的爱国者和百分百美国人之间就不会有区别。它必须带有“真正的美国人”的含义，几乎可以肯定，它会被解读成白人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18年7月，南达科他州的一篇

社论说：“所有愿意宣誓彻底效忠我们的政府并奉献其忠诚的人，都应该有资格享有‘美国公民’的光荣称号。”^[42]同样，在一篇广为流传、题为《连字符公民的自由》的文章里，一位新移民解释说，他做的事情确实还不足以令自己获得“百分百美国人”的标签。“三年前，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就像一滴清水与另一滴水融合在一起一样，毫无差异地融入了美国人的生活，”他在《世纪报》（*The Century*）上发表的文章中痛苦地总结道：“我早该知道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移民不能把自己改造成百分百美国人，就像兔子不能长出鬃毛一样。不管他是在德国的波兰人、在日本的中国人、在阿根廷的意大利人，还是在美国的德国人，都永远是二等公民。”^[43]

当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朱利叶斯·卡恩（Julius Kahn）（外界称他为“或许是美国公共生活中最重要的犹太人”）^[44]宣布，“我是美国人，因为美国是第一、最终，也是永远；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吸引我，”《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将他的宣言作为“百分百美国人”的副标题，不过卡恩从未使用过这个表述。这些表达已经成为同义词，编辑认为它们是可以互换的。^[45]

因此，当1918~1920年《旧金山纪事报》报头均打出“本报是百分百的美国”时，是向所有读者发出信号：这份报纸支持“美国优先”、“纯粹美国人”以及政治孤立主义。



事实上，你越是把“美国优先”和“百分百美国人”联系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其与其他短语的联系也越紧密。

朱利叶斯·卡恩是德国出生的移民——也是“连字符公民”，1899年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1902年，他与人共同执笔《卡恩-米切尔排华法案》（*Kahn-Mitchell Chinese Exclusion Act*），该法案使《排华法案》成为永久性法律。（换句话说，一个德国犹太人，只要努力工作，运气好，愿意排斥其他少数民族，就能被这个百分百俱乐部接纳。然而，中国人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

在卡恩参议员被视为百分百美国人之后不久，另一位移民国会议员得到了同等地位，而且这个案例同样值得玩味。参议员克努特·纳尔逊（Knute Nelson）去世时，全国各地的讣告将他誉为“百分百美国人”，尽管他出生在挪威。

纳尔逊获得了成为纯美国人的免费入场券，这是因为（正如他的讣告中费神阐明的那样）他是“真正的北欧血统”的后裔，“来自拥有强大神灵、培养强大人类的种族”。罗斯福曾列出一系列愿意成为真正美国人的移民种族，纳尔逊恰恰来自其中，也就是欧洲最合适的地区——北欧。因此，他多年的公共服务可以证明“出生在海外的人对美国的价值，他能成为美国人，恰恰充分体现了这句使我们当中最杰出的人脱颖而出的表述，‘他是百分百美国人’”。[\[46\]](#)

纳尔逊之所以能成为百分百美国人，正因为他是北欧人（这似乎有点矛盾），原因在于“北欧人”和“百分百美国人”同样交织在一起。好像嫌这一切还不够混乱似的：20世纪前几十年，“北欧人”是另一个暗语，它的使用方式与纳粹使用“雅利安人”的方式相同。

“北欧主义”认为，北欧人在生理上优于南欧人，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等白人至上主义者支持这一理论，他在1916年出版的《伟大种族的消逝：或欧洲历史的种族基础》（*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or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成为优生学科学种族主义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格兰特写道：

他们（北欧人）是由士兵、水手、冒险家和探险家组成的种族，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由统治者、组织者和贵族构成，这与阿尔卑斯山脉本质上的农民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骑士精神和骑士封号，以及他们存在至今但已严重受创的对手，是北欧人独有的特征，欧洲人的封建主义、阶级差别和种族自豪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北欧。^[47]

格兰特警告说，美国面临“低等种族取代高等种族”的“巨大危险”，除非“本土美国人”（即本土主义者，早期欧洲移民的白人后裔）“运用他卓越的智慧来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孩子，免受东欧和西亚源源不断的最低等种族侵入引起的民族竞争”。^[48]对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格兰特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设立贫民窟，对“劣等”种族实施绝育。

但实际上，“北欧人”可以用来描述指一切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或高加索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或北欧人，以及那些确实来自挪威的人。（我们将看到，当种族主义者因对他们该憎恨哪一类人感到困惑时，这一点可能会导致有趣的闹剧。）

这一切并不体面，当时的观察人士对一切都看在眼里——这恐怕也正是这些宣传的用意，正如1920年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妇女在写给当地报纸的信中指出的那样。“我不喜欢所有这些拿‘百分百美国人’‘美国优先’排斥其他国家的宣传，不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恰恰正因为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49]

但许多美国人都欣然接受。一名儿子在战斗中丧生的科罗拉多州牧场主对中西部的民众说：“你们这些人看起来不把这场战争当回事。对我们这些西部人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建立了很多由百分百美国人组成的社团，我想告诉你们，任何不忠的言论或行为

都将招致私刑，私刑仪式必不可少的要素是一根绳子、一棵树，以及一场绞刑。”[\[50\]](#)

爱国主义、公民身份、族群纯洁性和种族纯洁性被混为一谈：从“百分百美国人的社团”到私刑，这只是在修辞上简短地迈进了一步，因为背后的关联链已经建立。负载着更多意涵的短语依凭足够的力量相互撞击，可以引发真正的暴力；当口号创造政治现实时，它不再不仅仅是文字。

这位科罗拉多农场主凶残地威胁说，他会私刑处死任何在他看来不够忠诚的德国人，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仅仅一个月后，一个中西部的暴徒就这么干了。1918年，佛罗里达州一篇新闻以《暴徒可能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为题，报道了伊利诺伊州一名“社会主义者因不忠言论被处以私刑”的事情。受害者在被绞死之前用德语祈祷；凶手后来在死者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份效忠美国的声明。[\[51\]](#)

私刑的威胁以一定的频率针对“连字符公民”。尽管“连字符公民”一词最常用于移民，但它也隐晦地让许多听众联想到“非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早在1835年，废奴主义者的报纸就已使用“连字符公民”这一表述。[\[52\]](#)1855年，一位废奴主义者将“非裔美国人”与“撒克逊美国人”区分开来。[\[53\]](#)另一个人在1859年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两个不可避免的最大问题是盎格鲁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54\]](#)

50年后，对“连字符公民”身份已经显示出公开的敌意，并不需要明确点明非裔美国人，就能含蓄地将他们与“盎格鲁美国人”或“撒克逊美国人”区分开来。这也不应该是一个意外：因为至少从内战前的19世纪50年代起，族群和移民在美国就彼此交织，当时美国发起了诸如“一无所知”之类的本土主义运动，由辉格党的残余组成的

“本土美国人党”既反对为逃离革命和饥荒而涌入的欧洲移民，同时也反对新生的共和党人的废奴政策，后者很快将由林肯领导。

到20世纪早期，就像“美国优先”一样，对所有“连字符公民”的敌意已经为众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所接受。

尽管有七位总统游说反对私刑，但伍德罗·威尔逊不在其列；在压力之下，他只发表了一次演讲对此予以谴责。他也不大可能因为自己的竞选口号越来越多地与宣扬种族纯洁性的优生学理论联系在一起而感到不安。威尔逊反对“连字符公民”的演讲不仅仅是竞选策略。尽管他是一名国际主义者，其政府也通过了包括《联邦储备法》

（Federal Reserve Act）在内的进步立法，但他在种族问题上立场保守。事实上，如果追溯到强迫奴隶建造白宫的时代，威尔逊是众多入主白宫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之一。

威尔逊来自弗吉尼亚州，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出生。在成长过程中，他经历了一段被称为“败局命定”（the Lost Cause）的民族“罗曼史”。南方在内战中遭遇惨败后，南方人开始试图收复失去的东西，毫无疑问，那就是种族和经济霸权至上的旧社会秩序。他们讲述了一些故事，想要将他们反对“北方侵略战争”的崇高事业理想化，声称在这场战争中，北方人出于贪婪、傲慢、无知和怨恨，“入侵”了向来和平的南方。温和的南方人英勇地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忠诚的奴隶一路为其喝彩。这个伊甸园式的神话将南方描述成失落的农业乐园，善良的贵族、勤劳的农民与忠诚的奴隶和谐共处：它与杰斐逊式自耕农的理想相结合，成为最早的对奴隶制的宣传和辩护。

自南北战争以来，民主党是南方的政党，在奴隶制和公民权问题上（“公民权”一词早在南北战争前的废奴讨论中就与非裔美国人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反对林肯的共和党，后者是北方和联邦的政党。战争结束后，林肯的政党逐渐演变为城市工业主义政党，而民主党在20世纪40年代前一直坚定地与南方农业主结盟。由于这种对南方土地制度意识形态上的忠诚，民主党同时也是州权、《吉姆·克劳法》^[55]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政党。

尽管伍德罗·威尔逊不是典型的“南方民主党人”——他曾任新泽西州州长，1912年当选总统时推行进步主义，但他的观点与他们并不总是截然不同。作为总统，威尔逊在联邦政府中实行种族隔离，包括在美国财政部和内政部设置了种族隔离的厕所。他的财政部长威廉·G. 麦卡杜（William G. McAdoo，1863年出生于佐治亚州，当时正处于内战中）后来成了他的女婿，麦卡杜为这一决定进行了辩护，称“在这类事情上，很难忽视白人的某些特定的感情与看法”。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很容易做到忽视黑人的感情与看法。

1914年，国家独立平等权利联盟（National Independence Equal Rights League）的一个非裔美国人代表团来到白宫，表达他们对种族隔离联邦化的失望。威尔逊坚称，这是“从两个种族的舒适和最佳利益出发，以便克服摩擦”。在得知如若继续支持种族隔离，可能会导致非裔选民在1916年大选中的联合抵制时，威尔逊感到非常不快。

“他说，如果有色人种觉得投票给他是个错误，他们尽管去纠正好了，但他坚持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把政治卷进去，因为它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代表团离开时告诉记者说，威尔逊“声称进行种族隔离是为了防止种族摩擦，这种说法没有事实依据”。^[56]

1915年，威尔逊成为第一位在白宫放映电影的总统。这部电影是由D.W. 格里菲斯（D. W. Griffith）执导的《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格里菲斯是南方一位上校的儿子。这部如今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电影改编自种族主义色彩更为浓厚的小说《同族人》（*The Clansman*），作者托马斯·W. 迪克森（Thomas W. Dixon）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就读时，与伍德罗·威尔逊熟识。迪克森本人就是“一滴血法则”的坚定拥护者，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对当地记者解释道，“黑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不可调和的”，因为“一滴黑人的血就会制造一个黑人”。^[57]迪克森写了一系列书，将三K党的崛起加以神化，这属于种植园小说流派“月光与木兰花”的一部分，该流派的另一成员是作家托马斯·纳尔逊·佩奇（Thomas Nelson Page），伍德罗·威尔逊任命其为美国驻意大利大使。

纳尔逊的小说，如《在古老的弗吉尼亚》（*In Ole Virginia*, 1887）和《红色岩石》（*Red Rock*, 1898），帮助确立了这样一个程式：忠诚的前奴隶用方言讲述了他们对宁静的种植园文化的回忆，这种文化被好战的北方废奴主义者和对权力狂热的联邦主义者肆意践踏。一小群光荣的战士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惨遭失败；一心只想着报复的北方扶植无能或腐败的黑人来征服无辜的白人；南部的无赖汉和北部的投机客纷纷涌入，剥削这些饱受战争蹂躏的城镇。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南方军队以三K党这种高尚的形式再次出征，奋起捍卫荣誉和尊严。这些小说恶毒地把武装捍卫奴隶制美化作为一种优雅的姿态。

《一个国家的诞生》以夸张、虚构的细节编派了这个神话，按照字幕卡的介绍，它讲述的是“北方和南方这对曾经的宿敌再次团结起来，共同捍卫他们雅利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据报道，迪克森说他的目的是“彻底改变北方的观众”，写一个故事“把每个人都变成终

生的南方党派”；而格里菲斯说，他对这部电影的一个期望是“催生白人尤其是白人女性对有色人种的厌恶之情”。[\[58\]](#)

它起到了效果。《一个国家的诞生》成了一部现象级的电影。北方白人观众欢呼雀跃；黑人观众则被吓坏了。这部电影引发了美国各城市的骚乱，鼓动了种族主义暴徒，导致了至少一起凶杀案：一名白人男子杀害了一名黑人少年，案件发生在印第安纳州，而不是在南部腹地。

《一个国家的诞生》以一己之力，重新激起人们对三K党的兴趣，而“上校”威廉·约瑟夫·西蒙斯（William Joseph Simmons）在观看了这部电影及其对三K党英雄形象的描绘后，开始复兴三K党。不久之后，像威尔逊的“美国优先”和罗斯福的“百分百美国主义”这样的口号成为复兴的三K党的暗语。

尽管三K党内部存在分歧，但它在全国势力范围的延伸，也像《一个国家的诞生》中所设想的那样，顽固地调和着南北矛盾。它呼吁“盎格鲁-撒克逊人”团结起来，对抗他们打算驯服的群体可能带来的威胁；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威尔逊的当选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帮助美国在重建之后实现了统一。

与此同时，即使没有三K党的推波助澜，白人仍然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残害黑人。1889～1922年，根据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统计数据，美国有3436人被处以私刑——这只是官方记录。[\[59\]](#)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受害者身份不详，下落不明。尽管大多数受害者是非裔美国人，但也有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妇女被处以私刑。还有墨西哥公民被处以私刑，但美国未能起诉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墨西哥政府因此把美国政府告上法庭；意大利公民也被处以私刑，仅1891年就有11人涉嫌谋杀。

私刑并不总是（甚至不主要是）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摸摸的暴力行为。19、20世纪之交，在美国的许多地方，私刑已经成了一种娱乐、一种血腥的运动。公开私刑在光天化日之下冷酷地进行，事先会充分通知，方便人们远道而来，寻欢取乐。届时会散播传单和贴出告示，告知民众何时何地举行私刑；当地报纸登出新闻，宣布即将实施的计划；记者被派去报道；许多家庭带着孩子来，一边野餐一边围观。受害者往往先遭受酷刑和残害；孕妇在大嚼花生消遣的人群面前被烧死。

1915年10月，作为13岁的玛丽·法根（Mary Phagan）之死的替罪羊，一位名叫利奥·弗兰克（Leo Frank）的犹太人——作为本应被绞死的13岁女孩玛丽·法根的替罪羊——在佐治亚州被处以私刑。两个月后，“上校”西蒙斯在佐治亚州的石头山（Stone Mountain）上点燃了罪恶的火焰，宣布三K党重生。



1916年5月，在得克萨斯州，一位名叫杰西·华盛顿（Jesse Washington）的黑人农场工人在韦科市政厅前被处以私刑，人们声称是他杀害了自己的白人老板娘。华盛顿没有被绞死。他先是被阉割，然后被割去手指，继而在篝火上熏烤，持续了两个小时，直到被折磨致死。他烧焦的尸体随后被肢解，躯干被人拖着游街，身体的其他部分被作为纪念品出售。

事件发生在中午，当时有大约1万名民众围观，包括当地官员、警察和学校午休的孩子。有照片记录下了华盛顿被烧焦的尸体挂在咧嘴大笑的白人上方的画面，并被制成明信片。

在20世纪前几十年，这就是“百分百美国人”和“美国优先”对于众多美国公民意味着的现实。

- [1] *Tribune*, Union, MO, 1 February 1889.
- [2] *New York Times*, 19 June 1891.
- [3] *Morning News*, Wilmington, DE, 13 November 1894.
- [4] *Advocate*, Topeka, KS, 14 February 1894.
- [5] *Centralia Enterprise and Tribune*, Centralia, WI, 2 December 1899.
- [6] *News-Journal*, Mansfield, OH, 1 December 1914.
- [7] *Baltimore Sun*, 21 April 1915.
- [8] *Baltimore Sun*, 21 April 1915.
- [9] John Brisben Walker, “Woodrow Wilson: Has He Been for ‘America First?’ ” Address given at Cooper Union, 18 November 1915.
- [10] *Chicago Tribune*, 2 June 1889.
- [11] *New York Times*, 14 September 1889.
- [12] *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Minneapolis, MN, 14 April 1912.
- [13] hyphenate, 意指使用连字符 “-” , 连接个人的祖籍和美国国籍的归化的美国移民。
- [14] See, for example, *Baltimore Sun*, 14 October 1892; and *Natchez Democrat*, Natchez, MS, 13 October 1916. “Mercenary minded – money mad” , “unmergeable” , “alien and unassimilable” from H. W. Evans, “The Menace of Modern Immigration” , Knights of the Ku Klux Klan, pamphlet, 1924, p. 24.
- [15] *New York Times*, 13 October 1915.
- [16] *New York Times*, 13 October 1915.

- [17] *Lawrence Daily Journal-World*, Lawrence, KS, 19 October 1915.
- [18] *Palladium-Item*, Richmond, IN, 29 October 1915.
- [19] *New York Times*, 14 June 1916.
- [20] *New York Times*, 10 October 1916.
- [21] *Cincinnati Enquirer*, 8 June 1916, p. 2.
- [22] *Scranton Republican*, Scranton, PA, 7 November 1916.
- [23] *Allentown Leader*, Allentown, PA, 26 January 1916.
- [24] *Washington Post*, 26 April 1916.
- [25]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204, No. 731, October 1916, p. 514; original emphasis.
- [26] *Altoona Tribune*, Altoona, PA, 25 October 1916.
- [27] *Los Angeles Times*, 2 January 1916.
- [28] *Farmer and Mechanic*, Raleigh, NC, 3 November 1903.
- [29] *Weekly Journal-Miner*, Prescott, AZ, 6 June 1917.
- [30] *Arizona Republic*, Phoenix, AZ, 28 June 1916.
- [31] *Wichita Daily Eagle*, Wichita, KS, 28 November 1915.
- [32] *Reno Gazette-Journal*, Reno, NV, 2 August 1917.
- [33] *New York Tribune*, 30 September 1917.
- [34] *Hardin County Ledger*, Eldora, IA, 15 February 1917.
- [35] Quoted in John Milton Cooper, *Woodrow Wilson: A Biograph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9, p. 585.

[36] *New York Times*, 19 July 1918.

[37] *New York Times*, 20 December 1915.

[38] *New York Times*, 27 June 1916.

[39] *Topeka State Journal*, Topeka, KS, 31 May 1916.

[40] 罗斯福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很复杂。虽然他认同那个时代许多关于白人优越论的优生学猜想，但他也相信种族的“提升”和进步，认为黑人可以进步。1901年，他成为第一个邀请黑人在白宫共进午餐的总统，对方是他的朋友、顾问和前奴隶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这一决定改变了全国对种族的议程，也令他成为泛滥的种族主义抨击的目标。有关罗斯福对种族的全面看法，可参阅Thomas G.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41] *Portsmouth Herald*, Portsmouth, NH, 1 June 1918.

[42] *Argus-Leader*, Sioux Falls, SD, 1 July 1918.

[43] *Argus-Leader*, Sioux Falls, SD, 21 April 1917.

[44]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9 February 1919.

[45]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9 February 1919.

[46] *Cincinnati Enquirer*, 1 May 1923.

[47] Madison Grant,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 p. 198.

[48] Madison Grant,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 p. 98。有大量关于科学种族主义和它与美国主义关系的文献。例如，EEwa Barbara Luczak, *Breeding and Eugenics in the American Literary Imagination: Heredity Rul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164: “The reference to the nordic race quickly grew to embody the doctrine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 American descendants of North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came to be identified with Americanism”.

[49] *Greensboro Daily News*, Greensboro, NC, 17 October 1920.

[50] *Wichita Daily Eagle*, Wichita, KS, 1 March 1918.

[51] *Ocala Evening Star*, Ocala, FL, 5 April 1918.

[52] *Liberator*, Boston, MA, 26 September 1835.

[53] *Anti-Slavery Bugle*, Lisbon, OH, 24 November 1855.

[54] *New York Times*, 10 February 1859.

[55] Jim Crow Laws, 一部主要针对非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对其他有色人种实施种族隔离的法律。

[56] *New York Times*, 13 November 1914.

[57] *Henderson Gold Leaf*, Henderson, NC, 27 February 1902.

[58] Hernán Vera and Andrew M. Gordon, *Screen Savors: Hollywood Fictions of Whitenes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 20.

[59] 这个数字在1922年广为流传，包括NAACP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整版广告，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报道称：“自1889年以来，有3436名受害者被暴徒私刑处死。其中只有17%的人被指控侵犯妇女。被处以私刑的受害者包括64名女性。” *Richmond Item*, Richmond, IN, 13 January 1922.

3 美国梦 1917~1920年：除了社会主义，你还能管它叫什么？

当美国在1917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总统在参战前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坚称“必须为民主创建一个安全的世界”。不过，如果他说的是为了美国梦创建一个安全的世界，那也不足为奇，因为在战争期间“美国梦”几乎纯粹是用来形容美国参加这场欧洲战争的目的，或者说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短语已经摆脱了一切经济意涵。俄勒冈州的一则广告写道：“向每一位忠诚的美国人吹响号角，让他们记住美国代表什么。让美国梦成真，为民主创建自由的世界。”^[1]

尽管美国仍在讨论是否应该参战，但“美国梦”仍可能意味着和平。“在实现促进世界和平的美国梦方面，我们正在分道扬镳。”^[2]但它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为美国参战辩护，比如《芝加哥论坛报》指出，美国只能通过在欧洲为美国梦而战来维护自由。

如果美国的理念、希望、梦想以及美国人建立的机制不值得我们奋力地去维护和捍卫，那么它们也不值得我们奋力地去建立。美国通过战斗赢得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果它没有为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而斗争，那么今天人类的平等将只是抽象的理论，而非既定的事实。^[3]

尽管《牛津英语词典》引用了《芝加哥论坛报》的这段话，作为耳熟能详的“美国梦”定义的早期例句（即“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通过努力工作、决心和主观能动性来取得成功理想”），但该报的这段原始引文与成功或繁荣、努力工作或主观能动

性并无任何关联。这篇社论明确提到了美国的民主结构、政治和个人自由以及捍卫平等的理想。

在1916年《芝加哥论坛报》社论的作者看来，那些才关乎美国梦，而不是成功。但《牛津英语词典》再次假设“美国梦”的含义与繁荣和自决相同，因此即使是那些并不支持这一含义的引文也可以作为“美国梦”来使用。

把美国梦看作对暴政威胁的自由承诺的，也不仅仅是《芝加哥论坛报》。1917年2月，玛丽·E.T.查宾夫人（Mary E. T. Chapin）——她在曼哈顿比尔特莫酒店（Biltmore Hotel）的讲话“在时髦社交场中轰动一时，他们不去教堂，但仍然觉得需要精神上的指引”^[4]——发表演讲，敦促美国参战，她的演讲词在全国转载。几乎可以肯定，查宾夫人的言论是对孤立主义者的谴责，后者不断错误地引用乔治·华盛顿的话，为自己反对“外国纠缠”的论点辩护。

华盛顿梦想人类享有比世人所知更为广泛的自由……他为此为国家实现了这一梦想。我相信，华盛顿的梦想将通过这场伟大的战争扩展到欧洲，美国将被要求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这场战争：美国的自由梦想将传遍欧洲并最终包围世界。^[5]

这个短语也被用来描述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崛起的力量，批评这个国家拒绝参战，显得过于胆怯，这种用法就显得不那么和平，但政治色彩同样浓厚，比如1917年1月，《芝加哥论坛报》一篇推崇武力的社论说：“乔治·杜威（George Dewey）摧毁西班牙舰队是完美地实现了美国梦，彰显了胜利的力量。”^[6]有些文章讨论“关于从赤道到加拿大边界之主宰政治的美国梦”，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则报道了“关于打造一支伟大商船队的美国梦”。^[7]

美国在1917年4月勉强参战。六个月后，艾奥瓦州各家报纸转载了首府得梅因一家报馆的社论，宣称这场战争是帝国的“普鲁士梦”和民主的“美国梦”之间的较量。^[8]面对暴政，对“美国梦”表述的早期使用将始终以捍卫自由为中心，认为这将是维护民主的决定性原则。

但与此同时，美国梦继续呈现出各种政治形态，从经济平等到国家进步的模糊概念。《芝加哥论坛报》特别喜欢使用它；一篇被广泛转载的社论批评美国在规划铁路方面缺乏远见。“我们必须学会以另一种精神展望未来，而不是总带着美国梦式的轻松乐观。战争的巨大压力正迫使我们迅速摆脱自满情绪。”^[9]“美国梦”开始摆脱限定性的描述，不再是“关于”这个或那个的“美国梦”，而是一种松散的集体乐观主义的表达。

1918年4月《芝加哥论坛报》再次提出了关于自由的美国梦，带着些许骄傲反思这一年的战争：“它证明了有序自由的美国梦的现实，是对美国民族令人难以忘怀的承诺，配得上那些在独立战争和联邦战争中全身心服务的高尚的人们。”^[10]“你意在保护你所居住的自由之国吗？”1918年4月，堪萨斯州的一篇社论问道：“美国永久和平的梦想对你有吸引力吗？记住，只有在为之战斗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获得和平。美国不想要战争，但这是一场终结战争的战争。”^[11]

1918年11月战争终告结束时，美国梦仍然可谓“有序的自由”，但也是民主秩序。美国梦不止一次被用来描述拟议中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内布拉斯加州的一篇社论认为，这将令“美国梦实质上成为现实”——在欧洲。和平计划制定了“世界邦联国家的宪法，规定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政府原则”，就像美国宪法规范了各州之间的关系一样。^[12]联盟的捍卫者坚持认为，民主政府的美国梦可以在欧洲复制，以推广美国平等、自由、自决和正义的信条。

然而，事实证明，实现欧洲和平并非易事。1919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篇报道称，威尔逊是在凡尔赛会议上“释放美国梦”，而这一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指责共和党人蓄意破坏这一努力。“威尔逊总统一直在努力为人类描述自文明出现以来人类头脑中最宝贵的梦想。”在《圣贝纳迪诺太阳报》（*San Bernardino County Sun*）的编辑看来，这个民主梦就是美国梦。^[13]但共和党领导人无意支持这一特定的美国梦。

在美国重新讨论起国内将会建立什么样的民主之时，俄国革命引发了“红色恐怖”，人们担心苏俄共产主义会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构成威胁，担心这个国家会被布尔什维克渗透。不平等仍在加剧，1919年“五一”骚乱不仅仅代表劳工冲突。“红色恐怖”以及包括无政府主义炸弹袭击在内的相关恐怖主义行动，与战争中的沙文主义狂热相裹挟，加上对“外国特工”、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非美国”社会力量的恐惧与日俱增，引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波士顿、纽约和克利夫兰传统上相当和平的五一游行，发展为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

它们还再一次引发了对“百分百美国主义”的吁求，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将美国“苏维埃化”的反对声浪，以及对“非美国”活动人士无休止的抨击，这些活动在40年后的冷战期间复活。

“五一”骚乱之后，种族骚乱迅速蔓延。1919年夏秋，包括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在内的近40个城市爆发了种族骚乱，黑人市民对白人的攻击行为予以还击。

同年11月，宾夕法尼亚州雷丁市的共和党人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宣称他们是“健全的百分百美国人，有意志和勇气抵制将雷丁市苏维埃化的一切企图或向其政府灌输非美国的一切思想或做

法”。^[14]两个月后，内布拉斯加州的当地记者激烈地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试图控制政治思想的政策是不符合美国精神的。驱逐出境的政策是专制行为。这当然不是美国的做法。一些百分百美国人在考虑把菲律宾群岛作为美国的西伯利亚是否明智。”

这位作者警告说：“对言论和媒体的压制将适得其反。难道当局永远不明白，你没法通过监禁或驱逐思想的解释者来遏制思想？”^[15]

同化是对仇外心理的一种回应，一些人开始认为美国梦是对白人民族主义的纠正。“美国梦”用来描述移民经历和个人成功梦想，我能发现最早的例子是在1918年。关于移民回忆录《一个美国人的炼成》（*An American in the Making*）的书评结尾写道：

我们发现，对一个刚从乡村生活中走出来的欧洲年轻人来说，纽约是多么可怕。贫民区的噪音和污秽是多么恐怖！他遇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船员，态度是多么粗鲁！起初，美国是多么令人失望、心碎啊！但是这位麦克斯为了成功一路奋斗，最后他开始做起了自己的美国梦，因为他承认，到头来，是他在贫民区的老朋友和亲戚让他觉得奇怪和落后。

这是一个同化主义的梦想，但也是一个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梦想：在做着美国梦的过程中，麦克斯把其他“奇怪和落后”的移民甩在了后面，拥抱了美国的成功梦。^[16]

但是，其他有影响力的声音继续对将向上的社会流动视为国家理想的想法表示怀疑，甚至发出警告。1919年，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此时他还不是著名小说家，但已经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出版了《十二个人》（*Twelve Men*），描述了一组对自己有影响的人。在书中，德莱塞写到了一位现在已经被人遗

忘的短篇小说作家，称他的出众之处在于他“对美国政治或社会一点都不感兴趣——一个美妙的迹象。在经济和社会上，‘先人一步’的美国梦不是他的一部分——另一个一流的标志”。[\[17\]](#)

显然，对向上的社会流动的美国梦的表述正在生成，但它绝不是一个普遍宣扬的集体理想，也不是这个国家应该集体追逐的“美国梦”。这种易变性远不仅是表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思想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随着美国信条的理念——自由、民主平等、社会公正、经济机会、个人发展——被吸引着围绕“美国梦”这个短语凝聚在一起，它也开始呈现出一种更加独特的形态。但这种形态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当前的政治或社会压力可能会使“美国梦”的天平向这个或那个信条倾斜。

1920年，著名的浪漫奇幻探险小说作家乔治·巴尔·麦卡奇翁（George Barr McCutcheon）出版了一部名为《西风漂流》（*West Wind Drift*）的小说。这是一个荒岛求生故事，背景设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过年代史实极不可信，讲述的是1917年一群美国人从南美回国，打算加入美国的战争壮举，路上在一艘远洋客轮上邂逅。船长手下有“一个苏格兰裔美国人”、“一个爱尔兰裔美国人”和“一个来自巴尔的摩、没有归化身份的普通美国人”。书中的英雄人物自然是这位普通的美国人，因为普通的言下之意是“真实”。

这部小说的桥段显然是模仿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沉船事件。故事中，远洋客轮被阴谋破坏者炸毁后，幸存者漂流到一个无名的岛屿，在那里他们开始建造岛上天堂。麦卡奇翁解释说，在生存主义经济中，唯一重要的是劳动力，所以这些岛民为自己的社会设计了一种新的货币：时间。工作时间是唯一的价值，因此也就成了唯一的交易物。

他们规定了每周的“营税”，每个人都以既定的时间量来缴纳，“学校、教堂、‘医院’和‘政府’将得到税收支持”。每个人获得同样的工作时间计数。“这里没有贪欲，因为没有囤积的机会。”相反，资源“做圆周循环”，从人到政府，再从政府到人。[\[18\]](#)这就奇迹般地产生了一个乌托邦。

单薄的情节围绕着一些煽动分子展开，这些人都是外国人，乌托邦必须将他们清除出去，以保持这里的完美无缺。一开始，一位来自美国的银行行长还具有邪恶的资本家的所有特征（这位狡诈、傲慢、戴着大礼帽和单片眼镜的垄断者是美国民粹主义魔鬼论中镀金时代的脸谱化角色）。但最终即使是银行家也得到了救赎，因为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正派的美国人，尊重民主和正义，并且懂得平等的价值。

在一个引人注目的段落中，一位美国人称他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最精致的境界。这与史上闻名的美国梦“民有、民治、民享”的精髓非常接近。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所知的最罕见的社会主义学说，但我们的目光要更放得更长远。“从人民中来，由人民所治，到人民中去。”除了社会主义，你还能管它叫什么？[\[19\]](#)

无论大多数美国人如何形容今天的美国梦，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不是美国梦的一部分。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从葛底斯堡演说中摘取出来，与大家熟悉的社会主义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1920年这句话就已经变成陈词滥调）相融合，便勾兑成了“史上闻名的美国梦”。

但书中的这位英雄——“没有任何连字符身份的普通美国人”很快指出，他们创造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博弈，你得从口袋里掏出一些东西放到另一个人的口袋里，不管他想不

想要。我们的计划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不打算平分口袋里的东西，甚至也不打算平分手里的东西。” [\[20\]](#)

他们的制度实际上是社会民主：清教徒的工作伦理激励个人努力，税收制度支持集体服务和互惠互利。这个“美国梦”包含了社会正义和平等、获得商品及服务的权利，抛弃了个人发展的观点。它不是主张财富的再分配，而是反对财富的积累。

从《华盛顿邮报》到《匹兹堡每日邮报》（*Pittsburgh Daily Post*）再到《圣路易斯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西风漂流》被不断转载，这表明在1920年，没有人为这种准社会主义的美国梦的颠覆性形象所困扰。

事实上，在“美国梦”一词出现的前20年里，它通常被用来描述政治理想而不是经济理想；而在它被用来描述一种经济抱负时，“梦想”带有贬义，代表着一种幻觉，而不是理想。我在研究中也发现，“美国梦”这个短语在最初问世时，从未被用来赞美自由市场的自由。它讨论的是保护个人免受腐败势力和利己主义的影响。

美国梦关乎的是如何阻止邪恶的千万富翁，而不是自己如何成为千万富翁。

[\[1\]](#) *Oregon Daily Journal*, Portland, OR, 27 March 1918.

[\[2\]](#) *Burlington Free Press*, Burlington, VT, 10 December 1915.

[\[3\]](#) *Chicago Tribune*, 7 February 1916.

[\[4\]](#) *Evening World*, New York, NY, 26 February 1917.

[\[5\]](#) *Evening World*, New York, NY, 26 February 1917.

[\[6\]](#) *Chicago Tribune*, 18 January 1917.

- [7] *Baltimore Sun*, 7 January 1917, p. 6;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 DC, 15 July 1919.
- [8] *Daily Times*, Davenport, IA, 5 September 1917.
- [9] *Chicago Tribune*, 29 October 1917, p. 8.
- [10] *Chicago Tribune*, 8 April 1918.
- [11] *Walnut Valley Times*, El Dorado, KS, 25 April 1918.
- [12] *Nebraska State Journal*, Lincoln, NE, 7 November 1918.
- [13] *San Bernardino County Sun*, San Bernardino, CA, 25 June 1919.
- [14] *Reading Times*, Reading, PA, 4 November 1919.
- [15] *Nebraska State Journal*, Lincoln, NE, 1 January 1920.
- [16] *Chattanooga News*, Chattanooga, TN, 5 January 1918.
- [17] Theodore Dreiser, *Twelve Me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8 (1919), p. 219.
- [18] George Barr McCutcheon, *West Wind Drift*, New York: A.L. Burt Company, 1920, pp. 292–293.
- [19] George Barr McCutcheon, *West Wind Drift*, New York: A.L. Burt Company, 1920, p. 294.
- [20] George Barr McCutcheon, *West Wind Drift*, New York: A.L. Burt Company, 1920, p. 294.

4 美国优先 1917~1920年：我们已经走出梦境

就像“美国梦”一样，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优先”这一短语的含义也迅速收窄。战时的爱国主义使得这个词与孤立主义格格不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它或多或少发展为纯粹的沙文主义，经常被拿来与“法兰西万岁！”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等民族主义口号相比，同时却大肆嘲笑“德意志高于一切”是令人反感的军国主义。

这种立场的虚伪性经常被人指出。北卡罗来纳的一篇社论观察发现，那些坚持认为喊出“德意志高于一切”这类口号无异于高举魔鬼旗的人，正是最强烈地支持“美国优先”口号的人。但是，既然都打着军国主义口号，无非好战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细微之差，这二者之间也没什么好选择的。社论警告说，如果“美国优先”成为这个国家的指导原则，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个国家走向进一步的冲突。文章总结说：“我们有信心相信，这个国家不是也从来没有信奉‘美国优先’。我们希望并相信这个国家秉持的是正义优先。”^[1]

但随着美国仇外情绪如今被军事化和彻底合法化，有了自己的宣传口号，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这种情绪催生了一些真正可怕的诗歌：

美国优先！她的传统和法律，

她的理想崇高，要珍惜我们的事业；

她的土地肥沃，只容她自由的子民涉足；

我们将神圣地守护她和她的上帝；

所有肤色的子民再一次集结，

美国优先！从东海岸到西海岸。[\[2\]](#)

还有很多同样愚蠢的小说。1917年9月，《赫斯特杂志》（*Hearst's Magazine*）刊登了一篇名为《数小兵》（*The Pawns Count*）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包括一个德裔美国人、“一个日本人”、“一位名叫哈桑（Hassan）的穆斯林恶棍”和女主人公卡米拉·范·佩尔（Cammella Van Peyl），尽管女主人公的名字听着像外国人，但她是一个信奉“美国优先、美国唯一、美国永远”的“美国女孩”。

在一则插画广告里，信奉美国优先的卡米拉申明：“你唬不着我的，哈桑。”广告既充斥着对穆斯林的社会偏见，也将卡米拉的言辞包装得更华丽（“北方姑娘，天生泼辣”）。[\[3\]](#)

“You Cannot Frighten Me, Hassan.”

SPIES—WAR

This illustrates E. Phillips Oppenheim's great story, "The Pawn's Count," in HEARST'S MAGAZINE for September.

A German-American, an Englishman, a Japanese and Cammella Van Peyl, the American girl "for America first, only, always," is the heroine.

This is a first-class Oppenheim story. Fair warning, if you read as far as Cammella's interview with the villain, Mohammedan Hassan, you will be a confirmed Oppenheim reader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



Yankee Girl Hard to Frighten.

1917年和1918年席卷美国的战时爱国主义，当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梦或美国优先。“美国信条”的回归，要归功于美国前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的后裔威廉·泰勒·佩奇（William Tyler Page），他在一场“全国公民信条竞赛”中赢得了1000美元。佩奇的“美国信条”的开头如下：

我相信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其公正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许可；它是一个民主共和国，是集合了许多自治州的主权国家；它是一个完美的联盟，统一而不可分割；它建立在自由、平等、正义和人道的原则基础上，美国爱国者为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4\]](#)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佩奇的信条在美国各地的学校和市政厅被反复背诵，并被灌输给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正如在1892年撰写、在1945年获得正式地位之前已被广泛背诵几十年的“效忠誓词”（pledge of allegiance），佩奇的“美国信条”也会在反极权主义的斗争中回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优先”的含义迅速从战时的沙文主义回归纯粹的孤立主义。这当中不存在任何矛盾，因为它的民族主义本色始终如一。

威尔逊曾试图将“美国优先”归为美国在全球拥有领导地位的口号，但一股反对任何进一步结盟的民众浪潮压倒了这一努力。这个国家的情绪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大多数人仍然认为，欧洲的问题是欧洲自己的事情，美国政府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国内。他们已经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破了一次例；这个例外业已失效，现在是回归孤立主义常态的时候了。

威尔逊在《凡尔赛条约》上的立场以及他关于国际联盟的主张，在国内尤其不受欢迎。进步人士反对该条约向德国施加的巨额战争赔偿要求和与之伴随的巨额债务负担，也反对它任意处置领土，认为这是对他们为之奋斗的正义原则的背叛。保守派人士鄙视威尔逊建立国际联盟的企图，认为这是一场联盟的噩梦，而且将永远纠缠不清——这一次，人们更准确地引用了华盛顿的告别演说。

国会特别反对第十条，该条允许采取集体行动来维持和平，要求所有成员国“尊重并维持……联盟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独立免受外来侵略”。不干涉主义者痛恨这种表述，认为这掩盖了帝国主义的倾向，是推行帝国联盟意志的借口。反对者认为，第十条规定美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做出永久性的承诺，即一旦联盟遭遇“外部侵略”，美国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派兵。

“美国优先”带给威尔逊事与愿违的结果：现在，他的对手称他加入国际联盟的愿望是“站不住脚的”。

像沃尔特·李普曼这样的进步人士普遍认为，第十条中的一个问题在于，战后对领土变更的解决方案是不公正的，而该条款将迫使美国捍卫此种不公正。李普曼预言这将“给欧洲带来无尽的麻烦”，他极其准确地警告说，《凡尔赛条约》肯定会成为“严重分裂、极度怨怼的欧洲争议的前奏”。^[5]

但也有人反对国际联盟，因为它似乎将民主代理权从公民个人手中转移到了神秘的外国势力和国际金融家之手。特别是许多拥有小型农场和企业的白人男性，他们认为国际联盟是对其政治霸权的又一次侵犯，又一次将影响力从他们那里转移到“外来”团体之中，削弱了他们的权力。

当美国政界人士和媒体呼吁征收保护主义关税时，他们开始讨论所谓的“经济民族主义”问题，一个世纪后，这个说法也将重新被提起。银行家们辩称，美国一定会“与其他民族的经济民族主义正面接触并展开竞争”。^[6]被广泛转载的《新共和》的一篇社论反驳说，建制派反对德国民主自治，显然是为在美国建立后来被称为军工复合体的“未来的军备、军国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强权政治结构”找借口。^[7]

“美国优先”很快就被当作保护主义关税和反对国际联盟的战斗口号。市民写信给报纸，阐释为什么共和党是最爱国的政党。一封给《纽约论坛报》的市民来信这么写道：“称共和党为‘美国党’恐怕是恰如其分的，让我们高喊‘美国优先’的口号。”^[8]

在美国国内，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对《凡尔赛条约》第十条的批评最为尖厉。在赫斯特看来，国际联盟和第十条将不可避免地使美国卷入欧洲的外交冲突，他领导了在国内的运动，反对威尔逊说服国会签署和约的努力，重申国际联盟和世界法院是“令人作呕”的组织，其唯一的目的在于让美国深陷足以摧毁自身的外交冲突。

赫斯特在社论和给媒体的信中，公开威胁支持该和约的政界人士。赫斯特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毫无疑问，任何爱国的政治家都希望美国公民“知道他是如何投票并铭记自己是如何投票的”。赫斯特准备利用他的出版物——“现在有2500万美国人在阅读，而且读者人数与日俱增”——“尽一切可能，避免这些政治家和他们的选票出现在美国人民面前”。

最后，如果国会接受了《凡尔赛条约》，赫斯特誓言要将他的出版物“奉献”出来，以求“组建一个新的政党……其主导理念将是‘美国优先’，该党将仅忠诚于自由、民主和独立，正是这些令美国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独占鳌头”。^[9]

《斯克兰顿共和党人》警告读者，国际主义正以其“微妙的幻想”“包装光鲜的笼统表述和对普遍情感的诉求”欺骗美国公民。

“这个国家的人民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美国优先’。”^[10]

关于国际宣传渗透到美国的担忧并没有因为某些成功的调查报道而有所减轻，其中一篇报道揭露了“欧洲假新闻局”，后者是一个“纯粹出于投机目的而向美国传播毫无根据或完全扭曲的新闻”的计划。^[11]宣传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新想法，它第一次暴露出利用虚假或歪曲的信息来操纵舆论是一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情。

战争期间开始出现了对宣传的担忧；系统性的宣传对民主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所有依靠群众智慧的制度的脆弱性都立刻显露无遗。关于广告的现代观念表明，政治口号可以帮助创建一个竞选品牌，说服选民不仅选择一位候选人，还选择一种政治立场。19世纪，有了知名度通常就足够了，想想《蒂皮卡诺和泰勒也是如此》^[12]；而在20世纪，候选人越来越倾向于与意识形态如“美国优先”结盟。

“美国优先”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国化理念，包括呼吁将英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被吹捧为对抗外国宣传和外来观念的解毒剂。“美国优先必须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在公立小学里只应有一种语言，那就是出自《独立宣言》、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的语言，”曾指挥罗斯福的骑士队并在1920年寻求共和党提名的伦纳德·伍德（Leonard Wood）将军说：“要像避免死亡一样避免松散的国际主义，因为后者意味着国家的死亡。”^[13]

尽管很多人竭力宣称“美国优先”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理想，但许多知名教育人士公开鄙视它。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W. 艾略特（Charles W. Eliot）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言辞犀利地说道：

美国优先——这种看法无论是出自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极大地低估了美国人的智力和良好的判断力。只有那些有能力在1917年和1918年洞察美国芸芸众生的思想的公职人员，才能提出这样的看法，这说法似乎难以置信，却是一个屈辱的事实。[\[14\]](#)

更具代表性的是，新泽西州共和党参议员沃尔特·艾奇（Walter Edge）宣布，“推崇‘美国优先’公民与那些寻求‘世界强国’梦想的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后者将‘无条件地将美国卷入欧洲的漩涡’”。[\[15\]](#)美国各地的社论对此表示赞同，批评威尔逊“固执地坚持”国际兄弟情谊的理想，而“世界尚未为此做好准备”。[\[16\]](#)“简而言之，美国人希望首先捍卫美国。”[\[17\]](#)

不久之后，“美国是优先，是最终，也是永远”的理念在全美范围内复苏。从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到威斯康星州的绿湾，当地的报纸都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印在每期的社论版上。



到1920年初，赫斯特的《纽约美国人》（*New York American*）——宣称它的“灵感来自‘美国优先’”——拿出了500美元和100枚

“‘美国优先’银牌”，以表彰在纪念乔治·华盛顿征文比赛中获奖的学生，而华盛顿“一直支持美国是第一，是最终，也是永远”。

[18]在接下来的20年里，赫斯特时不时地会在他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报纸上加上“美国优先”的报头。



1920年3月19日，参议院第二次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将和约发回威尔逊总统（关于他在六个月前中风的传言终于在此时开始流传）。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些愤怒的美国公民的来信，坚称美国应该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努力恢复威尔逊式“美国优先”的国际主义内涵，即在世界舞台上首先做正确的事。

“我们愤怒而羞愧地看到美国从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上坠落，”一封读者来信抗议道，“‘美国优先’应该是指美国首先（而不是现在的最后）兑现它的承诺；美国首先，而不是最后，承担它的道义责任；美国是首先而不是最后，自愿做出牺牲。” [19]

1920年夏天，共和党人提名沃伦·G. 哈定作为总统候选人。1914年，哈定以“繁荣的美国优先”为纲领，成功当选为参议员。现在哈定把它作为自己竞选总统的口号。“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叫作民族自利，但我认为这是对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的一种激励——保卫美国优先，稳定美国优先，繁荣美国优先，考虑美国优先，尊崇美国优先，敬畏美国优先，为美国优先而活。” [20]

许多美国人确实称其为民族自利。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份报纸报道称，哈定被斥为“‘自私、自我中心、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中世纪反动信条’的倡导者”。 [21]《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

(*Indianapolis Journal*) 早在1895年就告诉读者，英国人用沙文主义形容那些通过“挥舞战争旗帜威胁、恫吓和排挤其他国家”来寻求权力的人。沙文主义是欺凌弱小者的爱国主义；它专挑弱小国家，从来不讲原则，只谈荣耀；从来不为正义，只为私利。[\[22\]](#)

1920年夏天，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 (Henry Cabot Lodge)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以“美国优先”之名谴责国际联盟。洛奇警告说，美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凡尔赛条约》。他宣称，“凡事先想到美国的人都不必害怕回应”威尔逊“专横的要求”。[\[23\]](#)

6月30日，哈定在新设备——留声机上录制了“美国优先”讲话，作为其选战活动的一部分；一个月后，他在接受提名时引用了这句话，承诺要用“美国优先”来反对威尔逊国际主义和国际联盟的“大错特错”。其他人注意到了这一讽刺。“总统候选人哈定正在拿‘美国优先’大做文章。共和党人喊出的这一口号的问题在于，它是从威尔逊政府那里借来的。”[\[24\]](#)表面上看，哈定的竞选海报和四年前威尔逊的非常相似。



全国范围内发行的《美国经济学家》（*American Economist*）在社论中表示支持哈定作为总统候选人，并承诺哈定（“一个正直廉洁的人”）将开创一个“民族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的时代，我们将拥有一位以‘美国优先’为要务的国家元首”。[\[25\]](#)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北卡罗来纳州的一篇社论反驳道：“哈定参议员空谈‘美国优先’。可是谁想把美国摆在第二位？如果不是华盛顿的这群共和党参议员——哈定参议员也是其中一位——在维护世界和平与自由的强国协商会议上，首先落座而且坐在首位的如今一定是美国。”[\[26\]](#)

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句口号的爱国主义精神很快就不言自明。得克萨斯州在独立日当天刊登了一则广告：“明天——7月4日，美国人民将再次宣誓效忠于美国国旗，并再次宣誓相信《独立宣言》

体现的伟大原则。美国优先已经成为所有忠诚的美国人的口号。”
[27].

这种对公民美德的赞歌被一个事实稍微削弱了，那就是它推销的是洗衣服务（“你家的床单、桌布永远簇新——你家的衣服永远簇新”），图中山姆大叔对着“美国优先”沉思。



不管这则广告是不是有意搞笑，关键在于“美国优先”已经完全融入全国性的对话，结果是，到1920年，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它就像独立日、《独立宣言》和山姆大叔一样具有标志性。

但它也仍然存在分歧。全美各地的人写信给当地报纸和《纽约时报》，谴责这种表述及其情绪，认为它代表着一种丑陋的极端民族主义。一位记者观察到，“当[哈定]第一次回国演讲，在结尾处六次

重申‘美国优先’时，人们觉得他肯定要脱口而出诸如‘德意志高于一切’之类的话了”。[\[28\]](#)

另一位记者则更为直白地宣称：“在我看来，‘美国优先’是一个非常恶毒的口号。”[\[29\]](#)

这年7月，《匹兹堡邮报》指责哈定暗示那些不同意他的人就是没有把“美国放在第一位”。这篇社论认为，判断美国主义的标准不仅应该是战争期间对国家的热爱，还应该是“在和平时期对国家原则的忠诚。如果说在美国的信条中有一个原则更加突出的话，那就是对意见的宽容。由此可见，一个不宽容的人绝不是一个理想的美国人”。[\[30\]](#)

但是，哈定经常指责那些反对他的人不够正直，包括他自己党内敢于挑战共和党保守派的进步人士。这篇社论进一步说，哈定通过卑鄙地宣称“民主党人不支持美国优先”来攻击他的政治对手。哈定越早认识到，仅仅因为对手不同意他的观点就指责他们是叛徒的做法为人所不齿，对所有人来说就越好。[\[31\]](#)

《纽约时报》写得比《匹兹堡邮报》更妙。它认为“美国优先”这个说法本身就为人所不齿，并对它的“陈腐”嗤之以鼻，“有史以来所说的最多的陈词滥调。‘美国优先！’‘同意，同胞们，让我们都热爱我们的祖国吧。’每一个共和党人的竞选演说都在反复念叨着这类激动人心的口号”。这篇社论总结称，哈定演讲最出色的地方在于，它为所有有头脑的人“彻彻底底地减轻了智力负担”。[\[32\]](#)

然而，这句口号仍然很受群众欢迎，尤其顺应政客们忙于煽动的排外恐惧。这年秋天，哈定在后来被称为“对外国出生人士的讲话”中，提出了以“美国优先”来抵御“连字符公民”的危险。哈定宣称自己“坚决反对任何当前或未来的连字符公民美国主义”，他警告

说，国际联盟必定会把手伸向那些“心意从‘美国优先！’转向‘连字符公民优先！’的部分美国人团体。”

哈定认为，美国必须防范“有组织的连字符公民投票”，以避免对国家的控制权“转移到外国资本手中”。^[33]所有这些委婉语——国际主义将把选民分成个别团体，国家必须阻止有组织的连字符公民投票，外国阴谋集团在等着攫取美国的财富——实际上等于妖魔化作为一个整体投票的所有移民社群，故意将国际主义与排外情绪混为一谈。

哈定批评民主党未能为自己的价值观提出积极的理由，他说：“我们不知道对手的立场是什么。我代表的是一个团结的美国，一个人道的美国，一个高效的美国，美国优先。”^[34]

哈定的听众并没有忽视这些暗语的潜台词。1920年10月31日，一位愤怒的美国公民在大选前夕写道：“‘美国优先’和‘我赞成置身事外’的口号让人不寒而栗。美国可能会对国际联盟‘置身事外’，但它不会置身于历史之外。”^[35]

1920年10月，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尔·海斯（Will Hays）宣称，他可以看到“共和党人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走向胜利’”。^[36]11月3日，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在白宫和国会选举中取得全面胜利，包括在大选中战胜民主党候选人，此番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人选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哈定在胜利后说，参加“一战”不是为了确保民主，而是为了确保美国在海外的权利：国际主义只会为民族主义服务。担心美国退出世界舞台的欧洲政界人士相互打气说，“哈定参议员的成功只是‘美国优先’口号所代表的理念取得的暂时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

将长期坚持这一立场。^[37]毫无疑问，这只是一种竞选策略，美国将重返世界领导地位。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一旦哈定获胜，“美国优先”似乎就获得了合法地位；很快，它被视为一项行政政策，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1920年大选后，有读者致信《纽约时报》为这种理念辩护：“所有消息灵通的人士都明白，‘美国优先’仅仅意味着保护和捍卫我们的国内事务不受任何不利的外界势力的入侵或干扰，”这包括“虚无主义的讨论和实践，激进的社会主义或外国宣传”。“美国优先”的唯一目的仅仅是抵御“分裂的影响”，该口号“在选举后期获得通过”，如今已成为政府的政策。“美国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步调一致。”^[38]

虚无主义、激进社会主义的威胁，以及“美国优先”旨在打击的外国宣传，都与欧洲知识分子有关，而且其中许多人是犹太人，这绝非巧合。这些带着异端思想的激进知识分子，被视为对“美国优先”的“普通”支持者的威胁，而“美国优先”——通过另一条关联链——成了一种公然的反知识分子立场。乡村人口认为，自鸣得意的国际化精英，如因侮辱美国中产阶级中的“乡巴佬”和“土包子”而出名的作家H. L. 门肯（H. L. Mencken），在嘲笑他们的道德和宗教。

结果是，“美国优先”绝不仅仅是共和党人的问题。就在大选结束后不久，密苏里州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里德（James Reed）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美国优先感恩节”庆祝活动上说：“我们已经走出梦境。”里德属于一个被称为“不可调和者”

（Irreconcilables）的两党国会议员团体，他们单方面拒绝任何形式的《凡尔赛条约》。“美国人民拒绝降下美国国旗。我们已经走出了梦境。人民是永远可以信赖的。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祖先意识到了这一点。”讲到这里，里德加进了一些种族主义的调料。“他们知道，

正如杰斐逊当年所知道的那样，人民的常识比少数知识分子的全部知识还要丰富。” [\[39\]](#)

这种考量使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国元勋和普通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抵制住在虚幻梦境中的外国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在这里稍做停顿，设想这种情景：博学的美国首任驻法国大使杰斐逊抵制外国知识分子）。指责身处都市、国际化的知识分子不如直言不讳的乡下人那么美国化，或者说不那么“真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为该国反精英民粹主义的周期性爆发埋下了伏笔。到1920年，它已与“美国优先”联系在一起。

从“梦境”中走出来，里德所谓的“真实的美国”拥抱了沃尔特·李普曼所认为的一种幻觉，一种普通民众质朴智慧的梦想，一种显而易见的反智主义力量。并不巧合的是，李普曼就是来自纽约的第一代德裔犹太移民——参议员里德正以“盎格鲁-撒克逊”父辈的名义，鼓励其选民抛弃他这种类型的“外来”的公共知识分子。每一个团体都习惯性地指责对方抱有幻想，生活在虚幻中。

1920年早些时候，前参议员阿尔伯特·J. 贝弗里奇（Albert J. Beveridge）在印第安纳州对一群“数量庞大的听众”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将同质性与他的美国同胞的现实加以比较。贝弗里奇肯定地说，他不仅支持美国第一，而且支持美国唯一。

我是民族主义者；我反对国际联盟。我是民族主义者，这既是与生俱来的，源于信仰，源于思考，也是基于审慎的理由。原因何在？当这个国家成立时，它是一个同质的国家。我们现在不是一个这样的国家，而是一个不同种族团体的集合体，没有任何一个种族居于主导地位。我们不是一个民族，正如法国人不是一个民族，意大利人不是一个种族实体。直到我们成为一个民族，种族界限消除，我们的血液、

名字和目的趋于同一，我们才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一个与众不同的种族。不是美国第一，意大利第二；不是美国第一，法国第二；不是美国第一，德国第二。我们的口号应该是美国唯一。

对于纯化“美国种族”的呼吁，以及回到单一种族的神话般的过去，现场大多数听众回以雷鸣般的掌声。[\[40\]](#)

1920年，三K党也将“美国优先”作为其口号，这应该不足为奇。1919年7月4日国庆节，得克萨斯州一名三K党领导人在演讲中宣称：

“我永远都支持美国是第一，是最终，也是永远，我不希望任何外国势力指指点点，告诉我们该怎么做。”[\[41\]](#)当年美国只由种族纯正的北欧“普通人”组成的离奇幻想，也是三K党制造的国家起源神话，他们希望强迫堕落的美国回归这种过去——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将不惜诉诸暴力。

私刑已经构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危机，以至于在1920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人被敦促在自己的政纲上增加一项条款：将私刑定为联邦罪行。那年夏天，《纽约论坛报》刊登了一位读者的来信，建议共和党这么做。在同一版上，另一位记者说：“诉诸种族因素太有吸引力了。这个国家必须消除一切排外主义。”他坚称，美国主义并不代表“美国优先”——这个表述本身带着怀疑的意味，就好像还有第二种选择似的——而是代表“美国唯一”。排外主义和外国势力领着这个国家误入歧途：“作为美国人，我们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样每个阶级、种族、教派都可以感到满意。”[\[42\]](#)这位作者反对过多地迎合种族元素，呼吁消除一切排外主义，并希望确保“每个种族都可以感到满意”，但他似乎没有看到这当中有任何矛盾之处。

那一年，共和党没有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任何反私刑政策，这使得美国的每一个种族都不太可能觉得满意。

相反，在地方政府决定如何或是否起诉动用私刑者时，本州主权仍然被拿来当作借口。多数情况下使用私刑者并没有被起诉，在1918~1921年的四年里，美国至少有28人被公开烧死在火刑柱上。

到1920年，大多数美国报纸至少公开谴责了私刑。但是，为种族暴力做合理辩护所需的认知扭曲总是会造成令人吃惊的盲点。例如，1920年7月，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份报纸发表社论称，威尔逊和哈定的“美国优先”口号“只是有点自私”：“一年前，美国领导世界；今天，我们完全被孤立。”

该报〔讽刺的是，它名为《华盛顿进步报》（*Washington Progress*）〕在这篇社论里谴责自私自利，而在同一个版面紧挨着的位置还发表了一篇社论，威胁要对美国黑人处以私刑。“又有一个黑人畜生对一名白人女子犯下了可怕的暴行，并导致另一名白人男子死亡，数人受伤。”文章这样开头，随后陷入歇斯底里的混乱：“这已经是近期第二起事件，之前的那个黑人被私刑处死，对最后这一个也有此打算（原文如此）。”

在对道德和法律做了简短的口头承诺——“私刑令人震惊，不应得到许可”之后，这篇社论很快就开始指责受害者：

但情况每况愈下，我们不应容忍。黑人不妨彻底认清这一事实。如果有色人种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愿意做出选择，他们可以帮助消灭这种罪行并保持种族间的相互好感。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不管人们如何谴责私刑，它还是会被不断使用。[\[43\]](#)

只要美国黑人不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接受白人强加给他们的部分公民身份，立即处决式的暴力就不会消失。

后来，历史学家无可辩驳地证明，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行为是对他们在这时期取得的政治和经济成就的强硬报复，而维持性关系的底线通常只是一个借口。早在1903年，美国当地报纸就承认了“经济竞争”导致私刑的事实。^[44]少数族裔越是能获得经济自主权并融入国家社会，引发的报复性暴力就越多。（压迫者认为少数族裔这么做是“傲慢”——他们没能搞清楚自己的位置——压迫者也用这种逻辑说服自己，让他们相信受害者是罪有应得，激发暴力者理应承受暴力）

针对黑人的暴力绝大多数是出于经济动机，即使在当时，外界也偶尔无法忽视这种动机。内布拉斯加州一份当地报纸在1920年报道说，“数千名黑人”被“白帽暗夜骑士”强迫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地里干活。然而，标题对这种强迫劳动的描述略有不同：“穿着三K党服装的‘暗夜骑士’的行动拯救了棉花作物”。^[45]看来应该祝贺三K党做出“英勇”的决定，通过暂时恢复奴隶制来拯救眼看烂在田里的棉花作物。

与此同时，私刑正在南方蔓延开来。1920年，《达拉斯快报》（*Dallas Express*，自称是“南方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黑人报纸”）指出，五年前北方的私刑非常罕见，因此一旦发生就会占据新闻报道的头条，而在南方，私刑并不那么受关注。^[46]但是到了1919年，美国82起私刑中，2起发生在科罗拉多州，1起发生在华盛顿州，1起发生在内布拉斯加州，1起发生在堪萨斯州。

1920年6月，三名在马戏团务工的黑人男子——他们分别叫埃利亚斯·克莱顿（Elias Clayton）、埃尔默·杰克逊（Elmer Jackson）和伊萨克·麦克（Isaac McGhie）——在明尼苏达州德卢斯被处以私

刑，他们被控强奸一名白人女孩。这个据称的受害者后来接受了医生的检查，但没有发现身体受到侵害的证据。没有人因为谋杀被起诉。

两个月后，一伙1000多人的暴徒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一所监狱，用私刑处决了被控谋杀一名白人妇女的利奇·丹尼尔斯（Lige Daniels）；他半悬在空中的尸体的照片被制成纪念明信片，尸身下方一如既往地挤满了傻笑的白人，当中也有孩子。

那年晚些时候，加利福尼亚州圣罗莎市又发生了一起公开的私刑事件，而且这次是一连绞死三人，其中一名围观者向媒体生动地描述了这一“令人作呕”的事件。[\[47\]](#)

甚至在当时，人们就注意到动用私刑的借口越来越站不住脚，似乎暴民再也不用为酷刑和谋杀寻找借口。《达拉斯快报》上的同一篇文章指出，公共舆论一度仅认为“黑人对白人女性实施强暴”可构成“足够的挑衅”。但现在“公共舆论变得更加纵容”。[\[48\]](#)20世纪初对美国黑人实行当即处决时提出的“理由”包括“胡言乱语”“赌博纠纷”“工资纠纷”“债务纠纷”“传播文学”。

对于三K党来说，“美国优先”提供了一块遮羞布：一种在社会和政治上都可以接受的仇外心理，掩盖了一种自发的种族主义，至少他们在公开层面声称其并没有清除“外来元素”，对黑人也没有任何敌意。但事实是，三K党很少攻击外国人，无论是新移民还是来自其他国家的访客。相反，“外来元素”是对错误的美国人群体的一种本土主义的委婉语：名称是用归化的美国公民连接的那类美国人，带有外来观念的那类，名字像外国人的那类，信仰外来宗教的那类，或者带有外来种族血统的那类。

但是，因为“一滴血法则”不可能行得通（毕竟所有的血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证明种族纯净度比像三K党这样的组织愿意承认的难得多。人们可能隐藏自己的真实血统，以白人甚至美国人的身份“招摇过市”，这种可能性可能会让本土主义者非常焦虑，而在焦虑的重压下，他们可能会鼓捣出一套关于当权者血统的阴谋论。

这就是为什么在1920年哈定当选在即时，他突然被人说成是黑人。

1920年10月，媒体披露了针对总统候选人的秘密阴谋论，这是他的对手为了阻止其入主白宫捏造的。《纽约先驱报》头条写道，这是“震惊世界的政治堕落和道德败坏”的一个例证。他们揭露了“一个卑鄙的阴谋”，即“通过阴险地断言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沃伦·G. 哈定带有黑人血统，从而‘偷走’选举”。[\[49\]](#)

这一指控基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即拥有“黑人”的部分血统不仅是不光彩的，而且会因为不是“百分百美国人”而被取消总统资格。“百分百美国人”可以被解释为黑人、外国人、叛国者，或者三者兼而有之。

愤怒的共和党主席向选民保证，哈定是“纯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同时他也反对那些毫无根据的指控被广泛传播，而且还有那么多人相信，他声称这是“有史以来对拥有崇高荣誉的候选人最可鄙、最下流的攻击”。[\[50\]](#)许多人感到震惊的是，即使是在现代，总统的荣誉也不足以使候选人免受有关他血统的下流谣言的伤害。

在美国各地转载的一篇社论中，来自哈定家乡俄亥俄州的一家报纸愤怒地谴责了攻击这位总统候选人合法性的“流言蜚语”。美国本应摆脱对人不对事的人身攻击。“本世纪的总统竞选主要是在公开场合进行，主要考察的是执政原则、候选人的性格和意愿。”[\[51\]](#)

有读者来信称，现在民主党人在散布哈定的祖母是黑人的谣言，试图恢复一种丑陋的“卑鄙的党派偏见”。没有一个民主党人正式支持这种“鬼鬼祟祟的宣传”，但是关起门来，他们都在四处散发小册子。[\[52\]](#)

对哈定的辩护不断涌现，有人拿出了他的家谱，详尽地解释了他家族的祖先来自何方（苏格兰拉纳克郡）、何时到来（17世纪），同时还承诺“要证明在他们之中没有掺进一滴黑人的血”。[\[53\]](#)

读者来信结尾写道，“美国人通常反对谎言，尤其是那种只有在暗处才会盛行的谎言。除非我们人民的天性发生改变，否则他们将在选举日展示自己对这场地下运动的确切看法”，这场以种族为理由、通过耳语诋毁总统合法性的运动。来信者确信：“不能在美国自由开放的媒体上进行的政治竞选活动，对任何政党或候选人都没有好处。”

《圣路易斯邮报》报道说，俄亥俄州的三家报纸“谴责”谣言，宣称“沃伦·哈定拥有纯洁的心灵和纯美国主义，涌动着豪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他的血管中只流淌着白人纯净的血，他的祖先为他留下了绵延漫长的文化血脉，这是一群他可能以之为荣的男人和女人——他以他们的成就为荣，以他们美好的家庭生活和理想为荣，以他们纯粹的种族完整性为荣。”[\[54\]](#)

所有这些“纯洁性”即使不是同等的，也是相关的。纯洁的心灵、纯美国主义、豪迈的爱国主义情怀、纯净的白人血统、令人钦佩的文化、崇高的成就、美好的理想、纯正的种族，每一项都与其他密不可分。

从“美国优先”的“纯美国主义”到“白人的纯净血统”，这只用几个简单的修辞步骤。这也不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用带有太多

“黑人血统”来暗示一位总统不算是“百分百美国人”，因而不适合担任总统，尽管似乎没有人要求哈定提供出生证明。

记者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广受美国人喜爱，被誉为“堪萨斯的贤人”。同年12月，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一个多么该死的世界啊！“如果十年前有人告诉我，我们的国家会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肯定会质疑他的理由。” [\[55\]](#)

[\[1\]](#) *Greensboro Daily News*, Greensboro, NC, 25 July 1916.

[\[2\]](#) *Buffalo Commercial*, Buffalo, NY, 17 February 1917.

[\[3\]](#) *Washington Times*, 29 August 1917.

[\[4\]](#) *Los Angeles Times*, 4 April 1918.

[\[5\]](#)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80, pp. 158–9.

[\[6\]](#) *New York Herald*, 27 January 1919.

[\[7\]](#) *St. Louis Post-Dispatch*, 20 November 1918.

[\[8\]](#) *New York Tribune*, 1 March 1920.

[\[9\]](#) *Washington Times*, 8 February 1920.

[\[10\]](#) *Scranton Republican*, Scranton, PA, 26 July 1919.

[\[11\]](#) *Burlington Free Press*, Burlington, VT, 28 May 1920.

[\[12\]](#) *Tippecanoe and Tyler, too*是1840年美国大选中的助选歌曲，在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总统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逊在蒂皮卡诺战役中一战成名。

[\[13\]](#) *New York Times*, 29 February 1920.

[\[14\]](#) *New York Times*, 15 February 1920.

- [15] *New York Times*, 10 March 1920.
- [16] *Times-Dispatch*, Richmond, VA, 10 March 1920.
- [17] *Times-Dispatch*, Richmond, VA, 10 March 1920.
- [18] *Brooklyn Daily Eagle*, 13 February 1920.
- [19] *New York Times*, 20 March 1920.
- [20] *New York Times*, 13 June 1920.
- [21] *Courier*, Asheboro, NC, 5 August 1920.
- [22] *Indianapolis Journal*, 23 December 1895.
- [23] *Albany-Decatur Daily*, Albany, AL, 8 June 1920.
- [24] *Fayetteville Observer*, Fayetteville, NC, 1 July 1920.
- [25] *Kinsley Mercury*, Kinsley, KS, 1 July 1920.
- [26] *Winston-Salem Journal*, Winston-Salem, NC, 2 July 1920.
- [27] *El Paso Herald*, El Paso, TX, 3 July 1920.
- [28] *New York Times*, 25 July 1920.
- [29] *New York Times*, 1 September 1920.
- [30] *Pittsburgh Daily Post*, 1 July 1920.
- [31] *Pittsburgh Daily Post*, 1 July 1920.
- [32] *New York Times*, 19 October 1920.
- [33] Warren G. Harding, "Address to Foreign Born" , *Marion*, OH, 18September 1920.
- [34] *New York Times*, 25 October 1920.
- [35] *New York Times*, 31 October 1920.

[36] *New York Times*, 18 October 1920.

[37] *New York Times*, 4 October 1920.

[38] *New York Times*, 14 October 1920.

[39] *New York Times*, 28 October 1920.

[40] *Indianapolis Star*, 23 February 1920.

[41] *News and Observer*, Raleigh, NC, 5 July 1919.

[42] *New York Tribune*, 2 February 1920.

[43] *Washington Progress*, Washington, NC, 22 July 1920.

[44] “Econom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negroes and the ‘poor whites’ is a source of trouble ... The Southern ‘cracker’ is the bitterest enemy of the negro, and he leads and composes a large part of the lynching parties”, *Courier-Journal*, Louisville, KY, 10 May 1903.

[45] *North Platte Semi-Weekly Tribune*, North Platte, NE, 23 November 1920.

[46] *Dallas Express*, 17 January 1920.

[47] *Santa Ana Register*, Santa Ana, CA, 10 December 1920.

[48] *Dallas Express*, 17 January 1920.

[49] *New York Herald*, October 1920.

[50] *Lincoln Star*, Lincoln, NE, 28 October 1920.

[51] Quoted in *Public Ledger*, Maysville, KY, 30 October 1920.

[52] *Daily Arkansas Gazette*, Little Rock, AR, 31 October 1920,
p. 24.

[53] *Daily Arkansas Gazette*, Little Rock, AR, 31 October 1920,
p. 24.

[54] *St. Louis Post-Dispatch*, 31 October 1920.

[55] “William Allen White to Ray Stannard Baker, 8 December 1920”, Walter Johnson, ed., *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Allen White*, New York: Henry Holt, 1947, p. 213.

第二部分 1920~1930年

5 美国梦 1921~1923年：推销员的盛世

当哈定总统把美国的注意力聚焦于“美国优先”时，“美国梦”继续逐渐成为一种提升核心国家价值观，甚至是理想主义在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中的威望的方式，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自尊意识的增长。

1921年1月，沃尔特·李普曼写了一篇文章，此文从未发表过，但被收录在关于他的论文集中。在文中，他认为美国犹太人应该吸收而不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造锡安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实现美国梦同样精彩。”[\[1\]](#)

除了可能引起争议的政治立场（这也是李普曼的传记作者提到该文的原因），这段之前未发表的引文实际上代表了“美国梦”一词在描述抱负、同化和移民经历时最早的现存用法之一。这一想法显然清晰地留存在李普曼的脑海中，因为不出两年，他将在另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再次提到这个短语。

它在慢慢积聚文化势能。一年后，《匹兹堡新闻》（*Pittsburgh Press*）讲述了一个故事：三位有进取心的剧作家在长岛租了一套房子，“他们希望在这个避世之所勾画伟大的美国梦”。这是较早将美

国梦视为职业抱负和快速致富计划的结合：进步时代的理想日益渗透进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的态度中。^[2]

1922年初，《阿克伦灯塔报》（*Akron Beacon Journal*）仍有可能大书“世界和平的美国梦”，但这个词在经济语境中的使用不断增多，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经济确实蒸蒸日上。^[3]20世纪20年代，每一个美国人或许都有机会发财致富的梦想——不仅仅是繁荣，还是巨富——开始蔓延，彼时股市在承诺每个人花上几美元就能赢取大奖，就像百老汇和好莱坞也似乎在暗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明星，或者写一部热门剧一样。

随着国家对繁荣的关注成为定势，20世纪20年代，一些作家以小说作为回应，这些小说现在被视为有关“美国梦”的经典著作，尽管这些小说都没有使用了这个短语。

1922年最畅销的美国小说是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巴比特》（*Babbitt*），小说对美国人从众、粗俗的物质主义和全国性的商业崇拜进行了猛烈而颇受欢迎的讽刺。在小说的开篇，乔治·巴比特（George Babbitt）心满意足地凝视着一座银行大厦，将其视为“商业神圣殿堂中的顶峰，一个忠贞、热诚、高贵、卓越的人”。^[4]刘易斯写道，巴比特喜欢抱团，不假思索地遵守规则；他条件反射般地遵循共和党长老派主义，这“坚定了商界人士的信仰”。^[5]尽管巴比特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天真的庸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简直讨人喜欢，但他的信仰仍然相当庸俗。如果从小说中走入现实世界，巴比特恐怕会为一些同行所理解的“美国主义”的丑陋所震惊；他虽然既愚蠢又自私，但并不恶毒。

刘易斯多次揶揄奉行“美国优先”的共和党人和“百分百美国人”。他解释道，巴比特是好市民联盟的一员，“属于最富裕的顶层公民”，这包括乔治·巴比特这类“普通人”，他们代表的是“推销

员的繁荣”，但也包括“一些贵族，他们是一些比较有钱或是许多代以来一直有钱的人，如银行和工厂的总裁、农场主、公司的律师、时髦的医生”。[\[6\]](#)

“好市民联盟”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劳工阶级应该有自己的地位；而他们也认为美国的民主思想并非意味着财富上的平等，但要有健全一致的思想、穿着、艺术观、道德和语言”。[\[7\]](#)通过讥讽“美国优先”的一致性，刘易斯不无讽刺地提醒他的读者，美国梦确实意味着“财富上的平等”，这是美国人在过去20年里一直谈论和书写的梦想，但共和党日益否定它的好处——他们支持的是无节制的资本主义。

巴比特的好市民联盟还支持“美国化运动，举办了英文、历史和经济学的晚间课程教育，和有关新闻的媒体教育班，如此一来，这些新抵达的外国人方能全面地了解美国。美国人解决劳工纠纷的方式就是让工人相信并爱戴他们的雇主”。[\[8\]](#)

资本主义对“劳工问题”的回应是教育工人，爱国主义意味着爱你的老板，这种观点不仅仅是一个笑话（尽管很好笑）。《巴比特》一书中的大部分怒气都是针对这样一种观点：商业是美国的宗教，这个国家崇拜的是金钱。在19世纪美国迅速扩张的时期，商业被提升到爱国美德的高度。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在1931年所主张的那样，商业不再是一种像所有其他事业一样受道德规范约束的职业，而是开始超越道德。“赚钱已经成为一种美德，它不再受美德的控制，而是与美德并驾齐驱。”[\[9\]](#)一个世纪后，从这种逻辑中生发出一种普遍受到追捧的观点——百万富翁一定是好人，否则他们不会如此成功。这是认为财富是上帝恩典之标志的加尔文主义庸俗观点的延伸。

早在1913年，英国诗人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在纽约之行中就有一个令他震惊的发现：美国人实在是太崇商了。对此，他评论道：“这一切都证实了来美国旅游的人正日益加深的印象，商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展成一种宗教，而且这不仅仅是轻飘飘的隐喻。” [\[10\]](#)

《巴比特》大受欢迎，引发了全美范围内的争议和讨论，由此“巴比特”成为一种人尽皆知的角色类型，同时也使刘易斯闻名海外。英国版的《巴比特》在出版时，增加了一个生词表，收录了一些难以理解的美国俚语，如Gee（“清教徒对上帝的委婉称呼”）和liberal（“心胸开阔的准美国人的标签”），在当代人眼中，这恐怕是“Throw shade” [\[11\]](#)的早期案例。

那年秋天，《纽约时报》评论说，中西部居民对刘易斯的戏谑大为恼火，告诫纽约人不要过于享受这个以牺牲美国腹地民众为代价的笑话，因为“纽约人自身也经常是类似错误的受害者”。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其他地区有太多的居民被称为“非美国人”。（事实上，这篇文章接着说，“纽约是最具美国特色的城市”，原因很简单，它的居民“几乎来自美国的每一个村庄、小镇和城市”） [\[12\]](#)

巴比特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无知、自满、轻信，不假思索地接受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灵丹妙药。但是，尽管巴比特表面上自私自利，他被一种长期的、琐碎的不满困扰，隐隐地感觉到他身处的世界在精神上十分贫乏和虚伪，却不知道如何去识别或纠正它。他的故事现在经常被当作批评“美国梦”空洞性的杰出小说之一来讨论。但刘易斯从未提及美国梦；这类分析首先假设美国梦意味着物质主义，因此其空洞性必然被揭穿。

就在刘易斯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还存在其他美国梦，但是现在它们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在我能找到的所有文献记载中，最早将移民的“美国梦”与美国作为机遇之地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记录是在1922年，尽管李普曼在1921年那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已经含蓄地表达了这一含义。正如大多数最早将美国梦视为个人抱负的文献一样，1922年的这处说法表达的不是一种希望，而是一种失落。“美国梦破灭了”，1922年，俄勒冈州一份报纸在关于德国移民家庭的报道中写道，他们“梦想着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结果却签署了一份相当于契约仆役的合约，遭遇了“实质上的奴役，只能忍饥挨饿”。[\[13\]](#)

这似乎也是标题中“美国梦”的首批用例之一，表明读者越来越容易理解这种简略的表述；从沃尔特·李普曼撰写的有关东海岸犹太民族主义的文章，到太平洋西北地区（Pacific Northwest）的一位编辑撰写的有关当地德国移民的报道，“美国梦”在美国各地日益清晰。

随着它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它也慢慢变得不再那么具体。不是关于这个或那个特定事物的美国梦——它只是美国梦，一种假设每个人都心怀同样的梦想，并且不被告知就知道它代表何物的用法。

但是，即使人们逐渐开始使用这个表达，好像它的意思是固定的，他们这样做的背景清晰地表明，它的含义实际上不断变化。在进步时代，美国梦被认为是控制不平等和保护民主的改良的梦想。20世纪20年代，美国梦的说法开始频繁出现，同时美国也在大举颂扬财富，传播对新财富侵入旧权力堡垒的焦虑情绪。有关移民问题的辩论在全国各地持续升温。

作为一个短语，“美国梦”可以把所有这些相互冲突的想法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结合在一起。1923年，《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社论

敦促美国“关闭大门”，认为取消对移民的限制将是“伪装成人道主义的短视利己主义”。它坚持认为，反对增加移民在经济上站得住脚，并补充说：“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和谐而同质的民族，我们必须自由地从事这项同化工作，而不需要不断地吸收新元素。”换句话说，通过同化的工作，移民可以与种族同质的观点协调一致，但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从已经存在的“元素”中挤压出异质性。不能再让新的元素融入这个大熔炉。

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即使移民将提供廉价劳动力的经济论点是正确的，“我们仍应反对打开大门。因为我们美国梦的未来取决于美国公民的特性，而不是我们口袋里的现金”。^[14]这就是进步时代的“美国梦”，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坚持认为评判美国的标准应该是它的价值观，而不是它的财富。但进步的理想正被用来为一种种族主义仇外心理辩护，这种心理认为，这个国家必须是“同质的”，而进入这个国家的这些“新元素”，顾名思义，不可能具有良好的品质。即使他们带来了金钱，这些“元素”也会破坏“美国梦”。老移民可以留下；新移民被挡在门外。

“美国优先”的仇外情绪——这正是《华盛顿邮报》在1845年的一篇社论中提醒人们警惕的问题——正在渗入“美国梦”的思想中。它将导致美国信条遭到贬损，退化成“没有美国心”的人所信仰的自私自利的本土主义。

如何判断移民社区和少数民族的“价值”？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变得日益紧迫。20世纪20年代初，对许多人来说，披着科学外衣的种族主义提供了显而易见的答案。1916年首次公布的斯坦福-比奈智力测试（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tests）是将优生学假设制度化的最有效、最顽强的尝试之一。

到20世纪20年代初，智商测试被用来证明任何数量的群体分类都是正确的。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为《新共和》撰写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文章，抨击军队使用这种测试手段。这又为他一年后的论点铺平了道路，他认为智商测试会破坏美国梦，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这是“美国梦”首次出现在出版物上。[\[15\]](#)

李普曼一开始就尖锐地警告说，智力测试是“对一群人进行分类的工具，而不是‘智力的衡量标准’。人们根据解决问题的成功程度来划分群体，但这些问题可能是智力测试，也可能不是”。[\[16\]](#)李普曼对这种做法错误的前提进行了严厉批评：“我们无法衡量智力，因为我们从未对它下定义。”此外，他还能清楚地看到关于智力“先天论”的优生学基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主张“没有科学依据”：“从受孕之日起，智力就与无数种教育和环境影响不可区分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我们无法甄别出其遗传基础。”[\[17\]](#)

1923年7月，李普曼将智力测试的生物决定论视为对个人实现机会均等的美国梦的直接威胁。考虑到在半个世纪之内，以及未来几十年里，受教育的机会将被普遍视为实现美国向上社会流动的梦想的基础，李普曼的立场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因为他的论点恰恰相反。

李普曼在全美被广泛转载的《教育与白领阶层》（*Education and the White Collar Class*）一文中预测，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断增多，专业管理职位的供给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超过需求。一些有志于从事新闻职业的高中生曾向李普曼请教，目前来看，“对他们开放的职业林林总总”，似乎拥有无数选项。可是到底有多少白领职位对毕业生开放呢？

李普曼估计，美国大约有1000万个专业管理职位，但每年有50万名毕业生进入职场。现有职位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要么经验丰富的人被解雇，为拥有现代技能的年轻一代腾出空间，要么年轻人被排除

在与其教育相称的职位之外。考虑到产业环境迅速变化，一个国家如果面临毕业生过剩且无法胜任那些尚未成为现实的工作的局面，该如何应对？

李普曼认为，美国现在在偷偷摸摸地试图通过标准化考试来限制竞争激烈的高中和大学的入学人数。有些人利用标准化考试来证明拒绝包括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在内的“劣等”群体接受精英教育是正当的。李普曼坚称，这些测试是“一派胡言”，因为它们意在表明“只有一部分人口天生适合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将人为地限制申请白领职位的毕业生人数。

李普曼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智力匮乏，而是工作岗位紧缺”。如果美国人继续坚持认为接受了高等教育就必须在办公室工作，而不是相信受过教育的人可以从事“熟练的手工工作”，那么这个问题只会变得更糟。李普曼认为，“真正的补救办法”是消除专业管理职位与社会优越感之间的“势利联系”。

教育应该被看作“打开生命宝库的钥匙”，而不是“通往某些特殊职业的阶梯”。另一种做法则是将“高等教育局限于一个人数不多、精挑细选的阶层”，这将“标志着美国梦的失败”。

正如李普曼在1921年的一篇关于犹太人同化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他在这里是在唤起我们所熟知的美国梦。但他明确主张个人发展高于向上的社会流动：因为李普曼相信，美国梦意味着拒绝向上的社会流动。美国梦意味着帮助所有公民发掘他们自己的智力和精神潜力；仅仅关注经济发展或地位意味着美国梦已经失败。

李普曼补充说，如果没有广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美国将会留下一个“识文断字但无知的民主国家，这就是我们的现状”。识字率

和有无知识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选民能够阅读，但缺乏良好的信息鉴别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将会发生什么？

李普曼预言，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将“越来越多地由海兰、汤普森和墨索里尼那种人来统治”。

1918~1925年担任纽约市市长的约翰·F. 海兰（John F. Hylan），因其蒙昧无知、演讲空洞且含混不清而广受嘲讽。在海兰任期进入第四个月时，《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质问，这座城市是否能挺过他四年的任期。“这四个月已经足够暴露他的无能”，尽管事实上海兰“不适合担任公职的情况在竞选期间已经展露无遗”。海兰的竞选演讲“完全暴露了他的无知、他的煽动民意，以及他不适合担任一个在行政难度方面仅次于总统的职位”。在竞选时，海兰已经展现出“一个明智的选民需要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他所说的都是已经实现的预言”。这很令人吃惊，但是“选民们看到了他，听见了他，并且选择了他”。[\[18\]](#)

绰号“大比尔”（Big Bill）的威廉·黑尔·汤普森（William Hale Thompson）在1915~1923年担任芝加哥市长，至今仍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市长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他与阿尔·卡彭（Al Capone）之间的公开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后来才曝光。（1927年，他再次成功竞选市长，这一次他的竞选纲领是“美国优先”，我们将在后面说到这一点）而在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刚刚在意大利掌权。

李普曼警告说，一个国民识文断字但无知的民主国家将选举出无能、腐败和法西斯式的领袖。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梦依赖教育，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但在李普曼看来，情况正好相反：教育本身是一种公共

和个人利益，而不是创造财富或地位的工具、手段。这是我发现的最早将美国梦与教育联系在一起的用法，但它是将教育与社会或物质野心区分开来，而不是将两者结合起来。

当《教育与白领阶层》刊载于1923年7月的《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时，它几乎肯定被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读到了。在这个月，他开始撰写一部心目中“伟大的美国小说”，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美国梦从追求个人实现堕落为对财富和权力的单纯渴望。

几个月前，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他最不为人知的作品，这是一出名为《蔬菜，或从总统到邮递员》（*The Vegetable: Or, From President to Postman*）的戏剧，意在讽刺哈定总统。一篇评论精练地总结了《蔬菜，或从总统到邮递员》所传达的信息：“一个人可能与这个国家的总统职位极不相称，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但他可能具备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邮递员的条件。” [\[19\]](#)

该剧始于1920年的晚上，当时沃伦·G. 哈定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这部戏的主角杰里（Jerry）头脑不清，在等待结果的时候喝醉了，在第二幕他梦见自己当选为总统。他把家人安插进内阁，向全世界宣战，执政期间腐败猖獗，最后陷入谵妄，终于遭到弹劾。

《蔬菜，或从总统到邮递员》是对美国成功梦的辛辣讽刺，讽刺了以“人人都能当总统”这一理念为象征的美国机遇的承诺，以此来表明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当总统。尽管该剧从未使用“美国梦”这个短语，但它建立在一个隐喻的基础之上，美国向所有公民承诺的权利和繁荣不只是一个梦，还是一种谵妄。

正如当年夏天《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社论所言，菲茨杰拉德并不是唯一注意到“近年来美国精神发生重大变化”的人，但不同的人指出了这种变化的不同原因。菲茨杰拉德认为美国的精神贫困是由其唯利是图的野心造成的。而《芝加哥论坛报》则认为是由过度监管造成的。它抗议说，随着美国公民中“嫉妒和怀疑”的比重增加，“出现了规范个人的倾向……不尊重个人良知，扩大政府对个人或少数群体的支配”。这种统治与美国理想相左，是对美国梦的挫败。美国主义意味着摆脱一切暴政和对于个人不可抑制的信心。但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鼓吹古老的谬论，越来越多地放弃了对个人及其自由的鼓舞人心和充满活力的信念。” [\[20\]](#)

美国的自由之梦从定义上讲是不受监管的，但它正日益与从定义上（或至少从人性上）要求实现监管的平等与正义的美国梦发生冲突。一些人开始认为，美国政府是一个压制自由的威权引擎，而不是一个保障所有人自由的监管体系。在这个版本的国家想象中，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真正的美国人”同样是一股支持自由的革命性力量。而那些可能侵犯这种自由的特权的规定——包括那些为保护其他美国公民的自由而制定的规定——被视为有违美国精神，会伤及忠诚的、至高无上的个人。

如何平衡个人的需要和他人的需要——人类历史上每一个社会所面临的命题，这一棘手的问题也继续以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辩论的形式出现在国际问题中。对于那些试图表达对共同、协作的价值观的需求的美国人来说——这些美国人肯定都是政治自由派，美国梦仍然暗示着把追逐自利作为集体成功的手段只会是一种错觉，这一点已经在进步时代清晰地表明。在《芝加哥论坛报》提出美国自由梦与监管相抵触三周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份报纸称，美国梦是一种谴责孤立主义的幻觉。“孤立只不过是一场美国梦。‘我们是我们所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21\]](#)

这不是“美国优先”的观点。

[1]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p. 190.

[2] *Pittsburgh Press*, 6 January 1922.

[3] *Akron Beacon Journal*, Akron, OH, 11 January 1922.

[4] Sinclair Lewis, *Babbit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2, p. 13.

[5] Sinclair Lewis, *Babbit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2, p. 25.

[6] Sinclair Lewis, *Babbit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2, p. 391.

[7] Sinclair Lewis, *Babbit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2, p. 391.

[8] Sinclair Lewis, *Babbit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2, p. 392.

[9] James Truslow Adams, *The Epic of America*,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47 (1931), p. 191.

[10] Rupert Brooke, *Letters from America*, New York: Beaufort, 1988 (1916), p. 68.

[11] 意指在公开场合微妙地羞辱他人。

[12] *New York Times*, 16 October 1922.

[13] *Oregon Daily Journal*, Portland, OR, 2 July 1922.

[14] *Chicago Tribune*, 27 March 1923.

[15] 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将“美国梦”的谱系追溯到1931年，但有些人确实将其追溯到1923年的李普曼，更少的人则上溯至他1914年的作品《趋势与主

宰》。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发表了自己发现的一些早期新闻报道和相应日期。这些信息已经被我后续的研究取代。例见，Scott A. Sandage, *Born Losers: A History of Failure in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37.

[16] Walter Lippmann, “The Mental Age of Americans: II. The Mystery of the ‘A’ Men”, *New Republic*, Vol. 32, No. 413 (1 November 1922), pp. 246–248.

[17] Walter Lippmann, “The Mental Age of Americans: II. The Mystery of the ‘A’ Men”, *New Republic*, Vol. 32, No. 417 (29 November 1922), pp. 9–11.

[18] *Hartford Courant*, Hartford, CT, 2 May 1918, p. 14.

[19] Phil A. Kinsley, “The Vegetable Proves Bird When Right Post Is Found”, *Philadelphia Record*, 13 May 1923. In Jackson Bryer, ed., *F. Scott Fitzgerald, The Critical Reception*, New York: Burt Franklin & Co., 1978, p. 172.

[20] *Chicago Tribune*, 1 July 1923.

[21] *Harrisburg Telegraph*, Harrisburg, PA, 20 July 1923.

6 美国优先 1920~1923年：政府之简单

在1920年的“美国优先”选战活动中，哈定有一句贻笑大方的话，他当时说，“政府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如果当选，他只可能把事情做好。他承诺说，总统这份工作再容易不过。

他说：“好政府差点就这样葬送在我们手里，因为它没有利用美国商业的首要合理原则。”^[1]哈定将结束这一切，承诺像经营企业一样管理美国政府，这一承诺受到许多美国人的欢迎，他们认为企业化正是国家所需要的补救措施。哈定保证，他将“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在政府中注入更多企业元素”。^[2]

盐湖城的一份报纸不耐烦地指出：“保守势力总是在念叨着一个商人居然要竞选总统。”《华盛顿先驱报》(*Washington Herald*)观察到，民主党人也对“‘商人总统’的广泛需求”做出了回应。^[3]

哈定向美国保证，他将把美国从“战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并承诺对行政部门进行全面改革，使其更加高效。1921年3月哈定上任时，他不仅完全控制了白宫，而且把持了政府的两大机构。共和党人将继续掌权，几乎不受任何真正反对派的制约。在这整整10年里，民主党完全不可能再有任何当选的机会，两党制近乎崩溃。

在哈定准备就任时，他宣称：“我真诚地相信繁荣的美国优先。”^[4]在宣誓就职后不久，他一边享受着志得意满的兴奋，一边发表了一系列演讲，题为《我们共同的国家：美国社会中的相互善意》(*Our Common Country: Mutual Good Will in America*)。在演讲中，他13次提到“美国优先”，并将这一信条与良好的商业原则联系起来。“所有真正的美国人都会说，我也会这么说，‘美国优先’！”

让我们共同祈祷，美国永远不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永远不会受到连字符公民的威胁！”^[5]在一本呼吁“彻底消灭阶级”分裂的书中，哈定将阶级与种族背景混为一谈；突然之间，民主和经济平等的梦想看起来很像百分百美国主义。^[6]

事实上，在哈定的总统任期内，不平等将急剧上升。他对美国繁荣优先的定义显然不包括社会安全网，而是要求经济政策“不要立足于限制每个人的收益机会，无论他是资本家还是最卑微的劳动者，而是基于永恒不灭的‘美国优先’精神，为繁荣贡献各自的优点、能力和价值”。^[7]

他继续说道：“由于政府做了太多无效的干预，美国企业遭受了沉重打击。”^[8]哈定遵守了他的诺言，不再进行无效的干预——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干预。虽然他的政府经常被形容成“自由放任”，但他们执行的与其说是一种不干涉政策，不如说是一种胡来政策。

在执政的第一年，哈定发现执政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1921年，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名为《政府之简单》（*The Simple of Government*）的社论，对哈定政府大加嘲讽。文章开头写道：“哈定先生在竞选期间说‘执政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政府“提出了简单的想法，承诺多多，但几无成绩”，现在果真证明了这一点。共和党人“在竞选中高谈阔论”，当时“几乎所有的承诺看起来都像是争取选票的诱饵，但在获得选票之后，民主党的记忆力就不太灵光了”。^[9]

哈定的承诺之一是减税，这个承诺非常吸引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家伙”，毕竟他们不喜欢为了自己的收益缴税。他们投票时相信，“共和党人有一种悠久的传统，那就是谁愿意捍卫共和党，共和党就

会特别照顾谁”，知道他们能够“把所有资源保留下来为己所用”。
[\[10\]](#).

到了1922年，许多人都在嘲笑共和党自1920年取得伟大胜利以来自爆式的螺旋式下滑。



尽管我们往往会将20世纪20年代描述为经济繁荣的十年，在此期间美国确实经历了连续八年的增长，但牛市直到1924年才真正来临，而且只持续到1929年。哈定继承了这样一个经济体：在一个尚未普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时代，战争支出远远超过税收。为了平衡预算，政府大幅削减开支，导致在这个十年的前两年出现严重衰退。1919～1922年倒闭的企业数量增长了两倍。农民尤其深受经济衰退的影响，战争期间他们在政府的敦促下贷款，然后被迫违约。很多农民未能恢复元气；小型农场的止赎不是始于30年代的大萧条，而是从20年代经

济衰退时期开始的。甚至在繁荣时期，银行也在倒闭：20年代，将近6000家银行以每年超过500家的速度暂停营业，其中大部分位于中西部和南部。

此外，泡沫是短暂的。这不仅是因为股票市场建立在虚假的价值和大宗商品基础之上，充斥着庞氏骗局、不法经纪商（bucket shops）和其他不正当或明目张胆的欺诈，而且股市对实体经济也几乎没有影响。随着资金在虹吸效应下集中于少数寡头手中，不平等加剧。

美国人厌倦了多年来的混乱和不确定，厌倦了工人罢工和种族骚乱，厌倦了炸弹威胁和进步煽动者，厌倦了扒粪者，厌倦了从墨西哥战争到美西战争再到他们确信将结束所有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渴望稳定和安全，哈定承诺要通过把美国放在首位，特别是通过限制一战后持续激增的移民“回归常态”。

1920～1921年，80万移民经过埃利斯岛的入境关口进入美国，因此人们对美国吸收如此多“外国元素”能力的担忧只增不减。许多人认为移民的涌入只会导致进一步的失业，而“红色恐怖”继续助长人们对国内无政府主义者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种族主义恐惧。1920年1月初，作为“帕尔默突袭行动”（Palmer Raids）的一部分，至少有3000人被捕，500名所谓的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被驱逐出境，突袭打着“百分百美国主义”的旗号，因此被普遍认为出师有名，而且得到1917年《反间谍法》和1918年《反煽动法案》的支持，这些法案在威尔逊执政期间通过，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先前的进步主义。[\[11\]](#)

尽管许多反动暴力针对的是黑人、天主教徒，尤其是犹太人，但大量的暴力私刑也以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为目标。1919年，三名曾经的士兵在华盛顿森特勒利亚被枪杀，狙击手被认为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的成员。当地

人“冲进IWW的大厅，围捕所有可疑人物”，这些人被强行“关进监狱”。一个据信是他们领袖的人被一群私刑暴徒抓住，“他们在他的脖子上套上绳子，把他吊在一根电线杆的横臂上，并开始往上拽”。直到警察局局长说服众人，他才获救，又被送回监狱，“险些送了命”。[\[12\]](#)

1920年，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出版了一本小说，名为《100%：一个爱国者的故事》，部分灵感来自一个名叫汤姆·穆尼（Tom Mooney）的激进人士，他因1916年旧金山的一起爆炸案被捕并被判处绞刑，人们普遍认为他的罪名是莫须有的，而赫斯特旗下那些以反社会主义作为幌子的地方媒体也放大了这一指控。辛克莱的小说是以彼得·古奇（Peter Gudge）的角度讲述的，“彼得是爱国者中的爱国者，一个超级爱国者；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美国人，向来不是懦夫；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美国人’，一个百分百美国人……彼得是这般美国化，以至于他一看到外国人就充满了战斗的冲动”。[\[13\]](#)

彼得深信以下观点：

百分百美国主义将会找到一种方法保护自己不受欧洲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诡辩之害；百分百美国主义已经得出它的公式：“如果他们不喜欢这个国家，就让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但是，当然，他们心知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根本不想回去，所以有必要迫使他们离开。[\[14\]](#)

对于彼得这样的人来说，“现在正是繁忙时刻。尽管有鞭打、私刑和监禁——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激进运动如火如荼”。[\[15\]](#)在全国各地都有人遭到指控，那些主张自身权利的人，要为其主张引致的暴力负责。

20世纪20年代初，所有激进分子都是外国煽动者、所有外国人都是激进分子的观点，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已是不言自明的，而且政治气候往往主要由反移民情绪驱动，或与之有着内在联系。甚至在1920年1月生效的禁酒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将移民群体的习俗定为罪行。北方传统的清教徒大多有节制地饮酒，在19世纪上半叶的“第二次大觉醒”后尤其如此。此次宗教觉醒引发了福音派的狂热传播，激起人们对“酒精恶魔”的敌意。

尽管19世纪的控酒运动在开始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广泛而原初的女权主义运动（在这个从法律和政治上妇女仍然受丈夫支配的时代，女性对于酗酒和家庭暴力问题毫无根治的办法，因此只好寻求预防措施），控酒很快就与反移民情绪纠缠在一起，正如爱尔兰人与威士忌、意大利人与葡萄酒联系在一起。宗教为针对“外国元素”提供了借口，而酒精也提供了一种途径去排斥据说会伤及本土美国主义的移民习俗。坚持“真切”而清醒的乡村价值观那种发自内心的纯粹，而不是城市世故的虚假幻想，这也是妖魔化城市精英、颓废享乐的另一方式。

酗酒是移民和贵族的恶习，无论等级高低；那些反对酗酒的人自认为代表“真正的”美国人。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言，反对饮酒的“观点来自一种感觉，即喧嚣的城市生活不应被视为美国的理想”。^[16]因此，1921年《坦帕时报》（*Tampa Times*）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作者抱怨说，海兰市长不是“百分百美国人”：“无论如何，纽约都不能算作一个美国城市。它有一个远非百分百美国人的市长……真正的美国人支持法律，不会将数以千计的外国人、酒鬼、赌徒、无政府主义者、白人奴隶贩子和诸如此类之人组织在一起，抗议原本保护他们的宪法。如果这群非美国人不喜欢这个国家的法律，他们越快离开这个国家，对我们就越好。”^[17]

对于这位来信的作者来说，酒鬼、外国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白人奴隶主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被归为一类（“和诸如此类之人”），同样不真实，同样身负罪恶，同样非美国。而任何支持他们的人也不能被认为是“百分百美国人”。

这对一切外国人都适用。当美国驻英国大使在演讲中大胆提及“美国和英国的共同利益”时，他遭到民主党参议员里德的严厉批评。里德要求召回大使，他宣称，这次演讲“要么出自白痴之口，要么可以看作叛国之举”。“我们应该安排一个百分百美国人取而代之，这个人必须相信美国优先、美国永远。”[\[18\]](#)

在执政的头几个月里，哈定和他的顾问们在敦促恢复孤立主义时，不断提到“美国优先”。俄亥俄州的一份报纸指出，哈定“强调美国优先的原则，以及外国联盟纠缠的威胁”。[\[19\]](#)早在1921年1月，就有报纸报道“‘美国优先’将成为政策”，美国的“主权不会被放弃”。[\[20\]](#)很明显，“美国优先”是这届新政府施政纲领的基调。[\[21\]](#)到1921年夏天，美国各地出现了“美国优先社团”，其纲领包括倡导抵制英国乃至欧洲的商品。

到1921年底，也就是大选后的一年，哈定政府试图以“美国优先”的名义通过一项永久性的保护主义关税。[\[22\]](#)

然而，尽管这种表达充满着必胜信念，但显然仍在继续给许多听众带来不安。在几个月前，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篇社论赞许地写道，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应该在海外代表哈定政府，因为他是“百分百美国人。他代表美国优先，但不代表孤立”。[\[23\]](#)

并非所有人都相信，美国优先可以如此容易地与孤立主义区分开来。哈定就职几个月后，一位牧师观察发现，“我们都渴望被称为百分百美国人”。但他坚称，“美国主义不是只考虑美国。如果美国优先的意思是美国自私自利，或者罔顾世界上的种种错误，我们很难称之为美国主义”。^[24]其他一些人也同样注意到一股强大的社会压力，要求人们始终用同样的措辞展现爱国情怀：“我们必须是百分百美国人，我们必须爱国，我们必须支持美国优先。”^[25]

就在哈定宣誓就职时，威斯康星州的进步媒体《首都时报》（*Capital Times*）追问：“‘美国优先’？为了谁？是金融统治者的美国优先，还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美国优先？……哈定政府提出的‘美国优先’的新理念到底为何物？是‘美国优先’还是‘美国高于一切’？”

这篇社论指责说，“美国优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加强对“正在慢慢将触角伸向美国人生活的产业章鱼”的控制。保护性关税将“确保‘美国优先’，好让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和金融统治者对全世界予取予求”。美国需要的是“寻求给予世人的‘美国优先’”。

这篇社论中时不时出现代表愤怒的大写字母，它敦促美国“在反对战争、反对军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民族和种族仇恨、反对孤立我们的关税的全球运动中首先站出来”。最重要的是，美国应该首先站出来“反对世界经济统治者的那些神圣信条，也就是财产权高于人权……当美国有勇气说‘我爱我的同伴，无论他身处何方，我是世界公民’时，他们将是首屈一指的”。^[26]

哈定政府对此不那么确定。1921年2月，哈定的副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为《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这是谁的国家？》（*Whose Country Is*

This?)。他在文中宣称：“我们的国家不应再被视作垃圾场”，而应该只接受“合适的移民”。

在谈到他心目中的移民类型时，柯立芝表示愿意向美国人推荐优生学和北欧人。“生物学定律告诉我们，某些有差异的人不应该混血或融合。北欧人成功地繁衍了后代。而其他种族的融合结果显示，双方都出现了退化。他们的身心素质表明，对一个国家来说，遵守种族法则和移民法是同等必要的。” [\[27\]](#)。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保持美国的“纯净”是可能甚至是可取的。1922年初，在1920年大选中落败的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M. 考克斯（James M. Cox）给出了一个尖锐的评价：“此起彼伏的‘美国优先’口号是对人类智慧的嘲弄，因为不幸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 [\[28\]](#)。

在美国政府加深了与“美国优先”的联系之时，三K党也在深化这种联系。到1921年2月，从印第安纳州、俄勒冈州到科罗拉多州、纽约州，从巴尔的摩、蒙大拿到得克萨斯，全美各地的报纸都报道了三K党使用了“美国优先”的口号。印第安纳州的一份报纸在一篇全国转载的专题报道中写道，“1921年三K党的口号实质上是‘美国优先’”，并指出第二次三K党运动是“那个南方重建时期著名组织的复兴”。[\[29\]](#)。

1921年，三K党已正式宣布与“美国优先”结盟，并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通告，宣称：“三K党的基本原则是美国优先、仁爱和种族主义。” [\[30\]](#)。

《纽约论坛报》解释说，第二代三K党的一些成员包括“一些幸存的第一代三K党成员”；它现在正在分享它的“信条”。三K党的信条

包括这样的承诺：“我们将永远致力于纯美国主义的崇高原则，勇敢捍卫其理想和制度。我们承认人类种族之间的区别是由造物主规定的，在维护白人至上方面，这一点永远正确。”

与此同时，三K党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绰号“帝国巫师”的W. J. 西蒙斯（W. J. Simmons）在会上宣布，该组织主张：

1. 百分百美国主义和对基本原则的恢复。
2. 白人至上。
3. 捍卫妇女的荣誉和家庭的神圣。[\[31\]](#)

三K党头目在全国各地散发小册子，重复他们的“美国优先、仁爱、种族主义”的“信条”。他们抗议说，三K党不支持“任何关于宗教偏狭或种族偏见的宣传”；该组织只是一个“由真正的男人组成的协会”，他们相信“要做值得做的事，而且在所有事情上都秉持百分百美国人的立场”。[\[32\]](#)

1921年9月，《世界晚报》（*Evening World*）在头条揭露了三K党。头条的标题是“曝光三K党的秘密”。



《世界晚报》指出，在五年的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三K党成员从34人发展到近50万人，在北部和西部的传播速度是南部的两倍多，这要归功于“高度组织化的销售队伍”。数百万美元以佣金的形式流入三K党的推销员之手；用后来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三K党是美国最成功的种族主义金字塔骗局（racist pyramid scheme）。

信仰天主教的学校教师 and 当地政客正在被迫下台；三K党的牧师们“甚至在教堂的讲坛上宣扬对犹太人的仇恨”。三K党暴民剥光白人妇女的衣服并加以“虐待”，对做出他们不赞同的“私人行为”的白人男子，则会处以鞭打、身上涂柏油、粘羽毛等惩罚。他们还“警告”报纸在报道三K党时要小心。[\[33\]](#)。

在接下来的三周里，《世界晚报》每天都在头版报道三K党的秘密活动，并向美国人介绍其神秘的仪式和暗语，如“克莱格”[\[34\]](#)、“克拉弗恩”[\[35\]](#)和“可兰”[\[36\]](#)。鉴于21世纪早期的美国反动政治，最后这个融入伊斯兰教经典的词特别具有讽刺意味，三K党神秘民族主

义的愚蠢之处并没有被当代观察家忽视，他们注意到，三K党愿意接受任何听起来有点玄秘或深奥的东西。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1931年回顾20世纪20年代的三K党时说：

它的仪式中荒谬的词汇可以用来表达对骗人的把戏、花哨的演出的那种幼稚的偏执，对秘密冒险的渴望，这种渴望在生活在单调乏味的地方的成年人身上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将乡下的偏执狂包装起来，让他摇身一变，成为隐形帝国的骑士。[\[37\]](#)

《世界晚报》在1921年的系列报道收尾时谴责三K党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三K党成员“绑架，殴打，往受害者身上洒柏油、粘羽毛，然后把他们扔到其他地方”。报道列举了最近的四起谋杀案，以及40多起鞭刑和27起“柏油和羽毛刑”。[\[38\]](#)

这些报道在全国各地被转载，每天都有200多万美国人读到。《世界晚报》显然相信曝光会挫败这个秘密组织，但他们的乐观是错误的。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努力适得其反，帮了倒忙，等于给第二代三K党打了广告；在《世界晚报》揭秘报道后的四个月里，三K党招募人数激增，并成立了200多个新分会。[\[39\]](#)

当时所有人都非常清楚，三K党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而且这正是其本意（事实上，它的仪式就把三K党的头目称为“恐怖分子”[\[40\]](#)）。堪萨斯州州长直截了当地说：“我反对三K党，因为它意味着恐怖主义。”[\[41\]](#)1921年的一幅漫画在全国各地被转载，画中一条穿着裤子的腿，上面贴着“真正的美国主义”标签，正踢向一个穿着三K党长袍、举着“恐怖主义”标语的家伙。[\[42\]](#)



在20世纪20年代，没有人怀疑白人会成为恐怖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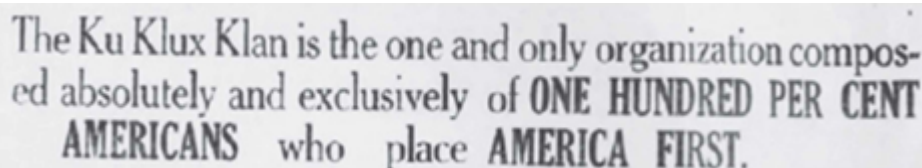
1922年1月1日，美国各地的许多读者以一篇来自塔斯基吉研究所（Tuskegee Institute）的报告迎接新年，该报告称1921年美国有64人被处以私刑，其中59人为黑人，5人为白人；就性别而言，其中2人是女性。[\[43\]](#)4人被活活烧死。

这些只是被报道的私刑。72起私刑被中途叫停；根本无从知晓在这个国家还发生了多少从未被发现的私刑事件。那一年，密西西比州是全国私刑案例最多的州，达到14起；得克萨斯州有7起。

几周后，三K党在路易斯安那州亚历山大市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高举两个燃烧的红色十字架和横幅，上书“美国优先”“百分百美国人”“白人至上”等口号。他们还高举着其他一些标语，如“种族纯

洁”、“好黑人是安全的，坏黑人小心，白人也是如此”和“支持堕胎者，你们小心着点！”[\[44\]](#)。

那年夏天，三K党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把“美国优先”等同于“百分百美国人”。[\[45\]](#)



The Ku Klux Klan is the one and only organization composed absolutely and exclusively of **ONE HUNDRED PER CENT AMERICANS** who place **AMERICA FIRST**.

1922年11月的一份报道称，三K党试图在时报广场的核心区域建立一个前哨站，具体位置是在第七大道和四十二街的赫米蒂奇酒店（Hotel Hermitage），这促使海兰市长（他显然并不是一无是处）宣布纽约出现了“三K党势头”，并指示警察“击溃他们”。[\[46\]](#)三K党人回应说，他们“拒绝被恫吓”；毕竟三K党人相信恫吓是他们的专利。与此同时，赫米蒂奇酒店表示不会“收容试图煽动偏见的人”，[\[47\]](#)并将三K党成员赶出了酒店。

三个星期前，在大约六个街区开外的西四十五街，有人看到一名年轻的黑人男子亲吻一名白人女子，这名男子险些被一群暴民用私刑处死。[\[48\]](#)

1923年2月，《纽约时报》报道说，三个燃烧的十字架似乎“吓坏了长岛镇的黑人”。那年夏天，据说有2.5万人加入三K党，参加了在东艾斯利普附近举行的入会仪式。[\[49\]](#)

一些打着“百分百美国人”旗号的组织开始录制歌颂三K党的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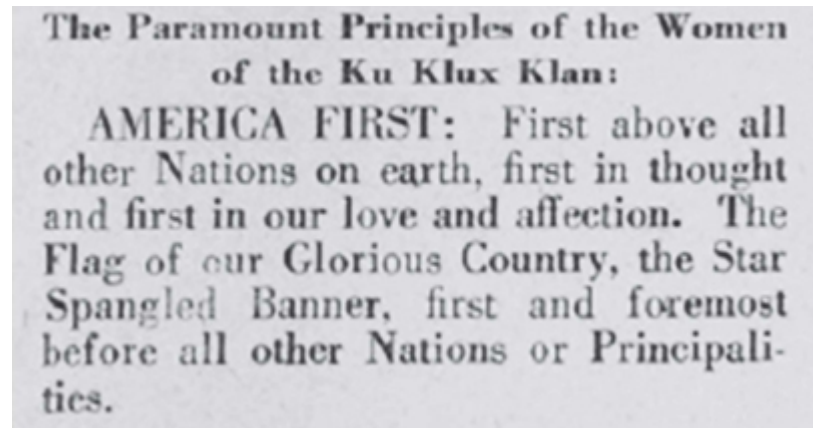
住在隐形而神秘的帝国之城，

一个伟大而高贵的巫师，曾做过一个奇妙的梦。
在这个梦里，他看到了古老的荣光和自由的事业
被一个漂洋过海的民族取代，
带来属于原始大陆的旗帜和习俗
把它们牢牢地根植于我们的祖国。

合唱

三K党，三K党，三K党，
新教徒，非犹太人，土生土长，
戴着兜帽，穿着骑士服，披着长袍，
红、白、蓝三色旗下的子民，
我们不会效忠于任何人，我们生而自由，
我们向上帝和古老的荣耀屈膝，
在历史长河中铸就的崇高血统，
奇异神秘的三K党。

1922年11月，三K党成立了“官方”妇女分会，并出版了一本名为《美国妇女！过去！现在！未来！》的小册子，概述了他们的信仰，并正式采用了三K党的基本原则，即美国优先、仁爱和种族主义。



美国媒体最早提到“法西斯主义”似乎是在1921年初，当时一名驻罗马的意大利记者给《布鲁克林每日鹰报》和《费城大众纪事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发去特电。他解释说，“毫无疑问，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这条消息让人暂时松了一口气，被全国各地的报纸转载。^[50]但贯穿1922年全年，随着墨索里尼的“公司国家”巩固了在意大利的权力，许多美国观察家得出结论：法西斯主义看起来太熟悉了。

在墨索里尼接管政府的几周内，《纽约世界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向读者解释了“法西斯主义”：“用我们自己形象的语言来说，他们可能被称为三K党。”^[51]《坦帕时报》对此表示赞同：“事实上，三K党就是美国的法西斯，除非它被迫公开，否则很容易获得类似的权力。”^[52]

就像将第二代三K党视为恐怖组织一样，视之为法西斯组织也不需要事后诸葛亮：他们的同代人可以再次清楚地看到其中的相似之处和危险。事实上，这种比较很普遍。圣保罗《呼声报》（*Appeal*）写道：“受到法西斯主义或意大利三K党重大成功的鼓舞，美国三K党也在寻求获得美国的政治权力。”^[53]

《明尼阿波利斯星论坛报》（*Minneapolis Star Tribune*）曾在1921年夏天报道称，“法西斯是一个秘密组织，拥有一些三K党的手段”。^[54]一年后，费城媒体形容法西斯为“那些难以驾驭的反动派，他们以‘法西斯’的名义在意大利的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十分类似于美国部分地区由三K党成员扮演的角色”。^[55]《纽约论坛报》有同感，认为“法西斯分子具备了三K党的一些特征，他们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守法的民主国家都是站不住脚的”。^[56]

1922年11月，蒙大拿州的一份报纸指出，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意思是“意大利人的意大利。而这个国家的法西斯分子对此的表述是‘美国优先’。在美国似乎有大量法西斯分子，但他们总是以‘百分百美国人’为傲”。蒙大拿州的另一家报纸明确地称哈定的共和党人是法西斯分子，文章得出出人意料的结论：“民主党人可能会说，美国法西斯分子在1920年赢得了选举。”^[57]

全美各地的报纸报道墨索里尼的黑衫军在罗马夺取政权，称“意大利牢牢地控制在”法西斯分子之手。三周后，《纽约时报》也首次提到了德国一位边缘政治人物正在崛起。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纽约时报》在对希特勒的第一篇报道中称，他的反犹太主义似乎非常暴力，令人不安。然后引用了一位德国资深政治家的话，建议大家不必担心。这位德国“老练的政治家”认为，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只是一种竞选策略，其用意在于操纵无知的民众。这位政治家解释说，因为公众永远不可能欣赏政治家“更精妙的真实目标”，“你必须用更粗俗的言论和反犹太主义这类想法来满足大众”，而不是“揭示真正引领他们前进的更高层次的真相”。^[58]他们都确信选战结束后，希特勒会转向中间路线，变得十分讲道理。

《纽约时报》记者显然不同意这一观点，并警告说，巴伐利亚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而希特勒“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想要实现什么”。然而，“他的宣传主旨是暴力反犹太主义”，这位记者重复道，并补充说一些犹太人已经离开了德国。[\[59\]](#)

那一年，一位名叫多萝西·汤普森的年轻美国记者住在维也纳，她刚刚成为《费城大众纪事报》和《布鲁克林每日鹰报》的驻外记者。在几个月内，汤普森就报道了维也纳反犹太主义的兴起，以及罗马人对“法西斯意大利的真实想法”。[\[60\]](#)1923年11月“啤酒馆暴动”失败后，汤普森去了慕尼黑，想要采访希特勒，但没能成功，之后她发表了一系列描述“希特勒的童子军秀”的文章，包括巴伐利亚其他许多密谋推翻德意志共和国的派系，以及希特勒在“墨索里尼的建议”下如何更新了自己的“俾斯麦式的梦想”。[\[61\]](#)

《得梅因纪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在那年夏天写道，“这个‘父系国家’组织是德国的三K党”。[\[62\]](#)几个月后，美国报纸第一次刊登了希特勒的照片，“他可能是欧洲最著名的躲避镜头的人”。不管希特勒以前对宣传有多厌恶，他都会很快克服这一点。



在希特勒的照片旁边，一篇报道抱怨说，“美国优先”作为外交政策毫无意义。“‘美国优先’的口号在欧洲和美国都被当作一种伪装，更多的是用来掩饰美国完全缺乏外交政策。”这种优柔寡断对美国在国际上的威望“非常有害”。[\[63\]](#)

1922年希特勒在《纽约时报》上首次亮相之前，《华盛顿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质问读者：“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点，我们的美国法西斯分子就是三K党的那些先生？这个国家对他们的力量和发展一无所知。”这位专栏作家从一位消息灵通的华盛顿内部人士那里获悉，新一届国会的75名成员也已经加入了“三K党”。[\[64\]](#)

一个月后，圣保罗《呼声报》报道称，在一次会议中，大多数美国州长拒绝谴责“三K党”。报道总结道：“坊间传说大多数州长都是

由三K党推选上台的，他们在三K党问题上的沉默似乎为这一谣言提供了证据。” [\[65\]](#)

俄勒冈州州长警告说，三K党可能会将美国引向另一场内战，因为它正在全国范围“获得惊人的控制权”。问题是“最初人们宽容三K党，是由于他们认为它仅仅是反黑人，而不是反其他任何人”。

“反黑人”是一回事：显然，俄勒冈州的白人公民对此并不反对。但当他们发现三K党还反其他人，这也许包括他们自己时，他们开始抗议。“席卷了整个南部地区的暴行——用白色长袍和风帽遮住面孔的夜行者所犯下的暴行——在俄勒冈州也一再发生，法律和秩序就这样被美国的法西斯分子篡夺，情况一如在路易斯安那州那样。” [\[66\]](#)

在美国各地，从费城和艾奥瓦州到蒙大拿州和俄勒冈州，美国公民都面临三K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威胁，他们占据新闻头版，似乎步调一致。没有人会忽视这二者之间的相似性。

1922年底，三K党决定公开宣布打算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建立“联盟”。三K党的高级头目“大头目 [\[67\]](#)”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年度“会议”上承诺，作为三K党“欧洲扩张计划”的一部分，“法西斯将与我们一起在意大利建立三K党”。

亚特兰大的记者们清楚地解释了这一“扩张计划”，称其为“三K党入侵欧洲并组织发起维护全球白人霸权的计划”。

一些著名的三K党成员对大头目准备允许他们公开的敌人罗马天主教徒加入其组织表示震惊。这位大头目则表示欢迎所有“白人基督徒”成为三K党成员。当然，犹太人和黑人仍然被排除在外。 [\[68\]](#)

1923年初，百分百美国人、三K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明显，因此开始加入插入语来定义彼此。一位读者写信给《得梅因纪事报》，反对这个国家由“人数仅占总人数2%”的经济精英统治。这些富豪选择“培育和鼓励像美国法西斯（三K党）和所谓的百分百资本主义守护团（美国军团）这类组织。二者都是‘爱国主义者’‘百分百美国人’，随时准备将任何东西‘美国化’”。这位读者对所有这些表述都半是怀疑半是恐惧地加了引号，同时补充说，百分百美国主义一直试图与法西斯主义者和富豪结盟。

“这些组织过去和现在的目的都是压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除非这种自由得到‘三K党内部人士’的授权，”^[69]而他们“头戴愚人帽、身穿棉睡衣的午夜游行是纵火、谋杀和驱逐出境的前奏”。两个月后，《圣路易斯邮报》（*St. Louis Post Dispatch*）报道了“美国法西斯主义即三K党的公开声明”。^[70]

那年夏天，有报道称，三K党在幕后支持南方民主党人威廉·G. 麦卡杜竞选总统。麦卡杜是内阁成员，曾敦促他的岳父伍德罗·威尔逊建立联邦种族隔离制度。加入三K党并支持麦卡杜参选的得克萨斯州农民坚持认为，三K党并不是“反黑人”。该组织并不是健全的“美国法西斯主义”。^[71]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得克萨斯州农民坚称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而只是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们知道欧洲法西斯主义会带来何种恐怖的景况。他们对法西斯主义有限的一点认识，主要来自墨索里尼上

台后《厄尔巴索先驱报》（*El Paso Herald*）发表的庆祝社论。报道称，意大利的这位新元首受到伦敦和巴黎的“法西斯团体”的热烈欢迎，并表示这些团体是“好组织，它们的存在是当今世界上最鼓舞人心的希望之一”。^[72]

这篇社论指出了法西斯主义最鼓舞人心的地方：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对激进主义的反对，以及维护政府权威的决心。然而，文章接着承认，法西斯主义者“并非尽善尽美”，有时“他们无视法律，并在必要的前提下使用武力”。

好消息是，“法西斯分子的暴力行为很少见，而且是零星的”；它主要执行“秩序井然的军队”的纪律。最后，“法西斯主义是健全的，对世界上那些似乎需要它的地方是有益的，因为它展现的是司空见惯、遵纪守法的爱国主义。它无疑是对激进主义的有力谴责”。^[73]没有什么比在令人遗憾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使用非法暴力更能表达“谴责”之意了。

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维护并不局限于南方。《芝加哥论坛报》也对法西斯分子“谴责”激进派的做法表示欢迎。该报1922年的一篇社论说，“我们不尊重针对法西斯暴力的大惊小怪，这些暴力针对的恰恰是一个为了自己的事业也会毫不犹豫使用暴力的革命派团体。美国的空想家和只会空谈的社会主义者动辄谴责法西斯诉诸非法武力，但法西斯主义直面的是复杂的环境，而不是理论”。^[74]任何对于“非法”一词感到如鲠在喉的人，都可能会被斥为只会在沙龙里夸夸其谈的社会主义者。

事实上，美国媒体提供了大量法西斯暴力的例子，许多观察人士选择忽略这些证据，因为他们利用它为自己的种族民族主义立场辩护。《圣路易斯邮报》评论说：“每个人都知道，法西斯政府统治下的意大利工人不敢罢工，因为他们已经彻底被法西斯的暴力吓倒，暂

时屈服于它。”文章在结尾时宣布，至少到目前为止，“民主在意大利已死”。[\[75\]](#)

印第安纳州曼西市的读者得知，“法西斯发起了一场破坏运动”，而且“暴力活动一直持续到1921年7月大选之后”。在那之后，暴力“有那么一点减少”。[\[76\]](#)

有那么一点。

说到土生土长的美国法西斯主义，不管支持麦卡杜的埃尔帕索农民想告诉自己什么，在1922年，任何活着的美国人都清楚地知道“反黑人”运动实际正在发生。全国各地的报纸都谴责了私刑，而在1922年，国会就《戴尔反私刑法案》（1918年首次提出）举行了辩论。[\[77\]](#)哈定总统在1920年公开反对私刑。他宣称：“我相信联邦政府应当铲除私刑，清除美国这个美好名字上的污点。”他的发言赢得了包括黑人媒体《布法罗美国人》（*Buffalo American*）在内的多家报纸的支持。《布法罗美国人》一直是林肯派，对共和党的忠诚由来已久。哈定说：“我认为美国的黑人公民应该得到保障，享有他们所有的权利。”接着他补充道：“他们已经获得公民权授予的全部权利。”[\[78\]](#)

有了哈定在1921年支持《戴尔反私刑法案》，该法案1922年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之后南方民主党人在参议院阻挠议事，最终将其扼杀。一些议员威胁说，如果该法案通过，他们那一年将不会再通过任何一项立法，这实际上是使参议院受制于他们极端的党派立场。

《布法罗美国人》发表了一篇关于《戴尔反私刑法案》的社论，认为该法案理应代表“美国优先”的原则，并赞扬戴尔议员为之所进

行的斗争。“除非他是一个百分百美国人，除非他对‘美国优先’的信条深感兴趣——这一信条在竞选时为人所熟知，但现在已经被人遗忘，否则他就不可能起来战斗，他为了的不是某一个种族，而是人道和人权。”不能让“政府‘美国优先’的口号”连同“1/10的人口”一起被遗忘，这一点至关重要。[\[79\]](#)

《戴尔反私刑法案》失败了，《布法罗美国人》将“美国优先”原则扩大到全体美国人包括黑人的努力也失败了。20世纪上半叶，将近200项反私刑法案被提交到国会，但没有一项获得通过。

1922年6月14日，非裔美国人举行了一场支持《戴尔反私刑法案》的“华盛顿无声游行”，这比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发出自己的声音——令他的美国梦家喻户晓——早了40年。

就在参议院阻挠《戴尔反私刑法案》通过的时候，《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论，题目为《私刑的权利》（*The Right to Lynch*），黑人报纸《达拉斯快报》和其他一些全国性的反私刑媒体转载了此文。《波士顿环球报》指出，“民主党人不喜欢这项反私刑法案，为了阻止就该法案进行投票，他们真是连嗓子都喊破了”。

《波士顿环球报》的编辑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立场。“因为民主党人已经放弃了他们支持各州有权在各种事务上自决的传统立场，只在一个问题上例外。现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支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唯独在保留烧死有色人种的权利上破例。”[\[80\]](#)

《布鲁克林每日鹰报》登出了一幅漫画，画中“我们国家戴着头巾的眼镜蛇”正在窥伺着政府法制，旁边还刊出了一篇名为《美国法西斯主义》（*American Fascism*）的文章，把三K党和法西斯主义以及百分百美国人联系在一起。“在所有国家，一个普遍存在的因素是对

伪爱国主义的诉求。意大利法西斯表现得极端爱国，而在世界各地，同样‘百分百’的爱国者比比皆是。” [\[81\]](#)



文章称，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他的儿子将在10年后建立一个法西斯的长枪党，不久该党与佛朗哥的政党合并）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府均采取了“欧洲百分百的爱国主义”的形式，并认为受三K党影响，美国也在迅速朝着极端民族主义暴力的方向前进。“对三K党不应存在任何误解。它在这个国家代表的观点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德里维拉在西班牙代表的观点是相同的。三K党就是美国的法西斯，它决心以自己的方式统治，完全无视民主政府的基本法律和原则。”

它警告说，如果允许这些人接管这个国家，“我们将会面对一个独裁政权”。[\[82\]](#)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意大利人和意大利裔美国人也加入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阵营。“纽约法西斯”（New York Fascia）已成为包括“巴尔的摩法西斯”在内的美国各地墨索里尼支持团体的“母体”；所有人都“听从墨索里尼总理的指示”。[\[83\]](#)

讽刺的是，追隨墨索里尼的美国法西斯主义者担心的问题之一是，从定义上来讲，他们属于“连字符公民”，却效忠于美国以外的国家。1923年，全国各地的报纸就美国法西斯运动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展开了辩论。《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Springfield Republican*）说，单看名字就知道它是反美运动，因为它“强调的种族团结——可以说是一种泛意大利主义”，只会让“归化的美国公民精神”延续下去。《塔科马纪事报》（*Tacoma Ledger*）对此表示赞同，称“意大利政府认定”美国法西斯主义将使归化的美国公民仍然效忠于其“祖国”。这将使法西斯主义“像10年前德国的支持一样对美国主义构成巨大威胁”。[\[84\]](#)

尽管三K党和法西斯主义者都喜欢声称他们的立场纯粹是意识形态上的——当然他们会基于意识形态实施暴力——但他们也倾向于将资本主义与白人至上混为一谈。1923年春天，一位共和党政治家敦促南方“领导针对激进分子的斗争”，告诉阿肯色州的农民，“赤色分子正在煽动黑人”，并敦促“纯美国血统的人”采取报复行动。他警告说，由于“南方人民的种族纯洁性和政治传统”，“想在美国发起反激进主义运动，南方是最自然、最适合的地方”。[\[85\]](#)

一个奇怪的巧合是，拥有“种族纯洁性”的人是“激进分子”的天敌，这又回归了本土主义者向所有非“纯美国人”宣战的关联链——尽管这些人是在民族、种族还是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够纯正。

但并非所有自称法西斯的美国人都支持墨索里尼。这年春天，美国各地的报纸均报道“某个被罢黜的克莱格”正在内布拉斯加州组建“据信是美国的第一个法西斯组织”。一位发言人解释说，“美国法西斯”是一个“法治团体”。他们将效仿意大利同行，反对“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强大的革命劳工团体”，但“绝不是三K党的敌人或模仿者”。[\[86\]](#)

像意大利法西斯一样，他们身穿黑色衬衫，但不戴面具；15000件衬衫已经生产完成，并计划召开一次“怪物会议”。这位发言人说，“它不会与政治或宗教争端搅和在一起”，而只是针对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劳工组织者。显然这些都不属于“政治争端”。[\[87\]](#)据创立这个“非政治性”组织的前“克莱格”所说，这个“非政治性”组织将“反对‘红党’和‘三K党’”，但将“体现‘三K党’的所有优点”。[\[88\]](#)

这位前“克莱格”没有详细说明三K党有哪些优点，但是很多美国人以为，如果美国法西斯不那么神秘的话，他们就不会像三K党那样危险。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份报纸预测，如果“法西斯运动”将在美国迅速蔓延，那也不足为奇；据说美国已经有大约2万名法西斯分子。“在某些方面，美国法西斯与三K党相似，但很明显，‘蒙面骑士’过于神秘，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而美国法西斯则不那么隐秘，也就不至于如此神憎鬼厌。”[\[89\]](#)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恐吓、被胁迫、被打上烙印、被泼上柏油粘上羽毛、被袭击、被恐吓、被折磨、被绞死，甚至

被公开烧死在火刑柱上，这些受害者恐怕不会认同，令三K党成为威胁的，仅仅是它的神秘。

[1] Warren G. Harding, *Our Common Country: Mutual Good Will in Ame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3 (1921), p. 18.

[2] *Baltimore Sun*, 19 December 1920.

[3] *Salt Lake Herald-Republican*, Salt Lake City, UT, 1 February 1920; *Washington Herald*, Washington DC, 19 April 1920.

[4] *New York Times*, 22 January 1921.

[5] Harding, *Our Common Country: Mutual Good Will in America*, p. 73.

[6] Harding, *Our Common Country: Mutual Good Will in America*, p. 8.

[7] Harding, *Our Common Country: Mutual Good Will in America*, p. 18.

[8] Harding, *Our Common Country: Mutual Good Will in America*, p. 18.

[9] *Charlotte News*, Charlotte, NC, 25 June 1921.

[10] *Charlotte News*, Charlotte, NC, 25 June 1921.

[11] 例见 *The Courier-Journal*, Louisville, KY, 10 January 1920: 社会主义党……名誉扫地，每一个百分百美国人都对其成员敬而远之……百分百美国主义意味着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毁灭……官员们昨晚宣布，如果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三名在路易斯维尔因移民许可而被捕的外籍人士逃脱了移民局的驱逐出境，还可以采取‘另外两项措施’将他们驱逐出境……志愿的情报人员……每天他们都在报告有激进倾向的人的活动。

L. A. 希克曼 (L. A. Hickman) 律师……昨天说, 他和其他百分百美国人一样, 渴望“看到‘赤色分子’落得他们应有的下场”。

[12] *Cincinnati Enquirer*, 12 November 1919.

[13] Upton Sinclair, *100%: The Story of a Patriot*, The Floating Press, 2013 (1920), p. 133.

[14] Upton Sinclair, *100%: The Story of a Patriot*, The Floating Press, p. 319.

[15] Upton Sinclair, *100%: The Story of a Patriot*, The Floating Press, p. 262.

[16] Walter Lippmann, *Men of Destiny*, New York: Macmillan, 1927, p. 8.

[17] *Tampa Bay Times*, St Petersburg, FL, 6 July 1921.

[18] *Evening Star*, Washington, DC, 25 February 1922.

[19] *Marion Star*, Marion, OH, 5 March 1921.

[20] *Brooklyn Daily Eagle*, 16 January 1921.

[21] *St. Louis Star and Times*, 5 March 1921.

[22] *New York Times*, 14 November 1921.

[23] *Harrisburg Telegraph*, Harrisburg, PA, 8 August 1921.

[24] *Wilmington Morning Star*, Wilmington, NC, 4 March 1921.

[25] *Des Moines Register*, 16 July 1921.

[26] *Capital Times*, Madison, WI, 21 March 1921; original emphasis.

[27] Calvin Coolidge, “Whose Country Is This?” *Good Housekeeping*, February 1921, Vol. 72, No. 2, pp. 13, 14, 106, 109.

[28] *Pittsburgh Daily Post*, 27 January 1922.

[29] *Muncie Evening Press*, Muncie, I.N., 14 February 1921.

[30] *New York Tribune*, 28 January 1921.

[31] *Palm Beach Post*, West Palm Beach, FL, 28 January 1921.

[32] *Honolulu Star-Bulletin*, 21 July 1921.

[33] *Evening World*, New York, 6 September 1921.

[34] kleagles, 指负责招募人员的销售员。

[35] klaverns, 意为地方分会。

[36] Kloran, 由“Klan”和“Koran”组合而成, 意指帮派内部的“圣经”。

[37] Frederick Lewis Allen, *Only Yesterday: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31, p. 54.

[38] *Evening World*, New York, September 1921.

[39] Nancy K. MacLean, *Behind the Mask of Chivalry: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Ku Klux Kl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8-9.

[40] *Knights of the Ku Klux Klan*, Kloran, Ku Klux Press, 1918, p. 5.

[41] *Salina Evening Journal*, Salina, KS, 31 October 1922.

[42] Reprinted in *Los Angeles Times*, 9 October 1921. 例如, 研究三K党的历史学家南希·麦克林 (Nancy MacLean) 在1995年写道: “事实上, 美国历史学家远没有意识到, 三K党的意识形态和与其同时代的纳粹分子有着共同的特征。” *Behind the Mask of Chivalry*, p. 180. 后来的历史学家可能看不到这种相似性, 但曾目睹这两种现象的美国人可以看到。

[43] *Morning Register*, Eugene, OR, 1 January 1922.

- [44] *Town Talk*, Alexandria, LA, 30 January 1922.
- [45] *McKinney Courier-Gazette*, McKinney, TX, 17 August 1922.
- [46] *New York Times*, 24 November 1922.
- [47] *New York Times*, 25 November 1922.
- [48] *New York Times*, 6 November 1922.
- [49] *New York Times*, 13 February 1923 and 22 June 1923.
- [50] *Brooklyn Daily Eagle*, 1 February 1921.
- [51] *Great Falls Tribune*, Great Falls, MT, 29 May 1921.
- [52] *Tampa Times*, 12 December 1922.
- [53] *Appeal*, St Paul, MN, 9 December 1922.
- [54] *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Minneapolis, MN, 1 August 1921.
- [55] *Philadelphia Inquirer*, 5 August 1922.
- [56] *New York Tribune*, 12 November 1922.
- [57] *Great Falls Tribune*, Great Falls, MT, 5 November 1922.
- [58] *New York Times*, 21 November 1922.
- [59] *New York Times*, 21 November 1922.
- [60] *Brooklyn Daily Eagle*, 1 April 1923.
- [61] *Brooklyn Daily Eagle*, 22 November 1923.
- [62] *Des Moines Register*, 9 August 1923.
- [63] *News Leader*, Staunton, VA, 27 September 1923.
- [64] *Washington Times*, Washington, DC, 17 November 1922.

- [65] *Appeal*, St Paul, MN, 23 December 1922.
- [66] *Appeal*, St Paul, MN, 23 December 1922.
- [67] 指爱德华·扬·克拉克 (Edward Young Clarke) 。
- [68] *Baltimore Sun*, 30 December 1922.
- [69] *Des Moines Register*, 21 January 1923.
- [70] *St. Louis Post-Dispatch*, 31 May 1923.
- [71] *Independent Record*, Helena, MT, 14 May 1923.
- [72] *El Paso Herald*, 13 December 1922.
- [73] *El Paso Herald*, 13 December 1922.
- [74] *Chicago Tribune*, 18 November 1922.
- [75] *St. Louis Post-Dispatch*, 6 May 1923.
- [76] *Star Press*, Muncie, IN, 12 November 1922.
- [77] *Wichita Daily Times*, Wichita Falls, TX, 3 January 1922.
- [78] *Buffalo American*, Buffalo, NY, 29 July 1920.
- [79] *Buffalo American*, Buffalo, NY, 19 January 1922.
- [80] *Dallas Express*, 16 December 1922.
- [81] *Brooklyn Daily Eagle*, 30 September 1923.
- [82] *Brooklyn Daily Eagle*, 30 September 1923.
- [83] *Baltimore Sun*, 22 March 1923.
- [84] *El Paso Herald*, 10 April 1923.
- [85] *New York Times*, 3 May 1923.

[[86](#)] *Baltimore Sun*, 22 March 1923, p. 26.

[[87](#)] *Baltimore Sun*, 22 March 1923, p. 26.

[[88](#)] *Santa Ana Register*, Santa Ana, CA, 20 March 1923.

[[89](#)] *Nebraska State Journal*, Lincoln, NE, 23 March 1923.

7 美国梦 1924~1929年：内心的意愿

1924年，美国梦似乎已经烟消云散；那一年好像没有人再提起。也许这不是巧合，美国梦突然陷入沉寂，仿佛是被经济繁荣带来的喧哗湮没：1924~1929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216%。或许美国人都在做着快速发财致富的梦想，无暇梦及其他；这一时期，无尽繁华皆能触手可及的令人极度兴奋的信念占据着美国大部分人的心理。就美国梦最初被用来表达的进步主义理想而言，它似乎与它所倡导的进步主义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黯然失色。

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表达也在积聚力量。仍然有作家在思考当时已与美国梦发生关联的理念，其中一位作家在1924年底完成了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现在被普遍誉为有史以来关于美国梦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菲茨杰拉德从未使用“美国梦”一词，但他的小说中充满了美国梦。故事背景设定在长岛，位于曼哈顿和大颈区（Great Neck，菲茨杰拉德称为“西卵”）之间，从1922年秋到1924年春，菲茨杰拉德在那里生活了18个月。小说的大部分情节发生在位于这两个地点之间的皇后区，小说中的富豪恶棍汤姆·布坎南（Tom Buchanan）的情妇默特尔·威尔逊（Myrtle Wilson）也住在那里。布坎南一家住在长岛——菲茨杰拉德非常清楚，在故事发生时，那里的三K党正忙着通过焚烧十字架来恐吓非裔美国人。

汤姆·布坎南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对他从有关北欧主义的书中学到的无稽之谈的优生学滔滔不绝。“书的大意是说，如果我们

不当心，白色人种就会……就会完全被淹没。讲的全是科学道理，都是已经被证明的东西……我们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种，我们有责任提高警惕，不然的话，其他人种就会掌握一切。”在被晚餐上的同伴们嘲弄后，汤姆试图为自己的“科学”理论辩护。“我们是北欧日耳曼民族。我是，你是，你也是……我们创造了所有那些加在一起构成文明的东西——科学啦，艺术啦，以及其他，等等。”^[1]说到这里，他自己也陷入了困惑，没法再继续为科学种族主义的愚蠢辩护。

在小说快到结尾时，菲茨杰拉德强调了布坎南的愚蠢：“一个简单的头脑陷入慌乱非同小可。”^[2]

菲茨杰拉德对“美国梦”的影射主要出现在小说著名的结尾处，尼克·卡拉威（Nick Carraway）望向大西洋：

意识到当年让荷兰水手的眼睛放出异彩的这个古岛——新世界的一片清新碧绿的地方。它那些消失了的树木，那些为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被砍伐的树木，曾经一度迎风飘拂，低声响应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昙花一现的神妙的瞬间，人面对这个新大陆一定屏息惊异，不由自主地堕入他既不理解也不企求的一种美学的观赏中，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对着和他感到惊奇的能力相称的奇观。^[3]

这段话继续铺展。盖茨比“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里。“他的梦想就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被他丢在身后，丢在这个城市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那里合众国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延伸。”^[4]

关于个人抱负的美国梦，以及美国梦渐渐局限于物质主义的想法，可以说最终呈现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许多人认为确实如此。

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在我们所知的美国梦即将实现的那一刻，它已经消逝，消失在一个黑暗共和国向前延伸的无尽田野中。

菲茨杰拉德是在回应一种文化，至少20年来这种文化一直主张一种内涵丰富的美国梦，它曾保护美国的信条，使之不受席卷这个国家的机械论观点的侵蚀。菲茨杰拉德捕捉到了物质主义攫取美国梦的那一刻——他记录了这一刻，并看到了它的代价：希望的破灭和无尽的失望；人们丧失的是惊奇的能力，而不是实现梦想的才干。

换句话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著名的结尾描述了美国梦的内涵在如何收窄，从对人类无限潜力的憧憬，到愚蠢的持白人至上主义主张的富豪对权力的贪婪欲望——他们的财富是继承得来，除了拿来显示自己的优势，他们根本无法想象还能用它做点其他什么。

菲茨杰拉德并未真正使用“美国梦”一词，却唤起了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遵循的轨迹：从正义、自由和平等的梦想到自私和贪婪的合理借口。美国梦一词开始用来描述这个国家正在背叛着什么，明确地说，是它的理想。

正因为如此，菲茨杰拉德小心翼翼地将美国梦与荷兰水手的商业野心而不是清教徒的宗教信仰联系起来，因为小说暗示，经济机会主义将摧毁“内涵丰富的”美国梦，而不是助其实现。理想主义被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扼杀：杰伊·盖茨比的伟大潜力被一个只教会他渴求财富和奢侈的表象的国家侵蚀，而汤姆·布坎南继承的资本实际上赋予他无限的优势，这种地位与白人至上难解难分。

换句话说，布坎南的白人至上是个无法回避的细节。它是菲茨杰拉德关于权力在美国如何运作的概念的核心，他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建立在对奴隶劳动的不道德的继承基础之上〔这点他

在1922年的小说《一颗像里茨饭店般大的钻石》（*The Diamond as Big as the Ritz*）中已有明确阐述】。

杰伊·盖茨比全盘接受了纯粹资本主义式的宗教。菲茨杰拉德在另一段名言中如此形容他的主人公：“他是上帝的儿子，因此他必须为天父的事业效命，献身于一种博大、庸俗、华而不实的美。”^[5]盖茨比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人，他吸收了美国人的所有信条，包括自我创造、有能力成为任何愿意成为的人。但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上帝”的儿子，他必然会把天父的事业粗暴地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商业意义，一种为“华而不实”服务的事业——这种肤浅的美毫无价值，缺乏正义，华而不实。这就是财富的福音书。

1925年春天《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时，销量并不高，其矛盾的反资本主义论调在繁荣时期遭到美国人的反对或被忽视，这并不令人意外。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最成功的一本书是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的《无人知晓之人》（*The Man Nobody Knows*），该书恰好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一个月后面世。

《无人知晓之人》将耶稣基督奉为完美商人的典范，这本书在1925～1926年（据推测）是美国最畅销的非虚构著作之一。巴顿解释说，耶稣不仅是“耶路撒冷最受欢迎的晚餐客人”，而且是“一个喜欢户外活动的人”，还是“高管成功的令人吃惊的例子”。^[6]他的使徒就是他的雇员：耶稣“从企业的最底层挑选了12个人，把他们锻造成一个征服世界的组织”。^[7]他使用的比喻故事是“有史以来最有力的广告”。^[8]如果耶稣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那么他“将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广告商……因为他在他那个时代正是最伟大的广告商”。^[9]各种洞见可谓层出不穷。

在巴顿笔下，上帝之子和乔治·巴比特几无分别。他告诉读者，耶稣是“现代商业的奠基人”，他把耶路撒冷盛宴的故事说成是“伟

大的国定假日”，年轻的耶稣就是在这一天失踪的。当父母找到他时，耶稣显得很暴躁。

“为什么找我呢？”〔耶稣〕问。“岂不知我应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他认为他的生活就是生意。他说的生意是什么意思？他做生意的原则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我们的原则？如果他再次出现在我们中间，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他的商业哲学会奏效吗？

你会回想起，有一次他曾说出成功的秘诀……[\[10\]](#)。

就这样，巴顿把《新约全书》变成了一本商业自助手册，将耶稣的话逐字逐句诠释为与“商业”沾边的表述，并用斜体字重点标注出来。菲茨杰拉德和巴顿在讨论现代美国对商业的崇拜时，都引用了《圣经》中的同一个短语“天父的事业”（但角度完全相反），这并非巧合。

一本将耶稣称为第一位伟大商人的畅销书，还原了美国长期以来将商业与宗教混为一谈的荒谬之处、对成功的崇拜，以及加尔文主义认为个人积累财富越多，必然意味着获得了更多上帝宠爱的堕落观点。

1925年1月，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宣称：“美国人民的主要事务是商业。他们深切关注全世界的生产、购买、销售、投资和繁荣。”[\[11\]](#)商业一直是美国人的价值观，但在所谓“柯立芝繁荣”的短暂岁月里，美国人几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兴衰的循环已经结束，人人都可以在股市上发财。

事实上，1923～1929年，美国93%的人口平均收入下降，而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垄断和企业并购再次占据主导地位，6000家独立公司被吞并，200家大公司控制着美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到20年代末，美国1%的人口拥有40%的财富。

加尔文·柯立芝起了个好名字，因为从大众市场的角度来看，加尔文主义是他的基本信条。人们广泛引用柯立芝的名言：“建造工厂的人是建起一座庙宇；工作的人是在那里敬拜，对于每个人来说，应得的不是轻蔑和责备，而是尊敬和赞美。”^[12]他对股市的信心是实实在在的，股价开始飙升，而专家承诺股市将继续上涨。然而，“柯立芝繁荣”是极不平等的：财富主要集中在上层，穷人继续被甩在后面。但这种对繁荣的信念很快就开始让人们觉得这是一种承诺，甚至是一种保证。

也是在1925年，人们对听到的关于美国梦的描述越来越熟悉。比方说，一篇被广泛转载的文章将迈阿密誉为“美国的造币厂，它是一块精美、闪亮的钱币，浓缩了代表美国自由梦想的坚实成分，那就是机会和成就”。^[13]20世纪20年代中期，佛罗里达的房地产繁荣实际上是一个泡沫；一夜暴富的想法与“美国梦”如影随形。随着关于个人财富的美国梦日益泛滥，美国梦也越来越多地与“机会和成就的自由”这种不切实际、非平等的理想融合在一起。

我们以前也看到过美国的自由梦，当时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动员用于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它还将再次被动员与极权主义做斗争，不过眼下还不是时候。不同的语境仍然可以改变美国梦的含义，依据美国信条中的这种或那种价值观来重新定义它。

它仍然可能与国际主义有关，从洛杉矶到艾奥瓦州的不同记者称国际联盟同意建立国际法庭的协议是在实现“美国梦”，^[14]这些报

纸向读者保证，“召开关于信仰和秩序的世界大会，实现美国17年来的梦想，其结果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教会委员会”。[\[15\]](#)

美国梦对拓荒者和移民的羁绊也在加强。1925年出版的一本书被描述为“唤醒早期美国梦中的城镇”，当时开拓者的目标仍是塑造这片土地。[\[16\]](#)《密尔沃基日报》（*Milwaukee Journal*）转载了一幅照片，画中是一群生活在芝加哥南部、生意（贩卖二手货）做得红红火火的犹太小贩。“那个美国梦似乎即将成真。”[\[17\]](#)但它仍然只是“那个美国梦”，暗示还可能存在其他梦想。

诸如选美比赛中的“美丽女性的美国梦”或“‘坚不可摧的国防’美国梦”之类转瞬即逝的提法表明，尽管向上的社会流动正在开始与“美国梦”这一表述趋同，但距离这个说法缩小到我们熟知的那个非常具体、有限的意义之前，尚有一段路要走。[\[18\]](#)1925年，一位牧师向他的会众保证，“我们的美国梦——基督化的个人主义、立宪共和国的原则以及基督般的兄弟情谊”将战胜“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奢望”。[\[19\]](#)

个人主义开始超越以美国梦为象征的其他价值观，但尚未抛弃宪政民主和平等的原则。

一个关于众议院代表席位的问题促使国会中的少数党发布了一份报告，反对开启一个先例，即腐败的政治可以“基于任何特殊目的选择任何它需要的人，而众议院对此将束手无策”。他们警告说，这不仅会对宪法造成威胁，而且“是对宪法的正面攻击，这个爆炸性的过程将削弱‘代议制政府’这一伟大的美国梦的基础”。[\[20\]](#)

与此同时，即使个人的梦想与国家的梦想相连，这种梦想仍然是谦逊的，并且仍然坚守着这个国家开启了黄金道德时代的神话。《迈阿密新闻》（*Miami News*）在1927年报道说，“‘耕种得当的小农

场’曾是普通美国人的梦想”，该报在这里使用了过去式，表明杰斐逊式的自耕农梦想已成明日黄花。[\[21\]](#)

仅仅持续了四年的牛市正迅速走向崩溃。1928年，柯立芝决定不再参加竞选；据推测，他曾私下表示，他认为市场将出现异动。然而，他的副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却向美国承诺，繁荣永无止境。他会在每一口锅里放一只鸡，在每个车库里放两辆车，在竞选过程中，他承诺美国“比任何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消灭贫困”。[\[22\]](#)

1929年10月19日，菲茨杰拉德发表了小说《游泳者》（*The Swimmers*）。小说讲的是一个名叫马斯顿（Marston）的美国人意识到国家的理想已经被金钱腐蚀的故事。马斯顿在一家银行工作，银行的名字起得颇具讽刺性，名叫“承诺信托”。

在小说开头，马斯顿那位水性杨花的法国妻子抱怨起她在里维埃拉看到的美国女人：

“你该拿她们怎么看呢？”她喊道，“了不起的女士们，资产阶级，冒险家——她们都是一样的。看！……”

突然她指着一个正在下水的美国女孩：

“那位年轻的女士也许是个速记员，但她非得强迫自己改头换面，从穿着打扮到言谈举止，就好像全世界所有的钱都归她所有似的。”

“也许真会有那么一天的。”

“这就是她们听到的说法；可这种事情只能是百里挑一，剩余的那99个都没戏。这就是为什么等到她们三十好儿时，每个人的脸看起来都那么不满足，那么不快乐。”^[23]

只有1%的人实现了美国梦，至于其余99%的人，未来等待他们的将只有不满和痛苦。认为最富有的1%或2%的人口控制着国家的想法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德莱塞和安德森等作家曾警告，“美国梦”是对财富的一种危险的错觉，但在这里，它正在清晰地转向21世纪美国梦含义中隐含的“承诺”，以及当这个承诺几乎不可避免地破灭时随之而来的痛苦。

《游泳者》中的反派人物是一位富有、粗俗的银行家，他宣扬的是镀金时代财富福音的最新说法。“金钱就是力量……金钱创造了这个国家，建造了它伟大而光辉的城市，创造了它的工业，在它的土地上覆盖了铁路网。”^[24]这个故事清楚地表明，银行家的说法错了，但他对美国的愿景正在胜出。

马斯顿感到越来越格格不入，他开始思考美国的意义，尤其是美国人对忘记历史的渴望。“他喜欢说，美国人生下来就应该有鳍，也许他们确实有，或许金钱就是鳍的一种形式。在英国，财产会产生强烈的地方意识，但美国人躁动不安，根基浅薄，他们需要鳍和翅膀。在美国，一种观念反复出现，即教育应该摒弃历史和过去，成为一种空中冒险的工具，不应被任何传承或传统的残余拖累。”^[25]现代美国的繁荣取决于它不受历史或传统的束缚。

马斯顿最终认定，在以他的对手为象征的暴利社会中，他没有立足之地，但他不会放弃对美国所代表的理想的信念。菲茨杰拉德在书的结尾写到马斯顿驶向欧洲，目送美国渐渐遁去，成为自己的过去。这段结尾的魅力不亚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那段著名的结语：

在“庄严”号甲板上，看着城市逐渐褪色，海岸渐渐消失，他的心里涌动起强烈的感激和欢喜之情：美国远在那里，在工业丑陋的瓦砾中，富饶的土地仍然被推高，一如既往的丰沛和肥沃；在群龙无首的人民心中，古老的慷慨和奉献仍在继续斗争，时而在狂热和过剩中爆发，但永远不屈不挠、无坚不摧。当下，骑在马鞍上的是迷失的一代，但在他看来，那些继往开来的人、战斗的人都要更为伟大；而他所有的曾经的感觉，认为美国是一个奇怪的意外、一种历史性的运动，已经永远消失了。美国是最好的，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国是一片土地，英国是一个民族，但美国仍然是一个难以表述的想法——那是夏洛^[26]的坟墓和它伟大的人民的那一张张疲惫、憔悴、紧张的面孔，以及在阿尔贡^[27]为国捐躯的乡村青年，只有在他们的身体衰竭之后，令他们奋不顾身的那句话才从空想变为现实。这是内心的意愿。

小说发表10天后，华尔街股市崩盘。

[1]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25), p. 14.

[2]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p. 99.

[3]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p. 143.

[4]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p. 143-144.

[5]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p. 79.

[6] Bruce Barton, *The Man Nobody Knows: A Discovery of the Real Jesus*,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24, 1925, pp. iv, 32, 23.

[7] Bruce Barton, *The Man Nobody Knows: A Discovery of the Real Jesus*, p. iv.

[8] Bruce Barton, *The Man Nobody Knows: A Discovery of the Real Jesus*, p. 107.

[9] Bruce Barton, *The Man Nobody Knows: A Discovery of the Real Jesus*, p. 140.

[10] Bruce Barton, *The Man Nobody Knows: A Discovery of the Real Jesus*, pp. 159–63; original emphasis.

[11] *Racine Journal-Times*, Racine, WI, 19 January 1925.

[12] Calvin Coolidge, “Have Faith in 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Senate President Acceptance Speech”, 7 January 1914.

[13] *Daily Republican*, Monongahela, PA, 3 September 1925.

[14] *Los Angeles Times*, 29 January 1926; *Daily Times*, Davenport, IA, 29 January 1926.

[15] *Brooklyn Daily Eagle*, 12 June 1927.

[16] *Philadelphia Inquirer*, 17 October 1925.

[17] *Ironwood Daily Globe*, Ironwood, MI, 1 Oct 1927.

[18] *Morning Herald*, Uniontown, PA, 17 September 1925; *Ithaca Journal*, Ithaca, NY, 16 November 1929.

[19] *Los Angeles Times*, 6 July 1925.

[20] *St. Louis Post-Dispatch*, 18 March 1928.

[21] *Miami News*, 8 April 1927.

[22] *Los Angeles Times*, 12 August 1928.

[23] Fitzgerald, “The Swimmers”, *Saturday Evening Post*, 19 October 1929, p. 13.

[\[24\]](#) Fitzgerald, “The Swimmers”, *Saturday Evening Post*, 19 October 1929, p. 152.

[\[25\]](#) Fitzgerald, “The Swimmers”, *Saturday Evening Post*, 19 October 1929, p. 150.

[\[26\]](#) Shiloh, 指南北战争时期发生在田纳西州、最终由北方胜出的夏洛战役。

[\[27\]](#) Argonne, 指1918年的阿尔贡森林战役，此役美国远征军伤亡达12万人。

8 美国优先 1923~1929年：一个爱国者，一个超级爱国者

“‘美国优先！’自一战以来，我们已经多次听到过这种说法？”1923年7月2日，一位名叫普鲁登斯·布雷迪什（Prudence Bradish）的专栏作家叹息道。这让她想起了“我们过去常常听到德国人说的话——毫无疑问，他们至今还在说：‘德国高于一切！’那种古老的‘不管是对是错，都是我的国家’的腔调，正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要摆脱的腔调，就像我们除掉（或想要除掉）花园中的杂草一样。这是一个糟糕的论调，一个糟糕的想法”。

另外，7月4日独立日的全部意义在于庆祝爱国忠诚，这就造成了一个困境。布雷迪什提出，也许解决的办法是让每个人都说“美国优先！……美国优先于个人。”[\[1\]](#)

这一年早些时候，一位署名“美国优先”的美国公民给《芝加哥论坛报》写了一封信，呼吁使所有使用“外国名字”的美国人美国化。他说，即使是第二代移民，“只要他们保留自己的旧名字，就无法去除效忠外国的印记。他们像外国人一样聚集，像外国人一样投票，像外国人一样说话。在我看来，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百分百美国人，除非他们放弃自己的外国名字，换成与我们的语言协调的美国名字”。[\[2\]](#)

这封信引起另一位读者的强烈反应，他指责“美国优先”是“无知偏执的可悲表现”。后者一开始就指出，“除非这位‘美国优先’是印第安人，否则他就不是他所相信的那种‘美国人’”。他想知道“美国优先”到底认为什么才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名

字，还指出就连美国（America）本身也不是美国名字，而是意大利名字，为的是纪念探险家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3]

巴尔的摩一位愤怒的读者同样反对一位记者最近的说法，这位记者“谈到了三K党的爱国热情，并断言‘他们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把其他所有国家摆在第二位’”。一个鼓动“迫害犹太人、黑人和天主教徒的人，还怎能扪心自问，以百分百美国人自居？”[4]“美国优先”一直与“百分百美国主义”的概念相去甚远，可是三K党有一个令人讨厌的坏习惯：但凡这两句格言同时出现，它们也会跟着突然冒出来。

海勒姆·埃文斯（Hiram W. Evans）在1922~1939年被奉为三K党的“帝国巫师”，1923年10月他在得克萨斯州发表了关于“现代移民的威胁”的演讲，引用三K党关于“来自国外的人口污染流”的观点，称移民威胁到“本土盎格鲁-撒克逊人”（他补充道：“不唯利是图的动机将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到我们的国家。”该说法之荒唐令人惊叹）。“优生学的案例由此进入我们的视野，不是这里有些那里有些，而是比比皆是，”埃文斯明确表示，这是因为带来“不好的结果”的异族通婚正在危及“真正的美国精神”。[5]

到1923年，三K党已经取得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影响力。当年11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长文，用醒目的图片展示了那些由三K党决定选举结果的州，并转载了全国各地三K党报纸的标题。[6]

这位记者走遍了由三K党人把持的各州，调查“所谓的‘纯美国主义’势力”的崛起。三K党控制着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印第安纳州和俄勒冈州的地方政府，甚至印第安纳州的非三K党人也认为该州约有50万名三K党成员，而三K党自称有70万名成员。那一年，如果没有三K党的支持，印第安纳州的任何一位候选人都不可能赢

得地方选举，而俄勒冈州是“第一个屈服于三K党的州”，自1922年以来一直处于三K党的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俄亥俄州似乎“已经准备好加入蒙面游行，据说加利福尼亚州很快就会加入”。在那之后，争取州控制权的三K党把目标对准了密歇根州、堪萨斯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然后是肯塔基州、伊利诺伊州和密苏里州。这位记者尖刻地补充说，他们的目标是让每个州对居住在那里的“戴着兜帽的纯美国人”来说都是安全的；他们通过提名候选人来寻求政治控制，并通过其他方式让人们感受到他们的影响力，这样“三K党就不再是一个可以拿来开玩笑的东西了”。^[7]一些美国人曾经觉得这很荒谬，但现在人们越来越担心三K党可能会控制政府甚至白宫。

这位记者还说，面对三K党的攻击，“这些州的参议员、众议员、州长、立法者、州官员、县官员和地方官员都保持沉默”。在即将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威廉·G. 麦卡杜身上，据说他获得了三K党的支持。麦卡杜顶住了拒绝承认这一背书的压力，试图继续“作为三K党善意的不置可否的接受者”。^[8]

《纽约时报》的记者预测，这种沉默无论是出于懦弱还是同谋，都将被证明是一种地方性流行病。任何质疑三K党操控即将到来的选举的人，“都应该设法让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家在这些州中谴责三K党。也就是说，必须公开予以谴责”。^[9]

早在大选开始前的整整一年，人们就对选举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关注，部分原因在于1923年夏天，在“茶壶圆顶丑闻”（Teapot Dome Affair）不断升级的压力下，总统沃伦·G. 哈定于8月突然去世，他当年轻易做出的承诺也不了了之。事实证明，哈定和他的政府肯定没有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哈定政府有望证明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一任政府（尽管有必要在此说明，美国历史尚未结束）。

《华尔街日报》披露，哈定政府的内政部长阿尔伯特·富尔（Albert Fall）未经竞标，在海军部长埃德温·登比（Edwin Denby）的协助下，将联邦石油设施（当中包括怀俄明州的茶壶山）租给了私人石油公司。作为回报，富尔获得了40多万美元的“个人贷款”——按今天的购买力计算要远超400万美元。富尔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入狱的政府成员，但他不是最后一个。哈定政府的司法部长哈里·多尔蒂（Harry Daugherty）后来因收受贿赂被迫辞职，但逃脱了牢狱之灾。哈定去世一年后，政府提起诉讼，要求追回“被盗财产及报酬”，赃款总计逾100万美元。[\[10\]](#)

哈定政府是由裙带资本主义和空前的腐败定义的。这不仅仅包括哈定的老朋友、参与各种形式腐败活动且公然藐视《沃尔斯泰德法案》（*Volstead Act*，即《禁酒法案》）的俄亥俄州的黑帮。此外，在任参议员时，哈定在夏威夷度假时遇到了查尔斯·福布斯上校（Colonel Charles Forbes）。1921年，哈定决定将新成立的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 Bureau）交给他。福布斯在该局从事大规模诈骗活动，从承包商那里收受贿赂，出售医疗用品以牟取个人利益，而士兵却无法得到适当的医疗护理。参议院随后的证词显示，该局存放着20万封退伍军人寄来的邮件，但始终没有开封。福布斯也因此进了监狱。

然而，“美国优先”这一思想相对来说并没有受到茶壶圆顶丑闻太大的‘影响，共和党总体而言也是如此，部分原因在于卡尔文·柯立芝出了名的廉洁，他在当选总统后一直追查哈定政府的腐败成员，而不是赦免他们。柯立芝获得了广泛嘉许，人们认为他是一个节俭、谦虚、朴实的商人，信奉传统的清教价值观。但有一点也是事实，似乎没有人充分关注已经曝光的腐败问题，并将其归咎于共和党：共和党将在接下来的两次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重返白宫。

1924年柯立芝竞选连任时，他的一个口号是“美国优先”；成千上万的“标语牌”上印着他和竞选伙伴查尔斯·G.道斯（Charles G. Dawes）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简历，旁边写着“美国优先”。这些标语牌是“专供装裱而设计的”。[\[11\]](#)（柯立芝还有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口号：“与柯立芝一起处变不惊”）

1924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旨继续强调“美国优先”，宣称共和党是“坦诚而问心无愧的政党，没错，它骄傲地坚持把美国放在首位，拒绝接纳软弱而不稳定的国际主义，他们的忠诚和热情只对美国保留”。[\[12\]](#)

这一年，还有人鼓励工业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竞选总统。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一项调查要求美国人对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进行排名，福特名列第三，仅次于耶稣和拿破仑。他是白手起家的典范，他的创业史是典型的美国成功故事，20世纪20年代初，他广受欢迎；同时，他也是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者。最终，他没有参选。

在1924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寻求党内提名时，麦卡杜表示，“美国优先”因其与共和党腐败挂钩而遭到玷污。当一个支持者喊道：“别忘了茶壶圆顶丑闻。”麦卡杜承诺：“从现在直到选举日，我们不会让共和党人忘掉他们肮脏的丑闻……我们都希望本次大会的讨论将有利于美利坚合众国，因为除非民主的理念能比美国优先更加深入人心，否则我们不会取得任何成功。”[\[13\]](#)

但麦卡杜的参选在民主党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此前，芝加哥的一名政客指责他依赖于三K党的支持。这种说法迅速传遍全国，促使民主党在全国纲领中提出了一项“反三K党”条款，试图迫使所有南方民主党人正式与三K党断绝关系。

那一年，三K党成功地策划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缅因州的波特兰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的官员选举。在一些州，如科罗拉多州和印第安纳州，他们将足够多的三K党成员安插到要害岗位，从而有效地控制州政府。1924年，大约25%的三K党成员分布在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14]三K党所表述的“百分百美国主义”，明确地定义为对财富和权力的兴趣，当时的观察人士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

“上校”西蒙斯于1915年在石头山上点起一把火，由此组建了第二代三K党。同年，他“考虑到接受了2万美元的现金”，于是辞去党领袖一职。随后他成立了一个名为“烈焰剑骑士”的新组织。一位记者预言“烈焰剑骑士和三K党以后可能会就美国法西斯党的领导权问题发生争端”。^[15]

在1924年的选举中，科罗拉多州的一名法官与一名得到三K党支持的对对手展开了一场苦战，他向媒体写了一封公开信，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曾经有一名女士冲着我嚷嚷，“你不是百分百美国人，你反对三K党”。同这样的人讲道理是完全没有用的。他们花10美元就能买动一个人仇视别人，这笔钱花得太值了……在任何一次竞选中，我都没有见过这等赤裸裸的疯狂，它是如此的怨毒、如此的憎恶……他们是自卑情结的受害者，当他们读到三K党的文字，发现自己被称为“世界上血统最高尚的人”唯一纯粹的百分百美国人时，这种情结给他们带来了自高自大的错觉和与之相伴的妄想——江湖骗子得以利用他们的无知，将其转化为金钱和政治职位。^[16]

纽约州北部一家报纸以明显的轻描淡写的口吻报道说，“三K党条款是政党的大问题”，并补充道，“争取和反对三K党纲领的力量角逐十分激烈，”令民主党纲领的所有其他条款相形见绌，包括该党对国

际联盟和禁酒令的立场，“以及其他存在争议的问题”。^[17]民主党的此次大会后来被称为“三K党烤炉”，因为大会召开时不仅气温飙升，而且与会人员情绪高涨，气氛非常热烈，以至于有报道着重指出，在1.3万名现场观众中，许多人向尖叫的代表吐口水。^[18]公开谴责三K党的条款动议最终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

大会开始时，《纽约时报》一则报道的标题称“麦卡杜对三K党保持沉默”，他的竞选经理拒绝向麦卡杜提出有关其在三K党立场方面的问题。^[19]三K党贬称麦卡杜的一个主要对手是“犹太人、酒鬼和耶稣会士”候选人，并在大会上支持麦卡杜。麦卡杜一再被人追问自己的立场，但他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无力回避，遭到广泛的批评。

最终，麦卡杜拒绝否认三K党的背书。人们普遍认为正是此举使他失去了总统候选人提名。

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柯立芝签署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反移民法案。1924年的《约翰逊-里德法案》（Johnson-Reed Act）又名《国家起源法案》（National Origin Act），引入了一种基于移民原籍国的配额制度。根据18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它将移民人数削减了90%以上，使发放签证数仅占美国国民总数的2%——故意跳过1920年、1910年和1900年的人口普查，而挑选了基本上不受限制的移民“大潮”到来之前的人口统计学数据，这是一个有意为之的选择。

该法案的起草者之一、共和党参议员大卫·里德（David Reed）——不要将他与民主党人詹姆斯·里德混淆，尽管在他们二人之间实在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对参议院说，早期的立法是欠缺的，因为

它“忽视了我们当中那些有兴趣将美国民众水准保持在最高标准的人，也就是那些土生土长的人”。

议员们积极寻求回归“更白”的本土主义，也就是更多移民属于“北欧人”的年代。他们根据早期的移民人数制定配额，鼓励来自北欧的移民，阻止或防备来自其他任何地方的移民。根据1917年移民法中按地理界定的“亚洲禁运区”，他们完全排除了亚洲移民。

这实质上创造了种族优越性的类别，其中西欧人和北欧人获得的签证比例上升，而东欧、南欧和亚洲人则受到严格限制或完全禁止入境。这一决定严重影响了美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总体来说，《约翰逊-里德法案》是通过控制美国的种族构成，倡导一种从根本上来说属于优生主义的同质性理想，从而确定无误地创造一种可定义的美国身份。

此前的全国性讨论最终顺理成章地促使《约翰逊-里德法案》获得通过，这一点并非巧合。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杂志《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刊登了一系列宣扬北欧主义的著名文章。例如，1922年1月，一篇名为《关闭海门》（*Shutting the Sea Gates*）的文章告诉读者：“某些生物学法则支配着跨品种杂交，无论对象是狗、马还是人。这些法则应该引起美国公民的极大兴趣，因为自1880年以来，已有数百万非北欧的外国人涌入美国，在美国最大的几个城市中，这些外国出生的人及其子女人数甚至远远超过美洲印第安人。”^[20]

几个月后，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市长宣布1922年7月2日为“美国的第一天”，当地的一位牧师对此做出回应，呼吁“美国的美国化”。他从麦迪逊·格兰特的《伟大种族的消逝》一书中直接照搬术语，阐明了美国化在优生学中意味着什么。同样，他把1880年定为一个分水岭（格兰特也这么做过），声称在那之后美国开始在种族上退化。

“1880年以前，”这位牧师对他的会众说，“我们的大多数移民来自伟大的北欧民族国家，也就是欧洲北部国家——瑞典、挪威和丹麦；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来自德国、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管理自己和他人的能力。”他还说，他们是这个世界上的贵族，是“自愿的探险家、拓荒者、战士、水手和冒险家”。他几乎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格兰特对北欧人的描述，声称这些卓越的北欧人是美洲的早期定居者，是“塑造国家”的制宪者。

然而，自1880年以来，情况急转直下。“大部分移民到美国的人来自欧洲其他两个主要族群——阿尔卑斯族群和地中海族群。”阿尔卑斯人（全部）属于“斯拉夫民族”；地中海族群中既有南欧人（他着重指出了意大利人、希腊人和西班牙人），也有北非人。他说，这些人从来没有成功地“管理过自己或其他任何人”，显然他不怎么了解亚历山大大帝、埃及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或西班牙征服美洲的历史。这些人“生活水平低下”，一旦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总会将后者排挤出去。“难怪全欧洲熟悉这类移民的美国人都在发出警报。”[\[21\]](#)

其次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所预言的无非“下等人的统治”。[\[22\]](#)

这位牧师怒斥道，美国不是“罪犯、穷人和无能之辈的垃圾场”，这与柯立芝“这是谁的国家？”的言论相呼应。他抱怨说，近些年来到美国的绝大多数人是“欧洲最软弱、最贫穷的人——失败者、无能和不成功的人，欧洲社会的最底层”。美国不应该成为“不能融化的元素的熔炉”。这个国家终于认识到，你不可能“从任何劣等种族中制造出美国人”。[\[23\]](#)

这种以纪念“美国第一天”为主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反映了《约翰逊-里德法案》背后的普遍情绪。让种族和民族的时钟倒转的努力——就好像在1879年，美国的每个人都是“纯净的”一样，对于纯粹

的幻象也同样重要。更有争议的是，试图重建美国历史上某个被神话的阶段，回到种族侮辱这一原罪之前的那一刻是徒劳的，这导致了人们不再重新思考这个神话，而是用暴力来实现不可能的事情。

大多数时候，纯净不过是对邪恶思想的一种伪善的暗语。密西西比州前参议员詹姆斯·K. 瓦尔达曼（James K. Vardaman）广为人知的外号是“伟大的白人首领”（他的竞选口号是“给瓦尔达曼投票，就是给白人至上投票”），1923年，他编辑出版的《瓦尔达曼周刊》（*Vardaman's Weekly*），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早期版本。《瓦尔达曼周刊》5月号将其主编称为一个“为美国的纯净、自由和安全而战”的人。^[24]这听起来似乎无可厚非，但实际上，使美国纯净的斗争包括瓦尔达曼那句臭名昭著的宣言：“为了维持白人至上，有必要的话，本州的每一个黑人都将被处以私刑。”^[25]

《约翰逊-里德法案》将一种观点法典化，即衡量一个人对美国社会的潜在价值的是其所属的人种和种族。在围绕它展开的政治辩论中，这一观点始终与“美国优先”联系在一起。当有人反对将日本人排除在外时，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在众议院宣布，“本党不希望得到那些不相信美国优先原则的人的支持”。^[26]在1924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柯立芝为限制移民进行了辩护，他告诉“在外国出生的选民”要首先为美国服务。“那些与这个国家共命运的人，必须首先忠诚于美国，其次才是忠诚于自己的母国”。^[27]1924年5月26日，柯立芝在签署《约翰逊-里德法案》，赋予其法律地位时宣布：“美国必须保持美国化。”

换言之，他们想让美国再度伟大。

1924年秋，一位通信记者写信给《底特律自由新闻报》（*Detroit Free Press*），嘲笑三K党代表“百分百美国主义”的观点。信的开头这样写道：“加入三K党，成为百分百美国人。”但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首先，“你必须在美国出生”，尽管“在哪里出生本身就是意外”。其次，你必须是新教徒，尽管大多数人在信奉宗教时都是听从自己长辈的安排。

除了出生这种偶发事件，三K党还提出了其他自相矛盾的定义。“他们要求你必须忠于宪法，紧接着又要你必须仇恨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黑人。对宪法的忠诚和对同胞的仇恨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一旦加入了三K党，你就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其次，“你还必须是基督徒！身为教徒，你又怎么可能认同三K党的教义？”

最后，这位通信记者预言，如果美国在战斗中真的需要一条防线，那么在战斗结束之后，三K党成员将无处可见。但是，一旦“和平和富足的日子重现，那些不宽容的群体”就会再度兴起，“与之相伴的是百分百美国主义的呐喊，而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黑人又会再度被边缘化”。[\[28\]](#)

1925年，卡尔文·柯立芝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发表了演讲，该演讲被广泛报道。他向听众保证，“美国优先”仍是美国的目标：

广泛表达的“美国优先”的愿望不容批评。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愿望，我国人民应该倍加珍惜。但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美国成为第一。通过培养民族偏执、傲慢或者自私，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只能在真正的意义上使美国成为第一，这意味着通过培养友谊和善意的精神，通过国内的进步和对国外的帮助，树立为人类切实服务的榜样。除非我们能够消除种族对立、恐惧、仇恨和猜疑，并在地球

公民的心目中培养一种宽容的态度，否则很明显，战斗的成果将会不复存在，我们将进入一个为另一场冲突做准备的阶段。[\[29\]](#)

这是一个值得称许的雄心，但“美国优先”可能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尤其是因为“美国优先”继续与完全由民族偏执、傲慢、自私、种族对立、恐惧、仇恨和猜疑驱动的群体联系在一起，这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它已正式保证要将“培养和延续百分百的美国精神”写入章程，而且它经常被指控为法西斯组织。[\[30\]](#)

到1925年，全美三K党成员估计在300万~800万人；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个有着1.15亿人口的国家，大约有500万三K党成员，约占美国总人口的4%。

到1925年，非裔美国人报刊《布法罗美国人》已经对共和党人将“美国优先”用于全体美国人而不仅仅是白人不再抱有希望。“为激起人们对‘美国优先’的兴趣，应该在每个联邦部门任命一名有色人种联络官，负责向人民解释政府，向政府解释人民。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在黑人看来，这说明其长期效忠的政党对他们毫不关心。”[\[31\]](#)但林肯所在的政党对民权事业的漠不关心只会随着20世纪的发展而变得更加严重。

1926年，当三K党开始面临选举失败和丑闻时，海勒姆·埃文斯在一本名为《三K党为美国主义而战》（*The Klan's Fight for Americanism*）的小册子中，再次宣传该组织。它试图解释“大批美国老派民众的性格和现在的心态。必须记住的是，大众有别于智识上混杂的‘自由主义者’……如今在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自由主义无非国族、种族和精神上的背叛”。

埃文斯称自由主义者 of 叛国者（根据定义，他们不是“老派美国人”，尽管很多自由主义者可以将其血统追溯到“五月花”号上的祖先，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不愿意这么去做），他接着列举了像他这样的“北欧裔美国人”的不满。

上一代的北欧裔美国人越来越不安，最终深感苦恼……我们在文化、智力支持和训练有素的领导力方面非常薄弱，从事的是普通人的劳动。我们要求把权力交还普通人，不是那群特别有文化、过度理智的人，而是完全没有被宠坏、没有去美国化的普通的老派公民，我们也期望赢得这场运动。我们的成员和领导人都属于这一阶层——我们站在把持着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的对立面，后者已经背叛了美国主义，我们希望从他们手中夺回控制权，这几乎是必然之举。

埃文斯坚持认为，他们的反精英民粹主义也是由经济焦虑引发的，或者用他的话说，是“经济困境”：“提供给我们孩子的未来的保障日渐缩水。我们发现我们伟大的城市和对工商业的控制权被陌生人接管，他们获得了取得成功和繁荣的先机。”埃文斯重申了他们对“白人至上的基本理念”的忠诚，这一理念包含在“三K党的口号——‘本土主义、白人、新教至上’”中。[\[32\]](#)

问题在于（如果还需要说明的话）三K党感到“不安和苦恼”，是因为他们对于权力和统治的既有保障确实受到他们寻求统治的人民进步的“侵蚀”，这群“陌生人”接管了他们认为本应属于自己的商业权力。对此，他们的反应是恐吓对方——黑人、犹太人、工会主义者、激进分子、外国出生的人和傲慢自大的女人，事实上这些人比三K党人“更不安，更苦恼”。

当曾经板上钉钉的政治和经济霸权面临威胁后，三K党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并为他们通过暴力重申这种日益减少的特权提供了各种理由。三K党否认公民平等，越来越多地把一切代表公民利益的政府干预视为压迫行为。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把自己塑造成反法西斯政权的“自由斗士”。

这一年，英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它由作家路易吉·斯图佐（Luigi Sturzo）创制，用来形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33]两年间，美国的演讲者就极权主义的后果展开了辩论。他们为当地观众给出了极权主义的定义：“认为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家，国家不可能做错事”，对国家的任何批评都是“叛国大罪”。^[34]

但与此同时，“美国优先”也开始被排挤到这样一个空洞口号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外。1927年，芝加哥市长“大比尔”汤普森发起了一场“美国优先”运动作为反英活动的一部分，但遭到全国媒体的嘲笑。汤普森放话说，如果乔治国王胆敢来芝加哥，他将“一拳抽扁他的鼻子”。他还要求公共图书馆根除亲英文学，坚称英国人正在从事殖民主义宣传。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反英声明无疑是有意讨好芝加哥众多的爱尔兰裔美国人。

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嘲笑这些荒谬的说法。在《大比尔的超级爱国者协会》（*Big Bill's Superpatriot Society*）一文中，《圣路易斯邮报》指出了汤普森俱乐部与三K党之间的关系。与三K党一样，“美国优先基金会”的入会费为10美元。“它的政纲与三K党相似，宣扬崇高的目标——更好的公民身份、忠诚”和其他公民美德。但它的真正目的看来是“诉诸无知和偏见，为了政治目的煽动种族和民族仇恨”。

这篇社论建议，汤普森的美国优先运动应该采用讽刺作家亚历克·伍尔科特（Alec Woollcott）最近写的一首诗作为主题曲。

我是百分百美国人

我是爱国者，超级爱国者

红色，红色，红色，红色，红色，我是

一片赤诚的美国人。

合唱

我是百分百美国人，

我是，我就是。[\[35\]](#)

《纽约时报》赞同《圣路易斯邮报》的观点，认为“通过喊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在这个充斥着帮派枪击、街头谋杀和腐败选举的城市里焚烧书籍、打压英国人，他激起了一些兴趣，带来了很多笑料”；同时也指出，汤普森的活动与三K党之间存在隐性联系。美国优先基金会曾打动佐治亚州的三K党成员，后者“热情地支持汤普森市长和他的反英口号”。

但很快，这种偏见就开始发生冲突，“一些受过教育的三K党成员发现，三K党支持北欧人反对所有外来者，但在佐治亚定居的是北欧英格兰人；这个城市满是心怀怨恨的移民，它的市长试图朝北欧人的摇篮开枪”。

那么，当美国优先基金会攻击英国人的时候，他们怎么知道该支持哪类北欧人呢？三K党很乐意反英，可反着反着，他们得知英格兰人也是“北欧人”，而攻击英国人的是芝加哥的移民。突然之间，汤普

森的“美国优先”不再是一个代表“真正的美国人”的有益团体，而是与令人憎恨的“虚假”城市结盟。他们不得不站在“北欧英格兰人”一边，反对汤普森的“美国优先”。这一切都非常令人困惑——这就是试图严肃对待任何像科学种族主义这种愚蠢的事情的后果。

《纽约时报》记者嘲讽地写道：“这种幻灭是瞬间产生的，但它迟早会出现。因为当汤普森市长选择定价10美元作为加入他的仇恨社团的费用时，就已经触动了三K党的心灵和灵魂——他们的钱包。”
[\[36\]](#)

正如上文中那位科罗拉多州法官指出的，“美国优先”组织，无论是汤普森基金会还是三K党，都在兜售仇恨。他们甚至给它定了相同的价格。

此外，声名狼藉的三K党与“美国优先”组织的联系开始给其追随者带来麻烦。1928年，《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说，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州长被迫否认“与三K党有牵连”，此前，相关谣言催生了一个新的口号：“百分百美国人优先”。[\[37\]](#)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继续受到内讧的困扰，还有人指责他们未能团结在选民可以信任的单一问题上。

密苏里州一篇充满愤怒的社论写道：“这个问题势不可当地出现：民主党非得是头蠢驴吗？”[\[38\]](#)

麦卡杜此时还有影响力，他敦促民主党人围绕支持禁酒令来界定自己。许多南方民主党人支持禁酒令，他们的原旨主义与“美国优先”的理念相符。相比之下，马里兰州州长阿尔伯特·里奇（Albert Ritchie）则希望吸引那些痛恨禁酒令的城市少数族裔选民，并且从中

发现，眼下的情况是乡村福音派少数团体获准制定管理美国大城市主要人口的法律。

密苏里州的这篇社论对这两种观点都不以为然，认为禁酒令既已获得法律地位，这艘船就扬帆起航了；民主党应该继续前进，团结起来对抗共和党。“美国仍然需要一个民有、民享的政府”，而且它需要一个政党来支持普通美国人反对大企业寡头和裙带资本主义，这些人在20世纪20年代控制着共和党的议程。[\[39\]](#)

社论还说：“任何有观察力的公民都能看到，美国民主政府和寡头政府之间、人民政府和有权有势的少数派特权阶级政府之间的界限正在以多么迅速、多么冷酷无情的手段被划定。不仅美国的未来，而且整个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是美国民主还是美国法西斯主义。”[\[40\]](#)

社论总结说：“民主党拒绝团结起来，为杰斐逊理论进行一场伟大的斗争，挑战梅隆和摩根的统治；如果它继续坚持内讧……所有既得利益者和特权机构都在敦促它这么做”“不仅愧对伟大的重任，还将是彻头彻尾的愚蠢——这一点要更加糟糕。”[\[41\]](#)

尽管这篇社论很可能最早用“美国法西斯主义”来形容企业寡头政治和华尔街可能给民主政府带来的风险，但这远不是该国在1927年与美国法西斯主义幽灵所做的唯一一次对抗。还有一次较量发生在纽约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骚乱六个月后，当时三K党和自封为美国法西斯分子的一伙人在曼哈顿和皇后区与围观者发生冲突，7名男子被捕，其中一人是20岁的德裔美国人弗雷德·C. 特朗普。“C”是克里斯特（Christ）的缩写。

[\[1\]](#) *Philadelphia Inquirer*, 2 July 1923.

- [2] *Chicago Tribune*, 12 December 1923.
- [3] *Chicago Tribune*, 15 December 1923.
- [4] *Baltimore Sun*, 14 September 1923.
- [5] H. W. Evans, “The Menace of Modern Immigration”, *Knights of the Ku Klux Klan*, pamphlet, 1924, pp. 6–8.
- [6] *New York Times*, 18 November 1923.
- [7] *New York Times*, 18 November 1923.
- [8] *New York Times*, 18 November 1923.
- [9] *New York Times*, 18 November 1923.
- [10] *New York Times*, 30 January 1924.
- [11] *St. Louis Post-Dispatch*, 17 May 1924.
- [12] *New York Times*, 25 September 1924.
- [13] *Press and Sun-Bulletin*, Binghamton, NY, 23 June 1924.
- [14] 参见Thomas Pegram, *One Hundred Percent American: The Rebirth & Decline of the Ku Klux Klan in the 1920s*, Chicago: Ivar R. Dee, 2011。书中估计了三K党成员人数，总结道：“对三K党成员人数的合理估计范围是200万人到运动高峰期的400万人甚至500万人。” 麦克林写道：“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可能多达500万人，分布在将近4000个地方分部。然而，这些数字几乎无法显示三K党触角之广。” *Behind the Mask of Chivalry*, p. 10.
- [15] *Age*, Melbourne, Australia, 14 February 1924.
- [16] *Mail Tribune*, Medford, OR, 29 December 1924.
- [17] *Mail Tribune*, Medford, OR, 29 December 1924.
- [18] *New York Times*, 11 August 1980.
- [19] *New York Times*, 21 June 1924.

[20] Kenneth L. Roberts, "Shutting the Sea Gates" , *Saturday Evening Post*, 28 January 1922, p. 51.

[21] *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Minneapolis, MN, 3 July 1922.

[22] *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Minneapolis, MN, 3 July 1922.

[23] *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Minneapolis, MN, 3 July 1922.

[24] *Vardaman's Weekly*, Jackson, MI, 10 May 1923.

[25] *Marion Democrat*, Marion, AL, 10 April 1907.

[26] *Philadelphia Inquirer*, 13 April 1924.

[27] *New York Times*, 17 October 1924.

[28] *Detroit Free Press*, 27 October 1924.

[29] *Asbury Park Press*, Asbury Park, NJ, 6 October 1925.

[30] *Freeport Journal-Standard*, Freeport, IL, 22 April 1921.

[31] *Buffalo American*, Buffalo, NY, 19 November 1925.

[32] *North American Review (1821-1940)* , 1 March 1926, Vol. CCXXIII, No. 830, p. 52.

[33] *Manchester Guardian*, 9 November 1926.

[34] *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2 February 1928.

[35] *St. Louis Post-Dispatch*, 30 October 1927.

[36] *New York Times*, 6 November 1927.

[37] *Chicago Tribune*, 5 April 1928.

[38] *St. Joseph Observer*, St Joseph, MO, 7 October 1927, p. 1.

[39] *St. Joseph Observer*, St Joseph, MO, 7 October 1927, p. 1.

[\[40\]](#) *St. Joseph Observer*, St Joseph, MO, 7 October 1927, p. 1.

[\[41\]](#) *St. Joseph Observer*, St Joseph, MO, 7 October 1927, p. 1.

第三部分 1930~1940年

9 美国梦 1930~1934年：美元国

华尔街崩盘两年后，美国陷入了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商人总统”，他们凭借激进的自由放任政策支配美国经济长达10年之久。胡佛认为预算需要平衡，他不愿反击——他的政府没有通过任何重大立法来应对经济萧条，而1930年通过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Hawley-Smoot Tariff Act）将美国进口关税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无非令经济局面雪上加霜。但民主党人也陷入混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意现行的财政思路，即平衡预算是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随着失业率上升，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继续大幅下降。到1932年，失业率达到23%，仅1931年一年就有2000多家银行倒闭，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住房、农场、企业和毕生储蓄。胡佛的回应是民族主义式的：他坚持认为大萧条的罪魁祸首是战后欧洲经济的不稳定，而不是根本上不健全的美国制度。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失业，政客们似乎不愿或无力挽救这种局面。尽管华尔街崩盘后的自杀潮被严重夸大，但商界领袖开始惊慌，手足无措，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而普通美国人也在表达自己的愤怒。

1931年，大萧条还在继续，“美国梦”一词终于开始主导全国的对话。这一切都始于历史学家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的著作《美国史诗》（*Epic of America*）。（他曾据理力争，要求用《美国梦》作为书名，但出版商固执地认为读者“永远不会掏3美元买一个梦”，并坚持让他更改书名。）[\[1\]](#)

这本书于1931年10月出版，立即引起轰动，让这个国家获得了一种方式来讨论它所遭遇的灾难，并找回失去的目标。对亚当斯来说，国家的失败主要是精神层面而不是经济层面上的。这一信息在全美引起共鸣。

亚当斯认为，追逐商业成功的幽灵正是令美国深陷大萧条的原因。亚当斯敦促美国摒弃对物质的关注，重拾它更高的理想，他声称：“为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创造更美好、更丰富、更快乐的生活的美国梦……从一开始就存在这个梦想或希望。自从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以来，每一代人都目睹了普通美国人为不平而鸣，他们要从似乎势不可当的力量手中拯救这个梦想，并驱散这股力量。”[\[2\]](#)

这是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定义，但人们没怎么关注到其中蕴含的明确警告：每一代人的美国梦都会受到威胁，需要重振。亚当斯没有明确指出反对美国梦的力量，但在过去30年里，美国人一直在讨论民主的敌人（“为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威权主义——的方方面面。这自然包括专制，但也包括特殊利益团体、腐败、财阀统治和寡头政治、裙带资本主义和社团主义，以及随着暴政走向公司化而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新兴极权主义。

亚当斯观察指出，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战斗；每一代人都会发现普通美国人被号召抵制威权主义的影响，重拾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民主梦想。他补充说：“目前，我们可能面临这些斗争中最艰巨的一个。”

但对于亚当斯来说，民主还有另一个明显的敌人：物质主义。在整部《美国史诗》中，他反复强调，贪婪正在摧毁美国梦。“这不仅是一个关于汽车和高工资的梦想，更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每个男人和女人都能够达到与他们天赋相匹配的最高成就，并获得他人的认可，这一切都与其出生或地位的机缘巧合无关。”

亚当斯认为，美国梦是关于品质而不是购买力的力量。它坚决反对裙带关系和继承的特权。这是对美国既有信条的回归，是对民主和平等、行动和自决、正义和慷慨原则的回归。亚当斯认为，对个人财富和奢侈的渴望并不是美国危机的解决方案，而是问题所在。美国正在失去它的灵魂，失去定义它的民主理想，转而满足于追逐浮华的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亚当斯是在让美国梦回归杰斐逊式的对“普通人”的信仰，而不是沃尔特·李普曼式的对这种神秘民粹主义的怀疑。但亚当斯也对安德鲁·杰克逊式民主的实用民粹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杰克逊的领导下，“任何人都能做任何事”的“美国主义教条”根深蒂固。每个普通美国人都得知，他可以胜任任何工作，“不经过特殊训练，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万事通，他找不到任何理由要求公职人员具备特殊的素质或经验”。[\[3\]](#)

但是，正如亚当斯观察到的，一个万事通的工作质量可能达不到这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最佳水准。平均法则意味着“平庸是为完全平等付出的代价之一，除非人们能够将自身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就像30年前的进步主义者一样，亚当斯认为，“美国梦”需要大力维护一种致力于超越个人富裕的价值观的社会秩序。美国人一直记得每样东西的成本，而不记得任何东西的价值：“大小，就像财富一

样，成了‘成功’的一个纯粹的象征，关于质的价值感被量取代，精神价值让位于物质。”[\[4\]](#)

亚当斯身上也有他那个时代的盲点。他是从欧洲移民的角度、透过白人男性的行为来看待美国历史，他称土著人为“野蛮人”，几乎没有注意到“黑人”的存在，只关注到了少数白人女性。但亚当斯也在描述一种被这些欧洲白人男性移民定义的民族精神。他所挖掘的自我实现梦想的原则适用于所有人，甚至包括像他这样的普通美国人，也往往会忘了当初的梦想。那些被忽视的美国人正在以越来越大的力量指出这个事实。

《美国史诗》一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粗鄙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史，它解释说，美国梦由残酷的现实塑造：从荒原中攫取生命，创造一个国家经济和意识形态来支持它。早期的移民习惯于自行决定遵守哪些英国法律，这逐渐孕育了一种近乎闭关自守的自治文化。亚当斯写道，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我们都能听到“斧头在树上的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倒下的巨人发出的闷响——前进的伐木工人在清理木场；民主；‘商业’”。[\[5\]](#)

他补充说，直到19世纪，美国人才开始说服自己，相信积累财富是一种爱国的义务，追求财富为的是个人和国家的共同利益，发展和建设国家事实上是公民的道德义务。这个谬论站住了脚。“如果赚10万美元是一种道德行为，那么赚100万美元就必须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和爱国主义行为”，至于赚钱的手段有多么不道德，倒是不用理会。[\[6\]](#)

富有从那以后被想当然地视为一种美德，有一天人们可能仅仅因为一个人有钱就相信他是好人，而不是认同肮脏的财富无论如何都不能洗白。而今，巨额的财富看起来总能表征道德败坏而非正直。

美国的个人主义使“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异常迅速”，但是个人对“炫目的奖品”的争夺正在摧毁“我们的个人理想和社会责任感”。最富有的人仍然不担心特权，“因为特权对他们有利”；至于大多数普通人，“大约都会反抗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制度的积弊”。

但是，个人主义总是能作为美国的“政府运行原理”卷土重来，因为国家深厚的资源意味着人们不断瞥见个人机会，并对政府横加干涉感到不满。

亚当斯认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让平等和机会的美国梦成为持久的现实。相信“政治家明智的家长式作风或商界领袖的无限智慧”永远不会奏效——但亚当斯并没有妖魔化富人。他看到了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的价值，即奋力去追求社会教导他们要尊重的东西。只要财富和权力仍然是“成功的唯一勋章”，它们将继续塑造这个国家的抱负，“除非我们在自己的灵魂中培养出某种伟大的力量”。[\[7\]](#)

指望有钱有权的人“抛弃这两者，成为一个蔑视精神财富的民主国家的精神领袖”是荒唐可笑的。同样的道理，没有一个政客会“超越自己权力的起源”。因此，寄希望于领袖毫无意义，“除非无数男人和女人通过亲身经历（也许得亲历幻想破灭），打心底里确认什么才是真正令人满足的生活，什么才算是古希腊意义上的‘美好生活’”。[\[8\]](#)

为美国价值体系绘制发展谱系，这令《美国史诗》成了畅销书。亚当斯的想法受到了一个试图通过改变规则来度过危机的国家的欢迎；对许多人来说，在旧有的共同福祉基础上重新树立起共同责任感和公益意识而非实现共同富裕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答案，他们用“美国梦”来表达这种精神。他们的结论是：经济和道德的失败相互交织，是时候着手恢复国家的道德经济。自私自利不仅已经行不通，而且一败涂地。现在，人们需要关注更大的德行。

大萧条引发了一场国家认同危机。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以“美国梦”为名，为美国找回了这种身份认同。在他的书于1931年出版后，这个短语突然在国内的各种出版物中暴红，曝光率指数级增长。短短几周时间，随着作家和政客开始讨论它的演变，它开始进入全国性媒体的视野。

1932年1月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一篇文章说：“现在像我们许多人所做的那样去否认这个梦想，或者说它毫无意义，都是徒劳的。在我们迄今为止的所有梦想中，或是在一系列美国梦的任何一个片段中，我们在1929年陷入的这个梦因其规模、复杂性和各个部分的奇异性，将是最难以在现实中具体化的。” [9]

那几年，关于美国意义的其他著作的数量也在激增，包括《美国理想》（*The American Ideal*）、《谁拥有美国？新独立宣言》（*Who Owns America? A New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apitalism*）、《追逐幸福：美国民主的故事》（*Pursuit of Happiness: The 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美国传奇：美国美好生活梦想的历史和文学》（*American Saga: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Dream of a Better Life*）、《美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America*）等。为了努力理解究竟是哪出了错，美国开始以史为鉴。

1932年11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他所在的民主党的竞选纲领是美国人将获得“新政”，与美国签订一份“契约”，其中包括就业增长、国家养老保险、农业救济金和废除禁酒令。罗斯福在1929年连任纽约州州长的就职演说中概述了他的政治哲学：“我们的文明不能持久，除非我们作为个体认识到，我们对世界

其他地区既承担着个人责任，又依赖它们。事实上，‘自给自足的男人’和女人已经像石器时代的人一样灭绝了。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帮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赤身裸体，饿死街头。”^[10]在总统竞选活动中，罗斯福也一直承诺削减政府开支，但到头来，他会彻底违背这一承诺。

超过1.1万家银行倒闭，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毕生积蓄。失业率正逼近25%的惊人水平，货币价值继续在通货紧缩的螺旋中暴跌，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以上。沙尘暴带来的环境灾难导致了美国大陆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造成了移民危机，约翰·斯坦贝克在他的两部关于“美国梦”的经典小说中描写了这场危机，这两部小说——1937年的《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和1939年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都是在大萧条时期写就的，而且都谈及移民工人的绝望和梦想。

亚当斯的“美国梦”关乎精神上的伟大，明确反对物质上的繁荣，对于这个正面临切实的贫困、举目皆是流浪汉和饥民的国家而言，这似乎是一种有悖常理的安慰。对富人来说，渴望获得精神上的改善已是一种奢望；而饥饿的人们一心只渴望食物。

相比之下，一种更加愤世嫉俗的观点可能会认为，这种转瞬即逝的梦想恰恰会在国家贫困的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敦促公民专注于“更高的理想”，让他们不再执着于摆脱经济窘境，或许在政治上行得通。

但20年前孕育这一说法的进步时代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代，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尽管许多美国人眼见少数人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感到非常不安，对其道德成本心存疑虑，但他们担心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

亚当斯所普及的美国梦的意义，事实上几十年来一直潜伏在美国人的对话之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正在恢复一种信念：如果平等和社会正义得不到保护，民主试验将失败，这一主张相当于绝大多数人在“美国梦”一词创造之初的几十年里对它的理解。大萧条并没有催生这个想法作为一种缓解的手段，而是重新发现了它，将之作为一种解决方案。

其他有影响力的作家也对物质主义的危害做了类似的诊断。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的《恍如昨日》（*Only Yesterday*）——第一本书写20世纪20年代历史的著作，在1931年出版。在书中，他谈到了上一个十年对富商的错误信念。“梅隆、胡佛和莫罗（Morrow）等人发现他们的财富是公职人员的一种资产，而不是一种负担；或者是1924年人们发起的广泛的民众运动，呼吁让亨利·福特当总统，这并非偶然。拥有数以百万的财产是成功的标志，而成功会受到举国上下的崇拜。”^[11]

但美国对“成功”漫不经心的追求已经变成自我毁灭。在这个国家深陷危机的时刻，“美国梦”用来表达美国需要重新发现的道路：一条远离而非通向物质主义的道路。美国的信条——自由、正义、平等、民主——必须首先得到恢复；人人享有繁荣的经济梦想只有在一个优先考虑这些原则的社会中才能实现。

文化与修养同根同源；价值观无法自给自足。任何精神都需要培养；美国已经停止维护民主，而是开始保护金钱。代价是显而易见的。

突然间，美国人开始对“20世纪20年代的噩梦”和此前十年的“贫瘠”发表具有讽刺意味的评论，否定了爵士时代是一个繁荣和冒进的颠狂年代的老生常谈。回首往事，他们看到了近代精神上的贫乏。1933年，亚当斯回顾了“贸易的突然扩张、我们的巨额利润、移

民以及整个爵士时代的终结”，那时“美国梦变成了赌博、腐败和疯狂消费的噩梦”。

20世纪20年代的道德贫瘠被普遍认为是30年代经济贫困的罪魁祸首，很明显，教育对于维护精神和个人成就的美国梦是必需的。1930年，亚当斯写道：“显然存在两种教育。一种教我们如何谋生，另一种教我们如何生活。当然，这二者永远都不应该混为一谈。”^[12]美国人开始看到这种区别。

许多教育工作者开始承认，公立学校造成了目前的“社会混乱和不确定性”。其中一位是这么说的，“和我们其他的理念一样，它们过分强调物质上的成功”。学校一直在强化“快速致富的普遍的美国梦”，却没有教会学生“批判性地评价美国”。^[13]人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为赚钱做准备上，但对金钱理应创造的丰盛生活并没有做什么准备。富人和有进取心的人既是学校也是市场的偶像”。^[14]

1933年，有些地方性的讨论提出了这样的论题：“初中能否为实现美国梦的社会规划做出贡献？”一位校长认为，美国一直在“错误地”教导孩子们“追求幸福”，鼓励他们积累财富，退休时享受生活，而不是建立“美好和建设性利益的激励机制”，而后者有利于“我们孩子的身体、道德和精神福祉”。在经济紧缩时代，学校“只有通过树立更远大的成功理想，激发更广泛的社会意识”，才能证明其价值。^[15]

另一篇文章认为，教育正是“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笔下的美国梦的体现，在专注于单调和物质的过程中，这种对心灵和精神的渴望曾经被剥夺，而教育会令我们在追求更充实、更丰盈的生活的道路上迈进一步”。^[16]对于教育应该把人们训练成温顺的工资奴隶，令其成为消费者，并为富人提供劳动力和市场的观点，普通市民表示明确反对。1934年，教育改革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宣称：

“公共教育是美国梦的灵魂，是美国梦的核心理念。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是强还是弱，都被美国梦塑造。” [\[17\]](#)

这种表述正逐渐成为众所周知的真理，与基本的民族信仰融合在一起，传递出一个听起来越来越耳熟的美国梦。一个毕业班的学生被告知，这个国家的一项历史性实验是发明“美国梦——这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可以在这里实现他（她）最大的潜力”。 [\[18\]](#)

一位经济学家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讲堂上说，“典型美国人的内心愿望”是“保护这个国家，使之成为机遇之地、经济自由之地、个人事业和进取之地。这就是美国梦”。 [\[19\]](#)

但他补充说，在过去的75年里，由于“金融控制的集中”，以及“一些重要的金融和工业领袖在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增强的力量”，美国社会一直反对捍卫这一梦想。在美国新的“公司主义”制度下，少数人“成为自我选举、自我延续、基本上不负责任的受托人”，掌管着包括其同胞的储蓄和投资在内的国家资源。事实上，这位经济学家是从保守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极端的新政举措”事实上是意欲创建国家垄断。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为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是对美国梦威权的威胁。

医疗保健也进入了美国梦的框架中：随着城市开始试验公共卫生系统，并付出了“公共红利”，他们认为，全民医疗保健有助于实现“亚当斯口中的‘美国梦’，即社区中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平等机会的梦想”。 [\[20\]](#)捍卫美国梦意味着守护儿童的健康，而不是个人的财富。

早在1932年，媒体就报道说路易斯安那州的民粹派参议员休伊·朗最喜欢的一句短语是“美国梦”，为了实现美国梦，他主张没收

“年收入超过500万美元以上的部分，如果这种收入还存在的话”。
[\[21\]](#).

“每个人都是国王”，这是休伊·朗著名的承诺。不过，他自己倒开始表现出专制倾向，而民粹主义似乎又一次向暴政靠拢。许多观察家得出结论：休伊·朗唯一真正关心的国王是他自己，他最在意的是有朝一日自己能加冕。

美国梦作为社会正义的承诺，反对物质利益的利己主义，这意味着它对一些人也提出了国际主义和反孤立主义的正当理由。正如俄克拉何马州一位牧师所说，“美国梦”要求“道德法必须是任何稳定社会秩序的核心”，也意味着“孤立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行的，在道德上是错误的”。[\[22\]](#)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所做的那样，美国梦已经准备好走向国际，成为保护全世界民主梦的象征，为有朝一日定义冷战、塑造战后秩序的表述意义铺平了道路。

1932年秋天，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前往柏林大学，在那里举行了关于“美国梦”的演讲。这肯定是美国首次向世界其他国家介绍这个短语，就这个问题展开国际对话。“美国梦”仍然是一个不太为人所熟知的术语，《纽约时报》赞许诺林[\[23\]](#)（George Norlin）博士在此次演讲中传播了这个短语，并介绍了他给出的定义，即“这既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原则和实践”，它是“美国人特质的基础，这种特质表现为‘自力更生、自尊、睦邻合作和全体人民（而非特权阶层）对更美好、更富裕生活的愿景’”。这应该就是这个国家想要说服自己的理念，但诺林博士也分享了他此行中一个令人遗憾的发现：在德国，美国被称为“美元国”。[\[24\]](#)

两天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他在1933年3月的就职演说中宣布，是时候面对“我们共同的困难。感谢上帝，这些困难只是物质方面的”。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罗斯福告诉美国人，“我们唯一需要感到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在演讲中，罗斯福还强调，美国在追求物质富足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将其他一切都排除在外。

罗斯福指控道：“贪得无厌的货币兑换商的种种行径，将受到舆论法庭的起诉，将遭到人类心灵理智的唾弃。”由于缺乏真正的价值观，这些商业和金融领域的“错误领导”未能恢复人们的信心，因为他们“只知道自私者的处世规则。他们没有远见，而没有远见的人定将灭亡”。

美国人不应再“疯狂地追逐那转瞬即逝的利润”，而是需要认识到，“把物质财富当作成功的标准是错误的”；同样，“以地位、尊严和个人收益为唯一标准来衡量公职和高级政治地位，也是错误的信念”。

坦率来说，随着这个国家认识到一种新近觉悟的精神，现在是时候“改变伦理观念”了。不过，罗斯福向美国人民保证，“货币兑换商已经从我们文明殿堂的高处落荒而逃”，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则是另一个问题。

在上任前几周，罗斯福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全面改革，包括金融监管、救济计划、养老金、失业保险、福利、医疗津贴和税收改革。罗斯福政府还创建了公共工程管理局（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该机构向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数十亿美元。罗斯福新政第一次有效地将社会民主政策引入美国社会，他的政府创建了福利国家，并开始通过支出摆脱萧条。在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新政已经使联邦政府的开支增长了一倍多。

起初，许多美国人，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认为新政是联邦政府的严重越权行为，许多人认为罗斯福滥用行政权属于危险甚至不道德之举。批评者称他为独裁者；捍卫者则唤他为国家的救星。共和党人将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甚至更长时间内坚定不移地推翻这些改革。后来，他们将以实现“美国梦”的名义采取这一立场。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梦”已经为有关新政原则的全国性辩论（教育、医疗、住房、不平等），以及关于美国社会演变的其他对话，提供了一种语言和历史框架。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一开始是罗斯福的支持者，但他坚决反对罗斯福的经济改革。亚当斯在1929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抱怨说，他再也负担不起请帮佣的花销，也没钱买个足够大的房子容纳他的图书馆。他还说：“这只不过是世界各地民主的作用，而我正迅速成为一个反民主的人。”^[25]有崇高的原则是一回事，在生活中坚持这些原则又是另一回事；但是，人类社会长期未能实现其理想，并不意味着这些理想不再那么有价值，这一点同样正确。

尽管亚当斯在私下里抱怨不知如何处置传统，不过他还是在对这个国家丧失对美国梦的愿景将导致的后果发出预警。例如，1933年5月，他警告说，大型企业“似乎注定要统治这片土地”。如果企业财阀开始控制美国的政治经济，那么一度被定义为自由公民的美国人很快就会“沦落为单纯的消费者”。商品拜物教将接管国家；即将到来的“新产品的洪流”“发现和应用”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生活的物质基础”。

如果美国进入了一个技术先进的时代，除了“竭尽全力去获取和消费”不存在其他“任何处世哲学”，那么美国梦将会被致命地“扭曲”，它能做出的唯一承诺，就是每个美国家庭都可能成为“现代化的百货商店”。^[26]

他还说，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历了“三种情绪状态”——困惑、恐惧和怨恨，“针对的是背弃了自己信任的银行家和其他领导人”。但现在，这个国家似乎“只是在坐等”繁荣回归，“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个国家需要一种“更加理性的哲学。没有这样的哲学，美国梦注定要失败”，国家将“在精神层面上破产”。[\[27\]](#)

美国人已经重新发现，这个故事应该蕴含着某种寓意，但这种寓意的本质为何，仍然不清楚。

[\[1\]](#) Allan Nevins, *James Truslow Adams: Historian of the American Dre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8, p. 68.

[\[2\]](#) Adams, *The Epic of America*, p. viii.

[\[3\]](#) Adams, *The Epic of America*, p. 172.

[\[4\]](#) Adams, *The Epic of America*, p. 216.

[\[5\]](#) Adams, *The Epic of America*, p. 71.

[\[6\]](#) Adams, *The Epic of America*, p. 192.

[\[7\]](#) Adams, *The Epic of America*, p. 427.

[\[8\]](#) Adams, *The Epic of America*, p. 427.

[\[9\]](#) Garett Garrett, “America Can’t Come Back”, *Saturday Evening Post*, 23 January 1932.

[\[10\]](#) *Noblesville Ledger*, Noblesville, IN, 1 January 1929.

[\[11\]](#) Allen, *Only Yesterday*, p. 146.

[\[12\]](#) James Truslow Adams, *A Search light o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1930, p. 143.

[\[13\]](#) *New York Times*, 9 April 1933.

- [14] *New York Times*, 9 April 1933.
- [15] *New York Times*, 13 May 1934.
- [16] *New York Times*, 20 January 1935.
- [17] John Dewey, “Tomorrow May Be Too Late” , *Good Housekeeping*, 20–21 March 1934.
- [18] *Pantagraph*, *Bloomington*, IL, 30 January 1934.
- [19] *Decatur Daily Review*, *Decatur*, IL, 11 November 1934.
- [20] *New York Times*, 13 January 1934.
- [21] *Brooklyn Daily Eagle*, 26 June 1932.
- [22] *New York Times*, 27 May 1932.
- [23] 科罗拉多大学校长，原书未给出全名。
- [24] *New York Times*, 6 November 1932.
- [25] *Nevins, Adams*, p. 198.
- [26] *New York Times*, 14 May 1933.
- [27] *New York Times*, 14 May 1933.

10 美国优先 1930~1934年：对现实的正式承认

1933年，美国正面临着精神上的失败，而欧洲则面临纳粹势力巩固权力的问题——在希特勒成为总理后差不多整整一个月，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三周后，《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说，1933年3月22日，“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希特勒任内的第一个集中营隆重启用。^[1]

在两年半前，记者多萝西·汤普森曾采访希特勒，称他“说法前后矛盾、滔滔不绝、举止毛躁、缺乏安全感。他就是典型的小男人。”^[2]她根据这段采访，于1932年出版了《我见到了希特勒》（*I Saw Hitler*）一书，书中指出，《我的奋斗》（*Mein Kampf*）是“多达800页的哥特剧本、可悲的姿态、不准确的德语和无限的自我满足感”。^[3]

她认为，希特勒崛起过程中最不寻常的部分或许就在于它的前提：“想象一下，一个未来的独裁者开始劝说一个主权国家的人民投票表决，放弃自己的权利。”^[4]她后来因为在第一次评估中“否定”了希特勒而受到嘲笑，尽管她低估了独裁者，但她也高估了选民。

当希特勒掌权时，汤普森对选民的自欺欺人和自我毁灭感到震惊。她写道，希特勒并没有“逼迫”德国人民；相反，“独裁是通过民众的意愿实现的……他向他们推荐自己，他们于是买了他的账”。超过50%的德国选民“刻意放弃了他们所有的公民权利，放弃了他们进行公共控制的所有机会，放弃了他们代表自己的所有机会”。总而言之，“他们毫不怀疑地就选择了独裁”。^[5]

汤普森警告说，希特勒上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谓的文明人不相信他能做到”。问题是，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的文明理念“受到所有人的极大珍视”。他们一致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一种由偏见、标准和理念组成的复杂体系”，是在几个世纪里“以巨大牺牲为代价积累起来的”。

相反，知识精英需要理解的是，“这种文化对广大民众来说，实际上根本不是财富，而是一种负担”。如果经济状况恶化，令民众满腹牢骚，“饥肠辘辘、无所事事”，他们只会把这种“文明看作一种制约和阻碍的力量”。[\[6\]](#)

在这一点上，他们会把摧毁这个系统视为自由。

当欧洲法西斯主义站稳脚跟时，100%的美国人发现自己卷进的麻烦事越来越多。到了1930年，三K党衰落，其政治影响力在选举失败后逐渐减弱，而包括选举舞弊、贪污和贿赂指控在内的金融和政治丑闻进一步削弱了其领导人的影响力。早在1926年，《纽约时报》就宣称“三K党的隐形帝国正在衰落”[\[7\]](#)；到20世纪20年代末，外界估计全国范围内三K党成员人数降至几十万人。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许多农民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能力支付10美元的会员费。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三K党成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身成功的牺牲品：他们赶走了担心会成为经济竞争对手的非裔美国人，结果发现再没有经济少数群体供自己剥削，需要找人摘棉花时，再也找不到强迫奴役的对象。[\[8\]](#)结果是，他们是如此忙碌，以致无暇来实施暴力。

然而，随着三K党的衰落，更多自称“美国法西斯”的团体开始取而代之。1930年夏天，全美各地的报纸都忧心忡忡地报道说，两个月来，亚特兰大全城一直在为一个名为“美国法西斯”的新组织的活动而“兴奋不已”，这个组织实际上更喜欢自称“黑衫军”。尽管它公开的目标是阻止共产主义蔓延，但正如报道很快显示的那样，其成员的目标事实上是非裔美国人。“会员资格仅限于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黑衬衫是其官方标志，其支持者否认“与三K党有任何联系”，称这是一场“自发的运动”。[\[9\]](#)

据《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源于失业的阵痛，以及其领导人那套共产主义将威胁白人霸权的说辞的精准号召力，该组织自称已经招募了2.7万名成员，”[\[10\]](#)他们并非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裔美国籍追随者；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法西斯主义的本土支持者。不出所料，美国“黑衫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前三K党成员。

1930年，伊利诺伊州的一份报纸报道说，除了“美国法西斯”，亚特兰大还有另外两个团体在“煽动种族骚乱”，分别是“白人十字军和三K党。当前美国法西斯分子表现得最为活跃。接下来的可能是‘白人十字军’，而三K党看来只是它从前的影子，尽管没有人确切知道它的实力”。[\[11\]](#)

那年夏天，大约7000名“黑衫军”成员在亚特兰大游行，他们举着横幅，其中一条横幅上写着：“回到棉花地去，黑鬼——它需要你；我们不需要！”[\[12\]](#)“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衫军”威胁亚特兰大的雇主说，如果他们不解雇非裔美国工人，将发起抵制活动并诉诸暴力，结果这些组织很快就面临大陪审团的起诉。[\[13\]](#)

1930年春，一家奥克兰的报纸刊登了一版兄弟会招募广告，其中包括正努力招募新成员的三K党。“欢迎所有本土出生的信奉新教的美国人加入三K党。这个全美组织正在积极争取五万名新成员。我们希望

参加1932年的州选举大会。加入兄弟会的机会成熟，它铁骨铮铮，代表美国是第一，是最终，也是永远。” [14]

但是，即使三K党作为一个组织正在瓦解，它的成员也没有突然放弃自己的信仰以及使用专横的暴力灌输其信仰的意愿。在奥克兰三K党登出招新启事10天后，黑人劳工大会宣布将发起反对“私刑和其他形式的白人恐怖主义”的运动。 [15]



抵制运动未免来得太迟了。1930年8月，印第安纳州马里恩发生了一次臭名昭著的双重私刑，有人拍到了一群白人笑嘻嘻地指着头顶上悬挂着的两具尸体，死者是托马斯·希普（Thomas Shipp）和亚伯兰·史密斯（Abram Smith）。这类照片流传已久，但现在它们被报纸公

开登出。希普和史密斯的照片迅速成为一种象征，成为反私刑歌曲《奇怪的水果》（*Strange Fruit*）的灵感来源，这首歌的原唱是比利·霍利迪（Billie Holiday）。

印第安纳州的曼西市位于私刑发生地以南40英里开外，该市的《晚报》（*Evening Press*）在头版刊登了这幅照片。



这张照片的图片说明写道：“这张非同寻常的照片——尽管可能令人毛骨悚然——是昨晚在马里恩拍摄的，就在几分钟前，两名承认杀害了一位白人男子并袭击一名白人女孩的黑人被吊死在法院院子的树上。他们遭到毒打，被刀刺，还被拖过一条水泥人行道——所有这

一切都可以从照片上看出来。但照片中只显示了少数在附近游荡的暴徒。” [\[16\]](#)

对此事件，《晚报》给出的描述是“令人毛骨悚然”；邻近的曼西市看来并不准备使用更强烈的字眼。就在两名黑人男子被吊在树上的照片旁边，编辑刊登了一篇专栏文章，副标题“在空中”着实令人震惊，开头写道：“当形势真的开始好转时，你可以在空气中感受到它。”

托马斯·希普和亚伯兰·史密斯遭受的私刑有时被认为是美国最后一场公开私刑。可悲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私刑在1934年仍然很猖獗，艺术家雷金纳德·马什（Reginald Marsh）以此为灵感，创作了一幅漫画。画中兴奋的人群中，一位白人妇女举起一个金发小女孩，高兴地告诉旁边的人：“这是她第一次观看私刑。”这幅漫画刊登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 [\[17\]](#)

在马什的漫画出版不到两个月后，克劳德·尼尔（Claude Neal）在佛罗里达州的玛丽安娜市被处以私刑，在大约5000名围观者面前，他被控强奸并杀害了一名白人妇女。据《纽约时报》报道，私刑的消息“提前数小时被广而告之”，“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兴奋地聚集在一起，渴望目睹这一奇观”。私刑“的残酷和残忍已经到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程度”。 [\[18\]](#)

10天后，一名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白人卧底调查员从目击者那里听到了此前报纸不愿提及的酷刑和残害行为，他一一做了列举：

他们切断了他的阴茎。他被迫吃了它。然后他们割下他的睾丸，强迫他吃下去，还要说自己喜欢吃。然后他们用刀割他身体两侧和腹部，时不时有人剁下他的一根手指或脚

趾。有人用滚烫的熨斗，从头到脚地烫那个黑鬼。……在酷刑过程中，有人会不时地在尼尔的脖子上绑一根绳子，把他挂到一根大树枝上，一直吊到他眼看就要窒息而死，然后他们会把他放下来，酷刑重又开始。[\[19\]](#)

尼尔的尸体从树下被放下来后，遭到暴民的侮辱，他们踩踏他的尸体并对着它撒尿，他们开车从尸体上碾过，小孩子用棍子捅它。

一些当地的报纸在早晨的报道中发布了当天早些时候即将举行“私刑集会”的消息。邻近的亚拉巴马州的《多森鹰报》（*Dothan Eagle*）在私刑当天下午的头条新闻中准确解释了当时的详细计划：“佛罗里达州将把黑人置于危险之中，布鲁顿监狱中被抓的性罪犯将被肢解，并对其采取法律以外的报复行动。”[\[20\]](#)

另一个向当地人宣告私刑即将到来的标题是“三K党可能会卷土重来”。[\[21\]](#)三K党虽已垮台，但未彻底出局。

在三K党发现自己对美国反动情绪的控制力在下降时，“美国优先”这个词也继续被其他使用它的人玷污。当“大比尔”汤普森试图再次为摇摇欲坠的“美国优先基金会”争取支持时，他受到的嘲笑多于财富。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政治力量已经开始消退，就连汤普森有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1930年，当被问及“他于1927年问世的心血——‘美国优先基金会’”的进展时，向来咄咄逼人的汤普森发出了一声完全不符合他性格的叹息，把它归为“过去式：‘美国优先发展得不错，做了很多好事，’他说。‘你可以在美国参议院中发现它带来的结果。’”[\[22\]](#)

但后来汤普森市长又做了一次尝试，邀请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来帮忙庆祝“芝加哥日”，以纪念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这一天的主题是“美国优先”。报纸打出了“‘美国优先’赫斯特”的标题。

[\[23\]](#)

“America First” Hearst Welcomed by Chicagoans

几周后，在沃伦·G. 哈定的家乡俄亥俄州马里恩市，另一位政治家也表示支持“美国优先”的立场。为了在中期选举中寻求连任，参议员罗斯科·麦卡洛克（Roscoe McCulloch）重新使用这个口号最古老的含义，坚称“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然后再考虑世界其他地区”。他断言，“这个问题很明显：美国主义反对国际主义；国外资本反对美国资本，投资于本国产业；美国工人反对外国工人。保护性关税是拯救我们的唯一办法”。[\[24\]](#)

当地政客也采用“美国优先”的口号，将它与主张百分百美国精神的其他暗语加以整合：“美国优先”和“美国为美国人”的政纲应该“向全世界表明，美国的大门只对那些宣称有意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敞开”。在密歇根州寻求连任的州众议员维吉尔·A. 菲奇（Virgil A. Fitch）表示，他的竞选广告承诺“提高经济效率，限制移民以减少失业，老年养老金，‘美国优先’”。[\[25\]](#)

在1932年的总统竞选中，“美国优先”一度复苏，但这一次又转回到民主党阵营。《纽约时报》在一篇关于罗斯福参选前景的报道中提到了他的“进步原则”，以及“他坚定不移地捍卫美国的利益至上，反对以牺牲美国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帮助欧洲的政策”。[\[26\]](#)

与此同时，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1932年积极为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约翰·南斯·加纳（John Nance Garner）策划了一场总统竞选，设计的竞选纲领为“美国优先”，其目的是反对罗斯福和阿尔·史密斯（Al Smith）参选，赫斯特痛恨这两位候选人。他抨击他们与伍德罗·威尔逊的关系，指责伍德罗·威尔逊不支持“美国优先”这个表述——他恐怕是有点健忘了，毕竟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短语正是由威尔逊发明的。正如1930年的一篇文章所说，“自威尔逊1915年初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首次使用‘美国优先’以来，它已成为整个国家的资产，但它被蛊惑人心的政客们误用为口号，可悲地削弱了它作为一种爱国诉求的重要性”。[\[27\]](#)

在赫斯特看来，加纳的对手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愚蠢地追随伍德罗·威尔逊在政治上的野心，意欲干涉欧洲的冲突和复杂局面”。赫斯特认为，美国人民需要“回到美国主义的正轨”。“除非我们美国公民愿意为了给欧洲进贡而无限期地做苦力，否则我们应该亲自确保今年有一个以‘美国优先’为指导思想的人当选总统。”[\[28\]](#)

赫斯特为加纳竞选站台的举动遭到沃尔特·李普曼的公开嘲笑。他在被全国转载的专栏里写道，“赫斯特先生满怀激情地说道，加纳支持美国优先，就好像其他候选人支持‘美国第二、第三或第四’似的”。李普曼认为，加纳的对手“被泼了污水”，就因为

他们都认识到在某些至关重要的方面，美国的安全和福祉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息息相关。他们是“国际主义者”，因为他们都认为，当今世界存在一些必须通过国际行动来解决的问题。我想，这正是赫斯特先生想要否认的。[\[29\]](#)

对于赫斯特来说，遗憾的是，加纳辜负了其信任，同样承诺奉行国际主义政策。李普曼总结说，这次可怕的经历应该给了赫斯特一个教训。“这应该让他明白，如果无人支持他的理论，那么他的理论肯定有问题。” [\[30\]](#)

李普曼并不是唯一一个蔑视“美国优先”的人。一篇被广泛转载的内布拉斯加州媒体的社论提出，在重新将其用作口号时应三思而后行。“共和党在1918年和1919年用来重新控制国家事务的口号，美国人民正在逐渐意识到这个口号的虚假性，”文章开头宣称：“美国优先”是一个“由共和党人领导的一群人策划和执行的微妙而险恶的攻击的结果，已故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是幕后操盘手”，这一攻击直接激起了民众的仇外心理。

根据这篇社论的说法，洛奇精心推动了“美国优先”一词深入人心，因为“他想摧毁威尔逊”，并决定利用“普通美国人天生深深厌恶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实。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诞生了‘美国优先’这个短语”。它滋生的孤立主义代表了“候任总统罗斯福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一些地方，‘美国优先’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

社论最后说：“我们还是诚实为好。是我们点起了这堆火。我们已经火上浇油了12年，现如今，我们实际上已经关闭了世界贸易的大门。”如果美国当初只是追随威尔逊的国际主义梦想，就会避免很多问题。事与愿违，美国被共和党人的呼吁所动摇，他们“诉诸古老的偏见，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本能的怀疑”。美国人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和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从贸易保护、孤立主义的“死亡谷”中走出来。 [\[31\]](#)

《纽约时报》对此表示赞同。它在1932年初写道：“最容易获得欢呼的方式就是挥舞着美国国旗，高呼‘美国优先’。”显然，美国人“厌倦了与世界为伴”，而“国际主义的种种不便激怒了每一个国

家”。但这种态度不可能持久：美国迟早将面对国际形势，这种不情不愿、心照不宣的认识让国会陷入了“阴霾”，“表明华盛顿终于开始面对现实。这个充满希望的事件值得成为头条新闻：官方开始承认现实。”[\[32\]](#)

即使说人们对“美国优先”的热情在某些方面开始减弱，它也没有完全消失。在罗斯福总统就职典礼之前，纽约州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发表了讲话，表示“希望当选总统的罗斯福致力于‘美国优先’的政策”。[\[33\]](#)

罗斯福似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这个口号能吸引选民，他就会使用它，尽管他从未以此为基础进行竞选活动。《纽约时报》在一篇有关干涉主义的文章中打出了这个标题：“罗斯福相信公众支持给欧洲‘一点颜色瞧瞧’”。文中写道：“罗斯福不仅支持‘美国优先’，而且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予以执行。”[\[34\]](#)

1933年夏天，也就是罗斯福第一个总统任期刚开始几个月，有报纸标题写道：“美国优先竞选活动在华盛顿展开。”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报纸宣布，“美国不再是全世界的橄榄球”，但文章没有具体说明美国在何时曾被国际社会踢得如此之惨。它补充说，“作为‘新政’的一部分，一项基于‘美国优先’原则的外交政策目前迅速成型”，不过也没有探寻“美国优先”带来了什么新内容。[\[35\]](#)

那年夏天，一名记者报道说：“美国优先是我们总统的口号。”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这也是此前四位总统的口号。肯塔基州的一份报纸敦促道：“让我们所有人高喊这个口号，用和谐的语调赋予它应有的力量和音量。”[\[36\]](#)如果读者认为这句口号已经被赋予相当大的音量，恐怕也是情有可原的。

不过，一位教授争辩说，随着反对孤立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优先口号的音量不断减弱。孤立主义只会制造“情绪化和无关紧要的口号”。有了这些简单的口号，从“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和他的报纸集团”，到“以‘美国优先’、‘一拳抽扁乔治国王的鼻子’和‘没有世界法院’为竞选纲领赢得了芝加哥市长选举的‘大比尔’汤普森”，“这些蛊惑人心的政客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乡巴佬的选票”。[\[37\]](#)

这位教授坦率地（也许有人会认为他太不通世故）补充道，孤立主义“揭示了情感上的神秘主义、不可动摇的非理性、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和大量美国选民的地方主义”。孤立主义只是一种“流行的爱国神话”，如同一团迷雾笼罩着美国文化。[\[38\]](#)

特拉华州的一份报纸更简洁地指出：“美国优先是一句好口号，但‘更繁荣的美国’比它更好。”[\[39\]](#)

另一位教育家把美国在国际社会奉行孤立主义比作在国内执行个人主义。在国内，“粗鄙的个人主义的不健全的基础”只会导致不平等，给“少数人和业主”带来越来越多的利润，让大多数人处于收入和购买力低下的状态，而越来越多的人根本没有赚钱能力，也没有获得这种能力的机会。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使美国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是将国家的“巨大资源”社会化，并对财富进行分配，“使全体公众获得繁荣所必需的收入和购买力”。[\[40\]](#)

这位教师补充说，在外交政策方面，这种个人主义已经发展为一种行不通的孤立主义。“我们也不能继续说：‘美国优先，世界其他国家去死。’”[\[41\]](#)

俄亥俄州的一名记者致信当地报纸，抗议此前发表的一封署名为“一名共和党人”的信件中所采取的立场。他评论说：“如果共和党

能卷土重来或者值得回来，那将是通过否认和背弃这种可悲的党派观点来实现的。”他们最好改变其旧有的座右铭，“采用‘美国优先，共和党次之’的口号，因为在一个国家的生活中，有时从党派之见出发产生的罪恶，比慈善所能掩盖的更多”。[\[42\]](#)

1934年5月17日，“新德国之友”（Friends of New Germany）组织2万名成员在纽约市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集会。“新德国之友”于1933年获得鲁道夫·赫斯（Rudolph Hess）的授权，并获得希特勒的正式承认，被美国报纸称为“纳粹党在美国的附属机构”。[\[43\]](#)

他们说，那晚他们聚集在一起，部分是为了抗议对德国商品的抵制。这种集会越来越普遍；就在一个月前，一位记者致信《纽约时报》，抗议在“新德国之友”的会议上，“星条旗和纳粹党党徽”混挂在一起。

各家报纸都没有过多报道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美国纳粹集会。《艾伦镇晨报》（*Allentown Morning Call*）在第四版用小字号标题写道：“纽约集会高呼希特勒之名。”报道称：“今晚，在数百名纽约大都会警察的监视下，两万名纳粹同情人士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集会，他们高喊着希特勒的名字，并向抵制德国商品的人发出嘘声。”此外，还有“‘800名德国秩序警察’”在那里帮忙“维持秩序”。[\[44\]](#)《布鲁克林每日鹰报》在第三版向读者讲述了“纳粹集会”后抗议者在街道上发生的冲突。[\[45\]](#)《芝加哥论坛报》在第六版予以报道，用寥寥数行字介绍了此次“示威”。[\[46\]](#)

然而，那天晚上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拍摄的照片表明，人们本就对事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纽约时报》在头版进行了报道，在第三版

转载了一张令人胆寒的照片，并在第二天再度提及此事，不过之后便再也没有重提。[\[47\]](#)

两个月前，德国驻纽约总领事向美国人保证，“这个国家只有几百名国家社会主义者”。[\[48\]](#)在两万名美国纳粹分子聚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10天后，那里举行的一场次中量级拳击比赛得到比纳粹大型集会更广泛的全国性报道。到1935年底，“新德国之友”短暂解散，但在1936年初旋即重组，更名为“德美同盟”（German-American Bund）。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名称是用连字符连接起来的。

在集会后的几个月，《布鲁克林每日鹰报》的记者写道：“美国人，醒来吧！”“对纳粹威胁漠不关心，任何结果都有可能发生”；“新德国之友”“正打着美国主义的幌子在美国传播希特勒主义”。这位记者自称是“美国优先且永远协会”布鲁克林分会主席，写这封信是为了“强烈抗议那些在美国制造偏执者的非美国式做法”。[\[49\]](#)但是，以“美国优先”为名抵制偏执变得越来越少见。

1934年9月，詹姆斯·M. 特鲁（James M. True）创立了“美国优先！公司”（America First! Inc.），承诺“给新政一个X光检查”并“恢复宪法”。[\[50\]](#)《斯克兰顿共和党人》报道说，“美国优先公司”（文献记载中既有带感叹号也有不带感叹号的版本）将“打击并揭露源自新政的宣传和颠覆活动”。[\[51\]](#)特鲁指控罗斯福政府与俄国有“共产主义牵连”，这一指控后来登载于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全国报纸。[\[52\]](#)10月，美国优先公司宣布，美国全国信用社协会是“税务间谍”，在联邦监控系统中被用来监视美国公民。[\[53\]](#)然后，它声称“所有支持新政和联邦政府的国会候选人都违反了1925年的‘反腐败法’”。[\[54\]](#)特鲁开始代表美国优先公司发表演讲，反复指控罗斯福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被共产主义者控制”。[\[55\]](#)

当地一家报纸生硬地承认，“美国优先公司成功地制造了一些轰动”，但无非通过偏执的宣传“对新闻进行了扭曲”。^[56]

这年9月，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访问德国，会见了希特勒，并与其“亲密交谈”。^[57]许多美国报纸注意到赫斯特“对纳粹政权的同情态度”，谴责他对希特勒的支持是“不公平、有偏见和有害的”，是“战争时期最恶劣的宣传”，是“在直接鼓吹偏见、无知和仇恨”。^[58]这些记者认为他们的工作不只是报道赫斯特访问的事实；他们有义务做出判断并得出结论，指出他们所发现的诡辩和偏执之处。

当被问及与希特勒的谈话内容时，赫斯特回答说，这不宜公开。他说：“拜访希特勒就像拜访美国的总统。”^[59]听闻赫斯特暗示美国总统有朝一日也可能与法西斯分子有某种相似之处，记者毫不掩饰对这种说法的蔑视。

^[1] *Chicago Tribune*, 21 March 1933.

^[2] Dorothy Thompson, *I Saw Hitler*,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2, p. 14.

^[3] Dorothy Thompson, *I Saw Hitler*, p. 32.

^[4] Dorothy Thompson, *I Saw Hitler*, p. 4; original emphasis.

^[5] *Daily Press*, Newport News, VA, 3 May 1933.

^[6] Dorothy Thompson, “Back to Blood and Iron”, *Saturday Evening Post*, 6 May 1933; “Room to Breathe In”, *Saturday Evening Post*, 24 June 1933.

^[7] *New York Times*, 21 February 1926.

^[8] MacLean, *Behind the Mask of Chivalry*, p. 178.

- [9] *Altoona Mirror*, Altoona, PA, 19 July 1930.
- [10] *Baltimore Sun*, 12 September 1930.
- [11] *Dixon Evening Telegraph*, Dixon, IL, 27 August 1930.
- [12] *Baltimore Sun*, 12 September 1930.
- [13] *Oshkosh Northwestern*, Oshkosh, WI, 2 September 1930.
- [14] *Oakland Tribune*, Oakland, CA, 18 May 1930.
- [15] *Pittsburgh Courier*, 31 May 1930.
- [16] *Muncie Evening Press*, Muncie, IN, 8 August 1930.
- [17] *New Yorker*, 8 September 1934, p. 26.
- [18] *New York Times*, 28 October 1934.
- [19] quoted in Dora Apel, *Imagery of Lynching: Black Men, White Women, and the Mob*,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7.
- [20] quoted in Dora Apel, *Imagery of Lynching: Black Men, White Women, and the Mob*, p. 137.
- [21] *Tampa Bay Times*, St Petersburg, FL, 23 October 2011.
- [22] *Times*, Shreveport, LA, 3 March 1930.
- [23] *Decatur Herald*, Decatur, IL, 10 October 1930.
- [24] *Sandusky Register*, Sandusky, OH, 14 October 1930.
- [25] *Detroit Free Press*, 27 April 1930; *Ludington Daily News*, Ludington, MI, 10 August 1930.
- [26] *New York Times*, 31 December 1931.
- [27] *Millard County Chronicle*, Delta, UT, 29 February 1930.

- [28] *New York Times*, 3 January 1932.
- [29] *Lincoln Journal Star*, Lincoln, NE, 8 January 1932.
- [30] *Lincoln Journal Star*, Lincoln, NE, 8 January 1932.
- [31] *Quad-City Times*, Davenport, IA, 19 January 1932.
- [32] *New York Times*, 17 January 1932.
- [33] *New York Times*, 23 February 1933.
- [34] *New York Times*, 27 February 1933.
- [35] *New Castle News*, New Castle, PA, 7 July 1933.
- [36] *Kentucky Advocate*, Danville, KY, 8 July 1933.
- [37] *Oakland Tribune*, Oakland, CA, 25 April 1933.
- [38] *Oakland Tribune*, Oakland, CA, 25 April 1933.
- [39] *Morning News*, Wilmington, DE, 7 October 1933.
- [40] *New York Times*, 29 January 1933.
- [41] *New York Times*, 29 January 1933.
- [42] *Akron Beacon Journal*, Akron, OH, 20 December 1933.
- [43] *Miami News*, 28 August 1933.
- [44] *Morning Call*, Allentown, PA, 19 May 1934.
- [45] *Brooklyn Daily Eagle*, 18 May 1934.
- [46] *Chicago Tribune*, 18 May 1934.
- [47] *New York Times*, 18 May 1934.
- [48] *New York Times*, 31 March 1934.

- [49] *Brooklyn Daily Eagle*, 13 August 1934.
- [50] *New York Times*, 10 September 1934.
- [51] *Scranton Republican*, Scranton, PA, 9 September 1934.
- [52] *New York Times*, 17 September 1934.
- [53] *New York Times*, 15 October 1934.
- [54] *New York Times*, 4 October 1934.
- [55] *Times Herald*, Port Huron, MI, 28 November 1934.
- [56] *Press and Sun-Bulletin*, Binghamton, NY, 25 September 1934.
- [57] *Burlington Free Press*, Burlington, VT, 17 September 1934.
- [58] *Brooklyn Daily Eagle*, Brooklyn, NY, 30 September 1934.
- [59] *Burlington Free Press*, Burlington, VT, 17 September 1934.

11 美国梦 1934~1939年：历史的盛会

“有人见过行走的美国梦吗？”

1934年，《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美国笔记》（The American Note）的文章中向读者提出了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有点难以回答。[\[1\]](#)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梦确实已经无处不在，从讲座到布道，从午餐时间的谈话到书评，从专题文章到政治演讲，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可能遇到它。

随着“美国优先”似乎日益被推挤到只有怪人和狂热分子才会潜伏的边缘，“美国梦”继续让人感到它的存在，它的意义仍然主要是呼唤人们回想自由民主原则和开国功臣的梦想，但它与向上的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也在加强。

英国的一本旅游指南将《美国笔记》形容为无限的进步和可能性的民族意识、对权威的漠不关心、创新的趋势，以及“无法熄灭的希望”。比起世界其他地方，这些力量在美国“更广泛地实现了人类的兄弟情谊”。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引用了德·托克维尔的观点，称尽管民主政府不是效率最高的政府，但它产生了效率更高的政治体系所不能产生的成果：“一种无处不在、永不停歇的活动”，一种能够“创造奇迹”的动能。《纽约时报》总结道，美国人可能会问：“一个从100年前德·托克维尔访问时起就未曾有任何改变的美国梦，一个由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追溯到300年前的美国梦，是否还可以被人们当作一个梦？”在美国，民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状态”，而且“但凡有什么东西延续了300年之久，那么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它和大多数事物一样真切且持久”。^[2]就像语言一样，梦想也能创造真理，使之变为现实。

到1934年，这个梦想似乎已经十分稳定，足以被称为现实，这倒不是因为它已经成真，而是因为它获得了大量认同，经久不衰，让人持续感受到它的存在，并且正在塑造美国的文化现实。

换句话说，美国民主平等的梦想之所以能够长期萦绕在人们心头，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人一直在呼吁实现民主平等，尽管他们承认这个梦想还远未实现。希望和信念来自对梦想本身的承诺；它们并不依赖于它的实现，而是依赖于实现它的努力。

那年夏天，新墨西哥州的一家报纸以美国梦的名义为罗斯福的社会保障计划进行了辩护。文章称：“在这里创造一个比起其他任何地方都能让普通人获得更好的喘息之机的社会。寻求保护普通人不受失业、意外事故和年老时司空见惯的困顿之苦，并努力保证他有一个体面的住所得以安居。这难道不正是在努力使古老的美国梦成为现实吗？”^[3]

几周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篇社论写道：“如果不希望过去18个月的厚望破灭，”那么这个国家最好追忆一下这些理念，“它在共和国早期帮助我们勾勒了伟大的美国梦，令我们可以将视线转移到地平线以外，”梦想的内容是“最卑微的人拥有的权利可以和最有权势的人拥有的权利一样神圣，除非进步对于社会和人民来说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和更真实的自由，否则这种进步就毫无意义”。这个“高尚的梦想”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尘或磨损”，“但它仍然是我们最好的遗产；如果这个时代的混乱意味着什么，那么它一定意味着这个梦想的复兴和实现它的新努力”。^[4]

那年春天早些时候，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也同样宣称，民主的美国梦本身就是美国对世界做出的最大的智力贡献。在一篇题为《粗鄙的个人主义》（出自西奥多·罗斯福的名言）的文章中，亚当斯认为，美国实际上并没有培养出多少出类拔萃的思想家，而是培养出了创新者和发明家：美国培养的不是爱因斯坦，而是爱迪生。

“也许我们最显著的贡献是我所称的‘美国梦’，”亚当斯（带着些许自我推销的意味）总结道，“我们相信，无论阶级或环境如何，所有人都有过上更好生活的权利和可能性”。亚当斯认为，美国人对个人主义的信仰意味着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掌控这个国家，因为二者在本质上都属于专制统治。捍卫美国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需要得到一个民主政府的保护，以免被大公司扼杀。

随着有关美国梦的讲座、文章、演讲和著作在美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短语的含义很快就出现了分歧。不过，人们仍广泛引用它来描述社会正义的理想，以及经济不平等给民主自治带来的问题。

然而，在美国梦的意义引发争论之时，那些认为罗斯福政府非法侵犯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人也在努力宣扬美国梦。当新政给国家价值体系带来压力时，自由再次在美国梦的天平上倾斜。例如，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校长在一篇被广泛转载的电台演讲中警告说，“独裁的危险”是对“自由和进步的美国梦”的威胁。

《洛杉矶时报》对读者说，“国家主义”（stateism）——这个R. A. 米利肯（R. A. Millikan）博士在广播中创造的“有用的新术语”，包含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官僚主义和家长式作风”。“美国的理想是作为自由和机遇的国度，每个人都能获得

自己的价值和品质赋予他的地位，而国家主义对它构成最大的威胁。”如果美国人接受了“过多的家长式作风”，这将导致国家“从自由走向专制”。[\[5\]](#)

米利肯博士警告说：“过度的政府干预可能会破坏美国梦。”但即便是反对政府干预的保守派人士，也仍然接受政府应履行“监管”职能这一基本前提；他的演讲只是反对政府“插手”过多或者手伸得太长。过度活跃的政府可能会带来问题，但在20世纪30年代，任何严肃的舆论都不反对政府发挥适当的监管作用，即使是那些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的右翼人士也是如此。保护个人免受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侵害，是政府的职责之一。

米利肯总结说，“美国梦”只能通过“在〔美国〕公民中广泛地分配权力和机会，而不是将其集中在具有政治头脑的官员甚或暴君手中来实现”。[\[6\]](#)

支持自由市场的资本家和自由民主党人都通过“美国梦”来描述他们日益分化的国家理想，但他们都认为，美国梦与政治家或独裁者积累了大量财富和权力的做法是不相容的，也都相信自由市场与政治自由不是一码事，或者说二者之间并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事实上，美国梦仍然与政治领域的民主和自由紧密相连。新泽西州一家报纸转载了一篇对美国军团的布道，题目为《美国梦》。它以《圣经》中的一段文字开始：“你们蒙召，是要得到自由。”和大多数人一样，布道词的撰写者也注意到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对美国梦的定义，并宣称这个梦想“受到了挑战”，只有当人们“觉醒，令梦想成为现实”，它才能成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目睹民主的失败，目睹普通人无法获得应有的地位，目睹美国梦所承诺的人类愿望无法一一实现。”[\[7\]](#)

1935年，获普利策奖的自由派历史学家、记者赫伯特·艾格（Herbert Agar）发表了多篇专栏文章，这些文章被广泛转载。他声称美国大多数人仍然“支持所谓的美国梦。这不仅仅是所有人都能享有较高生活水平的国家才会有的梦想。它与美国本土无关；它是全人类共有的。”

对艾格来说，自由与平等是不可分割的。他解释说，“美国梦关乎人民的自由，指的是从真正意义上说，人民拥有相当的独立性，命运尽其所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的梦想还包括人人平等，”而且不仅限于法律上的平等，“更在于人人都有机会使自己过上有尊严和有价值的生活”。[\[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舒适中；使美国梦与众不同的不是个人成功的承诺，而是自决的承诺。然而，这仍然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自决在哪种情况下实现得最好？是自由放任的政府，还是通过干预以防止更强大的文化或经济力量干涉个人主权的政府？

1935年底，艾格出版了《自由的土地》（*The Land of the Free*）一书。在书中，与我们的直觉相反，他辩称，“美国主义的失败”在于“它未能提升私有财产权”——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的财产权。“对美国主义的背弃伴随着财富、特权、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与“美国梦……自由国家的自由人，在土地和机械生产中拥有切实的所有权并享受自由的最终果实”背道而驰。[\[9\]](#)

美国梦的理念总是向后延伸，重新唤起许多美国人担心丧失的原始价值体系。虽然乍一看，这似乎是对黄金道德时代的怀旧，但它更像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提醒——不是美国过去更好，而是它昔日的梦想更远大。

不久，随着当地居民以美国梦为主题的演讲、戏剧和盛会如雪崩般涌现，将美国梦视为国家进步的持续推动力的想法，与关于美国历史的更广泛观点融合在一起。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所持的基调不是必胜主义，而是向善论，因为在此时，道德乐观主义开始重新抬头。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名律师在当地的一次选举和野餐会上谈到了“美国梦”，重点讨论了“普通人自由和平等的梦想”。^[10]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市的高中生举办了一场名为“美国梦画卷”的盛会，讲述了美国从殖民时期到1935年的“大熔炉”的历史。优秀毕业生发表关于美国梦的致辞，谈道：“追溯到早期殖民地时期，这个国家不断向西进行工业扩张，在这一过程中，物质增长和追逐利润的理想在疯狂的投机浪潮中失去控制，直至1929年陷入崩溃的泥潭。”在演讲结尾处，他表示“要承认美国日益增长的物质主义”，并敦促国家“恢复美国生活中人性的一面”。^[11]“‘美国梦’——体现在《独立宣言》中的信条，‘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在被遗忘，被对财富的疯狂追求掩盖。”^[12]

在纽约的宾厄姆顿，一位牧师大谈“美国梦相对于民族主义宗教”。他认为爱国主义不同于“破坏性的”民族主义，“我们的一些兄弟称其为‘百分百’民族主义”。这种白人民族主义“与《独立宣言》和‘宪法’序言以及美国梦格格不入”。^[13]不久，被明确定义为立宪者民主平等理念的美国梦，就成为对“百分百美国人”民族主义言论的谴责。

对许多人来说，美国梦的意义在于，它不是国家给予公民的东西，而是他们必须为自己创造和重塑的东西。纽约《伊萨卡》的一篇社论对公民责任感的丧失表示遗憾，评论道：“在任何社会中，当天生具备领袖才能的人拒绝领导权时，不称职的领导者就有机会乘虚而

入。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智者放弃承担领袖重任时，独裁者就会出现。想要美国梦成真，就必须有一种公民责任感。”[\[14\]](#)

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举行的国旗日仪式上，一位发言者说，威廉斯堡的殖民地背景应该提醒观众，“《独立宣言》中有关18世纪哲学的某些概念是永恒的。如果想要美国梦成真，我们必须借鉴昨日的历史来评价今日之现实”，谨记国旗代表了美国梦的“精神”，即“自由、平等全民皆享”。[\[15\]](#)

所有这些呼吁都没有假定美国梦已经实现。对这个国家的期许，使普通的美国人再次呼唤当初的誓言，而不是抱怨承诺没有兑现。如果这个梦想有朝一日真的能够实现，那也将是全体美国人努力的结果。

马克·肖勒（Mark Schorer）于193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后来他为辛克莱·刘易斯撰写了权威传记），讲述了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成长经历。一篇评论描述了他所生活的这个中西部小镇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忽视了美国梦，一边是物质上的进步，一边是精神上的逐步解体。对于这个过程，我们在生活和在关于美国场景的小说中，都已经司空见惯。”美国梦仍然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手段，用来捍卫超然的理想、反对物质主义——只注重物质进步就意味着“忽视”美国梦，而这一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精神上的分裂。[\[16\]](#)

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一位校监在一次教师会议上谈到了在协调自由和平等方面的困难。他解释说，“问题在于美国梦是双重的”，它既“孕育于自由之中”，又“致力于平等”。[\[17\]](#)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工业化，以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包括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坚持认为国家价值体系也适用于他们，美国信条中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正义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

“美国梦”一词的流行，使美国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民主原则往往与企业资本主义存在直接冲突，如果不对后者加以遏制，强有力的商业精英将自发地趋向威权主义，向富豪统治集团靠拢。

艾奥瓦州的一位政治学教授预测，美国的“时势似乎预示着独裁者的到来”，因为“如果面临失败的威胁”，资本主义将“接受他的统治”，他们宁愿选择一个支持华尔街的独裁者，也不会选择一个试图监管华尔街的社会主义者。美国需要“坚定地支持我们的美国梦”，以确保“我们的民主不会失败”。[\[18\]](#)随着极权主义的阴影在欧洲蔓延，美国梦与民主的联系必须进一步巩固。

如何调和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它也暴露出人们对自由的理解存在越来越大的分歧。在俄勒冈州尤金市，扶轮社的一场演讲警告说，美国人“眼看就要破坏我们的国家梦想。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自由和平等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我们在自由的祭坛前敬拜，代价却是牺牲了平等。恢复和重振美国梦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体系中再次理解平等的内在价值”。[\[19\]](#)

1936年的一篇文章认为，不难看出，自由民主原则“被以爱国为幌子的人无耻地使用，也不难看出，它们很快就变成名义上的原则。然而，它们不能轻易被丢弃；如果未来还有一线希望的话，它们根本不会被抛弃，因为它们代表的不仅是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还代表美国梦中充满动力的一切，代表民主理想的活力和永恒的新意”。[\[20\]](#)

平等不仅是经济上，而且是政治上的。普通美国公民在讨论国家价值体系的意义时，也达成了这种至关重要的共识，这意味着随着定义“美国梦”的公民逐渐放弃有关平等的语汇，转而支持旨在保障个

人成功的自由，“美国梦”最终将发生转向。在战后美国梦的论述中，唯一重要的自由将日益局限于自由市场的自由。

这一年，巴尔的摩的一则头条新闻写道：“社会民主的基础已被摧毁。”一位经济学家兼作家发表了一个演讲，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摧毁了自由、平等和社会民主的‘美国梦’之根基”。[\[21\]](#)

今天，许多美国政治评论家经常声称美国梦与社会民主是背道而驰的。但当一度攫住整个国家的想象力时，美国梦几乎成了社会民主的同义词。与之对立的是威权主义，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

到1935年，新政开始让美国摆脱萧条。失业率几乎减半，从23%降至14%，而国内生产总值也同样大幅增长，在一年内增长了11%，银行倒闭的速度已逐渐放缓。住房拥有率也在攀升。

在匹兹堡，一份简短的告示指出，新政下的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虽然成立仅一年，但其“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所付出的努力，比任何政府规定都要多”。1935年，美国梦刚刚开始与自有住房联系在一起，但二者的关联仍然不普遍。[\[22\]](#)1936年，赫伯特·艾格编辑了《美国是什么？一份新的独立宣言》（*What is America? A New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呼吁政府为住房所有权提供担保，以此来应对住房危机。如果没有“真正的财产，真正的竞争”，美国人的生活将会更好，因为这个经济体进行规划时考量的将是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是强盗大亨为了彼此的利益而计划的国家”。[\[23\]](#)很明显，风险已经社会化，但利润仍然私有化；没有资本主义的道德风险，资本主义就没有道德可言。

那种认为如果资本主义凌驾于道德经济之上，美国梦就会受到威胁的观点，并不仅限于像艾格这样的进步人士。1936年春夏，前总统赫伯特·胡佛通过高举美国梦的大旗，敦促共和党同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团结起来反对罗斯福新政。胡佛的这番话预示了反对政府福利支持的共和党人将在未来1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利用这些论点。《纽约时报》在报道胡佛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时称，“胡佛谴责新政是法西斯主义，呼吁为了捍卫个人自由进行一场‘神圣的圣战’”。^[24]但就在一个月前，胡佛还批评美国是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大企业”为了私利管理着国家。

美国面临的严峻危险是对美国自由的破坏。我们必须再次为一个建立在有序的个人自由和机会基础上的政府而战，这就是美国的愿景。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将继续沿着新政的道路前进，建立的将是基于集体主义理论的个人政府。在这些思想下，我们的政府可能变成某种法西斯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以谋取财政利益为目的而管理着国家。或者我们会成为某种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能因其对政治权力的贪婪而获得相应的好处，而代价则是彻底丧失自由。我不知道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哪个更邪恶。我只知道这不是美国梦。它们已成为世界的噩梦。^[25]

没有人——即使是写过一本名为《美国个人主义》（*American Individualism*）的书的前共和党总统——认为企业富豪应该治理国家。“国家主义”是右翼日益关注的问题，但保守派也认识到，人类自由受到大企业和极权主义的威胁。

1936年10月底，在第二次选举前夕，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讲，向大企业宣战。他说：“商业和金融垄断、投机、不计后果

的银行业、阶级对立、分裂主义、战争暴利，是和平的宿敌，我们必须与其做斗争。”美国的金融力量“已经开始将美国政府视为自己事务的附属品”。但是“由有组织的金融势力组成的政府和由有组织的暴徒组成的政府一样危险”。[\[26\]](#)

两年后，甚至《财富》（*Fortune*）杂志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同时批评了共和党人和罗斯福新政。这篇社论严厉谴责了前几届共和党政府所助长的贪婪。文章开头写道：“共和党以前的做法无甚可圈可点之处，他们向来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在利用联邦权力为私人牟利。”

但《财富》杂志也反对罗斯福的“反动限制和干涉，它以民主的名义，为了公众利益而设计，却像阴影一样笼罩着美国梦”。[\[27\]](#)自由与监管之间的界限将继续面临争议。

1937年，经济发展再次严重受挫，重新陷入衰退。或许与此相关的是，美国梦与物质富足之间的关联也重新浮现。1937年1月，在第二任期总统就职典礼上，罗斯福谈到了国家繁荣的回归，并对美国人民说了一句传诵至今的话：“衡量我们进步的指标，不在于是否令富者更富，而在于是否令穷者衣食富足。”

罗斯福的这番话让一位记者想起“1929年经济崩溃前夕，‘总是郁郁寡欢的赫伯特·胡佛总统’发表的有关‘消灭贫困’和‘每口锅里有两只鸡’的演讲。这些话听来似曾相识，因为繁荣仍是我们国家的目标，”这位记者厌倦地写道：“物质充裕仍然是我们的美国梦，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乐土。”无论理想主义者如何坚持，“在美国，对热情、对精神体验或者智识成就的崇高向往，还没有成为良政的一部分”。[\[28\]](#)

印第安纳州的一篇社论指出，物质上的不安全开始动摇美国人对更宏大的美国梦的信心。美国人曾经相信自决，认为他们所面临的贫困基本都是咎由自取，而大萧条结束了这种“轻巧的观念”。当美国人意识到，他们的前途不仅取决于自己，而且“取决于（他们）不希望理解或预见的力量”时，围绕着国家认同，另一种不安全感油然而生。这个国家必须使自己“摆脱经济萧条的影响，不仅因为我们必须把人们从真真切切的匮乏中拯救出来，而且因为这种不确定和怀疑的感觉正在使美国梦蒙上阴影”。[\[29\]](#)

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敦促国会给予联邦政府援助，以“拯救”个人农场所有权的“美国梦”、“家庭规模化农场的美国梦”，由此他成为最早使用这个短语的主流政治领导人，也成为率先将美国梦与财产所有权联系起来的领导人。[\[30\]](#)（罗斯福后来再也没有在公开演讲中使用这个短语）

同年，约翰·斯坦贝克出版《人鼠之间》一书。书中，移民工人伦尼和乔治梦想拥有自己的农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斯坦贝克将这种恢复美国伊甸园般的丰饶景观的田园梦想，与现代美国生活的可悲异化、普通人无法实现自决或自给自足进行了对比。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人鼠之间》是第一部对“美国梦”进行经典审视的小说，而且写作年代正逢该短语在美国广泛使用。但这仍然是一部从未使用“美国梦”这个短语的美国梦小说。事实上，书中始终未曾出现“梦”这个字眼。斯坦贝克的故事虽然将主人公的欲望与财产所有权和繁荣联系在一起，但也将他们的希望与平等和集体社会正义联系在一起，这是当时“美国梦”更为突出的含义。

1937年底，一篇名为《美国梦：居者有其屋》的社论被广泛转载，这多半要归功于罗斯福的承诺，美国梦与自有产权房屋之间的联

系突然成为从犹他州到阿肯色州再到亚拉巴马州的全国性话题。

[31]1938年，宾夕法尼亚州雷丁市的一篇短特写告诉读者：“多年来，我们一直珍视‘美国梦’：每个家庭都有一幢房子和一个花园。”[32]然而，将白色尖桩围栏与“美国梦”这一短语联系在一起仍有一段路要走。（白色尖桩围栏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装修风格，它们直到二战后才与“美国梦”联系起来。）[33]

霍雷肖·阿尔杰和他笔下的成功故事总算是再次被人记起。1937年，一篇关于古根海姆（Guggenheim）兄弟的文章认为，他们的故事是“美国梦的素材，活脱脱就是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人物”。[34]两年后，《财富》杂志上一篇名为《美国共产主义》的文章被广泛转载，文章认为，“穷孩子的美国梦成真”能在美国构建起一道反对共产主义的屏障。这会让“即使收入最微不足道的苦力也能相信自己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也会阻止唤起劳工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有人打趣说，美国的无产阶级只是暂时没有钱的资本家”。[35]

不过，直到1943年，《纽约时报》似乎才把霍雷肖·阿尔杰和美国梦联系在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在一篇文章中向读者保证，美国正在“重拾霍雷肖·阿尔杰对美国梦的感觉”。虽说是“重拾”，但这其实是这份全国性的报纸首次提到这种感觉。[36]

自决的理念从来不会与个人的雄心壮志相去甚远；像霍雷肖·阿尔杰和成为总统这样的个人成功的象征正日益进入这种表达的轨道。宾夕法尼亚州一篇文章援引一位英国作家在1937年访问美国的话说：“每个男孩都有机会成为总统的美国‘梦’已经破灭。”他解释说：“英国人一直认为，美国人认为每个男孩都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这是你们国家的基本理念。”但“大多数美国人现在相信这样的想法太牵强了”。[37]（很明显，再怎么牵强也没有一个女孩成为总统那么牵强，因为后者的可能性甚至没有被考虑在内）

1938年，“自由企业”的概念（它本身是对“私营企业”这一日益不可信的旧概念的重新定义）开始普及，并与“美国梦”联系起来，进一步改变这个短语的含义。关于“个人无限进步的美国梦是否已经终结”的辩论开始兴起，尽管自1914年以来，个人无限进步的想法并没有明显地与美国梦联系在一起，当时李普曼认为这个国家“无限进步的梦想”需要加以遏制，因为它与对辉煌过去的幻想一样愚蠢和危险。[\[38\]](#)

但现在，尽管这句话攫住了美国的想象力，但“无限进步的梦想”已不再是愚蠢的幻想，而被视为美国梦的核心。1939年初，美国商务部部长发表了一篇广泛流传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保护我们的自由企业制度不再仅仅是美国梦，而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所有能够为我们的国家福祉做出贡献的人，其机会与自由都必须得到保障。”[\[39\]](#)

通过自由企业实现个人不断进步的美国梦的基础正在建立；但是，要等到一场野火席卷一切后，才能真正得到夯实。

人们在呼唤美国梦时，也许有一点是始终保持一致的，那就是认为它应该适用于各行各业的普通公民，无论是成为总统的梦想、富有的梦想、自由或平等的梦想，还是教育或正义的梦想。每当不平等和寡头政治的力量似乎又在限制普通美国人的机会时，美国梦就会重新成为讨论的主题。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许多辩论都表明有一种信念被广泛接受，那就是美国梦依赖于监管大企业，其动机不是保护消费者，而是保护小企业。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一位编辑坚持认为，“杰斐逊和杰克逊这两位楷模总统在尝试以各种方式实现美国梦时，首先想到的是小

商人及拥有小额资产和强烈民主责任感的美国人”。说到西奥多·罗斯福进步的共和主义，他认为：“国家离不开大企业，但它应该认识到，一个完全由大企业组成的国家最终将不得不接受高度的规划和管理，无论监管者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如果这个国家想要保持民主的本质，它必须确保小商人也能保持活力、繁荣和生机。” [\[40\]](#)

著作颇丰的赫伯特·艾格在1938年出版了另一本书《追求幸福：美国民主的故事》（*Pursuit of Happiness: The 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纽约时报》在书评中突出强调了艾格对“富国贫困”的抨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不平等意味着平均收入和收入中位数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富人太富，以致他们抬高了平均收入。“我们国家的富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富人都富有。我国真正富裕的人口比例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同时，我们的贫困人口比例又是如此之高，以致我们应该羞愧低头。”这篇评论说，这种不平等“显然与杰斐逊宣扬的‘美国梦’相悖”。在艾格看来，经济不平等是“汉密尔顿对商业、工业和高高在上的金融业偏爱”的必然结果。这位书评人还说：“很少有美国人会对他所说的巨额财富有悖于更明智的先辈们的精神和意图的说法提出异议。” [\[41\]](#)

如今，如果在美国主流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假设“很少”有美国读者会质疑这样一个前提——积累巨额财富有悖于美国梦，有悖于开国元勋的精神和意图，肯定会让读者大吃一惊。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远非一种另类的立场，尽管它关于开国元勋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问题是，在1938年，不同政治派别的美国人仍然普遍认为，不平等将摧毁美国梦，因为美国梦主张的就是民主和经济的平等，衡量的是集体而非个人的成功。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最好地实现这种平等。

与此同时，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凭借着民主自由的美国梦与帝国主义势力作战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倒计时之际，这个美国梦迅速成为一种表达反对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方式。

1938年初，《洛杉矶时报》敦促美国人在捍卫民主时提高警惕。自由主义政府对企图摧毁它的力量过于宽容，将会面临风险。它警告说：“如果自由主义放任敌人以自由之名发起攻击，它就会陷入自我毁灭。”由于大多数人很少花时间分析政治事件或研究历史，民主总是会面临被选民的感受而不是其理性分析塑造的风险。如果感情压倒了理智，它可以“在短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转变为最歇斯底里、最不理性、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洛杉矶时报》的这篇社论强调，“我们需要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更具积极性的民主制度。如果不想看到我们的子子孙孙被剥夺与生俱来的权利，不想看到美国梦像泡沫一样破灭”，美国人就必须意识到“自由必须予以捍卫。它是赐予我们的礼物，但它也是通过斗争得来的，并且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保留下来”。这场斗争将包括教导所有美国人不仅要向国旗致敬，还要“珍视这面旗帜所象征的理想”。应该“教导孩子们学会分析宣传”，帮助他们培养更好的判断力。“应该就迫害的起因和后果，对他们进行教育。”最后，这篇社论极富预见性地警告说：

除非我们摆脱我们的地方主义和政治腐败，除非我们埋葬狭隘的仇恨和偏见，除非劳动力和资本学会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团结在一起，除非我们消除贫困和不安全，同时给个人留有足够的发展余地，除非我们镇压叛徒，建立自己的力量以抵御来自外部的有毒宣传，否则美国及其民主理想将从地球上消失。[\[42\]](#)

“美国梦”是一种将美国民主与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企图以及推动法西斯主义的偏见和种族主义区分开来的方式。美国梦正在与一些长期以来与“美国优先”联系在一起的信条产生隐隐约约的冲突。

1938年，马里兰州的一份报纸称：“‘美国梦’中最美好的部分和美国本身一样宽广。美国主义并非建立在狭隘的种族基础上。”这个国家需要诉诸“美国性格中的宽宏与慷慨，而不是偏执和仇恨”。美国不应将自己定义为“反法西斯”，而应通过“纠正滥用权力，让自由在精神、智识和经济财富方面结出累累硕果，让法西斯主义在所有自由人眼中显得贫瘠、匮乏”，以此来保护民主。[\[43\]](#)

那年秋天，来自费城的巴鲁克·布劳恩斯坦（Baruch Braunstein）博士发表了题为《伟大的美国梦——犹太人如何加强它》（*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How Can Jews Strengthen It*）的演讲。布劳恩斯坦正在为“一个致力于为从欧洲逃往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提供资金的组织”筹款，在接受采访时他谈到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困境以及对国内反犹太主义的看法。

布劳恩斯坦看到了美国各地“反犹太主义抬头的确凿证据”，并警告美国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这里的法西斯主义形式会与欧洲的不同”。法西斯将是“疯狂的，而且它完全有机会在这里发生”。话虽如此，但也未必一定会沦落至此：“伟大的美国梦不在于将不同种族的文化磨合成一种共同的统一体。杰斐逊和这个共和国的缔造者所构建的真正的民主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基础之上的，即每一个独立的群体都可以通过自己独特的传统和文化做出很大贡献。”多元主义是答案，而且是一个与美国梦相一致的答案。

布劳恩斯坦敦促美国犹太人寻求“与那些促进和平、公平分配财富和收入、为所有群体争取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力量结盟，与有助于巩

固一个自由而宽容的美国、信奉‘伟大的美国梦’的所有群体和力量结盟”。[\[44\]](#)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一篇关于亲纳粹的“德裔美国人同盟”（其前身为“新德国之友”）势力开始抬头的社论，在美国各地被转载。文章称，“德裔美国人同盟”的纲领“受到国家社会主义原则的启发”，融合了“美国主义”“反共产主义”“对犹太人的敌意”，并已与“其他十三支民族主义力量”联手。这篇社论警告说：“如今的美国人正面临许多不同的组织，它们声称自己在推销一种优越的美国主义，但真正的美国主义不包括种族仇恨，也不以对群体的仇恨和对抗作为行动的基础。”[\[45\]](#)

可以肯定的是，这篇社论并没有稍做停顿，承认从历史上看，在美国，违背这一原则要比遵守它时更为清晰可见；《排华法案》、精英学府拒绝招收犹太人的历史，更不消提奴隶制、种族隔离以及持续存在的私刑，这些引人注目的例证都没有出现在编辑的笔下。

但关键是，各种肤色、各种信仰的普通美国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而且不惮于承认，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如同洪水猛兽，从根本上不利于美国梦。1938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编辑是共和党记者罗斯科·德拉蒙德（Roscoe Drummond），他后来参与成立了民主监督机构——“自由之家”。

这一理想再次得到重申，这种重申与其说是断言，不如说是对自己和其他任何人的规劝。这篇社论最后总结道：“美国主义并不是建立在狭隘的种族基础上。‘美国梦’中最美好的东西和人性本身一样博大精深。”[\[46\]](#)

即使这是一种幻想，它也是一种必要的幻想，一种不断将民主平等原则重新奉为信条的民族幻想，一种使那些被排除在幻想之外的人

更有可能维护其平等权利的幻想。承诺若遭背弃，文明或将逐渐溃亡，但只有在毫无承诺可言时，文明才会灭亡。

换句话说，保持持久的警惕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之一，包括要对自由的脆弱性和独特性形成基本的认识。一名16岁的犹太难民在安全抵达美国后，写了一篇《祈祷文》，美国各地的报纸在社论中引用了该文。文章的开头很简单：“我要感谢自己生活在一个由民主而不是由武力统治的国家。我要感谢，我是幸福和自由的。”编辑们对这位难民传递的信息做了一些加工。

我们忘了感谢美国梦——这就是美国的现实。然而，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比美国梦更重要的吗？如果我们失去了那个梦想，我们不是失去了一切最可宝贵的东西吗？如果我们忘记了自由和自主的长期理想，我们不是也就遗忘了将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国家的那种力量吗？如果我们放弃了宽容，给予他人与我们同等的思想和表达自由，我们不就是等于背叛了自己的祖先吗？[\[47\]](#)

从梦想到现实的飞跃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轻巧。语言再次塑造了文化现实；只要经常主张梦想的权利，它就可以通过践行梦想的人们的共同信念来实现。这篇短文尖锐地指出，没有了宽容，集体自由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只强调自由的意识形态很容易忘记这一关键条件，尤其是在一个高度重视个人主义并将其视为平等象征的国家。自由需要容忍他人的自由。

“美国梦”既是一种谈论如何调和平等与自由的方式，也是一种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方式，它把自由、平等和民主混为一谈，就好像它们是同义词一样。正如我们一直看到的那样，“美国信条”这个短语也遇到了类似的局面。1938年底，一位“小镇商人”给当地报纸写了一封信，将这些理念糅合在一起，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鲁斯到阿

肯色州的小城霍普（居民7475人），这封信在全国各地被转载。爱国主义不仅是“盲目的忠诚”，这位没有具名的商人写道：“它还是人们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和牺牲的东西，在这个国家的建设中，它是值得付出所有鲜血、泪水和辛劳的东西。”

这种无形的东西与繁荣无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从未被提及（如果作者真的认为繁荣很重要的话，恐怕会轻易指出来）。相反，这是这位作者上学时接触到的“美国信条”，也就是于1918年成文，20世纪20年代流行并灌输给像这位作者这样的公民的信条。离开学校20年后，他将美国梦和美国信条融入了反法西斯斗争。

他相信，任何理解美国信条及其所代表的美国梦的人，“都将坚持以一种不会破坏或削弱美国传统中那些无价的元素的方式来解决当今之问题”。整个国家“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美国梦中蕴藏着难以言喻的珍贵的东西”。[\[48\]](#)

这种难以言喻的珍贵的东西属于每一个美国公民。

然而，如何识别那些无法言喻的东西，是社会公正和平等还是自由与机会？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1938年底，《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社论，在全国广为流传。文章主标题是“商业和政府”，副标题点明了这篇文章的论点：“美国梦的本质是自由和革命”。《财富》杂志推崇的美国梦强调的是个人机会，将“美国梦”作为一种代表个人成功的方式，将其更有力地推向国家层面的讨论，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

但即便是《财富》杂志也完全愿意承认政府监管的大前提。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监管，而只在于监管的力

度有多大。尽管新政为国家带来了很多好处，但《财富》杂志认为，新政使国家权力过度扩张，并危及自由和个人主义原则。

社论开头写道：“美国梦是西方世界伟大革命的产物。对自由的创造者来说，它意味着个人的机会。这种体现在美国梦中的自由意志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经历。从这方面来说，后来的一切运动都是反革命的，任何主张回归制度主义的学说，即法西斯主义，都是反革命的学说。”^[49]“自由意志主义”一词最初来自神学词汇，自进入20世纪以来，很少在美国政治语境中使用；到30年代末，随着有关自由和自由企业的辩论升级，这个词又有了用武之地。^[50]

《财富》杂志继续阐述道，自由——一个被制宪者青睐的“高度具体化的词”，“最近已经被广义上的‘民主’一词取代，而开国元勋甚少使用这个词”。随后，《财富》杂志明确提出了其核心主张：“诚然，民主的概念是美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并不是最重要的。”民主政府无非达到最终目的，也就是实现“个人解放”的一种手段。

《财富》杂志的社论最后批评了罗斯福新政，称“现任政府的发言人几乎从未提到过自由。他们大谈民主，就好像美国梦的核心是民主而不是自由”。^[51]

《财富》杂志断言，高度具体化的“自由”一词是开国元勋美国梦的核心，但这个说法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开国文件在谈及对奴隶制的保护时，措辞确实“高度具体化”。这些文件确实体现了自由和民主平等（尽管在使用“民主”一词时非常谨慎），这一事实是从战前到现在所有根据法律主张公民平等权利的基础。但是，《财富》杂志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只是为了支持个人的解放而创立的，与无视通过法律保障所有这些被解放的个人的平等权利，并不矛盾。

似乎这种不和谐还不够明显，《财富》杂志选择用“解放”一词来形容美国的自由——这个词与美国黑人的自由联系最为紧密，当初使用它时，曾经的奴隶及其后代还远未享受到“解放”理应包含的充分的政治或经济自由。

这篇文章对自由的意义进行了探讨，在20世纪30年代的全国性讨论中，这绝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唯一一次。相反，它只是代表了辩论的展开方向。《财富》杂志将自由意志主义的斗争带到了社会民主的力量面前。“美国梦”的正确含义成为这场长期斗争的文化战场之一，而这场斗争尚未结束。

正如一封来自田纳西州的信所表明的那样，《财富》杂志将自由置于平等和社会正义原则之上的观点，清楚地被该刊的首批读者注意到。“《财富》杂志将自由的理想与‘美国梦’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的确如此，”这位作者表示同意，“但是，如果存在对梦想的威胁，它不是来自对自由理想的任何不满，而是来自我们的社会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共识。”^[52]问题不在于自由的价值，而在于如何生存。

在危机之时，美国信条所蕴含的理念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时已达到临界点，而经济萧条与极权主义的崛起相裹挟，无疑构成了一场危机。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财富》杂志和许多美国报纸在1938年就已准备好为自由在美国梦中的核心地位而战，但就连《财富》杂志也相信，赚钱并不是美国梦的核心。^[53]

此外，在驳斥“美国梦”意味着民主平等的观点方面，《财富》杂志的尝试只是众多例证中的一个，这些例子肯定了当时理智所具有的牵引力（否则他们就不会花如此大的力气对此发起抵抗）。在辛辛那提，有人发表演讲，宣称“到处都在宣扬美国梦。这还不够——憎恨专制并不意味着能保证自由——反法西斯并不等同于支持民主”。

我们可以从这些言论中推断，美国梦不仅无处不在，而且广泛等同于支持反法西斯民主。这位演讲者敦促美国人为抗击法西斯主义做出更多努力，而不仅仅是在口头上将美国梦称为民主；而《财富》杂志则认为，美国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民主。但如果在一件事上他们能取得共识的话，那就是美国梦象征着民主，反对专制。^[54]而且，美国梦的解释力越来越强。

美国梦固有的对威权主义的敌意很容易就能联想到种族平等问题，但《财富》关于此的争论显然是在回避种族平等问题。这再次表明，事后诸葛亮并不需要看到这一点。1939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威斯康星州希博伊根市的一位牧师发表了一篇讲话，表明许多人都认识到种族平等和宽容总是与美国梦的原则紧密相连，就像他们同样宣称美国信条可以追溯到19世纪。

这次演讲是为了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士兵，他们代表了不同的种族、文化传统和信仰。演讲一开始就指出，作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征兵时从未歧视过非白人基督徒。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黑人为了实现这个美国梦而献身，但他们肯定无法安眠。只要我们仍然把他们当作局外人，冲着他们的孩子关上机会之门，看到任何诋毁他们的毫无根据、充满偏见的说法都信以为真，他们就无法安息。埋在这个墓地里的，是美国人的骨灰——他们原本来自英国、德国、法国和荷兰，他们来到这里，为的是宗教宽容、政治自由和经济机会。他们不希望我们在这里一方面空谈美国主义，另一方面却基于肤色或种族而拒绝给予这些独特的美国特权。

这位牧师总结说，美国人需要“忠诚于”那些为国家理想而献身的人，并承诺“我们将维护自由和正义的美国理想”，以帮助“捍卫

和全面实现美国梦”。^[55]全国各地的普通公民，不论黑人还是白人，长期以来都已认识到民主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普遍原则同种族和族裔歧视是不相容的。

在希博伊根市的这位牧师致辞两个月后，一位读者写信给圣路易斯的一份报纸，提出“种族偏见”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对此也是有解决方案的，那就是实现“不同国家、信仰和教派的人能够和平共处、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美国梦”。^[56]

关键不仅在于社会正义原则与最近的发明相去甚远，更重要的还在于曾经将“美国梦”视为一项从根本上反对偏见的平等主义原则的普通美国人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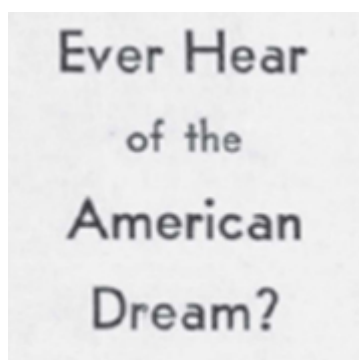
社会正义与个人梦想之间的摩擦是另一部经典的“美国梦”小说的主题。这部小说的重点是，美国梦是一种被背叛的承诺，它摧毁了那些相信它的人。这本书就是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该书出版于1939年3月，它从未真正使用“美国梦”这个短语，但是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它也使用了梦的象征意义，将美国梦的理念渗透到读者的意识中。当乔德一家勉为其难地决定离开家，向西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应许之地”时，斯坦贝克用美国梦来描述他们离开的时刻：

临到要走的时候，他们都不由得像爷爷那样恐惧起来。眼看着那小木棚在阳光里显出鲜明的轮廓，眼看着提灯的光线渐渐黯淡，不再投射出晕黄的光圈，眼看着星星几颗几颗地在西边隐没下去。一家子梦游似地站在那儿，他们不是看着某一件东西，而是看着整个黎明、整片大地、整片原野。^[57]

后来，当乔德一家与其他流民家庭联合起来时，斯坦贝克进一步强调：他们都被西部充满希望和富足的集体梦想吸引。“晚上，出现了奇怪的情形：二十来家变成了一家。孩子们成了大家的孩子，失去老家成了大家共同的损失，西部的好光景成了大家共同的美梦。”

[58]

在《愤怒的葡萄》出版前两个月，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游行声势越来越浩大，不容忽视。《纽约时报》就《美国传奇：关于美好生活的美国梦的历史与文学》（*American Saga: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Dream of a Better Life*）一书撰写了一篇书评。书评一开始就明确提到当前的政治局势。这位书评人写道：“今时今日，美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及其意义表现出的兴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浓厚，这并非偶然。正如我们的祖先在3/4个世纪之前所做的那样，我们现在也在问自己，美国式的民主意味着什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正面临威胁。”他补充说：“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们应该敏锐地意识到恢宏的历史画卷正徐徐展开。” [59]



[1] *New York Times*, 9 April 1934.

[2] *New York Times*, 9 April 1934.

- [3] *Clovis News-Journal*, Clovis, NM, 29 June 1934.
- [4] *Shamokin News-Dispatch*, Shamokin, PA, 22 September 1934.
- [5] *Los Angeles Times*, 8 August 1934.
- [6] *New York Times*, 7 August 1934.
- [7] *Asbury Park Press*, Asbury Park, NJ, 18 November 1935.
- [8] *Courier-Journal*, Louisville, KY, 30August1935.
- [9] *Des Moines Register*, 1 December 1935.
- [10] *Statesman Journal*, Salem, OR, 13 August 1935.
- [11] *Lincoln Star*, Lincoln, NE, 2 May 1935.
- [12] *Lincoln Evening Journal*, Lincoln, NE, 2 May 1935.
- [13] *Press and Sun-Bulletin*, Binghamton, NY, 1 July 1935.
- [14] *Ithaca Journal*, Ithaca, NY, 23 November 1935.
- [15] *Daily Press*, Newport News, VA, 15 June 1935.
- [16] *Brooklyn Daily Eagle*, 15 September 1935.
- [17] *Arizona Daily Star*, Tucson, AZ, 22 September 1935.
- [18] *Des Moines Register*, 13 December 1935.
- [19] *Eugene Guard*, Eugene, OR, 28 May 1935.
- [20] John Hyde Preston, "Searching for Roots in America", *Harper's*, October 1936.
- [21] *Baltimore Sun*, 14 December 1936.
- [22] *Pittsburgh Press*, 27 June 1935.

[23] Herbert Agar, *What is America?* London: Eyre Spottiswoode, 1936, pp. 228-229.

[24] *New York Times*, 11 June 1936.

[25] *Minneapolis Star*, 15 May 1936.

[26]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ddress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 New York City, 31 October 1936.

[27] 引自 *Lincoln Journal Star*, Lincoln, NE, 26 November 1938。

[28] *Salt Lake Tribune*, Salt Lake City, UT, 22 January 1937.

[29] *Republic*, Columbus, IN, 20 January 1936.

[30] *Greeley Daily Tribune*, Greeley, CO, 20 February 1937.

[31] *Ogden Standard-Examiner*, Ogden, UT, 29 December 1937; *Courier News*, Blytheville, AR, 30 December 1937; *Anniston Star*, Anniston, AL, 28 December 1937.

[32] *Reading Times*, Reading, PA, 28 April 1938.

[33] 1949年的一篇题为《美国梦》的文章是我所能找到的最早的联想。文章开头写道：“围着白色尖桩围栏、装着绿色百叶窗的乡村小屋已经成为美国人渴望的象征，就像家里自制的苹果派在上次战争中成为美国士兵希望的象征一样。” *Salt Lake Tribune*, Salt Lake City, UT, 1 May 1949.

[34] *Brooklyn Daily Eagle*, 29 August 1937.

[35] *Courier-News*, Bridgewater, NJ, 15 August 1935.

[36] *New York Times*, 3 July 1943.

[37] *Times-Leader*, Evening News, Wilkes-Barre, PA, 21 October 1937.

[38] *Cincinnati Enquirer*, 26 February 1938.

- [39] *Pittsburgh Post-Gazette*, 25 February 1939.
- [40] *Hartford Courant*, Hartford, CT, 3 February 1938.
- [41] *New York Times*, 30 October 1938, Section 6.
- [42] *Los Angeles Times*, 24 April 1938.
- [43] *Denton Journal*, Denton, MD, 16 April 1938.
- [44] *St. Louis Star and Times*, 4 October 1938.
- [45] *Lead Daily Call*, Lead, SD, 14 April 1938.
- [46] *Lead Daily Call*, Lead, SD, 14 April 1938.
- [47] *Post-Register*, Idaho Falls, ID, 14 April 1938.
- [48] *Hope Star*, Hope, AR, 16 December 1938.
- [49] *Nebraska State Journal*, Lincoln, NE, 28 November 1938.

[50] 尽管《牛津英语词典》最早提出的美国政治语境中使用“自由意志主义”的用例是在1945年，而政治科学家将这一运动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它最早用于美国政治言论应在1893年。“社会无法再继续依赖旧自由意志主义、求生心切、不受拘束的制度，而许多明智的人似乎迷恋这种体制。” *Stark County Democrat*, Canton, OH, 19 October 1893.

- [51] *Baltimore Sun*, 1 December 1938.
- [52] *Tennessean*, Nashville, TN, 25 November 1938.
- [53] *Times*, Shreveport, LA, 27 November 1938.
- [54] *Cincinnati Enquirer*, 5 May 1939.
- [55] *Sheboygan Press*, Sheboygan, WI, 31 May 1939.
- [56] *St. Louis Star and Times*, 13 July 1939.

[57] John Steinbeck, *The Grapes of Wrath*, New York: Penguin, 1939, p. 112.

[58] John Steinbeck, *The Grapes of Wrath*, p. 193.

[59] *New York Times*, 19 February 1939.

12 美国优先 1935~1939年：它会在这里发生

美国梦占据了全国的话题，尽管“大比尔”汤普森的竞选活动让“美国优先”声名扫地，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和其他支持者无意不战而退。

1935年1月29日，参议院否决了一项美国加入常设国际法院的提议。长期以来，新闻界一直将美国的这一雄心壮志称为“参与国际司法的美国梦”。参议院的投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赫斯特及查尔斯·E. 库格林神父策划的媒体运动的回应，后者是“基督教阵线”

（Christian Front）颇具影响力、观点偏激的反犹主义发言人。在对国际联盟的攻击结束之后，对国际法院发起的斗争就揭开了序幕，整整15年之后，国际法院的最终失败几乎具有同样重大的影响。中西部的孤立主义者被认为是粉碎这一企图的功臣；这次失败被宣布为“美国优先”的又一次胜利。

《布鲁克林每日鹰报》在一篇题为《美国优先！》的社论中予以辛辣讽刺。文章开头写道，那些企图“把我们引入外交事务”的“有识之士和‘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最终还是被击败了。“我们已经被告知上百次，这是美国精神的一次伟大胜利，我们必须永远把美国放在首位。”

《布鲁克林每日鹰报》承诺说，它已经做好了“适时忏悔”的准备，将努力与新孤立主义保持一致。这篇社论承诺，“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继续为美国的建设而努力，让世界其他国家或多或少地自行其

是”。社论提出了一个主要问题：“本报能以何种方式宣扬美国优先主义？”

如果为一个更强大、更繁荣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的最佳方式是首先保护美国，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尽自己所能促进布鲁克林的利益，为这个让美国更强大、更繁荣的事业做出贡献。既然我们已经不再追求国际主义，决心把美国放在首位，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为布鲁克林服务呢？”

首先，纽约所有的国际航运必须停止，这样布鲁克林人就不会被迫处理受污染的外国货物。这将节省资金，因为这样一来既不需要新建地铁系统，也不需要牙买加湾建设一个新园区：一旦国际工业消失，海滨地区就会有足够的空间。这很好，因为很明显，目前港口两侧的码头、仓库和工厂在美国新的计划中没有任何作用；政府也可能逐步淘汰海军造船厂，因为“最终作为一个隐士王国，美国将不需要海军”。由于没有进行国际贸易的必要，他们可以把精力集中在中西部的国内事务上，而这现在决定着国家利益。

这篇专栏承认，“改造布鲁克林，使这个社区符合美国优先计划的任务并不容易，如果布鲁克林想要达到爱国主义的新高度，联邦政府必须提供帮助”。它将需要在中西部建设农舍，“以容纳我们这个社区的200万居民，这些人要么搬到内陆，要么只能忍饥挨饿”。为了省钱，他们或许应该“熄灭自由女神像的灯”。[\[1\]](#)

应该指出，并不是每个人都欣赏这篇“‘自作聪明’的社论”，有几个人直接发表了反对意见，一个自称通常喜欢《布鲁克林每日鹰报》专栏的人说，那篇“坏脾气的长篇大论让人大跌眼镜”。[\[2\]](#)

“美国优先”本土主义的势力不会很快消失，这一点在一个月后《匹兹堡新闻》刊出的一封读者来信中得到明确说明。“作为一个美

国人，我相信美国优先，而且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培养出一位好公民。”显然，满足这一个条件就足够了。

因此，这封来信的作者主张“制定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市一级和县一级的任何一个部门尝试和处理业务，与操着外国口音的人接触，由他们来指点我们该如何管理我们的政府，这肯定是令人痛苦的。”^[3]本土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到1935年，“美国优先”已经成为最明显的表达这种立场的方式，以至于有人认为，出生在美国自然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到了1935年8月，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报道说，“新德国之友”的5000名成员聚集在长岛亚普汉克（Yaphank）附近的齐格弗里德营地（Camp Siegfried），“重申对纳粹德国政治和经济信条的忠诚”。作为营地“夏季节日”的一部分，他们带着混合美国国旗元素的纳粹标志游行，行纳粹礼；照片在全国各地刊载。^[4]

那年9月，在宣布竞选总统一个月后，参议员休伊·朗被政治对手的女婿暗杀。他曾不止一次被称为“美国的第一位独裁者”，长期以来，他融合了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政策令许多观察人士感到担忧；在他死后，一些人物特写比较了他诉诸美国梦的倾向和他对美国法西斯主义的偏爱。^[5]

朗去世后不久，一篇报道指出：“他承诺为所有家庭提供一套房子、一辆汽车、一台收音机，以及每年5000美元的补助，并为有能力的年轻人提供教育，这听起来像是美国梦的新版本。”

文章接着写道，朗的支持者最初没有看到的是，他最终选择用“最严厉的法西斯主义”来解决他发现的问题。法西斯主义长期以来的作用“在那天晚上国会大厦走廊的枪林弹雨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尽管这些地方致力于民主原则，但“他们的精神已经逃离”。在朗的治理下，路易斯安那州州政府变得极度“巴尔干化”，以致对于杀死他的年轻医生来说，“巴尔干式的解决方案”（即暗杀）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这篇文章用朗自封的绰号总结道，这才是真正的“掌握绝对权力之人的恐吓”。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政治利益。相反，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煽动家”，“知道如何利用各种群体的不满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他还活着，他可能“已经缔造了美国法西斯主义。他的职业生涯告诉我们，美国本身并不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证据”，除非民主得到保障，否则法西斯主义“可能会再次抬头”。[\[6\]](#)

他遇刺几周后出版的一本传记更为简洁地写道：“休伊·朗可能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墨索里尼’。”[\[7\]](#)

尽管许多美国人确信“它不会在这里发生”，但休伊·朗的崛起已经向忧心忡忡的观察家们证明，它可以在这里做到。很明显，辛克莱·刘易斯在1935年底出版了一部小说，名为《不会在这里发生》（*It Can't Happen Here*）。他在小说中想象了美国法西斯主义的样子，小说的灵感源自休伊·朗的政治生涯（但写于他被暗杀之前）。刘易斯告诉记者，这个书名很“讽刺”。他还说：“我不是说法西斯主义会一定在这里发生，但它确实有可能。”[\[8\]](#)

《不会在这里发生》认为，在美国，法西斯主义最危险的支持者永远是那些“否认‘法西斯主义’一词的人，他们鼓吹宪法和传统印第安人自由的形式受到资本主义奴役”。美国法西斯主义必然会受到

资本主义——或者正如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出于利润的政府，由利润治理的政府，一切皆为利润的政府”——的影响。

作为刘易斯最成功的小说之一，该书对美国例外论可能将其与法西斯主义隔离开来的观点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抨击了试图“用法西斯主义的罪恶来治愈民主的罪恶”的“滑稽疗法”。书中的参议员巴斯·温德利普（Buzz Windrip）显然是以休伊·朗为原型，他在竞选总统时奉行传统价值观的民粹主义运动，对恢复繁荣做出了过于简单的承诺（“他主张每个人只要投票就能致富”）。一位报纸编辑徒劳地发出警告：“人们会认为，他们选择他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保障。然后，看看吧，情形有多恐怖！”

上任后，温德利普就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创建了名为“一分钟人”（Minute Men）的私人安全部队，并把他的政敌关押进“集中营”，就像希特勒自1933年以来在德国所做的那样。

当总统温德利普得知他的执政遇到了阻力时——“在中西部和西北部，特别是明尼苏达州和南、北达科他州，叛乱一触即发，其中一些以前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煽动者要求他们的州脱离联邦……并组建他们自己的合作联邦（实际上近乎社会主义）”，他对自己的内阁大发牢骚：“你们忘了上周我本人也曾在全国某个特定地区发表特别的广播讲话！我得到了很棒的反应。中西部人对我绝对忠诚。他们感谢我一直以来所做的一切！”

温德利普政府同意“用爱国主义团结全国所有的力量，这种爱国主义总是在受到外来攻击的威胁时召之即来”，因此他们立即“安排在墨西哥边境精心策划一系列受到侮辱和威胁的可悲‘事件’，一旦美国国内出现爱国热情高涨的气氛，便立刻对墨西哥宣战”。

温德利普的内阁明白，政府再也不需要“借助上帝的力量，坠入一场不明不白的战争，作为对内部不满情绪的一种补偿式疗法”。相反，“在这个精心策划的宣传时代，一个真正的现代政府，比如他们自己的政府，必须弄清楚他们必须推销什么品牌的战争，并有意识地策划推销活动”。也就是说，在这里他们需要运用现代广告作为工具。

温德利普越来越自恋，沉湎于个人崇拜；他反复无常、不负责任的行为震惊了整个国家，而他以此“自娱”。“他不是至高无上的吗？他不是像罗马皇帝那样是半神半人吗？难道他就不能蔑视他已经开始鄙视的那些肮脏的庸众吗？”

一场起义爆发了，但随后又停滞不前，因为在美国，“由于‘普及的受欢迎的免费教育’受到了热烈赞扬，在这里几乎不存在教育、普及、流行、免费的其他任何东西，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实际上，他们对想要的东西知之甚少。”

于是他们又回头照温德利普的吩咐办事，小说以美国即将迎来第三次独裁统治、与墨西哥的一场虚假战争、出现了一家国营媒体（当中每一份报纸都被称为“公司”）以及主要由资深记者发起的抵抗运动作为结尾。

1935年10月，也就是刘易斯的小说出版的同月，另一场支持纳粹的集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再一次，它几乎没有得到全国性的报道，即使少数媒体做了报道，其描述也都显得很温和。据《辛辛那提问询报》（*Cincinnati Enquirer*）报道，“德国驻美国大使今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批评了《凡尔赛条约》，有15000名德裔美国人参加集会，共同庆祝德国日”。[\[9\]](#)

辛克莱·刘易斯和多萝西·汤普森于1928年结婚。他们两人的传记作者都认为，他的小说主要受到她的圈子里关于欧洲局势的讨论的影响。当刘易斯开始写《不会在这里发生》时，汤普森刚刚成为第一位被希特勒驱逐出德国的美国驻外记者，这使她成为国际名人。她写道：“不管希特勒‘革命’可能是或不是什么，这都是一场大规模的逃离现实的运动。”

在一封信中，她评论道：“最令人沮丧的不仅是自由主义者的无助，还有他们令人（对我而言）难以置信的温顺。为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无处可觅。”[\[10\]](#)

汤普森从欧洲回国后，又怒又急。不出几个月，刘易斯就完成了他对反法西斯的讽刺之作，紧接着汤普森获得机会撰写在全国转载的专栏，这个始于1936年3月的专栏名为《有案可查》（*On the Record*），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正好与沃尔特·李普曼的专栏《今日与明日》（*Today and Tomorrow*）是对页，在接下来的22年里，它保持着每周三次的发稿频率。全美150多家报纸联合转载，阅读量达到1000万。1936年夏天，汤普森又有了自己的国家电台广播节目，该节目一直播放到1938年。1939年，她被《时代杂志》评为美国第二大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仅次于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

开设《有案可查》专栏两个月后，也就是1936年5月，汤普森发表了一篇名为《它会在这里发生》（*It Can Happen Here*）的文章，讨论了美国各地出现的组织松散的法西斯主义“团伙”。一个来自所谓“基督教义务警员”组织的男子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分享了他们的“座右铭”：“请牢记：信奉基督教的北欧裔美国白人将本着希特勒的精神，将使犹太人和黑人永远处于《吉姆·克劳法》规定的下等人的位置。”[\[11\]](#)

汤普森解释说，这些极端组织中有几个似乎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跨州的奇妙组织”，自称“白人男性新教徒”，誓言“捍卫美国和宪法”。他们还决心“消灭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天主教徒、黑人和犹太人；限制入境和驱逐一切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支持和参与私刑；在内战中为其成员提供武器，并最终在美国建立独裁政权。”

该组织的一名成员草率地射杀了另一名成员（他说，这是出于一时的烦躁而非不和），而凶杀案调查揭示了这个神秘的地下组织的存在。这群极右翼仇恨组织为了共同的事业而成立，但甚至连真正的名字都没有。

“他们在仇恨谁？”汤普森问，“生活对他们很不好。这该怪谁？于是他们把这归咎于替罪羊。要怪罪那些在田里干活的黑人吗？还是犹太人？他们不是经营着红红火火的商店吗？或者共产主义者……或者工会主义者……或者尊奉罗马教皇的天主教徒？还是从事这些工作的外国人？这些人都成了替罪羊。因此，要消灭他们。我们贫穷，一无所有。但我们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我们的祖先建立了这个国家。它属于我们。”为了抗议自己的地位被取而代之，他们用暴力作为回应。

她指出，这些人“贫穷、轻信、有暴力倾向，都是些小男人，为仇恨所困。他们容易受骗。他们被告知这个组织可以追溯到革命时期。它有13名高层成员，代表着最初的13个殖民地。他们与三K党及‘暗夜骑士’有着直接联系”。

埃德加·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FBI）宣称其无法跨州追捕该组织，而“根据宪法，各州保留使用私判处死本州少数族裔的权利”。汤普森最后说，所有“容忍不宽容的种族偏见言论，却没有表达对这

种非美国思想的愤怒之情”的人同样应该受到指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坐在旁边自鸣得意，认为它不会在这里发生！”[\[12\]](#)。

三周前，《奥克兰论坛报》转载了13岁的伊莱恩·埃里克森（Elaine Erickson）写的一首题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诗。

在每个美国人的心中，美国优先

尽他的一份力

尽他的本分；

每个美国人都应该关心

为正义而不为邪恶；

当你开始工作时，

唱起你的歌——

“美国优先”。

美国优先，在你的歌中

但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

远远超过那些与你种族不同的人，

想想他们，和他们共进晚餐。

在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

不要太过贪婪。

但内心深处你明白

“美国优先”与我同在。[\[13\]](#)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束语，让人感觉这首诗虽然是在敦促读者口头上支持宽容其他种族，“但内心深处你明白‘美国优先’与我同在”——就好像在1936年，连孩子们都能看得出来，“美国优先”已经成为隐秘的种族主义的暗语。

1936年初，詹姆斯·沃特曼·怀斯（James Waterman Wise）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法西斯主义的可能特征的演讲。怀斯是一位颇受欢迎的作家、演说家和反法西斯活动家，也是一位全国闻名的犹太拉比的儿子。据报道，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约翰·里德俱乐部，他在讲话中谈及了库格林神父〔库格林神父发表的电台广播谴责“犹太银行家”及其对世界金融和媒体的神秘控制，这些观点直接取自臭名昭著的反犹太阴谋文学《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怀斯认为，库格林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都明显代表了美国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一旦出现，“很可能‘会被包裹上美国国旗，并被宣扬为对自由和维护宪法的呼吁’”。[\[14\]](#)

法西斯主义被美国国旗伪装的形象深入人心（“当法西斯主义来到美国时，它将被包裹在国旗里，并带着一个十字架”），后来被广泛认为出自辛克莱·刘易斯之口（很多人认为它其实出自《不会在这里发生》），但刘易斯从未说过这句话。

相反，这句话很可能出自怀斯之口。他在另一场演讲中再次描述了这个画面，只不过措辞略有不同。他说，“美国需要法西斯主

义”，“美国的权力和财富”依赖于“奴役大众”来维系。怀斯警告说：“不要以为他们会高举纳粹的旗帜，也不要指望他们从欧洲借鉴任何流行的法西斯主义形式。”他还说，“身着各种颜色制服的队伍——整个服饰军团都在利用群体偏见——正在播下法西斯主义的种子。它可能出现在所谓的“爱国主义组织”中，比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美国革命女儿会”，或者“它可能被包装在一面旗帜或一份赫斯特集团的报纸里”——宣扬“美国优先”。[15]

“服饰军团”不仅指墨索里尼的黑衫军和希特勒的褐衫军，还指1933年由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的威廉·达德利·佩利（William Dudley Pelley）组建的“银衫军”。“银衫军”是一个公开宣扬白人至上主义、反犹太主义的准军事组织，1936年，它只是众多支持美国法西斯政权的组织之一。那一年，佩利作为华盛顿州“基督教党”的候选人参加了总统选举，当时有传言称他呼吁“美国的希特勒和大屠杀”，而且这一说法广泛流传，促使由犹太喜剧演员埃迪·坎托（Eddie Cantor）任主席的好莱坞反纳粹联盟（Hollywood League Against Nazism）给罗斯福总统发了一封电报，要求调查佩利的“亲纳粹秘密组织”。[16]

就在怀斯发表演讲几周后，弗里茨·库恩（Fritz Kuhn）组建了德美同盟。库恩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巴伐利亚步兵部队服役，1934年成为美国公民。几个月后，一个“联盟党”将右翼集结起来，形成了白人至上主义的法西斯组织联盟。

1936年夏天，多萝西·汤普森在一篇名为《疯狂边缘》（*The Lunatic Fringe*）、分成上下两部分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对这些组织进行了抨击。汤普森指责联盟党比美国任何政党“都更接近民族法西斯主义倾向”。“联盟党说美国应该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攻击“华尔街的金融界”、“‘反动派、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激进

派’，但他们最仇视的还是先进的自由主义，并把它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汤普森显然对那些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的人不以为然。她说：“希特勒也是如此。”

他们的追随者也像是纳粹的追随者：“中产阶级中一无所有、丢尽脸面的人，破产的农民，激进分子，以及‘可敬’但极度不满的乡野之人。”

由于该组织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强大的工业集团和保守的利益集团会暗中支持它，当然也会容忍它，寄希望于依靠它推翻罗斯福总统推行的计划”，也就是新政的社会福利制度。她警告说，一些保守派和资本家宁愿与法西斯主义结成愤世嫉俗的联盟，也不愿容忍自由主义。

她接着说，“货币激进主义，百分百主义和对所谓外来思想的仇恨，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信仰，这些都是纳粹运动上台之前的特点。反社会主义、反自由主义、凡事引用《圣经》、反对由外来者组成的领导层，这使它吸引的不是富裕阶层，而是心怀不满、负债累累的中下层，”以及“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坚持三K党思想的所谓爱国团体”。这样一个组织能否巩固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出现一位能够推动这些运动的领导人。

她说，这还将取决于“美国保守派有多开明”，以及他们是否愿意与这样一位领导人战斗。如果极端主义组织像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那样，同时在左翼和右翼形成，“自称保守派的人”开始帮助极右翼组织击败自由派，“那么，我们将走上欧洲许多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也就是通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17\]](#)

在随后的专栏文章《疯狂边缘II：“我们的种族和文化的救世主”》（*The Lunatic Fringe II: “Saviors of Our Race and Culture”*）中，汤普森列举了美国几十个反犹太、亲法西斯的边缘组织，其中不仅包括“银衫军”，还包括“十字军白衫军”、黑人军团、“世界反犹太侵略联盟”、所有的“基督教”组织（“忠诚的雅利安基督徒”“基督教信仰捍卫者”）和三K党，它们都在忙着散播《锡安长老会纪要》，并蔑称罗斯福为“罗森菲尔德”^[18]。

但因为极左的人“愚蠢地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并把所有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都贴上‘法西斯分子’的标签”，左派和右派结合在一起，让“‘爱国’这个词成为对一切正直和慷慨的人的诅咒”。汤普森援引塞缪尔·约翰逊关于爱国主义的名言，指责道：“是时候让爱国者坚持爱国主义不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也不是无知、偏见和狂热者的专利。”^[19]

虽然并非所有不同意强硬左派观点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者，但也有美国人准备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同时坚称自己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愿意“容忍”它，正如汤普森在她的前一篇专栏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同行的人，可以殊途同归。

那一年，威廉·福克纳出版了《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对神话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国家历史的关联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部恢宏的史诗摆脱了月光和木兰花的梦境，揭示了背后的哥特式梦魇。《押沙龙，押沙龙！》的情节是由这样一个命题驱动的，即贫穷的白人相信他们对黑人拥有与生俱来的优势，从中获得了自尊和种族自豪感，这便是南方历史的定义。小说认为，如果他们的这种种族优越感受到威胁，就会以暴力作为回应。

就在一年前，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也指出了白人的“心理酬劳”（psychological wage），发现“白人劳工相信，打压黑人劳工比提拔白人劳工更为重要”。种族的作用是分裂和征服工人，无休止地推迟革命。（很多人会步杜波依斯后尘，在谈及社会主义为何从未在美国站稳脚跟时，用种族一词作为回答）杜波依斯补充说，尽管白人劳工仍然很穷困，但他们“通过某种公众和心理酬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补偿”，这就是所谓种族优越感的酬劳。[\[20\]](#)

福克纳曾说过一句名言：过去并未逝去，它甚至从未过去。

与此同时，“美国优先公司”发出了更多的噪声。《时代》杂志转载了一篇最早发表在激进杂志《新大众》（*New Masses*）上的文章，报道说“美国优先公司”的创始人詹姆斯·M. 特鲁告诉一名假装是共和党人的记者，他计划在9月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枪杀犹太人”的运动。[\[21\]](#)特鲁还吹嘘说，他为一家警察俱乐部申请了专利（专利归于“娱乐设备和游戏”类别），称这家俱乐部为“犹太杀手”，其中两个专利例证就放在他的桌子上。由于“最急需的是一流的杀手而非警棍”，特鲁在为他的“9月大屠杀”练习射击，以肥皂作为靶子，因为“肥皂的稠度接近犹太人的身体”。[\[22\]](#)

《时代》杂志记者在报道这一切时的语气似乎相当轻率。四天后，《威斯康星犹太纪事报》（*Wisconsin Jewish Chronicle*）在报道时语气就没那么轻佻了，该报将“美国优先公司”列为美国“主要的反犹太组织”之一。[\[23\]](#)

1937年2月，罗斯福犯了许多人认为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政治错误，他试图扩大最高法院的规模，以抵消对他的许多新政改革的持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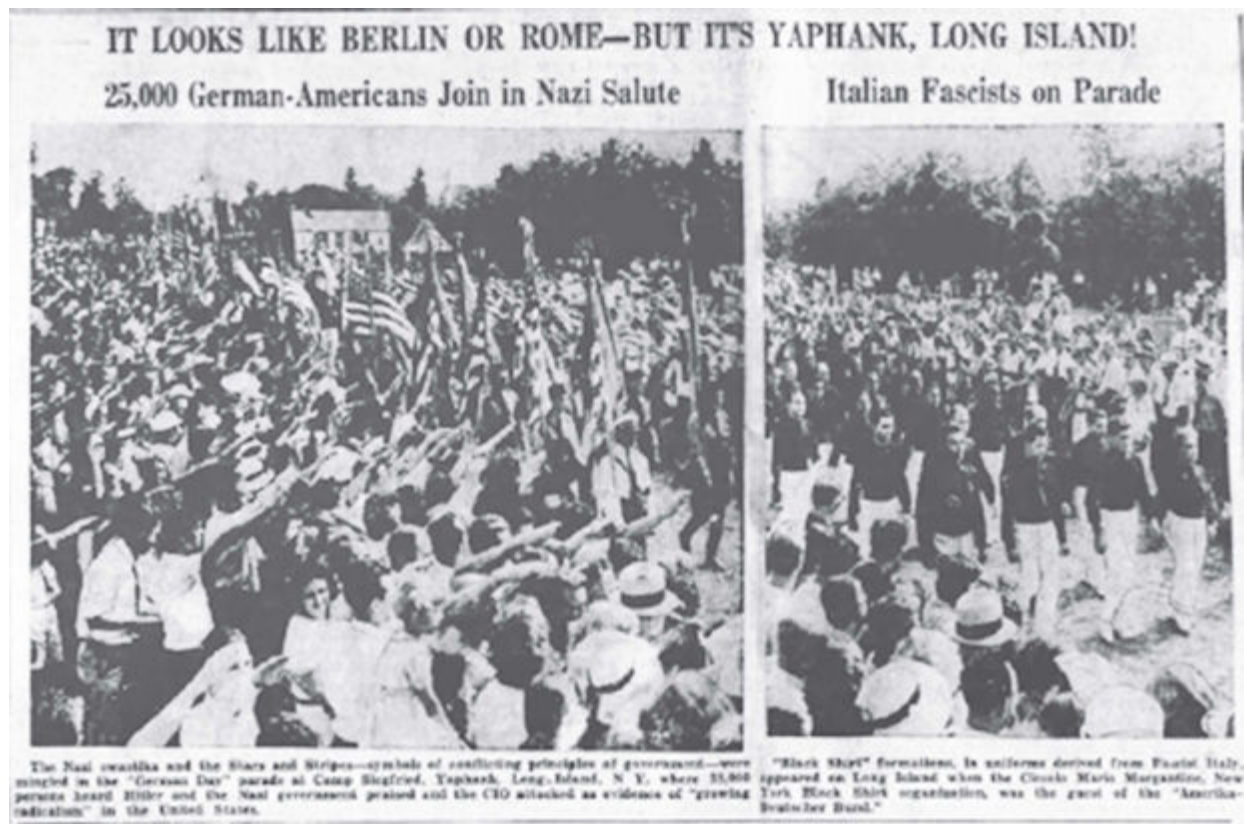
敌意。当时，罗斯福的举动被广泛谴责为对美国三权分立原则的冒犯，甚至连他的副总统也强烈反对他“包揽”最高法院的企图。

全美各地的社论都称罗斯福为“独裁者”。多萝西·汤普森常常犀利地批评罗斯福，她警告说，希特勒就是这样来到美国的。在经历了一些断断续续的抵抗之后，“美国人民对任何事情的兴趣很少持续两周以上，他们会开始说：‘哦，让总统做他喜欢做的事吧。他是个好人。’”不幸的是，“没有人能事先辨认出他们中的独裁者。没有谁会拿独裁作为自己的竞选纲领”。

她补充说：“当美国人想到独裁者的时候，他们总会想到一些外国的例子。”但由于所有独裁者都声称自己代表“国家意志”，一个美国独裁者将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他将代表传统美国的一切”。美国人民“在欢迎他时，将报以巨大的、普遍的、民主的、类似于羊叫的呼声，‘好的，老大！想怎么安排随你的便，老大！’”[\[24\]](#)

1937年7月，“德美同盟”在新泽西州安多弗建立了诺兰营地（Camp Nordland），库恩在那里告诉12000名听众，该组织代表“美国的原则、百分百美国人”。[\[25\]](#)

7月4日，库恩来到长岛的齐格弗里德营地，站在一个巨大的纳粹十字符号前，向一万名观众发表了讲话。他承诺，德美同盟“公开声称自己是百分百美国人”，将“为美国白人而拯救美国”。[\[26\]](#)“弗里茨·库恩身着制服拍摄的‘百分百美国人’”的照片从东海岸传到西海岸，约有2.5万人在长岛和新泽西州向纳粹标志和美国国旗敬礼，这在全国各地引发了抗议。[\[27\]](#)



1937年夏天，亚拉巴马州参议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有人质疑他与三K党有牵连。确认委员会被敦促调查“布莱克参议员在其职业生涯早期获得三K党支持的事实和影响，作为亚拉巴马州的政治领袖，他对斯科茨伯勒案^[28]所提出的问题保持沉默的原因，他在胡佛执政期间对白人和有色人种失业者获得平等救济的态度，最重要的是他威胁要阻挠反私刑立法的有关传闻”。^[29]

一个月后，布莱克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就在他获得任命后不久，《匹兹堡邮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报道，披露亚拉巴马州三K党的活动记录显示布莱克在1926年成为该党终身成员。当地人“谈论着三K党统治亚拉巴马州和雨果·布莱克在这个州上上下下传诵隐形帝国的荣耀的伟大日子”。当地一名三K党成员对记者说：“我为自己作为一名三K党成员而感到自豪。”尽管有着如此巨大的自豪感，他还是要求

记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然后才解释说，所有人都知道布莱克之所以当选参议员，之后又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都多亏了三K党。[\[30\]](#)

10月，布莱克在电台发表讲话，承认自己曾是三K党成员，但声称已经退出并与该组织断绝联系，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与三K党没有任何关系。全美各地的社论纷纷做出回应，谴责布莱克的“供词”是“一派胡言，前后矛盾”。《巴尔的摩太阳晚报》（*Baltimore Evening Sun*）评论说：“既然布莱克不过是个南方的廉价政客，他加入三K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随着“这是一场非法勾当的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即使是脑子最迟钝的政客也能看出这是不祥之兆，并公开否认与其有任何干系”。布莱克之所以与这些政客不同，只是因为他“迟迟既不承认其三K党成员身份，也不对该团体发起谴责，直至公众舆论逼迫他不得以为之”。弗吉尼亚州的一篇社论也同样尖刻：“一直等到公众的批判声如此之大时，他才最终被迫打破沉默，他对邪恶的三K党理念的批判，并不能抹去令人不快的记录。”[\[31\]](#)

《匹兹堡邮报》对此仍持怀疑态度，报道了布莱克在接受参议员提名时对三K党所说的话，当时他称三K党是“盎格鲁-撒克逊情感的真实代表，这种情感必须而且将控制美国的命运”。这篇社论抗议说，不管他是否否定了他以前的价值观，“任何有这种记录的人都不应该担任美利坚合众国最高法院法官”。[\[32\]](#)

多萝西·汤普森撰写了几篇愤怒的专栏文章，谴责对布莱克的任命；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她想象布莱克参议员盘问布莱克法官与三K党的关系：

布莱克参议员：法官先生，为什么……你加入了三K党？

布莱克法官：我不记得了。

布莱克参议员：三K党对你当选参议员起了什么作用？

布莱克法官：我不记得了……

布莱克参议员：你不是在三K党的一次会议上收到这张会员卡的吗？你不是公开承认三K党对你当选有功吗？你收到这张卡片不是再次表明你支持其成员的准则吗？

布莱克法官：我不记得了……[\[33\]](#)

但汤普森同样对布莱克的党派辩护者感到愤怒。由于他是民主党提名的，进步人士正在为他的政绩辩护。她严厉谴责“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不仅“屈尊为三K党道歉，而且如果这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实际上他们可以为任何个人行为辩解”。这种不道德的合理化意味着“你可以放弃攻击世界上大多数罪恶的基础”，从“美国警察局的三级监狱到德国的集中营，再到苏联的大清洗”。此外，她还警告说：“如果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是人类行为的唯一指南，那么未来的政客们将有理由利用三K党或任何类似组织作为其获得政治权力的工具。‘自由主义者’想要为三K党及其所有类似组织的复兴负责吗，比如在这片土地上复兴黑人军团和纳粹组织？”

她指出，三K党已经卷土重来过一次，在20世纪20年代转变为“利用无知人士的偏见，为上层人士牟取利益的组织”。现在，多亏了布莱克的确认和自由派捍卫它的决定，三K党“能够也愿意对成千上万此前加入它的人说，总统之所以任命布莱克先生为最高法院法官，是因为他是三K党成员，而政府就是三K党的靠山”。

她指出，三K党也是“政治权宜之计”的坚定信仰者。[\[34\]](#)政治领袖树立的榜样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不道德行为的犬儒式的辩解会渗透进政治体系并毒害它。

一个尖刻的笑话开始在华盛顿流传开来，那就是布莱克法官正式进入最高法院时不必买新袍子，他把他那件白色的袍子染成黑色就行了。

与此同时，德美同盟在西海岸频繁举行集会和野餐会。在洛杉矶，《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一本捍卫美国民主的杂志”）披露说，1937年德国国庆日那天，法西斯分子聚集在当时被称为“兴登堡公园”（Hindenburg Park）的地方进行“纳粹野餐”，在20世纪30年代，此地举行了不止一次美国纳粹集会。[\[35\]](#)

向美国读者解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书籍开始出现。其中一本名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的书记录了“当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倒退实验，这个实验经常被描述为‘工业封建主义’”。罗伯特·A. 布雷迪（Robert A. Brady）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对抗自身固有破坏性力量的最后一站”，是“‘企业国家’确保利润源源不断流入的最后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对大众信仰和理想的重新定位，对法西斯领导人巨大的情感忠诚，以及关于‘血与土’神秘主义的完整的伪造体系”。[\[36\]](#)

那年秋天，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份报纸分享了一幅引人注目的照片，照片上是一群人在曼哈顿上东区观看游行，标题写道：“纳粹游行时一些人在欢呼，另一些人捏着鼻子”。图片说明加重了嘲讽的意味：“在纽约约克维尔，一些观众在观看美国纳粹组织德美同盟游行。不到1000人参加了游行，而此前该联盟宣称游行的人数为10000人。请注意，一些旁观者在行纳粹礼，而其他人则发出嘘声或冷笑。也许他们就是不喜欢纳粹？”[\[37\]](#)

Some Cheer, Others Hold Noses As Nazis Parade



Here is a view of some of the spectators who watched the parade of the German-American Bund, Nazi organization in America, in New York's Yorkville. Less than a thousand marched in the parade, after publicity given by the Bund had placed the figure at ten times that number. Note that some of the bystanders are giving the Nazi salute, while others are delivering the Bronx Heil, or raspberry. Maybe they just don't like Nazis? (Central Press)

两个月前，罗斯福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承诺尽一切可能“让我们远离战争”；不久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出现在柏林的一个集会上。他们的演讲通过广播传遍了全世界，因为希特勒肯定了“鼓舞意大利和德国的共同理想和利益”。一周后，罗斯福发表了“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试图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主张，宣布“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齐心协力，维护令和平得到保障的法律和原则”，因为法西斯主义正在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和不稳定局势，仅仅通过孤立和中立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罗斯福的法院改组计划几乎耗尽他所有的政治资本；美国人正在倾听孤立主义者的声音，他们坚称罗斯福是出于政治原因，想要迫使美国卷入一场外国冲突。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在德奥合并之前的几周里，汤普森在一篇题为《谁爱自由？》的文章中写道：“美国民主的本质就是保护个人、团体和少数群体的某些基本权利不受哪怕99%的多数人的侵犯。”

“也许这是一种个人偏见，”她补充道，“但我恰好非常不喜欢‘自由派’法西斯主义者、反动法西斯主义者、劳工法西斯主义者、工业法西斯主义者、犹太法西斯主义者、天主教法西斯主义者和个人法西斯主义者。在论及法西斯主义的特定种类时，我不会偏好任何一种。” [\[38\]](#)

美国当然提供了很多选择。那年春天，《布鲁克林每日鹰报》报道说，“银衫军”的负责人威廉·达德利·佩利新近描绘了一幅与“美国优先公司”创始人詹姆斯·M. 特鲁会面的“田园诗般的画面”，当时他们身处“华盛顿特区，坐在舒适的椅子上，谈论许多对灵魂有益的事情”，比如他们共同决心消灭犹太人。特鲁“眼睛里闪着光”，佩利充满激情地道：“这意味着顺应或是战斗，不同的观感取决于你的种族出身，究竟是非犹太人还是犹太人。”

正如《布鲁克林每日鹰报》所指出的，特鲁“不仅反犹，而且反罗斯福和反新政，亲日、亲纳粹、亲法西斯，甚至亲穆斯林”。这位记者补充说，据“威廉·达德利·佩利们和其他土生土长的美国小希特勒们称”，“真正的美国主义”只能建立在“对种族、肤色和宗教区分的基础上。他们小心翼翼地谈论着通过‘血洗’来促成这些事情的发生。‘爱国主义’由推翻政府的阴谋构成，尽管这种阴谋毫无效果”。 [\[39\]](#)

那年晚些时候，耶鲁大学教授哈尔福德·E. 勒科克（Halford E. Luccock）发表了一篇演讲，讲稿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它为一种日益高涨的情绪提供了表达的机会。“万一法西斯主义来到美国，它不

会被贴上‘德国制造’的标签；它不会用卍字符作为标识；它甚至不会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当然，它将被称作‘美国主义’。”他还说：

“‘美国方式’这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短语将被一心只为牟利的利益集团利用，来掩盖对美国和基督教传统的诸多罪恶，比如无法无天的暴力、催泪瓦斯和猎枪，以及对公民自由的剥夺。”[\[40\]](#)

这并不牵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许多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把“纯美国主义”与偏执、本土主义、排外主义和种族暴力联系在一起。

《纽约时报》指出，那年秋天，有关“美国‘反犹太主义浪潮高涨’”的报道不断增多，这似乎至少部分是由于“这个国家有大量组织在煽动这种情绪，部分是由于受‘欧洲局势’的影响”。这些著名的反犹太组织包括“美国优先公司”“美国雅利安人”“美国非犹太人保护协会”“美国法西斯”。[\[41\]](#)

与此同时，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决定再次大力支持“美国优先”，他在广播中回应了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美国“与欧洲的民主国家联手”的要求。赫斯特坚称，“美国不能被毫无根据的情绪拖入另一场外国战争的灾难之中”。“美国优先应该成为每个美国人的座右铭”的口号现在出现在赫斯特所有报纸的报头上。[\[42\]](#)

那一年，法哲学家杰罗姆·弗兰克（Jerome Frank）出版了《拯救美国优先：如何使我们的民主制度发挥作用》（*Save America First: How to Make Our Democracy Work*）一书，声称孤立主义是确保美国民主和繁荣的唯一防线；为了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必须拯救资本主义的“利润体系”。该书时常见诸报端。

突然之间，“美国优先”重新回到全国对话的最前沿，美国人再次给当地报纸寄去关于“美国优先”的信件，一些社论也加入进来，以“美国优先”的名义敦促坚持孤立主义。宾夕法尼亚州一份报纸的社论以“美国优先”为标题，赞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一位发言人的建议。这位发言人说：“如果美国公民为了英国和法国而发动欧洲战争，他们将是‘蠢蛋’。”

社论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在美国没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容身之地。我们想要的是不掺杂任何外国意识形态的美国主义。”美国人需要“捍卫我们享有的宝贵自由，改善我们自身的命运，而欧洲人有他们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43]但他们并不承认以德美同盟和其他自封的美国法西斯组织为代表的“百分百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威胁正在抬头。

南达科他州的一份报纸也在社论标题中讴歌“美国优先”，文章写道：“如果我们坚持首先为美国服务的计划，我们的国家利益将更加安全，这是不言而喻的……首先为美国服务，远离相较我们自身的安全与福祉应放在次要位置的外国危机，具有现实意义。”^[44]

1938年11月，在德美同盟的一次集会上，弗里茨·库恩告诉听众，罗斯福政府提出的不是一项新政，而是一项“犹太人政策”。据美国各地的报纸报道，“这位同盟领导人宣称，美国的媒体和电台由犹太人控制，他们‘试图摧毁这个国家，就像他们试图摧毁德国一样’”。^[45]

同一天，美国媒体还广泛刊登了一篇报道，称“众议院委员会正在对极右翼亲法西斯组织数量惊人的增加进行调查”。委员会主席确认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包括“美国优先公司”（华盛顿特区）、“美国雅利安人协会”（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美国法西斯黑衫军”（亚特兰大）、“美国法西斯”（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美

国法西斯卡其布衬衫党”（费城）、“国家社会主义党”（纽约）、“美国民族主义者”（华盛顿特区）、“美国白人守卫军”（洛杉矶）、“黑衣军团”（底特律）、“黑衬衫”（华盛顿塔科马市）以及许多其他团体。[\[46\]](#)

1938年9月30日，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签署了《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以期安抚希特勒，被安抚的希特勒立即大举入侵苏台德地区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到六周，名义上为了报复一个名叫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的波兰犹太青年在巴黎刺杀了一名德国官员，在“水晶之夜”（night of broken glass），纳粹及其支持者砸毁了犹太人的企业，夷平了犹太教堂，逮捕了数千人，并杀害了近100名犹太人。

多萝西·汤普森被激怒了，她对格伦斯潘的绝望进行了充满激情的讲述，描述了难民危机，并为他的辩护筹集了资金。几天后，她在《“事情”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Thing”*）一文中再次警告美国。汤普森不止一次被称为“美国的卡珊德拉”[\[47\]](#)；她反驳说，历史总是证明卡珊德拉是对的。

汤普森指出，美国的部分问题在于，某种特定类型的“实业家领袖”表现出“一种自然的下意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体现在他们眼中的法西斯国家的概念上”。后人会将这种做法称为“抬轿子”，这让他们深陷其中，使法西斯主义“在他们看来既熟悉又轻松。在实业家量身定做的宣传中，法西斯被勾勒为一家由高效率的管理人员经营的大型、高效、垄断型的公司”。[\[48\]](#)

她解释说，欧洲法西斯主义在某些方面是不可否认的社团主义，“这就是亨利·福特喜欢纳粹主义的原因，最近他还为此获得了纳粹政府颁发的勋章。在福特先生的心目中，纳粹主义是一家规模庞大无比的福特工厂”，一个“摆脱了‘寄生的’犹太人”的工厂”。

但这种经粉饰的企业法西斯主义形象只是一个神话。事实上，纳粹领导人并不是实业家，而是“冷酷无情、三流、心理变态、阶层降格的失业的分子和士兵”。法西斯主义通过“将宣传和恐怖主义包裹在一起”赢得了大众的支持。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保持群众的“侵略性——通过不断地制造内敌和外敌”，将自身打扮成为人民的“捍卫者，勇于反抗一切特权势力、富裕国家和阶级”。

民主如果想要战胜法西斯主义，它必须清楚地看到自己在与什么做斗争。它将需要为“我们都一致同意的事项创造出热情的团结”。此外，它还需要“将任何基于种族原因让一个美国人憎恨另一个美国人的企图视为叛国行为”。[\[49\]](#)

当然，汤普森并不是美国唯一猛烈抨击法西斯主义的人士。但由于她的卓越、犀利和直言不讳，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她很快就成为美国反法西斯事业的代言人。她的传记作者后来写道：“在公众心目中，她为了维护民主而奋起斗争的程度，不管怎么形容都不为过。”[\[50\]](#)

1939年前几天，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德美同盟纳粹意图的报道。一篇披露“德国官员计划在德美同盟内部建立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分部’”的报道在全美各地被转载；成立这个新的分部后，在德美同盟“纳粹旗帜的领导下”，美国的“一些小规模的破坏势力将会合并”。[\[51\]](#)另一篇指出“德美同盟的活跃分子已达2.5万人”的报道也在同一天被广泛转载。它还声称，“约有10万人愿意在同盟的公开集会上露面”。[\[52\]](#)

1939年全年，多萝西·汤普森在持续猛烈抨击“纳粹主义机器”“纳粹意识形态的奇怪的大杂烩”。[\[53\]](#)他们“无甚可以宣传，却以

宣传家自居”，“没有革命思想，却号称是革命家；没有思想体系，却号称是思想者”。^[54]“如果希特勒主义蔓延开来，那只是因为那些已经拥有可以想象到的一切资源的人们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源。他们继续珍视并加强民族主义，即使在彼此之间也是如此，并把保持世界分崩离析作为一个原则问题。”^[55]

但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以“美国优先”的口号回应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报馆收到各种读者来信，写信的人坚持认为欧洲的“迫害”不是美国的问题：“我们的外交官越早采取‘美国优先’的政策，我们伟大的国家就会越好。对我来说，一个血统纯正的美国人怎么能对外国的迫害感到愤怒，这委实是没有道理的。”^[56]

政客们再次开始主张美国应该“管好自家的事，不介入他国人民的麻烦和战争……一个健全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是最好的防御。”^[57]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拉什·霍尔特（Rush Holt）在广播中发表了题为《让我们优先照顾美国》的讲话：“卷入外国的争论肯定会危害我们的国家”。^[58]

1939年2月20日，即霍尔特参议员的广播播出四天后，德美同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了集会，两万名支持者站在“纳粹党卐字符下，谴责‘世界上的犹太人’、罗斯福政府的一些成员，以及美国与欧洲民主国家的任何结盟”；同时，“身穿制服的纳粹突击队员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里断断续续地行军”。^[59]

一位年轻的犹太裔酒店职员跳上台表示抗议；他被德美同盟的突击队员拳打脚踢，直到在场维持秩序的纽约市警察把他救下。活动被拍录下来；巨大的纳粹标志悬挂在舞台上，穿着纳粹制服的突击队员（只不过他们穿的是白衬衫）在每一个过道上排队等候入场。

一条巨大的横幅上写着“停止犹太人对美国基督教徒的统治”，而报纸报道说，舞台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乔治·华盛顿的画像，两边是美国国旗和纳粹卐字符的混合图案”。^[60]

多萝西·汤普森参加了集会以期吸引关注，在别人发表演讲时（其中一篇嘲讽“富兰克林·罗森菲尔德总统”），她放声大笑，高喊“扯淡！”和“愚蠢的傻瓜！”^[61]当德美同盟的突击队员试图把她带走时，她坚持主张自己的权利，并迅速回到前排。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愉快地分享了汤普森对法西斯领导人演讲的“雄辩反驳”：“扯淡！”^[62] [《奇利科西镜报》（*Chillicothe Gazette*）拒绝使用不雅的“扯淡”一词，代之以拘谨的“荒谬”。]^[63]“多萝西·汤普森参加了盛大的节日战斗（Gala Fight），”一份报纸的头版头条开玩笑地将她的出场比作一场职业拳击赛。^[64]另一份报纸写道：“纳粹分子在德美同盟上的聚会给了作家灵感。”^[65]

汤普森在她的下一篇专栏文章中直接回应了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她解释说：“为了废除美国的民主制度，库格林神父的追随者和弗里茨·库恩的追随者结成了一个公开的联盟。”“在德美同盟打着‘自由美国’的旗号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召开的这次会议”上，二者的结盟已经十分明朗。前一天，库格林神父在他自己的一次会议上分发了宣传材料和集会的门票。“他们享有言论自由的特权，他们打算利用民主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法西斯政权。”

她接着说，他们当然不会说这是法西斯主义。“辛克莱·刘易斯在写作《不会在这里发生》时，就颇有先见之明：当法西斯主义来到美国时，它将打扮成‘真正的美国主义’。”

她指出，刘易斯在小说中预测的情况，“与周一晚上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会议几乎别无二致”，会上有“突击队员”待命，“处理‘逾矩的元素’”。她补充道：“那些逾矩的元素便是你和我。”

汤普森继续无所畏惧地捍卫民主。她向读者讲述了当晚听到的演讲内容，当时一位来自费城的路德会牧师“承认这场运动是法西斯主义”，并告诉听众：“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界限。它介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中间地带。”^[66]民主不是德美同盟版的“百分百美国主义”的选项。

1939年5月13日，载有937名乘客的“圣路易斯”号远洋客轮从德国汉堡启航。几乎所有乘客都是想要逃离大屠杀的犹太人；大多数人持德国护照，少数人没有国籍。他们最初的目的地是古巴哈瓦那，但希望最终能在美国找到安全的避风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申请了美国的入境签证。没有一名乘客知道，就在他们启航的时候，古巴政府已经宣布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落地证件无效。5月27日抵达古巴时，古巴政府只允许28名乘客下船，其中22人是持有美国签证的犹太人，另外6人为持有入境证件的西班牙人和古巴公民。一名乘客自杀未遂，被送往医院。其余乘客仍在苦苦等待，希望获得美国签证。

但是他们没有收到美国的签证，古巴也不接受这些难民，命令他们离开古巴水域。由于没有地方可去，他们只得扬帆前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待到驶近迈阿密，已经能够看到城市的点点灯光时，他们给罗斯福总统发去电报，恳求让他们入境。罗斯福没有回应。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发了一份电报，通知他们必须和入境等候名单上的其他人排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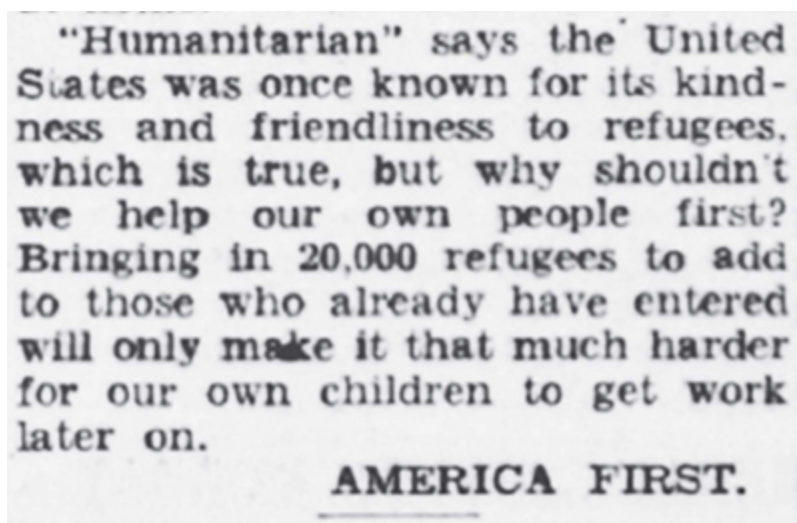
1924年的《约翰-里德法案》仍然有效，德国移民的配额早已用完；罗斯福政府也没有采取必要的特别措施来推翻该法案。“圣路易斯”号被迫返回欧洲，难民最终被分配到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一半人在大屠杀中幸存，另一半人死亡^[67]。

“圣路易斯”号并不是唯一一艘被驱逐出美洲、被迫返回欧洲的犹太难民船，但它成了“最臭名昭著”的一艘，象征着众多陷入困顿、险境中的人们的绝望。这是一个残酷的历史讽刺，在“圣路易斯精神号”成功飞行、缩短了美国和欧洲之间航行时间的12年后，“圣路易斯精神”显然不再是铁板一块，很快将有人公开谈及这一分歧，而发声的不是别人，正是“圣路易斯精神号”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他将广泛传播自己的孤立主义观点。

不过，在林德伯格发言之前，“圣路易斯”还代表了另一种冷酷的精神。1939年8月，《圣路易斯星时报》（*St. Louis Star and Times*）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来信以“美国优先”的名义敦促美国遣返2万名难民儿童。“我同意那位署名‘美国人’的读者来信的观点，”这封信开头写道，“我们连自己的贫困人口都没法照顾，怎么能照顾那2万名难民儿童呢？”

在反驳另一位读者时，这位匿名作者补充道：“‘人道主义’说，美国曾经以对难民的善意和友好而闻名，这是事实，但我们为什么不先帮助我们自己的人民呢？在已有难民的基础上再接纳2万名难民，只会使我们自己的孩子今后更难找到工作。——美国优先。”

[\[68\]](#).



"Humanitarian" says the United States was once known for its kindness and friendliness to refugees, which is true, but why shouldn't we help our own people first? Bringing in 20,000 refugees to add to those who already have entered will only make it that much harder for our own children to get work later on.

AMERICA FIRST.

“美国是一战中英国和法国的替罪羊，”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一位市民写道，“让英国和法国自己站稳脚跟，不要躲在美国后面。美国是第一、最终和永远。”[\[69\]](#)一位来自亚拉巴马州的读者倒也实诚，他争辩道：“‘美国优先’听起来可能自私，但在一个自私的世界里，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口号。”这份辩词在全美各地被转载。[\[70\]](#)

各报的社论也在为自私找借口。“我们也是得为自己着想的。我们得想着‘美国优先’！”《迈阿密新闻》宣布拒绝参与“外交纠缠”。“美国是文明的后卫部队，是文明的大后方。想要最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那些运气不那么好的人得巩固自身在战场前线的力量。再也不会再有海外军队了！英国代表英国优先，法国代表法国优先。只有首先为美国效力，我们才能巩固英国或法国的力量。不要感情用事。美国优先！”[\[71\]](#)

这年年底，国会通过了自1935年以来的第四个中立法案。在人们围绕1939年“中立法”激烈争论时，孤立主义者再次争辩说：“我们美国人负有责任——首先对美国负责。”[\[72\]](#)

观察人士开始指出，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很难与希特勒的德国民族主义区分开来（20年前关于“美国优先”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比较已经指出这一点）。夏威夷一份报纸的社论将其与《我的奋斗》相比较，指出希特勒曾写道：“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不愿成为其他国家的捍卫者，而要成为自己国家的先锋力量。这意味着民族社会主义不是笼统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捍卫者，也不是属于其他国家或种族的某些权利的捍卫者；它只为自己的民族主义和自己的权利服务。”这篇社论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我国的孤立主义者……这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中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73\]](#)

他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孤立主义与亲法西斯组织崛起之间的联系，其中许多组织宣称“美国优先”是它们的口号。辛辛那提一家报纸一

篇题为《一幅丑陋的画卷开始展开》的社论在全美被转载，该文认为，如此众多的极端右翼组织聚集在美国，“着实令人不安”。“同盟、银衫军、白色骑士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美国优先、法人组织，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以无知和偏执为目标的骗局，已不再仅仅是为了从乡下人那里掠夺金钱而设计的空壳游戏。它们已经成为一个树大根深的集团，为共同的目标服务，那就是摧毁民主，用暴政取而代之。在达到目的之前，他们不会把暴政称为法西斯主义。当然，他们都是‘爱国主义者’和‘基督徒’！”[\[74\]](#)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战争爆发三天后，多萝西·汤普森在广播中发出愤怒的声音。“我认为这是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故事之一，一个人可以坐下来提前写下他想要做的事情。”《我的奋斗》就是这么写就的。“然后，一步一步地开始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而世界各国的政治家还在继续对自己说：‘他不是那个意思！这说不通啊！’”[\[75\]](#)

[\[1\]](#) *Brooklyn Daily Eagle*, 10 February 1935.

[\[2\]](#) *Brooklyn Daily Eagle*, 13 February 1935.

[\[3\]](#) *Pittsburgh Press*, 11 March 1935.

[\[4\]](#) *St. Louis Post-Dispatch*, 19 August 1935.

[\[5\]](#) *See Pittsburgh Press*, 30 November 1934.

[\[6\]](#) *Hartford Courant*, Hartford, CT, 11 September 1935.

[\[7\]](#) Forrest Davis, *Huey Long: A Candid Biography*, New York: Dodge Publishing, 1935, p. 286.

[\[8\]](#) *St. Louis Post-Dispatch*, 8 October 1940.

[9] *Cincinnati Enquirer*, 7 October 1935.

[10] 1933年3月13日汤普森给辛克莱·刘易斯的信，引自Peter Kurth, *American Cassandra: The Life of Dorothy Thomps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90, p. 187。

[11] *Cincinnati Enquirer*, 28 May 1936.

[12] *Cincinnati Enquirer*, 28 May 1936.

[13] *Oakland Tribune*, Oakland, CA, 3 May 1936.

[14] *Christian Century*, Vol. 53, 5 February 1936, p. 245.

[15] *Central Home New Jersey Home News*, New Brunswick, NJ, 20February 1936.

[16] *San Bernardino County Sun*, San Bernardino, CA, 26 July 1936.

[17] *Morning Call*, Allentown, PA, 21 July 1936.

[18] Rosenfeld, Roosevelt为荷兰名，意为“玫瑰田”，其相应的德语或犹太语为Rosenfeld，当时很多阴谋论认为罗斯福为犹太人。

[19] *Corpus Christi Caller-Times*, Corpus Christi, TX, 24 July 1936.

[20] W. E. B.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1935), p. 700.

[21] “Jew Shoot”, *Times*, 24 August 1936.

[22] “Jew Shoot”, *Times*, 24 August 1936.

[23] *Wisconsin Jewish Chronicle*, Milwaukee, WI, 28 August 1936.

[24] *Independent Record*, Helena, MT, 21 February 1937.

[25] *Lincoln Journal Star*, Lincoln, NE, 6 September 1937.

[26] *Tampa Tribune*, Tampa, FL, 14 September 1937.

[27] *Arizona Daily Star*, Tucson, AZ, 1 August 1937; *Courier*, Waterloo, IA, 1 September 1937.

[28] 1931年，九名黑人男孩被控在所乘坐的车子途径斯科茨伯勒镇时强奸了同车的两名白人女孩，其中八人被草率地定罪并被处死，但此后最高法院两度推翻了亚拉巴马州的裁决

[29] *New York Times*, 17 August 1937.

[30] *Pittsburgh Post-Gazette*, 18 September 1937.

[31] *St. Louis Post-Dispatch*, 3 October 1937.

[32] *Pittsburgh Post-Gazette*, 4 October 1937.

[33] *Marion Star*, Marion, OH, 4 October 1937.

[34] *Cincinnati Enquirer*, 27 September 1937.

[35] *News of the World*, Hollywood, CA, 18 September 1937.

[36] *Brooklyn Daily Eagle*, 27 June 1937.

[37] *Greenville News*, Greenville, SC, 3 November 1937.

[38] *Pittsburgh Post-Gazette*, 11 January 1938.

[39] *Brooklyn Daily Eagle*, 6 April 1938.

[40] *New York Times*, 12 September 1938.

[41] *New York Times*, 20 November 1938.

[42] Ian Mugridge, *The View from Xanadu: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13.

[43] “Times-Leader”, *Evening News*, Wilkes-Barre, PA, 2 May 1939.

- [44] *Argus Leader*, Sioux Falls, SD, 6 May 1939.
- [45] *Moberly Monitor-Index*, Moberly, MO, 19 November 1938.
- [46] *Moberly Monitor-Index*, Moberly, MO, 19 November 1938.
- [47] Cassandra, 希腊、罗马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阿波罗的祭司, 可预见未来。
- [48] *Star Press*, Muncie, IN, 19 November 1938.
- [49] *Star Press*, Muncie, IN, 19 November 1938.
- [50] Kurth, *American Cassandra*, p. 328.
- [51] *Daily Capital Journal*, Salem, OR, 3 January 1939.
- [52] *Emporia Gazette*, Emporia, KS, 3 January 1939.
- [53] *Abilene Reporter-News*, Abilene, TX, 21 October 1939.
- [54] *Asheville Citizen-Times*, Asheville, NC, 6 September 1939.
- [55] *Oakland Tribune*, Oakland, CA, 15 February 1939.
- [56] *Pittsburgh Press*, 27 January 1939.
- [57] *New York Times*, 13 January 1939.
- [58] *Daily Press*, Newport News, VA, 17 February 1939.
- [59] *Decatur Daily Review*, Decatur, IL, 21 February 1939.
- [60] *Danville Morning News*, Danville, PA, 21 February 1939.
- [61] “Stupid Fools” , *Danville Morning News*, Danville, PA, 21 February 1939; “President Rosenfeld” , *San Bernardino County Sun*, San Bernardino, CA, 21 February 1939.
- [62] *Reading Times*, Reading, PA, 1 March 1939.

[63] *Chillicothe Gazette*, Chillicothe, OH, 21 February 1939.

[64] *Santa Cruz Sentinel*, Santa Cruz, CA, 21 February 1939.

[65] *Greenville News*, Greenville, SC, 21 February 1939.

[66] *Cincinnati Enquirer*, 22 February 1939.

[67] 据统计，288名乘客入境英国，因而躲过大屠杀，余下的619人中绝大多数进入集中营，392人幸存。

[68] *St. Louis Star and Times*, 5 August 1939.

[69] *Democrat and Chronicle*, Rochester, NY, 7 July 1939.

[70] *Indianapolis Star*, 30 March 1939.

[71] *Miami News*, 5 March 1939.

[72] *New York Times*, 6 October 1939.

[73] *Honolulu Star-Bulletin*, 14 October 1939.

[74] *Cincinnati Enquirer*, 2 June 1939.

[75] 引自Kurth, *American Cassandra*, p. 310。

13 美国优先和美国梦 1939~1941年： 美国人！醒醒！

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优先”本土主义、孤立主义的原则与主张宽容和平的“美国梦”之间长期存在的隐性摩擦，最终引发了公开的冲突。出现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在于查尔斯·林德伯格的介入，他是所有美国优先运动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后来该运动演化为美国优先委员会。

德国入侵波兰两周后，林德伯格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全国广播讲话。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在一系列演讲、文章和广播中敦促美国远离冲突。他认为，美国应该保卫并主导西半球，而不是在欧洲作战。

在年幼的儿子被绑架并遭到谋杀后，林德伯格和他的妻子安妮逃离了1935年在美国出现的媒体闹剧。在英国和法国生活期间，他们游历了整个欧洲，曾应纳粹之邀多次前往德国，调查德国的空中力量。希特勒企图利用林德伯格恫吓美国，其意图在许多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林德伯格看来并非如此，德国精心策划的这几次招待活动——历史也会证明，活动还进行了缜密的误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8年，林德伯格从纳粹德国二号权势人物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手中领受星形德意志雄鹰勋章。

孤立主义是一回事，接受纳粹勋章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一决定遭到了美国媒体的广泛谴责，他们对林德伯格的忠诚提出了尖锐的质疑，甚至直接指责他是纳粹支持者。亚拉巴马州的一篇社论以典型的措辞写道，“宽容的解释”会假定林德伯格“为这份荣誉感到非常尴尬”，但“这似乎是对我们国家最好的欧洲朋友的背叛……就好像他

一直在欧洲四处奔走，获取各国军用航空的机密，然后利用这些机密为纳粹出谋划策”。文章还说，如果林德伯格的意图被“歪曲”，“那他应该费心公开地给出一个解释”。^[1]但他并没有。

一年后，当闪电战席卷欧洲各地时，林德伯格开始了一系列电台广播，敦促美国不要拿起武器对抗希特勒，坚称纳粹的空中力量势不可当。

林德伯格只能设想一个加入欧洲冲突的理由：保护“白人”免受“外来入侵”。在第一次广播讲话中，他认为美国应该置身战争之外，因为“白人”没有受到威胁。他坚持说：“欧洲的这些战争并不是我们的文明抵御亚洲入侵者的战争。不存在什么成吉思汗或薛西斯^[2]来攻打我们的西方国家，也不存在是否要团结起来保卫白人不受外来侵略。”由于这场战争只是“白人”之间的一场战斗，美国可以由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决一死战。

一个月后，林德伯格重申了这一逻辑，再次表示美国唯一的义务是保护“白人”。“这是一场关于欧洲力量平衡的战争，一场由德国对力量的渴望以及英国和法国对力量的恐惧引发的战争……我们与欧洲的纽带是种族的纽带，而非政治意识形态的纽带……我们要保护的应是欧洲的种族……如果白种人受到严重威胁，那么我们就应该参与保护白种人的行动，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并肩作战，而不是为了相互毁灭而互相攻击。”至关重要的是“种族”忠诚，而不是政治原则或民主价值观，更不用说对受害者的同情了。

到1939年，希特勒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对犹太人的野蛮迫害得到了普遍承认。即使此时还很少有人意识到集中营里发生的暴行的严重程度，但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些暴行的存在；自1933年以来，纳粹隆重地启用了一个又一个集中营。关于大规模逮捕和驱逐、私刑和严刑拷

打、大规模集体屠杀的报道，就像一年前的“水晶之夜”一样，在美国媒体上随处可见。

1938年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那年秋天，2000人聚集在辛辛那提，“抗议希特勒政府迫害犹太人”，集会上“一位牧师出人意料地要求美国断绝与纳粹德国的所有贸易关系，引来一片欢呼声”。^[3]在圣诞节期间对1938年的重大事件进行回顾时，《布鲁克林每日鹰报》特别指出了“犹太人遭到的迫害”。“希特勒对待德国犹太人的行为惹人厌憎，令世人震惊。”^[4]《匹兹堡日报》认为：“希特勒在德国野蛮迫害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这种行径的幕后有着一批反动金融家和实业家，这些人在这个国家也发挥着作用。”^[5]12月，艾奥瓦州达文波特市的《每日时报》（*Daily Times*）评论说：“希特勒政府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会唤醒人类的愤怒……一段时间以来，一个事实已经非常明显：决定犹太人被迫命运的并不是‘血统纯正论’——希特勒的雅利安神话，而是一项攫取犹太人财富、旨在支撑摇摇欲坠的国民经济的计划。”^[6]

几个月间，除了查尔斯·林德伯格这个显著的例外，似乎每个美国人都在谈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林德伯格没有对希特勒的暴力行为发表任何谴责之词，他坚称双方都有侵略行为，双方都只是在一心维护自己的权力。事实上，他说了很多话，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意思：只要是某些“白人”在欧洲把持着不可辩驳的统治权，他并不太在意统治者是哪类“白人”。

1939年11月，林德伯格在《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后来被广泛转载，他在文中更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尽管仍然在小心翼翼地用委婉语遮掩。由于欧洲战争将“削弱白人的力量，摧毁白人的财富”，西方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外来种族”，“停止争吵，重建我们的白人堡垒”。林德伯格警告说，要防

止“我们的传统”被“异族——蒙古人、波斯人和摩尔人的汪洋大海吞没”，呼吁只需抵御“成吉思汗或劣等血统的渗透”。他坚持认为，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应该站在一起，他的意思很明显：如果这意味着屈从于德国的侵略，那就这样吧。

林德伯格的论点明显是从优生学出发的，他主张白人必须“团结一致保护我们最宝贵的财产，我们对欧洲血统的继承”，“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外国军队的攻击，不受外来种族血统的稀释”。林德伯格在日记中更明确地指出了他担心哪些人在进行这种稀释。他写道，“我们必须将犹太人的影响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以防止“犹太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过高”带来的问题。

在美国，随着一部分人继续按比例向另一部分人施舍人道，“一滴血法则”的逻辑再次抬起它丑陋的头。

尽管林德伯格还没有以他的孤立主义论点的名义宣扬“美国优先”，但其他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一位宾夕法尼亚州的市民宣称：“本人相信我们美好古老的美国，甚至是令人憎恨的德国的发明和馈赠，不仅能与英国的馈赠相媲美，而且绰绰有余。我想这让我成了贵报的‘第五纵队’（Fifth Columnist）的队员，因为不幸的是，那些不亲英的人，那些相信美国是第一、最终也是永远的人，被贴上了纳粹分子或者类似的标签。总有一天，真正的‘第五纵队’队员会被干掉，美国人民可能会知道真相……美国优先。”^[7]

俄亥俄州一位读者投书：“为什么不为我们高中的整顿而努力，送我们的下一代免费上职业大学，而是非得把他们送到欧洲去送死呢？——美国优先。”^[8]

圣路易斯的一位读者建议：“在我们告诉世界其他国家如何生存之前，让我们先把我们自家日益增长的国债、不断增加的失业人口和成千上万的佃农（他们比奴隶也好不到哪里去）给清理干净，咱们咬紧牙关管好自个儿吧——美国优先。” [\[9\]](#)

欧洲战争爆发三周后，多萝西·汤普森在回应林德伯格的第一次广播讲话时说，“林德伯格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他的朋友们都是知道的”，然后又说道，“‘怜悯、情感和个人同情’在他的生活中无足轻重。另外，他对机械充满激情，倾向于纯粹从技术和机械的角度来判断世界和社会。他对作为民主思想核心和要点的人文学科完全不感兴趣，对政治哲学无动于衷”。[\[10\]](#)其用意很明显：林德伯格肯定会发现自己与当时被称为“纳粹机器”的东西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

沃尔特·李普曼也在他的专栏中公开反对林德伯格的广播讲话，谴责他关于美国应该控制西半球的说法“十分可悲”，并警告说：“要反对这种帝国主义思想在这个国家的传播及其在西半球所有邻国间的影响。” [\[11\]](#)

甚至埃莉诺·罗斯福也在她自己被全国转载的专栏中加入了这场争论。宾夕法尼亚州一份报纸在标题中引述了她的专栏内容：“罗斯福夫人称他有纳粹倾向。”在文中，罗斯福夫人提到了李普曼和汤普森在全美范围内引起的巨大“兴趣”，他们“从林德伯格上校的演讲中看到了一种对纳粹理念的同情，我认为这种同情是存在的，但我又不敢相信它真的存在”。[\[12\]](#)

然而，许多美国人发现林德伯格的论点越来越有说服力，正如汤普森在前一年指出的那样，那些亲商人士往往倾向于把纳粹主义简单地看作一个高效率的公司。（20年后，阿道夫·艾希曼在受审时恬不知耻地诡辩说，纳粹党也喜欢这样看待自己。他自鸣得意地认为自己

只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职员，这促使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这一理念）

林德伯格的第一次广播播出后，几位与多萝西·汤普森有联系的华尔街人士公开支持美国的中立立场，认为法西斯主义从本质上说无非一个大企业。她大发脾气，有人听见她大喊：“该死，他们发现希特勒是一个优秀的共和党人！”[\[13\]](#)

汤普森接着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谴责林德伯格和他所代表的政策——她发表的专栏文章至少和他的现场演讲与广播讲话一样多。就像林德伯格成为美国孤立主义的代言人一样，汤普森迅速成为反对法西斯主义最著名的代言人之一，这场战斗也随之打响。

1940年1月，汤普森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抨击库格林神父的“基督教阵线”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团体。10天后，作为要求她为该指控提供证据的回应，她就事论事地指出，是弗里茨·库恩将“基督教阵线”称为与“德美同盟”合作的“伙伴”组织，此外还有“基督教鼓动者”、“基督教十字军”、“社会正义协会”、“美国银衫军”和“白茶花骑士”。她指出，许多其他法西斯主义的“同路人”都“打着‘基督徒’、‘爱国主义者’或‘美国’的旗号”。[\[14\]](#)

欧洲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白人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越来越明显。1940年7月，弗吉尼亚州丹维尔市的一座南方邦联纪念碑上悬挂了卍字符，人们认识到卍字符是恐吓和恐怖的象征；他们都站在白人至上的一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15\]](#)



汤普森在那年夏天写道：“煽动者领导的大众政府不是美国的民主。”像“美国优先”这样的孤立主义运动是否普遍并不重要；普遍并不能证明其正当性。她坚持认为：“一种说法认为，无论多数人多么无知，他们都与生俱来拥有某种神圣的智慧，这种理念并不是美国的民主。”她有意无意地呼应了沃尔特·李普曼25年前对他眼中的美国梦的批评。[\[16\]](#)

她警告说：“世界各地的权力都已与责任脱钩。我们一代人靠不劳而获的财富过活，浪费和滥用我们祖先用鲜血为我们赢得的自由；抵押我们孩子的遗产来支付今天的账单。我们出生在自由之中，却忘记了自由的严峻事实，即它涉及最高程度的个人和集体责任。没有责任的自由意味着无政府状态。”

“我们不需要放弃民主，”她最后说，“我们需要回归民主——回归民主的道德和智力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再次进行建设。”[\[17\]](#)

为了找到一种方法来区分民主基础、有序民主的理念以及个人和集体对自由的责任，美国找到了现成的公理：民主平等和正义的“美国梦”。

例如，1940年6月，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一份报纸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社论，在全国范围内被广为转载。社论一开始就宣称，林德伯格对反犹太主义的默认从根本上与美国梦相悖，接着也指控了美国种族主义：“林德伯格上校仍然担心我们插手欧洲事务。他没有提到希特勒的欧洲是如何干涉我们的。一个邪恶而致命的例子是，纳粹正在我们反犹太主义的背景下进行宣传。”

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坦率解释的那样，那些将小谎言斥为荒谬的人，恰恰会因为一个大谎言的无耻而接受它（“他们不相信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事。即使在觉悟之后，他们仍然会陷入长期的怀疑和动摇中，并且仍然相信在它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些真相”）。所以，这篇社论解释说，希特勒给全世界上了“一堂更加邪恶的课”，也就是说，“一个大的罪行将使那些本会与较小的罪恶做斗争的人们陷入麻木和迷惑之中”。[\[18\]](#)

作者指责说，欧洲暴行的规模之大让美国人变得麻木不仁。“一想到欧洲半数犹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心就紧绷起来。如果我们敢于直面巨大的恐怖，我们会发现纳粹反犹太主义才是极权主义力量的真正象征。”[\[19\]](#)混乱可能会反常地被用来使曾经看起来不可容忍的事情正常化，因为普通公民很难确切知道他们的反抗应该指向哪里。

尽管现在回想起来，有些人为了林德伯格和其他美国优先孤立主义者辩护，理由是他们无法预测纳粹暴行的范围和深度，但单是这篇社论就表明，许多美国人相当清楚，至少从广义上来说在希特勒统治下发生的迫害。1940年夏天，路易斯维尔当地的一位编辑知道，“欧洲半数犹太人”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他显然认为所有的读者也都知道这一点。要弄清这一基本事实，既不需要非凡的洞察力，也不需要做事后诸葛亮。

但是，这篇社论并没有完结。它接着说：“美国梦的每一个敌人都是反犹分子，这并非偶然。这是我们的致命弱点。但凡有谁憎恨美国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只要能让我们相信这是一种邪恶的念头，美国就完了。” [\[20\]](#)

美国梦是民主正义、法律平等的梦。社论指出，美国向世界做出了承诺，并将其镌刻在自由女神像上。这一承诺未能实现。“我们已经失败了。我们一败涂地；但还没有否认这一梦想。即使在黑人身上我们遭遇最卑劣的失败，我们也仍然充满希望，我们仍然在缓慢地进步。失败是可以挽回的，只要它不是借口。只有当一个人夸耀他的罪恶并把它当作一种美德来炫耀时，人们才会感到绝望。反犹主义是种族主义的敲门砖。种族主义一旦被接受，美国就不可能存在。” [\[21\]](#)

一旦夸耀自己的罪恶并将其作为美德来炫耀的人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除了绝望，这个国家还应该做些什么呢？不幸的是，这位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

尽管路易斯维尔媒体的这篇社论无疑是最有先见之明、最犀利的呼吁之一，主张用美国梦来纠正美国优先的偏见，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呼吁。圣路易斯的一篇社论使用了类似的表述（兑现圣路易斯精

神），指出美国梦关乎如何创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具体形象，它考虑到了社会不公正和“受压迫的少数群体”的斗争，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享”的政府，这个政府不会让不同群体因仇恨而分裂。美利坚合众国无法“通过歇斯底里地镇压少数族群”或“只能加深群体对立和阶级意识的反应”生存下来。相反，美国需要“把美国梦的核心即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转化为现实。如果不希望民有、民治的政府从地球上消失，它就必须继续作为民享政府发挥作用”。[\[22\]](#)

一篇名为《美国的不宽容》（*Intolerance in America*）的文章被广泛转载，文中分享了著名的移民作家路易斯·阿达米克（Louis Adamic）的警告：不宽容将“把美国梦变成一场噩梦”。阿达米克写道：“反犹太主义日益抬头。人们对外国人和归化的移民也新添了几分蔑视。蔑视的对象甚至包括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这类事情并不能保护民主和美国主义。”相反，美国人以自满和漠视的态度对待他们来之不易的民主。“我们对公民自由和珍贵理想的忽视和滥用，为这些理想遭到破坏提供了一个入口。”[\[23\]](#)

威斯康星州的一篇社论预测，极权主义政权将在一个分裂的美国获得最大的满足感。在即将到来、充满唇枪舌剑的美国大选中，外国势力会获得恶意的快感。“在目前的竞争中，有这样一粒分裂的种子，它是一种邪恶的东西。竞选往往会抹杀美国人民最基本的统一性，哪怕只是暂时如此。”

社论坚称，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多年来，在我们对自由制度的奉献中，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凌驾于总统和政府之上。”

美国总统来来去去，但美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立志建立更好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将更接近于实现人们自由追寻经济和政治上的个人命运的美国梦。我们的统一比我们的分裂更有吸引力。”[\[24\]](#)

《哈泼斯》（*Harper'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告诫读者：“现在我们急需某种团队合作。”

希特勒和他的代言人轻蔑地说，我们不能得到民主，也不能保留民主；强者和能人不会为弱者和无能者工作，也无法合作。强者和能人将决定现在和未来。如果他们现在或以后不充分发挥其精力和技能，我们的美国梦就会破灭。有了陆军和海军，我们无疑可以阻止希特勒，但不能阻止希特勒主义，因为从长远来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揭露他和他的追随者的谎言，那就是让我们的民主制度履行它为所有人带来自由和富裕的承诺。[\[25\]](#)

从长远来看，如何保护民主不受法西斯主义的侵害，这是个问题。但含义仍未确定的美国梦不仅会被用来支持自由民主，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似乎是它当时最常见的含义。它的内涵也可能催生代表孤立主义的例外主义论点，一封写给《哈特福德新闻报》（*Hartford Courant*）的读者来信即是证明：“看来，干涉主义因素正在失去其通过炸弹宣传和平与民主的热情，并逐渐认识到，在美国，一个完美的民主的美国梦必将最终实现。”[\[26\]](#)

这样的推理导致了对孤立主义回到“梦”作为幻觉的意义上的反驳。《明尼阿波利斯星报》（*Minneapolis Star*）反驳道：“如果‘伟大的美国梦’意味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然，那么它就是一个白日梦。”美国不可能与一个“通过改善交通和通信手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的世界保持独特的分离。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学会通过合作共处和分享生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部分失败，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自己的无能和所有民族未能理解20世纪社会的性质”。[\[27\]](#)

宾夕法尼亚州一份报纸的社论认同美国梦曾经可能是孤立主义的，但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国家需要成长起来。它认为，“孤立是美国

梦的一部分”，因为自1607年以来来到美国的绝大多数移民“是为了逃离某些东西”，由此再次将孤立主义与例外论联系在一起。但是，美国再也不能“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上实现一种独立和独特的命运……如果它曾实现的话”。

对一个国家和一个人来说，退回到“童年梦想”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本想退出的世界就在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发挥我们的作用，如同自由的男人和女人一样。”
[\[28\]](#)

多萝西·汤普森在她的反法西斯战斗中也不止一次使用了“美国梦”。1940年夏天，她提出以“美国纲领”作为所有美国人的信条。在这篇专栏中，她汇编了从世界各地的读者来信中摘录的短语。当中的语言呼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承诺，即以民主自由的形式把美国梦带到欧洲，承诺所有美国人都将砥砺前行，“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美国梦可以由我们实现，并且可以通过我们造福人类”。文章还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遵循同样的逻辑，正是这样的逻辑，推动了美国后来在冷战期间的政策。[\[29\]](#)

几个月后，汤普森再次谈及纳粹社团主义已在美国企业寡头政治中危险地反映出来的观点，她认为美国梦本质上是反对这类体系的。“垄断大企业所培养的概念和价值观从逻辑上导致了纳粹式的世界秩序。类似于健康的有机体吐出毒素，美国梦也会自发地排斥它。”
[\[30\]](#)汤普森不仅认为美国梦与经济抱负无关，而且坚持认为，它从根本上对企业资本主义过敏。

1940年4月，希特勒发动闪电战，德军攻入丹麦和挪威。几周内纳粹就征服了荷兰和比利时，入侵法国，并在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围困

了英国远征军及其法国盟友。战争不过进行了六个月，西欧几近沦陷。唯一没倒下的是英国。

1940年5月，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撰文对英国撤离敦刻尔克做出了简洁而有力的回应，文章题目为《美国优先》。

李普曼警告说，此时盟军和英国舰队在法国北部和佛兰德斯都已告急，除非能阻止希特勒的步伐，否则他将“征服”大西洋和欧洲。

“任何人都不要自欺欺人或者骗别人说，这只是过去两年漫长辩论中的又一个更令人兴奋的篇章，辩论的焦点是美国是否应该给予盟国一点、很多的援助或压根不提供帮助……我们当下必须决定的问题将由其他国家——日本和意大利的行动——强加给我们。”

李普曼主张，现在是美国政客抛开党派分歧、团结起来决定什么对国家最有利的時候了。“如果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不假思索地指望我们的领导人把国家置于他们的党派之上，把他们的良知置于他们的野心和偏见之上，那么，我们可以为之拨款的一切防御措施都不能保卫美国。” [\[31\]](#)

就在共和党领导人被敦促在1940年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中加入“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纲领时，俄勒冈州的一份报纸给读者上了一堂有益的历史小课，列举了“20年前的今天——1920年6月9日（星期二）”发生的五个令人难忘的事件。第一个事件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说：“让我们先结束我们自己的灾难，然后再结束欧洲的灾难。”第三个是类似的提醒：“‘美国优先’是共和党大会的主题。洛奇参议员在第一次讲话中说“击败伍德罗·威尔逊王朝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这超越了所有其他议题以及恢复战争肆虐时被践踏的基本理想。”

1920年，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德国的新国会即将成立”。^[32]1920年，德国国会选举产生魏玛共和国第一届国会，当时执政的联合政权魏玛联盟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组建了一个软弱的少数党政府，这为包括纳粹党在内的极右翼势力在1924年的选举中崛起铺平了道路。换句话说，列出1920年开始的一系列值得纪念的事件，这个想法看似异想天开，但实际上非常犀利，它从历史上将“美国优先”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联系在一起，并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关联。

与此同时，林德伯格还在发表演讲，引发了人们的各种反应。比如堪萨斯《伊奥拉公报》（*Iola Register*）登载了一封题为《林德伯格万岁》（*Heil Lindbergh*）的信。信的作者指出，希特勒为给林德伯格颁发纳粹勋章所花掉的几美分“正在获得巨大的红利”。在林德伯格最近的一次广播中，他“实际上是在邀请希特勒来接管我们”。信的作者建议，美国人最好现在开始练习行纳粹礼，并“学会正确地说‘林德伯格万岁’，没准有一天，我们就会身处林德伯格和德美同盟可能正在筹划建造的集中营了”。^[33]

直到1940年夏天，美国优先委员会才真正成立，不过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该委员会是“美国优先”口号的起源。^[34]这个委员会的前身是由耶鲁大学的学生发起的反战运动，它把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拒服兵役者、自由主义者、本土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聚集在一起。

1940年9月，非正式的学生运动在芝加哥得到更强大的支持，迅速成为美国主要的不干涉主义组织，坚决反对美国卷入欧洲冲突。鼎盛时期它有超过80万名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成员，包括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E. E. 卡明斯（E. E. Cummings）、莉莲·吉什（Lillian Gish）和亨利·福特，以及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和杰拉尔德·福特

（Gerald Ford）等年轻学生。孤立主义网罗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盟友，使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等左翼社会主义者与罗伯特·R. 麦考密克（Robert R. McCormick）上校等反动实业家团结起来。麦考密克拥有《芝加哥论坛报》，是美国优先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未来的“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队长萨金特·施赖弗（Sargent Shriver）和社交名媛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思（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与库格林神父相谈甚欢；民主党参议员伯顿·K. 惠勒（Burton K. Wheeler）和共和党参议员杰拉尔德·P. 奈（Gerald P. Nye）也加入了讨论。

董事会中实业家的数量让许多美国人不禁要问，到底是谁的利益得到了满足；关于位高权重的美国人资助希特勒的谣言开始流传（而且从未消失）。除了亨利·福特之外，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西尔斯百货、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的总裁，财务主管是芝加哥中央共和国银行（Central Republic Bank of Chicago）的副行长，委员会成员还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一些人认为该协会也属于法西斯组织）的前成员。创建该组织的学生的反战情绪很快因其他动机和政策消退，不过林德伯格并没有立即加入委员会。

美国优先委员会以反帝国主义者自居，许多人把大英帝国等同于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其论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主张美国优先的人提出的论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那年夏天，林德伯格再次提起了老掉牙的“外交纠葛”的说法。“无论如何我们都应摆脱外国的纠葛和偏袒，华盛顿在把我们国家命运的指南传给子孙后代的时候，曾警告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对德国侵略和野蛮行径的指控，只会使人感到伪善，回想起凡尔赛宫。” [\[35\]](#)

1940年12月，多萝西·汤普森将矛头直指美国优先委员会。她说：“我们开始看到协调一致的行动，得到了大量资金的支持，获得

了部分媒体和国会的支持，还争取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活动的协助。”在她看来，这个组织的目标只有一个：“为希特勒的和平而合作”。她警告说，他们会声称封锁对英国的物资供应和援助只是为了“保护美国优先”，而这会为希特勒送去胜利，让他得以高姿态地呼吁停战。“这场运动正在进行，它打着‘百分百美国主义’的旗号，并且遵循自上而下的路线，纳粹宣传也曾遵循这一路径。” [\[36\]](#)

她说，美国优先运动得到了德美同盟的“热情”支持。汤普森写道，“美国的纳粹化”也被“具有个人野心的”极端主义者追求，其中包括《即将到来的美国法西斯主义》（*The Coming American Fascism*）的作者劳伦斯·丹尼斯（Lawrence Dennis），他的目标是“建立在群众诱惑基础上的专制性权力”。“首先要去除的是‘能言善辩的10%’，诽谤、恐吓和经济压力可以让他们噤声。新的精英智囊团介入，将新秩序合理化为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各阶级的安全保障。因此，如果它达到了目的，杰斐逊和林肯的梦想也将终结。” [\[37\]](#)

汤普森指出，美国冷不丁地要面对一个“暴政再度焕发活力、民主已经垂垂老矣”的世界。 [\[38\]](#)

1941年2月，她描述了她所看到的“本土法西斯主义”的蓝图。“美国法西斯主义一边鼓吹与欧洲隔绝，一边却在设计一个模仿希特勒大陆帝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计划。它的轮廓在查尔斯·A. 林德伯格上校的讲话中体现得最为清晰。内容包括把欧洲交给希特勒，把亚洲交给日本和俄国，以换取新的门罗主义……而我们将成为西半球的主人。” [\[39\]](#)

她说，这个想法让她想起了休伊·朗对她说过的话：“美国法西斯主义永远不会以法西斯主义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百分百美国运动的形式出现；它不会复制德国的执政方式，只需选出合适的总统和内阁即可。”此外，朗还说：“完全没有必要压制媒体。几家实力强大

的报业连锁公司和2~3家在某些领域具有实际垄断地位的报纸，就可以抹黑、诽谤和胁迫对手，使其保持沉默并无情地消灭竞争对手。”当美国法西斯主义掌权时，“它将发动对邻国的战争，对自由主义者的战争，对少数族裔的战争，军国主义……”[\[40\]](#)。

只需要一个强大的新闻机构来提供支持，便万事俱备。

同月，汤普森还对亨利·卢斯（Henry Luce）颇具影响力的专栏《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做出回应。在该专栏中，她表示20世纪要么是美国世纪，要么是纳粹世纪。她撰文予以反驳，在结尾处严厉地斥责道：“自上次战争以来，犹疑的怯懦一直在诅咒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在世上尽自己的一分力量，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现在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将在历史上退居二线。要么是美国世纪，要么是美国梦沉沦的开始。”[\[41\]](#)。

在此几周前，罗斯福总统发表了国情咨文，在演讲中表示期待“建立在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这些自由是民主原则的精华：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不是一个遥远的千年愿景，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实现的一种世界的坚实基础，这种世界和独裁者想用炸弹爆炸来制造的所谓新秩序的暴政，是截然相反的。”

在短短几个月内，罗斯福的四项自由就与美国梦融为一体。1941年夏天，在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举行了一系列讨论，讨论的“文本”是“四项自由”，前提则是“民主现在正面临1776年以来最大的挑战”。“艾奥瓦大学的计划是通过分析‘美国梦’及民主在美国的含义来回击极权主义对民主哲学的攻击。”[\[42\]](#)。一个名为“民主委员会”的组织打出广告，把美国国会大厦打造成美国“民主的象征，自由动力背后的力量，我们的美国良知，我们的美国梦，我们美国人对四项自由的奉献”。[\[43\]](#)。

有人批评说，“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四项自由是不切实际的”，多篇社论对此做出回应，敦促美国认识到一个理想的世界是“一个需要我们付出心血、辛勤劳作的世界”，“对这种需求的回应使美国人对工作的既有梦想活跃起来……我们将珍惜世界的需求；这是我们填饱自己肚子的唯一办法”。[\[44\]](#)

美国优先委员会宣布，罗斯福正试图以残暴的武力强加四项自由。共和党参议员亨里克·希普斯特德（Henrik Shipstead）在美国优先委员会赞助的一次广播讲话中追问：“推翻独裁者，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给外国人强加新的独裁者，独裁者再把四项自由强加给那些从未听说过四项自由的群众，这么做明智吗？”[\[45\]](#)

1941年4月，查尔斯·林德伯格正式加入美国优先委员会。他周游全国，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发表演讲，通常他的身后都会挂着乔治·华盛顿的标志性画像。那段时间，美国优先委员会的实力和声望迅速上升。

汤普森对林德伯格加入美国优先委员会立即做出了直率的回应。在一篇题为《林德伯格和纳粹计划》（*Lindbergh and the Nazi Program*）的专栏文章里，她毫不留情地宣布：“我认为林德伯格上校是亲纳粹的。我认为他把美国想象成希特勒‘新秩序’的一部分，而他自己则在美国的新秩序中扮演主导角色……在芝加哥的演讲中，他主张与欧洲的主导力量签订一项‘条约’，作为确保和平的唯一途径。这次演讲得到叛国的德美同盟的全力支持。”[\[46\]](#)

那年春天，《自由》（*Liberty*）杂志报道说，最近在纳粹德国，一首夜总会的歌曲流行起来。

美国元首林德伯格万岁

他将摧毁财阀式的民主，

犹太人和共济会

在美国。[\[47\]](#)

也许用德语唱起来更合乎格律，或者它可能是捏造的。但无论如何，这个故事在美国流传，表明人们对林德伯格赤裸裸地支持纳粹的做法普遍感到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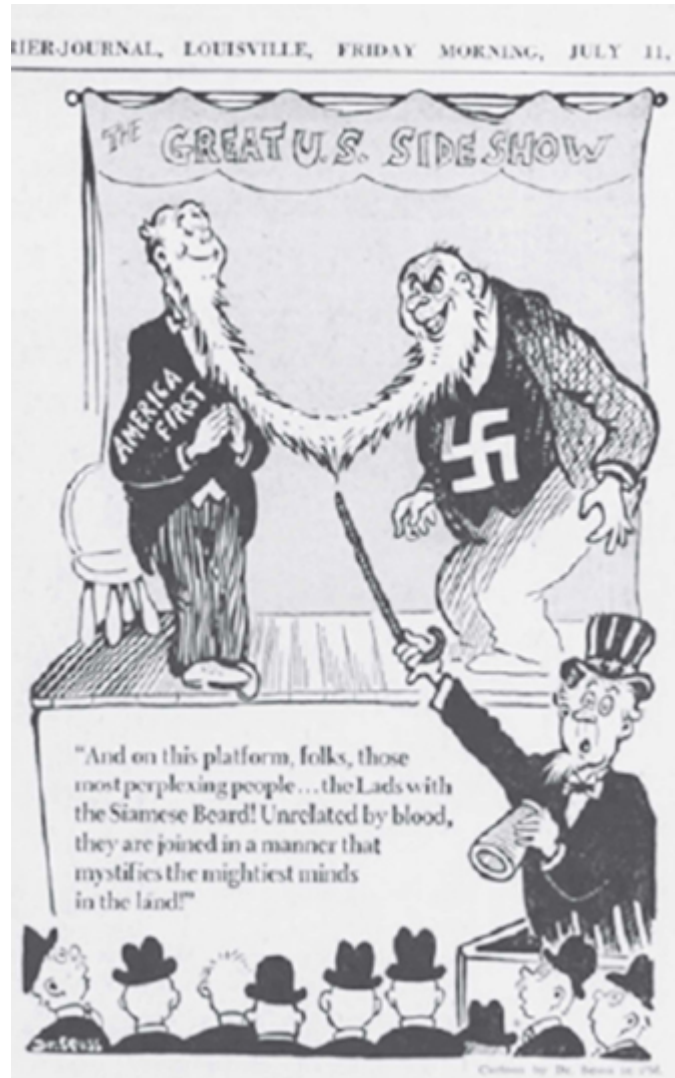
一周后，汤普森抨击林德伯格劝说美国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一场“可笑的十字军运动”（grotesque crusade），指控他通敌卖国，将他与挪威领导人和纳粹串通一气相提并论。她说：“这不是希特勒主义，这是卖国贼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最后一种、也是最荒诞的形式。” [\[48\]](#)

汤普森补充说，在这种时候，“‘美国优先’染上了非常不吉利的意义——不吉利，但不知何故又有些可笑”。[\[49\]](#)许多美国人同意这一观点。在写给《匹兹堡日报》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看到林迪（即林德伯格）发表对纳粹的看法，这一幕实在可悲。他发表了耸人听闻的演讲，精心策划，目的是进一步恐吓那些早已被吓破了胆却还在叫嚣美国优先的人。” [\[50\]](#)

汤普森反复写道，在实践中，美国优先往好里说意味着绥靖；而往坏里说，它无非向法西斯主义举手投降。“告诉我，美国和平主义者、美国优先委员会的成员、美国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劳工领袖和反帝国主义者今天在说些什么，我可以为你们写下明天希特勒的演讲。他知道民主最容易被民主本身的口号摧毁。毁灭民主是他唯一的目的，也是他宣传的唯一目标。” [\[51\]](#)

尽管汤普森无疑是林德伯格最公开的批评者之一，但她绝不是唯一一位知名的批评者。1941年，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在美国犹太全国工人联盟（Jewish National Workers Alliance）发表演讲，称林德伯格是“纳粹的美国头号同路人”。他开诚布公地说道：“他（林德伯格）希望德国获胜……他似乎更喜欢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民主；他对自由漠不关心，就算他没有为纳粹意识形态犯下的暴行喝彩，他也会宽恕这些暴行。”伊克斯拒绝称他们为美国优先委员会，而是代之以“美国下一个委员会”，并补充说他们都是“纳粹同路人”和希特勒的“傀儡”。[\[52\]](#)

那年夏天，一系列反孤立主义的漫画在全美各地被转载，其中包括由西奥多·苏斯·盖泽尔（Theodore Seuss Geisel）创作的几幅谴责美国优先委员会是纳粹同盟者的漫画，漫画的作者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童书作家“苏斯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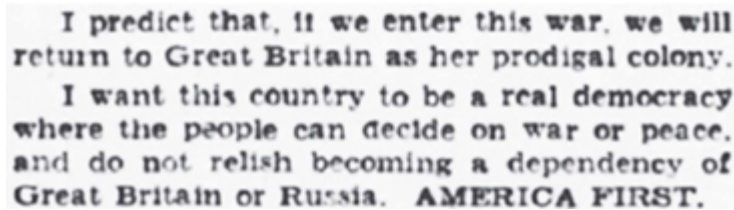


尽管《芝加哥论坛报》在其社论中支持美国优先运动，但其他报纸谴责美国优先委员会是“美国的法西斯前线”，并列出了与运动有关的其他人士，其中包括“德美同盟”、三K党、“基督教前线”、“基督教动员者”和“美国命运党”的数位领导人以及劳伦斯·丹尼斯（法西斯“理论家”）。[53] 艾奥瓦州的一份报纸写道，“所有这些组织都被认为是亲纳粹的绥靖机构，它们团结在林德伯格的领导下”，以和平为借口，“在美国做希特勒要做的工作”。[54]

然而，他们仍然得到了美国各地的支持，他们以“美国优先”为标题或落款寄去信件。“美国必须优先！我们绝对不能按希特勒开出

的条件与他作战……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拯救英国和帝国主义还是拯救我们自己？”[\[55\]](#)。

“醒醒，美国人，为你们的权利而战！”一位落款为“美国人”的人写信称。“把我们的钱留在国内……了解一下英国的历史，你会发现它攫取土地的方法和希特勒现在的办法是一样的。我支持美国优先，而且只支持美国。”[\[56\]](#)另一个署名为“美国优先”的作者警告说，站在英国一边参战意味着美国将在再次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情况下结束战争。[\[57\]](#)



I predict that, if we enter this war, we will return to Great Britain as her prodigal colony.
I want this country to be a real democracy where the people can decide on war or peace, and do not relish becoming a dependency of Great Britain or Russia. **AMERICA FIRST.**

1941年5月，辛克莱·刘易斯加入美国优先委员会的消息不胫而走；那时他和多萝西·汤普森已经悄悄地分道扬镳。[\[58\]](#)据刘易斯的传记记载，他“当时强烈反对美国介入欧洲战争，对富兰克林·D. 罗斯福相当不以为然，并且赞同鼓吹美国优先的那批人”。这背后个人动机可能居多。当他们的婚姻破裂时，据说刘易斯曾发誓：“如果多萝西站出来支持战争，我将夺取麦迪逊广场花园作为讲台，站出来反对战争。”[\[59\]](#)

那年春天，沃尔特·李普曼再次公开反对“美国优先”，但语气远比七年前调侃赫斯特时要严肃得多。李普曼有力地指出，孤立主义作为一种绥靖政策毫无意义，因为孤立会令美国陷入孤苦无助的境地，结果只能是非战即降。“当然我们不能说，在全世界最后一道防线上孤军奋战、对抗敌人，这是一种可取的局面，但绝对是一种危险而可怕的局面，只要还有能力，理智的人就会竭尽全力避免这种局面。”[\[60\]](#)

不出所料，美国优先委员会也宣布了美国梦，再次将孤立主义与例外论结合起来。“美国人！醒醒吧！”美国优先委员会在一则广告中敦促大家写信给总统，要求美国不要参战。“1776年，300万美国人敢于签署《独立宣言》，没有任何外国海军的支持，也不惧怕任何外国经济。‘美国梦’就这样诞生了。”美国人必须坚持“在所谓的‘保家卫国’进程中，你们不会出于恐惧而支持在‘许多不同的地形’下进行杀戮和屠杀”。[\[61\]](#)

这个论点没有被普遍接受。“你怎么了，美国优先？”“为自由而战公司”（Fight For Freedom, Inc.）发布了一则相反的广告，呼吁“立即采取毫不留情的行动粉碎希特勒主义”。“你说你想先考虑美国，但你不能想得更清楚一点吗？”[\[62\]](#)

随着亲法西斯的言论越来越明显地与本应奉行和平主义的美国优先委员会牵扯在一起，林德伯格因为多次拒绝公开抵制与该组织有牵连的“法西斯分子”而受到广泛的批评。[\[63\]](#)一位外国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发言人谴责“德美同盟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银衫军组织的邪恶支持”，并呼吁“美国优先委员会清除这些危险分子”。[\[64\]](#)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1941年9月11日，林德伯格前往艾奥瓦州得梅因市。尽管他登上了当天早上《得梅因纪事报》的头版，但并不见得他受到了热烈欢迎。头版上一幅漫画的标题写道：“最欣赏他的观众。”漫画上，林德伯格对着正在热烈鼓掌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裕仁天皇（Hirohito）讲话，角落里一个身上标有“美国民众”字样的小个子男人抓住他的帽子，径直往“出口”方向走去。



林德伯格在得梅因的演讲中声称，使美国卷入欧洲冲突，不仅符合英国的最大利益，而且符合犹太人的最大利益。他坚持认为，他们的利益不是美国的利益，而犹太人（被认为）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媒体、电影、企业和政府，对国家构成了威胁：

不难理解为什么犹太人渴望推翻纳粹德国。他们在德国遭受的迫害足以使任何种族成为死敌。任何一个有着人类尊严意识的人都不能宽恕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但是，今天在这里，所有诚实和有远见的人看到他们的亲战争政策时，都

会看到这种政策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他们都有危险。这个国家的犹太人团体不应煽动战争，而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反对战争，因为他们注定首先感受到战争的后果。宽容是一种美德，它依赖于和平与力量；历史表明，它无法在战争和灾难中保全。少数有远见的犹太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反对干预战争。但大多数人仍然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对这个国家最大的危险在于他们对我们的电影、媒体、广播和政府拥有巨大的所有权和影响力。

他的演讲让人不禁回忆起1938年弗里茨·库恩在“德美同盟”本部发表的观点，当时他抱怨说：“美国的媒体和电台被犹太人把持，‘他们试图摧毁这个国家，就像他们试图摧毁德国一样’”。犹太阴谋集团控制全球媒体和金融的古老阴谋论，通过《锡安长老会纪要》流传甚广。当然，这也是纳粹提供的借口。^[65]

库格林神父也曾对犹太人控制金融和媒体发表类似的言论，但林德伯格走得太远。狗哨声响亮得过了头；如果本应隐蔽的东西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暗语就不管用了。他在得梅因的演讲引起了全国的强烈抗议。

艾奥瓦州的报纸宣称，林德伯格“诉诸种族和政治偏见”引发了“媒体、教会和政治领袖的一致抗议”。^[66]《堪萨斯城日报》（*Kansas City Journal*）宣称：“林德伯格对希特勒主义的兴趣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67]《纽约先驱论坛报》谴责了“偏见和不宽容的黑暗势力”，尤其是演讲所鼓吹的反犹太主义。^[68]《芝加哥先驱观察家报》（*The Chicago Herald Examiner*）宣称：“断言犹太人正在把这个国家推向战争是不明智、不爱国、不符合美国精神的。”^[69]《奥马哈世界先驱报》（*Omaha World Herald*）谴责演讲“充斥着仇恨和偏见的虚伪”，称其“与卍字符一样非美国主义，和

响尾蛇一样恶毒”。《旧金山纪事报》写道：“这个声音是从林德伯格口中发出来的，但这些话是希特勒说的。”[\[70\]](#)

在一篇被广泛转载的社论中，《自由》杂志称林德伯格为“美国最危险的人”。他流露的是“焚烧女巫者的真诚”，给反犹太主义提供了一个平台，在那之前反犹太主义在美国“是卑鄙的勾当”，由“卑劣的小骗子和狂热分子通过邮件寄送下流的传单来领导。他们为数众多，这一点是事实，但没有一个重要人物。”现在林德伯格已经将他们的观点合法化，发出了“大屠杀的召唤”。林德伯格不仅是“美国头号纳粹分子”，还是“希特勒的先锋、反基督者的代表、罪恶势力的元首”。[\[71\]](#)

作为对暴行的回应，美国优先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措辞拙劣的声明，称他们对将“种族问题引入”有关战争辩论的做法表示遗憾，但随后又声称，将种族问题引入讨论的不是他们，而是干预主义者，似乎抗议林德伯格的反犹太主义才使反犹太主义成为一个问题。

有关各方都不够宽容的说法激起了人们的讽刺和愤慨：这种借口，就好比是在说战争“是由波兰对德国的阴谋进攻引起的”。[\[72\]](#)

《纽约时报》一篇题为《非美国方式》（*The Un-American Way*）的社论声称，林德伯格在得梅因的演讲“完全不符合美国精神”，驳斥了美国优先委员会将“种族问题引入辩论”的责任转嫁到干预主义者头上的做法。《纽约时报》指出，这篇所谓的“辩词”饱含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但问题是：“如果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来自几乎所有文明国家，讲的是各种西方语言，这个宗教团体是否可以被称为一个‘种族’。”随后文章转向林德伯格的演讲，以及他们对“纳粹在德国的宣传”的“显然如出一辙的重复”。[\[73\]](#)

社论指出，美国优先委员会拒绝“否认这些声明中的哪怕一个音节”，这意味着它“与这些声明有关联”。文章进而声称，演讲“最邪恶的一面”并不是“呼吁反犹太主义，无论做出这种可耻呼吁的意图多么明显”。它坚称，美国永远不会宽恕反犹太主义。“受到攻击的是我们的自由所赖以生存的宽容和兄弟情谊。美国主义本身被嘲笑和蔑视。”^[74]

当人们呼吁将林德伯格的名字从街道、桥梁和他家乡的水塔上清除时，就连赫斯特也发表了一篇社论谴责林德伯格的演讲，并在他的报纸上广泛报道对林德伯格言论的批评。“林德伯格先生发表了非美国式的演讲，”社论称，“指责犹太人正在把这个国家推向战争是不明智、不爱国、非美国的。”而他声称犹太人控制了媒体，“此种言论听起来就像出自希特勒之口”。^[75]罗斯福的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Stephen Early）也公开指出林德伯格的讲话和最近“柏林方面的言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76]

多萝西·汤普森指控林德伯格试图“敲诈”犹太裔美国人；其他人从他的演讲中看到了明显的威胁。威廉·艾伦·怀特坚称这是“道德叛国”，并补充说：“查尔斯·林德伯格，你把纳粹种族问题引入美国政治，你真无耻。”^[77]《得梅因纪事报》称其为“诽谤”言论，“其含义是如此无节制、如此不公、如此危险”，这样一来，“林德伯格没有资格在政策制定方面自命为这个共和国的领导人”。^[78]美国优先委员会不再邀请林德伯格发言，并且后知后觉地开始设法疏远他。

1941年11月，汤普森接受《展望》（*Look*）杂志采访时直言不讳，这篇题为《林德伯格真正想要什么》（*What Lindbergh Really Wants*）的访谈被媒体广泛引用。她说，她“对林德伯格亲纳粹这一点

深信不疑”；他的目标是“成为美国总统，并成立一个与纳粹路线一致的新政党”。

“林德伯格认为美国将会参战，而且他认为美国将输掉这场战争。然后，他就能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当被问及她何以对林德伯格有这种判断时，她解释道：“我了解他的举止、态度，人群的行为，追随者的本质，模棱两可的讲话，操弄的情感，以及没有逻辑的推理。我从他的第一次演讲中就知道，他的演讲表面上是无害的，但几个月后他就会公开站出来反对犹太人。”

他是那种她早就预测会寻求“美国纳粹化”的人，尽管当时她并不知道那个人将会是谁。但不管是谁，和林德伯格的例子一样，紧随其后的都是“极度不满的共和党人，尤其是实业家，被忽视的政客、沮丧的社会主义者、三K党成员，不管他们自称是基督教鼓动者还是……以及一些神经质的女性。就像林德伯格一样，他会宣扬净化美国人的生活，他有轻微的殉道者情结。他的大多数追随者将完全不知道他真正的计划。” [\[79\]](#)

她认为，林德伯格的追随者揭示了他政治的真实本质。“他吸引了这个国家所有彻头彻尾的法西斯支持者和煽动者。”她坚持认为，仅仅三K党支持他这个事实就足以让所有人停下来想一想。她指出，所有自称“基督徒”、由“犹太迫害者”组成的反犹太团体也都支持他。这些理由足以使他名誉扫地。

汤普森说：“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林德伯格是自己的领袖。他们是他的突击队，而他从来没有明确地与他们的想法决裂……整个计划都是希特勒式的。这些男人相当暴力。他们利用言论自由煽动暴力。” [\[80\]](#)

她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如何解读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我认得出法西斯的笔迹。这个人想当我们的元首。”

两周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天后，美国优先委员会正式解散，并承诺支持政府的作战行动。

在专栏中谈到珍珠港事件时，汤普森关注的不是林德伯格或法西斯主义，而是美国梦的堕落。她相信，这次袭击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国几十年来一直满足于一个堕落的理想，一个勉强凑合的梦想。她说：“对整整一代人来说，美国人的理想是尽最少的努力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对于整整一代人来说，美国人的座右铭一直是‘我想这已经够好了’。”

“我们钦佩成功，而成功一直以来用金钱来衡量……问题不是‘做得有多好？’而是‘能挣多少钱？’此外，无论地位高低，平庸一直是美国梦……‘得过且过’，把享乐和休闲作为生活的目标，沉湎于愚昧的乐观主义，相信无论如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如果没有好起来的话，那就尖叫着跑出去找一个替罪羊。”

美国梦已经成为一种自满的权利意识，当轻松的承诺没有兑现时，这种意识很快就变为怨恨。

汤普森敦促她的读者铭记：“永恒的美国人——这个美国人没有‘购买’独立，而是用鲜血将其从宿命拯救出来。这个美国人没有‘推销’某个想法，而是自己思考并创造出来……这个美国人仍然在这里，在所有松懈的习惯之下焦躁不安，努力挣脱奢侈的束缚，走

向更纯粹、更粗鄙的生活。美国人啊，难道你们忘记了奢侈是最糟糕的束缚吗？”

她总结道，仅仅指责法西斯分子是没有用的。“我指责我们。我指责20世纪的美国人。我指责我自己。” [\[81\]](#)

[\[1\]](#) *Jackson Sun*, Jackson, TN, 13 November 1938.

[\[2\]](#) 原文为Zerzes，疑为Xerxes，波斯帝国薛西斯一世。

[\[3\]](#) *Cincinnati Enquirer*, 23 November 1938.

[\[4\]](#) *Brooklyn Daily Eagle*, 25 December 1938.

[\[5\]](#) *Pittsburgh Press*, 10 December 1938.

[\[6\]](#) *Daily Times*, Davenport, IO, 19 December 1938.

[\[7\]](#) *Times-Leader*, Evening News, Wilkes-Barre, PA, 11 July 1940.

[\[8\]](#) *Akron Beacon Journal*, Akron, OH, 11 July 1940.

[\[9\]](#) *St. Louis Post-Dispatch*, 8 October 1940.

[\[10\]](#)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20 September 1939.

[\[11\]](#) *Detroit Free Press*, 19 October 1939.

[\[12\]](#) *Plain Speaker*, Hazelton, PA, 20 October 1939.

[\[13\]](#) 引自Kurth, *American Cassandra*, p. 311.

[\[14\]](#) *Salt Lake Tribune*, Salt Lake City, UT, 28 January 1940.

[\[15\]](#) *Jackson Sun*, Jackson, TN, 7 July 1940.

[\[16\]](#) *Harrisburg Telegraph*, Harrisburg, PA, 3 June 1940.

[\[17\]](#) *Harrisburg Telegraph*, Harrisburg, PA, 3 June 1940.

- [18] *Courier-Journal*, Louisville, KY, 17 June 1940.
- [19] *Courier-Journal*, Louisville, KY, 17 June 1940.
- [20] *Courier-Journal*, Louisville, KY, 17 June 1940.
- [21] *Courier-Journal*, Louisville, KY, 17 June 1940.
- [22] *St. Louis Post-Dispatch*, 18 August 1940.
- [23] *Tribune*, Kokomo, IN, 15 March 1940.
- [24] *Eau Claire Leader*, Eau Claire, WI, 1 November 1940.
- [25] Guy Greer, “Arming and Paying for It” , *Harper’ s*, November 1940.
- [26] *Hartford Courant*, Hartford, CT, 20 June 1941.
- [27] *Minneapolis Star*, 21 April 1941.
- [28] *News-Dispatch*, Shamokin, PA, 30 April 1941.
- [29] *Harrisburg Telegraph*, Harrisburg, PA, 25 June 1940.
- [30] *Amarillo GlobeTimes*, Amarillo, TX, 7 October 1940.
- [31] *Freeport Journal-Standard*, Freeport, IL, 24 May 1940.
- [32] *Medford Mail Tribune*, Medford, OR, 9 June 1940.
- [33] *Iola Register*, Iola, KS, 6 August 1940.
- [34] 1940年成立的美国优先委员会是“美国优先” 口号起源的说法广为流传, 参见Louisa Thomas, “America First, For Charles Lindbergh and Donald Trump” , *New Yorker*, 24 July 2016; Eric Rauchway, “Donald Trump’ s New Favorite Slogan Was Invented for Nazi Sympathizers” , *Washington Post*, 14 June 2016; Susan Dunn, “Trump’ s ‘America First’ Has Ugly Echoes from U.S. History” , CNN, 28 April 2016; “ ‘America First’ : From Charles Lindbergh to President Trump” ,

NPR podcast, 6 February 2017。历史学家斯奈德在2017年10月的一次采访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参见 “Trump and Bannon’ s idea of ‘America First’ is technically from 1940’ , from ‘Taking Bad Ideas Seriously: How to Read Hitler and Ilyin? ’ ” interview with Timothy Snyder, Eurozine, 28 August 2017。

[35] Lindbergh, “Our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August 1940.

[36] *Daily Times*, Davenport, IA, 30 December 1940.

[37] *Daily Times*, Davenport, IA, 30 December 1940.

[38] *Abilene Reporter-News*, Abilene, TX, 24 January 1941.

[39] *Cincinnati Enquirer*, 17 February 1941.

[40] *Escanaba Daily Press*, Escanaba, MI, 18 February 1941.

[41] *Tampa Bay Times*, St Petersburg, FL, 23 February 1941.

[42] *Quad-City Times*, Davenport, IA, 17 August 1941.

[43] *Sikeston Standard*, Sikeston, MO, 7 November 1941.

[44] *St. Louis Star and Times*, 18 October 1941.

[45] *Minneapolis Star*, 20 July 1941.

[46] *Harrisburg Telegraph*, Harrisburg, PA, 25 April 1941.

[47] *Index-Journal*, Greenwood, SC, 28 May 1941.

[48] *Nebraska State Journal*, Lincoln, NE, 6 June 1941.

[49] *Cincinnati Enquirer*, 4 June 1941.

[50] *Pittsburgh Press*, 18 May 1941.

[51] *Miami News*, 21 March 1941.

[52] *Independent Record*, Helena, MT, 14 April 1941.

- [53] *Chicago Tribune*, 25 April 1941.
- [54] *Daily Times*, Davenport, IA, 29 April 1941.
- [55] *Daily Tar Heel*, Chapel Hill, NC, 29 January 1941.
- [56] *Akron Beacon Journal*, Akron, OH, 8 March 1941.
- [57] *St. Louis Star and Times*, 16 August 1941.
- [58] *St. Louis Star and Times*, 23 May 1941.
- [59] Mark Schorer, *Sinclair Lewis: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1, p. 661.
- [60] *Democrat and Chronicle*, Rochester, NY, 30 April 1941.
- [61] *Arizona Republic*, Phoenix, AZ, 29 April 1941.
- [62] *Akron Beacon Journal*, Akron, OH, 13 July 1941.
- [63] *Star Gazette*, Elmira, NY, 9 June 1941.
- [64] *Oakland Tribune*, Oakland, CA, 28 June 1941.
- [65] *Moberly Monitor-Index*, Moberly, MO, 19 November 1938.
- [66] *Daily Times*, Davenport, IO, 16 September 1941.
- [67] 引自*Des Moines Register*, 14 September 1941。
- [68] 引自*Des Moines Register*, 14 September 1941。
- [69] *Daily Times*, Davenport, IO, 16 September 1941.
- [70] *Daily Times*, Davenport, IO, 16 September 1941.
- [71] *News Leader*, Staunton, VA, 20 October 1941.
- [72] *Minneapolis Star*, 25 September 1941.
- [73] *New York Times*, 26 September 1941.

[74] *New York Times*, 26 September 1941.

[75] Weekly Town Talk, Alexandria, LA, 27 September 1941.
Reprint of Hearst editorial from New York Journal-American.

[76] *Wisconsin Jewish Chronicle*, Milwaukee, WI, 19 September 1941.

[77] *Stanberry Headlight*, Stanberry, MO, 16 October 1941.

[78] *Des Moines Register*, 13 September 1941.

[79] Dorothy Thompson, “What Lindbergh Really Wants” , *Look*, 18 November 1941, pp. 13-14.

[80] Dorothy Thompson, “What Lindbergh Really Wants” , *Look*, 18 November 1941, pp. 13-14.

[81] *Cincinnati Enquirer*, 17 December 1941.

后记 1945~2017年：仍然美国优先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夏天结束。1946年夏天，弗雷德·C. 特朗普的儿子降生，取名唐纳德·特朗普。70年后，他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在竞选和就职演说中承诺将以“美国优先”，因为“不幸的是，美国梦已经死了”。

在这70年里，美国梦发生了什么，相比于这章的篇幅，本应需要更多的篇幅才能恰当地加以叙述。二战后，“美国梦”被重新塑造成中产阶级熠熠生辉、舒适安逸的生活，一个关于社会向上流动和无穷无尽的代际进步的故事。多萝西·汤普森曾在她关于珍珠港事件的专栏文章中抨击这种“愚昧的乐观主义”，她警告说，一旦出了问题，它总会找个替罪羊。

“美国优先”很快就陷入沉寂。尽管有过那么几次半心半意的尝试，试图复兴这句格言——1942年，一家报纸报道说，少数人“仍然坚持美国优先”，但这句短语似乎已经名誉扫地，难以为继，“孤立主义者”这个词也一样，后来同样声名狼藉。[\[1\]](#)

1947年，也就是沃尔特·李普曼的第18本书《冷战》（*Cold War*）令“冷战”这个字眼家喻户晓的同一年，美国总统哈里·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在得克萨斯州韦科市的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发表了演讲，此地距离30多年前杰西·华盛顿被公开烧死的地方不到一英里。演讲时，杜鲁门修订了罗斯福的四项自由，取

而代之的是三种自由的基本形式。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如故，但杜鲁门用“企业自由”的承诺取代了罗斯福倡导的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象征意义的改变，因为杜鲁门坚称“前两项自由与第三项自由有关”。资本主义被奉为一种基本的自由，作为美国民主观念的核心——美国的自由观念将永远不会与自由市场脱钩。

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用企业自由代替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意味着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民主。^[2]这种修辞上的转变折射出文化上的转变，从那时起，企业自由与美国梦交织在一起。从那时起，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把企业自由视为一项基本的美国权利，是所有其他自由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并不是靠杜鲁门一己之力促成了这种文化的转变，但他的演讲使转变合法化，并使其有了明确的说法。

罗斯福将“免于恐惧的自由”确立为一项人权，试图终结“恐惧经济”——沃尔特·李普曼用它来形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产物。用企业自由取代免于恐惧的自由，有效地让美国回到了恐惧经济，从那时起，它就一直掌控着局面。

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梦已经摆脱了所有道德上的不安，成为一种必胜的爱国主义主张。冷战确保了一股新的国际主义和干涉主义浪潮席卷美国政坛并成为一种常态。赫斯特和他的追随者们长期以来所担心的问题确实塑造了美国几十年来的政策：随着军工复合体的形成，美国与西欧结成了永久的或者至少是持久的联盟，并继续发动战争。传播美国生活方式的美国梦成为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或借口，这取决于你的观点）。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一个信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的美国似乎离我们更远了。

在冷战中，美国梦成为一个重要的修辞武器，美国战后的繁荣再次以类似加尔文主义的术语被支撑起来，作为美国社会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其价值观可以为民众带来安全和舒适的证据。国际主义软实力运动的一部分是美国梦，这个美国梦，关乎的是个人消费主义繁荣所支持的民主愿景。

作为美国战后经济复苏的一部分，联邦住房管理局提供贷款来推进住房项目。开发商被鼓励保持社区的种族“同质性”，这是一个我们以前见过很多次的暗语。^[3]其中一位利用住房贷款的投资者是弗雷德·C. 特朗普，他开始利用联邦资金在纽约周边地区开发住宅。

20世纪50年代初，创作歌手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在弗雷德·C. 特朗普位于布鲁克林的住宅开发项目中住过两年。格思里对特朗普作为房东所采取的公然的种族主义行径感到非常愤怒，他写了一首诗——《老家伙特朗普》，诗中写道：“他知道自己激起了多少种族仇恨/他搅动仇恨。”在“特朗普大厦……没有黑人来闲逛”。

1954年，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对弗雷德·C. 特朗普在其房地产开发项目中“从公共合同中牟取暴利”的行为进行了调查。在宣誓后，他承认“为了从政府获得数额更多的抵押贷款，极力夸大了开发项目的成本”。^[4]对这种行为，有些人可能称之为欺诈。

整个20世纪50年代，民权事业得到了真正的法律和政治支持。1955年，雨果·布莱克法官支持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案的一致裁决，这是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民权案件，判决美国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违反宪法。令许多人吃惊的是，布莱克居然是一位非常开明的法官。

1963年，马丁·路德·金强有力地复兴了最初设想的美国梦——一个民主和经济平等的梦。他援引美国梦，表示美国梦从未延伸到美国的黑人。

马丁·路德·金在“为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的集会中说：“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之中。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民权历史学家都知道，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是对开国元勋理念‘颠覆性’甚至是‘预言性’的重新利用，将民权与美国建国时的民主平等承诺联系起来，而美国的立宪者曾明确将美国黑人排除在这一承诺之外。”[2013年，一位研究马丁·路德·金的专家告诉《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金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其他人（无法）理解的东西”][\[5\]](#)。但不管金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他远不是第一个提出平等的“美国梦”包含民权原则的人。虽然没有人会否认金的远见卓识所具有的力量和影响，但这个观点并不是他独有的。

第二次是三K党于1944年解散，但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激起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强烈反弹——在南部，当地的三K党重新集结，对黑人和白人活动人士实施了暴力行为。1965年，林登·B. 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公开谴责三K党，同年《约翰逊-里德法案》最终被1965年的《移民法》（Immigration Act）取代，这是约翰逊“伟大社会”这一自由主义公民改革的国内进程的一部分。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优先”仍然是地下三K党的口号，被印在诸如1966年铸造的纪念币之类的徽章上。[\[6\]](#)



美国法西斯运动也再次抬起它丑陋的头，代表团体是由乔治·林肯·洛克威尔（George Lincoln Rockwell）领导的美国纳粹党（American Nazi Party）。从1958年成立，到1967年洛克威尔被一个分裂组织的心怀不满的成员暗杀，这段时间里，该党曾经被媒体间断报道过。使用纳粹口号和标志的民族国家的权利党（National States' Rights Party）同样成立于1958年，该党反对南方的种族融合。法西斯分子与三K党之间的关系依然清晰。

弗雷德·C. 特朗普于1973年将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管理权交给了儿子唐纳德·特朗普。那一年，美国司法部以种族歧视为由起诉了特朗普管理公司：1967年，纽约州调查人员已经确定，在位于科尼岛特朗普村的约3700套公寓中，只有7套租给了非裔美国人。唐纳德·特朗普抱怨政府试图强迫他把房子租给“吃福利的人”，他以诽谤罪提出反诉，聘请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律师罗伊·科恩（Roy Cohn）为他辩护。他最终签署了一项同意令，其中包含了数项旨在确保特朗普地产项目废除种族隔离的规定。1978年，特朗普家族被指控违反该同意令并继续实施种族歧视政策。

20世纪70年代，一位名叫大卫·杜克（David Duke）的三K党成员在路易斯安那州竞选参议员；他将于1988年竞选总统。1967年，他加

入了三K党，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读书时，他建立了一个名为“白人青年联盟”（White Youth Alliance）的新纳粹组织，该组织与美国纳粹党有关联。1974年，杜克成立了“三K党骑士”组织。

1989年，一名白人女子在纽约中央公园遭到强奸，五名年轻的黑人男子被错误地认定为元凶。唐纳德·特朗普在该市四家报纸刊登整版广告，呼吁对其判处死刑。定罪13年后，另一名男子承认自己才是强奸案的凶手；DNA证实了他的罪行，对五人的定罪被撤销。特朗普非但没有道歉，反而为《纽约每日新闻》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称无罪释放中央公园五位犯人是“本世纪最大的犯罪”。

1992年，由于帕特·布坎南的总统竞选活动，“美国优先”突然重新登上报纸头条。布坎南被广泛认为代表了20世纪初原旨主义保守派的价值观。他在宣布参选时发表演讲，宣称美国绝不能因为“欧洲超级大国崛起”带来的经济挑战而丧失“主权”。他召唤的是“一种新的爱国主义”和“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承诺“把美国人的需求放在首位”。

布坎南指责说，反对他的人“将使美国的财富和权力服务于某种暧昧不明的新世界秩序。而我们将把美国放在首位。”布坎南的竞选活动没有成功，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排外政纲适得其反，最终比尔·克林顿从中受益。

1999年10月，布坎南宣布他将以新成立的“改革党”的名义参加2000年总统竞选，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他打算与布坎南竞争改革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

特朗普解释了自己放弃共和党籍的原因：“我真的认为共和党人现在右倾得发疯。”他接着称布坎南为“希特勒的情人”，并补充说：“我猜他是个反犹分子。他不喜欢黑人。他不喜欢同性恋……居然还有人能接受这个家伙，这真是不可思议。”但后来，特朗普发现，布坎南显然是在追逐“真正坚定的右翼疯子的选票”。[\[7\]](#)

最后，特朗普没有参加竞选，他在2000年离开了改革党，发表声明说：“改革党里现在有三K党成员杜克、新纳粹分子布坎南，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者莱诺拉·富拉尼（Lenora Fulani）。这不是我想要的伙伴。”[\[8\]](#)改革党的一名发言人回应说，特朗普只是一个“骗子”，伪装得看上去满怀政治抱负，实际上只是想要宣传他的书：这一切都只是“媒体的一场闹剧”。[\[9\]](#)几天后，特朗普再次批判改革党。“嗯，大卫·杜克——一个偏执狂，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麻烦——也加入了。我是说，你不会希望自己党内出现这号货色。”[\[10\]](#)1990年，《名利场》的一篇报道披露，特朗普办公室里放着一套希特勒的演讲集。

16年后，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发起了他的竞选活动。“我不是孤立主义者，”他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宣布，“但我支持‘美国优先’。”他说：“我喜欢这个说法。我主张‘美国优先’。”[\[11\]](#)

这句话被他的支持者引用，其中许多人很可能不知道它的历史。

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2016年2月，大卫·杜克表示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我很高兴看到唐纳德·特朗普和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我本人多年来一直在捍卫的大多数问题。我的口号仍然是‘美国优先’。”[\[12\]](#)

当被要求拒绝大卫·杜克的支持时，特朗普说：“大卫·杜克支持我？好吧，好吧。我拒绝，行了吗？”^[13]两天后，在面临着更强烈的压力时，他试图回避。“如果我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我会拒绝对方的支持……但你可能会发现有些团体完全没问题，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你得先把有问题的团体列个单子给我，我再来说我的想法。”当被告知唯一受到质疑的就是三K党和大卫·杜克时，他回答说：“我不认识大卫·杜克。我想我从未见过他……我对他一无所知。”^[14]

特朗普模棱两可的回答既没有让他失去提名，也没有让他输掉选举。

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说过，如果说历史之于国家正如记忆之于个人，那么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

2017年8月，即特朗普上任7个月后，美国法西斯分子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举行了一场集会。许多对特朗普领导下的“另类右翼”法西斯主义突然崛起感到愤怒的美国公民前去抗议。当一辆汽车撞向反法西斯抗议者时，19人受伤，另有一位名叫希瑟·海耶（Heather Heyer）的女士死亡。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特朗普拒绝直接谴责另类右翼集会或法西斯分子对和平抗议者的袭击。令许多观察人士感到震惊的是，三K党和新纳粹分子居然可以在现代美国举行游行，高喊“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更让他们震惊的是，特朗普拒绝谴责极端右翼暴力，而是发布了对“多方仇恨”的模板化的谴责，字里行间，显然是在暗示那些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抗议者也是“仇恨者”。特朗普声

称，双方都有“很多好人”，尽管其中一方完全由新纳粹分子、三K党成员和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另类右翼”作为21世纪早期的新瓶，装的还是“新纳粹主义”的旧酒，只不过名字更委婉，更易被社会接受。夏洛茨维尔市的“团结右翼运动”坚称自己不是纳粹，但同时一直喊着“血与土”之类的纳粹口号。多萝西·汤普森一早就警告说，不会有人一上来就组建独裁的政党。

另类右翼运动与其他极右翼组织的松散派系联合起来，其中包括心怀阴谋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担心一个由势力强大的精英集团（这些精英可能是犹太人，也可能不是）操纵的国际主义新世界秩序的建立；一批自称是反抗压迫政权（通常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战士武装民兵”，茶党运动及其最著名的发言人萨拉·佩林（Sarah Palin），故意煽动“9·11”事件后对极端伊斯兰主义和崛起的“伊斯兰国”的仇恨与恐惧的右翼政客和所谓“专家”以及福音派，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推动近期被视为极端主义的议程成为共和党的主流。

当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2008年当选美国总统时，这些迥然不同的群体因为一个共同的敌人而团结在一起，并通过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这个全国性的新闻渠道将自己的观点正常化，传达给全美各地的保守派。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的当选激起了全美范围内种族主义的反弹。

特朗普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崛起与奥巴马的总统任期紧密相连。通过本土主义者“出生地”阴谋论的甚嚣尘上，他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该阴谋论认为奥巴马是在外国出生，因此没有资格竞选总统。他们的基本目标是努力剥夺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合法地位。当奥巴马2011年在白宫记者晚宴上嘲笑特朗普时，特朗普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许

多观察人士得出结论，他的整个总统竞选活动都源于他被一名黑人公开羞辱、自尊心大受打击。

因此，特朗普对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的妥协回应并没有让所有人感到震惊。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反犹太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符号和修辞，并在他以白人为主的反对抗议者的集会上煽动暴力，其中许多抗议者是黑人。尽管存在明显的种族界限，但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坚称，他们的担忧是经济方面的。如果说有人在讨论中注入了种族主义，那也是他们的批评者——这让人不禁联想起1941年批评者反对林德伯格大谈反犹太主义，而美国优先委员会称正是批评人士将种族主义注入了讨论中。尽管特朗普否认竞选是由种族政治推动的，但他肆无忌惮地把竞选重点放在白人的仇恨上，就像1926年希拉姆·埃文斯为三K党辩护时一样。

特朗普就职时承诺“美国优先”，“从华盛顿移交权力”，“把权力还给你们，美国人民”。这些人——他的追随者和选民——绝大多数是白人。特朗普就职后不久就在他的内阁中安插了几位口无遮拦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史蒂夫·班农和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并邀请塞巴斯蒂安·戈尔卡（Sebastian Gorka）担任顾问（戈尔卡是匈牙利纳粹党记者协会的成员，但他否认这一点）。[15]

2018年1月，特朗普在讨论来自海地和非洲国家的移民问题时，称“所有这些都来自粪坑国家”。他还表示，他认为美国应该“接纳更多来自挪威这类地方的人”。[16]尽管大多数评论人士都认为挪威是一个白人国家，但其他人对特朗普特意点出这个白人国家感到困惑。“为什么是挪威？”《休斯敦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的一篇报道指出了这种选择的“种族主义”；它还说，新法西斯主义网站“每日冲锋”（Daily Stormer）已经认可了特朗普的言论，称“特朗普或多或少地与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17]然而，《休斯敦纪事

报》并没有提到，特朗普或“每日风暴”的追随者们所一直支持的北欧主义，本身就是美国的一种种族主义理想。[\[18\]](#)

就像多萝西·汤普森在谈到查尔斯·林德伯格时说的那样，这都是些“老一套”。与此同时，针对黑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手无寸铁的美国黑人继续被白人警察冷血地射杀，而凶手却可以“全身而退”，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行刑灾难，有充分的理由将其描述为私刑。

白人种族主义的信号——狗哨声——无处不在，而且与对特朗普和他父亲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指控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2016年竞选期间，有消息称特朗普的父亲曾在1927年被捕，被捕的场合常被错误地描述为“三K党集会”。特朗普起初否认那个被逮捕的弗雷德·C. 特朗普是他父亲，称他们从未住在报纸报道中提到的皇后区德文郡路175-24号。但正如其他报纸报道所证实的，尽管唐纳德从未住在那里，但特朗普家族确实曾在那里居住。

没有证据表明弗雷德·C. 特朗普曾在1927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中支持三K党。值得注意的是，2万名观众中，只有7人被捕，1人立即获释。其他六人包括五名“公开承认的三K党成员”，外加弗雷德·C. 特朗普。

唐纳德经常自豪地说，他继承了他所崇拜的父亲的世界观。他在2015年说：“我的精神传承根植于我父亲。”

在特朗普的传记作家中，不下一位认为，这种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优生学。这位传记作者说：“他们家族信奉人类发展的赛马理论。他们相信存在优异的人，如果你把优秀的女人和优秀的男人的基因组合在一起，你就会得到优秀的后代。” [\[19\]](#)

特朗普支持优生学的一个含糊其词的版本（他貌似是想不起准确的术语），2010年在接受CNN采访时他解释道：“我想我生来就有追求成功的动力，因为我有某种特定的基因。我相信基因。”他为此举了个例子：“嘿，当你让两匹赛马配种时，你通常会得到一匹快马。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有一个很好的基因池。”^[20]这句话简直活脱脱来自1922年《星期六晚邮报》上某篇关于将人与马类比的鼓吹北欧主义的文章。

2017年10月，特朗普因回应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称他为“天杀的白痴”的报道而受到广泛嘲笑。特朗普回应说：“我认为这是假新闻。但如果他真的这么说，我想我们就只好比一下智商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谁会赢。”^[21]尽管特朗普可能不知道沃尔特·李普曼在1923年驳斥智商测试背后的优生学理论，但他相信智商测试将证明他是个天才，这与他对于优生学的信奉不无关系。

弗雷德·C. 特朗普留给儿子的世界观来自一个信奉优生主义的美国。当年，1400多名三K党成员在他居住的街道上游行，大声宣布他们支持百分百美国主义和美国优先。这是一个坚持本土主义和“一滴血法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百分百美国人意味着百分百的白人。这是一个自封的美国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在街头战斗的世界。1939年，德美同盟吸引了两万名美国人参加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纳粹集会（有未经证实的传言称，德裔美国人弗雷德·C. 特朗普是同盟中的一员，但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虽然没有人知道，在1927年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骚乱中，弗雷德·C. 特朗普为什么会和五名自称是三K党成员的人一同在皇后区被捕——这一点是事实，但他后来的记录表明他出现在那里并不是为了抗议三K党——这一点也是事实。

也许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巧合。

但这个故事充满了巧合，巧合——这是后见之明所创造的模式的一个名称，也是历史的一个名称。事实上，驱使这本书成型的，正是这些相似且不断出现的模式。

其中一个巧合是特朗普与这个故事中许多人物在政治上的相似之处，其中一位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这位高呼“美国优先”的大亨成为1941年的电影《公民凯恩》（Citizen Kane）中查尔斯·福斯特·凯恩（Charles Foster Kane）的原型。2016年特朗普宣布接受共和党提名时，身后是一张他的巨幅肖像照，这张照片几乎完全运用了电影中凯恩在政治集会中以及大搞个人崇拜时的视觉效果。特朗普曾告诉一位采访者，《公民凯恩》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并补充说他认同凯恩。至于特朗普是否意识到影片导演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有意把查尔斯·福斯特·凯恩比作法西斯主义者，在视觉效果上参考了《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中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形象，则是另一个问题。

在威尔斯这类人眼中，赫斯特阻止美国抗击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势力，这与支持法西斯主义无异。在《公民凯恩》的开场镜头里，威尔斯参照了赫斯特1934年对希特勒访问的情节：凯恩宣称不会有世界大战，然后画外音补充说，凯恩经常先支持继而谴责某个特定的世界知名人物，画面中，凯恩和希特勒一同出现在阳台上。

凯恩奉行的威权主义或许不是特朗普喜欢《公民凯恩》的原因，但他肯定意识到了赫斯特的报业集团赋予他的政治权力，因为2012年他告诉《卫报》，社交媒体对他的作用就像拥有一份报纸。

我的推特粉丝比《纽约时报》的读者还多。我有一份报纸，事实上我有自己的报纸，名字叫@iamdonaldtrump。真的。现在如果有人攻击我，我也会立即反击。我过去常常发表演讲攻击别人，现在我甚至连这个也不用做了。[\[22\]](#)

（正如采访者所指出的，这“事实上”并不是他的推特账号，他的推特账号实际上是@realDonaldTrump，特朗普自恋地说错了他的账号）

1915年，伍德罗·威尔逊将“美国优先”这个短语介绍给世人时，曾警告称，宣传力量正在制造“假新闻”，这句话成为特朗普政治生涯的一个标志（他被指控厚颜无耻地说谎、歪曲事实和捏造事实，而今他变被动为主动，转而声称有关他的任何不光彩的事实都只是“假新闻”）。

然后是辛克莱·刘易斯笔下的“总统”温德利普，他吹嘘自己在媒体上的亮相有多么成功，他的支持者是多么忠诚，这听起来也有点像特朗普。“你们忘了上周我也曾在全国某个特定地区发表某篇特别的广播讲话！我得到了很棒的反应。中西部人对我绝对忠诚。他们感谢我一直以来所做的一切！”还有，刘易斯用“可悲”一词来描述墨西哥边境的冲突，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在那里修建一道墙时，希拉里·克林顿用这个词来形容特朗普的追随者，因而引发了争议。

让我们不要忘记沃伦·G. 哈定，他曾以“美国优先”为竞选纲领，坚称当总统很容易，并承诺要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美国，但真的轮到他来管理这个国家时，他的内阁又像是一个乱套的犯罪集团。事实证明，围绕哈定“出生地怀疑”阴谋的形象与针对奥巴马的阴谋的形象不可思议地截然相反，特朗普卑鄙地利用这种形象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黑血”的说法继续伴随着哈定的后代，直到2015年他

们做了DNA测试才最终推翻了这种说法。其中一人承认有点失望，他说：“我希望能有黑人血统。”）[\[23\]](#)。

此外，对特朗普的媒体报道所采取的合理化的解释，与帝国巫师希拉姆·埃文斯1926年为三K党辩护时使用的借口十分相似，这一点着实令人不安。90年前三K党成员所持的“经济困境”论调，与媒体如痴如醉地鼓吹的“经济焦虑”论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后者是为了激发特朗普的选民而非种族仇恨。同样，埃文斯明确呼吁“交还权力”（“我们要求把权力交还到普通人手中，不是那群特别有文化、过度理智的人，而是完全没有被宠坏、没有去美国化的普通的老派公民，我们也期望赢得这场运动。”），这种论调，恰似白人至上主义者后来在夏洛茨维尔高喊的那样，“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

这些相似之处超越了特朗普本人，延伸到了他的内阁成员身上。他的竞选经理兼首席顾问班农使用了“经济民族主义”一词，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有关国际主义和《凡尔赛条约》的“美国优先”辩论中。雨果·布莱克曾加入三K党的事实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这与有过反民权记录的杰斐逊·博勒加德·塞申斯（Jefferson Beauregard Sessions）在2016年被任命为司法部长时引发的抗议如出一辙，这两人都来自亚拉巴马州。此外，多萝西·汤普森当年讽刺布莱克无法“回忆”起自己的种族主义历史，而塞申斯2017年在国会作证时也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2015年，塞申斯在和史蒂夫·班农一起接受电台采访时，还称赞了《约翰逊-里德法案》。他说：“七年后，非美国出生的移民人口比例将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1924年，当这个数字刷新纪录时，总统和国会改变了政策，显著地减缓了移民的速度。然后，我们通过1965年的《移民法》同化了外来移民，创造了真正稳固的美国中产阶级，这对美国有好处。我们通过了一项远远超

出1965年任何人所能意识到的法律，我们正走在一条远远超过1924年形势的道路上。”^[24]他的说法听起来非常像1923年《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社论，文章认为，美国想要实现种族“同质性”，这个国家就不能“不断地吸收新元素——还是老的那一套，老移民留下来，新移民出去”。

2017年10月，《纽约时报》报道称，斯蒂芬·米勒在高中时的纪念册上曾引用西奥多·罗斯福关于“百分百美国主义”的表述。“这个国家不可能存在五五开的美国主义。我们只能容许百分百美国主义。美国主义只能提供给美国人，没有别人的份儿。”^[25]不出所料，这段话是他断章取义引用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2016年，联合右翼运动向夏洛茨维尔进军并导致希瑟·海耶遇害，而在此事件发生75年前，一个“联合党”将白人至上主义团体聚集在一起。1940年，美国人在弗吉尼亚州的南方邦联纪念碑上悬挂卐字旗；2017年，在夏洛茨维尔举行的集会是为了抗议计划拆除南方邦联纪念碑中罗伯特·E. 李（Robert E. Lee）的雕像。

对南方邦联“败局命定”进行神话，150年来一直否认奴隶制与内战有关，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修正主义行为。南方邦联的动机是各州的权利、北方的侵略、联邦主义者的背信弃义，而不是对白人特权的野蛮保护，这种特权正源自奴隶制的血腥继承。

维护奴隶制正是邦联建立的目的，而这种有意将南方邦联与奴隶制度切割的做法，导致罗伯特·E. 李雕像的捍卫者坚称，李将军也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决定带领南方邦联军队参战以捍卫奴隶制和它所支持的白人至上主义，这显然只是另一个巧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少有人把南方的独立归因于“经济焦虑”，尽管失去种植园奴隶制及其他集中的资本，确实在南方白人中造成严重的经济焦虑。这

就是他们发动战争反对其美国同胞的原因——保护他们的权利，以获得他们残酷虐待的黑人劳工创造的利润。

如今，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南方邦联纪念雕像是在内战后竖立起来的，动机纯粹是出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骄傲或愤怒，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历史有一天会如何评判他们。对一些雕像来说，情况确实如此，但并不全都是这样。

就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近100年前，美国南方爆发了一场关于是否要竖立一座白人至上主义者雕像的辩论——这场辩论的框架关乎的恰恰是历史将如何评判他们。

1916年9月，小说家托马斯·W. 迪克森想要在北卡罗来纳州竖立一座雕像，以纪念他的舅舅，他是《同族人》一书中主人公的灵感来源（书中的“小上校”）。《同族人》继而又赋予了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创作灵感。迪克森希望给舅舅麦克菲上校（Colonel McAfee）的雕像穿上三K党长袍，但附近夏洛特的一家报纸提出反对，认为麦克菲上校应该穿南方邦联的制服。

《夏洛特观察家报》（*Charlotte Observer*）的一篇社论坚持认为，虽然迪克森的舅舅穿着南方邦联制服的雕像会“毫无疑问地得到认可”，但给他披上三K党的长袍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篇社论抗议说：“很难想象有哪座雕像受到如此怪异的对待。这是属于过去的历史，应该被记录下来，封存在档案馆里……为这个群体竖立一座雕像，将把无休止的解释和辩护的责任强加给这一代和以后的几代人，这一责任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令人厌烦，最终可能会遭到批判。” [\[26\]](#)

当然，对于纪念南方邦联的事业这一点并无争议；相反，《夏洛特观察家报》的结论是，纪念麦克菲上校是件好事，“作为一名南部邦联的军官，人们在听到他的名字时，所给予的将是一片颂扬”。

所以他们只是在三K党这点上划定了界限，但他们确实划出了界限。尽管他们告诉自己，一座南部邦联军官的雕像在今后将只会受到颂扬，但他们也承认，任何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偏见最终都可能被“批判”。

这一争议登上了《纽约时报》，旁边就是一篇关于“美国优先”的文章（两篇内容无关）。《纽约时报》的文章开篇提到了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广告报》（*Advertiser*）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批驳《夏洛特观察家报》的立场“荒谬可笑”，认为如果麦克菲因组织三K党而出名，那么他就应该被铭记。

被奉为美国纪实报纸的《纽约时报》参与到辩论中，声称在南方人不同意的问题上，北方人可能会“表达意见”。《纽约时报》的意见如何？它认为：“与这名战士发生关联的，是三K党历史中较为光彩的部分，也就是为保护南方文明而战的那部分。”文章支持“败局命定”的神话，认同三K党战斗的动力并非白人至上——比白人至上更好。“如果要用一座雕像来纪念他，那应该是一座能让人回忆起他真实伟业的雕像。就像《广告报》所说的那样，那是南方文明业已消逝的一个阶段。”

文章的结论是：“《夏洛特观察家报》可能太敏感好斗了。”
[\[27\]](#)

也许吧。

我们已经实现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游泳者》中勾勒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愿景，这个国家认为它可以完全摆脱历史，仿佛它是一个拖累我们的障碍，尽管实际上它应是我们赖以前进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健忘症无疑是一种解脱；但了解历史，同样也可以获得解放。

[1] *Star Gazette*, Elmira, NY, 28 January 1942.

[2] John Fousek, *To Lead the Free World: 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3] 联邦住房手册对“不和谐的种族或民族的渗透”提出警告，称社会或种族居住状况的改变通常会导致不稳定和房屋贬值。James O. Midgley and Michelle Livermore,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olicy*,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8, p. 406.

[4] *New York Times*, 27 August 2016.

[5] 这是一种习惯性的观点，甚至在大众媒体中也有同感。参见“‘I Have A Dream’ Speech’s Social Critique Sometimes Lost In Celebrations”，*Huffington Post*, 24 August 2013。其中几位民权历史学家强调了金演讲的“颠覆性”和“预言性”。

[6] 无形的帝国徽章，据称是为了纪念三K党百年诞辰，Cajun Coins, Mandeville, LA, 1965。

[7] Francis X. Clines, “Trump Quits Grand Old Party for New”，*New York Times*, 25 October 1999.

[8] *New York Times*, 14 February 2000.

[9] *New York Times*, 14 February 2000.

[10] Glenn Kessler, “Fact Checker: ‘Donald Trump and David Duke: For the Record’”，*Washington Post*, 1 March 2016.

[11] *Los Angeles Times*, 20 January 2017.

[12] David Duke, “Former Ku Klux Klan Leader, To Run for Congress”, BBC News, 22 July 2016.

[13] US News & World Report, 28 February 2016.

[14] US News & World Report, 28 February 2016.

[15] “Sebastian Gorka and the White House’s Questionable Vetting”, *Atlantic*, 26 March 2017; “Sebastian Gorka: Former Trump Aide Accused of Ties to Nazi Group Heads to Israel”, *Newsweek*, 6 September 2017.

[16] *New York Times*, 11 January 2018.

[17] *Houston Chronicle*, 15 January 2018.

[18] 例见, Amfirstbooks.com, 它们利用了麦迪逊·格兰特和洛斯罗普·斯托达德 (Lothrop Stoddard) 的优生学理论并发出警告, 比如“美国, 看看挪威, 看看你自己, 别再谋杀北欧民族了!” 它们告诉读者, 北欧国家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同质性, 以保持“北欧人的特征”, 正是这些特征使北欧国家在技术创新和创业方面具有优势。它们对美国历史的描述也将北欧主义和“未竟的事业”的神话结合在一起: “真正的致命一击来自北方侵略南方独立战争期间的‘林肯国王’的独裁统治……联邦政府接受了强制性的种族和民族融合, 扼杀了北欧人/凯尔特人的新兴部落文化, 加速了犹太天主教在社会的战略基础上剥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种族层面上, 联邦政府在所谓的‘重建时代’ (Reconstruction Era), 通过在南方建立反南方白人阴谋的政权, 首次大举介入强迫种族融合的事业……” 等等。

[19] “The Choice 2016”, *Frontline*, PBS, Season 35, Episode 1, 27 September 2016.

[20] Donald Trump Interview, CNN, Correspondent: Becky Anderson, 10 February 2010.

[21] “Trump Challenges Tillerson to ‘Compare IQ Tests’ After Reported ‘Moron’ Dig”, *Guardian*, 10 October 2017.

[22] Hadley Freeman, “Donald Trump: It is My Hair and It is an Amazing Thing” , *Guardian*, 2 October 2012.

[23] Peter Baker, “DNA Shows Warren Harding Wasn’ t America’ s First Black President” , *New York Times*, 18 August 2015.

[24] Adam Serwer, “Jeff Sessions’ s Unqualified Praise for a 1924 Immigration Law” , *Atlantic*, 10 January 2017.

[25] “Stephen Miller, the Powerful Survivor on the President’ s Right Flank” , *New York Times*, 9 October 2017.

[26] *Charlotte Observer*, Charlotte, NC, 19 September 1916.

[27] *New York Times*, 26 September 1916.

结束语

当然，这些比较只能带领我们走到这里。1916年的世界与2016年的世界并不相同。找到这些相似之处，并不能让我们的故事止步于此；相反，它们开始启发我们了解美国的共同意义。

历史不是表面相似的问题，人们也不是由单一的选择来定义的。举个例子，雨果·布莱克曾是三K党成员，但后来成为一名非常开明的最高法院法官。但如果人们不应被一次选择或一种职位定义，那就值得再追问这个问题：某些选择是否完全不可原谅，做出了这种选择是否就意味着自动丧失了资格，就像《匹兹堡邮报》在其对布莱克的披露报道中所指出的那样。多萝西·汤普森提出的这个疑问同样值得反复揣摩，即纯粹的政治权宜之计对任何社会的代价是什么。如果你没有被一次选择定义，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被一次选择评判，尤其是被历史评判。

正如我们必须警惕过去与现在的差别一样，我们也应该看到连续性。这段历史表明，民主依赖于诚信。这就是多萝西·汤普森和沃尔特·李普曼一再坚持的观点。个人恶意操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要想让这个制度取得成功，就必须诚信行事。

事实证明，我们的理想主义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理想。毕竟，“公序良俗”不仅意味着基本的道德，而且是一种共同坚守的道德。公序

良俗与无耻之徒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结束——公序良俗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取得胜利。

并不一定要在令美国梦成为现实的情况下，才能塑造这个国家的历史——只需要反复重申美国梦，就可以保持理想的活力。当这个梦想从一个定义各异、争论激烈的集体民主理想，转变为一个很少受到质疑的个人成功的意愿时，它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性质。正如1914年弗吉尼亚州一份报纸的社论所言，我们都是为了梦想而变得更好。

公平地说，每个时代都创造了自己的美国梦——美国梦不是在不断失败，而是在不断成功地适应新的环境。进步时代激发了美国社会正义和经济平等的梦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唤起了美国的国际民主梦；爵士时代激起了美国人对无尽财富的梦想；大萧条促成了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梦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点燃了自由民主的美国梦；战后的繁荣推动了向上流动和民主资本主义的美国梦；民权运动重拾了民主平等的美国梦。

但是，如果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美国梦，那么我们今天的美国梦是什么呢？

美国梦的意义已经不再被每一代人争论，现在人们争论的只是它的现实；这也许就是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所说的“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战斗”的内涵。

然而，尽管人们对美国梦大声疾呼，但作为一个概念，它变得毫无生气，僵化成某种静态、扁平的东西。美国梦不再继续适应——不是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而是适应不断变化的伦理要求。

今天，美国继承了一个对其梦想轻描淡写的故事，掩盖了一个事实：美国曾经梦想过更广阔的未来。如果连你的梦想都不再挥洒肆

意，那么你一定迷失了方向。这个丰富、复杂、困难的梦想是与生俱来的，却在战后的淘金热中被遗忘。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辛克莱·刘易斯、多萝西·汤普森和其他所有人都警告说，在一场追逐财富的竞赛中，这个梦想可能会被抛弃。

热爱民主不是陈词滥调，也不是感情用事。美国人表现得好像民主可以经受住任何挑战。威权主义一直存在于美国人的生活中，上一次对这种势力进行“激烈抵抗”应该是在75年前，如今另一场抵抗又将来临。美国梦曾经在国家危急时期团结了美国人民，但最终改变方向，令民心分崩离析。

真理总是比任何改良主义者的理想更丑陋。正如本书所显示（无论是含蓄的还是明确的）的那样，美国总是避免直面自身历史中的种种恐怖。事实远没有美国告诉自己和世界的神话那般传奇。但神话和事实也并非完全泾渭分明，因为正如本书所述，神话帮助塑造了事实。

特朗普当选后，许多撰写有关美国梦“已死”的专栏作家指出，美国梦曾经是一个拥有更宏大精神抱负的国家理想，而今则已沦为纯粹的物质主义。^[1]可以肯定的是，战后个人抱负的确开始收缩。

但正如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所言，美国人对个人成功有过更宽泛的定义。关键是，美国梦曾经是一个集体理想，而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理想。之后它从一个平等民主的政治梦想变成了一个追求机会的个人梦想，再进一步退化为纯粹的物质主义。我们对美国梦之死的挽歌只有在火化时才会开始唱起，仿佛它的灰烬就是我们所失去的一切。

或许更重要的是，许多自诩为美国文化专家的人宣称，曾经象征着美国梦的社会民主原则如今与之背道而驰。恰恰相反：社会民主与

社会正义的思想是这一表达的根源，它源于一场关于进步主义、社会民主与不平等的对话。正是这些力量催生了这个短语——努力控制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确保所有美国人的福祉，而不仅仅是有钱有权者的福祉。

尽管有些人认为美国梦只能指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断言社会民主本质上是反美的，但历史并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事实证明美国人对美国梦一直以来的看法不止于此。至少，没有人能确切地主张美国梦只意味着资本主义和个人的经济抱负。还有些人主张，美国梦是为了保护白人特权而创造的遮羞布，是为了掩盖奴隶制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种族主义基础，这也不是事实。当然，近年来它被用来这么做，而且这种情况可能经常发生；但当美国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总会起到劝诫的作用，敦促所有美国人做得更好、更公平，反对偏见和不平等，为一个平等的共和国而奋斗。梦想没有实现甚至尚未接近并不意味着梦想已经堕落。但它确实意味着人们在堕落。

所有这些都不能否认我们现在使用“美国梦”的合法性。语言是集体的，多变的；它会不断演化发展。很明显，美国梦现在意味着人们用它来表达的意思，其中包括个人的繁荣。机会平等确实一直是这个理念的一部分——这句短语只不过是改变了向这个国家提出的如何实现机会平等的建议的方向。

问题不在于对这个短语现在的使用方式做出道德判断，而在于质疑它一直以来的使用方式，或者它现在的使用方式是否代表了它一直以来唯一的含义，抑或可以再次表达的含义。

我的观点也不同于“原旨主义”（originalism），“原旨主义”是指一个词或一份文件最早的含义才是正确的，因为它代表了最初的用意——就好像对美国梦的更古老的定义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它们出

现得更早。比起物质主义的美国梦，我更喜欢民主的美国梦，但原因并不在于后者最先出现。我之所以更加青睐它，是因为它更好。

理想主义不是无穷无尽的；民主亦然。正如许多作者警告的那样，我们必须更新这些理念。我们的理想并不总是和他们的一样，但都应该建立在共同的原则之上。这是一个关于老派的无形资产的故事：关于伦理、道德和品格——如果我们把它们当成过时的东西抛诸脑后，就一定会面临危险。没有它们，我们就只剩下一些非常具体的有形物：腐败、腐朽的统治、诈骗。那些也过时了。带有民族主义恶意的白人至上主义同样如此。

美国人需要重拾对社会契约的信念，重拾对社会作为道德经济的认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以重拾美国梦的名义这样做。但我们没有理由以美国优先的名义这样做。

没有抱负就没有进步。但并非所有的抱负都是平等的。

1941年8月，多萝西·汤普森为《哈泼斯》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谁会成为纳粹？》（Who Goes Nazi?），在这篇文章中，她建议在社交聚会上玩一个“有点恐怖的室内游戏”，“猜测谁会在摊牌时成为纳粹分子”。^[2]她说，法西斯主义是现代人的一种疾病，这种人“被灌了一肚子的维生素，全身充满了其智力无法约束的能量。他接受了各种形式的教育，这使他摆脱了压抑。他的身体很强壮，思想却很幼稚。他的灵魂则几乎完全被忽视。”

通过鉴别房间里的不同人群——“天生的纳粹分子，民主本身造就的纳粹分子，未来注定结伴同行的旅伴”，以及“那些在任何能想象的情况下都不会成为纳粹分子的人”，汤普森指出，纳粹主义与国

籍无关，而是与“特定类型的思想”有关。她描述了人物甲、人物乙等，预测了每一个人信奉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直到出现了人物丁，于是汤普森宣称，他是“这个房间里唯一天生的纳粹分子”。

人物丁是个“被宠坏的儿子”，母亲对他极为溺爱；他——

一辈子都没有被人冒犯过。他游戏人生，想看看他能逃脱什么惩罚。他经常因为超速被逮捕，他的母亲支付罚款。他对两任妻子都很无情，他母亲负责支付赡养费。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刺激和戏剧性中度过。他完全不体谅别人。他长得很好看，空洞、傲慢，而且极度虚荣。他肯定会幻想自己穿着一件制服，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威风凛凛地凌驾于众人之上。

房间里还有一位年轻的移民。尽管“他的英语有点磕磕巴巴——他五年前才学会的”，但他“读了大量的美国历史，将惠特曼的诗牢记于心，想知道为什么真正读过《联邦党人文集》的美国人如此之少”。

房间里的其他人“都认为他不是美国人，但他比几乎所有人都更美国化。他发现了美洲，他的精神就是拓荒者的精神。他对美国感到愤怒，因为美国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力量、美丽和能量。”

除了懂得自己价值（其中一个是一慷慨）的美国人，移民也是这个房间里法西斯主义最大的反对者。

历史表明，只有团结起来，他们才能战胜人物丁。只有团结起来，他们才能重新为了一些对所有人来说都殊为紧迫的公众利益而努力。

SC，芝加哥和伦敦，2017

[\[1\]](#) Peggy Noonan, “What’s Become of the American Dream?” *Wall Street Journal*, 6 April 2017.

[\[2\]](#) Dorothy Thompson, “Who Goes Nazi?” *Harper’s*, August 1941.

致谢

写作这本书并不在我的计划内；我一直在研究美国梦的修辞历史，这个理念与西方民主国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交织在一起，于是在偶然间激起了我写书的念头。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成为这些运动的全球代言人，并以“美国优先”为口号成功当选美国总统。

在上一本关于菲茨杰拉德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书出版后，我受邀在海伊文学节的伦敦图书馆系列讲座上发表了关于美国梦的演讲。在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美国报纸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注意到，30年代对美国梦的讨论似乎暗示了一些与我们的标准理解截然不同的东西。那场名为“美国梦的秘密历史”的演讲，开启了我思考和研究的历程，并最终促使我写作了本书，所以我首先要感谢运作海伊文学节的彼得·弗洛伦斯（Peter Florence）和伦敦图书馆的邀请。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的研究和思考不断发展；关于本书思考的一些早期版本出现在《伦敦图书馆杂志》（*London Library Magazine*）、《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卫报》、《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和《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以及英国各地的讲座和研讨会上。其中之一是2016年春季的布里斯托尔创意节，那是我第一次把唐纳德·特朗普带到了这个故事的上下文之

中。2016年大选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根据选举结果，对自己曾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进行改写，文章参考了菲茨杰拉德的《游泳者》，本书也引用了该书的部分片段。感谢《金融时报》记者乔纳森·德比希尔（Jonathan Derbyshire）那天早上给我的绝佳灵感。

2017年2月，我在伦敦大学英语研究所（Institute of English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做了一次讲座，讲座协办方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英国校友会，在演讲中我首次阐述了上述这些想法。感谢主办方和观众鼓励我继续思索这些理念，感谢英语研究所和高等研究院同事的支持和配合，没有他们，本书不可能完成。

几周后，BBC第四台委托制作了一部关于美国梦和美国优先的纪录片；感谢莫希特·巴卡亚（Mohit Bakaya）、彭妮·墨菲（Penny Murphy）和沙卜娜姆·格雷瓦尔（Shabnam Grewal）为这部纪录片所做的工作，感谢凯文·克鲁泽（Kevin Kruse）、达里尔·平克尼（Darryl Pinckney）、安德鲁·罗斯·索金（Andrew Ross Sorkin）、托马斯·萨格鲁（Thomas Sugrue）和莱斯利·文贾姆利（Leslie Vinjamuri）在这部纪录片的采访中所做的卓越而慷慨的贡献，这些都帮助我形成了自己的想法。

在那之后不久，我与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版社的亚历克西斯·科什鲍姆（Alexis Kirschbaum）交谈。令我有些惊讶的是，她相信关于这个题材值得写一本书，而且在出版的每一步中都为它大声疾呼。唯一能与她对这个项目的信心所媲美的，就是她出色的编辑工作，对于她的这两点以及她给予我的帮助，我都感激不尽；我会边喝香槟，边告诉她其余的一切。感谢安杰利克·陈文桑（Angelique Tran Van Sang）的耐心和清晰的思维，感谢凯瑟琳·弗莱

（Katherine Fry）对本书（繁复细密）一丝不苟的编辑，感谢格雷格·亨尼曼（Greg Heinimann）出色的书衣设计。

如果没有我了不起的研究助理萨达夫·贝茨（Sadaf Betts）的鼎力相助，我不可能及时完成本书的写作。贝茨追踪了许多问题的答案，并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简·罗伯逊（Jane Robertson）、林德西·斯通布里奇（Lyndsey Stonebridge）和艾丽卡·瓦格纳（Erica Wagner）阅读了早期草稿，并给出了明智的建议和鼓励。苏珊娜·利普斯科姆（Suzannah Lipscomb）在完成自己著作的最后阶段，花时间仔细而严谨地审阅了本书初稿，极大地改进了分析和论证；而安德鲁·拉达勒维格（Andrew Rudalevige）慷慨地提供了他的专业意见，帮助我更好地梳理了本书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当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本书的写作中时，我手头还有一本关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书正进展到一半，这本书是我在2015年开始动手写的，得到埃克尔斯大英图书馆作家奖（Eccles British Library Writer's Award）极其慷慨的支持。埃克尔斯美国研究中心（Eccles Centre for American Studies）一直为我的工作提供宝贵的资源，当我告诉他们我要中断关于亨利·詹姆斯的写作项目，转而从事这项工作时，他们表现出特有的大度。我要感谢中心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凯瑟琳·埃克尔斯（Catherine Eccles）和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es），感谢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和鼓励。

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经纪人和亲爱的朋友彼得·罗宾逊（Peter Robinson），就像我们在家里说的，他一直是我的坚强后盾。我真希望大卫·米勒（David Miller）能读到本书。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父母，让我相信知识的重要性，赋予我对美国历史及其价值观的热爱，如果没有这些，我的人生将会大打折扣。我要把本书献给温德姆

（Wyndham），谢谢他为我做的一切，但尤其要感谢他像我一样深切关心本书想要表达的意图。

参考文献

Adams, James Truslow, *A Searchlight o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1930.

———*The Epic of America*,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31.

Agar, Herbert, *The Land of the Fre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35.

———*What is America? : A New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London: Eyre Spottiswoode, 1936.

Alien, Frederick Lewis, *Only Yesterday: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 s*, New York: Perennial, 1964 (1931) .

Anderson, Sherwood, *Windy McPherson' s Son*, New York: John Lane, 1916.

Apel, Dora, *Imagery of Lynching: Black Men, White Women, and the Mob*,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Ayers, James E. ‘ “The Collosal Vitality of His Illusion” : 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Dream in 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 , *LSU Doctoral Dissertations*, 2767.

Barton, Bruce, *The Man Nobody Knows: A Discovery of the Real Jesus*,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24, 1925.

Bouchard, Gerard, *National Myths: Constructed Pasts, Contested Present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Brooke, Rupert, *Letters From America*, New York: Beaufort, 1988 (1916) .

Bryer, Jackson, ed., *F. Scott Fitzgerald: The Critical Reception*, New York: Burt Franklin & Co., 1978.

Campbell, Marius Robinson, et.al., *Guidebook of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5.

Chandler, Lester V., *America' s Greatest Depression, 1929—194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Cole, Wayne S, *America First: The Battle Against Intervention, 1940—1941*,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3.

Coolidge, Calvin, 'Whose Country Is This? ' , *Good Housekeeping*, February 1921, Vol.72, No.2.

Cooper, Jr., John Milton, Jr., *Woodrow Wilson: A Biography*,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9.

Cullen, Jim, *The American Dream: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a that Shaped a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Davis, Forrest, *Huey Long: A Candid Biography*, New York: Dodge Publishing, 1935.

Delbanco, Andrew, *The Real American Dream: A Meditation on H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ewey, John, 'Tommorrow May Be Too Late' , *Good Housekeeping*, 20-1 March, 1934.

Dreiser, Theodore, *Twelve Me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8 (1919) .

Du Bois, W.E.B,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1935) .

Dyer, Thomas G.,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Evans, H.W., 'The Menace of Modern Immigration' , *Knights of the Ku Klux Klan*, pamphlet, 1924.

Faulkner, William, *Absalom, Absalom!*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6.

Fitzgerald, F.Scott, *The Great Gatsb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25) .

—— ‘The Swimmers’ , *Saturday Evening Post*, 19 October 1929.

—— *The Vegetable: or from President to Postma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923.

Fousek, John, *To Lead the Free World: American Nationalism &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Garrett, Garet, ‘America Can’ t Come Back’ , *Saturday Evening Post*, 23 January 1932.

Garrett, Paul Willard, ‘The Jazz Age in Finance’ ,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229, No.2 (February 1930) .

Ghosh, Cyril, *Th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Dream: Democratic Inclus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Gilbert, Felix,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Grant, Madison,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or,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916.

Greer, Guy, ‘Arming and Paying For It’ , *Harper’ s*, November 1940.

Harding, Warren G. , *Our Common Country: Mutual Good Will in Ame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3 (1921) .

Herring, George C. , *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 U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Hertog, Susan, *Dangerous Ambition: Rebecca West and Dorothy Thompson, New Women in Search of Love and Power*, New York: Ballantine, 2011.

Hewes, Jr., James E. , ‘Henry Cabot Lodge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114, No.4 (August 1970) .

Hofstadter, Richard,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1955) .

Jenkins, McKay, *The South in Black and White: Race, Sex and Literature in the 1940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Jillson, Cal, *The American Dream in History, Politics, and Fiction*,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6.

Katznelson, Ira, *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Liveright, 2013.

Kauffman, Bill, *American First! : Its 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5.

Kennedy, David,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 1929—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Kurth, Peter, *American Cassandra: The Life of Dorothy Thomps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90.

Lallas, Demetri. ‘ “From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to the People” : The American Dream (s) *Debut* ’ ,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2014, 37.

Leuchtenburg, William E. ,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The Perils of Prosperity, 1914—193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1958) .

Lewis, Sinclair, *Babbit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2.

———*It Can' t Happen Here*, New York: Doubleday, 1935.

Lippmann, Walter, *Drift and Mastery: An Attempt to Diagnose the Current Unrest*, New York: Mitchell Kennerley, 1914.

———*The Stakes of Diplomacy*, New York: Henry Holt, 1915.

—— ‘Education and the White Collar Class’ , *Vanity Fairy* July 1923.

———*Men of Destiny*, New York: Macmillan, 1927.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BN Publishing, 2008.

Littell, Robert, *Read American First*, Freeport, New York: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68 (1926) .

Locke, John,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London: W. Baynes & Son, 1823 (1689) , 24th edn.

Luczak, Ewa Barbar, *Breeding and Eugenics in the American Literary Imagination: Heredity Rul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McCutcheon, George Barr, *West Wind Drift*, New York: A. L. Burt Company, 1920.

MacLean, Nancy K. , *Behind the Mask of Chivalry: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Ku Klux Kl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Manela, Ezra,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rchand, Roland, *Advertising the American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Midgley James O. , and Livermore, Michelle,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olicy*,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8.

Mugridge, Ian, *The View from Xanadu: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Montreal: McGill-Queen' s University Press, 1995.

Nevins, Allan, *James Truslow Adams: Historian of the American Dre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8.

Olson, Lynne, *Those Angry Days: Roosevelt, Lindbergh, and America' s Fight Over World War II, 1929—1941*,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Parsons, Frank, *The City for the People: Or, The Municipalization of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of Local Franchises*, Philadelphia: C.F.Taylor, 1900.

Pegram, Thomas, *One Hundred Percent American: The Rebirth & Decline of the Ku Klux Klan in the 1920s*, Chicago: Ivar R. Dee, 2011.

Phillips, David Graham, *Susan Lenox: Her Fall and Rise*, New York: D.Appleton & Company, 1917.

Procter, Ben,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The Later Years, 1911—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Ravage, Marcus Eli, *An American in the Making*,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17.

Rawlings, William, *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Invisible Empire: The KKK of the 1920s*,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Rieder, Jonathan, *Gospel of Freedom: Martin Luther King, Jr. 's 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and the Struggle that Changed a Nation*,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Roberts, Kenneth L. , ‘Shutting the Sea Gates’ , *Saturday Evening Post*, 28 January 1922.

Rosenberg, Emily S. ,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 1890—1945*,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2.

Samuel, Lawrence R. ,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Sandage, Scott A. , *Born Losers: A History of Failure in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arles, Ruth, *A Story of America First: The Men and Women Who Opposed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World War II* (ed. Bill Kauffman) , 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2003.

Schorer, Mark, *Sinclair Lewis: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1.

Sinclair, Upton, *100%: The Story of a Patriot*, Auckland, New Zealand: The Floating Press, 2013 (1920) .

Sirkin, Gerald, ‘The Stock Market of 1929 Revisited: A Note’ ,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49, No.2 (Summer 1975) .

Steel, Ronald,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80.

Steinbeck, John, *Of Mice and Men*, New York, Covici-Friede, 1937.

——— *The Grapes of the Wrath*, New York: Penguin, 1939.

Thompson, Dorothy, *I Saw Hitler*,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2.

—— ‘Back to Blood and Iron’ , *Saturday Evening Post*, 6 May 1933.

—— ‘Back to Blood and Iron’ , *Saturday Evening Post*, 6 May 1933.

—— ‘Room to Breathe In’ , *Saturday Evening Post*, 24 June 1933.

—— ‘Who Goes Nazi? ’ , *Harper’ s*, August 1941.

—— ‘What Lindbergh Really Wants’ , *Look*, 18 November 1941.

Vera Hernán, and Gordon, Andrew M. , *Screen Savors: Hollywood Fictions of Whitenes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Wall, Wendy L. , *Inventing the ‘American Way’ : The Politics of Consensus from the New Deal to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Wheelock, David C., 'Regulation and Bank Failures: New Evidence from the Agricultural Collapse of the 1920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52, No.4 (December 1992) .

White, Eugene N., 'The Stock Market Boom and Crash of 1929 Revisited'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4, No.2 (Spring 1990) .

White, John Kenneth and Hanson, Sandra L., eds, *The Making and Persistence of the American Drea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White, William Allen, *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Allen White 1899—1943*, Walter Johnson, ed., New York: Henry Holt, 1947.

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damic, Louis, 266

Adams, James Truslow, 103, 170—9, 181—2, 199—202, 304
—5

Advertiser (Montgomery) , 301

African-Americans, 60—2, 64, 93, 108, 134—5, 184—289

Agar, Hebert, 203, 208, 214

Akron Beacon Journal, 102

Alcott, Louisa May, 22

Alger, Horatio, 22—3, 38, 211—12

‘alienism’ , call for purging of, 92

Alien, Frederick Lewis, 176

‘America first’

and anti-British sentiment, 163—4

and approach to Second World War, 247—8, 250—1, 254—5, 260—1

attributed to Wilson, 43, 191—2, 298

becomes divisive, 87—8

code for secret racism, 235

early uses of the phrase, 41—3, 270

and First World War, 43—50, 77—8

and immigrants' names, 149—50

Klan motto, 91, 121, 150

and lack of foreign policy, 129—30

motto for local papers, 83

and 'one hundred per cent Americanism' , 55—60, 64—5, 150

rallying cry for protectionism, 81

and return to isolationism, 79

revived for Roosevelt campaign, 191

and tourist industry, 42

Trump and, 291—2, 294, 299, 329—30

and underground Klan, 288

see also America First Committee

America First Committee, 1, 4, 42, 270—4, 276—8, 282, 284, 294, 329

America First Day, 157—8

America First Foundation, 163—4, 189—90

America First, Inc., 197, 239, 246—8, 256

American Aryan Folk, 247—8

‘American creed’ , 24—5, 72—3, 78—9, 176, 218—19

American Civil War, 9, 15, 25, 61—2, 300—1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82, 86—7, 204—5, 278

American Destiny Party, 276

‘American dream’

Adams’ s redefinition, 170—9

and ‘American creed’ , 24—5, 72—3, 176, 218—19

antithetical to social democracy, 207

and Berlin lecture, 180

centrality of democracy to, 222

‘death’ of, 305—6

debasement of, 284—5

early uses of the phrase, 21—7, 32—3, 75, 310—11,

316

eclipsed (1924) , 139

as egalitarian principle, 223

and emerging individualism, 145—6

and First World War, 67—70

and foreign policy, 286—7

Horatio Alger and, 212

and immigrant experience, 101, 105, 145

increased use of the phrase, 170, 174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134, 288, 331

and novels, 102—5, 139—41, 309

opposed to ‘America first’ bigotry, 257—68

opposed to inequality, 213—14

and proposed World Court, 145

as protest against inequality, 27—30

surge of talks and essays, 204—7

and ‘white picket fence’ , 211, 325

and womanhood, 145

and world peace, 102

American Economist, 85

American Fascist Khaki Shirts of America, 248

American Fascist Order of Black Shirts, 248

American Gentile Protective Association, 247

American Idea, The, 174

American in the Making, An, 72

American Legion, 160, 236, 247, 271

‘American Dream’ sermon, 202—3

American Nationalists, 248

American Nazi Party, 289—90

American Saga, 174, 224

American White Guard, 248

Amoroso, Nicholas, 14

Anderson, Sherwood, 37, 147

Angelo Rizza Fascista League, 14

anti-Semitism, 2, 10, 128—9, 216—17, 227, 291, 294

Lindbergh and, 259—60, 264, 275, 279—83, 294

opposed to American dream, 264—6

and rise of American fascism, 234, 236, 238—40, 246—
8, 251

Appeal (St Paul) , 127, 130

Arendt, Hannah, 262

Asiatic Barred Zone, 156

Awakening of America, The, 174

Baltimore Evening Sun, 242

Baltimore Star, 56

Baltimore Sun, 185

bank failures, 175

Bannon, Steve, 4, 294, 299, 330

Barton, Bruce, *The Man Nobody Knows*, 142—3

Beveridge, Albert J., 90—1

billionaires, considered un-American, 28

Birth of a Nation, The, 62—4, 301

Black, Justice Hugo, 241—4, 287, 299, 303

Black Legion, 238, 243, 248

Black Shirts (Tacoma) , 248

Bolshevism, 71, 117, 145, 317

Boston Globe, 135

boycotts, 119, 185, 195

Bradish, Prudence, 149

Brady, Robert A., 244

Braunstein, Baruch, 216

Brooke, Rupert, 104

Brooklyn Daily Eagle, 26, 127, 129, 135, 195—6, 227—9,
246, 259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287

Buchanan, Pat, 290—1

Buffalo American, 134, 161

business, as religion, 103—4, 142—3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

Calvinism, 144

Cantor, Eddie, 237

Capital Times, 120

capitalism

associated with white supremacy, 137

enshrined as essential freedom, 286

foundations in slavery, 306

monopoly capitalism, 27—9

Capone, Al, 110

Carisi, Joseph, 13

Catholics, 17, 117, 234, 246, 259, 332

Ku Klux Klan and, 64, 123, 131, 150, 159—60

Central Republic Bank of Chicago, 271

Century, The, 57

Chamberlain, Neville, 248

Chapin, Mary E.T., 68

Charlotte Observer, 301—2

Chicago Day, 190

Chicago Herald Examiner, 280

Chicago Tribune, 32, 46, 67—9, 106, 111—12, 133, 149, 164, 183, 195, 270, 276, 300

Chillicothe Gazette, 251

Chinese Exclusion Act, 47, 58, 217

Christian Crusaders, 262

Christian Front, 227, 262, 276

Christian Mobilizers, 262, 276, 283

Christian Party, 236—7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17

Christian Vigilantes, 234

Churchill, Winston, 247

Cincinnati Enquirer, 232

Citizen Kane, 297

City for the People, The, 28

‘City upon a Hill’ , 6

civil rights movement, 61, 161, 221, 287—8, 299, 304

Clayton, Elias, 94

Cleveland, Grover, 27

Clinton, Bill, 290

Clinton, Hillary, 298

Cohn, Roy, 289

Cold War, 6, 8, 71, 179, 268, 285—7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23

communism, 71, 137, 185, 197, 201, 211, 216—17, 220,
247, 253

concentration camps, 259, 270

Confederate statues, 300—2

Coolidge, Calvin, 121, 143—4, 146, 153, 156, 158—60

Cooper, James Fenimore, 22

‘corporationism’ , 178

Corrupt Practices Act, 197

Coughlin, Father Charles E. , 227, 236, 252, 262, 270, 280

Council for Democracy, 273

Cox, James M. , 121

Crèvecoeur, Hector St. John, 22

Crusader White Shirts, 238

Cuba, 23, 253

cummings, e. e. , 270

Daily Stormer neo-fascist website, 294

Dallas Express, 94—5, 135

Daniels, Lige, 94

Daugherty, Harry, 152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47, 236

Dawes, Charles G. , 153

Decline of American Capitalism, The, 174

Defender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238

Democratic Party

and anti-lynching bill, 134—5

and Great Depression, 169

and Harding campaign, 87—8, 96, 113

and Klan influence, 152, 154—6

party of the South, 61—2

and Prohibition, 165

revives ‘America first’ slogan, 191

and Wilson presidency, 55, 70

Denby, Edwin, 152

Dennis, Lawrence, 271, 276

Des Moines Register, 129, 131, 278, 282

Detroit Free Press, 158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 77, 87, 149, 255

Dewey, George, 29

Dewey, John, 178

Disney, Walt, 270

Dixon, Thomas W., 62, 301

‘Dollarland’ , 180

Dothan Eagle, 189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139

Dreiser, Theodore, 9, 72, 147

Drummond, Roscoe, 217

Du Bois, W.E.B. , 239

Duke, David, 289—92

Dust Bowl, 27, 175

Dutch merchants, 141

Dyer Anti-Lynching Bill, 133—5

Early, Stephen, 282

Easter Rising (Ireland) , 43

‘economic nationalism’ , 299

Edge, Walter, 83

education, 107—10, 177—8

Eichmann, Adolf, 262

El Paso Herald, 132

Eliot, Charles W. , 82

Eliot, T.S. , 32

Emerson, Ralph Waldo, 37

English language, 45—6

Erickson, Elaine, 235

Espionage and Sedition Acts, 117

eugenics, 53, 61, 121, 150, 260, 295—6, 312, 332

Evans, Hiram, 161—2, 294, 299

Evening Press (Muncie) , 187

Evening World, 122—4

exceptionalism, 6—7, 43, 231, 267, 278

‘fake news’ , 44, 81, 296, 298

Fall, Albert, 152

farm ownership, 210

fascism

American Legion and, 160

alt-right, 292—3, 300

called ‘Americanism’ , 246—7, 252

corporate nature of, 262, 268

described as totalitarianism, 162—3

emergence of, 127—33, 135—8

European, and white nationalism, 262

explained to American readers, 244

 ‘native fascism’ , 272

and patriotism, 236, 238

rise of ‘American fascism’ , 166, 185, 230—40, 246—53

Faulkner, William, 9, 239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208, 287, 331

Federal Reserve Act, 61

Fight for Freedom, Inc., 278

Firch, Virgil A., 190

First World War, 116, 144, 179, 214, 268, 271, 304

 and German-Americans, 46—8

 and ‘hyphenate’ hysteria, 46—50

 and isolationism, 1, 43, 45—6, 51, 54—5

US enters, 43—6, 67—70, 77—8

Fitzgerald, F.Scott, 9, 110—11, 304

‘The Diamond as Big as the Ritz’ , 142

The Great Gatsby, 139—42, 148, 224

‘The Swimmers’ , 146—8, 302

The Vegetable, 110—11

Forbes, Colonel Charles, 153

Ford, Gerald, 270

Ford, Henry, 153—4, 176, 249, 270—1

Fortune magazine, 209, 211

‘American Dream’ editorial, 219—22

Founding Fathers, 90, 214, 288

Fox News, 293

Frank, Jerome, 247

Frank, Leo, 64

Franklin, Benjamin, 35

free enterprise, 212—13, 220, 286

Freedom House, 217

Friends of New Germany, 195—6, 217

Fulani, Lenora, 291

Garbo, Greta, 30

Garner, John Nance, 191—2

George V, King, 163, 194

German-American Bund, 196, 217, 229, 237, 240, 244, 248,
250—1, 256, 262, 270—1, 276, 278, 280, 296

Gettysburg Address, 74

Gilded Age, 9, 27, 73, 147

Gish, Lilian, 270

Goering, Hermann, 257

Goldsborough, Fitzhugh, 30

Good Housekeeping, 121

Gorka, Sebastian, 294

Grant, Madison, 58—9, 157, 332

Grant, Ulysses S., 25

Great Depression, 116, 169—70, 174—6, 194, 210

Great Society, 288

Griffith, D.W., 62—3

Grynszpan, Herschel, 249

Guardian, 2—3, 297

Guggenheim brothers, 211

Guthrie, Woody, 287

Hamilton, Alexander, 21—2

happiness, pursuit of, 2—3, 36—7, 177, 204, 268

Hardin County Ledger, 54

Harding, Warren G., 42, 84—9, 92, 101, 110, 113—16, 119—21, 128, 134, 190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152—3

and racial purity, 95—7, 298

Harper's magazine, 266, 307

Hartford Courant, 267

Hawley—Smoot Tariff, 169

Hawthorne, Nathaniel, 22

Hays, Will, 88

hazing, 47—8

health care, 179, 181

Hearst, William Randolph, 54, 81, 83, 117, 190—2, 194, 197, 227, 236, 247, 282, 286, 297

Hearst's Magazine, 78

Hess, Rudolph, 195

Heyer, Heather, 292, 300

Hirohito, Emperor, 278

Hitler, Adolf, 7, 10—11, 128—30, 183—4, 232—4, 236—7, 245, 248, 255, 262

America First Committee and, 276—7

and Friends of New Germany, 195—6

Hearst meets, 197, 297

Lindbergh and, 257—8, 270, 274—5, 278, 281—3

Mein Kampf, 183, 255—6, 264

Pat Buchanan and, 290

persecution of Jews, 259—60, 264

and Second World War, 256—8, 266—72

Trump and, 291

Holiday, Billie, 186

Hollywood League Against Nazism, 237

Holt, Rush, 251

home ownership, 207—8, 211

Hoover, Herbert, 146, 169, 176, 208—10, 241

Hoover, J. Edgar, 235

Hotel Hermitage (New York) , 125

Houston Chronicle, 294—5

Huffington Post, 288

Hughes, Charles Evans, 48—54, 56, 120

Hungarian Nazi Party, 294

Hylan, John F., 109, 118

‘hyphenates’ , 46—50, 52—3, 56—8, 60—1, 95, 137, 166

Ickes, Harold, 275—6

immigrants’ names, 149—50

immigration

debates on, 105—6

from Japan, 156, 159

quota system introduced, 156—9

rising in 1920s, 116

Trump and, 299—300

Immigration Act (1965) , 288, 299

Indianapolis Journal, 84

‘individualism, rugged’ , 172, 201

inequality, 2, 26—30, 36—7, 71, 105, 114, 116, 181,
194, 201, 306

opposed to American dream, 213—14

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 , 117, 317

Iola Register, 270

IQ tests, 107—8, 296

Irish-Americans, 43, 46, 73, 163

Irving, Washington, 22

isolationism

anti-isolationist cartoons, 276

and First World War, 1, 43, 45—6, 51, 54—5, 68, 77,

renewal in 1930s, 227—9

renewal under Harding, 119—20

Roosevelt confronts, 192—4

and Second World War, 245, 247, 254—8, 260—70, 276—8

Trump denies, 291

Italian-Americans, join fascists, 136—7

Jackson, Andrew, 8, 171, 213

Jackson, Elmer, 94

jazz age, 177, 304

Jefferson, Thomas, 2—3, 22, 35—7, 90, 213—14, 216, 272

Jesus Christ, 142—3, 154

Jewish National Workers Alliance of America, 275

Jews, 47, 57—8, 89—90, 101, 105, 108—9, 117, 145, 216—17, 332

and alt-right fascism, 292—3, 299

European, 128—9, 216, 253—4, 259, 264, 279—80

Jewish refugee' s prayer, 218

and Kristallnacht, 248—9, 259

Ku Klux Klan and, 64, 123, 131, 150, 159—60, 162

and Lindbergh' s anti-Semitism, 259—60, 264, 275, 279—83, 294

and rise of American fascism, 234, 236, 238—40, 246—8, 251

see also anti-Semitism

jingoism, 39, 71, 77, 79, 84

Johnson, Lyndon B. , 288

Johnson, Samuel, 238

Johnson—Reed Act, 156—9, 253, 288, 299

Kahn, Julius, 57—8

Kansas City Journal, 280

King, Martin Luther, Jr, 134, 288, 331

Knights of the Flaming Sword, 154

Knights of the Ku Klux Klan, 290

Knights of the White Camellia, 256, 262

Kristallnacht, 248—9, 259

Ku Klux Klan, 8, 93, 95, 140, 234, 238, 276, 283

‘America first, motto, 91, 121, 150

and America First Foundation, 163—4

and Confederate statues, 301—2

decline in 1930s, 184—6, 189

and fascism, 127—32, 135—8, 155, 184, 318

Hiram Evans defends, 161—2, 294, 299

Invisible Empire Token, 288, 331

Justice Black and, 241—4, 303

‘Klavana’ , 15

membership, 123, 161, 321

and Memorial Day riots, 15—17, 166, 295—6

opposition to liberalism, 161—2

political influence, 150—6

post-war, 288, 290, 292—3

revived by Simmons, 63—5

rise in 1920s, 121—6

Trump and, 294—6, 299

Kuhn, Fritz, 237, 240, 248, 252, 262, 280

Labor World (Duluth) , 28

Lazarus, Emma, 46

League of Nations, 70, 79—81, 84, 88, 91, 145, 155, 227

Lee, Robert E. , 300

Lewis, Sinclair, 9, 205, 277, 298, 305

Babbitt, 102—5, 143, 232—3

It Can' t Happen Here, 230—2, 236, 252

libertarianism, 34, 220—1, 270, 326

liberty, Jeffersonian idea of, 2—3, 36—7

Liberty magazine, 275, 281

‘liberty cabbage’ (sauerkraut) , 47

Lincoln, Abraham, 60—2, 74, 82, 272

Lindbergh, Charles, 1, 4, 7, 13, 254, 257—62, 264, 270—
2, 274—5, 278—84, 294, 295

Lippmann, Walter, 32—6, 44, 80, 90, 101, 105, 107—10, 118, 171, 191—2, 212, 233, 261, 263, 269, 277—8, 285—6, 296, 303

and ‘American dream’ , 32—3, 310—11, 316

Locke, John, 3, 36—7

Lodge, Henry Cabot, 84, 192, 269

Long, Huey, 8, 179, 229—30, 272

Longworth, Alice Roosevelt, 270

Look magazine, 282

Los Angeles Times, 14, 52, 201, 215

Lost Cause myth, 300, 302, 332

Loyal Aryan Christians, 238

Luccock, Halford E. , 246

Luce, Henry, 272

Lusitania sinking, 73

lynching, 60, 64—5, 91—5, 117—18, 125—6, 186—9, 217, 235, 313, 315

Dyer anti-lynching bill, 133—5

James K. Vardaman promotes, 159

Justice Black and anti-lynching legislation, 241

McAdoo, William G., 62, 132—3, 152, 154—6, 165

McAfee, Colonel, 301—2

McCarthy, Joseph, 8, 289

McCormick, Colonel Robert r., 270

McCulloch, Roscoe, 190

McCutcheon, George Barr, *West Wind Drift*, 73—4

McGhie, Isaac, 94

Madison, James, 22, 34

Manchester Guardian, 29

March on Washington, 288

Marsh, Reginald, 188

materialism, 3, 102, 104, 141, 171, 176, 204—5, 305, 307

May Day riots (1919) , 71

Mayflower pilgrims, 161

Mellon, Andrew, 165, 176

‘melting pot’ , 46, 53, 106, 158, 204

Melville, Herman, 22

Memorial Day (1927) riots, 13—17, 166, 295—6

Mencken, H.L. , 89

Mexican War, 116

Miami News, 146, 255

military draft, 222—3

Miller, Stephen, 294, 300

Millikan, Dr R.A. , 201—2

Milwaukee Journal, 145

Minneapolis Star, 267

miscegenation laws, 52

Monroe Doctrine, 272

Morgan, J.P. , 165

Morning Call (Allentown) , 195

Mornington News (Wilmington) , 42

Morrow, Dwight, 176

multimillionaires, 21, 75

Munich Agreement, 248

Mussolini, Benito, 13, 110, 127, 131—2, 136—7, 162, 185, 236, 245, 278

‘mystical anarchism’ , 34

Napoleon Bonaparte, 22, 154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ured People (NAACP) , 64

National Independence Equal Rights League, 62

National Origins Act (Johnson—Reed Act) , 156—9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New York) , 248

National States’ Rights Party, 289

nativism, 24, 53—4, 59—60, 95, 106, 156, 185, 229, 247, 257, 270, 296

Neal, Claude, 188—9

Negro Labor Congress, 186

Nelson, Knute, 58

Neutrality Acts, 255

New Deal, 179, 181, 197, 201, 207—9, 220, 237, 240,
246, 248

New Masses magazine, 239

New Republic, 44, 80, 107

New York American, 83

New York Daily News, 290

New York Herald, 96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233, 280

New York Post, 21—2, 24, 106

New York Times, 42, 46, 56, 82, 84, 87, 89, 104, 130,
150, 155, 164, 180, 184, 191, 193, 197, 208, 212, 214, 224,
281, 300, 302

‘The American Note’ essay, 199—200

and ‘hyphenates’ , 47—9

reports on Friends of New Germany, 195—6

reports on lynching, 188—9

and rise of fascism, 246—7

New York Tribune, 81, 92, 121, 128

New York World, 127

New Yorker, 188

News of the World (Los Angeles) , 244

Nordicism, 58—9, 121, 156—7, 161, 164, 295—6, 332

Norlin, Dr, 180

North American Review, 50

Nye, Gerald P. , 270

Oakland Tribune, 235

Obama, Barack, 293, 298

Ohio Gang, 152—3

Omaha World Herald, 281

‘one hundred per cent Americanism’ , 14, 55—60, 71, 97, 117—19, 131, 134—5, 164, 184, 237, 248, 296, 300

Ku Klux Klan and, 64—5, 122, 125, 150, 155, 184

one-drop rule, *see* racial purity

originalism, 306—7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3, 30, 32, 38, 68, 326

Page, Thomas Nelson, 63

Page, William Tyler, 78—9

Palin, Sarah, 293

Palmer Raids, 116

paternalism, 27, 173, 201—2

patriotism, 42, 49, 56, 60, 84, 97, 103, 120, 173, 219,
231, 246

and fascism, 133, 135—6, 238

opposed to nationalism, 204

Pat Buchanan and ‘new patriotism’ , 290

wartime, 77—8

‘Pawn’ s Count, The’ , 78

Peace Corps, 270

Pearl Harbor, 284—5

Pelley, William Dudley, 236—7, 246

Phagan, Mary, 64—5

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 127, 129

Philippines, 23, 71

Phillips, David Graham, 30—2

Pittsburgh Daily Post, 74

Pittsburgh Post, 87

Pittsburgh Post-Gazette, 241—2, 303

Pittsburgh Press, 101, 229, 259, 275

plantation fiction, 63

Ponzi schemes, 116

Primo de Rivera, Miguel, 136

Progressive Era, 9, 27, 29, 101, 105—6, 112, 172, 176,
304

Prohibition, 118, 153, 155, 165, 175

propaganda, 35, 81—2, 89, 128, 163, 197, 215, 232, 249,
271, 275, 281, 298

protectionism, 50, 80—1, 119, 169, 193, 286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The, 236, 280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181

Puritan work ethic, 32, 37, 74

Pursuit of Happiness, 174

race riots, 71

racial purity (one-drop rule) , 52—4, 61—3, 125, 137,
158—9, 296

and Harding campaign, 95—7, 298

racism, scientific, 107, 313

see also eugenics

railroads, 23, 69

Reader' s Digest, 260

Reagan, Ronald, 6

Reconstruction, 15, 64

Red Scare, 71, 116

Reed, David, 156

Reed, James, 90, 119, 156

Reform Party, 290—1

regulation, 33—4, 36, 111—12, 209, 220—1

Republican Party

and anti-lynching bill, 134

appeal to xenophobia, 192

corruption scandals, 153—4

fails to adopt anti-lynching policy, 91—2

and fascism, 128

and Harding campaign, 87—8, 96, 110, 113—15

indifference to civil rights, 161

opposition to League of Nations, 81, 84—6

opposition to Roosevelt reforms, 181

party of the North and Union, 61-2

and Roosevelt presidency, 193, 195, 208-9

and Second World War, 269

Riefenstahl, Leni, 297

Ritchie, Albert, 165

Rockwell, George Lincoln, 289

Roosevelt, Eleanor, 233, 261

Roosevelt, Franklin D., 7, 88, 175, 180-1, 183, 191-2,
197, 200, 208-11, 220, 237-8, 251, 277

and four freedoms, 273, 285-6

‘Quarantine Speech’ , 245

and refugees from *St. Louis*, 253-4

Supreme Court appointments, 240-1, 243, 245

Roosevelt, Theodore, 27-8, 55-6, 58, 64, 82, 201, 213,
300

position on race, 312-13

Russian Revolution, 70

St. Louis, refugees from, 253-4

St. Louis Post-Dispatch, 74, 97, 131, 133, 163

St. Louis Star and Times, 254

San Bernardino County Sun, 70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57, 281

Santayana, George, 32

Saturday Evening Post, 157, 174, 296

Schlesinger, Arthur, Jr, 292

Schorer, Mark, 205

Scranton Republican, 50, 81, 197

Sears, Roebuck, 271

Second Great Awakening, 118

Second World War, 181, 214, 256, 268, 285, 304

Dunkirk evacuation, 268–9

US enters war, 284

segregation, 62, 64, 217

Sessions, Jefferson Beauregard, 299

Seuss, Dr, 276

Sherman Anti-Trust Act, 27

Shipp, Thomas, 186–8

Shipstead, Henrik, 273

Shriver, Sargent, 270

Silver Shirt Legion, 236–7, 246, 256, 262, 278

Simmons, William Joseph, 63, 65, 122, 154

Sinclair, Upton, *The Story of a Patriot*, 117–18

slavery, 52, 61, 94, 217, 220–1, 300, 306

Smith, Abram, 186–8

Smith, Al, 191

Snyder, Timothy, 4

social Darwinism, 158

social democracy, 3, 26, 33, 74, 207, 221, 286, 304–6

Social Justice Society, 262

social mobility, 2, 4, 25, 31, 72, 107, 109–10, 145, 199, 285

social security (welfare) , 200, 237

socialism, 33, 74, 89, 145, 201, 209, 237, 239, 255, 272, 317

Southey, Robert, 23

Spanish–American War, 116

Spirit of St. Louis, 254

Springfield Republican, 137

Star Tribune (Minneapolis) , 127

‘stateism’ , 201, 209

Statue of Liberty, 46, 228, 265

Steinbeck, John, 9, 175

The Grapes of Wrath, 223–4

Of Mice and Men, 211

Stoddard, Lothrop, 332

Stowe, Harriet Beecher, 22

Sturzo, Luigi, 162

suicide epidemic, 169

Tacoma Ledger, 137

Tampa Bay Times, 118

Tampa Times, 127

taxation, Harding administration and, 115–16

Tea Party movement, 293

Teapot Dome Affair, 152–4

Thomas, Norman, 270

Thompson, Dorothy, 7, 129, 183–4, 232–5, 256, 261–3,
293, 303, 305

and America First Committee, 271–2, 277

anti-fascist writings, 233–5, 237–8, 240, 245–6, 249–
53, 268, 307–8

and debasement of American dream, 284–5

denounces Lindbergh, 261–2, 274–5, 282–3, 295

ejected from Germany, 232–3

and Justice Black appointment, 242-3, 299

Thompson, William Hale (‘Big Bill’) , 109-10, 163-4, 189-90, 194, 227

Tillerson, Rex, 296

Time magazine, 233, 239

Tocqueville, Alexis de, 22, 199

‘totalitarianism’ , word enters language, 162-3

Treaty of Versailles, 79-80, 84-5, 90, 232, 271, 299

True, James M. , 197, 239, 246

Truman, Harry S. , 285-6

Trump, Donald, 1-2, 4, 8-9, 285, 289-99, 305

Trump, Fred C. , 17, 166, 285, 287, 289, 295-6, 309-10

Trump Management, sued for racial discrimination, 289

Twain, Mark, 22

Tyler, John, 78

unemployment, 169, 175, 207

Union Party, 237, 300

Unite the Right movement, 293, 300

University of Iowa, 173

US Bureau of Education, 45

US Constitution, 52, 70, 146, 159–60, 197, 204, 234–6

Vanity Fair, 110, 291

Vardaman, James K., 158–9

Vespucci, Amerigo, 150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Bureau, 153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278

Vidal, Gore, 270

Volstead Act, 153

Wall Street, 166, 206, 237, 262

Wall Street Crash, 148, 169

Wall Street Journal, 152

Washington, Booker T., 312

Washington, George, 51, 68, 251, 274

Washington, Jesse, 65

Washington Herald, 113

Washington Post, 69, 74

Washington Progress, 92

Washington Times, 130

Welles, Orson, 297

Wheeler, Burton K., 270

White, William Allen, 97, 282

White Band of Caucasian Crusaders, 185

‘white collar’ , first use of the term, 38

white supremacy, 4, 9, 15, 122, 125, 131, 137, 162, 185,
262, 288, 293, 299, 307

and Confederate statues, 300–2

and fascist organisations, 236–7

The Great Gatsby and, 140–2

James K. Vardaman and, 158–9

Woodrow Wilson and, 61–2

see also Nordicism

White Youth Alliance, 290

Whitman, Walt, 308

Who Owns America? , 174

Wilhelm II, Kaiser, 43

Wilson, Woodrow, 39, 43-5, 47-50, 54-5, 61-4, 67, 70,
92, 117, 269

and 'America first' slogan, 43, 191-2, 298

and League of Nations, 79-81, 84-5

Winthrop, John, 6

Wisconsin Jewish Chronicle, 239

Wise, James Waterman, 235-7

Wood, General Leonard, 82

Woolcott, Alec, 163

World Alliance Against Jewish Aggressiveness, 238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145

World Court, 145, 194, 227

Wright, Frank Lloyd, 270

xenophobia, 53-4, 71, 77, 88, 95, 106, 192, 247, 290, 293

Zionism, 1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优先和美国梦：1900—2017/（美）莎拉·丘奇威尔（Sarah Churchwell）著；詹涓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1

书名原文：Behold, America: A History of America First and the American Dream

ISBN 978-7-5201-7975-1

I. ①美… II. ①莎…②詹… III. ①美国-历史-1900-2017
IV. ①K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12136号

美国优先和美国梦，1900—2017

著者/〔美〕莎拉·丘奇威尔（Sarah Churchwell）

译者/詹涓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肖世伟

责任印制/王京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1 字数：282千字

版次/2021年11月第1版 2021年1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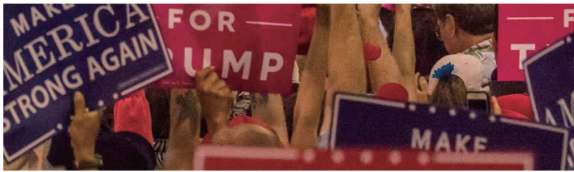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201-797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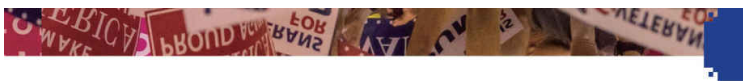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1370号

定价/8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美国优先”和“美国梦”，一个始终与白人至上紧密相连，一个代表着民主和经济平等的广泛愿景。

本书从文化史角度，对“美国梦”和“美国优先”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和著述，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表现和影响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梳理。

★ 史料非常丰富、详实，以百年间美国地方和全国性的报纸、杂志、书籍以及重要政治人物的演说等历史资料为重要依据。

★ 将“美国梦”和“美国优先”的发展演变划分为 1900—1920、1920—1930、1930—1940、1945—2017 四个阶段论述，脉络清晰，从对比中看清美国文化和政治走向。

此时，许多人都在问美国的未来会怎样，《美国优先和美国梦，1900—2017》提供了一幅不加修饰但富有启示性的画卷，揭示出美国曾经历的一切。



索·恩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定价:88.00 元



索·恩 历史图书馆

〔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著

透过千年历史，看清帝国真相

古罗马到美国

从逻辑

帝国统治的

HERFRIED MÜNKLER

程卫平——译

DIE LOGIK DER WELTHERRSCHAFT ·
VOM ALTEN ROM BIS ZU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 (Herfried Münkler)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院士。他写的很多书都已成为权威学术作品，比如《新战争》（2002），《帝国》（2005），荣获“莱比锡书展奖”的《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2009），《新德国人》（2016）和《三十年战争》（2017）等，这些著作几乎都曾占据《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数月之久。赫尔弗里德·明克勒还曾获得过多个学术奖项和荣誉，包括阿比·瓦尔堡学术奖、弗里德里希·席德尔文学奖、约翰内斯·古腾堡基金会教授席等。

程卫平，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德、英文自由译者，德语教师。

图书策划人



视觉设计师

联合创立

逻辑 帝国统治的

IMPERIE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历史图书馆丛书序

自然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乳交融，共同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方式。碎片化阅读和深度阅读是始终共存又相得益彰的两种学习形态。在大众传媒极大地便利了实时资讯传播，提供了琳琅满目的个性化趣味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主动应对多元化的刺激，习得深度处理、记忆信息的技能，构建自身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正是我们坚守深度阅读的阵地，推出历史图书馆丛书的初衷。

阅读权威、经典的好书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对思考人类命运和当下现实大有裨益。因此，收录进历史图书馆丛书的优秀作品主要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它们往往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乃至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反映了一个较长历史时段的发展趋势。这些著作是研究者经年累月在一个领域深耕的成果，梳理了某个事件、领域或学科的脉络，是全景式、集大成的学术著作。它们涉及世界史、国别/区域史、考古研究、海外中国研究、文化史等，在研究和写作上各具魅力，在知识和观点上相互映照，未来也将接受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断考验。而除了历史事件，人对历史进程的走向也起着关键作用，个体因素往往是我们看待历史发展不可忽视的一点，因此重要历史人物将被收录在索·恩即将推出的人物档案馆丛书中。

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着全球性的疾病、战乱、环境恶化、资源限制等挑战。仍如狄更斯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索·恩历史图书馆丛书愿与读者共读历史，共思当下，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洪流中形成更审慎和周全的判断，既敏锐捕获新知，又不迷失于信息，透过不同视角看到更广大的时代图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索·恩编辑部

本书获誉

明克勒的《帝国统治的逻辑》一书独树一帜，因为他并不仅仅谈论了美国，而且对欧盟这个潜在的帝国也提出了引人入胜的思考。

——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德国战略学家明克勒写作风格讲求实际，他在这部极有学术抱负的比较学著作中阐明了帝国的世界历史逻辑。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

可比肩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的《帝国》及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的《人民与帝国》，堪称“帝国”主题下最好的总结性专著之一。

——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

尽管明克勒的关注点牢牢立足于当今世界，但其《帝国统治的逻辑》一书与其他试析帝国的著作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他在论证时显示了远大学术抱负，展示了丰富的史学考察。明克勒挑战了关于这一主题的许多评论所特有的“现时论”立场，他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全景式史学之旅，从古罗马与秦帝国这两大“平行帝国”到中世纪晚

期和近代早期的海洋帝国与草原帝国，再到现在的“美利坚帝国”……这是一次愉悦的阅读体验。

——《澳大利亚政治学杂志》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明克勒将理论和实证严丝合缝地编织在一起，《帝国统治的逻辑》是一部卓越的史学分析之作。

——《政治研究评论》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明克勒一个人就是行走的智库。

——德国《时代周报》 (*Die Zeit*)

对帝国进行了引人入胜的考察。

——《论坛》 (*Tribune*)

如果你感兴趣的是在史料和政治理论基础之上做出分析、得出结论，而不是满足于那些在有关美利坚帝国的日常讨论中已司空见惯的陈词滥调，那么这本书绝对值得你一读。

——安德烈斯·费尔埃克 (Andreas Vierecke) 博士

明克勒深入地追溯了古往今来各大帝国的兴衰沉浮，梳理了帝国主义与帝国的概念范畴，并对当今两大案例做出发人深省的持平之论：美国的帝国命运的矛盾因素，以及步美国后尘的欧盟——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特征，但出于客观必要将不可避免地采用帝国形式。在21世纪的今天，秩序和稳定话题成为安全问题的核心，这本书不仅构思精巧、行文优雅，也紧切时代脉搏，或可作为我们重要的指南。

——詹姆斯·高（James Gow），伦敦国王学院（King' s College London）

毫无疑问，这是目前关于古往今来各大帝国统治逻辑的最佳著作。实证的广度令人叹服，它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整本书行文雅正，思路清晰。

——约翰·A·霍尔（John A. Hall），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 [前言](#)
- [第一章 什么是帝国？](#)
 - [/ 帝国特征简述](#)
 - [/ 世界帝国与超级帝国](#)
 - [/ 帝国的干预压力、中立选项与修昔底德的米洛斯对话](#)
- [第二章 帝国、帝国主义和霸权：必要的区分](#)
 - [/ 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式动力：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
 - [/ 中心与边缘问题](#)
 - [/ 威望追求与权力竞争：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
 - [/ 扩张压力、边缘“地利”与时间主权](#)
 - [/ 霸权和帝国：棘手的区分](#)
- [第三章 草原帝国、海洋帝国和全球经济体：帝国统治的简要分类](#)
 - [/ 通过军事和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的帝国构建模式](#)
 - [/ 帝国的两翼（或多翼）](#)
 - [/ 帝国周期与奥古斯都门槛](#)
- [第四章 文明教化与蛮族边界：帝国秩序的特点和任务](#)
 - [/ 和平：帝国统治正当性的源泉](#)
 - [/ 帝国使命与帝国的神圣性](#)
 - [/ 蛮族论与帝国空间构建](#)
 - [/ 繁荣：帝国统治正当性的源泉和统治方略](#)
- [第五章 帝国落败于弱者的权力](#)
 - [/ 帝国过度延伸的形式](#)
 - [/ 政治动员与军事非对称化：反帝国行为体的策略](#)
 - [/ 文化认同之争与作为毁灭性战争策略的恐怖主义](#)
- [第六章 帝国在后帝国时代的意外回归](#)
 - [/ 关于帝国时代终结论的评析和后帝国空间的问题](#)
 - [/ 美国：新的帝国](#)
 - [/ 民主帝国？](#)
 - [/ 欧洲面临的帝国挑战](#)
- [参考文献](#)
- [致谢](#)

前言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德国学术界对帝国理论及历史的研究就一直兴味索然，远不如前。苏联的解体，一时间又重新激发起人们对帝国的兴趣，然而也仅仅收获了一个让人松了口气的结论，即可上溯至早期文明时期的帝国历史终于画上了休止符。但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随着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新角色日渐明朗，这一情形骤然转变。一时间，“美利坚帝国”成为热议话题，而且从此以后，对美国在世界政坛所作所为的批评带上了一种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倾向。虽然此前美国也时常被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遭人诟病，比如其对越南的战争，以及在拉丁美洲或在波斯湾的军事干预等，但这些指责针对的都是美国政府某些特定的决策和行动，而反帝国主义的基调则直指美国的整体优势及其主宰权。显然后一种批评要严重得多。

国际社会为保障自身安全是否意味着非得仰赖帝国的主宰性力量不可？还是说，这种帝国的主宰性力量已严重破坏了世界秩序？如果没有这种主宰力量，世界是否会变得更好？在最近一次海湾战争^[1]爆发之前的争论，说到底，正是围绕这些问题所展开的。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聚首联合国的国际社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倚重帝国强权的力量行事。帝国的付出并非出于无私，美国就曾为此一再索取特权，只是这一点我们都不愿承认罢了。由此而生的种种困惑和误解，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认真思考过帝国的功能和诉求问题了。

帝国不仅仅是大国，它们活动于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普通主权国家联合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创建一个容纳它们的秩序体系，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力支配这个体系。帝国则不同，它是秩序体系的缔造者，也是维护者。这个秩序的存在，离不开帝国。面对一切威胁秩序生存的不和谐声音，它都必除之而后快。而回顾美国及诸多帝国的历史时，我们不难发现诸如“邪恶轴心”或“暴政前哨”的修辞术并非当代美国人的发明，那些词汇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整个帝国史。

帝国害怕秩序动荡，担心整个帝国秩序陷入混乱。它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捍卫“善”和“治”，抵御“恶”与“乱”。在这样的角色里，帝国为自己的存在自赋了正当性。除此之外，帝国的使命在根本上也同样为世界帝国的形成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使命涵盖的内容很广：可能是传播文明遍及各地，或是让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在全球开花结果，或是保护人权、推进民主。普通主权国家不越国界的雷池，克制自己干涉别国内政；帝国则不同，它为了践行使命，难免插手他国内部事务。所以，帝国的行动可能会触发国际政局的大变迁，相形之下，主权国家构成的秩序体系在整个结构上则明显带有保守主义倾向。

有人认为，由权利对等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全球秩序，理应成为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和梦想。在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下，这几乎已成为理所当然的真理。然而，当我们从上文所述的角度来考察问题，就会发现，这种想法未必可靠。在欧洲大地上，自罗马帝国衰亡以后，其内部政治秩序几经变迁，却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可比肩罗马、国祚永续的强大帝国政权；欧洲史上先后涌现的那些强国也不过是觊觎这一王座的竞争者罢了。它们的统治后来都一一夭折了，这在世界其他地方——先撇开欧洲人曾在其他大陆建立过超级帝国不谈——可并非如此。特别是在亚洲，常见的政治秩序是帝国居中心、一帮附庸国环绕

四周。因此，这些地区的政治秩序都高度集权化。欧洲的秩序特点则偏向多中心布局。

谈到帝国，我们脑中先会浮现一个画面：边缘被帝国肆意剥削、压榨一空；边缘陷入穷困，而中心则越来越富有。事实上，这样的帝国确实一直都有，但皆年寿不永。时间一长，反抗帝国中心的怒潮便一浪高过一浪，帝国统治成本一路走高，以致超过帝国在边缘搜刮到的利润。与之相反的是，另一些帝国则致力于边缘的投资建设，国祚久续。他们的投资在边缘臣民中获得回报，那些人渐渐跟中心地带的百姓一样，心系帝国的安危存亡。

所以，本书要讨论的重点在于：帝国统治的类型，它对外扩张和巩固政权的方式，以及帝国得以形成的手段和条件，等等。但此书的认知旨趣并不拘囿于在海洋帝国与陆地帝国之间做区分，在商业帝国和军事帝国之间划清界限，搞清哪些帝国秩序依靠控制疆域壮大、存续，又有哪些大致倚重对人力、商品和资本流动的掌控。我们更要深入诸多行为体的理性层面，梳理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书中还会对美帝国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做一些分析，并且给欧洲把脉问诊，为它所面临的难题提供参考性意见：我们该怎么塑造欧洲，才能让它成为一支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独立政治力量，同时又能稳住自己骚乱不安且波及内里的边缘，并对诸多邻国发挥其积极的影响？这样的欧洲既要吸收帝国的特质，更当练就帝国的功力。细细察之，会发现这一发展趋势已然启幕。当然前提是我们不能从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地认定帝国行动一定代表卑劣和虚伪，而应当把它视作主权国家以及国际政治组织之外的另一种应对国际问题的体系形式，认可它的存在。

假若有人认为这是在为昔日的殖民帝国招魂，那就大错特错了。毕竟对于美国人来说，在一个殖民帝国的压迫之下杀出一条血路，最终赢得了独立，这是他们独立建国的神话；而对欧洲人而言，那（殖

民帝国）曾经用以统治海外领土的方式，早已被抛在身后，这是他们的自我认知。然而问题是，在未来几十年里，立足于平等性和相互性原则的主权国家模式能否成功应对渐露端倪的各种挑战，这是值得怀疑的。国家失败，特别是国家崩解，这都会诱发帝国的干预行动，或者直接催发帝国的诞生。

对此很多人提出异议，认为主权国家和帝国并非世界政治秩序的全部选项。关于良善政治秩序的类型，他们心中充满五花八门的期许和幻想，不一而足。然而这种观点与现实相去甚远。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政治秩序终归逃不出两大模式：主权国家和帝国。当然，我们应从广义上，以更宽宏而非偏狭的视角去理解国家和帝国这两个概念。不能一碰到国体和帝制的特例，便马上生造出一个新的大概念出来。在此我们将挖掘帝国概念的深义，勾画出帝国诞生及其崩溃消亡的轨迹。在学术上我们将就此走进一片长期荒置、久未有人踏足的领地。

2005年2月于柏林

[\[1\]](#) 即伊拉克战争。（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第一章 什么是帝国？

欧洲人对伊拉克战争的讨论，对美国再次军事干预海湾地区的可能背景及其掩藏目的的争辩，乃至对美国在海湾到中亚地区所扮演角色的思量，无不进一步促使欧洲人将目光聚焦于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成形。从《京都协议书》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美国屡屡置身国际公约之外的行径，正重新定义美国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地位。2002年9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联合国大会上威胁道，如果国际组织无能为力的话，美国将会在一些紧迫的安全政治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几十年来，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一直问题缠身、矛盾不断，小布什的这番表态，使得双方的关系在根本上受到了质疑。

这也绝非空洞的恫吓。2003年早春，伊拉克战争的炮火声即证实了这一点。对于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之间的新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解读可能：要么美国将安理会的功能转向听命于美国并为其行为赋予合法性的工具，要么美国开始致力于从其国际组织“打手”的角色中解脱出来。美国发达且昂贵的军备不再服役于国际性组织，而更多地投入其自身利益和目标的实现。出现在伊拉克战争备军阶段的矛盾冲突，也反映了各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即究竟哪一方能将另一方作为工具加以利用：美国利用联合国，抑或是联合国利用美国。[\[1\]](#)

在这之前，德国国内本可仰赖的欧洲安全构架也同样出现了裂痕。北约的角色正悄然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建立在协商基石之上的联盟已在20世纪90年代演变为美国控制欧洲的工具。在其政策鞭长莫

及之地，美国便祭起“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willing）的大旗。事实上，跟冷战时代相比，欧洲人对美国的依赖有增无减：谁若拒不跟随美国路线共同行动，重者将遭逢来自后者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轻者面临铺天盖地的冷嘲热讽、口诛笔伐。相反，若有意站到美国一方行动，机会则随时都有，当然前提是要满足美国提出的条件，且不插手美国在政治上的根本性决策。即便是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也一再验证了这一点。美国在伊拉克曾经陷入困境，于今[2]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北大西洋联盟中共同协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北约东扩也在事后证明了，那正是从冷战时代走来的盟友们影响力明显削弱的肇始。[3]

在这一局势下，一种呼声日渐高涨，即冀求美国安于其“仁慈霸主”（wohlwollender Hegemon）之职，而不贪求一种“帝国强权”。为了强化这一警告，人们力陈帝国所受的那不可控的风险，提到古往今来所有帝国面临的过度延伸的危险以及最终因之而覆亡的教训。在美国执教的英国人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说：“直到晚近时期，美国的权力都是霸主式的，就是说在原则上得到他国的首肯，而且常常被视为是合法的；如今这种权力却出自枪管。而这反过来削弱了它的霸权地位和成为‘仁慈帝国’的资格。”[4]曼还指出，任何一国倘图谋以帝国地位换取霸主地位，不仅可能无功而返，甚至到头来连霸主的地位都保不住。在历史上，霸主和帝国以种种方式互相牵制和对抗，而每每几乎总有迹象表明：保持霸主地位胜于追求帝国统治。

一时之间，始自美国在海湾地区利益和意图问题的辩论，掺入了大量史料证据和历史比较。这种史料索引以及同早期历史发展的类比有助于人们拨开迷雾，把美国政策及世界政局中不断冒出的新谜团引入相对熟悉和清晰的观察轨道。人们搬出罗马帝国的历史做参照物，来评判美国政策的机遇和风险；大英帝国的结构则为衡量美国的帝国

挑战和应对挑战所需之力提供了一个模板。此外，十年前^[5]上演的苏联解体，也作为帝国过度延伸的恶果被一再援引，那也将是美国如长此以往一意孤行或可面临的危险。^[6]这些历史参照和示例有关联性，但缺系统性，它们只是在论证前人早已提及的观点。这些举例和参考更多的是为论证提供史学的注脚，而非从早期世界帝国的诞生史中做出一种深刻的经验主义总结。

如今将美国历史和罗马历史并行比较，理由不言自明。原因就在于：美国从建国伊始，一直以罗马共和体制为基石，并将自己视为罗马传统的继承者。^[7]在这里，笔者将严格审视这样一个平行比较，它自始至终深植于美国政治精英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之中，举足轻重。首先，美国同大英帝国的比较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美国进入了英国在二战后退出的广阔地区并取而代之，成为那些地区的主导：这其中包括中东，这些年它与美国大部分的政治行动和军事策动都息息相关。和苏联的比较也属情理之中，毕竟美苏为争夺世界政治霸权角力40多年，直至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最终在拉锯战中被踢出局，俄国人终因军备竞赛而掏空了自己，也因维系帝国的高昂代价而一蹶不振。^[8]

如果对美利坚帝国的机遇和风险做深入的分析，单单跟这三个世界帝国做比较，根基仍显单薄。寿命长久得多的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很有必要列入对比和考量的名单。而13世纪的蒙古帝国对于研究帝国行动逻辑和行动需求同样不容忽视。它在历史上虽然昙花一现，但它疆域之广足令其跻身历史最强帝国之列：面积达25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仅仅逊色于拥疆3800万平方公里的大英帝国。不同的是，英国人的属地散布于五大洲，而蒙古人的帝国则覆盖了几几乎整个欧亚大陆，连成一气。在后者权力的极盛时期，其疆域东起黄海，西至波罗的海之岸，无远弗届；唯印度半岛、中南半岛、西欧、中欧及南欧地区未遭占领。^[9]在古典时期，除了罗马帝国，

那些东方的希腊化大帝国也是值得我们考察的对象。在诸多海洋帝国当中，除了大英帝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也应加入考量之列，它既是欧洲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殖民帝国。不过18世纪以来，葡萄牙一直更像是英帝国的一个保护国，而不似独立自主的政治强权。^[10]

通过这样一番整理，一个在对帝国行动逻辑进行比较性研究时绕不开的基本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究竟该如何理解帝国这一概念。如若进一步论及超级帝国和世界帝国的区别，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倘若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科学领域对帝国的研究已经总结出有关帝国性的可靠标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恐怕不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有关具体帝国的历史叙述可谓卷帙浩繁，有关帝国主义的比较性研究也颇有建树，^[11]然而究竟何为帝国，帝国与欧洲领土国家结成的政治秩序之间差异何在，这些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这也是为什么在近来有关美国政治的辩论中，帝国概念常被随意援引、往往只具谴责意义。政治学家也没有在定义上廓清、在实例上充实帝国的概念，而是把它交到了每日时评员手里被随意使用。

学术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空白，不可能一朝一夕填补起来。然而，帝国是什么，帝国不是什么，帝国职责何在，以及帝国与其他政治秩序结构差别何在，弄不清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从世界帝国形成的比较研究中，找到分析 世界新秩序以及新秩序中美国角色的有益线索。只有先弄清帝国的特点，才可能真正理解帝国的行动逻辑。

^[11] 关于伊拉克战争之前的形势分析，参见Aust (Hg.) : *Irak*，特别是第39页起若干页；Tilgner: *Der inszenierte Krieg*，第17页起若干页；Kubbig: *Brandherd Irak*，特别是第9~20页；Wolfgang Sofsky: *Operation Freiheit*，第66~74页，以及 本书作者Münkler: *Der Neue Golfkrieg*，第19~28页。

[2] 到此书写成的2005年。

[3] 关于北约东扩的历史及涉事各方的意图，参见Asmus: *Opening NATO's Door*。

[4] Mann: *The Incoherent Empire*, 第252页；类似表述见 Czempiel: *Pax Americana oder Imperium Americanum?* 这一概念显然可以追溯到Kagan的一篇文章: *The Benevolent Empire*。

[5] 指成书之前十年。

[6] 将美国和罗马帝国进行系统性比较可见Bender: *Weltmacht Amerika*, 把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称为“新罗马” (New Rome) 始于19世纪中期，见 Gollwitzer: *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1卷，第489页起若干页；与英帝国统治方式的隐性比较贯穿Mann的论述: *The Incoherent Empire*; Todd: *After the Empire*介绍了苏联衰亡等对美国命运的昭示；有关美国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进行对比的想法也出现在Ferguson的书中，参见 *Colossus*, 第19页起若干页，第34页起若干页。

[7] 参见Wood: *The Creation*, 特别是第48页起若干页；Richard: *The Founders and the Classics*。美国虽然自豪宣称其对罗马共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但同时也对罗马从共和制过渡到帝制的历史持批判态度。罗马史学研究中提到的罗马人因此而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而按美国人的说法，这些坏毛病也转移到了大英帝国身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通过艰苦战斗脱离英国而获得独立，也是将共和制从帝制里挽救出来了。参见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第131页起若干页，以及Wood: *The Creation*, 第35页起若干页。

[8] 对此详述见Daschitschew: *Moskaus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第41页起若干页和第511页起若干页。

[9] 对大英帝国和蒙古帝国的比较，参见Göckenjan: *Weltherrschaft oder Desintegration*；关于蒙古帝国的扩张，参见Weiers: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第45页起。

[10] 关于阿契美尼德帝国（波斯第一帝国）及其希腊化继任帝国——作为连接地中海地区与亚洲的中间帝国——在Breuer的书中有生动描述: *Imperien*, 第122~158页；对葡萄牙在欧洲殖民帝国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带头作用的深入研究，

见Abernethy: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第45页起若干页, 以及
Reinhard: *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 第25页起若干页。

[\[11\]](#) 这方面的简述可参见Mommsen: *Imperialismustheorien*。

/ 帝国特征简述

要理解何谓帝国，不妨先走到其反面，试析帝国不是什么。首先，帝国有别于国家，准确地说有别于制度化的领土国家，后者遵从完全不同的准则和行动逻辑，包括内部人口融合方式和对属地边界的理解。一般而言，国家间的边界清晰而明朗，但这种明晰的国界除了少数例外，鲜见于帝国。昔日帝国属地广袤无垠，边境的部落和游牧族群时而顺从、时而违逆帝国的意志，帝国之界变得模糊不明。当然，如今帝国的疆界不再如上述古代帝国那样迷失于属地的辽阔无际，但是即便那些曾经不受统治的游离地带（古典帝国扩张的触角曾得以伸入其中）早已不复存在，帝国疆界和国家边界依然迥然不同。

帝国的疆界不是将权利对等的政治实体隔开，而是起到将权力和影响力分层之用。此外，与国家边界相反的是，帝国的疆界具有单向通行的特点：进入帝国的条件，绝不等同于脱离帝国的条件。这跟帝国本身的经济和文化吸引力有关，想进去的人多于想出来的人，而这一点也会对边缘政权造成诸多影响。美国人旅行、工作，在全世界畅行无阻，但没有美国国籍的人，就不能随意踏上美国的领土。这昭示了一种地位上的差距：在帝国边界之外的政治实体并不享有与帝国同等的尊严。

和帝国边界的单向通行性相对应的，是极端不对等的干预条件。从19世纪开始，美国涉足中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政治，从不必担心这些国家倒打一耙，干预美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事务，更别提军事事务了。这种不对称性恰恰反映了帝国疆界和国家边界的差别所在。与国家截然不同，帝国没有与之权利对等的邻国，换句话说就是，国家是个复数概念，帝国则往往是单数形式出现。帝国这一事实上或自我标榜的独特性对其内部融合方式不无影响。由于面临来自

邻国的直接竞争压力，国家在整合其境内人口时会采取一视同仁的做法，这就意味着：无论民众是生活在中央，还是远在边塞，都须给予其同等权利。而帝国却并非如此。在政治中心地带和外围之间总是存在融合度的落差，越往外围去，法律约束力越小，而参与权力中心决策的机会也随之下降。以美国为例，这种情况体现在所有那些被美国政权所左右但又绝无可能被美国吸纳为联邦州的地区。在加勒比海地区就不乏这样的例子。

在某些时候，帝国疆界也可以替代国家边界。曾几何时，在欧洲境内，诸多殖民帝国通过国家边界各自分开，但在亚非大陆它们则借助一道道帝国边界，同自己的欧洲邻居——很多时候是松散的统治联合体——彼此隔开。两种边界截然不同，透过边界可以看清楚，在边界之外究竟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帝国。但是帝国疆界也可能与主权国家间的边界重叠，而且这种叠加会使得国家间的边界更加泾渭分明、壁垒森严。曾经横亘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那条国界，在当时，也是苏联帝国的对外边界。这种功能二合一的情形，赋予了两德边界独有的特点，也正因如此，这条边界才没有在历史的长卷中被人遗忘。自地球上每一片有人居住的地方都以主权国家的形式在政治上被敲定以后，上述两种边界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互补性关系，而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性关系了：帝国结构覆盖主权国家构成的秩序，但不再取而代之。这时候，辨识一个帝国就变得异常困难了。一旦认定帝国体系和国家政权之间非此即彼，那么难免会得出当今世界不存在帝国的结论。相反，如果相信帝国结构会覆盖主权国家体系，就会发现还存在另外某种权力和势力架构——它并不等同于主权国家的秩序体系。帝国的结构主要在非正式领域才显露面目，这也是帝国边界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国家间的边界往往是政治、经济、语言和文化边界的叠加。这个特点赋予边界以力量，但同时也让它显得僵化和死板。帝国边界则不同，它像一张交错的网，在那里面政治和经济的界线彼

此分开，文化差异呈层级化分布，而语言差别从来无足轻重。这个特点减少了帝国边界的正式性，增加了它的灵活性。

其次，我们还可以比照霸权的支配性结构来勾勒帝国的轮廓。但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霸权统治和帝国统治之间的界线是动态的。但在两者之间做个区分，还是很有必要的。霸权是形式上平等的政治行为体所构成的集团中雄踞主宰地位的力量。帝国则不同，至少在形式上，取消了平等，将弱势行为体降格为附庸国或者卫星国，而且它们或多或少仰帝国中心之鼻息。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都是通过在帝国和霸权之间做对比，来描述苏联在华约以及美国在北约中的地位。苏联曾被卫星国环绕四周，它们如何运转皆由中心来规制。^[1]北约不一样，它被视为原则上平等的盟友结成的体系，在其中，美国作为实力远在他国之上的最强、最大的伙伴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美国基本始终把持着军事最高指挥权，其他成员国顶多就是拿下秘书长之位。通过对北约和华约的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在冷战时期对帝国和霸权做区分，难免带上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味道。

帝国和霸权的不同，还有一个佐证是来自更久远的历史深处，政治上也没多少争议，即提洛同盟转变为雅典海上霸权的历史。最初，提洛同盟是在小亚细亚西岸及爱琴海地区建立起来的反波斯霸权。在同盟内部，各盟邦地位平等。当然，从一开始各个成员对同盟的贡献便千差万别。有些只掏钱，有些提供船只。而雅典始终是贡献战舰最多的那一方。^[2]

各个盟邦在贡献和实力方面事实上的差别，对同盟的内部体制并无影响。它使得这一同盟渐渐从霸权（*hegemonía*）转变成统治权（*arché*）。^[3]当时雅典统率同盟的联军，掌管财政大权，规定盟邦盟金的金额，主导商事裁判权，并采取措施，确保其度量衡在整个同

盟范围内畅行无阻。此外，它向各个盟友的城邦派驻了卫戍部队，从而对盟邦内部事务施加影响。末了，它将同盟金库从提洛岛搬到雅典，大家宣誓效忠的对象也不再是“雅典及其盟友”，变成了“雅典人民”。它还将战争与和平的定夺大权从同盟大会移交到雅典公民大会手里。后来科林斯人怂恿斯巴达同盟^[4]和雅典决一死战时，他们厉色声讨：霸主，业已蜕变成独裁者了。^[5]

我们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新定位置于提洛同盟转变为雅典海上霸权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解释，理由不言自明。虽然，当时的雅典无论在疆域跨度还是时间跨度上，都还不足以称为帝国。但若细细观察，帝国政治的很多因素其实已在雅典霸权里显露无遗。当然，对此我们要感谢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一演变过程极具开创性的论述。所以，我们在后文中将反复提及雅典海上霸权，虽然严格说来它只能归入广义的帝国范畴。

最后，帝国的轮廓还可借助19世纪以来形成的帝国主义概念来勾勒。在帝国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之间做区分，首先有助于我们扬弃几乎所有帝国主义理论所惯用的规范-评价性视角，转向一种专注帝国行动准则的描述性分析的思路。此外，根据帝国主义概念及相应的理论，帝国的诞生本质上是一个从中心向边缘外扩的过程。言下之意，它的发展轨迹是单向的。这样的理解，对帝国的研究是有害无益的。

帝国主义意味着要有一种成为帝国的意志，无论是出自政治抑或是经济的动机。这种意志即便不是世界帝国形成的唯一起因，至少也是主导因素。不同于这一论调的是，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爵士曾在1883年口出妙语，他说，大英帝国似乎在“一时的心不在焉间”征服了半个世界。^[6]恰恰是他这种带着刻意片面性的措辞——其实西利想借此呼吁英国实行有意识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他担心若不这么做，大英帝国夹在新生强国美国和沙

俄中间将凶多吉少——指出了帝国主义理论有多夸大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走上帝国之路的行为体所抱持的野心和主观意识。其实，几乎没有哪个帝国的形成是基于“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考量。大部分帝国的诞生，都是一堆偶发事件和个别决策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这些决策又常常是由一些政治上毫无合法性可言的个人做出的。如此看来，可以说几乎每个帝国都是在“一时的心不在焉间”降世的。

帝国主义学说理论把目光聚焦于“中心”，但在中心之外，对“边缘”同样需要加以注意。我们要关注那里的权力真空和经济动力，关注在地区冲突中弱势一方的军事干预请援和当地主政者的决策。近来，流行一个新词：受邀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有人用它来表述美国权力和势力范围的扩张。^[7]其实这个表述也凸显了边缘在帝国产生过程中的“发起者”作用。毋庸置疑，中心推向边缘的帝国原动力确实存在，是它将行为体自身的权力范围不断向外扩张。但除此以外，还同时存在一种源自边缘的旋涡般吸力（Sog），它也同样拉动统治范围向外延伸。究竟两个不同作用力孰强孰弱要视具体情势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帝国主义理论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心的原动力才是关键因素。^[8]而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对边缘做更细致入微的考察，这不仅事关过往帝国的研究，同时对于解析美国过去几十年间的政策也意义重大。

^[1] 将帝国势力比喻为太阳及围绕着它的星体，依我所见，并不是源于军事帝国特性，而是源于经济帝国特性。银行家Nathan Rotschild在19世纪初对英国下院演讲时说：“英国是世界金融之都，大宗商业活动或多或少都在这个金融中心的影响之下完成，不那么富有的国家必须像太阳系中小天体围绕着太阳旋转一样围绕着金融中心运动，在那里获得光和养料，并乐此不疲。”转引自Gollwitzer: *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1卷，第505页。

^[2] 参见Schuller: *Die Herrschaft der Athener*，第54页起若干页。

[3] Heinrich Triepel: *Die Hegemonie*, 第146页起, 将这一现象称为“吸收性霸权”。

[4] 也称为伯罗奔尼撒同盟或拉刻代蒙同盟。

[5] 参见Breuer: *Imperien*, 第140~147页; 详见Welwei: *Das Klassische Athen*, 第77~139页; 关于将雅典统治的政治学名称由原来的 *hegemonía* 改为 *arché*, 参见Triepel: *Die Hegemonie*, 第343页起若干页; 关于同盟的质变, 见同一出处, 第377页起若干页。关于雅典统治权的详述, 见Schuller: *Die Herrschaft der Athener*, 特别是第153~165页。

[6] 转引自Ferguson: *Empire*, 第246页。

[7] 参见Maier: *Among Empires*。

[8] 基于完整性考虑, 在此必须指出, 在帝国主义研究理论中的旁支, 也就是所谓着眼于边缘的帝国主义研究理论, 极有可能看到了边缘对超级帝国产生的意义。这类理论认定: “大国的帝国主义行为一般都是由第三世界中的危机性事件引发的”。Mommsen: *Imperialismustheorien*, 第80~90页, 上述引文见第81页。

/ 世界帝国与超级帝国

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我们会继续尝试通过与其他政治秩序的参照，来勾画一幅更加精细的帝国图景。不过在这之前，应先定下几条启发式标准，以便将世界帝国与区域性帝国或短命帝国区分开来。

首要标准是帝国的时间跨度。帝国需至少经历一个崛起和衰落的周期，而且还必须已开启了下一个新的周期。^[1]因此帝国存续时间较长这一标准体现在其制度革新力和再生力上，有了这两种能力，帝国的存在便不再取决于先父（们）的超凡领袖魅力。有鉴于此，在我们随后的讨论中，不会过多关注拿破仑开创的超级帝国（Großreich，或者称为大帝国），或者更为短命的意大利法西斯及德国纳粹政权。日本人孜孜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迷梦，也不在重点讨论之列。

较难界定的是威廉二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即使我们认定，他的帝国政治始于俾斯麦下台，而不是在1871年凡尔赛镜宫上演的德皇加冕礼——第二帝国相较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帝国政治，持续时间还是更长久一些。后两者的帝国政治仅止步于大战初始阶段的几次胜利而已。然而，如果我们把威廉二世和纳粹的帝国政治这两个先后出现又以德国一战战败为分割点的周期连接起来的话，似乎又可以将德国纳入帝国之列。可以认为帝国只是在内部出现了权力易手而已，而且它也满足上述所谓再生能力的标准。相似的情形还有日本。如果我们把1905年的日俄战争看作其帝国之路的起点，似乎将日本归入超级帝国之列也就顺理成章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得对这一判断加一条限定性的说明：对德日两国来讲，其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的诞生，可谓姗姗来迟且都昙花一现。此外，由于德国和日本早早败降，很难确切断定当年它们究竟是世界帝国还是只是区域性超级帝国。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在做超级帝国比较性研究时，将

德国和法国列为研究的重点。而在本书中，笔者仅把这两个国家作为“失败帝国”（failed empire）的典型加以援引。^[2]

除上述的时间跨度标准，疆域跨度是另一个重要标尺。如果一个强国没有幅员辽阔的统治疆域，是不足以称为帝国的。所以，哈布斯堡皇朝从时间跨度上讲，无疑是当之无愧的帝国政权；但从疆域跨度而言，则多少显得牵强了。准确地说，它是一个雄霸中欧的超级帝国。在欧洲列强俱乐部里，它与诸如法国这样的大国平起平坐，但它未曾寻求雄踞整个欧洲大地的霸权。即使在哈布斯堡的家族成员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冠的时期，皇朝的霸权也没有超出中欧地区。查理五世是个例外，他既是西班牙国王，又当上了尼德兰的君主，他手中握有远比此后移驾维也纳的其他皇帝更为丰富的资源。1556年，哈布斯堡皇室正式分为德意志和西班牙两支，帝国之风也随之顺势吹到了马德里。^[3]那句闻名遐迩的奥地利国家格言AEIOU（Austriae est imperare in orbe ultimo），即“奥地利乃最后一个帝国”，或曰“普天之下，莫非奥土”，在不久之后也变成了明日黄花，随风而散。^[4]

相比海洋帝国，疆域跨度的标准显然更适用于陆地帝国。海洋帝国的权力和影响，不光反映在其统治领土面积的多寡，更多体现在对商品、资本和信息等诸多元素流通的控制力上，以及对经济枢纽^[5]、海港及可靠贸易通道的掌控上。对于海洋帝国的权力扩张而言，远比疆土的有形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手中可供支配的资源，是商业伙伴对其国际通用货币的信任感。^[6]关于陆地帝国和海洋帝国权力的巨大差异，我们还会在后文中详细阐述。在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帝国权力的扩张、成形离不开地缘经济的因素。控制贸易，跟统御疆域一样，也是帝国权力的活水之源。以西班牙为例，直到16世纪末，它都尚未占有任何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通商口岸和金融城市，所以，它无

法左右欧洲人主导的世界经济。对于英格兰的异军突起，并最终一跃成为更为强大的帝国，西班牙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恰恰通过观察西班牙的式微和英国的崛起，我们发现很难将商品、资本流的控制，同疆域统治完全剥离开来。当西班牙夺回尼德兰失地的努力功亏一篑，其对外贸易也随之陷入停滞，于是经济流仿佛绕开了西班牙辖制的地区，这最终导致西班牙丧失了对欧洲经济的掌控力，其国际信用品质一落千丈。后果便是接二连三的国家破产。如果1588年无敌舰队能够获得胜利，并成功侵入英格兰的话，那么西班牙还有一线生机，从疆域统治的弯路转回经济流控制的正轨。但无敌舰队最终一败涂地，西班牙便告别了其帝国权力扩张的巅峰，从此由盛转衰。

与主权国家相比，在帝国权力扩张、成形过程中，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相互交织得更紧密。由于这两个要素总是双管齐下，共同作用，我们必须将它们放在一起考察。不过这其中，军事优势这一小因素也能对帝国的崛起与衰落产生大作用。比如1588年，英国人的优势之一就体现在他们以更优良的冶金技术铸造出的重炮上。^[7]这个例子，特别提醒我们，世界帝国疆域跨度的标准，不仅局限于对疆域的有形控制，它还体现在对商品、资本流的无形控制上。可见，关于疆域跨度的衡量标准跟时间跨度的标准一样，是多维度的。

我们的讨论引向一个关于界定世界帝国极为棘手的问题：究竟怎么理解“世界”？“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要按这样的理解，只有在苏联瓦解之后的美国才有资格称得上世界帝国，而大英帝国充其量只能算作它的前身。按这样对“世界”的理解，诸多对世界帝国的比较性研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那些坚称美国之史无前例的学人，基本上这样论述：美国成了前无古人、横跨全球的强权，虽然它更多借助非正式支配手段而不是正式统治来完

成这一壮举。按这样的逻辑，继续研究世界帝国的历史将无益于理解当今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他们的著作《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2002）中沿用了这一论证模式，当然，他们这个模式下的新型帝国不必与美国强权完全一致。他们理解的帝国自成一种新型网络结构，超越了一切政治疆界和主权。

然而深入观察美国的权力，我们还发现它不仅仅产生于对地球空间的统治，甚至体现在对宇宙空间的控制上。一方面，因为它开发研制出卫星导航的巡航导弹，使美国能够对地球任何角落实施军事打击；另一方面，美国也有能力将人类对扩张的幻想、对科技的憧憬加以集合和引导：从登陆月球，到长期载人的空间站，再到殖民火星的计划。由此可见，“世界”的概念已经超越地球的外延，具有跨星际的特点。^[8]这种跨星际性，正是美利坚帝国重要的权力资源。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证明它与历史上其他的帝国就没有可比性。

“世界”是一个相对且可变的量，不能拿诸如各大洲的地理边界或地球的有形面积等不变因素来固化。人类所有文明的独特视野和视角，都在形塑“世界”的过程中留下了各自深深的烙印，也就是说，其中文化和科技的力量超过了纯粹地理的因素。^[9]“世界”究竟是什么，这取决于贸易关系的广度、信息流通的密度、知识的秩序以及航海技术等诸多因素。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帝国统治世界的诉求不断膨胀，且愈发强烈。按帝国的唯一性和独有性的特点，可以说，如今地球上确实只够容下一个帝国了。

从古代到近代，世界上常常几个帝国比肩而立，群雄逐鹿；这一并存局面，未必会妨碍各自对帝国性的主张。中华帝国曾经与罗马帝国作为所谓的“平行帝国”^[10]鼎立天下数百年，这期间他们的帝国合法性从未因此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两大帝国统治的世界，并行不

悖，井水不犯河水。相反，当年拜占庭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加洛林王室、奥托王室和萨利安王室并存于世，但他们的帝国合法性就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他们属于同一个“世界”，一山不容二虎，在这一“世界”范围内，其实只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因此，他们至少在形式上相互否决对方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权利。[\[11\]](#)

至于大英帝国与沙俄帝国，直至20世纪早期，大抵都相安无事。他们各自统领的“世界”，相互隔离且迥然不同。差别不仅在于英国人和俄国人各自主宰不同的领地——他们沿着大高加索山脉，直到喜马拉雅山脉一线，将亚洲南北一分为二[\[12\]](#)——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英、俄各持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俄国人通过行政手段，必要时以军事手段，统治着一个陆地帝国；另一边，则是基本依靠海路贸易交流得以维系的大英帝国。他们都不对对方构成威胁，又都不去挑战对方的合法性——至少在俄国人克制自己、不追逐自己“向温暖海洋扩张”野心的时期，双方确是相安无事的。

然而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后继帝国——美国和苏联的情形则大不一样。单就双方的指导方针和“使命”这一点，两国便否认了对方的存在合法性。此外，他们在同一空间、同一领域展开了竞争：从苏联打造规模庞大的战舰，进军世界公海，再到两国的太空军备竞赛，角逐无处不在。同当年英俄关系不同的是，美苏并存对于它们双方而言，都构成了各自帝国主导权的限制。他们分享了同一个“世界”，而当年沙俄与大英帝国则统治着各自的“世界”。

然而在大英海洋帝国和沙俄陆地帝国之间，却再也容不下希冀在余下的中间地带再建一个帝国的第三方。因为这样势必会引发与上述其中一个帝国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一般又会演变为一场大规模战争，最终会将另一个帝国也拖进其中，加入对第三方的围剿。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安于各自“世界”的帝国之行动逻辑：经过一段时间的

观察和试探，它们走向合作，戮力对付第三方，遏制第三方的权力扩张。从拿破仑、威廉二世、希特勒，再到昭和天皇，概莫能外。无论第三方与称雄世界的两大帝国中的哪一个产生了战略冲突，结果没什么不同。对拿破仑来说，他自始至终都绕开大英帝国走，而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也极力避免与英国人起争端，他们都宁愿将其霸权主张限制在欧洲大陆，或者将霸权向东延伸。本质上讲，拿破仑和希特勒在东线折戟沉沙，而威廉二世则在西边同对手的争斗中丢了皇帝的宝座。日本在20世纪初成功地制服俄国，但最终在二战中败在美国手下。而美国当时也曾试图与苏联联手，开展战略合作。诚然，在任何情况下，海洋帝国和陆地帝国的内在需求必然引致它们合力对付第三方；而从各自帝国“世界”中衍生出来的行动准则，会荡涤一切阻碍，不达目的誓不休。[\[13\]](#)

这些外部边界相对清晰易辨的帝国“世界”，如何才能更精确地描述它们？它们的内部有何特点？与那些非帝国的“世界”又有何差别？另外还有关键一点：陆地帝国和海洋帝国的内部空间是否存在什么共同特征呢？

对帝国空间而言，中心-边缘落差是很鲜明的特点，这一点在上文已有提及。无论是建于疆域统治之上的帝国，抑或是主要通过“流”控制攫取权力的帝国，概莫能外。除此之外，学术文献还反复提及帝国的多种族及多民族特征。不过，如此描述帝国特征，多少有点问题。一来它毫无新意，因为扩张的帝国总不可避免会覆盖多种族及多民族群体，这一点不言而喻。二来它太政治化，毕竟，族群和民族差别何在、民族差异会被接纳还是被压制，最终都是由帝国中心依据“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14\]](#)的原则来裁定的。

在欧洲范围内，探讨西欧民族国家与中欧帝国之间的关系时，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各自的弱点和优势何在：是单一民族的团结一致，还

是多种族的多元化。在20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的痼疾已路人皆知，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内部也显露离心的倾向，这些都让一些人相信，民族国家在战时要优于多民族的帝国联合体。而一战的结局则又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随着美国和苏联的崛起，以及欧洲民族国家在世界政坛的边缘化，观念的钟摆又往回摆了过去。不过很显然，以上谈及的印象和想法，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并非学术的实证分析，标准难经推敲。

考查主体民族在一个帝国内的比例高低，并不能给我们解答有关帝国空间扩展和时间跨度的问题。在中华帝国内汉人所占的比例一直高达90%以上，1897年沙俄帝国人口中的44%为俄罗斯人，191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奥匈帝国领土上操德语的奥地利人仅占24%，而1925年大英帝国境内英国人的人口比例更低至10%。^[15]至少从短、中期视角看来，这些数字并不足以推导出什么富有价值的结论，我们无法从中获得一个关于帝国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

^[1] 关于大国兴衰长周期的概念化问题，参见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第7~38页。

^[2] Doyle: *Empires*, 第306页起若干页，第319页起若干页。当然，多伊尔更多关注的是法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而不是帝国的成功创建过程。

^[3] 参见Kann: *Geschichte des Habsburgerreiches*; 有关查理五世的帝国野心，参见Kohler: *Karl V.* 以及Haider: *Karl V.*。

^[4] 有关哈布斯堡皇朝的叙述也基本适用于拜占庭的情形。拜占庭遭受伊斯兰教势力的攻击后，在中东地区丧失了大片领土，沦为一个地区性霸权。当然这并没有阻止它继续追求世界统治权。参见Lilie: *Byzanz*, 第75~141页，以及Beck: *Das byzantinische Jahrtausend*, 第78~86页。

^[5] Osterhammel (*Kolonialismus*, 第17页) 对殖民地进行了统治型殖民地和据点型殖民地的划分。两者都可以被看作不同类型的帝国形成的源头。

[6] Fernand Braudel在他有关15~18世纪社会史的著作中指出，欧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最早是在意大利，大部分时间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竞争。后来转移到尼德兰地区的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最后又转移到英国伦敦。金融中心的转移对于欧洲权力转移的意义远甚于那些夺取领土而发动的大大小小的战役。参见Braudel: *Sozialgeschichte des 15.-18. Jahrhunderts*第3卷，第147页起若干页和第187页起若干页；还可以参见Wallerstein: *Das moderne Weltsystem*，第97页起若干页和第245页起若干页。

[7] 参见Nef: *Western Civilization*，第84页起若干页；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第89页起若干页以及 Cipolla: *Guns, Sails and Empires*，第89页起若干页。

[8] 顺便一提，这曾经体现在苏联身上。在控制太空方面，苏联曾经长时间领先美国一步。

[9] 关于“天下”（Ökumene）这一概念，参见Voegelin: *Das ökumenische Zeitalter*，第58~62页。对文化与技术因素意义的忽略，一直是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大空间秩序理论的根本性错误。他先是批评了美国“门罗主义”从美洲大陆慢慢到世界的扩张，后来他又自己设计出一个针对欧洲的“德国门罗主义”。参见Schmitt: *Völkerrechtliche Formen des modernen Imperialismus*以及他的*Großraum gegen Universalismus*，还可以参见Diner: *Imperialismus*。所有这些想法都没有摆脱地球空间概念的束缚，并因此疏忽了帝国“世界”观的原动力，帝国“世界”观并非始自资本主义扩张，却因资本主义扩张明显地获得了更多活力。

[10] 参见Breuer: *Imperien*，第12页起若干页和第158页起若干页。

[11] 参见Lilie: *Byzanz*，第143页起若干页。

[12] 俄国和英国在19世纪仅有的冲突都发生在这条分界线上：争夺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权。由此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争夺波斯和阿富汗的争端。当时泛滥于英国知识界的仇俄情绪，也让两大帝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受到严重挑战。参见Gollwitzer: *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2卷，第28页起若干页，第71页起。

[13] 英国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最近在他的*The Pity of War*一书中开启了一场辩论：20世纪初的英国为了防止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陆地帝国而加入一战时，英国政治在多大程度上误读了英帝国自己的生存需求。事实上，

英国政策如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所说，源自其帝国“世界”的逻辑。彻底的“改天换地”（global shift），如弗格森所言，可能符合英帝国的中长期利益，但在事实上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14] 或许指出帝国的多种族或多民族特性只是为了强调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差异。民族国家的特征是政治空间和民族认同趋向高度一致。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著作*Reich, Nation, Europa*，第61页起若干页。

[15] 数据出自Osterhammel: *China*，第122页。

/ 帝国的干预压力、中立选项与修昔底德的米洛斯对话

比帝国的多种族及多民族特性更具启发意义的是，在帝国统辖的“世界”的“内部”，帝国中心明显承受着政治及军事干预的压力。帝国中心不能挣脱这一压力，否则自身地位恐受其害。换句话说，帝国在面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政权时，不能无动于衷，保持中立。相应地，帝国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它也不允许这些政权保持中立姿态。这种中立选项仅仅存在于主权国家模式下的世界秩序里，帝国倘若在其统治的“世界”之内或者其边缘地带的纷争中长期坚守中立立场，到头来，它势必丧失其帝国地位。这也正是帝国和主权国家的差异所在。近来在美欧关系中一再出现的不和谐声音，或许可归因为人们没有足够重视这一分歧。

不独帝国，霸权政权也始终摆脱不了干预压力，只不过程度稍弱一点。这种持久压力与帝国和霸权的可信度大有关联，而它们面临的可信度问题与非帝国政权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冲突。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做过阐述，^[1]当时，雅典跟斯巴达正打得不可开交，米洛斯人不想蹚浑水，希望置身事外。按他们的想法，自己地处爱琴海地区，受雅典人一手掌控，雅典大可接受一个蕞尔小岛的中立立场。因为跟斯巴达的交战，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米洛斯人的参战都显得杯水车薪、无足轻重。而雅典人若放过米洛斯一马，还可坐收大将风度的美誉。然而雅典人没有这么做。他们认为，一旦让步，其他盟邦势必竞相效仿，要求获得类似的 决定权。如此一来，雅典的权力将很快土崩瓦解，或者不得不随时诉诸武力恢复其政治威信。因此米洛斯人必须俯首听命，否则不免有被夷为平地之虞。如果没有那样一支强大的战舰编队在米洛斯岛外耀武扬威，任其调遣，雅典或许真的就容忍了米洛

斯的中立姿态。但一旦退让，雅典的威信必受重创，同米洛斯人的任何妥协都将招致所谓威信损失。最终雅典的权力和影响力恐将付诸东流。

有人认为，米洛斯对话本质上不过是鸡同鸭讲，双方都是自说自话。^[2]事实确实如此。但误会的根源在于，小邦在面对强权时的盘算同帝国的行动逻辑背道而驰。米洛斯人希望作为地位对等的友邦得到雅典的承认，这一点雅典不会接受。

在有关修昔底德、有关雅典海洋霸权历史的文献中，我们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其中一种解读认为，修昔底德借写米洛斯事件的结局，实际上认同了雅典人的做法。米洛斯陷落，男丁遭屠杀，妇孺沦为奴隶被掳走。不同于雅典人的现实原则，米洛斯人把生死安危寄托在一厢情愿的期望上，导致了他们对形势的误判，埋下了覆灭的祸根。这种解读，已经不是仅仅在强调雅典人给出的理由里的现实原则了，更多是出于对雅典人在事理上的认同。在同斯巴达的交火中，雅典城四面受困，几个盟邦又表现得优柔寡断，态度反复无常。而雅典人也认识到，纵容一个盟邦的忤逆，等于开了先例，其他盟邦必将效尤。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雅典人别无选择，只能逼迫米洛斯人做出抉择，要么对爱琴海地区的帝国政权施以援手，要么拆它的台，非此即彼。任何一个小小的让步，都可能铸成大错。所以帝国没有中立选项。当它受到严重挑战时，必须迫使他人选边站来维系其对世界的主导权，他人中立骑墙的态度被视为变相的撕破脸。如此看来美国总统小布什的那句名言，“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正是帝国逻辑赤裸裸的告白。

关于米洛斯对话，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诠释。按这一解读，对话的意义并不直接体现在米洛斯事件当中，只有把对话置于修昔底德对那场战争的全部叙述中，才能看得清楚。对此，书中对米洛斯对话之

后雅典人远征叙拉古的论述，对于理解这一点显得至关重要。那次远征正是雅典霸主地位的转折点。雅典人严重高估了自己的实力，通过这次海战力量掏空、元气耗尽，最终自毁长城、土崩瓦解。^[3]

那么伯里克利原本的作战计划何以走上致命的歧途呢？伯里克利审时度势，经过权衡雅典和斯巴达双方的优劣，曾采取了战略防御的措施，坚壁清野、固守城垣，暂时安于现状，不贪远功。^[4]如果雅典人果真执行了这一方针，伯罗奔尼撒一战的最后胜利非雅典人莫属。按这一解读，雅典人败在了自己的狂妄自大，中了威廉·福尔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所说的“权力的傲慢”的蛊。^[5]这种傲慢在米洛斯对话中表露无遗。因此，对话中雅典人给出的理由并非真的出于现实原则，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一叶障目、盲目自信。这直接招致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灾祸。雅典人一边大谈政治威信，另一边，他们自己的言行实际上已向世人昭示，他们在政治道义上缺乏自律。海上同盟得以维系，靠的主要不是军事力量，而是这种自我约束。随着雅典自我约束力的消退，雅典霸权转变为帝国。直到这时，诸盟邦才如梦方醒，希图从雅典霸权的沉重压力下走出来。

对修昔底德的两种不同解读，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对美国过去几十年政策几乎截然相反的评价。一方面，有人把美国政策归结为帝国逻辑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人们谴责美国，认为它跋扈的权力政治损害了其道义上的威信，美国的世界影响若以道德信誉为基石，而不是依靠航空母舰编队、巡航导弹以及地面部队的军事干预，那么它的世界影响力将会牢固得多。于尔根·哈贝马斯（Habermas）就曾多次在其文章和访谈中，表达了后一种观点。^[6]当然，这个说法有一个假定前提，那就是当政者面对挑战时拥有很大决策空间，可以做出各种应对。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大部分批评者将美国政策的责任推给他们所认定的政治人物。据此哈贝马斯也认为，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作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是该重新领导世界

继续建立一个普世法制秩序，还是罔顾国际法重返仁义霸主的帝国角色。”^[7]他认为，美国已经在行动上选择了后者，尤其是因为小布什政府在国内受到了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影响和支持。

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种解读方式。它把目光聚焦于帝国逻辑和由此衍生出来的行动方针，至于政治人物的个人影响和决策，在他们眼里则显得没那么重要。这种解读着眼于规制当权者行动空间的体制结构和指导方针，所以它并不追问基督教信仰复兴与小布什政策之间有何关联，它不关心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扮演了何种角色，它也并不认为，新保守势力对美国政策起到了决定性影响。此外，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的心理状态也兴趣有限。^[8]它真正追问的是帝国政权的行动逻辑。

当然，这些行动方针绝不可能自行实现，况且还可能一次次被政治行为体误读或耽误。至于道德信誉等，无疑属于帝国权力的一种资源；不过在这个视角里，道德信誉不是政策的“标尺”，而是它的一个工具：帝国逻辑本身很清楚如何利用道德信誉这个权力因素达到目的，但它自己绝不会接受道德信誉的衡量。

帝国逻辑由哪些元素构成？它的内在要求是什么？抵制帝国逻辑又有哪些可能性？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下一章通过对历史上一些帝国的分析来逐一探讨。

^[1] Thukydides: *Peloponnesischer Krieg*, V, 第84~116、450~460页。

^[2] 参见Volkman-Schluck: *Politische Philosophie*, 第39~58页中对米洛斯对话做出的阐释。与此相对，de Romilly: *Thucydides*中作者没有将这一冲突归因于米洛斯对帝国格局的误判，而是将这一冲突归因于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

[3] 很显然，修昔底德的哪一种解释更受青睐，跟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有关：在德国文献中便随处可见对强权政治衰亡的记载和解读。

[4] Thukydides: *Peloponnesischer Krieg*, I, 144, 1, 以及 II, 65, 7。

[5] Fulbright: *The Arrogance of Power*.

[6] Jürgen Habermas: *Was bedeutet der Denkmalsturz?* 以及同一作者的 *Wege aus der Weltunordnung*。

[7] Habermas: *Wege aus der Weltunordnung*, 第34页。

[8] 比如说Heinrichs: *Die gekränkte Supermacht*。

第二章 帝国、帝国主义和霸权：必要的区分

人们今天对帝国的看法，仍然受制于帝国主义理论所定下的准则。依帝国主义理论看来，超级帝国的诞生完全拜那些心怀扩张抱负的精英们所赐：出于威望需求和权力扩张的野心或者是攫取更多利润的贪欲，几个大国采取在经济上渗透其他地区、在权力政治方面并吞别国的政策；而欧洲殖民帝国的诞生，正是这一政策发展的结果。时至今日，每当我们谈及帝国，这些欧洲殖民帝国往往都会成为我们讨论的焦点。所以，在此我们需要将它们细细审视一番。

细阅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欧洲政治文献，我们确实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帝国的诞生，不过就是精英们实现其帝国主义抱负的结果。^[1]在此期间，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那些在扩大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竞赛中落伍的国家，不仅担心自己会失去对竞争对手的优势，而且生怕自己会由此而踏上衰落的不归路。^[2]它们相信只有在抢夺世界统治权的竞争中胜出，在夺取全球经济最重要资源和市场的角逐中屹立不倒，才能以独立于世的政治力量最终幸存下来。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以及一种焦虑的气氛，^[3]曾笼罩于欧洲的上空，也笼罩着美国和俄国这两个侧翼大国，令它们头脑发热、焦躁不安。一时间，欧陆的未来似乎都悬于对海外权力及势力范围的瓜分上。

在事后我们不大可能还认为那狂热激烈的竞争阶段源自一系列深思熟虑的理性决策，毕竟殖民主义并没有给欧洲人带来他们预期的收益。从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角度来看，这甚至与预期的结果南辕北辙：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中，帝国主义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剥削和压迫方式之一。毋庸置疑，殖民帝国主义也确实配得上此一殊“荣”。但即使极尽武力压榨之能事，它的投入与产出也越来越趋向于相互抵消。从国民经济学角度讲，殖民帝国主义其实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严重失算。

[1] Gollwitzer: *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2卷对这个时期在英国、俄国、美国、法国和德国进行的有关讨论给出了出色的综述。Mommson: *Imperialismstheorien*和Schröder: *Sozialistische Imperialismusdeutung*对批判性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简要概述。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发展史，请参见Koebner: *Imperialism*。

[2]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与当今大企业的论调如出一辙，他们认为只有先做全球玩家（globalplayers），才能成为赢家。

[3] 学界在讨论这种焦虑状态主要以德国为例。例如可参见Ullrich: *Die nervöse Großmacht*，以及 Radkau: *Das Zeitalter der Nervosität*。当然，这种焦躁不安的状态不限于德国，它也同样表现在法国和英国身上，狂热的日耳曼仇视情绪曾弥漫在这两个国家。参见Gollwitzer: *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2卷，第71页起。

/ 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式动力：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

那么，该如何解释上述这种失算呢？特别是当这种失算并不限于哪一国，也不限于欧洲大陆，它曾经蔓延全球，臭名昭著的“瓜分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就是其中一例。^[1]同样，当年日本和美国的政策也深陷帝国主义狂热：日本将战火烧遍东亚大陆，尤其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与俄国人卷入纷争，最终触发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场战争可谓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而美国则于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不仅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站稳了脚跟，随后还接管了菲律宾。而在菲律宾，美国被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且损失惨重的游击战争当中。^[2]

莫非这种失算是因为受了瘵症的感染，它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开来，以至于精英们都无法理性地谋求自身利益了？还是果真如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帝国主义理论所宣称的那样，经济最发达国家的过度积累和消费不足决定了它们必须为商品开拓市场、为资本寻求投资机会呢？抑或是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言，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其实是前现代精英的最后挣扎？那些精英不愿接受“贸易和变化”的新时代精神，便转投征服政策的怀抱，即使那明显是得不偿失之策？^[3]

关于19世纪那些超级帝国的成因，以及在帝国成形中相伴而生的种种冲突，在原则上，有着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其一，强调非理性的根源，认为非理性侵入了一个渐趋理性化的世界，此乃问题症结所在。另一，帝国主义恰恰是资本主义世界里最强大行为体的一种理性行动，是民族资本竞争和资本回报需求给帝国主义扩张规定的方向。后一种解读模式，也让我们明白了与之应和的理论学说何以对超级帝国的诞生和崛起问题着墨不多，而更多是在探讨“资本主义有没有前

途”这样一个问题，以及如果它有前途，是如罗莎·卢森堡所言，那将会是一个野蛮的时代，还是如约翰·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所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原动力可借助社会政治改革得以驯服。

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霍布森开创了完完全全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理论。此后，这一理论在广大帝国主义理论学家中掀起了研讨的热潮。霍布森认为，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考量，帝国主义政策肯定是不划算的，是一桩十足的赔本买卖。跟经济落后甚至尚未开发的地区做生意，所得收益同维持帝国运转的军事和管理成本相比，极不相称，更别提还在那些属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了。

那么，到底谁会愿意去创建这样一个无利可图的帝国呢？霍布森认为，既不是纳税人，也非商人或企业主；对此兴致勃勃者，乃寻求高回报投资机会的金融资本。帝国的扩张政策可为此打开方便大门——特别是当国家出面，提供应有保障；随时做好在海外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准备，弭兵平乱，不遗余力，为海外投资保驾护航；甚至在必要时直接接管当地政权。^[4]于是，为了说服国家政府，也让大部分国民支持其在海外开拓高回报的可靠投资良机，金融资本不惜极力操纵民意，点燃人们心中民族主义的本能，在民众中撒播亲帝国主义的种子。通过这些手段，少数资本家对海外投资的贪欲竟被抬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了。按霍布森的说法，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发生在经济发达社会里的一次内部再分配运动。

和稍晚时候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学家之看法不同，对于所谓资本主义即使不经海外扩张以及为海外投资撑起政治、经济保护伞也一样会崩溃的观点，霍布森不以为然。他更相信，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不足问题在中期可通过推行积极有力的社会政策，提升大众购买力，而使问题迎刃而解。按照这个思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驯

化、发展高效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全可以取代那种四处插手、侵略性十足的帝国主义政策。

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作为逆周期调节论的代表人物，在很多方面都深受霍布森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启发和影响。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同党内社会改革派及工会主义者的论争中，坚决驳斥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化改革”的可能性，并且还指出，帝国主义扩张乃资本主义的本性所在。从一开始，他们的帝国主义理论就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己任，认为必须以革命手段铲除资本主义。依据他们两位的理论，资本主义必将朽亡；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则是其掘墓人，强权国家将相互征战，彼此削弱。而社会主义革命则将坐收渔人之利，走上通往胜利的康庄大道。

上述所有理论和论辩的关注点，都不在于帝国何以成形，而是纠缠于能否借助改革和革命来救治欧洲社会这一话题。因此，它们对于帝国扩张之剑刺入的边缘，也关注甚微。对于帝国主义理论来说，要解答资本主义是否可以改革以及其优势和弱点何在这些挑战性问题，帝国的政治、经济边缘完全是次要的。于是，边缘在这些理论学说里自然也仅居次要地位。所以，在这些理论里，帝国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被理解成一个从中心向边缘延伸的过程。它们只考量了其中的推动因素（push），至于拉动因素（pull）则无人问津。其实这些帝国主义理论的提问方式（Fragestellung）和认知旨趣已经为它们得出何种结论埋下了伏笔。

在这当中，只有列宁一人在其帝国主义理论里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边缘问题。不过说到底，原因主要在于他的俄国作为帝国的历史虽有数百年之久，但从“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的视角来看，它本身也属于边缘。如果认定帝国主义只是资本过度积累的结果，那么资本单薄

的俄国难免就沦为二流角色了；特别是它还曾效仿英、美，试图建立经济的“卢布帝国主义”来充实其军事帝国主义，终因资本匮乏而功亏一篑。^[5]列宁认为，俄国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最为薄弱的环节”，链条必将在此断裂。

作为“理论家”的列宁所做出的帝国主义预言，对于身为“政治家”的列宁可谓适逢其时，恰如其分。按照他的预测，社会主义革命之火将在俄国点燃；并从此成燎原之势，烧至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世界的中心地带。其实归根结底，列宁对边缘问题的兴趣也不大。他真正关注的只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在这一环节，他看到了以革命推倒旧统治的千载难逢之机。在俄国内战时期，列宁授令收复沙俄在一战中的失地，并将其纳入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版图。其手腕足见他对边缘态度之漠然。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定问题，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基本也是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理论——那里，倒成了解读帝国形成的关键所在。这些理论，对那个时代的问题做出了那个时代的回答，本也无可厚非。然而常常有人并不把这些理论仅仅理解为时代之音，而是将其奉为解读帝国形成的普适圭臬。结果就是，这些理论需要解释的东西超出了它们可以解释的范围，^[6]以至于让人看不清帝国政治背后的真正因素和动力。

可以套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国、美国甚至德国身上的理论，未必同样都适用于法国。虽然当时的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帝国，但跟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资本积累的动力相对不足。将其套在日本头上就更为牵强了，而对俄国来说，则完全不合时宜：在这一时期，沙俄仰赖资本输入；另外，沙俄反复变换盟友——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先与德国结盟，后又转投法国（这也为一战的最终爆发埋下了伏笔）——背后的动机正是通过订立一系列借贷合同推动俄

国走上基础设施和军备现代化以及工业建设的道路。^[7]可见，以经济驱动力之说无法解释19世纪下半叶沙俄帝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1] 参见Doyle: *Empires*, 第344页起若干页。

^[2] 关于美国在19世纪末进行的帝国扩张，参见Wehler: *Der Aufstieg des amerikanischen Imperialismus*。与美国帝国扩张有关的战争，见Boot: *The Savage Wars of Peace*, 尤其关于菲律宾战争的评述，见第99~128页。

^[3] 帝国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代表有鲁道夫·希法亭、罗莎·卢森堡、卡尔·考茨基和列宁。在这些人的讨论中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应该将帝国主义扩张更多地归因于消费不足还是过度积累。这个问题在本书阐述中并不重要。对于传统思维跟“贸易与变迁”精神的碰撞，在Wemer Sombart的战争论文 *Händler und Helden* (1915) 中有一段值得关注的阐述。但该著作涉及核心不是身处战乱的桑巴特 (Sombart) 的一个“爱国主义错误”，而是他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政治应用：资本主义在成功中渐渐丧失活力，变得越来越“臃肿”，所以必须引入与其本质相抵触的新思路让它得以继续运行。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采取了与此相反的视角 (*Zur Soziologie der Imperialismen*, 第283页起)，关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帝国主义是种返祖现象……是社会结构的回潮和个体精神的感受习惯的返祖。因为曾经造就帝国主义的生存紧迫感已经荡然无存，所以哪怕那些非帝国主义性的（侵略性的）发展变化有让帝国主义死灰复燃之意，但帝国主义还是必将慢慢消亡。”

^[4] “侵略性帝国主义让纳税人负担沉重，给商人和企业主的回报微薄，对公民危害极大，但它却给一些投资带来丰厚利润。这些投资者在国内市场已经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所以要求政府帮助他们在海外找到可靠而回报丰厚的投资机会。” 见Hobson: *The Imperialism*, 第74页。

^[5] 特别是在1892年就任财政大臣的维特 (Sergej Witte) 任期内进行了这一尝试。他认为，沙皇帝国如果不能过渡到经济帝国主义政治，将沦为被剥削的殖民地。而这一过渡，按照维特的预计，最有可能在东亚实现。参见Geyer: *Russian Imperialism*, 第147页起若干页。

^[6] Aron: *The Century of Total War*, 特别是“列宁及其对帝国主义的解释”这一章第89~115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精彩阐述。

[7] 关于俄国在19世纪80年代末变换盟国政策背后的经济支撑，详见Geyer：*Russian Imperialism*，第169页起若干页。

/ 中心与边缘问题

为实现对外扩张而不惜奴役和压榨自家百姓，成为沙俄帝国诞生史的胎记。^[1]这种对内压榨方式也被称为“内部殖民主义”。其中一项重大举措，便是伴随暴力和胁迫的人口大迁移：将劳动力大规模从俄国在欧洲的领土转移到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2]在解释西欧国家为何迟迟没有爆发革命时，列宁提到，在帝国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惠及大众的超额利润，而这在俄国则是遥不可及的幻梦。首先，为支撑沙皇帝国权力扩张的霸业，广大农民数百年来穷困潦倒、饱经霜雪。此外，贵族阶层是否真如帝国主义理论家所宣称的那样，在帝国扩张中捞尽便宜，也是值得怀疑的。比如1863年至1904年间，90%的贵族领地易主便是一则反例。^[3]为在强权国家的帝国竞争中抢占先机，俄国不得不变革国内的社会经济结构，此举加剧了贵族地主阶级的破产，同时也使农民阶级在穷困的深渊里越陷越深。根据帝国主义理论的考察和预测，贵族阶层的贫困化问题无疑要比农民处境恶化的影响更为重大——毕竟，前者才是沙俄帝国社会经济的支柱。然而，贵族的社会利益明显与帝国的政治需求背道而驰。按理说，贵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本应竭力阻挠帝国对外扩张才是。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沙俄都属于这样一类帝国：在其权力的中心，几乎找不出帝国政策的真正受益者。

谈到俄国，还有一个因素是帝国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的。那就是，为便于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自彼得大帝时代以降，沙皇便高度依赖非俄裔人士。这其中，德国人扮演了突出的角色，既有波罗的海的德意志贵族——他们随着18世纪初期沙俄向波罗的海的扩张而踏足沙皇的领地，并享有种种特权；也有从德国征募的军官和管理人才。以至于在18世纪和19世纪，俄国高层官员中有约18%是德裔。到20世纪之交，这个比例还有所上升。^[4]这些人无疑从沙俄的帝国扩张中分得了

一杯羹。他们的飞黄腾达皆得益于此。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哥萨克人身上，他们在戍守帝国边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沙俄帝国的真正受益者是那些边缘群体和少数民族，他们在帝国秩序之内平步青云；而这是他们在其他情况下未敢奢望的。[\[5\]](#)

源自帝国边缘的群体和少数民族为何受到如此厚待呢？这个问题，用帝国主义理论回答不了，但可以用帝国统治的理论加以诠释。帝国主义理论，考查既有的社会政治权力同帝国扩张之间的联系，从而找到帝国扩张政策的幕后推手及真正赢家，追寻在政治上、在社会中最强大的行为体。而帝国（统治）理论则提出了一种说法，认为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对于统治辽阔帝国颇有用处；在这个帝国里，中心不可能掌控所有事态发展和决策，它必须依靠边缘的主政者。而中心真正关心的不是边缘地区政策的是非优劣，而是那里的当权者的赤胆忠心。帝国越是幅员辽阔，其内部离心力越是彰明较著。地方长官和军事统帅同边缘军民打成一片，深孚众望，那么这就增加了这些人伺机从帝国分裂出去或者通过兵变、政变夺取中央政权的危险。以罗马为例，从公元前1世纪的内战时期开始，罗马帝国内就接二连三上演叛乱和篡位之争，这些纷争起于边缘，并蔓延至中心。[\[6\]](#)

为了避免地方行政长官跟当地民众走得太近，防止军事指挥官同帝国边缘驻军打成一片，可行的一个做法是频繁、定期更换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统帅。也确实有些帝国常常采纳此策。然而，这种手段自有其不足之处：边缘的主政者，常常因此而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熟悉错综复杂的当地情况，以致泥古拘方，不知变通，决策失误接踵而至。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可以证实轮换制原则的恶果。罗马帝国在日耳曼尼亚曾有一个总督——普布利乌斯·奎因克提里乌斯·瓦卢斯

（Varus），此君先在叙利亚担任行省总督，但对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这块情形完全不同的地区却了解不足，这导致公元9年他在平息日耳曼土著首领叛乱时失利。在那一年，瓦卢斯和他的军团在条顿堡森林

遭遇敌军伏击，最后一败涂地。这次军事失利也让罗马人向东北方向的帝国扩张之路从此止步不前。^[7]在帝国衰亡史中，类似瓦卢斯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

除了上述频繁更换主事者的做法，还有一种方案：在主政精英层——至少其中一部分——将那些被迫绝对效忠帝国中心的群体或个人吸纳进去。由于这些人的政治和个人命运与其主子的命运紧紧相依，所以即便天高皇帝远，没有主子的直接管控，他们也将奉献其忠诚和干劲。

利用少数族群维系帝国政权的例子，除了上文提及的沙皇俄国的文官和戍边的哥萨克人，还有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团。当然，他们并非远在帝国边缘，而恰恰驻扎于权力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及周边地区。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们足以对苏丹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近卫军直接向苏丹负责，他们是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一旦叛变，苏丹恐难有平乱之力。所以，苏丹完全依赖这一精英群体的忠诚。为确保他们战时骁勇善战以及对苏丹绝对效忠，军队采取了特殊的招募制度。奥斯曼帝国从其所属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臣民中挑选男童，以所谓“血税”^[8]之制征其入伍。他们与权力中心素无政治上的瓜葛，与之也无任何社会关联，他们获得特权地位完全拜君主的恩宠。

在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精英阶层都来自巴尔干地区。在种族上讲，他们更接近阿尔巴尼亚人而非土耳其人。近卫军帝国边缘的出身，加上种族和宗教上又属于少数族群，足以令苏丹器重和信任，而不会让他重蹈当年某些罗马皇帝的覆辙——不少罗马皇帝死于禁卫军之变。至于奥斯曼帝国的官僚精英，情形与近卫军颇为相似。从17世纪晚期开始，当自由身的穆斯林在官僚精英层中与日俱

增，渐渐占据了半壁江山，整个官僚精英层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税务官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中心逐渐丧失对边缘的有效管控。^[9]

同样，在西班牙世界帝国的衰落和崩解历史中，我们也能看到内部离心力的上升乃至失控，这最终导致大片地区从帝国体系里脱离出去。由于很少向拉美属地派驻行政官员和军队，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地管理成本不高。如此一来，一方面，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民兵军官（当时民兵是维护社会安定、抵御印第安游牧部落侵袭的主要力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克里奥尔化（Kreolisierung）势头。而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的贸易也全面落入克里奥尔人之手。^[10]在极盛时期，西班牙在美洲的势力范围北起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南接智利南端。在这片辽阔的属地，得势的克里奥尔上层集团没过多久便认定，已经没有必要再向宗主国源源不断输出其赖以维系欧洲霸权的财富了。

在帝国的中心马德里，人们的看法自然完全不同。他们力图通过波旁王廷的改革削弱克里奥尔人的影响，同时也增强来自欧洲的西班牙人在当地的权力。这些改革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同时也使西属拉丁美洲地区渐渐疏远其宗主国。^[11]1807年，拿破仑的军队占领西班牙，随后他任命其兄长为西班牙国王。这一事件为拉丁美洲从西班牙分离出去提供了一个契机，但并非其根本原因。

在沙俄帝国，我们已经看到，在它的官僚及军事精英层里，有一部分来自社会政治的边缘地带。这种边缘性对应于西班牙帝国，则是在一个印第安人人数占优的环境里白人城市上流阶层长期的少数派地位。在那里，阻碍西班牙帝国秩序离心趋向的，是克里奥尔上流阶层的顾虑——他们并不能肯定，在脱离帝国联盟之后，能否保住其“新世界”的社会地位。他们担心自己在奴隶和印第安人的抗争中，会最终变得一无所有。正是文官管理制、法治，以及内外安定这些维系西班牙稳定的要素，在这时起到了向心平衡的作用。但随着波旁王廷改

革的推进，克里奥尔人承受的成本压力日增月涨。直至西班牙在对英国的战争中已无力兑现改革承诺，克里奥尔人方才确信，从帝国脱离出去要胜过留在里面。

在沙俄和西班牙的例子中，我们发现——至少从帝国建立之时开始——不能仅仅通过“中心”来解读帝国秩序的结构和动力。那些对帝国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的决策，很多都是由那些来自边缘的个人或群体做出的，这些人的政治意识有着深深的边缘烙印。比如，2世纪以后的罗马皇帝即大致属于这一类人。

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边缘对中心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英国人抛弃了——至少部分抛弃了——通过控制商业和人员流通所换来的帝国安逸的局面，在印度和非洲大陆给自己徒增了领土帝国特有的沉重负担，统治成本由此攀升。作为自由贸易理念的信徒，英国人本相信通过强化经济往来可达致长治久安；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英国人最初曾将帝国扩建之大任大部分交到了非国家行为主体手里，特别是贸易公司，也包括那些开辟新市场进而扩大贸易的商人和银行。自由贸易理论的奠基人理查德·柯布登（R. Cobden）在1846年就曾说过：“依我看来，在道德世界里，自由贸易的原则所起的作用如同宇宙空间里的重力原则。它让天各一方的人汇聚一堂，消融了种族信仰和语言的千差万别，以永久和平为纽带，将我们团结在一起。”^[12]

然而到了19世纪末，事情发展的方向与自由贸易和自由国际主义理论所设想的背道而驰。^[13]那些强加于附庸国家的经贸协议，并没如英国人所期待的那样，强化当地政治秩序或者带来政治秩序自由化。相反，却一步步削弱了那里的政治秩序，最终导致它的分崩离析。于是，叛乱层出不穷。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起义是一个序曲。在那一连串事件的影响之下，英国人在整体上对其在印度的行政和军

事体制进行了改革。他们放弃了低成本的间接统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代价高昂的直接统治。这一决策并非根源于中心，归根结底，它是由边缘的动荡局面所触发的反应。

这些此起彼伏的骚乱，加上新上台的政客们又不比前任，没能顺应经济发展的时代需求而有所作为，凡此种种导致了贷款偿还期一再延宕，在新开发地区的投资安全也令人担忧。英国人碰到的这些问题，美国也曾经遭遇过，尤其是在它的所谓“后院”——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至于“不得不”一次次付诸干预行动。一时间，那些原本在其经济触角渗入的地区刻意回避政治干预的帝国政权，突然面临着新的抉择：要么干脆从这些地区全身而退，要么在行政管理和政治上全面接管当地统治。^[14]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选择了后者。他们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建立殖民地。而在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美国的政策则止步于阶段性军事干预。全身而退，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曾经付出的投资将付诸东流。那些已经一只脚踏入经济全球化阶段的强国，断然不会因为边缘局势出现动荡或遭遇零星反抗，而真正考虑全身而退。^[15]

当扩张中的西方社会决意以这种方式用尽政府机构、军队特别是税收手段来实现其经济利益时，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而言，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国家。^[16]然而，这当中被人忽视的，是在边缘悄然发生的变化。在那里，在源自工业化中心的商品流通的重压之下，传统的生产方式土崩瓦解。而与此同时，人们原有生活方式所起的凝聚作用，也已荡然无存。19世纪下半叶，初具雏形的全球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推动着19世纪80年代以后所谓的帝国主义扩张，并最终开启了真正帝国主义时代的序幕。如果我们把上述发展过程描述成一个由经济因素所触发的，对既有秩序日侵月蚀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促使外在强权介入其中、稳定局面，那么就不难看出20世纪末的政局倒与之颇有几分相似。比如在过去几十年里，那

些出于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从阻止种族屠杀到遏制内战，不一而足——都可视作对当今全球化进程中的意外副作用的一种补救方式。那么，某些学者口中的所谓人道帝国主义，其实也无异于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所做的政治调整。

虽然那些潜心于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历史的史学家，不遗余力地呼吁大家对边缘给予更多关注，^[17]不过应者寥寥。帝国主义理论家们之所以不待见边缘，是因为他们的理论从理念到提问方式都着眼于中心：在他们看来，但凡有意于缔造帝国的思潮和政治运动都可冠以帝国主义之名。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理论，不可避免地太过拘泥于中心少数行为体的主观意志，而忽视了中心和边缘互动所产生的连锁效应对于帝国成形之重要意义。相反，帝国理论将中心和边缘等量齐观，无论是在考察帝国诞生的初期时，还是在研究帝国的稳定期时，皆一以贯之。

这样，我们的讨论也就自然而然触及了帝国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问题，即这一理论聚焦于帝国的诞生阶段，而忽视了稍晚时期帝国的运作。很明显，这种片面性根源于其认知旨趣在于资本主义的原动力：这些理论家坚持认为，帝国主义将无法构建起一个稳健的秩序体系，于是战乱和冲突将不可避免，这又将最终埋葬帝国主义。基于这样的认知，他们自然不会更深入地钻研那些发达帝国的运作之道。即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帝国主义理论学说得以复兴，学者们也只是更多关注那些年寿不永的帝国诞生史，如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威廉主义以及纳粹大日耳曼帝国的狂想等。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了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然而，除了大英帝国，他们对那些国祚久续的诸多帝国兴趣寥寥，探究不多。^[18]他们认定帝国主义时代的末日已指日可待，这样的期望，本身似乎已让这种探讨显得多余；于是，即便论及大英世界帝国，他们主要也是把目光投向冒进的帝国扩张阶段，而对润物无声的帝国运作期视而不见。所以，顺着

帝国主义理论的这种思路，理论家们完全也有可能抛出这么一个武断的预测：“美利坚的帝国”也将不会长久。

[1] 为了建立帝国而对农民进行压榨的情况，参见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第228~254页。

[2] 仅仅在1887到1913年期间就有540万人移民或被强迫迁移到西伯利亚，参阅Reinhard: *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 第164页起。

[3] 参见Geyer: *Russian Imperialism*, 第128页。

[4] 参见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第36页。

[5] 不能因此而否认，部分商人家族的发迹与俄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息息相关。一个佐证就是斯特罗加诺夫家族（Stroganov），他们推动并操纵了俄国向西伯利亚的扩张运动。参见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第13页，以及Reinhard: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 第161页起。

[6] 中华帝国历史上每隔较长一段时间便会出现的分裂现象无一例外地肇始于边缘。参见Schmidt-Glintzer: *China*, 第64页起若干页、第133页起若干页、第193页起若干页。

[7] 参见Lehmann: *Das Ende der römischen Herrschaft*。

[8] 德夫希尔梅（Dewschirme）。

[9] 关于土耳其禁卫军的体制和“血税”招募方式，参见Matuz: *Das Osmanische Reich*, 第98页起若干页。作为奥斯曼帝国衰弱的征兆，禁卫军衰没的历史可参见Jorga: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第3卷，第220页起若干页。简要概述见Ursinus: *Byzanz, Osmanisches Reich, türkischer Nationalstaat*, 第155页起。

[10] 参见Pieper: *Das Ende des Spanischen Kolonialreiches*, 以及Bernecker: *Spanische Geschichte*, 第107页起若干页。

[11] 见本书下文，第163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

[12] 转引自Schell: *Unconquerable World*, 第36页。

[13] 参见Robinson: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14] 参见Schell: *Unconquerable World*, 第35~38页。

[15] 英国人和美国人对边缘动荡的不同因应方式主要与他们特定的政治传统有关，而与原则性和规范性差异关系不大。对英国人来说，建立保护国和殖民地的决定符合他们的一贯政策。而对于美国来说，因为他们在意识中将对英国的独立战争上升到了立国神话，所以建保护国和殖民地的做法与他们的理念有冲突。但事实上，美国对待巴拿马和菲律宾的方式也是以建立保护国而告终的。有关作为空间与时间密集化的全球化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参见Menzel: *Die Globalisierung*。

[16] 当然，我们更应该把这种过渡想象为走过了一段路程，而不是跨越了一道门槛。

[17] 参见Robinson: *Non-European Foundations*, 以及Fieldhouse: *Economics and Empire*。

[18] Geiss: *Kontinuitäten des Imperialismus*评述了帝国主义理论的复兴以及因此在德国所触发的历史研究。

/ 威望追求与权力竞争：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

要梳理晚近强权政治的演变发展，是否可以指望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帮我们指点迷津呢？须指出，这一理论学说将关注点集中在大都市发展上，同样对中心-边缘问题鲜有涉及。所以，早期的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致力于诠释拿破仑三世的崛起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诞生。这些理论将拿破仑一世和他开创的帝国以及法兰西第一、第二帝国何以延承罗马帝国传统衣钵等问题，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础。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是这些理论的开山之作。书中，马克思将拿破仑三世的政治发迹归因于19世纪中期法国社会的“阶级平衡”。进步的力量和保守的力量分立于天平的两端，在一段时间里，双方势均力敌，并且彼此削弱。这就导致了国家机构趋向自主化：自此，它可以推行不受某个统治阶级意志主宰的政策。

所谓波拿巴主义理论^[1]本身并不是帝国主义理论。但它已经闪现了不少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子。比如它认为，军队和国家权力精英在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不再受制于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羁缚，而汲汲营营于其——套用韦伯的概念——威望追求。至于威望的代价问题，可以搁置不提，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政治上无权的社会所必须承担的。当1851年冬路易·波拿巴窃取了权力，马克思这样写道：“法国逃脱一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权威的人的权威。”^{[2][3]}

在马克思眼里，路易·波拿巴只是流氓无产阶级两个帮派的首领，是暴发户和暴徒的头儿。马克思相信法国的真正权力因素是军队，而不是国民会议。早在第二帝国尚未建立时，他便写道：建成完全意义的共和国，只差一点，即（议会）永久休会，把（共和国）高

唱的“自由、平等、博爱”信条换成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4]此前的拿破仑一世，也只能借助无休止的对外战争使其通过政变篡夺的政权苟延残喘。就这一点而言，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5]在马克思看来，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倘若马克思不是一味专注于经济和阶级斗争问题，而是在其阐述中加入政治心理学方面的考量，那么，他会很快触及后来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称为威望追求的那个点。皇帝、朝臣和将领汲汲营营，都希望获得人们对其卓然地位的认同，不独在法国，在欧洲，在全世界范围内，莫不如此。而且，要满足这种威望追求，只能寄望一次又一次的帝国行动：从巩固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统治，到哈布斯堡家族的马西米连诺一世（Maximilian）在墨西哥的冒险事业，无不代表着当时的法国政治。

诚然，关于上述政策轻率冒险的一面，在当时没有谁比马克思看得更加清楚了。法国当时外交内政的目标在于提升皇帝（拿破仑三世）及其帝国在欧洲大陆和整个世界上的威望，而并不以经济收益作为衡量标准，更不可能将经济收益作为最终目标。可以说，拿破仑三世的政策是拿经济资本换取政治威望。在这种政治威望追求背后暗含着一个承诺：在中长期，经济上将会有利可图；在短期，每个法国人将受益于法国的帝国威望，他们能从第二帝国的巨厦上沾得一分荣光。^[6]

跟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学说相比，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自有其优点：他们援引多种资本类型来进行论证，不同资本类型之间可相互比较，相互转换。^[7]事实上，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确实受了路易·拿破仑政治的影响，并由此传播开来。^[8]英国当年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 Disraeli）在其1872年著名的“水晶宫演讲”中，

使用了这个概念，借以描述一种扩张性的外交政策。不过，他推行这一政策，归根结底，主要还是为了提升英国王室的威望以及保守党的公众声望。甚至维多利亚女王在1876年4月加冕为印度女皇，也是彻头彻尾的帝国行为：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皇权，而在这个新皇权里，政治威望压倒了经济利益。

迪斯雷利大打帝国牌，与当时欧洲大陆的政治气候不无关系：在当时的欧洲，皇帝的尊号 已经从巴黎移到了柏林。普法战争中败北的法国，于1870年9月重返共和政体；而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德意志南北大小诸邦在其王侯和国王率领下，于1871年初臣服于德皇的统治。欧洲的陆地帝国，比如两个拿破仑皇帝的法兰西帝国，以及在俾斯麦时代终结、威廉主义启幕之后前后两个“德意志帝国”，[\[9\]](#)都曾试图与古罗马帝国“攀亲”，从而提升自身威望。而迪斯雷利则致力于在欧洲之外扩张英国的权力，以强化其全球威望，也即“世界统治地位”。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尚无海外殖民地，按全球威望的标尺来衡量，只能算是一个二流角色。然而，殖民扩张的狂热很快感染了德国。这种狂热同样是一种威望追求的外显，即冀望为德意志帝国争得“那太阳下的一席之地”。

因此，在当时，这种帝国诉求在内政上的作用体现在它试图使帝国子民都获得一份民族自豪感，以此纾解经济上的分配冲突；在外交方面，它能达到提升国际威望，增强其权力和影响力的目的。[\[10\]](#)就这一点而言，威望追求无异于一种政治运作过程，不宜以短期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评估其价值。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威望竞争解读为建立国际层级制的过程。这个层级制，无须“以战争作为出路”（克劳塞维茨语），至少在争夺主宰地位的竞争对手之间，无须动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劲敌之间就可以完全相安无事，只不过因竞争而生的战争往往发生在各自统治范围的边缘，而且竞争各方也会极力避免与对方发生直接摩擦。[\[11\]](#)他们通过武力制服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劣

势的对手，赢得威望。只有当这种权力和威望竞争模式失灵的时候，边缘的帝国战争——往往是以不对称的战争方式出现——才会演变成帝国主义战争。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争夺霸权地位的竞争对手才会直接兵戎相见。

因此，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12\]](#)是不同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的另一类竞争。那不是抢占市场和投资机会的资本竞争，而是一种争夺权力和影响力的国家间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中，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效益平衡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当然，威望追求也总会给非理性的动机和期望打开方便之门。不过，我们需谨慎待之，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给威望追求一律扣上非理性的帽子。反而那种只拿经济利润来衡量成本和收益的考察方式，恰恰是不理性的。

跟一般主权国家不同的是，帝国总要承受一种非正式压力，即要在一切权力、威望、成绩可量化、较量的领域里保持领先地位。时至今日，这种争冠夺魁的压力，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或经济业绩上，也表现在技术发展和学术进步上，甚至已扩展到了体育和文娱领域：诺贝尔奖斩获几何，大学排名怎样，奥运会奖牌数排名，奥斯卡奖花落谁家，等等，这些都成为展示和捍卫帝国“软实力”的竞技场。在这些舞台上，偶尔的名落孙山，立刻有人将它视作帝国衰落的先兆，而且无疑也会导致帝国威望的损失。在下一轮较量中，它必将竭力挽回颜面。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些领域虽是帝国接受霸主地位考验和检视的试金石，但终究还无伤大雅。

检验帝国优势地位，还有一个远比这些激烈得多的赛场，那就是自然科学和尖端技术领域。这些领域决定了对世界经济命脉的掌控力，而政治和军事的权力也正来源于此。航天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航天事业取得了石破天惊的突破。美国朝野上下无不愕然，引发了所谓“斯普尼

克惊恐”^[13]，而且还直接触发美国太空计划的立项——通过这项计划，美国矢志在航天事业上赶超苏联。登月成功，正是美国奋起直追并取得领先的标志性事件。当尼尔·阿姆斯特朗走出登月舱，踏上月球的土地，那一刻，对人类来说的确是迈出了一大步。而就美国而言，首先是它在威望追求和优势地位上向前迈出的的一大步。

要正确评估政治威望追求的意义，我们必须了解清楚威望竞争的框架条件，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先把国际政治中的多极体系和两极体系区分开来。而且除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普遍的多极和两极区分外，^[14]有必要加上对第三种可能——单极体系的区分。在单极体系里，那一极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它的威望追求，其实已降为威望的维持。在这种情形下，最重要的一点，是权力分配的客观指标所确定下来的格局得到其中所有行为体的广泛认同。认同程度越高，国际政治秩序则越稳定，反之，则越容易发生拒绝追随甚至公然违抗现存层级制的行为。在伊拉克战争之初，种种论争甚嚣尘上。这些争论本质上都绕不开美国的政治威望问题。几个盟友公然拒绝追随，这自然给美国的威望招来不费之损。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在西方阵营里一直扮演着质疑美国至高无上威望的角色，甚至力图获得大致与山姆大叔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西方霸权世界里与之平分秋色。戴高乐总统开了这一政策的先河，并且打上戴高乐主义的招牌。就连推崇自由社会和法式社会主义的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和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两位总统也步其后尘，追随了他的路线。至于英国人，则走了不同的路。他们与美国过从甚密，想借此搭美国政治威望的顺风车，从而也提升自己的国际声望。

这种来自“第二梯队”的威望角逐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因时而异。它在冷战时期的两极秩序中所产生的后果，不同于在今日单极秩

序里的影响。两极秩序让威望角逐的影响效应受到了限制，而单极和多极秩序则会放大和强化这种影响作用。具体而言，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法国人偶尔唱唱反调，显然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不可能动摇法国隶属于西方阵营的属性，背离西方阵营也绝非法国政策的出发点。因此，法国在外交政策上虽时时展露其独立自主的势头，但不会逾制僭越。法国人的威望追求，与其说是为了改变当时的政治棋局，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民族虚荣心。也就是说，美国在当时无意过度彰显其霸权地位，与此同时，英国人虽紧紧追随美国左右，从中所得却相对较少。

这一切随着两极体系的终结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5]很明显的就是若以1991年为分界点，美国所面临的局面在这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1991年底，苏联正式解体。但几乎直到十年之后，当事行为主体才清楚地意识到，两极体系的终结究竟给它们带来了怎样的后果。两极变成了单极，最大竞争对手出局，单极霸主的相对权力固然获得了提升，但来自“第二梯队的威望角逐”，如今也对霸主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 challenge。它再也不能像从前两极对立时期那样，对这样的挑战泰然自若、坐视不管了。另外，霸主国的无条件追随者则行情看涨，至少是象征性上涨。总的来说，在两极体系的结构压力消除以后，霸权强国对其盟友的期望压力远甚从前。鉴于近些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龃龉不断，很多观察家指出，美国已从“仁慈霸权”的角色蜕变为强硬的帝国强权；而这一切皆被归因于美国政府班底和政治智囊团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影响，^[16]但或许这一切只是两极压力消散所带来的后果以及由此而生的更激烈的威望竞争的反映。

霸权候选国之间的角逐越是激烈，霸主国家以帝国行动来彰显其诉求的压力也就越大。迪斯雷利的“水晶宫演讲”正是面对欧洲新格局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当时在德意志统一之后，英国对欧洲大陆事务的影响力已受到削弱；同时它又面临俄国在中亚的侵略政策的挑战。

此外，随着美国的日益壮大，英国作为全球领先的工业强国地位也已岌岌可危。简言之，英帝国的地位受到了挑战，而迪斯雷利力推的帝国主义计划便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外部问题的应对方式远比经济学及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所设想的更为激烈。此前英国几乎没有大费周章，便成就了其世界政治霸权的地位，如今它受到质疑和挑战，自当奋起捍卫，以求地位不失。那些在大部分帝国主义理论家看来是进攻性的表现，其实在政治行为主体眼里，可能恰恰出自再正常不过的防御动机罢了。

在整个18世纪，英国都充当了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平衡者”角色。保持欧陆的均势，压制可能威胁其霸权地位的对手之崛起，做到这些英国人曾经无需派出一兵一卒，只需在资金和道义上向相对弱势的一方施以援手，增强其承受力。英国人这种极为划算的霸权政策，在同法国拿破仑一世的争斗中走到了尽头。为了扳倒拿破仑，同时也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都不得不向欧陆投入兵力。而拿破仑不仅通过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在军事上压制英国；而且，他还以贸易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来打击英国经济。此举意图切断英伦三岛与欧洲市场的所有联系，进而使英国屈服。

拿破仑帝国瓦解后的欧洲局势，完全符合英国人的利益。欧洲自此又恢复了昔日多极力量的均衡局面，但也同时渐渐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在中欧和东欧，是沙俄主导的神圣同盟，与之遥遥相对的是西边实力受挫的法兰西。后者严重依赖与英国的政治同盟关系，而英国人也得以重拾其一贯的霸权政策，他们以其无与伦比的海军实力独霸海上霸权；他们倚借盟国和自身资金的优势，把持欧陆事务；他们为商品流通打开市场，并随着其工业革命的深入不断拓宽市场。英国人从他们成本极低的霸权地位中大受其益，除了战舰，他们几乎不必为此大费周章地投入人力、财力。因此，当迪斯雷利的对手——自由党人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力拒迪斯雷利的帝国主义

政策，并完全贬斥帝国主义概念，实属情有可原。^[17]诚然，英国人一向在欧洲维持均势，在欧陆之外的地区实行间接统治，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人何苦要放弃这样一个有利局面，转向代价高昂且前途未卜的帝国主义冒险呢？

^[1] 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理论在20世纪又被多位学者重新挖掘，用于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分析，参见Jaschke: *Soziale Basis*。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5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 Marx: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第196页。

^[4] Marx: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第148页。

^[5] Marx: *Erste Adresse des Generalrats*, 第3页。

^[6] 关于威望的概念和理念，参见Kluth: *Sozialprestige*。

^[7] 当然，主要源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资本类型模式在当时并不流行，因而在19世纪的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中没有这方面的详尽阐释。但事实上，即便没有提到概念，这些研究理论中已经具备了资本类型模式的雏形。

^[8] 参见Koebner: *Imperialism*, 第1~26页。

^[9]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Das Reich als politische Macht*。

^[10] 关于威望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参见Gilpin: *War and Change*, 第30页起若干页。

^[11] 见本书下文，第118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

^[12] 概要参见Mommsen: *Imperialismustheorien*, 第7~11页。

^[13] Spunik shock, 斯普尼克为苏联人造卫星的名字。

[14] 关于这一点，Snyder从霸权和帝国的野心入手，阐述了多极和两极体系的激励机制和制裁机制，参见Snyder: *Myths of Empire*, 第21~26页。

[15] 国际政治的框架条件被定义成单极还是多极，对于“来自第二梯队的威望追求”造成的影响并非至关重要。在这两种情况下，优势力量为了确保盟友对其霸权地位的承认而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按照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第12页起的说法，也可以将上述两种格局描述为具有一个潜在霸主的多极局面。在作者米尔斯海默看来，这一体系最易发生冲突。

[16] 这样的观点大致见于Verenikotte: *Die Herren der Welt*第82页起若干页中，有作者旁征博引的论述。

[17] 参见Koebner: *Imperialism*, 第135页起若干页。

/ 扩张压力、边缘“地利”与时间主权

同样是维护自身安全并在军事上保持对竞争对手的优势地位，相比欧洲大陆国家，那时的英国人在这一方面的花费要小得多。他们除了在打造海军战舰上的投资以外，不必像对手那样需要一支常备陆军。在形势所迫，确需调用大规模陆军的情况下，英国人则长期采取在欧陆租借或雇用军队的做法。

跟陆军正好相反，海军曾是维护经济繁荣的一大利器。当欧陆国家的陆军大多数时间驻守根据地，让白银东流，海军战舰却随时待命，控制并守卫着水上商道，创造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附加值。对陆军而言，战争与和平之间有一道根本性的分割线：无论宣战还是媾和，都会彻底改变一支陆军的“相态”（Aggregatzustand）；而海军，尤其是海洋霸主的海军，情况则迥然不同。即使真的天下太平，海军依然可以履行警察之职，在海上商道保驾护航，让商船免遭海盗之祸。可见，在海军战舰上的投入，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看，都物有所值。相形之下，陆军顶多在政治上获得回报。这也正是海洋帝国相较陆地帝国而言最为重要的成本优势之一。关于这一点，美国海军将领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其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890）中有过细述。^[1]此外，在大英帝国诞生的例子中，我们还看到，英国地处欧洲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位置也是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欧洲大陆那端，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征战不休中相互削弱，也同时断了各自达致帝国地位之路。而英国则在隔岸观火中崛起壮大。此外，作为欧陆均势的平衡者，英国还控制着这些争霸战争的进程。^[2]

那些从一个主权国家体系里或者一种由势均力敌的强国组成的多元体（Pluriversum）里脱颖而出建立帝国的努力，几乎都胎死腹中。而与此相反，那些起家于世界政治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区的，则常常顺风顺水，大获成功。身处中心从一开始就要付出多得多的努力，俾便在强手如林的竞技场上一马当先，形成帝国政权的雏形。在这一条冲向帝国的路上，必然伴随大规模的战争，战争中强大的国家联盟与初具雏形的帝国相对峙，难解难分。在这些霸权战争中，^[3]要么帝国胎死腹中，要么则像拿破仑的法国和威廉皇帝的德意志那样，在慢慢成形的帝国内部，军队获得主导权。但是，这又让帝国的继续壮大在成本上变得难以承受，同时在政治上束缚了帝国的手脚，让政治行动僵硬呆板。所以，与起家于边缘地区的帝国不同，脱胎于权力政治中心的帝国在其形成过程中，无权坐享前者独有的那种安逸局面：仅仅通过控制贸易流实现帝国统治，而且产出总高于投入。所以，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后，欧洲虽然也出现过称雄一时的霸权，却没有一个长盛不衰的帝国。无论是腓力二世到腓力四世时期的西班牙，^[4]还是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甚至由霍亨索伦家族统一后的德意志，皆因连年征伐而未能成功缔造一个帝国。而且到头来，还将原有的霸权优势也一并葬送了。

在政治权力的边缘地带，往往因为没有多个势均力敌的竞争者，而不会爆发毁灭性的大规模战争。在那里，帝国的崛起之路起步于一连串的“小战争”。在这些小型战役中，组织和技术上逊色的对手最终被制服。^[5]另外，这些小战争的特点是，一般无须投入庞大兵力，不必动用大量军备物资或庞杂后勤供给，因此战争成本不高。在那些成功的帝国诞生史之中，我们看到，它们大都产生于纷争不休的国际政治大空间之边缘，而不是中心。从英国、俄国、美国、罗马到西班牙及葡萄牙，莫不如此。^[6]就连奥斯曼帝国也起家于安纳托里亚半岛的边缘，直至帝国扩张阶段，才向小亚细亚和东南欧的中心地带徐徐推进。值得一提的是，古老的波斯帝国和中国，它们都是在国际政治

的中心地带发迹并最终形成的帝国。在世界帝国光谱上，它们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这些所谓侧翼大国，除了在对付对手和敌人时具有政策执行成本更低的优势以外，最大的长处在于它们源自边缘位置的“时间主权”（Zeitsouveränität，或者说时间自主性）。位于中心的强国，与对手常年征战不休，而对手中也不乏在人力和资源上胜出自己一筹者；而边缘的强国，却能将地处边缘的和平红利转化为对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18和19世纪的英国，正是凭借此道，在经济上赢得了对欧洲大陆的优势。也由于英国在全球化的萌芽阶段便从贸易发展中大获其利，所以它才成为自由贸易的开路先锋和捍卫者，[\[7\]](#)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不难看出，和平符合当时大英帝国的利益。如果要打仗，那也必然是为了保障商道通畅或者开辟新市场，也就是说它只打完全合算的仗。至于势均力敌的强国，英国则极力避免与之卷入冲突。17世纪西班牙衰落，葡萄牙后来沦为英国人的附庸，法国则为争夺霸权，疲于征战，以致最终国力大挫。此时，放眼欧洲大陆，英国人已经难觅对手。[\[8\]](#)

其实，美国的崛起同样得益于其地处边缘的“地利”。地利使得它在1815年（试图 攻入加拿大各省，但最终在英国的抵制中败下阵来）和1917年（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避免了同旗鼓相当的劲敌短兵相接，一决高下。而在19世纪中后期，对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战争则属于帝国的扩张战争，对手跟它远不在一个级别。南北战争从头打到尾，也没有外来势力插足，搁在欧洲大陆，这是难以想象的事。在那里，如若遇到这种情形，其他国家会争先恐后，从强权政治的真空中捞上一把。

边缘位置的优势，也彰显于罗马的历史中。在很长时间里，罗马都在希腊化世界——当时地中海地区的政治重心——之外的边缘地带

延展、扩张。相似的情形也可见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它们在欧洲权力中心之外的地带完成了其政治和经济上的迅速崛起。而当时的权力中心基本在巴黎—罗马—维也纳围成的三角区域。或许我们可以说，随着阿拉贡王室入主意大利之南，随着查理五世当选德意志国王（1519），西班牙便早早卷入了欧洲列强争夺霸权的战争，而这也正是西班牙厄运之始。因为这些战争让它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实力大为受挫。这个情境让人不由联想到英国人，他们曾一直克制自己，竭力置身于劳民伤财的欧陆战争之外，或许正是因为他们从西班牙的历史中汲取了经验教训。事实上，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在18世纪初期卷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是一大例外。不过说到底，英国参与这场大战主要还是力图将一个可能危及它欧洲影响力的反霸权阵营扼杀于摇篮。

那么俄国呢？不消说，近海的边缘位置有着与陆上边缘位置不一样的影响效应。沙皇帝国的崛起，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纷飞的战火。对手虽都非等闲之辈，但经过几十年的交战，最终也都臣服于沙皇。这段历史起于对金帐汗国的征战，最终沙皇在俄罗斯南部地区取代大汗成为主宰。此后，战火烧到了囊括乌克兰的波兰王国，随后继续与瑞典王国交锋，因为上述几国阻碍了沙俄向西北扩张的前进之路。俄国与奥斯曼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长久以来，奥斯曼人控制着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封锁了俄国常年对外通商的必经之道。而且，奥斯曼人还因为拜占庭，拥有东正教的圣地，而那又是沙皇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来源。^[9]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自诩为西、南斯拉夫民族庇护者的沙皇为争夺对这些斯拉夫民族的统治权，同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皇朝）展开了拉锯战。这种征战不休、烽火连天的局面，也导致沙皇帝国之创建付出了远比大英帝国或美利坚帝国更为高昂的代价。与此对应的是，在俄国，军队作为权力要素的权重远比在其他西方强国中更高。事实上，俄国从未像英国或美国那样，从其边缘位置中获得那么多好处。

然而，跟中欧和西欧强国相比，俄国还是优势明显。除了个别例外，俄国极少与大国联盟发生冲突。这样一来，它就可以逐一打击对手，各个击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俄国人也充分利用了源于其边缘位置的时间主权：他们将领地扩张的时间进程放缓、拉长，将它细分为多个步骤和阶段。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这样就避免了陷入师老兵疲、力不从心的危境。

如果帝国丧失了按自己的节奏把控其扩张和巩固进程的能力，也就是说按部就班，加速和放缓帝国前进步伐的能力，那么对帝国政治而言，不啻为致命之害。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因素，都能对帝国的时间主权施加双向制约。所谓外部因素，是指那些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及联盟，他们力阻帝国候选者的进一步壮大，或者对其业已取得的地位发出挑战。边缘位置的优势，说到底其实就在于它相比权力政治的中心更不容易发生上述那种直接冲突。在权力政治的中心，只要行为体尚未奠定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那么它就还不能自称为时间上的主人。而这种对时间进程的掌控，成为一种独立的影响因素，反过来也帮助行为体赢得左右时局走向的权力。相形之下，边缘位置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在这个区域内，一般只存在“一个”强大的行为体，这个行为体独掌时局轻重缓急的发展节奏。第一次世界大战，归根到底是一场欧洲内部的战争，也是包括俄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大国对时间节奏丧失掌控力的典型案例。当时，唯一的时间节奏大师是美国，它也是一战实际的赢家。

随着帝国的固本强基，情势也悄然发生变化。曾经的边缘，如今变成了中心；而昔日的核心地带，则可蜕变为新“世界”秩序中的边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除了少数例外——起步于世界政治权力中心的帝国，往往难产或夭折，而边缘的地利条件则能助崛起的帝国一臂之力。我们还不妨进一步延伸，可以说，因为既无劲敌环伺又享有拜边缘位置所赐的高度时间主权，边缘位置几乎就直接催生了

帝国。此外，在那变动不居的边界，崛起中的大国没有遭遇任何劲敌的挑战；于是，边界好似真空，吸引着大国朝边界之外的区域扩张开去。美国的西部疆界就属于这种情况。它在18和19世纪不断往外延展推进，直至太平洋之滨。相似的情形还发生在俄国的东部疆界上，它在同一时期一再迁移，倏忽之间，触角已伸向北美大陆。然而，当俄国人将边界推至日本海时，它的扩张便戛然而止了。在那里，俄国人遇到了真正的对手。^[10]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其扩张之路并未止步于太平洋之滨，从19世纪晚期开始，美国日益壮大，一跃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强国。而这一扩张过程，最终也导致美日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相似的情形，可见于欧洲殖民帝国的诞生史。当时，边缘出现权力政治的真空，刺激了列强一再外扩的野心。对于领土帝国的诞生，边缘的吸力效应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不亚于中心地带的扩张原动力。

当然，中心的原动力依然是帝国扩张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没有它，边缘的权力政治真空无法得到充分利用。中心的原动力并不会产生一种向外扩张的不可控压力，这也是帝国时间自主权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这种压力便将成为侵蚀帝国时间自主权的“内部”因素。帝国主义理论，无论经济学的还是政治学的帝国主义理论，都聚焦于上述这种扩张性压力。根据帝国主义理论的说法，帝国主义的崩溃指日可待，最有力的证据不仅在于强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更因为帝国的时间主权因内部因素困扰而受到了侵蚀。在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游击战理论中，“农村包围城市”乃其核心思想，他借此阐述了这样一种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世界最终将不是毁于内部因素，而是毁于外部因素；不是败于其中心的演变，而是败于边缘的反抗。而他的理论其实也同样触及帝国中心的时间主权问题：中心的时间主权，受到了被毛泽东称为“持久战”的游击战争的制约和削弱^[11]。

认为内部因素会侵蚀帝国中心时间主权的设想，进一步发展成为过度积累及消费不足的理论。按这一理论的说法，在经济中心的销售

危机的“压力”之下，人们必须不断开辟新市场，以便为商品和资本输出打开方便之门。社会帝国主义理论提出另一种视角：帝国中心受到日益强大的压力，被迫从它通过帝国主义剥削或抢占殖民地而攫取到的超额利润中分一部分来犒劳和安抚它的社会底层阶级。而在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里反复提及的威望竞争，说到底，本质上也不过是对外扩张压力的一种表述。这一压力，制约了帝国极具政治价值的时间主权。^[12]

这种制约在处于世界政治中心的帝国竞争者身上表现得要远比在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竞争者身上更明显——毕竟在边缘，时间视域（Zeithorizont）要更为开阔。为了证明其世界强国的地位或至少宣示具有世界强国的候补资格，当时欧陆大国都争先恐后地在海外攻城略地，抢占领土。首先是德国，其次就是法国，甚至包括意大利在内。如果哪个国家没有斩获任何殖民地，也没有寻求他径得以扩张领土，那么它不仅会在市场及原材料分配中无功而返，同样会在欧洲权力体系内丧失其分量和影响力。也就是说，这其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是交织在一起，同时作用的。

19世纪晚期弥漫于欧洲大陆的焦虑不安的情绪，^[13]主要就是在欧陆内部竞争的加剧下，时间视域持续收缩所造成的。不独欧洲，甚至边缘也受到了这种焦虑情绪的感染。19世纪末，美国的扩张政策就是一例。不过，总的来说，边缘的竞争压力毕竟小一些。当位于中心的帝国政权和具有帝国雏形的政权越来越无力决定行动的方向，^[14]侧翼大国——除了在同日本的冲突中被严重削弱的沙俄帝国这个例外——则明显更从容不迫，能做自己行动和决定的主人。然而，边缘位置和权力政治中心的差异，不仅对帝国创建的成败、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且对于我们判定一个国家是霸权力量还是帝国也非常重要。

^[1] Mahan: *Der Einfluss der Seemacht*, 特别是第21页起若干页。

[2] 关于欧洲权力之争以及持久霸权一次次失败的历史，参见Dehio: *Gleichgewicht oder Hegemonie*；关于英国的欧洲均势政策和平衡者角色，参见Vagts: *Die Chimäre des Europäischen Gleichgewichts*。

[3] 关于霸权战争的概念和定义，参见Gilpin: *War and Change*，第186～210页。

[4] 至于西班牙，要把它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海外帝国和因法国及奥斯曼的（有时是协同的）反制行动而胎死腹中的欧陆帝国梦区别开来。对此及其随后的论述，参见Dehio: *Gleichgewicht oder Hegemonie*。

[5] 这类小规模战争不可以与现代游击战混为一谈，虽然二者之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见本书下文184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这类战争有时采用极为残忍的方式，而且完全无视任何国际法。1904年德国对德属西南非的赫雷罗人起义的血腥镇压就是其中一个佐证。参见Zimmerer: *Völkermord*。

[6] Bender: *Weltmacht Amerika*，第170～176页，指出了边缘对于罗马和美国崛起的意义。

[7] 关于18世纪起英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其他欧洲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势，参见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第213页起若干页，特别是第232页上的图表。

[8] 按照这些帝国主义理论的看法，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爆发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可能性本该在英国对美国内战的干预中变成现实。按照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英国极有可能向美国宣战。但众所周知，两国的战争并没有发生。关于两国开战可能性的阐述，参见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第384～390页。

[9] 参见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第7页起若干页。

[10]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因为轻敌而自食恶果。俄国显然仅仅把日本当作了它向东扩张过程中碰到的诸多弱国中的一个。

[11] Mao Tse-tung: *Vom Kriege*，第179页起若干页。

[12]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95年在弗赖堡大学教授履新演讲中，说明了这种帝国时间视域收缩的问题，他宣称：“我们必须了解到，如果德国的统一不是德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政治起点而是终点的话，那么统一就仅仅成了年轻人

挥霍过去的恶作剧，而这个恶作剧代价太高，最好还是免了。”见Weber: *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lehre*, 第23页。照此说法，较晚才加入帝国列强俱乐部的德国如果不想空手而归，就必须抓紧时间。

[13] 除了Ullrich: *Die nervöse Großmacht*和Radkau: *Das Zeitalter der Nervosität*, Fenske: *Ungeduldige Zuschauer*也探讨了帝国政治中核心要素——帝国时间视域受限问题。

[14] 国际政治中所谓现实主义派的强项在于对这种权力政治竞争的解释，它们的解读基于这样的想法：在一个由众多接近平等的国家构成的多元体中，权力分配是一种零和游戏。这里说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两部代表作是：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以及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霸权和帝国：棘手的区分

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在多极体系中，所有大国都觊觎霸权之位，并为之尽心竭力，因为它会给人带来最大限度的安全感。然而，这种霸权之争势必会引起体系震荡，毕竟，每个大国在竞争中都会感受到来自他国的威胁，故而更加竭其所能，力求霸主之位不为旁人染指。米尔斯海默把这种恶性循环称为“大国政治的悲剧”。^[1]他认为，一国只要还想留在强国阵营，就注定无法完全摆脱这一悲剧。

跟霸权国家相比，帝国很少受到其他强国的困扰和纠缠，因而也比霸权更为稳固持久。在帝国的“世界”里，它们避免与那些旗鼓相当的强大行为体角力，而坐观较弱国家之间为争第二排、第三排，甚至第四排席位闹得不可开交。帝国中心还不时出面，充当调停人，避免这些国家因为竞争过烈而大打出手，诉诸战争。正因如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帝国统领的内部疆域太平无事，而霸权控制下的区域剑拔弩张。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在帝国秩序里压根不会发生兵革互兴、武力相向的情况。实际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难以根除，而且，一般都比大规模霸权战争更加旷日持久。当然，霸权战争一旦爆发，程度会惨烈得多，往往在极短时间内造成各方的巨大损失。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整体上挑战帝国的秩序本身，相比之下，霸权战争则倾向于让整体秩序走向稳固：霸权战争的结果只是霸权之位易主，秩序模式本身却仍得到冲突各方的认可。^[2]此外，战争对于帝国和霸权国家的功用各异，这也正是两者的差别所在。

在欧洲，人们对国际政治体系的不信任可谓根深蒂固，毕竟这样的体系极易触发霸权之争。20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两场惨烈的战争，阻止了陆地霸权国家向陆地帝国统治的过渡。战争结束以后，为了不让

霸权之争死灰复燃，欧洲人积极寻求妙术良方。历史已经昭示世人，战争每每得不偿失，即使赢了战争，也难免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输家。^[3]有鉴于此，欧洲人才不遗余力地通过缔结国际条约加强经济往来，特别是借助主权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来消泯国家之间的敌意，并遏制欧洲内部出现灾难性的霸权争夺。

被今天的德国人主要描述为汲取一战、二战经验教训的过程，在当年也可能完全有另一种解读：这是一个欧洲主权国家秩序严防德国人卷土重来继而将欧洲大陆重置于帝国卵翼之下的过程；^[4]同时，这也是欧洲人筑起堡垒，对抗已侵入中欧地区的苏联所带来的新帝国威胁的进程。那么按这种解读，当欧洲人在1945年之后宣称要走和平发展之路的时候，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北约，而不是欧盟和欧安组织。关于北约的角色，第一任秘书长英国人黑斯廷斯·里奥内尔·伊斯梅（Hastings Lionel Ismay）上将曾一针见血地概括为三句话：

“摠住德国人，挡住俄国人，留住美国人”。这样说来，正因为欧洲人将霸权之位转交给美国这么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欧洲本土的霸权之争才从此得以幸免。所以，欧洲战后秩序的建立，更多的还是得益于美国的庇护，它给欧洲人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安定局面；而并非主要是在政治上汲取了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当然，说到汲取历史教训，这一点欧洲或许真的可为其他很多危机四伏的地区提供借鉴。

顺着这一思路，不难看出，大国为中等规模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不仅是创建和巩固帝国政权的手段，同样也是一种终结霸权之争的方法。凭借此策，那些战乱频仍的地区偃兵息甲，实现持久的和平秩序也计日可期。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外来大国有志于在饱受霸权战争之苦的地区实现长治久安，并为此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在1918年之后的一段时间，美国并没有接过这一使命。而1945年之后，它则欣然接受了。^[5]

当然，对美国而言，无论当初它曾期望从中捞到什么好处，接受这项使命无疑是它对西欧地区一项支费浩繁的政治投资。

与这项使命连在一起的是人们对美国行使“仁慈霸权”的想象，这个角色跟以前那种在大国竞争中的最终胜出者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是在与劲敌激烈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前者的角色更像群畜的牧人，御敌于城门之外。它的“仁慈”不仅在于帮助属国抵御外敌，还在于它不再为一己私利滥用其力。它的本质特征是以服务众邦为己任，而很少为求私利与人为敌。按这样的理解，霸权其实是“潜在的帝国”，只是出于善意这种帝国性并未完全展现出来。当然，这里面或许也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比如对法治的敬畏，或者有鉴于本国民众的道义呼声，或者出于政治智慧，等等，不一而足。无疑，是走霸权之路还是迈向帝国，也只有主导性大国才有这种选择权。所以，有必要游说这些大国——无论大声吁请还是厉色警告——让它们认清霸权角色之利以及帝国角色之弊。

按照上述观点，在这两种路径中，走哪一个，是一种主观选择，而且并非恒定不可变。所以，走哪一条路是一个政治道义和政治智慧上的问题，而不属于——姑且称之为——政治物态（politische Physik）的范畴。当然，主导性大国及其当权者是否真的接受这一观点，或者说占上风的是不是政治物态所主导的某种认知，这些都无法确知。不管怎么样，我们基本可以肯定一点，即站在主导性大国的角度，客观压力条件影响作用更大；而弱小一些的国家则更着力强调强国所拥有的决策余地。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把霸权理解为一种受规则制约的宰制力。它不同于帝国，因为帝国拥有绝对的主宰力，自感不受任何规则之束缚。曼由此推导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问题，即美国人必须做出决定，要走霸权之路，就得遵守相应的规则；如果迈向帝国，一

旦失败，那么连霸权之位也保不住。可世界还是会一切照常运转，世人也将乐意接受多边主义结果。^[6]和曼观点相左的是查默斯·约翰逊（Chalmes Johnson）。这位以研究东亚问题闻名于世的美国政治学家，针对帝国与霸权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更倾向于认为，两者的差异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修辞术，借助这一策略可以照亮现实的权力运作，使之看上去或冠冕堂皇，或黑暗龌龊。他说：“一些作者将‘霸权’概念描述为不占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而在二战之后的‘超级大国’时代，霸权又成了东西方‘阵营’概念的代名词。美国总倾向于借用其他委婉语来代替或美化帝国主义概念，因为，这可以让美国的内政外交至少在它的国民眼里看来是光明正大、无可厚非的。^[7]但也正因如此，帝国和霸权的概念问题才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按他的说法，“霸权”应当只是“帝国”的委婉表达。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而仅仅代表了两种对秩序体系的不同描述方式而已。也就是说，这其中不涉及学术分类问题，而只关乎政治修辞。

但是两者概念上的混淆不清，显然不仅仅出自一种委婉表达的倾向。就连素以犀利直率著称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在其近年的论述中，将“霸权”和“帝国”的概念等同了起来。他的《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2001）（*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一书传达了一个关键信息，即扮演霸权的角色，很快就会严重拖累美国。如此一来，美国社会将无力支撑下去。在基辛格看来，不要说帝国，就是霸权的诱惑，对美国而言都是致命的。那足以将美国拖入衰败的深渊。^[8]

不过，我们也可以转变一下考察问题的思路。不妨把帝国的创建理解为一种防御手段，用以解除霸权那始终摇摇欲坠的危险。如果霸权的定义是，它负责提供公共产品，诸如抵御外部威胁，限制较小国家的军备升级，规范经济空间，等等。对于这些公共产品，霸权从属

国受益最大，而付出最多的却是霸权国家。所以，倘若这是我们所定义的霸权，可以理解主导国家及其国民对于这种成本和收益分配方式有多么不情愿了。而帝国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帝国让其中心地带的子民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或者至少不必独力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而是责令其保护国臣民一同分担。这样的帝国与一个霸权国家相比，将会赢得其子民的更多支持。在过去几十年里，当很多政客和知识分子以一种非美国式的口吻论及“美利坚帝国”——确切地说是表达了对建立和巩固美帝国的赞成态度时，^[9]很显然，他们是出于一种担忧，担忧面对一个须不断确立地位的霸权时不得不承担的风险和成本。对他们来说，概念上的确切区分不太重要。而他们所理解的“帝国”，其实就是一种稳固而持久的霸权形式。

关于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关系，德国法学家海因里希·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做了迄今为止大概最为深入的研究。他在1938年发表了阐释霸权的皇皇巨著^[10]。特里佩尔同样对帝国和霸权是否分属不同学术范畴表示了怀疑。他认为，霸权只是“用以表述帝国主义政治的一种形式而已”，^[11]其特征是“权力的自我约束”。^[12]特里佩尔认为，通过观察数百年来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一个趋势：那些处在帝国权力统治下但并不隶属于帝国的地区，其独立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他把这一趋势称为“强制力递减律”（Gesetz der abnehmenden Gewalt）。^[13]特里佩尔所看到的，其实是“权力自我驯化”的过程；^[14]其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基本采用了霸权的形式。“我们可以说，在现代的‘帝国主义’政治语境中，谋求霸权已经逐渐演变为权力扩张的一种典型方式了。”^[15]

在特里佩尔看来，帝国和霸权可以交会：“当帝国主义主动放弃将他国并入旧式国家政权的架构之中，帝国和霸权则可能但并非必然彼此交会。”^[16]也就是说，特里佩尔确信帝国政策有向霸权政策转变的趋向，特别是当联邦制因素在帝国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影响

时，这种转变趋势则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能否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实现转变，特里佩尔对此表示怀疑。在写作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特里佩尔能做出这样的审慎之论，真可谓恰如其分。

追本溯源，关于霸权是一种更自制之帝国统治形式的思考，特里佩尔与古希腊那些研究雅典海上霸权兴衰起伏的史学家和雄辩家不谋而合。后者逐级使用了不同的几个希腊语概念，如arché, dýnamis和hegemonía。arché表达了一种集中强大的权力关系，基本对应特里佩尔的Herrschaft（支配地位）一词，dýnamis也经常用来表述这层含义。而hegemonía却表述一种较弱的权力关系，按特里佩尔的观点翻译过来就是Vorherrschaft（优势地位）一词。[\[17\]](#)

同样，迈克尔·多伊尔在他帝国的比较性研究中指出，公元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各自同盟政策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他还由此得出帝国和霸权类型上的差别：如果说雅典主宰的提洛海上同盟是帝国性质的，那么斯巴达为主导力量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则是一种霸权。[\[18\]](#)在多伊尔看来，霸权的典型特征在于，其宰制权仅限于盟邦的“外交政策”上，不会对盟邦内部事务横加干涉。不管是盟邦的政治体制还是经济制度，无论是其宪法问题还是市场调节问题，霸主邦都不会插手干预，更不用说以领导权的名义去改变这一切了。

多伊尔确信，在帝国之中，缺乏这种对盟邦内部问题不加干预的自制力。帝国统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在其内部和外部事务之间并没有一道明晰的界线，因此，它会不断干涉盟邦内部事务。[\[19\]](#)这也正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差别所在：斯巴达止步于对盟邦外交关系的把持，所以伯罗奔尼撒联盟在面对爱琴海地区另外两大强敌波斯和雅典时，就能够保持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态势。[\[20\]](#)而雅典正好相反，它一直插足其盟邦的内政：刻意让民主派占据上风，将包括死刑判决权在内的司法审判权据为己有，联邦在联盟地区发行统一货币，甚至

迫令盟邦让出土地以便雅典殖民者落户安家。^[21]在当时的雅典，人们只相信，要想盟邦听命于自己，必须将其控制于股掌之间。当然，雅典公民也渴于在海上同盟的贡税中分得一杯羹。至于公民大会，关乎长远利益的方案总没法获得稳定多数派的赞成，只有短期的眼前实惠，才能获得多数人的鼎力支持。在多伊尔看来，斯巴达的贵族统治有能力实行霸权政策，而雅典的民主政治则明显带有帝国的倾向。^[22]

当然，迈克尔·多伊尔也看到，斯巴达和雅典的联盟体系有着迥然不同的结构性前提条件。因此，两个政治行为体几乎谈不上什么选择走霸权还是帝国的自由。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都偏向保守的斯巴达，霸权是它组织联盟的唯一选项。而雅典的情况则不同，联盟的扩充伴随着其内部激进民主势力的发展，雅典自身发展的原动力传导给了整个联盟体系，最终推动整个爱琴海地区发生社会经济结构的剧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更具流动性的商人阶层取代了传统的地主阶层。^[23]可以说，雅典只能持续不断地干预盟邦的内部事务：一来是为了打造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二来也可借助控制黑海和爱琴海地区的海上航道，消除海盗的侵扰和威胁；更重要的是，也为盟邦内部参差不齐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政治上的保障。只有确保民主派的统治，这一切才有实现的可能。恰恰是斯巴达的传统社会结构限制了它，使它只能止步于霸权形式的统治。而雅典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原动力，则推动了其帝国的创建。

海因里希·特里佩尔也做了类似的论述。^[24]不同的是，按照特里佩尔的观点，霸权和帝国的诞生，以及两者之间的过渡转化，说到底取决于权力中心地带的社会经济形势及政治格局。而多伊尔对斯巴达霸权和雅典帝国的思考归纳为两者在政治结构上的差异。多伊尔认为，如果中心与边缘之间是一张交织的关系网，而且两者通过超国家的社会结构彼此相连，那么，可据此认为，这是一个帝国。而霸权则

情况不同，它牵涉的是不同中心之间的一种关系体系，在这些中心里有一个中心鹤立鸡群，明显强过其他。[\[25\]](#)

以上述观点看来，一个政治秩序究竟应归为帝国的还是霸权性质的，取决于联盟下属的诸多邦国和政权各自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相对政治实力。倘若他们之间实力悬殊，而且这种差距还因为受到中心原动力的推动而继续拉大，那么宰制性政权的“帝国化”就势不可当了。反之，如果联盟成员之间的社会经济及权力政治差距较小，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长期保持稳定，那么，权力系统的“霸权化”则合情合理了。对于霸权的形成，除了各盟邦之间权力落差较小这一条件外，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那就是联盟下属政权无意排挤和挑战现有霸权国家，乃至取而代之。在这种条件下，霸权国家才会安心于保持宰制权，而不会力图从霸权转变为帝国。

因为拥有出色的军事实力，斯巴达面对其他盟邦优势明显，稳操胜券。但来自毗邻联盟体系的原动力，则让斯巴达人颇感威胁。于是，他们决定先发制人，率领众邦向雅典发难，以遏制后者的进一步壮大。

18世纪晚期以来，世界政治进入持续的波动期，霸权秩序往往昙花一现：要么很快演变为帝国组织，要么在自我毁灭性战争中分崩离析。也许，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可能，即通过发展超国家政治组织，以及加强经济依存关系来稳定大国之间的关系，避免其过于波动不定。在这一方面，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是个成功的例子。说到底，我们并不能排除霸权和帝国构架出现重合的情形。也就是说，在同一秩序之内，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帝国特点，在另一些方面又闪现霸权的身影。

当今的美国是帝国还是霸权？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一点，即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差异要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模糊不定。如

果说，判定为帝国仅仅是因为它干涉弱小国家的内政，判定为霸权则是因为它对弱小国家内部事务兴趣不大，那么按这样的判断标准——从卡特政府开始，美国就一直奉行积极的“人权外交政策”——自卡特政府开始美国无疑当属帝国，而在此之前，则是霸权。比如，它对以前北约成员国的军人专政就曾坐视不管。当然，如果真是这样，就彻底颠倒了两个概念之间的价值层级（Wertehierarchie）。或许更为合理的是，我们在应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应当保持价值中立原则，借用它们来评判同一个政治秩序内各成员之间的不同力量对比关系：霸权是大致相当的诸多成员国中的佼佼者。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相当”不局限于权利和义务上的对等，也体现在实力和贡献上不分伯仲。但是，帝国需要满足的条件就完全不同。仅仅当一个政治秩序内的中心大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权力落差大到无法通过法律拟制的平等来弥合时，才可以认定这个中心大国为帝国。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帝国以何种权力独霸天下了：经济、文化、政治，还是军事的权力。因为极少有一个国家会在每个方面都独占鳌头。所以，一个秩序究竟是更趋向霸权还是帝国，以及它正朝哪个方向发展和上升，这些问题从来都充满争议，难有定论。

[1]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特别是第29页起若干页。

[2] Daase: *Kleine Kriege-Große Wirkung*持有这么一个论点：大规模战争促使国际秩序趋于稳定，而小规模战争则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3]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Die neuen Kriege*, 第125页起若干页。

[4] 参见Judt: *A Grand Illusion*, 第15~50页。

[5] Junker: *Power and Mission*, 第51页起若干页和第73页起若干页；另见本书下文第147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

[6] Mann: *The Incoherent Empire*, 第265页。在这本书的另一处也有类似表述：估计不可能有纯粹慷慨的帝国，但有可能存在几乎所有臣民一致认同的帝国。我们把这称为“霸权”。这个称呼表明帝国政权是建立游戏规则，其他玩家按它的规则行事。也有可能大家同意这些规则；如果这样，那霸权就拥有了合法性。见同一出处，第25页。

[7]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第30页；弗格森（Ferguson）也站在帝国支持者的立场对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差异含糊其词，而且还有误导作用，参见Ferguson: *The Incoherent Empire*, 第8~12页。

[8] Kissinger: *Does American need a Foreign Policy?*, 第325页起若干页。

[9] Verenkotte: *Die Herren der Welt*, 第68页起若干页，对相关观点做了一个概述。

[10] 即《霸权》（*Die Hegemonie*）一书。

[11] Heinrich Triepel: *Die Hegemonie*, 第189页。

[12] Heinrich Triepel: *Die Hegemonie*, 第283页。

[13] “我们的法律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对异邦和异族的统治越来越多地让位于霸权这种较弱的权力形式。我们可以把这一演变历史的起点一直上溯到斯巴达订立它的第一个霸权性共治条约，即与帖该亚（Tegea）订立条约的那一天。根据那个条约，斯巴达中止了征服与吞并政策。在当今国际生活中，霸权如何强势地挤压政治统治的空间，我们可以在现代‘帝国主义’历史的每一页上都读到。” Heinrich Triepel: *Die Hegemonie*, 第147页。

[14] Heinrich Triepel: *Die Hegemonie*, 第283页。

[15] Heinrich Triepel: *Die Hegemonie*, 第176页。

[16] Heinrich Triepel: *Die Hegemonie*, 第187页。

[17] Heinrich Triepel: *Die Hegemonie*, 第343页。当然，创造并使用这一概念的政治环境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判断：重要的主要还不是提炼简明精确的概念，而是通过政治修辞影响决策过程。特别是当伊索克拉底（Isokrates）在他关于和平的演讲中宣称，斯巴达人因为在陆地上拥有霸权（hegemonia）而取得了

海上的统治权（*dynamis*），但因为滥用霸权又很快丧失了海上统治权。参见 Isokrates: *Rede über den Frieden*, §§ 101-104, 第169页起；关于这篇演讲的政治背景以及Isokrates在帝国主义和霸权政治之间的立场，参见Ottmann: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第I卷（2），第241页起。

[18] Doyle: *Empires*, 第54页起若干页。

[19] Doyle: *Empires*, 第40页。

[20] Doyle: *Empires*, 第58页起若干页。

[21] Doyle: *Empires*, 第55页起若干页；关于雅典干涉盟邦内部事务的详述，见Schuller: *Die Herrschaft der Athener*, 第11页起若干页（直接统治方式）和第80页起若干页（间接统治手段）。

[22] 当然，这样对比两种结盟体系，能较好地重现科林斯人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中采取的战争宣传。按这种宣传，雅典的势力扩张已经威胁到希腊人的自由。所以必须对雅典发动一场战争，来粉碎提洛海上同盟。修昔底德（Thukydides: *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 I, 88）就曾警告大家不要听信这些观点，认为那纯粹是蛊惑人心的宣传。在他看来，真正的战争原因是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害怕雅典进一步和平崛起。

[23] Doyle: *Empires*, 第70页起若干页。

[24] “自这支伯罗奔尼撒力量（斯巴达）在半岛上站稳脚跟，建立了优势，它就一直没有扩张野心：领土已经饱和，天性中趋于防御，满足于保护自己的‘天下’（*Kosmos*）不失。扩张政策对斯巴达有害无益。而心系海洋的雅典可以说注定热衷于扩张政策。哪怕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雅典就需要控制海洋，并因此控制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城邦。更何况，随着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工商业人口激增，以及不安分人民的抢掠欲望，这一切都促使雅典走上了扩张之路。所以雅典霸权带有帝国主义的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仅仅除了形式（原文如此）上的不同它像极了今天英国在英联邦中的霸权地位。当然，英国的霸权特性是后来发展的结果，而在雅典则刚好相反，先有‘霸权’，后有‘统治权’。”见 Triepel: *Die Hegemonie*, 第382页。

[25] 参见Doyle: *Empires*, 第81页。

第三章 草原帝国、海洋帝国和全球经济体：帝国统治的简要分类

迈克尔·曼在他以全球大历史为框架写就的巨著《社会权力的来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中，对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做了区分。^[1]其中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在超级帝国形成的初始阶段至关重要。没有这种优势，超级帝国的诞生无从谈起，那是权力扩张的基石。而迈克尔·曼所说的另外两种权力来源——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力，直到帝国的巩固阶段才慢慢上升为重要因素。在这个时期，帝国走出了相对活跃的扩张期，力图立足新攫取的权力，长久站稳脚跟。从这个时候起，一些在帝国创建之初显得无足轻重的因素开始发挥更大影响，比如帝国在辖制地区所费治理成本的高低，或者民众承担帝国经济负担的意愿如何，等等。

在帝国形成的萌芽阶段，成本和收益问题都无关宏旨。因为，要么扩张本身带来的收益高于它对资源的消耗；要么对一个收益丰厚的未来的期许尚足以抚慰人心。情势在过渡到帝国的巩固阶段时发生了变化，如果帝国不想覆灭于国家破产，或者在不堪重负的民众揭竿而起、奋起抗争中毁于一旦，它必须将想象中的收支平衡转化为实际的平衡，这通常也意味着必须降低统治成本。要达此目标，投入更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在大多数时候是最简单不过的方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投入意识形态权力所需的成本远低于军事权力。因此，当帝

国的扩张已达极限，再进一步就可能坠入“帝国过度延伸”的泥淖的时候，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对帝国的作用 and 影响便日渐凸显。^[2]

迈克尔·多伊尔把帝国从扩张阶段转入巩固阶段的节点，称为“奥古斯都门槛”。^[3]多伊尔借此概念，喻指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所施行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当时，他刚刚通过亚克兴角战役（公元前31年）铲除了他最后的对手。随后，“罗马共和国”转变为“罗马帝国”。^[4]正是在这道门槛上，许多创建超级帝国的大计最终功亏一篑。可以说，帝国从扩张阶段转入巩固阶段，是整个帝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所以值得我们细细探讨，深入研究。

帝国的诞生，要么借助于武力的攻城略地、开疆拓土，要么归功于经济上的渗透推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帝国”是囊括了“政治统治空间”的帝国秩序。另一种帝国秩序则与之截然不同，它建立的基石是贸易体系和对当时“世界经济”命脉的掌控。^[5]虽然帝国有两种不同类型，不过，在历史上帝国极少纯粹以其中某一形式现身。几乎所有世界帝国兼具世界经济体的要素，尤其是那些存续长久的帝国，反之，完全不依靠权力政治因素得以持久的世界经济帝国也难觅其踪。

一般来说，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引发的一个后果是政治统治结构充实和完善了原有的贸易体系。与此同时，在政治统治疆域里经济依存关系会明显强化，相反，世界帝国的崩溃往往伴随着对应世界经济体系的瓦解，这两者密切相连，息息相关。所以在西罗马帝国衰亡以后，那些相关地区间的贸易也随之陷入停顿，一蹶不振：大都市衰败不堪，大多数民众不得已重操农活，维持生计。^[6]惊人的相似情形出现在苏联。随着苏联的解体，曾经由它主导的经济体系也土崩瓦解。结果就是，无论中心还是边缘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受到很大冲击。然而，大英世界帝国的衰落却并未给世界经济带来太多负面的影响，原

因在于，美国严丝合缝地顺利接手了原先大英帝国所履行的职能。当然，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也可以视作伴随这次过渡而生的一场危机。

虽然我们认为，政治统御空间同贸易空间从来就不能完全割离开来，但是我们不妨姑且先将两者分开，相互对照着来理解和廓清。相对于帝国权力扩张的高峰期，两者在帝国的诞生阶段区别更加明显。在传统超级帝国慢慢成形的过程中，政治统领空间先于贸易空间产生。而近代欧洲的大部分帝国，情况则恰恰相反。很长时间以来，对这种关于超级帝国发展阶段的归类，人们做过一些补充，把陆地和海洋帝国的结构性差异也考虑了进去：陆地帝国，诞生于对统领之地的扩大、延伸；而海洋帝国，则通过加强和拓展商贸关系，完成扩张。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出现在这种归类之中的相互转化和彼此交融的情形。比如，帝国统治空间常常为扩大内部经贸交流提供广阔天地；再比如，当贸易体系在政治冲突中遭到破坏，帝国中心积极介入，致力于贸易体系的恢复及其活动空间的保障。

在帝国的形成过程中，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权重不一。甚至在帝国权力扩张的高峰期过后，它们有时也会发挥不同的影响作用。然而，其中任何一种权力因素的短缺都会给帝国招来不利的后果：通过扬长避短，增强另外几种实力来弥补某一项短缺，代价将是高昂的。此外，长此以往，帝国内部的权力平衡也会被打破。所以，沙俄、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全球帝国都没能在发展军事实力的同时，打造出同样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就导致了帝国的早衰，或者是帝国走向毁灭性的穷兵黩武。以葡萄牙和荷兰为代表的“海洋帝国”（seaborne empire）则正好相反，它们无力打造和支撑足以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因此不久之后，它们双双沦为新兴海洋帝国英国的副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帝国的四种权力来源均衡发展，共同支撑帝国巨厦，并且在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后保持权力平衡，这样的帝国最可存续久远。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 参见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关于权力的四种来源和组织形式, 参见第1卷第46页起若干页。

[2] 见本书下文, 第172页(原书页码, 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3] 参见Doyle: *Empires*, 第93~97页。同时见本书下文, 第105页(原书页码, 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4] 参见Heuss: *Römische Geschichte*, 第272~320页, 特别是第289页起若干页。

[5] 关于“世界经济体”和“世界帝国”的关系, 参见Wallerstein: *The Rise and Coming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特别是第35页起若干页。

[6] 对此, 参见Kulischer: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第1卷, 第78页起若干页。

/ 通过军事和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的帝国构建模式

帝国的诞生，或通过统治空间的扩张，或者通过贸易体系的强化，它们代表帝国在其边缘地带榨取剩余价值的两种不同方式：要么基本上诉诸军事手段，要么以商业手段为主。以军事手段榨取剩余价值的典型例子为草原帝国，而海洋帝国则是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的代表。两者的区别不在于其剥削程度，而在于直接暴力的表现程度。在这一点上，草原帝国的程度要远甚于海洋帝国。海洋帝国的核心剥削机制不在于烧杀掳掠，而在于通商和交易。

两个海洋帝国，葡萄牙与其继任者荷兰，采取的都是上述商业榨取剩余价值的模式。^[1]它们曾经一度垄断了从非洲东海岸至东南亚广大地区的世界贸易。它们并没有在这些地区大举投资，而是通过广建贸易据点来猎取巨额利润。以葡萄牙人为例，在非洲东海岸和印度半岛，他们取代了阿拉伯商人的地位。阿拉伯人曾在这片土地上拥有密布各地的广泛商贸关系网，结果，不是被葡萄牙人取而代之，就是被后者武力切断。当时，葡萄牙人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就是在重要的贸易枢纽建立要塞和据点。在这些据点——通常位于半岛上或者近海岛屿——他们只需投入少量的兵力防戍，他们并无意向大陆腹地推进。^[2]通过这些稳固据点和较大通商港口，葡萄牙人得以与当地统治者建立联系，并赢得了后者对其商业活动的支持。至于改善当地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结构，助其走上现代化之路，葡萄牙人毫无兴趣可言。

在16世纪初期，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成为葡属印度的“副王”。当时，他提出了一个方案，按该方案，有鉴于葡萄牙作为蕞尔小国所拥有的实力和机会相当有限的客观现实，他要求派出一支中型舰队，长期镇守印度洋，机动灵活地穿行于葡萄牙所建的各个要塞和战略要点之间。这样一来，一旦某个据

点遭到威胁，有限的兵力可以迅速集结到位。由于葡萄牙不愿为辽阔的疆域统治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于是他们抛弃了在海外建立欧洲人永久居留地的做法。到16世纪中叶，非洲沿岸的白人居民也不过两三百人而已，而分布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欧洲人定居点，其实也只是为了加强和维护葡萄牙人所建立的战略要点而已。^[3]

葡萄牙人将印度洋宣布为“mare clausum”（封锁的海洋），^[4]并从这种海域封锁的政策中大获其利，以此抵消控制贸易空间所需的成本。葡萄牙人把封锁的印度洋看作一个封闭的领地，他人如若穿行其间，必征以关税和杂费。葡萄牙人引入海洋通行证，即所谓“卡特兹牌照”制（cartazes），实现对东印度贸易的垄断：非葡萄牙商船，必须向葡萄牙海军购买这种许可证（否则就会受攻击）。^[5]通过这样的贸易垄断，葡萄牙人获得了那些在欧洲极受欢迎的香料，特别是胡椒、丁香和肉桂的定价权，而不必担心商业对手搞低价竞争。而且，如果非葡萄牙商人要参与东印度贸易，必须支付相应的许可证费用才行。葡萄牙驻守在印度洋的舰队，不仅为其要塞和贸易据点保驾护航，也担负落实葡萄牙海上贸易垄断的使命。

在此基础上，葡萄牙海洋帝国称雄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期间，它始终保持收支盈余。历史学家奥利维拉·马奎斯（Oliveira Marques）写道：“1574年的财政收支表显示，葡萄牙的亚洲帝国（包括非洲东部的据点在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盈余8万多克鲁扎多（cruzados，当时葡萄牙的货币），1581年盈余降到4万克鲁扎多，1588年又冲到10.8万克鲁扎多。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形势急转直下，为对付荷兰和英国等对手，支出与日俱增。即便如此，1620年和1635年分别还有1.5万克鲁扎多和4万克鲁扎多的盈余。”^[6]

保持贸易垄断，可谓葡萄牙海上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这种垄断受到的威胁，既非来自出售商品给他们的当地人，也并非来自阿拉伯

人——他们在这之前已从贸易网里被排挤出去了——真正的威胁来自他们的欧洲竞争对手。后者矢志打破葡萄牙的贸易垄断，力图取而代之，或者引入一种市场竞争体系来取代这种垄断局面。后来，荷兰人征服了葡萄牙人在东印度的海洋帝国，他们继续沿用葡萄牙留下的组织原则。不同的是，荷兰人以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私人公司取代了葡萄牙人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私人公司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远非那个发放许可证的国家体制所能比拟。[\[7\]](#)

这种“私有化”的方式，正是军事榨取剩余价值与商业榨取剩余价值的分水岭。军事扩张一般在陆地上铺开，且以政治方式来策划组织。军事扩张的重中之重，是统治者或者军政精英层。他们是扩张能力的先决条件，直接组织并领导着军事行动。而商业手段的扩张，固然也能以私人——常常是贸易公司为载体——来开展、施行，不过商业手段的扩张缺乏总体战略计划，更多的是利用帝国边缘各个不同地区所涌现的种种机会。与军事方式的扩张不同，商业手段的扩张不会赢得领土上封闭的统治空间，而是千差万别的区块所围成的贸易空间。它们仅仅通过商道彼此相连，便借由这些商道，在经济上互通有无。所以说，通过商业攫取剩余价值得以建立的帝国，往往是海洋帝国；呈现在地图上，不是连成一体、界线分明的一个面，而是一堆散落四处的点，以及连接这些点的线条。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这一区别：一边，是些扩张成帝国的国家；另一边，是些维系着一个帝国的国家。[\[8\]](#)

葡萄牙和荷兰这两个海洋帝国的成功创建得益于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即宗主国成功地掌控了重要的贸易流通。这种带有帝国性质的贸易体系具有一个鲜明特征：中心明显比边缘更受体制的垂青。贸易体系建立在一系列不平等协议的基础之上，这些协议都以中心的利益为指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依附于这样一个体系对于边缘就是有害无益，不过中心肯定比边缘从中受益更多：中心必须长期保有高收

益，从而负担起维持这一体系所需要的费用。帝国中心致力维持一个理想的贸易条件，这样，帝国就不必永无休止地向帝国贸易空间进行投资，而其他人也可坐享其成，从帝国所创设的安定有序的环境中获益。[\[9\]](#)

帝国中心通过对其“世界经济”的掌控所获得的收益，可以通过什么来量化吗？在这些收益中，帝国中心在世界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恐怕不是最要紧的。比如美国如今约占全球经济总产值的四分之一，但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这个比例可能在中期呈下降趋势。[\[10\]](#)相形之下，更为重要的收益，是对资本流动和知识流通的掌控。在大英世界帝国的鼎盛时期，英镑是世界储备货币，伦敦决定着利率走势和股价水平，英国的银行是全球经济的心脏，维持并调控着当时世界商品和资本的流通。正是主要借助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掌控，英国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成功地主宰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11\]](#)只要保住这一局面一天，英国人便能从中获利一天，进而也就能消化掉掌控贸易空间所需的费用，特别是英国皇家海军军费，以及通往印度的海上通道上各个军事据点的费用。然而，当大英帝国丧失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宰地位，帝国的统治成本又随着边缘民众反帝浪潮此起彼伏而与日俱增，后来它又卷入两场争夺霸权的大战（先是与德国，然后同日本），这一切的发生无异于宣告了帝国的终结。

我们可以通过与大英帝国的类比，来评判美国的帝国地位。当然，今日美国的经济实力远在当年英国之上，军事实力同样非当年英国可比。然而，对美利坚帝国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起着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美国经济的生产力水平，也不是它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体系（这一体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年英国用来保证贸易空间安全的军事力量）。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美国对全球经济资本流通的掌控力，对其他货币对美元价值的操纵力，是它通过不断创新对世界经济发展节奏的影响力。为了达到这种操控的目的，美国以世界银行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工具，当然，还包括美国国内诸多研究所和技术中心，它们有磁石一般的吸引力，吸纳大批人才不断涌入美国。这一切，保证了边缘埋单、美国获利。而军事上的开支，则意味着收益的减少。

原则上，可以替代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可能，是以军事手段攫取剩余价值。这种手段最为暴烈的表现形式，则是完全通过在帝国权力的边缘长年征收贡税，以及掠取财物来维持帝国军队的开支。通过这种方式，首先可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其次，也足以支撑帝国在其都城大兴土木，显耀帝国及其统治者无上的荣光。这些浩大工程有时还会带来另一个结果，那就是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权力的补充，减轻了军事权力的负担。也就是说，这些宏大建设工程可以促使“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卫城的扩建，奥古斯都治下罗马城的重新规划，其实都可以理解为军事权力向文化和意识形态权力转化的一项工程。至少修昔底德就深信一点：正因为卫城之上那些恢宏磅礴的建筑，人们眼中的雅典要比它实际拥有的权力高出了一倍。^[12]对边缘的掳掠，支撑了帝国中心的建设，在中期还会带来统治成本的下降，如此一来，也使帝国政权得以延续更久。

对于纯粹以武力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来说，权力这种转向文化和意识形态方向的努力就显得无关痛痒，甚至根本不值一提。亚述帝国，就是纯粹以军事手段豪取剩余价值的典型。它倚重其独具优势的军事技术，特别是马战车和刀轮战车的运用，在美索不达米亚称雄一时。^[13]然而，亚述统治者的财力无法长久支撑代价高昂的军备投入。另外，对于长久掌控帝国的边缘，他们同样心余力绌，更别提在那里年年征捐收税了。那些肩负进贡重担的边缘统治者，想方设法逃避进贡义务。于是，在烽火不息的战场上夺取所需资源，就完全落到了亚述军队的身上。在当时，一座城或一位君主在亚述面前无非有两

种选择：要么在亚述军队逼近的关头缴纳规定的贡金，拿出自己的物资储备来犒劳和供养帝国军队，从而在物质上确保这支军队效忠于亚述。要么，拒交贡赋。那么亚述军队就会以战利品的形式将贡赋夺入囊中。为了让臣属地区相信，年年进贡好过战祸不休，亚述人推行一种全面洗劫和毁灭的政策，他们也因这种涸泽而渔的政策而臭名昭著。但他们无以复加的野蛮和残忍，并非目的本身，而正是一种维系帝国的特有方式：这种方式加大了边缘地区君主叛离帝国所要面临的风险。叛离的方式，是拒不纳税。惩罚叛离的方式是让它成为战利品。这意味着尤甚于提高贡赋的代价：后果可能是城池被付诸一炬，田地被洗劫一空，臣民被赶尽杀绝。军队，正是这种征服政策的威胁手段和执行工具。

亚述帝国代表着帝国形成的传统方式。当然，在它之后，以如此残忍野蛮的方式索征贡赋的例子已极为罕见。或许只有后来的蒙古人也同样一意孤行地采取过这种穷兵黩武的策略。这一政策最大的缺陷在于，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帝国根本无力跨越奥古斯都门槛。相似的情形，还出现在斯基泰人后裔建立起来的草原帝国，那些游牧民族在冬、夏牧场转场中，大肆扩展自己的活动半径，加速了一个超级帝国的诞生。当然，那是一个短命的帝国。草原帝国之所以难逃短寿的厄运，原因在于游牧民族通常都无法摆脱军事扩张的宿命，转向定期征税来获得稳定收入，而不是一味依靠索取贡赋、掳夺战利品。按照严格的帝国定义，草原帝国因其短命充其量只能算作帝国概念的一个注脚而已。它是帝国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之所以要对它特别关注，是因为它代表着军事类型的帝国扩张，作为近乎纯粹的武力攫取剩余价值的形式，它值得我们研究一番。

草原帝国的历史非常悠久。不过，它在西方史学界只占次要地位。那些来自亚洲草原腹地的游牧民族，也常被史学家视为政治和经济有序发展的破坏者和捣乱分子，从斯基泰人到萨尔马提亚人、奄蔡

人、匈人、匈牙利人，再到可萨人及蒙古人，^[14]他们前赴后继，试图打下一个超级帝国，而且都走过了相似的轨迹，即在帝国形成之初，这些马背上的民族都将进贡的重担压在那些紧邻其冬牧场的耕农肩上。这样，他们就取得了在广大区域内对外扩张所需的资源。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生活条件变化不定，吉凶叵测，尤其大受气候变化和牲畜疫情的影响，为了求生存，他们不得不选择在其草原边缘，从农耕生产区猎取食粮、贡物。奇袭、掳掠，自一开始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一旦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不再仅仅为了活命而东劫西掠，开始重视财富的积累，那么帝国诞生的序曲也就此奏响了。

通过考察5世纪卢阿（Rua）和阿提拉统治下的匈人帝国，可以看出，游牧民族超级帝国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特征，^[15]这些特征或多或少显现于所有的草原帝国。首先是族群的生成（Ethnogenese）。特点是多个部族并起，一个部族领头。成功的关键是部族首领的神明魅力（蒙古语：qut）^[16]，首领也不遗余力地通过行动来提升其个人魅力。阿提拉被其臣民奉为天神，莫不景仰，无不畏惧。他本人也深信自己受命于天，受神谕之指引，他认定自己的统治必须囊括全世界。为了俘获帝国（军事）精英层的忠心，阿提拉将那些以战利品、赎金或贡赋形式缴获的金银财宝赏予他们。在精英层内部，由他排资论辈，论功行赏。在他的大帐之内，也按级别安排座次。于是，魅力型领袖的个人喜恶取代了氏族长老和部族首领的传统领导权。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定义，魅力型权威（charisma）是“对某种个人神性、英雄伟力或榜样性的超乎寻常的秉承”。^[17]游牧民族社会的政治秩序从传统向上述这种领袖魅力的过渡转变，给部落和氏族的内部组织注入了动力。这又为帝国扩张奠定了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游牧民族何以成就如此可怕的冲击力；虽在人数上劣势明显，却能一举攻破广袤无垠的地区，将其他大国奴役于其铁蹄之下。

但与此同时，草原帝国的脆弱性也源于此。这类帝国常常在其魅力领袖亡故后，迅速落幕。[\[18\]](#)

武夫扈从制取代了门第等级制，这加快了原本相互敌对的游牧部族走向统一，为其大规模扩张插上了虎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此一来，游牧民世界尤为欠缺的忠诚，以及其桀骜难驯的一面，也得以改观。蒙古大汗铁木真，即后来的成吉思汗，为此采取了一种手段，他将以族群为单位组成的军队，改组为百夫队、千夫队。正是将士对其首领的忠心，将这些百夫队和千夫队紧密团结在一起。而且，他们在规模和构成上都取决于大范围作战的需要。[\[19\]](#)桀骜不羁的部族被分成诸多军队单元，加以驯服。成吉思汗无情地粉碎了来自传统门第等级制卫道士的反抗。那些阻碍他宏图大计的宫廷萨满保守派，统统被他处以极刑。而那些顺从了大汗旨意的部落，为了保命则迫不得已为其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他们背负着掳掠战利品的巨大压力，望不到尽头；只有夺取大量战利品，部族首领才好班功行赏，以犒赐来收买部队头目的忠心。因此，成吉思汗不得不投入一轮又一轮的冒险征战，而无暇享受胜利的果实。

蒙古人的征服压力，实乃成吉思汗一手擘画，有意为之：“蒙古人必须征服所有国家，绝不可能同任何民族和平共处。除非他们完全臣服于我们，否则必除之而后快。”[\[20\]](#)事实上，大汗（大可汗）位于蒙古帝国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作为地区首领的可汗，又对大汗负责，在这种机制下，蒙古帝国的统一只能借助推行持续扩张政策得以延续。1259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死后，蒙古世界帝国瓦解成各自为政、彼此攻伐的分离帝国。

商业手段巧取剩余价值和军事手段豪夺剩余价值，好比一个“频段”的两端，而这个频段涵盖了各种可能性。但历史的常态不是“极值”，而是些“混合形式”。“混合形式”可能接近于军事手段或者

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其中的一极。一般而言，混合比例关系在帝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变动不定。19世纪末，大英世界帝国正是为了确保能以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而被迫更频繁地诉诸武力。而蒙古人的分离帝国，也就是产生于中国和西伯利亚东部地区（即所谓“中心汗国”），以及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即所谓“伊尔汗国”）地区的局部帝国，也无法继续依赖军事手段，而是越来越借助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进而延续帝国的权力。[\[21\]](#)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帝国的缔造者们有权在榨取剩余价值的商业和军事两种手段之间自由选择。一些先天约束条件不容小觑，诸如地理位置，中心的文明发展水平，精英层的能力和心态，历史影响，集体记忆，以及边缘对中心初露端倪的扩张野心的应对之策，等等，这些因素都举足轻重。数百年来，似乎有一种亘古不变的法则，即每隔一段时间，总有游牧民族异军突起，建立起草原帝国。他们在转瞬之间发展出惊人的规模，但又急速衰败，消失于历史长河。他们留给后世的不是丰功伟绩，不是灿若晨星的城市、皇皇庙宇或教堂，他们带给世人的是对阻碍其扩张霸业之一切文明的蹂躏。就连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也是来自中亚的匈人不断侵犯的间接后果，匈人驱逐定居于俄罗斯南部草原的日耳曼人，迫使后者向西迁徙，这就给罗马帝国的边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最终导致了边境的沦陷。相似的情形发生在巴格达的哈里发国[\[22\]](#)，那是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超级帝国。当蒙古人如暴风骤雨一般讨伐四方的时候，哈里发国早已辉煌不再，国力大不如前。[\[23\]](#)1258年，哈里发国被攻陷，这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历史长河里，激起轩然大波，影响可谓深远。因为从此以后，在阿拉伯世界里再也没能出现一个帝国。帝国所留下的遗产被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王朝瓜分一空。在中亚地区也能看到相似的情形：囊括了今天伊朗、阿富汗和部分中亚国家的花刺子模帝国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击溃，整个经济、文化基础被连根拔起，毁于一旦。[\[24\]](#)唯有中华帝

国大致安然无恙地熬过了蒙古人的统治，在近一个世纪的异族统治结束之后，中华帝国又卷土重来。

草原帝国在本质上具有明显的剥削特质：它们创造不了发达的文化，本与文明中心无缘，只能局限于掠夺边缘的财富，抢走边缘的文明成果。有鉴于其文明及技术落后的劣势，他们不得不倾力于其唯一的优势领域：军事。骑射部队迅疾如风，以极低的后勤成本达致极远之地，骑兵个个彪悍善战，他们的武器——复合弓射程远、准度高，首领在长期逐水而居的游牧生活中练就运筹帷幄的韬略，远非对手所及。凭借这种种优势，那些人数并不占优的游牧民族建立起史无前例的超级帝国。而罗马和中国，这两大文明帝国都以行政技术手段将所征服的地区一一融入其整个大帝国的版图，因而他们的扩张之路只能步步为营，徐行推进；直至帝国文明教化之力全部消耗殆尽方休。但草原帝国的对外扩张，无远弗届，唯一的限制就是自己部队的活动半径了。边缘往往只是出于对草原野蛮军队的深深恐惧而融进帝国，所以，草原帝国的这种统合方式是很脆弱的。[\[25\]](#)

以商业手段攫取剩余价值和以武力手段豪夺剩余价值，两者在原则上虽背道而驰，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帝国空间几乎无休止的延伸，以及较弱的统合度。那些庞大的海洋帝国，诸如葡萄牙、荷兰和英国（西班牙从一开始就注重领土扩张，而非贸易），伴随15世纪中期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应运而生。而它们也只是实现了表面上的整合，未能完成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上的统一。[\[26\]](#)

海洋帝国有一点跟草原帝国颇为相似，即它对边缘的兴趣源自其剥削本性，至于传播文明的成果，它其实并没有多大热情；为此付出的努力，也相当有限。海上起家的贸易帝国，至少在其萌芽阶段，政策集中于在中心和边缘之间搭建一座经济联系的桥梁。对于新融入的贸易区，帝国极少触及其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它的惯用伎俩是同当

地当权者合作，利用当地敌对势力之间的鹬蚌相争，坐收渔人之利。归根结底，帝国也只是对某些特定的商品兴趣浓厚。对边缘投入越少，所得利润就越高。这就是在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之基石上所创建之帝国打的如意算盘。

当然，从长远来看，这种盘算是否划得来，是否会产生反作用，最终导致反盈为亏，都不得而知。草原帝国军队对外长期掳掠和侵扰，导致边缘经济一步步走向衰竭；而与此对应的另一个问题也浮现出来：与外族异域的长期贸易往来会慢慢瓦解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那些单单依靠武力手段榨取剩余价值或者单以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的帝国，如果不在其边缘大力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势必无法将这些边缘充分纳入帝国的“世界秩序”当中。能不能做到（在边缘投入）这一点，对帝国的存续和稳定来说，恐怕是最为关键的。历史上有一些帝国，它们的中心和边缘仅仅借助剩余价值榨取这条通道彼此相连。它们无一例外地比那些转向了行政省的常规管理模式——也就是说，不仅在边缘猎取资源，同时也投资于边缘——的帝国，更快地走上了衰亡之路。就帝国长治久安这一点看，没有一个海洋帝国或是草原帝国可与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相媲美。帝国长寿的秘诀，大概就在于在危难关头、衰颓之际总有边缘襄助，挽大厦之将倾。然而，只有当帝国外围有强烈的帝国归属感且坚信帝国的崩塌于己而言弊大于利，它才可能对帝国中心施以援手。[\[27\]](#)

放弃对边缘不加节制的掠夺，转而对其基础设施及文明化进程予以投入，绝不意味着对中心和边缘之间贸易关系的颠覆。也不能据此认为，边缘已然成为帝国的纯粹受益者。但是，相关的负担会随着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得到更为均匀、合理的分配。一些负担也会转移到素来受益于帝国的那拨人肩上：昂贵的军备，新设立的管理体系，这些开支已经不能单靠帝国边缘那些臣属省份的贡赋捐税来消化了。要维系帝国的生存，帝国中心的臣民也得出一份力——比如通过缴税

——才行。当然，这往往会遭到他们的抵制。在这个时候，在中心会慢慢升起一种支持政变的危险倾向，叛乱者许下减轻税负的承诺，收买人心。也就是说，帝国在边缘获得长治久安，代价却是，在中心不满之声日益高涨。这或许正是许多帝国从来未能跨越奥古斯都门槛的根本原因：毕竟边缘的骚乱不安，还是要比中心的民怨载道更易承受些，即便偶尔一个行省的叛离，也好过帝国都城的持续动乱。然而，回顾历史，似乎情况恰恰相反：行省的离心离德比来自中心的动乱常常更容易导致帝国的覆灭。我们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整个帝国空间里实行更统一的行政管理手段来谋取剩余价值，这样做使得帝国更加长治久安、根牢蒂固。

[1] 综述，参见Reinhard: *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 第25~43页。

[2] 历史学家奥利维拉·马奎斯 (Oliveira Marques) 这样写道：“因为葡萄牙人自知无力攻城略地，确实对在远离欧洲的地方建立政治帝国的兴趣不大，他们只是孜孜以求于对海洋的有效控制，并以势力范围的形式实现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参见Oliveira Marques: *Geschichte Portugals*, 第151页。

[3] Oliveira Marques: *Geschichte Portugals*, 第162页起。

[4] 在荷兰人和英国人之间曾经有过一场辩论：海洋应视为开放 (mare liberum, 即自由海洋) 的还是封闭的空间 (mare clausum, 即封闭海洋)。关于这场讨论，参见Diner: *Imperialismus und Universalismus*, 第24页，以及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第84~112页。

[5] 参见Oliveira Marques: *Geschichte Portugals*, 第150页。

[6] 参见Oliveira Marques: *Geschichte Portugals*, 第252页。

[7]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第132页起若干页；有关荷兰人迥异于葡萄牙人的经济理念，参见S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第252页起若干页。

[8] Maier: *Die Grenzen des Empire*, 第128页起。

[9] 见本书下文, 第157页(原书页码, 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10] 有关数据见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第37页起若干页; 关于金融对于建立世界经济支配权要比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份额更加重要这一点, 参见Mann: *The Incoherent Empire*, 第50页起若干页。

[11] 参见Landes: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第256页起若干页, 以及特别是Fischer: *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und Währungsordnung*。

[12] Thukydides: *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 I, 10, 2, 关于雅典卫城的建造计划和造型艺术规划, 可参见Welwei: *Das Klassische Athen*, 第120页起若干页; 关于奥古斯都的建造方案和造型艺术政策, 参见Zanker: *Augustus*, 第171页起若干页。

[13]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大国投建战争机器来补偿行政管理体系运作上的缺陷, 可参见Edzard: *Geschichte Mesopotamiens*, 第170页起和第208页起, 不过书中还是明显流露出了对国王们战功记录的怀疑。在迈克尔·曼的著作中有很多处指出了战争机器对早期大国形成的意义, 见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1卷, 第231~249页。

[14] 对此以及随后的论述, 参见Göckenjan: *Die Welt der frühen Reiternomaden*; 关于早期草原帝国对欧洲历史进程的意义, 参见Schieder: *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第1卷, 第215页起和第357~370页。

[15] 对此详见 Grousset: *L'empire des steppes*; Altheim: *Geschichte der Hunnen*;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16] 汉语译为忽提, 意为智福大相, 国富民强的保护神。

[17]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第124页。

[18] 超凡魅力(charisma)概念最早主要被用于日耳曼的族群产生历史, 并因此发扬光大。参见Wenskus: *Stammesbildung und Verfassung*, 以及Wolfram: *History of Goths*。关于蒙古骑兵摒弃步兵, 通过骑兵军事优势屡战屡胜, 参见Liddell Hart: *Große Heerführer*, 第7~32页。

[19] 对此及随后的论述，参见Weiers: *Geschichte der Mongolen*。有关这一主题还可以参见Kämpfe: *Činggis Khan*; Weiers: *Von Ögödei bis Mönke*，以及Morgan: *The Mongols*，特别是第84~103页。所有关于蒙古人及其世界帝国研究工作的基石都来自13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篇蒙古文字: *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20] 转引自Weiers: *Geschichte der Mongolen*，第72页。

[21] 关于伊儿汗国的历史发展，参见Weiers: *Geschichte der Mongolen*，第92~96页，以及Nagel: *Timur der Eroberer*，第134页起若干页。关于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参见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第IV卷，第424~959页。

[22] 阿拔斯王朝。

[23] 参见Lewis: *The Arabs in Eclipse*，特别是第110页起。

[24] 参见Nagel: *Timur der Eroberer*，第155页起若干页，以及 Irwin: *Die Entstehung des islamischen Weltsystems*，第71~76页。

[25] 这就明确了为什么对于帝国的过度延伸没有客观标准可以衡量：如果不把帝国的扩张形式和整合方式考虑进去的话，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最远距离和帝国对外边界线的总长度都不足以作为过度延伸的证明。见本书下文，第172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26] 关于欧洲海外帝国的产生和结构，首先参见Abernethy: *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关于葡萄牙和荷兰的海洋帝国，参见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还可以参见Reinhard所做的概述，见Reinhard: *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25~52页。

[27] 见本书下文，第118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 帝国的两翼（或多翼）

诸多地理条件制约了帝国核心的扩张方式，除此之外，精英们有限的决策余地同样影响着帝国权力扩张的方式和机制。那些决策常常会借鉴历史的先例或受到一些政治神话的影响。17世纪的英国，曾经对于自身定位摇摆不定，不知道该把自己视为罗马帝国，还是迦太基衣钵的继承者。横亘于这两者之间的是贸易大国（迦太基）与领土帝国（罗马）的鸿沟。^[1]英国人最后放弃走罗马领土帝国的老路，背后隐藏着一个考量，即这样的帝国不可避免地会沦为一人专政，正如我们在罗马从共和制转向元首制的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不同的是，迦太基直至最后一刻实行的都是由一些豪门巨室掌权的寡头政治（Oligarchie）。所以，大陆扩张总与黥武主义唇齿相依，而黥武主义又常常坠入独裁或专制的深渊。如此一来，英国在1688年至1689年获得的立宪制胜利成果，将会白白断送。相反，一个跨越全球的贸易帝国往往建立在“间接统治”（informal rule）基石之上，它的发展与贵族统治方式非常契合：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只是偶尔动用一下雇佣军，而且原则上只在宗主国以外执行任务，所以军队不致成为一个危险的内政权力因素。英国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为海洋贸易大国的做法，就好比筑起一道防线，从内部遏制政治上有害的发展苗头。

当然，我们也可以翻转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以罗马为例，我们也可以认为，对共和制的根本威胁来自其海洋扩张，而不是领土扩张。在与迦太基的竞争和缠斗中，罗马长期以来实行小规模缓步扩大其统治空间的政策，当元老院决定抛弃这一政策的时候，也意味着罗马共和国衰亡的序幕就此拉开。正是随着大胆的海洋扩张新政策的展开，权力集中到了那些认定共和宪政框架束缚了手脚的人手里。此外，罗马军团常年在海外卖命，服役时间大大延长，以至于根本无暇返乡务农，老兵问题由此而生，且矛盾一触即发。同样，军队指挥的服役期

也不得不再延长，时间一长，士兵与将领之间的信赖关系日渐加深，这就与共和国政治中的轮换制暗生抵牾。^[2]对新领土的每一次征服，都会制造新的精英，而他们的野心又唯有通过更多的征服方得以餍足。

这种演变，已在三次布匿战争期间露出端倪。随之而来的，是公元前67年至公元85年之间古代世界最宏大的一次海上扩张运动。^[3]这一运动的序曲是庞培将海盗清除出地中海的行动，这一行动疏通了连接东西及南北之间国际贸易的通道。他的目标已不再是消除竞争对手对罗马的直接威胁，而是在地中海建立一个普遍 海上霸权，将地中海变成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在那之前，罗马帝国是由很多领地所组成，现在它获得了一个海洋中心，一个新的重心，从此帝国的对外扩张动力及其政治秩序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庞培主导之下，罗马实力得到极大扩张，在他之后的军政统帅都不得不以他的武功为参照，来衡量自己的功过得失。比如恺撒进军不列颠，称其为控制海洋权的重要一步，其实是要拿自己对海洋的征服同庞培对地中海的征服相提并论。同样出于与庞培、恺撒等前人一较高下的决心，奥古斯都将其一生的“丰功伟绩”在“功德碑”上铭刻下来，永垂后世。然而，他的流芳功名不在其对外扩张之勇，而在其孜孜勉力于帝国内部的长治久安。奥古斯都的这一决策影响深远，因为这也正是所谓“奥古斯都门槛”的核心所在。

可见，在公历纪年开始前后的一个世纪里，罗马帝国加速对外扩张，而这一现象也是贵族价值体系和普遍世界统治观念相结合的产物。这当中，航海成为一种胜利的象征，标志着人类智慧成功克服了过去千百年来陆地对人沉闷的束缚。英国的贵族阶层一方面与罗马的领土帝国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又在意识形态上与迦太基“攀亲道故”，不知不觉中已经走错了“跑道”：英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在走罗马人的老路了。^[4]

当罗马人将政治和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当作一种文明的凯旋而额手相庆时，一种帝国自信心油然而生。而这种自信在他们与希腊化的东方文明碰撞之时，根本不可能产生。那两种文明的相遇，罗马人胜在武力，却输在文明。但他们在西边的情形则截然不同。先是在西班牙，再在高卢、日耳曼尼亚和不列颠，入侵的罗马人确信自己带来了更高水平的文明。而当地的土著——那些“蛮族”——既无大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手工业，对贸易所知寥寥。因此，罗马人在这些地区的武力戡乱行动，最终几乎不可避免地引致这些地区在文化上融入罗马。在西边，罗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边缘的投入；而在东边，则以剥削和奴役者的一面示人。用于罗马权力扩张的庞大资源，主要来自东边，但其文明化自信则生于同西边的交融之中。在与这两个天差地别的边缘地区之接触中，罗马人截然不同的做法在政治上影响深远：在东边，罗马摆出霸权姿态，在西边和北边则直接实行帝国统治。^[5]究竟该展霸权之姿，还是行帝国之实，这个问题的决定权不在中心，在边缘。

东、西两个边缘之间的差异，长久以来影响着罗马帝国的政策，并且使两边一再处于相互敌对和猜忌的对立状态。特别是在涉及两边军团谁更有权拥立其统帅为皇帝的敏感问题时，双方更是争论不休。戴克里先（Diocletian）对帝国的改革，以及后来君士坦丁大帝完成对帝国的分治，都是充分考量这些差别的因应之策。但事与愿违的是，他们的举措反而固化了这些差异。要知道，罗马帝国此前正是通过消除那些差异汲取了力量，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在公元5世纪，西部的边缘慢慢脱离帝国，在此关头，除了查士丁尼大帝一度力挽危局外，东边并没有为挽救帝国西半边的颓势而倾尽全力。恰恰相反，对于最终摆脱西部，摆脱它军事防务的无底洞，他们似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当时罗马帝国的东部贡献了65%的赋税收入，而大部分税收投入到军队中，军力的三分之二是驻扎于西部的。^[6]

在某些方面，沙俄的情形与罗马帝国相似。不同的是，沙俄的东部是化外之地，而在西方俄国人又感觉低人一头，于是它奋力追赶西方的发展水平。在西方人眼里，当时的俄国是尚未完全开化的征服者，而在东方，它则被捧为文明大国。1864年，在一封外交公函中，时任俄国外交大臣的戈尔恰科夫（Gortschakow）公爵，极力为俄国入侵塔什干的行径辩解，他将俄国当时的处境同其他推进文明的国家进行比较，认为它们都在边缘遭逢了未开化的游牧民族，不得已踏上一条对外扩张之路。^[7]这既是面对西方列强的疑虑所做的自我辩护——辩解俄国并未因此走上对抗英国的帝国主义路线，同时也是在呼吁国内贵族阶层支持俄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俄国在亚洲的扩张和征服政策当时并没有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原因在于萦绕于俄国人头脑中的观念一直没变：俄国，属于欧洲；俄国的历史和抱负，应该在欧洲开花结果，而不是在亚洲。同罗马完全不同的是，俄国几乎无法从其推进文明化诉求中斩获任何政治资本。

在整个19世纪，沙俄帝国的东西两翼成为让俄国贵族和知识阶层头痛的一个问题。知识阶层一直在追随西方和神往东方之间举棋不定，揪心不已。广为人知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的长期论争^[8]便是这一冲突的体现。一个处在这场冲突风口浪尖的问题其实就是政治上选择谁作为榜样，在文化上又该朝怎样的前景进发。在其他民族国家，虽然也时有这样的争论出现，但表现得不像俄国那般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在俄国的争论，属于典型的帝国内部分歧，争论焦点在于，应由庞大帝国的两翼或多翼中的哪一方决定帝国未来的走向。

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贵族阶层——帝国的中流砥柱、“唯一代表并捍卫着帝国精神的社会阶层”^[9]——就被迫承担起近乎人格分裂般的双重角色：一个，是在亚洲的总督角色；另一个，是在欧洲的绅士角色。很多沙俄贵族以及19世纪晚期以来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为摆脱这一双重角色的困境，往往选择倒向帝国两翼中的“一边”，但这

样一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帝国的行动需求陷入冲突。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领导阶层中的很多成员成为坚定的反对派，他们的对立姿态削弱了沙俄的实力，并最终推动了沙俄走向崩溃。作为沙俄的继任国——苏联，曾经一度成功将两种观念连成一气，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代价太过高昂。^[10]苏联继承了沙俄遗留的老问题，也同样由于这一老问题而落败：统合的压力让它不堪重负，最终压垮了帝国。

通过罗马帝国和沙俄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帝国各个边缘地区政治水平和文明化程度的迥异，成为超级帝国的心腹大患。而对于那些主权国家，特别是民族国家，这不会构成任何问题。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能在其内部化育出相对统一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并从中汲取力量，获得影响力，俾使面对其他诸国足以立于不败之地。^[11]而帝国则必须化解其自身“内部”（通常多出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处理得当，善加利用，以免大受其害或由此败落。

由此而败落的典型例子，便是哈布斯堡皇朝：最终，泱泱帝国裂解成了诸多小邦。由于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带，德国、意大利、俄国及奥斯曼帝国诸强环伺，哈布斯堡皇朝不只有两个，而是足足有四个边缘地区和影响源。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威胁着皇朝的生存，对此，哈布斯堡皇朝参照古罗马帝国的模式，在1867年下定决心，将帝国一分为二：一半是奥地利，一半是匈牙利。两国以莱塔河（Leitha）为界，一边（前者）称为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en），隔河相望的另一边是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en）。然而，这又引发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包括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斯拉夫民族群体在其中自感地位卑微处境不善，这就强化了他们寻求独立的决心。当时提出了“三元帝国”的解决方案，即以布拉格为都城，将波希米亚加为第三元帝国，可最终不了了之。然而，即使是“二元帝国”，已经释放出强烈的离心力了。各个民族的生活空间越拉越远，帝国社会的中流砥柱——贵族阶层，在现代世界的社会经济巨变

冲击下日渐陷入困境，巴尔干地区衰弱的经济造成了常年的预算赤字，这一切都让人对前途充满悲观甚至绝望。为了驱散这种“末日情绪”，人们甚至寄望于一场世界大战。也正是在这场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分崩离析。[\[12\]](#)

按本书开篇给出的定义，哈布斯堡皇朝在严格意义上算不上帝国。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它的崩溃中细细体察一个超级帝国作为跨文明秩序体系的历史意义。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里，哈布斯堡皇朝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将整个中欧地区融合、凝聚于一体，它是一座桥梁，连接了东南欧边缘地带和西欧、中欧地区。它所起的这种作用，在1918年之后无人可及。或许有个例外，那就是南斯拉夫，然而，后者也只是在很短时间内，且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内发挥了这一作用。事实上，今天的欧盟归根结底面临一大任务，那就是要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长久之计。

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分工就做得更为成功。早在16世纪，帝国就将鲁米利亚同安纳托利亚地区分开，成为行省。它们各自任命总督（beglerbeg）为行政长官，[\[13\]](#)总督负责管理各自所属帝国领地的内部事务，同时负责边境的防务，自行筹措一切所需资源。不过，与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皇朝情形不同，由于苏丹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加上奥斯曼帝国的高度集权，上述两个地区并未走向独立。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并非离心倾向演变的结果，它的覆没源自其他方面的短缺。

在帝国整合方面，成效更高的是中华帝国。它成功地应对了来自边缘的各种挑战，大抵维系了始于秦代（公元前221年～前206年）的中华大一统。从一开始，中华帝国便面临一个南北问题：在北面，它不断受到蛮族的侵扰；而在南面，则同诸多朝贡国维持着一种与北方华夷之间大为不同的关系。在中国，遏制南北方不致彻底分道扬镳的

是一以贯之的“中央帝国”理念，它弱化了存在已久的离心倾向。就是这种离心势力在中华帝国衰颓和崩溃的时期，一次次导致南北方走向分裂并峙；而帝国每一次重整旗鼓，也总会带来南北方的重新归于“大一统”。[\[14\]](#)

在郑和率领船队（1405～1433年）浩浩荡荡完成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之后，大明帝国却退出了航海事业。焚毁宝船，只容在官府主持之下[\[15\]](#)开展有限的口岸互市。[\[16\]](#)明廷这一重大决定很可能源自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中原为重的帝国观念。海洋扩张、发展海外贸易，可能极易动摇这一帝国意识。[\[17\]](#)

对于诸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等欧洲海洋大国而言，帝国边缘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要远比传统陆地帝国更为突出。[\[18\]](#)这些海洋大国在亚洲遭遇了印度、中国和日本这样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的国家或帝国。在那里，欧洲大国的帝国扩张刚开始只能限于商品交换和打开市场。在由此产生的贸易空间里，欧洲人虽有利可图，但面对当地的强权政府，政治上往往难有作为，影响力微弱。直到等来印度莫卧儿王朝崩溃（1739年），而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清王朝也走向衰落、大势已去，欧洲列强的政治统治空间才不断膨胀，慢慢覆盖了它们的贸易空间。

海洋帝国在西面边缘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在北美和南美，它们慢慢建起多个殖民据点，吸引了大批欧洲人源源不断涌入其中。这些离开欧洲，远渡重洋踏上美洲土地的人，怀揣不同的打算：有些人受了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黄金神话的诱惑，期待在此迅速发家致富；有些人是为了追求一种在欧洲旧世界无以实现的新式宗教团体。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结果是欧洲人在新世界引入了他们的经济模式，压垮了当地原有的结构。加上欧洲人武器技术优势明显，于是闯入者很快在美洲大地建起政治上直接受控于中心的帝国扩张空间。

也就是说，西班牙帝国及大英帝国的东西两翼，可谓云泥之别，两边的历史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但由于海洋将海洋帝国诸多属地同帝国的中心分割开了，所以，帝国边缘那种社会文化异质性的对海洋帝国中心带来的冲击，远远不及它对陆地帝国中心的影响那么大。很显然，海洋帝国更有能力应对来自帝国边缘的各种挑战，即使失去某一边缘，也不会伤及帝国元气。在这方面，英国就是一个佐证：它在失去北美殖民地以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帝国周期。

[1] 参见Vance: *Vom mare nostrum zu Kipling "The Seven Seas"*。

[2] 对这一发展情形的详尽描述，见Heuss: *Römische Geschichte*, 第168页起若干页；以及Syme: *The Roman History*, 第15页起若干页。

[3] 这里的论述参考了Schulz的想法，见Schulz: *Roms Eroberung des Mittelmeers*。值得注意的是，Bender在对比罗马帝国和美国异同时，给罗马选取的历史时间段是在第一次到第三次布匿战争时期，给美国选取的则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见Bender: *Weltmacht Amerika*, 第60页起若干页，还可以参见作者书评，见Historische Zeitschrift第279期，第430~432页。

[4] 不过英国在18到19世纪幸免于类似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所经历的那种内战，也许是因为17世纪后半叶在英国已经发生过内战。

[5] 对此，详见 Triepel: *Die Hegemonie*, 第464页。

[6] 关于戴克里先在位期间对罗马帝国的改革，参见Bellen: *Grundzüge der Römischen Geschichte*第2卷，第244页。关于君士坦丁大帝对罗马帝国的分治，参见同书第3卷，第110页起若干页。关于罗马东西帝国的税收情况和军队部署密度，见Breuer: *Imperien der Alten Welt*, 第186页起若干页。

[7] 关于俄国在中亚传播文明的诉求，参见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第38页起，以及Geyer: *Russian Imperialism*, 第187页起若干页；关于俄国在建立政治文化认同时介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矛盾心理，参见Figs: *Natasha's Dance*, 特别是第282页起若干页。

[8] 对此，参见Isaiah Berlin 的著作，比如说*Herzen and his Memoirs* 和*Russian Thinkers*。

[9] 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第183页。

[10] “历史证明，把有着云泥之别的历史地区——从西方拉丁语文化圈的共和国，到东斯拉夫的东正教地区，再到伊斯兰教文化圈的国家——统统整合在一个社会主义霸权体系之内，从长远角度看是不可行的。” Simon: *Die Desintegration der Sowjetunion*, 第205页。

[11] 最近特别是在德国，对作为民族国家基石的政治文化认同的形成做了深入的研究，比如可以参见Bernhard Giesen和Helmut Berding主编的论文集*Nationale und kulturelle Identität, Nationales Bewusstsein und kollektive Identität*以及*Mythos und Nation*。

[12] 参见Rauchensteiner: *Verlust der Mitte*, 以及 Kann: *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3] 参见Matuz: *Das Osmanische Reich*, 第141页。

[14] 还有一个维系中华帝国统一的因素，是儒家士大夫的伦理精神，他们对文明德化远邦的作用深信不疑，这有助于抵御来自边缘地区的蛮夷危险。见本书下文，第124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15] 市舶司。

[16] 参见Buckley Ebr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第209页起，以及 Merson: *Roads to Xanadu*, 第73页起。顺带一提：中国并非唯一出于国内安定而远离海洋贸易的国家。奥斯曼帝国尽管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舰队，并依靠这支舰队与威尼斯和西班牙周旋，但它还是把远洋贸易几乎完全交给了国外商人。参见Matuz: *Das Osmanische Reich*, 第111页。

[17] 但退出海洋扩张的决定绝非没有反对声音。对此，参见Menzel: *Eurozentrismus*, 特别是第76页起，及书中提示的其他文献。如果中国继续远洋活动，是否会阻止欧洲人挺进印度洋——正如所谓亚洲主义的代表最近声称的那样（参见同书，第74页起若干页）——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如果当时的海洋扩张运动继续下去，中华帝国走向四分五裂也同样有可能。

[18] 对此及对随后的论述，参见Doyle: *Empires*，第108页起若干页，以及Reinhard: *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24页起若干页；关于欧洲与南亚及东亚的文化接触的论述，见Osterhammel: *Die Entzauberung Asiens*；关于殖民关系的不同类型，参见同一作者的*Kolonialismus*，第19页起若干页。

/ 帝国周期与奥古斯都门槛

在帝国的兴衰起伏中，不同来源和不同形式的权力多管齐下，同时作用，这一点要比在主权国家历史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如果说，基于相互性原则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联盟组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四种权力类型^[1]在主权国家内部走向同化，那么，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边缘客观上就要求帝国在某些时候多调动军事或政治权力，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运用更多的经济或意识形态权力。比如，帝国在军事方面的短缺可在其他方面获得弥补：那些被帝国的夺人光芒所吸引的民族，可能为了最终获得帝国的庇护而竭其所能，鞍前马后，为帝国拼尽一切。当然，他们的付出需要得到回报，而筹赏他们所需的资金远远低于动用帝国自家军队的花费。

帝国的边缘防卫，极少意味着要对付势均力敌的敌手。所以，就确保边缘安全这一点，那些商人、军师、民俗家和策反特工实际上常常发挥着比帝国常备军队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古至今，例子不胜枚举：远到古罗马帝国用以防御日耳曼人的“蛮族边界”，近到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其“印第安人边界”上的所作所为，以及欧洲殖民势力渗入所谓无主地区，还有前些年美国人以数百万美元的代价“收买”阿富汗地方军阀，从而在短短几天之内便使当地整个权力结构地覆天翻，最终一举挫败塔利班政权。这些事件都印证了这一点。

除了金钱，也就是经济实力之外，文明吸引力，或者说意识形态实力在打动边缘地区民众，使之献身帝国事业方面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罗马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有关阿米尼乌斯（Arminius）和弗拉乌斯（Flavus）兄弟反目的记叙中看出来。这一对来自切鲁西（cherusker）部落的兄弟，心怀异志：兄长阿米尼乌斯，揭竿而起，发起一场抗击罗马的起义，改变了历史；而弟弟弗

拉乌斯则执意留在罗马，继续忠心耿耿为帝国效力。这场跨越了威悉河（Weser）的争端，肇始于阿米尼乌斯对其兄弟弗拉乌斯的发难。他质问他那在为罗马人的战斗中失去一只眼睛的弟弟，残疾之痛究竟为他赢得了什么酬赏：“弗拉乌斯提及军饷上涨，获颁荣誉项链、花冠，以及其他军人勋章等。阿米尼乌斯对此不屑一顾，大声嘲笑说，这些都不过是给奴隶的一点可怜奖赏罢了”。^[2]而涉及该忠于罗马帝国，还是忠于切鲁西的出身，两人更争得不可开交。虽然阿米尼乌斯力劝其弟，思其故土，念及承自先祖的自由和家乡神灵，但弗拉乌斯不为所动，坚持选择效忠罗马皇室。打动他的是帝国之浩大，总督之权势。可见，让弗拉乌斯选择罗马的，除了罗马的政治权力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其意识形态权力，而并非在此之前已经元气大挫的军事权力。

在决定帝国的崛起和存续的诸多因素中，权力类型相互之间易换条件和转变方式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那些较为长寿的帝国都要经历多个周期，上述这两个因素则起到调节帝国周期的功用。它们不仅影响到前面已经提到的成本问题，关系到对耗费最低的权力类型的选择问题，同时也影响到帝国能否随时随地调用这一权力。一个帝国能在强盛周期维持多久，取决于它某一种权力的短缺是否可以通过另一种权力的富余得以弥补。

西班牙崛起成为欧洲霸权乃至称雄世界的全球性帝国，主要归功于其现代化的强大军备。其中包括一支纪律严明的步兵团和具有远洋作战力的舰队，而政治权力又为军事力量锦上添花：西班牙国内运转良好的官僚治理体系带来了国泰民安，这正是其政治权力的活水之源。在1521年城市公社起义被挫败以后，西班牙国内局势重归平静。相比同时期的法国，社会安定确实是当时西班牙的一大优势。法国人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长期陷于内部纷争，最终被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3]彻底拖垮。然而，西班牙的经济缺乏一种发展的自动力。正如历

史学家瓦尔特·伯尔奈克（Walter Bernecker）所指出的，它“缺少一个连通世界的金融系统，尤其缺少一个由企业家和商人组成的动力阶层：通过它跟国家政府的互相配合、双管齐下，在政治和军事权力之外，合力打造一种经济权力”。^[4]从根本上讲，支撑西班牙皇室大肆采购军火、维持帝国昂贵军事装备的，不过是采自美洲大地的真金白银。尽管“新世界”的贵金属源源不断流向大西洋彼岸——仅在16世纪流向西班牙的贵金属总值就高达约三万亿塔勒^[5]——但帝国的支出常年高出国库收入约20%。西班牙政权受困于其长期无解的财政难题，最终垮台。

西班牙世界帝国的另一大弊病是人口基数太小。特别是跟周围霸权竞争对手如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相比，西班牙人口明显不足。雪上加霜的是，西班牙人口在16世纪又遭受重创，锐减约20%。^[6]在当时的欧洲霸权之争中，西班牙的这项人口赤字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刚开始还未显现出来——因为当时法国的内斗暂时抑制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而奥斯曼帝国的实力也在东边受到掣肘。此外，西班牙在与哈布斯堡家族德意志一支联姻后，充分利用了这一便利，在德国招兵买马，扩充了兵源。

最后还有一个意外事件也帮了西班牙一把，延长了它的帝国周期。1580年西班牙国王^[7]继承葡萄牙王位，这样又一个殖民帝国落入了西班牙手中，于是西班牙就拥有了举世无双的庞大商船队。就这样，西班牙失去尼德兰的损失在短期内得到了弥补。但在接下来那场长达80年、志在重夺叛离行省的战争^[8]中，西班牙资源耗尽，却未收获预期的胜利。17世纪伊始，尼德兰人便展开攻势，他们的东印度和西印度贸易公司成功抢占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部分殖民地和一部分贸易。《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和约》（der Frieden von Münster und Osnabrück）和1659年《比利牛斯条约》（der Pyrenäenfrieden）的签订，标志着西班牙的第一帝国周期落下了帷幕。^[9]18世纪波旁王室

的改革暂使西班牙帝国得以苟延残喘，帮助它迈入了另一个帝国周期。然而在后一周期，其声势已远非昔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已是雄风不再。

归纳起来，可以说西班牙帝国的第一周期，归根结底，仰仗了其军事上的优势。而这一优势又源自其军队组织上的一系列改革成果，以及武器技术上的屡屡创新。^[10]但这些革新在另一方面也大大加重了军费开支的负担，这一切又因财政上的捉襟见肘而无以为继。同时，四周诸多强敌虎视眈眈，它们在军事组织和技术上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于是，在欧洲，西班牙的权势便轰然倒地。西班牙失去军事优势之后，之所以会连带着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正是因为它没有其他任何权力类型强大到足以弥补其不足：西班牙的经济实力弱于其欧洲竞争对手；至于政治权力，尤其在结盟和在联盟中实现自我意志的能力方面，西班牙一方面受制于欧洲基督教教派分裂，另一方面又同正在崛起的英国的利益冲突凸显，于是政治权力也大打折扣。只是借助反宗教改革运动，西班牙才勉强得以收获意识形态权力，但这项运动让它赢得同情和支持的同时，也树敌无数。另一边，起于尼德兰，紧接着蔓延整个欧陆的“黑色传奇”，抹黑了西班牙人，被西班牙的对手所利用，化育出一种强烈的反西班牙意识形态。这让西班牙在欧洲高高在上的领先地位显得暗淡无光^[11]：人们大谈宗教裁判所的残酷和专横，腓力二世的暴行如何罄竹难书，西班牙人腐化堕落的国民本性；大谈西班牙妄图建立一个雄霸寰宇的全球性帝国来奴役万民，涂炭生灵——世界上其他所有族群将无一幸免。在这些骇人听闻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近代欧洲最早的国际反帝国意识形态慢慢浮现。对此，西班牙的宣传机器黯然失色，无所作为。^[12]

当然，西班牙的权力短缺一开始仅仅在欧洲暴露出来，而在欧洲以外的帝国领地尚未显现。岌岌可危的是它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海外帝国依旧安然无恙。所以说，西班牙从欧洲霸主的宝座上坠落，并不

意味着西班牙世界帝国就此衰亡。事实上，它在这之后继续主宰拉丁美洲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在太平洋及加勒比海地区继续称雄近两个半世纪。因此，把这一漫长的时期简单地称为颓败和衰亡期，是有失公允的。

按照大国兴衰的模式（Modell vo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来看，几乎所有帝国的历史都经历了一个短暂且活跃的上升期和一段漫长的衰落期。上升期又在很大程度上与武力扩张期重合，而帝国权力在达致鼎盛之后，施行的种种改革一律被视为帝国进入缓慢衰落期的因应之计。这样一个研究帝国历史的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对帝国的“军事”一面青睐有加，而对其“政治”的更新能力却重视不足。按照这一理论模型，无论是行政管理上的改革，还是经济秩序、财税体系乃至军事领域的革新，都不过是为遏止或延缓帝国那原则上无可挽回的衰落进程所做的最后一搏。

特别是在研究罗马帝国历史时，这一模式被一再引用，以至于几乎模糊了历史叙事和模型理论的假设之间的界限。按照这一模式的说法，罗马帝国最迟在2世纪初期，即所谓养子继承制时期，国力达致极盛；特别是在图拉真（Trajan）治下，帝国的疆域扩展至最大；此后，便陷入了漫长的衰落期。^[13]3世纪末，帝国改革始于戴克里先，继而在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继任者治下实现帝国分治；最后，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在公元380年颁敕令将基督教定为国教，^[14]完成了向意识形态权力的转换。所有这一切努力，按这一模式的思路看来都没有对帝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任何“根本性”意义。就像它对待西班牙的历史一样，那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帝国史被简单地说成是衰落史。而在所谓帝国“衰亡”的漫长时期里出现了周期性兴衰起落，却被这个模式所忽略——这种忽略未必体现在历史叙事中，却体现在历史意识里。尤为关键的是，这种兴衰模式里有一种历史必然性观念，它让

那些帝国改革家身上充满宿命的悲情意味：不管他们如何励精图治，力挽帝国之将颓，到头来不过加速了帝国的朽亡罢了。

与崛起一鼎盛一衰亡的研究模式不同，我们在这里引入政治史中的周期模式（Zyklenmodell）来阐释问题。这一模式，由希腊化时代的古罗马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os）提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由政治哲学家尼可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发扬光大。^[15]按照这一模式，所有政治实体，在其长短不一的历史中都会经历若干周期；在这些周期里，几经兴衰起伏。至于经历几次周期，周期内的上升阶段持续多久，这些则取决于政治实体领袖的政治手腕和远见。^[16]

对于重构帝国历史，周期模式具有不少优点。首先，比起兴衰模式紧盯帝国的兴衰两个发展演变方向，周期模式深入肌理，带领我们看到更多帝国兴衰起伏的细节；其次，周期模式着眼于帝国如何克服危机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如何奋力走出谷底，极力拉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因此——也就是第三个优点——这一模式，自然更重视政治（及社会）行为主体的影响力。正是他们一手掌握政治共同体的命运——当然也是在其可供动用的资源及权力类型允许的范围内——他们可以通过种种革新措施，在源头遏制帝国的衰落，增强帝国上升的推动力。^[17]

最近几年，在霸权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数据）分析模式（analysemodell）。^[18]它们在阐释帝国起伏不定、变幻无常的历史时，相比传统的兴衰模式更加精确和细腻。按照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教授和威廉·汤姆逊（William R. Thompson）的说法，20世纪初期的美国，由于在核心经济领域，如钢铁业、化工业及电气工程等行业一马当先，于是在整个经济领域赢得了全球领先的地位。在此基础之上，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举跃升为当时的世界领

袖。在这个起于1850年，止于1973年的霸权周期内，经济发展和政治扩张携手共进。后来，又仰赖在新的核心领域，如信息工程和微电子等方面遥遥领先的技术优势，美国迈入一个新的霸权周期。这一新周期让美国在短暂的式微过渡期之后，成为美苏角逐的胜者，并因此成为硕果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

不过，上述这种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它那强烈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套用权力类型的概念，在这一理论中，经济权力压倒了一切，排除了不同权力类型之间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结果就是，霸权周期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在美国之前，只有英国也曾经历那样两个周期：第一个周期建立于强大海权和商业优势基础之上；另一个，则得益于在工业革命中获得的领先地位。霸权周期的经济决定论，没给政治决策留任何影响余地。在这一点上，即使相比古典共和主义的政治周期理论，经济决定论也显得一叶障目、失之简单。至少前者还把社会道德因素和政治体的宪政秩序看作影响历史兴衰起伏的决定因素。

研究帝国历史，我们不妨将四种权力类型的概念同上述两套周期理论结合起来，跳出单一因素决定论的狭隘，承认决策精英对经历周期的方式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比如，克服各种危机的努力，以及竭力拉长每个周期的上升阶段，等等。在这种情形下，猜测每一个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长，显得无关宏旨，没有必要。我们要注意区分：有些帝国仅仅经历了一个周期，昙花一现；而另一些，则经历了好几个周期，且每个周期都有较长的上升阶段。前者的典型例子是蒙古帝国及拿破仑一世的法国，中国和罗马帝国则属于后者，而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和大英帝国也属于后一种。另外，或许可以说，一个帝国可资支配的权力类型越少，或者优于竞争对手的权力类型越少，那么周期持续时间也就越短；反之，帝国的权力类型选项越多，它在周期的上升阶段就停留得越久。此外，权力类型的多元化，也给帝国决策精英增加了调控周期进程的机会，也就是加速或者延缓周期的进程。^[19]当

然，我们也不应高估精英层的决策空间和余地，他们能施加影响的是周期如何进展，至于跳脱或中止周期，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帝国要在周期的上升阶段长驻久留，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迈克尔·多伊尔所称的所谓“奥古斯都门槛”。^[20]屋大维（奥古斯都）推行的改革基本上涵盖了三大要素。首先，他努力赢得罗马有地贵族的信任，凭借他们的支持，打破城市寡头统治阶层的权力垄断；其次，他左右了罗马的宪政秩序和行政制度的革新，且并未引发政治危机；最后，他对整个行政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那些行省从寡头统治者贪腐的老巢转变成治理有效的帝国之一部分。屋大维试图通过这些改革方案结束内战，巩固自己的权力，并由此从根本上重组罗马的政治秩序，而这种重组也被后人视为共和制的终结，同时也是元首制的滥觞。但与此同时，他也确实创立了确保“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长治久安的各项制度。随着奥古斯都门槛的跨越，罗马告别了盲目的大肆扩张阶段，由此引发的种种内耗内战也随之烟消云散，至此，罗马迎来了它长期稳定的统治期。

此后，罗马周期在周期上升阶段至少停留了两个世纪之久。这要是在帝国建立之初，听上去无异于天方夜谭。要知道，此前罗马国内经历了数十年惨烈的内战，在这些战争中，帝国边缘一次次沦为争夺帝国中心权力的基地和军事要冲。当战火燃尽，罗马面临着帝国分崩离析的危险，就像曾经的马其顿帝国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迅速分裂的情形一样。为了平息内战，罗马历史上三番五次出现所谓“三头同盟”，这一次又由“三雄”将各大行省划为各自势力范围，这种三分天下的局面，如按马其顿帝国的经验，原本可以轻易分裂成几个各自为政的继任国。特别是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这在当时已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然而，屋大维还是成功地使行省的臣民都归心帝国，帝国军队规模得以大幅削减，^[21]进而降低了疆域防务的费用，也为降税减负铺平了道路。^[22]在彻底击败迦太基之后，罗马继续南

征北战，除了控制整个地中海地区，还将势力范围向西北和东南的两个方向拓展开去。就是这样一个扩张性权力中心，现在成了保障“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罗马帝国”。

奥古斯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化育出一个对腐败具有抵抗力的行政管理层。为达此目标，屋大维不仅致力于机构改革，同时也倾注心血改革帝国精英的风纪。这位在公元前27年被元老院赐封为“奥古斯都”（意即神圣至尊之人）的皇帝，当时推出一系列革新风纪和宗教的新政，在现代历史文献中常有人认为，这些政策源自他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倾向，同时也是其个人价值观的体现，另一些人则深信屋大维本人正是靠着那些他后来所激烈反对的手段上台的。对其前后矛盾之虚伪性的指责，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固然不无道理。不过，我们讨论一个帝国的革旧维新和强基固本，重要的是政治成效，而非道德上一以贯之。^[23]当时，铲除充斥于共和制寡头政治统治后期的腐败已势在必行，^[24]这也是帝国谋取剩余价值方式实现转变的先决条件，即从护民官之类的地方军阀所采取的掠夺机制转变为定期制度化的税收方式。要落实这一点，清正廉洁而非损公肥私的公职人员必不可少。而在帝国管理精英中提高抗腐力恰恰是屋大维风纪和宗教改革措施之着眼点。这其中包括对元老院的多次“清洗”运动，当然，屋大维也借机铲除了那些政治上并无污点的对手。另外，他颁布《关于选举舞弊的尤利法》（*lex Iulia de ambitu*），那些被证明有贪腐渎职行为的候选官员，五年之内不准担任公职。^[25]

不过，屋大维看重的不仅仅是帝国精英政治上是否忠诚可靠，清官贤相是否后继有人也是他非常关心的大事。在帝国内战刚刚结束之后的头几年，屋大维即命意大利行省的臣民大批迁入帝都，敕封骑士为城市贵族，新任命一批元老院议员。通过这些举措，他给罗马政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虽然这些政策成功提升了他在整个领导层的威望，但屋大维并无意将这种招贤纳士的方式常态化，他只是把它作为

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而已。在屋大维看来，更好的方法是实现精英层的自我更新。要么自己延续后嗣，要么通过领养的方式传宗接代（这在当时的罗马相当盛行），未婚人士的继承权大打折扣，国家还加大了对死后无嗣者财产的征收。相反，对于孩子超过两个的家庭，政府予以财政补贴，对通奸者或伤风败俗者严惩不贷。儿女满堂的执政官，在卸任后可优先挑选行省来管理，而不像人丁不兴的执政官只能等抽签决定。^[26]也就是说奥古斯都不欢迎一个“独身主义”的精神精英层，因为那需要不断从外部来补充和更新它。他希望创造一个能够自我换血、自我更新的精英层——哪怕在另一方面会限制他对精英层人员构成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一举措解读为他实现从“权力”（*potestas*）^[27]到“威信”（*auctoritas*）^[28]转变的计划。^[29]此外，这也是一项预防措施，确保帝国人口的稳定——要知道这一难题也同样困扰着奥古斯都的继任者们——使得精英层成为万民之表。我们还不妨将它理解为一项提升政治及军事精英层抗腐力的重要举措：相比那些靠单打独斗而飞黄腾达的野心家，出身达贵世家的人更经得起贿赂的诱惑，因为前者顶多会顾及一下自己的身后之名，却不必挂念子孙后代的福祉。

奥古斯都门槛，说白了就是一系列深刻改革之和。通过这些改革，一个帝国告别了对外扩张阶段，过渡到一个有序的长期发展阶段。奥古斯都门槛，用周期理论的话来说，就是最大限度地延长帝国周期上升阶段的存续时间。而在罗马帝国的自我认知中，这些改革措施引发的变化是，共和制的周期历史观——在从波利比乌斯到撒路斯特乌斯（Sallust）的历史学家中一直占尽上风——现在让位于“永恒罗马”（*Roma aeterna*），即“帝国千古长存”的帝国意识。^[30]总览罗马种种革新措施，我们不难看出，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其实也意味着一场深刻的权力类型转换：军事权力的重要性大幅下降。有鉴于此，屋大维才敢大规模裁军。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尤其是意识形态权力的权重上升。除了借助“帝国永恒”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平的理

念也提升了帝国意识形态权力，即“罗马治下的和平”，这也成为帝国合法性的一个新的来源。也就是，只要罗马帝国存世一天，则天下太平；帝国根基越是稳固，和平则越有保障。

帝国一旦跨越了奥古斯都门槛，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转向了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在建立独立官僚体制之后，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摆脱了昔日城市贵族寡头政治的专断妄为，并且中心的公民权慢慢扩展到部分行省民身上。这一点，在几次罗马人口登记和财产调查中可见一斑。公元前7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罗马帝国统治区域男性公民数总计91万，而公元前28年由屋大维和阿格里帕（Agrippa）主持的人口统计则显示罗马公民已达406.3万。数字上的提升，不能单单归因于计入了妇孺的人数。20年后，罗马公民数再增17万，达到423.3万。^[31]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惊人的攀升，但它标志着帝国已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随着212年至213年的卡拉卡拉敕令（die Konstitution Caracallas）的颁布而落下帷幕。该敕令将罗马的公民权赋予了意大利以外全帝国的自由人。^[32]

可以说，随着卡拉卡拉敕令的颁布，罗马帝国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差异性越变越小乃至无足轻重的演变过程已经正式画上了句号。早在哈德良（Hadrian, 117~138年在位）统治时期，意大利便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眷顾，降格为一个普通的帝国行省。正是在这一时期，帝国的经济重心从中心转移到外省，昔日的帝国中心意大利进入经济萧条期。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其南部人口的大量减少。^[33]帝国军队从此也主要从部队驻地的行省来招募，军事权力也不再是帝国中心用来统治边缘的工具，反倒是边缘自己打造了一种确保帝国延续的军事力量。是那些出生于意大利之外的皇帝，如来自北非行省的塞维鲁（Severer）家族，让军队建设重新成为罗马帝国政策的重心。

跨越奥古斯都门槛，特别体现在两点上：中心和边缘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差距消失无存；中心在法律上的种种特权也逐步取消。这些特权往往是作为胜利的果实赐予那些征服者的。在罗马，卡拉卡拉实施推广公民权的改革后，戴克里先又继以税制改革，对意大利征收直接税（此前对意大利免征直接税）^[34]，最终，随着帝国中心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完成了其去中心化，或者说中心的弱化。就连帝国西半部的行政中心即首都也在不久之后迁往他乡，293年迁至米兰，自402年起，因地形易守难攻，拉文纳（Ravenna）成了西罗马帝国的首都。

还有其他帝国也跨越过奥古斯都门槛吗？在帝国历史的比较性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帝国史上两种大相径庭的现象：有些帝国故步自封于奥古斯都门槛，止步不前；而另一些帝国则义无反顾跨过了那道门槛。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援引西班牙的例子。随着查理五世^[35]在1556年淡出朝政，而帝国的泱泱国土又一分为二——西班牙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两支，查理五世结束了他惯用的巡游统治方式——他曾以这种方式既维护了在军队中的权威，又在帝国四方尽显其统治者的威仪。1561年腓力二世定都马德里，使之成为帝国统治的中心，并创建了一套在当时来讲高度现代化的官僚体制。^[36]从此，野蛮征服的时代成为历史。在边缘地区无序地以武力掠取剩余价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然而，对西班牙来说，其军事力量作用力的衰减，没能通过提高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分量而得以弥补。所以，西班牙并没有在世界政局中真正完成它从剥削和奴役到文明教化的角色转变。^[3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从未如罗马那样，发生明显的去中心化。因此它也无法像罗马那样实现边缘的振兴。

西班牙之所以停滞在奥古斯都门槛，故步自封，问题应该不出在宗主国与海外殖民地的关系上。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西班牙与其他诸多欧洲列强争强斗胜耗尽了国力。西班牙失败了，从本质上讲，是

作为“霸权”的西班牙失败了，而不是作为“帝国”的西班牙。换言之，西班牙帝国之所以最终崩溃，是因为西班牙在欧洲的霸权争夺战中耗光了那原本可造福帝国边缘的庞大资源。此外，由于卷入长年霸权战争，帝国不得不孤注一掷，以举国之力强化其军事实力。

罗马占尽天时地利，加上政治上的好运气，使得它在击败迦太基和东部一些王国之后，举目再无对手可堪匹敌、与之争锋。这样，罗马彻底收进和平红利，并将其投入帝国文明的传播之中。相比之下，西班牙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冲击，尤其又经过同近邻法国的冲突，西班牙不得不从16世纪初期开始就投入巨资改进攻城技术，建立全面的防御体系。^[38]最终，光是偿还国债一项，西班牙就要花掉它65%的财政预算。^[39]其庞大军队因开支过高而难以为继，而海军又在北非巴巴利海岸^[40]和加勒比海及中美洲地区遭到蛮族的挑战，甚至还受到了死敌英国暗中支持的私掠者及海盗的侵扰，这一切都让帝国体系内各地之间的经济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

为了减少损失，西班牙在美洲和欧洲之间的航道上引入了护船队，从此商道得到了大西洋无敌舰队的护卫。从军事角度看，这项举措无疑很成功，在1560年到1650年，90年间的多达15000次航行中，西班牙仅仅损失了62艘船。^[41]可是，这项政策花费巨大。西班牙一直未能化育出像英国“商人冒险家”（merchant adventurers）那样一个自由企业家阶层。它的跨大西洋国际贸易始终处在国家政府的掌控之下。西班牙世界帝国必须一直像统治陆地空间那样来组织其贸易空间，这样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它无法将统治成本长久地维持在低位。

同样在奥古斯都门槛上止步不前的，还有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的沙俄帝国。彼得一世很清楚，要实现沙俄帝国的长治久安，必须先广泛动员民众，充分利用国家资源。在此基础之上，效仿西方，

将军队职业化，并建立完备的官僚机构。^[42]但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首先将莫斯科公国封地制组织下的领土扩张引导到国家控制的轨道上来。彼得一世建立常规陆军，取代了先前一到冬天就遣散的贵族雇佣军队。新建的常规军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Poltawa）会战中小试牛刀，一鸣惊人。彼得一世开创的治国体系，其核心部分是将官僚机构与沙皇个人相分离，世俗世界与宗教领域相分离，这些核心制度一直保留到1917年。在改革军事和行政制度的同时，他还将原本彼此完全隔阂的世袭贵族^[43]与军功贵族融合成新的贵族阶层。于是，一个新的帝国精英层由此而生。在1722年颁发的贵族等级表，即《官秩表》（Rangtabelle）中，个人功勋重于个人出身。此外，在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的建议下，沙皇还努力培育学术精英，挑战了东正教神职人员作为智识权威的地位。采纳了拉丁文君主尊号Imperator Russorum^[44]；将帝国首都从莫斯科迁至圣彼得堡——在一片荒芜的沼泽地上，新的帝国中心拔地而起，这象征着帝国改革进入高潮。^[45]当年深受拜占庭影响的“第三罗马”——莫斯科，从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进行帝国扩张开始，就一直为帝国合法性发挥了关键作用；^[46]如今，它的尊位被号称“新阿姆斯特丹”的圣彼得堡取而代之。新都帮助俄国赢得了更多的海权，对提升帝国国际地位功不可没。同时，它也为帝国增添了几分炫目的文明之光。可以说，在彼得一世的改革政策里，我们看到其中很多特征是非常符合一个跨过了奥古斯都门槛之帝国的。

然而，在帝国接下来的发展上，彼得一世的俄国却走了一条不同于罗马帝国的路径。这既跟它们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有关，也跟两国所秉持的不同政治目标不无关系。当屋大维着手改革的时候，他相信，在扫除所有威胁自己主导权的竞争对手之后，帝国就无须继续扩张下去了。或许，在葡萄牙殖民帝国并入西班牙帝国后，腓力二世本可知足而返，但苦于西班牙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依然根基不牢。而彼得一世跨入奥古斯都门槛，则是为了继续推进沙俄的帝国扩张，同

时也是为了能在同其他欧洲劲敌（特别是瑞典，也包括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中采取进攻态势。也就是说，彼得一世政策的重点不在于降低统治成本，他要动用一切资源和力量控制并继续延展帝国泱泱疆土。为达此目标，沙俄在其历史上从未满足于只在边缘攫取剩余价值，它还要不断向帝国中心地区的臣民压榨、索取。因此，为了扩展帝国的边缘，彼得的政策最终引致对中心的“自我殖民化”。

至于奥斯曼帝国，它跨越奥古斯都门槛的情形及后果也与众不同。它在跨越门槛的同时，还必须在生产方式上完成游牧到农耕的转变，[\[47\]](#)否则，奥斯曼将很可能与之前那些草原帝国一样年寿不永、昙花一现。因为那些游牧征服者未能创建出自己的行政管理结构，于是，他们干脆采取拿来主义，在占领地区直接沿用拜占庭的行政制度，并将之推广至整个帝国。[\[48\]](#)其实，建立帝国行政管理制度与摆脱奴役和扩张的压力，两者原本就紧紧相依。而要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有效管理结构，必须先让帝国精英及其军队、官僚的生活方式获得一定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则是，帝国军队不单单指着打仗来养活自己。那时，在帝国的边界线上，虽然战事仍未消停，[\[49\]](#)但军队的补给已开始转向依靠封邑制（如帝国重骑兵西帕希）或者依靠关税和地租收入（如耶尼切里禁卫军那样）。

虽然有上述那些举措，但纵观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历史，军事力量始终是其政权的基石。成为常备军的耶尼切里军团骁勇善战、纪律严明，在西方军队面前渐显优势。但随着西方对武器技术的改进以及军制方面的革新，苏丹亲兵的优势很快便荡然无存。那个曾经令人生畏的奥斯曼帝国，一下子变成了“波斯普鲁斯病夫”。

除了军事实力，当然，奥斯曼帝国也拥有一定政治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免受内斗之害，在欧洲霸权争夺战中它曾是几大欧洲列强无名有实的重要盟友，尤其是法国，它试图通过与奥斯曼联手建

立对抗哈布斯堡皇朝的“第二阵线”。与政治权力不同，奥斯曼人的意识形态权力好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把剑使奥斯曼在伊斯兰世界里一度赢得众人的追随和效忠；而另一方面，这把剑在基督教世界却点燃了敌意的怒焰。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无数讨伐土耳其人的檄文纷纷号召人们对来自东方的祸害发起十字军东征；西方基督教国家应搁置一切政治矛盾，同仇敌忾，一致对付来犯的土耳其人。

奥斯曼帝国从一开始就有一大软肋，那就是经济实力不足。虽然生产方式从游牧转变到了农耕，经济薄弱的局面却并未因此得到根本改观。那时，外国公司控制着作为海上咽喉的两个海峡，于是几乎所有的海上贸易都落入了外人之手，而帝国只能从他们的营业额里抽取一点可怜的关税收入。^[50]帝国的资源只能通过行政手段来谋取，也正因如此，帝国在建立行政制度方面极具创造性。然而问题在于，奥斯曼既没有推出积极的经济政策，也没能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扶持起一个帝国自己的商人阶层。

在历史上，帝国政治-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经济权力的分布不均，导致了它们在遭受重创之后克服危机的能力和自我革新力也不尽相同。奥斯曼帝国在1402年迎战帖木儿大军，在安哥拉（安卡拉）一役中一败涂地，帝国虽元气大伤，却并未崩溃。^[51]而且它慢慢休养，最终恢复了过来，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帝国周期。当然，在外部，这也得益于帖木儿之死导致其短命帝国的瓦解，其速度之快，好似它当初的崛起。在奥斯曼，比起前任巴耶塞特一世（Bayezit I，他在战败后，沦为帖木儿的阶下囚，并死于狱中），苏丹穆罕默德一世的帝国版图缩小了一半。但随着他的上台，一个新的帝国周期也就此启幕。^[52]在这一周期里，帝国经历了15世纪的长足发展，而征服君士坦丁堡最终让它在欧亚文明的交会之处继承了拜占庭的衣钵。

与帖木儿的交锋当然完全是一场军事力量的对决，而经济权力则无关宏旨。在同西方的较量中，情况则大相径庭，战时的幸运天平并未太偏向哪一方，天时地利各有千秋。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实力的重要性一下子凸显出来，在这方面，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劣势日益明显。关于奥斯曼帝国，史学家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奥斯曼直接从崛起阶段坠入了衰落期，而并未在帝国周期的上升阶段停留太久。支撑这一论点的证据是奥斯曼严重不足的经济实力。^[53]但事实上，这个观点无法解释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和17世纪何以在帝国周期的上升阶段坚持那么久。

说到跨越奥古斯都门槛，除了罗马帝国，最重要的也最有意思的例子当属中国了。关于中国，值得注意的首要一点是中国拥有比其他所有帝国更为宽裕的时间来巩固其帝国权力。在秦代，中原版图基本定型，大致与今日中国的疆界相吻合。在领土变迁方面，中国的情形不同于大英帝国：英国在其第一和第二帝国周期之内，经历了疆域变迁。当时，他在东翼的扩张取代了西翼的扩张。而中国的几次帝国周期演变始终发生在同一地理空间里。在秦代，此前以武力征服的地区在行政上实现了大一统。秦皇嬴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行政长官由皇帝钦定，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54]到了汉代（公元220年亡），帝国的文官制度进一步加强，朝廷成为帝国文化中心。儒家仁学的重大发展强化了文武百官效命朝廷的忠心。随着对儒术的尊崇，^[55]帝国治理改以儒家的君子之德为基，而不再倚重法家原则、刑律和政令。儒家伦常大道是崩坏还是发扬光大，对于帝国周期的运行演变至关重要。草原帝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维系于其军事权力，而在中国从来都是其他类型的权力更占上风。

在中华帝国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那就是它在完成征服、一统中原后，仅仅在北面还面临一定的军事威胁。面对盘踞北方的胡人，“中央帝国”打怀柔亲政策加奇袭反击战略的软硬两

手牌。汉廷发动的奇袭战并不求为帝国开疆拓土，只为威慑敌胆，击破屡屡进犯的 异族联盟。秦灭六国后，秦皇嬴政即命北筑长城，以御匈奴南犯中原。汉武帝对北胡的政策则更具攻击性。他用兵奔袭千里，长驱直入匈奴腹地。不过，在通常情况下，中原的“对外政策”限于通过向胡人定期纳贡，以阻强敌于外。作为交换，不少胡人政权派质子到中原，接受汉文明的教化，并借由此法让其归心中原。可见，怀柔政策明显倚重意识形态权力，而非军事权力。由此可见，中国帝王选择的这条路颇类似于3世纪开始罗马皇帝同日耳曼人周旋时所采取的策略。[\[56\]](#)

对武力的克制，是中华帝国史的鲜明特点。不过这有一个背景条件，即中国在其统治的“世界”之内，久未遭逢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因而得以着力于守卫“帝国的蛮夷之界”（imperiale Barbarengrenze，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语）。同时，这些地缘政治条件也有利于在官僚行政体系之内施行儒家的君臣纲常。从根本上讲，儒家思想与群雄逐鹿、诸侯争霸时代所需的激进主义政治南辕北辙。原则上，儒家排斥侵略性外交政策。

在其漫长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华帝国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在其内部。在汉王朝日薄西山之际，中央权力式微，门阀贵族阶层迅速崛起，瓦解了统一的帝国官僚行政制度。[\[57\]](#)而商业和金融业，统合帝国大疆的两个最重要工具，也日渐萎缩，中国分裂为南北朝。在隋、唐（618～907年）[\[58\]](#)时期帝国恢复统一，随之而来的是儒家 君臣纲常之道的发展和中兴。隋代设立科举制度，以科考在官僚体系内化育出一个博学多识的士大夫精英阶层。唐朝末年，东边河朔的藩镇坐大，帝国上下重武轻文，不久，帝国再次崩解。在随后的“十国”时期，整个南方在政治上陷入四分五裂，直至宋朝（960～1276年）恢复了帝国的统一。[\[59\]](#)

在宋代，商业迅猛发展，货币流通激增，同时儒学复兴，这一切合成一股力，推动了帝国的中兴。^[60]这一周期模型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中国与西方强权迎头相撞，才戛然而止。崛起的西方强权和以西方为师、走上了现代化之路的日本，成为中国新的霸权竞争对手。在同这些列强的对抗中，军事权力的分量一下子超过了过去两千年的任何时期。

哪一种权力类型对一个帝国的崛起和稳定起到关键作用，这既取决于帝国的内部因素，也与其外部条件息息相关。在内部和外部条件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称关系，它左右着“帝国理性”（Räson），而这种特定的帝国理性又直接决定了其帝国精英的行动余地有多大——无论成还是败。这里所谓“帝国理性”也正是我们在此书中所泛指的治疗世界的逻辑之具化。

^[1] 文献中一般使用“权力形式”（Machtformen）这一概念，比如说迈克尔·曼就是这样用的。本书中的权力分类基本上借鉴他的分类方法。本人更愿意依照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资本类型理论，使用“权力类型”

（Machtsorten）的概念，从而用类推方式提出权力类型可以转换或者说可以彼此挹注的论点。

^[2] P. Cornelius Tacitus: *Annalen*（II，9-10），第121页。

^[3] 指法国宗教战争。

^[4] Bernecker: *Spanische Geschichte*，第35页。当然，西班牙苦于缺少商人和银行家的现实，也是它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对此还可以参见Elliot: *The Decline of Spain*。

^[5] 参见Bernecker: *Spanische Geschichte*，第34页；Bennassar/Vincent: *Spanien*，第103页起若干页，并重点参见Cipolla: *Die Odyssee des spanischen Silbers*，第53页起若干页。

^[6] 参见Bennassar/Vincent: *Spanien*，第86页起若干页。

[7] 即腓力二世。

[8] 也称荷兰起义。

[9] 在这两个和约中，西班牙都不得不作出大量让步，影响很大。雪上加霜的是，1627年、1647年和1652年西班牙国家破产，1639年在海战中败给尼德兰，在罗克鲁瓦战役（Rocroi）西班牙步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被彻底摧毁。关于尼德兰侵入葡萄牙的贸易空间，参见Reinhard: *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 第35~43页。

[10] 参见Robert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以及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Parker: *The Army of Flairs*。

[11] 参见Pollmann: *Eine natürliche Feindschaft*。

[12] 参见Pagden: *Spanish Imperialism*, 特别是第37页起若干页。

[13] 比如说按照吉本（Edward Gibbon）在*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Römischen Imperiums*第1卷第IV章，第112页起若干页的看法，安东尼时代结束后，罗马帝国便开始走向穷途末路，而Otto Seeck在*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中则认为戴克里先的改革拉开了帝国衰亡的序幕。

[14] Bleicken: *Verfassungs-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Kaiserreichs*对这些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析。

[15]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Machiavelli*, 第121页起若干页和第374页起若干页。

[16] 在经济学理论中，经济景气的周期性波动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Kondratieff-Zyklen）。它作为一种经济史周期正好与我们在此处讨论的政治周期相互呼应。

[17] 关于正确与错误措施的讨论，参见Cipolla主编的论文集*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中的引言部分，第5页起若干页。

[18] 参见Modelski/Thompson: *Leading Sectors and World Powers*;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Modelski/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Thompson: *On Global War*。

[19] 在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建议背后有一个前提条件：美国政策应更多立足于软实力（soft power），而不是硬实力（hard power），因为这样做一来不会招致太多敌意，二来成本更低。参见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第170页起。

[20] Doyle: *Empires*, 第93页起若干页。

[21] 亚克兴战役取得胜利后，屋大维将罗马军队从70个军团缩减到26个或者25个，具体地说就是裁军12万，被裁退的士兵在意大利或其他行省获得土地，或者得到金钱方面的补偿。同时他进行了军队改革，规定了军团士兵、禁卫队士兵和辅助部队的兵员的服役年限及定期军饷。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强部队对中央的忠诚，弱化士兵对长官的依赖。这也正是罗马帝国内部平定的关键所在。详见König: *Der Römische Staat II*, 第35页；Bellen: *Grundzüge der Römischen Geschichte*, 第163、171、179页，以及Heuss: *Römische Geschichte*, 第198页起若干页。

[22] 屋大维将他在埃及抢掠的托勒密王朝的金银财宝分配给罗马城市的子民，从而得以将贷款利率从12%降到4%。这样，国库可以偿还战争借贷，并放弃追回债款。这种债务普遍减免的举措很快促进了经济繁荣——特别是在东部各个行省。参见Bellen: *Grundzüge der Römischen Geschichte*第1卷，第162页，以及Heuss: *Römische Geschichte*, 第294页起若干页。

[23] Ronald Syme在他论述罗马内战时期的巨著的结束语中，对奥古斯都一生中的抱负与职责之间的辩证关系做了言简意赅的概括：“为了权力他牺牲了一切，他的凌云之志前无古人，是他的励精图治拯救了罗马人民，也让罗马浴火重生。”见Syme: *The Roman History*, 第524页。

[24] Syme对共和国权力精英阶层的道德沦丧进行了深入的描述，见Syme: *The Roman History*。

[25] König: *Der Römische Staat II*, 第45页。

[26] 参见König: *Der Römische Staat II*, 第45页；Bellen: *Grundzüge der Römischen Geschichte*第1卷，第182页，以及Heuss: *Römische Geschichte*, 第285页。

[27] 或者称为“支配力”，乃后世power一词的源头。

[28] 即后世所谓“权威”（authority）一词的源头。

[29] 在“奥古斯都功德碑”（Res gestae Divi Augusti）中，屋大维强调了从“权力”（potestas）到“权威”或“授权”（auctoritas）的转变正是其政府的信条。参见Syme: *The Roman History*, 第518页起若干页。

[30] 见本书下文，第136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31] 这些数据引自 Bellen: *Grundzüge der Römischen Geschichte*第1卷，第107、163和174页。

[32] 关于卡拉卡拉敕令（或译为安东尼敕令或安东尼亚努斯敕令），参见 Bellen: *Grundzüge der Römischen Geschichte*第3卷，第177页起若干页。

[33] 参见Potter: *Roman Italy*, 第74页起若干页。

[34] 参见Bellen: *Grundzüge der Römischen Geschichte*第2卷，第251页起若干页。

[35] 也即卡洛斯一世。

[36] 参见Bernecker: *Spanische Geschichte*, 第7页起若干页；同样也可以参见Doyle: *Empires*, 第111页起若干页。

[37] 在这一点上，我不能接受多伊尔（*Empires*, 第118页起）的论点，即西班牙不同于英国，前者在殖民地统治过程中跨越了奥古斯都门槛。多伊尔做出这一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史实：西班牙在美洲的统治时间比英国在美洲的统治时间长出一倍。

[38] 参见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第12页起若干页，以及 Pepper/Adams: *Firearms and Fortifications*。

[39] Bernecker: *Spanische Geschichte*, 第36页。

[40] 即阿拉伯人所称的马格里布，巴巴利是欧洲人的叫法，相当于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

[41] Bernecker: *Spanische Geschichte*, 第50页。

[42] 对此及随后内容，参见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第76页起若干页。

[43] 波雅尔。

[44] 即“俄罗斯帝王”。

[45] 对这一大业及在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参见Figes: *Natasha's Dance*, 第4~10页起，里面有精彩论述。

[46] 见本书下文，第141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47] 参见Matuz: *Das Osmanische Reich*, 第69页起若干页。

[48] 参见Ursinus: *Byzanz, Osmanisches Reich, türkischer Nationalstaat*, 第165页。

[49] 参见Matuz: *Das Osmanische Reich*, 第141页起。

[50] 参见Matuz: *Das Osmanische Reich*, 第110页起。

[51] 参见Matuz: *Das Osmanische Reich*, 第45页起若干页，以及Nagel: *Timur der Eroberer*, 第354页起若干页。

[52] 参见Jorga: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第1卷，第325页起若干页。

[53] 同样的看法见Matuz: *Das Osmanische Reich*, 第84页起和第98页。

[54] 对此及随后内容，参见Ebr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以及Schmidt-Glintzer: *China*。

[55] 参见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第1卷，第268~320页中的深入描述。

[56] 在对中华帝国历史的描述中，Ebrey多次拿罗马帝国同中国做对比；参见Ebr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第85页。

[57] 参见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第1卷，第388~431页）。

[58] 参见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第2卷, 第350~529页。

[59] 参见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第4卷, 第101~124页。

[60] 参见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第351~423页。

第四章 文明教化与蛮族边界：帝国秩序的特点和任务

大空间秩序，乃至全球性政治秩序面临着比以前更大的正当性压力。倘若政治秩序涵盖区域较小，小到城邦联合体，或者中小国家结成的联盟，那么大家或许会在边界问题上争论不休，甚至会由此引发战争，但至少对于这种秩序的基本架构没有异议。小空间秩序，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人们一般会认为，它们的形成自然而然，故而也是天经地义的。但对于大空间秩序，人们的看法则截然不同。之所以这样，归根结底，应该跟大空间秩序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权力落差有关。而且，秩序涵盖的政治或经济空间越大，这种权力落差则越显著。如今，在大空间秩序里最明显可见的一点是秩序内部统治性的一面。那些臣服于大空间秩序的子民，对其秩序存在意义和目的的追问，完全不同于那些身处小空间秩序者。在小空间秩序里，权力中心多，故可以彼此制衡：其他政治体的存在，正好解除了某单个政治体证明自身存在正当性的压力。^[1]

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在那些大空间秩序里，中心的统治权或主导权即便不致遭到完全否决，但也总逃不掉来自边缘的一次次质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约翰·冯·沙里斯布利（Johann von Salisbury）对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腓特烈一世的质问：“谁要德意志人来做诸国的法官？谁给了这些笨拙粗野的人当家做主、恣意妄为的权利？”^[2]答案显而易见：没有人。在他看来，德意志人只是自作

主张占据这一未被授权的角色，这种自以为是的越权行为越早放弃越好。根据蒂托·李维（Titus Livius）的记载，汉尼拔也曾对罗马人发出类似的责难。在当时的西班牙，罗马人想在政治上压制汉尼拔，就像当初对待他的前任哈斯德鲁巴一样。汉尼拔喝道：“这个丧失人性的狂妄民族，什么都想据为己有。他们四处插手，我们跟谁开战，跟谁修好，他们都要横加干涉。他们把我辈撵进被山川河流围起来的圈子里，不让我们越雷池一步，而这帮人却无视他们自己当初划定的界线。” [3].

如果大空间秩序由帝国的中心来统治和维系，那么它难免会因为独断专行和单方受惠而遭诟病。姑且不论这样的指责是对是错，我们有必要先提一个问题：面对反帝国的批评声音，该如何证明帝国秩序的合法性呢？

[1] Eric Lionel Jones在他的书*The European Miracle*中用他的小空间政治秩序理论来解释欧洲在近代早期面对亚洲所取得的优势。关于作为政治秩序的欧洲国家多元体的各种源头，参见Fueter: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而Vagts: *Die Chimäre des Europäischen Gleichgewichts*, 第131页起若干页，则对国家多元体作为政治秩序的属性持怀疑态度。

[2] 转引自Fuhrmann: *Deutsche Geschichte im hohen Mittelalter*, 第174页。

[3] Livius: *Römische Geschichte*, XI 44, 第97页。

/ 和平：帝国统治正当性的源泉

和平，一次又一次被人拿来作为帝国秩序存在正当性的理由：小空间秩序体系常常为你进我退的边界问题大打出手，争斗不休。只有那些由中心统治的大空间政治秩序才能摆脱这种宿命。小空间政治秩序自称有自然性的优势，但帝国的意识形态则直指其兵连祸结的恶名。在帝国秩序体系正当性的辩词中，最有名的一则来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s*）。依据朱庇特的神谕，罗马民族便是埃涅阿斯的后裔。维吉尔假借众神之主朱庇特之口称，罗马人是“世界之主”：“战火将熄，昔日粗蛮的世界渐趋平和。/白发苍苍的‘信义’女神菲得斯和守护家庭的维斯塔，奎里努斯及他的孪生兄弟雷木斯，/他们颁定律法：那阴森可怖的战争之门将会关闭，用铁栓牢牢锁紧，/大门内那丧尽天良的‘骚乱’狂魔，蜷缩在一堆可怕的武器之上，/被千百条铁链双手反绑，张着血淋淋的大口，牙齿咬得咯咯作响。”^[1]

对但丁而言，“至珍之宝是人类的和平共处”。他认为，要达至世界和平，人类全体必须“臣服于同一统治者……当他们服膺于唯一的主，他们便最接近上帝。同时，这种臣服也与上帝的旨意最为契合。它将给人类带来福祉和康宁”。^[2]对但丁来说，不建立大一统的“普世帝国”（universal monarchy）——比如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一个囊括了整个欧洲的帝国大空间秩序那样——永久和平将遥遥无期。因为一山难容二虎，两强对垒，必有一争。但丁以此反对法兰西腓力四世御前政论家们的观点，也同腓力四世支持的意大利归尔甫派^[3]的看法背道而驰。后者否定建立普世帝国的必要性，主张创建一个由独立城邦和领土国家组成的体系。但丁谴责他们，称他们不过是戴着伪善的面具空谈公义罢了。因为，公义获胜，大行天下，并不是这些人真心祈望的。

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很少有人像但丁那样如此坚定不移地将和平的夙愿同建立帝国秩序联系在一起。只有托马索·康帕内拉

（Tommaso Campanella）和乔万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与但丁相肖，力倡帝国治下的和平。他们鼓吹建立一个由西班牙统治的，从欧洲推及全球的政治秩序。^[4]然而，欧洲政治思想界的主流更关注主权国家之间的“协定和平”（Vertragsfrieden），而较少关注帝国“统治下的和平”（Herrschaftsfrieden）：保障和平，需要来自原则上权利平等的行为主体共同达致的集体约束力，而不应该依靠来自和平空间中心的主导性力量。伊曼努尔·康德在其论文《论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 1795）中对这一设想做了最有名也最为有力的阐述。^[5]按照他的观点，主权国家之间的协定和平通过建立一种邦联（Staatenbund）得以保障。康德反对为追求和平“不计代价”的观点，他将帝国治下的和平视为“坟墓的安宁”

（Friedhofsruehe）。而政治不自由和经济停滞是帝国治下的和平必须付出的代价，而这代价太过高昂。此外，这样一个和平秩序难以持久；要不了多久，必将在叛乱和起义的战鼓声中被击得粉碎——特别是，边缘难逃野蛮的奴役和盘剥之劫数，因为帝国需要拿物质实惠来抚平帝国中心臣民丧失自由的痛苦。

这种借边缘代价来驳斥帝国秩序的论证方式，有不少例子。其中一个 是孟德斯鸠在《关于普世帝国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monarchie universelle*, 1727）一文中对普世帝国的批判：罗马人为了创建首个普世帝国，不惜荡平整个世界。可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后来居上的西班牙人那般野蛮。因为，后者为了独占一切，而不惜毁掉了一切。^[6]孟德斯鸠对帝国的批判干脆将帝国自我表述中的文明与野蛮之关系整个颠倒了过来。他称帝国政治本身就是野蛮。如果一个大国在远离本土的海外东劫西掠，行径野蛮，那么这种野蛮也必然反作用于其中心，假以时日，中心就会沦落得与边缘一样，同一套统治和压迫的伎俩也会用在中心子民的身上。按孟德斯鸠的说法，帝国的

内在规律决定了它趋向于自我毁灭。因此，它定然要守护的和平，难以持久。针对西班牙统治 在意大利南部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的严重恶果，孟德斯鸠不禁质问：建立于专制权威之上的世界帝国是否还能在一个贸易主导的世界里拥有容身之地。

在18世纪，西班牙仿佛走到了代表文明理性之“商品社会”的反面，俨然成为人类进步的一大绊脚石。^[7]从这时起，在世界政治及经济理论界不断冒出一观点，认为通过商业手段能比政治权力更有效地统合幅员辽阔的大空间，而且在很长时间里，这种统合方式都被视为非帝国式的。同样，康德对永久和平的论述之所以对后世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也在于，他确信通过经济合作之途统合广袤大空间的新思想完全可以跟保障和平和自由的需求统一起来。民主和平论与帝国和平说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模式。民主和平论推崇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多元体系，这一体系的和平性源自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在所有参与国的内部开花结果。^[8]

21世纪初，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将民主和平论进一步发展，发展为后现代国家秩序模式，但同时他也弱化了民主和平论的效力要求（Geltungsanspruch）。^[9]在库珀眼里，后现代国家的“世界”大致不超出欧洲的范畴。与之并峙的是其他那些依然奉行现代国家规则的“世界”：为了生存遵循同一规则的行为体，彼此争斗，永无宁日。这些规则被米尔斯海默表述为：唯有当某一大国鹤立鸡群，掌握了全球性主宰力量，才能消除霸权战争的隐患。^[10]就这样，通过反证，米尔斯海默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角度重申了帝国的“自我正义性辩护”，即帝国是永久和平唯一可靠的保障。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他辛辣的论著《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中，援引了库珀的后现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政治概念，他把后现代世界称为康德式的世界，把现代世界称为 霍布斯的世

界：美国不得不一如既往，游荡于充满猜忌和戒备的“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里，而欧洲则在“康德式”的天堂般世界里优哉游哉。然而，卡根思想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两个世界不能彼此分开，独立存在。欧洲和平的实现，必须仰赖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11\]](#)

同样，我们可以说，美国继承了昔日大帝国的衣钵，将维系辽阔疆域的大空间之和平作为其主导权最为关键的正当性工具。所不同的只是，在民主帝国条件下的和平是以践行和捍卫人权为准绳的。人权取代了昔日帝国挂在嘴边的文明教化需求。同样有着悠久传统的还有繁荣承诺，这一点会继续存在。无论哪一种价值占上风，前提条件都是实现和平，否则践行价值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讲，实现帝国和平，乃是为践行这些价值而铺平道路。所以，几乎所有的帝国都不会单纯将和平作为自我正义性辩护的唯一基石，他们会将和平同特定的使命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和平。

[\[1\]](#) Vergil: *Aeneis*, 1, 第291~295页。

[\[2\]](#) Dante Alighieri: *Monarchie*, 第104页和第98页。

[\[3\]](#) 教宗派。

[\[4\]](#) 参见Botero: *Discorso dell' eccellenza della monarchia*, 以及Campanella: *Della Monarchia di Spagna*; 还可以参见Bosbach: *Monarchia Universalis*, 第64页起若干页, 以及Pagden: *Instruments of Empire*。

[\[5\]](#) 详述见Fetscher: *Modelle der Friedenssicherung*, 以及Fischbach: *Krieg und Frieden in der französischen Aufklärung*。关于康德永久和平论对当前有关世界秩序的争论具有怎样的意义, 参见Habermas: *Das Kantische Projekt*。

[\[6\]](#) Montesquieu: *Réflexions sur la monarchie universelle*, 第23页起; 参见Bohlke: *Esprit de nation*, 第219页起若干页。

[7] Abbé Raynal以其*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 deux Indes* (1774) 对西班牙帝国及其殖民政策进行了最激烈的抨击。对此参见 Gollwitzer: *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 第1卷, 第262~285 页。关于“商业社会” (commercial society) 的思想, 参见Bohlender: *Government, Commerce and Civil Society*。

[8] 参见Brown: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关于这一理论基本观点的批评,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Ist der Krieg abschaffbar?* 特别是第367 页起若干页。

[9]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第55页起若干页; 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Röhrich: *Problemfelder der Weltinnenpolitik*, 作者建议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国家世界与剩下的没有发展出“密集经济空间”的世界分离开来。

[10]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第2页起。

[11] Kagan: *On Paradise and Power*, 第16页起若干页。

/ 帝国使命与帝国的神圣性

所有较为长寿的帝国，为了自证其存在的意义和正义性，都会挑一个世界历史性任务或使命，它赋予帝国一种“救世性”或“宇宙论”意义。霸权强国无须使命，而帝国则不能没有使命。霸权强国必须在同竞争对手的争霸中保住自己的地位，在竞争中，自然完全可能运用到意识形态权力，但它主要还是在外交政治中发挥作用。与此不同的是，帝国使命面向帝国之内的子民，尤其是帝国中心的民众。不过，最关键的是，帝国使命其实是政治精英层的一种自我暗示。他们通过这种暗示，汲取继续推进帝国大业的信念和能量。

当然，我们可以在“意识形态”的概念下去研究帝国使命，探讨世界帝国的救世伟业或受命于天的大任，进而按图索骥，试着找出帝国主义行动的硬核，而我们发现，这硬核往往都披着并不光彩的物质利益的外衣。马克思在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部分提到^[1]：我们不妨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政治和社会行为体对自己所设目标及目的之局限性的一种（必要的）自我欺骗。^[2]如果我们这样解读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批判说或许倒是能为我们研究帝国使命提供一个创造性视角，让人豁然开朗。但是，人们很容易将意识形态等同于一小撮当权者及其御用知识分子惯用的瞒天过海、掩人耳目的伎俩，在广大民众面前极力掩盖其帝国政治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意图。从这个角度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仿佛变回到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神父欺骗论”了。有鉴于此，本书在原则上放弃了在意识形态的概念下探讨帝国使命问题。与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了的意识形态批判说常常会引起对帝国政治复杂性的简单化处理，认为帝国政治不过是少数几个行为体力图实现私利罢了。

跟意识形态批判说的惯常推测截然相反的是，帝国使命确实也会衍生出一种自我约束力和自赋义务。显然这是拿帝国行为体的直接物质利益所无法解释的，因为从那个角度来看，这些约束和义务无疑都属于资源浪费。帝国使命要求其主人公们肩负起实现帝国宏图大计的重责，而那宏图大计又绝非朝夕之间一蹴可就。故而它会大大超出一切个人私利的范畴。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帝国使命看作一种工具手段，借助此术，一个志在千秋的帝国将其行动逻辑强加给那些出现在帝国每一个时期的当权者：这种使命要求当权者，若想要推行帝国政策，则须搁置一己之私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帝国的使命特别以帝国精英为对象。

帝国借助了使命这一工具，委其政治和社会精英层大义在心、重任在肩；且防止精英为图眼前私利而罔顾帝国的千秋大业、生死存亡。这个隐喻说法，换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帝国精英不同成员之间的一种互动和协作：帝国“决策精英”在短期须依赖包括知识分子、作家、学者、记者等在内的帝国“宣传精英”的支持。依靠他们为大众鼓吹一种帝国愿景或幻景，美化乃至神化“决策精英”的权力，并为其正义性摇旗呐喊。不过这种愿景或幻景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维护权力的正当性，同时还有一种制约决策的自我约束力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原本并无权力的知识分子也能发挥不容小觑的影响力。在古罗马，聚集在盖乌斯·梅塞纳斯（C. Cilius Maecenas）周围的诗人圈子就曾为新秩序所用。在中国，起到类似作用的是孔子和他的儒家弟子们，在西班牙，则是萨拉曼卡学派的那些新经院哲学家们。在英国，大任落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肩上；在苏联，则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挑起这一大梁。而在今天的在美国，则是那些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和政论家为政权鸣锣开道：首先，他们抛出了冷战结束后美国该担负何种世界政治使命的问题，另外，他们取得为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把脉诊断的权职——且不论他们下的诊断究竟是对是错。

虽然，帝国使命确实为一个世界帝国的合法性提供了自我辩护，但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说得直白点，借助帝国使命，帝国合法性的自我证明得以转变为帝国的自我神圣化。帝国的准宗教性意义设定促使那些政治当权者和社会显贵在做决策时不致太过随意和武断。即便他们重权在握，但他们终究还是帝国权力的一部分。为了达致这种超脱个人意图的高义，必须赋予帝国使命一种神圣光芒，让使命高高凌驾于日常政治俗务之上。这一点在罗马帝国的使命中表露无遗：在地中海及周围地区实现和保障“罗马治下的和平”。

当然，我们可以说，在地中海驱逐海盗和在东面结束霸权战争无疑完全符合罗马的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家的利益。因为这样一来，贸易风险就降到了最低，投资环境变得更为安全。但是，也不排除商人同海盗合作，^[3]以及金融家大发战争横财的情形。也就是说，海上航道的安危、和平局面稳定与否，其实取决于利益集团以及经济整体运行情况。因此，帝国不能将其合法性的核心来源建立在这样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帝国使命必须摆脱行为体利益波动不定的影响。这个时候，即可搬出使命神圣化这一利器了。正因如此，古罗马帝国为达目的，将和平神圣化了。屋大维建造和平祭坛就是将这一信念具象化。所以，这位罗马第一公民和他的继任者们都毅然以帝国大业为己任，而这也是每一位希望赢得民心、获得元老院认可的皇帝都必须孜孜以求的。

更多时候，帝国使命可能扎根于一个帝国潜在的自我认知里，但也可能一再地被公然召唤和策划。前一种情形，大多出现在天下太平的稳定时期；后一种，则一般发生在举步维艰的危难之际。3世纪中叶后的罗马，当帝国边境威胁日增，一度告急，和平便再次抬升为帝国的世界历史性使命，且灌输到民众的群体意识当中：要让老百姓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一旦失守，对众人而言将意味着什么样的损失。^[4]此前政治精英的抱负和自我约束力如今要推及广大庶民，唤醒他们为帝

国兴亡安危而献身的意志，那正是帝国存续所急需。最后，就连教父圣奥古斯丁也加入保卫罗马帝国的行列当中。当时他力图让帝国的基督徒们明白，以帝国为后盾的和平有利于布道和基督徒的生活。因此，虽然帝国也有过黑暗的初期，且至今仍弊病丛生，但帝国的存续仍然符合基督徒的利益。故所有教徒当挺身而出，奋起守卫之。^[5]

但是，对帝国使命的神圣化做出更重要贡献的，不是政治理论家，而是学者文人和造型艺术家们。建筑师和雕塑家大兴和平殿（Templum pacis），以建筑和雕塑为形式承载和固化罗马统治的文明因子。尤有甚者，梅塞纳斯的诗人圈子聚集了包括维吉尔和贺拉斯在内的这个时代最有感召力的诗杰，他们为屋大维的新政高唱赞歌，颂之为世界之新生，声称只要罗马帝国存世一日，这个世界便永不消亡。对屋大维来说，文人骚客的支持无疑至关重要。因为单靠法条、律令，新政显然无法落实。需要一种文化荣光加以渲染，赋以意义，而这正是官吏仕宦之辈所鞭长莫及的。

特别是维吉尔，他的诗作大部分都与屋大维的新政息息相关。以《牧歌》（*Bucolica*）为题他创作诗章10首，对城市贵族的道德沦丧大加鞭挞；另外，他讴歌田园生活，称赞其为祖先之法（*mos maiorum*）复兴的源泉。维吉尔力倡 重振祖先之法，进而消除当下的黑铁时代，并复兴人类历史初期的黄金时代。在另一部诗集《农事诗》（*Georgica*）中，维吉尔重申了类似的理念。^[6]名著《埃涅阿斯纪》（*Aeneis*）由于作者的溘然离世，成为未竟之作；而按诗人遗愿，本该被付之一炬。在这部幸存下来的史诗里，埃涅阿斯逃离熊熊大火中的特洛伊，奔赴罗马，并且预言了奥古斯都“跨越全球”的太平盛世。维吉尔在书中再次勾画出一幅普世和平秩序的蓝图，在这当中，埃涅阿斯以奥古斯都的原型和榜样现身。他的节节胜利，代表着在通往和平的路上对一切邪恶力量的胜利。因此，罗马帝国不仅志在和平，还在仁爱。维吉尔笔下那披着宗教圣光的罗马使命，是一个志

在实现天下和平、共抵仁爱彼岸的使命。这一天命正是朱庇特“无限帝国”（*imperium sine fine*）^[7]，即“永恒的罗马”预言的源头。

“对他们（作为埃涅阿斯后裔的罗马人）我不设任何时空之限，我赋予了他们无限的帝国。没错，狠心的朱诺，惊惧不已，将沧海、大地和青天搅得疲惫不堪，她也将回心转意，同我一起呵护这些世界的主人，这身着托加长袍的民族。”^[8]

罗马人在地中海地区的统治获得了正当性，因为它确保了天下太平，融入帝国者也沾得了文明与教化的雨露。而远在帝国疆界之外，蛮族当道，狼烟不息。不过，这些还不够：帝国和平还跟黄金时代的神话扯上了关系，并借由此道给帝国和平平添一抹神性的光辉。几乎可以说是取帝国之道，重返天堂。无论是黄金时代的概念，还是关于将充满敌意的世界挡在墙外的天堂乐园（《伊甸园》）之信念，统统源自东方。这原本同罗马人尚武的权力政治思维方式格格不入，但维吉尔将这些想象巧妙地糅进他虚构的罗马史叙事当中，对促进帝国的文化融合功不可没。他暗指，罗马征服东方，不仅是在权力政治上完成了征服；同时，它还有意接过东方在文化和政治及意识形态上的衣钵。对埃涅阿斯出走特洛伊、奔赴意大利之旅的叙述，成为这一交接的注脚。东方的文明世界，在一片纷争中正陷入自我毁灭，特洛伊之战则是这一毁灭的征象。而拯救行动，以罗马帝国式和平之形自西而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想象，为何奥古斯都一心要救《埃涅阿斯纪》于既毁，并且坚持将维吉尔的这部伟大遗作公之于世了。

同样，贺拉斯^[9]创作的部分诗作也服务于罗马的帝国使命。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有关内战的骇人阴影弥漫其间，他将驱散这战争阴云的希望寄托在屋大维（奥古斯都）身上。对贺拉斯而言，罗马的国体危机主要不是宪法危机，而是一种道德危机。在这一点上，他与奥古斯都的改革新政思路可谓不谋而合。他厌恶纵欲、通奸、贪婪、欺诈、骄奢和懦弱的品质，推崇古罗马的美德，诸如节制、勇毅、虔敬

和正义。这些美德倘能大行其道，黄金时代自可久续永延。而防止世风堕落、道德沦丧，是帝国应负之责。故应使民风、礼仪和正义感与时俱进，获得新生。为这样一个帝国，贺拉斯写出了他最为响亮的一行诗句：为国捐躯，甜美而光荣（*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10\]](#)

细览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作，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观念：帝国和平不仅被视作大空间统治秩序的一个特质，而且它同时还是时代之新生、扭转颓势之需。帝国之重不光体现在权力政治上，它的存在还深具宇宙观和救世意义。这一点，正是帝国与主权国家及霸权国家的差距所在。后两者，按照它们的自我认识，是因应时势而行事，而帝国则不同，它直接引领时局之发展。赋予帝国使命神性光辉正是基于帝国上述需要的一种最强有力的表达。在维吉尔和贺拉斯笔下，所谓黄金时代代表的已不仅仅是一个伟大宇宙纪年的开始，而且它还预设了一种前提理念：帝国能够左右整个宇宙纪元的发展。时代的发展进程被重启，而帝国之伟力会将其固守于初始阶段。也就是说，原本认为不可避免的——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再经青铜时代，最后走向黑铁时代——坠落过程，被遏制住了。在任何一个衰落与消亡都被视作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的时代里，遏止衰落、阻止世界末日的来临便成为帝国的世界历史性职责。与此不同的是，在18世纪的启蒙时期，人类历史将不断走向进步的基本史学观被普遍接受。人们开始认为，帝国是人类历史的加速器，它们向世界各地传播了文明进步的成果。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一点，也会给人类历史造成重大影响。这一观点适用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情形。

当然，并不是在所有帝国身上都可以看到如此强烈的宇宙观和救世意义上的自我神圣化。说到罗马，如前所述，它巧借源于东方的历史叙事强化了帝国的自我神化。随着基督教被确立为国教，包裹在这种帝国使命里的某些神性因子不得而被剔除掉。而在此之前，奥古斯

都就已经提出要把“尘世之城”（*civitas terrena*）和“上帝之城”（*civitas dei*）区分开来。神化帝国的理念对后世究竟有多大影响？我们只需翻开11世纪的历史即可管窥一斑。当时，霍亨斯陶芬家族自称他们的王朝统治为“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这一王朝后来又以（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号沿袭了下去。^[11]同样在这一表述下，帝国神圣性得以树立的基石是帝国作为世界末日“拦阻者”（*katechon*）的历史神学角色。倘若帝国消亡，世界末日必将来临。^[12]

对西班牙世界帝国而言，以武力反宗教改革可以被看作它的帝国使命。而这一使命绝非仅仅由宗教改革所挑起，它的根源在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中已露端倪。当时，西班牙人步步推进，最终夺回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控制的领地。收复失地运动的征服精神，与它后来对“新世界”的征服可谓一脉相承。而这也渗透到了将犹太人和摩尔人赶出西班牙的运动当中。排犹、异端审判和对尼德兰新教徒的迫害成为西班牙的帝国使命，而这一使命在16世纪晚期演变为一种“堡垒心态”。驱使西班牙的帝国使命转入防御保守的是新教徒阴谋论，即西班牙人假想新教徒在全世界范围正酝酿着一场旨在颠覆西班牙帝国统治的阴谋。此外，西班牙的帝国使命带有明显的天主教烙印，最显著的表现是他们那种非逼新大陆的“化外之民”皈依天主教不可的想法。从这当中西班牙人也获得了在中南美土地上开展大规模扩张运动的动力。^[13]

显而易见，人们一般会把奥斯曼帝国看作伊斯兰世界里一支抗衡西班牙的力量。然而，我们容易由此而低估奥斯曼在宗教政策上的宽容和自由。这一点，恰同西班牙在其属地暴力推行天主教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奥斯曼帝国好像一件百衲衣，由自治权高低不一的宗教族群（*millet*，即米利特）拼凑而成，其中也包括拥有自己内部组织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团体。在相关历史文献中，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

是，究竟该不该把宗教多元主义看作奥斯曼自我认知的一大组件。还是说，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初期征服阿拉伯诸国之后，便自视为伊斯兰教世界帝国，以抵御异教徒为己任了？^[14]按照前文针对超级帝国不同边缘的思考，我们或许更应该说，创建了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民族原本既无组织力又缺乏使命感，他们在其扩张区域里与当地两种相互抵牾的帝国思想不期而遇，于是索性将两种思想统一起来，熔为一炉。一方面是来自阿拉伯及穆斯林地区的观念，即以火与剑为伊斯兰教的传播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并且这始终都为每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超级帝国视为核心职责。^[15]另一方面是拜占庭帝国相对保守的行政管理方式。奥斯曼人为了能够对征服地区实现持久统治，大致沿袭了拜占庭的这套管理方法。^[16]

在此基础之上，最后甚至发展出奥斯曼帝国与东正教会的非全面联盟。联盟针对的首先是西方基督教界，挑战的是其教宗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在欧洲地区，奥斯曼帝国一度成为巴尔干半岛上基督教团体和社群的临时庇护者，当时这些人的自主和自治仅在奥斯曼帝国方才得到保障。结果还引发了很多基督教徒加入土耳其军队，与土耳其人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当然，从这当中无法孕育出一种真正的帝国使命。奥斯曼人的帝国使命一向十分脆弱，从未像其他一些帝国的使命那样上升为一种权力要素。而这一点，也正是奥斯曼人为其帝国摇摆不定的两面性所付出的代价。奥斯曼帝国国运式微后未能迈进一个新的帝国周期，这也算是其先天不足的帝国使命造成的一大恶果。

目光再投向沙皇俄国，它的帝国使命受宗教的影响远超上述其他国家。当奥斯曼帝国继承了拜占庭留下的行政组织方面的遗产，俄国则接过了拜占庭庇护东正教的使命。在这接力棒易手之初的1472年，伊凡三世与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帕列奥罗格（Sophia Palaiologa）结为连理。很快就有人点破，这桩婚事本身颇有跟罗马帝国攀亲的意味。后来在修道院院长普斯科夫的斐洛菲斯（Filofei

von Pskow) 的信件中, 正统性转移又被进一步升华为“第三罗马”的理念。^[17]此外, 俄国人把打击游牧民族鞑靼人的战争说成是保护基督教民不受敌寇侵扰的正义之战, 这样一来, 沙皇的对外扩张政策同样在政治实践上算是完成了对罗马-拜占庭传统的继承。伊凡四世时期建造于莫斯科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正是这一使命及其成就在建筑上的表达。^[18]当然, 帝国历史的发展未必是由一成不变的帝国使命所左右。在一些改革派眼里, 这些使命可能反倒成了现代化的阻力。比如在彼得一世时期, 彼得大帝将俄国一边倒的向东扩张之使命扳了过来, 转向了与西方邻国发展水平看齐的政治使命。

在奥斯曼帝国那里, 我们已经看到了帝国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与赋予政治精英驱动力的帝国使命之间的矛盾对立。这一点, 同样可见于沙皇俄国的历史。为了同西方接轨, 彼得一世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前任沙皇们的帝国使命。自此, 他也为俄国国内在向东去还是朝西看的问题上的纠结与对立埋下了伏笔。时至今日, 这种紧张关系依然挥之不去, 影响着俄罗斯历史的发展。而俄国作为正统基督教信仰卫道士的观念并未随彼得大帝改革的展开而消退, 也没有被其他新的使命所取代。并且在国运堪忧的危难之际, 它一次次重新浮出水面。反击拿破仑战争便是其中一例。战争结束后, 俄国人把他们的胜利归功于其农民的虔诚信仰。这个时候, 俄国人怀着一种要把西方从物质主义迷梦里拯救出来的信念, 将那原本倒向东方的帝国使命转向了西方。^[19]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坚信自己身负以基督教道德重塑欧洲的神圣使命。他梦想着将各种不同基督教派重新整合, 熔为一炉, 炼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基督教。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 诸国宣布成立神圣同盟, 意在开启一项以欧洲各民族的和解为目标的运动。^[20]不过, 最晚到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1856年, 俄国誓同西方发展水平看齐的思想再进了一步。这一点在俄国人的眼里之所以绝对必要, 是因为他们不想重蹈奥斯曼帝国的覆辙。相反, 俄国人谋求在东南欧, 在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黑海海峡地区接手奥斯曼的遗产, 这将意味着去

实现他们第三罗马的光荣梦想。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西化。所以，俄国才会一个时期为其帝国使命而奔劳，在另一个时期又忙于同西方的发展节奏接轨。于是它就在两种状态之间来回切换、穿梭，而这一点也深深影响着俄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俄国的发展滞后于西方，这对俄国而言固然是一大隐忧。但帝国使命的逐渐消散更是极大破坏了帝国内部的稳定。因此，在1917年的两次革命中，旧势力之所以迅速被赶下台，也是因为他们早已丧失了将万民召集于世界历史性使命这一大纛之下的凝聚力；或者说，这一使命早已无法再在民众心中激起足够的回响。这一幕，后来又在苏联解体的事件中重演。正如1977年苏联新宪法所宣称的，苏联的帝国使命在于“联合所有民族和人民共同建设共产主义”。^[21]然而，在此宪法颁布之时，它已然成为一句空话。苏联陷入大衰退的标志之一就是它丧失了它的使命；最后，只得以一种犬儒主义方式对待它的使命。帝国使命已经从帝国内部的发动机沦为纯粹的舞台布景。^[22]苏联的发展由此失去了推动力，失去了促成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必需的动力。

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来自西方的帝国则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它们都放弃了狭义宗教性的使命，虽然偶尔也给它们的使命披上一层富有宗教意味的修辞学外衣。如果我们把英国看作西班牙世界帝国的继任者，那么——这也正好符合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观念史的发展——取代先前天主教信仰的是文明之进步：英国人的帝国使命是向世界四处传播他们的现代文明成果，虽然他们的政策经常只是为英国商品打开海外市场而已。^[23]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挑起白人的负担……为他人谋福利，为他人争利益。”^[24]在这首诗里，英国人的物质主义私利完全退到了帝国文明教化使命的身后，消失不见。当然，这也招来意识形态批判者的抨击。不过，在诸多研究英帝国的观察家中，即便像马克思这样一个最

不可能忽视物质利益的思想家也承认英国对外扩张在“客观上”起到了文明教化的作用。

1853年，马克思在其《大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Die britische Herrschaft in Indien*）一文中写道：“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25][26]}他把英国侵入印度社会带来的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归因为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冲突。千百年来，手纺机和纺车一直是印度社会联系农业和手工业的枢纽，但随着英国商品涌入印度市场，印度的纺织品失去了竞争力。^[27]然而，这一切“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士兵的粗暴干涉，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机和其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由此，也引发了亚洲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社会革命”。^[28]作为亚洲史上第一次且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马克思认为这场革命之发生恰恰反过来为英国入侵印度提供了合理性依据，而英国人在全球市场法则下的征服运动变成了一次文明教化行动：“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29][30]}

要证明大英世界帝国文明教化之功，我们大可不必像马克思那样仅仅看到英国人那间接的并非有意而为的影响作用。在此，我们可着重提一提奴隶制度和黑奴贸易。这两者在欧洲帝国诞生史首个阶段中就已泛滥不堪，最终正是在英国的干涉下废除——至少受到了遏制。而这并非英国海洋霸权的间接影响作用，而是它直接的、明确的目标之一。^[31]在19世纪，为了遏制依然猖獗的黑奴贸易，英国动用了数支舰队在非洲西海岸巡逻。在英国本土，首先是圣公会神职人员以及贵格会教徒将废奴主义推向帝国使命的中心。他们合力促使英国在其

掌控下的世界经济体系里把贩卖人口列为非法贸易。并且为了打击这一贸易，他们不惜动用帝国的权力手段。^[32]这也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在美国内战时期并没有站在南方诸州的党派一边，借此来削弱和牵制美国这一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毕竟，这更符合大国竞争的逻辑；可如果那么做，就与英国人的帝国使命背道而驰了。

美国的帝国使命说到底可以视作英国帝国使命的延续：市场经济、民主和人权共同构成其使命的三角，三者的优先等级又视具体地区挑战之情形或世界政治局势之变化而各有不同。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美国的政治直接简化为它的帝国使命。对美国来说，军事安全需求同经济利益同等重要，当安全需求与帝国使命的要求发生冲突时，一般来说前者具有优先权。^[33]于是，在这样的考量中也就产生了美国政策中饱受诟病的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我们一次次看到：如果符合其军事安全需求或经济利益的话，美国完全可能对某些行为体放下它帝国使命的要求。

帝国使命与帝国存续或自我提升的需求之间出现紧张对立，这在帝国历史上并不鲜见。这种矛盾关系就好像一道红线，贯穿于整个帝国史。最起码，对于那些没有把血腥攫取私利作为唯一使命的世界帝国而言，这种矛盾确实存在。考察草原帝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它们身上最容易看到帝国使命与实现私利完全一致的情形。然而，其代价就是，帝国必将年寿不永，昙花一现。一个在其中心以民主制构建而起的帝国在其实现帝国使命的路上会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这种自我约束使民主帝国具有比专制或贵族统治的帝国更高的责任感。^[34]没有向上述职义务（Rechenschaftspflicht）的权力精英会更快、更容易地摆脱掉责任的束缚，而另一些政治家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参加竞选，以获求广泛支持，还要跟诸多储备精英一较高下。他们这些人要摆脱责任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此外，获取帝国政策的资讯变得更加容易，从此，曾经由统治精英垄断的“统治秘术”（*arcana imperii*）

大为缩水，这对帝国使命的特性和意义都造成了深刻影响。也就是说，帝国使命发生的悄然变化，不仅同“民主革命”进程有关，还受到“媒体革命”的直接影响。如此看来，帝国中心选民的参与也会对帝国使命与实现私利之间的对立起到某种平衡作用。此外，边缘的民众也可要求兑现帝国使命，以反对帝国的现行政策。

在一个民主帝国里，有诸多政治选项可因应帝国使命和实现私利之间的矛盾对立。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的政策反差就是其中一例。在美国历任总统中，老罗斯福一向以传统的帝国主义者著称。在他的外交政策中，追求利益最大化重于帝国使命的义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在1904年将“罗斯福推论”补充到门罗主义里。据此，当某地政治运动已发展到有损当地政府偿还美国债务的能力时，美国有权介入干预。就是说，美国作为“国际警察”，将有义务制止“错误行为”。而与此同时，老罗斯福在太平洋地区推行制衡外交政策，这却跟实现美国主导地位（比如面对日本）几乎没什么关联。^[35]也正是基于大国均势的外交思想，老罗斯福勉力在日俄战争中斡旋，也因调停有功而在1905年^[36]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调停也反映了他大国平衡的外交思想。也就是说，老罗斯福刻意要约束美国的帝国使命。当他谈及美国的“国际警察”角色，他希望这个角色仅限于同美国直接利益挂钩的情形。

与之相对的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政策，他赋予美国全球性职责。为此，他不得不为帝国使命设定价值规范。倘若美国没有一个将使命凌驾于直接经济和政治利益之上的想法，那么，美国在一战中的军事介入——明知会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就无法在国内赢得支持了。威尔逊的外交理想主义涵盖了建立全球性和平秩序（“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实现各民族的自决权，并确保它在民主体制下长存（为了民主而让世界更安全）等内容。这些规划获得了民众的赞同，进而华府获准干预一些按此前美国外交共识本不应插手的地区。

[37]当然，威尔逊所获得的有限支持还不足以让美国将外交重心长期定在欧洲大陆。正因如此，《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即宣告了威尔逊在政治上的失败：他为美国擘画帝国使命时，高估了美国国民的追随意愿。

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代表着大空间的利益政治和帝国使命之间对立关系的两种极端。时至今日，这种矛盾对立依然遗留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并且反映到美国总统及其智库的政治立场，以及将其政治决策传达给公众的方式上。此外，它也影响到新闻和学术界对政治决策的解读。而在评判和解读这一块，也存在两极化现象，就好像一长串可能性所构成的线段之两端。在其中一端，某个以利益为上的政策会被说得好像它其实在遵循帝国使命的规范一样；而在另一端，即便帝国行动主要是服务于公共利益或者以在边缘政治上的边缘地区落实人权政策为指向，但被聚光灯照亮的仍然是帝国的私利。做出后一种解读绝不仅仅是那些反帝国的思想批评家之独门秘技。

[38]有一些政客，他们相信只有把落实价值规范说成是利益追求才能帮他们赢得足够支持，于是他们也会采取这一策略。

帝国使命总倾向于拿宗教概念及宗教感染力来武装自己。很多欧洲人对美国政治的宗教修辞术一窍不通，也说明他们对美国的帝国使命一无所知。这种修辞术，既不能简单归为在基督教底蕴厚重的选民当中拉选票时所施展的计谋；也不宜——像我们在欧洲新闻评论中经常听到的那样——被降格为纯粹的非理性行为。这其中其实触及了美国政治上自我认识的内核：从威尔逊在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设定的目标，到艾森豪威尔登陆诺曼底时发出的“欧洲的十字军东征”的壮语豪言，以及里根把苏联描绘成“邪恶帝国”，最后到小布什提出“邪恶轴心”的概念——将伊拉克、朝鲜等国网入其中[39]——凡此种种，无一不是这种自我认识之体现。

帝国旗帜鲜明的自我神化，总会激起反帝国的情绪。对于这样的反应，在意识形态方面最有力的证据出现在《圣经·旧约》中的“但以理书”里。书中描述了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释梦，当统治中东地区的塞琉古人声称已建起永世不朽的显赫帝国，这一妄断通过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巨像之梦的解释被完全否定了。按他的解释，当世的帝国只是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四大帝国当中的最后一个，且已日薄西山，余日不多了。^[40]在这里，书中关于世界末日临近、天国就要到来的预言否定了世俗帝国万古长青的宣言。有鉴于此，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和但以理的释梦一再受到反帝国的反叛者和革命者的追捧，并被换上新的外衣，赋以新的内涵，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基本模式：帝国修辞术借用了准宗教的确信；而这也激起了同样建立在宗教确信之上的反帝国的对立修辞术。在当下有关美帝国地位和权力的论争中可见这一模式的身影：美国越是高调地以准宗教性确信解读和传达它的政策，比如将其敌人诋为撒旦或魔鬼，就越会强烈地激起那些同样心怀宗教确信的力量担起反帝国的要角，与之大唱反调。所以，很长时间以来，这一叛逆角色都由伊斯兰主义所扮演也就毫不奇怪了。伊斯兰主义构成了美帝国最有力的挑战，因为它在根本上否定了美帝国的使命，把美国称为“大撒旦”。^[41]

帝国恶魔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抬上宗教层面的蛮族论。按照这一理论的说法，那些远在帝国统治之外的民族通通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化外之民，自然也被列为帝国主义文明教化的潜在对象。而反帝国的恶魔论则以牙还牙，它将帝国的中心描绘成道德败坏的巢窟，罪恶的深渊。

^[1] Marx: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第97页起若干页；关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参见Lenk: *Ideologie*第17~59页引言部分有

关问题渊源的阐述。

[2] 一旦这一概念离开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小圈子，就肯定如此。

[3] 关于公元前1世纪在地中海地区贸易与海盗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海盗的勾结，参见Christ: *Pompeius*，第56页起若干页。

[4] 参阅Bleicken: *Verfassungs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Kaiserreiches*第1卷，第93页起。

[5] Augustinus: *Vom Gottesstaat* X IX，26，第2 卷，第580页起若干页。

[6] 关于维吉尔诗歌的政治内涵，参见Rilinger: *Das politische Denken der Römer*，第531页起若干页，以及Ottmann: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第2卷（1），第183页起若干页。

[7] 也译作永恒帝国。

[8] Vergil: *Aeneis*，I，278-282，第23页。

[9] 关于贺拉斯诗歌的政治内涵，参见Rilinger: *Das politische Denken der Römer*，第534页起，以及Ottmann: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第2卷（1），第168页起若干页。

[10] Horaz: *Sämtliche Werke*第1部分: *Carmina, Oden und Epoden*，Carm. III，2，13。

[11] 参见Fuhrmann: *Deutsche Geschichte im hohen Mittelalter*，第170页起若干页。

[12] 拦阻者（Katechon）的形象曾经在斯陶芬王朝的政治想象世界里发挥过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弗赖津主教奥托（Otto von Freising）来说；后来又在卡尔·施米特的政治理论中重新发扬光大，参见Blindow: *Carl Schmitts Reichsordnung*，第144页起若干页；同样可参见Nichtweip: *Apokalyptische Verfassungslehren*，第60页起若干页。

[13] 参见Bernecker: *Spanische Geschichte*，第57页起若干页；Pagden: *Spanish Imperialism*，第13~36页，以及 Otto: *Conquista*，

Kultur und Ketzerwahn, 第45页起若干页。

[14] Adanir认为奥斯曼帝国政治中具有宗教多元化的特点, 参见Adanir: *Der Zerfall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第112页起若干页; 而相信奥斯曼帝国具有伊斯兰教扩张特性的观点, 可参考Philipp: *Der aufhaltsame Abstieg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15] 参见Lewis: *Die Araber*, 第62页起若干页, 以及Hourani: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第22~38页。

[16] 参见Jorga: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第2卷, 第196页起若干页。

[17] 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第5页起若干页; 关于第三罗马的理念, 参见Barudio: *Die Macht des Hegemonialismus*。

[18] Figes: *Natasha's Dance*, 第152页; 关于伊凡四世的帝国外交路线, 参见Stökl: *Russische Geschichte*, 第237~246页。

[19] 参见Figes: *Natasha's Dance*, 第306页起。

[20] 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第138页起若干页, 以及Stökl: *Russische Geschichte*, 第450页起若干页。

[21] 转引自 Lorenz: *Das Ende der Sowjetunion*, 第259页。

[22] 参见Simon: *Die Desintegration der Sowjetunion*, 特别是第186页起若干页。

[23] 关于英国人的帝国使命详见Ferguson: *Empire*, 第115页起若干页; 关于大英帝国文明教化的理念, 概述见Reifeld: *Imperialismus*, 第29页起若干页。

[24] 参见Kipling: *Complete Verse*, 第321~323页。顺便一提, 吉卜林的这首诗其实指的是应该接受并肩负起帝国义务的美国。

[2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第679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26] Marx: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参看Marx, Engels, *Werke*第9卷, 第129页。

[27] Marx: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参看Marx, Engels, *Werke*第9卷, 第130页。

[28] Marx: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参看Marx, Engels, *Werke*第9卷, 第132页。

[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第683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30] Marx: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参看Marx, Engels, *Werke*第9卷, 第133页。

[31] 参见Wolfgang Reinhard: *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 第97页起若干页。

[32] 对此详见Ferguson: *Empire*, 第117页起若干页。

[33] 关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 参见Hacke: *Zur Weltmacht verdammt*。

[34] 关于贵族统治的帝国以及贵族作为统治阶层的角色, 参见Kautsky: *The Politics of Aristocratic Empires*, 特别是第79页起若干页。作者考茨基主要研究了那些权力与影响力建立在土地财产权之上的帝国, 他认为这些帝国有一个鲜明特点, 那就是其中没有发生任何社会变革。

[35] 有关门罗主义的补充——罗斯福推论, 可参见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第192页; 关于在太平洋地区的均势政治, 参见Junker: *Power and Mission*, 第34页起若干页。

[36] 此乃作者笔误, 应该是1906年。

[37] 参见Junker: *Power and Mission*, 第42页起若干页;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第242页起若干页, 以及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第132~173页。

[38] 针对美帝国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旧日传统意识形态批判一脉相承，批评者把所有帝国大业和重大决策都一律视为由政治和经济利益所驱动。持这种批判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他的 *American Power and new Mandarins* 及 *Hegemony or Survival* 中可以读到他对帝国形成的各种不同形式所做的深入探讨。

[39] 这种为政治增加宗教底色的做法贯穿于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无论外交政策服务于什么基本立场或遵从什么主义；对此参见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也可参见 Pratorius: *In God We Trust*。

[40] 关于这四大帝国的区分以及它们后来如何扩展成为罗马帝国的叙述，可参见 Koch: *Das Buch Daniel*, 第182页起若干页，以及 Mosès: *Eros und Gesetz*, 第111~126页。

[41] 见本书下文，第190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 蛮族论与帝国空间构建

针对帝国使命所要反对的敌人，或者通过使命防止其政治上变强变大的对象，为他们构建一套“话语”（discourse）对帝国使命的说服力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对象我们在这里可以用蛮族或化外之民的总称加以概括。

蛮族论是帝国的惯用伎俩，至少对于那些以文明教化其治下疆域为己任的帝国而言，蛮族论是其普遍特性。^[1]蛮族论的关键作用在于，将帝国的疆界划定为非对称接触区域。也就是说，跟一般国与国的边界不同，边界上的并峙双方在本质上绝非同类；美好和高贵的“世界”止步于此，此界之外，便是吉凶莫测的无序之地，对它必须昼警夕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帝国的边界也总是宇宙与混沌的界线。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帝国——如本书开篇所提到的——为什么那么注重其对外疆界的单向通行性了。

蛮族论所制造的非对称性首先体现在，通过这种论调其中一方变成了政治的主体，而另一方则被当作政治客体；并且从此将双方的这种角色融入政治的观念世界。当然有人会反驳说，在帝国的边缘，主体和客体的角色分配实乃权力政治作用使然，何须刻意制造一种“话语”体系。事实上没有蛮族论，帝国疆界内外的差别只是纯粹权力落差或者是一种组织严密的军队同松散部落联盟间的差别而已；但是蛮族论则硬是将这种差异转变为一种“法定”差异。并且仅当蛮族接受了帝国的文明教化，也就是说甘心“去野蛮化”，这种差别才可能减弱。要进入帝国的空间，他们就得变得跟里面的子民一样才行；要不然，就只能以俘虏之身进入帝国，而当俘虏被押解过市，无疑也宣示了帝国权力之强，蛮夷威胁之大。这一传统可追溯至古罗马战功显赫的将领和皇帝的凯旋式，再到后来欧洲诸多殖民帝国对土著民的民族

志研究，直至最近一次阿富汗战争（2001年）后发布塔利班俘虏的照片，从中我们都可以瞥见这一传统的身影。

在本质上，具有非对称性的蛮族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可能以人类学研究现身，强调只要要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向帝国靠拢，自我文明化之门便随时敞开；它也可能穿上宗教的外衣，也就是说，可通过皈依帝国的宗教来实现“去野蛮化”；最后，它还可以诉诸种族差别论。后一点，在殖民主义历史中相当普遍，不过，这种形式基本上排除了彻底去野蛮化的可能。不过，蛮族论很少拘囿于上述某一种形式。大部分情况下，这几种形式连成一气，或者彼此交融，于是就可能导致边界功能的强化，或者是弱化。但不管怎样，非对称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另外，蛮族论还会在帝国边缘制造一种介于帝国内部和帝国外部之间的缺口。在现实政治中，这种缺口并不多见。在帝国辽阔的边缘地带，内部和外部的分水岭往往游移不定，究竟一个族群或部落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听命于帝国或者逆帝国意志而行，这从来就不能一锤定音。因此，同样在语义学上，蛮族论也向来有助于稳固那些原本模糊不清乃至几不可见的边界。它为帝国划了一道虚构的分界线，弥补帝国事实上轮廓不明的缺陷。这里所言之非对称，其实就是一种身处帝国边境地区的人自己根本无法确知的非对称，而帝国的中心却借助这种非对称确保了其对统治区域的边境已尽在掌控。

回到古希腊，在波西战争以及雅典提出霸权主张的背景下，蛮族概念才被正式赋以政治的内涵：蛮族成为希腊人所代表的文明世界的反义词。这样一来，雅典人的对外征服政策便笼罩了一层文明教化的光环。^[2]在希罗多德（Herodot）笔下，蛮族的典型特征是，生活方式上游牧式的居无定所，淫乱无度，饮烈酒，食生肉，甚至人吃人。而帝国的文明教化意味着让边缘地带的游牧民过上稳定的农耕生活，取缔人祭和食人陋习。^[3]而在帝国民众的集体意识里，关于人祭和食

人行为的印象向来根深蒂固。在上述两种描述之外，流行于游牧民族当中的“抢亲”之风又给帝国的蛮族画像添了浓重一笔。^[4]

帝国一旦跨越了奥古斯都门槛，也就是说，从扩张阶段进入了文明化阶段，蛮族带给帝国的威胁感便与日俱增。这种威胁感尤其体现在他们对女性恐遭伤害的臆想上，而这一条红线，从古罗马和中国，再到欧洲的殖民帝国，一直贯穿至西进运动时期的美国。它的调整版，广见于21世纪初期发布的那些受侮辱受蹂躏的女性影像及报道中，这些现象对于在富足世界边缘地带所发生的族群（蛮族）战争已经越来越普遍了。^[5]这些报道又加给所谓文明世界一个要求，即在必要时应当武力干预，哪怕出于在这些地区实行最基本的人权保护。

有关蛮族凶残本性的报道和影像震撼了帝国民众的群体意识，并且强化了他们奋起捍卫帝国边界的决心。与此同时，在实际政策上，帝国力图促使边疆游牧民族定居下来，让猎人成为农民。对帝国而言，达成这种转变的目的始终如一，那就是保证帝国边界之外也长治久安。因为这样一来，用以抵御游牧族群侵扰的军事成本就会大为降低，而帝国的边防之务自然也从此往外挪到了那些已经“去野蛮化了的蛮族”身上。

除了让这些好斗的游牧民族定居下来，实现边境和平，还有一种方案是招安他们，使其为帝国效劳，直接委以戍守帝国边疆之任。在诸多传统帝国之中，罗马人最谙此道，中国人则很少这么做。运用此策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沙俄境内的哥萨克人，比如一些欧洲殖民大国招募异族兵团入伍。而美国利用阿富汗军阀颠覆喀布尔的塔利班政权不妨视为帝国戡边缘之乱的冒险政策之现代版本。之所以说这个政策很冒险，是因为合作双方可能随时翻脸，以致兵戎相见。也因为，帝国的文明教化权可能会受到挑战，最后甚至引火烧身，遭到那些本应效命帝国、以帝国财力武装起来的蛮族的反戈一击，或者被蛮族一

步步取而代之。在这项冒险政策里走得最远的，当属推行“军队蛮族化”^[6]的罗马帝国。这项政策，导致了它——至少在西面——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公元6世纪，帝国的西半部瓦解为一众日耳曼人的王国（这些王国决定了此后欧洲历史发展的进程），帝国大空间分裂为小空间统治秩序。而在中国，蒙古征服者带来的帝国“蛮族化”则经历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它引发了蛮族同化，而且在程度上远超当年西罗马帝国的情形。中华帝国的大一统大抵维持了下来。为此，蒙古征服者需要一套官僚行政体系，而大部分官吏都不得不从被蒙古人武力征服的汉人中招募。^[7]

早在蒙古人接受先进中原文明同化之初，成吉思汗之子蒙古大汗窝阔台便放弃了最初要将被征服的中原大地变为蒙古牧场的计划，而改为向臣服的汉人征税，从而获得更为可观的财富。^[8]然而，执行这项决定，蒙古人心余力绌。为摆脱对被征服者的过度依赖，蒙古人授权穆斯林行包税之务。这些穆斯林大多是沿丝绸之路来华的商人，本是中国和西亚之间贸易往来的纽带。这些人扑买中原课税，大敛横财。这种毁灭性的包税制在中国北方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局。最后，民众对包税人深恶痛绝，且闻之色变，见了他们就好像见了蒙古骑兵一样。蒙古人所采取的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虽非一击致命，但经过长年累月的过度透支、涸泽而渔，最终压垮了整个社会结构。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征服南宋王朝之后，采用“大元”的汉文国号，建立元朝；且宫廷延用汉人礼制。随着统治疆域的不断扩大，蒙古人越来越依赖汉族文人，没有他们，整个浩浩帝疆的官僚体系都难以运转。后来，蒙古人 在1315年正式恢复科举考试，科考也为来自其他邦族的贤能入仕为官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样一来，元廷便不必完全仰赖汉人了。与此同时，蒙古人也刻意避免被发达的中原文明彻底同化。他们明令禁止本族人同汉族妇女通婚，以蒙古文处理朝

政；一到夏季，便迁回蒙古草原。^[9]与之相对的是，汉民族这边的儒家思想深信文明有潜移默化的德化之力。只需假以时日，即便北来的野蛮征服者也可得教化。元朝覆灭后，蒙古人退回漠北。但中原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武力作为统治手段获得了更多认可；以军事力量抵御北夷南侵的需求显著上升。

在西班牙帝国史上，蛮族论又经历了另一番景象。帝国并未遭逢蛮族侵犯的危险，新发现的“新世界”里的野蛮人在西班牙人眼里仅仅是文明教化的对象。按西班牙的帝国使命，文明教化意味着基督教化。于是重点不在促使游牧民族定居下来，而是终止人祭。当时那些惨无人道的礼仪被当地大部分印第安民众所接受，因此，西班牙人，如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Francisco Vitoria）在其《论西班牙对野蛮人的战争法权》（*De jure belli Hispanorum in Barbaros*, 1539）中所言，不仅要干预、解救那些将被献祭的牺牲者，同时他们还要建立一个足以阻止土著民继续推行这套礼制的政权。^[10]“野蛮人”从未对西班牙的政权构成过威胁，从西班牙世界帝国的崛起到衰落，他们自始至终都只是帝国政治的客体。^[11]

在沙皇俄国，哥萨克人的情形介于古罗马蛮族和西班牙人所遭遇的蛮人之间。正是哥萨克人的游牧民生活方式使他们有能力守卫那迷失于无垠草原之间的帝国边界，免受其他外来游牧民族的侵扰。也正因为如此，沙俄无意让他们定居下来。当沙皇让这些半野蛮的民族加入戍守帝国的行列之中，其实是冒着一定风险的。风险在于，蛮族在帝国疆域内有强烈的反叛倾向和劫掠冲动。要知道，正是有了哥萨克人的鼎力支持，18世纪早期俄国的农民起义才如此风起云涌，也因之而对帝国政权更具威胁。即便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哥萨克骑兵已更加紧密地融入了沙俄军队，他们依然是沙俄帝国使命中一个有点说不过去的因子：有鉴于他们的作战方式，很多俄国观察家都不禁质问，沙俄帝

国这些所谓文明教化之师难道不是比被征服的高加索及中亚地区的民众更为野蛮吗？[\[12\]](#)

在19世纪欧洲人的观念里，阿拉伯奴隶猎手和奴隶贩子臭名昭著，已然成为野蛮人的代名词，于是欧洲殖民列强的帝国使命也直接针对这帮人。猎奴和贩毒由来已久，它源于非洲的阿拉伯人地区，纵深蔓延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为欧洲人在整个西非和东非地区夺取当地政权提供了一个正当理由，至少是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13\]](#)然而，在另一方面，欧洲列强也通过指责自己霸权竞争对手的野蛮行径来为自己的主导权辩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就指责协约国从海外殖民地搬来土著兵团为欧洲殖民者作战，从而使整个战事野蛮化。反过来，协约国这边也针锋相对，痛批德国人。后者在侵入比利时的战役中，以极为野蛮之法对当地平民犯下滔天罪行。[\[14\]](#)

帝国使命中的文明教化的成分越是突出，蛮人的反面形象便越显得清晰和突出。这一点也反映在近年来围绕恐怖主义尤其是自杀式恐怖袭击的一系列论辩中。而在那些族群冲突触发的战争中所发生的现代大屠杀，才让我们最真切地感受到野蛮力量在今天所带来的威胁。[\[15\]](#)在公共舆论中，那些在富足世界的边缘参与种族屠杀的士兵，那些渗入富足世界的恐怖主义者，都是新帝国那用以文明教化之国家暴力所应打击的对象。不过，野蛮人不仅要跳离文明化的要求，而且一旦成功突入帝国空间，他们将成为和平和繁荣的一大威胁。

[\[1\]](#) 关于蛮族论的概述，参见Schneider: *Der Barbar*，以及 Nippel: *Griechen, Barbaren und 《Wilde》*；关于在从帝国大一统观念向民族认同基础上建立的多元体过渡的过程中，蛮族论的结构和功能，可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Nationenbildung*，第130页起若干页；关于在蛮族论中被视为野蛮者的一方如何反应，参见同书，第210页起若干页，以及 von See: *Barbar, Germane, Arier*，第31~60页。

[2] 该观点及随后的一些论点是从Reinhard Koselleck的杰作*Zur historisch-politischen Semantik asymmetrischer Gegenbegriffe*中得到的启发。

[3] 参见Nippel: *Griechische Kolonisation*; Francisco de Vitoria把西班牙的征服运动作为取缔人祭的政策而赋予征服运动以合法性, 这一点可参见本书作者妻子Marina Münkler: *Entdecker und Eroberer*, 第173页起。

[4] 在中国, 随着南宋政权与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南北并峙, 华夷之分的观念进一步加深。落入蛮夷之手的汉族女子如何惨遭厄运的街谈巷议对这种观念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可参见Ebr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第150页起。

[5]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Die neuen Kriege*, 第146页起若干页。

[6] 关于罗马军队蛮族化及其后果, 参见Heuss: *Römische Geschichte*, 第484页起若干页, 以及Goldsworthy: *Die Legionen Roms*第208页起若干页。

[7] 参见Schmidt-Glintzer: *China*, 第165页起若干页。

[8] Ebr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第172页。

[9] Ebr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第173页。

[10] Vitoria在1538年发表的文章*De indis recenter inventis* (《关于最近发现的美洲印第安人》) 中还坚持认为: 西班牙对印第安人仅有的法律诉求是在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上自由旅行和自由传教两种权利。只有在他们行使这两项权利遭到土著人暴力阻挠时, 西班牙人才可以使用武力。关于西班牙统治形式与合法性议题, 极为精辟的讨论参见Pagden: *Spanish Imperialism*, 第13~36页; 但首先可以参见本书作者妻子Marina Münkler: *Entdecker und Eroberer*, 第172页起若干页。

[11] 参见Bitterli: *Die Entdeckung und Eroberung der Welt*第1卷, 第51页起若干页。

[12] 对此, 参见Figes: *Natasha's Dance*, 第376页起若干页。

[13] 关于欧洲人抵制阿拉伯人贩奴的行动, 参见Albertini: *Europäische Kolonialherrschaft*, 第453页和第513页起。

[14] 参见Jeismann: *Propaganda*, 以及 Hamann: *Der Erste Weltkrieg*, 第34页起若干页, 第42页起若干页。在这两种情况下, 野蛮的形象都被烙上滥施性暴力的深深污痕。

[15] 关于自杀式袭击对规则的拒斥, 参见Reuter: *Mein Leben ist eine Waffe*, 第9~31页; 关于发生在卢旺达、国际社会本该阻止得了的大屠杀, 可参见Des Forges: *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 Genocide in Rwanda*, 第595页起若干页。

/ 繁荣：帝国统治正当性的源泉和统治方略

首先，帝国使命为帝国中心的精英指引了方向，而蛮族论则将帝国空间的秩序同混沌的周遭世界划清了界线，那么繁荣承诺则应当由帝国向其治下所有芸芸众生传达。这项承诺涉及的不是那些远大目标，或者一些虚幻的架构，而是帝国对其境内所有百姓许诺的实实在在的实惠：帝国之疆，丰衣足食；帝界之外，贫困交迫。因此，帝国体系向外扩展、延伸，对边缘而言，不啻福音佳讯。事实上，繁荣承诺也正是帝国证明其存在正当性的最有力依据之一。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帝国的边界确实也是由富转贫的分水岭。然而，事实能否如此，还取决于帝国的类型及其行使权力的方式。

草原帝国的典型特征是，它们不会将其统治方式从剥削型过渡到投资型，或者说是文明教化型。在这些征服者眼里，那些被征服之地，归根结底就是战利品；同样，他们也将占领地作为战利品来对待。由于被征服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文化上优于那些游牧民征服者，于是后者只能将其统治筑垒于武力和掠夺之上。在这种情形下，要维系帝国统治变得相当艰难。通常他们都或多或少依赖定期的突袭、掳掠得以苟延残喘。如若他们也拿繁荣承诺来证明其帝国正义性，那恐怕是骗人的把戏，大概没人会相信。

然而，中心和边缘之间那种压倒性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绝非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仅仅体现在草原帝国对其领土空间的短命统治上，其实也屡见于早期的海洋帝国。葡萄牙和荷兰的贸易霸权曾经涵盖从印度到东南亚的广袤地区，他们这种霸权在本质上也是剥削性的，跟投资建设几乎沾不上关系。但是，他们得以统治的基石，是维护而非破坏当地既有的统治体系及社会结构。他们的占有方式，是交易，而非武力。草原骑兵为了夺取财富，攻破继而摧毁挡其去路的一

切秩序体系。而那些商人冒险家则紧随新世界发现者的步伐，建立海洋帝国；顺应而不伤及当地既存秩序结构和生产关系，并作为纽带，将它们连为一体。他们牢牢掌控远洋贸易，实现大区域间的经贸往来，并按他们自己的意愿支配着国际间的贸易条件。^[1]

当然，时间一长，随着贸易额的逐年增长，欧洲的商贸统治也削弱了当地既存的社会及政治结构。贸易帝国曾经十分依赖的那些社会及政治条件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悄然不觉，但日积月累。在一定程度上，贸易帝国仍需仰赖这些条件过活，但终有一天，帝国会将其蚕食一空。到那时，帝国要继续生存，就必须为当地统治体系及社会结构之稳固投资出力了。这种投资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助，制造技术的输出，鼎助其建立工业，在大城市和军事战略要地设立兵营，也可以是派遣行政管理人员帮助当地人建立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但这样一来，不可避免也会引起帝国成本的增加。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心为了在帝国政策中继续牟利，几乎总是选择退出直接管理，退回到商业技术手段的掌控上；并转向寻求更为有利的贸易条件，以获得更高商业利润。如果我们静观细察世界经济史前后发展的脉络，会发现在20世纪下半叶，全球性经济体已取代了昔日的海洋帝国和贸易帝国。而且，在一段时间里，这些经济体的运行成本远低于从前的帝国。这一优势能否长期保持，则是另一回事了。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会讨论到。^[2]

谈到跨越奥古斯都门槛，^[3]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任由中心慢慢掏空边缘之外的另一种处理边缘问题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帝国会在相对较早的时间点开始往边缘投资，以唤起边缘对帝国秩序长治久安关心。在这方面，帝国手里有三个政策选择，它们既可以单独运用，也可以——如现实中更常见的那样——组合起来运用。第一种可能：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帝国之境天下太平，安全旅行和经商的机会，以及司法保障等。这些好处，身在帝国边缘的民众完全跟帝国中

心的同胞一样，人人有份。也就是说，在享用公共产品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帝国子民会被排除在外。

除了上述提供公共产品以外，还可以通过强化境内经济依存关系，进而促进帝国空间的繁荣。为此，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产于帝国各区的商品，必须多元互补，能够充分满足帝国境内的互通有无。比如说，在古罗马帝疆之内，西西里、埃及和北非提供粮食，而意大利则输出葡萄酒和橄榄油。^[4]也就是说，帝国空间内的经济依存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是境内各地生产剩余产品的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此，贸易量增加，商品交换持续发展。当然，商品经济生产和贸易发展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航道和商路是否安全畅通。所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提高经济依存度这两者可谓息息相关、唇齿相依。

然而，帝国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贸易空间的安全。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空间是伴随帝国扩张才被真正开拓出来：工匠和工程师紧随军队而来，扩建或新建贸易港口，建造道路和桥梁，最终将帝国的统治空间变成经济空间。公元前2世纪，古罗马人伟大的筑路工程彪炳史册。亚壁古道（via Appia），弗拉米尼亚古道（via Flaminia），艾米利亚古道（via Aemilia）等，这些深思熟虑和用心良苦的项目不仅仅为了在经济和军事上打通帝国四境，同时也显示出，罗马有意锤炼并完善自己建设帝国的能力。罗马人在建造桥梁方面累积的经验，为他们修筑笔直的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这之前，古商道往往蜿蜒曲折，仅驮畜可通行；马车只能望之兴叹。而今，这些羊肠小道变成了由石子铺成的笔直大道（四季可用），这些都成为帝国文明伟绩的象征。除去军事和经济上的实用价值外，这些道路也通向了帝国空间的罗马化及其文化大一统。在戴克里先皇帝在位期间，罗马帝国全境道路网总长最终达到85000公里。^[5]

铁路（还有传达信息的电报）对大英帝国的重要意义，大抵相当于道路网之于古罗马。从此，大宗商品的运输不再仅仅依赖海路，还可通过陆路送达，既迅捷又价廉。欧洲其他殖民列强也纷纷步英国人之后尘，利用铁路深入其占领区域的腹地，开拓市场。如此一来，商道从海洋延伸到了路上，将那些远离海岸的地区同帝国的经济中心成功地连接起来。^[6]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人从其殖民地撤离之时，他们遗留给当地的铁路网，大部分甚至比这些取得了独立的国家几十年后所拥有的铁路网更先进。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最关键的一点是，铁路线曾是帝国之躯的血脉和神经，当帝国巨人轰然倒下，那些帝国境内的基础设施也随之倾颓乃至废弃。苏联解体，由它发起组织并一手掌控的经济体也树倒猢猻散。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帝国商贸及经济区的瓦解也会带来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倾颓没落。^[7]

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沙俄在其广袤无垠的疆域内，尤其是在西伯利亚，改进了交通运输技术，这成为它得以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关键因素。当时，俄国落后的经济越来越威胁到它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对于这一点，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Sergej Witte）深信不疑。他担心，俄国倘若不能奋发图强，崛起为一个经济中心的话，那么要不了多久就会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任人鱼肉。^[8]因此，维特推行了旨在提升经济繁荣程度的政策，而他的手段则是在全俄境内大修铁路，改进交通运输条件，开拓国内市场。在他的经济理念里，首要的一点便是以高效的铁路网运输取代中亚地区古老的商队贩运。与此相关的还有他的另一层想法：俄国人要跨过西伯利亚深入东亚，打开那经济发达的对手不得其门而入的市场，进而获取那里的原材料。由此，便催生了西伯利亚铁路这一浩大工程，它最终也成为连接欧洲大陆和俄罗斯东亚领土的大动脉。

在这方面，军事和经济这两方面的效应常常结伴而行，同时显现。在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人们意识到，相比扩军来说，提高军队机动性更能改进俄国军队的战斗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从莫斯科地区向克里米亚半岛调遣援军，比英法联军的动作慢了一倍。^[9]普鲁士位于柏林的总参谋部更害怕一支提升了机动性的，而不是徒增规模的俄国军队。也就是说，大规模修建铁路系统颇具军事战略意义。有了铁路，人类第一次可以如此快捷地大范围调兵遣将，及时实现远距离的后勤补给。^[10]但很快，铁路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显露出来：货物运输成本降低了，相距遥远的经济体连成一气，刺激了经济的发展，由此促进了整个帝国的繁荣。可以想见，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罗马帝国的筑路工程上：通过新修大道，罗马军团可以携辎重快速转移，这一显见的军事战略优势，直接促使帝国下定了筑路修道的决心。但从长远来看，帝国四通八达的道路也通向经济统合，而从这当中，边缘比中心受益更加明显。可见，道路带来的经济效应毫不逊色于其军事意义。

当然，我们在此也要补充说明一点。在军事动机刺激下获得的交通大发展，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溢出效应，或者说未必会带来充分的溢出效应。关于这一点，恰恰又是俄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例子。他们的铁骑深入东亚地区，力图把中国北方及朝鲜半岛尽收囊中，一手掌控。而它的扩张，引发了同日本的冲突。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的惨烈败局，再次暴露了俄国的弱点，只不过这一次主要暴露在海军方面。战败引燃了1905年的革命，也就此敲响了沙皇俄国的丧钟。

类似的演变，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下西班牙帝国。在它那边，问题并不出在帝国漫长的外部边界上，而在于：大西洋海上航道的安全护航制之启用，使其经济陷入僵化，渐失活力，大大抑制了其经济自主性。所以，跟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的沙俄相似，西班牙在16及17世纪

没能在经济上充分整合其辖治的广大属地。事实上，它在西欧经济体系里，最后竟沦为一个欧洲与南美之间贸易中转国的二流角色。[\[11\]](#)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西班牙人沿着新重商主义路线，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早在1743年，何塞·德坎皮略（José de Campillo y Cossíos）就在其出版的《美洲经济治理的新体系》（*Nuevo sistema de gobierno económico para la América*）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和政治重建的计划。[\[12\]](#)他在书中分析指出，西属美洲的大部分财富留在了美洲，它跟西班牙本土之间的经济联系已渐行渐远。所以，加大力度在经济上统合整个帝国，从而增强帝国生命力，已势在必行。唯有重组经济结构，帝国才能赢得生机。在这一点上，何塞·德坎皮略与谢尔盖·维特不谋而合。作为财政大臣，德坎皮略着手经济改革：安达卢西亚被首当其冲地取消了贸易垄断地位，随之消失的还有强加在它身上的护航制。通过贸易自由化，德坎皮略力图振兴西班牙的生产制造业，并打击走私。不过，他的真正目标是将西属美洲打造成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以及西班牙本土商品的倾销市场。如此，帝国两端的贸易额将稳步增长，也会为帝国的中心创造出更多价值。

德坎皮略致力于产品的多样化，然而，这一下子也增加了西属美洲的负担。这在美洲克里奥尔上层精英中产生了不小影响，直接推动了后者一步步脱离宗主国。因为在他们当时看来，宗主国不是改革的动力，而是发展的阻力。相比继续留在西班牙的帝国阵营里，或许政治独立能给他们带来更长足的经济进步。于是，为求独立，他们开始盯紧每一次机会。结果，西班牙在18世纪80年代的这场旨在加强帝国经济统合的改革努力，最终事与愿违，而且以帝国的政治分裂告吹。

除了古罗马和大英帝国，走进中华帝国我们也可以很好地认清帝国秩序与经济繁荣之间的联系。在公元3世纪到6世纪的帝国分裂时期，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衰落，货币流通量回落，[\[13\]](#)货币作为维系

帝国经济空间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其意义亦大幅削弱。而在帝国重归统一之后，尤其在唐朝，帝国境内的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发展态势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翻转：开运河，筑道路，帝国四域八方在经济上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就既在政治上，也在经济上，促进了帝国的大一统。

随着唐王朝的衰亡，帝国统合的经济空间再次星落云散。但到了宋代，国内贸易再度繁荣，货币流通量增加，中国实现了经济的一次真正起飞。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类首次尝试用纸币取代金属货币。[\[14\]](#)对于帝国秩序同经济繁荣之间的依存关系，恐怕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像中国人那样，有如此直接的切肤之感了；这或许也能解释中华帝国何以拥有绵亘千秋的生命力以及分久必合的周期性规律。

在帝国全境统一货币，已为帝国四境之内的繁荣昌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货币统一当然并非远途贸易的先决条件，但无疑极大减少了远途贸易中的麻烦，从而提升了贸易的广度和深度。真正的先决条件，应该是币值的稳定及帝国中心的偿付能力。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中华帝国，周期性爆发的通货膨胀都给帝国境内的商业发展带来恶劣后果，从而也妨碍了帝国各地间的经济整合。至于西班牙，一再遭遇国家破产，不仅暴露了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同时，也严重削弱了它在欧洲的经济地位。毋庸置疑，英国人对货币的重视，举世无双。结果，英镑后来越过帝国之界，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储备货币。也正是强大舰队和英镑组成了帝国巨厦的支柱。当英国在一战期间从债权国沦落为债务国时，英国人世界帝国的丧钟也敲响了。美元取代了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决定20世纪世界经济周期的，也不再是伦敦，而是纽约了。

确保帝国繁荣的第三个选项，是向边缘地区直接投资出力，从而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拉近边缘与中心的距离。这种边缘投资，用

帝国主义理论是无法解释的。而帝国理论，在解读边缘投资时也不得不将其归因为帝国的长远战略考量。可这一战略考量的长远性，充其量也只有从帝国使命的角度讲得通，但没办法在当权精英的实际政策中找到注脚。总的来说，这样的文明化投资在帝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当然，草原帝国除外。鼎盛时期的海洋帝国同样不在此列，而当从海洋起家的超级帝国将其统治触角伸向陆地，或者在陆地帝国根深固本，稳住了阵脚以后，这样的文明化投资总会出现。英国人属于前一种情况，后者的典型例子有中国，而罗马大致相当于两种情况的混合。

倘若帝国能成功兑现繁荣承诺，借助蛮族论搭起一道看不见的虚构边界，永葆帝国使命的可信度，最后，保障四境之内天下太平，那么帝国就可实现长治久安，国祚永续。上述这种多管齐下的合力可确保帝国的延续，反之，一旦其中某些环节失灵，那么就会把帝国推上衰败的歧途。与此同时，帝国的敌人也潜伏于这些失灵环节，蠢蠢欲动。

[1] 当然若完全放弃军事手段，建立海洋帝国和贸易帝国也无从谈起。正是卡拉维尔帆船（caravel）和西班牙大帆船（galleon，也称盖伦帆船）奠定了欧洲的优势地位，参见Cipolla: *Guns, Sails and Empires*, 第81页起若干页。

[2] 见本书下文，第240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3] 见本书上文，第112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4] 对此详见Potter: *Roman Italy*, 第182页起若干页，以及Doyle: *Empires*, 第102页起。

[5] 参见Potter: *Roman Italy*, 第125页起若干页；有关戴克里先时代的道路网的数据，参见同一出处，第132页。

[6] 关于英属印度建设的铁路系统以及电报的意义，参见Ferguson: *Empire*, 第169页起若干页。

[7] 有关苏联控制下的经济区的崩解，参见Kapuściński: *Imperium*, 第107页起若干页，以及Kemig: *Lenins Reich in Trümmern*, 第333页起若干页。

[8] 关于维特的帝国政策，参见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第342页起；Geyer: *Russian Imperialism*, 第144页起若干页；Stökl: *Russische Geschichte*, 第610~618页。

[9] 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第347页起若干页。

[10] 关于铁路对于提高运输系统效率的意义，参见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第242页起若干页。

[11] 参见Bernecker: *Spanische Geschichte*, 第62页起若干页，以及Cipolla: *Die Odyssee des spanischen Silbers*, 第91页起若干页。

[12] 对此及随后一些内容，见König: *Der Zerfall des Spanischen Reiches in Amerika*, 第128页起若干页。

[13] 参见Ebr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第86页起若干页。

[14] 参见Ebr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第141页起。

第五章 帝国落败于弱者的权力

很多帝国挫败于强大的竞争对手。它们要么在战场上折戟沉沙，被打回区域强国的原形；要么遭到严重削弱，以至于在接踵而来的国内革命和内战的冲击下，消失于世界政治大版图。拿破仑帝国和威廉皇帝的德国，与其说是真正的帝国，倒更像是帝国候选者。它们在遭受军事重创之后，都依战胜国的决议成了民族国家，且在国力与规模上也按欧洲均势的内在要求受到了约制。虽然过程更富戏剧性，但这两个国家的军事挫败，其实都不过是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帝国失利的翻版。^[1]与之大相径庭的是沙俄、奥斯曼帝国及哈布斯堡皇朝的命运。它们的失败归因于多重因素的组合拳：帝国国内的积弱，军事上败于权力政治上的对手；最后，国内人民揭竿而起，点燃了革命烈火。如果说，拿破仑的法兰西和威廉的德意志直接溃败于各自劲敌的军事优势之下，那么在另一边，军事实力只是压倒早已陷入长期衰退的沙俄、奥匈及奥斯曼的最后一根稻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正是它们用以扭转帝国败势的最后一搏。

相比败于强敌的帝国而言，面对弱小对手帝国马失前蹄的例子更加发人深省。人们起初完全没有料到，那些弱小势力有朝一日竟会成为帝国大患。倘若帝国行为体被势均力敌或者力胜一筹的对手所遏制，说明帝国的一个关键特质在它们身上尚显不足——世界统治力或者最起码对自己“世界”的绝对主宰力。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只是狭义的帝国，因为按照帝国的严格定义，在它们的“世界”里找不到一个对手与之匹敌，遑论力胜一筹了。那么我们在这里观察到的，本质上

就并非帝国的失败，而是大国的兴衰。对于后一个话题，大国理论或霸权战争理论有过阐释，^[2]但是这个话题跟帝国秩序及其衰落的主题关系不大。

当然，如前文所述，在现实中霸权国家同帝国之间绝非判若鸿沟。它们的差异，并非总如概念所示那么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事实上，不同帝国的“世界”，大可相互交叠。17世纪的西班牙和英国之间的情形便是如此。再比如七年战争期间争夺北美霸权的英国和法国。还有一个例子，是沿黑海至兴都库什山脉一线互起争端的英国和俄国。在这些不同帝国“世界”犬牙交错的重叠区域，霸权之战与帝国战争交织在一起，在那里上演的，究竟是强国之间争夺主导权^[3]，还是帝国势力镇压反帝国行为体的抗争^[4]，并非总是一目了然。在东西对抗的冷战时期，所谓代理人战争，大致符合下述模式：两大帝国中的一方，披上了反帝的外衣，假借反帝国之名，给对手的帝国边缘上爆发的反抗运动推波助澜，从而将霸权冲突维持在小范围的拳来脚往、小打小闹上。毕竟双方都慑于对方的核武器威胁，这样的霸权冲突已经不再会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上演了。

当帝国在其边缘同较弱的反帝国行为体陷入冲突时，那冲突是确实只关乎反帝国行为体，还是说背后虎视眈眈地站着另一个帝国“世界”的中心，这一点并非总是一望可知。也许，后者正处心积虑蛰伏于对手的“世界”里，或者隐匿于夹在敌我世界之间的真空地带，伺机给霸权竞争对手制造失败。在越南，美国遭遇了这样的失败，而后来出兵阿富汗的苏联也一样。这还只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例子。

当霸权竞争国家拥有了核武器及核武投送系统，大规模霸权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但在这之前，情况则完全不同，发生在帝国边缘——如果那里正好是帝国候选者们利益场和势力范围交叠之地的话——那些小小的帝国战役总潜藏着升级为霸权战争的危险。欧

洲列强纷纷卷入“一战”，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奥匈帝国军队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endorf）伯爵眼中，他竭力主张的对塞尔维亚之战不过就是一场小小的帝国战争，旨在教训或消灭那破坏奥匈帝国内部和平的敌手。虽然在战争的第一年，奥匈帝国军队出师不利，^[5]但没有人怀疑他们将最终击败塞尔维亚。不出意外的话，这次交锋将同过去众多巴尔干战争一样，只是区域性强权按照其利益诉求重塑地区政治格局的又一次努力而已。然而俄国的参战让情势急转直下。俄国人素来自视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族的守护神，且力图借此之名进一步推进它的帝国势力范围，于是自然站到了塞尔维亚一边。当俄国人实施全国总动员之后，一场小规模帝国战争顷刻间演变为一场霸权大战，而这场战争最终断送了欧洲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

可见，战争波及区域的有限性是帝国战争的固有特点。而霸权战争则不同，它颇具星火燎原之后劲，冲突往往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地区被卷入其中。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反帝国行为主体倾向于将它们对帝国统治的抗争变成霸权战争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一旦得逞，它们成功贯彻自己政治意愿的机会便大大增加。

德意志帝国的军政领袖其实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如果介入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势必会引爆一场霸权大战，战火恐将超出传统帝国战争的地域范围，烧到巴尔干地区之外。如果必须得在空间上扩大战事，德国人至少希望能在时间上把控战事，唯有如此才可最终赢得战争。这正是当时德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

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计划的关键点：它计划在西线奇袭法国，迅速逼其就范，然后集中全部兵力迎击东边的俄国。从德国的长远利益来看，速战速决重于一切。因为，一旦战事拖得太久，德国迫于地缘政治的劣势，会有腹部受敌之虞。为了在时间

上掌控战争进程，德国采取了积极的进攻性战略。但这无疑也是极大的冒险。当柏林也意识到这一冒险已让它深陷危局，便竭力在最后关头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6]但当局势发展到1914年7月底的时候，一切努力都为时已晚。德国人铸成了大错，他们任由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起了一场规模有限的帝国战争，却没有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来避免自己陷入霸权战争的泥沼。而这场霸权战争规模之大，影响之巨，远非一场发生在欧洲边缘的帝国战争可以比拟。^[7]而且我们看到，随着帝国战争演变为霸权战争，德国人在时间上的自主权荡然无存。

在塞尔维亚战例中，我们再次清晰地看到，在欧洲成功实现帝国政治的可能性大异于其他大陆。当美国 在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发动小规模帝国战争时，它不必担心与诸多强国发生冲撞。最多也就是如1898年美西战争那样，碰上一个“大国”对手而已，而且还是一个没有盟友的孤强。^[8]而欧洲的情形截然不同。每一次小小的帝国战争都隐藏着升级为一场霸权大战的威胁。就连沙俄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挑起帝国战争之时，也没有随之卷入一场霸权冲突的远忧。只是在东亚，情况稍有不同。因为日本迅速崛起后，已跃升为一个怀有帝国野心的强权。按俄国人的最初打算，1904年的日俄战争本只是一场帝国战争；但情势骤变，很快战斗转变为一场大规模的霸权战争。结果，俄国人铩羽而归，战争失利，他们在欧洲的地位也被削弱。^[9]

同样，英国也做到了在挑起帝国战争的时候，不招惹其他的霸权竞争对手。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比如攻占埃及的战争，同样还有它随后在喀土穆镇压马赫迪起义的苏丹战役——这一战可谓伊斯兰主义的先声。另一佐证是在南非爆发的第二次布尔战争。当时，虽然德皇威廉二世在“克鲁格电报”（Krüger-Depesche）中向布尔人示好，但并未在实际行动中给予后者任何支持。

对英国人来说，最大的一次危险出现在1898年的法绍达（Faschoda）事件中。那时的英国距离一场霸权战争仅一步之遥。当时，英国基奇纳（Kitchener）伯爵率领的远征军在南苏丹一个叫法绍达的小地方与马尔尚（Marchand）少将所率的法国军队狭路相逢，一时间两大帝国强权剑拔弩张。双方火药味十足地对峙了数周之久。[\[10\]](#)幸亏是在非洲，大家还能妥协、忍让，撤军收场。要是在欧洲，事态发展将不堪设想。此外，远在非洲高加索、加勒比海或者菲律宾，战争的爆发即使意味着对平民的血腥暴行，也难以在社会中激起惊涛骇浪；如果发生在欧洲，恐怕政府早已被淹没在一片愤怒的声讨中了。换句话说，在欧洲，所有战争呈现对称性倾向，而在欧洲之外的战争有可能呈现非对称态势。在非对称战争中，帝国在技术和组织上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因如此，所谓帝国过度延伸（imperial overstretch）问题，主要出现在欧洲之外的地区。而且它很快又带出另一个新问题，即面对帝国非对称性优势，反帝国行为体是否还有可能，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其政治意图。它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转弱为强。

[\[1\]](#) 在Ludwig Dehio (*Gleichgewicht oder Hegemonie*) 看来，近代欧洲的历史有一个鲜明特点：先后四大霸权雄踞欧洲大陆——西班牙帝国，在腓力二世时期江河日下；法兰西第一帝国，毁于路易十四手里；法兰西第二帝国，终结于拿破仑；最后是德意志帝国。在他看来，德意志帝国始自俾斯麦的统一，瓦解于1945年。

[\[2\]](#) 参见Gilpin: *War and Change*, 第186页起若干页，以及Mearsheimer: *The S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第32~54页。

[\[3\]](#) 霸权战争。

[\[4\]](#) 帝国战争。

[\[5\]](#) Keegan: *The First World War*, 第219页起若干页；Strachan: *Der Erste Weltkrieg*, 第44页起若干页；战争开始时，造成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战

线的军事行动一溃千里的直接原因，是奥匈在俄国参战后被迫对其军队进行了改组。

[6] 关于整个事件的始末以及战争逻辑的独立性，参见Baumgart: *Die Julikrise*。

[7] 在关于战债问题的争论中，对于德国1914年7月的参战行为，大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德国外交手段过于拙劣，另一种则认为德国是有意参战——此前不久爆发的巴尔干半岛危机只不过给了德国一个开战的口实。德国的最终目的是拆散由法、俄、英三国组成的帝国联盟。

[8] 参见Schley: *Die Kriege der USA*，第58～63页；关于美国小规模帝国战争的论述，参见Boot: *The Savage Wars of Peace*。

[9] 法国对俄国的战败忧心不已。对法国而言，俄国的战败意味着它最重要的盟友遭到严重削弱。战后俄国大举借债力图实现军事的现代化，同时推进铁路运输网的扩建工程。这些举动又加深了德国方面的疑惧。参见Howard: *Kurze Geschichte des Ersten Krieges*，第36页起。

[10] 具体内容参见Lewis: *The Race to Fashoda*。

/ 帝国过度延伸的形式

关于帝国过度延伸以及它对帝国稳定的长远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可上溯至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里程碑式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1766～1788年）。[1]他透过罗马历史，同时参考当时英国的发展轨迹分析指出，帝国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一种在疆域上过度延伸以及不加节制地包揽任务和责任的倾向。在新近的史学文献中，它们分别被称为过度延伸（overstretch）和过度承诺

（overcommitment）。按这一理论的说法，帝国暂时从那些并非利益攸关的地区撤出，或者适时卸下那些在特定时局下挑起的职责，这些都符合帝国的生存利益。正是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帝国的生存需求同主权国家世界的运行之理完全背道而驰：帝国受到的空间之羁缚和公约之约束越少，则其稳定性越强；而主权国家世界（Staatenwelt）则相反，其中的成员国受领土和公约的制约越强，体系就越能实现其稳定与和平。[2]

对于过度延伸这一概念，传统的理解是对控制区域的 过度扩展。在这样的语境下，避免过度延伸几乎意味着收缩边界，放弃某些领土。不过，过度延伸和过度承诺的观点主要适用于陆地帝国，同昔日海洋帝国只有有限的关联。对于后者而言，只有当它们跨过那些港口和贸易据点，深入大陆腹地，才会遭遇与传统陆地帝国相同的困境，空间过度延伸的危险才会降到它们头上。否则的话，海洋帝国凭借其机动灵活的海上舰队，足以纾解空间上过度延伸的压力。[3]同戍守边境的陆军部队不同，海军舰队作为一支守卫力量，始终游移不居。海上防线的延伸，也并不一定会带来扩展军力及成本陡增的压力。正因如此，蕞尔之邦如葡萄牙，也可气吞万里如虎，雄霸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国际贸易长达一个多世纪。这一规律在大英帝国身上更是展现无遗。英国海军实力之所以强劲，不仅因为舰队规模庞大，更得益于过

硬的舰艇质量，船员出色的航海技术，以及海军将领在广阔海域指挥作战的高超战略战术水平。另外，对大英帝国的实力而言，船舶在港受载期大大缩短的作用不容小觑，可以说跟扩增服役战舰同等重要。

这样的效能储备，是传统陆地帝国在维护边缘及疆域安全时并不具备的。所以，可以说陆地帝国的过度延伸问题，跟海洋帝国所面临的，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简单说来，对海洋帝国而言，抓住技术创新之先机远比开疆拓土、扩张领土领地更为重要。海洋帝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它需将运用最新造船工艺及武器制造技术所耗费的资源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便腾出一部分资源注入新技术的开发，并抢在竞争对手之前将新技术大量投入运用。所以毫不奇怪，第一次大规模军备竞赛正是发生在海军领域，即大不列颠和德意志帝国之间。[\[4\]](#)

作为帝国统治的新领地，领空乃至外太空被先后开发，科技优势的重要性随之一步又一步提升。如今，领土边界上的过度延伸问题已经没那么重要。这样一来，收缩边界也就不再是解决帝国过度延伸问题的方案了。严格说来，如今的美利坚帝国只剩下一些虚拟的边界。它们是根据潜在反对力量所拥有的武器技术，准确地说是核武器及核武器投送系统来划定的。除去上述这一顾忌，美帝国凭借对领空的绝对主宰力已慢慢成为一个无边界的帝国。倘若美国从它凭借强大技术优势获得控制权的区域中撤离，那已经无法套用所谓“拉直防线”的领土模式来解释了，特别是如果它从领空和外太空层撤离，将无异于宣告帝国权力的衰亡。

帝国过度延伸的真正风险在地面。因为，在地面要发挥技术优势，有一定的局限性。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反帝国行为体面对帝国的强大军队面无惧色。它们坚信通过积极备战，鼓舞将士为国捐躯，可以弥补其技术上的不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开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军队成功运用游击战术抗击了德国及其盟友的侵略军，由此开

启了一个游击战争时代，这个时代直到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才暂时谢幕。^[5]对反帝国行为体而言，历史的记忆仍历历在目，它们从中看到了胜利的微光。它们冀望 借用这一战术来扳倒哪怕最现代化的帝国。事实上，正是亚洲大陆上风起云涌的游击战大大加速了欧洲殖民帝国的朽亡。无论是越战中的美国，还是侵入阿富汗的苏联军队，面对当地巧用游击战术的对手，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交战数年下来，帝国雄师被拖得兵疲马困，只得黯然退场。

也就是说，拥有巨大优势的帝国在地面战中并非不可战胜。尤其是碰到坚韧不拔的对手，只要后者避开硬碰硬的决战，拖长战线，稳扎稳打，以弱胜强则不无可能。^[6]在历史上，这样的战例不胜枚举：比如日耳曼部族面对向威悉河（Weser）和易北河进犯的罗马人奋起抵抗，再比如西班牙反抗拿破仑军队的游击战，包括最终颠覆了欧洲殖民帝国的各地民族解放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反帝国行为体充分利用帝国过度延伸所暴露的问题，依托帝国触角深入腹地所造成的空间纵深，一举抓住帝国的软肋。因为帝国过度延伸，意味着补给线的延长；补给线越长，越容易遭受攻击。帝国在疆域上将触角伸得越远，留给反抗者以小股力量即可攻破的靶子也就越多。通过不断对这些薄弱点进行攻击，日削月割，也可最终重创帝国。除去少数例外，^[7]反帝国行为体在正面会战中罕有胜绩，它们的胜利是通过不断消磨对手的斗志和力量来获得的。它们拖垮了帝国，最终逼其撤离。

对于过度延伸问题，战争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论及常规作战方式时，用了“进攻顶点”（Kulminationspunkt）一词进行阐释。他认为，“进攻顶点”涉及的是 进攻力量削弱的特殊问题。这在他眼里也是战略上的一个主要问题。^[8]进攻者在敌方地盘挺进得越深，它的绝对力量减弱得越厉害。如果这种力量随着进攻的推进，减弱得并不像防御方那么快，也就是说绝对力量的削减换来了相对力量的上升，那么这时进攻方力量的减弱才没有超出它可以承受的范围。

然而，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这一原则仅适用于地域有限的作战情形。倘若对手拥有超大的战略纵深，双方的力量对比会完全颠倒过来：进攻一方推进攻势时，要比防御方防守时消耗更多的资源。即便如此，进攻方还是有机会达成目标，但必须满足一些条件，诸如对手已师老兵疲，厌战情绪高涨，再也无法弥补失地的巨大损失，且急于媾和。那么“进攻方可以像买东西一样获得一些媾和谈判时对它有利的条件，但这必须先以自己的军队为代价，付出现款”。^[9]

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攻防颇具商业意味的形象比喻，点破了过度延伸的关键问题：并非在任何情境下都要避免过度延伸，有时它也可以达到预期目标。但问题在于，必须提前付出代价。而这种投资是否值得，难以预知。因为成功与否，其实取决于对手的反应，这在事先恰恰是没办法确切知晓的。如果防御一方能扛到进攻方超过其“进攻顶点”，战局就会发生大逆转。防御方将予以反戈一击，而这种“反击的力量通常要比进攻者的攻击力量大得多”。^[10]所以，跟战略战术特点无关的是，游击战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拒绝媾和的一项“政治”决策。^[11]它的战略考量就在于让进攻方持续“付现”，但对手却始终买不进防御方求和或乞降的果实。于是被拖得兵疲马困，时间一长，不得不主动抛出橄榄枝或者直接班师回国。亨利·基辛格在他一篇著名文章里对这一问题做了总结。他说，参加常规战争的军队非赢即输，而对采用游击战的一方来说，只要保证没什么伤亡就是胜利。帝国过度延伸的风险正是这一机制运行的结果。

克劳塞维茨提出的“进攻顶点”的军事战略思想，直接启发了帝国过度延伸的理论。比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其著作中提到，美国受到一种“反弹”（blowback）威胁，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在那里，美国人已经跨过扩张的“顶点”，反击的威胁已经逐渐显露。^[12]一些批评者大声疾呼美国不应越过霸权的界限，追求帝国地位，否则一旦失败，连原来霸权的地位也要葬送了。^[13]这

一警告同样符合顶点和反击模式。在这些声音里，克劳塞维茨的定律被简化了：解决问题之道在于完全保持克制，哪怕接近“顶点”也万万不可。不过这并非克氏的本意。他的建议并不是让人们完全规避一切风险，相反他相信有时必须做一些冒险决定，才能克服某些挑战。他写道：“我们只消想想力量的等式是由多少要素所组成，那么就不难理解，在某些情势之下要断定交战双方孰强孰弱有多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往往取决于不十分可靠的想象力。” [\[14\]](#)

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依据的是领土的迁移模式。所以在他有生之年，他的理论都不适用于海洋帝国。而如今，随着领空和外太空的开发，领土对于军事力的意义已趋于淡化。但他的理论原则仍然适用于今天的政局，尤其是克氏提到力量的等式涉及诸多未知量，这一点时至今日仍具特殊意义。今天要判定这些未知量，无疑比他所生活的时代又难了许多。因此过度延伸问题所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自身兵力强弱与可控地域大小之间的对比。如今，它需重点考虑的是帝国政权的经济潜力以及民众的精神与“道德”因素。两者合起来，决定了政权的持久力。在游击战中，上述两元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游击战即便不能摧毁对手的政治意志，也完全可以消磨以至拖垮对手。 [\[15\]](#)

也就是说，帝国过度延伸的风险在于帝国可能陷入资源枯竭。反帝国力量越是了解帝国的底细，对帝国的哪些资源匮乏，哪些资源充足摸得一清二楚，那么帝国这种过度延伸的风险就越大。所以毫不奇怪，很多反帝国战争的领袖早在交战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蛰伏于帝国的中心，以摸清帝国的优势和软肋，做到知己知彼。然而，往往等不到帝国的物质资源消耗到足以威胁帝国安危，帝国中心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可能就已经突破极限。正因如此，现如今帝国民众的精神与道德面才成为反帝国力量攻击的主要目标。无论是游击战抑或是恐怖主义，都是一种以精神与道德为主要打击目标的策略。

就像中华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也曾被对手武力制服，做不到战无不胜。甚至连强大的西班牙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不例外。但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却是例外。对手无法在军事上征服它们，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不敢直接攻击英国，而是通过北非采取迂回战术，但同样收效甚微、事倍功半。大英帝国的衰落，其实是经济的衰落，从1914年到1956年，那是一个缓慢渐变的退潮过程。^[16]大英帝国经历了欧洲的两次霸权战争，大伤元气。又为争夺东亚殖民地，大战日本，损失惨重。高昂的战争代价严重削弱了整个国家，从此一蹶不振。面对接踵而来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它再也无力开展持久和坚决有力的镇压了，最终不战而退。^[17]从中，我们也再次领教了英国人不同于法国人的帝国智慧和远见：他们充分认识到，帝国的疆界已延伸过度，只得急流勇退。在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人决定放弃他们全球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任其走上独立之路。直到那时，恐怕还没有人会想到昔日庞大帝国的疆界会最终几乎缩回到其宗主国的边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想象着大英帝国会继续以“英联邦”的形式长存于世，而完全没有料到今天这个结局。^[18]

除了肯尼亚和缅甸等少数例外，英国人放弃了以军事手段来维系帝国的存续。而法国人则采用正好相反的策略。结果，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军事上失利，在北非的失败则同时来自经济和精神两方面。1954年5月，法军在连接老挝和越南的重镇奠边府投降，他们也由此彻底输掉了印度支那的战争。法国失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人拒绝为其提供后勤补给上的支持，令法国人在战事上无以为继。^[19]在阿尔及利亚情况则大相径庭。在那里生活着超过一百万的法国居民，他们出生于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取得了阿尔及利亚军方的大力支持以及中产阶层的广泛拥护，这些人真正关心的是获得完整的政治权利，而对（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毫无热情。然而持续八年之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让整个法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一方面，战争在经济上拖垮了法国；另一方面，举国上下人心涣散，士气低迷。这一切最

终导致1962年埃维昂协议（Evian）的签订，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20\]](#)虽然法国人在政治行动上坚决果敢，军事上也优势明显，但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是向世人昭示了一点：面对殖民强权，即便你军事上无法击败它，但能在政治上战胜它。阿尔及利亚人正是通过游击战争，在经济和精神上成功拖垮了法国。[\[21\]](#)

从越南到莫桑比克，从纳米比亚、安哥拉到阿富汗，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风起云涌的反帝及反殖民战争中，阿尔及利亚战争堪称典范。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那些游击队一次又一次把列强或殖民帝国在其本土之外的军事干预扭变为一种帝国过度延伸。在游击战中，军事力量的运用已大异于国家间的常规战争，它的目的不在于逼迫对手就范，以便将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于人，它的目的恰恰在于在经济上消耗对手，从而消磨并最终摧垮对手的政治意志。按照游击队的推算法，时间一拖久，帝国中心的人就会意识到，在边缘的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实在是入不敷出、得不偿失的糟糕之举。这样一来，帝国内部的反对政治势力开始抬头，这些人本来就无意为偏远的帝国边缘承受帝国大量投入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以美国为例，当年中产阶级大力讨伐政府的越南政策的呼声，似乎还依稀可闻。而在葡萄牙，是一帮高级军官发动了兵变，最终导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最后是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迅速终止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因为在他们看来，上述行动窒息了苏联内部革新的动力。

所以说，帝国的过度延伸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客观量，无法依照地缘政治学或地缘战略学的理论参数 度量和计算。二战期间，游击战策略重见天日，战后欧洲社会对和平的渴求，特别是全力重建满目疮痍的欧洲家园的决心，这些都极大促进了帝国过度延伸界线的重新界定。此外还有边缘民众在政治上的觉醒，于是突然之间，那些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都固属于帝国的领地就变成了被帝国过度延伸的土地。这正是当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观

点。他在1960年即将结束其非洲之行时发表演讲说，一股“变革之风”正横扫帝国之境。^[22]在那些从前怎么也谈不上过度延伸的地方，现在人们也一口咬定存在过度延伸问题。当然，这一方面归因为帝国中心的衰退，但另一方面，更得益于边缘的振兴和崛起。

中心的衰退，可以通过统计数据来解读，但边缘的壮大却不行。殖民地、保护国和托管地在脱离殖民统治之前，并没有出现所谓经济的起飞，真正让边缘壮大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的首先是它们追求独立的坚强意志以及为达目标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决心。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人曾仅凭数百文官和几千士兵即可统御泱泱疆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边缘对独立的追求引发帝国的统治成本剧烈攀升，另外它也导致帝国过度延伸的界线彻底发生迁移。

那些在苏联解体之后坚信帝国时代已成明日黄花的人，^[23]主要依据的正是我们在上面所叙述的种种时局的发展变迁。然而他们恐怕忽略了一点，即帝国的过度延伸其实是一个动态变量，它会随着冲突各方的资源变化，也会随着动用资源的意愿变化而发生改变。不独如此，它还会随着帝国统治形式的改变而变化。帝国统治形式一经改变，统治的资源和反抗的资源之间优劣多寡的关系都要重新评估和权衡。当美帝国从领土统治转向了流控制（资本流、信息流、商品流和服务流），当它放弃在地面控制疆域，转向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领空乃至外太空控制上，传统游击战损耗帝国统治成本的功能就大打折扣了。如今，它已逐渐沦为军阀们发动资源战争的一个工具，^[24]却已无法撼动美国权力对全球的控制。隐形轰炸机和巡航导弹都是游击队怎么也奈何不了的武器，如果反抗一方的军事目标远在冲突地区之外，完全遥不可及，那他们即使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持久支持，也是杯水车薪，对战事的走势影响甚微。

一直以来，帝国致力于塑造一种非对称优势，将过度延伸界线往外推移，从而打破那些原本封闭的空间，开拓全新领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身上找到佐证。跟对手相比，它们的军队组织得更高效、装备更优良，往往领导也指挥更加得当。但是最关键一点是它们能长久保持这一优势，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能将优势制度化。诚然，这仅仅是一种相对微弱的非对称优势。^[25]对手只要不懈努力，迎头赶上并非没有可能。比如说，照搬帝国的军事组织为其所用，比如诱拐手艺人 and 工程师入境，让他们把一身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帝国的对手。^[26]

对于海上霸权来说，帝国权力的非对称优势表现得突出很多，它们那装备火炮的战舰就代表着一种身处边缘的潜在对手所无法企及的技术。而且对手根本不具备掌舵这些战舰的航海能力。^[27]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这种巨大的不对称很快扩展到了地面战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898年的恩图曼战役（Omdurman）。在此次战役中，基奇纳伯爵率领的英国远征军借助重炮和新锐武器——马克沁机枪的优势一举击败了兵力数倍于己的马赫迪军队。然而，真正体现非对称优势的并非孰胜孰败的战果，而是双方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落差何等之大：英方仅仅损兵48人，而苏丹军队阵亡人数则高达13000。^[28]

面对拥有非对称优势的对手，如果身处边缘的反帝国行为体以对称方式进行对抗，将注定会失败。只有避开大会战，不跟对手正面交锋，转向袭击敌人的补给线，攻打它们分散的小股部队，从而造就有利于己方的非对称作战情境，这样才能弥补一些技术和组织上的不足。随着帝国在技术上的改进，战略战术的创新，以及帝国控制手段的改变，同时也受到反帝国行为体政治动员能力的影响，帝国的过度延伸界线一次又一次发生推移。有人说，如今这种推移已经骤然减速，几乎停滞不前，或者已经与主权国家的边界合而为一。显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诚然，帝国过度延伸的新界线或许不再体现在

地理版图上，而更多体现在对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在信息竞争中胜出，以及在技术革命和战略创新中先人一步。总而言之，在技术革新和战略战术创新方面的竞争依然会如火如荼地继续下去。

[1] 吉本的著作不久以前出了一个德文译本，一直叙述到西罗马帝国灭亡，Gibbon: *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Römischen Imperiums*。

[2]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Staatengemeinschaft oder Imperium*。

[3] 参见Modelski: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第27页起若干页。

[4] 参见Massie: *Die Schalen des Zorns*, 第40页起若干页，第506页起若干页，以及第573页起若干页。

[5] 参见Heilbrunn: *Die Partisanen in der modernen Kriegsführung*; Schulz: *Partisanen und Volkskrieg*; 本书作者Münkler: *Der Partisan*。

[6] 对此现在冒出一个流行的集合概念，即“低强度战争”（low intensity war），这方面内容可参见Creve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 第57页起若干页，第171页起若干页。

[7] David将所有的例外情况——从条顿堡森林战役到越南奠边府战役，看成是帝国行为体过于自负的结果，参见David: *Military Blunders*, 第221~287页。

[8] Clausewitz: *Vom Kriege*, 第877页。

[9] Clausewitz: *Vom Kriege*, 第879页。

[10] Clausewitz: *Vom Kriege*, 第879页。

[11]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讲完“向本国腹地退却”后，紧接着用一章内容阐述了“民众武装”。在他看来，向本国腹地退却和民众武装在功能上是相通的：倘若缺乏向腹地退却所需的战略纵深，那么必须以民众的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获得补偿。因此游击战的政治逻辑在于：“无论一场战役有多关键，一个国家都不应将自己的生死存亡全部押在某一场战役上。即使吃了败仗，也还可

以再积蓄出新的有生力量；静待对手因每一次进攻而自然削弱，或是从外界获得支援，这些都可能扭转败局。在灭亡之前，总有一点时间可以争取。就像濒临溺水的人会出自本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在道德世界的自然法则中，任何一个民族在被逼到悬崖边缘而无路可走时，同样也会不顾一切试遍所有自救之策。”（同一出处，第805页）。帝国在其边缘地区遇上这样困兽犹斗的民族时，将面临帝国过度延伸的巨大危险。

[12] Johnson: *Blowback*.

[13] Johnson: *Blowback*, 第41页起若干页。

[14] Clausewitz: *Vom Kriege*, 第879页起。

[15] 在克劳塞维茨之后，军事历史学家汉斯·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对歼灭战略（*Niederwerfungsstrategie*）和消耗战略（*Ermattungsstrategie*）进行了区分。他把前者称为单极战略，因为其目的仅在于彻底摧毁敌军；而消耗战略具有两极性，即根据双方力量的对比和各自政治意图，既可通过军事手腕消耗拖垮对手，也可能诉诸一决胜负的大决战。参见 Delbrück: *Die Strategie des Perikles*, 第27页起；详述参见 Lange: *Hans Delbrück und der “Strategiestreit”*。当然有鉴于近些年来游击战的新形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在消耗战略里，同样存在着向单极化演变的趋势：只要游击队面临的不是当地武装，而是帝国的战争机器，那么就几乎没有发生大决战的可能。

[16] 在这里，1914年指的是英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相信自己受到了德国的威胁（参见 Howard: *Kurze Geschicht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第23页起若干页）；而1956年指的是苏伊士运河危机那一年 [见本书下文，第221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17] Ferguson: *Empire*, 第352页。

[18] 对这种自我欺骗抱以同情的态度，参见 Porter: *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19] 参见 Frey: *Das Ende eines Kolonialreichs*。

[20] 参见 Rémond: *Frankreich im 20. Jahrhundert*, 第543页起若干页，第561页起若干页。

[21] 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简明扼要而又鞭辟入里的分析，参见Aron：*Clausewitz*，第496～504页。

[22] 引自Ferguson：*Empire*，第352页。

[23] 见本书下文，第216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24]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Kriegsszenarien des 21. Jahrhunderts*，特别是第84页起若干页。

[25] 在文献资料中提到对称与非对称概念时，一般都是非此即彼，这样一来人们就忽略了非对称还有强弱之分。只有灵活运用这对概念，才能真正发挥其学术分析价值。

[26] 特别是在中国北方的华夏边缘，劫掠手工艺者和工程师曾是活跃在那一带的游牧民族用以弥平同中原之间差距的惯用伎俩。参见Merson：*Roads to Xanadu*，第54页；这样的手段奥斯曼人也不陌生。经常会有一些来自“西方”的铸炮师来到奥斯曼帝国，为其服务。不过这些人一般不是绑架而来，大多是被收买进来的。参见Cipolla：*Guns, Sails and Empires*，第94页起若干页。

[27] 参见Nef：*Western Civilization*，第84页起若干页，Cipolla：*Guns, Sails and Empires*，第101页起若干页。

[28] 这些数据可见于Schweinitz：*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India*，第242页。恩图曼战役（Omdurman）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丘吉尔那篇脍炙人口报道。在两年之前意大利人在阿杜瓦（Adna）一战中负于埃塞俄比亚人，这已经反映出欧洲殖民强国并非战无不胜。对此，参见Brogini Künzi：*Der Sieg des Negus*。

/ 政治动员与军事非对称化：反帝国行为体的策略

帝国出于生存需要一直竭力将其竞争对手，特别是潜在的反帝国力量排除在与军事有关的技术革新浪潮之外。^[1]帝国的领先地位越是建立在技术优势的基石之上，它们越是在保密和防扩散上处心积虑、大做文章。然而在欧洲的国家体系之中，这种排他式做法从未得逞。所有开创性的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几乎都在一夜之间传遍欧洲——至少在西欧和中欧地区向来都畅行无阻。^[2]或许正因如此，欧洲才没能孕育出一个长盛不衰的大帝国。或者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欧洲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大帝国，才从根本上杜绝了技术排他式行为。对于在对等性条件下彼此竞争的主权国家而言，“统治秘术”涵盖了从战争预算、同别国所立的秘密协议，到战时方针和危机对策等诸如此类的内容。^[3]而对于统领自己“世界”的庞大帝国来说，“统治秘术”则是优势技术的秘密，在任何时候帝国都必须对此守口如瓶。

守住秘密的一大法宝是给予安全保证：帝国承诺保护其盟友免受攻击，同时它阻止盟友们赶超帝国先进技术水平的努力。这些盟国友邦赶超帝国技术水平的潜力越强大，帝国就越主动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在冷战时期为西欧和日本撑起的“核保护伞”。通过让众盟友从帝国的领先优势中获得实惠，帝国换得了对其领先地位的维系。^[4]作为回报，其他国家（除法国外）也乐于将放弃发展核武器技术的承诺“卖”给帝国；它们则可以将省下来的资金投入其他领域的建设或者用于提高社会福利。人们把这种帝国政策称为“受邀帝国”的政策。如前文所述，它最早可上溯至古代雅典人的同盟政策。^[5]

如果较弱的竞争对手或者干脆是反帝国行为体通过大力发展武器系统，一步步以“对称敌手”的身份来抗衡帝国，最终达到化解帝国

非对称军事优势的目的，这种局面将会令帝国头痛得多。当然最棘手的是那些行为体发展核武器及其投送系统。以朝鲜为例，如果它没有核武器，在国际政坛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支区域性力量。而这种情形也适用于任何一个穷国，如果没有关乎世界经济发展的矿藏，本身根本无法引起世人关注。但核武器，或许可以说是那些战略资源的等价物，拥有它可以弥补战略资源匮乏的先天不足。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核武器让一个弱小的弹丸之国在即使面对庞大帝国时也显得坚不可摧，并且让它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隐隐威胁着帝国的安全。正因如此，很多国家不愿安守在帝国或地区霸权的保护伞之下，它们对于建立自己的核武库孜孜以求、雄心勃勃。

面对这样的形势变化，没有哪个帝国可以无动于衷。因为长此以往，帝国自身的威望和权力势必受损。于是帝国自然积极应对，以图改变。以美国为例，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步一步——先是试探性地，然后愈发旗帜鲜明地——通过订立各种条约，从防扩散政策过渡到更主动的反扩散政策（Counterproliferation，也就是说在具备核潜力的国家研制出核武器之前，对其实施军事打击）：一旦有谁拒不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暗地里 或者公然违反条约规定，或以其他方式暴露出加入核武俱乐部的端倪，都会立刻招来美国雷霆万钧般的打压。可以说，没有任何领域能够如此清晰明白地反映出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仅体现在它们目前的大小和强弱上，还体现于在将来变得平等的可能性上。防扩散和反扩散政策其实都是积极“阻止平等”的表现方式。在这个时候，所谓不能让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说辞，常常被拿来当作一个借口，以阻止别国拥有核武器。

从核威慑政策到防核扩散政策的转变，首先表现为核武库的转型：不足1000吨当量的小型战术核武器诞生了，包括强力钻地核弹——号称“掩体粉碎机”——成为实施反核扩散政策的典型武器。与

此同时，旨在反扩散的“裁减军备战争”（Abrüstungskrieg）概念也渐渐大行其道。2002年9月，布什主义登场，[\[6\]](#)对存在已久的各种变化趋向做了总结并将之纳入美国政策的政治指导方针中。[\[7\]](#)

落实布什主义中的防扩散和反扩散政策，有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美国非对称的军事优势——不仅是核武器上的优势，同时也体现在常规军事领域。美国独霸外太空为其国防优势提供支柱，无须与敌人短兵相接，它就能帮助美军轻易接近作战目标。由此便可避开对手游击战的天罗地网，并且完全不给对手攻击补给线、据点及小股部队的机会。特别是高科技武器和特种部队的运用，让对手通过非对称化策略来化解美国非对称优势的努力几乎化为泡影。[\[8\]](#)美国希望以最少的损失，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损失一大，战事一拖久，其国内民众对战事的热情就会急速降温，他们对军事行动的政治支持也会随之消失殆尽。这也正是那些在边缘发动戡乱而非掠夺战争的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而且帝国政府越民主且民众后英雄主义的心态越重，那么帝国这一软肋便越容易遭受攻击。

弱国通过研制或购买核武器及远程导弹，以求获得与帝国军事相对平等的地位，这可以视作一种“重建对称”的努力。这项政策望到头，就是地球上所有国家都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世界政治将重归相互对称的棋局。通过核武器扩散来重建对称，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极端方式建立国际政治关系。拥有了核武器，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如人口、经济实力、常规军队及国土面积等，瞬间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至此，在权力政治中唯一的差别就是每个国家的核武威力了。正如英国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揭示的那样，处于自然状态的芸芸众生都是平等的，因为谁都可以杀死他人。即使弱小之人也可以巧用阴谋诡计，干掉最强大的个体。[\[9\]](#)我们不难想象，按照这个思路，如果每个国家都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就会造就国际政治关系的一种极端平等状态。然而一旦出现这种平等状态，霍布斯所

说的自然状态也会随之降临人间。我们将“永远生活在暴力死亡的恐惧中，人人自危”，“人类的生活……将是孤独、贫困、齷齪、野蛮和短暂的”。[\[10\]](#)

倘若只能让所有国家拥有核武器来重建世界权力政治的对称性关系，那么这种对称重建本身就没有什么政治吸引力可言了；更何况，即使拥有核武器，国家仍有可能遭遇覆亡的灭顶之灾。而且，核武器完全有可能会流入次国家行为体，甚至私人组织手里，后果难料。

[\[11\]](#)正因如此，美国旨在维持帝国非对称优势的核不扩散政策，以及它主动的反扩散政策，即使在那些对美国的帝国主宰地位本无好感的地方，也能赢得广泛支持。帝国以自身的权力政治利益为出发点的不扩散政策，反倒让它创造并收获了一种公共产品：避免核战争的相对安全。倘若没有帝国的支配性权力作为后盾，我们真未必敢奢望这样的安全感。

由于重建对称之路行不通，反帝国行为体只得另做他想。如果它们不满足于游行示威，即发动世界舆论来反抗帝国中心，还要以暴力相抗争的话，那么摆在它们面前的将是一条建立“系统性非对称”的路。[\[12\]](#)因为无论是武器技术还是军事组织，它们都无力撼动帝国政权的根基，它们不得不尝试以持久的小规模战争方式来消磨帝国的斗志，并最终拖垮它。在20世纪下半叶，非对称化的最重要策略非游击战莫属。如今有迹象显示，它有被恐怖主义取代的可能。[\[13\]](#)关于游击战和恐怖主义在政治战略上的差异，我们后文还会讨论。在这里，我们先来谈谈两者的共通之处。

无论是游击战争还是恐怖主义，都极力避免与前来进攻的强国的专业化战争机器正面交锋，它们躲在暗处，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与对手周旋。通过持续不断的奇袭突击消磨敌人意志，破坏敌人的供给线。非对称化战略的目标是不断增加作为攻方的强国的资源损耗，尤

其针对攻方在资源上最脆弱的点。增加对手的资源损耗，固然可以通过直接进攻并造成对手有形损失的方式达致，但也可以借助挑衅战略来实现：激怒对手，使之反应过度，从而将它拖入帝国过度延伸的泥淖。

游击战和恐怖主义作为反帝国战争的非对称方式，一般来说会极力否定帝国的和平承诺，驳斥和平承诺背后的安全保障。在中心、边缘以及在边缘之外，那个令帝国秩序极具吸引力的要素一旦被毁，那么从中长期来看，民众对整个帝国秩序的认可和接纳也可能随之消散不存。如果帝国无力兑现承诺，或者说兑现承诺的成本太高，甚至以牺牲公民自由权利为代价，那么民众便会收回对帝国秩序的支持和认可。甚至要不了多久，来自中心的支持都会发生动摇。换言之，非对称的暴力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激发民众寻求帝国秩序外的替代秩序，其战略“目标”则是在经济上、精神上消磨对手，拖垮帝国境内的民众。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则是形形色色的暴力渗入，以扰乱帝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14]

弱小者通过非对称化战略建立起来的威力，主要由两大元素构成：一方面，它们想方设法让帝国显得外强中干，绝没有它所宣称的那般坚不可摧、战无不胜；另一方面，它们给帝国施压，诱使帝国继续扩大某些优势来增加它的负担，从而使帝国行动越来越难以为继，最终陷入过度延伸和过度承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这两个元素中，前者主要是象征性的，后者则基本是工具性的。但从实际结果上看，两者可谓殊途同归。借用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概念来说，结果都是导致帝国以“硬实力”取代“软实力”，统治成本因之不断攀升。非对称战略最终是要迫使帝国为了实现统治成本最小化，不得不再次从已经跨过的奥古斯都门槛上折回。^[15]这一目的一旦达成，反帝国一方相当于推了世界帝国一把，加速后者从权力之巅的坠落。而且这种坠落不再缓慢而漫长，而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然而反帝国

行为体能否得偿所愿，不仅仅取决于它们自身的能力和手腕，同时还得看帝国如何应对。无论是对称冲突还是非对称冲突，都依循行动与对抗行动的模式进行，双方都有机会挫败对方的预谋，让它竹篮打水一场空。只不过非对称冲突的竞技场不同于对称冲突，遵循的是另一套竞赛规则。

冲突双方的非对称性尤其体现在它们使用暴力的正当性上。双方都极力将对手贬为邪恶的化身，帝国擅长的恶魔论前文已有讨论，[\[16\]](#)而反帝国一方也不甘示弱，同样祭出它的恶魔论，而且几乎同出一辙。重点都是将对方妖魔化，同时将自我神圣化。在双方日益加深的敌意中，对称性和对等性明显缺位。

在反帝国行为体眼中，帝国在本质上就是压迫奴役和掠夺的手段与形式，而帝国自诩创造的诸如和平与安定等所谓公共产品，只不过是为了给帝国中心带去实惠，而边缘则遭受系统性冷落。这一点早在经典反帝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中已有论述，它将帝国秩序称为“各国民族的牢笼”。[\[17\]](#)到了20世纪，在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中几大帝国都轰然崩塌；然而民族主义自己也没能运用其青睐有加的民族国家政治秩序模式，创造出稳定的世界秩序来。就在帝国势力被民族主义赶跑的那些地区，民族主义自己后来也惨遭滑铁卢：在巴尔干半岛、近东和中东地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莫不如此。而在这之前，民族主义曾因解放民族自决权的感召而释放出惊人的威力和无穷的能量。正是这种威力和能量击倒了沙俄、奥斯曼帝国及奥匈帝国，也摧垮了欧洲诸多殖民帝国。

大多数时候，民族主义反帝思潮都伴有社会主义帝国批判的影子。不过社会主义批判的矛头对准的主要不是民族压迫，而是帝国在各地的掠夺及剥削的民族等级制度。此外在那些被帝国推动了现代化的边缘，帝国颠覆了当地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在那里游击队恰以民

族传统捍卫者的身份应运而生。基于这种挽救传统和祖法的诉求，游击队获得了民众的强烈支持。^[18]所有这些对帝国秩序的批判合力剥去了帝国秩序的合法化外衣，鼓动帝国边缘的民众奋起反抗，最终脱离帝国，战胜帝国。由此而生的大小战争和起义都以民族解放战争之名获得了正义性，加上自由之概念又在现代社会获有崇高价值，所以起义者得以充分动员民众，获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站在帝国的角度看，在四海鼎沸的纷争中帝国秩序受到干扰和破坏，为了维护帝国四境之内所有良民的切身利益，有必要采取行动捍卫这一秩序。也就是说，帝国感到职责在肩，必须以无情的铁腕还击那些破坏帝国秩序的敌人。正因如此，帝国和平化的戡乱战争被认为是正义的，而这个“正义战争”的概念确实也正是紧随帝国秩序之成形而诞生。以罗马为例，在扎马战役（Zama）中罗马完胜了同它争夺西地中海霸权的最后一个劲敌——迦太基，在此役获胜之后，罗马人提出了“正义战争”的理念。自此以后战争牵涉的就是戡平或扫除帝国和平的破坏者了。

在观念史的层面上，正义战争这一概念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巴内修斯（Panaitios）和波利比乌斯。这两位从异邦远道来到罗马的斯多葛派学者对这一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西塞罗则将他们的观点发扬光大，发展成正义战争的理论。^[19]诚然，从现实政治角度看，这个理论的提出正呼应了罗马在地中海地区所取得的帝国地位。按照这一理论的说法，发动帝国战争并不是出于对称的法理依据，即两个人的决斗，而是一种打击罪犯的行动。可以说，法律依据上的非对称性为构建正义战争理念夯实了基石。这一理念，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帝国战争史。在西班牙，它受到萨拉曼卡学派（Salamanca），尤其是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推崇；^[20]在大英帝国，拥护帝国统治的知识分子成为它的新门徒；它在苏联的意识形态中，以及在美国的保守主义理念里，也都留下了飞鸿雪爪。^[21]

因此在帝国战争及反帝国战争的非对称局面背后，对应的正是战争合法性上的非对称：在这些战争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种将对手罪恶化的强烈倾向。敌与我绝非同类，当然也就否定了敌人作为战争方的正义性。结果就是，战争法的规定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对战争难有约束。造成这一局面的症结在于，在帝国战争及反帝国战争中，交战双方实力完全不在一个等级。战争目标有天壤之别，作战原则也判若云泥。发动游击战等于暗中打破国与国交战的“对等性规则系统”，游击队的威力也由此而来；在这一点上，恐怖分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他们恪守交战之正道，将毫无胜算可言。不过，同反帝国行为体交战正酣的帝国军队在遵守战争法这一点上，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也并没有遵从法则的责任感，而且面对神出鬼没的对手持续不断的零敲碎打，常常恼羞成怒，以致反应过度。展开帝国战争及反帝国战争的史卷，我们看到一帧接一帧的大屠杀影像。如果这些大屠杀并非全然出于发动者的恐慌而是具有某种军事意义的话，那么这种军事意义就在于屠杀所造成的恐怖阴云，它让笼罩其中的民众再也不敢支持敌人了。

另外，帝国战争及反帝国战争的非对称性还体现在战争双方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将民众卷入了战事。从中心的视角看，战争是边缘地带的骚乱，帝国的战争机器会很快出面平息，而不应惊扰到帝国众生的安宁生活。而反帝国行为体则不同，它们恰恰要唤醒战火即将烧及的地区之民众，充分动员群众服务于它们的战争目标。倘若宣传手段未能调动起民众，它们也会让老百姓看到帝国强权采取的种种压迫手段，以证明其所谓“帝国秩序不堪忍受”所言非虚。否则的话，反帝国战争在一开始就宣告失败了。反之，一旦帝国边缘的民众，哪怕只有一部分听信了它们的鼓动而认为反帝之战非打不可的话，那么一场冲突将一触即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很快变成帝国身上一处不断化脓的伤口。

无论是游击战还是恐怖主义，都将矛头对准帝国相对短缺的资源。在反帝国战争史上，帝国紧缺的资源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条普遍规律，即一种普遍稀缺的资源是跟智慧和远见直接有关的政治专注力。因为帝国的中心对信息加工和判断的能力总是很快就捉襟见肘，尤其在帝国面对多个边缘地区同时发生反帝国叛乱的挑战时，这一宝贵资源更是急速消耗一空。

关于这种认知超负荷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当年肯尼迪政府介入越南战争之动因。当时他们并未搞清楚真正的敌人是谁，应以何种方式参战，就贸然踏上了越南的战场。^[22]对肯尼迪和约翰逊

（Johnson）两位总统以及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来说，发生在越南的冲突是当时全球范围东西方冲突的一部分。然而这却是一个误判。事实上，恰恰在美国先派遣军事顾问，再继以空中打击，最后部署地面部队登陆等一系列愈演愈烈的行动之后，这一冲突才升级为东西方冲突的一部分。于是，到了这个时候苏联和中国虽不直接参战，却也不失时机地假借北约政府之力，暗中使劲，力图将美国拉入旷日持久又劳民伤财的消耗战中。对于越南大部分民众而言，冷战中的东西对抗并非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打的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就像当年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那样，只不过这次的敌人换成了美国。正因如此，他们英勇无惧，即使付出惨重代价，也在所不惜。无论战事如何一步步升级，他们都绝不在政治上让步分寸。而美国人打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让北越政府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就能逼迫北越政府放弃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23]的支持和援助。这样就等于切断了美国在南越的对手的生命线，胜之当易如反掌。然而事实却证明，这只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对美国而言，尤其在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看来，越战属于“工具型战争”（instrumenteller Krieg），目的在于达成一个既定的政治目标，即维持“北越属东方阵营，南越归西方阵营”的现状。相

反，对越南人而言，这是一场“生存性战争”（*existenzieller Krieg*），关乎民族生死存亡。^[24]美国政府在给战争定性的时候，正是没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帝国精英的所谓认知超负荷，主要就是说他们在面对泱泱帝国所卷入的形形色色边缘及边界冲突时，习惯了用一成不变的模式来思考、分析和判断。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对于资源更为雄厚的美国来说，越战只能算一次严重失利。而阿富汗事件则直接为苏联帝国敲响了丧钟。^[25]无论是越南还是阿富汗，作为弱小者它们都从强者的误判和失算中汲取了力量。

美国和苏联分别在越南、阿富汗所得到的教训，在本质上其实不过是欧洲殖民列强20世纪40年代晚期至60年代早期所遭遇之滑铁卢的翻版。这些教训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对于现代帝国来说，当一个体量较大的地区充分动员了它的民众使之群起反抗帝国中心政权之时，帝国若还要将其控制于股掌之间，则比登天还难。而这样的反抗往往也奏响了帝国在这一地区统治的尾声。^[26]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20世纪反帝国行为体的成功要素迥异于更早的历史时期。在20世纪之前的时代，面对边缘人民的揭竿而起帝国列强报以铁的手腕，血腥镇压，继而建立专制政权，将所有叛乱皆扼杀于萌芽中。直到20世纪初，英国人还有孔武之力，将南非布尔人的抗争镇压下去，从而一举恢复其帝国统治的稳定。在布尔战争中，英国为了彻底消灭游击队的活动基础，釜底抽薪，不惜将布尔平民，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统统赶进“南非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里。在这些集中营里，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很多人在此悲惨死去。^[27]但随着全球媒体网络连成一体，尤其在六七十年代出现视听新媒体以后，英国人还像从前那样长期执行这类政策，那将是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死亡，一旦这些影像进入人们的视野，恐将激起帝国中心民众潮水般的声讨。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相信无须多久帝

国就不得不打开集中营的大门放人。因此可以说，如果布尔战争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英国人不大可能会打赢。

布尔战争的例子之所以发人深省，还有一个原因：战争中布尔人巧妙运用了各种作战手段，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手段几乎成为打赢反帝国战争的法宝。诚然，反帝国战争的胜或败并非完全取决于军事战略战术上是否有出其不意的创新手段。在20世纪，弱势一方已完全指望媒体来增加这种敌我力量悬殊之战的胜算，但在20世纪之前呢？我们不要忘了，就连美国移民也主要是借助了游击战才击败英国，从而赢得独立的。

对此当然会有人反驳，他们会认为倘若没有法国人施以援手，在战争的决胜阶段控制了东岸附近海域的制海权，从而在约克镇逼降英军，美国人能否打赢独立战争还是未知数。[\[28\]](#)相形之下，当初布尔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没有从其他强国（比如德意志帝国）那里获得那么有力的援助，这也大大限制了他们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持久战斗力。更为致命的，恐怕是布尔人仅拥兵三万，且在战争期间始终无法在国内赢得广泛政治支持。为此，他们不得不倚重黑民众的力量，而后者对布尔人的压迫之恨竟尤甚英国人。而布尔人在战争中吃败仗，还有一点是因为他们虽然在技术层面采取了游击战战略，却没能启动游击战的“政治升级机制”。这一机制一旦运转得力，会让帝国政权随着战争的深入从戡乱力量慢慢蜕变为一种镇压势力。这就必将帮助游击队不断收获来自国内的更多支持和同情。

令人诧异的是，在关于游击战的文献中[\[29\]](#)对于这种政治升级机制鲜有论及：在反游击战中，帝国愈来愈背离战区的民心，一步步变成占领国。在此过程中，帝国恰恰自我否定了其作为和平力量和繁荣保障的形象。这正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经历的噩梦。

在18到19世纪之交的美国和西班牙大地上，游击战在小规模战争的实践中慢慢发展出其独有特色。^[30]实战证明，它是有效的反帝国作战形式。而所谓独有特色，就是它将军事和政治手段联系了起来，让帝国反抗者在游击战中明显获利，相反，帝国秩序的劣势则暴露无遗。从帝国认定其机构和人员遭到了暴力袭击而决定以武力平息暴乱的那一刻起，它与游击队之间的正义性便开始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种消长现象看作帝国和反帝国力量“非对称正当性”的肇始。在观念史上，这种非对称性随着18世纪自由理念的深入人心而应运而生，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深化。游击战让这种蛰伏已久的非对称性重见天日。也正是这一非对称性，在20世纪成为反帝国抗争的制胜法宝。

帝国一旦诉诸武力，便正好应验了反帝国抗争宣传机器此前所宣扬的内容：帝国控制一个地区，就是为了奴役其民众，掠夺其资源。所谓留在帝国卵翼之下便可获得种种好处，纯粹只是空中楼阁，遥不可及。或者说，这些好处只有那些与帝国交好的一小撮剥削阶层方可染指。而在反帝国宣传中，反帝力量承诺在赢得独立以后，连最普通的劳苦大众也将过上更好的生活。随着游击战遍地开花，在大部分国土上蔓延开来，帝国对游击队的每一次攻击都相当于应验了上述预言。当民众中沉默的大多数也开始转变态度，从最初不支持帝国的中立立场倒向支持反帝国力量的阵营，于是游击队因为受到攻击，反倒为自己赢得了民众越来越多的支持，汲取了越来越深厚的力量。

对此，当年的传统陆地帝国报以暴力的升级。手段之厉，可远远超出英国在南非之所为，以至剿灭一个地区的全部黎民，或为驱散整个族群，迫令其背井离乡、远迁他处。^[31]在弱小者眼里，《圣经》里所谓“驱散子民”的概念为帝国的这项政策提供了注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亚述人和新巴比伦人对犹太抗争者发动的大规模“种族清洗”运动。^[32]蒙古人也曾步其后尘，推行了类似的政策。

而“新世界”的征服者屠刀挥向印第安原住民，造成后者人口剧减。在19到20世纪，俄国人更以惨无人道的血腥手段奴役高加索人。奥斯曼帝国也不例外，面对民众的叛乱和反抗，统治者一次次诉诸民族迁徙和民族驱逐的伎俩。在一战期间，奥斯曼人对亚美尼亚族故技重演，随后演变为一场种族大屠杀。这血腥的一幕被当时的国际媒体传向了世界各地，对土耳其及其盟友的政治地位造成了巨大冲击。^[33]然而，在古罗马当维斯帕先（Vespasian）和提图斯（Titus）的父子兵镇压了公元66年到72年的犹太人大起义时，可就没有那样的控制机制（媒体）来约束他们了。起义被镇压下去，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政治社群也随之被连根拔起。^[34]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当年罗马帝国加在犹太人头上的这一举措才总算走到尽头。

此外，现代帝国在边缘发动小规模战争时，也会极力避免战争升级，即投入所有精良武器孤注一掷。因为那么做，显然不合比例原则，有大炮打小鸟之嫌。因此，美国一些政客和将领曾希望通过核攻击来迅速结束美国势力范围边缘的战争，他们在国内是不得人心的。这一点就曾经发生在一度广受爱戴的麦克阿瑟将军身上。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就曾力主美国政府对华实施核攻击。同样，后来在越战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 1964）、美国独立党（AIP）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及其副总统候选人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 1968）都曾呼吁对北越动用核武器，一招制胜。^[35]而真正阻止帝国在其边缘动用核武器的，不光是大家对地区冲突升级为超级大国间核战争的忧惧，还有另一种深入人心的理念：一旦动用核武器，将意味着美国人肩负的所有政治理想和道义，都付诸东流，彻底破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在边缘镇压叛乱，兴兵发难之际，民主帝国的自我约束恰恰让对手及反帝国行为体的胜算大增。

当然，一般以海洋和贸易为中心的民主制帝国在调整统治方式、转变控制手段方面有着昔日传统陆地帝国无可比拟的灵活性。民主帝国从冲突地区行政长官的角色退出，听任那里的民众走上政治独立之路。但不用多久它又卷土重来，而新的身份是商品流、服务流、信息流和资本流的操控者。这时候这些地区对帝国会产生一种柔性依附关系，无论是揭竿而起还是打游击战都无法消除这种依附，而反帝国斗争的那些传统利器在这时也就全无用武之地了。因为如今——如某些人所言——作为镇压力量的帝国已成历史云烟，或者是因为——如另一些人所宣称——帝国镇压和剥削的方式变得更精巧隐蔽、更有弹性了。在帝国势力范围的边缘上所发生的争斗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帝国的转变是真的从压迫和剥削者的角色到保和平促繁荣力量的脱胎换骨；还是说，它的改头换面仅仅是让其压迫和剥削的利爪深藏不露，可到头来终究还是本性未改、不离其宗。

[1] 对此及以下相关论述，参见Rosen: *Ein Empire auf Probe*，特别是第92页起若干页。

[2] 奇波拉（Carlo Cipolla）以制造铸铁大炮所需的技术能力为例阐明了一个问题：当英国和紧随其后的瑞典人成功地研制出质优价廉的轻型铸铁大炮，这种领先技术使他们一下子获得了相对其他欧洲竞争对手的优势。但事实上，他们随后便大量出口这种大炮，而掌握生产机密的工人也一同流向国外。于是在短时间内，欧洲所有国家都获得了这种质量上乘的铸铁大炮。参见Cipolla: *Guns, Sails and Empires*，第23~98页。

[3] 详述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Im Namen des Staates*，第280页起若干页。

[4] 参见Rosen: *Ein Empire auf Probe*，第96页。

[5] 关于这一概念，参见Maier: *Die Grenzen des Empire*，第128页。

[6]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eue nationale Sicherheitsstrategi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的部分内容刊登于*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2002年第11期, 第1391~1393页, 以及2002年第12期, 第1501~1511页;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Angriff als beste Verteidigung*。

[7] 关于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前世今生”, 参见Hacke: *Zur Weltmacht verdammt*, 第471页起若干页, 第576页起若干页。

[8] 参见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第288~292页, 以及Priest: *The Mission*, 特别是第121页起若干页。乌尔曼 (Harlan Ullmann) 惯用的Shock and Awe (震撼与威慑) 和“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 (达成快速掌控) 两个短语道出了在边缘随时可以建立帝国优势的战略思想。

[9] Hobbes: *Leviathan*第1卷第13章, 第94页。

[10] Hobbes: *Leviathan*第1卷第13章, 第96页。

[11] 没有领土束缚的政治行为体因为没有遭到核攻击的担忧, 因此可能对核武器的使用方式迥异于普通国家, 而且它们还会使那些受领土束缚的国家长期处于核敲诈的阴影之下。对此参见Behr: *Entterritoriale Politik*, 第75页起若干页, 以及第119页起若干页。如果核武器在全球扩散, 可能会出现很多国家对核武器的控制和保护不力的情况。而一旦核武器失窃, 流入犯罪分子手中, 他们则可能向某些国家甚至所有国家去索要赎金。

[12] 参见Schrofl/Pankratz主编: *Asymmetrische Kriegsführung*。

[13] 下文中列出的观点详见本书作者Münkler: *Ältere und jüngere Formen des Terrorismus*, 以及同一作者的*Terrorismus heute*以及*Wandel der Weltordnung*。

[14] 这一看法秉承了克劳塞维茨的三段论: 目的、目标和手段。按这一理论, 目的是“通过”战争达致; 目标则给出“在战争中”应达致的成果。参见Clausewitz: *Vom Kriege*, 第200页起。

[15] 见本书上文, 第112页 (原书页码, 即本书页边码) 起若干页。

[16] 见本书上文, 第149页 (原书页码, 即本书页边码) 起若干页。

[17] 参见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第50页起若干页;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第136页起若干页。

[18] 参见本书作者Herfried Münkler: *Partisanen der Traditionen*。

[19] 参见Olshausen: *Das politische Denken der Römer*, 第510页起。

[20] 参见Pagden: *Instruments of Empire*。

[21] 对此所做的综合介绍, 参见Steinweg: *Der gerechte Krieg*和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关于美国人的自我认识, 参见美国知识分子在阿富汗军事干预之后和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发表的声明: What we are fighting for (我们为何而战)。

[22] 关于这一部分及以下部分, 可参见Steiniger的综述: *Der Vietnamkrieg*。

[23] 即“越共”。

[24] 对工具性战争和生存性战争的区别, 可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Instrumentelle und existentielle Auffassung des Krieges*。

[25] “从1988年开始, 形势越来越明朗, 即如果不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采取大幅度精简减负措施, 一方面会造成无法消弭长期以来剑拔弩张的地区冲突, 另一方面也不能减轻苏联的国家财政压力。从1990年开始, 苏联从第三世界很多地区仓促撤离, 而随着国家的解体, 它最终彻底放弃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政策。”Simon: *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sowjetischen Imperiums*, 第73页起若干页。

[26] 参见Schell: *Unconquerable World*, 第63页起若干页。

[27] 参见Ferguson: *Empire*, 第270~282页。

[28] 参见Tuchman简述: *The March of Folly*。

[29] 参见Hahlweg: *Guerrilla*; Heydte: *Der moderne Kleinkrieg*以及Kitson: *Low Intensity Operations*。

[30] 参见Kunisch: *Der kleine Krieg*, 第5~24页。

[31] 关于20世纪帝国推行的民族驱逐政策, 以及在后帝国空间发生的种族大屠杀, 参见Naimak: *Fires of Hatred*。

[32] 亚述帝国在提格拉·帕拉萨三世 (Tiglatpileser III) 和萨尔曼纳瑟五世 (Salmanasser V) 在位时期推行的统治政策, 主要基于一点: 驱逐征服地区的上层阶级出境, 从而抽空那里民众的组织 and 行动能力; 关于亚述人摧垮以色列的历史, 可以参见Noth: *Geschichte Israels*, 第233页起若干页; 古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对犹太地区也推行了类似的政策, 参看同一出处, 第253页起若干页; 同时可参见Hayim Tadmor 的文章, 见Ben-Sasson: *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 第166页起若干页, 第191页起若干页。

[33] 驱逐亚美尼亚人造成的死亡人数, 在20万到100万之间; 另外, 从19世纪晚期开始, 亚美尼亚叛乱者一直以各种恐怖袭击和游击战反抗并试图推翻土耳其统治, 而对于土耳其政府针对这些叛乱者采取的行动, 众说纷纭, 分歧很大。参见Matuz: *Das Osmanische Reich*, 第265页, 重点介绍了种族灭绝; 同时可参考Majoros/Rill: *Das Osmanische Reich*, 第360页。相反, Kreiser/Neumann, 第371~377页, 更多在当时高加索战事的背景下讨论了颁布于1915年5月的《特西尔法》(或称《驱逐临时法》) 关于18世纪以来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中的地位, 可参见Jorga: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第5卷, 第606~613页。

[34] Noth: *Geschichte Israels*, 第392页起若干页; 同时可参见 Hayim Tadmor的文章, 见Ben-Sasson: *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 第364页起若干页。

[35] 参见Angermann: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第313页起, 第400页, 第426页。

/ 文化认同之争与作为毁灭性战争策略的恐怖主义

自人类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之后，可以说无论结果是胜是败，战争往往都得不偿失。一个被战争蹂躏了的社会要恢复到战前的经济水平，可能要花上数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游击战争。只不过，由于反帝国游击战所发生的地区当时几乎都处于农业经济和社会制度之下，因此战争的中长期代价还不会立刻显现。另外，在那些地方当时还没出现工艺复杂、造价昂贵的工业设备；而且，所幸在当年去殖民化战争中，在街道和田野大面积布雷的做法尚属罕见。这种作战方式，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及 90 年代才在一些国家的内战中被军阀及其他战争方广泛运用。

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社会层面，其次才是经济层面。战争击碎了既有的社会秩序，销蚀了传统的权威，给至少一代人的成长刻上了深深烙印。以反殖民理论闻名的思想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认为，战争和暴力的环境造就自信与自由之人，他们能战胜殖民压迫所带来的屈辱感。但事与愿违的是，这种暴力环境给人留下的心灵创伤会成为重建新社会的阻力，而非动力。^[1]那些走出了战争阴影的人，往往都期待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获得补偿。他们很难让自己面对那横在前方的重建社会之重任，更意识不到开战原本的目的能否达成恰恰取决于他们的重建工作。至于在游击战中打下江山的老兵，始终是重建新社会和安邦固本过程中最大的负累。通常情况下，他们都要求国家资养他们的余生，也往往期待享有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好的物质待遇。这一切势必导致管理混乱和腐败的滋生。

在 20 世纪下半叶，通过游击战赢得独立的众多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在世纪之末达成或接近它们在独立之初所设定的目标。所以以为

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能改善帝国边缘的经济状况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予以反驳。虽然说游击战中民众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强大精神力量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技术和军事组织上的不足，增加了对手，即帝国强权的统治成本，最终迫使其知难而退；然而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战争对本国社会 深入骨髓的自我戕害。程度之烈，以至于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解放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依然遥不可及。

诚然，上述总结难免有种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处在那个时代的反帝国行为体没法跳出“此山”之囿，识得“庐山真面”。恰恰相反，受他们所崇奉的革命理论之影响，他们坚信自己所领导的民族抗争、游击战以及战争中的全民政治动员，都将直接推动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崛起。但这只是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2\]](#)

由此说来，对于20世纪末的反帝国行为体而言，它们其实有很好的理由远离游击战争。特别是当他们打响解放战争的初衷主要是最终改善冲突地区民众的经济状况，是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增加社会财富为己任的话，那么对游击战更应弃之如敝屣。只要它们还想投身世界经济发展的洪流，从中分一杯羹，它们就必须再次直面那些仍然掌控世界经济命脉的老牌帝国，同后者达成某种妥协而不是把那些强国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巨大影响力挡在门外。而如果它们希望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那里获得贷款的话，这种妥协与和解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3\]](#)

由此可见，游击战这种反帝国斗争形式充满着矛盾。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一度作为民族解放斗争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何以面临困境了。毕竟社会经济学思想更注重同帝国中心合作而非反抗帝国主义的剥削，所以本身即以社会经济课题为着眼点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论断已经不再适合为那种反帝国战斗指引方向了。事实上，早

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很多年，族群民族主义 和宗教性文化性的意识形态就已在反帝国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优点在于它们不以社会经济指数来衡量反帝国斗争的成败，对它们来说关键在于民族文化和宗教的认同感保持不失。对于这种以身份认同为指向的反帝国主义，我们无法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解释。在马克思主义之后，身份认同反帝国主义很快流行。在这一思潮影响之下，战争和暴力逐渐丧失其工具性意义，反倒获得某种生存性意义。也就是说，如今战争和暴力不再仅仅是达致某个特定目标或目的的手段而已，也成为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肯定的技术。谁没有这项本领，按它们的思路就注定衰落，至少会丧失掉自己的文化认同。于是，这种反帝国抗争的结果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为抗争而抗争。这种转变最为激烈的形式便是新型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自杀式恐怖袭击。

在富足世界的边缘，社会经济的变化带来了机遇，也潜伏着风险。在这样的情势下，文明、文化认同在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回答这个问题，对于认清未来世界的战争形态以及了解威胁帝国中心的恐怖主义将以何种形式出现，都非常关键。简而言之，如果上述这些国家的精英层把经济增长和物质富裕作为奋斗目标，那么它们与帝国中心之间达成妥协或者实现利益平衡尚有可能。反之，如果它们一门心思维护身份认同，竭力使之免受来自帝国中心生活方式的侵蚀和冲击，那么达成妥协、实现利益平衡的希望则极为渺茫。其实，随着经济、信息和媒体的全球化，西方的生活方式早已摆脱了一国一地的樊篱，必然跨越国界，无远弗届。这种生活方式的传播并不直接受政治的左右，它的动力源自经济领域和公民社会。前者表现在，通过西方商品打开新市场，于是西方生活方式随之而来。后者则表现为，引入大众教育的项目以及平权运动。除此以外，在 帝国秩序的边缘地区，总有那么一些举足轻重的集团和群体强烈推崇帝国中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且希望将它们移植到本土上来。因此在帝国边缘的社会领

域里展开的内斗才是反帝国行为体真正抗争的先声，选择怎样的价值观成为这场内斗的焦点。

在从前常规的内战中，抢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和社会价值之争往往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但如今我们不妨将帝国边缘地区的各种内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为争夺特定地区军事控制权的军阀之战。因为那个地区有令他们垂涎的珍贵矿藏或原材料。^[4]至于那里的民众价值取向如何，宗教和文化倾向怎样，根本不是这些军阀们关心的话题。他们推行暴政，鱼肉百姓，但对教化民众兴致索然。另一类内战则截然不同。掌控矿产资源以及夺取政治权力退居次要地位，民众的文化认同反而升至首位：包括在生活中恪守先辈之遗习，将宗教价值视为无条件承担之义务，抵制西方享乐主义的蛊惑，等等。

对于第一种内战类型，帝国中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大可采取隔岸观火之姿，置身事外。等到内战获胜方试图将他们通过战争夺来的矿产资源资本化，那么他们就会自动加入帝国的经济循环中。于是富足世界孜孜以求且赖以生存的原材料也会源源不断不请自来——无论哪一方赢了内战、掌了权。倘若帝国中心介入这种内战，一般也不是为政治或经济利益所驱使，而通常是因为某个军阀的残忍暴行完全超出了大众可以容忍的界限，于是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联合起来，吁请人道主义干预，以结束暴行。然而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干预总是姗姗来迟。特别是在速战速决的希望十分渺茫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至于第二种内战类型，冲突的焦点关乎规范和价值，同样帝国中心也无心介入。所不同的是，从内战冲突双方的角度看，帝国中心其实从一开始就已涉身其中。因为在反抗当地统治政权的起义者眼里，正是帝国中心的支持维系了统治政权的存续和稳定，于是这些抗争者也就自然成了反帝国行为体。他们奋起反抗和坚决抵制的，主要是从

帝国中心向边缘扩散的“软实力”。约瑟夫·奈曾经建议美国，若要维系权力，应多借助“软实力”，而非“硬实力”。^[5]在上述这种情形中，恐怕他的建议也起不了作用了。事实上，相比硬实力，软实力对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之影响，的确要大得多：硬实力只触及权力关系，而软实力改变的却是认同感。原教旨主义无论其形式如何多变，在本质上对抗的都是来自帝国中心的软实力。这种对抗并非一定要诉诸暴力，但帝国软实力所展现的强大渗透性，不断诱使反抗者将对抗升级为暴力行为。

一些原教旨主义组织为了捍卫其内在价值和社会取向，不惜挑起冲突。^[6]他们一旦认定帝国中心就是侵蚀他们倍加珍视的价值体系间接或直接的罪魁祸首，并确信武装斗争才是遏制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的不二之选，那么这时候他们便会成为反帝国行为体。这种以宗教和文化认同为指向的反帝国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当时，巴勒斯坦马加比家族（Makkabäer）揭竿而起，反抗塞琉古王朝

（Seleukiden）的暴政，这可视作这种反帝国主义的先声。^[7]在希腊文明四处渗透、传播的过程中，它最先为流散异邦的犹太人所接受，随后不久也为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Judäa）^[8]的上流阶层所吸纳，使他们成为希腊化派。然而在那些遵祖制守祖道的犹太群体眼中，希腊化威胁到了他们的文化认同，特别是对于他们严格尊奉的一神论来说，更是无法忍受，于是他们选择反抗。^[9]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

（Antiochus IV.）以严厉的手段镇压起义，这激起更多犹太人投入抗争的洪流。而且此后不久，犹太人的斗争转入了游击战。在荒芜的山区里，塞琉古王朝的军队只得散成诸多小股部队，分开作战。这正中犹太人游击队的下怀：战事一拖久，他们便尽占优势。还有一点对起义军也颇为有利，当时的塞琉古已国运式微，还面临腹背受敌之险境：在东面，它遭到安息国（帕提亚）的威胁，在西边，则与扩张中的罗马直接冲撞。而在自己王国的中心，权力斗争此起彼伏；统治层只顾眼前利益，决策时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在这样的条件下，犹太

抗争者负隅顽抗，在政治和军事上终于守住阵脚，最后赢得了政治和宗教自治权。

在犹太起义军当中，大家各怀不同的动机，或出于权力政治目的，或为宗教认同。但不管怎样，在起义之初，当弱小的犹太人游击队对抗强大的塞琉古王朝的军队，如蚍蜉撼树，胜算微乎其微。支撑众人奋不顾身、举起义旗的，毫无疑问主要是宗教认同。然而起义军后来走向分裂，散成两派：一边是温和派，只要塞琉古恢复耶路撒冷犹太教会自治权，不再插手大祭司的人选问题，即得偿所愿。另一边是激进派，他们的野心在于改天换地，为建成“神的国”铺平道路。最终他们在巴勒斯坦建成了一个大致独立的犹太人王国——哈斯蒙尼王朝（Hasmonäer）。这个王国的建立，还得益于塞琉古国内长达数十年之久的王位之争，它与罗马在近东地区的冲突也让其国力大折。这一切都让犹太人坐收渔人之利。当然，当时向东入侵的罗马人尚没有能力对整个塞琉古地区实行直接的政治控制。于是在这片“后帝国空间”里，哈斯蒙尼王朝竟见缝插针地存活了百年之久。

事实上，犹太人正是凭借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决心和意志，缔造了哈斯蒙尼王朝。诚然，当时有利的客观政治环境帮了他们大忙，但那并不能解释他们何以产生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显然，在此过程中，植根于族群内部的宗教认同之推动力发挥了远胜于政治的作用。而对于那些一心只为捍卫宗教认同而挺身反抗的犹太人来说，50年斗争最终所修成的正果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战争始于捍卫传统，然后很快走向极端化，最终演变为原教旨主义式的斗争。他们之所以明知胜算无几，却偏不肯草草放弃，也跟当时流传的“末世预言”不无关联。在《圣经》的“但以理书”里载有四大帝国及其末日来临的预言，这个传说恰恰诞生在马加比人起义的时代^[10]。^[1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加比一书、二书》（*das 1. und 2. Makkabäerbuch*）。一书以史学家的细节还原了整个起义的经过，二书则对事件来龙去脉做了

总结和梳理。两书都浸透了一种宗教和文化上的“反帝国主义”思想，批驳了在王朝四境之内对礼和法的一统化做法。希腊化世界主义在他们眼里无异于世界专制主义，应当群起而攻之。

马加比两书对起义事件的叙述，突出了其中的宗教认同问题，而不去深究冲突中的政治因素。塞琉古在文化领域的渗透和控制，让犹太人的逆反情绪日益高涨。最后，它在耶路撒冷兴建希腊式大竞技场，彻底点燃了犹太人的怒火，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那与神庙仅仅一墙之隔的竞技场里，竞技者赤身裸体，这一景象深深刺痛、激怒了虔诚的犹太人。尤有甚者，希腊式竞技场里供奉着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kles）之像，相当于在犹太人的圣城强行输入偶像崇拜，这更是犹太人无法忍受的。马加比一书浓墨重彩地记载了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异教（非一神教）偶像崇拜，马加比二书则突出了在希腊化的影响下，犹太人的日常生活走向了世俗化。很显然，在犹太人的起义中，贯穿始终的绝不仅仅是对塞琉古无理要求的驳斥，而且还一直伴随着犹太人内部的矛盾冲突。^[12]犹太上流阶层与塞琉古王朝政权的串通一气，让马加比起义兼具了内战和反帝国斗争的双重意义。

跟完全受经济利益所驱使的资源战争一样，上述这种为捍卫宗教文化认同而揭竿而起的反帝国抗争，总会引发帝国在其边缘地区的军事干预。在起义那一方，政治因素与宗教及文化认同方面的动机交织在一起，大家各怀心思，目标不一。但这却没有如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导致起义者整体力量的内部消耗和削弱。相反，各方集团仍然可以维系在一起，并未在有关何去何从的政治方向争论中分道扬镳，走向决裂。犹太人反抗塞琉古统治的大起义以及马加比两书中对起义事件的记载和阐述，都对我们分析当今世界政局深具历史借鉴意义，这是因为在其中权力政治因素和宗教认同动机已彼此交

融。而且两书有关起义事件的叙述，始终都包含着一个判定，即上述两个因素中哪一个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不过我们在马加比人起义的实例中，观察到的首要一点是塞琉古王朝同时施展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两手。毫无疑问，塞琉古的军事权力和凭借军事之力对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实现占领是起义爆发的重要动机。但更为关键的——至少依马加比二书看来——是希腊化文化的吸引力。正是文化软实力让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深感他们的宗教认同受到了威胁，于是便拿起了武器奋起反抗。矛头所指的，正是希腊文化的载体及其宣传鼓动家们。另外宗教传统要求无条件认同，而世俗化或启蒙倾向则削弱了它的凝聚力。随着这一矛盾的日益深化，传统主义者变成了原教旨主义者。这些人是在起义之火愈燃愈烈的过程中，才慢慢转变其思想的，有人称之为极端化趋向，实际上恐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当这些人拿起武器抗争的时候，就已经告别了他们传统主义者的身份，成了原教旨主义的真正信徒。他们矢志以求的是恢复犹太人社群，寻回失落的传统价值。为此他们不惜诉诸武力，流血相争。对他们来说这场斗争是一次道德的净化运动，要将那帮叛教变节者从社群中剔除出去。这种道德净化的说法，几乎是所有内战共有的古老主题。不过只有反抗帝国中心，直捣腐化堕落的老巢，才能实现这种道德净化的目标。

除了上述这些内容，马加比人起义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之间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可比性了。无论是逼迫塞琉古占领军撤出耶路撒冷，还是起义军将所有希腊文化支持者赶出犹太地区，包括后来建立哈斯蒙尼王朝，这一切都促使时局走向稳定化，最终那席卷整个近东地区的希腊化进程没有波及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这些解决方式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当今世界，人员和信息的交流如此之深，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完全孑然一身、独立于世。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无形中也提升了帝国中心的软实力，它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人才流入帝国的中心。反过来，这又增强了帝国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的表现涉及从学术实力到流行文化塑造力的广阔领域。反帝国行为体把软实力的传播说成帝国有意识地对其文化的同化，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恰恰借助这样的诋毁，反帝国行为体在民众中赢得支持，汲取了力量。顺着反帝国行为体的这一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的反帝国斗争已经不像早些年那样，是发生在帝国边缘的一场领土解放之争，它的战场如今已经直接搬到了帝国的中心，而斗争的方式就是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和游击战都以暴力为手段，但后者以“肉体消灭”为目的，而前者则以“心理震慑”为指向。不过，这并非两者的唯一区别。它们的差异还在于，游击战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13]而恐怖分子则会随时随地主动出击。此外，游击队离不开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掩护，国际恐怖主义则不需要也不具备这一条件。恐怖分子依靠支持者的资助，充分利用目标国当地的基础设施之便——包括媒体、都市公共交通系统、民航网络、互联网以及现代都市的匿名性特点等（最后一点尤为重要）。这些基础设施满足了策划实施恐怖袭击的一切所需条件：无论是选择和布置恐怖袭击指挥中心，还是后勤补给，让飞机变身武器，将炸弹伪装成手机等，皆能一一实现。发生在纽约和马德里的恐怖袭击都充分佐证了这一点。

但是新型恐怖主义的战略目标究竟何在？先来看传统的恐怖主义，比如19世纪末发生在俄国的恐怖袭击。它打击的对象是沙俄专制政府的领导高层及某些军队要人，恐怖分子们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威吓军政精英，同时赢得民众的同情，最终激起群众起义的巨浪狂澜，一举推翻统治政权。也就是说，传统恐怖主义袭击是星星之火，它真正需要引爆的，应是人民大起义。这种手段更适合民族革命运动，在社会革命运动中则成效甚微。相比之下，现代跨国恐怖主义立足于截然不同的战略思想。它们袭击的目标是平民，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牺牲

品，仅仅因为这一点，它就无法博取众人的同情。这种恐怖袭击无异于毁灭性战争的现代翻版，恐怖分子试图通过对对手地盘の肆意破坏来达到目的。在本质上，恐怖分子运用了与当年游牧牧民相似的战略，后者以奇袭之术突入帝国安宁之地，一番烧杀掳掠，留下一片焦土。帝国军队还来不及反应，他们便已逃之夭夭，消失无踪。

在传统的毁灭性战争中，兵贵神“速”，而在恐怖主义袭击中，关键在于行动的隐蔽性。这一点首先得益于大都市の匿名性；其次，利用外来人口大量流动的特点得以潜伏其中；最后是高度的机动灵活性。袭击者无须自己动手，现成的交通系统统统任其利用。他们的醉翁之意，不在于蹂躏村庄，破坏城市以至毁灭整个一片地区等“有形”打击。他们把攻击的目标锁定在后英雄主义时代人们那脆弱的心理防线，通过恐怖袭击让人们陷入恐慌和焦虑，打乱他们平静如水的生括，造成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一片混乱，由此造成巨大损失。这一战略之所以奏效，与其说是归功于攻击者之强大，毋宁说是受攻击者极其脆弱的心理帮了大忙。另外，恐怖打击还有另一个效果，即当帝国政权忍无可忍，决计侵入恐怖分子藏身的老巢，它便会立即陷入传统游击战的天罗地网。于是，帝国的非对称优势几乎无用武之地，而反帝国行为体的非对称化的作战创造性则大显神通。一言以蔽之，当恐怖袭击让帝国变得强者不强，那原本的弱者便可摇身一变，成为强者了。

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伴随着边缘地区明显的权力增长，这是由于帝国在面对边缘暴动时已愈显疲态，无法全力镇压了。在这样的形势下，鼓吹帝国时代已经终结的论调听上去不无道理。然而事实很快证明，下此结论为时过早。其实帝国时代尚未结束，只是改头换面的帝国秩序又有了新的形式。从前的传统帝国在地面上控制领地，弱点外露、易遭攻击。新帝国抛弃了这种控制方式，控制范围转向更广的领空及外太空。如此一来，帝国既可以选择性干预，也可局部性干

预。帝国在政治空间方面所失去的，它又借助科技的发展获得了补偿。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反帝国行为体一方也变换了其对抗的方式，新的跨国恐怖主义代替了从前的传统游击战。传统对称条件下的军备竞赛，慢慢演变为技术革新上的较量以及战略创新上的比拼。因此，今天帝国面临的重大危险不再是来自领土上的威胁，而是其财政上的重负。

[1] 法农在其两部著作*Les damnés de la terre*和*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中表达了有关在去殖民化进程中暴力疗效的观点；从精神病理学角度论述游击战争，参见Voss: *Ich habe keine Stimme mehr, mein ganzes Leben flieht*，该作旁征博引，信息量很大。

[2] 游击战在中长期摧毁对手，但也会产生持续的自我戕害。只需对西班牙和普鲁士的反拿破仑战争做一个比较性研究，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两国在19世纪初都曾被拿破仑大军制服，并竭力要摆脱法国人的控制。普鲁士的改革可以被理解为针对法国通过大革命建立起来的优势而做出的一种对称重建的努力，而西班牙走的则是一条“非对称化”道路——他们将小规模战争（游击战）发展成为几乎独立的作战形式。两国都在击败拿破仑帝国的斗争中居功至伟。后来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在1814/1815年以后，普鲁士社会进入持续发展期，1848~1849年的革命又使之骤然加速。但是西班牙社会则在整个19世纪中危机不断，权力更迭频繁，越来越跟不上欧洲经济发展的步伐。对此，可参见Bernecker: *Spanische Geschichte*，第111~149页。

[3] 关于这一影响及其后果，可以参见Stie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4]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Die neuen Kriege*，特别是第131页起若干页，以及同一作者另一部作品*Zur Charakterisierung des neuen Krieges*。

[5] 参见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第8页起若干页。诚然，奈很清楚，软实力受到的政治束缚要远远小于硬实力。参见第99页。

[6] Armstrong: *The Battle for God*，对20世纪原教旨主义及其前身有着极为透彻的论述。

[7] 对此及随后的论述，可参见Noth: *Geschichte Israels*, 第322~343页，和Stern 的文章，载于Ben-Sasson: *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 第251~268页，以及Sogg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Israel and Judah*。

[8] 又译作朱迪亚或犹利亚地区。

[9] 反抗之所以会产生，宗教及认同问题当然并非唯一主导因素。当时塞琉古王国对埃及托勒密王朝发动的战争支费浩繁，以至于超过了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的财力。于是他把贪婪的目光投向帝国神庙的珍宝，他妄图将之据为己有以便解决财政上的难题。然而他对耶路撒冷神庙的大肆掠夺激发了犹太人揭竿而起反抗的决心，或至少是增强了他们的斗志。

[10] 在这里，作者认同“但以理书”写于公元前2世纪塞琉古帝国时代的观点，更多人认为此书成于公元前6世纪。

[11] 参见Mosès: *Eros und Gesetz*, 第111页起若干页；Koch: *Das Buch Daniel*, 特别是第127页起若干页。

[12] 这场内战实际上涉及一些社会问题，而围绕何为正确生活方式问题而起的宗教及文化层面上的冲突成了激化这些社会问题的催化剂。关于这一点，可参见Menahem Stern的文章，见Ben-Sasson: *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 第254页。

[13] 在卡尔·施米特对游击战的本质进行剖析时，防御性是他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参见Schmitt: *Theorie des Partisanen*, 第26页。不过事情并非如施米特预估的那样，是列宁将那些“防御性的、土生土长的家园保卫者”变成了“好斗的世界革命活动家”（同上书，第35页）；事实上，这个转变是在帝国权力从软实力逐渐取代硬实力的背景下才得以发生的。

第六章 帝国在后帝国时代的意外回归

在短短的十年之内，世界舆情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很多美国人并不看好自己国家的前景，认为它将持续衰落下去。取而代之的即使不是苏联，也很有可能是日本和西欧。到了90年代，一种全新的“胜利主义”（triumphalism）论调又占据舆情的上风，鼓吹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遥遥领先于其他列国，美国世纪还远未终结。显然，这种世界舆情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现象与观察家关注焦点的转移大有关联：观察家认为自己觉察到了民众心态的根本变化，实际上只是因为他稍微转了一下脑袋，于是耳朵里便钻进来一些别的讨论声音，眼睛也注意到了别的一群人而已。其实考察对象并没有多少改变，改变的仅仅是观察者的视野而已。

在冷战时代的后期，不少西欧国家的人误以为美国已经走向衰落，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听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美国本土唱衰美国的声音。那些声音里满是对美国前景的忧虑，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工业产量下降，犯罪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医疗、教育行业痼疾未除，国债继续攀升，居民储蓄率低迷，以及贸易赤字持续高涨，等等。但是等到苏联解体，接着美国又打赢1991年的海湾战争，展示了其强大的实力，欧洲人对美国的认识一下子发生急转。他们又反过来认定美国已经获取史无前例的霸主地位，成为全球主宰。从这时候开始，人们主要留意的是这样一种声音：美国四处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这不再仅仅意味着教训“流氓国家”，防止其为非作歹，而且它还要致力推进令美国经济大受其惠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

外部对美国认知的变化，或许也加速和强化了大众舆情的转向。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的各种警告和忧虑之音，今天仍有所闻，更何况当年的问题还未曾消失。但是人们之所以产生了一种美国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发生改变的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受了西欧人观点改变的影响，还基于一系列的现实：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了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在90年代它的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不仅经受住了来自西欧和日本（在90年代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在经济领域的有力挑战，而且再一次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一马当先。还有一点，1991年海湾战争的胜利让美国摆脱了越战失败挥之难去的阴影，这一切都打消了人们关于美国“已经跨过权力扩张巅峰”的猜疑；面对新世纪的挑战，美国人踌躇满志、成竹在胸。之前那被视为“衰退”的种种征兆，到这个时候在人们眼中也就是一个个“难题”罢了。虽然棘手，但都并非无解。而且关键是，如果连美国都解决不了，又有谁可以应付呢？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恰恰宣示了美国人新的自信。

长期以来，人们很可能都没有充分认识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对美国舆情的急转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老布什总统在战争获胜后连任失败，政权移交到当时还声名不显的比尔·克林顿手中了。但是事实上，海湾战争对于美国重拾信心确实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对一代美国人而言，越南是心中挥之不去的创伤。这一创伤不仅仅来自对北越和越共的军事失利所带来的痛苦记忆，也不光是1975年4月29日仓皇逃离位于西贡的美国大使馆带来的屈辱印记，这一创伤更来自一种深深忧惧，即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海外战场上无往不胜的辉煌历史就此终结。后来在伊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再次证明和加剧了人们的这一担忧。1979年，伊朗沙阿政权倒台，随后不久，在德黑兰爆发了持续近15个月的美国外交官人质劫持危机。而1980年4月营救行动失败，令人扼腕。然而，在海湾地区的大漠里，美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速胜，这冲淡了人们对越战噩梦般的记

忆。从此，越战失利被淡化为美国光荣胜利史上的一个短暂的插曲。至于社会道德面的疗伤和救赎任务，就全权交给好莱坞的导演们。或许恰恰在好莱坞，最容易体会到美国的这一舆情转向：从前那些弥漫批判意味的越战电影渐渐让位于“英雄史诗片”。而通过这些史诗大片，美国人将他们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都定格为政治共同体集体记忆的一部分。^[1]

然而，海湾战争的军事胜利还不仅仅是医治越战创伤的一剂良药，它还具有更多的意义。首先，当时的苏联一息尚存，伊拉克军队全仗苏联的武器装备；在军事战略上，也依苏联人主意行事。而这一战显示，美国对苏联的优势非常明显。其次，它让美国人意识到大可不必畏惧来自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挑战，不妨善加利用。毕竟主要是日本和德国帮美国人埋了海湾战争的单。但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以微不足道的代价打赢了这场战争。他们通过军事装备升级获得了一种非对称优势，凭借这一优势，他们可以抵达地球上任何一寸土地上投入战斗。^[2]此外，在这次战争结束后，军事再一次变成美国外交政策中方便好使的利器。这个改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看到美国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9·11”事件以后——越来越多地以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时，答案已在我们面前变得日渐清晰。

也就是说，海湾战争的经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政府并不像欧洲那样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缩减军备开支、分享和平红利的契机。相反，它加大了军费投入，不遗余力地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倘若美国人真把西欧和日本在经济领域的追赶作为对美国世界地位的根本威胁来看待，那么这种扩充军备的做法无疑是华府的一种错误的政治决策了。而他们真正严阵以待的，显然是完全另外一副模样的“威胁情境”。在那种没有竞争对手直接威胁的情况下，美国通过扩充军备，表明了其转向帝国政策的动向。美国的这种倾向之所以尤其引人注目，是因为公众早就普遍认为帝国的时代已成明日黄花了。正如历史

学家亚历山大·德曼特（Alexander Demandt）所写的那样：“随着1991年12月31日苏联的解体，帝国时代的幕布徐徐落下。三千年以来，全球政治一直被那些世界帝国所主导，如今这一切已成为过往烟云。” [3]

[1] 美国电影很好地反映了美国舆情的转变以及美国人自信心的恢复。此外，这些电影不仅反映了舆情转变，而且还会推动和强化这一心理变化。有关施瓦茨科普夫（Schwarzkopf）将军对美国越战创伤记忆的愈合作用，可参见QRT: *Schlachtfelder der elektronischen Wüste*, 第10~39页。

[2] 在文献资料中，非对称概念多用于描述弱势一方的作战方式，比如说用来刻画游击战或当今恐怖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非对称是双方面的，既有弱势方的非对称性，也有优势方的非对称性。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Wandel der Weltordnung durch asymmetrische Kriege*。

[3] Demandt: *Die Weltreiche in der Geschichte*, 第223页。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出版的众多文献中，人们探讨的重点已不再仅仅是某个具体帝国那多少有点偶然性的衰亡命运，转而力图总结出所有帝国衰亡的一般性规律。参见Richard Lorenz: *Das Verdämmern der Macht*; Altrichter/Neuhaus: *Das Ende von Großreichen*; Demandt: *Das Ende der Weltreiche*。

/ 关于帝国时代终结论的评析和后帝国空间的问题

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视角里，20世纪是一个始自1914年、终于1989年的“短促世纪”。^[1]在这一世纪，上演了多少帝国和大国分崩离析的大戏，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实早在一战爆发之前，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这三巨头都已是强弩之末，濒临破产。国内动荡不安，体制僵滞不前。在维也纳、圣彼得堡和伊斯坦布尔，三国主政者都在帝国的一个临界点上，不约而同地寻求战争手段以挽狂澜于既倒。然而事与愿违，三国之中没有一个获得成功。沙俄甚至还没有挨到战争结束便寿终正寝。而在圣热尔曼（Saint-Germain）和色佛尔（Sèvres），同协约国集团签署和约的也已是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继任政权了。经历大战炮火的洗礼，从中欧、东欧、东南欧到小亚细亚阿拉伯地区，诸多帝国悉数倒下。只有德国得以幸免，不过它也损失了大片领土，付出了沉重代价。而它得以幸存，或许仅仅因为德国在内部结构上更接近一个民族国家，而非帝国。

有人会说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稳定秩序，完全可以取代帝国秩序。这一说法能否成立很值得怀疑。因为一方面，在一战后的很多新生国家里，国民重新拼凑组合，其民族差异性太大；另一方面，原本推动这一转变的西方战胜国又心思不一，利益各异。虽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大声疾呼，将民族自决原则提上国际议程。但由于美国国会不买账，他也鞭长莫及。于是对欧洲一战之后的国家重建和政权稳定化进程，华府无法施以援手。此外在巴黎和会上，面对与会各方极大的利益分歧，威尔逊无能为力，抱负难展。最后只得两手空空，铩羽而归。^[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将民族自决权称为“20世纪欧洲政治的灾难”。战后没多久，民族自决权成为诸多国际、国内战争的导火线。原因就在于，此前由帝国统御的空间现在被划分为诸多民族国家，不可避免会带来诸如少数族裔以及各种不公、压迫等一系列问题。^[3]在二战期间，中欧和东南欧的广袤土地备受摧残和蹂躏，^[4]而在此之前，这个地区已是问题缠身、矛盾不断：从土耳其和希腊的异族大驱逐，到1939年早春捷克斯洛伐克被侵吞，风波不息。这些问题或许都可以作为后帝国时代政治格局的反面教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二十来年的光景里所发生的起伏变迁，在后殖民时代及后苏联时代里又再次上演，只是改头换面，转变了形式而已。这些形式，从以前帝国强权的渗透和颠覆伎俩，到发动军队兵变的尝试，或者挑起民族冲突，再到新生国家的内战，不一而足。

1918至1919年的美国，既无保障中欧、东南欧政治、经济秩序之“心”，恐怕也无保障之“力”。于是帝国走后留下的后帝国空间基本上进入当地人自决的状态：美国人走了；德国战败，元气大伤，在政治上被《凡尔赛和约》束缚了行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力图在那片土地上一统意识形态，甚至建立实际统治，结果未获成功。不过，中欧、东南欧部分地区在1945之后倒是变成了苏联帝国的外围。后来，苏联解体，美国便伙同其西欧盟友顺理成章地在那里接手了它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未敢触碰的使命，在那一地区采取的行动包括经济援助、稳定政局以及军事介入等。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它们的军事干预被描绘成一场人道主义行动。人道主义这一点，在客观上当然也无可否认。但是这些行动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外部的干预，避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种种乱象重新上演。作为“外部势力”（*raumfremde Macht*），^[5]美国之所以挑起重担，主要是因为唯有美国才具备这样的军事实力。另外“外部势力”的好处在于，美国只需完成保障和平的帝国“任务”即可不必担心像“邻近势力”（*raumnahe Macht*）——欧洲强国那样容易陷入帝国“角色”的泥潭。

审视后帝国时代在当年中欧和东南欧所面临的第一个考验，会发现一种似曾相识的独特辩证法，它在20世纪几大帝国衰亡的过程中曾一次又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后帝国空间必须借助外部力量方能得以稳固，进而在其内部孕育一个稳定的秩序；后帝国空间也需要时间来发展自己的政治结构，而政治结构之存续，又必须仰赖一个外部强国暂行帝国维持秩序之职能，而不僭持旧帝国之地位。恰恰是这种挑战，为美国上升为全球霸权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可见，在20世纪被称颂一时的后帝国时代其实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后帝国时代的存在，一方面离不开某种行为体的力量，而按照后帝国时代的本义，根本就不该有这么一个行为体。有鉴于此，尼尔·弗格森才把美国人的这种矛盾概括为“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6]

在结束1918到1919年的活动后，伍德罗·威尔逊对诞生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寄予厚望，认为它将为后帝国空间的长治久安提供有力保障。事实上，当时人们也只能寄望于那样一个国际性联盟组织，既要胜任拟定之任务，同时又不陷入帝国的角色。然而，联盟虽在理论上让人心悦诚服，在行动上却让人大失所望。“国联”的历史，其实就是应对上述那一挑战失败的历史。国联一直担心用力过猛，跨越既定使命之雷池，陷进帝国角色的泥潭；结果反而是用力过轻，最终没能完成既定的使命。^[7]事实证明，对于帮助后帝国时代的中欧和东南欧稳定政局，国联无能为力。而这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隐患。二战固然因纳粹德国而起，但也不要忘了，纳粹之所以能够发动战争，跟国联的失败也不无关系。^[8]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出现于中欧和东南欧的权力政治真空或多或少成为新帝国形成的诱因。我们不妨把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解读为打破中欧、北欧及东南欧民族国家秩序并将之拉回帝国秩序的一种尝试。在德国方面，修订《凡尔赛和约》为纳粹党等提供了借口。与之相应的，在苏联方面，则是修订《布列斯特-立陶

夫斯克和约》，虽然对后者的修订在俄国国内战争中已部分实现了，但那似乎还远远不够。^[9]所以苏联和纳粹德国后来串通一气、结为同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我们不能眼里只有它们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却对它们地缘战略利益的交集视而不见。^[10]

希特勒的帝国美梦，经苏联与大国的全球性联盟之一击，登时化为泡影。而斯大林的帝国——当然在他亡故近40年后才出现——则因资源耗竭而寿终正寝。二战结束后，随着德国人的撤离，在东欧和中欧再现权力真空。斯大林乘虚而入，利用这一权力真空借机将其帝国西界推至易北河和伏尔塔瓦河（Moldau）一带。而这又诱使美国和西欧联手，筑起一道反苏联盟的高墙。但就双方发展后劲而言，苏联人可谓相形见绌，面对西方阵营的挑战，苏联不得不耗费掉国内生产总值五倍到六倍的巨资，才能勉力维持双方军力的结构性平衡。

为了扭转这一致命劣势，苏联对第三世界施以援手，不遗余力地支持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希望借此一步步挖空西方世界的优势。然而事与愿违。当苏联在1991年宣告解体的时候，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苏累计欠债已高达1300亿美元。^[11]即便对于西方阵营来说，这些石沉大海的欠款也不啻天文数字。对当时的苏联而言，自然更是雪上加霜的灾难。压在苏联身上的帝国权力扩张的压力，导致了它在外边界上过度延伸，国内资源耗竭一空。此时即使退出帝国的迷梦，也无法恢复元气了。

在过去的千百年里，多个帝国强权叱咤风云，统御了欧亚的西部大陆，而苏联的解体则宣告其中最后一个也彻底告别了世界政治舞台。而在世界的其他角落，种种迹象也似乎都在昭示帝国时代正走向穷途末路。1945年，不光纳粹德国走到了尽头，日本天皇的帝国迷梦也彻底破产。二战期间，西欧殖民列强左支右绌，损失大片领地。二战结束后，在短短20年间，除了葡萄牙，其他殖民帝国纷纷崩解。而

这一时期的东西方对峙又为老牌殖民帝国的卷土重来设置了重重阻碍。同时，冷战也让西方霸权——美国疲于应付，无暇对欧洲列强重夺殖民地施以援手。发生在1956年的那一幕，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年7月，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没过多久，英国和法国便试图伙同以色列夺回运河控制权。对此，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声明：“我们怎么可能支援英国和法国？如果这么做，会使我们失去整个阿拉伯世界，相当于把它们拱手让给苏联。”^[12]关于美国插手的少有的一次例外，发生在越南。当时美国之所以没有作壁上观，也只是因为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的民族解放运动与苏联及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3]

除去个别例外，欧洲殖民帝国时代的落幕并没有伴以太多腥风血雨。欧洲人将权力交还当地土著精英，而后者对此显然没有做好准备。^[14]于是，很快在那里同样也出现了中欧和东南欧所经历的后帝国空间问题。但在那里，恰恰缺少一种能持久履行帝国维持秩序之职能且又不僭持帝国之地位的“外部势力”。在冷战时期，东西两大对立阵营固然不乏稳定局势之功，但双方行动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倾向，即借执行帝国的任务索求帝国的角色。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务施以巨大影响。它们借助军事援助和经济救济手段，维持了第三世界的稳定；可这种暂时的稳定，在很长时期里都遮蔽了新生于后帝国空间的大部分国家之内部问题。其实它们早已虚弱不堪，危机四伏。而在这些国家加入联合国以后，不免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拥有一个联合国席位便足以证明它们的“国家属性”（Staatsqualität）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至此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对第三世界也失去了兴趣。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很多新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国家都不过徒有其表，它们在政坛第一次大地震中便纷纷落马。^[15]事实再次证明，主权国家多元体取代帝国秩序之途布满艰难险阻。然而，即使看到在后帝国空间

稳定化过程中问题丛生，都没有动摇人们关于帝国时代已经终结的观点。

下此论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无非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是潜在帝国行为体的实力相对衰落。关于这一点，保罗·肯尼迪做过如下总结：“跟四分之一世纪之前^[16]相比，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的军事义务几乎与那时一样多，但当时它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量、军费开支和武装部队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都比现在要大得多。”^[17]因此按他的观点，美国应当缩小自己的义务范围，否则恐因帝国的过度延伸而加速自身的衰亡。^[18]

其次，那些臣服于某个世界帝国的民族，它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慢慢积蓄更大的抵抗潜能，这样就造成帝国统治成本的飙升。以成本-效益计算为内核的政治理性，加上媒体持续关注扩大了公众舆论的影响，这两者合起来即便不能完全遏止帝国政策，但也足以让它失去吸引力。对于这个硬伤，即使重新搬出正义战争的概念也于事无补，虽然在历史上正义战争理念确实与帝国政策总是如影随形。

最后，在现代社会情势下，一个帝国能否仍有利可图，这是相当值得怀疑的。按世界经济史学家的统计，^[19]19世纪到20世纪初，推行帝国主义让帝国强权得不偿失、入不敷出。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这种逆差将会进一步扩大。^[20]这样看来，帝国孜孜以求的宏图大计已经不合时宜，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些帝国计划就像阴魂不散的过去闯进现实的杂音，而现实之风早已吹往新的方向。

由此可见，对于帝国时代业已终结的观点而言，其有力的证据皆源自经济和权力政治方面的考量，而不是基于规范的社会赞许性。正

因如此，当美国突然开始以新帝国作为其远景定位，才格外让众人大跌眼镜。

[1]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第ix页起。

[2] 参见Junker: *Power and Mission*, 第48页起若干页。

[3]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第31页起。

[4] 参见Dan Diner: *Das Jahrhundert verstehen*, 第85页起若干页，特别是第195页起若干页关于民族清洗的内容。

[5] 这一概念由卡尔·施米特提出（参见Schmitt: *Völkerrechtliche Großraumordnung mit Interventionsverbot für raumfremde Mächte*和*Großraum gegen Universalismus*, 第295~302页）。当然，本书作者在书中援引这一概念时，有着不同于施米特的政治思路。

[6] Ferguson: *The Incoherent Empire*, 第78页。

[7] 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究竟是结构性的，还是源于集体性失职的体制，抑或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隙期特殊政局所致——比如大国之间互相猜忌，由此产生了自我封闭，这些都还无法确定。

[8] 希特勒之所以能同经济界和军界的保守精英们结成联盟，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双方都思量着在中欧发动一场空间和时间上有限度的边界修正战争，来恢复德国在这一地区的霸权地位。即使后来成为坚定的反希特勒派的人也坦言自己曾对中欧范围内的边界修正战争持支持态度，对此参见Klaus-Jürgen Müller: *Militärpolitik in der Krise*; 关于东南欧地区对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参见Gabriel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9] 虽然此前曾短暂获得独立的国家如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乌克兰被拉入了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发生在白俄罗斯、克里米亚半岛、巴什基尔、伏尔加鞑靼以及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草原上的独立运动也都被镇压下去（参见Alexander J. Motyl: *Sovietology, Rationality, Nationality*, 第105页起若干页），但是毕竟还有芬兰、波罗的海东岸三国以及波兰成功挣脱了苏联红军的控制。此外，原先受沙皇俄国控制的巴尔干半岛地区和多瑙河下游地区，也摆脱了苏联的掌控。

[10] 围绕当年俾斯麦德国和沙俄帝国已划好的帝国利益界线，希特勒和斯大林很快便达成了一致。但涉及昔日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旧属地时，双方分歧立见，而且都是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最终导致德苏同盟的破产。关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协定的缘起，可以参看Besymenski: *Stalin und Hitler*, 特别是第111页起若干页；有关双方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分歧以及对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权的争议，可以参看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第127页起若干页，第206页起若干页。

[11] 参见Daschitschew: *Moskaus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第38页起若干页。类似的观点参见Simon: *Die Desintegration der Sowjetunion*, 第191页起。

[12] 引自 Ferguson: *The Incoherent Empire*, 第141页。

[13] 引自 Ferguson: *The Incoherent Empire*, 第194页起。

[14] 参见Mommsen: *Das Ende der Kolonialreiche*, 以及Abernethy: *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第331页起若干页。

[15] 另一种不同的解读，参见Jung/Schlichte/Siegelberg: *Kriege in der Weltgesellschaft*, 第56页起若干页。

[16] 此语出处《大国的兴衰》一书出版于1987年。

[17]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第768页；参见同一作者*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第371页起若干页。奈有相似的论证，只是他认为，美国在硬实力上的相对损失，通过强大的软实力补回来了。

[18] 对这种加速衰亡的风险，保罗·肯尼迪是这样说的（*The Rise and Fall*, 第784页）：“那些领跑的国家总会面临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外部挑战迫使它们将更多资源投在军事上；另一方面，它们的相对经济实力同时也在减弱。因为可用于投入生产的资本变得越来越少，加上税收升高，对政治项目优先权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大，承担军费负担的能力日益削弱，这一切都加速了这些大国衰亡的进程。”

[19] 相似观点参见Fieldhouse: *Economics and Empire*, 以及Robinson: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20] 战略理论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指出，地缘政治已经大范围地让位于地缘经济，由此得出结论说，依靠强权政治把守帝国空间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了（Luttwak: *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 第307页起若干页）。这一点，亚历山大·德曼特（Alexander Demandt）深有同感。他说：“普世帝国同经济帝国合为一体，或者让位给了后者。它们才是未来强国的样子。争斗不再聚焦于国界，而是市场、原料以及标准体系，斗争的方式变成了贸易封锁、低价倾销、货币操纵等。这些经济巨人立足于北美、日本和欧洲，活动范围却遍及全球。”参见 *Die Weltreiche in der Geschichte*, 第232页。

/ 美国：新的帝国

有关帝国时代终结的种种分析，广见于20世纪晚期的政治评论界，其中也不乏关于未来世界新秩序的设想。但完全听不到关于帝国回归的声音。广大民众，尤其是欧洲民众，对联合国寄予厚望，希望它挑起大梁，担负起创建之初的自赋使命。然而，由于安全理事会内部羁绊，自缚手脚，直到苏联解体，联合国最多也仅仅得以履行了其部分使命。而冷战的结束让人以为这个难题已经迎刃而解。

联合国在国际政治舞台越来越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主权的衰弱。凭借主权，国家曾得以发展壮大。但如今，无论是维护外部安全，还是保障货币的稳定，国家主权都已无法发挥从前的作用力。^[1]一方面，国家的控制权力日益弱化；另一方面，国家主权正越来越多地让渡给国际组织。这一切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属于国际组织的新时代已正式拉开了序幕。特别在西欧，人们对此翘首以盼。这主要是因为西欧国家有缔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ZE）及欧盟（EU）的成功经验。按照欧洲人的想法，二战以后欧洲的发展模式理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典范。^[2]

除了国家共同体这一秩序模式以外，还有另一种构想，即不断推进经济共同体的去国家化，让它彻底摆脱国家边界的束缚，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经济的互融互通。^[3]在16世纪到17世纪逐渐成形和流行的民族国家模式，将会慢慢淡出政治舞台。上述这种经济体秩序不是一种空间，一种结构，它是一种运动，一种流通——无论涉及的是资本、服务、信息还是劳动力。随着国家功能的弱化，国家会丧失一部分权力。而这部分权力将被市场体制的自我调节以及非政府组织（NGOs）的政治作用所取代。^[4]

在提出世界新秩序的两种设想时，无论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家共同体，还是全球大都市互联一体化，人们都对边缘的重要性重视不足，低估了边缘对中心的反作用力。其实恰恰是边缘的反作用力推动了帝国秩序模式的意外回归，使帝国秩序甚至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也博得了好感。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是其中的一位。此君曾断言，对当今形势下的世界民众而言，“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最值得期许。[\[5\]](#)

在一个以联合国为核心协商平台和最终决策机构的国家秩序中，其实暗含了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实现国体的稳定，接下来要做的就只剩把国家政权绑定到一个法制和协商体系上了。然而，这一预设前提何其轻率乃至荒谬，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那一系列国家崩解的风波中，便可体察。而如今“失败国家”（*failing states*）的概念也早已被人们挂在嘴边。事实上，称得上国体稳定的只有西欧、中欧、北美和东亚的那些国家，它们才满足上述国家秩序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拉丁美洲、非洲近东、中东、高加索地区、中亚及部分东南亚地区，会发现在那里一个稳定的国体尚有待建立或恢复。另外，这一国体能否顶住全球化的考验，不致胎死腹中，也还是未知数。与此同时，一次成功的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无论对“稳定输入者”还是“稳定输出者”而言，都影响深远：保护国和托管地诞生，那些禁绝暴力滥用、恢复基础设施、培训管理人员并在整个转变期行监管之职的行为体陷入一种准帝国的角色——即便它们事先为这一角色设置了期限，即便这一角色本身就能让它们显得很多余。[\[6\]](#)一次又一次，正是美国接手了这种“戡乱帝国”的任务，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无论在波斯尼亚、科索沃还是阿富汗。

至于全球都市圈的网络化体系，本该为世界实现一种流动性秩序。但在“9·11”事件以后（甚至更早），人们看到了这一秩序在结

构上的脆弱性。经济富足且后劲十足的秩序中心对网络体系之外的地区漠不关心，中心不愿为这些地区的秩序投资。这一点跟“国家建构”模式完全不同。但网络之外的地区完全可能对各大都市之间那极为脆弱的连接线发动攻击，这样一来，中心就不得不在相关地区勉力拉起一张巨大的保护网。^[7]简言之，在新的战争形势和作战手段横空出世的背景下，有关后帝国时代世界秩序的种种构想，要么不够成熟，有待改善，要么就是空中楼阁，根本无法落实。联合国秩序，它在面对军阀间的资源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战争时每每显得力不从心；而国际都市圈网络体系则会遭遇跨国恐怖主义的难题，袭击者无声地隐匿于全球化的商品、资本、人员及服务流通之中，并充分利用这些便利条件满足其一切后勤所需，然后策动骇人听闻的袭击。^[8]

就这样，帝国作为政治经济的秩序模式重回人们的视野，成为热议的话题。而且我们很快发现，联合国为核心的国家共同体和国际大都市网络体系鞭长莫及之处，恰恰是帝国秩序之所长。比如，果断干预那些主权国家之外的权力真空地带，至少阻止那些冲突地区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行为；再如，为连接世界主要经济中心的脆弱通道提供广泛保障。前一个任务如今以人道主义军事干预之名执行，后一个则在反恐战争的大旗下进行。而在帝国势力扩张中两者很快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自然也不足为怪。在此情况下，有关帝国的辩论也再一次以批判帝国开场。

在这场帝国辩论中，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帝国回归是一种主观的、可以撤销的政治运作，还是说无论哪个总统上台，美国主政者的行动都受制于结构性需求。具体的一个问题就是：倘若小布什没有当上总统，新保守主义也没有在政界造成什么影响，那么美国还有没有可能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让强权政治重新抬头？事实上，确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在本质上正是总统的个人决定——当然受到幕僚及幕僚意识形态风格的影响^[9]——才使美国政治具有了一种帝国特

质。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帝国逻辑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只需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研究一下小布什和他的亲信们便可找到答案了。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用的就是这个路数，并因之在全世界博足了眼球。相反，在这个问题的深处，我们真正要追问的，是帝国的产生“在本质上”究竟是起于权力中心那些心怀帝国主义抱负的政治家呢，还是归因于边缘的结构性问题。对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前文所阐释的内容：帝国使命塑造了政治精英的责任感，左右着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最终也为精英做出的决策提供了不容低估的合法性来源。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以蒙古人的世界帝国为例，倘若没有成吉思汗这个人，可能就不会产生蒙古帝国。正是他一手创建的军队组织既有长途奔袭之力，同时也因其内部结构特点“不得不”不断攻城略地、征战四方。另外，草原帝国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一种现象：从匈人、阿瓦尔人，到蒙古人都无一例外地诞生了极具扩张野心和能力的领袖人物，令万众同心。由此我们推测，中亚地区的地理条件不仅有利于甚至直接促成了魅力型帝国领袖的诞生。正如我们所见，这一特点甚至一直延续到沙俄帝国及其继任者，亦即中亚地区最后一个帝国强权——苏联身上：正是权力政治的真空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加上魅力型征服者的决策，对帝国的诞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对此可能会有人反驳说，一项富有远见的高明政策就得抵御源自边缘的逆流吸力，防帝国过度延伸之患于未然。而这一点能否成真，取决于两点：一是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受限于国家机器（主要指军队和官僚）的贪欲；二是决策者又在多大程度上响应民众的呼声。在一个军事贵族势力强大或者资产阶级充满活力的帝国里，这种边缘吸力足以获得持久的支持，以至政治决策层欲罢而不能。在一个民主帝国里可能是选民们的要求——在大屠杀、饥荒和无尽内战的影像及报道

的刺激之下，群情激愤——迫使当权者采取干预行动并且由此强化源自边缘的逆流吸力。对于后一种帝国情形，如今也有人引入了自由帝国主义或民主帝国主义的概念加以描述，[\[10\]](#)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则把它称之为“轻帝国”（empire lite）[\[11\]](#)。

在美国，自称“帝国”（empire）虽不是什么忌讳，可长时间以来美国就一直很少用帝国来称呼自己。保罗·肯尼迪在其备受关注的名作《大国的兴衰》中用了大国（great powers）一词，[\[12\]](#)而当他提及帝国（empire），指的则是历史上的那些世界帝国，并不包括美国。[\[13\]](#)即使在现代语境下，他所使用的“帝国”概念也不过是专门用来描述苏联的一种批判性称谓。把苏联肯定地称为帝国，无疑是打破了一个禁忌，而在这背后想必自有学人的一番深思熟虑。

反越战的批评家曾将美国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这么做是出于一种挑衅的动机，给素以反帝国主义自我认知而自豪的美国人当头一棒。其实，即使从肯定的层面谈论一个美利坚的帝国，也基本上没有为昔日帝国续命的意思。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在帝国的概念下把当今帝国与旧帝国区别开来，特别是跟帝国主义政治区别开来。正因如此，才有了诸如“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受邀的帝国”或“合意帝国”（consensual empire）等新说法。[\[14\]](#)

那么美利坚帝国的“新”，到底新在哪里呢？叶礼庭提到了“后帝国时代的新型帝国统治”，“新型”之处在于它以保人权、促民主为己任，在于其以开拓和保障自由市场为信念。而在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看来，美帝国之“新”体现在对传统意义上卫星国的扬弃，转而经由诸如北约、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中间机构来发挥其全球性影响力。依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之见，美帝国特别之处在于将经济往来和安全承诺熔于一炉。

丹·蒂纳（Dan Diner）则认为，美帝国其实只是以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的持续扩张正在不断挤压世界其他地区的自主构建力。[\[15\]](#)

与此相反，美帝国的批评家则认定，美国的统治方式没有走出传统帝国主义的窠臼，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新”。[\[16\]](#)为此他们搬出了重磅证据，那就是，美国在军事上将全球划分为五大战区，以维护美国在全球每个地区的利益不受侵犯。至于五大战区的司令，常有人把他们比作罗马的资深执政官，这些分管着拉丁美洲、欧洲、中东、太平洋地区及北美的司令们可以调遣多达25万的海外驻兵。这些军人分布于全球150多个国家的700余个军事基地及设施，他们无须长途跋涉，即可随时在当地迅速投入战斗。即使美军按兵不动，其军事基地本身也可于所在地区发挥持久影响，对当地政府能起到稳定或恐吓的作用。[\[17\]](#)在批评者眼里，这些军事基地支撑起新帝国的骨架，足以令美国延续始自19世纪的帝国政治传统。对此查默斯·约翰逊曾撰文写道：“美帝国的历史，正是一部在广大海外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的历史。”[\[18\]](#)

在上述视角里，批评者强调了强权政治延续性及军事手段延续性。而另一些美帝国政策的批评家则指出，从19世纪开始，帝国主义就不仅仅意味着对领土的行政及军事统御，也不局限于对众多贸易据点的掌控。他们认为，现代的帝国主义更注重开辟市场，以便倾销其通过工业化生产制造出来的大量廉价商品。[\[19\]](#)当年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1840～1842年），正是以武力打破中国闭关锁国的贸易政策。同样1853年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率领下，美国人将装有重炮的“黑船”舰队驶入江户关口，耀武扬威，最终胁迫日本幕府当局为欧美贸易打开国门。这一幕，经济意义远胜军事价值。也就是说，这其中最核心的并非地缘政治，而是地缘经济。后者虽罕见于传统方式的殖民统治，却同样是帝国政策的一种表现形

式。按照这些批评家的观点，早在19世纪，作为帝国主义新的形式，市场帝国主义业已成为传统殖民帝国主义的一个补充。而今全球化大潮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所谓“炮舰经济”几乎已无容身之地，取而代之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们是落实全球性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重要工具，而这些政策又直接与美国的利益高度呼应。[\[20\]](#)

由此看来，通过控制全球化进程来构建帝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至少其“新鲜”不在于丹·蒂纳等人所说的在美国人的“门户开放”政策里——打开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后面的世界市场——看到了一种有别于欧洲大陆发展之路的、美国自己的“法”（Nomos）。[\[21\]](#)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推行的也是同一套政策。当时与之携手同行的是自由国际主义，它通过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广自由贸易原则，亦不乏维护和平之功用。然而那些对欧洲商品和资本打开大门的地区，在短短几十年里便随着资本的渗透、侵蚀丧失了政治上的稳定。于是欧洲人不得不调兵遣将，派驻军队，同时建立欧洲人的行政结构，来恢复当地的政治稳定。

对建于经济全球化基石之上的美帝国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美利坚帝国的形成周期运转如下：全球化制造了“失败国家”，因为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国家里严重侵蚀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

（Gewaltmonopol）[\[22\]](#)；接着军阀们控制了那些矿藏丰富、有利可图的地区；这又进一步引向军事干预和国家构建，以确保全球化在边缘地区继续推进。就这样，一步一步在市场全球化进程中，孕育出一种“干预帝国主义”，确切说是一系列的戡乱战争。[\[23\]](#)而这些战争最终带来的，是一种脆弱的世界统治形式，但并非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最重要的是，美国将不得不更多地诉诸军事手段，而不是依赖经济统合和文明吸引力，也就是说软实力逐渐让位于硬实力了。结果就像从前的英国人那样，美国的周期也将是以一系列边缘战争和更强的军事

干预结束。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靠战争和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已经远远不如19世纪晚期那么有效了。这意味着美帝国将在其有限的手段与无尽的问题之间的失衡中很快败下阵来。而且美国政策的批评者进一步指出，美国之所以走不远，关键的一点是，对决胜21世纪的权力类型，它过于欠缺；而其他意义不大的权力类型，它却拥有太多。用迈克尔·曼的话说，“到头来会发现，美帝国也不过就是军事的巨人，经济上指手画脚的后座司机，政治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意识形态的幽灵”。[\[24\]](#)

当然，发生在边缘的戡乱战争也可理解为帝国过度延伸的一个结果。而主导性强国越是着眼于富足世界的内圈，着力保障富足世界的利益不受来自边缘的威胁，那么这种戡乱战争对它的重要性也就越小。这也恰恰是古罗马和中国在巩固帝国疆域后所推行的帝国政策之特点。简单来说，帝国政策有别于帝国主义政策的关键之处在于，前者几乎一心扑在中心，仅在情势所迫、万不得已之时，才把目光转向帝国之外的远邦。相反，帝国主义政策对边缘倾注了太多心力，并且深信帝国的最大挑战来自边缘，而非中心。因此对于帝国主义政策而言，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远胜于其对帝国政策的意义。对于帝国政策来说，军事不过是与经济、政治及文化权力并驾齐驱的四种权力中的一种而已。[\[25\]](#)

在美帝国的批评者看来，它不可避免的衰落主要起因于让它陷入边缘困境的错误政策；高明的政策是通过“分而治之”的手腕让对手自我削弱。按这种说法——就像查默斯·约翰逊所认为的那样[\[26\]](#)——作为帝国政治家，比尔·克林顿表现的要比小布什更为明智，后者没能抵挡住帝国主义边缘政策的诱惑。

由此可见，帝国政策不同于帝国主义政策，它要求美国主要担当护航员角色，确保欧洲、美洲和东亚之间密切的经济往来，并作为

“理想的总资本家”^[27]保障现有的世界经济和智识交流水平不致像20世纪20年代末那样出现大滑坡（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重新达到原有的经济交流水平）。^[28]如果说帝国，无论海洋帝国还是陆地帝国（或许不包括草原帝国），存续的先决条件在于不断加强和深化其羽翼之下的浩大空间内的经济交流，那么帝国政策最为紧要的使命便是：以法制手段规整它的经济区，以武力遏制冲突，在经济中心的不同货币之间确保货币平稳及贸易条件稳定的环境，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确保帝国空间相对其他地区的领先优势，保护帝国空间不受外敌侵犯，等等。一言以蔽之，帝国当完成跨越奥古斯都门槛所带来的重任。因此，对于帝国的存续来说尤为关键的一点是，克制军事行动，而不致让军事任务在帝国权力的“注意力经济”中太占上风。

当然，在实践中能否实现这样一种任务领域的优化权衡，并不仅仅取决于主政者的政治智慧，还要看帝国空间的经济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是不是在帝国空间内部即可获得，还是说非得从外部进口不可。倘若要依赖进口，那么帝国恐将陷入直接统治部分边缘的持久压力之下。在这方面，可以说对石油供应的控制和对油价的操控成为美利坚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然而，立足于和平之存续而非武力之扩张的帝国政策定位难免也会导向一种道德悖论，进而触发多方面的问题：在边缘及边缘之外的所有的人道主义干预方式——也就是前文所称的帝国使命之核心要素——如今成为一种道义奢侈品。对于这一奢侈品，帝国一来出于经济原因无力支付，二来基于生存需求也不该买进。对于一个着眼于经济繁荣的帝国，在它的逻辑里，为保障和控制石油供给而采取军事干预合乎理性。但远在帝国中央之外，为结束别国内战而采取军事行动并且还要在战后花大力气投入“国家构建”，这就不合理性了。可这个结论势必会导致帝国得告别在全球范围内落实和保障人权的帝国行动（即叶礼庭所谓“轻帝国”^[29]）。上述这种帝国行动广受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的欢迎，但对帝国而言不啻又一个意识形态陷阱。当帝国高估自己的能力，将那些有悖自身生存需求的目标和使命尽数承揽，便会堕入其中。

这里所谈论到的，其实是一种在帝国史上时有出现的情形：帝国理性同帝国使命陷入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当年的西班牙世界帝国如果出于生存需求以及保护帝国有限资源的目的，本该撤销反宗教改革的武力措施。可西班牙的帝国使命不允许它这么做——帝国使命既赋予了西班牙合法性，也是帝国精英的动力之源。而当其帝国使命从17世纪中期开始日渐衰落，也标志着西班牙帝国势力已成强弩之末，这一点也很快被其他政治行为体看穿。

今日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这样的两难困境：以和平方式维系帝国之存续，将意味着避免在全球范围内负荷过重。帝国“亚全球世界”

（subglobale Welt）的存续，必须仰赖它明智的帝国政策，避开“覆盖全球的世界”问题，并通过建立“帝国的蛮族边界”^[30]把这些问题挡在门外。蛮族边界之外的事务，只要不危及帝国的安全，帝国就不必理睬。事实上，那些长寿帝国——尤其是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所推行的政策基本都遵循了这样的原则。不过这在民主和媒体大行其道的时代里，几乎已经没有了可能了：美国的帝国使命将会因此而不断遭到否定和削弱，那么道德使命感也就自然成了无源之水，而丧失道德使命感，美帝国的势力将大为削弱。说的直接一点，如果美帝国有朝一日失败了，很可能不是被外部敌人所击溃，而是被帝国使命所带来的沉重道义负担所压垮，毕竟这种使命感让美国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地”置身外界事务之外。

^[1] 有关国家控制和调节力的悄然消退，参见Reinhard: *Geschichte der Staatsgewalt*, 第509页起若干页；关于国家主权的日益虚化，参见 Badie: *Souveränität und Verantwortung*, 第104页起若干页。

[2] 库珀 (Robert Cooper) 把些想法称为后现代世界的或后现代国家的秩序模式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第16页起若干页)。但要实现这一模式面临的现实问题是, 现代国家, 尤其是“前”现代的国家还将继续存续下去; 有鉴于此, 这一秩序目前还仅仅适用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及欧盟地区。

[3] 关于政治和领土秩序模式让位于经济全球化秩序模式, 萨斯基雅·萨森 (Saskia Sassen) (*Machtbeben*, 第16页起) 做了最激进的预测, 她提出了“在空间和时间上彻底去民族化”的观点。她坚信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已相互紧密交织, 可能会使国家面临强大的资本体系压力, 国家还会因为税收不足而失去其行动余地。

[4] Hardt/Negri: *Empire*一书也为国家重要性下降而非政府组织 (NGOs) 地位上升的观点提供了论据。

[5] Rorty: *Ein Empire der Ungewissheit*, 第253页。如何因应人道主义干预需求, 换言之, 如何在完成帝国任务和避免成为帝国之间找到平衡, 对美国自由派和左派人士来说是个棘手的难题——毕竟这种干预常常意味着无视国家主权。对此, 可参见Walzer: *Is There an American Empire?*

[6] 参见Fukuyama (福山): *State-Building*, Hille: *State Building*, 以及Hippier: *Nationhuilding*。

[7] 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 和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在他们的观点里特别强调了袭击帝国秩序脆弱连接线这一点, 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攻击看作秩序破坏因素, 相反, 他们把那理解为推动秩序继续发展的促进因素。在他们眼里, 帝国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 所以他们也就不把任何外来攻击当作一种威胁了。见Hardt/Negri: *Empire*, 第271页起若干页, 第306页起若干页。

[8] 关于新的作战方式,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Die neuen Kriege*, 以及他的另两部著作*Die Privatisierung des Krieges*和*Kriege im 21. Jahrhundert*; 有关新型战争背后的后勤补给和经济学, 参阅 Napoleoni: *Die Ökonomie des Terrors*。

[9] 值得一提的还有Vidal: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Mailer: *Why We Are at War?*; 同样, Mann (*The Incoherent Empire*, 第24页起, 第314页, 第330页起) 也认为, 美国在克林顿时期推行的是一种霸权政

策，到了小布什时代转变成成为帝国主义政策。当然曼也怀疑，即便是霸权政策，它给世界带来的混乱也多于稳定。

[10] 参见Boot: *Plädoyer für ein Empire*, 第66页，同样讨论了“民主帝国主义”的还有Leggewie: *Ein Empire der Demokratie*, 第205页。

[11] 见Ignatieff: *Empire Lite*。

[12]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类似的还有Mearsc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13] 参见Doyle: *Empires*。

[14] 参见Bacevich: *New Rome, New Jerusalem*, Maier: *Die Grenzen des Empire*, 奈 (Joseph Nye) (*Amerikas Macht*, 第160页) 坚持认为，美国的政策霸权性一如既往，没有改色。但绝非是帝国性的，一个佐证就是，美国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只为军事作战而来，从不为警察的职能而忙。在相关讨论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布热津斯基 (Brezinski)，他从地缘战略角度探讨了美国永久捍卫其世界政治领袖地位的课题，他的研究凝结为一部名作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15] Ignatieff: *Empire Amerika?* 第30页，Bacevich: *New Rome, New Jerusalem*, 第71页起；Maier: *Die Grenzen des Empire*, 第126页起；Diner: *Das Prinzip Amerika*, 第262页。

[16] 参见Johnson: *Blowback*, 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 *The Sorrows of Empire*。

[17] 查默斯·约翰逊认为，军事基地有五项功能：维系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治权；暗中监视各国政府和民众，特别是窥伺企业，以获取重要情报；控制油田和石油运输通道；保证石油军工产业的收入和就业；改善美国士兵及其家属的生活条件，从而吸引更多兵源。见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第151页起若干页。

[18] 见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第188页。在谈及美国未来几十年何以维系其全球霸权这一问题时，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虽然比约翰逊更看重约瑟夫·奈笔下所谓“软实力”的意义，但在本质上他同约翰逊的批判性观点如出一辙。布热津斯基说：“当对美国方式的效仿渐渐遍及全世

界，这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似乎众望所归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理想的外部条件……所以，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真正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构成的精巧复杂体系支撑的。”（见《大棋局》中文版第44页）

[19] 参见Gallagher/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Mommsen: *Wandlungen der liberalen Idee im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

[20] 参见Mann: *The Incoherent Empire*, 第80页起若干页。这个想法在支持帝国的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比如巴塞维奇（Bacevich）（在American Empire第3页）就在论述帝国形成的基石——门户开放政策时写道：“它的终极目标在于创建一个基于民主资本主义原则的开放统一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里，美国是最高维护者，也是规则的最终执行者。”现在已经有大量文献作品认为，出于经济原因，美国的主宰地位已岌岌可危，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索罗斯。Soros: *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

[21] Diner: *Das Prinzip Amerika*, 第273页。

[22] 韦伯语。

[23] 关于由帝国中心向边缘推进的戡乱战争的意义，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Kriege im 21. Jahrhundert*, 特别是第93页起；作者的另一部著作*Politik und Krieg*论述了关于全球化所导致的（但绝不仅仅归咎于全球化）的战争。

[24] Mann: *The Incoherent Empire*, 第13页。

[25] 在这个意义上讲，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追捧应理解为对帝国政策而非帝国主义政策的青睐。参见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在另一方面，那些美国政策最激烈的抨击者则将帝国主义等同于军国主义。参见Mann: *The Incoherent Empire*, 第314页起若干页，Johnson: *Blowback*, 第29页起若干页，第93页起若干页。

[26] Johnson: *Blowback*, 第220页。

[27] 语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28] 参见Harold James: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以及Fischer: *Die Weltwirtschaft im 20. Jahrhundert*。

[29] Ignatieff: *Empire lite*, 第1~25页。比他走得更远的有萨曼莎·鲍尔 (Samantha Power), 对她而言, 推广人权是美国维系权力的前提条件。参见 Power: *Das Empire der Menschenrechte*。持类似观点的还有Beck: *Über den postnationalen Krieg*, 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 *Power in the Global Age*。

[30] 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Osterhammel: *Kulturelle Grenzen bei der Expansion Europas*, 第109页起若干页。

/ 民主帝国？

民主秩序能否与权力扩张长期兼容、并行不悖，很多人对此持否定态度。一般来说在帝国秩序里，帝国中心的领导层不是专制主义的，就是威权主义的。在这种语境下，民主化便意味着帝国的崩溃。苏联帝国的解体似乎佐证了这一论点。罗马帝国的历史对这一观点影响很深：当年正是由于罗马在地中海地区的武力扩张破坏了其共和秩序，并且由此将罗马拖入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混乱和内战之中。在屋大维（奥古斯都）掌权后，那些共和制机构已形同虚设。在他一手擘画的新秩序里，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无法定夺国是了。

在古罗马，帝国的建成便宣告了共和制的破产，这种观点不仅感染了世世代代的欧洲人，同样也深深影响了美国人。^[1]后者在政治秩序上对罗马的效仿，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诚然，古罗马也曾在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发挥了榜样作用：法国对罗马的效仿首先体现在拿破仑升为第一执政官最终加冕为皇的历史，在这当中拿破仑师法罗马，将法兰西的势力往南欧和中欧推进。也就是说，行为主体及观察家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看到的更多是帝国罗马的反光，而少见共和罗马的风姿。在美国，情形则大相径庭。罗马共和国的各项制度被奉为典范，美国人相信它们可以遏止党阀主义，杜绝党魁专权，最终捍卫共和政体不至于遭到破坏。^[2]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在政治上的自我认知确实自带反帝国的底色，它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跟国际政治的种种挑战保持一定距离，而这也一度左右了美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内政外交。所以对美国的帝国政策大加鞭挞的批判者一再援引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历史，重申共和秩序与帝国政治的水火不容，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认为，由于帝国和民主互不兼容，美国的新帝国政策将导致民主制的废弃。

[3]而这方面的最早征兆一般表现为媒体的不断趋同化，媒体在他们看来已沦为政府的政策宣传工具。

就连那些对美国的帝国地位持好感或至少开放态度的人也认定，在内部的民主秩序与 对外的帝国政策需求之间存在一种对立关系。对此，叶礼庭一针见血：“帝国的负担长久存在，而民主时间紧张，对这种长期的负担毫无耐心。” [4]也就是说，在民主制下执政，不可避免地感染快节奏的风格。总统任期最多不过八年，民众期望政府处理问题时快刀斩乱麻。这些都与帝国政治的内在要求背道而驰：在帝国政治中，制定任务到显见成效往往要历经几十年的光景。如果时间紧张，仓促而为之，结果一定不会太好。内政失误，无非导致政府下台，或者出台中期性矫正措施，尚可亡羊补牢；但外交错误，尤其是全球性主导强国的外交错误，一旦犯下，几乎总会酿成难以弥补的长期性恶果。

或许可以说，在过去多年里美国之所以越来越倾向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跟民主制带来的时间压力有着直接因果关系。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一来立竿见影，二来一锤定音。有鉴于此，一个“仓促的帝国”常常急不可耐地挥舞手中大棒动武，哪怕不合时宜，即便失之鲁莽。如果上述说法为真，那么将由此引向一个令人错愕的结论：民主帝国将比专制帝国更乐于诉诸军事手段。这样倒是可以很好地解释1945年以后的美国何以卷入那么多的战争。 [5]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民主社会确实没有那么好勇斗狠，不会把战争视作赢取荣耀与威名的途径，而是用成本-效益分析来衡量战争的得失。结果就会发现战争往往耗资惊人，且效率不高。换句话说，如果民众能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就不大可能为他们总统的战争决定拍手称好了。那么这样一来，很多战争也就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或者政客们先制造一些假象，待寻得了口实再开战。这样的例子很多，越战

期间的所谓北部湾事件，就为美国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在1990年，当伊拉克士兵入侵科威特城，美国又炮制了伊士兵残杀科威特保育箱早产婴儿的惨案，给它后来发动海湾战争寻得了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几年后，又借口萨达姆·侯赛因

（Saddam Hussein）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到了自由世界的和平，再动干戈。为了给军事干预打开方便之门，美国不惜制造各种假象，编造了各种谎言。^[6]那些被拆穿的谎言常常被人用来佐证美国政治的虚伪与狡诈：制造耸人听闻的威胁和危险的假象，俾便扩张势力范围，实现一己私利。但常常被人所忽略的一点是捏造威胁也源自一种结构性压力，即说服民主社会的公众接纳帝国任务。“制造假象”的政策其实是为了填补民主和帝国之间的那道鸿沟。

从长远看，上述这种政策会伤害民主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种政策虽在表面上顺应了帝国秩序的要求，但仍然很有风险，绝非长久之计；毕竟在民众的自我认知里，民主有着比帝国更高的价值（前提当然是人们也认同帝国作为政治秩序的存在价值）。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陆军上将莱曼·莱姆尼策

（Lyman Lemnitzer）的“诺斯伍兹行动”（Operation Northwoods）恐怕是对民主最可怕的一次威胁。按这项计划，美国对它自己的城市和民众发动恐怖袭击，然后推罪给古巴政府，以便从美国民众那里获得入侵古巴的支持。^[7]虽然事情败露后，莱姆尼策不得不中止计划，然而对美国政府的猜疑——政府不仅编造威胁，甚至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国民——自此而生，且从未消散。这种猜疑在“9·11”事件发生后更是进一步发展为完全的阴谋论。^[8]

诚然，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战争中获得了跟欧陆国家截然不同的经验，这种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一次次激发了美国选民，让他们甘心承担——至少部分承受——源自帝国行动的军事负担。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赢家，跟其他诸多参战国相比，美国先后两次均以最

小的人员伤亡换取了最大的经济收益。^[9]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还是个债务国，但离开战场时它已摇身一变，成为最大债权国了。与此同时，欧洲对手迫于战争所带来的经济负累，向美国敞开了市场大门——那是它之前几乎未曾涉足的新市场。二战的烽火熄灭之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法与美国匹敌；大英帝国则在战争的摧残下气势衰竭、辉煌不再。美国顺理成章一跃成为经济和政治上遥遥领先其他国家的超级强权。所以美国人得到的经验是，完全可以在战争中获利。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真正获利的主要是美国资本家，可在普通美国人的印象中，参战每每与经济振兴如影随形，相伴而生。

美国人对两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也很好地诠释了他们当年何以经年累月心甘情愿地承担越战的重负。但随着战事的推进，人们意识到越战不仅造成美国民众的精神消沉，还导致了经济萧条，于是美国民众对战争适用性（Zweckmäßigkeit）的信念发生根本动摇。而这种动摇是持久性的。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方才重温那来自20世纪上半叶有关战争的正向记忆。从根本上讲，“现代战争”得不偿失，这几乎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然而很多人不以为然，或者仅仅赋予它相对的意义，即它只普遍适用于一般主权国家，而帝国在特定情势下完全可以从战争中渔利——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所谓特定情势，一方面是在战争中诸多竞争对手可相互削弱，另一方面是让竞争对手承担战争的主要费用。此外还有一类战争对帝国有利，即战争让人们看清一种来自外部的威胁而同仇敌忾，于是帝国空间内的凝聚力由此得以加强。这种战争遏制了来自帝国内部的某些离心倾向，并且强化帝国理性。海湾战争成功地取得了这种效果，但伊拉克战争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至于反恐战争的中长期效果如何，还有待检验。

在安德鲁·巴塞维奇看来，即使帝国行动获得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对此他也深表怀疑——也必须指出：美国的政治系统并非适合帝国统治的最优选择；一旦帝国政策耗时过长，公众的支持难免动摇，毕竟民众总是“期待帝国所带来的好处大于且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责任和经济负担”。^[10]跟历史上比比皆是的专制帝国不同，民主帝国，或者说对民意保持高回应性的帝国基本无力长期苦撑一项得不偿失、事倍功半的帝国政策。简言之，民主帝国要承受比专制帝国更大的“战利品压力”。^[11]

当然，在民主帝国的语境里，“战利品压力”的概念更像是一种隐喻。毕竟民主帝国诞生在一个后英雄主义社会，战争在这个社会的自我认知中不再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12]而对于昔日的传统帝国而言，战利品在其崛起阶段则不仅仅是对外扩张的“动力”，同时也是对外扩张所依赖的“资源”。但随着1945年德国和日本帝国霸业的破产，所谓战利品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其实，工业革命就已经在根本上改变了帝国形成的动机结构（Motivationsstruktur）以及帝国政策的内在需求，从此以后帝国的对外扩张再也不是以夺取物质财富、压榨臣服方的劳动力为目的了。至此，对外扩张主要是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商品流开辟新市场，这时候的战利品不再是臣服者的财富，而变成了他们的消费需求或者他们技术上的落后状态——毕竟帝国中心的工业技术能让它生产出远比边缘的手工制造品更加便宜的产品。

由此可见，成功推进上述这种帝国政策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经济优势，而军事实力则退居次要地位。至于物质“财富”，只有其中的矿产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它的价值直到工业革命后才真正突显出来。工业革命让化石燃料或矿石沉积物变成了地下“财富”，于是对矿藏的巧取豪夺对经济发展而言变得至关重要。英国的帝国主义者最先踏上了这条新路，紧随其后的是其他欧洲国家，而北美国家也步其后尘，新兴的日本后来居上，但沙俄帝国推行的帝国政

策则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最终在20世纪初不得不咽下战争惨败的苦果。[\[13\]](#)

然而在主要基于经济领先而非军事优势的帝国崛起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帝国要维系新开拓的经济空间，不得不派驻军队。如果小股分遣队便足以应付，那么问题不大——特别像大英帝国的印度土兵团〔西帕依（Sepoy）〕那样，部队由贸易公司出资维持运转且由它管控。可一旦当地爆发起义进而引发大规模骚乱，使得大部队长期驻防已势在必行，那么麻烦就接踵而至：一方面，这么做耗费巨大；另一方面，帝国士兵的伤亡也会造成本国民众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形下，又是英国人最先实践（也是他们运用得最广）一种因地制宜的解决之术：在帝国边缘就地招兵买马——一来成本低得多；二来即便损兵折将，造成较大人员伤亡，也不会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但这如果是发生在从帝国中心募集的部队身上，定会激起更大的波澜。[\[14\]](#)

在今天美国的军队里也能找到上述解决方案的影子。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便已取消义务兵役制，从此军队主要由期限合同兵和职业军人所组成。美国从越战中总结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那就是绝不能把那些出身中产阶层的年轻人送上战场。因为这个阶层有巨大的反抗潜能，也更有政治表达力。如今，美国陆军中有44%的士兵来自少数族裔。[\[15\]](#)这些人在普通的劳务市场毫无竞争力可言，但参军入伍让他们获得了社会融入感，感受到社会认同，而这些情感又反过来让他们更紧密地融入军队。诚然，所谓军队亚文化已蔚然成风于美国广布于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及战舰之上，与普通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这能否长久地见容于民主制，尚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无论如何，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在全球部署了一支可以随时作战且富有战斗力的军队——即便那是一支来自后英雄主义社会的军队。

从19世纪到20世纪，欧洲列强曾利用殖民地士兵部队在军事上维系了其海外帝国的统治。而如今，雇佣兵和私营军事公司（PMCs）似乎成了昔日殖民军队的现代翻版。^[16]如此一来，帝国中心的子民无须抛头颅洒热血，只要花钱就能解决问题。据估计，派驻伊拉克的美国士兵当中有多达五分之一的“绿卡士兵”。这些人几年服役下来，就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另外，由私营军事公司提供的兵源总计也有2万人。为了入籍美国的美好前景，或者为了钱财，这些人冒着危险承受着美国政策的军事负担，而在另一方面这也大大提高了美国选民对国家军事行动的接受度。

剩下的，就只有成本问题。成本最终决定，从长期来看帝国究竟是不是利大于弊。1991年打海湾战争一共花掉了610亿美元，美国盟友承担了其中八成的费用。然而，对于帝国的中心国来说，这么划算的便宜事不可能指望每一次都摊上，于是就有一个问题：美国选民是否愿意长期承担帝国庞大的军备开支——这是值得怀疑的。美国现在的国防开支预算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5%，这个比例虽然只有冷战时期的一半，但并不代表军费开支绝对数值的下降，只是因为9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良好。

也就是说，我们衡量美国国防开支的负担，必须参照其经济能力，以及它的经济能否长期支撑每年大致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5%的国际收支赤字，后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固然美国经济基础雄厚，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高达27%^[17]，这个数字已超越当年的大英帝国，^[18]但这一比例远低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歇期和二战结束时40%的水平。而且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个比重还可能继续下降。所以美国想要保住目前的军事优势，就必须缩减公共开支，而这又会直接波及国内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可以想见这种情况将会反过来影响到民众对帝国事业的支持率。

若想了解帝国的军事开支对美国民众的负担有多重，我们只消比较一下两个数字：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致相当于紧随其后的日本、德国和法国三国之和^[19]，但美国的军费开支预算绝对值却是排在后面的十二个国家之总和^[20]。^[21]这也就是为什么安德鲁·巴塞维奇得出结论说，美帝国最大的软肋不在于外部威胁，而在于美国民众未必甘心承担帝国的成本。^[22]成本问题，也就是帝国政治的收益与开支在中期的比例关系，恐怕是困扰民主帝国的主要难题。倘若帝国内部反对者与外部敌人一齐抓住这一软肋，大做文章，那也是不足为怪的。

在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时代结束以后，美国相信，它所受到的来自帝国边缘的挑战远比帝国秩序内部的竞争更为严峻。这一观念促使美国政府仅兑现了冷战结束的部分和平红利，而继续扩大其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针对美国海外机构设施的恐怖袭击不断攀升，尤其是“9·11”事件的爆发，似乎证明了华府这一决策的先见之明。此外，美国人的这个决定还基于他们的另一个信念：欧洲在科技和经济上赶超美国已永无可能，也就无力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发起真正挑战了。

事实上，欧洲通过引入欧元，建立欧洲统一货币区，对美国全球宰制地位的威胁将远远大过伊斯兰主义。^[23]而欧洲的科研组织若充分整合，并将科研成果转化到经济发展之中，那么也同样可能收获类似于引入欧元的效果。美国近几年来之所以越来越青睐军事控制手段，不排除与欧洲经济发力、渐渐迎头赶上的势头有关联：通过将竞争领域转移到军事力上，美国至少还能在短时间内保持对欧洲的优势。另外，美国还在欧洲内部挑起政治争端，借机抵消欧洲人通过经济一体化而获得提升的权力与影响力。

结合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权力之四种来源，上述观点的本意是：美国经济权力优势下降，^[24]需要通过扩大军事权力优势来弥

补；而在军事权力上，欧洲人又显然无意下大功夫，以求获得与美国对等的地位。当然美国的做法会增加它对帝国经济空间的统治成本，而其中能转嫁给欧洲的不会太多。对此，美国的因应方式无非两种：以传统“分而治之”的政策来分化欧洲，或者将欧洲更紧地嵌进帝国空间的维护体系中。究竟将来其中哪一种会成真，也要看欧洲人自己如何抉择。

[1] 这种印象借助史学家的研究一再浮现：在20世纪，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当属Symes: *The Roman Revolution*。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提到，面对欧洲大陆民主秩序自我破坏的窘境，盎格鲁—美利坚人从罗马历史的镜鉴中证实并坚定了他们的自我认知。在那些研究20世纪美帝国如何形成的历史的学人中，我们看到这种比照古罗马的研究方式屡见不鲜——无论他们的比照基于批判性视角，还是出自肯定的态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像奈这样对帝国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不能无视这种类比。参见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第167页起若干页。

[2] 有关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如何受到罗马的影响，可参看Lefebvre: *Napoleon*, 尤其是219页以后的内容。美国人如何通过与罗马共和国的参照构建自我认知，对此一个绝佳的佐证是*Federalist Papers*。在这些文字里，几位政治家勾画出联邦制国家的蓝图并为之辩护。参见Hamilton等人的*The Federalist Papers*。

[3] 特别值得参考的是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第43页起若干页，第387页起若干页；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第11~49页。

[4] Ignatieff: *Empire Amerika?*, 第24页及第31页。

[5] 有关美国所发动的战争之罗列总结——当然带有明显的谴责口吻，详见Schley: *Die Kriege der USA*。

[6] 相关论述参见Beham: *Kriegstrommeln*；关于1991年海湾战争，参见MacArthur: *Second Front*；关于科索沃军事干预，参见Lampe: *Medienfiktionen beim NATO-Einsatz im Kosovo-Krieg 1999*；关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参见Tilgner: *Der inszenierte Krieg*, 特别是第17页起若干页。

[7]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第412页起。

[8] 参见Brockers: *Verschwörungen, Verschwörungstheorien und die Geheimnisse des 11. 9.*, 同一作者所著*Fakten, Fälschungen und die unterdrückten Beweise des 11. 9.*。同样,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对太平洋舰队的伏击也屡屡被“破解”为一场罗斯福总统针对美国民众的别有用心的阴谋: 他希望借此为美国参战获得民意的支持。参见Stinnett: *Day of Deceit*。

[9]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人所付出的代价以及承担的损失, 参见Kolko: *Century of War*, 第88页起若干页, 第102页起若干页; 而Junker (*Power and Mission*, 第52页) 对大战给美国人造成的后果做了总结: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一跃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经济和贸易强国。在20年代它又扩大了这一优势。1913年, 美国工业产量在世界总量中占比35.8%, 而在1925~1929年间, 这个比例提高到平均46%。按美元计算, 当时美国的国民收入相当于排名其后的23个国家的总和——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加拿大等。纽约则在伦敦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从此世界经济体系即使没有完全以美国为中心, 但至少也呈现出双中心的态势。”有关二战的财务状况表可参看Kolko: *Century of War*, 第205页起若干页, 以及Overy: *Why Allies won*, 第326页起。

[10] Bacevich: *New Rome, New Jerusalem*, 第56页。

[11] 尼尔·弗格森对美利坚帝国的存在并无异议, 他在阐发美帝国问题时, 虽然认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不在于维系帝国的成本, 而在于美国民众缺乏“成为强权的意愿”, 但他在书中仍然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Ferguson: *Colossus*, 第29页。

[12]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13] 关于美国的贸易帝国主义, 参见Wehler: *Der Aufstieg des amerikanischen Imperialismus*, 第259页起若干页; 关于俄国的军事帝国主义以及它企图用“卢布帝国主义”充实军事帝国主义的失败尝试, 参见Geyer: *Der russische Imperialismus*, 第144页起若干页。

[14] 最早是在其他国家租借整个军队去打仗, 后来才出现在当地招兵买马、组建自己军队的做法。比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英国人基本依靠黑森雇佣兵来维系他们在当地的统治。

[15] 参见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第144页起若干页。

[16] 对著名私营军事公司（PMC）的罗列和调研，详见Ruf: *Politische Ökonomie der Gewalt*, 第317~345页。

[17] 这个数字在2018年已降至23.9%。

[18] 参见Ferguson: *Colossus*, 第18页起若干页。

[19] 此书写成于2005年初，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美国在全球GDP中占比依然大致相当于紧随其后的中国、日本和德国三国之和。

[20] 按照2018年的数据，大致相当于排名其后的八个国家总和。

[21]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第37页起若干页。

[22] Bacevich: *New Rome, New Jerusalem*, 第57页。

[23] 所以，对帝国持批判态度的学人，如Todd (*After the Empire*)、查尔斯·库普乾 (Kupchan) (*The End of American Era*)，都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问题极力强调，显然并非出于巧合。类似的还包括Rifkin: *The European Dream*, 第七、八章。

[24] 见本书上文，第79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 欧洲面临的帝国挑战

随着东西方对抗的结束和苏联的瓦解，世界政治格局重新洗牌。新的政局给欧洲的挑战远比人们在90年代初期所设想的或所期望的更为严峻。起初人们把东西对峙局面的终结看作一种机遇：欧洲人将告别政治分裂和敌意，而发轫于西欧、超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也将稳步向中欧和东欧推进。回首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初人们一方面明显高估了俄罗斯对一体化进程的阻力，但另一方面也低估了由此而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些观察家已经预料到，欧洲的“重新统一”将改变它的政治分量，欧洲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往往他们也对欧洲的角色寄望过高。认为北约将随着向中欧和东欧的进一步扩张而发生根本改变的看法，有一叶障目之嫌，甚至在多数时候是一种误判。比如按预测，欧洲会在扩张后的北约中发挥更大作用，结果欧洲的影响力不升反降，美国反而进一步上升为一种不受约制的宰制权力。[\[1\]](#)

事实上欧洲所面临的挑战没有变，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在帝国撤离的后帝国空间，动荡不安、冲突不断——当然这也是后帝国空间的通病；另一方面，一直扮演“仁慈霸主”角色的西方领导国越来越朝着帝国行为体的方向演变，却对其盟友的意见和诉求置若罔闻。多数欧洲政治家都对这些变化感到错愕不已，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将帝国的行动逻辑纳入考量体系，而是一直将主权国家作为政治考量单位。结果他们现在必须同时应对一大片后帝国空间和一个帝国行为体。欧洲人的困扰始于南斯拉夫问题，面对因南斯拉夫解体而引发的一系列战争，究竟该如何应对，曾让欧洲人纠结不已。后来，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这些困扰加剧为政治上的反目。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欧洲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果真如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提高了呢，还是像另一些人所认为的，下降了呢？

欧洲面临的帝国挑战是一种双重挑战，而且两个挑战截然不同。一方面，欧洲必须同强大的美国继续保持双边关系，同时也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形：给霸权国家的行动投资、出力，又要承担战争善后工作，但在政治和军事决策上却失去了发言权。在这一点上，欧洲人必须遏止自己的政治边缘化趋向。面对美国，欧洲人要坚守住自己作为帝国空间亚中心的地位，避免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出现一种中心和边缘的落差。另一方面，欧洲同样还须关注其东部和东南部动荡不安的边缘，既要遏制战乱，防止国家陷入崩溃，又要避免卷入对外扩张的漩涡，后者将是当前框架下的欧洲所不能承受之重。在欧洲的边缘，欧洲人面临一个相当吊诡的危险：没有成为帝国，却依然陷入帝国的过度延伸。

面对这双重挑战，欧洲人至今没有找到对策，他们甚至还未认清这些挑战。翻阅相关学术文献，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上述问题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宽心说”，它特别看重欧洲同美国的关系。但它的主要观点是，^[2]来自美帝国的挑战并没有乍看之下那么严峻。因为美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在全球四处插足已让它不堪重荷，所以很快美国将失去对欧洲的领先地位。这一“宽心说”突出强调了欧洲的经济实力，断言欧洲和美国朝着均势的方向发展，然而它忽视了两点或者说对这两点认识不够：首先，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的削弱乃至崩塌即使能帮欧洲消除一些问题，但恐怕又会给它带来大得多的新麻烦。其次，恰恰是欧洲和美国在经济上的均势，可能会诱使美国更多地依赖军事力量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因为这样一来，欧洲人便又变回侏儒，而美国则变成了巨人。简而言之，“宽心说”低估了美帝国作为全球稳定器的作用，同时又高估了经济因素在短期内对权力关系的影响力——经济因素的分量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慢慢突显出来。

“宽心说”的补充是所谓“认同说”。这种学说从纯粹的内部角度来认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它们的视线从欧盟对东欧、近东和北非的政治影响上转移出去，聚焦于欧洲的宪政秩序和文化认同。^[3]但这种说法有一个假定前提，那就是欧洲人得像冷战时期那样有充分的时间来让决策走向成熟，让迥异的政治文化求同存异、共荣共存。冷战时期政治的降温让政治进程放缓，似乎也引起了政治“相态”上的转变，这一切都有利于欧洲的进一步融合。但是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政治进程放缓的诱因也荡然无存，于是在迫切的“追补需求”的驱动下，欧洲政治进程明显加速——即使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快，至少也恢复了正常速度。在放缓期欧洲人尚有闲心和耐心寻求共有的认同感，但随着政治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速，寻求认同感变成了遥远的奢望。此外，“认同说”还忽视了边缘问题，想当然地认为在中心的认同问题理清之前，边缘的麻烦不会有提前升级的危险。这种倾向在有关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公共讨论中充分显露出来。

谈到欧洲同美国的关系，我们想到本书首章所讨论的雅典海上霸权的演变，它给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敲响了一记警钟：只要波斯帝国的威胁还迫在眉睫，雅典虽居高临下，视其他盟邦为弱者，但彼此尚且权利平等。但在东方的威胁解除以后，众盟邦兑现了和平红利，雅典也同意诸盟邦以金钱来代替履行义务，至此权利对等的盟邦关系就蜕变为一种附庸关系。诸盟邦唯雅典马首是瞻，而盟邦之间的鹬蚌相争，更让局面火上浇油，自然加剧了这一蜕变趋向。欧洲如若不想重蹈那些小盟邦的覆辙，就必须把自己铸造成一个政治统一体，它在做重大决策时不容旁人置喙——哪怕最紧密的盟友也不例外。

迫使欧洲人戮力协作的压力来自外部，但内部发展必须得跟上。这一切能否成功，主要不取决于新加入欧盟的中欧成员国，更多要看英国人怎么决定，是给美国当副手，还是做欧洲人的领袖。不管英国人走哪一条路，欧洲一体化进程都要跟着做出相应调整。众人翘首以

盼的巴黎-伦敦-柏林的三角若前景无望，就得在欧陆再寻觅一个强国加入巴黎-柏林的轴心，扩展为新的三角。当然，如此一来伦敦将被移至统一欧洲的边缘。但不管怎样提升欧洲对外行动能力，将引起欧洲人的决策结构更趋层级化，这样的决策结构在欧洲制定共同农业政策时没能成形——当时也还没有这个必要；反过来说，欧盟国家若不实现其鲜明的层级化，欧洲一致对外的行动能力也无从谈起。另外，层级化不强这一点也足以解释很多中小国家何以阻碍强大集体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其实这些国家自己必须明确一点，它们的遏阻行为并没有为自己争得什么活动余地，反而让美国人从中渔翁得利，提升了左右欧洲事务的影响力。正因如此，美国喜欢利用欧洲小国及中等国家的差异性来做文章。不过面对越来越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美国毕竟也离不开欧洲的支持。这就给欧洲提供了一个机会，对华盛顿的这一行径说不。

欧洲推行一个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之所以大有必要，不仅是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同时这也是维护欧洲边缘稳定必不可少的条件。欧洲人首次领教动荡边缘所产生的旋涡吸力效应，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中，而且这个吸力效应还有进一步增大的可能。一旦波及开来，就不仅仅是区区一个巴尔干半岛遭难，还会殃及从白俄罗斯、乌克兰到高加索地区，直至近东和中东的一大片地区，从那里还会经由地中海继续蔓延到摩洛哥等北非一带。在上述这个大圈子里，一旦国家崩解，内战爆发，或是经济破产都会引发欧洲政局大地震。而这些风波对美国造成的影响会小很多。有鉴于此，欧洲人必须采取行动，在这些边缘地区发挥更大影响，而不是让美国一家说了算。当然最好的局面是欧洲人自己做主，管好自家“后院”，在这些地区让美国人退居二线。不过至少就近东和中东地区而言，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美国一方的自身利益和舆情也有可能发生突变，那么这时候欧洲人就得勇挑大梁，无论是提出方案还是付诸实施，都要承担起一直以来由美国所扮演的要角。

欧洲是一个边界较为模糊的大陆，仅在北方和西边才存在天然的边界，而就南面和东部来讲政治和经济共同体可以或者说应当延伸到哪里，就没有那么明朗了。南面的地中海固然是大陆的自然边界，但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更多起到一种连接作用，而不是隔离效用。比如对罗马帝国而言，地中海非但不是边界，而且曾是帝国的中心，而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了公元8世纪到9世纪——一直到阿拉伯人入侵才结束。^[4]后来随着意大利海上共和国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兴起，地中海再次变成贸易中心。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其势力重心也落在东地中海地区。当然今天的欧洲人有很多理由继续将地中海作为其政治一体化的尽头，但这却无法让他们卸下维持地中海彼岸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压力。毕竟北非国家能否维系稳定的秩序，对欧洲人来说也利害攸关。

以上针对欧洲南部边界的讨论，同样适用于东部边界。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曾将欧洲比作“亚洲大陆的一个小小海角”。^[5]在其漫漫历史中，欧洲人每每东望，心中总惴惴不安。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从亚洲内陆草原踏出的铁蹄，侵扰欧洲人的生活。从历史时期上看，这种入侵始自所谓“民族大迁徙”时期，一直延续到沙俄帝国的诞生，其结果就是欧洲的东界陷入动荡：面对亚洲游牧民族的屡屡进犯，欧洲人后来慢慢尝试将自己的文化领地和势力范围向东延伸。在这当中，沙俄帝国的崛起影响深远。随着沙俄帝国的建立，欧洲人棘手的东部边界问题从此以后便取决于人们对俄国的心理定位了——把它看作偏欧洲的力量，还是偏亚洲的大国。沙俄的这种两面性也折射出它自己反复在两个选项之间摇摆不定的事实。如果在古典地理学家眼里顿河是欧洲的东界，那么18世纪的地理学家在彼得大帝改革后又将这条边界推至乌拉尔山脉一线。俄国也因此变成了一个欧洲的国家。^[6]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这一原先基本停留在文化层面上的问题，如今成了彻头彻尾的政治难题。在这个问题里，首要的一点是欧盟和俄罗斯应当相互毗邻呢，还是说两者之间需要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缓冲？

当然欧洲最为头痛的边界，还是在欧、亚、非三大洲交界的东南隅。广义上讲，东南欧涵盖巴尔干地区南部、小亚细亚及近东地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一地区或轻或重一直扮演着欧洲火药桶的角色，危机难息。这同1945年之后便保持长期和平的欧洲内陆形成了强烈反差。恢复和维系这个地区的稳定，需要欧洲的大量投入，而这也是欧洲绕不开的一道坎。回眸东南欧的历史不难发现，这片土地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就一直是庞大帝国诞生的温床，但也是诸多战争的策源地。而早在很久以前，人们就以东西方碰撞或专制与自由之争等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来解读这种战乱频仍的现象。拜占庭和奥斯曼先后都以这一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庞大帝国，在其鼎盛时期皆被视作西欧的强劲对手。到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步入漫长的垂死挣扎期，当时欧洲国家力图通过复杂的结盟体系稳住它，稳住一触即发的东南欧危局。由此可见，在整个欧洲历史长河中，东南欧边陲确实始终扮演了一个十分特殊的角色。

所以说，无论从地理上还是政治上讲，欧洲没有明晰的边界。特别在东部和东南部，欧洲只有所谓“边界地带”，而这也恰是帝国大空间秩序所特有的。但欧洲的历史是领土国家形成、再发展成为民主国家的历史。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是基于边界单一化（或者说固态化）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疆界，不仅是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分界线，同时也是语言和文化上的分水岭。正是因为由此而生的同质性，在欧洲兴起的民族国家当中总会孕育出一些异常强大的行为体，叱咤于政治舞台；而当它们同中欧、东欧的帝国发生冲突时，吃亏的几乎总是后者。

然而边界单一化（固态化）的秩序模式导致了一个后果：在秩序内部积蓄的能量一再在这些边界耗失一空——因为民族国家对具体的边界划定无法达成一致，总企图往外推移。此外，在西欧已生长数百年的民族国家模式要移植到东部，常常水土不服。在那里边界单一化

的策略催生出歧视性政策，甚至引发对少数族裔的驱逐。二战结束以后，在西欧启动的欧洲一体化政策虽然在原则上仍然维系了民族国家的秩序模式，但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界线正发生系统性消融。打破政治及文化认同的壁垒曾被视作遏制欧洲人彼此之间敌意的不二法门。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最终形成决议，一种新的变化趋向由此拉开序幕：边界多元化模式让位于新一轮的边界单一化（和固化）。欧洲的认同之争就是在这个变化下产生的结果。于是，在欧洲的对外边界上出现了清晰可见的断层，对外边界最终成为一道排他性边界（Exklusionsgrenze），而这又激发更多国家希望加入欧盟，入盟谈判一轮接着一轮。于是颇为吊诡的是，反而首先是边界单一化政策推动了一个持续不断、经久不息的欧盟扩张进程。

还有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帝国秩序模式。帝国秩序模式会引起不同的边界走向多元化，因此它大多只有柔性的动态边界，在这些边界上，中心的支配权慢慢消退。边界地带取代了边界线。如若欧洲不想因负荷过重而最终归于失败的话，那么它将不得不采纳这种帝国的边界模式。实际上这一秩序模式已经写入欧洲发展的进程之中：欧盟的对外边界，有别于申根区边界，也不同于欧元区边界。这一模式必须进一步发展完善，使欧洲的对外边界既保持稳定，又不失弹性。与此同时，还需对边缘发挥影响作用，影响方式应更符合帝国式的要求，而不是超国家体系的准则。总而言之，不借用帝国的秩序模式，未来的欧洲将难有出路。

[1] 有关一个自信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参见Sloterdijk: *Falls Europa erwacht*, 以及Schmieder: *Mein Name sei Europa*, 特别是第174页起若干页。关于北约东扩，参见Asmus: *Opening NATO's Door*, 第134页起若干页。

[2] 对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Todd: *After the Empire*, 特别是第191页起若干页的内容；Rifkin: *The European Dream*, 第16页起若干页，第64页起若干

页；还包括Kupchan: *The End of American Era*, 第119页起若干页, 他认为美国的真正挑战来自欧洲。

[3] 随着土耳其申请入欧谈判, 欧洲人关于认同问题的争论更趋白热化。参看Leggewie: *Die Türkei und Europa*, 另外还可参阅Hoffmann/Kramer: *Europa-Kontinent im Abseits?* 该书从多个不同角度综述了欧洲人的认同问题。

[4] 参见Brague: *Eccentric Culture*, 以及Pomian: *L'Europa et ses nations*, 第14页起若干页。

[5] Valéry: *La Crise de L'Esprit* (1919) (中文版《瓦莱里散文选》之“精神的危机”篇); 参见Lützeler: *Die Schriftsteller und Europa*, 第308页起。

[6] 有关俄国的欧洲认同或亚洲认同问题, 参见Figes: *Natasha's Dance*, 第377页起若干页。

参考文献

A

Abernethy, David B., *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European overseas Empires. 1415–1980*, New Haven/London 2000.

Adanir, Fikret, «*Der Zerfall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in: Alexander Demandt (Hg.), *Das Ende der Weltreiche*, München 1977, S. 108–128.

Albertini, Rudolf von, *Europäische Kolonialherrschaft: Die Expansion in Übersee von 1880–1940*, Zürich/Freiburg 1976.

Altheim, Franz, *Geschichte der Hunnen*, 5 Bde., Berlin 1959–1962.

Altrichter, Helmut/Helmut Neuhaus (Hg.), *Das Ende von Großreichen*, Erlangen/Jena 1996.

Altvater, Elmar/Birgit Mahnkopf, *Grenzen der Globalisierung: Ökonomie, ökologie und Politik in der Weltgesellschaft*, Münster, 6. Aufl. 2004.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1983

Angermann, Erich,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seit 1917* (= dtv-Welt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 9. erweiterte Auflage, München 1995.

Armstrong, Karen, *The Battle for God: Fundamentalism in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London 2000.

Aron, Raymond, *Clausewitz: Den Krieg denken*, Frankfurt/M. 1980.

Aron, Raymond, *The Century of Total War*, Frankfurt/M. 1953.

Aron, Raymond, *Krieg und Frieden: Eine Theorie der Staatenwelt*, Frankfurt/M. 1963.

Asmus, Ronald D., *Opening NATO's Door: How the Alliance Remade Itself for a New Era*, New York/Chichester 2002.

Augustinus, Aurelius, *Vom Gottesstaat*, hg. von Wilhelm Thimme, 2 Bde., München 1978.

Aust, Stefan/Cordt Schnibben (Hg.) , *Irak: Geschichte eines modernen Krieges*, München 2003.

B

Bacevich, Andrew J., «*Neues Rom, neues Jerusalem*», in: Ulrich Speck/Natan Sznaider (Hg.) , *Empire Amerika: Perspektiven einer neuen Weltordnung*, München 2003, S. 71–82.

Bacevich, Andrew J., *American Empire: The Rea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U.S. Diplomacy*, Cambridge (Mass.) /London 2003.

Badie, Bertrand, *Souveränität und Verantwortung*, Hamburg 2002.

Bailyn, Bernar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London 1967.

Barudio, Günter, «*Die Macht des Hegemonialismus—das Moskauer Zarentum*», in: Pipers Handbuch der politischen Ideen, hg. von Iring Fetscher/Herfried Münkler, Bd. 3, München 1985, S. 189–198.

Baumgart, Winfried (Bearb.) , *Die Julikrise und der Ausbruch des Ersten Weltkriegs*, Darmstadt 1983.

Beck, Hans-Georg, *Das byzantinische Jahrtausend*, München, 2. Aufl. 1994.

Beck, Ulrich, *Macht und Gegenmacht im globalen Zeitalter*, Frankfurt/M. 2002.

Beck, Ulrich, «*Über den postnationalen Krieg*»,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1999, Heft 8, S. 984–990.

Beham, Mira, *Kriegstromele: Medien, Krieg und Politik*, München 1996.

Behr, Hartmut, *Entterritoriale Politik: Vo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zur Netzwerkanalyse*, Wiesbaden 2004.

Bellen, Heinz, *Grundzüge der Römischen Geschichte*, 3 Bde., Darmstadt 1994–2003. Bender, Peter, *Weltmacht Amerika: Das Neue Rom*, Stuttgart 2003.

Bennassar, Bartolomé/Bernard Vincent, *Spanien: 16. und 17. Jahrhundert*, Stuttgart 1999.

Ben-Sasson, Haim Hillel (Hg.) , *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1992.

Berlin, Isaiah, «*Herzen und seine Erinnerungen*», in: ders., *Wider das Geläufi ge. Aufsätze zur Ideengeschichte*, Frankfurt/M. 1982, S. 291–320.

Berlin, Isaiah, *Russische Denker*, Frankfurt/M. 1981.

Bernecker, Walter L., *Spanische Geschichte: Von der Reconquista bis heute*, Darmstadt 2002.

Besymenski, Lew, *Stalin und Hitler: Das Pokerspiel der Diktatoren*, Berlin 2002.

Bitterli, Urs (Hg.) , *Die Entdeckung und Eroberung der Welt*, München 1980.

Bleicken, Jochen, *Verfassungs-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Kaiserreichs*, 2 Bde., Paderborn u. a., 2. Aufl.

1981.

Blindow, Felix, Carl Schmitts *Reichsordnung: Strategie für einen europäischen Großraum*, Berlin 1999.

Bohlender, Matthias, «*Government, Commerce und Civil Society. Zur Genealogie der schottischen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Hartmut Kaelble/Jürgen Schriewer (Hg.) , *Gesellschaften im Vergleich*, Frankfurt/M. 1998, S. 115–147.

Böhlke, Effi, «*Esprit de nation*»: Montesquieus politische Philosophie, Berlin 1999. Boot, Max, «*Plädoyer für ein Empire*», in: Ulrich Speck/Natan Sznaider (Hg.) , *Empire Amerika: Perspektiven einer neuen Weltordnung*, München 2003, S. 60–70.

Boot, Max, *The Savage Wars of Peace: Small Wars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2002.

Bosbach, Franz, *Monarchia Universalis: Ein politischer Leitbegriff der frühen Neuzeit*, Göttingen 1986.

Boxer, Charles R. ,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1992.

Boxer, Charles R. ,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Manchester 1991.

Brague, Rémi, *Europa: Eine exzentrische Identität*, Frankfurt/New York 1993.

Braudel, Fernand, *Sozialgeschichte des 15.-18. Jahrhunderts*, 3 Bde., München 1985? .

Breuer, Stefan, *Imperien der Alten Welt*, Stuttgart 1987.

Bröckers, Mathias, *Verschwörungen, Verschwörungstheorien und die Geheimnisse des 11. 9.*, Frankfurt/M. 2002.

Bröckers, Mathias/Andres Hauß, *Fakten, Fälschungen und die unterdrückten Beweise des 11. 9.*, Frankfurt/M. 2003.

Brogini Künzi, Giulia, «*Der Sieg des Negus. Adna, 1. März 1896*», in: Stig Förster u. a. (Hg.) , *Schlachten der Weltgeschichte*, München 2001, S. 248–263.

Brown, Michael E. u. a. (Hg.) ,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Cambridge (Mass.) /London 1996.

Brzezinski, Zbigniew, *Die einzige Weltmacht: Amerikas Strategie der Vorherrschaft*, Frankfurt/M. 1999.

Buruma, Ian, *Chinas Rebellen: Die Dissidenten und der Aufbruch in eine neue Gesellschaft*, München/Wien 2004.

C

Chomsky, Noam, Hybris. *Die endgültige Sicherung der globalen Vormachtstellung der USA*, Hamburg/Wien 2003.

Chomsky, Noam, *Wirtschaft und Gewalt: Vom Kolonialismus zur neuen Weltordnung*, München 1993.

Christ, Karl, *Pompeius: Der Feldherr Roms*, München 2004.

Cipolla, Carlo M., *Die Odyssee des spanischen Silbers*, Berlin 1998.

Cipolla, Carlo M., *Segel und Kanonen: Die europäische Expansion zur See*, Berlin 1999.

Clausewitz, Carl von, *Vom Kriege*, 19. Aufl. hg. von Werner Hahlweg, Bonn 1980.

Clauss, Manfred (Hg.) , *Die römischen Kaiser*, München 1997.

Cooper, Robert,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2003.

Creveld, Martin van, *Die Zukunft des Krieges*, München 1998.

Czempiel, Ernst-Otto, «*Pax Americana oder Imperium Americanum?* », in: Merkur, 57. Jg., 2003, Heft 11, S. 1003–1014.

D

Daase, Christoph, *Kleine Kriege – Große Wirkung*, Baden-Baden 1999.

Dante Alighieri, *Monarchie*, hg. von Constantin Sautter, Aalen 1974.

Daschitschew, Wjatscheslaw, *Moskaus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bitteren Früchte hegemonialer Politik*, Hamburg 2002.

David, Saul, *Die größten Fehlschläge der Militärgeschichte: Von der Schlacht im Teutoburger Wald bis zu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München 2001.

Dehio, Ludwig, *Gleichgewicht oder Hegemonie: Betrachtungen über ein Grundproblem der neueren Staatengeschichte*, Krefeld 1957.

Delbrück, Hans, *Die Strategie des Perikles erläutert durch die Strategie Friedrichs des Großen*, Berlin 1890.

Demandt, Alexander, «*Die Weltreiche in der Geschichte*», in: ders. (Hg.) , *Das Ende der Weltreiche*, München 1997, S. 221–233.

Des Forges, Alison, *Kein Zeuge darf überleben: Der Genozid in Ruanda*, Hamburg 2002

Diner, Dan, *Das Jahrhundert verstehen: Eine universalgeschichtliche Deutung*, München 1999.

Diner, Dan, «*Das Prinzip Amerika*», in: Ulrich Speck/Natan Sznaider (Hg.) , *Empire Amerika. Perspektiven einer neuen Weltordnung*, München 2003, S. 256–274.

Diner, Dan, «*Imperialismus und Universalismus: Versuch einer Begriffsgeschichte*», in: ders., *Weltordnungen: Über*

Geschichte und Wirkung von Recht und Macht, Frankfurt/M.
1993, S. 17–59.

Dippel, Horst, «*Die Auflösung des Britischen Empire oder die Suche nach einem Rechtersatz für formale Herrschaft*»,
in: Richard Lorenz (Hg.) , *Das Verdämmern der Macht*,
Frankfurt/M. 2000, S. 236–255.

Doyle, Michael, *Empires*, Ithaca/London 1984.

E

Ebrey, Patricia Buckley, *China: Eine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Frankfurt/New York 1996.

Edzard, Dietz Otto, *Geschichte Mesopotamiens: Von den Sumerern bis zu Alexander dem Großen*, München 2004.

Elliott, John H. , «*The Decline of Spain*», in: Carlo M. Cipolla (Hg.) ,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London/Southampton 1972, S. 168–195.

F

Fanon, Frantz, *Die Verdamnten dieser Erde*, Reinbek b. Hamburg 1969.

Fanon, Frantz, *Schwarze Haut, weiße Masken*, Frankfurt/M. 1980.

Fenske, Hans, «*Ungeduldige Zuschauer: Die Deutschen und die europäische Expansion 1815–1880*», in: Wolfgang

Reinhard (Hg.) , *Imperialistische Kontinuität und nationale Ungeduld im 19. Jahrhundert*, Frankfurt/M. 1991, S. 87–123.

Ferguson, Niall, «*Das verleugnete Empire*»; in: Ulrich Speck/Natan Sznaider (Hg.) , *Empire Amerika: Perspektiven einer neuen Weltordnung*, München 2003, S. 15–37.

Ferguson, Niall, *Das verleugnete Imperium: Chancen und Risiken amerikanischer Macht*, Berlin 2004. Ferguson, Niall,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London/New York 2002.

Ferguson, Niall, *The Pity of War*, London 1998 (dt.: *Der Falsche Krieg: Der Erste Weltkrieg und das 20. Jahrhundert*, Stuttgart 1999) .

Ferro, Marc, *Der große Krieg 1914–1918*, Frankfurt/M. 1988.

Fetscher, Iring, *Modelle der Friedenssicherung*, München 1972.

Fieldhouse, David,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London 1973.

Figes, Orlando, *Nataschas Tanz: Eine Kulturgeschichte Russlands*, Berlin 2003.

Fischbach, Claudius R. , *Krieg und Frieden in der französischen Aufklärung*, Münster/New York 1990.

Fischer, Wolfram, «*Die Weltwirtschaft im 20. Jahrhundert*», in: ders., *Expansion, Intergration, Globalisierung: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Weltwirtschaft*, Göttingen 1998, S. 140–165.

Fischer, Wolfram, «*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und Währungsordnung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 in: ders., *Expansion, Integration, Globalisierung: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Weltwirtschaft*, Göttingen 1998, S. 79–86.

Franke, Otto,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Eine Darstellung seiner Entstehung, seines Wesens und seiner Entwicklung bis zur neuesten Zeit*, 5 Bde., Berlin/Leipzig 1930–1952.

Frey, Marc, «*Das Ende eines Kolonialreichs: Dien Bien Phu, 13. März bis 7. Mai 1954*», in: Stig Förster u. a. (Hg.), *Schlachten der Weltgeschichte*, München 2001, S. 358–373.

Fueter, Eduard,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von 1492–1559*, München/Berlin 1919.

Fuhrmann, Horst, *Deutsche Geschichte im hohen Mittelalter* (= *Deutsche Geschichte*, hg. von Joachim Leuschner, Bd. 2), Göttingen 1978.

Fukuyama, Francis, *Staaten bauen: Die neue Herausforderung internationaler Politik*, Berlin 2004.

Fulbright, William, *Die Arroganz der Macht*, Hamburg 1967.

G

Gallagher, John, *The Decline, Revival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82.

Gallagher, John/Ronald Robinson, «*Der Imperialismus des Freihandels*», in: Hans Ulrich Wehler (Hg.) , *Imperialismus*, Köln 1972, S. 183–200.

Geiss, Imanuel, «*Kontinuitäten des Imperialismus*», in: Wolfgang Reinhard (Hg.) , *Imperialistische Kontinuität und nationale Ungeduld im 19. Jahrhundert*, Frankfurt/M. 1991, S. 12–30.

Geyer, Dietrich, *Der russische Imperialismus: Studien über den Zusammenhang von innerer und auswärtiger Politik 1860–1914*, Göttingen 1977.

Gibbon, Edward, *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Römischen Imperiums bis zum Ende des Reiches im Westen*, 6 Bde., München 2003.

Giesen, Bernhard/Helmut Berding (Hg.) , *Mythos und Nation*, Frankfurt/M. 1996.

Giesen, Bernhard/Helmut Berding (Hg.) , *Nationale und kulturelle Identität*, Frankfurt/M. 1991.

Giesen, Bernhard/Helmut Berding (Hg.) , *Nationales Bewusstsein und kollektive Identität*, Frankfurt/M. 1994.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1981.

Göckenjan, Hansgerd, «*Die Welt der frühen Reiternomaden*», in: Arne Eggebrecht (Hg.) , *Die Mongolen und ihr Weltreich*, Mainz 1989, S. 7-43.

Göckenjan, Hansgerd, «*Weltherrschaft oder Desintegration? Krise und Zerfall des Mongolischen Großreichs*», in: Richard Lorenz (Hg.) , *Das Verdämmern der Macht. Vom Untergang großer Reiche*, Frankfurt/M. 2000, S. 82-103.

Goldsworthy, Adrian, *Die Legionen Roms: Das große Handbuch zum Machtinstrument eines Weltreiches*, Frankfurt/M. 2004.

Gollwitzer, Heinz, *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 2 Bde., Göttingen 1972 und 1982.

Gorodetsky, Gabriel, *Die große Täuschung: Hitler, Stalin und das Unternehmen «Barbarossa»*, Berlin 2001.

Grousset, René, *L' empire des steppes. Atila, Gengis-Khan, Tamerlan*, Paris 1948.

H

Habermas, Jürgen, «*Das Kantische Projekt und der gespaltene Westen*», in: ders. , *Der gespaltene Westen*, Frankfurt/M. 2004, S. 111-193.

Habermas, Jürgen, *«Was bedeutet der Denkmalsturz? Verschließen wir nicht die Augen vor der Revolution der Weltordnung: Die normative Autorität Amerikas liegt in Trümmer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Nr. 91, 17. April 2003.

Habermas, Jürgen, *«Wege aus der Weltunordnung: Ein Interview mit Jürgen Habermas»*,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1/2004, S. 27-45

Hacke, Christian, *Zur Weltmacht verdammt: Die amerikanische Außenpolitik von J. F. Kennedy bis G. W. Bush*, München 2001.

Hahlweg, Werner, *Guerilla: Krieg ohne Fronten*, Stuttgart 1968.

Hamann, Brigitte, *Der Erste Weltkrieg: Wahrheit und Lüge in Bildern und Texten*, München 2004.

Hamilton, Alexander/James Madison/John Jay, *Die Federalist-Artikel: Politische Theorie und Verfassungskommentar der amerikanischen Gründerväter*, hg. von Angela und Willi Paul Adams, Paderborn 1994.

Hardt, Michael/Antonio Negri, *Empire: Die neue Weltordnung*, Frankfurt/New York 2002.

Heilbrunn, Otto, *Die Partisanen in der modernen Kriegführung* (engl. Original 1962) , Frankfurt/M. 1963.

Heinrichs, Hans-Jürgen, *Die gekränkte Supermacht: Amerika auf der Couch*, Düsseldorf/Zürich 2003. Heuss, Alfred, *Römische Geschichte*, hg. von J. Bleicken, Paderborn, 9. Aufl. 2003.

Heydte, Friedrich August Frhr. von der., *Der moderne Kleinkrieg als wehrpolitisches und militärisches Phänomen*, Würzburg 1972.

Hille, Charlotte (Hg.) , *State Building: Challenges between Theoretical Necessity and Political Reality*, Leiden 2003.

Hippler, Jochen (Hg.) , *Nation-Building: Ein Schlüsselkonzept für friedliche Konfliktbearbeitung?* , Bonn 2004.

Hobbes, Thomas, *Leviathan oder Stoff: Form und Gewalt eines kirchlichen und bürgerlichen Staates*, hg. von Iring Fetscher, Frankfurt/M. 1984.

Hobsbawm, Eric, *Das Gesicht des 21. Jahrhunderts: Ein Gespräch mit Antonio Polito*, München 1999.

Hobsbawm, Eric, *Das imperiale Zeitalter*, Frankfurt/New York 1989.

Hobsbawm, Eric, *Das Zeitalter der Extreme: Welt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1995.

Hobsbawm, Eric, *Nationen und Nationalismus: Mythos und Realität seit 1780*, Frankfurt/New York 1991.

Hobson, John Atkinson, *Der Imperialismus, eingel. von Hans-Christoph Schröder*, Köln, 2. Aufl. 1970.

Hoffmann, Hilmar/Dieter Kramer (Hg.) , *Europa – Kontinent im Abseits?* , Reinbek b. Hamburg 1998.

Horaz, *Sämtliche Werke*, Teil I (Carmina, Oden und Epoden) , hrsg. von H. Färber und W. Schöne, Düsseldorf/Zürich 1993.

Hosking, Geoffrey, *Russland: Nation und Imperium, 1552–1917*, Berlin 2000.

Hourani, Albert, *Die 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Völker*, Frankfurt/M. 1992.

Howard, Michael, *Kurze Geschichte des Ersten Weltkriegs*, München/Zürich 2004.

I

Ignatieff, Michael, «*Empire Amerika?* », in: Ulrich Speck/Natan Sznaider (Hg.) , *Empire Amerika. Perspektiven einer neuen Weltordnung*, München 2003, S. 15–37.

Ignatieff, Michael, *Empire lite: Nation Building in Bosnia, Kosovo and Afghanistan*, London 2003.

Irwin, Robert, «*Die Entstehung des islamischen Weltsystems 1000–1500*», in: Francis Robinson (Hg.) ,

Islamische Welt: Eine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Frankfurt/New York 1997, S. 56–85.

Isokrates, «*Rede über den Frieden*», in: Isokrates, *Sämtliche Werke*, Stuttgart 1993.

J

James, Harold, *Der Rückfall: Die neue Weltwirtschaftskrise*, München/Zürich 2003.

Jaschke, Hans-Gerd, *Soziale Basis und soziale Funkt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Studien zur Bonapartismustheorie*, Opladen 1982.

Jeismann, Michael, «*Propaganda*», in: Gerhard Hirschfeld u. a. (Hg.) , *Enzyklopädie Erster Weltkrieg*, Paderborn 2003, S. 198–209.

Jerabék, Rudolf, «*Conrad von Hötzendorf, Franz Freiherr*» in: Gerhard Hirschfeld u. a. (Hg.) , *Enzyklopädie Erster Weltkrieg*, Paderborn 2003, S. 419–421.

Johnson, Chalmers,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2000 (dt.: *Ein Imperium verfällt*, München 2000) .

Johnson, Chalmers, *Der Selbstmord der amerikanischen Demokratie*, München 2003. Jones, Eric Lionel, *Das Wunder Europa: Umwelt, Wirtschaft und Geopolitik Europas und Asiens*, Tübingen 1991.

Jorga, Nicolae,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s*, 5 Bde., Gotha 1908–1913, Neuaufl. Darmstadt 1990.

Judt, Tony, *Die große Illusion Europa: Herausforderungen und Gefahren einer Idee*, München/Wien 1996.

Jung, Dietrich/Klaus Schlichte/Jens Siegelberg, *Kriege in der Weltgesellschaft: Strukturgeschichtliche Erklärung kriegerischer Gewalt (1945–2002)*, Wiesbaden 2003.

Junker, Detlef, *Power and Mission: Was Amerika antreibt*, Freiburg/Br. 2003. Kagan, Frederik W., «Krieg und Nachkrieg»,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11/2003, S. 1321–1332.

K

Kagan, Robert, *Macht und Ohnmacht: Amerika und Europa in der neuen Weltordnung*, Berlin 2003.

Kagan, Robert, «*The Benevolent Empire*», in: *Foreign Affairs*, 76. Jg., 1998, Heft 111, S. 24–33.

Kaldor, Mary, «*Das ohnmächtige Empire*», in: Ulrich Speck/Natan Sznaider (Hg.), *Empire Amerika: Perspektiven einer neuen Weltordnung*, München 2003, S. 173–198.

Kämpfe, Hans-Rainer, «*Cinggis Khan*», in: Michael Weiers (Hg.), *Die Mongolen: Beiträge zu ihre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armstadt 1986, S. 183–191.

Kann, Robert A., *Geschichte des Habsburgerreiches 1526–1918*, Wien 1977.

Kant, Immanuel, «*Zum ewigen Frieden: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 in: ders., *Werke*, hg. von Wilhelm Weischedel, Darmstadt 1970, Bd. 9, S. 191–251.

Kapus' cin' ski, Ryszard, *Imperium: Sowjetische Streifzüge*, Frankfurt/M. 1993.

Kautsky, John H., *The Politics of Aristocratic Empires*, Chapel Hill 1982.

Keegan, John, *Der Erste Weltkrieg: Eine europäische Tragödie*, Reinbek b. Hamburg 2000.

Keegan, John, *Die Kultur des Krieges*, Berlin 1995.

Kennedy, Paul, *Aufstieg und Fall der großen Mächte: Ökonomischer Wandel und militärischer Konflikt von 1500 bis 2000*, Frankfurt/M. 1989.

Kennedy, Paul, *In Vorbereitung auf das 21. Jahrhundert*, Frankfurt/M. 1993.

Kernig, Claus D., *Lenins Reich in Trümmern. Schatten über Russlands Zukunft*, Stuttgart/München 2000.

Kipling, Rudyard, *Complete Verse*, Cambridge 1989.

Kissinger, Henry, *Die Herausforderung Amerikas: Weltpolitik im 21. Jahrhundert*, München 2002.

Kissinger, Henry, «*The Vietnam-Negotiations*», in: *Foreign Affairs*, Jg. 47, 1969, Heft 2, S. 211-234.

Kitson, Frank, *Im Vorfeld des Krieges: Abwehr von Subversion und Aufruhr*, Stuttgart 1974.

Kluth, Heinz, *Sozialprestige und sozialer Status*, Stuttgart 1957.

Koch, Klaus, *Das Buch Daniel*, Darmstadt 1980.

Koebner, Richard/Helmut Dan Schmidt,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1964.

Kohler, Alfred, *Karl V.: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1999.

Kohler, Alfred u. a. (Hg.) , *Karl V. (1500-1558)* . Neue Perspektiven seiner Herrschaft in Europa und Übersee, Wien 2002.

Kolko, Gabriel, *Das Jahrhundert der Kriege*, Frankfurt/M. 1999.

König, Hans-Joachim, «*Der Zerfall des Spanischen Weltreichs in Amerika*», in: Richard Lorenz (Hg.) , *Das Verdämmern der Macht*, Frankfurt/M. 2000, S. 126-152.

König, Ingemar, *Der römische Staat II. Die Kaiserzeit*, Stuttgart 1997.

Koselleck, Reinhart, «*Zur historisch-politischen Semantik asymmetrischer Gegenbegriffe*», in: ders.,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M., 2. Aufl. 1984, S. 211–259.

Kreiser, Klaus/Christoph K. Neumann, *Kleine Geschichte der Türkei*, Stuttgart 2003.

Kubbig, Bernd W. (Hg.) , *Brandherd Irak: US-Hegemonieanspruch, die UNO und die Rolle Europas*, Frankfurt/M. 2003.

Kulischer, Josef,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 2 Bde., Berlin 1954.

Kunisch, Johannes, *Der kleine Krieg: Studien zum Heerwesen des Absolutismus*, Wiesbaden 1973.

Kupchan, Charles, *Die europäische Herausforderung: Vom Ende der Vorherrschaft Amerikas*, Berlin 2003.

L

Lampe, Gerhard, «*Medienfiktionen beim NATO-Einsatz im Kosovo-Krieg 1999*», in: Michael Strübel (Hg.) , *Film und Krieg: Die Inszenierung von Politik zwischen Apologetik und Apokalypse*, Opladen 2002, S. 127–134.

Landes, David,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arum die einen reich und die anderen arm sind*, Berlin 1999.

Lange, Sven, *Hans Delbrück und der ‹Strategiestreit›: Kriegführung und Kriegsgeschichte in der Kontroverse 1879–1914*, Freiburg/Br. 1995.

Lefebvre, Georges, *Napoleon*, Stuttgart 1989.

Leggewie, Claus, *Die Türkei und Europa: Die Positionen*, Frankfurt/M. 2004.

Leggewie, Claus, «*Ein Empire der Demokratie*», in: Ulrich Speck/Natan Sznaider (Hg.) , *Empire Amerika: Perspektiven einer neuen Weltordnung*, München 2003, S. 199–218.

Lehmann, Gustav Adolf, «*Das Ende der römischen Herrschaft über das ‹westelbische› Germanien*», in: Rainer Wiegels/Winfried Woesler (Hg.) , *Arminius und die Varusschlacht*, Paderborn 1995, S. 123–141.

Lenk, Kurt (Hg.) , *Ideologie: Ideologiekritik und Wissenssoziologie*, Darmstadt und Neuwied, 6. Aufl. 1972.

Lewis, Bernard, «*The Arabs in Eclipse*», in: Carlo M. Cipolla (Hg.) ,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London und Southampton 1972*, S. 102–120.

Lewis, Bernard, *Die Araber.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eines Weltreichs*, Wien/München 1995.

Lewis, David Levering, *The Race to Fashoda*, New York 1987.

Liddell Hart, Basil H., *Große Heerführer*, Düsseldorf, Wien 1968.

Lilie, Ralph-Johannes, *Byzanz: Das zweite Rom*, Berlin 2003.

Livius, Titus, *Römische Geschichte*, hg. von Josef Feix, München und Zürich 1991.

Lorenz, Richard (Hg.) , *Das Verdämmern der Macht: Vom Untergang großer Reiche*, Frankfurt/M. 2000.

Lorenz, Richard, «*Das Ende der Sowjetunion*», in: ders. (Hg.) , *Das Verdämmern der Macht, Vom Untergang großer Reiche*, Frankfurt/M. 2000, S. 256–280.

Luttwak, Edward, *Weltwirtschaftskrieg: Export als Waffe – aus Partnern werden Gegner*, Reinbek b. Hamburg 1994.

Lützel, Paul Michael, *Die Schriftsteller und Europa: Von der Romantik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1992.

M

MacArthur, John R. , *Die Schlacht der Lügen: Wie die USA den Golfkrieg verkauften*, München 1993.

Maenchen-Helfen, Otto, *The World of the Huns: Studies in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Berkeley/London 1973.

Mahan, Alfred Thayer, *Der Einfluss der Seemacht auf die Geschichte. 1660–1812*, überarb. und hg. von Gustav-Adolf

Wolter, Herford 1967.

Mahnkopf, Birgit, «*Neoliberale Globalisierung und globaler Krieg*»,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Heft 1/2004, S. 47–57.

Maier, Charles S., «*Die Grenzen des Empire*», in: Ulrich Speck/Natan Sznaider (Hg.) , *Empire Amerika. Perspektiven einer neuen Weltordnung*, München 2003, S. 126–137.

Mailer, Norman, *Heiliger Krieg. Amerikas Kreuzzug*, Reinbek b. Hamburg 2003.

Majoros, Ferenc/Bernd Rill, *Das Osmanische Reich 1300–1922*, Wiesbaden 2004.

Mann, Michael, *Die ohnmächtige Supermacht: Warum die USA die Welt nicht regieren können*, Frankfurt/New York 2003.

Mann, Michael, *Geschichte der Macht*, 3 Bde., Frankfurt/New York 1990–1998.

Mao Tse-tung, *Vom Kriege: Die kriegswissenschaftlichen Schriften*, Gütersloh 1969.

Marx, Karl,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in: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 I. Abt., Bd. 11, Berlin 1985, S. 96–189.

Marx, Karl, «*Erste Adresse des Generalrats über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d. 17, Berlin 1979, S. 3–8.

Marx, Karl,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i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 I Abt., Bd. 12, Berlin 1984, S. 166–173; dt. Text 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d. 9, Berlin 1975, S. 127–133.

Massie, Robert K., *Die Schalen des Zorns: Großbritannien, Deutschland und das Heraufziehen des Ersten Weltkriegs*, Frankfurt/M. 1993.

Matuz, Josef, *Das Osmanische Reich: Grundlinien seiner Geschichte*, Darmstadt, 3. Aufl. 1994.

McNeill, William, *Krieg und Macht: Militä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vom Altertum bis heute*, München 1984.

McPherson, James M., *Für die Freiheit sterben: Die Geschichte des amerikanischen Bürgerkrieges*, München/Leipzig 1991.

Mead, Walter Russell,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2002.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London 2001.

Melinz, Gerhard, «*Vom osmanischen Mosaik zur türkischen Staatsnation*», in: Ernst Bruckmüller u. a. (Hg.) , *Nationalismus: Wege der Staatenbildung in der außereuropäischen Welt*, Wien 1994, S. 51–75.

Menzel, Ulrich, «*Die Globalisierung vor der Globalisierung*», in: ders., *Paradoxien der neuen Weltordnung*, Frankfurt/M. 2004, S. 31–50.

Menzel, Ulrich, «*Die neue Hegemonie der USA und die Krise des Multilateralismus*», in: ders., *Paradoxien der neuen Weltordnung*, Frankfurt/M., S. 93–151.

Menzel, Ulrich, «*Eurozentrismus versus ReOrientierung*», in: ders., *Paradoxien der neuen Weltordnung*, Frankfurt/M. 2004, S. 64–90.

Merson, John, *Straßen nach Xanadu: China und Europa und die Entstehung der modernen Welt*, Hamburg 1989.

Modelski, George,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London 1987.

Modelski, George/William R. Thompson, *Leading Sectors and World Powers: The Coevolution of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olumbia (S.C.) 1986.

Modelski, George/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Basingstoke/Seattle 1988.

Mommsen, Wolfgang J. (Hg.) , *Das Ende der Kolonialreiche: Dekolonisation und die Politik der Großmächte*, Frankfurt/M. 1990.

Mommsen, Wolfgang J., *Imperialismustheorien: 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neueren Imperialismusinterpretationen*,

Göttingen 1977.

Mommsen, Wolfgang J., *«Wandlungen der liberalen Idee im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 in: ders., *Der europäische Imperialismus*, Göttingen 1979, S. 167–205.

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t, *«Réflexions sur la monarchie universelle»*, in: ders.,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1964, Bd. 2, S. 192–197.

Morgan, David, *The Mongols*, London 1986.

Morgenthau, Hans,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1948) , New York, 5. Aufl. 1973.

Mosès, Stéphane, *Eros und Gesetz: Zehn Lektüren der Bibel*, München 2004.

Motyl, Alexander J., *Sovietology, Rationality, Nationality. Coming to Grips with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New York 1990.

Müller, Klaus-Jürgen, *«Militärpolitik in der Krise: Zur militärpolitischen Konzeption des deutschen Heeres-Generalstabs 1938»*, in: Dirk Stegemann u. a. (Hg.) , *Deutscher Konservat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estschrift für Fritz Fischer*, Bonn 1983, S. 333–345.

Münkler, Herfried, *«ältere und jüngere Formen des Terrorismus. Strategie und Organisationsstruktur»*, in: Werner

Weidenfeld (Hg.) , *Herausforderung Terrorismus*, Wiesbaden 2004, S. 29–43.

Münkler, Herfried, «*Analytiken der Macht: Nietzsche, Machiavelli, Thukydides*», in: Michael Th. Greven (Hg.) , *Macht in der Demokratie*, Baden–Baden 1991, S. 9–44.

Münkler, Herfried, «*Angriff als beste Verteidigung? Sicherheitsdoktrinen in der asymmetrischen Konstellation*»,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Heft 3/2004, S. 22–37.

Münkler, Herfried, «*Das Reich als politische Macht und politischer Mythos*», in: ders., *Reich, Nation, Europa: Modelle politischer Ordnung*, Weinheim 1996, S. 11–59.

Münkler, Herfried, *Der neue Golfkrieg*, Reinbek b. Hamburg 2003.

Münkler, Herfried (Hg.) , *Der Partisan: Theorie, Strategie, Gestalt*, Opladen 1990.

Münkler, Herfried, *Die neuen Kriege*, Reinbek b. Hamburg 2002.

Münkler, Herfried, «*Die Privatisierung des Krieges: Warlords, Terrornetzwerke und die Reaktion des Westens*», i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wissenschaft*, 13. Jg., 2003, Heft 1, S. 7–22.

Münkler, Herfried, *«Gegensätzliche Kriegsursachenanalysen: Aristophanes, Thukydides, Platon und die Vernunft der Regierenden»*, in: ders., *Über den Krieg: Stationen der Kriegsgeschichte im Spiegel ihrer theoretischen Reflexion*, Weilerswist 2002, S. 19–33.

Münkler, Herfried, *Im Namen des Staates: Die Begründung der Staatsraison in der frühen Neuzeit*, Frankfurt/M. 1987.

Münkler, Herfried, *«Instrumentelle und existentielle Auffassung des Krieges bei Carl von Clausewitz»*, in: ders., *Über den Krieg: Stationen der Kriegsgeschichte im Spiegel ihrer theoretischen Reflexion*, Weilerswist 2002, S. 91–115.

Münkler, Herfried, *«Ist der Krieg abschaffbar? Ein Blick auf die Herausforderungen und Möglichkeiten des 20. Jahrhunderts»*, in: Bernd Wegner (Hg.) , *Wie Kriege enden: Wege zum Frieden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Paderborn 2002, S. 347–375.

Münkler, Herfried, *«Kriege im 21. Jahrhundert»*, in: Erich Reiter (Hg.) , *Jahrbuch für internationale Sicherheitspolitik* 2003, Hamburg 2003, S. 83–97.

Münkler, Herfried, *«Kriegsszenarien des 21. Jahrhunderts»*, in: Karl Acham (Hg.) , *Faktizitäten der Macht*, Wien 2004, S. 79–94.

Münkler, Herfried, Machiavelli. *Die Begründung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der Neuzeit aus der Krise der Republik*

Florenz, Frankfurt/M. 1982.

Münkler, Herfried, «*Partisanen der Tradition*», in: ders., *Gewalt und Ordnung: Das Bild des Krieges im politischen Denken*, Frankfurt/M. 1992, S. 127–141.

Münkler, Herfried, «*Perspektiven der Befreiung: Die Philosophie der Gewalt in der Revolutionstheorie Frantz Fanons*», in: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33. Jg., 1981, Heft 3, S. 437–468.

Münkler, Herfried, «*Politik und Krieg: Die neuen Herausforderungen durch Staatszerfall, Terror und Bürgerkriegsökonomien*», in: Armin Nassehi/Markus Schroer (Hg.),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Baden-Baden 2003, S. 471–490.

Münkler, Herfried, *Reich, Nation, Europa: Modelle politischer Ordnung*, Weinheim 1996.

Münkler, Herfried, *Rezension zu Benders «Weltmacht America»*,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279, 2004, S. 430–432.

Münkler, Herfried, «*Staatengemeinschaft oder Imperium: Zur Gestaltung der «Weltinnenpolitik»*», in: Merkur, 58. Jg., 2004, Heft 2, S. 93–105.

Münkler, Herfried, «*Terrorismus heute: Die Asymmetrisierung des Krieges*»,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59. Jg., 2004, Heft 2, S. 1–11.

Münkler, Herfried, «*Wandel der Weltordnung durch asymmetrische Kriege*», in: Josef Schröfl/Thomas Pankratz (Hg.) , *Asymmetrische Kriegführung – ein neues Phänomen in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 Baden-Baden 2004, S. 85–93.

Münkler, Herfried, «*Zur Charakterisierung der neuen Kriege*», in: *Krieg der Gegenwart – eine Beurteilung*, MiLAK Schrift Nr. 4, 2004, S. 21–32.

Münkler, Herfried/Hans Grünberger/Kathrin Mayer, *Nationenbildung. Die Nationalisierung Europas im Diskurs humanistischer Intellektueller*, Berlin 1998.

Münkler, Herfried/Karsten Fischer,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 Überlegungen zu einer politischen Theorie des Opfers*», in: *Leviathan*, 28. Jg., 2000, Heft 3, S. 343–362.

Münkler, Marina, «*Entdecker und Eroberer*», in: Eva Horn u. a. (Hg.) , *Grenzverletzer*, Berlin 2002, S. 156–175.

N

Nagel, Tilman, *Timur der Eroberer und die islamische Welt des späten Mittelalters*, München 1993.

Naimark, Norman M. , *Flammender Hass: Ethnische Säuberungen i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2004.

Napoleoni, Loretta, *Die Ökonomie des Terrors*, München 2004.

Nef, John U., *Western Civilization Since the Renaissance: Peace, War, Industry and the Arts*, New York 1963.

«*Neue nationale Sicherheitsstrategi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Heft 11/2002, S. 1391–1393, sowie Heft 12/2002, S. 1505–1511.

Nichtweiß, Barbara, «*Apokalyptische Verfassungslehren: Carl Schmitt im Horizont der Theologie Erik Petersons*», in: Bernd Wacker (Hg.) , *Die eigentlich katholische Verschärfung: Konfession, Theologie und Politik im Werk Carl Schmitts*, München 1994, S. 37–64.

Niedhart, Gottfried, «*Der Erste Weltkrieg: Von der Gewalt im Krieg zu den Konflikten im Frieden*», in: Bernd Wegner (Hg.) , *Wie Kriege enden: Wege zum Frieden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Paderborn 2002, S. 187–211.

Nippel, Wilfried, *Griechen, Barbaren und <Wilde>: Alte Geschichte und Sozialanthropologie*, Frankfurt/M. 1990.

Nippel, Wilfried, «*Griechische Kolonisation: Kontakte mit indigenen Kulturen, Rechtfertigung von Eroberung, Rückwirkungen auf das Mutterland*», in: Raimund Schulz (Hg.) , *Aufbruch in neue Welten und neue Zeiten: Die großen maritimen Expansionsbewegungen der Antike und Frühen Neuzeit im Vergleich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München

2003 (Beihefte [NF] der Historischen Zeitschrift, Bd. 34) , S. 13–27.

Noth, Martin, *Geschichte Israels*, Göttingen, 10. Aufl. 1986.

Nye, Joseph, «*Amerikas Macht*», in: Ulrich Speck/Natan Sznaider (Hg.) , *Empire Amerika: Perspektiven einer neuen Weltordnung*, München 2003, S. 156–172

Nye, Joseph, *Das Paradox der amerikanischen Macht: Warum die einzige Supermacht der Welt Verbündete braucht*, Hamburg 2003.

Nye, Joseph,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2004.

0

Oliveira Marques, A. H. de, *Geschichte Portugals und des portugiesischen Weltreichs*, Stuttgart 2001.

Olshausen, Eckart, «*Das politische Denken der Römer zur Zeit der Republik*», in: Iring Fetscher/Herfried Münkler (Hg.) , *Pipers Handbuch der politischen Ideen*, München/Zürich 1988, Bd. 1, S. 485–519.

Osterhammel, Jürgen, «*China: Niedergang und Neubildung eines Vielvölkerreiches*», in: Richard Lorenz (Hg.) , *Das Verdämmern der Macht*, Frankfurt/M. 2000, S. 104–125.

Osterhammel, Jürgen, *Die Entzauberung Asiens: 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 Jahrhundert*, München 1998.

Osterhammel, Jürgen, *Kolonialismus: Geschichte, Formen, Folgen*, München 1995.

Osterhammel, Jürgen, «*Kulturelle Grenzen bei der Expansion Europas*», in: *Saeculum*, Bd. 46, 1995, S. 101–138.

Ottmann, Henning,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2 Bde., Stuttgart/Weimar 2001/02.

Otto, Wolfgang, *Conquista, Kultur und Ketzerwahn: Spanien im Jahrhundert seiner Weltherrschaft*, Göttingen 1992.

Overy, Richard, *Die Wurzeln des Sieges: Warum die Alliierten den Zweiten Weltkrieg gewannen*, Stuttgart/München 2000.

P

Pagden, Anthony, «*Instruments of Empire: Tommaso Campanella and the Universal Monarchy of Spain*», in: ders., *Spanish Imperialism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New Haven/London 1990, S. 37–63.

Parker, Geoffrey, *Die militärische Revolution: Die Kriegskunst und der Aufstieg des Westens 1500–1800*, Frankfurt/New York 1990.

Parker, Geoffrey, *The Army of the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1567–1659*, Cambridge 1972.

Pepper, Simon/Adam Nicholas, *Firearms and Fortifications: Military Architecture and Siege Warfare in Sixteenth-Century Siena*, Chicago/London 1986

Philipp, Thomas, «*Der aufhaltsame Abstieg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in: Helmut Altrichter/Helmut Neuhaus (Hg.) , *Das Ende von Großreichen*, Erlangen/Jena 1996, S. 211–223.

Pieper, Renate, «*Das Ende des spanischen Kolonialreiches in Amerika*», in: Alexander Demandt (Hg.) , *Das Ende der Weltreiche*, München 1997, S. 74–88.

Pipes, Richar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Berlin 1992

Pollmann, Judith, «*Eine natürliche Feindschaft. Ursprung und Funktion der Schwarzen Legende über Spanien in den Niederlanden, 1560–1581*», in: Franz Bosbach (Hg.) , *Feindbilder: Die Darstellung des Gegners in der politischen Publizistik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 Köln/Weimar/Wien 1992, S. 73–93.

Pomian, Krzysztof, *Europa und seine Nationen*, Berlin 1990.

Porter, Bernard, «*Die Transformation des British Empire*», in: Alexander Demandt (Hg.) , *Das Ende der Weltreiche*, München 1997, S. 155–173.

Potter, Timothy, *Das römische Italien*, Stuttgart 1992.

Power, Samantha, «*Das Empire der Menschenrechte*», in:
Ulrich Speck/Natan Sznaider (Hg.) , *Empire Amerika:
Perspektiven einer neuen Weltordnung*, München 2003, S. 138–
153.

Prätorius, Rainer, *In God We Trust: Religion und Politik
in den USA*, München 2003.

Priest, Dana, *The Mission: Waging War and Keeping Peace
with America' s Military*, New York/London 2003.

Q

QRT (= Markus Konradin Leiner) , *Schlachtfelder der
elektronischen Wüste: Schwarzkopf, Schwarzenegger, Black
Magic Johnson*, Berlin 1999.

R

Radkau, Joachim, *Das Zeitalter der Nervosität:
Deutschland zwischen Bismarck und Hitler*, München 1998.

Rauchensteiner, Manfred, «*österreich-Ungarn*», in:
Gerhard Hirschfeld u. a. (Hg.) , *Enzyklopädie Erster
Weltkrieg*, Paderborn 2003, S. 64–86

Rauchensteiner, Manfred, «*Verlust der Mitte: Der Zerfall
des Habsburger Reiches*», in: Helmut Altrichter/Helmut

Neuhaus (Hg.) , *Das Ende von Großreichen*, Erlangen und Jena 1996, S. 225–246.

Reifeld, Helmut, «*Imperialismus*», in: Iring Fetscher/Herfried Münkler (Hg.) , *Pipers Handbuch der politischen Ideen*, Bd. 5, München 1987, S. 23–53.

Reinhard, Wolfgang, *Geschichte der Staatsgewalt*, München 1999.

Reinhard, Wolfgang, *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 Stuttgart 1996.

Rémond, René, *Frankreich im 20. Jahrhundert. Erster Teil: 1918–1958* (Geschichte Frankreichs, hsg. von Jean Favier, Bd. 6/1) , Stuttgart 1994.

Reuter, Christoph, *Mein Leben ist eine Waffe: Selbstmordattentäter – Psychogramm eines Phänomens*, München 2002.

Richard, Carl J. , *The Founders and the Classics: Greece, Rome, and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ss.) /London 1994.

Rifkin, Jeremy, *Der europäische Traum: Die Vision einer leisen Supermacht*, Frankfurt/New York 2004.

Rilinger, Rolf, «*Das politische Denken der Römer: Vom Prinzipat zum Dominat*», in: Iring Fetscher/Herfried

Münkler (Hg.) , Pipers *Handbuch der politischen Ideen*, Bd. 1, München 1988, S. 521–593.

Roberts, Michael,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550–1660*, Belfast 1956.

Robinson, Ronald,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London 1968.

Robinson, Ronald, «*Non-European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Sketch for a Theory of Collaboration*», in: Roger Owen/Bob Sutcliffe (Hg.) , *Studies in a Theory of Imperialism*, London 1972, S. 117–142.

Röhrich, Winfried, «*Problemfelder der Weltinnenpolitik*», in: Astrid Sahm u. a. (Hg.) , *Die Zukunft des Friedens*, Wiesbaden 2000, S. 257–267.

Romilly, Jacqueline de, *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Oxford 1953.

Rorty, Richard, «*Ein Empire der Ungewissheit*», in: Ulrich Speck/Natan Sznaider (Hg.) , *Empire Amerika: Perspektiven einer neuen Weltordnung*, München 2003, S. 240–255.

Rosen, Stephen Peter, «*Ein Empire auf Probe*», in: Ulrich Speck/Natan Sznaider (Hg.) , *Empire Amerika: Perspektiven einer neuen Weltordnung*, München 2003, S. 83–103.

Ruf, Werner (Hg.) , *Politische Ökonomie der Gewalt: Staatszerfall und die Privatisierung von Gewalt und Krieg*,

Opladen 2003.

S

Sassen, Saskia, *Machdbeben: Wohin führt die Globalisierung?*, Stuttgart/München 2002.

Schell, Jonathan, *Die Politik des Friedens: Macht, Gewaltlosigkeit und die Interessen der Völker*, München 2004.

Schieder, Theodor, «*Typologie und Erscheinungsformen des Nationalstaats in Europa*», in: ders., *Nationalstaat: Studien zum nationalen Problem und modernen Europa*, Göttingen 1991, S. 65–86.

Schley, Nicole/Sabine Busse, *Die Kriege der USA: Chronik einer aggressiven Nation*, Kreuzlingen/München 2003.

Schmidt-Glintzer, Helwig, *China: Vielvölkerreich und Einheitsstaat*, München 1997.

Schmierer, Joscha, *Mein Name sei Europa. Einigung ohne Mythos und Utopie*, Frankfurt/M. 1996.

Schmitt, Carl, «*Großraum gegen Universalismus: Der völkerrechtliche Kampf um die Monroedoktrin*», in: ders., *Positionen und Begriffe*, Berlin 1988, (Nachdr. der Ausg. von 1940), S. 295–302.

Schmitt, Carl, *Theorie des Partisanen*, Berlin 1963.

Schmitt, Carl, «*Völkerrechtliche Formen des modernen Imperialismus*», in: ders., *Positionen und Begriffe*, Berlin 1988, S. 162–180.

Schmitt, Carl, *Völkerrechtliche Großraumordnung mit Interventionsverbot für raumfremde Mächte*, Berlin/Wien 1939.

Schneider, Manfred, *Der Barbar: Endzeitstimmung und Kulturrecycling*, München 1997.

Schröder, Hans-Christoph, *Sozialistische Imperialismusdeutung. Studien zu ihrer Geschichte*, Göttingen 1973.

Schröfl, Josef/Thomas Pankratz (Hg.) , *Asymmetrische Kriegführung – ein neues Phänomen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 Baden-Baden 2004.

Schuller, Wolfgang, *Die Herrschaft der Athener im Ersten Attischen Seebund*, Berlin/New York 1974.

Schulz, Gerhard (Hg.) , *Partisanen und Volkskrieg. Zur Revolutionierung des Krieges im 20. Jahrhundert*, Göttingen 1985.

Schulz, Raimund, «*Roms Eroberung des Mittelmeers und der Vorstoß in den Atlantik: Reaktion und Rückwirkungen auf die Ideologie, Geographie, Ethnographie und Anthropologie der späten Republik und frühen Kaiserzeit*», in: ders. (Hg.) , *Aufbruch in neue Welten und neue Zeiten: Die großen maritimen*

Expansionsbewegungen der Antike und Frühen Neuzeit im Vergleich, München 2003, S. 29–50.

Schumpeter, Joseph, «*Zur Soziologie der Imperialismen*»,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Bd. 46, 1918, S. 1–39 und 275–310.

Schweinitz jr., Karl de,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1983.

See, Klaus von, *Barbar, Germane, Arier: Die Suche nach der Identität der Deutschen*, Heidelberg 1994.

Seeck, Otto, *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 6 Bde., 1895–1920, Darmstadt 2000.

Shama, Simon, *Überfluss und schöner Schein: Zur Kultur der Niederlande im Goldenen Zeitalter*, München 1988.

Simon, Gerhard, «*Die Desintegration der Sowjetunion*», in: Alexander Demandt (Hg) , *Das Ende der Weltreiche*, München 1997, S. 174–210.

Simon, Gerhard und Nadja, *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sowjetischen Imperiums*, München 1993.

Sloterdijk, Peter, *Falls Europa erwacht: Gedanken zum Programm einer Weltmacht am Ende des Zeitalters ihrer politischen Absence*, Frankfurt/M. 1994.

Snyder, Jack,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und London 1991.

Sofsky, Wolfgang, *Operation Freiheit: Der Krieg im Irak*, Frankfurt/M. 2003.

Soggin, J. Alberto,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Israels und Judas: Von den Ursprüngen bis zum Aufstand Bar Kochbas*, Darmstadt 1991.

Sombart, Werner, *Händler und Helden: Patriotische Besinnungen*, München 1915.

Soros, George, *Die Vorherrschaft der USA – eine Seifenblase*, München 2004.

Steininger, Rolf, *Der Vietnamkrieg*, Frankfurt/M. 2004.

Steinweg, Rainer (Hg.) , *Der gerechte Krieg: Christentum, Islam, Marxismus*, Frankfurt/M. 1980.

Stieglitz, Joseph, *Die Schatten der Globalisierung*, Berlin 2002.

Stinnett, Robert B. , *Pearl Harbor: Wie die amerikanische Regierung den Angriff provozierte und 2476 ihrer Bürger sterben ließ*, Frankfurt/M. 2003.

Stökl, Günther, *Russische Geschichte*, Stuttgart 1997.

Strachan, Hew, *Der Erste Weltkrieg: Eine neue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München 2004.

Symes, Ronald, *Die Römische Revolution: Machtkämpfe im antiken Rom*, hg. von Christoph Selzer und Uwe Walter, Stuttgart 2003.

T

Tacitus, *Annalen*, lat.-dt. hg. von Erich Heller, Darmstadt 1992.

Taube, Manfred (Hg.) , *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München 1989.

Thompson, William R. , *On Global War: 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1988.

Thukydides, *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 übersetzt und hrsg. von Helmuth Vretska und Werner Rinner, Stuttgart 2000.

Tilgner, Ulrich, *Der inszenierte Krieg: Täuschung und Wahrheit beim Sturz Saddam Husseins*, Berlin 2003.

Todd, Emmanuel, *Weltmacht USA: Ein Nachruf*, München 2003.

Triepel, Heinrich, *Die Hegemonie: Ein Buch von führenden Staaten*, Stuttgart/Berlin 1938.

Tuchman, Barbara, *Der erste Salut*, Frankfurt/M. 1988.

U

Ullrich, Volker, *Die nervöse Großmacht: Aufstieg und Untergang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71-1918*, Frankfurt/M.

1997.

Ursinus, Michael, «Byzanz, Osmanisches Reich, türkischer Nationalstaat. Zur 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 am Vorabend des Ersten Weltkriegs», in: Richard Lorenz (Hg.) , *Das Verdämmern der Macht: Vom Untergang großer Reiche*, Frankfurt/M. 2000, S. 153–172.

V

Vagts, Alfred, «Die Chimäre des europäischen Gleichgewichts», in: ders., *Bilanzen und Balancen: Aufsätze zur internationalen Finanz und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hg. von Hans-Ulrich Wehler, Frankfurt am Main 1979, S. 131–160.

Valéry, Paul, «Europäischer Geist», in: ders., *Werke*, hg. von Jürgen Schmidt-Radefeldt, Bd. 7, Frankfurt/M. 1994.

Vance, Norman, «Vom mare nostrum zu Kiplings *The Seven Seas*: Das Römische Weltreich und Britanniens Wahrnehmung des Empire von 1600–1914», in: Raimund Schulz (Hg.) , *Aufbruch in neue Welten und neue Zeiten: Die großen maritimen Expansionsbewegungen der Antike und Frühen Neuzeit im Vergleich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München 2003 (Beihefte [NF] der Historischen Zeitschrift, Bd. 34) , S. 79–108.

Verenkotte, Clemens, *Die Herren der Welt: Das amerikanische Imperium*, München 2003.

Vergil, *Aeneis*, dt. von Joh. Götte, München und Zürich, 7. Aufl. 1988.

Vidal, Gore, *Ewiger Krieg für ewigen Frieden: Wie Amerika den Hass erntet, den es gesät hat*, Hamburg 2002.

Voegelin, Eric, *Das Ökumenische Zeitalter – Weltherrschaft und Philosophie*, München 2004.

Volkman-Schluck, Karl-Heinz, *Politische Philosophie*, Frankfurt/Main 1974.

Voss, Tobias, «*Ich habe keine Stimme mehr, mein ganzes Leben flieht.*» *Psychische Dimensionen des Guerilla-Krieges*», in: Herfried Münkler (Hg.) , *Der Partisan: Theorie, Strategie, Gestalt*, Wiesbaden 1990, S. 292–321.

W

Wallerstein, Immanuel, «*Aufstieg und künftiger Niedergang des kapitalistischen Weltsystems: Zur Grundlegung vergleichender Analyse*», in: Dieter Senghaas (Hg.) , *Kapitalistische Weltökonomie. Kontroversen über ihren Ursprung und ihre Entwicklungsdynamik*, Frankfurt/M. 1979, S. 31–67.

Wallerstein, Immanuel, *Das moderne Weltsystem: Die Anfänge kapitalistischer Landwirtschaft und die europäische Weltökonomie im 16. Jahrhundert*, Frankfurt/M. 1986.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1979.

Walzer, Michael, *Gibt es den gerechten Krieg?*, Stuttgart 1982.

Walzer, Michael, «*Is There an American Empire?* », in: Dissent, Herbst 2003, S. 27–31.

Weber, Max, «*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 in: ders.,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hg. von Johannes Winckelmann, Tübingen, 4. Aufl. 1980, S. 1–25.

Weber, Max,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5., rev. Auflage besorgt von Johannes Winckelmann, Tübingen 1972.

Wehler, Hans-Ulrich, *Der Aufstieg des amerikanischen Imperialismus: 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s Imperium Americanum 1865–1900*, Göttingen 1974.

Weiers, Michael,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in: Arne Eggebrecht (Hg.) *Die Mongolen und ihr Weltreich*, Mainz 1989, S. 45–114.

Weiers, Michael, «*Von Ögödei bis Möngke. Das mongolische Großreich*», in: Michael Weiers (Hg.) , *Die Mongolen: Beiträge zu ihre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armstadt 1986, S. 192–216.

Welwei, Karl-Wilhelm, *Das klassische Athen: Demokratie und Machtpolitik im 5. und 4. Jahrhundert*, Darmstadt 1999.

Wenskus, Reinhard, *Stammesbildung und Verfassung: Das Werden der frühmittelalterlichen Gentes*, Köln/Graz 1961.

«*What we' re fi ghting for-wofür wir kämpfen*»,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6/2002, S.
756–760.

Wolfram, Herwig, *Geschichte der Goten: Entwurf einer
historischen Ethnographie*, München 1979.

Wood, Gordon S.,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Chapel Hill 1969.

Z

Zanker, Paul, *Augustus und die Macht der Bilder*, München
1987.

Zimmerer, Jürgen/Joachim Zeller (Hg.) , *Völkermord in
Deutsch-Südwestafrika: Der Kolonialkrieg (1904–1908) in
Namibia und seine Folgen*, Berlin 2003.

致谢

此书的问世，缘起于同洪堡大学和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同事们的数次长谈。我们的交谈，触及几个问题，如：何为帝国？帝国在政治学分析中是否具有重大意义？新生的和古老的帝国区别何在？在这些交流中，乌利希·斯派克（Ulrich Speck）博士给了我最初的启迪。当时，正值伊拉克战争战前战中欧美摩擦几达顶点，此君特邀我为他出版的《美利坚帝国》（Empire Amerika）丛书写些东西。另外，在我——包括受邀波士顿歌德学院所做的——多次讲座中，以及在2004年德国外交部举办的大使会议上，我得以进一步完善和阐明关于帝国的浅见，并将它作为课题与同仁广而论之。在拙著创作阶段它有幸得到卡斯滕·菲舍尔（Kasten Fischer）博士、哈拉尔·布卢姆（Harald Bluhm）博士、汉斯·格林贝戈（Hans Grünberger）博士、格拉德·胡曼（Gerald Hubmann）博士以及尼卡拉斯·斯多克哈默（Nicolas Stockhammer）诸君的垂阅，他们发表的真知灼见，包括批评意见，令我受益匪浅，这才慢慢有了这本书的雏形。

我的秘书卡丽娜·霍夫曼（Karina Hoffmann）对此书的最终付梓功不可没，她誊写并录入了我的手写稿。在拙著临近完成的收尾阶段，安娜·阿恩特（Anna Arndt）和塞缪尔·米勒（Samuel Müller）负责完成注解的整理和参考文献目录的补全工作。此外，我想借此对柏林科学中心深表谢悃，感谢其主席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博士兼教授，为我慷慨提供科学中心这样安静舒适的创作环境长达一年。

感谢罗沃尔特（Rowohlt）柏林出版社的贡纳尔·施密特（Gunnar Schmidt）先生，他的鼓励贯穿于此书的整个诞生过程。是他鼓励我，要紧追那最初的学术灵感，将之打磨成基于历史事实比较和论证的研究成果。贝恩德·克罗克纳尔（Bernd Klöckener）此前就曾审校过我的《新战争》（Dieneuen Kriege）一书。对于审校工作，他一如既往严谨和果断，对此书的最终成型他可谓居功至伟。我的妻子玛丽娜·明克勒（Marina Münkler）博士二十年如一日地关念我的工作，在这个项目中她的身影也伴随始终。在阅读我的手稿时，她从来都一丝不苟，而她的建议和意见又总植根于她的深厚学养，带给我启发。对以上诸君我在此一并报以诚挚的谢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
著；程卫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

书名原文：Imperien: Die Logik der Weltherrschaft-vom
Alten Rom bis zu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ISBN 978-7-5201-7686-6

I. ①帝… II. ①赫…②程… III. ①帝国主义-研究 IV. ①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47648号

帝国统治的逻辑

——从古罗马到美国

著者/〔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

译者/程卫平

出版人/王利民

责任编辑/段其刚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0 字数：242千字

版次/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7686-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20-3322号

定价/7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帝国的特征是什么？帝国秩序潜藏着怎样的风险，又提供了哪些机遇？突然之间这些问题不再仅仅具有历史学意义。当今世界，美国所拥有的主导地位在很多人眼里是一种威胁。规则由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制定，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只管服从规则就是了么？还是说存在一种连华府也不得不屈从的统治世界的逻辑呢？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在此书中向我们阐明，帝国如何运转，在历史的长河中又出现过哪些类型的帝国。作者游刃有余地穿行于千年历史长卷，同时对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做出了精湛的剖析。

明克勒一个人就是行走的智库。

——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

德国战略学家明克勒写作风格讲求实际，他在这部极有学术抱负的比较学著作中阐明了帝国的世界历史逻辑。

——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



忘掉地平线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定价: 79.00 元

索·恩
THORN BIRD

[加] 米歇尔·迪安 / 著 冯璇 / 译

Michelle Dean
那些
特别善于
表达自己观点
的女人们

帕克 | 韦斯特 | 阿伦特 |
麦卡锡 | 桑塔格 |
凯尔 | 迪迪翁 | 埃夫龙 |
阿德勒 | 马尔科姆

The Women Who Made an Art of Having an Opin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米歇尔·迪安 (Michelle Dean) / 作者简介

记者、评论家，曾荣获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颁发的 2016 年诺娜·巴拉希扬精彩评论奖 (Nona Balakian Citation for Excellence in Reviewing)。迪安是《新共和》的特约编辑，她也在《纽约客》《纽约时报杂志》《评击杂志》《纽约杂志》《她》《哈泼斯杂志》上发表文章。迪安还与他人一起监制和创作了电视剧《恶行》(The Act)。该剧是根据迪安的文章《迪迪希望女儿总生病，吉普赛希望妈妈被谋杀》(Dee Dee Wanted Her Daughter To Be Sick, Gypsy Wanted Her Mom Murdered) 改编的，已于 2019 年 3 月在 Hulu 流媒体平台上播出。迪安现居于美国洛杉矶。

冯 璇 / 译者简介

自由译者，已翻译出版了《美第奇家族的兴衰》《印加帝国的末日》《利维坦：美国捕鲸史》《皮毛、财富和帝国》《布鲁内莱斯基的穹顶》《印象巴黎：印象派的诞生及其对世界的革命性影响》等作品。

图书策划人



联合创立

视觉设计师



她们是20世纪美国文学 and 知识历史被掩藏的核心角色

不愿被简单归类为女权主义者的先锋女性

“Sharp” 无疑是21世纪女性从这些前辈那里继承的宝贵遗产

不和善，不屈服，不避讳，用声音与社会的涡流对抗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女性的声音穿透一个世纪

SHARP by Michelle Dean

Copyright © 2018 by Michelle De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ichelle Dean, c/o Black
Inc., the David Black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那 些
特别善于 ——
表达自己观点
的 ——
女 人 们

The Women Who Made an Art of Having an Opinion

- [前言](#)
- [第一章 帕克](#)
- [第二章 韦斯特](#)
- [第三章 韦斯特和赫斯顿](#)
- [第四章 阿伦特](#)
- [第五章 麦卡锡](#)
- [第六章 帕克和阿伦特](#)
- [第七章 阿伦特和麦卡锡](#)
- [第八章 桑塔格](#)
- [第九章 凯尔](#)
- [第十章 迪迪翁](#)
- [第十一章 埃夫龙](#)
- [第十二章 阿伦特和麦卡锡和莉莲·赫尔曼](#)
- [第十三章 阿德勒](#)
- [第十四章 马尔科姆](#)
- [后记](#)
- [参考资料说明](#)
- [参考资料](#)
- [索引](#)

前言

被我写进本书的这些女性在各自的生活中拥有同一个被视为褒奖的标志：她们都曾被形容为“锐利（sharp）”。

这些女性各自天赋的确切本质不尽相同，但她们的共同点是都能写一手令人难忘的好文章。没有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对自己生活中的荒谬事物的尖刻回顾；没有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将世界的一半历史浓缩进一次用第一人称描述的旅程的能力；没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没有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以山精中间的公主的奇特觉悟为主题的小说；没有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对阐释的理解；没有宝琳·凯尔（Pauline Kael）对电影制片人的强烈抨击；没有诺拉·埃夫龙（Nora Ephron）对女权运动的怀疑论；没有雷娜塔·阿德勒（Renata Adler）对权威人士缺点怪癖的编目列举；没有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对精神分析学和新闻学的风险与回报的反思：这个世界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些女性是在二十世纪取得这些成就的事实更让她们显得非比寻常。那时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人渴望听到女性就任何事情发表观点的世界。我们很容易忘记当多萝西·帕克开始发表她那些辛辣的诗文时，女性甚至还没有选举权。我们也总是忽略第二波女权主义思潮是在苏珊·桑塔格凭借《关于“坎普”的札记》（*Notes on “Camp”*）成为标志性人物之后才盛行起来的。这些女性在任何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开

始为女性这个整体谋求利益之前就已经公开蔑视人们为特定性别限定特别期许的行为了。她们凭借自己超群的天赋，获得了其他女性根本不可能拥有的，在智慧层面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所有这些个人成就还总让她们与“女权主义”的群体政治关系紧张。这些女性中有一些人会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另一些则不会。事实上，她们之中没有谁满足于做一名活动家。丽贝卡·韦斯特是最接近于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但她最终也发现，妇女参政论者虽然勇猛得令人敬佩，但也假正经得不可原谅。桑塔格写过为女权主义辩护的文章，但是在受到质疑时又对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怒斥这项运动“头脑简单”。就连诺拉·埃夫龙也承认自己为女性在197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组织能力感到担忧。

这种矛盾心态通常被看作她们想与女权主义政治撇清关系的证明。有些时候，这的确是她们的目的。这些女性之间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她们并不愿意被归为同一个群体。一方面是因为她们之间有些人相互憎恶：比如麦卡锡就不喜欢帕克，桑塔格也不喜欢麦卡锡，阿德勒攻击凯尔时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们没有时间培养什么“姐妹情”：我甚至可以想象，要是汉娜·阿伦特看到我把她的作品放在女性身份的背景中讨论，一定会滔滔不绝地把我训斥一番。

即便如此，这些女性依然被认为是女性像男性一样有资格就艺术、思想和政治发表观点的有力证明。我们在这条战线上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得益于阿伦特、迪迪翁和马尔科姆及其他女性为这个等式的女性一方增添的砝码。无论她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们确实为其他在她们之后的女性开辟了道路。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这段历史还远远没有达到它理应享有的为人熟知的程度，起码在纽约某些偏僻的区划之外是这样的。她们每个人都

有传记出版，我也读了这些传记。不过鉴于传记的性质，每本书只能单独讲述一位女性，介绍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的事件，而不能体现我认为我发现的存在于她们之间的联系。美国文学的发展通常是以男性小说家作为纪年标志的：先是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然后是罗斯、贝娄和塞林格的作品。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同时期的女性作家也有许多同样值得被铭记的成就的想法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便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人们也普遍认为男性在“智识史”中占主导地位。二十世纪中期被称作“纽约知识分子”的这个群体当然也总是被定义为一个男性群体。不过我的研究显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人口统计角度来说，男性的数量确实超过了女性的。但是从一个大概是更关键的问题上看，即用其创造出的成果是否值得被铭记，是否能够定义他们所处环境中的术语来衡量的话，女性也是完全符合标准，甚至是有所超越的。

毕竟，谁的声音比帕克的更能穿透各个时代？你几乎可以从她的每行诗句中感受到那种刮擦声。又有谁的道德和政治观点比汉娜·阿伦特的影响更深远？没有苏珊·桑塔格，我们对于文化的构想将停留在哪里？如果不是宝琳·凯尔为我们开启了推崇流行文化的大门，我们会如何看待电影？对摆在我面前的这些女性的成就研究越久，我反而越觉得困惑：在谈论二十世纪的文学和智识历史时，怎么有人能够不将女性作为其中的核心？

我不禁认定，人们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在这些女性所处的时代中，如此聪慧、卓越和锐利并不总能为她们赢得赞美。更多情况下，她们还会因为无意中刺伤了别人的感情而遭到猛烈的攻击。百老汇的制片人都憎恨帕克，甚至将她从戏剧批评家的位置上赶了下去。玛丽·麦卡锡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许多朋友都厌恶她以他们为对象写的那些诙谐模仿文，还认为她是一个高傲、刻薄的人。与宝琳·凯尔同时期的男性电影制作人批评她不够严肃。（实际上，

她至今仍然会受到这种指责。)在琼·迪迪翁(Joan Didion)首次发表她关于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著名散文《一些做着美梦的梦想家》

(*Some Dreamers of the Golden Dream*)之后,她的编辑收到了不少毫不留情的批评信。当珍妮特·马尔科姆提出有些记者利用了被报道对象的虚荣心时,不少报刊的专栏作家们都在自己的专栏中批判她玷污了新闻工作宣称拥有的尊严。

有一些批评就是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另一些则是纯粹的愚蠢。还有不少是以上两种情况的综合。不过这些女性的力量的关键就体现在她们如何对待这些批评上,她们秉持的是一种往往很风趣的聪明的怀疑论。就连汉娜·阿伦特也会不时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Eichmann in Jerusalem*)引发的喧嚣而感到厌烦;迪迪翁则给一封放肆的读者来信回复了一个“哦,哇”;阿德勒有一个引用作者的原话回敬他们的习惯,她会指出这些人的用词重复和缺乏深意。

这些女性善于嘲讽的作风有时会成为她们应当被忽视的根据,因为人们觉得她们“不够严肃”。反讽、挖苦和嘲弄可以是局外人的工具:当你本身没有参与传统智慧的形成过程时,你对传统智慧自然会产生怀疑,这种怀疑的副产品就是讽刺。我认为,当发现这种特征和倾向时,我们应当更加小心试图干涉这种特征的做法。因为与众不同始终具有其智慧价值。在本书中,这种“不同”指的是“不是男性”,但它同时也可以指不是白人、不出身于上流社会,或不曾就读于名校。

这些女性就不总是身处所谓对的地方,她们也不是什么完美的榜样人物。她们的背景情况都很相似:大都是白人,大多是犹太裔,以及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你会看到她们也都拥有伴随这些特征而来的习惯、侧重点和偏见。比如,在一个更完美的世界中,像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这样的黑人作

家也应当被更加广泛地认定为这个群体中的成员，但是种族主义导致她的作品被边缘化了。

即便如此，这些女性仍然投身战场，参与了这场二十世纪的大辩论。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仅凭她们的成就，就足以让人认可她们存在的价值。

我写这本书还有另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决定了我会去探索关于这些女性的哪些问题。如果你是拥有某种雄心壮志的年轻女性，了解这段历史会让你获得一些宝贵的财富。知道尽管性别歧视还很盛行，但你终究会找到突破它的道路就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所以，我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会一直探索究竟是什么把这些女性塑造成了她们后来成为的样子，她们是优雅的辩论者，她们会受到男性的阻碍，但也从他们那里得到过帮助；她们容易犯错，但不会被自己的错误定义；更重要的是，她们完全不会被人们遗忘。我寻找这些答案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即便是在今天，即便是在女权运动结束之后（这个说法尚存争议），我们依然需要更多像她们一样的女性。

第一章 帕克

在成为后来那个指引方向的北极星之前，年仅十九岁的多萝西·帕克已经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了。对于像她这样的人来说，生活本不应该如此。1893年，帕克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皮毛商人家庭中。她的家族姓氏是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但不是那个罗斯柴尔德——帕克一生都在这样提醒采访者。不过帕克家在纽约仍然算得上一个受人尊敬的犹太家庭，他们的经济状况足以承受泽西海岸边的假期和曼哈顿上西区的宽敞公寓。然而在1913年冬天，因为两任妻子先后离世，以及一个亲兄弟随着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海底，帕克的父亲终于被悲伤击倒，撒手人寰。他几乎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任何遗产。

当时的多萝西·罗斯柴尔德（Dorothy Rothschild）尚未婚嫁，所以也无法指望夫家拯救她于水火之中。她也没受过什么教育，高中都没毕业，因为像她这样出身的女性都不是为了将来找工作而接受教育的。到二十世纪中期，秘书专科学校将向大量中产阶级女性传授让她们能够养活自己的职业技能，但是在帕克刚成年时，这些机构还都处于起步阶段。最终，帕克只能依靠自己仅有的能够迅速领到报酬的技能谋生：她会弹钢琴，而且舞蹈学校当时正如雨后天晴般在曼哈顿各处被创办起来。帕克喜欢说有时候她甚至向学生们教授略微不合体统的新兴的雷格泰姆（ragtime）舞蹈^[1]，比如火鸡跑和灰熊舞之类的。帕克在讲到这个故事时总是把自己当成故事中的笑料。她的一个朋友记得她曾这样说：“我教过的男学生之后都成了不中用的跛脚鸭。”^[2]

这是个有意思的故事，但也几乎肯定是个被夸大了的故事。在帕克的朋友和同时期人的所有记录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过帕克坐在钢琴边，更别说跳过任何舞蹈了。可能她只是把这些才能都抛弃了，也可能，如她后来在写作上的经历一样，利用她的音乐天赋挣钱这件事让她对音乐本身失去了兴趣。不过，还有可能是她为了幽默而夸大了事实，因为从一开始，幽默就为她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逃避途径。她的笑话最终会将多萝西·罗斯柴尔德转变为传奇一般的“帕克夫人（Mrs. Parker）”，后者仿佛是某种愉快时光的化身。帕克夫人手里总是端着一杯鸡尾酒，她说出的俏皮话总会像投下一枚手榴弹一样在聚会中引爆笑声。

不过，就如聚会中的喧哗热闹和光鲜亮丽总能掩盖苦难和沮丧一样，帕克的生活也是如此。那些让其他人着迷不已的故事都是用悲惨的经历雕琢成的供人消遣的愉悦内容。就连这个坐在一群随着音乐旋转的舞者中间弹钢琴的天性快活的形象，也是帕克用来隐藏自己的愤怒和痛苦的。帕克显然并不介意告诉别人自己曾经身无分文，因为从白手起家到身处她达到的高度这件事中蕴含了某种大无畏的精神。不过帕克很少谈及在她五岁时就去世的母亲，以及被她憎恨的继母。她还不喜欢谈自己十五岁就离开学校的原因其实是要留在家中照顾越来越病弱，且开始变得糊涂的父亲。直到将近五年后她父亲去世为止，帕克才摆脱了这个困住她的牢笼。

后来，帕克在一篇题为《了不起的老绅士》（*The Wonderful Old Gentleman*）的文章中描述了这个（虚构）人物弥留之际的情况：

人们没有必要聚集到老绅士的病榻前了，他已经认不出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实际上，他在近一年前就认不得他们了，他总是叫错他们的名字，还会在有礼但严肃地询问他们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时弄错谁是谁的丈夫、妻子或孩子。[\[3\]](#)

帕克喜欢将父亲的去世描述为一场悲剧，有时还会为自己不得不孤苦伶仃地自谋生路而愤愤不平：“你知道，我当时没有钱。”^[4]不过不得不找工作养活自己被证明是对她大有裨益的，这也是帕克第一次将一段不好的经历转变成一个精彩的故事。这就是她的天赋：将复杂的情绪梳理成机智风趣的妙语，将所有辛酸艰难隐藏在字里行间，而不是平铺直叙地大吐苦水。

在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帕克显然认定所有的好运都是某种偶然。她总是说自己走上写作道路是个意外，是“因为缺钱”^[5]才写作的。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帕克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了，虽然具体是从几岁开始已经弄不清了。帕克不喜欢保存记录，她的文稿也很少有留存至今的。她的一位传记作者设法找到了她小时候给父亲写的几封短笺，从那里面，人们已经可以听出一位明日作家的声音。有一次她给父亲写信说：“人们说如果你的字迹向上扬，那意味着你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天性。”她在这里指的是自己倾斜的手写笔迹。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略微泄气的评论：“我想我有。”^[6]这种做法后来将成为她的标志性策略。

有时候，天赋也是一种意外。它会选择哪些人能拥有这些天赋，然后让这些人过上一种他们自己都从未梦想过的生活。不过，天赋确实是与多萝西·帕克成为作家这件事有关的唯一可以被算作意外的东西。

最先给予帕克一个职业机会的人叫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Frank Crowninshield）。1914年的某个时候，他从一堆主动投稿的文章里挑出了帕克的稿子，可能是因为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可能是因为看中了她的反抗精神。克劳宁希尔德出身于波士顿婆罗门

（Boston Brahmin）阶层^[7]，此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他和纽约上流社会的其他成员有很大区别。克劳宁希尔德终身未婚——可能因为

他是同性恋，不过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一点。在所有关心他的人面前，克劳宁希尔德是一位专心照顾自己沉溺于麻醉药品的兄弟的人。他在纽约为人所知的特点主要是他好开玩笑，以及他担任了新版《名利场》（*Vanity Fair*）的负责人。这份杂志原本是一份古板、正派的男士时装杂志，但康泰·纳仕（Condé Nast）雇用克劳宁希尔德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

当时还是美国杂志的最初兴起阶段。《哈泼斯杂志》（*Harper's*）和《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都在发行中。不过《纽约客》（*New Yorker*）尚未问世，也没有什么人敢奢望比“迪比克（Dubuque）的老夫人们”更有见识的读者群。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是弗洛伊德的外甥，通常被认为是创造了公共关系学的人，他是在1913年秋才刚刚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的。^[8]从事广告业的人们更是刚刚才开始设想他们最终将在美国拥有怎样的影响力。

在几乎没有什么先例可效仿的情况下，克劳宁希尔德的《名利场》就呈现了某种与主编的个性很相似的特点：尖酸刻薄、莽撞无礼，在针对富人的时候尤其如此。可能是因为他的兄弟遭受的折磨，也可能是因为克劳宁希尔德家族一直是个很有声望，但并非多么富有的家族——反正克劳宁希尔德对于富人们总是抱有一种批判态度。不过他采用的并不是什么言辞激烈的社会批判。相反，克劳宁希尔德喜欢调侃。就连他为改版后的第一期杂志写的《主编的话》都带着一种讽刺意味：

我们打算遵循着高尚的、传教士一般的精神为女性做一些事情，据我们观察，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份美国杂志为女性做过这样的事。我们打算常常迎合她们的智慧。我们打算冒险相信，她们在最清醒的时候，也是能够胜任一些大脑活动的；我们甚至打算壮着胆子相信她们正是为当代文学

作出了更原创、更令人兴奋，而且是充满吸引力的贡献的人。我们特此宣布自己为坚定、顽固的女权主义者。[\[9\]](#)

这就是一个可以有多种解释，容易令人困惑的讽刺：这是在拿当时还相对新鲜的女权主义这个概念说笑？还是一种旨在赞美女权主义的幽默？又或是不含任何政治意图的单纯嘲弄？在我看来，这三个答案都是对的。一个类似这样的讽刺的主要乐趣就在于从不同的方向能够看出不同的含义。至少有几种方向是女性可以采用的。当这第一期杂志在1914年被发行出来的时候，女性甚至还没有投票权。但是因为克劳宁希尔德喜欢开玩笑，所以他需要一些站在相反立场上看问题的作者，也就是那些不受公认的规矩界限禁锢的人。

大部分符合这个类别的作者碰巧都是女性。安妮·奥黑根（Anne O’ Hagan）是一位妇女参政论者，她写过关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中所谓的波希米亚生活的文章。克拉拉·泰斯（Clara Tice）是一位前卫派插画家，她喜欢宣称自己是第一位梳波波头的女性，从这份杂志创立初期，泰斯就一直是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玛乔丽·希利斯（Marjorie Hillis）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会成为各地女性单身生活的代表，杂志创立初期，她也在这里发表过文章。

帕克将会成为这份杂志最具标志性的声音，不过让她到这里就职的过程花了不少时间。克劳宁希尔德是因为她提交的一段轻诗歌而注意到她的。那首诗的名字叫《任何门廊》（*Any Porch*），全诗共9节，内容都是无意中听到的评论，这首诗的主旨就是，在任何家境富裕、消息比较灵通的富有人家的门廊上，你都可能听到这些内容。风格固定的、品评二十世纪初期上流社会的道德偏见的题材可能会让现代人觉得没意思。不过从这首诗中已经能够看出后来的帕克会关注哪些焦点：她对于女性特质带来的局限的尖酸解读，以及对那些只会重复公认观点和陈词滥调的人的不耐烦。

我不会说布朗夫人是个坏人，
她不关心道德，但不是不讲道德……
我觉得这个可怜的姑娘嫁不出去了
她正在谈论她的“事业”呢。[\[10\]](#)

克劳宁希尔德从这首诗中看到了一些东西，他支付了5美元或10美元或12美元来购买这首诗。（关于这个报酬，帕克、克劳宁希尔德，以及其他人说数额各不相同。）这次小小的成功让她有勇气向克劳宁希尔德申请一个工作机会。起初，他没法在《名利场》为她争取到职位，所以他把帕克安排到了《服饰与美容》（*Vogue*）。

这个安排并不十分合适。1916年的《服饰与美容》还是一本为拘谨古板的端庄女性提供拘谨古板的端庄内容的杂志。帕克对于时装潮流从来不感兴趣，可是她发现这里的工作要求她对每种布料的优点或做多长的褶边之类的问题保持充满激情甚至是近乎虔诚的关注。哪怕是她在这里上班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她也无法鼓起足够的干劲。后来她尝试用礼貌的言辞描述这段回忆，但她依然难以掩饰自己像爱批判其他任何事一样，对同事们也抱有诸多意见。她告诉《巴黎评论》（*Paris Review*）的采访者说，在《服饰与美容》工作的那些女性“平淡无奇……并不时髦”。[\[11\]](#)她对那些人的赞美从来没有对她们的侮辱一半长：

她们都是正派、端庄的女性——是我见过的最端庄的，不过她们根本不能胜任在这样一份杂志中的工作。她们戴着滑稽的小软帽，把杂志中的模特从强悍的尤物无趣化为娇柔的小家碧玉。

《服饰与美容》是为顺应刚刚兴起的商业制衣产业的需求而创办的，这项产业大多时候要迎合顾客的喜好，同时也在让他们的喜好变得平庸。即便是在杂志创办初期，《服饰与美容》中的每篇文章就已

经蒙上了一层营销的外衣，每期杂志都会表现出一种产品目录的格调。此时距离女性推翻裙装的束缚还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但是凭借着既令人敬佩，又有些邪恶的先见之明，帕克在《服饰与美容》工作时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摧毁美丽的服装是女性优雅的最高表现的理念。

公平地说，在《服饰与美容》被迫终日应对一个在她看来根本配不上自己的主题的这段时间，反而能让帕克更加集中自己的才智。那个写出《任何门廊》这样的作品的作者开始把自己的钢笔当作所向披靡的大锤。在《服饰与美容》感到的压抑让她变得狡猾和敏锐。举例来说，当她被安排为用钢笔和墨水绘制的服装画撰写插图说明时，她就必须非常小心。这些插图往往是占据《服饰与美容》最多版面的内容，帕克得利用机智让自己的文字足够难以捉摸，这样主编才不会抓到帕克其实很看不起《服饰与美容》的读者的任何暗示。这种像制作金银细丝工艺品一样精心雕琢出来的插图说明中不乏一些绝妙的成果——比如那句著名的“简洁是内衣的灵魂”^[12]。其他一些则拿时尚要求的复杂的支撑内衣开起了更轻松的玩笑：

只有一件事能和人生中的第一场恋爱一样激动人心，那就是人生中的第一件紧身胸衣。这两件事都能够带来一种令人愉悦的受重视的感觉。这件紧身胸衣能让十二岁孩子平板一样的身材也显示出某种腰部曲线。^[13]

不过，她的编辑们还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她的不屑表现得过于明显时，帕克不得不重写某些插图说明。尽管帕克的举止显然是无懈可击的，但《服饰与美容》的主编、头脑冷静的埃德娜·伍尔曼·蔡斯（Edna Woolman Chase）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形容帕克是“嘴上涂着蜜，脑子里酿着醋”。蔡斯能够意识到帕克的文字乍一读来甜美可人，实则将尖酸刻薄都隐藏在某种托词背后这点似乎很重要。她的评价与帕克后来的一位朋友的描述相互呼应。戏剧批评家亚历山大·伍尔科特（Alexander Woollcott）说年轻时的帕克是“小耐儿和麦克白

夫人的奇异综合（So odd a blend of Little Nell and Lady Macbeth）”^[14]。在最初的那些年里，帕克简直是文思如泉涌。她像为《服饰与美容》写文章一样频繁地为《名利场》供稿，显然是想在那里获得一个工作机会。《名利场》肯定能给帕克源源不断地写出这种轻松、嘲讽，大多数时候并不会为人们所铭记的文字提供更多空间。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一种被她称为仇恨之歌的体裁上，这种轻诗歌针对的对象范围很广，从女性到宠物狗应有尽有。有些这样的作品非常诙谐，但大部分还是以不加修饰的抱怨为主题，它们表达的尖刻甚至会觉得刺耳。当她被许可在散文中更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才华时，帕克往往能写出更精彩的东西。她那种像醋一样尖酸的机智被这样利用起来时往往能收获不错的效果，它们就像是一种缓慢反应的酸性物质，一点一点腐蚀被她嘲弄的主题。她对事物的厌烦情绪也总能让她的作品更深刻、更透彻。

1916年11月发行的《名利场》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还没结婚》（*Why I Haven't Married*）的文章，帕克在这里解释了自己的独身状态。这篇文章是对纽约约会场景的一种讽刺，在帕克所处的年代，她显然和如今的我们一样毫无希望。帕克描绘了一位单身女性能够遇到的几种共进晚餐的对象，用他们来概括今天的情况似乎也依然适合。比如拉尔夫，一位永远满怀热切期盼的好男人：“我看到自己被一堆毯子和沙发靠垫围在中间……我看到自己成了反对妇女参政的社团的一员”。^[15]又比如马克西米利安，一位左派波希米亚主义者：“他把艺术看得比什么都重”。再比如吉姆，一位事业蒸蒸日上的生意人：“在他的心中，我其实只能排在第三名，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威士忌和威士忌，第三名才轮到我”。

1917年7月发行的《服饰与美容》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室内的亵渎》（*Interior Desecration*）的文章。帕克在其中为人们描述了到由阿利斯泰尔·圣克劳德（Alistair St. Cloud，很可能是虚构的人

物）装饰的房子中拜访的令人困惑的经历。（这次拜访很可能也是虚构的。）我们被告知，有一个房间里装饰着紫色的绸缎和黑色的毯子，还摆着“从宗教法庭流传下来的稀有的古董椅子”。^[16]

除了一个黑檀木小柜上放着的一本有鲜亮的红色封皮的书之外，房间里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我看了一眼书名，上面写着《十日谈》。

我问：“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用的？”

阿利斯泰尔自豪地回答说：“是藏书室。”

帕克每天都在进步，写出了越来越多的妙语，对目标的分析也越来越精准。她从一开始就显露了天赋，但是她也需要时间来磨炼写作技巧。她似乎还必须获得克劳宁希尔德的赞赏和关注作为激励。帕克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初几年里非常多产，超过了后来任何时候。自食其力的准则符合她的风格，即便是在1916年春嫁给埃德温·庞德·帕克二世（Edwin Pond Parker II）之后，她依然是这么做的。

给了多萝西新姓氏的男人是一个年纪尚轻的金发男子，他是普惠公司（Paine Webber）的股票经纪人，负责销售业绩良好的康涅狄格股票。不过就像多萝西原本的姓氏会让人联想到那个富有家族一样，帕克拥有的财产也并不像他的名字暗示的那么多。通常被简称为埃迪（Eddie）的帕克先生注定是一个没有留下什么自我描述，只能通过别人对他的印象来为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知道他一直喜欢喝酒，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至少远比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多萝西更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多萝西刚认识埃迪时几乎还是个滴酒不沾的人，但在两人婚姻期间，埃迪会让她慢慢爱上杜松子酒。

《新郎来了》（*Here Comes the Groom*）发表于1917年6月，帕克站在自己一贯的批判视角谈论了婚姻制度。“从始至终，结婚的过程对于新郎来说都很悲哀，”^[17]帕克在这篇于1916年结婚后创作的文

章中打趣道，“从婚礼进行曲奏响到蜜月的开始阶段，他一直迷失在被遗忘的浓雾之中。”尽管似乎所有人都说帕克爱着埃迪，但她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继续把丈夫留在了那片浓雾之中。他们才结婚没几个月，美国就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埃迪应征入伍，在随连队接受训练之后，最终被派上了前线。他显然就是在此期间开始对吗啡上瘾的，而酒精对他的吸引力也并没有降低。

埃迪·帕克的种种问题让他成了妻子人生中一个游魂一般的存在，他是一个偶尔被她拉着参加某些聚会的幽灵，是一个被她硬插进一两个故事中的角色，但是帕克从没有清楚地说明过他身上究竟有什么吸引自己的地方。1918年，克劳宁希尔德终于让帕克进入了《名利场》，他的本意是想让她写散文。自这份杂志被改版时起，负责撰写戏剧评论的人一直是P. G. 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他辞职以后，克劳宁希尔德就让帕克填补了这个空缺。帕克从来没写过任何关于戏剧的文章，然而戏剧评论却是《名利场》不得不关注的一个主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有地位的时髦人士都热衷于阅读戏剧评论。电影在此时还不是占支配地位的流行娱乐形式，剧院中的现场表演仍然是创造和培养明星的场所。一名戏剧批评家能够搅动、影响、审视，更不用说嘲弄讽刺的金主和明星是很充足的。

这可能也解释了帕克最初为《名利场》写的几篇评论为什么显得那么小心翼翼。原本自信幽默的文章突然失去了节奏。在最初的几篇专栏文章里，帕克只是在紧张地闲聊。在大多数文章里，她几乎没怎么描述自己观看的戏剧和音乐剧。在1918年4月发表的第一篇评论中，帕克用了大量笔墨来抱怨一位在观看音乐剧时，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寻找一只手套上的观众。这篇文章的结尾也很突兀，最后一句话是：“就这些了。” [\[18\]](#)

信心最终还是被建立起来了，不过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帕克这位投手在进行希望渺茫的正面投球的过程中，渐渐可以投出几个快球了，而且她瞄准目标的能力也提升了。在她的第四篇专栏文章里，她抱怨了戏剧批评家的“悲惨生活”^[19]，因为她想要评论的戏剧在杂志能够被送到商店货架上出售时往往已经停止演出了。在第五篇专栏文章里，她批判了戏剧总离不开战争题材的现象：“除了裹上盟军旗帜，他们就不知道还能如何打扮歌舞女郎了。”^[20]渐渐的，帕克的尖刻嘲讽又显示出了她原有的优雅风格。她在抱怨《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中必将出现的开枪场景时说：“我真心希望[易卜生]偶尔能让女士们服点二氯化汞，或是打开煤气阀门，或选择其他一些声音小、又不会弄脏房子的死法。”^[21]

帕克的信心得以增强的原因之一是她发现在《名利场》，自己是在为朋友而写作。克劳宁希尔德和这份杂志的其他编辑都理解她。幽默要建立在某种程度的相互理解上才能被感知。即使某个笑话很过火，甚至是越轨的，也必须是在讲笑话的人和听笑话的人之间存在某种共识的前提下，讲笑话的人才会有道德界线可逾越。在帕克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有一个密友和知己组成的圈子随时可以给予她鼓励和认可。这个圈子里的成员几乎全是男性，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两位她在《名利场》的同事。第一个人是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这位有些笨拙的新闻记者是在帕克从《服饰与美容》转投《名利场》后不久受雇担任执行主编一职的。另一个人是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他身材偏瘦，沉默寡言，然而隐藏在这种拘谨背后的是同样具有杀伤力的幽默感。这三个人在《名利场》总是形影不离，成了制造麻烦的三人组。

从任何层面来说，他们都用文字写就了自己的传奇。很久之后，帕克带着明显的为自己的邪恶而自豪的口气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差到了极致。”^[22]他们都喜欢搞恶作剧，尤其是以他们的老板们为

捉弄对象的那种。有一个他们最爱讲的趣闻是帕克订阅了一份葬礼杂志。她和本奇利都喜欢与死亡有关的幽默。他们还喜欢观察克劳宁希尔德从帕克的办公桌前经过，看到她从那些杂志上撕下并用大头针钉起来的尸体防腐图解时表现出的惊恐的样子。他们中午出去吃饭总要花很长时间，对于迟到心安理得，甚至拒绝为此编造借口。当克劳宁希尔德陪同康泰·纳仕一起到欧洲出差的时候，这三个人就更无法无天了。他们确实不是什么忠于职守的员工。

他们这种懒散的精神气质还被延伸到了阿冈昆圆桌会议（Algonquin Round Table）中。这个传奇的团体中包括多位作家，就连那些借别人的光来参加活动的追随者们也都很迷人。成员们会到曼哈顿中城的阿冈昆酒店进行短暂的聚会。圆桌会议的正式形成源自一次自我放纵。1919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戏剧批评家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宴请宾客庆祝自己在战后平安返回。出席者对这次特殊仪式意犹未尽，于是决定将它延续下去。这个群体的声望持续的时间远比这个活动本身持续的时间长。圆桌会议的存在时间很短。八卦专栏里第一次提到圆桌会议是1922年。到1923年时，有报道说成员内部出了问题，原因是酒店的所有者发表了一些反对犹太人的看法；^[23]到1925年，这个特别的活动已经被宣告终结了。

后来，帕克对于圆桌会议的感觉变得越来越充满矛盾，她对自己获得的几乎所有成功好像都是这样的感受。帕克并不如有些人提到的那样，是参加圆桌会议的唯一女性。包括鲁思·黑尔（Ruth Hale）和简·格兰特（Jane Grant）之类的记者，以及埃德娜·费伯（Edna Ferber）之类的小说家也会经常来这里与其他人共饮。不过帕克无疑是作风和观点与这个活动联系得最紧密的一个。她的声望让其他参加活动的男性也相形见绌，那些人的名字如今大多已被人遗忘。因为帕克的风趣言谈总是那么精辟，所以她也是最经常被八卦专栏作家们引用的人。

对所有这些情况并不很适应的帕克有时会对提起圆桌会议的采访者发脾气，她要么说：“我并不经常参加，去那里花钱太多。”^[24]要么对整个活动轻描淡写：“那不过是一群爱讲闲话的人凑在一起吹牛炫耀罢了，他们攒了几天的笑料，需要找机会说个痛快。”^[25]帕克无疑会受到当时媒体报道的影响，那些内容对于圆桌会议自称文学界中坚力量的说法充满怀疑，甚至持批判态度。1924年，一位八卦专栏作者对这个群体嗤之以鼻：“没有一个[成员]为文学带来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格调，也没有谁写出过什么影响深远的诗篇，可他们都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传统思维充满不屑。”^[26]

也许帕克辩驳得太多了，对自己朋友们的赞许则太少了。他们在酒店共进午餐和晚餐时度过的愉快时光似乎不是什么大事，没有任何深远影响，但这为其他更重大的事情提供了助力。本奇利、舍伍德和这个群体中其他乐于听她发表意见的人们让她感到充满活力和激情。在《名利场》工作并参加阿冈昆圆桌会议的那些年正是她人生中创作力最旺盛的阶段。

帕克天生缺乏认可他人作为严肃作家或迷人明星的能力，这在她成为评论家后也一直影响着她。她不是一个容易被取悦的戏剧观众；简单来说，她不是一个戏剧迷。戏剧制作人们对于帕克在自己的专栏中发表的让他们很受伤的评价越来越气愤。其实评价本身的侮辱性并不至于引起那么强烈的受冒犯感，但是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制作人不仅是被评论的对象，更是广告商。他们可以挥舞棍棒反击。

还有些时候，就连帕克的无心之举也会引发他们的怒火。那篇让康泰·纳仕疲于应付的专栏文章甚至都不是帕克最精彩的文章之一。该文章评论的对象是一部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喜剧《恺撒之妻》（*Caesar's Wife*）。帕克对这部作品中的明星比利·伯克（Billie Burke）是这样评价的：

扮演年轻妻子的伯克小姐看起来青春靓丽。她在一些比较严肃的场景中表现得不错；在一些轻松的桥段中，为了表现出角色的小女孩儿气质，她的表演就像在模仿伊娃·坦圭（Eva Tanguay）。[27]

这种讽刺已经比她平常的那些都隐蔽了，然而它却导致百老汇传奇戏剧监制人，同时也是伯克的丈夫的弗洛·齐格飞（Flo Ziegfeld）冲到电话前大肆抱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伊娃·坦圭被认为是一位“充满异国风情的舞者”；而比利·伯克却代表着一种纯洁无瑕的形象。她最著名的银幕形象大概就是米高梅公司1939年拍摄的《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中的好女巫格琳达（Glinda the Good Witch）。不过，这种卑贱下流的暗示可能还不是最令伯克感到受辱的。因为刚刚年满三十五岁的伯克对于帕克讽刺她年龄的怨恨，可能比对暗示她像脱衣舞娘的还要强烈。

不管怎么说，齐格飞已经不是第一个投诉帕克这种口无遮拦的评论的人了，所以康泰·纳仕坚持让她做出改变。克劳宁希尔德带帕克到广场饭店（the Plaza）喝茶，借机告诉她说自己不想让她继续负责戏剧评论的工作了。关于帕克究竟是辞职了还是被从《名利场》彻底解雇了，各方说法不一，答案的左右摇摆取决于你读到的是谁的版本。帕克说自己点了菜单上最贵的甜点，然后愤然离席。接着她给本奇利打了电话，后者立马也辞职了。

本奇利绝对已经成了帕克生活中最重要的男人。她渴望得到他的认可，还会以他为效仿的榜样。他们的朋友们怀疑两人之间是否发展出了婚外情，不过似乎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显然，帕克对本奇利来说也像本奇利对她一样重要，因为尽管本奇利有孩子要抚养，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名利场》的工作。帕克说：“这是我所知的最伟大的友谊的表现。” [28]

不过，在离开《名利场》这件事上，他们其实并不像自己夸张的离场所表现得那么气愤，连他们的接班人都是他们自己选好的。帕克离开之前不久刚刚提拔了一位名叫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年轻批评家，他原本的工作是负责审核投稿。^[29]当克劳宁希尔德安排威尔逊接替本奇利的执行总编的工作时，帕克很可能更高兴了。被解雇不到一年，她的文章就会重新被刊登在《名利场》上。

交接工作非常顺利。在此过程中，威尔逊偶尔也会到阿冈昆喝上几杯，但是年纪尚轻、资历尚浅的他还要再过很多年才能成为写出《阿克塞尔的城堡》（*Axel's Castle*）和《到芬兰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这样“严肃的”批评作品的受人尊敬的作家。受邀参加了圆桌会议活动的威尔逊在日记中写道：“我没觉得那些人特别有意思。”^[30]不过他的确认为帕克是一个令他很感兴趣的人，因为“她的本性中充满相互抵触的东西”。威尔逊认为帕克有别于阿冈昆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是因为她能够与严肃的人“平等地对话”^[31]。她的“入木三分和一针见血”让她不像其他成员那么偏狭土气。这些特质很对威尔逊的口味，他成了帕克一辈子的朋友，即便是在帕克被人遗忘、身无分文时也依然如此。威尔逊与其他许多出身于类似背景 and 环境的男性不同，他真心享受与思维敏锐的女性相处。他似乎抵挡不了与真正聪明的人为伍的诱惑。

*

不过帕克根本不需要对康泰·纳仕心怀怨恨。因为凭借她此时的声望，她根本不缺少工作机会。一份名为《安斯利》（*Ainslee's*）的杂志立即雇用她做戏剧批评家。帕克的轻诗歌几乎每周都会出现在城中各份报纸和杂志上，她的戏剧批评文章每月都会被发表，除这些以外，她还会写一些散文。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帕克一刻不停地工作着。尽管她说靠写诗挣的钱从来都不够生活，但她还是依靠自

己的收入及埃迪的某种形式的贡献坚持下来了；这对夫妻在1922年时已经分居，不过他们要到1928年才会正式离婚。

所以我们可以说帕克的文章在当时肯定是非常受欢迎的，不过它们是好文章吗？从这一角度来说，她的诗歌是最不受重视的。美国人对于轻诗歌的需求日渐萎缩，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更是完全没有人再看这些东西了。我们得承认，如今看这些东西确实会觉得它没什么吸引力。它的形式过分考究，内容则都是些陈词滥调。帕克也常常以爱情为主题，所以有人批评她多愁善感。她对这些批评意见很当真，于是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诗歌毫无价值。不过如果你能细细品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表现围绕着她的外在世界的诗句时常能闪烁出智慧的光辉。就连被她弃如敝屣的作品中都不乏精彩的妙语，比如1922年创作的《轻佻女子》（*The Flapper*）中就有这么一段：

她少女般的举止可能会引发激动，

她的礼数教养可能会遭人指点，

不过她能造成的伤害

绝没有一条潜水艇能造成的多。[\[32\]](#)

这种指责绝不是随便一说的。帕克是在无声地瞄准与她同时代的人们。帕克和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差不多是同时成名的，后者正是把轻佻女子（flappers）和轻佻女子问题

（flapperdom）神话化的代表人物。菲茨杰拉德创作的小说《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讲述的就是大学校园中的年轻学生爱上一位轻佻女子的故事。这部1919年出版的小说不仅销量惊人，还获得了评论界的交口称赞。菲茨杰拉德因此书而声名鹊起，简而言之就是他被视为同龄人中的贤哲。帕克和菲茨杰拉德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当菲茨杰拉德还在艰难挣扎时就相互认识了。尽管如此，帕克还是对

于他获得成功之后在媒体面前为自己塑造的形象感到厌烦。1922年3月，帕克用一首名叫《一群年轻人》（*The Younger Set*）的仇恨之歌来纾解自己对于像菲茨杰拉德这样的青年才俊作家的嫉妒之情：

那些男孩儿作家；

那些要把纯文学抛在脚边的人。

每天晚上入睡前

他们会双膝跪地向孟肯（H. L. Mencken）祷告

求他保佑自己成为好男孩儿。

他们总是随身携带一大沓自己剪裁的稿纸，

还说毕竟世上只能有一个雷·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

对此我毫无异议。

他们惧怕真正的公开发表

就像你和我

面对一百万美元的礼物时会畏缩一样。

不过眨眼间

他们又要朗读自己的作品了——

无论是在商场里，

在运送谷物的升降机上，

还是在女士的更衣室里。[\[33\]](#)

雷·德·古尔蒙曾经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批评家，如今他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了。不过帕克显然是在用他来暗喻男孩儿作家们当时的主保圣人——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出版

时，菲茨杰拉德只有24岁。与他同时期的人无法不注意到他并对他充满嫉妒。另一位阿冈昆圆桌会议的成员在读了这本小说后抱怨说：

“它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 [\[34\]](#)

帕克也嫉妒菲茨杰拉德吗？她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总说他是自己的朋友，还说自己喜欢他的作品。不过另一些暗示则说明帕克心中有一种想要跟对方一较高下的求胜心。1921年，她在《生活》（*Life*）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又见哈伯德妈妈》（*Once More Mother Hubbard*）的文章，她要表达的意思是这篇诙谐模仿文就是“给菲茨杰拉德讲的”经典童话故事。

十九岁的罗莎琳德（Rosalind）把手肘撑在膝盖上。你能看到的只有从已经用了十九年仍被擦得闪闪发光的浴盆边露出来的带波浪的短发和她隐含焦躁的灰色眼睛。她在弯弯的嘴角处懒洋洋地叼着一根香烟。

艾默里（Amory）靠在门边，轻声地吹着口哨，他吹的是《返回拿骚楼》（*Coming Back to Nassau Hall*）。罗莎琳德的年轻貌美在他心中点燃了一簇好奇之火。

他随意地说道：“给我讲讲你自己。” [\[35\]](#)

这篇诙谐模仿文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和其他成功的模仿作品一样，都建立在对被模仿对象的仔细研究上。如果说这里面有一部分嫉妒的成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直言不讳的批判。菲茨杰拉德确实对上流社会的“随意”抱有一种盲目的崇拜。他也对常青藤联盟情有独钟（《返回拿骚楼》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助威歌）。他还喜欢安排自己书中的英雄遇到各种貌美，但整体上一团糟的年轻女性角色，所有这些女性都是模拟作家的妻子泽尔达·菲茨杰拉德（Zelda Fitzgerald）创造的。菲茨杰拉德没有对这篇作品给出任何回应，不过如果他读到这些内容，他一定能看出帕克投出的石头和射出的箭至少有一些是正中靶心的。

菲茨杰拉德对女性人物的处理会引起帕克的注意绝不是个意外。帕克和菲茨杰拉德的很多朋友一样不喜欢他的妻子泽尔达。帕克对泽尔达的传记作者说过：“她一遇到什么不喜欢的事就生气，我不觉得这是什么招人喜欢的品质。”^[36]帕克这么说可能是一种竞争心理作祟：有传闻说菲茨杰拉德和帕克之间是男女关系，不过没有任何证据留存下来。^[37]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形象问题：泽尔达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塑造成媒体眼中的终极轻佻女子，这样的形象恰恰是帕克一直在抗拒的。在《人间天堂》出版之后，公众对菲茨杰拉德十分关注，而泽尔达也一直是被关注的一部分。她会在采访中说自己热爱罗莎琳德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以她为原型的。她还会说：“我喜欢这样的女孩儿，我喜欢她们的勇气，还有她们的鲁莽和挥霍无度。”^[38]与她相反，帕克认为她的表现都是装出来的，帕克说不出这样的话，也无法理解这样的想法。

即便如此，帕克和菲茨杰拉德的友谊还是几乎持续了一生。他们太相似了——两个大部分时间里缺乏偿债能力的酒鬼兼遭遇创作瓶颈期的作家。最终，菲茨杰拉德也会认可帕克的观点，承认自己早期作品的无力，以及爵士时代无节制享乐背后的空虚。到菲茨杰拉德在1925年出版《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之时，他已经不再那么崇拜“随意”了。轻佻女子和富有人家的子孙到此时成了各自玫瑰花瓣上的溃烂之处。不过人们更关注的仍然是像盖茨比在西卵的豪宅这样的闪闪发光的幻象，却没有人在乎多光鲜的幻象也不过是伪造之物的现实。《了不起的盖茨比》从商业角度来说并不成功。菲茨杰拉德所处时代的人们还没有准备好聆听他想要传达的信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出版了被免费派发给士兵的版本，这本书才变得受欢迎起来。^[39]

与帕克不同的是，菲茨杰拉德英年早逝，酗酒和肺结核联手在1940年夺取了他的生命，他去世时仅四十四岁。帕克比他多活了近三

十年。当她看到躺在棺材里的菲茨杰拉德时，帕克引用了作家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原话用到他本人身上：“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没有人意识到这句话的出处。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帕克也被自己设定的人格面具困住了。所有报纸杂志上都能看到她的作品，所有人都想发表她的诗歌或妙语。1927年，她出版了一本名为《够长的绳子》（*Enough Rope*）的诗歌作品集。令她吃惊，也让其他所有人意外的是，这本诗集很快就成了一本畅销书。她的诗歌太流行了，以至于其中的词句和韵文都被融入了日常生活。人们在聚会中相互引用其中的内容，好让自己显得风趣非凡。《诗歌》（*Poetry*）上一位严苛阴郁的评论者在1928年写道：“几乎你认识的所有人都能直引、转引，或者哪怕是不完全准确地引用至少十几句帕克的诗文。她似乎已经取代了麻将、填字游戏和《再问我一题》（*Ask Me Another*，该年代流行的寓教于乐的游戏书）。”[\[40\]](#)

鉴于帕克的诗歌读起来并不会让人轻松愉快，她还能如此受欢迎就更出乎意料了。人们喜欢的正是她这种让人震惊的风格。她的技巧中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虽然被反复使用，但是每次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此时已经离开《名利场》，到《新共和》（*New Republic*）任主编的埃德蒙·威尔逊评论了《够长的绳子》这本书。直到距今相对不算很久以前，文学界的朋友互相评论彼此的作品都还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威尔逊对于帕克的诗歌的惯用套路作出了一个精彩的总结：

起初是用带有滑稽感的伤春悲秋的几句话营造气氛，往后读也不过是典型的杂志上的补白短文，顶多可以说是内容上可信一些，文笔上优美一些，但也仅仅是略高于平均水平而已；直到读完最后一句，你才能体会到它给整篇作品带来的让人难以想象的冲击力。[\[41\]](#)

这种策略也有其自身的缺点。点睛妙语出现之前的部分往往都是些陈词滥调或过分煽情的内容，也就是威尔逊所谓的“平凡无奇的幽默韵文”和“平淡无奇的女性诗歌”。评论者们总是批评帕克靠死记硬背写诗，还总说她不够原创。但这些人忽略了一些事情。当帕克使用这些老生常谈的内容时，她往往就是为了利用这些内容的空洞无物，它们的不足正是帕克拿来嘲笑的对象。尽管如此，帕克还是接受了外界对她作品的批评，还总会重复那些人的观点。她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就说：“亲爱的，实话实说，我的诗文太落伍了——和任何曾经流行，但如今看来惨不忍睹的东西一样。”^[42]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威尔逊在内的一些人当时并不这样看待她的作品。威尔逊在为《够长的绳子》撰写的评论中提到自己发现了这些诗中存在一些引人不快的内容，但他同时认为这些诗“表现了一种不断向前的状态，创作出这些令人满意的作品的人不仅拥有引人注目的文学天赋，更拥有想要写作的纯粹需求”。他在帕克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风格，但是二者秉持的哲学理念却完全不同。威尔逊坚持认为帕克这种“锋利、辛辣的风格”^[43]是她独有的。他还觉得这种风格弥补了她作品中存在的弱点。他确定她的声音是值得被所有人认真倾听的。

帕克的声音是一种带着自厌和自虐气息的声音，但是她折磨的目标超越了她本身。你可以将她的目标概括为“身为女性的局限性”，或“浪漫爱情传说的虚假之处”，甚至是“自杀本身的小题大做”，就如她在那首举世闻名的《摘要》（*Résumé*）及类似的作品中写到的那样：

用刀片会疼；

投河会湿漉漉；

酸会留下污迹；

麻醉品会引发痉挛。

枪支是违法的；

上吊绳索不一定结实；

煤气特别难闻；

你还是继续活着吧。[\[44\]](#)

尽管帕克的大部分读者都不知道这一点，但这首诗其实是一种自嘲。帕克在1922年第一次尝试自杀时选择的就是一片刀片。当时她因为与查尔斯·麦克阿瑟（Charles MacArthur）的分手而心情沮丧。麦克阿瑟是一位记者，后来会写出一部名为《头版》（*The Front Page*，又译《犯罪的都市》）的喜剧，该剧还成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大热电影《女友礼拜五》（*His Girl Friday*）的样板。帕克和麦克阿瑟的婚外情最后闹得很僵，在此期间帕克还做了一次人工流产。之后帕克也没有勇敢地振作起来并恢复如初。而且她似乎对很多人反复讲述过这段经历，有时候甚至是对着没有什么同情心的听众。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是她选择的听众里包括一位当时还很年轻，且没什么经验的作家，这个人正是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和帕克一样，海明威在今天如此著名，以至于我们觉得当初他的天才一定是马上就获得了认可，他的名气应该是从他发表第一句话时就树立起来了。然而在1926年2月帕克第一次见到海明威的时候，他还是一位只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的人。《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是由规模极小的博尼与利夫莱特出版公司（Boni and Liveright）出版的。这本书并没有在纽约引发什么轰动。帕克后来描述它得到的反响与“在曼哈顿上城河滨大道发生的一场无疾而终的狗打架”[\[45\]](#)差不多。是菲茨杰拉德把海明威介绍给了出版自己作品的，资金更雄厚，也更有声望的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Scribner's）。1926年春，海明威来纽约与出版商洽谈出版自己首

部重要著作的事宜，也是这次洽谈达成的协议最终让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出版了海明威的第一本真正成功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所以说，当帕克和海明威结识时，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就还有很大差距。从受公众追捧的角度来说，帕克的知名度远高于海明威。这一点似乎让海明威很不自在。更让他厌烦的是，帕克听迁居海外的作家说在法国生活很愉快又省钱之后，就决定延长两人相互了解的时间，和海明威乘坐同一条船前往欧洲。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帕克在欧洲大陆上遇到过海明威几次，有时是在法国，有时是在海明威热爱的西班牙。不过帕克显然已经开始让海明威觉得忍无可忍了。

帕克和海明威在船上时，以及后来在西班牙和法国相遇时发生了什么，谈到了什么都已经无人知晓。帕克的传记作者之一称帕克取笑了一场葬礼游行，她对西班牙人的荣誉和苦难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侮辱了海明威。不过，她肯定还跟海明威讲了关于麦克阿瑟和她的人工流产的事。我们之所以能肯定海明威很厌恶帕克的坦白，是因为他生气到决定写首诗来记录他的愤怒。他给这首诗取名为《致一位悲惨的女诗人》（*To a Tragic Poete*）：

用抄袭的韵律来表露

你曾经对查理抱有的怨恨和渴望

他离开了，却在你腹中留下了孩子

孩子的小手还没成型

成型的小手总是很可爱

不过孩子的脚长出来了吗

他的睾丸下降了吗？[\[46\]](#)

海明威用他认为是直白的打击的一句话结束了全诗：“据我观察，悲惨的女诗人就是这么产生的。”

帕克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致一位悲惨的女诗人》，没有证据证明她知道这首诗的存在。不过她的朋友知道。海明威参加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在巴黎的公寓内举行的宴会时当众大声朗读了这首诗。出席这场聚会的还有圆桌会议成员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Donald Ogden Stewart）及其妻子。据称在座的人都无比惊骇。斯图尔特本人在某个时刻还爱慕过帕克。他对这首诗感到无比气愤，因此立即斩断了与海明威的友谊。不过海明威显然并不后悔写了这首诗。他把这首诗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和自己的其他文稿保存在一起。

即便是没有听过这首诗，帕克也感受到了海明威对她的不屑，而且她对此无法一笑了之。尽管海明威当时还不出名，但是他已经获得了一群文学界人士的认可。这些人的认可正是帕克也想得到的。帕克并不像其他人以为的那样毫无野心。海明威成了帕克的一个燃点，她总会从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打探消息，问他们觉得海明威喜不喜欢她。后来帕克还写了两篇关于海明威的文章，一篇是书评，一篇是传略，这两篇文章都被刊登在当时刚刚创立的《纽约客》（*New Yorker*）上。两篇文章都充满了溢美之词，但是人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作者在写作时怀着怎样的焦虑心情。

“如所有读者都知道的那样，他拥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帕克在她的评论中这样写道。“他做的那些简单的事情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但是如果别人也尝试做同样的事，看看他们的结果吧。”^[47]帕克通常不擅长直白的赞美，所以那篇海明威的传略中自然也带着别扭的，甚至可能是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带刺的言辞。帕克不断评论海明威对女性的诱惑力，并将这一点归咎于书上的作者照

片。帕克还说海明威对批评意见过于敏感，但她认为海明威有资本这样，因为“他的作品已经创造出了一些该被用酒精保存起来的范例”。最后，帕克说海明威拥有非凡的勇气和胆量，还称赞了他管这些优点叫“决心”的说法。整篇文章读起来就像一份字数过多的道歉信，收信人不但不会原谅道歉人，还会因此觉得不自在。

像往常一样，帕克再一次成功地将其他人对自己的批评意见内化了。没有人能比多萝西·帕克更讨厌她自己。这正是海明威不曾理解的地方。

*

《纽约客》当时的掌舵人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也是一位圆桌会议的常客，这份杂志就是由他于1925年创立的。杂志的定位是精致高雅、符合大都市品味。它的目标读者是“迪比克的老夫人们”之外的群体。不过罗斯本人从来不是个温文尔雅的角色。虽然《纽约客》的员工最终会变得忠诚于他，但他看上去总是有些缺乏风度和品位。他始终决定不了要如何看待女性。一方面，他的妻子简·格兰特（Jane Grant）公开声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格兰特的信念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纽约客》发行之初的几年里，那上面刊登的女性和男性作家的文章数量不相上下。^[48]另一方面，在1927年加入《纽约客》的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却称，罗斯总是将男性的无能归咎于“可恶的学校女教师”。^[49]帕克欣赏罗斯完全的自信，但是她在开始为罗斯创作稿件之前就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声望了。实际上，帕克为提高杂志名气而发挥的作用反而比杂志为提高帕克名气作出的贡献大得多。

在《纽约客》艰难维持的最初几年里，帕克只是偶尔在这上面发表一些短篇小说或诗歌。直到罗伯特·本奇利不得不暂时辞去《纽约客》的图书评论家的工作，并由帕克填补了这个空缺之后，她才将这

份杂志打造成了一份著名的出版物。帕克在这里发表文章时，用的还是本奇利选择的笔名——“永远的读书人（Constant Reader）”。

作为一名书评人，帕克堪称难忘金句女王。她就A. A. 米尔恩（A. A. Milne）在作品中使用过度甜腻的口吻回击的那句“永远的读书人吐了（Tonstant Weader fwowed up）”^[50]至今仍很出名。不过很多帕克最精彩的讽刺针对的目标都是如今已经被大众遗忘的作品，比如帕克曾说“玛戈·阿斯奎斯（Margot Asquith）和自己谈恋爱的内容将成为文学史上最优美的爱情故事之一而存在下去”。^[51]鉴于此，总有人觉得帕克把精力浪费在了一些不值得她评论的作品上。琼·埃科塞拉（Joan Acocella）就认为从这一点上看，埃德蒙·威尔逊要比帕克做得好，因为威尔逊评论的都是一些虽然没有那么流行，但本质上更重要的作者的作品。埃科塞拉写道：“‘永远的读书人’专栏并不是真正的书评专栏，反倒更像单口相声演员的例行表演。”^[52]这个评论略微有些不公平是因为不同的杂志针对的读者群不同，《纽约客》从来不渴望成为发表严肃的、知性的批评的场所，它追求的只是精彩的文章。而要写出精彩的文章，选择负面评论的角度总是比正面的容易，因为作者可以通过开玩笑来提升文章的精彩程度。

幽默搞笑其实能够实现比人们通常承认的更机智、更有自知之明的尖刻效果。帕克以“永远的读书人”为笔名发表的文章中，我最喜欢的一篇其实不算是书评。这篇发表于1928年2月的文章是关于一些被她称为“文学扶轮社友（literary Rotarians）”^[53]的人的。她在这里表达厌烦之情的对象是一群出入纽约的一些文学场合，在各个聚会上就各个出版商夸夸其谈的人。这些人本身可能也是某种作家。帕克认定他们就是那些用诸如“和书呆子一起鬼混”或“与书虫一起转圈”之类的笔名发表专栏文章的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些装腔作势的人，他们只是披着文学的外衣，实际上没有作出任何评论：“文学

扶轮社友把我们和他们自己带到了——一个你写的是什么都已经不重要的阶段；一个所有作家都平等的阶段。”

像帕克这样拥有尖刻思想的人会觉得文学扶轮社友的态度是对自己的冒犯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不过她做的是比捍卫使用评判来衡量文学价值更复杂、更明确的事。毕竟，她写的东西都会被发表在这个名为“永远的读书人”的专栏中。尽管她也写了很多广为人知的诗歌，但帕克始终被认为是世俗的、喜好社交的女人。她描述的可能就是圆桌会议中的某些成员，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在名字特别诙谐幽默的专栏中写文章。但最重要的是，她描述了一些后来她开始担忧也适用于自己的问题：那就是她和她的大多数朋友都把时间浪费在了没有价值的东西上。

1957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帕克告诉采访者说：“我总想要表现得古灵精怪。那真是可怕的想法。我本应该更有头脑些。”^[54]这种想法顽固地纠缠着帕克，且随着她越来越成功而变得愈发强烈。它就像一把插在帕克心上的刀，不但没能激发她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反而毁掉了她的创作欲望。帕克肯定不是当时唯一厌恶这种“成熟老练”的审美趣味的人。比如1930年10月，《哈泼斯杂志》上就刊登了一篇名为《向成熟老练说再见》（*Farewell to Sophistication*）的文章，其中还旁敲侧击地将帕克定义为这种空洞、无用的“世故言谈”^[55]的主要支持者。

这种幻想破灭实际上从1929年就已经不再是说笑了。矛盾的是，就在那一年年初，帕克还获得了一个职业生涯中的巨大成功：她发表了一篇后来将为她赢得欧·亨利奖（O. Henry Award）的短篇小说，由此证明她的才华也可以被用在创作虚构类文学作品上。但是这篇小说好像是帕克对自己的失望之情的一种寓言。小说的名字叫《高个子的金发女郎》（*Big Blonde*），其中的女主人公黑兹尔·莫尔斯

（Hazel Morse）被帕克描述为一位拥有“染出来的金发”的女士。实际上，关于黑兹尔的一切都像是编造的，是一种假扮。黑兹尔出场时已经人到中年，她年轻时的生活很风光，她把时间都花在了“温顺随和”地招待男士上。如叙述者有预兆性地告诉我们的那样：“男人们喜欢温顺随和的人。”^[56]不过黑兹尔对继续这种表演感到厌倦——“她越来越需要有意识地去扮演，而不是自然地流露出那种感觉”。再加上随着年纪的增长，她已经不那么容易获得富有男人们的注意了。于是她弄来了一些佛罗拿（veronal）药片〔一种巴比妥类药物，相当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版本的安必恩（Ambien）〕，不过她的自杀尝试没有成功。

《高个子的金发女郎》显然含有一些自传性的元素。帕克也曾采用同样的方法尝试自杀（但没有成功）。她与埃迪的离婚也是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情绪下完成的，这与黑兹尔的婚姻失败具有相同的特征。不过帕克这种深刻的愤怒并不完全是针对埃迪·帕克的，也不是针对男性这个整体的。

无论是帕克还是黑兹尔都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对男性的执迷不悟。说到男性，作家和她创作的角色其实都抱有一种骑墙态度。她们对于圆满是什么样子有自己的设想，而且认为男性应当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在现实中，男人总是让她们失望。男人只追求肤浅的联系，他们要找的是“温顺随和”的人，而不是有渴望、有志向、有自己的需求的活生生的人。不过这篇小说中体现出的自传性质的回响不是靠几个具体细节表现的，不在于黑兹尔是不是吃了同样数量的安眠药，不在于她也从威士忌中寻求慰藉，更不在于可能是从帕克抛弃埃迪的离婚过程中借用的某些桥段。这种回响体现在充斥于字里行间的失望感中：其中当然有对男性的失望，但也有对世界，以及对她自己的失望。

也是在这一年，帕克第一次收到了几个请她到好莱坞为剧本润色的邀约。作为一位著名的风趣作家，帕克从邀请方那里得到的条件都是优于当时的一般标准的。最终帕克接受了一个周薪300美元，为期三个月的工作。挣钱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她也渴望借此机会换个环境放松一下。虽然她很不喜欢好莱坞，和她同时代的人一样，帕克也认为好莱坞是个愚蠢的地方，但她在那里的工作相当成功。她与别人一起创作了不少成功的电影剧本，珍妮·盖诺（Janet Gaynor）主演的1934年版《一个明星的诞生》（*A Star Is Born*）不仅为她赢得了赞美，还给她带来了一个奥斯卡奖和大笔的钞票。这些钱都被用来买杜松子酒和宠物狗了。帕克买了很多狗，其中一条贵宾犬被她取名为“陈词滥调（Cliché）”。帕克显然是为这些用钱买来的东西感到喜悦和享受的，不过宽裕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问题就在于靠这个工作挣钱太容易了，所以帕克把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她几乎完全停止写诗了，连短篇小说也只有在手头宽裕的时候才偶尔写一篇。起初，这种方式运行得还算顺利；她在1931年、1932年和1933年时还能每隔几个月发表一篇短篇小说。可是接下来，短篇小说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了。没过多久，就变成了间隔一整年才发表一篇小说。至少有一次，她已经收了创作一部小说的定金，但是最终没能完成，于是只好把钱退了回去。她逐渐成了那种与出版商的通信内容主要都是在道歉的作家。帕克能够编出“我的作业被小狗吃了”那样让人无法生气的理由，比如1945年，在与维京出版公司（Viking Press）的编辑帕斯卡尔·科维奇（Pascal Covici）就某个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项目通电报时，帕克就是这么说的：

我发电报而不是打电话的原因是我都没脸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是写不出来/我从没这么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过/从没这么想让什么文章足够好过/但是我得到的只有一摞摞写着感觉不对的词句的稿纸。我能做的只有继续加油/希望上帝能帮我完成它。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怎么这么难/或者我为什么这么无能。[\[57\]](#)

不过帕克的失望之情也获得了某些缓解。第一，她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艾伦·坎贝尔（Alan Campbell）。她是在1934年嫁给这位又高又瘦，像电影明星一样英俊的男人的。坎贝尔自认为是夫妻之间比较会照顾人的那一个，他会监督她的饮食，还异乎寻常地关注她的着装，以至于其他人都开始怀疑他的性取向。（然而就算这是真的，朋友们和观察者们也总是说，当他们处于热恋中时，二人之间在身体上的相互吸引是显而易见的。）这段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帕克和坎贝尔会离婚，之后又复婚，最后再次离婚。最终坎贝尔会在西好莱坞的一栋小房子里自杀。那栋房子是他们无论在分居时还是离婚期间都在共同居住的。不过，在这段感情最好的时候，二人确实如胶似漆。

此外，帕克还参与到了政治中——不过很多她的仰慕者都说她在这个领域里也没能取得成功。促使帕克行动起来的火种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人们对于处决两名意大利裔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的抗议。因其无政府主义政治活动而为波士顿警方熟知的萨科和万泽蒂是以谋杀和持械抢劫的罪名遭到逮捕的，但是很多美国文学界和政界的精英们都坚称二者在这些指控上是完全无辜的。像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和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这样的人一样，帕克坚定支持释放萨科和万泽蒂的要求。最终，作家和政治家的诉求都被无视，这两个人还是被处决了。不过在那之前，帕克已经在1927年因为参加一次游行而遭逮捕，这个消息也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条。她在被扣押几个小时之后获释，前提是她就“游荡和闲逛”的罪名认罪，并缴纳了5美元罚款。当被媒体询问她是否认为自己有罪的时候，她回答说：“好吧，我确实闲逛了。” [\[58\]](#)

第一次参加抗议的滋味让帕克渴望更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帕克还会投身于无数政治和社会事业。她开始对没有组织起工会的劳动者们抱有真挚的同情，她还会参加抗议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Astoria）服务人员所处困境的活动。帕克总是会成为在好莱坞兴起的一些新的政治组织的领头人：比如好莱坞反纳粹联盟（Hollywood Anti-Nazi League），电影艺术家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协会（Motion Picture Artists Committee to Aid Republican Spain），最终还有电影剧本作者行业协会（Screen Writers Guild）。

有些人觉得他们很难不质疑帕克新发现的这种对平等主义的坚定信念，毕竟她和风光迷人的富人之间的联系还是很频繁的。不过，无论此时的她境况如何，帕克毕竟曾体会过物质生活的富足突然消失是一种什么感受。她偶尔还要面对财务紧张带来的恐慌，这很可能使得她对其他身处困境的人更具同情心。无论她和富人们一起相处了多长时间，她那双在很多年前就被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打磨得雪亮，专门发现可取笑之事的双眼让她永远不可能与富人休戚与共。

除此之外，她的政治活动还为她提供了自我批评的新途径。帕克总是用她此时参与社会和政治事业的严肃性批判自己之前进行的活动多么肤浅。比如1937年，在一篇为美国共产党创办的《新群众报》（*New Masses*）撰写的文章中，帕克就这样写道：

我不是任何政党的党员。我唯一参加过的就是那个并不特别勇敢的小团队，我们用幽默感这件过时的服装掩盖赤裸的心灵和思维。我听到别人这样说，所以我也跟着说：嘲讽是最有效的武器。我不认为我真的相信这句话，但相信是更容易、更让人安心的选择，所以我还是这么说了。如今我知道，我知道有些事情从来就不是可笑的，也永远不会变得可笑。我还知道嘲讽可能是一个保护的盾牌，但它从来不是武器。[\[59\]](#)

随着大萧条的结束以及整个国家越来越接近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帕克的自我鞭打也变得越来越严苛。1939年时，帕克在美国作家

代表大会（American Writers Congress）上发表演讲。这是一个公开的共产主义者群体，帕克在演讲中阐述了自己的彻悟：

我不认为我们的语言中有哪个词的隐含意义比“成熟老练（sophisticate）”的更令人恐惧，唯一能跟它相提并论的大概是“社会名流（socialite）”。真正的字典上对它的解释也不怎么招人喜欢。它作动词时的意思是：误导、使复杂、使虚伪、篡改，以及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掺假。你也许以为这个解释已经够明白了，不过实际上，它还有更多的深意。如今，这个词的意思似乎变成了：成为有文化、有感情的孤立主义者；嘲讽那些为自己的同胞和世界贡献一切的人；永远高高在上藐视众生，而不关注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一切；只嘲笑那些根本不可笑的事物。[\[60\]](#)

这段话揭示了一些真理。“成熟老练”有它自身的缺点，包括执迷于表面的东西，以及随意性。然而帕克说的和写的这些后来被证明无非是昙花一现。人们依然会把那首名叫《摘要》的诗歌介绍给别人，依然会引用帕克对A. A. 米尔恩和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的评论。人们只记住了她在认为自己已经写不出东西来很久之后的1957年时说的话：“至于我，我想要富有。我也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这两件事可以同时发生，我希望它们同时发生，但是如果那样的美事不可能，我宁愿选择有钱。”[\[61\]](#)

但是在去了好莱坞之后，在参加了政治活动之后，绝大多数认识帕克的人似乎都开始将她视为一个失败。她参与的那些电影都被认为是配不上她的才华的。编写政治标语的差事对于这样一个以取笑所有事为专长的人来说似乎太过严肃了。她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的野心也被认为逐渐消失了，因为她再也没能重复《高个子的金发女郎》的成功。最糟糕的可能还要数这些批评是如何渗透进她对自己的评价的：从任何角度来说，她都是一位成功的作家，甚至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不过人们对此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中期，帕克似乎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相信自己已经被人遗忘。她对写小说越来越心不在焉，至于诗歌，则彻底不写了。

在失去了帕克的严苛独白的鞭策之后，其他人就可以更安心地发表赞美了。1928年，在评论一本显然非常滑稽的关于俄国神秘主义者拉斯普京（Rasputin）的作品时，一位署名丽贝卡·韦斯特的作者说这本书一定是某个美国幽默作家写的。她在其中发现了“多萝西·帕克的独特天赋的影子”，^[62] 她认为帕克是一位“超群的艺术家的”。韦斯特尤其喜欢帕克在此几个月前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只要一小杯》（*Just a Little One*）的短篇小说。它讲了一个女子在酒吧里醉得不省人事，梦到自己把一匹拉马车的马带回家和自己一起生活的故事。韦斯特对于男性也很绝望，而且她也知道如何把这一点写成文章。

^[1] 雷格泰姆是一种原始的音乐风格，它把非洲音乐节奏的基本元素引入流行音乐，为爵士乐的兴起创造了条件。雷格泰姆最初是作为舞蹈音乐，1897年至1918年十分普及，在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的美国黑人社区的红灯区尤其流行。（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2] Frank Crowninshield, “Crowninshield in the Cubs’ Den,” *Vogue*, September 15, 1944.

^[3] “The Wonderful Old Gentleman,” in *Collected Stories* (Penguin Classics, 2002).

^[4]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 Dorothy Parker,” 帕克接受 Marion Capron 采访, *Paris Review*, Summer 1956.

^[5]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 Dorothy Parker,” 帕克接受 Marion Capron 采访, *Paris Review*, Summer 1956.

^[6] 见于 Marion Meade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论文中的照片，照片内容是帕克童年时写的一些短笺。

[7] 即新英格兰地区的名门世家。

[8] 参见Larry Tye, *The Father of Spin: Edward L. Bernays and the Birth of Public Relations* (Picador, 1998) 。

[9] “In Vanity Fair, ” *Vanity Fair*, March 1914.

[10] “Any Porch, ” *Vanity Fair*, September 1915.

[11]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 Dorothy Parker.”

[12] From a section on *Vogue* patterns, October 1, 1916, 101. 《服饰与美容》中的插图说明从来不署名，但这里引用的例子已经被许多学者认定是出自帕克笔下。

[13] “The Younger Generation, ” *Vogue*, June 1, 1916.

[14] Alexander Woollcott, *While Rome Burns* (Grosset and Dunlap, 1934) , 144.

[15] “Why I Haven’ t Married, ” *Vanity Fair*, October 1916 （署名是多萝西·罗斯柴尔德）。

[16] “Interior Desecration, ” *Vogue*, April 15, 1917（署名是多萝西·罗斯柴尔德）。

[17] “Here Comes the Groom, ” *Vogue*, June 15, 1917.

[18] “A Succession of Musical Comedies, ” *Vanity Fair*, April 1918.

[19] “Mortality in the Drama: The Increasing Tendency of Our New Plays to Die in Their Earliest Infancy, ” *Vanity Fair*, July 1918.

[20] “The Star-Spangled Drama: Our Summer Entertainments Have Become an Orgy of Scenic Patriotism, ” *Vanity Fair*, August 1918.

[21] “The Dramas That Gloom in the Spring: The Difficulties of Being a Dramatic Critic and a Sunny Little Pollyanna at the Same

Time, ” *Vanity Fair*, June 1918.

[22]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 Dorothy Parker.”

[23] 参见 “Inside Stuff, ” *Variety*, April 5, 12, 1923.

[24]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 Dorothy Parker.”

[25] 转引自Dorothy Herrmann, *With Malice Toward All: The Quips, Lives and Loves of Some Celebrated 20th-Century American Wits* (Putnam, 1982) 。

[26] O. O. McIntyre, “Bits of New York Life, ”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ober 29, 1924.

[27] “The Oriental Drama: Our Playwrights Are Looking to the Far-East for Inspiration and Royalties, ” *Vanity Fair*, January 1920.

[28]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 Dorothy Parker.”

[29] 参见Edmund Wilson, *The Twenties* (Douglas and McIntyre, 1984) , 32-34。

[30] 参见Edmund Wilson, *The Twenties* (Douglas and McIntyre, 1984) , 44-45.

[31] 参见Edmund Wilson, *The Twenties* (Douglas and McIntyre, 1984) , 47-48.

[32] “The Flapper, ” *Life*, January 26, 1922.

[33] “Hymn of Hate, ” *Life*, March 30, 1922.

[34] Heywood Braun, “Paradise and Princeton, ”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April 11, 1920.

[35] “Once More Mother Hubbard, ” *Life*, July 7, 1921.

[36] Nancy Milford, *Zelda: A Biography* (Harper Perennial, 2001), 66.

[37] 参见Scott Donaldson, “Scott and Dottie,” *Sewanee Review*, Winter 2016.

[38] “What a ‘Flapper Novelist’ Thinks of His Wife,” *Baltimore Sun*, October 7, 1923.

[39] 参见, 例如: Maureen Corrigan, *So We Read On: How the Great Gatsby Came to Be and Why It Endures* (Little, Brown, 2014)。

[40] Sterling North, “More than Enough Rope,” *Poetry*, December 1928.

[41] Edmund Wilson, “Dorothy Parker’s Poems,” *New Republic*, January 19, 1927.

[42]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 Dorothy Parker.”

[43] Wilson, “Dorothy Parker’s Poems.”

[44] “Résumé,” *Enough Rope* (Boni and Liveright, 1926)。

[45] “Constant Reader,” *New Yorker*, October 29, 1927.

[46] Ernest Hemingway, “To a Tragic Poetess,” in *Complete Poem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

[47] “Reading and Writing,” *New Yorker*, October 29, 1927.

[48] Ben Yagoda, *About Town: The “New Yorker” and the World It Made* (Da Capo, 2001), 77.

[49] James Thurber, *The Years with Ross* (Harper Perennial, 2000), 4–5.

[50] 米尔恩在《小熊维尼》系列作品中使用了很多模仿婴幼儿发音习惯的幼稚拼写, 帕克在这里故意改变了“Constant Reader”(永远的读书人)和“throw up”(呕吐)的拼写方式, 是为了模仿和取笑米尔恩的风格。

[51] “Constant Reader, ” *New Yorker*, October 22, 1927.

[52] Joan Acocella, “After the Laughs, ” *New Yorker*, August 16, 1993.

[53] “Constant Reader, ” *New Yorker*, February 8, 1928.

[54]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 Dorothy Parker.”

[55] La Mar Warrick, “Farewell to Sophistication, ” *Harper’ s*, October 1, 1930.

[56] “Big Blonde, ” *Bookman*, February 1929.

[57] 这封电报的时间是1945年6月28日，电报的图片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参见，例如：“I can’ t look you in the voice, ” *Letters of Note* (June 17, 2011) 可见于[http: //www. lettersofnote. com/2011/06/i-cant-look-you-in-voice.html](http://www.lettersofnote.com/2011/06/i-cant-look-you-in-voice.html)。

[58] “NY Pickets Parade Boston Streets in Bus, ”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August 12, 1927.

[59] “Incredible, Fantastic... and True, ” *New Masses*, November 25, 1937.

[60] *New Masses*, June 27, 1939.

[61]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 Dorothy Parker.”

[62] Rebecca West, “What Books Have Done to Russia, ”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1928.

第二章 韦斯特

丽贝卡·韦斯特就像是一个英国版的帕克，她们都是在有生之年就受到高度赞美的女性作家。不过年轻时的韦斯特也曾沉浸于艺术家和作家的费边社会主义和实验道德，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及她的姐姐瓦妮莎（Vanessa）热衷于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set）[\[1\]](#)一样。从一开始，韦斯特的世界中就充满了“严肃的人”，所以她在他们中间感到很自在，这种她就是属于这个群体的归属感是帕克一直不曾拥有的。然而韦斯特是一个从不缺少自信的人，相反，她的自信心往往正是帮助她接近自己的雄心壮志的东西。

韦斯特让小说家H. G. 威尔斯（H. G. Wells）成功记住自己的方式是在一份名为《自由女性》（*Freewoman*）的报纸上对其进行攻击。他们俩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对因为一方给另一方写了一份极度贬低的书评而结识，后来还成了情侣的男女。当时还很年轻的韦斯特读了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威尔斯的小说《婚姻》（*Marriage*），结果她一点也不喜欢这本书。威尔斯是当时最受尊敬的作家之一的事实并没有让韦斯特胆怯，针对威尔斯骄傲地宣称的性激进主义，韦斯特这样写道：

他肯定是小说家中的老处女，就连像冷掉的白色酱汁一样凝结〔在他的小说中〕的对性的执迷都像是老处女的疯狂而已，是长时间专注于飞船和胶质的思维对肉体的反应。[\[2\]](#)

让如今的人们记住威尔斯的是他的飞船和像《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又译《世界大战》）和《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这样的浪漫科幻小说，但是在韦斯特和他见面的时候，他的全部作品大多还是像《婚姻》这类关于爱与性的坦白式的、半遮半掩的自传体小说。在这本小说之前被创作出来的《安·韦罗尼卡》（*Ann Veronica*）就讲述了一个与韦斯特刚刚让自己陷入的这段婚外情很类似的丑闻故事。比起具体情节，这些书籍传递的关于婚姻生活的悲观看法的主题反而更容易被记住；美满的婚姻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像某种牢笼。每个故事似乎都是为了一点一点地动摇婚姻能带给人永恒的安逸和幸福的主张。

从理论上说，这一点应该能够让韦斯特和威尔斯成为天然的盟友。威尔斯肯定认为自己是一个支持两性平等的人。他是《自由女性》的支持者和忠实读者。他通常会十分小心地将他对婚姻的批判表现为追求女性和男性的解放。他认为婚姻夺走了女性实现她们最重要、最有满足感的追求的机会。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他对女性人格的概念的是，他显然相信大多数女性只对室内装饰和潮流服装感兴趣。韦斯特要求威尔斯回答自己的问题：

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有些女人从来没有遇到过值得爱的男人（威尔斯先生下一次坐在管子里进行时间旅行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男性同行乘客们，看看他们是不是不可爱得不可救药），她们也不觉得荷兰时钟有任何诱惑力，她们像大多数人一样记不住自家餐厅的墙纸颜色，她们充满智慧，能在五分钟内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就不再为此费心，那么她们要靠什么打发时间呢？我猜是去打桥牌，或者也可能是接受国家进行的安乐死。[\[3\]](#)

非常值得赞扬的是，威尔斯并没有感到受辱。他没有以一副怒气冲冲、居高临下的口吻给编辑写什么抗议信。相反，他邀请韦斯特到自己和妻子简（Jane）居住的教区长住所做客。这种在面对尖锐的批评时表现出的成熟十分令人钦佩。就在发表了这篇评论文章的当月月

底，韦斯特接受了邀请，到威尔斯家喝茶。她给对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甚至可能比她本来打算留下的还好。不知道为什么，不认同对方观点的时候往往也是韦斯特最有魅力的时候。

韦斯特会有这样一种争强好胜的性格是很自然的。部分原因在于她的成长环境。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的伦敦是一个比纽约更激进、更好战的地方。当时的大不列颠已经不是世界的文化中心——这个头衔应该属于法国，或者也可能是德国——不过这里依然是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这里的思想家和作家们关注的首要问题都是选票和金钱，所以他们不太会像纽约的人们一样写那些让帕克感到无比厌烦的无忧无虑、爱开玩笑的文章。在二十世纪的大约头十年中，一位英国作家的生活中只有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社团和妇女参政论者示威这两件事。

不过，韦斯特还是有一些浪漫主义倾向的，所以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投身政治或写作。起初，她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女演员，因为她十几岁的时候在一个爱丁堡演出公司里待了几个月。可惜命运对她另有安排。1910年，她乘地铁前往皇家戏剧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Dramatic Art）面试的途中在候车站台上晕倒了。三位女士帮助了她，韦斯特在给不认同自己的选择的姐姐写信时说其中一位女士忍不住惋惜道：“可怜的孩子——一个女演员！我来出白兰地的钱。” [\[4\]](#)

这是个不吉利的征兆。虽然韦斯特最终还是被录取了，但她连一年都没坚持下来。因为体质虚弱，她经常会晕倒。而且，尽管韦斯特当时的照片显示她是一个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和一头浓密有光泽的秀发的年轻姑娘，可她总说自己被认定没有漂亮到可以成为女演员。韦斯特从很早就认清了，如果她想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她就只能靠写作来实现目标。

那个时候她还在使用自己冗长的本名署名。西塞莉·伊莎贝尔·费尔菲尔德（Cicely Isabel Fairfield）是一个过分讲究的名字，容易让人误以为名字的主人性格温和、逆来顺受，然而这些特点是韦斯特一辈子都不曾有过的。和帕克一样，韦斯特也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她在那里继承了某种反射性的自我防御机制。她有一个漂泊不定的父亲，就是那种你会在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5]的小说中读到的父亲形象：他们衣着光鲜，风趣幽默，受到所有孩子的喜爱。不过那仅限于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而他并不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韦斯特在一本依据自己的童年生活创作的小说中形容他的父亲查尔斯·费尔菲尔德（Charles Fairfield）是一个“糟糕的普洛斯彼罗（Prospero）^[6]，甚至被从自己的岛屿上驱逐出去，不过他依然是一位魔法师”。^[7]这样的描述比帕克以为的还要准确。他的父亲竟然真的是一位花招大师，能够天衣无缝地隐藏自己的秘密：韦斯特的一位传记作者最近挖掘到一个信息，她的父亲在与她的母亲结婚前曾经进过监狱，然而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女儿对此似乎都一无所知。^[8]

如果费尔菲尔德是一个能养家的人，那么他的性格缺陷可能还容易被忽略一些。然而实际上，他对任何事的专注时间都不足以长到能让他有所建树。起初他是一名任性不羁的记者，后来又打算创业做生意。如果他挣过哪怕一点点钱的话，那些钱也都因为赌博输光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计划是到塞拉利昂去，靠倒卖药品挣钱。结果他去了不到一年就身无分文地返回英格兰。这一次他再无脸面回家，而是选择独自生活，直到在利物浦的一间肮脏的寄宿公寓里去世为止。他死的时候，他的三个女儿都还没有成年。

成年之后的韦斯特对父亲的评价非常严苛。她会这样描述他：“我不能说我父亲堕落了，因为堕落还都有个度呢。”^[9]韦斯特还替她母亲感到受辱。伊莎贝拉·费尔菲尔德（Isabella Fairfield）在

结婚前曾是一位有天赋的钢琴家，是很多人追求的对象。不过查尔斯的各种冒险带来的压力彻底毁了妻子的生活。她总是一副憔悴不堪、身心俱疲的样子。韦斯特说：“有这样一位母亲是一种奇特的历练。我从来不曾觉得她让我丢脸，但这件事总让我感到气愤。”所有事加在一起让韦斯特相信，婚姻是个悲剧，或者至少是一种值得可怜的命运。

然而，换一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父亲的失败以可能的最好的方式定义了女儿的人生。这件事给韦斯特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那就是自力更生的必要性。你不能依靠男人。浪漫小说里的内容全是骗人的。在关于“获得解放的女性”的概念存在之前，韦斯特就已经懂得女人通常还是要靠自己谋生活。她似乎从不怀疑她必须为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鉴于此，韦斯特会受到妇女参政论者吸引的原因就很清楚了：她认为这些人的目标很重要，而且是符合她的个人经历的。除此之外，她还对她们吵闹、无序的风格感兴趣。韦斯特从小被培养成了一位斗士，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的两个姐妹争论。在政治行动主义中，韦斯特有空间发挥自己天然的魅力。她很快就加入了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她的女儿克丽丝特布尔（Christabel）的队伍。这对母女是当时知名度最高的妇女参政论者，她们的组织——妇女社会与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也是当时的运动领导机构。潘克赫斯特母女在当时就像今天的娱乐明星一样受人瞩目。一篇有代表性的美国报纸新闻提要是这样写的：

“搅动全英格兰的改革运动；总指挥是个漂亮姑娘。克丽丝特布尔·潘克赫斯特年轻富有、清秀标致，还是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发起者、鼓动者和主要组织者。” [\[10\]](#)

韦斯特经常和她们一起游行，并且对她们的的工作充满敬意，不过她始终无法融入她们的世界。潘克赫斯特母女，特别是克丽丝特布尔本人，都是妇女参政权的坚定拥护者，她们勇猛、忠实地捍卫这项事业。韦斯特对此深感敬佩，她尤其崇拜埃米琳：

当她站在高台上，提高自己已经嘶哑，但依然甜美的声音发表讲话时，人们会觉得她像风中的芦苇一样瑟瑟发抖。不过这个芦苇是用钢铁打造的，它的力量无比强大。[\[11\]](#)

韦斯特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显示出了对文学的偏爱。她总是在读各种小说。她对于性自由的理念的的兴趣是在一个更艺术性的圈子里培养起来的，而那个圈子是相对来说过分正经的潘克赫斯特母女不愿涉足的。

另一位名叫多拉·马斯登（Dora Marsden）的妇女参政论者成了对韦斯特产生更关键影响的人。与韦斯特不同的是，马斯登上过大学，她毕业于略带无产阶级性质的曼彻斯特欧文斯大学（Owens College）。马斯登与潘克赫斯特母女一起工作了不到两年。为了脱离她们，马斯登向韦斯特及其他一些朋友提议一起创建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就是《自由女性》[后来经过重组，该报被重命名为《新自由女性》（*New Freewoman*）]。它将比普通的女权主义者报纸更加充满雄心，它会允许自己的作者就时事话题发表范围更广的意见。马斯登希望它能够让参加到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中的那些真正的作家们脱离形式的束缚，抛开宣传口号似的陈词滥调。这些想法对韦斯特很有吸引力，她为能够在《自由女性》中享有相对宽松的撰稿自由而无比兴奋，这样她就可以发表那些可能会让她身为苏格兰长老会信徒的母亲惊恐万分的关于性和婚姻的观点了。为了保护她的家族姓氏，韦斯特从此时起选定了丽贝卡·韦斯特这个后来她用了一辈子的笔名。

韦斯特宣称自己只是随便选了一个笔名，就为了逃避她的本名暗示的那种“金发美女”^[12]、“美国甜心”的形象。她选择的笔名听起来确实比她的本名刚强了不少。这个名字出自易卜生的戏剧《罗斯莫庄》（*Rosmersholm*）。剧中的鳏夫和他的情妇因为这场婚外情给他已去世的妻子带来的痛苦而逐渐陷入深深的愧疚中。情妇承认自己加重了去世妻子的痛苦。最终，在戏剧的结尾，两个人双双自杀。这个情妇的名字就叫丽贝卡·韦斯特。

这层层潜在的没有被意识到的深意足够另写一本书了。比如与不常在身边的父亲断绝关系；再比如最初的，虽然有些矛盾的向戏剧方面发展的雄心（以及为什么偏偏是一个易卜生笔下的角色）；除此之外，这个名字还很有预见性，因为韦斯特最终也会陷入一场人尽皆知的婚外情。然而，韦斯特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局外人、一个被鄙弃的人、一个最终因为难以承受的愧疚而自杀的人的名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很多人都知道韦斯特有一个特点，她一生都不惧怕在自己的作品中展露情绪。她也很少在文章中作模棱两可的表述，还总是使用第一人称来提醒读者，别忘了他们身处的是以她的主观为权威的世界。不过韦斯特的一个朋友告诉《纽约客》，韦斯特“其实比任何人的脸皮都薄，就好像是某种心理上的血友病患者一样”。^[13]她的作品直接剖析了她的思想、她的渴望和她的感觉。她不像帕克一样自厌。她的自我防护是另一种样子的。韦斯特会用她的人格来淹没你。她的所有作品可以被比作一个漫长连贯的句子，偶尔打断连贯的标点符号是那些因为缺钱才不得不写的东西。表面上，她似乎非常自信，但这其实只是一个精心制作的面具。她会为一切事情忧心忡忡，她会担心钱，担心爱情，担心几乎所有她就其发表过观点的问题，尽管她的观点会让人误以为她无比自信，无比笃定。

不过她的观点确实从一开始就是自信和笃定的。韦斯特有一种选择目标的本领。她使用新笔名之后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针对当时特别流行的爱情小说作家玛丽·汉弗莱·沃德（Mary Humphry Ward，笔名汉弗莱·沃德夫人）的。依据年轻的韦斯特的观点，这个女人“道德败坏”。有一位男士愤怒地给《自由女性》写信，无端指责韦斯特是在为工业主义辩护。韦斯特用一个像是在优雅地朝自己的对话者竖中指一般的表态作为她回应文章的开头：“这真是最让人扫兴的了。”^[14]她的大胆总是能惹人发笑，至少她发表的文字是这样的。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韦斯特用她的书评炮轰了威尔斯，然后又去他家喝了茶。韦斯特对于威尔斯夫妇的第一印象比他们对她的差多了。她认为威尔斯长相怪异，“声调还有些高”。^[15]威尔斯则认为那天的韦斯特是一位“奇妙地混合了成熟和幼稚两种气质的”^[16]年轻女士。最终在他们之间像用打火石敲击钢板一样打出火花的是知识层面的相互吸引。威尔斯并不是那种会逃避挑战的人，所以韦斯特那种难以捉摸的气质吸引了他：“我从没见过像她这样的人，我怀疑世上根本没有过像她一样的人。”另一方面，韦斯特则向多拉·马斯登坦白说自己为威尔斯的思想着迷。

事实证明，韦斯特在那篇书评中对威尔斯的浪漫主义风格作出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起初，威尔斯对待她的方式就像他在他的小说中看到的一样刻板。诱惑都被融入了充满智慧的讨论中。不过尽管韦斯特已经有所表示，威尔斯还是拒绝与她发生身体接触。威尔斯的表现并不是出于对妻子简的尊重。威尔斯夫妇的婚姻是开放性的，简完全清楚他的那些婚外情。但是威尔斯当时已经有一名情妇了。他的理智似乎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毕竟，就算是对他这样一个放纵的男人来说，同时拥有两名情妇也会吃不消。

尽管如此，威尔斯保持正直的决心还是只维持了几个月。1912年底的某一天，威尔斯在自己的书房里意外地和韦斯特接吻了。这在两

个普通人之间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段已经向着婚外情发展的感情中出现的单纯的挑逗罢了。然而在两个格外好分析的作家之间，这件事就成了让这种相互吸引达到圆满的顶峰所必需的某种纠结冲突。可是起初，威尔斯再次退缩了，韦斯特则因为他的拒绝而陷入了精神崩溃。

一个如此充满智慧的女性却会因为感情上的挫败而万念俱灰是无法被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权主义理念认同的。不过韦斯特当时才十九岁，威尔斯似乎是她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对象。她像往常一样将自己的悲痛情绪融入优美的文字当中，不过她并没有把这些内容发表出来。我们是从一封韦斯特写给威尔斯，但是可以确定并没有被寄出的书信中发现这些内容的。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要么会朝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么会做出一些比死亡更让我粉身碎骨的事情。[\[17\]](#)

韦斯特在信中指责威尔斯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想要的世界是一个所有人都像木偶一样对待彼此的世界，一个有人陪你争吵陪你玩耍的世界，一个人们只能愤怒和痛苦，却不能充满渴望的世界。”韦斯特不能容忍这样的对待：

当你说“丽贝卡，你在胡言乱语”的时候，你的口气中带着一种确定的明智：你觉得自己真正掌控住我了。我不认为你是对的。不过我知道你会从把我看作一个精神错乱、因为毫无必要的心脏病突发而倒在你的客厅里的年轻女子的想法上获得极大的满足。

就算威尔斯知道韦斯特曾经这么想——无论是通过读这封信或其他什么途径——他也没有立即奔向韦斯特。他似乎给韦斯特写过一封信，不过他在信中严厉地批评了她的过分情绪化。他并不能理解让韦斯特困扰的并不仅仅是他在这段婚外情开始之前就叫停，而是他用自己情感上的疏离嘲笑了韦斯特感受到的极度痛苦。

韦斯特是1913年6月在西班牙写的这封信，她和母亲一起到那里待了一个月，为的就是找回自己的理智。她在西班牙时也没有停止向此时已经更名为《新自由女性》的报纸发送稿件。在一篇名为《在巴利亚多利德》（*At Valladolid*）的文章中，她不惜笔墨地详细描述了一个关于自杀的幻象，文章的情绪、语气和主题都像是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的《钟形罩》（*The Bell Jar*）的预示。文章中的叙事者是一位年轻女士，她在朝自己开枪之后来到医院寻求救治。让叙事者陷入这场麻烦的原因也是一场婚外情，这正呼应了我们都知道的威尔斯和韦斯特之间已经过去（和尚未完结）的纠葛：“我的情人虽然没有占有我的身体，但是他诱惑了我的灵魂；他和我融为一体，直到他比我更像我自己，然后他却离开了。” [\[18\]](#)

值得一提的是，韦斯特知道威尔斯仍然是《新自由女性》的读者。他也如她所愿地被勾起了兴趣。威尔斯会给韦斯特写信谈论她的文章。他在第一封信中说：“你又开始写出精彩的文章了。”不过据我们所知，韦斯特没有回复这封信，反而是给威尔斯最新的小说《热情的朋友》（*The Passionate Friends*）写了一篇书评。韦斯特在文章中说她同意威尔斯关于性与创造力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观点：

男人总是像在深海中航行的轮船不得不到煤炭站点补充燃料一样，不管愿不愿意都需要做爱，这是真的：他们要想做出伟大的成就，先得获得激情来提供灵感。 [\[19\]](#)

接着，韦斯特又坚称陷入这种关系的女性并不会像威尔斯在他的小说中想象的那样，被此类短暂的婚外情彻底毁掉。她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赞成了威尔斯的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女性需要对她的性生活和爱情生活掌握自主权。

在属于自己的充满雄心壮志的剧本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女性是不会因为不能在某个男人的已无激情的剧本中扮演主要角色而哭泣的。

所以，韦斯特不仅是靠一份书评挑起了这场婚外情，她可能还无意识地在随后的书评中为自己的感情进行了辩论。

这些文章确实发挥了效果。威尔斯收到了韦斯特的信号。1913年秋，在这份书评发表几周后，韦斯特就开始和威尔斯在他的书房里幽会了。通过书评进行的调情很快终结。二人之间的通信内容沦落成了某种你侬我侬的甜言蜜语。他们用猫科动物的名字称呼对方，很多时候，威尔斯是美洲豹，而韦斯特是黑豹（Panther，后来这个词成了她给儿子取的全名的中间名）。对于这样两位作家来说，这些信件中的幼稚语气可不是他们文学水平的最高表现。

很快，一件非常讽刺的戏剧性事件的发生给两个人的命运都造成了影响。他们第二次发生关系时，威尔斯忘了戴避孕套。韦斯特当时已经开始在一份新发行的英国期刊《号角》（*Clarion*）上发表一些洋洋洒洒的长文，为未婚母亲的困境表示愤怒，因为无论在英国社会阶层的哪个位置，未婚母亲都会被视为其中的贱民。如今她自己也要成为其中之一，这当然不是什么会令她兴奋的事情。

从安东尼·潘瑟·韦斯特（Anthony Panther West）于1914年8月出生在诺福克（Norfolk）的一间小农舍开始，他就给自己的母亲带来了麻烦。后来他坚称，韦斯特对身为母亲的矛盾心情让她的孩子深受伤害。韦斯特无法掩饰自己对于孩子本身，以及因为有孩子而让她受到的限制的不耐烦。韦斯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被关在房子里，与世隔绝，为孩子的各种事情操心的处境：

我憎恨家庭琐事……我想要的是无拘无束、充满冒险的生活……穿着蓝色羊毛外套的安东尼看起来很精神，我可以肯定我为他准备了美好的未来〔那就是1936年时一起在卡尔顿（Carlton）吃晚餐〕，但是我现在想要的是罗曼史。是与一个有白皙的皮肤和带一点自然卷的深色头发，还有一辆大型灰色敞篷车的男人共度的时光。[\[20\]](#)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的是，威尔斯不具备以上特征中的任何一点（顶多可以说他的皮肤还算白皙）。尽管他尽可能体面地应对了这个局面，还给韦斯特和孩子安排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住处，但是他并不能像韦斯特希望的那样陪在他们身边。他们之间仍然是情人关系，威尔斯也依然是韦斯特的思想导师，但事实证明，韦斯特并不特别适合被粉饰成一个完美的情妇。因为她太热衷于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了。

鉴于此，韦斯特一直坚持写作，而且是以一种足以让许多新手妈妈羡慕不已的速度。她在安东尼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一本小说，也在她经常发表文章的地方继续发表文章，还找到了一个宣扬自己思想的新场所：威尔斯本人加入了惠特尼家族（Whitney）新近资助的一份名为《新共和》（*New Republic*）的美国杂志。他邀请韦斯特也为该杂志供稿。韦斯特的文章后来被刊登在了1914年11月的创刊号上，她还是这一期中唯一一位女性撰稿人，她的文章的题目是《严苛批评的责任》（*The Duty of Harsh Criticism*）。

这篇文章将成为韦斯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它体现了一种她在《自由女性》上发表的所有文章都不具有的严肃性，看上去更像一份带着书卷气的“山上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韦斯特在文中没有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I）”作主语，而是改用了无实体的权能性复数“我们（we）”。她是站在一种居高临下的位置上发表自己的分析的：

如今的英格兰根本没有文学批评。这里有的只是软弱无力的齐声称颂，是除非这本书被警察封禁否则就不会停歇的高声赞美，一种既不会升温成激情也不会突转为愤怒的温吞吞的友好。^[21]

考虑到韦斯特正是依靠她认为缺乏的这种文学评论为自己打造出成功的文学事业的，所以她有可能夸大事实了。她对这个问题的一概

而论有些不同寻常。通常来说，她的文章都是基于个人经历，但是这篇散文中并没有此类内容。她呼吁“严苛批评”可能是因为她对自己当时所处的那个特定的人生时期感到挫败。她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但是她不能直接写这件事，因为未婚生子在当时还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将矛头转向“英格兰的文学批评”就是在借机隐晦地谈论她平凡枯燥的生活。“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忘记了思维的事，我们都会变得不安全，”韦斯特这样写道，这些话不仅是真理，更是她在当时的处境下对自己的一种提醒。

虽然她对当时的状况感到沮丧，但是她的名气却越来越大了。为了给《新共和》这份刚发行不久的杂志做广告，编辑们将韦斯特列为本杂志的一大看点。广告将韦斯特的性别作为炒作的话题，说她是“被威尔斯称为‘英格兰最杰出的人（man）’的女人”。^[22]韦斯特没有就这个有争议的赞美作出回应，但是她将威尔斯的作品用作了《严苛批评的责任》针对的目标之一，她写到威尔斯时说 he 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还说“他做着狂热者放肆狂喜的美梦，思考着被仇恨的旧事物及未来世界的和平与智慧，然而他讲的故事却是个彻底的失败”。^[23]

此时，韦斯特和威尔斯的关系进展还算顺利。不过，读到这篇文章的威尔斯可能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双层含义：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他讲的故事”包含了丽贝卡和安东尼。这个小男孩儿后来会一直成为他父母生活中的一个争论焦点。起初他们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他们就是他的父母。他们甚至还为安东尼是否应当在威尔斯的遗嘱中被正式提及而吵得不可开交。威尔斯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给韦斯特保证，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可能是意识到一边在杂志上给情人的作品写书评，一边给他写多愁善感的情书有多么奇怪，韦斯特开始专注于另一位作者，她打算撰

写一篇足够一本书长度的研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文学批评。她在《新共和》早期的一个专栏中概述了自己对这位作者的兴趣，还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躲到乡下的自己在一次持续了整晚的空袭期间阅读詹姆斯的散文集《关于小说家们的笔记》（*Notes on Novelists*）的经历。伴随着天空中警笛鸣响的声音，韦斯特从詹姆斯作为一个作家的极度精确性中体会到的安慰越来越少：

他能把一根头发丝也分出几个叉，直到不能再分为止。这种精神上的姿态不过是给彻底的、令人不安的直率制造的让人焦灼的障眼法。[\[24\]](#)

不过，仿佛是在跟自己争辩一样，韦斯特最终又认同了詹姆斯那种既严苛精细又混乱离题的腔调。在特定的环境中，激情和愤怒突然变成了被高估的东西。飞机“在我头顶盘旋，似乎想在这个连一点灯光都没有的小村子里找到屠杀的理由，”韦斯特写道，它们“烧的燃料可能是它们能够孕育的最纯洁、最高尚的激情”。

但是韦斯特后来再次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在她的书中，韦斯特反对詹姆斯的核心论点正是他的“毫无激情的超脱”——这一点如今可以被看作韦斯特针对很多伟大男性作家抱有的标志性的不满。她认为他“希望生活中完全没有暴力，甚至是情绪的爆发都不行”。不过，也不是詹姆斯的每本书都有这个问题。韦斯特喜欢《欧洲人》（*The Europeans*）、《黛西·米勒》（*Daisy Miller*）和《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但是她讨厌《一位贵妇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因为她认为小说的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Isabel Archer）是一个“傻瓜”。詹姆斯令人烦恼的超脱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韦斯特抱怨说，只要一谈到女人：

人们无法从她引起的喧闹混乱中了解女主角的信念和性格，她可能是来得太晚、走得太早，或是干脆忘了去充当这个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年长女伴的角色。皆因年轻男子的举止都是鸽子般纯洁可爱的，所以人们不应当认为她有必要在场保护一个女孩免受攻击；年轻女士们的言语都是温柔甜

美的，所以人们也不应当觉得两性之间的对峙能有多激烈，既然如此，他们要一名公断人干什么呢？[\[25\]](#)

韦斯特在英格兰出版这本书时，詹姆斯刚刚去世约一个月，这也让这本书成了被评论的焦点，不然一本普通的文学批评研究很可能得不到这么高的关注。总体来说，人们对这本书的反馈是积极的。《观察家》（*Observer*）说它“闪烁着金属般锋利的光亮”。[\[26\]](#)绝大多数美国批评家似乎也持类似的意见。不过《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图书专栏的作者，一位名叫埃伦·菲茨杰拉德（Ellen Fitzgerald）的女士认为这本书中“对文学荣耀的破坏”是一种直白的侮辱。她说：“还很年轻的女性不应该就小说撰写文学批评，这让小说家们难以承受。”[\[27\]](#)

我们不认为韦斯特会为这样一篇评论而感到难过。时至今日，打破“还很年轻的女性”要遵守的规则对于韦斯特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她根本不担心自己是不是给重要的人留下了好的印象。她也不在乎小说家们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树立的虔诚信仰。

然而韦斯特绝对不是对于小说家们经历的创作艰辛熟视无睹的。她本人也会持续创作不少虚构类作品，总共出版了十本小说。这些小说获得的总体评价是积极的：“如此严格的诚实，如此沉重但独一无二的美丽，在它们崇高的精神现实主义中大获成功。”[\[28\]](#)这段话代表了人们对她的第一本小说，1918年出版的《士兵的归来》（*The Return of the Soldier*）的看法。然而，评论者们在普遍表示赞美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的失望之情，因为韦斯特的名气太大了。《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评论者在评论1920年出版的《法官》（*The Judge*）时说：“它没有达到韦斯特女士这么有能力的作家轻易就可以达到的完美程度。”[\[29\]](#)没有人会因为她能写一本不错的小说而感到惊讶，但是人们对她的期望是写一本伟大的小说。小说家 V. S. 普利切特（V. S. Pritchett）在提到1929年出版的《哈丽雅特

·休姆》(*Harriet Hume*)时就抱怨说：“她这种错综复杂、推进很慢的风格显露了机智和温暖的优美，但是读者很可能会看到一半就搁浅在那些心理浅滩上，从而干脆放弃艰难的阅读。”^[30]

这就是一个广受赞美的批评家不想只做一位批评家时需要付出的代价。人们习惯了某种她作为作家特有的人格面具，然后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她未来的所有作品。帕克想要凭借自己的小说而不是俏皮话和诗文而被大众接受的时候，也不得不与这种衡量标准斗争，结果没能成功。韦斯特在散文中的智慧出现在虚构作品中时就成了某种恶魔，小说读者都不明白她的离题是要把他们带到哪儿去。

韦斯特的记者工作才是她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毕竟威尔斯只承担了她的部分开支。她在《新共和》上的专栏帮助她获得了更多工作机会，她还开始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及其他次要一些的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比如《当代》(*Living Age*)和《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韦斯特对于在哪里发表文章并不挑剔，她需要钱，而且她从不缺观点可表达。

韦斯特对于题材也不挑剔。她倾向于从一本书说起，最终归结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上。她谈论过萧伯纳的战争演讲；^[31]写过她在一次夜晚乘火车时从一个醉酒的人身上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气质；^[32]她对狄更斯早期的传记作者之一总是在章节之间插入天气预报发过牢骚；^[33]还抱怨过那些将农村穷人的生活作为主题的小说：“他们总是会把这种题材写得冗长乏味且脱离实际。”^[34]韦斯特还总被邀请写一些关于女性的文章，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蔓延，她也被邀请谈论女性在战争中的角色问题。她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另一篇洋洋洒洒、充满激情的长篇大论，内容是论述战时护理工作如何实现了女权主义的承诺，将普通的女性转变成

战争的一部分。她写道：“勇敢的女性一直存在，所以女权主义不是创造了这种勇气，而是让这种勇气在土壤中扎根。” [35]

韦斯特用文字在纸面上给自己塑造了一个自信的形象，但是在其他方面，她的生活开始分崩离析。与威尔斯的关系已经亮起了红灯。他的新情妇层出不穷，虽然他这种拈花惹草的特点可能并不会让谁感到意外，但有时候，二人还是会因此闹得很不愉快。他们关系的最低谷出现在威尔斯开始和一位奥地利年轻艺术家纠缠不清〔她有一个好记的名字叫加藤里格（Gattenrigg）〕，而两人彻底决裂则是在1923年6月的一天，加藤里格先是出现在韦斯特的公寓里，当天晚些时候又试图在威尔斯的房子里自杀。韦斯特在媒体面前保持了镇静，她在接受本地报纸采访时说：“加藤里格夫人没有出言不逊，也没有大吵大闹。她是一位非常聪慧的女士，能够创作出十分精美的作品，我为她感到遗憾。” [36]

韦斯特也开始为自己感到非常遗憾了。她在给朋友和家人的信中直白地抱怨威尔斯“总是打扰我的工作”。[37]他表现出的居高临下的气势曾经令她着迷，如今却被她称为“自我中心”。[38]此时的学生已经学会了老师能教给她的一切，而且从法律上说，威尔斯与韦斯特和安东尼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尽管她担心失去了威尔斯的慷慨解囊，自己可能会入不敷出，但两人之间的关系的确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这段感情在韦斯特人生中已经发挥了它该发挥的作用，让她走上了自己梦想的事业道路。她当时几乎已经比威尔斯还出名了，因为她更多产，而且正处于人生中全盛的阶段，而威尔斯的作品量则开始走下坡路。所以韦斯特已经不需要他了。

彻底断绝关系的机会是以一次到美国作巡回演讲的形式出现的。1923年10月，韦斯特把安东尼留给母亲照顾后乘船前往了大洋彼岸。她在美国成了很受欢迎的人物，能够直言不讳的无拘无束和尚未婚嫁的自由之身也让她感觉如鱼得水，或者至少可以说这些特性是符合她为自己塑造的公众形象的。美国媒体显然都被她迷住了。她成了某种能够独立思考的新女性形象的化身。让记者们更满意的是，韦斯特很愿意回答与此相关的问题。比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就询问她为什么年轻女性小说家的数量似乎突然变多了。这是不是与战争有关系？韦斯特摇头答道：

年轻女性确实正在小说领域“继续前进”，不过她们并不需要战争来增加她们的数量。她们也不需要战争来为她们打开自我表达的大门，无论战争的情况是激烈还是缓和。促成这一局面的是英国女性已经为之奋斗了很多年的东西，你可以称之为自由的精神，女权主义的精神，但你要永远记住，它不局限于获得投票权的斗争。让女性为之奋斗的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位置，是在艺术、科学、政治和文学领域不断成长的权利。[\[39\]](#)

韦斯特还补充说她不认为年龄是一个应当被考虑的因素，实际上，年龄的增长只会带来力量的增强。她还举了弗吉尼亚·伍尔夫、G. B. 斯特恩（G. B. Stern）和凯瑟琳·曼斯菲尔（Katherine Mansfield）的例子。韦斯特断言：“你知道，三十岁及以上的女人才开始显示出自己真正的价值。生活对她们而言开始有意义，而她们也能够懂得这种意义。”[\[40\]](#)

韦斯特似乎就是在说她自己。她说这段话的时候已经三十岁了，而且无疑已经占据了“有发展前途的位置”。她在美国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引起大批公众的关注，她就像帕克一样成了一位名人作家。韦斯特还在全美各地的女子俱乐部里做演讲。她的社交日历上写的全是行程安排，连页面的边边角角都被字迹占满了。她对于美国的态度不如美国对她的那么肯定。韦斯特在《新共和》上发表了四篇有关这次行

程的文章，其中一篇这样写道：纽约可以“凭借其奢华富有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其千篇一律也难免让人感到枯燥乏味”。^[41]韦斯特对于某些方面的评价十足积极：她喜欢美国的铁路体系和密西西比河。但是她在自己的书信中也写了很多尖酸刻薄的话，尤其是在谈到美国的女性时，她说她们“邋遢得令人难以想象”“萎靡不振得让人反感”“对于自己的晚礼服也不上心得都令人难以置信”。^[42]

韦斯特的名气算是不太有压力的那种。她的私生活还不至于被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中，即便如此，威尔斯的名字也总是会和她的一起出现。作为掩饰，她有时会称自己是威尔斯的“私人秘书”。无论是安东尼的名字还是他的存在都从未被提及。不过对于韦斯特在美国见到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来说，她与威尔斯的婚外情和私生子都是公开的秘密。

这些人当中也包括几位圆桌会议的成员，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就是其中之一。韦斯特还见到了菲茨杰拉德，但是难以确认她是否见过帕克。尽管纽约的记者和风趣人物们似乎显然会与这位来自伦敦的锐利的年轻女士意气相投，但韦斯特其实并没能融入这个环境。只有伍尔科特成了她的朋友，关于其他人的记忆则不怎么愉快。这次旅程中间的某个时候，人们为韦斯特举办了一场庆祝聚会。帕克似乎没有参加，不过她的朋友，女权主义作家和活动家，同时也是圆桌会议成员的鲁思·黑尔出席了。黑尔是因为做过战时通讯员而出名的，后来又成了活跃的艺术品评论家。她虽然嫁给了海伍德·布龙（Heywood Broun），但是在婚后仍然使用自己原本的姓氏。1921年时，她还因为自己是否必须在护照上使用夫家的姓氏而与美国国务院陷入了争执。当国务院不肯作出让步之后，黑尔毅然交还了护照，放弃了欧洲之行。她是一个有原则的女人。

显然，黑尔在私下里也是一个不害怕直抒胸臆的人。韦斯特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说，黑尔在聚会上走近她，然后开始了一通长篇大论：

丽贝卡·韦斯特，我们都对你感到失望。你终结了一个伟大的幻象。我们以为你会是一位自立的女性。然而眼前的你却是这么一副哀戚的样子，这是因为你过去总是依靠男人给你提供你想要的一切，现在你不得不离开他，要靠自己保护自己了，你就各种抱怨。我相信威尔斯肯定是对你太好了，给你钱，给你珠宝，给你你想要的一切。如果你依照这样的条件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那么你早该想到，等他厌烦了，他就会把你赶出去。[\[43\]](#)

通常情况下，圆桌会议的成员之间相互侮辱时会采用婉转隐晦的方式，不过黑尔并不是像其他人一样的幽默大师。韦斯特直到三十年后依然记得黑尔对她的评价，而且她转述的内容可能比黑尔的原话还要尖锐。不过黑尔的失望之情无疑刺痛了韦斯特。这次当面批评成了这趟从任何职业角度上说都很成功，而且充斥着人们对她的赞美的旅程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但让她永生难忘的正是这个不和谐音符。

人们总是对韦斯特感到失望：无论是她的母亲，她的姐姐莱蒂（Lettie），威尔斯，还是评论她小说的批评家及她的同行们。而在这个高唱失望之歌的合唱团中，声音最洪亮的人还要数她的儿子安东尼。安东尼在成长过程中总被父母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因为他们的绝大部分雄心壮志都没有被放在这个孩子的成长上。这样长大成人的安东尼心中充满了对不闻不问的父母的怨恨。安东尼选择将自己的怨恨集中到与他接触更多的母亲身上，这种母子之间的敌对关系也逐渐变成了一种一直延续的传统。最终他会为了发泄自己的痛苦而创作一本被巧妙地命名为《遗产》（*Heritage*）的小说和一本非虚构类作品，并在这两本书中对韦斯特发出严厉的责难。他对于这个题材的执念如此顽固，以至于韦斯特在晚年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对此已经无话可说：“我希望他能想想私生子身份以外的事。唉。”[\[44\]](#)

对于除了安东尼之外的几乎所有人，韦斯特让他们失望的原因多多少少都与她的文字有关。韦斯特的散文中的一些东西会让人们对她产生特定的期许，而当人们发现韦斯特本人其实并不符合这种期许的时候，人们就不免感到很受伤。鲁思·黑尔在读韦斯特的文字时看到的是一位坚强、独立的柏拉图式女性典范，但她在聚会上看到的韦斯特却是另一种样子，这自然会令人失望。即便是那些为韦斯特的智慧和才华而着迷的人，有时也很难接受他们看到的这种略显轻浮的个人风格。“丽贝卡的形象介于打杂女工和吉卜赛女人之间，不过她像小猎犬一样顽强，还有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和邋邋甚至是脏兮兮的指甲。她非常有活力，但品味不佳，对知识分子和特别有智慧的人充满怀疑。”^[45]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34年的一封写给姐姐的信里这样描述韦斯特，话中一半是侮辱，一半是赞美。

不能满足所有人让韦斯特感到困惑，尽管她自己就是一个毫不吝于发表批评意见的人。韦斯特当记者时也喜欢使用带刺的言辞，女性被不讨好地描述为拥有“像稻草一样颜色浅淡、又直又硬的头发”，^[46]男人则“鼻子很尖”。^[47]不过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对她作出了恶劣的回应。韦斯特在人生末期时说道：“我引起了太多人的敌意。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认为我有什么可怕的。”她想要的是情人、仰慕者和朋友，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完全不在乎别人想法的人：“我想要被认可，哦，是的……我讨厌不被认可。而我总是不被认可。”^[48]在韦斯特的自信深处其实隐藏着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和一种想要被倾听、被喜爱的迫切渴望。

在威尔斯之后，韦斯特又遇到了多名追求者，其中包括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勋爵威廉·马克斯韦尔·艾特肯（Lord Beaverbrook, William Maxwell Aitken）。韦斯特似乎不打算再和其他作家发生婚外情，或者只是不想再陷入可能伴随各种戏剧性复杂情况的关系。她把献殷勤的目标转到了生意人上，这一点可能也证明了鲁思·黑尔的

怀疑，那就是韦斯特对经济保障的看重胜过其他任何事。后来回忆起彼此的初次见面时，韦斯特形容这位名叫亨利·安德鲁斯（Henry Andrews）的投资银行家“贴心、亲切又可爱，有点像一只笨笨的长颈鹿”。^[49]这显然正是她想要寻找的类型。不到一年，韦斯特就在1930年11月与安德鲁斯结婚了。他们的婚姻会一直持续到后者在1968年去世为止。双方在婚姻期间都有不忠行为，但这并不会有什么影响，大多数时间里，韦斯特都能够从朋友和工作中得到满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阿奈·尼（Anaïs Nin）就是这些朋友中的一员。当时尼还是一名无人知晓的法国作家。韦斯特是因为尼出版的第一本书而知道她的。这本薄薄的关于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的作品的副标题是“一份不专业的研究”。尽管劳伦斯总被看作一个厌恶女性的人，但这本书是最早从女性视角为劳伦斯的作品进行辩护的研究成果之一。韦斯特认识劳伦斯，在后者去世时，韦斯特还发表文章抱怨说“他在自己所属的阶层中都没有受到他理应受到的尊重”。^[50]所以韦斯特和新任丈夫到巴黎度假时，她邀请了尼来和自己见面。

无论是从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位作家来看，尼都与韦斯特截然相反。尼给人的印象是风趣又优雅，而韦斯特则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尼在散文中表现出来的人格也给人一种精心修饰、弱不禁风的感觉，与韦斯特展现的自信的勇士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尼欣赏艺术的角度是看它们如何清晰地表述个人欲望，而且她只把这些想法写在日记里而不是发表到报刊上。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她和韦斯特对待写作和生活的方式绝对是有天壤之别的。

所以1932年的第一次会面显然不是发生在两个心意相通的人之间的。尼在日记里记录了这种喜忧参半的结果：

她有那么明亮、那么充满智慧的浅褐色双眼。就像波拉·内格里（Pola Negri）^[51]，但是没有她的美貌，却有一口典型的英国人的牙齿。她的声音尖细，充满了痛苦，听着让我不舒服。我们只在两个层面上有共同语言：知识和人性。我喜欢她充满母性的丰满身材。我们没有谈论任何悲伤忧郁的话题。她特别不自在，我让她感到害怕。她为自己凌乱的头发道歉，还为自己的疲倦道歉。^[52]

尼还补充说她能看出韦斯特“渴望闪耀她独特的光芒，但是却因为内心深处的胆怯而不敢这样做，她还很紧张，她说话的能力远远比不上她写作的本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感情日益加深了。韦斯特开始恭维尼，说自己认为尼的作品远胜过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她还告诉尼自己觉得她非常美丽，这让尼有了色诱韦斯特的想法。（没有证据证明尼采取了任何实际行动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尼后来甚至希望自己能变得像韦斯特一样。她在日记中写道：“她的文字那么锐利，她不会受到过分天真的困扰，等我到了她现在的年纪，我也能像她一样锐利吗？”^[53]事实证明，完全不同的女性之间也能够找到很多可以互相仰慕的东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韦斯特的生活越来越稳定。亨利的事业虽然出过一些问题，但是这对夫妇因为从亨利的叔叔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而变得更加富有。安东尼也长大了，虽然他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可他给韦斯特增加的负担越来越少。韦斯特还在持续创作数量稳定的书评和散文，但文学方面的工作显然开始让她觉得厌烦了，就像帕克后来对纽约的生活感到厌烦一样。不过韦斯特没有去好莱坞，而是去了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是一个拼凑而成的国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一次旨在团结这一片地区中的斯拉夫民族的运动而组建起来的。整个国家的建立就是一个同盟国阵营保护下的大型世界主义实验。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大型实验已经彻底失败。那里发生了政变，民

族主义势力日益增长，而且这个国家还同时遭到了德国和意大利两国的法西斯主义活动挤压。南斯拉夫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次遭受成为附属国的经历，最终在铁托统治下保持了独立，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解体。

1936年，英国议会派遣韦斯特到南斯拉夫进行巡回演讲。虽然她到那里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但是她依然为那片土地着迷。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希望详细写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东西——这个她并不在那里生活的国家，这个其拥有的深层问题与对她的吸引力一样复杂难解的国家。同样吸引韦斯特的还有她在南斯拉夫的向导斯坦尼斯拉夫·维纳弗（Stanislav Vinaver）。不过当后者想要将双方的相互吸引推进为肉体关系时，韦斯特拒绝了。她的拒绝肯定是婉转友善的，因为她在后续的五次行程及长达五年的创作关于这个国家的书籍的过程中依然借助了维纳弗的指导。即便是在希特勒开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韦斯特仍坚持前往该地。最终在1941年10月，她出版了根据这些经历创作的厚度超过1200页的《黑羊与灰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近来有一位韦斯特的传记作者称《黑羊与灰鹰》“能够掌控全局但略显杂乱散漫”。^[54]这样的评论是客观的，不过它大概忽视了这种散漫的闲谈方式一直是韦斯特作品吸引人的关键，也是让读者能够坚持读完这么厚的书的全部原因。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韦斯特已经成了擅长利用看似不相关的联系，以她独有的方式从一个想法跳跃到另一个想法的大师。读韦斯特的文字就像是在观看她的大脑如何运转。

从知识层面讲，韦斯特关于南斯拉夫的理论是存在缺陷的。她是一个敢于用心理分析法分析一整个国家的人。这种做法如今被恰当地视为一种以简释繁的途径，至少在韦斯特采用的绝对条件下是适用

的。在该书开篇不久之后我们就被告知，一辆货车上坐着的四个乏味、顺从的德国人就能够代表“我认识的所有德国雅利安人；而欧洲中部像这样的人共有六千万”。^[55]韦斯特相信属于哪个民族是一种天命，因为人和人之间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区别，这种区别应当被理解并获得尊重。这样的想法让她不以为耻地接近了分析的种族主义界线。在本书中的某一段中，她甚至明确宣称，她很喜欢看由美国“黑人男女”跳的“摘樱桃舞”，但是如果换成一个白人跳这种舞，她就会觉得表演变得充满“兽性”。

韦斯特在地缘政治学和幽默笑话之间转换得游刃有余。在解释几乎将几个斯拉夫地区拱手送给意大利的《1915年伦敦条约》（1915 Treaty of London）的过程中，韦斯特突然停住了话题。她刚刚描述了意大利原始法西斯主义诗人加布里埃莱·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是如何带领士兵进入阜姆^[56]（属于克罗地亚的一部分），以防止意大利人失去这片地区的。邓南遮是一个秃顶，蓄着抹了蜡的胡须的男子。关于他的行动引发的混乱，以及它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发出的鼓励信号，韦斯特说道：

什么时候我听说有一个国家允许自己因为对于一个彻底秃顶的女作家的热情而被搅动得天翻地覆，甚至濒临战争的边缘，那我就相信女权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了，而且女性已经获得与男性平等的位置了。^[57]

相对于韦斯特的更充满诱惑的纯粹情感问题，她的丈夫亨利在整本书中都被呈现为一种理智的衬托。一个很有说明性的例子是，有一次韦斯特和丈夫与一位克罗地亚诗人进行了关于文学的讨论，后者试图强调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比萧伯纳、威尔斯、夏尔·贝玑^[58]和纪德这样更传统的“文学”类型作家优秀：

他们写下的是人们在咖啡馆谈论的内容，如果内容足够好，那这也是不错的事，但这样的内容不够严肃，因为它关乎的是像汗水一样普遍且可

再生的东西。〔这个克罗地亚诗人认为〕相比之下，纯粹的讲故事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因为它汇集了可以被其他有才能的诗人吸收并转化为更高形式的经验。^[59]

亨利对此提出了一个苍白的抗议（“康拉德完全没有悲剧意识”），不过韦斯特继续大段引用了诗人坚持的观点，以至于让人不禁怀疑她其实也接受了这些观点。

最早在《大西洋月刊》上刊登的一系列对《黑羊与灰鹰》的评论起码可以说都是饱含赞美之情的。《纽约时报》有点奇怪地称之为“最精彩客观的游记作品”，其评论者甚至将该书的卓越之处具体地归因于它是由“最有天赋、最有洞察力的当代英国小说家和批评家之一”写出来的。^[60]《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一位评论家写道：“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我读的唯一一本书，它像真实生活一样，自有其重要性，足以与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危机相提并论。”^[61]

这最后一个评论非常重要。《黑羊与灰鹰》的出版时间是在偷袭珍珠港几个月之前，美国当时仍认为自己不会陷入欧洲的乱局。而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到《黑羊与灰鹰》出版时，战争已经不是什么惊悚故事书里的内容，而是吞噬一切的日常生活状况。

战争期间，韦斯特和丈夫安静地生活在英格兰。从1939年秋战争在欧洲爆发之后，亨利一直在经济战争部（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工作。这对夫妇在乡下买了一栋大宅作为主要住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了，他们大概还能“靠自己种地保证生活”。^[62]韦斯特从英格兰给《纽约客》的哈罗德·罗斯发过两份报道。她在其中反复使用家庭主妇这个词指代自己。她承认自己在战争期间经历的艰辛还不至于像历史学家吉本笔下的那么难熬，但是如果不是战时的油漆价格高到离谱，她绝不会选择给新房子贴墙

纸，她选择这么不相称的灯罩的唯一原因是灯泡“发出的光线可能会害死我们，因为我的房子坐落在一座小山顶部，它很容易引起道尼尔巡逻机（Dornier）的注意”。韦斯特尤其了解战争对猫的影响，她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谈到了自己的姜黄色虎斑猫的情况：

这场危机让猫暴露了它们是多么可怜的生物——它们的智力水平无法读懂任何书面或口头通知。它们遭受着空袭和由此导致的迁移的痛苦，就好像如果聪明敏感的人们不了解历史，没有获得关于战争性质的预先警告，不确定自己住在谁的房子里或依靠了谁的慷慨过活，也没有犯下让自己理应遭受苦难的过错时，他们也必将感受到痛苦一样。如果扑扑（Pounce）发现自己独自在房子里无人看管，它很可能已经跑到树林里，再也不回到危险的人类中间了。[\[63\]](#)

《黑羊与灰鹰》确立了韦斯特作为一流记者的地位。但是直到二战的欧洲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她才真正有机会发挥一名记者的作用，她成了《纽约客》关于战犯审判新闻的首席通讯员。对于韦斯特而言，这些审判是很适合她的题材，因为审判既要考虑摆在面前的单个案件，又要考虑一般的法律原则，这种从具体到概括的方式与韦斯特在自己的文章中通常使用的思考方式不无相似之处。

韦斯特报道的第一场审判是威廉·乔伊斯案（William Joyce），英国人更熟悉的名字是他的绰号“哈哈勋爵（Lord Haw-Haw）”。乔伊斯的身份背景也被多少提及了，他出生于美国，但是主要生活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他是一个顽固的盎格鲁—爱尔兰民族主义者（Anglo-Irish nationalist），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加入了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领导的法西斯运动，后来在1939年秋天去了德国，成了为纳粹分子做宣传工作的广播员。他的广播节目在英国播出，目的是损伤英国人的士气。他的绰号是英国报纸给他取的，他在人们眼中是一个应当受到严厉斥责的形象。战争结束后，乔伊斯在英格兰以叛国罪接受审判。韦斯特是坚定地认为他理应被判处死刑的人之一，乔伊斯最终也确实被执行了死刑。韦斯特迫切地想要将她

认为的乔伊斯在道德上的狭隘与他的身材联系在一起：“他非常矮小，虽然相貌不是特别丑陋，但令人厌恶至极。”^[64]在亲眼见证了乔伊斯的绞刑之后，韦斯特就对他失去了兴趣，继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她认为受过这个人伤害的那些人身上，韦斯特写道：“一位老人告诉我，他来这里观看绞刑是因为他的孙辈在一次V-1型巡航导弹轰炸中丧生，他从停尸房看了他们的尸体之后回到家，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哈哈勋爵的声音。”^[65]

韦斯特还为《纽约客》报道了纽伦堡审判，这次审判给她提出了一些更令她困扰的问题。她当然不是比别人对纳粹分子更有好感，但是她最终并没有把这些人描述成特别险恶的形象。关于副元首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韦斯特的观察是他“明显已经疯了，这样的人还要接受审判似乎是法律的耻辱”。^[66]在写到希特勒的指定接班人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时，韦斯特说他“非常软弱”。韦斯特没有特别明确地提出那个后来让汉娜·阿伦特举世闻名的观点，即这些官员中的一部分人并不能用“邪恶”这个词的传统含义来解释。韦斯特确定他们犯下了罪行，但她不能接受这些官员只是在依照命令行事的说法，她直白地表述了自己的这种看法：

如果一位海军上将接到精神错乱的第一海务大臣的命令，让他在军官食堂里供应煮熟的婴儿，上将显然应当拒绝从命；但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将官们在接到希特勒的接近于水煮婴儿的命令时，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情愿。

关于德国人对于纳粹分子犯下的凶残暴行怀有的集体罪责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会成为一个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但是韦斯特在战后创作的最早一批文章里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多少兴趣。关于大屠杀，她觉得除了相关者必须接受惩罚这个事实之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即便是在当时，她也相信纳粹分子全部应当为他们的战争行

为而受到惩罚，并且将“他们对犹太人做的一切”归入了纳粹罪行的概括名目之下。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道德上的疏忽。部分原因在于，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韦斯特的注意力转向了苏联。早在关于乔伊斯的文章中，韦斯特就给人们敲响了这样的警钟：

纳粹德国和苏联的主张和推进方式之间有一种相似性。这些主张依赖的是一个前所未闻的假设，即某个拥有特殊天赋的人会拥有一种普遍的智慧，这种智慧使得他可以对一个国家下达命令，而且他的命令高于由被称为民主的群策体系发出的命令。这在实质上是给了一个人对其他人的事指手画脚的权力。^[67]

韦斯特对于共产主义的担忧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占据了她的生活和写作的绝大部分，不过她也并非只关注这一个问题。她曾经被派遣报道国王的葬礼、民主党代表大会、战犯审判、惠特克·钱伯斯

（Whittaker Chambers）事件和南非问题等。1975年，她还被邀请参加了缅怀一位妇女参政论者的活动，韦斯特记得她“特别漂亮”。

^[68]不过韦斯特能够引发的关注已经大不如前了。她与左派的疏远给她造成了一定伤害，她那种轻浮善变的风格也让她不受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渐成熟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的喜爱。对于这些作家来说，韦斯特有些古怪，像是前一个时代留下的遗迹。

在人生的晚期，韦斯特清楚地意识到了人们对她关注的日渐减少。她给一个朋友写信说：“如果你是一名女性作家，那么有些事你一定要做。第一，不要太出色；第二，要英年早逝，在这一点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胜过了我们所有人；第三，像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自杀。一直写作并且写得好是不能被原谅的。”^[69]韦斯特会以这种有艺术性的、聊天似的风格继续写作，直到去世为止。她的作品仍然受到人们的赞美，在她晚年时，她还成了知识分子谈话节目的固定嘉

宾。她是少有的被看作国家大事方面专家的女性之一。不过她也会犯错，她对反共产主义的执迷就是其中之一。

[1] 布卢姆茨伯里派是从190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英国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地区为活动中心的文人团体。它的拥护者包括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哲学家等。他们否认自己是某种正式的组织，而是被共同的理念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人。

[2] “Marriage, ” *Freewoman*, September 19, 1912.

[3] “Marriage, ” *Freewoman*, September 19, 1912.

[4] 1910年4月18日，写给Letitia Fairfield的书信，转引自*Selected Letters of Rebecca West*, ed. Bonnie Kime Scot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1849~1924），美国女作家，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市，英语世界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有《秘密花园》《小公主》等。

[6] 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普洛斯彼罗是意大利北部米兰城邦的公爵，被弟弟篡夺了公爵的宝座后带着三岁的女儿漂流到一个小岛上，他从书中学会了使用魔法，并借此保护女儿和控制剧中的其他角色。

[7] *The Fountain Overflows*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3), 85.

[8] 参见Lorna Gibb, *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Rebecca West* (Counterpoint, 2014), 36.

[9] “I Regard Marriage with Fear and Horror, ” *Hearst's International*, November 1925, 收录于*Woman as Artist and Thinker* (iUniverse, 2005)。

[10] 这段提要被刊登在了1906年12月2日的*Los Angeles Times*上。

[11] “A Reed of Steel, ” in *The Post-Victorians*, ed. W. R. Inge (Ivor Nicholson and Watson, 1933)。

[12] 1972年12月21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电台Anthony Curtiss采访，转引自Gibb, *Rebecca West*, 41。

[13] V. S. Pritchett, “One of Nature’ s Balkans, ” *New Yorker*, December 21, 1987.

[14]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编辑的信, *Freewoman*, March 14, 1912.

[15] Rebecca West on Wells, 1CDR 0019053, at Yale’ s Beinecke Library, 参见Gibb, *Rebecca West*, 48。

[16] H. G. Wells, *H. G. Wells in Love: Postscript to an 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 (Faber and Faber, 1984) , 94-95.

[17]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威尔斯的书信，时间大约是1913年3月，in *Selected Letters of Rebecca West*.

[18] “At Valladolid, ” *New Freewoman*, August 1913.

[19] “The Fool and the Wise Man, ” *New Freewoman*, October 1913.

[20]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Sylvia Lynd的书信，时间大约是1916年，in *Selected Letters of Rebecca West*.

[21] “The Duty of Harsh Criticism, ” *New Republic*, November 7, 1914.

[22] 这份广告被刊登在1914年11月7日的《纽约时报》上。

[23] “The Duty of Harsh Criticism. ”

[24] “Reading Henry James in Wartime” *New Republic*, February 27, 1915.

[25] *Henry James* (Nisbet and Co, 1916) .

[26] *Observer*, July 23, 1916.

[27] Fanny Butcher, “Rebecca West’s Insulting Sketch of Henry James, ” *Chicago Tribune*, December 2, 1916.

[28] Lawrence Gilman, “The Book of the Month, ” *North American Review*, May 1918.

[29] 转引自*Living Age*, August 18, 1922。

[30] “Fantasy, Reality, History, ” *Spectator*, September 21, 1929.

[31] “Mr. Shaw’s Diverted Genius, ” *New Republic*, December 5, 1914.

[32] “Redemption and Dostoevsky, ” *New Republic*, June 5, 1915.

[33] “The Dickens Circle, ” *Living Age*, January 18, 1919.

[34] “Notes on Novels, ” *New Statesman*, April 10, 1920.

[35] “Women of England, ” *Atlantic*, January 1, 1916.

[36] *Westminster Gazette*, June 23, 1923.

[37] 1923年8月24日,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Winifred Macleod的书信, 转引自Gibb, *Rebecca West*, 85。

[38] 1923年11月2日,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Winifred Macleod的书信, Lilly Library, 转引自Gibb, *Rebecca West*, 85。

[39] “Rebecca West Explains It All, ”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 1923.

[40] “Rebecca West Explains It All, ”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 1923.

[41] “Impressions of America, ” *New Republic*, December 10, 1924.

[42] 1923年11月2日，丽贝卡·韦斯特写给Winifred Macleod的书信，转引自Gibb, *Selected Letters of Rebecca West*。

[43]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Gordon Ray的书信，日期不详，Pierpont Morgan，转引自Gibb, *Rebecca West*, 88。

[44] “Rebecca West: The Art of Fiction No. 65,” 接受Marina Warner采访, *Paris Review*, Spring 1981.

[45]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ume Four (1931-1935)* (Mariner Books, 1983), 131.

[46]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A Journey Through Yugoslavia* (Penguin Classics, 2007), 403.

[47] *A Train of Powder* (Viking, 1955), 78.

[48] “Rebecca West: The Art of Fiction No. 65.”

[49] 出自被收藏在Tulsa archive的一个笔记本中的内容，转引自Gibb, *Rebecca West*, 116。

[50] “A Letter from Abroad,” *Bookman*, April 1930.

[51] 波兰女演员，曾在德国拍摄了一系列大获成功的喜剧。到好莱坞发展后，关于她与卓别林订婚的传闻一直闹得沸沸扬扬。后来，这段关系被很多人当作明星利用绯闻提高人气的最早案例。

[52] Anaïs Nin, *Incest, From “A Journal of Love”: The Unexpurgated Diary of Anaïs Nin, 1932-1934* (Harvest, 1992), 1934年4月27日的内容, 323。

[53] Anaïs Nin, *Fire, From “A Journal of Love”: The Unexpurgated Diary of Anaïs Nin* (Harvest, 1995), 1935年8月12日的内容, 130。

[54] Gibb, *Rebecca West*, 183.

[55]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37.

- [56] Fiume, 今称里耶卡 (Rijeka) 。
- [57]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124.
- [58] Charles Péguy, 法国作家, 1873~1914。
- [59]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59.
- [60] Katharine Woods, “Rebecca West’ s Brilliant Mosaic of Yugoslavian Travel, ”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1941.
- [61] Joseph Barnes, “Rebecca West in the Great Tradition, ”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6, 1941.
- [62] “Housewife’ s Nightmare, ” *New Yorker*, December 14, 1941.
- [63] “A Day in Town, ” *New Yorker*, January 25, 1941.
- [64] “The Crown Versus William Joyce, ” *New Yorker*, September 22, 1945.
- [65] “William Joyce: Conclusion, ” *New Yorker*, January 26, 1946.
- [66] *A Train of Powder*, 83.
- [67] *The Meaning of Treason* (McMillan and Company, 1952) , 305.
- [68] “ ‘Shoulder to Shoulder, ’ ”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1, 1975.
- [69] 1952年3月11日,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Emanie Arling的书信, 转引自 Gibb, *Rebecca West*, 198。

第三章 韦斯特和赫斯顿

1947年，《纽约客》派遣韦斯特去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Greenville）报道一场发生在那里的私刑审判。这个任务是她自己要求的。1947年2月16日晚，二十四岁的威利·厄尔（Willie Earle）被从皮肯斯县监狱（Pickens County jail）里劫走，当时他是因为受到刺死一位白人出租车司机的谋杀指控而被关在这里的。尽管证明他就是凶手的证据全部都是间接证据，由受害出租车司机的同事们组成的暴徒群体还是把厄尔从监狱里劫走，并对他进行殴打，用利器戳刺，用枪支射击，直至其死亡。

虽然私刑在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终结，但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种事已经相对罕见了。厄尔的案例成了东北部各大报刊上的头条。新闻记者们热切地报道了厄尔血淋淋的尸体的情况，以期达到让读者震惊的效果。有一篇文章说厄尔的头被“崩成了碎片”。^[1]另一篇说暴徒们把他的心脏从他的身体里挖了出来。^[2]北方人在读到这些残忍细节的时候可能反而会感到某种安慰，因为他们生活在距离这些事情很远的地方，他们也是在用震惊来表达某种形式的自鸣得意。他们告诉自己，野蛮行为仅存在于落后的南方。

不过事实证明，南方人对于威利·厄尔死亡一事的看法也是存在分歧的。南卡罗来纳州当时刚迎来一位新州长，即上任仅一个月的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这起格林维尔私刑事件给瑟蒙德州长带来了一场危机。尽管联邦调查局最终拒绝调查，但据说杜鲁

门的总统民权委员会密切关注了这场审判，结果是，有31人被送上了被告席。

韦斯特与她所处时代的绝大多数白人知识分子一样为这场私刑感到惊骇。她认为这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产物。韦斯特写道：“不管那些暴徒是什么人，说他们的行为与威利·厄尔的肤色无关绝对是荒谬的。”^[3]但与此同时，她费尽苦心地想要传达她在这个案例中明显感受到的一种细微差别。她写到自己在这里没有发现白人在给黑人带来苦难后可以免受惩罚的文化。在韦斯特看来，那些被告都很担心自己会被定罪。她还认定是厄尔自己“对白人有巨大敌意”。^[4]韦斯特说那些实施私刑的白人男子显然并不享受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出于与被害出租车司机的友谊才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而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嗜血成性。韦斯特仅详细引用了一位黑人的话，而且还是一个“请求延长吉姆·克罗体系（Jim Crow system）^[5]”的黑人。^[6]

他说：“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一项禁止黑人乘坐白人驾驶的出租车的法律。黑人喜欢乘坐白人司机驾驶的出租车。我们都喜欢。你难道猜不出原因吗？因为这是我们靠付钱就可以让白人表现得像是我们的仆人的唯一机会。”

韦斯特眼中的种族主义是不带个人色彩的、制度上的种族主义。法院的座位是遵循隔离制度的，前来报道审判的黑人记者如果想和白人记者一起坐在媒体区就会遭到指责，以至于他们最终只能坐到黑人坐席区域里。韦斯特还推断说，实施私刑的暴徒们对于就杀死一名黑人而接受审判所感受到的恐惧肯定不如杀死一名白人的恐惧那么严重。

韦斯特的愤怒有一个更直接的针对目标。辩方律师说他希望有更多像威利·厄尔一样的人死掉，他还补充道：“法律规定禁止杀狗，但是如果在我居住的区域有一条不受控制的疯狗，我宁可被控告也

会杀了这只狗。”^[7]韦斯特忍无可忍地评价说：“在任何时候的任何法庭上都没有发生过比在这里发生的更令人恶心的情况。”不过这场诉讼让韦斯特感到愤怒的原因都是从人性角度出发的，而“种族主义”和“偏见”这两个词则根本没有出现在她的文章中。

韦斯特知道被告最终被宣判无罪是不公正的。听到判决时被告们的庆祝不过是“在庆祝获得救赎，而所谓的救赎其实是将他们送到了更危险的境况中”。^[8]韦斯特担心这样的判决会带来更多不法行为，但是让她紧张的似乎主要是黑人会做出什么。她觉得黑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还认为格林维尔的审判预示着在南方发生的私刑的终结，如今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预测错得有多离谱。

症结所在可能是韦斯特对于此类题材没有经验，她坚持要到格林维尔报道的是一个其他一些人，主要是黑人作家已经很好地报道并理解了领域。艾达·B. 威尔斯（Ida B. Wells）是一位一生致力于禁止私刑的黑人记者，她撰写的文章大概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了，但是她的名字依然为人们所熟知。同时期的其他一些黑人作家对于南方的情况也有更深刻的理解，他们甚至还经常在白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就是其中之一。

赫斯顿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伊顿维尔（Eatonville）长大的，那里是这个种族主义盛行的州里的一片黑人飞地。赫斯顿一直是个叛逆的假小子，她很早就离开了学校。二十几岁的时候，她在巡回表演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剧团（Gilbert and Sullivan troupe）里给一位演员做过十八个月的女仆。直到二十六岁时，赫斯顿才获得高中文凭，之后又考上了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1925年，她像许多充满雄心壮志的年轻黑人知识分子一样来到了哈勒姆（Harlem），并很快成了《机遇》（*Opportunity*）和《信使》（*Messenger*）这样的黑人杂志的固定供稿人。^[9]

给赫斯顿带来突破的文章是她在1928年发表的《身为有色人种是什么感觉》（How It Feels to Be Colored Me）。赫斯顿写到自己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离开了伊顿维尔，在那之前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有色人种”，也不觉得身为有色人种有任何悲惨之处。她还不能理解其他黑人因为自己的种族而感受到的哀伤。赫斯顿说那是因为“我在忙着磨利我的开蚝刀”，[\[10\]](#)不过在白人的世界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之后，“当我被推到一个反差鲜明的白色背景前面时，我最能体会到什么是身为有色人种”。在赫斯顿生活的时代及那之后的许多年里，美国的知识分子圈子还是一个白人占绝大多数的群体。黑人和白人的报纸、杂志都是泾渭分明的，即便是在自由的北方也不例外。主要的白人报纸也报道了赫斯顿的作品，她的书籍都受到过《纽约时报》的评论，但是人们对她最先的，也是最主要的定位显然还是一位黑人作家。而黑人作家是不会被《新共和》或《纽约客》约稿的。所以她想要靠做记者写文章来养活自己是不可能的。

鉴于此，赫斯顿选择成为一名人类学家，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at Columbia）获得了博士学位。她在那里追随先锋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后者安排她为自己测量头骨。她的工作在当时被称作人种学研究（ethnography），而且都是由各个基金会赞助支持的。赫斯顿在自己的一生中会出版几本民俗研究著作，其中大部分致力于保护伊顿维尔这样的飞地中的黑人使用的日常口语。此类语言也会出现在她最著名的小说《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中。她还研究了牙买加和海地的伏都教（voodoo，又译巫毒教）传统，并将自己的发现记录在了《告诉我的马》（*Tell My Horse*）一书中。

然而，赫斯顿蒸蒸日上的事业在1948年戛然而止，因为她房东的儿子指控她猥亵。经过几个月的审讯后，男孩儿撤销了指控，但是这个消息已经被刊登在了报纸上。巨大的压力让赫斯顿无心写作。再加

上她感兴趣的黑人生活也不是杂志社和出版社编辑们热衷的题材，她的情况就更加艰难了。赫斯顿在一篇于1950年为《黑人文摘》（*Negro Digest*）创作的名为《白人出版商不肯出版的作品》（*What White Publishers Won't Print*）的文章中写道：“人们对仆人阶层以上的黑人的深刻、全面的内容没有需求这个事实，暗示了这个国家中存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11]

在赫斯顿彻底被人们遗忘前，她还有一个故事要写。1953年，赫斯顿受黑人报纸《匹兹堡信使报》（*Pittsburgh Courier*）的派遣到佛罗里达州的莱夫奥克（Live Oak）报道对鲁比·麦科勒姆（Ruby McCollum）的审判。赫斯顿的传记作者称她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主要是因为她需要挣钱，但是这个案件的案情显然也是吸引赫斯顿的原因。

受审的麦科勒姆是一名黑人，她被指控谋杀了白人男子C. 勒罗伊·亚当斯医生（Dr. C. LeRoy Adams）。麦科勒姆杀了亚当斯这件事确凿无疑，她是在后者的办公室，当着几位病人的面开枪杀死医生的。然后她就转身离开，回到家中等待警察前来逮捕自己。审判的焦点不在于她是否犯下了这个罪行，而在于她为什么这样做。事实证明，医生的行医活动与麦科勒姆的丈夫的“小圆球”生意王国（bolita empire）之间存在关联。（小圆球是一种西班牙的彩票游戏。）

人们还得知，麦科勒姆的四个孩子中有一个是亚当斯的。在审判过程中，麦科勒姆宣称亚当斯曾多次强奸她，但是法官却不允许她详细阐述具体的情形。麦科勒姆在第一次审判中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在第二次审判中，她被许可以精神疾病的理由做无罪辩护，最终她被判定在精神病院接受几年治疗。

赫斯顿只旁听了第一场审判。虽然她在《匹兹堡信使报》的编辑会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加强报道的戏剧性成分，但是赫斯顿的文章本

身是细致入微且保持尊重的。她描述了旁听者们看到的幻象，他们告诉赫斯顿说自己看到麦科勒姆的鬼魂在镇上游荡，那个鬼魂有一个鹰头，“手里还握着一把燃烧的长剑”。^[12]在写到麦科勒姆的故事时，赫斯顿照搬了法院的庭审记录，有时加上一点她本人的注释。当控方宣称麦科勒姆杀死亚当斯的真正原因是不愿支付她的医疗费用时，赫斯顿在自己的文章中复述了这个说法。

简单的复制庭审记录的方式是不可能创造出引人深思的文章的。不过赫斯顿这么做似乎只是在等待时机。审判结束之后，她写了一篇关于麦科勒姆的家庭生活的类似短篇小说的文章。《匹兹堡信使报》分十次连载了这篇文章。文章中的内容无疑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加入了自由发挥。赫斯顿创造了一个关于勇敢、叛逆的麦科勒姆的故事，她最终“主宰了两个强壮的男人的命运，他们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在赫斯顿讲述的故事中，麦科勒姆是一个与作家自己不无相似之处的女人：顽皮，渴望被爱，忍受着不幸婚姻和不忠的丈夫带来的孤独感。这个案件中的某些东西似乎让赫斯顿混淆了事实和虚构的界限。学者指出赫斯顿甚至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曾经在《他们眼望上苍》中出现过的原话。^[13]

这些文章不是赫斯顿最精彩的作品，不过它蕴含了一种生命力。换作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环境，赫斯顿也许本可以就这次审判提交一份完全不同的报道，而那份报道中必将包含后来被称为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的报道形式包含的一切标志性元素：即事实、感情和个人经历的融合。赫斯顿原本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报道格林维尔审判之类的题材，也就是韦斯特非常不成功地报道过的那次审判。相反，赫斯顿甚至没有拿到《匹兹堡信使报》承诺支付她的八百美元报酬。八年后，赫斯顿在1961年时悄无声息地去世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赫斯顿才重新获得重视，主要是在女权主义者黑人作家艾丽

斯·沃克（Alice Walker）的倡导下，赫斯顿的作品又获得了广泛的阅读，不过如今人们主要将她视为一位虚构类作品作家。

[1]. “So. Carolina Man Lynched in Cruel Mob Orgy, ” *Los Angeles Sentinel*, February 20, 1947.

[2]. “Lynch Mob Rips Victim’ s Heart, ”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February 27, 1947.

[3]. “Opera in Greenville, ” in *A Train of Powder*, 88.

[4]. “Opera in Greenville, ” in *A Train of Powder*, 82.

[5]. 吉姆·克罗法（Jim Crow laws）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

[6]. “Opera in Greenville, ” in *A Train of Powder*, 109.

[7]. “Opera in Greenville, ” in *A Train of Powder*, 99.

[8]. “Opera in Greenville, ” in *A Train of Powder*, 112.

[9]. 赫斯顿人生经历的细节出自Valerie Boyd, *Wrapped in Rainbows: The Life of Zora Neale Hurston* (Simon and Schuster, 2004) 。

[10]. *Pittsburgh Courier*, May 12, 1938.

[11]. “What White Publishers Won’ t Print, ” *Negro Digest*, April 1950.

[12]. “Ruby McCollum Fights for Life, ” *Pittsburgh Courier*, November 22, 1952.

[13]. 参见Virginia Lynn Moylan, *Zora Neale Hurston’ s Final Decad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2) 。

第四章 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变成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让公众注意到她的是一份近五百页的关于极权政治的政治理论论文，她在这篇论文中使用了传达伟大观点时往往必须使用的繁复的语句。因此人们可能很容易忘记阿伦特也曾经是一位充满梦想的年轻女性，她的思考生涯也是从书写大量诗歌开始的，以及她也曾俗气地写过自己

“被对现实的恐惧战胜了，这种毫无意义、毫无根据、毫无内容的恐惧，用它无神的凝视将一切化为乌有，这种恐惧是疯狂，是无趣，是痛苦，是湮灭”。[\[1\]](#)

不过这正是汉娜·阿伦特在1925年春天从大学返回家中后给自己的教授，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写的书信中的内容。当时他们已经发生了关系，后来的事证明，这场热烈的婚外情对双方来说都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当阿伦特用“保护性的第三人称”[\[2\]](#)撰写这份自传性的文件时，这场婚外情才刚维持不到一年。她给这份文件取名为“阴影（Die Schatten）”，以此来直白地表现抑郁的情绪。当时才二十出头的汉娜·阿伦特真的非常担心自己会一辈子碌碌无为：

她很可能会在无意义的实验和无理由或无依据的好奇心中继续自己的人生，直到长久渴盼的终结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候，强行终止她毫无用处的活动。[\[3\]](#)

人生的毫无益处和终结的突如其来是阿伦特的人生中经常出现的话题——就像韦斯特和帕克也经常提到它们一样。阿伦特出生在普鲁士城市柯尼希堡（Königsberg）的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她的母亲是一个意志坚强、很有钢琴天赋的家庭主妇，她的父亲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位研究希腊和罗马的业余学者，一天到晚埋首于书堆。

阿伦特和父亲共处的时间并不长。年轻的保罗·阿伦特（Paul Arendt）在结婚之前就染上了梅毒。到他女儿年满三岁时，保罗的病情迅速恶化了。他发病的细节非常可怕：有时一家人正在公园里散步，他会突然瘫倒在地，这正是伴随晚期梅毒出现的运动失调的表现。到阿伦特五岁时，保罗不得不入住疗养机构，他在那里待了大约两年，于1913年去世。临终前，他已经病得连前来探望自己的女儿都不认得了。父亲去世后，阿伦特很少提起他。阿伦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写到阿伦特曾对自己的朋友说她关于父亲的疾病的记忆仅限于母亲弹奏钢琴的声音，因为音乐能够在深夜安抚抱恙的父亲。

阿伦特的母亲不得不继续生活下去。她在阿伦特十几岁的时候改嫁给一位受人尊敬的商人。从物质层面来说，一位犹太裔寡妇带着自己的女儿在一战后的德国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就相当不错了。这个国家当时正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包括严重的通货膨胀、艺术实验和希特勒逐渐掌权。不过当时的家庭生活并不艰难。阿伦特总是坚称她的母亲保护她不受她遭遇的反犹主义的伤害。如果有人教室里发表任何反犹主义言论，年轻的阿伦特回家后会告诉母亲。玛莎·阿伦特（Martha Arendt）就会给教师写批评信，然后此类现象就会停止。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如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写到的那样，阿伦特从来不认为反犹主义是“永恒的”。

不管她在《阴影》中向海德格尔表述了什么，在其他人眼中，年轻的阿伦特已经充满了冷酷的自信。她在学校的时候连老师都说不过她，因为她在家能自学的并不比老师能教给她的少，而且她很喜欢让老师也知道这一点。有一次，一位老师的评价让阿伦特感到受辱，没有人记得这位老师说了什么，但是阿伦特为此组织了一场联合抵制这位老师的活动。她因此被学校开除，最终主要是依靠自学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

在青春期末段，阿伦特开始对哲学感兴趣，尤其对爱深思的丹麦存在主义者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的作品偏爱有加。克尔凯郭尔是最先提出焦虑的概念的人之一，那是一种人与自身及人与世界之间的严重失衡的感觉。阿伦特肯定对此深有体会。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她写出了许多诗篇，这些诗歌并不精彩，但却可以证明这个后来被指责太冷酷、太遵循逻辑的人的内心深处也充满了浪漫情怀，那些人只是没有仔细读懂她而已：

啊，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懂，我懂。

所以让我享受自由自在的日子吧。

你不会找不到我，因为我给你留下了一个标记，

这页文字和这团火焰。[\[4\]](#)

在听到一位前男友说马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的海德格尔教授的演讲很精彩之后，阿伦特也选择了马尔堡大学，还很快报名了海德格尔的课程。当时是1924年，她十八岁，海德格尔三十五岁，已婚，还有两个儿子。

要用简单几句话概括海德格尔复杂的哲学观点很难，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方法的特点是摆脱之前的思想家们对于冷硬的逻辑的忠诚。如丹尼尔·梅尔-凯廷（Daniel Maier-Katkin）曾经写到的那样，海德

格尔认为“人类的经验和理解都与诗歌中固有的关于感情和情绪的领域有紧密联系（这个观点对于阿伦特有很强的吸引力）”。^[5]海德格尔还将这个态度融入自己的教学方法中。所有人都说他的演讲就像表演，他的独白并不仅仅是要直接传递信息。关于校园中流传的说法，阿伦特后来写道：

关于海德格尔的传闻说得很明白：思考重新获得了生命；过去的文化宝藏一度被认为已经作古，如今却再度发声，在此过程中，它们提出了与人们认为它们要说的那些熟悉的、陈旧的、意义不大的琐事完全不同的内容。那里就有这么一位老师；你也许可以学会思考。^[6]

在阿伦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学习思考之后，1925年2月某一天下课后，海德格尔走近阿伦特，问她在读什么书。阿伦特回答了问题。她给的答案肯定特别有魅力，以至于海德格尔立即给她写了一封情书：“你永远不会成为我的人，但从现在起你会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将因你而变得更加丰富。”^[7]这段婚外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阿伦特和海德格尔总是用抽象的论述谈论两人之间的婚外情，那些书信不愧是两个毕生都在交换观点理念的人写出来的。他们描写对彼此的爱意的方式不仅让这件事更具戏剧性，还充满了高度的思想性。与韦斯特和威尔斯之间交换的情书不同，他们的通信里没有幼稚的对话，也没有昵称。唯一留存下来的通信记录都是海德格尔发出的那些，他会写这样一些内容：

我受到了恶魔的侵扰。它隐藏在你充满爱意的双手和闪亮的眉毛的无声祈祷中，那是一种充满女性魅力的伪装。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8]

不管有什么充满女性魅力的伪装，恶魔依然是飘忽善变的。这段婚外情开始仅三个月之后，海德格尔就退缩了。他在信中的口气突然变得疏远。他以工作繁重为借口，还就他可以将注意力转回现实生活

以后的未来作出了许多夸大的承诺。简而言之，他表现得与任何意识到和一个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女人纠缠不清是个错误，尽管心怀愧疚，但仍不愿彻底断绝今后继续与其发生关系的可能的男人没什么两样。

公平地讲，海德格尔也不算完全在说谎。他的妻子在他们的乡村地产上为他搭建了一间小棚屋，海德格尔当时正在那里创作将给他带来重大突破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不过从他打发阿伦特的时候算起，这本作品还要再过两年才能完成，何况他还计划在当年秋天继续授课。总而言之，那一年的夏天，阿伦特又变成孤身一人了。

1925年秋天，当这对师生都回到马尔堡大学之后，海德格尔继续躲避着阿伦特。到1926年春天，他干脆开始放阿伦特鸽子了。沮丧的阿伦特从此开始对海德格尔死心，只不过这个过程几乎要持续一生。她离开了马尔堡，转拜到另一名哲学家门下，这个人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她和海德格尔还保持着联系，但大多数时候只能给他写一些充满哀伤之情的书信。他们还可以在小镇的火车站上短暂约会，其持续的时间都不能超过火车停靠的时间。

尽管这样的见面显然是短暂且无法令人满足的，这场婚外情仍会成为他们各自生命中的标志性事件。海德格尔对于阿伦特的影响显然塑造了她的性格，而且这种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不过阿伦特从海德格尔这里获得的东西对她来说更像是某种启发，而不是什么必须遵循的指令，至于她的作品的主题和范围更是由她自己选择的。海德格尔专攻哲学，阿伦特则转向了政治理论。海德格尔留在德国，阿伦特离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人终于重逢时，阿伦特已经凭借自己的能力即将成为一位举世闻名的思想家，而那些为她树立了声望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德国在二战中的行为的理念都是在没有海德格尔的评论或控制的情况下研究出来的。

他们两个人在德国的经历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可谓是天壤之别。海德格尔在结束了与阿伦特的婚外情之后不久就加入了纳粹党。后来关于海德格尔对于入党的事究竟有几分真心的争论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于纳粹党运动是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的。纳粹党宣扬的对于整个世界的浪漫主义幻想灾难性地与海德格尔本人的一致，那就是所有种族都陷入了长期的、严重的争斗，在这场争斗中，正义属于“德意志民族（Volk）”。

海德格尔并不只是悄无声息地接受纳粹党人，他甚至积极地与他们一起活动。他几乎是刚一加入纳粹党就开始领导清除大学中的犹太人的活动，就连取消他自己的导师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教授资格的文件都是由他签署的。（关于这一举动，阿伦特称海德格尔是一个“潜在的杀人犯”。[\[9\]](#)）这件事让海德格尔成了被纳粹称为“一体化（Gleichschaltung）”的过程中的突出人物。这个德语词有时可以被翻译成英文“collaboration（协调、合作）”，大多数德国人，无论他们是公民组织中的成员还是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接受了纳粹主义的那些要务的。

后来在抽象地谈论到“一体化”问题时，阿伦特直白地说道：“这个问题，这个针对个人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敌人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的朋友做了什么。”[\[10\]](#)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有多深是直到她去世之后才为公众所知的，不过她肯定一直都在想着他。在海德堡大学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期间，阿伦特写了一篇题为《爱与圣奥古斯丁》（*Love and Saint Augustine*）的博士论文。这也许可以被视为她对自己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感到沮丧的另一个标志，她在这里关注的问题已经从男女之爱转为了邻里之爱。阿伦特是在1929年初完成这篇内容充实且具有挑战性的论文的。此时距离华尔街股市崩盘，从而引发大萧条，并导致为保证德国遵循《凡尔赛条约》

（Treaty of Versailles）而设立的贷款供应出现不稳定等事件发生

仅剩几个月。后来希特勒正是利用经济灾难带来的破坏为自己赚取了支持度，不过在阿伦特获得博士学位时，希特勒尚未真正羽翼丰满。

阿伦特当时生活在柏林，同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还有很多年轻的研究生，他们都在试图想明白，在这个因为被大多数人视为侮辱的《凡尔赛条约》而动摇不定的国家中，自己能做些什么。与魏玛时期的其他人一样，阿伦特也参加了很多与当时阴郁的大环境并不相符的光鲜亮丽的聚会。一个影响她命运的聚会是在柏林人种学博物馆（Museum of Ethnology in Berlin）举办的。这个聚会是一次左派人士以筹募资金为目的而举办的化装舞会。阿伦特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阿拉伯闺中少女”。^[11]人们可能很想知道这样的装扮在1929年时是什么样子，反正她的造型显然很成功。阿伦特在舞会上遇到了一个很久没见的同学冈瑟·斯特恩（Gunther Stern），他们自此又重新联系上了。

后来斯特恩在自传中提到自己当时试图吸引阿伦特的方式是对她说“爱是一种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某些本来是后验的事物——比如偶然遇到的一个人——就被转化成了一个人生活中的先验”。^[12]对于其他女人来说，这样的话似乎是在炫耀。但是对于阿伦特来说，这是证明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不仅局限于感情上，还存在于思想中的明显证据。阿伦特于当年9月嫁给了斯特恩。然而她通知海德格尔自己结婚消息的书信依然透露出一种挫败感。她向海德格尔重申自己想要安顿下来，想要获得家庭的温馨，即便这个家庭不是完美的：

不要忘记我多么清楚、多么深刻地知道我们的感情已经成了我人生中最大的幸事。这个想法不会被动摇，直到今天也不会。^[13]

在阿伦特写这封信的时候，海德格尔还没有公开自己倾向于纳粹党的态度。

婚姻带来的安逸生活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它让阿伦特有机会更加专注于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这次她要写一本不完全算是以她的内心生活为研究对象的书，但是它依然可以被视为阿伦特写过的最接近自传的作品。她的朋友从一位珍本书商手中发现了十八世纪犹太裔沙龙女主人（salonnière）的书信和日记，然后把它们都交给了阿伦特。这个名叫拉埃尔·瓦恩哈根（Rahele Varnhagen）的女人的生活很快就让阿伦特入迷了。于是她开始着手写一本传记，这本书最终会成为一本一半在陈述个人哲学理念，一半在褒扬这位被她视为榜样的女性的作品。从这一点来说，阿伦特几乎算得上同时期女性思想家中的一个特例了，因为其他大多数人没有胆量明确承认自己感激其他女性。

瓦恩哈根1771年出生在柏林，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的女儿。尽管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瓦恩哈根从年纪很小时就开始对人们的想法感兴趣。成年后，她身边围绕的都是同时期的伟大艺术家和思想家，他们通常都是德国的浪漫主义者。瓦恩哈根的沙龙让她成了德国智识史中的一位关键人物。阿伦特对她如此热衷的部分原因在于瓦恩哈根和阿伦特一样是犹太裔，受同化程度也很深。不过瓦恩哈根对于身为犹太人这件事的看法有些矛盾。鉴于此，阿伦特认为由瓦恩哈根的丈夫记录下来，据说是她的临终遗言的这段话令人难忘：

身为一名犹太裔女人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生中最大的耻辱，也是我一生苦难和不幸的根源——但现在，我不再渴望自己不曾拥有这些经历。[\[14\]](#)

阿伦特深受这句话的影响，所以她用这句话作为她作品的开头。这本书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一种通灵的特质。阿伦特直接称瓦恩哈根为自己“最好的朋友”。这本书是在完成大约二十五年后的1958年才终于被出版的。阿伦特写到她在创作本书时选择了“一种传记文学中少有的角度”。实际上，阿伦特在描述自己的目标时几乎有种玄学的意味：

我的目的从来不是写一本关于拉埃尔的书；至于她的个性，根据作者从外面引入的各种心理学标准和分类理论，也可以得出各种各样的分析结果……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只是用拉埃尔可能采用的方式来讲述她的一生。

[\[15\]](#)

研究阿伦特的学者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曾经宣称，阿伦特说自己在“用拉埃尔可能采用的方式”讲述她的故事这一点“令人震惊”。[\[16\]](#)你可以花一生的时间去研究另一个人的档案，但可能依然无法彻底理解那个人的内心世界。阿伦特肯定也明白这一点，甚至是在尝试从拉埃尔的角度写拉埃尔的人生时体验过这样的经历。一方面来说，想要真正代表一个已经去世一个世纪或更久的人发声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是另一方面来说，阿伦特从情感上感受到的瓦恩哈根的生活对她的吸引力已经超越了所有理性因素。她发现了一位自己想要给她当学徒的女主人，写这样一本书就是阿伦特实现自己愿望的方式。

阿伦特认为瓦恩哈根最让自己感兴趣的一点在于她找到了让与众不同变成对自己有益的东西的途径。阿伦特尤其把这一点与她的犹太人身份联系在一起。瓦恩哈根的丈夫试图通过获得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来超越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是这个方法对于瓦恩哈根来说，从来都没有效果。她认为自己无法抹去这个标志，于是她选择接受现实。阿伦特的结论是，如果说身为犹太人让瓦恩哈根与德国社会格格不入，那么它正好给了瓦恩哈根一种独具个性的视角，这种视角最终被证明是有其价值的。能够对事物有不同看法不仅仅是选择不同视角的问题，有时候，那还意味着对事物有更透彻的理解。

阿伦特告诉我们，瓦恩哈根因此成了某种“贱民（pariah）”。但她使用这个词时并不含有我们如今使用它时包含的那种贬义。阿伦特在后来的著作中又在这个名词前面增添了一个形容词，变成了“有意识的贱民（conscious pariah）”。一个有意识的贱民知道自己与

别人不同，也知道至少在别人眼中，自己永远不能彻底摆脱这种不同。但是“有意识的贱民”还知道这种独特性让自己获得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某种接近本能的共情能力，即一种因为有切身经历，所以能够敏感地体会到他人难处的能力：

这种敏感是对于每个人的尊严的一种病态的夸大，是一种特权阶层从不能感受的激情。就是这种强烈的共情能力造就了贱民的慈悲心。在一个建立于特权、因出身获得的骄傲和由头衔赋予的自大之上的社会中，在理智将人的尊严当作道德的基础很久之前，贱民已经凭直觉发现了广泛的人的尊严。[\[17\]](#)

尽管阿伦特通常只在描述犹太人的与众不同时才使用“贱民”这个名词，但她暗示自己知道这个模型还可以被应用到更广阔的范围中。阿伦特会选择一位女性作为贱民的代表这一点似乎并不是碰巧而已，尽管阿伦特否认了这个代表是男是女有任何重大的区别。她可能会说瓦恩哈根的犹太人身份是比她的女性身份更能引起共鸣的要点，但阿伦特在瓦恩哈根身上发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类比来延伸，而且阿伦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知道这一点。当她终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了这本关于瓦恩哈根的生活的作品时，阿伦特在引言中这样写道：

当代的读者们肯定立刻就能发现：拉埃尔既不漂亮也没什么魅力；和她产生过任何意义上的恋爱关系的男人都比她年轻；她不具备任何能够让她施展自己惊人智慧和激情创意的才能；还有最后一点，她拥有典型的“浪漫主义”性格，这是一个“女性问题”，即男性“总体上”对女性的期盼与女性本身可以提供或想要获得的一切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个问题已经因为这个时代的状况而形成了，它表现为一个根本无法被填平的鸿沟。[\[18\]](#)

从汉娜·阿伦特与女权主义关系的历史来看，这算得上一段非常令人惊奇的表述了。阿伦特对于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者的豪言壮语都没什么兴趣。她在工作中接触的几乎都是男性。她从来不怎么担心自

己能否融入几乎全是男性的知识分子圈子。她也不觉得父权制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在人生晚期，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女性解放的时候，她说“女性问题”对她来说从来不是什么问题。她还告诉采访者说：

我一直觉得有些职业由女性承担是不成体统的，那不适合她们，由女人下命令就是不怎么好看。一个女人如果想保持女性化，就应当尽量避免陷入那样的处境。我并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这个问题本身对于我个人来说无关紧要。最明白的说法就是，我一直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19\]](#)

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回答让如今的人们没法将当时的阿伦特认定成为一名为女性事业默默斗争的改革者，人们甚至很难确定她本人是否支持两性平等。

尽管如此，她还是认为一个人应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她没有创作关于诸如克尔凯郭尔之类的人物的传记作为自己广为人知的事业的开端，反而选择了一位让自己着迷的女性为主题。这位女性“既不漂亮也没什么魅力”，却拥有“惊人智慧和激情创意”。她的局外人身份不仅不是一个需要被克服的困难，反而成了可以被挖掘的力量源泉。如一些学者推测的那样，阿伦特没有感受到任何形式的对女性的歧视的原因可能是，在她生活的时代里，她的犹太人身份是一个比性别明确得多的目标。与纳粹分子针对犹太人进行的迫害相比，人们对于女性的敌意被大大地淡化了。

1933年，当位于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被付之一炬时，阿伦特还在忙着创作这本关于瓦恩哈根的作品。起火的原因是有人纵火，人们对真凶的身份存在争议，但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并被当作最有可能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而立即接受了审判，德国的左派也因为纵火案造成的混乱而备受指责。希特勒在纵火案发生大约一个月前刚刚宣誓就任总理一职。这场动乱让他有借口获得紧急权

力。阿伦特的丈夫冈瑟·斯特恩与反纳粹主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他立即离开德国到巴黎去了，阿伦特则留了下来。

她并不是感受不到政权更迭带来的危险，实际上，她说这场大火是一种“直接的冲击”，[\[20\]](#)并且让她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做一个“旁观者”了。不过早在纵火案发生之前，她肯定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曾经的朋友和同事们正渐渐屈服于纳粹的影响力这个事实。在前一年秋天，阿伦特就听到了一些传闻，于是她给海德格尔写信询问对方新的政治立场。阿伦特具体的关切包括海德格尔已经成了反犹主义者的传闻，以及她从丈夫和朋友那里收集到的各种消息。海德格尔回信的口气起码可以说是非常不耐烦和愤怒的。他在信中列出了自己最近帮助过的犹太人学生的名单，还补充说：

谁想把这叫作“激烈的反犹主义”就去叫好了。除此之外，我在大学事务上的反犹程度与十年前我在马尔堡时别无两样……更不用说我还与很多犹太人保持私人关系的事了。

最重要的是，这绝对不会影响我与你的关系。[\[21\]](#)

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受影响了。这封信成了此后十多年里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联系。

国会纵火案几个月之后，阿伦特同意帮忙偷偷搜集收藏了瓦恩哈根的文件的那间图书馆里存在的含有反犹主义声明的小册子。这些内容是要送给在国外组织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朋友们加以利用的。不过阿伦特才干了没几天就被发现，并被举报给了当局。她和母亲双双遭到了逮捕，并在拘留室里待了几天。逮捕她的警官挺喜欢她，甚至还对她进行了言语挑逗：“我该拿你怎么办呢？”[\[22\]](#)最终，他还是把阿伦特放了，这可以算是非常幸运了。在接受审讯时，她干脆选择了撒谎，没说自己是在为谁工作。

不过出了这件事之后，阿伦特也明白自己显然不能留在德国了。起初，她和母亲一起去了布拉格，玛莎·阿伦特从那里回到了柯尼希堡，阿伦特则去了巴黎。她随身携带着瓦恩哈根那本书的手稿。不过一抹阴云一直笼罩着她，她对于纳粹带来的灾难之深重已经了然于心。她在柏林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与纳粹政权同流合污。海德格尔已经当上了大学校长，不仅把纳粹党徽别在胸前，甚至短暂地尝试过求见希特勒。这些事阿伦特都知道。

就这样，阿伦特把思考变成了个人的事。“我再也不想参与任何种类的知识事业了。”^[23]如今我们都知道，她打算让自己与知性主义疏远的计划最终没有成功。不过这种背叛留下的印记是永恒的。阿伦特从那之后不再将传统的思想生活当作一种救赎。因为即便是伟大的思想家也会受到糟糕判断的影响，他们抛弃常理和常识的速度都很快。

阿伦特在去世前几年曾告诉一位采访者说：“我至今依然认为就所有事提出观点是身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质。”她当时谈到了她觉得这是一件坏事：“今天我会说他们都被自己的观点束缚住了。就是这么回事。”像海德格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加入纳粹党时并不是在主动作出什么战略性的选择。他们也不只是为了生存下去才加入的。对于他们来说，与一个自己不能热诚地坚信的事业结盟是让他们极为厌恶的事，所以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化的理由，还会让自己不断贴近纳粹党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本身就都成了纳粹分子。

阿伦特在1933年抵达巴黎之后，不仅与自己的祖国断绝了关系，还将她的哲学事业抛在了一边。在法国暂居的八年里，阿伦特几乎没有发表过一个字，只是在朋友们的督促下才完成了那本关于瓦恩哈根的作品。不再进行学术研究的阿伦特选择工作，她成了多个旨在帮助越来越多聚集到巴黎的犹太移民的福利项目中的行政人员。这种相对

更具官僚性质的程序性办公室工作让她觉得很放松，能够完成，也不太可能像她之前的“思想生活”那样让她感到失望。

阿伦特在巴黎时曾与冈瑟·斯特恩短暂地团聚过一段时间，不过后者一直忙于创作一部无比复杂（最终也没能出版）的小说，二人的婚姻很快就破裂了。1936年时，阿伦特认识了另一个男人，这个名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Heinrich Blücher）的德国共产党党员擅长社交，他与共产党运动的牵连很深，以至于他在巴黎生活的时候必须使用一个假名。

人们往往忍不住对布吕歇尔表现出来的令人震惊的男性气概进行浪漫化的描绘，阿伦特的很多传记作者都抵挡不了这个诱惑。布吕歇尔比斯特恩和海德格尔身材更高大。他说话的声音也很洪亮，还很爱笑，再加上他常年投身政治，所以是一个阅历丰富、老练世故的人。不过他在知识层面上也足以与阿伦特一较高下，这正是阿伦特要求自己的伴侣拥有的素质。无论是在书信里，还是在餐桌上的闲聊中，布吕歇尔都可以就哲学和历史问题详细表述有说服力的观点。有一封他写给阿伦特的书信令人过目难忘，在书信的开头，他先就阿伦特母亲去世发表评论并表示慰问，接下来的内容就升级为全面批判哲学家对抽象真理的忠诚：

马克思只是想将存在的天堂传遍整个世界，那些不如他著名的思想家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都处于因血腥阴云和烟雾窒息而死的边缘……克尔凯郭尔使用散落的砖块给自己堆砌了一个狭窄的洞穴，并把他的道德自我和一个本性凶暴的上帝一起关在里面。对此人们只能说：好吧，祝你好运，以及非常感谢。[\[24\]](#)

如布吕歇尔自信傲慢的文风显示的那样，他不是海德格尔或斯特恩那样的学究。他读过很多书，完全是自学成才。尽管他也有文学方面的抱负，但是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著作。他一生都在抱怨自己遭遇了作家的瓶颈期，不过写信显然是不受任何影响的。他过的是一种被

过着学术的知性生活的文人雅士们排斥的生活，这一点似乎对阿伦特很有吸引力。认识布吕歇尔十年之后，阿伦特在一封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多亏了丈夫（二人于1940年结婚，部分原因是这样布吕歇尔才能获得离开欧洲的批准文件），自己才能够“用政治的视角看待问题，用历史的方法思考问题”。阿伦特还喜欢布吕歇尔能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生活和工作，而海德格尔对于这个世界肯定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一位名叫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的诗人朋友称阿伦特和布吕歇尔为“二元君主”。^[25]虽然他们二人有时会很高傲，但这个说法的本意不是为了强调他们的高傲，而是要指出布吕歇尔和阿伦特都可以从他们之间的讨论中获得可观的力量的这个事实。他们谁也不是谁的主宰，虽然在美国的那些年里，阿伦特通常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他们的婚姻是在一种自然平等的关系下运行的，就算布吕歇尔偶有不忠，这种平衡总体上并没有受到破坏。

在巴黎与其他作家和思想家相处的时光被证明是对阿伦特有益的。她后来发现与他人一起工作更容易思考。阿伦特与另一位德国难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成了朋友，后者当时还是一位不太成功的评论家，很难让自己的作品获得发表。编辑与他意见相左时，他总是不肯遵照他们的要求妥协。本雅明是一个古典浪漫主义者，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在他家里，公开表达任何职业追求都会被视作庸俗。虽然本雅明的父亲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向他提供任何资助，他还是坚持投身了这项肯定会让他陷入贫困的事业。回想本雅明要成为文人（*homme de lettres*）的选择时，阿伦特这样说道：

德国人还不知道文人的存在，几乎同样不为人知的还有本雅明为了挣钱糊口而不得不用这个身份进行的工作：不是文学史专家或学者撰写必要的长篇宏论的工作，而是撰写批评文和散文的工作。他认为这种文体的形

式过于通俗泛泛，如果不是因为要按字数获得报酬，他肯定宁愿去写格言警句。[\[26\]](#)

本雅明也是坚持要阿伦特完成瓦恩哈根的手稿的朋友之一。1939年他给自己和阿伦特共同的朋友格肖姆·索罗姆（Gershom Scholem）写信推荐这份手稿时说：“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充满了针对时下的有教化和辩护意味的犹太研究的强有力的冲击。”[\[27\]](#)阿伦特也非常乐意帮助本雅明完成他的工作。她在给索罗姆的信中写道：“我很担心本雅明。我尝试在这里帮他获得一些机会，不过彻底失败了。但我比以往更加确信，帮助他获得稳定的收入，好让他有机会继续创作是非常重要的。”[\[28\]](#)

本雅明一直比阿伦特更趋近于一位神秘主义者。他与现实世界的联系非常脆弱。不过阿伦特后来写道，自己在本雅明的高傲中发现了一种值得延续下去的政治原则。她认为他的文人生活方式与自己已经开始鄙视的“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之间是有区别的：

知识分子阶层要么以专家、专业人士和官员的身份为政府提供服务，要么为社会提供消遣或教导；而文人则总是在努力地疏远政府和社会。[\[29\]](#)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的欧洲，政府还是一种人们想要与之保持距离的东西。法国的反犹宣传也上升到了极端狂热的程度，整个国家受到来自东边的纳粹分子的施压，已经开始分崩离析。1939年底，布吕歇尔被送到了法国南部的一个拘留营里，好几个月之后才在一位有权势的朋友的帮助下获得释放。1940年，阿伦特本人也被送到了位于法国与西班牙边界附近的古尔斯（Gurs）的拘留营里。阿伦特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直到法国向德国投降，像古尔斯这样的拘留营都被解散为止。最终夫妻二人得以重聚，并获得了前往美国的签证。他们是1941年5月抵达纽约的。

与此同时，瓦尔特·本雅明也看到了灾祸将至的征兆，1940年秋，他筹划了前往里斯本，再从那里乘船前往美国的行程。不过本雅明必须穿越西班牙前往里斯本。当他和其他一小群原本生活在马赛难民一起抵达西班牙边界时，他们被告知就从当天开始，边界对他们这样的“无国籍人士（sans nationalité）”关闭了，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都要被送到集中营去。到了晚上，本雅明使用过量吗啡自杀了。在失去意识之前，他给了自己的同伴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他看不到自己还有任何出路。

阿伦特是最先听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朋友之一，那证明了后来她在一篇长长的悼念散文中所称的他的“坏运气”的一切：

早一天，本雅明就可以顺利地通过边界；晚一天，马赛的人就能知道穿过西班牙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唯独就在那一天，灾难才有可能发生。[\[30\]](#)

这是对本雅明的命运的理智的惋惜，是她对这场悲剧的看的陈述，她的态度似乎显示了某种感情上的疏离。不过阿伦特对于发生在本雅明身上的一切绝不是无动于衷的。在她离开法国的途中，阿伦特还特意在事发地点停留，试图寻找朋友的坟墓，结果她只找到了一片公墓。在给索罗姆的书信中她描述道：

（公墓）面朝一个小小的海湾，可以直接俯瞰地中海；坟墓是被凿刻在一层层石阶上的；棺材也都被推进了这些石墙中。这是我一生见过的最奇异、最美丽的地点之一。[\[31\]](#)

就在本雅明离开马赛前，他把自己的手稿全集留给了阿伦特和布吕歇尔，如果自己到不了纽约，他希望阿伦特可以将这些手稿转交给他在那里的朋友们。手稿中有一篇是本雅明的《论历史的哲学》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阿伦特和布吕歇尔在前

往美国的船上曾互相朗读其中的内容。“深思让我们看到，我们对幸福的概念会受个人存在的这段时间的彻底影响。”本雅明继续写道：

会引发嫉妒的幸福仅存在于我们呼吸过的空气中，存在于我们曾与之谈话的人们之间，存在于将自己献给我们的女性中。换句话说，我们对幸福的概念与对救赎的概念是牢不可破地关联在一起的。^[32]

然而到他们登船前往美国时，在欧洲大陆上激烈上演的战争几乎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救赎的机会。曾经塑造了他们的大部分事物，包括他们知道的那个德国就那么消失了。

在纽约的生活一度很艰难。阿伦特和丈夫，后来还加上阿伦特的母亲一起住在一栋破烂不堪的多租户房屋里，他们租了几个房间，但是要和其他租户共用一个公共厨房。布吕歇尔找过各种奇怪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他从没做过的某种工厂工人的活计。阿伦特先是到马萨诸塞州的一家收容所学习英文，然后就开始依靠写文章赚钱。她主要是给一份规模很小的名为《重建》（*Aufbau*）的德语报纸及其他以流亡犹太人为受众的期刊供稿。阿伦特把本雅明的论文寄给了当时也在纽约的本雅明的朋友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不过并没有立即得到什么回应，似乎没有人计划出版这些作品。

阿伦特在这段时间里写的文章介乎于学术论文和现代报纸社论之间。其中大多数暴露了一定程度的文笔枯燥和一味地重复相同主题的问题。按照顺序阅读这些文章时，你会开始感觉像在接受什么慷慨激昂的动员，而非真的获得某种内心的触动。不过阿伦特在1943年为《灯台报》（*Menorah Journal*）撰写的《身为难民》（*We Refugees*）绝对是一篇突出的作品。文章本身就是用英文写的，这可以解释其文法简单的特点，因为此时距离阿伦特开始学习英文刚刚过去两年。

因为是在使用自己的第二门外语而难免流露出的那种干巴巴的语调刚好符合她哀悼和争辩的主旨：“首先，我们不喜欢被称为‘难民’。”^[33]阿伦特描述了这个因为在欧洲的遭遇而受到巨大打击，但是只能把那些事全都埋藏在心底的群体。阿伦特写道，这样的氛围让难民们整天魂不守舍，他们不能向别人倾吐自己的困扰，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地狱”：

显然没有人想知道当代历史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人类——他们被敌人关到集中营里，被朋友关到拘留营里。

阿伦特从来不惧怕涉及令人不快的主题，她还批判了在难民中发生率很高的自杀现象，不过她批判的对象并不是那些选择自杀的难民，而是他们自杀的形式。阿伦特写道：“他们的消失是一种悄无声息、不引人注意的消失。好像他们是在为自己选择这样极端的解决自己问题的方式而感到抱歉。”^[34]阿伦特认为这样做的理由不充分是因为自杀的逻辑不仅是纳粹制造的政治灾难造成的，甚至也是美国的反犹主义提供的：“在巴黎，我们每天晚上八点以后不得离开住处的原因是我们是犹太人，而在洛杉矶，我们处处受限的原因是我们是‘敌国侨民’。”

阿伦特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七岁，这篇文章是显示她拥有争论到底的天赋的第一个标志。她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说服自己，为公众写作是有用处的。她的文章着力于号召犹太人成为“有意识的贱民”——拉埃尔·瓦恩哈根被重新提起，海涅（Heine）、肖洛姆·阿莱赫姆（Sholem Aleichem）、贝尔纳·拉扎尔（Bernard Lazare），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甚至是查理·卓别林”等人的例子也都被阿伦特用在了后来的文章中——因为这是脱离他们所处的令人麻木、逼人自杀，还要装作没事的处境的唯一办法。

少有的那些坚持讲出实情，甚至不惜讲述被视为“卑劣”的经历的难民用让自己不受欢迎的代价换来了一个宝贵的进步：历史对他们而言将不再是一本合上的书，政治也不再是非犹太人的特权。

类似这样的文章让阿伦特受到了纽约更广泛的左翼出版圈子的注意。对于她之后的活动具有最重要影响的是一小拨以《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杂志为中心的年岁未老，思想却有些陈旧过时的前共产党员和文学批评家们。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份杂志没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不过对于一小部分有权有势且大都生活或出生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人来说，《党派评论》成了令人向往、充满魅力的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部象征。这份杂志是在一份旧杂志的基础上改版而来的，原本的杂志与共产党员约翰·里德俱乐部（Communist John Reed clubs）有关系。改版后的杂志掌舵人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和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在改版之前就是这里的编辑，不过他们连杂志的政治立场也一起改掉了。

美国的共产党在那些年里正在渐渐分出派别。一派认为只有不计一切代价忠于苏联，才能取得共产主义社会实验的成功。另一派则持怀疑态度，他们尤其怀疑斯大林和对他的个人崇拜。拉夫和菲利普斯都属于后一个阵营。他们并没有抛弃自己的左派原则，他们只是不愿意追随教条的政党路线。你可以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有意识的贱民”。鉴于阿伦特关注的正是分析法西斯主义及其根源，她立刻就融入了这个集体。

不过随着《党派评论》的不断发展，它逐渐成了一份更关注艺术和文学，而非政治问题的杂志。阿伦特为该杂志提供的第一篇稿件发表于1944年秋，文章内容是关于卡夫卡的。阿伦特并不是唯一给《党派评论》供稿的女性，短篇小说作家珍·斯塔福德（Jean

Stafford)、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也在这里发表文章,不过只有阿伦特写的是深奥的知识性文章。

她早期的文章中暴露了所有使用非母语写作的人可能遇到的问题,布吕歇尔曾经写信提醒她必须放弃自己的“(昂贵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Stradivarius)”,改用“(普通的)小提琴”。^[35]这一点在她后来为当时最重要的左派杂志之一——《国家》

(*Nation*)创作的文章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国家》的编辑是兰德尔·贾雷尔,他是阿伦特的朋友,还会帮她把文章改得更便于美国读者阅读。贾雷尔对她的影响力几乎是立即就显现出来了:1946年,阿伦特会同时为《国家》和《党派评论》撰写关于存在主义的文章,不过只有那些经贾雷尔编辑过的文章才会拥有吸引人的导语:“一场关于哲学的讲座足以引发一片混乱,因为有成百上千的人涌进来听,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拂袖而去。”^[36]贾雷尔后来会成为阿伦特最经常求助的人,她称贾雷尔作的贡献是让她作品“英文化”。

关于存在主义,阿伦特还在巴黎时了解过一点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她宣称自己对萨特的《恶心》(*La nausée*)和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局外人》(*L' étranger*)印象深刻,但她对这两个人不仅怀有她对其他知识分子都怀有的担忧,更为他们表现出的倾向感到不安:“象征性地说就是,他们整天待在自己的酒店房间或咖啡厅里。”阿伦特还为他们这样麻木地隐蔽在荒谬中的做法感到担心。如果他们不走入外部世界并有所作为,阿伦特担心:

尽管有很多反对意见,但是虚无主义的元素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们并非什么新见解的结果,而是一些非常古老的观点的产物。

此时的阿伦特已经开始创作记录自己的“新见解”的汇编了,最终得出的成果就是《极权主义的起源》。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

一直在《党派评论》和其他多份美国左派报刊上发表分析反犹主义和无国籍人士困境的文章。最早在1945年，阿伦特就说服霍顿·米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的一位编辑认可这些分析文章值得被集中成一本书出版，不过阿伦特后来又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这本书的创作。

要简单地描述这本分为三部分的大部头很难。如阿伦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观察到的那样，书里可没有能够帮助读者理清头绪的温馨介绍。在第一版的前言中，阿伦特开篇就猛烈抨击了过分简单地解读历史的做法：“认为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一定可以为人所理解的信念导致人们总在用陈词滥调解释历史。”^[37]阿伦特还对认为善与恶的关系可以被简单、随意地确定的观点持抗拒态度，虽然她相信极权主义从任何层面来说都是一种恶：

如果说在极权主义的终极阶段会出现一个绝对的恶（说它绝对是因为已经不能用人类可理解的方式推理其动机），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它，我们也许永远不能知道恶真正的激进本质。

这本书具有的广泛的、漫谈性的特质是由其漫长的创作周期而形成的。创作途径不仅包括了阿伦特的经验与研究，还有她与海因里希·布吕歇尔进行的很多直至深夜的畅谈。阿伦特创作这本书的大大部分时间里，布吕歇尔都处于意志消沉的无业状态。他英文不够好，所以做不了文职工作；他没有博士学位，所以不能教书。而阿伦特则在由纳粹德国难民建立的朔肯出版社（Schocken Books）做编辑。每天她去上班之后，布吕歇尔会到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读几个小时的书。到了晚上，夫妇二人会交流各自的劳动成果，即布吕歇尔在历史方面的知识和阿伦特的分析。这本书和书中的见解最终属于阿伦特，但布吕歇尔的贡献是无价的。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的关键点是集中营。她将之描述为极权主义的“激进的恶（radical evil）”的终极工具。集中营是“对人的完全主宰”这项纳粹总实验的试验场。集中营的恐怖成功地将每个人简化成“一些反应的集合”，一些可以互相取代的个体。阿伦特将这一点与很多人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己是“多余的”联系在了一起。这些人的生活和死亡都成了毫无意义的事，至少是不如政治的意识形态重要。

意识形态是阿伦特的另一个见解。她写道：极权主义非常依赖于意识形态提供的过分简单化的承诺，以及它能够让那些随波逐流的人相信过去和未来可以仅靠一套简单的法则就全部被解释清楚的功用。实际上，意识形态那过分简单化的，尤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承诺，恰恰是让它如此强大的原因。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意识形态承诺的解决之道意味着集权主义政治将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威胁：

即便是在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解决办法也可能幸存下来，每当人们似乎无法找到一种人道的方式摆脱政治、社会或经济困境时，那些解决方法就会以一种强烈诱惑的形式出现。[\[38\]](#)

1951年，这本书终于出版后获得了评论界的热烈赞美。人们赞美的不仅是阿伦特的分析，还有她在传达自己想法时表现出的博学。[这本书的文字部分也经过了“英文化”，做这个工作的人是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和阿伦特的另一位朋友罗丝·法伊特尔逊（Rose Feitelson）。[\[39\]](#)] 很多评论将重点放在了阿伦特对纳粹极权主义策略和苏联方式所作的比较上。《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评论文章的副标题是“纳粹和布尔什维克派系被评价为‘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体系’（Nazi and Bolshevik Varieties Rated as ‘Essentially Identical Systems’）”。实际上，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从没使用过单引号中的这个说法，她只是强调了两种运动的领袖人物的策略之间存在的相似性。阿伦特嫁

给了一位前共产党员，她在纽约的很多新朋友都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让她担忧的是斯大林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苏联形式，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

对于阿伦特的赞美声势浩大，以至于她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的销量也非常好。就连《服饰与美容》这样通常不报道知识分子事物的杂志都将阿伦特列入了1951年年中的“人们在谈论（People Are Talking About）”名单：

《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著。阿伦特用一种新鲜的构想创作了一本意义重大，但可读性极强的作品。她在书中写道：“极权主义组织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它们可以直接利用众多秘密社团作为组织工具，他们甚至不屑于尝试隐藏自己的目标。” [\[40\]](#)

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只是随意引用了一段书中的文字，这段话绝对不能代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论述的精华。不过这恰恰预示了阿伦特即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太有象征意义了，以至于对于她的仰慕者来说，她的思想其实并不如她展示给公众的这个形象重要。她给那些在她影响范围之内的女性带来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她不仅获得了那些把自己塑造成公共知识分子的男性们能够获得的地位，还用自己高屋建瓴的分析让那些人费尽心思写出的深奥的，论述他们对战争、对人类历史作用看法的文章都显得黯淡无光。就这样，阿伦特不仅成了那个时代在纽约定居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还成了其中最闪耀的一颗明星，成了其他人追随的对象。直到这本书出版四十多年之后，一位名叫珍妮特·马尔科姆的记者还会写道，被“错认为……可能被邀请参加汉娜·阿伦特在五十年代举办的聚会的人……是种恭维”。 [\[41\]](#)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阿伦特的新地位。最引人注意的是很多男性对此表现得极为糟糕。阿伦特属于所谓的纽约知识分子群体，不过这个

名称是直到其中很多成员都去世之后才开始被使用的。纽约知识分子指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集中在曼哈顿的一些作家和思想家们，这个群体中的人会相互结交、约会或结婚，但一个最根深蒂固的积习是他们会其他成员的背后嚼舌根。他们相互通信，还在信里讲别人的八卦，纽约知识分子的传奇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即便如此，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些人对于阿伦特的第一印象的确切记录。我们知道的是，经常和这些人来往的诗人德尔莫尔·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称阿伦特是“那个魏玛共和国的轻佻女子”。^[42]据说批评家莱昂内尔·埃布尔（Lionel Abel）在她背后称她为“汉娜·自大狂（Hannah Arrogant）”^[43]。^[44]就连写过阿伦特“对我的人生至关重要”这样的话的艾尔弗雷德·卡津也补充说自己是“耐心地顺从了一种以傲慢为表现形式的知识分子的孤独”。^[45]

这些男人都不是什么畏首畏尾的人，他们沉着冷静，喜欢发表高深的见解，所以他们究竟是在何种程度上把智慧误认为傲慢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弄清楚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些人都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不过这样的处境确实给阿伦特造成了困扰。帕克从来没有这样的困扰是因为她几乎从不涉足战争、历史和政治这样严肃的题材，而且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她几乎已经不发表批评文章了。韦斯特也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与纽约知识分子热衷于进行的这种自恋竞争关系不那么紧密。不过这些脑子里满是绝顶聪明、关乎整个世界的大想法的男人们似乎从来不会被指责为过于自负。

起码是在这个最初的阶段，只有很少一些人会因为阿伦特的才华而讨厌她，敢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表达这种想法的人就更少了。更引起人们注意的反而是那些完全可以被称为她的狂热崇拜者的男性。文学批评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为一份名叫《新领袖》（*New Leader*）的小规模左派杂志撰写了一篇评论《极权主义

的起源》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崇敬之情。他先是将阿伦特比作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后者是一位留下了很多关于宗教和政治的格言警句的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接下来，可能是觉得阿伦特是一个比韦伊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人，所以麦克唐纳又提出了一个更具野心的对比：

书中对于极权主义的理论分析是继我在1935年第一次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后读到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政治理论。它带给我的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带给我的类似的充满矛盾的熟悉感（“当然，这正是我已经思考好多年的问题”）和充满震惊的新发现（“这竟然有可能是真的？”）
[46]

这段评论并没有太过夸大其词。《极权主义的起源》确实已经成为了一部经典著作，是历史学者和政治科学学者的必读内容。虽然这本书很厚、很难懂，但是阿伦特描述的法西斯主义在民众普遍不满的环境下崛起的发展方式如今已经被广泛接受为真理。她与马克思的不同在于她不认为存在什么能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的革命性的方式。晚年时变得更加理智、更加脚踏实地，也更疲劳厌倦的阿伦特看到那么多朋友已经被愚蠢和暴力的激流吞噬，所以她会回避过分简单化的解决办法，她已经学会只依靠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

因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出版，阿伦特会交到一个新朋友。一个在《党派评论》工作的人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后给阿伦特写了一封信，用没什么新意的内容描述了这本书：

过去的两周里，我完全沉浸在你的书中，我在浴缸里读，坐车时读，在杂货店排队结账时也读。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本真正非同凡响的作品，其中的理念至少比其他人超前十年，而且这本书读起来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令人着迷。
[47]

有趣的是，写这封信的人接下来可能是出于尊敬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批评意见”，她认为阿伦特在对自己的观点充满热情的同时，

没有充分考虑到机会、运气在塑造极权主义机构上发挥的作用。“我不认为我表达得很清楚，我手边也没有这本书可查阅，因为我已经把它借给别人了”，写信的人用一种聊天似的口吻继续着，先是突然批评了一个愚钝的评论者“蠢极了”，然后又在附言中邀请阿伦特和布吕歇尔共进午餐，还提出了在劳伦斯、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的反犹主义的问题。

写出这封带着既紧张又自信的感觉的书信的人就是批评家玛丽·麦卡锡。阿伦特和麦卡锡是1944年认识的，《党派评论》的聚会无穷无尽，她们在其中某一次上遇见，并争吵起来。

[1] “Shadows, ” in *Letters, 1925-1975: Martin Heidegger and Hannah Arendt*, ed. Ursula Lutz, trans. Andrew Shields (Harcourt, 2004) .

[2] 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the Love of the World*, 2nd 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50.

[3] “Shadows, ” in *Letters, 1925-1975*.

[4] 转引自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40。

[5] Daniel Maier-Katkin, *Stranger from Abroad: Hannah Arendt, Martin Heidegger, Friendship and Forgiveness* (Norton, 2010) , 27.

[6] “Heidegger at 80,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21, 1971.

[7] 1925年2月10日，马丁·海德格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Letters: 1925-1975*。

[8] 1925年2月27日，马丁·海德格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Letters: 1925-1975*。

[9] 1946年7月9日，汉娜·阿伦特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书信，in *Correspondence: 1926-1969*, ed. Lotte Kohler and Hans Saner, trans. Robert and Rita Kimber (Harvest, 1992)。

[10] “What Remains? The Language Remains: 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 in *Hannah Arendt: 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 trans. Joan Stumbaugh (Melville House, 2013), 18.

[11]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77.

[12] 阿伦特中心 (Arendt Center) 翻译的Gunther Anders, *Die Kirschenschlacht*, 可见于<http://hac.bard.edu/news/?item=4302>。

[13] 汉娜·阿伦特写给马丁·海德格尔的书信，时间大约是1929年，in *Letters, 1925-1975*, 51。

[14] Rachel Varnhagen: *The Life of a Jewish Woman* (Harvest, 1974), 3.

[15] *Varnhagen*, xv.

[16] Seyla Benhabib, “The Pariah and Her Shadow: Hannah Arendt’s Biography of Rahel Varnhagen,” *Political Theory*, February 1995.

[17] *Varnhagen*, 214.

[18] *Varnhagen*, xviii.

[19] “What Remains?,” 5.

[20] “What Remains?,” 8-9.

[21] 马丁·海德格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时间大约是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那个冬天，in *Letters, 1925-1975*。

[22] “What Remains?,” 10.

[23] “What Remains?,” 19.

[24] 1948年7月29日，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Within Four Wall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annah Arendt and Heinrich Blücher, 1936-1968*, ed. Lotte Kohler, trans. Peter Constantine (Harcourt, 1996), 93-95。

[25]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xi.

[26] “Walter Benjamin, ” in *Men in Dark Time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95), 176.

[27] 1939年2月20日，瓦尔特·本雅明写给格肖姆·索罗姆的书信，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1910-1941*, ed.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 Adorno, trans. Manfred R. Jacobson and Evelyn M. Jacob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596。

[28] 转引自Howard Eiland, *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9] “Walter Benjamin, ” 181.

[30] “Walter Benjamin, ”, 192.

[31] 转引自Gershom Scholem, *Walter Benjamin: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3), 283。

[32]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 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Schocken Books, 1969), 254.

[33] “We Refugees, ” in *The Jewish Writings*, ed. Jerome Kohn and Ron Feldman (Schocken, 2007), 265.

[34] “We Refugees, ” 268.

[35] 1941年7月26日，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Within Four Walls*, 65。

[36] “French Existentialism, ” *Nation*, February 23, 1946.

[37]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rvest, 1973), viii.

[38]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rvest, 1973) , 459.

[39]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250.

[40]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 *Vogue*, May 1951.

[41] Janet Malcolm, *The Silent Woman* (Vintage, 1995) , 50.

[42] William Barrett, *The Truants: Adventures Among the Intellectuals* (Doubleday, 1983) , 103.

[43] 英文中的“自大、傲慢 (Arrogant)” 与阿伦特的姓氏“Arendt” 形似。

[44] 参见Anne Heller, *Hannah Arendt: A Life in Dark Times* (New Harvest, 2015) , 25。

[45] Alfred Kazin, *New York Jew* (Knopf, 1978) , 195.

[46] Dwight Macdonald, “A New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 ” *New Leader*, May 14, 1951.

[47] 1951年4月26日, 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 in *Between Friends: The Correspondence of Hannah Arendt and Mary McCarthy, 1949-1975* (Harcourt Brace, 1995) 。

第五章 麦卡锡

终其一生，麦卡锡始终被视为一位对话专家，她秉持的正是她给阿伦特写信时体现出的那种聊天似的风格。麦卡锡和帕克具有某种相同的天赋，这让她们尤其擅长与人谈天说地，还能在聚会中表现得轻松自如。每当人们回忆起麦卡锡，尤其是在很多女性的记忆中，她总是站在房间的远端，身边围绕着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话的人们。比如诗人艾琳·辛普森（Eileen Simpson）就记得自己在大约和阿伦特结识麦卡锡相同的时间见到麦卡锡的情况：

后来我意识到，她那时站立的姿势是她的一种标志性站姿：右脚略向前伸出，重心放在另一只穿着高跟鞋的脚上。一手夹着香烟，一手举着一杯马天尼。^[1]

不过麦卡锡并不是一直这样泰然自若的；她和阿伦特的友谊就经历了一个磕磕绊绊的开始。那次对话是关于战争的，麦卡锡在谈话过程中作出了一个评论，大意是她“觉得希特勒很可怜”，因为在她看来，这个独裁者渴望的正是受他折磨的人民的爱戴。阿伦特听到后马上就愤怒了。“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一个受到希特勒的迫害，曾经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说这样的话？”^[2]阿伦特惊呼，然后就拂袖而去。不过走之前她还不忘先找到《党派评论》的主编菲利普·拉夫，义愤填膺地质问对方怎么能允许“有人在你的家里，一个犹太人的家里，发表这样的言论”。通常情况下总是很讲究社交礼仪的麦卡锡就算不为自己的言论感到羞愧，至少也会因这个处境而无比尴尬。对于很快

将成为这两个女人职业生涯和思想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段友谊来说，这样的开端可真算不上什么吉兆。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喜欢将麦卡锡归类为“美国文学的黑暗夫人”。这暗示了她属于蛇蝎美人的类型，是一个永远冷静自持，甚至有些麻木不仁的人。其实麦卡锡并不是这样的。就像帕克总是表现为一个爱说俏皮话的人一样，麦卡锡也会使用一些维持自己形象的把戏和花招。她的朋友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在麦卡锡去世后曾暗示说：

她的那些轻率行为往往是公开的、坦诚的，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可以说她就是“一本打开的书”。然而，能不能找到有意思的事取决于你打开的是哪本书。[\[3\]](#)

这还取决于你从哪一页开始读。麦卡锡讲了又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她奇特的混合了狄更斯和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4\]](#)风格的童年经历。麦卡锡1912年出生于西雅图，他的父母分别是两个富有且受人尊敬的家族的后代。麦卡锡在婴幼儿时期享受到了富人家孩子能享受到的一切舒适，不过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仰仗的收入并不稳固，其来源主要是麦卡锡祖父对她家的慷慨解囊。麦卡锡的父亲罗伊·麦卡锡（Roy McCarthy）是一个间歇性的酒鬼，他身体总是不好，几乎找不到工作。最终，麦卡锡的祖父厌倦了给儿子开支票的生活，他要求儿子一家搬回明尼阿波利斯。

麦卡锡一家于1918年秋末登上了一列横跨美国的火车。当时西班牙流感正在全国肆虐。登上火车的麦卡锡一家无一人幸免，他们一个比一个病得严重，都到了说胡话的程度。一家人还能抵达明尼阿波利斯已经是个奇迹了。在疾病带来的恍惚中，染上流感的一家人隐约记得火车上的乘务员在火车行驶到北达科他州的某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时曾试图将他们赶下车。这段不是很清晰的记忆中包含了麦卡

锡的父亲挥舞着一把枪的情节，但是没人确定那是否真的发生过。不管怎么说，罗伊作出的最后的抗争并没有多大意义：到达明尼阿波利斯之后没几天，麦卡锡的双亲就都病死了。

麦卡锡的祖父不喜欢孩子。所以照顾麦卡锡和她三个兄弟的日常生活的义务就落在了其他亲戚身上。不幸的是，那些能够照顾他们的人都不太情愿接受这个职责：最终一位上了年纪的姑奶奶和她苦行僧一般的丈夫成了孩子们的照管人，他们关于抚养孩子的观念似乎是从管理十九世纪孤儿院的公职人员那里学来的。在这二人的看护下，麦卡锡家四个年幼的孩子每天只能吃一些根茎类蔬菜和梅子干。他们晚上睡觉时还会被用胶带封住嘴巴，这么做的目的是防止他们“用嘴呼吸”。即便是隆冬时节，他们也会被赶到明尼苏达州寒冷刺骨的室外“玩耍”。他们的娱乐活动很有限，有时还很奇怪：

阅读是被禁止的，除非是读上课的课本，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可以看赫斯特集团在星期天出版的一些可笑的报纸和杂志（Sunday Hearst papers），那上面可能会讲到麻风病，博尼·德·卡斯特拉内伯爵（Count Boni de Castellane）的婚外情以及一种能够让人从双脚开始向上逐步石化的奇特的疾病等内容。[\[5\]](#)

受惩罚也是家常便饭，而且这些惩罚都很严厉。这种严厉既是身体上的，也是感情上的：受罚的孩子会被用梳子或磨刀的皮带抽打；而且这位姑奶奶和她的丈夫还尤其擅长把惩罚作为一种羞辱。有一次麦卡锡摔坏了自己的眼镜，结果她就被告知没有人会给她买新的。这样的忽视和虐待整整持续了五年，直到麦卡锡的外祖父介入，十一岁的玛丽·麦卡锡才被匆匆地接回了西雅图，而她的兄弟们则被送到了寄宿学校。

麦卡锡尤其喜欢表现出她对于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方面的见解的怀疑。其第一本作品《她选择的伴侣》（*The Company She Keeps*）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躺在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躺椅上突然想

道：“我排斥关于调换儿、孤儿和继子女相关问题引发的一切感伤。”^[6]但是她也知道，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一生当作一本劣质小说，然后用一句冷落的言语就将它从思想中摒除了”。^[7]事实是，当麦卡锡的父母去世时，麦卡锡的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就整个随之蒸发了，麦卡锡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我可以想象自己嫁给一位爱尔兰律师，每天打打高尔夫和桥牌，偶尔去度假，还要参加某个天主教读书俱乐部的样子。我怀疑我会变得相当胖。”^[8]

麦卡锡获得的取代这种已经不会实现的人生的东西，是后来成为她的写作特点的那种充满好奇的冷静超然。她所有回忆录中的风格都带着一点点黑色幽默的感觉，即便在她写到用胶带封住孩子们的嘴这种事时也是如此。经历过这些耸人听闻的苦难之后，麦卡锡反而不怎么愿意完全地表露自己的感受。也许一种认定过去那些事多么荒谬的意识能够让她自在一些。《她选择的伴侣》中的角色提到她同情那些“像一个没完没了地给别人讲述自己的糟糕经历的傲慢妻子那样讲究做作的礼仪的人”。^[9]

对其他孩子来说，麦卡锡的外祖父安排她就读的西雅图的新天主教学校可能会让他们感觉过于严苛。麦卡锡写到，这个地方有一套历史悠久的惯例，修女们“通晓对权威的精准服从”。^[10]麦卡锡渴望成为受欢迎的学生，希望能像学校里的其他女孩儿一样自信，不过懂事听话似乎并不能帮助她交到很多朋友，所以麦卡锡改变了策略。

后来麦卡锡写道：“如果美德不能让我名声大噪，那么我已经准备好了靠恶劣扬名立万。”^[11]她很快就通过假装自己失去了天主教信仰而让学校里所有人心绪不宁。麦卡锡之前有没有天然的宗教情感不是一个能够用是与否回答的简单问题。她的出身环境是一种淡漠的新教和一种主要关注形式的天主教的混合。实际上，她母亲是犹太

人。如麦卡锡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讲述的那样，年轻的麦卡锡为信仰设计了精准的时间框架：

假设，我在星期天失去了信仰，那么在接下来的三天静修时间里，我还可以重拾信仰，并赶上周三的告解。这样的话，就算我碰巧突然死去，我的灵魂可能陷入危险的日子一周也不过才有四天。

麦卡锡发现自己很享受引发众怒的感觉，也享受通过假扮的叛逆收获他人的认可。这件事让她得到了修女们的特别关注，以及她渴望的在同学之间的重要地位——一种能够让她与众不同的识别标志：

“她就是那个连耶稣会会士也说服不了的姑娘。” [\[12\]](#)

这件事还让麦卡锡知道自己具有一种计算其他人的反应，并利用这种反应来实现自己目的的天赋。成年后的麦卡锡也知道自己在这个方面多么善于控制和操纵别人。在《回忆信仰天主教的少女时期》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中，她描述了年轻时的自己如何策划了这次事件：她抱着“政治家和青少年经常有的那种冷静、空洞的赌徒心境”仔细观察了女修道院。[\[13\]](#)她看到了这里的人如何作为，看到了她们渴望什么；她把了解这里的规则当成必须完成的工作，然后研究出了具体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利用规则为自己服务。

在社交层面，这种天赋并不是总能给麦卡锡带来好处。她对别人作出的谨慎小心的赞美往往被当作尖刻的评判。伊丽莎白·哈德威克曾经写道：

玛丽在道德生活中总是带着一点神学院学生的感觉，对我来说，这是她独特性的一部分，也是她的风度中最令人说不清楚的一种魅力。她很少有漫不经心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习惯、偏见、重要时刻，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刻，都会被解释清楚、研究透彻，并记录在册。[\[14\]](#)

对于一位想要将评判伟大的戏剧作为自己最终的热情所在的批评家来说，这些评估和计算的习惯被证明是非常有益的。显然不是所有

人都喜欢这个习惯。麦卡锡这种判断别人的能力往往会被别人当作傲慢无礼的表现。“她表现出一副全世界数她最可靠的样子，不过实际上她一点儿也不可靠。”^[15]黛安娜·特里林（Diana Trilling）这样告诉麦卡锡的传记作者之一。

特里林也是定期出席《党派评论》的诸多聚会的女性之一。她算是一个对麦卡锡抱有敌意的旁观者。麦卡锡也不喜欢特里林，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特里林总是觉得自己被《党派评论》的那群人边缘化了，因为他们在他们眼中只是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妻子”，而丈夫才是比妻子出名得多的批评家。虽然黛安娜·特里林反复强调她不介意自己作为图书评论家和记者的表现都被丈夫作为批评家的远胜过她的光辉掩盖了，但她却总是忍不住就此发表评论。她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人们只会赞美一个家庭中的一位成员，要赞美一个家庭里的第二位成员时，人们会变得双倍审慎。”^[16]她说的不算错，但是麦卡锡、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汉娜·阿伦特也都是别人的“妻子”，但她们都成功地找到了进入这个圈子的办法。

不管怎么说，麦卡锡注意到了自己喜欢评判的倾向。在《她选择的伴侣》中，女主角的丈夫说：“你总是用各种奇妙的顾虑作为你表现得像一个贱人的借口。”女主角则向丈夫保证自己已经努力不这样了。可丈夫并不相信她，还继续问道：“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呢？”^[17]然而，从一开始，麦卡锡就注定不会像别人一样。

在西雅图度过的青少年时期，麦卡锡总是坚持结交一些与众不同的朋友。她离开女修道院，改为到公立高中学习，然后在那里遇见了让她开始了解文学人生是什么的朋友。这个黑头发的年轻姑娘名叫埃塞尔·罗森堡（Ethel Rosenberg，不是罗森堡间谍案中的同名人物），她喜欢穿背心和粗革皮鞋，还总是随身携带着一叠推荐书籍名单。埃塞尔给自己取了个简称叫“特德（Ted）”。麦卡锡在一本回忆

录中说“据我所知，后来她成了公开的女同性恋者”。^[18]当时的麦卡锡已经读过不少书，但绝大部分内容质量不高，都是些庸俗的小说或名为《真心忏悔》（*True Confessions*）的杂志之类的东西，那上面会刊登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淫秽的谋杀或强奸事件。这些当然算不上卡夫卡级别的文学。

特德向麦卡锡展示了在更严肃的文学中也会有关于性的内容。特德的品味倾向于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作家，比如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和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他们会将感官描写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这让麦卡锡比较容易接受。至于另一位年轻男孩儿向她推荐的更为厚重的梅尔维尔（Melville）和德莱塞（Dreiser）的作品就不那么让人愉悦了。麦卡锡写道：“我根本看不懂《白鲸记》（*Moby-Dick*），虽然我看过约翰·巴里莫尔（John Barrymore）主演的改编电影《海兽》（*The Sea Beast*），但是电影不但对读书没有帮助，还造成了障碍。”^[19]特德还介绍麦卡锡进入了她的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圈子，那个西雅图沙龙是由一个比她们年纪都大的女同性恋者组织的，后者的丈夫拥有一家书店。

过了不到一年，麦卡锡就被送回了更接近上流社会环境的寄宿学校。不过那些波希米亚主义者已经影响了她。麦卡锡保持了给特德写信的习惯。她也会为完成课业而创作关于妓女和自杀的短篇小说或散文。她还会就男人进行一系列实验，她交过很多男朋友，直到认识了一个名叫哈罗德·约翰萨德（Harold Johnsrud）的人之后才安定下来，这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哈罗德是一个秃顶的男演员，还比麦卡锡大好几岁，他肯定不是麦卡锡的第一个男人，另一个男朋友早已经夺走了麦卡锡的童贞（后来她在一本回忆录中描述这个经历时说那是“一种被填塞的轻微感觉”^[20]）。不过哈罗德和麦卡锡的关系却一直持续着，直到她在1929年升入瓦萨学院（Vassar）之后也是如此。

出于某些明显的原因，写出一本畅销小说往往会留下一些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直倾向于夸大瓦萨学院如何“塑造了”麦卡锡的原因。有时候，麦卡锡甚至鼓励人们相信这种编造的神话。1951年，她在一篇为某杂志撰写的散文里写到了启发她去美国东北部上大学的那位老师。这位传说中的女老师确有其人，不过实际情况比她写的复杂得多。麦卡锡说她有“一副温柔、清晰、有穿透力的声音”，自己为她“批评学生在遣词造句时选择的某些自命不凡或自甘堕落的词语”的方式而着迷。^[21]她去瓦萨学院就是为了成为同样锐利的人。

不过，如果说朋友是能够启动思想生活的引擎的话，那么瓦萨学院的问题就在于：它无法给坦克加油。直白地讲就是，麦卡锡在瓦萨学院的同学都不怎么喜欢她。也许有一两个例外，但是麦卡锡在大学期间获得的绝大多数友谊都不长久。尽管如此，麦卡锡仍然为在瓦萨学院上学而感到骄傲。她将女孩儿们的冷淡高傲视为一种应该被表现出来的气质。《她们》（*The Group*）中的一个角色就这样告诉自己：“她知道，瓦萨学院的姑娘们总体来说不被大多数人喜欢。她们已经成了某种高人一等的象征。”^[22]

即便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麦卡锡仍然会给其他同学一种很势利的感觉。她们想起麦卡锡时会提到她的聪颖过人，但也会以此抨击她。后来的一本传记中引用了某位同学的话：“世界上最让人心灰意冷的事莫过于和玛丽·麦卡锡一起作为大学一年级新生上英语课。”^[23]另一位同学说：“我觉得她引人注目又令人惧怕，而且她绝对会毁掉一个人的自信。玛丽不会对你做出无礼的举动，但是她会让你觉得低她一等。”^[24]鉴于麦卡锡后来获得的成功，人们出于嫉妒可能会忍不住把对她的记忆写得很尖刻。不过就连麦卡锡本人也注意到了自己并不合群。她在给特德的信中写道：“关于瓦萨学院，我觉得这里还好，至少比[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5]]好，

但是这里有太多能说会道、虚伪狡猾的人，他们还总爱给事物贴标签。” [\[26\]](#)

这样的评论出自一个因为“能说会道”而闻名的人之口确实有些奇怪。这个问题可能与东北部严格的社会阶层划分有关。人们一提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层阶级女性，就难免感情用事地认为她们不会受到大萧条的影响，因为她们绝大多数是注定要成家而非立业的。不过这样的想法往往低估了女性之间持续存在的社会竞争。在麦卡锡的时代，到瓦萨学院上学的女性都是精明能干的人；她们适应了地位的变化，看到被她们视为趋炎附势的行为就会大加指责。这里的学生出身背景各不相同，有豪门后裔，也有普通的资产阶级子女。她们当中的一些人会看着自己的父亲在大萧条中倾家荡产。而麦卡锡来自西部，没有接受过如何在东北部社会中行为处事的严格训练，所以注定要引起摩擦。她与教授们的关系就好得多了。其中有两个甚至可以被称为《绿山墙的安妮》中的安妮定义的那种“密友”。这两个人分别是基切尔女士（Miss Kitchel）和桑迪森女士（Miss Sandison）。后来她把自己的回忆录献给了这两个人，而不是那些与自己同龄的朋友们。

实际上，这些教授们远比此时依然在与麦卡锡约会的约翰萨德更深入地参与了她的思想和文学热情，约翰萨德在麦卡锡到瓦萨求学的这段时间里依然会不时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他们在某一年的夏天里同居了一个月，那次经历很糟糕。在麦卡锡读研究生期间，二人也总是分分合合。麦卡锡的感情生活与帕克的很相似，在她们的剧本里，男人绝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的角色。

瓦萨学院在麦卡锡的一生中留下的真正持久的影响表现为她与一本“文学杂志”的最初接触。麦卡锡和包括伊丽莎白·毕晓普在内的几名爱好文学的年轻女性一起创办了这份杂志。杂志最初的名字叫

《女强人》（*Battleaxe*），后来被正式定为《生气勃勃》（*Con Spirito*）。麦卡锡为这份报纸写了她的第一篇书评，她在其中通过对比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及如今早已被人遗忘的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的《公众面目》（*Public Faces*）来贬低前者。麦卡锡在文章中拐弯抹角地批判了现代主义者们：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学界的半神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弗吉尼亚·伍尔夫正在掩饰她的最新的缺乏深思的事实，这一缺点会在她的《普通读者II》（*The Second Common Reader*）中暴露无遗，那里面有的不过是简单的、“漂亮的”，被伪装成强烈情感和“一种新型实验”的女性特质。[\[27\]](#)

后来，麦卡锡说这些恶毒攻击证明了她“特有的邪恶”。不过她对此还是感到骄傲的，所以毕业之后，她把这篇文章带到了纽约。在与《新共和》当时的文学编辑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见面时，麦卡锡就向对方提交了这篇文章。考利算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艺术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他曾经和海明威等人一起待在巴黎，却没能像他们一样获得巨大的突破。当他显然已经无法仅仅依靠写作养活自己之后，考利改行做了编辑。他把自己的后半段职业生涯都用来记录其他人的成功了。

当时的考利对麦卡锡的文章没什么兴趣。他告诉麦卡锡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自己才会让她写评论：一是她是个天才，二是她快要饿死了。

我很快回答说：“我还不至于挨饿。”我知道我不是个天才，我也不喜欢这个我是在抢走他人口中的面包的暗示。[\[28\]](#)

考利在这个问题上只作出了一点点让步。麦卡锡先是获得了写一些非常短的评论的机会，之后才终于被安排去评论一本如今已经被人

遗忘的纪实性回忆录的机会。这本书的名字叫《我上过煤坑大学》（*I Went to Pit College*），作者是一位毕业于史密斯学院的研究生，他隐藏身份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矿场上工作了两年，之后创作了这本深受美国共产党偏爱的作品。考利是一位公开的共产党员，实际上，他负责的版面被普遍视为“共产党的扩音器”。^[29]所以麦卡锡觉得这份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喜欢这本书，并在文章中对其大加赞美。她后来回忆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奉命写作。”^[30]即便如此，当她把评论文章交给考利之后，后者还是戏弄了她。考利认为她的评论不够严厉，于是他又刊登了第二篇评论，作为对麦卡锡的文章的羞辱的纠正。第二篇评论的作者是《新共和》的电影批评家，文章称：“这本书永远不应当被视为一段扣人心弦的社会纪实报道，甚至不应当被视为一个毫不做作的人道主义姿态。”^[31]那之后的好多年里，麦卡锡没有再在《新共和》上发表任何文章。

另一份杂志《国家》对于麦卡锡的风格则宽容得多。麦卡锡对于分配给自己的书籍基本都不喜欢，她为它们写的评论里也充满了简单粗暴的人身攻击。在评论一位当时很出名，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记者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时，麦卡锡写道：“人们很难相信这些短篇小说能够代表伯内特先生（Mr. Burnett）的最高成就。说他是在一辆旧车的后备厢里发现这其中的大部分内容的反而是更给他留面子的想法。”^[32]在另一篇针对五本书的评论中，麦卡锡写道：“它们的共同点有两条：第一是它们全都平庸得令人极其厌烦。”^[33]这些评论中总是蕴含着一种邪恶的口气，一种写评论的人知道自己其实是在挑战评论文章适当性的惯例的感觉。麦卡锡的傲慢无礼变成了她的某种招牌。这些文章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整体上宣称的更高级别的诚实。不需要因为被评论作品既有的声望而说违心的话让麦卡锡的作品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就像多萝西·帕克的“永远的读书人”专栏一样，你不是非要读了某本书才能体会这种精神。

《国家》显然也很满意麦卡锡这种夹枪带棒的腔调。不到三年，这份杂志就决定派她出去执行一项更具野心的工作。这个项目计划对美国所有杂志和报纸上的书评做一次评审，就像是发布某种书评界的国情咨文。绝大部分工作是由麦卡锡一人完成的，但是《国家》的主编，一个名叫弗蕾达·柯奇韦（Freda Kirchwey）的女人坚持让麦卡锡和杂志的文学副主编共同署名，这位年纪略长的女性副主编名叫玛格丽特·马歇尔（Margaret Marshall）。柯奇韦认为年龄和经验可以让这个系列更为人所信服。很难说她的这个担忧是不是有必要。不管怎么说，这个项目获得了成功。系列文章的标题叫《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Our Critics, Right or Wrong*），系列中的所有文章被分成五期，每两周发表一期。这些文章的基调是好争辩的；它们号召这个国家的批评家解释自己的评论为何会“从整体上造成人们对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误解，还拉低了人们的品位”。[\[34\]](#)

在美国书评的历史中，这样的批评文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批评家们很喜欢互相评论，就算公众认为这样的辩论毫无意义，他们还是要坚持这样做。《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能从这个种类的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的综合性。这些文章并不是要提出什么连贯的理论，以用来给世上所有的批评文章打分及赞扬或羞辱当时撰写批评文章的所有批评家们。比如《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的主编就因为它对被评论对象的老态龙钟的处理方式而遭到了嘲笑：

文学作品只是触动了她头脑中的一些模糊的，通常是没有依据的联想思维过程。他就像一位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闲逛的老绅士，只能够在路人的脸上看到转瞬即逝的与某位过世的姐夫或很久不曾想起的表亲的相似之处。[\[35\]](#)

这样的评价方式自然也给麦卡锡提供了一些报复的机会，马尔科姆·考利在一份已经被人遗忘的名为《图书》（*Books*）的期刊上发表

的评论他好朋友的作品的书评就受到了直白地抨击。麦卡锡还通过将该系统的一整期专门用来批判《新群众》（*New Masses*）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的糟糕表现来间接打击了一些人。这篇文章嘲弄了“马克思主义和唯美主义之间的奇特的内战，让对糟糕的无产阶级图书的左翼评论有了一个混合的党派路线”。[\[36\]](#)

《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如愿引起了反响，这些反响并不一定是负面的，但是却都流露了对女性竟然可以如此锐利而感到的惊讶。一位《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冒着自己被攻击的风险在专栏中用全部的篇幅谈论了麦卡锡和马歇尔。他甚至花时间写了一首居高临下的打油诗来描述这两个人：

哦，玛丽·麦卡锡和玛格丽特·马歇尔

两个聪慧又公正的女孩儿。[\[37\]](#)

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麦卡锡和马歇尔偏离了主旨，因为她们过分强调正式的学徒期，而且他每次提到这两位作者时都不忘用“女孩儿”这个词来指代她们。其他人表达自己不满的方式则更加直接。富兰克林·P. 亚当斯（Franklin P. Adams）曾经是帕克早期的崇拜者之一，他抱怨说：“这两个女孩儿让我想起老斯特劳斯提到一个我们记不起名字的人时说的话：‘他总是疯疯癫癫的，但已经是芝加哥脾气最温和的人了。’”[\[38\]](#)

也有一些批评家是受到麦卡锡喜爱的，而且她也不吝于表露自己的赞美之情，她说他们“有洞察力”，尽管“他们势单力薄的嘘声都被向出版商献殷勤的人们的喝彩掩盖了”。[\[39\]](#)受到麦卡锡赞美的批评家包括丽贝卡·韦斯特，其余则大多是男性。有一人获得了麦卡锡的特别青睐，她称赞这位批评家拥有“将当代文学中有价值的东西与过去的文学联系起来”的能力。这位获赞者正是多萝西·帕克的老朋

友埃德蒙·威尔逊，他为这样的评价感到满意。此时四十岁的威尔逊已经离开《名利场》，成了一位颇具声望的文人。他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和他离婚了，但他们育有一个女儿；第二任妻子和他结婚才两年就于1932年去世了。此时的威尔逊虽然已经成了一个胖子，头发也快掉光了，但他很快就会迎娶麦卡锡为自己的第三任妻子。

1933年，麦卡锡从瓦萨学院毕业后嫁给了哈罗德·约翰萨德。麦卡锡总是将这段婚姻描述为一次不带感情的好奇之举，麦卡锡显然为此感到难堪，她曾经这样写道：“我刚刚做的事就是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未经深思熟虑就这样做是一种邪恶的行为。”^[40]她的丈夫认为自己是位剧作家，但是谁都看得出来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约翰萨德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麦卡锡很少提到他。两个人都有不忠行为，到了1936年，他们都觉得这段婚姻可以结束了。麦卡锡有过一系列婚外情，不过没有哪段关系是长期的。即使是名义上毁掉了她的婚姻的那次，似乎也在她离婚后就失去了吸引力。

麦卡锡在进入共产党人圈子的事上也充满矛盾。这正是造成她和马尔科姆·考利这样的人合不来的一半原因。麦卡锡在大学期间就见过左翼人士，她认为她们的活动是“高大、枯瘦、脾气不好的穿裤子的女孩儿们打的某种政治曲棍球”。^[41]麦卡锡绝对算是个漂亮姑娘，虽然穿着打扮还有点俗气，但她觉得自己和那些女孩儿不一样。她也没有一种想要通过参加某个政治党派来服务于什么更广泛的社会公益的冲动。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文学圈子和左派圈子的重叠程度非常高。参加鸡尾酒会意味着谈论卡夫卡，也意味着谈论共产党和党的艰苦奋斗。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人针对这些话题的充满激情的演讲令麦卡锡印象深刻。她写道：“他们让我觉得自己虚有其表、浅薄无知；我要说，他们日常生活中面对的丑陋让我生活中的光鲜亮丽显得廉价而俗气。”^[42]

让麦卡锡写出这样的文字的是她性格中存在的好唱反调的特征。如果人们不喜欢什么她喜欢的东西，她总会想要弄清楚为什么。她的好奇最终会将她引向确信。麦卡锡在名为《我的告白》（*My Confession*）的散文中写道：“历史性事件的标志就是一个个体被漫不经心地置于了某种潮流之中。”^[43]在这篇文章里，麦卡锡解释了她没什么前途的身为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不是每个个体都会紧紧抓住潮流奋勇直前。平静和沉着从来不是麦卡锡的风格，至少不是她的文字体现出的风格。

麦卡锡会在斯大林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论争中选边站队完全是个意外。一位小说家朋友在没有向她详细解释情况之前就把她的名字写在了一份为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辩护的委员会成员名单中，结果就成了她被认定为一位持不同政见者。麦卡锡写到自己起初大吃一惊，然后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或多或少地尝试说服自己接受这种恰当的政治观点。这让她在社交圈子里获得了一定声望：

每当我走进一个晚间活动的场所，戴着首饰的作家女士们就会面无血色，还要愤怒地挥挥她们戴着手链的手臂；当我敦促在出版界和广告界发展的年轻男子们自己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充满怀疑地拉紧领带。如果我晚上到俱乐部跳舞，高个子的大学生年轻党员会把我拉进他们的怀中，对我说不要犯傻了，宝贝。^[44]

这就是黛安娜·特里林说自己发现麦卡锡的政治路线“不可靠”的意思。所有批评麦卡锡的人都认定她这种摇摆不定是不严肃的表现。即便是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这样宣称自己仰慕麦卡锡的人也对她的传记作者说“她不擅长解释抽象概念。她对生活的总体理解很好，比如对人，对社会，以及人的反应”。^[45]

然而对于人而不是对抽象概念的洞察也是获得政治见解的一部分。麦卡锡不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或伯林

那样的思想家，她不会把时间花在清晰地论述权利的完整体系，或详细说明公正的本质。但理解人性仍然是进行政治分析的宝贵技能，后来麦卡锡称之为“对正统观念的有所怀疑和独立于大众意见的自主思考”。^[46]这种技能对于分析二十世纪中期的政治非常有益，因为当时有很多庞大的抽象概念体系，比如纳粹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等，它们在大多数时候给人类带来的是灾难而非福音。不管怎么说，这让麦卡锡成了最能经受住发生在三十年代的两败俱伤的左派内部战争的人。当原本达成共识的集体内部有人争论不休时，不参与任何一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被卷入托洛茨基辩护委员会的那段时间里，麦卡锡正在和菲利普·拉夫同居。拉夫是《党派评论》的总编之一，麦卡锡也是这份杂志的领导层成员之一。拉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俊男子，但是他有一种深沉、激烈的魅力。他说的话“尖锐、严苛、有说服力，还带着很重的俄语口音”。^[47]拉夫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非常深入，他是在大萧条时期来到美国的，曾经需要靠排队领救济度日。麦卡锡并不太把主义当回事，而拉夫则正相反，而且他一点儿也不怕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坚定信念，甚至可以为此对他人出言不逊。以赛亚·伯林描述拉夫时说“他不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人”。^[48]另一位《党派评论》圈子成员德怀特·麦克唐纳说，拉夫“在很多方面相当冷酷无情”。^[49]不过，麦卡锡对拉夫的看法与他们不同。当她在拉夫的葬礼上致悼词的时候，她说最开始让她受到拉夫吸引的原因是他在《工人日报》（*Daily Worker*）上为《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写的一篇书评。虽然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负面的，但麦卡锡被拉夫对菲茨杰拉德这位富人的编年史记录者抱有的“有同情心的见解”惊呆了。她说拉夫对这本书的评论中含有一种出乎她意料的“温柔”。^[50]

麦卡锡后来写到，拉夫不得不“为〔她〕发布一份敕令（ukase）”，^[51]以此宣布麦卡锡加入《党派评论》的领导层。

（“敕令”是苏俄成立之前由沙皇发布的一种公告。）要让一位女性介入杂志社的整体事务就必须这么做。1934年初《党派评论》发表创刊号时，麦卡锡是发行人栏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在这期杂志上发表了文章的女性。多年后，她带着不无调侃的口吻回忆说，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知识分子登场也曾让自己感到紧张。管理杂志运营的其他男性同事都比麦卡锡，或者是比他们眼中的麦卡锡更执着于政治问题的激烈争辩。共产党纪律的余韵没能让《党派评论》避免各种内部正统思想的束缚，对意识形态纯洁度的焦虑疯狂地蔓延开来。

赞助人是一位出身传统纽约家庭的年轻抽象派画家，他在政治上非常“糊涂”，以至于有一天他走进（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工人书店买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那天他还戴着一副鞋罩，拿着一根手杖，一想到他那副样子，我们其余人紧张得脸都白了。我们立即问道：“有人认出你吗？你觉得他们知道你是谁吗？”

这个插曲暗示《党派评论》的编辑和作者相对年轻，大多是二三十岁。他们迫切想要证明他们的“文学杂志”可以在世上享有一席之地。他们的焦虑总会体现在版面上，但焦虑也总会被伪装成高傲，而且都不是经历过正式的学徒期后理所应当拥有的那种高傲。如麦卡锡后来说的那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只有在美国，或者说只有在纽约的一小部分区域里，几乎没什么资历的人才敢表现得像某种至高权威一样”。

麦卡锡被安排评论戏剧是因为其他男同事对她还有质疑。根据他们年轻的正统观念，戏剧是一种不值得费太多心思关注的资产阶级艺术形式。“就算我说得不对，谁会在乎呢？这个想法最终胜出了。”事实证明麦卡锡很适合这个职位。她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来完成这些工作，这意味着她可以自己教自己写作。像帕克一样，麦卡锡倾向于讨厌其他所有评论家喜欢的东西，这一点对她不无帮助。

起初，麦卡锡过于迫切地想要对马克思主义者表达诚意，所以她根据他们的政治观念评论戏剧，这样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些俗套的陈词滥调。麦卡锡写道：“那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时代，每个人都加入了某种‘揭露’艺术作品中的潜在倾向的活动，就像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在探案一样。”在评论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制作的萧伯纳的《伤心之家》（*Heartbreak House*）时，麦卡锡注意到他作为演员有一种把“某种黏稠的圣油喷到自己塑造的角色的粗糙表面上”的倾向。^[52]与此同时，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则患上了某种“自体中毒”，中毒的表现是他们“〔的作品中〕会不时出现停顿，为的是等待几不可闻的鼓掌声结束”。^[53]唯一的例外是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的《我们的小镇》（*Our Town*）。麦卡锡真心喜欢这部戏，认为它“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意识行为；它证明了至少在艺术作品中，经历是可以被捕获、控制和观察的”。^[54]

在某一篇评论中，麦卡锡需要评论的是一位前辈。女演员露芙·高顿（Ruth Gordon）参加了一部名为《超过二十一岁》（*Over Twenty-One*）的戏剧，这又是剧作家们无数次想要在舞台上塑造出一个多萝西·帕克一样的角色的尝试之一。麦卡锡评论说：“多萝西·帕克的角色像适合被画成漫画悬挂在萨蒂餐厅（Sardi's）^[55]一样适合于舞台。”^[56]她认为戏中对帕克的机智幽默的隐约效仿是观众可能会喜欢这部戏剧的唯一原因。

麦卡锡从来没见过帕克，或者说没有正式见过。她有过一次近距离看到帕克的经历，后者当时参加了一场在纽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活动。麦卡锡写道：“她矮胖的身材让我很失望，如果她是出现在如今的谈话类电视节目里，我可能还会有点心理准备。”^[57]不过当麦卡锡上了年纪之后，也会有人粗鲁地评价她又矮又胖。

*

麦卡锡第一次见到埃德蒙·威尔逊是1931年，他到瓦萨学院做演讲时。麦卡锡当时对此并不怎么热心：“他身材臃肿、气喘吁吁的，还很紧张，真是一个糟糕的演讲者，那绝对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演讲，而我甚至听过一位口吃者做的演讲。那是几年后我在纽约主持一次会议时遇到的一位口吃者，他念了二十一个音节才念完‘极权主义’^[58]这个单词——有人数来着。”^[59]到1937年，威尔逊已经成了受《党派评论》的编辑们追捧的人，他们都崇拜威尔逊和他尤其热衷于撰写的针对年轻男性知识分子的批评文章。当时威尔逊的作品几乎登上了纽约所有主要报纸杂志的版面，其中大部分是书评，也有一些是新闻报道。他的研究象征主义的长篇作品《阿克塞尔的城堡》让他成了一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本书也是他去瓦萨学院演讲的原因。《党派评论》想获得文学上的认可，好以此提高杂志的文化地位。威尔逊正是可以带来这种认可的人。

麦卡锡一直是这个团体内部的对抗分子，所以她没有义务像她在《党派评论》的其他同事一样必须对威尔逊崇拜有加。即便如此，她还是被要求和另外五名编辑一起与威尔逊共进午餐。威尔逊还邀请了《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的合作者玛格丽特·马歇尔。感受到压力的麦卡锡非常紧张，于是她和领导层的另一位成员在饭前去喝了些鸡尾酒。后来在餐桌上，她又喝了很多曼哈顿鸡尾酒和红葡萄酒。酩酊大醉的麦卡锡和威尔逊、马歇尔一起在酒店的套房里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给菲利普·拉夫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去哪儿了。

这件事其实是有些不恰当的，但不知怎么的，几周后麦卡锡答应和威尔逊约会。结果她去了威尔逊在康涅狄格州的房子，并且没有拒绝后者的求爱，在沙发上和他发生了关系。没过多久，麦卡锡就离开拉夫，嫁给了威尔逊。她总是无法解释这个举动，她在自己的回忆录

里写道：“我很喜欢和他聊天，但是并不觉得他有性方面的吸引力。” [\[60\]](#)

人们在回看糟糕的婚姻时总会将它们神秘化。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对威尔逊和麦卡锡的描述称他们的婚姻是“两个暴君” [\[61\]](#)的结合。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大其词。起码应该说，他们两人相处不愉快的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的。1938年时，这对夫妇有了一个儿子，取名鲁埃尔（Reuel）。后来鲁埃尔写了一本关于父母的书，他是这样刻画这对夫妻的性格的：

别的都不提，只说一点就够了：威尔逊受到内心恶魔的鼓动，能够做出粗鲁、残忍，甚至是暴力的行为。麦卡锡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还被监护人冷酷地利用，她一直带着童年悲剧留下的耻辱心，所以对于丈夫频繁的刺激和批评总会给出情绪强烈的反应。 [\[62\]](#)

在遇到麦卡锡之前，威尔逊的感情生活和性生活都相当混乱。他喜欢特别聪明的女人——他第一次非常投入的恋爱对象是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虽然最终是米莱提出分手的，但总体上说，威尔逊总是维持不好和他人的关系，包括与自己的孩子之间的。他的经济状况并不稳定，他的收入来源仅限于作为自由撰稿人获得的报酬。财务问题是他持续不断的压力来源之一，除此之外，他还酗酒。

麦卡锡和威尔逊结婚时，后者承诺要带她离开城市，让她过上宁静一些的生活。威尔逊夫妇在婚姻存续期间暂居过纽约州北部、韦尔弗利特（Wellfleet），还有芝加哥。但无论他们在哪儿生活，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麦卡锡觉得不幸福。这种感觉会表现为某种短暂的、歇斯底里的狂怒。威尔逊和前妻生的孩子当时已经十几岁了，她形容这样的麦卡锡是“癫痫发作了”。1938年6月，麦卡锡再次情绪失控后被迅速送到了佩恩·惠特尼精神病院（Payne Whitney psychiatric ward），经医生诊断，她是患上了焦虑症。麦卡锡在回忆录《我如何

成长》（*How I Grew*）的第二卷中宣称这次发病是因为醉酒的威尔逊打了她，而且她当时已经怀孕两个半月了。

这件事非常令人震惊，很多人在打探细节的过程中都被吓到了。威尔逊的一位和麦卡锡成了朋友的亲戚见识过他们之间最糟糕的情况。这个人告诉威尔逊的传记作者刘易斯·达布尼（Lewis Dabney）说，与这对夫妇谈论他们的婚姻就像是在听“《罗生门》

（*Rashomon*）里的人物讲述各自版本的相互排斥的所谓现实一样”。在那部电影中，人们可能最终也无法得到一个一致的故事真相。在他们的离婚诉讼中，威尔逊宣称自己从没对妻子动过手——“只有一次除外”。他指的例外可能就是导致麦卡锡被送到佩恩·惠特尼精神病院的那次。不管怎么说，七年之后，当这对夫妻在1945年打起离婚官司时，朋友们都站在了麦卡锡一边。

不过，这次婚姻还是给麦卡锡带来了两件毋庸置疑的好事。第一是她有了一个儿子鲁埃尔，第二是她开始改行写小说。终其一生，麦卡锡一直都会说威尔逊就是那个坚持让她尝试写小说的人，因为他觉得她为《党派评论》和其他地方写的那些文章不足以施展她全部的天赋。此外威尔逊也为她提供了物质帮助，他雇用了家政人员，这样就算孩子还小的时候，麦卡锡也能有时间写作。

麦卡锡在与威尔逊结婚期间写的小说配得上威尔逊曾经对帕克作品的称赞：这些作品同样有一种是由具有“想要写作的迫切需求”的人写出来的感觉。麦卡锡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名叫《穿布鲁克斯兄弟牌西装的男人》（*The Man in the Brooks Brothers Suit*）。它讲述了关于这个像极了麦卡锡的主人公的第一个故事。这个名叫梅格·萨金特（Meg Sargent）的人物乘坐火车前往里诺（Reno）是为了去和自己的第一任丈夫离婚。她在火车上遇到一个无趣的已婚中西部生意人。最终他们发生了关系，但是她的态度犹豫不决，甚至带着些后悔。在

整个相遇过程中，梅格·萨金特一直在审视自己，评价自己的一言一行。她从一开始就在沉思：“没错，她总是希望遇到什么激动人心或罗曼蒂克的事情，不过成为那种‘坐在车厢里钓男人的女孩儿’其实并不浪漫。”^[63]梅格·萨金特恰恰就是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她喜欢这样利用自己的性感魅力。梅格很漂亮，但她并没有为此特别虚荣。她知道只有一种特定的美国男人会认为她美：

在内心深处，她轻视那些认为她完美的男人，因为她知道如果她穿着泳衣走在南安普敦（Southampton），她根本没有任何出众之处。虽然她从来没有真的挑战过这个冷酷的测试，但这件事在她的脑海里一直是种威胁。无论是一本在美容院翻看的《服饰与美容》杂志，还是一顿超出她支付能力的大餐都足以让她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险境。如果她和那些爱上她的各个男人在一起时曾经感觉到安全，那是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那些人全都很糟糕，如今她终于看清楚这一点了……他们每个人的美国生活都存在某种缺陷，这让他们在恋爱中变得谦卑。而她自己真的就那么没有资格享受更好的东西吗？难道她真的只能属于缺陷者兄弟会？她不是一个生活在自我放逐之中的正常、普通的女人吗？她不是行走在山精中间的公主吗？^[64]

拉夫大概就是麦卡锡所谓的“山精”之一，不过前者似乎没有为此感到受辱。他们都知道这篇小说恐怕会引起公众的愤怒。故事中的直言不讳在当时看来实在太不寻常了。不过这反而更激发了他们发表这篇文章的愿望，而且文章获得的反响证明一切都是值得的。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对麦卡锡的传记作者之一说：“当时我还是埃克塞特学院（Exeter）的学生，这篇小说给我带来的震撼几乎和珍珠港事件带来的一样大。”^[65]男人总是抱怨麦卡锡在小说中对他们的描述过于严苛，不过碰巧是威尔逊朋友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就非常喜欢麦卡锡最终的小说集：“这些作品太精彩了，充满诗意，机智而新颖。”^[66]当时还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有抱负的年轻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也对麦卡锡的这篇小说青睐有加。

女性普遍喜欢这篇小说，因为她们对于梅格的思想独立、自信，以及她犯的错误都能够感同身受。“这个女主人公是一个坚强，同时也愚蠢的女权主义者。”^[67]宝琳·凯尔记得自己读到这篇小说时就是这么想的，当时她还是一位在西海岸为事业挣扎的剧作家。“她很蠢，但是她绝不软弱。”这样的细微差别是很难被捕捉到的。梅格很有主见，也很自信，但她并不一定总是对的，这样的混合特质在当时既有的对女性的刻画套路中还很少见。无论是在电影还是书籍中，女性很少被允许同时表现出自信和脆弱。

因为这篇小说大获成功，所以麦卡锡在不到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一整本关于梅格的短篇小说集，书名叫作《她选择的伴侣》。这是麦卡锡的第一本书，一经出版就收获了热烈的赞美。几乎所有评论都认定麦卡锡是某种能用文字置人于死地的谋杀者。一位《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写道：“她使用讽刺的方式就像猫捕食老鼠的方式一样既温柔又致命。”^[68]《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男性）图书专栏作家宣称他相信麦卡锡拥有一种“精妙地表达恶意的天赋”，尽管他称梅格为“骄纵的甜心”。^[69]《新共和》的马尔科姆·考利亲自写了一份书评，起初他似乎不喜欢书中前四个故事的腔调：

机智而邪恶，但还不是邪恶的机智；一种心理上的尖锐，但似乎并没有挖掘得很深……总是选择一些糟糕的伴侣的女主人公可能正是这些人中最糟糕的——最势利、最做作、最充满恶意，也是最不确定自己是否拥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人格的人，她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存在于自己不停重写的这本书之外。^[70]

理智的人们可能会在梅格究竟是势利、做作、充满恶意，还是一切只因为她年纪尚轻的问题上持有异议。梅格去看了心理分析专家，结果发现自己绝大部分困惑和借口都与可怕的童年相关——这正是她不断给别人讲述的“糟糕经历”。^[71]她走出心理分析专家的办公

室，打算“去调查自己的欺骗”。^[72]考利以一种其他评论家所不能的方式看出了这给整本书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改变。

麦卡锡女士已经学会了不用讲述一个自我保护的谎言就按照事情可能发生的样子安排好一切情节的复杂技巧……《她选择的伴侣》不是一本讨人喜欢的书，也不是什么精妙地组织起来的内容，不过它具有一种亲身经历过的不寻常的特质。^[73]

考利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书里的内容确实是麦卡锡的亲身经历。这些短篇小说中的内容具有自传性质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争议。细节也许是编造的，但核心内容不是。梅格和麦卡锡一样是来自西部的女孩儿。她失去了母亲，拥有一个缺衣少食的童年，她到纽约来是想成为一名作家。她的婚姻也像麦卡锡的第一段婚姻一样失败了：因为她的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个男人。梅格还拥有和麦卡锡拥有的类似的第一份工作，同样的朋友圈子，连她选择的恋人也是年轻时的麦卡锡会选择的那种。虽然不是麦卡锡的仰慕者，但是批评家莱昂内尔·埃布尔曾经说过：“除了像告解一样真实的内容之外，我不认为她写过别的什么。”^[74]

麦卡锡无论如何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她远没有帕克那么喜欢折磨自己，但她的小说依然是倾向于自我批评的。根据小说反映她的亲身经历的程度来看，麦卡锡显然已经跳脱了事件本身，她像个局外人一样审视这些经历，同时也审视她自己，然后根据自己作出的判断来把事件小说化。这种小说中的自我意识和一般的一副忏悔口气的作品截然不同：它是淘气顽皮、疏远淡漠、坦白直率的，不过这些态度中都带着一种冷酷无情。

显然，这种技巧很适合麦卡锡，她甚至可以将其适用到发生在更近期的事情上。当她还和威尔逊在一起时，麦卡锡就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杂草》（*The Weeds*）的小说，内容涉及了她婚姻中

的那些伤痛。故事开头，一位没有取名字的女性人物坐在花园里思考如何，以及何时离开丈夫。最后她逃到了纽约。同样没取名字的丈夫追到纽约来把妻子带回家。妻子大闹了一场，叙述者在描述这个场面时冷酷地分析了她的动机：

她已经意识到自己表现得既怪异又令人厌恶，她的丈夫都为她的样子和她发出的声音感到震惊，但是这种快要喘不上气的抽泣让她感到愉悦，因为她意识到这是自己能够对他施予的最后惩罚，她像巫婆一样丑陋的外形，以及显然已经衰败的精神就是她最终的复仇。[\[75\]](#)

这个故事中的自传性因素是作者有意识使用的。麦卡锡曾经把初稿拿给威尔逊看。后者没有就文中对自己的刻画提出不满。但是当这篇小说最终被发表在《纽约客》上之后，威尔逊又改变了看法。“他真的非常生气。我对他说：‘可是我之前给你看过了。’他却说：‘可是你又改进了！’”[\[76\]](#)

1944年，经过了七年的吵闹和争论，并利用这些吵闹和争论为灵感创作了一系列精彩的小说之后，麦卡锡终于离开了威尔逊。他们的离婚大战同样火爆，最终还是闹到了法庭上。关于各自在婚姻期间具体受了多少伤害的争论无穷无尽。这场婚姻虽然糟糕，甚至可以被称作为一场情感上的灾难，但它却促使麦卡锡创作出了她最精彩的那些作品。用现代流行的说辞是这并不能“弥补”任何损失，但是能够留存于世的正是这些作品，而不是她为很久之前就停演的戏剧或如今已经被遗忘的小说所撰写的那些评论。

*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回到1944年在菲利普·拉夫家举行的那场聚会了，也就是麦卡锡说了一些让汉娜·阿伦特无比气愤的评论的那次。考虑到她当时承受的压力，再加上婚姻的解体，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她为什么会对希特勒做出如此轻率的评价了。作为一位经验丰富

的聚会女主人，麦卡锡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失误。在《杂草》那篇文章中，女主人公抵达纽约后才发现一切都变了，几乎没有哪个朋友回复她的电话。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麦卡锡却是强势回归纽约的。她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集已经让她成了真正的作家，这样令人羡慕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在左派杂志上发表几篇戏剧评论和书评文章能带给她的。当时和如今一样，小说被看作是文学成就的最高峰。麦卡锡突然变得受欢迎了，她还开始接到请她去教课的邀请，于是她接受了，先是在巴德学院（Bard），后来又在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麦卡锡的生活也朝更好的方向发展了，她遇到了一个比威尔逊冷静，也远不像他那么专横的人。这个拥有头韵体名字的人叫鲍登·布罗德沃特（Bowden Broadwater），他身材苗条、衣冠楚楚，是《纽约客》的作家。他和麦卡锡是在1946年12月结婚的。

时至今日，麦卡锡已经成了一种家喻户晓的另类人物。那些喜欢看文学报纸和平庸杂志的人都知道她，但是她的书并不畅销，可人们突然开始注意她梳什么发型，穿什么衣服了。这群观察者之一说：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她看起来似乎是在坚持一种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类型的平凡外表。”^[77]与此同时，她的名声还开始传播到更广泛的文化圈子里。《服饰与美容》的“人们在谈论”专栏就提到了《她选择的伴侣》。文章宣称麦卡锡的写作风格“就像一个手里拿着鱼叉的聪慧的鸟身女妖，她四处插刺只是为了自己高兴”。^[78]

认为麦卡锡的风格就是纯粹的邪恶的观点随处可见。评论家们总是会承认她具有某种洞察力，有一种轮廓鲜明的风格。但是他们并不喜欢麦卡锡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认为麦卡锡把她的看法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做法有些无礼和粗鲁。他们选择的那些比喻暗示了他们认为麦卡锡的智慧是带着伤痕的、有破坏性的，甚至可能是阴险狡诈的。就连认识麦卡锡本人的人也会有和那些不认识她的人

一样的想法。她的朋友艾尔弗雷德·卡津后来评价这本书“非常严肃”，但是“充满敌意，就像合唱团里的一个女孩儿说另一个女孩儿的坏话时一样恶毒”。^[79]

从女性和恶意这些字词传统的本意上讲，麦卡锡的作品可能既不是女性的，也不是带有恶意的。麦卡锡的小说有一种挖苦讽刺的腔调，不过那些以她自己为原型角色也和以其他人为原型角色一样受到她的评判和嘲讽。换句话说，麦卡锡的作品很锐利，不过它们并不必然含着恶意，或令人反感。

有一个可能算是例外的存在是麦卡锡在嫁给布罗德沃特之后开始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题目叫《绿洲》（*The Oasis*），小说的主题是纽约的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圈子。小说的内容建立在一个荒诞的前提之下，一群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被派到宾夕法尼亚州创建一个乌托邦。这场努力自然是要以失败告终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活在这个聚居地中的人们的虚荣自负。很难确定促使麦卡锡写《绿洲》的具体动力是什么，但是她写得很快，只用了几个月。因为奥威尔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政治讽刺题材在当时很流行，这可能也启发了麦卡锡。在现实生活中，麦卡锡当时正在费力地组织美国知识分子中的左派人士联合起来支持外国作家，不过这个活动简直就是灾难，因为内部争斗不断而分崩离析。《绿洲》可能是麦卡锡给出的一种报复手段。

尽管如此，麦卡锡还是在多年后辩解说：“整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80]不过她指的仅仅是情节，至于小说中的人物，她承认自己依照了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我努力尝试至少要尽可能地明确一个人的本质，要找到对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还是小说里的人物都至关重要的那个本质。”菲利普·拉夫的本质被体现在了一个名叫威尔·陶布（Will Taub）的角色身上。陶布是这个群体的领袖，不过他气势汹汹

的咆哮只是他用来掩饰自己就身为犹太人和其他问题而感到的深刻的不安全感的手段。他的妻子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角色，对他很体贴，但是“每当她想要思考社会问题时……（他总是）一副粗鲁无礼、心情不佳的样子”。^[81] [拉夫此时已经娶了麦卡锡在瓦萨学院的同学纳萨莉·斯旺（Nathalie Swan），后者在某些方面也符合这样的描述。]

理论上说，这本小说挺有意思的。但是从社交角度上看，写这样一本书无异于自掘坟墓。麦卡锡是直接在拿自己的很多朋友开玩笑。由这部小说的明显的恶劣而引发的中伤在因为《党派评论》而被常年联系到一起的人们之间蔓延开来。据说黛安娜·特里林抱怨麦卡锡时称：“这个女人就是个恶棍。”^[82]那些模仿角色依据的原型们感受到的背叛程度是无法被忽视的。拉夫尤其觉得很受伤。他开了个会讨论大家该怎么做，结果大家都劝他不要表现得这么高高在上。不过拉夫已经下定决心，他扬言要起诉麦卡锡，并让自己的律师给该书的美国出版商发去一封律师函，宣称这本书“是对他隐私权的严重侵害，因为其中包含了完全虚假的、有异议的和诽谤的内容”。^[83]最终，拉夫还是放弃了，部分原因是他的朋友们提醒他，他必须先证明麦卡锡小说中那个愚蠢的角色足以被认定为他才能就诽谤索赔。这个前景对他来说实在没什么吸引力。

更糟糕的是，这本书也不怎受欢迎。书中谈论的是一个相对与世隔绝的世界，一位普通的报纸读者肯定不能理解它其实另有所指。

《纽约时报》的评论家抱怨说：

麦卡锡女士特有的精确性在为以她为圆心的特定读者群体写作时反而成了一个缺点，因为紧挨着圆心的核心圈子太小了。一份文学杂志的主编毕竟不是英格兰的财政大臣。在那个圈子之外的读者除了觉得《绿洲》有一种模糊的巧妙诽谤和不多的几个精彩情节之外，根本体会不到别的什么。^[84]

一个很了解核心圈子，且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还觉得非常喜欢的人正是汉娜·阿伦特。不久之前，阿伦特和麦卡锡已经在地铁站台上讲和了。“我们的想法有很多相似之处，”^[85]在聚会上的争吵发生五年之后，阿伦特显然是这样告诉麦卡锡的。她还在一封信中赞美了这本别人都很讨厌的书：

我必须告诉你，这本书能带来纯粹的愉悦。你写出了一本真正的佳作。恕我冒犯，但我想说这本书不仅仅是比《她选择的伴侣》好，而是根本比它高出了一个层次。

这本书的贡献之一就是拉近了“以堕落为标志的”麦卡锡和“有意识的贱民”阿伦特之间的距离。

事实证明，这两个人简直是知识分子世界里的天作之合。她们一直保持朋友关系直到阿伦特去世，中间没有过间断。两个脾气相投的女性之间的友谊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麦卡锡和阿伦特的友谊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坚韧。她们俩几乎没在同一个城市居住过，因此她们之间的友谊完全是靠书信维系的。信里的内容很是八卦，但八卦也是与她们讨论的知识问题缠绕在一起的。比如她们对朋友的书籍的看法，对彼此的作品看法等等。观点是精妙有益的东西，但它们要立足于外面的世界，并与那些持这些观点的人的人性联系在一起。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麦卡锡带着儿子和鲍登·布罗德沃特一起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多个小镇上生活过。她会给阿伦特写信描述拉夫的到访——他显然已经像被《绿洲》迅速地惹恼一样迅速地原谅了麦卡锡。麦卡锡在信中称“他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念让我觉得他仿佛是一个大洪水以前的人”。^[86]接着她继续谈论了拉夫如何“让我紧张得要命，我们好像是两个站在巴别塔上朝彼此大吼的人。不是那种充满敌意的吼叫，只是有一种疏远和相互警惕的感觉。这大概都是我的错”。麦卡锡还会抱怨所有在聚会和谈天中打断

她讲话的人。与此同时，阿伦特则从她位于纽约上西区的公寓里给麦卡锡写长长的回信，内容是对于那些所谓的“滑稽哲学家”^[87]的富有同情心的滔滔不绝的论述。她会思考苏格拉底、笛卡儿、霍布斯、康德、帕斯卡尔等，当然，还有海德格尔。

她们还会漂洋过海去探望对方。麦卡锡创作关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书时，阿伦特会和麦卡锡一起前往欧洲。阿伦特也请麦卡锡帮忙“英文化”她的作品，就像其他的朋友帮她做过的那样。在阿伦特大部分时间定居欧洲之后，麦卡锡还总是住在阿伦特在纽约的公寓中。从精神上说，她们两人是不可分割的。

与麦卡锡同时代的很多人都暗示，甚至是直白地表示自己不明白阿伦特看上麦卡锡哪一点。人们觉得她们的作品风格大相径庭：阿伦特充满了复杂的思考，而麦卡锡则直率而优雅。这已经是人们最委婉的表达了。很多人认为麦卡锡与阿伦特不是同一个级别的思想家。但阿伦特并不觉得自己的朋友在知识层面与自己有这么明显的差距。她把自己的手稿交给麦卡锡考虑和编辑，并且进行“英文化”。她们通信的内容也不是仅限于八卦消息和日常汇报，而是包含了对于小说的组成、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个人道德和公共常识等内容的争论。

尽管如今的人们回看麦卡锡和阿伦特时会将她们的归入解释事物的男性的圈子中（这两位女性在通信中称这些男性为“男孩儿”），但实际情况对于她们来说还要复杂得多。她们并没有作为“男孩儿中的一员”而被接受。尽管男性在某种程度上钦佩她们的作品，但在面对阿伦特或麦卡锡的批评时，他们也会充满敌意和防御性。公平地说，无论是麦卡锡还是阿伦特对自己圈子里的大多数男性都没有什么可恭维的。比如麦卡锡给阿伦特写信谈论索尔·贝娄（Saul Bellow）时就写道：

我听说索尔最近状况不太好，他在攻击被他称为美国机构的一群人，那其实就是指他的批评家们。他在伦敦作了一次演讲，演讲结束后，听众被要求在原位上坐十分钟（也可能是五分钟？）才可以走，这样在他坐上离开的车之前，就没人能去找他要签名了。[\[88\]](#)

关于写文章攻击麦卡锡的卡津，阿伦特这样写道：

这些人越老越糟糕，这一次他纯粹是出于嫉妒。嫉妒是魔鬼。[\[89\]](#)

这种简洁的侮辱当然不是仅仅出于女性之间的团结。无论是麦卡锡还是阿伦特都不会接受将她们的友谊定义为“女权主义”的做法。她们也不喜欢自己圈子中的其他女性。她们渴望以女性身份发表观点，但是她们从来不希望自己的性别成为一个定义她们的特征。这与她们生活的时代不无关系。另一部分原因是她们除了彼此之外，与其他人并不怎么合得来。她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建立在传统含义的姐妹情上的。如阿伦特在这段友谊开始时评论的那样，她们是两个总是“想法非常一致”的盟友。每当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与她们为敌时，这种一致的思维方式就被加固成了一套她们可以共同穿戴的铠甲。

[\[1\]](#) Eileen Simpson, “Ode to a Woman Well at Ease,” *Lear’s*, April 1990, 转引自Frances 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A Life of Mary McCarthy* (Norton, 2000), 223.

[\[2\]](#)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197.

[\[3\]](#) Elizabeth Hardwick, “Mary McCarthy in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6, 1992.

[\[4\]](#) 美国小说家，他的作品大都是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和成功的故事。

[\[5\]](#)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57), 61.

[6] *The Company She Keeps*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42) , 263.

[7] *The Company She Keeps*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42) , 194.

[8]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16.

[9] *The Company She Keeps*, 264.

[10]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102.

[11]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111.

[12]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121.

[13]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111.

[14] “Mary McCarthy in New York.”

[15]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119。

[16] Diana Trill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Journey* (Harcourt Brace, 1993) , 350-51.

[17] *The Company She Keeps*, 276.

[18] *How I Grew* (Harvest Books, 1987) , 56.

[19] *How I Grew* (Harvest Books, 1987) , 61.

[20] *How I Grew* (Harvest Books, 1987) , 78.

[21] “The Vassar Girl, ” *Holiday*, 1951, reprinted in *On the Contrary* (Noonday, 1961) , 196.

[22] *The Group* (Harcourt Brace, 1963) , 30.

[23] Elinor Coleman Guggenheimer,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67。

[24] Lucille Fletcher Wallop,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67。

[25] 位于西雅图。

[26] 1929年11月1日, 玛丽·麦卡锡写给特德·罗森堡的书信,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69。

[27] “Two Crystal-Gazing Novelists, ” *Con Spirito*, February 1933,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81。

[28] “My Confession, ” in *On the Contrary*, 80.

[29] Adam Kirsch, “What’s Left of Malcolm Cowley, ” *City Journal*, Spring 2014.

[30] *Intellectual Memoirs 1936-1938*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 9.

[31] “Coalpit College, ” *New Republic*, May 2, 1934.

[32] “Mr. Burnett’s Short Stories, ” *Nation*, October 10, 1934.

[33] “Pass the Salt, ” *Nation*, January 30, 1935.

[34] “Our Critics, Right or Wrong, Part I, ” *Nation*, October 23, 1935.

[35] “Our Critics, Right or Wrong, Part III, ” *Nation*, November 20, 1935.

[36] “Our Critics, Right or Wrong, Part IV, ” *Nation*, December 4, 1935.

[37] John Chamberlin, “Books of the Times, ”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1935.

[38] F. P. Adams, “The Conning Tower, ”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3, 1935.

[39] “Our Critics, Right or Wrong, Part V, ” *Nation*, December 18, 1935.

[40] *How I Grew*, 267.

[41] “My Confession, ” in *On the Contrary*, 78.

[42] “My Confession, ” in *On the Contrary*, 86.

[43] “My Confession, ” in *On the Contrary*, 77.

[44] “My Confession, ” in *On the Contrary*, 100.

[45] Isaiah Berlin,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46] “My Confession, ” in *On the Contrary*, 102.

[47] “Philip Rahv (1908–1973) ” in *Occasional Prose* (Harcourt, 1985) , 4.

[48] Isaiah Berlin,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121.

[49] 德怀特·麦克唐纳接受黛安娜·特里林采访, *Partisan Review*, 1984, in *Interviews with Dwight Macdonald*, ed. Michael Wreszi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3) 。

[50] “Philip Rahv (1908–1973) ” in *Occasional Prose*, 4.

[51] *Theatre Chronicles, 1937–1962*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63) , ix.

[52] “Theatre Chronicle, ” *Partisan Review*, June 1938.

[53] “Theatre Chronicle, ” *Partisan Review*, March–April 1940.

[54] “Theatre Chronicle, ” *Partisan Review*, April 1938.

[55] 纽约的一家餐厅, 以展示数百幅名人漫画而闻名。

[56] “Wartime Omnibus, ” *Partisan Review*, Spring 1944.

[57] *How I Grew*, 16.

[58] “totalitarianism” 这个单词含有七个音节。

[59] *How I Grew*, 260.

[60] *Intellectual Memoirs*, 97.

[61] David Laskin, *Partisans: Marriage, Politics, and Betrayal Among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88.

[62] Reuel K. Wilson, *To the Life of the Silver Harbo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8) , 53.

[63] *The Company She Keeps*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42) , 84.

[64] *The Company She Keeps*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42) , 112.

[65] George Plimpton,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181.

[66] 1942年5月6日,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写给埃德蒙·威尔逊的书信, 收录于*Dear Bunny, Dear Volodya: The Nabokov-Wilson Letters, 1940-1971*, ed. Simon Karlinsk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67] Pauline Kael,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181。

[68] William Abrahams, “Books of the Times, ” *New York Times*, May 16, 1942.

[69] Review by Lewis Gannett,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May 15, 1942.

[70] Malcolm Cowley, “Bad Company, ” *New Republic*, May 25, 1942.

[71] *The Company She Keeps*, 194.

[72] *The Company She Keeps*, 223.

[73] Cowley, “Bad Company.”

[74] Lionel Abel,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180.

[75] “The Weeds, ” in *Cast a Cold Eye*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50) , 35.

[76] Mary McCarthy in *Contemporary Authors*, New Revision Series, vol. 16 (Gale, 1984) ,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208.

[77] Margaret Shafer,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267.

[78]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 *Vogue*, July 1947.

[79] Alfred Kazin, “How to Plan Your Reading, ” *Vogue*, July 1947.

[80] “The Art of Fiction, No. 27: Mary McCarthy, ” *Paris Review* (Winter-Spring 1962) .

[81] *The Oasis* (Harcourt Brace, 1949) , 39.

[82] William Barrett, *The Truants: Adventures Among the Intellectuals* (Doubleday, 1982) , 67.

[83] 1949年5月3日, H. William Fitelson写给Robert N. Linscott的书信, 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84] Donald Barr, “Failure in Utopia, ” *New York Times*, August 14, 1949.

[85] 1949年3月10日, 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 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86] 1954年8月10日, 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 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87\]](#) 1954年8月20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88\]](#) 1966年10月11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89\]](#) 1965年10月20日，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第六章 帕克和阿伦特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为止的过去二十年里，多萝西·帕克主要忙于撰写剧本，只断断续续地发表过文章。不过此刻她决定重新写一些严肃的东西。她总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写作：那就是缺钱。可是当时的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难找到发表机会了。

麻烦的根源是政治性的：帕克的名字总是被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关于帕克是否具有共产党党员身份一直存在争议，不过她曾为共产党宣传机构执笔，还曾出现在共产党活动的现场。所以当美国的情绪转向反共时，帕克的名字就不停地出现在政府的调查中。1951年，联邦调查局探员第一次敲响了她的家门，她的狗一直围着探员们上蹿下跳。帕克似乎是这么告诉他们的：“你看，我连让我的狗老实待着的本事都没有。你觉得我看起来像是能推翻政府的人吗？”^[1]

要么是被帕克的魅力迷住了，要么是被帕克的名气吓住了，总之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一次也没有逮捕过她。参议员麦卡锡扬言要传唤她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接受问询。而纽约州的州委员会则真的传唤了帕克，她礼貌地提供了证词，在被问及她是否加入过共产党时，帕克使用了《宪法第五修正案》（Fif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赋予自己的权利。^[2]最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支持对帕克进行正式处罚，但她的名声依然受到了损害。不过这种在公众面前的名声受损远不如她在好莱坞遭受的实际损失严重。她突然间失去了

过去近二十年里一直拥有的稳定且丰厚的收入。她的个人生活也陷入了混乱。她开始酗酒。1947年时她已经和艾伦·坎贝尔离婚，1950年二人复婚，但是1952年他们又分居了，直到1961年才再次和好。

在这段时间里，心神不宁的帕克回到了纽约。她在一个被她称为沃尔尼（Volney）的酒店里住了下来。她与别人合著了一个名为《走廊中的女士们》（*The Ladies of the Corridor*）的剧本，内容就是关于那些像她自己一样孤身一人、年岁渐长的中老年女性的。同时，帕克还开始重新为《纽约客》写文章，不过没有哪一篇能接近她早期作品的水平。

有征兆暗示帕克连仅剩的一点才华也要耗尽了，还有征兆暗示她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1955年8月，帕克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洛丽塔》（*Lolita*）^[3]的短篇小说，其情节似乎是受到纳博科夫的同名小说的启发，尽管那本书是于帕克发表文章几周后才在法国首次出版的。帕克的《洛丽塔》也讲述了一位孤独的单身女性的女儿受到一位名叫约翰·马布尔（John Marble）的男房客色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内容怎么会与纳博科夫即将出版的小说如此相似的原因无人清楚，但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们能够得出的最好的理论是帕克是从埃德蒙·威尔逊那里听说了纳博科夫手稿的事，威尔逊已经读过了，但是并不喜欢。^[4]无论怎样解释这件事，说这是某种极端形式的健忘也好，说帕克想和一位冉冉升起的俄国小说家新星竞争也罢，总之它们都只能暗示帕克在写这个故事时的状态已经很糟糕了。

不管怎么说，帕克当时写的东西根本无法和她早期大受欢迎的那些作品相提并论了。她已经不想，也不能写出公众仍然希望从多萝西·帕克笔下看到的那种净是俏皮话的文章了。简而言之，帕克抑郁了。本奇利在1945年因心脏病去世，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比本奇利还要早一两年，他是1943年去世的。此时的纽约和二三十年代的纽约已

经不是同一个样子了。此时的帕克也不再是围绕在圆桌旁的熠熠生辉的新星之一，而是变成了某种更接近于幕后大佬的人，她显然并不适应这样的角色。

最终，帕克找到的唯一能带来稳定收入的工作是为一份刚刚重新恢复活力的名叫《时尚先生》（*Esquire*）的男性杂志写书评。帕克是这份杂志的执行主编哈罗德·海斯（Harold Hayes）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为履行与《时尚先生》签订的合同而撰写的作品是帕克一生中最后一批稳定而持续提交的作品，尽管偶尔还是会出现到交稿截止日期无法交稿的情况，但她至少保证了每年发表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并没有她早期在“永远的读书人”专栏中发表的文章所具备的那种言简意赅。它们更像是一个飘忽不定、上了年纪的心灵进行的冥想，而非早期评论中发射的那种被抛光的子弹。不过她的幽默依然隐约可见，有时候帕克会把它用在回忆老朋友上：

说到已故的罗伯特·本奇利，愿他的灵魂安息。他这个人最受不了进书店。很多人不进书店是由于遭受幽闭恐惧症的折磨，但本奇利不属于这种情况，他的烦恼源于一种巨大的、让人精神疲惫的怜悯之情。当他看到一排排、一层层闪耀的新书时，他感受不到任何喜悦，因为他仿佛能看到这些书像一个巨大无比的海浪一样朝他拍来，他似乎还能看到一种幻象，就是所有这些书的作者在完成作品那一刻的情景——他们都在对自己说：“好了，我写完了！我写出了一本书。我和我的书从此以后就会流芳百世了。” [\[5\]](#)

帕克交稿的时间还是断断续续的，编辑有时候会抱怨让她交稿得靠强迫。不过当帕克尽力写作时，她似乎还是能够享受到乐趣的。她赞美自己的老朋友们，比如埃德蒙·威尔逊；她也攻击自己的宿敌，比如埃德娜·费伯。当编辑要求她评论詹姆斯·瑟伯在几年前出版的《与罗斯一起的年头》（*The Years with Ross*）时，帕克写出了她已经多年没有写出过的精彩的文章。在回忆她曾经的老板时，她这样描述道：“他颀长的身躯好像是用粗针长线草草缝起来的，他的头发像

是豪猪身上的棘刺，他的牙齿像巨石阵，他的衣服看起来像是给别人准备的。” [\[6\]](#)

有时候，帕克似乎是想要和被她评论的非虚构类书籍的作者一较高下；人们可以感受到帕克有一种渴望投身战场，弄清一切不确定性的迫切需求。她对笔名为“不久前的托马斯（Lately Thomas）”的作者创作的一本关于麦艾梅（Aimee Semple McPherson）的书就表现出了这样的态度，她认为这本书完全可以写得更生动：

（他的出版商承认“不久前的托马斯”是一位西海岸的记者兼作家的笔名。这个名字把人们引入了一个充满奇迹的精彩迷宫，所有人都在试图弄明白他怎么选了这样一个笔名。）不管他的真名是什么，他用完全平铺直叙且严肃无趣的方式描述了一个誉满全国，不，应该说是举世闻名的事迹，对这个内容的描述本来是可以让他随时陷入难以自制的大笑中的。
[\[7\]](#)

帕克还不惜笔墨地嘲弄了沉醉于自我之中的凯鲁亚克和垮掉的一代。不过帕克总算是在这个闪耀的新世界里重新找到了明确的立足点。她受邀与诺曼·梅勒及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一起在电视节目中谈论这些年轻的新诗人。帕克抱怨说垮掉的一派的诗人们只是在“一遍一遍地重复一种毫无生气且千篇一律的日日夜夜”。[\[8\]](#)她还断言自己不是一位批评家，她在《时尚先生》的工作是“写自己的想法，然后祈求上天不要让自己摊上诽谤官司”。《新共和》的一名年轻作家珍妮特·温（Janet Winn，即后来的珍妮特·马尔科姆）看到这个节目后不无讽刺地评价道：

帕克女士已经不再拥有（如果她真的曾经拥有的话）关于她的故事中提到的那种“尖锐的机智”，她在节目中说话不多，但给人的印象还不错，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她很像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
[\[9\]](#)

帕克为《时尚先生》撰写专栏文章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62年。她评论的最后一本书是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的《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We Have Always Lived in the Castle*），她喜欢这本书，说它“恢复了我对于恐怖和死亡的所有信念。我甚至找不到更好的词来赞美这本书及其作者了”。^[10]这就是帕克作为评论家发表的最后一项内容。在她和丈夫艾伦·坎贝尔最后一次重归于好仅仅一年之后，坎贝尔就突然去世了。帕克的状况也开始严重恶化。她为《时尚先生》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艺术家约翰·科克（John Koch）的作品的。

如今写关于艺术的文章会让我感到一种深刻的难堪，很久之前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是当时我把它隐藏在一种“她又在经历艰难，女士——她吼叫、朝人吐口水，天知道她还会干什么”的表象背后。^[11]

这以后，帕克又挣扎了三年，最终于1967年6月在纽约的一个酒店房间里去世。不论从任何角度衡量，她的职业生涯都应当算是非常成功的。她去世这么多年来，人们依然能够轻易地从某篇散文或一首诗歌中分辨出她的声音；她就是那种一直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作家。在她的遗嘱中，她把自己所有文学作品的版权都遗赠给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然而常常被视为她的遗产的其实是她“深刻的难堪”。

*

1957年9月，有一张照片登上了大多数报纸的版面。照片中的内容是阿肯色州小石城（Little Rock, Arkansas）的一位十五岁黑人女孩儿走在上学路上。这个女孩儿穿着一条白裙子，戴着太阳镜，她把书本紧紧抱在胸前，脸上的表情很是决绝。她身后跟着一大群人，一个紧追着她的白人女孩儿脸上充满了愤怒和不屑，照片中的她大张着嘴，似乎正在高喊某个侮辱性的词语。

这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儿叫伊丽莎白·埃克福德（Elizabeth Eckford），是“小石城九人”之一，也就是在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判决做出后被送到小石城中心高中上学，以废止种族隔离制度的九名黑人学生之一。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威胁要阻拦废止种族隔离制度的行动，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危机。因为埃克福德家没有电话，所以伊丽莎白没收到其他黑人同学计划先集合，然后一起由护卫队陪同进入学校的通知。相反，她就那么在暴民群体的跟随下，孤身一人走着去上学了。[\[12\]](#)

汉娜·阿伦特被这张照片触动了。她后来写道：“我们不需要多少想象力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对黑人或白人孩子来说，让他们解决他们之前的几代成年人都承认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过于沉重的负担。”[\[13\]](#)但是出于对照片中的黑人女孩儿的关切，阿伦特逐渐发展出了某种反对学校普遍废除种族隔离的主张。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是一份名为《评论》（*Commentary*）的倾向左派的犹太人新杂志的主编。他邀请阿伦特为杂志撰稿，于是阿伦特就在这篇文章里论述了对这起事件的观点。

然而在阿伦特提交稿件之后，她论述的令人不安的观点在编辑内部引发了不同意见，他们为该不该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而争论不休。起初，他们计划邀请历史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写一篇回应文章，然后将其与阿伦特的文章发表在一起，以此来弱化阿伦特充满争议的论述可能产生的冲击。但是在收到了胡克的文章之后，编辑们又开始犹豫不决，一直拖着不发。气愤的阿伦特于是收回了稿件。后来悉尼·胡克还宣称阿伦特是惧怕他的批评意见才收回稿件的。但是关于学校种族隔离的斗争在1958年全年一直没有平息，阿伦特又将文章发给了另一份名为《异议》（*Dissent*）的杂志，最终该文章于1959年初被发表了。

要理解阿伦特反对学校废止种族隔离制度的本质，你必须先理解到1959年时，阿伦特坚持的是一种三分世界的政治理论，最上层是政治领域，中间是社会领域，底层是私人领域。就政治领域而言，她承认通过立法禁止歧视不仅是可接受的，更是有必要的。但阿伦特同时坚信私人领域应当受到保护，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政府入侵私人领域。阿伦特还确信政府也不应当过多参与社会领域，这样人们才可以掌控彼此之间的连接和关系。

鉴于此，阿伦特提出了歧视是正常运行的社会的固有本质，这在当代人看来多少有些难以置信。阿伦特认为，当人们在社会领域中歧视时，即当他们去购物、去上班或去上学时，他们是在“自己心里”歧视，他们只是在行使一种被调整之后的结盟自由。所以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不管怎么说，歧视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权利，就像平等是一种政治权利一样。” [\[14\]](#)

无论这种想法听起来多可怕，阿伦特都是出于善意才提出此番言论的，尽管这种善意目光短浅。她没有在这篇文章中使用“有意识的贱民”这个名词，但你还是可以将阿伦特的想法与她的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照片中孤身前行的女孩儿将要加入的是一个明确表示不欢迎她的群体，这个画面传达出的义无反顾的悲壮情绪显然让阿伦特很受困扰。她认为这是种错误的策略。拉埃尔·瓦恩哈根永远不会这样走着去上学，她会舒服自在地远离一个要求她必须被同化的社会下达的命令。阿伦特显然还表达了针对女孩儿父母的明显的愤怒，因为她认为就是他们强迫孩子走上这条注定艰难的上学之路的。

阿伦特表达的对于废止种族隔离制度问题的观点是毫无远见的。至少可以说，这种观点在当时就受到了其他人的挑战。实际上，因为阿伦特的观点必然会引起反对意见，所以在刊登她文章的版面顶部的一个方框里，编辑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不是因为我们同意其中的观点，我们的立场恰恰与之相反！但是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即便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阿伦特女士在知识界的崇高地位、她谈论的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她之前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被剥夺的事实，我们认为将她的观点，以及对她的反驳不受限制地发表出来是在造福公众。[\[15\]](#)

同时被刊登出的两篇反驳文章都是由如今已被人遗忘的学者撰写的。其一是一位政治科学教授，尽管他完全不同意阿伦特的论断，但是他对于阿伦特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的。另外一篇文章的作者是社会学家梅尔文·图明[Melvin Tumin,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曾经反复提到图明就是启发他后来的小说《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中科尔曼·西尔克(Coleman Silk)这一角色的原型]，他在文章开头就大声疾呼：“起初，人们会以为这是个糟糕的玩笑。”[\[16\]](#)接下来，图明一直延续了这种惊骇的口气，最让他诧异的莫过于一个像阿伦特这样杰出的思想家怎么会反对终止种族隔离制度。他的论述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考虑到阿伦特遭受情绪化的谬论攻击次数之多，这篇文章竟然还能给她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她在《异议》给她安排的反驳这些批评的版面上开篇就指出：“作为我的两位对手之一，图明先生在他那篇驳斥文章中采用的口气已经超出了探讨和对话的限度。”

也有一种可能是，尽管阿伦特鲜有道歉的时候，但她其实已经开始改变看法了。她最终会遇到一个连她也忍不住听从的对话者：散文家和批评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艾里森更著名的身份是《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的作者。他对阿伦特观点的第一次挑战其实出现在他对《异议》当时的编辑，欧文·豪(Irving Howe)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反驳中。他评价说阿伦特与豪都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17\]](#)但是他要说清楚的是，这两位白人作家都没有资格主张这种权威。后来艾里森在接受罗伯特·佩恩·沃伦

（Robert Penn Warren）采访时详细阐述了自己为什么不同意阿伦特的观点：

我相信〔美国黑人〕经历的意义的线索之一存在于这样一个理念中，那就是牺牲的典范。汉娜·阿伦特无法理解这个典范在南方黑人中的重要性，所以她在自己发表于《异议》杂志上的《回顾小石城事件》

（*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中提出了一些非常古怪的观点，也就是指责黑人父母在废止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利用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根本不知道黑人父母让自己的孩子走过那些充满敌意的人群排成的长队时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明白这样的仪式中的暗示对于他们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这些孩子要抛开一切传说和假设，直面社会生活中切实存在的恐怖。在很多黑人父母看来（尽管他们也希望现实不是如此），正因为他们是黑人，所以他们的孩子注定要面对这些恐惧，并学会控制自己的恐惧和怒火。一个黑人必须学会控制因为自己的种族而出现的内心情绪，如果他受到了伤害，那么他只不过是又一次牺牲。这是一个严苛的要求，但是如果他无法通过这个最基本的测试，他的人生只会更加艰难。

[\[18\]](#)

贱民的典范是可以避开社会生存下去，但是对于生活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南方的黑人来说，这个选项根本不存在。和自己的同类团结在一起，从自己的不同中汲取力量的做法在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环境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论述令人信服，起码是足以让阿伦特亲自给拉尔夫·艾里森写信承认对方的观点：“我认为你的评论完全是对的，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根本不了解这个情况的复杂性。” [\[19\]](#)苏珊·桑塔格后来会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上下文中讽刺地写到，阿伦特犯下的正是一个人在看到一张照片时会犯下的典型错误。她以为一张埃克福德的照片就足够让她理解民权斗争，就足够让她对别人的对策品头论足了。

在写了《回顾小石城事件》，以及随后一篇观点类似的《教育的危机》（*Crisis in Education*）之后，阿伦特似乎意识到自己起码应当作出一点让步了。不过她同时也在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她不仅给艾

里森写了那封信，还在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纽约客》上首次发表名为《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的文章之后，写信给后者谈论政治的本质。^[20]（她写到自己被他的“爱的福音吓到了”，^[21]尽管她还说自己写这封信是带着“真诚的赞赏”。）至少有一位黑人学者始终认为阿伦特的好奇带着一种“家长式作风”。^[22]阿伦特似乎并没有任何黑人朋友，她也没有特别专注于民权斗争。时至今日，她作为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高到当她对什么事发表观点时，她的观点总是带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在阿伦特的余生中，人们会一直将她视为这样的权威。她一直都是那种居高临下地发表观点的人。不过她的铠甲上已经出现了一条缝隙，在亮光下细看的话，这条缝隙还将越变越宽。

^[1] Marion Meade, *Dorothy Parker: What Fresh Hell Is This?* (Penguin, 1988), 699.

^[2] 《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指“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

^[3] “Lolita,” *New Yorker*, August 27, 1955.

^[4] 参见Galya Diment, “Two 1955 Lolitas: Vladimir Nabokov’s and Dorothy Parker’s,” *Modernism/Modernity*, April 2014.

^[5] “Book Reviews,” *Esquire*, May 1958.

^[6] “Book Reviews,” *Esquire*, September 1959.

^[7] “Book Reviews,” *Esquire*, June 1959.

^[8] Harry Hansen, “The ‘Beat’ Generation Is Scuttled by Capote,” *Chicago Tribune*, February 1, 1959.

^[9] Janet Winn, “Capote, Miller, and Miss Parker,” *New Republic*, February 9, 1959.

[10] “Book Reviews, ” *Esquire*, December 1962.

[11] “New York at 6: 30 p.m. ” *Esquire*, November 1964.

[12] 此处的细节参考Christine Firer Hinze, “Reconsidering Little Rock: Hannah Arendt,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the Struggle for Justice, ”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 Spring/Summer 2009.

[13] “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 ” *Dissent*, Winter 1959, 50.

[14] “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 ” *Dissent*, Winter 1959, 51.

[15] “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 ” *Dissent*, Winter 1959, 46.

[16] Melvin Tumin, “Pie in the Sky…” *Dissent*, January 1959.

[17] “The World and the Jug, ” in *Ralph Ellison, Shadow and Act* (Random House, 1964) , 108.

[18] Ralph Ellison, 转引自Robert Penn Warren, *Who Speaks for the Negro?* (Random House, 1965) , 343.

[19] 1965年7月29日, 汉娜·阿伦特写给拉尔夫·艾里森的书信, 出自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316。

[20] “Letter from a Region in My Mind, ” *New Yorker*, November 17, 1962.

[21] 1962年11月21日, 汉娜·阿伦特写给詹姆斯·鲍德温的书信, 可见于<http://www.hannaharendt.net/index.php/han/article/view/95/156>。

[22] Kathryn T. Gines, *Hannah Arendt and the Negro Ques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 5.

第七章 阿伦特和麦卡锡

1960年，阿伦特给自己曾经的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写信说，尽管她如今忙得分身乏术，总是到各处讲学，根本没有时间探望朋友，但她还是打算空出一大块时间，前往以色列旁听一场审判。阿伦特在信中写道：“我要去亲眼看看这个行走的灾难，这个古怪的行尸走肉，我不想通过印在报纸上的文字了解这一切，否则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不要忘记我多早就离开德国了，我直接经历的已经非常少了。” [\[1\]](#)

这个“行走的灾难”指的就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当年5月，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摩萨德（Mossad，即以色列情报及特别行动局）特工绑架并带回以色列接受问询和审判。艾希曼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纳粹战犯，以至于时任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决定不依靠正规的引渡程序将其带回。艾希曼曾是一位高级别的党卫军军官，领导着执行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的部门。不过，艾希曼在战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使用伪造的文件逃到了奥地利，然后又用这些文件从红十字会获得了护照。从1950年起，他一直使用假名生活在阿根廷。

艾希曼的被捕从一开始就是全世界媒体关注的轰动事件，绑架的戏剧性方式意味着充满戏剧性的新闻报道。不过当时也正是西方终于开始重视最终解决方案的时期。在纽伦堡审判中，最终解决方案曾经被反复提及，艾希曼的名字也经常出现。但是有些人觉得纽伦堡审判

对于纳粹分子针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的处理并不够彻底，以色列人对此的体会尤其深刻。所以当艾希曼根据以色列1950年颁布的《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Nazis and Nazi Collaborators (Punishment) Law] 被指控十五项罪名时，很多人将此视为一个纠正过去错误的机会。控方律师做足了文字工作，他在开庭陈述中宣称自己是在代表逝去之人提出控诉。他还承诺说：“我将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以他们的名义，宣读这份令人敬畏的起诉状。”

毫无疑问，至少就以色列人指控他的那些罪名来说，艾希曼是难以推脱的。在审判之前，艾希曼已经接受了长达数月的审讯。以色列人有成百上千页的文件。但艾希曼仍然表示“对起诉书中的罪名不服罪”。他的辩护理由是自己协调谋杀数百万人的后勤工作只是在服从上级命令。实际上，当被传唤出庭作证时，艾希曼宣称“我从未杀过一个犹太人，也没杀过非犹太人——就这一点来说，我从未杀死过任何人”。^[2]简言之，他宣称因为自己的职衔很高，没有接触过切实的杀戮行为，所以也没有理由感到愧疚。

对艾希曼的审判会持续五个月。阿伦特从1961年4月开庭第一天就到场了。当时，帕克的老朋友哈罗德·罗斯已经去世，接替他成为《纽约客》总编的人是个子不高、矜持寡言的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阿伦特问肖恩自己是不是可以写一些关于审判的东西。阿伦特对肖恩说的肯定不会像她对雅斯贝尔斯说的那么多，她只是说自己“非常想要”^[3]前往，以及她想知道肖恩是否有意愿接收一两篇文章之类的。阿伦特旁听审判时显然一直认为被告就是一个“古怪的行尸走肉”。她旁听了一部分审判，没能旁听的部分则依靠阅读庭审记录补全。结果是阿伦特越来越确信自己的观点。艾希曼的空洞让她着迷，就是这种空洞引发她提出了如今看来可能是她最著名的，但也最充满争议的论点：即“平庸的恶”的概念。

理解这个词的最好办法可能是要先接受阿伦特对于艾希曼的看法，她对这个人的姿态和行为的解释在后来一直饱受争议。不过对她来说，艾希曼是一个谜，是傲慢和无知的致命组合。阿伦特对一份德国报纸上刊登的艾希曼回忆录节选非常着迷，艾希曼在其中叙述自己的出身和地位时使用了一种只能被称作最没有自知之明的方式。在一个典型的段落中，他拘谨地宣称“我本身不仇恨犹太人，因为我从父母那里接受的教育一直是严格的基督教信条；我母亲的亲属中也有犹太人，所以她持有的观点与党卫军圈子中被普遍接受的那些是有区别的”。^[4]这些段落的腔调让阿伦特觉得既困惑又可笑。她抱怨说这些段落中的喜剧性已经远远超越了荒诞的界线，直接升级为令人惊悚了。阿伦特质问：“这是选错信仰的教科书式案例吗？是典型的自欺欺人和愚蠢透顶的结合吗？还是说，这就是一个永远不知悔改的罪犯的样子？……一个因为自己的罪行已经成了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法面对现实的人。”^[5]

尽管抱有困惑，但阿伦特还是明确表示她相信艾希曼是罪大恶极的。她把自己的观点写进了1962年发表于《纽约客》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系列文章中，后来又将这些文章集合在一起出版了同名著作。但是阿伦特也相信在艾希曼心中形成的自我欺骗在纳粹德国是一种普遍的情况，群体妄想正是让极权主义如此强大的因素之一。巨大的邪恶与渺小的个人形成的对照让阿伦特深受触动：

鉴于此，人们必须认真地对待他，这是至关重要的，但也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有人选择最简单的办法来解释行为具有的无法形容的恐怖和实施这些行为的人表现出的无可否认的荒谬愚蠢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特性之间的难题，即宣称他是一个聪明透顶，善于算计的骗子——但他显然不是。

就艾希曼的性格形成一个连贯清晰的理论是有困难的，阿伦特当然也提出了她认为的一些原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后的半个世纪里，艾希曼的性格和人生经历引发了极大的争论，就阿伦特宣称

的观点进行争论的著作足够摆满图书馆的一整个书架。很多人把通过引证史料来证明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评价有误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成果丰富的研究领域，因为至今人们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愚蠢与否是观察者自己的判定。不过这些批判背后的动机往往是基于同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与阿伦特竭力论证的那些观点一样让人无法忽视：从某种程度上说，阿伦特是不是在通过暗示艾希曼不够聪明，不善于算计来为他减轻大屠杀的罪责？

对此，主流评论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人们认为阿伦特确实减轻了艾希曼的罪责。《纽约时报》的编辑邀请艾希曼审判的见证者之一——法官迈克尔·马斯曼诺（Michael Musmanno）来评论这本书。马斯曼诺指责阿伦特“同情艾希曼”，^[6]称她是在为艾希曼的无辜做辩护：“她说惩罚艾希曼完全是一个可怕的错误！”然而阿伦特没有同情艾希曼，也没说过惩罚他是个错误，绝大部分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她的朋友们立即给读者来信版面写文章支持阿伦特，诗人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就是其中之一。他写到他肯定有人能写出更好的“逐字逐句的反驳”，但是他“只想说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几乎与〔马斯曼诺的〕正相反”。^[7]

知识分子对这本书发起攻击的理由各不相同。阿伦特在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她认为“完整的真相其实是这样的，如果当时的犹太人真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局面可能会陷入混乱，也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幸；但受害者的数目几乎肯定不会达到450万至600万”。^[8]阿伦特在这里指的是犹太居民委员会（Judenräte），即纳粹在强迫犹太人聚居的区域里建立的委员会。不同地方的犹太居民委员会具有不尽相同的结构和职责，但它们的众多职责之一是为纳粹提供犹太人名单。有时候，它们甚至会指导警察如何将犹太人集中起来，统一运送到集中营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学者们才刚刚开始撰写关于大屠杀的恰当的历史。劳尔·希尔贝格（Raul Hilberg）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s*）直到1961年才得以出版，这本书至今仍被广泛当作教科书使用。希尔贝格将重点放在了协助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行政机构上；鉴于此，他的书中包含了对犹太居民委员会的详细叙述，还有一段关于艾希曼作为一个普通官僚的描写。阿伦特在报道审判期间读了希尔贝格的书，书中记录的史实显然对她产生了很大影响。^[9]她在写那句受害者的数目“几乎肯定不会”那么多的论断时，脑子里肯定就在想着希尔贝格的书。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读过希尔贝格的书，而且阿伦特的论断让很多读者感到震惊，尤其是犹太人读者。他们认为阿伦特太随意、太冷酷无情，用今天的话说，她可能会被认为是在“责怪受害者”。阿伦特的观点当然比这一行文字能够表达的含义复杂得多。即便是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她也是在反复论述这个问题。她确实提到“犹太人领袖在自己人民遭受毁灭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故事中最黑暗的一章”。^[10]但是她也写到就最终解决方案分摊责任的问题是“冷酷无情且愚蠢的”。^[11]她想要寻找的是一个能够让这两种观点协调的立场，但是她并没有明确地将二者关联起来。

这导致了一些问题。阿伦特谈论这些归责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出现在了艾希曼的审判中，但是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变成了比法庭上说过的任何内容都更具爆炸性、更引发争议的东西。她的批评者们指责她在彻底重新校准天平，指责她对艾希曼过于友善，对犹太人则过于严格。已经成为《评论》杂志主编的诺曼·波德霍雷茨就写了一篇激烈批判的评论：

就这样，在谈论罪大恶极的纳粹的时候，她告诉我们那是“平庸的”纳粹；在谈论作为道德高尚的殉难者的犹太人时，她告诉我们那是邪恶的

同谋者；在谈论罪孽深重与纯洁无辜的正面对决时，她告诉我们那是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勾结。^[12]

波德霍雷茨是在夸大其词。不过他认为阿伦特因为受犹太居民委员会问题影响而在道德层面上出现了偏差的观点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同。另一位坚持不懈地批评阿伦特的人是莱昂内尔·埃布尔，他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也紧抓着这个论点不放。根据埃布尔的说法，问题在于阿伦特“从审美角度上”认为艾希曼很有意思，犹太居民委员会却远不及他。（实际上，阿伦特用了大量篇幅论述犹太居民委员会。）埃布尔写道：“如果一个人用枪指着另一个人的头，并要求他去杀死自己的朋友，那么从审美角度上说，这个用枪威胁别人的人并不及那个因为担心自己有生命安全而杀死朋友，最终甚至也没保住自己性命的人丑恶。”^[13]埃布尔的论点是，阿伦特对艾希曼感兴趣归根结底不过是因为他能够成为她书中更有意思、更丰满的角色，这一点让她的论述的说服力打了折扣。

并不是只有阿伦特的宿敌们才这样想。埃布尔和波德霍雷茨提出的关于基调的问题，也是阿伦特的老朋友格肖姆·索罗姆直言不讳地指出的问题。索罗姆还在柏林时就认识阿伦特和本雅明了，但是他后来成了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于1923年迁居以色列。他在那里成了一名犹太神秘主义方面的学者，尤其专注于卡巴拉（Kabbalah）^[14]的研究。他与阿伦特之间一直维持着友好的通信，但是他在1963年给阿伦特的信中表达了极端的失望。他指出的最主要的问题正是基调问题。他觉得这本关于艾希曼的书表达的情绪太过轻率无礼。索罗姆在给阿伦特的信中写道：“你表达这些观点的口气不恰当得令人难以置信。”^[15]本质上，索罗姆要求阿伦特能对犹太人有点感情，有点忠诚。这封原本是私人之间的书信后来还被公开发表了。

在给索罗姆的回信中，阿伦特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她不能接受批评者们认为她缺乏基本的同情心，也就是她在给索罗姆或其他

人的信中提到的认为她没有“灵魂”^[16]的说法。她也不能接受索罗姆提出的因为她是犹太人，她就对犹太人负有索罗姆恳求她承担的责任的前提。阿伦特辩论说：“我确实‘只’爱我的朋友，我唯一了解的和信仰的爱就是对单个人的爱。我不能爱我自己，或任何我明知是让我成为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东西^[17]。”^[18]

索罗姆询问过阿伦特自己是否可以将他们之间的通信内容发表出来，阿伦特以为他是指以色列发表，但令她意外的是，索罗姆把这些信交给了《文汇》月刊（*Encounter*）。这是一本在英美知识分子群体中广受欢迎的杂志。《文汇》拥有相当雄厚的资金实力，后来被证明它曾经与中央情报局的反共宣传有关。就这样，如阿伦特后来在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的的那样，索罗姆的信“让尚未受谎言的流行病波及的那部分人口也被感染了”。^[19]

阿伦特并不是一个这么容易就受伤的人。她带着某种困惑，甚至是置身事外的超然看着如雪崩一样铺天盖地的批评。她在给玛丽·麦卡锡的信中提到埃布尔的评论时说：“这篇文章只是政治动员的一部分，这根本不是文学批评，甚至根本不是关于我的书的。”^[20]麦卡锡同意她的说法，但她同时也把这件事看成一个体现政治联盟的场合，于是她立即主动提出要写一篇忠于阿伦特的驳斥文章，尽管她其实还没怎么看阿伦特的这本书。

在这整件事中，个人因素是很难被抛开不谈的。阿伦特告诉麦卡锡：“最让我意外和震惊的是，竟然有这么多憎恨和敌意潜伏在那里，只等待一个爆发的机会。”^[21]阿伦特的信中确实没有什么内容暗示她此前知道自己圈子里的一些人认为她傲慢专横，她也不知道埃布尔，可能还有其他人在背后称她为汉娜·自大狂的事，她更不知道索尔·贝娄为了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坚称阿伦特看起来像“乔治·阿利斯（George Arliss）扮演的迪斯雷利（Disraeli）^[22]”。^[23]

但阿伦特是个精明的人。她的作品及她所有的理论阐述都不是建立在抽象的逻辑上，而是建立在个人观察上。没有什么能够影响到她，尤其是嫉妒、小气和冷酷之类的阴暗人性更不被她放在眼里。其他人会因为这些不安全感而对知识诚信发起猛攻这种事，对于一个写出了《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人来说根本不在意料之外。

*

对于麦卡锡来说，1963年也是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年，但是这种成功很快就变味了。不过与固执的阿伦特不同，麦卡锡更易于在失败的打击下消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她一直在写一本长篇小说。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总是被打断，但是到了1962年末，出版商威廉·乔万维奇（William Jovanovich）变得无比执着于这本书，所以他向麦卡锡支付了一大笔预付款，要求她完成这部作品。麦卡锡利用了这个机会，到1963年9月，封面上印着几朵雏菊的成书终于上市，并立即成了出版商认定它会成为的那种畅销书。

这本名为《她们》的书讲述了贯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八位女性到纽约打拼，以妻子和职业女性的身份经历对于她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但还没有彻底自我解放的女性来说完全崭新的十年的故事。著名的巴尔比宗酒店（Barbizon Hotel）始建于1927年，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为了给突然涌入纽约，占据了城中的秘书职位的众多满怀雄心壮志的年轻女性提供住处的。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获得一份工作就像是进入一间女子精修学校，她们只是在这里等待婚姻的降临。麦卡锡对这八位女性生活的记述世俗但不世故，这本书是讲述同类故事的作品中最早的一本之一。《她们》中的角色都符合某一种特定的类型，比如平凡的多蒂·伦弗鲁（Dottie Renfrew），圆滑的莱基·伊斯特莱克（Lakey Eastlake）和“富有而懒散”的波基·普罗瑟罗（Pokey Prothero）。书中记述了她们的恋爱失败、生儿育女，还有狂喜和失

去，直到她们之中的一个人，凯·斯特朗（Kay Strong）在四十年代自杀身亡为止。这个角色身上有一些与麦卡锡的人生相似的经历。其他角色则体现了麦卡锡在瓦萨学院的某些同学的特征。

《她们》作为一本小说并不成功。这本书的腔调是调皮的，但不带有批判；叙述者的清晰智慧和其对书中人物心理的相对简单的分析不怎么搭配。早期的《她选择的伴侣》中那种敏锐的自我审视已经不见了，那种让麦卡锡出名的挖苦的、尖锐的语气也不见了。麦卡锡在知识分子和文学圈子中的朋友几乎都不能忍受这本书的油腔滑调和偶尔出现的夸张情节，以及相对的一本正经。罗伯特·洛厄尔给伊丽莎白·毕晓普写信时就预言道：“看了这本书的人都不喜欢这本书，我很害怕看到《纽约书评》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评论。”^[24]

洛厄尔提到的不是《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而是当时刚刚兴起的一份名叫《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杂志。1963年1月，洛厄尔及妻子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联合洛厄尔的朋友，编辑贾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及其妻子芭芭拉（Barbara）共同创办了这份刊物。他们本来没有多少资金来启动一份文学杂志，但是因为诸如《纽约时报》、《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和《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等许多报社当时都在遭受工人罢工的困扰，其他一些出版机构也已经停工数月，连带着那些刊物上的书评也无处可寻了，《纽约书评》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纽约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人本来就不怎么喜欢《纽约时报》上的书评，和几年前的麦卡锡，以及更久之前的丽贝卡·韦斯特一样，伊丽莎白·哈德威克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书评状况的长篇批评文章。这篇1959年发表于《哈泼斯杂志》上的文章还经常被看作是创办《纽约书评》的公开宣言。哈德威克写道：

平淡无味的赞美和微弱模糊的异议，最有限的风格和最无足轻重的短小篇幅，缺乏参与、激情、性格、特别之处，最重要的是缺乏文学基调这一点已经让《纽约时报》变成一份偏狭的文学报刊，除了更长更厚之外，它和小城镇里的《星期天图书版》（*Sunday Book Pages*）没有什么区别。[\[25\]](#)

麦卡锡显然同意这个观点，二十多年前，她在《国家》上发表《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系列文章时就明确地表达过类似的态度。所以，当哈德威克和洛厄尔问她的时候，麦卡锡主动提出为这份1963年初刚起步的杂志的第一期免费供稿，内容是评论威廉·S. 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麦卡锡喜欢这本书，尽管这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她称之为“第一本严肃的科幻小说”。[\[26\]](#)

然而这也是随后几年中她为《纽约书评》贡献的最后一篇文章。因为《她们》出版后，《纽约书评》上刊登了两篇对该书的评论，其一是相对直接的评论，作者是诺曼·梅勒；其二是模仿原著创作的诙谐模仿文，作者的笔名是泽维尔·普林（Xavier Prynne）。

如今的人很难想象当时的诺曼·梅勒在他职业生涯中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仅仅获得过一次巨大的商业成功：他的第一部小说，1948年出版的《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然而他接下来出版的小说都被评论家和公众所厌恶。经过几年的落寞之后，他发表了一部论文集兼自传，题目不带一点讽刺地叫作《为我自己做广告》（*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这本书详细阐述了梅勒本人对名声和更广大的读者群的渴望。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在《国家》上发表评论称：“如果梅勒的新书中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感到惊慌的话，那就是他对取得公认的成功痴迷。”[\[27\]](#)事实上，1963年的诺曼·梅勒可以算是有些名气了。不过他最为人知的可能是

1960年秋天他在一个聚会上刺伤妻子，后来就殴打和侵犯人身罪认罪的事。

1962年秋天，梅勒还和麦卡锡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争吵。理论上说，他曾经是麦卡锡的崇拜者，他在上大学时就读过《她选择的伴侣》，而且麦卡锡在文字上表现出来的样子与他理想中的作家完全吻合。梅勒在晚年时告诉麦卡锡的一位传记作者说：“她（在那本书中）展现自己的方式后来再没有出现在她其他的作品中，她是在允许读者了解她。”^[28]不过梅勒还说自己直到1962年8月和麦卡锡一起出席在爱丁堡举行的作家集会之前都与她没有过什么交集。当年的集会气氛特别紧张。麦卡锡给阿伦特写信说：“最显著的事实是，无论是在讲台上还是在人群中都有不少疯子。老实说，我非常享受这次经历。”^[29]在这场混乱中，好斗的梅勒向麦卡锡提出挑战，要她和自己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辩论。麦卡锡拒绝了，梅勒为此很生气。

鉴于此，当《纽约书评》的编辑邀请梅勒评论《她们》的时候，他们肯定已经预料到对方会写些什么。

她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写出一本重要小说的女人，至少现在还不能；她失败了，从里到外彻底地失败了。她败给了虚荣——因为多年来人们对于她的有限的才华的过度赞美以及她为自己取得的可怜的成绩沾沾自喜而积累的虚荣；她败给了根深蒂固的胆怯——像任何从小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好女孩儿一样，她不敢释放出心中的恶魔；她还败给了势利——就算她最终在作品里显露了一些对那些角色的同情，她依然不能接受任何无法把小动作也做得很精致的人；她的想象是失败的，毕竟，她脑子不太灵光，她的愿景有些荒唐，她的诉求也显示出自鸣得意，这都是造成她的风格失败的原因。^[30]

麦卡锡对于梅勒不喜欢这本书并不意外。远比这更让她担心的其实是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纽约书评》的执行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在想什么，因为她知道正是这两个人邀请梅勒

来写书评的。实际上，在梅勒的评论被刊登出来的前一周，《纽约书评》上已经刊登了泽维尔·普林效仿《她们》创作的诙谐模仿文，其中提到了与梅勒指出的麦卡锡的罪过相似的问题。关于这篇诙谐模仿文的细节只有那些逐字逐句地研读过《她们》的人才能体会，普林显然就这样做了。值得记住的是麦卡锡最终的发现：原来泽维尔·普林就是伊丽莎白·哈德威克。

哈德威克只比麦卡锡年轻一点儿，她的家乡是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Lexington, Kentucky）。1939年，她作为研究生来到纽约。与麦卡锡一样，哈德威克也因为在极度礼貌的表象下隐藏着毁灭性的恶意而出名。这还不是她和麦卡锡唯一的共同之处。与《党派评论》的那群人结交之后，哈德威克也成了菲利普·拉夫的情人。哈德威克做的很多事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麦卡锡已经先于她做过同样的事了。不过至少在泽维尔·普林事件之前，麦卡锡似乎并没有把哈德威克视为对手。直到这次关系破裂前不久，她们还在给对方写长长的、友好的、令人愉快的书信。

作家们出于平常的友好关系相互评论彼此作品的事很常见。无数被公之于众的书信内容都显示，哪怕是在各方面都很友好的作家之间，也会存在关于某篇小说或某首诗歌的意见分歧。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哈德威克的这个举动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更奇怪的是，她之前还在给麦卡锡的私人信件里赞美过这本书，尽管言辞并不算热烈：

我想说恭喜你。我非常高兴你写完了这本精彩的作品，也很高兴这本书一定能为我赚很多钱，我们“都知道你一定行！”……这样的成就太了不起了，玛丽。[\[31\]](#)

然而哈德威克在写这封信时肯定已经想好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因为她在不到两个月之后就发表了那篇诙谐模仿文。麦卡锡给阿

伦特写信说：“那些我以为是朋友的人竟然会邀请公然宣称是我的敌人的人写评论让我觉得奇怪。至于那篇诙谐模仿文，他们到今天也没跟我提及，可能是希望我不会发现。”^[32]让麦卡锡感到特别受困扰的原因是在这整个期间，《纽约书评》的编辑们一直在反复向她约稿，如果她提供了稿件，那么她的散文就可能被和这篇批评她作品的文章刊登在一起。哈德威克试图道歉。她在自己的诙谐模仿文被发表几周后给麦卡锡写信：“我为我的文章感到非常抱歉。我当时就想表达这些想法，我们回不到它被发表之前了，但是我本来只想搞一个简单的恶作剧，我没有别的意思。”^[33]这样的道歉不足以让麦卡锡满意。在接下来的四年里，麦卡锡没有和哈德威克说过话，也没有为《纽约书评》提供过稿件。

所有这些事不禁让人想到一个明显的问题：是麦卡锡不能承受人们对她发表的作品看法吗？另一个在她的传记中流传的故事是关于另一位《纽约书评》群体中的成员，如今已经基本被遗忘的批评家弗雷德·杜佩（Fred Dupee）的。麦卡锡曾经和杜佩一起参加某个聚会，当时麦卡锡对他说自己听说他不喜欢这本书。戈尔·维达尔这样讲述这个故事：

弗雷德以非常礼貌、优雅，而且一点不好斗的语气回答：“是的，玛丽，我不喜欢。”接着麦卡锡又犯下了第二个错误，她问：“你为什么不喜欢？”弗雷德回答说：“嗯，那要说的可多了。不过，你这样一个以高得离谱的标准要求别人的批评家自然也应当准备好让别人以同样的标准衡量你。”麦卡锡听到这话后就哭了。^[34]

麦卡锡对于其他一些批评家就她的书作出的批评还是能够泰然处之的。她告诉自己在《纽约客》的编辑说，一封写满了对《她们》的批评的书信其实会让她感到高兴：“我喜欢你费这么大力气让我知道真相。”^[35]与此同时，《她们》依然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作品。几年之后，好莱坞的制片商就把小说改编成了电影，这也让麦卡锡成了真

正有名气的作家，更挽救了她在过去很多年里一直相当糟糕的财务状况。

不过麦卡锡还是对朋友们说她确定这本书把她毁了，她甚至后悔写这本书。她早知道书卖得好会让她的圈子里那些还在挣扎求生的雄辩者和诗人们感到嫉妒。与她在自己作品中写到的那种强大的性格不同，麦卡锡容易感到受伤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一个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那是她在读了《她们》的第一章，以及兰德尔·贾雷尔的讽刺校园小说《大学图景》（*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其中有一个角色以麦卡锡为原型）的摘录之后得出的：

哦，可怜的姑娘，真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她一直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就是她的问题。她总是装成别的什么人，但是她无法让自己或他人相信她的表演。当我了解她之后，我总是在被她激怒和为她感动两种情绪之间纠结——因为那时她表现出来的虚荣自负既浪漫又哀伤。[\[36\]](#)

同样是在1963年秋天出版，另一本同样由女性作者创作的小说却获得了所有麦卡锡曾经习惯获得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荣耀。这部作品相当前卫，它对于传统的情节推进和角色发展的抵制使其刚好成了《她们》的对立面。这本书的书名是《恩主》（*The Benefactor*），这本书的作者在纽约还鲜为人知——她的名字叫苏珊·桑塔格。

[\[1\]](#) 1960年12月2日，汉娜·阿伦特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书信，in *Correspondence: 1926-1969*.

[\[2\]](#) *Eichmann in Jerusalem* (Penguin, 1963), 22.

[\[3\]](#) 1960年8月11日，汉娜·阿伦特写给威廉·肖恩的书信，转引自 http://www.glennhorowitz.com/dobkin/letters_hannah_arendt-william_shawn_correspondence 1960-1972。

[\[4\]](#) *Eichmann in Jerusalem*, 30.

[5] *Eichmann in Jerusalem*, 51-52.

[6] Michael A. Musmanno, “Man with an Unspotted Conscience, ” *New York Times*, May 19, 1963.

[7] 罗伯特·洛厄尔写给编辑的来信, *New York Times*, June 23, 1963。

[8] *Eichmann in Jerusalem*, 125.

[9] 希尔贝格宣称阿伦特欠他一个大大的致谢, 他确信后者剽窃了他的作品。参见Nathaniel Popper, “A Conscious Pariah, ” *Nation*, March 31, 2010。

[10] *Eichmann in Jerusalem*, 117.

[11] *Eichmann in Jerusalem*, 12.

[12] Norman Podhoretz, “Hannah Arendt on Eichmann: A Study in the Perversity of Brilliance, ” *Commentary*, September 1, 1963.

[13] Lionel Abel, “The Aesthetics of Evil: Hannah Arendt on Eichmann and the Jews, ” *Partisan Review*, Summer 1963.

[14] 卡巴拉是与犹太哲学观点有关的思想, 用来解释永恒的造物主与有限的宇宙之间的关系, 旨在界定宇宙和人类的本质、存在目的的本质, 以及其他各种本体论问题。

[15] 1963年6月22日, 格肖姆·索罗姆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 reprinted in “Eichmann in Jerusalem: An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Gershom Scholem and Hannah Arendt, ” *Encounter*, January 1964.

[16] 参见, 例如: “Don’ t tell anybody, is it not proof positive that I have no ‘soul’ ? ” 出自1964年6月23日, 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 in *Between Friends*。

[17] 指犹太人身份。

[18] 1963年7月24日, 汉娜·阿伦特写给格肖姆·索罗姆的书信, in “An Exchange of Letters” 。

[19] 1963年10月20日, 汉娜·阿伦特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书信, in *Correspondence: 1926-1969* (Harcourt Brace, 1992), 523。

[20] 1963年9月20日, 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 in *Between Friends*。

[21] 1963年9月20日, 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 in *Between Friends*。

[22] 《迪斯雷利》是一部1929年上映的电影, 乔治·阿里斯在其中饰演外交手腕高超, 为英国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

[23] Saul Bellow,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354。

[24] 1963年8月12日, 罗伯特·洛厄尔写给伊丽莎白·毕晓普的书信, in *Words in Air: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lizabeth Bishop and Robert Lowell*, ed. Thomas Travasino and Saskia Hamilt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489。

[25] Elizabeth Hardwick, “The Decline of Book Reviewing,” *Harper’s*, October 1959.

[26] Mary McCarthy, “Déjeuner sur l’herb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 1963.

[27] Gore Vidal, “The Norman Mailer Syndrome,” *Nation*, October 2, 1960.

[28] Norman Mailer,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189。

[29] 1962年9月28日, 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 in *Between Friends*。

[30] Norman Mailer, “The Mary McCarthy Cas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12, 1963.

[31] 1963年8月3日,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 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32] 1963年10月24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

[33] 1963年11月20日，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34] Gore Vidal，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525。

[35] 玛丽·麦卡锡写给Katharine White的书信，转引自Kiernan，524。

[36] 1954年2月22日，伊丽莎白·毕晓普写给Pearl Kazin的书信，in *One Art: Letter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Robert Giroux*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4)，288-89。

第八章 桑塔格

非常年轻且非常严肃的苏珊·桑塔格作为作家的首秀不能更与众不同了。《纽约时报》的评论家称《恩主》是一本“以流浪汉冒险为内容的反小说”，^[1]尽管这句话的本意是种赞美，但是它对于提高作品的销量并无太大作用。整本书是靠一位六十岁的男性叙述者希波吕特（Hippolyte）的叙述推进的，他居住在巴黎，过着某种波希米亚风格的生活。他的叙述总是离题，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想法中。后来，桑塔格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过，她是在尝试描绘“从美学角度审视生活的归谬法——也就是唯我论意识”，^[2]不过在描述唯我主义时，她可能过于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中了。

不是所有读者都能够进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很可能就是《恩主》无法取得经济上的成功的原因。即便如此，当桑塔格的出版商将这本书送给阿伦特以征求她的意见时，阿伦特还是写下了很高的评价：

我刚刚读完桑塔格女士（Sonntag，阿伦特拼写桑塔格的名字时多写了一个“n”）的小说，我认为它精彩绝伦。请接受我诚恳的祝贺：你们可能发现了一位重要的作家。当然，她非常有独创性，她已经从法国文学那里学会了如何利用这种独创性。这很好。我尤其赞赏她严密的一贯性，不会让想象力不受控制地发散，但是又可以用梦境和想法写出一个真切的故事……我真的非常享受这本书！我很乐意参加出版庆祝会。^[3]

我们不清楚至此时为止，桑塔格读过多少阿伦特的作品。她在笔记本上列出的打算阅读的书籍名单中没有《极权主义的起源》，实际

上，这个名单中没有阿伦特的任何作品。不过，桑塔格捐献给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档案中包括一本做了各种标记的《拉埃尔·瓦恩哈根》，在书页边缘的空白处有很多用铅笔标注的感叹：“哈！”（桑塔格大概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觉得阿伦特在文字中的人格面具有趣的人。）到两人见面时，桑塔格已经成了阿伦特的崇拜者。实际上，玛丽·麦卡锡在1967年时还曾为桑塔格竭力想要获得阿伦特的友谊的事而调笑过阿伦特：

我上次在洛厄尔家看到她的时候，她显然是想要降伏你。要么就是她爱上你了——这两种可能是一码事。说真的，她是不是？[\[4\]](#)

这个说法当然是开玩笑的，不过麦卡锡和桑塔格注定是要被树立成竞争对手的。很多人都讲过的一个故事是麦卡锡在提到桑塔格时称她为“那个模仿我的人”。[\[5\]](#)有一个最具戏剧性的版本说的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某次聚会中，麦卡锡走近桑塔格，对她说了一句大意如下的话：“我听说你就是新版的我。”[\[6\]](#)我们不清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桑塔格写过自己听说这个故事的事，但她不记得麦卡锡亲口对她说过这样的话。她还告诉麦卡锡的传记作者自己一直不能确定人们认为麦卡锡是在什么时候或哪里说了这样的话。

桑塔格在1964年的一篇日记里用中立的态度简述了这位前辈，她的文字中没有暗示任何真正的敌对情绪，至少一开始没有：

麦卡锡的露出牙齿的笑容——灰白的头发——不时髦的红蓝印花套装。俱乐部女会员的八卦。她就是〔她的小说〕《她们》。她对丈夫态度和善。[\[7\]](#)

桑塔格后来说这第一次见面肯定是在洛厄尔家。她对当时情况的记忆只包括一段简单的对话，既不恭维也无挑衅。麦卡锡认为桑塔格显然不是纽约人。

“对，实际上我不是。虽然我总是想在这里居住，但是我很清楚地感到我不来自这里。但你是怎么知道的？”桑塔格说自己当时这样回应。

麦卡锡说：“因为你笑得太多了。”[\[8\]](#)

不难想象这样的回答等于给这个话题画上了句号。桑塔格写道：“麦卡锡可以靠她的微笑做任何事，她真心笑时都在使用这种笑。”[\[9\]](#)不过麦卡锡对桑塔格还算友善，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的。1964年，麦卡锡还给包括索尼娅·奥威尔（Sonia Orwell）在内的欧洲知识分子朋友们写信介绍桑塔格。她在纽约时经常邀请桑塔格一起吃饭，坚持履行只有麦卡锡才觉得理所应当的社交礼仪。尽管如此，在某次这样的聚餐之后，麦卡锡在给桑塔格的信中的一条附言无疑还是让后者略微感觉到，在纽约知识分子圈子这个她一直渴望加入的世界中，她依然只是个暴发户一样的存在：

附言：我意识到我在给索尼娅〔·奥威尔〕的信中把你的名字拼成了有两“n”。所以你向美国运通查询的时候也试试“Sonntag”。[\[10\]](#)

麦卡锡对于桑塔格是哪里人的判断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桑塔格1933年出生于纽约，小时候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在长岛。她的母亲米尔德丽德·罗森布拉特（Mildred Rosenblatt）在生桑塔格的时候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因为她的丈夫杰克·罗森布拉特（Jack Rosenblatt）在中国工作，而她不想在中国生产。

与多萝西·帕克的父亲一样，杰克·罗森布拉特也是做皮毛生意的，他在上海与人合伙经营一家比较成功的加工厂。但是他年纪轻轻就染上了肺结核，在桑塔格不到五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米尔德丽德·罗森布拉特过了一年才有勇气告诉桑塔格和朱迪丝（Judith）姐妹她们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从那以后，杰克在桑塔格心中就成了某

种非常令人感伤的形象，以至于她在一篇短篇小说中承认：“只要看到电影中有父亲在令人绝望的长期分离后终于返家的情节，我依然会在他拥抱自己的孩子（们）时被感动到流泪。”^[11]至于她的母亲，米尔德丽德则成了某种令人窒息的存在。后来她开始酗酒，变得非常依赖长女的认可和支持。桑塔格早期日记中的内容显示了十五岁的她关心母亲幸福的程度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我脑子里能想到的只有母亲，她多么漂亮，她的皮肤多么光滑，她多么爱我。”^[12]

这个时候桑塔格的母亲已经再婚了，她嫁给了一位立有战功的陆军飞行员内森·桑塔格（Nathan Sontag）。虽然苏珊和朱迪丝都改姓了桑塔格，但是内森·桑塔格并没有在法律上收养她们。桑塔格一家先是居住在图森（Tucson），后来搬到了洛杉矶，桑塔格就是在北好莱坞高中（North Hollywood High School）上学的。可以说即便是青少年时期的苏珊·桑塔格也并不适应西部这样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闲散时间。几乎在所有关于这段时间的传记片段中，无论是已出版还是未出版的，她都显露出了明显的躁动不安。她曾经写道：“我感觉自己是在忍受生活。”^[13]桑塔格无法融入这样的环境。

在洛杉矶时，她找到了好莱坞大道上唯一一家公道的书店——匹克威克书店（Pickwick book shop）。阅读成了她逃避的首选方法。桑塔格总是在自己的文章中将读书比作旅行，她有时还会称书籍是“宇宙飞船”。她从阅读中获得的安慰很快转化成了骄傲，继而变成了一种对自己没有益处的优越感：阅读渐渐让她与日常生活中必须接触的人疏远起来，包括她的同学，甚至是她的家人。在她的直截了当的传记性散文《朝圣》（*Pilgrimage*）中，她提到内森·桑塔格曾经对她说“苏，如果你读这么多书，你永远也找不到丈夫。”

我那时想，“这个笨蛋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里有多少聪明的男人。他以为他们都像他一样。”因为尽管我与世隔绝，但是我一直相信在外面的世界里，在某些地方，一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存在。

不过外面那个广阔的世界也会让人失望。在《朝圣》中，即便是去拜访自己非常崇拜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经历也让桑塔格体会到“一种遗憾的色彩”。托马斯·曼当时居住在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他喜欢海明威，但是桑塔格并不怎么喜欢。他“说话就像在做书评”，而她在寻找可赞颂的更高境界，但总是找不到。对于桑塔格来说，这将成为她一生的主题。

为了寻找这个人们只谈论思想和高等艺术的麦加，桑塔格开始读《党派评论》。作为对这些主题从不感兴趣的家长的孩子，桑塔格不得不自己去学习这种不同的语言。桑塔格的一个朋友告诉桑塔格的传记作者说，在读自己买到的第一期《党派评论》时，桑塔格根本看不懂上面的任何一篇散文。^[14]在她的人生后期，桑塔格总被视为令人惧怕的，或者用某些人的话说是自命不凡的。[她的朋友，学者特丽·卡斯尔（Terry Castle）回忆说她喜欢吹嘘自己热爱“不那么为人熟知的亨德尔^[15]的歌剧”。^[16]] 不过，桑塔格是靠勤奋努力才获得这种她后来拥有的对于前卫艺术的娴熟了解的。这种才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这可能也是她如此看重这种才能的原因。她的经历证明无论是谁，只要读书足够多，就能变得有见识。

后来被问到是谁的作品让她成为她后来成为的这种作家时，她总会提到莱昂内尔·特里林。其他启蒙者的名字也会继续累积，包括瓦尔特·本雅明、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有桑塔格心中的英雄在写作时都会使用很多典故并引用丰富的参考文献，每篇散文中都满含着前人研究成果的证据。他们的风格是建立在深而广的学识基础上的。

考虑到所有这些，人们可能就不会为桑塔格总是坚称唯一对她没有一点儿影响的人是玛丽·麦卡锡感到惊讶了。桑塔格经常强调这个问题：她是“一个我从来不看重的作家”。^[17]这其中的原因不难想

象。麦卡锡的文章几乎不涉及精神愉悦，它们总是与社会现实牵连在一起，但社会现实似乎从来不是桑塔格能够惬意生活于其中或就其创作文章的东西。另外，尽管桑塔格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在她渴望加入的这个属于男性知识分子的世界里，她显然并不特别担心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实际上，在最初那些年里，她似乎也从没有担心过那些厉害的男性知识分子们是如何看待她的。她已经见识得足够多了。

大学是让桑塔格不用再“忍受生活”的第一个机会。她计划得非常仔细，打算提早高中毕业，好尽快离开那里。桑塔格还很小时就想去芝加哥大学，她认为那里的“伟大书籍项目（Great Books program）”符合她正在萌芽阶段的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然而她的母亲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放孩子出去闯荡，所以她坚持让桑塔格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Berkeley）先上一个学期作为过渡。于是，十六岁的桑塔格在1949年入学了。桑塔格在进行课本交换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哈丽雅特·索默斯（Harriet Sohmers）的高个子姑娘，这个人会在年轻的桑塔格的生活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索莫斯的搭讪台词足以吸引任何自负的年轻姑娘：“你读过《夜林》（*Nightwood*）[\[18\]](#)吗？”[\[19\]](#)

桑塔格从高中毕业前不久就开始担心自己会受到同性吸引这件事。她曾经努力压制这种冲动，尝试与男性约会，自称喜欢他们，尽管实际上她并没有这种感觉。她在伯克利分校的短短几个月里，索默斯会带她前往旧金山活跃的女同性恋活动场所，索莫斯也是第一个真正与桑塔格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桑塔格对这次经历的看法是，它不啻一次解放：

我关于性取向的概念被大大改变了——感谢上帝！——双性恋是对一个个体更丰满的表达——而且是对——没错——是对用等待“对的人”出现这种理想化的概念限制性行为、尝试去物化理解性行为的变态观念的抵

制，是对全面禁止不建立在爱之上的纯粹的身体感受和全面禁止随意选择性交对象的抵制。[\[20\]](#)

对感官享受敞开怀抱的桑塔格与索默斯之间的情事维持了很长时间，之后她又与另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桑塔格在日记中潦草地记录着自己感受到的新生。她责怪自己在母亲建议她来伯克利分校时还曾犹豫过，如果她没有来旧金山，她就不会拥有这些经历了。

在桑塔格后来的人生中，她与女性和男性都约会过，虽然她人生中最重要几次恋情都是与女性在一起的，但是有时候她还是不愿给自己的性取向贴上明确的标签。这是一种个人模式的解放，是一个私人问题。桑塔格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视隐私的人，很少写回忆录。即便是她作品中的，代表她可辨识的声音的“我”都让人觉得不像丽贝卡·韦斯特的“我”一样能够被当成一个丰满鲜活的人。桑塔格的声音更像一种自然力，一种不表露任何具体的个人经历的声音。桑塔格始终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双性恋或同性恋这一点让很多人感到失望。不过她没有这么做的原因可能从来不全是为了隐藏自己的性取向，而是单纯地不愿在发表给公众的作品中分享过多信息。

最终，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在伯克利分校的桑塔格手中，其中还包括授予她奖学金的承诺。桑塔格仍然坚定地想要参加芝加哥大学的要求严格的教学项目，于是她在1949年秋来到了芝加哥大学。那里有许多她仰慕的教授。她被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深深吸引，伯克还是一名文学青年时，曾在巴黎和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及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合住同一间公寓。（桑塔格在接受采访时说：“你能想象那对我意味着什么。”[\[21\]](#)）不过，后来桑塔格嫁给了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她是在大学二年级时认识里夫的，二人在第一次约会后没几天就结婚了。

在发生了旧金山的那些同性之间的情事之后，这场婚姻看起来像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反转，但桑塔格试图宣称这是她出于爱情作出的自由选择。不过，发挥影响的其实还有其他更明显的原因。桑塔格到芝加哥后的第一个月，她读了一篇由弗洛伊德的学生撰写的论文，论文开篇就宣称：

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调查一再表明，对于同性恋者来说，异性恋的道路只是被堵住了，认为后一条道路完全不存在是不正确的。[\[22\]](#)

桑塔格的日记中还夹着一封信，里面的内容包括她告诉一位高中同学说母亲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钱已经用完了，因为她的叔叔把生意搞砸了。“他需要把所有钱用来避免牢狱之灾，所以没有钱可以给我们了。”[\[23\]](#)除非能找到其他办法在经济上满足自己继续上大学的需要，否则她很可能得去找份工作。

菲利普·里夫比自己的新妻子大十一岁。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当时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弗洛伊德的博士论文。据说他是一位令人着迷的演讲者，但也是一个性格阴郁的人。桑塔格没怎么谈论过二人之间身体上的相互吸引到什么程度。不过他们在知识层面的联系是变革性的。桑塔格曾经告诉采访她的人说，里夫一开始请求她嫁给自己时，她的回复是“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开玩笑。他的愿望之强烈让桑塔格最终接受了他的求婚。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我带着完全清醒的意识+对我倾向于自我毁灭的意志的恐惧嫁给里夫。”[\[24\]](#)这样的话不是典型的年轻新娘会写的，不过在当时，这一整件事显然是一种折中和妥协。

起初，这种合伙关系进行得还算顺利，里夫夫妇就是“聊了七年的天”。[\[25\]](#)他们的对话从白天延续到深夜，从卧室延续到浴室。他们一起写他那本关于弗洛伊德的书；桑塔格最终会宣称那本书的每一个字都是她写的。与此同时，她还完成了本科学业，并追随里夫来到

波士顿，因为后者在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工作。桑塔格起初在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开始修读哲学硕士学位课程，后来到哈佛大学参加了博士研究项目。1952年，她生下了儿子戴维（David），那时她还不满二十岁。

与丽贝卡·韦斯特和威尔斯的情况正相反——虽然丽贝卡生下儿子的时候同样只有十九岁，同样是刚刚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嫁给里夫对于桑塔格来说却是有益的，至少在一开始时是。她已经走上了成为学术明星的正轨，她的教授们都热烈赞美她的智慧，她在哈佛大学的成绩名列前茅。过了几年表面看来像知识分子的田园诗般宁静的生活之后，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向她提供了1957～1958学年到牛津大学参与研究的机会，桑塔格在丈夫的祝福下接受了邀请——至少起初是这样。

到此时，与里夫在一起的稳定生活已经开始让桑塔格厌烦。和里夫结婚期间，她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只除了一篇为《新领袖》写的对埃兹拉·庞德作品的新翻译版本的不太精彩的评论。后来，桑塔格在自己的小说《在美国》（*In America*）中借旁白之口描述了自己十八岁时意识到的问题，那就是她嫁给了一个爱德华·卡索邦（Edward Casaubon）。卡索邦是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的角色，是小说女主人公多罗西娅·布鲁克（Dorothea Brooke）的年长的丈夫，她的生活就是因为很早嫁给他而诸事不顺。

“发明了婚姻的人真是一个折磨人的天才，这个制度就是用来耗尽人们的感情的。”^[26]桑塔格在1956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曾经看起来是真正的心灵相通的婚姻如今成了一个牢笼。里夫是一个有占有欲的人，在桑塔格看来，他是一个“感情上的极权主义者”。^[27]桑塔格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失去了自我。她给琼·埃科塞拉讲过一段去电影

院看《昼夜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的孤独回忆。这部劣质但令人愉快的商业电影是1956年的一部热门电影，完全是借同名歌曲的成功而走红的。桑塔格很喜欢这部电影，但是她突然发现自己连一个可以一起谈论它的人都找不到。[\[28\]](#)

《在美国》中的叙述者写道：“我花了九年的时间才决定，我有权利，有道德权利与卡索邦先生离婚。”[\[29\]](#)在牛津大学的一年也是里夫夫妇婚姻终结的一年。桑塔格是独自一人前往的，戴维被送到了外祖父母家。在牛津大学待了四个月之后，桑塔格放弃了学术追求，改到巴黎的索邦大学学习并体验法国文化。她在那里再次遇到哈丽雅特，不仅与其旧情复燃，还通过她认识了古巴裔剧作家玛丽亚·艾琳·福恩斯（María Irene Fornés）。1958年桑塔格返回波士顿之后，她的自我意识已经强化到有勇气在机场就向菲利普·里夫提出离婚。她从戴维的外祖父母家那里把他接回来之后就搬到纽约去了。

福恩斯也去了纽约。有一天，这对情侣坐在格林尼治村的费加罗咖啡馆（Le Figaro Café）谈到两人都有写作的愿望，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根据桑塔格的讲述，是福恩斯对她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在现在就开始写你的小说？”

我回答说：“是的，我会写的。”接着她说：“不，我是说此时此刻。”[\[30\]](#)

这句话显然鼓励了桑塔格，她离开咖啡馆，回到家中，写下了后来将成为《恩主》这本书的前三页的内容。后来她说，这就像是某种“空白支票”。她还说，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她经常是把戴维放在腿上打字的。小说的创作过程远比她和福恩斯在一起的时间长。桑塔格喜欢吹嘘说写到最后，每当她打字的时，已经十岁的戴维都能够站在旁边帮她点烟了。[\[31\]](#)

这本小说没有让她变得富有，甚至没有获得真正赞美它的评论——比较奇怪的赞美之一认为这本书展现了一种“精明、平静、属于家庭主妇的自信”^[32]——但是，仅仅是出版一本小说也足以让桑塔格在纽约感到更加自信。在一个聚会上遇到《党派评论》的两位主编之一威廉·菲利普斯时，她问菲利普斯自己能否为杂志供稿。菲利普斯问桑塔格愿不愿意写戏剧评论专栏。他似乎还说了：“你知道，玛丽曾经负责写这个。”^[33]桑塔格虽然对戏剧没兴趣，但是她对于在《党派评论》上发表文章的兴趣太强烈了，所以她接受了这个提议。她写了两篇评论，结果都从最开始的主题偏离到她真正热爱的电影上，直到她发现自己不能继续写下去了为止。她告诉人们她真的很想做一位小说家，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就在眼前。德怀特·麦克唐纳告诉她说：“苏珊，没有人对小说感兴趣。”^[34]

然而，人们很快就开始对桑塔格的散文感兴趣了。她的第一次巨大成功是《关于“坎普”的札记》，该文章最初于1964年秋天被发表在《党派评论》上。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世界上有很多事从来没有被命名，还有很多事虽然被命名了，但是从来没有被描述过。”^[35]桑塔格辩论说，“坎普”是一种专注于技巧的辨识力，它巧妙地认定风格比内容更有价值一些。桑塔格的漫不经心、稳操胜券的口吻与她谈论的主题形成了完美的搭配，所以文章很快就大受欢迎。桑塔格成功地定义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反过来也会定义桑塔格。

从《恩主》开始，桑塔格就已经开始迅速取得成功。她获得了《年轻女士》（*Mademoiselle*）授予的优秀奖，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还突然受邀为《纽约时报书评》写书评文章。不过没有什么比她的散文更能引发人们的关注。桑塔格被提升到了流行文化的预言家的位置。“坎普”的概念受到了如此广泛的讨论并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到春天的时候，《纽约时报》的文章作者甚至设法找到了一位愿意谴责这种现象的匿名专业人士：

“基本上讲，‘坎普’是一种退化，是一种过分感性、不够成熟的与权威对着干的方式，”一位反“坎普”的精神分析学家最近这样告诉自己的朋友，“简而言之，‘坎普’是一种逃避生活和生活中的真实责任的途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极度幼稚，还对社会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它是病态和颓废的。”[\[36\]](#)。

这种威胁的口气在如今看来会有些奇怪。“坎普”的定义如今已经变得非常主流和商业化，以至于人们无法理解在1964年时，如此直率地谈论它是多么激进的一件事。纽约知识分子已经有那么多共产主义政治观点了，所以他们接受严肃知识分子叛逆者的空间少之又少。他们不喜欢垮掉的一代，对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也不感兴趣，同志文化对他们来说更是可以被无视的东西。对所有这些内容的抵抗情绪的最好概括大概可见于菲利普·拉夫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这封信是在1965年4月写的，当时《时代》杂志（*Time*）对这篇关于“坎普”的散文作出了赞美的总结，从而让它获得了其他在小报上刊登的文章不曾拥有的接受程度：

苏珊·桑塔格的“坎普”风格现在非常时髦，每一种堕落都被视为先锋。同性恋者和色情文学作家们成了主导者，无论男女。不过苏珊这个人，她是谁？——在我看来，她只是下半身开放，脑子里同样迂腐保守。那些同性恋热爱她不过是因为她为他们的轻率浮躁提供了思想上的合理性。如今她还反过来说我是一个保守的卫道士，反正我是这么听说的。[\[37\]](#)。

《关于“坎普”的札记》是对流行文化的一种梳理，这样的梳理是此前从没出现过的。桑塔格列举的作为“‘坎普’教义一部分”的所有现象都是高度流行的内容，比如《金刚》（*King Kong*）和《飞侠哥顿》（*Flash Gordon*）漫画。这篇文章的精神从本质上说是民主的，让人们摆脱了非要对自己的品味做非好即坏的划分的限制。“坎普”允许不好的品味成为好的，换句话说就是它允许人们享受乐趣。桑塔格写道：“对于‘坎普’进行一本正经的、写论文似的研究会令

人困窘。这样做的人反而有可能会制造出一个非常低级的‘坎普’。”[\[38\]](#)

如今看来，这里体现出的羞怯矜持显然是有意为之的。不过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个年纪尚轻的桑塔格还不是后来写出那些专横傲慢、好表现出权威的文章的作者。此时的她还在寻找自己独特的风格，实际上，与她后来创作的关于瓦尔特·本雅明或埃利亚斯·卡内蒂的文章，以及其他那些足可成书的长篇文化批评文章相比，《关于“坎普”的札记》一点都不像出自桑塔格笔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的朋友特丽·卡斯尔后来提到桑塔格变得不喜欢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卡斯尔还论述了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桑塔格对“坎普”的酷爱太过清晰地显露了她的特立独行和性取向，这让后来的桑塔格感到不自在。[\[39\]](#)这种遮遮掩掩也是让1964年时读这篇文章的同性恋者们感到疑惑的东西，他们明白桑塔格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群体的，因为她的遮掩并不能真的骗到任何人。

桑塔格另一篇重要的早期散文是几个月后被发表在《埃弗格林评论》（*Evergreen Review*）上的《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起初，这篇文章读起来像是对桑塔格余生一直致力于的工作的反驳。文章宣称：“阐释是对艺术领悟力的报复。”这话听起来就像另一个古老观念的重新措辞，那就是批评家批评是因为他们自己创造不出优秀的艺术。不过她的措辞让这个观点变得更有诱惑力了，文章坚称最终“我们需要的不是一门艺术的阐释学，而是一门艺术的色情学”。[\[40\]](#)

很多人从这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相信桑塔格就是要攻击所有关于艺术的文章。不过她显然没有这种想法，因为她自己就绝对没有放弃撰写关于艺术的文章，她也一直在尝试遵循自己提出的原则。桑塔格后来说自己想要论述的其实是关于艺术的形式和内容的互动问

题，以及任何特定媒介的规则影响“它是什么意思”的方式的问题。更简单的解释可能是，对于苏珊·桑塔格来说，思考和写作这些行为本身就是色情、感性的体验。她试图通过使用有层层深意的句子来传达这种观点，通过愉快地使用“对比法”“不可言喻”之类的高深词语，让它们变得更容易被接受，甚至是展现出美感。这就是她选择的取代了更适于传达个人腔调的“我”具有的亲密感的方式。

在《关于“坎普”的札记》和《反对阐释》都引发了反响之后，曾经出版了《恩主》的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公司（Farrar, Straus and Giroux）看到了商机，他们将这些批评散文集中在一起，于1966年出版成一本书，并选择了桑塔格最广为称颂的散文《反对阐释》的题目作为书名。这本书被评论的次数比她的小说被评论的次数多得多，主流媒体又获得了一个被她震惊的机会。《服饰与美容》刊登的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称人们为她的作品“争论不休，要么认为那是创造历史，要么认为那是大胆欺骗”。^[41]在主流媒体上，大部分评论者认为桑塔格是骗子。一位评论者在痛批这本书之前先宣称桑塔格是“一个锐利的姑娘，像是一个在当代文化中奋力向上攀登的本科没毕业的玛丽·麦卡锡”。^[42]另一位评论者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表达了如下观点：

作为这些散文的作者，苏珊·桑塔格实在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她的声音沙哑、粗鲁、刺耳。这本书中没有任何内容暗示她在乎我们如何看待她的腔调和礼貌。^[43]

也不是所有评论都这样；《洛杉矶时报》和《新领袖》上的批评家就很欣赏桑塔格。不过这些针对个人的评价往往不只是批评文章中的边角料。大多数时候，批评家们的整篇文章都是在写他们眼中的桑塔格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这样，从那之后，桑塔格的性格成了与她所写的内容一样重要的问题。这种模糊的特性，她所谓的“形象”将和她的作品一样成为她文学声望的一部分。她的出版商们总能精明地注

意到这一点，他们会充分利用桑塔格深邃的双眼和毋庸置疑的魅力。

《反对阐释》已经成了一本不同寻常的畅销书，它的大众市场简装版封底上就只有一张桑塔格的照片，照片是由摄影家哈利·赫斯（Harry Hess）拍摄的，照片中的桑塔格正低着头看向一边。

在关于桑塔格的文章中，谈论她外表的内容太多了，甚至多到你如何形容都不为过的程度。即便是关于她的最严肃的文章里通常也会出现对于她样貌的评论。这些不计其数的笔墨大概都可以被概括为如下一句话：她漂亮得非比寻常。不过我认为桑塔格与美的关系比旁观者兴高采烈的赞美和照片中表现的精致复杂得多。在她的笔记本中经常有劝告自己多洗澡的内容；据同时代人的观察，她总是很邈邈，她的头发通常被向后梳，再松散地扎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发型可言。桑塔格在媒体上出现时也是这副样子。在一次采访中，她不做发型不化妆的样子与导演阿涅丝·瓦尔达（Agnès Varda）一丝不乱的波波头形成了鲜明对比。[\[44\]](#)

桑塔格还只喜欢穿黑色的衣服，这是那些不愿意费心思考穿什么的人的标准策略。在人生晚期，她还会撩起衣服向人们展示手术留下的疤痕。尽管有魅力的人总是拥有不在乎自己外表的特权，但桑塔格对自己外表的漠不关心是真诚的、不做作的。她喜欢自己的样子能够对自己有所帮助，但也只是顺其自然而已。

另外，桑塔格从一开始就对她的公关经理想要让她投射出的形象感到担忧。她的照片开始遮盖了她这个人本身。一位英国出版商提议发行以劳森伯格（Rauschenberg）拍摄的照片的复制品为特色的限量版《反对阐释》，不过这个提议被桑塔格否决了：

这不就是那种极端时髦的情况——我和劳森伯格——《生活》+《时代》肯定会大肆报道，这等于确立了我就是那种“拥有一切的”女孩儿，

是新版的玛丽·麦卡锡，是麦克卢汉主义（McLuhanism）^[45]+“坎普”的女王，这些不都是我想要抹杀的东西吗？^[46]

不知幸或不幸，桑塔格对成为“拥有一切的女孩儿（It Girl）”的抗拒最终没能成功。对她的采访总会提到有些人戏称她已经成了“美国先锋派的纳塔莉·伍德（Natalie Wood）^[47]”。^[48]她后来出版了第二部小说《死亡匣子》（*Death Kit*），不过收到的反响始终无法超越她日益提高的作为散文家的声望。与《恩主》一样，《死亡匣子》也是一本情节简单的小说：一位宾夕法尼亚州商人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都在设法弄清楚自己关于杀死一名铁路工人的记忆究竟是真是假。桑塔格在这本书里常常引经据典，遵循了一种在法国很流行的风格。戈尔·维达尔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本小说不成功的原因：

桑塔格女士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成就被无视的原因很奇怪，因为那也恰恰是让她在美国作家中成为与众不同和极为重要的一员的原因：她广泛的阅读量，英语系称此为比较文学……这种后天习得的文化将她与大多数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美国小说家区别开来。那些人几乎没有读过任何东西，你如果肯接受他们作品中贫乏的文字和偶尔的评论的随意性作为证据，就不难看出这一点。^[49]

像桑塔格这样对先锋艺术感兴趣的批评家很少，出现的间隔也很长。相反，媒体报道都喜欢抓着简单一些的题材不放。一位《华盛顿邮报》的女性评论者这样写道：“如果世上还有公道的话，苏珊·桑塔格应该长得很丑，或者至少是相貌平平。一个长得那么漂亮的姑娘没有权利再拥有那样的头脑。”^[50]女权主义者和学者卡罗琳·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受《纽约时报》的委派去采访桑塔格，结果她完全不是桑塔格的对手，以至于写出了一篇没有引用一句桑塔格原话的文章——“我不该引用她的原话，因为那些词句太具体，把它们从说到它们的上下文中硬抽出来会简化它们的深意，甚至让它们变成错误”。理论上说这是一种赞美。这次采访最终促成了一篇关于桑

塔格是什么样的人的散文诗，其辞藻之华丽看起来更像某位名人的传略，而非一本书的简介：

当我第一次阅读关于苏珊·桑塔格的内容时我想：上帝呀，她就是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又漂亮，又成功，但是受到了诅咒，[用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最好的一句话说是]需要上帝的保佑。我们已经听说美国人的生没有第二幕，是名副其实的“死亡匣子”。评论者们会在桑塔格女士的新小说中寻找她的影子。（但她不在那里。这已经不是她的书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现在是我的书，或者你的书了。她知道这已经不是她想读的那种书了。）[\[51\]](#)

在桑塔格名望最盛的时候，她同意由《时尚先生》的一位作家为她写一篇传略。她对这位作家说：“传奇就像一条尾巴……它总是跟着你，无情、怪异、没有用处，本质上说与你本人没有什么关系。”[\[52\]](#)当然，谦虚里总是包含一点自吹自擂的成分的，毕竟唯一能够随意抛弃传奇的人只能是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传奇可抛弃的人。不过，人们也很容易发现她说得没错：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苏珊·桑塔格的人格面具与她的作品的关系越来越淡了，这肯定不是她愿意看到的。

尽管如此，桑塔格的名气还是有它的作用的。当时的很多男性知识分子都对媒体上报道的桑塔格的形象感到惧怕。比如，1969年初，她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菲利普·罗斯的信。罗斯写了一本新小说叫《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纽约》杂志（*New York*）刚刚发表了一篇他的传略。在那篇文章的开头几页中，他在提到桑塔格时用了“苏，苏茜·Q，苏茜·Q. 桑塔格”。[\[53\]](#)在看到自己的话被印在杂志上之后，深感懊悔的罗斯马上给桑塔格写了封信：

无论你知不知道，我一直为你的个人魅力所倾倒，我也钦佩你作品的尊严，这篇报道对我印象中我说的原话的误解和误报让我非常震惊，我说那些话时的态度也不是这样的。[\[54\]](#)

针对这样一个仅仅带有非常微小的不敬的提及作出的这次道歉可以说是非常善意的了。这可以让人们体会到尽管她的作品获得的评价一般，但桑塔格这个人物已经开始具有多么大的威力。她作为一位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而受到了广泛的尊敬。她能够让菲利普·罗斯感到惧怕，通常情况下，后者可不是会轻易道歉的人。

随着桑塔格的迅速成功，她下定决心暂离文学批评和散文写作，转而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三本小说。在接到一个来自瑞典的在那里拍摄低成本艺术电影的邀请后，她还开始尝试拍电影了。桑塔格抛弃了抽象的批评类作品，改写对眼下发生的事件的直接评论。1967年，《党派评论》主办了一场写作研讨会，会议主题是“美国正在发生什么？”桑塔格在调查问卷上写下了一段长长的回应，都是针对这个从来无法给她归属感的国家此时的状态的；她还直接用自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童年生活做比喻来批判这个国家：

今天的美国，有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做加州的新州长，有约翰·韦恩（John Wayne）在白宫里嚼肉排骨，这简直和门肯（Mencken）描述的耶胡国（Yahooland）一个样了。[\[55\]](#)

桑塔格从来不会生搬硬套爱国主义价值口号，而是指出如果美国真的是“西方白人文明的顶点的话……那西方白人文明肯定是出问题了”。她写道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毒瘤”。

就这样，在一份不重要的杂志上的一篇随笔突然成了新闻。创建了《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保守派作家威廉·F. 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从桑塔格的文章里挑出了这些或那些词语，然后写了一篇情绪激昂的社评文章。他充满讽刺地写道，桑塔格这个“甜美的年轻人”根本就是支持共产主义的。[\[56\]](#)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一名无比惊骇的社会学教授甚至都不愿写下这个出于“自我毁灭”的冲动而写出这样的内容的“异化知识分

子（Alienated Intellectual）”的名字。[\[57\]](#)“人类历史的毒瘤”这个评论会成为桑塔格余生躲不开的话题。

然而到这个时候，桑塔格的作品已经开始登上小规模杂志版面之外的地方了。1968年末，桑塔格受《时尚先生》的委派到越南实地考察。《时尚先生》当时的主编是哈罗德·海斯，他迫切地想要将这份杂志从男性时尚杂志升格为一股强大的文学势力，桑塔格正好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目的。

具体来说，桑塔格的越南之旅其实不是一趟完全自主的行程。她只能算是受北越邀请的客人之一。当时的北越政府有一个邀请杰出的反战作家和活动家来亲眼看看这里发生的一切的习惯做法，这也是它们的一种宣传手段。当桑塔格透露她不能脱离她的北越导游，真正独立自主地观察这个国家时，她并没有深思这可能导致她的报道陷入道德困境的问题。鉴于此，她小心翼翼地避免了将这篇文章写成对越南当前形势的权威性论述，而是将其作为对个人经历的记叙。这也是她少有的公开讲述自己对某件事的直接体会的情况：

在过去的四年里，知道越南人民正因为我国政府而遭受着极度的苦难让我感到难过和愤怒。此时我亲身来到这里，迎接我的却是礼物和鲜花，华丽的致辞和茶会，以及似乎有些夸张的善意，我的感受与在万里之外已经感受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58\]](#)

桑塔格为此次经历写的文章足有一部中篇小说的长度，所以后来被单独出版成书了。从前面这段话可以看出，文章的内容与其说是关于越南人的，不如说是关于桑塔格如何理解和回应越南人的。记者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在为《纽约书评》评论这本书时将其比作病人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59\]](#)比起深入了解越南，桑塔格其实更希望弄明白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帝国。即使是被她眼中的越南人民的善良正直围绕着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依然渴望自

己的“不道德”的祖国拥有的“各种令人惊讶的知识和审美乐趣”。在结尾处她写道：“到头来，美国人终究无法将越南融入自己的意识中。” [\[60\]](#)

桑塔格绝对不是唯一前往越南，却发现自己处处受阻的美国记者。实际上，在她抵达河内两年前，玛丽·麦卡锡就已完成了这趟旅程并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就此撰写的文章。她对于时局的分析比桑塔格的更直接，最终完成的著作总体上也不像桑塔格的那么充满反思：

我承认去年2月初去越南时，我是去寻找对美国利益有实质损害的内容的，而且我确实找到了，尽管往往是偶然发现或是在听取官员介绍情况时发现的。 [\[61\]](#)

可惜麦卡锡的直言不讳却产生了对她不利的效果，因为如此坦率的表述让她看起来过于轻信北越人员的说辞了。另外，麦卡锡还被认为是事实问题上出现了疏忽。菲茨杰拉德在《纽约书评》上的评论文章中微妙地提到了麦卡锡没能“像一位人种学家一样细致地观察自己的证据”。 [\[62\]](#)无论是麦卡锡的还是桑塔格的作品在出版成书之后都没有获得什么成功。桑塔格后来提到这本书时似乎觉得很丢脸。她说：“我那时候真傻。” [\[63\]](#)

尽管如此，麦卡锡还是在桑塔格出版该作品时写信给她，有些迫切地想要强调她们在思想上存在某种相似性。她这样写道：“你也感受到审视良心的需要这点很有趣，可能是女性的自负……”

你肯定会因为围绕苏珊·桑塔格下笔，而不是写那里的学校、医院等情况而受到责难。不过你是正确的，而且我认为，你比我更加正确的原因是你比我做得更彻底，你毫不掩饰“这本书就是关于我的”这件事。 [\[64\]](#)

年长作家对于桑塔格逐渐成形的风格的评论可谓正中要害。十年前，年轻一些的桑塔格曾在笔记本中责备自己说：“我的‘我’弱小、谨慎、过于冷静。好的作家都是咆哮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甚至是自大愚蠢的人。”^[65]关于河内的散文对于一个几乎都没用过第一人称写文章的人来说是一次尝试。这篇文章体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自信。即便是不喜欢她的批评家们，比如在评论文章的开头称桑塔格是“去年文学界的海报女郎”^[66]的《纽约时报》作家赫伯特·米特冈（Herbert Mitgang）也不得不承认，她写出了一篇充满思想的文章。

就麦卡锡而言，她似乎看出了这一点。她在给桑塔格的共三页的书信末尾一反常态地加了一段略显羞怯的附言：“我自以为是地假设你读过我的书了，万一你没读过的话，关于解决方法的内容在最后一章。”^[67]这不是一封不友好的书信，不过其中却有某种淡淡的怀疑的语气，隐藏着一个没有问出口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是写出相似的观点？

与此同时，桑塔格越来越为自己作为一位散文家的名气感到懊恼。1970年10月，她告诉自己的采访者说：“我已经不写散文了。”

对我来说那是过去的事了。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拍电影。仍然被认为是以写散文为主业对我来说在某些程度上是种负担。我相信诺曼·梅勒也不希望在《裸者与死者》出版二十年后，还只被人们看作这一本书的作者，毕竟他也做了许多别的事。这就好比如今还按照1943年的“弗兰基”

（Frankie）的叫法来称呼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一样。

^[68]

但桑塔格也无法摆脱她已经树立的声望。她正在制作的那些电影遭到了批评家的狂轰滥炸。这些电影被描述为抽象的、无趣的。除此之外，更糟糕的是，这些电影让桑塔格陷入了财务困境。她本来就是在依靠有限的预算在海外工作，几乎没赚到任何钱。相反，她还欠了债。短短几年内，她就不得不放弃了。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到，因

为这些电影引发的糟糕反响，她的自信遭受了严重打击。为了赚钱，她向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公司提交了出版计划，不过她计划的这些书最终并没有完成：比如其中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桑塔格告诉人们说它读起来就像汉娜·阿伦特和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作品的混合。[\[69\]](#)

她还突然开始更自由地谈论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当第二波女权运动开始兴起时，桑塔格的职业生涯也才开始不久。作为一项有组织的运动，女权主义在此前已经蛰伏了近四十年。历史学家们认为，妇女参政论者的能量已经被摩登女郎的鞋跟碾碎了。自从女性的投票权获得保障之后，年轻女性尤其难以再对她们的前辈进行的斗争产生共鸣。[\[70\]](#)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女性作家不会像如今的女性作家一样，几乎例行公事般地都要被问及她是否是“女权主义者”这个问题。帕克和韦斯特都曾对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表达过同情，但女权主义对于她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需要费心应对的问题。就麦卡锡和阿伦特而言，她们几乎没有以作家的身份加入任何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因为在她们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女权运动根本就不存在。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桑塔格开始成为美国最不容忽视的女性知识分子时，女权运动正处于最激烈的高潮阶段，游行、集会和女子团体随处可见，纽约城中尤其如此。一个由批评家和记者埃伦·威利斯（Ellen Willis）等人组建的名为“纽约激进妇女（New York Radical Women）”的组织就在纽约发展壮大起来。激发自我意识的圈子非常盛行。渐渐地，随着关于这些情况的辩论成了媒体上的主要议题，人们自然希望桑塔格能够表露一下忠心。

纽约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这项运动展现的能量和带来的混乱是感到不屑和厌烦的。他们无法理解这项运动，很可能还觉得这项运动

很低俗。对此，桑塔格开始表现出一连串的逆向主义，这与那位她“从来不看重的作家”玛丽·麦卡锡不无相似之处。桑塔格比《党派评论》和《纽约书评》圈子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更加完全和自由地接受了这项运动。

桑塔格第一次作为一名女权主义游行参与者公开发表讲话是在1971年。她参加了在市政厅举行的针对诺曼·梅勒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轻蔑地谈论女权运动的文章而进行的女权主义集体讨论会。已经四十八岁的梅勒仍然像个小学生一样，试图通过侮辱女性来引起女性的注意。梅勒在这篇题目为《性别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Sex*）的文章中提及了不少女权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一边侮辱和轻视她们的想法，一边不忘贬低她们的个人魅力。他在行文中称著名女权主义评论家及充满辩论性的《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的作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为“愚蠢的女人”。还称后来成为国会议员的女律师贝拉·阿布朱格（Bella Abzug）是“母老虎（Battle-ax）”。[\[71\]](#)

当天晚上，桑塔格没有参加集体讨论，而是坐在了观众席中。她起身向梅勒提出了一个问题。“诺曼，即使是抱着最善良的初衷，女性依然会觉得你与她们交谈时表现得高高在上，”桑塔格带着清楚的权威，以一种平静的、让人无法不全神贯注地聆听的语气继续说道，“表现之一就是你会使用‘女士’这个词，我不喜欢被称为‘女士作家（lady writer）’，诺曼。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这样说很有绅士风度，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个称呼是恰当的。被称为女性作家（woman writer）会稍好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你知道词语的选择是有重要意义的，咱们都是作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72\]](#)

后来，桑塔格接受了《服饰与美容》的长采访，她坚称在作为作家的职业生涯中，自己切身感受到了歧视的影响。采访桑塔格的人试

图说明在她向梅勒提问的那晚之前，她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像梅勒一样轻视女性知识分子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认识的聪明人中至少有一半是女性。我对女性面对的问题充满同情，对女性的处境无比气愤。但是这种愤怒存在已久，所以我已经不会天天感觉到它。在我看来，这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故事。
[73]

好像是为了彻底表明观点，桑塔格立即在《党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原本是为当时刚刚创办的《女士》杂志 (*Ms.*) 写的，但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Gloria Steinem) 的新杂志认为桑塔格的文章说教性太强，所以它被转发给了《党派评论》的“男孩儿们”。他们给这篇文章取名为《女性的第三世界》 (*The Third World of Women*)。文章中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女性应该彻底地反抗父权制：“她们应该在街上对男人吹口哨，突袭美容院，围攻生产性玩具的玩具制造厂，大量转变为激进的女同性恋，提供女权主义者离婚咨询，建立化妆品回收中心，使用母亲的家族姓氏。” [74] 然而桑塔格似乎在这一篇文章中用尽了全部的热情；它成了桑塔格所有知性文章中唯一彻底、直接论述女权主义的一篇。

让桑塔格一直坚持创作的散文主题是1972年她在与芭芭拉·爱泼斯坦 (Barbara Epstein) 共进午餐时构思出来的一些东西。当时她刚刚在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 看过黛安·阿勃斯 (Diane Arbus) 的摄影展。那些照片让桑塔格心潮澎湃，于是爱泼斯坦建议她为《纽约书评》写一篇关于这个摄影展的文章。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桑塔格共写了六篇，这些文章最终被收录在一起，以《论摄影》 (*On Photography*) 的名字被出版成书。

一位评论家认为《论摄影》这本书其实应该取名为“反对摄影 (*Against Photography*)”，因为有时桑塔格似乎是在质疑摄影这种实践本身。桑塔格在写到照片时说：“它们是关于看的法则，更重要

的是，它们是关于看的道德规范。”^[75]桑塔格在这些道德规范中往往找不到太多值得推荐的东西。她评论说照片经常被当作表现现实的东西，然而它们被呈现的方式中总是存在一些隐藏的动机。拍摄照片的普遍流行也受到了她的批评：“拍照片是一种证明体验的方式，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排除体验的方式——因为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照片效果而限制了体验本身，体验的经历被转化成了一张图片，一个纪念品。”^[76]

为了确保稳定的收入，桑塔格还开始定期为《服饰与美容》撰写文章，不过这些文章都是她绝对不会收录到自己今后的文集里的。1975年，她与当时二十三岁的戴维·里夫（David Rieff）合著了一篇文章，内容是为读者提供“如何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建议，比如：“假装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死去，假装我们遭受的痛苦都是没有用处的，或者假装我们差不多总是心存恐惧。”^[77]另一篇文章，《女人的美貌：是被轻视的理由还是力量的源泉？》（*A Woman's Beauty: Put-Down or Power Source?*）竟然是在敦促美国最受欢迎的时尚杂志的读者们思考“女性被教导要注重外表的方式鼓励了自恋情节，强化了依赖性和不成熟”的问题。她继续说道：

被大多数女性接受的关于她们性别的讨人喜欢的理想状态其实是一种让女性对自己实际的样子，或她们通常会成为的样子感到自惭形秽的手段。因为美的理想被用作了一种自我压迫的方式。^[78]

每当她的女权主义原则受到挑战时，桑塔格就会以十倍的热情反击敢于挑战它们的人，这成了她的一个习惯。诗人艾德丽安·里奇就是与她发生过论战的人之一。里奇与女权运动的牵涉很深，她在读1975年2月那期《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桑塔格写的关于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文章《迷人的法西斯主义》（*Fascinating Fascism*）时注意到，桑塔格宣称里芬斯塔尔的电影能够参加很多电影节是因为“不得不牺牲一个能够拍出被所有人视为一流作品的电影的

女人会让女权主义者感到极度痛苦”。^[79]于是里奇给杂志去信质疑为什么女权主义者成了被指责的对象。

桑塔格显然是将里奇的“浮夸的、吹毛求疵的来信”视为一种明白的侮辱，所以她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近两千字的回应文章。她指出，自己的文章实际上并不是关于女权主义，而是关于法西斯美学的。里奇非要单独挑出令自己困扰的部分横加指责这件事恰恰代表了女权运动中存在的让桑塔格感到憎恶的愚钝思想。“如所有最根本的道德真理一样，女权主义也有一点头脑简单。”桑塔格如此争辩道。

这两个人之后会通过书信往来重归于好，她们都同意双方具有一些值得探索的共同点。里奇在给桑塔格的书信中写道：“多年来我一直对你的思想很感兴趣，尽管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往往截然不同。”不过桑塔格会发现，那以后她不得不在采访中为自己与里奇的争论作出辩解。大多数人似乎都把那次争论看作认定桑塔格反对女权主义的确凿证据。尽管她写过关于性别政治和女权主义的文章，但人们的观点始终不曾动摇。忍无可忍的桑塔格干脆开始对采访者发脾气了，她对其中之一说道：“鉴于我也是女权主义者，这次事件根本不应该被描述为我和‘她们’之间的不和。”^[80]

但是到1975年秋天，当桑塔格被确诊患有乳腺癌之后，其他事都被搁置了。她的医生告诉戴维·里夫说她活不了多久了，因为她的肿瘤已经进入第四阶段。虽然没有人直接告诉桑塔格她快死了，但她似乎知道自己面临的风险。她选择了激进的乳房切除术，希望通过去除必要组织以外的其他部分来增加她活下去的概率。这个方法奏效了。她的癌症进入了缓解阶段。但是这种经历彻底改变了她。她写道，这种治疗方法让她觉得无比震惊、疲惫不堪，就好像她打了一场一个人的越南战争。

我的身体受到入侵，被殖民化了。他们在我身上使用化学武器。我必须打起精神。[\[81\]](#)

当时她觉得自己被“抹平了”，她还注意到自己变得“弄不懂自己了”。[\[82\]](#)她还担心是她对自己的压制——比如她对母亲的愤怒的压制，对自己的女同性恋倾向的压制，对艺术的绝望感觉的压制——实际上导致了她的癌症。她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当她从疾病中走出来时，她感觉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完全摆脱那些情绪。

净化心灵的过程就是创作《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的过程。这篇长散文于1975年以书的形式被出版，准确地说它并不是一本回忆录。桑塔格完全抽象地讨论了人性将结核病和癌症美学化的方式，关于她自己的治疗方法或任何来自医生的劝慰或残忍宣告等个人经历则没有被具体提及。但是如果有人问她，她会很清楚她表明她将这里的文字视为一种心灵的呼喊：

我没有丝毫超脱的感觉。这是一本我在心中充满狂怒、恐惧、痛苦、惊骇和义愤的时候写出的书——是在我病重的时候，在治疗效果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写出的书……但我没有因为患上癌症而变成白痴。[\[83\]](#)

《疾病的隐喻》成了桑塔格直抒胸臆的载体。桑塔格主要的不满在于小说家和作家们在用疾病做隐喻时往往倾向于指责病人本身，桑塔格卧病在床时也曾短暂地认为自己应该受到责备。但是最终她把自己的愤怒指向了诺曼·梅勒这样的“癌症恐惧症患者”[\[84\]](#)。后者最近解释说，如果他没有刺伤他的妻子（并表现出“一种凶残的感觉”），那么他可能会患上癌症，“过不了几年就死了”。她还写到了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妹妹艾丽斯·詹姆斯（Alice James）在很久以前因患乳腺癌而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事。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虽然桑塔格并没有使用第一人称，但她的文字显然是私人的，她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

包括《纽约时报》的图书批评家约翰·伦纳德（John Leonard）在内的许多评论家批评桑塔格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癌症比喻美国的状况。（别忘了：桑塔格在1967年时就曾称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毒瘤”。）但是他们都看到了她的愤怒让她的文字更加鲜活，就算对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持保留意见，他们也都被它征服了。爱尔兰批评家丹尼斯·多诺霍（Denis Donoghue）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

我认为《疾病的隐喻》是一本令人不安的书。我已经读过三遍了，但我仍然认为她的指责是没有依据的。但是这本书对人们持有的态度的一些看法非常有洞察力：例如，我们是如何看待精神错乱或心脏病的。[\[85\]](#)

多诺霍还说，他认为桑塔格的风格很直率，对她来说“写作就是战斗”。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一种批评。但考虑到桑塔格的出身，考虑到她的思维风格和超然的敏感，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仍然不能用第一人称写作。但是她能够感到气愤了。而且人们听到了她对这种非常恐怖和危险的人生经历的记录，尽管她的声音是被隐藏在一层又一层的思考背后，也被隐藏在她对所有可能直到被她提及才为人们所知的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引用背后。

《疾病的隐喻》的严肃风格与桑塔格一直想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方式形成了一致：她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然而人们提到她时总会想起《关于“坎普”的札记》，而《关于“坎普”的札记》会将她的名字与流行文化结合在一起。她并不喜欢这个情况。桑塔格的朋友特丽·卡斯尔讲过一个故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她与桑塔格一起参加一个聚会时，一位客人不幸地告诉桑塔格他喜欢那篇文章。

桑塔格气得鼻翼翕动，她立即用蛇怪一般的目光盯着他。他怎么会说出这么蠢的话呢？她没有兴趣讨论那篇文章，而且以后也永远不会。他绝对不应该提起它。他太落伍了，他在知识层面上已经死了。他没有读过她的其他作品吗？他不懂得与时俱进吗？我们其余的人都吓得一动不动，眼

看着桑塔格落入一个黑暗的愤怒隧道——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们都深刻地感受到了她的情绪。[\[86\]](#)

因为与《关于“坎普”的札记》剪不断的联系而感到沮丧的部分原因是桑塔格想要摆脱她年轻时创作的作品。另外，她显然也对人们阅读那些文章的方式感到非常不安。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她目睹了人们对流行文化的知性趣味的激增，而高雅艺术则陷入了挣扎困境。她觉得自己应当负些责任，但这当然不全是她的错。她在倡导流行文化的旅途中曾经有过同行者，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就是电影批评家宝琳·凯尔。

[\[1\]](#) Daniel Stern, “Life Becomes a Dream,”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1963.

[\[2\]](#) *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 ed. David Rieff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237.

[\[3\]](#) 1963年8月20日，汉娜·阿伦特写给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公司的书信，转引自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 *Susan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 (Norton, 2000), 73。

[\[4\]](#) 1967年12月19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

[\[5\]](#) Susan Sontag,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537。

[\[6\]](#) Morris Dickstein, 转引自Sheelah Kolhatkar, “Notes on Camp Sontag,” *New York Observer*, January 10, 2005。

[\[7\]](#) *As Consciousness*, 8.

[\[8\]](#) 关于这件轶事可见于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538。

[\[9\]](#) *As Consciousness*, 10.

[10] 1964年8月11日，玛丽·麦卡锡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11] “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 ”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73.

[12] *Reborn: Journals and Notebooks 1947-1963*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 5.

[13] “Pilgrimage, ” *New Yorker*, December 21, 1987.

[14] 参见Daniel Schreiber, *Susan Sontag: A Biograph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2.

[15] Georg Friedrich Händel, 巴洛克音乐作曲家，创作作品类型有歌剧、颂歌及管风琴协奏曲，著名作品为《弥赛亚》。

[16] Terry Castle, “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 ” *London Review of Books*, March 17, 2005.

[17] “Susan Sontag, The Art of Fiction No. 143, ” 接受Edward Hirsch采访, *Paris Review*, Winter 1995。

[18] 《夜林》是最早明确描绘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恋情的著名小说之一。该书还以其强烈的哥特式散文风格而引人注目。小说采取了现代主义创作技巧，包括不同寻常的形式和叙述方法，因此也被视为超小说。

[19] 2015年11月30日，哈丽雅特·索默斯·兹韦林 (Harriet Sohmers Zwerling) 接受采访，可见于 <http://lastbohemians.blogspot.com/2015/11/harriet-sohmers-zwerling-ex-nude-model.html>。

[20] *Reborn*, 28.

[21] “Susan Sontag, The Art of Fiction No. 143. ”

[22] Wilhelm Stekel, *The Homosexual Neurosis* (Gotham Press, 1922) , 11.

[23] 苏珊·桑塔格写给“Merrill”的书信，日期不详，不过这封信被发现时夹在记录1950年3月23日内容的那一页，转引自Alice Kaplan, *Dreaming in French: The Paris Years of Jacqueline Bouvier Kennedy, Susan Sontag, and Angela Dav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24] *Reborn*, 60.

[25] *As Consciousness*, 362.

[26] *Reborn*, 79.

[27] *Reborn*, 138.

[28] Joan Acocella, “The Hunger Artist,” *New Yorker*, March 6, 2000.

[29] *In America* (Picador, 1991), 24.

[30] Interview with Marithelma Costa and Adelaide López, in *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 ed. Leland A. Pogu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95), 227.

[31] Sigrid Nunez, *Sempre Susan: A Memoir* (Atlas, 2011), 87.

[32] Donald Phelps, “Form as Hero,” *New Leader*, October 28, 1963.

[33] “The Art of Fiction No. 143: Susan Sontag.”

[34] Ellen Hopkins, “Susan Sontag Lightens Up,”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16, 1992.

[35] “Notes on ‘Camp,’ ” *Partisan Review*, September 1964.

[36] “Not Good Taste, Not Bad Taste—It’s ‘Camp,’ ”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65.

[37] 1965年4月9日，菲利普·拉夫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in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38] “Notes on ‘Camp.’ ”

[39] 参见Terry Castle, “Some Notes on Notes on Camp,” in *The Scandal of Susan Sontag*, ed. Barbara Ching and Jennifer A. Wagner-Lawlo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21.

[40] “Against Interpretation,” *Evergreen Review*, December 1964.

[41] “Sontag and Son,” *Vogue*, June 1966.

[42] Kevin Kelly, “‘A’ for Promise, ‘F’ for Practice,” *Boston Globe*, January 30, 1966.

[43] Geoffrey A. Wolff, “Hooray for What Is There and Never Mind Reality,”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5, 1966.

[44] 大约1969年秋季接受Camera Three节目采访，可见于 <https://vimeo.com/111098095>。

[45] 即认为媒介的传播特征比其传播的信息内容更能影响和控制社会。

[46] 1966年11月22日，Lila Karpf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此处疑有误，应为苏珊·桑塔格写给Lila Karpf的书信。）转引自Schreiber, *Susan Sontag*, 133。

[47] 娜塔莉·伍德（Natalie Wood, 1938年7月20日～1981年11月29日），美国女演员，出演过《西区故事》《天涯何处觅知音》《无因的反叛》等，曾三次获得奥斯卡提名。

[48] Robert Phelps, “Self-Education of a Brilliant Highbrow,” *Life*, January 1, 1966.

[49] Gore Vidal, “The Writer as Cannibal,” *Chicago Tribune*, August 10, 1967.

[50] Beatrice Berg, “Susan Sontag, Intellectuals’ Darling,”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8, 1967.

[51] Carolyn Heilbrun, “Speaking of Susan Sontag, ”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1967.

[52] James Toback, “Whatever You’ d Like Susan Sontag to Think, She Doesn’ t, ” *Esquire*, July 1968.

[53] Howard Junker, “Will This Finally Be Philip Roth’ s Year? ” *New York*, January 13, 1969.

[54] 1969年1月10日, 菲利普·罗斯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 见于Susan Sontag Archive at UCLA。

[55] “What’ s Happening in America: A Symposium, ” *Partisan Review*, Winter 1967.

[56] William F. Buckley, “Don’ t Forget— ‘Hate America’ Seems to Be the New Liberal Slogan, ” *Los Angeles*, March 20, 1967.

[57] Lewis S. Feuer, “The Elite of the Alienated, ”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1967.

[58] “Trip to Hanoi, ” *Esquire*, February 1978. (此处疑有误, 应为1968年)

[59] Frances FitzGerald, “A Nice Place to Visit,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13, 1969.

[60] *Trip to Hanoi*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69) , 87.

[61] Mary McCarthy, “Report from Vietnam I: The Home Program,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20, 1967.

[62] FitzGerald, “A Nice Place to Visit.”

[63] Susan Sontag,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594。

[64] 1968年12月16日, 玛丽·麦卡锡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 in Susan Sontag Archives at UCLA。

[65] *Reborn*, 168.

[66] Herbert Mitgang, “Victory in the Ashes of Vietnam, ”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1969.

[67] 1968年12月16日, 玛丽·麦卡锡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 in Susan Sontag Archives at UCLA.

[68] Leticia Kent, “What Makes Susan Sontag Make Movies? ”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1, 1970.

[69] *As Consciousness*, 340.

[70] 关于这种情况及其在女权主义中作为一种周期性现象反复发生的全面的叙述, 参见, 例如: Susan Faludi, “American Electra, ” *Harper’ s*, October 2010.

[71] Norman Mailer, “The Prisoner of Sex, ” *Harper’ s*, March 1971.

[72] 参见 *Town Bloody Hall* (1979) dir. D. A. Pennebaker and Chris Hegedus.

[73] Leticia Kent, “Susan Sontag Speaks Up, ” *Vogue*, August 1971.

[74] “The Third World of Women, ” *Partisan Review*, Spring 1973.

[75] *On Photography* (Dell, 1978) , 3.

[76] *On Photography* (Dell, 1978) , 9.

[77] “How to Be an Optimist, ” *Vogue*, January 1975.

[78] “A Woman’ s Beauty: Put-Down or Power Source? , ” *Vogue*, April 1975.

[79] “Fascinating Fascism,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6, 1975.

[80] 1977年接受Performing Arts Journal采访, in *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 ed. Leland Pogu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5), 84。

[81] 出自David Rieff, *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 (Simon and Schuster, 2008), 35。里夫没有将这篇日记的内容收录到*As Consciousness*中。

[82] 出自David Rieff, *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 (Simon and Schuster, 2008), 35。里夫没有将这篇日记的内容收录到*As Consciousness*中。

[83] 1980年接受Wendy Lesser采访, in *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 197。

[84] *Illness as Metaphor* (Vintage, 1979), 22.

[85] Denis Donoghue, “Disease Should Be Itself, ” *New York Times*, July 16, 1978.

[86] Castle, “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

第九章 凯尔

1963年8月，当《纽约书评》的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联系上宝琳·凯尔时，后者已经等待一个突破的机会很久了。西尔弗斯在最后时刻才询问凯尔是否愿意为自己的杂志写一篇书评。^[1]她要评论的书正是玛丽·麦卡锡的《她们》。

凯尔只比麦卡锡小七岁，而且一直对麦卡锡崇拜有加。《她选择的伴侣》问世时，凯尔才二十三岁——正是理解书中那种性坦白的完美年龄。到《她们》出版时，凯尔早就是一位麦卡锡一样眼光敏锐的电影批评家了，但她一直没有获得什么广泛的成功和主流的认可。如今四十四岁的凯尔显然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在东海岸知识分子圈子里到底还有没有可能获得一席之地。到此时为止，她似乎做什么都不能一帆风顺。

这就是为什么当西尔弗斯在1963年打电话来约稿的时候，凯尔立即就答应了。前者只想要一千五百字的内容，而且要得很急，不过凯尔认为自己可以完成任务。唯一的问题是她并不特别喜欢《她们》这本书。《她选择的伴侣》中拥有的那种深深吸引着她的智慧在这本书中荡然无存。凯尔在这份书评的草稿中写道：

这个群体里的姑娘们冷漠、好算计，同时又不理性、无防备心和笨拙无能，完全像是一个反对女权主义的男性作者写出来的人物一样。那些想要相信用脑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真的不好，说这不适合她的“生活”，会让她混乱，或让她变得尖酸刻薄、脾气不好的人（过去玛丽·麦卡锡就经

常被说成是这样），如今在玛丽·麦卡锡自己的文字中找到了证明他们观点的依据。[\[2\]](#)

凯尔到此时已经知道“用脑子”可以给一个女人带来什么结果了。她自己就总被指责为“尖酸刻薄、脾气不好”。实际上，1963年新年当天，她在伯克利的KPFA电台做广播节目时还宣读了一份听众投诉信，信中的开头是这样的：“凯尔女士，我认定你还未婚，因为当一个人学会关心他人时，她的声音里就不会带着那种难听的尖刻了。”凯尔像摆好完美进攻姿势、期待着冲向猎物的捕食者一样朗读了这封信，然后作出了猛烈的回击：

关于这位不知姓名的女士，我想知道，在你令人安心的、受人保护的已婚状态下，你是否考虑过关心他人也可能会让声音变得尖刻？我还想知道你是否考虑过一位女性生活在这个时代中有多艰难。这个所谓的弗洛伊德化的时代对待女性的态度与维多利亚时代没有任何不同。只要女性表现出任何智慧，她们就要被指责为显露了不正常的侵略性，具有充满仇恨的报复心理，或被认定为女同性恋者。最后一种指责通常是那些在辩论中处于下风的男人们提出来的；他们喜欢安慰自己说这个女人是半男性化的。[\[3\]](#)

这里表露的显而易见的挫败感源于凯尔的个人经历，而不是政治信念本身。凯尔并不像桑塔格那样，被每个读过她文章的人立即认定为奇才。相反，凯尔是一个想要什么都得靠奋斗的人。她好斗的性格并不总能获得旁观者的接受，虽然这让她感到愤怒，但她依然不愿意改变自己以满足旁人要求她变成“关心他人”的人或别的什么样子的期望。很明显，她希望她出色的工作就足够证明一切，就像一个处在她职位上的男人唯一需要做到的那样。

在她生命的前半段时间里，仅做到这一点并不足够。凯尔曾经出色到似乎足以让除了亲密朋友之外的所有人都对她敬而远之，这一点上她与阿伦特很相像。凯尔不擅长培养人际关系，而且一直在为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而苦苦挣扎。实际上，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她依

然是靠比她年轻的桑塔格的帮助才终于引起了那些占满《纽约书评》版面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在《她们》出版几个月之前，桑塔格不知在哪里和凯尔见过面。年轻一些的桑塔格显然对这位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印象深刻。所以得知哈德威克和西尔弗斯想要找人给《她们》写书评后，桑塔格就向他们推荐了凯尔。最初接到那个电话时，凯尔肯定非常感激桑塔格：就玛丽·麦卡锡的本行评价她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这篇文章被接受，那么凯尔就终于有机会进入她认为自己理应跻身的行列了。

凯尔的奋斗路程很漫长。1919年，她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佩塔卢马（Petaluma）的一个家禽养殖场中。她的父母是纽约的犹太人，他们搬到这片区域，谋求加入某种进步的农业公社。到凯尔出生时，他们已经有四个孩子要养活了。她谈到在那个农场上的童年生活时总是把它说得像田园诗一般美好，或者至少是任何有干不完的家务和婚姻受不稳定财务状况和不忠行为困扰的父母的农民家的孩子能拥有的最美好的生活。不过凯尔一家在佩塔卢马只待到了1927年。当时艾萨克·凯尔（Isaac Kael）在股市崩盘中失去了所有的钱财，于是他们一家去了旧金山，他尝试寻找更稳定的工作，但大多数时候都以失败告终。

高中时的凯尔已经开始显露出天赋。她是一名好学生，在学校管弦乐队中演奏小提琴，还加入了辩论队。像桑塔格一样，她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哲学。但与桑塔格不同，凯尔没有立即离开加州。她热爱加州。在后来评论《赫德》（*Hud*，又译《原野铁汉》）这部电影时，她狂热地谈到了童年时期自己家中存在的不自觉的平等主义。她写道：“与墨西哥人及印第安人农场雇工一起吃饭并不是出于某种纡尊降贵的歉疚感，那就是西部人的生活方式。”^[4]再说旧金山也是个世界性大都市，足以满足她对艺术的偏好；这里有那么多电影院，那么多艺术家，那么多爵士乐俱乐部。大学毕业后，她

和自己的朋友，诗人罗伯特·霍兰（Robert Horan）一起，在这个城市中的波希米亚圈子里逛了个遍，他们一起梦想，一起参加各种项目。霍兰是一位同性恋者，凯尔知道这一点。根据她的传记作者布赖恩·凯洛（Brian Kellow）的说法，尽管这两个人曾经一度是恋人关系，但霍兰会受男性吸引这件事根本不曾令凯尔感到困扰。

1941年11月，霍兰和凯尔一起遵循有抱负的艺术家们长久坚持的传统前往了纽约：这些身无分文的搭便车者都抱着等自己抵达目的地后就能够以某种方式养活自己的希望。然而现实却是他们食不果腹，不得不在大中央车站遮风避雨。霍兰去找工作时很快就被一对在街上被他迷住的同性恋伴侣收留了。但是凯尔并不被包括在他们的安排中，突然之间，她被丢在一边自谋生路了。霍兰的注意力很快就全部转移到他的新恩人身上了。在这件事之后，凯尔很难相信纽约愿意接受她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最初那些年里，她不得不依靠担任家庭教师和出版社文员来谋生，因为她发表自己作品的努力都遭遇了阻碍。她近距离地观察着纽约的知识分子们，尤其看重一份由麦卡锡和阿伦特的朋友，德怀特·麦克唐纳创办的名为《政治》（*Politics*）的报纸。不过凯尔一直无法取得突破。她指责纽约，指责这个氛围。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个地方充满了‘有前途的’年轻诗人，他们现在已经三十五或四十岁了，但他们写出的东西还和他们十五年前写出的一样，甚至更糟。”^[5]1945年时，凯尔终于放弃纽约，回到了旧金山。

回到家乡的波希米亚风格的奇异环境中，凯尔遇到了一位名叫詹姆斯·布劳顿（James Broughton）的诗人兼实验电影制作人。他经常解释说因为自己一生都在从傲慢专横的母亲的影响中恢复，所以他更倾向于短暂的恋爱关系而不是承诺白头偕老。他拍摄过一些短小的实验电影项目，如1948年拍摄的《母亲节》（*Mother's Day*），影片内

容是一个赤裸的金发小孩儿在到处乱跑，同时能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一会儿夸奖他，一会儿责骂他。凯尔搬到布劳顿的住处和他同居了不长的时间。在她怀孕之后，布劳顿把她赶了出去，且不承认孩子是自己的。1948年9月吉娜·詹姆斯（Gina James）出生时，凯尔没有把布劳顿的名字写在她的出生证明上。

孩子总是会给人带来很多改变，吉娜也改变了凯尔的生活。这意味着凯尔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活，但她很快就不得不改为从事自由职业，因为如果她出门上班，就没有人照看孩子了。于是凯尔写书评，尝试写舞台剧剧本。她还对一个电影剧本进行了润色，但并没有被采用。最终她谈妥了唯一一个适合的机会。她在一家咖啡馆约见了一位男士，后者想要在自己新创办的名为《城市之光》（*City Lights*）的小规模电影杂志上刊登一篇关于电影《舞台春秋》

（*Limelight*）的评论。[这名男子就是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他后来会在旧金山创建城市之光书店。]这部1952年10月上映的电影是为已经上了年纪，需要使用替身的查理·卓别林量身打造的一部电影，不过凯尔从来没有特别关注过查理·卓别林任何作品。

尽管如此，凯尔还是写了评论，因为她想谈论的是这位演员本身。凯尔写道：“《舞台春秋》中的卓别林不再是一个无礼的小丑；他对自己的想法的崇敬太令人震惊，就算这些想法真的值得考虑也略显过度，更何况它们并没有价值——电影的内容时时刻刻暴露着这样的现实。”^[6]凯尔还称卓别林是“星期日思想家”，他完全符合苏格拉底对艺术家的评价：“凭借他们的诗歌的力量，这些人相信自己在其他他们不了解的问题上也是最聪明的人。”

这就是宝琳·凯尔撰写的第一篇影评，它被刊登在《城市之光》1953年冬季刊上。这篇影评揭示了凯尔的一些特点。其一，她把电影

看作比单纯的美学体验更广大的东西。尽管在她后来的人生中，凯尔是作为电影流行品味和感性反应的捍卫者而为人所知的，但她也对这些东西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关于它们所代表的想法的质量如何，以及它们怎么融入美国文化和知性生活这个更复杂的谜题。其二，凯尔具有充沛的活力，这种活力最终将成为她的标志。她不是一个过多使用第一人称写作的批评家，偶尔会穿插一些“我”的趣闻，但大多数情况下，她的个性体现在分析、探究和寻找线索的活力中。其三，尽管她对普通观众很感兴趣，但她永远不会怯于痛批流行现象。当时的卓别林可能已经处于职业生涯的尾声，面容干瘪、头发灰白，但他毕竟是查理·卓别林，是整个美国的小流浪汉。不过凯尔相信，批评家的角色就是要严厉抵制名望的影响。这一点并没能让她受到欢迎。

在她第一次去纽约时，起初她对人们的穿衣打扮和严肃举止印象深刻。她曾经告诉一位采访者：“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认为有很多才华横溢的人是因为堕落了才写出那么沉闷的东西。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是写不出更好的东西了。”^[7]可是关于《舞台春秋》的评论被发表之后，一直向凯尔关闭着的纽约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尽管只是开了一道小缝。突然之间，她收到了《党派评论》的编辑菲利普·拉夫的热烈回应，虽然他仍觉得她有些作品篇幅太长。身在伯克利的凯尔还从自己的朋友，诗人韦尔登·基斯（Weldon Kees）那里接过了KPFA电台的电影评论家职位。起初，基斯只是邀请凯尔做嘉宾。在广播开始之后，他有时会说：“宝琳，让我们先说点儿积极的。”^[8]但是到了1955年，基斯自杀了，于是电台邀请凯尔接替他的位置。做这份工作挣不到什么钱，但她还是接受了，并发展出了一批忠实听众。凯尔总是迎着潮流逆势而行，也总是很有系统性。与她之前的韦斯特和麦卡锡一样，凯尔有时也喜欢直接瞄准其他批评家的关注点进行攻击：

我想谈谈这个国家的电影批评的崩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针对观众或电影制作人的充满智慧的指南，也没有人能解答为什么我们年轻的电影制作人制作出来的只是一团废纸，而不是电影。[\[9\]](#)

凯尔的听众中有一位名叫爱德华·兰德伯格（Edward Landberg）的男子，他在伯克利经营一家名为影院协会（Cinema-Guild）的小型电影院。他是一个略微有些古怪的男人，拥有还在心理健康范围内的强烈的自尊心和对自己品味的固执坚持。他在电报大道（Telegraph Avenue）上的影院店面不大，能容纳观众数量不多，而且他只放映他个人喜欢的电影。他给电台打电话说自己喜欢凯尔的节目。之后他们开始约会，没过多久，两人就在1955年12月结婚了。很难说这段婚姻中有多少爱情的成分，但它显然是两个一心致力于电影的人的联盟。

在他们结婚之前，凯尔基本上就已经在和兰德伯格一起经营他的电影院了。她开始密切参与放映内容的排期工作，但她的一项重大创新还要算在影院沿街散发的宣传广告上增加对电影的批评内容，以此吸引更多顾客的做法。虽然这些传单本身是营销宣传材料，但凯尔从不惧怕用它们来向热门电影开炮。在描述《公民凯恩》（*Citizen Kane*）时，她写道：“威尔斯用‘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所有事’的叙事方式戏弄了电影手段，又用深刻的主题嘲笑了被回顾的内容。”[\[10\]](#)这种对电影的有力度的总结在电影票的销售上发挥了促进作用，哪怕是嘲讽这些电影的评论也同样有帮助。在凯尔的努力下，影院协会变得非常受欢迎，还增设了第二块银幕。

然而这段婚姻注定不会持久。兰德伯格讨厌妻子的固执。毫无疑问，凯尔对丈夫也有同感。兰德伯格告诉一位纪录片制作人说让他们最终走上离婚道路的原因是凯尔对电影宣传单上的内容主张著作权。1960年10月，兰德伯格解雇了凯尔，她失去了自己拥有过的唯一一份成功的工作。凯尔对此的反应很激烈。首先，她从影院协会的常规通

信名单中收集了七千个收信人，并在她制作的宣传广告版本中加入了一封辞职信：

五年半以来，我编写了这些传单，设计了版面，并通过电话与你们之中的数千人交谈。我认为影院协会和工作室（the Cinema Guild and Studio）是这个国家里唯一一家以个人品味和判断为决定因素来选择放映影片的影院——这个个人指的就是作者我本人。我很遗憾地宣布，出于与影院所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我已无法继续我的工作：这将是执笔的最后一期内容。[\[11\]](#)

兰德伯格在发出这一期宣传广告时将辞职信的内容涂黑了。凯尔随后起诉兰德伯格，要求对方支付59000美元的欠付工资和利润。[\[12\]](#)她还指控兰德伯格挪用公款用于个人开支。最终凯尔败诉，兰德伯格保住了影院协会的所有权，凯尔则再次失去了收入来源。

不过此时的凯尔至少开始有途径发表批评文章了。在与兰德伯格结婚后，凯尔写出了她最早的杰出作品之一。这篇名为《影院观众的幻想》（*Fantasies of the Art House Audience*）的散文是给《画面与音响》（*Sight and Sound*）写的。这是凯尔第一次将她作为批评家所拥有的最深刻的洞察力清晰地表达出来。简而言之，她相信那些对流行电影避而远之，坚持观看外国电影，认为自己这样是看到了更高级、更优秀的艺术的人都是满口胡言。而且她毫不畏惧地拿这些人的心头好开了刀，苏珊·桑塔格非常喜欢的外国电影《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就是其中之一。

凯尔对这个电影的意见主要是针对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撰写的台词的，她觉得其中有很多重复，而且太多都是关于电影中的女性角色的感受：

它越来越像精神和性的更高层次交融版本的《真情告白》（*True Confession*）；我觉得我们所有人从这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闭嘴。电影中的这个女人〔尽管埃玛努埃尔·里瓦（Emmanuelle Riva）对

她的诠释非常优美] 犯了智慧的现代女性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她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说了出来——好像床是展示感性的地方似的。不幸的是，人们认为关于自己的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真心话和秘密，或者说是我们在看起来很有同情心的人面前全盘托出的真实想法，其实很可能是我们平常足够理智的时候会将其忘个一干二净的废话。我们隐瞒真实的自己，因为我们认为人们不会接受那个邋遢的样子——怎么会有人想要看那些呢？^[13]

这是一个并非特意显露的观点。艺术中的情感表达曾经是，现在也是一个人们一直争论的问题，因为就像凯尔在这里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似乎是依照性别区分的。在女性作家中，由此产生的分歧由来已久。有些人一直坚持认为对每一个缺陷和每一种情感的彻底坦白是唯一诚实的写作方式；与凯尔相似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样做会强化人们持有的对女性的糟糕刻板印象，还让她们最差的品质有了像智慧的人一样发声的机会。不过，就这段话最后的那句坚持认为一个人的内在自我是邋遢的，没有任何理智的人会想要了解的残酷评论来说，凯尔肯定不只是在谈论艺术或《广岛之恋》或玛格丽特·杜拉斯。这绝对是一个如此看待自己的人才作出的陈述。

她所有猛烈的批评都清楚地表明，凯尔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多愁善感的人。她可不想在死后被某个只会坐在扶手椅里夸夸其谈的精神分析专家美化。她讨厌感伤。但是这种对自己冷酷无情的奇怪感觉有时也会出现在遇到令她沮丧的对手时。她希望与线性思维的思想家打交道，他们要清楚和直接；那些不这么思考的人 would 让她抓狂。她似乎是专挑那些她认为需要补充足够的常识的作家作对。

然而，凯尔也鄙视“高瞻远瞩”的理论家，因为他们不能像其他“短视”的人一样清楚地分析眼前的问题。这似乎形成了某种悖论。例如在一篇1962年为《画面与音响》创作的名为《电影批评有救吗？》（*Is There a Cure for Film Criticism?*）的文章中，她痛批了曾就电影的本质撰写过晦涩的长论文的德国理论家西格弗里德·

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她无法忍受这种理论，甚至认为对这种理论的尊重会在整体上毒害电影写作：

在任何艺术中，都存在着将自己的偏好转变为一种偏执的理论的倾向；在电影批评中，一位理论家越是混乱，越是固执己见，越是执着（于站不住脚的命题），他反而越有可能被认为是严肃的，重要的和“深刻的”——相比之下，有很好的辨识力的轻松的人们对电影的多元化理解则会被认定为不够根本。[\[14\]](#)

她把克拉考尔比作无趣的追求者，他的爱意对他爱的人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她写道，如果克拉考尔对“电影”的理解是对的，那么她打算甩掉他。这样的批评还只是凯尔的热身运动，接下来她将对一位名叫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的批评家新人作出更猛烈的抨击。后者在《电影文化》（*Film Culture*）的1962~1963年冬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电影作者论的笔记》（*Notes on the Auteur Theory*）的文章。凯尔认为该文章荒谬至极，所以她立即写了一篇强力反驳的文章《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Circles and Squares*）。

这场著名的论争中的一个讽刺之处是，萨里斯并不是发明他的那篇不长的文章中提出的理论的人。电影作者论是由法国人提出的，他们或多或少也是发明了电影批评的人。简而言之，该理论认为电影导演具有一种可被识别的风格，这种风格即使是在一部好莱坞商业片中也应当可以被确认和分析。从其最简单的形式上说，这个理论几乎是无法让人提出异议的，就连凯尔也不是完全不认可它。她也倾向于谈论导演对最终制作完成的电影拥有很高程度的控制，这是她对从查理·卓别林到布赖恩·德·帕尔马（Brian De Palma）的所有人的作品持有的一种假设。但让她觉得愚蠢和自负的地方是，萨里斯把这个理论发展成了一个系统，一种让她厌恶的单调乏味、过分坚决地评估艺术的方法。

萨里斯在很大程度上为凯尔打开了驳斥他的大门，因为他试图明确地界定电影作者分析的前提，这种抽象的概括听起来确实相当引人质疑：“电影作者论的第二个前提是作为对价值的衡量标准的导演本人的与众不同的个性。”^[15]凯尔抓住这个明显的薄弱论点不放，她带着一种直截了当的语气写道：“臭鼬的臭味比玫瑰的香味更与众不同；所以臭味比香味更好吗？”^[16]这将成为凯尔最喜欢的技巧，她总是让自己比她讨厌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批评家们表现得更合情理。如果一句尖锐的评论能够达到目的，她绝不会写一长段啰唆的废话。

凯尔也不害怕利用某些作家深藏不露的性别歧视思想来反击他们。萨里斯的散文中模糊地作出了一个与这里要论述的问题不怎么相关的使用“本质上女性化的叙事手法”的评价。凯尔在《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的结尾处利用一种修辞上的猛击将“女性化”和“男性化”技巧的理念回敬给了萨里斯：

电影作者批评家们如此着迷于他们自恋的男性幻想……以至于他们似乎无法放弃他们对人类经历的小学生一般的看法。（是不是有女性的电影作者批评家存在我不知道，反正我还没见过。）我们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英国和美国，电影作者论是成年男性用来为停留在他们童年和青春期的有限经验中提供正当理由的？那段时期中，男性气质看起来如此伟大和重要，而艺术则是装腔作势者、虚伪的人和像女性一样敏感的人才讨论的东西。他们把毫无价值的作品当作真正的电影艺术，这或许就是他们评价我们的文明的方式？我要问；我不知道。

萨里斯的反应就像一个受到训斥的孩子：他在余生中一直都在抱怨这些评论多么不公。他对她的传记作者说：“宝琳表现得好像我是美国批评界的巨大威胁。”^[17]但他当时的感觉是，人们很少读他的作品，他也没有获得什么报酬，所以他受到的攻击与他的影响力完全不相称。〔他在《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的批评家职位是后来才获得的。〕让他更加困惑的是，尽管《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把萨里斯的观点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凯尔对于萨里斯本人并没有什么怨

怒。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会经常说自己发现萨里斯的某些作品很有见地。实际上，当凯尔在《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发表后的第二年来到纽约时，她还给萨里斯打了电话，并邀请他一起吃饭。

萨里斯讲这个故事时讲出了几个不同版本——他不止一次地写过这件事——但我们起码可以确定，他为接到这个电话而觉得惊讶。他抱怨凯尔认定他是同性恋〔萨里斯后来娶了莫莉·哈斯克尔（Molly Haskell）〕。一开始，居住在皇后区另一端的萨里斯支支吾吾地表示去曼哈顿太麻烦。凯尔回答说：“有什么问题？是你的爱人不让你离开吗？”^[18]萨里斯还明确表示，自己觉得凯尔严厉粗野，咄咄逼人，按照他自己的标准衡量，她太过热衷谈论性爱的话题了。此后他们似乎没有再聚过。

关于二人之间这场小争执的有趣之处在于，尽管如今的人们普遍认为它曾引起电影界的注意长达数月之久，但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热闹。主流媒体肯定不会报道这次争论，就连各个电影期刊似乎也没有特别广泛地关注这件事。其他男性显然会觉得自己成了凯尔文章最后一段影射的目标——主要是英国杂志《电影》（*Movie*）的编辑们，凯尔曾嘲笑他们是糟糕电影的爱好者。这些人抱怨凯尔在某段话中的最后一击隐晦地污蔑他们是同性恋者，他们不屑地表示：“我们是否可以（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地）因为凯尔女士狂热的女权主义观点就推断她是女同性恋者？同样，她持有什么观点与她作为批评家的能力大小几乎也是不相关的。”^[19]但根据这些编辑的说法，性别与一个人作为评论家的能力就是相关的了。《电影》的编辑写道：“当凯尔女士说没有女性的电影作者批评家时，她是对的。她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女性的批评家也是不存在的，唉。”

这是一个糟糕的战术举动。凯尔在她的回复中把对手杀了个片甲不留。她列举了一些女性批评家的名字，并提出一个问题：“他们为

什么要加上一个冒犯性的、虚情假意的‘唉’——好像如果女性在智力上不够强大到足以承受他们批评中的那种严苛，《电影》的编辑们真的会感到遗憾似的。”^[20]

在这些小规模刊物的页面上刊登的言辞激烈的争论永远不可能使这场辩论成为它最终成为的那种永恒的对峙。确保它一直持续的人其实正是萨里斯。多年来他不断重新炒热这个话题，尽职尽责地痛批凯尔后来的每一本书，还反复提及他们之间的不和，其间的高潮是他在1980年时写的一篇精彩文章。凯尔从未回应过他。1991年，她告诉一位采访者：“我一直为他非要把我的评论看成针对他个人的而感到有些惊讶。”^[21]凯尔至今为止唯一的传记作者布赖恩·凯洛认定她是为了实现事业上的野心才写了《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这篇文章。^[22]这样的指控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因为当时的萨里斯在他自己的行业中也还默默无闻。凯尔不可能不是为了超越萨里斯，因为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作为一个电影批评家还不拥有值得别人超越的地位。

但是，《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的出版确实发生在凯尔职业生涯迎来变革的1963年。同年她还获得了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 fellowship）。推荐她获得该奖的人之一是德怀特·麦克唐纳。后者在回应这一请求时挖苦地说道：“尽管你在报纸上永无休止地骚扰我，但作为一名像基督徒一样善良的无神论者，我把另一边脸也给你打，还写了一篇满是溢美之词的文章，向古根海姆基金会推荐你的项目。”^[23]这里说到的项目就是《电影让我很生气》（*I Lost It at the Movies*）的汇编工作。书中将收录凯尔在《电影季刊》（*Film Quarterly*），《大西洋月刊》和《画面与音响》上发表的多篇散文。

但是，1963年也是西尔弗斯委托她给《她们》写书评的那一年。凯尔本希望这篇文章可以让她体面地加入纽约知识分子圈子。她很快就写完文章交了上去。她希望这可以成为她进入自己从二十多岁以来

一直想要融入的知识分子环境的契机。可惜哈德威克拒绝了凯尔的稿件，只是说她觉得批判麦卡锡对待女性的方式是一个不相关的话题。

[24]凯尔被拒绝的原因可能是此时梅勒已经同意亲自为这本书写书评，但也有可能是哈德威克真心这么认为。

凯尔感到很受伤。她把自己被拒绝的消息告诉了桑塔格——因为后者没有再关注这件事的进展。凯尔还把自己写的评论发给了桑塔格。桑塔格回信说她厌恶梅勒对麦卡锡的评论：“他对她本人的攻击太过严厉，对书的批评则不合常理地轻描淡写。”[25]但是桑塔格说她认为凯尔的作品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她不认为关于女权主义的争论是对这本书最好的攻击角度。桑塔格补充说：“我觉得你说的关于这部小说，关于角色的发展方式，关于现实与虚构之间关系的内容比表达你对麦卡锡诽谤女性的愤慨更有意思，也更新颖——尽管我跟你同感。”

也许就是由于这一点鼓励，凯尔把这篇书评保存了起来。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凯尔不再在她的作品中评论两性关系了。这些内容就是不再以曾经出现在她的批评文章中的方式继续出现了。人们开始提出并认定凯尔与女权主义不相干就是因为她的这种沉默。一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见过凯尔的女权主义者批评家告诉凯尔的传记作者说：“我认为宝琳完全不理睬女权主义。她不是对女权主义怀有敌意，她只是听而不闻。”[26]这样的评价可能是正确的，至少就她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式兴起的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态度而言没有错。但同样有可能的是，在听到她尊敬的人告诉她这些对于性别问题的评论不够严肃之后，凯尔接受了这个假定，并决心在自己作为批评家的余生中不再费力以女性的身份为女性辩护。凯尔无法放弃的是她想要被视为严肃作家的渴望。

不过，她并没有彻底放过《她们》。当她听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她立即为自己争取到了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文章的机会。她将自己对麦卡锡原著的看法，主要是指责她诽谤知识女性的那一部分融入了对电影导演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和制片人西德尼·布克曼（Sidney Buchman）的质疑中。她写道他们不怎么在乎这部小说的主题，尤其是在听到布克曼将本书主题概括为“高等教育不能让女性更好地适应生活”之后，她变得担忧起来：

我不习惯只充当观察者的角色（我从来没有习惯过），我反驳了这个说法：“那什么能？高等教育让男性更好地适应生活了吗？”[\[27\]](#)。

制片人在一段时间之后才给了凯尔一个直白的答案。他显然觉得教育腐化了所有人，但他补充道，“你知道，宝琳，我不知道这本该死的书是关于什么的。”关于她看到的导演的显而易见的缺点，凯尔一直礼貌地保持了沉默，直到电影拍摄结束后的庆功会上，据导演西德尼·吕美特说，当关于批评家角色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时，凯尔突然说了一句：“我的工作就是告诉他〔吕美特〕应该走哪条路。”[\[28\]](#)。这篇文章显示了作者在写它的时候感受到的沮丧之情。它的篇幅非常长，表述的观点非常固执，以至于《生活》杂志拒绝发表，最后凯尔只好把它收录到了自己的一本书中。[\[29\]](#)。

1965年，凯尔的《电影让我很生气》终于出版，没人认为一本电影批评文章的汇编能有什么市场。但不知为何，它还真成了畅销书。1964年12月，《大西洋月刊》上刊登了一篇对这本书的介绍，题目是《电影要崩溃了吗？》（*Are the Movies Going to Pieces?*）这篇文章把凯尔描述为一名街头公告员，她大声抱怨电影的生命力正在消失。从某种程度上说，凯尔认为这是电影工作室主管们的错。她还如往常一样地指责了那些已经变得深奥难解、反对含义的批评家

们，正是他们在捍卫那些只执迷于技术而完全没有含义的电影。凯尔特别批评了一位这样的作家：

苏珊·桑塔格在1964年4月13日的《国家》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的《火焰生物》（*Flaming Creatures*，又译《热血造物》）的非凡散文，题为《为开放的眼界提供的盛宴》（*A Feast for Open Eyes*）。桑塔格在文中阐明了一个新的批评原则：“鉴于此，史密斯的粗糙的技巧美妙地符合了展现火焰生物的感性的需要——这种感性是基于无选择性、无理念、超越否定的基础上的。”我认为，通过将无选择性视为一种价值，桑塔格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潮流先锋。[\[30\]](#)

到此时，这两个女人已经互相认识了，所以这一切都很令人好奇。公平地说，桑塔格不是凯尔这样的批评家。她不会用通俗的语言写作，尽管她不完全算是一个喜欢长篇大论的人，但桑塔格从其他所有角度来看都可以被归入凯尔认定的势利眼的范围：比如桑塔格主要关注“电影艺术”，她对外国电影感兴趣，她注重形式和风格胜于注重内容。（值得记住的是，桑塔格此时尚未发表《关于“坎普”的札记》——她在那篇文章里至少显露了一点儿对流行文化的热爱。）此时，也就是在《纽约书评》那次奇怪的交集发生一年多之后，凯尔还在像用骨头逗狗一样不停地提及桑塔格：“桑塔格女士正在研究某些东西，如果她继续研究，并且像牛仔竞技表演者斯利姆·皮肯斯（Slim Pickens）那样驾驭自如的话，那么批评的终结很可能就要到来了。”如批评家克雷格·塞利格曼（Craig Seligman）后来注意到的那样，凯尔的话可能已经让桑塔格意识到了问题：最终出现在《反对解释》中的文章版本在措辞上有所调整。桑塔格没有赞扬“无选择性”，而是赞扬了一种“放弃理念束缚”[\[31\]](#)的辨识力。就是这一微小的变动让桑塔格的论述避开了凯尔的批评大刀。

不管怎么说，反正凯尔的论述引起了各份报刊的注意，当整本书面世时，批评家们都非常喜欢它。《纽约时报》上，一位电影杂志的

编辑盛赞这本书证明了“她是美国目前活跃着的最理智、最尖锐、最机智、最不装腔作势的电影批评家”。^[32]这位编辑尤其钦佩她在《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中总结的她的方法：

我相信我们可以对任何形式的艺术作出最彻底的、最好的回应……只要我们在作出判断时是多元的、灵活的、相对的，只要我们是不会拘一格的。折中主义不等于无所顾忌，而是要从各种系统中选择最佳标准和原则。成为一名多元论者比做一个适用单一理论的人需要更多心思和更多的秩序性。^[33]

这或多或少就是宝琳·凯尔在余生中一直坚持的写作方法，她一直是矛盾的，喜欢充满激情的即兴发挥，还坚称唯一值得捍卫的原则是乐趣。有些人自然会认为这种理论“让人愤怒”，一位批评家在她经常发表文章的《画面与音响》上撰文抱怨“她好争论的文章中充满了会造成破坏的情绪性”。^[34]尽管如此，这本书无论如何都可以算是一次成功。凯尔靠这本书赚的钱搬回了纽约。

在她四十六年的生命中，凯尔第一次可以靠写作来维持生计了。她的女儿也来到纽约，和她一起住在上东区。凯尔全身心投入了工作，显然是确信在这次成功之后，必将有更多的成功接踵而至。她已经获得了一个看起来很稳定的工作：为《麦考尔》杂志 (*McCall's*) 撰写影评。多萝西·帕克早在大约四十年前曾为这份杂志供稿，此时它的订阅量为一千五百万。《麦考尔》的编辑聘请凯尔的原因是因为知道这份杂志的读者群正在发生改变，他希望凯尔的生气勃勃能够吸引年轻人群体。所以他与后者签订了为期六个月的合同。

可能这个人以前读过的凯尔的作品还不够多，所以他并不理解她的题材。他也许以为既然她曾经为没什么价值的电影辩护过，那她就可以为所有垃圾电影找到值得宽恕的理由。总之结果是，他说当他看到凯尔写的拉娜·特纳 (Lana Turner) 比较不受人关注的一部电影——《X夫人》 (*Madame X*) 的影评时，简直觉得惊骇至极。凯尔在文

中批评五十岁的拉娜·特纳不适合这个角色，因为她还太年轻了。凯尔会推荐戈达尔（Godard）的《男性，女性》（*Masculin Féminin*），也会痛批《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按照媒体上广泛报道的说法，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题为《唱歌的修女》（*The Singing Nun*）的评论，凯尔把这篇文章当作了表达她对《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的不屑的机会。她提到现在电影行业里的大多数人都把这种音乐剧称为“金钱之声”，她还说：

这个电影会冒犯谁？只有我们这些会提出异议，讨厌被以这种方式操纵，并且意识到我们被迫感受的情绪是多么自我放纵、廉价且现成的人。当我们听到自己哼唱那些令人作呕、炫耀卖弄、假仁假义的歌曲时，我们可能会更加意识到自己是如何被利用，并沦落成情感和审美的白痴的。
[35]

这篇文章是凯尔在合同执行到第三个月时写出来的，编辑觉得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当他解雇凯尔时，媒体立即报道说她遭到解雇是因为电影工作室施加的压力。这是她的名字第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宝琳的险境”的新闻标题下。她的编辑还到各个商业报刊去做了一圈道歉拜访，他接受《剧艺报》（*Variety*）采访时拘谨地表示：“凯尔女士越来越多地质疑电影制作人的动机，而不是关注电影本身。” [36]

凯尔很快就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并在《新共和》获得了一份工作。她将取代更有绅士风度的电影批评家斯坦利·考夫曼（Stanley Kauffman），因为后者已经被《纽约时报》聘为戏剧批评家。起初，这似乎是一个更好的搭配；《新共和》的读者群比《麦考尔》的更能够宽容思想上的不同观点。但是这里的报酬比《麦考尔》少得多，而且在发表了一两篇作品之后，凯尔就又开始与她的编辑产生分歧，因为后者经常随意修改她的稿件。在为一部名为《邦妮和克莱德》（*Bonnie and Clyde*，又译《雌雄大盗》）的新电影写的长文完全被

该杂志拒绝之后，凯尔就辞职了。有那么一小段时间里，年近半百的她似乎又要做回自由职业者，只能赚取零碎的收入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她与《纽约客》的威廉·肖恩取得了联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纽约客》已经不再是哈罗德·罗斯掌管下的那种简单的幽默杂志。当威廉·肖恩在1952年接任编辑一职后，杂志的基调发生了很大变化。肖恩是一个矜持寡言、品味独特的人，但当他真心喜欢某位作家时，他会真的有所表现，比如为他们提供杂志社的职位，让他们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华。许多人会终身在《纽约客》工作，他们对自己的定义有别于为杂志提供日常内容的记者。

“肖恩先生”喜欢的那些作家都是终身任职的，他们随时可以回到这里来。

凯尔已经吸引了肖恩的注意。几个月前，她第一次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电影和电视》（*Movies and Television*）的文章。她在这篇长文中大谈自己对于电视的平庸风格感染了电影的不满。肖恩喜欢那篇文章，他也很喜欢此时收到的长达七千字的关于《邦妮和克莱德》的文章。肖恩把它刊登在了1967年10月的杂志上，尽管这部电影是8月份上映的，此时热度已经下降了。该电影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成绩，但其获得的口碑却像一艘不断下沉的船，评论者们纷纷指责它是在美化暴力。但凯尔把这艘船拖上了岸。她写道：“在这个国家里，如何才能制作一部好电影，而又不遭到别人的严苛批判？”^[37]这些负面的反应只能让她确信，大多数人对艺术是怀有敌意的。凯尔提出：“《邦妮和克莱德》没有给观众提供一个简单、安全的认同依据，他们看这部电影时会有很多感受，但是没人限制他们必须如何感受。”人们可能会不喜欢《邦妮和克莱德》中把暴力表现得有趣的方式，但这并不自然让它成为一部糟糕的电影。那是观众的问题，而不是艺术的问题。不过凯尔仍然认为道德应当发挥一定作

用。她说这部电影的“主旨”是“让我们直面（暴力），让我们为嘲笑付出代价”。

到此时为止，凯尔已经熟练掌握了她特有的电影批评方式。第一，她会关注其他批评家所写的内容，关注其中存在的逻辑缺陷和虚伪之处；第二，她会关注电影观众及其对大屏幕上呈现的内容的反应，因为凯尔认为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体验与电影本身一样重要；第三，她会关注这一切之中的乐趣。乐趣可能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感受，但凯尔与包括桑塔格在内的其他那些高傲的批评家们不同，她确信电影的最高价值在于它给人们带来的乐趣。正是这个理念让她一生都被指责粗俗愚钝、冷漠无情，甚至是头脑简单。但是，根据她自豪地坚持的“折中主义”风格，乐趣一直是凯尔最关注的事情之一。她把乐趣当成一种信条。

人们提起肖恩时，通常不会认为他是一个看重乐趣的人，但他非常喜欢凯尔在这篇《邦妮和克莱德》的影评中表现出的风格，所以他邀请凯尔担任《纽约客》的两位常规电影批评家之一，她将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止。鉴于在最近几份工作中遭遇的问题，凯尔提出要有条件地接受雇用：她希望在合同中规定，未经她的许可，她的文章不会被实质性地修改。肖恩同意了，但是凯尔来到《纽约客》之后，肖恩就食言了，他做了他对本杂志其他所有作家都要做的事，那就是像用细齿梳子梳头一样仔细地审查凯尔的稿件。凯尔为此与肖恩争吵过。她的固执正是使她无法在《纽约客》办公室中成为受欢迎的人物的原因之一。肖恩为杂志设定了遵从资产阶级礼仪标准的基调，而凯尔喜欢咒骂和“刻意使用粗鲁言辞”^[38]这个标志性特征就成了两人之间讨论的永恒主题。他们似乎在辩论中达成了一种休战状态，但这种休战仅限于他们两人之间。至于其他人则仍然难以认同凯尔：

我记得我收到过一位杰出的《纽约客》作家写给我的一封信，对方说我穿着沾满粪土的牛仔靴子践踏了这份杂志的页面，并建议我穿着我的牛仔靴子离开这里。^[39]

肖恩一直支持凯尔，虽然他有时会在深夜打电话和她争论逗号的使用位置。但凯尔终于有了生活保障，而且她还会继续出版收录她批评文章的书籍。她的第二本作品《亲亲，砰砰》（*Kiss Kiss Bang Bang*）几乎和《电影让我很生气》一样成功，里面还收录了她当初为《生活》写的关于《她们》的影评。不过到此时，凯尔已经成了一位正规的电影评论家，她凭借文章中体现的丰富情感和一针见血的评论树立了自己的声望。通过她在《纽约客》的职位，凯尔对无论是偏左还是偏右的普遍观点都会提出争论，她还倾向于让自己的攻击带着一种戏剧性的独特风格。从获得这个职位之初，人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她必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有些人对于凯尔写作风格的形容比其他人的讨喜一些。例如凯尔送给默片影星路易丝·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一本《亲亲，砰砰》，后者与她早就有通信往来。布鲁克斯在回信中说：“你在封面上的照片让我想起多萝西·帕克，而且是她还年轻、幸福时的样子。”^[40]尖刻但欢快似乎就是凯尔追求的文字中的人格面具。但凯尔不断增长的敌人团体却一口咬定她在整个电影行业面前表现得过于傲慢无礼。1967年12月13日的《剧艺报》上刊登了这样一个大标题：

宝琳·凯尔：充满热情但缺乏教养；她把礼貌的男性都踩在脚下^[41]

这可能是夸大其词了。威廉·肖恩绝对是一个“礼貌的男性”，但他同时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他并不想要那种谈论电影艺术或电影批评现状的全局性的散文，他已经对凯尔进行了足够的干涉，以确保不会有那样的文章出现在他这份文雅的杂志上。凯尔也很早就意识到自己需要成为一位普通一些的评论者。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只发表了

一篇长文，这篇文章最后被刊登于1969年2月的《哈泼斯杂志》上，题目为《垃圾、艺术和电影》（*Trash, Art, and the Movies*）。

正如桑塔格的《关于“坎普”的札记》有时会被错误地描述为为“坎普”辩护一样，《垃圾、艺术和电影》有时也会被错误地描述为为垃圾一样无价值的艺术辩护。但凯尔其实花了大量笔墨来解释这两者之间存在的一个关键差别。她想要解释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技术性问题是无关紧要的：

一个批评家不应该靠把一部作品拆开揉碎来说明自己知道它是如何被组合在一起的。真正重要的应该是传达电影中的新颖和美丽之处，而不是讲解它的制作方法。[\[42\]](#)

这个观点与桑塔格一直强调的形式与内容的互动不无共同之处。实际上，一个快速提炼《垃圾、艺术和电影》一文要旨的方法是借用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中的术语。在《垃圾、艺术和电影》中，凯尔极为详细地论述了应当用色情学取代阐释学的问题。凯尔一如既往地关注反应，而非美学。她说观众对于让他们感到愉悦的电影反应最多，即便这样的电影是没有价值的垃圾而非艺术。不过她也辩论说电影中的艺术：

……是我们一直认为好的东西，它出现在电影中时只是更更好了。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颠覆性姿态，是持续时间更长的兴奋时刻，它还延伸出了新的含义。

凯尔担心，垃圾与艺术的相互作用带来的真正问题其实是，它意味着人们越来越愿意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称某些垃圾为艺术。可能没有什么人会反对她说这种一知半解的自以为是有害处的观点。让凯尔又与不少批评家，而且大多是男性批评家意见不合的地方其实是，她将希区柯克的作品归类为垃圾，但是她对那些坚持认为垃圾电影需要证明自己的正当性的人感到气愤。她问道：“为什么快乐还需

要正当性？”凯尔并不是看不出垃圾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文化的整体基调：“它肯定会减少和限制艺术家的机会。”但她认为垃圾作品就像一种诱导性毒品，在文章结尾处她写下了一句著名的结语：“垃圾让我们渴望艺术。”

桑塔格关于“坎普”和阐释的想法与凯尔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桑塔格曾写到分析的乐趣之一在于把事物拆开并重新组合起来，这一点是凯尔永远无法接受的。桑塔格相信的是一种不那么普及的快乐，而且她完全不关心普通电影观众如何体会更高的价值；认可垃圾电影的纯粹享受——而不是通过“坎普”的讽刺来体会——是桑塔格完全不能理解的。但奇怪的是，尽管她们二人都对艺术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感兴趣，桑塔格和凯尔再也没有就艺术发生过争论。除了1964年的那次简短的交流之外，她们都没有写过一句关于对方的内容。凯尔似乎对发表重大见解失去了兴趣。虽然她的评论仍然杰出和精彩，但这些文章已经改为采用相对传统的评论形式。实际上，在她的余生中，她再也没有写过像《垃圾，艺术和电影》这样的作品，大多数时候，她都会避免这种涵盖广阔的文章。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原因的。凯尔说服威廉·肖恩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个主要项目是关于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的长篇论文。起初，凯尔打算为以书的形式出版的剧本写一篇引言，但她写着写着就控制不住字数了，于是引言变成了一篇长达五万字的关于作家与制作电影全过程的关系的论文。1971年10月，《纽约客》分两期发表了这篇文章，毫无疑问是认定它将凸显凯尔已成为全国最著名的电影评论家之一，也是一个受到普遍欢迎的人物的地位。结果，它却成了凯尔职业生涯中的灾难。

这篇关于《公民凯恩》的文章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轨道。凯尔宣称这部电影的价值只是一部“浅薄的杰作”，^[43]根据她

个人对价值的衡量尺度来看，她并没有认定这部电影是一部烂片。引起她关注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她想知道究竟是谁让《公民凯恩》如此光辉夺目。她认为这部电影的大部分精彩之处不该被归功于广受好评的威尔斯，而应当被看作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被遗忘的剧本作家赫尔曼·曼凯维奇（Herman Mankiewicz）的贡献。曼凯维奇曾经是圆桌会议中的追随者。和多萝西·帕克一样，他也是为了挣钱而接受了好莱坞的工作机会。在介绍他的职业生涯时，凯尔迅速进入了疯狂赞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编剧们的成就的模式：

尽管他们显然都出卖过自己的才华——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出卖也可以是愉快的经历；尽管他们大多都爱上了电影——因此他们不仅要忍受个人的挫折，还要忍受这项伟大的，仍然新鲜的艺术本身的堕落；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为这种随心所欲的魔法的持续壮举作出了贡献，我们称这个壮举为“三十年代的喜剧”。我认为，《公民凯恩》正是其中的最高峰。

凯尔还明确地将多萝西·帕克包括在这群人之中。虽然她提到这些作家在好莱坞大多成了酒鬼，但她也承认他们设法拍出了一些好电影，他们的作品被迫变得“更加粗犷，更加强硬，更具反传统性，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规整，一样风格化”。这似乎就是她对曼凯维奇具有如此强烈的信心的基础，以至于她确定后者就是某种被巨星奥逊·威尔斯的自我掩盖了光芒的悲剧人物。虽然凯尔并没有夸大威尔斯作为恶棍的形象，但他给人的感觉仍然很糟，俨然成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巨大名气故意将编剧排挤到阴影之中的人。

起初，人们喜欢凯尔对《公民凯恩》的新颖评论方法。加拿大小说家莫迪凯·里奇勒（Mordecai Richler）在《纽约时报》上赞扬了她对这部电影制作过程的描述，他特别喜欢凯尔称《公民凯恩》是一部“浅薄的作品，一部浅薄的杰作”的说法。^[44]但他认为她夸大了阿冈昆圆桌会议成员的才能，还引用帕克本人的刻薄评价来反驳凯尔的观点，帕克曾称他们“只是一群讲讲笑话并互相吹捧的人”。^[45]

但随后，那些心怀不满的批评家们，尤其是很多热爱《公民凯恩》这部影片，并将威尔斯视为无可争议的电影作者的批评家们就开始核查事实真相了。凯尔没有接受过做记者或研究员的专业训练。她也没有记者或研究员拥有的那种系统化的思想。所以她的文章中会存在漏洞。奥逊·威尔斯还活着，但凯尔没有采访过他。她后来解释说，她认为自己不采访也知道威尔斯对谁写的剧本的问题会如何回答，他当然要极力为自己辩护。相反，她对曼凯维奇参与剧本创作情况的大部分了解来自她与约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一位与威尔斯合作过的制片人）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者霍华德·苏伯（Howard Suber，凯尔付钱雇用苏伯为自己做调研）的谈话。这两个人都确信威尔斯根本没有参与剧本创作；而凯尔在没有对另一方说法进行检验的情况下就采纳了他们的观点。

这激怒了她的敌人。她再次被指责为过度追求名利。反对者声称她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损害威尔斯的声望，批评家们纷纷站出来为被广泛认可为一位伟人的威尔斯辩护。安德鲁·萨里斯认为这是一次能够隐蔽在安全地带为自己和自己的电影作者论辩护的机会。于是他在《乡村之声》上轻蔑地回击道：

凯尔女士关于赫尔曼·J·曼凯维奇的惊人揭露并不会严重削弱奥逊·威尔斯作为《公民凯恩》的电影作者的身份，就好像《伟大的安伯森家族》（*The Magnificent Ambersons*）中所有最好的台词和场面都是由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写出来的这件事也不会削弱奥逊·威尔斯作为《伟大的安伯森家族》的电影作者的身份一样。[\[46\]](#)

萨里斯并不是唯一看到凯尔对“电影作者”这个概念进行代理攻击的人，她在这里说的内容比她在《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中已经说过的多一倍。即使在更高深的评论文章中，好斗的比喻也随处可见。有同情心的肯尼思·泰南（Kenneth Tynan）在伦敦的《观察家》

上称凯尔正在发起一场正义的运动：“我支持她的战争，但有时难免觉得她选错了战场。”^[47]

据说奥逊·威尔斯为此在他律师的办公室里哭了一场，还考虑对凯尔提起诉讼（但他最终没有采取行动）。^[48]此后他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坚称剧本是合著的成果。接下来，人们普遍认为是威尔斯雇用了一个人在《时尚先生》上发文为他辩护。这个人就是曾经的杂志撰稿人，此时已经成为电影导演的彼得·波格丹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这篇题目为《凯恩叛乱》（*The Kane Mutiny*）的文章根本不是关于《公民凯恩》的：它完全是在一点一点地驳斥凯尔的文章，波格丹诺维奇能够这样做显然是得益于威尔斯的大力帮助。波格丹诺维奇抓住的把柄正是真正能够痛击凯尔的地方：他严厉地指责凯尔付钱购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者苏伯的研究成果，却没有明确提及苏伯对她文章作出的贡献的行为。更糟糕的是，苏伯本人显然也对凯尔感到气愤。他告诉波格丹诺维奇说，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同意凯尔提出的剧本是由曼凯维奇单独所写的观点。

波格丹诺维奇的文章还有另一个目的：它可以被看作是他正在创作的一本关于威尔斯的作品提前推广。他引用了自1969年以来他对这位导演进行的多次采访中的内容，威尔斯曾经相对大度地承认曼凯维奇对剧本作出的贡献。（波格丹诺维奇直到1992年才终于出版这本书。）波格丹诺维奇引用的威尔斯的原话是：“曼凯维奇的贡献……是巨大的……我爱他，人们都爱他。你知道，他非常受人敬佩。”^[49]从这里开始，波格丹诺维奇开始逐句驳斥了凯尔文章中的几乎一半内容，他用的都是威尔斯的辩解，但也有引用自其他来源的内容。波格丹诺维奇在文章结尾强调了这场无端怀疑给威尔斯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他还引用了导演本人的原话：

我讨厌去想如果将来我有了后人，如果他们想到要看看这些书中的任何一本，那么他们会怎么想他们的祖先呢：她是狂妄自大的虱子中特别的一个……清洗凯尔女士留下的污迹要颇费一番力气。

在她对威尔斯作品的评论中，凯尔也称赞威尔斯是一位创造出了奇妙事物的有远见的人的事实已经毫无意义了。实际上，凯尔写过的所有涉及威尔斯作品的内容几乎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文章。就因为这篇关于《公民凯恩》的评论，过往的那些就通通被抹杀，不再相关了。凯尔一方当然也有一些过错。她想讨论的合作作品的作者身份问题几乎是一个不可能获得确切答案的问题。即便是在萨里斯和波格丹诺维奇开始对她围攻之前，她就已经动摇了。凯尔告诉《星期六文学评论》的采访者说自己并不是要损害威尔斯的形象；她还承认他一直是这部电影的关键人物。

曼凯维奇的剧本很精妙，但是换成其他导演……或是换成其他演员扮演凯恩，这个剧本也可能被拍成平淡无奇的影片。[\[50\]](#)

这样的认可并没有挽回什么，部分原因是从出现争议的早期开始，这件事就不再是关于凯尔实际上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她的错误暴露了她良好声誉的一个可攻击的弱点，而那些不喜欢她所坚持的一切的人都不会错过这个击倒她的机会。她喜欢用文章与人交战，也完全不会因为别人做同样的事而指责别人。凯尔一如既往地提出自己的论点，像正在行军的一个个连队一样，毫不停顿地继续向前。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她早就知道想要写出有权威性的文章，就必须投射出极端的，甚至是超人一般的自信。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投射。凯尔很傲慢，但她也很精确。她的自我编辑能力是传奇性的。如她的朋友，有时也是门徒的詹姆斯·沃尔科特（James Wolcott）说的那样，凯尔“就像任何从E. B. 怀特（E. B. White）的精灵学院里走出的大惊小怪的人一样，是一位狂热的修补匠”。[\[51\]](#)她虽然会疯狂地关注细节，但是她对事实是否疏于

查证了？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更奇怪的是，在读者来信版面上与人唇枪舌剑、机智反击在凯尔的职业生涯中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这一次她却并没有继续发表回应文章。据凯洛说，凯尔在读了波格丹诺维奇的文章不久后曾与伍迪·艾伦（Woody Allen）一起吃饭，她问对方自己是否应当有所回应。艾伦似乎告诉她：“不要回应。”^[52]凯尔这次明显受到了伤害，不过她似乎从中吸取了教训，那就是她不该再参与任何报道了。她也不再在版面上与那些不喜欢她作品的人争论了。

不过这件事始终纠缠着她。在这次争论过去几年后，凯尔参加一个奥斯卡聚会时遇到了一位名叫约翰·格雷戈里·邓恩（John Gregory Dunne）的编剧。邓恩在写到这件事时，他立即把它视为这位著名的电影批评家最丢脸的经历。当《提升凯恩》（*Raising Kane*）最终被收录到书中之后，他拒绝了为该书写评论的机会。在他看来，这是一本“傲慢愚蠢的书，它比我读过的任何关于好莱坞的东西都更能让我忍不住傻笑出声”。^[53]但邓恩一直害怕与那些可以发文痛批他参与的电影的人交恶。鉴于此，他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并粉饰了自己对这本书的作者的真正看法。关于他们在聚会上的相遇，邓恩写道凯尔穿着“璞琪（Pucci）仿品和矫形鞋”来参加活动。当他做自我介绍时，凯尔已经知道他的名字，而且立刻要求见见他的妻子，琼·迪迪翁。

^[1] 参见1963年8月28日，罗伯特·西尔弗斯写给宝琳·凯尔的书信，in the Pauline Kael Papers at Lilly Library, Indiana University at Bloomington。

^[2] 为《她们》所写的书评的初稿，出自Pauline Kael Papers，转引自Brian Kellow, *Pauline Kael: A Life in the Dark* (Penguin, 2011)。

^[3] 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KPFA电台广播节目，日期不详（大约是1962年至1963年间），可见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hs-jKei3g>。

[4] Pauline Kael, “ ‘Hud’ : Deep in the Divided Heart of Hollywood, ” *Film Quarterly*, Summer 1964.

[5] 1942年2月28日, 宝琳·凯尔写给Rosenberg的书信, 转引自Kellow, *Pauline Kael*, 29。

[6] *City Lights*, Winter 1953, reprinted in *Artforum*, March 2002, 122.

[7] 1982年接受Los Angeles Reader采访, in *Conversations with Pauline Kael*, ed. Will Brantley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6), 76。

[8] 参见*Ed and Pauline*, dir. Christian Brando (2014)。

[9] 参见*Ed and Pauline*, dir. Christian Brando (2014)。

[10] 参见*Ed and Pauline*, dir. Christian Brando (2014)。

[11] “Owner and Employe [sic] feud over ‘Art’ ; Guess Who Has to Take Powder? ” *Variety*, November 16, 1960.

[12] “Wife Wants Artie Operators ‘Wages, ’ ” *Variety*, May 31, 1961.

[13] “Fantasies of the Art House Audience, ” *Sight and Sound*, Winter 1961.

[14] “Is There a Cure for Film Criticism? ” *Monthly Film Bulletin*, (此处疑有误, 正文里说的是*Sight and Sound*), Spring 1962。

[15] Andrew Sarris, “Notes on the Auteur Theory in 1962, ” *Film Culture*, Winter 1962-63.

[16] “Circles and Squares, ” *Film Quarterly*, Spring 1963.

[17] 转引自Kellow, *Pauline Kael*, 78。

[18] 转引自Kellow, *Pauline Kael*, 78。这个故事出自Kellow, *Pauline Kael*, 78。

- [19] “Movie vs. Kael, ” *Film Quarterly*, Autumn 1963.
- [20] “Movie vs. Kael, ” *Film Quarterly*, Autumn 1963.
- [21] 1991年8月28日, 接受San Francisco Bay Guardian的Allen Barra采访, in *Conversations with Pauline Kael*, 135。
- [22] 参见Kellow, *Pauline Kael*, 78。
- [23] 1963年11月27日, 德怀特·麦克唐纳写给宝琳·凯尔的书信, in *Pauline Kael Papers*, Lilly Library, 转引自Kellow, *Pauline Kael*, 70。
- [24] 1963年9月14日,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给宝琳·凯尔的书信, in the *Pauline Kael Papers*, Lilly Library。
- [25] 1963年10月25日, 苏珊·桑塔格写给宝琳·凯尔的书信, in the *Pauline Kael Papers*, Lilly Library。
- [26] Karen Durbin, 转引自Kellow, *Pauline Kael*, 174。
- [27] “The Making of The Group, ” in *Kiss Kiss Bang Bang* (Little Brown, 1968) , 97.
- [28] Kellow, *Pauline Kael*, 91.
- [29] 这本书是《亲亲, 砰砰》。
- [30] Pauline Kael, *I Lost It at the Movies* (Dell, 1965) , 17.
- [31] 参见Sontag, *Against Interpretation*, 229。
- [32] Richard Schickel, “A Way of Seeing a Picture, ”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1965.
- [33] “Circles and Squares. ”
- [34] Geoffrey Nowell-Smith, Review of *I Lost It at the Movies*, *Sight and Sound*, Summer 1965.
- [35] “The Sound of...” in *Kiss Kiss Bang Bang*, 177.

[36] “Sez McCall’ s Stein: Kael Pans Cinema Profit Motives, ” *Variety*, July 20, 1966.

[37] “Bonnie and Clyde, ” *New Yorker*, October 21, 1967.

[38] 接受Marc Smirnoff采访, Oxford American, Spring 1992 in *Conversations with Pauline Kael*, 155.

[39] 接受Marc Smirnoff采访, Oxford American, Spring 1992 in *Conversations with Pauline Kael*, 156.

[40] 1962年5月26日, 路易丝·布鲁克斯写给宝琳·凯尔的书信, 转引自 Kellow, *Pauline Kael*.

[41] 参见*Variety*, December 13, 1967。

[42] “Trash, Art, and the Movies, ” *Harper’ s*, February 1969.

[43] “Raising Kane, ” *New Yorker*, February 20, 1971.

[44] Mordecai Richler, “The Citizen Kane Book, ”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1971.

[45]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 Dorothy Parker.”

[46] Andrew Sarris, “Films in Focus, ” *Village Voice*, April 1, 1971.

[47] Kenneth Tynan, “The Road to Xanadu, ” *Observer*, January 16, 1972.

[48] 参见Barbara Leaming, *Orson Welles: A Biography* (Limelight Editions, 2004) , 476。

[49] Peter Bogdanovich, “The Kane Mutiny, ” *Esquire*, October 1972.

[50] “Raising Kael, ” 1971年4月24日接受《星期六文学评论》的 Hollis Alpert采访, in *Conversations with Pauline Kael*, 13。

[51] James Wolcott, *Lucking Out: My Life Getting Down and Semi-Dirty in Seventies New York* (Anchor, 2011) , 67.

[52] Kellow, *Pauline Kael*, 167.

[53] John Gregory Dunne, “Pauline” in *Quintana and Friends* (Penguin, 2012) .

第十章 迪迪翁

迪迪翁和凯尔发现自己经常被与桑塔格混为一谈，因为她们都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而在纽约的知识分子圈子里，这被认为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巧合。但她们往往不喜欢让自己的名字被这样联系在一起。迪迪翁和凯尔肯定也从来没觉得自己和对方有什么相通的精神。约翰·格雷戈里·邓恩写道，当凯尔要求见迪迪翁时，他能想到的只有凯尔多么讨厌迪迪翁的一部小说，以及基于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因为凯尔认为它们就是“公主的幻想”。^[1]“我知道我对这类事情的耐受程度比许多人都低；但这是应该被容忍的东西吗？我觉得琼·迪迪翁的小说体现了一种荒谬的趾高气扬，我读它的时候经常因为难以置信而忍不住笑出声。”尽管如此，邓恩还是为两人作了介绍，他看出了她们拥有的连她们自己都看不到的共性：“两个强硬、娇小的女人，拥有獠一样敏锐的本能和对对方作品的友好的不屑，但还是表现得像礼貌的好姑娘。”^[2]

“强硬”并不总是一个能与迪迪翁联系起来的词。“优雅”和“迷人”是对她更常见的描述，而这些形容并不总是被用来表达恭维——她经常受到指责的地方就是凯尔抱怨的那种“荒谬的趾高气扬”的风格。但是，如迪迪翁深刻体会到的那样，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虽然她的风格不像凯尔的那样通俗易懂或好争论，但她同样也是一位擅长打碎别人自我幻想的大师。她只是倾向于锋利钢刃的优雅利落，而不是钝器的拖泥带水。

迪迪翁1931年出生于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弗兰克（Frank）不是凯尔的父亲那样在家禽养殖场工作的理想主义农民，也不是麦卡锡、韦斯特或桑塔格的父亲那样的梦想家。他是一个现实、稳重的男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的工作是卖保险。1939年他加入国民警卫队，家人也要随他一起迁移到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Durham）及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的各个基地。^[3]从大多数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非常普通和平静的美国式童年。但迪迪翁后来会提到，正是这种不断迁移的经历最先让她产生了一种自己是局外人的感觉。她本身就是一个害羞的小孩儿，这也不利于她适应新环境。然而，即便是在她还很害羞的时候，迪迪翁已经开始梦想成为公众人物的生活。她最初的愿望是成为一名演员，而非作家。（这一点与麦卡锡相同。）^[4]她告诉希尔顿·阿尔斯（Hilton Als）：“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同一种冲动。都是虚构。都是表演。”^[5]

但是有些关于父亲的事情是迪迪翁从来不写的。迪迪翁是一位以创作与个人经历相关的散文而为人所知的散文家，很多人认为她喜欢无情地自我揭露。然而，直到她将近七十岁时，她从来没有写过与她早年生活中另一个困扰她的事件相关的任何内容：她作为一名英文系学生在伯克利入学的第一年，她的父亲则作为病人住进了旧金山的一家精神病院。

迪迪翁的母亲不是同样阴郁的人，她更符合加利福尼亚州拓荒者的强硬精神，那也是迪迪翁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来尝试说明和捍卫的精神。但艾杜内·迪迪翁（Eduene Didion）也不是没有内心生活或梦想的。迪迪翁说正是她母亲发现了《服饰与美容》上刊登的竞争最佳散文奖，胜者可获得巴黎旅游机会的广告。她告诉女儿自己认为她可以赢得大奖，当女儿在1956年获胜后从伯克利开车回家向父母展示自己的成果时，母亲的回答是：“真的吗？”^[6]

这实际上已经是迪迪翁在二十岁出头时获得的第二个奖项了。1955年的整个夏天，她参加了在曼哈顿举行的《年轻女士》客座编辑活动。[这个活动最著名的参与者是几年前的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后来她还在自传体小说《钟形罩》中描述和讽刺了这个活动。] 迪迪翁为活动当期的杂志写了一篇令人满意的关于小说家珍·斯塔福德的传略。当时斯塔福德已经与诗人罗伯特·洛厄尔离婚。迪迪翁尽职尽责地描述了斯塔福德关于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适销性对比结果的深思，她的文字体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所有的控制力和自信，但是没有一点儿人们后来会从她身上听到的那种声音的苗头。

迪迪翁获奖时还是伯克利的一名大四学生，她没有去巴黎，而是请求《服饰与美容》在曼哈顿为她提供一份工作。于是《服饰与美容》把她安排到了文字编辑部，但是1956年秋天她就离开了。她那篇名为《向那一切道别》（*Goodbye to All That*）的著名的散文就是关于她最终再次离开纽约的经历的。在文章开头处，迪迪翁将这两次来到纽约的经历简化了。她提到自己第一次看到纽约是二十岁时来参加《年轻女士》的活动。但她在文章中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她第二次来这里之后的经历——从雇主告诉她要穿哈蒂·卡内基（Hattie Carnegie）的衣服，到穷得不得不在布卢明代尔百货店（Bloomingdale）的美食店赊账，年轻人总是这样，即便已经破产了也还是忍不住放纵自己。

要说清楚的一点是，这篇文章中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谎言。对这两次到纽约的经历的省略是种微妙的处理，毕竟，绝大多数曾经来纽约工作的人都可以证明，她所描述的那种“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一切都在触手可及范围内”^[7]的感觉，是一种可再生的情绪，是可以被反复体会的。但是迪迪翁在这里使用的方法中有一点是我们要领悟

的：实际上，她经常有意识地用她的经历创造一些不再仅仅是无畏的自我揭露的东西。

在《服饰与美容》工作时，迪迪翁最初被随便地安排到了广告部，后来又承担了多萝西·帕克曾经负责的工作：给插图写说明文字。到此时，帕克的编辑埃德娜·伍尔曼·蔡斯领导下的那种拘谨呆板的时期已经结束，《服饰与美容》变得更加雄心勃勃，特别是涉及出现在它的版面上的服装时。不过，《服饰与美容》编辑部里的知性腔调并没有太大提升。在这里工作的仍然是那些毫无疑问比迪迪翁富有，但既不特别有文学素养，也不特别有智慧的人。不过他们能够紧追潮流趋势，而潮流和趋势有时会引导他们找到非常优秀的作家。

迪迪翁总是这样讲述那段经历：她为《服饰与美容》写的第一篇署名作品其实是一次意外。因为当期杂志要出版的其他内容没能被按时提交，所以她写了一篇规定字数的文章作为替代。她想到的主题是对嫉妒本质的思考，但文章的内容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它提出的老套的观点是认为嫉妒在人的生活中发挥了一些影响：

去与任何从事涉及投入自我的工作的人交谈吧：比如一位作家或一位建筑师。你听到X曾是一位多么出色的作家，直到《纽约客》毁掉了他的名声；或者，不管黛安娜·特里林说什么，作家Y的第二本小说只会让我们这些意识到Y真正潜力的人感到失望。^[8]

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一位为自己未来的辉煌职业生涯作准备的作家，那么我们有必要记住，此时的迪迪翁并不是在为了一本在文学和思想方面受到尊重的杂志写作。《服饰与美容》在1961~1962年间许可她撰写的一些散文的主题有时似乎反映了迪迪翁内心的沮丧。它们都是关于自尊，接受拒绝的能力和情感勒索的。

迪迪翁当时不仅为《服饰与美容》供稿，她也与《假日》（*Holiday*）和《年轻女士》有合作。她告诉自己的采访者说：“我那

时写的都是只为了发出去的文章，我对它们还没有真正的控制力。”
[9]那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像一个还在磨练文笔的作家的练习品。她没有把那些文章收录到后来的文集中，显然也是因为她不认为那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迪迪翁偶尔也会为保守的《国家评论》撰稿，主要都是提供给书籍或文化专栏的。在这里，她能有机会针对一些容易被指责为用有文学性的语言撰写的自我安慰或肤浅的杂志娱乐以外的主题进行更充分的阐述。她可以写一些诸如评论J. D. 塞林格（J. D. Salinger）的《弗兰妮和佐伊》（*Franny and Zooey*）之类的文章。她对这本书作出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专横抨击。她在文章中回忆起在一次聚会上：

还有一位令人惊叹的名叫萨拉·劳伦斯（Sarah Lawrence）的女孩儿试图跟我讨论塞林格和禅的关系。当看到我似乎没有回应时，她纡尊降贵地用她认为我可以理解的语言宣称：塞林格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理解她的人。[10]

这一陈述在如今成了相当有戏剧性的讽刺，因为迪迪翁对于她之后的几代年轻女性的意义正在于，她们坚称迪迪翁在散文中阐述了她们内心最深处的想法。但是，当迪迪翁最初开始写作时，她并不打算以这种方式受到欢迎。她其实是在塞林格身上看到了推翻一个大人物的机会：她说《弗兰妮和佐伊》“是最终的欺骗”。她看到一个男人通过给予他的读者们一种他们好像属于一个知道如何比其他人活得更好的精英群体的感觉来取悦他们，而实际上他除了关注一些琐事之外什么也没做。他无非是肯定了其他人对于无足轻重的肤浅事物的迷恋，并通过这种方式向他们提供类似自助的东西而已。

同意她的观点的人之一就是在《哈泼斯杂志》上发文的玛丽·麦卡锡。此时距离应付将占据她全部精力的人们对《她们》的反应还有一年的时间，现在的她把最锋利的攻击都用在了这本书上。她也抱怨

塞林格在琐事上浪费太多笔墨：比如用玻璃杯喝酒，或点燃香烟。然而，最让麦卡锡感到厌恶的还要数塞林格的世界观：即只有获得他信任的小圈子里的人才真实，其他人都在撒谎。她无法忍受在整个《弗兰妮和佐伊》的故事中挥之不去的西摩·格拉斯（Seymour Glass）的不明不白的自杀。她想知道格拉斯为什么会自杀，无论是因为他的婚姻太糟糕还是因为他太开心。她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话令人十分难忘：

或者是因为他一直在撒谎，他的作者一直在撒谎，一切其实都很糟糕，他只是在假装吗？

当时正是塞林格最受欢迎，但是即将去隐居的那段时间。而麦卡锡和迪迪翁对他的同样的厌烦恰恰揭露了他的一些东西：那就是塞林格只显露自己的表面。有趣的是，这两个女人日后也都会被同一把刷子抹上相同的污迹，她们都被称赞为无可挑剔的拥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但她们的想法和观察从未完全配得上她们优美的文字。

比如，当凯尔抓住迪迪翁“趾高气扬”的形象问题不放时，她正是在沿着这个思路争论。但凯尔知道，迪迪翁有技巧，即使在贬低她的时候，凯尔也承认迪迪翁可以闪烁出天才的光芒：“干冰般的句子里升起了创造性的烟雾。”^[11]凯尔只是希望迪迪翁能够表现得不那么受伤，不那么忧郁，概括地说，就是不那么像一位受害者。然而，这似乎只是她们在个人风格上的一种分歧：凯尔一生都在避免承认任何过错或弱点，特别是在她的文章中。

虽然现在的人很少这么想了，但这两个人也曾经为明确的理由成为工作上的对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迪迪翁在《服饰与美容》担任过不长时间的电影批评家，凯尔差不多也是在那时加入《纽约客》的。迪迪翁拥有的空间比凯尔小得多，而且显然对电影批评界内部的战争不感兴趣。但她像凯尔一样，对流行禁忌持一种怀疑态度，并且对电影导演采用的某些情感许可缺乏信任。至少一次，在一部特定的

电影中，凯尔呼应了迪迪翁的观点。1979年，《纽约书评》请迪迪翁评论伍迪·艾伦的《曼哈顿》（*Manhattan*）。结果迪迪翁交出了一篇与凯尔曾经的突破之作，即对《舞台春秋》的尖刻评判很相似的作品。迪迪翁在文章开头说“自我沉醉是和自我怀疑一样普遍的情绪”：

“当谈到与女性的关系时，我都可以得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奖（August Strindberg Award）了，”由伍迪·艾伦饰演的角色在《曼哈顿》中这样告诉我们；后来他对黛安·基顿说的一段台词会成为被经常引用和赞美的经典：“我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维持过长期的关系，反正不会长过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Eva Braun）维持的时间。”这些台词毫无意义，也不好笑：它们只是“提及”，就像哈维（Harvey）、杰克（Jack）、安杰利卡（Anjelica）和《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总会被人提及一样，聪明的谈话应该能体现说话者通晓文学和历史，更不用说娱乐行业了。[\[12\]](#)

讽刺的是，尽管她对迪迪翁有很多抱怨，尽管她本人往往是赞赏伍迪·艾伦的作品的，但凯尔却和迪迪翁一样对《曼哈顿》感到无比愤怒，她也认为其中看似有深度的谈话不过是在掩盖其根本上的肤浅。一年之后，凯尔在评论《星辰往事》（*Stardust Memories*）时旁敲侧击地提到了《曼哈顿》：“除了伍迪·艾伦，哪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能把对青少年的偏好说成是对真正价值的追求呢？”[\[13\]](#)

*

显然，迪迪翁在创作非虚构类作品时从来不会在使用“我”上遇到任何问题。但到了1964年，也就是她开始为《服饰与美容》撰写那些深入透彻的散文三年之后，她显然迫切想要写一些不以自己为内容的文章。她的生活也正在发生变化。她已经出版了一本不长的小说，名叫《河流奔涌》（*Run River*）。但这本书在书店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这个书名是出版商选的，这本书的编辑完全改变了小说的形式，

将其实验性的结构改成了非常传统的样子。迪迪翁也是在此期间与约翰·格雷戈里·邓恩结婚的。后者曾经是她的朋友，也是在她另一段为期不短的恋爱关系的最后阶段一直支持着她的人。这对夫妇决定放弃他们在杂志社的工作，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去。他们已经设定了到那里的电视行业中发展的模糊计划。

《服饰与美容》似乎还不想彻底失去迪迪翁，于是邀请她为该杂志撰写电影评论。1964年，迪迪翁在距离她结婚还有一个月时发表了专栏的第一篇文章，宣称自己的批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将是民主的：

直白地讲：我喜欢电影，我会以宽容的态度看待它们，哪怕这可能会让你觉得我头脑简单。一部电影也不是非得成为某种经典才能引起我的注意，它不非得是《奇遇》（*L'Avventura*）、《红河》（*Red River*）、《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或《公民凯恩》，我只要求它有自己的精彩之处。^[14]

她随后对《费城故事》（*The Philadelphia Story*）、《圣路易斯精神号》（*The Spirit of St. Louis*，又译《壮志凌云》）和《谜中谜》（*Charade*）这几部电影都作出了积极的评价。此时凯尔还没能在主流电影评论界获得什么突破，《电影让我很生气》也尚未出版，但我们可以在迪迪翁的文字中看到一种相似的批评方法。而且迪迪翁也会用整个职业生涯来坚守一个观点——即使在毫无争议的垃圾影片中，也有出现精彩绝伦的时刻的可能。

除了迪迪翁之外，还有另一位作家在为《服饰与美容》评论电影，所以那些令人难忘的电影似乎总是轮不到她来写。尽管如此，她还是试着在有限的版面中写出有特质的文章，她的大部分评论都是明快活泼的，充满了俏皮话，看起来更像帕克而不是迪迪翁的文字。她讨厌《粉红豹》（*The Pink Panther*）：“可能是有史以来人们唯一一次带着真实事物的平庸拍摄出的色诱[戴维·尼文（David Niven）与公主]。”^[15]她喜欢《琼楼飞燕》（*The Unsinkable Molly*

Brown，又译《翠谷奇谭》），但评论黛比·雷诺兹（Debbie Reynolds）“倾向于表演成西部是靠上蹿下跳和对它大喊大叫而得来的。”^[16]她承认自己对于青少年冲浪电影情有独钟，“也许我应该尝试把这种热情说成是出于社会学角度的”。^[17]像凯尔一样，迪迪翁也讨厌《音乐之声》，并称之为：

比大多数电影都令人难堪的作品，好像是在暗示朱莉·安德鲁斯（Julie Andrews）和克里斯托弗·普鲁默（Christopher Plummer）这样的人完全不会受到历史事件影响似的。只要吹响曲调明快的口哨，把德奥合并（Anschluss）抛到脑后就行了。^[18]

然而，迪迪翁渐渐地对电影评论感到了厌倦。根据她的说法，《服饰与美容》因为这篇对《音乐之声》的评论太尖刻而解雇了她。（这成了她与凯尔的另一个联系，后者也是因为痛批这部电影而被《麦考尔》解雇的。）总之，当她和邓恩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开辟新专栏时，她已经转向其他题材了。

为《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时，迪迪翁的文字基调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迪迪翁的散文《论自尊》（*On Self-Respect*）和另一篇她为《服饰与美容》写的关于美国的夏天的散文中已经显露出迪迪翁早期具有的一种带着伤感情绪的独特腔调。但是，鉴于《星期六晚邮报》愿意培养她参与实地报道，迪迪翁正好发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州是渴望曲折故事的优良市场，这有利于迪迪翁抓住机会，写一些比一两篇专栏文章更长的内容。她开始为《星期六晚邮报》撰写关于海伦·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她觉得她很傻）和约翰·韦恩（她觉得他不傻）的文章，但真正符合读者胃口的是她的第一篇犯罪题材文章——这篇文章也被认为是第一篇显示迪迪翁真正风格的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我怎么能告诉他们什么都没了？》（*How Can I Tell Them There's Nothing Left?*）但是，当迪迪翁将此文收录到自己的文集中时，她把题目改成了《一些做着美梦的梦想家》，变动后的题目才是这篇文章更为人所知的题目。名义上，这篇文章是对当地一起谋杀案的详细报道，一位妻子被指控把丈夫烧死在了他们的私家车里。迪迪翁立即采用了一种广泛地审视困扰加利福尼亚州，甚至是美国其余大部分地区的一切事物的视角：

在加利福尼亚，人们打个电话就可以聆听一段祈祷，但要买本书却很难。在美国，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从相信《创世记》（*Genesis*）的字面解释变成了相信《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的字面解释；在美国，人们梳着蓬蓬头，穿着七分裤，对于姑娘们来说，一辈子的指望都被浓缩进了一条长度到小腿中部的白色婚纱中，她们会生儿育女，也许取名金伯利（Kimberly）或谢里（Sherry）或黛比（Debbi），但最终还是要到墨西哥办理一个又快又便宜的离婚手续，然后重返理发学校。[\[19\]](#)

这名女子最终被认定谋杀了丈夫，但生活在圣伯纳迪诺山谷（San Bernardino valley）的居民对这样的概括描述很不满意。这个山谷就是迪迪翁在文章开篇处用不少笔墨描述过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某片区域。一位名叫霍华德·B. 威克斯（Howard B. Weeks）的人给杂志社写了一封信。他提到自己是洛马琳达大学（Loma Linda University）公共关系和发展部副主席，他在信中提到：“我为琼·迪迪翁感到担心，据我们观察，这些感受是纽约年轻作家在冒险进入哈得孙河以外的广大未知世界时通常都会体验的症状。”[\[20\]](#)这封信表明，迪迪翁此时尚未在主流文化中获得突破；不过霍华德·B. 威克斯并不知道，此时被自己说教的这位女性今后会成为在关于自己家乡的题材上最具代表性的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作家。

迪迪翁并不是立即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线的。接下来她写的一篇文章似乎就绝不可能惹恼任何人。文章的标题是《大岩石糖果无花果布丁陷阱》（*The Big Rock Candy Figgy Pudding Pitfall*）。考虑

到她曾经痛批海伦·格利·布朗和塞林格本质上是浅薄的人，人们猜测这篇文章应该属于迪迪翁为了挣钱而写的那种作品。文中详细介绍了制作二十个无花果布丁和二十棵硬糖树的方法。不过它似乎还反映出了迪迪翁对于自己处理家务事的能力感到多么沮丧：

我是个娇弱、懒惰的人，不适合做任何事，只除了别人花钱雇我做的这件事之外——那就是一人坐在打字机前，用一个手指打文章。我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无所不能”的女人，能修补畜栏，能腌制足够所有人吃一冬天的桃子，还能在皮尔斯伯里烘焙大赛（Pillsbury Bake-Off）中赢得一次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旅行。实际上，如果哪天我不再相信只要我付诸行动，我就可以赢得皮尔斯伯里烘焙大奖，那肯定意味着什么东西死了。[\[21\]](#)

邓恩在这篇文章中的形象是一个亲切和善，带有漫画风格的人物，他在看到这么多吃的时问道：“本周我们要接受的到底是什么治疗方法？”不过迪迪翁没有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就在当年早些时候，她和邓恩收养了一个孩子，并给她取名昆塔纳·鲁·邓恩（Quintana Roo Dunne）。然而，想要成为某种“能够制作树木形状的硬糖和无花果布丁的”家务女神的焦虑，确实很像被女性杂志称为“筑巢心理（nesting）”的东西。

迪迪翁为新一年最初几期专栏写的文章之一是《向魔法城市道别》（*Farewell to the Enchanted City*）。（后来的读者更熟悉的名字是改动后的《向那一切道别》。）她整个职业生涯一直痴迷于的“我们给自己讲的故事”的主题，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明确显现征兆的。迪迪翁认为自己居住在纽约的整段时间里，她对纽约的想象影响了这个城市真正的样子：

我看过的所有关于纽约的电影和我听过的所有关于纽约的歌曲被编织成了某种本能，它们告诉我它再也不会是曾经的样子了。事实上它从来不是那个样子的。晚些时候，上东区的自动点唱机里会出现一首歌，歌词是“曾经那个还是女学生的我去哪儿了”，到了夜深人静真的很晚的时候，

我也会问我自己这样的问题。现在我知道，几乎所有人，或早或晚，无论自己在做什么，都想过要问同样的问题，但是当你还是二十岁、二十一岁，甚至二十三岁的时候，既是好处又是坏处的一点是，尽管所有证据都证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但你还是相信，这样的事从不曾发生在别人身上。[\[22\]](#)

这篇文章如此著名，据说它已经催生以一种以离开纽约为主题的小型散文派别。就像自动点唱机上的歌曲一样，它表达了所有人对某种共同体验的感受。这篇文章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迪迪翁写作的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重新体验一种情感上的陈词滥调，叙述者是在告诉过去的自己，相信一个所有人都信以为真的故事是多么可怜和愚蠢。这种自我觉醒的风格，这种置身事外地讲述个人经历的方式将成为迪迪翁的标志。即使是在她写到关于离婚之类的私人问题时，她也会保持一定距离，把问题放在手中翻来覆去，直到把它的外表打磨得闪闪发光，至于那些粗糙的内心部分，它们都被仔细地隐藏起来。

邓恩和迪迪翁很快就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拥有了一个固定专栏，并共同署名。当时的人们会觉得这有些奇怪，尤其是杂志还会改动每期专栏顶部的插图，插图的内容就是他们两人的画像，如果专栏是邓恩写的，那他的画像就会出现在迪迪翁的画像之前；如果专栏是迪迪翁写的，那么她的画像就会被换到邓恩的前面。

迪迪翁写的那些文章通常是专栏中更值得一读的部分，她引起读者回应的技巧是一流的。她写的关于偏头痛的散文，以及她关于恶魔岛监狱（Alcatraz）被停用的报道和对当时还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夫人的南希·里根（Nancy Reagan）的糟糕描述都被发表在这个专栏中：

她告诉我说州长从来不化妆，即便是过去演电影的时候也不化妆，她还说政坛是比电影行业更艰辛的圈子，因为没有电影工作室来保护你

了……“有一个漂亮的工作场所对男人很重要，”她这样建议我，还向我展示了她放在州长办公桌上的总是装满硬糖的药剂罐。[\[23\]](#)

近一个月之后，南希·里根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些文字带来的刺痛。她对《佛雷斯诺蜂新闻报》（*Fresno Bee*）说：“我还以为我们挺合得来，要是我凶一点就好了。”[\[24\]](#)

这种似乎是放任被采访对象自由地暴露自己的愚蠢，而不是被她的评论或想法打断的写作方法成了迪迪翁的标准模式。她著名的探索海特-阿什伯里区（Haight-Ashbury）的文章就大量采取了这种方式。她会在文章开篇处大大地抱怨一番“核心难再支撑”的现状，然后向着不断加宽的深渊跋涉，以期在那里找到一些能够通过一两句话揭示自己的人。比如她遇到的两个感恩至死乐队（the Grateful Dead）的歌迷：

我问那些女孩是做什么的。

“我只是经常来这里”，其中一人说。

“我算得上和乐队的人认识”，另一个说。[\[25\]](#)

这些乏味的回答暴露了作出回答之人脑子里空空如也。《星期六晚邮报》收到的读者来信中不同寻常地充满了对迪迪翁的赞美之词，大多数读者都同意她对当时流行的被称为嬉皮士群体的野蛮人的深度解析。也有一些反对者，比如绰号“雏菊（The Daisy）”的桑尼·布伦特伍德（Sunnie Brentwood）就继续坚称“大多数‘花童（flower children）’都是好孩子，他们正在努力改善世界，让它成为一个更好的家园”。[\[26\]](#)

最终还是迪迪翁的观点胜出了，不仅因为这篇名为《向伯利恒跋涉》（*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的散文会成为她1968年出版的同名散文集的标题文章，还因为这本散文集为迪迪翁树立了声望。为

《纽约时报》评论这本书时，迪迪翁的朋友丹·韦克福尔德（Dan Wakefield）提出，迪迪翁是“我们这代人中受赞美最少，但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27]他指出，迪迪翁的作品比其他年轻女性作家，比如一位名叫苏珊·桑塔格的时髦人物的更容易理解。韦克福尔德对这本书的全面赞美几乎得到了其他所有评论家的响应。他们中的一些人偶然发现了迪迪翁的智慧与她的性别的关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梅尔文·马多克斯（Melvin Maddocks）含义模糊的评价似乎是想表达一种赞美：

女性做新闻报道是男人的世界为让她们失望而付出的代价。这里展现的正是她们最出色的，像被遮盖起来的帽针一样隐蔽的风格，她们对于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从不宽容，也不会遗忘。^[28]

这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虽然用帽子别针做比喻显然是将问题平凡化了，但关于这种结果是“代价”而不是礼物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迪迪翁在文字中创造的人格面具对于如格利·布朗、乐队歌迷、南希·里根和会做无花果布丁的家庭主妇之类的女性与对“男人的世界”同样失望，无论这个“男人的世界”具体指的是什么。这种观点并不是纯粹女性化的，而更是一种有感知力的、敏锐的判断。某些感知力的大门对女性更加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无法看到女性指出来的一切，他们要做的只是安下心来，去听，去看。

在《向伯利恒跋涉》之后，此前对她不闻不问的文学传略作家们开始一窝蜂地前来采访迪迪翁，还把各种有娇小的迪迪翁的精美照片刊登在诸如《琼·迪迪翁：刀刃一样锋利的作家》（*Joan Didion: Writer with Razor's Edge*）^[29]和《向琼·迪迪翁跋涉》

（*Slouching Towards Joan Didion*）^[30]之类的文章标题旁边。这时已经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汉娜·阿伦特的老朋友艾尔弗雷德·卡津立即申请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他兴高采烈地在迪迪翁和邓恩当时居住的位于马里布（Malibu）的房子里见到了这对夫妇，他们正在合作撰

写基于迪迪翁在1970年出版的小说《顺其自然》（*Play It as It Lays*）改编的剧本，小说讲述的是一名不顺遂的女演员玛丽亚·韦思（Maria Wyeth）的故事，曾经为迪迪翁带来了热烈的赞美。卡津注意到迪迪翁真正的样子与她经常在文章中谈到的样子之间存在区别：在1969年的一篇著名的发表在《生活》上的专栏文章中，迪迪翁描写的自己娇贵、病弱，处于离婚的边缘，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迪迪更像是由理智的钢铁而不是轻浮的丝绸组成的：

琼·迪迪翁是一个有很多优点的人，她还确信自己在金州（Golden State）开始发生这么多令人不安的事情之前在萨克拉门托出生和长大是明智的。^[31]

卡津继续梳理了各种差异。他注意到埃德蒙·威尔逊已经发现迪迪翁表达的声音“比她本人的像小女孩一般的声音强势得多！”尽管住在马里布这样的地方似乎意味着轻松惬意，但卡津觉得下面的海浪声震耳欲聋：“居住在海滨别墅里的人不知道这让他们变得多么机警。”他称迪迪翁为伦理学者，说她对严肃性有一种痴迷。他还指出，即便是在写小说时，她也会像文化批评家一样，想要诊断她所写的任何主题的弊端——玛丽·麦卡锡也有同样的癖好，尽管她们二人在小说中的腔调区别很大。卡津甚至将迪迪翁与阿伦特联系在一起，后者曾经告诉他，美国人似乎比她在欧洲见过的任何人都更绝望。

当卡津发表了他为迪迪翁写的传略时，迪迪翁已经是一位毋庸置疑的明星了。然而她遇到的问题是，能够允许她热情地谈论偏头痛，谈论返回家乡萨克拉门托，或是让她为了一篇文章飞往夏威夷的《星期六晚邮报》关门了。迪迪翁开始寻找新的雇主。《生活》杂志与她签订了撰写专栏的合同，但这种关系很快就恶化了；迪迪翁要求去西贡，因为包括桑塔格和麦卡锡在内的许多作家都去过了。可是她的编辑反对这个提议，告诉她说“某些男性作者会去”。^[32]她对这次随

意的回绝的愤怒最终变成了一篇如今非常著名的专栏文章，文章的内容是在预测将有巨浪来袭的时候前往夏威夷的经历：

我丈夫关掉电视机，从窗口向外看。我避开他的视线，忙着给宝宝梳头。在没有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焦虑处境。我们正身处这个太平洋中部的小岛上，否则我们可能就去申请离婚了。

[\[33\]](#)

这篇文章似乎是一种高度的自我揭露，但原本关于婚姻问题的框架会渐渐消失。迪迪翁开始告诉你，她如何感到自己与一切失去了联系，以及感受本身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她承认，自己正如一个曾经的男友预测的那样变成一个感受不到任何东西的人。这篇作品中充满了彻底的黑暗和绝望，难怪《生活》的编辑似乎被它吓到了。他们给它取了一个反映了他们的困惑的标题：《创造联系的困难》（*A Problem of Making Connections*）。随后的那些非常私人化的专栏文章也都不怎么符合编辑们的口味。最终迪迪翁在合同到期之前就提出了解约，因为编辑们不肯刊登她的专栏文章。很多年后，她在《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中提到这件事时会对编辑的冷漠评论作出回击。

这暗示了有关迪迪翁作品的一些重要特征：即使在她描述无法忍受的绝望，在她感觉自己的生活正在随着这个国家一起分崩离析的时候，至少还有另一个运转的引擎在支撑着她。任何一个像迪迪翁描述的那么沮丧和失落的人都不可能写出如此精准的句子，不可能选择如此切中要害的用词。以承认她有可能离婚的文章为例，隐藏在那背后的引擎可能正是愤怒，她愤怒的原因是编辑认为她不是像那些正要去西贡的“男性”一样大胆的作家，这导致她没有机会发挥自己全部的能量。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被收入“糟糕编辑决策博物馆”的错误。

迪迪翁重新开始写小说了。她偶尔会为《时尚先生》供稿，但是发现自己也很难融入那里的风格。从有男性注意到她的作品并希望发

表她的文章的意思上说，她显然也已经是“男孩儿”中的一员了，然而她还是无法彻底适应他们的体系。

尽管如此，在女性解放运动正好达到顶峰时，转向女性的杂志对她来说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就像桑塔格一样，她无疑也会被问到关于对这些突然无所不在的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34]的圈子的忠诚度问题。不过迪迪翁一直没有直接作出评论，直到1972年，她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女权运动》（*The Women's Movement*）的文章，其中列出了十六本激励人心的书籍。只不过她显然是因为被《纽约时报》几个月前发行的“女性特刊”弄得厌烦了才这样做的。

迪迪翁不愿意为这个刚刚兴起的第二波女权运动赋予过多根据或意义。她甚至向它作出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直白的一些攻击。她谈到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撰写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著作时说：“这种头脑发热的激情似乎很有新英格兰特色。”^[35]她将这项运动的某些方法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特别提到英国作家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描述的在意识提升会议（conscious-raising session）中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她还在那些将《她选择的伴侣》和《她们》中的女性人物拆解为无法辨识、过度政治化的漫画人物的女权主义理论家面前为玛丽·麦卡锡辩护：“她无法自由的原因是她总是想从男人身上寻找自己的身份。”^[36]

然而，迪迪翁的文章并不是对女权主义理念的完全排斥。她只是表露了对于这个在她看来整体上已经陷入了争论琐碎问题的泥潭的统一运动的担忧，因为它争论的都是诸如怎样分担洗碗之类的家务活这样的问题。

当然，在运动初期，对这种琐事的滔滔不绝的陈述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将女性政治化的一种关键技术，因为这些女性可能已经习惯于遮掩自己

的愤怒，哪怕是在自己面前……但是，如果一个人拒绝理解更广泛意义上的问题，不能实现从个人上升到政治的飞跃，那么这些发现就是没有任何作用的。[\[37\]](#)

迪迪翁还认为，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的书中，她们构建了一种自我妄想，迪迪翁将之概括为“受自己的妇科医生迫害”、“每次约会都被强奸”的“每个女人（Everywoman）”。迪迪翁并不否认女性是被看低的对象，是性别角色限定的刻板印象的受害者。考虑到她这个时期的人是怎么描述她的，以及她无法顺利地融入男性主导的杂志圈子，我们无法想象她会否认这些观点。但是她认为这项运动的主要作家们表达的那些愿望是极端幼稚的。她认定“这些皈依者想要的不是革命，而是‘罗曼史’”。

迪迪翁以前也谈过女性的状况，往往是在写多里斯·莱辛（Doris Lessing）的上下文中提到的。她写过两篇关于她的文章：一次是为《服饰与美容》，一次是为《纽约时报书评》。在《服饰与美容》上的文章中，因为版面有限，她只说了自己不赞同莱辛的身为女性本身存在一些“不公”的观点。当迪迪翁被邀请评论科幻小说《地狱之行简报》（*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时，她对莱辛的看法已经柔和了不少，部分原因是莱辛本人在此时对女权主义政治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如莱辛形容的那样，《地狱之行简报》是一本“内心空间小说”，它更多是讲疯狂和精神错乱的，而不是要批判现代社会结构的。尽管迪迪翁并不特别喜欢这本书，但她仍然不遗余力地赞美了莱辛，在她看来，莱辛对所有政治思想和行动的直白形式有了彻悟，就如迪迪翁对女权主义的看法一样：

寻求解决方案的冲动不仅是她的困境，还是她的时代的指导性妄想。这不是一种我会尊崇的冲动，但莱辛夫人的坚韧不拔中存在着某种最终会让人感动的东西。[\[38\]](#)

迪迪翁和她对女权主义的排斥之间还是存在一些曙光的。她似乎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女权主义者的目标和希望的同情，尽管她仍然厌恶她们的策略和文章。这种曙光并不强烈，但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不过另一方就未必这么看了。几位女权主义活动家写信到《纽约时报》投诉。其中之一就是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她的作品《违背意愿》（*Against Our Will*）也是被迪迪翁列入自己那篇文章中的作品之一。布朗米勒指出迪迪翁从来没有把自己明确定位为左派，还曾经为《国家评论》撰稿，所以她隐晦地继续说道：

真正的硬汉总是站在对手一边，这不是很有趣吗？一周中的任何一天，我都宁愿选择穿着靴子和蓝色牛仔裤，而不是留着修剪整齐的长指甲。[\[39\]](#)

迪迪翁的这篇《女权运动》将她永远地排除在了女权运动之外。事实上，自此以后，人们普遍有了一个批评她的理由：她似乎在以自己的方式表现某种符合刻板印象的女性气质。尽管她一直在为复杂性辩护，但她却不敢承认在她所描述的这个运动中也发生了许多意识形态的内部争斗：小说家阿利克斯·凯茨·舒尔曼（Alix Kates Shulman）是争斗中的一派，宣传册作家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则是另一派。但是在迪迪翁看来，她们都是一样的，都是被她称为“每个女人”的那种人，都应该能够作出与她们已经作出的不同的选择。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剩余时间里，迪迪翁把主要精力花在了电影制作和小说创作上。她和邓恩合作撰写了电影版《顺其自然》，以及重拍版《一个明星的诞生》。她本人则出版了小说《公祷书》（*A Book of Common Prayer*）。她偶尔会为《时尚先生》撰写文章，但她的能量似乎不如以前了。在这段时间里多次避免了离婚的迪迪翁和邓恩夫妇是出色的聚会主人，筹备这些活动也要占据他们很多时间。直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迪迪翁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非虚构作品文集《白色专辑》（*The White Album*）。

文集同名文章《白色专辑》以那句著名的“我们为了活着而给自己讲故事”^[40]为开头，文章内容是碎片化的。虽然这第一句话经常被当作一种自助性的咒语而引用，但迪迪翁其实还在这篇散文中列举了各种虚妄的幻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作家尤其应当为把某种叙事秩序强加到存在之上，以至于“冻结了经验的千变万化”而深感歉疚。

这篇文章中的内容包括一些迪迪翁多年来曾尝试着去做但最终失败的项目。具体来说，她提到了自己与二十三岁的琳达·卡萨比安（Linda Kasabian）的会面，她是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的成员，1969年8月，一群家族成员杀害了莎伦·泰特（Sharon Tate）和在她家过夜的客人，卡萨比安在这个过程中负责开车。

从表面上看，卡萨比安的故事看起来像一个完美的迪迪翁风格的题材。这就是一个被关于爱和快乐的承诺困住的人，这些东西正是嬉皮士运动的诱惑所在——迪迪翁曾经用大量笔墨论述这些承诺都是虚假的。然而卡萨比安已经走得太远了，甚至是亲身参与了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谋杀案。这些谋杀太过残忍野蛮，在一个将犯罪视为夜间娱乐节目的国家中都算得上超乎寻常。不过迪迪翁最终没能就这个题材进行创作。曼森谋杀案和琳达·卡萨比安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政治和社会泥潭中另一个梦幻般的元素，迪迪翁写到那是一段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时间：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各种误传，我也记得这件事，尽管我宁愿忘掉。我还记得当时没有人感到惊讶。^[41]

在《白色专辑》这本书中，迪迪翁从来没有明确地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道德和哲学空虚的状态下，是什么让她从痛苦中清醒。有可能是她正在制作的电影，也可能是她作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的身份终于获得承认，因为《公祷书》收获了良好的反馈。还可能是没有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暴力和反常之后，她发现自己突然开始享受生活了。昆塔纳也在一天天长大，她的婚姻已经熬过了艰难期，她的收入也很不错。

迪迪翁就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交上好运的。她遇到了一位和她在《星期六晚邮报》的那些老编辑们相似的新编辑，后者也准备让她尽情发挥她在创作非虚构类作品方面的才华。此时担任《纽约书评》的两位主编之一的西尔弗斯很乐意让迪迪翁在自己杂志的页面上畅所欲言。她的第一篇文章名义上是在评论斯坦利·考夫曼发表在《新共和》上的电影批评文章，而实际上，迪迪翁打算瞄准的目标另有其人：

我曾经想知道宝琳·凯尔是如何能够流畅自如地使用那些漫不经心的从属句的，比如“如今电影工作室正在崩塌”，或者她怎么会对行业晚宴的复杂特性作出如此偏颇的解读，以至于将“好莱坞妻子们”描述为“在聚会上滴酒不沾、面色冷凝，坐在一边等着将她们醉醺醺的天才丈夫带回家的”女人。[\[42\]](#)

迪迪翁还继续嘲笑了像凯尔和考夫曼这样在不知道电影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情况下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对电影指手画脚的人。她说他们顶多是希望自己能给电影行业带来某种特定的智慧，但这种智慧的“效果其实就像是在纸巾上刺绣，其结果经不住什么严格的审查”。

考夫曼在读了这篇评论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被多作提及，甚至连迪迪翁使用的四段引文也都来自他写的另一本书。于是他写信给《纽约书评》陈述自己的反对意见，并且对迪迪翁写评论的真实动机作出了推测：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1972年12月9日的那期《新共和》上，我评论迪迪翁女士的电影《顺其自然》时提到了她的同名小说，并表达了我对这两个作品都很厌恶的想法。（厌恶的依据主要是她在自己文章中证实的：这部电影表面上要探讨严肃的主题，其实明摆着就是一种行业产品。）如果我当初赞扬了她的作品，也许迪迪翁女士依然不会喜欢我的文章。我希望如此。但贵报的读者大概会想要知道这有可能是睚眦必报的结果。[\[43\]](#)。

迪迪翁一如既往地作出了回应。她坚称就算考夫曼积极评价了她的作品，她依然不会喜欢他的文章，而且“我也会对自己的作品有所怀疑”。

“自我沉醉是和自我怀疑一样普遍的情绪”，[\[44\]](#)她在评论伍迪·艾伦的作品文章开篇写下了这句令人难忘的话。她对艾伦的抱怨与她在十八年前就塞林格的作品发表的意见几乎相同。艾伦扮演的所有角色都是“聪明的孩子”，他们说出的那些带着小聪明的评论都是没有一个严肃的成年人能够轻易接受的。当他们列举让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时，他们都痴迷于琐事，比如棒球明星威利·梅斯（Willie Mays）和爵士乐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

伍迪·艾伦列出的清单就是一份最终的消费者报告，它被认可地引用的程度表明美国出现了一个新阶层，一个次世界，其中的人们僵化地理解一切，他们到死都穿着不搭调的运动鞋，弄错交响乐的名字，偏爱《包法利夫人》。

迪迪翁还特别质疑了《曼哈顿》中唯一还在上高中的角色——玛丽埃尔·海明威（Mariel Hemingway）扮演的特蕾西（Tracy）。迪迪翁称这个角色就是依据她所谓的“另一种青春期幻想”塑造出来的。她觉得特蕾西太过完美了，而且缺少一个会阻止她和艾伦扮演的四十多岁的神经质男人约会的真实的家庭。一个男性读者给编辑写投诉信，过分详细地表达了反对迪迪翁对显然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制作人的不敬。对此迪迪翁是如何回应的呢？她说：“哦，哇。”[\[45\]](#)。

凯尔和迪迪翁一直没有冰释前嫌、成为朋友。詹姆斯·沃尔科特在一本回忆录中提到，凯尔特别喜欢因为迪迪翁对艾尔弗雷德·卡津说的一句话而窃笑，那句话是：“唐纳大队（Donner Party）[\[46\]](#)令我困扰。”[\[47\]](#)这真是太可惜了。能让这两个人产生同感的问题理应不仅限于伍迪·艾伦，因为到这个时候，迪迪翁也开始遭受那种往往追随着成功而来的奇怪的人身攻击。

攻击之一来自作家芭芭拉·格里祖蒂·哈里森（Barbara Grizzuti Harrison），她曾经担任《国家》的评论家，她写了一篇名为《只是失去联系》（*Only Disconnect*）的文章。虽然哈里森在迪迪翁有时会投射出没完没了的困苦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不错的观点，但从她开始取笑昆塔纳的名字那一刻起，她就立即毁掉了自己的文章。

另一次攻击出现得晚一些，但是来自一个她熟悉得多的人：玛丽·麦卡锡。迪迪翁算得上某种麦卡锡的崇拜者；她经常在关于女性题材的文章中引用麦卡锡的话，还在批判海伦·格利·布朗和关于女权运动的文章中明确提到过麦卡锡的小说。但麦卡锡终于提到迪迪翁是在她评论后者于1984年出版的小说《民主》（*Democracy*）时，而且她对于这本书的评价是令人失望和缺乏诚意[\[48\]](#)：

可能谜题中的所有元素都出于电影。也许琼·迪迪翁只是希望自己是
一个老派的编剧而非小说家。如果这就是原因所在，那么我感到气愤。因
为一个人若想表现得自命不凡的话，他（她）至少应该比这更深刻。[\[49\]](#)

在这一点上，西尔弗斯似乎已经决定，迪迪翁的杰出智慧需要被用到一些更好的目标上，也就是那些可以让她花费数小时的探索性手段去研究的题材。几个月以来，她和邓恩一直在谈论去拉丁美洲看看，她告诉一位采访者说，这是她提出来的想法。

1982年，迪迪翁抵达了萨尔瓦多。这里的共产党政府毫无疑问是一个可怕的暴力政权。一位大主教就在讲坛上被射杀了；摄影记者们用镜头记录下了大屠杀的场面。阿尔玛·吉列尔莫普列托（Alma Guillermoprieto）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关注这里发生的一切。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告诉迪迪翁和邓恩夫妇说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他无法感到安全的国家。就这样，迪迪翁决定像她之前的桑塔格和玛丽·麦卡锡一样，走进黑暗的中心，看看她能在那里发现什么。

与在越南的桑塔格和麦卡锡不同，迪迪翁在萨尔瓦多几乎不需要什么检验自己良心的理由，因为有太多可怕的事情等待着她记录了。

前往萨尔瓦多的人会立即获得一种特殊的实用信息，就像前往其他地方的游客要了解货币汇率和博物馆开放时间等信息一样。在萨尔瓦多，人们会了解到秃鹫最先吃的是软组织，眼睛，暴露在外的生殖器，以及张开的嘴巴。人们还会了解到张开的嘴可以被用来表明某种特定的立场，可以被塞入一些有象征性的东西；比方说，阴茎，或者，如果是与土地权利相关的争议，还可以塞入争议地区的泥土。^[50]

迪迪翁就是从在萨尔瓦多时开始质疑自己的技巧的。在一个“代表萨尔瓦多可能获得拯救后的未来的样子”的购物中心里，她想知道记录这里销售了什么商品是否真的是一个好主意，这与外面发生的谋杀和恐怖事件太不协调了。她本想在作品中列出这些商品以表现讽刺意味的想法似乎也不再有趣或尖锐了。她会在最终创作的散文中明确地写到这一点，她觉得与其说自己是在见证“故事”，不如说是在“观察黑夜（noche obscura）”。

这种将注意力放在简单的叙事上的观点显然是迪迪翁在她的作品《白色专辑》中已经提出过的。要讲述一个故事，就是要找到事件所谓的核心，但有时候，核心并不能恰当地代表整件事。这是她在写自己的生活时学会的第一件事。她会写一些让读者觉得是某种坦白的文章，比如关于离婚的，关于她喜欢随身携带笔记本的，关于自尊的。

但是她知道她该选择公开什么，以及回避什么；她知道她的故事中的某些元素需要被隐藏。公众愿意接受她所投射的形象这件事显然教会了她一些东西。

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迪迪翁会继续写大量关于政治的文章。那时的美国已经熬过了充满幻觉的、梦一般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逐渐稳定下来，并且已经开始进入保守的里根时代。这个国家正在给自己讲述“美国的早晨”^[51]，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刚刚开始影响总统选举的大众媒体机器已经变得更加深奥复杂。《纽约书评》的西尔弗斯对迪迪翁谈到这个想法之后，迪迪翁就开始写关于政治的文章。西尔弗斯似乎明白迪迪翁最擅长的题材莫过于故事，还有什么能比国家政治中的故事更离奇呢？——这是一个将会反复出现在她的文章中的观点。

美国政治好像没有从迪迪翁早期的作品中学到任何东西。她在《白色专辑》中写到的“我们为了活着而给自己讲故事”这个事实并不是很受赞美。它会造成某种伤害。毕竟，故事都是自我欺骗的。我们用它们来避免自己看到真相中的某个元素，因为全部的真相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无法承受，或者说，在政治问题中，真相是让人尤其无法控制的。

所以在迪迪翁看来，报道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失败的总统竞选的记者们就太过轻信了，他们太愿意接受这个被提供给他们故事，然后在没有经过多少独立审查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故事报道给公众。在这个故事中，杜卡基斯被说成将“成为总统”，但要实现这种转变的要素却一直被模糊带过，政治作家们似乎希望读者接受他们提供的故事而不提出任何疑问。迪迪翁写道：“这个故事是由一些相互理解，和或大或小的心照不宣的协议组成的，大家一致对某些可以被观察到的内容视而不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个

有戏剧性的故事线。”^[52]这种对“权限新闻（access journalism）”^[53]的批评在当时很少见，因为只有身处迪迪翁这样的立场的人才能提出这种批评。迪迪翁的观察不能阻止记者和政治竞选团队中的公关人员的勾结，但她确实让社会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了。

迪迪翁对政治记者的奴隶状态的批判很精彩，但让这种批判更生动的也许是其他一些东西，一些对政治记者生活的个人角度的看法。很久以前，她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一位名叫诺拉·埃夫龙的年轻作家并与其成了朋友。埃夫龙后来嫁给了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也就是通过报道水门事件有效地弹劾了尼克松总统的两位记者之一。他们的关系并不美好，但这段婚姻在建立初期还是非常稳固的。身为水门事件中的丑闻揭露者足以证明，伯恩斯坦不是迪迪翁厌恶的那种白宫党派路线的忠实奴仆。他们两人也成了朋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伯恩斯坦写了一本关于他的共产主义者父母的回忆录，迪迪翁是最先读到这部作品的人之一。

但是，埃夫龙和伯恩斯坦的关系可就没有这么和谐了。

^[1] Pauline Kael, “The Current Cinema,” *New Yorker*, November 11, 1972.

^[2] Dunne, “Pauline.”

^[3] 此处关于迪迪翁的家庭的细节出自Tracy Daugherty, *The Last Love Song: A Biography of Joan Didion* (St. Martin’s, 2015)。

^[4] 此处疑有误，应为韦斯特。

^[5] “Joan Didion, The Art of Nonfiction No. 1,” *Paris Review*, Spring 2006.

^[6] *Where I Was From* (Vintage, 2003), 211.

[7] “Farewell to the Enchanted City, ” *Saturday Evening Post*, January 14, 1967, republished as “Goodbye to All That” in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68) .

[8] “Jealousy: Is It a Curable Illness? ” *Vogue*, June 1961.

[9] “Telling Stories in Order to Live, ” 2006年6月3日参见国家图书奖活动时接受的采访，之前可在网上观看，此处依据的是从作者处复制的文件。

[10] “Finally (Fashionably) Spurious, ” *National Review*, November 18, 1961.

[11] “The Current Cinema, ” *New Yorker*, November 11, 1972.

[12] “Letter from ‘Manhattan, ’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16, 1979.

[13] Pauline Kael, “The Current Cinema, ” *New Yorker*, October 27, 1980.

[14] “Movies, ” *Vogue*, February 1, 1964.

[15] “Movies, ” *Vogue*, March 1, 1964.

[16] “Movies, ” *Vogue*, June 1, 1964.

[17] “Movies, ” *Vogue*, November 1, 1964.

[18] “Movies, ” *Vogue*, May 1, 1965.

[19] “How Can I Tell Them There’ s Nothing Left, ”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7, 1966, republished as “Some Dreamers of the Golden Dream” in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20] 霍华德·威克斯写给编辑的信, *Saturday Evening Post*, June 18, 1966。

[21] “The Big Rock Candy Figgy Pudding Pitfall, ” *Saturday Evening Post*, December 3, 1966.

[22] “Farewell to the Enchanted City.”

[23] “Pretty Nancy, ” *Saturday Evening Post*, June 1, 1968.

[24] Nancy Skelton, “Nancy Reagan: Does She Run the State Or the Home? ” *Fresno Bee*, June 12, 1968.

[25]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 *Saturday Evening Post*, September 23, 1967.

[26] 桑尼·布伦特伍德写给编辑的信, *Saturday Evening Post*, November 4, 1967.

[27] “Places, People and Personalities, ” *New York Times*, July 21, 1968.

[28] “Her Heart’ s with the Wagon Trains, ”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6, 1968.

[29] 参见*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 1970上这个标题的文章。

[30] 参见*Newsday*, October 2, 1971上这个标题的文章。

[31] Alfred Kazin, “Joan Didion, Portrait of a Professional, ” *Harper’ s*, December 1971.

[32] *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 (Vintage, 2006) , 111.

[33] “A Problem of Making Connections, ” *Life*, December 9, 1969.

[34]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一种方式, 以“个人的即政治的”口号为旗帜, 由公民权利运动发展至妇女解放运动, 将“政治”和“经济”延展至身体、情感、家庭等过去被视为私人的范畴, 也常称为awareness-raising。
——编者注

[35] “The Women’ s Movement, ” *New York Times*, July 30, 1972.

[36] 迪迪翁引用了Wendy Martin, ed. *The American Sisterhood: Writings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Harper and Row, 1972) 。

[37] “The Women’ s Movement.”

[38] “African Stories, ” *Vogue*, October 1, 1965.

[39] 苏珊·布朗米勒写给编辑的信,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1972。

[40] “The White Album, ” in *The White Album*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9) , 11.

[41] “The White Album, ” in *The White Album*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9) , 142.

[42] “Hollywood: Having Fun,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2, 1973.

[43] 写给编辑的信,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19, 1973。

[44] “Letter from ‘Manhattan.’ ”

[45] “They’ ll Take Manhattan,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11, 1979.

[46] 又称作唐纳-瑞德大队, 指的是一群在1846年春季由美国东部出发, 预计前往加州的移民队伍, 他们是由数个家庭组成的大篷车车队。由于错误的资讯, 他们的旅程遭受延迟, 导致他们在1846年末到1847年初受困在内华达山区度过寒冬。在恶劣的环境下, 接近半数成员冻死或者饿死, 部分生存者依靠食人活了下来。

[47] Wolcott, *Lucking Out*, 61.

[48] 原文此处为 “deathlessness”, 疑为印刷错误, 可能应为 “depthlessness” 。

[49] “Love and Death in the Pacific, ”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pril 22, 1984.

[50] *Salvador* (Vintage, 2011) , 17.

[51] 1984年的里根竞选团队制作的电视广告，广告词的第一句话是“美国又迎来了新的早晨”。

[52] “Insider Basebal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27, 1988.

[53] 指引用来源不明的论断并不对之作检验和判断的新闻行为，往往信息单一，措辞含糊，预设采访结果，回避争议，比之新闻客观性和全面性的价值理念更看重通过名人效应引起关注，与政界、文艺界、体育领域等名人关系密切，通过特殊的权限获得消息，亦反过来为维持这种权限服务于这些名人。

第十一章 埃夫龙

诺拉·埃夫龙出版的唯一一本小说讲的是卡尔·伯恩斯坦以及所谓他毁了她的生活的故事。这对夫妇是在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纽约相遇的，他们能够一拍即合的原因可能是他们都有一种好斗的精神。伯恩斯坦仍然拥有他因为在水门事件中发挥的作用而获得的桂冠；埃夫龙则是一位畅销的女权主义作家，还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已经被普遍视为一个风趣幽默的公众人物。用八卦杂志的术语来说，两位才华横溢的人彼此钟情就是天作之合。他们很快就成了某种“拥有一切的情侣（It Couple）”，并于1976年正式完婚。那时的他们身处世界之巅——直到他对妻子不忠，他们也跌下了神坛。

这至少就是《心火》（*Heartburn*）这本书为你描绘的情景：一段原本可能很完美的婚姻的血淋淋的终结。埃夫龙设计的叙事者雷切尔·萨姆塔特（Rachel Samstat）写道：“第一天我认为这不好笑，第三天我依然这么认为，不过我已经可以用它开个小玩笑了。”^[1]不过这个玩笑并不小，《心火》是一个长长的，以不得不带着两个还在学步的孩子离开花心的丈夫的绝望为对象，还穿插介绍了各种食谱的大玩笑。叙述者因为自己没能早点发现丈夫偷情而自责不已，不过她对丈夫的怒火当然比对自己的更盛。埃夫龙写道：“这个男人对着威尼斯式百叶窗都能发情。”这本书甚至会为痛批这个丈夫的方式而觉得不自在：

每个人都总在问我，他会不会因为你写这本书而生气？我不得不说，会的，会的，他生气了。他到现在还在生气。对于我来说，这是整件事中

最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他背叛了我，然后表现得好像他才是受了伤害的一方，就因为我把这件事写出来了！

《心火》这本书就是埃夫龙经常用来形容自己使命的那句口号的化身：“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她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经历，然后把它转化成了每个人都喜欢的小说。虽然有些媒体质疑了这部作品，但《心火》成了一本畅销书，它让埃夫龙富有了一段时间；还帮她离开了伯恩斯坦。所以，它担负的使命几乎都完成了，但这也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它使得埃夫龙将永远被这次经历定义。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诺拉·埃夫龙都不是一个喜欢纠结于糟糕的往事的人。在她人生的晚期，她曾对一群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的毕业生说道：“最重要的是，做生活的女主角，而不是受害者。”^[2]

这句话听起来鼓舞人心，但也有些油腔滑调。不过埃夫龙会这么说是因为她对身为受害者有所体会。在本书中提到的所有人当中，她是唯一一个与多萝西·帕克有直接联系的人。埃夫龙的父母都是编剧，他们在好莱坞时与帕克成了朋友。虽然在埃夫龙的童年时代，帕克是她家的常客，但埃夫龙对于帕克的记忆已经模糊：“她身体瘦弱、娇小玲珑，眼睛里闪烁着光彩。”^[3]年轻时的埃夫龙把帕克视为偶像，或者至少是崇拜着她表现出来的样子。埃夫龙为帕克曾经是“圆桌旁唯一的女性”，是曼哈顿每一个文雅聚会上的风趣而有才华的重要人物这件事着迷不已。她也想成为那样的人。她将这个目标称为自己的“多萝西·帕克问题”。当然，帕克的传记最终会纠正她对帕克的生活抱有的幻想，也会让她了解关于酗酒和“受害者”情结的问题。埃夫龙宣称自己从那时起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个梦想。“在人们过于认真地弄清楚一切之前，那原本是一个美好的神话，放弃它很难。”

其实埃夫龙自己家中也发生过幻想破灭的事，只是她不愿意承认而已。诺拉1941年出生，是菲比和亨利·埃夫龙（Phoebe and Henry

Ephron) 的四个女儿中的老大。因为一种性格和天赋的神奇配比，这个家庭里的人创造了大量的文字作品。四个姐妹最终都会成为作家，其中三个是回忆录作家。亨利·埃夫龙本人也写了一本回忆录。据大家所知，这种自我展示的艺术是从埃夫龙家的餐桌上就开始培养的。一家人每天晚上都会比赛谁是最风趣的人。在这个家庭的历史中，特别是诺拉选择抛在脑后的那段过往中，这样的时刻大多被描绘成了诙谐幽默的场景。她说是他们让她体会到了幽默具有的让人自由的威力。

最有趣的人是埃夫龙的母亲菲比。她像丽贝卡·韦斯特的母亲一样是位多才多艺的女性，而且可能也像她一样嫁错了人。

菲比·埃夫龙在布朗克斯区 (Bronx) 长大，曾经在商店里做店员。她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亨利时，后者还只是一个有抱负的剧作家。菲比受到了亨利的追求，但是在同意嫁给他之前，菲比坚持要先读读他的作品，看这些作品是否足够好。^[4]这是一个全家人都很喜欢的故事。菲比凭借自己的本事赢得了权威，她总能吸引房间里所有人的注意。她告诉女儿们说，生命没有比独立更宝贵的价值。诺拉记得母亲从她们很小的时候就对她们说：“如果我没能教会你们要自己作决定，那告诉你们我的想法也没有用。”^[5]菲比的生活也是一种例外。她和帕克一样是好莱坞为数不多的女性编剧之一，她坚持做只有男人能做的事情：

她不是空想家或教条主义者；虽然她用《玩偶之家》的女主角的名字给我取名，但她无法忍受被称为女权主义者。她只是我行我素，就因为为她为榜样，我们从小都是带着对自己能力和命运的盲目自信长大的。^[6]

这样的勇气听起来值得尊敬，这就是一个讨厌女权主义这个名词的女权主义者的完美故事。（韦斯特和埃夫龙的名字都来自易卜生的戏剧是一个美丽的巧合。）但是后来埃夫龙透露，从她十五岁起，母

亲开始大量饮酒。埃夫龙写道：“前一天，她还不嗜酒，第二天她就成了彻头彻尾的酒鬼。”^[7]随着酗酒一起出现的还有大量的叫喊和争吵。（亨利也喝酒，而且还是一个花花公子。）埃夫龙承认，她在菲比人生的最后几年甚至会惧怕母亲。当母亲到埃夫龙就读的韦尔斯利学院看望她时，埃夫龙发现自己一直紧张地等待着必然发生的事，整晚都在担心母亲会开始疯狂尖叫。不过对于埃夫龙的同学来说，那时的菲比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物，因为埃夫龙的父母写过一部在百老汇大获成功的剧本。菲比·埃夫龙的酗酒问题会一直持续十五年，几乎不曾间断，直到她五十七岁时死于肝硬化。

诺拉·埃夫龙在给母亲的悼词里并没有提及所有这些事，因为她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消化这一切。菲比·埃夫龙就是那个创造了“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这句话的人。但在最初，并不是任何内容都可以被借鉴。埃夫龙直到七十多岁时才会在文章中承认，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希望母亲早点去世。在此之前，她讲到的自己家庭的故事都是简单清新，田园诗一般的，只有说俏皮话的天赋简单地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而已。埃夫龙经常反复讲述一个特定的临终故事是这样的：

我想她那时已经知道自己快死了，她转向我说：“你是记者，诺拉，要记笔记。”这让她听起来比实际上更坚强。她曾经很坚强——那很好——但她曾经也很温柔，有些神秘，并且非常骄傲。^[8]

埃夫龙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记笔记”的故事，但关于温柔——关于她母亲的矛盾——则大部分未被提及，直到埃夫龙在2011年出版的最后一些散文集中写到母亲的酗酒问题时，这些内容才终于浮出水面。可见菲比·埃夫龙在坚强和风趣之外，还教会了女儿一些关于人性的东西。

埃夫龙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不得不建立起一种人格面具。她的父母极度坚持“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的信念。当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她的父母就把他们在布朗克斯与菲比的父母一起生活的经历写成了一部名为《三人是一家》（*Three Is a Family*）的戏剧。这部剧是一场轻松的闹剧，意在作为晚间的娱乐消遣，但却引来了不好的反响。当这部戏剧被改编成电影时，宝琳·凯尔特别讨厌的《纽约时报》的电影评论家，傲慢自大的博斯利·克劳瑟（Bosley Crowther）称该电影“特别幼稚”。^[9]后来埃夫龙到韦尔斯利学院上学时，她写的家信激发了父母创作另一个剧本的灵感，这部名为《抓住她，她是我的》（*Take Her, She's Mine*）的舞台剧实际上也是她父母最后一部真正受欢迎的作品。父母显然为女儿的风趣感到骄傲，他们忍不住在戏剧中直接引用了她的原话：

附言：我是班上唯一仍然戴着牙齿矫正器的人。我可不想在这种事上鹤立鸡群。请问希克医生（Dr. Schick）这是否绝对必要。如果他说，那么我很可能也还是要摘掉它。^[10]

这部剧在百老汇首次登台时，埃夫龙还是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的一名大学生。批评家们立刻爱上了这部剧。《女装日报》（*Women's Wear Daily*）称其为“欢笑的暴风雨”。^[11]《剧艺报》也表示认可，说它“讲故事的方式很有趣，台词中充满了会让人掩口轻笑或捧腹大笑的内容”。^[12]这部剧从1961~1962年一直上演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校园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它。

埃夫龙会以她标志性的冷淡描述这一切。但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了解成为别人作品的素材，让别人从她的生活里挖掘可作为戏剧和电影剧本内容这件事带来的无奈了。正如琼·迪迪翁的那句名言说的那样：“作家总是要出卖一些人的。”^[13]埃夫龙比大多数人更早地了解了这个规则。她从不谈论这件事给她造成的困扰，但这种困扰体现在了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上。

*

不管怎么说，埃夫龙显然不是一个喜欢沉迷于往事的人。她总是说1962年离开韦尔斯利学院前往纽约时的自己反而觉得像是要回到家乡一样。她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贝弗利山庄度过的，但她坚持认为自己从未喜欢过那里。她没有写过多少关于高中时代的文章，她青少年时期的照片看起来尴尬笨拙，穿着打扮一点儿都不时髦。她似乎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职业抱负；她不像桑塔格一样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渴望想象中的欧洲。她到达纽约之后直接去了一家职业介绍所，跟中介人员说自己希望成为一名记者。职业介绍所知道《新闻周刊》

(*Newsweek*) 有一些职位空缺，但中介人员告诉她，那里的女性都不是作家。与我们印象中的总是抗拒性别规范的埃夫龙不同，她说当时还年轻的自己轻易地接受了这些障碍。

我从没想过要提出异议或者说：“你对我的看法将被证明是错的。”当时的人都认定，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做某些事，她就必须成为能超越标准的特例。[\[14\]](#)

埃夫龙和一位朋友一起住在沙利文街 (Sullivan Street)，当时这里还被认为是在格林尼治村的南部，她搬进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一地区在庆祝圣安东尼节 (Feast of St. Anthony)。

埃夫龙在《新闻周刊》的工作不是报道新闻的记者，而是一名调查员。所以从写作的角度说，这个职位让她失望；埃夫龙离署名文章最近的时候，是看到被放在自己的老板，报纸总编的办公桌上的别人的文章的时候。和本书中的其他许多人一样，埃夫龙实现突破的机会也不是来自某个有声望的杂志社的编辑，而是来自一个规模较小的杂志社的编辑。维克托·纳瓦斯基 (Victor Navasky) 是一份名为《单片眼镜》 (*Monocle*) 的幽默杂志的编辑，后来还会成为《国家》的编辑。埃夫龙在杂志举办的众多聚会之一上认识了纳瓦斯基。他觉得埃

夫龙很风趣，所以当1962年末出现报社罢工时，纳瓦斯基邀请她写一篇诙谐模仿文，她要模仿的对象是当时的一个著名八卦专栏，叫“莱昂斯的小窝（Lyons’ Den）”，专栏作者是伦纳德·莱昂斯（Leonard Lyons）。结果这篇文章引起了《纽约邮报》编辑的注意，他们立即向埃夫龙提供了一份记者的工作。

对埃夫龙的文章印象深刻，并作出抓住她这个人才的决定的人是《纽约邮报》的出版人，多萝西·希夫（Dorothy Schiff）。希夫是一位已婚的社交界名人，她展现了一种富有女性的独立性，这一点与后来的《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相似。埃夫龙后来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评论希夫的文章，因为内容太过严苛，以至于她觉得有必要在开篇处事先说明：“我将要在这里做的事让我感觉糟糕。”^[15]但是，如果没有希夫，就不会有后来被美国人熟知的诺拉·埃夫龙。在那些年里，首先是名记者，其次才是作家这个概念是埃夫龙人格面具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她说到的激励她成为记者的人经常变。有些时候，她说这个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6]的喜剧《女友礼拜五》中的希尔迪·约翰逊（Hildy Johnson）。埃夫龙喜欢笑话，也喜欢喜剧。她将开玩笑视为必不可少的生存技能。这意味着埃夫龙从很早开始就知道，她想成为公共事务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

被新闻行业吸引的人通常是那些因为自己的玩世不恭，或情感疏离，或沉默寡言，或其他什么因素而只能作为事件的见证者的人。有什么东西阻止了他们参与或投入这些事件，让他们保持置身事外。把我与我所写的东西分隔开来的是怀疑，是一种认为事情很荒谬的感觉，这让我对很多事情都无法太当真。^[17]

埃夫龙在《纽约邮报》时显然遇到过很多荒谬的事。尽管她总是赞美这个地方教会她如何报道和快速写作，但她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地方。整个办公室都脏乱不堪；记者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桌，他们每

天都得争先恐后地抢占一个座位。但埃夫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坚强性格，这可能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甚至可能就是由她母亲培养的。在挑战之下她似乎发展得很好。她报道过各种题材：很多犯罪案件，不少对当地政客的介绍，甚至还写过一位名叫苏珊·桑塔格的迅速走红的新作家的传略。（那是一篇平淡无奇的文章；她们谈到了生活在聚光灯下的感受，还谈到了桑塔格的继父以及他对她说如果她读太多书，可能永远也嫁不出去的事。[\[18\]](#)）

但是在这里的工作内容并不总是好的。希夫对她的报纸或她自己的声誉都不怎么在乎，她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怪异和焦虑的源泉。她为人小气，不愿意慷慨对待她的员工。希夫是当时纽约唯一的女性出版人，但她绝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不喜欢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因为她担心正是阅读《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这类书鼓励了她女儿离开自己的丈夫并投身政治事业。有一次，多萝西·希夫试图让埃夫龙去调查住在自己隔壁的导演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是否在他的公寓里安装了桑拿房。希夫认为有这种可能性的证据是她说自己在一天中的所有时间都能听到流水声。埃夫龙给她发了一份备忘录，耐心地解释了桑拿房不需要流水。于是希夫又将这个任务安排给了另一名调查记者。他当然也查不出任何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知道这么多关于多萝西·希夫的荒谬故事，就是因为诺拉·埃夫龙把这些内容都记了下来，否则它们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遗忘。在离开《纽约邮报》很久之后，埃夫龙在为某杂志写的新闻专栏中不仅列举了希夫的所有糟糕品质，还总结了这份报纸的各种缺点。在这篇专栏文章中，埃夫龙说在广播节目中讲述普雷明格的故事之后，自己最近才刚刚与希夫讲和，但是此时又要对她进行攻击了。她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纽约邮报》是一份“糟糕的报纸”，以及希夫就是掌舵的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她会说就让人们阅读糟糕的东西吧（let them read schlock）[\[19\]](#)。”[\[20\]](#)

使埃夫龙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的置身事外的特殊素质也让她非常愿意攻击自己的雇主。多年来，她不惜激怒她认识的人的意愿，以及用凯尔或韦斯特或任何前人使用过的方式作出的攻击成了她的一种职业资产。比如她对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Julie Nixon Eisenhower）的评价就极具攻击性：“我认为她是一只蜘蛛。”[\[21\]](#)正是这种猛烈凶狠让她登上电视节目，并建立起一名社会批评家的声望。此时距离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因为自己创作的那些更温暖、更宽容的浪漫喜剧而为人所知还有很长时间，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从来没有改掉置身事外这个习惯。女演员梅格·瑞安（Meg Ryan）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我认为她对语言比对人更忠诚。”[\[22\]](#)

埃夫龙离开《纽约邮报》后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感觉到她可能会成为一位优秀的评论家的《纽约时报书评》是第一个真正开始让她发挥才能的地方。她就是在这里发表了一篇模仿安·兰德（Ayn Rand）的“头部遭受创伤性损伤的海明威”风格的诙谐模仿文：

二十五年后，霍华德·罗克（Howard Roark）笑了。他赤身裸体地站在悬崖的边缘，脸上涂着颜料，他的头发和鲜亮的橙子皮一个颜色，他的身体笔直，每个线条和角度都清晰流畅，每个弯曲的地方都变成了光滑，整齐的平面，霍华德·罗克笑了。[\[23\]](#)

对《纽约时报》安排的每一个主题，埃夫龙都会带着浓厚的兴趣深入探究。迪克·卡韦特（Dick Cavett）是一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作家们会在这位梳着精心打理的发型的主持人面前争论一些他根本听不懂的问题。诺拉·埃夫龙早期为这位主持人写过一篇传略。卡韦特的经纪人管他叫电视先生（Mr. Television），起初似乎是为了取笑他，但他写了长长的，充满琐碎小事的四段话来拒绝这个头衔及进行

自我批评。埃夫龙连续引用了全部四段话，以此来说明卡韦特所谓的自我沉醉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我还会收到问我为什么总是系同一条领带的来信。我没有总系同一条。我有两条。[\[24\]](#)

她还写过一篇赏析雷克斯·里德（Rex Reed）的文章，里德是一位记者，后来成了电影批评家。埃夫龙称他是“一个轻佻、好窥探，脾气不好的男人，他看待事物的眼光很敏锐，并成功地让我们所有人成了偷窥者”。[\[25\]](#)她明确表示，这些都是让她欣赏的作家的品质。

不过，埃夫龙并没有将多少早期的作品收录起来，比较这些文章和她其他的作品时，你很可能会怀疑问题通常是出在编辑给她指定了乏味的主题上。1969年，她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名为《出版商约在哪里吃饭》（*Where Bookmen Meet to Eat*）的文章，其中记录了代理人、图书编辑和作家总喜欢花很长时间一起吃午餐这个易于被拿来取笑的主题。埃夫龙处理这个主题时很谨慎，不过在文章末尾她还是设法说服了一位经纪人承认“这样的两小时午餐时间还不如用来回电话”。[\[26\]](#)

当然，埃夫龙也必须小心地保护自己的谋生能力。在那段时间及后来的采访中，她说在1974年之前，她一年的收入不超过一万美元，堪堪满足生活需要。[\[27\]](#)埃夫龙和她之前的桑塔格一样，也靠为女性杂志写文章挣钱，特别是《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创作那些文章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因为用埃夫龙的话说，那些作品不能按照“最能让身为作家的我感到满意的知性水平”完成。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作品也是将她推向女权运动的原因，因为她对分配给自己的题材，尤其是海伦·格利·布朗安排给她的那些感到无比沮丧。不难想象，当时她能写的无非是关于形象改造、旅行、性和科帕卡瓦纳歌舞女郎（Copacabana showgirls）的文章。

但格利·布朗确实让埃夫龙创作了一个突破《世界主义者》通常的活泼风格的题材。可能是因为时尚小报《女装日报》总是用不友善的言辞来记录格利·布朗作为杂志编辑的职业生涯，而且这些内容让格利·布朗感觉受到了伤害，所以她同意让埃夫龙就此问题写一篇文章。埃夫龙痛批了《女装日报》编辑的自命不凡。她写道这份报纸不过是一个八卦小报，其受众只是一小群被称为“女士”的读者，埃夫龙无情地嘲笑了她们奢侈无度的虚荣生活：“除了中间吃顿午饭，成天无事可做的日子让人觉得有点难为情。”^[28]她还说这份杂志就是一个“代理贱人”，它在找借口嘲笑名人外表的同时，硬把自己的行为称作新闻报道。

埃夫龙正是在借用这本杂志自身的风格来打击这本杂志的：据埃夫龙说，该杂志的习惯是表面上装出一副值得相信，随便开个玩笑的样子，借此来遮掩它对那些职业女性作出的，关于她们的穿着打扮、她们的约会方式，以及她们如何打理自己的工作事务的破坏性的评论。埃夫龙后来写道，《女装日报》根本没有注意到这种在语气和风格上的讽刺的模仿，还威胁说要起诉。

但是，海伦·格利·布朗也许早该想到，埃夫龙在为《世界主义者》写文章的时候，同样也在收集关于这本杂志的材料，更具体地说就是关于它的主编的材料。埃夫龙的文章也吸引了《时尚先生》的编辑的注意。她在那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格利·布朗的传略，而且是一篇试图凸显她最糟糕的个性特征的作品。在这篇传略中，埃夫龙认为格利·布朗的问题不是她受到批评时只会哭，也不是她的批评者们经常提到的一些道德败坏的倾向，比如她建议年轻女性与已婚男士约会。相反，她抓住自己曾经的主编不放的问题是一个可能只有在这份杂志中工作过的作家才能看得如此清晰的问题：那就是格利·布朗对全体女性的智慧的侮辱：

她非常努力地想要证明，有超过一百万的女性愿意花60美分买这份杂志，不是为了了解政治，也不是为了了解女性解放运动，更不是为了了解越南战争，她们只想了解如何找到如意郎君。[\[29\]](#)

这一论点与迪迪翁对海伦·格利·布朗的看法不无相似之处。迪迪翁也在文章中抱怨过某位流行杂志编辑的低俗品味，说她希望成为“小公主，成为实现自己的书籍和所有广告中悄悄承诺的愿望的女人，成为遇到各种好事的女孩”。[\[30\]](#)但是，埃夫龙并不是站在一个高人一等、鄙夷轻视的立场上写这篇文章的；因为她能够以迪迪翁所不能的方式理解这种轻浮具有的吸引力。所以，她才选择从一个更加民主的角度来批评格利·布朗。她承认自己也是《世界主义者》的读者和作家之一，她还问道：“你怎么能对有你电话号码的人生气？”格利·布朗起初没有意识到埃夫龙的这种同情心。她讨厌这篇文章，更讨厌随文章一起刊登的配图，但是没过几天，她就原谅了埃夫龙。[\[31\]](#)

埃夫龙表达愤怒的下一个目标是耶鲁大学古典系教授，畅销小说《爱情故事》（*Love Story*）的作者埃里克·西格尔（Erich Segal），和诗人罗德·麦昆（Rod McKuen）。埃夫龙自称是一个通俗作品爱好者，尤其喜欢杰奎琳·苏珊（Jacqueline Susann）的小说。她断言道：“我从不相信通俗套路会让人厌烦。”[\[32\]](#)但她无法忍受西格尔和麦昆的多愁善感，也无法忍受他们给自己设定的在公众面前的人格面具，特别是西格尔的。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当时正与西格尔的书争夺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位置，于是西格尔养成了一个公开谴责罗斯对性的露骨描绘的习惯。（对于一本情节俗套的爱情小说来说，《爱情故事》里完全没有性爱场面的描写倒是很不同寻常。）埃夫龙对此表示难以置信：

所有人都喜欢埃里克的演讲。所有人，或者说，除了电影批评家宝琳·凯尔之外的所有人。凯尔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的作者书籍午餐会上听过埃里克演讲的早期版本。之后凯尔对埃里克说他的演讲是

在攻击言论自由，也是在拍听众的马屁。对此埃里克的回答是：“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卖书，不是吗？”

这种能够站在一个广阔的现象之中，知道它是如何迎合和欺骗人格的最基本方面，然后又能够以一个内部人士的角度批评它的能力使埃夫龙成了几乎比其他人都出色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事件的记录者——尤其是在对女权运动的记叙方面。她既能参与其中，又能置身事外，是一个总是被卷入所有事件，又能像局外人一样冷静旁观的存在。敏锐的感知力是种天赋，在那些年里，她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天赋。当然，埃夫龙后来作为电影制作人的声望几乎盖过了她作为一名作家取得的所有成就。但她的文字作品才是体现了她不可磨灭的印记的东西，这种印记来源于她的个性，她的识人能力，以及在这些人们真正需要的时候，泰然自若地向他们发起攻击的能力。这让她成了那种人们会以她为荣，渴望取悦她，甚至有点怕她的朋友。这也是让她那一时期的作品都非常精彩的原因。

在埃夫龙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以第一人称写作。不过因为她早期接受的作为记者的训练，她始终觉得使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有点儿不够公正。在《纽约邮报》时接受的训练让她学会了不要把文章写成自己的故事。所以最开始写散文的时候，她要在编辑的鼓动下才开始使用第一人称。但是到了1970年，当她把自己早期的作品收录到一本名为《疯狂聚会上的壁花》（*Wallflower at the Orgy*）中时，她承认她已经对这种限制感到有点儿不耐烦了。

某些时候，在采访进行过程中，我会感到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想要张口大喊的渴望：“我！我！我！说了太多你了。我呢？”[\[33\]](#)

多年以后，在作为一个真正著名的人物接受过各种采访之后，埃夫龙会为这种年轻时的虚荣心感到难为情。不过，没有任何一篇作品能够比她在1972年为《时尚先生》写的《浅谈乳房》（*A Few Words*

About Breasts) 更完整地展现埃夫龙本人，以及她的声音和她的视角。

写这个主题是需要观察结果做基础的：埃夫龙本人的胸部异常平坦。这显然是家族遗传的结果；她记得自己的毒舌母亲在女儿们要求购买第一件文胸时是这么回答的：“为什么不用创可贴呢？”^[34]

埃夫龙写道：女性加入了一场不曾停止过的“评论乳房大小”的游戏。她承认自己也曾执着于这个问题，甚至还购买过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处可见的蛇油丰胸产品。一位大学时期的男友的母亲曾在谈话中向她暗示，由于这种缺陷，她永远无法在性方面获得满足。埃夫龙在文章结尾处写的一段话将成为她的一个标志性做法：她在这里考虑了所有与她的经验对立的论点，以及那些坚持认为乳房娇小的人穿衣服更合身，也更少被戏弄的人们。这是一种新闻行业的客观性的表现，但埃夫龙说自己从来不相信什么客观性，即便是在她害怕完全从“我”的角度写作之前也不相信。接下来，她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戳破了：

我考虑过他们的观点了，试图设身处地地从他们的角度看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在胡说八道。

这篇文章被刊登在1972年5月的《时尚先生》中，这是埃夫龙在她母亲去世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可能有一些意义，而且这篇文章为杂志吸引了许多读者来信。

在写了关于她的乳房的这篇文章之后，《时尚先生》为埃夫龙安排了一个专栏。多年来，关于这个专栏应当关注女性问题的想法究竟是埃夫龙还是杂志编辑提出的说法不一。无论这个功劳应当归结于谁，这种安排确实是一个绝配。

在埃夫龙开始写这个问题时，她已经关注女权运动一段时间了，这意味着她已经收集了相当多的观察结果。她的第一篇专栏文章探讨的是一个几乎所有女权主义者都写过，但当时还很少有人愿意直白地论述自己观点的问题：女权主义革命是否会引发两性对对方性幻想的方式的变化？埃夫龙认为自己仍然足够正派到不愿太过明确地描述自己的幻想，但至少可以说其中涉及了支配地位的问题，而且她已经知道女权主义者不应当想要在性关系中处于被男性主导的角色。她没有在专栏文章中给出任何真正的答案，而是在最后写了一段充满自觉的话：

我意识到，在《时尚先生》上写一个关于女性的专栏有点像给一群爱尔兰天主教徒讲一个犹太人的笑话。我对这场运动的批评似乎是对男性和女性的双重背叛；在这样的上下文环境中，我想要带给这个主题的幽默感也可能被看作轻率无礼。[\[35\]](#)

埃夫龙确实是在敌人的领地中跋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当时的《时尚先生》还不像它现在这样依靠名人效应，而且它将自己视为一份文学杂志而不是时尚杂志。埃夫龙的专栏是独一无二的。她不像桑塔格和迪迪翁那样从远处观望女权运动，然后对它进行笼统的批评。但埃夫龙也不是那种一头扎进去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她并没有把自己的专栏当成支持任何政治纲领的阵地。

埃夫龙发动的第一次攻击是针对另一位作家的。阿利克斯·凯茨·舒尔曼（Alix Kates Shulman）是流行小说《前毕业舞会女王回忆录》（*Memoirs of an Ex-Prom Queen*）的作者。这本书在当时是畅销书，以主人公回忆自己被第一任丈夫强奸为开篇，之后就转向了该书真正的主题，即在男性主导的文化中，美丽正遭遇危险：“我曾经以为，如果我能确定我仍然美丽，离开就不是什么难事。”[\[36\]](#)舒尔曼接着还宣称，实际上美丽的人和丑陋的人一样有很多困扰，只不过是不同的困扰。她还以玛丽莲·梦露等人为例来解释美丽带来的苦难。

埃夫龙从来没有被视为一个美女，她发现书中的这个论点让人难以接受。埃夫龙坚称，包括自己在内，“全国没有哪一个丑女孩不愿意用自己的困扰交换身为美女的困扰”：[\[37\]](#)。

阿利克斯·凯茨·舒尔曼写道：“他们说长得丑更糟糕。”是的，人们确实这么说。而且人们说得很对。贫穷也会更糟糕，成为孤儿、成为胖子都会更糟糕。那不仅仅是与家财万贯、父母双全、身材苗条不同——而是更糟糕。

这篇作品因此戳穿了女权运动中非常流行的一句台词。舒尔曼是女权运动中一位知名人物，她曾在《女士》杂志上刊登了自己和丈夫签订的婚姻契约，其中将人们可以想到的所有家务活都列举出来并分配给了婚姻双方。没有其他人以这种方式批评过她，尽管迪迪翁将舒尔曼的婚约作为女权运动正越来越纠结于琐事的证据。但埃夫龙不是把舒尔曼当作一个排斥整个运动的理由；实际上，她试图用一段更有同情心的评论来结束这篇具有杀伤力的文章。她说自己对舒尔曼的评价并不公平，对女权运动的也是如此：“我正在努力，就像所有关于解放的事情一样，姐妹情也是一个难题。”

“姐妹情也是一个难题”也许可以被当作她的专栏文集的另一个标题。[埃夫龙在1975年时以《疯狂的沙拉》（*Crazy Salad*）为名出版了这本文集。]事实上，埃夫龙在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里都在尽力用令人愉悦的说法描述女权运动，但她描述的不是女权主义强调的那些基本原则，而是现实中的女性对这些原则的诠释。有一篇专栏文章报道了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迈阿密举办的197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针锋相对的事。女权主义活动家在这次大会上的目标是在民主党的党纲中获得一些认可和承认，但是如埃夫龙看到的那样，她们除了内斗之外什么也没做成。那里发生的事情糟透了，但埃夫龙还是不得不对其进行描

述，她特别写到了弗里丹对于年轻一代正在迫使她退居二线的方式感到的愤怒：

这[个运动]是她的孩子，该死的。她的运动。难道她应该静静地坐在那里，让一个漂亮、苗条的女人把她的孩子抢走吗？[\[38\]](#)

当时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是女权主义者的一位实际领导，其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正处于顶峰时刻。虽然她比弗里丹更盛气凌人，还有朋友可以替她解决那些见不得光的问题。但是从埃夫龙的镜头中看到的斯泰纳姆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对斯泰纳姆作出了某些关于党纲的承诺，后来却将她抛在一边，斯泰纳姆为此大哭一场。埃夫龙并没有像以前批评海伦·格利·布朗只会哭那样批评斯泰纳姆哭的问题，但是她为导致她大哭的理由感到困惑。“我从来没有因为生活中任何哪怕跟政治沾一点边儿的问题而哭过，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埃夫龙告诉一位采访者说就因为她在报道中简单提到了斯泰纳姆的眼泪问题，她的许多朋友“对我大喊大叫”。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为此而生了好多年的气。

然而大多数人还是很喜欢埃夫龙这种有同情心，但也保持怀疑的论调的。今天的我们有一种习惯，就是假设人们对女权运动只能有一种反应：要么全心投入，要么两不相干。但是，第二次浪潮并不是像迪迪翁这样的批评家们有时形容的那样，是一个完全统一的阵营。运动内部也充斥着派别分立，有对不同年龄、种族及其他各种女性内部的断层线如何反应“身为女性”这个问题的方式的争论。任何现实中的人在看到这一切时都无法不产生充满矛盾的观点。人们可能会同时感受到极端的、无法控制的满怀希望和失望透顶。

所有这些矛盾的感觉或许就是让埃夫龙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的原因：她在批评这项运动的荒谬和丑陋之处时毫不留情，但她是以一个运动参与者的身份作出这些批评的。而且一贯比较温和的埃夫龙偶尔也会对批评家的选择性省略提出更正。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她反对迪迪翁坚称的女人的生活包含“流血^[39]，生育和死亡”，她认为这种定义“离奇和令人费解”。^[40]到这个时候，迪迪翁和埃夫龙对彼此已经变得友善，她们出入的都是相同的圈子。也许埃夫龙对迪迪翁产生了好的影响。当后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问及女权运动的立场时，迪迪翁似乎收回了她早先提出的批评观点。

我认为那篇文章是关于某个特定时刻的。我曾经认为女权运动陷入了纠结于琐事的困境中，它当时正朝着一个不理想的方向前进，它已经撞上了一堵墙，而且一直在谈论无关紧要的小事。然而，平凡化的趋势已经消退，这种运动设法存续了下来，它也不再仅仅表现为一场运动，而是成了一种改变了的生活方式。^[41]

埃夫龙显然对于谈论女性的身体没有任何障碍；毕竟，她已经写过那篇关于乳房的文章了。1973年初，她还写了一篇名为《处理那个……问题》（*Dealing with the uh, Problem*）的调查性长文，她在文中勇敢地探讨了女性除味喷雾，即“外生殖器区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会阴区外部）除臭剂”^[42]的制造、使用和营销问题。她的置身事外的态度在这里依然很适合她，她几乎没有发表多少主观评论就足以让这个行业显得无比荒谬。

写男人对女人所说和所做的荒谬事情很容易，写女人对自己做的荒谬事则要困难一些。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在与苏珊·布朗米勒争论化妆的问题，这也是女权运动中存在明显分歧的一个问题。埃夫龙将这段经历写入了那篇关于舒尔曼的文章中，但没有提及姓名：

有一次我试图向另一位女权主义者解释我为什么喜欢化妆；她也向我解释了她为什么不喜欢。我们俩都完全不能理解对方的想法。^[43]

用一个专栏直接与这种运动中交替出现的狂热和矛盾斗争，这让埃夫龙发现自己很难既忠诚于运动又成为一名作家。“这场运动中反复出现的讽刺之一是，你没办法在说出关于运动的真相的同时避免在某些小问题上给它造成伤害。”^[44]她还说她发现评论女性作家写的关于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书籍很难，因为虽然她认可她们的激情，但她并不喜欢这些女性的写作方式。她当然知道自己在批评这些作品时应当考虑到作者写作的良好初衷：

这就是女权运动中所谓的姐妹情，我猜这是好的政治，但并不是好的文学批评，也不是诚恳，更不是说真话。（此外，这还与如今男性在批评关于女性的书籍时采用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腔调别无二致——那种无意识的以高人一等的身份自居，将关于女性或由女性创作的作品视为某种文学的子类型，认为它们是属于主流之外、并不完全相关，但挺有意思的东西的态度：这些女人是如何做的，我们一定得试着了解一下，无论那是什么。）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自我批评的东西，因为《时尚先生》将这个分析女性的专栏与杂志的其他内容分割开来这种做法本身就含有某种本质上的居高临下的感觉，更不用说这份杂志只将男性读者作为受众，在女性中的传播程度也远远低于在男性中的。一直让埃夫龙只写这些东西无疑是种根本性的浪费。后来她说是自己决定不再写这个专栏的，因为她已经厌倦了，她需要说的都已经说了。

然而在此之后，这个主题在一段时间之内还在继续为她提供着可借鉴的内容。被《纽约》杂志挖走后，埃夫龙会在那里继续写关于女性的文章。在最早的一些文章中，她攻击过一位朋友，作家萨莉·奎因（Sally Quinn），因为后者说自己一直把调情作为一种报道技巧。在分析自己对奎因的说的愤怒时，埃夫龙提到一位最近接受了自己的采访，并逐渐与自己成为朋友的人对女性和职业竞争问题的看法：

[莉莲·] 赫尔曼 (Lillian Hellman) 女士说：“达希尔·哈密特 (Dashiell Hammett) 曾经说我具有一种最低劣的嫉妒心。我不嫉妒别人的工作，也不嫉妒别人的钱财。我只嫉妒那些能够利用男人的女性，因为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 [\[45\]](#)

在《纽约》杂志工作的埃夫龙开始找回自己早些时候的出色状态，即简单地推翻声名显赫的媒体人物。《屋檐》杂志

(*Penthouse*) 的出版商鲍勃·古乔内 (Bob Guccione) 决定于1973年推出一本针对女性读者的杂志——《万岁》 (*Viva*)，该品牌的口号为：“由问心无愧地享受女性的男性为你提供的杂志。”在埃夫龙的专栏中，你完全可以看出埃夫龙对于揭露古乔内的无知程度有多么兴奋，她像曾经批评迪克·卡韦特和海伦·格利·布朗时一样大段引用了古乔内的原话而不发表评论：

把所有事情都尽可能地考虑到的话，我不愿这么说但我认为这是真的，我比女性更了解女性。 [\[46\]](#)

《万岁》在此之后持续出版了七年，但它不会成为女性之间互相引用其中内容的那种标志性出版物，这与古乔内的梦想和希望截然相反。

埃夫龙攻击的下一个目标是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因为埃夫龙发现她是一个骗子。在水门事件造成了灾难后果之后，一头金发、魅力出众的朱莉成了被尼克松家推到镜头前面的人。根据埃夫龙的记述，华盛顿的记者团几乎都爱上了她。

正如一位记者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说有谁会相信她说的话，而是说人们相信她自己相信自己说的话。他们还会告诉你她很平易近人，这是真的，她还很开诚布公，这就不是真的了……这就好像在说，她是全美国唯一一个已经过了二十岁，却仍然认为此时的父亲和自己六岁时的父亲一个样的女性。 [\[47\]](#)

埃夫龙说这句话时可能掺杂了一些个人情绪，因为自从菲比·埃夫龙去世之后，亨利·埃夫龙就成了女儿们的负担。他开始写一本他取名为《我以为我们可以做任何事》（*We Thought We Could Do Anything*）的回忆录，这个题目直接来自他女儿给母亲写的悼词。埃夫龙后来坚称这本回忆录里全是没有意义的内容。[\[48\]](#)更糟糕的是，这似乎是一次赤裸裸的想要利用自己名气不断增长的大女儿赚钱的尝试，这一定让埃夫龙很受困扰。

此时的诺拉·埃夫龙已经很有名了。她会出现在多年前她曾经批判过的社会八卦刊物中，比如《女装日报》就经常提到她，甚至比过去提及海伦·格利·布朗的次数更频繁。她还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在一个节目中，主持人提到了她经常直击别人痛处的做法。

主持人：你有时候很恶毒，不是吗？

埃夫龙：哦，当然。

主持人：恶毒是一种乐趣，不是吗？

埃夫龙：不，你——

主持人：让我告诉你你怎么恶毒了。比如你那篇关于朱莉·尼克松的文章。

埃夫龙：你对朱莉·尼克松情有独钟。

主持人：我喜欢朱莉，是的。

埃夫龙：嗯，我不喜欢。我认为她是一个裹着巧克力的蜘蛛。[\[49\]](#)

埃夫龙的后续作品几乎都会采用这样的框架。后来某个时候，她会重新为《时尚先生》写文章，这一次她的目标从女性变成了媒体，还有很多她认识的媒体人：比如《人物》杂志（*People*），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还有某些《纽约客》作家的自命不凡。

（她没有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凯尔。）埃夫龙甚至会对《时尚先生》发起攻击。有一次，她被卷入了《时尚先生》与作家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的争议中，最终《时尚先生》就由她为该杂志编辑的一篇古德温的传略引发的争议与古德温达成和解。而埃夫龙则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批评这种做法。

有些人称埃夫龙生活的这个方面为刻薄的一面，然而在当时，读者似乎并没有觉得她很刻薄。甚至有些时候，连埃夫龙本人也不觉得自己刻薄。1975年《疯狂的沙拉》出版之后，埃夫龙接受了美联社的采访，她说：

你可以写一篇关于某个人的最充满溢美之词的文章，但是人们可能只会记住你说这个人“胖”……你很早就明白了自己从事的这项工作并不是要让你与你所写的人成为朋友。如果你们是朋友，你就会缩手缩脚。[\[50\]](#)

她在这里阐述的困境就是她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敏锐地感受到的。当埃夫龙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时，有些男人偶尔会在自己的专栏中诽谤她，或者说她有点小聪明、讨人喜欢，而不是赞美她的才华，他们还会说自己多想和她共度良宵。她看到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影响，作为一位散文家，她被要求写哪些内容、思考哪些内容都受到了影响。她在1974年告诉一位采访者说“有些杂志不仅不会，甚至是根本不考虑给女性分配任何与经济或政治这类主题相关的题材”。[\[51\]](#)

1974年时刚离婚不久的诺拉·埃夫龙还对这位采访者说：“单身让人分心。”〔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刚刚嫁给了一位幽默作家丹·格林伯格（Dan Greenburg），这段婚姻维持的时间不长。〕“我的意思是，婚姻对男女双方都有好处的一点是，它可以让你省掉为约会而付出的所有能量。那样你就可以把这些能量投入工作。你不必再担心明天找谁带你去参加晚宴。在我看来，单身需要占用很多时间。”伯恩斯坦帮她解决了这个问题。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埃夫龙与伯恩斯坦的结合与她突然失去为杂志写文章的兴趣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后半段，埃夫龙几乎完全放弃了写文章，因为她把注意力转向了写剧本。她就是从这时起开始与艾丽斯·阿伦（Alice Arlen）合作撰写《西尔克伍德事件》（*Silkwood*），还在伯恩斯坦坚持不懈的追求下与他结为了夫妇。她对一位采访者说：“我们决定在周日结婚，但是我们周三就结婚了，最完美的部分是，我们是在东方巴士公司的巴士上决定结婚的。”^[52]但是，她还告诉这位采访者说“考验婚姻是否成功不一定要看婚姻是否持续到最后”。

正如我们从《心火》中得知的那样，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到最后。“我在编故事方面非常差劲，”当采访者问她是否有写小说的意愿时，她会这样回答。但她还说，从她离开第二任丈夫的那一刻起，她就有一种确定自己会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的感觉。与伯恩斯坦私通的女人的丈夫名叫彼得（Peter），他请埃夫龙吃了顿饭。当他们在街上碰面时，埃夫龙已经在观察和分析这个场景了，不过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她会把这些也写出来：

我们约在康涅狄格大道（Connecticut Avenue）上的一家中餐馆门口，然后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哦，彼得，”我对他说，“这太糟糕了，不是吗？”

“这太糟糕了，”他说。“这个国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歇斯底里地哭着，但我想，总有一天这会变成一个有趣的故事。^[53]

埃夫龙说，她最终意识到她母亲一生中重复的那句话，“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其实讲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

当你踩到香蕉皮滑倒时，人们会嘲笑你；但是当你给别人讲述你踩香蕉皮滑倒的故事时，它就成了你的笑料。所以你会成为笑话的英雄而非受

受害者。

我认为这就是她要表达的意思。[54]

《心火》成了一部非常畅销的作品，让埃夫龙赚了很多钱。她为电影版写了剧本，她的朋友迈克·尼克尔斯（Mike Nichols）指导了影片的拍摄。所有人都说伯恩斯坦非常愤怒。他甚至在离婚协议中规定电影只能把他描绘成一个慈爱的父亲。她的一些朋友显然认为写这么一本书不是个好主意；在小说即将出版时，《纽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八卦文章，埃夫龙的第一任丈夫丹·格林伯格告诉文章作者说：“诺拉本人是比书中人物优雅得多的人，也是一个更优秀的作家。”[55]

这本书如今已成为一种传奇，尽管电影版没能完全表现出小说的精妙之处，这可能是因为伯恩斯坦为了保护他和埃夫龙的两个孩子而给电影设定的条件造成的结果，也可能是因为电影不能像小说一样展现出一个有趣的叙述者的意识。影片成功与否太过依赖于雷切尔这个角色能否听起来像诺拉一样，能否拥有像她一样精准地审视世界和自身处境的方式，这样的内心活动复杂到无法在大银幕上被诠释出来，即便扮演者是梅里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也不行。然而，这是女权主义复仇的伟大流行作品之一，伟大到埃夫龙职业生涯后期拍摄的所有那些甜蜜蜜的电影作品都无法遮掩其光彩。

[1] *Heartburn* (Knopf, 1983), 3.

[2] 1996年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学位颁授典礼上的演讲，可见于 <http://www.wellesley.edu/events/commencement/archives/1996commencement>。

[3] “Dorothy Parker” in *Crazy Salad and Scribble Scribble* (Vintage, 1972), 168.

[4] 参见Henry Ephron, *We Thought We Could Do Anything* (Norton, 1977), 12-13。

[5] 菲比·埃夫龙的悼词, printed as “Epilogue,” in *We Thought We Could Do Anything*, 209。

[6] 菲比·埃夫龙的悼词, printed as “Epilogue,” in *We Thought We Could Do Anything*, 211。

[7] “The Legend,” from *I Remember Nothing* (Random House, 2010), 37。

[8] “Epilogue,” in *We Thought*, 210。

[9] Bosley Crowther, “The Scree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 1944。

[10] Henry and Phoebe Ephron, *Take Her, She’s Mine* (Samuel French, 2011), 18。

[11] Thomas R. Dash, “Bringing Up Father Theme Yields Tempest of Mirth,” *Women’s Wear Daily*, December 26, 1961。

[12] “Take Her, She’s Mine,” *Variety*, November 29, 1961。

[13] 出自《向伯利恒跋涉》前言, xiv。

[14] “Journalism: A Love Story,” in *I Remember Nothing*。

[15] “Dorothy Schiff and the New York Post,” *Esquire*, April 1, 1975。

[16] 此处疑有误, 该电影应为1940年上映。

[17] 出自《疯狂聚会上的壁花》序言, (Bantam, 2007), 18。

[18] *New York Post*, September 23, 1967。

[19] 此处将希夫比作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为了借用后者的那句(如果农民没有面包,)“就让他们吃蛋糕吧。(Then let them eat brioches.)”不过实

际上并没有记录证明玛丽·安托瓦内特真的说过这句话。

[20] “Dorothy Schiff and the New York Post.”

[21] 此次采访的这个片段出自*Everything Is Copy*, dir. Jacob Bernstein (2016)。

[22] 采访梅格·瑞恩, 出自*Everything Is Copy*, dir. Jacob Bernstein (2016)。

[23] “A Strange Kind of Simplicity, ” *New York Times*, May 5, 1968.

[24] “Dick Cavett Reads Books, ” *New York Times*, June 2, 1968.

[25] Review of *Do You Sleep in the Nude?* *New York Times*, July 21, 1968.

[26] “Where Bookmen Meet to Eat, ” *New York Times*, June 22, 1969.

[27] 接受Michael Lasky采访, *Writer's Digest*, April 1974, reprinted in *Nora Ephron: 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 (Melville House, 2015)。

[28] “Women's Wear Daily Unclothed, ” *Cosmopolitan*, January 1968, reprinted in *Wallflower at the Orgy*.

[29] “Helen Gurley Brown Only Wants to Help, ” *Esquire*, February 1970, reprinted as “If You're a Little Mooseburger, Come with Me. I Was a Mooseburger and I Will Help You, ” in *Wallflower at the Orgy*.

[30] Joan Didion, “Bosses Make Lousy Lovers, ” *Saturday Evening Post*, January 30, 1965.

[31] *Nora Ephron: The Last Interview*.

[32] “Mush, ” *Esquire*, June 1971.

- [33] 出自《疯狂聚会上的壁花》序言。
- [34] “Some Words About My Breasts, ” *Esquire*, May 1972.
- [35] “Women, ” *Esquire*, July 1972.
- [36] Alix Kates Shulman, *Memoirs of an Ex-Prom Queen* (Knopf, 1972) , 17.
- [37] “On Never Having Been a Prom Queen, ” *Esquire*, August 1972.
- [38] “Miami, ” *Esquire*, November 1972.
- [39] 指月经。
- [40] “Vaginal Politics” in *Crazy Salad*.
- [41] Christopher Bollen采访琼·迪迪翁, 可见于V, http://www.christopherbollen.com/archive/joan_didion.pdf.
- [42] “Dealing with the uh, Problem, ” *Esquire*, March 1973.
- [43] “On Never Having Been a Prom Queen.”
- [44] “Truth and Consequences, ” *Esquire*, May 1973.
- [45] “A Star Is Born, ” *New York Magazine*, October 1973.
- [46] 转引自 “Guccione’ s Ms. Print, ” *New York*, October 29, 1973.
- [47] “Women: The Littlest Nixon, ” *New York*, December 24, 1973.
- [48] 参见, 例如: “The Legend, ” in *I Remember Nothing*, 37。
- [49] 这个片段出自*Everything Is Copy*。
- [50] Jurate Karickas, “After Book, Friends No More, ” *Atlanta Constitution*, August 3, 1975.

[51] *Nora Ephron: The Last Interview*.

[52] Peter Stone, “Nora Ephron: ‘I Believe in Learning the Craft of Writing, ’ ” *Newsday*, December 5, 1976.

[53] “The Story of My Life in 5, 000 Words or Less, ” in *I Feel Bad About My Neck* (Knopf, 2006) .

[54] “The Story of My Life in 5, 000 Words or Less, ” in *I Feel Bad About My Neck* (Knopf, 2006) , 86.

[55] Jesse Kornbluth, “Scenes from a Marriage, ” *New York Magazine*, March 14, 1983.

第十二章 阿伦特和麦卡锡和莉莲·赫尔曼

在汉娜·阿伦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她一边教书，一边以令人羡慕的速度出版著作，这样的状态是只有那些已经达到人生中一个完全自在的境界的人才可能拥有的。但这种情况在1970年10月发生了变化。“海因里希于周日突发心脏病去世”，^[1]阿伦特在电报中这样告诉麦卡锡。当时，麦卡锡和她的最后一任丈夫，外交官吉姆·韦斯特（Jim West）一起住在巴黎。她立刻飞回纽约参加葬礼。

到此时为止，阿伦特和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没有他，她就成了孤家寡人。阿伦特在丈夫去世后不久写信给麦卡锡说：“我现在坐在海因里希的房间里使用他的打字机，这让我有了一些能帮我坚持下去的东西。”^[2]实际上，失去了海因里希的阿伦特并没能坚持很久。1975年12月4日，她在与朋友共进晚餐时也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麦卡锡被指定为阿伦特的遗稿保管人，她还自主承担起了葬礼的安排以及与家人协商的工作。在其他朋友之间，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显得非同寻常的亲密，但就这两个人来说，最好的朋友会自然成为最主要的哀悼者。麦卡锡在纽约为阿伦特致悼词时，偶尔会用谈论情人的口吻谈论阿伦特，麦卡锡赞美她的外表，还有她躺在沙发上思考时的样子。她甚至以一种会导致她被嘲笑的方式谈论了阿伦特的腿和脚

踝。但如果你考虑到麦卡锡把她的朋友直接形容为思想的化身，那么她做的一切就没有什么不合适了：

我第一次听到她在公共场合演讲——是在近三十年前的一场辩论中。她让我想到伯恩哈特（Bernhardt）^[3]一定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是普鲁斯特（Proust）笔下的贝尔玛（Berma），一个壮丽的第五幕，那意味着女神登场。也许是来自阴曹地府的女神，或者是烈焰般炽热的女神，反正不是无忧无虑的那种。与其他优秀的演讲者不同，她根本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相反，她看起来更像一个哑剧演员，一个戏剧演员，她在演出一场心灵的戏剧，她在进行她经常在文字中召唤出的那种她和她自己的对话。^[4]

之后，麦卡锡将自己的写作搁置了两年多的时间，转而致力于撰写和编辑阿伦特生前的最后一个项目。这是一篇名为《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的三卷论文。第一卷谈论的是思考行为，第二卷谈论的是意志行为，第三卷谈论的是判断行为。阿伦特只完成了前两卷的绝大部分初稿，关于第三卷则只在一张纸上写了两段引言。阿伦特去世时，这张纸还插在她的打字机上。虽然麦卡锡的德语并不好，而且从根本上说她也不是什么理论家，但她认为完成这本书是为了致敬她的朋友。她也确实完成了，尽管出版商只向她支付了预付款和版税的1/4，其余的钱被付给了阿伦特的家庭成员。

这是一种非凡的慷慨行为。时间是艺术家最渴望的一件事；如桑塔格曾经说过的那样，时间是他们用钱来买的最主要的东西。但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麦卡锡不像她曾经那样多产了。她只完成了一部小说《食人族和传教士》（*Cannibals and Missionaries*），这也是她的最后一部小说。阿伦特及罗伯特·洛厄尔的先后去世让麦卡锡感到沮丧。《食人族和传教士》算不上她最好的作品，不过这本书得到了很多积极的评价。麦卡锡此时还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但她在寻找一个真正的角色的过程中也会犯些错误。

这也许可以解释后来发生的和莉莲·赫尔曼有关的事情。

赫尔曼起码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复杂的人。她作为一名作家的第一次巨大成功是名为《双姝怨》（*The Children's Hour*）的剧本，内容是孩子们指控两位寄宿学校的女教师是同性恋者。这个剧本的成功，以及赫尔曼在此后获得的好莱坞合同让她变得富有。然而，她的财富和名望与她的政治立场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搭配。她在好莱坞与帕克成了朋友，而且和帕克一样，赫尔曼年轻时也是一位左翼活动家。与帕克不同的是，赫尔曼倾向于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人们普遍认为，赫尔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宣称自己目前与共产党或“任何政治团体”都没有联系是在撒谎。她的证词让她避免了牢狱之灾，而那些比她诚实的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比如她的搭档达希尔·哈密特。这整件事使赫尔曼在像麦卡锡和她的朋友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中间非常不受欢迎。

说到个人敌意的话，麦卡锡其实只见过赫尔曼两次。第一次是1948年麦卡锡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的那段时间，她在吃午饭时无意中听到赫尔曼在一群学生面前抨击约翰·多斯帕索斯，说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放弃了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就因为他讨厌西班牙的食物。麦卡锡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纠正别人的机会，于是她指出实际上多斯帕索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过，他不再抱有幻想的原因是一位朋友遭到了谋杀。麦卡锡在1980年给一位朋友写信时说她当时看到了赫尔曼的愤怒：

我记得她裸露在外的干瘪的手臂上戴着很多手镯，有金的也有银的，她的手臂开始颤抖——因为愤怒和惊讶，我猜这是因为她在给别人洗脑时被抓了个正着。[\[5\]](#)

赫尔曼和麦卡锡似乎都没有忘记过这个插曲。当麦卡锡为《食人族和传教士》作宣传时，她突然决定旧事重提。首先，她向法国采访

者讲了这件事。然后，在受邀参加《迪克·卡韦特秀》（*The Dick Cavett Show*）时，她又命中注定般被问到她认为哪些作家“名不副实”：

麦卡锡：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人就是莉莲·赫尔曼这个属于旧时代的人，我认为她被严重高估了，她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一个不诚实的作家，她真的属于过去，属于斯坦贝克那么遥远的过去，但不是说她是斯坦贝克那样的作家。

卡韦特：她有什么不诚实的地方？

麦卡锡：一切。但我曾在一些采访中说过，她写的每个字都是谎言，包括连词和冠词都不可信。^[6]

后来，许多人告诉麦卡锡的传记作家说他们认为她在那里“带着她特有的微笑”^[7]说出这么尖锐的侮辱是“鲁莽的”^[8]。赫尔曼显然也看了这个节目。卡韦特后来讲了赫尔曼无比愤怒地给他打电话的事：

“我想我从不认为你是没有抵抗能力的人，莉莲，”我勉强回答道。

“那是胡说。我要起诉你们所有人。”至少在这一点上，她证明了她是一个说到做到的女人。^[9]

麦卡锡认为她只是在说一件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结果却发现她将面临一场自己无法承受的诉讼。该诉讼声称，麦卡锡明知自己的陈述是虚假的，而且她是带着恶意指责赫尔曼是一个骗子的。赫尔曼将麦卡锡、《迪克·卡韦特秀》和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全部列为被告，并要求他们赔偿自己225万美元的损失。《纽约时报》给赫尔曼打电话，请她对此次诉讼作出评价时，她这样推测麦卡锡的理由：

我十年没有见过她了，我从未写过关于她的任何文章。我们有几个共同的朋友，但这不会成为她发表这些言论的原因。我想她一直不喜欢我。

这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内战时期，就是1937年11月或12月，我从西班牙回来之后。^[10]

麦卡锡一方则对《纽约时报》说：

我几乎不认识她……我的观点都是基于她的著作，特别是《邪恶时代》（*Scoundrel Time*），我拒绝购买这本书，而是借了一本来看看。我不喜欢她在那本书中给自己安排的角色。

从来不会错失宣传自己的机会的诺曼·梅勒自作主张地充当起了争议裁判员的角色。他表示：“她们都是出色的作家，但是她们的天赋如此不同，她们会厌恶对方是很自然的事。作家们在这一点上与动物很相似。”^[11]他还说麦卡锡的评论是“愚蠢的”和“不该说的”。就一个把诉诸武力视为基本美德的人来说，作出这样的表态真是不寻常。不过根本没有人听他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前妻、先锋女记者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也从退休状态中站出来，在《巴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十六页的文章抨击莉莲·赫尔曼，并指出后者创作的《没有完结的女人》（*An Unfinished Woman*）中几乎每一个日期都是错的。盖尔霍恩特别了解海明威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活动，她基本上摧毁了赫尔曼的说法。盖尔霍恩的结论是：“在我对虚伪的非专业研究中，赫尔曼女士是其中一个登峰造极的人物。”^[12]

私下里，麦卡锡很担忧。但她担心的不是自己最终能否胜诉，因为她正在悄悄收集能证明赫尔曼谎言的材料。她也确实找到了一个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的确凿的例子。赫尔曼的回忆录《旧时痕迹》（*Pentimento*）中的一部分内容被改编成了由简·方达（Jane Fonda）主演的好莱坞电影《朱莉娅》（*Julia*）。根据赫尔曼的说法，这个“朱莉娅”是她童年时代的朋友，她像是某种生活在二十世

纪初，接受过弗洛伊德的分析的西力（Zelig）般的人物，在西班牙内战的前线表现英勇，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世。

事实证明，朱莉娅是一个编造的人物，部分经历参考了一个名叫缪丽尔·加德纳（Muriel Gardiner）的女人的生活，这个人曾就自己和朱莉娅的生活之间的相似之处给赫尔曼写信，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是在麦卡锡参加卡韦特的电视节目时，公众还不了解这些情况。每个人都抱有怀疑，特别是玛莎·盖尔霍恩，她认为赫尔曼的说法大部分都是谎言。

无论有没有证据，诉讼的开销都足以令麦卡锡担忧。自1963年的《她们》之后，麦卡锡再也没有出版过畅销书，而赫尔曼则拥有她不配拥有的财富，更不用说比谁都坚定的要确保取得她满意的诉讼结果的决心。在起初的几次小交锋中她都取得了胜利，一名法官驳回了麦卡锡最初的驳回起诉的请求。

1984年6月下旬，赫尔曼在实现自己的复仇之前就去世了，这对于被告一方来说真是太幸运了。因为去世之人在法律上不构成遭受侮辱、诽谤等侵害的对象，所以谈论损害赔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实际意义。到了8月，这场诉讼就彻底结束了。不过这件事已经成为传奇；在今天，这往往是人们唯一记得的关于玛丽·麦卡锡的事情。在自己的人生晚期，仍然痴迷于这个主题的诺拉·埃夫龙还写了一部关于仇恨的戏剧，并取名为《想象出来的朋友》（*Imaginary Friends*）。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和赫尔曼做过朋友，而且她觉得自己可以遵循自己一贯的冷酷的公正来提供一些对这场争议的想法：

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开始怀疑，她给她的朋友们讲的那些精彩绝伦的——姑且礼貌地称之为“故事”的东西真的都是编出来的。几年后，当她起诉麦卡锡时，我并不感到惊讶。那时她已经生病，几乎失明。愤怒成了她最喜欢的配饰，而她的愤怒让那些曾经忠于她的人也感到越来越厌倦。

[\[13\]](#)

埃夫龙的这部戏剧于2002年在百老汇上演，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只上演了七十六场。但对于埃夫龙来说，这是一个让她充满激情的项目，一种解脱，一种重回顶峰。在经历了几部电影的连续失败之后，当时的埃夫龙称自己生活在一个电影监狱中。“自从我担任杂志记者以来，我终于可以写一篇关于我感兴趣的题材的文章了：女人以及她们对彼此做的那些事。”可惜她并没有成功地将自己的热情传达出去；到2012年她去世时，这部戏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

[1] 1970年11月1~2日，汉娜·阿伦特发给玛丽·麦卡锡的电报，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2] 1970年11月22日，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3] 指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 1844年10月23日~1923年3月26日），法国舞台剧和电影女演员。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演员”，以及圣女贞德之后最有名的法国女人。

[4] “Saying Good-by to Hanna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22, 1976.

[5] 1980年2月26日，玛丽·麦卡锡写给Ben O’ Sullivan的书信，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6] The Dick Cavett Show, October 17, 1979,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673.

[7] Jane Kramer,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674.

[8] Irving Howe,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674.

[9] Dick Cavett, “Lillian, Mary and Me,” *New Yorker*, December 16, 2002.

[10] “Miss Hellman Suing a Critic For \$2.25 Million, ”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1980.

[11] Norman Mailer, “An Appeal to Lillian Hellman and Mary McCarthy, ” *New York Times*, May 11, 1980.

[12] Martha Gellhorn, “Guerre de Plume, ” *Paris Review*, Spring 1981.

[13] Nora Ephron, 《想象出来的朋友》前言, (Vintage, 2009) 。

第十三章 阿德勒

谁也没想到，1980年是如此硝烟弥漫的一年，因为已经四十多岁的雷娜塔·阿德勒看到了向一个比她年长的人发动攻击的机会。宝琳·凯尔刚刚从好莱坞重返《纽约客》工作，她在那里待的时间很短，甚至不满一年。她是去和沃伦·贝蒂（Warren Beatty）一起担任制片人的，结果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利。她去洛杉矶就是为了参与詹姆斯·托贝克（James Toback）的《爱与金钱》（*Love and Money*）这部电影的制作，但几乎从她抵达洛杉矶的那一刻起，她的工作职位就不复存在了。当这件事没能成功之后，她决定留在电影公司担任执行制片。

可以说凯尔并不适合这个工作。后来她提到那些好莱坞的高管们都认为她是来做间谍的。当她打算回《纽约客》工作时，威廉·肖恩是好不容易才被说服重新接纳她的。如另一位编辑告诉《名利场》的那样：“肖恩先生认为宝琳已经玷污了自己的名声。”^[1]不过最终他还是同意让凯尔回来工作了。

当年夏天，凯尔出版了一本新的电影批评文集。《当灯光调暗后》（*When the Lights Go Down*）获得的绝大部分评价都是热烈的赞美。关于《公民凯恩》的争论已经过去十年了。因此，尽管遭遇了好莱坞的失败经历，但凯尔仍然被认为是她所处行业内的顶级人物。她还拥有很多崇拜者。

雷娜塔·阿德勒却是持反对意见的人之一。她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评论极为严苛，她用即便是在著名批评家之中也非常罕见的凶狠力度向这本书发起了攻击：

现在，《当灯光调暗后》已经面世，这本书里收录了过去五年来她写的那些评论；我很惊讶，我不是像凯尔或约翰·西蒙（John Simon）那样在夸大其词，而是这本书真的让人不快，其中每一篇、每一行的内容都毫无例外地没有任何价值。[\[2\]](#)

这段评价出现在整篇评论的中间部分。阿德勒先是用大量笔墨谈论了自己喜欢的那些凯尔写的评论。阿德勒没有将凯尔风格的退步归因于凯尔个人的缺点——事实上，这篇文章几乎没怎么谈论凯尔本人，而是主要谈论了作为固定员工的批评家的文章内容重复的问题。他们需要写那么多影评，看那么多电影，所以他们写文章时自然会陷入无话可说或重复已经说过的内容的窘境。但是，无论阿德勒先给出了多少合理的解释，仅这一段毫不留情的评价就足以被看作向凯尔宣战的清楚证明。而且她的攻击完全有理有据。

阿德勒的如外科手术般精准的论述主要针对凯尔的散文风格，而不是她的批评的敏锐性。凯尔的作品给阿德勒带来困扰的原因在于这些文章的写作方式，她认为其中的内容几乎全是空洞的夸夸其谈，实际上没有提出任何想法：

她有大约九类最常用的基本字词，在这本近六百页的书中，这些词出现过几百次，往往一页上就能出现好几次：一是“妓女”（及由其衍生的“像妓女的”“妓女一样的”“妓女身份”），它们可能被用在各种语境中，但几乎没有一次是指实际的卖淫人员；二是“神话”、“象征”（以及形容词性的“神话般的”“象征性的”），它们在被使用时带有明显的思想目的，但没有可确定的含义；三是“流行”、“连环漫画”、“垃圾”（“垃圾一样的”）、“八卦”（“八卦的”），这些词都被用来进行评价（通常是表达认可的态度），但在发挥其他作用时似乎可与“神话般的”互换；四是“城市诗意”，它的含义比“八卦的”暴力一些；五是

“软”（贬义）；六是“紧张”，这显然被用来指所有理想状态；七是“节奏”，它经常被用作动词，但意思是和谐或不拖沓；八是“出于本能”；九是“水平”。

阿德勒在她的职业生涯中会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这种技巧，即计算某些字词的使用次数，然后利用它们来攻击某个主题，好让这些词语看起来很蠢。就凯尔来说，她有太多的作品可供阿德勒分析，所有这些作品都是依电影评论的结构创作的，所以得出的结果对她极具毁灭性。实际上，因为这种毁灭性太强了，以至于许多人都觉得有必要为凯尔挺身而出。《纽约书评》的版面上全是为凯尔鸣不平的内容，一位年仅十三岁的马修·怀尔德（Matthew Wilder）在为凯尔辩护时称阿德勒的文章是一篇“令人抑郁，充满仇恨，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3]《纽约时报》的约翰·伦纳德也斥责阿德勒说：“可以肯定的是，我认识的作为固定员工的批评家对待他们自己作品的态度和阿德勒女士对待凯尔女士的一样严苛。他们会精心挑选自己使用的形容词。他们是在用‘八百字的文章谈论思想’。”^[4]包括詹姆斯·沃尔科特在内，凯尔的其他朋友也都纷纷发表文章支持她。但阿德勒的文章已经给凯尔造成了损害。当凯尔于2001年去世时，阿德勒对她的评价会被每一篇讣告引用。

换作年轻一些的凯尔，比如那个写《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的时候的凯尔可能会写一篇同样锐利严苛的文章作回应。但此时的凯尔没有写任何东西，也没有就这一事件接受任何采访。她只对一位记者说道：“很遗憾阿德勒女士不喜欢我写的东西。我还能说什么？”^[5]还有报纸联系了威廉·肖恩，后者只是简单地说阿德勒一直这么写文章。这一点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到此时为止，阿德勒已经断断续续地为《纽约客》撰稿十七年了。这些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这样批评别人。阿德勒是一位不留情面的分析作家，当她发现逻辑谬误时，她可能会有点像叼着骨头不松嘴的狗一样绝不放过批评的对象。

任何了解她之前的职业生涯的人都知道两件事：一是她比她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聪明；二是她喜欢通过发表文章来炫耀这一点。

*

作为一个在论述问题时秉持着非黑即白的原则的人来说，阿德勒的传记中充满了奇怪的矛盾。被发表在《纽约》杂志上的一篇阿德勒的传略称她“像伍迪·艾伦一样自信和公开地‘隐秘’（assertively and publicly ‘private’）”。^[6]这样的比较在如今看起来很是奇怪，因为我们对伍迪·艾伦的了解明明很多。但阿德勒过的确是一种既在所有人目光之中，又在所有人视线之外的生活。我们对她的童年知之甚少，只能确定她是德国难民的女儿，1937年出生于米兰，以及她的父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某个时候带着她来到康涅狄格州的。

根据《纽约》杂志上的那篇传略的说法，从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开始，焦虑情绪就主宰着阿德勒的生活。她告诉一位杂志采访者说，起初她在学习英语方面遇到了困难。当她的父母试图通过让她进入寄宿学校来帮助她时，阿德勒反而更加紧张了。她的焦虑症跟随她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这是一家女子学院，阿德勒在那里成了那种会举报自己做出的破坏荣誉守则的吸烟行为的人。她声称后来情况甚至糟糕到她必须去看精神病医生，并让她的兄弟替她写论文的地步。她本来打算毕业后考取法学院，但最终她去哈佛大学读了研究生。像在她之前的桑塔格一样，阿德勒学的是哲学，而且也没能获得学位，尽管在此期间她还获得过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的资助，到巴黎跟随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学习了一年。

阿德勒不想搞学术研究，尽管她声称自己几乎是因为意外才脱离学术研究的既定路线的。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她遇到了如今已经被遗

忘的《纽约客》作家S. N. 贝尔曼（S. N. Behrman）并翻译了他的一部戏剧。贝尔曼正是建议她去《纽约客》面试的人，而阿德勒能够获得录用几乎确实是个意外。写作对于阿德勒来说仍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后来她会说她最初的那些作品主要都是为了给她的未婚夫鲁埃尔·威尔逊留下好印象而写的。鲁埃尔就是此时已经成年的，埃德蒙·威尔逊和玛丽·麦卡锡的儿子。

某一年夏天，当麦卡锡在意大利遇到阿德勒时，她把她形容得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鲁埃尔的“纤瘦，看起来像圣经中人物一样的犹太裔女朋友……在有些人眼中平凡无奇，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大美女，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品味”。^[7]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她们之间存在敌意，或像麦卡锡和桑塔格之间那种强大知识分子的竞争的记录留下来。阿德勒后来说她在见到麦卡锡之前没有读过她的作品：“那时的我很害羞，她对我非常友善。后来，当我从她的作品中感受到她的那种令人畏惧的批判智慧时，我觉得很惊讶。”^[8]这种脱节后来会成为定义阿德勒的东西。很少有见过阿德勒本人的人能够把这个有些焦虑、说话细声细气的人与她在版面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凶猛联系起来。

然而，她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能够无比确信地提出观点的天赋。阿德勒以自己的名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对《纽约客》作家、记者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著作的书评（在此之前她曾经用笔名写了一篇文章，结果被一位编辑批评得一无是处）：赫西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研究报道《广岛》（*Hiroshima*）。这一次他把自己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收录在一起，出版了一本文集，并取了一个有些自大的题目《坚持：对人类韧性的研究》（*Here to Stay: Studies in Human Tenacity*）。可以确定的是，阿德勒不喜欢赫西的作品：

他在这本书开篇的地方提出了一个论断：“爱与死是伟大的主题；活下去的意愿则是这二者的结合，这本书就是关于这个内容的”——这句话完美地说明了整本书的特征，即一种平凡的、无意义的辞藻堆砌。^[9]

此时的阿德勒还是《纽约客》的一名全职员工。她的主要职责仅限于撰写不署名的“城中大事（Talk of the Towns）”版面。但即便是在这个版面中，她的主要话题也是关于书籍和出版行业的，而且她觉得这些主题蠢得让人无法形容。在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中，她把畅销书名单当成了抨击对象，因为她注意到最近的上榜作品：

包括一本成人填色书，一本孩子写的日记，一本收录了带有幽默插图说明的报纸照片的小册子，一位棒球队经理的自传，一位在一场耸人听闻的好莱坞审判中为被告辩护的律师的回忆录，一本讨论节食的书和一本研究未婚女性性生活的书。[\[10\]](#)

阿德勒继续说道，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依赖这个榜单。因为它只是“对焦虑的、文化水平有限的人士才有帮助的指南”。她还建议《纽约时报》干脆不要再发布这个榜单了。最终，这些关于文学现象的评论为阿德勒赢得了在《纽约客》上发表一些真正的关于书籍的专栏文章的机会。1964年，27岁的阿德勒谈论了书评的衰弱这个一再出现的顽疾。像她的女前辈们一样，阿德勒无法忍受当代书评人们糟糕的论证能力。但她也不怎么喜欢那些似乎要取代他们的“新评论（New Reviewing）”，她认为这种文学派别过分执着于辩论了：

在文学批评中，辩论是最短命的形式，没有什么文章比持批判态度的辩论文章更容易被人遗忘。如果受到攻击的作品是有价值的，那么它不会因为一些反对的评论而受影响。如果它没有价值，那么它会和攻击自己的辩论文章一起消亡。[\[11\]](#)

这是阿德勒写的第一篇反对辩论文章的辩论文章，这将成为她写作的主题之一。尽管她本人实际上经常被指责为风格太夸张，以及辩论过于严苛，但阿德勒恰恰一直在批评其他人采取这种做法。（她对凯尔职业生涯后期评论不满的原因之一也是认为它们过于好争辩。）阿德勒也没有太多地受限于传统评论的条条框框。在这篇文章中，阿

德勒理论上是在评论欧文·豪和诺曼·波德霍雷茨的书籍，但逐渐地，她对他们的批评就扩大到涵盖了大多数突然开始活跃在《党派评论》上的年轻知识分子们。阿德勒认为，文学杂志的整个运动此时正在经历发展过程中的艰难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过去的问题开始变得不明朗，老派的门徒发展得很好，对复杂的事务容忍度低的说明文作家则陷入了困惑。”^[12]此时已经没有欧文·豪的一席之地了，因为他是属于过去时代的遗迹。即便是对待汉娜·阿伦特的宿敌，略微年轻一些的诺曼·波德霍雷茨，阿德勒也已经没有什么耐心。

阿伦特将成为阿德勒的导师。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面世并引发了评论界的喧嚣时，阿德勒甚至尝试说服威廉·肖恩刊登一份回应文章。自从阅读了拉埃尔·瓦恩哈根的传记之后，阿德勒就成了阿伦特的追随者。起初，肖恩不想让阿德勒写任何东西，因为通常情况下，《纽约客》对于可能被与自己的文章联系到一起的争议会选择视而不见。但阿德勒坚持要写，直到《纽约时报》刊登了迈克尔·马斯曼诺写的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相当不利的评论之后，肖恩妥协了。他们原本希望《纽约时报》会在读者来信版面上刊登阿德勒的回应，但这篇文章被对方拒绝了。于是《纽约客》自行发表了这篇口气强硬，目空一切的文章：

针对阿伦特女士低调、道德、理性的作品，[马斯曼诺]却用像“希姆莱（Himmler）！”、“希特勒！”这样的夸张的惊叹来提出反对，仿佛这样的呼喊是历史哲学中什么有启发性的陈述似的……拒绝倾听和令人恐惧的沟通失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已经在生活和头条新闻中逐渐习惯了这些。但文学的本质就是沟通，在一份主要报纸的文学版面中发现这种失败是非常令人失望的。^[13]

看到这篇文章后，阿伦特邀请阿德勒去喝茶。阿德勒后来带着深情写道：“用莉莲·罗斯（Lillian Ross）的话说，如果有人充满仰

慕之情地坐在她的脚边，那个人就是我。”^[14]阿德勒也很喜欢海因里希·布吕歇尔。这对夫妇和她说德语；他们把她当成了某种需要关怀提携的对象，而阿德勒则称阿伦特为“严格的家长”；^[15]也许是因为体会过布吕歇尔在没有学位的情况下教书养活自己多么困难，所以他们总是鼓励她重返学校，取得博士学位。

换句话说，阿德勒得到了这个苏珊·桑塔格似乎很渴望的位置。阿德勒坚持说阿伦特“不怎么关心桑塔格女士”。^[16]有一次被问及为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汉娜·阿伦特并不是讨厌桑塔格。她只是对桑塔格的作品不怎么感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看法。”^[17]这确实是，不过阿德勒和桑塔格可能也陷入了不自觉的竞争之中。阿德勒也获得了桑塔格获得过的《年轻女士》授予的优秀奖，只不过比她这位年轻的同行晚了三年。因为拥有在《纽约客》的职位，所以阿德勒在财务状况上比桑塔格更稳定。但她不是媒体上的明星，不是一个“拥有一切的女孩儿”，至少不像桑塔格那样能够引发大量关注。

因此，当阿德勒在1964年开始对波德霍雷茨发动攻击时，她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认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的人。当她把波德霍雷茨的作品撕成片，切成丁，打击得体无完肤时，她的口气中有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阿德勒的攻击方式是精准无情的。波德霍雷茨常常会重复某些短语，而且他选择的那些短语都像是滑稽演员的口头禅。阿德勒此时使用的技巧与后来她针对凯尔时使用的完全相同，这种技巧让她能够实现毁灭性的连续攻击，从而揭露作品中的怪异和伪善。就波德霍雷茨写的批评《纽约书评》的文章——《书评和我认识的所有人》（*Book Reviewing and Everyone I Know*）而言，阿德勒用一个观察就击破了波德霍雷茨的观点：

首先，“我认识的所有人”出现了十四次（不算在标题中出现的那次），“我认识的某个人”、“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

某个人”和“他们认识的所有人”各出现了一次。虽然我们 must 承认，重复可以是一种修辞手段，且波德霍雷茨先生在任何情况下一直过分喜欢这种手段（在另一篇文章中，“三十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反复出现过九次；“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极权主义本质的内容”也曾连续出现过好几次），所以似乎可以肯定地说，《书评和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充满了同志之情和团结友爱；波德霍雷茨先生显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孤立的演讲者。[\[18\]](#)

阿德勒可以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指责波德霍雷茨不恰当的词语重复。阿德勒还提出，这种浮夸做法的结果是，新评论家们只是组成了一个俱乐部，里面的人互相交谈，互相恭维，互相侮辱，而付出代价的却是普遍的理智主义。这些人是在把自己变成名人，而不在乎他们评论的书籍本身。当然，这让阿德勒自己也暴露在被指责她做的是同样的事情的危险中——就像凯尔在写《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时被指责为追求名利一样。曾支持过社会主义的保守派作家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在转投共和主义之前曾在《新领袖》上发表文章称：

虽然我之前可能已经读过阿德勒女士的文章，但我对它们没有什么印象。直到读了她遵循波德霍雷茨的指令认真撰写的这篇评论，我才真正开始将她视为一位“文学界的名人”。[\[19\]](#)

克里斯托尔说得没错，这篇散文就是最先清楚地展示了人们将会看到的雷娜塔·阿德勒在出版物上的风格的文章。这篇文章具有阿德勒风格的几个标志，其实这些标志在她职业生涯的初期就已经被完全呈现出来了。阿德勒在文章中从来不会逢迎讨好，不喜欢开玩笑，或表露出其他的个性。她的文章就是纯粹的分析，纯粹的推理，公事公办。她经常使用第一人称“我”，但这个“我”从来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像桑塔格的“我”一样更具分析性。阿德勒的文字就像一道激光束，比起用美丽让读者眼花缭乱，她更喜欢用一个观点来穿透他们的思想。她很少讲述任何类型的故事，但她会收集大量的证据，并以牛头獬豸一样的坚决攻克自己分析的对象。阿德勒经常让人感觉她更像是一位检察官，而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包括批判波德霍雷茨的文章在内的一些作品让威廉·肖恩认定阿德勒可以作更多尝试。她本人也想写一些被肖恩称为纪实报道的题材，即那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纽约客》惯用招牌的雄心勃勃的长篇文章。阿德勒接受的第一个此类任务是被派去观察1965年发生在亚拉巴马州的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游行（Selma-to-Montgomery marches）。也许是因为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外出采访的紧张感，阿德勒在这篇文章里表达了比以往多得多的赞赏语气，她写了很多她观察到的景象，只作了很少的分析。文章中的句子也比较短，有些甚至可以算得上精简。她并不是容易为游行中的慷慨激昂的言论所影响的人。除了提到对游行参与者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一点的疑虑之外，她的文章仅限于报道她看到的情况：

薇奥拉·刘易佐夫人（Mrs. Viola Liuzzo）被枪杀的消息传来。一些游行参与者立刻返回了塞尔玛。其他人也登上飞机回家了。蒙哥马利机场的出口处有一块固定的标志牌，上面写着：“很高兴你能来。愿你尽早返回。” [\[20\]](#)

整篇文章给人一种奇特的置身事外、冷漠疏离的印象。

在写关于世代差异的问题时，她明显更有信心，也更具批判性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阿德勒是一个充满激情、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但她对周围人的疏离感使她对他们产生了怀疑，她怀疑他们的政治运动，也怀疑他们对恋爱自由的信念，还怀疑他们对生活中的艰辛抱有的厌恶。有些人称她为“东海岸的琼·迪迪翁”，[\[21\]](#)但她的风格更直接，更强悍。迪迪翁倾向于在设置好的对话和场景中暴露嬉皮士和漂泊者的弱点，而且她的报道会涉及很多有关她本人或她的情绪的内容。而阿德勒的做法则一直是提出一个论点，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她通常会将内在的自我隐藏在他人的直接视线之外：

然而目前，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激进的流浪者，他们模糊地信奉从赌城大道的对抗和事件的整体风气中得出来的基本道德倾向。而这个倾向就是爱；加州的青少年们如今都在使用（还会出现在他们的歌词中）的这个词包含了性解放、甜蜜美好、世界和平、平等的梦想，奇怪的是，这个梦想里也包括毒品。[\[22\]](#)

最后一点关于毒品的说法能够揭示比阿德勒打算揭示的更多的东西，因为在1967年，毒品对于她这个年龄的人来说绝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她当时刚满三十岁。）作为一个难民的孩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阿德勒脑海中没有和别人一样的代表美国理想的形象可供她作为反抗的对象。即便如此，阿德勒也总是会脱离到事物之外，而不是亲身感觉它们。这恰恰让她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观察者。阿德勒写的关于1967年爱之夏嬉皮士运动时期的作品中出现的细节描写往往令人惊叹，就像她能够客观地描述哪怕是最怪异的行为的能力一样非比寻常。“他开始唱起了约德尔调（yodel）”，[\[23\]](#)阿德勒这样写自己在日落大道延长线（Sunset Strip）上遇到的一个年轻人，好像这么做很寻常似的。不过阿德勒在想要更宏观地理解发生在她身边的事情时总是遇到困难。她做的几乎所有报道最终都会有一个充满矛盾的结尾。就这篇关于日落大道延长线的文章而言，结尾就是她对一个被称

为“人类大聚会（Human Be-In）”的活动的评论：“周围根本没有警察。”

阿德勒会返回密西西比州，目睹更多民权示威活动；她会前往以色列报道第三次中东战争（Six-Day War，以色列方面称“六日战争”）；她还会前往比夫拉（Biafra）[\[24\]](#)。但是无论她报道什么内容，她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就是她的矛盾。后来，当她将这些文章收录到书中时，她会将矛盾视为她所描写的那个年代的一个可识别的现象。但即便是在阐述这个观察结果时，她也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圈子里。她写道：

我想和我同龄的这一代人是被跳过的一代，是从未拥有属于代表我们的声音的一代人，我们被迫进入了最广泛的美国人的范围。即使是现在（我们都是三十多岁的时候），我们没有出版我们的刊物，没有共同经历放逐，没有斗殴，没有轶事，没有战争，没有团结，没有标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正是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我们没有什么为人熟知的特征，如果有，那就是我们的无动于衷。我们心中的行动中枢似乎是崩溃的。[\[25\]](#)

需要再强调一次的是，写出这篇分析文章的女性才刚刚三十岁，而她已经脱离了这个国家中大部分的政治和社会潮流。她对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混乱局面的某些评价听起来几乎像是一个保守派作出的。

“我们的价值观是陈腐的价值观，比如理性、正派、繁荣、人类尊严、接触，以及有可能实现的最优秀、最广泛的美国。”阿德勒这样写道，但她没有明确界定“我们”这个集体代名词中都包含了哪些人。即便如此，关于这种分析的最奇怪的一点还要数阿德勒把自己与她所使用的“我们”完全脱离开来这件事。她在美国的人生轨迹并不典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只有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上过大学；他们当然也没有从二十二岁开始就为全国发行的主要出版物写文章。阿德勒是多萝西·帕克级别的神童，从最开始就达到了如后来一样的水平，从最初那些“城中大事”版面的文章到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

表的最后一些文章中，阿德勒的声音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可辨识度。但她与人群的疏离意味着她无法伸出手去触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人广泛感受到的情绪。她只能从旁观看。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968年，阿德勒突然离开了《纽约客》。《纽约时报》找到她，想请她做电影批评家。他们已经厌倦了守旧的博斯利·克劳瑟，也就是宝琳·凯尔的宿敌。很难说《纽约时报》是否想过把凯尔本人从《纽约客》挖过来。但是当凯尔和与她交替的另一位批评家佩内洛普·吉列特（Penelope Gilliatt）都没空的时候，阿德勒偶尔也为《纽约客》写过一些影评。再加上她很年轻，她在批评界已经有了一些作为，她正在写那种时髦的旁观者角度的关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章。所以阿德勒看起来一定是这个职位的完美人选。

如果《纽约时报》期待的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那他们就找错人了。阿德勒带着一种明确的使命感接受了这份工作。她不会给任何人放水。她写的第一篇影评是关于一部如今已经被完全遗忘的德国电影的，自文章一开头，阿德勒就像在她过去的书评文章中一样严厉地批判了被评论的对象，这种方式与她曾经批判约翰·赫西时的如出一辙：

即使观看一群中年德国人——他们其中有一些非常胖，所有人都面红耳赤，表情狰狞，不停出汗，还全都会为埃尔克·佐默（Elke Sommer）而神魂颠倒——就是你对美好时光的设想，我也不会推荐你去观看《极奔自由》（*The Wicked Dreams of Paula Schultz*），因为今年的这第一部电影会以各种无趣的方式让你觉得它糟糕透顶。[\[26\]](#)

因为这句评论太风趣了，它反而提升了人们对电影的期望。这篇文章标志着一位一针见血的年轻批评家的到来。阿德勒评论的下一部电影——诺曼·梅勒的《狂野90》（*Wild 90*）给了她一个更熟悉的主题。这一次，阿德勒又回到了对作家的人身攻击这个她感觉游刃有余

的领域中。那些喜欢梅勒的观众，“那些最宠爱他、最宽容他的人，也是我们的时代中最自以为是、最具毁灭性的人”，^[27]他们很可能会像满足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满足于这部电影。不过，这并不是一种恭维。阿德勒明确表示，她认为梅勒的拥护者群体并不是一个在智慧层面上让人印象深刻的群体。举例来说，她无法想象这个“纵容放任的群体，这个将梅勒视为经历彼得·潘式寻找自由和发现自我的不成熟挣扎的可爱主角的群体，能有接受一篇立场坚定、内容充实、不含歉意的作品的那天”。

如她后来在《宝琳的险境》（*The Perils of Pauline*）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一方面阿德勒似乎完全没有受到凯尔的影响——她最初的这些电影评论承袭了她在报道事实时的言简意赅的文风；而另一方面，阿德勒又似乎拥有与凯尔完全一致的好斗精神。在阿德勒的电影评论世界里充满了对自负和多愁善感的指责。“严肃的人”喜欢的电影，比如《毕业生》（*The Graduate*）、《冷血》（*In Cold Blood*）和《猜猜谁来吃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这些非常符合资产阶级观众口味的电影也都是阿德勒批判的对象。她的局外人身份在这里成了一种有利条件，让她体会不到追随大众口味的压力。甚至在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电影批评家都选边站队的情况下，阿德勒也没有就电影作者论和反电影作者论的战争确定一个立场。她只是单纯地表述自己的判断，将系统性的争论留给别人。

正如凯尔在《麦考尔》杂志的经历一样，阿德勒在《纽约时报》的十四个月里也一直受到电影工作室的挑战。其中最著名的是联美公司（United Artists）制作的一则广告，内容是指出既然阿德勒讨厌流行电影中的大部分，那么公众不应该听她的话：

《纽约时报》的雷娜塔·阿德勒不喜欢《冷血》。

她对《毕业生》、《猜猜谁来吃晚餐》和《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持保留态度。

我们不太确定她对《邦妮和克莱德》持什么态度。

其他大多数批评家都喜欢这些电影。

最重要的是，公众喜欢这些电影。

现在她也不喜欢《爱情游戏谁来玩》（*Here We Go Round the Mulberry Bush*）。

这说明它值得推荐！[\[28\]](#)

尽管人们总是说她从一开始就是让好莱坞制片人头疼的人，但实际上该行业对她的看法在最初的时候是中立的，起码在她开始这份工作两周之后，1月的那期《剧艺报》就是这样报道的。但是到1968年3月，该报刊登了一篇长文，称各方对她的态度出现了分歧：

她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一致同意的一点是：她的批评立场更偏向文学性而非电影性。[\[29\]](#)

接受《剧艺报》采访的人们还说，比起做评论家，他们认为她更算是一个出色的散文家，他们甚至常常很喜欢她为阐明电影的“死亡崇拜”或暴力的适当性所作的最大努力。然而，这些努力往往会从电影本身转向阿德勒关注的问题：

民主体系最不具备应对能力的对象之一就是作为一种审美行为的革命。任何历史哲学都没能真的预见到：一群属于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受到这个体系的任何错待，甚至应该说，他们将被这个体系培养成掌握权力的人；然而，就是这些人，竟然想要为了好玩而推翻这个体系。[\[30\]](#)

阿德勒的评论是严肃冷酷的，总体来说不会涉及垃圾电影。她想要贬低谁的时候就可以造成毁灭性的杀伤，但她还是试图在哪怕是一

部糟糕的电影中找到值得赞美的精彩元素。她认为芭芭拉·史翠珊让《妙女郎》（*Funny Girl*）得到了升华；她喜欢佛朗哥·泽菲雷利（Franco Zeffirelli）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优雅的舞会场景，尽管她认为电影整体的传达方式有点太像《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了。当《芭芭丽娜》（*Barbarella*）上映时，阿德勒忍不住痛斥最近的电影是如何刻画女性的：“也许这是厌母情结作祟，大屏幕上没有一个杰出的、体面的女性角色。”^[31]即便如此，她还是赞美了简·方达，因为她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

电影行业应对这些评论带来的刺痛的方式是向他们自己的行业媒体抱怨阿德勒的评论中存在很多事实错误。《剧艺报》报道说，福克斯电影公司的负责人达里尔·F. 扎纳克（Darryl F. Zanuck）曾被一位高管告知，阿德勒只看了一半的《星星星》（*Star!*）就去评价这部由朱莉·安德鲁斯出演的甜如蜜糖的电影。于是扎纳克向报社编辑提出了投诉。还有报道称《时尚先生》准备刊登一篇揭露阿德勒其人的文章——不过这个计划最终没有被付诸实践。总之，这些说法最多就是一些酸葡萄心理的表现，到1972年2月底，阿德勒干脆辞去了这份工作。她还写了几篇评论关于革命后的古巴的电影的文章，但之后她就重返《纽约客》工作了。在后来的采访中，她坚称自己没有解雇，还有她后来指控宝琳·凯尔的那些罪责也暗示阿德勒只是厌倦了这种折磨。她说，学会赶在截稿日期前写完文章很好。^[32]

阿德勒离开《纽约时报》之后也写了一些非虚构类作品。其中最好的一篇是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长篇文章，内容是批评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在针对尼克松的罪行进行弹劾调查时的糟糕表现。通过精心梳理委员会的记录，阿德勒发现了许多应当进一步调查的问题。她最终认定弹劾调查实际上成了掩盖尼克松罪行的工作的一部分。直到今天，网络上许多研究尼克松阴谋的理论家还在引用她这篇文章中的内容。

然而，撰写尼克松这样的题材的文章似乎也不再是她真正想做的事情了。雷娜塔·阿德勒决定，她真正想做的是写小说。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德勒抛弃了记者工作，专心创作她的两部小说《快艇》（*Speedboat*）和《漆黑》（*Pitch Dark*）。两部作品都采取了不连贯的、多讽刺警句的写作风格。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可以被看作阿德勒本人的替身。在这两者中，《漆黑》是偶尔发出社会批判声音的那一本。阿德勒在小说中的风格与玛丽·麦卡锡的完全不同，但她也具有和前者类似的无法将自己的生活与作品分割开来的问题。事实上，莉莲·赫尔曼也出现在了《漆黑》中，她被伪装成了一个名叫薇奥拉·蒂加登（Viola Teagarden）的角色。

这个人提到她所谓的“我的愤怒”时总是带着某种敬畏的口气，好像它是一种有生命的，珍贵的财产，比如一头可以用来当种牛的良好公牛；也有点像一个娶了一位美丽的，还比自己年轻和富有得多，但令人意外地难以相处的女人的男人提到“我的妻子”时的口气。[\[33\]](#)

这些书虽然都写得很精彩，但它们有时会显露出阿德勒写作时经历的巨大艰辛的痕迹。1975年，《快艇》首次以节选形式被刊登在《纽约客》上。1976年它正式出版后，所有人都对它赞不绝口；阿德勒还获得了国际笔会美国分会颁发的声望卓著的海明威奖（PEN/Hemingway Award）。接着阿德勒又花了七年时间来创作《漆黑》，不过在那之后，她似乎完全放弃了写小说。

作为一个好像永远无法找到足够让自己完全痴迷的唯一的主题的人，阿德勒后来去了耶鲁大学法学院，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阿德勒的头脑几乎完全适合像个律师一样思维。在谈论“新评论”的那篇文章中，她像检察官一样论述了自己的理由，剖析了波德霍雷茨的证词，用一个字词或短语定了他的罪。法律论证的有序性最终还影响了

《宝琳的险境》那篇文章，它读起来就好像一篇答辩摘要似的。也是从这时起，阿德勒的文字变得好斗，总是用尽全力要摧毁什么。

她的好斗也延伸到了法庭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名利场》的复兴本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项目，它最初的目的是要转型成为一份严肃的知识性出版物，要更接近于《党派评论》，而不是《人物》。主编理查德·洛克（Richard Locke）雇用雷娜塔·阿德勒负责这项工作。她保留了自己在《纽约客》的职位，但是只能被称为“顾问编辑”。

新版《名利场》领导层的工作并没有持续多久；理查德·洛克是在1983年4月被解雇的，随后阿德勒也很快离开了。但是，在一份名为《华盛顿新闻评论》（*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的没什么名气的行业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却称阿德勒是被解雇了。文章还说她用化名在《名利场》上发表了一段《漆黑》中的内容，但没有如实向杂志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她是因为能力不足而被解雇的。阿德勒决定起诉他们，最终她打赢了官司。

*

阿德勒职业生涯的法律阶段就此开始了，她写的关于法律的文章开始涉及法律中的真实事件。阿德勒开始着迷于两起针对媒体的法律案件。第一个是威斯特摩兰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案（*Westmoreland v. CBS*），引发争议的是一部关于越南战争的电视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基本上是在指责前陆军上将威廉·C. 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通过操纵情报使美国更深地陷入了这场战争。第二个是沙伦诉《时代》杂志案（*Sharon v. Time*），阿里尔·沙伦（Ariel Sharon）是一位以色列军人和政治家，他起诉《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暗示他应当为1982年9月发生在黎巴嫩的大屠杀负责的文章。

在这两个案件中，人们完全可以肯定是记者一方犯了错误。报道中的内容被证明与事实不符。但是这两个案子中争议的焦点都在于，记者是否是出于“实际恶意”而犯下错误的，根据美国法律，“实际恶意”是证明诽谤罪名成立的条件。要满足这个条件非常难。实际上，无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是《时代》杂志都被认定在公开内容时不具有“实际恶意”或“鲁莽漠视”。（威斯特摩兰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案的结果是双方在判决被作出前达成和解；沙伦诉《时代》杂志案的结果是原告败诉。）阿德勒认为这个定罪条件最终成了为媒体报道虚假新闻提供全面保护的保护伞。从这方面来说，她似乎总是同情原告的处境：

无论他们的其他动机是什么（骄傲、愤怒、荣誉或国内政治），原告显然是依据原则提起诉讼的，至少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思维中，这个原则就是真相：不是正义，而是朴素的、切实的真相……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美国的法院不是根据宪法从理论上被设计来解决这类问题的，它甚至不被允许解决这类问题，不能为历史断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34]

在对这个难题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阿德勒对这些涉案的记者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以至于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她最初于1986年夏天在《纽约客》上发表了自己对审判的看法。（在威廉·肖恩担任主编期间，作家们通常会被允许为某一篇文章花费多年的时间，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安排。）这些文章将被收录在一本名为《鲁莽漠视》（*Reckless Disregard*）的书中。然而，在预定于9月份的出版日期到来之前，《时代》杂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以诽谤为理由将《纽约客》和雷娜塔·阿德勒的出版商告上了法庭。这本书的发行也因此被推迟了几个月。

与此同时，对《鲁莽漠视》的恶评比比皆是。因为阿德勒提出了一些记者对待他们要报道的事实并不确定，或者至少是存在错误认识的可能，所以其他记者就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检查阿德勒是否

会犯错误上。据他们说，她也犯错了。就连对阿德勒有预先倾向性和同情心的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这样的批评家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时，也会在赞美阿德勒总体上的洞察力之后指出，

她也经常会向她严厉谴责的那些新闻恶习投降。《鲁莽漠视》这本书被片面的报道毁掉了，特别是对威斯特摩兰案的描述部分，以及结尾部分显示的在面对相反证据时同样的不妥协态度，我们正当地谴责的不正是机构报刊的这种做法吗。[\[35\]](#)

最终，阿德勒的声誉因为这件事受到了损伤。《纽约客》的事实核查员声称阿德勒用花言巧语把他们唬住了。[\[36\]](#)

然而，《鲁莽漠视》引发的愤怒并没能显著降低阿德勒对争论的胃口。不过对她来说，情况突然变得更加糟糕了，在她遇到的诸多争议中一直支持她，直到《鲁莽漠视》引发喧嚣时也与她同一战线的威廉·肖恩被解雇了。1985年，康泰纳仕（Condé Nast company）收购了《纽约客》，该公司的所有者S. I. 纽豪斯（S. I. Newhouse）决定是时候作出改变了。他认为只要更换了主编，《纽约客》上就不会再有那么多冗长而且可能毫无价值的文章了。

出乎纽豪斯预料的是，肖恩被解雇后爆发了员工抗议。纽豪斯没有遵守肖恩提出的由他自己选择继任者的条件，而是聘请了一位外人，长期担任艾尔弗雷德·A. 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总编的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负责领导杂志社的复兴大计。员工们提交了请愿书，召开了员工会议，有一段时间，《纽约客》看起来似乎会因为转型期间的压力而从内部崩溃。但最终，杂志社并没有失去多少作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其实也找不到其他肯发表他们作品的地方。

阿德勒对这次改组的态度极为负面。她为纽豪斯的傲慢而愤怒，更为肖恩遭到这种恶劣对待而难过。她也不认为戈特利布是一个足够好的接班人。她觉得他“对一切漠不关心”。^[37]他想改变艺术版面，于是他请来了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阿德勒无法忍受后者的“卑劣”性格：

我在与高普尼克先生的谈话过程中了解到他提的问题不是问题，甚至不是试探。它们的真正作用是设计你，好让你主动建议他做他无论如何也要做的事。

1999年，在所有这些事件已经过去十多年后，阿德勒写了一本关于这段内容的书，书名是《消失：〈纽约客〉的最后时光》（*Gone: The Last Days of the “New Yorker”*）。这本书可以算作一本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其中有对《纽约客》的某些员工的令人生厌的描绘，也有对其他一些人的明显过度的赞美。这本书的开头就是一篇长长的对另外两本关于《纽约客》的回忆录的批评。那两本书的作者分别是莉莲·罗斯和韦德·梅塔（Ved Mehta）。阿德勒读了这些回忆录后认为它们并不能充分地代表她感受到的那种由肖恩先生培养起来的严肃对待写作的氛围。

询问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纽约客》员工，他们一定会对这本书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异议。阿德勒再一次犯了些错误，主要是拼错别人名字之类的问题。一位编辑告诉我说，她觉得阿德勒在她所描述的那段时间内在办公室的时间不多，根本不足以了解《纽约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看待这本《消失：〈纽约客〉的最后时光》的最佳方式也许并不是将它严格当作威廉·肖恩的《纽约客》是如何解体的历史重现，而是应该将它当作一本知识分子的私人传记，它记录了一个假如为另一本杂志工作，就永远不会成为她成为的这种作家，也不可能成为她成为的这种力量的人的一段经历。《消失：〈纽约客〉的最后时光》是一部充满愤怒的作品，这种愤怒是因为感觉遭到背叛而

产生的。包括罗伯特·戈特利布本人在内的一些评论了这本书的批评家们有时似乎也不忍心完全无视阿德勒这种遭到背叛的感受：

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是一种痛苦和愤怒的爆发，就好像家里的女儿深深地眷恋着这个完全失调的大家庭——最让她受伤的莫过于发现家中再也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了。[\[38\]](#)

《消失：〈纽约客〉的最后时光》是阿德勒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她的整个写作生涯中，她一直是发起攻击的一方，而且她总是相当自信地认定即使她失败了，也能找到某种稳妥的解决方式。突然间，她攻击了美国最负盛名的杂志。即使那些仍然喜欢她的人也不认同她的观点。而那些显然是希望能够获得新《纽约客》编辑们青睐的人则决定，彻底地、真正地攻击阿德勒的时候到了。

如阿德勒后来指出的那样，仅在2000年1月这一个月的时间里，《纽约时报》就刊登了至少八篇各自独立的评论她这本书的文章。其中前四篇是关于《纽约客》的。后四篇则围绕着书中的一句关于约翰·西里卡法官（Judge John Sirica）的漫不经心的评价。西里卡是主持水门事件审判的法官。阿德勒写道：“与他作为英雄的名声相反，西里卡实际上是一个腐败、无能和 dishonest 的人，他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关系密切，还与有组织犯罪明显相关。”[\[39\]](#)

西里卡给阿德勒的出版商写信就此提出异议。他似乎还给记者打了电话，因为他们开始给阿德勒打电话。其中之一是当时《纽约时报》的媒体记者费莉西蒂·巴林杰（Felicity Barringer），她开始强烈要求阿德勒公布她对西里卡作出指控依据的消息来源。阿德勒拒绝了，但巴林杰依然紧追不舍。如阿德勒宣称的那样，巴林杰的行为促使她作出了自己标志性的讽刺回复：

巴林杰问我，如果我不想在采访中向她“透露”我的“消息来源”，“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发布在互联网上？”“你会在互联网上发布很多你的

文章吗，费莉西蒂？”[\[40\]](#)。

于是这位记者就发表了一篇指责阿德勒隐藏她的消息来源的文章。该报委托尼克松信赖的顾问之一，约翰·迪安（John Dean）[\[41\]](#)亲自撰写了一篇关于这句神秘评价的社论文章，并暗示阿德勒的消息来源是心怀怨恨的G. 戈登·利迪（G. Gordon Liddy）[\[42\]](#)。阿德勒觉得这很搞笑：

然而，值得注意的不是作品的内容，而是《纽约时报》对这篇文章作者的介绍文字。该段说明全文如下：

约翰·W. 迪安，投资银行家，曾任理查德·M. 尼克松总统的顾问，《盲目的野心》（*Blind Ambition*）一书的作者。

如果迪安仅以这些头衔被载入史册，那么《纽约时报》就这一特定事件发表的全部文章都有价值了。[\[43\]](#)

当阿德勒最终亲自写了关于“这一特定事件”的文章时，人们才知道，西里卡与麦卡锡关系的消息来源正是西里卡本人的自传。阿德勒揭露他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途径是找到了西里卡父亲的一位商业伙伴的儿子。当她于2000年8月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她的调查结果后，《纽约时报》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他们不愿意纠正它的原因是阿德勒在自己文章的结尾处已经无情地批判了他们的那些策略：

《纽约时报》在经济上也许是成功的，不过此时的它是一个强大的，但并不十分健康的机构。它的问题不在于一本书，或八篇评论文章。问题在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矿井状态，而矿井中的巨型感应器——这份在某些方面仍可以算作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的出版物——却在散发最具爆炸性的气体，还要切断空气的来源。[\[44\]](#)

这个事件几乎消耗掉了阿德勒的大部分职业地位。在《纽约客》，她已经不再是对编辑来说至关重要的撰稿人了。她就调查比尔·克林顿丑闻的《斯塔尔报告》（*Starr Report*）写了一篇评论，但

是当她打电话询问《纽约客》是否愿意发表时，当时的总编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说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关于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文章了。最终阿德勒设法在《名利场》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这是一篇精彩的评论，她着迷地细读了上千页的报告，像律师一样剖析这份文件自身的逻辑，自从她放弃创作小说后，这种能力成了她最强大的武器。

肯尼思·W. 斯塔尔（Kenneth W. Starr）向美国众议院提交的六卷本《斯塔尔报告》从很多方面来说，是一份完全荒谬可笑的文件。可以说这份文件就是由一卷的参考文献和五卷的附录及补充材料组成的。它不准确，很愚蠢，存在偏见，杂乱无章，不专业，而且不诚实。从文本上来说，这是一部精神错乱、连篇累牍的色情作品，其中有许多迷人的角色和几条大部分被隐藏起来的故事线。从政治角度来看，通过对性相关材料的无限关注，这份报告试图抛弃，甚至抹杀相对枯燥的对真实证据和宪法程序的要求。^[45]

这篇文章获得了杂志社颁发的评论奖。但同年早些时候，《纽约客》断绝了与阿德勒的长期合同关系，也不再为她支付健康保险。之后她又写了两篇文章，一是在9·11事件之前不久，她为《新共和》写了一篇批评最高法院的文章；二是就《纽约时报》犯的另一个错误进行的争论。但她总是感到自己被排斥了，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她一直感觉很茫然，因为此时她的身后不再像肖恩时代那样有一个她可以依靠的机构了。

“我一直在用比较平和的方式指出：如果你为康泰纳仕撰稿，但他们把你的文章撕得粉碎，那你也要坚持下去。用你的私人时间写你想写的文章，但不要辞职，因为那样你就不再属于那里了，你会变得易受攻击。当我离开《纽约客》时，我就成了狩猎目标。”^[46]2013年，阿德勒这样告诉一位采访者，当时她的小说都被重新发行了，她

正在享受某种复兴。批评界对于她的小说的卓越性的共识使她获得了新的显赫声望。但是那种分析视角，那种激烈批判别人观点的能力却没有再找到适合的用武之地。自1999年以后，阿德勒再也没有发表过新的散文。

[1] Lili Anolik, “Warren Beatty, Pauline Kael, and an Epic Hollywood Mistake, ” *Vanity Fair*, February 2017.

[2] “The Perils of Pauline,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14, 1980.

[3] 马修·怀尔德写给编辑的信,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5, 1980.

[4] John Leonard, “What Do Writers Think of Reviews and Reviewers? ” *New York Times*, August 7, 1980.

[5] *Time*, July 27, 1980.

[6] Jesse Kornbluth, “The Quirky Brilliance of Renata Adler, ” *New York*, December 12, 1983.

[7] 1961年8月29日, 玛丽·麦卡锡写给Carmen Angleton的书信,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499.

[8] 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500.

[9] Review of *John Hersey's Here to Stay*, *Commentary*, April 1963.

[10] “Talk of the Town, ” *New Yorker*, December 8, 1962.

[11] “Polemic and the New Reviewing, ” *New Yorker*, July 4, 1964.

[12] “Polemic and the New Reviewing, ” *New Yorker*, July 4, 1964.

- [13] “Comment, ” *New Yorker*, July 20, 1963.
- [14] *Gone: The Last Days of the “New Yorker”*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 82.
- [15] 接受Christopher Bollen采访, *Interview*, August 14, 2014。
- [16] *Gone*, 33.
- [17] 2015年11月, 我在纽约大学人类学学院 (New York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就本书的调研进展作演讲时, 阿德勒在问答环节中这样说。
- [18] “Polemic and the New Reviewing, ” *New Yorker*, July 4, 1964.
- [19] Irving Kristol, “On Literary Politics, ” *New Leader*, August 3, 1964.
- [20] “Letter from Selma, ” *New Yorker*, April 10, 1965.
- [21] Jesse Kornbluth, “The Quirky Brilliance of Renata Adler, ” *New York*, December 12, 1983.
- [22] “Fly Trans Love Airways, ” *New Yorker*, February 25, 1967.
- [23] “Fly Trans Love Airways, ” *New Yorker*, February 25, 1967.
- [24] 尼日利亚东南部一个由分离主义者建立的历史上未被普遍承认的国家。这个国家于1967年5月30日成立, 至1970年1月15日灭亡。其政权的军事首领于1970年1月12日正式宣布有条件投降。
- [25] Introduction to *Toward a Radical Middle: Fourteen Pieces of Reporting and Criticism* (Dutton, 1971) .
- [26] “A Teutonic Striptease, ” *New Yorker* (此处疑有误, 应为*New York Times*) , January 4, 1968.
- [27] “Norman Mailer’ s Mailer, ” *New York Times*, January 8, 1968.

[28] 这则广告在 *Adler v. Condé Nast Publications, Inc.*, 643 F. Supp. 1558 (S.D.N.Y. 1986) 的庭审过程中被引用。

[29] Lee Beauport, “Trade Making Chart on Renata Adler; But Some Like Her Literary Flavor,” *Variety*, March 6, 1968.

[30] “How Movies Speak to Young Rebels,” *New York Times*, May 19, 1968.

[31] “Science + Sex = Barbarell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1968.

[32] 接受Christopher Bollen采访, *Interview*, August 14, 2014。

[33] *Pitch Dark*, (NYRB Classics, 2013), 5.

[34] Renata Adler, *Reckless Disregard: Westmoreland v. CBS et al.; Sharon v. Time* (Knopf, 1986) .

[35] Ronald Dworkin, “The Press on Tria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6, 1987.

[36] 参见Robert Gottlieb, *Avid Reader: A Lif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6), 220。

[37] *Gone*, 203.

[38] Robert Gottlieb, “Ms. Adler, the New Yorker, and Me,” *New York Observer*, January 17, 2000.

[39] *Gone*, 125.

[40] “A Court of No Appeal,” *Harper’s*, August 2000.

[41] 迪安曾深深卷入水门事件和随后的丑闻掩盖过程。他被联邦调查局称为“掩盖的主要操纵者”。

[42] 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帮助策划了水门大厦闯入事件。被判犯有阴谋，入室盗窃和非法窃听罪，狱中服刑四年多。后来成为演员、作家、电台脱口秀主持人。

[43] “A Court of No Appeal, ” *Harper’ s*, August 2000.

[44] “A Court of No Appeal, ” *Harper’ s*, August 2000.

[45] “Decoding the Starr Report, ” *Vanity Fair*, February 1999.

[46] Rachel Cooke, “Renata Adler: ‘I’ ve Been Described as
Shrill. Isn’ t That Strange? ’ ” *Guardian*, July 7, 2013.

第十四章 马尔科姆

珍妮特·马尔科姆的职业生涯与雷娜塔·阿德勒的一样离不开《纽约客》。不过比起阿德勒的傲慢冲动，马尔科姆是安静低调的；比起阿德勒的年少有为，马尔科姆则是大器晚成。和汉娜·阿伦特一样，马尔科姆也是在过了不惑之年后才终于开始发表重要的作品。至于真正成名，则要一直等到她在1983年发表了一篇一位几乎还没什么人听说过的学者的传略之后。这个原本是梵文学者，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学家的男人名叫杰弗里·穆萨耶夫·马森（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那时的他刚刚被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档案馆（Sigmund Freud Archives）负责人的职位上解雇。

马尔科姆采访他时，马森刚过四十岁，那时的他头发浓密，自信的程度也还在心理健康范围内。根据马尔科姆的叙述，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马森就对她说：

分析领域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愿意做任何事情来摆脱我。他们嫉妒我，但我认为他们也真心觉得我是一个错误，一个麻烦和一个精神分析界的潜在威胁——一个真正有决定性的威胁。他们感觉到我可以一手摧毁整个精神分析行业——现实地说，这项事业让他们挣了很多钱。他们感到害怕是对的，因为我发现的东西是可以引发爆炸性后果的炸药。[\[1\]](#)

马尔科姆对马森用这种炸药引发的争吵很感兴趣。具体来说，他提出的是一个针对“性诱惑论”的论点，“性诱惑论”是一种关于亲子关系本质的理论，认为从原始意义上讲，亲子关系是由性吸引力定

义的，这个理论后来被弗洛伊德排斥和修正过。然而随着对这场知识论争的深入调查，用马尔科姆的话说，她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显然永远无法停止自我赞美的男人。

马尔科姆倾向于通过暗示而不是直白的陈述来传达想法。她向马森发起攻击时从来不使用直白的侮辱。她会像前文中那样不断引用马森的原话，那些内容自然会让他听起来像个傻瓜。例如，她会让他解释他通过精神分析治愈了自己的“完全滥交”的事。他告诉马尔科姆说，当他还是一名研究生时，他就已经和一千名女性发生过关系了，于是马尔科姆就引用了他的原话。或者，马尔科姆会引用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时写的一封谈论其他人的书信中的内容，借此来让自己对马森活动的描述更富有变化：“他所说和所想的一切都具有一种可塑性，一种温暖的感觉和一种至关重要的特征，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掩盖缺乏更深层实质的事实。” [\[2\]](#)

这个特征需要被考虑在内是因为马尔科姆正在调查马森被解雇一事的情况。如果他多变、浮夸，而且以自我为中心，那么这些就都成了相关的事实。不过最确信无疑的是，他还好打官司。马森最终会起诉马尔科姆，而且这场官司持续了多年，一直打到最高法院。马森起诉的理由是马尔科姆错误地引用了他的话，在下级法院进行的两次审理中，双方就报告文学的本质进行了辩论，但马森最终输掉了控告马尔科姆诽谤的官司。

珍妮特·马尔科姆这种微妙但极具毁灭性的间接攻击是人生经历和性格的产物。马尔科姆1934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原名珍娜·温诺韦拉（Jana Wienovera），她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文雅、顺从。战争爆发后他们一家逃离祖国，定居布鲁克林，珍妮特和妹妹玛丽（Marie）就是在那里学会英语的。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她还记得“幼儿园老师在每天放学时会说‘再见，孩子们（Good-bye，

children)’，那时我以为‘children’是个人名，所以我很羡慕叫这个名字的孩子。我偷偷地盼望着某一天，老师能够说‘再见，珍妮特’。”[\[3\]](#)

马尔科姆的父亲是一名精神病医生（这无疑是让马尔科姆最终对该学科产生兴趣的影响因素之一），她的母亲是一名律师。他们都设法在美国找到了工作。为了方便美国人发音，马尔科姆的父亲将家族姓氏简化为温（Winn）。学习英语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且珍妮特是个好学生，最终被密歇根大学录取。她的思想并不是很激进。像五十年代的其他很多人一样，她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讨好男人，然后结婚，组建一个家庭。她告诉《巴黎评论》的采访者说：“大学四年的时间里，我没有上过一位女教授的课。据我所知，学校里根本没有女教授。”在这一点上，她有时似乎会把自己看作一个艾丽丝·芒罗（Alice Munro）一样的人物：聪明，书卷气，但不是特别雄心勃勃，随随便便就结婚了，只因为别人都说这是你应该做的。

她开始自己的事业的过程也很缓慢，而不是像阿德勒或帕克那样，带着已经完全成形的声音脱颖而出。在大学时，她认识了一位名叫唐纳德·马尔科姆（Donald Malcolm）的年轻人，唐纳德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珍妮特也有同样的理想，但是她的尝试总是被她的创意写作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否定。当毕业后的唐纳德·马尔科姆前往《新共和》工作时，珍妮特·温追随了他的脚步，也开始为这本杂志撰稿。她在1956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篇诙谐模仿风格的影评，模仿的对象是激动的青少年：

昨晚我去看了《铁血柔情》（*Love Me Tender*），我太喜欢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即猫王）没有一点淫秽或下流的感觉；他只是与众不同。故事发生在内战时期，那时几乎还没有摇滚乐，但他确实比电影中的其他人都出色，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歌声和男子气概，更是因为他精彩的演技。[\[4\]](#)

这篇文章绝对不是什么严肃作品，在它的结尾，作者表达了希望玛丽莲·梦露和猫王一起拍摄《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的愿望，因为那样就“太好了”。现代读者也许体会不到这其中的幽默，因为诙谐模仿文往往有时代局限性。但是年轻的珍妮特·温这种天真的讽刺一定给什么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六个月，她就开始不定期地为《新共和》撰写更严肃的电影评论了。她一般不喜欢好莱坞拍出来的东西。她贬低了奥托·普雷明格的《圣女贞德》（*Saint Joan*），认为他削弱了萧伯纳最初给予贞德的故事的道德复杂性。她也不喜欢亚历山大·麦肯德里克（Alexander Mackendrick）的《成功的美妙滋味》（*Sweet Smell of Success*），因为她觉得剧情太容易被看穿了。但是当写到对当时重新放映的《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的感受时，她的观点引发了一些读者的不满。马尔科姆认为这部电影不仅宣扬种族主义，而且过分专注于善恶之间的硬性划分：

就在影院之外，距此几个街区的地方，一项民权法案正在获得通过，尽管它还不尽善尽美；朝另一个方向走，也是距此几个街区的地方，一部名为《我曾少年狼人》（*I Was a Teenage Werewolf*）的电影正在上映。我不禁感到愉悦和舒畅，因为无论是在电影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5]

读者就这些坚定的观点给出了强烈的反应。一个人给杂志社写信说他怀疑温女士可能知道得很多，并且有很好的判断力，但他补充说“这一点并不容易确定，因为温女士非常坚定地展露了慈悲，她的散文带着满满的正义感评判我们。她的标准看起来如此之高”。^[6]另一封读者来信的作者名叫哈尔·考夫曼（Hal Kaufman），自称是“电影专业学生”，他来信也是为了纠正温女士的错误。他对她产生疑虑的范围就更广泛了，并且举了一大堆例子来说明自大浮夸的人经常被误认为是有智慧的人。这封信的作者希望提醒温女士，“各地的领袖权威都对格里菲思（Griffith）^[7]的电影给出了最高的赞赏”。^[8]他不

仅提到列宁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还敦促珍妮特在评判老电影时应表现出更多的“慈悲”。对此，马尔科姆的回答非常简单：

考夫曼先生是一位“电影专业学生”，而我不是。我们怎么可能观点一致呢？

此时，马尔科姆已经将自己的批评才能转向书籍和戏剧领域了。她评论过劳伦斯的书信集，但没有什么比其中的引言更能激发她评判的欲望了。这篇引言正是由麦卡锡和阿伦特的老对手，黛安娜·特里林写的，后者当时是《国家》的首席批评家。马尔科姆指出，对一部文学批评作品而言，作者的妻子是不是一个糟糕的人是毫不相干的问题，她以此嘲笑了特里林夫人称弗丽达·劳伦斯（Frieda Lawrence）为“特别讨厌的人”^[9]是出于嫉妒，还评价特里林“老得厉害”及“没有真才实学”。

这些评论本身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铭记的地方，但是它们体现了一名年轻作家不断积累自信的过程。除了那些讽刺信之外，她也开始获得一些赞美，诺曼·梅勒就是赞美她的人之一。梅勒、多萝西·帕克和杜鲁门·卡波特一起上电视的内容是由马尔科姆为杂志写文章报道的。梅勒认为她对于自己与卡波特讨论的内容的引用有错误。但是他写的投诉信却似乎有一些调情的口气：

我不得不补充一点，温女士的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瑕疵，那就是她说是我说的大部分内容都并非出自我口。^[10]

当时，珍妮特·温已经与唐纳德·马尔科姆订婚。1957年，唐纳德在《纽约客》获得了一份工作，珍妮特也搬回了布鲁克林居住。此后的七年里，珍妮特一直忙着照顾他们唯一的女儿安妮·奥利维娅（Anne Olivia），她本人没有发表过一个字。

如果你让她自己说她成为作家的故事，珍妮特·马尔科姆通常会从《纽约客》开始讲起。在她女儿还很小的时候，她不得不给她读很多儿童书。最终，她通过丈夫认识的肖恩先生建议她为1966年12月的《纽约客》写写自己最喜欢的儿童文学作品。马尔科姆的表现可能比肖恩预期的更加热切。她向后者提供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散文，总结并分析了她最喜欢的那些书。文章开头的口气比她年轻时在《新共和》使用的口气少了一些顽皮：

我们的孩子是信仰的反光镜，也是哲学的试验场。如果我们想要养育一个快乐的孩子，而不关心他的行为方式，那么我们显然是相信人性本善，以及生活中存在无穷的幸福的可能。[\[11\]](#)

有了这第一篇文章之后，肖恩又在1967年和1968年继续邀请马尔科姆撰写类似的作品。1967年的评论与1966年的评论一样刻板，但是到了1968年，某些原因让马尔科姆选择涉足理性论证的领域。在文章的中间部分，马尔科姆加入了一段与医生的争论，后者坚持认为，给孩子看的现实应当被粉饰得“不那么丑陋”。

我不知道拉萨尼亚医生（Dr. Lasagna）要如何让现实变得“不那么丑陋”，我甚至不确定今天的现实是否比曾经任何时候的更丑陋了。今天的人们对社会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和关注，这并不意味着今天存在的社会问题更多或更糟。有人会认为，如果今天的孩子也会因为偷一根面包而被绞死，那么要面对现实将更加艰难。（今天的人应该把给我们做面包的人绞死。）[\[12\]](#)

接下来，她开始建议让孩子阅读关于麻醉药物的“科普读物”，目的就是防止他们沾染毒品。她也推荐了一些关于性的书籍，不过她说这些书“比之前出版的任何书籍都直白得多，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接受这样介绍此类问题的方式”。马尔科姆还评论了一些适合儿童阅读的关于黑人历史的书籍，并发现其中大部分甚至也让她学到了以前不了解的事。

肖恩先生显然注意到了这个开始显露天赋的人才，于是他安排马尔科姆负责一个名叫“关于房子（About the House）”的专栏，写一些关于艺术和设计的文章。马尔科姆认为这是学习如何写作的良好训练。此外，这也是她第一次进入批评之外的领域。她开始慢慢撰写这些文章，谈论各个经营家具和室内设计的商人。到1970年，她也写了一些关于其他人正在谈论的新兴的女性解放运动的文章。

那篇文章是被发表在《新共和》上的。文章的作者署名被杂志社错写成了“Janet Malcom”（应为Malcolm），但马尔科姆曾经的那种俏皮口气又出现了。她取笑了女权运动中普遍存在的，认为唯一能够获得满足感的地方只能是在家庭以外的地方的观念。

在任何情况下，选择将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照顾，好让自己可以继续工作的女性不应该虚伪地宣称自己的决定是为了孩子好。她这么做是为了自己。她决定这么做可能是对的——自私的决定往往是最好的决定——但是她应当看清自己在做的这件事，并甘愿承担情感淡薄的结果，那往往是不管孩子的父母不得不付出的代价。[\[13\]](#)

这些文字中隐含的愤怒可不只是一点点，它提出的“新的女权主义可能是一种更易招人怨恨的导致不幸福和不满足的原因”的主张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论点。迪迪翁在担忧女权运动纠结于“琐事”时就经常提到这个问题。但是马尔科姆的论述也显示了某种不确定，因为它并不符合一个正在逐渐建立独立性的作家的观点，而是符合一个认为做母亲是一种愉快的经历的人的观点，这样的人既不想放弃由此产生的任何益处，又不想失去主张某种程度的选择权的机会。不过，她在这里的文风和她在《纽约客》发表的散文中的活泼完全不同。《纽约客》上的马尔科姆更加优雅，是完全的意识流风格。而在应《新共和》编辑的要求回应充满愤怒的读者来信时，她则写了一个典型的充满讽刺意味的答复：

至于那些提出关于主旨的问题的人们，我需要比烘焙点心和把食物装罐的家务活允许我的更长的思考时间。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希望能再给你写一篇散文来探讨这些有争议的问题。[\[14\]](#)

也许这种不确定是因情境而生的。马尔科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她的丈夫唐纳德正身患重病。医生们都查不出他哪里出了问题；后来马尔科姆认定丈夫得了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没过多久，唐纳德就无法工作了，虽然当时的《纽约客》对作家还很慷慨，但这个家庭依然承受了相当大的财务压力。而且谁都看得出来，唐纳德·马尔科姆已经时日无多。

马尔科姆依然在每月按时发表她关于家具的专栏文章。其中大多数内容都是在简单地列举和描述她喜欢的那些商品。但是在1972年3月，她第一次跳出了自己的固定模式。为了写这篇关于现代家具的专栏文章，她去拜访了艺术家吉村二三夫（Fumio Yoshimura），“至今为止，他更为人所知的还是他的妻子凯特·米利特，而非他的作品”。[\[15\]](#)米利特在1972年已经是名人当然是因为她写了那本畅销书《性的政治》。这本书是一种把女权主义引入文学批评的颠覆性方法。在马尔科姆继续描述与吉村的接触过程时，她总是会被米利特分散注意力，而谈话最终也确实转向了女性的解放。

我提到这里的父母担心那些不喜欢运动的男孩长大后会成为同性恋者。“这种命运比死亡还糟糕。”凯特·米利特并没有把目光从她的信件上抬起来，她只是小声这样说道。后来我意识到，凯特·米利特退出这场谈话其实是一种圆滑，而非不懂礼貌。

时至今日，马尔科姆似乎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她的文章最终变成了对米利特的采访，而且她在提到米利特时一直在使用她的全名。

与凯特·米利特谈话时完全听不到《性的政治》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暗示、讽刺和学术性的腔调……凯特·米利特的雕塑看起来都很相似，而且

都很像凯特·米利特本人。它们都有一种棱角分明、坚实、强大和乐观的特性。

这就是会让珍妮特·马尔科姆受人尊敬但也会引发争议的那种报道文学的第一次出现。她在这次简短的采访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开始建立一个“我”，后来她会告诉大家这个“我”不值得信赖，只是一种必要的伎俩。例如：读者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他们读到的这篇文章记录的是一个对女权主义持极大怀疑态度的人采访一位伟大的女权主义者的内容，但这个怀疑者显然已经读过米利特的书了。

唐纳德·马尔科姆于1975年9月去世。也许是想到自己不得不打造一个更加稳固的职业生涯，所以在丈夫生命的最后一年里，珍妮特·马尔科姆开始将事业范围扩展到摄影这种令她感兴趣的新艺术上。那时她还没有读过苏珊·桑塔格的那些在《纽约书评》上慢慢发表的作品。她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终于读了那些文章。

但是在所有这些发生之前，她为《纽约客》评论了一本关于艾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的书，接着又为《纽约时报》回顾了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的作品。在关于韦斯顿的评论中，她非常仔细，而且倾向于使用专业术语。这最终成了《纽约时报》对她能否担任摄影批评家的一种考察，然后他们就向马尔科姆提供了这个职位。但威廉·肖恩告诉她，她也可以选择担任《纽约客》的摄影批评家。

1980年，马尔科姆出版了她关于摄影的散文作品集《黛安娜和尼康》（*Diana and Nikon*）。马尔科姆在书中承认，她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她写道：“重读这些文章让我联想到一个试图砍倒一棵树的人，她以前从未砍过树，她也不是很强壮，她的斧子也不好，但是她非常固执。”^[16]她认为自己是从小1978年才开始找到窍门的。当时她写了一篇名为《两条路》（*Two Roads*）的文章，内容

是探索摄影的快照属性。她开始从道德角度谈论摄影，这个方法一直被桑塔格运用得很好。通过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她可以更容易地传达她为什么觉得很多照片令人不安：

[沃克·] 埃文斯 (Walker Evans) 的书并不是一本它本应成为的表现优雅和秩序的选集。相反，这本书里充满了混乱和无序，有难看的肮脏凌乱的场面和眼神空洞的人物，还有被冷漠的资本主义机器压垮的受害者和失败者，他们居住的国家的精神与他们脚下的土地一样受到了侵蚀，已经枯竭。[\[17\]](#)

你还可以看到马尔科姆在处理某些主题时的轻松状态，她的文字读起来也更令人愉快：

不了解内容的人如果翻开大都会博物馆在展出这些摄影作品时出版的《乔治娅·奥基夫：一幅肖像》 (*Georgia O' Keefe: A Portrait*) 这本书，会觉得自己就像开着车在乡下转转，然后突然就来到了巨石阵。[\[18\]](#)

对于摄影题材驾轻就熟之后，马尔科姆又开始对撰写被《纽约客》称为“纪实报道”的那种文章越来越感兴趣。这个名字是杂志社内部对于那种长篇报道文章的称呼，这种文章也是《纽约客》的标志性作品。此时的马尔科姆已经再婚，她的丈夫是《纽约客》的编辑德纳·博茨福德 (Gardner Botsford)。当时她正在戒烟，她曾经认为抽烟和写作是两件密不可分的事。但是做报道能让她深入社会，她总不能一边抽烟一边采访。所以她告诉肖恩先生她认为自己应当写一篇“纪实报道”，她选择的主题是家庭治疗法。也许因为父亲是一名精神病医生，所以马尔科姆也有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洞察力。反正身为作家的马尔科姆选择精神分析这个主题绝对是一种完美且令人难忘的搭配。

当马尔科姆开始撰写关于精神分析学的文章时，这个事物已经存在近一个世纪了。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就是她开始写关于精

神病治疗法的文章时，她选择的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题材。精神病药理学当时正处在兴起阶段；很多杂志在反复提及一种被称为“母亲的小助手”的地西洋类药物（Valium，即安定）。女权运动对精神分析大多持厌恶态度，将弗洛伊德思想（比如“阴茎嫉妒理论”）视为对女性的根本性压迫的基础。然而，具体到治疗方法本身，尽管其在美国的鼎盛时期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才来临，但从此时开始，它们已经越来越受欢迎了。存在主义精神治疗师罗洛·梅

（Rollo May）将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观点与临床实践联系起来，创作了一些非常受欢迎的著作，他的作品在那些可能会订阅《纽约客》的文化精英中间很流行。以上所有原因都足以激发人们对这个题材的好奇心。

马尔科姆就现代精神病治疗实践展开探索的第一篇文章名叫《单向镜》（*The One-Way Mirror*），内容是关于家庭治疗法的。文章指出，这些实践实际上推翻了大部分已经存在的精神分析学思想。随着接受治疗一端的人数越来越多，等式另一端的治疗师也变得更具有对抗性和战略性，而且他们几乎不可能坚持保密义务。马尔科姆怀疑地看待这一切，但她也给了家庭治疗师为自己辩解的机会。结果却是，他听起来有点像穿着廉价套装的推销员：

家庭治疗法将在此后的一二十年内取代精神病治疗法，因为它是关于特定环境中的人的。这是一种属于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疗方法，而个人治疗法是属于十九世纪的。这并不是贬义的说法。只是事物都在发展和变化，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有某些特定的看待和回应生活的方式在各个地方出现。家庭治疗法对于精神病治疗法而言就像品特（Pinter）[\[19\]](#)之于戏剧，或生态学之于自然科学。[\[20\]](#)

这篇文章并不完全是被写来对精神分析学这个整体进行批判的。遭到批判是马尔科姆的下一个报道对象面临的命运。这位典型的治疗师被她取名为“阿伦·格林（Aaron Green，这不是他的真名）”。马

尔科姆从自己对格林广泛深入的采访中找到了对精神分析学家和一般的精神分析学提出批判的理由。简而言之，她分析了阿伦·格林。连格林的治疗师的躺椅都成了被评论的对象：

被摆在房间里的空荡荡的躺椅带着一种饱含深意的气势。它似乎是在说：“我可不是什么破旧的泡沫橡胶包裹的沙发，我是躺椅。” [\[21\]](#)

这种微妙的笔触（还有对报道对象的室内装饰的幽默潜质的标志性兴趣）揭示了马尔科姆写作技巧中的一些重要特征。虽然文章立足于一个批判的角度，但它的批判并不是冷酷无情的。马尔科姆是在阐明一个问题，并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作出某种评判，但正如一位评论家解释的那样，她总是更“顽皮”。[\[22\]](#)虽然阿伦·格林有时显得愚蠢和焦虑，但他也非常有同情心。在马尔科姆的质疑之下，他逐渐认识到就连这个职业对自己的吸引力也具有一种心理上的缺陷：

我被精神分析工作吸引的原因就是它能在我和接受我治疗的人之间创造一种距离。这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禁绝状态。[\[23\]](#)

马尔科姆继续给这个“不可能的职业”中存在的模糊和虚伪进行编目：比如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治疗方式；还比如病人从精神分析治疗中得到的很可能不是治愈，而是“移情”的事实。这种现实指的是病人将他们最初来接受治疗时想要处理的，从童年时期保留的情感和渴望投射到了他们与治疗师的关系上。马尔科姆认为，这些问题中有绝大部分被精神分析培训机构制度化了，治疗师们本身也将自己视为一种代理父母。马尔科姆温和地指出，这种培训坚称好的精神分析学家必须先接受广泛的心理分析。

但她并没有把格林本人描绘成一幅讽刺画。他似乎是个运气不佳，困惑烦恼，很可能需要换一份工作，但并没有什么恶意的人。

为阿伦·格林写的传略被整合成了一本名为《心理分析：不可能的职业》（*Psychoanalysis: 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的书，它获得了来自各方的狂热赞美。差不多每个美国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个时间里都尝试过精神分析治疗，然后就厌恶地放弃了它，因为他们对这种治疗在病人身上应该产生什么效果感到困惑。马尔科姆的作品无比精妙地论述了这个悖论，以至于每个评论家，甚至是精神分析学家们都被这本书迷住了。

大受鼓舞的马尔科姆于是展开了与精神分析学家相关的第二个项目。这篇文章依然是为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写的长篇传略。但这一次，马尔科姆没有在曼哈顿丰富的治疗师资源中寻找对象，而是选中了杰弗里·穆萨耶夫·马森。马森所谓的“炸药”出现在弗洛伊德与其门徒之一，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之间的未被公开的书信中。马森立即告诉各个报社说他从这些书信中发现弗洛伊德并没有真正放弃所谓的“性诱惑论”。最初的性诱惑论认为童年的性经历，通常是受到父母之一的性诱惑的经历是大多数病人患上神经官能症的原因。弗洛伊德在1925年放弃了这个理论，他解释说他已经明白，当病人描述这种经历时，他们描述的往往不是一种真实发生的，而是某种超自然的情况。如果马森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弗洛伊德最初怀疑儿童时期的性经历（当代人普遍称之为性侵犯）是大多数心理障碍的核心的想法就是正确的。

马尔科姆对马森产生兴趣就是因为他提出的这个主张，所以她决定打电话给马森。马森非常健谈，而且喜欢在言语中透露许多信息。在为期几天的采访过程中，马尔科姆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录音，另一些则记在了笔记本上。马森给她讲了他的婚姻，他的婚外情。他还告诉她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和他的其他导师都对他有所怀疑。马尔科姆根据自己的笔记引用了她认为是马森的原话的内容，但马森后来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我就像一个知识分子中的小白脸，人

们从你那里获得快乐，但是他们绝不会把你带到公共场合。”^[24]显然，马森已经准备好要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了，因为他正准备写一本关于他宣称自己在弗洛伊德与弗里斯的书信中找到的真相的书。安娜·弗洛伊德和最初帮助马森获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档案馆工作的库尔特·艾斯勒（Kurt Eissler）都告诉马尔科姆，他们认为马森对这些书信的理解有误。

大概正是因为受到了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围攻，所以马森才认定马尔科姆可以成为他的某种新朋友。在他们接触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知道马尔科姆是打算将他告诉她的内容写成文章的，然而他仍然会连续好几个小时，事无巨细地给她讲述他的性生活，他与同行的宿怨，以及他强烈的自我价值感中的各种因素。马尔科姆最终发表的文章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对马森原话的大段引用，不是关于马森对弗洛伊德观点的理解，就是关于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大量女性的长篇大论。一个典型的段落是这样的：

你知道安娜·弗洛伊德曾对我说过什么吗？她说，“如果我父亲现在还活着，他不会想要成为一名分析师。”我发誓，这些都是她的原话。不对，等等。这个很重要。这话是我对她说的。我说：“弗洛伊德女士，我觉得如果你父亲现在还活着，他不会成为分析师。”然后她说：“你说得对。”^[25]

尽管这些长长的引用看起来像是不曾被打断的独白，但实际上，它们往往是由马尔科姆用采访中的各个地方的内容拼凑出来的——马森后来在法庭上就是针对这种做法提出了异议。

几乎所有读了这篇《档案馆中的麻烦》（*Trouble in the Archives*）的读者都会认定马尔科姆是故意将马森描述成一个小丑，并破坏他的可信度的。即便是像批评家克雷格·塞利格曼这样充满智慧、有辨识力的粉丝也把马尔科姆的这篇关于马森的作品称为“诋毁人格的杰作”。^[26]这些文章后来被克诺夫出版社出版成了一本名为

《在弗洛伊德档案馆》（*In the Freud Archives*）的书。毫无疑问，没有人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还会认为杰弗里·穆萨耶夫·马森是一位正直的公民。最终，就连马尔科姆也对马森产生了不好的看法，她在与一位被卷入这场事件的分析师交谈时说：“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乎过任何事情。” [\[27\]](#)

然而，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马尔科姆本意的轻微误读。我们很快会讲到关于这本书的后续争议，在那些过程中马尔科姆已经证明除少数例外，她几乎完全是在引用被记录在录音带和笔记本上的马森说的内容。从这一角度来说，她只是传达了马森提供给她们的内容。在接下来的诉讼中，马森坚称有些引文是编造的，另一些则是断章取义，但不是全部引文都存在这些问题。将这篇文章简单地认定为“诋毁人格”，就等于是暗示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不存在这种合作。

马尔科姆是否有义务阻止马森本人的自我毁灭行为这个问题将成为一个占据她人生接下来十年的问题。

这本书出版之后，马森果然火冒三丈。他给《纽约时报书评》写了一封投诉信，说自己受到了诽谤。马尔科姆对此的回复也很尖锐：

事实上，对马森先生的描述是基于四十多个小时的录音对话得出的。这些采访开始于1982年11月，地点是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最初的采访为期一周，在接下来的八个月中，我们还通过电话进行了后续采访……我引用的马森先生说的所有内容都是他说的，而且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引用的。（说“几乎”是因为存在为语法规则而进行的更正。） [\[28\]](#)

最终，马森向法院提起了要求被告赔偿1020万美元的诽谤诉讼。其中1000万美元是惩罚性赔偿。这是一个荒谬的数额。对马尔科姆来说不幸的是，这场诉讼一直延续了十多年。如无数评论员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指出的那样，马森总是不得不改变他指控的具体内容。 [\[29\]](#)他

在最初的原告陈述中列出了他确定他对着录音说过的内容。马尔科姆都能够播放出来。

但是有几个问题确实很突出。一个是“知识分子中的小白脸”这个说法在录音带上无法找到。另一个是如马尔科姆在给《纽约时报书评》回信为自己辩解时说到的那样，她确实对引文作了一些改动，但这主要是为了删除某些马森提出的更夸张的观点。就这样，这场诉讼成了法院的一个棘手案件。正如赫尔曼诉麦卡锡案（*Hellman v. McCarthy*）一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尔科姆最终是否能够胜诉（她最终胜诉了），而在于这场纷争在持续过程中可能给她造成多大伤害。

1987年，马森的首次起诉被驳回。马尔科姆后来懊恼地说：“我早应该想到，写完描述他的文章后，马森不会轻易罢休。”^[30]不过她已经决定将精力投入到一个新项目中了。

《新闻记者与谋杀犯》（*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于1989年分三期被刊登在《纽约客》上。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很有名，马尔科姆是这么写的：“任何不是太过愚蠢或太过自满的记者都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31]这句话就像是点燃了一条导火索。许多人似乎根本不在乎这句话之后写的是怎么了。我第一次见到马尔科姆是在这句话被发表二十年后，当时她站在《纽约客》节（*New Yorker Festival*）的高讲台上谈论她的作品。人群中有一个年轻男子站起来，愤怒地就这句话向她提出质疑。在回答之前，马尔科姆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嗯，你明白，那其实是一种修辞手法。”^[32]然而这个年轻人显然并没有真正明白。

这样的情况不过是马尔科姆出版她深入研究记者乔·麦金尼斯（*Joe McGinniss*）和杀人犯杰弗里·麦克唐纳（*Jeffrey MacDonald*）之间纠纷的成果之后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缩影。1979年，麦

金尼斯与麦克唐纳签订合同，商定在麦克唐纳因为谋杀自己的家人而接受审判期间，麦金尼斯享有独家采访他和他的辩护律师的权利。麦克唐纳同意了，显然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某种大新闻。麦金尼斯因为写过一本《1968年总统的推销》（*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而很有名气，该书毫不粉饰地描述了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是如何让他们的候选人看起来更加……怎么说呢……风度翩翩的。凭借这本书，麦金尼斯收获了相当多的尊重。

对于麦克唐纳来说不幸的是，到审判结束时，麦金尼斯认定他确实犯下了他被指控的罪行。根据他们的协议写出来的这本名为《致命幻象》（*Fatal Vision*）的非虚构作品是一本粗制滥造，但是非常畅销的书。该书声称麦克唐纳是一个精神变态者，他冷血地杀死了自己的全家。被塑造成受人鄙夷的凶手的麦克唐纳随后起诉麦金尼斯，称后者有意地误导了自己对于这个项目性质的理解。根据大多数新闻行业的标准来看，麦金尼斯的行为确实越界了。比如，麦克唐纳可以拿出两人之间的通信作为证据，其中有麦金尼斯似乎是为了消除麦克唐纳的疑虑而向这个能给自己提供新闻的人表示，他认为判定麦克唐纳有罪是严重的不公的内容。

马尔科姆继续介绍了她所知道的事：

他是一个自信满满的骗子，靠捕捉人们的虚荣、无知或寂寞生存，先获得他们的信任，再毫无愧疚地背叛他们。好比一个容易轻信别人的寡妇，一觉醒来，发现那个迷人的年轻男子和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就是当文章或书籍面世后，一位同意成为非虚构作品描述对象的受访者得到的惨痛教训。[\[33\]](#)

鉴于这段话是从被出卖的受访者角度说的，所以许多读了这篇文章的人便立刻认定马尔科姆是在控诉新闻行业。记者们最喜欢的事莫过于谈论新闻业。到1989年，也就是马尔科姆的文章被发表时，新闻界充斥着想要成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人，他们都自认为可以凭借

新闻工作与真正的权力对抗。结果就是，许多人觉得马尔科姆伤害了他们的尊严。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持续时间特别长的批评风暴。

“马尔科姆女士似乎创造出了一条吞下自己尾巴的蛇：她攻击所有记者的职业道德，也包括她自己的，然而她并没有透露她自己在扮演‘自信满满的骗子’时干过哪些勾当，”^[34]《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激烈地斥责马尔科姆，还诬告她曾经承认“捏造事实”。算得上重要图书批评家之一的克里斯托弗·莱曼-豪普特（Christopher Lehmann-Haupt）指责她用给麦金尼斯定罪来为麦克唐纳免罪。一位很受伤的《芝加哥论坛报》的专栏作家在环视报社的办公室时看到“同事们在记录政客的行为，报道医学界的突破……谁能告诉我这些常规的新闻工作何错之有？”^[35]

马尔科姆也有一些支持者。戴维·里夫就在《洛杉矶时报》上为她辩护。他指出，就马尔科姆的立场而言，她说的这句话与琼·迪迪翁那句大受赞美的“作家总是要出卖一些人的”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36]诺拉·埃夫龙在此之前就与马尔科姆成了朋友，她在接受《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采访时说：“珍妮特·马尔科姆说的话合情合理，竟然有人对此大做文章令我感到非常震惊。”^[37]她还说：“我相信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你必须愿意完成被珍妮特描述为背叛的那种交易。”这句话与菲比·埃夫龙的“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要表达的态度也很相近。与之对立的问题是有些时候，其他人并不愿意成为被借鉴的内容。

另一位广为人知的丑闻探听者是曾在1963年曝光了殡葬行业内幕的杰茜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她也来自一个有多位可以被形容为“锐利”的姐妹的家庭。她呼应了诺拉·埃夫龙的观点：“我认为马尔科姆的文章非常精彩。”^[38]

相关报道的另一个主题是鉴别马森与马尔科姆之间刚刚发生的事情与马尔科姆在《新闻记者和杀人犯》中所分析的情况之间的相似性。马森感觉他有机会重新谈论自己的故事了，于是他告诉《纽约》杂志的一位记者说，他读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时觉得那就是写给他的公开信，是马尔科姆对自己罪过的一种坦白。^[39]他一直在对驳回自己起诉的判决提出上诉，最后一路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Justice Anthony Kennedy）判定他可以重新提起诉讼，但最终，马森于1994年败诉，陪审团认定马尔科姆虽然不够严谨，但她的行为不带有“鲁莽漠视”的主观恶意。一位陪审团成员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马森有点太诚实了。他说出了一切，表露了自己的本质。她据此给他画了幅画像，而他并不喜欢。”^[40]

后来，马尔科姆说，她有点理解为什么人们向她扔了这么多石头：

当自封的神明倒下时，谁不为此感到愉悦呢？被在泥泞中拖着走的人是一位《纽约客》作家这个事实只会增添邪恶的欣喜。当时的《纽约客》还是一个用高高在上的道德感把自己包裹起来的毛茸茸的虫茧，这一点真的让为其他出版物工作的人很恼怒。在有媒体来采访我时，我像所有《纽约客》作家认为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对采访者唯恐避之不及，简直就是恐惧宣传的威廉·肖恩的翻版。这种方式对我没有任何帮助。当马森在一个接一个的采访中对我提出错误的指控时，我没有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而是一直保持着荒谬的沉默。^[41]

不过马尔科姆也不是完全沉默的。就在马森提出上诉的过程中，《新闻记者和杀人犯》以书的形式正式出版了。马尔科姆为该书写了一篇新的后记。在这篇后记中，她否认麦金尼斯与麦克唐纳的争议折射了她与马森之间的麻烦。她还说实际上自己开始觉得马森可怜，因为他再一次被记者们利用了，那些人打电话给他，为的是借用他的话来攻击她，之后他就会再次被抛弃。^[42]

她在这篇后记中做的另一件事是为编辑引用内容的理念作出辩护。这一点正是马森在诉讼中提出指控的争议点：他宣称马尔科姆拼凑句子和改变句子顺序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她作为记者而享有的权利的范围。她为这种做法进行辩护的理论是她在作为一名作家的生涯中还会多次提到的，那就是用“我”写出的文字并不总是值得信任的：

新闻中的“我”与自传中的“我”不同，后一个“我”代表着传记作者本人，而前一个“我”与文章作者之间只存在一种很薄弱的关联——就像超人与克拉克·肯特之间的关联。新闻报道中的“我”是一个被过分信赖的叙述者，一个被赋予了叙述、辩论和定基调的重要任务的人，它是为文章而专门创造出来的，就像希腊悲剧中的合唱一样。这个“我”是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是不带感情地观察生活的理念的化身。^[43]

这种号召人们连作者本人也不要相信的理念不仅是解锁马尔科姆作品的万能钥匙，也几乎是解锁本书中所有人物作品的万能钥匙。从丽贝卡·韦斯特到迪迪翁和埃夫龙，一种强健的第一人称体系已经在这个世纪中被建立起来，而马尔科姆的理念为这个体系增加了一些东西，即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阅读马尔科姆的文章时，人们总会体验到一种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感，这种感觉既与名义上的主题相关——麦金尼斯真的那么差劲吗？马森真的是个白痴吗？——又与叙述者本身相关——她究竟又要使出什么新花招戏弄我们？

在马尔科姆身上总会出现这种更深一层的意义，这是她的一种技巧。正如精神分析师引导她的病人检查和分析自己的习惯反应和感受一样，马尔科姆也激发了一种饱含情绪的反应，这种反应让许多记者重新思考了他们对自己职业的了解。

总之，对《新闻记者和杀人犯》的愤怒除了证明马尔科姆试图提出的论点的正确之外，并没有带来其他效果。很明显，这本书的主题是新闻。它的论点是被撰写的主题总会为别人写出的关于它的内容而感到受了背叛。新闻界也确实因为马尔科姆对它的评价而感到受了背

叛。幸运的是，人们最终改变了想法，如今，《新闻记者与杀人犯》成了大多数新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如果你问马尔科姆本人，她也会这样告诉你，最终，事实证明她是正确的。

*

马尔科姆随后的所有作品都受到了《新闻记者与杀人犯》的先入为主的影响。无论看什么问题，她都会发现其中存在的说不通的地方。她写了谋杀案的审判〔见于《密林山坡中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a in Forest Hills*）〕和企业的不正当行为〔见于《希拉·麦高夫之罪》（*The Crimes of Sheila McGough*）〕，她会着眼于决斗故事双方的说法，以及他们看似不可调和的不一致性。她还写了一篇关于艺术家戴维·萨尔（David Salle）的文章，其中包含了如其标题所示的《四十一种虚假开头》（*Forty-One False Starts*）。^[44]因此，这篇文章似乎是在质疑写新闻是否有用。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在审视这些我们依靠其来给我们讲故事的人的过程中，马尔科姆表达了对叙述的怀疑态度——一种与迪迪翁的怀疑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的真假很相似的怀疑者的态度。

但最好的例子大概还要数《沉默的女人》（*The Silent Woman*），这是马尔科姆在《纽约客》发表的一篇足够一本书长度的关于西尔维娅·普拉斯、她的丈夫特德·休斯（Ted Hughes），以及一个想要理解他们二人在一起时的生活的传记作者的文章。普拉斯是一位早熟的诗人和散文家，二十多岁时发表了大量作品，但从未特别出名。最终她移居英格兰，嫁给了诗人特德·休斯，并生了两个孩子。她出版了一本诗集，但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沮丧。1963年，休斯为另一个女人而离开她之后，普拉斯选择了自杀。她去世几年后，她创作的所谓的忏悔诗歌集《阿里尔》（*Ariel*）得以出版并广受赞美和追

捧。同样在她去世后出版的小说《钟形罩》也成了经典之作。而麻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那些在普拉斯去世后成为她的崇拜者的人们相信自己对导致她自杀的苦难有独特的见解，他们责备特德·休斯是罪魁祸首。休斯的名声糟糕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普拉斯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休斯为了另一个女人而离开，留她独自在异国生存，除了两个还很年幼的孩子，没有其他亲人在身边。作为情感激烈的诗歌《阿里尔》的作者，普拉斯后来成了女权主义者中的幽灵明星，这意味着大量的愤怒指向了休斯。鉴于此，休斯和他的姐姐奥尔文（Olwyn）在决定为普拉斯写传记的人选时非常谨慎小心，他们会通过控制传记作者从普拉斯尚未发表的作品中引用哪些内容来控制传记的写作。

马尔科姆对整个案件的兴趣源于他们选择了安妮·史蒂文森（Anne Stevenson）为传记作者。马尔科姆说她在密歇根大学时就认识史蒂文森了。上过同一所大学激起了她的好奇心，而且在史蒂文森身上，她似乎不仅看到了与自己的一些相似之处，还看到了一个自己曾经想要成为的人的样子。

有一次我在街上走着，有人指着她让我看：一个苗条、漂亮，看起来有点笨拙紧张，但是充满激情的姑娘，她正打着手势，周围都是些表情专注的男孩。那时候我非常倾慕艺术气息，而安妮·史蒂文森就是我想象中闪耀着特别的夺目光彩的人物之一。[\[45\]](#)

然而，史蒂文森写的普拉斯传记《苦涩的名声》（*Bitter Fame*）遭到了严重的批判。史蒂文森在一篇显眼的作者序言中再三表达了对奥尔文·休斯的感激之情，还暗示休斯在手稿发表之前已经读过、评价过，甚至是要要求修改过书中的内容。这被视为对史蒂文森身为传记作者的正直和诚实的攻击，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避免让委托人在手稿出版前看到其中内容能保证传记更加客观。马尔科姆对这本书也有疑

虑，但她的疑虑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别。她发现自己对身为传记作者的史蒂文森似乎是被命令采取的明智姿态感到厌恶。包括一位真的很讨厌普拉斯的人在内的一些受访者在书中根据自己与普拉斯相处的经历发表了意见，与他们提供的内容相比，史蒂文森遵从仔细权衡证据的必要性而写出的东西显得很乏味。

这种对基于个人经历的更坚定的声音的偏好让马尔科姆开始同情休斯和他的姐姐。她发现了休斯写给这段传奇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的书信，休斯在信中愤怒地抱怨他们将他的个人经历转变为某种“官方历史——好像我是一张墙上的照片，或西伯利亚的某个囚犯一样”。

[46] 马尔科姆觉得这很有说服力，尽管她还认为这个故事中的许多人物在描述自己体会过的普拉斯的性格时都带着值得怀疑的动机，但她依然表示认可休斯的说法。这本书在结尾处完全推翻了可以被称为普拉斯故事中一位关键证人的观点。我不会告诉你这个人是谁；你应该自己去读这本书。对此，马尔科姆的观点依然是你不需要相信任何人，不需要带着她曾在两个不同的上下文环境中提到的“单调的平静”接受任何人对事实的断言。

但是在这篇文章中，马尔科姆对自己作了一个小小的披露。她去拜访了批评家阿尔·阿尔瓦雷斯（Al Alvarez），他是普拉斯最后的朋友之一。阿尔瓦雷斯先是和蔼可亲地与她谈论了五十年代在汉娜·阿伦特家举办的聚会，然后解释了自己不觉得普拉斯有吸引力的原因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太“高大”了：

我明白他想说的什么，这让我感到不舒服。阿尔瓦雷斯认为我是那些可能被邀请参加汉娜·阿伦特在五十年代举办的聚会的人，这是种恭维，但并不正确（我怀疑那时我是否知道汉娜·阿伦特是谁），所以他现在令人苦恼地将我误认为是一个能够毫无痛苦地听他讨论他认为没有吸引力的女性的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因为没有人知道她是犹太人而被默默地包含到一段反犹谈话中的犹太人一样。[47]

这里体现了一丝明显的女权主义思想，明确表达了对男性之间，甚至是男性与其他女性谈论女性的方式的不满。这是一个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出现在马尔科姆作品中的主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了那篇长篇批评文章之后，她对女权主义的态度已经渐渐改变了。她还结交了一些女性作家朋友。马尔科姆甚至和桑塔格有点接触，但交情不深。1998年桑塔格再次患病时，马尔科姆给桑塔格写了一封短笺：

“午饭的时候我没有表达清楚，在这里我还是要尽力尝试说明白，我为你不得不经历的一切深感难过，我非常钦佩你，我也非常感谢你写出《疾病的隐喻》。”^[48]

像迪迪翁一样，马尔科姆也会成为诺拉·埃夫龙的朋友，并逐渐对她的作品，特别是散文感到一种深深的共鸣。女权主义是她们常年谈论的主题之一。在埃夫龙人生的晚期，她们两个人都会成为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她们会重读《金色笔记本》（*The Golden Notebook*），只是为了看看它到底是关于什么的。

在作为记者和批评家的人生经历中，马尔科姆似乎注意到了这个世界是如何对待聪明、有能力、有见识的女性的。1986年，她发表了一篇英格丽德·西奇（Ingrid Sischy）的传略，题为《时代精神的女孩儿》（*A Girl of the Zeitgeist*）。这篇文章是在马森最初提起诉讼的那段时间里完成的。文章的主题之一就是——一个严肃的女人如何一直努力在一群严肃的男人的否定中开辟自己的道路。有一次，西奇告诉马尔科姆说她曾经在午餐时遇到过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对西奇不太感兴趣，因为他不喜欢她的样子。马尔科姆立刻把自己想象成了那个男人：

在看到《艺术论坛》（*Artforum*）从一本没有生命、暧昧不明的杂志变成一本属于疯狂、自信的当代人的杂志之后，人们只能想象它的编辑一定属于某种惊人的现代风格，具有某种被释放到世界中的令人诧异的新女性的感知力。这让我已经想好了如何写这篇关于她的文章。然而此时走

进我家中的，是一个讨人喜欢、聪明、谦逊、有责任心、有职业道德的年轻女性，她身上没有一丝我确信将会看到的夸张做作的感觉，所以就像午餐时的那位政客一样，我明显失望地转过身去。[\[49\]](#)

女人对彼此的期望，我们把对方设想成什么样子的方式，让我们充满希望，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希望破灭的时刻：这似乎是成为一个会思考，并公开谈论思考的女人的本质。

[\[1\]](#) *In the Freud Archives* (Knopf, 1983) , 35.

[\[2\]](#) *In the Freud Archives* (Knopf, 1983) , 133

[\[3\]](#) “Janet Malcolm, The Art of Nonfiction No. 4, ” 接受Katie Roiphe采访, *Paris Review*, Spring 2011。

[\[4\]](#) “A Star Is Borne, ” *New Republic*, December 24, 1956.

[\[5\]](#) “Black and White Trash, ”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 1957.

[\[6\]](#) James F. Hoyle写给编辑的信, *New Republic*, September 9, 1957。

[\[7\]](#) 《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导演和编剧。

[\[8\]](#) Hal Kaufman写给编辑的信, *New Republic*, September 30, 1957。

[\[9\]](#) “D. H. Lawrence and His Friends, ” *New Republic*, February 3, 1958.

[\[10\]](#) 诺曼·梅勒写给编辑的信, *New Republic*, March 9, 1959。

[\[11\]](#) “Children’ s Books for Christmas, ” *New Yorker*, December 17, 1966.

[\[12\]](#) “Children’ s Books for Christmas, ” *New Yorker*, December 14, 1968.

[\[13\]](#) “Help! Homework for the Liberated Woman, ” *New Republic*, October 10, 1970.

[14] “No Reply, ” *New Republic*, November 14, 1970.

[15] “About the House, ” *New Yorker*, March 18, 1972.

[16] 出自《黛安娜和尼康》前言 (Aperture, 1997) 。

[17]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Pa. , ” *New Yorker*, August 6, 1979.

[18] “Artists and Lovers, ” *New Yorker*, March 12, 1979.

[19] 哈罗德·品特 (Harold Pinter), 英国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他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剧作家之一, 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代表作有《生日聚会》 (*The Birthday Party*)、《归家》 (*The Homecoming*)、《背叛》 (*Betrayal*) 等。

[20] “The One-Way Mirror, ” *New Yorker*, May 15, 1978.

[21] *Psychoanalysis: 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 (Knopf, 1977) , 47.

[22] Joseph Adelson, “Not Much Has Changed Since Freud, ”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81.

[23] *Psychoanalysis*, 110.

[24] *Psychoanalysis*, 41.

[25] *Psychoanalysis*, 38.

[26] <https://www.salon.com/2000/02/29/malcolm/>.

[27] <https://www.salon.com/2000/02/29/malcolm/>., 163.

[28] 珍妮特·马尔科姆写给编辑的信, *New York Times*, June 1, 1984.

[29] 参见, 例如: Robert Boynton, “Who’ s Afraid of Janet Malcolm? ” *Mirabella*, November 1992, 可见于 http://www.robertboynton.com/articleDisplay.php?article_id=1534.

[30] “Janet Malcolm, *The Art of Nonfiction* No. 4.”

[31] *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 (Vintage, 1990) , 3.

[32] 我记得马尔科姆是在2011年9月30日与Ian Frazier一起参加《纽约客》节时说这番话的。

[33] *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 3.

[34] Albert Scardino, “Ethics, Reporters, and the New Yorker, ”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89.

[35] Ron Grossman, “Malcolm’ s Charge Turns on Itself, ” *Chicago Tribune*, March 28, 1990.

[36] David Rieff, “Hoisting Another by Her Own Petard, ”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1, 1990.

[37] Nora Ephron in t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July 1, 1989.

[38] Jessica Mitford in t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July 1, 1989.

[39] John Taylor, “Holier Than Thou, ” *New York*, March 27, 1989.

[40] David Margolick, “Psychoanalyst Loses Libel Suit Against a New Yorker Reporter, ”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 1994.

[41] “Janet Malcolm, *The Art of Nonfiction* No. 4.”

[42] “The Morality of Journalism,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1, 1990.

[43] *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 159–60.

[44] 参见*New Yorker*, July 11, 1994上这个标题的文章。

[45] *The Silent Woman: Sylvia Plath and Ted Hughes* (Vintage, 1995), 13.

[46] 特德·休斯写的书信，转引自 *The Silent Woman*, 53。

[47] 特德·休斯写的书信，转引自 *The Silent Woman*, 48.

[48] 珍妮特·马尔科姆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日期为1998年10月3日，in the Susan Sontag Archive at UCLA。

[49] “A Girl of the Zeitgeist,” *New Yorker*, October 20, 27, 1986.

后记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用了很多时间来思考一个问题：当人们用锐利来形容这些女性时，他们究竟想表达什么。很多人将它用作一种褒奖，但同时又显露出一种隐隐的惧怕。毕竟，锐利的东西是可以伤人的。对这个问题思考越多，我越觉得当人们给这些女性贴上诸如锐利、刻薄或黑暗夫人之类隐含不祥之意的标签时，他们往往是对这些女性具有一种幻想的。这种幻想让他们认定这些女性都是具有毁灭性、充满危险、善于狡辩的，好像知识分子生活是某种哥特小说似的。

然而这些女性根本不是这样的。她们不总是对的，但也不会犯比她们应该犯的更多的错误，而且有些时候，她们恰恰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困难就在于，人们对不“和善”的女性总是感觉难以接受，因为她们不会屈服，因为她们敢于在公众面前偶尔犯错。

这些女性还都倾向于不去追求那个可能是唯一认清了这种困境的运动对她们的认可。玛丽·麦卡锡去世几年前曾经在旧金山对一群人说“我不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不过后来她改变了说法。

我认为，我这一代人中的那些杰出女性确实因为女性作为一个整体被轻视这个事实而获利了——尽管她们并不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男性〕发现了一个不该被轻视的女性，他们就会把她捧到可能比她实际应得的更高一些的高度。我的女权主义意识至少强烈到足以让我不喜欢“她拥有男性一样的思维”这种所谓的赞美。我一直非常厌恶这种说法。[\[1\]](#)

认为某一个人比其他人都强并不是一种有姐妹情的想法。我在为这本书做研究的过程中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数量还不少的一种人。他们之所以想要将这些女性从历史中抹去正是因为她们虽然利用了自己的天赋，却没有利用这样的天赋为女权运动提供支持。这些人将这一点视为不可原谅的背弃信仰。

最著名的此类指责出自桑塔格的老对手，艾德丽安·里奇之口。当里奇读了阿伦特完成的最后几部著作之一的《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时，她感到既着迷又失望：

读到一位心灵广阔、知识渊博的女性写出的这样一本书让人感到痛心，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受男性意识形态滋养的女性思维。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损失，因为阿伦特渴望解析的深层道德问题正是我们需要关切的问题……男性意识形态控制这样一个女性思维，以及将这个女性思维从包含它，同时也被它包含的女性身体中割离的能力在阿伦特这本高傲但残破的作品中表现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令人触目惊心。^[2]

鉴于阿伦特直到去世都没有改变过反对女权主义的立场，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公平的。阿伦特几乎没有就性别问题发表过任何意见，起码比本书中其他女性人物就此发表的都少得多。她对同时期的女权主义者的轻视甚至是非常尖刻的。我的一位教授，珍妮弗·内德尔斯基（Jennifer Nedelsky）是阿伦特的最后一批学生之一，她讲过一个和阿伦特一起坐电梯的故事。当时珍妮弗·内德尔斯基佩戴了一个芝加哥妇女解放联盟（Chicago Women's Liberation Union）的小徽章。阿伦特看看她，又看看小徽章，然后指着徽章，带着浓重的德语口音说道：“这个不严肃。”

帕克、韦斯特、桑塔格、凯尔、埃夫龙和马尔科姆虽然也曾犹豫过，但是她们对于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并没有那么抵触。帕克不是一个严格的妇女参政论者。桑塔格和里奇就女权主义“头脑简单”^[3]的缺点展开过争论。凯尔试图就《她们》提出一种女权主义者的论点，但

当这篇文章被拒绝之后，她似乎也完全抛弃了关于女性解放的话题。迪迪翁后来会在一次采访中否定自己曾经在散文中提到的反对女性解放的观点，称“那篇文章是关于某个特定时刻的”。^[4]马尔科姆如今把自己描述为一名女权主义者，虽然她曾经在《新共和》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并不是这么说的。

在这本书中，我一直在尝试指出，尽管她们看待女权主义的态度非常矛盾，甚至对它怀有敌对情绪，但我们依然能够从某些地方看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信息。没错，女权主义被认为是与姐妹情紧密相关的，但是姐妹之间也会争论，有时甚至会疏远失和。定义我们的不仅仅是共通性。如果我们从关于交叉性的辩论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身为女性”的经历会受到种族、阶级和其他社会标记的深刻影响。

这种经历同时还会受到个体性格的影响。我们之中有些人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服从一项社会运动对其参与者提出的服从的要求。我们之中还有些人习惯于置身事外，她们总是忍不住要问：“但是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是这个样子？”

阿伦特在写到拉埃尔·瓦恩哈根时曾经说：“当你孑然一身时，你会发现判定与众不同应该被算作瑕疵还是卓越是一件很难的事。当你找不到任何事来支撑你时，你最终会选择抓紧那些让你与其他人不同的东西。”^[5]阿伦特的论点是与众不同是一种卓越，她的结论是正确的。

你只能用你获得的声音说话，而且你获得的这种声音的音质和音调是由你所有的经历决定的。有些经历不可避免的是关于身为女性这件事的。我们不得不接触彼此，不得不接受我们之前已经存在的历史。你可以开辟你自己的人生航线，但是你永远要受制于其他人形成的水流和漩涡，不管你对他们有多喜欢或多讨厌、有多认可或多反对，也不管你有多么希望自己能够逆转整个潮流。

这绝对是这本书中的那些女性不得不接受的教训。

[1] 1985年10月，玛丽·麦卡锡参加在旧金山举办的City Arts and Lectures时作的演讲，转引自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710。

[2] Adrienne Rich, “Conditions for Work: The Common World of Women, ” in *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Norton, 1979) .

[3] Adrienne Rich and Susan Sontag, “Feminism and Fascism: An Exchange,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0, 1975.

[4] 接受Christopher Bollen采访，日期不详，可见于
http://www.christopherbollen.com/archive/joan_didion.pdf。

[5] Arendt, *Varnhagen*, 218.

参考资料说明

我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书籍。直接引用的内容已在注释中列明出处。如果没有之前其他传记作者的作品，我就不可能创作出这本书。那些作品是整理本书的年表所必需的参考，我是在之前作品的成果基础上撰写此书的。我在参考书目列表中列明了我构建本书年表的过程中参考的传记和二手资料来源，无论我是否在本书中直接引用了其中的内容。

鉴于本书研究的是这些女性在她们的作品中的人格面具，所以我依据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她们公开发表的内容，但我也参考了书信集，并偶尔查阅过档案，尝试为其他传记作者没有彻底探明的个别问题寻找一些答案。

虽然我并没有将本书创作成此处涉及的任何女性人物的完整传记，但是我有幸在2014年简短采访了珍妮特·马尔科姆，并于2015年在就自己的研究成果做报告时遇到了雷娜塔·阿德勒。她们当时表述的内容也被写入了本书。

参考资料

Valerie Boyd, *Wrapped in Rainbows: The Life of Zora Neale Hurston* (Simon and Schuster, 2004) .

Carol Brightman, *Writing Dangerously: Mary McCarthy & Her World* (Clarkson Potter, 1992) .

Richard Cohen, *She Made Me Laugh: My Friend Nora Ephron* (Simon & Schuster, 2016) .

Tracy Daugherty, *The Last Love Song: A Biography of Joan Didion* (St.Martin' s, 2015) .

Lorna Gibb, *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Rebecca West* (Counterpoint, 2014) .

Victoria Glendinning, *Rebecca West: A Life* (Knopf, 1987) .

Robert Gottlieb, *Avid Reader: A Lif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6) .

Anne Heller, *Hannah Arendt: A Life in Dark Times* (New Harvest, 2015) .

Dorothy Herrmann, *With Malice Toward All: The Quips, Lives and Loves of Some Celebrated 20th-Century American Wits* (Putnam, 1982) .

John Keats, *You Might As Well Live: The Life and Times of Dorothy Parker*. (Simon & Schuster, 1970) .

Brian Kellow, *Pauline Kael: A Life in the Dark* (Penguin, 2011) .

Frances Kiernan, *Seeing Mary Plain: A Life of Mary McCarthy* (Norton, 2000) .

David Laskin, *Partisans: Marriage, Politics, and Betrayal Among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Marion Meade, *Dorothy Parker: What Fresh Hell Is This?* (Penguin, 1989) .

Nancy Milford, *Zelda: A Biography* (Harper Perennial, 2001) .

Virginia Lynn Moylan, *Zora Neale Hurston's Final Decad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2) .

Carl Rollyson, *Rebecca West: A Life* (Scribner, 1996) .

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 *Susan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 (Norton, 2000) .

Daniel Schreiber, *Susan Sontag: A Biograph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Reuel K. Wilson, *To the Life of the Silver Harbo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8) .

Ben Yagoda, *About Town: The “New Yorker” and the World It Made* (Da Capo, 2001) .

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the Love of the World*, 2nd 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英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bel, Lionel, 89, 114, 137, 138

Abzug, Bella, 168

Acocella, Joan, 23–24

Adams, Franklin P., 103

Adler, Renata.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ppearance of, 263–264

Arendt and, 266–267

awards and honors, 267, 276

background, 263, 270, 271

characteristics, 263

colleagues' opinions of, 268, 269, 273–274

Gopnik and, 279

Gottlieb and, 279

Kael and, 260–263, 272

McCarthy and, 263–264, 275

media reporting of falsehoods and, 277–278, 279, 281

New Yorker and, 262, 264–266, 269–271, 276

New York Times and, 262, 271–275, 280–281

ostracization of, 280–283

Podhoretz and, 267–268

suit against *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 276

Vanity Fair and, 276

Adorno, Theodor, 82

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 (Mailer) , 141

Against Interpretation (Sontag) , 158–159, 160, 190

“Against Interpretation” (Sontag) , 158

Against Our Will (Brownmiller) , 220

Ainslee’s, 14

Aitken, William Maxwell (Lord Beaver-brook) , 50

Algonquin Round Table

beginning of, 11

Kael and talents at, 198, 199

members, 14, 23

West and, 48

women at, 11-12

Allen, Woody, 202, 208-209, 223-224

Alvarez, Al, 307

Andrews, Henry, 50, 52, 54, 55

Ann Veronica (Wells) , 32

anti-Semitism. *See also* Nazism

Arendt and, 66, 75, 76, 86

in France, 80-81

Heidegger and, 70, 76

in US, 83

“Any Porch” (Parker) , 5-6

Arbus, Diane, 169

Arendt, Hannah.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dler and, 266–267

on aims of Varnhagen biography, 72

anti-Semitism and, 66, 75, 76, 86

arrest by Nazis, 76–77

background, 66, 67

“banality of evil, ” 133–134

on *The Benefactor*, 146

on Benjamin’ s suicide, 81

biography of Varnhagen, 71–74, 75, 311

Arendt, Hannah (*continued*)

Blücher and, 78–79

characteristics, 66–67, 137–139

on collaboration with Nazis, 70

colleagues’ opinion of, 89–91

“conscious pariahs, ” 73–74, 84, 128

death, 253

difficulty writing in English, 85

on distinction of being Jewish, 73–74

early newspaper articles, 82–84

essays on existentialism, 85–86

feminism and, 74–75, 310–311

Heidegger and, 65, 68–69, 71, 76

internment camp in France, 80–81

on Kazin, 120

living conditions in US, 82

marriage, 71, 78

McCarthy and, 118–121, 138, 253–254

Partisan Review and, 85, 86, 90–91, 137

political theory of, 127–131

relationship between good and evil, 86

reputation, 131

school desegregation and, 127–128, 129–131

Sontag and, 267

Arendt, Martha, 66, 76, 77

Arendt, Paul, 66

Arlen, Alice, 251

Atlantic Monthly, 45-46, 54, 189-190, 275

“At Valladolid” (West) , 39

Aufbau, 82

auteurist theory, 184-186, 200

“A Woman’ s Beauty: Put-Down or Power Source? ”
(Sontag) , 170

Axel’ s Castle (Wilson) , 109

Baldwin, James, 131

“banality of evil, ” 133-134, 135-137

Barringer, Felicity, 280-281

Barthes, Roland, 150

Battleaxe, 100

Beatty, Warren, 260

Beaverbrook, Lord (William Maxwell Aitken) , 50

Behrman, S.N. , 263

Bell, Vanessa, 31

Bellow, Saul, 120, 138–139

Benchley, Robert, 11, 13–14, 23, 123, 124

The Benefactor (Sontag) , 145, 146, 155

Benhabib, Seyla, 73

Benjamin, Walter, 79–80, 81, 82, 150

Berlin, Isaiah, 105

Bernays, Edward, 4

Bernstein, Carl, 227–230, 250–252

“Big Blonde” (Parker) , 25

“The Big Rock Candy Figgy Pudding Pitfall” (Didion) ,
212–213

The Birth of a Nation, 287

Bishop, Elizabeth, 85, 100, 145

Bitter Fame (Stevenson) , 306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West) , 53–55, 56

Blücher, Heinrich, 78–79, 80, 82, 86–87, 253, 266–267

Bogdanovich, Peter, 200–201

Bonnie and Clyde, 193–194

A Book of Common Prayer (Didion) , 221, 222

“Book Reviewing and Everyone I Know” (Podhoretz) ,
267–268

Books, 103

Botsford, Gardner, 294

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 (Lessing) , 220

Broadwater, Bowden, 116, 119

Brooks, Louise, 195

Broughton, James, 179

Brownmiller, Susan, 220, 246

Buchman, Sidney, 189

Buckley, William F., 163

Burke, Billie, 13

Burke, Kenneth, 152

Burroughs, William S., 141

Caesar’s Wife (Maugham) , 13

camp, 156–157, 158, 197

Campbell, Alan, 27, 123, 126

Canetti, Elias, 150

Cannibals and Missionaries (McCarthy) , 254

Castle, Terry, 158, 173–174

Cavett, Dick, 237, 256

Chaplin, Charlie, 179

Charade, 210

Chase, Edna Woolman, 7, 205

Chicago Tribune, 44, 161, 301

The Children's Hour (Hellman) , 255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15–216

Cinema Guild, 181–182

“Circles and Squares” (Kael) , 184, 185–186, 187

Citizen Kane, 197–201

City Lights, 179

civil rights, 59–61, 126–127

Clarion, 40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302

Commentary, 127, 136–137

Communism

Blücher and, 78

Cowley as “megaphone for, ” 101

Hellman and, 255

McCarthy and, 104–105, 106

Parker and, 122–123

Partisan Review and, 84

Rahv and, 106

similarities to Fascism, 57–58

Sontag accused of favoring, 163

in US, 84–85

The Company She Keeps (McCarthy) , 94–95, 97, 113, 116,
140, 141–142, 219

Condé Nast, 278

“conscious pariahs”

African Americans as, 129–131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and, 86

Phillips and Rahv as, 84–85

refugees in US as, 84

Varnhagen as among, 73–74, 128

Con Spirito, 100

Constant Reader, 23–24

Cosmopolitan, 238–239

Cowley, Malcolm, 101, 103, 113

Crazy Salad (Ephron) , 244

“Crisis in Education” (Arendt) , 130

Crowninshield, Frank, 3–6, 9, 10

Crowther, Bosley, 233

“Dealing with the uh, Problem” (Ephron) , 246

Dean, John, 281

Death Kit (Sontag) , 160–161

Democracy (Didion) , 225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Hilberg) , 136

Diana and Nikon (Malcolm) , 293

The Dick Cavett Show, 256

Didion, Eduene, 204

Didion, Frank, 204

Didion, Joan.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llen and, 223–224

awards and honors, 204–205

background, 204

characteristics, 203

children, 213

Ephron and, 245

essays after *Saturday Evening Post* folded, 217–218

fame, 216, 217, 224–225

feminism and, 311

filmmaking, 221

Gurley Brown and, 239–240

Kael and, 203, 208, 222–223, 224

Kauffmann and, 222-223

literary persona, 216-217

marriage, 209

Didon, Joan (*continued*)

McCarthy and, 219, 224-225

National Review and, 206-208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nd, 208-209, 222-223, 227-228

personal columns, 218

Saturday Evening Post and, 211-215

second wave of feminism and, 218-221, 245-246

sources of writers' material, 233-234

discrimination. *See* racism

Dissent, 127-129

Donoghue, Denis, 173

Dos Passos, John, 255

Dukakis, Michael, 227

Dunne, John Gregory

filmmaking, 221

Kael and, 202, 203

marriage, 209

Saturday Evening Post column, 214

in writings of Didion, 213

Dunne, Quintana Roo, 213

Dupee, Fred, 144

Duras, Marguerite, 182–183

“The Duty of Harsh Criticism” (West) , 41–42

Earle, Willie, 59–61

Eckford, Elizabeth, 126–127

Eichmann, Adolf, 132–136

Eichmann in Jerusalem (Arendt) , 134–138

Eisenhower, Julie Nixon, 237, 248

Eissler, Kurt, 297

Ellison, Ralph, 129–130

El Salvador, 225–226

Encounter, 138

Enough Rope (Parker) , 18–19

Ephron, Henry, 230–231, 233, 249

Ephron, Nora.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rticles for women' s magazines, 238–239

background, 230–231, 233–234

characteristics, 237

death, 259

Didion and, 245

Esquire and, 249–250

fame, 249

feminism and, x , 240–241, 242–248, 311

Gurley Brown and, 238–239, 240

Hellman and, 258–259

Malcolm and, 302, 308

marriages, 227–230, 250–252

at *Newsweek*, 234

Parker and, 230

as reporter, 235-237

reputation as social critic, 237

as screenwriter, 251

writing in first person, 241

Ephron, Phoebe, 230-233, 249

Epstein, Barbara, 140, 169

Epstein, Jason, 140

Esquire

Didion and, 218

Ephron and, 239, 241-247, 249-250

Kael and, 200

Parker and, 124-125, 126

Sontag and, 162, 164

Evergreen Review, 158

Everywoman delusion, 219, 221

existentialism, Arendt's essays on, 85-86

Fairfield, Charles, 34–35

Fairfield, Cicely Isabel. *See* West, Rebecca

Fairfield, Isabella, 34

“Fantasies of the Art-House Audience” (Kael) , 182

“Farewell to the Enchanted City”

(“Goodbye to All That, ” Didion) , 205, 213–214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58–159

“Fascinating Fascism” (Sontag) , 170–171

Fascism, 57–58, 90. *See also* Nazism “A Feast for Open Eyes” (Sontag) , 190

feminism. *See also* suffragettes

Arendt and, 74–75, 88–89, 120–121 310–311

defiance of gendered expectations, i x–x

Didion and, 218–221, 245–246, 311

Ephron and, x, 240–241, 242–248, 311

Kael and, 185–186, 188–189, 311

Malcolm and, 290–291, 307–308, 311

McCarthy and, 120–121, 309–310

Millett and, 168, 292

Parker and, 19–20

Phoebe Ephron and, 231

psychoanalysis and, 294

sexism in journalists' assignments, 217

sexism in reviews of Didion' s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215–216

sexism of auteur critics, 185–186

Sontag and, x, 151, 167–169, 170–171, 311

Vanity Fair and, 4–5

Wells as supporter, 32

West and, x, 54

women in war and, 45–46

Ferber, Edna, 12

“A Few Words About Breasts” (Ephron) , 241–242

Film Culture, 184–185

Final Solution, 132–133, 135–137

The Fire Next Time (Baldwin) , 131

Firestone, Shulamith, 219, 221

Fitzgerald, Ellen, 44

Fitzgerald, F.Scott, 15-18, 20-21

FitzGerald, Frances, 164-165

Fitzgerald, Zelda, 17

“The Flapper” (Parker) , 15

Fornés, María Irene, 155

“Forty-One False Starts” (Malcolm) , 305

Franny and Zooey (Salinger) , 207-208

Freewoman, 31, 32, 36

Fresno Bee, 214

Freud, Anna, 297

Friedan, Betty, 244

Gardiner, Muriel, 258

Gellhorn, Martha, 257, 258

Germany, Nazi

Final Solution, 132-133, 135-137

intellectuals and, 77

mass self-deception and delusion, 134

Nuremberg trials, 132-133

takeover, 75-76

West on, 56-57

Germany between World Wars, 70-71

Gilliatt, Penelope, 271

“A Girl of the Zeitgeist” (Malcolm) , 308

Gone: The Last Days of the “New Yorker” (Adler) , 279-
281

“Goodbye to All That” (“Farewell to the Enchanted
City, ” Didion) , 205, 213-214

Gopnik, Adam, 279

Gordon, Ruth, 108

Göring, Hermann, 57

Gottlieb, Robert, 279, 280

Grant, Jane, 11-12, 23

The Great Gatsby (Fitzgerald) , 18

Green, Aaron (pseud) , 295–296

Greenburg, Dan, 250, 252

The Group (McCarthy) , 99, 139–140, 142–145, 219

The Group (movie) , 189

Guccione, Bob, 248

Gurley Brown, Helen, 211, 212, 238–240, 249

Hale, Ruth, 11–12, 48–49, 50

Hardwick, Elizabeth, 96, 140–141, 142–143, 188

Harper' s, 140–141, 156, 196, 281

Harriet Hume (West) , 45

Harrison, Barbara Grizzuti, 224

Hayes, Harold, 124, 164

Heartburn (Ephron) , 229–230, 252

Heidegger, Martin

anti-Semitism of, 70, 76

Arendt and, 65, 68–69, 71, 77

as Nazi, 76, 77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al approach, 67–68

Heilbrun, Carolyn, 161–162

Hellman, Lillian, 255–258

Hemingway, Ernest, 20–23

Here to Stay: Studies in Human Tenacity (Hersey) , 264

Hersey, John, 264

Hess, Rudolf, 56–57

Hilberg, Raul, 136

Hillis, Marjorie, 5

Hiroshima Mon Amour, 182–183

Holiday, 206

homosexual community and camp, 158

Hook, Sidney, 127

Horan, Robert, 178

Houseman, John, 199

“How Can I Tell Them There’ s Nothing Left? ”
(Didion) , 211

Howe, Irving, 129–130

How I Grew (McCarthy) , 110

“How It Feels to Be Colored Me” (Hurston) , 61–62

Hughes, Olwyn, 305, 306

Hughes, Ted, 305, 306

The Human Condition (Rich) , 310

Hurston, Zora Neale, 61–62, 64

Husserl, Edmund, 70

Illness as Metaphor (Sontag) , 172

I Lost It at the Movies (Kael) , 188, 189–191

Imaginary Friends (Ephron) , 258–259

In America (Sontag) , 154

In Our Time (Hemingway) , 20

intellectual history, twentieth century

chronicled through male lens, x i

chronicled through white lens, 62

contempt for women as intellectuals, 168–169

cultural outlaws in, 157

homme de lettres, 79–80

justification of pleasure from art, 158, 197

in Nazi Germany, 77

Partisan Review “What’ s Happening in America”
symposium, 163

power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87

second-wave feminist movement and, 167, 218–221

women in, 88–89

“Interior Desecration” (Parker) , 8

In the Freud Archives (“Trouble in the Archives, ”
Malcolm) , 298–300

“Is There a Cure for Film Criticism? ” (Kael) , 184

Jackson, Shirley, 126

James, Alice, 172

James, Henry, 43–44, 172

Jarrell, Randall, 79, 85, 145

Jaspers, Karl, 69, 70

Jews and Judaism

Arendt' s loyalty to Jews, 137-138

Final Solution, 132-133, 135-137

Varnhagen' s identity and, 73

Johnsrud, Harold, 98, 104

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 (Malcolm) , 300-302, 303-
304

Joyce, William, 56

The Judge (West) , 45

“Just a Little One” (Parker) , 30

Kael, Gina James, 179, 191

Kael, Pauline.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dler and, 260-263, 271, 272

background, 177-178

Bogdanovich and, 200-201

characteristics, 176-177, 180, 182, 183-184, 201-202,
208

colleagues' opinion of, x i

daughter, 179, 191

death, 262

Didion and, 203, 208, 222–223, 224

Dunne and, 202, 203

feminism and, 185–186, 188–189, 311

feud with editors of *Movie*, 186–187

feud with Sarris, 185–186, 187

first movie review, 179, 180

Guggenheim fellowship, 187–188

in Hollywood, 260

last long essay, 196

marriage, 181–182

McCall's and, 191–192

on McCarthy's Meg Sargent, 112

movies as fun, 194

New Yorker and, 193–196, 197–201, 260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nd, 175–176, 188

Segal and, 240

sexism of auteur critics and, 185–186

Sontag and, 177, 188, 190

“The Kane Mutiny” (Bogdanovich) , 200–201

Kasabian, Linda, 221–222

Kauffmann, Stanley, 192–193, 222, 223

Kaufman, Hal, 287–288

Kazin, Alfred, 89, 116, 120, 216–217

Kees, Weldon, 180

Kellow, Brian, 178, 187, 202

Kennedy, Anthony, 302

Kierkegaard, Søren, 67

Kirchwey, Freda, 102

Kiss Kiss Bang Bang (Kael) , 195

Koch, John, 126

Kracauer, Siegfried, 184

Kristol, Irving, 268

The Ladies of the Corridor (Parker) , 123

Landberg, Edward, 181–182

Lawrence, D.H. , 51

Lehmann-Haupt, Christopher, 301

Leonard, John, 172, 262

Lessing, Doris, 219–220

Liddy, G.Gordon, 281

Life, 16–17, 189, 216

The Life of the Mind (Arendt with McCarthy) , 254

Limelight, 179

literary history, twentieth century

access journalism, 227

beat poets, 125

camp in, 156–157, 197

chronicled through male lens, x i

evolution of magazines, 4

exploitation of subjects by journalists, x i – x ii

fiction as pinnacle of achievement, 115

film criticism, 183–184

“I” of journalism, 241, 303–304

New Journalism, 64

Parker’ s hate songs, 8

sexism of auteur critics and, 185–186

use of metaphors, 172–173

writing as sensual, 158

“literary Rotarians, ” 24

Little Rock (AK) Central High School, integration of,
126–127

Living Age, 45

Locke, Richard, 276

“Lolita” (Parker) , 123

Los Angeles Times, 88, 159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Arendt) , 70

Love Story (Segal) , 240

Lowell, Robert, 135, 140, 254

Lumet, Sidney, 189

Lyons, Leonard, 235

MacArthur, Charles, 20

Macdonald, Dwight, 90, 106, 156, 178, 187

MacDonald, Jeffrey, 300–301

Maddocks, Melvin, 215–216

Mademoiselle, 156, 204–205, 206, 267

Maier-Katkin, Daniel, 67

Mailer, Norman, 112, 141–142, 168, 172, 257, 272, 288

Malcolm, Anne Olivia, 289

Malcolm, Donald, 286, 288–289, 291, 292

Malcolm, Janet.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rendt and, 89

background, 285–289

child, 289

colleagues' opinion of, x i – x ii

Diana Trilling and, 288

Ephron and, 302, 308

feminism and, 307–308, 311

Malcom (misspelling) , 290

marriages, 288, 294

Masson and, 284–285, 296–300, 302, 303

McGinniss and, 300–302, 303–304

New Republic and, 286–287, 290–291

New Yorker and, 289–290, 291–292, 293–303, 305–307

on Parker, 125

Sontag and, 293, 307

Manhattan, 208–209, 224

“The Man in the Brooks Brothers Suit” (McCarthy) , 111–
112

Mankiewicz, Herman, 198–199, 200

Mansfield, Katherine, 58

Marriage (Wells) , 31

Marsden, Dora, 36

Marshall, Margaret, 102, 103, 109

Masson, Jeffrey Moussaieff, 284–285, 296–300, 302, 303

Maugham, Somerset, 13

McCall's, 191-192

McCarthy, Mary.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dler and, 263-264, 275

Arendt and, 118-121, 138

attitude toward men, 111-112

autobiographical nature of fiction, 114-115, 139

background, 93-94, 95-96, 97

on Bellow, 120

Broadwater and, 116

characteristics, 92, 95-96, 105-106

colleagues' opinion of, x i, 96-97, 116

Communism and, 104-105, 106

Diana Trilling and, 96-97

Didion and, 219, 224-225

feminism and, 120-121, 309-310

first review by, 100

Hellman and, 255–258

Mailer and, 141–142

maintenance of image, 93

marriages, 104, 110, 116, 253

mental health, 110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nd, 141, 144

Parker and, 108

as *Partisan Review* drama critic, 107–108

Rahv and, 106–107, 112, 117–118, 119, 157

review of *The Company She Keeps*, 116

review of *Franny and Zooey*, 207–208

review of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90–91

Rosenberg and, 97–98

sexual activity, 98, 104, 106

Sontag and, 147–148, 150–151, 165–166

spread of fame, 116

transit into fiction, 111–113

trip to North Vietnam, 165

Vassar experience, 98–100

West and, 104

Wilson and, 104, 108–111, 114–115

McCollum, Ruby, 63–64

McGinniss, Joe, 300–302, 303–304

McKuen, Rod, 240

Mehta, Ved, 279

Memoirs of an Ex-Prom Queen (Shulman) , 243–244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McCarthy) , 96

Menorah Journal, 83–84

Millay, Edna St. Vincent, 19, 110

Millett, Kate, 168, 292

Milne, A.A. , 23

Mitchell, Juliet, 219

Mitford, Jessica, 302

Mitgang, Herbert, 166

Monocle, 235

Movie, 186–187

“Movies and Television” (Kael) , 193

Ms. , 244

Musmanno, Michael, 135

“My Confession” (McCarthy) , 105

Nabokov, Vladimir, 112

The Naked and the Dead (Mailer) , 141

Naked Lunch (Burroughs) , 141

Nation, 85, 101–104, 141

National Review, 206–207

Navasky, Victor, 235

Nazism. *See also* Germany, Nazi

collaboration with, 70

concentration camps as ultimate instrument, 87

Heidegger and, 69–70

Sontag’ s essay about aesthetics of, 170–171

Soviet totalitarianism and, 88

West on, 56–57

Nedelsky, Jennifer, 310–311

Negro Digest, 62

New Freewoman, 36, 39

Newhouse, S. I. , 278–279

New Leader, 154, 159, 268

New Masses, 28, 103

New Republic

Adler and, 282–283

Donald Malcolm and, 286

Kael and, 192–193

Malcolm and, 286–288, 290–291

McCarthy and, 100–101, 113

racism, 62

Wells and, 41

West and, 41–42, 45

New Statesman, 45

Newsweek, 234

New York, 247–249, 252, 263

New Yorker

Adler and, 262, 264–266, 269–271, 276, 277–278, 282

Arendt and, 133, 134

Baldwin in, 131

Donald Malcolm and, 288

founded, 23

Kael and, 193–196, 197–201, 260

Malcolm and, 289–290, 291–292, 293–303, 305–307

McCarthy' s fiction in, 114–115

Parker' s contributions, 22, 23–24, 123

racism, 62

Shawn firing, 278–280

West and, 55–58, 59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54–55, 113

New York Post, 235–237

New York Radical Women, 167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dler' s contributions, 260–261, 267–268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continued*) Didion' s
contributions, 208–209, 222–223, 225–226, 227–228

FitzGerald and, 164–165

founded, 140

McCarthy and, 141, 144, 165

philosophy of, 140–141

review of Sontag' s essay “Fascinating Fascism, ”
170–171

reviews of *The Group*, 141, 142–144, 175–176

New York Times

Adler and, 262, 271–275, 280–281

Arendt and, 135

Hellman lawsuit against McCarthy, 256–258

Hurston and, 62

Kael and, 191, 199

Malcolm and, 301

Marshall and, 103

McCarthy and, 103, 113, 118

review of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215

review of *Three Is a Family*, 233

reviews of West' s books, 54

Sontag and, 146, 156, 161–162, 166, 173

“The Women’ s Movement” (Didion) in, 218–219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37–238

Nin, Anaïs, 51–52

“Notes on ‘Camp’ ” (Sontag) , 156–158, 173–174

Notes on Novelists (James) , 43

“Notes on the Auteur Theory” (Sarris) , 184–185

The Oasis (McCarthy) , 116–118

Observer, 44, 200

Odets, Clifford, 108

O' Hagan, Anne, 5

“Once More Mother Hubbard” (Parker) , 16–17

“The One-Way Mirror” (Malcolm) , 294–295

“Only Disconnect” (Harrison) , 224

On Photography (Sontag) , 169–170

“On Self-Respect” (Didion) , 211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Arendt) , 66, 86–89, 90–91

Orwell, Sonia, 148

“Our Critics, Right or Wrong” (McCarthy and Marshall) , 102–104

Our Town (Wilder) , 108

Over Twenty-One (Gordon) , 108

Pankhurst, Christabel, 35

Pankhurst, Emmeline, 35

pariah. *See* “conscious pariahs”

Paris Review, 6, 19, 24, 49, 257

Parker, Dorothy.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s *Ainslee's* drama critic, 14

Algonquin Round Table and, 11-12

appearance of, 108

attitude toward men, 25-26

awards, 25, 26

background, 1, 2-3

on beat poets, 125

characteristics, 19, 23, 25, 28-29, 30, 92

colleagues' opinion of, 7, 10-11, 29-30, 125

Communism and, 122-123

death, 126

disillusionment with sophistication, 25, 29

Ephron and, 230

Esquire reviews by, 124-125, 126

failure to complete assignments, 26-27

fears of, 24

feminism and, 19-20, 167, 311

fictional versions of, 108

Fitzgerald and, 15–17, 18

Hemingway and, 20–23

marriages, 9, 15, 27, 123

New Yorker and, 22, 23–24, 123

as pianist, 1–2

poetry and, 15–16, 18–19

political activism, 27–29

reputation of, 45

as screenwriter, 26, 198

suicide attempts, 20, 25

use of clichés, 5, 15, 19

Vanity Fair and, 4–6, 7–8, 9–10, 12–14

at *Vogue*, 6–7, 8–9

Parker, Edwin Pond, 9, 15

Partisan Review

Arendt and, 85, 86, 90–91, 137

McCarthy and, 106–108

second incarnation, 84

Sontag and, 155–156, 169–170

“What’ s Happening in America” symposium, 163

The Passionate Friends (Wells) , 39–40

PEN/Hemingway Award, 276

Pentimento (Hellman) , 258

“The Perils of Pauline” (Adler) , 272, 276

The Philadelphia Story, 210

Phillips, William, 84–85, 155

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 (Jarrell) , 145

“Pilgrimage” (Sontag) , 149–150

The Pink Panther, 210

Pitch Dark (Adler) , 275–276

Pittsburgh Courier, 63–64

Plath, Sylvia, 305–307

Plimpton, George, 112

Podhoretz, Norman, 127, 136-137, 267-268

Politics, 178

Portnoy's Complaint (Roth) , 240

The Portrait of a Lady (James) , 43-44

"The Prisoner of Sex" (Mailer) , 168

Pritchett, V.S. , 45

"A Problem of Making Connections" (Didion) , 217-218

Prynne, Xavier (pseud) , 141, 142-143

psychoanalysis, 284-285, 294-300

Psychoanalysis: 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 (Malcolm) , 296

Quinn, Sally, 247-248

racism, 59-60, 60-61, 62, 127-128

Rahel Varnhagen (Arendt) , 71-74, 147

Rahv, Philip

as conscious pariah of Communism, 84-85

Hardwick and, 143

Kael and, 180

McCarthy and, 106–107, 112, 117–118, 119, 157

Raising Kane (Kael) , 202

Reagan, Nancy, 214

Reckless Disregard (Adler) , 278

Reed, Rex, 238

“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 (Arendt) , 127–130

“Résumé” (Parker) , 20

The Return of the Soldier (West) , 44

Reynolds, Debbie, 210

Rich, Adrienne, 170, 171, 310

Richler, Mordecai, 199

ridicule

“literary Rotarians” articles (Parker) , 24

Parker on, as weapon, 28

Parker’ s *New Yorker* reviews, 23–24

social criticism by Crowninshield, 4

by West toward women, 50, 54

Rieff, David, 154, 155, 170, 171, 302

Rieff, Philip, 152, 153–155

Rosenberg, Ethel “Ted, ” 97–98

Rosenblatt, Jack, 148–149

Rosenblatt, Mildred, 148–149

Ross, Harold, 23, 133

Ross, Lillian, 279

Roth, Philip, 162, 240

Rothschild, Dorothy. *See* Parker, Dorothy

Run River (Didion) , 209

Ryan, Meg, 237

Sacco, Nicola, 27

Saint Joan, 287

Salinger, J.D. , 207–208, 212

Salle, David, 305

Sarris, Andrew, 184–186, 187, 199–200

Sartre, Jean-Paul, 85

Saturday Evening Post, 211–215, 217

Saturday Review, 201

Schiff, Dorothy, 235, 236–237

Schocken Books, 87

Scholem, Gershom, 137

Schwartz, Delmore, 89

Scoundrel Time (Hellman) , 257

second-wave feminism, 167, 218–221, 245–248, 290–291

“seduction thesis, ” 284–285, 297

Segal, Erich, 240

Seligman, Craig, 298

sexuality

creativity and, 39–40

Ephron and, 242–243

McCarthy and, 98, 104

Parker and Fitzgerald, 17

“seduction thesis, ” 284–285, 297

Sontag and, 151–152

Wells and, 31, 32, 38

West and, 35

Sexual Politics (Millet) , 168, 292

“The Shadows” (“Die Schatten, ” Arendt) , 65–66

Sharon v. Time, 277–278

sharpness, described, i x – x , x i – x ii , 309

Shawn, William

Adler and, 260, 262, 269, 278

Arendt and, 133

Kael and, 193–196

Malcolm and, 289, 290, 293

Sherwood, Robert, 11

Shulman, Alix Kates, 221, 243–244

Sight and Sound, 182, 184, 191

The Silent Woman (Malcolm) , 305–307

Silkwood, 251

Silvers, Robert, 142, 175, 188, 222, 225, 227

Simpson, Eileen, 92

Sirica, John, 280, 281

Sischy, Ingrid, 308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Didion) , 215–216

Sohmers, Harriet, 151, 152, 155

“Some Dreamers of the Golden Dream” (Didion) , x i ,
211–212

Sontag, Judith, 148, 149

Sontag, Nathan, 149

Sontag, Susan.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ccused of
favoring Communism, 163

Arendt and, 267

background, 148–150, 151, 152

cancer, 171–172

characteristics, 149, 151

colleagues’ opinions of, 162–163

feminism and, x , 151, 167–169, 170–171, 311

as filmmaker, 166–167

Harper's and, 156

Hiroshima Mon Amour and, 182–183

inspirations for, 150

Kael and, 177, 188, 190

Mademoiselle award, 156

Malcolm and, 293, 307

marriage, 152–155

McCarthy and, 147–148, 150–151

as new version of McCarthy, 147, 159, 160

New York Times reviews, 156

in North Vietnam, 164–165

Partisan Review and, 156, 169–170

pleasure in analysis of art, 197

reaction to response to “Notes on ‘Camp, ’ ” 173–174

reputation, 159–160, 161–162, 166

sexuality of, 151–152

Vogue essays, 170

women' s magazines articles, 170

The Sound of Music, 192, 210–21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45

Soviet Russia, 57–58, 88

Speedboat (Adler) , 275–276

The Spirit of St. Louis, 210

Stafford, Jean, 85, 205

A Star Is Born, 26

Steinbeck, John, 108

Steinem, Gloria, 244–245

Stern, Gunther, 71, 76, 78

Stevenson, Anne, 306

Stewart, Donald Ogden, 22

Suber, Howard, 199, 200

suffragettes

Parker and, 167, 311

West and, 35, 36, 167, 311

The Sun Also Rises (Hemingway) , 21

Sunday Times, 45

Sweet Smell of Success, 287

Take Her, She's Mine (Phoebe and Henry Ephron) , 233

Tanguay, Eva, 13

Tell My Horse (Hurstons) , 62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Hurstons) , 62, 64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Benjamin) , 82

“The Third World of Women” (Sontag) , 169

This Side of Paradise (Fitzgerald) , 15, 16

Thomas, Lately (pseud) , 125

Three Is a Family (Phoebe and Henry Ephron) , 233

Thurber, James, 23, 124

Thurmond, Strom, 59

Tice, Clara, 5

Time, 157, 277–278

“To a Tragic Poetess” (Hemingway) , 21-22

“Tconstant Weader fwowed up” (Parker’ s quip about Milne) , 23

totalitarianism, 86-89, 134

“Trash, Art, and the Movies” (Kael) , 196, 197

Trilling, Diana, 96-97, 105, 117, 288

Trilling, Lionel, 97

“Trouble in the Archives” (In the Freud Archives, Malcolm) , 298

Truman, Harry, 59-61

Tumin, Melvin, 129

“Two Roads” (Malcolm) , 293-294

Tynan, Kenneth, 200

An Unfinished Woman (Hellman) , 257

The Unsinkable Molly Brown, 210

Vanity Fair

Adler and, 276, 282

as feminism’ s voice, 4-5

Parker and, 5-6, 7-8, 9-10, 12-14

Vanzetti, Bartolomeo, 27

Variety, 195, 233, 273-274

Varnhagen, Rahel, 71-74, 75, 77, 80, 128, 311

Vidal, Gore, 141, 144, 161

Village Voice, 199-200

Vinaver, Stanislav, 52-53

Viva, 248

Vogue

Arendt in, 88

Didion and, 204, 205-206, 208, 220

as marketing tool, 6-7

McCarthy and, 116

Parker and, 6-7, 8-9

Sontag and, 159, 170

Wakefield, Dan, 215

Walker, Alice, 64

Wallflower at the Orgy (Ephron) , 241

Ward, Mary Augusta (Mrs. Humphry Ward) , 37

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 276

Washington Post, 159, 161

Wayne, John, 211

“The Weeds” (McCarthy) , 114–115

We Have Always Lived in the Castle (Jackson) , 126

Weil, Simone, 90

Welles, Orson, 108, 197–201

Wells, H. G.

affair with West, 37–39, 40–41, 46

early novels, 31–32

as feminist, 32

New Republic and, 41

West on writings of, 31, 37, 42

Wells, Ida B. , 61

“We Refugees” (Arendt) , 83–84

West, Anthony Panther birth, 40-41

knowledge of, 48

left with grandmother, 46

resentment of mother, 49

Wells' s relationship with, 42-43

West, Jim, 253

West, Rebecca.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ffairs after Wells, 50

American lecture tour, 46-48

on American women, 48

background, 31, 33-34

characteristics, 31, 48-49, 50

choice of name, 36

colleagues' opinions of, 44, 48-50, 104

on Communism, 57-58

feminism and, x, 54

on James, 43-44

marriage, 50

McCarthy and, 104

on Nazi Germany, 56–57

Nin and, 51–52

on Parker, 30

on racism, 60–61

reputation as critic, 45

reviews of fiction by, 44–45

subjects of articles, 45–46

suffragettes and, 167, 311

targets of writing, 37, 43–44

as unwed mother, 40–41, 49

Wells and, 31, 37–39, 40–41, 46

on women writers, 58

writing as a mask, 36–37

Yugoslavian lecture tour, 52–53

Westmoreland v. CBS, 277–278

We Thought We Could Do Anything (Henry Ephron) , 249

“What White Publishers Won’ t Print” (Hurstons) , 62

When the Lights Go Down (Kael) , 260, 261

“Where Bookmen Meet to Eat” (Ephron) , 238

“The White Album” (Didion) , 221-222, 226, 227

The White Album (Didion) , 221-222

“Why I Haven’ t Married” (Parker) , 8

Wienovera, Jana. *See* Malcolm, Janet

Wild 90 (Mailer) , 272

Wilder, Matthew, 262

Wilder, Thornton, 108

Willis, Ellen, 167

Wilson, Edmund

on *Enough Rope*, 18-19

McCarthy and, 104, 108-111, 114-115

Parker and, 14, 23-24

Parker’ s “Lolita” and, 123

Wilson, Reuel, 109–110, 111, 263

Winn, Janet. *See* Malcolm, Janet

Wodehouse, P.G., 9

Wolcott, James, 202, 224, 262

Woman Problem, 74–75

women. *See also* feminism

acceptable characterizations of, 112

confines of femininity as Parker target, 19–20

contempt for, as intellectuals, 168–169

F.Scott Fitzgerald's treatment of, 17

factors affecting experiences of, 311

in film, 274

gendered art of, 183

James's inability to write about, 44

need for autonomy in sex and romance, 40

Newsweek's refusal to hire, as writers, 234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 247–248

sharp, described, i x-x, x i-x ii, 309

as subject of West, 45-46

surge of, as novelists, 47

West on, 48, 58

“The Women’ s Movement” (Didion) , 218-219

Women’ s Wear Daily, 233, 238-239, 249

“The Wonderful Old Gentleman” (Parker) , 2-3

Woolf, Virginia, 31, 58, 100

Woolcott, Alexander, 7, 11, 48, 123

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 (Didion) , 218

The Years with Ross (Thurber) , 124-125

Young-Bruehl, Elisabeth, 66, 86

“The Younger Set” (Parker) , 15-16

Zanuck, Darryl F. , 274

Ziegfeld, Flo, 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加）米歇尔·迪安
（Michelle Dean）著；冯璇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7

书名原文：SHARP: THE WOMEN WHO MADE AN ART OF HAVING AN
OPINION

ISBN 978-7-5201-6286-9

I. ①那… II. ①米…②冯… III. ①女性-评传-世界-现代
IV. ①K8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9916号

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

著者/〔加〕米歇尔·迪安（Michelle Dean）

译者/冯璇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8.5 字数：330千字

版次/2020年7月第1版 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286-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20-2547号

定价/8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Further Readings

《边境：行至欧洲边缘》

《何故为敌》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

《维多利亚女王：帝国女统治者的秘密传记》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1935-1961》

她们是 20 世纪美国文学 and 知识历史被掩藏的核心角色

不愿被简单归类为女权主义者的先锋女性

“Sharp”无疑是 21 世纪女性从这些前辈那里继承的宝贵遗产

不和善，不屈服，不避讳，用声音与社会的涡流对抗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女性的声音穿透一个世纪

媒体评价 / 本书荣誉

入选《纽约时报书评》编辑推荐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Editors' Choice)

入选《纽约时报书评》平装书名录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Paperback Row)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2018 年度好书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018 年度好书

《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2018 年度好书

《密尔沃基新闻哨兵报》(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2018 年度好书

BuzzFeed 2018 年度非虚构作品

第一章 帕克 第二章 韦斯特 第三章 韦斯特和赫斯顿 第四章 阿伦特 第五章 麦卡锡
第六章 帕克和阿伦特 第七章 阿伦特和麦卡锡 第八章 桑塔格 第九章 凯尔
第十章 迪迪翁 第十一章 埃夫龙 第十二章 阿伦特和麦卡锡和莉莲·赫尔曼 第十三章 阿德勒 第十四章 马尔科姆

《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就是一场你想参加的晚餐聚会……迪安的文学批评与其选择的客人名单一样令人兴奋和极具洞察力。她以非常简洁的方式，极其精准地总结了她们的生平和成就，更重要的是，她还发现了这些人之间的联系……《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是对一些真正勇敢、智慧的女性的精彩赞颂。

——赫勒·麦卡尔平 (Heller McAlpin)，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忘掉地平线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定价: 86.00 元



R
素·思
SUNSHINE BOOKS

Jack E. Davis [美] 杰克·E·戴维斯

丘梦晨 译

- 第一部分 * 河口和陆海变迁：土著和入侵的欧洲人
- 一 * 奠基
- 二 * 墨西哥湾的由来
- 三 * 无明的迷途
- 四 * 三条最重要的河流和「一个」了不得的「海湾」
- 第二部分 * 大海和天空：17世纪亮相的美国人
- 五 * 昭昭天命
- 六 * 鱼的海洋
- 七 * 靠服海岸的野鱼
- 八 * 炼乳之海

西班牙人发现了墨西哥湾，法国人从那里找到了密西西比河的入口，英国人从那里找到了北美的未来。现在，它是美国的海。

这是萨姆·戴维斯的《崛起》和西蒙·温斯顿的《大西洋的故事》之后，另一部关于美国海洋史的重要著作。

墨西哥湾的 历史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Sea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Sea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杰克·E.戴维斯 / 作者简介

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和可持续研究教授，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环境问题演讲人。他在墨西哥湾地区长大，现居住在佛罗里达州和新罕布什尔州。

丘梦晨 / 译者简介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注册会计师，毕业后曾就职于一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现为全职译者。

图书代理人



译者简介

联合创立

〔美〕杰克·P·戴维斯 著

丘梦晨 译

墨西哥湾

的

历史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ea

The G U I H
美 国 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年表](#)
- [序 历史、自然和被遗忘的海](#)
- [引言 诞生](#)
- [第一部分 河口和陆海变迁：土著和入侵的欧洲人](#)
 - [一 冢堆](#)
 - [二 墨西哥湾的由来](#)
 - [三 无谓的送命](#)
 - [四 一条最重要的河流和一个“了不得的”海湾](#)
- [第二部分 大海和天空：19世纪亮相的美国人](#)
 - [五 昭昭天命](#)
 - [六 鱼的海洋](#)
 - [七 降服海岸的野鱼](#)
 - [八 铩羽之鸟](#)
- [第三部分 未来的序幕](#)
 - [九 从海湾到海滨](#)
 - [十 石油和得克萨斯的小心试水](#)
 - [十一 石油和路易斯安那的奋力一跃](#)
 - [十二 岛屿，因时而易的沙子](#)
 - [十三 风和水](#)
- [第四部分 饱和与失去：1945年后](#)
 - [十四 扩张的海岸](#)
 - [十五 深陷泥潭的佛得二州](#)
 - [十六 物质过剩的河流](#)
 - [十七 出逃和失控](#)
 - [十八 时光沙漏中的沙](#)
 - [十九 消失的边界](#)
- [后记 黑暗中的光明](#)
- [参考文献](#)
- [图片来源](#)
- [索引](#)

年表

时间	事件
10000年前至1513年 活。	第一代居民在墨西哥湾沿岸定居生 海平面上升至现代水平。 生态和地理环境演变至现代形态。
1513～1821年 在墨西哥湾部分海岸登陆并定居。	来自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征服者 欧洲人发现墨西哥湾的主要地理特 征和海岸线轮廓。
剧减。	欧洲疫病在当地肆虐，原住民人口
1821～1900年	海湾开始美国化。 海湾五州成立。 商业性捕鱼业萌芽。

类等自然资源产生影响。

帷幕。

活动。

1900～1945年

然资源的商业化。

号。

势。

行。

1945～2000年
增长。

大肆开发开始对当地包括鱼类和鸟

针对墨西哥湾的生态保育活动拉开

旅游观光从垂钓扩展到海滩度假等

人们开始在密西西比河筑堤。

墨西哥湾发现石油。

工业进步推动着旅游业的发展和自

沿岸大部分地区的人口稳定发展。

摧毁性的飓风为上述发展画上了问

部分海洋生物数量呈现急剧下降趋

候鸟迁徙路径被锁定，猎鸟开始盛

整个海湾和海滨地区人口呈爆炸式

飓风持续威胁着海滨生物的生存。

至现代水平。

线。

态的理解。

增加，并形成组织。

2000年至今
油泄漏事故。

地区则仍在发生。

续。

海上石油开采和石油化工行业发展

化工废水污染急剧加重。

墨西哥湾水域出现死水区。

工程活动大大改变了海湾的海岸

海岸线侵蚀问题被正视。

动植物数量大幅减少。

生态学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海湾生

针对海湾的自然生态资源保护活动

部分水体得到了清洁。

墨西哥湾遭遇史上最严重的一起石

污染在部分地区得到遏制，在其他

有组织的自然生态保护活动仍在继

海平面上升成为新难题。

海岸线侵蚀加速，范围更广。

水产养殖使海湾的自然资源得到可
持续利用。

序 历史、自然和被遗忘的海

人类应该作为物理世界的组成部分来研究。

人属于自然范畴。

——汉斯·费迪南·海尔默特（1901）[\[1\]](#)

不录荒野的历史不成其为历史。

——E. O. 威尔逊（Edward O. Wilson）（2016）[\[2\]](#)

1904年，佛罗里达州西北岸，霍莫萨萨河（Homosassa River）正从这里缓缓流入墨西哥湾，画家温斯洛·霍默（Winslow Homer）整个1月都在这里垂钓。此前，这位大西洋画家从未来过墨西哥湾，现下这大海和海岸共同构成的大自然调色盘——它的色彩、律动和历史——令他兴奋不已。

沿岸是芦苇丛生的湿地，再往里是茂盛的林地——霍默称那为一抹丛林之绿——那里蔓延的气生植物和蕨类植物在斑驳阳光下摇曳，在柏树和红月桂传送的阵阵芳香中，还夹杂着有机肥腐烂的气味。此刻，霍默也许在探听丛林深处象牙喙啄木鸟的敲击声，也许在观察正在水上安静捕鱼的苍鹭和白鹭的奇特站姿。宽广平静的水面一览无余，水底暗流涌动。霍默带上了鱼饵和钓具，划着小船；小船所到之处，水底铺满水草，绵延数英里，水草中满是螃蟹、贝类，以及各种目不暇接的小动物。其中最亮眼的是成群成群的鱼，它们随着看不见的墨西哥湾流游动着，形成的鱼群足有运货的火车那么长。数量如此

壮观的鱼群，既吸引来了在上方盘旋的鹰和鸮，以及素爱浅滩的涉水鸟，也吸引来了霍默。他在数年之后又回到了这里。

他当时68岁，一如既往地把自己拾掇妥帖，蓄着胡子；彼时的他名声正盛，他的大西洋海景画最为人所称颂。他同时也是垂钓的狂热爱好者，他擅长收竿就和他擅长作画一样。冬天到来时，他会关闭他在缅因州的工作室，南下度假偷闲，其选取的目的地通常是一个微风和煦的海岛。

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在古巴和佛罗里达礁岛群（Florida Keys）间发现过墨西哥湾的影子。多年来，他的垂钓日记都在称颂美国后院的海是垂钓者的天堂，是未被开发的人迹罕见的净土。从佛罗里达州南部到得克萨斯州南部是一条长长的弧形海岸线，遍布绝佳的垂钓点，而其中霍莫萨萨河的入海处是他一直以来的最爱。《森林和溪流》称其“实在是一处迷人之地”，在那里“钓竿守卫者平常用来放钓饵和固定钓钩的时间就足够让他钓上一条大鱼来”。鱼来得如此轻松，霍默在给弟弟的去信中写道，那“是他能找到的全美国最棒的地方”。^[3]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当地独特的历史印迹，尽管它们在多年后已被美国的主流历史所遗忘。你若沿着海岸行进一整日，沿途可能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却随处可见数不尽的土著冢堆，它们在平坦的荒原上如此突兀，处处透露着旧时人为的痕迹。这些冢堆由泥土和贝壳组成，上面覆盖着植被，就像鱼群和树林一样，融为大自然闪耀的一部分。它们是人造环境的遗迹，是数千年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但后来又消失了的人们留下的。其中少数冢堆相对更高耸、庄严，其余的则多是较低矮的丘堆，它们中部分要追溯到公元前250年甚至更早。数量最多的是堆了生活垃圾的山包，它们被称为厨余冢；人们在里面发现了

贝壳和骨头，它们既是土著饮食结构的明证，与现代垂钓者们的盛宴也同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揭示了一段至今仍未被揭晓的历史。

墨西哥湾熠熠生光的自然和历史唤起了霍默的创作灵感。他正等待这样的时刻。他只要带着鱼竿和渔线，就一定也会带上颜料和画笔。当他的画作日渐成熟，以往作为背景出现在他画布和画纸上的自然景观现在已经成为他作画的焦点。在他许多的大西洋海景画中，人物细节清晰，摆位正中，画中人常与大海做着搏斗，磅礴的大海时见惊涛骇浪，象征着大自然的无上威力。

墨西哥湾水面开阔，常常平静有如小水池一般，如此一来画面上的各个要素的比例便面临调整。霍默在霍莫萨萨河边完成的几幅水彩画中，人物只是淡淡的一抹颜色点缀在平静的大海上，海面碧绿宛如硕大的明镜，棕榈树映衬在其上，树干向着淡褐色的云层一直延伸到画面的中央。《贝冢》（*Shell Heap*）正是这样一幅作品，画面上蒲葵树下是一个原始丘堆，丘堆上满满的牡蛎壳一直散落到了水边，近岸处漂着一只小船，船上坐着两个垂钓的人，此处寓意的正是原始到现代的延续。和霍默在霍莫萨萨河边的其他所有画作一样，《贝冢》表现的是人、自然与历史三者之间密切且重要的联结。我把这三要素称为霍默的真理，它是此书的核心。

霍默那个年代，在大多数人包括史学家眼中，大海和自然并不单独存在，它们的出现总是伴随着人类的活动和发展。尽管海洋面积占地球表面积的71%，但史学家们的研究主题仍是重大事件、数据、战争，以及大城市和民族国家。时至今日仍是如此，海洋代表贸易和勘探通道，甚至在更多时候，它只是一个陪衬的背景。在1901年发表的一篇少有人知的以太平洋为论题的论文中，史学家爱德华·维尔切克伯爵（Count Edward Wilczek）提到了这种异常，他认为海洋“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即使是维尔切克伯爵，这位奥

地利贵族，最后也是落了窠臼，他的论述依然将海洋视为一片起到连接或分离陆地作用以及文化作用的被动水域。^[4]

直到20世纪中叶，以法国学者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首的新一代历史学家才开始转向更开放的态度。布罗代尔是当时倡导创新的年鉴学派的领导者，年鉴学派从普罗大众的视角解析历史，颠覆了传统史学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即将历史事件的发生归因于少数领导者个人的行为。布罗代尔在年鉴派方向上更进一步，将“我们所见所爱的海洋”视为影响人类活动的重要媒介。他发表了具有开创性的他称之为地中海“传记”的两卷本著作^[5]，肯定了维尔切克的观察，与霍默的理念不谋而合。作品于1949年面世，并于1966年、1972年再版发行，《地中海》一书引领了一股海洋研究的热潮。世界各地的史学家纷纷开始撰写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历史。从那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出现，其中也不乏以地中海为题的。但进取的海洋史学家却总止步于墨西哥湾，墨西哥湾未在这段辉煌中占有一席之地。

即使在今天，墨西哥湾也不被美国历史提及^[6]。因此本书涵盖了从更新世至今的历史，旨在展示这片在沧海桑田中孕育了数个文明的海洋。墨西哥湾不仅承载着灿烂土著文明的全貌，也是西方帝国财富积累的积极推动者，美利坚版图扩张和经济崛起的重要一环。合众国的缔造者们通过协约、征战和买地筑起了这个国家，他们认为墨西哥湾理所应当是美国的。早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和此后的西进运动之前，托马斯·杰斐逊就将当时还处于西班牙控制下的这片海域，视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日后兴旺的基础。但如此有杰斐逊之视野，能将其看作国家扩张目标和美国精神化身的史书却是罕见。只需对海湾历史稍作了解，便能知晓它对美国人民价值指向和野心的彰显力度并不亚于西部历史，而针对西部历史的书作已浩如烟海，无不试图借此探讨美国精神之所在。

墨西哥湾的历史，如我们将看到的，正是美国的历史，两者唇齿相依。学校书本教给我们说，加入美国独立战争的是英属的十三州殖民地，但实际上是十五个：被遗忘的两个分别是当时同被殖民的西佛罗里达和东佛罗里达。湾区与北美十三州同样站在抗争的前线，为美国人民和移民提供了追求更好生活的机会，让国家得以繁盛，这一切依赖的不仅仅是西部的林地、群山和河谷，还有南方的海湾。19世纪初，新英格兰的捕鱼船将贸易活动开展到了墨西哥湾，于是东北部、中西部的度假爱好者和霍默一样，闻声南下，被这里的阳光和户外活动吸引而来。此时，一个垂钓者来到了得克萨斯州一片封闭的小海湾里想试试运气，结果在他的小船下发现了石油。于是油田勘探者纷纷会集到近海处，在地底下寻找那个污秽黏稠的东西，最终墨西哥湾便成了整个国家最重要的油气储藏地。

随着每一条驶往海岸的铁路线的铺设，每一家新旅馆的开业，各路眼睛都紧盯着这里的紧俏资源，这个地方很快便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紧紧跟上了改变和消耗的步伐，最后一举超越了它们。墨西哥湾成为美国海。

这些无一不受自然的影响。既拥抱霍默的真理，我们便不能撇除自然的语境；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人类活动的背景没有得到应有的记述，自然因素被抹除和忽视，本书将摒弃这种叙述方式。即使在很多随《地中海》浪潮而起的海洋传记中，自然环境这一历史媒介也是——用近70年前布罗代尔的话来说——“几乎无法察觉的”。正如这位法国学者所说，自然从不缺席，它不只是模糊的背景^[7]。

它是参与者、推动者和催化剂。丰富的资源既使一国富饶强盛，也使各国短兵相接；我们的祖先坚持垦荒畜牧，靠天吃饭。人们以何种方式，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式来建造他们居住和营生的地方，都依赖于自然环境和条件。人们书写作画、穿戴交谈、谋划消闲，以及

选择生计的灵感，无不来源于天地之间。自然塑造了战争策略和经济形态，自然资源的丰富和贫乏便决定了人们和其事业的兴衰。

和前辈温斯洛·霍默同样敏感的密西西比河画家沃尔特·安德森（Walter Anderson），曾经问道：“人为什么活着？”20世纪中叶他曾旅居在墨西哥湾一处岛上，在其日志中，他是这么回答的：“为了成为自然的仆人和奴役。”安德森并非在宣扬一种理想，而是陈述海湾人们固有的生活。它丰富的渔业资源，准确来说，并不是新英格兰人进取开拓的产物，而是墨西哥湾富饶的河湾带来的。第一批度假爱好者是被当地一种鱼吸引而来的一一这种鱼凶猛好斗，非常受垂钓爱好者的青睐一一随后被垂涎的便是这里美妙绝伦的海滩和落日了。河流将美国海和本国的其他地方，包括其农业和工业中心，连接了起来，从此墨西哥湾沿岸便有了全国最繁忙的货运港口。偶然而成的地质条件，连同河流、山川、千变万化的海洋、久远的海洋生命，和古老的地球一起，赋予了海湾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它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改变着现代社会。[\[8\]](#)

西方传统将历史当作文明进程和伟大领袖天才之举的记录。但传统观念上的进步一一人口发展、财富积累、技术进步一一却可叹地一直伴以生态环境的恶化。湾区曾有不计其数的飞鸟从天空上跌落，只为满足商业活动和人类的消遣。这片地区成为美国陆军工程兵团[\[9\]](#)展示其地表挖掘技术的绝佳场地，也成了全国农业和工业污水的集中排放地。壮观的海湾几近枯竭，当日霍默看见的鱼群种类中只有小部分存活至今，而水也不如那时清澈干净了。

海洋并不是唯一遭殃的，发展带来的恶果也侵蚀着大陆和岛屿。墨西哥湾是美国的飓风走廊，但美国人还是死心不息地在其中大搞建设。移民大量聚集的众多海滩，并不全是天然而成，而多是花着纳税

人的钱与大海“打对台”的结果。这些恶劣的事例反映了当下盛行的文化观念，它们蚕食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支柱，使未来岌岌可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请用平等的心怀/思考过去和未来”，T. S. 艾略特在他著名的描写海洋的诗篇《干燥的塞尔维吉斯》（*The Dry Salvages*）[\[10\]](#)中如此写道。我们这个时代的议题，已经与霍默时代相去甚远；我们的日常话题都在探讨我们与环境的关系，而且对此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但从种种迹象看来，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与往日并无不同。我们没完没了地往自然界生产垃圾、排出废气——我们仍然按我们的意志在使用它。[\[11\]](#)

可以说如今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来自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而在美国所有地区中，墨西哥湾首当其冲。我们在寻找补救方法时，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大量可供参考的先例：其他文化中人们是如何与周围环境共处的；我们如何在过去过着比现在更可持续的生活；当我们试图改变自然时它是如何给出与以往不同甚至令人不解的回应；或者当从前无人叨扰时，自然是如何不吝馈赠，而自从人类干预以来，它却变得所剩无几。历史可以揭露适得其反的行为，同时也能借过去的智慧弥补过失。它可以揭示生态环境对人类状态的影响，重新唤起自然是人类居所这一理念。

因此全书章节的结构是围绕墨西哥湾的自然特点展开的，从鱼群、鸟类到河口、海滩，旨在探讨它们是如何介入人类活动中，以及相应地，人类是如何介入自然从而影响到自身的。基于各种相关原因，后面很多内容都聚焦在了美国。它不像大西洋有多达43个国家共享其海岸，也不像太平洋几乎占了半个地球，墨西哥湾并不是一个有相似体量的国际性海域。与它接壤的只有三个国家，而美国占据了其一半的海岸线。然而海滨景色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地缘政治、地理、

经济，尤其是生态环境等因素都使墨西哥湾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脱不了干系。

在我看来，墨西哥湾在我们的生活和历史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它的前世今生了解得更为透彻，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起因。自2010年“深水地平线”漏油灾难发生以来，墨西哥湾的名字上便被打上了石油的烙印。它塑造了人们——无论是记者还是政策制定者，甚至是科学家和游客——对美国海的观感。前后持续了87天的噩梦，造成了11人丧生，爆炸的钻井平台在世界地球日不幸沉没，这次事故成为史上最严重的石油泄漏事故，也许也是最糟糕的一次事故善后处理。墨西哥湾从此背负着对未来致命且未知的后果，对此作家罗恩·雅各布森（Rowan Jacobsen）在《墨西哥湾上的阴影》（*Shadows on the Gulf*）^[12]一书中已有了敏锐的预判。

此书并不是专门为“深水地平线”两亿加仑的原油倾泻事故作的序。一来，正如雅各布森和文稿中提及的其他人所认识到的，这次重大的石油泄漏并不是，也远远不是墨西哥湾自然生态遭受到的最大灾难。无论源头远近，墨西哥湾每天都在经历环境灾害，泄漏事故也因此不足一提。二来，没有单独的一个人或一次事件能代表一个或一连串悲剧的全部。

墨西哥湾及其历史——布罗代尔也许称之为它的传记——应当被称颂，而非哀悼。美国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人类的福音。它我们的生活带来美好，鼓舞人们的精神。它为我们提供食物，调节气候，帮助我们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代之以我们呼入的氧气。这种养分不是从水井抽取上来的，而是散布于海湾各处。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是从阳光到植物到动物的能量循环；对未来生存而言，生命链条上不竭流动的活力比化石储藏量更重要。

[1] H.F.Helmolt, *The World' s History: A Survey of Man' s Record*, vol.1 (William Heine-mann, 1901) , x x v.

[2] Edward O.Wilson, *Half Earth: Our Planet' s Fight for Life* (Liveright, 2016) , 211.

[3] Charles Hallock, *Camp Life in Florida: A Handbook for Sportsmen and Settlers* (Forest and Stream Publishing, 1875) , 336, 337; Helen Cooper, *Winslow Homer Watercolo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34; Randall C.Griffin, *Winslow Homer: An American Vision* (Phaidon Press, 2006) , 190.

[4] Count Edward Wilczek,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Pacific Ocean, ” in Helmolt, *World' s History*, 566.

[5] 指的是*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á l' Epoque de Philippe II*, 英译名为*The Mediterranean*, 中译本为由唐家龙、曾培耿、吴模信译介,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全二卷)》(下文简称《地中海》)。另, 本书后文也征引了不少书目, 但少有中译本, 因此除非注明, 相应中文书名仅供参考。——译注(除特别标明为译注, 本书其他脚注均为作者注)

[6] A couple of noteworthy exceptions include Robert S.Weddle, *Spanish Sea: The Gulf of Mexico in North American Discovery, 1500-1685*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5) ; and Kathleen DuVal, *Independence Lost: Lives on the Ed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andom House, 2015) .

[7]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vol.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20.

[8] Walter Inglis Anderson, *The Horn Island Logs of Walter Inglis Anderson*, ed.Redding S.Sugg Jr. (Memphis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28.

[9] 美国主要水利机构之一, 隶属于联邦政府和美国军队, 主要负责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及运用维护。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工程、设计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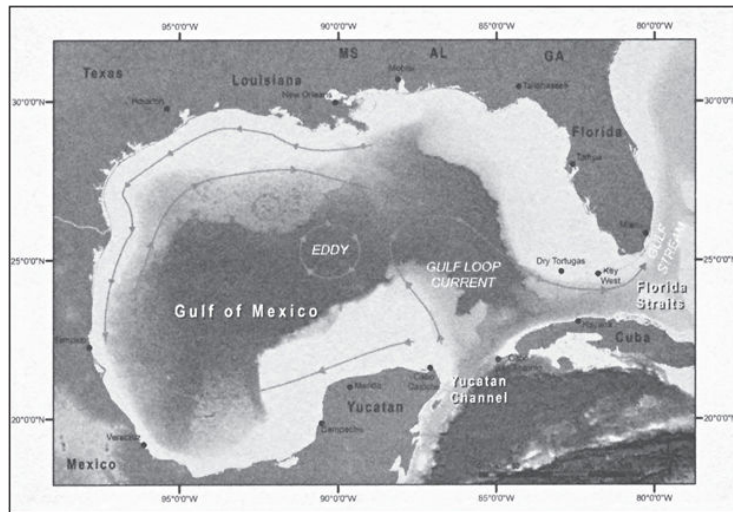
建筑管理机构。——译注

[10] 出自其《四首四重奏》（收录于《T. S. 艾略特诗选》，译者张子清）。——译注

[11] T. S. Eliot, “The Dry Salvages, ” in *Four Quartets* (Harcourt, 1973) , 48.

[12] Rowan Jacobsen, *Shadows on the Gulf: A Journey through Our Last Great Wetland* (Bloomsbury, 2011) . Similarly, Terry Tempest Williams has dedicated a compelling chapter in her latest book to the events of the tragedy and its immediate aftermath. See *The Hour of Land: A Personal Topography of America's National Parks* (Sarah Crichton Books, 2016) , 221-51.

引言 诞生



墨西哥湾环流滋养着墨西哥湾暖流，改变了欧洲人从新大陆返程的航道。

墨西哥湾的生态故事……就是一切的源头。

——威廉·惠特森（William Whitson），《墨西哥湾计划》（*Gulf of Mexico Program*）（1993）[\[1\]](#)

1.5亿年前，从赤道往北极方向的三分之一处，墨西哥湾开始有了雏形。它的发展势头并不迅猛，却蔚为壮观。它的形成得益于泛大陆的分裂；泛大陆是当时地球上唯一的大陆地块，被唯一的大洋——泛大洋——所包围。亿万年来偶有发生的地壳震动撼动着这片超大陆，使陆地分裂，沼气喷涌而出。火山爆发，数以千计的火山带溢出炽热的火山熔岩，最终形成山体。喷射物使整片天空弥漫着烟雾和二氧化硫，导致了“大灭绝”的发生；这是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物种

灭绝事件，几乎所有海洋生物和大部分的陆地脊椎动物因此绝迹。在断裂碰撞之下，巨大的上地幔和地壳板块经过一系列的震动、推移、碰撞和相互堆叠，在隆起形成了更多高山的同时，也撬动着超大陆的解体，它一分为二，诞生了劳亚古大陆（北美和欧亚大陆）和冈瓦纳古大陆（南美和非洲大陆）。裂缝将巨大的陆地地块尤卡坦半岛与佛罗里达割离，中间便形成了一处盆地。

慢慢地而又不可阻挡地，盆地发展为海湾。水从西南和泛大洋灌进来，当时的尤卡坦半岛尚在逆时针漂移，以后它才与墨西哥合为一体，成为一道天然大坝。在东边，一道裂缝形成的海峡切割了佐治亚州的下半部陆地，引入附近的水流，也就是日后的大西洋。不久海峡闭合，加勒比海成为盆地唯一的海水源头，海水从尤卡坦东侧海峡流入。在地球的极点还未被永冻冰层占据时，海湾所能覆盖的最北端位于现在伊利诺伊州开罗市的位置。

经过数百万年的断裂、下沉和侵蚀，这个海盆终于被打磨成如今墨西哥湾的大小和形态。恐龙出现又消失，它们中的一些进化成了鸟类，在地质灾害时期存活了下来，栖息在墨西哥湾海岸。海水上升、下降了两次、三次、四次，也许更多。在更新世时期，蓄水的海盆大幅萎缩，水位比今天差不多要低250英尺，温度也比现在低很多。墨西哥湾此后四分之一的水量被冰川裹挟，随之北上了数百英里，随着冰川融化，水流通过密西西比河流域倾泻而下，灌饱了盆地。

墨西哥湾是如何形成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地球科学领域的一个谜。地质学家有时通过观察地球的特征来判断它的起源，苏伊士湾就是一个例子。俯瞰下，它狭长的水域就像绿巨人衬衫上崩开的一道缝，这表明它起源于一次断裂。但就墨西哥湾来看，它的形状让人想起一只被牵引着的、头向西侧视的骆驼脑袋的轮廓，地表并没有暴力撕扯留下的痕迹。19世纪发展起来的诸多起源理论基本只是未加

证实的猜想。一些科学家猜测是小行星碰撞产生的其中一颗流星撞进大气层进入地球后，在墨西哥湾的位置砸出的一个深坑。这个猜想毫无根据，也许可见于科幻小说情节，但与真相相去甚远。

20世纪末时，一位专研石油的地球物理学家在尤卡坦半岛西北角位置发现了一个110英里宽的陨石坑，将其命名为希克苏鲁伯陨石坑。这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触发传说中白垩纪第三纪大灭绝的导火线，陨石撞击造成大量烟尘升空，遮天蔽日，阻挡了光合作用，使依赖阳光获取能量的植物和浮游生物无以为继，包括恐龙在内的动物便因此断了食物来源。

墨西哥湾起源的决定性证据一直深埋地底，直到20世纪初才在石油公司的一次偶然侦测下得见天日。通常，地质学家的研究成果会为矿物探测带去帮助，但在这次案例中，石油公司在这个地区广布的深钻勘探井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前所未见的重要样本，以及指向断裂和泛大陆解体的实质证据。石油公司成功的勘探发现也坐实了这个结论，因为断裂点通常就是石油的发现地。

一直以来墨西哥湾起源的难以定论让世人对它的定位也摇摆不定。1895年作家斯蒂芬·克兰在得克萨斯州一港口城市加尔维斯 顿流连时，曾表达出当时人们的普遍想法，他注意到“墨西哥湾被认为是大西洋的一部分也许是个错误”，它的名字在地图上应该也是“大写的红色字体”才对。数十年后，由沿海国家组建的承担世界水道测量工作的国际水文组织，将墨西哥湾划定为大西洋海域的一部分。此次降级掩盖了墨西哥湾的独立起源，模糊了它的物理属性、水文特征和个体特征，也为此书的存在提供了部分理由。[\[2\]](#)

温斯洛·霍默再一次给我们带来灵感，但这次他是作为大西洋画家出场的。有别于他对广阔大洋的描绘，他的霍莫萨萨河水彩作品更加印证了墨西哥湾独一无二的特性。霍默画笔下的大西洋是一个狂怒

咆哮的巨人，灰暗的海面下海水翻腾，惊涛骇浪，鲨鱼涌动。海岸上海浪击打着参差不齐的礁石，黑暗汹涌有如压顶的天空。画中人常常与冷酷无情的风浪抗争，因为大西洋广阔、粗暴、自我，并不轻易让你容身。相反，霍默笔下的墨西哥湾亲切友好，有着另一番色彩。在他的画里，水面平静，波澜不惊，偶尔有鱼跳动着吐钩。但这令人兴奋，而非害怕，垂钓者继续让小船随波漂着，继而用一个漂亮的动作将渔线收回。白云悠悠的天上，鸟儿张开翅膀迎着上升的气流自在飞翔。

霍默注意到，墨西哥湾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散发的独特气质。它诱使你进入，但在你眼前的并不是像大西洋画里呈现的那样是一个暗藏汹涌的海底旋涡。它叫你融入它，叫你踮着脚丫走在慢慢暗下来的船坞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墨西哥湾，七岁的E. O. 威尔逊便是在这样一个船坞上度过了一个夏天。这个夏天被他称为“奇幻的一个夏天”，他不断在那里发现“珍贵稀有的”生物，这次经历使他一往无前地走上了开拓学识和精神视野的人生之路。当他长大成人，成为美国国内卓越的进化生物学家时，他写道，他此前的这番经历“当被一代一代人重复上无数次”。[\[3\]](#)

但这并不表示墨西哥湾总是风轻云淡。它也会翻脸无情，那可能是因为大西洋的坏天气席卷而入，也可能是它自己酝酿翻腾的结果。可以肯定的是，正如英国旅行作家亨利·梅杰·汤姆林森（Henry Major Tomlinson）多年以前说过的，它有“翻江倒海”的能力。[\[4\]](#)

端详着墨西哥湾的人们如果没有将它与大西洋混为一谈，那他们常会将它同地中海（同样被国际水文组织定义为大西洋的附属海域）联系起来。1934年，当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从基韦斯特往墨西哥湾望去，他总有那么几次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另一片海。他给在康涅狄格州家中的妻子去信说，墨西哥湾“有地中海般的美丽”。这种比

较可追溯至早期欧洲人的活动，他们尝试在这里再现熟悉的景色，尽管二者的形态相去甚远。地中海比起蓝中透着绿的、水深较浅的墨西哥湾，要更年轻、更大、更深，也更蓝。年轻的这片海，海岸都是峭壁，几乎不见潮水涨落，而年长的这个，落潮涨潮分明可见，罕有礁石，垂直高度最高的不过是沙丘和少见的红黏土断崖。地中海严格说来也是海，而墨西哥湾，其实，是一个海湾。^[5]

史蒂文斯的这番比较最终抛出了一系列问题：一个水体什么时候是海湾（Gulf），什么时候又会被纳入洋（Ocean）、海（Sea）、海湾（Bay）、小湾（Cove）^[6]或其他类别里？大小是最主要的区分点，洋是其中最大的。它们是地球上广而深的所在，是有边界的主体，是互相连接的海水整体。在大小上紧随其后的是海，然后是海湾，虽然划分并没有固定的标准，有点像服装行业里不统一的尺码表：这个牌子的中码是其他牌子的大码。墨西哥湾的总面积有60万平方英里，比俄罗斯东端的鄂霍次克海要大五分之一，比之日本海就更是大了。

可以确定的是，在日常谈话中，将海湾称为海并无大碍，但绝不能将海称为海湾。另一个让人不自觉地会将墨西哥湾和地中海 联系起来的原因，是海湾和海都与洋相通而又部分地被陆地包围。除了九英里宽的直布罗陀海峡外，地中海四周被陆地环绕，而古巴、墨西哥和美国也将94%的墨西哥湾包围了起来。从理论上来说，海湾应大于湖湾和小湾之流，而且通常也包含它们。不过，地理学，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都有规则破坏者。就面积而言，北美洲的哈得孙湾^[7]比世界上其他海湾都大，除了一个：墨西哥湾。

这个最大的海湾其面积在地球上所有水体中排第十位。墨西哥湾的表面积相当于太平洋的百分之一，大西洋的五十分之一。费城到伦敦的航行距离大约就是墨西哥湾的周长，海湾沿岸是美国的五个州、

墨西哥的六个州。海岸线中约有1500英里从墨西哥的塔毛利帕斯州延伸至金塔纳罗奥州北部，另有1631英里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到得克萨斯州。墨西哥湾区的所有海岛、海湾和其他枝枝节节上的海岸线有美国潮汐海岸线的十倍之长。古巴236英里的海岸线虽然相形见绌，但这个横卧在海湾中央修长优雅的海岛是出入海湾的唯一门户。从古巴的最西端向西横跨125英里便是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此间的尤卡坦海峡连接了加勒比海与墨西哥湾。哈瓦那东北方99海里（115英里）就是基韦斯特的所在地，两地之间是佛罗里达海峡，部分墨西哥湾流从这里涌入巴哈马海峡和大西洋。

墨西哥湾流是一股温暖而强有力的水流，它沿佛罗里达东部海岸而上到达北卡罗来纳州，然后横跨大西洋向欧洲流去。它就像大海中的河流，以每小时5.6英里的流速每一秒输送着将近40亿立方英尺的水量——这比世界上所有河流的水量总和都要多。欧洲人若想加快回家的航程，多半会选择让载着新世界金银的船只从墨西哥湾起航，于是湾流的源头来自何处便激起了科学家们的的好奇心。1575年，安德烈·特维（André Thévet）——这位法国牧师和宇宙学家——错误地断言密西西比河是湾流的源头。他错得离谱。

来自尤卡坦和加勒比暖流以及太阳的热力和能量，在墨西哥湾形成一股强劲的环流，即使从卫星图像上也能清晰看见这股墨西哥湾环流像毛毛虫似的蠕动着。它的尾部从尤卡坦海峡一直爬升至路易斯安那海岸。躯干的部分环绕着佛罗里达狭长地带^[8]海岸线行进，然后以几乎平行于赤道的方向，通过古巴和基韦斯特间的佛罗里达海峡，与此同时虫子的脑袋继续沿着半岛往北推进。环流如此循环重复，南北往返耗时大约一年时间。

蕾切尔·卡森，这位为海洋生命著书立说的人物，将墨西哥湾称为“靛蓝的洪水”。它比周边水域的颜色要显而易见地深上一两个色

度，这部分是由于水里布满了游动的生物——小至显微镜才能观测到的浮游生物，大到海龟，比比皆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喜爱在基韦斯特和哈瓦那之间的墨西哥湾捕鱼，寻找与大马林鱼或金枪鱼一战的机会。有了湾流的助力，再加上他自身的坚韧品格和高超捕鱼技术，海明威赢得了世界纪录创造者和巡回赛冠军的头衔，以及海上杰出运动家的名号。[\[9\]](#)

华莱士·史蒂文斯从没和海明威钓过鱼，却和他在基韦斯特一处酒吧门口打过架。他戏谑道，他刚到墨西哥湾来，就被一阵飓风“推”出了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这倒不全是坏事（至少远远坏不过他那只向海明威下巴抢去一拳反倒骨折了的手）。史蒂文斯从此便知道墨西哥湾也能生出不同于地中海的美来，就像一首自有一套节奏和韵调的诗歌。美国海成为他的罗蕾莱女神，将他迷住了；他来了一次又一次，古巴和湾区五州他都去了个遍。

想象一下，他坐着客船，像玩跳房子一样在墨西哥湾上从这玩到那。第一步是乘着蒸汽船驶出哈瓦那港，将旧时西班牙的要塞莫罗堡（Morro Castle）甩在身后，往北方的亚拉巴马州莫比尔港驶去，来到湾区最靠北的海岸——至此他已经行进了将近700英里了。此处风景之动人让他写下了一首描写鱼鹰的可爱诗歌《来自帕斯卡古拉的一些朋友》。下一跳将会从佛罗里达西海岸的坦帕市出发，这里盛产用古巴烟叶人工卷制的雪茄（“上好的圆胖的”那种最合他的胃口），穿过湖湾狭长的航道，就能迎着落日进入墨西哥湾，客船要如此行进1000个五英里才能最后到达墨西哥的港口。[\[10\]](#)

在两趟旅程之间，他会经过一个装着6430兆加仑水的海盆，就提到的这个容量而言并不算太大，因为墨西哥湾的平均深度只有一英里。卫星图显示，整个海岸边上似乎聚集着一片雪地，其中最厚的当

属尤卡坦、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那些。那是大陆架和大陆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墨西哥湾的浅水（约38%）比深水（约20%）占比更大。

大陆架是亿万年前在海平面更低洼时其四周还未被淹没的陆地。现在你若站在墨西哥湾边，由于地球曲度的存在，你是无法一眼望到更新世时海浪到达的边界的。那时的气候寒冷、干燥，狂风大作，和现今的温暖和煦相去甚远。乳齿象、剑齿虎、大熊、骆驼，还有牛一般大的地懒在热带稀树草原上扬长而过，稀树草原呈阶梯状，草色褐中带金，针叶林地的树种现在只能在大陆北方见到了。在这片大风肆虐的土地上，除了有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动物外，也居住着人类。这些体型巨大的动物举步维艰，因为它们不仅面临共同的无情的捕食者——手持矛枪骨棒的人类——还要应对不断变化的气候环境。历史告诉我们，它们的灭绝是这两者共同导致的。

[1] Quoted in Associated Press, “Scientists Say Flood Waters Threaten Gulf, ”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ust 17, 1993.

[2] Stephen Crane, *Stephen Crane: Prose and Poetry* (Penguin, 1984), 707.

[3] E.O.Wilson, *Naturalist* (Island Press, 1994), 7, 11; Edward O.Wilson,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June 19, 2014.

[4] Henry Major Tomlinson, *The Sea and the Jungle* (E.P.Dutton, 1920), 363.

[5] Holly Stevens, ed.,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68.

[6] 对不同大小的湾，此处分别译为海湾、湖湾、小湾以示分别。在汉语习惯中，实际不作严谨区分。尤其对于gulf和bay，专有名词的中文译名一般均译为湾，例如下文中提到的在英语中能体现出区别的哈得孙湾（Hudson Bay）和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译注

[7] 哈得孙湾具备海湾（gulf）的特性，若非沿用历史上的命名，称其为海湾（gulf）更妥当。

[8] 佛罗里达狭长地带（Florida Panhandle），即佛罗里达州的西北部，也译作“佛罗里达走廊”。——译注

[9] Rachel Carson, *The Edge of the Sea* (Houghton Mifflin, 1983), 192.

[10]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449, 655.

第一部分 河口和陆海变迁：土著和入侵的欧洲人

一 冢堆



湾区被数量巨大的贝冢环绕，标志着湾区的富足和外来文明入侵前原住民生活的兴旺。

最浪漫的莫过于绿色的海湾闪烁着粼粼波光，自古老的冢堆而上，远远地映射于天际。

——威尔士·摩西·索耶（1896）[\[1\]](#)

美国考古史上最令人兴奋的考古发掘之一是伴随一声闷响开启的。1895年初，墨西哥湾上靠近佛罗里达南端有一个叫马可岛（Marco Island）的小岛，一名劳工的铲子在岛上淤泥沼泽地里铲到了一个手工雕刻的木制物件。这名劳工是W.D. 柯里尔（William D. Collier）手下挖泥煤的，挖到的泥煤会被用来给蔬菜园子施肥。人们

称柯里尔为柯里尔船长，他种植柑橘和椰子，捕捞蛤蜊，建造、驾驶包船，经营岛上的杂货店和小旅馆。他还是马可岛的邮政局局长，虽然岛上居民比方圆500英亩的土地上的居民都少。他拥有诸多头衔，但没有考古学家这一头衔。

尽管如此，当他的工人挖到这件宝贝的时候，柯里尔还不至于毫无头绪。在墨西哥湾住了一辈子的人，不会不知道它的海岸边环绕的都是土著留下的贝丘，山体连绵不断，直入墨西哥境内。人们不断地在山丘上挖掘，希望能让他们找到印第安人留下来的金银。他们有时能找到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小饰品，可能是当时双方的贸易品，但最常见的还是矛尖和看上去没什么价值的贝壳之类的东西。柯里尔的这件手工品连同它的出土地——沼泽，而不是山丘——都不太寻常，不寻常得就像未起贪念的柯里尔一样。他本着探索历史的兴趣去咨询了一位考古爱好者C.D. 邓福德（Charles D. Durnford），这是一名从爱丁堡来的英国退休军官。

邓福德和墨西哥湾间有那么一点不解之缘。他的曾祖父作为英国皇家陆军工兵的测绘署署长，曾在18世纪60年代对彭萨科拉市进行了测绘，当时彭萨科拉市西至密西西比河一带是英属殖民地。邓福德则不时地来墨西哥湾钓大海鲢，以及探索人人称奇的人造山遗迹。有人说这山是早已消失的湾区土著留下的，也有人说这是外来移民修建的。查尔斯·肯沃西，这位经常来墨西哥湾边海钓的纽约户外运动爱好者，在20年前的《森林和溪流》中也提出过这个种族学上的迷思，“众所周知，印第安人如此懒惰，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工程的”。他呼吁“我们的科学人士们”去调查调查。但当时墨西哥湾并未引起考古界的兴趣，这个答案唯有等柯里尔领着邓福德去采样后才能揭晓了。

[\[2\]](#)

这位考古爱好者明白这东西必须让专家过目，而找专家最好去费城。邓福德的家乡爱丁堡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中心，而费城就是美国

的爱丁堡。两座城市在科学领域上的交流可追溯到本杰明·富兰克林时期。邓福德亲自将手工艺品送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并请博物馆的创始人威廉姆·培柏作评。威廉姆·培柏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物理学家，在学术界和社交圈中被称为胡椒博士^[3]。当时同在博物馆的还有一位人类文化学家弗兰克·汉密尔顿·库欣

（Frank Hamilton Cushing），他看起来身体虚弱。库欣本任职于史密森学会^[4]，当时告了病假在培柏这儿养病。他只扫了一眼穿孔的贝壳和绳网，就知道眼前这东西是土著留下的古物。于是他不顾病中的身体，坚持要马上到马可岛上去。

库欣天资高，做事细致，自尊心强，是完成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人类学和种族学领域的同行都尊他为土著文化研究的权威。库欣的童年在纽约州的中北部度过，小库欣在家里农场耕犁边上发现了一枚箭镞，这仿佛是命运的召唤，因为他的脚下正是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笔下《最后的莫希干人》这样的印第安故事的发生地。库欣在17岁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科研论文，论述对象是他研究了三年的当地的一个碉堡。他19岁时便在史密森学会得到了一个馆长的职位。^[5]

此后他逐渐走入公众视野。纽约报纸上刊载着他在新墨西哥与祖尼族印第安人共同生活的六年经历，这段经历使库欣成为美国社会科学史上利用参与式观察法进行科研的第一人（这个名号在他离世多年后却被错误归到了别人头上）。《华盛顿邮报》一则头条里称他为“最著名的西部专家之一”，库欣在史密森学会的上司约翰·韦斯利·鲍威尔也称库欣是“天选之才”，而鲍威尔本人就是一位西部研究领域杰出的科学家和勇敢的开拓者。库欣遇到邓福德时已经37岁，胡子拉碴，身形瘦小却神情刚毅，永远在田野工作中忙得停不下来，即使因此染上了病痛也不管不顾，就像晕船却不愿意离开大海的海员一样。^[6]

库欣对土著文明研究的贡献是卓著的，他的发现曾轰动一时，但历史没有记住他，一同被遗忘的还有他将在马可岛上挖掘出的遗落的印第安文明。提到美国的诞生地，现在更为人熟知的是那群走出森林的祖先，但被库欣称为“礁岛居民”的原住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海湾对美国历史的贡献绝不逊色。

墨西哥湾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湾区之一，其200多个河口（占北美河口总数的四分之一有余）占地近800万英亩。与美国五州接壤的墨西哥湾沿岸是生命的发源地，造就了这片美国海独特的生态环境。它的存在有赖于几个条件。一是土地——无论海岛半岛，无论气候干湿——需部分地被浅水环绕，形式也不拘于湖湾、长沼、小湾、潟湖、入海口、海峡、河谷或湿地。这些地形在墨西哥湾处处可见。

另一个条件就是最早研究海湾的拉丁人所说的“aestuarium”，也就是“有潮汐的地方”。海洋生态系统的核心就是海水和淡水间的动态交换机制，淡水可能来自溪流、河流或者地表径流。美国内陆的65条河流缓缓汇入海湾，交汇融合，最后形成了环绕聚合的湾区。流动的淡水夹带着肥沃的沙土沉淀物注入咸水。这锅咸水犹如高汤，滋润着动植物的生长，为饥饿的野生动植物送去大餐。墨西哥湾就这么勤劳地、坚定地集合了众河流之力建筑着大海和海岸，它的周边是当时世界上最富饶的栖居地。它孕育了礁岛居民，也间接地为库欣的墨西哥湾之旅埋下了伏笔。

从费城到佛罗里达州西南部的这趟旅程除了需要耐力，还需要耐心。库欣见过邓福德不久就踏上了火车，但火车出不了纽约州，于是他们转乘克莱德公司的蒸汽轮船到了佛罗里达州东北岸的杰克逊维尔。然后又从那儿坐艄明轮船往南跨过半个半岛，来到自南向北流的圣约翰河的下游城市桑福德，桑福德盛产柑橘，但那年冬天冰天雪地、霜冻绵延。接下来是火车，再接下来是30英里的马背之旅，终于

来到了佛罗里达的西南海岸，夏洛特港口的蓬塔戈尔达（Punta Gorda）。他可能在蓬塔戈尔达旅店歇了一晚，当时很多海钓的狂热爱好者会在每年开春南下钓大海鲑，这家旅店就是为迎合这批旅客新近修建的。库欣在当地雇了一个叫约翰·史密斯的海钓导游，史密斯驾着一只他起名为“佛罗里达号”的“单桅小帆船”，带着库欣沿着海岸来到了马可岛。[\[7\]](#)

佛罗里达的西南岸远离了季节性游客的喧闹，只有寥寥几百的居民，他们都是些分得了土地的定居移民、牧场主、渔民和野生动物盗猎者，散居于这1000平方英里的灌木丛地、沼泽地和充当着海风屏障的岛屿上。库欣又一次来到了科研前线，虽然这地方看着和他住过的位于西部的祖尼族栖居地——刷新了美国人想象的一次经历——不太一样。但它们是一样的天高云阔，在一片红红褐褐的荒漠沙石中，库欣看到了银白的沙滩、葱绿的岛屿和一望无际的水域。他后来写道，眼前的景象，把他带回到了“儿时关于海盗和西班牙人传奇冒险的梦境……”[\[8\]](#)

为了能真实记录下这趟探险，库欣随身带着一本日记本。第一篇日记出现在5月28日（1895年），那天，史密斯船长和他的伙伴带着库欣在“美丽的黑夜”里从夏洛特港出发了，他们航行在港口“光洁的水面”上，穿过迂回曲折的水道，来到了墨西哥湾。按工业文明的定义，这些水道被称为港口；按自然界的说法则是入海口，皮斯河和米亚卡河在这里放缓，众多的小海湾构成了整个河口，它吞纳潮汐，被湿地环绕。库欣就是从夏洛特港开始被一点点吸引去的。[\[9\]](#)

“佛罗里达号”航行了一个小时后，“远方水天交接处出现了一根蓝色的带子”，那是墨西哥湾，这是库欣第一次见到它，它“泛着乳白色的光”，“壮观极了”。如果“佛罗里达号”驶往得克萨斯州或者湾区北部，史密斯船长会看到更平静慵懒的海湾。为了能到达马

可岛，船长选择了更常规的航道，往基韦斯特和古巴的方向向南驶入派恩岛海域——这也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河口，周围岛屿“密布棕榈”，“泥沙均被吸附其上”。[\[10\]](#)

从蓬塔戈尔达到马可岛，在顺风的好天气里不作停歇，一日便可到达，结果他们却用了八天。每到一个出现了贝冢的岛，库欣便要“佛罗里达号”停下来。从夏洛特港到马可岛的一路至少有75个冢堆，根据他的估测，其中40个体积“巨大”，他称之为“被截了顶的金字塔”。“古老的”水道在土地上“交织”而过，他认为那是供独木舟行驶的，间或还点缀着似是人工挖就的湖泊。他还遇见了海螺壳筑成的防波堤，有几英尺高，将潟湖状的区域围了起来，他将这片封闭区叫作“水下广场”，认为这里曾是人们安居的地方。他渐渐意识到土著人口数量要比他想象中的多得多，而且他们很可能并不是从别地迁居至此，而是真正的原住民。[\[11\]](#)

开始时，库欣和其他大多数的游客一样，将此地的自然景色视为多彩的热带风光的一部分。然后他注意到在冢堆和水下广场周围野生生物活动频密，于是他开始将这些现象联系起来。他坐在“佛罗里达号”的船舷侧，从船舷上方望去，陆地和海岛近岸“遍是暗绿色的红树林”。红树林生长在海岸线，常见于气候更温暖的河口地带。全世界有超过50种的红树林，三种生长在墨西哥湾的美国海岸，集中于广阔的海岸林里，库欣称其为“遮天蔽日的水中丛林”。最为多产的红色红树林只分布在佛罗里达州，因其垂悬赤褐色的铅笔状细长荚果而得名。它们向外伸出细长的支撑根，像准备好要迈起步来的样子。黑色红树林在地理上的分布则更为广泛，因黑色树干和硬铁般的心材为人所熟知。它们长着成千上万的一种名为呼吸根的特殊根茎，这些根“像蜈蚣腿似的弯曲着”钻出湿地，库欣如此描写道，使它们在变化的潮汐间也能够呼吸。不喜湿水的白色红树林则生长在它的两栖近亲的后方，因此长得也就没那么古怪。[\[12\]](#)

红色和黑色红树林都是河口生态的庇护者和市集。海潮高涨的时候，树林的根系网络将海上的漂浮物诸如腐烂植物、贝壳、不完整的珊瑚和被连根带起的海绵动物都网罗了起来，变成了食物的储藏地。附生在根系上的红树林牡蛎将随海潮漂来的浮游生物过滤取食，反过来，一同到来的鱼类也会以牡蛎为食。同样地，红树林蟹会吃入浮游的碎屑腐食，然后通过被鱼类鸟类吃掉将能量传送到食物链的上一级。在潮间滩涂地里，独居的寄居蟹和成群的招潮蟹的做法也多是如此。咖啡豆一样的蜗牛为了躲避鱼类捕食会往树上爬，但也只是成为鸟类的食物。生活在红树林草上的蚊子也同样是这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食物链底层的蚊子幼虫便是小鱼们的食物来源。

虽然水下的生命对库欣来说并不那么容易看见，但它们并不比湾区任何一个城市冷清，挤满了蓝蟹、牡蛎、游虾、乌龟和各种或幼小或成熟的鱼。“世界上没有其他水域能像佛罗里达南边的墨西哥湾海岸一样，”库欣断言道，“有这么丰富的能产出食物的动物了。”在浅滩和海岸，红树林在其根部堆积腐殖土，海草滋长，营养丰富，生命繁衍不息。在库欣那个时期，湾区河口广布着远超百万英亩的海草草甸，数量以佛罗里达水域为最。有人估测，一英亩的海草生长一年即能为上千万的无脊椎动物和上万的鱼类提供足够的食物，无论是虾米还是大鱼。库欣沿途遇见“极大的”鱼群，它们常常“恣意跳跃……一遇到张嘴而来的海豚和庞大的鲨鱼时就四下逃窜而去”。

[\[13\]](#)

鸟，这种最招眼的野生动物，也被鱼群给招呼来了。库欣有一次目睹了千鸟齐飞的景象。鸟中的长腿家族，像苍鹭、白鹭、朱鹭、篦鹭和林鸮，喜爱在“灌木丛生的”红树林里筑巢栖息，于晨昏间到浅滩，偶尔也会到更近岸处，涉水啄食。鹰和鸮靠飞临水面抓获食物。褐鹈鹕头朝前方，从天空俯冲而下，“一举便迅速锁定了它们的晚餐”。鱼群和鸟群使河口呈现出一派生机，而它们周围也总是会出现

冢堆和水下广场，这传递了一个信息。它们“以一种生动瞩目的方式告诉了我”，为什么几百年前人们“会选择在海边安营扎寨”，库欣写道，“他们跟随鸕鹚和鸕鹚的步伐，在可以行船但又不至于太深的近水海岸，先是解决了生计，最后世代定居于此，这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儿了吗？”^[14]

晚上，“佛罗里达号”停靠在一处偏远的商业运营的海钓营地边上。营地管理者是些偏爱孤岛生活的人，他们习惯了蚊虫和这里黏糊湿热的天气，可库欣却一晚没合眼。晚餐常是白天里的猎物，从来难不倒他们。有一顿晚餐是史密斯射杀到的苍鹭——“不错的食物”，库欣写道。另一个晚上的，是库欣在海滩上踱步捡贝壳时将它翻了个个儿的一只海龟——“比牛排要好。”当他们的单桅帆船终于抵达马可岛时，岛主人柯里尔船长端出了一盘鹿肉来。库欣显然觉得这无甚特别，全然没提到它的味道。^[15]

但他记下了对柯里尔的印象——一个“有礼”之人，但“嘴上并不尊重神明”，意思是他为说话添趣不避脏字。身材细长，蓄着胡子，正值中年，柯里尔^[16]多少算是这个遍地有湾区常见的锯棕榈和菜棕装点的马可岛的统治者了。落潮时露出的红树林沼泽便将他的岛与另一个名叫卡桑巴斯（Caxambas）的岛连接了起来，卡桑巴斯岛比马可岛大了好十几倍^[17]。在这片与世隔绝的绿地中，少数的渔民、猎户和向导都住在用厚木板搭建的刷了白漆的房子和捕鱼用的小屋里。

在柯里尔还是小孩时，这个岛便是他的家。他、他的父母和他的八个兄弟姐妹在美国内战中流离失所，父亲是田纳西州的一名技工，造了一艘纵帆船并命名为“罗伯特·E. 李”，全家人乘着它行驶在湾区海面上。1870年这家人在不幸地经历了一场暴风雨后偶然来到马可

岛，就像不计其数的为了政府授予的160英亩宅地而迁居西部展开新生活的人一样，他们在这里落脚了。

柯里尔的夫人，玛姬·伊莱扎·莫西维恩，也吃惯了岛上生活的苦，自幼生长在锡达礁（Cedar Keys）海岸上，那正是柯里尔大量往来贸易的地方。她经营着他们有20间客房的旅馆，帮忙监管他们雇来照看菜地的工人们。这菜并非要运去集市上售卖，而是专供店内客人食用，客人们多是北方来的有闲阶级的先生女士们，热衷于运动休闲。这里最吸引他们的是休闲式的钓鱼活动，但有些人会到佛罗里达的大柏树区去渔猎。大柏树是个尚未被伐木工染指的千年湿地森林，人们总期望能在那里猎获美洲豹或熊，但短吻鳄从不会让他们失望。[\[18\]](#)

库欣径直走到挖掘点，“几乎是马上就发现了遗迹”。“巨大的成功”，他在他（1895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污泥里苦干了一天，就让他碰上了个大的。他肯定那是土著居民的村落遗址，他们并非带着身家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的，而是让自己适应了当地的环境。接下来他马上回了费城。他带回的样本内有一个木制面具和海螺壳制的长勺，成功说服了培柏博士和菲比·A. 赫斯特为接下来的全面研究提供资金支持，菲比即威廉·伦道夫[\[19\]](#)的母亲[\[20\]](#)，她同时也是一位满腔热忱的人类学研究赞助人。当年12月，库欣就回到了佛罗里达。[\[21\]](#)

这一次，他从佛罗里达的塔彭斯普林斯（Tarpon Springs）启航，那是湾区边上的一个村庄，定居着在这里下水采收海绵的希腊裔移民。他拿到了驾船许可，船名叫“银色浪花”，它是一只52英尺长的纵帆船，“船帆很多”，总共六张。事实上他是掌舵的最佳人选。据这支探险队里的画家威尔斯·索耶（Wells Sawyer）说，库欣有着“用不尽的、无处不在的……热忱和激情”，让这支他亲自挑选的11人组成的考古队伍士气高涨。从塔彭斯普林斯出发时，系着领带，穿

着翻翼领的衬衫、西服马甲和外套，健康状况仍然堪忧的库欣，在陪伴他13年的妻子艾米莉·丹妮森的陪同下，驾驶着“银色浪花”从安克洛特河往湾区驶去。他们周日下海，周三便到了马可岛的峡口。那里“顺风而下，别有风味”，索耶在给友人的去信中如此说到“银色浪花”。于船的左侧便可见覆盖了整个200英里海岸的红树林。[\[22\]](#)

柯里尔把马可岛完全交由库欣支配，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将挖出的不含盐分的腐殖土留下给他的庄稼用。从表面看，挖掘现场就像一个“淤泥洞”。这“整个地方就像一块厚厚的海绵”，库欣写道，“浸透了水，水里含盐量高，臭味也足”——如此他也并不泄气。这个臭熏熏的泥潭，形成一个厌氧泥沼，有效地将氧气隔离在外，将里面的东西保护起来。但当木制手工品接触到空气的那一刻，他并没有为即将到来的可怕事情做好准备。它们开始迅速腐烂。索耶赶在那个祭祀用的面具或辟邪器物还未丧失它原有的色彩和形状前，用纸、笔和速写本疯狂画了起来。其中一些出土物，索耶的速写成为它们最后仅有的留存形式。[\[23\]](#)

此外令人丧气的是挥之不去的蚊子，工作人员一直用烟熏也无济于事，它们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索耶染上了轻微的疟疾。库欣的身体倒令人意外地挺住了。他每天穿着白衬衫和马甲来，却迫不及待要弄脏它们，如此持续了六周的挖掘工作，是美国考古史上成果极为丰硕的一次。“他们每次挖到好东西的时候，”玛姬·柯里尔在她日记里写道，“所有人都会大喊一声，然后库欣先生会与那个发现东西的人握手。”喊声和握手频频出现。库欣的团队挖掘出约1000件手工艺品：几百年前的祭祀面具、工具和武器。他的上司鲍威尔从华盛顿来了，还有F. W. 帕特南，这位哈佛大学皮柏第博物馆的考古馆长，说“几乎不敢相信会有如此重大的发现”。那些面具，帕特南坚定地认为，是“所有出土文物中最为了不起的考古证据”。[\[24\]](#)

对帕特南和其他考古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库欣证明了生活在佛罗里达州西南部的人们已经发展出了一个有机的社会。他们最开始可能来自中美洲或南美洲，甚至也可能是北美洲，但他们在墨西哥湾的海洋环境中重新孕育了全新的文化，在这里生息繁衍了数千年。当库欣此后开始将这些实实在在的过去的手工制品与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联系起来时，这一事实显得更加清晰。西班牙人是第一批到达墨西哥湾的欧洲人，在他们到来时，时值16世纪，当时佛罗里达西南部的土著人口数量可能已经有两万人，分散在50个村落中。这些人即库欣所称礁岛居民的后代，他们生活在等级森严的酋邦社会中，通过战略性联姻和武力来维系权力。他们的领地范围覆盖了南部三分之一的佛罗里达半岛，之后追随库欣而来的研究人员将其合并定义为沼泽文化。

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和传教士将他们在佛罗里达西南部遇到的土著人以他们的酋长（最高统治者）名字为名，称他们为“卡洛斯”，后衍化为“卡卢萨”（Calusa）。根据西班牙人的记录，当地的被统治族群将卡卢萨解释为“凶猛的人”。这个形象很快传遍了大西洋。新大陆早期的史学家对卡卢萨性情的描述是“极为乖戾野蛮，凶狠好斗，不受控制，喜怒无常”^[25]。这个毫无疑问就成为欧洲侵略者眼中当地土著的形象，而他们第一次展现出这些特质是在海上。

卡卢萨人将柏树改造成木筏，先用火将原木的中心烧掉，然后用贝壳铲刀将中间掏空，两根原木经过捆扎后可以载40个士兵。装上船帆后，这只得力的小船便能将他们载往古巴，也许还能到尤卡坦和卢卡亚^[26]（巴哈马群岛）^[27]。

胡安·庞塞·德莱昂于1513年第一次来到佛罗里达，当他在今天的夏洛特港附近登陆时，他与那些木筏相遇了。他的三艘海船驶入对方控制的水域，靠岸时带着武器和装甲士兵，这副极富侵略性的武装

姿态，导致了两场小的冲突，八个印第安人被俘，双方均有伤亡。某日的破晓时分，80艘木筏上的战士悄然潜伏在水中，瞄准了这些抛锚泊定的入侵者，然后随着声声高喊，箭簇和飞镖如雨点般划过头顶，刚好落在入侵者船只前的不远处。这是警告。西班牙人只好撤退，并最后返回到波多黎各。

在将近四个世纪后，随着库欣团队的挖掘，证明这些土著势力存在的有力证据展现在世人面前。它们是武器和家用工具的残骸。北方土著用的是石头，卡卢萨人则用他们所在环境中可及的材料；而他们周围除了石灰岩外，几乎不见卵石和岩石。骨头和贝壳是南佛罗里达文化的核心。“他们的艺术，”库欣写道，“是贝壳和牙齿铸就的艺术，海洋为其提供了几乎所有部件，土地仅仅为部分材料的使用提供了场地。”战士们用来武装自己的矛枪是用短吻鳄和鱼的骨头做成的，刺**红**的脊椎骨也能用作不错的家用刀具和鱼叉。鱼叉在战斗中能兼作矛枪。贝壳用作勺、匙、碗、锤子、锥子和其他的挖掘砍劈工具。大的带尖头的海螺壳被绑在棍棒头上，可用于打斗。[\[28\]](#)

八年后，不知悔改的庞塞·德莱昂再一次将自己暴露在这些防御武器面前。他率领两艘船回来，计划要殖民这片土地，卡卢萨人又一次阻击了欧洲人。后来西班牙的历史编写者将卡卢萨人描述为长着渡鸦般的黑色毛发的巨人。虽然他们并非巨人，但这种夸张说法情有可原。卡卢萨人身高在五尺八到五尺十之间，比西班牙士兵的平均身高高了数英寸，比库欣也还要高些。这两次失败打击了号称所向披靡的西班牙征服者，也击碎了庞塞·德莱昂的梦，这也就让卡卢萨人以巨人的形象出现在了欧洲人的新大陆神话中。

是什么让卡卢萨人无论在身高还是政治上都如此令人瞩目？简单来说，是海湾的生态。具体而言，根据库欣的发现，其他的狩猎采集社会在过冬时，存粮和猎物都在减少，食物短缺的问题甚至严重到了

威胁生命的地步，年老体弱者将很难熬过冬季。但对卡卢萨人而言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只需固守在湾区河口，这里源源不断地供着蛋白质——自生自长，长年不断——让卡卢萨人免去了冬季里的忍饥挨饿。他们不再需要费心农耕，同时也因为常年待在一个地方，他们能专注发展出稳定的社会和有力的防御机制。

在北美乃至全球，能让人永久定居且无须操心粮食作物的地方实属罕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卡卢萨人也无须逐猎而居，因为食物会自己送上门。大鱼、小鱼、虾米、海龟、螃蟹、龙虾、海牛，甚至是鲨鱼、鲸鱼和西印度海豹，只用矛枪、渔网甚至是敏捷的双手就能轻易捕获。水鸟、鹿和植物在当地食物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在所有食物来源中，海洋生命占了超过90%的比例。卡卢萨人身材高大，因为他们有丰足的食物。

从库欣和其后的研究者们从贝骨冢堆中获取的挖掘物可以轻易破译他们的日常饮食。冢堆中贝壳的密度和种类与当地生态相关联。牡蛎壳占据了河口一带，海螺壳则集中在含盐量高的水边。库欣很早便注意到，那些被称为土著居民的垃圾山或厨余冢的冢堆常包含更多信息。由于海湾海岸上少有天然山地，土著人于是用废弃贝壳制造高地，这在他们的文化中象征崇拜和政治荣耀。近海居民对其自然环境同样有明智见解。他们将房子抬高，直到高于海水涨潮和预计风暴潮将到达的高点，高处的风也许还能击退咬人的虫子。

库欣很肯定湾区土著在为他们的房子市镇选址时考虑了风和海的因素。当贝壳不够用时，或者如果某人的社会地位不足以确保他拥有稳固的基底，他们便会往淤泥里敲木桩，将房子高高盖在它们上面以保持干燥。马可岛的原住民将房子建在北边，也就是靠近大陆一侧的岛屿上，可以稍稍阻隔些暴风雨和飓风。尽管如此，一场大风仍然可以掀掉他们的住所。其建筑物是标准的圆形一室小屋，以松木杆支

撑，以棕榈叶和茅草为顶，配以斜条结构的墙和相同材料编织而成的地垫。

酋邦里的公共议事厅，可以容纳2000人，在和平时期酋长便在这里用鱼和牡蛎（没有蔬菜或陆地食物）来招待西班牙使者。公共议事厅设置在基冢岛（Mound Key）上，议事厅是一个大型的土垒工事，贝壳基材将其整体抬高了60多英尺，其他小些的住房抬高高度在20~30英尺。

库欣的研究对象们也并非过着全无忧虑、与世无争的生活。他们不会像北美的其他狩猎采集者一样，将野牛恐吓驱赶到悬崖边上[\[29\]](#)，不会为了获取猎物而火烧森林，不会耕作田地直至地力枯竭。但他们也汲干湿地、平整土地，建立镇区，这些镇区相互独立，都经过严谨细致的规划。所有新大陆的土著居民都面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西半球没有马或骡子供他们用来拉车，但卡卢萨人有他们的河道。在他们的冢堆周围，他们挖掘了大量绵延数英里、不亚于威尼斯运河的水道，通过水道，他们乘木筏漂流2.5英里，就可以横跨位于两个海峡间的派恩岛，而无须蹚10英里的水绕道岛的任何一头。在从18世纪中叶卡卢萨人消失，到白种人在下个世纪移居至此的这段时间里，被清理的空地上草木重新生长，湿地也恢复了，正如柯里尔和库欣挖掘留下的坑洞此后又重新变回沼泽。

但卡卢萨人的生活并没有离开有机自然，他们始终在这个环境里生活工作，与之共存。库欣修复了卡卢萨人的渔网后便从中注意到了这种互动方式。他们用辛勤的双手将松萝凤梨和棕榈纤维（蒲葵或锯棕榈）旋转捻拧成紧紧的绳索，然后同样小心细致地将它们编织成网，并沿着底边穿上贝壳，以加重网底的重量。为了能让网笔直立在水里，他们把上沿的绳索（也就是今天的浮子绳）绑上有悬浮力的葫芦科植物——通常是当地生长的木瓜或压扁的西葫芦。他们捕到了

鱼，而且数量众多。海湾用丰富的海草和清澈的河湾持续养育着它们。卡卢萨人世代见证了这种从不间断的丰饶富足，他们明白鱼类和鸟类之间相互依托的关系。他们也看到了月运周期和季节间的联系：月亮潮汐会将贝类带到近岸，冬天遇到大退潮时，牡蛎床就会暴露出来；春天海龟会被吸引着爬到岸上产卵，大鱼会游到内陆水道里找食。

即使在西班牙人大加赞叹对手的健美和壮硕时，他们也没有将这些和富饶的河湾环境联系起来。尽管他们在湾区奋力拼搏，却始终没有正视土著文化是如何在自然世界中自处的。他们也许在航海报告和日志中对此稍作评论，但从未试图去复刻它。库欣对历史的挖掘是对这段遗落的文明和遗产的记录。欧洲人的征战，正如后文将讲述的，使后人与自然的关系抛弃了和谐，走上了不明智的道路。

在庞塞·德莱昂第一次撞见卡卢萨人的一个半世纪后，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了佛罗里达东海岸，尚未占据墨西哥和古巴外沿的墨西哥湾。但他们丝毫没有停下在印第安村落里布道的脚步。基督徒有义务传颂上帝的话语，为未入教的人引路。耶稣会会士胡安·罗赫尔与卡卢萨人一同生活，那时卡卢萨人已经勉勉强强地接纳了西班牙人。他的布道持续了整整三年时间。在此期间，罗赫尔由当地人带着，乘木筏，沿着手工挖掘的运河，走遍了各个村子。无论什么季节，他都穿着粗纺教士服，束之以黑色腰带，头戴不带绒球的四角帽，手按圣经。圣经告诉他，上帝主宰人类，而人类主宰世界，因此人类对海里的鱼、天上的鸟以及世上万物有绝对的支配权。不同于上帝创造的其他“牲畜”，人类是一个独立物种，拥有智力和理性，拥有神赐的福泽，他与自然有别，高于自然。

卡卢萨的宗教领袖们有与此截然不同的精神感悟，但它们不是从书上来，而是来自土地和海洋。他们不穿袍子，但是戴面具。面具就

是库欣在地里发现的那种，上面雕着动物形象，用于仪式；人们也许会在仪式中称颂大海的慷慨。小雕像用当地悬铃木雕刻而成，同时融合了人和动物的样貌特点。卡卢萨人相信在他们死后，他们的灵魂会附着在某个陆地动物或者鱼的身上，当它们被吃掉，灵魂便又转移到下一个动物身上。所有形式的生命都是人和动物共通的灵魂的集合。

罗赫尔既不能理解面具和雕塑的含义，也不能将它们赶走。他试图阻止被他称为“巫医”的卡卢萨宗教领袖们参与卡卢萨的宗教仪式，但未能如愿。一年之后，他向在圣奥古斯汀的执政者去信表达了他的挫败感：卡卢萨人“和我说，他们的祖先有史以来就生活在而且愿意生活在他们自己的规则体系下，所以我应该随他们去，他们不愿意听我的话”。布道不止于拯救灵魂。罗赫尔尝试禁止卡卢萨人涂画身体，他给他们遮蔽裸体的布料，给他们修剪长发的剪子，给他们种植粮食作物的工具，但都被卡卢萨人拒绝了。粮食作物可以喂饱罗赫尔和他的卫兵。但卡卢萨人更愿意围绕海湾自然组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在田地上耕作。[\[30\]](#)

326年后，弗兰克·汉密尔顿·库欣踏上了这个曾经被罗赫尔的教士袍拂过的土地，但这位人类学家没能活到他的发现被发扬光大的时候。此时距离他辞世还有五年，他并非在调研时染病去世——这倒是浪漫的死法——据说他是在缅因州一所名叫庇护港的隐居寓所里整理墨西哥湾笔记时被一根鱼骨噎死的。

库欣曾经到佛罗里达的西南部去研究一种古代文明，他称这个文明下的人们是“史前最聪明的人群之一”。他在那里也了解了墨西哥湾的相关信息。古老的面具之后就隐藏着关于他的礁岛居民兴盛之谜的答案。威尔士·索耶为此以一首抒情的赞歌作结：“与自然面对面/在所有他们眼见到的/在小鸟、溪涧和花朵里/自然的法则在运行/用法力让它们生生不息。”这是墨西哥湾的馈赠。这是库欣杰出发现的关

键，虽然西班牙人发现了墨西哥湾并据为己有，但他们从未领悟这一点。[\[31\]](#)

[\[1\]](#) Quoted in Marion Spjut Gilliland, *Key Marco's Buried Treasure: Archaeology and Adven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89), 94.

[\[2\]](#) Charles Kenworthy, "Ancient Canals in Florida," *Forest and Stream* 5 (August 12, 1875): 8.

[\[3\]](#) “培柏博士”在英语中称Doctor Pepper，与当时七喜公司推出的一款碳酸饮料（中译名“胡椒博士”）同名，故有此昵称。——译注

[\[4\]](#) 1846年创立于美国华盛顿的一个博物馆机构。——译注

[\[5\]](#) Frank Hamilton Cushing, "Relics of an Unknown Race Discovered," *Journal* (New York), June 21, 1896.

[\[6\]](#) "Folk Lore of the Zuni,"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5, 1895; Alex F. Chamberlain, "In Memoriam: Frank Hamilton Cushing,"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3 (1900): 129; "In Memoriam: Frank Hamilton Cushing,"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 (1900): 366.

[\[7\]](#) Cushing, "Relics of an Unknown Race Discovered."

[\[8\]](#) Cushing, "Relics of an Unknown Race Discovered."

[\[9\]](#) Cushing, "Relics of an Unknown Race Discovered."

[\[10\]](#) Cushing, "Relics of an Unknown Race Discovered."

[\[11\]](#) Cushing, "Relics of an Unknown Race Discovered."; Frank Hamilton Cushing, *The Pepper-Hearst Expedition: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ploration of Ancient Key-Dweller Remains on the Gulf Coast of Florida* (MacCalla, 1897), 20.

[\[12\]](#) Cushing, "Relics of an Unknown Race Discovered"; Cushing, *Pepper-Hearst Expedition*, 3, 4.

[13] Cushing, *Pepper-Hearst Expedition*, 7, 68.

[14] Cushing, *Pepper-Hearst Expedition*, 8, 68; Frank H. Cushing, *Exploration of Ancient Key-Dweller Remains on the Gulf Coast of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3, 4.

[15] Cushing, *Exploration of Ancient Key-Dweller Remains*, 4; Phyllis E. Kolianos and Brent R. Wiesman, eds., *The Florida Journals of Frank Hamilton Cushing*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5), 22.

[16] W. D. 柯里尔与广告业大亨巴伦·柯里尔并无血亲关系。巴伦·柯里尔后来成为当地乃至全州最大的地主，佛罗里达州的柯里尔县即以他命名。

[17] 库欣时期的马可礁 (Key Marco) 现名古马可村 (Old Marco Village)。20世纪80年代，马可岛南边的霍尔岛 (Horr's Island) 被开发商更名为马可礁。二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疏浚填筑工程中被连接了起来。

[18] Kolianos and Wiesman, *Florida Journals*, 23.

[19]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20世纪初美国报业大王，是新闻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译注

[20] 几乎所有提到她的材料中都将其身份错误标示为是赫斯特的妻子。

[21] Kolianos and Wiesman, *Florida Journals*, 23; Cushing, *Exploration of Ancient Key-Dweller Remains*, 28.

[22] Wells M. Sawyer, "Memories," Wells M. Sawyer Collection, Special and Area Studies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Wells M. Sawyer, "The Health" (undated verse), Sawyer Collection; Wells Sawyer to My Dear Weller, March 1896, Sawyer Collection; Kolianos and Wiesman, *Florida Journals*, 89-90.

[23] Kolianos and Wiesman, *Florida Journals*, 59.

[24] Randolph J. Widmer, "Introduction," in Cushing, *Exploration of Ancient Key-Dweller Remains*, xvi; Cushing, *Pepper-Hearst Expedition*, 112.

[25] 这位史学家是冈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瓦尔德斯（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y Valdés），由R.H.福森（Robert H. Fuson）引述于 *Juan Ponce de León and the Spanish Discovery of Puerto Rico and Florida* (MacDonald and Woodward, 2000) 一书第165页。

[26] 卢卡亚，西语为Lucayos，卢卡亚人是西班牙人入侵前定居在巴哈马群岛的土著居民。——译注

[27] 16世纪的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哥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认为卢卡亚的女人拥有能引诱男人们渡过大海的美貌。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Indias y Vida de Hernan Cortes* (Biblioteca Ayacucho, n.d.), p.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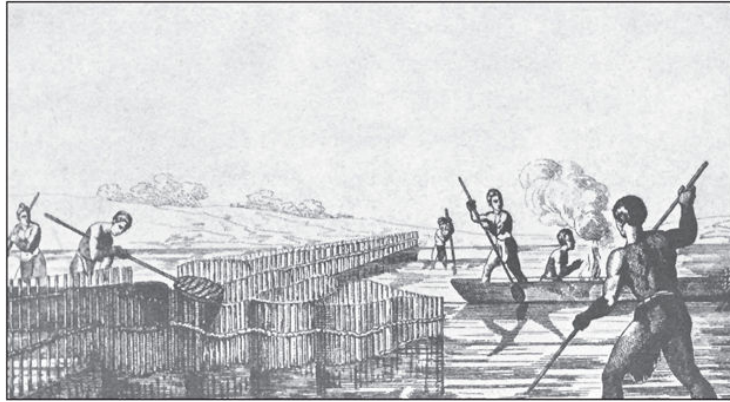
[28] Cushing, *Pepper-Hearst Expedition*, 83.

[29] 美洲野牛是北美土著居民重要的生计来源，他们猎杀野牛的技巧便是将野牛引诱、恐吓至悬崖边上，牛群跑至悬崖前收不住腿便会随惯性跌入崖底摔死，然后人们在崖底预先布置好的屠宰场中将其宰杀。——译注

[30] Darcie A. MacMahon and William H. Marquadt, *The Calusa and Their Legacy*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4), 84.

[31] Gilliland, *Key Marco's Buried Treasure*, 75; Sawyer, "Health."

二 墨西哥湾的由来



在欧洲人到来前，成千上万的土著居民生活在墨西哥湾海岸，在富饶的河口繁衍生息。

水对人类是友好的。海洋，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它不可改变、至高无上的威力与人类的精神大相径庭，却从来都是地球上前进开拓的各国的朋友。

——约瑟夫·康拉德（1906）[\[1\]](#)

1519年6月，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Álvarez de Pineda），这位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少有恶名的西班牙探险家，驶入墨西哥湾，环绕海岸绘制了一幅地图。尽管西班牙人到过佛罗里达，也正对墨西哥进行殖民统治，但在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的地图出现之前，他们并不确定两地之间的这片水域是海洋、大型湖湾还是海湾。大航海时期，一个广阔的世界展现在欧洲各个帝国势力面前，约瑟夫·康拉德称这些帝国为“世界上奋进开拓的各国”。他们的航海人发现了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格陵兰岛、纽芬兰岛、百慕大群岛、马达加斯加岛、津巴布韦和亚马孙河。他们绕过非洲的好望角驶过崎岖的水道，到达印度、泰国、越南和中国。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Vasco Núñez de Balboa）将船停靠在加勒比海岸，穿过巴拿马地峡

银灰色的山林后，他跳见了太平洋。他将其命名为Mar del Sur，即“南海”。六年后，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开始了他的勘测之旅。

克里斯多弗·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后，首要任务是沿着加勒比地区开疆拓土、征服岛民，无暇顾及该如何界定北面那片水域。区域地理的划定同样也是问题。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的西班牙殖民地之间，有一片狭长的热带山坡和绿林，日后它被命名为古巴。它阻隔了征服者们的视线，本身也一直未被外界踏足。殖民者们以为古巴是另一片新大陆的边缘。即使只是在它边上流连数年，人们也时刻感受到了来自全新的土地和海洋的吸引力，未来的财富和荣耀在向他们招手。

第一个向古巴驶去的是哥伦布，他要去探寻他幻想中通往远东极乐和财富的入口。1492年10月，他沿着古巴岛的东北岸往湾区驶进，然后遇到了一股强大的海流，迫使他倒退。他驶入了墨西哥湾流，但他并不知道。他只知道，或者他坚持认为他知道，古巴是亚洲大陆东端的半岛。

胡安·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他是哥伦布远航旗舰“圣马利亚号”的主人，同时也是领航员和船长，他对此有不同的想法。他随船环绕了古巴岛，也在哥伦布的命令下签署了证明他们勘察到一个半岛的保证书——以防自己被割了舌头，但他之后绘制了一幅地图，上面显示他勘察的这片陆地是一个海岛。绘制于1500年，德拉科萨的这幅地图艺术气息浓厚，除标识着地理信息外，它用色鲜艳如同手工艺品。因此也就不奇怪，在被湮没在巴黎的档案文件里数个世纪之后，它能成功引起亚历山大·洪堡的注意。洪堡是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也是最先提出南美洲和非洲大陆原属一个大陆的人之一。洪堡力证德拉科萨是个天才。这个西班牙人描绘古巴的角度非同一般，地图上岛的北端是一片大大的直入大陆中心的湖湾或海湾。他也许是从西班牙的奴隶口中得知海岛和其上水域的存在的，因为这些

奴隶常来往于这些未知海域，也可能他是从生活在加勒比、在当地航海的泰诺人处了解到的。随后另两幅地图也问世了，它们的绘制思路与德拉科萨的近似。最后，西印度群岛的总督尼古拉斯·德奥万多（Nicolás de Ovando）为找到确定的答案，寻求塞巴斯蒂安·德奥坎波（Sebastián de Ocampo）的帮助。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项任务本都不可能轮到德奥坎波。虽然他掌管着一队贸易商船，但他本不被允许这么做。他在西班牙惹了麻烦，罪名已不可查，但皇室将他流放禁足于伊斯帕尼奥拉岛（如今的海地岛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但德奥万多总督一直不是循规蹈矩的人，虽然也不是毫无防范，但他还是在1508年派德奥坎波前去查明古巴的地理形态。德奥坎波率领的两艘船先是到达古巴岛北岸，然后和哥伦布船队一样，逆着洋流往西侧驶进。德奥坎波奋力前进，在他的船只要停下来做例行检修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港口，他后来起名为Puerto de Carenas（此后更名为哈瓦那）。船只准备好后，他继续前进，绕过了古巴岛最西端——圣安东尼奥角，此时伟大的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就在他的右肩方向，但很可能超出了他的视野范围。他回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证明古巴是一个岛，而且它的西北方还有一片广阔的海域。

德奥万多总督的探索发现给他自己和出逃的德奥坎波带来了麻烦。古巴岛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两年后，随德奥万多征战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其中一个副官，迭戈·委拉斯开兹·德利亚尔（Diego Velázquez de Cuéllar），对这座岛屿发动了一场成功入侵。作为古巴岛第一任总督，委拉斯开兹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殖民地事业上，他稳定经济，奴役泰诺人，许多泰诺人都成了他的私人奴隶，数量从几人上升到惊人的三万人。他，至少在那个时候，无暇理会岛屿北边的海域。他现在做的事为胡安·庞塞·德莱昂后来成为史上第一个进入墨西哥湾的欧洲人开辟了道路。

继哥伦布后，那段时期最为人熟知的一次远航当属胡安·庞塞·德莱昂1513年的发现佛罗里达之行。他没有其他航海家那么“花里胡哨”，已故史学家查尔斯·阿纳德（Charles Arnade）如此评论道，与他的同时代人比起来，他的成就是瞩目的，但尚不至于伟大。庞塞·德莱昂死后，因与不老泉^[2]传说联系在一起而声名鹊起，这个故事最早见于早期的编年史料，然后因受到纳撒尼尔·霍桑^[3]、奥森·威尔斯^[4]和佛罗里达旅游业的推崇而广为流传。对像庞塞·德莱昂这样一位自筹资金远航的征服者来说，其议程上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踏上一片能令此行有利可图的土地。西班牙皇室颁予他的特许状里强调其任务是寻找金银和奴役印第安人，未提到泉水的事。^[5]

因一个传说而声名大噪的这项远航任务实际上并不传奇。他在3月初启航去寻找巴哈马北面未知的大海和陆地，没有可供导航的地图。当他的三艘船到达佛罗里达东海岸的时候，他以为他碰巧到了一座岛上。他沿着海岸线北上，因时值复活节，于是他将这片陆地取名为La Florida^[6]以作纪念，“复活节”一词在西班牙语里即Pascua Florida，意为“花的盛宴”。而今天的佛罗里达人更愿意将其解读为西班牙人踏上的这片土地多彩芬芳，因为它确实有如亚热带地区般繁花盛开。这是个稀奇的说法，抛开了征服者的角度，代之以现代人的视角，用他们生活周围的、公园里看到的井然有序的景观来描绘早期的佛罗里达，他们对西班牙人当时登上的北美大陆的蛮荒所知甚少。

在庞塞·德莱昂眼中，海岸上应该尽是干草丛生、藤蔓缠绕的树林，灌木丛林地里满是锯棕榈，它们蔓延着生长开去，令人无路可走。这个地方应当是几乎见不到花的踪迹的。作为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西班牙人常以宗教节日来命名他们新发现的地方。如果船队在更北的地方着陆，那么特拉华州或新泽西州，即便在当时还没迎来春花，它们在今天也许就被称为佛罗里达了。但这个小型护航队到了卡纳维拉尔角附近，一路往南开，绕过半岛南端，沿着西海岸来到了今

天的夏洛特港海域。庞塞·德莱昂实际已经进入了墨西哥湾，只是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西班牙人与卡卢萨人斗争了两周后便离开了。在返回波多黎各途中，他们登上了有11个小岛的岛群，将上面的野生动物掠杀一番，杀了数以千计的鸟和好几只海牛。他们的指挥官将群岛命名为Los Tortugas^[7]，这次这个名字无关圣人，也无关宗教纪念，而是以160只他们或杀或掠的海龟为名。

庞塞·德莱昂环行于红树林环绕的佛罗里达半岛时，并没有意识到它西边的大海是一个海湾，也全然不知佛罗里达连接的是一个大陆。他以为那是另一个新世界的海岛。如果不是在半岛东边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他1513年的这次出行本将无功而返。他在卡纳维拉尔角附近转向南行，船只遭遇到一股强大的洋流，使他们寸步难行。这些西班牙人还未意识到他们已经完全被裹挟在墨西哥湾流中了。不久，他们就估摸出这股激流能够将一艘船一直往东推进，横跨大西洋，直至欧洲。一位墨西哥湾流学者这么评论道：“克里斯多弗·哥伦布找到了通往新世界的路，而庞塞·德莱昂则找到了回来的路。”^[8]

对湾流潜在动力的发现其实应归功于庞塞·德莱昂身边机敏的副驾驶员安东·德阿拉明诺。他是地地道道的西班牙帕洛斯（Palos）人，而帕洛斯正是哥伦布那次历史性航行上的站点，也是无数航海人的摇篮。德阿拉明诺在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加入了哥伦布对新世界的第四次探险。庞塞·德莱昂有幸在数年后获得他的帮助。德阿拉明诺是当时最熟悉西印度群岛的人之一，也因此成为数一数二的领航员，颇受推崇。帝国力量的施展，既少不得像委拉斯开兹和庞塞·德莱昂这种自负而乐天的开创者，也同样不能缺少像德阿拉明诺这样有高超航海技术的领航员。

领航员们看得更远，也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地理大发现时代在自然界里有着功不可没的同盟：助力的洋流和大风，导航的星辰和太

阳，建造船舰的材料，还有人们期待中的风险回报——金山银矿。作为一个领航员，德阿拉明诺要依赖人类发明的航海仪器，星盘和四分仪引导他靠近如灯塔的星体，指南针在地球磁场的作用下为他指引方向。他只需看一眼清澈夜空中的星辰，稍加计算，就能知道他所处的纬度和已航行距离，从而根据已知的地点——西班牙或伊斯帕尼奥拉岛——推算出当下身处的位置。当暴风雨让他偏离了航道，或者不合时宜的云层遮挡了他观测天体的视野时，他也许也会咒骂自然。可是，要想横穿大西洋或带领庞塞·德莱昂顺利到达未知的墨西哥湾，德阿拉明诺不得不指望自然的力量。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当他遇到了挡住去路的陌生洋流时，相比于阻力，他从中看到更多的是可利用的机会。六年后的1519年，也就是阿隆索·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绕着新海岸航行的同一年，德阿拉明诺就第一次利用当时还不知名的墨西哥湾流让满舱满载的西班牙舰队从墨西哥顺流而返。湾流在接近欧洲大陆的地方分为两路，一路去往不列颠群岛和挪威海，另一路去往西班牙。顺流而行在横渡大洋时可以节省一个星期的时间。在水上停留的时间越短，也就意味着更低的行船成本与更小的遭遇恶劣天气和海盗的风险。对西班牙人来说，湾流不仅可以运送贵金属，还可以运送木材、松脂制品^[9]、糖和朗姆酒。它成为全球贸易的海上高速通道，正如已故的地理学家卡尔·奥特温·苏尔（Carl Ortwin Sauer）所说，它是“帝国”的“生命线”。^[10]

在美国版本的历史里，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第一个绘制出湾流地图的人。这股水底的暗涌的确吸引了他，但他并不是地图的始创者。一个世纪前的1665年，德国耶稣会士亚塔那修·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在他绘制的世界大洋图上已将湾流标示了出来。其他在富兰克林时代前出现的地图也对此有过刻画。它们是专门为贸易和清算公司绘制的，作为机密被妥善保管起来，谨防商业对手的窃取。富兰克

林的确创作过一幅地图，但是是基于早期的地图和多位船长的证言而成。当时他还是殖民地的邮政局局长，想通过避开洋流的阻力加快英国寄来包裹的到达速度。只是，船长们是一群顽固的人。他们没有理会富兰克林的示意，邮件越过大西洋的速度依然一如既往地慢。将近一个世纪后，墨西哥湾流才迎来第一次精准的现代化勘测。主导人就是美国海岸勘测局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巴赫（Alexander Bache），他也是富兰克林的曾孙。

如果说好奇心是探险和摸索新世界的领路人，那利益便是前进的驱动力。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于1488年首次到达好望角，为开辟前往亚洲的贸易通道奠定了基础。打通水上的全球贸易通路后，各国商船赚得盆满钵满，欧洲帝国财富膨胀，教会将金银收入囊中。为了能走得更快更远，新式海船被设计了出来，原先60英尺的轻便帆船被改进为大得多的宽身帆船。船员们在世界地图上连点成线，探险家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如果可能的话。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斐迪南·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麦哲伦是扬着西班牙旗帜出发的葡萄牙裔人，所率领的舰队代表当时最先进的航海力量，他启航的时间正是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完成墨西哥湾海图绘制的那一年。

在庞塞·德莱昂之后，先后有三队探险人马到过墨西哥湾。他们从古巴岛，向东途经尤卡坦半岛和玛雅人的金字塔式台庙，最终到达了墨西哥湾底部一个开阔的椭圆形湖湾上。其中一人，德阿拉明诺，将其命名为坎佩切湾（Bay Campeche）。第一队人是带着殖民任务的骑兵，他们没有带劳工——而要想在加勒比地区建立起有利可图的殖民事业，劳工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随后那支队伍由离经叛道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率领，他们收获了墨西哥的金银财帛。此后一个月，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便从牙买加向墨西哥湾进发了。

我们对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知之甚少，无论是他的国籍、经历还是相貌。他有没有可能，像德奥坎波一样，是被牙买加总督派来执行任务的流放犯？这位总督垂涎的不仅是珍贵金银；其岛上奴隶的数量因受到体罚、旧大陆疫病肆虐而锐减，他亟须补充奴隶，而北方的墨西哥湾就是一片等待被征服的领地。

开春后，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率领四艘船离开了牙买加，他很可能是从尤卡坦海峡进入墨西哥湾的。从这里开始，他的航行路线我们不得而知。他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地将湾区环绕了一周，也或许两种方式都走过也未可知。证据就是他的地图。他的地图绘制得粗糙简单，没有指示线，没有方位刻度或标识，至多是一条鬼画符样的海岸轮廓线。看起来丝毫不像能改变一个领航员一生的那种海图，但它恰恰就是。那个鬼画符样的轮廓线是墨西哥湾物理形态的恰当表达，它解开了两个谜题。它告诉我们庞塞·德莱昂发现的佛罗里达岛其实是一个半岛，古巴北边不知名的水域周围有大陆环绕，那是一个海湾。

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达湾区北部海岸、到达得克萨斯州海岸的欧洲人。途中，他发现了几条河流，包括看起来像密西西比（他将其命名为Espiritu Santo，意为“宗教节日”）的一条河，此后它将成为欧洲各国在北美大陆最为重要的一条河流。湾区地图的第一位绘制人也在维拉里卡（Villa Rica）遇见了正在征战墨西哥的埃尔南·科尔特斯。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继续往北走，在墨西哥的帕努科河（Río Pánuco）附近展开了殖民统治。这段时间持续得不长。史学家们判断有99%的可能，他是在当地瓦斯特克人（Huastec）的反抗中死去的。

他的地图比他长寿，此后出现的各版本地图也充分显示了其影响力。曾经隐匿于世的这片海也有了自己的姓名。1541年的一版作者不

详的地图上称之为Seno de Mejicano，也就是“墨西哥湾”（Mexican Gulf）。塞巴斯蒂安·卡伯特——新大陆发现人约翰·卡伯特的儿子——在1544年发行的一版地图上指其名为Golpho de la Nueva España^[11]。一位葡萄牙制图师从地理角度取了一个中性的拉丁文变体名Sinus Magnus Antiliarum，意为“大而圆的海湾”。这个名字的命运就像它的前辈们一样，并未被采纳，也许是因为显得笨拙了（不像制图师本人的名字LopoHomem，是拉丁语中“狼人”的意思），最终被敲定的名字是Golfode México。

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是否曾为墨西哥湾命名，我们不得而知。在他的地图上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名字，而且不幸的是，他的探险之行没有在后世留下任何书面文字。因此这片大海和海岸经过他的巧手绘制，却也没留下一些诗意的结语。正如每个探险家都会做的一样，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肯定也有记日志的习惯。他的日志将是发现新大陆时期唯一从第一视角对海湾北部的当地文化进行观察描述的文字。根据二手史料的记载，他遇见的土著族群有40个之多，那将是数千年土著文明的最完整呈现，因为此后横渡大西洋的每一艘船都将带着欧洲大陆的病菌，侵袭大片的土著生命。考古证据表明，他会看到保存完好的圆顶小屋，小屋以木梁承重，覆以动物皮毛、茅草或棕榈叶，卡卢萨人的住所也一样，被建在贝冢上，其中有不少要比埃及金字塔还要古老。他在6月到达这里，也许会看见空无一人的村落。因为在卡卢萨以外的地区，海湾海岸的狩猎采集者会在暖和的季节里前往内陆采集坚果、水果，追猎野生动物，其余时候则回归到海湾常年供应的食物上。

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的日志里还很可能会描述地形，而当地的地形，一言以蔽之，就是平坦。不同于他所熟悉的加勒比地区高峻的火山岛群，湾区地势并无明显的起伏。没有岩石嶙峋的山峦岬角，也没有陡直纵深的山谷沟壑。虽然地形千篇一律，但地貌是多样的：沿

海草原、盐沼、宽阔海滩、红树林防护线、海峡、潟湖、障壁岛、河口三角洲。它们组成了湾区的自然景观，使湾区的土著居民活得健康强壮，从而有力地抵御了欧洲入侵者，让他们当中很多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1] Joseph Conrad, *The Mirror of the Sea* (Harper & Brothers, 1906), 168.

[2] 不老泉 (Fountain of Youth) 是传说中能使人异常长寿的奇妙泉水，其最早见于公元前3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中，此后也有许多欧亚民间传说间接地提到了不老泉水。在大航海时代，加勒比海的土著居民认为这种神奇的泉水是在比米尼群岛 (Bimini) 的某片神秘土地上。16世纪胡安·庞塞·德莱昂占领了波多黎各，不老泉的传说也被写进了其传记中。——译注

[3] 19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红字》等。——译注

[4] 20世纪美国著名演艺人士，《公民凯恩》的导演、制片和编剧。——译注

[5] Charles W. Arnade, “Who Was Juan Ponce de Leon?” *Tequesta* 27 (1967): 3.

[6] 西班牙语“花开的土地”的意思。——译注

[7] 西班牙语“海龟的岛”的意思。——译注

[8] Stan Ulanski, *The Gulf Stream: Tiny Plankton, Giant Bluefin, and the Amazing Story of the Powerful River in the Atlanti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8), x ii.

[9] 松脂制品因其疏水性被广泛应用于木制船只的建造和维护，在大航海时代中扮演重要角色。——译注

[10] Carl Ortwin Sauer, *Sixteenth-Century North America: The Land and the Peoples as Seen by the Europea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29.

[11] “新西班牙海湾”之意。——译注

三 无谓的送命



对土著来说，16世纪驶近海岸的西班牙船只充满了敌意。作为回击，有三位著名的征服者都在墨西哥湾的异域海岸上丢了性命。

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被惊恐绝望弄得如此软弱，以至于面对上天的丰富馈赠也不懂利用；知道这一点，我们的怜悯之情也就少得多了。

——伯纳德·罗曼斯（1776）[\[1\]](#)

毒番石榴树生长在热带地区，常与红树林为邻。它的大小与红树林相当，根系暴露在外，扭曲弯折。它们之所以扎根于海湾沿岸，也许是靠果实随着环流一路从中美洲漂荡而来播下了种子。毒番石榴树的叶片亮绿无瑕，花气香甜，果实有手掌大小，形似苹果——它的外表掩藏了其致命的毒性。西班牙人叫它*manzanilla de la muerte*，即“致命的小苹果”。

当庞塞·德莱昂于1521年带着殖民者第二次来到南佛罗里达时，一个卡卢萨守卫者用一个手工刻制的梭镖投射器掷出一个飞镖，击中

了庞塞·德莱昂的大腿。被击退的殖民者带着半昏迷的队长逃离。几乎可以肯定飞镖的尖端沾有毒番石榴的毒液。庞塞·德莱昂撤回古巴几天后就身亡了。几个世纪后，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对此挖苦道，卡卢萨人“让他的泉水涌了出来”。[\[2\]](#)

当时居住在海湾沿岸的土著有上万人，他们防守能力强，沟通网络高效，能够将信息沿着陆地和水道传送到千里之外。作为海上民族，他们并不像西班牙人设想的那样，过着原始的离群生活。他们的世界跨越了地平线。实际上，在西班牙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前，他们已经知道了西班牙人的存在。他们已经获知了发生在巴哈马群岛、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岛上的对印第安土著的殖民和杀戮。还有那个年代随处可见的船舶残骸，也出卖了他们的存在。自从欧洲人开始大探险以来，漂浮的残骸持续冲刷着印第安土著居住的海湾沿岸，一同被冲上岸的还有T. S. 艾略特所说的“外国死人的装备”，有时还包括遇难人本身，他们面目模糊，披头散发，穿着厚重的衣服。偶尔会有幸存者爬上岸，如此一来，外来人的信息就更多地被透露了。所以当庞塞·德莱昂第一次见卡卢萨人，对对方还一无所知时，当地人使用西班牙语和他的船队问好了。[\[3\]](#)

印第安人并不奇怪这位征服者在八年后重返此地。在这个他认定将成为他伊甸园的地方、在那个苹果面前，他终究还是倒下了。印第安人也不惊讶七年后又来了另一位征服者，潘菲洛·德纳尔瓦埃斯（Pánfilo de Narváez）。这些征战者前赴后继，冷酷无情，而德纳尔瓦埃斯的冷血一如他的前辈。在史学家们的笔下，他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暴虐之徒——一个“嗓音低沉的恶霸”，有人这么说——一心想着报复埃尔南·科尔特斯，绝不会任人宰割。他是地道的卡斯蒂利亚人[\[4\]](#)，蓄着红褐色须髯，是征战牙买加和古巴的主要力量。科尔特斯也曾参与古巴殖民战争。他和德纳尔瓦埃斯当时是迭戈·委拉斯开兹

- 德利亚尔的手下，委拉斯开兹在征服古巴后，成为古巴总督，蓄养了三万奴工。[\[5\]](#)

古巴岛土壤肥沃，因此除了蓄养农奴外，委拉斯开兹还在这里种植了木薯（古巴语称为yucca）一类的农作物，它们能换取大量财富，但这些作物一旦离开健壮的劳动力则毫无价值。大部分土著奴工不是死于外来的疫病就是死于殖民者的暴戾酷刑。由于前两次出师尤卡坦半岛均不成功，委拉斯开兹于1518年末派科尔特斯发起了第三次征战。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错误的决定。科尔特斯掠得阿兹特克的金银后，尽管是委拉斯开兹资助了此次出征，但他丝毫没有要起程返航与其分享战利品的意思。一年后，总督派德纳尔瓦埃斯将科尔特斯带回来。科尔特斯的一个手下，伯纳尔·迪亚兹，后来回忆起此事时，说德纳尔瓦埃斯是一只“赶尽杀绝的疯狗”。但显然这两人中，科尔特斯是更精明的那一个。他征战阿兹特克人的经历，在他与这位卡斯蒂利亚对手的斗争中重演了：他以少胜多，打败了德纳尔瓦埃斯。德纳尔瓦埃斯失去了一只眼睛，但保住了性命。他在韦拉克鲁斯（Veracruz）——欧洲人在北美大陆的第一个永久殖民地——被囚禁了近四年，后来在其妻子的担保下被释放。[\[6\]](#)

重获自由只会让德纳尔瓦埃斯重燃复仇之心。他回到西班牙，请愿要与科尔特斯一战。查理五世很慷慨。除了庞塞·德莱昂的旧有领地，他授予德纳尔瓦埃斯的佛罗里达领地向北延伸至今天的佛州边界，向西至距离太平洋250英里处，向南到了墨西哥他的关押地附近。几乎还未被白人染指的墨西哥湾海岸线的三分之二都落入他的管辖范围。古往今来除了君王，没有一个人像他这般坐拥如此多的滨海之地。德纳尔瓦埃斯出征时的头衔也是一大箩：总督，船长总领，第一执法人，要塞总指挥，殖民地行政总督。他此去墨西哥湾将要自筹资金。但是，人们预期此行将会带来回报（金银和奴隶）以及与科尔特斯彻底清算的机会——这是一个会削弱判断力的动机。不仅如此，代

价还包括性命。有大约600个士兵、水手和殖民者为这次出征赌上了性命——这是一场不明智的赌博。

史学家们一直以来都说德纳尔瓦埃斯不仅是最残酷的，也是“所有征服者中最不走运的”。所有跨洋跋涉都伴随着风险，正因为危险无处不在，一次平安的旅程就将成就一段史诗。德纳尔瓦埃斯率领着五艘船于1527年夏天渡过了大西洋，一路无灾无难。但不幸的到来也是史诗级的，他刚驶入新世界，坏运气就像水蛭一样紧紧吸附在他身上，直到耗尽他的生命。一场罕见的11月飓风带走了两艘船、60条人命和20匹马。德纳尔瓦埃斯在古巴岛上换了船，还雇了一个领航员，对方称自己具备相应的航海技术，足以驾驭前方的陌生海湾。他上任第四天，便将船队带上了古巴南边海岸的暗礁，导致船底龙骨触礁，船搁浅了两周。然后从南边席卷而来一场船员们平日最怕的暴风雨，海潮上涌，船队才得以脱身。他们随后在哈瓦那补充给养，整装再次出发，却因偏航一头扎进另一场风暴中，然后是第二场、第三场。[\[7\]](#)

他们在哈瓦那重整旗鼓后，这群着了咒的西班牙人终于做好向墨西哥进发的准备了。在新世界里行进仍要依赖古希腊传下来的工具，那就是用来指示方向的罗盘和测定纬度的星盘，但它们并不准确，因为要到两个世纪后才发展出能做精准测量的六分仪。当时的海图也不可靠，常常标错地标，地标间距也不准确。航海人到16世纪末才等到可以测船速的测程板出现。18世纪时，用以定位东西方向并确认经度的经线仪问世。领航员可用的工具有限，因此他们在航位推测上的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所谓航位推测，就是基于船速和洋流方向而做的猜测；船速的测算依据是水面泛起的波纹大小，而说起洋流，墨西哥湾流在当时仍是一个谜。

当船队离开古巴时，事情就变得糟糕透顶了。他们的目的地是格兰德河（Rio Grande）以南125英里处的帕尔马斯河（Rio de las

Palmas) [8]，领航员穆罗本应按这个西向航线相应调整他的罗盘，然后根据水面波纹计算定位。在海上不知过了多少天后，他们还是看到了陆地，但他们身处的不是帕尔马斯河，而是900多英里之外海湾另一头的坦帕湾附近——他们到了哈瓦那的北边，而不是西边。

尽管日落出现在大海那头而不是陆地那头，穆罗和其他领航员都坚称船队到达的地方就是墨西哥，只要沿着海岸往北走10~15里格[9]就是帕尔马斯河了。这支小船队究竟是怎么偏离航道的至此仍旧是个谜。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另一场暴风雨袭击了德纳尔瓦埃斯，另一些认为船只是遭遇了墨西哥湾流和环流而被带偏的。这两种观点都说得通。

可以肯定的是，德纳尔瓦埃斯要先解决摆在眼前的难题。迷了路的西班牙人应该尝试去找帕尔马斯河吗？如果要找，是走着去还是坐船去？当地的土著会作何反应？土著居民有黄金吗，或者他们知道哪里能找到黄金吗？他们有食物吗？

补给是远道而来的殖民者面对的最要紧问题。随船而来的都是西班牙社会中称得上体面的一群人——工匠、商人、律师、科学家、绅士和修道士。除了一些奴隶外，他们所有人都是基督徒，势必跟随他们的上帝以及代表耶稣战士的德纳尔瓦埃斯，他们必定是坚韧自律、忠于信仰、仁慈宽容的。但渐渐地，他们开始感到怀疑、害怕和懊悔——背靠丰饶的河湾，饥饿反倒是无须担心的。

他们从没想过要从坦帕湾开始对水底生命进行全方位的勘测，这是他们的失策之处。在海洋这座不眠的都市中，海湾是熙熙攘攘的市中心，而坦帕湾就是海湾东海岸的大苹果城[10]。鱼群就像集市或露天市场前后簇拥的人群。它们的数量之多就和陆地上的昆虫一样。在海湾绵延的海草床上，200种鱼类在和虾蟹、小鱼们孜孜不倦地玩着捉迷藏的游戏，鱼类在海底可以轻而易举地捕获到蚝、蛤和扇贝。这里

生活着鲨鱼、**鲟**鱼、宽吻海豚、水獭和数十种鸟类，它们的存在将海湾的食物链向上拓展到人类下方的位置。

科学界的主流猜想是千万年前，坦帕湾所在的石灰岩板块分裂，于是形成了坦帕湾这么一个淡水汇集的盆地。也许在6000年前，墨西哥湾水位不断上涨，海水开始涌入这个淡水盆地，海生动植物也借机寄居于此，直至今日。四条占据了2200平方英里流域面积的河流在这里汇合，源源不断地供应着淡水，但它们对河口生态改变甚微，仅仅使其在干涸和季节性的水位上涨间摇摆徘徊。不同区域的水体表现略有不同，或浑些或清些，或咸些或淡些，沿岸多是红树林和盐沼。

西班牙人早期称呼坦帕湾为Bahia Honda，意为“深的海湾”。坦帕湾平均水深12英尺，虽然适合德纳尔瓦埃斯的船队通行，但若不加疏浚的话，其水深并不足以支撑此后出现的大型船舶行驶。也许更合适它的名字应是Bahia Muchos^[11]。坦帕湾占地400平方英里，是一个汇聚了众多小海湾（名称分别为Terra Ceia, Boca Ciega, Hillsborough, Old Tampa, Little Cockroach, Miguel, Mobbly, Double Branch, East, McKay, Joe）和长沼（名称分别为Coffee Pot, Cabbagehead, Boat, Mullet Key, Clam, Cooper, Little, Big, Emerson, Cambar, Champlain, Critical, Custer, Tillette, Williams）的海湾区。虽然河口形态在持续不断地变化着，但坦帕湾今日的轮廓线与当年被德纳尔瓦埃斯错认为墨西哥河的那个基本一致。

关于德纳尔瓦埃斯此次远征的大部分史料都来自阿尔瓦·努涅斯·卡韦萨·德巴卡（Álvar Núñez Cabeza de Vaca）；卡韦萨·德巴卡是此次远征队伍中的幸存者，他在呈给国王的一份报告中记录了这些事件。史学家普遍认为其所言可信，但他的话里没有提到德纳尔瓦

埃斯对土著的残忍行为。年代史编者后来是从其他渠道了解到征服者们的事迹的，包括从遭受了他暴行的人们口中流传下来的故事。

卡韦萨·德巴卡是一名孤儿，原出生于南西班牙的一个下层贵族家庭，后来作为德纳尔瓦埃斯手下的皇家财务总管加入了远征舰队，在这之前他从未踏足过新大陆。今天，卡韦萨·德巴卡的纪念碑被安放在休斯敦的赫曼公园里。他铜像上闪烁的熠熠光泽很好地映衬着他的面容，他胡须蜷曲，衣袖细长，头戴高顶头盔（这是传统的征服者们的头盔），胸前是硬挺的护胸铠甲，凝视前方的眼神透露出的并非坚定，而是好奇。政府追认他为得克萨斯州外科学会的守护圣人（他作为一名印第安人移除了嵌入其胸膛的一枚矛镞），得克萨斯州的第一名欧洲商人（他协调了印第安族群间的贸易活动），第一位人种学家（他记录了对狩猎采集社会的描述），第一位史学家（因记下了他在海岸上的经历）——德纳尔瓦埃斯远征结束后发生的事情。

卡韦萨·德巴卡也对当地的动植物做了记录。新世界的自然环境对西班牙人来说，一方面是新奇，另一方面又难以适应。他的记录里没有提到土地上显而易见的葱茏繁茂。在一个征服者看来，平静得毫无威胁的大自然并不能吸引其注意，只有当它来势汹汹挡住其去路时才能被正视。卡韦萨·德巴卡描述海岸边是一片“陌生又糟糕的土地，资源缺乏，让人留也不是，去也不是”。与此相反的是，至少有35万名土著居民在这里兴旺繁衍，他们中多数都栖居在河口地带。

[\[12\]](#).

在他们到达坦帕湾后，远征升级为殖民、探险和财富掠夺，复仇之役演变为延续了八年之久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长篇传说，既暴露了德纳尔瓦埃斯的凶残本性，也显示了他领导能力的不足。从中也能看出，当面对同样的自然环境，土著和欧洲人所代表的两种文化是如何做了截然相反的解读：一种待其如朋友，另一种则当成对手。

这五艘随海浪摆荡的船在坦帕湾下了锚，在土著居民看来，这些船只令人生厌。这些土著居民身上文有蛇、鸟和几何图案，因此很有可能就是拜日的图可巴伽人（Tocobaga）。面对眼前在海上受尽磨难的迷路的西班牙人，他们既没有发起攻击，也没有张开双臂欢迎。

对征服者们来说，海岸上荒无人烟也不如在陆地上看到印第安人来得可怕，印第安人是他们对“新发现土地”上的土著人的称呼。欧洲人，尤其是西班牙人认为，土著人缺乏进取的野心，也没有取得西方文明的成就。上帝创造了他们，但他们没有接受他的恩典，反而去尊崇——用一位多米尼加修道士的话来说——“他们的自然之神”。在海湾土著人和欧洲人的互动中，有一个史学家们甚少提到的事实，那就是土著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进行的宗教活动，让欧洲人愈加坚信印第安人是低等种族，因而欧洲人确信他们的征服行为是正当的。在西班牙人看来，守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不用、对财富没有野心和追求的人，都是粗鄙、懒惰的人，于是西班牙人理应夺回上帝恩赐的资源，并将这帮野蛮人奴役为己用。印第安人看似过着简单的生活，衣不蔽体，贫困潦倒，他们心安理得地臣服于自然，而没有征服它的心思；他们生于这片荒野，和这里的荒地一样未经开化。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可以被用来当向导、奴隶，为西班牙人提供食物。除此之外，他们就像灌木丛一样，西班牙人只想将其铲除得干干净净。[\[13\]](#)

当船队遇到图可巴伽人时，德纳尔瓦埃斯期待他们能为其人数众多的远航部队奉上食物，然后领着他们去寻找黄金白银。他梦想得到财富和权力，但他现在来到远离墨西哥的这个地方，这两样都沦为泡影，对此他无法接受。耐心也不是他的品格之一。一项早期的资料显示，他在一场与图可巴伽人的争吵后砍下了酋长的鼻子，并令咆哮的军犬扑向对方的母亲。图可巴伽人急切地想摆脱这个胡子拉碴的暴虐之徒，于是指向北边，向他保证他想要的东西都能在那个叫阿巴拉契（Apalachee）的地方找到。德纳尔瓦埃斯另派了一支船队走水路去搜

寻原定的目的地帕尔马斯河，自己则领着剩下的队伍走陆路，向着金山银山进发。他后面跟着300人的队伍、40匹营养不良的马，以及数量不详的身负教化任务的修道士，尽管他们已经自身难保。他们计划最终要与船队会合，虽然没人清楚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德纳尔瓦埃斯在关键时刻总能做出决断，只是他的决定不是每次都正确。

德纳尔瓦埃斯率领的一众人沿着当地土路前进了200多英里。不仅是土路，他们还用斧头开路，在柏木沼泽、阔叶林和松木林都留下了欧洲人的新足迹。当他们披荆斩棘来到阿巴拉契，也就是今天佛罗里达北部塔拉哈西附近时，人和马都已经疲惫不堪，最后直到他们奄奄一息也没有找到财宝。图可巴伽人骗了他们。阿巴拉契人已经收到西班牙征服者要前来的预警，于是全数搬离了村子，并且手持竹箭埋伏于树林和沼泽地旁，箭镞是鱼骨、蟹钳或者火石，他们向着西班牙人不时地一通乱箭齐发，且屡屡得手。

饱肚和逃生的需求已经取代了对金银的渴望，成为远征队伍的首要目标。西班牙人撤退到阿巴拉契湾（Apalachee Bay）沿岸，他们祈祷着在那里可以看到前来会合的船只，但未能如愿。

陷入困境的西班牙人决定自救。现在他们已经反应过来他们所到的是海湾的另一头。他们认为现在的最佳选择是先造木筏，然后乘木筏到位于墨西哥的西班牙领地去——想比做容易。在他们组成的这个分工各异的西班牙小社会里，似乎没有谁具备造船的技能，但此时已经走投无路的队伍别无选择。

剩下这大约250人的队伍开始合力打造起能出海航行的木筏来。这是一项因地制宜的工程。海岸边上茂密挺拔的松林。它们在几个世纪后，将被机器轻而易举地伐倒并被榨取制成纸浆。而手边没有切锯工具的西班牙人唯有就地取材，用马革制成风箱，把马刺盔甲、长剑弯刀等能找到的金属品都熔化了，锻造出凑合用的斧子，砍了大概150

棵成熟松木，每30根松木做成一个木筏，每一个木筏搭载合计四吨重的人和物资。最终，这些木筏虽然做工粗糙，却格外牢固，它巧妙地结合了外来资源和本土资源，堪称典范。柏木则用来做船桨。船帆是用衣服缝制成的。至于木桩之间的空隙，这些造船新手用了矮棕榈叶子和松树树脂的混合物将它们密封住。

他们还有阿巴拉契湾的帮助。阿巴拉契湾位于大弯曲（Big Bend）上方，湖湾海岸线长200英里，南边是塔彭斯普林斯（Tarpon Springs），北边是欧拉克尼湾（Ocklocknee Bay）。霍莫萨萨河盆地，也就是在1904年被温斯洛·霍默引以为最佳钓鱼点的那个地方，就位于阿巴拉契湾上。大弯曲的水浅，看起来像个水塘，天然适合潮沼、带状草地和灯芯草的繁衍壮大。平静的水面和阳光普照的浅滩，促进了以泰莱草和海牛草为主的海草的生长繁殖，形成了绵延1200平方英里的水下草原。在暖和的季节里，海牛（manatee）从南边迁徙来吃草。有些人会将这种大型哺乳动物称作海中牛（sea cow），哥伦布曾误以为它们是美人鱼。海湾东部有85%的鱼都曾在大弯曲的草场里觅食草料，而扇贝、虾蟹、海马和海星则会选择避开捕食者。长久以来，这里的河口环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但它没有填饱西班牙人的肚子。他们到达阿巴拉契湾时正值夏末，正是食物富足的时候。牡蛎随处可见，它们已经让多须石首鱼、红鲈和蓝蟹们饱餐了一顿。西班牙人造木筏的时候正遇上石蟹产卵季里的最后一个月，多肉的甲壳动物此时正爬向浅滩，红鲑鱼开始产卵，此时也是这些平日清心寡欲的动物一年中唯一的交配时间。但自学成才的造船工们似乎在捕食海鲜这件事上没有天资。他们为了果腹，隔一天便宰杀一匹马，直到木筏可以出海的那天——9月22日——刚好吃剩最后一匹，这时的鲑鱼开始成群游向近岸准备过冬产卵。木筏启航了，从印第安人那里强征来的玉米被装上了船，每人每天定量配给。

风和沿岸洋流将西班牙人送往了他们想要去的方向——西边。虚弱的船队一开始只在海岸和障壁岛间航行，小心避开牡蛎床。对印第安人来说，牡蛎床是全年食物的指望，但在西班牙人看来，那是长着锯齿的沙洲，一不小心就会将他们好不容易饿着肚子造起的船给劈开。于是，他们诉诸惯用的伎俩，一路偷袭印第安土著人，毕竟除了饥饿以外，土著人本身也是另一种威胁。抢来的食物，卡韦萨·德巴卡写道，“为当时的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土著人日常以渔猎各种牡蛎和鲑鱼为食，对这些窃来之食，西班牙人也难有贬损之词。

“我们见过的所有印第安人都长得很好，匀称健壮，身手敏捷。”

“远看就像巨人。” [\[14\]](#)

离开内陆河道的庇护后，水手们便遭遇了坏天气。海浪汹涌，扎木筏的绳索眼看着要松解，但它们顶住了，这是对造船新手技艺的一次考验。他们过得越发艰难。淡水和食物一直短缺，“身上的骨头都能数清了”，而当他们气虚力竭地上岸找食物时，还常会遇到攻击他们的土著人。接下来，飓风季过去了，东北风暴（nor'easter）来了，寒风和冬季里混浊的海浪不断地拍打着木船。德纳尔瓦埃斯此时宣布所有人各自为战，这是一条海事规约，当境况发展到了团队作战会危及个体生存且已经别无他法时，便适用这条规约。但卡韦萨·德巴卡认为，那是他的指挥官退缩了。 [\[15\]](#)

很快，在11月的一个寒夜里，海浪“在黑暗中怒吼”，海浪将木筏一个接一个地抛向岸上。这些西班牙人此时身在得克萨斯州，散落在今天的加尔维斯顿（Galveston）和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间。印第安人埋伏在海岸的最南端，突袭被冲上岸的船只。那些在骇浪中活下来的人，结局依然是一死。为了让自己免于此劫，德纳尔瓦埃斯在船靠岸后，行使自己的特权，命令两个人为他在夜里值守以保证安全。但夜里突然起了大风，把正熟睡的人带到了海里，带向了死亡。 [\[16\]](#)

德纳尔瓦埃斯因为倒霉和自大死了，留下了卡韦萨·德巴卡和其余40名幸存者，他们精疲力竭，继续面对来自陆地的折磨。许多人蜷在海滩上，赤着身子，带的东西都在来路上丢光了。海湾北部的冬季，不停刮着让人生疼的北风，这并不是一个能让人存有救赎希望的季节。没有衣服蔽体只是其中一个担忧。那些不停为生计奔波的狩猎采集者正在障壁岛上过冬。毫无抵抗之力的西班牙人，对这个远离冷酷大海的避难港一无所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土著人的仁慈。

卡韦萨·德巴卡后来将这座岛称为Malhado，即“苦难之岛”，这个命名并不妥，因为岛上的土著人可是救了他的。土著人虽将他和其他幸存的人俘虏为奴，但给了他们食物、容身之所，以及性命。有五个人因为害怕自己会沦为献祭品或者食人族的食物而挺身反抗，但土著人也没有伤害他们。除了他们自己，他们本不需要害怕任何人。或出于无知，或出于恐惧，他们放弃了河口的天然给养，导致了此后的厄运。他们“互相吃掉对方”，卡韦萨·德巴卡写道，“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基督信徒们认为这种难以置信的行为是蛮荒之地的习俗，而他们自己正犯着这样的罪行。土著食人族的故事受到欧洲编年史作者的追捧，这为他们笔下的新世界故事增添了猎奇色彩。此后美国大学里的考古学家们也不遑多让，继续编造着这些神话。一位史学家在1959年的写作中称得克萨斯州的印第安海岸为“吃人的海岸”。但是迄今也没有一人做过可靠的田野调查，来证实无论是出于宗教目的还是饮食需求，都是确有其事的。恰恰相反，卡韦萨·德巴卡记录道，土著人对这些陌生人居然争先恐后地相食同类的行为大感惊骇。[\[17\]](#)

整个岛被卡兰卡瓦人（Karankawa）占据，西班牙人在这个岛上孤立无援。虽然卡韦萨·德巴卡的记录中没有说俘虏者的任何坏话，但历史还是将卡兰卡瓦人视作嗜血的恐怖分子。几个世纪以来，白人都害怕搁浅在得克萨斯州海岸，因为按照传言，他们很快会遭到土人的

折磨、杀害，成为被吃掉的那个弱者。因此大概在19世纪30年代，当卡兰卡瓦人逐渐走向绝灭时，没有人对此感到惋惜。

100年后，得克萨斯州沿海土著的形象仍停留在老一辈的故事里。同时他们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得克萨斯州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学会（Texas Archeological And Paleontological Society）的创始人埃德温·布斯·塞尔斯（Edwin Booth Sayles），在一只名叫“开心”的混血杰克罗素梗犬的陪伴下，完成了对美国土著历史的一项初步调研。此后有很多研究者也跟上了脚步。随着一个个矛头、贝冢和考古现场的出现，土著文化开始被重塑。和卡卢萨人一样，卡兰卡瓦人体型占优、孔武有力。在欧洲人到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面对来自大陆、来自大洋对岸的西班牙人、法国人、墨西哥人和美国人，纷纷奋起反击，捍卫自己的领地和生活方式。得克萨斯州的考古学家罗伯特·里克利斯（Robert Ricklis）说，我们将守卫者贴上“怀有敌意”（这是英裔美国社会至今仍然使用的描述印第安人的用词）的标签，谴责他们的行为，可同样的事情挑衅的入侵者们做得更多。[\[18\]](#)

在塞尔斯带领的这条研究支线上，里克利斯是其中最新近的一位研究者。他认为卡兰卡瓦人并不是一个仅仅在生存线上挣扎 而没有组织的零落种群。这个说法就像那些说他们好斗食人的说辞一样不准确。他们的祖先在8000~10000年前来到得克萨斯州海岸，他们身强体壮，有着完整的社会关系结构，对自然有一套传统的认知体系。他们将自然尊为高于人类生命、社会和文化的神圣力量，这是土著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最根本差异。

差异可能是从看似不相关的东西开始体现的，比如当地人使用的一种抗蚊叮的制剂，这是一种用短吻鳄脂肪和鲨鱼鱼油调制而成的膏药，因为气味辛辣，致使欧洲来的访客对土著人的人道产生了怀疑。一名来自得克萨斯州海岸的学者说：“你还没看到来人，就能闻到那

是一个卡兰卡瓦人。”他们身上刺着文身，喜欢在脖子上挂着海螺壳、野狼牙齿，雕琢过的北美野牛骨头在胸前晃荡着，这说明他们和海湾另一边的卡卢萨人不同，他们是半游牧的种族。他们在春天离开岛屿，为了躲避烦人的蚊虫，他们搬离盖着兽皮的椭圆小屋组成的驻扎地，顺着内陆的河流一路采食牡蛎和蛤蜊，跟着白尾鹿群和北美野牛穿过草原，等到秋天再回到他们位于岛上的营地。在沿海地带，因为不用担心会断粮，他们会吃得更痛快些。[\[19\]](#)

卡兰卡瓦人像墨西哥湾海岸的其他土著人一样体格高大，比生活在内陆的人吃得更好。“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来的目击者，他们在这点上的看法都高度统一，”19世纪的一位人种学家评论道，“那就是他们的人长得很高，身材健美，体格强壮，身形比例上也是匀称得堪称完美。”里克利斯写道：“他们这种体型，一部分可能是源于其膳食结构，而不只是社会文化因素驱使下基因筛选的结果。”[\[20\]](#)

卡兰卡瓦人控制的367英里得克萨斯州海岸线有小海湾、后湾、长沼、潮汐带和峡湾，是一道呈弧线形的河口湾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它们中许多此前并不是现在这个模样，也是在土著人定居后才逐渐成形的，其他河口区也有这样的规律。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和纳拉甘西特湾（Narragansett Bay）就是曾经的河谷因冰川融化导致被海水淹没而有了现在的河口湾。有些河口湾，例如坦帕湾，是从湖泊盆地发展而来的。也有些原本是陆地，由于地质变动或火山爆发引起陆地断裂而形成河口湾。旧金山湾（San Francisco）就是一例，普吉特湾（Puget Sound）也有这个成因的河口。而峡湾型的河口，是原本纵深的河谷被冰川切割后，经冰川消融后的海水倒灌而成。得克萨斯州的海岸地势相对低洼，也就没有险峻的河谷或峡湾。但它有河水冲积的三角洲，包括加尔维斯顿湾（Galveston Bay）、马塔戈达湾（Matagorda Bay）以及科珀斯克里斯蒂湾（Corpus Christi

Bay)。它们与入海口处的潟湖汇合；近岸泥沙堆积形成了障壁岛，由于障壁岛的隔绝，就形成了与外海分离的水域，即潟湖。

得克萨斯州最大的河口潟湖是马德雷湖（Laguna Madre）。从地图上看，它是帕德雷岛（Padre Island）和大陆之间一道狭长的蓝色线条。有着3000年历史的马德雷湖北起于科珀斯克里斯蒂湾，南止于格兰德河三角洲，长115英里（和古巴到基韦斯特的距离一样）。它的下半截，也就是南马德雷湖，与北马德雷湖之间被潮汐滩和美墨边界阻隔，湖长与上半截相当，沿着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Tamaulipas）的海岸展开。这里才是德纳尔瓦埃斯的倒霉船队从古巴出发后本应登陆的目的地。

北马德雷湖中间位置有一个以它遥远的北极表亲命名的巴芬湾（Baffin Bay）^[21]。和科珀斯克里斯蒂湾一样，巴芬湾最后与马德雷湖主干一起流入河口三角洲。由于没有足够的淡水河注入，加上潟湖水浅、水流速度慢，马德雷湖是世界上含盐量最高的潟湖，甚至高于墨西哥湾，对牡蛎这种得克萨斯州海岸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的食物来说，这里的水太咸了。但是，全美四分之三的海草草甸都分布在这片潟湖的65%的面积上，海草草甸连同蔓延的潮汐滩、向内凹的黑红树林带，为鱼蛟虾蟹们——鲱鱼、鲚鱼、海鳟、红鲑、小褐虾和甜虾等——铺就了寄身之所，它们正是得克萨斯州当代商业性渔业的最主要贡献者。超过七成的约100万只北美潜鸭聚在马德雷湖过冬，数量多得让19世纪初发现它们的户外运动人士惊愕不已。

大多数遇难的西班牙人都搁浅到了马德雷湖以北的海岸上，邻近加尔维斯顿湾，或者加尔维斯顿湾区中较小的水域——克里斯姆斯（Christmas）、韦斯特湾（West）或德拉姆湾（Drum Bay）。加尔维斯顿、福莱特（Follet's）、圣路易斯（San Luis）的群岛后方围蔽着众多二级小海湾，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卡韦萨·德巴卡的登陆点就在

那一带。加尔维斯顿湾是墨西哥湾美国境内部分最大的海湾，比坦帕湾还大200平方英里。它属于特里尼蒂-圣哈辛托河口湾（Trinity-San Jacinto Estuary）的一部分，特里尼蒂-圣哈辛托河口湾是得克萨斯州第一大、全美第七大河口湾，水域极其开阔，但水深仅有七英尺。有33000平方英里流域的淡水注入其中，它们来自地上径流、特里尼蒂河（Trinity River）和圣哈辛托河（San Jacinto River），并且带来了大量泥沙，混合于海水中。当西班牙人在那里着陆时，海湾中满是牡蛎，更别提虾蟹和鱼类了，而鱼类中又以石首鱼和红鲑鱼为最。

从阿巴拉契湾来的这一路，随着征程越来越艰难绝望，这些走投无路的难民中有部分人摸索出了怎么捕食贝类。在得克萨斯州，他们从他们的俘虏者那里学到了如何在河口湾环境中觅食，因为西班牙人作为奴役者本来就被指望要给所有人准备食物。一个半世纪后，当法国探险家罗伯特·拉萨尔（Robert de La Salle）率领的船队搁浅在100英里外的马塔戈达湾上时，队员们感恩河口湾为他们提供了蛋白质来源。“水面阵阵骚动，水里的鱼纷纷弹跃而起……我们收获颇丰，”远征队的成员之一昂利·如泰勒（Henri Joutel）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种程度的收获经常有，对我们的生存起到了很大帮助。” [\[22\]](#)

相对于谷物稻米，土著人的一个显而易见但又不太为人知的碳水化合物来源，是广泛生长在湿地的香蒲。卡韦萨·德巴卡吃的印第安面包，就是以香蒲根茎为原料，将其捣烂并用蛤壳刮擦后形成的淀粉浆做的。在陆地上度过的几个月里，他从地里挖各种可食的根茎，割仙人掌，到秋天时和当地人一起沿着瓜达卢普河谷边的野生树林采集美洲山核桃，这个采集季就像节日一样盛大，会吸引很多从遥远地方来的土著族群。白尾鹿和北美野牛也是他们的猎物，它们以墨西哥湾的林地和河岸为主要栖居地。德纳尔瓦埃斯的这支流亡队伍恐怕是第一批尝试北美野牛肉的欧洲人，卡韦萨·德巴卡还曾想象这片哺育了

北美最大野兽的琥珀色草原，在未来某天也会出现欧洲牛群的身影。里克利斯的研究显示，北美野牛占了土著人肉食总量相当大的比例，但其比例还是比不上“河口湾区的水生动物”。但看起来，这些西班牙人都没有想到商业性渔业在日后的巨大成就。^[23]

虽然卡韦萨·德巴卡保住了性命，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依然营养不良。他多年来作为奴隶在不同的印第安家庭间辗转，而这也正是西班牙人轻易强加于殖民地土著人身上的命运。但卡韦萨·德巴卡一直在策划逃跑。最后，他和另外两个西班牙人以及一个来自另一远征队伍，同样受到奴役的摩洛哥人一起逃走了，希望与他们在墨西哥的同胞重聚。这个残余的德纳尔瓦埃斯远征队，穿过了被太阳暴晒的土地，往北沿着险峻的西马德雷山脉（Sierra Madre Occidental），一路摸索着往内陆挺进。这是伟大征程的最后一环。还在海岸上时，他们会治病的名声就已经传开了。这个消息经由土著人的沟通网络不脛而走，他们沿途经过的村庄和营地都会要求他们提供这项服务，以作为让他们通行的条件。通常，他们只需做祷告，在病人身上画十字，便可保证四人的安全和温饱。到1535年年中时，他们已经到达墨西哥的中北部地区，准备往西南沿古代的贸易路线走，越过东马德雷山脉（Sierra Madre Oriental）后朝日落的方向一路穿过索诺兰沙漠（Sonoran Desert）。

在他们被海浪抛在得克萨斯州那个冰冷的海滩八年之后，这四个游魂一样的幸存者，同时也是我们知道的德纳尔瓦埃斯陆上队伍中仅存的几个人——三个面目全非的基督徒和一个外国奴隶——他们衣不蔽体，受着烈日烘烤，拖着已经瘦得不成人形的躯体，终于来到了太平洋沿岸的圣米格尔·库利亚坎（San Miguel de Culiacán），见到了同胞。

卡韦萨·德巴卡终于踏上了往西班牙的回程，路上先是击退了法国的私掠船^[24]，然后又一次遭遇了可怕的飓风。他在呈诵给帝国法庭的报告中，对湾区的土著和河口环境做了详细阐述。但在许多人的脑海中，新世界依然有且仅有满地金银，全然罔顾已经有成百上千的人葬身在那里而一无所获的事实。

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是又一个相信远征海湾的回报会大于风险的人，他坚信自己会在德纳尔瓦埃斯倒下的地方获得成功。他刚为西班牙国库填进了来自秘鲁的银子，于是请求皇室将原本属于德纳尔瓦埃斯的领地和所有必不可少的头衔都转授予他，包括一个奖励：古巴总督。他曾尝试邀请卡韦萨·德巴卡入伙，好在两人后来协商未果，倒是为卡韦萨·德巴卡省去了额外的劳顿。

德索托的墨西哥湾之行最终只是重现了德纳尔瓦埃斯的暴戾无情和败绩。从思想上来说，它同样开启于对墨西哥湾区遍地黄金的幻想。德索托押上了他的全部家产，还借了些债。连卡韦萨·德巴卡的亲戚也往这个虚无的淘金热里投了钱。从行动上来看，它起始于1539年5月的哈瓦那，这一次船在和风春色中扬帆，计划中的目的地是坦帕湾。德索托在启航一周后到达，将它命名为*Bahía de Espíritu Santo*^[25]。^[26]

当地土著人看到西南方向的海平面上出现了九艘船，然后西班牙人就看到远处树林上方升起了烟雾。烟雾延续了几天时间，这是沿岸居民在持续给内陆村民发送陌生人的位移信号。德索托在一处人去屋空的村子里驻扎下来，村子建在小海牛河（Little Manatee River）河口边的贝冢上，这个河口就是当地尤兹塔人（Uzita）的餐饮室。这位总督佩上礼仪徽章，站在海岸边，为西班牙皇室，也为他自己，将目之所及之处甚至更多，都收入囊中，并且，据史学家玛乔利·史东曼·道格拉斯（Marjory Stoneman Douglas）的研究观察，他们四处

“行礼致敬，插上旗帜横幅，奏响音乐，身着金色祭衣的神父做了弥撒，向印第安人做宣告”。一切进行得井然有序，对双方来说各有不同意味。德索托有500名可供调遣的士兵，12名负责必要的劝诱改宗的修道士。他还得了一个翻译，叫胡安·奥尔蒂斯，曾经是德纳尔瓦埃斯麾下成员，被土著人抓去后，由于得到酋长妻子的说情而被释放——这个情节成为日后约翰·史密斯的宝嘉康蒂故事^[27]的灵感来源。德索托队伍中还包括两个女人、237匹马、数不清的佣工奴仆、驮货的骡子、作战的格雷伊猎犬和一群伊比利亚猪。和德纳尔瓦埃斯不同，德索托身边有现成的新鲜肉，不需要牺牲他的马队。^[28]

土著人这次见到的殖民领袖的模样和上次红胡子的那位不同，却是一样的嗜血暴君。如果后来人的描述可信的话，德索托有着褐色头发（或卷或直），胡须像鸭尾巴，一双浅褐色眼睛横亘在鹰钩鼻上。举止间有种高傲。据他的一个传记作者的说法，他作为低阶贵族的后代，是一个内心有太多“雷霆和激情”的人，传统生活远远无法满足他的野心。^[29]

国王曾令德索托对印第安人要加以“善待和教化”，尽管他们终将被奴役和剥夺财产。这位新任总督还接到了措辞矛盾的命令，让他“征服并[在此]安居”，“使[此地]永保安宁”。对此德索托还是诉诸熟悉的操作。几周后，他和士兵、修道士出发前往阿巴拉契，大批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的武器威胁下加入了德索托的分遣队伍，被当作搬运奴工，除军队物资外，还得搬运德索托成箱成箱的奢侈用品：衣橱、精美的寝具、瓷器、橄榄油和葡萄酒。人和牲畜组成的浩荡队伍，绵延数英里，在行进中起起伏伏地蠕动着，像一只有生命的爬行动物。队伍长长地划过荒野——当然，这是有主的荒野——随着一串串足迹在生机盎然的野地里穿行而过，土地的旧貌不再。风笛手吹响了队伍前行的号角，所到之处，刀砍剑劈，人群、马群、猪群踩踏而过，俘虏戴上了镣铐。行军路上大开惩戒，这和他们的前人并无不

同：外来的人强征食物，奴役更多的土著人，对不合作的土著人，他们砍下其双手、割去其鼻子。[\[30\]](#)

德索托的远征队于10月抵达阿巴拉契。考古证据显示，西班牙人在那里庆祝过圣诞。如果这是真的，尽管庆祝活动可能并不盛大，但他们很可能是第一批在今天的美国过圣诞的人。在德索托军洗劫了阿拉巴契的一个村庄并且没收食物、摧毁房屋后，土著人掀起反击，西班牙人理应有所预料。他们伏击了巡逻队，攻打了德索托的驻地，他们的武器通常是像人一样长的弓，以及根据西班牙人的描述，能够纵向刺穿一匹马的箭。西班牙侦察队在一个海湾附近发现了德纳尔瓦埃斯当初建木筏时留下的残存的营地遗迹，包括被宰杀马匹的骨头。这是一个预兆。在佛罗里达的十个月里，后六个月他们持续地遭遇围攻，德索托部队只得转移至佐治亚州，结果只是将无法避免的战斗和苦难一起带到了那里。

随着他们往大雾山（Great Smoky Mountains）行进，队伍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疲惫不堪，勘测金银的活动还在虚弱地进行。然后队伍转而向西，横渡泥泞混浊的河流之父密西西比河，进入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路上遇到一个接一个的土著部落。距离他离开古巴三年后，德索托在密西西比河边病倒了。一些现代研究者说他死于一种热带的热病。但这个结论显然不成立。猜测中的热病指的是疟疾或黄热病，但它们都起源于大西洋彼岸，在德索托时期的北部湾区尚未有其踪影。在目击人的记述中也没有提到在队伍里有疫情蔓延的情况。但相反，他们提到了流感。不同于黄热病和疟疾，流感病毒的传播不需要昆虫做媒介，只需一个咳嗽、喷嚏或者肢体接触，就能在人和任何野生或家养的动物间传播。另一个可能性是他感染了伤寒，长时间的冬季扎营为有害的粪便细菌的繁殖提供了机会，提高了感染概率。卫生纪律的缺乏能够摧毁一支原地不动的军队。德索托死的时候正是他刚结束冬季露营的时候。

当西班牙人将他们领袖的尸体从密西西比河西岸送入水中时，这支曾经浩大的队伍已经萎缩到只剩300个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人，还有几匹羸弱的马。但他们至少在完整性上还是比德纳尔瓦埃斯的好一些。他们也没有被印第安人掳去为奴，还进入了此前欧洲人没有踏足过的地区。但他们仍是一支没有征服任何土地、没有获利、没有记录下任何新领地的远征队伍。他们不堪困窘，只能中断使命，找到回西属墨西哥的路。陆上路线没能成功，他们最终还是诉诸德纳尔瓦埃斯的办法，打造了七只海航的木筏回到了墨西哥。

1543年的一个仲夏夜里，密西西比河的水流将这支临时拼凑的船队送往了墨西哥湾。西班牙人刚开始对他们是否到达了目的地不太肯定。其中一个存活者回忆说，在晚祷过后，信徒们注意到他们已经接近河岸，但仍然在一道“离海岸很远”的混浊的淡水水流上。他们向西行驶，力图不让海岸离开视野范围，中间遇到了一场糟糕的暴风雨，最后总算活着到了得克萨斯。木船漏水严重，但根据其中一位官兵日后写到的，他们发现了一种黑色的“海面涌起的浮渣，看起来像沥青一样的东西”，他们于是用它来给船密封。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眼前的正是未来的石油——日后西北湾区无出其右的称霸者。[\[31\]](#)

德索托的剩余部下从得克萨斯州挺进到帕努科河（Río Pánuco），这里也是墨西哥湾第一位地图绘制者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25年前的葬身地。德索托一行历时四年，走过了美国和墨西哥共十个州，合计4000英里。最终，德索托所达成的目标也没有比德纳尔瓦埃斯更多。如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所言，德索托梦中的“黄金国”，已经“化作了苦难与死亡的苍茫之地”。[\[32\]](#)

但这场悲剧远征的领袖作为一个崇高偶像活在了美国白人的历史里。德索托脱离盎格鲁人标准的普利茅斯和詹姆斯敦[\[33\]](#)式的叙事结构，成为机会均等（equal opportunity）的典范（当然，前提是如果

我们不从土著的视角看待这段历史的话）。美国历史上只有出类拔萃的美国国父、少数几位总统和马丁·路德·金，能继德索托之后成为名字被广为使用的公众人物。多个城市、（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多个郡、学校、高尔夫球场、街道、联邦和地方公园、一个国家公园、一个国家森林、一个联邦军事堡垒、一艘美国军舰、数个淡水泉、一个瀑布、一个唱片公司，争相以德索托的名字命名。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1928年至1961年间运营着德索托汽车品牌（但没有以美国国父名称命名的轿车，倒是福特旗下有林肯汽车公司，通用旗下有庞蒂克），20世纪50年代车型引擎盖上的标识是一个戴着头盔的德索托半身肖像，现在已经成为收藏家们的藏品。国会大厦的圆顶大厅里，悬挂着作于1847年的德索托发现密西西比河的画像。虽然那是个没有意义的成就，因为当时没有人记录下河流的地理位置，欧洲人需要重新发现它。

研究德索托的学者倾向于维护他在历史上作为最著名征服者的地位。对一些人来说，追踪他行进路上的每一次绕圈、转向、回头和转弯都像寻找宇宙起源一样。但它们的大部分都不能粉饰德索托的凶残手段。最近一位传记作者称他的这次征程为“野蛮人在美洲的探索”。源于其远征的四份一手材料让我们难得地可以一瞥当时的人口种族布局。它们和考古证据一道展示了繁荣的密西西比文化，它由数不清的土著部落组成，他们建冢立堆，覆以泥陶建筑和庄稼田地，挖掘出小径和步道。一个世纪后，当法国探险家们沿着这些小路对路易斯安那进行殖民活动时，土著人的抵抗已经不复从前。存活下来的土著村落越来越少。德索托的军事活动扰乱了部族间的权力结构。他挑起冲突、盗窃食物、烧毁村舍，但所有这些造成的永久危害都不如他们带来的看不见的病菌更严重。[\[34\]](#)

北美土著人对天花、麻疹、流感等外来的传染病没有免疫力，这些病菌随着德索托历史性的跋涉在村落间传播，最终导致了疫病肆

虐，百万人因此病死。他带来并留下的黑褐相间的猪，其中包括阿肯色州的尖背野猪，成为他这趟旅途留下的一个意想不到的“遗产”。在今天，它们的野生后代成为一大威胁，它们将当地植被连根拔起，扰乱种群演替进程。当年，受感染的猪很可能触发了肺结核、旋毛虫病、布氏杆菌病、炭疽病、细螺旋体病或囊虫病的暴发，或将病菌传到了土著人食用的野生动物身上，例如鹿和火鸡。即使德索托只是安静旅行，与当地村民握手，而不是砍了他们的手，他依然埋下了种族灭绝的暴雷，为日后的殖民之路扫清了障碍。[\[35\]](#)

佛罗里达的阿巴拉契人、图可巴伽人和卡卢萨人，得克萨斯的卡兰卡瓦人，亚拉巴马的莫比尔人（Mobilian），密西西比的比洛克西人（Biloxi），路易斯安那的霍马人（Houma），以及所有其他湾区的土著居民对西班牙的刀剑和宗教入侵奋起抵抗，长达200多年。但他们无力抵御传染病，强大一时的酋邦土崩瓦解。至于卡卢萨人，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他们是被北方殖民地来的印第安奴隶贩子乘虚而入强行掳走的。根据哈瓦那保存的洗礼记录，1763年西班牙向英国妥协交出佛罗里达后，卡卢萨人中有一部分最后到了古巴。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在写到美国和墨西哥湾的征战时说：“我们的历史开启于谋杀和奴役，而不是发现。”[\[36\]](#)

没人清楚为什么征服者们会饿死在海湾上。有史学家说那是因为他们多是来自西班牙内陆，没有吃海鲜的习惯。但显然他们对吃马和吃同类倒是不排斥的。最大的可能是他们习惯于掠夺食物，相比于从海里捞捕食物，掠夺才是他们更熟悉的战略。关键是，他们饿死在了土著们生息成长的这片河湾上。活不下去的那部分人战胜了在这里世代繁衍的人，这是不折不扣的讽刺。

在那几个荒唐世纪里，西班牙人从没有真正利用过海湾上的丰富资源。除了他们获得的第一手观察外，他们得出的结论与弗兰克·汉

密尔顿·库欣不同，后者在历史的挖掘中每每惊叹于土著人民的生活方式。法国人、英国人皆如是，他们紧随西班牙人来到这里，但不是挖金掘银，而是为了打下更传统的经济根基，这使得他们对此地的地理环境有了更好的理解。

[1] Bernard Romans, *A Concise Natural History of East and West Florida*, ed. Kathryn E. Holland Braund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9), 259.

[2]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n the American Grain* (New Directions, 1925), 44.

[3] T.S.Eliot, “The Dry Salvages,” in *T.S.Eliot: Poetry, Plays and Prose* (Atlantic, 2008), 141.

[4] 卡斯蒂利亚人是西班牙的主要民族。——译注

[5] 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Florida: The Long Frontier* (Harper & Row, 1967), 51.

[6] Bernal Diaz del Castillo, *The Memoirs of the Conquistador Bernal Diaz del Castillo*, vol.1, trans. John Ingram Lockhart (J.Hatchard Lockhart, 1844), 302-28.

[7] Samuel Eliot Morison and Henry Steele Commager,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33.

[8] 即今天的索托马里纳河 (Rio Soto la Marina)，位于墨西哥北部。——译注

[9] 里格，旧时长度单位，通常在航海时运用，1里格约为3海里。——译注

[10] “大苹果城”，纽约别称。——译注

[11] 西班牙语中Muchos意为“很多”。——译注

[12] *The Account: Álvar Nuñez Cabeza de Vaca's Relación*, trans. Martin A. Favata and José B. Fernández (Arte Público Press, 1993), 46.

[13] Robert F. Berkhofer, *The White Man's Indian: Images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from Columbus to the Present* (Vintage, 1979), 5, 11.

[14] Andre Reséndez, *A Land So Strange: The Epic Journey of Cabeza de Vaca* (Basic Books, 2009), 104, 121; *Account: Álvar Nuñez Cabeza de Vaca's Relación*, 23.

[15] *Account: Álvar Nuñez Cabeza de Vaca's Relación*, 56.

[16] *Account: Álvar Nuñez Cabeza de Vaca's Relación*, 56.

[17] *Account: Álvar Nuñez Cabeza de Vaca's Relación*, 56.; Edward W. Kilman, *Cannibal Coast* (Naylor, 1959).

[18] Robert A. Ricklis, *The Karankawa Indians of Texas: An Ecological Study of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hang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19] C. Herndon Williams, *Texas Gulf Coast Stories* (History Press, 2010), 13.

[20] Albert S. Gatschet, *The Karankawa Indians, the Coast People of Texas*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1891), 56; Ricklis, *Karankawa Indians of Texas*, 10, 109–10.

[21] 指北冰洋属海巴芬湾，位于北美洲东北部巴芬岛、埃尔斯米尔岛与格陵兰岛之间。——译注

[22] William C. Foster, ed., *The La Salle Expedition to Texas: The Journal of Henri Joutel, 1684–1687* (Texas Stat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98), 99.

[23] Ricklis, *Karankawa Indians of Texas*, 61.

[24] 私掠船 (Privateer)，又译作武装民船，是一种获得国家授权可以拥有武装的民用船只，用来攻击他国（主要是敌国）的商船。——译注

[25] 意为“圣灵之湾”。——译注

[26] 虽然索托抵达了坦帕湾是学界公认的说法，但历史学家罗伯特·维德尔 (Robert Weddle) 对此持有异议。他推测索托的登陆点在夏洛特港一带。
[Robert S. Weddle, *Spanish Sea: The Gulf of Mexico in North American Discovery, 1500-1685*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14.]

[27] 这是一则广为流传的历史逸事。英国殖民领袖约翰·史密斯 (John Smith) 1607年到达弗吉尼亚并开始殖民印第安人，在此过程中被印第安部落逮捕囚禁，据约翰·史密斯自己的讲述，在他即将被执行死刑时，当地酋长波瓦坦 (Powhatan) 的女儿宝嘉康蒂 (Pocahontas) 为了救他，将自己的头颅取下，替换了约翰·史密斯的，这才让他逃过此劫。这个故事被后世多番改编创作，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有1995年的迪士尼动画电影《风中奇缘》 (*Pocahontas*)。——译注

[28] Douglas, *Florida: The Long Frontier*, 53.

[29] David Ewing Duncan, *Hernando de Soto: A Savage Quest in the America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7), x x.

[30] Michael Gannon, “First European Contacts,” *The New Florida History*, ed. Michael Gannon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6), 23-30.

[31] Lawrence A. Clayton, Vernon James Knight Jr., and Edward C. Moore, eds., *The De Soto Chronicles: The Expedition of Hernando de Soto to North America in 1539-1543*, vol.1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3), 162.

[32] Francis Parkman, *La Sall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Great West*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5),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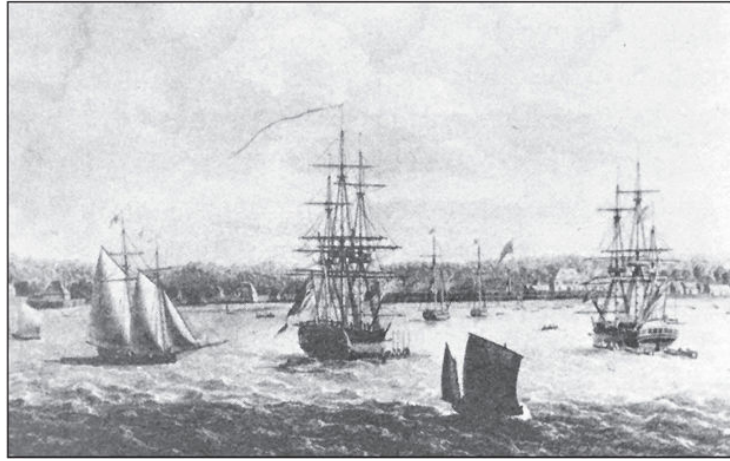
[33] 普利茅斯和詹姆斯敦是英国在北美建立的最早的两个殖民据点。——译注

[34] Ann F. Ramenofsky and Patricia Galloway, “Disease and the Soto Entrada, ” *The Hernando de Soto Expedition: 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Discovery” in the Southeast*, ed. Patricia Kay Gallowa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6) , 270–75.

[35] 疾病是如何促进了他们的征战进程的，西班牙人对此很是清楚。

[36] Williams, *In the American Grain*, 44.

四 一条最重要的河流和一个“了不得的”海湾



英国地理学者乔治·高尔德（George Gauld）笔下18世纪60年代繁忙的彭萨科拉湾和港口。

此次勘测让我们有了全新的认识，不仅认识了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也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英属西佛罗里达总督

乔治·约翰斯通（1766）[\[1\]](#)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是北美境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冲积平原之一，充分展现了墨西哥湾的地理特征。作为北美大陆最大的水系，密西西比河流域远跨中西部，每年输沙量高达4亿吨，因此得了个“大泥潭”（Big Muddy）的绰号（其主要支流密苏里河也有此称号）。在流域末端，所有泥沙顺着河口发散开去，成为沼泽和海岸线的一部分——从远方陆地分解而来的泥沙，在这里堆积出了新的陆地。河水顺着河道冲入墨西哥湾，泥沙沉积形成三角洲，面积大得惊人，水流终年不止，并通过五条水道与大海相连。恼人的是，三角洲有时会让人难以辨认，尤其是在春季入汛后，即使你身在其中也难识其真面目。这也

是为什么德索托的人马逃难到春天的大河上时，一度判断不出他们究竟是还在河上，还是已经被冲到了海湾里。

欧洲的探险者们对地理位置的划分，主要是为了根据地形来排兵布阵——海湾是船只能安全入港停泊的地方，厚实牢固的海崖上可以构筑堡垒，河流可以帮助他们深入内陆。像密西西比这样的三角洲不是能让人定居的地方。这里“稀疏得可怜的植被”，还有它们脏兮兮的淤泥，都给人一种“贫乏无用的印象”，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其充满诗意但少有人读的书《大海如镜》^[2]（*The Mirror of the Sea*）中对三角洲做如此描绘。尽管如此，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注定要与地缘政治扯上关系。谁掌控了这条大河，谁就掌控了这片大陆的多数商业和贸易。^[3]

要从墨西哥湾进入这条河，你必须在谜一样的三角洲里找到通行的路。德索托的队伍跌跌撞撞来到了河上，但当时没人画下地图，西班牙人也没有再来寻过它。抛开河不说，墨西哥湾北部，也就是格兰德河和佛罗里达半岛之间这一块，既没有金也没有银，飓风倒是经常造访，因此并不得意欲征服新世界的西班牙的青睐。

法国人在这片遭西班牙冷眼的广袤之地上看到了机会。法国人一直致力于保护他们在加拿大和五大湖的皮草贸易帝国，他们传统的出口路线需经由东北部而上，但彼时正值英国大肆扩张其殖民领地，法国人因此急于找到另一条通道。为此，雷内-罗伯特·卡瓦利·拉萨尔先生（René-Robert Cavelier, Sieur de La Salle）于1681年12月循密西西比河而下，同行的还有54名印第安人和法国人。当时已是严冬，他们从迈阿密堡（在今天的俄亥俄州）乘树皮艇出发，在覆着冰层的伊利诺伊河上滑行而下。当他们到达密西西比河的汇入口，转而往南划着冰水时，两个月已经过去了。

终于，他们在4月到达三角洲。他们在淤泥里临时插了一只标记用的木杆，在木杆旁埋下刻着法国纹章的铅制碑牌。拉萨尔于是以他的国王路易十四的名义，认领了这片土地——不管它是湿地、旱地、河流、长沼、沼泽，还是其他什么，总之是这片生活着7万土著居民的土地。他将下游命名为路易斯安那^[4]河谷以表敬意。由于补给已不多，树皮艇只能在春天呼呼上涨的湍急河流中调头往回走，回到了伊利诺伊。

划着独木舟顺河而下是一回事，驾着船从大海出发去往法国的贸易站又是另一回事。两年后，拉萨尔来到墨西哥湾，准备再次出征密西西比。他说服国王支持他的此次探险，他说密西西比河口就在今天得克萨斯州的位置——意味着它就位于西班牙在墨西哥的银矿附近，并誓言此次是为“国王陛下的荣誉”而战。史学界们一直以来都称拉萨尔弄错河口位置是一场巨大的骗局，但也许事情没那么极端。他第一次沿河而下，带的是坏掉了的、不断出错的罗盘和星盘，所以可能不是欺骗，只是犯蠢罢了。不管原因为何，他400英里的差错使得制图师将河口画在了今天的得克萨斯州海岸上，河口处是一个大大的海湾。这个海湾是拉萨尔犯下的又一个错误。那些不幸和他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人——士兵、工匠、女人和孩子——都因他的错误遭了罪。^[5]

四艘船渡过大西洋，在尤卡坦海峡遇到西班牙海盗时损失了一只，就这样拉萨尔的小舰队进入了墨西哥湾。“船上没一个人知道它凶险走向的秘密”，已故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写道，“它”，指的是墨西哥湾难以捉摸的湾流。拉萨尔向北往河口方向驶去，显然他已经到了。但他没有看到它。他不知道他要找的是一个三角洲，他在找一个不存在的海湾。一个测深员往水里投掷绳索，但他并不知道他在探测的这片混浊水域是河流的沉积物。拉萨尔乘着大划艇到了岸边，懵然不知他脚下的泥泞就是那个三角洲。这些法国人搞不清楚方向，也没搞清楚自然环境，史学家克里斯

多夫·莫里斯（Christopher Morris）如此评论道，他们没能“理解三角洲的大小、形状、位置和作用原理”。拉萨尔坚持认为他们在阿巴拉契湾上，于是让船队往西行驶，但阿巴拉契湾还远在佛罗里达狭长地带东边的拐弯处，他们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河越来越远。[\[6\]](#)

最终这次探险的终点落在了马塔戈达湾，也是拉萨尔错误的地图上密西西比的位置。马塔戈达湾在一个半岛后面，让法国人躲过了正到处找他们的西班牙巡逻舰。此时的海湾，潮沼和河牡蛎床吞噬了海岸线，短吻鳄推倒了芦苇爬上来晒太阳，印第安人正在进行季节性的迁徙。密西西比还在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

另一个失望之处来自拉萨尔本人。他严肃傲慢，十分自负，情绪大起大落。他的头衔“拉萨尔绅士”本意是令人尊敬，结果却适得其反[\[7\]](#)。补给船的船长故意让船在海湾入口处搁浅损毁，很显然，他是想破坏这次行动，令其不得不中止。然后又一艘船被损坏，掉头回了法国。到最后，仅剩的那只船也不见了。这支被荒野打败的殖民队伍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找到那条“致命”的河，然后往北去法国属地。探险队的成员昂利·如泰勒（Henri Joutel）用“致命”形容密西西比；无独有偶，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也用了同样的形容词。此后两年时间里，这位领队一直将目光投向西方，直到当地的塞尼斯人（Cenis）给拉萨尔画了一张地图，告诉他河在东边。拉萨尔于是带着从幸存者中挑选的17个强壮点的出发了，虽然他们很多人连鞋都没有。至于那些体弱的，大概有二十来个，则留在原地。这一次，他终于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了。但在他们发现河流前，“既是为了复仇，也是为了自保”，帕克曼说，队伍内部发生叛变，拉萨尔被杀害。最后只有一小队人成功抵达伊利诺伊河段。[\[8\]](#)

对西班牙人而言，拉萨尔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入侵者。自从他们在海峡抢下拉萨尔的船后，他们就有要将其逐出墨西哥湾的打算。他们

派出了五支巡查队，四支走海路，一支走陆路。几年过去了，他们没有找到要驱赶的法国人。但潜在对手的存在使西班牙人重新在上湾区（upper Gulf）活跃了起来。史学家罗伯特·维德尔（Robert Weddle）对法国人早期在墨西哥湾的活动做了细致研究，他对此评论道，西班牙人对拉萨尔的搜捕，慢慢演变成了“那个年代里对墨西哥湾最彻底的一次考察”。他们定位了加尔维斯顿湾、马塔戈达湾、查克托哈奇湾（Choctawhatchee Bay）、密西西比湾（Mississippi Sound）、莫比尔湾（Mobile Bay），以及不胜枚举的障壁岛。[\[9\]](#)

在整个搜查过程中，西班牙人从来没发现密西西比。一支搜查队伍已经驶入了三角洲，但并未找到河流入口。他们也在寻找拉萨尔虚构的那个海湾。墨西哥湾一共有33条大河流入，欧洲人已经知道了它们中的大多数，但其中最大的同时也是世界第十大的这条除外。

西班牙人的挑衅使法国更加坚定了要建立连接北美内陆和墨西哥湾的水上通道的想法。

1698年，皮埃尔·莱莫恩·伊贝维尔先生（Pierre Le Moyne, Sieurd' Iberville）从法国布雷斯特启航，率领三艘配备30倍径火炮的护航舰，誓要从海湾入口找到密西西比河。这位38岁的指挥官，生长于蒙特利尔的一个显赫家庭，他和他的几个兄弟都是新法兰西[\[10\]](#)杰出的军人，他本人更是久经历练、英勇有加，也因此，他并没有将信任全寄托于那个时代的地图上。当他抵达加勒比海时，他向领航员询问河的位置。没人能准确回答上来。

所以伊贝维尔赌了一把，往湾区北边的海岸线去了，他始终贴着海岸行驶以便全面侦察。他后来在帕斯卡古拉（Pascagoula）遇到印第安人，从他们口中得到了有关河流方位的最确切信息。他很庆幸自己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于是在密西西比海岸附近一个障壁岛的背风处下了锚。他，和比他小很多的弟弟让-巴蒂斯特·莱莫恩·德比安维

尔先生（Jean-Baptiste Le Moyne, Sieur de Bienville），以及其他几个人搭乘两只双桅小舟和两只树皮艇，出发去找大河的入海口。到第四天快结束的时候，他们遇到一股湍急的淡水流，上面漂着死掉的树和其他植物残骸。这一次，这些欧洲人知道，自17年前拉萨尔顺流而下后就没再出现的那个河口，被他们找到了。“这是一次愉快的行程，”乐观的伊贝维尔写道，“一次海岸探索之旅。”^[11]

尽管如此，他还是要去探一探河口以及周围的海岸线，以确保它不会再次消失。三角洲非常潮湿，不适合久居，于是他们回头找船只在帕斯卡古拉河附近的下锚处。但是帕斯卡古拉的浅水，还有能划破船体的牡蛎床，都令他们知难而退。向西行驶三里格后，伊贝维尔测得此处比洛克西湾（Biloxi Bay）的水深正合适。在他们东边，是一处结实的楔形陆地，左右各被一个湖湾和一个风景如画的内陆长沼包裹着。那里有溪流和泉水，除了可供采集狩猎的常见食物（牡蛎、李子、火鸡、野兔和鹈鹕），稀奇的野生动物（浣熊和负鼠）也不少见，比洛克西人和帕斯卡古拉人的世代繁衍便有赖于它们。而紧挨着水边的，是密密匝匝的松林，可以用来建堡垒要塞。法国人将此地称为比洛克西，所建堡垒称莫勒帕堡（Maurepas）。这里视野开阔，一眼望去，嵌于两个障壁岛（船岛和霍恩岛）之间的峡湾可尽收眼底。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虽然两国已经通过皇室联姻达成同盟，西班牙人依然不乐见法国人进驻墨西哥湾海岸。针对法国人在比洛克西建堡的行为，西班牙在帕斯卡古拉建起了永久据点，想着恶劣的自然环境自会把法国人驱赶出去的，就像西班牙人自己一个世纪前在帕斯卡古拉遭遇的那场飓风一样，那也是他们放弃上湾区的主要原因。法国的路易十四对自然的角色有不同的定位。他指示伊贝维尔“在比洛克西繁殖[当地]水牛；寻找珍珠；了解野生桑树以便制丝；寻找木材以便造船；以及探寻矿藏”。^[12]

伊贝维尔深谙新法兰西经济与自然资源间的联系。17世纪80年代，英国的哈得孙湾公司^[13]来犯，双方不宣而战，伊贝维尔肩章上的杠条便是从这场皮毛贸易捍卫战而来。但路易斯安那并没有让路易十四如愿。南方的水獭和浣熊，其皮毛质量比不上北境的海狸。如果说还有什么能像皮草一样受欧洲人追捧的话，那就是丝绸，丝绸要从中国进口，路途遥远，价格高昂，且需要用白银交易。虽然路易斯安那的桑树是完美的桑蚕养殖地，但这个产业还是没能运作起来。干旱的气候和印第安人的围猎迫使水牛往西迁徙，成片成片的牡蛎里也找不到珍珠。

比洛克西的自然环境也不是那么合法国人的意。1702年，他们舍弃了莫勒帕堡，将行政首府搬往莫比尔湾。那里有比洛克西所没有的进入内陆的水上通路。但有时一个好的地理位置会变坏。莫比尔湾被泥沙冲积后，港口淤塞，于是法国人又撤回比洛克西。那年随后迎来一场飓风，比洛克西的水道被改变了，他们又将阵地——连同它的名字一起——搬到了西边。路易斯安那的首府就像棋盘上的旗子，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被挪来挪去。

在法国人第一次来到比洛克西，还没站稳脚跟时，不速之客就出现了。在伊贝维尔发现密西西比河的六个月后，英国一艘10倍径火炮轻巡洋舰就沿河逆流上行了60英里。这是密西西比河上出现的第一艘远洋船，对法国人来说已经足够羞辱了。此后不久，英国就因贸易纠纷和路易十四之孙承袭西班牙王位^[14]的问题，与法国和西班牙开战，而此时英国的出现，已然对帝国在湾区的权力平衡构成了威胁。伊贝维尔年仅19岁的弟弟，号令两只独木舟的比安维尔，设法将无耻的巡洋舰驱离了密西西比河。为防更多入侵者闯入，他领头在三角洲上建起了一座堡垒，而后为以防万一，又在纳齐兹族印第安人领地往北的一个大断崖上建了一个前哨，下游有什么动静可以一览无遗。尽管如此，建在纳齐兹人眼皮底下的哨岗还是装备有限，三角洲上的堡

垒也常年洪水泛滥。比安维尔于是将目光投向两地之间的一处大河曲地带。这里离海岸有100英里，背靠大湖湖口，他将这湖取名为庞恰特雷恩（Pontchartrain）。此处海岸蜿蜒，河段弯曲，使得日后这里的城市地形如新月，新月城的外号也由此而来。法国人正式将此殖民地命名为新奥尔良，得名于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1723年比安维尔将首府搬往新奥尔良，确信它同时能抵御外敌和飓风。

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墨西哥湾不过是将黄金白银运出墨西哥的通道。法国人在这里重新发现了密西西比河入口后，与金银宝物分享这条航线的还有内陆的皮毛。然后七年战争（北美称为法国-印第安战争）打响，这是大西洋列强在殖民地和贸易上的利益之争，英国和法国是两个主要对抗方。由此，先前的权力结构被打破。战火没有烧到墨西哥湾，但它还是免不了受殖民力量重新洗牌的影响，1763年前来的和平大臣就很乐于借此测试地理专家们的分类技能[\[15\]](#)。

法国割让了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东岸的路易斯安那给英国，保留了西路易斯安那和新奥尔良，但随后又拱手将二者给了它的前盟友西班牙，就此，法国与墨西哥湾的沿岸属地算是暂时没了瓜葛。西班牙的哈瓦那在战争中被英国占去了，于是西班牙用佛罗里达去交换。古巴的制糖业利润可观，佛罗里达就没什么赚头。战争快结束时，一个逐利而来的人凿开了银矿丰富的马德雷山脉的主矿脉，于是哈瓦那作为湾区财富守护者的角色就变得空前重要起来。新奥尔良也为西班牙财富的增加做了贡献，它成为大英帝国版图边缘一个碍眼的指印。一位忠诚的帝国国民愤愤道：“只要西班牙人还占据着新奥尔良，那密西西比河通航就是一个笑话。”[\[16\]](#)

所以重新划分后的帝国版图是这样的。西班牙控制密西西比以西的湾区海岸，英国占据其东面，但新奥尔良除外。而印第安人则无处容身。

英国控制了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绝大部分地区，而佛罗里达对英国人的意义就在于补足这条海岸线。英国国王将新得的领地划分为两块——西佛罗里达和东佛罗里达，把它们加进了现有的十四个殖民地中，十四个殖民地中也包括新斯科舍。应该说，1775年爱国者们^[17]奋起反抗时，英属殖民地中有十五个将最终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其中两个被美国历史课本准确地略去了。这两个是唯一的湾区殖民地，当然真正的区别在于革命期间它们仍忠于英王——也就是说，反对美国。

在英国治下的20年间，它们对大英帝国忠心不二，这与那些私人殖民公司截然不同。大西洋沿岸的东佛罗里达，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孕育出一片盛产靛蓝、棉花、大米、甘蔗和柑橘的种植园。这里的经济并不十分发达，但英国政府仍希望英国人勤劳节俭的美德能将成熟的商业环境复制到墨西哥湾的土地上。

收集地理数据是当时的首要任务。虽然密西西比自1701年就能在地图上被准确定位，也厘清了其河口处是一个三角洲而非海湾，但它的很多地理细节仍是一片混沌。制图师继续把佛罗里达半岛画成短短粗粗的钟乳石形状，尤卡坦半岛则是一个头重脚轻的沙漠岩石的构造。用来标识航向、距离的地图和航海图，竟是“这样错漏，令人感到可耻”，湾区印第安事务的英国负责人这样说道。很多老西班牙地图都是委托作坊制图师画出来的，他们从来没去过这些地方，只是在西班牙某个房间的桌子上凭借从航行日志上收集来的信息埋头描画。而英国人则相反，他们让制图师到实地去，用上最先进的测量仪器，例如能更精确计量纬度的六分仪，还有最先进的数学和推测技术去推演地球的曲率。他们还开始对通航水位的深度进行细致测量。^[18]

不知道应该说是反映了官僚组织的冗余，还是反映了英国对湾区的兴趣，也许两者都有，他们分别给三个人分派了绘制地图和海图的

任务，测绘对象是从密西西比河到南佛罗里达的墨西哥湾上部。三位未来都是美国哲学学会的成员，他们为世界提供了经过放大的墨西哥湾地理景观。

乔治·高尔德（George Gauld）是苏格兰人，在亚伯丁的国王学院接受教育，他在和约签订的次年来到海岸。他从地中海来，墨西哥湾就常被人们冠以美国地中海的名号。被任命为海军的海岸测量员后，他在墨西哥湾度过了17年，这些时间他有时是在虫蛀的船上，有时在忙于躲避因过深而难以进行有效测量的水流。他还是一个天才的铅笔画家，留下了一幅少有人知的画，画工精妙，画的是彭萨科拉湾上的航海景象——几只船在航行，下了锚的船只则正在转移人员和货物，长长的码头上显眼地飘着属于国王的颜色，后方是一排随着海湾沿岸成为永久据点而出现的四坡顶建筑物。

托马斯·哈钦斯（Thomas Hutchins）出生于新泽西殖民地，参加过法印战争。随之而来的是20年的军人生涯，当过工程师、测量员和制图师。作为一位“丈量过大量土地”的专注的科学家，一份当代出版物如此评论道，哈钦斯绘制过大西洋中部、上南方^[19]、俄亥俄河道以及密西西比河谷上游地区。此后就接到了为佛罗里达绘制地图的任务。测量战利品的任务交给曾帮助取得战争胜利的人去完成最合适不过了。他在墨西哥湾上的工作成果使他写下了《路易斯安那和西佛罗里达的历史和地形》（*An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op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Louisiana and West Florida*）一书，在1784年出版，篇幅不长，共95页。^[20]

伯纳德·罗曼斯（Bernard Romans），一项资料显示，他也是一个“行动派”，在史料中，罗曼斯的形象是三位地理学家中最为鲜明的。他出生于荷兰，在英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移民到了北美殖民地，在法印战争中服务了三年，至于他是否参与了前线战斗则并不清楚。

他十分能干，在他43年的人生中，他当过海军上校、私掠船船员、测量员、制图师、植物学家和学者，广泛阅读历史、诗歌、人类学和政治学书籍，阅读语言涵盖了荷兰语、西班牙语、法语和拉丁语。18世纪60年代，他率领满载红木的船从古巴出航，在佛罗里达礁岛群附近海域的大堡礁上搁浅了。这次事件后，第二次沉船事故又紧随而来，这“迷阵似的航海经历”是墨西哥湾给他的见面礼。人有从错误中学习的天性，因此他之后成为南区测量员副手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将测绘的数据和自己各种幸运和倒霉的经历，包括在坦帕湾的又一次沉船，都写进了一本名为《东、西佛罗里达简明自然史》（*A Concise Natural History of East and West Florida*）的书里。书名具有欺骗性。书包括了正文、附录和地图，它的简明“在不知不觉中膨胀起来”，他说道，最后成书变成了上下两卷共800页。它涵盖了大量重要信息，其中有许多借鉴自高尔德未出版的作品。[\[21\]](#)

给未知地域测绘是一件难事。其中最难的莫过于给墨西哥湾臭名昭著的浅水做测深。这是个辛苦活，借用测深索吊着铅锤来完成，完全是手工作业。随着铅锤一遍又一遍下探到底部，每一次海员都要根据测量标记或绳索上的绳结大声报出一个记录深度。水底几乎都是沙子和贝壳，海员们不需要担心会撞上岩石，或者，如果是在群岛外海域，会撞上珊瑚礁。但没有哪个海底会一直那么深，或者一直那么浅。很多船长，包括经历了三次海难的罗曼斯，都知道沙质浅滩的危险，不仅在近岸，即使数英里之外，它也在埋伏以待。更危险的是牡蛎床，几乎所有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都有它们。哈钦斯就曾警示，在帕斯卡古拉河的河口有一处牡蛎床，竟达到惊人的四英里之长。三位测绘员最终将数不清的测深数字铺满了他们的海图，其中又以海难的潜在发生区域最为详细。

除了浅滩，制图师们还得格外留意资质优良的天然港口。其中得众人一致认可的是位于佛罗里达狭长地带最西端的彭萨科拉湾。高尔

德接到任务后，从英国来到墨西哥湾海岸，他乘“鞑靼号”（HMS Tartar）穿过尤卡坦海峡赶往这个广受赞誉的港口。结果“鞑靼号”在离目的地东边很远的地方停下了——这并不奇怪，毕竟当时的航海图还很粗糙，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海员还没有测量经度的能力。即使领航员严格跟随罗盘指向，但由于缺乏能定位东西方向的工具，不管风向如何，航船总会在湾流的作用下往东向偏移。作为一种矫正手段，“鞑靼号”沿着海岸往西行进。近岸的墨西哥湾如碧玉松石般闪耀，水深40英尺，水下的沙子清晰可见，平静的水面偶尔泛起涟漪，倒映着护卫舰长长的身影。当船首右舷出现圣罗莎（Santa Rosa Island）这个50英里蛇身般细长的障壁岛，看到上面“洁白如雪的……沙丘”时，“鞑靼号”就到了熟悉的海域了。彭萨科拉湾就在岛的西端。在进入之前，“鞑靼号”下锚等待满潮和港口引航员的指引。[\[22\]](#)

彭萨科拉是西佛罗里达的首府。在高尔德目所难及的彭萨科拉西北面，那里的大陆海滨与近百英尺高、数英里长的高地相连，铁锈色的红土沿内陆山丘倾撒而下，绝壁断崖成为彭萨科拉的标志性地貌，这即使在整個墨西哥湾北部也实属罕见，是一个建立要塞的好地方。西班牙人就曾这么做过，只不过他们建造要塞用的是木料，建得狭小鄙陋，被“鞑靼号”上的一位军官嗤为“小得不值一提”。英国人将在日后把木头换成砖石和当地的红土，在这里重建要塞。八年后，根据罗曼斯的统计，这座首府将拥有房屋180座，这些房屋建得“颇为雅致，但用的是木头”，而且很多盖顶材料用的依然是不堪一击的美洲蒲葵叶。[\[23\]](#)

彭萨科拉并不是个友好的热带地区。士兵们抱怨冬天里往屋顶缝里钻的北风和屋子单薄的板材。但没人会抱怨这个海湾，显然他们不知道海底还沉着十艘被暴风雨刮沉的西班牙船舰。这是飓风的杰作，阻止了16世纪的西班牙人在这里建立永久据点。小瞧了眼前这个要塞

的一位英国官员称这个海湾“了不起”。罗曼斯被它的宽广打动了，它长13英里，宽2.5英里，水深则是宜人的30多英尺。这是“我在这个大陆上见过的最棒的水域”。坦帕、阿巴拉契科拉、莫比尔、比洛克西、帕斯卡古拉的海湾在尺寸上都相形见绌。得克萨斯的那些也是。[\[24\]](#)

它的航海条件优越，但要想驶入它却是有风险的。这也是“鞑靼号”锚定了等领航员的原因。高尔德此时站在上层甲板一连串的火炮间，甲板由北美橡木铺就，此时被笼罩在盐雾里。当他看着距离不远但现在进不去的海湾时，心里一定在预想他的第一个任务：绘制一幅海湾入口的海图。英国人相中的这个海港还有另一个缺陷。埃斯坎比亚河（Escambia River）和帕蒂诺河（Perdido River）从海湾北边汇入，船只从两条河进入海湾内只需要行驶一小段距离。

没有比密西西比更完美的了，所以英国人才会对西班牙控制着新奥尔良而使其无法长驱直入大为光火。但他们还是相信，它被外人控制的时间不会很长。他们宣称密西西比河口的东边通道属于他们，于是派高尔德前去破译三角洲。高尔德穿着军装，带上军团，对三角洲进行了详细细致的测深，在海图上标记了数百个标识作为对浅滩的提示。在他的作品中，三角洲向下延伸着五条通道，就像大树深入土壤的根系一样。之后当哈钦斯来这里做测绘的时候，他观察到墨西哥湾的水是“黏土一样的颜色”，密西西比河也“差别不大”，“每年的洪水带下来大量的泥土、大树、树叶等”（如果拉萨尔知道就好了）。[\[25\]](#)

罗曼斯的时间是在另一条河上度过的，汤比格比河（Tombigbee），它有螺丝锥一样的行进路线，从莫比尔湾的北端汇入。住在莫比尔的欧洲人和非洲人可能有800名。罗曼斯很可能在那里碰上了犹太人，他们是被英国的宗教自由政策吸引而来的新移民，和彭萨科拉的以色列移民一道成为湾区的第一批犹太定居者。他提及他

们时，好像他们是从法国统治时期就一直在那的一群人一样，那时的莫比尔是法兰西帝国最重要的湾区前沿据点。英国人没怎么在意过莫比尔这个潮湿闷热的地方。而且让人头疼的是它湾水很浅，沿岸土地“贫瘠荒凉”，除了有条“还不错的河”以外，看起来似乎就没其他搞头了。罗曼斯想它其中可能隐藏着通往新奥尔良上方密西西比的水道，这样就可以绕过讨厌的西班牙人了。他去找了，可没有成功。但他发现了乔克托人（Choctaw）和契卡索人（Chickasaw）的60个村落，他们是密西西比地区冢堆建造者尚存的后代，罗曼斯将这个信息列在了河流的地图上。乔克托总人口有7500人，契卡索有2500人，而他们更兴旺的邻居克里克人（Creek）则有两万人。罗曼斯正在描摹这个大陆的文化地图——这个时常被英国政策当作一片空白来对待的东西。[\[26\]](#)

到了上游地区，罗曼斯就变成了一个民族志学者，展现出他学者风范的一面。他认为，当地人与土地的关系也许表明英国从当地收获商业利益是可行的。西南部的印第安人除了采集坚果、橡子、浆果和野生燕麦以食用外，他们也是“备受尊敬的好猎手”，他们会猎食鹿、熊、野牛、火鸡和野猪的肉，这些野猪就是被西班牙早期探险者带来然后繁衍下来的后代。印第安人也会饲养家畜，这些家畜的来源，一是过去伊比亚人留下的品种，二是英国人带来的家畜闯进了印第安人领地的那部分。[\[27\]](#)

在欧洲人入侵以前，印第安人的园子里大多是玉米、豆类、南瓜、向日葵和烟草。现在，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了甘薯，甘薯最早是南美洲的产物，后来远渡去了欧洲，又被早期的湾区探险者带回美洲大陆。一种解渴的藤蔓植物，西瓜，最开始由入侵的摩尔人在8世纪引入欧洲大陆，然后被带到了墨西哥湾沿岸，西瓜备受印第安人喜爱，一个世纪后在美国南方人那也有同样的待遇，他们每逢春天就用四轮马车载着西瓜到镇上广场和郊区路口贩卖，还发明了西瓜节（和选美

比赛一起），有腌瓜皮和吐籽比赛。罗曼斯曾说，印第安人的“耕耘精神使他们种植培育了”韭葱、大蒜和卷心菜，这都是从非洲大陆越洋而来的入侵物种。[\[28\]](#)

罗曼斯很好奇还有什么在他的同胞不能在沿岸的沙质土里种出来的。支撑着印第安人“广大丰饶的土地”的是湾区从5000万年前就逐渐形成的土壤根基。当时的地球温度比现在高得多，海水上涌至内陆100英里处，死掉的浮游藻类沉积下来，它们的石灰质遗骸在千万年间一点一点地凝聚固化，最终形成了一种密集的石灰岩层，即塞尔马白垩层（Selma Chalk）。同样的演化进程也在湾区东部州的土壤下方形成了一种地下结构，20世纪50年代一位水文专家将其命名为佛罗里达含水层（Floridan Aquifer）。在雨水和湿地的共同驱动下，整个佛罗里达半岛的湖泊、池塘和泉水底部，以及上海岸一带至密西西比州下方的岛屿和沙丘底部都潜藏着这种含水层。它支撑着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南部一带的灌木丛地和松林地，南卡罗来纳州也不例外。在很多地方，这些古老的石灰岩层暴露在了地面，罗曼斯很可能是见过的，它们看起来带着霉菌，黄黄的、坑坑洼洼的样子。[\[29\]](#)

大多数的石灰岩层是暗藏在地底的，它是一块巨大的透水岩石，有丰富的通道、孔洞和缝隙，就像满是洞坑的蜂巢，或者坚硬的海绵，聚集着上千兆加仑的淡水。地表涌动的泉水最初便是来自这些含水层，泉水又滋养着河流和湖泊，它是印第安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饮用水源和洗浴水源，也是欧洲航海人们必需的补给，不老泉的传说也由此而来。罗曼斯遇到的印第安部落所在的塞尔马白垩层，位于佛罗里达含水层的最北部边缘地带。当墨西哥湾的水位退回到今天的海岸线或更远处时，腐烂掉的有机植物——主要是海底草甸——层叠堆积在塞尔马白垩层上，形成了异常肥沃的土壤。

罗曼斯不满这些肥沃的土地被“野蛮人”占据着，他预言“未来的文明人会享用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的来自土地的馈赠”（在除掉印第安人后，那些“文明人”——美国白人——将会用奴隶来获取以棉花为主的“土地的馈赠”）。至于墨西哥湾的角色，他写道：

“总而言之，我预测[它]将成为往来贸易的地方，成为北美的富庶之地。”他说得多对啊！英国商人已经开始通过汤比格比河来运送大自然的货物了。[\[30\]](#)

是他们催生了这个地区的产业化，虽然只是在大海的外延。印第安人像往常一样聚集在彭萨科拉，用农作物与商贩换取毯子和一些金属器皿、刀具，外加一些朗姆酒和威士忌。如果是熊皮和鹿皮，英国人愿意用手中的来复枪交换。他们自己也设法从当地攫取了大量资源。当地的柏树可以制造出经久耐用的隔板。雪松可以制成盖板、木标杆和木桶上的板条。彭萨科拉高原上的红土被拿来制砖，盐场建在海湾沿岸，制出的盐用来腌肉。

他们的法国前辈们发现泥泞的密西西比三角洲和莫比尔沼泽地是种植稻米的好地方。那里的环境，罗曼斯写道，“非常乐意”产出谷物。长期依靠米来做汤、做面包、做贝奈特饼的法国人，凭借西非人的湿地经验，耕耘出了一连串的大农场。他们的奴隶很多来自尼日尔和冈比亚河口三角洲，它们在自然环境上和密西西比就如同双生儿一样，那里的居民种植冲积土谷物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从此路易斯安那人有了一道特色菜肴：秋葵浓汤（gumbo）。在法国人之后，西班牙和英国人继续种植稻米。他们还出口槐蓝属植物、大麻和柑橘，罗曼斯也曾寄希望于丝绸、无花果、葡萄干、棉花、糖，以及朗姆酒和葡萄酒酿制产业，但最后只有棉花业维系了下来。此外还有松脂制品的买卖，主要是沥青、松香和松节油。松脂贸易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因为到那时松树林已经耗尽了，而原本的松林面积广阔，围绕着

湾区沿岸，覆盖了从弗吉尼亚到佛罗里达再到得克萨斯一带的南方土地。[\[31\]](#)

英国人几乎完全忽略了海洋资源，将目光锁定在土地作物和 他们的印第安贸易伙伴身上。这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一件坏事。欧洲疫病的致命打击和激进的入侵活动迫使印第安人进入了商业世界，而这在欧洲人到来前的土著文化里是不存在的。他们变成了一项浮士德式交易[\[32\]](#)里的供给方，给他们赖以生存了数千年的荒野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陆地上的野生动物数量急剧下降。树木几乎被砍伐得精光，他们还对商人欠下了巨额债务。更糟糕的是，他们开始在曾经的富庶之地上遭遇饥荒。面对一边是西进的卡罗来纳的英国殖民者，一边是湾区北上的贸易货船，将他们的土地抵给了英国的债主后，乔克托人、契卡索人、克里克人、彻罗基人（Cherokee）和其他印第安部族人被迫南下到佛罗里达半岛寻找食物和毛皮。英国人将他们笼统地称为塞米诺尔人（Seminole）。

最后，因为印第安贸易的成功，彭萨科拉的经济重要性超过了西班牙的新奥尔良，这激怒了路易斯安那总督，也恶化了本已紧绷的西班牙和英国殖民者的关系。在这一切还有待解决的时候，大不列颠和它不守规矩的北美民间的战争爆发了。

美国革命改变了这三位地理学者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滩头阵地。当支持美国人的西班牙掷弹兵在1781年攻下彭萨科拉时，他们将高尔德下了狱。他在一年后死去，死时仍忠于英王。

罗曼斯转而支持爱国者一派，刚开始他自愿要为哈得孙河堡垒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工程师技能。但军事委任会写了一纸诉状递到了乔治·华盛顿将军面前：“为了罗曼斯先生展示他的天才，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结果无人收益。”他被解雇了，然后以陆军校级军官的身

份加入南部战场。在去往查尔斯顿的途中被英国海军俘虏，之后就神秘失踪了。^[33]

哈钦斯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保皇派，直到政府将他关进了英国监狱，给他捏造了一项严重叛国的罪名。在他自己的策划下，他被释放了，之后便向本杰明·富兰克林请愿加入大陆军，他如愿成为南部地理学者。战后，国会任命他为第一位美国地理学者。

在1783年的和平谈判桌上，佛罗里达被归还给西班牙，英国在墨西哥湾的短暂篇章就此落幕。此后哈钦斯马上提出应将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一起并入美国国土。他相信新共和国的命运在西部，这片丰饶的土地——墨西哥湾和密西西比河，终将并且应当成为美国领土。他的声音自有人听到。

^[1] Quoted in John D. Ware and Robert R. Rea, *George Gauld: Surveyor and Cartographer of the Gulf Coast*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1982), 37.

^[2] 约瑟夫·康拉德：《大海如镜》，倪庆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译注

^[3] Joseph Conrad, *The Mirror of the Sea* (Harper & Brothers, 1906), 168.

^[4] 这里的路易斯安那领地包括现今美国中部由密西西比河口至加拿大边境的很大一部分区域，和今天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不是一回事，整片法属领地在1803年被低价卖给美国（即“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后，从中先后划分出15个州。——译注

^[5] Louis De Vorsey Jr., “The Impact of the La Salle Expedition of 1682 on European Cartography,” in *La Salle and His Legacy: Frenchmen and Indians in the Lower Mississippi Valley*, ed. Patricia K. Galloway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2), 71.

[6] Francis Parkman, *La Sall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Great West*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5), 373; Christopher Morris, *The Big Muddy: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Mississippi and Its People from Hernando de Soto to Hurricane Katr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5.

[7] 拉萨尔名字中的Sieur de La Salle字面意思是庄园主，是法国的一个贵族头衔称谓，作为名字的一部分冠在原姓氏后。在法国贵族阶层的体系中，这个头衔的获得不需要经过承袭或立功勋，花钱就可以买到。——译注

[8] Parkman, *La Salle*, 366.

[9] Robert S. Weddle, *The French Thorn: Rival Explorers in the Spanish Sea, 1682-1762*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91), 82.

[10] 新法兰西，即法国位于北美洲的殖民地，在占据路易斯安那前，新法兰西领地集中在北美洲东北海岸。它以1543年的圣劳伦斯湾（加拿大东南部海湾）沿岸为起点逐步扩张，鼎盛时期（1712年）的新法兰西包括五大区域：加拿大（蒙特利尔之所在）、阿卡迪亚、哈得孙湾、纽芬兰、路易斯安那。得益于毛皮贸易的发展，蒙特利尔在此间逐渐成为新法兰西的殖民基地和商业中心。——译注

[11] Richebourg McWilliams, *Iberville's Gulf Journals*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1), 52.

[12] Weddle, *French Thorn*, 136, 157.

[13] 哈得孙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于1670年获得英王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并注册成立。它控制英占北美地区的绝大部分皮毛贸易达几个世纪之久，同时也承担了早期北美大陆的开发探索，在欧属殖民地建立前实际上承担了部分北美地区的政府职能。今天，它依然是加拿大著名的百货公司。——译注

[14] 1700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逝世，留下遗嘱传位给法王路易十四的次孙安茹公爵腓力，英国、荷兰在法国对西班牙关系上产生不满，由此爆发了一场几乎欧洲全部国家卷入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由于是近亲结婚，卡洛斯二世（或称查理二世，腓力四世之子）从出生起就身患多种遗传病，没有直系后嗣。由于影响着整个欧洲的权力平衡，因此在卡洛斯二世还在世时，西班牙王位

的继承人就一直备受欧洲各国关注。腓力的继承权建立在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的关系上——腓力的祖母安妮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的长女。] ——译注

[15] 1763年英、法、西三国签署《巴黎条约》，和约的签订正式宣告七年战争的结束。——译注

[16] Thomas Hutchins, *An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Description of Louisiana, and West Florida*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68), facsimile reproduction of 1784 ed., xlv.

[17] 爱国者 (the Patriots)，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属十三个殖民地的暴力反抗英国统治的殖民者。仍然忠于国王的殖民地人民称他们自己为保皇党、“托利派”或者“国王的人”。——译注

[18] Newton D. Mereness, ed., *Travels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Macmillan, 1926), 489.

[19] 上南方 (Upper South) 指美国南部偏北的地区，与之相对的是深南部 (Lower South 或 Deep South)，这个划分源于南北内战。在1860年总统选举后南方七个蓄奴州 (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以及得克萨斯) 宣布脱离联邦，组建新的南方政府，这七个州后来被归为深南部。而上南方则指1861年4月南北战争正式打响前并未脱离联邦的各州，即弗吉尼亚、田纳西、阿肯色、北卡罗来纳，也包括肯塔基、密苏里。上南方当时以小规模种植业、畜牧业和狩猎为生，较少使用黑人奴隶。时至今日，二者在经济、人口和文化上依然有较明显的差异，现在有时也直接用上南方指代所有深南以北的州。——译注

[20] Thomas Hutchins, *A Top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Virginia, Pennsylvania, Maryland, and North America* (Burrows Brothers, 1904), 49.

[21] Bernard Romans, *A Concise Natural History of East and West Florida*, ed. Kathryn E. Holland Braund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9), 1, 3, 321, 348.

[22] Ware and Rea, *George Gauld*, 61, 62.

[23] Ware and Rea, *George Gauld*, 24; Romans, *Concise Natural History*, 267.

[24] Ware and Rea, *George Gauld*, 24; Romans, *Concise Natural History*, 262, 267.

[25] Hutchins, *Historical Narrative*, 33.

[26] Romans, *Concise Natural History*, 158.

[27] Romans, *Concise Natural History*, 126.

[28] Romans, *Concise Natural History*, 138.

[29] Romans, *Concise Natural History*, 142.

[30] Romans, *Concise Natural History*, 142.

[31] Romans, *Concise Natural History*, 209-10.

[32] 浮士德式交易，指一个人因对一种看似最有价值的物质有了盲目崇拜，而失去了理解人生中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或精神的理由和机会。歌德的诗剧《浮士德》是最佳阐释，浮士德为了寻求生命的意义，在魔鬼梅菲斯特的引诱下，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得它的帮助。——译注

[33] Edward Charles Boynton, *History of West Point* (Applewood Books, 1864), 32.

第二部分 大海和天空：19世纪亮相的美国人

五 昭昭天命



美国的海湾各州在19世纪建立；建立之初，海岸仍是一片荒地，这对美国海岸勘测局的地图测绘工作来说无疑是一项挑战。

你所提到的，我们这美妙的三角体系具有不间断的延续性，它将联邦的海岸逐段逐段地串联起来，[我]非常清楚它的重要性。

——斐迪南·格迪斯，美国海岸勘测局（1853）[\[1\]](#).

“麻烦似乎总跟着你，但都被你一一克服了。”美国内战期间，约瑟夫·史密斯·哈里斯登上联邦军的炮艇“酋长号”后，读到了这份来自其华盛顿上司最新的赞许。几周前，他在“枪林弹雨”间沿着绳梯攀到桅顶，指挥迫击炮射向南方联盟的杰克逊堡（Jackson）和圣菲利普堡（St. Philip），它们是分置在密西西比河两岸的两个前哨。沿此上行70英里，就是南方邦联的龙头城市新奥尔良。[\[2\]](#)

在南部邦联的星杠旗前，新奥尔良的上空飘扬着三面联邦国旗。这座城市一共有16万人，人口分层明显，族群多元，那是各帝国在此殖民留下的印记，也是它作为港口城市的特殊性。在这座由法国人创立的城市里，那些标志性的法式铁艺阳台建筑，都有优雅的法语名字，但住在里面的却大都是西班牙居民，即使在古老的法国区

（French Quarter）也不例外。新奥尔良整体的样子、味道和声音都受到来自欧洲和西非的影响，它们肆意交杂糅合的痕迹在饮食、服装、音乐、艺术、礼拜和混合语上随处可见；所谓混合语，就是语调轻快的克里奥尔语，它将英语和法语混合在一起，还加入了西班牙语、塞内加尔语和当地的马斯科吉语。

至于战争的目的，南部局势最不稳定的城市也是联盟的少数几个产业中心之一。工厂向外输送军需用品和联盟军的灰色制服，船舶装配工将最新式的轮船下了水，那是装甲舰和潜水艇。新奥尔良还有北美最大的奴隶市场，最后这个城市废止了奴隶制，这是包括奴隶在内的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们所获得的巨大道德胜利。最重要的是，孜孜不倦的大河日夜不停地输送着国内外的货物，使新奥尔良成为南部最繁忙的港口城市；也正因如此，大河成为联邦的海湾封锁分遣队要拿下的关键目标，这支分遣部队的头头是舰队司令大卫·法拉格特（David Farragut）。

战争爆发后，毫无疑问联邦军会把目标瞄向新奥尔良，但联盟军领袖们确信对方会使用步兵从北边打过来。在被泄露给《华盛顿明星报》的一份报告显示攻击即将从另一个方向发动起来时，联盟钢铁般坚定的信心丝毫没有被动摇。联盟军对从南边发起攻击这个策略嗤之以鼻，认为即使是北方人也不会干这样的蠢事。一来，路易斯安那南边的沼泽和长沼即使是最精锐的步兵来了也招架不住。二来，密西西比的河口，不是简单的一个招呼你进去的大开口，它有五条隐晦的通道，像一只手上的五根指头，是一副完美的铠甲手套，通过泥泞多变的浅滩将敌军战舰都挡在了外面。河两边的杰克逊堡和圣菲利普堡，墙体用土砌成，外面加护了两层红砖，钢缆和柏木做成的横木架在河上，但它们不过是后援，大自然才是他们依赖的主力。

自然发挥了它的力量，只不过它站在了入侵者那一边。春天上涨的河水使法拉格特的舰队顺利通行。不仅如此，它还冲走了河上的部分障碍物。13艘联邦舰艇躲过了堡垒的炮火，挺进了新奥尔良。美国南方城市庄严的堤坝是为抗击洪水而建，无法抵御坚定的敌人。新奥尔良很快就被攻下了。11位美国海员被国会授予了荣誉勋章^[3]，法拉格特则被提拔为海军上将，这是特为他而设的一个军衔。

至于协助操控迫击炮的约瑟夫·史密斯·哈里斯，上级的赞许就足够了。他不是一个正式军人。称赞他的那位华盛顿上司是美国海岸勘测局的负责人，海岸勘测局负责的是美国湿地边界的测绘。战争爆发后，测量员们的技能被用在了战场上。在新奥尔良一役中，哈里斯请求跟随海军沿河北上，记录下敌军堡垒的准确位置，决定迫击炮船的停泊点，进而发动最有效的攻击。他精准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一位炮舰船长说如果没有哈里斯或者其他测量员“在身边”，他“不会执行任何一项炮击任务”。^[4]

除了战场上的危险，对从事和哈里斯一样的职业的人来说，为墨西哥湾测绘——以线条的形式呈现在地图上——也同样是挑战重重。正如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先前学到的，水陆相交的地方极少有定数。你不能像对待岩石众多、海岸线固定的缅因州海岸一样去对待墨西哥湾。墨西哥湾有不断变化的海岸线，而且变化还会一直持续下去。作为一条线，它自然地转向、扭曲、凸起、退后。它甚至会转圈，无时无刻不在考验你的方向感。太阳总是东升西落的，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海面上。确实是这样吗？

自从欧洲人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有它的存在以来，三个半世纪过去了，美国人仍在研究墨西哥湾的地理。西班牙人发现了墨西哥湾，法国人从那里找到了密西西比河的入口，英国人则开始在地图上描摹它。终于，美国人在19世纪夺取了对它的控制权，在约瑟夫·史密斯·哈里斯从“酋长号”的桅杆上爬下来后，在战场的硝烟消散后，海岸的测绘员开始捕捉湾区的地理细节——它的海水是拍打在沙滩上，还是流入芦苇丛生的湿地，还是潜入岛屿后的小湾、长沼、海湾里去了。它现在是美国的海。

让这一切开始的人是托马斯·杰斐逊，他自己就曾是一个测量员。就任总统后，他在1807年愉快地签署了成立海岸勘测局的法规。他不仅重视国土扩张，也有对地理信息准确度的追求。正因如此，他在1803年将刘易斯和克拉克派去西部勘测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的新土地。四年后授权成立海岸勘测局也是基于同样的需求。水资源的重要性毫不逊色于土地。那是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背后隐藏的故事。当托马斯·哈钦斯——这位英国皇家地理学者，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位地理学者，杰斐逊的测量员同僚——提出墨西哥湾无论从地理上还是道义上都属于美国时，杰斐逊听得很认真。在对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简要论述中，这位总统援引了哈钦斯的著述。

关于美国扩张论的谚语式表述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了，它最终是这样被呈现的：在这个与拿破仑·波拿巴和法国人达成的世纪购地案中，托马斯·杰斐逊将美国国土扩大了一倍，为日后国人在这片大陆上畅行无阻开辟了道路，尽管如此，也还有几场与印第安人的战役和积雪的山路。这是真的。但在新西部殖民和买地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入海通道畅通。这项交易之所以诱人，是它包含了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权，而墨西哥湾就是这二者的前厅。

杰斐逊支付给拿破仑500万美金，换取了直至落基山脉的8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他支付了两倍于前述的价钱取得了新奥尔良和美国的通航安全。虽然杰斐逊从没有踏足过海湾沿岸，但一幅地图足以显示为什么“美利坚”这个名字要靠这片海来补足。它将大范围打通对外贸易的水路运输渠道，将领土边界从脆弱的土地变为有防护力的海洋。在他任国务卿时，杰斐逊曾向约翰·亚当斯总统提议，古巴作为墨西哥湾入口的天然堡垒，它“对联邦的持续和完整是必不可少的”。

在杰斐逊买下路易斯安那前，国家安全问题的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忧患。英属西佛罗里达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落入了西班牙人手中，和谈没有将东、西佛罗里达判给美国，而是给了西班牙。西班牙自从法印战争后就一直把持着路易斯安那。然后，在1800年，拿破仑秘密向西班牙施压，迫使其归还路易斯安那，并且希望佛罗里达最终也会归他所有。后院相对安静的西班牙邻居美国人尚且难以容忍，咋咋呼呼的拿破仑就更不用说了。这次杰斐逊是总统了，虽然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亲法派，但在巴黎时他明确地告诉他的部长，拿破仑要是来占领新奥尔良，那法国就是“我们的天敌、世仇”。[\[5\]](#)

后来，法属圣多明戈（海地）的非裔奴隶造反，拿破仑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北美大计。为了筹集镇压动乱的足够的资金，“为日后大局考虑”，佛罗里达作家T.D. 奥尔曼评说道，“路易斯安那像一件被

穿上又匆匆脱下的巨大斗篷”，拿破仑准备好了要将这个大号省份脱手。他不知道的是为了断了法国插手密西西比的念头，美国暗中扶持海地人的革命，革命最后取得了成功。[\[6\]](#)

杰斐逊通过购置路易斯安那，渐渐促成了美国史上第一次墨西哥湾沿岸的不动产业。交易中转让了今天的路易斯安那州海岸不到400英里的部分，但发生了一点意外。美国宣称交易包括了西班牙在西佛罗里达上的200英里土地，也就是密西西比河以西至帕蒂诺河（Perdido River）间的部分，帕蒂诺河是今天亚拉巴马和佛罗里达州的分界线。西班牙人当然提出了抗议。谈判一直相持不下，另一边自称西佛罗里达龙骑士的美国定居者洗劫了西班牙在巴吞鲁日（Baton Rouge）的驻地，建立了西佛罗里达共和国，草拟宪法，选出总统一一福尔沃·斯基韦弗（Fulwar Skipwith），他是弗吉尼亚的烟草酒品商，也曾在路易斯安那种植棉花，但没有成功，他还是杰斐逊的远房表亲，自不必说他还参与过路易斯安那购置案的谈判。

新共和国的首都在密西西比的圣弗朗西斯维尔（St. Francisville），爱国者们升起了国旗，国旗以蓝色作底色，上面是一颗白色的五角星。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他们是最早的孤星共和国[\[7\]](#)。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看到了其中的机会，发布了合并声明，将爱国者们和他们的领土并入美国，用闷闷不乐的斯基韦弗总统的话来说，那就是到“祖国的怀抱”中去。[\[8\]](#)

此时的美国像一个难以管教的横冲直撞的青少年，年长的欧洲各国正逐步缩减在北美的势力，但还未做好彻底引退的准备。在这个年轻国家想一展身手的地方，西属佛罗里达正好挡住了去路。它带来的困扰不止一件。印第安人生活在那里，佐治亚州的黑人奴隶也纷纷逃往那里。在其中串联一切，同时也在后来挑起了第一次塞米诺尔战火的，就是所谓的黑人堡（Negro Fort）。黑人堡在阿巴拉契科拉河东

岸的西班牙属地内，离墨西哥湾航程15英里，是英国人在1812年战争中所建，最初只是简单地被称作英国哨点（British Post）。很快他们就意识到可以利用它来怂恿奴隶们逃脱美国的种植园，然后联合当地印第安人，拿起武器反抗他们的敌人。后来战争结束，失败的英国人从这里撤出，他们留给美国人的临别馈赠，就是这个被黑人和印第安人控制了的全副武装的河上堡垒。

为了防止种植园劳动力持续大量外逃，美国人也在佐治亚州上游的弗林特河修建了他们自己的关卡。美军的南方事务指挥官，安德鲁·杰克逊，坚持弗林特河驻地的物资必须通过阿巴拉契科拉河运送。终于如杰克逊所愿，黑人堡的占领者向美军巡逻队开火了，他马上展开反击。十天后，美方炮艇射出幸运的一炮，直击黑人堡的火药库，军火弹药被炸毁，堡垒占领者伤亡惨重。

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承诺庇护出逃的黑人奴隶，因此此次爆炸事件也没有阻止佐治亚州奴隶外逃。杰克逊不能容忍这两拨不守本分的人——一个是本应安守一隅的印第安人，一个是归白人所有的黑人。另一边的西班牙人也不得杰克逊的欢心，在他看来，西班牙人是时候退出北美大陆了。所以不难想象，他离开了田纳西州的种植园，召集了一支军队，向南进发，要让佛罗里达归降。

他的出征在多大程度上是总统詹姆斯·门罗的授意我们不得而知。杰克逊在战场上的行事多是源于他老胡桃木^[9]式的狂妄以及他此前的军事征服。杰克逊身材颀长，一头密密匝匝的乱发下是一双敏锐的眼睛，他在1812年战争中攻下了彭萨科拉和新奥尔良，擢升为少将，现在在美国总统的指派下来到了西属佛罗里达。在靠近圣马克（St. Marks）时，他指控两个英国人与印第安人密谋妨害美国安全，凭借一点薄弱的证据将两人定了罪，并且在外国土地上将二人处死。

杰克逊继续向西而行，到了西佛罗里达的首府彭萨科拉，他摆出一副战斗姿态，几声鸣枪示警后，西班牙官员随即逃到了古巴。

殖民地难以为继，西班牙没有理由再紧抓着它不放。行驶在墨西哥湾流上的航船不再满载着财宝，因为它需要来自半岛的保护。此外，他们从佛罗里达殖民地上挣的还抵不上他们的维护开销。为了债务平衡，西班牙将大量土地分售给美国移民。新移民的到来，在帮助振兴佛罗里达经济的同时，使当地人口中白人占了主流——也就是对前来讨伐的杰克逊欢呼喝彩的那部分人。杰克逊在海湾沿岸烧起的战火在美国国会和新闻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一部分人认为杰克逊越权行事，另一部分人则为其行为辩护。但最后，他的野心带来了巨大回报。1819年，美国拿下了佛罗里达和770多英里的墨西哥湾海岸线，并以偿还美国居民对西班牙政府的未偿债务的名义支付了价款。

公众的谴责如果说对杰克逊有什么影响，那也只是更加坚定了他的意志。他让战争部长约翰·卡尔霍恩把枪和人给他，他要一并拿下古巴。美国人已经越发相信墨西哥湾是自己的，所以除掉占着海湾出入口的西班牙人的提议使人难以拒绝。在蒙蒂塞洛（Monticello）[\[10\]](#)注视着这一切的杰斐逊写信给门罗总统，说控制了古巴“就控制了墨西哥湾”，并且“有助于开创良好的政治格局”。[\[11\]](#)

门罗顶住了诱惑，放过了古巴，但杰斐逊很肯定另一片海湾土地注定会被美国收入囊中。“得克萨斯，”他告诉门罗，会成为“我们联邦的最富有的一个州，没有例外”。不久，墨西哥脱离了西班牙，取得独立，得克萨斯被纳入墨西哥。获得自由的墨西哥之后犯下了西班牙犯过的错误，那就是邀请美国人定居得克萨斯。此时杰斐逊已经离世十年，但没人会讶异，从诞生了独立宣言的国家出来的人们将会为独立而战。接下来，得克萨斯人创立了第二个孤星共和国。他们的主权维持了九年之后，在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和他的继任

人J. K. 波尔克（James K. Polk）的策划下，得克萨斯国会通过了并入美国的提案 于是在1845年，美国又获得了367英里的墨西哥湾海岸。
[\[12\]](#).

对有些人来说，这还不够。这些人无非就是南方的种植园主，牢牢守着颇具争议的奴工体系，对古巴虎视眈眈。对国会来说，这符合它原有的奴隶制度，是其权力向群岛的延伸。波尔克，这位来自田纳西的杰克逊门徒，向西班牙慷慨出价100万美金要买下古巴岛。也许这位总统也曾让教皇放弃梵蒂冈吧。有利可图、忠心耿耿、具有象征意义、地理位置优越的古巴，一直是神圣之所在。西班牙回复说宁愿要“将它沉入大海”也不会卖给美国人。[\[13\]](#)

美国众议院的南方州议员坐不住了。这番回绝不仅侮辱人，也潜在地让南部要扩大其政治影响力的美梦破灭。南部议员们未加犹豫，修改了前路易斯安那参议员皮埃尔·索尔（Pierre Soulé）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时撰写的报告，著名的奥斯坦德宣言就此产生。这份2500字文件的要义是：因西班牙对总统发出的友好而可敬的要约做出了有辱神灵的回绝，美国从西班牙手里“武力夺取”古巴是“正义的”。
[\[14\]](#).

1854年的秋天，国会内部的热忱友好在西进运动的压力下正慢慢减弱，他们在奴隶制问题上相持不下。南方人希望在西部建立新的奴隶州，而北方人只想要自由的制度。阶层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堪萨斯内战（Bloody Kansas）爆发，美国人互相残杀。民族骄傲因此受损。在远离动荡的西部的古巴和墨西哥湾，南方白人看到了推行他们的劳动/种姓制度的另一个可能之地。佛罗里达议员、海湾沿岸的种植园主大卫·尤利·莱维称墨西哥湾是一个“可供扩张的盆地”。然后，南方阶层可能会往南，甚至跨过古巴到委内瑞拉，也许一直到巴西（内战后，的确有很多美国南方的奴隶主最后到了那里），通过那里大量的

奴隶劳力，建立一个商业帝国，然后如《里士满调查报》说的，“控制全世界的力量”。^[15]

以上这些都没有发生。但内战结束后，美国开始绘制墨西哥湾北部新的海岸线，这就像在大海上盖上美国所有的印戳一样。那便是美国海岸勘测局的工作。

它最近的几位前任——英国地理学者哈钦斯、高尔德、罗曼斯——绘制了不错的地图。启蒙运动在科学领域掀起高潮，作为支持者，他们证明了自然世界的真相是可以通过有素训练而观察到的。他们到旷野、林地、沼泽中去，带上了数目可观的专业工具：测量链、转镜经纬仪、象限仪、反射望远镜、平板仪、经纬仪、镀金或镀铜的指向仪。他们所缺乏的是计算经度，也就是东西定位的能力。

航海和制图业的一项革命性发展是英国一位佩戴假发的钟表匠约翰·哈里森带来的，他完善了精密计时表。在乔治·高尔德前往彭萨科拉的那一年，哈里森登上“鞑靼号”，在行经巴巴多斯^[16]时，他设计出了能精准得出相对于天体的已知位置时间的工具，从而能够得到所在地在经线上的位置。对于高尔德、哈钦斯、罗曼斯来说，不幸的是，在英国20年殖民统治结束后，这种精密计时表才在墨西哥湾上被广泛应用。

由于时间宽裕，技术也有了突破，海岸勘测局能够在原来的英国地图上补充线条，海难发生的惊人次数得以减少。亚历山大·贝奇在1843年谋得了勘测局负责人的职位，此后勘测局成为联邦一大政府机构和全美极为重要的科学组织。贝奇曾是美军工程师、自然科学教授、国家科学院的第一位院长，同时也是“红标右侧进港”（Red, Right, Returning）（至今仍在沿用的一套航道标志放置标准）的创立人。这位蓄着长髯的勘测局负责人跟随了曾祖父本杰明·富兰克林

在航海事业上的追求，一直监督着墨西哥湾流海图的绘制过程，以求精准。

和富兰克林一样，贝奇对科学精确有严苛的要求，这也成为他对手下测量员的要求：要精通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数学、光学和测地学。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升起和控制风帆，如何迎风航行，如何改变帆向，而且，由于他们的船舶是混合动力，就必须知道怎么操作锅炉，怎么拧开螺丝钉修理。贝奇的“助理”——这是他们职级中的一个正式职位——是其中毋庸置疑的佼佼者。他就是写信给约瑟夫·史密斯·哈里斯，并称赞其在法拉格特的新奥尔良一役中表现出色的那位华盛顿长官。

哈里斯在偏僻的宾夕法尼亚州出生、长大，看起来并不适合海岸测绘一职。事实并非如此。他有九个兄弟姐妹，他和他的哥哥史蒂芬，毕业于同一所以理数见长的高中，贝奇就曾担任过这所高中的校长。海岸勘测的职责是给那些为户外而生的人准备的，正如这两兄弟。1854年，当时只有18岁的约瑟夫就已经装扮整齐，做好了要跟随哥哥史蒂芬加入勘测局的准备。他在帕斯卡古拉（Pascagoula）待了几乎有一年，其中六个星期因感染伤寒卧床休养，然后就接到了去西北勘定北纬49度线^[17]的任务。他在1862年2月回到墨西哥湾，在从华盛顿出发，驾驶着联邦“昂卡斯号”（USS Uncas）沿波拖马可河（Potomac River）而下时，他目睹了北军“监视者号”和南军“弗吉尼亚号”（即联邦的“梅里麦克号”）间的汉普顿海战^[18]。两个月后，他自己也将在密西西比闪躲炮火。26岁的约瑟夫·哈里斯身材苗条，身手敏捷，爬得了桅杆绳梯，勘得定海岸。

尽管海岸勘测局资金宽裕、人才济济、设备先进，无常的墨西哥湾海岸没有轻易向海图和地图测绘投降。“多处海岸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困难，”斐迪南·格迪斯，哈里斯的顶头上司，在给贝奇的汇报中

如此写道，“勘测进行得越深入，困难便越大。”格迪斯从1848年开始就是墨西哥湾的首席测量员。在19世纪50年代，他领导着勘测局最大的勘测项目，将重心放在了海运和商业渔业活动频繁的地方：基韦斯特，墨西哥湾上海岸，以及新并吞的得克萨斯州。[\[19\]](#)

墨西哥湾颇有异域风味，但不是讨人喜欢的那种。打头阵的是海湾上的夏天——这个“有害健康的季节”。蚊子，以及被当地人称为“不见影”的微米级别的蠓虫，它们毫无怜悯之心。据格迪斯手下的一个助理说，它们的命运“无法用语言表达”。蠓虫是纯粹的惹人厌，蚊子就不是惹人厌这么简单了；盐沼地、淡水湿地、森林里潮湿的地面都是它们的产卵地。其产下的卵可以在严寒气温下存活，即使天干物燥，它们也能躲藏数月，直到有了水汽它们才孵化蜕变为空中杀手。这些小小的身躯——虽然不总是、不全是，但也常常、多数——携带着可怕的病菌，令每一个测量员忧心忡忡。疟疾和黄热病已经在海岸肆虐了数个世纪，并且此后仍将持续半个世纪。其中数新奥尔良所遭受的创伤最为惨重，在1853年的大灾中其病死的人数以千计。[\[20\]](#)

那一年的天气状况也不好——至少不利于海岸测绘。那年5月，贝奇记录道，得克萨斯州近海处“突然遭遇强烈的飓风，营地被摧毁，测绘工作难以为继”。风暴的到来是随时随地的，此前毫无征兆，它一来，测绘队员们就要仓促逃往高地。身处得克萨斯州的助理詹姆斯·威廉姆斯在他给贝奇的报告中记录了他的沮丧心情：“风暴多发的冬季，短促的暮色，炎热无云的夏天；频繁到几乎已成常态的狂风；雾蒙蒙的空气——都令工作举步维艰。”[\[21\]](#)

也许威廉姆斯实在是个爱抱怨的人，但他说的不无道理。频繁的风暴拖慢了工作进度。墨西哥湾的多处海岸线难以辨认，沼泽地和红树林的存在模糊了土地和海水的分界线。沉下地面的花岗岩地界碑随

着时间的流逝有时会消失，那是因为它标记的那块土地消失了。岛屿有规律地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河口时而淤积时而畅通，海岸也在侵蚀和堆积的两端来回变动。

尽管如此，地理也有它稳定不变的一面。此次勘测向美国展现的不仅是海岸线，还有关于这块土地珍贵的物理描述——它的等高线和上面的植被。哈里斯发现在诸多地理信息中，绿色植被——最明显的就是树木——是极富传达力的。它们的种类很少，但数目众多。一些古树对海岸线的迁移并不敏感。最多的是榲栲树（live oak），醒目地分布在被哈里斯用测链量过的44英里密西西比海岸线上。它们组成了海岸硬木林，被美国海军砍来做炮艇的木质骨架。虽然在海岸树种中，榲栲树并不是最多产的一种，但它们是常青的地标，屹立此处数百年，见证着历史。毋庸置疑，哈里斯遇见的榲栲树在德索托、德纳尔瓦埃斯的时代就已经存在，甚至要早于贝冢建造者们的时代。

榲栲树是这里最富有诗意的树。它们“枝繁叶茂”，“令人愉悦”，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这么写道，它们向四周延伸开去的树丫能比主干还长，上面栖息着鸟禽、松鼠，还生长着松萝凤梨^[22]。松萝凤梨是一种形态纤细、垂悬生长的附生植物，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和它附生的大树一样是这一区域的标志性植物。榲栲树被成排种植在大街小巷上，绿树成荫，别有风味。它们是常青树，在冬天会有短暂的落叶，秋天里，榲栲树的橡子像雨点一样落下，喂饱了松鼠、浣熊、鹿、熊、鸭子、火鸡和松鸡，橡实也是当地人食用油的来源之一。榲栲树的分布范围从得克萨斯南方海岸一直延伸到佛罗里达角，生长在硬木群落和内陆稍高的飞地上，这些飞地土壤含有较多的泥煤，其中就有榲栲树落叶的功劳。比起大多数的沿海林木，榲栲树对来自入侵盐水的污染更为敏感，但靠着深入地底的根系，它们在暴风雨中是最为坚挺的。^[23]

在得克萨斯州，针对美国多变的海岸线，海岸勘测局的助理威廉姆斯首先绘制出了准确且详细的海图。他还记录下旱地的特征。这些旱地被裹挟在数不清的看上去都差不多的沼泽湿地里，四周是海湾、潟湖，还有延伸至宽广内陆的草原。得克萨斯海岸多是大风天气。在罕见的无风天里，风出现在海旁的倾斜面上，在厌恶盐分的槲树里，在豆科灌木丛中，在林冠下。它们有的死死抵抗但还是被压制住了，有的则顺从地弯下身躯，随风摆动，没有还能站得笔直的。虽然沿海树木的树冠又绿又开阔，但整体依然矮小。天空很大，就像沙漠一样，使平坦地面上的所有事物都显得渺小荒凉。这种整齐划一中间或会出现成片的槲树，槲树旁边有时又可见菜棕的身影。菜棕既可以独处，也不介意有邻居，它们欢迎任何其他树种群落前来做伴，有时能在其他种类的树木根系间找到一小片自己的立足地，变成了双物种的关系——棕榈和槲树，棕榈和松树，或者棕榈和木兰。没有什么树能像菜棕一样容忍墨西哥湾时冷时热、时干时湿、时咸时淡的环境。

就像它们毫无困难地扎根得克萨斯的草原海岸一样，棕榈也生长在路易斯安那海岸，出现在被测量员认定为是咸水和盐沼的几乎每一寸土地上，成为陆地和海洋的一部分。密西西比在1817年被国会从西佛罗里达中划离，独立为州，测量员们发现这里的土地坚实，沿着这个州不长的滨水区有一片温和的沙质高地。生长在海滨边缘的多是松树，松树中又以长叶松林为主；它在南方松树林中居统治地位，间或也有其他种类的松（沙松、湿地松、云杉和火炬松）。与它们共处的，还有虽不占多数但也颇具规模且能在沙质的酸性或碱性土壤中存活的树种（木兰、柏树和槲树），对于融入环境，它们各有办法。木兰只能生长在干燥土壤中，它们开白花，花香浓郁，叶子呈龟壳状。而柏树，稳稳地扎根在沼泽地里，树干多凹槽，根系向上生长，被称为“根膝”。上方，柏树的短枝上也常和槲树一样密密地悬附着松萝凤梨。

亚拉巴马领地在1819年被划立为州，划走了西佛罗里达50英里的海岸线；在靠近亚拉巴马州境线处，测量员们又一次摸爬滚打在湿地里。亚拉巴马州的大部分边缘，尤其是莫比尔湾和毗连的长沼沿岸，都是连绵的沼泽。以松树为主的树林在这里延续，它从亚拉巴马一直延伸进入佛罗里达。长长的海滩一路贯穿佛罗里达狭长地带，成为被夹在海湾和林地之间的一道白色线条。藏在像驼峰似的沙丘后面的，是40英尺高的灌木丛林地，那是一片宽广的低矮锯棕榈和数目更多的松树，这些郁郁葱葱的密林将面临大范围的砍伐开发，以黑人为主的劳工将它们砍下，造成木材、松节油，最后变成纸浆。

在更远的东边，亚拉巴马州南部从佛罗里达狭长地带到半岛一带，在大弯曲的沿岸，海滩在这里暂时消失，演变为沿海沼泽，就像路易斯安那州的一样。这里的海水很浅，沿着大陆架缓缓上升到海岸线，不卷起一点浪花。科学家们称之为低能量海岸。这里的洋流太过柔和，以至于带不动太多泥沙，无法形成沙滩或沙丘，所以在和煦天气里，海水也只是轻拍在长满草的海岸上。

再往更南边去，沙子又开始闪耀起来，虽然堆起的沙丘不如佛州狭长地带上的那么多、那么高；这次红树林成为内海岸的主角。一位测绘副官称红树林给他们造成了“极难克服的困难”。它们可以延续数英里，形成密不透风的海边密林，蚊、蠓滋生，令人苦不堪言。在19世纪50年代，墨西哥湾北部冬天的平均气温比南佛罗里达要低十多度。坦帕以南的海岸就进入了亚热带，在那里，如罗曼斯所说，不见“冬天的踪影”。热带植物——椰树、桃花心木、裂榄、兰花——在这里出现了，但不包括坦帕以北或者在墨西哥以外的海岸。[\[24\]](#)

这次勘测将佛罗里达半岛严谨而精确地绘制了出来，它看起来不会再像个短短粗粗的钟乳石了。测绘员们绕着佛罗里达礁岛群航行，佛罗里达礁岛群由珊瑚礁构成，岛群从半岛西南端向西探入佛罗里达

海峡，看起来像被洋流拉扯过、打了绳结的绳索，当然，这里的洋流是朝另一个方向去的。绳上的最后一个结是无人居住的干龟群岛（Dry Tortugas），这里也是三个世纪前庞塞·德莱昂发现那些海龟的地方，离基韦斯特有72英里，和半岛的最西端在同一条经线上。对于那些在大西洋一侧的群岛，测绘员们要沿大佛罗里达礁（the Great Florida Reef）小心翼翼地行驶，这个礁岛海岸线长170英里，是美国境内唯一的活珊瑚大堡礁。

哈里斯在1864年墨西哥湾勘测项目结束前，就离开了美国海岸勘测局，转而在一家铁路公司工作，再后来就成为雷丁铁路公司的主席。勘测工作在下一个世纪依然在继续，他们将海湾合理分解成小块，以便认识它、开化它。这就是在海图和地图上画下线条、标出准确数据的意义。估计陆地和海水的位置，这项工作从西班牙人起就开始做了，这只是他们拒绝接受它的原始形态并对其进行改造的第一步。自然风光并没有被多看几眼。在征服者、制图师、工程师和美国移民的眼中，所谓美，不是原始和荒芜，而是规矩和制度。

如果杰斐逊的西部是这个国家昭昭天命中的那片土地，那么墨西哥湾就是其中那片海。我们能轻易推论，奴隶是推动这个国家南进（这个方向被多数史学家遗忘）的主要力量，但也别忘了大自然是引燃昭昭天命论^[25]这个美国终将主宰北美大陆的信念，并使它燃烧起来的那根导火线。在这个语境下的大自然指的是商品化的大自然：基于商业利益和政府认为的为国家和经济安全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怀着美利坚帝国梦的人们梦想着农业、矿业、木业，以及毛皮贸易——如果它还能持续的话——都能得到发展。但如果没有土地这个地理学家D.W. 梅尼格（Donald W. Meinig）口中“伟大而振奋人心的美国特色”，这些都不可能发生。土地是这片大陆的主要商品，这个商品造就了传说中的美国 开拓者，保证了传说中的美国人的个体自由。^[26]

墨西哥湾海岸有陆地，是的。但它提供的另一种形式的丰盛，从某种程度来讲比土壤给予的要更好。如果说，山峰和山谷让开拓者们看到了无际的农田、牧场、林地，那么海浪和波峰就让海湾的渔民们看到了无尽的海洋生命。有人曾看见，鲐鱼在水面翻滚跳动，就像“远处的闪电”在“日夜”闪烁；还有其他种类如鲭鱼，它们时常游过船底，像点亮了大海的银色河流，水里的鲨鱼和海豚追击它们，天上飞过的足以遮天蔽日的鸟群也盯着它们。天上有多少飞鸟，海里就会有比那更多的鱼。墨西哥湾的鱼群格外地丰饶。“最难以置信的故事，”诗人西德尼·拉尼尔（Sidney Lanier）在1875年如此写到墨西哥湾，“是关于鱼群的，它们如此之多以至于挡住了船舰的去路。”
[\[27\]](#).

渔民们，无论男女，都成为美国湾的拓荒者，他们热切而坚定地憧憬着未来的无限机会。渔村就是边疆城镇，和传奇的西部简陋城镇没有两样。在杰斐逊的愿景中，自由的国家和自由的人民要靠领土扩张来完成，而这里就和西部一样，有同样开阔的天地，承载着同等分量的人们对未来的寄托。如果说土地臣服于斧头和耕犁，那么鱼群则臣服于渔网和绳缆。一头牛，一只船，都是自给自足的手段。但是，不同于宅地的格栅和围栏，它们最终会将土地圈起变成牧场和田地，多数的海湾始终保持开阔的水域；而且不同于西部，其土地总是有限的，海湾的自然资源是源源不断的。渔民不用为雨水不足而忧虑，也不会为担心失败而困扰。海湾就是这样，大方得要命。

[\[1\]](#) US Coast Survey,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Coast Survey, Showing the Progress of the Survey during the Year 1862*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64), 92.

[\[2\]](#) Anne P. Streeter, *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Joseph S. Harris and the U. S. Northwest Boundary Survey, 1857-61* (Trafford, 2012), 428.

[3] US Coast Survey,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262.

[4] Robert W. Tucker and David C. Hendrickson, *Empire of Liberty: The 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9.

[5] Robert W. Tucker and David C. Hendrickson, *Empire of Liberty: The 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9.

[6] T. D. Allman, *Finding Florida: The True History of the Sunshine Stat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13), 65.

[7] 孤星共和国是得克萨斯共和国的别称，因1836年自墨西哥独立后，被夹在美墨之间，实力弱小，因而别称“孤星共和国”。——译注

[8] Roger G. Kennedy, *Mr. Jefferson's Lost Cause: Land, Farmers, Slavery, and the Louisiana Purcha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03.

[9] 安德鲁·杰克逊的强硬性格被军队中的士兵比作又坚又硬的老核桃，所以便给他起了个“老胡桃木” (Old Hickory) 的绰号。——译注

[10] 指蒙蒂塞洛庄园，位于弗吉尼亚州中西部，是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住所。——译注

[11]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October 24, 1823, in Thomas Jefferson, *The Wisdom of Thomas Jefferson*, ed. Kees De Mooy (Citadel Press, 2003), 106.

[12]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May 14, 1820, in Thomas Jefferson, *The Work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 12, ed. Paul L. Ford (G. P. Putnam's Sons, 1904), 160.

[13] G. J. A. O' Toole, *The Spanish War: An American Epic—1898* (Norton, 1984), 38.

[14] “The Ostend Manifesto” (Aix-la-Chapelle, October 15, 1854), historyofcuba.com,

<http://www.historyofcuba.com/history/havana/Ostend2.htm>, accessed summer 2014.

[15] 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76.

[16] 巴巴多斯 (Barbados), 位于东加勒比海。——译注

[17] 北纬49度是美国与加拿大在西半部边境的划定依据, 也就是呈现在地图上的美国西北部那一段直线。——译注

[18] 汉普顿海战, 或译汉普顿锚地海战 (Battle of Hampton Roads), 是1862年即南北战争期间, 在大西洋沿岸汉普顿停泊场发生的一场海战, 是装甲舰艇之间的首次作战, 代表北军的是“监视者号” (USS Monitor) 装甲舰, 南部邦联军用的是“弗吉尼亚号” (CSS Virginia), 即改装后的原“梅里麦克号” (USS Merrimack)。——译注

[19] US Coast Survey,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92.

[20] US Coast Survey,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90.

[21] US Coast Survey,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79.

[22] 又叫松萝铁兰、老人须, 因形似西班牙征服者的大胡子, 它在英语中被称为西班牙苔藓 (Spanish moss)。——译注

[23] Walt Whitman, “I Saw in Louisiana a Live-Oak Growing,” in *Leaves of Grass* (Modern Library, 1892), 101.

[24] US Coast Survey,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175; Bernard Romans, *A Concise Natural History of East and West Florida*, ed. Kathryn E. Holland Braund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9), 262.

[25] 昭昭天命论 (Manifest Destiny), 又译天命论、命定扩张论等, 是19世纪美国民主党人所持的一种信念, 他们认为美国被赋予了向西扩张至横跨北美洲大陆的天命。Manifest Destiny, 这在当时是一句上口的政治口号, 现在已是标准的历史名词。——译注

[26] D.W.Meinig, *The Shaping of America: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on 500 Years of History*, vol.1, 1492-180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410.

[27] Michelle Honora Zacks, “From Table to Trash: The Rise and Fall of Mullet Fishing in Southwest Florid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 2012) , xix; Sidney Lanier, *Florida: Its Scenery, Climate, and History, with an Account of Charleston, Savannah, Augusta, and Aiken; a Chapter for Consumptives; Various Papers on Fruit-Culture; and Complete Hand-book and Guide* (J.B.Lippincott, 1876) , 94.

六 鱼的海洋



密西西比海岸的商业渔民们正驾驶着渔用帆船收工返航。

这海里的牡蛎、鱼、海鸟、贝壳、海龟，似乎总是源源不断。

——西德尼·拉尼尔（Sidney Lanier）（1876）[\[1\]](#)

史学家们还没有串联起墨西哥湾上由来已久的商业捕鱼史。如果他们有，那他们应该谈起古巴人、印第安人、新英格兰人；谈起虾、鲷鱼、牡蛎和红鲷鱼；应该确定墨西哥湾实际已经成为美国海。经过研究，他们会发现一座特别的墓碑，那是白色大理石砌的方尖碑，上面沾染着一层黑色霉菌，依稀可见碑上凿刻的生卒年份，1813～1881。

这是莱昂纳德·德斯坦（Leonard Destin）在这片土地和大海上生活过的岁月；在这68个年头里，他从康涅狄格的新伦敦一路到了佛罗里达的伊斯特峡湾（East Pass）。他只有一幅画像被保留了下来——可能是他40岁时留下的——一幅用软性炭笔画的上半身画像。或许他内心仍是十足的新英格兰人，但他在墨西哥湾海岸上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他看起来整洁、拘谨，穿着纯黑的西装外套和马甲，白色

衬衫领子上系着一个简单的领结。他的头发从前额倾斜而下，像帘子似的盖住了耳朵。他的脸型窄长，不蓄胡子，脸上的神情表现出的严峻恰如其人。他适合去训诫有罪之人，或者讲述饮酒的罪恶。但德斯坦并没有坐上布道坛，而是站在了一艘捕鱼船的船舵前。他死后的20年，伊斯特峡湾小小的刷了白墙的邮局为了纪念他，以及他创立的这个繁荣的渔村，将这里命名为“德斯坦”。

莱昂纳德·德斯坦在1835年来到墨西哥湾。得克萨斯当时还是独立的共和国；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是美国的州；佛罗里达是领地，十年后才成立了州。印第安人还生活在这里，虽然人数已经不如从前，但白人还很少见。从海路来到国境边的海岸上，就像翻山越岭去往西部大地一样，总有些危险。

22岁的德斯坦从新伦敦出发，带了一小队人，开的是家里的渔用帆船，这艘纵帆船有双桅杆，从船头到船尾可能有80英尺长。他的父亲乔治和哥哥威廉姆斯在另一艘船上。《新英格兰杂志》曾经在19世纪——航海时代的末期——发表评论说：“要说行驶安全、造型优雅，没有什么比得过装点整齐、大胆向海而行的渔用帆船了。”德斯坦出发时正当9月，风暴还未减弱，并不是大胆向南方海域进发的最佳时机，甚至都不是登上纵帆船的时候。他们计划在秋冬两季捕鱼，将它们拿到基韦斯特和哈瓦那的市场上贩卖，然后沿着佛罗里达礁岛群打捞那些在珊瑚礁上失事沉没的货物——这是常有的事。^[2]

他们航行至卡纳维拉尔角附近时，两艘船被大雾阻隔了。接下来驶近群岛时，情况变得更糟。一场飓风从大西洋席卷而来，将来自新伦敦的两艘船狠狠地甩在了暗礁上，他们靠打捞沉船发财的计划不成，反而成为失事船只中的一员。除了一个船舱服务生，他父亲船上的其他人都不见了。船是被海水冲上岸的，塞米诺尔族土著将这个男孩从已粉碎得不成样的船里救了出来。德斯坦那艘船上的整队人都沉

入了大海。他活了下来，从汹涌的海浪中挣扎逃上了一个荒岛。虽然大海不缺食物，但孤岛上没有淡水来源。三个月以来，口渴和暴晒在考验他不断消失的运气，直到一队渔民发现了她。

几年后，德斯坦独自完成了他家族的未尽之旅，他最后来到一个叫伊斯特峡湾的小湾，在其最东端的圣罗莎岛（Santa Rosa Island）上安全登陆了。这位来自康涅狄格的渔民，最终还是保持了他“东部人”的身份。

如果德斯坦曾为自己的幸存感到过愧疚，那多半是因眼前的美景而生。他将会在这片土地的岬角上盖一座装有护墙板的房子，成为七个孩子的父亲，建立起一支船队（包括一艘30吨重，名叫“一点不在乎”的纵帆船），开展起商业捕鱼，因被指控是联邦间谍而进了邦联政府的监狱，最后悄然离世。他眼前的这片土地，现在尽是沙子和长满草的沙丘。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大主色调：环绕的蓝色天空，无瑕的白沙滩，以及海湾明亮如绿宝石、剔透如水晶的水。这样的海湾颜色，是白沙滩一路延伸入海底，阳光从干净的海底反射上来，途中经过了细密海藻和层层叠叠数不清的各种微生物的结果。

在连接查克托哈奇湾的入口附近，水底满是水草，混杂着牡蛎床，很多有机物被从内陆冲刷下来，水因此有些发浑。水底生机盎然，有虾，有蟹，还有一种稀奇的时常跳跃的鱼叫鲱鱼。在进入海湾12英里处，德斯坦和来自亚拉巴马、密西西比的其他渔民发现那里有个100英寻^[3]的弯曲面，也就是说，海水在这里陡然加深了600英尺，在这里能找到石斑鱼、鲭鱼和鲷鱼。再往半岛方向前进200英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海绵栖息地。以海绵为食的是海龟，它们乘着看不见的洋流在海湾各个角落自由来去。每一个角落都活力纷呈。

生物学家们说墨西哥湾的鱼类生物量密度和种群多样性是全球最高的。抛开这些科学的说法，早年间一位诗人也曾有过相似的结论。

20世纪30年代，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简洁明了地称墨西哥湾是“鱼的海洋”。60年前，西德尼·拉尼尔到访这里时，他就像个作词人一样把海洋生命都数了一遍：“这里有：黑鲸鱼、白鲑鱼、黄鲷、蓝鲷、银鲤、石斑鱼、棘鬣鱼、梭鱼、鳟鱼、河鲈鱼、鳗鱼、鲱鱼、鲱鱼、比目鱼、颌针鱼、羊鲷、鲈鱼、石鲈、黄狮鱼、大海鲈、无鳔石首鱼、鲳鲆、圆鲆、扁鲨、红鲷、鼓鱼、牙鳕、鲟鱼、乔氏笛鲷、鳐鱼，没人知道还有多少其他的。”拉尼尔的同时代人，但与其性情截然相反的爱德华·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科学家，有商人特有的严肃正经，他写道，从佛罗里达到得克萨斯的海岸，“这里有大量的牡蛎、鱼和休闲活动，如果面向这个市场开展事业的话应该会非常成功”。一个世纪前，当那位笨拙的英国测绘员伯纳德·罗曼斯来到墨西哥湾，船只搁浅在这里时，他可能也被吸引了。“海鱼，”他写道，“数量太惊人，实在超出了想象。”^[4]

在德斯坦那个时代，墨西哥湾被看作世界海鲜供应市场的奇迹。勤勉的新英格兰人将贸易带动了起来，也正是他们中许多人的祖辈在北方海域开创了商业性捕鱼的先河。他们中有些人只在冬天南下到这里，为一个季度的收获而来，也有人是永远移民到这里的。他们钓鱼类和海龟，也开始捕捞和采集螃蟹、牡蛎、海绵和虾，然后将存货拿去新奥尔良和哈瓦那卖，或者运回新英格兰。商业性捕鱼是墨西哥湾第一个真正重要的产业。美国人民不是发起人，但当他们断言墨西哥湾不再是西班牙海，而是美国海时，他们抓住了机会。

伯纳德·罗曼斯曾希望英国能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海湾发展商业性捕鱼的潜力，他写道，“需要且值得认真考量”。这样的考量没有发生。英国殖民者（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也不例外）的餐桌上主要是牛肉、猪肉和当地种植的蔬菜、稻米和采集来的坚果——鲜有鱼类。欧洲人忙于榨取土地，而非海洋。官员和领导早期探险与殖民的探险家们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土地是他们能理解的东西，虽然他们并不会

弄脏自己的手，但他们知道土地能够以及将会带来什么，所以他们坚持自己所熟悉的，并指挥他人耕耘、采摘。那些拖着海上的收成回来，身上脏兮兮还带着鱼腥的老水手，他们在帝国发展大计上并没有发言权，但不代表他们没有在其中做出贡献。[\[5\]](#)

罗曼斯在海湾测绘时，遇到了临时搭建的捕鱼营地，当时他就看到了一个潜在兴起的行业。“整个东佛罗里达的西海岸，”他注意到，“全是渔民们的临时营房和架台。”临时营房实际是房子大小的建筑，木质框架，表面覆盖着蓬松的灰褐色棕榈茅草，从某种奇怪的角度看，像是很久以前漫步湾区的长满毛的猛犸象，但不像猛犸象那般坚固。它们向一边倾斜、松垂，看起来一阵微风就能把它们刮倒。供睡觉的吊床里里外外地悬挂着。坑里烧起的火，用来做饭和驱赶蚊虫，它们被严格地与棕榈茅草隔离开来。架台是手工搭建的支架，用来将鱼晾晒在太阳底下，然后用盐腌后保存，这样能保证鱼在运抵市场的路上不坏掉。营地的主人们就像工作台前勤勤恳恳的工匠，不断地清洗、腌制、晾晒他们捕获到的和卖掉的东西。罗曼斯看到的训练有素的渔民不是英国人，而是古巴人，即西班牙领地下旧世界和新世界的融合。[\[6\]](#)

哈瓦那对新鲜的、被干燥和腌制过的捕获物的需求源源不断。后者翻越了丛山被运送到种植园给印第安和非洲奴工当食物。古巴海域一度可以满足需求，但随着其重要性的提高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古巴岛就越来越指望卡卢萨人的供应了，卡卢萨人会将串联的木筏满载货物，穿过佛罗里达海峡来做交易。除了鱼以外，西印度的海豹和海牛有丰富的脂肪，土著人从中提炼出油，用来与西班牙人交换其他商品，西班牙人需要这油脂来涂抹在船底。有时卡卢萨人还供应一种美味，那就是乌鱼子，欧洲人认为其可与鲑鱼子酱媲美。而土著人的返航船上则装满了咖啡、烟叶、糖、衣服和酒。显然，在古巴人看来，卡卢萨人所在的佛罗里达是个资源丰富的好地方。西班牙渔民声称那

片海是他们的，他们往北边的海域挺进，想着能满载而归。刚开始，他们拿着鱼钩渔线一番摸索，但一无所获；然后转而用卡卢萨人的方法用草捻的绳织网，学习如何在近岸的海里撒网。最后，经验丰富的西班牙渔民带来了棉织的渔网。

“古巴渔民将佛罗里达海域，”民俗和鱼类学者米歇尔·扎克写道，“当作自家后院的食物储藏室，它离得近也不费事。”很快，沿岸就开始涌现很多为秋冬渔猎而扎起的营地。他们在春天补充保存肉类用的盐，夏天则闭门而坐，躲开飓风。营地最后扎进了英国人的佛罗里达领地里，已经成为出了名的渔牧场（fish rancho）了。罗曼斯敦促英国政府效仿，他计算道，一季两次，古巴渔民每次为哈瓦那带去“1000吨重的风干腌制鱼”。[\[7\]](#)

开始时，罗曼斯的长官对此未加理会。罗曼斯立马批评他们“如果不是愚蠢，那也是懒散怠慢”，让古巴人“带着这些殖民地上的丰富水产离开”。他说，古巴人将从海湾捕来的鲷鲈鱼放到古巴市场上出售，比英国渔民在纽芬兰市场里卖的任何东西价格都高。迫于压力，自满的英国当局决定让古巴人离开，但也没有将渔业机会开放给自己人。这些渔牧场循例使用的是印第安劳工。在早年间，他们中很多人无疑是正在走向消亡的卡卢萨人的后裔。后来，迫于卡罗来纳剧增的英国移民数量，当地的克里克人和雅玛西人（Yamasee）只能向南撤。当时，新英格兰那边，美国激进分子正磨刀霍霍，准备为民族独立而战，佛罗里达的殖民者害怕渔牧场里的印第安人会和美国人站在一边，就像西班牙一样。因此，反独立的佛罗里达殖民政府驱逐了古巴人，关停了渔牧场。[\[8\]](#)

但这些渔民前脚刚走，后脚又回来了。美国获得独立，在其与西班牙签署的和约中承诺归还东西佛罗里达。19世纪第二个十年，在派恩岛南湾和坦帕北湾之间，虽然移民稀少，但有至少六个渔牧场恢复

经营，这一点即使在佛罗里达被并入美国领土后也没有改变。1831年，一位税务官员从基韦斯特启航，照例去各处收税，他发现在派恩岛湾一带有四个渔牧场、200个劳工，他还受邀享用了他们的古巴面包、咖啡和雪茄。

一位记者，约翰·李·威廉姆斯（John Lee Williams），在撰写一本关于美国南部最新领地的书时，遇见了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吸引他注意的是一位名叫何塞·马里耶·卡尔德兹的老前辈。卡尔德兹已有90岁，长得“结实，健康，是一位西裔白发老人，非常勤劳”，他已经在坦帕湾和派恩岛湾经营了30年的渔牧场。他把自家房子建在派恩岛湾上的一个岛上，他叫它何塞法（Joseffa）岛。岛是小岛，但由于被一道18英尺的山脊遮挡，卡尔德兹的渔牧场可以安全躲过暴风雨天气。按照西班牙人的习惯，他很多年前就以繁育和食用为目的养了猪。威廉姆斯到访的时候，猪崽子已经在岛上泛滥了。[\[9\]](#)

卡尔德兹手下超过一半的工人是印第安人，美国人不加区别地一律称其为塞米诺尔人。古巴男人和印第安女人间的通婚和同居已经像潮汐起落一样平常。美国边界上向来是也一直会是文化融合的大杂烩。税务官员对渔牧场的阶层流动并没有什么疑虑，只要渔牧场主人像现在这样缴足了税就可以。渔牧场的经营者们也对基韦斯特的经济发展贡献良多，他们在那里购买保存干燥鱼肉的盐。他们还将雪茄、菠萝、橙子等商品卖给布鲁克堡的士兵，布鲁克堡在坦帕湾的一个半封闭的岛上。

佛罗里达成为美国领土后，新英格兰人闻声而动。莱昂纳德·德斯坦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乘着小鱼船（smacks）出行，之所以叫“smack”这么个名字，是因为流动的海水拍击在船内活鱼舱的木板上发出的就是类似的声音。在特定季节里，卡尔德兹大概会看见30只上下康涅狄格来的渔用帆船从他的小岛旁经过。一开始，这两拨人相安

无事。古巴人擅长做风干的腌鱼，新英格兰人则做新鲜的。新英格兰人会将成堆的鱼，主要是石斑，卸在哈瓦那的码头上，然后在5月赶回家，在纽约和波士顿的集市上一直工作到11月。终于有一天，新英格兰人也开始尝试晒鱼干，与古巴人面对面地竞争起来。总有那么几个贸易保护主义分子会抱怨抢占市场的外来渔民。当矛盾正要升级的时候，其他迫在眉睫的问题打断了它。但不管如何，古巴人都是输家。

事情在1835年急转直下，也就是那一年德斯坦来到了墨西哥湾。哈瓦那突发霍乱，集市暂时关闭，与此同时关税征收的手伸进了渔牧场经营者们的口袋里，一场关税战争在美国和西班牙之间被迅速挑起。同一年的12月，佛罗里达的美国人和塞米诺尔人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渔牧场在双方交火中遭了殃。在军人看来，印第安人就是印第安人，而所有的印第安人，包括在渔牧场辛勤工作没有惹事的印第安人，都要被驱逐到西部去。另外，谣言传播开来，说古巴渔民在向战中的塞米诺尔人走私武器，尽管印第安人对几个渔牧场进行了扫荡。

同时，美国人害怕逃命的奴隶会在渔牧场的掩护下逃往古巴，因为在古巴只要他们改信天主教就可以换得自由，或者逃去巴哈马，那里在前一年废止了奴隶制。众多逃走的人都站在塞米诺尔人一边，足以说明这场战争既是奴隶的反抗也是印第安人的起义。1836年，也就是美国人暗中帮助得克萨斯脱离墨西哥的那一年，海军部部长下令墨西哥湾舰队荡清佛罗里达的古巴渔牧场。

到这时，古巴岛是墨西哥湾上唯一还存在的殖民地。海湾不再是西班牙海，也不再只是陆上商品的运货通道。新英格兰渔民将快速使它变成工业的海洋，而且是美国的海洋。海湾沿岸的多个位置扮演了新英格兰渔港的角色——而没有其他地方比彭萨科拉更合适。

英裔彭萨科拉人永远感激安德鲁·杰克逊在1817年第一次塞米诺尔战争中赶走了西班牙人。当地一份出版物对此大加赞赏，说正是将

军在彭萨科拉之役的胜利让这个国家“睁眼看到了美国的‘昭昭天命’”。这番话是带着家乡的自豪感而说的，但彭萨科拉有理由认为它在此间发挥了特殊作用。在较短的一段时间里，它是美国佛罗里达属地的两个首府之一，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共同分享这份荣誉（杰克逊任临时总督）。彭萨科拉的联邦政府坐落于一个海军船坞，还在海湾的障壁岛圣罗莎岛上建有一座堡垒，堡垒是让奴工用2500万块当地黏土烧制的砖头砌成。伐木业随后井喷式地发展起来，精选的长叶松木用于建筑业，榲木则用于造船（南方木材已经在联邦“宪法号”^[10]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1]

联邦军在内战期间占据了彭萨科拉，北方人在此地的影响力在重建时期^[12]和之后都一直存在。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的自然条件适宜停靠一只船队——不是西班牙和英国那样的海军舰队，而是渔船队。同样理想的是，这个海湾在一个100英寻深的弯曲地带中。许多守旧的当地南方人反感从北方来的趁南方局势不稳来捞一笔的掇包客，但这些该死的北方佬确实对海洋略知一二，他们在彭萨科拉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渔业，在墨西哥湾北部首屈一指。

安德鲁·富勒·沃伦（Andrew Fuller Warren）跟这也有点关系。他是另一个被墨西哥湾吸引来的新英格兰人，他的新英格兰人身份不容置疑。他父亲的祖辈们乘“阿拉贝拉号”来到美洲大陆，同行的还有约翰·温斯洛普^[13]；他母亲的祖辈们则乘“里昂号”来，同行的有罗杰·威廉斯^[14]。沃伦在罗得岛的布朗大学读书。他1863年入学，1871年也就是29岁时到了彭萨科拉，成为班级里唯一移居南部的人。他去佛罗里达前，当过波士顿一家银行的职员，也在一家大型的海运公司里工作过。海鱼、麻绳、沥青和焦油的气味，他最熟悉不过了，还有船靠岸时被摩擦得嘎吱响的系船索，哐啷响的短索，挥动的风帆，还有鱼仓屋顶盘旋欢呼的海鸥、码头上被敲打的桩木。彭萨科拉如一弯新月的海湾边上就是这样一幅场景，12个码头分列开去，

都是密密麻麻的桅杆和整齐地被收拢在帆桁上的风帆。这些船舶都登记在加拿大人、英国人、俄罗斯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名下。码头附近是一个挪威海员教堂。

科曼德西街码头的尽头是彭萨科拉冰块公司，它是这座城市第一家做这个行业的，创立人是一个康涅狄格人，叫S. C. 科布（Sewall C. Cobb）。他的办公地点就是两个鱼仓那么大，沃伦在他手下干活。沃伦在海运公司的工作经验让他多少知道些和冰有关的知识。在19世纪初，波士顿就开始把冰用于鲜肉储存和运输，那时的冰是从新英格兰冬天里结冰的湖泊河流上用长的带齿的手锯切割来的。然后这些冰被严严实实地封存在船舱里，周围塞满木屑来隔热，这样最远可以运到印度。这个收割机一样将瓦尔登湖的冰面锯成大块全球贸易商品的行为，让亨利·戴维·梭罗讥讽了一番：“这样说来，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还有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的闷热难耐的人们，是从我这口井里取水喝的。”严寒的新英格兰给南部送去了它的标志性饮料——冰茶。[\[15\]](#)

在使用冰之前，墨西哥湾的鱼，比如石斑鱼，它们来自低温深水，不喜欢结群而游，在运输途中就比较难在温暖拥挤的鱼舱里生存。如果游进了淡水海湾和淡水河，对它们来说就预示着死亡。另一位康涅狄格州人，赛拉斯·莱瑟姆（Silas Latham）船长，自称是第一个解决了这个问题的人。1868年春天，他在往南航行时，船上带了八吨冰，他为此支付了200美金，然后就从坦帕湾到莫比尔湾一路捕鱼。当他将捕来的鱼放到冰上时，码头上开始沸沸扬扬地传起了“疯狂的北方佬”的故事。很快，“疯狂”变成了“绝妙”。配备了密闭舱的冷藏船开始定期开往哈瓦那、基韦斯特、新奥尔良、莫比尔和彭萨科拉。渔船上装上了冰盒子，这样船长在叫卖货物时就可以加上“新鲜”二字，以示与风干腌制鱼的区别。然后，有冰袋包装的鱼就

从海产盛地新奥尔良和莫比尔被传送到江轮或火车上，然后被运到内陆餐馆和鱼贩子手里。[\[16\]](#)

科布的公司经营着一只渔船，并会在当季与港口里几艘康涅狄格的船签订协议。沃伦，他的同伴描述他“天生脑子快，适应能力强”，扩大了捕鱼这项经营活动，公司很快就将名字改为彭萨科拉冰块和海产公司，再然后就把“冰块”两个字去掉了。[\[17\]](#)

沃伦对自己在墨西哥湾的前途有信心，于是回到北方娶了来自缅因州巴斯的范妮·克拉克·斯特恩斯，巴斯是海岸上的一个捕鱼和造船港。他们在这个旧西班牙殖民城市定居下来，这里有他们熟悉的新英格兰式的渔村，在沃伦余下的46年岁月里，他们见证了这座城市迅速扩大了十倍，居民超过三万人。

在那些年里，国家铁路公司加入进来，不需要借助内陆深河，便将这座城市与更多的人、更多的市场连接了起来。彭萨科拉的美景还有路易斯维尔和那什维尔客运火车站（Louisville and Nashville Passenger Station），这是一个橙黄色砖楼，结合展示了草原学派[\[18\]](#)、西班牙布道院和意大利建筑风格。遥相呼应的建筑群矗立在城镇街道两侧，一直延伸到码头，它们中许多都仿着新奥尔良和莫比尔的建筑式样，有西班牙风格的阳台。

这个城市的业务和那些忙于业务的人，不管是工人还是业主，似乎都聚集在海湾边上。小渔船每天都将捕获物带到冷藏鱼仓里。那里有包装仓库、货仓、船库、供膳宿舍、澡堂、港务局长办公室和海关；有船务杂货间、造船间、制帆间；有锅炉、机器、修补配件、铁匠、舢板和咖啡馆；有三角起重机、沙砾和刨削机。大量被伐下的木材被日夜不停地运往港口，排队等待锯木机。轮船驶入，卸下压舱石——被搁置在水边，很快上面就爬满了黑蜘蛛一样的方蟹——来自墨西哥湾且经过铣削的木材被装上船，往大西洋彼岸出发。那里还有台

球厅、酒吧和妓院——太多了，用高尚的当地人的话来说，光顾得最勤的都是从货船和渔船下来的饥渴难耐的船员。他们常常在发薪日趾高气扬地走进来，然后身无分文地踉跄着出来，不过想来也是得到了满足的。[\[19\]](#)

沃伦的妻弟塞拉斯·斯特恩斯（Silas Stearns）也是一个严格谨慎的人。安德鲁和范妮婚后两年，范妮16岁的弟弟也从缅因州来到这里。斯特恩斯在彭萨科拉渔业公司当学徒，是一个能干的职员——对数字敏感，工作细致——他之后参与创立了他姐夫开在贝伦街码头的沃伦渔业公司。在一段时间里，彭萨科拉渔业和沃伦渔业是镇上的两大渔业公司。此后，两个新英格兰人——一个来自罗得岛，一个来自康涅狄格——从彭萨科拉渔业公司手里买过它的船和机器，在帕拉福克斯街码头经营起了E. E. 桑德斯公司。在19世纪80年代发展的巅峰期，拥有33只船的船队的兴盛主要有赖于一种鱼，那就是红鲷。

自从19世纪40年代，康涅狄格的詹姆斯·基尼（James Keeny）将红鲷引入彭萨科拉的市场，彭萨科拉的渔民就开始和红鲷打交道了。基尼当时正驶往新奥尔良去卖鱼，他手里有羊鲷、鲳鲹鱼、鲑鱼，以及一些其他的鱼，他都叫它们“海滩鱼”，但船开到一半，遇到了无风天，被迫停在离岸还有几英里的海上。据美国渔业委员会一位代表在后来写下的故事说，当厨子把食物残渣倾倒在船边时，一种胖胖的红色的鱼出现了——“长得奇怪”，“急吼吼地吃着”那些残渣。于是船长和船员下了钓饵，最后钓上来200条这样的鱼。在新奥尔良，鲷鱼“卖得和刚出炉的煎饼一样”。[\[20\]](#)

红鲷鱼通常要到深水区才能捕到。墨西哥湾盛产红鲷，其鱼鳞呈红色，有斑点，它们最适宜的水深为30英尺到200英尺甚至300英尺，也会在礁石、海底斜坡和暗礁周围活动，那里有大量的螃蟹、甲壳动物和幼鱼供它们饱餐。如果有一艘古老的西班牙大帆船长埋海底，那

这些西大西洋的“土著”一定会在其中流连忘返。比起其他鲷鱼——灰笛鲷（mangrove snapper）、巴哈马笛鲷（lane snapper）、双色笛鲷（mutton snapper）和九带笛鲷（dog snapper）——斯特恩斯的同时代人形容红鲷“是一种块头很大的鱼”。它有典型的鱼的样子——如果一个孩子作画的话，弧线会在向下张开的鱼嘴处骤然上扬，然后在多刺的背鳍下滑至扇形的尾巴，鱼尾到突出的下颚这一段是微微下突的曲线，最后是针一样的牙齿。还会特别画上胸鳍和腹鳍，添上有深有浅的红颜色，最后一下是点睛的一笔——圆圆亮亮像黑珍珠纽扣一样的眼睛。[\[21\]](#)

往鲷鱼锯齿嶙峋的栖息地里撒网会让你损失惨重，所以渔民们会使用鱼钩和渔线。通常，他们会在渔线的两根子线上装两个鳕鱼饵，然后将两磅重的铅坠下沉到五六英尺的深度。鲱鱼是海湾里极丰富的一种小鱼，拿来作饵是最好不过的。“鱼在饿的时候，”斯特恩斯提到红鲷鱼时说，“渔线刚放下去它们就咬钩了……它们因此得名啮鱼。”渔民们用那些涂了焦油的棉渔线，能钓到平均有24英寸长的鲷鱼，在斯特恩斯那个年代，它们的重量大概在20~60磅。[\[22\]](#)

任何钓上来的鱼叫价都要比网到的要高，因为船在冰上航行的成本要算进去。在纽约，墨西哥湾的红鲷鱼在1883年的价格是18美分一磅，比生鲜龙虾要贵8分，是鳕鱼价格的三倍——前者是诱捕的，后者是网捕的——但比鲱鳕便宜四分之三，鲱鳕是另一种要用上鱼钩渔线的鱼。可煎可烤，带着克里奥尔的风味，红鲷鱼很快成为深南部[\[23\]](#)人民的最爱。铁路运输网覆盖到彭萨科拉后，鲷鱼就开始被卖到亚拉巴马、田纳西，然后是中西部一带。全国性的报纸杂志开始报道来自墨西哥湾的鱼，它经常被佐以柠檬出现在女士俱乐部午宴的餐盘和火车餐车里。《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称红鲷鱼是“高价奢品和珍贵食材”，并预言它的受欢迎程度会超越鳕鱼。事实并非如此，但冰块能承载多少，沃伦和桑德斯就卖出了多少。[\[24\]](#)

红鲷和彭萨科拉变成了同义词，两者都得到了美国渔业委员会的注意。美国渔业委员会在1871年成立，目的是帮助发展和促进商业捕鱼业。委员会还注意到了塞拉斯·斯特恩斯，斯特恩斯当时已是名声在外的墨西哥湾鱼类专家。他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或画像。他高矮胖瘦、蓄须与否，我们并不知道。他一直年轻着；他没有挺过30岁。但我们不知道他的死因，也不知道是什么点燃了他对鱼的热情。这种热情是源自他在家乡巴斯的经历吗？还是在彭萨科拉？我们知道他父亲的离世中断了他的学业，他搬去彭萨科拉后，曾经试图让华盛顿特区的鱼类研究学会的元老们相信他作为自然学者的能力，但他开始被拒绝了，他被当成了一个纯粹的业余爱好者。

也许是谦逊的言辞帮了倒忙。“我还年轻，获取的知识还不多”，他在给史密森学会主席的信里这么说道。但拒绝似乎激励了他。有海湾作为他的实验室，再加上他敏捷的思维和双眼，这位极其勤奋的年轻人能辨认出超过50种鱼类，其中有四种最后以他的名字命名。史密森学会最终邀请他做顾问，他同时也出任了美国渔业委员会的特别代表，被赞誉为国内首席鱼类专家。[\[25\]](#)

乔治·布朗·古德（George Brown Goode）是史密森学会的助理秘书和鱼类研究负责人。在成为渔业委员会的负责人前，他曾计划为其编制一份综合性的渔业研究报告，邀请斯特恩斯准备其中墨西哥湾方面的稿件。这是斯特恩斯用生命去完成的一项任务。研究鱼类已经刻在了他的骨子里，这也将成为他的遗作。

他沿墨西哥湾行进的路线是从基韦斯特到布朗斯维尔，途中见了许多的鱼仓经营者、船长、船员，一丝不苟地收集了所有相关的详尽数据，包括船舶类型和吨位、捕获量和价值，以及收入，包括船员们的薪水等。他访谈过的对象口音各异，有德国的、意大利的、希腊的、葡萄牙的、瑞典的、挪威的、新斯科舍的、南斯拉夫的，还有纽

芬兰的。他在路易斯安那的卡津海岸（Cajun Coast）遇到华裔移民在捕捞虾蟹。如果他曾在圣伯尔纳堂区（St. Bernard Parish）停留，他会遇到一群说西班牙语的人，他们是从加那利群岛移民来的群岛人（Isleño）^[26]，运营着牛地湾（Terre aux Boeufs）和水獭湾（La Loutre）。他统计过，1880年，这个行业在整个海湾地区的从业人数有5131人，渔船有1449只。除了鱼钩和铅坠，他似乎把能数的一切都数遍了。

佛罗里达控制了这项贸易。美国墨西哥湾四分之三的本土船只都出自它的港口。它有渔民1936人，而得克萨斯有290人；佛罗里达卸下的鱼有830万磅，而在所有湾区的州中排第三位的得克萨斯的这个数字为380万。佛罗里达占据墨西哥湾在美国的半数海岸，所以它的统治地位来得并不稀奇。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反而是路易斯安那州。虽然它的海岸线只有佛罗里达州的一半长，但其捕获量却有佛罗里达州的85%。亚拉巴马州的捕获量是350万磅，与得克萨斯州几乎不相上下，但其渔民干活的海岸只有它的小脚趾^[27]那个范围。密西西比州有78.8万磅；不过它终有一日会拥有一个美国国内最多产的渔港之一。

斯特恩斯在古德研究的开篇就表达了对纽约、马萨诸塞、缅因和俄勒冈州渔民的敬意。其中每一个州的产出都超过了墨西哥湾区1550英里海岸产出的总和——在那个阶段是的。不用说，东海岸的渔业作业更高效，不仅是因为船队规模更大，也因为渔民世代的海洋生活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里。不过，斯特恩斯的致敬看起来仅仅是必要的铺垫，因为他接下来就带着可以理解的骄傲之情，强调了墨西哥湾的功绩：“美味的鱼类和贝类”，“品种多样，无穷无尽”。他将此归功于“自然的仁慈”——“热带阳光的宜人”和“可亲的栖息地”。^[28]

委员会里的一位元老级鱼类研究学家J. W. 柯林斯（Joseph W. Collins），来自鱼群的故乡缅因州，他对墨西哥湾便没有这么迷恋。

他在1885年发表的一篇令人费解的政府刊文中写道，墨西哥湾“不可能达到与新英格兰渔业相提并论的高度，仅仅是因为它没有如此巨大的可供汲取的资源”。他补充道：“南方物种在熏制食品领域也不太可能取得像大批量生产的北方海域那样的重要地位。”^[29]

还在经历战争失利的伤痛的南方人，当然对柯林斯言及“南方物种”时表现出的新英格兰式高人一等的态度进行了强烈回击。他那位身在彭萨科拉的缅因州老乡斯特恩斯，现在已是南方水域的皈依者，对此抱有他自己的看法，但当时他一直从鱼的角度看待墨西哥湾，包括其丰饶的河口。更少有人会承认墨西哥湾的未来并不止于红鲷鱼。维系斯特恩斯和沃伦的生意的红鲷鱼甚至不是这片美国海最有经济价值的产品。说到经济价值，牡蛎名列前茅，接下来是海绵、石斑鱼、鲷鱼、虾，然后才是红鲷鱼。

自然学者罗伊·白迪切克（Roy Bedichek）在他1950年环游得克萨斯时注意到，“这里的海岸边留下了很多无可置疑的远古牡蛎制品的遗迹，让人不敢想象”。早在两个世纪前，墨西哥湾海岸就被法国探险家皮埃尔·德沙勒瓦（Pierre de Charlevoix）指名为“牡蛎的王国”。他们所说的，是墨西哥湾土著居民每日饮食中残留下来的一堆又一堆经过岁月洗刷的贝冢。^[30]

贝类海鲜的（美国）国内市场最先在北方显露，人们想到牡蛎，首先想到那是来自纽约和康涅狄格州之间海域的礼物，偶尔也会有来自切萨皮克湾^[31]的作为补充。在那些地方，多亏印第安人的善良，牡蛎拯救了无法靠自己力量填饱肚子的白人殖民者。在其富饶多产且未遭到破坏的黄金时期，南哈得孙河河口繁育着大约350平方英里的牡蛎床，可能全世界有一半的牡蛎都在这里，牡蛎床包括壳在内有十英寸之厚。

这种汁多味美的双壳贝在纽约人手中变成了19世纪都市餐饮文化中的标志性菜式，就像在下一个世纪享受到同样待遇的披萨和贝果一样。熟食店和街头的餐饮车会售卖带壳牡蛎。餐厅的菜单上有牡蛎肉饼和牡蛎派，做法也多样，有用油煎的、用扇贝壳烤的、腌制的、焖炖的，配以鸡尾酒酱的，放吐司上烤的，佐以培根的，或加入牛奶或奶油一起炖的；菜的名字也五花八门，比如蓬帕杜生蚝、阿冈昆生蚝、荷兰风味蚝、纽伯格风味蚝、法式浓汤牡蛎。可惜，查尔斯·狄更斯口中的“令人赞不绝口的牡蛎烹饪”，带来了一个坏处：过度捕捞。18世纪初这个问题就开始显现，大都市往贝壳栖息地激增的污水排放更是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32\]](#)

在纽约已经变得污浊的在墨西哥湾依然甜美。北美的牡蛎是一个种类，纽约的本地供应量日益减少，可想而知，墨西哥湾的牡蛎将成为其合适的替代品。但是，“正如酒一样”，马克·科兰斯基（Mark Kurlansky）就这座城市的牡蛎史写了一本有趣的书，他说，牡蛎的大小、形状、色泽，甚至是味道都随它的生长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水温、盐度、养分含量、牡蛎床的构造和密度，还有牡蛎的年龄都有影响。所以虽然几乎墨西哥湾的每一个河口都生长着牡蛎，但它们吃起来并不都一样，也不太像哈得孙河的牡蛎。纽约人在品味一事上有点自命不凡，但他们热爱牡蛎，这就够了。南方海域中最受他们赞赏的大概是来自佛罗里达州阿巴拉契科拉湾（Apalachicola Bay）的。斯特恩斯说“在墨西哥湾没有其他地方是更好的了”。[\[33\]](#)

阿巴拉契科拉湾河口的宜人气候赋予了这里牡蛎的独特风味。它既有海水，也有养分丰富的淡水，两者达到了理想的平衡。其淡水来自与海湾同名的河流，而这条河流又由弗林特河和查特胡奇河汇流而成。在海湾前方的四个障壁岛既阻隔了来自河流的淡水，又引入了盐度适中的海水。以岛做防护的这种类型还存在于派恩岛湾、拜尤拉巴特里（Bayou La Batre）、巴蒂斯特湾（Bay Batiste），以及马塔戈

达湾、加尔维斯顿湾、比洛克西湾、卡米纳达湾、莫比尔湾、彭萨科拉湾和博卡谢加湾（Boca Ciega Bay）——这些地方都盛产肥美的牡蛎。

部分地归功于其牡蛎，阿巴拉契科拉湾也是捕捞鱼、虾、蟹的好地方。牡蛎是滤食性动物，每一只牡蛎每小时过滤两加仑的水，摄食其中的海藻和浮游生物。这让这片214平方英里的海湾得以保持清澈。阳光能够直达水底，鼓励了海草的生长，海草又能制造出为其他海洋生命所需的氧气，构成了生命循环的一部分。长大后，鱼会吃漂浮着的牡蛎幼体和蚝仔，也就是即将长壳的幼年牡蛎。成年牡蛎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它们完全长成的贝壳利如刀锋，会在踩上它们的脚或碰到它们的手上无情地切开一道口子。但它们并非刀枪不入。海星和螃蟹会吃牡蛎。浣熊也会在浅滩搜寻它们。钻蚝螺，一种住在壳里的蜗牛，会在牡蛎壳上钻孔，然后吸食里面的牡蛎。

阿巴拉契科拉一度看起来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海运港口。阿巴拉契科拉河的水深足以运送来自亚拉巴马和佐治亚州的棉花，以及来自所有三个州的木材。1907年发展起来的铁路将大多数的海运贸易导向了其他港口，但它跑起了“牡蛎快线”，将美味的冰鲜贝类直接送到正蓬勃发展的亚特兰大。从经济角度看，阿巴拉契科拉最后不需要发展为主要的货运港口，相反，它成为墨西哥湾最大的牡蛎出口地。海湾上的工作可以让一个人（man）过上不错的生活，那里也的确几乎是男人（man）的天下。1915年，镇上三分之一的男性工人——有400人——在117艘捕蚝船上工作。

钳子是他们的干活工具。钳子上绑了两个桤木或橡木手把，有8~16英尺长，看起来就像是一把在刀尖处有个钢制耙子的剪刀。由于经年累月地使用这种夹钳，在所有渔民中，采捕牡蛎的人最突出的是他们宽厚的背部和肩膀。通常，他们的妻女、姐妹会从事开壳的工作，

这是个不需要花心思的机械性工作，所需的只是一个简单工具——一把开壳的刀子，可以用来撬开贝壳以取出蚝肉。阿巴拉契科拉的牡蛎仓雇用了250个开壳工，他们中很多是孩子。其中一个雇主是镇上最富有的人之一，J. G. 鲁格（John G. Ruge）。他最出名的一是他在海边有一幢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二是他为人顽固（他有一次被罚款是因为他说邮政局局长是该死的蠢蛋）。他和他的兄弟乔治来自德裔移民家庭，在河口建立了阿巴拉契科拉第一家牡蛎罐头厂。这个时候是1884年，当地的商业采蚝业已有50年历史。

比洛克西、拜尤拉巴特里，还有南边的加尔维斯顿，它们的采蚝业也有一些发展。路易斯安那河口将最终在1912年以一次百万美元的丰收一举超越它们。虽然这只是“厨房牡蛎”，对此很多路易斯安那人也承认，它们并不如阿巴拉契科拉湾的那样美味，但这不重要。不管你手上有1蒲式耳^[34]的牡蛎，还是100蒲式耳，在19世纪90年代的新奥尔良，你都能以一桶（3蒲式耳）3~4美元的价格将它们卖光。那时候，食客们会为他们的贝壳食物搭配塔巴斯科牌（Tabasco）的辣椒酱，辣椒酱产自南方牡蛎栖息的长沼地区。墨西哥湾上四分之三的牡蛎床都分布在路易斯安那州水域，像尚德卢尔、布列塔尼海峡，还有那些有着特别名字的长沼：卡尤（Caillou）、杜拉吉（Dularge）、拉福什（Lafourche）、特澈（Teche）、泰勒博恩（Terrebonne）。

因珀尔河（Pearl）、阿查法拉亚河（Atchafalaya）和萨宾河（Sabine）汇入而被冲淡的长沼带，大部分都被“播种”了取自东边大河的天然牡蛎床上的牡蛎。不出数月，它们就会长成适合出售的大小，这些贝壳没那么细长，而是更圆，更受挑剔的餐馆食客的青睐。这种将蚝仔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细致工作，主要是19世纪初达尔马提亚海岸（Dalmatian Coast）的克罗地亚移民发展起来的，克罗地亚裔人采集牡蛎已经有125年的历史了。（斯特恩斯写道：“在路易斯安那涂画花哨的采蚝船上几乎没人说英语。”）牡蛎幼体需要

附着或扒在河底或湾底的一个坚硬物上，以便成长为蚝仔和成熟牡蛎。牡蛎加工者做过最聪明的事就是将老牡蛎的壳重新扔进河口，这样幼体就有了它们所需的坚硬物。[\[35\]](#)

牡蛎的日常饮食也需要石灰，而被丢弃的贝壳中就有大量的石灰。牡蛎加工者做过的最笨的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但又是他们最常做的事——就是将贝壳砸碎做肥料，拉走去修路，或是毫不在意地堆在一边，直到它们像莱昂纳德·德斯坦的墓碑一样被覆上了一层黑色霉菌。汽车问世后，修路人们对路基材料的需求如饥似渴，以至于要去挖古老的贝冢，真是让人感到可怕的“古文物爱好者”。路易斯安那州的摩根城在20世纪20年代有两个碎壳厂，专门出售粉碎后的贝壳，其既可以用来修路，也可用于制作家禽饲料和化工厂用的石灰。四分之一的碎贝壳产品来自路易斯安那海岸。

路易斯安那同时也是牡蛎罐头的首创地。阿巴拉契科拉人喜欢说是鲁格兄弟开了墨西哥湾上的第一家牡蛎罐头厂。但实际上另有其人，他们是来自新奥尔良的两兄弟——乔治和弗兰克·邓巴。他们在南北战争期间去法国学习烹饪艺术（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躲开战争），并且于1867年在路易斯安那的格兰德特雷岛（Grand Terre Island）建立了第一家罐头厂。十年后，在密西西比州的帕斯卡古拉也开了一家罐头厂，又过了几年，又一家开在比洛克西——这都是在鲁格兄弟之前。

密西西比海岸成为墨西哥湾的罐头加工中心，它和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罐头厂街》开篇中描述的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的沙丁鱼区相去不远。它们都“是一首诗，一股恶臭，一阵刺耳的噪声，一片深浅不变的光，一个音调，一种习惯，一阵思乡之情，一个梦”。1900年，比洛克西的罐头厂雇用了2500人，那是接近全市一半的人口。而北方工厂的劳动力则依赖移民——主要是波兰移民，和斯坦贝克笔下

沙丁鱼罐头厂里的情况一样——他们在马里兰和海湾沿岸的牡蛎罐头厂季节性地来回迁移。[\[36\]](#)

早在城市区划法令出台之前，比洛克西的罐头厂就沿海而设，占据了海湾附近的所有荒地，人们对其毁誉参半，它提供了工作机会，但也是个碍眼的存在。机器无时无刻不在哐啷作响。没有遮挡的厂房已锈迹斑斑，金属件凹陷起皱，被丢弃的贝壳像瀑布一样被哗哗啦啦地从上面倾倒下来，像山一样高高堆在场地上。罐头厂往空气里注入了死去的海洋动物标志性的麝香味，工人们穿回家的橡胶靴和脏污裤子上都带着这股味道。比洛克西的镇长及时颁布了一则气味法令，强迫至少一间罐头厂迁往下风区。

虾，同样地，不仅为罐头厂的周边空气增添了风味，也让牡蛎采集者的钱包鼓了起来，因为他们会在夏秋季时转而捕捞甲壳类动物。海湾里的虾实在太多，海滩上蜕下的虾皮收集起来会像海藻的地毯一样。

墨西哥湾地区的商业性捕虾开始于18世纪（一说1735年[\[37\]](#)）法属路易斯安那的两个男人和一张围网。两个人一人拉着围网的一头，从海草床上方包抄过去，这样餐桌上就有食物了。希腊人、罗马人和墨西哥湾的土著人几千年前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捕虾。后来，这两个人开始把虾卖给邻居——或煮过、炖过、煎过，里面填上米饭或面包屑，外面裹了秋葵浓汤和什锦菜（jambalayas），配上粗碾的谷物。后来的人将网编得更长，直到它有2000英尺，需要20个人才能拖动它。他们有时会套在马或骡子身上来省点人力。然后人们学会了驾驶纵帆船来展开围网，如此一来他们的围捕活动就能在更远的海湾、长沼和海峡上进行了。

这种捕虾方式持续了一些时日。然后，1913年，在佛罗里达东海岸的费尔南迪纳，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捕鱼船长比利·科库姆

（Billy Corkum）经历了灵光一现的瞬间。他一直不满足于传统的围网——花费太多的人力，收获却不多。他拿捕鳕鱼用的网板拖网来稍作改良，最后的成品是一个背袋状的网，前面开口处装有木门，裂口打开时就像饥饿的鱼张开的大嘴。他从他的纵帆船船尾将网徐徐放出去，就这样，他用更少的人力在捕虾上有了不小的收成。

近四年后，这种方法才慢慢在墨西哥湾的捕虾人中普及，一旦普及，他们的产量随即飙升。路易斯安那的渔民毫不费力就在其中拔下头筹。他们中有克罗地亚人和中国人——“操着一口外国话的乡下人”，还有沿岸的卡津人，他们也猎捕皮革市场所需的短吻鳄，“靠潮涨潮落”过日子，新奥尔良的《每日一铜币报》（*Daily Picayune*）通讯员玛莎·菲尔德（Martha Field）这么写道。“路易斯安那的捕渔业，”她补充道，“作为几大产业之一，它极为独特，而且利润丰厚。”菲尔德也许自己都没意识到她说得有多对。她所在的州有全国40%的沿海湿地，那就是海洋生命的孵化器、家园和食槽。[\[38\]](#)

虾在海洋里生存的时间不比其他海洋生物短，以虾为食物的捕食者，从鲸鱼往下，数不胜数。古罗马人的烹饪书《阿比修斯》

（*Apicius*）中有虾的做法，另外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移民——在类似古巴人在佛罗里达的渔牧场的营地——开始将路易斯安那的脱水虾出口到中国、夏威夷和菲律宾。东北部的美国人曾经将虾盛入香槟杯中，当作一种时髦的可食用的鸡尾酒待客。这些都发生在拖网的普及之前，在那之后虾便以更低廉的价格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拖网出现，市场对虾的需求与日俱增，与此同时，船舶开始使用汽油发动机，汽油引擎驱动着船只在海岸、海湾自如地来去、进出、往返。人们变得不再那么依赖变化无常的风力，这意味着人和自然世界之间又被割裂开了一点，但人类又会以另一种形式成为有限自然资源的奴隶——在这里体现为精炼石油燃料。制冷技术在20世纪20年代

诞生——自然界的冰不再被需要了——完美地配合克拉伦斯·伯宰开发出海鲜的速冻处理法。瞬间销量飙升。

为了赚钱，捕虾船隔一段时间就会消失个几天。它们要驶入海湾深处，风吹海和的经典乐章从此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重金属的轰隆声和蒸汽排气的呼啸声。渔民们发现，如果他们工作到日落之后，他们的拖网中会出现一种以前没见过的褐色的虾，它们会在晚上和常在近岸水域被捕捞到的白色虾一起浮出水面。然后到了1949年，在基韦斯特临海那一头，一个拖网渔船又网上来满满的另一个品种的虾，虾身呈粉红色，肉质鲜嫩甜美，它第一次被发现还是在石斑鱼和鲷鱼的肚子里。

据自然科学作家杰克·鲁德洛（Jack Rudloe）和安妮·鲁德洛（Anne Rudloe）的观察，“数百吨”这种粉色“黄金”从佛罗里达的西海岸被捕捞了出来，它们最终占据了全国捕捞总量的85%，成就了冬季渔业。接下来，在亚拉巴马海域200英寻深处发现了皇家红虾（royal red），使拜尤拉巴特里一跃成为主要的捕虾港。然后，又一个新品种，岩石虾（rock shrimp）在阿巴拉契科拉湾现身。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捕捞网的设计也在与时俱进，“平网、气囊网、撇取式拖网、蝴蝶网和猫鼬网，”鲁德洛写道，它们每一个“都比虾聪明”。据作家伯尔尼·基廷（Bern Keating）说，20世纪70年代的捕虾人可以总价15万美金买下一只85英尺、钢制船体的拖网渔船，并在五年内付清。^[39]

一连串偶然的创新——汽油和柴油引擎、网板拖网、制冷、冷冻食品——改变了捕虾和捕鱼业，开启了墨西哥湾的无限商机。那么在全新的驱动力和捕捞网出现后，船舶又做出了哪些改变呢？

答案要从比洛克西的克劳福德街街尾的一家船坞开始说起，这家船坞的主人是克罗地亚移民，名叫J.D. 克瓦契（Jacob D. “Jacky

Jack” Covacevich)。在他1962年去世前的70年间，数百只新船经由他的双手驶入了巴克湾（Back Bay）平静的水面。他选择当地的长叶松、常青橡木和柏树，用他麻利的双手将它们锯切、刨平、连接、搭接、弯曲，制成坚固的框架和龙骨，最终设计并制造出密不透水的船只。他有帮忙的学徒，学徒在当时的19世纪90年代每天工作15个小时，日薪是75美分。那是在1893年飓风过后，那一次附近几乎所有船只不是沉没就是被撞得粉碎。比洛克西是墨西哥湾的造船中心，飓风过后，它的六个码头日夜赶工，重建渔船船队。

和他的竞争对手们一样，克瓦契制造出“白翼皇后”，这是人们对神圣的纵帆船的昵称。但和他们不同的是，他发明了一种更聪明的作业船，并起了一个无趣的名字叫比洛克西小帆船（Biloxi lugger）。小帆船长30~60英尺，有一种地中海风格，对此，克瓦契说灵感来自路易斯安那的意大利渔民。小帆船的甲板在船尾处呈方形，船腰较低，弧线形的船首最高，吃水深度仅有三英尺。驾驶室放在了船尾，工作甲板在前面。第一艘下水的装了桅杆和风帆，之后的装的是引擎和螺旋桨轴，去掉了帆缆。它们在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亚拉巴马地区被广泛使用。

另一个创新是所谓的得克萨斯拖网渔船，和佛罗里达拖网渔船是一样的。它的上层设计与比洛克西小帆船正相反：工作甲板在后，驾驶室在前。拖网渔船更受欢迎，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它们被装配上舷外支架，它像蜻蜓翅膀一样展开并从两侧分别将网拉起，一个舷外支架可以有两个以上的网。到这时，墨西哥湾渔民捕获的虾占了全美国的大部分，而捕虾的拖网渔船也成为海上的标志性作业船，就是那种画家站在画架边上描摹黄昏时会从落日前方经过的船——微隆的船身轻晃着，腰身低平，船首和驾驶舱都清晰可见，渔网收拢并悬挂于船尾，白色的船漆已经有了锈迹，尾流在船后深深地荡漾开来，它正往地平线驶去，也或许正从那里回来。

船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捕获物本身。它在很大程度上表露了渔夫的身份。它可以揭示渔夫的职业，甚至他的家族。在英年早逝的斯特恩斯离世前，类似于拖网捕虾船的船只开始从佛罗里达半岛的安克洛特河驶出。这些船没有舷外支架，船体俯冲式的线条已经说明了一切。这几何图形是希腊的，船员是希腊人，他们所来自的塔彭斯普林斯（Tarpon Springs）是希腊人的地盘。他们的捕获物——海绵，本就深深打上了希腊传统的烙印。

19世纪70年代，一个渔夫在捕海龟时，他的网被挂在了黏糊糊的东西上，直到那时人们才意识到墨西哥湾中海绵分布之广。事实证明此处海绵有9000平方英里，是美国之最。虽然海绵看着像植物，而且也像植物一样牢牢固定在一个地方——有些甚至会向下伸出根系来——它们其实是动物。和珊瑚一样，海绵是无脊椎动物，多为群体生活，也像珊瑚一样会筑礁。它们可以忍受几乎所有的水温环境，无论是极地的严寒还是热带的温暖，不过它们更青睐清澈平静的水域。虽然它们有些长在岩石上，但大多数的墨西哥湾海绵附着于沉积岩形成的海湾底部。它们没有循环或消化系统，而是在水流经过它们身上的小孔时一边吸收其中的营养物质，一边排泄废物。鱼虾特别喜欢海绵创造的生活环境，海龟则喜欢海绵尝起来的味道。

数十年来，海湾沿岸的居民会在船舶下锚的浅水地带采集海绵，用于个人生活，直到19世纪40年代，他们才意识到海绵巨大的商业价值。起初，海湾地区的海绵贸易中心在基韦斯特和古巴，直到19世纪末这个格局才被打破。事情源于北边海岸的一个捕龟渔民被钩住了渔网，于是生长在这里的黄海绵、海藻绵、线海绵、手套海绵和羊毛海绵被发现，产业中心开始势不可当地向北转移。海藻绵被医院用作外科医用海绵，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用羊毛海绵来洗浴和擦洗马车，当然，后来就变成擦洗小汽车了。在世纪之交，阿巴拉契科拉成为这两类海绵的重要供应港口。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塔彭斯普林斯不过就是东北部人过冬的一个好去处。它气候宜人、橡树成荫，河流也显得可亲，因为那里有容易咬钩的鱼儿供人垂钓，还有一年四季恒温的温泉浴，足以满足一大批游人。但海绵床正是在塔彭斯普林斯被发现了，它们是大自然赋予的水底宝藏。斯特恩斯报告说海绵的价格是每磅1美元。在当地没有任何水产能有这样的价值。最贵的鲳鲹鱼也许能有50美分的单价。在1890年，根据当地史学家的说法，海绵床为塔彭斯普林斯的一家公司贡献了100万美元的销售额。

这个商机鼓励了来自费城的加工厂厂主约翰·切尼（John Cheyney），他雇用了希腊人约翰·可克里斯（John Cocoris）做他的采购员。他们构思了一项计划，从希腊的多德卡尼斯群岛招来了一批经验丰富的海绵采集者，多德卡尼斯的海绵采集历史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期甚至更早的自由潜水员。墨西哥湾的海绵床提供了很好的工作环境，切尼也许在招募希腊潜水员时声明过这一点。那里的水域既平又浅，如“清澈的泉水般透明”，斯基伯纳出版社的一位作者写道，“自然的壮美和新奇”“无处不在，令人目眩”，它会“激发一个自然学者最炽热的爱”。第一年有500个希腊人移居至此，很快又有数百位陆续加入。[\[40\]](#)

在20世纪40年代，安克洛特河停泊了150只海绵采集船。它们的设计原型来自进口的地中海船，它长30英尺，有上扬的船首和船尾。它们“像一弯新月般”滑过水面，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一位撰稿人如此写道。在它们即将启航展开一段2~4周的旅程时，圣尼古拉斯希腊东正教堂的牧师会为每一艘船祈福。[\[41\]](#)

每一个渔港都喜欢宣称自己是这种或那种鱼的产地中心。而塔彭斯普林斯，在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二三十年间，是真正意义上的

世界最多产的海绵出口港。它出产的天然产品将美国冲刷得干干净净。

虽然塔彭斯普林斯（Tarpon Springs）的经济和一种纹丝不动的水生动物捆绑在了一起，但这个城镇的名字^[42]来源却相当有动感，虽然它其实是个误会。从北方来到安克洛特河的新移民以为水里跃起的鱼是大海鲢（tarpon），他们看到的很可能是钢灰色的鲱鱼。大海鲢只有在感受到压力的时候才会跳起。而鲱鱼看起来是想跳就会跳，也许是因为在海里的生活非常开心（研究者们还没有弄清它们的动机）。“鲱鱼跃出”应该更为准确，但作为冬日度假胜地的名字就太过扫兴了。除了它的空降兵特性，鲱鱼和大海鲢比起来就是一种平平无奇的鱼。钓到一只鲱鱼是不算数的，但一条漂亮的大海鲢就不同了。鲱鱼不会咬你的钩，它们是坚定不移的素食主义者。鲱鱼很难让垂钓者生出兴致来，除非他们能发明出对其有诱惑力的长得像草一样的假饵来。鲱鱼也毫无威望可言。它们很普通，墨西哥湾的每一个小海湾、海峡、小湾、长沼和长着一片海草的河口里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尽管如此，鲱鱼有一点是胜过大海鲢的，那就是它们可以吃。它们在咸水和淡水中都可以生存，人们世代都在食用这种随处可见的暖水海洋鱼。《每日一铜币报》的玛莎·菲尔德称其为“阿卡迪亚人的奢侈品”，指的是鲱鱼已经成为挑动工薪阶层味蕾的最不容置疑的美味，没有之一。米歇尔·扎可思（Michelle Zacks）在她一篇言过其实的鲱鱼专题报道中说，吃这种鱼的“人通常不是白人或都市老饕，而是肤色各异的普通人”。鲱鱼从来没有出现在戴尔莫尼科（Delmonico）餐厅的菜单上。^[43]

但对赏鱼的行家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一位来自锡达礁（Cedar Key）的老渔民麦克·戴维斯说，只要鲱鱼还在跳，“人就不会饿

死”。不管经济状况如何，不管鱼虾卖得好还是卖得差，水里都有食物。北卡罗来纳的许多家庭在19世纪80年代移居到了佛罗里达的科尔特斯（Cortez），带上了他们称之为飞鱼的小艇，把海湾戏称为他们的“厨房”。那里经常能看到鲷鱼跳跃的身影——鱼身有墨西哥湾常见的条纹，颜色灰中泛蓝，身形修长，背鳍较小，成熟之后有18英寸到两英尺长、数磅重。其数量之多可比肩牡蛎或虾。从码头或收了帆的小艇艇尾撒下一张网，然后将鱼拉上来，去掉头尾，从鱼肚处剖开，掏出内脏，将鱼身往两边摊平，鱼脊骨要留在其中一边（让吃的人而不是烹饪的人去对付那些牙签一样的鱼刺），然后烹煮。再加点粗面粉，让狗安静下来，这样你就能得到一顿饱食了——“一日三餐，全年如此”，《纽约时报》的通讯记者在1876年写到鲷鱼时这么说，“除了猪肉和玉米粥，这就是那些‘穷苦白人’一日三餐的主食了。”^[44]

鲷鱼就是一顿饭，它代表了渔牧场的年代和古巴的奴隶制。它们在餐桌上或市场上出现时通常是腌制的，而不是冰鲜的；它们被装进牛车，哐啷作响地经过乡野地区，或装上火车一路颠簸着运往南边的火车小站，而不是一路飞驰送往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城市。痴迷垂钓的洋基客南下钓鱼时，数不清的米诺鱼大小的鲷鱼被他们拿来作饵。

对外人对鲷鱼的兴趣就仅止于此。铁路和冰块也没能消除遥远的距离。得克萨斯州的鲷鱼一般是被得克萨斯州人自己吃掉的；亚拉巴马的，被亚拉巴马人吃；佛罗里达的，被佛罗里达和佐治亚州的人吃。南方的种植主，和古巴的种植主一样，买鲷鱼来给他们的奴隶吃——废奴后，给他们的佃农吃。这样一种可靠的食物要价只是每磅两美分，买它们的人自是打好了算盘的。当地海产中没有比这更方便获取、更有营养或更便宜的了（石斑鱼每磅要七美分）。斯特恩斯在计算鱼和渔船时，发现占墨西哥湾海产捕获量50%的鲷鱼，在销售额上仅占20%。

鲐鱼就是南部的鳕鱼，融入了地区经济中，也被嵌入了捕猎这种鱼的人的形象，虽然这个形象带着一点洋基客的偏见。在北方，鳕鱼的捕鱼人被理想化地描述为干净、清醒、努力工作的一群人，捕获的食物保障着这个国家的伟大。而在南部的墨西哥湾，追逐低贱的鲐鱼的，不是那些来自过度捕捞海域的休假中的新英格兰人，而是没有留下讨喜印象的当地人。据美国渔业委员会估计，有3000名墨西哥湾区的居民参与了鲐鱼贸易。60%是白人，25%是黑人，剩下的是巴哈马人、古巴人，以及平常的卡津人、中国人和路易斯安那的克罗地亚人。因为鲐鱼活动于近岸水域，渔民不会进入大海，如果是在海上，他们将会在新英格兰船长的严密监控下证明自己的坚毅品格。捕猎鲐鱼的人倾向于单兵作战。许多人让旧日的渔牧场重现辉煌，他们有时去到长毛猛犸象一样的茅草屋里工作，那些茅草屋都在偏远的地方，在那里可能走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看不见一个陌生人。

这些地方证实了外界对他们生活方式的判断，而这种生活冒犯了这些旁观者的情感。其中一位就是自由民管理局的巡视员，陆军上校G. F. 汤普森（George F. Thompson），萨拉索塔湾（Sarasota Bay）的鲐鱼渔民让他感到恶心，尤其是他们的早餐，“臭气熏天的咸鱼和面包！！！”显然，被他投以刻薄评价的这些人，他们所遭受的内战导致的匮乏，这位大惊失色的洋基客陆军上校是没有经历过的。但即使是塞拉斯·斯特恩斯，这位忠实的墨西哥湾的辩护人，这位看起来无辜的人，也显露出了内心深处的旧清教徒身份，他将捕鲐鱼的渔民称为“一群卑贱的人”。[\[45\]](#)

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并不是唯一的消费者。几乎所有的鱼都会吃鲐鱼。这也就是鲐鱼肉会成为上佳的垂钓鱼饵的原因。鸟吃它们，龟和螃蟹也吃它们。虽然鲐鱼每拖上来一网，就是数以千磅计的起鱼量，但这种风光，在墨西哥湾的渔夫兼饭店老板兼作家里奥·洛弗尔（Leo

Lovel) 看来，是鲐鱼的苦难，于是抱着几分同情，洛弗尔将鲐鱼称作“海洋食物链的基础”。

鲐鱼，可怜的家伙。海里游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所有动物都爱它……

现在它是海豚的最爱……

鲐鱼奋力向上游时，鹈鹕便俯冲了下来。

每一条浮向水面的鲐鱼都会被老鹰和鱼鹰一把抓起。

大海里所有鱼都吃它。小到河口里手指头长短的，会被鳉鱼吃掉，大到近海三磅重的，则是大马林鱼的食物。

水里有鸬鹚的追逐。

水草里的小鱼苗被海鸥拣食。

连短吻鳄也吃它们。[\[46\]](#)

由于所有这些捕食者的存在，鲐鱼的生物本性让它的产卵数量比预期所需存活的后代数量多得多。已故保育生物学家阿奇·卡尔（Archie Carr）称这种行为是应对“捕食者过剩”的策略。很多生物会采取同样的手段——比如，青蛙和鲎（一只雌性会一次产下10万颗卵）。鲐鱼只有在产卵的时候才会离开河口、海湾和峡湾，游向外海，此前它们整个夏天都在吃腐烂植物和动物残骸。深秋和冬季，当雌性鲐鱼体内满是鱼卵时，它便会游向开阔的墨西哥湾。空气变得新鲜，海水渐凉，激发了它们迁徙的本能。[\[47\]](#)

数千尾鲐鱼成群而游，蔚为壮观。渔夫们捕鱼时也往往会对眼前之景惊叹不已。他们为了保暖穿着厚重的衣服，有些人还会往脑袋上套一个面粉袋子，像戴着滑雪面罩一样，时不时从大衣和船舱里掏出“几品脱的纯黑威士忌”来，洛弗尔这么说道，“鲐鱼如此肥美，他

们像打鼓一样拍打着船边板。”渔夫手里的渔网能在河里拖上几百码，或者他们会将渔船都并排聚集起来，鲐鱼翻腾跳跃，搅动着河水，数不清的鲐鱼奋力往网外逃，但最终还是有数吨的鲐鱼被捕获。洛弗尔说：“鲐鱼不喜欢被抓住。”[\[48\]](#)

没有谁会喜欢，有时，渔夫们也不想要他们抓到的东西。三不五时地，撒网捕鱼的渔夫会带上来一只海龟。杰克·鲁德洛是在一个捕虾人那第一次见到这个情景，他听到对方骂：“该死的，没什么比捞上来一只又大又老还臭气烘烘的海龟更可恨的了！”渔夫们的前车之鉴告诉他们，海龟会给捕虾捕鱼的渔网带来不小的破坏。海豚也是一样，甚至更坏。但是，如果是只海龟，当渔网倾撒在甲板上，露出大自然最有魅力的馈赠时，人们的愤怒很快会随之消退。海龟壳在世界各地都价值连城，它们被用来做成昂贵的龟甲梳、笔刷和首饰盒。尤利乌斯·恺撒在埃及大获全胜，除了所剩无几的金库，最令他惊喜的是亚历山大的宝库高高堆起的龟甲。大多数时候，海龟受到赞美是它们被盛在餐盘和汤碗中的时候。“他们说一只海龟身上同时有七种不同的肉，”那个捞到该死的海龟的捕虾人告诉鲁德洛，“有些吃起来像猪肉，有些像小牛肉，有些像鸡肉，其他的我也说不上来。但是真的好吃！”[\[49\]](#)

这位捕虾人拉上来两只红海龟。海龟共有九种，墨西哥湾里生活着五种，红海龟是其中之一。当地人说海龟实在是太多了，你可以踩在海龟背上在水里自由行走。它们疯狂的繁殖方式让庞塞·德莱昂将佛罗里达礁岛群西南海域的那个小岛群命名为Los Tortugas（海龟岛）。那160只被船员掠夺的海龟很有可能就是红海龟和肯氏龟。

红海龟是大海里的流浪者，它们的足迹从深水到浅水，遍布大海各处。它们通常在近岸处搜寻软体动物、螃蟹和甲壳类动物。肯氏龟也一样，喜欢到拖网也会经过的地方去吃虾，因此这两种海龟最是经

常大肚朝天地落在渔船甲板上。绿海龟，小只滑溜的家伙，有强壮有力的划水肌，常常游得比贪婪的拖网渔船还快。棱皮龟，也被称作舢板龟，是第四重的爬行动物，在所有海龟中体型最大、鳍状四肢最为发达，它不仅体型大，而且体态特殊，呈罕见的泪珠形，生活在远洋，以水母为食。玳瑁常出没于会扯破渔网的礁石洞穴环境。但其精致漂亮的背甲曾经是现在依旧是龟甲收藏者们的最爱。

海龟落入渔网并不单纯是不幸的偶然事件。它们曾经是被猎捕得最凶的墨西哥湾商品。数千年来，沿海土著起初猎以为食，然后作为贸易产品运往古巴，海龟脖子和四肢上的皮用来做船很是耐用。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在19世纪30年代游历墨西哥湾时，注意到有白人正小心翼翼地在小河入海口处撒网。他后来了解到他们用的是网眼较大的渔网，可以让鱼通过，但足以困住令人垂涎的远洋爬行动物。海龟游动时，“它们的名声以及轻盈的动作”让他联想到了“空中的飞鸟”。[\[50\]](#)

他本人作为天才的画家和鸟类学家同样声名在外，但并没有用他的名望为野生生物挣得同情，即使它们对他的工作是如此珍贵。在当时社会普遍的氛围下，地球上的生命都围着人类的兴趣打转，野生生物的数量看起来已是过分得多，并不需要为今天这里或那里又杀了一只海龟而担忧。如果说奥杜邦叹赏它们水中优雅的身姿，他更赞赏的是那些用鱼叉捕捉它们的“技艺高超的捕龟人”。话说回来，作为一件商品，海龟捕回来要用网网着，养在船板上，确保它们还活着，这样的海龟更值钱。它们接下来会被卖给商贩，商贩把它们关进围栏里，待价而沽。[\[51\]](#)

整个墨西哥湾都在猎捕海龟。绿海龟被认为是最好吃的。一个商贩夸口说：“绿海龟之于其他肉类，就像香槟之于其他酒。”斯特恩斯的报告中说，在1879年，有2400磅的绿海龟在得克萨斯被捕捉，并

以3~4美分一磅的价钱出售。曾经有一天彭萨卡拉迎来了一艘满载500只活海龟的船。将海龟处理制成罐头肉和汤的加工厂遍布墨西哥湾沿岸。在一段时间里，上好的捕龟水域很多分布在锡达礁四周以及它的南边，那一带的水底都长满了海草。[\[52\]](#)

而在南边的基韦斯特，捕龟活动终年不休。有个名叫阿曼德·格兰迪的法国厨师，被一个纽约批发食品商说服，在这个热带岛屿的玛格丽特街上开了一家罐头厂。他的罐头厂是这一带最繁忙最有名气的。他将海龟汤罐装在一个1.4磅容量的罐头里，外包装上的标签写着海龟产自“附近海域”，标签上的图展示的是两个男人正在沙滩上将海龟翻面，他们身后是一片山峦，可基韦斯特是一片平坦沙地，并没有山。上面的广告语是“源自大海，直达罐头”。是的，途中经过了屠宰场，但在供应这道格兰迪大厨招牌菜的精致纽约餐馆里，这一点是不被说破的。除此之外，做汤的时候，大厨的罐头厂里弥漫着死亡的腥臭味。工厂并不好看，壁板是光秃秃的，金属屋顶上起伏着斑斑点点的海鸟粪，后面是拥挤不堪的龟栏。无论什么时候，格兰迪罐头厂里都有100只海龟在爬行游动，它们互相挡住去路，对眼前的无路可走感到不解。人们对海龟很是有兴致，于是格兰迪开始收费，每次十美分就可以看一眼这些巨大的、稀奇的、即将被做成汤的爬行动物。[\[53\]](#)

对于不断扩张的捕龟业来说，罐头厂只是其中的一件副产品。不需要去捕龟，甚至不需要有船，你也可以是产业中的一员。海龟被逐出海岸，以便人们在这里或附近安居，这样看来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个产业。每年4月下旬到盛夏，是海龟们筑巢的时间，他们从海湾划着重重的身体向海滩游去——难看的泳姿和半溺水的水手没有两样——人们正在等候着。等一只海龟产下了卵，覆上了巢，缓缓爬过沙地、爬向大海时，有人就会过来将它仰面翻过来，任凭它四脚朝天，无力地挥舞着。海龟的背甲是它最好的保护和依靠。要将沉重的

棱皮龟、红海龟和玳瑁翻过背来，需要劳动两个或以上的壮汉，或者借助杠杆的力量。海龟一旦被翻过来，捕猎人就走近龟巢，将里面的蛋全部偷走，一个不留，一个窝巢大概能有250个蛋。这些人回家先自己吃饱，然后喂给狗和猪，丝毫没有浪费——然后是又一次的……

掠取窝巢是对自然恩赐的违逆，这个行为连奥杜邦都无法容忍。他称被偷的蛋是威胁种族存续的“不义之物”。除了入侵的人类，海龟也不得不和其他野生生命抗衡。浣熊、熊、狼和野猫会偷袭埋好的巢穴。当破壳而出的小海龟往海里快快爬去时——它们的快是本能——鸟迅速落下把它们叼走，沙蟹将它们拖走，即使逃过这俩，鱼也要吃了它们。海龟也有鲑鱼一样的补偿机制，用过量产卵的方式。为其他动物提供饲料已是不易，更别提还要喂养人类，尤其是他们同时抓走了祖先和后代，全然不顾后世。[\[54\]](#)

斯特恩斯没有将海龟列为墨西哥湾的主要商品。它们正在消失。格兰迪在1890年开设罐头厂，那是在斯特恩斯死后的一年，那时海龟的消失在墨西哥湾北部和西部已经显而易见。曾经能捕捞起上千只海龟的地方，现在据统计只产出了1000多磅的海龟肉。格兰迪的生意进行了不到十年已经难以为继，因为他的供货商已经无法再供应来自“附近海域”的海龟了，他们转战中美洲和加勒比水域——那里倒的确山峦迭起。

浪费是水产捕捞业一直以来都存在的现象。渔民们的世界观就是丰盛是永远存在的，他们相信他们的渔网在海里留下的空洞自然会有其他某处的鱼游过来补上。佛罗里达那不勒斯的一位居民曾经看见渔民们快速甩动着一张四分之一英里长的围网，最后拖起了5400磅的正游向外海产卵的鲑鱼。几乎整个鱼群就此覆灭了。这里的鱼肉已经多于任何人的需求。史料里包含大量对惊人捕捞现象的证实描述。据渔业委员会统计，在1896年，渔民从佛罗里达西南海域捕捞起的鲑鱼共

有50万磅，其中没有到达市场的数量数不胜数。有时一次的捕捞量太大，以至于渔民们来不及准备，无法及时晒干，也无法及时获取足够的冰保证它们不变质腐败。

过了没多久，在1904年，得克萨斯的渔民出港了20万桶牡蛎——这是永久性衰退前最后的巅峰时刻。阿巴拉契科拉以及它邻近的圣文森特湾在十年之后出产的肉量达到了30万磅，但此后就一蹶不振了。密西西比的官员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规定了采收季节，但牡蛎采捕者从未遵守过。在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渔民们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采用起贝器作为他们采捕牡蛎的操作方法，对他们自己和对海底环境都造成了伤害。在大萧条的饥饿年代，密西西比州的环境保护法批准了起贝器的使用，起贝器像捕虾的拖网一样张着一个大嘴，下唇是类似耙子的铁器。渔民可以用它在深水中捕捞牡蛎，但它在底部拖行后会凿出拖痕，没有鱼会跟上去了。阿巴拉契科拉的牡蛎捕捞者永远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同行会选择这种毁灭性的工具。威廉·柯里尔用自己设计的起贝器捞起的马可岛的蛤蜊，到了1910年就再也看不见了。

到了20世纪的下半段，捕虾船用起了水底拖网，远在那之前，他们从鲱鱼捕捞人那里得到了灵感，也开始用网来封锁河段或长沼。虾无法承受这样的围捕，近岸数量急速下降。但没人从中吸取教训。捕虾人继续开发新的虾场、新的品种来自我拯救，他们远航至墨西哥，越走越深，就像大海是一个无底洞一样。捕获量开始展现向上的势头，从19世纪80年代的1000万磅上升至1905年的2400万磅。

红鲷鱼的捕捞者们在类似海域上活动。斯特恩斯不情愿地报告道，1883年对他们来说是悲惨的一年。他推测红鲷要么是被过度捕捞了，要么是游到其他地方去了。渔民们更愿意相信是后者，于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补救措施：他们也到别的地方去。冰块解决了时间和距离

的问题。1885年，在离彭萨卡拉西南方200英里处，就在墨西哥湾所谓的外滩群岛（Outer Banks），他们找到了红鲷鱼的大本营。它们的栖息地一路延伸到干龟岛（Dry Tortugas），位于佛罗里达西海岸50～60英里外，锡达礁、坦帕和萨拉索塔的渔民被吸引而来，也包括那些移民到了科尔特斯的北卡罗来纳家庭。

这个意外之财最后证明是一股只刮到了1910年的旋风。但没关系。到那时，渔民们又在路易斯安那边上找红鲷鱼了，从阿兰萨斯（Port Aransas）和加尔维斯顿港口来的商船也加入了进来。到20世纪中期，有了制冷技术和引擎——解了燃眉之急的动力——渔民们往南跑到了坎佩切海岸，惹来了墨西哥政府的抱怨。海洋划界问题上的争端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加剧。

商业性捕鱼在墨西哥湾上的诞生，借用斯特恩斯的话来说，正是海湾的“仁慈”的表征，但即使在他那个年代，人类的过分行径也已危害到了那份仁慈。但令人称奇的是，墨西哥湾被誉为下四十八州[\[55\]](#)最佳钓鱼点的荣耀时刻还在后头。捕鱼业还在继续扩张，它接下来在产出重量上超过了东海岸产出的总和，尽管此时它的丰盛程度已经不如从前。但它们是相对的。每一个渔牧场都面临资源减少的问题。1971年标志着墨西哥湾区统治地位的开始，那一年它的产出占了全国总捕获量的42%。

100年前，国会通过了一项联合决议，决议中表达了对渔业中过度捕捞现象——指的是东北部渔牧场——会造成“公共伤害”的忧虑。这项决议后成立了美国渔业委员会，而新英格兰渔民的应对措施就是跟随鱼群去往南方。和数十年前的莱昂纳德·德斯坦一样，他们向墨西哥湾进发。他们，以及那些后来加入的人，无一不是在重蹈覆辙——阿奇·卡尔称之为供过于求的捕食者。[\[56\]](#)

他们不是唯一漫不经心的海洋猎手。游钓者也来到了墨西哥湾，而且就在斯特恩斯正潜心成为鱼类学者时，他们的数量逐年上涨。他们对自然的索取是另一种方式——带着消闲、运动和特权的意味。他们也不是工薪阶层，他们是爱运动的那一群人。他们中打前阵的是银行家、律师、建筑师、商界领袖，以及这些人的妻子和遗孀。他们中有些人改革了美国经济。一个世纪后，一位从前是游钓向导的小说作家挖出了这段历史，了解到他们是如何，同样地，帮助美国认识了墨西哥湾，以及他们是如何，同样地，将这片水中花园采摘得寸草不生。

[1] Sidney Lanier, *Florida: Its Scenery, Climate, and History, with an Account of Charleston, Savannah, Augusta, and Aiken; a Chapter for Consumptives; Various Papers on Fruit-Culture; and Complete Hand-book and Guide* (J.B.Lippincott, 1876), 94.

[2] H.C. “Hank” Klein, *Destin’s Founding Father: The Untold Story of Leonard Destin* (Freeport, FL: Arturo Studios, 2017), 11-60.

[3] 英寻 (fathom)，测量水深的单位，1英寻=6英尺=1.8288米。——译注

[4] Wallace Stevens, “Some Friends from Pascagoula,” i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allace Stevens* (Vintage, 1990), 126-27; Lanier, *Florida*, 94; Edward King, *The Great South: A Record of Journeys in Louisiana, Texas, the Indian Country, Missouri, Arkansas, Mississippi, Alabama, Georgia, Florida, Sou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Kentucky, Tennessee, Virginia, West Virginia, and Maryland* (American Publishing Company, 1875), 406; Bernard Romans, *A Concise Natural History of East and West Florida*, ed. Kathryn E.Holland Braund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9), 185.

[5] Philip Lee Phillips, *Notes 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Bernard Romans* (Florida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1924), 124.

[6] Philip Lee Phillips, *Notes 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Bernard Romans* (Florida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1924) , 185.

[7] Michelle Honora Zacks, “From Table to Trash: The Rise and Fall of Mullet Fishing in Southwest Florid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 2012) , 29; Clinton Newton Howard, *The British Development of West Florida, 1763-176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40.

[8] Phillips, *Notes on the Life and Works*, 185.

[9] John Lee Williams, *The Territory of Florida: Or Sketches of the Topography, Civil and Natural History, of the Country, the Climate, and the Indian Tribes, from the First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Time* (A.T.Goodrich, 1837) , 25.

[10] “宪法号” (USS Constitution) 是美国海军自己生产的第一艘战舰，也美国战争史上的著名战舰，曾参加40多次海战，胜绩屡屡。“宪法号”的建造共消耗了60英亩林地，木材均取自南方缅因州和佐治亚州的松树和榲桲树，包括来自佐治亚州加斯科因海崖的南方榲桲树 (southern live oak)。——译注

[11] “Pensacola—A City of Manifest Destiny, ” *Stone & Webster Public Service Journal* (December 1908) : 382-86.

[12] 重建时期 (Reconstruction) , 指的是美国历史上1863年到1877年, 南北内战结束, 南方邦联瓦解, 奴隶制被废止, 美国解决内战遗留问题的尝试。“重建”需要解决的是南方分离各州如何重返联邦, 南方邦联领导人的公民地位, 以及黑人自由民的法律地位等问题。——译注

[13] 约翰·温斯洛普 (John Winthrop) , 英国殖民者, 曾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译注

[14] 罗杰·威廉斯 (Roger Williams) , 英属北美殖民地教士, 宗教自由的鼓吹者和罗得岛州的创建人。——译注

[15] 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and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 (Arc Manor, 2007) , 178.

[16] J.W.Collins, “Notes on the Red-Snapper Fishery, ”
Bulletin of the U.S.Fish Commission 6 (1887) : 299.

[17] *Makers of America: An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Work by an Able Corps of Writers*, vol.2, Florida ed. (A.B.Caldwell, 1909) , 360.

[18] 草原学派 (Prairie School) 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建筑风格, 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最为常见, 以水平线条、平坦或檐状屋顶、开阔屋檐、用水平条框统一起来的窗户、造型厚重、装饰简单为特征, 强调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19] *Makers of America: An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Work by an Able Corps of Writers*, vol.2, Florida ed. (A.B.Caldwell, 1909) , 360.

[20] Collins, “Notes on the Red-Snapper Fishery, ” 299.

[21] Jason T.Raup, “Fish On: Pensacola’ s Red Snapper Industry, ” *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85 (2007) : 327.

[22] Silas Stearns, “The Red-Snapper Fishery and the Havana Market Fishery of Key West, Florida, ” in *The Fisheries and Fishery Indust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ed.George Brown Good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7) , 591.

[23] 深南部指美国南部偏南的州份, 详见第四章脚注。

[24] “The Retail Markets, ” *New York Times*, January 7, 1883.

[25] Silas Stearns to Professor S.F.Baird, April 17, 1878, Silas Stearns Papers, John C.Pace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 Archives.

[26] 加那利群岛 (在大西洋上, 摩洛哥的西南方) 从1497年起成为西班牙殖民地, 现在是西班牙管辖下的自治区。因为西班牙的主体民族在伊比利亚半岛, 所以为了区分, 便将加那利群岛上的居民, 包括后来移民到美洲的群岛后裔, 都称为Isleño, 即群岛岛民, 而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裔人则称为 “peninsulares”, 即半岛岛民。——译注

[27] 亚拉巴马州从地图上粗略地看就是一个大矩形连带在左下角突出一个小矩形，这个突出形似伸出的小脚趾。亚拉巴马州只有那个小脚趾的范围是沿海的。——译注

[28] Stearns, “Red-Snapper Fishery, ” 553-54.

[29] William N. Lindall Jr. and Carl H. Saloman, “Alter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Estuaries Affecting Fishery Resources of the Gulf of Mexico, ” *Marine Fisheries Review* 39 (1977) : 1.

[30] Roy Bedichek, *Karankaway Country* (Doubleday, 1950) , 8; Clyde L. MacKenzie Jr., “History of Oyste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Featuring the Eight Greatest Oyster Estuaries, ” *Marine Fisheries Review* 58 (1996) : 59.

[31] 切萨皮克湾在美国东海岸中部。——译注

[32] Mark Kurlansky, *The Big Oyster: History on the Half Shell* (Random House, 2007) , 165.

[33] Mark Kurlansky, *The Big Oyster: History on the Half Shell* (Random House, 2007) , 47; Stearns, “Red-Snapper Fishery, ” 563.

[34] 英美计量干散颗粒物的容量单位，大约相当于8加仑或36.37公升。——译注

[35] Stearns, “Red-Snapper Fisher, ” 579, 580.

[36] John Steinbeck, *John Steinbeck Novels, 1942-1952* (Library of America, 2001) , 101.

[37] Jack Rudloe and Anne Rudloe, *Shrimp: The Endless Quest for Pink Gold* (FT Press, 2010) , 31.

[38] Martha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The Travel Writings of Catharine Cole*, ed. Joan B. McLaughlin and Jack MacLaughli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6) , 5.

[39] Bern Keating, *The Gulf of Mexico* (Viking Press, 1972) , 55; Rudloe and Rudloe, *Shrimp*, 37, 39.

[40] KirkMunroe, “Sponge and Spongers of the Florida Reef, ” *Scribner’ s Magazine* 12 (1892) : 640.

[41] “Ten Fathoms Down in the Gulf, ” *Florida Highways* 10 (March 1942) : 10-12, 14.

[42] 英文Tarpon Springs, 中文音译为塔彭斯普林斯。tarpon是大海鲢, 一种尤其受垂钓者喜爱的游钓鱼种, spring意为“跃出”。——译注

[43]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19; Zacks, “Prom Table to Trash, ” 129.

[44] Mike Davis,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October 28, 2011; Zacks, “From Table to Trash, ” 126; L.S.K., “Fishing in Florida, ”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1876.

[45] Zacks, “From Table to Trash, ” 87, 139.

[46] Leo Lovel, *Spring Creek Chronicles: Stories of Commercial Fishin’ , Huntin’ , Workin’ and People along the North Florida Gulf Coast*, ed.Ben Lovel (L.V.Lovel, 2000) , 17, 18.

[47] Jack Rudloe, *Time of the Turtle* (E.P.Dutton, 1979) , 100.

[48] Lovel, *Spring Creek Chronicles*, 11, 53; Leo Lovel, *Spring Creek Chronicles II: More Stories of Commercial Fishin’ , Huntin’ , Workin’ and People along the Gulf Coast*, ed.Ben Lovel (Spring Creek Restaurant, 2004) , 137.

[49] Rudloe, *Time of the Turtle*, 3, 7-8.

[50] John James Audubon, “The Turtles, ” in *Audubon in Florida*, ed.Kathryn Proby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4) , 352.

[51] John James Audubon, “The Turtles, ” in *Audubon in Florida*, ed.Kathryn Proby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4) , 352.

[52] Osha Gray Davidson, *Fire in the Turtle House: The Green Sea Turtle and the Fate of the Ocean* (Public Affairs, 2001) , 70.

[53] Corey Malcom, “Turtle Industry in Key West, ” *Sea Heritage Journal* 19 (2009) : 5.

[54] Audubon, “Turtles, ” 348.

[55] 英文Lower Forty-Eight, (美国的)下四十八州,字面意思指的是美国最北两个州(阿拉斯加及明尼苏达)以南的所有美国州,但更常用于表述不计阿拉斯加及夏威夷以外的美国,多为阿拉斯加州人使用,指阿拉斯加人视角中的美国大陆本土地区。——译注

[56] Joint Resolut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Food Fishes of the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22, 41st Cong., session 3, February 9, 1871, preamble.

七 降服海岸的野鱼



1914年克莉丝汀·B.M. 霍利 (Christine B. M. Hawley) 和她的154.5磅重的大海鲢合影。自19世纪末期，北方的有钱人开始到墨西哥湾来钓这种大海鲢，引爆了海湾的旅游业。

然后他会高明地将话题转移到深海怪兽上，然后谈起不可避免地要到尤斯帕岛，或者长礁岛，或者阿兰萨斯湾，甚至远到坦皮科去度假的可能性。

——理查德·萨顿 (Richard Sutton) (1924) [\[1\]](#)

你很容易会将兰迪·韦恩·怀特 (Randy Wayne White) 错认为是职业摔跤手。他有着肌肉发达的倒三角身材，头上理着选手式的适合电视竞赛转播镜头的发型。大块头、大肌肉，你这么想着，直到你注视他的双眼。那双眼睛分明是文学心灵的澄蓝之窗。怀特写过通俗的犯罪小说，小说标题强劲有力，比如《热血岛屿》 (*The Heat Islands*) 和《燃情坦帕》 (*Tampa Burn*)。他的小说背景通常是20世纪末的墨西哥湾海岸。在成为畅销书作者前，就在弗兰克·汉密尔顿

- 库欣一个世纪前考察过的那片具有历史意义的海上，他当了13年的游钓向导。

向导们通常都对他们所服务行业的背景故事略知一二，而怀特几乎了如指掌。他尤其着迷于墨西哥湾大海鲢的历史。大海鲢拥有和种马同样的品质，身体光滑，耐力强劲，它的重量有时能超过100磅，上了钩的大海鲢是凶猛的斗士，是猎手争相追猎的战利品。虽然已经坐了数千回的包船，但怀特对大海鲢的后空翻杂技表演从未感到厌倦。每一次表演都令人兴奋。同样令他兴奋的是，经过对历史的一番挖掘，他了解到了这一野生鱼类是如何在19世纪引爆了游钓业并从此改变了墨西哥湾海岸的。

作为有着一头纤发，在俄亥俄和艾奥瓦州的农场上长大的男孩，怀特看起来不像是会对海洋生物如此着迷的人。他在高中的时候，对棒球、橄榄球和跳板显然比对钓鱼更感兴趣。实在无处可去的独处时间，他会用来读书——他的最爱是马克·吐温、约翰·斯坦贝克、约瑟夫·康拉德和柯南·道尔。高中毕业后，他上了社会大学。他说走就走，去从未去过的地方，靠自己的才智讨生活。有一次，他在一个小农场上干活，农场主人是一对四处游历的夫妻，他们“盛赞”了萨尼贝尔（Sanibel），那是墨西哥湾上的一个障壁岛，他们说那里有热带色彩和野生动植物，更别提美妙的海钓了。1972年，怀特再次上路。他那时22岁，身体里住着自由的灵魂，想将自己停靠在从未见过的大海边上。[\[2\]](#)

他开着一辆1968年通用的三色皮卡——红色、白色和锈色——沿着墨西哥湾沿岸，一路来到了迈尔斯堡（Fort Myers）。驶过迈尔斯堡，再穿过萨尼贝尔的海湾，就是圣卡洛斯岛（San Carlo Island），他在岛上租了个房子，房子有点破，和它所在的捕虾码头一样，闻起来也满是码头上大海的味道。这位从小在一片农田的“海

洋”上长大的中西部人，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岛民，围绕在他四周的是盐沼、红树林、海湾、河流、峡湾、关隘，以及墨西哥湾。他当上了专线记者，供职于被当地人称为鲐鱼日用包装纸的迈尔斯堡《新闻报》。这是一段有重要意义的学徒时期，激发了他成为犯罪惊悚小说家所需的想象力。他日思夜想的游船码头也是一样。

怀特一直在找机会进入大海，如果有一艘属于他的船，那就更理想了。他通过了折磨人的海岸警卫队员考试，拿到了驾驶租船的船长执照，然后用东拼西凑的钱买了一只二手的小帆船，船有20英尺长，船身是经过打磨的白色玻璃纤维材质，有着“讨人喜爱的外形”。他在1977年开始当向导，一年有300天都在船上度过，收入也翻了番。他在大海鲢湾（Tarpon Bay）旁的一个游船码头上干活，那里是一个鱼群跳跃的河口，与其说是湖湾，不如说是个小河湾，它在派恩岛海峡边上，邻近萨尼贝尔岛的南端。在导游之余，怀特开始写作。在他周围，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他都找到了供他写作的素材。^[3]

如果他生活在切萨皮克或科德角，他绝不会错过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波瓦坦人和万帕诺亚格人、弗吉尼亚公司^[4]和清教徒^[5]这段严肃的历史。但在高中历史课本里，即使是佛罗里达的历史课本，也只字未提生活在派恩岛峡湾附近的卡卢萨人和试图在那里建立欧洲人在湾区第一个殖民地的庞塞·德莱昂。怀特意外发现这片阳光灿烂、鱼群欢跃的大海有这样特殊的历史，而且他的客户们也是其中的一环。他们想抓住大海鲢。人们对这种特殊鱼类的痴迷要追溯到90多年前，这激起了怀特的好奇心。他开始收集科学文献、旧的杂志和报纸文章，以及被遗忘的回忆录里有价值的部分，总之是任何与大海鲢有关的东西，他将为其拂去历史的尘埃。

原来第一条记录在案的用鱼竿和渔线钓起的大海鲢是1885年3月19日在一个闷热的小海湾上被拉上船来的，那个小海湾他曾带他的客户

去过。从事商业性捕鱼的渔民就是这一年在彭萨科拉湾发现红鲷鱼的。当时墨西哥湾的美国海岸上居住的居民还不到8000人。休斯敦和加尔维斯顿的人口就占了这个数字的一半，而坦帕，拥有落日景色的城市中数它最大，它的人口也仅有2375人。而迈尔斯堡，则没有出现在美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里。格罗弗·克利夫兰在两周前刚就职第22任美国总统，否则，他本也将成为在墨西哥湾海岸渔猎大海鲢的好手。

当我们说到美国海的形成时，大海鲢，和红鲷鱼一样，不得不提。被它吸引来到海岸的人，不是新英格兰人，而是纽约人，不是新移民，而是游客，这都是墨西哥湾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有一位来自哥谭镇的30岁的建筑师，威廉·哈尔西·伍德（William Halsey Wood），他是许多大型华丽的教堂和卡耐基图书馆的设计者，现在，那条具有历史意义的鱼咬住了他的鱼钩。他钓大嘴黑鲈很是成功，据说没人比他钓得多，但这次他决定钓一条大海鲢。他此行的装备有一只小划艇，五英尺长的一根竹竿，自己设计的250英尺长的渔线，一个大大的用鳕鱼作饵的0型鱼钩（环形鱼钩，和商业渔民用来捉红鲷鱼的鱼钩类似），一条鲱鱼，以及训练有素的耐心。鱼咬钩时，伍德没有马上提竿，他让渔线出溜了250英尺。这其实就是他的技巧：在收线前要给鱼足够的时间去吃它嘴边的饵食。大海鲢嘴巴内层像钢铁一样，几乎不可能被刺穿。它一旦感觉到拉力，就会试图摆脱那个令它感到不舒服的物体。应该让鱼钩钩住鱼鳃或者到达内脏的位置。我们不知道最后伍德的鱼钩到了鱼的哪个部位。但我们知道它奋力挣扎了26分钟，重达93磅，长5英尺9英寸。

当兰迪·韦恩·怀特读到这个起源故事时，那个跳出来的英雄并不是这位纽约建筑师，而是他的向导——约翰·史密斯船长，一个被晒得黝黑、身材结实、工作勤劳的船夫。他，就是十年后用“佛罗里

达号”单桅帆船载着手工艺品收集人弗兰克·汉密尔顿·库欣从蓬塔戈尔达一路到了马可岛的那个约翰·史密斯。严苛的库欣几乎没有留意到史密斯作为租船船长的能力，也许这并不公平，但伍德将史密斯作为向导歌颂了一番。在3月25日，伍德钓到了第二条大海鲢，然后在31日，又钓到了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都少不得史密斯杰出的相助。

据资料记载，史密斯是一个芬兰海员，在基韦斯特的暴风雨中遭遇海难，然后沿着墨西哥湾海岸到了蓬塔罗莎（Punta Rassa），克卢萨哈奇河（Caloosahatchee River）多沼泽河口处一处偏僻的平地。蓬塔罗莎就在萨尼贝尔的对面，自从成为西班牙殖民地后，它有过很多身份：渔牧场、美军军需用品仓库，积尘、泥泞的它也是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牛群放牧的终点。它未经驯化，就像得克萨斯州西部的牧牛镇一样，看起来十足就是一个牧牛区，除了它还有个放牛的码头。除此之外是牲畜围栏、牛棚、寄宿处、酒吧，以及想来也肯定会有的一一妓院。它充斥着世界各地的声音，你能听见初来乍到的被太阳晒成棕色的牛仔们挥着皮鞭噼啪作响的声音。你能闻到牛群的味道，听见金钱的响声，因为他们的交易使用的是硬币。内战时联邦军封锁了海湾，牛仔们宁愿冒险将他们的牛卖给古巴人换取金银，也不卖给邦联军去换他们没用的纸币。蓬塔罗莎将许多佛罗里达男人养成了具有西部特色的大块头地主。

它也是墨西哥湾海钓最初的滩头阵地。如果你不是赶着牛的话，而是坐船前往蓬塔罗莎，你首先看到的会是水岸边一个仓库大小的木结构建筑。它始于第二次塞米诺尔战争期间，建在码头上，屋顶是杉木板盖的，讽刺的是它的形状看起来像一个印第安人的冢堆。最近的一次，它被用来存放国际海底电缆公司的电报站。这里也是来此钓鱼和捕猎的北方冒险家们的地盘。借宿在这里的游客们将它称为“营房”，从这名字里就能知道这个住宿地方的状况——斯巴达式的清苦

但讲究秩序。史密斯就在这里工作。通常向导会兼职当商业渔民，但史密斯不是，他是电缆公司的厨师（库欣赞赏了他的厨艺）。[6]

一次飓风过后，蓬塔罗莎几被夷为平地，史密斯于是搬到了派恩岛，一座被卡卢萨人用贝壳抬高了的障壁岛。怀特入了向导的行当后不久，也跟随前辈移居到了派恩岛上，住在印第安冢堆上的一间老房子里。数千年来人们都在这个隆起的冢堆上讲着故事，怀特喜欢这种感觉。

伍德的胜利很快就传开了。在他钓上来第一条大海鲢之前，让美国的钓手先生、钓手女士们兴奋的一般是大西洋鲑鱼、鲟鳇鱼、婢鲈和黑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能有一条大海鲢的四分之一重，那就能称得上战利品了。伍德手上93磅重的捕获物还只是小的，大的可以达到280磅重，8英尺长。但无论尺寸如何，都是一场好戏。“全世界多数的钓鱼人都认同，”一本垂钓向导手册的作者写道，“大海鲢腾空的身手、它的力量和强大的心脏使它成为轻钩钓鱼者的终极之选。” [7]

虽然你能在外海开阔的水域里抓到更大的鱼——蓝鳍金枪鱼或马林鱼——但伍德时代的这个运动项目多数会将深海留给商业渔民。在机动快艇被广泛应用之前，外海里的鱼无论大小并不受欢迎，人们也不会感到兴奋，因为那不是能轻易到达的地方。大海鲢会在春夏游进海湾、峡湾、关隘和河流。钓上一条大海鲢就是钓起了一条深海鱼，却不需要你到深海去。

这完全就是为了消遣。大海鲢的鱼肉里都是难以清除的小根鱼刺，几乎无法食用。但与一个有力的对手战斗，能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可以站在被从鱼鳃钩起的大鱼边上摆出胜利的姿态留影，越来越多这样的时刻被保存下来并展示在一面照片墙上，理所当然地可以拿来吹嘘一番。“我讨厌看到这些银色的庞然大物躺在码头的尘土

里”，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他经常和海明威在基韦斯特钓鱼，“是绝对的虚荣心捕住了大海鲢”。[\[8\]](#)

早前，人们对这种梦寐以求的游钓鱼种仅有的信息来源只是海钓爱好者和他们的向导们，而且这些故事中不乏传说。所有人都以为是生物的本能驱使它们游到近岸产卵。当生物学家们终于对这种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1300万年的古老鱼类展开研究时，他们发现，墨西哥湾的大海鲢在开阔水面产卵，主要是坎佩切湾以及佛罗里达西南方向的外海上。

和鳗鱼这位有一两次洄游习惯的表亲一样，大海鲢的幼体时期会持续几年时间，幼体大海鲢长得也像鳗鱼，手指般的长短，体形瘦长，呈半透明状。风暴和洋流可以轻易地将幼体运送到河口区，它们在水草和红树林的掩护下成长为年少个体，此时它们的外形已经是成年个体的缩小版。大海鲢对海水的咸淡值有非常高的容忍度，成年个体会离开深海，在繁殖周期游向近岸，甚至为了猎食更小的鱼而溯游到江河。它们通常在下层水域寻找食物，尤其喜爱虾，但也会拣食螃蟹和它美味的老朋友鲮鱼，但鲮鱼看似躺卧在水草上，实则暗藏鱼钩。大海鲢有一张夸张的充满机械感的大嘴和一个突出的下颌——这个身体结构组合能为掘土机的设计带去灵感；大嘴一张，能有整个鱼身那么长。鱼身本身是长长的圆柱体，体背蓝中透绿，体侧铬黄，泛着金属质感。一对胸鳍似是轻盈的蝴蝶落在了鱼身上。[\[9\]](#)

因其光泽、速度和威严，大海鲢获得“银色帝王”的称号。它的鱼鳞有银圆般的形状和光泽，常被从鱼身上移除并作为纪念品保存，有时也当作服饰珠宝出售，或者印上姓名和号码做精致花哨的名片。在很多游钓旅舍里，钓手们会将它们钉在大厅或餐厅的墙上，并在上面写上他们的名字和捕获日期，直到其数量已经难以被墙纸负荷为止。在得克萨斯，有这样一片上面写着：“5英尺1英寸。77磅。富兰

克林·罗斯福1937年5月8日于阿兰萨斯港。”在大海鲢的鱼鳞后面、鱼身的里面，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组成部分——上面覆满了血管的鳃，和陆上动物的肺一样，是用来输送氧气的。生物学家称大海鲢是一种专性空气呼吸的鱼，意味着它必须定期浮上水面吸收氧气。它呼吸时会打转。所以如果就在附近，游钓者就知道应该在哪里下渔线了。

[\[10\]](#)

大海鲢的身影出现在从弗吉尼亚州到巴西的大西洋，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的西非海岸，也总叨扰东南亚、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浅水和深海。“它真正的家，”一位英国垂钓者在19世纪90年代写道，“无疑是墨西哥湾。”这也是当时他所在的游钓圈子里人们的普遍看法。

[\[11\]](#)

游钓兴起时只是一项在淡水上进行的活动，许多人也会将游钓的历史起源与另外一位英国人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联系起来。沃尔顿是一个伦敦商人，他在退休后住进了英国乡下邻近密斯河的一间茅草顶的农舍里，并开始对垂钓产生了热情。他也将写作当成他的第二事业，后来写了一系列对文学体裁产生了影响的短篇传记。他的第一本书《钓客清话：沉思之人的消遣》（*The Compleat Angler, or Contemplative Man's Recreation*）[\[12\]](#)在1653年出版，奠定了他作为游钓之祖的地位。

如果当时有畅销书排行榜，《钓客清话》肯定榜上有名。这本书最后历经了300次印刷，它或沃尔顿在柯勒律治、狄更斯、儒勒·凡尔纳、托马斯·哈代、赞恩·格雷、诺曼·麦克林恩等众多数不胜数的大名家作品中都出现过。《钓客清话》是一部永不过时的渔钓策略书，是沃尔顿为读书之人写的渔钓指南。它包括诗歌、散文和寓言；它甚至有一个主角——渔夫——作为渔钓权威在书中发声。

“angle”一词意为“鱼钩”，可追溯至古英语。征服者威廉在11世纪离开诺曼底，冲过英吉利海峡后，他给英国带来了城堡、封建制度，以及飞蝇钓。最早关于消遣性渔钓的书之一，也是第一本由女性作者所写的书，出现在1498年：朱莉安娜·伯纳斯（Juliana Berners）的《关于使用鱼钩捕鱼的论述》（*Treatise on Fishing with an Angle*）。伯纳斯的背景有点神秘，难以分辨资料来源是否可信。一些说她是英国最早的诗人之一，其他的又说她是一位虽隐居但深谙世事的女修道院院长。最吸引人的一种说法是她是个美丽聪慧的女人，爱情令她忧惧，于是她将全副精力投入户外运动中。也许以上都不是她，也许都是她。她也很有可能是第一位使用英语出版的女性。在已知的户外运动书籍中，包括打猎、鹰猎和渔钓领域，她的作品是英语世界中最早出现的。

这些活动本是绅士们追逐的游戏，结果他们中很多人的信息竟是来自一位禁足于男人特权世界的修女或说女诗人。150年后，伯纳斯的书又成为沃尔顿珍贵的学习资料。她的论述解释了如何造鱼竿，如何绑蝇饵，以及哪个季节哪一种鱼适用何种钓饵。它将渔钓的重要性上升到了比肩其他户外运动（比如猎狐和猎鸟）的地位。

伯纳斯同样传达了作为垂钓人应具备的忍耐力和资源保育意识。“当你有足够的食物，你不应贪图更多，”她写道，“尽你所能，让你的猎物繁衍生息。”五个世纪后，国际钓鱼运动协会称她的保育准则“惊人地体现了现代思想”。^[13]

渔钓主要是给那些有社会地位和时间“只钓鱼，以及谈论鱼和捕鱼”的人做的，沃尔顿这么写道。大不列颠的地主贵族是控制了林地的少数人，他们将猎狐和猎鹿当作他们阶层自己的娱乐活动，不允许农民涉足其中，工人虽然可以进入，但也严禁随意射猎。贵族也或多或少地规定了哪些人可以在哪些水域钓鱼。而在大洋彼岸的英属美洲

殖民地上，定居的大多数英国移民并不属于旧地主阶级，于是他们坚定维护自己从前被否决的自由。消遣性渔钓和射猎在美国与土地私有联系在一起，被赋予了神圣的民主符号。掷下鱼饵，就是在用另一种日常的形式向世袭特权说不。枪炮和鱼竿消除而不是划分了社会阶层；英国贵族的消遣成为美国全民的消遣。更重要的是，自由派土地上的河流和湖泊都鱼群腾跃。[\[14\]](#)

然而，渔钓的魅力远不止于挂满一钩链的鱼和证明垂钓人有胜鱼一筹的技巧。有人将他们的战斗称作艺术。沃尔顿将其比作诗歌。其书的副标题“沉思之人的消遣”，揭示了一个珍贵的真相：钓鱼，就像艺术，是一种情感上的逃离，一次洗涤心灵和审视内心的机会。它意味着独处，即使有伴亦然。两个垂钓人坐在同一条船上，或站在同一条溪流里，他们都不成其为伴。“垂钓人都是美德的热爱者，”沃尔顿写道，“安静钓鱼。”1878年，一位常在户外活动者从墨西哥湾给费城的家人写信说，钓鱼就像一种有效的专利药。“在钓鱼上获得成功能给心灵带去巨大的满足，驱散腐蚀人心的思虑，激起内心深处的喜悦，鼓舞倦怠的神经，促进消化。”[\[15\]](#)

优点还体现在环境的优美上——沉浸在户外的气味和声音中，闪耀的天空和波光粼粼的水面，奔腾不竭的溪流，透亮的不起一丝涟漪的湖泊，在这样的时光交融的时刻，在美丽无瑕的和谐中，与不朽世界的联结显得如此真实、如此私密。进入19世纪后，渔钓还几乎没有跨出过淡水溪流和湖泊的界限。对垂钓的绅士们而言，钓海鱼听起来是在结实手臂上刻着粗糙文身的渔网拖运工们的事情。终于，海湾、长沼和峡湾里鱼儿们的活力四射俘获了他们的心。许多人将他们新发现的娱乐活动称为蓝海渔钓。

名义上的海钓之父是另外一个英国人，亨利·威廉·赫伯特。他在1831年被驱逐出境，原因不明，有人说是因可耻之事，总之赫伯特

在24岁的时候移民到了纽约。熟人和同僚眼中的他自以为是、傲慢自大，无可救药地显示自己高贵的家族血统（一个伯爵爵位）。他常怒气冲天，这似乎让他的及肩头发和威严的胡须都更蜷曲了起来。这导致了他的离婚、流放和自杀。然而，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的成就的。他创立了《美国月刊》，虽然他与常人相左的行事使他很早就离开了杂志社。在他到北美后的三年里，他出版了一部小说，之后又出版了些别的作品，但无一被国内文学界看好。

在某个时刻，赫伯特开始在纽约港和周边的河口区钓鱼。这些地方的水域开始不堪都市发展的重荷，他是早期发声提出渔业保护的人。不过他依然设法钓起了一些相当大的鲑鱼、鲱鱼和条纹黑鲈。三不五时地，西奥多·罗斯福的叔叔罗伯特会加入他，两人一起出游渔钓。和他的性格相一致的是，赫伯特对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有优越感，他坚称海鱼“无一例外是最强壮、最勇敢的，因此，与之相应，海钓作为最好的运动也名副其实”。完成了一天的捕鱼后，他会让自己坐在最爱的酒馆里喝一杯，然后忘形地吹嘘一番自己战胜了那些强壮的和勇敢的鱼。[\[16\]](#)

赫伯特的钓鱼故事也是站得住脚的。它们为他的遗作《美国和英属北美各省的鱼和渔钓》（*Fish and Fish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ritish Provinces of North America*）奠定了基础。书在1849年出版，是美国同类书籍中最早的一部，它的内容更多是指引性的操作指南，而非思考类专著，主要分类汇编了作者与全国各地渔钓者的来往函件，来信者各自阐述他们捕钓到了什么以及如何做到的。和《钓客清话》一样，赫伯特的《鱼和渔钓》是为未来游钓留下的一部力作。

令人惊讶的是赫伯特在书中没有提到墨西哥湾，虽然当时距离海湾迎来第一批钓客还有些时日。东北部的钓手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

觅新的钓鱼点，他们急切地等待着蒸汽班轮和贸易船带来的消息，因为它们的船员有机会在别的水域上抛下鱼钩试试水。约翰·詹姆斯·奥杜邦曾在1826年从新奥尔良乘船去利物浦，在他的航行日记里他观察到“提洛岛号”的船员们，包括船长，都手拿鱼钩和渔线，钓上来很多跟着船游的鱼，包括鲱鳅，它“像铮亮的金子一样在船边滑过”。[\[17\]](#)

实际上，墨西哥湾上第一个消遣性的游钓客可能是水手。也可能是蜗居在岸边的一个居民，虽以钓鱼为生，但从中体会到了一点乐趣。也许是一个来密西西比海岸体验矿物温泉浴的中西部人，一时起意要试试钓鲷鱼和鲭鱼。又或许是一个在沙岬碧水边冥想的亚拉巴马人，而其所在又恰好是莱昂纳德·德斯坦开始商业性捕鱼的地方。这里的鱼群大量涌入，到了20世纪中叶，德斯坦所在的小镇汇集了全国数一数二的游钓船队，于是小镇自称其为“全世界最幸运的渔村”。商业性港口多样化发展是再正常不过了。比洛克西、塔彭斯普林斯、加尔维斯顿、阿兰萨斯港、伊莎贝尔港、萨拉索塔都有船、有专家，也有鱼。他们缺的是游钓客。

查尔斯·哈洛克（Charles Hallock）——一个贵族，而非水手——在将游钓客带入海湾一事上也有责任。作为来自纽约市都市峡谷里的枪杆玩家，他出版了17本书，发表杂志文章数百篇，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他在推广户外运动上的贡献。他在1873年8月创办了《森林和溪流》，目的是“培养男士和女士们对自然的爱”。印刷业的技术革新使连载刊物的生产成本下降，铁路的普及又为杂志销售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更不用说垂钓客了。逐渐扩大的有闲阶层希望被告知哪里可以一试鱼钩和子弹的逍遥，当他们自己无法前去时，他们希望故事能将他们带去。哈洛克开始有了固定的读者，很快他就应邀推出了其他的连载作品：《野外运动》（*Sports Afield*）、《户外生活》

(*Outdoor Life*)、《美国垂钓客》(*American Angler*)、《田野和溪流》(*Field and Stream*)。[\[18\]](#)

作为一个继承了家族财富的英国殖民地居民，哈洛克自有冒险的资本。他在东部和中西部的溪流里钓鳟鱼，在太平洋海岸的河流里钓鲑鱼。北极的冰层里也有他留下的渔线，他后来又打包了他的鱼竿和枪支去了佛罗里达。他在人烟稀少的半岛上打猎、捕鱼，根据他同时代人的记述，猎物“非常丰盛，足以让这位渔猎好手酒足饭饱”。墨西哥湾的海岸吸引住了他。他说，这是“上乘的诱人土地”，这里的“河湾没有尽头，海滩开阔，有岩石嶙嶙的珊瑚港”。他对查尔斯·肯沃西(Charles Kenworthy)说了这些，对方最近刚从北部南下搬到杰克逊维尔，就为了能离户外运动场更近一点。哈洛克让肯沃西在海湾上一边探索娱乐项目，一边给杂志写稿。肯沃西一开始就目标明确：“我们一直都主张西南海岸的优点有必要让大家都知道且欣赏。”[\[19\]](#)

这位外派通讯员投入了工作。他在新泽西州买了一只21英尺的单桅帆船，将它运到萨瓦纳(Savannah)，从那里驾船航行到费南迪纳(Fernandina)，然后将船装载到平板货运火车上并运往锡达礁，几个月后也是在这条轨道上，将迎来正在做旅行见闻讲演的西德尼·拉尼尔。肯沃西一路巡航了海湾、小湾和岛屿，往返锡达礁和基韦斯特，在3月到6月的旅程中，一共写出了12篇通讯稿。肯沃西肯定“老艾萨克·沃尔顿的拥趸们”理所当然地会对墨西哥湾感到满意。他总结道，这里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20\]](#)

最当得起这个描述的是他最后到访的地方，佛罗里达的霍莫萨萨泉(Homosassa Springs)。“我们在霍莫萨萨停留了一周，发现在这里只有一件烦心事，”他说，“那就是我们不得不离开了。”霍莫萨萨位于从锡达礁去往塔彭斯普林斯的半道上，附近有一座500人的村

落，泉水与它流入的河流同名，霍莫萨萨榭树成荫，银灰色的松萝凤梨面纱似的覆于其上。荒野和文明在这里无碍交融。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时会从野生动物们的通道上经过，动物们也会在马车路上留下足迹。历史上西班牙人带来的柑橘在矮树丛中生长，那里还有当地人培育的桃子、梨子、无花果和番石榴。[\[21\]](#)

在北方的户外爱好者南下前，发出啁啾声的鹤群在冬天来到了这里，同行的还有一群熙熙攘攘的鹈鹕、苍鹭、鸮、鸬鹚、鹤和美洲蛇鸟。这些捕鱼者的出现从来都是一个好信号。带上“足够多的有力的鱼钩和渔线”，肯沃西建议道，“渔夫”会发现“竹荚鱼、鲑鱼、鲈鱼、红鲈、石首鱼，还有红的黑的石斑，数不胜数，在河底悠然自得地游着”。肯沃西本可以加上大海鲢，但“钓竿守卫者们”当时还没有掌握捕捉这种难以捉摸的对手的秘诀。[\[22\]](#)

世纪交接的时候，霍莫萨萨成为东南部极受欢迎的渔钓目的地。肯沃西的通讯稿为它在美国国内带去了不小的曝光量。他，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向导和杂志作者，赞扬霍莫萨萨有“家一样的舒适，出色的住处，上乘的餐桌，干净整洁，还有极好的气候”。格罗弗·克利夫兰为他自己和他的渔伴们在河边修了一座隐居寓所，后来，温斯洛·霍默的名字也出现在了当地一家公寓的登记簿上。[\[23\]](#)

那是在1904年年初。冬天来临时，霍默会离开他在缅因州的家，到大西洋上的热带岛屿去。他既是去试试钓蓝鳍金枪鱼的运气，也是去寻找艺术创作的灵感。12月，当他正浸淫在基韦斯特的温暖中时，他突然很想到墨西哥湾海岸上试试钓鱼，这样既能消遣，也能创作。在霍莫萨萨的激发下，霍默完成了11幅水彩画。最为著名的是《黑鲈》。在画的中间，一尾漂亮的黑鲈在半空中战栗着，它试图要吐出垂钓人下的饵钩，黑鲈的宽鳃闪耀着朱鹭似的猩红色。河水清澈，倒影浓密，河岸线就在不远的后方，河岸上生长着本地的菜棕和其他

“密林”植被。天空盘旋着一只鹰或鸮，它们是墨西哥湾最常见的猛禽，又或许是一只兀鹰，它常出现在霍默的作品中，象征着不可避免的死亡。

黑鲈是户外爱好者的田园牧歌。“这里的气候令人愉悦，”霍默给在普劳茨狭地（Prouts Neck）家中的兄弟亚瑟去信时说，“像我们的9月一样凉爽。”他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于第二年返家，然后1908年又来了，1909年是最后一次，因为此后他罹患了中风。他在后来的到访中没有再画画。他只是一个垂钓者，沉浸在被他认为是全美国最好的渔钓体验中。[\[24\]](#)

还有其他类似的话描述了从佛罗里达到得克萨斯一带的墨西哥湾上的渔钓僻静处。垂钓客回到家后会说起大海的遥远、热带的宁静、天堂般的岛屿，以及力量悬殊的较量。大鱼的故事不全是吹牛。你尽可以在水里扔下一个生了锈的饵钩，也会有鱼来咬钩。华莱士·史蒂文斯在海湾上时，当地人告诉他水里的“鲛鱼成群结队”，到处都是。和霍默一样，佐治亚诗人西德尼·拉尼尔从前也是个大西洋的拥趸，直到他来到墨西哥湾。无边无际的大海震住了他，而他不是一个爱钓鱼的人。“光是如此多样，这些鱼就足以令人赞叹。”[\[25\]](#)

最令墨西哥湾的狂热爱好者称赞的是大海鲢，但在拉尼尔提笔的19世纪70年代，它还没上垂钓客的钩。但海钓客们还是着了迷。他们非常清楚这种闪着金属亮泽的鱼的存在。他们想象着用鱼竿和渔线与它搏斗是种怎样的感觉。有人认为“没有人有那么强壮，可以抓住大海鲢”。其他人见到过一些抓捕的成功案例——但不是用鱼钩，而是鱼叉，用长绳绑在一只漂浮的木桶上的鱼叉。旁观者坐在一只小船上，头晕目眩地看着被鱼叉叉中的鱼不停地从水里弹跳到半空，这样过了半个多小时后，将自己活活累死。有时那根长绳会被绑在船首，户外作家詹姆斯·亨歇尔（James Henshall）在马可岛附近亲眼见

过。“小船就像一只鸟蛤壳一样被大鱼拖着打转……直到它激烈的抗争和大幅度的跳跃对它产生作用。”[\[26\]](#)

然后威廉·哈尔西·伍德成功钓起了一只大海鲢，《森林和溪流》报道了这则不可思议的消息，伍德此次捕获所用的鱼竿、绕线轮和渔线被展示在纽约富尔顿街的J.R. 康罗伊渔具商店里，四个街区之外就是受污染的东河。而南部的原始海湾将迎来改变。

在兰迪·韦恩·怀特的犯罪小说里，大海鲢的形象通常是这样的：“它们多数有六英尺长，疯狂地翻滚、俯冲，深吞一口水面的空气，然后一跃而上，口中吐着气泡，它们大大的马眼生动鲜明，但不见丝毫感情，作为远古时期的鱼类，它们意志坚定、行为狂野，但就像一束光线，它们不会思考。”这是《萨尼贝尔平原》（*Sanibel Flats*）里的旁白。小说主角是福特博士，一个前中情局探员和海洋生物学家。福特没有设法从中美洲恐怖分子手中救出他已故友人的儿子，他当时在研究大海鲢。[\[27\]](#)

在虚构鱼的事实来润饰小说的同时，怀特也为真实的大海鲢找到了展示的途径。他的一位朋友卡琳·弗雷德里卡·布伦南（Carlene Fredericka Brennen），也是银色帝王的爱好者和作家，在征得怀特同意后，将她多年搜集到的材料聚集到一起，包括她自己的一些，出版了《兰迪·韦恩·怀特的大海鲢终极全书》（*Randy Wayne White's Ultimate Tarpon Book*）。全书共406页，由怀特作序，汇集了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的报纸和杂志文章，以及200多张黑白照片。他们选取的文章和语句，都写自和渔钓有关系的名人：赞恩·格雷、托马斯·爱迪生、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哈尔西·伍德。他们发现了一颗属于棒球名人堂成员泰德·威廉斯的宝石，威廉斯曾经制作了一部关于捕钓大海鲢的电影，并在佛罗里达礁岛群上创立了一个大海鲢锦标赛，在其中赢了几回比赛。“一种有活力、有激情的、

迎难而上的一一唔，总之是动人的、令人为之惊叹的鱼”，威廉斯如此说道，他还参与创作了一本关于他钓大海鲢的书。少有游钓鱼种成为如此多书的主题。[\[28\]](#)

第一本出自弗兰克·平克尼（Frank Pinckney），出版时间在游钓运动兴起的三年后。但当时最著名的一本书是出版于1911年的《大海鲢书》（*The Book of the Tarpon*），作者是安东尼·韦斯顿·迪莫克（Anthony Weston Dimock）。身材瘦长、胡子密匝的迪莫克是海湾垂钓客中盎格鲁-撒克逊系的白人新教徒[\[29\]](#)的原型。他毕业于一流学府，赢在了起跑线上，年纪轻轻就在华尔街取得了成功，在黄金市场上挣了不少钱。读他的书时你能感觉到作者的自豪感。他清楚自己的优势，于是用它来在全世界周游历险。他和科曼奇人赶野牛，和肖松尼人追灰熊，和塞米诺尔人猎鳄鱼、海牛，“跟着其他荒野人民一道”巡航扎寨。他的儿子朱利安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天才摄影师，常常背着笨重的大画幅相机和明胶溴化银玻璃干板出现，用千分之一秒的曝光时间捕捉野生生物的瞬间。那本大海鲢书就收录了朱利安的92张黑白相片。[\[30\]](#)

这是迪莫克唯一一本以单一动物为主题的书。他的开篇故事讲的是咬了他的钩的一条大海鲢，这个故事的发表时间比伍德的早了三年。迪莫克从霍莫萨萨河顺着“洋流席卷”的方向进入海湾，拖饵而钓，他雇了一个黑人向导，书中只提到他叫泰特。黑人向导在佛罗里达西南部很常见，很多都是商业渔民，知道如何隐忍他们客户（包括北方客人）划下的肤色界限，比如说把泰特当家仆对待的迪莫克。咬了钩的大海鲢最终还是逃走了。迪莫克本想用鱼钩将它拖上来，但在鱼的抵抗下，他一个后翻掉进了水里——一次湿了身的失败冒险，为此他将泰特责骂了一通。骄傲的迪莫克写道：“我认为我渔线上的这条大海鲢才是人类钓上来的第一条大海鲢。”[\[31\]](#)

迪莫克或者伍德——获奖者的名字并不重要。爱好渔钓的布尔乔亚们正等着这样的鱼钩和小船的出现，是谁并不重要，只要上钩的是大海鲢。第一条大海鲢被钓起来后，《森林和溪流》中的一篇刊文说到如果艾萨克·沃尔顿抓到了一条银色帝王，他定会为它留一个章节，那《钓客清话》就“不仅是完整那么简单，而是完美了”。《伦敦观察家报》有感于向来无畏的英国垂钓客，预测道：“探险家们或许很快就会朝着佛罗里达的大海鲢进发了，就像他们现在到北极区猎驯鹿、海象和麝牛一样。”^[32]

大海鲢很快就被加冕为银色帝王。韦氏词典在它接下来的版本中加入了“大海鲢”一词，户外作家称呼起它来也是毕恭毕敬：“无双的君主”，“阁下”，“高贵之鱼”，“强大、勇敢的银色帝王”，“EL Sabalo”（“大海鲢”的意思）。眨眼间，这个新兴的游钓鱼种，正如一位户外作家所说，“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游钓对象”。当然了，这都是夸张的说法。或者，真是如此？^[33]

正如鳕鱼带动了新英格兰的码头作业，“无双的君主”也带动了墨西哥湾休闲海岸的发展。铁路和蒸汽船航线重新瞄准他们的目标：新兴的大海鲢游钓客。他们投放的广告上都是出游行程和度假寓所的价目表。交通航运业的业界大亨H. B. 普兰特（Henry B. Plant）让出行更简便了——比去北极区驯鹿的故乡要容易得多。秉承着一贯的揶揄客^[34]做派，这位银发的康涅狄格新英格兰人多年来抢先收购这一带濒临破产的铁路公司，将新轨道从杰克逊维尔一路铺到半岛的西边，而亨利·弗拉格勒（Henry Flagler）则往东开发。这两条线路都沿着柑橘和越冬蔬菜南向发展的轨迹走，但这亦敌亦友的两大巨头，同时也沿着铁路线为来此过冬的北方人——有钱的那些——建起了度假酒店。机缘巧合，普兰特开通了第一条去往坦帕的铁路线，而时间刚好就是伍德点燃了游钓世界的那一年。他还耗资300万美元建了一家旅店，旅店提供了镀金时代^[35]该有的安逸舒适，内设电梯、电灯、

电话（这些在佛罗里达都是首次亮相）、私人浴缸、保龄球馆、跑马地，以及赌场。无论是坐船还是坐火车，你到达坦帕首先看到的就是旅店的六座银灰色摩尔式的尖塔建筑，处处彰显着酒店的奢华。

然后在一次不那么巧合的情况下，普兰特决定要穿过亚热带灌木和湿地，向南开辟出一条通往蓬塔戈尔达的铁路线。这一次，是1888年，蒸汽动力第一次滚滚而来，随着火车停下时蒸汽释放的一声“长叹”，他已经为垂钓客们备好了住处。安妮女王式的蓬塔戈尔达酒店有150间房，俯瞰夏洛特港。向导们也在等候了。搭乘几个小时的蒸汽船或单桅帆船，就可以到达最好的大海鲢海钓点。普兰特自己，《迈尔斯堡新闻报》观察道：“拿捏起渔线来和他应对铁路线一样拿手。”在1897年的田纳西州百年纪念暨国际博览会上，他展出了当年4月他在克卢萨哈奇河捕到的一条150磅重的银色帝王。[\[36\]](#)

他是在标准石油[\[37\]](#)的百万富豪安布罗斯·麦格雷戈（Ambrose McGregor）和其妻子托蒂的游艇上抓到这条大海鲢的。麦格雷戈夫妇也是这里的季节性居民，他们在迈尔斯堡的克卢萨哈奇河边上有一座房子。他们的邻居是托马斯·爱迪生和他的妻子米娜，而在他们的房子隔壁，就是亨利·福特（这个名字被怀特借用来做他连载小说的主角名）的冬季寓所。在伍德钓起大海鲢的那一年，爱迪生夫妇从蓬塔罗莎的一个牛牧场主那里买来一片13英亩的土地，在上面盖房子和实验室，并将住所命名为塞米诺尔小屋。在屋后，他们增建了一个码头，一直延伸到奔流清澈的河水中。爱迪生夫妇对大海鲢有强烈的兴趣。他们为客人备好了划艇和电动汽艇，还有待命的船夫，以及充足的鱼竿和用具。大海鲢的海钓鱼竿是为他们自己预备的。“全世界最棒的大海鲢渔钓点就在我家门前”，得克萨斯的一位商人邀请他前去另一个海岸钓大海鲢时，托马斯如此回复道。“有如此多的大海鲢和其他鱼群涌到了这个浅浅的河里来，以至于它的水面每一季都会上升11英寸。”[\[38\]](#)

“所有人都在谈论大海鲢”，《森林和溪流》在佛罗里达西南部的一位通讯记者说。“大海鲢”被漆在无数船只的横梁或船头上，普兰特船队的一艘双推进器的蒸汽船也不例外，其航线连接了墨西哥湾上的莫比尔和哈瓦那。佛罗里达大沼泽地（The Everglades）也有一个大海鲢湾，不要和伍德钓鱼那个大海鲢湾混淆了，伍德这个大海鲢湾北岸在两年后建起了一个村庄，就是塔彭斯普林斯。蓬塔罗莎的“营房”也有了全新的大名，叫作大海鲢旅舍。其他旅馆很快就会来跟它抢客人了。[\[39\]](#)

多亏了伍德、史密斯和他们93磅的猎物，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几乎所有都来自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北部。在南下之路上，男士们换下了他们的羊毛西服，穿上了亚麻夹克和宽松的便裤，女士们的衣服也轻了三分之一多，裙子也越发短了起来。大海鲢旅舍在派恩岛的最南边，在那里史密斯的向导生意正做得风生水起，在海湾的另一头，来自缅因州和加拿大的一群投资人划出了圣詹姆斯城的地界。他们引进了酸橙和柠檬树、菠萝、香蕉、番石榴和成千的椰子树，计划在那里大兴农业。引入这些植物也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为这个布满灌木的岛增添热带风情。

沿着一条雪白贝壳铺就的道路开到尽头，就是圣卡洛斯旅店。旅店有三层楼，50间客房，一间酒水间，还有能容纳100人的餐厅。在一楼有一条长长的绿荫遮蔽的走廊，服务生在上面摆了一排摇椅，客人可以坐在上面吸烟、阅读，或者互相交换名片和大海鲢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在谈论那个鱼，”一位房客说，“希望着、期待着、渴望着，或是害怕自己不能抓到它。”那些希望时时刻刻都待在水边的垂钓者会选择入住凯普蒂瓦旅舍，它是一座漂浮在圣卡洛斯湾边上的建筑物，有21间客房。它的下锚地在凯普蒂瓦（Captiva Pass）和博卡格兰德峡湾（Boca Grande Pass）间轮换，房客们赞叹它是“全世界最棒的大海鲢海钓水域”。[\[40\]](#)

约翰·罗奇在1894年买下尤斯帕岛（Useppa Island）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作为芝加哥一家有轨电车公司的主席，罗奇对地理位置这件事略懂一二。尤斯帕此前有一段历史，它就是何塞·马里耶·卡尔德兹的渔牧场所在的小岛，当时它还叫何塞法岛。对罗奇来说，更重要的是，它能同时快速到达博卡格兰德峡湾和凯普蒂瓦峡湾。他盖的尤斯帕旅馆有三层楼，外墙漆成白色，从旅馆能看到派恩岛峡湾上的峭壁，远处就是墨西哥湾，此外旅馆提供不错的客房，还有一个技艺精湛的大厨，它很快就受到客人的追捧。广告业的富豪巴伦·柯里尔，他曾购买并出售罗奇有轨电车上的广告位，也曾聘请过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广告文案，他在1911年以1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间旅馆。他将第三层扩大，加建了有圆形柱子的门厅，以便显示与其客人身份相称的奢华和独特。唯恐被人认为这间度假旅馆正失掉它的优势，他将其名称改为大海鲢旅馆。俱乐部厅的墙上嵌着樺槽，上面闪耀着圆形的鱼鳞，这些都出自旅馆客人们的捕获物，也就是被他们奉上神坛的大海鲢。

客人们在尤斯帕的一天开始得很早，服务生在破晓前将他们唤醒用餐，早餐是丰盛的鸡蛋、培根和西柚。在旅馆码头上，其中一只烧木材的蒸汽艇，“瓦里玛号”或“艾卓号”，正等着将客人们送往其中一个峡湾，那里是大海鲢去往河口觅食的大通道。等小艇迎着升起的太阳上路时，停在浅滩上的涉水鸟此时已经开始捕鱼了。这样的景色应该被相机定格下来：锅炉的黑烟从玩具船一样的烟囱里袅袅升起，黑烟拖出的一束尾巴划过大得惊人的英国国旗后，往后面被拖行的无人船队飘去了。

这种蛇形组合是海钓兴起后的产物。蒸汽艇下锚后，每位客人分别和各自的向导爬上他们自己的小船，小船有8~18英尺长；然后拖绳就会被解开。向导会将船划到银色帝王堆里去，或者去到它们可能在附近游荡的红树林带。客人抛下鱼饵或假蝇，然后等待，通常这个时

间不会很久。那种感觉是无法比拟的，坐在船里，船被咬了钩的警觉的大海鲢拖来拖去，有时要拖上数英里，甚至可能被甩到水里去，如果大鱼弹射到半空的话——“以一弯新月的形状，”赞恩·格雷如此形容他的第一次经历，“对手拥有如此了不起的力量，它看起来就像笞打在水上的鞭子。”[\[41\]](#)

尤斯帕的客人们捕到了很多大海鲢。往墙上钉鱼鳞钉得最多的恐怕要数来自纽约的爱德华·沃姆·霍夫（Edward vom Hofe），他在每一片鱼鳞上都标上了他的名字、家乡、日期和捕获物的重量。他的游钓生涯跨越了33年，鱼的重量有不足100磅的，也有大大超出这个数字的。他是约翰·罗奇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还制造高端渔具和渔线轮。他的渔线轮是专为此鱼定制的——抗压力强、工艺考究，精美得如同珠宝镶嵌的手表，一个发烧友评论道——线轮的黑色侧面盘上采用的是硬化的巴西橡胶，与镍银材质的支架、线轴和摇臂形成色彩上的鲜明映衬（海明威钓鱼用的就是沃姆·霍夫设计的钓具）。从1888年开始直至去世，沃姆·霍夫每个钓鱼季都会去墨西哥湾，一待就是三四个月。理论上来说，他这是潜心于产品测试和研发，对这位老人长期在外的不满也许会来自他在纽约的办公室伙计，但绝不会来自醉心大海鲢的游钓人。他针对他们的大海鲢，研发出了一种特殊的拖动式渔线轮——寰宇之星（the Universal Star），在1896年成功申请专利。最好的一款售价是7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700美元。

两年后，沃姆·霍夫证明了这个售价的合理性。他在凯普蒂瓦峡湾捕获了一条破纪录的210磅重的大海鲢。在一张沾有污渍的照片上，纪录保持者正站在他的战利品旁边，鱼比人还大，被从嘴和鳃处挂起，吊在尤斯帕艇库的橡木上，沃姆·霍夫穿着一件长袖衬衫，外面套着一件马甲，戴着帽檐卷边的黑色帽子，像轻歌舞剧的笑匠，还有一个钩住边沿的鱼饵。他的右手握着鱼竿，上面正是寰宇之星的渔线

轮，左手点燃了庆贺的雪茄代替了他日常的烟斗。他正欢呼雀跃地、欣喜难耐地跳着吉格舞。

如果沃姆·霍夫的反应看起来过于夸张了，也许情有可原。在他所处的年代，美国正在经历男性气质的弱化，具体表现为消失的边境，不断扩张的都市，以及处于和平中的国家，捕获大海鲢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一剂解药。资产阶级的二代们被这个男性危机强烈地影响着。管理一个信托基金并不需要身强力壮，即使一个人在狗咬狗的复杂金融和商业世界里充分展现出其男子气概，他也依然可能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娇弱的身体，这曾经是管理者、所有者和继承人们特有的标志，让自己有别于体魄强健的劳力者——比如说，一个游钓向导，但这已经过时了。一个由软弱的男人——照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就是“肩膀溜得像只香槟瓶子”——领导的国家，据说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42\]](#)

竞技体育、西部探险和战争成为追求男性气质思潮下的受益者。拳击的形象从野蛮的毫无意义的运动转变为充满男子气概的艺术。橄榄球取代赛艇成为各大学间最重要的运动。西奥多·罗斯福，这位美国男性气概的体现者和宣扬者，认为橄榄球练就了未来领袖所应具备的毅力、自律和志在必得的决心。他也相信挺进美国西部荒地、大山和峡谷能对男子气概的历练产生不可磨灭的力量。他曾无数次去过西部。他也参加过1898年古巴对抗西班牙的战争，为了美国的男子气概而战——一场远离坦帕的战争。他著名的登上古巴圣胡安山之举，既是为了宣示美军的胜利，也是为了一展民族雄风。

捕捉大型猎物是罗斯福展示男子气概的主要尝试。他通常追逐四只脚的陆上动物，而将渔钓这项冥想艺术留给它的热爱者。但在1917年3月，这位前总统去了一趟凯普蒂瓦岛（Captive Island）。再过一个星期，国会就要讨论一项关于参与欧洲战场与否的特别议案，而作

为这项最具男子气运动的爱好者，他将前去游说美国参战。在加入华盛顿的政治混战之前，和一个能誓死捍卫自己生命的野生动物来一场搏斗是不错的热身运动。罗斯福带着日常随行人员来到蓬塔戈尔达，并和当地大鳄亲切握手，让平常使用长枪短炮的新闻摄影师们留下合影。他在凯普蒂瓦租了一条50英尺的屋船，船头飘着美国国旗，屋船顾名思义就是船上搭着白色隔板屋子的游艇。大海鲢热兴起了屋船租赁贸易，屋船供应雪茄和波本威士忌，用来招待周末的单身汉们。

罗斯福不是为波本酒而来，也不是全为大海鲢而来。作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野外活动好手，他是潮流的制定者而不是追随者。他来到大海鲢的故乡是为了捕猎魔鬼鱼，其在今天被称为蝠鲼。他称其为“大海里的野兽”，但他忽略了魔鬼鱼除了它的名字外，其实是海洋中最优雅、最被动的动物这个事实。在一次叉捕成功后，一位摄影师拍到了他在岸边获胜的一幕，照片中他摆出角斗士的模样，七英尺长的鱼叉交叉于胸前，脖子上绑着头巾，左脚扬扬得意地踏在被杀死的魔鬼鱼上，海湾的水正冲刷着它死去的16英尺长的体翼。驯兽师旁站着五位男性陪同者。他们现在是海上的牛仔，如果是在平原，他们身旁或许是一只死去的野牛，如果是荒山野地，则可能是一只熊。[\[43\]](#)

威廉·哈尔西·伍德的门徒们自称是大海鲢猎手和大海鲢杀手。一只大象或河马在来复枪的射击下无一例外地倒地，相较而言他们这个大猎物为其冒险带去了更多的意味。大海鲢会向你叫板。这就是它的魅力。迎着一条体重和身高相当或超出于自己的鱼，像重量级拳王约翰·沙利文一样与之搏斗，挥洒汗水，直至筋疲力尽、浑身疼痛，淤血的关节和火辣辣得疼的拇指（渔线的作用）使人重燃起对自身身体力量的信心。此外，要在一艘小船上打败一条大型的、力大无穷的、鼓噪不安的鱼是一件刺激的事。即使它已经力竭，一只在甲板上还“活着”的大海鲢也依然能发了疯似的摇动船只。人们因此受伤。一位向导被一只做最后一搏的大海鲢掀翻到船下，不省人事。亨利·

惠灵顿·瓦克（Henry Wellington Wack）是又一位对这种海钓者最凶悍的对手大加赞美的作者，他写道：“除了大海鲢，海洋里的所有其他猎物都是乏味的。”^[44]

保罗·亨德里克森（Paul Hendrickson）是对海明威的海上生活了如指掌的传记作者，他说，海钓大型鱼类，“不是竞赛，是激情，因它本身而起的激情”。这场战斗首先发生在男人与鱼之间，接下来是男人与男人，然后是男人与女人。维多利亚式拘束的女性特质逐渐走向衰落，这一点在海上尤其明显。女人们拒绝任何认为捕钓大海鲢是男人专属的说辞——但要说在屋船上疯癫玩乐、喝得酩酊大醉，这样度过周末的机会，她们很乐意让给异性。米娜·爱迪生钟情于钓大海鲢一如她的丈夫。她将这份痴迷告诉给他们的孩子们，往北方家中写的一连串书信中都是钓鱼的事情，称断然拒绝她鱼钩的大海鲢是“最诱人的”。女士们或由丈夫陪同，或独自前往渔猎大海鲢，在俱乐部厅的墙上留下了她们激情的见证，也留下了与大鱼的合影。^[45]

克莉丝汀·霍利的照片摄于1914年5月6日的尤斯帕。她是来自纽约上流社会一位31岁的寡妇，爱好打桥牌，身形异常得娇小。在她的纪念照里，她迎着阳光，眯缝着眼睛，上面架着一副款式端正的眼镜，穿着长及脚踝的带褶边的行走裙（这是那个时代女性渔钓客的标准服饰），上身是一件仿海军服风格的白色套头外衣，围兜领上系着围巾。被悬吊起来的大海鲢张着的嘴又大又圆，像一个篮圈。大鱼看起来大得足以吞掉她整个人。霍利是第一位获得银徽章的女性，银徽章是旅馆的垂钓者俱乐部为成功钓起重于150磅大海鲢的客人而设的奖章。霍利的鱼称得了154.5磅的重量。这个鲜有人知的表彰活动一直延续到了一个世纪后。旅馆的餐厅端上了一份八盎司的安格斯牛肉汉堡，“烤得正合你心意”，霍利女士评价道。

霍利用的是沃姆·霍夫设计的渔具。当这位渔线轮设计者抓到了那只让他跳起舞来的大海鲢时，他打破了另一位寡妇保持的七年纪录，她是G. T. 斯塔格夫人（Mrs. George T. Stagg）。她保持的历史纪录几乎没有对她此后的生活激起一丝涟漪，连她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这就是那个年代美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她们没有选票，在婚后也将失去个人权力和个体身份。唯一的涟漪引向的是她的丈夫，他已经再婚，是肯塔基州的一个威士忌酿酒师，而文档中留下的几句不过是陈词滥调的信息是：“斯塔格夫人”拥有“其作为女性所特有的迷人的谦逊”^[46]。她乘着她家的游艇在克卢萨哈奇捕到了205磅重的大海鲢，此后，基于迷人的谦逊，她将其展出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47]。

直到那个时候，在海水环绕的州游览的游客们被内陆河流和淡水泉吸引了，恐怕这就是激起庞塞·德莱昂灵感的神秘的不老泉。每年都有五万名远足者去到银泉市（Silver Springs）——和去往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人数相当——从杰克逊维尔乘明轮船沿丛林密布的河流来到佛罗里达州的心脏，水的世界。他们来看奇异的野生生物——进食的鸟儿、晒太阳的乌龟、沐浴的短吻鳄、玩耍的水獭。一个世纪后，他们会被称为生态旅游者。海滩浴一度取代了内陆的浴场成为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但海滩浴场的游客又被大海鲢招去了，岛屿和海岸线上的沙丘草和灌木丛都变成了为游钓狂热者用隔板和木瓦搭建的度假村。

如前文所说，亨利·普兰特注意到了海岸发展的趋势。在世纪博览会上展出他的大海鲢标本的那一年，他在坦帕湾的面海一侧开了一家旅店，叫贝尔维尤（Bellevue）。旅馆坐落于一座跨半岛的岬角末端，在几百年前，这里叫作松树角（Punta de Pinal），因为这里满是高高的松树。普兰特牺牲了这里树木心材造就的自然风光，建起了贝尔维尤，落成后它占地82万平方英里，有绿色的瑞士牧屋式屋顶。

它被宣传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框架建筑，很快又会成为游钓客们的另一个聚集地。

大西洋海岸铁路公司在1902年收购了普兰特铁路公司后，很快就开通了前往加斯帕里拉岛（Gasparilla Island）博卡格兰德（Boca Grande）的线路，将皮斯河（Peace River）开采出的磷酸盐送出去，将游钓客送进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合时宜是肯定的——博卡格兰德（大嘴）这个名字与这种令此地享誉全国的鱼的身体构造恰好相配。在迪莫克看来，“世界上不可能再找到比博卡格兰德更好的大海鲢钓鱼点了”。[\[48\]](#)

两年后你就能乘火车前往迈尔斯堡了。在其军事堡垒的职能被正式停用后，迈尔斯堡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了。此后大海鲢为这里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它成为墨西哥湾东部的渔钓中心，为街道建筑添砖加瓦，为商业发展积蓄资本，使之成为郡政府的所在地，从大沼泽地移来800棵大王椰子栽满街区的大道。“它的每一个贸易分支，”《森林和溪流》写道，“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渔业的影响。”1898年4月14日，当全国的日报头版都在争相报道即将爆发的古巴对抗西班牙的战争时，《迈尔斯堡新闻报》却在报道当年“官方颁布的大海鲢纪录”。[\[49\]](#)

一个城镇有它的当务之急。迈尔斯堡坐拥墨西哥湾海岸上最好的旅馆，从简朴到奢华一应俱全，它夜生活丰富，包括24小时营业的大海鲢餐厅、银色帝王酒吧和台球厅。那里有海特曼-埃文斯公司（Heiman-Evans Company），它被公认为纽约阿贝克隆比-费奇（Abercrombie & Fitch）以南最大的户外用品商店。如果你的钓具盒忘了什么或需要什么——也就是，想要什么——新的工具，爱德华·埃文斯都会帮你搞定。赞恩·格雷说在所有商店中，埃文斯那里有最全备的渔具供你选择。出于一些理由，迈尔斯堡有最好的向导，他们

收取的费用是一天六美元（是得克萨斯海岸收费的两倍），当地镇民也将游钓客当成“行走的金矿”。有人计算过，每一条被钓起的大海鲑，促成的当地贸易额为500美元——1894年被捕获的大海鲑有389条。那个“有人”很可能就是埃文斯，他负责为商会统计捕获量。[\[50\]](#)

再往海岸的南边一点点，是铁轨还远未到达的那不勒斯，它直到1927年才通了火车，那里有一个伸进海湾几百英尺的T字形垂钓码头。无论是什么日子，上面都摩肩接踵地挤满了垂钓者和讨鱼吃的鹈鹕；入夜后，人们在月光下起舞，喝着鸡尾酒，水边飘着乐声和絮絮密密的话音和笑语。暴风雨总是定期袭击码头，一次，有个没熄灭的烟蒂引燃了一场大火。那不勒斯人多数是来自肯塔基的移民，他们永远在重建家园。这个码头是当地经济的支柱。此时距离火车通行还有近30年，垂钓者们坐普兰特公司每周两趟的蒸汽船“大海鲑号”前来，《纽约时报》说人们在那不勒斯的“口头语”是“上钩了吗”。这是一篇两栏的专题报道，表达了对墨西哥湾海岸的游钓旅客将超越纽约州的忧虑。[\[51\]](#)

得克萨斯和墨西哥也是他们的目的地——游客不仅不去纽约，他们也打那里来。他们来自圣路易斯、德卢斯、威奇托、克利夫兰、波士顿、多伦多、伦敦、纽瓦克、巴尔的摩、路易斯维尔、帕萨迪纳、长滩和芝加哥。1891年，圣达菲铁路（Santa Fe Railroad）载着孤星州博览展驶入了风城[\[52\]](#)。这是商会的得意之作，三节旅客车厢被改造，用以展出得克萨斯州的风物。照着稿子发言的代表称，得克萨斯州拥有一切最大最好的东西，除了税金——虽然也是最好的，但当然，这里的最好说明它不是最大的。无论是定居还是玩乐，他们说，得克萨斯州都能令君尽兴。在声势浩大的宣传下，展览展出的都是些普通物件，如果不说是无趣的话：建筑石材、木材、肉类、水果、谷物和玉米。但有一件夺人眼球的，那就是110磅重的大海鲑标本。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得克萨斯海岸在一系列机缘巧合下俨然已是银色帝王的朝圣地。北方的户外活动爱好者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南下海岸射猎野鸭。一个备受欢迎的射猎地位于阿兰萨斯峡湾（Aransas Pass）附近，它是一处将科珀斯克里斯蒂湾（bay）和阿兰萨斯湾（bay）与墨西哥湾（gulf）相连的天然Y字形水道，西班牙殖民者将其命名为阿兰萨斯。1890年后的某天，州政府与一家工程公司协议要修建一道石筑的防波堤以促进通航。此时，多是克罗地亚移民的工程师和船员们，注意到了水里鱼群的活动。他们雇来当地的一些商业渔民，将他们摆渡到了峡湾中，就在那里他们捉到了大海鲢。很快，户外爱好者的射猎之旅就变成了渔钓之旅。虽然它在游钓领域的起步晚于佛罗里达，但这并不阻碍得克萨斯海岸将自己包装成银色帝王的王国。

商会在这轮大海鲢热中进账颇丰。1892年，有人在佐治亚州的坎伯兰岛附近捉到了这种光滑的大鱼，称捕钓大海鲢是“最伟大的一项运动”的《亚特兰大宪法报》断言道，墨西哥湾的游钓客会被吸引到佐治亚的海岸来。从东田纳西州到西北卡罗来纳的铁路线，向来是脏兮兮地拉着铁矿石，为增加旅客服务，也将坎伯兰纳为站点之一。虽然任性的大海鲢一路探险到了新斯科舍，但它们最终还是钟情于南方的温暖水域。佐治亚沿海始终没能像南边的墨西哥湾一样得到丰厚的进账。即使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垂钓者们的鱼钩通常也是为鳞斑鲮、鲮鱼、鲑鱼和鲷鱼准备的。这些鱼类更温顺，但更美味，而且没人抱怨自己不走运。“一天的垂钓，”《每日一铜币报》的记者，路易斯安那的玛莎·菲尔德写道，“就能给我们带来200多条鱼”，足够引诱艾萨克·沃尔顿爬出墓地来在水边过一天了。[\[53\]](#)

在得克萨斯南部，你不需要做出妥协。这里的水域给人们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从美味到仅供游钓的鱼都有。从得克萨斯州内陆到渔钓点，你可以从圣安东尼奥市出发，这里是得克萨斯州第一大旅游目的

地，从这里搭乘开往阿兰萨斯峡湾的火车到距离罗克波特

（Rockport）260英里的阿拉莫（Alamo）。然后搭乘纵帆船穿过阿兰萨斯湾抵达野马岛（Mustang Island），如果风力正好且遇上退潮，这段航程要花费两小时，最坏的情况则要六小时。如果你不是一个对口味挑剔的老饕，那你很可能就在哈特菲尔德家住下了，这是一对性情亲切随和的母子经营的得克萨斯大海鲢旅舍，它的前身是筑堤工人的营房。接待室的墙上挂满了银币大小的鱼鳞。很多都是玛丽·哈特菲尔德自己钉上的，她曾经在两小时内钓上来四条大海鲢，最小的那条长六英尺，重125磅。

另一条不错的渔钓线路是从新奥尔良坐火车到科珀斯克里斯蒂。很多垂钓者会留在南方，在马德雷湖周围垂钓，或者再往南到伊莎贝尔港（Port Isabel），那里有沿着格兰德河追着饵鱼北上的大海鲢。在大海鲢旅舍，刚到的客人会在房中密切留意那些围着向导船跳跃的银色帝王的动向，每一只向导船都飘着独一无二的长三角旗，这样客人们就可以决定第二天他们要雇哪条船了。向导每次远航的收费是三美元——“收入还不错”，有人说——他们的称呼五花八门，比如鲳鲹雷德和浮桥老兄。[\[54\]](#)

在11月下旬，鲳鱼吸引着大海鲢游向帕努科河（Río Pánuco）上游，垂钓者也跟着到了墨西哥的坦皮科。这就是那条让环绕墨西哥湾的欧洲第一人——阿尔瓦雷斯·德皮涅达——永远葬身于此的河。印第安人渡河用的仍然是手工砍制的木筏，上面常常载满了橘子和成梭的香蕉，宽阔的水边常能见到粉红色 的火烈鸟，还有越冬的发出啁啾声的白鹤。“朝霞下的河流就像一块不安的猫眼石轻轻颤动着”，这是赞恩·格雷所写下的，他在这些河上垂钓过不止一次了。[\[55\]](#)

北方来的同一群人——被玛莎·菲尔德粗暴地形容为“那些纽约来的富豪”——也在坦皮科垂钓。他们和宽容的向导们练习他们的西

班牙语，在充满南境氛围的小餐馆里，一口一口地抽着雪茄，轮流喝着渐渐见底的龙舌兰酒。他们也许比大多数的垂钓者都更贪心一点，在墨西哥的美国人通常是想在即将到来的得克萨斯州渔季里拔个头筹。[\[56\]](#)

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大海鲢渔猎大致是从3月持续到8月。一些海钓客断言得克萨斯州的渔钓环境更好，大海鲢当然也更大。有人说在阿兰萨斯峡湾钓鱼就像漂浮“在彩虹的尽头”。有人在1894年钓到了一条234磅重的大海鲢——这应该已经打破了斯塔格的纪录，但显然它没有得到过官方的认证。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大标本和大数据都出自得克萨斯。一个星期钓上来12条约等于一无所获。这里的鱼的好斗之心，也许比佛罗里达州的要更甚。有一个垂钓客说得克萨斯州的一条银色帝王和他拼搏了五个小时。[\[57\]](#)

得克萨斯有许多故事是大海鲢传说搜集者乐于讲述的——尤其是其中涉及总统垂钓客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和沃伦·哈定有关。在他赢了1920年总统大选后，他有了一次在墨西哥湾上度假的机会。他和他未来的第一夫人弗洛伦丝（Florence Harding）受一位竞选资助人的邀请，到墨西哥边境附近的伊莎贝尔港打高尔夫球。哈定在早上安排了一场大海鲢渔钓，这对他来说是一项新运动，而下午则去打他最是痴迷的高尔夫。他在一次外出时被拍到，照片上他穿着深色长裤，白色衬衫，打着领带，脚穿帆布鞋，头顶遮阳草帽。在跟拍的摄影机面前摆样子时，他留在老式的35毫米胶片上的动作显得焦虑不安。他宣称伊莎贝尔港是他“在世界尽头最喜爱的钓鱼点”。他是在迎合当地人，但他的声明也绝不缺乏诚恳。[\[58\]](#)

八年前，当时哈定的政坛之路还停滞不前，《纽约时报》观察说：“人们放弃了高尔夫俱乐部，转而追逐钓大海鲢的鱼竿去了。”哈定随后走上了政坛巅峰，在得克萨斯州时，他严肃声明取消了两场

高尔夫球活动，高尔夫球场是他除了家以外最爱去的地方了，他想试试拿个海上的战利品。一条七英尺长的咬住了他的渔线——是一只大鱼，但脱逃了。他幸运地在第二天提到了一条四英尺长的。弗洛伦丝，在一阵大呼小叫后，捕获了一条200磅重、将近六英尺长的。结果这条大海鲢就是当年的年度纪录。新当选总统收获了头条，未来的第一夫人有了夸口的资本，而伊莎贝尔港则有了无价的宣传机会。[\[59\]](#)

在哈定之后，民众又经历了两位共和党总统，才最终选出了一位慈祥的民主党总统，将美国拖出了大萧条。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是阿兰萨斯峡湾的常客。在1937年的春天，他劝说他父亲乘总统游艇“波拖马可号”前往得克萨斯游钓大海鲢。当地一位渔具小店的店主巴尼·法利（Barney Farley）接到了电话让他去给总统当向导。他此后将会留下两段关于总统的回忆。前一段里，法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统一如既往地谦和，捕到鱼的时候兴奋得像个小男孩，急切地问法利该如何应对咬钩的大海鲢。另一段是他在一本游钓鱼书里留下的访谈，他说总统对渔钓建议充耳不闻，固执己见，用他的鱼竿拍打水面，就像一个着了魔的管弦乐团指挥在挥舞他的指挥棒一样。但不管如何，罗斯福钓到了鱼。这些都被保存在当年的影音新闻纪录片里——总统被缚在钓鱼椅上，露出新月形的下巴和令人难忘的微笑，一条又一条的大海鲢被用鱼钩拖上来放在船的一边，小机动船随着汹涌的海浪上下晃动。有一条鱼与他搏斗了1小时20分钟，令他错失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那倒还好。新闻记者也坐着他们的船来到海里上下摇晃，其他公众也如是。每次海湾送上来一条翻腾扭动的战利品，人们都为之喝彩。

有一张具有吸引力的黑白照片，大约摄于1900年，是一个男人孤身站在那不勒斯600英尺长的垂钓码头上的身影。他穿着深色休闲外衣，正在使用一根2.5倍于他的高度的鱼竿，以击球手的姿势双脚分开站立着，左臀靠在码头栏杆上支撑着，左手握着鱼竿，右手支在右臀

上叉着腰，他的上半身向后倒着以平衡那股咬着他的线的力量。我们不知道他最后运气如何，但我们不妨猜测应该是不错的。墨西哥湾就是如此慷慨。大约也是这个时候，在得克萨斯的另一边阿兰萨斯峡湾，一个来自丹佛的男人在27天里钓到了80条大海鲢。

人们不断索取，为什么不呢？鱼咬了钩，垂钓者们不断积累它们的数字。渔钓俱乐部的建立就是为了推广这项运动。在尤斯帕岛，巴伦·柯里尔和其他人一起创立了艾萨克·沃尔顿渔钓俱乐部，它是致力于环境保育的美国艾萨克·沃尔顿联盟的前身。但保育并不是尤斯帕俱乐部人的目标——至少开始时不是。阿兰萨斯峡湾大海鲢俱乐部也一样，其总部在一个叫斯波特（Sport）的镇上。它的创立宗旨是“为这项运动设立更高的标准”。这个俱乐部认为，重量优于数量。普通的商贸渔民追求的是数量，但有尊严的垂钓者不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家从来不会夸口他捕获的猎物数量。”俱乐部向捕获了相应大小战利品的人授予金、银徽章，和尤斯帕的艾萨克·沃尔顿渔钓俱乐部因其捕获物的重量而授予克莉丝汀·霍利的那枚银徽章一样。饶是如此，每个人谈起大海鲢时说的还是数量。报纸记录着每日和每季度的“屠杀量”，这就是他们的原话，使用起来毫无愧疚之意。《森林和溪流》报道捕获数量，旅馆会给捕获数量最多的客人颁奖，于是就有了俱乐部一面面墙上那些大海鲢鳞片。[\[60\]](#)

这是一个竞赛：看谁能让自然吐出更多。1889年的一天，沃尔特·霍尔德曼（Walter Haldeman），这位那不勒斯的创立人和《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的发行人，在仅仅一天时间里，钓起了94条鱼。第二年，一个纽约人从1月到3月在蓬塔罗莎捕到大海鲢共199条。迪莫克曾经在52天左右的时间里钓鱼334条，他说——一次投掷就有63条。坦皮科在1906年的渔季捕获大海鲢1287条。在什么时候这项运动失去了它的意义？早在1895年，《纽约时报》报道称，“有太多的北方渔钓客

每年拜访大海鲢在墨西哥湾沿岸的渔钓点，现在大鱼数量锐减，在它们首次被发现的栖息地上已经很少见到其踪迹了”。[\[61\]](#)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垂钓者们有一个问题，而且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没有理会朱莉安娜·伯纳斯永不过时的建议：“当你有足够的食物时，你不应贪图更多。”大海鲢的数量越来越少。在一些季节里，这些好斗的鱼似乎忘了来到近岸，忘了扮演它作为游钓鱼种的角色。在阿兰萨斯峡湾，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将发展重点转移到了水上贸易。大海鲢的村庄被更名为阿兰萨斯港，码头被改建，河道被加深以适应货物运输，于是这条峡湾受到了游钓鱼之王的冷落。由于人们在格兰德河上修建了双重堤坝，曾经垂钓者在河口海滨处就能捕捉到大海鲢的伊莎贝尔港也受到了和阿兰萨斯港同样的影响。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休斯敦南边的布拉索斯河，人们在上面筑堤修坝，倾倒工业废料，堵塞了河道。河口湾消失，淡水不足，再加上令人窒息的污染物，于是也不再有活蹦乱跳的大海鲢了。

早期，各地的主要问题是银色帝王带来的狂潮。人们捕鱼，杀鱼，拍照留念，偶尔将鱼堆积如山，然后丢弃一旁。这是一种浪费。艾萨克·沃尔顿渔钓俱乐部首先提出了捕获后放生的倡议，使大海鲢成为最早受到保护的游钓鱼种之一，虽然这是个拯救游钓运动的保育计划。霍利引入，也许是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鱼钩，鱼钩呈圆圈形，在它进入鱼身内脏前会被卡住，以防鱼钩撕扯鱼身。

这都是伟大的想法，但大多数垂钓者并不在意。如果这个渔季收获不佳，他们会等下一个。只要大海鲢回归，杀戮就会继续，而且数量一直在增长，因为越来越多的垂钓客涌入峡湾、小湾和河口。更荒唐的是，在海湾地区人们纷纷创办起大海鲢锦标赛，并设置了大额奖金，它们可见于阿兰萨斯峡湾、奥康纳港（得克萨斯州）、格兰德岛（路易斯安那州）、萨拉索塔、博卡格兰德和韦拉克鲁斯。兰迪·韦

恩·怀特曾将福特博士的名号用于博卡格兰德峡湾的锦标赛——这在后来撤回了。

在大海鲢的游钓历史上，杀戮是其中困扰着怀特的部分。当他还在当向导的时候，他的客人会将他们捕到的多数大海鲢放生。当他想到被留下并吊起来拍照的鱼，或者使用虽然合法但并不人道的钩钓法抓到的鱼时，他总是内心一惊，钩钓法用的是一种在底部加重的鱼钩，实实在在地将鱼钩住，鱼的结局十有八九就是死亡——他认为，这是钓鱼圈里“不可告人的小勾当”。在艾萨克·沃尔顿渔钓俱乐部提出倡议的一个世纪后，怀特停止赞助博卡格兰德峡湾锦标赛，因为钩钓换了另一个叫法后仍继续存在于赛事中。他也敦促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将大海鲢指定为捕获后放生的鱼种，委员会照办了。[\[62\]](#)

美国人开创了游钓产业，也培养了出色的技能，能捕捉到同样出色且好斗的鱼。他们的才智、毅力和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得到了充分体现。与此同时，他们执着于在大自然身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而这种带来不幸的行为并不局限于游钓群体。

[\[1\]](#) Richard L. Sutton, “The Initiation of Raymond: A Tarpon Story of Aransas Pass, ” *Forest and Stream* 44 (1924) : 76.

[\[2\]](#) I thank Randy Wayne White for sharing his life story with me at Doc Ford’ s Rum and Bar Grill in Sanibel on January 19, 2013.

[\[3\]](#) Evan Williams, “The Relentless Randy Wayne White, ” *Fort Myers Florida Weekly*, March 3, 2010, <http://fortmyers.floridaweekly.com>.

[\[4\]](#) 英国政府特许弗吉尼亚公司在北美进行殖民地经营，弗吉尼亚公司在1607年将100多名移民送到詹姆斯敦，以这个定居点作为基础，英国建立了在北美的第一个殖民地，美国历史也由此开启。詹姆斯敦在弗吉尼亚州东南部、切萨皮

克湾的沿岸，而波瓦坦人（Powhatan）就是当时占据弗吉尼亚潮水地区、切萨皮克湾东岸的印第安部落联盟，他们与詹姆斯敦的英国移民经常爆发战斗。——译注

[5] 普利茅斯，在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州，名字源于英国西南部城市普利茅斯。这个殖民地的缘起与英国分离派清教徒有关。分离派清教徒是英国清教中最激进的一派，由于受英国国教的残酷迫害而决定迁居北美。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带着一批分离派清教徒先是到达科德角（Cape Cod），最后在普利茅斯登陆，在这里建立了继詹姆斯敦后英国在北美的第二个殖民地。而万帕诺亚格人（Wampanoag），是半定居半迁徙的北美印第安人，在英国清教徒移民到普利茅斯后，他们曾与英人缔结和平条约，后来英人毁约，对原住民抢占土地、肆行虐待，双方爆发战争，万帕诺亚格人几遭灭绝。——译注

[6] Moise N. Kaplan, *Big Game Angler's Paradise* (Liveright, 1937), 97.

[7] Frank Sargeant, *The Tarpon Book: A Complete Angler's Guide* (Larsen's Outdoor Publishing Group, 1991), 5.

[8] John Dos Passos, “Under the Tropic,” in *The Key West Reader: The Best of the West's Writers, 1830-1990*, ed. George Murphy (Tortugas, 1989), 86.

[9] Accessible scientific studies of the tarpon are found in Jerald S. Ault, ed., *Biology and Management of the World Tarpon and Bonefish Fisheries* (CRC Press, 2010).

[10] “Gulf Coast Byway,” Texas Tropical Trail, <http://thetropicaltraveler.com/blog/about/gulf-coast-byway>, accessed summer 2013.

[11] Otis Mygatt, “Some Tarpon Adventures,” *Badminton Magazine of Sports and Pastimes* 1 (1895): 328.

[12] 艾萨克·沃尔顿：《钓客清话》，缪哲译，新星出版社，2014。（正文中为对应原文对副标题做了补充。）——译注

[13] John Waller Hills, *A History of Fly Fishing for Trout* (Philip Allan, 1921) ; C.B.McCully, *The Language of Fly-Fishing* (Fitzroy Dearborn, 1992) , 9-11; John McDonald, *The Origins of Angling* (Doubleday, 1963) , 67-68; Dame Juliana Berners, *A Treatise of Fishing with an Angle* (Walking Lion Press, 2006) , 86; Dame Juliana League, <http://www.djlflyfishers.org>, accessed summer 2013.

[14] Izaak Walton, *The Compleat Angler or the Contemplative Man's Recreation* (S.Bagster, 1810) , 39.

[15] Walton, *Compleat Angler*, 243; *Philadelphia Inquirer*, March 12, 1878, clipping found in Hampton Dunn manuscript materials, Old Courthouse Heritage Museum, Inverness, FL.

[16] Henry William Herbert, *Frank Forester's Fish and Fish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ish Provinces of North America* (W.A.Townsend, 1866) , 12.

[17] John James Audubon, *The 1826 Journal of John James Audub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7) , 5.

[18] Charles Hallock, *An Angler's Reminiscences: A Record of Sport, Travel and Adventure* (Sportsmen's Review Publishing, 1913) , 38.

[19] "Qx, " unidentified manuscript, in Hampton Dunn manuscript materials, Old Courthouse Heritage Museum, Inverness, FL; Charles Hallock, *Camp Life in Florida: A Handbook for Sportsmen and Settlers* (American News Co., 1876) , 14, 30.

[20] Kenworthy's dispatches in *Forest and Stream* appeared under the pseudonym Al Fresco on March 18 and 25; April 1, 8, 15, 22, and 29; May 13, 20, and 24; and June 10 and 17, 1875. Hallock reprinted them, along with other essays, in *Camp Life in Florida*. Quotes are from the book's following pages: 38, 40, 259.

[21] Hallock, *Camp Life in Florida*, 341.

[22] Hallock, *Camp Life in Florida*, 336, 341.

[23] Hallock, *Camp Life in Florida*, 341; “Angling at Homosassa Florida, ” *American Angler* 3 (March 24, 1883) : 185.

[24] Helen Cooper, *Winslow Homer Watercolo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34.

[25] Peter Brazeau, *Parts of a World: Wallace Stevens Remembered: An Oral Biography* (Random House, 1983) , 97; Sidney Lanier, *Florida: Its Scenery, Climate, and History, with an Account of Charleston, Savannah, Augusta, and Aiken; a Chapter for Consumptives; Various Papers on Fruit-Culture; and Complete Handbook and Guide* (J.B.Lippincott, 1876) , 94.

[26] Robert Grant, “Tarpon Fishing in Florida, ” in *Angling*, Leroy M.Yale, A.Foster Higgins, J.G.A.Creighton, et al.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897) , 182; James A.Hen-shall, *Camping and Cruising in Florida* (Robert Clarke, 1884) , 192.

[27] Randy Wayne White, *The Heat Islands* (St.Martin’ s Press, 1993) , 119; White, *Sanibel Flats* (St.Martin’ s Press, 1990) , 45, 108.

[28] Randy Wayne White and Carlene Fredericka Brennen, *Randy Wayne White’ s Ultimate Tarpon Book: The Birth of Big Game Fishing*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0) , 265,

[29]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简称WASP, 是指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裔的、富裕的、有广泛政治经济人脉的上流社会美国人, 现在可以泛指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译注

[30] Anthony Weston Dimock, *Wall Street and the Wilds* (Outing Publishing, 1915) , 12.

[31] Anthony Weston Dimock, *The Book of the Tarpon* (Outing Publishing, 1911) , 15.

[32] N.A.Bimon, “The Silver King, ” *Forest and Stream* 38 (1892) : 394; Grant, “Tarpon Fishing in Florida, ” 183.

[33] White and Brennen, *Randy Wayne White’ s Ultimate Tarpon Book*, 9, 50, 55, 227, 234.

[34] 南北战争结束后，一些北方人来到南方，一部分是来推行共和党政策以稳定政局的，也有的是看准局势不稳的南方有商机而来的，这些人都会被南方人讥为“掇包客”（carpetbagger），指他们用一个毯子（carpet）打包了自己的全部家当，来到南方趁乱谋利。——译注

[35] 镀金时代（Gilded Age），引申自马克·吐温的一本同名长篇讽刺小说，指的是美国内战结束后至20世纪初期经济突飞猛进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美国超越英国成为最发达国家，时间上大概是从1865年到1893年。——译注

[36] White and Brennen, *Randy Wayne White’ s Ultimate Tarpon Book*, 122-23.

[37] 标准石油公司就是现在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前身。——译注

[38] White and Brennen, *Randy Wayne White’ s Ultimate Tarpon Book*, 138.

[39] Kevin Kokomoor, “ ‘In the Land of the Tarpon’ : The Silver King, Spor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west Florida, 1885-1915, ” *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11 (2012) : 191.

[40] White and Brennen, *Randy Wayne White’ s Ultimate Tarpon Book*, 26-28; Kokomoor, “ ‘In the Land of the Tarpon, ’ ” 211-12.

[41] White and Brennen, *Randy Wayne White’ s Ultimate Tarpon Book*, 55.

[42] Theodore Roosevelt, *The Rough Riders: An Autobiography* (Library of America, 2004) , 296.

[43] Theodore Roosevelt, “Harpooning Devilfish, ” *Scribner’ s Magazine* 62 (1917) : 293-305.

[44] White and Brennen, *Randy Wayne White's Ultimate Tarpon Book*, 81.

[45] Paul Hendrickson, *Hemingway's Boat: Everything He Loved in Life, and Lost, 1934-1961* (Alfred A. Knopf, 2011), 230; White and Brennen, *Randy Wayne White's Ultimate Tarpon Book*, 136.

[46] R. M. S., "The Tarpon Record—How Long Do They Fight," *American Angler* 21 (1892): 327.

[47] 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第一位乔治·斯塔格夫人名叫伊丽莎白，在1877年前后离世。乔治可能在1890年人口普查开始前已经再婚，但原稿已经在一次火灾中变成灰烬。他大概在1891年死去，也就是第二任乔治·斯塔格夫人钓到大海鲢并打破纪录的那个时间前后。如此，即使她在接下来的这次人口普查记录中出现，也无法追查她的姓名。

[48] White and Brennen, *Randy Wayne White's Ultimate Tarpon Book*, 89.

[49] Bimon, "Silver King," 394. Thanks to Gary Mormino for bringing this issue of the *Fort Myers Press* to my attention.

[50] Kokomoor, "'In the Land of the Tarpon,'" 192, 212; White and Brennen, *Randy Wayne White's Ultimate Tarpon Book*, 167.

[51] "In the Land of Tarpon," *New York Times*, March 5, 1893.

[52] 孤星州指得克萨斯州，风城指芝加哥。——译注

[53] W. D. "The Land of the Tarpon," *Atlanta Constitution*, December 18, 1893; Martha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The Travel Writings of Catharine Cole*, ed. Joan B. McLaughlin and Jack MacLaughli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6), 10, 11.

[54] Nellie D. S. Graham, "Tarpon Fishing at Port Aransas Pass," *Outing* 35 (February 1900): 473; Barney Farley, *Fishing Yesterday's Gulf Coast*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xi.

[55] Zane Grey, *The Best of Zane Grey, Outdoorsman: Hunting and Fishing Tales* (Stackpole Books, 1992) , 51.

[56]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5.

[57] Farley, *Fishing Yesterday' s Gulf Coast*, x iii.

[58] “Harding Fights Fish 45 Minutes, ”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1920; “Harding Loses Fish, ”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1920.

[59] “Tarpon along Florida Coast, ” *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12.

[60] “Aransas Pass Tarpon Club, ” *Forest and Stream* 69 (1907) : 100.

[61] “Fierce Fighting Tarpon, ” *New York Times*, July 21, 1895.

[62] Randy Wayne White, “Fishing’ s Dirty Little Secret, ” *Tampa Tribune*, April 14, 2013.

八 铈羽之鸟



路易斯安那州艾弗里岛上的白鹭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她们在此躲避为收集女士礼帽上的羽毛而来的猎人。

在法国它有着长长的喙，因为有这样的特点，当它们生下小鹈鹕时——幼鸟总是格外好看——它会用嘴在小鹈鹕身上厮磨爱抚，并张开翅膀覆盖在它们身上。

——菲利浦·德塔昂，《鹈鹕》，托马斯·莱特译（1841）^[1]

在阿根廷南方海岸4月的暮色中，一只鸟站在海浪中准备好要遵循自己的本能。这是一种娇小的鸟，不足两盎司重，比几片吐司还要轻。它的喙又长又细，呈深橘色，是一支能发出吱吱声的长笛。它的腹部是白色的，背部的羽毛已经从冬天时的灰色变成雪白，外沿则是暖棕色。它正扭转着它几乎很难被注意到的脖子，用长喙最后一次整理自己的羽翼，这样一来它尾巴上又露出了更多的白色，它便是因此得名的。白腰滨鹬从12月起就待在巴塔哥尼亚，吞食海水里的无脊椎动物。它的脂肪储备会迅速转化为能量。滨鹬的翼展有17英寸，三倍于其身长，黑夜一旦降临，它将展开翅膀，在星辰的引领下，沿这个种群数千年来已经熟稔的方向飞去：美洲北极。

这种矮脚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毅力可嘉的候鸟。当一切尘埃落定时，它已经飞出了7000英里，它能在空中一次连续飞行60个小时。直到在委内瑞拉作第一次停留，它已经掠过了整个南美洲。休整过后，它又在满天星光下开始上路了，它们结伴而行——每只都隔着一英尺的距离——扇动翅膀飞过西部的加勒比和尤卡坦，然后不停歇地飞越墨西哥湾。当白腰滨鹬在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州之间着陆时，它们像喷火式战机一样猛地向陆地一头扎下，如此维持着展翼的姿势，又轻轻地落在水边。在接下来一周时间里，它们会进食海生蠕虫、软体动物和甲壳类动物，然后又继续往北飞行。

在1915年的春天，洪都拉斯一份报刊上刊登文章讨论了鸟类飞越海湾的行为，并将其作为一种事实性的常识。美国鸟类学家对此表示反对，坚持认为这种高空壮举超出了鸟类的能力范围。当时，对鸟类迁徙活动做了细致记录的任职于美国农业部生物学调查分部的W. W. 库克（Wells W. Cooke），他试图提出相反意见，但遭到了嘲讽。对方嘲笑库克，虽然他们读过英国园艺家威廉·布洛克（William Bullock）的文字，他在1824年乘纵帆船经过墨西哥的坎佩切州北部时，遇上数百只在此降落的鸟，鸟群正处于“从墨西哥湾北岸飞往尤卡坦海岸”的迁徙途中。他们也知道马丁·弗雷泽（Martin Frazar），在布洛克事件的57年后，正值春天的暴风雨天气，弗雷泽正在密西西比河30英里开外的地方扎营，此时出现了20多个种类的100多只鸟——其中有鹀鸟、鸫、燕子、鹬——从南边飞来，飞到他的船上寻求庇护。他们也应该知道海军水手W. T. 赫尔穆特（W. T. Helmuth），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巡逻海湾时记录下了陆禽飞越的场景。约翰·詹姆斯·奥杜邦和其他博学的撰稿人，包括约翰·巴赫曼（John Bachman）（巴赫曼麻雀^[2]即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们提到海湾通道时——包括蜂鸟的——都将其作为已经被认可的事实提出。^[3]

每年两次，有十亿只鸟从墨西哥湾以及质疑的鸟类学家的头顶飞过。《约伯记》和《耶利米书》提到了迁徙中的鸟，荷马、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追踪过鸟类的季节性迁徙。但现代科学攻克了核裂变的秘密，却不曾接受鸟类横穿海湾行为的真实性。

相信者和质疑者究竟谁对谁错，着手验证此事的科学家是G. H. 洛厄里（George H. Lowery Jr.）。他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动物学家，他在1945年4月搭乘一艘挪威货船的顺风车从新奥尔良出发了。货船在蒸汽动力的驱动下直入海湾中心。洛厄里目睹鸟群在头顶飞过，日夜不停，看到这一幕时他离海岸的距离远得不能再远了。他还辨认出有21种不同的鸟登上船来休息。货船在尤卡坦的普罗格雷索的平静水域里刚停稳，他就架起了一个望远镜，观察着从月亮表面无声飞过的身影，它们在往北飞，他写道，往路易斯安那的方向。15年后，当科学家们开始使用风暴跟踪雷达研究鸟类迁徙时，每个人都成为相信者。最终他们了解到超过200个种、数十个科的鸟类每年会有两次从墨西哥湾上空掠过。结果显示，在北美洲的四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三条通过了墨西哥湾，分别是密西西比迁徙线、美洲大西洋迁徙线和中部大陆迁徙线。[\[4\]](#)

这些旅人都是挥着翅膀的朝圣者，北美就是他们的麦加城，它们古老的年度仪式确保了种族未来的延续。在一众候鸟中，巴尔的摩金莺和红喉蜂鸟从中美洲来，靛蓝彩鹀和橙尾鹟莺从西印度群岛来，食米鸟和烟囱刺尾雨燕从南美洲来。一次从南到北的跨海湾飞行的距离大约是600英里，环着海岸飞行的距离是前者的两倍，所以大多数鸟都选择直线飞行。尤卡坦半岛是一个理想的长途驿站，对候鸟们来说这是上天的恩赐。它们将这里当作休息点，吞咽着岛上的热带虫子，吮吸着热带花朵，为接下来的长途跋涉做准备。时候不早了，数千只鸟在黄昏时飞上树梢，然后和鹳一样，等星星出现，它们就起飞了。它们会飞上一整夜，直到次日早晨或下午时分在海湾北岸着陆——在空

中飞了20~30个小时，视当时情况而定。这是世界上陆禽进行的最长距离的开阔水域迁徙。

除了能抄捷径外，横跨海湾的飞行还有其他好处。一来，候鸟可以尽享蓝天，而免受捕食者的打扰。二来，它们数千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它们在非生产季节里将自己吃胖——科学家们称之为摄食过量。一克脂肪可以支持一只啮鸟在空中飞行125英里。最后，此时从百慕大高压刮来的热带纬度的风开始朝西北方向刮，它们便可以搭上季节性风而飞。不是所有鸟都能成功。有些年龄大的会累得从天上跌落。有些遭遇了暴风雨，可能数千只鸟会因此遭殃。科学家们曾经剖开过鲨鱼的肚子，从中发现了不幸的鸣禽。但大部分鸟群躲过了劫难，它们中许多最后会落在得克萨斯东部和路易斯安那西部的海岸上。

在它们还在半空飞时，海浪为迎接它们的到来，将裹挟着美味的无脊椎动物的海草推向近岸。这就是大自然的运转方式。精疲力竭的鹈、玎、三趾鹬、鸥和其他千鸟属的海鸟会像饿极了的马拉松选手一样对眼前的食物狼吞虎咽。让即将到此的鸟儿们备感欣喜的是，春天的温暖还会将树木、灌木丛和上一年秋天落叶堆里的昆虫都吸引出来。

每年的四五月份，似乎整个鸟类王国都在往墨西哥湾对岸飞去。每天都有上千万的鸟抵达这里。有些会多飞30或40英里的航程到内陆的森林里去。烟囱刺尾雨燕通常是第一个到的，蜂鸟紧随其后。候鸟们各有特点，无论是在大小、形态，还是颜色上——羽色发红的是为了迎接接下来的婚嫁季节。成千上万只鸟一同抵达，它们落下时就像天空中出现了一道瀑布，然后在绿荫上分出一道波浪，直到树上溢出了热闹的话音和歌声。进食马上开始，“一切来得毫无预兆，”自然学家·威登索（Scott Weidensaul）写道，“没有伸懒腰，没有放

松，也没有舔毛。”猎鸟者将这种现象称为“速降”（fallout）；在美国海，他们称之为海湾速递。[\[5\]](#)

“快乐的鸟！”1867年约翰·缪尔在墨西哥湾短暂停留时这样写道。“这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看着这些长着羽毛的人齐聚在此……优雅地在自然之家的餐桌上各自就座。”因为墨西哥湾是一个食物生产厂，这里有太多的鸟了——海洋的、涉水的、冲浪的，来自陆地的、来自岛屿的，路过的、季节性造访的，还有永久定居在此的。甚至迎来了蓝脸鲳鸟和红喉潜鸟。墨西哥湾是温带和热带地区的交会处，因此它既是喜晴鸟种迁徙的最北点，也是喜冷鸟种迁徙的最南端。鸭、麻雀和鹰——同样地，还有潜鸟——每个冬天到达的最南的地方就是墨西哥湾。白鹭、苍鹭、篦鹭、林鸛和朱鹭在每年春天也不会再往海湾的更北边飞，而是与终年原地栖息的无数留鸟一起待在这里。[\[6\]](#)

7月下旬，候鸟们开始感觉到有一股力量促使它们回南方的家。在墨西哥湾度过夏日的鸟类中，千鸟是第一个离开的，伴它而行的是北方南下过境的鸟群。随后离开的是在佛罗里达的圣乔治岛筑巢的燕鸥、蛎鹬和黑剪嘴鸥，很快，从东北部来的数万只嘲鸟也加入了它们。有些只离巢一月或两月的时间，它们都不会过久停留。障壁岛是返航鸟群的补给站，它们的毛色不再那么容光焕发了。秋季迁徙会持续到10月，一年中，10月的季节性强 气流将引领鸟群飞过海湾的东缘。从北极来的白腰滨鹬会在9月现身在此。跨越整个北半球，它很快就能回到阿根廷了。

1886年，15吨的“法兰西之花号”行至阿兰萨斯峡湾和加尔维斯顿时，因遭遇9月飓风而沉入海底。打捞队伍发现了600只鸟的残骸。但它们不是暴风雨下落到纵帆船上寻求庇护的迁徙受害者。船上还发现了价值数百美元的枪支弹药。

倒霉的“法兰西之花号”上的货物证实了威廉·厄尔·道奇·斯科特（William Earl Dodge Scott）在此前夏天了解到的信息。在威廉·哈尔西·伍德捉到改变海湾沿岸命运的那条大海鲢的一年零一个月零二十四天后，斯科特正坐在纵帆船上在同一片水域上逡巡。和船上其他人不一样，他不是为鱼而来。他是一位鸟类学家，刚满34岁，此时正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博物馆采集样本。

那个年代对自然历史的观察主要发生在实验室里，也就是科学家们去户外采集标本，带回实验室做研究。美国鸟类学的杰出先驱，亚历山大·威尔逊（Alexander Wilson）和约翰·詹姆斯·奥杜邦，就是背着两个木箱子到田野里去的——一个装着颜料和笔刷，另一个装着火药和枪炮。枪是斯科特最重要的田野工具。虽然从小腿脚不便，需要依赖手杖行走，但他能够熟练地越过树木和红树林的阻挠开枪射击。

但他在1886年的海湾考察之行中几乎没怎么开过枪。就标本搜集而言，这次出行无疑是失败的。这种情况极不正常。

七年前，当斯科特还在佛罗里达的热带内陆时，他就预见到这个灰暗的未来。他那时行进在欧克拉瓦哈河（Ocklawaha River）上，那里是佛罗里达当时流行的“丛林”漫游的主干道。最吸引游客的本是野生生物，但丛林里一片安静。船员解释说是因为上一趟游览活动变成了即兴狩猎。荷枪实弹的游客——当时很是常见——把红腹龟、水獭、短吻鳄、苍鹭、鸮，总之是一切活物当作标靶射击找乐子。游客现在可看的野生动物很少了，但船队将其归咎于胆小的动物而不是持枪作乐的游客。

斯科特对此非常熟悉。哈里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也一样，她曾享受过漫游欧克拉瓦哈河的活动，直到她目睹射杀发生，并被告知这是一项运动项目。“当然，”她在她1873年出版

的《棕榈树叶》一书中带着沉痛的心情写道：“这种与生俱来的野蛮本性很难追究其动机。人们为杀戮而杀戮。”如果枪手们乘坐火车行进在大平原上，那轨道车窗就会像战舰的射击孔一样炮火四射，死去的一排野牛如野鬼般游荡在草原上。19世纪末期，从南北达科他州到墨西哥湾一带，这里的自然生命在面对人类无情的随意杀戮时根本毫无招架之力。[\[7\]](#)

斯科特最近的一次海湾之行暴露了人类无止境的残暴行径。他租用了单桅帆船“坦塔洛斯号”，熟练驾驶它的船长以前是海绵采集者，叫作贝克。“坦塔洛斯号”在5月从塔彭斯普林斯的码头启程，开往多风的安克洛特河（Anclote River）。同行的还有斯科特的妻子玛丽安，他们的狗狗格劳斯，还有一位助手。他们目之所及都是垂钓者。这片水域满是惊喜，但对鸟类学家来说就不尽然了。斯科特更早时候来到海湾时，鸟群之庞大足以遮天蔽日，但现在垂钓者比鸟多，曾经洋溢着活力的飞鸟的天堂如今已是一片沉寂。整个海岸变成了屠宰区。这里的杀戮不像欧克拉瓦哈河上那样随意和随性，这里的人们有条不紊、勤勉劳碌。但它们是一样的——完全一样。

背后操控这一切的力量来自遥远的北方和外国，它有一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源头，那就是女士帽业。女士们在钓大海鲢时为了躲避强烈的光线而戴的草帽并不是罪魁祸首。被戴着去聚会、晚宴和教堂的那类才是。有些像花园里的鸟池一样大，上面绽放出长长的、轻柔的羽毛；因为花翎羽饰的存在，你可能都见不着帽子本身。大羽毛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非常时髦，价格昂贵，比最高级的沃姆·霍夫渔线轮还要贵得多。尽管如此，它们依然是美国和欧洲富裕家庭里每家必备的饰物。

设计师们最青睐长而轻软的羽毛，比如说白鹭、苍鹭、朱鹭、林鹳、篦鹭和火烈鸟的，也就是所有大型涉水鸟的羽毛。羽毛并不是被

鸟抖落后人们从地上捡来的，尽管这个行业里的人喜欢这么说。时尚和金钱制造了世上无处不在的灾难。商业猎鸟人从一小撮上好的雪白的白鹭翎羽上挣的钱等同于一盎司的黄金。因此为制造帽子而杀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现代社会对野生生物犯下的残暴罪行之一，恶劣程度相当于人类给北美野牛和海狸带去的毁灭。在那些更为著名的大屠杀里，毛皮和兽皮至少为需要它们的人提供了温暖。旅鸽被视为人为促使灭绝的标志性物种，它在眨眼间消失殆尽，但即使是旅鸽，也最终作为食物出现在食品市场和餐桌上。而帽子上的羽毛，除了虚荣什么也没带来。

墨西哥湾的涉水鸟成为主要的目标。如果最终没有得到以奥杜邦团队、妇女俱乐部、一位美国总统、塔巴斯科辣酱大亨为代表的墨西哥湾保育派们的荫庇，它们也许早就被从地图上抹去了。

贝克船长的“坦塔洛斯号”驶入坦帕湾时，屠杀的行径一览无遗。作为开端的是马克西莫群栖地（Maximo Rookery），它在历史上是整个墨西哥湾最丰饶的鸟类栖息地之一。这里曾经生活着将近十万只鸟，有25种鸟类在这里筑巢建窝，它们亢奋拍打翅膀的声音、叽叽喳喳的叫声不绝于耳，但现在的马克西莫已经不再是一个群栖地了。它现在只是一座被红树林环绕的孤寂的岛屿，万鸟飞绝，只剩下海鸟粪的白色渍点和摇摇欲坠的枝巢，成为它往日辉煌的唯一佐证。

斯科特和他的同伴目睹了那位“老法国人”的手工艺品。他的真名是阿尔弗雷德·勒舍瓦利耶（Alfred Lechevelier），也可能是让·舍瓦利耶（Jean Chevelier）。没有人确切知道。他就像一只游荡的鸥，只出现在海岸上一天。他说着一口奇怪的洋泾浜英语，虽然他说起巴黎的生活时让人以为那里是他的家，但他显然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50年前，是另一个法国人奥代·菲利普伯爵（Count Odet Philippe）将柑橘引入当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西莫只有为数

不多的移民在这里捕鱼、养牛、种植柑橘。在1885年《美国医学协会期刊》宣布这个海角是“佛罗里达州上……最健康的地方”之后，一切全改变了。北方的肺病和气喘患者纷纷向这里聚拢，正遭受黄热病和其他疾病侵害的坦帕港上的人们也跨过海湾来到这里。地球上最有利于健康的不是其他地方，正是鸟类群栖的地方。[\[8\]](#)

放弃了马克西莫后，老法国人和他的两个助手沿着海岸向南杀到了万岛群岛（Ten Thousand Islands）。在大沼泽地时，舍瓦利耶不慎将子弹射入了自己的右手，但他很快习惯了使用左手射击，他速战速决，留下他的助手们将射下的鸟剥皮、掏出内脏，得到的羽毛放到他的纵帆船上。但莫名其妙的是，佛罗里达州派内拉斯（Pinellas）的一处小湾、万岛群岛的一处海湾，以及建造了第一条横穿大沼泽地公路的建筑公司都以这个残忍的羽毛猎手的名字命名。多年以后，1958年的一部B级片《穿过沼泽》中，在伯尔·艾弗斯（Burl Ives）饰演的一个狂躁的羽毛商人的角色身上还能看到他的影子。这个大佬声音粗哑，身形圆胖，光秃秃的头顶和胡子拉碴的脸上永远渗着一层亮晶晶的汗珠，他沉迷于暴力，是电影中被着重刻画的一个角色。

斯科特跟随舍瓦利耶的屠杀路线从一个群栖地到另一个群栖地。萨拉索塔和加斯帕里拉岛的海湾上鸟类几乎已经绝迹，只有不知如何设法躲过了劫掠的一对有点泛红的白鹭、两只白色的朱鹭和三只苍鹭。斯科特形容他巧遇到的这几只仅存的鸟是惊惶的。然后是——“夏洛特港！”斯科特在他给《海雀》的报告中发出了一声惊叹，《海雀》是美国鸟类学家协会的期刊。在斯科特寄出这份快件前，蓬塔戈尔达的邮局局长告诉他，猎鸟者在短短两季时间里已经将当地的苍鹭的群居巢剿杀殆尽了。[\[9\]](#)

许多羽毛猎手和老法国人竞争。羽毛代理商一边刊登报纸广告，一边口头宣传，招募当地“枪手”（斯科特如此称呼他们），并承诺

这份工作来钱快，于是应征者如潮。纽约代理商约瑟夫·巴蒂和60多名猎手签了合约。之前，巴蒂收购的羽毛不外乎是用来制作捕猎陷阱、做博物馆的收藏品和实验室研究。当他能将羽毛卖给女帽制造商后，这些不怎么盈利的业务很快就靠边站了。[\[10\]](#)

作为前所未有的充满革新意识的猎人——他写了一本指引书，指导人们如何对野生动物进行射击、诱捕和下毒——巴蒂为他的猎手们配备了一批后膛霰弹猎枪，能同时适配12铅径枪管和杀伤力更小，声音也更小的0.22英寸口径枪管。后者用在小型鸟的近距离射击上。他那艘45英尺的单桅平底纵帆船是货运船舶，常停靠在港口、岛屿和渔船码头上等待运送羽毛。在加斯帕里拉峡湾（Gasparilla Pass），斯科特看着巴蒂的猎手们将纵帆船划向岸边，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砰-砰-砰的枪响声划破天际。他们用的是0.22英寸口径的。斯科特在第二天早上打听到，他们射下了燕鸥和鹈。[\[11\]](#)

6月下旬，斯科特回到了和平的普林斯顿。如果他将行程扩展到海湾的其他地区，他将会了解到随得克萨斯暴风雨而来的“法兰西之花号”上的600张鸟的皮毛。那场打沉了货船的飓风很可能制止了本将发生的针对数千只鸟的杀戮。佛罗里达海岸几乎被扫射了一遍，可搜刮的已经越来越少，于是羽毛猎手们继续往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以及墨西哥的障壁岛和海岸找寻生机。

羽毛代理商放出话来，要重金求购当时稀缺的白鹭羽毛。从生物学角度来说，白鹭的白色羽毛没有色素沉积，但仍拥有设计师们所追求的丝般的纯洁。三年后，美国鸟类学家协会对得克萨斯海岸的一项勘测显示，这种“雪白的产品”几近绝迹了。到了这个时候，代理商们转而收购所有他们可以收购的：燕鸥、反嘴鹈、鹈、鹈鹕、苍鹭和鸥。据说一个羽毛猎手一次要交付1000张混杂的皮毛，那是一周的射杀量。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得克萨斯布满丝兰和仙人掌的岛屿已经

一片死寂。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备受尊崇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鸟类馆馆长乔尔·阿萨夫·艾伦（Joel Asaph Allen）悲叹道：“得克萨斯经历过的浩劫正沿着我们的海岸线蔓延开来。”

[\[12\]](#)

离艾伦位于曼哈顿上西区的办公室不远，纽约的经销商近来收购了七万只被射杀的鸟的羽毛，它们全都来自长岛上的一个村庄。羽毛猎手大举扫荡澳大利亚、非洲、中东、远东、南美和南欧的鸟类巢穴，跨越地区、大陆和海洋将他们的掠夺品运往各地。1902年，在本就是一个巨大的时尚消费地的伦敦，其商业销售部公布，其羽毛库存有55000盎司。换算成鸟的数量的话，前面的重量等于19.2万只成年鸟类和2~3倍于此的丢失的鸟巢和鸟蛋——它们全部来自美国，大部分来自南部海岸。四只白鹭仅能产出一盎司的羽毛。像舍瓦利耶和巴蒂这样的每船十万只的射杀量并不少见。奥杜邦协会的一位成员说鸟类正在“吃它们的最后一顿饭”。[\[13\]](#)

在斯科特即将出发去墨西哥湾前的那个冬天，鸟类学家弗兰克·查普曼（Frank Chapman）花了两个下午的时间在曼哈顿上城的零售街区里行走。他数到了542顶有羽饰的帽子，代表了从麻雀到鸵鸟的174种鸟类。有些帽子有一整只的鸟——翅膀、头部、喙、爪等一切。最华丽的帽子招展着来自涉水鸟的羽毛，它们中的很多，毋庸置疑，曾经是丰饶的海湾自然的一分子。

在屠杀发生之前，涉水鸟和海上落日、棕榈树一样，是吸引游客的热带奇观。回忆录、日记和寄回家的书信中从来不会不提到白鹭、苍鹭、林鹳，或者荧光粉色的篦鹭。一些长颈的涉水鸟有成年男性的胸口那么高，它们姿态拘谨，竹竿腿和向后弯的膝盖[\[14\]](#)让它们走路来一板一眼的。结束了一天的捕鱼后，它们在黄昏时进行的仪式能轻易抓住旁观者的眼球。它们从头顶飞过，作家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Marjory Stoneman Douglas）写道：“白色的鸟群里有成千

上万只鸟，它们飞过时，发出丝质横幅沙沙作响的声音，鸟群像羊群、像楔子、像被风吹皱的缎带，蓝的一团，白的一团，鸟群似河流迎着落日倾泻而下，返回了栖息地。” [\[15\]](#)

涉水鸟一般喜爱独处——除了朱鹭，它们因此受到羽毛商的偏爱——而且每一只都鲜明耀眼。它们筑在红树林和柏树（林鸛喜欢后者）的巢非常醒目，就像它们白天在浅水或湿地猎食的身影一样。它们是严于律己的捕鱼者，部分涉水鸟可以令人难以置信地始终维持一动不动的姿态，就像在公共广场上表演的活雕像一样，直到有吃的走进了它们敏捷的喙的可及范围。其余的，包括雪白的白鹭，会从浅水上淌过，将食物搅弄上来。

雪鹭属于鹭科，它孵出的蛋呈淡蓝色，营巢建得很低，多是用细枝和芦苇堆集而成。成年后的雪鹭身长约24英寸，重0.75磅，这样的已经算是中等个头了。从出生开始，它们身体上的毛发就一直保持着无瑕的缎白色，完全漆黑的双腿和黄色的脚爪让你敢断言它们一定是在一桶油漆里被浸过。它们的嘴是同样的黄色和黑色，嘴的长度和形状与一把小军刀无异。在繁殖季，黄色会变成橘红，它们还会长出飘逸纯白的婚羽。一位研究得克萨斯海岸鸟类的专家，G. B. 塞内特（George B. Sennett），认为雪鹭是“所有鹭中最漂亮的”。它们的活动范围横跨世界各地的湿地，它们的种系起源可以追溯至更新世，当时和雪鹭共同生活在墨西哥湾上的还有猛犸象、前欧洲的马、骆驼、美洲驼、巨大的三趾树懒，但它们都没有在地质气候巨变以及早期人类的原始武器下存活下来。而更为敏捷和随机应变的鹭，活了下来。但它们终究无法抵挡现代狩猎者的枪。 [\[16\]](#)

没有什么比人们猎杀白鹭更让来自路易斯安那的爱德华·艾弗里·麦基尔亨尼（Edward Avery McIlhenny）感到胆寒的了。这个行为触犯了他内心南部绅士的感性，更不用说他和鸟类间的密切关系。

他自幼的生长环境给予了他这种共情，他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岛上长大，海岸边多是沼泽地带，树木茂密，野生动植物繁多。鸟爱待在这里。这里有它们生活的基础：食物、巢材和荫蔽，还有迁徙途中的栖息地。内德——人们是这么称呼麦基尔亨尼的——在1872年越冬鸟群聚集时出生在这个岛上，是黄石成为美国首个国家公园的那一年。除了外出念大学、差旅、探索世界之巅，他从未离开过这里。在他还是一个蓝眼金发的小男孩时，他就跟着他的父亲叔伯坐着小艇去钓鱼，虽然大人们的活动和谈话内容很是无聊，但他被“白鹭和苍鹭在低洼沼泽地边上昂首阔步”的姿态吸引住了。等长大了些，他便开始自己划着船出去一边观察一边学习。他将这些鸟画入画里，写进诗里。他贪婪地读着鸟类学的书籍，几十年后，他写了一本给小读者们的书，叫作《一只白鹭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n Egret*）。他迅速意识到岛屿上涉水鸟的数量锐减。他听到了枪声，看到了被丢弃的鲜血淋漓、被扯去羽毛的尸体。屠杀必须停止。[\[17\]](#)

麦基尔亨尼有一切充分必要的条件去完成他想要做的事。不管是打造一座大花园，尝试栽种竹子，还是经营家族生意，他都极富开创精神。他也生于富贵之家。麦基尔亨尼家族是这座岛的主人，岛屿得名于内德的外祖父丹尼尔·达德利·艾弗里（Daniel Dudley Avery），称艾弗里岛。这里是一处宁静的世外之地，四处萦绕着紫藤、柏树针叶和木兰花的香气，树林茂密，除了前面说到的，还有榲桲树和山茱萸；这里一年的降雨量有60英寸，到处是水塘、小湾和溪流，里面生活着乌龟、鱼和小龙虾；人工栽种的杜鹃和山茶花娇艳欲滴；长尾小鹦鹉、象牙喙啄木鸟和各种涉水鸟禽穿梭于其间。艾弗里岛边缘是密密匝匝的一圈3英尺长、2.5英尺宽的带状沼泽禾草（互花米草），使它看起来不像一座岛屿。岛上的最高点比海平面高出惊人的162英尺，它像新奥尔良以西140英里处拔起于长沼地带的一座山峰。内战爆发前，在岛屿和奴工的助力下，丹尼尔·艾弗里一跃成为一位成功的甘蔗种植园主。

随蔗糖而来的还有盐。艾弗里岛地底是一处岩盐盐丘——这也是岛屿地势高的原因。第一批开采的人是岛上最初的白人定居者，也就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爱尔兰移民，他们买来西班牙政府出售给新世界的天主教良民的土地。岩盐和海盐是珍贵的调料品和食物防腐剂。海水蒸馏——其实就是在火堆上架设大锅将海水煮沸——是墨西哥湾上一项古老的产业，可追溯至殖民时期。内战期间，邦联军先从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的畜养牛身上获取肉食，然后用来自海湾的海盐保存肉类。作为封锁补给线的一项措施，沿海岸逡巡的联邦军炮艇的炮轰目标就是那些透过树木升起烟气和蒸汽的地方——蒸馏地的标志。开采盐丘可以省去蒸馏的过程，为控制了盐矿的那一方积蓄优势。

当联邦军围攻新奥尔良的时候，艾弗里一家正在得克萨斯州自我放逐。大卫·法拉格特率领的军队控制了艾弗里岛，重开岩盐矿以供应军需用盐。战后，丹尼尔·艾弗里召集以前的奴隶劳工——现称雇佣劳动者——重操甘蔗种植旧业。他也从他的前敌人那里学了一手，开始和另一家公司合伙开采盐矿。艾弗里在1879年离世，他离世后，盐矿带来的特许经营费收入让艾弗里家族的财富得以维系。

盐是一项利润可观的遗产，但内德的父亲，埃德蒙·麦基尔亨尼（Edmund McIlhenny）留下的这一笔则更为“辛辣”。他体格魁伟，胡须又厚又黑，他长得看起来像吃喝不愁的人，又或者是一个银行家。他在新奥尔良时是后者，那时候内战还未爆发，他娶了丹尼尔·艾弗里的女儿玛丽·伊莱扎（Mary Eliza）。战后，北方掙包客独揽经济大权，他也因此丢了工作。他和玛丽回到了艾弗里岛，那里除了有瓦遮头，还有玛丽的盐矿收入。但埃德蒙需要一点目标。

他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尝试种植从墨西哥或中美洲买来的塔巴斯科辣椒（Tabasco pepper）。作为西班牙和哥伦比亚辣椒的杂交品种，到1868年，这种亮红色手指形状的辣椒在他的照料下已经在岛上茁壮

成长了起来。在一间用砖头和隔板搭建起的外屋里，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将成熟的辣椒捣碎至浆状。他将红润的辣椒泥放进陶瓷罐里使之变陈，上面盖上艾弗里岛的岩盐以锁住其风味，再加入醋继续陈化。数周后，他将这种辣物倒入古龙水瓶子里，这瓶子是他从新奥尔良的一个玻璃制品商那里买的，他在每一个瓶子上都贴了标签——“麦基尔亨尼的塔巴斯科牌辣椒酱”。

他的创造很快就被应用到牛扒、炖肉、汤、秋葵浓汤和其他更多来自长沼湾流的牡蛎虾食中，为其增添风味。如果没有当地的海鲜饮食习惯，他可能无法受到启发制作出此酱料。尽管它对餐饮贡献良多，但国家在麦基尔亨尼去世后的20年里陷入了经济萧条，辣酱公司也摇摇欲坠。塔巴斯科辣酱制造落到了他的大儿子约翰的身上。约翰为让经营好转做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在古巴反抗西班牙的战争中他加入了“旷野骑士”^[18]，并随西奥多·罗斯福登上圣胡安山，此时品牌的经营已有起色。第二个儿子，内德，此时接手了公司的经营。他将生产过程流水化，缩小产品容量，并且为了取得更醇厚的风味，他将陈化时间延长，酿造容器改用杰克·丹尼式的白橡木威士忌桶。内德为辣椒酱生产注入了新的生命，家族生意逐渐扭亏为盈。

生意上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麦基尔亨尼丰满的性情和乐于冒险的性格。根据他的家族传说，他好与短吻鳄搏斗，并破纪录地射杀了最大的短吻鳄——19英尺长；他与在后来击倒了重量级拳王约翰·L. 沙利文的绅士吉姆·科贝特^[19]拼拳击也不落下风；他救过200个遇难的海员，其中一位是杰克·伦敦。麦基尔亨尼大概从来没有和科贝特互殴过，也没有向杰克·伦敦投去过救生索，但他毋庸置疑是一位无畏的冒险者，曾经救出过被冰层困住的捕鲸船船员。

他彼时25岁，风华正茂。当时他的头发还是从中间分向两边，到他更年长时，便将其从前额往后梳，同时剃掉了以前修剪整齐的蓄

须。但他的男子气概依然在。他一直擅长利用他的社会身份，将它们当成一双穿着舒适的旧鞋，当梦想被阻拦时他便穿上它们。1897年，他离开了他的岩盐岛，去往冰雪之国，这是一趟自筹经费的探险之旅，他和两位助手将要去采集珍贵的北极生物标本，其中包括白腰滨鹬。三人探险队在阿拉斯加最北端的巴罗角（Point Barrow）建了一个大本营。那里的居民，除了野生动物，就只剩下当地土著和基督教士了，还有在夏天到初秋时会经过的捕鲸船。

这不是麦基尔亨尼第一次来冰封的北极圈。三年前，他曾和F. A. 库克（Frederick A. Cook）（他号称是第一个拿下北极的探险家）一起到过格陵兰岛，当时他们的船沉了，需要救援。巴罗角，阿拉斯加，勾起了他的回忆，尤其当他看到几条夏末还未返航的大意的捕鲸船。“担心他们”，麦基尔亨尼在他9月6日的日记里写道。不出几日，船队四周的冰层冻住，被围困的船员面临被饿死的境况。麦基尔亨尼参与了美国海关缉私署发起的救援行动，他负责给被围困人猎取食物。在一本记载了此事的书中，约翰·托利弗（John Taliaferro）写道，内德展现了他作为“一名出色的鸟类神枪手”的技能，这都是他还年幼时射猎秋季水鸟时习得的。为了救捕鲸人，他射倒了数千只鸭子，一天就杀了430只。他奇准的枪法总共带来了9000磅的肉。[\[20\]](#)

现在看来，有些鸟是麦基尔亨尼想射杀的，有些是他想救的。在巴罗角以南4000英里的地方，一场类似的援救活动正在展开。它饱含麦基尔亨尼对鸟类的善意和爱，这件事基本上是他以一己之力进行的。他想出了一个简单但又不那么明显的拯救被过度猎杀的白鹭的方法：一个鸟笼。在进行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岛之行的间隙，他和他雇的帮工在艾弗里岛上扩建了一个水塘，在水塘旁边，他打造了一个巨大的鸟舍，鸟舍用竹子架设框架，上面盖着铁丝网。然后他在艾弗里这座已经凋零的鸟类王国找到了两个白鹭巢，偷了八只小白鹭放进鸟笼

里。他把自己当成小鸟的父亲，每天喂食，和它们互动。很快，他说，它们“对于能在我身边流露出真正的快乐”。[\[21\]](#)

到深秋，这些小鸟已经有能力飞翔时，他卸掉鸟笼，让住客往南迁徙。过了两晚和一次霜冻后，它们飞走了。来年三月，他每天都要走到那边，期待着能看到回家的鸟儿。在3月的第18天，他发现，有四只雪白的小家伙出现在了灌木丛里，那里正是以前建鸟笼的地方。两天后，另一对也回来了。它们一点没浪费时间，两个鸟巢已经开始动工了，一根树枝一根树枝地搭建着。那个春天一共有八只小鸟被孵出来。13只白鹭在11月往南飞去，次年3月，它们全都回来了。到夏天的时候，艾弗里岛上养育着20只刚孵化的幼崽，一年年过去了，这个数字翻了两倍、三倍、四倍。没过多久，白鹭的表亲们也加入进来。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这里已经有2000多只鸟爸鸟妈了。

麦基尔亨尼没有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当地猎手，认为是他们造成了他现在正与之对抗的危机。他将他们看作环境改变的受害者，虽然他们参与推动了这个改变。射杀和诱捕野生动物一直是路易斯安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短吻鳄，在近几个世纪，自从这个已经存在了1.6亿年的美洲冷血爬行动物被欧洲探险者看上以来，它们就被猎杀在海湾周边的淡水和咸水中。在伊贝维尔1699年为法国重新发现了密西西比河口鸟趾状的三角洲时，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杀了一只小的，8英尺长。”纺织厂和内河船只用短吻鳄的油脂润滑机器，邦联军将鳄鱼皮做成马鞍和靴子，鳄鱼肉则成为他们的口粮。在麦基尔亨尼所处的时代，短吻鳄的生命被延续在钱夹、背包和鞋子上。它们的牙齿、卵、四肢、幼崽，无论是活着还是被做成标本，都被视为自然界的新奇玩意儿，广受欢迎。[\[22\]](#)

1880年到1933年，路易斯安那州向市场输出了350万只短吻鳄；佛罗里达的数字是其两倍。短吻鳄和白鹭的数量同时坠入深渊。不同之

处在于几乎没人不在乎短吻鳄的处境；唯一拯救了它们的是羽毛市场。当羽毛市场被打开后，短吻鳄相比起来就成为低收入但高风险的猎物。它们身上唯一可以出售的皮是肚子上的皮，市场价是一英尺十分钱。一个年轻猎手质疑如果“猎鸟一天的收入”就相当于“猎鳄”一个月的收入，那为什么还要冒险进入有可能被感染的水里呢。[\[23\]](#)

其他野生动物的境况更加糟糕。在皮毛贸易中被当地人和欧洲狩猎者疯狂猎杀的白尾鹿最终算是缓了过来，但熊、海狸等更多的动物并没有。到羽毛贸易盛行时，猎手和市场已经学会了接受浣熊毛和麝鼠毛。20世纪20年代的学院生活刮起了一阵浣熊皮毛外套的狂热风潮，于是又一个物种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起来。为了保持路易斯安那在皮毛经济中的活跃地位，有人想到了建立海狸鼠养殖场的主意。海狸鼠是半水生的啮齿类动物，如果让水獭和一只饥渴的海狸交配，生出的后代大概就是海狸鼠的样子。它们就像生长在湿地的野猪，跟吃了助孕药一样，繁殖能力强得令人生厌。在数十年间，2000万只海狸鼠将它们的大门牙伸向了当地植被，被它们啃过的区域，当地人称为“被吃干净的地方”。21世纪皮毛市场坍塌后，成倍增长的啮齿动物每年要吃掉40平方英里的湿地植被。

麦基尔亨尼是最早一批建立起海狸鼠养殖场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文字都指责是他将这种巨大的啮齿动物从阿根廷引进，并任由它们肆虐路易斯安那的海岸。但有其他更早建立的海狸鼠养殖场，其养殖场的大海狸鼠是从一个新奥尔良商贩那里买来的。待市场已经无法承受这种风险后，养殖者们放生了他们的海狸鼠。

鸟类并不像海狸鼠一样捣乱环境，也不像短吻鳄一样会咬掉你的手臂。而且它们的羽毛售价高昂，足以吸引当地狩猎者大规模出动。在猎鸟的狂热分子中有一类人，他们曾经猎鸟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餐桌上的食物。金钱，一位奥杜邦守育人评论道，对“许多真正善良的

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诱惑”。以前，当地人猎杀涉水鸟只是为了获得食物（在万岛群岛，他们叫白鹭“乔科洛斯基^[24]鸡”），枪支几乎没有对种群数量形成影响。根据美国鸟类学家协会的统计，女帽贸易每年屠杀500万只鸟，截止到20世纪末，墨西哥湾的羽类鸟群数量只剩原本的十分之一。查普曼说在那里要拍摄一只鸟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在大屠杀的顶峰时期，大平原上的北美野牛数量——顶多800只——都比海湾上的雪鹭要多。这样看来，白鹭很快将成为我们的回忆和博物馆的展出品了。^[25]

商业狩猎者通常不会看向未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也无法忍受其职业所带来的暴行。射杀鸟类的最佳时机是雏鸟刚被孵化出来时，这时成年鸟身上珍贵的婚羽还未褪去，大批的鸟类还日夜聚集在群栖地中。枪声响起时，作为父母它们不会四散而逃，而是要将幼鸟保护起来。无依无靠的雏鸟的结局，不是被天敌吃掉就是在阳光下死去。内疚袭来，一位猎手无法将杀掉白鹭母亲和“执行上帝的使命”联系在一起。那个被猎鸟酬劳吸引，认为它比猎鳄要好的年轻猎手最终彻底放弃了这个职业：“我受不了了，听着那些挨饿的小鸟的叫声。”^[26]

对动物心生怜悯并不利于职业发展。如果你会因杀戮而感到不安，你就不会得到工作。不管是在市场里屠宰，还是仅仅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学会漠视自然的遭遇是必要的。鸟类遭受的这种残酷压迫不仅仅在于贡献出自己的羽毛。在加尔维斯顿湾附近的鹈鹕岛（Pelican Island），得克萨斯州鸟类学家、酷爱雪鹭的乔治·塞内特有惊人的发现，“这座岛上的每一平方码”，有人告诉他说，都曾经有扇着翅膀、叽叽喳喳的造巢的鹈鹕，直到几个“有进取精神的人”来到这个海滩，怀揣着他们的冒险计划——杀鸟炼油。不出数年时间，鹈鹕岛上就再没有鹈鹕了。但从商业角度看，供应紧缺没有带来什么后果。因为这些准资本家从来没找到过有这个需求的市场。^[27]

破坏自然并不需要你身在自然。你的影响可能来自不起眼的地方，只是从大宅子里攫走了一小件物件。再说回到旅鸽，这次我们借用詹妮弗·普赖斯（Jennifer Price）在其杰出著作《飞行地图》（*Flight Maps*）中所说的话，纽约戴尔莫尼科餐厅（Delmonico's）的食客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餐盘上这只鸟在来到热气蒸腾的餐厅后厨前在什么地方，也没有想过他们自己在终结其生命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帽子上的鸟，同样地，将人远远带离了大屠杀的现场。

在工业化的都市社会，用自然之物来装扮、表达自我已经成为一件普遍的事。从她公寓窗子往下看伦敦的街道，弗吉尼亚·伍尔芙写道，“羽毛似乎是有活力的精致生活的自然装饰，是尊严和独特的象征”。鸟类带有女性特质，人们这样认为。羽毛，它们丰满、瞩目、活泼，当它转变为女性时尚时带来了审美意趣，只是它意味着致命的生态扭曲：自然之美助长了托借之美，而托借来的美将抹灭自然之美。[\[28\]](#)

顶戴的花羽是双手沾染的鲜血，这是麦基尔亨尼所看到的。他谴责人们“对饰物的残暴追求”。美国的媒体和科学环保组织都指责这种女性的虚荣。“这种对装饰品的渴求是一种野蛮人的品位”，一位著名的自然学家约翰·伯勒（John Burrough）在《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中写道。《华盛顿邮报》头版头条标题呐喊“时尚没有灵魂”。下方的刊文对“正托着枪支寻找下一个开采地”的“名流夫人”表示无法容忍。更多的陈情开始诉诸母性的温情：上百万的鸟妈妈正在被杀害，你难道看不见吗！伯勒、查普曼、麦基尔亨尼，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在大声疾呼。美国户外运动者联盟（League of American Sportsmen）的主席说，女性曾申斥以狩猎为消遣的男性“残忍对待动物”，但她们现在自己也放弃了这片道德高地。[\[29\]](#)

伍尔芙对“涂脂抹粉”的女人同样毫不留情，说她们用脑袋上那根羽毛来衬托她们那张“愚蠢的脸”。但这位作家太过敏锐以至于让男人逃脱了罪责。对沾染了鲜血的女性时尚的斥责有时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是男人的世界。男人们射杀了鸟群，他们控制着女帽制造业，而将羽饰帽子展示在橱窗上的商店的店主也是男人。男人们统治着媒体，报纸上年复一年、一页又一页地在标题栏上印的都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穿……，时髦女性穿……，上流社会的女孩们穿……，巴黎美人们穿……，等等。《华盛顿邮报》，那份宣布时尚没有灵魂的报纸，在一整页宣传最新羽饰穿戴的版面中用的是诸如“诗意”“优雅”这样的词。通常编辑时尚版面的都是女性记者，女性也在穿戴上保留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正如伍尔芙意识到的，她们将自己放在了男性主导的社会语境中。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的虚荣心不见得更少。他们修剪胡子，戴圆顶礼帽，为了博得身边这位穿戴羽饰的淑女的欢心，他们投入的精力也不少。[\[30\]](#)

麦基尔亨尼倒向了将羽毛需求归罪于女性的阵营。同时，他也知道女性作为社会规则的监护人和俱乐部的参与者，她们正致力于让猎杀鸟类成为道德问题。她们最为关注的，一是那些拿着空气枪对准了飞鸟的男孩，二是数量激增的猫，它们常“悄悄扑向”哺育中的鸟类。针对前者，她们发起了教育运动，并写信要求青少年杂志停止刊登气枪公司的广告。而针对被一撰稿人称为鸟类杀手的猫，应对措施则极端得多。在圣彼得斯堡，一位名叫凯瑟琳·蒂皮特（Katherine Tippetts）的俱乐部女性游说市政委员会颁布一道消灭“一切流浪猫”的法令。[\[31\]](#)

蒂皮特背后有来自当地奥杜邦协会的影响力支持。爱鸟俱乐部的女性们将她们的热情投入奥杜邦协会中，在一些地方，协会花名册就是一份女性俱乐部花名册的复写本外加几位男士的名字。就全美国而言，奥杜邦协会会员中的女性成员数量是男性的16倍。有组织的保育

活动，不论是来自奥杜邦协会还是女性俱乐部，都推动了19世纪末期美国进步主义的崛起。进步主义源于对迅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下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社会和政治反思，所谓的问题即如政治腐败、大财团的垄断、对工厂劳动力的剥削（包括童工问题），以及对自然环境和野生动植物进行的无意义的摧残。

美国进步主义中涌现出许多知名人士：西奥多·罗斯福、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爱莉丝·保罗、劳拉·简·亚当斯^[32]。改革的主要推力来自女性俱乐部，她们的改革议程在多个领域展开，从强制入学、公共图书馆到禁酒和妇女投票权——惯常被男性搁置在一边的议题。俱乐部成员由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女性构成，她们热心公共事务和人文关怀，尽管她们没有选票，就像《每日一铜币报》专栏作家玛莎·菲尔德写的，“一旦她们组织起来，就成为南方一股令人畏惧的力量”。^[33]

对像凯瑟琳·蒂皮特这样的人来说，关系和人脉意味着一切。蒂皮特是一个寡妇，这意味着她摆脱了传统妻子的责任，她是一家旅馆的所有者和房产管理人，一个作家，一个完美的市政工作者——她活跃于24个团体——在法律许可时曾竞选过公职。她参与创立了当地的女性俱乐部，并将其成员引荐到了她曾担任主席33年的圣彼得斯堡奥杜邦协会。她也曾出任佛罗里达妇女俱乐部联合会和佛罗里达奥杜邦协会的主席。

加尔维斯顿年轻的塞西尔·塞沙斯（Cecile Seixas）看似正走在相似的轨道上，她于1899年创建了第一个得克萨斯奥杜邦协会。不幸的是，第二年厄运降临到她身上，她的母亲、两个姐妹和其他8000多人葬身于当年的加尔维斯顿飓风。1903年，米莉·伊娃·兰姆（Millie Eva Lamb）和霍普·图尔逅（Hope Turhune）在加尔维斯顿湾的沿岸大陆上又重新集结起新的团体。

女性常常占据主动，然后高明地劝说行事高效的男性为她们工作。在女性主导的得克萨斯奥杜邦协会，其中一位重要说客就是一个真正带枪的前得克萨斯州骑警默文·巴瑟斯特·戴维斯（Mervyn Bathurst Davis），他留着一头狂野比尔^[34]式的长发和胡须，腰间别着一把六响枪。可想而知，他一定是别着这把枪去奥斯汀游说立法者通过美国鸟类学家协会的范例法（model law）的。

范例法是提前草拟好以方便立法者采纳的法律条文，立法者可以在其基础上按他们的喜好修改。得克萨斯州的法律非常具有代表性，其禁止贩卖野生鸟类羽毛，禁止偷盗属于海岸和涉水鸟的鸟蛋——一个日渐恶化的问题。奥杜邦曾于1832年拜访干龟群岛，群栖的禽鸟在那像“云团”一样盘旋在头顶，奥杜邦亲眼看见古巴的猎蛋人用木棍将上千只鸟赶向天空。他们最终“装满了一货船八吨的燕鸥蛋”，这些蛋会被运往哈瓦那和基韦斯特以每加仑25美分的价格卖掉。^[35]

几十年后，海湾沿岸的居民贪婪地望向野生鸟蛋，将它们视为季节性的食物来源——不算无理。自上一次繁殖季结束以来第一次，平底煎锅上将滋滋响地煎着蛋和培根。但是，这顿春季狂欢的美妙香气掩盖的是毫无远见的愚蠢：食用鸟蛋正在使鸟类种群绝后。城市居民向营巢地围拢来，他们不理睬巢中的鸟蛋，而是循例将每一个蛋打碎。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带回家部分成型的胚胎。等一两天后，先前的鸟巢里出现了新下的蛋，这些饥饿的人群便再次返回抢掠一空，这一次他们将这些新鲜的盗猎物小心翼翼地装满了木盆木桶。

1886年纽约州成为第一个通过范例法的州，虽然它的精要早在九年前已经出现在一个海湾沿岸州的法典中。引人瞩目的是，在佛罗里达深陷总统大选计票丑闻，导致选举结果遭到质疑的同一年，佛州的法律制定者仍镇定地制定出了宣告猎杀带羽鸟类和鸟蛋违法的法令。

海湾地区的其他地方，立法保护也在缓慢吃力地进行着。直到30年后，海湾的最后一个州，亚拉巴马，也拥有了范例法。[\[36\]](#)

推动州和联邦政府的鸟类保护是奥杜邦协会的首要任务。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奥杜邦协会有两个诞生地，第一个是在1886年。乔治·伯德·格林内尔（George Bird Grinnell），他是一个名副其实[\[37\]](#)的自然学家，更别提他还有一个鹰钩鼻；他创立奥杜邦协会的时间，正是查普曼在曼哈顿上城数帽子之时，是美国鸟类学家协会提出范例法之时，是威廉·厄尔·道奇·斯科特发现海湾上那个幽灵群栖地之时。格林内尔是查尔斯·哈洛克的《森林和溪流》纽约办公室的编辑。作为一个消息灵通的知情人士，格林内尔准备好了宣传他的新组织。协会成员很快超过了五万人。这让他猝不及防，同时运营一本杂志和一个组织压垮了他，所以他不情愿地解散了后者。

尽管如此，他创立协会的初衷得到了延续。查普曼创立了一本双月刊《禽鸟传说》（*Bird-Lore*），跟踪调查鸟类的处境，另外，麦基尔亨尼打造了他的鸟笼。在波士顿，这座女帽制造商和羽毛代理商的城市，哈里埃特·荷曼威（Harriet Hemenway）读到了关于鸟类屠杀的事件，她悲愤不已，并将此悲愤化作了有建设性的力量。荷曼威来自一个富庶家庭（约翰·辛格尔·萨金特[\[38\]](#)为她画过肖像画），她认为社会特权让一个人有义务奉献到利他事业中去。她的祖辈曾经鼓动社会保护被缉捕的外逃奴隶；她将鼓动社会保护被猎杀的鸟。1896年，她招募了她的表亲敏娜·霍尔（Mina Hall），然后两人邀请社会中的名流，创立了马萨诸塞州奥杜邦协会。900名女性组成了它的核心团队。其他各地的成员跟随她们的范例，纷纷在当地建立起协会——比如得克萨斯的塞西尔·塞沙斯。在海湾另一边的海岸上，九位女性、六位男性在1900年组织了佛罗里达奥杜邦协会。

几个州的团体开始每年在纽约市举行聚会，1905年便成立了全美奥杜邦协会联盟。其新任主席威廉·达奇尔（William Dutcher）说，协会宗旨是要通过推动明智的立法、建立鸟类保护区、设立保育员以树立起野生鸟类和“自私的人类”间的“屏障”。[\[39\]](#)

各州开始遵循范例法以来，全国协会开始为推动联邦的鸟类保护展开激进的游说活动。协会成立的五年前，国会已经通过雷斯法案，意味着联邦有权起诉任何违反州法猎杀鸟类的人。在此法案下第一个被起诉的，是一艘从得克萨斯的布朗斯维尔开往纽约，载着鸥和燕鸥的货船。然后，在20万封请愿信和奥杜邦协会说客的密集攻势下，国会在联邦的1913年关税法中增加了一道关于进口带羽毛服饰的禁令。

商业猎鸟人现在成为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盗猎者。但不严于执行的律不成其为好的律。海湾各州没有设置任何野生动物相关的公职；负责执行联邦鸟类保护法的美国农业部，只向货运港口而非猎杀现场派出执法官员。此时，在其职责范围内，灯塔科（US Lighthouse Service）加入进来，负责戒备盗猎者。在得克萨斯州马塔戈达岛灯塔科看守人的守护下，得克萨斯州海岸鸟类开始恢复生机，另一边，路易斯安那的蒂姆巴里尔岛（Timbalier Island）的灯塔看守人，像很多猫一样，将偷蛋人轰走了。为了弥补执法漏洞，新英格兰画家亚伯特·赛耶（Abbot Thayer）自行筹资，雇用保育人并将其交给达奇尔，达奇尔彼时已是鸟类学家协会下鸟类保护委员会的负责人。

达奇尔最早雇用的一批保育人之一是32岁的盖伊·布兰德里（Guy Bradley）。他被指派去监护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地南部、佛罗里达湾，以及佛罗里达礁岛群。在海岛和湿地长大的布兰德里，深知他巡查的这片土地地处偏僻，外界难以管辖。他也知道一旦他戴上保育员的徽章，虽然他有郡县治安官的授权，但他的处境并不比一只长羽毛的鸟好多少。一个难对付的盗猎者叫沃尔特·史密斯，他打小认识布

兰德里，他在即将被逮捕时射杀了布兰德里，留下他的尸体在他的巡逻船“奥杜邦号”上随波漂流。基韦斯特的大陪审团拒绝对此提起公诉，这对鸟类救护者来说是一个极其沮丧的时刻。数周后，全国奥杜邦协会成立了。

一个兄弟，准确地说是第一个兄弟倒下了；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威慑力也就不存在。保育员们有千万个理由重新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甚至放弃。饿狼击倒了牧羊人，走向羊群。尽管如此，其他保育员们仍选择继续坚守，包括负责守护动荡不定的夏洛特港的哥伦布·麦克劳德（Columbus MacLeod）。他独自一人住在一个狭小整齐的木结构房子里，房子周围只有一棵低矮的橡树和菜棕，前面是一个坚固的两层厚木板铺成的小码头。他当然知道狼群正在向他围拢。每年鸟群要回归栖木，狩猎者便每年都循迹而来。在1908年的11月，他们冲着麦克劳德来了，麦克劳德失踪了。他被绑上沙袋沉入了大海，他的巡逻船带着他死亡的线索浮出水面。在船上人们找到了麦克劳德的帽子，里面装着他的头骨碎片。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那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狼群拿下了第三个牧羊人。

女帽制造业被卷入了这场暴力事件中，作为该行业公共形象的维护者，全国女帽制造业协会在公共关系前线竭力为自己辩解。它向消费者们保证，羽毛服饰是合法的，帽子制造商是可敬的。受到冒犯的女帽协会对奥杜邦和查普曼提起控告，指责他们在一次次冲突中发起公开谴责，是在诽谤这个行业，这不仅威胁到百万美元规模的行业，也影响到刚走出19世纪90年代大萧条的美国经济。努力工作的人们会因此丢了工作，行业协会发言人如此宣称，问题在他们口中变成了人和鸟之间的抉择。

在谋杀带来的恐惧中，查普曼选择了人，但他并不是与女帽行业站在一边。他反对再往盗猎者的枪口上送新的保育员，奥杜邦的总部

一片愁云惨淡。此时为痛失人马而哀悼的达奇尔，有失优雅地提出了将鸟类群栖地和麻风病患者隔离区整合到一起的建议，认为这将比法律或保育员都有效。[\[40\]](#)

虽然这边一筹莫展，但鸟类保护区正焕发着生机——和麻风病院没关系。麦基尔亨尼鸟城的成功并非没人注意。

1903年，达奇尔和查普曼带着请求来到罗斯福总统位于纽约州长岛酋长山的家中。罗斯福对眼前两位上门的推销员有着巨大的敬意：理想主义的查普曼，他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只鸟”；大胆进取且总是一丝不苟的达奇尔，他将栖息在长岛上的每一只鸟都分出了类别。他们希望罗斯福将佛罗里达东海岸的鸬鹚岛划为鸟类保护区。他同意了，而且随之签署了一份总统令。于是，这片坐落于水美鱼肥的印第安河旁的2.5英亩的地块，就成为联邦政府开辟出的第一个唯一目的就是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区。墨西哥湾将是下一个。[\[41\]](#)

罗斯福在很早以前就展示了他作为一个爱鸟之人的善意。他对其兴趣的钻研系统深入，可以追溯至其童年时期。当他能认出一种鸟来而郊游的同伴不能时，他也会激动地大声喊出来。作为纽约州长，他签署过鸟类保护法令，作为总统，他列着清单记录白宫草地上出现过的带羽毛的动物。将他选为荣誉副主席的奥杜邦协会的数量比他知道的多得多。他曾在得克萨斯猎狼，在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猎熊，那个时候他第一次被墨西哥湾的鸟吸引了注意力。1904年身居高位的他意气风发，显然，他的矛头并不只指向托拉斯。他也对准了猎鸟人——“利欲熏心的鸟屠夫”，以及偷蛋人——一群“毫无道义，将后代资源挥霍一空的少数分子”。他再次提笔，将路易斯安那边上的布雷顿岛（Breton Island）和尚德卢尔群岛（Chandeleur Islands）划为另一个联邦鸟类保护区。[\[42\]](#)

联邦政府将开辟出上亿英亩的自然保护区，这成为罗斯福改革中的一记重锤。此前，政府将土地像忏悔节里的珠链一样分发给巧取豪夺的资本贵胄，他们认为公共领地的资源——矿藏、皮毛、石油、水、木材——是自由企业应得的权利。罗斯福最终设立了51个自然保护区^[43]。其中11个在墨西哥湾，包括路易斯安那的东蒂姆巴利亚岛（East Timbalier Island），这里是去往北极带的白腰滨鹬的中途停留点，以及曾经被老法国人舍瓦利耶扫射过的帕西奇岛（Passage Key），还有夏洛特港一带的三个保护区。当年罗斯福在坦帕湾等待启航前往古巴对抗西班牙人时，曾经到过帕西奇岛，几年之后他也在夏洛特港附近钓过魔鬼鱼。1915年他退任总统后，游览了布雷顿岛，在他设立的鸟类保护区中，这是他唯一拜访过的一个。

他随身的拍摄团队记录了这一幕。一位黑白分明的前总统，腰部圆润，穿着长袖长裤，纽扣扣到了最上面一颗，袜子盖住了裤脚，戴着的一顶柔软的军帽被压得很低，全副武装地抵抗蚊子和蠓虫。随着胶片斑斑点点地播放着，他脚上只穿着袜子，正小心翼翼地在沙地和沙丘草间挪动。到处是燕鸥巢，容不得半点破坏。他后来向政府提出要消灭抢掠成性的浣熊，以保护鸟类和绿海龟的营巢。尽管如此，这个没穿鞋的男人弯下大肚，挖出了一窝84只海龟蛋。他的一位同伴后来说，它们为“我们的餐桌添色不少”。^[44]

布雷顿属于尚德卢尔地区北边的一座岛屿，是密西西比迁徙线上的候鸟的一个重要过冬群栖地，也是约33种鸟类的夏季繁殖哺育地。有些营巢建在地上，有些在矮树丛里，有些在红树林带。在罗斯福的纪录影片拍摄时，有声技术还未问世，但看着影片你也知道前总统穿过的是一片有声季节，既有高分贝的啁啾、长鸣和怒吼，也有低迷的唧唧咕咕、喋喋不休和翅膀抖动时的扑棱扑棱。大海、长沼和近岸有丰富的食物，足以让大鸟安抚抱怨的幼雏。它们在四周和头顶疾飞，

回旋、高飞、交错、转向、倾斜、转圈，忽上忽下，来去自如。一场吵闹的飞行对罗斯福来说就是大自然完美的空中表演。

罗斯福在《一个爱书人的旷野假期》（*A Book-Lover's Holidays in the Open*）中写到了这次旅途。他赞扬了鸟城市长麦基尔亨尼。就那一件成就——那只鸟笼和拯救濒临灭绝的白鹭——就足以让人们称呼这位辣酱手艺人一声“鸟类学者”，路易斯安那奥杜邦协会也因此于1902年成立之初推选他为主席。他很快就投入新工作中。他的朋友，查尔斯·维里斯·沃德（Charles Willis Ward），是一位富裕的纽约商人，他曾搬到加利福尼亚并在那里开设苗圃。麦基尔亨尼和沃德计划购买海岸边的地产，并将其作为鸟类保护区的延续补充进行维护。沃德帮助麦基尔亨尼栽种山茶花，后来这片花园成为日后艾弗里岛上的丛林花园，可想而知，其自然保护区的计划正是在他们筹备花园时成形的。

1911年，沃德和麦基尔亨尼买了一大片沼泽地，并捐赠了13000英亩给路易斯安那州政府作为水鸟保护区（多年后这里不得不消灭繁殖失控的海狸鼠）。同一年，他们接触到一位豪奢，奥利维亚·赛奇（Olivia Sage），她是镀金时代华尔街大鳄罗素·赛奇（Russell Sage）的遗孀，热心慈善。他们请求她买下马什岛（Marsh Island），马什岛是一座76000英亩的海岛，是鸭、鹅与世隔绝的栖息地。交易很快达成。赛奇也是一个爱鸟之人，她将这个岛拱手让与州政府，条件是将这个岛设立为野生动物保护区。

与此同时，麦基尔亨尼用外界捐款再加上他自己的钱，买下了邻近艾弗里岛的86000英亩湿地。这和日后的土地保护信托^[45]非常类似，他亟须寻找一位捐助人。赛奇向他引荐了约翰·洛克菲勒，这位亿万富翁的基金会买下了这个地产。在路易斯安那州保育委员会管理地块五年后，基金会将其无偿转让给州政府，于是洛克菲勒野生动物

保护区（Rockefeller Wildlife Refuge）和禁猎区（Game Preserve）建立了起来。

在佛罗里达，自然保护区大量涌现，像春天的番红花般——在栽下了它们的俱乐部女性和奥杜邦人眼中无疑是美丽的。蒂皮特建起了圣彼得斯堡地区的11个保护区。在得克萨斯州，州土地局将南边海岸的格林岛（Green Island）以每年一美元的价格租给奥杜邦协会。协会的保育人R. D. 坎普，虽然患有“恼人的”风湿，但成功击退了盗猎者。这一方面是因为格林岛是刺槐的天下，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响尾蛇的助攻。“为了你的身体康健，你也不会到格林岛来”，坎普的接班人对野生鸟类摄影师泰德·克洛斯（Ted Cross）如此说道。27年来，每年春天，克洛斯都从普林斯顿出发，带着相机和防蛇咬的护胫到这座岛上拍摄红红的白鹭，如克洛斯所说，它们是一种“极其美丽、稀有和有趣的鹭，令人心生爱怜”。保护区和保育人的存在确保了它们在这里世代生活下去。[\[46\]](#)

对于罗斯福和麦基尔亨尼来说，保育的意义就在于：未来。向前看，佛罗里达女性俱乐部联盟的主席去信给麦基尔亨尼时说道。她的组织正在努力促成大沼泽州立公园的成立，她去信便是在就如何通过“合适的手段将野生动物吸引”到公园征询建议。大沼泽地的漫漫保育长路是从拯救白鹭开始的。两年后的1918年，麦基尔亨尼在艾弗里岛上统计到了两万只筑巢的鸟。他对白鹭的未来感到乐观。[\[47\]](#)

幸而，“未来”来了，大屠杀有所放缓。它的战场转移到了欧洲，人类对鸟的屠杀转变为对人性的泯灭。世界大战使资源抽离了民用市场和时尚行业。女士服装省掉了几码布料，帽子也变小了，某种程度是为了衬托最新的波波头发型和适应新型的封闭式轿车设计。随着军事基地的建立，红灯区在各地纷纷涌现，在其中工作的女性也赶时髦佩戴羽饰，因此，害怕引起身份误会的良家女性也就将她们的羽

毛帽子束之高阁了。虚荣又一次完成了道德劝说无法做到的事。但是，鸟类法案、保育人、保护区、奥杜邦们，以及爱德华·艾弗里·麦基尔亨尼在墨西哥湾保育活动中展现的精神意义非凡。

在和平重新回到全世界的群栖地时，新的枪火震响了墨西哥湾的上空。游客可能要大喊：“他们在射杀鹈鹕！”开枪的是渔民。

全球八种鹈鹕，墨西哥湾有两种：褐色的和白色的。白鹈鹕飞到海湾越冬，聚集在障壁岛上，褐鹈鹕则是终年栖息于此的本地鸟。很久以前有人说鹈鹕长得“奇形怪状”，其他人，包括鸟类学家们，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冒犯。弗兰克·查普曼站了出来，说它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鹈鹕存在的时候，”他写道，“人类还不知道在哪里。” [\[48\]](#)

20世纪中叶，在著名墨西哥湾画家沃尔特·安德森（Walter Anderson）的笔下，鹈鹕成了地球上最美的鸟。实际上，它们的确是海湾地区长久以来的标志。土著将它们的形象复刻在雕刻品和面具上，它们脑袋朝前的俯冲姿势总是能吸引住早期欧洲探险者们的目光。伊贝维尔1704年重返路易斯安那时，他所驾驶的船就名为“鹈鹕号”。1887年，新奥尔良的一个小联盟棒球队取名为鹈鹕，路易斯安那州也将褐鹈鹕作为自己的州鸟，刻画在其纹章和州旗上。圣彼得斯堡的城市标志是一只鹈鹕立在码头木桩上——自有码头以来，鸟儿们就占据了的落脚点。最后，还有迪克森·尼尔·梅里特（Dixon Lanier Merritt）所作的五行打油诗：

奇妙的鸟儿叫鹈鹕！

大嘴能将肚儿撑鼓。

张嘴往下吞，

一周食物屯。

可是老天，这小肚儿多无辜。

“一周食物屯”，这正是战争给它带来灭顶之灾的原因。美国在1917年卷入欧洲大战后便面临食物短缺。鱼肉价格猛涨，渔民大获丰收。鹈鹕有三加仑容量的喉囊，这比任何鸟类的都要大，因为吞食鱼类，它被指吃掉了渔民的生计。路易斯安那的法国移民亲热地叫鹈鹕 grand gosier——“大喉咙”；它的大喉囊使它们顶着抢劫犯、小偷和海盗的罪名。它们经典的俯冲入水捕食动作时刻提醒着美国渔民，来自鹈鹕的竞争无处不在。于是他们射杀鹈鹕，捣烂它们的鸟蛋。

对于群居的鹈鹕来说，这是一大伤害。它们不怕人，是无所畏惧的厚脸皮土著。为什么不呢？它们比恐龙长寿。它们还有来自《利未记》第十一章的保护，里面宣言鹈鹕是不可吃的。任何在码头或船上钓过鱼的人都知道这不是慎独之人该做的事。即使只有你一人，也不能做。褐鹈鹕总是会尝试亲近你。它们会快活地靠近拖网渔船、船泊处、船坞、码头，等待你喂给它食物。

对商业渔民来说，鹈鹕不是密友，而是乞儿。海湾渔民向他们的立法者和政府官员大声抱怨这种带羽毛的偷鱼者。他们写信给美国食品管理局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请愿政府出面扑灭鹈鹕。根据坦帕当地报纸的报道，其中一位愤愤不平者说：“只要给我们渔民这个权利，我们立刻将它们清除干净。”另一位说：“我看见一只鹈鹕在20分钟内就把足够任何一个家庭吃一周的鱼给吃没了。”一位精明的渔民代表律师可以在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日记里找到他要的支持材料；这位鸟类保护者们的精神先驱说道，仅一只鹈鹕“毁掉”的鱼的数目就“非常庞大”。抛开奥杜邦，投诉者们的话语还带有爱国色彩。渔民们正在为战争中的国家提供食物，而鹈鹕对此造成了“不小的威胁”。[\[49\]](#)

除了不满的渔民，没人愿意再发生一次大屠杀。查普曼等人强调这种针对鸕鶿的牢骚没有价值。为了平息争端，美国食品管理局派 T.G. 皮尔森（T. Gilbert Pearson）前去调查。虽然皮尔森在海湾附近长大，但他不是渔民心目中做此次调查的合适人选。他是全美奥杜邦协会的执行官。他和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三地的保育委员会合作，于是数百只鸕鶿被杀死并送到华盛顿做胃解剖。在里面没有发现一条食用鱼。海湾各州判决各项控告不成立，鸕鶿不应受到伤害。那一年，即1918年（此时距离世上最后一只仅存的旅鸽被发现死在辛辛那提动物园已有四年），国会通过了《候鸟协定法案》（Migratory Bird Treaty Act），受到法案保护的鸟类有数百种，包括鸕鶿。

让爱鸟人欣慰的是，联邦法取代了奥杜邦协会史学家弗兰克·格雷厄姆（Frank Graham）所称的“东拼西凑的地方方法”。但即使盗猎者们回了家，即使渔民们记起了鸕鶿是他们的朋友——能看到它们从半空扎进水里的身姿的地方就有鱼——海湾也从来不是一个平静的地方。挥之不去的噪声制造者就是前来狩猎的先生和女士们。[\[50\]](#)

多草的潮汐平原、水田（多是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多海藻的沙滩和淡水河流对移民和旅居者来说同时意味着拯救和死亡。天堂也有黑暗面。对于路易斯安那沿岸，自然学家亨利·柯普曼（Henry Kopman）不无讽刺地说道，这是“北美大陆上最风景如画的狩猎场之一”。鸟类刚落下脚来，它们就成了狙击对象——那些鹅、白骨顶、鹤，还有超过25种在海湾越冬的鸭子。那些被来来回回的海浪追赶得跳脚的小鸟也不能幸免。[\[51\]](#)

《每日一铜币报》的玛莎·菲尔德也是这些小可爱和毁灭场景的忠实观察者：“那些优雅的友好的小鹈鸟正站立在盐沼浅滩上……皮埃尔的枪突然发出巨响。两个小家伙倒在了地上。剩下的也好奇地聚

拢过来。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再装上子弹的。”如果她知道这些勇敢的小鸟为了种族生存，做出了飞越海湾的壮举，想象一下她在注视这一幕时的情感变化。[\[52\]](#)

在此地会合的持枪狩猎男女多数来自北方，他们比游钓大海鲢的人更早来到这里。纵帆船和汽艇带着狩猎团进行为期数周的短途游览，白天是射击马拉松，晚餐是美味的野禽和烈酒。后来的火车让狩猎者以更快的速度去更多的地方猎到了更多的鸟。在海湾沿岸加尔维斯顿和博蒙特间的州际铁路上，列车站点可以不经事先安排，火车司机会为狩猎旅客和队伍停在能看到大量禽鸟的地方。在圣安东尼奥-阿兰萨斯峡湾铁路，狩猎人可以租用有个人房间的卧铺车厢——“艾萨克·沃尔顿号”，车厢配备完全为满足客户嗜好而定制，包括一位擅长烹饪野禽的厨师。休斯敦的一家铁路代理公司曾组织过一次沿铁轨而猎的探险活动，该探险路线环绕了整个得克萨斯海岸。

到深秋季节，整个主要的候鸟逗留地满地都是鸭子，每一个人都成了杰出的猎手。在1894年的阿兰萨斯峡湾，一个大海鲢垂钓者撇下鱼竿渔线，偷空在三个小时里猎了160只沙锥（鹬的表亲），在另外两天时间里又猎到了251只鸭子。你大可以夸口炫耀自己猎获了许多的猎物，只是下一个人通常也能夸这样的口。这成了消遣，而不是竞技。一遍又一遍地以同样的方式杀戮，不会变得无聊吗？

抛开显而易见的糟蹋不说，许多以此为乐的狩猎者自认为是保育人士。说到流血竞技的坚定信徒，没人比得上罗斯福，他是第一位奉行保育的总统，就像鱼钩和子弹系列中的《森林和溪流》是第一本环保期刊一样。而既是狩猎爱好者又是鸟类保护代名词的约翰·詹姆斯·奥杜邦，他身上所体现的这种两面性比查普曼或蒂皮特都更直接。奥杜邦最为人熟知的两幅画作——《玫瑰琵鹭》和《白鹭》，它们的灵感分别来自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礁岛群，你需要射杀几只鸟才能摆

出可入画的姿势。但奥杜邦杀掉的海湾鸟类数量是远多于此的数千只，和一般的狩猎爱好者无异。他坦承有一次和同伴们在佛罗里达州群岛射杀的“带翅膀的动物”太多，以至于动物尸体堆积起来像“一座小小的干草堆”。同时，他也承认枪口不应该对准鸟类——只是他的除外。[\[53\]](#)

但是，海湾州府制定的最早的保护法案得到了狩猎爱好者们的支持。在19世纪20年代，立法机关宣布点火违法，点火指的是夜晚狩猎时使用火把照亮猎物的行为。接下来是在繁殖周期内设置禁猎期，保护濒临灭绝的狩猎物种，以及设置捕猎量上限以维持种群数量。狩猎者支付许可证和印章的费用，而这些款项将用于购买栖息地，他们也游说支持设立禁猎区，虽然这是为了确保他们的狩猎活动能持续存在。但和那些没有武装的环保主义者一样，这些持枪分子也关注未来。

没人看得比麦基尔亨尼更长远，也没人能像他一样在秋天破晓的晨雾中享受坐在隐蔽处观鸟的感觉。他是他所在的州未来别称“游猎者天堂”的鸭鹅狩猎的化身。但乔治·洛厄里，这位证实了鸟类跨海湾迁徙的有洞察力的动物学家，说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麦基尔亨尼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当路易斯安那奥杜邦协会选择麦基尔亨尼做主席时，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份报纸称他是“路易斯安那州伟大人士奥杜邦在鸟类研究领域的合格接班人”。他集结了近20万只鸟（洛厄里认为这对揭示迁徙路线是极其重要的），写下了许多鸟类观察日志，几乎创立了鸟类保护区，并促成了其中三个保护区的建立，他赢得了各地爱鸟人士的尊敬。[\[54\]](#)

然后他又失去了。他想建立第四个保护区，但事实证明困难重重。到20世纪20年代初，他已经收购土地八万英亩，保护了120种鸟类，全国上下媒体夸赞他是不会让人失望的“好小子”。他刊登广

告，招募疏浚队伍以扩大湿地范围，并提前招募好新保护区的七个保育员。但财务支援并没有如期而至，他只能从他游猎者的思维里生拉出一个绝望的办法：将保护区每年向游猎者开放三个月并向他们收取费用。他将此取名为路易斯安那海湾海岸俱乐部。俱乐部计划招募4000名会员，会费是每人1000美元。他立即招募了美国参议员、众议员和邮政大臣。

批评的声音大喊伪善、表里不一、背叛。他们说新划出的栖息地夹在赛奇保护区和原来的沃德-麦基尔亨尼保护区中间，一定会成为社会精英们快乐的狩猎地。《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说，披露出来的真相“引起了一场绝对的控诉风暴”。其中最令人难过的指责大概来自W.T. 霍那迪（William T. Hornaday），他是纽约动物园（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理事，美国野牛的救助者，野生生物保护领域备受尊敬的元老。他指控麦基尔亨尼是披着环保主义羊皮的狼，利用相邻的保护区引诱鸟群进入死亡的陷阱。[\[55\]](#)

面对疾风骤雨般的批评声音，俱乐部的支持者们指出，此时此刻争议地块正向所有人全年免费开放，而俱乐部则会推行季节性狩猎。它还将对狩猎者的数量做出限制，从栖息地中划分出禁猎地块，其中也包括位于现存保护区之间的候鸟迁徙路径。

后来接任达奇尔成为奥杜邦协会主席的吉尔伯特·皮尔森，勃然大怒。显然，为了让他的俱乐部合法化，麦基尔亨尼作为早期支持者扶持了皮尔森一把。虽然皮尔森是改邪归正了的游猎者，但他还是经常被批评对狩猎派的态度过于温和。为了保住他的声誉和潜在的工作机会，他一改前态，对麦基尔亨尼展开了炮轰。他展开了巡回游说，并播放他在路易斯安那保护区——合法正当的那种——摄制的鸟群影片，想以此摧毁麦基尔亨尼的海湾海岸俱乐部。他在格蕾丝·雷尼·罗杰斯（Grace Rainey Rogers）处取得了成功，格蕾丝是已故P. J. 雷

尼（Paul J. Rainey）的妹妹，规划中的俱乐部的部分土地就属于保罗·J. 雷尼。皮尔森说服了格蕾丝将土地设为野生动物保护区，并交给全国奥杜邦协会管理。

麦基尔亨尼丢了一个俱乐部，但收获了一个保护区。尽管如此，被误解和失去他所敬仰之人的尊敬依然是一件难过的事。他从没有原谅皮尔森这样反口复舌地背叛他。几年后，他往皮尔森在奥杜邦协会里的对手的箭筒里送去一支箭：他揭发说，自从奥杜邦协会在1925年开始运营雷尼保护区以来，他们就一直违反捐赠条约，让皮毛猎人用在保护区里射杀的鸟当作诱饵。而且，皮毛的交易所得有一部分进了协会口袋。皮尔森的主席之位本就摇摇欲坠，经过这次揭发，皮尔森的对手最终扳倒了他。

这些争端并没有打乱鸟儿们的生活。它们在路易斯安那有了75英里受保护的海岸线，以及沿海岸而建的一众禁猎区和保护区。它们的数量在日益增长。美国奥杜邦协会底下就聚集了18个保护区。狩猎者将一直存在，但会受到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约束。鸟群迎来了另外一大群动物的加入，那就是聚集在海滨上的人群，这在长远来看并不一定是好事。

[1] In Thomas Wright, ed., *Popular Treatises on Science Written During the Middle Ages, in Anglo-Saxon, Anglo-Norman, and English* (R. and J.E. Taylor, 1841) .

[2] 英文Bachman's Sparrow，汉语称松林猛雀鹀，是一种小型鸣禽。——译注

[3] “Notes from Field and Study,” *Bird-Lore* 18 (March-April 1916), 103; “A Tropical Migration Tragedy,” *Bird-Lore* 18 (1916): 103; W.T. Helmuth, “Extracts from Notes Made in the Naval Service,” *Auk* 37 (1920): 255-61.

[4] George H. Lowery Jr., “Evidence of Trans-Gulf Migration, ” *Auk* 63 (1946) : 175-211.

[5] Scott Weidensaul, *Living on the Wind: Across the Hemisphere with Migratory Birds* (North Point Press, 1999) , 251.

[6] John Muir, *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 (Houghton Mifflin, 1998) , 134.

[7] Harriet Beecher Stowe, *Palmetto-Leaves* (James R. Osgood, 1873) , 260, 261.

[8] Quoted in “The Pinellas, ” *Medical Bulletin: A Monthly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Surgery* 29 (1907) : 34.

[9] W. E. D. Scott,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Some of the Bird Rookeries of the Gulf Coast of Florida, ” *Auk* 4 (1887) : 139-40.

[10] W. E. D. Scott,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Some of the Bird Rookeries of the Gulf Coast of Florida, ” *Auk* 4 (1887) , 276.

[11] W. E. D. Scott,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Some of the Bird Rookeries of the Gulf Coast of Florida, ” *Auk* 4 (1887) , 276.

[12] J. A. Allen, “The Present Wholesale Destruction of Bird-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 *Science* 7 (1886) : 192.

[13] Minnie Moore-Willson, *Birds of the Everglades and Their Neighbors the Seminole Indians* (Tampa Tribune, 1920) , 7.

[14] 看起来像“向后弯的膝盖”的是鸟这种趾行性动物的脚后跟。——译注

[15] 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The Everglades: River of Grass* (Pineapple Press, 1997) , 279.

[16] *Life Histories of North American Marsh Birds, Orders Odontoglossae, Herodiones, and Paludicola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 Bulletin 135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6) , 149.

[17] Edward A. McIlhenny, *How I Made a Bird City* (privately published by author, 1912), 2.

[18] Rough Riders, 也译作义勇骑兵团。美西争夺古巴战争中诞生了三支志愿骑兵团, 其中由西奥多·罗斯福领导的第一志愿骑兵团别称“Rough Riders”, 以骁勇善战闻名。在前文提到过的那场发生于1898年7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圣胡安山战役中, 罗斯福正是带领这支部队重创了西班牙守军, 为夺取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译注

[19] 绅士吉姆 (Gentleman Jim), 詹姆斯·约翰·科贝特的昵称, 美国历史上的重量级拳王。——译注

[20] Shane K. Bernard, *Tabasco: An Illustrated History* (McIlhenny Co., 2007), 107; John Taliaferro, *In a Far Country: The True Story of a Mission, a Marriage, a Murder, and the Remarkable Reindeer Rescue of 1898* (Public Affairs, 2007), 228, 273.

[21] McIlhenny, *How I Made a Bird City*, 7.

[22] Terry L. Jones, “Alligator Tales: Stories from Louisiana’s Alligator-Filled Past,” *Louisiana Sportsman*, September 1, 2012, <http://www.louisianasportsman.com>, accessed fall 2013.

[23] Mark Derr, *Some Kind of Paradise: A Chronicle of Man and the Land in Florida* (William Morrow, 1989), 136-37.

[24] 乔科洛斯基 (Chokoloskee) 是当地地名。——译注

[25] Oscar E. Baynard to A. J. Hanna, September 24, 1947, Plume Hunting folder, Alfred J. Hanna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s, Rollins College, Winter Park, FL.

[26] Oliver H. Orr Jr., *Saving American Birds: T. Gilbert Pears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Audubon Movement*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2), 30-31.

[27] George B. Sennett, “Destruction of the Eggs of Birds for Food,” *Science* 7 (1886): 200.

[28] Virginia Woolf,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2, 1920-1924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 337.

[29] Ella Lowery Moseley, “Fashion Has No Soul, ”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1901; Robin Doughty, *Feather Fashions and Bird Preservation: A Study in Nature Prote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54; McIlhenny, *How I Made a Bird City*, 1.

[30] Woolf,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2 : 337; “Poetry of Season’ s Hats: Grace in New Shapes, ”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4, 1909.

[31] “Activity of the Audubon Society Spells Death for Vagrant Cats Slinking about Saint Petersburg, ” *St. Petersburg Times*, January 10, 1915.

[32] 爱莉丝·保罗 (Alice Paul) , 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 劳拉·简·亚当斯 (Laura Jane Addams) , 美国芝加哥赫尔宫协会的创始人, 因争取妇女、黑人移居的权利而获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33] Martha R. Field, “Come South, Young Woman, ” in *The Congress of Women*, ed. Mary K. O. Eagle (Monarch, 1894) , 776.

[34] 詹姆斯·巴特勒·希科克 (James Butler Hickok) 的别称, 他是19世纪中期美国西部的民间英雄式人物, 经典形象是及肩的蜷曲长发和八字须。——译注

[35] John Gould, *Handbook to the Birds of Australia*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865) , 410.

[36] The US Biological Survey *Bulletin* 41 (1912) contains a list of game protection laws by state from 1776 to 1911, pages 20-46.

[37] 指其名中Bird (鸟) 一词。——译注

[38] 约翰·辛格尔·萨金特 (John Singer Sargent) , 当时著名的肖像画家, 曾为西奥多·罗斯福、约翰·洛克菲勒画过像。——译注

[39] Frank Graham Jr., *The Audubon Auk: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47.

[40] “Third Audubon Warden Murdered,” *Bird-Lore* 11 (January-February 1909): 52.

[41] Robin W. Doughty, *Wildlife and Man in Texas*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9), 62.

[42] Theodore Roosevelt, *A Book-Lover's Holidays in the Ope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 283, 288, 300.

[43] 也有资料称他设立了53个保护区。

[44] John M. Parker, “Roosevelt as a Student of Birds,” *Forest and Stream* 89 (1919): 627.

[45] 美国的土地保护信托 (land trust或conservation land trusts) 作为一项自然保育制度, 起源于1891年, 在1981年美国通过保护地役权法案、土地信托联盟成立后正式得到推广。它主要有两种达成方式: 一是非营利组织自己取得土地的所有权或保护地役权; 二是为致力于自然保育计划的个人和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在第一种方式下, 信托基金得到的土地可能始终由自己管理, 也可能出售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通常是政府, 政府一般将该片土地与其他保育区合并, 或划分为单独的保护区; 第三方也可以是个人或企业, 但无论是谁都必须遵守严格的土地保育条件。组织取得土地的方式主要通过自行购买、受赠取得土地的所有权或保护地役权。保护地役权 (conservation easement), 意味着在不取得所有权的情况下, 永久性地限制土地上的一些权利, 如土地开采、伐木等。个人出售地役权, 一来不涉及所有权转让, 土地不因此转为公用, 不影响持有人在违反保育条件前提下的正常使用 (例如不允许建房, 但可以种庄稼), 二来个人在获得权利出让收入的同时, 还享受税收抵扣优惠, 因此得到广泛有效的应用。——译注

[46] Graham, *Audubon Auk*, 123; Theodore Cross, *Waterbirds* (W. W. Norton, 2009), 13, 14.

[47] Edward A. McIlhenny to May Mann Jennings, August 5, 1916, May Mann Jennings Papers, P. K. Yonge Library of Florida History,

University of Florida, Gainesville. I thank Leslie Poole for bringing this letter to my attention.

[48] Frank M. Chapman, *Camps and Cruises of an Ornithologist* (D. Appleton, 1908) , 368.

[49] John James Audubon, *The Audubon Reader* (Alfred A. Knopf, 2006) , 526. Thanks to Gary Mormino for the following *Tampa Daily Times* articles from 1918: “Say, Folks, Whaddye Know about Old Man Pelican? ” (February 17) ; “Fishermen Generally See, to Hold Pelican a Pirate” (February 28) ; “State Council of Defense Wants Pelican Protected” (March 2) ; “The Pelican: His Enemies Take a Swing at Him” (March 4) ; “The Pelican: Is Bird a Blessing or a Burglar? ” (March 5) .

[50] Graham, *Audubon Auk*, 90.

[51] Henry Hazlit Kopman, *Wild Acres: A Book of the Gulf Coast Country* (E. P. Dutton, 1946) , 37.

[52] Martha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The Travel Writings of Catharine Cole*, ed. Joan B. McLaughlin and Jack MacLaughli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6) , 12.

[53] Graham, *Audubon Auk*, 10.

[54] “The Audubon Society of Louisiana, ” *St. Tammany Farmer*, December 27, 1902.

[55] “Voice of the People: ‘Ignoble and Cowardly, ’ ” *Chicago Daily Tribune*, November 28, 1923.

第三部分 未来的序幕

九 从海湾到海滨



19世纪90年代墨西哥湾的海滨游客。

大海的边缘是陌生而美丽的所在。

——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55）[\[1\]](#)

也许是大海鲢带起了海湾的旅游业，但是对于20世纪以来与日俱增的游客，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不再带着渔线鱼竿前来的人来说，美国海拥有的不仅仅是一种好斗的鱼。即使是对海钓念念不忘的安东尼·迪莫克，也在停下的片刻中注意到，在他的垂钓经历中，没有“比这里的自然环境更健康更美丽的了”，“这里有全国最茂盛的植物，最多的、最有生命力的动物，还有最蓝的天和无与伦比的灿烂云霞”。

而观赏此等美景的最佳地点就是海滩，“美丽的、微风拂面的海滩”。有的海滩白得无瑕，也有的海滩经过风和水的鬼斧雕琢，面对它们，你所能做的只剩下目瞪口呆。到了20世纪中叶，这些大自然的恩赐已经成为海湾旅游业的中心，同时也是海湾地区极为重要的经济资产。[\[2\]](#)

那么这些自然资产，或更准确地说，沙滩上的物质——沙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大概在科学解释之外最常听到的，也是人们到海边最常得到的一个简单答案是：沙子被海水冲上岸，于是形成了沙滩。但它只解释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蕾切尔·卡森称沙子“美丽”且“神秘”，她说：“沙滩上每一粒沙子，其形成都要追溯到生命，或说地球本身模糊不清的起源上去。”[\[3\]](#)

在海湾的一些地方，沙子新来不久，比如路易斯安那的沙子，就是由密西西比河从它流经的31个州带下来的沉积物所形成的。被北达科他州的孩子踢起的泥土可能最终出现在路易斯安那的海滩上，并顺带着成就了大泥潭独一无二的模样。这里的沙子通常像土一样是黑黑的，海滩平地“平滑坚硬得仿佛由柏油铺就而成”，19世纪《每日一铜币报》的记者玛莎·菲尔德说。这就是路易斯安那的海滩从来没有什麼大名气的原因。当人们开始有兴致想晒日光浴，想光着脚在海浪里蹚水，更柔软、踩上去更舒服的白沙是最受青睐的。[\[4\]](#)

海湾大多数海滩上的沙子都由来已久。经年累月的河流、雨水、风，还有涨涨落落、冲刷不止的海水，它们都在运输沙子。即使是昨天刚出现的，也没有任何一粒沙是新的；每一粒沙都有数百年的历史，是万世以来不断被冲刷、打磨、翻滚和运送的结果。侵蚀造就了沙子，沙子造就了海滩，海滩造就了旅游业。

数万年前，当海岸线位置还在今天内陆更深的地方时，无数的沙粒就在大洋持续撞击冲刷岩石的过程中产生了。然后地球变冷，冰川

凝固，大洋后撤，露出了如今耸立于世的凿刻分明的山峰。后撤的海水带着它们制造的沉积物到了海湾，沿着陆地一路到了海洋。当大洋稍稍回摆，海岸线便达到了今天的水平。如今沙滩的边缘并不停在海浪拍岸的地方，而是远远地往海湾延伸到没入海水的大陆架边缘。

当海洋退出山峰，冰川和随后的雨水将取而代之，成为勤勤恳恳的侵蚀推动力。滴在坚硬的矿物集结物上的每一滴雨水都是一次敲击，每一次的力量极小，但时间赋予它力量，岩石被瓦解成了微粒；而每一滴雨水都是搬运工，将沙粒裹挟着落到土地上，运送到大洋里，或者跟随河流和小溪汇入大海。流入墨西哥湾的每一条河都曾布满了矿砂沉积物，还有一些，比如密西西比河和格兰德河，现在依然如此。高山不仅仅是地球的外脊，它们的冲积物是覆盖地球表面的土沙外衣。它们的泥沙流形成了湖底、海床和海岸。

所以当你走在海滩上时，你走过了高山。你还走过了海洋生命。混在矿砂里的还有被碾至粉尘状的珊瑚残骸、海洋生物化石和软体动物的壳——就是“她在海滩卖海贝壳”[\[5\]](#)里的海贝壳。西南部佛罗里达的沙滩是矿砂和颗粒状的海洋生物残渣的混合物，也被称为钙质砂。佛罗里达大陆架有四分之三是碳酸盐。贝壳的漂浮物则留在沙滩上，它们是覆盖在现有沙子上的未来的沙。

沙子从未停止移动。无论是在佛罗里达州还是得克萨斯州，沙滩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轻微的、不是总能被肉眼捕捉的变化，除非一场风暴到访。沙子被风、水流和拉扯海岸的潮汐裹挟着移动又抛下。一个平平无奇走完了全程的波浪——从海水到层浪，到薄薄一片拍岸的海浪，到最终渗入岸沙——会带动至少数千吨的沙子。就像地理学家迈克尔·韦兰（Michael Welland）说的，沙子的旅程是无止境的，“上岸，下海，或沿岸而行”，退入水中，形成近岸沙洲，在某个时候它很可能又会回到沙滩上。[\[6\]](#)

在20世纪50年代，得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学院（即现在的得克萨斯A&M大学）的小威廉·阿姆斯特朗·普莱斯教授（Professor William Armstrong Price Jr.）常常回到他家乡的海滩。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得克萨斯州的风成海岸，风成（地貌）得名于希腊的风神埃俄罗斯[7]。地理学家们主要研究的是风神在沙漠地貌上的扬沙效应，尤其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改变了大平原地貌和人口结构的黑色风暴[8]后。但是这位架着眼镜的普莱斯教授，他的兴趣都在风吹皱的海滩和风堆成的沙丘上。就每一个颗粒来说，得克萨斯州的沙子比路易斯安那的要轻，它几乎全由矿物组成，颜色从白到粉。沙子颜色和布拉索斯河、（得克萨斯州的）科罗拉多河和格兰德河的泛滥平原地势相匹配，一直到格兰德河的源头——白雪覆顶的落基山。格兰德河中带有高岭土，可用于制陶瓷和牙膏，它的颜色从灰色到红褐色都有。赤铁矿，属于氧化铁的一种，是沙波纹呈现出粉红色的原因，随科罗拉多河和格兰德河流动。所有河流都带有石英，它便是白沙滩的创造者。

石英是地球上分布第二广的矿物，几乎每一种岩石中都有它。石英的多种类型自古就被应用于珠宝制作。它一直是沙滩的主要颗粒物，在晴朗的天气里会反射出耀眼的阳光。佛罗里达的长海岸主要是石英，有些地方几乎是更新世就存在的纯石英。狭长地带和西半岛海岸上的沙子来自皮德蒙特和阿巴拉契亚高地，当时的它们高耸入云，比现在要高上两万英尺，和今天的喜马拉雅山一般高。侵蚀下来的泥沙向南流过半岛，流入已经变清澈的阿巴拉契科拉河和曾经到达过海湾的田纳西河。沿岸洋流将山砂沿狭长地带分布，最西端到达彭萨科拉的圣罗莎岛。

佛罗里达的海湾沙滩可能是世界上最白的海滩，带着“特殊的闪耀和光彩”，卡尔森写道。当你光脚走在上面时，干燥的沙子会嘎吱作响，也有些人说是唧唧声。沙滩是另一个世界——温暖，松弛，洁

白，但又充满色彩，无疑是诱人的——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以来，它活跃在人类历史中。[\[9\]](#)

现代海湾海滩的历史是又一段不被熟知的过往，它可以用以下这段话开始：“我好奇夏天的游客怎么能错过如此可爱的一处地方……这里有最柔和的阳光、最咸的海风、最好的钓鱼点，海滩浴值得开设单独的运动和卫生保健课程。”[\[10\]](#)

这段话出自19世纪90年代新奥尔良的《每日一铜币报》中玛莎·菲尔德的刊文。她轻快的行文听起来不像典型的报纸文风，当时的报纸每个版面都挤满了豆腐块文字，密密麻麻地充斥着摘要性文字。菲尔德的上司是伊莱扎·简·尼科尔森（Eliza Jane Poitevent Holbrook Nicholson），美国大型日报的第一位女性发行人。

她在1876年丈夫去世后接管了《每日一铜币报》，事实证明她是一个改革者，因报纸名称（“铜币”意味着小气）给人们带来了不少误导，她希望能提升大众对报纸的观感。她为办公室接通了电力，安装电话，将印刷机换成了莱诺铸排机，同时，桌上的墨水瓶和吸墨纸让位给了庞大的新型机器打字机（执着于纸笔的守旧者则绕道而行）。至于报纸，她翻新了它的周日版，一般而言周日版是被行业视为到手就扔的版面，但她在上面加入了一系列话题，从旅游到儿童文学到家庭事务，为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准备了一些内容。

为了扩充那些排列紧密、四四方方的格子，加入更多更有趣的主题，她聚集了一批女性作者，当时除了社交版外就很难再见到开放给女性记者的机会了。尼科尔森用她的笔名珀尔河（Pearl River）撰写了她自己的评论专栏，专栏名为“沉默是金的自然”，专栏多以动物虐待为主题。她重金请来得克萨斯州的知名作家和诗人莫丽·伊芙琳·摩尔·戴维斯（Mollie Evelyn Moore Davis）讨论当时的进步主义议题，还有多罗西娅·迪克斯（Dorothy Dix），她和尼科尔森一起首

创答问专栏，以及凯特·肖邦（Kate Chopin），她的小说以自我解放的女性为主角，在国内广受欢迎。她们，以及玛莎·菲尔德的才能，帮助尼科尔森将报纸的发行量扩大到原先的三倍。

菲尔德在1881年加入，用凯瑟琳·科尔（Catharine Cole）这个笔名开了一个定期专栏。女性记者通常会用笔名写作，以防她们的丈夫因自己妻子外出工作而惹来闲话，所以尽管菲尔德已经是寡妇，但她还是这么做了。她生于密苏里，在新奥尔良长大，在马塞·勒弗朗研究院（MacéLefranc Institute）上学，她此前在三家报社工作过，后来在尼科尔森和她口中的宏伟愿景的诱惑下去了《每日一铜币报》。

和她老板一样，菲尔德长得娇小秀气，自信于她作为女性所具备的才智。她也是一个无畏的采访者和旅行者，她最著名的文章是关于路易斯安那的。虽然有时也充斥着维多利亚式的华丽辞藻，但她的文章总是富有生气，不管描写对象是一个卡津渔民还是那片给他生计的海湾。她为读者们介绍路易斯安那的人种多元化的人口结构（黑人、白人、中国人、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以及同样多元的地貌（松林、湿地、长沼、沿海沼泽和沙丘）。

1891年，尼科尔森派菲尔德去执行一个1800英里行程，遍及全州39个地方行政区的任务。她在陆地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单座马车，拉车的是一对“瘦长结实的克里奥尔小马驹”，驾车的是一个“矮小的有色人种的小伙子”，而沿着海岸，她乘坐的是纵帆船和pirogue（路易斯安那方言，是一种手造的类似独木舟的船），如此断断续续地走了两年时间。她一路上遇到了暴雨的伏击、闪电的恐吓，曾经陷入泥潭，遇到前路被洪水冲毁而不得不回头，遇到短吻鳄，遇到像被婚礼彩炮喷出来的一大群飞虫。这些经历激励了她。虽然当她提到残忍的猎鸟人时——包括那个在海滩上射杀鹬的皮埃尔——你能感觉到她语

气的强硬，但她极少遇到讨厌的人。同样地，她没遇到过讨厌的风景。海岸边是沼泽湿地、海滩和海浪，沿岸航行是最为困难的。她称自己“多少成了海陆两栖了”。[\[11\]](#)

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时间里，美国才开始往相同的海边涌去。19世纪不断扩张的城市，很不幸地变得越来越喧闹、狭窄和有碍健康，那时公园绿景还不常见。人们日益渴望逃离呆板的灰砖水泥，暂时的逃离也是好的。刚开始，他们去乡下享受片刻的田园生活。随着社会对端庄持重的看法开始改变，放松也渐渐被当作消遣的形式，但更多的是人们内心深处对大海的恐惧解除了，于是海边的沙地开始受到关注。

在休闲人士还不是海滩游客前，他们是海浴的爱好者；也就是说，他们不会涌去面朝开阔海域的海滩，而是喜欢被陆地包围的水域——海湾、峡湾或者潟湖。夏季的海岸需要具有创造力的头脑来将它们变为度假胜地。正如海滩史学家莉娜·兰塞（Lena Lenček）和吉迪恩·博斯克（Gideon Bosker）所说，今天我们知道的海滩——人们躺着晒太阳、踏浪、眺望无尽的地平线的地方——是被发明出来的。它需要历经几个世纪的观念转变，还有像玛莎·菲尔德这样的发烧友来推动事情的发展。

其实，美国人并不是在发明创造，他们只是在古老的情感碎片中找寻其中被遗忘的，然后将它重复。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对海滩是疯狂痴迷的。虽然众神总是通过大海和海岸发泄他们的情绪，虽然在荷马的故事里出场的总是海妖，但人们依然抛开恐惧，在地中海和爱琴海的浪花中嬉戏。罗马人学会了逃离使人愚笨的城市中心，去往空气轻柔、视野开阔的海边，而希腊人则更钟情运动。包括水上运动，甚至还有古希腊版的肌肉海滩，比南加州的那个早了1000年。对于哲学家和诗人——普鲁塔克、索福克勒斯、西塞罗，甚至是荷马——海岸

唤起了他们心中的极乐世界。但当这个希腊罗马式的世界坍塌，海滩的美好印象也不复存在了。

公元476年罗马帝国陨落，随着人口中心北移至欧洲大陆，以及基督教影响的扩大，海滨失去了它的光彩。首先，就像兰塞和博斯克说的，那里缺少地中海有的快乐。北方的天空更灰暗，海水也更凉；瘟疫通过海港进入内陆。人们相信浸泡在水中会使毛孔张开而受到感染，他们因此躲避洗浴。干净指的是衣服，而非身体；在一个基督世界里，身体不是用来崇拜或显露的，就像它在希腊艺术和水中展现出来的那样，是“虚荣中的虚荣”。此外，大海是《〈圣经〉旧约》中恐惧的来源。基督教的统治需要塑造一个充满畏惧的世界观，以令人向黑暗的中世纪低头，远离阳光灿烂的海滩。《创世记》里的伊甸园没有海，也没有洋。旧约中海是“巨大的深渊”；上帝令大洪水冲走罪恶极大的人类。在《启示录》也就是《末日》中，一只七头怪兽从深渊中升起；在《但以理书》中，它又释放了另外四头巨兽去侵扰圣人。[\[12\]](#)

即使西方人想从地中海遗迹中找到蛛丝马迹，古希腊和古罗马幸福生活的重要证据——海滩、海浴和度假胜地——也已经丢失在了随全球变暖升高的海平面里。而吞没一切的海水又成为另一个要避开海岸的原因。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于海滩一直背负着许多感情包袱。早期西方神话中茫茫大海是洞穴巨人和木精灵的庇护所，里面躲藏着巨蛇和恶龙之流，它还是地球的坠落边缘（这更是一个广泛流传的观念，而非学术共识）。除了神话和迷信外，可怕的现实事物也有很多。甚至比森林更甚，大海总是充满无法控制的东西——它们总是巨大无比，而且很多还吃人。在《海上劳工》里，维克多·雨果让他的主人公吉利亚特陷入一场与大章鱼的恶战中，这个生物被描写为“天选的

恶魔……它们是黑暗力量转变而成的巨兽……既是幽灵又是怪兽”。
[\[13\]](#)。

海滩离危险的大海仅一步之遥。它是遭遇大风暴的入口，常常没有预警，更别提迎接或懊悔。遭遇海啸的次数要少些，但它们无不拥有摧毁毫无防备的村庄的力量。有时，它们到来时，天蓝云清，让人无法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下灾难即将降临。阳光如常照耀，小鸟声音洪亮。只是气氛变得阴暗，人们陷入了偏执。当你凝视深不可测的大海时，你的目光很可能收获一只年老的信天翁，它像是在发问：远方潜伏着怎样的危险？

这个问题没有困扰墨西哥湾海岸的土著——至少在怀有敌意的欧洲人出现在海滩上之前是这样的。在北美人的宇宙观中，大海是恭敬之地，是地球万物——包括人类——的发源地。当然它里面生活了各种生物，但不是怪物，而是可供食用的生物，骨头、牙齿和皮毛可以被制成饰物和有用的工具。暴风雨是常事，因此人们总是有所准备，比之其他地方，墨西哥湾地区更是如此；许多土著居民，比如卡兰卡瓦人，他们会有意在暴风雨季节搬到远离海岸的地方。土著人也会定期海浴，闻到欧洲来的基督徒身上的刺鼻气味时会捏住鼻子。

在一场漫长的海上之旅过后，早期的欧洲探险者们可能将沙滩看作新大陆绿白相间的大门在向他们招手。但结果经常是一场外来入侵者和当地抵御者的血战。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庞塞·德莱昂抵达海滩的那天腿上就被扎了一支毒镖。如果你有幸在一次海难中存活，你会被冲上海滩，那是你的救赎之地——只是你可能会被土著人掳去当奴隶，就像卡韦萨·德巴卡曾经经历的那样，如此你可能宁愿溺死在大海，为人类文明而牺牲。比被奴役更惨的命运在等待着正划着大艇在得克萨斯海岸寻觅河口的罗伯特·拉萨尔六人船队。当夜色降临，他们在岸上安静扎下营时，从黑暗中冲出一群土著，将他们杀死。几个世纪后，战场才成为游乐场。

即使在病菌入侵，土著数量锐减，海岸大开后，海滩对欧洲人来说也意味着冰冷的隔绝和危险，而不是休憩和放松。独立战争打响前，伯纳德·罗曼斯对墨西哥湾海岸也少有好话。他说的是“怒吼的狂风”、“阴冷的北风”和雷鸣电闪。经历过海难，他知道对于探险者和地图制作者来说，海岸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地方。它的看似宜人只限于因囿于海湾而显得安全的港口，以及以大海为生并深知其风险的吃苦耐劳的人民。海滩是用来挖海龟蛋，清理浮木和失事船舶的。否则，它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14\]](#)

为了跟上时代步伐，1850年的玛莎·奥斯丁将她的兴趣放在了内湾海岸（bayshore），而不是墨西哥湾海岸（the Gulf shore）上，她游说她的丈夫威廉，在东比洛克西兴建游客之家。东比洛克西是密西西比湾和比洛克西湾交汇点上的一个渔村，是最初法属路易斯安那的首府，当时法国人还只是简单地叫它比洛克西。他们后来将首府和其名称一道迁往海湾另一边更好的水域边上，并给了旧首府一个不真实的子身份叫东比洛克西，混淆了殖民地的开拓进程。

在奥斯丁夫妇随玛莎的提议展开他们的事业前十年，密西西比州的一位牧师在此处搜寻适合进行洗礼的水域时，他发现楔入陆地的内湾上有一处含矿物质的泉水，这片陆地就是东比洛克西。海岸平原下的蓄水层渗入了海水盐分，在密西西比州的海湾沿岸创造出温泉浴场一样的矿泉。印第安人曾经在这里洗浴，美国白人也产生了同样的兴致。

奥斯丁夫妇来自新奥尔良，丈夫威廉在那里行医。东比洛克西坐落在槲树荫翳下，上面稀疏地交错着用碎牡蛎壳铺成的窄道和小径。玛莎和威廉在300英尺槲树成荫的海湾边盖了一座白色墙板的旅馆。里面是呈弧形走向的上下走道和150间客房。走出旅馆外的尖木桩栅栏，你可以登上在一旁等待的马车，随着马蹄踏在杰克逊大道上的噔噔

声，你可以去往峡湾，或另一头的泉水。奥斯丁夫妇将他们的建筑起名为海泉旅馆。镇民非常喜爱这个名字，1854年便用“海泉”（Ocean Springs）替代了东比洛克西。

对密西西比的温泉产业来说，奥斯丁夫妇算是后来者。在比洛克西一带的海湾，虽然居民不足1000人，但营业的旅馆就有六间。有些已经开了十年甚至更长。它们都非常相似——木地板、波斯毯、抛光的楼梯扶手和栏杆、金光闪闪的大吊灯、墙纸和壁板、天鹅绒的垫衬和窗帘，再加上丰富的休闲度假设施：浴室、桌球室、酒吧间、舞厅，以及独立的家庭套房。游客在这里包管满意，垂钓码头伸入峡湾，向导随时待命，将你领上小船，甚至为你备好饵料。开私人游艇来的客人组织了一个游艇俱乐部互相竞技，他们的赛艇会成为这里夏天不容错过的节目。

但是将游客吸引到比洛克西和大洋泉，以及后来的圣路易斯湾、帕斯克里斯琴（Pass Christian）、帕斯卡古拉和密西西比市（也就是后来的格尔夫波特）的，是泉水。用早年一位编年史作者的话来说，它们无不“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它们被戏称为“六姐妹”，比洛克西又是其中的“泉眼王后”，密西西比的温泉度假地与捕鱼作业的水滨码头和谐共存，有着维多利亚式的悠闲惬意。客人们无须闻到当地罐头厂的气味，但风帆猎猎、渔船环绕的风景却尽收眼底。旅馆的餐桌铺好了亚麻桌布，上面供应着当地捕获的鱼、虾、牡蛎，再搭配上路易斯安那的新晋辣椒酱——塔巴斯科辣椒酱。蒸汽班轮定期往返，将这里的水产带往莫比尔港和新奥尔良的市场，同时卸下商品、食品原料、邮件和度假的旅客。海泉用被罐头厂丢弃的牡蛎壳堆起了一座塔，塔顶装了航标灯，为晚间到达的班轮导航——以免班轮略过此地到了下一个度假地。[\[15\]](#)

旅店营业季节性很强，它迎合了一种传统。很长时间以来，南方种植园主都倾向于逃离夏天里令人窒息的种植园，去往他们在沿海海岸的第二个家，在高窗宽廊前度过惬意的时光，这点上很像古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是以奴隶为基础的。1821年西班牙将南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割让给美国，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种植园主建起了第一批度假屋。此后，在这个国家百年诞辰之际，南方文化的引领人、前邦联总统杰弗逊·戴维斯，来到了比洛迪西附近，加入了他们。战争惨败后，这位身无分文的英雄搬进了毕沃益尔（Beauvoir）庄园的一间小村舍。

庄园主人是莎拉·多尔西（Sarah Dorsey），她同情前总统的败北，为他提供这里的食宿。她还帮助陷入情感低谷的戴维斯撰写回忆录，希望能借此挽回他的声誉和财产。从他的陋室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这座608英亩庄园的标志性自然风光：有一道自流泉流入的淡水湾头湿地。旁边就是庄园的主建筑，一座拔地而起的路易斯安那式种植园房屋。法式大门九英尺高，窗户外是白色圆柱门廊，从门廊望出去就是生机蓬勃的峡湾。三年后，多尔西将这座庄园和它的风光遗赠给了戴维斯。

城里人，多数来自新奥尔良和莫比尔，也在海岸上盖起了避暑的别墅。希腊罗马式的公共浴场用竹制管道将矿物泉水引来，于是光是浴场和泉水就吸引了大批度假游客。驱使人们收拾行囊逃离城市的主要原因是都市夏日的炎热和潮湿，但这些都比不上传染病。

城市，等于健康隐患，就是这么简单。虽然有人清理，但餐厨垃圾被倾倒在街道沟渠里，上面飞满了苍蝇，猪满街乱跑，十足街头帮派的样子。“必要的”人——这是人们避重就轻的称谓——会从公共厕所和地下室里拉走一车车的马粪和人粪。因此也就不奇怪，城市是疾病的大熔炉：霍乱、天花、伤寒、肺结核、流感。黄热病，也称黄

色瘟疫、黄杰克，是墨西哥湾地区苦难的根源，异常险恶：先是使人脉搏衰弱，牙龈流血、尿血、发热、吐出发黑的呕吐物，随后就是了结一切的死亡。

研究南方疾病的专家将多数的传染性疾病归咎于有毒的空气。他们对细菌和病毒性感染的概念知之甚少，或者持怀疑态度，认为城市普遍的肮脏输送了瘴气——不加掩盖的粪坑和随处可见腐烂的垃圾和动物尸体。天气越热、越潮湿、越闷，理论上来说，这种污浊之气也就越强。得克萨斯州的科珀斯克里斯蒂曾暴发过一次黄热病，其间，一位着急的居民写信给她在普鲁士的父母说：“黄热病出现在水无法排出的街道上，因此产生了传染性的物质。”^[16]

说到聚水，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得过新奥尔良。毕竟，比安维尔和法国人将他们的新首府建在了一个湿地上。更糟糕的是，汛期发大水是密西西比的自然之道——湿地之蜜糖，城市之砒霜。城镇刚刚重整起旗鼓，洪水就泛滥开来。比安维尔下令修筑防洪堤，结果导致陆地和海水的高度错位，将水平面上的景观颠覆了。走在街道上，你抬起头，能看见轮船诡异地行驶在河面上，从你面前经过。他成功地克服了河流——有时候——但当黑云压顶时，洪水从房顶一泻而下，根本无处可排。聚集的水池滋生蚊虫，于是黄热病暴发，为今后的新月城打下了不光彩的烙印。

随着事情的发展，穷人——被鄙视住在潮湿肮脏的街区，仿佛这是出于自愿——被指责是城市传染病肆虐的源头。内战前，新奥尔良的人均收入是全国最高的，显见于歌剧院、戏院和花园区安妮女王维多利亚式和希腊复兴式的房屋建筑。这个有着法式锻铁阳台的高贵城市也有它的贫民窟。住在那里的有这个城市多数的黑人（新奥尔良的黑人人口占比是全国最高的）和移民，主要是德裔和爱尔兰裔。贫穷的街区由于缺乏雨水排水系统，通常成为传染性病毒的第一个目标。

黄热病每个夏天都会造访，但没有哪一次比1853年造成的后果更惨重。那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黄热病暴发，导致新奥尔良一万人病倒。街上弥漫着黑色烟雾，是铁桶里燃烧的木馏油，这是一种常见的——但有毒的——用于铁轨枕木和码头板桩的木材防腐剂。政府官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这种刺鼻烟雾能帮助清除空气中的瘴气。它并不会。《纽约时报》每天报道传染病死亡人数。最终死亡人数是8000人，占当年这个城市死亡数的一半。

没人知道并不是那个看不见、不存在的气体，而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蚊子——埃及伊蚊——传播了黄热病；而黄热病是一种病毒性疾病，经过伊蚊从受感染的人类宿主传播到了新的未感染宿主身上。蚊子和黄热病都是从非洲来到美洲的，伊蚊无意中搭上了西班牙运送奴隶的船，而船上奴隶的血液中又带有黄热病毒。非洲也很可能是疟疾的源头，这又是另一种频繁困扰海湾的疾病。那里的蚊子——疟蚊——本是一种虽然讨人厌但无害的土著蚊，直到它将一位来自旧世界的带菌者的病毒传播到了新世界的人们身上。就像几乎所有的外来事物一样，疾病也是通过海港进入新大陆的。

海湾是繁忙的交易地，来自中美和南美、古巴、加勒比的商船在这里卸下热带来的商品——红木、橡胶、朗姆酒、咖啡、菠萝、香蕉，以及热带疾病。新奥尔良在进口疾病方面领先全球。一个来自热带地区被感染的行动自由的水手，去了酒吧和妓院，他就能令一整座城市瘫痪。

一个特定的自然条件决定了灾难的范围：雨水。死亡惨重的那一年，1853年，也是甘蔗获得极大丰收的一年。如果当年夏天田里生机盎然，新奥尔良便能预感灾祸将至，虽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实际上，埃及伊蚊比起沼泽，更喜欢雨水作为它的繁殖地，雨水洼地多见于街道、接雨水的水桶、家畜的水槽，甚至是花盆。滋养了农作物的

雨水，也滋养着蚊虫，悲剧的是，它们从成千上万的花瓶中滋生，成长为强大的入侵力量，而放下花瓶的正是黄热病受害者的亲友们。

新奥尔良的易感性是一种必然。涌入港口的船舶和水手稳定得就像一条终年流经它的大河。它的码头有两英里，是世界上最长的码头，永远高高堆着板条箱、大木桶和捆扎的棉花包。只有新奥尔良和波士顿的装卸工能经手更多的船货。内战时货运量短暂地下降了，战后恢复后，新奥尔良是美国第四繁忙的港口，虽然它并没能保持这个名次。接近19世纪末时，它掉到了第12位。铁路固然抢走了一些货运生意，但更重要的是，新奥尔良的发热体质令商人和游客望而却步。

当地人也没有责备他们的立场。每年夏天，有条件的人都会搬离新奥尔良。一般来说他们会去“六姐妹”，在泉水边等待的时候，享受有益健康的海湾微风的抚慰。像威廉·奥斯丁这样的医生，通常都会开这样一剂处方——到远离城市的健康的度假地去；顺便他还能一并推荐住宿地：在黄热病肆虐的1853年夏天过后，威廉和玛莎的大洋泉旅馆开业了。

有时候，处方中建议的休息地也会沾染上死亡的气息，就像1878年发生的那样，黄热病意外降临到海泉市。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铁路从附近的铁路厂往被疾病袭击的度假地运送了十桶木馏油。浓烟滚滚，日夜不停，也许它的确帮助控制了蚊虫这个隐匿的凶手的滋长，但依然有30人死去，其中包括大洋泉旅馆的经理和他的一些住客。

疾病在1897年再度来袭，刚开始，卫生检查员认为是人们吃了受城镇排放的污水污染的牡蛎导致的染病。然后他们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另一种训练有素的黄热传染病，并将源头锁定到一个刚从危地马拉来的外地人身上。不幸的是，在军队建立起检疫前，旅客纷纷逃离回家，将瘟疫沿着铁路线带到了马孔、亚特兰大、孟菲斯，甚至芝加哥。超过500人因此死亡。

如果一个度假胜地不再能推销有益健康这个好处，它依然能提供新的消遣。多年前，“六姐妹”就将增加冬季项目提上了日程。他们这么做不无道理。举个例子，如果你住在芝加哥，寒风鞭答着密歇根湖直到春天，相较之下，墨西哥湾看起来就是一个热带天堂，而且只是一段火车之旅的距离。当地史学家说，帕斯克里斯琴的墨西哥湾旅馆，是第一家招待冬季旅客的旅馆。墨西哥湾旅馆于1883年开业，有250间客房，每晚收取3~4美元的房费；直到1917年毁于大火前，它都一直挤满了逃离霜冻平原而来的中西部人。

在它的东边，冬季的海泉市变成了一个小芝加哥。其中一位风城的逃离者是大名鼎鼎的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在19世纪90年代，钢铁摩天大楼的大师在海湾边上盖了一座单层木结构的房子。他称他的冬天家园是“一座已经沉睡了祖祖辈辈，无忧无虑的村庄”。他显然对黄热病的暴发一无所知。[\[17\]](#)

讽刺的是，最令人害怕的海湾最前沿，也许用它持续稳定的大风驱赶了有传染性的蚊子，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就在游客们依然沉迷于近岸的温泉和受障壁岛保护的峡湾和内湾时，海湾上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大海的神秘之处，并解出了其中一二。海岸线的勘测、绘制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了这片海。但大海的深处是怪物还是其他什么，依然是个谜，为了找到答案，海岸勘测局在1877年发起了一项重要的墨西哥湾水底生物研究——这是前所未有的。

就在几年前，许多科学家仍赞同无生命假说，也就是相信深海中没有生命。英国博物学者爱德华·福布斯（Edward Forbes）在1840年首先提出这种假说，认为300英寻（800英尺）以下的深海寒冷且缺乏光线，无法支持生命体。福布斯是一个博物学家，但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钢笔漫画家，他为杂志报纸作画，画离奇的吃人的海洋生物，怪兽似的飞鱼，还有后侏罗纪的海生恐龙。这难道不是十足的讽刺

吗，科学家们欣然采纳一个漫画家提出的假说？也有大量证据与其假说产生了矛盾，其中包括一位葡萄牙渔民的证言，他自“远古以来”就开始从深不可测的深海里打捞出鲨鱼。但是，博学的科学家们不愿意承认一个词不达意的经验主义渔民说出来的话，于是几十年来，专业人士们的傲慢让他们坚守着一个错误的推论。[\[18\]](#)

但是质疑、问询和异议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支柱，部分科研人员不同意福布斯的说法。其中一位是路易斯·弗朗索瓦·普塔莱斯（Louis François de Pourtalès），他认为真相就埋藏在海面下的300英寻，而科学应该到达真相之所在。普塔莱斯曾是哈佛科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的学生，阿加西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自然学家，是海洋科学发展史上的中坚力量（他创建了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普塔莱斯后来在那里出任管理员，此后又在东海岸建立了第一个海洋实验室，是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前身）。

为了验证无生命假说的真伪，瑞士裔的普塔莱斯来到了墨西哥湾。他曾作为海岸勘测局一名测量员的副手协助过佛罗里达礁的三角测量，但他的专长在海洋动物学领域。1868年，他来到佛罗里达海峡水面，在勘测局“比博号”船尾放下了拖网，“比博号”是一艘160英尺的侧明轮船，它三年前曾参与封锁墨西哥湾上的邦联军补给线。拖网被下放到517英寻深度时，由“比博号”拖行了一小段距离，然后船员用绞盘将拖网重新拉上甲板。当他们打开拖网收集袋时，一摊由鲜活的无脊椎动物和沉淀物组成的“肉汤”倾泻到了甲板上。不管拖网下沉到多深，总是能打捞上来源源不断的活物。

普塔莱斯的此番考察是在路易斯·阿加西斯的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 Agassiz）的敦促下成行的。瑞士出生、美国长大的亚历山大，在1849年随父亲移居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从小就对科学心生向往。他取得了多个学位，在世界各地研究海洋生命，出版了

多部海洋生物相关书籍，曾出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长。他还是水产学的创始人，致力于研究推动商业性捕鱼。虽然他兴趣广泛，但海洋学一直是他潜心钻研的学科，实际上他也是在海上离世的，享年74岁。海岸勘测局的负责人本杰明·皮尔斯（Benjamin Peirce）认为亚历山大·阿加西斯可以领导1877年的墨西哥湾生物研究项目。

彼时的阿加西斯刚从秘鲁文物考察回来，42岁，开始秃顶，正迈入他人生中的学术巅峰。历史上第一次以海洋学名义进行的考察任务是由英国皇家海军“挑战者号”执行的，他们从世界各地带回了动植物标本，阿加西斯当时也是标本调研小组的成员。海岸勘测局派往墨西哥湾的是“布莱克号”，这是一艘专门为水道测量工作设计的风帆蒸汽双动力纵帆船，此次将由阿加西斯全权指挥。阿加西斯的帆船的指挥官查尔斯·锡格斯比（Charles Sigsbee）是他的得力助手，锡格斯比曾在几年前别出心裁，在测深时用琴钢丝代替了更为脆弱、弹性更大的麻绳。双动力帆船让锡格斯比能够卷起风帆并借助推进器来到达目标位置。他这么操作了3000多次，详细绘制了整个墨西哥湾的海底。这次考察绘制出了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海底（水下）地形图。地图上，锡格斯比用蓝绿色画出了蜿蜒的阶地，大致平行于海岸轮廓线。颜色最蓝，也就是最深处，是海湾的中心偏西部区域，深度超过2000英寻，这里后来被命名为锡格斯比海沟（Sigsbee Deep）。

阿加西斯和锡格斯比之行从基韦斯特，到尤卡坦，再到密西西比河返回，形成了一个三角考察区。在两年时间里，他们完成了300多次捕捞，证实了海湾的生物多样性^[19]。经过数年研究，最终成果发表在阿加西斯的上下两卷著作中。全书对深海动植物进行了条理清晰、巨细无遗的描述，包括甲壳纲动物、蠕虫、海绵、软体动物、根足类动物、腹足类动物、头足类动物、腕足类动物、海百合、放射线状生物、海鸡冠亚纲动物等，不一而足。锡格斯比的海底地形图，阿加西斯的生物标本，以及拖网和测深技术的创新都推动了海洋学深入发展

成为现代科学。深海怪兽被从知识地图上擦除后，墨西哥湾变得更可知、更有理可循，或许也就没那么令人生畏了。更确切地说，虽然有一些奇怪的生物生活在深海中，但它们许多不过是黏滑、多刺的动物，并没有发现巨蟒和恶魔的身影。[\[20\]](#)

对于未来的海滩游客来说，科学突破可能有间接的贡献。而更关键的是，艺术和文学引领了观念转变，令人们对海滩另眼相待，这些都是由美国土生土长的浪漫主义画家和作家带来的：比如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托马斯·莫兰（Thomas Moran）和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随着白人移民的到来和西进运动的开展，这些早年出色的笔墨构筑了独特的以自然的广阔画布为创作对象的美国艺术形式。荒野是浪漫的，陌生是美丽的，广袤是可敬的。自然的美国是令人称奇的美国。对于浪漫主义人士——在都市里避开了粗野的拓荒工作的世故之人，捕杀动物者、经商者和边陲上的拓荒者也许会颇有微词，认为这些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在谋划着什么。在还未开发的峡谷、沟壑、喷泉、山峰、瀑布、高低沙漠[\[21\]](#)、拱石、如大教堂似的森林和绵延细长的海岸线中，美国人看到了这个国家中欧洲各国无法匹敌的美。

穿越美国的艺术家们大多喜欢追逐落日和密西西比河的远端。南下的艺术家们虽然名单不长，但都是能令人眼前一亮的名字：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哈里耶特·比彻·斯托、亨利·詹姆斯、斯蒂芬·克莱恩、约翰·辛格尔·萨金特、马丁·约翰逊·海德（Martin Johnson Heade）、温斯洛·霍默、劳拉·伍德沃德（Laura Woodward）、玛莎·沃尔特（Martha Walter）。他们通常坐火车到佛罗里达的东北海岸，然后订一张圣约翰河的风光游览票。

其中去过墨西哥湾的名单更短。威廉·福克纳的妻子，埃斯特尔（Estelle），在两人蜜月时，曾试图将自己溺死在海湾里，而哈特·克莱恩成功了，他从客轮的船尾一跃跳下了墨西哥海域——他人生中的这一次诗意表达，悲伤而执迷，发生在美国海上。他们的消沉和海湾无关，海湾大多数时候激发的是惊叹。在20世纪30年代，华莱士·史蒂文斯去往新奥尔良和海岸上的“六姐妹”，写下了一首诗：《帕斯卡古拉的朋友们》（*Some Friends of Pascagoula*）。“朋友们”是两个本地人和一只“在阳光炙烤的天空下张开翅膀”的鹰。[\[22\]](#)

史蒂文斯果断地在基韦斯特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这里是热带，有阳光，有快乐，还带着一点迷醉——毕竟海明威也住在那里。史蒂文斯还在那里写下了他的名篇《秩序的概念》[\[23\]](#)。你可以将它解读为一个启示的故事。诗中的说话者，无论在大海的声音中，还是在歌唱者的歌声中，都无法找到秩序，他最终接受了自然在偶然性中发自肺腑的力量。

啊！可怜的雷蒙，为秩序而愤怒，

苍天总赐予创造者整理大海的词句的愤怒[\[24\]](#)。

诗人西德尼·拉尼尔于19世纪70年代在锡达礁时没有写诗。但是，翻阅他的旅行笔记，灵感和敬畏之意在他献给海湾的章节中比比皆是。自然世界对他来说是诗意浪漫和至高无上的，对爱默生和梭罗来说也一样。拉尼尔称占据了海岸的火炬松和长叶松是“庙宇中庄严的石柱……是化作了树干、树枝和球果的信仰”。抵达锡达礁时，火车在终点站停下了，那是一个被高高筑在海滨上的站台。海湾出现在他眼前的窗户中，“浩瀚舒畅的大片海水”触动了他。“对于那些渴望一尝探险滋味的游客和户外运动者来说，”他写道，“佛罗里达的这片海域提供了一片迷人的场地。”[\[25\]](#)

约翰·缪尔（John Muir）在七年前来到锡达礁时发出了同样的感叹。1867年，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一家马车车轮厂工作时，他的内心呼唤他来一场1000英里以海湾为终点的徒步行。他正走在成为美国重要的自然监护人的路上，这位双腿细长、蓄着赤褐色胡须的29岁年轻人进入佛罗里达的首站是杰克逊维尔上方的费南迪纳，然后他便沿着铁路线走过了佛罗里达州，这也是之后搭载了拉尼尔的那条铁路线。缪尔偶尔禁不住会漫步入佛罗里达的花园里，那里有不知名的植物、鸟儿和声音。展成扇形的锯棕榈在这里集结成军，他称它们为“耀眼的太阳之子”。走出刺柏和松树，他便进入了沿海沼泽的广阔地带，四周都安静了下来，就像走在中西部的麦田里一样。他看到了一组群岛，岛屿小小的，上面生长着棕榈和雪松，“布置得像一束品味高雅的鲜花，为了维持它的新鲜，将它放在了大海中”。[\[26\]](#)

镇上的四个加工厂、300个工人正在将当地的红雪松碾磨成铅笔材料。它们被装上船——有时和运往帽子工厂的鸟羽毛一起，被运往纽约和欧洲制成最终产品。到1890年，这些制造厂一年要消耗十万根雪松原木，制成的铅笔板可以绕地球五周。当地人后来会说是1896年的飓风摧毁了工厂和经济。事实上，这个行业的死亡是自己造成的，因为过度消耗当地木材。

缪尔亲眼看见了运作中的工厂，甚至在其中一家工厂工作了一天。那是12月，但蚊子依然猖獗，他染上了疟疾。研究缪尔的学者喜欢着重描述海湾的疾病，但往往忽略了随之而来长达一个月的康复期。缪尔实在闲不住，他将自己从病床上拖起来，跟一个石头似的坐在一株榲榭树下，凝视着冬天里广阔潮汐带上正在哺育的鸟。稍微恢复了一点体力后，他乘着一只借来的小艇，从一个岛去到另一个岛，他开始重新评估人类在地球上的位置。经常性地遭遇“分泌毒液的怪兽”和“全身长刺的植物”，再加上他染上的疾病，缪尔确信，将人类置于自然之上是西方社会的一大狂妄。“大自然创造植物和动物的

目的，”他在日记中吐露道，“很可能首先是为了万物的幸福，而不是创造了万物来满足某一种群的幸福。”^[27]

无论如何，缪尔并不是在打击与非人类世界的和平交流。对他来说，自然是神圣的，而鼓吹恐惧只会令其言辞沾染上他那加尔文主义父亲令人厌烦的关于死后地狱之磨难的说教的意味。自然是热情的、诱人的、有生命力的——“永恒的真相”和“永恒的美丽”。人类“生于大地”，自然是他们的家园；自然之地——不是教堂，也不是受加尔文教义限制的任何地方——会令身体和灵魂清洁、强壮。他在一年后将会被加利福尼亚的约塞米蒂吸引，那里将成为他生命的烙印，在那之前，缪尔在海湾的时光塑造了他的感受力，为他日后领导环保运动奠定了根基。^[28]

和创建了塞拉俱乐部^[29]的缪尔不同，多数浪漫主义者并不是花衣魔笛手，露骨地号召美国人民拥抱森林和大海。人们应该接受并置身于自然原本的模样中，艺术家们将这种观念暗含在了他们致敬自然的作品中。温斯洛·霍默的霍莫萨萨河水彩画正是如此。他画中展现的宁静成为超越其画技的诱惑，即使在一幅名为《丛林中》、画面中心是一只野豹的画中也是如此。以沼泽湿地为背景，画中描绘了两棵死去的树，灰灰的，光秃秃的，径直横倒在前景中。锯棕榈以不同角度挺立在湿地里面和旁边。美洲豹跨坐在其中一棵树干上，正往上攀爬，目光看向了别处。这里没有危险。恰恰相反：水中的倒影，深浅不一的绿色调，透过树林荫翳的阳光——没有引起恐惧的阴影——画面具有了立体的纵深感，像是打开了爱丽丝仙境里的森林入口，观看者也许会惊奇地踏入其中，一窥究竟。

18世纪中期，试探性地，西方文明开始迈向海滩——不是在美国，当时的北美大陆，自由之子孙们仍在将承载着政治意味的英国茶叶

撒入波士顿港，海湾还处于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控制之下——迈向英国海岸的海滩。

西方文明中的海滩之行始于灰暗寒冷的天气、一种在水上进行的浸浴疗法，还有一个古怪的被称为洗浴机器的精妙装置。一辆装配有小木屋的马车会驶入海水中，直到海水将将没入至木制车轮的车毂下方。这就是那个机器。一位主顾，或说病人，会从里面出现，穿着及脚踝的罩衫，放下双脚，让一位等在水里的护理人员握住，这位护理人员又称为浸泡工。这位病人会如此泡上数次。被大海唤醒的恐惧，伴随冰冷的海水和随时溺水的警觉，理论上应能使灵魂重回平静并最终令病人恢复生机。在失去北美殖民地后，国王乔治三世突发急性精神疾病，便进行了这种治疗。最终，洗浴没有救到他。

当海岸上出现这种机器时，围观者会聚集过来。开始时人们以窥探洗浴机仪式为乐，不久，他们便开始为海滩和海水娱乐而来。早期的海滩游客被称为海滩浴者。上层人士开始将他们的内陆浴场转移到海岸边，以疗养和消遣为目的的洗浴跨过了海峡，传播到了大陆的北方海岸。在南方，农夫和下乡人也在一段时间里加入海边的娱乐，关于大海凶兆的预言被人们谴责（衣服也是），于是地中海海岸的海水浴传统复兴了。

美国人跟上了英国和法国人的海上潮流，到19世纪中期时，他们已经习惯了海岸一日的说法。一开始湖岸是更安全也更受欢迎的度假地点，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已经腻味的波士顿、费城、纽瓦克和纽约，在6月到8月的周末搭乘通勤火车一日游，去往里维尔海滩（Revere Beach）、洛克威海滩（Rockaway Beach）、科尼岛（Coney Island）和泽西海岸（Jersey Shore）。后者有100英里的沙质海岸，一半都是海滩城镇。那里有豪华的饭店、商场、浴场和

数不清的木板路。数百名游客在某一个周末，在浴场里排队等待换上海滩装：女士们是灯笼裤或法兰绒的罩衫，男士们则是短裤和背心。

杂志上给出了如何正确地在海浪中嬉戏的建议，但同时又宣称海滩浴作为一项无聊的消遣潮流很快就会过去。《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称自己被海滩上“懒洋洋地倚靠着的”“自甘沉溺”的身体劝退了。那不仅不“别致、有诗意、引人注目”，还“古怪”。但在大西洋的两岸，印象派画家们——克劳德·莫奈、威廉·梅里特·蔡斯、莫里斯·普伦德加斯特、约翰·斯隆——用浪漫的笔触画下了海滩一日，描摹着未来。罗伯特·亨利问：“为什么我们热爱大海？”他的回答是：“因为它有无法抗拒的力量，使我们去思考我们愿意思考的事。”^[30]

1835年，当玛丽·奥斯汀·霍利（Mary Austin Holley）在布拉索斯河附近看见一群海水浴者的时候，人人都会猜想这群人在想什么。玛丽正乘着纵帆船游览海岸，彼时得克萨斯人正确实实地向墨西哥开火争取独立。那时，贝拉斯科（Velasco）还一片安静，那里是玛丽的表兄斯蒂芬·奥斯汀^[31]在14年前安置他的第一批“移民家庭”的地方。同来的旅客，包括“女士旅客”，乘空来到“海浪中洗浴”。这意料之外的场景，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海滩娱乐。60年后，贝拉斯科成为一个深水港，同时也是一个海滩度假胜地，临海处矗立着新开业的40层高的瑟夫赛德酒店（Surfside Hotel）。像它这样大胆地朝向外海的实在少见。当地报纸担保“那里绝对没有海底暗流之类的东西”，而且半英里外的“海水只有齐肩深”。^[32]

在北边的一个障壁岛上，加尔维斯顿海滩酒店占据了类似的一个朝向海湾的位置。它在1883年开业迎宾，不同的是它的经营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它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四层楼200间客房；每间客房配有海水浴室，每层楼都包围着一圈18英尺宽的游廊。外面的草坪修剪

一新，配着悦耳的乐声和汨汨涌动的喷泉，时而会有激动人心的烟火和高空走钢丝表演。斯蒂芬·克莱恩曾经来过这里，他说：“这个建筑的底层就是大海本身，它们通过一段台阶相连。”这个恢宏的酒店连同它标志性的红白相间的木屋顶，在城市健康检查员令其停止往不远处就是泳客游泳的海湾排放污水后，于1898年葬身在了一场原因不明的火灾中。这座酒店直面海湾而建，是时代的领先者，但它的木质结构决定了它并不是为未来而建造的。两年后，著名的1900年加尔维斯顿飓风也会轻而易举地推倒它——椽条、大头钉、墙板和红白相间的木屋顶。[\[33\]](#)

绝大多数的度假地为安全起见，都建在内陆的防波堤后或内陆水域边。亚拉巴马州普安柯里尔（Point Clear）上的格兰德酒店，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在那了；客人们可以躺卧在水边，举起一杯薄荷朱利酒，为让他们得以乘江轮跨越莫比尔湾的财富干杯。每年有超过40万捆奴隶采摘的棉花从内陆种植园顺流而下往海湾驶去，海湾离此处还有几英里的距离。刚踏入20世纪的科珀斯克里斯蒂有将近8000名居民，六家酒店，作为“一片拥有惬意的海风、阳光和鲜花的土地”而声名鹊起，因地处内湾（bay），从而提供了“最安全的”海浴。得克萨斯州塔彭受龟背湾（Turtle Cove）保护的塔彭旅馆，也不再局限于招待游钓客人了；它宣传称沿着马车旅行路线就能到达粉白色的海湾沙滩享受“无与伦比的海浴”。当巴伦·柯里尔买下尤斯帕岛上的大海鲢旅馆时，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休闲需求，他建造了一个沙滩，沙滩受派恩岛峡湾的荫庇，安全无虞，北方来的游客可以在插进沙地里的大太阳伞下悠闲地躺着。[\[34\]](#)

路易斯安那的则有所不同。他们除了勇敢别无选择。他们靠近内陆的地方除了沿海沼泽还是沿海沼泽。如果他们想要一个海滩，就只能去往海岛。最受欢迎的是格兰德岛（Grand Isle）和拉斯特岛（Last Island）。玛莎·菲尔德认为格兰德岛是所有路易斯安那障壁

岛中的“花束”，多数路易斯安那人表示赞同。格兰德岛长六英里，宽半英里，它藏身于路易斯安那州凸出的东南部后方，从新奥尔良来这里只需要一段闲适的100英里水路。岛中央是一道长满了橡树的山脊，橡树弯向海风吹过的方向，像伸展着双臂向大海高呼哈利路亚的朝拜者。岛民们的肌肤“沾染着阳光洒下的金色”，从法国殖民时期开始，他们就在这里种棉花、甘蔗和黑莓，打鱼捕蟹。花椰菜和虾是新近应市场需求增加的作物。在岛民们的记忆中，菲尔德写道，这个岛一直是“各种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大本营”，不管是水禽狩猎者还是游钓客。[\[35\]](#)

度假的传统多多少少是从格兰德岛上一位花椰菜种植主约翰·路德维格（John Ludwig）开始的，他还有一个别称叫水龟之王。他在他的农田里，永远是一样的穿着：工作裤，汗衫，一顶黑色礼帽，咬在嘴里的一支棕色雪茄。透过可乐瓶子做成的眼镜，他看到了养殖菱形斑纹龟的“钱景”。数千只水龟沿着他的围栏匍匐爬着，直到新奥尔良来的订单将它们做成龟汤，或者纽约来的订单将它们做成一碟主菜，和旅鸽一起出现在戴尔莫尼科的餐单上。多年前，在战争即将爆发时，奋进的路德维格将一座种植园房子改造成了岛上第一家旅馆，招待付钱的住客。报纸称它是一个美国的家庭式旅馆（*pensione*）。他的时机坏透了，但他的想法赶上了时代。

战争结束后，前邦联海军上校、弗吉尼亚移民约瑟夫·黑尔·哈维（Joseph Hale Harvey）给了这个想法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他和一个伙伴将格兰德岛上另一个种植园里的奴隶棚屋重新整修成了舒适的客居旅舍。它们很受欢迎，足以让轮船公司开通格兰德岛和新奥尔良之间的定期往返航线。往返穿梭的轮船提醒法国克里奥尔人家庭——他们是路易斯安那上等阶层里的绅士和夫人——可以到格兰德岛去建避暑别墅。于是夏季里的每个工作周结束后，他们离开城市来到这里。在1892年，菲尔德到来的那个季节里，耗资十万美元的顶尖之

作大洋俱乐部旅馆，在夜晚点亮320盏燃气灯，开放了160间海湾景观房。

在咸海里进行的海浴“绝对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不是不可思议的话。菲尔德声称认识一个严重瘫痪的人，他做了三周的定期海浴后，就能自行登上带他回家的船了。毋庸置疑，她夸大了现实。“大海的声音是诱惑的，它从不停止，喃喃低语着、喧嚷着、咕哝着，邀请灵魂漫步在孤独的深渊中。”但一个现实是南方和维多利亚式礼制的逐渐松散。人们不再需要打着健康的旗号来光脚漫步海滩或跳入海浪。[\[36\]](#)

尽管如此，习惯、传统、惊吓——或其他导致了恐惧的东西——并不是能轻而易举抛下的。菲尔德了解这些岛上客人的潜在性情。他们中“有许多”并没有好好享受这一切。

他们从不追逐一只黄色的沙蟹……到它在林木和海上浮木中的巢穴去。他们从不会打碎附着藤壶的啤酒瓶，看看里面有没有来自大海的一封信。他们也不会收集被海浪精心雕琢过的浮木，不会为发现幸运的漂浮种子而兴奋，或者仅仅本着科学探究的兴趣轻轻地折磨一只水母。[\[37\]](#)

在海洋恐惧被克服后，故事和现实又将它们搅动了起来。首先，海底有看不见的暗流会将海浴者拖往深海。如果疲倦没有将你沉溺，那里还有黄貂鱼、水母和鲨鱼会将你咬伤、杀死。“越来越近，”菲尔德写道，“一只等待中的鲨鱼鬼鬼祟祟地移动着它的鱼鳍。”神话中的深海怪兽没有完全死去。其中之一，是无害的魔鬼鱼，也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口中的“大海野兽”，它被它的名字拖累了，魔鬼鱼得名于它带刺的尾巴和像角一样突出的眼睛。菲尔德听见一位灯塔守护人警告说：“可怕的魔鬼鱼，……常出没于海湾，它有时会将一艘纵帆船或小帆船拖到大海中，然后往下沉，一直沉到海底。”他在重复着传说，也许是从当时一本畅销青春小说《佛罗里达海岸上的年轻旅

行者》（*Young Marooners on the Florida*）里读来的。作为故事里的配角，这只魔鬼鱼带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它绊住了一只小艇的锚线，将船上的四个年轻主人公带到了一座荒岛上。[\[38\]](#)

海边的物理环境也不太稳定。格兰德岛的休闲姐妹岛——也被称为Isle Dernière（最后的岛）的拉斯特岛——就散发出不安定的气息。这座24英里长的岛窄窄长长，像一根烟熏肉条，它就在爱德华·麦基尔亨尼鸟类保护区的东南边上一点，只比海面高出了一点，它作为障壁岛的身份可谓名不副实。你可以站在岛上长满草的陆地这一侧，看着海浪击打在另一侧海岸上。

尽管如此，新奥尔良的商人和医生，河流上游来的甘蔗和稻米种植主，自州长以下的州政府要员，都将拉斯特岛视为他们最爱的度假胜地——“在夏日中寻找久别的闲适”，一位到此游览的诗人写道。这里的时光不紧不慢，一天过去了，又是另一天，再另一天，直到，唉！是时候回到城市或种植园去了。1853年海岸勘测局的一幅海图中有这么一条注释：“拉斯特岛最容易被识别的就是海滩上无数的房子。”三年后这些房子都消失了。[\[39\]](#)

那一年的夏季到来前，堪萨斯的支持奴隶制和反奴隶制的动乱者间爆发了流血冲突。在度假岛屿上，在雪茄和波旁酒的间隙，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谈起即将到来的阶层矛盾，但是1856年沉浸在夏日宁静中的拉斯特岛，距离这些话题可能还有十万八千里远。穆加旅馆

（Muggah's Hotel）的房已经满了，保龄球道、台球室、纸牌桌和餐厅都热闹非凡。幸运的避暑房客们坐在房子的门廊上，向来往的人友好地道一声“日安”，此时侍者们会端上茶点。对于自由人来说，海滩提供了沉思的时刻，在咸咸的平缓的碎浪中，有些人在体验海泳的新奇乐趣。你可以走出500英尺，但海水依然只有胫骨高。在有檐的长廊下，女士们很庆幸可以让她们牛奶般白皙的肌肤避开阳光的照射，

她们正在等着去海滨漫步。所有人聚集在人头攒动的海滩上进行这场日落仪式：“严肃的绅士们”拄着手杖站立着，穿着衬裙的女士骑在马上或坐在马车里——每一个人都盛装打扮。夜幕降临时，他们会参加穆加旅馆的活动，或回到各自的房间，在他们的随身仆人的帮助下脱去衣服，睡在有细密网眼的蚊帐帘保护的床铺上。晚风从海上吹来，刚好助眠。这就是他们的夏日，闪亮、豪华、闲适——直到事情有了反转。[\[40\]](#)

当他们在8月10日的早晨醒来，如果他们知道接下来的24小时意味着什么的话，他们宁愿自己身处战斗中的堪萨斯。前一晚，他们参加了穆加旅馆组织的一场舞会。外面，看不见的海浪正在拍打海滩，黑暗中，大风呼呼地吹在这座被抬高的建筑上。它咯吱作响，颤抖不止；但每个人都在继续跳舞。安静不下来的天气看起来更多的是令人生气，而不是危险的征兆。再说，如果“海神的粗暴问候”变得太频繁的话，当时在度假的路易斯安那众议院议长威廉·皮尤（William Pugh）记得，会有一艘内河蒸汽船将他们带往有庇护的长沼。[\[41\]](#)

第二天早晨，风力达到强风级别。海浪狂啸，雨势愈加猛烈，大风卷着碎片将房屋撕裂开来。这栋两层建筑倒塌了。计划中的逃生工具，蒸汽船，被暴风雨抛在了海滩上。海湾来到了岛屿寄居者们的面前。在这个平日里他们正忙着在海滨漫步的时间，海岛消失在了12英尺高的风暴潮中。

几天前，一场大西洋飓风席卷了佛罗里达海峡，并向西北方向推进，持续积蓄力量。拉斯特岛正面遭遇了这场飓风。大海吞噬了这座狭长的岛屿，带走了198条生命。幸存者总计203人。他们所有人都是对海岸持接纳态度的先锋者，而即使暴风雨没有击倒人们重回海岸的心，它也将他们的消遣场地破坏成了八个破烂的小岛。

玛莎·菲尔德是在将近40年后游历海岸的。她当时坚信，格兰德岛，如它现在这般的高度，不像曾经的拉斯特岛，它是“永远不会被冲走的”。第二年，1893年，一场飓风卷起了16英尺的大浪，彻底摧毁了大洋俱乐部旅馆。每隔八年，格兰德岛都会遭遇一次正面冲击。一位小说家，同时也是生长于河流上游的中西部人，查尔斯·坦尼·杰克逊（Charles Tenney Jackson），在风暴的间隙拜访了暂时归于平静的格兰德岛，他苦恼“会有不幸的那一天格兰德岛被发现，然后岛上开始混乱不堪地挤满了旅馆和游客”。他不知道这座海岛的度假传统，却预知了它的未来。[\[42\]](#)

当人们抛弃了中世纪流传的对于海岸的恐惧，他们同时也丢掉了对风的小心。一半的人忘记了来了又走了的风暴，另一半人几乎不相信风暴再发生的可能性。在美国史上最致命的一次飓风——1900年加尔维斯顿飓风——来临的前夜，这座得克萨斯岛屿城市正迎来如潮水般的海滩游客，他们来自休斯敦，充分利用周末加开的特别专列，乘火车而来。骡车每趟收费五分钱，固定往返于海滩，骡车上带有轻便的更衣室。它们更像旧时英国用马拉的洗浴机器的新式改良版，只是目的不同：它是为了让病人的双脚不碰到沙子。那里也有许多穿着鞋和光着脚散步的人，还有自行车。

加尔维斯顿此时正处于真正的海滩文化前沿，随之而来的是毁灭。抛开死亡和毁灭，在1900年飓风吞噬岛屿的11年后，当地投资者斥资百万美元，建起了226间客房的加维斯酒店（Hotel Galvez），希望可以借此重振旅游业。得克萨斯州人称其为“海湾之后”。它有七层楼高，优雅地矗立在离城市新建的防波堤仅一步之遥的地方，以抵御另一场风暴，不怕它再来一次。1927年，得克萨斯州教师们的教案上说加尔维斯顿岛的港口贸易和旅游业的繁荣为“在1900年拒绝接受失败的英雄们的信仰”正名。加尔维斯顿岛因他们而有了宣扬它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临湾海浴的底气。[\[43\]](#)

纵览这一时期的海湾，佛罗里达海滩也不失精彩。这是托马斯·罗伊（Thomas Rowe）为他建在海浪边的旅馆招徕第一批度假客人时心里所期待的。罗伊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出生，父母是爱好歌剧的爱尔兰人。罗伊自己体态苗条，长相俊朗，也爱上了在伦敦演出的歌剧《唐·恺撒·德巴桑》（*Don César de Bazan*）中迷人的女主演露辛达。他们相爱了。她是他的玛丽塔娜，他是她的唐·恺撒。他们相约私奔到美国，但遭到她的父母阻挠。无奈带着一颗空洞的心灵，罗伊只身登上航船。

最后，罗伊娶了别人，但内心的孤独依旧。他用追逐财富来慰藉自己的心。在20世纪20年代，似乎每个参与到佛罗里达建设热潮中的人都迅速致富了，于是他加入了他们。看起来，每条去往佛罗里达的路——而且为了满足蜂拥的人群，新的道路正在建设——都通向财富。报纸刊文说这是1848年加州淘金热的重演，或者1897年阿拉斯加的克朗代克黄金热。只是其中火热的商品不是黄金。房地产才是，它在国内受追捧的程度比黄金尤甚。投资者们的财富在一周内就翻了一倍、两倍。

南佛罗里达就是一个梦，它是南加州的翻版——无止境的阳光、令人陶醉的海风、随风摇摆的棕榈（它们中许多进口自加州的枣椰树），搭配着地中海风情的建筑——但不失它自己的独特风情。萨拉索塔的房地产管理署在1925年10月登记了1100万美元的销售进账。约翰·林林（John Ringling）将他马戏团的大队人马包括小丑、杂技演员、老虎、大象带到镇上来，开启了冬季巡演；他买下来一大片临湾地块，在上面给自己和妻子梅布尔建起了一座私人艺术博物馆和一座威尼斯哥特式宅邸。有些媒体人将冬季旅居者称为“雪鸟”，这个词被一直沿用至今。

萨拉索塔的全年人口在这十年热潮中几乎翻了两倍；坦帕市也几近翻番；而跨过现在这座205英里长的混凝土大桥后的海湾对岸，圣彼得斯堡的人口达到了四万人，翻了不止一倍。圣彼得斯堡的外来人口远比当地出生的人口多——在商界和政界领袖中，这个比例大概是25：1。他们将这座城市建造成了他们心目中的香格里拉。那里有长片的临湾公园，曲径蜿蜒的街区（其中一个街区的街道用混凝土浇筑，被刷染成了粉色），成排的棕榈树，以及随处可见的地中海复兴风格建筑——游艇俱乐部、乡村俱乐部、女性俱乐部、基督教青年会、游乐场、公共盥洗室，每栋建筑都覆以白色或赤褐色的筒形瓦顶。

城市的主建筑是一座耗资百万美元的市政码头，它长1400英尺，宽度足以容纳两条汽车道和一条有轨电车道，上面盖有一栋两层的地中海复兴风格的娱乐场，里面有一个露天舞厅和瞭望台，从瞭望台上既能远眺坦帕湾，又能回望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天际线。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圣彼得斯堡共有140家酒店。世界冠军纽约洋基队在时髦的索然诺酒店设立春季主场。巴比·鲁斯（Babe Ruth）和卢·格里克（Lou Gehrig）在佛罗里德莱昂公寓租住了带屋顶花园的顶层双公寓，可以一览海湾美景。巴比在那里钓大海鲢，饮酒寻欢，对禁酒令嗤之以鼻。顶风作案的酒吧会以比如“跳板夜总会”这样的名字出售从海湾对岸的古巴和巴哈马用货船走私来的酒。兴旺的20年代是寻欢作乐的时代。那时甚至有一间市属的日光浴室，人们可以在里面进行裸体的日光浴。

这座城市也有简单粗暴的一面，沿街叫卖不动产契约的男孩，他们头发梳得油亮、穿着短裤和双色鞋子，站在市中心角落的橘色大木箱上兜售不动产合同。这带有刻板印象，但只有一点点。以低10%的价格出售不动产合同，他们是这个时代市侩文化的代表。这门生意的逻辑是契约规定的全额支付期限为30年，在期限到来之前契约可以被多

次转手从而谋利（佛罗里达最初的庞氏骗局）。合同被倒卖了一次又一次，直到房地产市场在1925年末轰然倒塌。

罗伊在这次繁荣潮中发了财，足够让他花十万美元的大价钱在长礁岛买下80英亩的地。长礁岛（Long Key）是一座200码宽的障壁岛，和圣彼得斯堡之间隔着一座桥——在海湾上这样的资产并不多见。桥和汽车对真正的海滨发展大有益处，罗伊正确地感受到了时代正在从内湾海滩往海湾海滩发展。他将他的岛屿地产划分为宅地，然后耗资120万美元建了一幢摩尔式酒店，楼高六层，共有220间客房，有拱形的入口、露台和红色筒形瓦顶。它没有像其他常见的海湾酒店那样使用钉子加墙板——它们都被飓风一根板子一根板子地刮走了——罗伊选择了混凝土和灰泥。建完整栋建筑，罗伊花费了12000加仑的粉色定制涂料，1928年1月16日，公众参与了一场盛大的黄昏开幕庆典。

此刻的罗伊是否期待露辛达，他的玛丽塔娜的到场？答案不言而喻。他将他的新作命名为唐·恺撒，酒店装饰传达着恰如其分的浪漫和始终不渝。客人们的夜晚从观赏日落开始，橘黄色的太阳渐渐下沉，最后消融在瑰红的天际。建筑的色调与夕照相映成趣，随暮色隐褪了下去；客人们在徐徐海浪声中进入了梦乡。

罗伊将他的酒店建在海湾100多英尺开外。为了保证建筑在流动沙地上以及对抗风暴巨浪时的稳定性，他的建筑师设计了一种以深入地底的金字塔式混凝土地基加固的浮动混凝土基础。这种设计让进一步征服外滩成为可能。罗伊建造了“唐”——这是当地人对酒店的叫法——使其经受住了长时间的天气考验，就像他为露辛达坚守的内心一样。瑰红的酒店富丽堂皇，耸立在沙丘间，长久地矗立着，成为附着于海湾边一处休闲度假的不朽丰碑。

到了唐的时代，“度假”迅速替代了“节日”，在现在更是如此，人们对消遣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对心灵、身体和精神上的自我提升

的追求。海湾沿岸也并非只是为有钱人准备的游玩地。在许多高端度假地纷纷拔沙地而起的20世纪20年代以及其后，有更多为普通人准备的朴实的旅馆和村舍。汽车也在改变着度假风景，将游客的基建设施——也就是过夜的旅馆和相关景点——从铁轨变成了柏油马路。

好路运动（Good Road Movement）推动了1916年、1919年和1921年三项联邦公路法案的通过。受益者之一是古西班牙路（Old Spanish Trail），它在1915年开始动工，最终连接了圣奥古斯汀和圣地亚哥。它沿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海岸而建，将“六姐妹”以铺设好的马路连接了起来。截至1927年，迪克西高速公路（Dixie Highway）建起了从加拿大到佛罗里达的东、西两条高速线，同时，汽车保有量的扩张也推动了美国的度假人数。但不是所有人都会为过夜订房。

有趣的是，现代汽车带来的便利让人们们对公路流浪跃跃欲试。

《纽约时报》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推出的最新汽车型号中有一半是为汽车宿营设计的。这篇报道也许言过其实了，但这种风潮的确在美国刮了起来。它抓住了那些无法负担酒店房间费用，或者单纯就是更愿意睡在星空下的人们的心。他们有一个引以为豪的绰号叫“罐罐旅行者”（Tin Can Tourists），得名于他们在营火上烹煮的罐头食品。他们在他们的雪佛兰、奥尔兹莫比尔和福特（小罐车，Tin Lizzie）的水箱盖上焊上一只空的汤罐头以表明自己的身份。有些人就是简单地将所有装备放到车里或车顶上，每到一个露营地就打开行囊，更有创意的会将汽车和卡车改装成露营车，它们看起来是在自家车库里鼓捣了一番木工活完成的。他们在原先汽车底盘的后半部分用木板搭设起方形的厢房，并为其着色上漆，修整边角，最后开出窗口和一道从里开的门。

罐罐旅行者就这么东征西闯，南来北往。每年有数千人去往佛罗里达，避开二手房契的兜售者和城市的喧闹，停在绿树成荫的公园

里，或者农民的休耕地里，或者矮树丛旁，或者专门为罐罐旅行者准备的营地，每周只要一美元。他们在坦帕设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协会，在戴德市玩起了推圆盘，在阿卡狄亚切开感恩节的火鸡，在萨拉索塔组一支铜管乐队，在墨尔本跳起方块舞，在泽弗希尔斯弓着腰玩宾果卡，并在所有地方烧烤。他们也到了对酒店仍然需求旺盛的临湾海滩。一把扎下帐篷后，他们在海里游泳、晒太阳、钓鱼，用海岸上的漂流木给柴堆添火，烹制他们的战利品。待到日落，美好的白天过去了，美好的夜晚降临了。

房地产热潮和罐罐旅行者绕开了佛罗里达狭长地带，虽然那里并不缺精致的石英白沙滩，但它缺乏现代交通的便捷。那里没有高速公路穿过，火车轨道在狭长地带上沿着它北方走廊的农田村落蜿蜒而过，避开了海岸，除了彭萨科拉。这个例外让当地一位报纸编辑抱着一个局限的思想，坚信圣罗莎岛及其遍布峡湾的光洁雪白的沙滩会很快成为“南部的科尼岛”。那是1887年，除了少数几个海浴者拥抱了它以外，没有过山车，也没有热狗摊出现在这里。在1931年开通了供汽车行驶的桥后，这座岛成为彭萨科拉人的周末海滩，酒店建了起来，亚拉巴马州人也来了。一座供跳舞和餐饮的娱乐城也开业了，当然也有必不可少的渔钓码头。现在，这里有了热狗摊，但还是没有过山车。“这是一个开始，尽管来得有些慢”，史学家哈维·杰克逊（Harvey Jackson）在一本有意思的关于狭长地带海滩的书里写道。[\[44\]](#)

在圣罗莎岛的最东边有一个未建制的沃尔顿堡（Fort Walton）（上面没有堡垒但在镇中心有一个印第安冢），不到100人的当地人和少数的亚拉巴马游客在峡湾和查克托哈奇湾上建起了房屋和村舍。有些人会划船或游泳渡过峡湾，徒步走过海湾高高的沙丘后，来到海湾里海浴。沙丘起伏延展，就像一座看不见的山脉上的山麓丘陵。在没有生长鼠尾草和棕色草叶的地方，沙丘闪耀着难以置信的洁白。它们

在风的雕刻下缓缓滑向沙滩的厚软垫，并随之伸向水彩画般的海里。这个壮丽的海滨总有一天会迎来成群的游客，这很显然也是托马斯·E. 布鲁克斯（Thomas E. Brooks）——这座城镇名义创始人（一个亚拉巴马人）的孙子——所预言的。他在20世纪20年代建造了40个村舍，一座观景台，在海滩上盖了一座娱乐场。营业第一年门可罗雀，杰克逊说，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在它东边的河湾入口处，莱昂纳德·德斯坦留下的捕鱼船队一如既往地忙着带游客到过百英寻的弯曲带去捕猎战利品以供相册收藏。尽管海清沙幼，但这里的海滩几乎无人问津。1933年，美国98号公路沿着海岸打通了狭长地带的东西两侧，公路距离海水仅数英尺的距离，它碾过沙丘，但开阔了视野，让更多的亚拉巴马人开车南下海岸。涌入此地的游人依然只是夏季里的一小股溪流，但足以激怒捕虾人、牡蛎捕捞者和长叶松樵夫，他们过着隐居生活是有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要避开讨厌的城里人。

有些城里人会从德斯坦以东一直开往格雷顿海滩（Grayton Beach），住在那里一间建于19世纪80年代的临湾酒店。格雷顿的名字要么来自一位大胡子内战老兵C. T. 格雷（Charles T. Gray），要么是一家将它作为伐木工营房的木材公司。有个爱开玩笑的人叫它作冲刷酒店。这是这片海滩在做的事——冲刷。这个地方最被守口如瓶的一个秘密就是海岸的沙丘湖，它呈单宁褐色，看起来肮脏，但其实干净诱人。它们和大海之间隔着沙丘，是水文系统中的一部分，可见于小部分地区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马达加斯加，但墨西哥湾上只此一处。通常来说，当雨水和溪流灌入沙丘湖时，不断积蓄的水量便溢出到狭长的沿岸沙丘带上。此时，当地人和游客便投入徒手冲浪的狂欢中，让身体随着湍急的水流冲向海湾，然后把自己拖回到沙丘上继续下一趟冲浪。最后，也许是一场暴风雨，也许是海湾的洋流会将湖水封堵起来，直至它下一次的突围。

再往南走是巴拿马城（Panama City），是狭长地带上仅次于彭萨科拉的最大城市，它在1930年的居民数量有大约一万人。和彭萨科拉一样，它位于其海湾的北部。和彭萨科拉人一样，巴拿马城的居民希望从日常生活（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在当地造纸厂里工作）中得到暂时的解脱，他们开始跨过内湾到海滩上去。村舍、舞厅和酒店很快沿着海湾兴建了起来。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位开发商购置了98号公路旁4000英尺的沿海地块，并将其划分为小片宅地，一周内便卖出了37处，全都卖给了亚拉巴马人。

半岛上的佛罗里达人极少会注意到狭长地带，除了在它以较少的人口数量在立法机关中占了绝对的多数席位时。如哈维·杰克逊指出的，在1937年发行的一本佛罗里达州的推介手册上连提都没有提到彭萨科拉的海滩或巴拿马城。论起与狭长地带的亲密关系，佛罗里达人并不及亚拉巴马人。从很早开始，狭长地带上的居民就认真发起过一项运动，要脱离佛罗里达，加入亚拉巴马“南方”的摇篮。他们多数是中产阶级、新教徒、白人。他们力求让海滩保持种族隔离，但就此事而言，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的白人也是如此，甚至，移民到了佛罗里达半岛的北方人也是如此。

维持白沙滩的白对狭长地带的发展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影响。漫长而孤单的98号公路——北面是松林，南面面朝海湾和内湾——等待公寓和沿路商业区弥合边界的那一天。

所有的一切都在下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来了，终于，彭萨科拉海滩的游乐园里有了起起落落的过山车，以及随之回响的尖叫声。美国海湾上几乎没有一处是被忽略的。回到被电灯点亮的《每日一铜币报》办公室里，那时正撰写专栏的玛莎·菲尔德有时会希望海湾海滩能激起文明世界更强烈的兴趣。如果能活过43岁，活到80岁，她也许会收回这个愿望。到那时，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挡人类、商业和开发商了。

——包括种族隔离、高企的房地产价格和建设成本、环境的退化、人山人海的海滨、拥堵的高速公路，甚至是飓风。

海滩游客不太可能了解吸引他们的海滩和将他们送到那里的石油之间的原生关系，前者点亮了世界，后者令其黯淡。

[1] Rachel Carson, *The Edge of the Sea* (Houghton Mifflin, 1983), 1.

[2] Anthony Weston Dimock, *The Book of the Tarpon* (Outing Publishing, 1911), 232, 256.

[3] Carson, *Edge of the Sea*, 125.

[4] Martha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The Travel Writings of Catharine Cole*, ed. Joan B. McLaughlin and Jack MacLaughli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6), 9.

[5] 引用的是一段有名的英语绕口令中的一句She sells sea shells by the seashore。——译注

[6] Michael Welland, *Sand: The Never-Ending 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19.

[7] 风成地貌指因风力的侵蚀、堆积等作用而形成的地貌，英语中“风成的”一词为aeolian，源自希腊神话中风神的名字Aeolus。——译注

[8] 美国此前持续数十年的农业扩张导致过度开垦，平原荒漠化，再加上当时持续干旱和大风天气，1930~1936年北美大平原发生了大大小小上千次沙尘暴侵袭灾害，风沙席卷时形成遮天蔽日的深色云雾，被称为黑色风暴，这是一场巨大的生态灾难。连年的沙尘暴使大平原成为不毛之地，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因此又导致了美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生态移民潮。——译注

[9] Carson, *Edge of the Sea*, 129.

[10]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10.

[11] Martha R. Field, “Come South, Young Woman, ” in *The Congress of Women*, ed. Mary K.O.Eagle (Monarch, 1894) , 776;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123.

[12] Lena Lenček and Gideon Bosker, *The Beach: The History of Paradise on Earth* (Viking Press, 1998) , 40, 43.

[13] Victor Hugo, *The Toilers of the Sea*, trans. Mary W.Artois (George H.Richmond, 1892) , 25.

[14] Bernard Romans, *A Concise Natural History of East and West Florida*, ed. Kathryn E.Holland Braund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9) , 8.

[15] Charles Lawrence Dyer, *Along the Gulf* (Women of Trinity Episcopal Church, 1971) , 1.

[16] Jessica Brannon-Wranosky, “Corpus Christi History before La Retama, ” Corpus Christi Libraries, http://www.cclibraries.com/local_history/laretama/lrhistory.htm, accessed May 2012.

[17] Louis H.Sullivan,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 (Press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1924) , 295.

[18] Robert H.Gore, *The Gulf of Mexico* (Pineapple Press, 1992) , 152.

[19] 他们接下来在加勒比海域进行了一次单独的巡航考察。

[20] Alexander Agassiz, *Three Crui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ast and Geodetic Survey Steamer “Blake”* , vol.1, 2 (Houghton, Mifflin, 1888) .

[21] 低沙漠 (Low Desert) 一般指加利福尼亚海拔2000英尺 (609.6米) 以下的沙漠地区。高沙漠 (High Desert) 则指南加州海拔在2000~4000英尺 (609.6~1219.2米) 的沙漠地区。它们因明显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差异而被做此区分。——译注

[22] Wallace Steven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allace Stevens* (Vintage, 1990), 126.

[23] 《秩序的概念》 (*The Idea of Order at Key West*) 译文摘自西蒙·水琴所译《史蒂文斯诗集》。——译注

[24] Wallace Steven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allace Stevens* (Vintage, 1990), 128.

[25] Sidney Lanier, *Florida: Its Scenery, Climate, and History, with an Account of Charleston, Savannah, Augusta, and Aiken; a Chapter for Consumptives; Various Papers on Fruit-Culture; and Complete Hand-book and Guide* (J.B. Lippincott, 1876), 115.

[26] John Muir, *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 (Houghton, Mifflin, 1916), 114, 134.

[27] John Muir, *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 (Houghton, Mifflin, 1916), 139, 140.

[28] John Muir, *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 (Houghton, Mifflin, 1916), 142.

[29] 塞拉俱乐部 (Sierra Club), 或译作山岳协会、山峦俱乐部等, 是约翰·缪尔于1892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创办的环保组织。——译注

[30] Julian Ralph, "Coney Island," *Scribner's Magazine* 20 (1896): 12; H. Barbara Weinberg, Doreen Bolger, and David Park Curry, *American Impressionism and Realism: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1885-1915*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4), 119.

[31] 斯蒂芬·奥斯汀 (Stephen Austin) 被称为得克萨斯之父, 他从西班牙政府和后来独立的墨西哥政府处获得在布拉索斯河地区的土地并管理殖民地事务, 是最早开发得克萨斯的人。——译注

[32] Mary Austin Holley, *Mary Austin Holley: The Texas Diary, 1835-1838*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5), 27, 29; "Surf Bathing," *Corpus Christi Daily Herald*, May 21, 1910.

[33] Stephen Crane, *Stephen Crane: Prose and Poetry* (Penguin, 1984) , 710.

[34] “Corpus Christi, the Home of the Next Annual Convention, ” *Texas State Journal of Medicine* 3 (1908) : 313; “The Life of Velasco, ” *Velasco Daily Times*, January 22, 1892.

[35]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9, 11, 12.

[36]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9.

[37]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3-11.

[38]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6, 123; Henry Lee, *The Octopus: Or, the “Devil-Fish” of Fiction and of Fact* (Chapman and Hall, 1875) , 31.

[39] Abby Sallenger, *Island in a Storm: A Rising Sea, a Vanishing Coast, and a Nineteenth-Century Disaster That Warns of a Warmer World* (Public Affairs, 2009) , 5; James M. Sothern, *Last Island* (Cheri, 1980) , 19.

[40] Sothern, *Last Island*, 26.

[41] Sothern, *Last Island*, 36.

[42]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10; Charles Tenney Jackson, *The Fountain of Youth* (Outdoor Publishing, 1914) , 293.

[43] Albert Irving Clark, “The History of Galveston Island, ” *Texas Teachers’ Bulletin* 14 (1927) : 58.

[44] Harvey H. Jackson III,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edneck Riviera: An Insider’s History of the Florida-Alabama Coast*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2) , 14.

十 石油和得克萨斯的小心试水



古斯克里克油田（Goose Creek Oil Field），是墨西哥湾上第一个水上油井，也是第一起海湾漏油事件的发生地。

目前可暂且认为墨西哥湾有潜在的盐丘油藏。

——O. L. 布雷斯（Orval L. Brace），地理学家（1941）[\[1\]](#)

193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上，一只雷龙大出风头。很多人知道雷龙是恐龙的一种，它长长的脖子上安详地顶着一颗小脑袋，为了保持平衡，它拖着一条长尾巴，四肢短粗，身体呈圆丘形。这只两吨重的灰绿色机械仿制品是万国博览会上恐龙展的一件展品，这个恐龙展的赞助商是辛克莱石油公司。根据公司的统计，博览会平均每天的参观人数达24000名——劳动节的那个周末达到了50万人。人们站在巨大的爬虫动物前拍照留念。当时展出了三种恐龙，尖牙的暴龙，长着巨角的三角龙，以及样子友好的雷龙，人们开始将它称为迪诺（Dino）。辛克莱灵机一动，将雷龙选为其官方吉祥物。

这是一次成功的公关策略（此时距离其创始人哈里·福特·辛克莱身陷蒂波特山油田丑闻已有十年，公司亟须修复与公众的关系）。迪诺的大受欢迎，让辛克莱成为向公众阐释石油来源的行业代表；关于石油来源，辛克莱将其简化成一个错漏百出，但通俗易懂的说法：化石燃料来自恐龙化石。辛克莱利用流行的迪诺来刻画其石油的古老

血脉，如此而来的真实性让竞争对手无法如法炮制。当时公司的一则广告断言：“总的来说，最好的机油从最古老的原油中来。”^[2]

于是顺理成章地，辛克莱的加油站在世博会后便换上了全新的标志：白底绿边，红色字体，一只迪诺的绿色侧影出现在前方正中央。凡购买一油箱辛克莱汽油的顾客可以免费得到一只迷你雷龙收藏品。在1964年，辛克莱再次带着它的恐龙展回到了世博会，并将展览命名为迪诺大地。高速公路穿过佛罗里达海湾沿岸的同一年，辛克莱将它的一个服务站建在了一个三维形态的大型迪诺里（汽车保养场被安放在迪诺的双腿之间）。这是独一无二的。在来往经过的车辆中，一张张稚嫩的小脸紧贴着玻璃，手指指着窗外——孩子们都爱死了辛克莱的吉祥物。为了能得到一只带去海滩玩的充气迪诺，他们会缠着父母去恐龙招牌那里加油。

多年后，批评人纷纷谴责麦当劳公司推出开心乐园套餐玩具，并且在店里开设游乐园来吸引孩子的营销策略。但辛克莱很早以前就开始用这样的策略了：“小孩，和成人一样，被这种独一无二的史前恐龙迷住了”，一份公司资料显示，“因此恐龙和辛克莱的关联在人们成长早期就被接受了”。^[3]

天真的迪诺也有隐藏的黑暗一面。它既是麦当劳叔叔也是 R. J. 雷诺（R. J. Reynolds）烟草品牌标志骆驼老乔的祖先。迪诺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品牌形象，但它的产品污染水源，排出温室气体和有毒物质——有些比较明显，比如从炼油厂和汽车排气管喷出的烟雾颗粒；有些则难以判断，比如燃烧含铅汽油时产生的看起来精致实则有毒的氧化铅（直到20世纪70年代联邦逐步废止了含铅添加剂的使用）。素来名声不佳的烟草巨头已经被禁售薄荷烟，但恐龙大使的石油起源故事依然在流传。^[4]

那个石油起源故事也有问题。首先，雷龙是不存在的。这只著名的恐龙是一个野心勃勃，或许还是粗心大意的古生物学家创造出来的，当时正值19世纪末期所谓的骨头大战^[5]，这位古生物学家正摩拳擦掌想一举击败对手。雷龙被错安上了别人的脑袋。由这个虚构恐龙引出了另一则“石油来自恐龙”的假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地理学家保罗·穆勒（Paul Mueller）说，这个说法是对化石的混淆。但是，即使科学家们认识到了真相，原始版本的故事作为一种聪明的商品营销手段依然存在，令化石燃料呈现出令人愉悦的侏罗纪公园的样子。像任何优秀的神话一样，这个故事后面也隐藏着让人难以接受的现实，那就是从地底攫取石油这门肮脏的生意。

相较之下，石油真实的地理起源是乏味的。即使是最有创意的营销天才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可爱的吉祥物来代表石油最原始的真实DNA——腐烂的海洋藻类植物和浮游动物（壳牌石油公司的标志是一个黄色的扇贝壳，但它远不能和绿色迪诺抗衡）。在古老的海床上躺着生物体的残骸，这些生物体在侏罗纪的巨型生物存在时就已经死去了，残骸上的细菌分解消耗了氧、氮、磷和硫，被留下的大多是碳和氢。这个过程持续了数百万年。就墨西哥湾而言，在这数百万年间，阿巴拉契亚山脉上的沉淀物被冲刷进入大海——同一种形成了海滩的沉淀物。

沉积物不断堆积，到了数千英尺的厚度，山顶成为海底，导致温度和压力上升（有些科学家认为落基山脉上的火山灰就形成于这个过程）。在沉积物内部，生物和地质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融合，动植物分解转化为原油，这就是未来石油钻机的富矿带。“现在，如果我可以将手伸到地底下，然后带上来那些几百万年的演化产物，”在1953年电影《霹雳湾》中，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演的一个海湾石油猎人如此怅然说道，“让它们为现实和未来效力，那我也算是做了点什么了。对吧？”

19世纪末期围着海湾工作的人们，一开始将他们的研究精力集中在得克萨斯的土地上，他们是斯图尔特所饰演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的前辈。因为从前的海湾比现在要大得多，因此深海淤泥的沉淀物——也就是石油——在海水撤去后被留在了干燥的陆地下。早期的石油勘探者自称投机分子，他们都是坚定的猎取土地的人。他们的勘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但始终保持和时间的一致。他们依赖地面地质学，基本上就是通过观察周围环境来决定——或说猜想——地底下有什么。得克萨斯州，一望无际、沼泽遍布、怪石嶙峋的得克萨斯州，备受蚊虫、野猫和响尾蛇折磨的得克萨斯州，要想在这里靠占卜探矿，你需要敏锐的眼神，一双好腿，有时还需要好几双鞋，因为到最后鞋面总是结着尘土，鞋底总被磨穿。

勘探者把目光放在油苗、矿物泉、石蜡土和沉积岩上，并从当地人口中获取信息。如果有人足够幸运能遇到难闻的气体嘶嘶地往地上裂缝处窜的情况，他们会擦一根火柴，并寄希望于它能烧起来。这是“人类技能与自然的执拗间的对抗”，20世纪中叶的一项行业历史记录如此宣称道，“运用人类的智慧去解开油气藏于地球哪个角落的谜题。”在这个尝试解谜的过程中，个人勘探者花光了积蓄，合伙勘探企业走向破产，投资人都往别处去了。然后，只要其中一根火柴被点燃，答案，以及财富，便会自然浮现。[\[6\]](#)

1901年得克萨斯州博蒙特镇（Beaumont）附近一个叫纺锤顶（Spindletop）[\[7\]](#)的地方就发生了这样的故事；西班牙探险者发现这一带柏树呈纺锤造型，因此得名纺锤顶。在乌鸦飞过的离海湾25英里的地方，一口前所未见的喷油井从一个新钻井处喷射而出。这是墨西哥湾海岸上的第一例，令人印象深刻，成为行业的头等大事。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最近的加利福尼亚州都成为财源滚滚的石油中心。但极少人认为南部有这个潜力，虽然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得克萨斯州早已发现地表上渗漏的迹象。印第安土著和西班牙殖民者，其

中包括德索托的撤离队伍，他们曾经从黑色泉水或渗出的储油层处提取一种类似沥青的东西作为船体密封材料。储油层就像是鼓鼓地装着原油的土地容器上裂开的一道缝。

这多少是帕提洛·希金斯（Patillo Higgins）的猜测。希金斯上学上到四年级，做过伐木工（在一次伐木事故中失去一只手臂）和制砖工，也杀死过警察。当时年少狂妄的他引爆了一个黑人教堂，将一名试图逮捕他的警官开枪射死，而他之所以引爆教堂显然是因为他憎恶那些聚会者的肤色。他后来说服了法庭他杀人是出于自卫，因而得以无罪释放。和从前很多谋杀犯一样，这个方下巴的年轻人最终被宗教拯救了。皈依上帝后，他让自己修长瘦弱的身体在洗礼水中冲洗，并描述说他的拯救是“无声的、超自然的圣灵所为”。他开始在一间浸礼会的主日学校教课，最享受的就是带着他的班级到酸泉高地（Sour Spring Mound）去野餐，高地就位于小镇南边的纺锤顶。[\[8\]](#)

这里是平原上的丘陵地带，丰饶宁静，没有市镇和农场上的苦差事。这里杂草丛生，野草有脚踝到腰间的高度，随风掠过野花，令人沉醉；这里的天空时而晴空高挂，时而深沉低悬，风若从西边吹来，那么是干燥的，若是从海湾来，那便是湿润的。但这里也并不总是纯净无瑕——对于鼻子来说。硫黄的恶臭常常能越过小山。但这也是它的诱人之处。这位主日学校老师会借此吸引孩子的注意，用一根竹棍刺穿土地，释放出油气；然后有条不紊地拿出一根路西法的火柴，点燃神奇的火把。

正如它名字所显示的，纺锤顶的酸泉高地上有矿泉。内战时，邦联军的医务部队曾经用它们来治疗黄热病患者。此后，商人将其中两处泉水和一个叫酸湖（Sour Lake）的地方改建为矿泉疗养浴场。纺锤顶的地表特征，包括地面的油苗，都清楚无误地显示它的地底结构。地理学家认为酸泉高地下面是一座盐丘。希金斯知道这个。别的不

提，他还是一个地理研究爱好者，他不仅相信地底下是盐丘，他还相信盐丘上的盖层是大自然为存储石油而盖上的盖子。

盐丘是原始海洋蒸发后留下的残余物；五万英尺厚的沉积物下潜伏着广阔的盐岩层，盐体刺破上覆岩层后便形成了盐丘。在海湾西北部的沿岸和近海处分布着超过500座盐丘，使美国海成为世界上盐丘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爱德华·麦基尔亨尼的艾弗里岛的162英尺的海拔高度就归功于盐丘。它比相当于珠穆朗玛峰海拔的深度还要深，永远不会被开采完。墨西哥的塔巴斯科，就是麦基尔亨尼家族著名辣椒酱品牌名的来源及其辣椒的故乡，有一座大型盐丘。就在这个家族将辣椒酱推出市场之际，捕鲐鱼的渔民在离得克萨斯州海岸100英里外的海里发现了三座礁岛，上面长满了植物、海绵和珊瑚。这些珊瑚礁在海湾北部是独一无二的（这里的珊瑚有10000~15000年的历史，可能是被环流从墨西哥裹挟而来的“移民”）。渔民们将它们命名为花园垄（Flower Garden Banks），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片水下花园的底部连接着的是来自海底的盐丘穹顶。

当时几乎没有人清楚盐丘的性质。即使地理学家们的知识也有限，他们似乎很肯定盐丘和石油没有关系。当希金斯在1892年成立了一家石油公司，为能在纺锤顶上钻井而寻找投资人时，当地报纸对他出售的是不是蛇油表示好奇。城里人在他背后讨论他，说他“着实古怪”。他对过去的忏悔也演变成为一种极端的自以为是，他监督他人的品行，大声斥责酒精、舞蹈、戏剧、游泳、海滩度假和原谅惯犯罪行的牧师。让人们大为震惊的是他长期单身并与他母亲住在一起，让人们更为震惊的是他开始收养十多岁的女孩——甚至，在他45岁时，和其中一个女孩结婚，生了三个孩子。他钻井三年以来，除了让诽谤者的话成真外，他什么也没有得到。[\[9\]](#)

他在公司破产后，又登广告招募新的投资者。当地人对此保持一贯的冷漠，就在此时希望降临，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克罗地亚移民安东尼·卢卡斯（Anthony Lucas）前来问询。卢卡斯生于达尔马提亚海岸（Dalmatian coast），是奥地利海军的前军官。他在1879年移民到美国后，为自己挂了个“上校”的头衔，虽然他在奥地利最高也只到中尉；他后来在艾弗里岛上找到了采矿工程师的工作，成为盐矿的管理人。他和希金斯都一致坚信哪里有盐，哪里就有油。除了艾弗里，路易斯安那州还有其他四个盐丘岛：杰斐逊（Jefferson）、威克斯（Weeks）、贝尔（Belle）、科特布兰奇（Cote Blanche）。卢卡斯一一调研过，都找到了有石油的证据。

在1900年的夏天，他开始在纺锤顶钻井。他用一种圣诞树形状的木制架塔，或称“钻井台”，来放置和固定一个用蒸汽引擎带动的旋转钻头。钻头分节组装而成，呈中空结构，以方便受压液体——也叫钻井泥浆——从中通过并到达底部，清洗锯齿状钻头末端钻进地面形成的岩屑。在到达地底575英尺时，卢卡斯遇到了困难，财力不济，于是去了一趟匹兹堡，和资深的石油开发人会面，并谈妥了几位财务投资人，其中包括银行业的百万富翁和未来的财政部部长安德鲁·W. 梅隆（Andrew W. Mellon）和他的兄弟R. W. 梅隆（Robert W. Mellon）。新投资人迫使虔诚的希金斯退出，他们认为他没有什么可贡献给这项事业的，但留下了卢卡斯上校。他们还从科西卡纳

（Corsicana）带来了经验丰富的队伍，科西卡纳地处休斯敦和达拉斯之间，六年前这里开发了得克萨斯州第一个虽然不大但有商业盈利的油井。

纺锤顶的探井还未复工，1900年飓风来袭，淹没了岛屿城市加尔维斯顿，离东北方向上的钻井地不到100英里距离。热心的科西卡纳人为受灾的人们送去了冰、水和1000条面包。新的钻井队带着钻井架木材和钻井设备登上了火车，到了博蒙特镇，并将赈灾物资送到加尔维

斯顿。当飓风幸存者从碎石堆里被救出时，钻井工人在酸泉高地上已经建好了钻井架，并架设上了全新的旋转钻机。当年10月，12英尺的钻头开始钻进沉积岩。

1901年1月10日，当钻井深度达到1139英尺时，钻井架开始震动。工人以为是钻头钝了，于是将其拉上地面换上新的。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泥浆从钻孔喷涌而出，六吨重的泥浆沿钻头顶端灌入了四英寸钢管中。工人们四下躲避。没有人受伤，喷发停止了。然后还没等众人缓过神来，泥浆再次喷射，工人们被第二次撞倒在地。油气嘶嘶作响，发出呼啸的风鸣声，空气变得混浊。随后又是一片安静，但所有人保持着小心。钻孔里传出冒泡声。石油慢慢涌向顶端，先是往外溢，积蓄能量后，怒吼的原油喷射而出，像被从亿万年沉睡中惊醒而燃起的怒火。它喷向150英尺的高空，是钻井架的两倍之高，落在手舞足蹈的钻井工人身上。

得克萨斯州的史学家说纺锤顶将石油带进了现代社会。这说法并不夸张，但就像他们说的，时机，意味着一切。在纺锤顶之前，用煤油灯点亮的街道和建筑为石油产业提供了燃料。以一桶三美分的价格打入市场的纺锤顶原油，为供暖、战争和运输提供了新的动力。从前以煤为生的发电厂在用上石油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扩张。铁路行业开发出石油驱动机车，代替了燃煤的蒸汽机车（截至1905年，服务得克萨斯州海岸的圣达非铁路公司运营着227个燃油机车）。1910年，煤也被美国海军抛弃了（煤的有效载荷比石油重）。英国刚完成了海军改造，在此前一年，西奥多·罗斯福为炫耀本国海上力量而组建的大白舰队刚结束了全球巡航，返回港口，一路上冒着黑烟和难看的煤灰。

但汽油仍然只是煤油提炼过程中产生的无用的副产品，煤油多用于治疗头虱和清除衣物上的油渍。提炼厂将大部分汽油排入了河里。但它很快将成为海湾原油最重要的提取物。距离纺锤顶开发不到十

年，汽车带动了美国交通、旅游和航运的改革，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对自然资源的商业需求。汽车制造商开始时考虑过多种不同燃料，包括一般性酒精和工业乙醇，直到可显著提高燃料辛烷值的四乙基铅[\[10\]](#)被研发出来，价格更便宜的汽油才被确定下来。

到了1918年，美国产出了世界上70%的石油。研发实验室在持续研发新的应用方向。石油“润滑车轮，铺设道路，为轮胎提供合成橡胶”，一段关于海湾本土的汉贝尔石油公司的史料中如此记载道。

“它为建筑提供暖气、盖顶和涂漆，为它们的地板上蜡，帮助清洁窗户。它为人工合成材料、塑料和化工产品——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提供了最基础的原料，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皆是如此。”[\[11\]](#)

博蒙特镇对泥泞街道上覆盖的沥青视若无物，为什么不呢？沥青是一种石油产品，而博蒙特镇多的是石油。在纺锤顶发现石油前，博蒙特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经营木材的镇子，镇上的生活乏善可陈。一夜之间，它变成了有些人口中的“喷油井之城”。石油商和投机客、男人和女人，纷纷来这里寻找工作和财富，他们从北方城市来，从农场和牧场来。到了1902年，这里运营的石油相关公司已达500家。9000人的入口在三个月后翻了两番，此后也没有停止过增长。三个新镇诞生了：纺锤顶，格拉迪斯和南非（黑人和墨西哥人的聚居地）。房地产的价格和卢卡斯的喷油井一样飙升得厉害。得克萨斯州的一份石油史料里记载说，“猪浴池的售价是35000美元，牛牧场售价是10万美元”。“博蒙特150英里外的地价是每英亩，1000美元。”而纺锤顶的每英亩地价是90万美元。[\[12\]](#)

纺锤顶上的钻油塔有如荷兰花园里的郁金香般生长着，尽管它乏味难看。租来的地块狭小得只有20平方英尺，勉强容得下一台钻油塔，有时这台钻油塔要同时操作好几个探井。到1904年，铺天盖地的1200台钻油塔占据了170英亩的土地。一个人可以脚不沾地地从这台钻

油塔走到那台钻油塔去。每一寸地方——每台设备、每个正在走路说话的人身上——都闪耀着原油的亮泽。即使天空湛蓝，这片土地也是灰暗的。开凿出的巨大露天矿井里，漂浮着300万桶油，这是一面映射着繁荣的庞大的闪耀黑镜。行业未来的三个巨头——海湾石油、美孚石油、德士古——都是从纺锤顶发的家。据报道，梅隆兄弟的投资回报是4000万美元。虽然被迫退出他们与卢卡斯协议，希金斯也很快穿上了昂贵的西服。他又创办了新的石油公司，出租仍在他名下的资产，最终将股份以约300万美元的价格转手了。在纺锤顶的25周年纪念聚会上，人们向这位曾经被视为执拗于找油的傻瓜欢呼致敬。

1902年，这片高地产出了超过1700万桶原油。旺盛的供应使石油价格跌到了空前的低点。但随着盐丘逐渐被汲干，价格快速反弹。纺锤顶开始熄火，来得快，去得也快。“这头奶牛，”卢卡斯说，“被榨取得太狠了。”1904年，油井中抽出的油只有10万桶。[\[13\]](#)

纺锤顶的衰落在整个恢宏的产业版图里不值一提。钻井塔很快开始钻探得克萨斯州的其他地方，萨拉托加（Saratoga），酸湖，巴特森（Batson），哈姆伯勒（Humble），还有西哥伦比亚（West Columbia），巴伯斯山（Barbers Hill），赫尔（Hull）和高岛（High Island）。得克萨斯州的沿岸地区成为石油产业的新大陆，但这不只是归功于人们的勇气和坚毅，大自然站在了成功的一边，提供了明显有利的环境条件。得克萨斯州的气候温和，土壤松软。不像其他地区坚硬的岩石，海湾大部分的沉积层为钻井消除了更多的阻碍。此外，还有海湾的500座盐丘。希金斯和卢卡斯的直觉是对的。纺锤顶之后，石油勘探的投机分子广布海湾沿岸，在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土地上从一个盐丘走向另一个盐丘。此后，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古斯克里克（Goose Creek）。

曾经的卡兰卡瓦人和阿塔卡帕人（Atakapa）会在合适的季节到古斯克里克和泰布斯湾（Tabbs Bay）捞牡蛎、蛤和鱼。西班牙和法国殖民者显然对此不太在意，虽然古斯克里克就位于圣哈辛托河流入加尔维斯顿湾的交汇处。19世纪20年代墨西哥挣脱西班牙取得独立后，美国人开始来到这里。他们在这里建起渔牧场和农场，在土地上种满了稻米，利用奴工和西非人的聪明才智在这片土地上精心耕作稻田。

1834年，玛丽·琼斯（Mary Jones）将泰布斯湾和古斯克里克交汇处的一个小半岛卖给了来自马萨诸塞州查尔斯镇的查布（Chubb）兄弟。查布兄弟在这里建造渔用和航运用的纵帆船，并且在山姆·休士顿（Sam Houston）的率领下参与了得克萨斯独立战争，其中一人还是海军的五星上将。他们从非洲的黄金海岸走私奴隶，当南北双方敌意升级时，查布二人背叛了北方弟兄，在古斯克里克建立了一座邦联海军船厂，建造吃水浅的封锁突破船。战争结束后几年，T. B. 盖拉德（Thomas B. Gaillard）买下了查布兄弟的资产，并将其妻子和八个儿女从密西西比州的那切兹接来了。

1903年，也就是纺锤顶走向衰落之时，盖拉德的其中一个成年的儿子，约翰，正在古斯克里克河口的泰布斯湾上钓鱼。当他发现有气泡往水面上冒时，他并不知道此时他漂浮的水域下是一座盐丘。他以为那是准备咬钩的水牛鱼吐出的泡泡。但他突然想试试擦一根火柴。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得克萨斯州沿岸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石油地质学家的这种伎俩。如果气泡燃起了红橙色的火焰和黑烟，它们就是天然气，地下很可能有石油。约翰·盖拉德不是地质学家，他是一个面积262英亩的小牧场的牧场主——但他很快将成为一个富人。他的火柴燃起来了。

是这样吗？盖拉德的故事也许是和辛克莱恐龙故事异曲同工的另一个小说式的起源故事——关于得克萨斯州沿海的石油如何被发现的

故事。它出现在很多在线资源里。它们互相之间一字不差，没有引文来源，也就是说大家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抄袭着其他抄袭者。最初的原创，其实是《得克萨斯指南》中的一篇文章，它发布在网上的时间是2010年6月，正是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事故发生的时候。这篇文章援引了四个出处。其中两个提到了盖拉德，它们都是书籍。其中一本拼错了盖拉德的名字，而且说他的钓鱼时间在1916年，而不是1903年。另一本没有提到日期，但名字是对的。后一本书中第13页的一张黑白照片里，四个男人在一座钻井架前正在南得克萨斯州的阳光下眯着眼。站在中间，八字胡翘到了颧骨上的就是盖拉德。他个子很小，跟一个小男孩一样。他戴着一顶斯泰森的“平原之王”（Boss of the Plains）毡帽，帽顶很高，帽檐和茶碟一样扁平——一个戴着大帽子的小牧场主。两本书都没有提到关于火柴的事。[\[14\]](#)

疑点并不止于此。根据20世纪50年代休斯敦地质学会出版的一本野外指南的说法，泰布斯湾的气泡是在1906年被发现的，发现者不是盖尔德。在水面上的是三个周末度假的垂钓者，可能是在钓大海鲢，他们一人口袋里装着庆祝用的雪茄，另一人口袋里装着雪茄——或其他可能出现的東西——用的火柴。其中一人，L. P. 加勒特（Lovic P. Garrett）有地理学学位，在布拉沃河石油公司工作。所以他知道划火柴的事。在火柴被点燃后，他的两个同伴，R. A. 韦尔奇（Robert A. Welch）和R. T. 鲁（R. T. Rue），在第二年创立了古斯克里克制造公司，并开始在盖拉德的牧场上钻探井。

野外指南条目的作者曾在海湾石油公司工作，这个行业是写出了最早一批石油探索历史的行业。它们都带有专营私有的色彩，各种记录文字已经形成了一种标准叙事方法，那就是将行业本身的发展归功于将国家带入现代社会的英勇探索。盖拉德是一个影子式的角色，如果他会被提起的话。也许的确是在1903年划下了那根火柴，只是官方的年代史编者对此避而不谈了。因为他不足以成为一个好故事。虽

然他把地租给了石油公司，但他内心始终是一个牧场主，这明显体现在他租约中的一项有争议的条款里：如果钻井工人们没有关好大门，以致他的牛群走散的话，他有权赶走土地上的这些工人。在遗产叙述中，早期石油勘探的投机分子都是石油商，都是有胆量的梦想家，有着不容置疑的品质。他们有着“超凡的能力”，一则史料中说，“见多识广，令人不可思议”，绝对具有“进取精神”。这种对斯多葛派式英雄的描写是乏味的，这些英雄没有缺点，没有怪癖，也没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们总是白人男性的专属，不是富人就是在成为富人的路上。[\[15\]](#)

不管是谁划的火柴，甚至有没有那根火柴，古斯克里克的第一桶石油直到1916年才出现。《休斯敦纪事报》8月24日的头版头条是：古斯克里克产石油万桶。美国石油公司引入了一个好的产地，时机刚刚好。在八个月之后，伍德罗·威尔逊会请国会批准对德宣战。欧洲的大战是第一次使用石油的战争；同盟国中80%的石油产自美国土地。

国会通过威尔逊的宣战不久，辛克莱石油和E. F. 西姆斯石油（爱德华·西姆斯是辛克莱董事会的成员，且足够富有，他的休斯敦庄园雇了八个园丁）在他们的油井“甜心11号”喷出了石油；当年8月，他们又在从盖拉德邻居处租来的地下发现了石油，这次的油井被取名为“甜心伊万杰琳”。钻头下探到了3000英尺处，每天产油35000桶。

《匹兹堡公报》上有一家石油公司登广告寻找投资商投资新的古斯克里克油井说：“每分钟入账33美元的喷油井。”在此前一年，古斯克里克的年出产量是40万桶；“甜心伊万杰琳”的那一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30万。虽然它不是1902年的纺锤顶，但古斯克里克依旧被业界称为美国新的甜蜜地带，牧场主盖拉德不知不觉经营起了租约牧场。

[\[16\]](#)

这片土地原本是得克萨斯州最大的河口湾，特里尼蒂-圣哈辛托河口湾中一个宁静的小峡谷，但最后，这段神圣的历史和随之而来的原

油事业已经将它原先的身份抹去了。在封锁突破船和石油出现之前，古斯克里克一直是鸟类的冬季天堂，候鸟群集，比如秋沙鸭、白帽鹈鹕和白鹈鹕。在约翰·盖拉德的管理下，吸引来的都是财富猎人了。甜心伊万杰琳带来了重型木材，框架支架，转盘，凯利钻杆，以及由休斯敦的老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 Sr.）设计的全新的双牙轮旋转钻头；锅炉、蒸汽引擎，以及黑烟；42加仑的钢桶，土制储液器，每天工作10小时日薪5.2美元的满身油污和汗渍的钻井工；一个城市的流动炊事车、厕所和帆布帐篷，将终年在这里用树枝在矮树丛里搭巢的褐鹈鹕和玫瑰琵鹭挤了出去。

《休斯敦纪事报》记录道，“在一排绿林后”，场景突然变换，“让人措手不及”。植被正在快速消失。盖拉德的牧场上飞快地出现了40多个钻井架。它们如果不是那么嘈杂、黏腻、浓烟滚滚，很可能已经被投机取巧的鸮和鹰拿来当作栖息的巢营了。其他的土地业主也开始出租和出售他们的产业。不到两年，这里已经有1500座木制的或钢制结构拔地而起，业界和媒体将这里称为古斯克里克油田。所有这些工业生产活动取代了河口环境，而本身作为自然经济中的重要生产者的河口，却几乎没有引起公众和科学界的关注。当防守用的石油需求刺激了石油价格的飙升，发展注定将成为重中之重。“发展不是全然无错的，我的朋友”，电影《霹雳湾》中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演的一位实话实说的政府环保官员这样说。[\[17\]](#)

钻井架无可避免地会从飞鸟栖息地扩张到海洋——也就是说，进入鱼虾牡蛎在得克萨斯州沿海最常光顾的地方。虽然它们通过木制码头与陆地相连，但这些油井依然是海湾上最早的海上钻井平台。

约瑟夫·艾萨克斯（Joseph Isaacs）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他时常出没在古斯克里克油田泥泞的大路上，坐在一个让两只黑色高大的骡子拉着的改装过的平板车上。平板车上平放着一个钢制水箱，在水

箱上方的前端，艾萨克斯装上了座椅，他坐在上面，双脚悬垂，双手抓着缰绳，缰绳那头是他听话的骡子。水箱装着来自一口自流井的井水，井水将以每桶35美分的价格卖给古斯克里克油田的住户。生意很红火。因为石油工业已经污染了这一地区的家用井水。

污水源于数十年前灵光一现的一个想法，虽然并非有意但无可避免。1859年宾夕法尼亚州西北部首次发现石油，由此引发了美国最早的石油热潮，就这股热潮卷起的当口，托马斯·罗兰（Thomas Rowland）向美国专利局提交了一份申请。罗兰在金属制造上的多项创新远近闻名。知名的联邦“监视者号”的钢制防弹船体就是罗兰在布鲁克林东河的大陆工坊（Continental Works）里一手打造出来的。

内战结束后，国内经济迎来变化，而罗兰一直走在变化的前端，甚至引领了这种变化。宾夕法尼亚州首次发现石油的十年后，他取得了他的“海底钻井装置”的专利。这是海上钻井平台的雏形，有出色的预见性。它包括一个架设在可伸缩支架上的独立平台，可以向海底延伸50英尺。对罗兰而言不幸的是，他的装置直到他去世后很久仍然只是草图上的一个概念。在他后来继续研发大型钢制天然气储罐时，石油行业开始往海上发展。但它们并没有按罗兰的设想走，而是去了他工厂所在地的反方向，大陆的另一头。

挺进海洋的第一步发生在1896年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市附近的面朝太平的萨默兰海岸的白色峭壁前。那里没有号角齐鸣，没有铜管乐队，没有嘉宾致辞或剪彩；更没有海底钻井装置；有的只是木制的钻井架，和其他任何一个钻井架别无两样，唯一的区别是它被架在一短截码头末端，离海岸只几步之遥。五年后，多个码头分布在整個峭壁海岸上，每个都支持着2~3个甚至更多的钻井架——码头上的钻井架共计有400多个。每个钻井架的延伸长度都不过100多英尺。这是一次心切但谨慎的探试。

海上钻探的受限之处并不在于设计或技术，像史学家或石油工业爱好者所称的那样。当时的独立钻井人正在俄亥俄州17000英亩的格兰德湖（Grand Lake）水库上作业，格兰德湖水库是伊利运河的一部分，它和100英里以北广阔的五大湖相比就是一个水洼。石油工人将木桩打入水库底部，以便建造不需要额外支撑的平台，它们被称为井壁基架（cribs）。上面会再分别盖上传统的索具钻井架。工人们则划船来换班，他们在一座人工水库里的人工木制岛屿上工作，与吵闹的蒸汽引擎和锅炉共享这个四面环水的空间。钻井架和陆地的唯一联系是一根连向岸边储油罐的输油管——没有相连的栈桥或码头甚至是狭窄的人行街道。1913年，《纽约时报》报道那里有“超过100个油井”。一位史学家认为最早的这批油井比加利福尼亚的那些足足早了五年。[\[18\]](#)

这个可能性的提出或许会让路易斯安那州穆灵斯波特（Mooringsport）富有集体荣誉意识的人们感到困惑。他们在1994年于喀多湖[Caddo Lake，曾名费里湖（Ferry Lake）] 为一个历史性地标举行了落成典礼，宣称那里的油井是全美国第一个独立式“近海”油井。喀多湖和得克萨斯州东部和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接壤，是一个由众多小湖和数不清的河沼组成的大湖，水边环绕着树干沟沟壑壑的古老柏树。得克萨斯州人称喀多湖是 他们唯一的天然湖——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是唯一“诚实的”一个（所有得克萨斯州湖都是人工湖）。美国未来的第一夫人，克劳迪娅·阿尔塔·泰勒（Claudia Alta Taylor）在1912年出生于喀多湖的得克萨斯州沿岸。她在日后成为伯德·约翰逊夫人后，因致力于沿州际公路栽种野花而受到爱戴[\[19\]](#)，人们将她的感性归功于喀多湖带来的自然财富，虽然它们被改变过。

20世纪初，海湾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队长在成功探明了一系列油井后，说服他的老板从路易斯安那防洪局租下了8000英亩的湖底。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批准在东侧修建堤坝控制水位（这就是得克萨斯州

诚实的湖的由来)。石油商砍掉了柏树，修建钻井平台，老霍华德·休斯从休斯敦带来了他号称“岩石毁灭者”的双牙轮旋转钻头，并进行了成功的试运行。在克劳迪娅·泰勒出生的前一年，休斯的钻头撬开了喀多湖第一个高产的海上油井（休斯注定要获得巨大的财富，小霍华德·休斯成立的第一家电影公司名字就叫喀多制片公司）。克劳迪娅刚学会走路时，拖船推着油驳船驶过湖泊，湖泊本身已经成为超过250个钻井架的露天剧场。它们就像完成委派任务的测绘员一丝不苟画下的图，纵横交错，整齐划一，就像阿灵顿国家公墓里的墓碑。

当古斯克里克也开始尝试往水体发展时，钻井队伍中既有使用加利福尼亚州的码头栈桥式的，也有使用喀多的独立式的。如果说喀多的是精确的几何艺术，那么古斯克里克的效仿就显得草率。它们毫无秩序可言，部分原因是得克萨斯州试水时正赶上战争的急切需求。陆上的油田到处是钻井架，到处是租赁人，所有人都在攫取同一块地里的石油——宰着同一头猪，用他们的话来说。所以你要尽你所能地在每一寸土地上架设钻井架，不然的话你隔壁的那个家伙就会把你吸干。但如果你拥有沿海土地的一纸租约，只要跨过了那道陆地和海洋的界线，房地产对你来说就是小意思了。古斯克里克在巅峰的1917～1919年，产出了900万桶石油，当时在陆地、沼泽和溪流上架设的钻井架有1500台。

你也可以咬文嚼字说，在游泳或涉水而行就可以到达陆地的水上建钻井架——它们的离岸距离还不及钻孔向下深度的2～10倍，水深可以让矮小的盖拉德站进去——算不上是真正的近海钻探。但是，这些溪流和海湾上的钻机是广泛应用于大海各处的钻机的先驱。而且它们有相近的审美、外观和手感。

在石油泄漏上尤其如此。油田肮脏、丑陋，散发着恶臭。当地居民恨恨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的钻井平台建起来，把他们的世界变得越发

黏腻乌黑。泥泞的泥巴地上交错着人行的木栈道，没完没了，到处都是，即使已经很久没下过雨了。可透水的地面上、水库里，目之所及都是坑坑洼洼的废水和原油。倒渗回土地的，或流入溪流、泉水和河湾的原油比被灌进油桶的部分还多。“石油泄漏”甚至不是一个正式的词语。当时最接近这个概念的词是“井喷”。

当井喷还很新奇的时候，它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一口活跃的油井像一瓶被拔去了木塞的香槟一样喷出来，让人的肾上腺素也随之飙升。纺锤顶的油井喷射前后持续了九天，流走了80万桶原油后，采油队才将喷射口堵住。你看在金钱的面上才让井喷停下，而不是在意鱼类、鸟类甚至地下水。所以才有像约瑟夫·艾萨克斯这样的人赶着两头骡子在各个新兴城镇间运送可饮用的好水。你让井喷停下是为了与钻井的邻居修好，因为他们不需要你的好运浇在他们倒霉的头上。尽管如此，还是偶尔有操作员会打开受控的油井为其测量流速，也有些人抵挡不住要炫耀一下冲天的黑色喷泉的诱惑。浪费是成功的一个标志。乌黑的土地上闪耀着金光。

但是，甜心伊万杰琳并不是每一个人的甜心。这座1917年8月凿出的喷油井，直冲250英尺的高空，整整三天，原油洒下犹如倾盆大雨。因此流失的35000桶原油足以为2100户家庭提供一年的供暖。溢出的原油形成了十英亩大小、两英寸深的油泊，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都集中到了这个坑里。风将喷洒出的原油带到了数英里之外。树木的枝叶在滴油，马路打滑，挂在绳上晾晒的干净衣服被染了色。古斯克里克剩下的稻田遭到污染。住在油井边上的家庭将他们的家和校舍一并搬离海岸，他们中很多人去往古斯克里克的镇区，在其他早几年逃离污浊空气和水源的人们的帮助下重整家业（学校被重新安置后的年鉴将被命名为《井喷》）。就在那时，盖拉德将他的牛群赶向了海湾对岸的霍格岛（Hog Island），他花了900美元将那里买了下来（他后来将此地将以25万美元的价格转卖给了汉贝尔石油公司）。

1918年，大家都在猜测8月时会不会实现连续第三年井喷。8月在闷热中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过去了。最终，8月31日，西姆斯-辛克莱的“甜心16号”在水边喷发，爆炸声之大你在邻国都能听见。钻井架被炸得散了架，绿黑色的液体往天空足足喷洒了九天，总共一万桶。这一次，脱离控制的原油没有往内陆去，而是飘进了泰布斯湾。如果钻油井处是坚实的土地，液体还能被困在临时的一个水洼里，或者随人工水道流入河流。水上或湿地边的油田则不然；在你还没来得及反应时，井喷就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污染整片沼泽和河口——实际上野生动物或野鸭的捕猎者和游钓人也并不会将古斯克里克当作他们的游猎场。泄漏的石油随波而下，进入加尔维斯顿湾，进入开阔的海湾，流向了未来。

[1] “Offshore Petroleum History,” American Oil & Gas Historical Society, <http://aoghs.org/offshore-history/offshore-oil-history>, accessed fall 2014.

[2] “Thunder Beast Breathes Again at World’s Fair,”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30, 1933.

[3] Sinclair Oil Corporation, “Sinclair History,” <https://www.sinclairoil.com/history>, accessed fall 2014.

[4] 截至本书写作时，辛克莱在中西部和西部20个州运营着大约2600家加油站。

[5] 骨头大战（Bone Wars），又称化石战争，当时的两位著名古生物学家，爱德华·德林克·科普与奥塞内尔·查利斯·马什，互相竞争发现更多、更著名的新恐龙。马什在雷龙的骨架上装错了颅骨。直到1981年，耶鲁大学的皮巴第自然历史博物馆才发现了这个错误。——译注

[6] Henrietta M. Larson and Kenneth Wiggins Porter, *History of Humble Oil and Refining Company: A Study in Industrial Growth* (Harper & Brothers, 1959), 6.

[7] 又译作斯平德托普。——译注

[8] Judith Walker Linsley, Ellen Walker Rienstra, and Jo Ann Stiles, *Giant under the Hill: A History of the Spindletop Oil Discovery at Beaumont, Texas, in 1901* (Texas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2002) , 23.

[9] Judith Walker Linsley, Ellen Walker Rienstra, and Jo Ann Stiles, *Giant under the Hill: A History of the Spindletop Oil Discovery at Beaumont, Texas, in 1901* (Texas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2002) , 34, 82.

[10] 辛烷值是燃料抵抗震爆的指标，汽油的辛烷值越高，代表其抗爆性就越好，动力经济性能越高。四乙基铅因能提高燃料的辛烷值，带来更高的燃油效率，一度被作为添加剂广泛使用在汽油里（即含铅汽油）。但如前文所述，四乙基铅是剧烈的神经毒物，对健康有极大危害，现在推广的是无铅化汽油。——译注

[11] Larson and Porter, *History of Humble Oil*, 1.

[12] Walter Rundell Jr., *Early Texas Oil: A Photographic History, 1866-1936*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77) , 38.

[13] Linsley, *Giant under the Hill*, 226.

[14] Patricia Meyers Benham, “Goose Creek Oilfield, ” *Handbook of Texas Online*
<http://www.tshaonline.org/handbook/online/articles/dog01>, accessed fall 2014; Tommy Thompson, *Great Oil Fields of the Gulf Coast* (Houston Chronicle, 1967) , 12-13; Rundell, *Early Texas Oil*, 119.

[15] Craig Thompson, *Since Spindletop: A Human Story of Gulf's First Half-Century* (1951) , 20, 21.

[16] “Gusher Makes \$33 a Minute, ” *Pittsburgh Gazette*, August 19, 1917.

[17] *Houston Chronicle*, July 13, 1916, quoted in Olga Miller Haenel, “A Social History of Baytown, 1912-1956”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Texas, 1958), 7.

[18] “Ohio Offshore Wells,” American Oil & Gas Historical Society, <http://aoghs.org/offshore-history/ohio-offshore-wells>, accessed fall 2014. See Judith L. Sneed, “The First Over-water Drilling: The Lost History of Ohio’s Grand Reservoir Oil Boom,” *Oil-Industry History* 6 (2005): 49-53.

[19] 泰勒·约翰逊是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妻子，因温良美丽而有“Lady Bird”（淑女鸟）的美名，在成为第一夫人后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美化，积极支持1965年的“高速公路美化工程”。——译注

十一 石油和路易斯安那的奋力一跃



1953年，詹姆斯·斯图尔特和他参演的《霹雳湾》将路易斯安那州第一次开采海上油井的真实事件搬上了大银幕。

往下钻，约翰尼，往下钻。

——史蒂夫·马丁，詹姆斯·斯图尔特饰，《霹雳湾》（1953）

1953年春天，战后经济仍然低迷，但衰退不会再持续超过一年。美国人对未来感到乐观，消费的引擎正在加速运转。他们购置房产，生儿育女，美国生育率达到了历史高峰。他们纷纷买起车来，高油耗的大车型——每加仑10~15英里的燃油功率——也不在话下。那个年代，比起燃油功率，开车人更注重马力和0~60英里/小时的加速情况，况且汽油还便宜。每加仑20美分的汽油，让婴儿潮中出生的孩子们可以坐在车里兜风，让住在郊区的大人可以驾车通勤（如果车主人是白人的话），人们心情愉悦地开车周游，避暑度假。每周黄金时间的电视荧幕上，广受欢迎的黛娜·萧尔（Dinah Shore）都会唱起那句：“坐在雪佛兰里看美国。”

美国人也在买电视机（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孩子们一屁股坐到电视机面前看《嬉闹屋》（*Romper Room*）、《库克拉、弗兰和奥利》（*Kukla, Fran and Ollie*）、《闪闪丁克和你》（*Winky Dink and You*）。全家人围坐着一起看《我爱露茜》（*I Love Lucy*）、《奥兹和哈里特的冒险》（*The Adventures of Ozzie and Harriet*）、《先知安迪》（*Amos' n Andy*）、《亚瑟·戈弗雷天才秀》（*Arthur Godfrey's Talent Scouts*），还有《德士古明星剧场》（*Texaco Star Theater*），这是早期极为成功的一档电视节目，播出时间从1948年持续到1967年。

虽然出现了新的竞争媒介，但人们对电影的热情始终不减。那一年，美国人花在大银幕上的钱估计有4300万美元。5月，曼哈顿中心区时代广场上的勒夫国家剧院要上映一部电影；影院的银幕是正常尺寸三倍的全景电影银幕，它是为《霹雳湾》的盛大首映礼准备的，电影由詹姆斯·斯图尔特出演，将以彩色画面和三组扬声器的立体音（一些批评家觉得这会让人分心）呈现。

首映礼当晚，夜色清朗，气温70°F^[1]，人群聚集在剧院外。一众闪亮的黑色豪华加长轿车停在遮檐聚光灯下，人们在等着看车里将走出哪些人物。总统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也是歌手和电台名人，率先走了出来，随后是鲍里斯·卡洛夫，泽维尔·库加特（Xavier Cugat），还有“意大利难以承受的性感美人”阿贝·莱恩（Abbe Lane）。维持秩序的警察这时把人群往后压了一压，是美丽的汤尼·寇蒂斯和珍妮特·李夫妇出现了，他们瞬间陷入闪光灯和麦克风的包围。然后斯图尔特到了，观众纷纷在人群中跳起来，就为看一眼这位身形矫健的全美偶像。他的身边是他结婚多年的妻子格洛丽亚，穿着高跟鞋的格洛丽亚和斯图尔特一般高，在70度的晚上身穿一件貂皮披肩。

《霹雳湾》也同样火爆，它在当时被宣传为一部讲述近海采油开端史的冒险片。它刻画了一对坚定的油井勘探冒险者，克服了怀疑、敌意和资金限制等困难后，在路易斯安那开采出首个远离陆地的水域里的油井，这个故事源自六年前发生的真实事件。

导演安东尼·曼（Anthony Mann）喜欢拍过程艰苦卓绝但这些困难最后无不被一位善良硬汉的双拳一一克服的故事，这个硬汉通常还会吻上一个直到被吻之前都不愿被吻的女孩。安东尼·曼的风格为西部片增添了色彩，而斯图尔特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男主角——少言寡语，神情痛苦，但坚如磐石，随时准备好挥起拳头或拔出枪支，捍卫法律、弱小者或他自己。他们合作了五部西部片——当年有两部（其中一部的另一个主演是珍妮特·李），都反响平平。环球国际影业希望他们有所突破，于是《霹雳湾》应运而生。斯图尔特本人对石油生意略知一二，这得益于他在得克萨斯州成功的油井投资，他向安东尼·曼推荐了这个题材。斯图尔特将饰演史蒂夫·马丁，马丁是一位退伍的工程兵，他仿照托马斯·罗兰的专利设计，设计出带可伸缩桩架的钻机，并下定决心要在海湾的海面下找到石油。在宽阔的电影银幕上，马丁双眼圆睁，坚定地说道：“那下面有足够润滑整个宇宙的石油。”

安东尼·曼喜欢在画面里的一切都巨大、醒目，所以他在实地自然光下拍摄，以便捕捉原始、生动的景色。在《霹雳湾》里，他选择了真实事件的发生地作为拍摄地——路易斯安那州的摩根城（*Morgan City*），它在阿查法拉亚河河口附近，四周是杂草丛生的牛轭湖。路易斯安那州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没有孤峰、峡谷、多彩的岩石，但安东尼·曼充分调动起南部大地的光线和广阔的海湾天空，再让阵阵轻柔的海风拂过演员的发梢。如果河流或海湾上水面平静或波涛汹涌，他会运用彩色电影的蓝色和绿色——以及飓风袭来时的灰色，来保证看电影的观众们也看到这一幕。

但影评人被电影中的钻井平台分了心，他们控诉安东尼·曼为了刻画钢铁建筑牺牲了自然景色。“直观地看，《霹雳湾》最与众不同的”，一位《纽约时报》的评论家说，是“复杂的近海钻井装置”。斯图尔特饰演的史蒂夫·马丁像个骄傲的老爹，称呼钻机时一口一个“我的宝贝”。安东尼·曼的电影传记作家，珍妮·贝辛格（Jeanine Basinger），说导演将其刻画得“美丽、威严”。[\[2\]](#)

这也许是他的隐喻。电影中的近海作业区几乎就是一个巨大油腻的建筑模型，泥污四处飞溅，画面中充塞着工业制造的灰暗和生锈的钻杆。影评人们没有在票房和安东尼·曼的艺术手法之上看到这幅更大的图景。没有人发现，无论是从美学角度还是生态角度，钻机已经是变迁中的美国的标志，已经是海湾水景的入侵者，或者说，已经广泛分布于海岸和内陆水域，它们象征的是工业对这个地区的接管。相反，他们眼中的钻机代表更好的经济水平和更高的生活标准，代表承诺和优质。就像被刻画出的亲切可人的迪诺，它不是真实的。但为影评人们说句公道话，这是20世纪50年代，向他们提出生态远见上的要求是过分的。但读到和看到更广阔未来的潜力就在那里，在人物对话间，在电影镜头里，在污泥、油垢和铁锈里。

为了了解这个为电影定做的近海石油钻井平台的起源，我们要回到1901年的纺锤顶，那时一个叫沃尔特·斯科特·海伍德（Walter Scott Heywood）的男人正在从得克萨斯州去往路易斯安那州海岸的途中。海伍德是一个石油勘探的投机者，1872年出生于俄亥俄的克利夫兰，那里是两年前成立的标准石油公司 最初的总部所在地。他的母亲是学校老师，父亲在希拉姆学院（Hiram College）授课，当时的学院负责人是未来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

年少的斯科特的短号吹得非常出色，他在青少年时便随一个音乐演出团体在西部州做巡回演出。19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加利福尼亚

作为专业演奏家做了最后的谢幕演出后，结了婚，开始卖保险，并指挥一个学校乐队。然后在1897年，他的独子出生的这一年，他投身于淘金。他和他的三个同样眉清目秀、有音乐才华且相亲相爱的哥哥，一同加入了其余十万名满怀希望的采矿人的行列，用镐在克朗代克地区沿着被雪覆盖的蜿蜒山路掘出了让人难以想象的漫长沟壑，山路两旁是嶙峋的山峰和一失足便会丧命的岩架。海伍德说那是“纯粹的折磨”。他们兄弟是极少数挣得了一点点勉强能算是收益的人。[\[3\]](#)

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后，海伍德又突然迷上了石油，他开始在圣贝尼托县（San Benito County）租来的土地上钻井采油。当卢卡斯喷油井的消息传到西海岸时，他拎起行李便踏上了开往得克萨斯州的火车，同样地，他的三个哥哥也加入了他的探险旅程。他是兄弟中最小的，却是这个团伙里的老大。他们不是互相竞争的兄弟，而是一个快乐和谐的四人组，他们后来创立了海伍德石油公司。作为钻井队的负责人，斯科特在纺锤顶的数月时间里就挖到了四个喷油井。很显然，对于如何将贵重商品从地里弄出来，他很是有一套。

后来有一帮投资人邀请他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杰斐逊·戴维斯堂区（Jefferson Davis Parish），他们看重的就是他的这点才能，这个堂区和古斯克里克一样有气泡冒出的迹象。在詹宁斯（Jennings）镇附近，有一个种稻田的农夫叫朱尔斯·克莱门特（Jules Clement），他感到好奇，每次他浇灌农田时都发现有气泡往水面上冒。他拿来烟筒放在气泡密集处，往后退了几步，点燃一根火柴，扔进烟筒里。探究石油地质并非难似登天，但有时它看起来和听起来就是登天般难。烟筒爆了，并射出了一道红色火焰。听说克莱门特的试验后，当地五个商人租下了那一片总共2000英亩的土地，他们行事低调，怕招来竞争对手使地价飙涨。

海伍德前来查看这片稻田。再过一个月他就29岁了。他的头发修剪得利落整齐，温和清秀的外形很像唱诗班里的男孩或小学乐队的老师。但如果你再看仔细些，会发现他手指甲里的泥。有人曾经拍过他的一张照片，他和四个勤勉的同伴正站在一堆油井砂上，背后的喷油井正在喷涌，他们几个都油光锃亮，像一群脸上画了黑油彩的游方艺人（其实看起来像他的哥哥，著名的歌舞杂耍艺人阿尔巴）。

事实证明，克莱门特的土地位于一座盐丘之上，它足以让海伍德和五个路易斯安那州商人谈成交易。海伍德将他的钻机从得克萨斯州运来，并和他的队伍一起，在6月的酷热中将它们重新组装起来。那个夏天的工作非常艰辛。有好几次油井开始冒油，所有人燃起了希望，油又迅速被堵在了沙土里。清理它们是一件相当耗时费力的事。

后来有一处油泉持续往外涌，附近的一个农夫很快跑到詹宁斯镇上，散播消息说克莱门特的田里有一口井喷油了。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的报纸媒体也听到了新油田的风声。《达拉斯晨报》刊登了一则附了四个副标题的头条：“詹宁斯举镇欢腾。”但人们高兴得太早了，这个任性的油井再一次淤塞。钻井工人将油和沙子弄得一团糟，朱尔斯·克莱门特一度将田地封了起来。一些投资人撤出，海伍德走在詹宁斯的街道上时说：“我被认为是一个在稻田里钻石油的疯子。”他依然继续前进，但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口井。[\[4\]](#)

在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路上，失败不成其为阻力。其他石油勘探的投机者蜂拥而来，很快，南路易斯安那石油涌流。海伍德转战新阵地，并获得了成功。他在詹宁斯镇上买了一所房子，将他的家人从加利福尼亚州搬了出来。他一直住在詹宁斯，直到1950年去世，他曾任一届州参议员，是州矿产委员会的成员，并被尊认为路易斯安那州的石油之父，他见证了盐丘海岸被展开的命运。直到20世纪末，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和水域上共出产了18.1万桶石油和天然气。

到20世纪20年代，勘探者发现了八座盐丘油田，它们都是陆上油田，或是像艾弗里那样分布在被沼泽地包围的高盐分的隆起型岛屿上。石油产业希望进入更多的勘探地，州政府一如既往地乐意效劳，出租了大片的沿海湿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一份租约就涉及上万英亩的标的。石油财富对富有州和贫困州来说都是毒品，对像路易斯安那这样的贫困州来说尤甚。“这是可悲的，”海伍德曾对州长休伊·朗（Huey Long）说，“我们有些人民要以这种方式生活并不得不忍受这种牺牲。”石油意味着就业、发展、税收，以及当权者捞取一点油水的机会。休伊·朗，这位当权首领说，一个拥有被很多人渴望的珍贵商品的州才是有影响力的州。[\[5\]](#)

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早在1849年沼泽地法案（1849年、1850年、1860年的沼泽地法案的最大受益者一是佛罗里达州，获得了2000万英亩地产，二是路易斯安那，获拨地900万英亩）将联邦政府的沼泽地所有权转移给州政府之前，路易斯安那就一直急于开拓或发展它的湿地。官方声明中说，湿地是荒地——即使从生态角度讲，湿地形成了有如天赐的路易斯安那州海岸。用它来打鱼捕猎自然是合适的；用来钻井采油更好，也更有利可图。

随着被引导的探索者进入湿地和长沼，地质勘探的新技术也出现了。重力计、扭秤，尤其是地震检波器，都为石油地理学家透过水面窥视地球的神秘提供了工具。他们定位到了深处的盐丘，以及隐藏在它们侧面和岩层断层里的石油。在探索中，地理学家们了解到海湾的近岸水底是海岸的漫长延伸带，从路易斯安那州往水下延伸出100多英里，极少有深过20英尺的，学者们预测那里存在盐丘和石油。此后科学家们在路易斯安那州将发现204处盐丘油田，其中80座是完全在陆地上的。

打通第一座合法近海油井的是优越石油（Superior Oil）和纯净石油（Pure Oil）公司，它们是独立的法人公司，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前者被埃克森美孚、后者被雪佛龙吸收合并）。20世纪30年代，这两家石油公司联手跨出了史无前例的一大步，它们在卡梅伦堂区（Cameron Parish）向海1.5英里处用140根涂有木馏油的南方黄松木搭建起了一座“木棍”钻井平台。克里奥尔油田所在水域只有14英尺深，但要划两个小时的船才能到，此时回头会发现大陆已经变成远方的一条线了。新油井在1938年3月18日动工（同一天，在半个地球之外，加利福尼亚州的标准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首次发现石油）。

前一年，在海岸往南一点的海面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带着他的招牌露齿笑容在阿兰萨斯港钓大海鲢。再往前一年，华莱士·史蒂文斯称海湾是鱼的海洋。而其他人早已将其视为一片等待被开采的大油田。一本行业杂志谈及路易斯安那人的新观念时说：他们不仅必须“了解石油”，而且“对当一个水手意味着什么要有切实的理解”。[\[6\]](#)

从现在回望过去，我们能看到向美国海转移工业发展重心的不祥征兆，捕虾船变成了钻油船，它们带着全新的目标向大海进发，柴油机的烟味盖过了所剩不多的鱼的气味，航行四小时载着钻井工人往返于克里奥尔钻油平台和陆地，这里和后来的其他近海钻井平台一样，没有可供休息的地方。随后那些年让克里奥尔油田这个名字充满了讽刺，家庭捕鱼船逐步变成了近海钻井平台，渔屋的发薪日变成了石油公司的付薪支票，克里奥尔人传统的沿海生存方式带来了普遍的损失。这并不是说商业捕鱼已成历史——至少当时还不是。它的黄金时代还在前头。但是，那个时候，一个新的石油力量将统治海湾，并成为政治权力的中心。

随着克里奥尔油田的成功和与德国、日本战争的来临，石油的地位理所当然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部分是因为战争的发生符合提

供了作战资源的人的利益。正如上一场战争一样，同盟国需要石油来推动工业发展，以便开放新的领地，钻取更多的油井，灌满比以前更多的油桶。地质图上代表被发现盐田的圆点变得越来越多，再加上水上前线已经被优越石油和纯净石油扫清了障碍，其他石油公司纷纷叫嚷着要投资近海油田这座富矿。只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愿——并不总是如人愿。

战争期间，海湾里潜伏着恶魔，推迟了这个未来的到来。就在阿道夫·希特勒1941年12月向美国宣战的几周后，他向美国东海岸派出了他最好的海军武器Unterseeboots，也就是潜艇、U船^[7]、狼群战队。商船运载着潜艇以及大批的军用物资和石油，成群拥入了海岸。美国海军对突如其来的猛攻毫无准备，而且在刚开始他们在派出护航舰队一事上犹疑不定，害怕还不成规模的舰队面临损失。大西洋海岸遭遇了敌军炮火的狂欢式扫射，比狂欢节上的射靶还容易。德国人不敢相信他们的运气，或说不敢相信美国人如此粗心，没有在晚上熄灭海岸上的灯，为敌人点亮了商船这个靶心的位置，而且商船没有护航，不堪一击。1942年的1~8月，希特勒的德军潜艇击沉了将近400艘船只，这些船只运送的是当年同盟军四分之一的物资。德国人称那是“快乐的时光”，“美国射击季”。^[8]

对美国人来说，开场的那几个月是四年战斗中最灰暗的时候。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说这些袭击“威胁到了我们整个战备”。那是美国历史上一段令人不安的时刻——超过了珍珠港事件。令人称奇的是，这段历史在今天鲜有人知，尽管当年有那么多亲历战场的民众。从泽西海岸到迈阿密海滩，海滩游客、度假人士和沿海居民日夜遭到海边爆炸声的惊扰，国内安全飘散于滚滚浓烟中。如果浓烟是漆黑色的，那代表一个油罐被击中了，更多时候，将天空染污的东西是漆黑色的。当政府对民用汽油实行配给制时，所有美国人都感受到了它的后果。^[9]

5月，美国物价管理局发行了第一批燃油配给券，与此同时德军潜艇潜入佛罗里达海峡，躲开了基韦斯特的海军港。整个夏天，从水面下，从看不见的地方，敌人控制住了美国海。24艘潜艇在海湾下逡巡而过，它们中的多数都在密西西比沿线航道上埋伏以待。美军仅击毁了一艘德军潜艇，而被德军沉入海底的同盟军船只是56艘（它们现在仍在海底，作为西佛罗里达大学海洋研究项目的考古遗址）。

1942年英国记者阿里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前往海湾沿岸时，他与同航班的一位乘客聊天，对方在新奥尔良周边经营了一队油轮。三个月前，他损失了20条船。那天早上他还有12条，到晚上的时候只剩下“可能八九条了吧”。库克问及有没有为油轮招员工时，对方的答案发人深省：“和招人来自杀也没什么两样了。”那时也不是在开阔水域钻井的好时候——当德军潜艇就潜伏在足以看清海岸上的人群时。那个新奥尔良人说现在的境况已经让他快要说出“去他的石油”了。[\[10\]](#)

但要赢得战争少不了它。当年夏末，已经有380条船被鱼雷袭击，海军被迫提前采取行动。灯火管制生效了。美国的战斗机和船舶（船舶多出自比洛克西）生产进度很快达到了历史高点，海军因此有能力为商业运输线提供空中和海上的护航。来自科珀斯克里斯蒂、比洛克西、彭萨科拉、坦帕、圣彼得斯堡和基韦斯特，以及迈阿密和圣胡利安（古巴）的战斗机组成了空中护航队。美国海军成功阻截了敌人的扫射。

当《霹雳湾》首映时，战争已经过去了八年；另一场在朝鲜发生的战争，将在两个月后结束。电影中出现的那个分散了影评人们注意力的石油钻机是真实存在的。安东尼·曼找到它的地方不是在外景场地上，而是在25英里外海湾上的科麦奇石油工业公司（Kerr-McGee Oil Industries）。这个信息带着强烈的暗示。科麦奇是在1947年打

通了世界首个深海油井（发生在《霹雳湾》所讲述的故事之后）的组织，油井位于阿查法拉亚河南向11英里处，连一条线的陆地都看不到。

和其他石油公司相比，科麦奇是一个相对小型的俄克拉何马州私营企业，汤姆·希尔（Tom Seale）说它“长期缺乏营运资本”；汤姆·希尔在一定程度上是斯图尔特饰演的史蒂夫·马丁的原型。除此之外，科麦奇此前专做陆地钻井，从未涉足过水上钻井。此前没人在海上钻过井，但所有人都知道无论要承担什么风险，大海都是未来的方向。“如果没人愿意赌一把，”为人亲切的克米特·麦克唐纳（Kermit MacDonald）说，“石油行业就止步不前了。”克米特·麦克唐纳是《霹雳湾》中为史蒂夫·马丁的理想提供资金支持的公司的领导人。[\[11\]](#)

科麦奇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到海上去赌一把的，因为大石油公司已经控制了陆地上最好的出租地块。科麦奇的二把手，迪安·麦奇（Dean McGee）是一个地理学家，他的父亲就曾在堪萨斯当过一阵不走运的石油勘探投机者，迪安·麦奇说：“我们决定去探索真正的可能高产之地——盐丘——陆地上的好油田已经不复存在了。”探索没有一刻停下来过。[\[12\]](#)

刚开始，这场探索像是在和时间赛跑。先是路易斯安那州地震地图上的一道褶痕几乎让麦奇错过了最有开采价值的一处水下地产。然后半路杀出了一笔被汇到巴吞鲁日的西联电报局的租地投标款，于是就有了一通拨给州长的求救电话，对手的投标被截下。麦奇搭计程车紧赶慢赶地到了路易斯安那34层形似阳具的州议会大厦，同时他在后座上已经填好了投标申请资料。他赶在截止时点的最后几分钟里递交了材料，尽管这项租约的合法性存疑。近期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项法院判决中，联邦政府获得了胜诉，法院裁定州府的采矿权应限定

在离岸三英里以内。麦奇很可能将从州政府租赁联邦土地，尽管如此，路易斯安那州还是配发了截止到8月13日的许可令。公司有一个月的时间开始钻井，否则将面临财政处罚，但麦奇还需要解决一项重要的运输问题，这样他的工程师汤姆·希尔（Tom Seale）才能开始工作。

在工地上的麦奇——矮壮结实，经常戴着一顶能让双眼藏在阴影下的黑色软呢帽，穿着卡其色的工装夹克和工作裤——看起来是个混合体，既像货运码头上的船队老大，又像控制了码头的黑帮头目。他最大的挑战是在作业地点离岸有3~4小时水路距离的情况下，如何支撑矿井的运转。他旅行到新奥尔良港时，看到了泊定在此处的二战退役备用船只，于是想到了办法。

他购置了两艘坦克登陆舰，各382英尺长，虽然外形毫无讲究之处，但特别适合多功能操作。麦奇从其中一艘开始，将它改装成服务于科麦克16号（Kermac No. 16）油井的流动交通船。它有足够宽敞的空间，可以为钻井队提供营房和食堂，存储物资和钻探泥浆。科麦奇将它的大写名字漆在它的外舱壁上，最后画了一幅飞机飞过油井的壁画作为点睛。离岸交通船和宿舍是行业的另一个首创，但即使有壁画也还是能看出它是临时拼配的装置。麦奇记得，有些人说科麦奇的探索“有勇气”，“其他人就说我们是在犯蠢”。[\[13\]](#)

坦克登陆舰在蒸汽驱动下到达指定位置后，在四面环绕着大海和天空的18英尺水深处下锚，希尔和他的钻井队在钢板桩基上架设起钢制钻机。在《霹雳湾》里，詹姆斯·斯图尔特的角色有一刻仰望着他的“宝贝”并断言它可以抵挡住大自然抛过来的任何一场飓风。钻井刚开始一周（在处罚截止日前），希尔就面临了这样的考验，一场热带风暴在海湾西部形成，向东往佛罗里达半岛方向移动，此时它还在

钻井区域的南边，但随后来了一个顺时针转动，在墨菲定律作用下往钻井平台而去，刮起了70英里时速的大风。希尔的宝贝挺住了。

就在三周后，它再一次证明了它的生存能力。在一个波光粼粼的10月早晨，科麦克16号开始涌出石油。原油从地下1500英尺涌上来，这个深度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浅。希尔原计划下钻到一万英尺到一个“不一样的地质年代”，有人这么说，去到盐丘的侧翼。他在无意间穿透了它的岩盖并击中了原油储藏的大动脉（原油会流上几十年）。石油商们非常清楚这份幸运背后的价值；在俄克拉何马州公司总部，大家无不面带微笑，互相拍背称庆。公司接下来的内部通讯将会报道说：“每一个人都和其他人连连握手。”[\[14\]](#)

但不知为何这个重大进展逃过了国家级媒体的关注。在大型日报中没有看到一点相关报道。但对石油商来说如天降甘露，业界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为新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一份一流期刊将科麦奇取得的成就和宾夕法尼亚首次发现石油、卢卡斯的油井井喷相比较。它“绝对将石油王国扩展到了新领域”。七年后，有40个钻井平台到达了离岸50英里处。人们预测，到20世纪末，海湾将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产油田区。他们是对的。[\[15\]](#)

“石油就在某处”，《霹雳湾》的史蒂夫·马丁坚称，“必须有人去把它拿到手。”你能听出他话中的急切，他相信为了全人类着想，必须跨过百万年，将石油从自然中解救出来。

几年前有另一位导演，他抱有同样的信仰，出现在大致同一片区域。他的名字叫R. J. 弗拉哈迪（Robert J. Flaherty）。他的电影《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Louisiana Story*）讲述的是石油工业与路易斯安那州沿海沼泽偏远居民发生的碰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不同，石油工业诞生于得克萨斯州。而在路易斯安那州，石油商多是外来者。弗拉哈迪在小安斯河沼（Bayou Petite Anse）拍摄，并在

那结识了辣椒酱大王。麦基尔亨尼将被盐圈包围的艾弗里岛开放给了弗拉哈迪，但有一个前提：不能伤害到任何野生动物。弗拉哈迪答应了，但实际上他想让他的主角射杀一只短吻鳄。

在这部影片里，弗拉哈迪没有用好莱坞明星。那样会显得不真诚。他拍摄的是纪录片，或说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希望让当地人出演。他们是那么“温和、快乐、生动”，弗拉哈迪受到了触动，那是他的优越感在作祟。为了找人饰演主角——一个光脚的卡津族男孩——他四处搜寻，真的找到了一个光脚的卡津男孩约瑟夫·布德罗（Joseph Boudreaux）。布德罗头发蓬松，是卡梅伦堂区的四年级生，因为他那时只会说路易斯安那法语而留了一级。他的角色名是亚历山大·拿破仑·尤利西斯·拉图尔（Alexander Napoleon Ulysses LaTour）。电影的旁白简单称他为“男孩儿”。[\[16\]](#)

布德罗在镜头前不用为他的英语担心。这个角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独木舟上钓鱼，或者和他的宠物浣熊乔乔一起去打猎。在整场78分钟的电影里，他要么不作声，要么只说只言片语的字词。所有角色都不太有台词。弗拉哈迪和他的妻子弗朗西丝，在最终剪辑版里，留下了20多句台词（但仍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编剧——现在叫最佳原创剧本——的提名）。电影在公映时，《综艺》（*Variety*）周刊称它是“在多数时候用纯粹的摄像机语言讲述的一个纪录片式的故事”。

时间倒回到1922年，当时弗拉哈迪以一部《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确立了他纪录片之父的地位，片子拍摄的是北极圈加拿大的一个因纽特家庭。1948年在主要影院首映的《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具备纪录片应有的形式，但其实它是一个故事片（《北方的纳努克》也是如此）。它必须如此，因为它要传达预定的信息：石油工业，作为文明进程的大管家，既要管理原始环境，也尤其要管理依赖于这片土地的原始文化。如果弗拉哈迪愿意分享的话，

他会在演职人员名单中放入免责声明，披露他接受了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的20万美元的电影拍摄赞助款，赞助方希望电影在主流影院中被放映。

电影观众是通过男孩合理的好奇心被带向弗拉哈迪想要传达的信息的。在开场的几分钟里，男孩正在后院河沼上探险，这时他听到了不远处的连续爆炸声。被吓到的他划船回家告诉他的爸妈，却只见一艘上了漆的闪亮的汽艇停在栈桥边，就紧挨着他父亲那只船尾装马达的未经打磨的平底小船。他的家是长满青苔的树林间的一间木屋，四周护墙板上挂着风干的海狸鼠皮毛和短吻鳄皮。这些皮毛是这个家庭的生计。屋内，一名和蔼可亲的石油公司代表正将一份出租协议从厨房桌上推到父亲的面前，协议将允许这位代表的雇主在河沼上钻井。这位父亲（由麦基尔亨尼的私人鸟禽看守人出演）用紧凑潦草的字迹签了名，很快，下一幕就是一帮人正用船载着一个油井架的画面。

多年前，成立于纺锤顶的德士古公司开发出建在驳船上的钻探设备，驳船由拖船拖动，可以驶入长沼，并在到达目的地后将部分船身下沉。弗拉哈迪在找拍摄点时，曾经透过一片草地的草尖，看到了这种驳船顶端的移动，那是驳船正沿着河岸悄无声息地行驶。这个画面触动人心。“诗意，”罗伯特后来回忆道，“它修长的线条出现在无边无垠的广阔沼泽草地上，那般干净、紧凑。”为了在电影中重现这个场景，它们从汉贝尔石油公司借来了一套钻探设备，和安东尼·曼对科麦奇钻井台的处理一样，罗伯特·弗拉哈迪让摄影师从下往上拍。这个35毫米的阿里弗莱克斯摄影机成为光脚男孩的双眼。这个钻井台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神迹，这与他穿着鞋站在纽约大街上面对帝国大厦没有两样。[\[17\]](#)

电影中，文明以驳船式钻井台的形式进入了黑白色的沼泽中。两者交错，就像柏树和河沼一样，除了日夜不停的陌生嘈杂声：金属相

互摩擦发出怨怼的声音，还有蒸汽引擎活塞和推杆发出的反反复复的哀叹和撞击声。男孩并没有反感，相反，不知停歇的工业活动刺激了他的好奇心，他和油田工人进行了友好的互动，工人们满是微笑，殷勤亲切。他向他们表演他是如何用在饵上吐唾沫的方法钓到鱼的，而他们则向他展示他们怎么用缆绳、转动绞盘和光滑的索链来钻井——先进文明中的速度和效率。后来，钻井遇到了困难，油田里不断喷出水 and 油气。男孩抓了一把他用来驱赶恶灵的神奇的盐，并扔进了钻孔里。然后他往里面吐了一口唾沫——一个原始但效果显著的仪式。很快，工人们开采出了石油。

弗拉哈迪然后切换到了一个重要的场景：他要传递他的信息了。在后方的木屋里，如同在过圣诞节。拉图尔一家拆开从商店买的食物包裹——给妈妈的双层锅和花色布料，给男孩的一把新猎枪——一切都源自和石油公司签的租约。

在接下来的场景中，钻井队暂时将油田井口盖上，并开走了钻井驳船，那里除了安静的井口，没有留下任何造访过的痕迹。没有喷油田会毒害这个家，会污染这个有着气派名字的卡津男孩的天地。电影接近尾声时，镜头从下方切入，男孩正坐在干净无菌的井口上，和乔乔一起拥抱着它，一边朝离开的钻井工人们挥别，一边喊着：“做得好！” [\[18\]](#)

这是标准石油用钱换来的神话。行业需要一个正面的故事。当时石油进入海上正面临非议，它们针对的就是亚历山大·拿破仑·尤利西斯·拉图尔所听到的那些爆炸声。自1924年海湾石油公司的人在得克萨斯州海岸上成功进行了第一次离岸地震探测后，石油行业便开始采用这种物理勘探方法，而爆炸声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一种名为地震折射法的方法中，石油地理学家通过引爆炸药来探测地底声波的动向。如果它们碰到一座盐丘，地震检波器会显示声波的传播时间递

增。在陆地上的爆炸已经很严重，如果它们发生在河沼中事情将更糟糕。它们会炸起河水、泥浆和植物，在海草和牡蛎床上留下大量的坑洞，并杀死鱼、虾、螃蟹。^[19]

弗拉哈迪从没解释过那些爆炸，或者暗示它们对古老河沼将造成的后果。在《霹雳湾》里，当史蒂夫·马丁在海湾上引发一连串的爆炸时，安东尼·曼也避开了这些重点细节，但他刻画了争议——一个当地人喊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正在杀死那些虾吗？”《霹雳湾》展现的主要矛盾并不像影评人们说的那样发生在人和自然之间。当安东尼·曼尝试新的电影类型时，他用的仍是惯常手法，呈现出的不过是以不同的夸张手法包装的西部世界。斯图尔特做了退让，他在电影海报中的形象是清晰的。海报中他一副枪战中枪手的站姿，这个姿势他很熟悉，因为此前已经做过无数次了。不同之处在于道具：他汗水浸湿的斯泰森毡帽现在成了一顶磨损严重的帽子，他拔出的六发式手枪变成了六根一捆的炸药。与他点燃的引信对峙的，不是背叛他的印第安人或残忍的歹徒，而是路易斯安那的卡津人。在一场紧张的僵持场景中，马丁咬紧牙，扔出了一捆炸药，击退了那个控诉他炸死了海湾的虾的当地暴徒。

如果按照现代的社会敏感度来看，让主角和努力工作、遵纪守法的美国人——包括美国少数族裔——产生冲突是不合理的。但那是1953年，冷战正热。美国人紧紧盯着公民同胞，以防有人干预经济发展，导致美国落后于苏联。此外，斯图尔特在年轻人中声誉颇高。他是一个真正的被授勋的二战退伍军人，见过在德国被执行的多起轰炸任务。在电影中，他总是扮演睿智且有着惊人的远见，虽然有时受困但总能力挽狂澜的好人。他是永远富有同情心的乔治·贝利，肩上有天使确保他生活美好^[20]；他是尽职的史密斯先生，前往华盛顿为弱小而战^[21]。那些试图妨碍史蒂夫·马丁的进步的卡津人，还有看起来过于法国化和落后于时代的人，需要来一点合理的美国化。谁能比

典型的美国人，吉米·斯图尔特，更适合来扮演这个让他们走上正道的角色呢？他比标志性的迪诺更具有标志意义，他是同样有效的传播者。为着他对卡津控诉者们说出的这句台词，石油行业的公关人也许给了他一个热吻：“那些虾可以承受十倍于这个爆炸的威力。”

银幕之外的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渔民对此更清楚，因为他们已经见过太多被炸得粉碎的甲壳动物，他们在州内提出控诉。就在迪安·麦奇赶着提交他的钻井许可的时候，《纽约时报》的一篇头条就是《墨西哥湾渔民叫板石油商》。渔民向州政府官员寻求帮助，这些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是有共鸣的。在得克萨斯州，近海的地震探测法只能在征得当地郡法官的许可时才能进行，但鲜少有人会站在发展和就业的对立面。而路易斯安那州只允许远离水底的爆炸发生，而且必须有一位州环保官员在场，表面上对海洋生命进行保护。[\[22\]](#)

离岸爆炸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一位直言不讳的路易斯安那人说：“那样对环境不好。”地震气枪出现了，取代了炸药，这项新技术缓解了行业的两大痛处：作业场地的意外爆炸和人员伤亡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气枪来看，这种对负面影响的考虑并不包括海洋生命。气枪实际上是大炮，每一支气枪包含48支枪，释放出的爆炸声能比喷气式飞机强烈十万倍。它们不会产生爆炸坑，但会杀死鱼类，并对鲸鱼和海豚的生物声呐产生无法弥补的伤害。[\[23\]](#)

河沼地区还有其他问题，包括石油泄漏和盐水污染（钻井活动的副产品）。1932年和1933年，路易斯安那的牡蛎渔民对德士古提出了19次诉讼。水面浮油和盐水不断污染毁坏他们在泰勒博恩

（Terrebonne）和拉福什（Lafourche）堂区的牡蛎床。11年的诉讼战后，州最高法院裁决行业对所做的损害赔偿付21.1万美元——实际上是弗拉哈迪的一部宣传电影的价格。

就像恐龙和石油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关联一样，钻井平台也不会像《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里呈现的那样，干干净净地进入和撤出河沼。在南部堂区，石油工业的到来像是一场入侵。说到入侵，我们说的是它的量级、范围、速度、持续性和完整性；说的是它的足迹，一个来了就免不了有第二个，然后就有了第三个、第四个；说的是它的不可避免和永久性；弗拉哈迪将这场入侵裹上了一层路易斯安那的蔗糖。

不论你对石油是欢迎、憎恨还是佯装漠不关心，你都处于它的控制之下。本地人谴责石油代理商，将他们一律归为“les maudits Texiens”，即“那些该死的得克萨斯州人”。他们的入侵表现为大卡车、飞机、驳船式钻井装置、巨大的橡胶轮胎。这些水陆两用轮胎不过是又一种制造噪声的新奇装置，那就是专为海湾石油公司进行湿地地震勘探而设计的，并被恰如其分地命名的沼泽车。它的第一批产品出现在《大众科学》1937年3月刊的封面上，那是定制的固特异大地（Terra）轮胎，高十英尺，厚三英尺，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轮胎。它们能将车尾溅起的泥泞抛出像喷油井一样的高度，在沼泽中涉水而过，就像摩西为他们分开了草地一样，碾压过路上的一切——走向另一种极端。

“那些该死的”石油商做生意的方式颇为极致，他们有意图让所有事情在昨天就完成的急躁性情，有公司律师式的游说能力，且认为土地所有权不可僭越——虽然，有人说，他们“分不清牡蛎床和花床的区别”，看似也并不在意踩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之上。他们的入侵武器还有管道，不只是凯利钻杆，还有直插入水和土地的大型焊接钢管（直径48英寸的那种）。比一路蹦跶的沼泽车更糟糕的是他们手上的牵引式疏浚机，它们挖通沟渠管道，让钢管、交通艇和驳船通行无阻。他们刚开始铺的是木板路，但那样消耗了太多的计薪工时和数不清的本地柏树板材，此外，麝鼠和海狸鼠也会吃掉起支撑作用的植物

性地基。于是一开始他们挖掘了数十英里的管道，然后扩展到了数百英里，接下来是数千英里的管道从牡蛎床、稻田、湿地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穿行而过。到了1982年，他们获得了73000英里的输油管道用地。其中的“麝鼠”输油管道线，到355英里处才停下，穿过河沼、海湾、河口三角洲和障壁岛，和其他所有管道一样，它的管道将植被连根拔起，改变水流和盐度，最终导致南路易斯安那州最为宝贵的旱地遭受洪涝。[\[24\]](#)

历来有捕鱼、务农和打猎传统的卡津地区，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卡津，而更像异乡的工业地区。这在摩根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曾经，摩根城的贝壳路随阿查法拉亚河的曲折而曲折，它的经济也随河口湾的涨落而涨落。在石油工业化到来之前，摩根城至多不过是一个安静的河湾沼泽带。它在18世纪迎来阿卡迪亚的法裔移民和他们的甘蔗，随后建立了以土地和河水为生的卡津文化，也就意味着在19世纪，他们过着诱捕猎物、捕鱼、捕虾、捞牡蛎和砍伐柏木沼泽的生活。

20世纪30年代，石油勘探投机者和大型石油公司进入了——侵入了一——这个河沼地区，并在摩根城设立了办事处。从公司代表的口中，当地人必然听到了史蒂夫·马丁那句被无数次以立体声播放的台词：“石油将造福这片土地。”对服务陆边盐丘来说，摩根城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因为它的堂区内就有四个盐丘。经由阿查法拉亚河，人们可以轻易进入海湾，在捕鱼码头上有大量可作为来往钻井平台交通艇的捕虾船供租借或出售。科麦奇在那次里程碑式的勘探突破前就已在那里设立了海岸总部，安东尼·曼得知此事后，搬来了好莱坞，用贝壳路作为他电影的开场画面。

到1953年《霹雳湾》首映时，路易斯安那州租给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土地有75%位于海岸带，路易斯安那州大多数出产原油也来自海岸带。有观察者说，州政府颁给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许可就像麦当劳应

对顾客订餐一样：“今天想要来多少呢？”^[25]没有地方能不被冒犯或得到幸免。麝鼠线路穿过了格兰德岛，格兰德岛是曾经迷住了玛莎·菲尔德的路易斯安那障壁岛中的“花束”，同时也是汉贝尔石油公司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总部。其他公司在马什岛钻井，马什岛是麦基尔亨尼协助设立并以救助鸟类为目标的罗素·赛奇州立野生动物管理区的所在地。全国奥杜邦协会管辖下的保罗·雷尼野生动物保护区未向公众开放，但没有禁止（37座油井的）天然气开采。诱惑太大，难以抗拒。在雷尼野生动物保护区开采得到的油气最终为奥杜邦协会带来2500万美元的净利润，赛奇州立野生动物管理区的租约和油矿使用费收入已多次为组织运转提供了资金。^[26]

虽然入侵、控制和污染依旧存在，但来自当地的抵抗越来越弱。无论史蒂夫·马丁在霹雳湾上遭遇了多少敌意，他总是能找到一艘可以雇用的捕虾船。为大人物摆渡，船舶主人不用累死累活就可以挣到捕鱼时一次大丰收的钱。为一家公司提供固定服务可以挣到前所未闻的薪水——是一个人拖网拖一整天挣到的钱的十倍。而且这还是一份稳定发放的薪资，无须看老天爷的脸色。最后，还有医疗福利、休假时间和养老金。你可以买上一所建好的房子——而不是自己用东拼西凑来的材料搭建的——付清房款，然后在里面过上退休生活，把你的孩子送进石油大亨们赞助成立的州立大学。即使你想坚守原则拯救传统的生活方式，但你很可能有一个兄弟、姐妹、表亲、婶婶或叔伯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于是你也只能作罢。麦基尔亨尼家族最后不得不停止了大多数辣椒的种植，因为他们种植地上的工人们都被石油行业的高薪工作挖走了。塔巴斯科最后一点和辉煌历史的联系也因此消失了。但这个家族也并不无辜：是他们让汉贝尔石油公司在他们地质优越的岛屿上钻井的。

1937年的劳动节是路易斯安那人和石油业之间不完美和解的开始。摩根城的居民在那一天揭开了第一届路易斯安那虾节的帷幕。从

那以后的每一年，他们会吃几大碗的秋葵汤饭和什锦饭，拉着提琴，为拖网渔船船队送去祝福。30年后，石油业希望成为社区节日里的主角。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提议，但一些现实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大萧条伊始，圣玛丽堂区（St. Mary Parish）的居民有44人在石油和天然气制造业中工作；到末期，超过了400人。这个数字向人们说明了一些问题。

当它提出要在节日中占有一席之地时，石油公司所雇用的当地居民人数是2352人。它的在编员工每年为经济贡献700万美元——比其他任何一个行业都多——当地工薪阶层的人均收入在全州位列前茅。第二年出产的1474口近岸油井预示着前方更美好的未来。这里的年轻人和海湾上其他很多捕鱼地区不同，他们在成年后会留下来——一部分人会继承家里捕鱼的传统，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石油领域开始新的工作，他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也是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摩根城的一个居民告诉作家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当你在河沼里钓鱼的时候，你置身在被石油产业包围的大自然中”。[\[27\]](#)

至于石油泄漏、输油管道和沼泽车辙带来的环境影响，1977年西南路易斯安那大学的研究者们为美国商务部撰写的一份报告中称“沼泽地”转变为“工业用地的好处”“远远大于其弊端”。由于没有一位研究者是生物学家，他们的研究发现令人高度存疑。但不管什么时候当行业伸手够向钱袋子时，它在彰显它的肱二头肌。钱就是用来修改节日横幅用的肌肉。从1967年开始，横幅上书“路易斯安那虾和石油节”。[\[28\]](#)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钻井和捕鱼看起来是达到了平衡的。当石油业遭遇抨击，它的发言人可以站出来说，“是的，我们在路易斯安那海岸钻井的力度比美国其他任何海岸地区都大，而且从商业角度而言，它是海湾上最成功的石油天然气区域”——然后加上理直气壮的

有政府数据支持的“但是”句：“但是我们的成功并不是牺牲商业渔业得到的。路易斯安那州渔民，无论是捕获数量还是价值，都一直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并在20世纪80年代高居首位。”这都是事实，因此它可以用接下来这个问句表达它另一个断言：“谁说石油和水不可以相融？”

安东尼·曼和斯图尔特说它们可以。他们处理外来的史蒂夫·马丁和捕虾人冲突的方式，可以看作一个无心插柳的劝诫故事。在最后一幕中，一帮挥舞着钩篙的卡津人正和马丁在钻井边对峙，准备一举毁掉他的事业。但这一次马丁没有从他腰间抽出一捆炸药。他有更好的防御武器：黄金虾。这是渔民们世代以来都遥不可及的捕猎目标，马丁找到了它们。这种虾堵住了他钻井装置上的水冷却泵，而他知道它们会被钻井机器吸引。这就是个人工鱼礁！马丁可以得到他的石油，卡津人可以获得难得的虾类，于是在这好莱坞式结局中太阳愉快地下山了。

这是对现实中的石油开采人更有用的东西，而且这次是免费的。石油巨头持续鼓吹这个故事，使得石油业最终从人工鱼礁这个比喻中获得的大量利益一直延续到了下一个世纪——比迪诺和恐龙起源神话收获的好处更多。它被运用到了路易斯安那虾和石油节的横幅设计上，节日标志是一只巨大的戴着黄色安全帽的虾正在拥抱一座石油钻井架，灵感正是来自安东尼·曼的电影，此外弗拉哈迪也曾在其电影中通过小主角拥抱井口的场景暗示过这一点。

现在快进到2006年——对那个骨瘦如柴的卡津男孩来说时光飞逝，曾经的影星现在已迈入人生的第八个十年，他很可能已经吃过太多的什锦饭和秋葵汤饭了。约瑟夫·布德罗行走时能看出他的背部和髋部状况不好，曾经乱蓬蓬的头发现在已是银白。在卡梅伦堂区的海岸上，在一个春日里，他带着州立大学电影专业的学生重游故地，说

着飓风、他的电影和油气行业的事。他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也知道这里的人民依赖于它，因此小心地没说任何严重的话。

但是随后他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看着电影的最后几分钟，谈论着它，言谈间似想吐露些真心话。“呐，就在这个无辜的地方，”他说，指着年幼的亚历山大·拿破仑·尤利西斯·拉图尔和乔乔趴在加盖井口上微笑着朝钻井队挥别的这一幕，“我告诉你们，从那时起再过个二三十年，侵蚀问题已经蔓延到了那里。”他说的是关于好工作和人工鱼礁的另一面——行业不愿意看到被翻起的那一面，那就是路易斯安那州海岸线和卡津文化受到严重侵蚀，而这一切的发生，与石油企业在沼泽地上大肆开挖输油管道不无关系。^[29]

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不断膨胀的石油化工业在拉紧了它们经济命脉的同时，也放松了对自然——海湾自然——的情感依赖。

^[1] 约21℃。——译注

^[2] A.W., “‘Thunder Bay’ Shown at State on New Wide, Curved Screen,” *New York Times*, May 21, 1953; Jeanine Basinger, *Anthony Ma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32.

^[3] Nola Mae Ross, “Heywood 1872 History,” USGenWeb Project, Louisiana Archives, <http://files.usgwarchives.net/la/jeffersondavis/history/heywood.txt>, accessed fall 2014.

^[4] “Jennings Has Become Greatly Excited,” *Dallas Morning News*, September 24, 1901; Ross, “Heywood 1872 History.”

^[5] Ross, “Heywood 1872 History.”

^[6] Diane Austin, Tyler Priest, Lauren Penney, et al., *History of the Offshore Oil and Gas Industry in Southern Louisiana*, vol.1,

Papers on the Evolving Offshore Industry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2006) , 29.

[7] 英语为U-boat, 是德语U-boot (U取自Unterseeboots首字母) 的英译, 德语中U-boot可用以表示一切潜水艇, 在英语语境中则一般用来特指德国潜水艇, 尤其是一战、二战中的德国潜艇。——译注

[8] Michael Gannon, *Operation Drumbeat: The Dramatic True Story of Germany's First U-Boat Attacks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World War II* (Harper & Row, 1990) , 308, 310.

[9] Michael Gannon, *Operation Drumbeat: The Dramatic True Story of Germany's First U-Boat Attacks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World War II* (Harper & Row, 1990) , xviii.

[10] Alistair Cooke,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1941-1942* (Grove Press, 2007) , 76.

[11] John Samuel Ezell, *Innovations in Energy: The Story of Kerr-McGe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9) , 154.

[12] John Samuel Ezell, *Innovations in Energy: The Story of Kerr-McGe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9) , 154.

[13] John Samuel Ezell, *Innovations in Energy: The Story of Kerr-McGe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9) , 169.

[14] John Samuel Ezell, *Innovations in Energy: The Story of Kerr-McGe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9) , 165.

[15] John Samuel Ezell, *Innovations in Energy: The Story of Kerr-McGe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9) , 169.

[16] Paul Rotha, *Robert J. Flaherty: A Biograph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3) , 235.

[17] Paul Rotha, *Robert J. Flaherty: A Biograph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3) , 235.

[18] Robin L. Murray, *Film and Everyday Eco-disaster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4) , 165.

[19] Alan Gevinson, ed., *Within Our Gates: Ethnicity in American Feature Films, 1911-196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614.

[20] 指1946年电影《生活多美好》 (*It' s a Wonderful Life*) 。——译注

[21] 指1939年电影《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译注

[22] “Fishermen in Gulf of Mexico in Contest with Oil Men, ” *New York Times*, June 8, 1947.

[23] Diane Austin, *History of the Offshore Oil and Gas Industry in Southern Louisiana*, vol.3, *Morgan City' s History in the Era of Oil and Gas—Perspectives of Those Who Were There*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2008) , 226.

[24] Jason P. Theriot, *American Energy, Imperiled Coast: Oil and Gas Development in Louisiana' s Wetland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72.

[25] Oliver Houck, “Who Will Pay to Fix Louisiana? ” *Nation*, June 24, 2010, online edition,
[http: //www. thenation. com/article/who-will-pay-fix-louisiana](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who-will-pay-fix-louisiana).

[26] 20世纪90年代, 当奥杜邦协会反对在阿拉斯加州的北极全国野生生物保护区进行石油开采时, 《华尔街日报》一则专栏指责协会伪善。(“PC Oil Drilling in a Wildlife Refuge, ”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7, 1995.)

[27] John McPhee, *The Control of Nature* (Noonday Press, 1993) , 86.

[28] Coastal Zone Information Center,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Impacts, Morgan City, Louisiana* (University of Southwestern

Louisiana, 1977) , 3.

[[29](#)] *Revisiting Flahert' s Louisiana Story*, produced by Patricia A. Suchy, James V. Catano, and Adelaide Russo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2006) , DVD.

十二 岛屿，因时而易的沙子



沃尔特·安德森 (Walter Anderson) 于1948年画的一幅鹈鹕速写。

在螺旋上升的创作过程中，原本最外侧的地方会翻转到最里侧。我会永远在灵魂深处带上一点霍恩岛。

——约翰·安德森 (John Anderson) (2009) [\[1\]](#)

如果海湾上有什么是确定的，那就是不可避免的变化。这是来自沃尔特·安德森的感慨，他和石油工业没有丝毫关系，也不想有任何关系，而且几乎没有用过它的产品——除了他的自行车链条上有一点，他的桨架上也许也有一点，有时也会出现在他的画里，虽然他更喜欢用水彩作画。在跨越20世纪中叶在密西西比海岸度过的一生中，他大多数时候都住在海泉市 (Ocean Springs)，见证了许多变化。他的双眼总是保持关注——虽然多半会排除人类的影响：将他的帆船推向岛屿又推离岛屿的风，太阳在东升西落中形成的仪式，变换季节间的“矛盾”，灌木丛和沙丘上的新旧交替。他曾经在他的日志中特别标出了“变化”这个词，说变化是“神奇的”。对他来说，最令他着迷的地方就是岛屿。[\[2\]](#)

它们不需要与谁竞争以得到他的注意力，即使对方是他的家人。他的妻子艾格尼丝承认，作为父亲和丈夫的沃尔特，在大多数时候并没有尽到义务。在他们的四个孩子出生时，他都不在场。茜茜，这是艾格尼丝最常被称呼的名字，她天生包容、善解人意，静静接受了沃尔特这种艺术才华带来的冰火两重天的自我沉浸。海湾的野生动物是他自我表达的源泉。他需要和他的表现对象待在一起，了解它们，直到他能将它们转化为艺术。障壁岛——“那些白色的土地背脊”，她这么称呼它们——环绕着从佛罗里达到墨西哥的海岸，尤其能激起他的好奇。他想去了解“是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海流创造了它们……有多少动物在这里死去，有多少植物接受缓慢生长……什么样的鸟或海浪带去了树的种子、草的种子，或海滨燕麦草的种子”。他将它们都画了下来；他就是单纯地被岛屿迷住了。其中一个障壁岛占据了他大部分的心思，那就是霍恩岛，那里是“那只白鲸，莫比·迪克^[3]的后背”。^[4]

这是沃尔特的比喻，看起来他是对的。霍恩岛长十英里，宽一英里，像一只长着白色沙丘的脊椎动物。它与密西西比海岸平行，要去那里你只能坐船。在这个故事里，安德森就是试图接近白鲸的船长亚哈，只是霍恩岛并没有抵抗，安德森也无意报复。

除了前来拜访的艺术家外，霍恩岛少有人烟。在19世纪的 大约30年里，它有一座灯塔和一个看守人，直到1906年的飓风将他们二者都卷入海底。有一户人家也住在那里，畜养了一小群很可能是西班牙人留下的牛和猪。这户人家在1920年离开了这里。但生命生存的支柱仍然存在。这里的年平均降雨量有大约60英寸，滋养着岛上的许多潟湖和水塘，它们在干旱期含盐量会提高。岛上有一处淡水泉水，人们以岛上最多的一种动物将它命名为兔子泉（Rabbit Springs）。那里还有大量的浣熊和海狸鼠和野猪。岛上野马奔驰，直到军队在二战时将它们赶走。水鸟、滨鸟和鸣禽也很常见。植被多为各种各样的矮树丛

——杨梅、沙丘迷迭香和冬青，因为水分充足，长得比别地的都更大些。湿地松由于没有伐木工和开发商的侵扰，生长得茂密成林。周围其他岛屿上的植被也大致如此，除了其他岛上有大量橡树，而霍恩岛只有两棵。

岛上的生活无拘无束。这是安德森喜爱它的原因。“霍恩岛上的动物好像在前一天就都出动了，”他在日记中写道，“白尾鹬、沙锥、水鸭、绿头鸭、大蓝鹭、兔子，还有只在黄昏出现的，一只浣熊。”他给这只浣熊取名小墨。从二战结束到他1965年离世，安德森是这里的常客，每次来都待上一到两个星期。在这里住下时，他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幸运观众”。[\[5\]](#)

霍恩岛在离海泉12英里外的密西西比湾上。安德森渡海用的是一只有点年头的渗水小帆船，这要么是从他兄弟那里借来的，要么是在海湾暴风雨过后打捞上来的遇难船，他在食物和画具上的预算只够他将几个黄麻袋和一只金属的垃圾桶带上船。“我轻便的小帆船是一只运货的驳船。我边划边往外舀水，边划边往外舀水。”他戴着一顶已经被汗水浸湿的卷檐软呢帽，用篙撑动船后便开始划水，等有风吹起时他便将帆扬起来，船帆很多时候不过是一张系在桅杆和帆桁之间的旧毯子。在顺风顺水的天气里，渡海要花六个小时。他喜欢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出发，在光影交错的“奇幻时刻”后，便被裹入夜色中，此时的风稳定但柔和，猎户星座跟着移动，星辰是他的向导。“有时月色下的水波会像胶水，而我则吃着杏子划着船。”他观察不眠的大海中海洋生物发光的奇观，倾听黑夜中鸟儿在头顶飞过的声音，从它们的叫声或扇动翅膀的声音猜测它们的种类。“等晨星伴着我在水上跳跃的时候，天空便破晓了，太阳升起了。”

在那些清晨，在他和第一缕光同时来到霍恩岛时，他会将船锚定，在海滩或琥珀色的草地上和衣而眠，一直睡到下午。他醒来时常

常看着天上的两只、三只或四只军舰鸟，它们乘风而上时的翼展有七英尺长，是水鸟中飞得最高的，伺机攫取其他鸟类口中的食物。他为它们画了速写，特别是它们长长的分叉的尾羽，他注意那些打动他的事物。“美就在那里。我从未见过比军舰鸟更激动人心的了。”他对岛上所有鸟类都了如指掌。军舰鸟的嫡系表亲，鹈鹕，是他最熟悉的。他知道它们的生活习性和它们走向成熟的几个阶段。他知道如果你拎起一只刚会飞的幼鸟的翅膀，你很可能会折断它们。这座岛让他目睹了许多此类真相，许多关于死亡和濒死的事实。

他对此全盘接受，包括他自己面临的风险。被蛇咬伤、被刺鲀刺中，还有水母有毒的灼伤——水母是随波逐流的游民，已经在海中生活了五亿年——它们无一不是威胁。甚至保护性的峡湾也有背叛他的时候。不止一次，有乘船人经过安德森的身边，此时安德森正安静地划着他浸水的帆船往岸边走，但离岸还有几英里远。有时安德森会同意让对方的船拖着他的船走。其他时候他会从汗湿的软呢帽下礼貌地回应说“不用了谢谢，我自己可以”，并轻轻地点一下帽檐。独处的时刻是无价的。

一旦他到了霍恩岛上也是一样的。1965年，他驾着一只漆成绿色的小帆船横穿海峡，那天是9月1日，正是大西洋风暴“贝琪”

（Betsy）跨过佛罗里达向西移动到墨西哥湾的时候。“没有比这场飓风更可敬的了，它到来之前提供了所有的先兆、预警、预兆，等等，等等，”安德森在日记里记录道。“那可怕的日出——没人会忽略来自它的警告——在半空盘旋的黑色幽灵般的鸟——只有一只——（理应如此）。”风从岛屿四周围拢而来，海浪重重地拍打在海滩上。一只救生船出现了，印在白色船身上的是熟悉的海岸警卫队的红蓝标志，救生船要将他带回家。他知道是家人派来的救援。但他还是坐在海滩上他那只被翻转的帆船下，那是他在坏天气或好天气里的庇护所。那只船“最后离开了”，他写道，“她的舷灯在水上闪烁着。”

贝琪进入海湾时是4级飓风，在它的中心接近安德森的位置时，风力已近5级，狂风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刮着。

如果风暴要将安德森带走，那就带走吧。此时的他离62岁生日只差一个月，他强壮，思维敏锐，天赋过人，离群索居，有些时候，还是一个执拗的人。他在他想的地方，这里有风，有雨，还有汹涌的大海和岛上的万物。

科学家们说，霍恩岛已经存在大约4500年了。多芬岛（Dauphin）、珀蒂布瓦岛（Petit Bois）、船岛（Ship）和卡特岛（Cat），这些位于它东西两侧最亲密的近邻也是一样。和海湾上的所有岛屿一样，它们都是障壁岛，不同于海岛。一来，只有海岛能起到作为国家唯一陆地地块的作用，比如加勒比海上的那些。从平均大小来看，海岛会让障壁岛相形见绌，有些障壁岛可能“还比不上大海里的一艘船”，玛莎·菲尔德在那些终日面对远洋邮轮的日子里如此写道；而海岛多是由坚固的长年濒死的火山岩石构成。它们在严格意义上属于群岛（archipelago），不和任何陆地相连，可能出现在海洋的任何地方。航行在墨西哥湾上时，在海中间你一座岛都不会碰上。^[6]

障壁岛离大陆很近；它的一侧是海洋，另一侧是海湾或峡湾，它是两者的中间地带。它们可以服务海岸，一来它为海岸抵挡住来自海洋的破坏性天气，二来，障壁岛的存在可以让海洋咸水和河流淡水搅混在一起，并留在近岸水域，为河口带来生命力。包括霍恩岛在内的五座姐妹岛从莫比尔一直到西边的密西西比，在海湾和大陆间组成了一道90英里长的屏障。彭萨科拉河和珀尔河为其间的峡湾送去源源不断的淡水。

霍恩岛，在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前，可能曾经与另一座岛屿或大陆相连。也有可能，它是自己形成的，由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上的土壤和岩石，落入田纳西河，流入海湾而成，当时的田纳西河与莫

比尔湾相连（今天，它从东向西穿过亚拉巴马州的北部，然后又折向北，汇入俄亥俄河）。进入海湾的浅滩后，这些沉淀物会随着洋流到达某个锚地，在经年累月的堆积下演变成干燥的陆地。障壁岛其实是由巨大沙砾堆积而成，四周被水环绕，许多障壁岛足够大，可以成为雨水的集流地；从大陆飘落入海的橡子和松果，以及更轻的随风传播的种子会在这里休憩。动物生命——天上的飞鸟，水里的游泳健将，还有顺着浮木或船而来的漂流者——最后都会来到这些岛屿。

上升的海平面在造就了新的海湾岛屿的同时，也淹没了旧岛。2001年，来自美国地质调查局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一队科学家登上长210英尺的科研船“莫阿纳波”（*Moana Wave*）号，通过两个月的声波勘测，他们绘制出了佛罗里达西北沿岸的大陆架图。他们想了解前一年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州水域中绘制过的深水礁，是否一直延伸到东边。结果他们发现了在海平面降低时曾经存在过的六个古老河口三角洲和无数障壁岛。如果科学家们在陆地上做过探索，他们会在高地上发现在海平面更高时期曾经存在过的障壁岛的遗迹。

那便是佛罗里达礁岛群开始成形的时间，即大约13万年前的桑加蒙间冰期，那时的海平面比现在高出大概25英尺。佛罗里达礁岛群是珊瑚岛，而非沙岛；珊瑚沿着被淹没的佛罗里达台地建礁，从半岛东端划出一道向西的弧线到达今天的基韦斯特和干龟岛，佛罗里达礁岛群由此而来。到了十万年前，反复无常的大海开始再一次回撤成为冰川，群岛便露出了海面。只有北部的那些，也就是从比斯坎岛以北的保卫着迈阿密的岛屿，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障壁岛。热带硬木——桃花心木、苦木裂榄木、海葡萄、牙买加山茱萸和北美悬铃树——生长在每一座岛屿四周环绕的红树林的后方。这里的白尾鹿为了适应在密林中穿梭，进化出了更小的个头。这种小型的亚种被称为礁鹿。16世纪被放逐到卡卢萨领地的赫尔南多·德埃斯卡兰特·方丹内德

(Hernando de Escalante Fontaneda)，在回忆录中写到它们看起来“像狐狸，但是……肉肥好吃”。[\[7\]](#)

障壁岛是海湾地理的独特组成部分，是众多海岸上极其令人着迷的特色，尤其是在得克萨斯。奇怪的是它们直到1700年才开始出现在地图上。从某些方面来说，前期的忽略是可以理解的。障壁岛很多时候难以捉摸。它们的确切数字取决于统计的人和统计的时间。它们稍纵即逝、摇摇欲坠，听凭风和水的摆布——它们造就它，改变它，也能毁掉它。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现存的障壁岛有大约20座。佛罗里达狭长地带有9座，半岛有41座，它们中许多是由间冰期海洋底部的石灰岩构成，因此会比通常的沙质障壁岛更牢固。

这些数量不包括万岛群岛。这个稀奇的岛屿集中位于佛罗里达的西南方，远离那些汽车前保险杠似的为海湾沿岸护航的狭长障壁岛，蒙骗和迷惑了早年的水手。它的数量是数百，而非上万，而且都是红树林岛屿——大多数是小而茂密的树丛，有时它们还不及一铲干沙来得结实。蕾切尔·卡森在《海滨的生灵》(*The Edge of the Sea*)[\[8\]](#)中写道，从空中俯瞰，万岛群岛就“像一群游向东南方向的鱼群——每一个鱼形岛屿在它们的头部都有由水潭构成的‘眼睛’，这些‘小鱼’的头都朝着东南方”。大部分岛屿都从红树林而来，红树林牢牢地抓住了牡蛎床，长着又高又粗的支柱根。[\[9\]](#)

依据人类中心论观点，人们会说万岛群岛是个荒岛。岛上臭气熏天，满是被吃剩一半的鱼类残骸。岛上栖息着近200种鸟类，它们有些是短住，有些则终年留守于此，它们在枝蔓交错的树林间筑巢，为自己和雏鸟觅食，它们的食物是长着紫色蟹螯在浅滩上碎步疾跑的寄居蟹。人类只在其中较大的几个岛上立了地标，比如乔克洛氏基(Chokoloskee)，它是岛群里的头，上面住了也许有400个居民。剩

下的岛屿海水清澈，海滩狭长（如果有的话），组成了99英里长的荒原水道和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是北美最大的红树林带，从马可岛一直延伸到罗斯特曼斯河（Lostmans River）。岛屿混杂着隐匿的河沼、海湾和潮汐汉道。划船人飘入一片阻隔了视线的红树林后，虽然数码之外就是开阔水域，却可能迷失在其中好几个小时。

科学家们说岛屿会挪动或漂移。有些岛其实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大团植被。障壁岛虽然不是，但它们依然会迁移。“你不能和障壁岛较真，”考古学家谢丽尔·沃德（Cheryl Ward）说，“它会到它想到的地方去。”风力产生的波浪和海滨漂积物会将一侧的沙子带往另一侧。1848年，珀蒂布瓦岛（Petit Bois）还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州界的东边；一个世纪后，它到了州界以西一英里处。整个霍恩岛群在这些年里都在缓慢地向西移动。“岛上的一切，”安德森写道，“似乎都捉摸不定。”[\[10\]](#)

飓风暴露了它们捉摸不定的天性，常常一夜之间，飓风就将这里搅得天翻地覆。随着风暴的侵袭，这些岛反复出现又消失，一会浅滩成了陆地，一会陆地又成浅滩。得克萨斯最著名的岛屿加尔维斯顿，曾经就是两个岛，直到1820年的一场大风暴闭合了中间隔绝的峡湾，于是两岛合而为一。1969年，飓风卡米尔（Camille）将船岛一分为二。英国的测绘人托马斯·哈钦斯在18世纪70年代对密西西比湾进行勘测时，他测定的霍恩岛长度是17英里；一个世纪后，海岸勘测局的约瑟夫·史密斯·哈里斯（Joseph Smith Harris）测定的是12英里。而据安德森的了解，它是一座10英里的岛。

岛屿神秘、浪漫、恬静；它是天堂之地，自由之所在，远离尘世喧嚣的避难所。《鲁滨逊漂流记》长年畅销不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所描绘的自然环境。读者被躲进岛屿这个新奇的可能性吸引了，不管这对生存来说是多大的挑战。丹尼尔·笛福需要一个孤岛来将其主人

公完全与文明社会隔绝。森林或山脉，因为与大陆相通而无法做到绝对的剥离。克鲁索和他的家之间必须隔着一片海，这是为了让小说达到它对西方文明进行校验的目的。

虽然霍恩岛将安德森与大陆生活隔绝开来，但安德森不是克鲁索。他并非流落到荒岛，他也从未试图像克鲁索那样，将大陆事务移植到岛上；克鲁索是个孤身奋战的殖民者，刚开始只有他一个人，然后有了星期五，并将他转变为人为社会秩序下的一名忠诚奴仆，这种人为的秩序便是——文明。对安德森而言，霍恩岛上长着羽毛、皮毛和鳞片的岛民们是自然秩序下的要素，它们应当受到人类的敬慕。克鲁索将荒岛命名为绝望岛，但安德森的信仰绝不允许他这么做。

霍恩和其他岛屿都是希望之地。安德森对岛屿的热爱，可从后人发现的他的素描和水彩画中窥见，他的画纸几乎都是便宜的打字机纸，有些还留下了被红树林木篝火燎着了的烧痕和被雨水、洪水浇湿或漏水的船打湿后又干掉的水痕。他的热爱还体现在他用钢笔和铅笔“写就”的情深意切的文章，文章有的写在装订好的笔记本里，也有些写在零散的纸页上，加起来有85本日记之多。“透过它们还能闻见岛屿吹来的清风，”茜茜写道，“读着它们，我尝到了海的咸味，在阳光下眯起了双眼。”^[11]

在大陆上时，安德森酒喝得凶，烟也抽得猛；到了岛上，他饮食节制得有如僧侣（他偶尔会带上一瓶酒）。他不需要逃避，不需要放松，不需要建立一个虚拟的现实。读他的日志，你会惊讶于他内心的充盈。“我在6点离开海泉市，”他在1959年1月4日的日记里写道。“海港入口处的黑色标杆向后退去。它们充满了和外形相符的精神——大概是颇为冷酷的那种。直到看到阳光洒落在海泉的水塔上时，我才稍感振奋，因为我正在往霍恩岛去的途中。”

少有人能如此全然地融入墨西哥湾，或者按安德森正确的话来说，接纳“内心无数次响起的对自身存在和当下意识的呐喊之声”。从下面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他对因他的存在本身而导致的影响是有充分意识的：“昨晚我升起了篝火，煮了几颗土豆。这么一来，我就用掉了 many 筑巢的材料。干燥的红树林木几乎是海滩上唯一能用的木柴了。”有人也许想拿安德森和瓦尔登湖的梭罗做比较。小R. S. 萨格（Redding S. Sugg Jr.）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1970年对其进行编辑出版前已经对安德森的日记烂熟于心，他注意到安德森在海泉市独居的村舍，房子“已经相当于梭罗在瓦尔登湖的木屋”，梭罗的小屋离爱默生的住所几步之遥，离为他洗衣的母亲也很近。梭罗越过瓦尔登湖来到了缅因州的北边林地，这里和安德森的障壁岛一样，一片荒芜，他笨拙地唤起既定秩序中的语言，说荒地是“野蛮和乏味的”。他感受着它，他说，“比想象中更孤独”。[\[12\]](#)

安德森在岛上从未感受到孤独。他将大自然当作自己的家。他无法对家族里的任何一个成员下批判之语，不管它是蛇、刺**鲀**，还是葡萄牙军舰鸟。对自然显露出来的模样，他从不会滥用拟人手法去描述；不管有多可怕，大海永远不会是“发怒”的大海。“万物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他写道，“有它们自己的完整体系，不管是草地，还是穿过草地的小动物。”[\[13\]](#)

镇上的人都说在安德森三兄弟中，中间的那个有点古怪。他聪明，甚至说到创造力上，他就是个天才；他面容俊朗，有着坚实的下巴和一头浓密卷曲的长发，穿的衣服有几分波西米亚的味道，行事安静沉默，是世俗社会里的局外人。从1938年到1940年的几年时间，他是分别在三家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从两家逃了出来。其中一次，他将床单绑在一起后，将其从二楼窗台抛出窗外，然后他夹着床单溜下来。他在安德森家族庄园上的一间村舍里过着隐居生活，庄园是一块24英亩的林地，上面是安德森三兄弟的家和它们的陶土生意。

沃尔特和其他人的互动，包括茜茜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一年比一年少。他在陆上无法驾船逃离时，他会骑上一辆挡泥板嘎达嘎达作响的自行车，这是他漏水帆船的陆上器械替代品。他踏着车到处走。他可以不留下一句话就消失，一直去到得克萨斯、南佛罗里达和纽约。他沿着古西班牙路（Old Spanish Highway）一路骑到了新奥尔良，尽管左肩还在咔咔作响，这83英里的路程，对他来说也仅仅是短途旅行。

抛开他的旅行癖不谈，海泉是被广泛认可的海湾小镇，准确地说是一个村庄，居民不到2000人。它有时也被称为东比洛克西或老比洛克西，出名的原因有一半是它曾是第一批欧洲殖民者在南密西西比河谷的定居点。它的历史从伊贝维尔1699年为法国人找到密西西比河口开始。霍恩岛西边的船岛就是此次伊贝维尔探索之旅的中转站。

伊贝维尔的海湾日记如果是他内心的真实反映的话，那么，这些岛屿并没有令他产生想去亲近的冲动。他既非艺术家也非科学家。他在墨西哥湾上航行时，没有想过要采集新的标本，也不希冀获得灵魂的升华。他的日记中没有提到过大自然本身，而只有关于自然界事物的只言片语，即便如此也只是基于实用主义的不带感情的描述。伊贝维尔关心的是当时迫切的探索任务。他是帝国的忠诚卫士。那是他看障壁岛的角度，透过这个角度没有什么能打动他。

障壁岛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水包围的荒地，“没有树木”，在恶劣天气里常常洪水泛滥。更严重的是，岛上蚊虫为患，还爬满了浣熊，这种浑身皮毛的动物被法国人错认为chats sauvages（“流浪猫”），这个岛因此得名Isle aux Chats，也就是霍恩群岛中的卡特岛。虽然伊贝维尔无法从岛上得到什么淡水和食物（浣熊令人提不起食欲），但它们依然是重要的地标，为他在海岸上指引方向，并得以最终画出地图的一部分。也不止一次，岛屿的背风处在恶劣天气里为

他们提供了庇护所。而船岛这个名字的起因则在于它提供了足够船只进出的水深。在定居到旁边的比洛克西湾前，伊贝维尔是将这里作为船队锚地的。[\[14\]](#)

安德森一家在1923年搬到海泉，彼时这里还只是一个度假地，“六姐妹”的其中之一。但维系当地经济的并不只时髦的游客。海泉市一直是个谋生的好地方，这可以从当地码头上停靠着的船幅巨大的捕虾船和采蚶艇看出来。海湾北部最广袤的牡蛎床位于尚德卢尔和布雷顿海峡，从比洛克西湾出来稍偏转航向就能到达。到20世纪初，比洛克西一年的虾蚝出港货量达到了1000万磅，于是它开始自称“世界海鲜之都”，其中它夸口的重点便是海泉的渔船，海泉的贡献从它铺着牡蛎壳的街道便可见一斑。

话虽如此，海泉的街道依然安静。街上“没有行色匆匆的脸庞，”过冬的旅居客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写道，“没有逐利者，没有地产经纪，没有骗子，没有推销员，没有偏僻的白桩待建地块。”牛群依然在街上自由漫步。除了几个罐头厂外，海泉没有其他工厂，但有来自土地的产品——小蜜橘、葡萄柚和美洲山核桃，还有间接产物，羊毛。在1915年到1916年间的三个月时间里，当地苗圃出港了20万棵美洲山核桃树。旅游业在村里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与中西部联系密切。1927年，来自芝加哥的威尔伯（Wilbur）和哈维·布朗尼加（Harvey Branigar）两兄弟耗资1500万美元在后湾对岸兴建了一个度假村叫海湾山（Gulf Hills），配备十八洞高尔夫球场和专为富裕的外州居民准备的豪华寓所。场地费是1.5美元。在大萧条期间，公共事业振兴署出版的密西西比导游指南——它的目标群体是有钱游客——给海湾山做了宣传：“海岸名胜之一。”[\[15\]](#)

除此之外，指南上对海泉市的唯一一个专题介绍就是剪水鹳陶窑（Shearwater Pottery），也就是安德森家的陶窑。这个认可无疑令

他们感到振奋，尤其是大哥彼特（Peter），是他1928年从父亲手里借了钱在安德森的土地上创建了这个陶窑。彼得依赖的是三兄弟的天分：他自己、沃尔特和最小的弟弟马克（Mac）。他们的母亲，安妮特（Annette），毕业于以艺术课程著称的杜兰大学纽科姆学院，她为这个家族生意贡献了她作为陶艺师的手艺。彼得以剪水鹫的名字为陶窑取名，剪水鹫喜欢沿海浪滑翔，有着优美的飞行特技和纤长的羽翼，擅长长距离飞行，而且长寿。彼得喜欢用本地的东西，包括他的陶土。他会定期驾驶一只26英尺长的纵帆船，后面拖上用来载陶土的小艇，去往比洛克西湾的最北端，在混浊的破罐河（Tchoutacabouffa River）几英里之上就是他采集陶土的河岸高地。这里也是当时已故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乔治·欧尔（George Ohr）采集陶土的地方，乔治·欧尔自称是“比洛克西的疯癫陶艺人”，后来被其他人称为“陶艺界的毕加索”。[\[16\]](#)

沃尔特在家庭事业里的职能，就是在彼得和母亲烧好的陶器上雕刻、描画图案花纹。他也会创作些古怪可笑的陶土小塑像，他叫它们小玩意儿。他极具风格的鸟、鱼图案对陶窑成为当地特色有重要影响。但这位爱岛人士不是一个可靠的生意伙伴。他迸发的创造力是用于陶窑，还是专属于个人创作和岛屿时光，两者一直在抗衡。他对他的家庭生活有关关注，也有忽视，大多数时候是后者。“他永远都是一个画家，”茜茜写道，“偶尔是爱人，从来不是丈夫和父亲。”[\[17\]](#)

他的性情与其说遵循了家庭生活的义务，毋宁说是追随了大海的节奏。他渴求“在海滨上能做自己的主”，他渴望得到同类的陪伴，他的同类是霍恩岛上的长叶松、火炬松和麒麟草，是羊鲷、雀鳝、石蟹、猫头鹰、紫拟椋鸟、海鸥、鹈鹕、苍鹭、白骨顶、紫青水鸡、红头鸭，还有闯入他营地行窃的浣熊，还有岛上的野母猪，它们在这里生活到老，在安德森也走过的小径上横行，直到飓风贝琪将它们淹没。它们是墨西哥湾上的灿烂夺目的生命力，也是安德森素描、水彩

和版画的主角；安德森的画面色彩鲜明，笔触柔软，它们极力模仿着海湾的轮廓和动作，几乎令人昏睡。“一个波浪打了过来，太神奇了！”他欣喜若狂道，“多炽热的色调，多不可思议的形状扭曲。”

有些出于善意的评论人会称赞安德森是以往某位杰出艺术家的承袭者。其中提到的一位是奥杜邦，奥杜邦也曾在海湾周围度过了一段时间。但这个说法侮辱了安德森。他无法想象杀死作画对象还将它们摆成一个姿势，像奥杜邦做过的那样。奥杜邦会杀死好几只鸟，将定位线穿过它们的身体，使之成为一个单纯的静物。安德森画死去的动物和画活物一样好，但前者生命的终结是由自然完成的。而且安德森的画布比奥杜邦的丰富得多，他将海湾呈现给他的一切都画了下来。

其他观察者还提到了塞尚、马蒂斯、梵高和毕加索。同样，这些比较是无力的。安德森传记作者克里斯托弗·毛雷尔（Christopher Maurer）认为，它们轻视了一点，那就是“对‘真实’的追求——无论是他自己的真实，还是自然的真实——是安德森的独特之处”。他用冷暖色来表现色彩的变化，用笔触来表达情感；他笔下的线条生动、灵活、饱满。它们勾勒出了墨西哥湾和上面的一切。这体现在他对自然完整性的追寻上，他力图发现一个“重要的形式”，这个形式不只是外形，它还有生命，安德森通过触摸、感受、聆听，甚至品尝去了解它。“一个美丽的形象基本是取之不尽的，”他在日记中说。但通常，“人们开始前总会说‘这是当然’，但他们的感受力还不具备赞叹和惊喜的能力”。这就是安德森的画所传达的：赞叹和惊喜。[\[18\]](#)

他做到了，雷丁·萨格说，因为他把“清晰的头脑”和“人类喜好”抛诸脑后，接受大自然的引领。安德森写道，“你会感叹于用专注的双眼观察一条鱼时它给你带来的惊喜，感叹于只要被放在适当的焦点上，几乎一切皆有可能；将两种东西以恰当的方式关联，会诞生令人心满意足的产物，它就是奇迹。”他从不乘汽艇登岛。这种做法

是将自己和人类文明强加于自然之上——被自然吸引而去总好过去征服自然。“这里的蝴蝶会跺脚。自然不喜欢被预测，它喜欢出其不意。”于是他驾船、划船，必要的时候，让他的船漂着。“我克服了对大海的恐惧，看到了红日落下在这片土地上作画——自然中的一切都赞叹我的勇气和热爱。”[\[19\]](#)

这份热爱很可能拯救了他自己，也拯救了茜茜。将生命奉献于大海的艺术家，定然有着相似的内心。从精神病院逃跑的那些年里，他罹患了暂时性的幻觉和妄想症。那只是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他成人之后更常见和根深蒂固的是他酗酒后的暴怒，显然是由自我怀疑和感觉受拘束引起的。茜茜的回忆录充满爱意，也很坦诚，她在里面谈到了他的黑暗面。不止一次，他威胁到了她和孩子们的生命，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一样，从未停止过对他的爱。他否认他生下过年龄最大的两个孩子，拒绝承担他作为父亲的责任。1946年12月，他怒气冲冲地宣布他要搬出去。“我无法再忍受了，”他说，“我是一个艺术家；我必须是。”从那时起，那些岛就偷走了他。他必须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更残酷地说，他需要自然帮他成为一个艺术家。[\[20\]](#)

安德森是墨西哥湾的艺术家。大西洋有属于它的许多著名画家：莫奈、修拉（Seurat）、西涅克（Signac），以及最为专注的透纳（J. M. W. Turner）和温斯洛·霍默。安德森和这些大西洋画家不同，一部分原因是海湾本就不同。海湾的海不是波涛汹涌、怒喝雷鸣的海。相反，它是哼着欢快的小曲儿的粼粼波光。他对人类与大海间的抗争没有特别的兴趣，不像霍默，霍默的画常刻画英雄式的人物，这个人常常是孤注一掷的个人，象征着他所看到的大西洋里的“孤独”。[\[21\]](#)

对安德森来说，海湾没有孤独的一面。它有属于它的很多忙碌着的、爬过的、飞过的、潜着水的、蹦起的、轻跃而过的动物——他的

伙伴与令他快乐和着迷的来源。它们就是他画里的英雄人物。他曾在纽约和巴黎学习，到过哥斯达黎加，最远去过中国，去观察和比较自然形态和色彩，但他永远会回家完成他的创作。密西西比就是有这样的深刻影响，吸引着人们回到这片土地。福克纳的文学事业就是围绕这里展开的。尤多拉·韦尔蒂的笔也忠于密西西比。安德森可能也画过其他地方，但很难想象任何其他地方有密西西比海岸和其岛屿所拥有的天然的色彩、律动和生命。

让一个一年级学生画海里的岛屿，她很可能会将它们用圆圈形状来表示。成熟的大人应该了解岛屿可以有各种形状和大小，但人们还是倾向于使用这种简化的几何图形。海湾上的每一座岛都是独一无二的（个别甚至是圆的），虽然其中有些会更引人注目一些。

比如，在得克萨斯有一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帕德雷岛（Padre Island）。陆地上的土壤颗粒被雨水带到了格兰德河，然后流入了海湾，岛屿因此形成。海岸洋流将沉淀物往北送，密西西比将沉淀物往南送，两相作用下它们建造了海湾上最大的障壁岛，为得克萨斯州人口中的“得克萨斯州一切都更大”添砖加瓦。但这说法也不尽然。帕德雷只是美国大陆上的第二大障壁岛。纽约州的长岛面积更大，人口也更稠密。帕德雷岛上唯一建制的南帕德雷，在2010年只有不到3000名居民。但从形态上来说，纽约州岛的名字更适合帕德雷，帕德雷是世界上最长的障壁岛——又是当地人夸口的好谈资。

帕德雷岛宽不足3英里，长113英里，和得克萨斯州海岸平行，与五个县隔水相对。它与海岸线弯曲的轮廓完美贴合。在地图上，狭长的帕德雷岛看上去就像安德森的笔触一样轻快。1920年，《华盛顿邮报》称其30英里绵延不断的海滩是“海湾沿岸最美的天然海滩”。它拥有令人赞不绝口的风蚀沙丘，沙丘不断地经历着堆积、剥蚀、再堆积，就像这座岛的海岸线，永远让视觉艺术家眼前一亮。摄影师杰夫

• 温宁汉姆 (Geoff Winningham) 描述它的大致地形 “半是沙漠，半是草滩” ——使之成为船长们停泊下锚的明智之选。[\[22\]](#)

帕德雷是西班牙运载财宝船队的第一个船舶失事点。1554年，三艘满载货物的武装商船被困在一场东北风暴中，它们很可能在岛屿南端一个叫恶魔之肘 (Devil's Elbow) 的拐弯处附近遭遇了强烈的涡流。此后，这块无情的陆地便等着将所有困于风暴的船舶上的木材和货物都据为己有。四面国旗——西班牙的、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共和国的，还有美国的——都漂到了岛上，它的外形构造或多或少写就了带着西方文明意味的历史。

岛上的第一位西方永久居民是何塞·尼古拉斯·巴利 (José Nicholas Balli)，一名墨西哥牧师。他也是第一任岛主，其岛屿所有权最初由19世纪初的西班牙政府授予，墨西哥共和国独立后这项所有权继续生效。巴利既是进取的农场主，也是牧师。他创建了一个布道所，当时岛上有在此过冬的逐渐消失的卡兰卡瓦人，也有被他招募的白人移民，他便向他们传布福音。他和他的外甥胡安·何塞·巴利 (Juan José Balli) 建起了一座挣钱的牧场，里面养着牛、羊和马。马德雷湖对岸的大陆正在变成一片广袤的牧牛场。那里有18个牧场，每一个面积都超过了一万英亩，最大的那个有60万英亩。胡安·何塞比他叔叔多活了25年。他1853年死于席卷了新奥尔良和得克萨斯州南部部分地区的黄热病，他的继承人对这座岛没有兴趣。

但J. V. 辛格 (John V. Singer) 有，那是一次命运的偶然。1847年，约翰·辛格带着妻子和四个子女，驾驶着一艘三桅纵帆船，离开了他们在纽约的家，扬帆起航，他此行计划前往得克萨斯着手做航运贸易。他们在穿过海湾时，不小心驶入了风暴，风暴将他们抛到了魔鬼之肘的浅滩上，他们被困在了眼前这座狭长荒凉的岛上。辛格一家上演了帕德雷岛版的《来自瑞士的罗宾逊之家》 (*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这是另一个出版于35年前的孤岛历险故事，但在当时仍极为畅销。他们从已经四分五裂的帆船上拆下木板，为自己盖了一间屋子，给马和牛安了畜栏，这些马和牛都是巴利留下来的。在最好的时候，他们靠着魔鬼之肘送来的遇难船只，养了1500头牲畜，搜刮来了珠宝、金币和各种珍品。在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后，约翰资助他的兄弟艾萨克·辛格 (Issac Singer) 创立了缝纫机公司，而且，根据他大儿子的说法，他赶在邦联军驱逐岛上的联邦军支持者之前，在沙丘里埋下了8万美元的真金白银。战后，辛格一家想取回钱财，但在岛上遍寻无果。当地的史学家说千变万化的沙丘地貌将他们坑了。

帕德雷接下来的主要岛主人是帕特里克·邓恩 (Patrick Dunn)，他也没有找到钱。他挣到了钱，像他的前任们一样。邓恩来自大陆，是经验丰富的牧牛场人，他完全可以出演奥迪·墨菲 (Audie Murphy) 的电影——他们长得太像了——而墨菲这个得克萨斯州人，喜欢出演西部人。邓恩作为一个牧场主，在成年时正赶上倒刺铁丝围栏的发明。它对它的普及使用感到恼火。铁丝围栏围住了广阔的牧场，给大牧牛场带来了便利。但他没有墨菲的性格，邓恩不会揣上手枪，为正义而战。他搬到了帕德雷岛，那里天然的围栏——马德雷湖和墨西哥湾——会为他守住他的牛群的。

他这么做是有目的的。其他牧场主将得克萨斯州其他三个障壁岛——马塔戈达、圣何塞和野马岛——改造成了牧牛场。这也还有其他好处。不像大陆上那些无序扩张的牧场，帕德雷上几乎没有可以让牛藏身的矮树丛。供给牛群的淡水随处可得，只要在沙地里掘上几英尺就有。邓恩从海滩上搜集来浮木，建了一座简单的两层木屋，屋里的家具都是从魔鬼之肘搜罗来的。然后这座岛开始吸引来其他人，他们说起了开发的事。

在邓恩的最后20年里（他死于1938年），帕德雷岛变得越来越不与世隔绝了。户外运动者发现了上好的游钓鱼种——鲳鲹鱼、鲑鱼、深海鲈鱼和大海鲢。总统哈定在20世纪20年代来这里试手气，身后还跟着国家级媒体。投资商制订了计划要把这里开发成度假胜地，准备建酒店，建垂钓设施。岛屿和大陆之间修了堤道，以欢迎自驾游客的到来；于是开发计划继续流传开来。传言还说要将北边岛屿设立为野生动物保护区。有人赞叹帕德雷自然环境之辽阔，也有人将其视为荒原。那就是美国军方。二战期间，帕德雷上了第一次核爆测试的候选地名单。海军彼时已经在使用马德雷湖以及岛上部分区域作为他们的投弹和射击靶场。美国大陆报纸警告浴疗者远离这里的水域，以防被操练期间的扫射误伤。

海湾上每一座岛都各有历史，其中一些，比如帕德雷，则身负双重责任，它既属于自然，也是文明进程所需要的。这些大陆的天然保卫者中有许多都被赋予了抵御外敌入侵、保卫美国的使命。这些岛屿上先后共兴建过十座军事堡垒，不过无一受到过战火的波及。第一座是船岛的马萨诸塞堡（Fort Massachusetts），这是一座由红砖砌成的防御工事，从空中俯瞰，像一个用衬线字体写就的齐头式字母D，像大学运动代表队队服上印的字母。在第二次塞米诺尔战争中，军队要将佛罗里达州的印第安人赶往俄克拉何马州的居留地，这里便被他们用来作为过渡安置点。法拉格特就是在这里集结了他装备有火炮和迫击炮的舰艇，沿密西西比河而上，攻下了新奥尔良。邦联军利用几个海湾岛屿帮助封锁了邦联军进出莫比尔、加尔维斯顿和其他港口的补给通道。在美西战争中，坦帕是美军侵袭古巴的登船点，工程师们在鲷鱼礁（Mullet Key）上建了德索托堡（Fort De Soto），在埃格蒙特礁（Egmont Key）上建了戴德堡（Fort Dade），用进口岩石和当地贝壳制成的混凝土建造而成。

对那里的400多名将士来说，为从未有过军事行动的岛屿戍堡是个轻松的差事。美得令人窒息的海滩，清明如玉的水面，耀目无比的海湾落日，这里几近天堂，除了可恶的蚊子。当地一位史学家说，它们“是德索托堡对战过的最凶猛的敌人”，也的确是一个令军方头疼的问题。海湾部的主治外科医生是个谨慎且有洞察力的人，他说如果这个“哨点需要继续作为驻地存在，那么应该，至少，保证上面的生活是过得下去的”。缺乏有效的蚊虫控制措施，驻地长官将“过得下去”理解成要为战士们喝上啤酒和葡萄酒。这样的话，是纯粹的巧合吗，当全国的禁酒令开始后，嗜酒的卫戍部队也撤离了？^[23]

很多海湾的障壁岛既没有军队，也没有酒，没有人。密西西比的岛群就少有人烟，如果有的话，也无法长久维系。海湾的一些岛屿最终成了公园或保护区，鸟类成为它们的主要住客。而那些与大陆距离足够近，以保证堤道或桥的连接具有经济可行性的岛屿，则注定要迎接文明在上面的杂乱蔓延。其他的，比如说帕德雷，既支持了人类的生活，也容纳着大量的野生生命，部分是因为它成为一个被分割的岛——实实在在地被分割。陆军工程兵团在帕德雷岛中间切割出一道30英里长的行船水道，工程在1962年——轰炸演习停止的两年后——完工。那年，南端的开发还在继续，肯尼迪总统签署法令，将81英里的帕德雷岛设立为国家海滨公园，这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第四件藏品。

帕德雷从未将它藏起来的钱给回约翰·辛格，因为有别的人找到了。多年来，流言说海湾的海盗简·拉斐特（Jean Lafitte）将走私品藏在了这座长岛的某个地方，满怀希望的寻宝人于是逐流言而来。对想象力丰富的人来说，岛屿是海盗藏赃的地方，它们最终会被某个幸运的家伙找到。利用这种白日梦流言，20世纪初，佛罗里达西海岸外岛上有一对聪明的房地产投资者，他们假装从岛上挖出了其实是事前偷埋进去的藏宝箱，以此来推动土地销售。他们的唬人把戏得到了

想要的曝光度，他们的岛屿也因此得名金银岛（Treasure Island）。海岸北边，为了找到商会每年春天埋在这里的藏宝箱，沃尔顿堡滩（Fort Walton Beach）的居民翻遍了圣罗莎岛上的山一样的山丘。这个仪式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已经成为“比利·博莱格斯海盗节”的一部分。[\[24\]](#)

比利·博莱格斯（Billy Bowlegs）是虚构的。但它的灵感原型是真的，来自一个叫威廉·奥古斯都·鲍尔斯（William Augustus Bowles）的人，他是出生于马里兰州的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和南部克里克（Lower Creek）印第安人一起生活在海湾北部。鲍尔斯在托马斯·哈代的画像中戴着土著的祭祀头饰，明白无误地是个长相帅气的盎格鲁人，他在西属佛罗里达创建了短命的印第安州府，此后统率了一支由两艘纵帆船组建的速战舰队，在海湾上掠劫货船。西班牙人抓到过他两次，他第一次逃脱了，第二次时，他在被囚禁于古巴一座岛上期间，因绝食抗议而死。

岛屿和海盗，神秘而浪漫，其中的真相和传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约翰·戈麦斯（John Gomez）就是这样在海上流传的半真半假的人物，他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在鲍尔斯的年代在海湾上当过海盗。不过他的确是个罗圈腿（bowleggs），至少在他年老的时候是，那时的他看起来已经过了他人生的一半了。他大多数时候住在豹礁（Panther Key），在派恩岛附近，据说是“西班牙人、印第安人、猎人和渔人的混合体”，出生地是葡萄牙或西班牙，出生时间是1778年、1781年或者1791年，在还小的时候就到了圣奥古斯汀，之后不是成了孤儿就是被绑架了。寓言故事没有什么可信度。[\[25\]](#)

据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戈麦斯开始卷入冒险的海盗生活，他当起了船上侍者，服务的是大名鼎鼎但也多属虚构的何塞·加斯帕尔（José Gaspar），加斯帕尔从前是西班牙海军军官，后来变成了坚定

的海盗。他纵情酒色、妻妾成群的老巢位于现在一个叫加斯帕里拉（Gasparilla）的岛上，在大海鲢聚集的博卡格兰 德峡湾的北端，他专抢劫活动不便的货船和财宝船。1821年他壮烈地死去了。他的双桅帆船在联邦“进取号”（Enterprise）的攻击下陷入火海，他将锚链绕在身上，跳入了海湾，喊道：“加斯帕里拉死在自己手里，不是敌人手里。” [\[26\]](#)

1904年，加斯帕尔在坦帕第一届加斯帕里拉狂欢节上被复活了，这是落了灰的雪茄生产城市急于将自己包装成过冬胜地向外推销。加斯帕尔的故事（除了被美化的海盗行为）有一个问题：它全是谎言。白色骷髅的海盗旗、“鹦哥想要一块饼干”这样的传说是许多旅游区为其历史人为添加的一道传奇色彩。不幸的是，权威的海盗主题书籍也收录了加斯帕尔的传说，坦帕甚至将其橄榄球联赛队伍命名为海盗（Buccaneers）。

戈麦斯是这些瞎话的主要兜售者，很可能也是那个编造者。在传说中他在当海盗的时候，其实，在现实中，他正在为海岸勘测局的海湾勘测队伍提供饮食服务。他也有可供分享的珍贵的地理知识。内战期间，他曾经担任封锁邦联任务的领航员。他的长官说，戈麦斯对“所有浅滩、岩石、牡蛎床、小溪、水湾、泥滩、钓鱼的岩架、鸟类的营巢地、鹿群走的路线、从基韦斯特到彭萨科拉的水道”都了如指掌。不难想象，海钓者们后来因为他的海上经验而来寻求帮助。他的向导服务广为人知，他的海上故事也经过一个不正经的老水手的口传播开来。他和妻子住在豹礁上的一个小屋里，小屋四周和屋顶用晒成深褐色的棕榈茅草遮盖。这符合他的形象。他的打扮总是充满了“热带和自由”的气息，再加上恰如其分的光脚，长长的灰白胡子，灌木丛般厚密的白发。《森林和溪流》没少写他的故事。他死于1900年，在119岁时意外溺亡，这是杂志的说法——如此死法才能不辜负他荒诞的人生故事。 [\[27\]](#)

简·拉斐特是真正的海盗，甚至在出生时便有了这个帅气的海贼名字，他大概是在1780年出生在法国或者圣多明哥（Saint Domingue）。开始时，他是新奥尔良周边一个没什么人注意的走私犯，那时候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尤其是在杰斐逊总统实施1807年禁运法案，明令禁止与英国和法国的贸易后。拉斐特被当地政府驱逐后，他将他的生意挪到了南边的巴拉塔里亚岛（Barataria Island），岛在密西西比狭窄水道的西边，是拦截过路货船的理想位置。很快，他和他的兄弟皮埃尔（Pierre），以及他们的团伙，带着几条装上大炮的细船，把巴拉塔里亚变成了一个炮火连天的港口。他们的行为惹怒了路易斯安那的官员，两兄弟被逮捕了。他们很快趁着保释逃走了。当1812年和英国的战争打响后，他们保护了新奥尔良免受入侵，暂时为自己挽回了声誉，还获得了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嘉许。

此后，海盗爱国者到了加尔维斯顿，帮助西班牙镇压墨西哥的反抗。在那里，他们重操旧业，掠夺运货和运奴的船只。1821年，联邦“进取号”驶入加尔维斯顿，驱逐拉斐特们。“进取号”和海盗的对峙随后再次出现在了加斯帕尔的悲情结局中，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拉斐特没有抵抗，而是离开了。他去了古巴，但很快就不受欢迎。从那里他又到了哥伦比亚，并得到了当地的独立政府的任命和一艘炮艇。成为官方支持的私掠者后，他开始抢夺西班牙船只。1823年，他试图在洪都拉斯海岸附近拦截一批银子，在与两艘西班牙战舰的战斗中，他丢了性命。“拉斐特就此陨落，”路易斯安那州历史学会的主席在1919年写道，“他是个极有天赋的人，熟悉他的领域，有过人的勇气，也有强健的身体。” [\[28\]](#)

路易斯安那人以拉斐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节日，多条街道和渔村，还有一座国家历史公园和保护区。人们在格兰德岛上搜寻拉斐特留下的金子。他们在传说的引领下排干了印第安长沼（Indian

Bayou)，结果一无所获，除了一个土著人的独木舟——对印第安学者来说是个宝贝了。

在一个早春，沃尔特·安德森开始对画霍恩岛上死去的和濒死的动物产生兴趣。他着迷于它们不断变换的色彩。一只临死的乌龟“身上有代表所有中国珍稀品的颜色，”他在日记中用铅笔写道，“古金，玉色，铜红。”他体内的艺术家不“允许这一切形态、色彩，那种条理，就此浪费”。

他有充分的理由对死亡上心。在上一个春天，他正在北边岛上一个牡蛎潟湖附近四处晃悠时，在一丛灌木的高处发现了一个麻鸦的巢。出于探究生命光谱的前端颜色的想法，他轻率地伸手到巢里想摸一只蛋，只觉一阵刺痛。在他把手猛地缩回来之时，他看到一只“受惊的”大毒蛇溜走了。他手边没有可供切开伤口让毒液流出来的锐器，于是他赶回到三英里外的营地。他只找到一把黄油刀，他将水放在火上煮沸，想用来让肿起来的手上皮肤软下来，但还没来得及做什么，他就昏倒过去了。他醒过来时，炉火已经蔓延了开来。“看起来火势要吞噬这座岛，”他写道，“这都是我的错。我放声大哭着、怒吼着，但我连一棵树、一只小鸟或者兔子，都无力去救。”他和大火搏斗了几个小时后再度昏死过去。让自己动起来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会让毒液在体内循环，但他想的是在威廉·亨利·哈德森（William Henry Hudson）的《翠谷香魂》（*Green Mansions*）里，艾博被蛇咬后就是通过保持身体活动活下来的。

安德森醒来时，风已经将火扑灭了。驾驶一艘小汽艇的两个男孩发现了他，将他带回他家，交给了茜茜。医生说他没死是走了运了。安德森从未因此对蛇感到憎恶；有无数其他蛇，他推论说，都让他安然无恙地通过了。茜茜照顾着他，直到他恢复健康，他又马上回到霍恩岛。

长期以来，他看起来就像在弥补他失去的时间，就像这个激情的发现来得太晚了，或者是想弥补因二战而禁止登岛那些年的时光。国外的冲突侵扰了国内的平静，军需用品和训练基地有需求，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期待都要做出大大小小的牺牲。在美国刚加入国外战场时，德国潜艇在密西西比河口处用鱼雷袭击了20多艘商船。对安德森来说，战争的真实性随处可见——海上的石油泄漏，被冲到岸上的焦油球和废弃物。他也不得不牺牲了霍恩岛。军方控制了几个海湾岛屿。佛罗里达的圣佐治岛（St. George Island）和鲐鱼礁，和帕德雷岛一样，被用作军方的轰炸演习场。军队在卡特岛上，将从街上提来的流浪小狗训练成做好战斗准备的攻击犬。就像在证实这是个笑话一样，炮火轰炸的声音将未来的战犬吓成了受惊的小猫咪。

类似笨拙的军事调度还发生在霍恩岛上，军方的化学战部队（Chemical Warfare Service）控制了它并在上面建立了一个精密的生物武器实验室。它的首要任务是将木馏油作为杀虫剂，喷洒在岛上的水塘里，以减少岛上的蚊子数量。海军修建营的战士们随后铺设了7.6英里长的窄轨铁道，然后用驳船从大陆运来两个重14吨的火车头和20个木制货运车厢。陆军工程兵团为全体人员盖了营房，为军官和士兵修建专门的休闲设施，有篮球场、电影院、食堂、司令部大楼、机动车调配车库、库房、金工车间、排污系统、发电厂、气象站、牲畜栏，还有实验室。与水平建筑相映衬的是耸立在焚化炉上方的红砖高烟囱，焚化炉是用来焚烧化学物和没用的实验对象的——实验对象的范围应该从老鼠到马都有。

据科幻作家埃德·里吉斯（Ed Regis）说，军方有意要将霍恩岛变成“美国生物武器实验的主要场地”。但在改建这座岛前，军队的工程师们就意识到霍恩岛并不满足偏远这一必要条件。来往于海湾的商业渔船每天开着马达从岛前经过，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在岸边都可以听见他们从轻到重的哈欠声。即使是大陆上的人口也离这里太

近。更糟糕的是，它处于下风口。尽管如此，拨款被批准了，钱会被花出去，实验会开始，只要完成化学战部队原始计划的一部分就可以了。最后，军队在岛上投下了67个四磅重的填充了肉毒菌液的炸弹，这是一种会导致肉毒（杆菌）中毒的化学剂。但是，在数百个不同物种的实验对象中，只有一个因吸入毒素而死，那是一只天竺鼠。对此，作为他们做的唯一一个英明决定，军队宣布肉毒菌不适合用作杀伤性化学剂，并停止了所有实验。[\[29\]](#)

但霍恩岛基地在关停之前还有一个任务：销毁从德军俘获的3000吨榴弹、火箭、炸弹，其中一部分是芥子气弹药。军队将一枚3万磅炸弹和三枚500磅炸弹投进了海湾。然后将化学武器带到霍恩岛上付之一炬。连续多日，大陆上的人们都能听到爆炸声，看见滚滚浓烟在南方的天边升起。烟火结束后，军火专家用驳船运输弹壳时，有一部分炸弹没有爆炸，导致芥子气外漏到了开阔水域，淹没在珀蒂布瓦岛和霍恩岛之间。海军对储备在新奥尔良的武器采取了相同的处理方式。最后，军队拆除了其在岛上的实验室，在1947年撤离，给霍恩岛留下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废弃建筑，还有睥睨着这一切的焚化炉烟囱。

对以岛为乐的安德森来说，烟囱的高高竖起是对自然的侮辱。“我去查看了军营，发现里面是废墟，于是决定搬进去”，1950年一个寒冷的3月天里他在日记中写下这些话。但他在旧建筑里的居住时间很短。他登岛并不是为了寻找文明环境里的栖身地——还不止，这里还是让他受到冒犯的军方接管留下的残骸。他此前曾与岛上穿制服的占领者们分享过他这个看法。

战争接近尾声时，他们发现他被冲到了海滩上。他正驾船驶往路易斯安那州的尚德卢尔群岛，但船在航行中倾覆了。在还没划到霍恩岛海岸时，已经被灌进大量海水的安德森彻底不抱希望了。此时响起了火车的汽笛声，这在岛上“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于是他认定

他正在通往另一个世界。接下来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火车，还有一条吠叫着的大军犬——他正躺在它看守的海滩上——然后两个带枪的士兵走近了他。“我震惊地意识到，我变成了敌人！”

他后来向茜茜坦白，他觉得请求救援会让他显得软弱。慢慢地，他被现实在他眼前呈现的景象激怒了。士兵将他带上火车，到岛的另一头接受审讯，然后他更完整地看到了军事基地。对他的审讯还没开始，安德森将质问的矛头指向负责此事的军官。“你为什么来这里？”安德森问。“你毁掉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永远不能原谅你。”就是这样，他告诉茜茜，他的审讯人“认为我是个‘疯子’”，于是他知道他会被释放的。[\[30\]](#)

这就是所需要做的一切：向眼前这个认为他的营房是最南边倒霉的服役之地的人描述这座海湾障壁岛无可比拟的美丽。当然，被俘的这个人，完全不知道把他救起来的人将很快用肮脏的军火弹药污染这片海湾。他到死也不知道。倾倒在珀蒂布瓦岛和霍恩岛之间的弹药残余一直是一个军事秘密，直到安德森死后五年才公开（2012年，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岛上发现了芥子气容器）。

除了这一次事件以外，在军队占领期间，外界对霍恩岛均是绕道而行，从没有过意外访客。在他还不能回到那期间，安德森去了尚德卢尔群岛（Chandeleur）。尚德卢尔群岛是50英里长的岛链，就在安德森出生那年，西奥多·罗斯福将它划为国家鸟类保护区。在战争期间，它们也成了安德森的收容地。尚德卢尔位于比洛克西的正南方，在霍恩岛以南25英里处。1772年，一场持续了五天的飓风把这个新月状的岛群从中切割出了多条水道，岛群因此看起来像一只淘气咧着嘴笑的柴郡猫的一排牙齿，一座岛就是一颗牙。它隶属于圣伯尔纳堂区，是路易斯安那州在最东边的州界，但漂浮在海湾里的它们更像是将这里当成它自己的一片天地。岛上或多或少地分布着盐沼、稀疏的

树木，以及长着海滩水草和灌木丛（杨梅属和千里光属灌木）的低缓沙丘。1699年2月1日，群岛进入了伊贝维尔的视野，那一天是圣烛节（La Fête de Chandeleur）的前夕，于是为纪念此节日的虔诚天主教徒便以此作为岛名。

“噢，尚德卢尔，”沃尔特给茜茜解释道，我“感到被释放到了一个崭新的维度里”。他指的不是群岛正在消失，这是当时几乎没人注意到的事。他感受到的是“被自由的飞翔者，自由的游泳者占领的维度”。这是他眼中的群岛——自由，因孤独而喜悦。有一次，当他在岛上搭的帐篷里幸福地安睡时，潮流将他的船拖离了海滩上的锚，卷到了海里。当他给他女儿玛丽讲这个故事时，她尖叫起来：“爸爸，你被困在那了！”“是的，”他回答，“这多好啊。”^[31]

但是，事情并不总这样好。另有一次，他在岛上已经住了一周，画素描、画水彩，与飞鸟为伴，直到他看见另一个人类——一艘小艇和两个渔民，他们“强壮、晒得黝黑、金发，散发着因常接触风和太阳才有的安乐”。他和他们聊了聊。他们给了他一条鲑鱼带回去烹煮，然后就继续上路了。那天晚上，这位隐居的日记作者表达了失望之情：“这座岛的一部分魅力没了。至少我曾拥有过七天。”

安德森自幼就常到尚德卢尔去，他和他的兄弟们会去那里玩大冒险。再之后，他就是独行侠了。但尚德卢尔没有给他在霍恩岛上体会到的隔绝感。这里日记作者又登场了，这一次他在为被滞留在岛上而兴奋：“我刚看到一只船驶过。昨晚有三艘亮着灯的船在岛周围；作为一个被困的人，我有很多陪伴。”生长着丰富的泰莱藻、海牛草、川蔓藻和浅滩野草的群岛周围是浅湾和潟湖，那意味着有鱼，有鱼则意味着有打鱼的人。

而且，鱼和野生的多草沙丘和黑红树林（它们的最西北端就是尚德卢尔）也意味着有鸟——哺育的鸟和营巢的鸟——而有鸟就意味着

有安德森。日记时间，7月25日：“潮水退去后的平滩上全都是涉水鸟，白鹭、小蓝鹭、三色鹭、秧鸡、鸕鹚、笑鸥、剪水鹩。”霍恩岛也许是他更偏爱的障壁岛，但尚德卢尔的鸟类是很难被打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西奥多·罗斯福的大笔一挥。安德森最动情的日记有很多是在那里写下的，其中几乎没有哪一篇是没有提到鸟的。7月29日：“午饭过后，我划上小艇去追逐军舰鸟……我画了一些飞鸟……大概2点的时候被雨赶了回来，于是在帐篷前写了日记，画了鸕鹚。”7月30日：“真让人为难，因为好东西太多了。我正在画鸕鹚，狂风中的黑云映衬着它们雪白的身子，这时来了一只水龟，然后是一只螃蟹，最后是一只王秧鸡，蹑手蹑脚地走在红树林的根系间。”7月31日：“那有苍鹭，天空中点缀着好多军舰鸟。”

军队一结束他们在霍恩岛上的事务，安德森就收拾了小艇，返回他最爱的绿色、白色和琥珀色相间的孤岛上去了，他的造访又恢复了从前的频率和时长。那里的鸟不如尚德卢尔的丰富，但这也不是坏事。丰富多样的生命形态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的日记因此有了更多的写作素材：海马，是“时间的媒介，在机械的单调乏味可怕和爆发的诗意之间游走……这是我和大自然间的默契”；被滞留在潮水潭间的虾，“全身是亮丽的朱红色，有着一条龙的身躯”，是珍贵的海湾食物链底层动物；一只青蛙，“绿色、金色、黑色、铜色——一身盛装打扮”，它被画家借用作模特，被大毒蛇垂涎；一只“桶中猴子[32]”——他这么称呼章鱼——被冲到了岸上，躲过了啄食的银鸥，它弯曲扭动的肢体完美地契合了安德森富有表现力的画笔。

每一个记日志的人，从船长到农夫，每天都会花上大量篇幅报告当天的天气。岛屿知悉海湾上每一点或微妙或显著的即时天气变化，安德森总能完整接收到它的所有讯息。1959年1月：“今天是暴风雨天气。天空从昨晚开始就一直在变化。”无论是寒冷的气温、咄咄逼人的暴雨，还是刮走了他的罩篷、把沙子吹进他帐篷里的狂风，他的日

志中都从未出现过它们的抱怨。这些都是岛屿的日常，多变的天气给了他观察作画对象的不同视角，世界不断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他眼前。

这也是为什么1965年9月初飓风贝琪来袭时他无法接受海岸警卫队的救援。他要和他在岛上的同伴们一起经历暴风雨，他和它们一样，仓皇逃生。贝琪狂怒的大风迫使他放弃了他的营地转而到高地上去。海水涌上来，他再次往上撤。他在第三次回撤后，找到了“合适的树，如果海水继续上涨，他可以将自己绑在上面”。最后，飓风放过了他。

当飓风过去，水势退去，霍恩岛活了下来，但受到了重创。他的营地“——那个我数年来安居的地方——消失了，随海浪而去了”。岛屿最东端原来是长长的沙土尖端，现在只剩下“短短一道被海浪拍打的海岸”。熟悉的沙丘也不见了；“大的高的”靠近岛屿中心的那些“还在那里”，是它们在最后时刻保护了他，但失去近岸的防御，它们也会变得更脆弱。盐雾和沙暴将几英里内的松树都刮成了粗糙的褐色，也“伤害”了香脂冷杉和麒麟草。相反，岛屿的北面的海滩有了全新的美丽面貌，到处是正在享用半埋在海滩里的水蚤和死去动物的鸟群。

重建即刻开始。这些日志又有了另一种价值：关于从飓风中恢复的障壁岛的第一手记录。蚂蚁立刻就回到了安德森的营地；大量的鸭子几乎立马重新出现在水边。“我在西边看到我那熟悉的杓鹬出现在了老地方，”就在差点没躲掉上涌的海浪的第二天，他记录道，“黄褐色的夜鹭回到了和之前一样的地方，那个小河沼的河口位置……我想知道它们之前都在哪里。”这位岛民后来才慢悠悠地回到海泉。

“变化，”他回忆道，“是神奇的。”

安德森在飓风贝琪中幸存了下来，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逃离到霍恩或任何其他岛了。回到家一个月后，他咳出了血。他的医生发现了一个肿瘤，诊断他为肺癌——这是吸烟，也就是“做自己的主”导致的后果。病魔来得很快。他因手术并发症去世了，在1965年11月30日，在一家新奥尔良的医院里，而不是一座海湾的岛上——在文明世界里，而非自然的怀抱中。

在他死后，茜茜在她姐姐的陪伴下，多年来第一次走进沃尔特的小屋。里面落满了灰尘、东西凌乱，但是，她在回忆录中说，“满满的都是珍宝”。房间里堆起的、散落着的，是意味着多产、认真和独具慧眼的自然画家的毕生之作：数千幅的水彩画、版画和用铅笔、钢笔、蜡笔画就的素描，有些保存完整，有些被撕扯过，有些被扔到了小壁炉里烧掉。房里有一个老派的地板暗格，暗格的门是开着的，里面保存着他将近20年的岛屿日志，但它们也并未得到比其画作更有条理地保存。它们承载着一个精神上、理智上都无条件向自然靠拢的人所具有的感受力，一个更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也许会从它映射出的世俗信念中获益，但日志主人所生活的及其死后的社会将这种信念摒弃了。

穿过小屋，堆满凌乱杂物的另一头是一间上了锁的房间。茜茜用钥匙开了锁，走了进去。她倒抽了一口气。这个房间是沃尔特向他的缪斯——神奇的大自然——致以的最高的敬意。从天花板到三面墙壁，他用他柔软灵动、色彩鲜明的笔触画下了“海湾海岸上”太阳和自然生命一整天的活动。茜茜姐姐脱口便说出了这个名字：“日出之作。” [\[33\]](#)

[\[1\]](#) *The Gulf Islands: Mississippi's Wilderness Shore*, directed by Jay Woods and Robbie Fisher (Mississippi Public Broadcasting, 2009), DVD.

[2]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ll Anderson quotes come from *The Horn Island Logs of Walter Inglis Anderson*, ed. Redding S. Sugg Jr. (Memphis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3] 出自赫尔曼·麦尔维尔所著的经典长篇小说《白鲸》 (*Moby Dick*) 。——译注

[4] Agnes Grinstead Anderson, *Approaching the Magic Hour: Memories of Walter Ander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9), 112, 148.

[5] Sugg in Anderson, *Horn Island Logs*, 85.

[6] Martha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The Travel Writings of Catharine Cole*, ed. Joan B. McLaughlin and Jack MacLaughli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6), 5.

[7] *Letter of Hernando de Soto and Memoir of Hernando Escalante de Fontaneda*, trans. Buckingham Smith (1854), 14.

[8] 蕾切尔·卡森: 《海滨的生灵》, 李虎、侯佳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译注

[9] Rachel Carson, *The Edge of the Sea* (Houghton Mifflin, 1983), 246.

[10] Susan Cerulean, *Coming to Pass: Florida's Coastal Islands in a Gulf of Chang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5), 221.

[11] Anderson, *Approaching the Magic Hour*, 174.

[12] Roderick Nash,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91.

[13] Christopher Maurer, *Fortune's Favorite Child: The Uneasy Life of Walter Ander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3), 227.

[14] Richebourg McWilliams, *Iberville's Gulf Journals*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1) , 42.

[15] Maurer, *Fortune's Favorite Child*, 17; *Mississippi: The WPA Guide to the Magnol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8) , 292.

[16] Nancy Sweezy, *Raised in Clay: The Southern Potte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 292.

[17] Anderson, *Approaching the Magic Hour*, 128.

[18] Maurer, *Fortune's Favorite Child*, 175.

[19] Sugg in Anderson, *Horn Island Logs*, 31.

[20] Anderson, *Approaching the Magic Hour*, 118.

[21] Simon Winchester, *Atlantic: Great Sea Battles, Heroic Discoveries, Titanic Storms, and a Vast Ocean of a Million Stories* (Harper Collins, 2010) , 197-99.

[22] "Harding's Vacation Town Used by Gen. Taylor in 1848, "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1920; Geoff Wingham, *Traveling the Shore of the Spanish Sea: The Gulf Coast of Texas and Mexico*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18-19.

[23] Rodman L. Underwood, *Waters of Discord: The Union Blockade of Texas during the Civil War* (McFarland, 2003) ; Frank Zoretich, *Cheap Thrills: Florida, the Bottom Half* (Pineapple Press, 1994) .

[24] C.H. Rockwell, "Death of John Gomez, " *Forest and Stream* 55 (1900) : 82; Charles Hallock, *An Angler's Reminiscences: A Record of Sport, Travel and Adventure* (Sportsmen's Review Publishing, 1913) , 38.

[25] Rockwell, "Death of John Gomez, " 82.

[26] James A. Henshall, *Camping and Cruising in Florida* (Robert Clarke, 1884) , 189.

[27] Gaspar Cusachs, “Lafitte, the Louisiana Pirate and Patriot, ” *Louisiana Historical Quarterly* 2 (1919) : 434.

[28] Anderson, *Approaching the Magic Hour*, 156-58; Maurer, *Fortune’ s Favorite Child*, 280-81.

[29] Ed Regis, *The Biology of Doom: The History of America’ s Secret Germ Warfare Project* (Henry Holt, 1999) , 64-76, 223-24.

[30] Anderson, *Approaching the Magic Hour*, 96-98.

[31] Anderson, *Approaching the Magic Hour*, 100.

[32] 桶中猴子 (Barrel of Monkeys) 是美国一款经典的桌游玩具，它们是一群装在桶中的单色塑料小猴子，双手弯曲细长，可以互相勾在一起形成一个长链条，其双手上下挥舞的姿态形似章鱼。——译注

[33] Anderson, *Approaching the Magic Hour*, 174-75.

十三 风和水



尽管飓风频频侵袭，例如1919年那场对科珀斯克里斯蒂、得克萨斯都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暴风雨，但美国人依然在以有害的方式进行自我扩张。

上帝不想要我。他带走了他想要的人，留下我们来讲这个故事。

——劳拉·迪普伊（Laura Dupuis）（2009）[\[1\]](#)

“它们叫作台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船长麦克沃尔（MacWhirr）在给妻子的信中解释道，他的妻子看到这里忍住了没打哈欠，她对“这些船上的事”不感兴趣。麦克沃尔船长是《台风》（*Typhoon*）的一个主要角色，他正遵守船员的守则，用所在地的叫法指代飓风。他的信来自太平洋西北部的中国海。如果他是从南太平洋或印度洋来信，那么让其妻子打哈欠的就是当地命名法命名的“旋风”。飓风只有发生在东太平洋和大西洋，以及墨西哥湾，才是“飓风”。[\[2\]](#)

这么称呼一部分是因为尤卡坦的玛雅人。玛雅人信奉一位开不得玩笑的一条腿的神，乌拉坎（Huracan），他分管风、雷，以及相应地，出生和毁灭。玛雅人在东边和东南边的邻居，泰诺人和加勒比人，都分别有一位有着类似名字和性情的神。西班牙人于是用他们的

huracán，来指称他们在新世界遭遇到的无法理解的暴风雨，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将他们的船只和殖民毁掉的暴风雨是神的行为。

科学家们翻查了航海日志、灯塔日志、日记和报纸，为的是整合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全球飓风地理。在历史风暴图上，他们绘制了以颜色区分的风暴路径线，紫色为最严重，浅蓝为最轻微；蜿蜒的线条看起来毫无规律可循，和小孩子用蜡笔画出来的一样，但它们是准确且始终严肃的。颜色在赤道附近的一一而非赤道上的一一七个区域变得尤其深。这些便是飓风的多发地，或者按科学家们的叫法是飓风盆地：印度洋周围有三个，北太平洋两个，西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各一个。

飓风是热带地区的土著；通常在长时间的炎热夏日里，海水在80华氏度（约26.6摄氏度）或更高的气温下不断蒸腾膨胀，便产生了飓风。这也是在世界各大洋航行的人们在南大西洋时最有安全感的原因。南美洲和非洲两块大陆距离遥远，两者之间更清凉的水温几乎无法搅动起一场飓风。老水手最有可能在北太平洋跪下祈祷，因为那里是风暴最为频发的海域。它每年平均会产生九次台风。而北大西洋也只是稍微好一点点。

三不五时地，在赤道附近的这些多发区域上，当热能积聚到一个临界点，一场热带风暴或飓风就诞生了。蒸汽从温暖的海面垂直上升，导致近洋面压力下降。更多的空气和水分穿过海面补充进来，就像一个真空带将它们吸入上升气流，而进入更冷的上层海拔后，空气里的水汽凝结。于是黑云形成了，雷声炸响，闪电刺穿云层，雨开始落下来。低空风切变使风暴愈演愈烈，最终汇集成一个单独的体系。

当体系足够大时，地球自转推动了风暴的旋转——赤道以北为逆时针旋转，以南则顺时针旋转。再加上已经蓄势待发的热能，整个无法化解的气团在海上任性地移动，最终导致狂怒的暴雨倾泻如注，所

到之处，一切都被摧毁殆尽。如果风速保持在每小时74英里以下，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抵御的热带风暴。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速，你面临的就是一场飓风——波及范围广且力量巨大，一个以其风眼而闻名的紧紧缠绕的巨大风柱。

自飓风卡特里娜后，路易斯安那的气象学家巴里·凯姆（Barry Keim）和罗伯特·穆勒（Robert Muller）开始统计海湾风暴的数量。他们将自己的发现出版成书，书中包含了史话、科学解释和原始数据[3]。其中一份图表信息量巨大，图表显示，从1886年到2005年，产生于大西洋的飓风数量是639次，每年平均下来略多于五次。其中三分之一，即每年有不到两次的飓风或发端于海湾，或最终进入海湾。两次，听起来不多，但想象一下加州人每年都有几个月时间要与同样数量的大地震作抗争。海湾各州受飓风袭击的频率比其他美国各州的总和还要多15%，从基韦斯特到加尔维斯顿的东部、北部海湾沿岸居民，也需要比其他美国人更常给他们的家钉上木板，然后逃离危险。[4]

有一些海湾飓风发端于百慕大高压下的温暖洋面，从非洲远道而来。百慕大高压是一个范围极广的高压带，在高压作用下，干燥炎热的空气下沉，使得太阳的热力可以畅通无阻地到达洋面。酝酿中的风暴搭上了北赤道洋流的顺风车开始向西运动，而北赤道洋流正是汇入墨西哥湾流，让欧洲探险者得以进入新世界的那道洋流。风暴在袭击了加勒比群岛后，有时会继续西进，并向北通过尤卡坦海峡；有时它们会搭上安的列斯暖流，进入北向的岔道，之后要么继续向北到达美国东海岸，要么经由佛罗里达海峡进入海湾。风暴季，海湾的水温在阳光照射，以及来自加勒比的环流的热力带动下，在80华氏度上徘徊，它之于大西洋飓风就像磁石之于铁器，于是飓风在这里一触即发。

宇航员在1985年9月1日通过“发现（Discovery）号”航天飞机拍摄到的飓风埃琳娜（Elena），让公众叹为观止。从太空上看，飓风是映衬在蓝色地球背景上的一个缥缈的奶油白色旋涡——从外沿到风眼，匀称而优雅，巨大而美丽。然而，在地面上，它令人胆寒。飓风范围可以扩张到数千平方英里。埃琳娜占据了墨西哥湾近四分之三的上空。它在一天中产生的活动能量足以为美国家庭和企业带来六个月的照明。

埃琳娜是3级飓风，在风暴体系中处于低档。3级的风力维持在每小时110~130英里。这足以连根拔起树木，掀翻屋顶，连续数天或数周扰乱电力供应。埃琳娜将房屋冲进海湾，带走了九条生命。飓风卡特里娜（Katrina）的尺寸更小，但风力达到了最高的5级——风速每小时157英里，将近30万所房屋被毁，已证实的死亡人数是2500人。埃琳娜造成经济损失28亿美元（以今天的货币价值衡量）；卡特里娜的则为1300亿美元。

让飓风季雪上加霜的是，东南部是美国降雨最多的地区，雨水最密集的十个大都市都在这里。“而浸透这些大都市的暴风雨，”辛西娅·巴内特（Cynthia Barnett）在《雨：一部自然与文化的历史》（*Rain: A Na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5\]](#)中写道，“大多是在墨西哥湾的温暖水域中酝酿成形的。”有四个在路易斯安那，两个在佛罗里达的海湾沿岸。莫比尔是其中降雨量最大的。海湾上几乎每一处地方每年都有50~60英寸甚至更多的降雨量。光是一个热带风暴季，巴内特说，倾泻下来的雨量就比西雅图一年的还要多。你也许以为在这样一个湿漉漉的地方，城市应该都会配备最先进的雨水排放系统。没有。它们的排水系统和你在年降雨量36英寸的堪萨斯州首府托皮卡见到的是一样的，唯一的重大区别是：这些沿湾城市的雨水是墨西哥湾上的飓风带来的，又通过排水系统回到了墨西哥湾。[\[6\]](#)

对洪涝、毁灭和死亡的担忧从6月1日开始高企，一直持续到11月30日，也就是整个飓风季。历史上最严重的风暴都发生在8月和9月。但有时恶劣的天气也会在6月悄然而至。

1957年6月下旬，在南边路易斯安那的卡梅伦堂区，数千只小龙虾纷纷逃亡至更高处的沼泽滩涂。不知怎的，反正它们知道，风雨将至，而且那是一场暴风雨。自然或本能，或两者都有，促使它们逃离。

路易斯安那人通过天气预报得知了天气情况。6月26日，路易斯安那州居民了解到一个名叫奥德丽（Audrey）的风暴正从南墨西哥湾向北移动。但他们并没有放在心上。大风暴通常在八九月到来，没人听说过在飓风季刚开始就面临巨大威胁的。天气预报说奥德丽移动缓慢，居住在预测登陆点上的沿岸居民当晚可以睡个好觉，等第二天早上再决定是否需要撤离。“我们都上床睡觉了，感觉一切平安，”罗瑞塔·弗劳尔斯（Loretta Flowers）说，她是夏天来卡梅伦堂区拜访祖父母的一个十几岁女孩，“在第二天我们才会遇上坏天气。”[\[7\]](#)

在北边的新奥尔良，纳什·罗伯茨（Nash Roberts）正在有条不紊地将所有指标检查一遍。罗伯茨是一个独立的气象学者和电视天气预报员。而在1957年，多数人还是从报纸和电台获取天气预报信息。这对此次事件来说是不幸的。罗伯茨此时就像撤离的小龙虾。他感觉到了其他天气预报员都没有想到的事，那就是风暴会比所有人预期的来得更快。“有这样的东西压在头顶，”罗伯茨多年后回忆说，“他们不应该睡着。”[\[8\]](#)

“我们在早上4：30被呼啸的大风吵醒，”弗劳尔斯说，两个小时后，“我们看向前门，看见海水正翻涌过来。”[\[9\]](#)

“所有人都看见了，”劳拉·迪普伊（Laura Dupuis）说，她是住在卡梅伦堂区的一个年轻母亲，“你能看到海浪正涌过来。”[\[10\]](#)

“你无法想象迎面而来的是什么，”吉米·特拉汉（Jimmy Trahan）说，“还没看见它，你已经听见它了。那是冲着你过来的一堵灰色大墙。”[\[11\]](#)

“似乎整个海湾在朝我们而来，”海岸勘测局一位勘测副手的妻子回忆说。[\[12\]](#)

杰里·富尔斯（Jerry Furs）家的落地窗爆裂了。“海水像一堵墙般倾泻进来。”[\[13\]](#)

“上帝帮帮我们，”马歇尔·布朗（Marshall Brown）在妻子耳旁低语道，此时海浪已经重重砸向他们的家。[\[14\]](#)

那些在海浪中存活下来的极少数人，说海浪肯定有50英尺高。之后，气候专家通过测量、计算和事实认定，确定了它在垂直方向上的猛烈程度。在海潮涌起、落下、回撤后，像是要最后来个完结，海水再次重整旗鼓，卷起了20英尺高的海浪。两次大浪都随高达12英尺的风暴潮而来，风暴潮席卷至内陆25英里，横扫得克萨斯州东部和路易斯安那州西部海岸。10英尺高的海浪已是常见。它们是时速145英里狂风不依不饶的结果，这是一场4级飓风。

失去爱的人的人们希望他们有所纳什·罗伯茨的话。未来，他们会。他们紧跟他的脚步，就像他紧跟飓风脚步；他们会跟踪他，了解他，几乎到了崇拜他的地步，无一例外地遵守他的建议。对罗伯茨来说，准确追踪一场飓风无关对错，或能否成为最好的天气预报人，而是关乎生命。奥德利夺走了500人的生命。[\[15\]](#)

在奥德丽和飓风卡特里娜之间的近50年，没有发生过致死率更高的海湾飓风。但除了极少数侥幸逃生的存活者，谁记得奥德丽呢？那些应从被遗忘的海湾风暴中吸取的教训呢？罗伯茨希望人们能领会的其中一点就是对有害的生活方式要再三斟酌。

起初，美国气象局（现在的国家气象服务中心）预测奥德丽会正面撞击加尔维斯顿。这个判断并非没有道理。这个岛屿城市经历过的飓风远超过它的正常份额；它能发展起来并保持如今的繁荣兴旺是一个奇迹。加尔维斯顿位于海湾的风暴巷道（storm alley），它只比海平面高出9英尺，麻烦总是蓄势待发。其中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1900年9月的一场风暴。再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夺走过比这更多的人的性命——根据美国飓风中心的统计，超过8000人。埃里克·拉尔森（Erik Larson）的调查显示这个数字超过一万，埃里克·拉尔森在他引人入胜的出版作品《艾萨克的风暴》（*Isaac's Storm*）中证实了这次风暴的历史性灾难的地位。无论是哪个数字，都超过了1889年约翰斯敦洪水和1906年旧金山地震的人数总和。一场美国史上空前的自然灾害，加尔维斯顿的飓风，包括它的灾后重建，都决定了现代海湾人对风暴的应对方式，但并不是纳什·罗伯茨会建议的方式。

楔在墨西哥湾和加尔维斯顿湾之间的加尔维斯顿是一座30英里长、2英里宽的棍棒形岛屿。它是卡兰卡瓦人的过冬地，是海盜简·拉斐特的藏身之所，是新得克萨斯共和国的首都。奥杜邦曾拜访这个富饶无比的海湾，受招待前往候鸟春季迁飞的终点，那里大量的鸟群可供观赏和猎杀。在白人开始铲平岛屿沙丘，清理海岸上的灌木丛，将它变成一个城市之前，这片陆地上的人们正忙于种植作物和畜养牛群。绵延710英里的特里尼蒂河从沃思堡和达拉斯缓缓流下海湾，为这里的鱼群和宽广的牡蛎床带来鲜活的淡水和营养物质，而它们随后又将成为人们的食物。

时年31岁的M. B. 梅纳德（Michel B. Menard），出生于魁北克，从事印第安贸易和锯木生意，他在1836年定居到这座岛屿，并将其发展作为他个人的事业。随着越来越多的东部人和移民涌入北方的大平原经营农场，必然会有更多的贸易机会顺着特里尼蒂河南下。看起来没有人会怀疑加尔维斯顿在未来会成为一个繁忙的港口。从那时起，岛上的一切便都是关于财富和经济增长。“加尔维斯顿，”曾在风暴发生的五年前来过这里的斯蒂芬·克莱恩说，“一直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量且从未动摇过。” [\[16\]](#)

岛屿四周的水域并非天然适合作为港口。海湾平均深度为7英尺，水涨起来的时候能有9英尺。加尔维斯顿希望成为另一个新奥尔良，不想被野心勃勃的竞争对手休斯敦打败，于是商界领袖们委托人修建了防波堤。最终防波堤被建在海港入口处，13英尺高——这在横帆船需要让行蒸汽货船的时代并不足够。他们希望它能高至30英尺，于是数百万美元被投入疏浚工程中。岛民们成立了一个深水委员会；还邀请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这位贪心的垂钓者，前来试试得克萨斯州的大海鲑；于是，在总统成功钓上鱼后，再加上一点哄骗，他们赢得了总统对联邦拨款的支持。取得了理想深度后，加尔维斯顿港一度成为国内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支持者们声称它出港的棉花比任何其他港口都多。那不是事实，但它每天的出港量有四艘或五艘蒸汽船。在风暴来临的前一个财年，出口国外的货值达到了8600万美元。三座供火车通行的栈桥和一座2.1英里供马车行走的路桥——桥身用厚木板搭就，桥墩以铸铁为框架——横跨海湾与大陆相连。

加尔维斯顿人戴的是得克萨斯州斯泰森毡帽，不是汗湿的、边沿磨损的那种，而是干干净净、拉过绒的，和他们上过浆的白衬衫领子一样硬挺。他们的城市不是尘土飞扬的牛镇。这是一个国际性岛屿城市，有将近四万居民，你可以在这里听到世界各国的语言。上面有教堂，而且是主教座堂，还有一座气派的犹太教会堂。它有一排优雅的

正对着百老汇大街的房子，一间1600个座位、门厅由进口大理石铺设的剧院，还有好几家妓院。这个城市，和那些斯泰森毡帽一样，干净、整洁——不像大半个城市都建在湿地上的泥泞的休斯敦。城市的主道斯特兰德街，铺着用木馏油处理过的木板，可以减轻扬尘和马蹄落地的嘚嘚声。所有游客都不会错过的是海滩酒店，这座建筑有着宽阔、红白相间的横纹屋顶和半圆的穹顶，显示出它作为旅游贸易中的中心角色、州内一大旅游目的地所具有的“自觉的宏伟”。得克萨斯州记者加里·卡特赖特（Gary Cartwright）写道，加尔维斯顿有一种“玩具城的神秘，它暗示着生命就像一场永远不会停下的派对”。[\[17\]](#)

但加尔维斯顿人，或者任何海湾上的居民，都应该知道，派对总有停下的时候。在加尔维斯顿风暴发生的七年前，一场飓风夺走了路易斯安那州2000人的生命，彻底摧毁了牡蛎河沼（Oyster Bayou）和谢尼尔·卡米纳达（Chenière Caminada）的社区——就像美国气象局搞砸了这场风暴的预报一样彻底。得克萨斯州的印第安诺拉（Indianola）同样一次次地遭受重创，第一次是在1875年，最后一次是在1886年。它被湮没在沙地下——整座镇子就此消失了。

埃里克·拉尔森笔下加尔维斯顿故事里的英雄——悲剧英雄——是艾萨克·克莱因，他是美国气象局加尔维斯顿分站的负责人。他留着三个火枪手模样的髭须和山羊胡，已迈入人生的第49个年头，胡子也开始发白了。他的工作有时不免有压力，尤其是他身在像墨西哥湾这样一个风暴频发的地区，错误的预报付出的将是人们的生命。那时没有飞机或雷达进行风暴追踪——只有海上船舶和其他气象站用电传打字机发来的寥寥数语。让事情更糟的是，所有实地获取的风暴信息都要先通过在华盛顿特区的总部筛查后才能继续发出。

在9月7日周五那天，根据远处的官方指示，克莱因在绳索上上升起了风暴预警的旗子，此时他办公室外已经嘶嘶嘶地开始起风了。是时

候了。华盛顿方面不情愿地给出这些指示。起先它说的是一场相对无害的热带风暴正向北进入海湾，随后它将摆尾佛罗里达北部，转向大西洋。于是东海岸的气象站都挂起了预警，但海湾各州没有。然后，就在那个清晨，华盛顿改口称风暴往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移动，但仍坚称这是一次温和的风暴。

但克莱因觉得哪里不太对。气压计显示气压正在下降，这是其一。其二，当他走上海滩时，畅通无阻的大风正迎面吹向潮水，但海潮不跌反涨。1893年击溃了谢尼尔·卡米纳达的那场飓风发生前一天，气象局预测第二天的天气是小雨，那个时候克莱因就已经在气象局工作了，而现在很有可能，他将目睹气象局的又一次错误。

那正是古巴气象专家所想的。36小时前，在预测中将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登陆的温和的风暴已经从大西洋而来，并横扫古巴岛，在圣地亚哥倾泻下了24英寸的大雨。对大西洋风暴可能比任何人都有经验的古巴气象学者们预测，风暴将发展为飓风，且正向得克萨斯州移动。但美国在美西战争两年后仍旧控制着古巴岛，华盛顿对古巴人有着高人一等的态度。于是美国气象局在古巴的派驻人员不顾当地专家的预测，向华盛顿报告说逐渐减弱的热带风暴正进入海湾。

他们错了；古巴人是对的。一场4级飓风正向克莱因袭来，而加尔维斯顿人对此一无所知。周六早上，家家户户走下海滩，对眼前不寻常的炸开的大浪花感到惊奇。随后，巨浪开始重重拍打在公共浴室和码头上，将它们砸成碎片，涂过木馏油的街道也被掀起，变成了流动的鱼雷，这时受到惊吓的围观人群才仓皇地往家赶。到了下午1点，高涨的潮水已经淹没了路桥和那三架栈桥，就在几分钟前，从休斯敦来的火车从上面驶过，从火车上下来的惊慌失措的周末游客，登上了这座正在被淹没的岛。房屋被扯裂开来，砖砌建筑轰然坍塌，220英尺高的圣帕特里克教堂也不例外。那个下午的晚些时候，对此次飓风做过

研究的几人写道，风暴潮“推着残骸碎片组成的一道超过10英尺高、数英里长的墙将岛屿扫荡而过……就像一个巨大的推土机，将还屹立着的建筑一一推倒”。[\[18\]](#)

几个小时后，风雨和海都平静了下来，疲惫不安的幸存者走出去，外面满目疮痍，他们整理好思绪，开始寻找他们失去的亲人的遗体。克莱因找到了他的三个女儿但不见他怀孕的妻子。建筑物无一不受到重创，其中有三分之一消失不见。岛屿的建筑堆叠在一起，像一个暴怒中的庞然大物拿起了100个储木场和100个砖瓦场，将它们全都倒盖了过来一样。火葬的柴堆连续烧了数周。

但加尔维斯顿的人民不会被飓风打败。他们没有放弃岛屿，将它任由大海和狂风处置，相反，他们开始重建家园。美国人不会逃离自然，他们迎面相抗，尤其是在这个技术进步鼓励他们控制自然世界的时代。他们的知识和机械让他们不仅能在河上筑堤，也足以让河流改道，足以汲干广大的湿地，足以让火车隧道穿山而过，足以用钢索吊起一座横跨东河的布鲁克林大桥，足以让钢铁结构的建筑直插云端。无线电波将会在下一年到达大西洋彼岸；不久，塞缪尔·兰利（Samuel Langley）将首次试飞以内燃机驱动飞机并以此征服蓝天；而就在以北海岸的博蒙特，美国第一口真正的石油喷油井将在纺锤顶喷发，标志着先进的摩登时代的到来。

美国人从来都生活在他们想住的地方。在沼泽地里、沙漠上、岩石边、泛滥平原中、岛屿上，无论严寒酷暑。他们总是带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期待，比起让自己适应环境，他们更喜欢改造环境让其适应自己。“重夺”（reclaim）是他们喜欢用的词，好似大自然曾经从他们手里夺走过什么，而现在，即使天崩地裂——都有分别或同时应验的时候——他们也死心不息地要将它夺回来。虽然沙漠里降雨不多，

但他们依然种植着市场作物。他们总会取到水的，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办到了。

加尔维斯顿人要从大水中夺回他们的岛屿。就在他们一点点将家园重建起来时，这个城市草拟了一项全面的工程计划。首先，在深水委员会的主持下，它修建了一道17英尺高、27英尺深的防波堤，防波堤由花岗岩巨石砌成，临海湾而建，堤上是一条滨海步行大道，它在刚建成时长三英里，这个长度将在日后被不断延伸。接下来，这座城市将自己的地势抬高，但并非仅是垫高自己那么简单。工程师们将河口海湾里的内容物排干，这相当于抽走了100万辆翻斗车的海洋生物栖息地，于是这个城市的栖息地——500个街区——所在的陆地便得以抬高。人们将房屋建得更高，或将它们迁离，并建起篱笆那么高的临时木板路，如此人们就可以避开堆填的淤泥了。他们抬高了污水、供水和输气管道，还有消防栓、电线杆，以及街道。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他们在三万吨重的圣帕特里克教堂下方插入700个手摇千斤顶来让教堂离天国近上五英尺。

和1900年飓风剧烈程度相当的1915年飓风考验了这座泥泞的城市，加尔维斯顿人说他们领土上勇敢的人们凭技术战胜了自然。新建的高耸在防波堤上的加尔韦斯酒店（Hotel Galvez）是展示当地人决心的标志。只有九人丧命。不过这一次是路易斯安那，这个100多人丧生的地方，接受了飓风的正面冲击，而不是加尔维斯顿。并且，虽然紧挨着防波堤的建筑挺住了，但外围的建筑有90%都倒下了。46年后，飓风卡拉（Carla）摧毁了120座建筑，造成六人死亡。1983年，飓风艾丽西娅（Alicia）带来三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但无人死亡。飓风艾克（Ike）连同20 英尺高的风暴潮在2008年席卷加尔维斯顿，令州府背负了500亿美元的损失。加尔维斯顿80%的房屋被毁。厌烦、害怕、受伤的人们——最终有9000人，占人口比例的17%——从此永远地离开了这里。

但从1900年飓风中留传下来的坚持并没有完全消失。市政执政官助理、第五代加尔维斯顿人布莱恩·马克斯韦尔（Brian Maxwell）告诉得克萨斯州的一名记者，说他“绝不会将我们岛屿的未来与其他任何人的交换”。[\[19\]](#)

无论是历史书、当地博物馆还是历史学会，都将1900年后非同寻常的城市重建视为诞生于灾难的伟大胜利。不屈不挠的加尔维斯顿人和众人说：“在直面飓风的地方，你们也做得到。”[\[20\]](#)这种城市重建和盲目的自信，让菲尔·斯科特（Phil Scott）想到了T.S. 艾略特的一句诗，他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1935年劳动节灾难性飓风的书，于是他将其引用为他书作的卷首题词：“我们的无知将我们引向死亡。”[\[21\]](#)

在电视上气象学者早就开始使用计算机图像进行气象预报，而纳什·罗伯茨依然在使用塑料天气板和毡制粗头笔。他从未用过高科技，路易斯安那人也从未对咯吱作响的毡制笔失去过信心。1998年，他打败了依赖多普勒雷达的专业对手，成功预测飓风乔治斯

（Georges）会绕开新奥尔良转道向东，《亚特兰大宪法报》称他“箭无虚发”。这份都市大报说的话，路易斯安那人这么多年来早已了然于心。自奥德丽以来，他们获取天气信息的方式就是问旁人：“纳什怎么说？”[\[22\]](#)

罗伯茨的头顶已经秃了，他脸上总是洋溢着喜气，他就像你的隔壁邻居，你会去向他借树篱修剪刀，然后邀请他和他的妻子孩子，一起来家里吃烤架上的汉堡。和很多其他住在新奥尔良郊区的人一样，他也参加过战争，在太平洋战场度过了他整个服役期。他于1946年回到他在新奥尔良的家，开了一家天气资讯公司，办公室就设在圣查尔斯酒店的大堂边上。他的主要客户是商业渔具和石油公司。因为预测准确，他树立起了自己的声誉。1951年，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软磨硬

泡，WDSU电视台第6频道成功说服他去主持节目。他是新奥尔良第一个定时播报的电视天气预报员，而且是从他的办公室进行远程播报。

“纳什只有一个，”电视台的广告语说，“他就在第6频道。”

他对恶劣天气的准确判断从两个方面来说都是重要的。如果石油钻井工人或渔船工人不必要地撤离，他的客户会有财产损失。如果他预测出错而飓风袭来，那么工人们的性命便被置于险境。作为一个电视天气员，他需要扩大他的安全网。他要对所有收看节目的观众负责。

奥德丽有点棘手。自他第一次录制电视节目以来，罗伯茨只遇到过一次飓风，那是1953年9月进入了海湾的加勒比风暴——飓风弗洛伦斯（Florence）。它以80英里的时速冲击佛罗里达狭长地带，迅速扫荡陆地，像所有飓风在释放从水上集聚的热量和水汽时会做的那样。通常，风暴都源自加勒比或大西洋。奥德丽不是大西洋飓风。它就是海湾的产物。海湾飓风生成的频率更低，但它们的难以预测让天气预报员们时刻保持警觉。

奥德丽在大洋彼岸没有可供参考的路线，也没有已确定的行进模式可以为它接下来的可能动向提供线索，无法测得它的能量和速度是在加强还是减弱。它就这么毫无预警地出现了，第一次是在6月24日，它作为热带低气压在坎佩切湾现身，这是在特拉汉、迪普伊和其他人看到大潮汐波的三天前。那天下午，一艘拖网捕虾船报告说海上出现大浪，风速达到每小时50英里：这是热带风暴。第二天，一架飓风猎人飞进奥德丽的乌云里，测得了每小时75英里的风速，而且观测到了一个成熟的风眼：这是飓风。26日，奥德丽将一艘78吨的渔船摔在一架石油钻台上，造成9人死亡。那天下午，另一架侦察机汇报风速已经超过每小时100英里。

对追踪飓风来说，空中气象侦测机的价值无法估量。历史上第一个风暴牛仔是二战期间从得克萨斯州布莱恩基地（Bryan Field）起飞的约瑟夫·达克沃斯（Joseph Duckworth），他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教官。为他挣得史上首位飓风猎人称号的是另一场海湾飓风。那次飓风起源于1943年7月里的一天，在密西西比海岸以南的100英里外。当时，达克沃斯正在训练英国飞行员使用AT-6得克萨斯单引擎教练机进行仪表飞行^[23]。作为经验丰富的战斗机飞行员，英国人厌恶得克萨斯州飞机，认为驾驶这样破旧的飞机有失他们的专业身份。7月的这场飓风到来时，他们接到命令，要驾驶飞机撤离布莱恩基地，他们对飞机便越发鄙夷了。AT-6不值得英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挽救，培训生们说。

这时达克沃斯站出来了，他要亲身证明飞机的坚固和仪表导航的优越性。他用一杯威士忌和英国人打赌说，他能开着AT-6进入飓风，并活着出来。就这样，在没有取得上级许可的情况下，他和一个领航员拉尔夫·奥海尔中校一起，系上安全带，起飞了，他们钻进了风暴黑压压的云墙中，在那里，奥海尔后来说，他们“被抛来抛去，就像一根棍子进了狗嘴巴里”。他们发现了风眼——平和安静，就在他们10英里开外——还看到了它下方的地面。在里面绕了一圈后，他们重新跳进凶猛的黑云中。^[24]

回到布莱恩基地后，达克沃斯和奥海尔获得了他们的赌注。与此同时，风暴正瞄准与加尔维斯顿一水相隔的玻利瓦尔半岛（Bolivar Peninsula）。它将两边的房屋和建筑一扫而过。19人就此丧命。

气象局起初以为这次奥德丽的目标是一样的，于是它对这个区域发出了飓风警告。但奥德丽并没有转向，它没有偏移。它一直往北移动，冲路易斯安那而去。6月26日晚上10点，罗瑞塔·弗劳尔斯正准备上床睡觉，此时新奥尔良气象局发出了最新的“7号警报”，更正了飓

风路线。奥德丽正往路易斯安那行进。整个海岸和得克萨斯州东部都被纳入了飓风预警范围。加尔维斯顿地区的预警降级为风暴警告。警报称，路易斯安那的海浪高度将达9英尺，风速将达到每小时100英里，风暴位于235英里以南。奥德丽是气象局第一次使用雷达跟踪的飓风，通过雷达搜集的风暴的主要数据是可靠的，除了其中一个。“7号警报”中报告的飓风路径是每小时10英里。气象预报专家计算后认为登陆在未来近24小时内都不会发生。因此不奇怪他们会建议市民们睡个安稳觉。警报结束前说下一则警报将在第二天凌晨4点发出。[\[25\]](#)

就在4点过后半小时，弗劳尔斯被风声吵醒了。

如此不慎重的警报让罗伯茨感到不负责任。第6频道的天气员是唯一说奥德丽将会在晚间登陆的人。不幸的是，当时的路易斯安那人还没有开始问“纳什怎么说？”

罗伯茨有他的一套办法让自己略胜一筹。他会“锁定‘它们’”，他提到飓风时说，“每天24小时，日夜不休。”他不会离开他的办公室，当睡意袭来时，他会钻进角落里的一个睡袋打个盹。这项严苛的工作流程一直持续到他80岁。他超越对手预报员（而且是极具竞争力的预报员）的一个优势，就是他可以通过他的个人渠道，获得由钻井平台和渔船稳定输出的天气数据。他会将他获取的信息与美国气象局的报告做比较，而他发现气象局的报告经常充斥着“办公室想法”，指的是被制度约束住了的思维方式。在分解完所有信息，再加上一点直觉后，他会做出他自己的判断。他不像艾萨克·克莱因。他不需要执行来自华盛顿的命令。[\[26\]](#)

罗伯茨还有一个新奥尔良的气象局人员所没有的优势，而且很可能是当时所有其他电视气象预报员都不具备的优势：他飞进了飓风风眼，而且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气象学家。这发生于二战期间他在VRF-1海军航空中队服役时。台风总是扰乱军事行动，导致美军船舰沉没

——军舰指挥的一大挫败来源。一天晚上在一次“模模糊糊的军官座谈上”，罗伯茨这么形容说，一个想法冒了出来，那就是将狂暴的太平洋天气转化为美军的优势。如果美国人可以准确追踪台风，舰队就可以偷偷跟在一个将在日本登陆的台风后面，然后趁敌军的船和飞机被风暴摧毁得不成样子时，再上去给他们一个了结。罗伯茨喜欢飞行，喜欢研究气象和解决问题，所以当第一个机会到来时，他和一个飞行员随即起飞，飞进了一个台风。一旦进入风眼，他便记下坐标，追踪其移动方向和速度。他的侦察让第七舰队不仅躲开了台风，还能跟在它后面，对日本发动了自1942年有名的杜立特空袭^[27]以来的第一次航母攻击。^[28]

从那之后，罗伯茨知道除了用双眼观察飓风外，还需要用上所有其他感官去理解它。破译它的性格，你就能更准确地预测它的行为。但你也要看到它周围正在发生的情况。奥德丽北边的高压系统正在减弱。那意味着风暴将会重新加快它的步伐。确实，它的每小时移动速度比气象局预测的快了将近25英里，它带动着大量的海水。

这风、这水将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特里斯坦·德鲁纳（Don Tristan de Luna Y Arellano）对天气没有直觉，他是一个不走运的征服者，本身也是一个演绎飓风将如何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例子。他生于西班牙一个显赫家庭，是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妻子的表亲，他参与了墨西哥的殖民征战，并赢得了上级的赞誉。1559年，墨西哥总督派他率领13艘船从韦拉克鲁斯出发，前往西佛罗里达，船上搭载着现成的殖民大军，包括1500个士兵和殖民者、必不可少的传教士，以及非洲和阿兹特克^[29]奴隶。马共计180匹。食物供应包括橄榄、樱桃、桃子、山核桃、胡桃、扁桃仁、山羊、鸡和牛。还有偷渡者：鼯鼠、甲壳虫、非洲的蟑

螂、欧洲的老鼠——得了佝偻病的。[\[30\]](#)根据鲁纳的传记作者的说法，这项计划在“万全的准备”和“小心”下启动了。[\[31\]](#)

西班牙人无疑并不待见La Florida，当时的佛罗里达属地在如今佛罗里达州州界的基础上还要再往西北大幅扩展。庞塞·德莱昂和德索托都在这里断送了性命；德纳尔瓦埃斯好不容易才从那里逃出来，但跛了脚，离终结了他生命的得克萨斯州也不远了。在从前的征程中存活下来的人拒绝再去佛罗里达，他们说它“到处是泥塘和有毒的水果，寸草不生，是太阳底下最差劲的地方”。但是，帝国高于一切，国王腓力担心对手的入侵。[\[32\]](#)

鲁纳的领航员们说服他将帝国的旗帜和基督教的十字架插在Ochuse，也就是今天的彭萨科拉湾旁边。它有着高耸的峭壁和深水，圣罗莎岛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为它阻隔了风暴和大海。鲁纳后来写道：“我选了一个不错的港口。”领航员们说这是西印度群岛里最好的。似乎是为了证明他们都错了，9月的一场飓风咆哮而至。船都锚定在海湾里，按理来说是安全的，但大风从北面偷袭。雪上加霜的是，鲁纳还没下令将物资卸船。[\[33\]](#)

这场风暴留下的，词典中将其称作灾难。十艘船被打沉。死亡人数不得而知。不到一年，紧张忙乱的殖民者放弃了这次努力。总督宣布西班牙殖民者禁止进入受风暴骚扰的佛罗里达狭长地带，这个做法就这样保持了139年。如果不是因为一场飓风，彭萨科拉将成为欧洲殖民者在今天的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但是，在中止殖民狭长地带期间，佩德罗·梅内德斯·德阿维莱斯（Pedro Menéndez de Avilés）殖民了圣奥古斯丁，将第一城的荣誉给了东海岸。

163年后的恶劣天气又剥夺了彭萨科拉的另一个第一——打响内战的第一枪。当佛罗里达州退出联邦时，联邦军正保持着对彭萨科拉四座，黏土砖砌堡垒的控制。林肯总统同时向南卡罗来纳的萨姆特堡

（Fort Sumter）和彭萨科拉派出补给船和援军，防止被邦联军强行接管。大西洋刮来的一场大风延误了护送船队，也挫败了邦联军进攻彭萨科拉的皮肯斯堡（Fort Pickens）的计划。等援军抵达彭萨科拉时，萨姆特堡的联邦军已经遭到敌军炮轰并投降了。

几十年后，一场大风暴颠覆了当时亚拉巴马州内小小的不知名的科登的发展计划。科登就在和它同名的长沼边上，与多芬岛隔密西西比湾相望，它是伯明翰和蒙哥马利商人家庭的垂钓胜地。那里宁静、丰饶，有着田园风情，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有两座旅馆，莫比尔海滨铁路（The Mobile & Bay Shore Railroad）从这里穿行而过。科登想象自己在未来将成为一座虽然不大但享誉世界的度假胜地。那是在9月的一场飓风袭来之前。1906年的飓风季飓风五次来袭，房子、旅馆和所有人的物品都被掀翻散落到了大风里。在海湾北部海岸，134人丧生。科登只好在度假村之路上勒住了缰绳，转而向商业渔村发展。这是可行的，因为渔人比任何人都清楚生活在水边的风险。

我们再来看看在佛罗里达礁岛群的两个例子中风暴是如何影响人类活动的，首先从国内蓄奴争端——用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话来说就是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大风暴——被挑起的前十年开始说起。海湾和大西洋之间的商船运输在内战前就已经迅速发展起来。海湾港口这一头迎来载着棉花的种植园马车和运送木材的火车，那一头送走了渔民们捕捞的水产。其他原料和货物被放上马克·吐温式的明轮船顺着河流而下，它们都来自遥远的地方——芝加哥、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在这里转运出口货船，去置换来自东北、欧洲和加勒比的货物。从西班牙人开始，所有船只都需要经由佛罗里达海峡和巴哈马海峡，小心翼翼地避开佛罗里达礁岛群一带的珊瑚礁和浅滩。

这片区域是航海人的噩梦。庞塞·德莱昂将礁岛群称为Los Martires，“殉道之地”；基韦斯特的西班牙名字叫作Cayo Hueso，

“骷髅岛”；而梅特康贝（Matecumbe）两座礁岛的名字显然来自西班牙语中的mata bombe，即“杀人”（也有一种说法是它取自这里生长的一种毒番石榴树的名字manchineel）。美国海岸勘测局的一项早期目标就是绘制出可依赖的礁岛群海图，但这项工作常受华盛顿的官僚作风牵制，因为它是一项耗时的苦差，更别说还有风暴的阻挠。即使在测绘局的海图和标识开始为航海带来便利后，航船也不仅需要妥协于阻碍物，还有恶劣的天气，当风暴来袭，“航行”二字就只能是嘴上说说了。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海湾的这一带是“世界上最险恶的航海环境”。它考察最老练的舵手和领航员的技术和勇气。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受住如此考验。在19世纪50年代，这片海域平均每周都会发生一起船难，情况常常是一艘船沉入海底的另一艘沉船上。[\[34\]](#)

而在南方的热带地区，严酷的天气和冒险的航行催生出一一种靠打捞沉没商船发财的强劲产业，礁岛群上的人们称之为“捞残骸”

（wrecking）。其从业者，也就是打捞人（wreckers），他们的人生信条是“有人赔才有人赚”，另一条常常被同时提及的是“占有即真理”。莱昂纳德·德斯坦和他的父亲、兄弟曾有意进入这个行业，直到厄运将他们的帆船变成待打捞船只的一员。到了19世纪，从沉船上打捞出的家具、银子、陶瓷、女士和男士用的精致衣饰被送到了新奥尔良和其他地方的拍卖行，使基韦斯特成为国内一大富户。

打捞沉船演变成了合法的趁火打劫。在19世纪50年代，大约50艘基韦斯特的沉船打捞船拿着联邦法院颁发的许可证活动。法律支持这种如荒诞新闻作者H. S. 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所说的“残酷但必要的打捞权”：首先取得财物并有能力保住它的——不管用枪、用刀还是赤手空拳——就有拥有它的权利。[\[35\]](#)

内科医师和《基韦斯特公报》（*Key West Gazette*）编辑本杰明·斯特罗贝尔（Benjamin Strobel），形容沉船打捞人是“热情友

好、穿着体面、看起来可靠的人”。奥杜邦认为他们是无私善良、受过训练的水手，行事“规律、敏捷”，他们驾驶的是大海上最干净、最精致、最光滑的纵帆船。不那么善良的评价则说打捞人靠别人的厄运为生，是唯一会祈祷飓风发生的人。海岸勘测局的费迪南·格迪斯（Ferdinand Gerdes）苦涩地报告说在一艘船触礁后的15分钟内，“五六艘打着打捞船名号的船只”便像6月野餐时的蚂蚁般朝其聚拢过来。反而更安全的海上航行将危及打捞人履行他们有利可图的天职。有传闻说这些“看起来可靠的人”掰掉了勘测局设的航标灯和方位标，并点亮了假的灯塔信号以促成灾难的发生。^[36]

尽管存在这样的恶作剧，地图的测绘人们继续前进，并完成了任务。即使这个区域的通行船只增加了，遇难船舶的数量也逐渐下降。最后，大部分打捞人都失业了，基韦斯特的经济注定只能依赖商业捕鱼和运输热带产品了。

饶是如此，新经济还是让亨利·弗拉格勒（Henry Flagler）在脑海中闪现出了一个念头。亨利·弗拉格勒身材高挑，有着浓密粗茬的白色须发，是高高在上的标准石油公司的百万富豪。从石油公司隐退后的他仍然是美国商界中令人瞩目的人物，他经营着一条贯穿佛罗里达东海岸的铁路线，在铁路沿线建了许多度假酒店，并在1896年一直延伸到了迈阿密。当地居民提出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但他拒绝了 this 荣誉。而且，他的宏图还未完全施展。他希望一路建到基韦斯特。来自古巴的新鲜菠萝，来自礁岛群的海绵和柑橘从这里用船运到北方。同样重要的是，这位有闲的大亨希望来往的游客都坐上他的火车。于是他做了其他人说不可能做到的事。1904年，他提出计划，要建跨洋铁路，连通佛罗里达礁岛群，全长156英里。为什么不呢？海湾另一边加尔维斯顿的工程师们将整座城市建在了一座岛屿上，他们就是挑战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并大胆行动的典范。

修建一座多半部分都悬在海面上的铁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海外铁路——弗拉格勒这么称呼它——将消耗数量难以预估的混凝土、钢筋和人力，每个月光是为工人们送去淡水就要450万加仑——为了补充他们在酷暑下挥洒的汗水。新铁路其中一段的海上跨度是不可能完成的七英里，需要横跨骑士（Knights Keys）和小鸭礁岛（Little Duck Keys）之间的海域。弗拉格勒的标准石油在钻井取油时，伴随高风险的还有最起码的一点收回投资的概率。但在这件事情上，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条在岛屿间跳跃的铁路线永远不会回本。人们称之为“弗拉格勒的糊涂事儿”。但这是这位老人自己的钱，用今天的货币价值算是65亿美元，他爱用来做什么都可以。重要的是结果。

但这几乎没有发生。并不是钱不够或激情不够，而是因为天气。在这项工程所需的八年时间里，三场飓风猛烈袭来，狂风横扫的速度是弗拉格勒的火车最高时速的两倍。每一次，数百万美元的设备都被毁于一旦。修建好的路段被冲走了。一并冲走的还有300多人的生命。最终在1912年1月21日，弗拉格勒坐在他私人的90号车厢——上面有三间卧室、一间浴室、会客室、厨房和办公室——随列车沿着完工的铁路驶向了基韦斯特，一路上火车哐啷哐啷地行驶在绵延开去的桁架和堤道上，它们连接着一座又一座岛屿，成为大西洋和海湾之间的人造分水岭。

人们现在称他的铁路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弗拉格勒刚过82岁，他年老瘦长的双腿已经跨过了两个时代。他的铁路是上一个时代的机器标志。它跨过大海，有着深远的意义，但当它置身于一个崭新的时代时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变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入侵者。讽刺的是，为弗拉格勒带来财富和铁路的石油，加速了这种不合时宜。就在弗拉格勒随隆隆车声到达终点的三年后，富有的汽车前灯制造商、印第安纳波利斯赛道（Indianapolis Raceway）的主席，C.G. 菲舍尔（Carl G. Fisher），在他自己的宝贝工程南方高速公路（Dixie Highway）

上一路高歌从芝加哥开到了迈阿密。轿车和铺面道路，而非四面环水的铁路，才是属于新时代的。菲舍尔的高速公路大行其道，弗拉格勒的铁轨就要靠边站了。

那时的佛罗里达州风头正盛。就在弗拉格勒铁路下的第一批枕木开始腐烂并需要被换下时，州府计划用混凝土和沥青建一条通往礁岛南端的高速路。这项工程的承包人将会是拥有23年历史的海外铁路最好的同时也是最后的客户。他们会在用火车运输完所需物料和设备后，将铁路关停——在一场飓风的帮助下。弗拉格勒的海外铁路受大萧条的影响，已经由破产管理人接管。基韦斯特，这个曾经在国内排得上号的富庶城市，也宣布了破产。还在旅行的少数游客，更多也是驾车，而非乘火车；因此佛罗里达州紧急救济署的负责人朱利叶斯·斯通（Julius Stone）推论，一条岛上高速路会将他们珍贵的美元带到热带地区来，就可以解决基韦斯特的偿债能力了。推翻铁路后所修建的通往热带乐园的路被公然命名为海外高速（Overseas Highway）。工程进行到一半，它就受到了飓风之府并不友好的迎接。

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5级飓风，发生在9月2日的星期一。它被称为1935年劳动节^[37]飓风，这个名称背后包含的不幸的讽刺比它本身的发生日期更重要。这场飓风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劳动者，而他们的劳动本应在那一天得到这个节日的承认——具体来说，就是联邦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正在修建公路的劳工。作为他们应得的假日，他们在这天放假一天，并没有在意即将到来的事情。飓风将目标瞄准了他们在梅特康贝礁岛（Matecumbe Key）的工地。从半岛出发的救援火车因为好几件事延误了出发时间，最后它在瓢泼大雨中赶到了目的地——被水淹了一半的岛屿。但它没能出去。一个巨大的浪将它的十节车厢掀离了铁轨，只剩下火车头直立在铁轨上。结果，对躲过飓风来说，待在被掀翻在地的火车车厢里并不是一个太差的选择。外面，是大多

数生命被夺取的地方。弗拉格勒铁路的岩石路堤和铁路桥阻碍了风暴潮，造成海潮回流，卷走了物资和人。最后，超过400人丧生。

那一年的早些时候，美国气象局为了改善预测，在新奥尔良和杰克逊维尔设立了地区办公室。显然，新系统还存在没有解决的小问题。就在几个小时前，史上少有的强劲飓风登陆，气象局却还说这是热带扰动。气象预报员直到当天下午4：30才弄明白飓风的准确路径。风暴在当晚8：30左右全面席卷了佛罗里达礁岛群。

基韦斯特以南45英里处，欧内斯特·海明威正坐在家里看着这场飓风，他的房子是1851年由一个沉船打捞人手下的奴隶们建造的，是两层的珊瑚岩房屋，足以抵抗飓风。海明威最近为了退税优惠，从不景气的市政府手中买下了这所房子。星期三黎明时分，大风大浪终于平静了下来，这位作家、户外运动家、退伍老兵此时精神矍铄，他驾驶着他的小船“皮拉尔号”，去查看飓风过后的梅特康贝。他帮助清理尸体，很多的尸体。自从战争后他就再没目睹过这么多的死亡。这些不幸的人缠绕在红树林间，飘在泛着涟漪的水面上，臃肿而坚硬地躺在海滩上，在太阳底下慢慢变黑，他们死后强直的手臂正伸向天堂，张开双手请求让自己进去。

海明威感到愤怒。几乎所有的救援人员都是退伍军人，这种沮丧的心情他曾在开着救护车穿行在满目疮痍的欧洲战场上时体会过。他和他们中的很多人一起在酒馆喝过酒、聊过天。他将怨气发泄在他免费为《新群众》（*New Masses*）写的一篇文章里。他想让华盛顿为此负责。他想知道，“谁”是他这篇《谁杀死了老兵？》的主题。是谁，将这些不走运的好人派到佛罗里达来送死？是谁，蠢到在飓风季里没有留下一个疏散计划就把他们扔下？他们“事实上是被谋杀的”，他在给他的编辑麦克斯威尔·柏金斯（Maxwell Perkins）去信时说。[\[38\]](#)

但海明威从来没有质疑建造海外高速公路的智慧。它在1938年开放使用，将会让更多人进入这个飓风之府。劳动节风暴发生时，基韦斯特的人口只有1910年高峰时的38%。到1950年，则是两倍有余，达到2.6万人。“我们的无知将我们引向死亡。”

当地人在1957年6月25日的周二当天已经得知飓风奥德丽正在往卡梅伦堂区移动。而且既然美国气象局已经为其命名，那说明这个海湾风暴已经不容小视了。但在当时，外围环境看起来是另一回事。卡梅伦的居民看向天空时，他们看到了蓝蓝的天，大朵大朵的积云从上面掠过。气温高得像置身在蒸笼，闷热潮湿——换句话说就是一切如常。衣服像湿纸似的黏在身上。这是一如既往让人乏力的南方天气，卡梅伦堂区不到7000人的居民们早已习以为常。学期结束了，人们带着孩子到了海滩，他们中很多人讲着卡津法语，收音机里放着卡津音乐。

从面积上说，卡梅伦是全州最大的堂区。它呈明显的方形结构，嵌在海湾和被当地人叫作大湖的加尔卡修湖（Calcasieu Lake）之间，前方是一片弱浪海岸，海岸上大片的泥滩和草地也是路易斯安那州与大海的接壤处。大陆架一直延伸到100英里外，这是美国境内海湾大陆架中“走”得最远的一处。在这里，大浪很罕见。水面通常平静如长沼，荡起的波浪像是被一小阵风掸起的透明窗帘。堂区同样地势低洼，平均不过高出海平面三英尺，超过四分之一是水和沼泽。

周三，几阵清凉的大风少有人让人透了口气。人们很肯定飓风还在路上。报纸上是这么说的。卡梅伦的商店正在往临风面的窗户上贴胶带，提前很久就做好了准备——至少大家是这么认为的。报纸上说奥德丽周五早上才会登陆，这比其实际登陆时间晚了整整一天。

海湾上，各个石油公司疏散了在加尔维斯顿外围近海钻井的工人，气象局最初预计奥德丽将在加尔维斯顿登陆。十年前，科麦奇的

科麦克16号油井揭开了石油开采的新篇章，西北部海湾便成为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平台的天下。D. W. 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 [\[39\]](#)是负责将钻井工人和设备安全转移到岸上的其中一个摆渡船长，他记得“钻井平台周围的”海浪“跟疯了似的”。他被满天的乌云和南边黑压压的海吓到了，他回到家后这么告诉他的妻子吉内瓦；他们的家就在卡梅伦堂区30英亩的布满橡树的沿海沼泽地边缘。[\[40\]](#)

格里菲斯是一个大块头，肩膀宽阔，有着一头长毛绒一样的黑发，他自小生长在海湾上，并不是一个会小看了飓风的人。他有两个孩子，莱斯利和切丽，他的父母从得克萨斯州的亚瑟港来这里拜访。抵御风暴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的门窗都钉上胶合板。吉内瓦已经储存好日用品和电池，他们的卡梅伦邻居已经给他们的汽车加好了油，以备第二天可以随时撤离。那天晚上，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员说奥德丽预计在周四下午登陆。撤离可以等到第二天早上。那天的晚报也是这么说的，于是这家人去睡觉了。

相对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飓风贝琪和卡米尔席卷海湾时，当时几乎无人入睡。在贝琪这样一个毫无规律和难以捉摸得令人胆寒的风暴面前，安然入睡是不可能的。它起源于1965年8月27日法属圭亚那的一个热带低气压，接下来的行进路线可以用疯狂来形容。它迅速升级为3级风暴，然后是4级，然后缓和回落到2级，又再次升级到3级、4级。它的活动范围从头到尾共覆盖了600平方英里，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风暴之一。它先往大西洋的西北方行进，然后一路向上，直冲南北卡罗来纳而去，但随后信手涂鸦似的原地打了一个转，往西南移动，碰了一下巴哈马群岛的北端，进而袭击了拉哥岛 (Key Largo) ——1948年鲍嘉和白考尔主演的一部令人回味的飓风电影就以此为片名[\[41\]](#)和拍摄地。贝琪以125英里时速的大风和9英尺高的风暴潮，切断了礁岛和半岛的通道。它横穿佛罗里达湾和大沼泽地，同时积蓄了来自海湾的热力，猛然转头向北——朝沃尔特·安德森扎营的霍恩岛而去。

贝琪来势汹汹。纳什·罗伯茨在办公室里研究了好一段时间，坐在他临街的玻璃窗前做远程天气播报。窗外是逐渐暗下来的圣查尔斯大街，随着时间推移，天气变得越来越糟糕。贝琪进入海湾后，他给听众送去了一则坏消息：飓风会在格兰德岛附近登陆，并向新奥尔良方向推进。

往大陆方向移动的过程中，风暴摧毁了八座近海钻油平台，不过让霍恩岛上的沃尔特·安德森活了下来。它荡平了耶斯科罗斯基（Yscloskey）和德拉克洛瓦（Delacroix）岛上的渔村。还有格兰德岛，它是土霸飓风手里的软柿子，从不退缩但受伤的也总是它，它被热带风暴掠过或正面袭击过28次，或许还不止，因为玛莎·菲尔德是在1892年说这里是她最爱的避暑胜地的——其中有8次是飓风。贝琪依循了惯例。它裹挟着150英里时速的狂风和10英尺高的巨浪将格兰德岛的马路倾轧得粉碎，将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连根拔起。整座岛淹没在海水里。墓地里的棺材被大水冲走，漂到了卡米纳达湾（Caminada Bay）。有一个奇迹生还者叫苏西，它是一只浑身颤抖的吉娃娃，主人已经全家撤离，它坐在一只桶里漂在浸水的家中，孤身挺过了风暴。

在北边的新奥尔良，堤坝外立面的大河已经涨了10英尺。巨浪高高翻起，又重重地拍打在庞恰特雷恩湖上。罗伯茨仍在继续播报。在电力被切断前，罗伯茨一直在实时直播，电视观众眼看着一个石头或砖头——总之是重物——砸穿了那面玻璃窗，击中了后方那位可信赖的天气播报员。他没事，只是更多了几分英雄色彩。

佛罗里达大道的防洪坝，并不是万能的，它在风暴期间从不能让人安心。这次和以前一样，也将会和以后一样，它屈服了。就是这时电力中断了，城市陷入黑暗中。大水灌进了本就泡在雨水里的下九区（Lower Ninth Ward），淹没了16万所房屋，被水围困的人们蜷缩在他们的阁楼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捕捉到了警察局发言人话语中无意

犯下却恰如其分的赘述，他说：“被洪水淹没的地区数不胜数。”
[\[42\]](#).

佛罗里达州死亡13人，路易斯安那州死亡75人。经济损失惊人，损失金额第一次迈入十亿美元的门槛。保险巨头伦敦劳合社的一位职员坦诚地说：“贝琪在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了脏话。” [\[43\]](#).

约翰逊总统在风暴后一天就乘“空军一号”抵达了新奥尔良，他前所未有的迅速反应感动了新奥尔良市民。房子仍被泡在水里，街上依然淌着水，这种情况还会延续十多天。总统先生走过九区，用他独有的亲和力和当地人攀谈，体会他们的境况。人群慢慢围拢过来，他们很多是这座城市无家可归的七万人中的一部分，他对他们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我要亲眼看看，风和水的不幸联合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都做了什么。”随后，回到机场时，他临行前留下一句承诺：这个州“会走出悲伤，开辟新的道路”。“联邦政府会站在路易斯安那的一边，在她前进的路上，尽全力帮她走好每一步。” [\[44\]](#).

约翰逊此前是一位新政拥护者，此时他提出的“伟大社会” [\[45\]](#). 这一施政纲领也才一年。他认为，联邦政府有义务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且除贫困人口外，受灾人口也应在被救助之列。城市本身也将得到联邦的扶助。从法国殖民时期起，路易斯安那负起了新奥尔良一带的防洪管理的职责。从1965年10月国会通过《防洪法案》（*Flood Control Act*）起，陆军工程兵团就代表联邦政府接手了这份职责，并接受命重建和加强新奥尔良的防洪堤坝系统——一场预计耗时13年的工程。在贝琪被定级为飓风的40年后，飓风卡特里娜汹涌而来，但由于官僚主义作祟、丑闻频发、资金不到位，此时工程兵团的防洪堤坝工程仍未完工。

1969年8月17日子夜将近时，此时工程几乎还未动工，飓风卡米尔就扫荡了密西西比河河口，驱使河水往北倒流，直逼新奥尔良。但这

一次这座城市逃过了一劫。飓风在距离密西西比海岸西南方120英里处登陆了。这次登陆不单是一次冲击，而是一场5级飓风的重击。大风刮倒了风力计，风速可能达到每小时175英里，也许更快。没人知道确切的数字。

罗伯茨又一次箭无虚发，准确预测了卡米尔的路径。卡米尔发端于非洲西海岸的热带风波扰动，它穿过大西洋，运行到古巴以南、开曼群岛以西时发展为飓风，随后通过尤卡坦海峡进入了墨西哥湾。此时负责报告飓风路径、发布预警和警告的联邦部门是国家飓风中心，它在迈阿密设立了分中心，于是从这个无窗的分中心办公室里，他们对沃尔顿堡海滩以东的佛罗里达狭长地带发布了飓风预警。沿岸的数千居民在用木板封住自家房子后撤离了。

罗伯茨是另一种说法：卡米尔将袭击密西西比。揭晓真相的前一天，8月16日，国家飓风中心将对佛罗里达的预警升级为警告。第二天早上，终于，中心对比洛克西提出预警，但还不是警告。此时在西边的帕斯克里斯琴，警长杰拉尔德·佩拉尔塔（Gerald Peralta）带着他的一小队警员在街上敲门，敦促居民撤离。他们大多并不愿意，坚持说他们的老房子在内战前就经受过了飓风考验，或说他们的房子是钢架结构，可以抵挡住任何风暴。黎塞留公寓（Richelieu Apartment）的住户们就是这么说的，只不过，建在沿海的90号公路边的这座公寓，墙内是木质结构，里面除了木条什么都没有。

17日晚上6：00左右，佩拉尔塔警长看向海峡对面黑暗中的海湾。“水面平静，平静得不能再平静了，”他说，“但越过它，你能看到黑暗正在走近。”一艘拖网捕虾船进入了他的视线，它正驶向被认为是安全的停泊处，尾流渐渐消散在海面上。[\[46\]](#)

另一边，沃尔顿堡和德斯坦的人们正等着卡米尔撞向他们的前门。但就在子夜前一刻，它在轰鸣声中登陆了197英里以外的密西西比

州韦夫兰市（Waveland），韦夫兰在帕斯克里斯琴以西的两个镇，在飓风中心预测的飓风最西点比洛克西往西32英里。卡米尔直径不大，但风力强劲，是20世纪的第二个5级风暴，引发了不可思议的24英尺的风暴潮。它荡平了三层高的黎塞留公寓（九人丧生），内战前就存在的宅第，还有位于帕斯克里斯琴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47]的一座宅邸——尽数夷为平地。前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的毕沃益尔庄园（Beauvoir）存活了下来，但也遭受重创（此后会有一场全国范围的资金筹集活动为其筹款修缮）。美国90号公路上发现了一艘燃油驳船；海滩上三艘远洋货船紧挨在一起，像是抱团的鹅群。飓风在船岛上劈开了一道峡湾，当地人将它称为卡米尔切口（Camille Cut）。

卡米尔飓风30周年时，纳什·罗伯茨当时在比洛克西。他剩下的头发修剪得整齐，已经全灰了；脸更圆润了，下颏也输给了地心引力。此时的他81岁，人生还剩下11年。他在那里做演讲，回顾卡米尔。外面，海岸高速路传来闹哄哄的行车和施工的声音。当年卡米尔留下的废墟早已被清理掉，现在正在重建。罗伯茨已经退出了电视节目，但在飓风进入海湾球场时，他还是会受邀回来打这场球赛的四分卫。比洛克西的观众听得入了神，在他离开前，他给他们留下一个清醒但无法想象的建议，这个建议来自最好的风暴预测员，一个穿越过风眼的人——无论是字面意思，还是隐喻。纳什说的是什么？“如果说我们能从这一切中得到什么，那就是去北方——远离大海。”^[48]

在卡梅伦堂区，睡梦中的罗瑞塔·弗劳尔斯被奥德丽的风声吵醒不久，她住在隔壁的叔叔婶婶就带着三个婴儿过来了。所有人都聚在收音机旁，就在这时，停电了；他们看向门外，海浪越来越近。是时候按计划行动了。他们在一块长木板上放上淡水和食物，然后陆续从后门离开，此时从海湾涌出来的水已经有齐膝深，他们迎着吹向人行道的风雨，带着木板涉水往谷仓走，水越涨越高了。一到谷仓，他们马上爬上阁楼，将他们的食物高高举起。他们刚才离开家现在已经

离开地基，正浮在水上慢慢打着转，就像堪萨斯龙卷风时多萝西家被卷上天的房子一样。谁也不知道谷仓能不能顶住，如果它可以，它又够不够高来保证他们的安全呢？“我们把手指穿过阁楼的地板，它可以碰到水。” [\[49\]](#)

年轻的沃尔特·卢瑟福（Walter Rutherford）的家也从地桩上溜走了，和其他无数人的房子一样。卡梅伦堂区变成了一条漂行着很多木房子的公路。它们中有些在水浪的冲击下解了体，有些成了碎片，有些还保持着完整，但也被水浸透了。房子不见了的时候，沃尔特的祖父母失踪了。“和我们一起的婶婶和叔叔，他们消失在了水里，”他回忆说，“一个婶婶和一个表亲还有一个小女孩，他们消失在了水里。”沃尔特和他的一个表亲设法爬上了房顶。大水将他们的临时救生艇推向了一棵橡树，他们爬了上去。等他们在树上停稳时，屋顶已经没了踪影。“就我们所知，我们是最后剩下来的两个人了。” [\[50\]](#)

折磨还没有结束。雨点落在身上，“就像有人拿着空气枪打在你身上一样。实际上，它让我背上起了水泡”，所有人回忆起来都这么说，同样的撕裂感和刺痛感，不是被空气枪就是被石头打在他们的手臂上、脸上和太阳穴上，像不久前在战俘集中营里受到的那些酷刑。他们无法忘记咆哮的狂风，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你已经无法思考。沃尔特不知道自己还能在树上待多久。“我撑不了太久，”他对自己说，“我的手臂要掉下来了。”他看向脚下的水，它在“打旋、翻腾”，碎片残骸组成的鱼雷在里面穿插而过。“我说，唔，你知道吗，我可能还能再撑五分钟再松手。” [\[51\]](#)

吉米·特拉汉也正在为宝贵的生命死撑着，他的小手缠在他父亲的皮带上，他们的性命都被押在了他父亲紧紧攥着的一株高草上。强劲的水浪试图将他们冲散，“他们”指的不只是父亲和儿子。“我妈

妈扯着爸爸的皮带，她还带着我妹妹。”然后皮带断了。“事情太坏了。” [\[52\]](#)

杰里·富尔斯家客厅的落地窗碎落后，全家人都知道他们最后的避难出路就是离开这里。的确是这样，于是他们所有人都抓着一台漂在水上的冰箱。

风暴伏击了吉内瓦和D. W. 格里菲斯。他们在凌晨4:00醒来，外面还是相对安静的。格里菲斯偶然间打开房门，被吓得一哆嗦。他们在睡觉的时候，海水已经涨上来了。海风将海湾推得比沼泽的草地还要高，海水在风暴到来之前已经涌上了陆地。他们的房子成了一座海岛。更糟的是，海水已经深入内陆超过一英里，把所有的道路都切断了。“我的天啊，吉内瓦，”他说，“我们像老鼠一样被困住了。”他涉水走到仓院，放走了那些紧张不安的动物，它们已经感觉到了危险。风依然挥着它的鞭，毫无疑问水还会涨得更高。 [\[53\]](#)

回到家中，全家人都跪下祈祷。说完“阿门”后，他们很快就站在了一路上涨的水里。格里菲斯在厨房天花板上钻了一个洞，一家老小赶紧爬上顶楼，包括爷爷奶奶。地上的所有家具都被冲出了房子，排在房子门口，就像牛群在赶牛槽里移动一样。浴缸紧随其后。水涨到了石膏天花板上，将天花板溶解了。然后格里菲斯在屋顶钻了一个洞，全家人又爬到屋顶上，抓住一切他们可以抓住的东西。现在天已经亮了，放眼望去，四面八方都是无边无垠的水。只有树顶和电线杆顶还能戳出水面。谷仓也已经看不见了。

然后他们的房子坍塌了，格里菲斯一家漂浮在屋顶上。屋顶被冲进他们家后面的树林，于是他们爬到了树上。他们这一带的风暴潮会在掀起14英尺的浪头后才退去。一阵不断向前推进的海浪席卷而来，他们屏住了自己的呼吸。格里菲斯的父亲在一棵较矮的树上，他挣扎后放了手，便消失在水里不见了，直到格里菲斯几天后在陈尸所辨认

出他的遗体。吉内瓦顶着骨折的脚踝强撑着，她是在屋顶撞到一棵树时受伤的。更糟的是，她被一条毒蛇咬了。

直到那天下午4：30，狂风和大水才开始有减退的迹象。下方的屋顶浮现了出来，格里菲斯一家爬下来。有那么一刻，吉内瓦问格里菲斯他觉得救援会马上赶到吗。“我不相信有人会知道，”他说，“我想剩下来的只有我们了。” [\[54\]](#)

他们在夜色降临前得救了。还有其他几个人在6月的这场风暴里活了下来，但几乎没有谁躲过了丧亲之痛。谷仓和罗瑞塔·弗劳尔斯一家奇迹般地挺过了风暴。沃尔特·卢瑟福尽管手臂疼痛，但还是坚守在了树上。杰里·富尔斯和他的家人也幸存了下来，除了他的祖母，她没有抓得住冰箱。吉米·特拉汉和他的弟弟基思逃过了死亡，但他们的妈妈和妹妹被发现在水塘里，她们的手还紧紧抓着草秆。活下来的劳拉·迪普伊失去了她名叫琼（June）的三岁女儿，在这场少有的发生在季初的6月（June）飓风里。

人们的亲身经历读起来常常像是在盘点失去和悲伤。“我的祖母和祖父被淹死了，”本尼·韦尔奇（Benny Welch）说，“还有她的弟弟、弟弟的妻子和六个孩子也淹死了，我父亲的兄弟和他的妻子淹死在了邻屋，住在他隔壁的妹夫淹死了，和我待在一起的朋友和其他三个人——他的祖父、祖母和他的曾祖母——他们都淹死了，还有住在南卡梅伦小学对面的那家人全都淹死了。每一个人。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被淹死了。” [\[55\]](#)

在比洛克西和帕斯克里斯琴之间的密西西比海岸，离峡湾还有100多英尺的微微倾斜的坡地上，生长着一株快500岁的榲桲树。在第一批西班牙人来此勘察海岸时，它就已经是一棵茁壮的大树了，但不知怎的，它躲过了斧头和锯子，没有变成造船的木材。有人曾经把这棵古树叫作友谊之榲。这名字从此就叫开了，人们说分享了它的树荫的人

就分享了一生的友谊。卡米尔将每片叶子都刮落了，但这棵古老的大树无惧高龄活了下来。它向外生长出的巨长无比的枝干，弯扭曲折得像患了关节炎般走了样，但是它的柔软和弹性使它最终萌发绿芽，又长出了一片绿荫。橡子落在地上，这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在卡米尔过去的头四年，志愿者们取了十万棵友谊之榲桲进发的枝芽，将它们种在了从帕斯卡古拉一直到韦夫兰的海岸上。这些志愿育木专家在传播的，是美丽，是荫庇，甚至，就像路易斯安那的那株保护了格里菲斯一家没被飓风奥德丽冲走的榲桲树，它们是救命的树。但随着海岸上人口结构的改变，这些志愿者很可能看不到它们的再生了。

当格里菲斯和他的家人仍在他们各自健壮的树上时，格里菲斯对吉内瓦保证说：“如果我能活着爬下这棵树，我会在我和卡梅伦堂区之间的几英里路上都种上这种树。”他没有遵守诺言。他回来后在厚重的、经过木馏油防腐处理的墩柱上建了一所房子，房子建在地脊上，比地面高出一层。他还在树上时，就发现退水时地脊是所有陆地中最先露出水面的。[\[56\]](#)

其他人，包括吉内瓦，则哭喊着拒绝并祈祷，说他们永远不要再住进卡梅伦。但他们食言了，包括吉内瓦。起初人们离开了，但卡梅伦的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反弹，并在2000年达到高峰，拥有一万人口，比50年代的人口数量多出了60%。然后在2005年，卡特里娜过去两周后，飓风丽塔（Rita）来袭，一切又回到了奥德丽时期。在格里菲斯一家居住的榲桲木林一带，共有35座房屋，只有4座抵御住了180英里时速的大风和17英尺高的风暴潮。其中一座便是格里菲斯盖的那所。他在1972年去世，他的儿子莱斯利现在住在里面。奥德丽过去后，他便放松了警惕，将底层变成了居住空间。丽塔将它掏空了，毁掉了主楼里几乎所有的东西。莱斯利和家人搬到了房子旁边的一辆联邦紧急

救灾房车里，然后开始重建。“我别无选择，”他告诉正在为飓风奥德丽撰稿的凯茜·波斯特（Cathy Post），“我不能离开我的房子和土地。”[\[57\]](#)

约瑟夫·布德罗，《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里的那位卡津男孩，在年近70岁时，失去了他的房子。两周前，他和妻子刚为家里铺上了新地毯，在风暴来袭时，新地毯上化学剂的味道都还未退去。风暴过后，他们也成了住在救灾房里的难民，2006年末在接受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研究生们的采访时，他们正住在他们儿子的地产上。这对夫妻说他们对未来不确定。“以我们的岁数再回去盖房子不太可能了，”约瑟夫承认说，“在某个地方有个[飓风]正等着我们。”卡梅伦堂区有31%的居民在飓风丽塔后选择不再回来。[\[58\]](#)

格里菲斯和布德罗在这个堂区扎下了深根，对这片土地有着纯粹的依恋。但搬到哈里森郡（Harrison County）的数千新移民则不然，哈里森郡是密西西比州海岸中部的一个行政区。由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部分委办的一份卡米尔飓风灾后报告指责当地的重建工作追求

“盲目的人口增长，而不关心如何减轻灾害风险”。看起来人们没有远离让他们受伤的地方，反而反其道而行。这似乎违反常识，但人口增长是新生的重要产业，当地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就像卡米尔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像纳什·罗伯茨说过的那样，“放手去吧”。灾害发生一年后，哈里森郡的人口达到了13.5万人，和过去十年相比有增无减。2010年，其人口达到了18.7万人。[\[59\]](#)

其中的主要推动力源自赌场赌博的合法化。州法律对赌博的合法化建立在一个具有讽刺性的条件上：赌场需要漂浮在水上（一个应对联邦向大陆赌场征税的策略）。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博彩业像风暴潮般涌入这里。巨大的豪华赌场巧妙地开设在近岸驳船上，带动酒店房间和独户住房数量增长到从前的三倍。两倍于前的旅游业收入向比

洛克西砸来，人们将这种新经济称为密西西比奇迹。市长A. J. 霍洛韦（A. J. Holloway）总爱讲起从前不起眼的每年接待18.5万人次旅客的地区机场，是如何成长为年吞吐量破百万的新航空枢纽的。

多年来的确有所改进的是事前准备和疏散工作。气象预测和通信技术在不断提高，风暴追踪交由国家飓风中心集中负责，再加上公众施加的压力，天气预报员们都开始加入纳什·罗伯茨的队伍。专家们宁可因过于谨慎而出错也要呼吁疏散。如果说人们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他们知道了要在危险到来前离开。当丽塔侵袭路易斯安那时，卡梅伦堂区几乎已经没人留在那里迎接它了。到20世纪末，飓风带来的死亡人数要比从前少得多。

但美国人依然在路上，他们盲目地往飓风季里驶去，倒不如当个西班牙宝船的水手。大概从奥德丽到卡特丽娜的这段时间，美国海岸人口增长了70%，其中以飓风带人口增长为最多。海湾沿岸人口飙升了150%，达到1400万人。为了安置这些迁移人口，更多的房屋、商家、购物中心、饭店和杂乱无章的基础设施需要被建造。住宅单元的数量猛增了246%，是全国增长速度的两倍。建筑是文明社会最昂贵的装备，暴烈的海湾天气预示着它们的毁灭和重置，让人脑海中不觉浮现出西班牙的黄金倾洒在海床上的画面。美国损失最为惨重（考虑通货膨胀后）的前十大飓风中，有八次发生在2000年后。七次发生在海湾，冲击着这个一心要建造、发展、定居、再建造的社会。[\[60\]](#)

[\[1\]](#) *All Over but to Cry*, directed by Jennifer John Block (Fresh Media and National Hurricane Museum and Science Center, 2009), DVD.

[\[2\]](#) Joseph Conrad, *Typhoon* (Doubleday, Page, 1908), 186.

[\[3\]](#) Barry Keim and Robert A. Muller, *Hurricanes of the Gulf of Mexico*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 These frequency numbers come from Eric S.Blake and Ethan J.Gibney, “The Deadliest, Costliest, and Most Intense United States Tropical Cyclones from 1851 to 2010, ”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Technical Memorandum, NWS NHC-6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August 2011) , 21.

[5] 辛西娅·巴内特：《雨：一部自然与文化的历史》，张妍芳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译注

[6] Cynthia Barnett, *Rain: A Na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 (Crown, 2015) , 21.

[7] Loretta Koonce Flowers, quoted by lawson at BeaumontEnterprise.com (“Memories of Hurricane Audrey”) , June 27, 2007, <http://beaumontenterprise.activeboard.com/index.spark?forumID=908866&p=3&topicID=12394316>.

[8] “WWL-TV Meteorologist Nash Roberts Dead at 92, ”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December 20, 2011.

[9] Flowers, quoted by lawson at BeaumontEnterprise.com.

[10] *All Over but to Cry*.

[11] *All Over but to Cry*.

[12] Mrs. John R.Smith, “My Battle with Audrey, ” *Personnel Panorama* 6 (July–August 1957) , quoted at “NOAA History, ”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http://www.history.noaa.gov/stories_tales/hurricaneaudrey.html, accessed spring 2014.

[13] *All Over but to Cry*.

[14] Cathy C. Post, *Hurricane Audrey: The Deadly Storm of 1957* (Pelican, 2007) , 120.

[15] 各项数据来源在死亡人数统计上有出入，从390人到大于400人再到大于500人都有。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统计，有至少416人死亡；美国国家海洋和

大气局则说有超过500人。

[16] Stephen Crane, *Stephen Crane: Prose and Poetry* (Penguin, 1984), 709.

[17] Gary Cartwright, *Galveston: A History of the Island*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1.

[18] Keim and Muller, *Hurricanes of the Gulf of Mexico*, 8.

[19] “Galveston Still Healing 5 Years after Hurricane Ike,” *Texas Tribune*, April 26, 2013.

[20] 这是2013年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科学星期五》 (*Science Friday*) 栏目在谈到飓风桑迪过后的纽约可以从加尔维斯顿借鉴到什么的论调。

“Galveston, Hurricanes, and Sea-Level Rise”, *Science Friday*, 2013年6月15日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21] Phil Scott, *Hemingway's Hurricane: The Great Florida Keys Storm of 1935* (International Marine, 2006) .

[22] Dominic Massa, “Legendary Meteorologist Nash Roberts Dies at 92,” *Houmatoday.com*, December 19, 2010, <http://www.houmatoday.com/article/20101219/ARTICLES/101219492>.

[23] 指在看不清天地线和地标的情况下，飞行员完全根据飞机上的各种仪表指示操纵飞机的飞行。——译注

[24] Lew Fincher and Bill Read, “The 1943 ‘Surprise’ Hurrican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Weather Forecast Office, Houston/Galveston, TX,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http://www.srh.noaa.gov/hgx/?n:projects_1943surprisehurricane, accessed spring 2014.

[25] New Orleans Weather Bureau, “Hurricane Warning and Advisory Number 7 Audrey, 10 PM CST June 26 1957,” Weather Underground, <http://www.wunderground.com/education/audrey.asp?>, accessed spring 2014.

[26] “Forecaster Is Right on Gulf Storms, ” *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1998.

[27] 杜立特空袭 (Doolittle Raid) , 也称为空袭东京 (Tokyo Raid) , 是二战期间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的首次空袭, 行动由美国陆军航空兵中校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 (Lt. Col. James Harold Doolittle) 负责策划并带领行动, 因此得名。——译注

[28] Brian Altobello, *New Orleans Goes to War, 1941-1945: An Oral History of New Orleans during World War II* (1990) , 67-68. On the Pacific fleet’ s frustration with typhoons, see *Command Summary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 Nimitz, USN, Nimitz “Graybook, ” 1 December 1941-31 August 1945*, vol.6, especially pp.2687, 2698, 2919.

[29] 阿兹特克 (Aztec) , 16世纪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前居住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译注

[30] These items were discovered by underwater archaeologists. See a special issue of the *Florida Anthropologist* devoted to the Luna shipwrecks: *Florida Anthropologist* 62 (September-December 2009) .

[31] Herbert Ingram Priestley, *The Luna Papers, 1559-1561*, vols.1 and 2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0) , x xvii.

[32] Herbert Ingram Priestley, *The Luna Papers, 1559-1561*, vols.1 and 2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0) , x x i.

[33] Herbert Ingram Priestley, *The Luna Papers, 1559-1561*, vols.1 and 2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0) , 7.

[34] Thomas Jefferson, *Memoirs, Correspondence and Privat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1, ed.T.J.Randolph (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 1829) , 61.

[35] Hunter S.Thompson, “The Gonzo Salvage Company, ” in *The Key West Reader: The Best of the West’ s Writers, 1830-1990*, ed.George Murphy (Tortugas, 1989) , 209, 211.

[36] John Viele, *The Florida Keys: The Wreckers* (Pineapple Press, 2001), vi, 54-55; Kathryn Hall Proby, ed., *Audubon in Florid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4), 338, 340.

[37] 美国的劳动节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这天放假一天，以示对劳工的尊重。——译注

[38] Ernest Hemingway, “Who Murdered the Vets? A First-Hand Report on the Florida Hurricane,” *New Masses* 16 (1935): 9-10; Jeffrey Myers, *Hemingway: A Biography* (Da Capp Press, 1985), 288.

[39] 这位D. W. Griffith和据称创立了好莱坞但通过电影将种族形象刻板化的那位同名电影导演没有关系。

[40] Post, *Hurricane Audrey*, 68.

[41] 影片*Key Largo*, 通译名为《盖世枭雄》。——译注

[42] “Betsy Lashes New Orleans,” *Chicago Tribune*, September 10, 1965.

[43] “Lloyd’s Last to Feel Impact of Hurricane Betsy’s Winds,” *Chicago Tribune*, December 24, 1965.

[44] Transcript of audio of President Johnson in New Orleans following landfall of Hurricane Betsy, September 10, 1965, LBJ Presidential Library online, <http://www.lbjlibrary.net/collections/quick-facts/lyndon-baines-johnson-hurricane-betsy/lbj-new-orleans-hurricane-betsy.html>, accessed spring 2014.

[45] 让美国走向“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是1964年约翰逊总统提出的施政目标，核心措施是向贫困宣战、保障民权和医疗卫生等，其施政理念与前文提到的代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罗斯福）新政”一脉相承，各项立法将战后美国的社会改革推到了新的高峰。——译注

[46] Philip D. Hearn, *Hurricane Camille: Monster Storm of the Gulf Coast*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7), 28.

[47] Frank Lloyd Wright, 20世纪美国知名建筑师。——译注

[48] Dan Ellis, *All about Camille—The Great Storm* (CreateSpace, 2010) , ii.

[49] Flowers, quoted by lawson at BeaumontEnterprise.com.

[50] *All Over but to Cry*.

[51] *All Over but to Cry*.

[52] *All Over but to Cry*.

[53] Post, *Hurricane Audrey*, 91.

[54] Post, *Hurricane Audrey*, 152.

[55] *All Over but to Cry*.

[56] Post, *Hurricane Audrey*, 298.

[57] Post, *Hurricane Audrey*, 298.

[58] *Revisiting Flaherty's Louisiana Story*, produced by Patricia A. Suchy, James V. Catano, and Adelaide Russo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2006) , DVD.

[59] Roger A. Pielke Jr., Chantal Simonpietri, and Jennifer Oxelson, *Thirty Years after Hurricane Camille: Lessons Learned, Lessons Lost*, Hurricane Camille Project Report (1999) , 14.

[60] Steven G. Wilson and Tomas R. Frischetti, *Coastline Population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0 to 2008*,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US Census Bureau, 2010) ; Blake and Gibney, “Deadliest, Costliest, and Most Intense.”

第四部分 饱和与失去：1945年后

十四 扩张的海岸



1983年马可岛上的公寓。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被称颂的西南佛罗里达红树林海岸已经变成了一片发展中的海岸，房子、酒店和公寓大厦，只用了不到20年时间，便将至关重要的自然植被取代了。

mangrove（红树林）

名词

起源于17世纪10年代，当时拼作mangrow，可能源自西班牙语的 *mangle*。

Mangle（压坏；扭伤）

动词

礁岛群的老海螺们^[1]过去常说：“飓风一刮，红树林里藏。”这种只向最猛烈的风暴低头的长腿植物，拥有保护和塑造一片海岸的力量。自然学家阿奇·卡尔（Archie Carr）曾沉思说：“实在无法想象没有红树林存在过的南佛罗里达将会是什么样子。”^[2]

红树生长在水边。它们是大陆的前线，是潮间带的哨兵。它们对盐水和含盐环境的容忍能力让它们在所有树木中独树一帜。证据就是从它们的叶子上渗出的含盐晶体。

和人类一样，红树林也在不知停歇地扩张。它们夺取领地，发起猛烈攻击，并实现统治。当地人把红红树叫作“行走的树”，指的是它们长长的支柱根。这个名字也恰当形容了它们快速的繁殖速度。它们的幼苗可以顺着洋流漂到数千英里外的新海岸，或者漂到附近的浅滩，在那里扎根，长成一片茂密的岛屿。黑红树常会在这时加入它们。“沧海变桑田，”蕾切尔·卡森惊叹着写道，“近乎发生在你的眼前。”^[3]

红树林创造的热带森林没有惊人的高度，但它密密匝匝，引人瞩目，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库欣写道，“让人根本看不见里面的轮廓”。它们的树冠又低又重，树叶的重重遮蔽下是扎入湿地的杂乱根系。它们纷杂缠绕，让人无法轻易通行。^[4]

“怪物。”一位对红树林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的科学家如此形容它们。可能他当时在读《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5]。康拉德的查尔斯·马洛称红树林是“扭曲的”海滨入侵者，林下叶层的守护者，“腐烂为泥……堆积成淤”。马洛沿着刚果河披荆斩棘，进入异族腹地，在那里找到了病重的库尔茨，库尔茨的无端残暴代表了丛

林深处的阴森恐怖。“那些红树林，”马洛说，“极尽扭曲之态，仿佛在告诉我们它深深的无力和绝望。”^[6]

历史上，人类对红树林的存在感到失望。在海湾上，它们是在土著人民和从大海来的征服者们之间竖起的一道护墙。它们让想在陆地和大海间画下清晰界线的早期地图勘绘人焦头烂额。它们曾经是，也会一直是咬人凶狠的虫子的恼人栖息地。

生态学的真相是，红树林其实是有着奉献精神的树种。它们古怪的根系能帮助平缓潮汐，接收被冲刷上来的沉积物，建立海滨线。它们的树林是河口生命的供养者和保护者。佛罗里达红树林里居住着18种哺乳动物、24种爬行动物、181种鸟类和220种大小不等的鱼类，其中包括伊氏石斑鱼，头5~6年的幼鱼与红树林密不可分。它们还是为跨海湾迁徙的候鸟提供休息和补给的中转站，包括濒危的巴巴多斯黄林莺。

海湾的红树林早在庞塞·德莱昂到来前的200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卡韦萨·德巴卡在得克萨斯看到了它。西德尼·拉尼尔在锡达礁瞥到过一眼红树林，那里是这些热带树种在佛罗里达能到达的最北端。威廉·哈尔西·伍德在钓到据记载是第一条大海鲢时，环绕在他周围的就是萨尼贝尔岛附近的红树林。库欣在马可岛上的红树林边挖手工品。罐罐旅行者在它们的荫翳下扎营。从霍莫萨萨泉到基韦斯特一带的红树森林在美洲没有对手，即使放眼全球也属罕见。

在萨拉索塔过退休生活的美国合众社前主席，卡尔·比克尔（Karl Bickel），他的一本描写当地生活的书，让红树林海岸（Mangrove Coast）这个名字流行了起来。他的书写于1942年，也就是说当时他身边有足够多的本地树林为他提供灵感。但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太久。比克尔称红树林是“统治了海岸的工程队”。这恰是那些南下到这里的人将会带来的问题。就在比克尔的书出版后，他们到

这里大搞建设，取代红树林统治了这片海岸。就像不以为意的查尔斯·马洛，他们对潮汐森林所做的地理和生态服务悲剧地给予了漠视。[\[7\]](#)

蕾切尔·卡森在1955年写作《海滨的生灵》时，她好奇“红树林海岸的未来是什么？”她感觉到了战后美国正在集结的步伐。也许她已经看到了泥浆四溅的推土机，听到了末日般的拉铲挖土机吃力的拖曳声。[\[8\]](#)

那一年，就在卡尔森展开调研的地方，机器已经准备就绪，它们将在圣彼得斯堡开始两项私人的疏浚堆填工程。发展商们经常从海湾底部打捞起沉积物，然后将它们堆填在陆地边缘，以此来扩大他们的房地产领地，有时能造出数百英亩的新土地。不管在哪里，当他们想要更多的滨水区时，他们就叫来推土机和链锯，将红树林不加选择地清理干净，然后叫来疏浚机建造新的陆地。在二战结束后的繁荣年代，随着扩张的野心与日俱增，机器拔除天然植被发出的声响也越来越大。

1955年也是让陆地建造商大为震惊的一年。以往他们发展滨水区的常规操作现在面临反对。针对圣彼得斯堡的博卡谢加湾的一项工程计划，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与佛罗里达州州长委托机构进行了生物学调研。州长希望让机器就此息声，这在一向迷恋发展的佛罗里达，以及海湾沿岸，都是闻所未闻的。

多年来，发展商们的得寸进尺已经没有什么大不了。州府总是在一开始就给足了他们“一尺”。1856年，立法者通过了《河岸法》（*Riparian Act*），承认土地所有者堆填沼泽地的特权。他们在1921年经济大繁荣期间修订了法案，将这项特权扩展到了潮间地，称“滨水房地产〔应〕得到推进和发展”。所有水下土地由州政府所有，由

委员会控制，委员会由州长和内阁官员组成，他们急于将这些土地卖给私营企业，而私营企业会将其改造成干燥而有生产力的土地。[\[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佛罗里达掀起了另一场建筑大潮，这一次除了卖沼泽地，更多的是卖湾底。帕斯科郡（Pasco County）为了拓展土地开发，将其边界向海湾延伸了两英里。创造新的土地只需走一个简单的程序：“你就去〔州府塔拉哈西〕，想挖多少就给他们多少钱，”说明是开发公司的代理人，“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个许可证。”报纸的各大头条宣扬报道了经许可的结果：湾底沙地助力佛罗里达银色海岸；如何打造一座全新岛屿；海滩计划疏浚工程即将启动；红树沼泽低地摇身变成“岛屿天堂”。[\[10\]](#)

艾伯特·富伦（Albert Furen）紧随1953年的协议而来。虽然他在圣彼得斯堡只拥有博卡谢加湾上六英亩的红树林海岸，但已经足以让州委员会批准他购买和堆填504英亩的湖湾。获得最终的放行信号还需通过派内拉斯郡（Pinellas County）的委员们，但他预计得到他们的许可不成问题。当地开发商已经制造出了37英里的人造滨水带，这些委员从来没有驳回过一个堆填计划。

博卡谢加湾是坦帕湾湾口外的一处潟湖状湖湾，毗邻圣彼得斯堡大陆和长礁岛，当年托马斯·罗伊的唐·恺撒酒店正是建在长礁岛上，博卡谢加湾是水下花园之所在。如果你还看不出这是自然的馈赠，那你肯定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生物。红红树和黑红树围拢着38平方英里茂密的泰莱草。就在富伦向塔拉哈西申请许可的那一年，博卡谢加湾为派内拉斯郡贡献了超过160万磅的捕捞量，占全郡的40%，而派内拉斯郡的出产量本就是佛州各郡的翘楚。海湾边上25家鱼饵店散发出的刺鼻味道，足以宣告它在游钓爱好者中的受欢迎程度。

就在富伦等着派内拉斯郡批文下来的时候，一组由当地市民组成的联盟试图阻挠这个开发计划。他们有《圣彼得斯堡时报》发行人纳

尔逊·波因特（Nelson Poynter）作为后盾，他们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同盟。一来，他的报纸有影响力；二来，他住在博卡谢加湾边，这么多年来他已经看到各个堆填工程将他的落日景观抬得越来越高。其中充斥着令人不适的自相矛盾，表面寓意美好的名字，比如天堂岛、卡普里岛和棕榈岛，背后却是一度清澈的海湾被开发商弄得黯淡、乌七八糟，给渔业和鱼饵店的生意带来威胁。在蕾切尔·卡尔森为其《海滨的生灵》在红树海岸（Mangrove Coast）上调研时，波因特和她见过面，并从她那里了解到了河口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将此传递给了他的读者们。

派内拉斯郡的半岛周围有如此多的湖湾和潟湖，以至于居民们已经习以为常。同样地，鲜少有人能意识到所有这些人造陆地正在使海洋生态走向枯竭。堆填工程的唯一缺点“就是影响了‘景观’之类的”，一位急于扩张的滨水区业主说，仿佛她在直接和波因特对话，但“因为所谓景观也就是〔泥〕滩和红树林，所以我们并不觉得改变它会是一个损失”。[\[11\]](#)

然后，富伦申请表上的墨水还未干透，第二份堆填申请就被递到了委员们的案前。底特律的开发商海曼·格林（Hyman Green）和欧文·格林（Irving Green）申请开挖900万立方码的博卡谢加湾，并将15座“低贱的红树”岛屿连成一片大陆。其中包括鲐鱼礁，具有历史意义的德索托堡便在其上，战士们曾经在那里用啤酒和葡萄酒抵御蚊虫的袭击。兄弟俩将公司命名为绿地公司（Green Land Company），开发的这片土地叫蒂拉佛得（Tierra Verde）[\[12\]](#)，灵感来自他们的姓氏，而与陆地植被无关。波因特的报纸称湖湾面对两重榨取，“令人忧虑”。派内拉斯郡居民要再一次为郡政府“错误的规划理念”买单。[\[13\]](#)

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与佛罗里达州的资源保护局（后者由州长领导，成立于人们大肆猎杀鸟类的年代）发起一项研究，考察这两个项目对生态的潜在影响。这是首次在佛罗里达和墨西哥湾上将科学研究用于控制发展。这无论在哪里都是罕见的，它是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前身，环评报告将在20世纪70年代在环保局的推动下成为一项惯例。

研究由迈阿密大学已退休的海洋生物学家罗伯特·赫顿（Robert Hutton）带领。多年来，圣彼得斯堡任意排放污水，赫顿及其团队在他们的报告中写道，导致海湾多处“污染严重，污染物带有典型的人类肠道有机物的特点”。同时，陆军工程兵团也正在对海湾造成巨大伤害，他们为修建近岸内航道（Intracoastal Waterway），开掘了一条15英尺宽的河道——河道太深，水体浑浊，光线难以穿透，导致海草生长困难——并将弃土堆在数百英亩的生物栖息地上。越来越多的疏浚堆填将“导致鱼类和野生动物数量大幅下降”，科学家们总结道，并将损害当地每年带来60万名游客和1.5亿美元的旅游业。[\[14\]](#)

不管研究结果如何，派内拉斯郡委员会一如预期，批准了富伦的申请。州长勒罗伊·柯林斯（LeRoy Collins）随后提出诉讼，要求撤回州政府的许可。“到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他问道，“当地的郡政府才会叫停更多的博卡谢加湾的堆填工程？”柯林斯上任时，州政府已经将富伦的湾底地块卖了出去。时年45岁的柯林斯，头发浓密，是一个激情四射的淡水垂钓爱好者，他出生于相对不那么发达的北佛罗里达，与波因特和《圣彼得斯堡时报》一样，他对批文核发之快速持悲观态度。[\[15\]](#)

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有环境感受力的州长实属罕见——在美国南部就更是不存在了。也许柯林斯并不是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但他说过，自然馈赠是否受到保护，佛罗里达州“比任何地方都要更与之休

戚与共”。当时，生态科学才刚获得承认，成为美国大学里的一门正式学科，但柯林斯已经拿着赫顿的研究报告上法庭，试图阻止所谓疏浚填土、造福大众的工程。他不是控诉对方违法许可程序或区域划分，而是控诉它破坏环境。[\[16\]](#)

那时富伦已经将他的土地和湾底疏浚许可证卖给了伦纳德·拉特纳（Leonard Ratner），拉特纳是芝加哥的杀鼠剂制造商，身家千万，一直在寻找合法的避税手段。拉特纳雇用的律师是以抓捕共产主义者闻名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前副手，这位律师的攻击性可想而知。在法庭上，赫顿作为证人，接受了拉特纳的律师对他可信度、胜任度和工作能力的质疑。虽然镇定的赫顿证明了他的正直，但初级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裁定拉特纳有权推进和发展他的滨水产业。接下来，州最高法院拒绝审理此案。派内拉斯郡也批准了格林兄弟的申请，这两项工程被启动。

挖掘出来的填埋土壤可以以一英尺的深度覆盖纽约的一条四车道高速公路。博卡谢加湾失去了一半的海草草甸和一半的红树林。好几个岛屿的草甸和红树都损失殆尽。开发商将海湾变成了市郊，上面的房屋和高层公寓紧挨在一起，阳光也只能侧身于其间。新建的土地在海湾下游，它就像一个塞子，收紧了水流的循环和流动，留下一片被污染的死水——几乎不值得在这里扔下一根渔线或渔网。商业渔民和饵料商铺纷纷离开。波因特的报纸说，自以为高明的短视“毁掉”了这片海湾。[\[17\]](#)

但湖湾的捍卫者们终究还是获得了一次胜利。波因特和《圣彼得斯堡时报》成功说服委员会将鲮鱼礁划为郡公园，保护了德索托堡——这座原意是为了保护文明进程的墨西哥湾堡垒。

1957年，正当挖掘机日夜不停地在博卡谢加湾轰鸣搅动的时候，柯林斯将一份关于改革审批程序的水下土地法案提交给了立法机关。

法案在延时会议上被提出，对原有法案做出了大量修订，以至于它几乎没有对传统操作进行任何改变。

这对杰克（Jack）和伦纳德·罗森（Leonard Rosen）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就在那一年，他们的社区破土动工，社区经过总体规划，占地103平方英里，位于南边的迈尔斯堡附近，是大海鲢的故乡，在一片红树密林的后方。兄弟二人正在打造佛罗里达的郊区。这意味着那里将以经过检验的莱维敦^[18]为蓝本：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宅地，简单重复的建筑式样，低廉的价格。但他们不像纽约的社区和在战后涌现的无数效仿者，罗森兄弟并不是为朝九晚五同时抚养着三四个孩子的都市通勤一族考虑的。

罗森兄弟四处广告，大吹大擂，将目标瞄准在已退休、半退休和季节性的追寻天堂般惬意生活的住客身上。罗森社区除了标准化的设施外，还将有来自大自然的舒适：温暖的天气、灿烂的阳光和惬意的垂钓。杰克和伦纳德加入了新的元素，“尽我们所能，满足你最想要的梦”。自然并没有完全满足他们，于是他们将自己动手创造一个。他们承诺每一处房子都将要么坐落于水畔，要么能观赏到水景。也就是说，那一片红树密林，需要消失。^[19]

最终，兄弟俩也许做错了很多事情，但他们把握住了对的时机。1950年，佛罗里达的居住人口不足300万。20年后，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700万。国内只有内华达州的增速高于佛罗里达。婴儿潮让全美国的人口数量都在上涨。但让阳光之州人口大增的与其说是新生儿潮，毋宁说是新移民潮。成年人占了人口的大部分，而且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来自别的地方，其中又以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为主。连发展商也是新移民。而且所有人似乎都是在同一时间迁居至此。史学家将他们的大规模到来归因于有效的蚊虫预防手段（以DDT杀虫剂的形式）和家用空调的普及。州府免征所得税也是一大诱因。

多数人是被吸引到海边来的，开发商承诺会扩建，要为更多人创造更多的空间。红树海岸一带的人口增速超过了佛罗里达州其余的地方，是从前的7倍，人口从60万上涨到350万。它变成了美国海湾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佛罗里达州的住房数量从不到100万增长到了700万；公路的英里数从8000延伸到了8万。随之而来的矛盾现象出现了：土生土长的佛州人抱怨规划者和开发商铺了通往天堂的路，导致越来越多人来到佛州，而那些新移民也抱怨天堂的铺路，导致更新的移民也来了，而更新一代的移民也在抱怨……于是不久，没人知道天堂到底是什么了。

不管人们心中理想的天堂是什么样，西南部的佛罗里达依然有大片未开发的土地可供改造。鲑鱼角（Redfish Point）是克卢萨哈奇河和麦乐西峡湾（Matlacha Pass）交汇的一处荒凉岬角，罗森兄弟打算在上面铺上柏油路。在河流的西南方，是迈尔斯堡和蓬塔罗莎，峡湾的西边坐落着派恩岛。住在岬角上从来不是一件易事。1836年，半岛上的塞米诺尔人受军队管制，被要求在指定居留地生活，他们因此攻击了白人的贸易站和岬角上的堡垒，杀死了14名士兵，并引发了第二次塞米诺尔战争。

国会随后通过了1842年《武装占领法案》，并以此驱逐印第安人。作为获得160英亩授予土地的回报，联邦土地局希望分得土地的定居者对其中5英亩的土地进行清理、围蔽和耕种。它还默认了定居者可以携带武器。为了对付另外一类不同的对手——蚊子——他们中有些人会烧牛粪，牛粪在当地并不难获取。麦乐西牛群公司在25000英亩土地上畜养牲畜，种植了专程从外地进口的百喜草当作牲畜的饲料。

21世纪伊始，百万富翁富兰克林·迈尔斯（Franklin Miles）退居到了鲑鱼角，他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埃尔克哈特，以邮购药品起家，以75美分的单价买下了鲑鱼角1700英亩的土地。他种植了越冬蔬菜、

水果和观赏花卉^[20]。他还运营了一个农业项目，向移民演示如何充分利用这里的沙质土壤。这些移民中有几位有意思的人物，尤其是 W.T. 贝尔文（William T. Belvin）。

贝尔文来自佐治亚州，此前是牧师，丧妻，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鲑鱼角。他们在一件茅草屋顶房住下了，但威廉的女儿认为这样的生活过于原始，搬去了迈尔斯堡与另一家人共同生活——但显然对她父亲来说那里不够原始。1929年，贝尔文离家出走，光着身子走进了丛林，他要证明一个人靠着土地和河口也能生存，就像曾经的卡卢萨人那样。“只是他的眼镜和假牙，”曾经研究过罗森兄弟社区（并在那里长大）的尼克·福尔曼（Nick Foreman）说，“将他和物质社会联结在了一起。”一年后，“狂野比尔”出现了，他特意蓄着大胡子，身上披着西班牙苔藓（松萝凤梨），比此前重了十多磅。^[21]

当罗森兄弟在30年后买下鲑鱼角时，只要愿意，这里的环境依然可以让你成为下一个贝尔文。兄弟俩就此拥有了66000英亩的湿地、松林、狗尾草草原、橡木丛和百喜草牧场，所有土地都如桌子面般平整，间或有几条挖出的马车道或马道，道路不是沙子就是淤泥，或者两者兼有。这里还住着美洲豹、黑熊和穴鸮，它们都是佛罗里达半岛上命运悲惨的“原住民”；红树林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沿着岬角开枝散叶，在岬角颈儿上尤其繁茂。红树滋养着这里的生命，使其蓬勃不息，为在克卢萨哈奇河上垂钓的爱迪生夫妇带去了无数的快乐时光，鼓励着约翰·史密斯船长将他的客人领向麦乐西峡湾。

蕾切尔·卡森关于野生红树林未来命运的问题，大海鲢的渔猎者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他们任其生长，不作干涉。但以众所周知的美国思维看来，大自然欢迎人类的干涉——改进自然，让它变得更好，让它加入文明的行列。即使最美丽壮观的地方也需要完善——驱逐不被接受的生物种群，或补充引入外来的物种。鲑鱼角是美丽壮观的反义

词，它是荒芜的废墟，按现代社会的标准来说，那就是它无法造福多数人。

人们不能坐视这片土地荒废而不理，尤其是在快速发展壮大的战后美国社会，这是无法接受的行为——多么浪费。清掉一些东西，加入一些东西，驯化它，调教它，如此这般，这片草地才可以让除了牛以外的更多人受益。保护当地的生态财富带不来价值提升；而去掉红树林的负累，无论是对提高当地的不动产价值，还是保证杰克和伦纳德获得可观收益，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此看来，狂野比尔的大冒险并不是愚蠢的逞能，而是对荒野自然最后的道别。

杰克和伦纳德的故事恰恰印证了佛罗里达人民普遍的移民出身，他们来自金光闪闪的北方大都市，“老家”——人们如此措辞——在巴尔的摩。罗森的妈妈是俄裔犹太移民，早年丧夫，一边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一边抚养着四个孩子。伦纳德上学上到了六年级；杰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过几门课。他们偶尔会去当推销员，有时在大西洋城的木板路上，有时在嘉年华的狂欢队伍里，有时在郡县的集市上。他们享受向人们推销这个产品或那个服务多么令人激动的过程。他们干这个是一把好手。伦纳德更是为此而生。

很快他们在巴尔的摩开了一家罗森家居设备公司，出售家具和家用电器。他们记起母亲用赊销的方式招揽顾客，便也为自己的顾客提供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此时正值战后住房数量激增，相应需求大增，他们卖出了大量的炉具和冰箱。查尔斯·卡舍尔（Charles Kasher）加入他们后，他们开始推出一款羊毛脂发乳的邮购服务，这款发乳就是查尔斯·安泰尔9号配方（Charles Antell Formula No. 9）。

邮购是传统业务，但电视这个新媒介，让罗森兄弟看到了推介商品的另一种木板路。他们向纽约一家电视台买了便宜的全天节目收播

前的几分钟播出时间，也就是在开始播放国歌、电视画面“哔”的一声跳到印第安人头检验图之前的那几分钟。他们是电视购物的先驱——赚了不少钱。你会看见伦纳德出现在电视画面上，说着“先坐下来”，因为他将“给你讲一个令你头发倒竖 的故事”。有时他们会把米奇·曼托^[22]从中外场叫来当推销员。其他时候他们会用七岁的小演员蓓蒂·杜克（Patty Duke）。她当时是不知名的留着齐刘海的小姑娘，但你知道艾美奖或奥斯卡奖正在路上等着她（她两项都有）。罗森兄弟同样正走向他们事业的巅峰。^[23]

事情是这样的。在棕榈环绕的迈阿密度假时，伦纳德注意到了那里的中介，他们为开发商代理出售分块宅地。他们坐在办公室里等着顾客上门——没有广告语，没有像20世纪20年代在街角吵吵嚷嚷倒卖不动产合同的男孩。伦纳德回去告诉了杰克，于是两人开始合计用电视节目来卖佛罗里达地产。他们先买了州中心附近的八英亩地作为试验，结果伦纳德在巴尔的摩的一家电视台投放广告后，转眼间销售一空。他可以就这样把整个佛罗里达的地都卖了，如果他有的话。

伦纳德出发了，在佛罗里达州四处巡察，买下了一大堆地皮。他有一次坐着一架单螺旋桨轻型机在天上逡巡时，瞥见了鲑鱼角，于是拉上了杰克，与那位药品商富兰克林·迈尔斯的后人展开了谈判。两兄弟在1957年7月成立了桑迪投资公司，把精力都集中在迈尔斯家的地块上。“我不想干其他事，”伦纳德后来说，“就想着……怎么把这块地一块钱买来，十块钱卖出去。”这并不完全是事实。他们买了更多的地，并试图打造一整座城市，里面有街道、电力、自来水、街灯、购物中心、玫瑰园、高尔夫球场、游艇俱乐部——有所有的一切。他们把它叫作开普科勒尔^[24]（Cape Coral）。^[25]

他们正值40多岁，处于人生的巅峰，风风雨雨也经历了不少——包括成功。这也没有阻止他们的母亲说出那句有名的话，她和伦纳德

说：“你建不了一个城市……你连自己房间都扫不干净。”在她这两个儿子中，伦纳德是比较邋遢的那个，但矛盾的是，他有着修剪整齐的发髻，但一副角质边框眼镜却戴得歪向了一边。他没有他弟弟那么注重仪表（他有一次出席商务会议没穿上装就出现了），容易兴奋，冲动，嘴上没有把门的。他是两兄弟中更外向的那个，完美的推销员和谈判者，是做公众演示和媒体采访的主力，虽然满嘴跑火车，有时说话还用词粗俗。他还喜欢玩弄女性，这让杰克感到困扰——杰克有着波浪般的卷发，是一个“贴心的绅士”，一家公司的副主席如此评价他，他话不多，头脑冷静，懂行，总是衣冠楚楚，喜欢系丝质领带。伦纳德在前线披荆斩棘、推杯换盏时，杰克就在后方照管生意，控制他过分的言行，并试着坚持完成伦纳德的好想法。[\[26\]](#)

虽然母亲持悲观态度，但到20世纪60年代，她的两个儿子正经营着全美最大的土地销售公司：海湾美国土地公司。这家公司要做的，是贩卖一个梦，而且是多数人支付得起的梦。这就到了屡试不爽的分期付款计划出场的时候了。他们最顶尖的销售团队喜欢说：“首付20美金，月付20美金，让你在天堂坐拥阳光。”的确，一个纽约邮差的养老金足以让他退隐开普科勒尔，开着一架小摩托艇驶入罗森打造的运河上，身后是罗森出品的10990美元的两居室和1990美元的土地，余生的大好年华尽可用来挥霍在游钓上。河滨地块相对贵些，要3390美元；不在海旁的海景地段只需990美元。

罗森兄弟在游戏节目《价格猜猜看》（*The Price Is Right*）上送房子，广邀社会名流到访，大造声势，其中包括鲍勃·霍普[\[27\]](#)

（Bob Hope）。1961年，平均每天有125对夫妻造访这里。罗森兄弟为他们安排免费的小艇出行、午餐，还有搭乘四座的塞斯纳空中之鹰俯瞰城市的体验。下面寸草不生的土地并没有什么看头。这是天堂吗？哪里？在西边，在麦乐西峡湾、派恩岛海峡和大片蓝色的墨西哥湾在热带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地方。如果你在被承诺的乐园里挑选出心仪的

位置，飞行员会变戏法似的地将一袋白色面粉撒在那里留下记号。而对那些闪烁其词的夫妻，一个有用的策略便是借观赏夺目的海湾落日来拖住他们。截止到当年最后一场落日，罗森兄弟已经售出了28000套宅地。

这些宅地很多还不存在。两兄弟需要用收到的20美元首付款 来让推土机和疏浚机将它们挖出来。他们耗资10万美元买了推土设备和40吨炸药。推土机将那一头炸掉底层珊瑚岩后得到的废土堆填在这一头的湿地上。配备坦克履带的黄色机器将沿路的本地的美洲蒲葵、橡树和松树一一推倒，所到之处基本不留下一棵直立的生物。这是热带，但他们竟推倒了树荫！

为了抬高岬角的地势，机器四处出动，将石灰岩和贝壳碾碎，将成百上千的本土地鼠龟活活掩埋在它们的藏身洞穴里。每月20美元的房子，四周土地贫瘠，房子的主人们无法在上面种草或观赏灌木。多年后，一位野生生物学家将开普科勒尔比作撒哈拉沙漠。“只要风一吹，就尘土飞扬。他们彻底铲掉了覆盖在土地上的每一寸植被。”

[\[28\]](#)

但罗森兄弟坚称，奢侈在于生活在海湾边，享受着充足的阳光和不计其数的消遣娱乐。再说，他们打造的不是绿色小山谷，而是海滨仙境。这就是你不会在上面看见树的原因。除非它们生长在正确的位置上——这是留给大自然的重要任务——否则它们是会挡到海景的。房子被建起来后面临同样的问题。水边的宅地只有这么多，于是罗森兄弟需要制造新的滨水区。他们清除了数千英亩的红树林。“消灭”，是佛罗里达奥杜邦协会的查尔斯·李（Charles Lee）在日后使用的词。他们开挖水道，在水道外侧修上一排防波堤，在防波堤外侧又盖上一排房子。最后，400英里的水道在开普科勒尔中奔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都要多，是意大利威尼斯的两倍有余，是佛罗里达州海湾海岸线长度的一半，比得克萨斯州的海岸线更长。[\[29\]](#)

7000多年来，人们为灌溉和通航而开凿水道，正如在开普科勒尔不远处的卡卢萨人所做的那样。但罗森兄弟的水道并不是航道。它们大部分是短短的侧向延伸水道，从主道岔开，分出密匝的分支，每一道分支尽头都是死胡同。行业里的人们把它们称作手指运河。但罗森兄弟修建的这些河流边界鲜明，有棱有角，又不十分像手指。从高空俯瞰，有些岔道群像梳子的梳齿，有些像叉子的尖齿；其他的，像可以插七或九支蜡烛的大烛台。水边的宅地面积小，后院地方也紧凑；而且因为水道太窄，码头是沿水道一侧而不是向水中延伸而去的。看起来你从自家的码头上可以一步跨到邻居家那边去。别人家后院里有什么活动你当然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你可以沿水道划船到达湖湾或河流，但找路的过程会让你觉得自己像一只迷宫里的老鼠。交通并不是他们的首要考量，毕竟这也不是威尼斯。打造滨水之都才是。

所以在罗森的仙境里，“海旁”在大多数情况下等于水道旁。这便是纽约退休邮差可以支付的生活。但经济的滨水住宅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人工水道的冲洗能力有限，留下了草地化肥和杀虫剂，混浊晦暗的水道环境几乎没有生物可以生存。开普科勒尔被疏浚和重新填埋的每一英里自然栖地，都是从过往渔牧场偷来的手工艺品，而垂钓之乐，是不断涌来的新移民被剥夺掉的又一项视觉和精神享受。

1960年，开普科勒尔的居民有280人。到了1970年，这个数字是11000。20年后，其人口数量将突破十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住在开普科勒尔的原始森林大道的人从未见过狂野比尔见到过的原始森林。住在湖湾大道、珊瑚大道、滨江大道、鸚鵡螺大道上的人们，虽然他们的水泥房子占据的正是红树林曾经繁衍生息的地方，但他们对红树林的生态重要性毫无头绪。此外，住在火烈鸟大道、棕榈树大道、奇基塔大道，还有一切名字庸俗或不那么庸俗的街道上的人们，对罗森兄弟鬼鬼祟祟的商业操作和马虎的挖掘工作，也一无所知。

20世纪60年代初开普科勒尔在商业上的成功，为罗森兄弟积累了财富，接下来，他们买下了柯里尔郡（Collier County）175平方英亩的土地，地块位于大沼泽地内大柏树沼泽的西部一带。这个野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被命名为金门庄园（Golden Gate Estates），最终集聚了800英里以石灰岩为主的道路，183英里的多数情况下不起作用的排水渠——尽管他们将地下水位降低了四英尺而提高了野火的发生概率。1962年，《迈阿密先驱报》曝光了罗森销售队伍的高压战术，第二年，《星期六晚间邮报》刊发了一篇揭露性文章，标题是《土地欺诈》。受邀成为美国商业改进局成员的海湾美国土地公司，被刻画成了蒙人的老手。[\[30\]](#)

所控罪行包括承诺金门庄园到墨西哥湾之间可以通航（一个不现实的提议）以及出售仍在水下的宅地（这在20世纪20年代被讥讽为“土地按加仑卖”）。作为对负面报道的回应，罗森兄弟在《纽约时报》中放了一则16版的煽情广告，似乎一切都是正常的。为了打消华尔街和股票投资者们的顾虑，伦纳德报告说公司1965~1966年度的销售合同签订量比上年度增加了32%，总销售额1.11亿美元，净利润超过1300万美元。《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称：“[佛罗里达现在的]土地热潮和20世纪20年代空中楼阁般的土地热潮不同，现在的热潮有稳定的地产开发公司作为支撑。”稳定的公司之一，《芝加哥论坛报》说，就是海湾美国土地公司。[\[31\]](#)

《芝加哥论坛报》还不如说芝加哥小熊队稳定。这只棒球队在当赛季输掉了64%的比赛，在全国棒球联盟中垫底。在佛罗里达，海湾美国的顾客满意度则在所有地产销售公司中垫底，该州接到的投诉中有64%要算在它头上。佛罗里达土地销售委员会派出了暗中查访的便衣，从汽车后备厢里录下了推销说辞，于是海湾美国被控存在销售欺诈，包括透露关于房产地点、价值和未来增值空间等误导性言论；未经州

府许可将土地二次划分；秘密将已出售宅地与七英里外的调包（多达1300户），以及未向买家出示不动产报告。

1967年，委员会令其从12月10日起暂停销售30天。海湾美国土地公司认罪并接受罚款。然后罗森兄弟改了主意。他们上诉到法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赢了。其销售额先是飙升，随后又迅速跳水，因其被控恐吓州长克劳德·柯克（Claude Kirk）的事件浮出水面。1968年7月，伦纳德辞去了公司主席一职，称今后将致力于慈善事业。兄弟两人将他们的公司卖给了通用承兑公司，售价超过200万美元。杰克和伦纳德各收到10万美元现金和约6300万美元的通用承兑公司股票，两人在头三年每年分红各54.4万美元，此后每年分红各164万美元（小熊队也有获胜的赛季）。

最终的报酬远比伦纳德起初规划的十倍投资回报要高得多，实际上更接近百倍回报。你可以说兄弟俩的盈利建立在他人的代价之上，更不用说他们致富了，却导致红树海岸的生态越发贫乏。土地委员会提出的其中一项主要控诉便和其堆填工程有关。在开普科勒尔，海湾美国的疏浚机从克卢萨哈奇河的河床上铲出了360万立方码废土，是它所获批准的量的六倍之多。这个控诉在当时的重点并不是他们破坏了海草和红树林环境，而是侵占了州政府利益。被偷去的河床底部属于佛罗里达，因此州政府希望获得公平的赔偿。

关于疏浚，当时还有另一种不那么官僚的视角。奥杜邦协会的查尔斯·李称开普科勒尔是一场“环境悲剧”。非营利调查机构INFORM在1977年进行了一项针对美国19个住宅区的研究，证实了李的看法。调查发现在所有被调查对象中，开普科勒尔的生态环境最为恶劣。数千英亩海草和红树林被破坏并消失。鸟类和鱼类数量减少。哥法地鼠龟消失。河道淤积，并受草地和街道径流的污染。且不论房屋，这片土地已经被敲了竹杠。[\[32\]](#)

杰克和伦纳德给海湾带来了生态灾难，但这也有积极的一面。他们的抢掠激发了担忧红树海岸未来的人们的行动。

这些人当中包括作家约翰·麦克唐纳。他住在萨拉索塔，遭受着来自开普科勒尔和圣彼得斯堡的双重夹击，当地人都为他们红树凋零的湖湾忧心忡忡。在柯林斯州长提出水下土地法案，试图通过立法手段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时，当地一位立法委员忧心地说道：“有没有可能马纳提郡（Manatee County）最终也会落得和派内拉斯郡湖湾一样糟糕的下场？”[\[33\]](#)

自从1950年搬到海湾沿岸居住后，约翰和妻子多朵（Dordo）就目睹了很多约翰称之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式的开发。在他看来，这只能怪被推选和任命的官员和他们不计后果的规划。作为一个犯罪侦探小说作者，他在他的打字机上发泄自己的怒火。“这就是速食的佛罗里达，”在他的小说《恐怖的橙空》中当时严肃的叙述者说，“黏腻得令人窒息，充满着丑陋和虚假的活力。”[\[34\]](#)

麦克唐纳的大多数小说都是适合在泳池边和飞机上消遣的读物，但它们扣人心弦、情节巧妙，丝毫不像以性别歧视和黄色笑话为乐的当代类型小说。小说的畅销使他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每天要在他米黄色的IBM打字机前待上八小时，每周写下两万字；在他38年的写作生涯中，他一共出版了78本书。据估算，他的小说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已经售出了超过7000万册。

二战时，麦克唐纳在印度担任情报员，每天埋首于纸堆中，他因此养成后来的工作习惯。之后他取得了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硕士，开始了朝九晚五的生活。白领的世界很快让他感到厌烦，而在他生长、工作过的纽约，天气寒冷灰暗，这促使他想到更温暖的地方去。在佛罗里达度假时，他和多朵（真名多萝西）深深地爱上了墨西哥湾。他觉得它“明亮、清新、悦目”。他们在清水海滩（Clearwater

Beach) 租了个房子，在那里他换下了他的羊毛西服，换上了不需要熨褶的开领加州衬衫和条纹棉布裤。在第一年租约到期前，他已经写了两本书和50多个故事。[\[35\]](#)

那时，麦克唐纳夫妇意识到清水滩被发现了。当地人口比20世纪50年代翻了一番有余。于是他们没有续租，而是打包行李，驾车往南开，在坦帕湾口换乘渡轮，在渡轮右舷外滑过的是椭圆状的红树林岛屿，它们不出几年就会成为格林兄弟的蒂拉佛得。他们继续往前开。在摇下的车窗外，海岸红树林沿着路肩绵延了数英里。他们最后来到萨拉索塔，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便没在其他地方住过了。

萨拉索塔人口1.8万，是个相对未受破坏的小村庄。20世纪20年代的土地热潮和随后的破产潮在这里留下了地中海式的建筑，包括约翰（John）和梅布尔·润格林（Mabel Ringling）有30间房的威尼斯哥特式宅邸，以及占地15万平方英尺（约13935平方米）的意大利乡村式博物馆，那里收藏着他们的巴洛克艺术藏品。以润格林名字命名的艺术学校在几年后开学。这个小小的临湾社区凭借它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一批作家前往，其中包括厄斯金·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卡尔·加摩（Carl Carmer）和马金莱·肯托（MacKinlay Kantor）。他们组织了一个周五午餐会社团，一众主要成员中也有麦克唐纳的身影。

在城镇最东沿，牧场一直延伸至内陆；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民间资源保护队[\[36\]](#)在那里建立了美丽的迈阿卡河州立公园（Myakka River State Park）。一群隐蔽的障壁岛——都称礁岛（长舟、利多、伯德、圣阿曼和塞尔斯特）——坐落于落日一侧，围绕着光辉下的萨拉索塔湾和众多小湖湾（帕尔马索拉、罗伯茨、小萨拉索塔和布莱克本）。宽吻海豚在周围嬉戏，鲑鱼跳跃个不停。麦克

唐纳一下就爱上了这里“柔软的空气、碧蓝的海水、轻轻点水和啼叫的海鸟，还有广阔的海滩”。[\[37\]](#)

1925年，当地市政想试着做点时髦的事。它请来了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师约翰·诺兰（John Nolen），约翰·诺兰以巧妙融合自然和建筑环境著称。他为萨拉索塔带来了一系列临湾而建的滨水公园和景观道，和他此前不久在圣彼得斯堡做的一样。三年后，州和联邦公路的工程师们修建了41号公路，也就是塔米亚米步道（Tamiami Trail），他们将印第安贝冢挖来的贝壳碾碎后铺设于公路，公路通过镇中心，沿着约翰·诺兰的其中一条蜿蜒的景观大道而建。这种荒唐事让诺兰不禁说道：“人类是唯一会玷污自己栖居地周围环境的动物。”[\[38\]](#)

约翰和多朵初来萨拉索塔时，这里仍葆有夫妻俩曾在纽约州北部夏日湖区中体会过的古色古香。只是，萨拉索塔不会永远留在古朴的过去。到这三年后，他们的新家已经脱离了从前的半隐居状态。州府将坦帕湾上的渡轮换成了双跨桥，距水面高度足以让货船通行，并取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名字叫阳光高架桥。眨眼间，萨拉索塔郡的人口猛增了16%。

复合景观陷入了机器运转的轰鸣声中。咆哮的推土机没有停下来时的时候。诺兰的景观大道兼41号国道变成了刺耳的驱赶行人的高速公路。湿地很快成为不时有轻微碰撞的停车场，屋顶取代了树冠，空调机在人们房屋的窗外嗡嗡响。当邻居将邻居告上法庭，控诉他们发出的噪声时，法官告诉原告，如果不喜欢新时代发出的声音，他们可以关窗。这着实让麦克唐纳恼怒至极，这些感动于自然的蓬勃来到佛罗里达的人，却只是践踏它，在室内躲避它，用他们制造出来的噪声，淹没了小鸟和青蛙的歌声，淹没了棕榈叶沙沙的摩挲声。

海边的确是逃离喧嚣的好去处。他搬到墨西哥湾海岸后，便喜欢戴着游艇帽扬帆垂钓。但噪声无处不在。在一个“阴郁寂静的早晨”，他正在浅滩边摆弄绕线轮，来回调整饵料，一边喝着酒，然后突然迎风响起了疏浚机的哀号声。岸沿的红树对开发商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意味着无限的可能。它是野生动物的栖居地，是抵御风暴的防线，这都不重要；它紧邻着崭新的价值连城的人造地，这才是至关重要的。[\[39\]](#)

麦克唐纳看着红树被重型机械连根拽起，堆在一边，和其他树木一起被当成垃圾付之一炬。他注意到自己钓鱼的运气变坏了。一切都是相连的，一圈令人不安的涟漪向外漾去——“快钱哲学”，被征服的土地，失去的自然，被削弱的生命。他向朋友抱怨，在写给《纽约时报》《萨拉索塔先驱论坛报》的文章和自己的小说里发泄——一个人经历影响创作，创作捕捉变化的现实。“佛罗里达一直在扩张，”在1953年出版的平装本《消失的低潮》中，主角如此深思道，“不像其他地方常规的扩张方式，在现有的土地上盖更多房子，而是土地本身在扩张。”[\[40\]](#)

1966年，麦克唐纳在塞尔斯特礁（Siesta Key）上盖了一座临湾的大房子——在他自己发展起来的土地上。他不得不拉来数千码的填充土料——“卡车运来的，不是从湾底挖来的”，他向曾经听过他破口大骂的家人这么保证道——而且他需要从州府购买“一小块湾底地块”，这样他的建筑工才能竖起防波堤。我们已经见过这种表里不一了——获得自己那份天堂的人不愿有其他人的加入。但麦克唐纳和这些人不太一样。他希望关掉的闸门刚好足以阻止更多的新来者涌入海岸，而且他反对的只是那种“对数量而非价值的不清醒的执着”。他应该会欣赏像约翰·诺兰这样的规划师，而且说出诺兰会说的话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上帝帮帮他，他不能够在一个周遭的自然秩序被毁坏的世界生存。”[\[41\]](#)

至于开发商们，麦克唐纳倾向于将被他标记为快钱牛仔、金钱挖掘机、城区规划破坏者、反计划者的“物种”收押，而剩余的人则拴在一节短绳上。在他最后一部小说里，他想到了第七代的概念，他写道：“等他们死后，他们造成的伤害一代一代地持续下去，他们的后代永远承受着这个恶果。他们曾孙的曾孙将会生活在一个单调、肮脏、丑陋、危险的世界里……病痛缠身，浑身恶臭。”[\[42\]](#)

当圣彼得斯堡的纳尔逊·波因特和当地市民联盟，试图阻止博卡谢加湾的开发商时，麦克唐纳正关注着他们。他在萨拉索塔建立了他自己的队伍，帮助创立了“大嘴居民”社团组织：美好萨拉索塔委员会，以及无党派市民委员会。他还加入了当地的环保学会。[\[43\]](#)

此时一份填埋小萨拉索塔湾（Little Sarasota Bay）的申请被提交上来，麦克唐纳为此写了整整一版的社论表示谴责。他写道，开发商“制造着大自然所没有提供的滨水产业，以此挣钱”，并认为这是他们的“职责”。他呼吁郡委员会摒弃惯例，“鼓起十足的勇气，坚定地表明立场，那就是今后不再批准填海申请”。当选官员们所持的唯一立场就是他们惯有的立场。委员格伦·利奇（Glen Leach）称所讨论的海岸线有“不稳定的潮滩”，会“排出气体，产出废弃物，因此需要被消除”。但这番过时武断的话和他所担保的“没人比我更反对填海”相去甚远。这番断言在堆填反对者听来如此可悲，但这番话是对他们立场的暗示，尽管空气中尚未有火药味。委员会批准了申请。[\[44\]](#)

然后来了一条更大的鱼，威胁要吞掉湖湾里所有的小鱼。亚瑟·瓦伊宁·戴维斯（Arthur Vining Davis），他是美国铝业公司脾气暴躁的前主席，同时也是全世界排名第三的富豪，在他91岁时，他拿定主意不想退休。他在1958年创建了阿维达（Arvida Corporation），计划用他名下位于佛罗里达半岛东南端戴德郡（Dade County）的80万

英亩土地做点什么。他只花了几个月时间就发现了海湾海岸，从润格林那里买来2000英亩地产。他想建酒店、商业零售店和4000座住宅——制造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乏味的铝制品，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生活方式需要借助制造土地来完成。麦克唐纳写信给一位环保主义同伴：“显然，他们计划尽全力把湖湾都给填了。”的确，润格林地块的3.5英里滨水区无法满足阿维达的计划，他们的计划包括了伯德礁和长舟礁的填埋工程。麦克唐纳发表社论宣称，“公众景观不应该成为车库和船坞”，在此之后火力升级。[\[45\]](#)

为了供应麦克唐纳的纸张，许多树木因此倒下，但至少它们变成了有良知的纸张。在阿维达公布其计划后的18个月里，麦克唐纳完成了一本小说初稿，作家吉姆·哈里森（Jim Harrison）称那是“第一本也是最好的一本拥有生态意识的小说”。书被命名为《闪现的绿光》（*A Flash of Green*），在1962年出版上架，比卡尔森的《寂静的春天》早两个月，它被认为开启了环保运动。但运动早已开始，否则麦克唐纳也无法完成这本书。他在献词页向积极“反抗丑化美国行为”的活动家们致去了敬意。[\[46\]](#)

麦克唐纳第38本小说的发生地是海湾海岸上的一个临湾小镇棕榈城（Palm City），这是一个虚构的地方，但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城市特质来看，都很像萨拉索塔。里面也出现了博卡谢加湾和开普科勒尔的影子，还有麦克唐纳的个人经历。叙述者在开始时说：“有着开阔潮水的湖湾带着它的宁静和古老的神秘感消失了，红树林、群栖地和橡树林被兢兢业业的人们连根拔起，建筑机器在清晨的轰鸣声比反舌鸟[\[47\]](#) [州鸟] 的叫声更让人感到熟悉。”[\[48\]](#)

惊险情节围绕一个名叫“救我湖湾”（Save Our Bays）的市民团体展开，团体更愿意使用具有挑衅意味的简称SOB[\[49\]](#)。他们试图阻止棕榈地开发公司的堆填工程，工程将堆填沙礁边上800英亩的绿茵湾

（沙礁上的主车道叫作红树林大道）。最后人们发现，开发商的背后有郡政府委员在撑腰。“他们是开着压路机来的，凯瑟琳，”小说的主角，新闻记者吉米·温，对他未来的爱人SOB的凯瑟琳·哈柏说，“任何挡了他们路的人都会被碾压而过。”SOB的主要对手，委员会成员埃莫·布利斯，则希望压路机为他铺平走向州长办公室的路。他最后贿赂了吉米·温，通过他破坏了SOB找来做证的海洋学家证词的可信度。[\[50\]](#)

书名麦克坦纳很早就想好了。绿闪光是自然现象，在太阳落山的最后一秒，当光线消失在海平面的一瞬间，有时会有绿色的光斑一闪而过。麦克唐纳也许从自己家的门廊上看到过它们。在他看来，闪现的绿光是一个隐喻，它象征地产公司在棕榈城所捞取的快钱——绿色的美钞。另一个没有明说隐喻，和麦克唐纳小说的整体有关：红树海岸的绿色自然在转瞬间消失了。就像小说中的SOB一样，萨拉索塔环保团体没有成功阻拦他们的敌人阿维达——这只是第一次。

在南边的马可岛，也没人阻止得了麦克尔家族（Mackles），直到他们给岛屿来了一次翻修，这次连最坚定的地球雕刻家——陆军工程兵团——都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格林兄弟、罗森兄弟一样，麦克尔家族是一组兄弟开发队，不同的是他们有三兄弟：艾略特（Elliot）、罗伯特（Robert）和小弗兰克（Frank Jr.）。1908年，老弗兰克在杰克逊维尔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这为他的儿子们开了一个好头，三兄弟后来分别在1954年创立了通用发展公司（General Development），在1962年创立了德尔托纳公司（Deltona）。

最终这个家族建了三万栋房子。在圣奥古斯汀的德尔托纳（Deltona）和比斯坎湾上的麦克尔社区，房子一幢幢地涌现出来。麦克尔兄弟在蒂拉佛得上建起了住宅、公寓和酒店，在夏洛特港的最北边，他们将8000英亩土地改造成了杂乱庞大的夏洛特口岸（Port

Charlotte)。他们在纽约中央车站和曼德尔兄弟芝加哥商场里打造住宅模型，派发促销手册并附赠橙汁。第二年，1958年，通用发展公司的销售额突破了4500万美元。1959年的销售更是火爆。

就在那时，巴伦·柯里尔家族提出将大半座马可岛以100万美元卖给州政府作为野生动物保护区，但州政府拒绝了这次机会，随后麦克尔兄弟以700万美元成交，买下的几乎是同一块地块。这项交易最终将建造出1.1万块宅地。三兄弟证明了做麦克唐纳最厌恨的事——建造新土地——他们是最擅长的。

一组航拍的岛屿改造前后对比照片解释了麦克唐纳的厌恶。1964年，在岛屿动工前夕，马可岛看起来几乎和库欣在70年前到访时一模一样——拳头形状，六英里长，四英里宽，岛上居民一共550人。威廉和玛姬·柯里尔的马可旅馆还开着，旅馆的白色护墙板四周依然植被葱茏。湿地、松木荒原、本地的棕榈和热带硬木群落依旧无人打扰。海滩是一道窄窄的白色线条，像完美的一弯新月，沿着海湾绵延三英里。红树林守护在剩下的岛屿边缘。饱览“绿意盎然的雄伟景观”，1965年佛罗里达的一则旅游影片如此形容马可岛。[\[51\]](#)

照片能牢牢锁住的，时间无法做到。在宣传影片拍摄的那一年，麦克唐纳让他在小说《亮橙色的裹尸布》中的主角痛惜道：“马可村让我感到痛心。自从我上次去过后，推土机和拉铲挖土机就占领了它。”此后的航拍照片便是岛屿被改造后呈现出来的毫无生气的一片灰褐。它的全景令人震惊。手指水道在岛屿上左探右探，钻进畸形的岛内腹地，增加了八倍于前的滨水区。房屋像多米诺骨牌般精确排列，一个屋顶挨着一个屋顶，蜿蜒曲折地立在沥青马路和91英里死气沉沉的水道旁。后院码头停泊着私人船只，既有“金汤力”平底船，也有舱房汽艇。岛屿的另一边是两个有绿茵草地的高尔夫球场。海湾

一侧的银色海滩变成了更长更宽的白色腰带，守护在后方的是一排度假别墅。[\[52\]](#)

到20世纪80年代，滨水建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社会对这个概念已经产生了不可逆转的麻木感。和在不断被制造出来的其他海湾海岸上一样，人们想要瞥一眼海景，却被困在车里或人行道上，眼前是棱角鲜明的建筑物，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高档的酒店和公寓耸立在那里，就像一道客流控制的关卡，将那些没有预约或访客通行证的人挡在门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马可岛上的两个公共海滩，停车费收得很贵，等候的车龙却也排得很长。9000英亩的岛屿，它们只象征性地占了其中的32英亩。

这么多的野生植物，曾经，它们生生不息，以岛屿的尽头为尽头，只有风暴和旱灾才能阻止它们的生长，但此时，它们都消失了。雨水汇入湿地和池塘，被舌头和鸟喙舔舐，被植物根系吸收，然后又重新进入雨水系统。鸟巢和洞穴——还有贝冢——被翻了个底儿掉，代之以房子、公寓和房地产办公室。浆果、树叶和根茎被扯下，代之以超市和便利店。爪子、钳子、肉掌踩过的小路让位于马路和水道。搞定了这一切后，麦克尔兄弟向全世界发起宣传攻势，配合以分期付款计划，将马可岛塑造为一个“原始天堂”。[\[53\]](#)

防波堤是天堂的盔甲。它们在很长时间里都与文明为伴。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通过浇灌混凝土来制作防波堤。一道用切割石灰岩砌成的防波堤曾多次保护君士坦丁堡免受海水和军事入侵，虽然没有挡住奥斯曼人。墨西哥湾上最著名的防波堤大概要数哈瓦那的马雷贡

（Malecon）长堤，它矗立于西班牙莫雷堡的港口对岸，在人们眼中，它不再只是一道隔离墙，而是一条在微风徐徐中观赏落日的滨海大道，情人们可以手牵着手漫步于其上。它建于1901年，正值四年美占时期。

此时在墨西哥湾的西岸，加尔维斯顿人正着手抬高他们的岛屿，并在沿岸修建了一道被不断加长的花岗岩巨石海堤，到1962年，其长度已达十英里。密西西比州人喜欢吹嘘他们26英里长、由荷兰人设计的阶梯式混凝土海堤，目的是保护新建的海岸高速即古西班牙路，它是“全世界最长”的海堤。1928年海堤完工后，根据当地新闻的报道，当地地产价格飙升到此前的十倍，支持者们更是乐于见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建起度假屋。[\[54\]](#)

没人计算过佛罗里达海湾沿岸有多少红树林因修建海堤而被毁。所有这些沿岛而建的迂回曲折的水泥墙、手指水道，还有人工海滨边上的笔直线条，它们的总长度早已达到上千英里，这是建设与毁灭并存的上千英里。直到1969年，国会通过自然环境保护法案的那一年，H. J. 赫姆（Harold J. Humm），这位任职于博卡谢加湾拐弯处附近的南佛罗里达州大学海洋科学研究院的主管，仍粗俗地称红树林是“荒地”的一种。[\[55\]](#)

当时和现在的科学家都断然否认这种说法。这并不是说防波堤导致了生态贫瘠的环境。藻类和藤壶依然在它们坚硬的表面上生长。海洋里的小生物依然在建筑产生的残骸和堤坝底部的碎石周边生长和穿行。你安坐在一道海堤上，放上鱼饵，掷下鱼钩，依然能钓上鱼来。但和划着船徜徉于红树林边上相比，钓上的鱼不再有那么多、那么大。

开发商坚持说海堤保护了现存的以及新增的海岸线。实则不然。海堤实际上可能加速海岸线被侵蚀。海水运送上来的新鲜补充沙砾被它们阻止，海浪形成的吸力遇到堤坝后被弹开，转而搜刮堤底，甚至到达地基和堤坝后方。“海堤挺住了，”麦克唐纳1956年在其《风中谋杀》（*Murder in the Wind*）中写道，“直到坚不可摧的海水越过

它，将堤坝后的沙土席卷而去……很快，没有了支撑的海堤便扭曲着身子倒下了。” [\[56\]](#)

海堤的扩张很难得到阻止或减缓，因为像赫姆教授这样的河口海草专家也在告诉政府官员人造防波堤替代红树林并不会降低海洋生产力；因为发展是全州不容置疑的第一要务，滨海房地产业贡献了最高的财产税收入，而海堤让如此重要的房地产的扩张成为可能；因为像阿维达这样有着高薪的说客的大公司，做出扩大课税清册的保证，而且靠的不仅是单幢家庭住宅，更是混凝土 高层建筑，这意味着相同面积的滨水区将容纳比单幢房屋多得多的入口。

如果说有什么比不断延长的防波堤（除了他自己的那个）更让麦克唐纳感到厌恶的，那就是公寓。“共管公寓”（condominium）本是法律名词，而不是建筑词语，是中世纪欧洲的发明。它为占用同一座住宅建筑的多个所有人提供指导原则。作为建筑，在人口密度大于土地供应量的地方，以及对于不想维护绿地的人群——比如希望在温暖的地方过退休生活的老人，现代公寓都颇具吸引力。在波多黎各，自20世纪50年代起，公寓就为这个拥挤的岛屿自治邦提供服务，并将这个建筑理念出口到了南佛罗里达。国会批准让联邦住房管理局为公寓提供按揭后，公寓建设便一发不可收拾。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所谓的超级巨塔已经将人类“码放”到了50层楼的高度上。对佛罗里达的开发商来说，公寓是一个绝妙的创造，让他们得以将一块滨水宅地卖给50个、100个甚至更多的买家。

麦克唐纳认为公寓必然导致交通拥堵，饮用水资源不堪重负，以及滨海景观被破坏。他在1977年出版的《公寓》（*Condominium*）充分显露了他的鄙夷之情。他的第66本书也是他的第一本精装非流派小说，但仍是典型的麦克唐纳风格。小说角色包括不择手段的商人，偷工减料的建筑工，以及一举摧毁了这些不堪一击的建筑和其中住户的

巨大飓风。他写这本长篇巨作是为了表达对这些出现在大陆海岸线和障壁岛上的人造景观也就是佛罗里达人所称“公寓峡谷”的反抗。

[\[57\]](#).

阿维达是制造公寓峡谷的先锋。当它的开发计划推进到萨拉索塔地区时，其总规划图上就出现了公寓楼的身影。反对活动也进入新的阶段。反对者毫不掩饰对《闪现的绿光》的支持，叫“救我湖湾”组织成立了。现实中的SOB联合萨拉索塔郡垂钓者俱乐部，对阿维达、州政府和长州礁岛——阿维达下一个堆填工程的所在地——提起诉讼，他们认为向私营企业出售公众共有土地，也就是此案中的湾底地块，以让其谋取私利，构成“对‘公众信任’的侵犯”。[\[58\]](#)

麦克唐纳永远是那个“爱挑刺的人”，他写信给总统林登·约翰逊，内政部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Stewart Udall），以及冷眼旁观的佛罗里达籍参议员乔治·司马萨斯（George Smathers）。麦克唐纳还帮助举办了一场“湖湾保卫筹款晚宴”，为这次诉讼筹集资金。1964年12月，州政府将阿维达的长州礁湾底地块购买提案无限期搁置。“我们明显把阿维达的股价压下来了”，麦克唐纳在给拯救旧金山湾协会副会长的去信中兴奋地说，他和对方交换彼此的斗争故事。[\[59\]](#)

他兴奋没多久，阿维达再次提出申请堆填水獭（Otter）和利多（Lido）礁周边超过170英亩的地。SOB的成员们对此同样不会手下留情，而且他们也没有预料到事情将如何展开。援助之手从塔拉哈西向他们伸来，州长以“年薪一美元”聘请的环境顾问N. P. 里德

（Nathaniel P. Reed）促成了新观念的形成。里德提到佛罗里达的开发模式时曾形容开发商“抢了就跑，贪婪无度”，倒像麦克唐纳书中角色会说出来的话。1967年，他劝说州长克劳德·柯克（Claude Kirk）签署一项法令，法令要求在批复所有涉及潮间地和水下土地地貌改变的工程前，都必须进行环境调研——按前州长勒罗伊·柯林斯

的方式。这项法案的倡议者是州议员，来自迈尔斯堡的泰德·兰德尔（Ted Randell）。

兰德尔喜欢待在克卢萨哈奇河上，当鱼不再咬他的钩时，他本人也亲历了开普科勒尔工程的影响。1月，他和柯克在萨拉索塔讨论立法事宜，行程包括了与阿维达主席布朗·惠特利（Brown Whatley）在伯德礁游艇俱乐部共进午餐。SOB得知了这次午餐会后，用200多条船摆起了“船阵”，在湖湾上“排成了队列”，以尖锐的哨声、钟声和喇叭声宣示它们的存在。柯克对他的午餐伙伴说了一句麦克唐纳会写的台词：“布朗，你的海军部队在外面呢。”2月，萨拉索塔郡委员通过不记名投票，否决了阿维达新的开发申请。[\[60\]](#)

他们并不是孤军作战。在南边海岸上，狭长的萨尼贝尔岛是一座置身于开发热潮外的孤岛。它的形状像一只蟹脚，东西走向，在西边被轻轻向北吊起，通过一座短桥与科帕奇岛相连。从萨尼贝尔岛的右边，你可以看着太阳早上从海湾上升起，晚上又从那里落下。透过峡湾，你还能看到对岸派恩岛的一角和圣詹姆斯城（St. James City）。自从大海鲢爱好者的圣卡洛斯酒店被大火烧毁，麻绳工厂也停工后，圣詹姆斯城也昏昏沉沉地睡去了。20世纪60年代，开发商的挖土机吵醒了它，他们正在为打造住宅区而大肆开挖水道。当你站在萨尼贝尔岛，用望远镜望向圣詹姆斯城时，中间会经过野餐岛（Picnic Island），默温礁（Merwin Key），饥饿礁（Starvation Key），经过大岛（Big Island）和小小的伯德礁——全都是无主岛礁——你可以勾勒出人口密集的开普科勒尔的轮廓。举着望远镜的你此时应该是站在或乘船漂在受到保护的萨尼贝尔红树林中。

从生态学角度来看，这座有着5000年历史的障壁岛是热带和温带岛屿的融合，而且整座岛屿可以说得到了完好保存。二战结束后，居民希望保有它的沙丘、沙丘草、海滩上的向日葵、马尾藻和红树林。

他们很幸运能有这个选择。萨尼贝尔岛是佛罗里达半岛土地公司的所在地，公司在1837年由纽约投资者创立，是佛罗里达州最早的全国性住宅开发公司之一。它的负责人规划了一个由50块宅地组成的小镇，小镇周围是环绕的农场，岛屿被宣传为花园小镇，但它随即因法律问题而遭到强制解散，随后第二次塞米诺尔战争爆发，移民停下了他们的脚步。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待内战和一场大型飓风过去后，移民开始重新迁入，他们大多到这里来种植甘蔗、柑橘、鳄梨、茄子和西红柿。

1926年，一场足以摧毁迈阿密及其建筑热潮的强劲风暴跨过半岛，将萨尼贝尔淹没在了水中。岛屿存活了下来，但是咸水浴破坏了土壤土质，它不再适合耕作了。但岛民们还有一条退路。大海鲢渔钓和冬季度假产业发展了起来。两年后，轮渡的开通吸引了大量观鸟者、自然学家和贝壳收集者前来。

来这里过冬的有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杰恩·诺伍德·“丁”·达尔林^[61]（Jay Norwood “Ding” Darling）。他是一个中西部人，他和妻子吉纳维芙（Genevieve）在1935年发现了萨尼贝尔和凯普蒂瓦岛。此前一年，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命达尔林为生物学调查部（很快就更名为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负责人，尽管他看起来是个奇怪的人选。达尔林既不是官员，也不是科学家，他是为多家报刊供稿的社论漫画家，普利策奖的获得者，而且忠于另一个政党。他的任职资格在于他常在野外活动，同时他的环保主义理念与新政的很多政策不谋而合。

作为调查部的主管，达尔林启动了联邦鸭票计划（Federal Duck Stamp Program），目的是增加政府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购买量，他用自己的艺术天赋绘制了第一枚鸭票，并设计了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区系统的蓝鹅标志。当意料中的阻挠者站起来反对调查局的新环保举措

时，达尔林意识到无论是鸭子、鹅、熊、狼、老鼠，还是其他动物，在华盛顿都没有话语权。于是，1935年末，他辞去职务，组织了一帮有选票的选民为它们发声。不出数月，他成为野生动物总联盟（后来更名为全国野生动物联盟）的创始人兼主席。

他一回到佛罗里达，就联合了萨尼贝尔、凯普蒂瓦的居民，创建了岛际环保协会（Inter Island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达尔林的过冬房子建在峡湾水边的木桩上，他把这里叫作他的鱼屋，峡湾上有一座吊桥，他需要个人空间的时候，就把它升起来。保持岛屿的宁静满足了个人欲望，但不仅如此，他的窗外是一片沿着峡湾覆盖了整座岛屿的湿地，日夜都能听到鸟儿抖动翅膀的声音。他无法想象岛屿有其他的模样。1945年，他和协会成功说服杜鲁门总统在那里设立了萨尼贝尔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保护区在1967年更名为J.N. 丁·达尔林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居民们最初的绿色理想被写入了对萨尼贝尔未来的确凿宣言里。

岛上大部分居民是逃离寒冷气候的北部移民，而且他们多数受过良好教育，家境富裕，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他们都带有些许合乎情理的环保思想，主要是“别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思维。1963年，基本就在岛屿连接外界的第一条堤道和第一座桥开通后（违背了许多岛民的意愿），开发商就开着车带着设计图和大想法纷纷涌入。堤道附近开始了疏浚和堆填，郡政府的新综合规划图显示，一幢公寓将在萨尼贝尔撒满贝壳的海滩上高高耸起。

岛民很快有了他们自己的主意。他们组建了萨尼贝尔-凯普蒂瓦环保基金会，并在1974年将岛屿建制为市。然后，埃拉尔·马提森（Erard Mattiessen），他是一位纽约退休建筑师、水产养殖的先锋、全国奥杜邦协会20年的董事会成员、萨尼贝尔-凯普蒂瓦环保基金会的创始成员，以及作家彼得·马提森（Peter Mattiessen）的父

亲，在他的发起下，人们研究出了针对岛屿本身的土地使用计划。萨尼贝尔的第一任市长，波特·戈斯（Porter Goss），在发展商的密集反对声中，将计划成功贯彻了下来。[\[62\]](#)

不再有疏浚和填埋，不再有被连根拔起的红树林，不再有难以负荷的公寓楼；度假村，可以有，但建筑物不能高于43英尺，且藏身于茂密的受保护植被后，通往度假村的马路不能超过两车道，汽车时速不能超过35英里，另外还铺设了25英里长的自行车道，所有这一切都被放在广阔的野生动物栖息地里。除基金会建立的保护区和丁·达尔林自然保护区外，大约三分之二的岛屿都未被开发。

1987年，丁·达尔林保护区扩张边界，将大海鲢湾纳入了保护区范围。内政部封闭湖湾，禁止渔猎，码头上的垂钓向导业务也被强制关停，兰迪·韦恩·怀特的向导业务也受到波及。怀特看了一下形势，就自己关掉了商店，开始全职写书。他从不往回看，但上一份工作开始的地方除外。作为作家他开始有了名气，最后从派恩岛搬回到了田园牧歌般的萨尼贝尔，加入了同样来自其他地方的当地居民，包括波特·戈斯，他当时俨然已是一个全国性的人物，当上了国会议员和中情局主管。

在萨尼贝尔和凯普蒂瓦，还有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63\]](#)（他买下来达尔林的鱼屋），威拉德·斯科特（Willard Scott）[\[64\]](#)，以及R. T. 阿伯特（R. Tucker Abbott），美国第一位贝壳学家。鸟类摄影师泰德·克洛斯（Ted Cross）买了保护区水边的一所房子。虽然他环游了全世界——包括南太平洋和西伯利亚，以及响尾蛇和棕颈鹭的乐园，得克萨斯州的绿岛（Green Island）——他仍然认为萨尼贝尔是全世界最佳的摄鸟地之一，只需一架无害的尼康相机和超长焦镜头。

到20世纪末时，萨尼贝尔的居民有6000人，达到了当地控制增长的目的，但一到冬天，人口数量会涨到两万以上。保护区的鸟和海滩上的贝壳每年吸引来近百万游客。主路上形成长长的车龙。游客踏着酒店和旅馆提供的脚踏车游览海滩，他们对自行车道很是满意。萨尼贝尔居民的平均年龄是60岁；人均年收入8万美元；他们的房产均价为50多万美元。在酒店、商店、饭馆领薪的员工，以及在主要十字路口上身穿制服的交通指挥官，他们都无法负担在岛上居住的花费。他们会在交接班后在收费站支付每次六美元的过桥费，通过桥梁往返于大陆和岛屿。在不断增长的海岸上，自然成了稀缺而被垂涎的商品，可惜，它的价格让很多人无法承受。

用罗森兄弟的话来说，自然的最好状态存在于它可以被出售的时候；这基本上也代表了每一个将原始海岸改造成稀缺品的开发商的想法，一切都适用于供需关系原则。出于生态原因捍卫它的人，几乎不会因为原生态滨海区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动摇。但那时，国内的环境保护意识开始崛起，1970年发起了第一个地球日，当地和州府的官员开始重新思考海岸的发展问题。陆军工程兵团的一项决议得到了环保主义者们的称颂，他们拒绝了麦克尔兄弟要将额外的马可岛红树林和敏感地块改造成3700块预售宅地的申请。20世纪80年代，内政部创立了万岛群岛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并在日后将保护区的占地扩大到35000英亩，其中三分之二是红树林。

大约在同一时间，佛罗里达的立法者通过立法承认了红树林的生态价值，他们制定法律严格限制对红树的修剪和砍伐（但是滨水区业主违反这项法律的情况还是常见）。州政府、地方政府、联邦当局和私营企业以维系、保护为目的留下了佛罗里达80%的现存红树林。佛罗里达州并没有停止疏浚和堆填，但它将许多海湾地区指定为“重要水域”或“水上保护区”，包括博卡谢加湾和坦帕湾上其他三个区域。萨拉索塔湾、夏洛特港、派恩岛海峡、麦乐西峡湾都在名单上，它们

将得到特别保护，严格限制日后的疏浚、堆填，以及筑堤。州政府认识到海岸线保护的必要性后，它常推荐或要求修筑用松散巨石堆砌的乱石堤，作为对环境友好的海堤替代物。将河口打造成住宅区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但是，保护和扩张之间的紧张拉锯依然存在。你无法阻止人们搬到佛罗里达的海湾沿岸生活。在很多地方，公寓和酒店沿着沙滩一路延伸，直到消失在远方。在新千年，开普科勒尔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人口超过10万人。昂贵的萨尼贝尔有着每平方英里356人的非应税人口，人类和野生动植物栖居地在这里和谐共存。在价格实惠的迈尔斯堡，每平方英里人口是2065人，萨拉索塔的这个数字是3540，在这里和谐共存的几乎只剩下人类和混凝土了。派内拉斯郡的人口密度是全州平均数的十倍，它一直在向外扩建。博卡谢加湾上的金银岛，有着沙丁鱼罐头般的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有4783人。这里是最拥挤的墨西哥湾海岸带上最拥挤的障壁岛。

按1895年库欣的“银色浪花号”从塔彭斯普林斯到马可岛驶过的路线，沿途随意停靠在任何一个港口，你会发现到处是湾底翻转而成的海岸线——一道道伪造的、横平竖直、修剪得平平整整的20世纪末风格的海岸线。那就是对蕾切尔·卡森所提问的关于红树海岸未来的回答。

最后一点与现在的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尤其相关。在谈到这两个问题时，很多注意力都投向了亚马孙雨林，讨论它们被耗尽后将会导致多么可怕的后果。但是，红树林本身的植被和它们交叉缠绕的根系周围的多泥煤土壤，让它比任何热带树林都吸收了更多的二氧化碳，其中包括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这意味着空气中含有更少的二氧化碳，意味着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问题将得到减轻，而海洋酸化是导致佛罗里达礁岛的珊瑚礁死去的原因之一。红树林还帮助

建设和保卫海岸线，即使上涨的海水要将它带走。就像本章开头卡尔·比克尔所说的，它们是“建筑队”，也是比疏浚机和防波堤友好得多、聪明得多的方案。

[1] 海螺 (conch) 起初 (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 用来指佛罗里达礁岛群上的巴哈马人移民后代，现在已经用来泛指礁岛群上的所有居民。——译注

[2] Archie Carr, *The Everglades* (Time-Life, 1973), 136.

[3] Rachel Carson, *The Edge of the Sea* (Houghton Mifflin, 1955), 246.

[4] Frank Hamilton Cushing, *The Pepper-Hearst Expedition: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ploration of Ancient Key-Dweller Remains on the Gulf Coast of Florida* (MacCalla, 1897), 3.

[5] 20世纪的文学经典，中文译本很多，曾被著名导演科波拉改编成电影《现代启示录》。——译注

[6] John H. Davis Jr., “Mangroves,” *Nature Magazine* 31 (1938): 551; Joseph 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Plain Label Books, 1983), 35.

[7] Karl A. Bickel and Walker Evans, *The Mangrove Coast: The Story of the West Coast of Florida* (Coward-McCann, 1942), 3.

[8] Carson, *Edge of the Sea*, 246.

[9] Gary R. Mormino, *Land of Sunshine, State of Dreams: A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5), 340.

[10] David Dodrill, *Selling the Dream: The Gulf American Corpor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Cape Coral*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2), 231; Mormino, *Land of Sunshine*, 340-42.

[11] Marian Coe, “Permit Sought from State for Huge Boca Ciega Fill,” *St. Petersburg Independent*, May 14, 1958.

[12] Tierra为高山气候带，Verde是西班牙语中的“绿”（Green）的意思，Tierra Verde发音类似英语中的“陆地”一词terra firma。——译注

[13] R. Bruce Stephenson, *Visions of Eden: Environmentalism, Urban Planning, and City Building in St. Petersburg, Florida, 1900-1995*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1-32.

[14] Robert F. Hutton, *The Ecology of Boca Ciega Ba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redging and Filling Operations...*, Technical Series no.17 (Florida State Board of Conservation, 1956), 69, 78.

[15] Martin A. Dykman, *Floridian of the Century: The Courage of Governor LeRoy Collins*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6), 163.

[16] Martin A. Dykman, *Floridian of the Century: The Courage of Governor LeRoy Collins*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6), 87.

[17] Jon Wilson, *The Golden Era in St. Petersburg: Postwar Prosperity in the Sunshine State* (History Press, 2013), 73.

[18] 二战后，新生儿数量急剧上升，同时大量军人退伍复员，美国社会住房需求大增，但战后经济萧条，住房供应不足，人们尤其退伍军人的购买力也十分有限，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便诞生了莱维敦式社区，并大获成功：一个叫莱维敦（Leviitown）的开发商在长岛建造了17500套住宅，住房样式简单且高度标准化，其建造过程被分解成27个步骤，以流水线方式建造，以此压低建造时间和成本。——译注

[19] Nicholas Foreman, “The Owl and the Monitor: Nature versus Neighborhood in Cape Coral, Florid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author, courtesy of Nicholas Foreman).

[20] 有史学家说是富兰克林·迈尔斯发明了阿卡塞泽（Alka-Seltzer）消食片。但真正的发明者其实是一个叫莫里斯·特雷尼尔（Maurice Treneer）的药剂师，他受雇于迈尔斯医生医药公司（Dr. Miles Medical Company），在迈尔斯去世的那年，也就是1929年，发明了阿卡塞泽。迈尔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公司[1935年更名为迈尔斯实验室（Mile Laboratories）]，由其他人负责公司的管理，阿卡塞泽于1931年首次推出市场，和迈尔斯没有关系。

[21] Nicholas Foreman, “The Owl and the Monitor: Nature versus Neighborhood in Cape Coral, Florid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author, courtesy of Nicholas Foreman) ., 8.

[22] 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译注

[23] “Human Hair Can Die of Thirst, ” *Life* 36 (1954) : 93; Dodrill, *Selling the Dream*, 20.

[24] “珊瑚角” 的意思。——译注

[25] Dodrill, *Selling the Dream*, 13.

[26] Kenneth J. Schwartz, interview by David Dodrill, November 16, 1987, Samuel Proctor Oral History Program, University of Florida, Gainesville, Florida, 2; “People of Influence: The Rosen Brothers in Cape Coral, ” *Fort Myers News-Press*, August 28, 2014.

[27] 美国喜剧演员。——译注

[28] Cynthia Barnett, *Mirage: Florida and the Vanishing Water of the Eastern U.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7) , 26.

[29] Dodrill, *Selling the Dream*, 233; “People of Influence, ” *Fort Myers News-Press*.

[30] Trevor Armbrister, “Land Frauds, ” *Saturday Evening Post* 236 (April 27, 1963) : 17-23.

[31] James M. Gavin, “Land Boom Echoes Way thru Florida, ” *Chicago Tribune*, July 4, 1965.

[32] Dodrill, *Selling the Dream*, 232.

[33] Dykman, *Floridian of the Century*, 162-63.

[34] John D. MacDonald, *The Dreadful Lemon Sky* (Fawcett Books, 1964) , 45.

[35] “Motor Boating and Sailing Answers, ” John D. MacDonald Collection, box 148, folder 18, Special and Area Studies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Gainesville, FL.

[36] 罗斯福新政举措之一，通过开展资源保护活动为失业青年提供工作，同时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译注

[37] John D. MacDonald, “Why a Quarter-Century of Growth May Not Have Been Progress, ” *Florida Trend* 25 (1983) : 34.

[38] Stephenson, *Visions of Eden*, 56.

[39] John D. MacDonald, “A Florida of Swamps and Silences, ” *New York Times*, August 15, 1982.

[40] John D. MacDonald, “A Florida of Swamps and Silences, ” *New York Times*, August 15, 1982.; John D. MacDonald, *Dead Low Tide* (Fawcett, 1953) , 19.

[41] Hugh Merrill, *The Red Hot Typewrit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D. MacDonald* (Minotaur Books, 2000) , 132.

[42] MacDonald, “Florida of Swamps and Silences” ; John D. MacDonald, *Barrier Island* (Knopf, 1986) .

[43] John D. MacDonald to Jerome Bernard, n. d. , John D. MacDonald Collection, box 148, folder 2.

[44] John D. MacDonald to Frank S. Freeman, December 20, 1967, John D. MacDonald Collection (JDMC) , box 67, folder 8. And the following newspaper clippings in JDMC, box 71, folder 8: “Developer Gets Bay Fill Permit, ” November 26, 1956; “Tilling in Bay Defense Heard, ” undated; “Further Filling of Bay Opposed, ” November 27, 1956.

[45] John D. MacDonald to Paul Stannard, December 16, 1959, John D. MacDonald Collection (JDMC) , box 69, folder 7; T. Carrington Burns (JDM pseudonym) , “Off the Beat, ” *Newsmonth*, June 1960, JDMC, box 69, folder 7.

[46] Jim Harrison, *Just before Dark* (Houghton Mifflin, 1999) , 248; John D. MacDonald, *A Flash of Green* (Simon & Schuster, 1962; repr., Fawcett Gold Medal, 1984) , dedication page.

[47] 指北美的反舌鸟，即Mockingbird，又称小嘲鸫或北方嘲鸫。——译注

[48] MacDonald, *Flash of Green*, 24.

[49] 这组缩写在英语中有“婊子养的” (son of a bitch) 的含义。——译注

[50] MacDonald, *Flash of Green*, 24.

[51] *Florida's Emerald Isle, Marco Island*. (Hack Swain Productions, 1965) , State Library and Archives of Florida, <https://www.floridamemory.com/items/show/232443>, accessed summer 2015.

[52] John D. MacDonald, *Bright Orange for the Shroud* (Random House, 2013) , 87.

[53] Mormino, *Land of Sunshine*, 57.

[54] “Sea Wall Project Began in 1925” and “Know Your Coast—Sea-Wall, ” undated newspaper clippings, M.J. Stevens Collection, Notebooks, box 10, McCain Library and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Hattiesburg.

[55] 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Proceedings on Coastal Ecosystems of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February 18-22, 1981*, ed. Robert C. Carey and Paul S. Markovits (Office of Biological Services, USFWS, 1981) , 48
https://archive.org/stream/proceedingsusfis00care/proceedingsusfis00care_djvu.txt, accessed summer 2016.

[56] John D. MacDonald, *Murder in the Wind* (Fawcett, 1956) , 53.

[57] John D. MacDonald, *Condominium* (J.B. Lippincott, 1977) .

[58] John D. MacDonald to Clark Kerr, February 11, 1965, John D. MacDonald Collection, box 70, folder 4.

[59] James to John[MacDonald], n. d., John D. MacDonald Collection, box 67, folder 9; “Bay Bottom Purchase Off IIF Agenda, ” *Sarasota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7, 1964, and “Bayfill: Thrust and Riposte, ” *Sarasota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5, 1968; Pete Schmidt, “An Armada of Retirees Invades Sarasota Bay, ” *Sarasota Magazine* 16 (1994) : 103.

[60] Barnett, *Mirage*, 28; “Bay Bottom Purchase, ” *Sarasota Herald Tribune*, and “Bayfill: Thrust and Riposte, ” *Sarasota Herald Tribune*.

[61] 因为他在签名时习惯将自己的姓氏Darling简写为Ding, 从此这就成为他的昵称。——译注

[62] John Clark, *The Sanibel Report: Formulation of a Comprehensive Plan Based on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1976) .

[63] 艺术家, 战后美国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译注

[64] 著名的喜剧演员、电视工作者, 也是最早的麦当劳叔叔扮演者。——译注

十五 深陷泥潭的佛得二州



得克萨斯，亚瑟港（Port Arthur）。到20世纪中叶，得克萨斯海湾沿岸已经成为石油化工的天下。

曾经的[海湾]，潮起而落，灰鹭啄食，鹰击长空，概莫能外，它沉睡在星空下，在时间的长河中不发一言。眼下，它是否嗅到了自己的未来？

——黛安娜·威尔逊（Diane Wilson）（2005）[\[1\]](#)

如果你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一家饭馆或海鲜市场点一份牡蛎，那么大于一半的可能（57%）它们会来自墨西哥湾。如果你叫的是虾，那么你剥到的那只虾有将近70%的概率也来自海湾。美国海的虾蚝捕捞业是全美产值最高的。这就是为什么，算上鲭鱼——大西洋鲱、金枪鱼、鲑鱼、石斑鱼、石首鱼、鲱鱼、鲑鱼、比目鱼——墨西哥湾的渔业出产量比五大湖和大西洋海岸的合计还要多，在除阿拉斯加外的国内总捕获量中占据了三分之一，码头收益达6.98亿美元。此外4200万条鱼来自480万休闲垂钓者的鱼钩。

当然，数据会说谎，或者隐藏相反的证据。墨西哥湾的产量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达高峰后，就开始逐年减少。其所占比例看上去仍然非常可观，是因为整个美国的渔业产量都在下滑。在东北部地区，向来被视为“矿井里的金丝雀”的大西洋鳕鱼数量已经遭遇了暴跌。

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在疾声警告，全世界正面临过度捕捞、过度发展，以及日益严重的海洋污染问题。1988年8月1日《时代周刊》刊文称：“各大洋正在发送求救信号。”它描画了一片受污染的海水，其中灰蒙蒙的海潮像人类的魔爪，伸向无辜的海洋生物，周刊在封面上大声喊出了“我们污秽的海洋”。就全世界的水域来说，美国有很大的责任。它是最大的海产消费者，最大的能源使用者，也是最大的污染源。^[2]因为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它们也难辞其咎，这就让美国多少可以将自己在这些每况愈下的海域上遭受的指责转移出去。但在自家后院海湾上发生的问题，就只能是自己的问题了。^[3]

这是战后海湾发展的另一面——工业的一面，它并不总是像耸立拥挤的住宅楼那么显眼，但真相一旦被揭开，也是骇人听闻的。第一个不对劲的征兆出现在红树海岸上，那里的开发商和新移民数量开始下降。1954年联邦政府公布了一份关于海湾污染的报告，里面着重指出了23处污染严重地区——有9处位于佛罗里达（最严重的那个在狭长地带），7处位于得克萨斯。它们无一不是经历了工业化的河口湾。

尽管如此，报告作者依然对前景保持乐观。只要有州政府和包括美国公共卫生署贝类卫生部（也就是报告的撰写人）在内的联邦政府机构在，一个更干净的未来就可以得到保证。“这份水污染数据必定不会长久，”作者宣称，“这主要是因为，市政当局和工业企业都在采取措施减少污染，且不断取得进展。”但是，20年后，所谓的进展没有出现。工业不断飞速扩张，因为利润的增长总是能弥补生态的赤字。^[4]

从小生长于佛罗里达狭长地带的查尔斯·洛厄里（Charles Lowery），此时正站在受到严重污染的海湾地区边上，看着那块他称为“死亡墓碑”的花岗岩石碑。它上面的刻字一目了然：“纪念埃斯

坎比亚湾，公元前1971年，死于污染。”这可能是他其中一个游钓伙伴从彭萨科拉的纪念碑制造商那里拿来一块花岗岩石板开的玩笑，游钓者也是一群在喝完了啤酒就把易拉罐扔进水里的人。纪念碑是在他们真正发现海湾正在遭受工业废物和人类垃圾污染之前就做好的，因为他们能从海水中嗅到、从捕获物中尝到这些不对劲的味道，他们发现钓上来的鱼身上有伤痕，看见死鱼的尸体被不断冲上岸来。墓碑并不是玩笑。[\[5\]](#)

1969年，埃斯坎比亚湾（Escambia Bay）上发现了21条死鱼。第二年，有30多条。在两亿美国人庆祝完第一次地球日后的五个月后，沿海地区的报刊纷纷报道，缺氧使埃斯坎比亚湾遭遇死亡威胁，这是有史以来所罕见的。专家的衡量标准不是海上的死亡数量，而是它波及范围之广：七英里的海洋动物死去，膨胀发臭，丧失了商业价值、消遣价值，脱离了食物链。佛罗里达海军巡逻队上尉刘易斯·赞加斯（Lewis Zangas）告诉美联社，大量的鱼肚翻白，让海面看起来“像雪地”，然后又坦诚地补充道：“但闻起来就不像了。”[\[6\]](#)

彭萨科拉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不再是以前海湾上那个诞生了商业渔业的城市了。旧码头区隐身而去，让位给了众多的旅游酒店、一座海军航空站、一所州立大学，还有容纳着五万人的住宅区。来自东北部的商业渔民曾将彭萨科拉打造为重要的海鲜港口，但这段新英格兰历史，已经被遗忘了。西班牙的根仍然以某种奇怪的方式维系着，主要靠的是它的历史和热情好客的人民，但居民们最强烈的归属感来自这座城市的或他们自己的南邦联文化。彭萨科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南方城市——政治保守，种族隔离，以及排外，但也有例外，它对军事开支和工业发展是欣然接受的。

彭萨科拉和战后的其余南部各州一样，紧跟时代步伐，热情地摆上了饕餮盛宴吸引着来自北方和外国产业入驻。劳动至上的法律削

弱了工会地位，使当地劳动力价格低廉，可利用价值高。税收优惠像姜饼一样被一点点发放着。在南方州国会议员的支持下，它得到了联邦拨款，修建了深水航道。在以到港和出港载重量计算的全国前十大港口中，有六个是墨西哥湾货运港，其中南路易斯安那港（位于新奥尔良和巴吞鲁日之间）和休斯敦港分居第一、第二位。南部对投资人的热情充分体现在其松懈的环保法律和一项不言自明的善意中：污染到你满意为止。

在彭萨科拉，他们的确这么做了。这座城市被四个湖湾包围，它们的三分之二流域一直延伸到了亚拉巴马州的乡村。农业径流和渗漏的化粪池将废弃物送进了主要的排污系统：黄河（Yellow）、黑水河（Blackwater），还有埃斯坎比亚河。查尔斯·洛厄里所在的埃斯坎比亚湾的情况最为严重。埃斯坎比亚河 及其支流为十座污水处理厂——“处理”是个暧昧的词——提供容器；其中九个在亚拉巴马，它们的半边屁股已经危险地坐到了佛罗里达的西部，剩下的那一半则蹲坐在湖湾岸上。

埃斯坎比亚河同时还支撑着一座发电厂和七座制造厂，其中四个是跨国化工产品生产公司。1977年环境保护局的一项调研显示，工业生产产生的耗氧化学物和氮是杀害鱼类的主要元凶。工厂还排放了大量重金属污染物：铅、锌、铬、锰、镍、铝、铁、钛、镉、铜、钴、钒。洛厄里会在日落前开着他的小卡车通过90号公路大桥，后面的拖车上载着他的船，饵料也已经精心备好，然后在车前灯的照射下，他会看见海湾电力公司煤灰里的金属氧化物在河面上闪闪发光。他知道在汤普森长沼（Thompson Bayou）上，他的电力提供商在那里将毒性极大的煤灰堆出了“一座该死的岛”。他也许也诅咒过热污染。电力公司从湖湾或河流里抽水冷却机器，随后将热水重新排回河湾，这些热水含氧量更低，通常会造成海草的死亡。[\[7\]](#)

工厂将湖湾当作污水桶，往里面倾倒废弃物，最终进入海洋这个水沟里。但由于地理上的巧合——水流形态、大陆位置以及障壁岛的存在——彭萨科拉周围的湖湾并不会被及时冲入墨西哥湾。于是多达40种的高浓度化学物在这里徘徊不去。

在湖湾倒下前，有人需要站出来行动。化学物的生产者不会自愿做出改变，地方官员也不会这样要求他们。亲商业、亲增长的《彭萨科拉新闻期刊》（*Pensacola News Journal*）将工业企业视若宠儿，为其说尽好话。鱼类死亡事件接踵而至。环保局估测，在1971年，全国的受污染水域共杀害了7400万条鱼，比1969年记录的增加了81%。将近四分之一的鱼窒息在得克萨斯海岸上，将近一半在佛罗里达翻了鱼肚，其中大部分都发生在埃斯坎比亚湾。

这是第一次，美国主要的致死水域不是在河流和湖泊，而是在沿海河口。对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将生命的摇篮变成了死亡的坟墓。在彭萨科拉公布了当年最大的鱼类死亡事件后，刘易斯·赞加斯通过美联社说出了另一句简单明了的话：“照这个速度，我想埃斯坎比亚湾不到一年就死了。” [\[8\]](#)

洛厄里那块石碑并非在凭吊死亡，而是在呼吁行动。

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往巨大的蓝色海洋里扔垃圾就像往一个湖里吐口水一样无害——想想二战结束时淡定从容地将化学武器从霍恩岛上扔下的美国军队。为和平目的制造化学品的公司照做不误，定期往墨西哥湾丢弃未稀释的有毒废弃物，包括二氯二苯三氯乙烷（DDT）和多氯联苯（PCBs）。1973年，大约就在军方承认酿成事故的同一时间，环保局叫停了这种操作。大部分有害物质被转移到一座距离得克萨斯州190英里的离岸焚化炉处。但15000名州民——有害废弃物排放量居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的23%）的州——联名签署请愿书，环保局不得不在1991年关停了焚化炉。

孤星州的居民戴安娜·威尔逊，可以引用任何的事实数据说明有害化学物正在得克萨斯州的阳光下“无所不在地潜泳”。为了让有毒物质停止流动，她愿意不止一次地赌上自己的性命。[\[9\]](#)

威尔逊住在卡尔霍恩郡（Calhoun County）一个叫海漂（Seadrift）的小镇上。郡政府设在拉瓦卡港（Port Lavaca）。拉瓦卡港的名字来自它出港的第一件商品。根据卡韦萨·德巴卡最初的愿景，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湾上引入了最早的畜牧场，到1840年，畜牧场传到了卡尔霍恩郡。美洲山核桃和棉花也是拉瓦卡港最早的一批出口商品。铜矿和铅矿也从那里被开采出来。它们预示着日后重金属的兴起，重金属并非从矿中开采，而是来自当地的化学加工。

拉瓦卡港在卡尔霍恩郡的北边，海漂镇则在南边，离海岸上的加尔维斯顿150英里远。和彭萨科拉类似，卡尔霍恩郡是插入四个湖湾里的一根手指，那四个湖湾分别是拉瓦卡、马塔戈达、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和圣埃斯皮里图（Espiritu Santo）。马塔戈达岛在这片陆地和水域的最前方，在另一个方向上，长耳大野兔的草原和杂草丛生的牧草地在它后方向西铺展。远处是林木线，生活着白尾鹿、北美鹑和野生火鸡。所有这些都曾经是卡兰卡瓦人的领地。

在威尔逊长大的20世纪50年代，海漂镇的居民不到500人。多数人通过网捞鱼、虾或蟹——常常三者兼有——来养家糊口。在20世纪20年代，这个小小的牧牛港口的虾产量在全国居于前位，至少当地历史是这么说的。威尔逊的曾祖父和祖父是捕虾人，她的父亲、叔伯、两个兄弟和丈夫也是——一个捕虾世家，到了威尔逊这里也不例外。海漂镇的水上晚高峰发生在船只纷纷回到鱼仓的时候。水边，杂草丛生的荒地上堆满了生锈的铁器、断裂的木头、剥落褪色的油漆和无主的马达，被扯断的渔网堆成了小山丘。[\[10\]](#)

威尔逊喜欢能包容这些垃圾的自然环境。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那里有“长喙涉禽和红翼歌鸪，还有成群手指长短的鲱鱼和钻进裂缝的蓝蟹，还有幽幽划过污泥的鲾鱼、比目鱼和鳐鱼”。密布湖湾的捕虾船漂浮于丰饶的生态环境中，似乎它会永远这样下去。[\[11\]](#)

威尔逊在八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出去工作了。她在24岁时买了属于她的第一艘船，那时的她高高的个子，皮肤被晒得黝黑，一头黑发；28岁时买下了第二艘船。船很好，龙骨牢靠，她叫它海蜂。威尔逊可以在破晓前黑漆漆的湖湾上航行，这对她来说就像在自家房子里走路一样容易。她自己一个人在船后拖网，可以修补那些破掉的被别人放弃的渔网，嗅到风暴即将来临的味道。驾驶海蜂的同时，她也管理着一个虾仓（两件女人不该做的事），并抚养着五个孩子（一件女人该做的事）。

卡尔霍恩郡周围的湖湾都大而汹涌，几乎无时无刻不是风起浪涌。沉没的渔船是大海留下的印记。有些船半沉在水中，是那些兢兢业业的有着许多故事的船舶的幽灵。捕鱼大多在湖湾上进行，每一个船长都知道失去船的风险。波涛汹涌的水浪中藏着码头残骸和标记桩，被丢弃的油井，以及被轻率处置的钻井设备。

威尔逊后来了解到了另一种更大的危险。环保局发布了第一份《有害物质排放目录》（*Toxics Release Inventory*），那一年是1988年，也就是《时代周刊》以“我们污秽的海洋”为封面的那年。在所有上榜的化学物排放源中，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占据了近四分之一。目录的前三十大郡中，有一半都和墨西哥湾相通，包括卡尔霍恩郡。不是匹兹堡、扬斯敦、底特律这些重量级工业城市，而是威尔逊的家乡，那个生活质朴、按部就班的渔村，其陆源有害物排放在全国及其所有19278座工厂中位居前列。

有毒物质来自五个后院工厂：美国铝业、联合碳化物、台湾塑料（以下简称“台塑”）、杜邦、英国石油化工（英国石油公司的子公司）。英国石油化工任意排放两种致癌物：乙酰胺和丙烯酰胺。联合碳化物排放丁二烯，这是一种毒性剧烈的空气污染物。美国铝业的铝土矿厂建立于1948年，往拉瓦卡湾的一座岛上倾倒了大量的含汞废料，导致得克萨斯州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封闭了部分湖湾，禁止捕鱼。台塑计划投资10亿美元，用于扩张塑料生产业务，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与日俱增的未经处理的废弃物排放，包括氯乙烯、二氯化乙烯和其他氯酸盐。[\[12\]](#)

卡尔霍恩郡并不是唯一上榜的得克萨斯州地区。在目录的前10名中，得克萨斯州有四个海湾沿岸郡府位居其中；前30名中，有7个，前31名中，有8个——但一个内陆郡都没有。1901年的纺锤顶不仅将美国送上了石油成瘾的不归路，也将得克萨斯州海湾沿岸变成了主要的石油衍生品制造基地。一个世纪之后，将近40%的美国石油化工行业——按威尔逊的说法——都“锚定在湿地里”，从亚瑟港到曾经是大海鲢游钓胜地的科珀斯克里斯蒂，无不如此。目之所及，化工厂的火炬像一团白光中的火把般燃烧着，火光刺破夜空，明亮耀眼，不知是地狱还是圣诞。

战后的住宅建造者在佛罗里达的红树海岸上找到了商机，工业美国则在得克萨斯的盐沼海岸上找到了避风港。东部海湾追求的是休闲经济；西部，追求的是工业。那边盖起了公寓，这边则升起了蒸馏塔。那边移民如潮水般涌来；这边，化学制品泛滥。佛罗里达的发展令人迷醉在幻境里；得克萨斯则将毒性带进了真实世界。工业的拥护者说他们创造了工作机会和税收。的确如此。但环保的拥护者也没有说错：毒害了鸟和鱼的，也将毒害人类。

每一个在得克萨斯州旅游或居住的人都不会想到《清洁能源法》和《清洁水法》已经颁布近20年了。得克萨斯州海岸的有毒物擅自排放、化学品溢漏、臭氧污染、清洁水污染、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为全国最严重。每年大约有1600磅得克萨斯州工业废物经布拉索斯河（Brazos River）排入墨西哥湾，近700磅来自休斯敦航道（Houston Ship Channel）和加尔维斯顿湾。

休斯敦航道建于20世纪初，位于休斯敦和加尔维斯顿间，用来运输棉花、牲畜和其他农产品。纺锤顶过后，它成为石油化工的海上高速公路，一并带上了重金属、二噁英、PCB等物，不一而足，全都朝加尔维斯顿湾而去。河流致癌物浓度飙升，人们开始称呼得克萨斯州的曲折海岸为“癌症带”。卡郡的居民因此生出了病态的幽默，他们说如果有人患了肝癌、脑癌、石棉肺或其他肺病，你可以根据他的病症猜他在哪家污染工厂工作。有段时间你可以看见美国铝业的水银珠子流入拉瓦卡湾。如果你流产了，那么，威尔逊会从威胁环境和公共健康的有害物中总结出一份“致流产化学物”清单。[\[13\]](#)

政府官员表示关心，但似乎在污染问题上并无作为。如果你走进一家工厂捣毁机器，或者走进一个农场射杀牲畜，你会被控以恐怖分子的罪名并被逮捕。但捣毁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河口湾的企业家们却安然无事。一封对当地报纸的去信说得对：“化工厂污染环境，但没有违反环保法律。”[\[14\]](#)

环保局提出一条工业行业理念：“稀释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将有害污染物以小剂量分散排入空气和水中，就不需要担心了。更糟糕的是，监管者定期给出“安全的”排放量标准，允许例外的发生。更更糟糕的是，行业的监管者就是它自己。污染者测量和报告它们自己产生的污染量——包括可免责部分和违法部分。它们总是称后者是意外，而许多“意外”完全不被提及。工厂趁人们晚上熟睡的时候，

偷偷加大排放，推土机将大桶大桶的有毒物埋入秘密土堆里（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做法）。人人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在持续发生。

在台塑公司宣布扩大生产计划后，威尔逊要求监管机构在批准扩建前，应遵循环境保护和公共健康法律以及它们自己的规则。看起来，政府官员对执行法规的热情，和这个总部设在台湾与新泽西州的塑料制造商遵守法规的热情程度是一样的。于是威尔逊成为她自己口中那个“不可理喻的女人”。

在埃斯坎比亚湾1969年因为死鱼潮而变得一片雪白后，查尔斯·洛厄里成立了欧鳊垂钓协会（BFA）。这不仅仅是一个户外运动团体，它仿照艾萨克·沃尔顿联盟建立，根据它的组织宗旨所说，其目标是提高“垂钓者、狩猎者、露营者和其他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环境保护责任感和休闲愉悦感”。BFA最初的成员来自洛厄里一起钓鱼和喝啤酒的同伴，大多是辛勤工作、拥护红蓝白^[15]的爱国者，有些人只有高中学历，有些也被称为“博士”，按洛厄里的话来说，他们是“一小帮红脖子”^[16]。^[17]

洛厄里终其一生都在彭萨科拉附近钓鱼。从六年级开始，他就和他最好的朋友吉尔伯特·麦吉（Gilbert McGhee）一起钓鱼了，麦吉是波阿克族的克里克人（Poarch Creek Indian）。他们住在彭萨科拉北边的松树林里，但在埃斯坎比亚河或其他湖湾上钓鱼实在太诱人，他们可以为此在天不亮就出发赶路。

J. D. 布朗（J. D. Brown）也是他们的一个朋友，共同创办BFA的成员。他在格兰德长沼（Bayou Grande）长大，那里位于彭萨科拉湾底部，在埃斯坎比亚以南。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可以一次从蟹笼子里抓出五六十只蓝蟹，或者走到海滩上，往水里撒几次网，捞到的鲷鱼就足够来一场丰盛的炸鱼了。

另一位关键的BFA成员是厄尼·里弗斯（Ernie Rivers），他从小住在俯瞰埃斯坎比亚湾的红色断崖上。他有时往下看，会看见上百只宽吻海豚追着足有半英里长密密麻麻的鲮鱼群跑。他还能看见湾底黑暗的阴影中成片成片茂密的海草。在他的记忆中，经济大萧条时期也没人饿死。“我们有那么多鱼虾牡蛎可以吃。” [\[18\]](#)

里弗斯在1943年加入海军，成为一名职业军官和飞行员。当他1964年回到彭萨科拉执行他退役前的最后一次任务时，海草还在，但河床已经开始后退。湖湾里的水不再像从前那般健康，它们正将海草置于死地。河床持续退化，最后消失不见了——到1980年，彭萨科拉水域95%的河床消失了，是墨西哥湾所有湖湾中损失最为重大的。结果虾也绝了迹。于是鲮鱼离开了。海豚不再来了。渔民亦然。他们现在成为被围困的群体，在当地没有了影响力，他们不是放弃了捕鱼就是到近海更严酷的环境中工作。在加入BFA之前，里弗斯就想停止人们对湖湾的强行攫取。作为海军航空站的航空摄影导师，他会指导学员飞到工业和污水厂上方，将排放污水的画面拍摄下来。

就在里弗斯进行空中侦察的时候，J. D. 布朗组建了一支海军陆战队。他发动BFA的志愿者在湖湾和长沼中取水样，这成为一个监察系统。他们两人正在编制一份滥用记录。BFA屡次到州卫生局和环保局，用他们搜集到的证据向它们施压。在联邦层面，国会和环保局制定了严格的全国污染物减少和合规日程表。到20世纪70年代末，彭萨科拉地区的工业企业为污染物建立了滞留系统，有害物将在那里等待，并最终通过深井灌注的方式得到处理。在某些案例中，湖湾排污的减少量因此达到了90%，企业对EPA如是说。报纸头条对此大加赞赏：湖湾归来，鱼儿又咬钩了。 [\[19\]](#)

但BFA并不会就此关门钓鱼。彭萨科拉的污水处理设施像个猪圈。它只提供最基本的处理，但不会移除化学物，包括氮和传染性病菌。

渗漏、事故和溢出导致的排污并不少见。这基本已经是全海湾范围内的常态了。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在1954年主持进行了一次墨西哥湾调研，其中有一幅地图，地图上用建筑物图标来表示当地的废水处理装置。这个图标布满了海湾和河流。黑色的代表废水未经合格处理就排放的污水处理厂，于是从科珀斯克里斯蒂一直到那不勒斯，黑色图标聚成一团，就像露天厕所里的苍蝇堆。[\[20\]](#)

研究还提到了赤潮，这是天然暖水区因为海藻暴发而引起水体变成红色、褐色或绿色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是关键十年，科学家注意到，这类有害事件在墨西哥湾发生得越发频繁。赤潮引起人们双眼和肺部的不适，并在海滩上堆积了大量的海洋生物尸体。海牛尤其受到严重冲击。卡韦萨·德巴卡也许在得克萨斯州见过赤潮暴发；迭戈·洛佩兹·德科罗戈多（Diego Lopez de Collogudo），一位方济会修士，记录了发生在1648年袭击了尤卡坦的一次疑似的赤潮暴发：一阵“恶臭”和“堆成山的死鱼”。专家认为发生在1844年佛罗里达狭长地带，位于莱昂纳德·德斯坦捕鱼处附近的那次，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赤潮现象，虽然当时没人知道那是什么。人们称其为“毒水”。1935年南帕德雷岛水域暴发了赤潮，杀死了两英寸的鲱鱼、八英尺的大海鲢，还有处于它们之间的一切生物，留下懵然不知所措的研究人员。[\[21\]](#)

紧接着，1947年的赤潮摧毁了大量的海绵层，塔彭斯普林斯至今未完全恢复，在显微镜下，科学家发现大量的有害藻类会释放出一种能麻痹海洋生物呼吸系统的毒素。但他们不知道赤潮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或者它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为了控制赤潮，科学家尝试往水里泼一点硫酸铜。结果只是杀死了更多的鱼。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南佛罗里达和南得克萨斯海岸周围的水域，赤潮暴发次数越来越多。

结果，得克萨斯州的牧场畜养起了更多的牛，屠宰场产能翻了一番。在佛罗里达，爆发式的人口增长引起了连锁反应，草坪肥料的使用量随之加大，类似家得宝、劳氏和沃尔玛这样的大卖场里，芳香的园艺商店引诱着人们，还有美乐棵这样的公司提供每月一次的草坪维护服务。一些科学家认为频繁的赤潮和绿地、牛粪和污水管道的涌出物有关，这让他们的同事头疼，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证据证实这种关联。媒体的报道将藻华暴发当作自然的一种残酷奥秘，有时他们也将污染导致的鱼类死亡错认为赤潮，归责于自然，放过了真凶。

偶尔会进入彭萨科拉的赤潮，常常将海湾海滩和旅游季搞砸。长期折磨着湖湾的是抽水马桶。厄尼·里弗斯不断给市政执政官弗兰克·费森（Frank Faison）打电话：“弗兰克，你又往我的湾里倒屎了。”里弗斯有照片为证。“你要把那些该死的东西弄出来。”但费森从来没弄过。他说市政负担不起一个新的排污系统。于是它不断地缝缝补补，安上新的管道，将同样的屎运到别的地方。每天超过2000加仑的污水流入水体。[\[22\]](#)

让彭萨科拉人备感为难的是主处理厂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市中心边缘，在湾边可以赫然看到它耸立的身影——一座古罗马竞技场状的排泄物建筑。顺着右边来的风，正在购物的顾客可能有一阵好闻。当地居民害怕风暴，是因为害怕狂风和水涝会让污水溢出到街道上。最可怕的时刻发生在2004年，飓风伊万（Ivan）将人类粪便灌进了轿车和建筑物里。弄脏了湖湾是一回事，弄脏了人住的房子，就是另一回事了。人们要求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该适可而止了。

市政管理局在征得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准允后，投资3.16亿美元，在老厂15英里以北处建了一座零排放的处理厂。它将经深度处理的水循环提供给当地的国际纸业造纸厂和海湾电力，用于机器冷却和需要大量用水的洗涤工序。这一处理系统赢得了全国和国际上的可持续环

保奖项。彭萨科拉不再因为粪水满街和臭气熏天尴尬地荣登新闻头条，而是在通往更清洁的未来的道路上骄傲地领先了其他城市一大步。

但在其他方面，它仍然跌跌撞撞得厉害。失去闪耀头条的是它的7座超级基金工厂。能比得上墨西哥湾海岸上的各郡的，只有休斯敦的哈里斯郡（Harris County）（16座）。彭萨科拉的其中之一是美国木馏油工坊，它污染地表和水体长达80年，直到1981年才关停。莫比尔也有一座带来污染的木馏油厂。密西西比河上的博加卢萨

（Bogalusa）、博蒙特和休斯敦也各有一个。加尔维斯顿在1900年飓风中卷走的木板路就是在当地一个木馏油厂里进行防腐处理的。沃尔特·安德森划船渡过密西西比湾时，他便置身于附近工厂排出的污染物中，工厂在处理用于巴拿马运河的木材。这些工厂很多为铁路公司所有，它们为铁路公司制造经木馏油处理的轨道枕木。这个地区的松树林不仅提供了枕木的原材料，还可以用作电线杆、码头铺设和早期的油井桩材，而且它们全都经过了化学防腐处理。

美国木馏油工坊的流出物渗进了奇科长沼（Bayou Chico）和彭萨科拉湾。J.D. 布朗回忆说，他捞上来煎着吃的鲮鱼吃起来就有一股码头木桩的味道。奇科长沼这个地方令人啼笑皆非。长沼边上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废水输送站和那个木馏油加工厂，这里的水既不能在里面游泳，也不能喝，但船舶最爱停靠在这里，因为水里缺氧，藤壶无法在这里存活。

BFA成员认为埃斯坎比亚湾也应该在超级基金的名单上。有几次他们试图修复海草床，耗费了数千项个人的和筹集的资金，但海草总是持续不了几个月就死了。这要归咎于湾底一圈残余的PCB，PCB在1979年被环保局禁止使用。要对此负责的机构很可能是孟山都公司，这家公司已经成为清洁湖湾支持者们喊打的对象了，这并非无妄之灾。孟

山都在全世界的环保行为记录上已经臭名昭著，作为埃斯坎比亚河的占有者，它是一个众所周知的PCB排放源。[\[23\]](#)

在这件事上，没人能比在彭萨科拉长大的琳达·杨（Linda Young）更清楚的了。她读小学时的一天，她母亲接了一通电话，随即哭了起来。琳达以为谁去世了。但其实是1969年那次大量鱼类死亡的消息。在此后很多年里，电话铃声不断响起，带来持续的天灾报道。这看起来的确像世界走到了末日。这就是埃斯坎比亚湾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杨记得人们的疑问：“什么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就是，孟山都对他们做了什么？

30年后，她成为一个环保积极分子，此时她正开着一辆小货车到了工厂外。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她的一个朋友和她们的四个孩子——并不都是自愿来的。杨跟在一辆运货卡车后面，溜进了那道颇具威慑性的大门，上面挂着禁止通行和危险品的标识。她听说有一座露天污水坑，里面的化学物直接往空气中挥发，大概也会排入湖湾。她爬上护道，远处是一片17英亩的湖泊，里面尽是会导致肺部灼烧的废水。她拍了照片，逃离了这个被围蔽的场地，随后在她的环境主题报纸《地球新闻》上发表了这项证据。迫于压力，孟山都建了一个储存槽，抽干、铲平了它的污水坑。

湖湾也许恢复了昔日的美丽，但如果PCB一直阻止海草长回来，这又好在哪儿呢？缺氧是持续存在的问题，科学研究表明鱼和蟹体内存在高浓度的PCB。卫生部张贴了严禁钓鱼的警示牌。但警示牌无法阻止鱼继续在受污染的湾底进食，有害物渗入它们的组织，然后它们游走了，在其他水域被捕捞上岸。杨，在当时已是佛罗里达清洁水网络的负责人，清洁水网络是一个非营利的环保和公共卫生组织，既然环保局和佛罗里达的环保部门没有完整履行其职责，杨就开始敲响湖湾边

各家住户的门。她聚集了50个原告，争取了法律代表，在2008年向孟山都以及后来接替它的企业提起诉讼，要求清除残余的PCB。

14年前，帕蒂诺湾（Perdido Bay）的沿岸居民发起了一个类似的诉讼。帕蒂诺湾是彭萨科拉西边唯一的一个湖湾，也是备受困扰的一个。帕蒂诺河和伊莱文麦溪（Elevenmile Creek）在这里交汇，而伊莱文麦就是问题所在，溪流上游有一座排放污水的造纸厂。造纸业是又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行业，爱它的薪资，恨它带来污染——它顺流而下，带着一股臭鸡蛋的味道，提醒着人们它的存在。自从化学家们发现，硫酸可以减少在南方松木转化为牛皮纸可用纸浆时所产生的树脂后，彭萨科拉的一家造纸公司，在1903年，第一次尝试生产这种产品。它失败了。但几年后，得克萨斯州位于萨宾河（Sabine River）上的一家工厂成功了。

于是，在松林密布的墨西哥湾北部，造纸厂像蘑菇般纷纷涌现，令这个剧毒行业在此地区站稳了脚跟。硫酸的臭气通过空气传播到数英里之外，随之而来的还有纸浆废水，废水的生物可降解性低，导致难以被净化。环境不会变得更好，因为化学家们又完善了漂白工艺，用氯将褐色的牛皮纸变白，过程中会产生副产品二噁英，一种有害的致癌物质，但令人费解的是，环保局直到2000年才将它纳入《有害物质排放目录》。1931年，国际纸业公司在巴拿马城建了全国第一座使用这项新工艺的造纸厂。

伊莱文麦溪的造纸厂成立于1941年。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溪流和湖湾变成了红褐色。上游湖湾的海浴者从水里走出来后，身上还挂着纸浆纤维，皮肤上起了疹子。鱼、软体动物和海草一一死去。水边积聚起了泡沫。在20世纪60年代，州卫生局在检测后总结道：“伊莱文麦溪受化学和生物的污染严重，这是圣里吉斯造纸公司的废水排放导致的。”但州政府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与湖湾西岸接壤的亚拉巴马

州提出控诉，促使联邦发起调查，调查结果和州卫生局的相同。但是，圣里吉斯依然将污水转移到伊莱文麦溪里。[\[24\]](#)

这件事让住在湖湾边的杰姬·莱恩（Jackie Lane）越想越觉得困扰。莱恩和她的丈夫吉姆在20世纪80年代初搬到彭萨科拉。这里是吉姆的老家，他在帕蒂诺湾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他和杰姬在东岸的上半边盖了一所房子，想为他们的孩子创造一个相似的环境。虽然莱恩觉得湖湾很漂亮，但她总觉得哪里不对。她会发现的；她的专业是海洋生物学。

她开始研究湖湾中的蛤蜊，但后来它们大部分都死了。那是在1986年。第二年，当时造纸厂的主人，钱皮恩（Champion），提出更新其许可证的申请，以继续排放并不符合州府标准的污水。莱恩和湾区的另一个居民乔·安妮·艾伦（Jo Anne Allen），建立了一个基层组织，要求州府行政听证。最终，政府批准了钱皮恩将合规时间延迟到1994年的申请。指定的1994年到来了，但事情几乎原地踏步，因为造纸厂再次申请更新它的排污许可。莱恩和她的组织带头，代表湾区居民提起了集体诉讼。钱皮恩最后赔偿原告500万美元，但不认罪，因为他持政府许可，进行的是合法操作。莱恩和其他诉讼成员用赔偿金的一部分建立了帕蒂诺湾基金会，而造纸厂则继续污染着水和天空。[\[25\]](#)

莱恩和杨与另一位为清洁水资源战斗的同志分享了斗争历程，对方是乔伊·托尔·埃泽尔（Joy Towle Ezell），她生活在半岛北边的泰勒郡（Taylor County）。迪克西[\[26\]](#)从未在泰勒郡死去（20世纪80年代当地的三K党曾将一家犹太熟食店团团围住）。这是一个满是沙砾的偏远乡村，疏疏落落地分布了不到两万居民，历史上充满着种族暴力和服役于伐木和松节油提取营地的罪犯劳工的故事。它曾两次是木材大郡——第一次在20世纪早期千年柏树被砍伐用于兴建高楼后结束，第二次是新的一批柏树在20世纪80年代长成，被当作护根覆盖物

染成红色或黑色后装进塑料袋里。在同一时间，一些当地人，包括一个副治安官，利用大片未开发的大弯曲海岸来走私进口毒品——并被逮捕。对于一个高中学历的男人或女人来说，要踏实干活是很辛苦的。如果你走运的话，可以在巴克艾纤维素公司（Buckeye Cellulose）找到一份工作，有时它的雇员数量可以占郡人口的将近十分之一。

俄亥俄纤维素公司由总部设在俄亥俄州的宝洁公司所有，成立于1954年。宝洁建厂前，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警告过，泰勒郡松软、可渗透的、易形成落水洞的地质结构非常不适宜作为工业用地——含水层将会受到污染（最后的确发生了）；污水沉降池极易坍塌（也发生了）。那里有芬河，即芬霍洛韦河（Fenholloway River），它穿郡而过，最终流入墨西哥湾。佛罗里达官员在20世纪40年代将它指名为工业航道，于是炫耀着它很快就会褪色的宝石，它邀请宝洁到阳光之州来随意污染。

换句话说，政府夺走了人们最爱的垂钓和游泳的天然泳池，将它拱手让给一家以制造家用清洁剂闻名的制造商，但结果它留下了一团无法清理的残局。巴克艾从纸浆中提取出纤维素，用于生产卫生棉、香烟滤嘴、帮宝适的一次性尿布、冰激凌和其他食物的装填材料，以及香肠肠衣等各种低端产品。厂房是一座占地十几平方英里的永久性建筑，河流经过它后，氧气耗尽，深受污染，几乎没有生命可以存活。埃泽尔说巴克艾将元素周期表上的 H_2O 重新定义为“两份恐惧（Horrible）和一份恶臭（Odor）”。[\[27\]](#)

1981年她在祖父母家体会到了她的第一份恐惧。她祖母站在厨房的水龙头前，尖叫道：“这水里有巴克艾！”他们的饮用水井在厂房的20英里开外，结果郡上所有这些私有的水井都能闻到纤维素污染物的味道。不出五年，埃泽尔也成为积极分子。她聪明，为公共卫生而

不停奔走，她有这个行业的工作经验，因此对化学物略知一二，她会在公开会议、产品演示会和媒体上与巴克艾做周旋。她甚至跑到俄亥俄，敲开宝洁公司总裁的家门，和他的妻子聊天，向她倾诉自己的孩子在备受污染的世界里长大，博得对方的同情。亲巴克艾的地方报纸称埃泽尔是一个“激进的环保恐怖分子”。人们威胁要取她的性命，因为他们说她威胁到了他们的工作。[\[28\]](#)

但她的丈夫在造纸厂工作了26年，而也鲜有人像她一样深深扎根于泰勒郡的沙质土壤里——可追溯至19世纪的整整五代人。和戴安娜·威尔逊一样，埃泽尔将人们的利益放在心上。当你无法从自家水井喝水，而不得不喝瓶装水的话，深受其害的是每一个人（最后，泰勒郡用的是由管道运输的净化水）。

环保局认定芬霍洛韦是佛罗里达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部分原因是人们吃的捕捞自河流下游的鱼含有污染成分二噁英。在埃泽尔和其他人包括琳达·杨的努力下，州政府在1997年将芬霍洛韦重新指定为休闲河流，巴克艾在其股东易主后，称它投资了3000多万美元清理其污染排放物。但它没有停止漂白它的产品（它坚称是因为母亲们希望用纯白的尿布）。

有兴趣的人，埃泽尔会带他们到工厂上游的河流里取一瓶水，这时瓶里的水清如山泉，然后再到工厂的下游取水，就会发现水色变得像白兰地一样。这种深色并非来自树皮中的丹宁酸，没人敢喝它。她会开车带着他们游览整条河，向他们展示这条化学之河，只有张大口呼吸空气的鱼才能在里面生存下来。有些鱼神奇地转换了性别。生物学家在1970年发现它们后称其为“大胡子女士鱼”。这条蜿蜒荫翳的水路本是一条风景秀丽的河流，但现在直到海湾的25英里沿河空气都刺鼻污浊。巴克艾最后提出的补救措施是修一条直接通往墨西哥湾的管道。2005年，塞拉俱乐部将公司告上法庭，控诉理由就是它将没有

达到联邦标准的私营企业污水直接排向原目的地。稀释并不是合适的解决方法。[\[29\]](#)

五年后，“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以来，前后87个噩梦般的日夜每天有260万加仑原油流入墨西哥湾。巴克艾的污水排放比这还多，而且这种做法已经持续了50年。即使在深水地平线的石油停止泄漏后，它依然在继续，这是一场不会停止的噩梦。

虽然赢了官司，但杰姬·莱恩仍然能看到帕蒂诺湾上噩梦在上演。2000年，美国国际纸业公司，也就是人们所称的IP，收购了钱皮恩在彭萨科拉的造纸厂。它开始扩大生产，致力于制造百分之百纯白的产品。公司一度为自己挽回了些许声誉，它使用了全新的污水处理设备，并将回收水循环用于抑制扬尘、浸湿堆积成山的木料以防起火。但这些做法对杜绝化学污染毫无作用。莱恩的组织做了检验，结果显示湖湾中所剩无几的蛤蜊体内含有二噁英和砷，其浓度决定了它们无法被安全食用。

佛罗里达环保部门在2010年一项新的排放许可中要求国际纸业建立一个“试验性”湿地治理系统，国际纸业照办了，为此发行了6000万债券，在1400英亩土地上建立了它所称的污水分排地。三分之二的污水将排向这里；纸业公司在这里种植了18万棵树，定期进行鸟类调查统计，并制作了一个推广视频。湿地的建立令国际纸业广受赞誉。但尽管污水经过处理，造纸厂排放物的氮、磷含量依然很高。当湖湾上半部变色起泡、遭遇缺氧时，国际纸业会辩称湿地上的污水并非点源污染，而且根据官方的定位这个系统是试验性的。等到2015年湖湾真的淤塞不通时，国际纸业试图指责是当地一个污水处理厂增加的污水排放导致了堵塞。[\[30\]](#)

湖湾是价值连城的资产，也是最初的彭萨科拉得以兴盛的原因。莱恩希望找回帕蒂诺失去的牡蛎、蛤蜊和海草床，正如琳达·杨以及

如今已是暮年的洛厄里、布朗和里弗斯，希望埃斯坎比亚湾底的水草能重归繁茂。

拉瓦卡湾的海草也正走向消亡。20世纪90年代初的宽吻海豚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样的事情太多，野生动物学家为此发起了一项调查，同时也让戴安娜·威尔逊过着并不合理的女性生活。这些是300磅重、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动物，他们比体积更小的生命更容易吸入污染源。威尔逊听一个调查员说：“他们在掠夺的是我们的食物。”^[31]

她为了台塑公司扩产的事，已经联系上了她认识的一个休斯敦律师。吉姆·布莱克本（Jim Blackburn）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本地人，在格兰德河谷（Rio Grande Valley）长大。他和威尔逊是灵魂上的至亲。他们对家乡都有着很深的情感，将得克萨斯的水草丰美的湖湾视为心中更高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布莱克本决定成为一名环境律师，尽管当时几乎不存在这个领域。他头发蓬乱，蓄着胡子，对工作全情投入，起诉未经许可的污染，破坏湿地的行为，以及陆军工程兵团做的坏事，比如随地处置清淤废土。

事件起源于新成立的加尔维斯顿湾基金会发起的一项运动，因休斯敦航道最终汇入加尔维斯顿湾，因此运动反对休斯敦航道的不断拓宽拓深。加尔维斯顿湾自1918年的甜心16号油井井喷以来，已经遭遇了数百次的石油泄漏，整个州超过一半的污水排放都流向了它的流域。反对的一方做出了相当大的妥协。他们曾经受过也将经受更多的挫败。布莱克本对此处之泰然，他说，那些从破坏自然中得利的人，在他们随心所欲的路上，迎接他们的是坚定有力的反击。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环保事业而战。其中不少是女性，她们是早期俱乐部和奥杜邦协会成员的后继者，为维系一个对所有人都更好的世界而努力。比如威尔玛·苏夫拉（Wilma Subra），她是一个环境化学家，她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密西西比南部的石油化工行业，并在日

后因此赢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大奖”。还有更靠近布莱克本的特里·赫尔歇（Terry Hershey），在20世纪60年代抗击哈里斯郡将水牛湾（Buffalo Bayou）变成防洪排污的沟渠一役上，她是主要力量。《休斯敦邮报》曾刊出一则头条说，河湾的水——“不过是阴沟里的水”。赫尔歇的榜样是阿内拉·德克斯特（Anella Dexter）和莎拉·埃莫特（Sarah Emmott），她们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援引西班牙国王在1815年的一道皇家命令中的优先权，成功劝说州立法机构通过了开放海滩的法规，该法规禁止了石化公司买下海岸线并阻止公众进入的行为。[\[32\]](#)

台塑公司是随意所欲的其中一员。该公司的环境污染前科，让即使是家乡的商业友好型的台湾当局也难以接受。但得克萨斯州的监管者似乎并未察觉。台塑在获得排放许可前就开始动工扩建，但当局并未阻止。工人在新厂房入口四周种上了观赏灌木丛和笔直的树苗，意在为台塑塑造一个生态友好的友邻形象。威尔逊一眼就看清了这些表面功夫，不过是在掩盖其污染者的本质。

同样惹怒她的还有环保局。环保局在此次扩建是否需要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一事上摇摆不定。于是，威尔逊和布莱克本提出申请，请求公司提供评估报告。威尔逊组建了卡尔霍恩郡资源观察机构（Calhoun County Resource Watch），并尽全力为机构招揽成员。她和她最好的朋友，唐娜·苏·威廉姆斯（Donna Sue Williams）大概是其中仅有的活跃分子。环保主义者在劳动阶层中是不受欢迎的人群，被认为和一个普通刑事犯、共产主义者（对那些仍然惧怕共产党的人而言），或者一个恐怖分子没什么两样，如果不是更糟的话；环保主义者在社区街坊中像性侵罪犯一样不受欢迎。杜兰大学法学院教授奥利弗·霍克（Oliver Houck）曾听一个女士在泰勒伯恩堂区的公共聚会上对着麦克风说：“在上帝创造环保主义者时，他应该选择堕胎！”此言引来了一片叫好声。[\[33\]](#)

卡尔霍恩郡委员会和商会将威尔逊视为反进步、反工作的煽动者。1991年3月，海漂镇的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厂房发生了三起爆炸，就发生在自我监管的得克萨斯州化工委员会称其为全州最安全的厂房后不久，但饶是如此，当一个污染者总比当一个环保主义者来得好。的确，污染制造者摧毁了一些生计，比如打鱼，但兄弟或叔伯可以停下他们的船去工厂里工作。人们知道污染制造者对自己的健康不利，但他们希望癌症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如果确实发生了，也许只是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问题，就像行业律师们说的那样——抽烟、喝酒、腰围的问题。[\[34\]](#)

渔民们对加入威尔逊的组织也并不热心。他们已经自身难保，不需要再加上一条工作破坏者的罪名。在鱼类数量大幅减少问题上，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替罪羊。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性危机，媒体和政客，甚至联合国，都坚持默认说法：过度捕捞。科学家们说渔民因误捕带来的间接渔获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曾有一段时间，墨西哥湾的捕虾人每捕上一磅的虾，就要丢弃和弄死十磅的其他海洋生物——每年无意识地屠杀了十亿磅。从1987年起，联邦政府强制捕虾人使用海龟逃脱装置，相当于海龟们的逃生舱，因为环保主义者称他们在杀害被缠在渔网中的海豚和海龟，有些渔网过于巨大，据《时代周刊》说，大得足以“吞掉12架波音747”。[\[35\]](#)

商业性渔民也遭到了来自休闲垂钓人群的炮火攻击。那些做生意的家伙正在清空大海，毁了他们的户外爱好，垂钓者们如是说。看看他们对红鲷鱼做了什么，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在塞拉斯·斯特恩斯时代）。现在他们又对鲑鱼下手了。有专家说这是保罗·普鲁德霍姆（Paul Prudhomme）的错。这个新奥尔良的名厨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一阵烟熏鲑鱼热，渔民们发现他们迎来了新商机。他们一时无法快速捕捞到足够多的鲑鱼。有些渔民甚至雇用了侦察机。鲑鱼的捕获量于是从1980年的5.4万磅飙升到了五年后的540万磅。

问题是鲑鱼是游钓者的最爱。他们开着双马达的大马力船在水面上恣意飞驰而过，这是最新的探鱼电动设备，甲板上的钓鱼者每人配备3~4根鱼竿。重复、大马力和复杂高科技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已经没有了克莉丝汀·霍利和弗洛伦斯·哈丁时代的好运气，钓上来的战利品也比那时的小了。垂钓者们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在得克萨斯州，他们集聚了众人的智慧和不可小觑的资源，成功禁止了商业刺网捕鱼。与其说是救鱼，不如说是抢鱼。

商业代表团毫无胜算。商业渔民的工作模式决定了他们是单兵作战的人，无法联合在一起拯救他们的生计。在这个问题上带头奋起的人感到悲痛，因为让他们的人走到一起就像赶着猫群放牧一样。聚起来的得克萨斯州渔民无法筹集到足够支付电视广告和游说的钱，但对组织有方的游钓方来说，凭借他们的财力和来自中上层阶级的人脉优势，这些都轻而易举。身处同一社会阶层的州立法委员中，有不少人的钱夹里就塞着游钓执照呢。但没人听说过渔民中有谁担任过经选举的公职的，除了个别市政职位以外。

所以，游钓人士赢了。得克萨斯州在1988年取缔了商业性的刺网捕鱼，宣布鲑鱼是户外爱好者们的专属战利品。1994年，佛罗里达的投票人以72%的多数票批准了宪法对刺网捕鱼的取缔，他们相信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环境（而不是为了垂钓）。路易斯安那在第二年宣布刺网不合法，亚拉巴马则在刺网捕鱼的牌照发放上极尽严苛。这就有如从木匠手里夺走了锤子。商业渔民无法使用工作中的基础工具，数代相传的捕鱼传统就这么不体面地突然结束了。但对前渔民来说，后来老天开眼，他们也得到了些许安慰：墨西哥湾水域的垂钓客数量创下纪录——在2011年达到了2200万人次，批评的声音抱怨机动船堵塞河湾水道、大量鱼钩被扔进海里，因鱼类数量减少产生的骂声全都集中到了垂钓者的身上。

同时，被打败的渔民将他们的渔网移交给州政府，能获得一点补偿，然后他们卖了自己的船，或者任它们生锈腐烂，或郑重其事地将它们沉入水中。他们中有些人年纪太大，不愿费心参加职业培训，于是去申领了失业救济。大部分人不得不卖了他们的房子，因为享受了垂钓特权的胜利者们，带着另一种掠夺的快感，推高了当地的不动产税——占领水边的房屋，他们可以在那里停靠造型优美的垂钓船。从前的刺网捕鱼者有些设法做起了水产养殖，有些去为污染企业打工。

污染企业在钓鱼战的多方交火中得以置身事外。垂钓者们知道甩掉刺网渔民比甩掉污染企业容易，因为企业有更深的关系网。商业渔民也在找他们的替罪羊，但错误地将怒火发泄在了渔业专家身上，他们说专家不懂算数——海里的鱼比这些高学历的“聪明人”知道的多得多。

商业渔民的说客如果援引以下这项调查数据或许胜算更大，数据显示墨西哥湾上95%的商业鱼种依赖于健康的河湾环境，而污染事实上已经渗入每一个海湾河口。在美国，没有其他地方的渔牧场比海湾各州的更营养过剩了。低溶氧量是四分之一的得克萨斯州河口、四分之一的路易斯安那州河口面临的共同问题。恶劣的水体环境迫使路易斯安那州35%的牡蛎床消失。美国90%的沿海湿地都在墨西哥湾上，但在过去200年间，半数湿地已经消失。莫比尔湾的海草床死了70%，坦帕湾为85%，加尔维斯顿湾为90%，彭萨科拉湾为95%。或者，他们可以直接指向受污染的藻类，科学家们发现它们从墨西哥湾随着墨西哥湾流漂到了北卡罗来纳。[\[36\]](#)

甚至在得克萨斯州取缔刺网捕鱼之前，威尔逊就知道商业渔民被人抓住的把柄。当她争论污染企业正在摧毁鱼类和渔民们的栖居地时，郡府的官员和当地的一位法官就将其归咎于过度捕捞。威尔逊也见过，野生动物的代理人们气势汹汹地针对非法渔民执行着《濒危物

种法》，而非违法的污染企业。勤奋工作的人因为使用渔网而被扔入监狱，而台塑的高管们可以任意毒杀动物却逍遥法外，正义何在？这并不是说过度捕捞不是事实。但在一个行业摧毁着海洋栖居地时，鱼的数量变少，总量正在衰减，渔网吞噬的数量自然就占据了更大的比例。

1990年的春天，环保局透露它将考虑免除台塑公司扩产所需的环评报告，威尔逊对此进行了一次甘地式的绝食抗议。“我讨厌绝食抗议”，布莱克本回忆道。但就在她日渐消瘦时，台塑做出了意外之举。为了让她进食，企业同意允许工会成立组织，遵守清洁水法规，并提交针对其厂房和污水排放状况的第三方分析报告。长期以来，威尔逊都同时站在工人和环境的一边，意图说明两者并非对立。也许这对台塑来说有点难以承受，因为几乎就在她咬下汉堡，结束30天的绝食抗议的同时，企业反悔了。

环保局随后同意了台塑需要提交环评报告，但威尔逊认为这个行动来得太慢。工程已经开始了，所有人都知道环保局在这个时候是不会拒绝批准许可的了，它当然也不会要求台塑拆除它具有欺骗性的绿化景观。得克萨斯州的官员也没有。得克萨斯州的大气治理委员会在颁发许可证前眼都不眨一下，即使威尔逊和布莱克本给出了公司一直都在违反州法律的证据。[\[37\]](#)

威尔逊不得不暂退一步，分析最近的不幸局势。就是在那时，她了解到了零排放技术，包括超滤、反渗透和去电离子技术。运用这种高深技术，可以消除废液排放，减少清洁水的使用，意味着湖湾或海峡有可能就此免受污染。她还了解到墨西哥湾上还没有人使用它。她向公众阐述这个想法后，台塑召集了镇会议说零排放技术是一个骗局。

威尔逊的下一步就是组织抗议游行，她不得不拉上当地越南裔捕蟹人和战争难民，他们被视为来自外域的入侵者，一度和环保主义者一样遭到人们的厌恶。200位和平示威者的游行拉开了一项新的疯狂行动的序幕：威尔逊要在台塑的污水排放处——一根30英寸直径的钢管，上面用绿漆印着公司名字，废液从里面喷涌而出——将她的“海蜂”沉入“湖湾，那里本是虾蟹鱼们的摇篮”。她将所有东西，包括引擎，从船上卸下来，她的哥哥用他自己的船将“海蜂”拖到指定地点，结果只招来鸣笛闪灯的海岸警卫队，用扩音器警告他们将面临18年监禁和50万美元罚款。威尔逊看到了其中的讽刺，她阻止工业企业用化学物杀害民众，而被派来阻止她的是“民兵组织”。[\[38\]](#)

她没能在排放污水的管道旁沉没“海蜂”。但后来，极具仪式感地，船沉入了另一个地点，变成了礁石。那时的台塑已经声名狼藉，并在1994年签下了布莱克本所称的“威尔逊-台塑零排放协议”。台塑起初减少了超过30%的废水；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零排放，但它或多或少抵消了扩产带来的影响，这个塑料生产商也在继续减少它的用水足迹。和台塑达成了协议后，威尔逊又立即转向联合碳化物、杜邦和美国铝业，要求他们签署类似的协议，并说服郡委员会和海漂镇议会通过零排放决议。她称这是“唯一一个能停止摧毁湖湾的合乎常理的解决办法”。[\[39\]](#)

接下来，美国铝业在21世纪花费了1.1亿美元对拉瓦卡湾进行了清理。环保局在1994年宣布将遭美国铝业汞污染的湾区水域划分为超级基金污染场址——这个声明对威尔逊来说来得太晚了。作为清理计划的一部分，美国铝业清除了湾底2300磅的水银。它在阿兰萨斯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一个重要的水禽栖息地）旁建立了70英亩湿地，并向保护区捐献了稍多于一平方英里的土地。铝业公司还培植了11英亩的牡蛎床，修建了向公众开放的垂钓码头。州政府重新开放了此前禁入的部分休闲区。人们重新钓起了鱼。美国铝业展示了它的合作精神，

这也是它在媒体中宣扬的，将它自己和历史上其他著名的污染企业加以区别。

拉瓦卡的复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故事，如果抛开几个必要因素不谈的话。威尔逊指出解决方案中没有提到要为沿湾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做评估。布莱克本反对只是简单地将污染湖湾的沉淀物转移到不远处湖湾岛屿上的一个隔离设施中。拉瓦卡是公众的资产，但它长期以来都成为美国铝业的“专属弃置点”，他争论道；他还质疑隔离设施是否能抵挡得了大型飓风的侵袭。他的质疑有理可循，因为风暴席卷岛屿已是常事。美国铝业的一位发言人担保说：“我们”也“生活”在这里。“如果有问题，我们也脱不了身。”^[40]

于是问题来了。就在那一年，2005年，发生了飓风卡特里娜。虽然卡特里娜侵袭的是路易斯安那州，但它暴露了一个建筑堆砌的工业化海岸的脆弱。它同样卷走了岛屿，人们开始更多地谈论起逐渐开始显现威胁的海平面上升问题。没有比墨西哥湾上的海岸线和岛屿处境更危险的了。

^[1] Diane Wilson, *An Unreasonable Woman: A True Story of Shrimpers, Politicos, Polluters, and the Fight to Save Seadrift, Texas* (Chelsea Green, 2005), 355.

^[2]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份报告（《2008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指出，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消耗量翻了一番。

^[3] Anastasia Toufexis, “Our Filthy Seas: The Oceans Send Out an S.O.S.,” *Time* 132 (1988): 44.

^[4] Paul Galtsoff, ed., *Gulf of Mexico: Its Origin, Waters, and Marine Life* (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1954), 555.

^[5] Charles Lowery,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August 27, 2013.

[6] “Huge Fish Kill in Escambia Bay, ” *St. Petersburg Times*, September 3, 1970.

[7]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nvironmental and Recovery Studies of Escambia Bay and the Pensacola-Bay System, Florida* (EPA, 1975) ; Lowery, interview, August 27, 2013.

[8] “Massive Kill Spotted in Florida Bay, ” *Chicago Tribune*, September 13, 1971.

[9] Wilson, *Unreasonable Woman*, 382.

[10] Wilson, *Unreasonable Woman*, 48.

[11] Wilson, *Unreasonable Woman*, 322.

[12] The information on pollution from these manufacturing plants was gathered in spring 2015 from the EPA’ s annual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reports, accessible online at <http://www2.epa.gov/toxics-release-inventory-tri-program>. On the closing of the bay, see “EPA Superfund Program: Alcoa (Point Comfort) /Lavaca Bay, Point Comfort, TX,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ttps://cumulis.epa.gov/supercpad/cursites/csitinfo.cfm?id=0601752>, accessed spring 2015.

[13] The information on pollution from these manufacturing plants was gathered in spring 2015 from the EPA’ s annual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reports, accessible online at <http://www2.epa.gov/toxics-release-inventory-tri-program>. On the closing of the bay, see “EPA Superfund Program: Alcoa (Point Comfort) /Lavaca Bay, Point Comfort, TX,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ttps://cumulis.epa.gov/supercpad/cursites/csitinfo.cfm?id=0601752>, accessed spring 2015., 36-37, 382.

[14] Irene Hahn, “Plants, Pollution and Lavaca Bay, ” *Victoria Advocate*, August 23, 1989.

[15] 美国国旗颜色。——译注

[16] 对美国南方的露天劳动者（政治观点保守，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贬称。
——译注

[17] Bream Fishermen Association, “Our Mission, ”
<http://breamfishermen.org>, accessed summer 2016; Lowery,
interview, August 27, 2013.

[18] J.D.Brown,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May 2, 2013; Ernie
Rivers,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May 2, 2013.

[19] Peter Behr, “Bay Recovers from Pollution, ” *Pensacola
News*, February 21, 1975; “The Fish Are Biting Again in Escambia Bay
Waters, ” *Escambia County Beacon* 2 (1976) : 2.

[20] Galtshoff, *Gulf of Mexico*, 555-73.

[21] Deborah Cramer, *The Narrow Edge: A Tiny Bird, an Ancient
Crab, and an Epic Journe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45;
Robert F.Hutton, *The Ecology of Boca Ciega Ba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redging and Filling Operations...*, Technical Series
no.17 (Florida State Board of Conservation, 1956) , 12.

[22] Rivers, interview, May 2, 2013.

[23] Jennifer Waters, “Harmful Fish, ” *Earth Issue*,
no.8 (April 10, 2008) , [http://inweekly.net/article.asp?
artID=7299](http://inweekly.net/article.asp?artID=7299).

[24] R.F.Schneider, *Surveys of Perdido River and Bay, 1966-
1967*, Report of Florida State Board of Health, Bureau of Sanitary
Engineering for the Northwest Region (1967) , 36.

[25] *Jacqueline M.Lane v. International Paper Company and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ate of Florida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GC case no.01-0582, DOAH case no.01-
1490; Jackie Lane,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August 27, 2013; *James
H.Lane, Jacqueline M.Lane, and Robert C. Donnenwirth, on behalf of
themselves and others similarly situated, Plaintiffs, v. Champion*

International Corp., et al., Defendants. Civ.A.No. 93-0914-BH-M. US District Court, SD.Alabama, SD.844 F.Supp.724 (1994) .

[26] Dixie, 指美国东南部地区，通常包括那些内战中组成南部邦联的各州。该称呼由滑稽说唱的歌曲《迪克西的土地》而普及。——译注

[27] Joy Towles Ezell,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November 11, 2011, and July 29, 2015; Will Lester, “State May Face Worse Pollution, ” *Gainesville Sun*, November 23, 1995; TaMaryn Waters, “Foley Cellulose Mill Plans River Restoration Project, ” *Tallahassee Democrat*, June 2, 2015; Julie Hauserman, “Dioxin at Mill Too High, ” *St.Petersburg Times*, February 9, 2001; Thomas B.Pfankuch, “Florida’ s Rotten River, ” *Florida Times-Union* (Jacksonville) , June 5, 2002.

[28] Ezell, interview, July 29, 2015; Pfankuch, “Florida’ s Rotten River. ”

[29] Lester, “State May Face Worse Pollution. ”

[30] *Jacqueline M.Lane v. International Paper Company*; Lane, interview, August 27, 2013;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TRI Explorer, Release Reports, 2014 Dataset (March 2016) , Inventory Facility Report, Escambia County, Florida, <https://www.epa.gov/triexplorer>, accessed summer 2016; Taylor Kirschenfeld, Robert K.Turpin, and Lawrence R.Handley, “Perdido Bay, ” US Geological Survey Publications Repository, 115-27, <http://pubs.usgs.gov/sir/2006/5287/pdf/PerdidoBay.pdf>, accessed summer 2016; William Rabb, “Suit Doesn’ t Rule Out Escambia Cleanup, ” *Pensacola Today*, October 21, 2014; Craig Pittman and Joni James, “DEP Chief Will Join Company He Helped, ” *St.Petersburg Times*, January 29, 2004; “Paper Plant to Eliminate Its Water Pollution, ” *GreenBiz*, June 6, 2001, <https://www.greenbiz.com/news/2001/06/06/paper-plant-eliminate-its-water-pollution>; *Tidings: The Newsletter of the Friends of Perdido Bay* 29, no.1 (February 2016) , <http://www.friendsofperdidobay.com/Feb%2016.pdf>.

[31] Wilson, *Unreasonable Woman*, 150.

[32] “Bayou Water... ‘Just Sewer Water, ’ ”, *Houston Post*, January 8, 1967.

[33] Oliver A. Houck, *Downstream toward Home: A Book of River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12.

[34] Wilson, *Unreasonable Woman*, 204.

[35] J. Madeleine Nash, “The Fish Crisis, ” *Time* 150 (1997) : 27.

[36] William N. Lindall Jr. and Carl H. Saloman, “Alter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Estuaries Affecting Fishery Resources of the Gulf of Mexico, ” *Marine Fisheries Review* 39 (1977) :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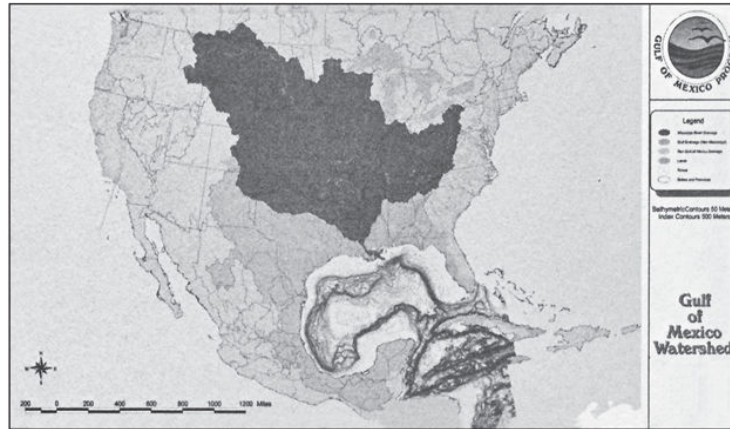
[37] James B. Blackburn, *The Book of Texas Bays* (Gulf Coast Books, 2005) , 158.

[38] Wilson, *Unreasonable Woman*, 158.

[39] Louise Popplewell, “Alcoa to Study Ending Lavaca Bay Discharges, ” *Victoria Advocate*, August 8, 1995; Blackburn, *Book of Texas Bays*, 161-63.

[40] “Company’ s Cleanup of Polluted Bay May Not Purge Acrimony, ”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3, 2005.

十六 物质过剩的河流



密西西比河流域覆盖美国31个州和加拿大两个省，受污染的河水就这样随径流流入了墨西哥湾。

曾经人类是可以住在河流边上而不去破坏河流的和谐生态的。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940）[\[1\]](#)

河流不眠不休。它们是永不停息的奋进者。大约有116条河流不眠不休地流向墨西哥湾，每一秒都有百万吨的淡水被驱赶着汇入咸水。有些激流勇进数千英里，有些不过几英里，它们中许多已经持续了数百万年了。它们脱离了传统的时间体系，无所谓任期或延续，它们代表的是无限。

在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关于谦卑和自我发现的经典小说《悉达多》（*Siddhartha*）[\[2\]](#)中，智慧的船夫维稣德瓦解释道，“河水在同一时刻无处不在，无论源头或河口、瀑布、渡口、水流、海洋以及山脉间”。它“只存在于当前的时间中，并非过去或未来的影子”。[\[3\]](#)

不着时间痕迹的河流，是所有地质形态中最为持久的那个。落入墨西哥湾的河流有84条，它们汇集自美国南48州和加拿大部分地区60%的径流。如果不是它们，北美将是一团糨糊。它们分割峡谷，形成绿色的溪谷和湿地。它们的水波甚至在子夜也闪烁着蓝色、绿色、棕褐和灰色的光——有时同时有好几种颜色，这取决于阳光、阴影、水底的覆盖物和光线的反射。

在地图上，蓝色代表河流，鲜明的墨黑色线条代表在人类社会里被分割的土地。最粗的蓝色线条是密西西比河，将大陆分割成了东西两半。在历史上，蜿蜒的蓝色油墨代表国家扩张的进击之路；在寓言故事中，它们是传说中马克·吐温和哈克·费恩的河。地图上的河流有时也代表联邦和民族国家间的正式界线。在墨西哥湾上，帕蒂诺河分隔了亚拉巴马和佛罗里达，密西西比河、珀尔河划分了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萨宾河则分开了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而格兰德河，众所周知，是墨西哥和美国的国界线。

以河为界固然方便，但并非永远理想，河流一直是许多领土纷争的催化剂。它们是脚步不停的漫游者，喜欢偏离河道，将属于这边领土的土地带走，放到另一边去，但更重要的是，以此提醒我们它们独立的本性。

这种坚韧自主的精神正是我们人类所钦佩的。河流象征着我们自己的拼搏奋进。我们仿效它们的自由、力量和信心，追求它们的锲而不舍。我们将它的幽鸣写入音乐，将它的涓流写入诗篇，将其律动和色彩融入画布。我们在圣洁的河流中洗刷身上的罪孽。同样地，当我们为河流注入灵魂，在它身上发挥想象力时，我们正以人类的视角看待它。鲜有一位牧师或诗人会跳入河中，去看看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的河流，去看一眼生命在其中的流动。

从河流的视角我们会看到很多。在漂浮的落叶上或站在水边的岬角旁，撒一张采样的网，你就会得到一份样本，它的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任何其他生态系统都无法比拟的。一条河就是一根不竭流动的纽带，它联结着位于上下游和两岸的栖居地和居民，不止，还有反复造访河床的访客。得克萨斯的布拉索斯河，便联结着水路和候鸟的迁飞路，沿着它，你可以听见——如果你能分辨出来的话——上百种鸟类的鸟鸣声。你也能遇上37种蛇，其中7种是毒蛇。

更老的河流，已经存在了100多万年的那些，它们更喜欢漫步在缓坡中。年轻些的，上千年的河流，它落入的崎岖地形还未经过足够的打磨，常常在流淌时击打出狂野的白色浪花。而已经上千万年的格兰德河，不顾年事已高，它的部分河段，经过石灰岩裂谷时，趾高气扬，激起了浪花千层，到了平坦的豆科灌木和丝兰地带时慢下来，直到即将落入墨西哥湾的曲形河道附近才平静下来。

多数的海湾河流河道狭窄，流过的是沙地而不是多卵石的河底，水面也几乎不见碎石。狭窄河流推送的沉积物很少，河水清甜，沿河的空气也被净化得充盈而纯净。有些河流源自古老的佛罗里达含水层喷出的泉涌，也有些河流在途中会因流入地底而消失。它们的水常常清澈见底，除非它流经的岸边植被疯长，那样腐烂的残枝败叶中含有的丹宁酸会将流水染黑。河畔林冠浓密的萨旺尼河，它的名字就取自当地的蒂姆库安（Timucuan）土著语，意思是“弯曲的黑水”。其他和它类似的都被称作黑水河，在墨西哥湾附近，人们将其透亮的水色比作冰茶。

受到阳光触摸的水底，总是分布着广阔的水生植物——尤其是带状叶子的慈姑草和苦草——将河道荫庇起来。叶子，或叶片，随着水流弯伸出一英尺或更多（苦草有数英尺），它们都开出长茎的白色的浮起的花，靠水流输送花瓣来授粉。

多草的水底有着丰富的溶解氧。它们之于水生动物，就像清新的山林空气之于我们这样的陆生动物的意义。在水面上快速移动的蜻蜓、豆娘和蜉蝣，它们繁殖的方式就是往水里投掷幼虫。在还是幼虫时，它们在水草中觅食、藏身，以及呼吸。在生长过程中，它们发育出平整的头部以抵御湍急的水流。在水下的动物群中，凹槽纹的身躯很常见，有些物种发育出了钩子、吸盘和有黏性的底盘来让自己停定在河水中。

扁头的鲇鱼，和被它吃的蜻蜓幼虫一样，进化出了聪明的应对之策，它们在水底活动，用颌上的胡须一样的感觉器官（触须）来觅食。此外还有鲟鱼，它们在不长牙齿的嘴和长长的口或吻之间，长着类似的胡楂儿，其身躯体现了“流线型”这个词的词源。在这个水上水下相互作用的动态群落中，这两种触须鱼类都有着开阔的上颌，可以吞食蚌、螯虾、幼鱼和昆虫；而它们自己又会成为短吻鳄、乌龟、水蛇、鸟类和更大的鱼的猎物。如果我们以看故事的角度来思考河流，就像赫尔曼·黑塞一样，那么食物链就是它的情节和叙事弧。这里有人物、句法、协同关系和事件更迭——但没有时间。

就环境而言，鲇鱼喜欢混浊的水域，这种水质在宽阔的大河中更为常见。它们强有力的水流充满了沉积物，在河流发大水的时候，它们就像工厂制造的肥料罐头一样滋养着河边的洼地。孟菲斯市和维克斯堡（Vicksburg）——这个维克斯堡不是河流末端的那个——之间是7100平方英里的密西西比三角洲，人们说这里的冲积土是尼罗河以西最肥沃的。在南边的大海上，这些被冲下来的淤积物创造了障壁岛、海滩和度假的乐趣。

在或清澈或混浊的河流末端是墨西哥湾健康的生态圈：河口。流入海湾的淡水每年有280万亿加仑，这些奔腾而下的淡水裹挟着营养物质和氧气，在这里熙熙攘攘地欢腾着。没有这些河流的浸润，这个世

界上最大的河口系统之一就不会存在。汇入海湾的河流中有85%的河水溢出在美国的土地上。这就是为什么河口都集中在海湾的北部。这就是为什么，撇开其他一切不谈，墨西哥湾是一片美国海。

自人类在海湾上落脚开始，不眠的河流和它们的河口就维系着他们在这里的生存。住在河畔的人们数千年来从未破坏过它的秩序，直到现代社会打破了它。我们坚持从河流索取的比自然可持续的供给更多——我们大量攫取河中的水，并利用它们来运走我们的垃圾——而当我们钦慕它们的力量时，我们却也无法容忍这种力量。如果河流本性专横，那我们人类则更加如是。以我们自认为具备的如河水般的品质行事，我们在圣洁的水中犯下了罪。我们是维稣德瓦的智慧的背叛者：我们在河流里、在自己身上投下了我们过去和未来的影子。

《时代周刊》1988年“污秽之海”的封面故事中提到了它所谓的死水区。美国的近岸水域中有几个，面积都不算大——和其中那个“漂在墨西哥湾上”的300英里长、10英里宽的相比。这个死气沉沉的区域位于路易斯安那海岸的前方，一头碰到得克萨斯的东边，另一头碰到亚拉巴马，在之后几年里，它将成长到新泽西州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个漂着的巨大的水下真空室，将所有的溶解氧都抽得一点不剩。^[4]

“死水区”这个生动的词语很适合媒体，但科学家们则更喜欢用技术性的“低氧”来定义水域的贫瘠状态。从肉眼看来，水面清澈、健康。但里面的鱼类无法呼吸，就像没有带上自己的专利水肺的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一样。商业渔民不得不启动马达到更远的地方去追逐他们的猎物。“往水里抛下一根渔线，”一个包船船长说，“你会钓上一条死鱼。”所有在情况变糟时没有逃离出来的海洋生物，都遭遇了同样的窒息而死的命运。水底散落着尸体——一片

悲惨的布满了蟹、软体动物和沙蚕残骸的荒地。它是可怕的海洋版本的核泄漏事件。它中心的毒气从密西西比河暴发。[\[5\]](#)

专家们起先并不知道。一个叫R. E. 特纳（R. Eugene Turner）的年轻科学家在将1974年事件联系起来后终于弄清楚了。特纳身材匀称、不蓄胡子，他刚完成博士学业，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海洋科学部的新人，当时他正在“四处闲逛”，想熟悉一下路易斯安那州的海岸。另一位科学家告诉他，那里的水有时显示出极低的含氧量。好奇的特纳于是接受了州府野生动物和渔业部门官员的邀请，从泰勒博恩堂区出发到近海海域上去一探究竟。乘着一艘15英尺的船，在汹涌的海浪上摇晃了几英里后，他将手持测氧仪的探针伸入水中，这个测氧仪是他的创作之一。探针几乎没动。他从未见过这种事情。随后，他又搭着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OAA）的便船测试了其他地方，所到之处得到的几乎都是极低的读数，他推测人类活动是罪魁祸首。[\[6\]](#)

这个想法令他感到不安。特纳在新英格兰的童年，尤其是在缅因州扎营度过的夏日，使他对自然持有一种有道义感。“如果我们对健康的环境没有敬意，”他多年后说，“我们就不能真正欣赏我们自然的人类状态。”在路易斯安那州，他饶有兴致地研究着三角洲对当地渔民社群的生计和文化的意义。他认识到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既是雇主也是入侵者。几乎没有哪片沼泽海岸是看不到钻井平台的。起初他怀疑他们是否将什么渗入了水中而导致了低氧现象。这个想法被证明是错的。[\[7\]](#)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目光放在密西西比河上，河有多长，目光就应有多密切。密西西比流域就是美国的厨房水槽，河流就是它的排水管。它从明尼苏达州北部喷涌而出，穿越十个州，有些流经边界，有些从州中穿行而过，全长2300英里。从西部的蒙大拿州到东部的纽约州，它整个水系吞没了美国大陆41%的面积。那是31个州。除此

之外还有加拿大的两个省。只有亚马孙河和刚果河有比之更大的流域面积。

但是，墨西哥湾并不是被动接受排放的水坑。夏天，蒸发的海水上升形成逆时针往大陆北部移动的大气团。它在接近中西部时，常会与来自加拿大的高压系统相撞，它要占据5月到9月每日天气预报40%的篇幅。这是海湾为让人大汗淋漓的炎夏送去的湿气。更重要的是，特纳发现，降落在中心地带的雨水通常是来自海湾的水。雨水落入密西西比及其近百条支流中，然后又回到了美国海上。

特纳决定“爬上流域”，去看看它里面有什么，往下游送去的又是什么。[\[8\]](#)

东边400英里处，文斯·拉菲尔德（Vince Raffield）从未觉得有爬上阿巴拉契科拉河流域的必要。虽然不及密西西比河流域宽广，但阿巴拉契科拉河的流域也深入了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在另一头是同名的壮丽湖湾。那里便是能令拉菲尔德——这样一位有着肌肉发达的肩膀和前臂、高大健美、皮肤被晒得黝黑的年轻人——满意的居住地。这里给予了他平静，让他可以养家糊口。他是一个采捕牡蛎的渔民，祖上几代都是。没有谁通过捕牡蛎变富了，但也几乎没有独立的渔民会梦想着为一个企业老板打工，没有哪座工厂的场地或大窗户的办公室能比得过湖湾上的工作环境。

几十年后，当拉菲尔德不再能捕捞牡蛎时，他坐在摄影机前，讲起他工作时的日子。拉菲尔德带着南部口音，说话清晰有力，戴着一顶水手帽，一把蓬松的灰胡子一直扫到他壮硕的胸前，他提到一次他正在湖湾上驾驶着他手工制作的胶合板小艇时的经历。当时，空气，水面，一切都是静止的。

我坐下来吃午饭。我听见从船底传来一声咔嚓声，我彻底安静下来。我能透过船底的木头听见被放大的牡蛎开合的声音。我顿悟了。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正在做的事，我爸爸做过，我祖父做过，我是某个东西的一部分，那就是自然。你在做那些牡蛎捕捞和捕鱼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适应它。你阅读自然，你就会了解它。你就成为它的一部分。[\[9\]](#)

同一时间，拉菲尔德被拉走又推到了他的避难港。他的父亲曾经是巴拿马城的圣安德鲁湾的采牡蛎人。不久前当地的管理人感到一种“迫切的需要”——就业和税收——要引入一家造纸厂到镇上来，那是郡里第一家用氯漂白松木纸浆的造纸厂。到了1971年，污水导致湖湾上的牡蛎采捕业无以为继。到70年代末，海湾河口每十英亩中就有一英亩的贝类捕捞被污水逼停，占了得克萨斯州贝类捕捞业的21%。[\[10\]](#)

拉菲尔德的父亲被迫到造船厂工作，他在那里和有害的材料打交道，后来得了石棉肺。他最终被病魔带走了生命。这就是文斯到阿巴拉契科拉的原因。除了父亲的死外，这里的一切都还不错。他和其他将近2000名的渔民一起打捞的牡蛎占了全州捕捞量的近90%；在他们看来，这些肥厚的双壳贝，同时得到淡咸水的交汇滋养，鲜甜、味足，最是好吃。从新奥尔良到纽约的餐厅大厨都对此表示同意。

可叹的是，阿巴拉契科拉也染上了其他湖湾的病。不管什么时候飓风猛烈攻击牡蛎床，它们总是能重新恢复活力。但自从陆军工程兵团为捕虾人和游钓客打造的从圣乔治岛到墨西哥湾的捷径完工后，河流大部分的淡水还未来得及冲刷湖湾、哺育牡蛎，就被这条新建水道给引走了。牡蛎床仍然活着，但它们抵御旱灾的能力越来越弱了。1988年全国受到旱灾侵扰，河流水量大减。咸水如常进入湖湾，牡蛎床状况顿时恶化。

州政府急忙派科学家和渔牧场人员去拯救它最好的牡蛎产业。专家们将官僚作风带到了湖湾，他们决定了哪片牡蛎床在哪个时间应该

被开放捕捞，甚至具体到了哪个星期的哪一天的哪几个小时，渔民因此怨声载道。如果有什么比坏了的引擎或30节^[11]的风更让渔民们讨厌，那就是政府。而政府还不是最坏的。1988年的灾害显示，湖湾面临比旱灾更大的挑战——一个终身的挑战——它和远方上游大城市的一意孤行密切相关。

拉菲尔德成为自然的一部分的日子屈指可数。

调查死水区原因的尤金·特纳到了密西西比河上游，去追寻成就了这条伟大河流的历史足迹。海湾河流是通往内陆美国的自然媒介，一个往返中心腹地的交通运输网络，它曾经主要用于运人和运货。它能提供不错的效率，一切都可以接受，如果河流没有被要求运输更多的其他东西的话。

在1837年的一本美国旅游书里，英国船长弗雷德里克·马利亚特（Frederick Marryat）称密西西比河是一条“肮脏的下水道”。他还形容华盛顿丑陋，纽约堕落。他的坦诚惹恼了美国人，他们拒绝买他的书。但他说得并非没有道理，至少在对河的描述上是这样。否则，受到冒犯的读者认为河边城市的夜间工作者都是往哪里倾倒来自厕所和污水坑的污物呢？不计其数的家庭 生活垃圾和街道垃圾都消失去了哪里？还有屠宰场里那些有害的血液、胆汁和未经处理的身体部位，以及制造企业工厂排出的污染物？一个多世纪后的1954年，政府组织了一项名为《墨西哥湾：它的起源、水域和海洋生命》的大型调研，证实了马利亚特的话。密西西比河沿岸又脏又臭，调研的作者们写道。但他们忍住了这种消极想法，转而总结道“污染对墨西哥湾的影响并不严重”，“自然的净化作用”将会消除这些影响。^[12]

研究公布后，这个令人不悦的死水区源头——这是特纳后来发现的——并没有被完整展现，或者没有被清晰地展现为一个使人反感的污水沟的样子。他发现了它具有欺骗性的外表：迷人、友好，赋予春

雨以活力，而这正是每一种作物、每位农夫在期盼的。但它们所做的不仅仅是补充；它们将农田里的氮、磷肥料冲到了河里。为艾奥瓦州的玉米、明尼苏达州的甜菜、伊利诺伊州的大豆、堪萨斯州的小麦播撒下的肥料，搭上了罪恶的便车，随着水流到了密西西比河河口，到了最南端支流阿查法拉亚河，最终流入了墨西哥湾。负荷着超量营养物质的羽流刺激了藻类的急剧繁殖。海藻死后，沉入水底，分解腐烂。氧气是藻类分解的燃料，于是接近水底地层的氧气最终被消耗殆尽。低氧现象和痲子一样，在每年夏天如约而至。

另一位科学家，南希·拉巴莱斯（Nancy Rabalais），很快加入到特纳的海湾研究中来。她在科珀斯克里斯蒂上八年级的科学课时，就对生物学产生了兴趣。高中时，她便获得了潜水证，并在得克萨斯州南部和墨西哥近海潜水。大学毕业后她继续攻读研究生，她在得克萨斯大学的学位论文主题就是关于一种招潮蟹的生殖生物学研究。

“在得克萨斯州南部追逐招潮蟹，”她后来说，“并不能让我做好发表国会证词的准备。”于是当她加入路易斯安那大学海事协会后，她选择了和特纳一起研究海湾低氧。两人在1988年结婚了。[\[13\]](#)

通常在7月，他们中会有一个人，或两人一起，带上一群研究生学生到海湾上去测量氧含量。他们在1987年没有测到多少。裹挟着数以吨计化肥的暴雨和洪水一直持续到入秋；路易斯安那海岸上的缺氧海水令大约1.87亿条鱼死于窒息，这是16年前全国鱼类死亡数量记录的两倍有余。就如报应一般，海湾的水在第二年拒绝降落在中西部。1998是黄石国家公园有记录的最干燥的一年。在中心地带，庄稼枯萎死亡。但海湾的海洋生命没有——至少没有到往常的那种程度。

但干燥的天气，也让阿帕拉契科拉湾缺水严重，拉菲尔德希望能有一次过得去的牡蛎收成。干旱是海湾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但不是特纳和拉巴莱斯所希望的那种。

没有其他河流像密西西比河一样承载了那么多、距离那么长的文明的垃圾。为了得到历史上的氧含量数据，特纳开始研究海湾底部200年前的岩芯样本。切开地球海底地壳的圆柱体标本，就像翻开一本美国历史的书页。其他科学家也在做同样或类似的事，也都有有趣的发现：被认为高耗氧的海洋生物体遗骸的密度在20世纪50年代突然增加，代表着缺氧时代的开始。

这个时间点完全说得通。20世纪50年代是转变发生的十年，尤其体现在预处理和预加工食品，以及婴儿潮的出现上。在1954年和1965年，美国每年都在增加400万张嗷嗷待哺的嘴。婴儿潮既是狼吞虎咽的进食机器，也是一个市场。抓住了机遇的快餐餐厅开始在全国各大主干道旁急速增长。内陆的农民忙着养更多的牛，种更多的小麦，以便供应汉堡和圆面包的制作，为此就要种更多的玉米和大豆去喂牛。在汉堡餐中加入可乐和薯条，成为在婴儿潮一代中颇受欢迎的套餐组合，在此影响下，密西西比河流域上的四个州发展成为全国产量最高的四个马铃薯种植大州。

与快餐区遥相呼应的是杂货店里的谷物食品区。生育高峰下的大胃口和聪明的广告手段——加入卡通老虎、熊、兔子、巨嘴鸟、魔法精灵、巧克力做的吸血鬼德古拉，还有滑稽的船长——让货架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长，堆着让人无法想象的各种各样的盒装早餐食物。中西部的牛奶、谷物和玉米生产规模也相应扩大。玉米既用来做谷物麦片，也可用于制作高果糖的玉米糖浆，玉米糖浆可以为麦片和婴儿潮一代爱喝的可乐带去甜味。谁能想到早上一碗快乐的麦片，晚上来点简单的汉堡加薯条会让海湾患上呼吸系统上的小病呢？当婴儿潮一代步入中年，将他们的饮食习惯传给他们的孩子时，整个美国的人均卡路里摄入量增加了25%。

为了保证谷物和玉米的产量，化肥用量迅速拉升，越来越多的化肥溢流快速、势不可当地流向了海湾。联邦的农场计划——尤其是提倡休耕荒地以换取政府补贴（被称为养家费）——鼓励农民在更少的地上种植更多的作物。化肥是提高亩产量的魔力药水。20世纪90年代，农民每年在每英亩农田上洒下的化肥平均有130磅。阿查法拉亚河和密西西比河的氮含量有时是20世纪50年代的四倍之多。

1991年，特纳和拉巴莱斯在《生命科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呼吁制定一项“坚实有效的管理办法”以控制中西部的化肥溢流。据他们统计，美国42%的氮肥和30%的磷肥全部或部分地汇入了密西西比流域。将近一半的氮和超过四分之一的磷进入了墨西哥湾。这些数据甚至还没有考虑奶牛和肉牛，也就是牛奶和汉堡的生产者每年排出的将近十亿吨粪肥，也没有考虑每英亩土地上洒下的2.3磅杀虫剂（美国在控制杀虫剂污染上花费了14亿美元）。[14]

在阿巴拉契科拉湾，来自上游的水源使咸水、淡水不平衡的问题更加严重，虽然方式不一样。我们随一条鱼从河流发源地开始顺流而下的路径，也许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展示。在佐治亚州北部蓝岭山脉3500英尺高的海拔上，在泉水滋润、置于密林中的查特胡奇河

（Chattahoochee River）中，这条鱼——可以想象它是一条条纹鲈——出发了。下落途中，它首先会游过一片清澈的河段，这里的河底有五彩缤纷的鹅卵石。“查特胡奇”是印第安的马斯科吉

（Muskogee）语中“多彩石头的河”的意思。一路上，这条旅途中的鲈鱼会遇到很多想用飞蝇钓法将它钓上来的垂钓者，还有划着皮划艇、划着木筏、浮潜的人堵在它的道上，这条河简直就是“胡奇”（Hooch，意为烈酒）。

在这位有鳍迁徙者进入亚特兰大外围开阔的西德尼·拉尼尔湖之前，三道堤坝给它带去了挑战。湖的名字以诗人西德尼·拉尼尔命

名，他在19世纪70年代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描写过墨西哥湾的鱼，几年之后又为查特胡奇河写过一首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湖泊在21世纪初拥有23000条船舶，成为美国最繁忙的休闲度假湖之一。在那里，我们的鱼要和房子、滑水板、平底船作斗争，更别提配置了最新的探鱼装置的捕鲈船。等逃到下游，它一路还要跳过13座堤坝，才能到达查特胡奇河和弗林特河的交汇点，随后进入阿巴拉契科拉河。总共有18座发电车间在鲈鱼的探险路上投下阴影。

环境记者辛西娅·巴内特（Cynthia Barnett）说，就其面积而言，查特胡奇河“也许是全美国最努力工作的河”。生长在南亚拉巴马和佐治亚的一万英亩的花生、玉米和棉花都仰仗胡奇河的灌溉，可成百上千的工业企业和城市居民在合法地往河水中倾倒污染物。亚特兰大，这个在持续扩张的都市，对胡奇河的攫取最为厉害。胡奇，在1990年，为亚特兰大不到300万的都市人群提供饮用水、灌溉水和冲厕水，到2010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200万有余。[\[15\]](#)

耗氧的且最终流向河流的都市溢流量是地区环卫系统排放量的三倍。环卫系统每天用2.5加仑的净化水交换水厂回收的3亿加仑水。饮用水来自拉尼尔湖，拉尼尔湖实际上是一座被陆军工程兵团用水坝隔开的38000英亩水库，水坝的另一边是胡奇河。这是一座贪婪自私的水库，成为阿巴拉契科拉湾之害的祸根。工程兵团罔顾自然，将蓄积起来的所有淡水都供给了一旁它认为更重要的亚特兰大，剩余的才流向下游的河口。河水南流时，水量陡然收缩，里面是从氮化合物到粪大肠菌的看不见的恶魔。

亚特兰大加大的水资源消耗加剧了1988年阿巴拉契科拉湾的干旱。一如往常，工程兵团设计了新设施来阻拦更多的河水，对此，亚拉巴马州提起诉讼。它的农民们需要胡奇河的水。山茱萸树也是一样；佛罗里达养蜂人以采集稀有的山茱萸蜜为生，因此山茱萸就是他

们的依靠，而阿巴拉契科拉的沼泽湿地就是山茱萸树繁茂成长的保证。旱灾期间，在亚特兰大占据着大量水资源的情况下，阿巴拉契科拉湾被联邦指名为灾区。牡蛎渔民和他们的家人挤进150辆大篷车，开到州府，要求州府采取行动——这是少见的商业渔民团结一致的时刻。佛罗里达也加入了诉讼。通过将生态和经济相联系，佛罗里达州称，亚特兰大巨大的思乐冰吸管已经危及产卵的墨西哥湾鲟鱼和濒危的三脊贻贝（fat threeridge mussel），以及牡蛎捕捞业的未来。佛罗里达希望下游的最低水量能得到保证。

1997年，国会通过了ACF协议（ACF分别指阿巴拉契科拉、查特胡奇、弗林特），在此协议下，纠纷的三方州府需要协调出一个水资源共享方案。国会在六年中14次延长协商期限，但均因缺乏共识而终止。三个州在水量上没有联邦标准作为指导，就像没有水质标准一样，事情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当旱灾再次袭来，再加上兵团对拉尼尔湖管理不善（它安装了一个计算错误的水位指示器），情况变得更糟，佛罗里达州再次被告上法庭。

在这种情况下，较劲的不仅仅是相互竞争的州府，还有下游的用水者和上游的分流者。得克萨斯州的活动家们同时也在游说立法机构制定管理法案，以保证湖湾和河口对河水有同等于农民、工业企业和城市的权利。但最后，其实早有预兆，管理工作输给了发展。在佐治亚州，人们房门外的草坪已经枯黄，车身上也已经落了一层灰，亚特兰大人无法理解限制用水就是为了保护蜜蜂、鲟鱼，还有他们听都没听过的古怪贻贝。法庭或多或少持同样的看法。联邦特区法官在2006年干旱的夏季做出裁决，自然——而不是亚特兰大或兵团——才是佛罗里达州的敌人。

“阿巴拉契科拉河是主动脉，就像我们体内的动脉一样”，牡蛎渔民约翰·理查兹（John Richards）说，对法官免除上游城市的罪

责，他表示抗议。“如果动脉被切断了，我们就麻烦了。”已经在湖湾生活了50年的理查兹目睹了亚特兰大不断扩大的贪念给牡蛎床带来的巨大压力。蓝绿色的咸水代替衰减的淡水进入湖湾，让牡蛎蚌壳闭紧，不再进食。盐还引来了来自海湾的以双壳贝为食的捕食者。[\[16\]](#)

恶劣的环境让湖湾越发面临过度捕捞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牡蛎渔民显然会成为被指责的对象。于是，他们就看着他们的工作日益被一群越来越多的外人所控制——他们是来阿巴拉契科拉帮助拯救湖湾和牡蛎产业的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州府的生物学家。对当地人来说，这些外来者是管闲事的人，和讨厌的政府并无二致，这些人都有一个带着恶意的外号叫“他们”。

“他们”一窍不通，渔民们抱怨道。“他们”会带着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取样瓶，细细计算一番，但“他们”从来没有了解过湖湾，也不像当地人那么熟悉。“他们”会关闭最适宜采集的牡蛎床，或者开放那些应该休养的部分。“他们”会侵占牡蛎还没成熟的片区，却将已经可以采集的片区保护起来。“他们”会说你这不能做那不能做，把你逼疯，逼到破产。牡蛎床关闭后，一些渔民转而捕蟹或虾，但“他们”也会同样限制那些活动。

大多数牡蛎渔民直接就退出了这个行业。也许有300人还留在海上，这本来是一个2000人的产业。他们的儿子或女儿不再跟随他们的足迹，而是离开了这个郡，或者到2005年在附近设立的州立监狱工作。牡蛎捕捞不再是“自由的生活方式”，就像一个商人曾经说过的。能够养家糊口就已经很幸运了。

文斯·拉斐尔德也成为不得不放弃牡蛎的人之一。它们不再在他的船底下快乐地噼里啪啦地响起。和他父亲一样，他去了一个船厂工作。结果，他也和他父亲一样，得了石棉肺，需要借助氧疗法。为了保持一点活力，他写下了文采飞扬的长信给当地报纸，维护自然生

命、林地、清洁水和滨水带，与发展商、官僚、政客作斗争，更重要的是要抗争无知和冷漠。和他爸爸一样，他因病去世了。他在家中离世，时年55岁，那天是2011年9月28日，联邦政府机构在那天公布了最终的深水地平线事故报告，呼吁石油钻井平台实行更严格的安全规范。

新千年伊始，科学家们在全球统计得到了146个沿海死水区。此后不出数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400，让很多人惊掉了下巴。美国占据了其中的69个。环境保护方面的楷模，俄勒冈州，也有一个死水区。同样的还有伊利湖、圣劳伦斯河、长岛海峡和切萨皮克湾。研究者报告说，海洋生物和氧气匮乏之间的较量在全国一半的河口湾区中已是常事。[\[17\]](#)

长期受灾的河流之一是历史上著名的查特胡奇河，卡卢萨人在那里建立了他们伟大的酋邦，大海鲢垂钓也从那里开始兴起。和常见情况一样，它的病源来自上游。河流发源于奥基乔比湖（Lake Okeechobee），这里位于内陆60英里处、大沼泽地的顶端，它是美国大陆内第二大淡水湖。但湖和河并不总是相连。

在19世纪，佛罗里达急于摆脱内战后的经济困境，一个富有的来自费城的手锯制造商，汉密尔顿·迪斯頓（Hamilton Disston），以25美分一英亩的价格从州政府手中买下了400万英亩地块，他此时正在想象在这片广袤的水下土地建立庞大的甘蔗帝国。为此，他计划先将大沼泽地北部的水抽到湖中，然后引水到水道，水道最终随克卢萨哈奇河汇入海湾。1885年，就在威廉·哈尔西·伍德钓上那条划时代的大海鲢时，迪斯頓已经通过挖掘和爆破，完成了河道的接入。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60年代，陆军工程兵团又两次加深拓宽了迪斯頓最初的水道，将古老河流上的近50个牛轭湾连成笔直的一条线，牛轭湾是天然的环状河曲，每一道牛轭湾都是一个迷你的生态系统和水流的筛

滤器。兵团将水道命名为“C-43”，它被剥夺了历史和自然传承，成为一个机构代号。

生态后果是严重的。堤坝阻碍了咸水潮汐的流入，阻隔了河口与上流的联系。受控于水利工程师，泄洪水量有时太大，逆流而上寻找河口家园的海洋生物只得被迫退回到外海。水利系统并没有抽干大沼泽地——没有完全抽干——但它排干了数千英亩的牧场农田，将河流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一道满载着来自庄稼肥料、化学剂和牛粪的大型磷化物的污水沟。每个夏天，在废水和暴雨的共同作用下，藻类水华淤塞了河口。暴雨所裹挟的成吨的家用农药，正是来自每个美国家庭引以为豪的草坪。一片绿地意味着一片变成褐色的湖湾。

2008年，李郡（Lee County）（郡政府在迈尔斯堡）通过一项法令，效仿萨尼贝尔-凯普蒂瓦环保基金会，于每年6~9月禁止使用家用化肥。在40年前拯救了萨尼贝尔当地湖湾的基金会，在此前一年带领这座岛屿城市实行化肥禁用期制度。萨拉索塔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且水质有所改善。但萨拉索塔并没有查特胡奇的再改造河流，查特胡奇河无法通过化肥禁用期来阻止来自农业的溢出废水。即使它没有被改造，即使堤坝得到移除，牛轭湖被复原，但曾经水清沙幼的奥基乔比湖和查特胡奇河底，现在已然淤泥成堆，那里堆积的是一个世纪以来累积的过剩营养物质，它们将会让藻华现象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的带领下，州政府已经放弃这项任务了。它认为“大规模清淤不是一项可行的方案”，于是藻华将反复在每年夏天上演。[\[18\]](#)

到2014年，佛罗里达的64个地方政府实行了化肥禁用期制，肥料的商用和家用量相比世纪初都大幅减少。这对一个本土化肥行业占数十亿美元体量的州来说，是一个非凡的创举。坦帕湾是美国国内化肥生产的水上中心，它为中西部持续的土壤增肥需求付出了生态代价。

在海洋科学领域，也有与特纳和拉巴莱斯一样的人，那就是西尔维娅·厄尔（Sylvia Earle），20世纪50年代，她在坦帕湾上的清水镇（Clearwater）度过了她的少年时光。她引证家人和朋友的经历写了一本为推动世界海洋清洁而作的回忆录，她回忆说，“只要在退潮时涉水走进草滩，得到的湖湾扇贝就足够拿来当晚餐了”；“我们以前常常捉红鲷鱼的地方，就在码头边上”；“在坦帕湾，不用挪动半步，在同一个地方收获52个蛤蜊”。“现在它们都不见了，”消失的还有草滩、红鲷鱼和扇贝。[\[19\]](#)

研究通常将建设、污水和雨水排放系统归结为湖湾退化的诱因。但是，这些常见的“嫌疑犯”都有一个默不作声的、更早就存在的同谋——磷酸盐；磷酸盐是坦帕湾的特产，在坦帕湾西部的波恩谷

（Bone Valley）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大量磷酸盐矿产。磷是化肥的主要成分。在坦帕湾周边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从古老的海洋生物遗骸的骨头和牙齿中可以找到含有磷酸盐的矿石沉积物，它们全都埋在佛罗里达中部的石灰岩下。

1881年，一位蓄须的地理学家和土木工程师，约翰·弗朗西斯·勒巴伦（John Francis Lebaron），在皮斯河为陆军工程兵团做勘测时，发现了这里的磷酸盐卵石。就是在这一年，“老法国人”舍瓦利耶在坦帕湾买下了120英亩地，就为了方便射杀鸟类去做帽子。磷酸盐是西班牙人从未找到的佛罗里达的金山，它是颜色暗沉的粉末，并不闪耀，在殖民时期并不具备商业价值。那时农田还没被透支，全世界还没产生对肥料的渴求。

勒巴伦发现磷酸盐后的15年来，已经有200家公司在这一带开采磷酸盐矿。火车将大海鲢游钓客送来蓬塔戈尔达和博卡格兰德后，又将一车厢一车厢的磷酸盐拉走。亨利·普兰特将铁路业务扩张到坦帕，既是为了游客，也是为了磷酸盐。半个世纪后，露天开采的蒸汽挖土

机和柴油动力机器，替代了手工采拣和铲子，将波恩谷变成了世界上产量最高的磷酸盐矿区，占美国总产量的75%。它的出产几乎全部被洒在了美国的草地和农田上，使坦帕湾的磷肥，经由内陆的庄稼地，成为造就墨西哥湾死水区的一个间接但主要的因素。

生产的一方同样存在危险。就像一个当地人说的，磷酸盐矿的开采将坦帕湾上方的空气变得污浊不堪，充斥着二氧化硫和氟化物的“毒烟”，杀死了灌木和树林。柑橘园枯萎了。牛群里的牛开始变得消瘦，腿瘸了，牙齿也掉了。人们的双眼直流眼泪，鼻子流血，喉咙肿胀。许多为了新鲜的空气和阳光而搬到佛罗里达的人，只能躲在屋里，门窗紧闭。开采和加工所产生的废料，包括受氟化物污染的泥浆，在未经处理和稀释的情况下，畅通无阻地流入了溪流，流进了坦帕湾和夏洛特港，一天下来产生的污水有数千加仑。[\[20\]](#)

来自各方面的侵袭难以负荷。到20世纪70年代，曾经伟大的河口湾，坦帕湾，正在死去。环保人士、游钓客、临湾居民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施压，奋起反抗这个在当地提供了五万个就业行业的行业。1991年，国会成立了坦帕湾河口项目，全国最终成立了28个河口项目，这是其中之一，意在恢复河口的水质和生态完整性。政府领导和磷酸盐行业介入进来，周围生活着230万居民的坦帕湾迎来了非同凡响的回归。到2000年，来自草地和企业的污水溢流已经减少了50%，许多志愿者重新在湖湾中种上了数千英亩的海草。代表了25种鸟类的四万对涉禽和岸禽——有些已经多年没见了——重新回到湖湾的岛屿上营巢，这是在一个世纪前躲过了舍瓦利耶猎枪的那部分鸟类。

随密西西比流域进入海湾的坦帕肥料影响到了它的一个姐妹湾，那就是莫比尔。特纳和拉巴莱斯的另一位科学界同僚，哈佛的自然和生物学家E. O. 威尔逊，在莫比尔度过了他的大半童年时光，并称那里是“北美生态富庶之腹地”。一个半世纪前，伯纳德·罗曼斯在悲叹

英国人对此地的开发时，说出了几乎同样的话。亚拉巴马州的65%、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一部分，再加上田纳西州的一点，这些地方的水流都汇入了莫比尔湾。每年夏天，有一到两次，有时是六次，这个浅湾会出现低氧现象，这几乎都发生在早上，持续的时间比莫比尔新闻媒体播报要闻的时间长。在这期间，成群的底栖生物会被驱赶到水面和岸边寻找氧气。[\[21\]](#)

当地人将这个慌乱成一团的水面活动称为一次“周年大庆”。在那些特殊的早晨，邻居们呼朋引伴，摇着铃、吹着号角，纷纷拿着渔网、篮子、水桶、洗衣盆和鱼叉跑到水边。大群大群的螃蟹、鲇鱼、鳗鱼和其他的鱼在水边虚弱地扑腾。曾经见过一次周年大庆的自然学家阿奇·卡尔说：“你可以叉到100条挣扎的鱼，然后往你的皮卡后面塞满一英尺厚的螃蟹。”人们难以相信湖湾里竟然生活着这么多生命。[\[22\]](#)

这些周年庆，卡尔解释道，“水波翻滚，只是自然现象”，这是威尔逊童年的草地成为死去的有机物后，在湾底不断积累、腐化，消耗掉了大量氧气的结果。来自五条河流的富余淡水叠在咸水之上——加盖，有些科学家这么称呼它——阻止了氧气在不同层次间的交换。在发生春汛的年份里，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了弗里波特附近的布拉索斯河末端。在莫比尔，事件变得越发严峻，附着在湖湾一排排船只上的藤壶因此死亡。有些研究人员相信，随着来自农场、高尔夫球场、郊区草坪的化肥溢流日益增多，这些周年庆现象将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强烈。2014年，莫比尔湾成为墨西哥湾众河口氮含量最高的水域，加尔维斯顿湾紧随其后，这些氮主要来自粪肥和化学肥料。[\[23\]](#)

在夏天，墨西哥湾的死水区变了质，并卷向亚拉巴马海岸，此时，鱼儿刚逃出透不过气来的湖湾，又被海湾来的水流噎住了，前后受阻。对一部分鱼来说，它们无处可逃。

接下来还有深蓝的大海。为了携手全球共同走向可持续之路，联合国大会宣布1998年为“国际海洋年”。紧跟其步伐，比尔·克林顿政府承诺治理墨西哥湾的低氧问题。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在科学调研上拨付了大量资金，研究结果一再确认了死水区的产生和上游肥料的使用的相关性。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称拉巴莱斯是“环境英雄”；1999年，无党派的圣地亚哥基金会奖励她和特纳25万美元，作为对他们研究价值的认可。

在保守派记者迈克尔·福门托（Michael Fumento）的剧本中，这25万美元的“支票”让两位科学家成为揶揄对象。他在《福布斯》杂志中写道：“真相就是没人确切知道墨西哥湾上发生了什么，或者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他是开始爬出阴影的众多批评者中的一个，和气候变化的怀疑者没什么不同，用上口的煽动性语言来弥补逻辑不通的缺陷。他称拉巴莱斯和特纳是推动了“低氧瘴症”的“反化肥群体”中的“环境情侣”。他站在农业的一边，反对“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就急着“解决”问题，尤其是这个解决方案包括制定“铁腕制度”并成立一个耗资500万美元的项目，放弃“高产农田”，回归“麝鼠都市”。[\[24\]](#)

他不需要担心。政府制定的不过是纸上谈兵的政策，除了和缓解海湾问题背道而驰的那些。以“后9·11”时代国内安保和环境保护的名义，国会通过了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并在2007年扩展了法案内容。这项立法意在减轻国家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它要求在汽油中添加生物燃料，为本土可再生能源提供税收鼓励，其中，本土可再生能源包括以玉米为原料的乙醇——而不是风能或太阳能这类真正的可再生能源，但不止如此。

在2006年、2007年，利用政府对他们产品的强制使用要求，农民新增开垦1500万英亩土地用于玉米种植，它们大部分都位于密西西比

河流域。美国的消费者看着玉米价格上涨了两倍多（谷物、麦片价格也随之飙升），此后，2011年他们拨付了600万美元用于补贴乙醇产业。在补贴的第三年，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共同建立的环保特别小组要求密西西比州在2015年之前，减少45%的营养物质负荷量。这不会发生。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生产国，其中相当一部分产品被制成乙醇。国会在2011年停止了税收补贴，但并没有停止它对这个产业其他劳民伤财的投入。新的联邦法令规定全国37%的玉米作物应进入加油站。他们还设定了一个目标，截至2022年，美国的乙醇产量应达到360亿加仑，其中150亿加仑来自玉米。

研究人员估计流入密西西比河的氮将会增加10~12个百分点。《国家地理》形容这是“硝酸盐的上涨浪潮”。“到目前为止，来自玉米地的硝酸盐比来自其他任何作物的都要多”，特纳提到乙醇时说。他和拉巴莱斯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中西部是全国接受补贴最多的农业区，也是化肥使用量最大的地区。几乎每一年，在5月前后，国家级媒体都会预测出破纪录的墨西哥湾死水区数量。（一个例外是2012年，当年的另一场天灾，干旱，让化肥留在了土地里，而没有进入河道。）[\[25\]](#)

乙醇产业受惠和繁荣的积极一面，就是通过死水区的恶化，让解决方案如未被污染的水体般清澈可见：遏制流域中的农田溢流。拉巴莱斯喜欢举黑海的例子，黑海的死水区面积是墨西哥湾的两倍，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崩溃前，就已经杀死了约6000万吨的底栖生物。当政府切断对化肥行业的补贴后，曾经缺氧的海域很快恢复了生机。

近在眼前的也有一例。在礁岛群（Florida Keys）东边的佛罗里达礁与污水和化肥溢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有93%的麋角珊瑚（elkhorn coral）和98%的鹿角珊瑚

（staghorn coral）死去。美国大陆正在杀死它仅有的，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堡礁。在佛罗里达海峡对面的古巴岛，农民在这里推行有机农业，因此古巴岛海域中30英里长的堡礁，皇后花园（the Gardens of Queen），一如既往地充满生机。加勒比的其他地区，岛屿上是大量使用化肥的商业性农业用地，这残杀了其大约50%的珊瑚礁。“几乎没有任何疑问，”拉巴莱斯说，“人类活动、养分负荷和富营养化与沿海生态系统的死亡有着密切关系。”[\[26\]](#)

特纳称海湾的低氧现象是一个“迷局”（wicked problem）。这个词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社会规划者们用来指一个由于政府、企业和大众这三个参与方的复杂利益纠缠而导致的更加严重的问题。生态学者发现“迷局”很适合用来描述环境难题——首先，就是气候变化。例如自然保护协会以及特纳协助建立的绿野碧水组织（Green Lands Blue Waters）这样的机构，试图在恢复包括自然和人类社群在内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健康的同时，让农民可以继续盈利。特纳的组织一来聚焦于在内陆重新引入多年生的作物，以此减少溢流，二来也重点关注寻求各方的共识。在绿野碧水的模式中，一个关键部分就是要让社区在他们流域的命运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英国石油漏油事件后，特纳申请从路易斯安那赔偿金中拨款建立一个模范社区。申请提出后，他告诉作者保罗·格林伯格（Paul Greenberg）说，“没有了下文”。[\[27\]](#)

墨西哥湾的死水区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它已经是世界第二大且最知名的死水区。2012年，拉巴莱斯获得了赫赫有名的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大奖”，赢得奖金50万美元。她用这笔奖金继续死水区的研究。除此之外，民间基金和政府拨款都在消失。但死水区没有。

研究人员估计死水区造成的旅游业损失是8200万美元。在海湾其他地方，污染正在造成数以亿计的损失，而大量的资金又用在了拯救河口上——当我们试着去救的时候。美国社会在玉米地和污水，以及自然最大的馈赠之间，选择了前者，几乎就像我们需要从自然中逃离出来一样。特纳、拉巴莱斯和其他所有试着让我们重新回到自然的逻辑上来的人，从来不曾，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且他们知道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经济。

那篇“污秽之海”的文章开头引述了雅克·库斯托的一句话，他说：“人类依赖于一片干净、有生气的海洋。”戴安娜·威尔逊一直都持这个观点，而西尔维娅·厄尔，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深海的她，在看到掠夺正向深海边缘蔓延时，她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意图拯救海洋和人类的布道者。她也曾看见海湾的河口湾，比如说坦帕湾，是如何从崩溃边缘被拉回来的。[\[28\]](#)

[\[1\]](#) Curt D.Meine and Richard L.Knight, eds., *The Essential Aldo Leopold: Quotations and Commenta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9), 248.

[\[2\]](#) 赫尔曼·黑塞：《悉达多》，杨玉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译注

[\[3\]](#) Hermann Hesse, *Siddhartha* (Simon and Brown, 2013), 76.

[\[4\]](#) Anastasia Toufexis, “Our Filthy Seas: The Oceans Send Out an S.O.S.,” *Time* 132 (1988): 45.

[\[5\]](#) Joby Warrick, “Death in the Gulf of Mexico,” *National Wildlife* 37 (1999): 48.

[\[6\]](#) R.Eugene Turner,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April 7, 2015.

[\[7\]](#) “Eugene Turner Named Boyd Professor,” *LSU Research*, 2013, 18.

[8] Turner, interview, April 7, 2015.

[9] Vince Raffield, interview, provided on tape by Linda Raffield, December 12, 2011.

[10] “Greeting from Bay County Florida” (1915 promotional brochure), facsimile on *Exploring Florida*, <http://fcit.usf.edu/florida/docs/b/baycounty.htm>, accessed summer 2015;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Water Quality Study, St. Andrew Bay, Florida* (EPA, 1975).

[11] 节是海上的风速计量单位，一节=每小时1海里=每小时1850千米（气象学中表示风向和风速的“F”符号，其中一根长横杠就代表10节风）。——译注

[12] Paul Galtsoff, ed., *Gulf of Mexico: Its Origin, Waters, and Marine Life* (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1954), 555, 569; Frederick Marryat, *A Diary in America: With Remarks on Its Institutions*, vol. 2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Longmans, Paternoster Row, 1839), 143.

[13] Nancy Rabalais, e-mail to the author, May 3, 2015.

[14] R. Eugene Turner and Nancy N. Rabalais, “Changes in Mississippi River Water Quality This Century: Implications for Coastal Food Webs,” *BioScience* 41 (1991): 144; Scott W. Nixon, “Enriching the Sea to Death,” *Scientific American Presents* 279 (1998): 50.

[15] Cynthia Barnett, *Mirage: Florida and the Vanishing Water of the Eastern U.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7), 114.

[16] John Richards,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December 13, 2011.

[17]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Hypoxia in U.S. Coastal Water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on Harmful Algal Blooms, Hypoxia, and Human Health, 2010).

[18] Karl Havens, Mark Brady, Erin Colborn, et al., “Lake Okeechobee Protection Program—State of the Lake and Watershed,”

in *2005 South Florida Environmental Report*, vol. 1, *The South Florida Environment—WY2004* (South Florida Water Management District, 2004) , chap. 10, p.2.

[19] Sylvia A.Earle, *Sea Change: A Message of the Oceans* (G.P.Putnam’ s Sons, 1995) , 179.

[20] Scott Hamilton Dewey, *Don’ t Breathe the Air: Air Pollution and U.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945–1970*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76.

[21] Edward O.Wilson and Alex Harris, *Why We Are Here: Mobile and the Spirit of a Southern City* (Liveright, 2012) , 186.

[22] Archie Carr, *A Naturalist in Florida: A Celebration of Ed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4.

[23] Archie Carr, *A Naturalist in Florida: A Celebration of Ed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3.

[24] Michael Fumento, “Hypoxia Hysteria, ” *Forbes* 164 (1999) : 96, 97, 99.

[25] Brian Clark Howard, “Mississippi Basin Water Quality Declining Despite Conservation, ” *National Geographic*, April 12, 2014, <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4/04/140411-water-quality-nutrients-pesticides-dead-zones-science>; Carolyn Lochhead, “Dead Zone in Gulf Linked to Ethanol Production, ” *SFGate*, July 6, 2010.

[26] Lochhead, “Dead Zone in Gulf” ; Cheryl Lyn Dybas, “Dead Zones Spreading in World Oceans, ” *BioScience* 55 (2005) : 554.

[27] Paul Greenberg, “A River Runs through It, ” *American Prospect*, May 22, 2013, <http://prospect.org/article/river-runs-through-it>.

[28] Toufexis, “Our Filthy Seas, ” 44.

十七 出逃和失控



飓风卡特里娜过后，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曾经浮在水上的宫殿赌场（Palace Casino）。

我有过这样的幻想。我们都知道孩子夭折所带来的巨大悲痛。如果你相信有来世的话，我想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的为这些孩子而建的墨西哥湾海岸，会有一些天使在守护他们。

——E. O. 威尔逊（2014）[\[1\]](#)

在1965年最后一次去密西西比的霍恩岛时，沃尔特·安德森得知了当地一些令人不安的发展动向。他一边划向他的岛屿天堂，一边回头时，能看见英戈尔斯造船厂高高的、像长颈鹿似的吊车从帕斯卡古拉河（Pascagoula River）两岸的树冠上探出来。英戈尔斯造船厂自从1938年创建以来，已经成长为一个工人数量上万的大厂。接下来，它建造了核潜艇、60多艘驱逐舰，还有几乎一整个美国导弹巡洋舰舰队。它是墨西哥湾上最大的造船厂，但绝不是最大的污染源。

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一家需对联邦标准负责的军工企业。此外，虽然美国主要河道的水流大多被严加控制起来，而人们对帕斯卡古拉河的热爱，让它成为其中少数的例外——没有水坝、没有堤防，没有水

闸。它也被称为“唱歌的河”，彰显了其保护生态和谐的坚定决心。在“后9·11”时代，乔治·布什政府宣布其计划将河流附近的盐丘掏空，用以填储1.6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计划的紧急燃油；计划引来了环保组织的高声抗议，包括大量由诸如领薪工人、律师、科学家等各阶层组成的草根组织。安德森最小的儿子，约翰，也是其中一员。

他们指出，能源部的报告已经给出了预测数据，那就是石油储库的建造将导致河流和湿地上的75处盐丘和近20处石油泄漏。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一根输油管将横贯15000英亩湿地进入墨西哥湾。德高望重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认为这项计划是在不遗余力地将西南部“最接近原始生态”的地方“搅和得一团乱”。舆论压力奏效了。巴拉克·奥巴马执政时，这项计划在2010年因无法获得资助而流产。[\[2\]](#)

上游相对来讲算是安全了，而下游，早在沃尔特·安德森时期前，就一直担负着将人类社会的生活垃圾运向密西西比湾的任务。安德森横渡水湾去往他的隐居地时，那里的水也并非清澈无瑕。在霍恩岛的北面海滩，他会看见大陆上空飘着一长串褐白色的云雾，那是从国际纸业公司的工厂里排出来的。正如它的烟囱玷污了天空，它的排水管也在污染河流。废水经由斯卡拖帕河（Escatawpa River）汇入帕斯卡古拉河下游，并最终流入了海峡。

帕斯卡古拉河为东路易斯安那和西亚拉巴马的沿线市镇提供了赏景消闲的去处。另外，1954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展开调研，在其绘制的污水地图上，示意为污水集水池的黑色标记在这一带比比皆是。安德森死后，1969年卡米尔飓风过境，住宅数量在此之后持续增长，每个社区的废水废料都在节节攀升。

密西西比州的海岸线虽然不长，但该州人一向引以为豪。他们继承了吃海鲜的传统，商业渔民和垂钓者和谐共处，也从未禁止渔民使用刺网捕捞。包船出海钓鱼在这里仍然像在20世纪末般热力不减。据

估计，这两个行业为当地提供了5000个就业岗位；它们也都支持沿海社区以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模式，海滩沿岸建起了一条长长的步道，将海岸轮廓清晰地勾勒了出来。

但密西西比州人对海湾沿岸的爱依然逃不过福克纳式的悖论。20世纪90年代，“六姐妹”中有一半——比洛克西、格尔夫波特、圣路易斯湾——它们通过赌场这条捷径，跳出了熟悉的发展轨道，一跃从19世纪的度假浴场发展为20世纪的海滨城市。沿岸的海滨公路像拉斯维加斯的商业街一样，灯火通明，巨大的荧幕上轮番播放着正在上演的舞台秀和头奖金额。24小时水上赌场通过步桥与十层高的酒店相连，这个庞然大物将景观遮挡了起来，街对面的无论是游客、驾车者，还是历史悠久的房子和街铺，都失去了从前一览无余的开阔视野。

一如预期，博彩业带来了大量的旅游收入和税收，只不过它们没有被花在改善峡湾污染问题上。杰克逊郡没有赌场，但它率先发起清洁行动，利用湿地技术建造了一套复杂的污水处理系统。但峡湾的清洁需要沿岸各地的一致努力。2000年，密西西比州国会议员吉恩·泰勒（Gene Taylor）曾尝试——但并未成功——对《水资源开发法案》提出修订，这项法案最著名的举措是它批准了史无前例的大沼泽地生态恢复计划，若此次修订得以通过，密西西比州沿岸的污水处理系统翻新工程将得到国会拨款。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发生漏油事故，事故过去三年，政府依然在与废弃物污染作斗争。在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 Defense Council）进行的一项针对海滨30州的调研中，密西西比州的沿海水域质量因常年不得重视，在全国位列倒数第三。

安德森的家乡海泉市拒绝了博彩业；它依赖1991年开业的沃尔特·安德森美术博览馆，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不那么咄咄逼人的餐饮和购

物上。美术博览馆在飓风卡特里娜中损毁严重（遗憾的是画作和日志的原稿均在飓风中遗失），它此后被复原并扩建，成为沿岸引以为豪的本土巨星。现实地说，这颗巨星依然不及比洛克西大桥上被成千上万颗灯泡照亮的赌场招牌闪亮。但这些招牌也遭不少人厌恶。如果你生活在北部的海湾沿岸，而且不想让开发商横行市政厅，不想让你的社区被混凝土路面和高楼大厦占领的话，比洛克西就是你会提到的反例；比洛克西共有11座炫目的赌场和一个不眠不休的海滨，昼夜不停地传出哐唧唧、砰砰砰，还有哗-哗-哗的声音；而且这些建筑还在没完没了地扩建、重建，整个城市的交通为它改道绕行。

卡特里娜过去数周，在博彩业游说团体的推动下，州政府批准赌场重建可以完全建在土地上，不再需要锚泊在码头边上了。接下来，在密西西比州尚有上万居民流离失所的情况下，说客又成功游说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允许密西西比州政府将联邦划拨的紧急住房援助金中的6亿美元用于赌场扩张和邮轮业发展。州政府官员声称这种做法对重建家园而言是必要的；其他人则说密西西比州海岸已经不复从前了。

一切为了赌场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密西西比州正在走佛罗里达狭长地带上部分城市曾经走过的路——有人说，它效仿的是一个坏榜样。说到彻彻底底的不复从前——满目疮痍、奄奄一息——没有哪里比得上当年莱昂纳德·德斯坦建立起来的，并最终以其名字命名的那条渔村。德斯坦经常被当作城市发展的反面例子被提起。它的推土机后方并不是精致的赌场大厅，而是微光粼粼的海滩和霓虹般的水面。有人由此想到了一个名字，“绿宝石海岸”，于是这个名字就成为东北部海湾一个响亮的名头，地产经纪更是常常挂在嘴边。

德斯坦经历了和红树林海岸一样的大开发阶段，不同的是，它发生得稍晚，所用的时间也更短。20世纪60年代，这个“全世界最幸运

的渔村”依然还是渔村，少不了有众多的泊船码头、卖饵料的小店，还有小木屋，这里交通慵懒，节奏缓慢，只有三两个交通信号灯，还有几家虾食海鲜饭馆，一家小便利店，一家酒肆和酒吧间。酒吧间门前是一个新奇的地标：一个涂绿漆的高大的盔甲骑士。海滩边只有几家破烂的汽车旅馆，此外就是数不尽的沙丘了。你花2000美金就可以在人工挖掘的手指运河上买到一片宅地，它百分之百是沙地。如果你在20世纪70年代将它卖掉，你可以维持收支平衡。

但如果你等上十年，这个滨水产业的价值将是过去的十倍；再等个十年，就是十倍的十倍，尽管此时它的环境已经少了从前的韵味：如果你的宅地曾经能眺望海湾景致，那么此时它必定已经消失了，因为视线早已被拔地而起的公寓高楼遮挡了，这样的高楼在海滩上一栋接着一栋被如法炮制，千篇一律。景观消失已经成为海湾沿岸越来越普遍的事情。在1960年前，德斯坦的住宅平均增长速度是每十年1%；而从1960年开始的此后40年，这个数字是24%。开发商更多地来自伯明翰和亚特兰大，而不是中西部和东北部州。但是和红树林海岸的开发商一样，他们对空间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就止步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将它塞满。

德斯坦的海钓租赁游艇数量之多在全美也少见，但它显赫一时的码头俨然已经淹没在这片城市开发热潮中。这个有着125年历史的渔村在1984年建制为市，它牺牲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换来了和其他沿海旅游城市如出一辙的俗套和乏味：两层高的冲浪用品店里满满当当都是T恤，小型高尔夫球场有一座山那么大，一家偌大的滑水乐园起名叫

“大人物”，还有数量众多的购物中心，门前是成排的连锁餐馆，里面塞满了连锁商店，这样的购物中心一座接一座沿着98号公路——奇迹地带——延伸开去，间或夹杂着警卫室和公寓社区的电动大门。公路两边的人造景观应接不暇，而且全都栽上了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粉白相间的紫薇花；公路上车水马龙，不得不动用数量众多的交通

灯，市政工程师也出动了，为其设计了一套同步系统，以保证六车道上的车流能有序地缓慢行进。那个绿骑士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被迅速移除了。

伊斯特峡湾大桥以西便是沃尔顿堡滩。沃尔顿堡滩想要游客，但不想要高楼；它严令禁止建筑物高度超过35英尺。地上风景最珍贵的应该是圣罗莎岛，岛上建筑低矮，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它的狭长海滩隶属于美国国防部——这座50英里的岛屿上大部分土地都归它所有。98号公路离开了德斯坦的大厦峡谷后，便进入了一片绵延不绝的白色沙丘——它们中有些已经超过了高度限制，在岛上连绵起伏，就像纵横的山脉。开发商们得到了一星半点的土地后，就像巴甫洛夫的狗^[3]一样，开始垂涎三尺，急切地想要复制下一个德斯坦。

“在与德斯坦比赛谁更俗气方面”，史学家哈维·杰克逊写道，亚拉巴马的格尔夫海岸（Gulf Shores）“也正鼓足干劲，不甘居于下风”。爱德华·威尔逊记得他还小的时候就坐着福特车从彭萨科拉做公路旅行，孤星州的公路一边是海滩，一边是林地，几乎没有例外的时候；当时的格尔夫海岸上不过也就是几间渔夫用的棚屋和避暑村舍。“哇，到格尔夫海岸的时候，看着那些大大的沙丘、墨西哥湾，还有海浪，感觉非常神奇。在我当时那么小的年纪，再也找不到比那更能令我兴奋的了。”^[4]

二战后，对地产投资商而言，没什么比“开发”更能令他们兴奋的了。到20世纪70年代，格尔夫海岸上有了两三间纪念品商店，一家连锁汽车旅馆，一些乡村酒吧，第一批公寓楼房，还有三万名的夏季游客。游客几乎全部来自亚拉巴马，他们对自己家乡媲美地中海度假胜地的“红脖子海滨”感到自豪和骄傲。当地的常住人口也不过1500人。发展还不算太快——直到1979年飓风弗雷德里克（Frederic）扫荡了这片区域。^[5]

格尔夫海岸成为又一个在飓风后兴起的新城。赈灾援助到了；“城市重建开始了，”杰克逊写道，“然后开发商们来了。改变来了。”所谓改变，指的就是公寓楼。12年不到，格尔夫海岸上已经有了超过100个公寓综合体——“不是公寓楼，”国家飓风中心负责人在1992年如此向国会强调，“是综合体。”那都是些15层、20层，最高到30层的大厦。如果你将其中一栋楼推倒，它的高层部分会落入海湾。它们被建在水平的沿岸沙丘上。沙丘是阻挡海浪的一道防线，但为了将楼建得更高，格尔夫海岸变得越来越平坦。[\[6\]](#)

另一边的德斯坦，高楼综合体也在不断往东边海滩的方向发展，就像被风将最初入侵物种的种子散播到了这里一样。它们一英里接一英里地涌出地面，直到沃尔顿郡郡界上才停止。但是，那里除了早期潜入的两座中层建筑综合体外，其余开发商都遭遇了来自另一种开发思维的挑战。

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狭长地带的伯明翰裔开发商反德斯坦模式而行之，赢得了不少赞誉之声。罗伯特·戴维斯（Robert Davis）来自一个犹太经商家庭，他们将亚拉巴马州人的家庭旅行目的地带向了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他们自己则喜欢去位于巴拿马城和德斯坦之间的海滩，他们在格雷顿海滩（Grayton Beach）上购置了一所小小的木结构房子，房子对面就是那座自19世纪起就存在的“冲刷酒店”。在海滩以东不远处南沃尔顿郡一个纯净的沙丘湖湖边，罗伯特的祖父约瑟夫·斯莫利安（Joseph Smolian）在1946年（罗伯特那年三岁）买下了那里80英亩的地块。这位老约瑟夫在伯明翰经营商店，他计划将这块地打造成他的员工们的一个度假屋。这块地上有半英里是绿宝石海岸标志性的滨海带，尽管当时还没出现“绿宝石海岸”这个说法；其余地方则覆盖着松树和锯棕榈灌木丛。老约瑟夫花了8000美金买下这块地，这遭到了他同僚们的嘲笑，他们说那是一块“毫无价值的沙地”，因此拒绝支持度假屋的建造计划。[\[7\]](#)

戴维斯后来到北部的纽约州念寄宿学校，暂时离开了他靠海的家。他先是到了安蒂奥克学院，后来又到了哈佛读商学院。他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北部和南部世界中自由切换，游刃有余。此后不久，他又展现了自己作为教师的才能，他在奥斯汀学院同时任教职和行政职位，后来又得到了安蒂奥克学院的延揽——因为当时安蒂奥克有意吸引更多的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学生，招揽戴维斯无疑能为他们增加筹码。后来，戴维斯认为是时候将他的工商管理硕士派上用场了，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动身到了迈阿密。此后好几年他都混迹在低收入住房建造行业，后来开始在市场上推出他自己的设计。

罗伯特·戴维斯为人体面，但不摆架子，人人都乐于与他打交道。他说起话来平静沉稳、自信谦和，既不带南方口音，也没有刚毕业的毛头小子身上的狂妄劲。他将自己从头到脚都拾掇得干净整齐，品味恰到好处，绝不至于浮夸或招摇。艺术、音乐、建筑，这类美学固然重要，但常识同样不容忽视。他知道他想在他的建筑物里呈现的是什麼，或者说，至少清楚它们的重点在哪里：那既关于物，也关于人，建筑物应该体现人类与环境从里到外、方方面面的互动。与成就和结果同样必不可少的是远见——非常不幸，这正是南佛罗里达所缺少的。那些带领了这场大开发的人一门心思钻进了眼前自己的致富道路，而对未来毫无构想。发展仅仅就是达成这一目标，而在城市规划的目标体系中，混凝土的多寡总是优于社区的整体利益。戴维斯相信，一个州想要走向繁荣，它需要找到一个更明智的办法。[\[8\]](#)

其中一种办法就是回溯过去。他想起了他童年时度过的假期，还有他从祖母那里继承来的他已故祖父的80英亩土地。为了琢磨出一个开发方案，同时也是为了学习其他的开发模式，他和他未来的妻子达里尔·萝丝（Daryl Rose）游览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沿海城镇。回国后，他们开着一辆1975年的庞蒂克红色“大都市”敞篷车，周游了美国南部。这款庞蒂克款式经典，开起来轻松，车内空间非常宽敞。车

篷收起来后，它就变身为他们的移动摄影平台，镜头可以在上面前后伸缩，移动自如。

罗伯特和达里尔将本地建筑分门别类地记录了下来。他们对旧社区很感兴趣，包括那里为步行设计的格局结构，街道的宽窄大小，还有从门廊到路缘的距离，等等。他们“乘着陆上游艇”到了新奥尔良、查尔斯顿、萨凡纳、基韦斯特，以及佛罗里达的一些内陆城市——在那里还保留着旧时佛罗里达的样子。罗伯特的脑海深处一直浮现出埃奇伍德的影子；埃奇伍德位于伯明翰，是罗伯特小时候生活过的一个电车郊区^[9]。在那里，居民通过步行就可以到达杂货店、药店、学校、邮局，拜访社区医生——满足一切日常需求。他还研究了“冲刷酒店”和格雷顿海滩上的房屋为抵御飓风而做的功能性设计。他们夫妇二人先是在迈阿密都市区和一座佛州牛仔（Florida crackers）的传统木结构房屋上试验性地加入了这些理念，包括通风对流和树荫的设计，然后将它们应用到了狭长地带^[10]上。

1981年，他们的锡赛德（Seaside, Florida）破土动工了。锡赛德是一个经过总体规划的社区（master-planned community）^[11]，就建立在那80英亩的灌木丛和海滨带上。社区的设计者是来自迈阿密的建筑师夫妇安德鲁·杜安伊（Andrés Duany）和伊丽莎白·普来特-吉伯克（Elizabeth Plater-Zyberk），他们借来了那辆大块头的庞蒂克，开始了他们的南部之行。他们也到过欧洲，思索过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莱昂·克里尔（Léon Krier）口中的理想城市。在所谓的理想城市中，人们应当能在不超过四分之一英里（孩子通常会在这个节点开始抱怨“还要走多久”）的步行可达范围内解决日常所需。除此之外，他们还研究了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的巴黎改造^[12]。

事实证明，奥斯曼的辐射状街道网络设计运用到那片80英亩的土地上非常适合。社区中心设置了杂货店、商店、餐厅和邮局，而社区内任何一点离中心区的距离都不超过四分之一英里。社区内的住宅采用佛罗里达州的传统建筑式样，建筑模式沿用的是“通用的语言和语法”，戴维斯说，“让每栋房子在保留各自特点的同时，保证整体的充分和谐”，以“创造一个赏心悦目的街景”。房屋中的每个房间都将有自然采光，保证空气对流。屋顶是金属材质，呈陡坡式，有深檐作为房屋的遮挡。房屋则都是木质结构，坐落在小片成荫的本土植被上——没有草皮，没有草坪喷灌器，没有为了维持绿地而喷洒的化学肥料。^[13]

每一所房子都被刷上了区别于左邻右舍的鲜亮颜色，房前有前门廊和尖桩篱栅。前门廊的设计是为了促进邻里交流，而篱栅则是为了美观——但又不仅仅是美观那么简单。成排的栅栏起到了道路减速装置的作用，让砖石街道看起来更狭小，而又无须用到煞风景的减速带。这里也没有纵横交错的地下排水管道系统。房屋被架高了，这样既有利于通风，也能加速雨水渗透。而砖石街道也有同样的作用，不仅好看，光脚踩上去也完全没有问题。

锡赛德彻底远离了单调乏味、与自然割裂的传统住宅地块模式，它成为美国新城市主义的先驱范例。新城市主义是20世纪末的一个建筑设计运动，在这股热潮中，像戴维斯这样的建筑师开始重拾旧时的城镇生活，在设计中着重融入邻里社区和实用性的价值理念。社区设计赢得了一个又一个专业奖项，获得了媒体的高度关注，社区俨然已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好莱坞也来到了这里，在这里拍摄了《楚门的世界》。

此后，观光客络绎不绝，他们总是驾车来到这个步行社区，直勾勾地盯着看；对此，居民感到厌烦不已。但这并没有阻止买房人的脚

步，即使是在房地产价格飙升了20倍之后依然如此，高企的房价让了无生气的德斯坦也相形见绌。追求实用的锡赛德成功了，但它成为这个成功结果的受害者，与它的设计初衷渐行渐远，从前在戴维斯时代可负担的房产价格一去不返。本土建筑中有四分之三最终成为高收入的季节性住户的第二个家——但这也证明了人们对置身于自然所怀有的强烈渴望。

效仿者接踵而至，它们自称新城市主义社区。它们是掺了杂质的锡赛德。离此处不远的圣乔公司（St. Joe Company）是一家老牌的木材和木浆纸生产污染企业，它当时是佛罗里达州最大的私人地主；它建起了沃特卡乐（Water Color, Florida），这是一片占地500英亩的度假胜地，上面同样是木结构房屋——但许多附带了公寓楼——有金属深檐屋顶，有包裹式的门廊，有散步可达的购物商场。只是它依然采用的是模式化的建筑和柏油街道。

虽然这里对建筑物有高度限制，但多数建筑都会踩在临界值上，让它们看起来格外突兀。沃特卡乐的房屋最低售价也要100万美元，这决定了它们是庄园大宅，而不是佛罗里达州牛仔的房子。房屋四周精心布置着本土植被，此外还有大量的草皮、草坪喷灌系统，以及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新建筑大多只是为了试水这股随锡赛德而掀起的环保风潮，这种做法让人们开始担心这个国家珍稀的沙丘湖。

在20世纪70年代，佛罗里达，这个高速发展中的州，开始慢下脚步以保护它的海岸线。它将平均高潮位线向陆15米作为建筑的后退线，在此界限内禁止开发建设。几年后，后退线的设置基准改为使用百年风暴潮线^[14]，联邦应急管理局对此也有同样标准。房屋必须建在后退线以上，打桩需足够深，活动空间也必须设置在预计的泛洪区以外。得克萨斯州在经历1983年的飓风艾丽西娅（Hurricane Alicia）后也制定了类似规定，禁止在海滩植被区域内进行包括重建

在内的建设活动。几年后，佛罗里达州颁布新的《海岸带管理法》，严令禁止沙丘开发。锡赛德在这方面树立了良好典范，它的建筑均建在沙丘的向陆一侧，另外在上面铺设了通往海滩的木板路。

海滩本身是不稳定的存在，沙丘就像挡在它前面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保护沙丘和植被并非没有意义。逻辑也告诉我们，如果你将固定的东西搭建在不固定的东西上，这必然产生冲突。而公寓楼、房屋、酒店和游客纷纷涌向海滩和岛屿，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海湾各州发现它们无法摆脱与自然的对抗——一场他们的创造和他们深爱的海滩间的较量。

[1] Edward O. Wilson,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June 19, 2014.

[2] Ken Olsen, “Mississippi’s Pearl: The Pascagoula,”
National Wildlife 48 (2010): 18.

[3] 指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所做的一项经典条件作用实验：实验者每次在给狗喂食前都要给它听一段音叉发出的音乐，久而久之，实验者只在狗面前摇动音叉（而未递上食物），狗就会开始分泌唾液。——译注

[4] Harvey H. Jackson III,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edneck Riviera: An Insider’s History of the Florida-Alabama Coast*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2), 151; Wilson, interview, June 19, 2014.

[5] Jackson, *Rise and Fall of the Redneck Riviera*, 89.

[6] Jackson, *Rise and Fall of the Redneck Riviera*, 103.

[7] Robert S. Davis,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January 28, 2013.

[8] Bruce Stephenson, e-mail to the author, August 10, 2015.

[9] 在美国的有轨电车时代（时间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私人汽车普及之前），路面电车和城际电车的普及大大延长了人们的日常出行半径，人们的居

住范围超出了固有的城市界限，于是开始出现了沿电车线路分布的所谓电车郊区（streetcar suburb）。——译注

[10] Davis, interview, January 28,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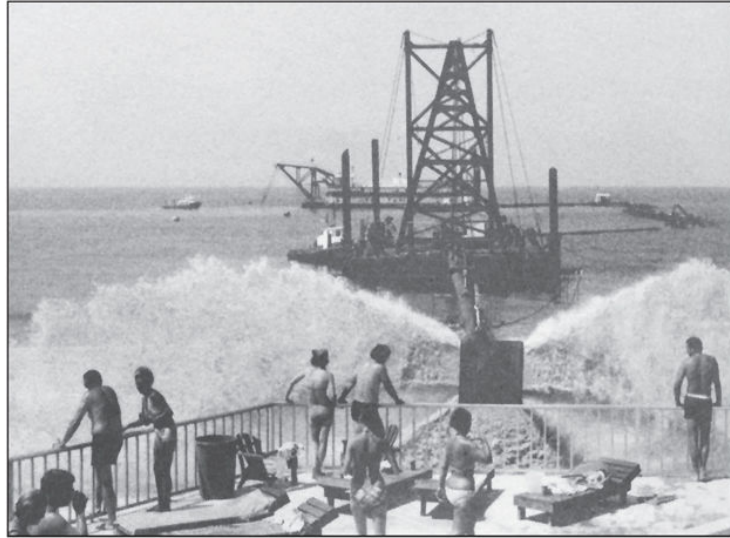
[11] 经过总体规划的社区，即master-planned community (MPC)，是一个相对于“住宅地块”（housing subdivision）而言的概念。住宅地块土地用途单一，是只单纯满足“住”的需求的房屋或楼宇地块；而MPC则经过良好规划以达到宜居目的，社区内有各项生活基础设施、康乐设施的支持，占地面积通常也更大。——译注

[12] 巴黎改造（renovation of Paris，又称巴黎重建），是19世纪法国塞纳省省长乔治-欧仁·奥斯曼主导的法国规模最大的都市规划工程，它整修了巴黎长期以来的混乱拥挤等城市问题，极大地改变了巴黎的城市格局。——译注

[13] Davis, interview, January 28, 2013.

[14] 百年风暴潮（the hundred-year-storm surge）是指一场严重程度百年一遇的风暴潮，或者说该区域在某一年发生这种极端事件的可能性不小于百分之一的情况。

十八 时光沙漏中的沙



20世纪70年代，一群海滩游客正在泳池边上看着挖泥船改造他们的沙滩游乐场。海岸侵蚀和代价高昂的修复工程在二战后普遍存在。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次提着个塑料桶装沙子玩，我提过的沙子得有十吨了吧。

——里克·布拉格（Rick Bragg）（2010）[\[1\]](#)

还记得小时候爸妈说，只要拿起贝壳贴近耳朵，你就会听见大海的声音吗？闪着天然光泽的贝壳正好可以贴合小孩的耳朵，然后你听，就在那儿：在贝壳浑然天成的旋涡里面和外围，是整个世界的声音，那里有风，有海浪，或许还有航行的船只和海盗。你大概也听说过，贝壳曾经是一只小小的海洋动物的家，等它长得比贝壳大了，便换了一间更大的屋子。于是你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只常年迁居者的模样。

这个广为流传的传说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你长大后就会知道或发现，贝壳里面并没有藏着大海。相反地，是贝壳与周围环境中的声

音产生了共振，这些声音中有时还包括了听者的脉搏或正在抽动的肌肉响声。

其占有者的真相则更为复杂，我们很多人从来没有机会真正了解过。只有寄生蟹和少数的章鱼会从一个贝壳转移到另一个贝壳，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只是鸠占鹊巢罢了。它们占据的是另一种动物曾经的一部分。原本的贝壳拥有者是一种软体动物，贝壳不仅仅是它的容身之所。软体动物没有脊椎，因此它们需要一个坚硬的保护性外壳。海贝壳就是它们生下来便有的、永远不会抛弃的外骨骼。这副外骨骼与生俱来，让它们得以最终存活。“一个贝壳，”海洋生物学家斯蒂芬妮·沃尔夫（Stefanie Wolf）说，“就是一辈子。”^[2]

软体动物是海洋中最大的动物门类，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已知海洋生物都属于软体动物。而软体动物门下各种生物的种类、大小、习性又千差万别。如果以人口数量作比的话，佛罗里达西南部的大陆架就是它们世界中的雅加达和上海，数以百万计、万亿计的软体动物都生活在那里。它们的数量，以及恰到好处的沿岸洋流，让毗邻的萨尼贝尔岛和凯普蒂瓦岛成为在全球范围内都大受欢迎的沃尔夫所称“无瑕的天然珠宝”的采集地。当1880年的美国人正在尝试摆脱对海滩的恐惧心理时，旅行作家A.M. 布鲁克斯（Abbie M. Brooks）[笔名西尔维亚·森夏恩（Sylvia Sunshine）]曾说起过这片区域，她说：“贝壳学家和爱好采集贝壳的人们会在这里得到满足。”从那以后，在萨尼贝尔和凯普蒂瓦海滩上伏低身子的游客就比在上面晒太阳的还多了。^[3]

其中就有林白夫人（Anne Morrow Lindbergh）的身影，她是著名飞行家林白（Charles Lindbergh）的妻子，曾在凯普蒂瓦岛上写下了《海的礼物》（*Gift from the Sea*）^[4]，这本书登上了1955年非虚构类图书的畅销榜首。她在那里租了一处“房子贝壳”，享受孤身一人、远离伴侣的盛名和威权。在独处的时光里，她在找寻“外界的简

单生活，内心的安稳，更完满的亲密关系”——也拾起了一枚枚的贝壳。清晨，她漫步在海滩上，伏低身子，翻捡贝壳；贝壳在她指间叮当作响，它们是在夜里被海浪冲上岸来，堆积在海滩上的。她将吸引了她注意力的都捡了起来。大海带给她的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让她重新认识了自己。它还每日送来这些贝壳，让她带回小屋中与她做伴。^[5]

海滩上可供选择的東西必定是琳琅满目的。那里会有峨螺、鸟蛤、扇贝、郁金香旋螺、甲虫螺、海螺、蟹守螺、金星蛤，还有长得就像缩小版火鸡翅膀的火鸡翅，在壳上印着英文字母的字母锥，将尖的那头立起来后能打转的坦帕顶，常年生活在红树林里的咖啡豆，形似螺旋形开瓶器的法戈螺，以及巨大的踩上去噼啪炸响着裂开的锯齿笔^[6]。此外，还有各种软体动物产出的旋曲状的长条卵链（或卵囊）。

墨西哥湾上最大的软体动物是马螺。刚出生时，一个咖啡杯底就能装下上百个马螺；成熟后，它们能长到11磅重。软体动物是贪婪的食肉动物，它们甚至能吃人。马螺会让它的猎物窒息致死，其猎物之一是体型更小的佛罗里达战斗螺——凤凰螺，当然后者战斗螺也并非浪得虚名。左旋香螺会用它小刀般锐利的壳口外唇来撬开一个双壳贝，然后吃掉里面动物的软组织。美丽的字母锥是个刺客。它的齿舌长着像鱼叉一样的牙齿，可以用来刺穿猎物的外壳，并向其体内注射毒液。玉螺会对准猎物的外壳，释放出酸性酶，将其软化后，用牙齿在上面钻孔吸食。如果你在一个贝壳身上发现一个圆圆的孔洞或缺口，那很可能来自它的捕食者，而不是与其他贝壳在海浪中产生的碰撞导致。而且这只贝壳有很大概率在被冲上岸的几个小时前还活着。

为了防止被抢掠者吸食，腹足类动物（即蜗牛）会将自己缠在与外壳一体成型的壳内螺旋轴柱（被称为螺轴）上。许多双壳贝的贝壳——此时可以想象希腊女神阿弗洛狄忒越出水面时脚踩的那半边贝壳

——通常会将自己伪装起来，下半边贝壳颜色较亮，而上半边则斑驳暗沉。有时这种防御机制是成功的，但由于海滩上贝壳数量密集，因此失败次数也不少。同类并不是唯一的敌人。鱼类，例如铁齿铜牙的大海鲢，也会以软体动物为食。石蟹和逍遥馒头蟹会用强有力的蟹钳撬开贝壳。即使是可怕的马螺也难逃它们的魔爪。寄居蟹也会大举入侵，猎食贝肉，并侵占它们的居所。

其中自然也少不了人类；自从居住在沿海地区以来，人类就一直在食用软体动物。他们对贝壳的利用还不止于此。在第一批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的那个年代，沿岸土著便拥有私有贝壳，他们将它们打磨抛光，做成贝壳珠串。贝壳串可以在贸易中作为货币使用，可以彰显某人的社会地位，可以作为宗教祭典用品，可以做成腰带的形式起到计数和记录事件的作用。根据库欣的了解，墨西哥湾的土著把贝壳当作工具和武器，用它们来抬高祭祀台和住所的地势。欧洲人也使用贝壳，利用其中的石灰来改良贫瘠的土壤，也会采掘贝壳灰岩——一种含有贝壳化石的沉积岩——来修砌房屋墙壁、建造坚不可摧的军事堡垒。同样地，他们会将石灰、沙子、水，以及碾碎的贝壳混合，创造出一种更坚硬的水泥状的材料，这种材料被称作泰比（tabby）。今天，许多海湾沿岸公路下铺填的正是海洋贝类，而为公路上行走的汽车提供动力的化石燃料，其部分也来自古生物的外骨骼遗骸。

为了维持它对游客的吸引力，萨尼贝尔颁布法律，禁止人们拿走被冲上海岸的活软体动物。但将它扔回海里也不是正确的行为。虽然它们有盔甲外壳，但这些行为会给它们带来刺激和伤害，甚至造成它们的死亡。正确的做法是将它们轻轻放回到水里，或者将它留在海滩上，等待下一次高潮的到来。

保卫沙子也是当地很长时间以来的重点工作。在凯普蒂瓦，当地的海岸线侵蚀问题让当地政府每隔几年都要对海滩进行修复。挖泥船

聚集在近岸，沿着大陆架往海水方向铺设了三英里长的新鲜沙子。这些新建的沙滩里混杂着大量数不清的软体动物，随沙子一并被挖泥船汲走，铿铿作响地撞击着金属管道，然后被活活掩埋或折磨死在新堆砌的海滩上。

海滩，和它上面的贝壳一样，在千变万化的海洋和天气条件下来回往复。前一天还能看到的漂亮滩沿，可能在第二天就消失不见了。那些由机器和人力打造出来的人工海滩，就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们一开始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为了防止它们被冲走，人们必须与大自然对抗。

墨西哥湾的海滩修复史大致可追溯至1947年，当时接踵而至的风暴和飓风对湾区造成了重创，一系列的海滩养护工程也就此启动。沃尔特·安德森骑自行车从海泉到新奥尔良的一路，就是沿着密西西比河著名的26英里防波堤的边沿行进的。这道防波堤在1928年完工，自打它建成后，它面前这片天然银色海滩就开始面临海岸线侵蚀的问题，这里的旅游酒店担负起了重造沙滩美丽的责任。可是1947年的“自然灾害”带来了联邦的救助拨款，于是这一切开始改变。不出数年，安德森就看见了在轰鸣工作的疏浚机。

安德森无法按捺心中重温沿岸骑行时光的念头。很快，他又踏着自行车行进在一片新的柔和海滩上。这片海滩头尾都是300英里宽，沙滩像白鹭的羽毛般洁白无瑕。陆军工程兵团负责了墨西哥湾上最大的一项海滩养护工程，运来了700万立方码的沙子，这些沙子多数是从1500英尺深的海峡中抽上来的。密西西比州人于是开始吹嘘他们同时有“全世界”最长的海堤和“最长的人造海滩”。但这都是需要维护的，维护者不是他们便是联邦政府。1969年的飓风卡米尔让纳税人负担了一项200万立方码的修复工程，1985年飓风埃琳娜的则是150万立方码。在没有灾害发生的时间里，仍然需要进行一些修缮工程。你在

造出来的海滩前面挖了一道大大的沟渠，沙子自然总是想来填满它。
[\[7\]](#)

早在人们开始为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忧心前，沿海州府就一直在与海滩侵蚀做对抗。美国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经历了其中最艰难的抗争岁月，但这并不意味着墨西哥湾地区就能轻松度过。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到90年代末，海湾各州进行的海滩养护工程，小到得克萨斯州玻利瓦尔半岛（Bolivar Peninsula）上不到一英里的新海滩，大到密西西比海岸（Mississippi Coast）上的26英里海滩，共计有158项。

佛罗里达州，作为海滩数量最多的一个州，也是对新沙最为渴求的州。其67%的工程发生在红树林海岸上，其中多数又在派内拉斯郡中。佛罗里达州官员一直担心源源不断溜走的根基将会威胁当地的旅游业发展。1950年到1997年，他们批准了4700万立方码的沙子重置工程，这些沙子经由卡车运输，然后通过挖泥船输送或铲入到目的地。20世纪90年代，州和地方政府在每一立方码的海滩修复上需要花费30美元，年花费额则为3000万到5000万美元，这是为了刺激旅游收入而投入的税钱。海滨地区以每年6~10英尺的速度在消失。这意味着大量的沙堡需要被建造，来让人们重新晒上日光浴，并最终刺激经济的增长。

当暴雨冲走海滩，人们通常会咒骂天灾。但如果人类在本没有海滩的地方建造出海滩来，自然也通常要将它夺走。研究者们经过细致调研后发现，掠夺的背后有85%是人类行为造成的。基本上在所有发生了陆地侵蚀问题的地方，都能看见大坝、突堤、堤道、通道、防波堤的身影——这些为了解决通航或洪水问题而创造出来的东西，几乎都与经济相关。

人造的或经过人为改造的通航水湾，通常都需加筑突堤作为后盾，而突堤就是最坏的海滩杀手。在得克萨斯州的几个水湾突堤——有些可以追溯至19世纪——对泥沙的流向造成了干扰；在有突堤以前，泥沙可以从密西西比三角洲流向帕德雷岛中部，在那里与来自南方的格兰德河的泥沙汇合（在这里汇聚沉积的泥沙，让此处成为贝壳繁育的绝佳场地）。这些工程的胜利让大多数得克萨斯州海滩都陷入了极度缺乏泥沙的境地。结果，突堤的缔造者，陆军工程兵团，让情况变得更糟；1992年，他们改变了科罗拉多河的流向，将原本流向墨西哥湾的泥沙导向了马塔戈达湾。

陆军工程兵团是海岸的主要改造者。他们的一个著名工程是海湾沿岸航道的建造；这项前后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工程于1949年完工，全长1100英里，连接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和佛罗里达州的卡拉贝尔（后来延长到了迈尔斯堡）；水道上布满了航道标志，为往来商船导航。航道至少有12英尺深，150英尺宽，穿过湖湾、长沼和海峡，在连接了海湾州府的天然河口湾区劈波斩浪而过，激起了人们对其生态影响的激烈抗议。它还破坏了海岸线。

佛罗里达州的立法者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开凿航道所产生的废石弃土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应被用于海滩养护。他们认为这是双赢的举措。但人工航道通常会改变近岸水流的走向，导致河道将别处海滩上掠取来的沙子堆到另一个海滩上。结果通常只有赢家和输家。在30年间，凯普蒂瓦岛就接受了七次修复工程。萨尼贝尔岛则只有一次，部分原因就是凯普蒂瓦的新沙，连同贝壳一道，被不断地冲向萨尼贝尔。

1955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发布了一项报告，报告中号召保护国内仅存的、未受破坏的沿海沼泽和海滩。“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沿岸几乎每一处引人入胜的海滨都已经被

事先占据，将用于商业或私人开发，”报告说，“我们漫长的海岸线只有一小部分被作为公共用地剩下，而这仅存的小部分海岸线也正迅速消失于我们眼前。”^[8]

国家公园管理局决定将海滩纳入到它的受保护区域中来。它刚开始设定的目标是科德角、雷斯角（Point Reyes，在旧金山以北）、俄勒冈沙丘（Oregon Dunes）、印第安纳沙丘（Indiana Dunes），以及帕德雷岛。得克萨斯州人近来一直在致力于将他们的海岸线保留为公有土地，以防石油企业染指；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已经设想在帕德雷的沿海草原和海滩上设立自然保护区了。1962年，被称为“微笑拉尔夫”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拉尔夫·亚伯洛（Ralph Yarborough）——他同时也是未来《濒危物种法》的共同起草者——施展手腕，推动国会通过了立法，将帕德雷岛的大部分地区划立为国家滨海保护区，这是继北卡罗来纳的哈特拉斯角和科德角之后的美国第三个国家滨海保护区。

帕德雷岛是一个开始。海湾北部的很多人担心无人占领的障壁岛将会重蹈红树林海岸的覆辙。最终，佛罗里达州南部出现过的高耸公寓楼和奢华酒店还是被堆在了障壁岛上，四周围绕着的房屋也千篇一律，像用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在圣罗莎岛西端的彭萨科拉海滩上，开发商正铆足了劲，开动推土机，将沙丘夷为平地；此后过了十多年，州政府才开始对海滩采取保护措施。地产商们也同样关心哪块临湾可售地块被联邦政府收购的可能性更高。

约翰·麦克唐纳由此获得了他的小说创作灵感。这一次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将佛罗里达作为他故事的发生地；在这个谋杀悬疑故事中，他描写了一个密西西比州建筑商，这个建筑商表面上持有许可证，并准备开发一座岛屿，而实际上是想欺骗国家公园管理局，将那座岛占为己有。《离岛风云》（*Barrier Island*）的情节并非凭空想

象。帕德雷岛的土地所有者主要是些非本地的大型地产财团，他们后来拿着地下采矿权和1850万美元扬长而去，这笔钱已经超出了联邦政府为买下国家滨海区而设定的支出预算。

《离岛风云》在1971年出版，此时距离国会设立海湾岛屿国家滨海保护区（Gulf Islands National Seashore）已经过去了15年，它对在密西西比州出现的一个群众运动影响很大。保护区被纳入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管辖，它们包括佛罗里达州西圣罗莎岛的部分地区〔皮肯斯堡（Fort Pickens）附近〕和帕蒂诺礁（Perdido Key），密西西比州卡特岛的一部分，以及所有的东船岛、西船岛、珀蒂布瓦岛和霍恩岛。亚拉巴马州人最不信任联邦政府，他们将自己州内的海岸，包括海湾海岸（Gulf Shores）和多芬岛，都排除在联邦的海滨保护计划之外。

国家公园的管理员沿着沃尔特·安德森走过的沙丘和灌木丛老路，在霍恩岛上开辟出了一条从海峡到墨西哥湾的安德森之路。他们在他扎营的沙地上插上铁杆（虽然他日志上说飓风贝琪已经将营地冲入海中），将其划定为筑巢产卵季的禁止进入区域。他们将此地命名为沃尔特·安德森路口（Walter Anderson Crossing）。这是对这位自然艺术家的致敬，尽管这份敬意不够单纯。

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岛上还设立了其他步道和景点，印制了观光地图，向公园游客做推广，并一度提出要建设占地100英亩的露营地，铺设三条跨岛游览路线。这个计划最终被国会叫停，霍恩岛在1978年被划定为荒野保护区。十年后，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将霍恩岛作为红狼的圈养繁殖地，红狼曾经的栖息地是更广阔的南部洼地和沿海草原。正如安德森所了解的那样，霍恩岛上兔子数量众多，因此红狼的数量在岛上也得到了迅速恢复，但十年后管理局将它们转移到了北

卡罗来纳的荒地上，因为红狼和智人之间发生了太多次相遇，这些智人包括露营者、观光者、观鸟者、安德森迷，还有周末的划船人。

安德森死后，在墨西哥湾其他岛屿上拔地而起的任何一座公寓或酒店，都在证明海滨保护区对野生动物的重要性。1947年，就在美墨边境以南、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的新牧场（Rancho Nuevo）海滩上，肯普氏龟在这里搭建起了大约四万个营巢。31年后，这种小小的绿灰色海龟，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巢穴只剩下不足1000个；于是美国科学家和墨西哥科学家合作，决定利用帕德雷岛的国家滨海保护区来扭转这个局势。

这时距离罐头汤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生活在墨西哥湾上的五种海龟，有四种——均是濒危或受威胁物种——都在帕德雷岛上产卵。帕德雷岛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能被濒危的肯普氏龟属意的产卵繁殖地。1987年，国会要求州政府对海龟采取保护性措施；但海湾各州中没有一个建立筑巢保护区，没有一个要求捕虾船使用带海龟放生装置（TEDs）的渔网。叛逆的巴吞鲁日立法者通过了一项藐视联邦命令的法律，明确告诉捕虾人，路易斯安那州的野生动物官员不会检查TEDs（迫于压力，州政府在2015年纠正了这种不作为行为）。在其他地区，成熟的海滩上都会执行熄灯政策，巢穴四周围上了黄色警戒隔离带，并有志愿者来回巡视。个人、公众和政府的通力合作将肯普氏龟从濒危边缘救了回来，现在肯普氏龟数量的年均增长率有15%。

如果安德森还活着，见证了海龟被改变的命运，那不难想象，他一定会写下一篇日志称颂州政府参与国家滨海保护行动所展现出的无私精神，尽管岛上不断增加的游客会让他不胜其扰。在安德森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不仅没有多少海龟可画，鸟类数量也在不断衰减。

他第一次注意这个令人痛心的变化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褐鹈鹕的数量急剧减少，并正在走向灭绝。从1963年年初起，除了那只已

经在州旗上栖息了50年的褐鹈鹕外，你在路易斯安那州大陆上就再也找不到这种安德森最喜爱的鸟类了。1966年，立法者将鹈鹕选为州鸟，就像用一位战败英雄的名字为公路命名以示纪念一样。这时，从得克萨斯州东部到佛罗里达州的大弯曲，都已经不见了这位海湾自然首席大使的身影。没人知道它们去哪了。起初有一种说法最为盛行，人们说是暴风雨或一种不知名的鸟类致使病菌席卷了鹈鹕的栖息地——这么说来，人类是毫无责任的。然后，南加州的鹈鹕也开始消失了。

西海岸的科学家们追寻到问题的根源出自DDT；制造工厂将上万加仑的DDT排入洛杉矶郡的污水管道系统，这些DDT便随水道进入了食物链。受感染的鸟类产下的卵远未成熟，如果没有鹈鹕父母将外壳击破，则无法成功孵化。1933年，一位鸟类学家在尚德卢尔的北岛上统计得到了2300个鹈鹕鸟巢。30年后，这个岛上的鹈鹕巢数量只剩下100个。尚德卢尔的常客，安德森，曾经怀疑过化学污染是祸首。他是对的。从二战时期始，农民就一直往他们位于密西西比河盆地的农田上灌DDT，DDT就这么沿着河流进入了食物链。

到1972年末，美国禁止了这种化学物的广泛使用。第二年春天，海湾沿岸的报纸开始报道“大嘴鸟”的身影又出现了。《彭萨科拉新闻报》称大嘴鸟的回归“预示着大自然就不会抛下我们，只要我们给它一个生存的机会”。这个说法带着强烈的人类中心论，但这份日常亲商的报刊也曾经是国家滨海保护区坚定的支持者——滨海区不仅是鸟类的庇护所，也是海滩游客的胜地。[\[9\]](#)

没有哪个群体比挥舞着望远镜的观鸟者更感恩DDT禁令和海湾保护区的设立了。从20世纪中叶开始，他们的热情就让观鸟迅速发展为一大户外消遣活动。得克萨斯州海岸是中部大陆和密西西比候鸟迁徙线

的汇合点，因此是人们最爱的观鸟目的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位身姿轻盈、充满活力的女士——就像小鸟。

人们此前对候鸟迁徙路线知之甚少，直到康妮·夏甲（Connie Hagar）和她的前石油商丈夫杰克买下了罗克波特（Rockport）的一处自驾者旅馆，旅馆共有八间村舍，坐落在得克萨斯州莱棕和沿海被大风刮得横七竖八的橡木林中。那是1935年，在此之前，康妮和她的姐妹波特（Bert）为了躲避家族疾病关节炎，就离开了她们在达拉斯附近的家，到沿海地区另觅住处。她们有意追随候鸟的脚步；康妮也会在她随身携带的日记本里写下对鸟类、栖息地和它们习性的珍贵记录。等到她和杰克搬到得克萨斯州海岸的时候，她对这里的留鸟和候鸟比大多数人都要了解。

专业的鸟类学家——都是男人——总爱嘲笑她，认为她所谓的观鸟不过是大惊小怪的主妇在厨房窗台上放了一个喂食器而已。的确，她到田野上时身上穿的是棉裙，观察鸟类世界时戴着的是时髦的菱形眼镜（蕾切尔·卡森也是这样）。但她的田野是一条九英里长的环路，那是她机敏地沿着海岸在地图上标记出来的；沿途会经过树林、草原，还有湿地和盐沼，让她得以最大限度地观察到各种各样的鸟类。这条环线成为她日常踱步的路线。

美国观鸟界的大主教罗杰·托里·彼得森（Roger Tory Peterson）在1948年来到罗克波特时，曾让康妮当他的向导，因此他知道她是货真价实的观鸟专家。得克萨斯州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鸟类保护区，后来这个保护区成为大得克萨斯海岸观鸟径（Great Texas Coastal Birding Trail）的核心。这条观鸟径开设于20世纪90年代，全长500英里，连接了沿岸的各个禁猎区、保育区和徒步道。那时，得克萨斯州的帕德雷岛有超过600种鸟类，这里也是白鹈鹕在墨西哥湾上的唯一筑巢点。当地旅游业因此财源不断，光是格兰德河谷——这里

有两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每年产生的旅游收入就有9000万美元。

到1973年，夏甲于87岁高龄离世时，海湾已经有了数不清的地方和州立鸟类禁猎区，以及十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迫于公众对不受控的开发热潮的指责，到深海地平线石油平台爆炸事故发生前，这里又增加了28个联邦自然保护区。但它们，和当年险些灭绝的鹈鹕一样，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国会议员吉恩·泰勒（Gene Taylor）有意肃清密西西比湾的污染问题，他对2000年的《水资源开发法案》提出修正建议，其中一项主要条款就是要进行海岸线修复。这不仅仅是要为游客修建海滩。岛屿正面临逐年下沉、缩小、消失的问题。

具有历史意义的船岛让国家公园管理局最为忧心。法国人对密西西比河口的搜寻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此外，它还是内战年代马萨诸塞堡的所在地——目前而言是这样。1969年的飓风卡米尔在岛中间划开了一道口子，船岛分裂为东、西船岛，马萨诸塞堡被留在了西船岛上，堡垒在飓风侵袭后摇摇欲坠，不断有砖块跌落到峡湾里。

对老堡垒的加固成为一项旷日持久的战斗。从1974年到2002年，岛屿总共经历了六次养护工程。飓风卡特里娜过后，堡垒被损坏，游客中心遭到摧毁；2008年飓风艾克袭来，东船岛在后来好一段时间里都淹没在了海水中。陆军工程兵团素来热爱修复事业——虽然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此前的海岸线侵蚀工程导致的，因此有鉴于前述境况，兵团提出要为密西西比州的障壁岛群修建15亿美元的护岸墙。在这则提案中，船岛被提到了537次。[\[10\]](#)

站在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说，比失去一个历史建筑更糟糕的是失去尚德卢尔群岛。尚德卢尔群岛地势不比海平面高出多少，因此它们一直都是高危岛群。一座接一座的灯塔，以及安德森的画作都是这种高危状态的历史见证。美国于1848年在尚德卢尔盖了第一座灯塔，四年

后，一场飓风将它带走了。由于1853年暴发黄热病，它的继任灯塔姗姗来迟。那是一座造型好看的、刷着白墙的砖砌塔楼，它以火焰为光源，使用四阶菲涅耳透镜，有50英尺高。风暴孜孜不倦地侵蚀着灯塔的基底，于是在1896年，一座崭新的金属骨架灯塔拔地而起，它使用更强大的三阶透镜，塔高是上一任的两倍。

50年后，安德森为灯塔画了一幅画。灯塔下是两位看守人的住所，还有一道长长的栈桥横跨在盐沼之上。栈桥的一头停靠着一只船和一座库房。海面平静，一只海鸥正立在一根木桩上。到了1960年，风暴已经摧毁了其中的那座船库以及大部分的栈桥。九年后，仅剩的那所房子也被卡米尔摧毁了；这时的灯塔已经是自动化操作了。1998年，飓风乔治斯（Georges）吞噬了大量陆地，留下灯塔搁浅在三英尺深的开放水域里；它看起来更像是航道标志，而不是灯塔了。最后，飓风卡特里娜抹掉了这座建筑物存在过的一切痕迹。在安德森画中灯塔下的干燥陆地，到2006年时已经成为17英尺深的墨西哥湾海水。有些科学家说，卡特里娜带来了永久性的严峻打击，到21世纪的下半叶，尚德卢尔群岛将会彻底消失。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美国第二古老的自然保护区，尚德卢尔的布雷顿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也会随之消失。安德森遇见过到访群岛的红海龟、绿海龟和肯普氏龟，每日有20多种在海滨和盐沼觅食的海鸟和滨鸟的陪伴。这些野生动物中超过一半都在尚德卢尔群岛上筑巢，因此这里也被奥杜邦协会指定为全球重要鸟类区。褐鹈鹕，在经历与DDT的斗争后，它们在尚德卢尔群岛上重整旗鼓，这里成为它们的一个大本营。飓风卡特里娜导致的五起石油泄漏事故，让鹈鹕和尚德卢尔的其他鸟类再次面临危机，北美最大的燕鸥栖息地也难逃此劫；卡特里娜的风暴潮对岛屿的海滩和盐沼更是造成了无法逆转的伤害，影响了上面的所有居住者和过路者。

尚德卢尔群岛，正如海湾上其他任何一座障壁岛，是迁徙候鸟途中的一个重要“间断”。乔治·洛厄里（George Lowery）于20世纪40年代在证明跨海湾迁徙路线时使用到了这个词，从那时起到2014年，那里的迁徙鸟类数量下降了一半（从前被当作军犬训练基地的密西西比州卡特岛，更是一点不剩了）。之所以数量剧减，是因为滨海开发导致鸟类栖息地和繁殖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可供特殊鸟类寄生的巢穴就更少了。另外，气候变化也改变了鸟类的迁徙路线和习性。最主要也是最致命的因素，就是海湾陆地的消失。^[11]

连障壁岛都在逐渐失去它的障壁作用，更像力量薄弱的沙嘴，而濒危物种的处境就更别提了。即使不考虑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路易斯安那州海域的障壁岛面临的也是这样一种命运。和急剧下降的鸟类一样，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填补岛屿和海岸的泥沙，其数量也已经不复从前了。

^[1] Rick Bragg, “The Lost Gulf,” *Garden & Gun*, August/September 2010, <http://gardenandgun.com/article/lost-gulf>.

^[2] Stefanie Wolf, beach tour narration, February 25, 2015, Sanibel Island, FL.

^[3] Stefanie Wolf, beach tour narration, February 25, 2015, Sanibel Island, FL; Sylvia Sunshine (Abbie M. Brooks), *Petals Plucked from Sunny Climes* (Southern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880), 303.

^[4] 林白夫人：《海的礼物》，唐清蓉、林燕玲译，重庆出版社，2013。——译注

^[5] Anne Morrow Lindbergh, *Gift from the Sea* (Random House, 2011), 28, 115.

[6] 名称均为英文俗名的直译，它们的拉丁学名分别为：火鸡翅Arca zebra、字母锥Conus spurius、坦帕顶Callisotomatampaense、咖啡豆Melampuscoffeus、法戈螺Vermiculariafargoi、锯齿笔Atrina serrata。——译注

[7] Office of Geology, Mississippi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Mississippi Coastal Geology and Regional Marine Study, 1990-1994: Final Report*, vol. 2 (US Geological Survey, n.d.), 198.

[8] US National Park Service, *A Report on Our Vanishing Shoreline*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1955), 7.

[9] “The Pelican Returns, ” *Pensacola News Journal*, May 6, 1973.

[10]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Mississippi Coastal Improvements Program (MsCIP)*, Hancock, Harrison, and Jackson Counties (2009) .

[11] George H.Lowery Jr., “Trans-Gulf Spring Migration of Birds and the Coastal Hiatus, ” *Wilson Bulletin* 57 (1945) : 92-121.

十九 消失的边界



到21世纪，上万英里的人工水道在路易斯安那广袤的海滨湿地上纵横交错，大部分湿地演变成了如图中所示的开阔水塘，加剧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水土流失危机。

宇宙的运行有赖于万物的环环相扣，一切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岔子，即使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环……整个宇宙也会轰然坍塌。

小玉米饼，《南国野兽》[\[1\]](#)（2012）[\[2\]](#)

在墨西哥湾的边沿，海滨沼泽比比皆是。长长的大陆架、障壁岛、温和的防波堤，还有各支河流带下来的泥沙，都促进了沼泽地的生息繁衍。包括盐沼和淡水沼泽在内，墨西哥湾占据了全国一半左右的海滨沼泽。它们广阔地围绕在湖湾、长沼和岛屿四周，装点着河流末梢处的河口水域。

在亚拉巴马州的拜尤拉巴特里（Bayou La Batre），大片的沼泽地恬静安宁，鱼虾码头依偎其上；当这片超脱尘世的景象出现在你眼前时，所有关于这世上纷争和苦难的想法在这瞬间似乎都变得遥不可及，目之所及只有茫茫无际的草地和天空，而你有如沧海之一粟，漂

浮在这片浩瀚之地。但，只要你愿意，这片沼泽地可以成为数以亿计生灵的庇护所。它生机盎然。是生命在孕育生命。

西德尼·拉尼尔称海滨沼泽为“神之广袤”。就像其他人被高山所触动，西德尼·拉尼尔也为眼前的沼泽所感动，他作了长诗赞颂它们：

沼泽啊，你是多么的率直、简单，浩荡而自在

你招展于天际，献身于大海！[\[3\]](#)

亚拉巴马，尤其是佛罗里达，都有着大量的海滨沼泽；密西西比有一两处；而数量最多的是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可以去看看美国地图上的康涅狄格州，那就是路易斯安那所拥有的海滨沼泽地的面积。它们位于路易斯安那州“靴子”的后跟和“鞋底”的位置。临海湾的沼泽地几乎每一寸都是一样的，它深入内陆15英里，展开的冲击带足有5500平方英里，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见的。

没有一个简单的词可以描述它。苍凉，这是肯定的；优雅，没错；激动人心，也没错。广阔的沼泽上有满天白云投下的影子，云随风行，行云如流水，这片沃野便同时拥有了天空的无垠。这里的天地苍茫无际，这一端正阳光普照，却见遥远的那一角黑云压顶而寂静无声。沼泽不仅从视觉上充满了你的视野；那里万籁俱寂，你听不到其他一点响动，但能闻见混杂于其中咸咸的、质朴的气味，那是青草、泥土、空气和水流的味道。

过去人们提起海滨沼泽时，往往以轻蔑的语气将它和另一个词联系起来，那就是“荒地”，即使在荒野热爱者的口中也不例外。得克萨斯州的自然学家罗伊·白迪切克（Roy Bedichek）认为沼泽“匮乏”。但事实上，它们一点都不匮乏、不荒芜，也不“空洞”——这是另一个对沼泽地的常见描述。实际上白迪切克第一个承认尽管那里

荒无人烟，但总能听到鲮鱼戏水，苍鹭鸣叫；那里就像水生的塞伦盖蒂平原^[4]，总是生机勃勃。拉尼尔认为它们自身就是一个活力十足的世界。^[5]

走过它，听见呼哧呼哧扇动的翅膀正在朝西飞去。^[6]

在路易斯安那，那里草野连天的群山上生活着100多种鸟类。小到海湾公路上的林莺，大到常年栖息于此的大蓝鹭，不一而足。体型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是黑水鸡，又称沼泽鸡，它属于外来物种，在这里十分常见，在当地被称作湿地鸡或水秧鸡。秋天，20多种迁徙野鸭从这里游过，引得猎鸭人纷纷出动。在艾弗里岛，当初在爱德华·麦基尔亨尼的庇护下存活的雪鹭已经繁衍了数百只后代，爱德华家族的后人在持续为它们提供着栖息地。

鸬鹚是这里的常客，它们经常飞上数英里，从栖居的家中来到这里，有时一天要来回好几次——它们的翅展有将近六英尺，因此这种通勤距离对体型巨大、擅于飞翔的它们来说易如反掌。它们总是出双入对，搭建的巢穴也很大，足以让它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蕾切尔·卡森曾经见过一个鸬鹚巢，直径有六英尺，它的底座搭建得堪称巧夺天工，底座材料有被冲上海滩的漂浮树枝、牡蛎壳、海螺卵囊、船桨碎片、一只渔夫的靴子，还有用于加固的24英尺渔网和浮子绳。这个鸟巢非常宽敞，它的下方容纳了好几个家庭同住，它们分别是麻雀、棕鸟和鸬鹚；但它们太重了，挂在40英尺高的火炬松上，树顶的枝条都被绷紧了。沼泽地上出没的鸬鹚有好几种，我们所知道的有灰的、白的和棕的；它们在水面高处追踪猎物，而它们自己也常常被另一种鹰从后面跟踪、偷走食物。

最正直且规矩的捕鱼者当数大蓝鹭。它常常一动不动地站在草丛边上，半隐匿于其间；从草丛上遮遮掩掩地伸出来它的脑袋，S形的脖

子，似匕首的鸟喙，还有一双黄眼睛。它将自己融入草地中，就像一棵长得特别高的新草抽了芽。

沼泽的草地，一里接着一里，它们齐腰般高，阔叶般宽，

高得整齐，绿得划一，没有谁更亮，没有谁更暗，

它们舒展着，在这欢快的平原上。[\[7\]](#)

如果没了草，沼泽什么也不是。那里有芦苇、灯芯草、粟草和苧麻。米草属植物称霸了盐沼，将草原渲染成了美丽的琥珀色、绿色和灰色。当地人称它们为米草，有时也称狗尾草、沼泽干草，在卡津地区则称为paille chat tegré——“老虎的毛发”。而盐沼在植物多样性方面类似旱地草原，种类较少（淡盐水沼泽多样性程度更高），但数量很多。盐沼上的草长得茂密而开阔；草长草落，枯荣交替，大量的植物在这里腐烂分解，使沼泽成为天然的缺氧环境。

在缺氧、水咸和水涝的生境里，远古的草类进化出了适应这种极端环境的特性。它们机智地进化出了折叠型的叶片，用于储藏淡水。草原上草的种子随风播撒，以此繁殖，但对沼泽草来说，这并不是理想的策略；米草得以快速繁殖，靠的是它在泥土中水平生长、侧向生长的地下茎。

但谁会出现在我们被唤醒的视野中

那漂浮的模样，蠕动的形体

在那沉睡的水底？[\[8\]](#)

海湾的沼泽里生活着水獭、海狸鼠、水貂、野兔、老鼠，还有蛇，以及一系列的龟（萨旺尼龟、莫比尔龟、钻纹龟）。盐沼上有蝴蝶，但没有两栖动物。最大型的沼泽常客是短吻鳄，它们更喜欢淡水。广阔的湿地花园是海洋的托儿所，有同样功能的还有红树林、河

口和珊瑚礁。海滨沼泽上静静流淌着蜿蜒的天然水道，海草和牡蛎床卧在其中，安逸慵懒，年幼的鲑鱼、鳟鱼、石首鱼、黄花鱼、比目鱼、鲱鱼和红鲈穿梭于其间。

蓝蟹是其中的主要居民。蟹的每日进食习惯让科学家对它们的生态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它们摆动着船桨似的后腿，也就是它们的游泳足，横行着游向水面，然后抬起一只蟹螯，从草丛中牢牢夹出一只玉黍螺。就和海狸鼠的情况一样，这种螺类的过度繁殖已经泛滥成灾；它们留下了大量的腐败植物，最终会导致更多的草本植物死亡以及水体环境的富营养化。螃蟹还是穴居者，它们挖掘地洞的行为——某些贻贝和蘑菇也有类似行为——在多孔渗水的泥土和植物废料中起到了提高含氧量、通风疏气的作用。

大多数水下动物的生命起源于“咖啡土”。所谓咖啡土，就是沼泽草地边缘上堆积的疏松褐色植物残骸，捕虾人称它们为咖啡土。这些腐烂物质吸收了大量的氧气，因此成为海洋动物的幼体、处于发育阶段个体的食物，比如褐虾。科学家们一度认为褐虾是“食腐质者”，也就是只以腐烂植物为食的动物。后来，研究人员发现其实是草本腐质促进了线虫的繁殖，褐虾通过啃啮腐烂草质来进食这些小虫。

早在1977年，当时这一切都还只是猜测，尤金·特纳，这位发现了死水区的科学家，就通过研究发现虾的数量规模与沼泽地区（即虾的“温床”）的大小和健康程度直接相关。如此也就难怪路易斯安那州的虾类出产量成为国内之最，它还是世界上不多的丰饶的海洋生物栖息地，1963年有一位生物学家给莫比尔和得克萨斯州东部之间的这段海岸起了一个绰号，叫“肥沃的新月渔场”。[\[9\]](#)

沼泽之于人类，正如咖啡土之于水下生命。当大自然为风暴频袭的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海岸展开一床沼泽沃野时，它清楚自己

在干什么。卡特里娜飓风灾害过后，很多人讲到保护自然风暴缓冲带的重要性，似乎这种庇护对人类而言是一项新发现。更准确地说，它在大多数时候都被遗忘了。早在19世纪40年代，为沼泽地法案论战的国会议员们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沼泽还有过滤污水的能力——其中主要是牡蛎的功劳。近来，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沼泽，以及红树林和海草；他们发现，它们在隔离海洋和大气中二氧化碳上的作用可以帮助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

但自然对人类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沼泽的过滤和隔离作用终究有限。人类对此常常一无所知。

然后，冷不防地，人类罪恶的味道，

乘着风，飘然而来。[\[10\]](#)

1988年，正是狂风大作的一年。这一年，环保局首次发布《有害物质排放目录》，《时代周刊》以“污秽的海洋”作为封面报道，得克萨斯州禁止了商业性的围网捕捞，旱灾重创了阿巴拉契科拉湾的牡蛎床但暂时性地缩小了死水区范围。奥利弗·霍克在这一年发表了一篇打破常见学术教条的法学评论文章；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抓人眼球：“我们正卷入一场灭绝之战。”战争的伤亡者是那些“沿海资源”，而就阻止伤亡发生这点来说，它“和其他的环保斗争”几乎完全不同。霍克是全国野生动物联合会前总顾问和前副主席，常在陆上河流划独木舟，也最享受与家人或学生在户外的时光，他当时任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正在着手推动一项现状核查。“全美国的土地开发都正朝海上推进”，他这番话随后得到了其家乡最负盛名的飓风追踪者纳什·罗伯茨的认可。[\[11\]](#)

路易斯安那州的邻居，得克萨斯州，其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近四分之三的工业基地都已经进驻沿海。全国各州的近海开发审批程序无

不是晦涩难懂、资金不足、人手太少、官僚僵化、政治弊病严重，对此霍克说——这一次听起来像尤金·特纳在描述某个罪恶问题——“我们创造出的是苏斯博士^[12]笔下的机器，它偶尔能带来好事，但更经常的是坏事，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机制最终只是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难以招架这一切的环保局思忖良久后，决定将湿地分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两类，来达到精简流程的目的；这正是“满脑子建设思维的兵团”所倡导的做法，而陆军工程兵团恰恰是导致这场灭绝战的主力。^[13]

结果是什么呢？全美的河口都在“遭受随处可见的污染”。霍克自家的大后方就是石油化工区，其规模仅次于得克萨斯州。同样地，路易斯安那州用自己的生态灵魂换来就业、税收，以及所谓的更高的生活水平。环境保护基金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在水污染调查中将路易斯安那州的近海水域列为受污染最严重水域的第五位。它超过三分之一的河口受到了污染问题的影响。治理污染水域的办法是有的，但相关部门是否有执行的决心就不得而知了。国会在1987年制订了美国国家河口计划（National Estuary Program），那时霍克便注意到，“肥沃的新月渔场”并没有获得像切萨皮克湾和五大湖那样的优先关注。^[14]

而面对土地流失这一更大的威胁，人们与之斗争的决心就更是少得可怜。海滨“走向消失的速度如此之快，拯救手段几乎已经触及了技术的极限，”霍克写道，“更不要提经济和政治意愿了。”他所说的也不是游客到访的观光海滨——况且路易斯安那州也不是靠观光海滩闻名的——而是海滨沼泽。^[15]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墨西哥湾上的沼泽地流失问题尤为严重的是其最大的两个湖湾。由于水道开凿和疏浚填土，40%的坦帕湾沼泽走向消亡，加尔维斯顿湾也因此丧失了35000英亩的沼泽，并且其海岸线

依然在以每年六英尺的速度消退。但问题最严重的还是广布沼泽的路易斯安那州，美国80%的湿地流失都发生在这里。卡津地区一度独居一隅，在数十年前的那部影片中，那个卡津小男孩还在这里带着他的浣熊小伙伴，撑着独木舟，他们遇见的钻井平台在当时还是新奇古怪的事物，但如今的卡津已经“被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堤道、管道和运河网络所覆盖”。“它们每一个，”霍克说，“都是破坏。”^[16]

路易斯安那州的海岸是天然的海蚀海岸。但它被侵蚀的部分可以通过——或说曾经通过——天然的泥沙沉积得到补充；阿查法拉亚河和密西西比河一直在维系、重建、重塑海岸线，它们是孜孜不倦的造岸者。密西西比这条瞬息万变的河流，在它上万年的生命里，像花园里一根不受束缚的浇水软管，奔腾着、挥舞着，自西向东、自东向西地来回喷洒，为海湾北部带去了水源以及使其重焕活力的泥沙。在卫星图像上，你可以看见在入海口处的墨西哥湾上，沉积物团团围拢在泥褐色的海岸边上，沿海浮起了巨大的混浊泥流。阿查法拉亚河，它分流了大约30%的密西西比河水流，一直在从容不迫地往其西边倾倒沉积物。

在它奔流不息的生命中，密西西比河将路易斯安那州海岸延长了50英里，打造了数个三角洲，其中被抛弃的几个现在已经成为路易斯安那州著名海滨沼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天然的造岸材料，就不会有这些沼泽泥滩，不会存在如格兰德岛、尚德卢尔群岛这样的障壁岛，更不会有路易斯安那州周围的地下、海底油气带。

英国的测绘员托马斯·哈钦斯曾经在18世纪参与绘制过墨西哥湾的北部；关于密西西比河将大陆北部陆地重新安置到南方，他是最早知悉的人之一。陆地重置可谓一项大工程，但只要你想想密西西比河每一秒都在推动平均45万立方英尺的水量往海湾奔腾，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再想象一下，200万辆翻斗车运着中西部的泥土——每年1.8亿

吨的泥沙量——沿着州际公路隆隆往海湾开去的场景。这些泥沙足够建造300英尺的路易斯安那州海岸了。但这都是“开发”前发生的事了。[\[17\]](#)

开发——或者更准确地说，河流改造——从比安维尔时期的法国人就开始了，他们借助铁铲和独轮手推车，在河岸边建起了第一道堤坝。继新奥尔良之后，河边的每一座城市都需要建造堤坝。农田灌溉和工厂生产需要堤坝。通航需要码头和堤道。1862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对姐妹，安妮（Anne）和玛莎·丘比特（Martha Cubitt）在通往龙德河口（Ronde Bayou）的河岸上挖凿了（有很大概率是，命令奴隶们为她们挖凿了）一条水道——更准确地说是沟渠——为她们年迈的父亲打通了一条通行捷径，让老人可以撑着小艇前往河口捕牡蛎。结果那年春天河水泛滥，在洪水的侵蚀下，她们的水道被拓宽了上百倍，令人目瞪口呆。不出八年时间，这条水道已经有了2500英尺宽。到1950年，河口已经演变成了新奥尔良大小的湿地（现在是三角洲国家生态保护区）。

丘比特姐妹所用到的技术无非人力和骡子。那么试想一下，工程师们若是借助了蒸汽和机械动力，那将产生怎样无法预料的后果。

《沼泽地》法案颁布后，顶着开垦、防洪、通航的神圣名义，当啷作响、头顶冒烟的机器开始大行其道，改造起河流来。它们仿佛拿出了当年联邦军攻打新奥尔良的狠劲，开疆拓土，拼搏进取。

史学家约翰·巴里（John Barry）曾出版过一本珍贵的书，名叫《潮起》（*Rising Tide*）；他在里面毫无保留地谈到了工程师们的技术天赋和他们不服输的精神，这种好胜不仅存在于同侪之间，当他们面对河流毫无节制的泛滥时更是如此。他们的天赋依赖于未经验证的科学，他们追求对自然的控制，急迫地想“修理”桀骜的河流。防波堤是他们策略的第一步。1874年，一道连接密苏里和伊利诺伊的铁道

路桥完工，设计者是自学成才的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布坎南·伊兹（James Buchanan Eads），这是他们的第二步。突堤是他们的第三步，这也是伊兹的另一大杰作。

对商业社会来说，大泥潭的一大缺陷就是它不断地往南方下游堆积泥沙，阻碍了新奥尔良和墨西哥湾之间的船运。伊兹，这个被《科学美国人》杂志称为“天才”的人，蓄着亚伯拉罕·林肯的胡子，脑袋上则溜光水滑，他尝试说服陆军工程兵团，告诉他们突堤是问题的解决办法。截流而建的突堤，会提高水流速度，使得水流冲刷河床，加深河道，从而减轻洪涝。突堤就是一台在永远工作的由液压驱动的疏浚机，完成了不那么可靠又更昂贵的机械疏浚机每天在做的事。

国会希望南通道（South Pass）的水深能达到30英尺，以让载荷最重的船也能在上面通行。伊兹说如果他没达到要求，政府无须支付他工钱。1879年，突堤完工，测深员测得水深30英尺，伊兹拿到了他的报酬。保证了峡口通行无阻后，船主们省下了500万美元的海上保险，新奥尔良在美国各货运港的排名一举从第九位跃升至仅次于纽约的第二位。[\[18\]](#)

三角洲和尚德卢尔群岛之间是布雷顿海峡，南山口开航没多久，布雷顿海峡的牡蛎渔民就发现，咸水开始纷纷涌入淡水沼泽和古老的海滨森林。1892年玛莎·菲尔德在格兰德岛上写道：“河口湖湾上的水正闪闪发光地向南流去，它们从泥沙上冲刷而过，好像要将这并不牢固的陆地冲走似的。”他们看到的是什么？[\[19\]](#)

五年后，伊兹的首席助理，身在密西西比州南部的埃尔默·科斯特（Elmer Corthell）在《国家地理》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一些提示。他报告说突堤附近的沼泽地正在后退，更准确地说是在沉陷，以每年略大于半英寸的速度沉陷；这并不是海湾水平面上升导致的，而是人为改造河流带来的后果。但他的发现并不是一个专业人员在做沉

痛追悔的自白。科斯尔推论说，他和伊兹的工作成果“所带来的巨大益处”——而且他认为“这片大陆上的每一个人”都共享了这份益处——“远远超过了海湾三角洲陆地下沉对后世的影响”。“再说了”，这位美国未来福祉的预言家又说，“等那个时候到来时”，工程师们可以再“造一个保护性堤坝，阻止海湾海水灌入”。[\[20\]](#)

同时，科斯尔在西南通道（Southwest Pass）上又打造了一个类似的突堤，以适应不断扩大的往来船运量。伊兹主导的第一个突堤最终被他们的行业组织指定为国家历史土木工程地标（National Historic Civil Engineering Landmark）。然后在1914年，农业部门针对侵蚀问题做了官方声明。它给出的结论是，路易斯安那州海岸是安全的，泥沙的天然沉积量足以抵消侵蚀和下陷的影响，此前已经持续了5000年的造岸进程未受影响，它将一直持续下去。此后50年，工程师和地理学家们一直在宣扬这种平衡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的一位地理学者，舍伍德·“伍迪”·加利亚诺（Sherwood “Woody” Gagliano），成为沉积作用问题上的乔治·洛厄里。加利亚诺在路易斯安那州长大，见过许多干燥的土地最终成为湿地；他对凡事都持有合理怀疑，这是优秀科学家常具备的品质。彼时，陆军工程兵团捏造报告，将密西西比河三分之一的河道改道，抽干了得克萨斯州的部分地区和新墨西哥地区，加利亚诺于是在资金支持下，对这项工程对路易斯安那州海岸的影响做调研。他和他研究团队的发现让人触目惊心：路易斯安那州正在以每年16.5平方英里的速度消失。放射性碳定年法所测定的岩芯样本显示，路易斯安那州最开始是在19世纪80年代，也就是伊兹完成他的突堤工程的十年后开始失去它的边界的。

不像20世纪50年代，19世纪80年代是一系列消失形态的征兆开始出现

斯科特发现羽毛鸟类数量日益减少。研究人员后来计算发现，路易斯安那州海岸的泥沙沉积量自那时起下降了将近80%。大部分的数据跳水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20世纪50年代也就成为科学家们称之为后水坝时代的开端。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上的大坝和水库，将本该流向下游的泥沙都拦截了下来。

人们在得克萨斯州最著名的水道上所做的类似研究也暴露出同样的问题。被认定为美国遗产河流（American Heritage River）的格兰德河，每90英里就筑起一道大坝，整条河共有大坝21座。如果不是它下游岔出的支流，其河口不会洒出一滴水来。而实际上它也只有一点。过去，大海鲢的游钓者就是站在一个叫大海鲢弯曲（Tarpon Bend）的地方掷下的渔线，格兰德河的泥沙顺流而下，堆积在海岸上，不断为帕德雷岛补充给养。现在，没人会在这里钓大海鲢了。大海鲢无法再经由河口进入大海鲢弯曲，因为河口收窄，变得细如纸片。有时河水甚至无法进入海湾，帕德雷岛从此失去了泥沙的主要来源。

在路易斯安那州，加利亚诺于1970年发表了他的研究发现。接下来的调查显示陆地的流失速度比之前所了解到的要更快——最新数据为每年25~35平方英里。自20世纪30年代起，截至世纪末，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已经损失了2300平方英里，那是一个特拉华州的面积。人们归咎于墨西哥湾，说是海湾的洋流带走了土地。但实际上，堤坝才是凶手，而且它并不是唯一的凶手。伊兹的国家级地标突堤，以及所有其他突堤，都一如预期加快了河流的流速，防洪堤岸造成的也是同样的结果。将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上修建的这些堤坝长度加总后，比河流本身还长。堤坝促使河水流得更快、更猛，结果河水冲击了沿岸堆积物，将大部分的泥沙都冲入了海湾的大陆架，冲向深海，导致泥沙无法在海岸周围停留。[\[21\]](#)

事情还不止于此。早在1974年，在尤金·特纳试图解开海水低氧谜团时，他曾坐飞机从高空俯瞰过美国的广袤沼泽。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惊。人工河道在沼泽地上纵横交错。它们有些像看不到尽头的机场跑道，有些像街区的街道，其干净利落的线条将沼泽切割成了几块，显然不是大自然的创作。它们当中的四分之三是油气企业留下的河道网，平均宽度为80英尺，主要服务于输油管、物资供应和油井工人的交通艇。就在特纳进行鸟瞰之旅的同时，生物学家们正将人工河道的生态影响链串联起来——它们将改变沼泽地区的水流，导致原本属于淡水的区域充斥着咸水，杀死了水草和牡蛎床，抑制了沼泽繁殖哺育的功能。而不出十年，这里的每一条河道横平竖直的边缘都被侵蚀殆尽，河道比原来要宽上一倍甚至更多——丘比特姐妹效应。

早在20世纪20年代，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海洋生物学家，珀西·维奥斯卡（Percy Viosca）就注意到，“运河和排水沟的切割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路易斯安那州湿地的“生存现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这个观点无人应和。然后在1948年的路易斯安那科学学会（Louisiana Academy of Sciences）的研讨会上，几位生物学家开始谈论起这个问题，那一年正赶上罗伯特·弗拉哈迪那部宣传影片首映。几年后，埃索（后来更名为埃克森）石油旗下的一家输油管道公司秘密承认水道的确造成了伤害，修复它需要耗费的功夫绝对不只是“一架推土机来回推几下，铲几把铁铲，撒点种子的事”。[\[22\]](#)

数年后，1959年，生物学家们注意到洛克菲勒野生动物保护区的20多英里水道面积激增。人们在保护区开凿水道，本意是为了让其展示石油和生态保育的和谐共生关系。就在特纳高空之旅的前一年，连工程兵团都承认了管道建设可能导致“无法挽救的沼泽地流失”。

“他们用到了这么重的字眼”，霍克在随后的法律评论文章中如此对工程兵团挖苦道。[\[23\]](#)

20世纪70年代，霍克开始觉察到海滨沼泽的“坍塌”，但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大秘密”，“完全不被”媒体和政策制定者所“关注”。作为一个律师，霍克曾起诉污水制造者，为了阻止工程兵团抽干阿查法拉亚河盆地，他打了足足17年的官司。但这些水道是个“大得多的问题”。起初，他在1983年发表的一篇法律评论文章中，将矛头对准了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文中援引多处文献数据来说明水道和沼泽地流失的关系。在他的电影中，弗拉哈迪颂扬了那些可爱的钻井工人和他们无害的活动，但影片中没有披露的是不久后另一支钻井队伍将会开挖一条管道线，直通亚历山大·拿破仑·尤利西斯·拉图尔拥抱过的井口，然后随着石油公司不断向近岸和离岸扩张，更多的输油管道将被打通，直到路易斯安那州这只沼泽广被的“靴子”被饰以上万英里的水道。[\[24\]](#)

霍克、特纳，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说受到油气开采最大影响的是近岸地区。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未怀疑过离岸石油泄漏的恐怖；1979年6月伊克斯托克（Ixtoc）1号勘探油井在墨西哥坎佩切湾上爆炸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在事故过去后的十个月时间里，每天有1~3万桶原油流入海湾。

直到2010年英国石油事故前，伊克斯托克1号都是行业史上最严重的海洋石油泄漏事故。足有一英尺厚的石油拍打着墨西哥的海滩，时间正赶上肯普氏龟在新牧场海滩上产卵，使生物学家们在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和帕德雷岛上初见成效的保育成果被侵吞殆尽。泄漏的石油在160英里有余的美国海滩蔓延，且主要集中在得克萨斯南部。某些地区的捕鱼量下降了70%之多，而且此后许多年的捕获量都在低谷徘徊。肯普氏龟的生存状态一度岌岌可危，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恢复，但好景不长，英国石油公司的泄漏事故再次让它们浸满油污。

深海地平线的灾难，无论对现在还是未来数十年，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如果有谁还对此避重就轻、含糊其词，那实在是愚蠢至极。也许很少有人尝试比较近岸和离岸事故的严重程度。但特纳和霍克提出了一个合理看法：海洋泄漏是一次性事件，它们多数只限于短期影响，且影响可控。面对这类紧急事件，人们提出了“危机情境”

（Crisis Situation）这个说法。各大媒体每时每刻都在跟进事态的发展，制作成爆炸新闻，争相报道，而公众不会容忍看到一口满目疮痍的油井。清理队伍用当年联邦应急管理局响应卡特里娜飓风的速度，火速赶往现场海滩。但真相是近岸和离岸钻井平台的事故每天都在发生，几乎已经成为常规事务，但，就像约翰·巴里说的，它们“没有意外事故所具有的戏剧性”。[\[25\]](#)

当一家石油公司想开采一个新地区时，它的对手们也会虎视眈眈，结果就是海水被染得漆黑，度假海滩变得乌烟瘴气。三不五时地，佛罗里达的立法者开始为石油行业站台，试图解除海湾州府对离岸钻井的唯一禁令，每当这些时候，市民和游说团体便会纷纷站出来抗议。2010年2月的一个周六，春寒未退，但天气晴朗；这一天，锡赛德的饭馆业主兼冲浪好手戴夫·劳施科尔布（Dave Rauschkolb）组织了上万人，他们手拉着手站在佛罗里达海湾的90多个海滩上，以此表明他们捍卫海岸线的决心。两个月后，深海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了。石油漫上了狭长地带的海滩，焦油球冲上了半岛的海岸，人们在萨尼贝尔海域的鱼的肝脏中发现了溶解的石油。

人们对外海危害的关注让石油公司集中精力解决这一问题。为了捍卫它的离岸活动，公司从1953年的《霹雳湾》中得到了灵感，想到了一个现成的办法——在影片中代表了美国精神的史蒂夫·马丁（詹姆斯·斯图尔特）曾经拿起过一只金色的大虾。近来，石油公司拿起了红鲷鱼，坚称它在海湾上的近4000个钻井平台每一个都是一座人工礁岛，这些礁岛帮助恢复了红鲷鱼的数量。到《霹雳湾》在影院上映

时，商业渔民已经不得不到坎佩切湾上去找寻海湾所剩不多的红鲷鱼了。到20世纪60年代时，即使是坎佩切湾，也已经不剩多少条鱼能咬钩了，因此渔民的长途跋涉也失去了意义。然后，到80年代时，休闲垂钓者在石油开采地附近轻松地就能钓上来红鲷等鱼类。

当时，伯尔尼·基廷（Bern Keating）受埃克森公司的委托，创作一本以墨西哥湾为主题的书，书出版后广受欢迎。伯尔尼·基廷在书中引用了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一位海洋生物学家的话，说每当石油公司沉下一座钻井平台，就为“过去空洞的那片海洋创造了一片哺育海洋生命的沃土”。也就是说，这片有着全世界最密集的钻井平台的海湾，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礁岛集聚区。为了扩大这种生态复合性，亚拉巴马州在其海域中投下了废旧的小轿车、巴士、船舶、军用坦克、轨道车和建筑砖碴，形成了两万个所谓人工礁岛，使之成为全新的海钓红鲷鱼的热门地点。[\[26\]](#)

一些地区的红鲷鱼数量似乎回到了19世纪的水平，其中60%都集中在海湾西北部的钻井平台水域。工业辩护者说，多亏有了钻井台，红鲷鱼成了路易斯安那海上的新鲜事物。但这不是事实。在20世纪早期，商业渔民从这里捕获了大量的红鲷鱼。但依然有许多人，包括环境保护基金会和五个海湾州在内，反对内政部强制拆除停止不用的钻井平台的命令，因为强制拆除通常意味着要炸毁——也就是说，要炸掉鱼群、珊瑚、人工礁岛的一切。

红鲷鱼的故事让能源企业的存在不再难以容忍。但《墨西哥湾上的阴影》（*Shadows on the Gulf*）一书的作者，罗恩·雅各布森，看待钻探设备，即所谓人工礁岛的问题时，则比常人更敏锐。他指出“实际上，海湾上红鲷鱼的育种数量自二战起就骤降了97%”，而其中大多是由捕虾船的拖网误捕，以及在钻井平台周围追求“轻松垂钓”的垂钓者导致的。纵使平台周围真的有大量鱼群，这些“生产性水

域”中也很有可能含有大量的汞——为了开采出油气，汞会被注入储油或储气层；汞同样存在于钻井泥浆中，但尽管环保局严令将泥浆留在钻井现场，这种现象依然屡禁不止。检测发现钻井设备附近的鱼虾体内的汞含量是外围水域鱼虾的25倍，结果也就导致经常食用平台捕捞海鲜的人群体内的汞含量也达到了高危水平。[\[27\]](#)

每一个钻井平台的存在，都将环境永远置于石油泄漏的风险中，而一旦发生泄漏，有毒的分散剂又将被投入海湾，因此虽然它们在无意中的确让鱼类数量迎来了增长，却得不偿失。土地流失，并不像石油泄漏事故能引起公愤；也不会有紧急救援队在农业污水径流处架设围油栏来防止死水区的扩大。就在英国石油钻井平台事故发生的前一年、当年，以及此后的每一年，密西西比河都有超过1200万磅的危险化学物质流入，而且它们绝大多数都属于合法排放。其中将近300万磅来自埃克森美孚在巴吞鲁日的炼油厂，它一直是国内十大污染源之一。[\[28\]](#)

密西西比也从不缺少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29\]](#)在它们存在期间，政府没有出台限制政策，路易斯安那州唯一的防线就是它负责吸收养分的湿地，湿地起到了阻碍农业污水进入死水区的作用。

土地流失同样在侵蚀海岸的文化历史。为此，迈克·蒂德韦尔（Mike Tidwell）写下了动人的《再见河湾》（*Bayou Farewell*），以此向一群人和一处地方道别。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关于语言、记忆和民族传统消失的故事。土地是世代传承得以延续的载体，而人们正在失去它们——一棵被淹没的大树，一根电话线杆，一条马路，一所房子，接踵消失。等文化消失殆尽时，纪念它的历史地标、纪念碑也就无处容身了。如蒂德韦尔所言，湿地的减少让其缓冲作用降低，卡特里娜过后的骚乱让新奥尔良损失惨重。与此同时，沼泽一带的居民身心交瘁，回到消失的地方，从此不再出现。卡特里娜过后数周，

飓风丽塔袭来，其导致的灾情甚至比前者更严重。这一切，就是约瑟夫·布德罗在飓风丽塔过后，坐下与电影专业学生聊天时想要吐露的真相——《路易斯安那的故事》的拍摄过去数十年后，“侵蚀便发生了”。[\[30\]](#)

但生活照常继续。人们依然在摩根城庆祝路易斯安那虾和石油节。随时随地，任何分量的秋葵汤饭和什锦饭都可以得到供应，蒂德韦尔怀着矛盾的心情享用他的那份食物。土地状况每天都在恶化，如同乌云盖顶，但看在眼里、身在其中的人们仍全然没有意识到这团阴云的威胁。

一个原因是渔民们普遍对政府不信任，因此政府的每个举动都只带来争议的升级，包括修建堤坝、调查沼泽、建造桥梁，让民众将房屋地基抬高，或将旅居拖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而不是那个地方钓鱼，以及在渔网中加上那些讨人厌的海龟排除装置。对抗土地流失，就意味着让政府更多地插手他们的生活。

另一个原因来自生活压力。如果你是一个渔民，你的每一天与守着沼泽捕鱼的鹭并无太大区别——都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他们要应付生活开销，要一边支付货车和渔船的费用，一边祈祷它们不要出岔子，还要专心将油箱加满，计算话费花销，他们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未来。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海里的虾依然活蹦乱跳，没有减少。石油泄漏前几年——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科学家们不断为海岸侵蚀问题奔走呼号的那些年中——虾、牡蛎和蓝蟹的捕获量一直在节节攀升。捕获量在2010年曾经一落千丈，但它很快又恢复了，到2013年时又回到了泄漏前的水平。路易斯安那州的拖网捕虾仍然是美国之最。

也许科学家们只是在谎报军情。也许海岸侵蚀的后果不过是要搬到地势更高的地方去，或者驾车开过一座桥而不是一条马路。也许像摩根城的节日那样把石油和虾放在一起，也不是一件那么不可理喻或作弊的事。

但是激增的捕获量并没有让科学家们感到意外。特纳在70年代时就说过，海洋产量与湿地海岸线长度相关：界线越长，产量越高。由于人工河道的开掘和海岸侵蚀问题，路易斯安那的海岸被分割，从而暂时性地延长了其海岸线，并提高了产量。随着海岸不断受到侵蚀，最终，开阔水域和湿地的交汇面积开始缩小，产量也将应声下跌。

[\[31\]](#)

1987年，环保局发布了《拯救路易斯安那海滨湿地：长期行动计划不容忽视》。一年后，一个由教会团体、科学家、环保人士和渔民组成的草根组织成立了“重建路易斯安那海岸联盟”（严格来说，它的成立时间还要早个三年），并发布了它自己的报告，其标题发人深省、拷问人心：《路易斯安那之滨：未来何去何从？》。它呼吁修复50万平方英里的卡津海岸。

州府和国会开始缓步推进立法，蒂德韦尔如此写道。地方开始修复工程，将河水和沉积物重新引向路易斯安那的海岸，且初见成效，包括布雷顿海峡这个在一个世纪前被牡蛎渔民发现事情不妙地方。这对尚德卢尔群岛的鸟来说是潜在的好消息。但整个海岸的损失太大，个别修复工程带来的好转不过是杯水车薪。显然，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大刀阔斧、花费高昂的工程——专家预测所需资金为140亿美元。

这笔资金后来也就没了下文。同时，海平面上升的问题日益严峻，让这个问题雪上加霜。而早在1987年环保局就曾预言：“温室效应将导致海平面在未来50年上升一英尺甚至更多，如果这个预测准确，那么行动刻不容缓，形势比我们此前预想的要紧迫得多。”从

2011年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开始以令人震惊的速度不断将消失的沿海地区划去；它们被海浪和历史所吞噬，而它们中不少在一开始正是由美国海岸勘测局放在地图上的。[\[32\]](#)

约翰·巴里，这位公民、作者以及近来的政策制定者，和伊兹相反，他不蓄胡须，一头卷发；他在两年后带头起诉了97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一个贡献了路易斯安那州36%的生产总值，同时导致其36%的土地流失的行业。讼状要求这些公司承担它们应承担的海滨湿地修复成本，对路易斯安那的未来负责。

[\[1\]](#) 2012年的一部美国奇幻剧情片，讲述六岁小女孩“小玉米饼”和她重病的父亲在密西西比河上顽强乐观生活的故事。又译《南方的野兽》。——译注

[\[2\]](#) *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 directed by Benh Zeitlin (Cinereacah, Journeyman Pictures, 2012), DVD.

[\[3\]](#) Sidney Lanier, *Poems of Sidney Lanier*, ed. Mary Day Lanier (Brown Thrasher Books, 1999), 16.

[\[4\]](#) 位于非洲东部、赤道以南的大草原，现在是国家公园，由于拥有极大规模的动物群落而闻名遐迩。——译注

[\[5\]](#) Roy Bedichek, *Karankaway Country* (Doubleday, 1950), 23.

[\[6\]](#) Lanier, *Poems of Sidney Lanier*, 18.

[\[7\]](#) Lanier, *Poems of Sidney Lanier*, 16.

[\[8\]](#) Lanier, *Poems of Sidney Lanier*, 18.

[\[9\]](#) R. E. Turner, “Intertidal Vegetation and Commercial Yield of Penaeid Shrimp,”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 106 (1977): 411-16.

[\[10\]](#) Lanier, *Poems of Sidney Lanier*, 33.

[11] Oliver A.Houck, “Ending the War: A Strategy to Save America’ s Coastal Zone, ” *Maryland Law Review* 47 (1988) : 358, 360.

[12] 苏斯博士 (Dr. Seuss) 是20世纪美国卓越的儿童文学家, 创作了许多家喻户晓的儿童绘本。

[13] Oliver A.Houck, “Ending the War: A Strategy to Save America’ s Coastal Zone, ” *Maryland Law Review* 47 (1988) , 362.

[14] Oliver A.Houck, “Ending the War: A Strategy to Save America’ s Coastal Zone, ” *Maryland Law Review* 47 (1988) , 360.

[15] Oliver A.Houck, “Ending the War: A Strategy to Save America’ s Coastal Zone, ” *Maryland Law Review* 47 (1988) , 358.

[16] Oliver A.Houck, “Ending the War: A Strategy to Save America’ s Coastal Zone, ” *Maryland Law Review* 47 (1988) , 360.

[17] These figures come from Michael J.Mac, Paul A.Opler, Catherine E.Puckett Haecker, et al., *Status and Trend of the Nation’ s Biological Resources*, vol. 1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US Geological Survey, 1998) .

[18] John M.Barry, *Rising Tide: The Great Mississippi Flood of 1927 and How It Changed America*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 22.

[19] Martha Field, *Louisiana Voyages: The Travel Writings of Catharine Cole*, ed. Joan B.McLaughlin and Jack MacLaughli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6) , 4.

[20] E.L.Corthell, *A History of the Jetties at the Mouth of the Mississippi River* (John Wiley & Sons, 1881) , vii; E.L.Corthell, “The Delta of the Mississippi River, ” *National Geographic* 8 (1897) : 354.

[21] Sherwood M.Gagliano, Hyuck J.Kwon, and Johannes L.van Beek, “Deterio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oastal Wetlands, ” *Coastal Engineering Proceedings* 12 (1970) : 1767–81.

[22] Jason P. Theriot, *American Energy, Imperiled Coast: Oil and Gas Development in Louisiana's Wetland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82;

[23] Oliver A. Houck, "The Reckoning: Oil and Gas Development in the Louisiana Coastal Zone, " *Tulane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28 (2015) : 198, 209.

[24] Oliver Houck,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December 1, 2015; Oliver A. Houck, "Land Loss in Coastal Louisiana: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medies, " *Tulane Law Review* 58 (1983) : 45-48, 169-70.

[25] John Barry,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December 8, 2015.

[26] Bern Keating, *The Gulf of Mexico* (Viking Press, 1972) , 62.

[27] Rowan Jacobsen, *Shadows on the Gulf: A Journey through Our Last Great Wetland* (Bloomsbury, 2011) , 137.

[28] 18 discharges at ExxonMobil Baton Rouge, see the EPA's TRI Explorer, 2014 Dataset and earlier years, <https://www.epa.gov/triexplorer>; see also Jennifer Larino, "Louisiana Waterways among the Most Polluted in Nation, Report Says, "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June 19, 2014.

[29] 其他地方也一样。2015年夏天的大暴雨期间, 圣彼得斯堡1500万加仑未经处理的污水倾泻入博卡谢加湾, 公众健康面临受大肠杆菌污染的威胁。

[30] Mike Tidwell, *Bayou Farewell: The Rich Life and Tragic Death of Louisiana's Cajun Coast* (Vintage, 2004) ; *Revisiting Flaherty's Louisiana Story*, produced by Patricia A. Suchy, James V. Catano, and Adelaide Russo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2006) , DVD.

[31] J. A. Browder, L. N. May, A. Rosenthal, et al., "Modeling Future Trends in Wetland Loss and Brown Shrimp Production in Louisiana Using Thematic Mapper Imagery, " *Remote Sensing of the*

Environment 28 (1989) : 45-59; Rex H. Caffey and Mark Schexnayder, "Floods, Fisheries, and River Diversions in Coastal Louisiana, " *in Coastal Water Resource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 May 13-15, 2002, New Orleans, LA.*

[32] Louisiana Wetland Protection Panel, *Saving Louisiana's Coastal Wetlands: The Need for a Long-Term Plan of Action*,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report (1987) , ii.

后记 黑暗中的光明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只能想象；而不断上升的海洋完全可能书写一段别样的历史。

——蕾切尔·卡森（1955）[\[1\]](#)

在路易斯安那的威尼斯（Venice）有一条街，叫哈里伯顿路（Halliburton Road）。你可以在导航仪中输入“哈-里-伯-顿”，然后选择一条路线去到那里。威尼斯，这个2010年人口为202人的小镇，位于密西西比三角洲的最北端入海口以南一小段距离上。2005年的飓风卡特里娜几乎要将这个小镇夷为平地，五年后深海地平线之灾又将石油和化学分散剂送到了它位于霍斯皮特尔湾（Hospital Bay）的海岸上，流过所剩无几的湿地屏障，从工业水道上冲刷而过。负责英国石油公司“深海”油井封堵工作的承包商是哈里伯顿公司；调查发现正是哈里伯顿在此过程中使用的劣质水泥，酿成了这场爆炸惨祸。

如果从新奥尔良驾车出发去哈里伯顿路，首先要经由休伊朗桥（Huey P. Long Bridge）跨过密西西比河，然后沿路易斯安那州23号公路继续行驶；不出几英里，便开始顺着沿途的河流曲折蜿蜒起来，如此行进70英里后就到了威尼斯。如果一直待在柏油路上，你是不会看到这片土地上超凡迷人的自然风光的，尽管它距离你也就几步之遥。它被藏在一座工程建筑后面，那就是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密西西比河堤。在公路左侧绵延不断的，便是这道设计精良的水泥河堤，有些地方生了杂草，其余均是光秃裸露。它是这一带唯一被抬高的建筑，横亘在土地和湿地之间，显得异常突兀。河堤既是一道上覆层，又是一笔下划线，它重笔刻画着民族精神，让它底下的这条河流以及河流即将汇入的大海都带有浓重的美国色彩。

在离威尼斯还有九英里的地方，拐过一道急弯后，就是杰克逊堡。杰克逊堡的砖墙已历经时日，但仍坚实如初，它在堤坝的簇拥下倒显得低矮了。你此时停好车，爬上河堤，密西西比河尽收眼底，河水呈混浊的暗绿色，奔腾、壮观。它河流激荡，暗涌深藏，但尽管如此，驶往新奥尔良的货船在上面络绎不绝，丝毫不受影响；这不禁让人想起，150年前，海岸勘测局的约瑟夫·史密斯·哈里斯为联邦军的攻击舰导航时，在这里遭遇了邦联军设置的拦截路障，对方也没有得逞。

舰队由18艘船组成，一支舰队的负载量用今天的一艘货轮就足以装满好几次了。每艘货轮都有好几千个长方体钢制集装箱，把货轮从船梁到驾驶台都塞得满满当当，每个集装箱有半挂式货车般大小——这些“丰饶之角^[2]”在运抵目的地后，将倾泻出消费主义文化的累累硕果。货轮来自海外，载着维系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货物：从衣服、玩具、家具、厨房用具、园艺工具，到台式和手持的电子产品（包括你的导航仪），甚至是绿色环保的不锈钢水瓶，林林总总，几乎囊括了零售商场里会出现的所有在架商品。

如果按出入吨位数计量的话，2013年全美国前25大深水港中有13个都位于墨西哥湾。它们输出石油、化学品、硫黄、盐、磷酸盐、海鲜、牛、谷物和林产品，输入的则主要是商品货物——用自然换取人工制品。很难想象所有这些进口商品都源自哪里，如此经过了3.22亿美国人的双手后，它们又将到何处去，而又有多少经过层层包装，最终进了垃圾堆填区，或者悬浮于海洋垃圾带。海洋垃圾带满世界飘荡，所有垃圾带加起来的面积已有得克萨斯州大小，其中90%是塑料制品。我们该如何清理这样的庞然大物？西尔维亚·厄尔（Sylvia Earle）在她的“蓝色使命”运动中着重谈到了这些垃圾补丁，她说我们必须根除它们，才能拯救海洋和我们自己。

杰克逊堡壁垒的那一侧是河堤，货柜船诡异地从它头顶上方经过，相形之下，壁垒是如此渺小，它的过去变得微不足道、被人遗忘，就像公路边某个沿途休息站上的某个不知名历史地标。作为曾经奴工的庇护者，历经沧桑的杰克逊堡与23号公路沿途的许多现代直升机停机坪已经大相径庭。四处延伸的停机坪是一片纹丝不动的交通工具的海洋，停在那里的几乎都是皮卡，而令人费解的一点是它们大多数都是白色的。这些皮卡是在油气钻井平台工作的工人們的，他们在这里换乘直升机去往近海，然后在那里连续工作上14天。钻井工人的薪资待遇优越，但他们并没有少中圈套，圈套一方面来自雇佣者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恰恰来自那些在密西西比河上川流不息的货轮所承载的——他们梦寐以求的高水准的物质生活。

路易斯安那被称为“石油殖民”州，这一点让人无可辩驳。州立法机构几乎永远站在石油行业那一边，法院也少有不向着它们的时候。到头来，石油巨头还要说它为路易斯安那州的人民和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它“在过去20年间从路易斯安那州攫取了价值4700亿美元的自然资源”。[\[3\]](#)

它的目的并不是提供就业机会。它是为了盈利，为了向股东分红，为了给公司高层支付奖金。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雇员数量，并没有随着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的大幅攀升而相应上涨。它和其他任何行业一样，当面对成本效益时，会毫不犹豫地用机器替代工人。另外，随着深海地平线事故的发生，以及水力压裂技术的大大繁荣，陆上资源的获取变得更经济，油气行业就开始减少昂贵的近海钻探活动了。就在2015年末到2016年初石油价格暴跌（数月时间里下跌了60%），美国重回全球能源供应大国地位之时，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的就业率均落后于国内其他各州。石油产业的相关税收水平急剧恶化，金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报告中称它将考虑降低路易斯安那州的信用评级，因为其油井工人的就业率在过去12个月中下跌超过20%（约为一万个就业岗位）。

沿23号公路深入，眼前的威尼斯不像小镇，更像一个工业园区，一个经历了石油价格暴跌也岿然不动的园区。导航会将你带向一条平坦、没有树木的道路，道路一侧是运河，另一侧是一排电线杆和低垂在它们之间的电线。接下来，你会看到被围起的大型钢制储油罐、建筑和垃圾装卸卡车，还有停在几乎空荡荡的沙砾停车场上的办公室移动拖车，以及无数在空转的起重机，它们正指向路易斯安那广阔的天空。

此时你的右侧，紧挨着目的地哈里伯顿路旁，会出现一座黑色的泥土山。环保局对钻井过程中所产生泥沙的处置方式是有规定的，但是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驳船将受汞和其他有毒物质污染的泥土通过运河运到陆地，然后便将它们堆积在一边；除了没有熟悉的海鸥在上方盘旋欢呼，整个过程都和市政当局将居民垃圾倾倒在垃圾填埋场无异。土著的贝壳冢堆被抹平成为路基，而这些泥山成为海湾在新时代的冢堆，在贝壳路基上堆得老高——它们都在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证明海湾的丰饶，并双双服务于汽车文化。沿阴森泥山的反方向开去，

是一个垂钓度假村，那里有一座汽车旅馆，一家餐厅，还有一个码头，上面停着各种价格不菲的游艇。顺着码头往远方地平线眺望而去，一片开阔的湿地像一幅风景画般在你眼前徐徐展开。它如鬼斧神工，展示着沿海路易斯安那的壮阔之美——除了偶尔探出头来的输气管道。不知不觉间，路易斯安那已经在自然与石油殖民的强烈冲突中找到了它的安身之道。曾经是渔港的威尼斯也不例外。

让人讶异的是，在经历了所有这些经济和生态变化后，威尼斯依然是美国产值最高的十大商业渔港之一。在21世纪的墨西哥湾沿岸，有此成就的也只剩威尼斯了。2000年，前十大渔港中有一半在墨西哥湾。人们说它们还未从英国石油的泄漏事故中恢复过来，但其实它们在泄漏事故前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事故发生后，虾蟹牡蛎的捕获量便一直无法完全恢复，如果海岸线继续消失下去的话，这种情况将永远持续。正如奥利弗·霍克教授指出的，也许石油已经蔓延到了内陆100码，但土地侵蚀范围是以英里计的。最坏的情况就是海湾从此不再属于渔民，而属于油气业。

虽然说的是海洋，但近岸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丰富的能源已经让这里遍地油污。在路易斯安那州23号以及其他沿海公路的边上，路易斯安那的盈利巨头们丢弃的废物随处可见：废旧机器和管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闲置驳船的停靠处已经杂草丛生，杂乱破败、锈迹斑斑。最令人不安的还是土地流失留下的痕迹。霍克多年前就说到这样一个令人感到悲伤和讽刺的现状，且此后多次重复：如果得克萨斯州每年从路易斯安那州抢去50平方英里土地的话，州长早就要召集国民警卫队了。但面对壳牌、雪佛龙、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时，他们却无动于衷。

海岸边的房子和拖车式房子全都高高建在马路边上，而这些马路不是已经被冲走，就是正在被冲走，只剩电话线杆和凋零的树木屹立

在水中。你也许不介意和生锈的输油管当邻居，但你无法住在不断被冲走的土地上。以格兰德岛为终点的路易斯安那州1号公路，其中有一段19英里的收费桥梁，它于2009年投入使用，就建在已经没入水中的旧公路上方。从谷歌地球上，交错纵横的水道以这座桥为中心发散开去，将陆地分割成条条块块。多数水道已经断裂成不成形的长条状，就像身体中的血管，一团乱麻，注定命不久矣。

看到这里，约翰·巴里发起诉讼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原告是东南路易斯安那州东岸防洪管理局（The Southeast Louisiana Flood Protection Authority-East）。约翰·巴里完成了《潮起》，随后又目睹了新奥尔良地区的堤坝在卡特里娜飓风的侵袭下是多么不堪一击，他约见了防洪管理局的管理委员会。最终，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致认为海滨湿地是抵御风暴的第一道缓冲区，因此，为了保护新奥尔良，修复海滨湿地和修建堤坝同样重要。

联邦法律要求企业修复因其行为导致的环境损伤，当停止使用土地时，应该及时填埋处理。但水道使用者总是推卸责任，而联邦和州政府也极少会采取强制性措施。州政府为海岸修复设计了总体规划方案，只是缺少实施方案所需投入的300亿美元（最开始预计的140亿美元已经涨价，截至2016年，这个金额已经高达700亿美元）。能源行业对海岸总体规划方案表示支持，甚至身体力行，减少了会导致水土流失的活动，填埋旧水道，但对于分担修复费用一事则毫无表示。它坚称堤坝系统和水流加速才是湿地流失的主要原因。

在校时曾担任橄榄队球员和教练的巴里，后来又担起了诉讼的重任，为它奔走代言，并得到了政府委员会的一致支持。他们认为英国石油的赔偿金应用于覆盖部分修复费用，诉状上的90多家石油、天然气和油气管道公司应合计支付它们应承担的180亿美元。巴里在2013年

7月24日就诉讼一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得到了来自州报刊和三位前任州长的多方声援，但其中不包括现任州长。

州长博比·金达尔（Bobby Jindal）指责这项上诉“轻率”，说防洪管理局做的事已经超出了其职责范围。能源行业则认为控告“考虑欠妥，不明智，会引发分歧”，他们出动了70个说客试图阻止立案，结果也一如众人所料，他们得逞了。就这样，在海岸持续消失的情况下，立法机构经投票撤销了诉讼。随后，防洪管理局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动议，申请对州法院行为的合法性做出裁决。2015年2月，法官娜涅特·乔利夫特·布朗（Nannette Jolivet Brown）驳回起诉，理由是防洪管理局对被告的控告不是“可行的诉讼请求”。巴里和海滨地区居民认为，能源企业在州政府的允许下盲目追求利润，而这项裁决让纳税人成为这些行为的买单者。[\[4\]](#)

巴里在防洪管理局的任期届满后，金达尔拒绝对他再次任命。虽然巴里不认为自己是活动家，但作为作者的他随即创办了一个非营利组织“路易斯安那修复行动”（Restore Louisiana Now）来帮助诉讼活动得以继续。防洪管理局继续上诉到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截至此书写作时，他们仍在等待法院做出决定。律师们告诉巴里，布朗法官的决定充满漏洞，霍克则说上诉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但是他们都不得不承认第五巡回法院从未做出过不利于油气企业的裁决。[\[5\]](#)

2014年3月末，一艘有两个橄榄球场长的货轮在行经加尔维斯顿湾时，从侧边撞上了一只由机动船只拖行的油驳船。4000桶燃油泄漏到海中，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危险品处理队进入了损伤控制模式。风浪将有害物质推入了墨西哥湾——至少对加尔维斯顿湾来说是幸运的，有人这么说。但事情没有发生本质改变，沿岸洋流又将石油和焦油球沿着海岸送到了各个海滩和湿地上，沿途恰好是大得克萨斯海岸观鸟径；因此丧命的有300多只鸟，39只海豚，以及17只海龟——这也算是

幸运的，因为春季迁徙还要几个星期后才开始，野生动物避免了更惨痛的伤亡。得克萨斯州报纸称这是加尔维斯顿湾百年一遇的大灾，但事实并非如此。自1985年起，加尔维斯顿湾平均每年发生285起燃油泄漏事故。没人知道1918年的泄漏事故数字是多少，加尔维斯顿湾和墨西哥湾的第一滴泄漏燃油就是“甜心16号”在那一年贡献的。[\[6\]](#)

深海地平线事故后，人们一直关心海湾是否受到了更好的保护。自那年起，石油产量开始上扬，部分原因是深水钻井正处于快速扩张阶段，它有更高的产出量，会到达比“深海地平线”更深的深度。而在深海钻井比在浅水更容易触发意外发生；为了抵御这种风险，行业发展出了一种水下机器人技术，它声称可以在45秒之内封住一口泄漏油井。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技术尚未经过深海测试，他们担心石油公司再次因为追求利润而忘乎所以。

它们并没有为了达到目的而不顾一切。石油公司和国会成员抱怨奥巴马政府开放新石油开采租约的动作太慢，而对于将在2016年定案的职业环境安全和油井防护等联邦新规，他们也提出抗议，认为落实的成本太过高昂。

而更为隐秘的近岸开采活动，就没有新规约束了，但实际上它们对河口湾区的伤害要比深海开采大得多。所以它们毁灭性的操作模式从未得到改变，老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此时，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在阿巴拉契科拉湾的水量多寡问题上的纷争还没有定论，人们预测不久后，采摘阿巴拉契科拉湾的牡蛎将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但水华问题并没有消失。2013年，佛罗里达发生了有害水华导致海牛死亡的事件。次年，在一项全民公投提案中，有75%的佛罗里达选民投了支持票；这项提案也叫《一号修正案》，修正案将不动产税收收入重新纳入购地信托基金的资金来源，而相应的资金将被州政府专门用于购买自然保护区土地——被议

会和州长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掏空的土地。在萨尼贝尔-凯普蒂瓦环保基金的大力推动下，佛罗里达州政府将大沼泽地（the Everglades）中的私有土地买了过来，并划立为保护区；这将大大减少营养物流入克卢萨哈奇河，从而有效抑制水华的产生。

信托基金所获取的第一轮资金并没有被用于购买保护区土地（但它划拨了部分资金用于不相关的民权法案损害赔偿金）。多个环保组织联合对州议会提起诉讼，就在案件等待开庭审判时，陆军工程兵团在2016年2月将创纪录的农业污水排入了克卢萨哈奇河。在网上流传的视频中，咖啡一样的漆黑排放物在河口上散播，杀死了牡蛎和鱼以及遇上它的一切生物。画面触目惊心，让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埃斯坎比亚湾上鱼群大规模死亡的场面，人人都以为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再次出现了。污水随后进入海湾，沿着海岸传播，此时正是旅游旺季，这个旺季于是被称为“来自地狱的旺季”，客人们收到酒店预警说海滩上有“红潮”。许多游客远从欧洲而来，就为了在墨西哥湾边享受阳光和欢乐，结果却被建议远离海水，如果要在海滩上散步也要带上面罩。

三年前，海岸上的一条河流——不属于墨西哥湾——也在等待救援。科氏兄弟（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掌握的科氏工业集团在2013年收购巴克艾技术（Buckeye Technologies）后，佛罗里达州为他们颁发预批许可证，他们可以建造很早前申请的15英里管道，管道将连接芬霍洛韦河的末端，并被允许每天向河中排放5800万加仑的工业废水（截至本书出版，管道尚未完工）。

此前巴克艾被要求应首先对污水处理程序进行改进，但就当地的活动家乔伊·埃泽尔所知，巴克艾易主后，这项要求并没有被提上日程。她知道科氏工业集团是国内出名的污染重灾区。根据《滚石》杂志的报道，埃泽尔的这颗眼中钉往“美国河流排放的污染物比通用电

气和国际纸业加起来的都多”。佛罗里达清洁水网络的负责人，琳达·杨，说佛州的水质检测标准——也就是巴克艾适用的检测标准——是低于标准的，而在“利益私有化和污染公众化”方面，没有谁比科氏兄弟更“精通这门艺术”了。[\[7\]](#)

2016年，在彭萨科拉，琳达·杨和欧鳊垂钓协会终究还是没能让埃斯坎比亚湾重见水草。多年前，当地50名居民曾联名上诉，将孟山都及其继任者，法玛西亚公司（Pharmacia Corporation）和首诺公司（Solutia Inc.），都告上了法庭，要求它们清理湖湾中残余的PCB；2016年这项诉讼已经有了判决结果。最终结果是被告向原告支付一笔未公开披露金额的赔偿金，但不包括清理残余PCB。“对我来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厄尼·里弗斯说道。他今年已经90岁了，他为这场长达50年的抗争竟落得如此结果感到悲哀。“我只是想让我的湖湾干净起来。”[\[8\]](#)

在帕蒂诺湾，自1940年以来草甸数量减少了90%，目前它们维持得很稳定。杰姬·莱恩仍在继续检测水质，但废水和工业排放仍然在持续输送过量的营养物和大肠菌，于是故事再次重演。

环保局每年发布关于工业排放量的评测报告《有害物质排放目录》（下称《目录》），在最新的2014年评测中，埃斯坎比亚郡榜上有名，位列第十二。奥升德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Ascend Performance Materials，前身为“孟山都”）就在埃斯坎比亚河上，是最严重的污染排放企业，其污染物主要通过大气排放；琳达·杨在21世纪初对其提起诉讼，才迫使它将污染物从河流排放改为深井灌注。国际纸业则将污水排入帕蒂诺河，论污染严重程度，它仅次于奥升德，位居第二。

戴安娜·威尔逊所在的卡尔霍恩郡，1988年时在《目录》中位居榜首，如今已经下降到第35位了。对比1988年，全郡在2014年的总排

放量减少了86%，但工业产值没有下降。美国铝业堪称环保之星，其有毒污染物的排放比例一直维持在平稳水平。台塑公司，则恰恰相反，其产能提高了一倍，排放量却是此前的十倍有余，且全部进入了大气。拉瓦卡湾（Lavaca Bay）的污水量有轻微的下降。2016年，台塑申请提高其铜和氯仿的日排放量上限，提高排放水温，这再次惹怒了戴安娜·威尔逊。这一次她得到了来自商业牡蛎渔民联盟（Union of Commercial Oystermen）的支持，台塑只好撤回申请，维持现在的排污量和水温水平。

密西西比州的哈里森郡在《目录》中排第13位。制造祸端的主要是杜邦公司一间排放二氧化钛的制造工厂。但什么都比不上未经妥善处理的城市污水，密西西比湾因此正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2015年，海峡的沿岸各郡共发布了36次“下水”警告，关闭海滩一次，持续时间超过一周。

海湾沿岸各郡中有五个在《目录》中上排名前三十。你也可以算上路易斯安那州紧挨着密西西比河的两个堂区。五个毗邻海湾的郡中，有三个在得克萨斯州，其中两个，哈里森和布拉佐里亚，都名列前十。有20个石油化工厂污染着布拉佐里亚郡的大气和河流，而哈里森郡的污染大户中，有19个都属于能源行业。休斯敦航道每天有将近350艘船和驳船在上面来往通行，它已经成为得克萨斯州的洛杉矶高速公路，加尔维斯顿湾就是它的四方向枢纽立交。2015年3月，一艘散货轮和一艘化学液体船在航道上相撞，导致可燃汽油添加物泄漏进入航道，事故发生后海岸警卫队将航道临时关闭。

除此之外，远方的化肥残留物也在不断进入海湾。2016年的冬末春初，中西部的雨雪来得比往年都更充足，导致当年墨西哥湾的死水区面积超过了平均值，为将近6500平方英里——这个数字和上一个夏天相同，相当于罗得岛州和康涅狄格州的面积总和。环保局在2008年

设定目标，要将死水区面积缩小到1900平方英里，但此后各年，死水区的平均面积都是这个目标数字的将近三倍。在尤金·特纳看来，政府部门本应做好整肃清理的监管工作，但它们“前进”无力，甚至有“倒退”的迹象。[\[9\]](#)

面对这些问题，再加上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特纳说：“海岸前景堪忧。”预测模型显示，到下个世纪，平均气温将上升7度。得克萨斯州的一位科学家建议可以想象一下科珀斯克里斯蒂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向西南内陆移动100英里的样子。[\[10\]](#)

到2016年，受气温上升影响，野生动物的繁衍足迹已经向其他方向行进了。渔民在加尔维斯顿附近水域捕到了灰笛鲷，而在从前，他们要南下到马德雷湖才能见到灰笛鲷的影子。得克萨斯州海岸北部的观鸟人在那里跟踪到了70多种鸟类，包括大蝇霸鹟、黑头拟鹂和热带必胜鸟，它们以前从未到过格兰德河谷北边。福来尖蛱蝶

（Guatemalan leafwing）、蓝眼水手（blue-eyed sailor）和其他很多热带蝴蝶，都越过墨西哥边境，落在了得克萨斯州的蜜源植物上。热带蜻蜓中有五种移居到了佛罗里达；而此前已经入侵到佛罗里达的古巴树蛙也开始向佐治亚州挺进了。

在得克萨斯州，科学家们观察到黑红树和红红树正跟随耐寒植物向北移动。二三十年前，黑红树在阿兰萨斯湾的占地面积约有65英亩；到2015年，它们已经占据了15000英亩。红红树不耐寒，虽然被当地人称为“行走之树”，但它的生长范围其实一直局限在南佛罗里达和墨西哥，但现在它们开始沿着得克萨斯州海岸一直向北进军，最北已经到了马塔戈达湾。

正常来说，像红树林这样的河口物种的到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气候变暖同时也导致北极冰层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温度上升时，海水会膨胀。水温上升也意味着飓风的产生。科学家们预计未来

风暴的数量会减少，但强度会更大。海平面上升让一切都变得比从前更复杂，比如海岸修复和海滨的公寓生活。2015年，杜兰大学的地理学家们发现，墨西哥湾海水在上个世纪的上升速度比现代工业革命前1000年要快上五倍。

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们报告称，未来一个世纪，海水将比现在高出7英尺，到时美国宇航局也难以幸免：海浪将会击打在休斯敦航天中心的混凝土外墙上。这也意味着休斯敦航道将化身为一片湖湾。加尔维斯顿人也无须像1900年那样，在飓风后大费周折地将城市抬高，因为这一次，他们的整座岛屿城市都将彻底淹没在水里。所有沿海岸建厂的企业——那些将成吨成吨的导致气候变暖的二氧化碳排入大气，将吸收二氧化碳的海草杀死的企业——也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墨西哥湾沿岸，咸水入侵已经毁掉了淡水沼泽和海滨森林。从前的很多潮汐滩已经变成了开阔水域。这些变化给了人们修筑海堤的借口，它们还有更委婉的说法，即“海滨防御”和“工事保护”。但不要忘了，海堤会导致海岸被侵蚀。海堤毁掉了珍贵的海洋和海岸植被，导致海浪卷入地底、渗入多孔石灰岩，这些多孔岩层蕴含淡水，组成了横跨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州部分地区的佛罗里达含水层。许多人认为高大的土堤——比如新奥尔良和荷兰——是抗击大海的好手，但其实当建在石灰岩层上时，它们形同虚设，因为海水可以通过堤坝底部渗入岩层。

几十年来，咸水便一直以这种方式污染着城市地下水，迫使当地供水部门到更远的内陆地区汲取淡水资源并通过管道运输进来。海堤对降雨系统的工作也毫无帮助；当暴雨来临时，沿海城市的排水系统往往更常遭遇雨水倒灌。雨水从天空落到地面，通过下水道后，又重新被海水倒逼上来。2015年8月对美国风暴潮的一项调查统计显示，前十大易危城市中，有五个位于墨西哥湾沿岸。其中，坦帕-圣彼得斯堡

都市圈居首，新奥尔良第二，迈尔斯堡第五，加尔维斯顿-休斯敦第六，萨拉索塔第七。[\[11\]](#)

应对海平面上升的首要原则是要明白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红树林、湿地和海草床的繁荣生息不仅能为鸟类鱼群提供栖息地，也可以帮助抵挡上升的海水、吸收碳排放。2016年1月，中国一位与墨西哥湾素昧平生的亿万富豪，承诺投入500万美元帮助修复马可岛附近的红树林生态。个人也可以做出改变，家庭可以减少草坪上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可以用本地植株代替草地，而且还要明白问题的根源并不只出在沿海草坪上。离海湾数英里之遥的社区，其污水也会通过排水系统进入大海或汇入最终流向大海的河流。此外，个人还可以通过投票选出更聪明的决策者。

但在海湾各州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趋势。在博比·金达尔2016年2月结束他的第二个任期之前，路易斯安那州的五个州长对气候变化议题要么予以否认，要么持怀疑态度，谁都不承认人类或工业企业的过失。大自然成为唯一的替罪羊。他们将气候变化视为政治问题而不是摆在眼前的一个现实。2015年，就在卡特里娜飓风十周年纪念活动即将在新奥尔良举办之际，金达尔还要求奥巴马不要在活动上提起气候变化的话题。

根据佛罗里达州政府人员和其合作方的说法，州长里克·斯科特办公室曾指示他们不要在官方通讯、报告或公众演讲中使用“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等词。斯科特政府对所谓的“讨厌的洪水”的应对措施就是在批准更多的海滨公寓建造计划的同时，大兴海防工程，装上船运集装箱大小、燃油驱动的抽水泵；但只字不提迁移傍海居民的事。[\[12\]](#)

得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2016年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特德·克鲁兹（Ted Cruz）称，气候变化是“图谋更大权力的大政府政客编造出

来的伪科学”，是想获取政府研究经费的科学家们想出来的诡计。同时，他又说人们应该信任自由企业制，让它发展出对气候变化有效的应对措施。而克鲁兹就来自在2014年《目录》上排名第十的全球变暖典型城市哈里森郡。[\[13\]](#)

墨西哥湾也感受到了另一种离岸油类开采活动带来的连锁反应，那就是鱼油，它普遍存在于家庭日用品中，包括肥皂、人造黄油、唇膏、油漆、杀虫剂、地板材料，以及营养保健品等。这种鱼油主要来自鲱鱼，它是沿海水域盛产的一种鱼类。欧米伽 3（Omega-3）鱼油补充剂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风靡，被认为可以抵御心脏病、前列腺癌和阿尔茨海默病；鱼油的来源，和其他各种喂给农场动物、家养猫狗吃的鱼类食物一样，都来自鲱鱼。你绝对没见过鲱鱼被干干净净地排列在海鲜市场的冰块上等待出售；因为它严格来说是一种工厂鱼，要在流水线上经过无数道粉碎、压榨等鱼粉加工（reduction）工序。H. B. 富兰克林（H. Bruce Franklin）称鲱鱼是“大海中最重要的鱼”，他写过的一本扣人心弦的讲述当代鲱鱼所面临困境的书，便是以此为书名。[\[14\]](#)

鲱鱼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商业价值，而在于其生态重要性。它们是海洋鸟类的主要食物来源。一战期间，鸕鹚因为和商业渔民抢食而遭到猎杀，那些被鸕鹚吃掉的大部分就是鲱鱼。它们是一种小鱼，“集群而游，浩浩荡荡”，19世纪时，有人见过鲱鱼鱼群有40英里之长。可它们虽然规模庞大，却“和羊群一样无助”，可以成为任何体型较大的食肉鱼类或海中哺乳动物的猎食目标，小到条纹鲈，大到鲸鱼，都是其天敌。[\[15\]](#)

这些对无助鲱鱼的描写出自乔治·布朗·古德。他是出色的鱼类学者，19世纪80年代，他在为美国渔业委员编写第一份综合性鱼类研究材料时，曾招募塞拉斯·斯特恩斯为其撰写墨西哥湾部分。在谈到

鲱鱼在食物链中所处的底层地位时，古德说只要你吃的是海鱼，那你吃的“就只有鲱鱼”。如果你的工作是处理鱼类，你面对的很可能就是鲱鱼。它们当时是——至今也依然是——美国规模最大的鱼类产业。截至1948年，海湾各州每年捕获的鲱鱼达10.3万吨。[\[16\]](#)

印第安人将鱼当成肥料，随庄稼撒播在地里，后来还将这个做法传授给欧洲移民。有史以来，无论是垂钓者还是渔民，鲱鱼都会被拿来用作钓饵鱼。但最主要的鲱鱼消耗者一直是加工渔业，而不是个体渔民。有一家总部在休斯敦的公司叫欧米伽蛋白（Omega Protein），它的生产工厂分布在弗吉尼亚、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州，它会战略性地买下所有更小的同类公司，以达到在渔业行业中接近垄断的地位，以避免违反反垄断法。

2007年，布鲁斯·富兰克林在写作那本书时，欧米伽蛋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马尔科姆·格雷泽（Malcolm Glazer），他同时是地产界的亿万大亨，橄榄球队坦帕湾海盗队（Tampa Bay Buccaneers）的老板——下辖61艘船，30架探鱼飞机，这正如一个飞行员和富兰克林所说的，令“鲱鱼无处藏身”。早在19世纪末，大西洋渔业开始走向衰落，到20世纪60年代时，墨西哥湾的渔业规模一举超过大西洋，且其年捕获量在20年后到达顶峰——其中鲱鱼超过了20亿磅——然后开始稳步下跌，到富兰克林写书的那个时间，海湾产量只剩其巅峰时期的一半了。这个下跌并不意外，毕竟渔船有了探鱼飞机的助力后，效率不容小觑；渔船的渔网足有三分之一英里长，它张着贪婪的大嘴，将整个鱼群一网打尽，直到把自己塞得鼓鼓囊囊，夹在两条渔船之间不留半点缝隙为止。[\[17\]](#)

2015年，渔业报告称大西洋和墨西哥湾的鲱鱼产业发展健康，因此应提高可捕捞数量。海湾州海洋渔业委员会——总部设于海泉市，由美国五个海湾州府于1949年成立，目的是促进可持续商业渔业的发展。

展——对此表示同意，它说“过度捕捞以前没有发生过，现在也不存在”，尽管2014年的渔获量已经比前五年的平均值下降了25%。[\[18\]](#)

富兰克林认为，欧米伽蛋白公司已经掌控了商务部的鲱鱼咨询委员会。此外，由于组成整个鲱鱼产业的只有三家公司——欧米伽蛋白和其他两家没有被欧米伽蛋白吸收的小公司——商务部没有要求它们公开披露捕捞数量，理由是这样能让行业成员之间保持竞争状态，虽然它们捕捞的鱼是公共而非私有资源。[\[19\]](#)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海湾的鲱鱼数量已经大幅减少了。鲱鱼数量的减少会影响其他鱼类的数量和海洋的整体健康状况。主要以浮游植物为食的鲱鱼是一种游泳滤食性动物，与之相对应的是表栖固着滤食类动物，例如蛤蜊和牡蛎，它们的成熟个体每分钟会过滤掉四加仑的水。这些被吃掉的浮游植物就包含了成吨成吨的海藻。

富兰克林不厌其烦地论证道，鲱鱼的饮食习惯能帮助抑制水华现象，但这个看法并没有得到海湾州海洋渔业委员会的认可。牡蛎和蛤蜊床已经大幅减少，且这种减少仍在持续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写道，鲱鱼群是“〔自然界中〕仅存的有效抑制浮游植物生长，从而消除藻华和死水区的东西了”。近来，科学家们指出，人类漠视规则的行为，例如将大量农业污水排入克卢萨哈奇河，导致藻华现象更为频繁和严重，鲱鱼的日常饮食受到污染后，这种毒性将随着食物链传递给其他鱼类和动物——就像生活在石油钻井平台附近的红鲷鱼一样。[\[20\]](#)

虽然现实不容乐观，但总有水清洁和野生动物保护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希望。甚至其中有个故事是关于滤食性动物的，尽管在2015年发生的事令所有人感到费解。那个春天，所有筑巢的鸟都从佛罗里达大弯曲地带的海马礁（Seahorse Key）上消失了。当科学家们前去调查时，165英亩的岛屿和营巢地像是刚经历了一场浩劫。“只剩下风”，

一个野生动物生态学家说。海马礁起初是一片尚未融化的冰川海岸上的一座高大的沙丘，它属于锡达礁群，因为礁岛状似海马而得名。19世纪，军队将海马礁当作驱赶塞米诺尔人往西部的中转站，不少塞米诺尔人曾在古巴人的渔牧场上工作过。1929年，胡佛总统将海马礁连同它的12座姊妹岛屿划为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21\]](#)

上万只鹈鹕、苍鹭、白鹭、朱鹭、篦鹭和鸬鹚从那以后就开始在海马礁上筑巢栖息，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2015年时它们会弃巢而去。科学家们锁定了几个潜在凶手——浣熊、蛇、鹰、中毒、疾病、汽船和食物短缺——但都不是。他们也考虑过气候变化，但还是排除了，虽然他们能从很多方面看到它的影响：被淹没的湿地，死去的树木，包括让锡达礁（Cedar Key）得名的雪松（Cedar）。

锡达礁成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一个无辜旁观者；有人认为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足以成立一个新地质时代，这个时代被他们称为人类世。锡达礁在19世纪90年代关闭了铅笔厂，在20世纪初关停了木材厂，从那以后，这片区域在不断减少它的环境足迹，尽管大部分海湾地区已经深陷其中。在两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四个州保护区中，此前被砍伐一空的林地渐渐又茂密了起来；另外，除了巴克艾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大弯曲地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房地产开发商和能源企业的践踏。锡达礁依旧是个渔村，保留着老佛罗里达的最后一点魅力，渔民在这里撒网捕鱼、捞蚝抓蟹。2010年，这里的人口是701人，无边无际的沼泽依旧是“广袤而甜美的容颜”，激发着西德尼·拉尼尔和约翰·缪尔的创作灵感。[\[22\]](#)

锡达礁还见证了水产养殖业的一个成功案例，那就是以洁净环境和工作为特色的蛤蜊养殖。写下这则成功故事的主要是两个人，苏珊娜·科尔森（Suzanne Colson）和莱斯利·施蒂默尔（Leslie Sturmer），她们将锡达礁的蛤蜊养殖称为“蛤蜊洛特”

（Clamelot），取“卡米洛特”（Camelot）之意，那是传说中一个充满诗意和快乐的地方。

施蒂默尔进入水产养殖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的一家鲑鱼孵化场，那时正是大厨保罗·普鲁德霍姆声名大噪的时代。在1988年大旱后，她凭借此前的工作经验，在阿巴拉契湾一门甲壳类动物养殖的职业进修课程中担任负责人。那里的渔民对政府提出的意见或课程有抵触情绪，所以不管施蒂默尔怎么努力，当地的水产养殖业还是步履维艰。

与此同时，科尔森在大弯曲地区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她是一个造船商的女儿，从小在长岛长大，后来她来到佛罗里达，并嫁给了从萨旺尼来的一个牡蛎渔民，于是跟着丈夫在海上谋生，海上咸咸的空气和沼泽湿地都让她有归属感。然后在1991年，萨旺尼河上的细菌污染事件迫使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喊停了萨旺尼海峡上的牡蛎捕捞活动。海峡位于锡达礁北边，风景如画，四周岛屿环绕，岛屿地势低洼，杂草丛生，但没有树木。很久以前一位写过萨旺尼河传记的作者称，这里是美国最浪漫的地方。

有人说玛雅人划着船从尤卡坦沿河而上，来到了今天佐治亚州的奥克弗诺基沼泽。西班牙牧师在河岸边的传教所布道。印第安人和美国人在这条河上打了两场仗。在胜利者的接管下，河流越发乌烟瘴气了。科尔森是一个“不轻易罢休的人”，施蒂默尔这么形容她，意思是说她坚忍顽强；科尔森决心要将河流清理干净，让牡蛎渔民重返海峡。“他们没有污染那里的水，”她说，“他们没有弄脏它。”她加入了佛罗里达州的萨旺尼河水资源管理区，帮助当地政府取得联邦拨款，淘汰了漏水的化粪池，换上了一套新的污水处理系统。水资源管理区还建立了最佳管理措施（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BMPs）的实施体系，鼓励上游的畜牧和家禽养殖活动主动减少农业地表径流。

[\[23\]](#)

与此同时，科尔森和其他人说服州政府官员，让施蒂默尔和贝类养殖产业转移到萨旺尼来。就像在阿巴拉契科拉时一样，施蒂默尔在这里遭遇了类似的对政府干预的抵触情绪。最终，在科尔森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她还是成功让治理体系运作了起来。接下来，1994年，佛罗里达叫停了商业性刺网捕捞活动，锡达礁的150多个渔民只好上交了他们的渔网，失去了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

“这道坎我永远过不去”，面对刺网禁用令，迈克·戴维斯如是说；他的家族早在内战前就开始在锡达礁上捕鱼了。“其他人也一样，只要他在捕鱼这个行当里谋生。我们都感觉像有谁死了似的。这不对。”施蒂默尔开始行动，她组织起了69个渔民，培训他们学习如何在岛屿四周两英亩大的租用水域中养殖蛤蜊。这不是开船出海，追逐鱼群，反而更像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在自己的工位上工作。但好歹眼下这份工作还在户外，还能养家糊口。[\[24\]](#)

科尔森不想看到渔民们“再次被环境灾难所困”。她于是去竞选，并成功在锡达礁城镇委员会中占有一席。她的首要任务是清理水域，并换上新的雨水排放和污水处理系统。截至2000年，这里的蛤蜊养殖面积已经扩大到了950英亩。到2001年，最后一个化粪池也停止使用了。干净的水域提醒州政府重新开放此前封闭的3700英亩渔场，其中包括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关闭的萨旺尼海峡。2010年，共有1300英亩的水域维持着206名蛤蜊养殖者的生计。

这是1300英亩的滤食性动物，它们在减轻水中氮、碳含量的同时，还将水体过滤得干干净净，让依赖阳光为生的海草受益。有研究者做过统计，在2012年全年，佛罗里达租赁养殖场共产出蛤蜊1.36亿只，它们为周围环境清除了25000磅氮和76万磅碳，为市政省下了10万美元的污水处理成本。这些蛤蜊有四分之三在外地出售。当地，在网

捕时代，它们产出的收入超过了摄取量，每年产生经济效益近5000万美元。这个行业在生态上的可持续，更是让各方得益。

锡达礁取得的成功最终是否会被气候变化所吞噬，还有待观察。在热带风暴侵袭期间，高涨的海潮已经涌上了这个小市区的街道。海平面的上升早已影响到了这里的淡水供应。但有一位蚌蛤养殖者，他的祖辈都以捕鱼为生，他说他欢迎大海回来。也许风暴和上涨的潮水会赶走北方来这里过冬的“候鸟人”，这些人在沙地上种植入侵的、极度依赖化肥的草皮；赶走该死的游钓群体，他们夺走了商业渔人的渔网，通过抬高不动产税迫使他们出走家园，包围他们的古老渔村，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搬入公寓村。渔民们，不管状况如何变化，都是最知道如何在海边生活的人，他们最终会夺回属于他们的海滨。

与此同时，水产养殖业已经在海湾沿岸逐渐发展壮大了起来。牡蛎养殖在路易斯安那水域大概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近来，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成功推动了一个牡蛎礁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结构就是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告诉我们路易斯安那州正在消失的舍伍德·加利亚诺所研发的。2015年对亚拉巴马州来说，是新牡蛎养殖场爆发式增长的一年，而且尽管此前人们抵触情绪高昂，但到了这时候，水产养殖在阿巴拉契科拉已站稳了脚跟。

但是水产养殖作为一项在开阔水域进行的鱼类养殖活动，它和陆地畜牧业面临一样的困境：繁育过度，抗生素的滥用，排泄物养分的传播，污染，以及疾病。路易斯安那捕虾人的最大竞争对手是泰国的养虾场，他们干的事就是将红树林铲掉，再往水里加养料，他们所付出的生态代价如此巨大，是经济利益也无法弥补的。而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墨西哥湾上的一个小小的古老渔村，通过修复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获得了健康的经济。

人类总是这么后知后觉，不知道保护一个富饶多产的河口比生产海鲜产品的收益要高得多。保护不是控制；恰恰相反，保护是控制我们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自然的行为。它意味着放手让自然找到属于它自己的节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压抑主导一切的冲动，去服从、顺应，秉持一个想法，那就是自然比人类更能照顾好它自己。

幸运的是，每一个河口湾、每一条河流都有至少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在维护它的生态完整。眼前这个更大的海湾也有多个组织在服务于它。我们不妨将它们当成公众利益组织，而不是环保组织。它们为世间生灵所做的一切努力，其实也是在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它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将勃勃生机带回到河流、湖湾和海洋。完成它们已开始的工作，这是再合乎情理不过的事了；如果我们有幸见证，它们的努力有一天将谱写一段崭新的历史。

“海浪的低鸣，”华莱士·史蒂文斯写道，“永远不会有停下的一刻。”墨西哥湾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长河里，人类就像恐龙，是这片土地上的过客，出现了又消失了，只不过我们更渺小，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存在的时间会更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不会比这些已经灭绝的前辈拥有更重要的地位。在我们自己眼中，我们既不渺小也不短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胆敢尝试去统治自然，试图说服自己，我们是重要的、强大的。我们的行为和决定，的确影响着地球上的许多生命，包括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控制我们的越轨行为，如果我们能尊重早于我们存在的自然平衡、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如果我们能明白自然之慷慨只有当其权威被尊重时才能施展，我们在这个星球上会活得更久一点。对于海洋，我们毁不掉它，也控制不了它，我们可以削弱它，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背离了天意，也削弱了我们自己。[\[25\]](#)

[1] Rachel Carson, *The Edge of the Sea* (Houghton Mifflin, 1983), 246.

[2] Cornucopia, 又译作“丰裕之角”，作为神祇的手持物出现在不少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通常是一种大型角状的容器，其中能涌出物产、花、坚果、各色食物或者是以某种形式体现的财富，是富饶与营养的象征。——译注

[3] Nathaniel Rich, “Waterworld,”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6, 2014): 32.

[4] Mark Schleifstein, “Federal Judge Dismisses Levee Authority’s Wetlands Damage Law Suit against Oil, Gas Companies,”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February 13, 2015.

[5] The case is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the Southeast Louisiana Flood Protection Authority-East et al. v. Tennessee Gas Pipeline Co. LLC et al.

[6] Matthew Tresaugue, “Oil Spills in Galveston Bay a Routine Occurrence,” *Houston Chronicle*, April 6, 2014; Matthew Tresaugue, “Latest Oil Incident Belies Painful Truth,” *San Antonio Express-News*, April 6, 2014.

[7] Tim Dickinson, “Inside the Koch Brothers’ Toxic Empire,” *Rolling Stone*, September 24, 2014, <http://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news/inside-the-koch-brotherstoxic-empire-20140924>; Kate Bradshaw, “Environmentalists Tout New Study Highlighting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Polluters,’” *Creative Loafing*, February 24, 2015, <http://cltampa.com/politicalanimal/archives/2015/02/24/environmentalists-toutnew-study-highlighting-the-influence-of-corporate-polluters#.VmncivkrJN0>.

[8] Ernie Rivers,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August 24, 2016.

[9] Eugene Turner, e-mail to the author, December 11, 2015.

[10] Eugene Turner, e-mail to the author, December 11, 2015.

[11] *Most Vulnerable U.S. Cities to Storm Surge Flooding* (Karen Clark, 2015) .

[12] John Van Beekum, “In Florida, Officials Ban Term ‘Climate Change,’ ” *Miami Herald*, March 8, 2015.

[13] Thomas Kaplan, “Republicans on Campaign Trail Largely Ignore the Climate Deal, ”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2015.

[14] H. Bruce Franklin, *The Most Important Fish in the Sea: Menhaden and America* (Island Press, 2007) , 7.

[15] George Brown Goode, *A History of the Menhaden* (Orange Judd, 1880) , 109.

[16] George Brown Goode, *A History of the Menhaden* (Orange Judd, 1880) , 110.

[17] H. Bruce Franklin, “Net Losses: Declaring War on Menhaden, ” *Mother Jones*, March/April 2006,
<http://www.motherjones.com/environment/2006/03/net-losses-declaring-war-menhaden? page=3>.

[18] Gulf States Marine Fisheries Commission, “Current Status of This Species in the Gulf of Mexico Ecosystem” (2015 report on menhaden) ,
http://www.gsmfc.org/profiles/Gulf_menhaden/Gulf%20Menhaden.php,
accessed winter 2016.

[19] Franklin, *Most Important Fish in the Sea*, 161-62.

[20] Franklin, *Most Important Fish in the Sea*, 9.

[21] Tessa Stuart, “What Made All of Seahorse Key’ s Birds Jump Ship? ” *Audubon*, July15, 2015, <https://www.audubon.org/news/what-made-all-seahorse-keys-birds-jump-ship>.

[22] Sidney Lanier, *Florida: Its Scenery, Climate, and History, with an Account of Charleston, Savannah, Augusta, and Aiken; a*

Chapter for Consumptives; Various Papers on Fruit-Culture; and Complete Hand-book and Guide (J.B.Lippincott, 1876) , 115.

[23] Leslie Sturmer,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October 7, 2011; Suzanne Colson,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September 23, 2011.

[24] Mike Davis,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October 28, 2011; Colson, interview, September 23, 2011.

[25] Wallace Stevens, “Fabliau of Florida, ” in *Wallace Stevens: Collected Poetry and Prose* (Library of America, 1997) , 18.

参考文献

Altobello, Brian. *New Orleans Goes to War, 1941-1945: An Oral History of New Orleans during World War II*. Brian Altobello, 1990.

Bailey, Conner, Svein Jentoft, and Peter Sinclair, eds. *Aquaculture Development: Social Dimensions of an Emerging Industry*. Westview Press, 1996.

Barnes, Jay. *Florida's Hurricane Histo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Bedichek, Roy. *Adventures with a Texas Naturalis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Boesch, Donald F., and R. Eugene Turner. "Dependence of Fishery Species on Salt Marshes: The Role of Food and Refuge." *Estuaries* 7 (1984) : 460-68.

Brinson, Ayeisha A., Eric M. Thunberg, and Katherine Farrow.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U.S. Non-catch Share Programs*. NOAA Technical Memorandum NMFS-F/SP0-150.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2015.

Britton, Joseph. *Shore Ecology of the Gulf of Mexico*.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4.

Cancelmo, Jesse, and John W. Tunnell. *Glorious Gulf of Mexico: Life below the Blue*.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16.

Casas, Bartolomé de las. *The Devastation of the Indies: A Brief Account*. Translated by Herma Briffaul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Cerulean, Susan, Janisse Ray, and A. James Wohlpart, eds. *Unspoiled: Writers Speak for the Florida Coast*. Heart of the Earth, 2010.

Chipman, Donald E. "Alonso Alvarez de Pineda and the Rio de las Palmas: Scholars and the Mislocation of a River." *South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98 (1995) : 369–85.

Crouse, Nellis Maynard. *Lemoyne d' Iberville: Soldier of New Franc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Cusachs, Gaspar. *Lafitte, the Louisiana Pirate and Patriot*. Louisiana Historical Society, 2013.

Cushing, Frank Hamilton. *Exploration of Ancient Key-Dweller Remains on the Gulf Coast of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Day, John, and George Paul Kemp,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ississippi Delta: The Once and Future*

Delta. Springer, 2014.

Dean, Cornelia. *Against the Tide: The Battle for America's Beach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Dickinson, William R. "The Gulf of Mexico and the Southern Margin of Laurentia." *Geology* 37 (2009) : 479-80.

Dimock, A.W. *Florida Enchantments*. Outing Publications, 1908.

Doughty, Robert W. *Wildlife and Man in Texas: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Conserv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3.

Durrenberger, E.Paul. *"It's All Politics": South Alabama's Seafood Industr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Dyer, Charles Lawrence. *Along the Gulf*. Women of Trinity Episcopal Church, 1971.

Eidse, Faith. *Voices of the Apalachicol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7.

Field, Martha R. "Come South, Young Woman." In *Congress of Women*, edited by Mary Kavanaugh Oldham, 776. Monarch, 1894.

Florida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hird Biennial Report of the Florida Shell Fish Commission, Years 1917-18*.

T. J. Appleyard, [1918].

Fontaneda, Hernando d' Escalente. *Memoir of Dr d' Escalente Fontaneda Respecting Florida. Written in Spain, about the Year 1575.* Glades House, 1944.

Frazer, Lynne Howard. *Silver King: The Birth of Big Game Fishing.* WGPU Film, 2012.

Galloway, William E. "Depositional Evolution of the Gulf of Mexico World." In *The Sedimentary Basi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edited by Andrew Miall, 506-44. Elsevier, 2008.

"The Gentleman of Elvas: From *The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Hernando de Soto* (1557)." In *The Florida Reader: Visions of Paradise from 1530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Maurice O' Sullivan and Jack C. Lane. Pineapple Press, 1991.

Green, Ben. *Finest Kind: A Celebration of a Florida Fishing Village.* Florida Historical Society, 2007.

Griffin, Randall C. *Winslow Homer: An American Vision.* Phaidon Press, 2006.

Hansen, Gunnar. *Islands at the Edge of Time: A Journey to America's Barrier Islands.* Island Press, 1993.

Hearn, Lafcadio. *Chita: A Memory of Last Is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3.

Hoffman, Paul. *A New Andalusia and a Way to the Orient: The American Southeast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Holder, Charles Frederick. *The Big Game Fish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acmillan, 1903.

Horowitz, Andy. "The BP Oil Spill and the End of Empire, Louisiana." *Southern Cultures* 20 (Fall 2014) : 6-23.

Houde, Edward D., and Edward S. Rutherford. "Recent Trends in Estuarine Predictions of Fish Production and Yield." *Estuaries* 16 (1993) : 161-76.

Howard, Clinton N. "Colonial Pensacola: The British Period." *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19 (1940) : 114.

Hubbert, M. King. "Energy Resources." In *Resources and Man: A Study and Recommendations*, by the Committee on Resources and Man of the Division of Earth Scienc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57-241. W.H. Freeman, 1969.

Huffard, R. Scott, Jr. "Infected Rails: Yellow Fever and Southern Railroads."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79 (2013) : 80-95.

Humphreys, Margaret. *Yellow Fever in the South*.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Ingle, Robert M. *Sea Turtles and the Turtle Industry of the West Indies, Florida and the Gulf of Mexico*.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4.

Jacobsen, Rowan. *Shadows on the Gulf: A Journey through Our Last Great Wetland*. Bloomsbury, 2011.

Jenkins, Peter. *Along the Edge of America*. Mariner Books, 1995.

Johnson, Sherry. "Climate, Community, and the Commerce of Florida, Cuba, and the Atlantic World, 1784-1800." *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80 (2002) : 445-82.

Kahrl, Andrew W. "The Sunbelt's Sandy Foundation: Coastal Development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outh." *Southern Cultures* 20 (2014) : 24-42.

Kane, Harnett T. *The Golden Coast*. Doubleday, 1959.

Kasprzak, R.A. "Use of Oil and Gas Platforms as Habitat in Louisiana's Artificial Reef Program." *Gulf of Mexico Science* 16 (1998) : 37-45.

Keating, Bern. *The Gulf of Mexico*. Viking Press, 1972.

Lowery, George H., Jr. *Louisiana Bird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5.

Lugo, Ariel E., and Samuel C. Snedaker. "The Ecology of Mangrove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5 (1974) : 39-64.

Maril, Robert Lee. *Texas Shrimpers: Community, Capitalism, and the Sea*.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3.

McComb, David G., and J.U.Salvant. *The Historic Seacoast of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9.

McCracken, Karen Harden. *Connie Hagar: The Life History of a Texas Birdwatcher*.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6.

Melosi, Martin, and Joseph Pratt, eds. *Energy Metropoli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Houston and the Gulf Coas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Minor, H.E. "Goose Creek Oil Field, Harris County, Texas." *AAPG Bulletin* 9 (19265) : 286-97.

Montrose, Jack. *Tales from a Florida Fish Camp and Other Tidbits of Swamp Rat Philosophy*. Pineapple Press, 2003.

Mullen, Patrick. *I Heard the Old Fishermen Say: Folklore of the Texas Gulf Coas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8.

Norris, Thaddeus. *The American Anglers Book: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porting Fish, and the Art of Taking Them*. E.H.Butler, 1864.

Nunez Cabeza de Vaca, Álvaro. *Chronicle of the Narváez Expedition: A New Translation: Contexts, Criticism*. Edited by Ilan Stevens. Translated by David Frye. W.W.Norton, 2013.

Ober, Frederick. *Juan Ponce de Leon*. Harper & Brothers, 1908.

Perdichizzi, Elizabeth McDonald, and Katherine Stephens Kirk. *Island Voices: They Came to Marco*. Edited by Marion Nicolay. Caxambas, 2006.

Pilkey, Orrin H., William J. Neal, Joseph T. Kelley, and J. Andrew G. Cooper. *The World's Beaches: A Global Guide to the Science of the Shorel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orch, Clay E., S.C. Turner, and M.J. Shirripa. "The Commercial Landings of Red Snapper in the Gulf of Mexico from 1872 to 1962." *Southeast Data, Assessment and Review* SEDA31-RD46 (2012) : 2-12.

Powell, Lawrence N. *The Accidental City: Improvising New Orle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ratt, Joseph A. *Offshore Pioneers: Brown & Root and the History of Offshore Oil and Gas*. Gulf Professional, 1997.

Priest, Tyler. "Extraction Not Creation: The History of Offshore Petroleum in the Gulf of Mexico." *Enterprise and Society* 8 (2007) : 227-67.

Rabalais, Nancy N., R. Eugene Turner, and William J. Wiseman Jr. "Gulf of Mexico Hypoxia, a.k.a. 'The Dead Zone.'"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33 (2002) : 235-63.

Reiger, George. *Profiles in Saltwater Angling: A History of the Sport—Its People and Places, Tackle and Techniques*. Prentice Hall, 1973.

Roberts, William.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Discovery, and Natural History of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76.

Rudloe, Jack. *The Wilderness Coast*. Great Outdoors, 2008.

Salvador, Amos, ed. *The Gulf of Mexico Basin*.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2.

Schmidy, David J. *Texas Natural History: A Century of Change*. 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 2002.

Schueler, Donald G. *Preserving the Pascagoula*.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0.

Scott, William Earl Dodge. *The Story of a Bird Lover*. Outlook, 1903.

Seavey, J.R. , W.E.Pine III, P.Frederick, L.Sturmer, and M.Berrigan. “Decadal Changes in Oyster Reefs in the Big Bend of Florida’ s Gulf Coast.” *Ecosphere* 2 (2011) : 1-14.

Sheffield, David A., and Darnell L.Nicovich. *When Biloxi Was the Seafood Capital of the World*. City of Biloxi, MS, 1979.

Streeter, Ann P. *Joseph Smith Harris and the U.S. Northwest Boundary Survey, 1857-1861*. Trafford, 2012.

Streever, Bill. *Saving Louisiana? The Battle for Coastal Wetlands*.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1.

Sullivan, Charles, and Murella Hebert Powell. *The Mississippi Gulf Coast: Portrait of a People*. Windsor, 1985.

Swanton, John R. *Indian Tribes of the Lower Mississippi River Valley and the Adjacent Coast of the Gulf of Mexico*. Sagwan Press, 2015.

Tembanis, Arthur C., and Orrin H. Pilkey. "Summary of Beach Nourishment along the Gulf of Mexico Shoreline."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14 (1998) : 407-17.

Turner, Frederick. *A Border of Blue: Along the Gulf of Mexico from the Keys to the Yucatán*. Henry Holt, 1993.

Tveten, John L. *Coastal Texas: Water, Land, and Wildlife*.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2.

Ulanski, Stan. *The Gulf Stream: Tiny Plankton, Giant Bluefin, and the Amazing Story of the Powerful River in the Atlanti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0.

Walsh, J. J., J. K. Jolliff, B. P. Darrow, J. M. Lenes, S. P. Milroy, A. Remsen, D. A. Dieterle, et al. "Red Tides in the Gulf of Mexico: Where, When, and Why?" *Journal of Geophysics Research* 111 (2007) : 1-46.

Weber, David. *The Spanish Frontier in North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White, Nancy Marie, ed. *Gulf Coast Archaeology: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5.

Widmer, Randolph J. *The Evolution of the Calusa: A Nonagricultural Chiefdom of the Southwest Florida Coast*.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8.

Yergin, Daniel. *The Prize: The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Free Press, 1991.

图片来源

- 10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 18-19 University of Florida Map & Imagery Collections
- 21 Florida State Library & Archives
- 39 Florida State Library & Archives
- 50 Annie Cole Cady, *The American Continent and Its
Inhabitants before Its Discovery by Columbus*[Gebbie, 1894]
- 77 Florida State Library & Archives
- 98-99 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
[http: //www.davidrumsey.com](http://www.davidrumsey.com).
- 101 Florida State Library & Archives
- 120 Mississippi Department of Archives and History
- 162 Useppa Island Historical Society
- 201 State Library or Louisiana
- 244-245 University of Florida Map & Imagery Collections

- 247 Florida State Library & Archives
- 289 Library of Congress
- 310 Universal Studios
- 337 Walter Anderson Museum of Art, Ocean Springs, MS
- 371 Portal to Texas History,
<https://texashistory.unt.edu>; Corpus Christi Museum of
Science and History
- 412-413 University of Florida Map & Imagery Collections
- 415 Florida State Library & Archives; photo by
Robert M. Overton.
- 455 Portal to Texas History,
<https://texashistory.unt.edu>; Museum of the Gulf Coast
- 485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 511 US Air Force; photo by Jennifer C. Wallis
- 524 Florida State Library & Archives
- 540 David Kidd/*Governing*
- 562 Florida State Library & Archives.

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原版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frican slaves and slavery, 101, 271

Cuba and, 105, 119, 140

on Gulf with Spanish, 55, 58, 67, 68, 69, 70, 236, 352

runaways to Gulf from colonies and U.S. states, 102,
103, 121-22

in the U.S., 98, 105-6, 112, 141, 196, 207, 247, 251,
353

used on the U.S. Gulf, 90, 196, 197, 271, 358, 497

Agassiz, Alexander, 240-41

Agassiz, Louis, 239, 240

Alabama

 fishing industry and, 128

 oysters and, 529

shrimp and, 491

U.S. annexation of, 110–11

Alaminos, Antón de, 48

navigating the Gulf Stream, 46–47

Alcoa Aluminum, 397, 418, 419, 438, 518

alligators, 78, 229, 443, 493

hunting and, 135, 190, 198, 200–201, 293, 294

Allman, T.D., 101–2

Álvarez de Pineda, Alonso, 49, 72, 178

first map of Gulf, 41–42, 48–50

American Ornithologists' Union, 192, 193, 201, 205, 206,
208

Anclote River, FL, 32, 137, 139, 190

Anderson, Agnes “Sissy,” 305, 312, 314, 316, 318,
327, 329–30, 331, 334

Anderson, John, 304, 466

Anderson, Peter, 316

Anderson, Walter, 314, 316

compared with other artists, 317, 318–19

Horn Island and, 304, 305, 306, 307, 313, 317, 326,
327, 328, 330, 331, 361, 465

nature sensibilities of, 8, 306–8, 312–13, 317–18, 326–
27, 331–32, 334

Apalachee Bay, 60, 66, 78,

Apalachee Indians, 59, 69, 70, 73

Apalachicola Bay, FL

ecological decline of, 447–48, 452–55, 516

oysters and, 130–31, 133, 147, 446–48, 450, 453–55,
495, 516

Apalachicola, Chattahoochee, Flint Compact, 453–54

Aransas Pass, TX, 182, 189, 216

Arvida Corporation, 397–98, 399, 402, 403–5

Atchafalaya River, 132, 282, 290, 299, 449, 451, 497, 502

Atlanta, GA, 131, 238, 452–54, 469

Atlantic Ocean, 5, 13, 17, 34, 70, 82, 84, 157, 288,
356, 481

comparisons with the Gulf, 10, 15, 16, 17, 318–19, 482

crossings of, 45, 46, 47, 49, 54, 77, 89, 125, 345

fishing and, 157, 163, 412, 524

hurricanes and, 16, 252, 336–38, 344, 348, 353, 361,
363

See also Gulf Stream; Homer, Winslow

Audubon, John James, 189, 215, 217, 218, 355

Gulf birds and, 180, 206, 317, 342

sea turtles and, 144–45

Audubon Society, 191, 194, 213, 215, 432

bird wardens of, 201, 208–9

local and state groups, 204–5, 207, 210, 211, 217,
389, 392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206–7, 208, 209, 212, 219,
300, 407, 489

Austin, Martha, 232–33, 237

Austin, Mary, 246–47

Austin, William, 232–33, 237–38

Avery, Daniel, 196, 197

Avery Island, LA, 198

as bird sanctuary, 184, 199–200, 213, 300, 492

salt dome under, 197, 266, 267, 293

Bache, Alexander, 47, 106–8

Bahama Islands, 34, 44, 52, 122, 255, 361

Balli, Nicholas, 320–21

Barnett, Cynthia, 338, 452

Barry, John, 498, 503, 508, 514–15

Batty, Joseph H. , 193–94

Bay of Campeche, Mexico, 48, 148, 156, 186, 348, 503, 504

Bayou Chico, 424–25

Bayou La Batre, AL, 131, 132, 136, 491

beaches

erosion and restoration of, 475, 479–82

geological origins of, 224–27

segregation and, 259

as tourist attraction on Gulf, 175, 247–60, 470–71

beachgoing

history of in western culture, 229–31, 245–47

trepidations about, 229–32, 238–39, 250, 252

Beaumont, TX, 216, 265, 268, 269–70, 345, 424

Bedichek, Roy, 129, 492

Belvin, William T., 384–85, 386, 390

Bermuda High, 187, 337

Berners, Juliana, 157–58, 182

Bickel, Karl, 377, 410

Bienville, Jean-Baptiste Le Moyne de, 80–81

establishes New Orleans and builds first dike, 82,
235, 497

Big Cypress Swamp, FL, 31, 390

Biloxi, MS, 316, 330, 363, 364

boat-and shipbuilding industry of, 136–37, 289

French settlement of, 80, 81, 232

seafood industry of, 131–34, 234, 315

tourism and, 161, 233–34, 364, 379, 465, 467, 468

Biloxi Bay, 87, 315

French settlement and, 80, 81

birding, 2, 187, 188, 406, 484, 486-87

birds and ornithology Audubon orioles, 520

black skimmers, 188

Blue Goose symbol, 406

common gallinules (marsh hen) , 492

coots, 216, 317

cranes, 163, 177, 216

curlew, 333

ducks, 66, 109, 177, 188, 199, 212, 216-17, 274, 317,
333, 406, 492

eagles, 4, 19, 30, 142, 163, 242, 274, 492, 525

egg hunters and, 206, 208

egrets, 3, 30, 184, 188, 191-96, 199, 200-202, 211-13,
217, 331, 408, 480, 492, 525

feather trade and, 184, 190-94, 201-2, 203

Federal Duck Stamp Program, 406

flyways, 2, 186-87, 211, 218, 442, 486, 489

frigate birds (man-o'-war birds) , 307

geese, 216, 217, 406

Gulf Express and, 188, 492

gulls, 123, 142, 187, 194, 207, 317, 331, 332, 488, 512

herons, 3, 30, 163, 188, 190-96, 306, 317, 331, 332, 492-93, 525

hummingbirds, 186

ibises, 30, 163, 188, 191, 192, 195, 525

ivory-billed woodpecker, 3, 196

migration across the Gulf, 185-89

birds and ornithology (*continued*) ornithology, 185-86, 189, 192, 194, 196, 202, 211, 213, 217-18, 486-87

ospreys, 4, 30, 142, 163, 190, 274, 492

oystercatchers, 188

pelicans, 30, 142, 163, 176, 194, 202, 274, 304, 307, 317, 321, 332, 485-86, 489, 523, 525

pelicans as targets of Gulf fishers, 213-15

protection of, 184, 203–9, 210, 214, 215, 217, 219

purple gallinules, 317

redstarts, 187

red-winged blackbirds, 417

sanctuaries and preserves of, 207–13, 218–19, 300, 487

sandpipers, 185, 187, 189, 193, 199, 210, 216, 229

shearwaters, 316, 331

sparrows, 186, 188, 194, 492

spoonbills, 30, 188, 191, 194, 217, 274, 525

starlings, 492

terns, 188, 193, 194, 207

turkeys, 73, 80, 88, 109, 163, 417

warblers, 186, 187, 188, 377, 492

wood storks, 30, 188, 191, 194, 195

wrens, 492

bison, 37, 64, 67, 81, 88, 166, 172, 190, 191, 202, 218

Blackburn, Jim, 431–33, 436, 437

Boca Ciega Bay, FL, 56, 379, 398, 402, 409, 505

sea grass and, 379, 381, 382

Boca Grande Pass, 169, 175, 182, 183, 458

Bonaparte, Napoleon, 100, 101–2

Bosker, Gideon, 229, 230

Boudreaux, Joseph, 293, 369, 506

Bowles, William Augustus, 324

BP, 418

2010 oil spill and, 10, 272, 430, 463, 468, 502–5,
510, 513, 514

Bradley, Guy, 208

Braudel, Fernand, 6, 8, 10

Brazos River, 26, 246–47, 442, 460

pollution of, 182, 419

Bream Fishermen Association, 420, 421, 518

Brennen, Carlene Fredericka, 163

Breton Island, LA, and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210,
211, 488

Breton Sound, 132, 315, 499, 508

Brooks, Thomas E. 258

Brown, J.D., 421-22, 424

Brown, Marshall, 340

Brown, Nannette Jolivette, 515

Buckeye Industries (a.k.a. Buckeye Technologies) , 428-30, 517

Buffalo Bayou, TX, 432

Cabeza de Vaca, Alvar Núñez, 68, 232

 envisions cattle ranching in Texas, 67, 416

 Panifilo de Narváez expedition and, 57-58, 61-62

 Texas years and escape to Mexico, 62-68, 377, 422

Calhoun County, TX, 416-17, 418, 419, 432, 433, 518

Caloosahatchee River, 168, 174, 384, 392, 404

 pollution and, 456, 457, 516, 517, 525

Calusa, 64, 152, 155, 310, 389, 456

 Cuban ranchos and, 120

 European views of, 34-35

interactions with Spanish and, 34-40, 52, 73

population of, 33

trade with Cuba and, 119

way of life with estuaries, 34-39, 385

Cameron Parish, LA, 303

hurricanes and, 339-40, 359, 360-361, 365-69, 370

Cape Coral, FL, 382, 387, 388-93, 396, 404, 405, 409

Captiva Island, FL, 169, 172, 405, 406, 408, 477, 479,
482

Carr, Archie, 142, 460

Carson, Rachel, 18, 223, 224, 385, 398, 486, 492

Gulf of Mexico and, 227, 310, 376, 377-78, 380, 410

sea-level rise and, 509

Cat Island, MS, 308, 315, 328, 483, 489

cedar trees, 90, 243-44

Cedar Key (s) , FL, 31, 140, 162, 377, 525

aquaculture and, 526-29

commercial fishing and, 145, 148, 527

pencil industry and, 243-44

sea-level rise and, 528

Chandeleur Islands, LA, 210, 211, 329-32, 485, 499

sea-level rise and, 488-89, 497, 508

Chapman, Frank, 194, 202-7, 209, 213, 215, 217

Charlotte Harbor, FL, 34, 167

estuary and, 27-28

feather industry and, 192, 208, 210

Juan Ponce de León at, 45

pollution of, 459

population growth around, 399

preservation of, 409

Chattahoochee River, 131, 452-54

Chevelier, Jean (a.k.a. Alfred Lechevelier) , 192, 194, 458, 459

Chickasaw Indians, 88, 91

Choctawhatchee Bay, FL, 79, 116, 258

Choctaw Indians, 88, 91

Civil War, 31, 122, 133, 142, 237, 353

Gulf blockade during, 197, 240, 271, 274, 322, 325

nature and war during, 98–99

See also Mississippi River

Clement, Jules, 284–85

climate change, 9, 489, 495, 519, 520, 522, 526, 528

Cline, Isaac, 343–44, 345

Coalition to Restore Coastal Louisiana, 507

coastal marshes, 3, 90, 110, 286, 482, 515, 521, 526

ecology of, 490–95

erosion of, 496 (*see also* Louisiana coastal marshes)

Cobb, Sewall C., 123, 124

Coden, AL, 353

Collier, Barron, 31, 169, 181, 248, 399

Collier County, FL, 31, 390

Collier, Maggie Eliza (McIllvaine) , 31, 33, 400

Collier, William D., 24, 25, 30–32, 37, 147, 400

Collins, Joseph, 129

Collins, LeRoy, 381, 382, 393, 404

Colson, Sue, 526–28

Columbus, Christopher, 44, 45, 46, 60

 encounter with Gulf of Mexico and Gulf Stream, 42–43

Conrad, Joseph, 76, 151, 335–36, 376

Cooke, Alistair, 289

Cooper, James Fenimore, 25, 241

Corpus Christi, TX, 62, 235, 248, 289, 335, 418, 422, 526

Corpus Christi Bay, 65, 177, 248, 422

Cortés, Hernán, 48, 49, 53–54, 352

Cortez, FL, 140, 148

Corthell, Elmer, 499

Covacevich, Jacob D., 136–37

 crabs, 3, 29, 36, 56, 59, 60, 61, 142, 144, 146, 156,
248, 296, 332, 460, 494

 blue, 29, 61, 65, 66, 116, 117, 125, 126, 417, 421,
494, 507

fiddler, 29, 449

grapsid, 125

hermit, 29, 311, 477, 479

industry in, 117, 128, 131, 248, 417, 437, 455, 507,
513, 526

pollution and, 426, 437, 445

stone, 61, 317, 479

Crane, Hart, 242

Crane, Stephen, 14–16, 242, 247, 345

Creek Indians, 88, 91, 120, 324, 421

creosote industry, 236, 238, 287, 424–25

Cross, Ted, 212, 408

Cuba, 4, 28, 34, 65, 103, 236, 255, 289, 344, 363

agriculture and, 53, 82, 85, 355, 462

American manifest destiny and, 101, 103–5

fishing industry and, 114, 119, 138, 141, 144

Gardens of the Queen coral reef, 462

Gulf geography and, 17, 18

Spanish period in, 38, 42-44, 48, 52, 53, 54-55, 68,
70, 73, 82, 122, 324, 326

See also Spanish-American War

Cubitt sisters, 497-98, 501

Cushing, Frank Hamilton, 74, 151, 154, 377, 400, 479

aboriginal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and, 28, 30, 35,
36, 37, 39-40

archaeology research in Florida of, 25, 26, 27-33, 34-
35, 38-39

mangroves and, 376, 410

Zuni Indians and, 25-26

cypress trees, 3, 31, 34, 59, 60, 90, 110, 136, 195,
196, 265, 276, 277, 298, 299, 428

Darling, Jay "Ding, " 406-7, 408

Dauphin Island, AL, 308, 353, 483

Davis, Jefferson, 284, 364

Davis, Mervyn Bathurst, 205

Davis, Mike, 140, 527

Davis, Robert, 471-74

DDT (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 416, 485–86, 489

Deepwater Horizon oil platform, 10, 272, 430, 455, 487, 503–4, 510, 512, 516

deer, 36, 64, 67, 73, 88, 90, 109, 201, 310, 325, 417

De la Cosa, Juan, 42–43

Delmonico' s, 140, 202, 249

De Pourtalès, Louis François, 239–40

Destin, FL, 161, 258

late-20th-century boom, 469–70, 471

Destin, Leonard, 114–17, 121, 149, 161, 354, 422

devilfish, 172, 210, 250

Dimock, Anthony Weston, 165–66, 175, 181, 223–24

Disston, Hamilton, 456

dolphinfish, 161

dolphins, bottlenose and others, 56, 113, 143, 297, 394, 421, 431, 433, 515

Douglas, Marjory Stoneman, 69, 195

dredge and fill, 31, 378–82, 383, 388–90, 392, 395–98,
400, 404, 407, 409, 410, 431, 469

Dry Tortugas, 45, 112, 144, 148, 206, 310

Duany, Andrés, 473

Duckworth, Joseph, 349

dune lakes, 259, 471, 475

Dunn, Patrick, 321–22

DuPont Chemical, 418, 438, 519

Dupuis, Laura, 335, 340, 348, 367

Durnford, Charles D., 24–27

Dutcher, William, 207, 208, 209, 218

Eads, James Buchanan, 498–500

Earle, Sylvia, 457, 464, 511

East Florida, colony of, 7, 83, 118

Edison, Mina, 168, 173, 385

Edison, Thomas, 165, 168, 385

Elevemile Creek, 426–27

Eliot, T.S., 9, 52, 347

Emerson, Ralph Waldo, 242, 243

Endangered Species Act, 436, 483

Energy Policy Act, 461

Escambia Bay, FL

fish kills and, 413–16, 425, 517

pollution of, 413–16, 420

sea grass and, 421, 425, 426, 431

Escambia River, 87, 414, 415, 421, 425, 518

estuaries, 10, 133, 299, 380

aboriginal life and, 26, 30, 35, 39, 41, 57, 61, 67, 68, 69, 74 (*see also* Calusa, way of life with estuaries; Karankawa, way of life)

commercial fishing and, 129, 131–32, 463–64

defined, 26–27, 28, 64–65

destruction of, 9, 182, 274, 279, 346, 402, 409, 413, 416, 420, 435, 447, 455–56, 460, 482, 496, 517

mangroves and, 377, 520

marine life and, 29, 30, 37–38, 60, 142, 152, 156, 170

natural wealth of, 8, 23, 26, 29, 64, 66, 444, 492,
493–94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454, 459, 463, 464, 529

Spanish and, 55–56, 62, 66

U.S.Gulf distinctiveness and, 26, 162, 444, 516

See also specific bays, bayous, and sounds; Trinity–San
Jacinto Estuary

ethanol, 461–62

ExxonMobil (and earlier incarnations) , 270, 286, 502,
504, 505, 513

Ezell, Joy Towles, 428–30, 517

Farley, Barney, 180

Farragut, David, 98, 99, 107, 197, 322

Faulkner, William, 242, 319, 467

FEMA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 369, 424,
475, 503

Fenholloway River, 428–30, 517

Field, Martha (a.k.a.Catherine Cole) , 135, 140, 178,
205, 216, 224, 227–228, 248, 252, 260, 308, 499

fish

bass, 117, 153, 155, 160, 163, 322, 452, 523

density of, 4, 113, 117, 412

drum, 66 (*see also* fish: redfish)

fish oil industry, 522-25

flounder, 117, 412, 417, 460, 493

grouper, 117, 121, 129, 136, 141, 163, 377, 412

mackerel, 117, 161, 177, 412

menhaden, 126, 412, 522-525

mullet, 61, 65, 113, 114, 116, 117, 119, 129, 139-43,
146, 147, 153, 156, 178, 394, 417, 421, 423, 424, 493

pompano, 119, 125, 126, 138, 155, 322

redfish (red drum) , 61, 65, 66, 125, 178, 322, 331,
434, 493, 526

red snapper, 114, 125-27, 129, 136, 148, 153, 434,
457, 504-5, 525

sea trout, 65

sharks, 15, 30, 36, 56, 113, 187, 239, 250

sheepshead, 61, 125, 163, 493

sturgeon, 117, 443, 453, 454

tarpon, 24, 27, 139-40, 150-57, 163-83, 189, 190, 216, 223, 248, 254, 272, 287, 322, 342, 377, 385, 418, 423, 456, 458, 479, 500

tuna (also skipjack) , 18, 65, 155, 412

See also fishing, commercial; fishing, sport

fishing, commercial, 115, 127, 213-15, 379, 417-19, 523

British rejection of, 118

Cuban ranchos and, 118-22, 135, 140, 525

declining yields in, 147-49, 382, 412, 433-35, 500, 507

diversity of fishers and, 128, 132-33, 135, 137

early, 1, 31, 113, 118-19

Gulf comparison with other fisheries regions, 128-29, 148, 412, 513

ice and refrigeration and, 123-24, 135

New England influence, 7, 8, 114, 117, 121-125, 129, 141, 414

Northeastern U.S. and, 128, 129

Spanish rejection of, 67

See also specific states

fishing, sport, 1, 3, 31, 60, 140, 233, 342, 379, 382,
396, 412, 469, 504-5, 513, 523

connection to Gulf tourism, 149, 150, 152-55, 156-57,
161, 163-64, 167-71, 174-80

conservation and, 181, 182, 420-21

economics of, 161, 412

history of, 157-61

fishing, sport (*continued*)

manhood and, 171-73

overfishing and, 9, 181-83

popularity with northerners, 1, 4, 31, 141, 149, 163,
164, 176-78, 181-82

women and, 173-74

fishing, subsistence, 37, 66, 140, 421

Flagler, Henry, 167, 355-57

Flaherty, Robert J., 292-98, 302, 502

Flint River, 103, 134, 452

Florida

clams and (*see* Cedar Key (s) , FL)

fishing industry and, 108, 115, 116, 128 (*see also specific cities*)

oysters and, 116, 421, 431, 447, 517, 526, 527 (*see also* Apalachicola Bay, FL)

sea turtles and, 29, 30, 36, 38, 117, 145

shrimp and, 60, 116, 117, 128, 421, 448, 455

Spanish naming of, 44-45

U.S. acquisition of, 103-94, 120

Florida Big Bend, 60, 111, 428, 485, 525, 526

Florida Everglades, 168, 175, 192, 208, 212-13, 361, 390, 456, 468, 516

Florida Keys, 4, 18, 85, 111, 112, 144, 165, 208, 217, 462

origins of, 309-10

Overseas Highway, 357-59

Overseas Railroad, 355-57, 358

See also Key West, FL

Floridan aquifer, 89, 232, 428, 442, 521

Florida Reef, 85, 112, 240, 410, 462

Florida Straits, 17, 18, 111–12, 119, 240, 252, 289,
338, 354, 462

Flowers, Loretta, 339, 340, 350, 365, 367

Forbes, Edward, 239

Foreman, Nick, 385

Forest and Stream, 4, 24, 325

on bird protection, 207, 217

on Gulf fishing, 164, 168, 175, 181

Formosa Plastics, 418, 420, 431, 432, 436–38, 518

Fort Jackson, 99, 510

Fort Myers, FL, 152, 382, 404, 410, 521

tarpon fishing and, 153, 167–68, 175–76

Fort Walton Beach, FL, 324, 363, 364, 470

Franklin, Benjamin, 25, 91

Franklin, H. Bruce, 523, 524, 525

Fumento, Michael, 461

Furen, Albert, 379, 380, 381

Furs, Jerry, 340, 366, 367

Gagliano, Sherwood “Woody, ” 500, 501, 528

Gaillard, John, 271–73, 274, 279

Galveston Bay, 65, 66, 79, 202, 271, 419

degradation of, 419, 431–32, 436, 460, 496, 519

fishing and, 131, 132

oil spills and, 279, 432, 515–16

Galveston Bay Foundation, 431

Galveston, TX, 14, 62, 66, 153, 189, 205, 322, 326, 424

as beach resort, 247, 252–53, 343

fishing and, 148, 161, 520

hurricanes and, 205, 247, 252–53, 268, 337, 311, 341–47, 350, 356

port of, 342, 419

sea-level rise and, 520, 521

Gasparilla Island, FL, 175, 192, 193, 324

Gauld, George, 91

Gulf survey work of, 84–87, 106

view of Pensacola and, 75, 84

Gerdes, Ferdinand, 97, 107–8, 355

Gomez, John, 324–25

Goode, George Brown, 127–28, 523

Good Roads Movement, 256

Goose Creek Oil Field (and Tabbs Bay) , 261, 271–75, 277–78, 279, 284

Goose Creek, TX, 271, 274, 275, 279

Goss, Porter, 407, 408

Granday, Armand, 145, 146

Grand Isle, LA, 182, 248–50, 252, 300, 361, 497, 499

Great Texas Coastal Birding Trail, 487, 515

Green brothers (Hyman, Irving) , 380, 382, 394

Grey, Zane, 157, 165, 170, 176, 179

Griffith, D.W., 360, 366–67, 368, 369

Griffith, Geneva, 360, 366–67, 368, 369

Griffith, Leslie, 360, 366–67, 368, 369

Grinnell, George Bird, 206–7

Gulf American Corporation, 388, 391–92

Gulf Islands National Seashore, 482–84, 485, 486

Gulf of Mexico

dead zone and, 2, 444–46, 448–52, 455, 458, 461–64,
494, 495, 506, 519

dumping biological weapons in, 328–29

early deep-sea exploration of, 240–41

early tourism and, 232–35, 238–39 (*see also* beaches;
individual cities and states)

European discovery and

early mapping of, 41, 43, 45, 48–49, 83–87

geological origins of, 12–14, 89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4, 5, 6–7, 8–11

Gulf of Mexico (*continued*)

manifest destiny and, 100–6, 112–13

physical geography of, 16, 17, 50, 85, 240–41

Pleistocene epoch and, 13, 19, 195, 226

post-World War II, development and growth and, 375,
378-40, 391, 402-5, 407-10, 469-71, 495

sea-level rise and, 438, 480, 520-21

U.S. expansion in (*see* Manifest Destiny)

World War II and, 288-89, 327-30

Gulf Oil Corporation, 270, 273, 277, 295, 298

Gulf Shores, AL, 465, 470-71, 483

Gulf Stream, 12, 42, 55, 104, 338, 436

anatomy of, 17-18

discovered and used by the Spanish, 45-47

mapping and, 47, 107

Hagar, Connie, 486-87

Haiti, 43, 101-2

Halliburton Corporation, 509-10, 512

Hallock, Charles, 161-62, 207

Harding, Florence, 179-80, 434

Harding, Warren. G., 179-80, 322

Harris County, TX, 424, 432, 519, 522

Harris, Joseph Smith, 98, 99, 100, 107–8, 109, 112, 312,
510

Harrison County, MS, 369, 519

Harrison, John, 106

Harvey, John Hale, 249

Havana, Cuba, 17, 23, 19, 168, 401

feather market and, 206

fish market and, 116, 117, 119, 121, 124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and, 43, 54, 55, 68, 73, 82

Hawley, Christine B.M., 150, 173–74, 181, 182, 434

Hearst, Phoebe A., 32

Hemenway, Harriet, 207

Hemingway, Ernest, 18, 156, 165, 170, 173, 242, 353, 358–
59

Herbert, Henry William, 159–60

Hershey, Terry, 432

Hesse, Hermann, 441, 443

Heywood, Scott, 183–86

Higgins, Patillo, 265–67, 270, 271

Hispaniola, 43, 44, 46, 52

Homer, Winslow, 6, 7, 8, 9

as angler, 3–4, 163–64

Atlantic Ocean and, 3, 5, 15, 163, 318–19

Gulf of Mexico and, 3–5, 15, 60, 163–64, 242, 245

Homosassa River, 3, 4, 5, 15, 60, 166, 245

Homosassa Springs, FL, 162–63, 377

Hornaday, William T., 218

Horn Island, MS, 79, 317, 327

military occupation of, 306, 328–29, 330, 416

national seashore and, 483–84

See also Anderson, Walter

horseshoe crabs, 142

Houck, Oliver, 299fn21, 433, 495–96, 502, 503, 513, 515

Houston Ship Channel, 419, 519, 520

Houston, TX, 57, 153, 252, 342, 343, 345

pollution and, 424, 432

as port city, 414

sea-level rise and, 521

Hughes, Howard, Sr., 274, 277

Humble Oil, 269, 279, 294, 300

Humboldt, Alexander, 43

Humm, Harold J., 402

hunting

American liberty and, 158–59

commercial, 31, 81, 91, 135, 200–201, 202, 299 (*see also* birds and ornithology: feather trade and)

conservation and, 158, 217–18, 219

sport, 31, 154, 158, 166, 177, 189–90, 203, 216–19, 229, 248, 279, 286, 420, 492

subsistence, 36, 37, 49–50, 57, 62, 67, 81, 88, 158–59, 199

hurricanes, 2, 36, 76, 82, 108, 231, 260, 292, 311, 330, 356, 361, 480

1559 storm, 352

1906 storm, 353

1861 storm, 353

1926 storm, 405–6

anatomy of, 335–39, 348, 349

Audrey, 339, 341, 347, 348–50, 351, 359–60, 365–68,
369, 370

Betsy, 307–8, 333, 360–62, 363, 484

Camille, 311, 360, 363–64, 368, 369, 467, 480, 487, 488

Carla, 346 Elena, 339

first tracked by plane, 349

Florence, 348

frequency in Gulf, 337

Galveston storm 1900, 205, 247, 252–53, 268, 311, 341–
47, 356

Georges, 347, 488

Ike, 346–47

Ivan, 424

Katrina, 337, 338, 341, 363, 369, 370, 438–39, 465,
468, 487, 488, 494, 506, 510, 514, 522

Labor Day storm 1935, 358–59

property damage and, 338, 346–47, 370–71

Rita, 369, 506

sea-level rise and, 489, 520

See also Atlantic Ocean; Cameron

Parish, LA; New Orleans, LA;

Pacific Ocean; Pensacola, FL

Hutchins, Thomas, 84, 85, 87, 91–92, 100, 106, 311, 497

Hutton, Robert, 380–82

Iberville, Pierre Le Moyne d' , 200, 213, 330

discovery of Mississippi River, 79–80, 314, 315

settlements on Gulf and, 80–81

Indians, 6, 24, 25, 37, 66–67, 83, 114, 115, 178, 233,
322, 523

American interactions with, 527

British interactions with, 88–89, 90–91, 103

Cuban ranchos and, 120, 121

enslavement of, 43, 44, 48, 53, 54, 58, 69, 70, 71, 73, 74, 119, 352

European diseases and, 49, 53, 73, 91, 232

European views and, 57, 61, 62, 63, 88, 89–90, 232

fishing and, 144 (*see also* Calusa, way of life with estuaries; Karankawa, way of life; shell mounds)

French interactions with, 77, 78, 79

Gulf population of, 41, 57

hunting and, 36, 49–50, 57, 62, 67, 80, 81, 88, 91

Spanish interactions with, 44, 49, 51, 52, 59, 61, 63–64, 68–70, 71, 73, 102

See also specific Indian groups

International Paper Company, 426–27, 430–31, 466–67, 518

islands, 61, 62

as bird habitat and migration stops, 188, 193

development of, 308–10, 311

erosion of, 487–89

estuaries and, 131, 415

popular imagination and, 312, 319, 323–24

as protective barriers, 239, 308–9, 489

sea-level rise and, 439, 489

See also Mississippi

Ixtoc I oil spill, 502–3

Izaak Walton League, 181

Jackson, Harvey, 258, 259, 470

Jacobsen, Rowan, 10, 505

Jefferson, Thomas, 6–7, 100–102, 104, 112, 113, 354

Jindal, Bobby, 514–15, 522

Karankawa, 73, 341

cannibalism myth and, 63

Spanish interactions with, 63, 320, 417

way of life, 63–64, 66–67, 231, 271

white views of, 63–64

Keim, Barry, 337

Kenworthy, Charles, 24, 162

Kerr-McGee Oil Industries, 290-92, 294, 299, 360

Key West, FL, 16, 17, 18, 65, 112, 121, 156, 356, 358

Labor Day Hurricane and, 358-59

poem by Wallace Stevens and, 242-43

seafood market of, 115, 124, 145, 206

shipwrecking (salvage) industry and, 116, 353-55

sponges and, 138, 355

Kircher, Athanasius, 47

Kirk, Claude, 392, 404

Koch Industries, 517

Kurlansky, Mark, 130

Lacey Act, 207

Lafitte, Jean, 325-26

Laguna Madre, TX, 65, 66, 178, 320, 322

sea grass and, 65

Lane, Jackie, 427, 430-31, 518

Lanier, Sidney, 117, 162, 164, 242, 377, 452, 491,
492, 493, 495, 526

Larson, Erik, 343

La Salle, Robert

descent of Mississippi River and, 77, 80

Gulf expedition of, 66, 77–79, 87, 232

Last Island, LA, 248, 250–52

Lavaca Bay, sea grass and, 431

Lee, Charles, 389, 392

Lenček, Lena, 229, 230

Lindbergh, Anne Morrow, 477–78

Louisiana

Cajun culture and, 128, 135, 141, 293, 295, 296–97,
299, 302, 303, 359, 493, 496, 507

nutria and, 201

oil and gas industry, 285–86, 297–303, 497, 501, 502–
3, 507–8, 510, 511–15 (*see also* Kerr-McGhee Oil Industries;
oil: Caddo Lake and, first offshore wells and)

oysters and, 81, 132, 133, 147, 198, 297, 298, 299,
436, 498, 499, 501, 507, 513, 528

sea-level rise and, 489, 519

shrimp and, 128, 297, 300-301, 302, 494, 504, 505-6,
507, 513

Louisiana coastal marshes, 18, 19, 102, 110, 111, 229,
248

canals and, 298-99, 490, 496-98, 501-2, 513-15

erosion and, 303, 496, 498-502, 506-8, 513-15

restoration of, 514-15

sea grass and, 493, 495

Louisiana Purchase, 6, 100, 102

Louisiana Shrimp & Petroleum Festival, 301-2, 506

Louisiana Story, 303, 369

See also Flaherty, Robert J.

Lovel, Leo, 142, 143

Lowery, Charles, 414-16, 420-21, 431

Lowery, George H. Jr., 186, 217-18, 489, 500

Lucas, Anthony, 267, 270, 271, 284, 292

Ludwig, John, 248–49

Luna y Arellano, Tristan de, 351–52

MacDonald, Dorothy, 393, 394

MacDonald, John D., 393–99, 400, 402–3, 404, 483

McGee, Dean, 290–91, 297

McGhee, Gilbert, 421

McIlhenny, Edmund, 197–98

McIlhenny, Edward Avery

bird protection and, 195–96, 201, 204, 209, 211–13,
250, 300, 492

conservationists and, 218–19

hunting and, 217, 218–19

Louisiana Story and, 293, 294

nutria farming and, 201, 203

Tabasco business and, 198

trips to Arctic north of, 198–200

McIlhenny, John, 198

Mackle brothers (Elliot, Frank, Robert) , 399–400, 401,
409

MacLeod, Columbus, 208–9

malaria, 33, 70–71, 108, 236, 244

manchineel tree, 52, 354

mangroves, 30, 31, 50, 108, 313, 358

carbon sequestration of, 410, 521

climate change and, 520

destruction of, 375, 377–79, 382, 383, 389, 392, 396,
398, 402, 409, 529

habitat of, 29, 32, 56, 65, 111, 152, 156, 179, 191,
195, 211, 310–11, 331, 376–78, 379, 385, 394, 402, 478

negative views of, 111, 377, 378, 380, 386, 395–96, 402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393, 405, 407, 409, 521

shoreline protectors and, 310, 377, 400

species on Gulf and, 28–29

manifest destiny, 112

See also Cuba; Gulf of Mexico; West Florida

Mann, Anthony, 282–83, 290, 294, 296, 299, 302

Marco Island, FL, 30–31, 147, 154, 164, 311, 409, 520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24, 25, 31, 32–33

growth and, 375, 399–401

Marryat, Frederick, 448

Matagorda Bay, 66, 78, 79, 481

Matlacha Pass, 37, 384, 385, 388, 409

Matthiessen, Erard, 407

Mediterranean Sea, 6, 137, 139, 229, 230

Gulf of Mexico comparisons and, 16–17, 18, 84

Meinig, Donald W., 112–13

Mellon, Andrew W., 267, 270

Mellon, Robert B., 267, 270

Menard, Michael, 342

Migratory Bird Act, 215

Miles, Franklin, 384, 387

Mississippi, 89, 115, 210, 309

barrier islands of, 310, 322, 483, 488 (*see also specific islands*)

coast of, 109, 110, 233, 256, 305, 319, 368, 369, 401, 480, 481, 483, 491

fishing industry and, 114, 117, 128, 133, 137, 147, 467, 523 (*see also* Biloxi, MS)

oysters and, 80, 85, 133–34, 233, 234, 238, 315, 327

pollution and, 424, 448, 450, 468, 519

seawall and, 480

shrimp and, 315

sport fishing and 161, 177, 467

tourism and, 161, 232–34, 259, 369–70, 401, 467, 468, 480 (*see also* Biloxi, MS; Ocean Springs, MS)

U.S. annexation of, 110

Mississippian culture, 72–73, 88

Mississippi River, 18, 24, 70, 84, 102, 186, 241, 242, 289, 327

basin and watershed of, 13–14, 75–76, 440, 441, 446, 450, 451, 463, 489

Civil War and, 98–99, 107, 322, 510

delta of, 75–76, 78, 87, 363, 481

European discovery and, 48–49, 70–71, 72, 77–82, 100, 200, 314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and, 79, 83, 87, 88, 92, 101

jetties and, 498–501

levees and, 235, 501, 510

pollution and, 432, 445, 446, 448–49, 450, 489, 505

sediment flow and, 76, 78, 109, 224, 225, 319, 481, 489, 497–99, 500

See also Gulf of Mexico: dead zone and

Mississippi Sound, 79, 232, 306, 311, 353, 368

pollution of, 424, 466–68, 519

tourism and, 467

Mobile, AL, 19, 168, 234, 309, 322, 494

British and, 87

fish market and, 234, 124, 234

French and, 81, 88, 90

pollution and, 424

rainiest city and, 339

sea-level rise and, 520

Mobile Bay, 79, 87, 111, 131, 247, 309

Jubilee and, 459–60

pollution and, 459–60

sea grass and, 436

mollusks, 3, 37, 38, 129, 144, 185, 225, 241, 427, 445,
477–80

Monroe, James, 103, 104

Monsanto Company, 425–26, 518

Morgan City, LA, 133, 282–83, 299, 301, 506, 507

mosquitoes, 29, 315

diseases and, 33, 235–38, 244 (*see also* malaria; yellow
fever)

as irritant, 33, 36, 64, 108, 111, 210–11, 264, 323,
380, 383, 384 species of, 236, 237

Muir, John, 188

Gulf trip and, 243–44, 526

Muller, Robert A. , 337

Mullet Key, FL, 322–23, 328, 380, 382

Mustang Island, TX, 178, 321

Myakka River, 28, 394

Naples, FL, 147, 176, 180, 181

Narváez, Panfilo de, 109

Gulf expedition of, 53–62, 65, 67, 68, 69, 70, 71, 72,
352

National Estuary Program, 496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341, 363, 364, 370, 471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341,
369, 445, 460, 508

Native Americans. *See* Indians

nature

human relationship with, 9–10, 11, 38, 64, 135, 202–3,
244, 383, 385–86, 445, 530

views of European explorers and, 57, 81, 314, 315–16

New Orleans, LA

Civil War and, 98–99, 107, 197, 322, 498

founding of, 82

hurricanes and, 350, 351, 358, 361–62, 363, 522 (*see also* hurricanes: Audrey, Betsy, Katrina, Rita)

international rivalry and, 82–83, 87, 91, 101, 103, 326

levee and, 99, 235, 277, 361, 363, 497, 514, 521

port city of, 117, 124, 125, 126, 234, 236–37, 289, 342, 354, 414, 498–99, 510

sea-level rise and, 520

society in, 98

yellow fever and, 108, 234–37

New York, 314, 319, 321, 382, 386, 395, 448, 499

feather trade and, 193, 194, 202–3, 206, 207, 210, 211, 244

Gulf seafood and, 126, 145, 447

Gulf tourism and, 164, 170, 173, 176, 179, 181–82

migrants to Gulf and, 388, 390, 393, 405, 407

oysters and, 129–30

Nicholson, Eliza Jane Poitevent Holbrook, 227-28

Nolen, John, 394-95, 396

oak trees, 109, 110, 122, 138, 162, 196, 208, 233, 248,
306, 365, 368, 385, 389, 398, 486

Ocampo, Sebastian de, 43-44, 48

Ocean Springs (a.k.a. Biloxi and East Biloxi) , MS, 305,
306, 314, 316, 468, 480, 524

as early beachside resort, 232-33, 234, 237-38, 315

Spanish settlement as Biloxi, 80-81

O' Hare, Ralph, 349

oil

artificial reefs and, 302, 303, 504-5

Caddo Lake and, 276-77

early commercial uses of, 268-69

early prospectors and, 264-65, 271, 286

first Gulf spill and, 279

first offshore wells and, 280, 282, 287-88, 290-92

geological origin of, 263-64

origin myth of, 261-63, 272, 297, 302

overwater drilling and, 275-79

salt domes and, 261, 266-67, 271, 285, 286

seismograph exploration and, 286, 290, 295-98

spills (*see* BP; Galveston Bay; Ixtoc I oil spill)

Spindletop strike and, 264-68, 269, 270, 271, 274, 278, 283, 284, 294, 345, 418

See also Goose Creek Oil Field; Louisiana; Pacific Ocean; *specific oil companies*; Texas

Omega Protein Company, 523-24

Ovando, Nicholas de, 43-44

Overseas Highway, 357-59

Overseas Railroad, 355-57, 358

oysters, 29, 81, 114, 117

beds of as navigational hazard, 61, 80, 85, 325

habitat of, 36, 38, 56, 60-61, 80, 132-33, 311, 448, 493, 526

industry and market of, 117, 131-32, 315, 411-12, 455, 518

loss of, 147, 296, 297, 298, 431, 436, 447–48, 453–54, 501, 507, 513, 516, 517, 525

native peoples and, 5, 36, 61, 64, 80, 129, 271

road bedding and, 233 (*see also* shell mounds)

species of, 29, 130–31

tools and weapons of natives and, 35, 231, 479

See also shell mounds; *specific bays*; *specific states*

Pacific Ocean, 5, 6, 42, 53, 348, 412

Gulf of Mexico comparisons and, 10, 17

hurricanes and, 336, 351

oil and, 276

Padre Island, TX, 65, 328, 422, 481, 487, 503

erosion of, 500–501

geological origin of, 319–20

history of, 320–23

national seashore and, 323, 482–83, 484

Panama City, FL, 259, 426, 447, 471

Parkman, Francis, 72, 77, 78, 79

Pascagoula, MS, 19, 107, 133, 233–34

Pascagoula River, 80, 85, 309, 466

Pass Christian, MS, 233–34, 238, 363–64

Peace River, FL

 estuary and, 28

 phosphate industry and, 175, 458

Pearl River, 132, 309, 441

Pearson, T. Gilbert, 215, 218–19

PCBs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 , 416, 419, 425–26, 518

Pensacola Bay, 131

 British period and, 75, 84

 pollution of, 414, 415, 421, 422, 423–24

 sea grass and, 436, 518

 Spanish period and, 86, 352

Pensacola, FL, 106, 417, 421

 British period and, 24, 86–87, 90–91

 fishing industry and, 122–25, 127, 129, 145, 148, 153,

growth and, 483

hurricanes and, 81, 352, 353, 424

pollution and, 413–16, 422, 423–27, 430, 518

Spanish period and, 80, 91, 103, 352–53

tourism and, 257–58, 259, 260, 414

Pensacola Beach, FL, 259–60, 483

Pepper, William, 25, 32

Peralta, Gerald, 363–64

Perdido Bay, FL, 426, 430

sea grass and, 427, 518

Perdido River, 81, 102, 426, 441

pesticides, 383, 390, 416, 451–52, 485–86, 489, 521, 522

Petit Bois Island, 308, 311, 329, 330, 483

petrochemical pollution, 431, 432, 433, 436–37, 496, 505

Peterson, Roger Tory, 487

Philadelphia, PA, 25, 27, 32, 139, 159, 246, 456

Pine Island, FL, 155, 168, 324, 384, 405

Pine Island Sound, FL, 37, 248, 388

Calusa and, 152

Cuban ranchos and, 120

as an estuary, 28, 131, 152

sport fishing and, 169

Pinellas County, FL, 192, 379, 380, 393, 410, 481

pine trees, 110, 136, 316–17, 243, 389

as construction material, 36, 80, 122, 175, 287, 424

Gulf region and, 59, 60, 89, 90, 110, 111, 175, 228,
243, 260, 306, 333, 385, 400, 421, 471

naval stores and pulp industries and, 60, 90, 123,
426, 447

pirates, 47, 214, 323–26, 477

Plant, Henry, 175, 176, 458

Plater-Zyberk, Elizabeth, 473

Pleistocene epoch, 13, 19, 195, 226

Polk, James K., 104–5

Ponce de León, Juan, 53, 174, 377

death of, 52, 352

Dry Tortugas and, 112, 144

first Gulf entrada of, 34, 35, 38, 44, 45, 48

Florida encounters of, 35, 45, 52, 152, 231, 354

Gulf Stream discovery of, 45-46

Port Aransas, TX (formerly Tarpon, TX) , 148, 156, 161,
178, 182, 248, 287

Port Arthur, TX, 360, 411, 418

Port Lavaca, TX, 416, 417

Powell, John Wesley, 25-26, 33

Poynter, Nelson, 379-80, 381, 382, 397

Price, William Armstrong, Jr., 226

Procter & Gamble, 428-29

Prudhomme, Paul, 434, 526

pulp industry pollution, 426-427, 428-30

Punta Gorda, FL, 28, 193, 154, 167, 172, 458

Punta Rassa, FL, 161, 384

Putnam, Frank W., 33

Rabalais, Nancy, 449–50, 451, 457, 459–63

Raffield, Vince, 446–47, 448, 450, 455

Randell, Ted, 404

Ratner, Leonard, 381–82

Rauschkolb, Dave, 503

red tides, 422–23, 517 (*see also* sponges)

Reed, Nathaniel P., 404

rice, cultivation on Gulf, 90, 215, 250, 271, 279, 284,
285, 286, 298

Richards, John, 454

Ricklis, Robert, 63–64, 67

Ringling, John, 254, 394, 397

Rio de las Palmas, 55, 59

Rio Grande, 55, 65, 76, 178, 441, 442, 520

diminished flow of, 182, 500

sediment flow of, 225, 226, 319, 481

Rio Grande Valley, 431, 487, 520

Rio Pánuco, 72, 178

rivers, ecology of, 440-44 (*see also specific rivers*)

Rivers, Ernie, 421-22, 423, 518

Roberts, Nash, 339-41, 348, 350-51, 361-64, 370

Rockport, TX, 178, 486, 487

Rogel, Juan, 38-39

Romans, Bernard, 51, 91, 111

 on commercial fishing in Gulf, 118-19

 Indian observations of, 88, 89-90

 Mobile observations of, 87-88, 90, 459

 Pensacola observations of, 86, 87

 as surveyor in the Gulf, 84-90, 106, 117, 232

Romantics, 241-45, 246

Roosevelt, Franklin, 156, 180, 269, 287, 394, 406

Roosevelt, Theodore, 160, 171, 172, 198, 205, 250

 bird conservation and, 209-12, 217, 330, 332

Rosen, Jack, 382-83, 384

Rosen, Leonard, 382-83, 384

Rowe, Thomas, 153–54, 255–56, 379

Rowland, Thomas, 275

Rudloe, Anne, 136

Rudloe, Jack, 136, 143, 144

Ruge, John G. , 132, 133

Ruth, Babe, 254–55

Rutherford, Walter, 365–66, 367

St. George Island, FL, 188, 328, 448

St. Johns River, FL, 27, 242

St. Petersburg, FL, 204, 214

bird sanctuaries and, 212

post-World War II boom and, 378–82, 391, 393, 397

real-estate boom of the 1920s and, 254–55, 395

sea-level rise and, 521

Sanibel-Captiva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407, 457, 516

Sanibel, FL, 151, 152, 377, 477, 482, 504

growth management of, 405–9, 457, 479

San Jacinto River, 66, 271

Santa Rosa Island, FL, 86, 116, 227, 257, 258, 324, 352, 470, 483

Sarasota Bay, 394, 397, 409

Sarasota, FL, 148, 161, 182, 192, 257, 377, 457

post-World War II growth, 393–99, 403–5, 410

real-estate boom of 1920s and, 254

sea-level rise and, 521

Saunders, E.E., 125, 127

Save Our Bays, 403–4

Sawyer, Wells Moses, 23, 32, 33, 39–40

Sayles, Edwin Booth, 63

Scott, Rick, 522

Scott, William Earl Dodge, 189–90, 191, 192–93, 194, 206

Seadrift, TX, 416, 417, 433, 438

sea grass, 134, 379, 402, 527

habitat of, 29, 37, 56, 60, 140, 145, 421

loss of, 296, 381, 392, 415, 421

See also specific bays and rivers

Seale, Tom, 290, 291, 292

sea-level rise, 9, 347, 439, 519–22, 528

See also Carson, Rachel; Gulf of Mexico; islands;
specific cities;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Seaside, FL, 472–75, 503

sea turtles, 18, 45, 112, 114, 117, 138, 142, 327, 443,
488

consumption of turtles and eggs, 145–46, 232

industry in, 137, 143–45

protection of, 211, 433, 484–85, 503

species of, 144, 484

See also Audubon, John James; *specific states*

seawalls, 28, 253, 346, 389, 396, 401–3, 409, 410, 480,
481, 521

Seixas, Cecile, 205

Seminole, 91, 116, 166

conflicts between U.S. and, 102–3, 121, 154, 322, 384,
405, 526

Cuban ranchos and, 121-22

sewage pollution, 2, 130, 238, 247, 381, 422-25, 430-32, 453, 456, 458, 462, 467, 506, 518, 519, 527, 528

shell mounds, 30, 36, 37, 49, 69, 401, 512

Gulf region density of, 4-5, 23, 24, 28, 129

as road bedding, 133, 395, 479

Ship Island, MS, 80, 314, 315, 322, 364

sea-level rise and, 487

shrimp, 29, 36, 56, 60, 114, 131, 138, 156, 198, 234, 332, 412

industry and, 134-36, 140, 143, 144, 147-48, 248, 287, 296-97, 433, 484-85, 505, 529

species of, 65, 135-36, 494

See also specific states

Sigsbee, Charles, 240-41

Sinclair Oil Corporation, 261-63, 272, 273, 279

Singer, John V., 320-21, 323

Smith, John, 27, 28, 30, 69

first hooked tarpon and, 154, 155, 168–69, 385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5, 127

Soto, Hernando de, 109

encounter with Texas oil, 71, 265

Gulf expedition of, 68–72, 76, 352

legacy of, 72–73

Southeast Louisiana Flood Protection Authority–East,
514, 515

Spain and the Spanish

Christianity and, 38–36, 55, 59, 62–63, 199, 352

colonizing the Caribbean basin and, 42–47, 48, 52

desire for gold and silver of, 18, 24, 44, 46, 47, 48,
53, 54, 55, 58, 59, 68, 70, 74, 76, 82, 458

navigation and the New World and, 46–47, 54–55

pigs of in New World, 43, 53, 69, 70, 73, 88, 235

See also specific Spanish conquistadors

Spanish–American War, 172, 198, 210, 322

sponges, 29, 241

habitat of, 117, 138, 266

industry in, 117, 129, 355 (*see also* Tarpon Springs,
FL)

red tide and, 423

Stagg, Mrs. George T., 174, 179

Standard Oil, 168, 283, 287, 293–95, 355, 356

Stearns, Silas, 125, 126–49, 500, 523

Stevens, Wallace, poetry and observations of, 16, 18,
117, 164, 242, 287, 529

Stewart, James, 264, 275, 280, 281–83, 290, 291, 296–97,
302, 504

Stowe, Harriet Beecher, 190, 242

Straits of Yucatan, 13, 17, 18, 48, 77, 86, 338, 363

Sturmer, Leslie, 526–28

Sugg, Redding S., 313

Sullivan, Louis, 238, 314

Swamp Land acts, 495

Tabasco sauce, 197–98, 300

Tampa Bay, 85, 111, 175, 254, 394

Cuban ranchos on, 120, 121

description of, 56, 66, 87

estuary and, 56, 64–65, 409, 459, 464

feather trade and, 191–92

marshes and, 496

phosphate industry and, 458–59

pollution of, 457–59

restoration of, 459, 464

sea grass and, 379, 436, 459

Spanish and, 55, 56, 57–58, 68

Tampa Bay Estuary Program, 459

Tampa, FL, 19, 124, 148, 153, 167, 257, 289, 325

growth of, 254

port of, 192

sea-level rise and, 521

Spanish-American War and, 172, 210, 322

Tampico, Mexico, 150, 178, 179, 181

Tariff Act, 207

Tarpon Bay, 152, 168, 407

Tarpon Springs, FL, 60, 162, 190, 410

sponges and, 32, 137–39, 423

sport fishing and, 161, 168

tourism and, 138

Taylor, Gene, 467–68, 487

Ten Thousand Islands, 192, 201, 310–11, 409

terrapins, 248–49, 332, 493

Texaco, 270, 281, 294, 297

Texas

coastal environment of, 110, 225–26

independence and U.S. annexation, 104–5, 108, 122, 342

oysters and, 64, 65, 66, 78, 129, 147, 271, 275, 342,
438, 518

petrochemical industry and, 295, 297, 303, 411, 416–
20, 431–33, 435–39

sea turtles and, 145, 515

shrimp and, 65, 66, 275, 297, 417, 437

Thoreau, Henry David, 123, 243, 313

Thunder Bay, 264, 274–75, 280–83, 290–92, 296–97, 299,
300, 302, 504

Tidwell, Mike, 506, 507

Tierra Verde, FL, 380, 394, 399

Tin Can Tourists, 256–57, 377

Time, “Filthy Seas” article, 412–13, 418, 444, 463–64,
495

Tippetts, Katherine, 204, 205, 212, 217

Tocobaga Indians, 58–59, 73

Tombigbee River, 87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TRI) , 418, 426, 518

Trahan, Jimmy, 340, 348, 366, 367

Trinity River, 66, 342

Trinity-San Jacinto Estuary, 66, 274

tupelo trees, 196, 453

Turner, R. Eugene, 502–3

coastal canals and, 501, 507

Gulf dead zone and, 445–46, 448, 449–50, 451, 457,
459, 461–63, 494, 495, 519

Union Carbide, 418, 433, 438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9, 277, 328, 399, 409, 453,
454, 480, 488, 517

navigation projects of, 323, 381, 431, 448, 456, 458,
481

US Coast Survey, 47, 99, 106, 250, 312, 340, 510

biological study of Gulf and, 239–41

mapping the Gulf and, 97, 100, 107–112, 325, 354, 355,
376–78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380, 418, 429, 438, 505, 507

fish-kill study of, 415, 416

lax oversight of 420, 426, 436, 496, 512, 519

offshore chemical incinerator and, 416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422, 425

sea-level rise and, 508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and, 418, 426, 518

US Fish Commission, 127–28, 141, 147, 149, 523

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378, 380, 406

US Geological Survey, 309, 428

US Weather Bureau, 341, 343–44, 349, 350, 358, 359, 360

Usseppa Island, FL, 150, 169–70, 171, 173, 181, 248

Velázquez de Cuéllar, Diego, 44, 46, 53

Veracruz, Mexico, 53, 182

Viosca, Percy, 501–2

vom Hofe, Edward, 170–71, 174

Walton, Izaak, 157–59, 162, 166, 178

Wang, Wenliang, 521

Ward, Charles Willis, 211–12

War of 1812, 102, 103, 326

Warren, Andrew Fuller, 123, 124, 125, 127, 129

WaterColor, 474–75

Weddle, Robert, 68, 79

Welch, Benny, 367–68

West Florida, 7

British colony of, 75, 83, 86

manifest destiny and, 101

Republic of, 102

Spanish colony of, 101, 102, 103, 110–11, 120, 352

White, Randy Wayne, 151–55, 165–66, 168, 182–83, 408

Whitman, Walt, 109, 241

Wilczek, Edward, 5–6

Williams, James, 108, 110

Williams, Ted, and tarpon fishing, 165

Williams, William Carlos, 52, 73–74

Wilson, Alexander, 189

Wilson, Diane, 411

as activist, 416–20, 429, 431–33, 436–438, 464, 518

Wilson, Edward O., 3, 15, 459, 460, 465, 466

Wood, William Halsey, 164-67, 172, 189, 377, 456

hooking first tarpon and, 153-54, 155, 168-69

Woolf, Virginia, 203, 204

Yarborough, “Smilin, Ralph, ” 482-83

yellow fever, 71, 108, 192, 235-38

Young, Linda, 425-26, 428, 429, 431, 517, 518

Yucatán, Mexico, 13, 14, 17, 34, 43, 48, 43, 83, 241,
422, 527

bird migration and, 185-86, 187

continental shelf and, 19

Zacks, Michelle, 119, 1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海：墨西哥湾的历史/（美）杰克·E.戴维斯（Jack E. Davis）著；丘梦晨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

书名原文：The Gulf: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ea

ISBN 978-7-5201-5276-1

I. ①美… II. ①杰…②丘… III. ①美国-历史 IV. ①K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63238号

美国海：墨西哥湾的历史

著者/〔美〕杰克·E.戴维斯（Jack E. Davis）

译者/丘梦晨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郭锡超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41 字数：598千字

版次/2020年2月第1版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5276-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8-7152号

定价/9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沿坟墓而行：穿越东欧大地走向伊斯法罕

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

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上下）

帝国边缘：英国在东方的征服与收藏，1750-1850年（上下）

美国海：墨西哥湾的历史

必然帝国：新世界的奴役、自由与骗局

帝国的十字路口：从哥伦布到今天的加勒比史

向和平宣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

扫码 GO
索恩微店



忘 掉 地 平 线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 / 宋 海

編劇/監製：德懷特·加納 (Dwight Garner)

《达拉斯晨报》·威廉·科布 (William J. Cobb)

《达拉斯晨报》：威廉·科布（William J. Cobb）

《盖恩斯维尔太阳报》，罗恩·坎宁安 (Ron Cunningham)

爱德华·O. 威尔逊 (Edward O. Wilson), 著有 *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

◆ 荣获 2018 年普利策奖（历史类图书）——

•《柯克斯书评》2017年度非虚构类图书奖

- 美国国家书评奖非虚构类提名好书
- 《纽约时报》2017 年最值得关注的非虚构类图书
- 《华盛顿邮报》年度好书

第三分：未变的岸是九。从海泊河到渤海湾，石油和煤炭组成的北方木主一老幼和路路畅通的铁路力十二三。富时，困路而陷的沙子，风和水。

第四部分：饱和与流失。安子安家十四：扩张的海岸十五：深沟浅滩的废墟十六：物通过墓前沉默十七：出逃和失控十八：时光沙漏中的砂十九：消失的边界



THORN BIRD

應、持、地、平、性、矣

系：恩智浦微電

不 想 自 己 調 換

定价: 89.00 元



R
索·恩
THORN BIRD

WAR ON 向 PEACE 和平宣战

外交的终结和
美国影响力的
衰落

[美] 罗南·法罗

著

李茸

译

The End of Diplomacy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Influence
(Ronan Farrow)

第一部 最后的外交官

11 美国神话 / 12 黛利班夫人 / 13 迪克 / 14 芒果箱 / 15 另一个哈卡尼网络 / 16 表里不一 / 17 兄弟会
18 任务：不可达成 / 19 走玻璃 / 20 农夫霍尔布鲁克 / 21 少点对话 / 22 艾·罗德 / 23 向我保证
你会结束战争 / 24 军轮子掉了 / 25 备忘录 / 26 实实在在的事 //

第二部 先开枪，别提问

27 一般规则 / 28 杯斯塔姆：他说真话并劝阻一切谎言 / 29 白野兽 / 30 最短的春天 / 31 午夜牧场 //

第三部 毁灭进行时

32 国务卿现状 / 33 蚊子与利剑 / 34 崩溃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罗南·法罗 / 作者简介

美国调查报道记者，现任《纽约客》杂志撰稿人及HBO电视网的纪录片制作人，曾任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和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节目的主播和记者，其作品经常在《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等报刊上发表。他获得过诸多奖项，其中包括普利策奖、乔治·波尔克奖(George Polk Award)和美国国家杂志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并且入选过《时代》杂志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法罗还是一名有执业资格的律师以及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现居纽约市。

李 苒 / 译者简介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及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英语写作专业，从事国际政治及金融新闻报道编辑工作25年，曾担任驻华盛顿特派记者，负责美国政治及外交政策报道。

图书策划人



视觉设计师

联合创立

War on Peace: The End of Diplomacy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Influence

Copyright©2018 by Ronan Farrow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美] 罗南·法罗 著

李茸 译

The End of Diplomacy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Influence
(Ronan Farrow)

WAR
ON
向
PEACE
和平宣战
外交的终结和
美国影响力的
衰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时任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第一副助理国务卿康特里曼2010年5月在阿富汗视察排雷工作。

（照片来源：美国国务院）



拉斐尔于2010年10月按计划结束对吉尔吉特-伯尔蒂斯坦地区（Gilgit-Baltistan）的访问后，登上巴基斯坦军用直升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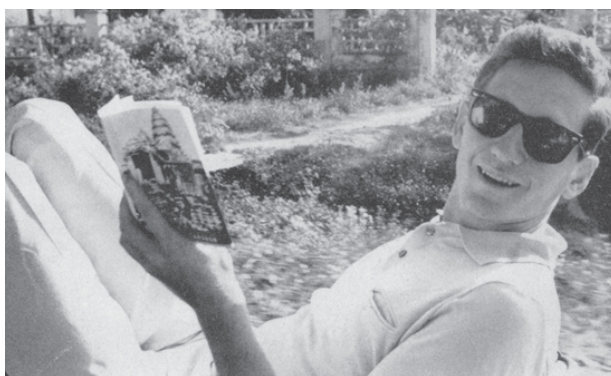
（致谢：乔纳森·佩恰）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2010年在伊斯兰堡的塞雷纳酒店与巴基斯坦国会议员们共进早餐时陷入片刻沉思，一旁的拉斐尔正在做笔记。

“他是个典型的霸道角色，”拉斐尔回忆起霍尔布鲁克时说，“但我喜欢他，因为他想做成事，想法也对路，而且不是个软蛋。”

（致谢：摩根·J. 奥布莱恩三世）



捧着书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摄于1963年，其外交服务生涯的早期阶段，驻东南亚期间。霍尔布鲁克经常大量阅读。

（凯蒂·马顿/摄）



左起：后来领导了朝鲜无核化六方会谈的克里斯托弗·希尔、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霍尔布鲁克、波黑总统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以及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于1995年《代顿协议》谈判期间，在美国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给霍尔布鲁克开辟出来的谈判区域内，仔细查看有争议领土的地图。

（致谢：凯蒂·马顿）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办公室（SRAP）工作人员2009年在美国国务院办公大楼前的庭院里合影。右侧紧挨着霍尔布鲁克的依次是：我、传播事务主管阿什利·博默尔，以及学者巴内特·鲁宾和瓦里·纳斯尔。

（致谢：摩根·J. 奥布莱恩三世）



左起：霍尔布鲁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办公室军事联络员道格·罗斯（DougRose）上校和布赖恩·拉姆森（BrianLamson）上校、我，2010年在喀布尔与北约驻阿富汗训练团指挥官威廉·B. 考德威尔将军（背对镜头）会面。

（致谢：摩根·J. 奥布莱恩三世）



约翰·赫弗南拍下的这幅照片中，人骨散落在刚刚被推土机推平的新土表面。2002年1月，赫弗南与同行的医生促进人权协会调查员珍妮弗·利宁医生在阿富汗大士特雷利沙漠中发现乱坟场后几分钟内，

拍下了这幅照片。根据李宁的回忆，乱坟场所在地气味“腐烂、肮脏、恶臭”，像是“掀翻开的垃圾”。

（照片来源：约翰·赫弗南/医生促进人权协会）



珍妮弗·李宁医生2002年1月在阿富汗北部希比尔甘的监狱采访被监禁者。“他们病得很严重，”她说，“非常瘦弱。”

（照片来源：约翰·赫弗南/医生促进人权协会）



2001年12月1日，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将军与美国特种部队人员在希比尔甘监狱与被关押的塔利班及基地组织投降者见面。

（版权所有：罗伯特·扬·佩尔顿）



2016年8月，在喀布尔副总统宫，杜斯塔姆将军看着一只他心爱的鹿闯进接见厅。

（罗南·法罗/摄）



2016年8月，在位于喀布尔的副总统宫中，杜斯塔姆将军（右）正为主持即将在宫中举行的中亚武术“克拉术”比赛做准备。我正在做笔记（中），应杜斯塔姆的要求，我穿着传统的乌兹别克民族服装长袍“衿祥”。

（致谢：杜斯塔姆副总统办公室）



托马斯·埃文斯（左，时年16岁）、其母莎莉（中）及弟弟迈克尔（右，时年14岁）2006年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合影，此时距离托马斯离家出走还有很长的时间。托马斯“很体贴，”莎莉回忆道，“我不知道他怎么变成了那样一个人。”

（致谢：迈克尔·埃文斯）



2012年2月，在突尼斯就青年及民主问题发表演讲后，希拉里·克林顿驻足望向地中海。此时的突尼斯刚刚经历了革命洗礼，对地区内的美国盟友势力持质疑态度。

（罗南·法罗/摄）



抗议者手中拿的是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詹姆斯敦的军火生产商综合战术系统公司生产的催泪瓦斯罐。它在2013年8月开罗爆发的拉比亚广场事件期间，被埃及保安部队用来驱散大规模集结的民众。

（版权所有：泰奥·布图鲁尼）



2018年，弗雷迪·托雷斯在自己用来运输树番茄、奎东茄之类水果至哥伦比亚各地的雪佛兰五十铃FRR中型卡车驾驶室中，为新一次长途运输做准备。

（致谢：弗雷迪·托雷斯）



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中）在2018年1月于斯坦福大学举行的一次活动上，与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右）和康多莉扎·赖斯（左）交谈。

（照片来源：美国国务院）



克里斯托弗·希尔（左）和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右）在飞往贝尔格莱德的航班上。1995年9月，结束波黑战争的协议达成。而之前漫长的谈判过程中，希尔和霍尔布鲁克多次结伴前往贝尔格莱德。希尔回忆称，自己的“谈判技巧是跟着霍尔布鲁克学的，就像学徒跟着木工大师学艺一样”。

（致谢：克里斯托弗·希尔）



2015年，国务卿约翰·克里及负责伊朗核协议谈判的美国外交官团队（左），与以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为首的伊朗谈判团队（右），在维也纳柯堡宫殿酒店的蓝色沙龙进行谈判。

（照片来源：美国国务院）

- [前言 红木走廊大清洗](#)
- [第一部 最后的外交官](#)
 - [1 美国神话](#)
 - [2 塔利班夫人](#)
 - [3 迪克](#)
 - [4 芒果箱](#)
 - [5 另一个哈卡尼网络](#)
 - [6 表里不一](#)
 - [7 兄弟会](#)
 - [8 任务：不可达成](#)
 - [9 走玻璃](#)
 - [10 农夫霍尔布鲁克](#)
 - [11 少点对话](#)
 - [12 艾-罗德](#)
 - [13 向我保证你会结束战争](#)
 - [14 车轮子掉了](#)
 - [15 备忘录](#)
 - [16 实实在在的事](#)
- [第二部 先开枪，别提问](#)
 - [17 一般规则](#)
 - [18 杜斯塔姆：他说真话并劝阻一切谎言](#)
 - [19 白野兽](#)
 - [20 最短的春天](#)
 - [21 午夜牧场](#)
- [第三部 毁灭进行时](#)
 - [22 国务卿现状](#)
 - [23 蚊子与利剑](#)
 - [24 崩溃](#)
- [结语 首选工具](#)
- [致谢](#)
- [索引](#)

前言 红木走廊大清洗

约旦阿曼，2017年

任命一位精通各学科的大使^[1]，一位听得清暗示、读得懂表情和肢体语言者……军队取决于统帅……和平及其对立面——战争取决于大使。只因大使其位既可结盟亦可树敌，大使是国王与国王间合纵或拆伙事务的执行者。

——《摩奴法典》，加州大学版《印度教经文》，公元前1000年

职业生涯已然结束了，对此这位外交官还丝毫不知。走进美国大使馆的安全区域前，他把手机放进了外墙上的小格子当中——按照外交规则，手机不得带入安全区域，因此区域入口处的墙上都设置了一排用于存放个人电子通信设备的小格子。这位外交官遵守规则已经35年了，经历了不止一座墙的倒塌和一个帝国的衰落，一路走来世界越来越小，电报换成了电话会议，繁复的外交语言缩减成简短且时常不那么正式的电子邮件。他错过了几个电话，开机进来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措辞简练。外事处总干事一直试图联系他，他们需要立即通话。

这位外交官名叫托马斯·康特里曼（Thomas Countryman），听起来有点像虚构的，但确实是真的。他正坐在美国驻约旦大使馆政治处一张借用的办公桌旁。坐落在阿曼豪华社区阿卜顿（Abdoun）的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占地面积很大，美国建筑承包商研究了中东建筑风格后，在兴建过程中融入了当地特色：沙色石头，防碎玻璃窗上有一个

红色钻石形图案，仿佛昭告“本土化，但还不太本土”。与世界这一隅中绝大多数美国使领馆一样，阿曼的这座大使馆也没避讳它给人的堡垒的感觉。“可能的话，我们会挖条护城河。”^[2]驻扎在那里的一位外交官曾经这样对我嘀咕道。说这话的当口，我们乘坐的装甲越野车正穿越大使馆外的钢筋混凝土护栏，驶过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的装甲运兵车。

那是2017年1月25日，康特里曼是美国军控事务高级官员，其任务实际上涉及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负责监督美国国务院寻求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脆弱谈判，以及对朝鲜政权的世界末日威胁做出回应。他1月的阿曼之行^[3]依旧毫无建树：有关中东核裁军的谈判进行了几十年，这不过是最新的一次出差而已。世界各地都建立了无核区，从拉丁美洲到非洲和欧洲的部分地区，然而没人认为以色列会突然放弃核武器。不过通过逐步的推进也许有一天可以实现，譬如禁止核武器本身不成的话，也许可以促成该地区相关国家先批准其已经签署的禁止核试验条约。然而即便这个目标也是“相当不切实际的追求^[4]”，因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看法截然不同”，康特里曼轻描淡写地说道。

他的工作任务是经典的老派外交，也就是说它令人沮丧，且涉及很多时差。经过多年小心翼翼的连哄带骗和调停，中东各国终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同意坐下来开会，也有了为促成未来对话而展开的对话，即便这种对话更似揶揄而难以实现。那天晚上，康特里曼将与他的英国和俄罗斯同行会见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官员，就防止核扩散的重要性向后者施压。第二天，他将前往罗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会谈。“那是一次重要的会议，”^[5]他后来告诉我，“如果不是决定性会议的话。”他干笑了一下，予以停顿。让康特里曼感到滑稽的与其说是他自己，还不如说是防止中东核扩散的使命。

康特里曼是前一天到达阿曼并住进洲际酒店的。然后他直接就去与阿拉伯联盟的同行开会了。开会过程中他以当地的方式喝mazboot，即少量加糖的阿拉伯黑咖啡；抽烟时，也尽可能地选择特醇万宝路（充满出差和谈判的生活不利于戒烟。“我在努力”，[\[6\]](#)他后来说，然后郁郁地吐了口烟）。

第二天他前去与英国和俄罗斯官员共进晚餐。并非所有同行都有康特里曼这么多年的经验和人脉。英国的联络人在之前几年里换了三四个，俄罗斯则派了名副手过来。这会让事情变得更艰难。在这走钢丝般的劝说工作中，每分每毫的外交经验都管用。

外交官履行许多基本职能——激励美国人摆脱危机，将发展中经济体团结在一起，促使各国政府之间达成协议等。这项工作有时可以让人觉得就像与最难相处的亲戚一起共进感恩节晚餐一样，只是这顿饭得吃一辈子，并且是在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进行。外交官的武器就是说服力，在国际峰会场边的对话战线上，在灯光昏暗的酒吧里，或是在战火纷飞的交战区内，有时还会亲历炸弹落下的过程。

自1982年加入美国国务院以来，康特里曼经历了外交上所有变幻莫测。在“沙漠风暴”期间，他在南斯拉夫和开罗任职。他去过阿富汗，也去过联合国相关机构，回来时都毫发无伤。一路任职下来，他还学会了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和希腊语，甚至他讲的英语也带上了点奇怪的口音，似乎受到所有这些语言的影响，又或许没有受到一点影响。康特里曼发音扁平，语调疏于变化，而且元音发音有点怪，听起来像诵读软件或007电影中反派人物在发声。互联网上一则评论斥责他为“国务院那些面孔模糊的官僚之一”[\[7\]](#)，将他的声音称作“一种我猜是因为你整个职业生涯都不曾在活人身边工作才有的奇怪的官僚口音”。这一评论也概括了外交官职业的

另一特点：他们在军队作战的地方工作，但回家时不会受到夹道欢迎。

但是这则评论是错的：康特里曼的面孔可不模糊。他那张鲜明的面孔，绝非那种混入人堆你就找不到的一张脸。他身材偏瘦，目光严肃、犀利且不躲闪，花白的头发经常修剪得前短后长，颈后的头发华丽地落到整洁的西装领子上——典型的外交官发型：前方和平，后方战争。（“让人反胃的头发，”某保守派媒体大声疾呼，“也是没谁能比了。”^[8]）他以在公开声明及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中应答坦率、不打官腔而享有盛誉，他对国务院一直非常忠诚，并且认为国务院的工作维护了美国的信念。哪部小说要是以康特里曼为主人公，恐怕会很费力且不讨好。

那天，坐在美国驻约旦大使馆政治处的荧光灯下，康特里曼看了一会儿电子邮件，然后回信并附上了办公桌上的电话号码。国务院外事处总干事阿诺德·查孔（Arnold Chacon）大使很快把电话打了过来。据康特里曼回忆，查孔的开场白是：“不是让人开心的消息。”^[9]查孔表示，白宫刚刚接受了康特里曼的辞职：从当周周末起生效。查孔表示了遗憾。“我没想到那通电话是关于我的，”康特里曼抽着电子烟回忆道，“我一点预感都没有。”^[10]但是没错，就在与外国政府展开一次关键谈判前的几个小时，他兜头中了个屎弹。

每当新总统入主白宫，需要联邦参议院确认的官员们 都会提交一份只有一两句话的简短辞呈。这是一种形式，一种传统。几乎全世界所有人都认为像这样的无党派职业官员将原地留任。这是个实际问题。职业外交官是美国政府驻外机构的基础，虽说结构并非完善，却可以确保政府机构不会因为大选中获胜的党派全盘换人，而陷入无能及腐败。只有职业官员才拥有数以十年计的维持国家机构运转所需要的治理经验，虽然每任总统都会拿这些“终身”官员配合不力和责任

心不够开刀，但人们的印象里没有任何一任政府曾大规模地解雇这些官员。

技术上，美国总统无权只为了将职业外交官从他们的岗位上挪开，就开除他们，但是有一个“升职或退休”的规则：如果你在高级别——康特里曼的级别——上任职一定年限后，仍没有出任总统委任的职务，你就必须退休。康特里曼被解职，意味着他职业生涯的终结；剩下的只是一个他想拖多久离开的问题。他选择了快速了结。接到消息的那天是星期三，当辞职在周五生效时，他就会离开。

当晚他还要出席与阿拉伯人的会议。“罗马会议怎么办？”^[11]康特里曼问。那是美国向世界强国推行其防止核扩散议程难得的机会。“那很重要”，查孔表示赞同，但是康特里曼去职前仅剩的48个小时是不足以出席罗马会议的，因此，只能让一位更低级别的官员顶替他的位置了。“好的，谢谢你告诉我，”康特里曼简短地说，“我会回家。”对于一个有着标准外交官发型的人来说，康特里曼绝不会让别人看笑话。

其他人就没这么乐观了。他的妻子杜布拉夫卡（Dubravka）是他第一次去南斯拉夫旅行时遇见的，他们在一起三十年，也有一段浪漫的外交佳话。她拥有教育学学位和绘画天赋，但她放下自己的事业，随着他走世界，每隔几年就搬一次家，一边养育他们的两个儿子，一边做口译员，贴补家用。她的父亲是外交官，所以她知道这份工作所需要的牺牲——但她也理解高级外交官所普遍期望获得的尊重，在南斯拉夫如是，在美国也如是。然而眼下则是另一回事。“这不公平，”^[12]康特里曼收到消息的几分钟后打电话给她时，她说，“这对我来说也不公平。”

她感到震惊。被派去罗马顶替康特里曼的更低级别官员也感到震惊——他在一个决策权不足的位置上，被派去处理一个全球最多变的

多边问题。意大利人感到震惊。那天晚上，阿拉伯人也感到震惊。当晚，康特里曼等到阿拉伯人宣泄完了希望在与以色列人坐下来谈之前解决问题的不满（阿拉伯人真是有很多的不满）之后，告诉他们，他会将此次谈话的结果转交给自己的继任者，因为当晚是他以美国外交官身份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一个接一个的阿拉伯人握住康特里曼的手，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对康特里曼，也对一个共同的传统。只是突然间，这个传统看似前途未卜了。

新的特朗普政府执政刚刚进入第五天，谣言和信息错乱让美国的外交官们无所适从。在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在外交问题上几乎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细节，只有“美国优先”的竞选口号。他希望“停止向仇恨我们的国家发放外援”，可是在当时，他指的到底是经济援助，军事援助，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大家并不清楚（“没人能比我做得更好。”^[13]特朗普还补充道）。

康特里曼是第一批与特朗普过渡团队初次见面之后就感觉不对头的高层官员。“这次过渡简直是个笑话，”他回忆说，“任何前任政府交接时，都有了解外交事务的人员、有执政经验的人员，他们系统地收集信息，将信息提供给新执政团队。在这次交接中，这些环节没有一个被执行。”^[14]康特里曼向过渡团队提供了有关防止核扩散的详细简报，做上“敏感但非保密”的标记，因为该团队成员中很少有人获得了安全许可。他们对核武器问题也没表现出什么兴趣，表现出来的倒是“对专业公职人员的深深不信任”^[15]，康特里曼说，他失望地意识到，这些人不是来学习的，而是来裁人的。

然后裁员就开始了。通常情况下，在重要地区，即便是出于政治原因任命的大使——尤其是那些没有过度党派色彩的大使，都会留任到接替人选获得国会确认，持续时间有时可以有几个月。特朗普政府

打破了这一传统：上任后不久，新政府就下令所有政治任命的大使立即离开，比往常快很多。收拾行李，走人吧。

之后，过渡团队要求国务院管理层整理提交外交系统内所有非全职雇员的名单。康特里曼开始担心下一个目标将是合同工作人员。这些人是由国务院专门负责让各领域专家参与美国外交的机构雇用进来的。国务院的各个业务部门都充斥着合同工。他们在涉及美国外交政策敏感领域的职能部门，包括康特里曼所在的部门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是朝鲜和巴基斯坦等问题上最好的专家，”康特里曼回忆说，“在军备控制局中^[16]，有些合同人员是很难被替代的。”他们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不能失去他们。但是“人们担心他们（特朗普过渡团队）会抛弃可以抛弃的每个人^[17]，这一点是明摆着的”。所以康特里曼在到达约旦之前，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游说国务院管理层，帮着他们整理论据，以防出现解聘国务院专家的风潮。

事实上，他还以为那通电话就是为了这事，可真正不可想象、毫无先兆也看似毫无道理的是，那实际上是关于像他这样的职业官员。康特里曼坚持认为这不只是关乎他个人的悲惨故事。他已经任职很久了，也有退休金。但这是对制度文化的侮辱，令人不安。康特里曼历经了共和党和民主党数届政府，拥有无懈可击的公职记录。他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有过一些与议员争论的时刻，但这些争论给他带来的更多是尊重而不是愤怒。他回忆说，参议员们听证“结束后会走过来跟我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直说的方式’”。康特里曼推测，也许特朗普政府正试图传递美国不再对军备控制感兴趣的信息。或者也许他们已经进入他的私人脸谱账户，发现在大选期间，他曾向一小群朋友发布过对特朗普的批评。“直到今天^[18]，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单挑上了我。”

事实上，康特里曼并没被单独挑出来。查孔告诉他，白宫当天解雇了六名职业外交官，其中有些人的离开比康特里曼的离开更容易理解。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帕特里克·肯尼迪（Patrick Kennedy）曾在世界各地服役超过40年，对国务卿的电子邮件账户及外交安全管理工作都有所参与，并且在之前一年总统大选期间，媒体就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电子邮件服务器及班加西^[19]争议事件的报道中，其被卷入得较深。大卫·马尔科姆·罗宾逊（David Malcolm Robinson）一直是负责国际冲突及维持稳定行动的助理国务卿，其所在部门是一个太过庞杂的部门，被保守派批评人士直接用华盛顿政圈内最致命的称谓来定义：“建立国家”。除帕特里克·肯尼迪之外，还有三位助理国务卿被一同裁撤，但就相关人士所知，这几位与班加西事件都没有任何瓜葛。“都是因为小事，”^[20]康特里曼说，“斗气。”

这只是开始。几个星期后，情人节当天，艾琳·克兰西（Erin Clancy）的手机——那只她放在一个蓝色旧木盒里的私人电话响了。她刚降落在橙县的约翰·韦恩机场（John Wayne Airport），正站在加利福尼亚二月的阳光下，穿着牛仔裤和T恤，等着取租好的车。“待在线上，别挂，”^[21]调度员说，“我们马上召开紧急团队会议。”克兰西是职业外交官，任职于副国务卿手下的团队。她的办公桌在国务院大楼的七层，离国务卿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越过安全防撞门，经过吊顶低垂且地板看起来像油毡的过道，就是墙上镶着木头，看起来富丽堂皇的会客室。这就是传说中被称为“红木走廊”的权力走廊。红木走廊里的工作岗位都是最精英的岗位，由外交领域里最出色的人选来担任；他们好比国务院雇员中的法拉利^[22]，但更可靠。

克兰西一直听着电话。同行的伴侣也是国务院雇员，用探寻的目光看着她。艾琳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被解雇的官员都至少在需要参议院确认的级别上。她的团队完全是由基层工作人员

组成，而且是基层工作人员中最精英且最受到保护的一批。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是安全的。

康特里曼和其他高级官员清空办公桌离去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国务院里死一般的安静。大多数总统任内，到了这个时候，副国务卿办公室都已经为了帮新国务卿启动各种议程，而忙得嗡嗡做响了。现如今，新政府甚至还没有拿出副国务卿的提名，且未来几个月内恐怕也未必能进行提名。最后一位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还在位时，克兰西及其团队的其他成员总是早上7点到岗，然后开始每天12~14个小时的工作。现在，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做，每天早上9点就开始工间休息，喝着咖啡，等着总也不来的指令。“没人来找我们要任何东西，我们完全被隔绝了，没人邀请我们参加会议，我们每次不得不为了参加白宫的会议而争取半天，”她回忆说，“我们的晨会都是‘好吧，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谣言？’^[23]这根本没办法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最终，代理副国务卿汤姆·香农（Tom Shannon）告诉大家不妨休息一下，于是克兰西那天早上才乘飞机离开哥伦比亚特区，去看望母亲。

自身也是外交官的副国务卿幕僚长尤丽·金（Yuri Kim）的电话接入了，她说话严肃。“好极了”，她开始说道，语气中暗示着实际上可能不妙。“谢谢大家拨冗。我们刚刚发现^[24]，我们都被要求寻求进一步发展了。”整个副国务卿幕僚团队都在这个电话会议上：五人在“红木走廊”的办公室里，两人在电话上。每个人都立刻同时做出了反应。“怎么（发展）？”他们问道，“为什么？”一个人建议大家应该去找工会，另一个人说应该去找媒体曝光。“你们的任务已不复存在了。”克兰西记得当时听到的话。“谁知道你们是否还会有下一份工作，也许没有。全乱套了，而且一切都突如其来，没有理由。”^[25]

金通常都会强势地捍卫她的团队，这时却变得很机械。大家有48个小时，第二天金会与人力资源办公室相关人员开会，然后告知大家接下来的步骤有哪些。他们应该利用仅剩的一点时间，开始为后续做准备。

电话会议结束后，克兰西挂断电话，转向她的伴侣，傻了一样：“我们都被解雇了。” [\[26\]](#)

像许多年轻的外交官一样，艾琳·克兰西是“9·11”事件之后加入国务院的。她想让世界变得更安全。她在中东驻扎了六年，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被抗议者占领时，她就在大马士革。她曾差一点被绑架。她拿着低薪，每天超时工作。与康特里曼一样，她团队中的外交官不能说被解雇就一股脑地都被解雇，但他们可以从岗位上被解职。这不仅仅是职业挫折，对许多人来说，这还是一个生计能否有着落的问题。外交官是没有加班费的，但是能累死人的岗位会有薪酬差异，副国务卿团队可以有18%的奖金。没有人加入这一行是为了发财，包括奖金在内，克兰西的年薪也就是9.1万美元。但是他们依然指望着这份工作，知道它们有年薪保障。许多人都是一家老小指望着这份收入的。说解雇就解雇，让人感觉肆意妄为，而且对大家的贡献毫无感觉。

整个国务院七楼的办公室当天都在召开相同的紧急会议。负责行政管理工作的副国务卿团队获知，已经有了取代他们最近刚离职的领导的人选，他们也同样需要走人。面临同样情况的还有国务院顾问办公室——有些顾问会被保留岗位，有些则不然。据当天在场的几位人士介绍，玛格丽特·彼得林（Margaret Peterlin）以即将到任的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幕僚长身份，在情人节当天来到国务院顾问克里斯蒂·肯尼（Kristie Kenney）的办公室，与后者进行了首次一对一的谈话。肯尼是一位老资格的大使，也是国务院最资

深的女性官员之一。彼得林向肯尼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她能多快离开？

根据外交系统内部人士的一些粗略估算，当天国务院七楼有一半以上的全职工作人员的工作受到了威胁。到第11个小时，艾琳·克兰西及其副国务卿团队获得了缓刑：代理副国务卿汤姆·香农插手，他们终于存留下来，但其他团队则依然要离开。

当我见到克兰西时，她还穿着T恤和牛仔裤，坐在洛杉矶一家咖啡馆外的阳光下。她仍然有工作，但她回到家乡，盘点自己的生活，考虑下一步。也许她应该竞选公职，她暗自遐想——这可能是现阶段做出改变的更好方法了。最后，她决定留下来，换到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岗位上。像许多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人一样，她没有放弃。但她对自己职业的信心已经动摇了。“国务院的文化已经受到了太多侵蚀。”她感慨道。至少有十几位职业外交官向我表示，国务院已经是一个他们几乎认不出来的机构，他们的专业知识在这里已遭到严重贬值。艾琳·克兰西在午后的阳光中眯起眼睛，停顿了一下。

“我们真的被视为局外人。”^[27]她说。

雷克斯·蒂勒森的团队坚称他们不知道解雇国务院官员的事情。这些解聘案中部分是发生在特朗普过渡团队开始与该部门接触之后，但在蒂勒森被确认为国务卿之前（其他的解聘或试图解雇案，例如克兰西，则发生在蒂勒森被确认为国务卿之后）。2018年初，我向蒂勒森问起康特里曼及强制退休潮时，他盯着我，眼睛一眨不眨，然后说：“我不了解这件事情。”^[28]一个多月后，蒂勒森也离开了：总统善变、国务院混乱的又一位受害者。

在某些方面，世界发生了变化，并把康特里曼和克兰西这些专业外交官甩在身后。反对和诋毁国际主义的民粹主义上一次盛行之时，美国还处于历史的初期阶段。而如今，一股民粹主义浪潮又开始在西

方世界崛起。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外交举措，促成了北约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制的建立，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建制。如今，这种建制早已沦为恶性党派之争的牺牲品。科技进步使外交官的工作变得不再像过去那么有意义和特殊。就向境外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而言，电子邮件比任何大使的效率都高。外交部门的威信和影响力在下降。

对美国外交的一部分怀疑是有道理的。国务院经常动作缓慢、机构臃肿又地盘思想分明。面对从网络恐怖主义到伊斯兰激进势力等诸多对美国影响力的挑战，其结构和训练已然过时。凡是提到“国务院反对”这一概念时，包括白宫在内，很多人都会翻白眼。然而对于一系列复杂的新挑战，例如在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中如何进行文化渗透，如何将朝鲜从核战争的边缘拉回来，如何遏制现代的伊朗谋求地区霸权等，在硬碰硬谈判艺术方面，受过特殊训练的专家仍然不可或缺，即便不断发展的科技和不断上升的军事力量也不可能取而代之。在这些危机中，外交边缘化不是全球性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是一种选择，由一任又一任的民主党以及共和党政府反复做出的选择。

“史无前例”^[29]，《外交政策》杂志及其他一些出版物大声疾呼，它们不约而同地以“攻击”或“开战”来描述特朗普政府对国务院的所作所为。然而看着事态发展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仅将其描述为史无前例都不免失真了。特朗普政府将2001年9月11日以来不断聚集的一种趋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从摩加迪沙（Mogadishu）到大马士革再到伊斯兰堡（Islamabad），美国将民间对话丢到一边，以美国与其他国家军方之间直接和战术性的交易取代了外交工具。在国内，白宫里大多是武将，外交官往往得不到进门参加会议的机会。然而这些外交官是这一专业领域的最后守护者，外交如今虽然日渐式微，但它拯救过美国人的生命，并创造了让世界得以稳定的国际秩序。在世界各地，军人正越来越多地主导谈判、经济重建和基础设施

开发等之前由训练有素的专家来专门负责的工作。结果，一系列不同以往的关系变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在文职人员得不到授权谈判的领域里，军方对军方的交易依旧方兴未艾。美国已经改变己方坐上谈判桌的人员结构，进而也改变了谈判桌另一方出席人员的结构。谈判桌上各方外交人员仍然在场，只不过军方和民间武装人士往往占据更好的席位。

这些关系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出现的，它们在本质上也并不消极。“如果美国的军事实力用得明智且战略精准度高的话，就是一种重要的外交工具。”美国总统乔治·H.W. 布什（老布什）任内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说。他的话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上的鹰派立场。“我总是说‘外交伴随军事威慑展开时，效果才最好’。[\[30\]](#)”问题是如何保持平衡。在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活动中，军事联盟如今已经超越曾经对其形成制衡的文职外交，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些趋势自2001年以来已经愈加明显，然而其根源却更加久远。截至恐怖分子夷平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当代外交的这场危机已经酝酿了至少10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竞选总统时做出的承诺是国内再投资——克林顿的战略顾问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在一份声明中总结出来的，后来它成为克林顿竞选攻势之经久流传品牌的那句“经济啊，傻瓜”。执政后，克林顿迅速着手削减美国政府派驻世界各地的文职人员。1994年，共和党人掌控国会，集保守主义、种族主义和狂热孤立主义倾向于一身的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成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31\]](#)。克林顿的第一任国务卿、已故的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拥护克林顿的政策，并将其概括为“艰难时期的严格预算”。克里斯托弗的继任者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 虽然每每为克林顿参与国际事务的个人承诺进行辩护, 但她也承认, 冷战兴起时 “的确有种我们需要关注国内问题的共识”。

20世纪90年代里^[32], 美国的国际事务预算缩减了30%, 与多年后特朗普政府要求的削减幅度相当。当时发生的情况是^[33]: 国务院撤销了26个美国领事馆, 以及50个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办事处。这些裁撤的时机简直不能再糟了。随着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 美国需要新的前哨阵地来维持该地区的稳定, 并在苏联撤出后的真空地区建立自己的立足点, 以拓展美国的影响力。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美国虽然也确实建立了一些这样的立足点, 但其在该地区拥有的美国使领馆总数还是比冷战时期要少^[34]。甚至保留下来的美国驻外机构也感受到了这种转变——克里斯托弗曾在一次国会的委员会听证中尴尬地表示, 驻北京的大使馆里弥漫着下水道气味, 而在萨拉热窝, 急需接收新闻的外交官不得不凑合着用烧烤架把卫星天线架到屋顶上^[35]。

1999年, 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 (ACDA) 和美国新闻署 (USIA) 双双被关闭, 其各自的职能被压缩且并入业已规模收缩、人手吃紧的国务院。冷战结束了, 这些机构存在的理由也随之而去。美国何时才可能用得着担心核大国崛起, 或者操心如何针对意识形态敌人阴险的宣传机器打信息战呢? 20年后, 伊朗和朝鲜的核抱负以及 “伊斯兰国” 全球招募 “圣战者” 都是美国面临的紧迫国际挑战。但到这时, 经过专业培训并被专门用于应对这些挑战的人员已经被裁撤殆尽了^[36]。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 带给我们视觉上的理解, 他哀叹美国是: “为了眼前的利益^[37], 背弃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过去和未来。” (弗里德曼的观点当然有效, 只是让人禁不住好奇: 这个国家现在到底背朝了哪里? 也许我们在旋转? 姑且认为我们在旋转好了。)

因此，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美国呈现的现实之一是：国务院人手短缺比例高达20%，留下来继续工作的人员受到的培训不足，拥有的资源也不足^[38]。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外交，然而外交已无处可寻。

乔治·W. 布什（小布什）政府忙不迭地再投资。“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39]为国务院提供资源。”时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回忆道。但这是由新型军事化外交政策驱动的增长，得以拨给国务院的资金越来越多地来自“海外应急行动”——专门用于推进全球反恐战争。促进民主，支持经济发展，帮助移民——所有这些使命都被重新包装到新的反恐怖主义行动名下。国务院预算中的“软性”类别^{[40][41]}——与打击恐怖主义的直接目标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项目——都停摆了，且在很多情况下永久地停摆了。另外，国防开支则飙升至历史新高，增幅远远超过国务院预算的温和增长幅度。“国务院从2001年以来已向国防部出让了很多权力”，^[42]奥尔布赖特反思说。

外交官们沦落到政策制定程序的外围，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初期，小布什将权力集中到了白宫，尤其集中到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手下。切尼与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却几乎没有时间留给鲍威尔。“副总统非常有主见^[43]，而且他直接与总统沟通意见”，鲍威尔回忆说。他表示，小布什在白宫的那段时间有“两个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一个由康迪（赖斯，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领导，另一个由副总统领导。任何上报总统的事情在离开康迪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都交到副总统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而我时常会遇到的问题是……接近（总统）在政治上就意味着一切，而且他（副总统）随时都在那里”。这是所有前任国务卿记忆里都曾面对过的挑战，无一例外，只是各自程度不同。“从心理上看，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国务

卿办公室距离白宫有10分钟的车程，而国家安全顾问就在走廊的另一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回忆起他在尼克松和福特两位总统任内分别出任上述两个职务的经历时说，“接近所产生的诱惑[\[44\]](#)是很大的。”

小布什政府任内，这些动态使得国务院甚至被排除在明摆着是纯外交领域的决策之外。鲍威尔在决定已经做出之后，才知道小布什退出国际气候变化《京都议定书》的计划，他恳求赖斯多宽限一些时间，以将这一激进举措告知美国的盟友。他赶到白宫去据理力争时，赖斯告诉他为时已晚。

然而国务院遭到的最深刻的排斥，还是发生在全球反恐战争过程中。势力已然抬升的五角大楼抓住机会，将反恐战争据为独家地盘。由五角大楼主导入侵伊拉克以及其后一段时间内的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之后，小布什将历史上一向属于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主管范围的战后重建以及民主建设活动的主导权，也交给了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中对国防部长汇报的军人。鲍威尔及其国务院下属官员对此提出了审慎意见，却苦于无法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在鲍威尔看来，当时的政策制定过程变得完全专注于战术，而牺牲了战略。“拉姆斯菲尔德先生觉得他有一套与我想法不同的战略，”鲍威尔回忆道，“而他也确实可以在低端和小规模范围内这样做。我担心的可能还是，没错，他10年前把那支军队打得惨败，我也毫不怀疑他们能打到巴格达，但我们那时没有接管这个国家并去经营这个国家。”[\[45\]](#)一位新闻记者后来曾用“陶器谷仓店（Pottery Barn）零售法则”这个短语来概括鲍威尔的想法，不过鲍威尔本人并未使用过这个说法，但是鲍威尔确实告诉过总统：“如果你打碎它，就得买走它。”后来，他长叹了一口气，对我表示，那是“政治加军事上的重大战略失败”。

说得更明确些，应该是一连串的战略失败。五角大楼解散了伊拉克安全部队，让数十万名有武器但没工作的伊拉克年轻人没了约束，为致命的叛乱^[46]奠定了基础。规模40亿美元之巨的指挥官应急计划（Commander's Emergency Response Program）用的是美国纳税人的钱，^[47]基本上就是授权在伊拉克作战的军事指挥官承担美国国际开发署所从事的相关类型的发展项目，然而这些钱中有不少后来被发现直接流入反叛分子手中。在对待地方参战人员的问题上，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48]通常都会应邀提供法律咨询，然而鲍威尔任上的国务院根本没有参与小布什政府扩大军事指挥权限的商议过程——这些做法当中有一部分后来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违宪。

随着伊拉克灾难加剧，碰得满头是包的小布什政府也确实为将额外资源转移到外交和发展上做了努力。白宫承诺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驻外人员规模扩大一倍，并且开始谈论文职和军职部门之间角色的重新平衡，以及授予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一定权限。谈论再平衡更多的是姿态，而不是切实的政策——战争中军方及文职部门领导层之间在拥有资源及影响力方面存在巨大落差，这一点并没有得到矫正——但是在事实证明军事决策有毒^[49]这一点上，理解至少是有了。

教训很快就被淡忘了。在怀旧情绪笼罩下，自由派评论员有时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说成是外交拥趸，与好斗的特朗普有天壤之别。他们记得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座无虚席的礼堂里，提议与阿拉伯世界对话，倡导和平。“伊拉克发生的一切^[50]已经提醒美国，需要尽可能使用外交手段，建立国际共识，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奥巴马在那次演讲中说。尤其是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在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及与古巴关系解冻问题上，展示了几个授权外交官取得成效的例子。在几个到特朗普政府任内已合力对美国外交能力产生破坏的趋势方面，奥巴马政府同样也起到了加速作用，尤其是在其第一任期内。

奥巴马身边的高官职位也同样被退休武将或其他军职官员占据，只是程度比特朗普要低，但他之前的许多任总统都高。奥巴马身边决策层中的武将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吉姆·琼斯（Jim Jones）上将、琼斯手下负责阿富汗事务的副手道格拉斯·鲁特^[51]（Douglas Lute）中将、担任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的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上将，以及先后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上将和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中将。国务院预算增长所需的资金继续来自海外应急行动，且资金也明确流向军事目标。国防开支持续增加。这种趋势是非线性的：自动削减赤字计划——2013年自动生效的联邦开支削减计划——给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都造成了冲击，但国防与外交支出之间的不平衡差距持续拉大。

“国防部的预算总是多很多，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我的意思是说我同意这一点，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

巴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所批准的与外国政府武器交易额是其前任小布什的两倍有余。事实上，奥巴马政府的对外军售额是美国二战后历任政府中最高的。^[52]当我就这些事实向希拉里·克林顿追问时，她似乎有些吃惊。“我不是说它很完美，”她对我说，“正如你所描述的那样，有些决定增加了与之相关的军事承诺。”然而最终，当涉及外交政策军事化问题时，她还是认为奥巴马政府取得的成果是“正确多于错误”。^[53]她以自己参与的阿富汗反恐战略检讨为例，指出这一过程还是强调外交侧重的。然而在国务院和白宫的官员们看来，对阿富汗反恐战略的检讨产生了太多遗憾，本身就是将文职官员排除在核心外交决策过程之外的典型案例。检讨过程中直接发送给希拉里·克林顿，后被公之于众的秘密备忘录中的信息显示，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表面上是总统派去处理阿富汗问题的代表，可用他自己的原话说，这个过程完全被“纯粹的军事思维”^[54]控制了。

小布什政府任内令鲍威尔一筹莫展的白宫内权力争夺，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也变本加厉。奥巴马上任没几天，国家安全顾问琼斯就发誓要扩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影响范围，被蔑称为“后门渠道”的总统与国务卿之类内阁成员之间的沟通^[55]方式将受到限制。高级官员透露，琼斯的继任者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和苏珊·赖斯（Susan Rice）各自都加强了对白宫的控制。

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多边事务主管，后来在奥巴马内阁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她承认外界对奥巴马政府的微观管理倾向存在“一些公正的批评”。“通常情况就是如此”，她回忆说，白宫最高层级之外的任何部门制定出来的政策都“不具备法律效力或主导能量。人们不相信它一旦进入白宫逐层上报程序后，能不被改变”。她说这番话时，我们正坐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附近的酒吧“格伦德尔家的酒窖”（Glendel's Den）中背靠裸砖墙的一角，此时她正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做教授。鲍尔曾是一位有着仁爱之心的战地记者，做过人权法教授，其探讨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抗种族灭绝政策失败的著作获得过普利策奖。长期以来，她是满怀崇敬但又不小心带上性别歧视色彩的颂歌式新闻报道中最受欢迎的主角，这些颂歌式新闻报道还往往以相同的方式展开。鲍尔“大步走过座无虚席的房间，坐了下来。她长长的红发洒下来，披肩一样地环绕住她的肩头”。《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这样描述^[56]。她有着“象牙色的皮肤^[57]，脸上有不少雀斑，一头红发又长又密”，《华盛顿邮报》补充道。“她长长的红头发，”时尚杂志Vogue也附和称，“在联合国大厦充满希望的天蓝色背景^[58]下分外醒目。”尽管萨曼莎·鲍尔自己什么责任都没有，但她的头发在关于她的各种报道和介绍中微光闪烁了10年，直到最终女权主义博客“耶洗别”（Jezebel）恳求道：“别再提萨曼莎·鲍尔飘洒的红发了^[59]。”鲍尔有着能打动对方的恳切的说话方式，以及连珠炮似的说话而不过脑子的倾向，

而后者有时让她在公关时成为麻烦。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她称希拉里·克林顿为“怪物”，令人印象深刻。她还常说“他妈的”。

“那瓶颈就太厉害了，”^[60]她接着说道，“如果美国外交政策即使在很小的方面都必须由副手或首长级别人员做决定，才算是政策的话。”据两位曾经受到过申斥的官员透露，多尼隆的副手，后来成为白宫幕僚长的丹尼斯·麦克多诺（Denis McDonough）会惩戒那些用他的话说企图“跑到界外去涂色”的高级官员。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苏珊·赖斯对除拉丁美洲以外全球几乎所有地区的政策都实施了严格的控制。^[61]赖斯指出，每个政府在白宫管理事无巨细的问题上多有挣扎。“这是各部委永远都会指控的，”^[62]她说，“我的职业生涯中，在国务院工作的时间比在白宫要多，我对这两个机构的情况都非常熟悉。你要能找到一个没有遇到过白宫‘霸王硬上弓’感觉的部委，我绝对很吃惊，而且刮目相看。”

但国务院的一些全职官员表示，在寻求平衡的举措方面，奥巴马政府比之前的政府更经常出错。例子比比皆是。对南苏丹问题的决策已提高到奥巴马以下的“首长”级别，却经常在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或国防部长阿什·卡特（Ash Carter）履行众多同样重要的义务而无法出席会议时停滞不前，而较低级别的官员却没有被授权来填补空缺，因此就只好取消会议另行安排，几个星期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人命关天的事就一直悬而不决。鲍尔承认：“那应该充其量是个副手就能拿主意的决策，因为在不可避免的限制下，对它的决策不太可能持续留在首长级别进行。”

权力集中带来的影响就是白宫以外机构的能力日渐萎缩。“政府机构变得习惯于询问方向或许可”，鲍尔评论道。这时女服务员将一盘咖喱轻轻推到她面前，她往上浇了让人吃惊的一大堆拉差辣酱——在酒吧点咖喱的话，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她继续说

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控制会产生类似于习得性无助^[63]的结果。”鲍尔生性拒绝盲从，她已几乎走遍世界，既是学者，又是政治家。此刻，短暂地，她听起来有些惆怅：“我想其他机构的人感觉到他们无法行动。”^[64]

特朗普和奥巴马这两位总统对白宫进行的控制在某些方面是大相径庭的。一任政府对某些机构严密管理，另一任政府则干脆直接把它们砍掉了。“在以前的政府中”，苏珊·赖斯辩称称，国务院“在官僚主义的粗暴和萧条中挣扎，现在，他们试图杀死它”^[65]。但最终结果是相似的：外交官坐在场边，政策在其他地方制定。

国务院自由落体式的衰落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时代里一直持续。截至2012年，驻外的外交人员职位中，有28%或者空缺，或者由经验、水平还不足以胜任^[66]的低级别员工填补。2014年，绝大多数驻外人员工作履历不足10年，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时，水平还有所下降^[67]。与以往相比，他们当中胜任领导岗位的人的比例更小：1975年，超过一半的外交人员被提升到了高级职位；到2013年，只有1/4的人获得提升^[68]。这个几十年前还从美国各高等院校和私营部门吸引最优秀人才的职业，如今即便不是正在走向死亡，也是百病缠身。

每个仍然健在的前国务卿都为这本书接受了采访，其中许多人对外交部门的未来表示担忧。“美国必须进行全球外交”，乔治·舒尔茨（George P. Schultz）说。我们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进行这场谈话时，他已经97岁了。舒尔茨认为，国务院人手极端不足，已很难承受一届又一届政府不断变化的奇思妙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刚刚在亚洲建立了枢纽，中东就爆发乱子了，同时俄罗斯又侵入了乌克兰……所以你必须进行全球外交^[69]。这意味着你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外交团队，以及永久在那里的人。”

亨利·基辛格表示，历史的曲线发展让外交部门日渐孱弱，使平衡进一步偏向军方领导层。“问题在于选择关键顾问时是否在一个方向上加载过多，”基辛格沉思道，“怎么说呢，有很多理由这样做。其一，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比以前少了。其二，你可以争辩说如果你向国防部下达一项命令，就会有80%的可能性得以执行；如果你向国务院下达一项命令，则会有80%的可能性进入讨论^[70]。”这些效能上的不平衡在战争时期会不可避免地加深。“当这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它（权力）会向白宫和五角大楼转移，”康多莉扎·赖斯对我表示，“而这一点，我认为，也很自然。”赖斯的话反映了一种贯穿多届政府的共性思维。“多种情况瞬息万变，”她论辩道，“没时间走官僚程序^[71]……它就不具备与正常情况下你所看到的平稳发展过程相同的特征。”

但是，到特朗普政府开始在国务院裁撤人员时，距离美国外交政策的“正常时期”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这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新现实。赖斯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官僚机构已老态龙钟，在紧急情况下行动已过于迟缓——往往是写实的。然而，靠无情地集中权力来避免破败官僚主义的低能，而不是改革机构以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会开启恶性循环。随着国务院在紧急情况永远不断的世界上用处不断减少，五角大楼在资金、权力和威望上使任何其他机构都相形见绌，又鉴于白宫本身也充满了前任将军们，美国正一步步地将外交解决能力抛到脑后，甚至都不让它“进屋”。

“我记得科林·鲍威尔曾经说过，占领日本的任务不是由外交官完成，而是由将军执行是有原因的，”赖斯说，“在那种情况下，你必须更多地向五角大楼倾斜。”^[72]但正如让外交官去执行占领日本任务是一种荒谬的做法一样，由军人去进行条约谈判和经济重建也是一种矛盾，而且是有着可疑记录的矛盾。

重点不是说旧的传统外交机构能够解决今天的危机。重点是我们正在目睹这些机构遭受破坏，却没考虑设计现代替代品。前任国务卿们在如何解决美国的外交机构摇摇欲坠问题上意见相左。作为一贯的鹰派，基辛格在承认国务院的衰落时只是耸了耸肩，说：“任凭谁现在到国务院里走一圈，都会发现那么多办公室空着，对这一现实我当然感觉不舒服。”我们谈话的时候，基辛格已经94岁了。他佝偻着坐在他纽约办公室的宝蓝色沙发上，从眉毛下边盯着我。因为皱眉太多，他的眉心有着清晰的恼怒纹。他仿佛是在从无限远的时空以外审视眼前的问题，甚至他的声音，那低沉的带着巴伐利亚锉刀般质感的声音，也像是穿越了数十年的岁月，仿佛录制于尼克松的椭圆形办公室。“的确，国务院人手不足。的确，国务院没有得到它认为应得的东西。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新机构出现了^[73]。”不过在我采访基辛格时，已经是特朗普执政时期，却还没有新的机构出来，像外交机构曾经为美国所提供的功能那样，进行同样深思熟虑、综合完整，同时不受军事紧急情势束缚的外交政策分析。

希拉里·克林顿则在2016年竞选总统失利的一年后仍显得疲惫，她向我表示，她注意到这种转变已经多年了。她在奥巴马执政初期就任国务卿时，“我开始打电话给我以前做参议员和第一夫人时就认识的各国领导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他们所看到的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军事化，以及（小布什政府）对恐怖主义，当然还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等重要问题的极为狭隘的关注，感到苦恼。我认为现在这种平衡已经在各种问题上全方位地进一步向军事化方向倾斜”，她说。“外交，”她补充道，“站到了枪口下。”^[74]她的话表达了民主党与共和党前国务卿的共同情绪。

这些都不是原则问题。这里描述的变化正实时地产生降低世界安全水平、阻碍世界繁荣的结果。它们已然迫使美国更深地陷入或许本可以避免的军事行动当中，已然给美国人的生活以及美国在全世界的

影响力带来了高昂的代价。本书接下来所做的是把危机描述出来。它讲述了一个拯救生命的专业被政治怯懦撕裂的故事，也描述了我自己作为国务院官员在阿富汗及其他地方看着衰落发生，看着它给美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给这一职业最后而伟大的捍卫者们的生活带来变迁的经历。本书同时也放眼观察了那些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由军人和间谍结成的现代联盟，以及这些关系让美国付出的代价。

总之，这是关于美国在世界各国中角色转变的故事，以及关于老旧的吱嘎作响的机构中寡不敌众的公务员拼尽全力，保住一种国家职能存活下去的故事。

[1] *The Laws of Manu*, Translated by George Bühler, Amazon Digital Services LLC, 2012, loc. 1818, Kindle.

[2] Conversation with a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Who Requested Anonymity Due to the Critique of Embassy Security Implicit in the Remark, 20 February 2012.

[3] Goldschmidt, Pierre, “A Realistic Approach toward a Middle East Free of WMD, ”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7 July 2016, carnegieendowment.org/2016/07/07/realistic-approach-toward-middle-east-free-of-wmd-pub-64039.

[4]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5]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6]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7] “The Case of Thomas Countryman, ” *Seattle Politics Google Group*, 26 February 2017,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topic/seattle.politics/hVTxKDgCdbU>.

[8] “Former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Rocks Bodacious Mullet on MSNBC, ” *Washington Free Beacon*, 1 February 2017,

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former-assistant-secretary-of-state-rocks-bodacious-mullet-on-msnbc/.

[9]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10]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11]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12]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13] Gharib, Malaka, “From AIDS to Zika: Trump on Global Health and Humanitarian Aid, ” NPR, 9 November 2016, <https://www.npr.org/sections/goatsandsoda/2016/11/09/501425084/from-aids-to-zika-trump-on-global-health-and-humanitarian-aid> and Clarke, Hilary et al., “Alarm Bells Ring for Charities as Trump Pledges to Slash Foreign Aid Budget, ” CNN, 1 March 2017, www.cnn.com/2017/02/28/politics/trump-budget-foreign-aid/index.html.

[14]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15]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16]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17]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18]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19] 班加西（Benghazi）是利比亚东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2012年9月11日晚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外发生了大规模反美示威游行，领事馆遭受武装袭击，造成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身亡，为1979年以来的首次。此事件也成为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职业生涯中的一大污点。——译者注

[20]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21]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22] Author Interview with Erin Clancy in Los Angeles, 1 June 2017.

[23] Author Interview with Erin Clancy in Los Angeles, 1 June 2017.

[24] Author Interview with Erin Clancy in Los Angeles, 1 June 2017.

[25] Author Interview with Erin Clancy in Los Angeles, 1 June 2017.

[26] Author Interview with Erin Clancy in Los Angeles, 1 June 2017.

[27] Author Interview with Erin Clancy in Los Angeles, 1 June 2017.

[28] Author Interview with Rex Tillerson, 4 January 2018.

[29] Gramer, Robbie, De Luce, Dan, and Lynch, Colum, “H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roke the State Department, ” *Foreign Policy*, 31 July 2017, foreignpolicy.com/2017/07/31/how-the-trump-administration-broke-the-state-department; Chalfant, Morgan, “Trump’ s War on the State Department, ” *The Hill*, 14 July 2017, 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341923-trumps-war-on-the-state-department and See, e.g., Dreyfuss, Bob, “How Rex Tillerson Turned the State Department into a Ghost Ship, ” *Rolling Stone*, 13 July 2017, 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features/rex-tillerson-turned-the-state-department-into-a-ghost-ship-w492142.

[30] Author Interview with James Baker, 22 January 2018.

[31] Konyndyk, Jeremy, “Clinton and Helms Nearly Ruined State, Tillerson Wants to Finish the Job, ” *Politico*, 4 May 2017, 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7/05/04/tillerson-trump-state-department-budget-cut-215101.

[32] “A Foreign Affairs Budget for the Future: Fixing the Crisis in Diplomatic Readiness, ” Stimson Center, October 2008, https://www.stimson.org/sites/default/files/file-attachments/A_Foreign_Affairs_Budget_for_the_Future_11_08pdf_1.pdf.

[33] “A Foreign Affairs Budget for the Future: Fixing the Crisis in Diplomatic Readiness, ” Stimson Center, October 2008, https://www.stimson.org/sites/default/files/file-attachments/A_Foreign_Affairs_Budget_for_the_Future_11_08pdf_1.pdf.

[34] Lippman, Thomas, “U.S. Diplomacy’ s Presence Shrinking, ” *Washington Post*, 3 June 199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6/06/03/us-diplomacys-presence-shrinking/4d1d817e-a748-457d-9b22-1971bb1cb934/?utm_term=.d3faf19815ad.

[35] Lippman, Thomas, “U.S. Diplomacy’ s Presence Shrinking, ” *Washington Post*, 3 June 199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6/06/03/us-diplomacys-presence-shrinking/4d1d817e-a748-457d-9b22-1971bb1cb934/?utm_term=.d3faf19815ad.

[36] “The Last Time @StateDept Had a 27% Budget Cut, Congress Killed A.C.D.A. and U.S.I.A, ” *Diplopundit*, 31 March 2017, <https://diplopundit.net/2017/03/31/the-last-time-statedept-had-a-27-budget-cut-congress-killed-acda-and-usia/>.

[37] Friedman, Thomas, “Foreign Affairs; the End of Something, ” *New York Times*, 26 July 1995, www.nytimes.com/1995/07/26/opinion/foreign-affairs-the-end-of-something.html.

[38] “A Foreign Affairs Budget for the Future: Fixing the Crisis in Diplomatic Readiness, ” Stimson Center, October 2008, https://www.stimson.org/sites/default/files/file-attachments/A_Foreign_Affairs_Budget_for_the_Future_11_08pdf_1.pdf.

[39]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 in Washington, D.C., 29 August 2017.

[40] “软性”类别，例如，经济支持基金（ESF）从2001财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2017财年的61亿美元，增加额度总计38亿美元，其中37亿美元来自“海外应急行动”。同样，“海外应急行动”的款项增长几乎占据了国际灾害援助的所有款项增长——该项拨款从2.99亿美元增加到20亿美元。同样的趋势也反应在移民和难民援助预算的增长（从6.98亿美元至28亿美元）中。与此同时，美洲国家基金会、非洲发展基金会和其他“软性”预算类别未见增长。信息来源：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Operations, and Related Programs: Fiscal Year 2017,”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Foreign Operations, Fiscal Year 2002,”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作者注

[41] For Example, Economic Support Funds (ESF) Tripled from \$2.3 Billion in Fiscal Year 2001 to \$6.1 Billion in FY 2017, with \$3.7 Billion of \$3.8 Billion Increase Coming from OCO. Similarly, OCO Accounted for Nearly All of the Increase in International Disaster Assistance, Which Rose from \$299 Million to \$2 Billion. Same Goes for the Increase in Migration and Refugee Assistance Budget (\$698 Million to \$2.8 Billion). At the Same Time, Inter-American Foundation, Africa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Other “Soft” Budget Categories Flatlined,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Operations, and Related Programs: Fiscal Year 2017,”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and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Foreign Operations, Fiscal Year 2002,”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42] Author Interview with Madeleine Albright, 15 December 2017.

[43]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 in Washington, D.C., 29 August 2017.

[44] Author Interview with Henry Kissinger, 4 December 2017.

[45]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 in Washington, D.C., 29 August 2017.

[46] Konyndyk, Jeremy, “Clinton and Helms Nearly Ruined State, Tillerson Wants to Finish the Job,” *Politico*, 4 May 2017, 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7/05/04/tillerson-trump-state-department-budget-cut-215101.

[47] Lake, Eli, “SIGIR Audit Finds Some U.S. CERP Funds Went to Insurgents in Iraq,” *Daily Beast*, 29 April 2012, www.thedailybeast.com/sigir-audit-finds-some-us-cerp-funds-went-to-insurgents-in-iraq.

[48] *Boumediene v. Bush*, 553 US 723 (2008).

[49] Konyndyk, Jeremy, “Clinton and Helms Nearly Ruined State, Tillerson Wants to Finish the Job,” *Politico*, 4 May 2017, 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7/05/04/tillerson-trump-state-department-budget-cut-215101.

[50] “Text: Obama’s Cairo Speech,” *New York Times*, 4 June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6/04/us/politics/04obama.text.html>.

[51] “Donald Trump Would Have the Most Generals in the White House Since WWII,” *ABC News*, 8 December 2016, <http://abcnews.go.com/Politics/donald-trump-generals-white-house-world-war-ii/story?id=44063445>.

[52] Weisgerber, Marcus, “Obama’s Final Arms-Export Tally More than Doubles Bush’s,” *Defense One*, 8 November 2016, www.defenseone.com/business/2016/11/obamas-final-arms-export-tally-more-doubles-bushs/133014 and Farid, Farid, “Obama’s Administration Sold More Weapons Than Any Other since World War II,” *Vice News*, 3 January 2017, https://motherboard.vice.com/en_us/article/qkjm vb/obamas-administration-sold-more-weapons-than-any-other-since-world-war-ii.

[53] Author Interview with Hillary Clinton, 20 November 2017.

[54] “Subject: At the Crossroads, ” Memo from Richard Holbrooke to Hillary Clinton, 10 September 2010, See Detailed Discussion Infra.

[55] DeYoung, Karen, “How the Obama White House Runs Foreign Policy, ” *Washington Post*, 4 August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how-the-obama-white-house-runs-foreign-policy/2015/08/04/2befb960-2fd7-11e5-8353-1215475949f4_story.html?utm_term=.ffae45cd1509 and DeYoung, Karen, “Obama’ s NSC Will Get New Power, ” *Washington Post*, 8 February 2009,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2/07/AR2009020702076.html.

[56] Buckley, Cara, “A Monster of a Slip, ” *New York Times*, 16 March 2008, www.nytimes.com/2008/03/16/fashion/16samantha.html.

[57] Roig-Franzia, Manuel, “Samantha Power: Learning to Play the Diplomat’ s Game, ” *Washington Post*, 4 April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magazine/samantha-power-learning-to-play-the-diplomats-game/2014/04/03/1ea34bae-99ac-11e3-b88d-f36c07223d88_story.html.

[58] Sullivan, Robert, “Samantha Power Takes on the Job of a Lifetime as Ambassador to the UN, ” *Vogue*, 14 October 2013, www.vogue.com/article/samantha-power-americas-ambassador-to-the-un.

[59] Carmon, Irin, “Enough with Samantha Power’ s Flowing Red Hair, ” *Jezebel*, 30 March 2011, www.jezebel.com/5787135/have-you-heard-about-samantha-powers-flowing-red-hair.

[60] Author Interview with Samantha Power, 10 July 2017.

[61]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Senior Official.

[62] Author Interview with Susan Rice, 19 January 2018.

[63] Author Interview with Susan Rice, 19 January 2018.

[64] Author Interview with Samantha Power, 10 July 2017.

[65] Author Interview with Susan Rice, 19 January 2018.

[66] Davidson, Joe, “Gaps Persist in Midlevel Foreign Service Positions, ” *Washington Post*, 16 July 201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federal-eye/post/gaps-persist-in-midlevel-foreign-service-positions/2012/07/16/gJQAHEdwoW_blog.html?tid=a_inl&utm_term=.7eccb98aeeld.

[67] “Five Year Workforce and Leadership Succession Plan FY2016 to FY2020, ”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Human Resources, September 2016,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62725.pdf>.

[68] “American Diplomacy at Risk, ” American Academy of Diplomacy, Reprint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 April 2015, <http://adst.org/american-diplomacy-at-risk>.

[69]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orge P. Shultz, 19 January 2018.

[70] Author Interview with Henry Kissinger, 4 December 2017.

[71]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 3 August 2017.

[72]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 3 August 2017.

[73] Author Interview with Henry Kissinger, 4 December 2017.

[74] Author Interview with Hillary Clinton, 20 November 2017.

第一部 最后的外交官

巴基斯坦，2010年

你要不说钱的事儿，我没工夫扯闲篇儿

你知道你说的弱爆了，没劲犯不着再说了

——DR. DRE，《日常生活》（与纳斯、纳蒂尔合作专辑）

1 美国神话

外交官并不总是濒危物种。尊敬这一职业的人指出，外交曾蓬勃兴盛，由走向世界的划时代人物主持，他们的成就依然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基石。外交故事是美国创世神话的一部分。没有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与法国的谈判，就不会有美法《联盟条约》，也不会有确保美国独立的海军支持。没有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约翰·杰伊（John Jay）谈判的《巴黎条约》，就不会有与英国战争的正式终结。如果出身于马萨诸塞州中等地位家庭的亚当斯没有前往英格兰，没有在国王乔治三世的王庭上作为美国第一位外交官递交国书，新生的美国或许就不可能形成战后与英国的稳定关系。即使在19世纪，当外交官薪水低得难以维持生计，国会还在国务院头上增加了从维持铸币厂运作到公证官方文件等一系列内政事务的情况下，国务院仍然划定了现代美国的版图，完成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的谈判，且解决了与英国在美国、加拿大边境问题上的争端。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注意力转向内部并为大萧条所困，时任的美国国务卿们仍然策划了旨在限制海军军备的华盛顿海军会议（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以及主张放弃战争和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巴黎非战公约》^[1]（Pact of Paris），这一公约为日后凝聚起反轴心联盟打下了基础。

历史上，美国政客一直在利用一丝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制约外交政策。一位19世纪晚期的国会议员指责外交官“通过创造对外国习俗和外国愚行的渴望，把我们自己推向毁灭。这种疾病是由我们那些回国的外交官和被他国君主或暴君派来我国的大使带来的，它会腐蚀和摧毁我们的美国理想”。这位议员建议圈禁从驻外任务中回国

的外交官，“就像我们因为害怕霍乱^[2]而隔离检疫外国乞丐一样”。然而伟大的外交成就总能跨越这些敌意。

这种情况没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清楚的了，当时美国国务院适应了时局的挑战，开启了美国历史上最富有外交成果的时代。国务院当时面临的存在危机的程度不亚于2017年开始的这场挑战。“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在这一时刻，迫切地需要也极度地缺乏一个足以塑造国家未来的国务院。”《圣路易斯快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在1943年的一篇报道中如是大声疾呼。这句话如果日后用到对特朗普执政时期国务卿们的报道中，也十分贴切。然而反响却是天壤之别：1940~1945年，国务院进行了现代化改革，员工数量增加了两倍^[3]，预算增加了一倍；它进行了重组，建立了从事长期规划和战后重建的办公室，以及专门应对大众媒体时代快速变化的公共信息办公室。

由雄心勃勃的新一代外交官领导的现代化国务院塑造了新的国际秩序。那些年间，美英之间伟大的战时同盟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斡旋下结成。同一时代，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通过谈判，成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时代还产生了定义美国未来几十年间与苏联接触政策基调的“遏制”学说。构建这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中有六个互为好友，他们后来共同被奉为“智者”，其中两位是身为外交服务团队成员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查尔斯·博伦（Charles Bohlen）。当时的外交服务团队还是新成立的专业外交官机构。在战后的岁月里，“智者”引导杜鲁门总统实行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政策，承诺美国支持其他反苏联国家，以及大规模推进马歇尔计划，以向这些国家提供国际援助。同一时间框架内还产生了北约，它是由重新焕发活力的国务院中另一位成员——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支持成立的。

“智者”的时代远非完美。他们有些最著名的想法也是错误和痛苦的代名词。例如，尽管凯南提出了警告，但遏制仍被拿来当作军备升级和冲突的理由，奠定了冷战格局^[4]。“尽管我喜欢阅读《创世亲历记》（*Present at the Creation*），”约翰·克里谈到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长达800页的国务院岁月详尽回忆录时说，“或许历史和一些距离告诉我们，艾奇逊和杜勒斯出于一种笃定和一种世界观，犯了一些错误，让我们在很长时间里付出代价，至少是在某些地方？在我这一代人中，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和我都知道，本应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让我们大量的朋友战死在了越南^[5]。”

然而“智者”在稳定世界方面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其影响力经久不衰。他们那种声望的外交官，以及他们所从事的老派外交，如今比起70年前或50年前，哪怕20年前，都似乎更难找到了。“是人，是角色，还是时代？”克里思考说，“我看到一些真正一流的外交官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也许我们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表彰政府里的人了吧？”

亨利·基辛格认为，更为广泛的转变已然出现，即产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国务院及其对整个官僚体系的相应影响，还有美国人民的哲学。我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是有着比“智者”甚至还多侧面的复杂传奇人物：在某些圈子里，他被视为强势外交官的典范；而在其他人看来，他应该因为轰炸柬埔寨而成为战犯（他对这一点也非常清醒：他在我问到争议性话题时，试图结束采访）。这也许正是基辛格倾向于普遍性和哲学性说法的原因吧。他认为，策略战胜了战略，快速反应战胜了历史化的决策制定。“美国亘古不变地专注于解决眼前出现的任何问题，”基辛格说，“我们在外交政策执行领域里，经验丰富者的数量不足，但更重要的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将外交政策视为一个历史过程。”

这就是代表外交官职业标准的最后一批标杆性人物所面对的状况，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与寻求政治权宜之计和军事效率的政府格格不入。基辛格点到了奥巴马政府与其麾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之间的对抗：军人在掌控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为寻求意见表达而进行一场斗争，而且是用越南战争的教训给一个迷恋创新的政府上课。“他想要开始一些新的东西，他想要应用过去学到的经验教训。”基辛格谈到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时这样说。在霍尔布鲁克之前，其他外交官也在类似的对抗中失败过。在他之后，失败的更多。然而有关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的故事，尤其是他最后一次任务“解体”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对他周围外交官生活的毁灭性影响，在我们即将放弃一个曾经拯救过我们的职业之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一窥何所失的窗口。“美国的一大神话，[\[6\]](#)”基辛格补充道，他的语速很慢，“就是你总能尝试些新东西。”

[\[1\]](#) “Diplomatic Gain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State Department,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s://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short-history/concl> and “A Return to Isolationism,” State Department,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s://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short-history/return>.

[\[2\]](#) “A Foreign Policy of Inaction,” State Department,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s://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short-history/inaction>.

[\[3\]](#) “Embarrassment Brings Change,” State Department,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s://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short-history/embarrasment>.

[4] Rojansky, Matthew, “George Kennan is Still the Russia Expert America Needs, ” *Foreign Policy*, 22 December 2016, [foreign-policy.com/2016/12/22/why-george-kennan-is-still-americas-most-relevant-russia-expert-trump-putin-ussr/](https://foreignpolicy.com/2016/12/22/why-george-kennan-is-still-americas-most-relevant-russia-expert-trump-putin-ussr/).

[5]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 21 November 2017.

[6] Author Interview with Henry Kissinger, 4 December 2017.

2 塔利班夫人

停电了，这在伊斯兰堡是经常的事。房间黑了下来。但笔记本电脑还有电，于是我来会见的这位人权活动人士把电脑屏幕转过来让我看。屏幕上闪烁着一段视频——从远处偷拍的画面，摇摇晃晃的。六名被蒙住眼睛、反绑着双手的年轻男子，跌跌撞撞地在林子里行进。他们身上的衣服是典型老百姓穿的库尔塔——南亚人日常穿的无领长袖宽松衬衫，看起来不像战士。身着巴基斯坦军队制服的士兵把这些年轻人带到一片空地上，让他们背靠一垛石墙站成一排。

一个年长一些、留着胡子的军官，也许是指挥官，走到每个年轻人跟前，一个接着一个。“知道‘清真言’吧？”他问道，指的是穆斯林归真前忏悔诵读的经文。他走向空地的另一端，加入站在那里不止六个士兵的行列。他们站成了执行枪决的队形。“一个一个的，还是一起？”一个士兵问。“一起。”指挥官说。士兵们端起了步枪——巴基斯坦军队的标准装备G3步枪——瞄准，射击。

穿库尔塔的人倒在了地上。几个还活着，在地上呼号扭动。一个士兵走过去，朝每个身体补枪，地上的人一个一个地没了声音。

视频结束后有片刻时间，没人说话。街道上汽车驶过的叮当声透过旁边的窗户钻进来，很清晰。终于，人权活动人士问道：“你现在想怎么办？”

视频令人震惊，但它的存在并不让人意外。那是2010年，在巴基斯坦，美国最重要的反恐伙伴关系之所在。“基地”组织（Al-Qaeda）首领们逃过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在巴基斯坦边境无人看管、空气稀薄的荒山野岭中蒸发了。这是反恐战争以及追捕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核心战场。我作为刚刚加入美国国

务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团队的新人，负责与经济发展和人权组织对话。我发现该地区的外交活动有点演哑剧的感觉。无论是建造水坝还是改革教育，每次谈话事实上都是围绕反恐的：保持让巴基斯坦人开心，以便让其愿意加入战斗，并允许我们的物资过境送到驻阿富汗的美军手里。但通常情况下，巴基斯坦人不愿意（在美国人看来）或没有能力（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扫除本国的恐怖主义据点。

前一年的秋季出现了一次罕见的成功——巴基斯坦部队在史瓦特河谷（Swat Valley）的乡村地带发动进攻，夺取了控制权，并俘获了塔利班武装分子。但之后不久，有关这次成功到底带来了何种后果的谣言便开始流传。大众中流传的说法是，随着史瓦特河谷军事行动开始，新一波的处决潮也很快出现。到2010年夏季，人权观察组织

（Human Rights Watch）对238起据称的处决案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至少有50起高度确凿。按照与政府中的其他事务处理方式一样，这些处决案甚至还有缩略称谓^[1]：EJK，即“法外杀戮”。这个问题很复杂。在巴基斯坦农村，法庭和监狱更多是人们的渴望，而不是现实。一些巴基斯坦军队部门认为，不经法律审判程序的即刻处决是处理他们所捕获的极端分子的唯一实用办法，但这种策略也证明被用来处理过越来越多的持不同政见者、律师和记者。巴基斯坦的军事人员被诱导着承认这个问题时，也痛苦地指出，是美国逼着他们铲除一些坏人，然后在他们除掉其他坏人时又有诸多抱怨。

杀戮是巴基斯坦与美国关系中异常敏感的一点。就巴基斯坦人而言，那是尴尬；对美国人来说，是一马勺坏一锅汤。美国纳税人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为巴基斯坦提供了价值197亿美元的军事和民间援助^[2]，揭露出来的这些杀戮提高了非意愿审查的可能性。

我把这一视频的消息，以及人权组织不断高涨的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报告给了国务院内部各相关部门。结果让人无语。官员们赶紧

着手找报告中涉及的人权组织开会，寻求灭火；国务院默许在华盛顿对人权观察组织进行了唯一的一次简报会，当时国务院内部的理解是，我们将不允许对方提出针对美国政府的任何问题，而且我们的评论仅限于“非常泛泛的新闻指导”。一位有着严谨举止和空泛笑容的职业官员在就此主题发给我的邮件回复中，提出了如下令人愉悦的建议：

发送时间：周一，2010年3月8日 下午4：43

主题：回复：法外杀戮/人权观察会议请求

一个建议：相对于具体使用EJK（法外杀戮）一词，我们一直试图在“严重侵犯人权”（摘自《莱希法案》条款的法定语言）框架下解决这些问题。使用《莱希法案》措辞的一个优点是它涵盖了美国政府关注的范围广泛的施虐行为（包括EJK）；另一个原因是它也涵盖了叛乱分子以及政府部队和机构所犯的虐待行为。额外的好处是它有助于将“公开”会议与敏感的政策讨论隔离开来。

只是外交服务中的一个措辞调整。

她所提到的法规是以其发起人、佛蒙特州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命名的，它禁止美国向从事暴行的外国军事单位提供援助。我把这一往来的邮件转发给了一位同事。“哦，我的天，这简直就是1994年前后卢旺达局势新闻发布会时的感觉！？”我写道，指的是当年在卢旺达危机期间，美国官员为了避免使用“种族灭绝”一词的“措辞调整”。

几个月后，我在会议桌上把一份档案推给梅兰妮·弗维尔（Melanne Verveer）——希拉里·克林顿任命的全球女性问题无任所大使。我们都在伊斯兰堡访问，她问到过人权组织都说了什么。我打印了部分有关人权组织的说法的文件——没有分类，只是公开文件。不过，我在措辞上保持了委婉。

“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出现飙升。”

“你说‘严重侵犯’时？……”她快速地翻阅着文件说。

“处决。”

那是6月，伊斯兰堡一年中最热的月份。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这个房间很小，气氛感觉亲密。我们两人的对面是派驻该使馆的一位外交官——职业外交官罗宾·拉斐尔（Robin Raphel）大使，她瞪着我。这个话题刚提起时，她给过我一个警告的眼神。现在她嘴唇紧闭，双目逼视着我的眼睛，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指关节像大理石一样白。她在1994年美国对巴基斯坦援助出现飙升时，开始监督这项工作。此时，她已然盛怒。

那个星期早些时候，使馆工作人员和当地人聚集在位于伊斯兰堡安全“红区”内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官邸外。伊斯兰堡坐落在茂密森林覆盖的马尔加拉山（Margalla Hills）脚下，市内宽阔街道两旁布满了桉树和松树。2010年6月，公园里和草坪上到处都开满了白色剑兰和紫菀花。到了晚上，豪华街区里充斥着各种文化活动。伴随战争在附近肆虐，一群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官、记者和救援工作者在珠光宝气的鸡尾酒会上相聚，低声交谈政治圈秘闻。

罗宾·拉斐尔多年来都是这些聚会活动上的固定参加者，自她几十年前开始在巴基斯坦工作以来一直如此。对很多当地人来说，她就是“罗宾”。

那晚在大使官邸，她如鱼得水，跟一群参加派对的人聊了很久。她颧骨高，体态挺直，有股贵族气质，金色的头发在脑后拢成一个紧凑的法式盘发。她说话口型开合不大，清晰的中大西洋口音使她有种20世纪40年代电影明星的韵味。她像往常一样，披了一条刺绣羊

绒披肩，只搭在一个肩上向后垂着，这让她的西装裙看起来有点像当地妇女穿的富有飘逸感的纱丽克米兹（Salwar Kameez）。

自那天会议室之后，拉斐尔就尽一切所能，给那位回答人权问题的初级外交官——就是我——以教训。实在不能把我排除在会议门外时，她也会饶有兴致地打断我说话。那晚在聚会上，她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快。“你怎么敢提起——”说到这儿，她刻意压低了声音，“在这个使馆的会议上提EJK。”她的嘴唇颤抖着，“你在这个问题上一钱不值”。

我想知道她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美国在巴基斯坦所扮演角色的批评而感到沮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讨厌我这个人。我尽量保持恭敬并解释说，国务院已经采取了承认人权报告之存在的政策，尽管我们没有对报告内容予以证实。“好吧，华盛顿的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手指摸着她脖子上的珍珠项链，“这里不是华盛顿。我们在这儿是不讨论这个问题的。”

此时离国务院“红木走廊”大清洗还有三年时间，但在这样的国家安全热点中，你可以实时地看到权力正从外交官手里消失。巴基斯坦的情况完美地诠释了这一趋势：数十年来，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绕过美国的文职外交政策系统，直接与巴基斯坦军事和情报领导人开展业务。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岁月里，他们在这方面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自由度。站在伊斯兰堡温暖的夏日里，我望着罗宾·拉斐尔，她如此热衷地回避有关巴基斯坦军方，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军方有任何瓜葛的棘手问题。在这个外交角色已有很多部分正被砍掉或转至他人之手的时候，她是怎样看待她的角色的呢？19世纪那些权威人士建议隔离外交官，以免后者带着打了折扣的忠诚度回国时，他们所指的就是今天这种情况吗？这是痼疾，还是新病？

几十年来，罗宾·拉斐尔身体力行老派外交的传统。罗宾·拉斐尔的闺名是罗宾·林恩·约翰逊（Robin Lynn Johnson），她在华盛顿州一个以伐木为经济支柱的静谧小镇^[3]出生长大，翻遍了她父亲收藏的《国家地理》杂志，梦想着有一天走进更广阔的世界。在马克·莫里斯高中（Mark Morris High）上学时，她被选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她身上有种世故的感觉”，一位同学回忆道。在大学期间，她一有机会就去旅行，跟着一个教会团体在德黑兰度过了一个夏天，然后大三又选择到海外学习一年，就读于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

“你还信教吗？”我有一次问她。她轻蔑地哼了一声，这在她看来似乎是个荒谬的问题。“你什么意思，‘我还信教吗’？”她厉声说道。追问下，她不屑地挥了挥手：“我不会说是或者不是。”罗宾·拉斐尔恐怕就算有时间信教，也没时间与我分享。她是坚定的实用主义者，并以此为荣^[4]。

大学毕业后，她又在剑桥大学学习了一年，遇到一群让她着迷的美国同胞，他们各自也都有着国际梦想，并且都在年级毕业册上名列前茅。那时正是越南战争交战正酣时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宿舍里，到处都是关于美国在代理人战争问题上铸成大错的辩论。当时的情形，与几十年后对罗宾·拉斐尔的生活产生灾难性影响的另一场战争之间，有着怪诞的相似之处：新一届政府面对诸多难题，包括公众业已疲惫，合作伙伴的军方实则不合作，以及恐怖分子倚仗在技术上很难把守的边境线以外拥有避难所，随时出没发动叛乱等。

当时还姓约翰逊的拉斐尔，开始同年轻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获得者、同为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毕业生的弗兰克·阿勒（Frank Aller）约会^[5]，并与他的室友们关系不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记者和副国务卿的斯特罗布

• 塔尔博特 (Strobe Talbott)，以及一位抱负远大的政治家，名叫比尔·克林顿^[6]。在北牛津莱克福德 (Leckford) 路46号不大的房子里，这几个朋友会花几个小时为服兵役的威胁发愁。克林顿和阿勒都被归类为“1-A”——适宜入伍——并且都反战。克林顿考虑了各种躲避兵役的策略^[7]，最终决定一个都不付诸行动，因为如他所言，要“保持我在体制内的政治生存能力”。阿勒为了躲开征兵而留在了英格兰，并为此产生的污点而不能原谅自己。一年后，他回到家乡华盛顿州的斯波坎 (Spokane)，将一把.22口径的史密斯威森 (Smith&Wesson) 手枪伸进嘴里，打爆了自己的头。

我问拉斐尔，阿勒在他们约会之后那么快就死了，他的死对她有什么影响。“哦”，她说，好像我问的是开车碰上追尾的感受。“我非常沮丧，那还用说！”她停顿了一下，意识到自己语气给人的感觉。“正如你无疑已经注意到的，我热衷于冷静。”^[8]罗宾·拉斐尔并不打算让情感成为她在世界舞台上生活的障碍，在学生时代，她就已经开始打造自己这方面的技能了。接下来的岁月里，她的轨迹将从德黑兰到伊斯兰堡，再到突尼斯。

在那段旅程中，拉斐尔的批评者并未分享她的冷静。职业生涯结束时，她被指控为叛国者、变节者和恐怖主义同情者。在印度媒体上，她被人们欣喜地称为“塔利班夫人”。拉斐尔令人震惊的人生最低谷出现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我们在伊斯兰堡交锋四年后，拉斐尔回到了她在国务院一楼的工位，即在汪洋一片用挡板隔开的办公桌当中，在食堂不远处的一个。她查阅了电子邮件并参加了几次例行会议。时间还是午后，她看到了未接来电。第一个来自斯洛明家庭保安系统 (Slomin's Home Security)，有人试图进入她的住宅。下一个是她女儿亚历山德拉 (Alexandra) 打来的，听起来惊慌失措。亚历山德拉说，拉斐尔必须立刻回家。拉斐尔钻进她的福特福克斯 (Ford

Focus) 轿车, 沿着那条耗时20分钟的路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西北区域的家驶去。

到家的时候, 她看到十几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正爬上她那幢两层的科德角 (Cape Cod) 式中型独栋住宅。两个神色认真的便衣特工走近她, 向她展示了他们带有徽章的证件。接下来, 他们递给她一纸搜查令。

那上面指出, 罗宾·拉斐尔正在接受美国法典编号18 USC条款第793 (e) 节的相关调查。这是一个覆盖非法收集或传输国家安全信息的刑事法规:

间谍。

[1] “Pakistan: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by Army in Swat, ” Human Rights Watch, 16 July 2011, <https://www.hrw.org/news/2010/07/16/pakistan-extrajudicial-executions-army-swat>.

[2] “Factbox: U.S. Has Allocated \$20 Billion for Pakistan, ” Reuters, 21 April 2011,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pakistan-usa-aid-factbox-idUSTRE73K7F420110421>.

[3] Mathieu, Stephanie, “Home Grown: Native Travels Globe as Diplomat, ” Daily News (WA), 16 November 2007, http://tdn.com/business/local/home-grown-native-travels-globe-as-diplomat/article_c1384a98-0a14-51d0-9fde-5b03d87ab082.html.

[4]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30 June 2016.

[5] Griffin, Tom, “Rarified Air: UW Rhodes Scholars since 1960,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arch 2004, <https://www.washington.edu/alumni/columns/march04/rhodes04.html>.

[6] Stanley, Alessandra, “Most Likely to Succeed, ” *New York Times*, 22 November 1992,
<http://www.nytimes.com/1992/11/22/magazine/most-likely-to-succeed.html?pagewanted=all>.

[7] “The 1992 Campaign; A Letter by Clinton on His Draft Deferment: ‘A War I Opposed and Despised’ , ” *New York Times*, 13 February 1992, <http://www.nytimes.com/1992/02/13/us/1992-campaign-letter-clinton-his-draft-deferment-war-opposed-despised.html>.

[8]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30 June 2016.

3 迪克

越南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于住在莱克福德路46号的几个朋友来说，如鬼魂一样可怕。但对于其他年轻人来说，这场战争则如磁石一样富有吸引力。对于多年后与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关系亲密，并且通过他又与比尔·克林顿接近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而言，这场战争成了试验场。他在越南的经历与之后40年间美国经历的战争情况一脉相承。数十年后，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当代冲突中，霍尔布鲁克成为最后几个仍在发出警示越战教训的声音的代表人物之一。

霍尔布鲁克是纽约客，父母都是犹太人。朋友们叫他“迪克”，直到他那优雅的第三任妻子强制大家改口叫他更为温文尔雅的大名“理查德”（他的敌人从未改过口）。迪克·霍尔布鲁克贪婪、无情、雄心溢于言表——用他一位朋友的话来描述，霍尔布鲁克是那种可以在你身后走进转门^[1]，却在你之前走出来的人。他可以为了追求目标而不顾社交礼仪。有一次他慷慨激昂地讲述自己观点时，竟跟着希拉里·克林顿走进了女士洗手间——那是在巴基斯坦，希拉里·克林顿复述这个故事时会强调这样说。他的一位前任情人回忆了一次在曼哈顿街头与他一起等出租车时的情景：他们站在暴风雨中无休止地等啊等，好不容易有一辆出租车来了，结果霍尔布鲁克亲了下情人的面颊，连句话都没有，就跳进车里扬长而去，把女士一个人留在了瓢泼大雨里。后来成为外交官的社交名媛帕梅拉·哈里曼（Pamela Harriman）曾经尖刻地评论霍尔布鲁克：“他还没完全驯化好呢。”^[2]

他总是给我一种浩大感——更多的还不是说他个头高，而是不知怎的，他看起来比他六英尺一英寸的实际身高还要高大。他眼珠的颜色淡而发白，盯着人看时既像猛禽，又带着让人无法抵御的闪烁。他

嘴唇较薄，嘴角微微上翘，总有种马上要傻笑的感觉。霍尔布鲁克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但他也常常会一下子静下来，放低声音，耳语一般地说话。他会在一场谈判中把这两种战术都用上，并把自己的谈判风格比作“国际象棋与登山^[3]相结合”——奉承、欺负、迷惑、恐吓，直至说服对手。他大量地写作，具有不可思议的出口成章的能力。对周围的人缺乏敏感度的同时，他又能无微不至地观察世界，且乐此不疲，不屈不挠。换句话说，他是个名副其实而且稀有的混蛋。

小时候，霍尔布鲁克崇拜科学家：爱因斯坦、费米（Fermi）。但他的兴趣转向了更广阔的世界。父亲因结肠癌去世后，他变得与同学大卫·腊斯克（David Rusk）一家关系密切。腊斯克的父亲迪恩·腊斯克（Dean Rusk）很快成为肯尼迪的国务卿，曾访问过斯卡斯代尔高中（Scarsdale High School）霍尔布鲁克的班级^[4]，并颂扬了外交部门的许多优点。当时吸引霍尔布鲁克的是新闻行业，他当过高中校报的体育编辑，之后成为大学校刊《布朗每日先驱报》（*The Brown Daily Herald*）的主编，其间他对冷战紧张局势的分析文章被排在大学啦啦队试训公告下方的版位上发表。大二时，他说服校报编辑们派他去巴黎，报道1960年的巴黎四国首脑会议。西方领导人计划在峰会上与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协商，试图缓和分割柏林所带来的紧张局势。峰会以失败收场。峰会召开数日前，苏联人击落了一架美国U-2侦察机，之后苏美之间的对抗很快就逼停了谈判。

《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斯科蒂”·雷斯顿（James “Scotty” Reston）是霍尔布鲁克的偶像，当时在巴黎给了这位年轻的学生记者一份为《纽约时报》报道四国峰会的团队取饮料的工作，他告诉霍尔布鲁克：“无论你选择新闻还是外交为职业，你永远都能说‘我是在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外交失败^[5]中开始职业生涯的’。”不过雷斯顿错了：霍尔布鲁克后来还看到过更糟的。从布朗大学毕业后，他尝试在《纽约时报》找工作未果，然后决定参加外交服务人员入职考试。在

1963年6月的一个闷热的晚上^[6]，新晋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抵达了西贡新山一（Tan Son Nhut）国际机场。

越南是当代对美国“反叛乱”战略的首次考验——这一战略主张一边保护弱势群体的安全，一边通过社会项目赢得忠诚度。一次外交服务培训期间，霍尔布鲁克与其他同时代被派往越南的学员——包括后来成为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在闷热的夜晚玩一种他们称为“风扇球”的游戏打发时间，就是朝屋顶上的吊扇扔网球，然后追着可能满屋子回弹的球看谁能抢到（就算尝试的话，他们也很难给越南的局面设计出一个比这更为醒目的比喻了）。到达越南时，22岁的霍尔布鲁克还是单身，可以被派往农村的前线去监督发展计划。这让他看到了最真实的失败加剧景象，而这都是坐在华盛顿的上司们见不到的。

他还目睹了越南政策制定的急剧军事化过程。随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九团前往岬港（Da Nang）农村期间，霍尔布鲁克看见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指挥官路易斯·沃尔特（Lewis Walt）将军跪下来，推开他面前扇形空间里的沙子，演示美国人应该如何推翻越共，为越南南方政权入主并施行良性治理铺路。一群越南儿童旁观着，好奇地叽叽喳喳。说话从不拐弯抹角的霍尔布鲁克指出：“但是你走了，越共还会再回来。”沃尔特将军以及越南境内的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赶走越共。霍尔布鲁克在一份未发表的备忘录中写道：“虽然他们都接受了数小时甚至数日的‘反叛乱’教导，尽管所有的简报都一再强调这场战争的政治性质，但他们还是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是什麼或应如何应对。”叛乱分子不会放弃，当地人“不会为了获得免费的肥皂^[7]而改换阵营”。

霍尔布鲁克大声表示了反对意见。在巡游各省期间，他曾与越南战场美军指挥官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公

开辩论。

“你多大了？”威斯特摩兰终于被激怒了，问道。

“24。”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懂得很多？”

“我不懂，”霍尔布鲁克说，“但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两年了，我一直在前线。”[\[8\]](#)

威斯特摩兰当时正向华盛顿打报告，表达他认为通过增兵可以击破叛乱分子的信念。随着霍尔布鲁克被提升到白宫和国务院的职位，他也经常主动地向自己的上司们发送措辞强硬的备忘录。“我从来没见过美国人如此混乱无序”，[\[9\]](#)他26岁时在一则备忘录中这样写道。40年后，美国军方推动向阿富汗增兵期间，我正在霍尔布鲁克手下工作。这时他找到了这份备忘录，并让我把它转发给他越战时期的哥们儿。

美国国防部后来对 1945~1967年美国在越南的政治军事卷入进行了重新评估，结果产生了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的秘密报告。国防部启动这项绝密调查时，霍尔布鲁克还是个不循规蹈矩的年轻外交官。一位名叫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Gelb）的国防部官员邀请他撰写其中的一卷。盖尔布后来成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负责人，与霍尔布鲁克成为一生的好友。霍尔布鲁克写的那部分报告措辞犀利刻薄，称反叛乱政策“构想错误，执行笨拙”[\[10\]](#)。他认为，鹰派危险地把持了政策制定过程。

具有传奇色彩的外交官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率代表团与北越谈判时，霍尔布鲁克硬是把他的老板磨得没了脾

气，同意给他在代表团中挤出了一个席位^[11]。他相信谈判的力量可以结束战争。“霍尔布鲁克永远希望与对手谈判，”^[12]20世纪60年代后期做过霍尔布鲁克上司的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森巴赫

(Nicholas Katzenbach)说，“他总是认为有的可谈，有中间道路”。然而美越巴黎谈判以痛苦的失败收场。当时的总统选战正难分伯仲，后来浮出水面的情况显示，尼克松竞选阵营曾试图破坏停战谈判^[13]，鼓励南越拖延时间。众所周知的是，眼看着战火肆虐，美方团队竟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争论该使用什么形状的谈判桌^[14]。

尼克松上任后不久，霍尔布鲁克辞职并离开了政府部门。“战争持续，进一步造成2.5万名美国人和无数越南人死亡，这既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他后来写道，“通过谈判于1968年结束战争^[15]是可能的；走向和平的距离比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认识到的要短得多。”他看到美国浪费了一次结束战争的机会；他不会允许这段历史重演。

2010年9月，随着阿富汗战争肆虐，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State Department Historian's Office)发布了美国官方版越战历史的最后一卷，其中包含了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早年撰写的备忘录。霍尔布鲁克从他的办公室走到国务院的乔治·C. 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会议中心，就该卷史料的出版发表了讲话。那天的天色灰蒙蒙的，他穿了一件灰色、有些皱巴巴的西装上衣，站在一块灰色的布艺背景墙前。荧光灯在他的眼睛下方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他停顿的比往常频繁。一位观众问起阿富汗战争与越南战争之间的相似之处时，霍尔布鲁克挤出了一个略显疲惫的微笑。“我正琢磨我们能回避这个问题多久呢。”^[16]

他回答得小心翼翼。随着与霍尔布鲁克同时代的人逐渐淡出决策层，新一代开始掌权，“越南”这个词给人的感觉越来越多地像一

门不受欢迎的历史课。但私下里，我听到过他做出的比较。在越南战争中击败美国的，是一个与发生冲突的地域相邻，并且在疏于防守的边境线对面为美国的敌方提供避风港的国家；是美国对腐败的合作伙伴政府的依赖；更是在军方要求下奉行的失败的反叛乱学说。在阿富汗，他目睹这三种动态的翻版出现，包括又一届政府青睐军方意见，而失去谈判机会的现实。“迪克·霍尔布鲁克当然是我的朋友，”亨利·基辛格说，“那是公允的比较。”他对霍尔布鲁克所做的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形势之间的比较这样评价道。在这两个地方，美国发现自己明明使用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行之有效的战略框架，却愣是都取得了灾难性的后果。“越南问题是（美国）试图把欧洲的遏制原则应用到亚洲，”基辛格继续表示，“然而，在欧洲，使用遏制政策的对象是已经存在了成百上千年，尽管受到战争冲击，但内部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事实证明，越南完全是另一回事。同样，在阿富汗，“9·11”之后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将阿富汗政府变成一个民主政府？”基辛格说：“这是错误的问题。”^[17]

那天在国务院，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很快就指出阿富汗不是越南。这一切的导火索是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袭击，它使战略公式变得全然不同。“但结构上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他说，“翻翻这里的这些书，这类信息会跳入你的眼帘。许多程序我们仍在遵循，许多基本学说与我们在越南所试图使用的^[18]依然相同。”

^[1] Halberstam, David, *War in a Time of Peace: Bush, Clinton, and the Generals* (New York: Scribner, 2001), p. 186.

^[2] Halberstam, David, *War in a Time of Peace: Bush, Clinton, and the Generals* (New York: Scribner, 2001), p. 17.

^[3] Holbrooke, Richard, *To End a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loc. 179, Kindle.

[4] Gordon, Meryl, “Ambassador a List, ” *New York*,
<http://nymag.com/nymetro/news/people/features/1748/index3.html>.

[5] Chollet, Derek and Power, Samantha, *The Unquiet American: Richard Holbrooke in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2) , p. 47, Kindle.

[6] Chollet, Derek and Power, Samantha, *The Unquiet American: Richard Holbrooke in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2) , p. 78, Kindle.

[7] Unpublished Memo, rpt. in Chollet, Derek and Power, Samantha, *The Unquiet American: Richard Holbrooke in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2) , p. 86, Kindle.

[8] Halberstam, David, *War in a Time of Peace: Bush, Clinton, and the Generals* (New York: Scribner, 2001) , p. 181.

[9] “Memorandum from Richard Holbrooke of the White House Staff to the President’ s Special Assistant (Komer) ,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umeIV, Vietnam, 1 December 1966, Document 321.

[10] Chollet, Derek and Power, Samantha, *The Unquiet American: Richard Holbrooke in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2) , p. 90, Kindle.

[11] Halberstam, David, *War in a Time of Peace: Bush, Clinton, and the Generals* (New York: Scribner, 2001) , p. 188.

[12] Packer, George, “The Last Mission, ” *New Yorker*, 28 September 2009,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9/09/28/the-last-mission>.

[13] Farrell, John Aloysius, “Yes, Nixon Scuttled the Vietnam Peace Talks, ” *Politico Magazine*, 9 June 2014,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4/06/yes-nixon-scuttled-the-vietnam-peace-talks-107623>.

[14] Holbrooke, Richard, *To End a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 loc. 3111, Kindle.

[15] Holbrooke, Richard, *To End a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 loc. 8208–8211, Kindle.

[16] Clemons, Steve, “Afghanistan War: What Richard Holbrooke Really Thought, ” *Huffington Post*, 17 May 2011,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steve-clemons/afghanistan-war-what-rich_b_862868.html.

[17] Author Interview with Henry Kissinger, 4 December 2017.

[18] Holbrooke, Richar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1946–1975, ” Washington, D.C., 29 September 2010, Keynote Address.

4 芒果箱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离开越战的废墟并辞去尼克松政府的公职后不久，罗宾·拉斐尔也离开剑桥回到了伊朗，在达马万德学院（Damavand College）出任教职，给女生讲授历史课。伊朗国王倒台前，德黑兰是座热情友好的国际大都会，拉斐尔还在受美国财力支持的舞台剧中跳舞和表演^[1]，其中包括《万事成空》（*Anything Goes*）。她与一位英俊幽默的外交官阿诺德·拉斐尔（Arnold Raphael）坠入爱河——朋友们叫他“阿尼”。1972年，他们在美国大使馆的庭院举行了跨宗教婚礼，在大量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天鹅绒衬托下，信仰基督教的她和信仰犹太教的他结了婚。

1975年，当他被派驻巴基斯坦时，拉斐尔随他一同迁居。巴基斯坦与伊朗差不多，没让她感到不适。伊斯兰堡那时还是一个昏昏欲睡的小城市，郁郁葱葱，人口只有现在的1/3。“那会儿很棒”^[2]，拉斐尔回忆说。想起往事，她情绪明快起来。“那时真是生机勃勃。”她加入外交团队，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任职。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建立了迷人的形象，经常举办鸡尾酒会和组织放映美国电影。她毫不费力地进入了巴基斯坦的上流社会，建立了未来岁月里为她服务——也让她倒霉——的关系网。如她之前多少代外交官一样，对拉斐尔来说，提升美国的影响力意味着建立友谊和对话。“你需要参与进来，弄清楚让人们心动的是什麼，以及什麼能激励他们，”她说，“对我来说，那是闭着眼睛就知道的明摆着的事情。”她在这里又思忖了一下。“但有时我们会忘记。在‘9·11’后，更加紧迫和严苛的时间里，我们变得不容分说地苛求。”^[3]

拉斐尔在伊斯兰堡度过了最初的黄金岁月，之后不过几年，变革席卷了整个地区。1979年的伊朗宗教革命推翻了美国支持的世俗国王

统治，美国对巴基斯坦这一军事和情报伙伴的依赖变得更加牢固。美国失去了伊朗境内用于监视苏联的重要监听站，中央情报局接洽了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后者同意建立巴基斯坦监听设施，以填补空缺。

伊斯兰革命的呼声也从伊朗传到邻国阿富汗，在那里，受苏联支持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已在之前一年掌控了全局。在克格勃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者推行了世俗改革，包括强制女童接受教育。在宣传海报上，围着红头巾的红唇女性捧着翻开的书本，头顶上用西里尔语大字大声疾呼：“如果你不读书，就会忘记这些字母。”^[4]对于保守的阿富汗人来说，这太过分了。阿富汗军队爆发了反共产党人的起义。

起义蔓延的初期，苏联人有些犹豫。但在莫斯科，外交已经靠边站，克格勃的影响力已然膨胀。克格勃负责人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巧妙地绕过主张谨慎的苏联外交官，满载苏联军队的运输机于圣诞夜当天降落在喀布尔机场。卡特政府认为这次入侵是让莫斯科难堪的机会，卡特批准了美国通过与巴基斯坦军事联盟精心策划的秘密战争。“阿富汗的抵抗必须持续下去，”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写道，“这意味着向叛乱分子提供更多的钱并且运送武器^[5]……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向巴基斯坦做出保证，并且也鼓励它帮助反叛分子。这将需要我们重新评估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向该国提供更多保障、更多武器援助，以及，一项决策，以确保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安全政策不被防核扩散政策主宰。”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巴基斯坦绝非美德典范。穆罕默德·齐亚-哈克（Mohammed Zia-ul-Haq）绞杀了被他赶下台的平民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并取消了选举。巴基斯坦此时正积极寻求制造原子弹^[6]，对美国要求其停止此举的呼吁置之不

理。当时在对苏联战争的名义下，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如同后来反恐战争中的情形一样。

里根总统第一任期内，国会批准用于秘密战争的资金从每年数千万美元增加到数亿美元^[7]。齐亚坚持完全按照巴基斯坦的条件，来分发用这些资金购买的枪支。战争刚开始时下发的一份最高机密“总统决定”要求中央情报局顺从巴基斯坦的意愿。一位中情局伊斯兰堡情报站的负责人记得他当时接到的命令是这样的：“照顾巴基斯坦人，然后让他们做你需要他们做的任何事。”^[8]齐亚访问美国并与里根会晤时，国务卿舒尔茨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说：“我们必须记住，没有齐亚的支持，阿富汗的抵抗力量，也是使苏联为他们在阿富汗冒险付出沉重代价的关键，实际上就死了。”^[9]（当我向舒尔茨问及他对巴基斯坦政权的支持时，他并无歉意。“齐亚和里根总统，他们之间存在一段关系。整个想法是帮助圣战者将苏联赶出阿富汗”，他说，话中用了代表圣战中伊斯兰战士的阿拉伯语单词，来指代对苏作战的人。“而且我们成功了。”^[10]）于是，如齐亚所坚持的那样，武器被交给了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由后者挑选接收战利品的圣战者。美国依然在越南那场代理人战争之复杂感到刺痛，也乐得将细节留给巴基斯坦处理。

在对苏作战的紧迫形势中，伙伴关系中令人不那么愉快的现实是易被忽略不计的^[11]。巴基斯坦军官把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武器拿到黑市上贩卖——有一次，他们甚至把武器卖回了中央情报局。巴基斯坦继续肆无忌惮地炫耀其核开发进展。1985年，参议院通过了所谓的《普雷斯勒修正案》（Pressler Amendment），要求总统必须每年认证巴基斯坦没有拥有核武器。规则是严格的：不认证，就没有援助。齐亚在巴基斯坦核计划上向里根总统撒了谎^[12]。“毫无疑问，我们拥有自1987年起就不再做此认证的情报基础”，^[13]一位资深中央情报局官员表示。但是里根无论如何还是继续认证了巴基斯坦的无核状

态。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格伦（John Glenn）认为，核扩散“给世界带来的危险，远大于切断对阿富汗援助的恐慌……这是短期利益相对于长期利益关系的问题^[14]”。但他是罕见的提出反对意见者。

这场秘密战争还要求美国人对阿富汗境内武装圣战的野蛮行为视而不见。巴基斯坦人把美国的武器交给了最无情的伊斯兰强硬分子，像阿卜杜勒·赛亚夫（Abdul Sayyaf）、布尔汉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和贾拉鲁丁·哈卡尼（Jalaluddin Haqqani）之类的激进分子，他们都与恐怖主义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最青睐的子弟之一是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他是狠毒的宗教激进主义者，据称专长是活剥被俘士兵的皮^[15]，且手下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平民。中央情报局一位名叫米尔特·比尔登（Milt Bearden）的特工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接管了这个项目。按他的估计，巴基斯坦人把近1/4的美国军火物资交给了希克马蒂亚尔。“希克马蒂亚尔是巴基斯坦人的最爱，但绝对不是我的”，他对我说。这位生性好斗的特工又冷冷地补充道：“我当时有机会时，真该一枪毙了他。”^[16]

巴基斯坦人和美国人的做法也点燃了极端主义的火焰，吸引全球范围内的穆斯林飞蛾扑火。出身于沙特富商家庭的奥萨马·本·拉登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搬到了巴基斯坦，逐渐与希克马蒂亚尔和赛亚夫等部分受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青睐的圣战者^[17]关系密切。拉登向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训练营出来的圣战者提供现金津贴，最终严格效仿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

策略奏效了。短短几年内，中央情报局宣布这场秘密战争成本效益显著^[18]。然而真正的成本以后才显现出来。

罗宾和阿诺德·拉斐尔搬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时间，刚好在对苏联战争爆发之前，按罗宾后来的说法，也是“很多事情都走下坡

路”之前。这对于美巴关系以及罗宾自己的生活而言，都是相当准确的描述。她想要孩子，阿诺德不想。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离了婚，罗宾·拉斐尔后来又结了两次婚，有了两个女儿。但根据朋友们的描述，阿诺德才是罗宾一生的挚爱^[19]。有人意识到，她宁可先跳楼，也不愿意承认对此的伤感。

阿诺德仍然是外交部门的后起之秀，他以美国大使的身份回到了巴基斯坦。在1988年8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在省城巴哈瓦尔布尔（Bahawalpur）附近的一片沙漠中与齐亚总统一同观看美国艾布拉姆斯坦克（Abrams tank）——这是最新可供巴基斯坦购买的军备产品——表演，军购资金仍然来自源源不断的美方援助。表演结束后，阿诺德又接受临时邀请，与齐亚一起乘坐后者的美国造C-130大力神运输机（Hercules）^[20]返回伊斯兰堡。一同乘机的还有齐亚的参谋长，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阿赫塔尔（Akhtar）将军——是他亲自选定^[21]接受美国秘密战争援助的圣战者名单，以及负责监督美国对巴基斯坦军事援助的赫伯特·M. 沃瑟姆（Herbert M. Wassom）将军。起飞后五分钟整，飞机坠入沙漠，炸成巨大的火球。机上30人无一幸免，全部遇难，包括齐亚和阿诺德·拉斐尔。

这一事件至今仍是巴基斯坦历史上几大未解的谜团之一。尽管有美国大使遇难，而且联邦调查局有法定权力进行调查，但国务卿舒尔茨还是命令联邦调查局人员远离此案。同样，米尔特·比尔登也阻止了中央情报局介入^[22]。唯一获准参与现场勘查的美方人士是七名空军调查员，他们在一份秘密报告中排除了机械故障^[23]。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破坏。或许，一个装有VX神经毒气或类似毒剂的小气罐毁灭了整架飞机。一个长期流传的阴谋论说法认为，神经毒气罐隐藏在一箱芒果里，是在起飞前被装上飞机的。

对于巴基斯坦来说，这次坠机事件加深了对美国人的不信任。后来夺取政权的贝格（Beg）将军也像齐亚一样，致力于巴基斯坦核计划的发展，以及为恐怖主义代理人提供支持——但他对美国的友好程度更低。对于罗宾·拉斐尔来说，这场悲剧将她从早期德黑兰那段充满希望的日子中隔断了出来。当我问起失去阿诺德的感受时，她微微冷笑了一下，“那对任何人来说都很艰难，可是生活还要继续”^[24]。

那是苏联完全撤出阿富汗的一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伊斯兰堡工作站传递苏联撤军消息的电文非常简单：“我们赢了。”^[25]然而红色威胁消退后，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缺乏更广泛战略对话的弊端就又快又狠地袭来。

四个月后，当巴基斯坦新总理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首次正式访问美国时，裂缝已经开始显现。贝娜齐尔·布托，被齐亚绞杀的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之女，是流亡海外多年后重返巴基斯坦的。她从哈佛大学毕业，只有35岁，有着迷人的形象。她戴着白色头巾和玫瑰色的飞行员眼镜，身穿金色和粉红色的纱丽，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站在美国国旗前，讲话中引用着林肯、麦迪逊和肯尼迪的话。“代表巴基斯坦^[26]，我可以声明，我们并未拥有，也不打算制造核设施”，她强调说。

然而几天前，贝娜齐尔·布托却坐在白宫斜对面的布莱尔国宾馆（Blair House）里，听到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H. 韦伯斯特（William H. Webster）带来的预警通报。根据那天一位在场人士^[27]的说法，韦伯斯特带着一个足球走了进来，那是按照他所知道的巴基斯坦已经拥有的一种核装置原型制造出来的模型。韦伯斯特告诉贝娜齐尔·布托，如果巴基斯坦继续将气态铀转化为固体的“核”——原子弹的芯——那么老布什总统就不可能在那一年早些时候再为巴基斯坦做无核认证。那个月底之前，伪装被揭穿了。美国中央情报

局有无可辩驳的证据^[28]，表明巴基斯坦已经将铀加工成了几个核芯。1990年，苏联人撤出阿富汗的一年后，老布什成为第一位拒绝认证巴基斯坦仍然是无核国家的总统。依照《普雷斯勒修正案》^[29] 的规定，大多数经济和军事援助被暂停，巴基斯坦订购并已经付款的F-16战斗机也留在了亚利桑那州，经年累月地收集灰尘。直到今天，F-16战斗机依然让我遇到的每一位巴基斯坦军官都无法释怀。它们象征着背叛，对此美国很快就忘了，然而巴基斯坦却从未忘记。

军事关系戛然而止时，美国几乎没有通过有效外交渠道来缓解这一冲击的余地。即便是对付圣战者乱局的大师米尔特·比尔登，也为美巴之间缺乏对话而感到遗憾。“那种关系总是浅薄的，”他回忆说，“苏联人于1989年2月撤出了阿富汗，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就制裁了他们（巴基斯坦），并切断了军事接触。” 这为接下来10年的两国关系定下了基调，其中巴基斯坦扮演了被抛弃的情人角色。

“他们喜欢我们，”比尔登反思道，“但是他们真的深信，每到关键时刻，我们就会背叛他们^[30]。”

没有了代理人战争的紧迫感，美国的外交政策机构开启了巴基斯坦业务。美国对伊斯兰激进力量的支持曾经带来便利，现在却是一种负担。苏联人离开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曾试图扶持自己青睐的极端主义者希克马蒂亚尔掌权^[31]。但是在他输掉了一场替喀布尔打的血腥战斗^[32]之后，巴基斯坦人转而选择了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开始武装和资助另一种他们希望能够抗衡地区内竞争对手印度的保守运动：“伊斯兰教的学生”，^[33]又称塔利班。

有关塔利班实施强硬的社会政策及其对妇女野蛮压迫的故事开始传到西方世界。即将上任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开始呼吁联合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国际政要之一，理由就是要终止塔利班对人民不断深化的压迫。（“我不后悔没有与塔利班打过交道，”^[34]

奥尔布赖特多年后表示，“但是，我愿意承认，在到底是谁做主的问题上，情况很复杂。”）人们的愤怒在升级，因为那些受塔利班领导人庇护的恐怖分子所带来的威胁已显而易见。两个美国驻非洲国家的大使馆1998年被炸事件，以及随后揭示出来的爆炸组织者奥萨马·本·拉登与塔利班关系密切的信息，夯实了塔利班政权为国际社会所不容和不齿的地位。巴基斯坦作为塔利班的施主^[35]，也分担了这一秽誉。

罗宾·拉斐尔是孤独的持不同意见者。比尔·克林顿于1993年就任总统时，聘请了在英国读书时的老朋友拉斐尔出任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华盛顿和伊斯兰堡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里变得冷淡，但拉斐尔依然忠实地为巴基斯坦说话，毕竟她在职业生涯早期在此建立了诸多关系。当一位名叫汉克·布朗（Hank Brown）的参议员提出放宽对巴基斯坦援助限制的立法^[36]时，她与巴基斯坦外交官一起忙活了好几个月，为该法案游说。该法案于1995年获得通过，为向巴基斯坦出口武器扫清了道路，尽管该国的核武器库仍在扩充。拉斐尔也热心地为贝娜齐尔·布托辩护，后者在拉斐尔出任助理国务卿的第一年里，重新掌握巴基斯坦领导权，并秘密授权向塔利班提供援助^[37]——同时在此问题上向美国人撒谎^[38]。拉斐尔告诉我，她走入这层关系时是睁大了眼睛的。“我没有相信贝娜齐尔·布托，我只是觉得我们需要与每个人交谈。”^[39]尽管如此，她还是反对制裁，并协助确保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40]。

拉斐尔还努力推动与塔利班领导人进行会谈。一封总结她1996年访问喀布尔行程的电报表明了其对塔利班政权的乐观看法，其中引用了一位塔利班领导人对拉斐尔说的“我们不是坏人”，并乐观地描述了塔利班“对自身局限性^[41]的认识不断提高，而这种认识是之前不曾有过的”。同年，塔利班控制喀布尔之后不久，拉斐尔还在联合国的一次闭门会议中呼吁其他国家也拥抱这一政权。“他们是阿富汗

人，他们是本土人，他们表现了持久的力量，”^[42]她说，“孤立塔利班不符合阿富汗或我们在座任何人的利益。”正如一位与拉斐尔一起工作过多年的巴基斯坦外交官所言：“如果罗宾再在助理国务卿位子上多待一年，华盛顿就该有塔利班大使馆了。”^[43]

拉斐尔另类的亲巴基斯坦及塔利班行为使她在华盛顿和南亚地区都引起了怀疑。也正是在这时，印度媒体开始称其为“塔利班夫人”，其后这个绰号一直跟了她数十年。“这太无聊了，”她说，“就因为我确实去和这些人交谈过。那是我的工作。但是，因为我没被吓坏，且不想像贱民一样对待他们……我觉得与他们交谈是完全正常的，人们就为此极度震惊了。”她叹了口气，“妖魔化塔利班是一个错误，很可能为他们完全失控添加了理由。没有人会听他们说话……我们背弃了他们，还认为他们全是尼安德特^[44]笨蛋”。在拉斐尔看来，这是最糟糕的错误：“情绪驱动。”^[45]

外交政策建制中，包括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内的许多人后来都接受了与塔利班对话的同一论点。拉斐尔对她的立场遭到更多孤立和争议，是否感到任何遗憾呢？“没有，”她笑着告诉我，“我超前于时代！”^[46]

1995年，拉斐尔加强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努力正在高潮时，时任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团队的一位助理敲开了她办公室的门，告诉了她一个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在监视巴基斯坦官员时，情报人员截获了他们认为是非法交换的内容。他们声称，拉斐尔当时正在向巴基斯坦人泄密，泄露了美国核项目情报的敏感细节。拉斐尔感到震惊。她会见了国务院的内部警察，即外交安全局人员，受到拷问。外交安全局的调查无果而终^[47]。拉斐尔并未被鉴定为违反任何规则，于是此事很快就被遗忘了——只不过它后来又被翻了出来，且结果不妙。

拉斐尔还先后出任过其他几个职务，包括驻突尼斯大使、国防大学副校长，以及在伊拉克战争初期负责协调援助工作。然而她的故事总要绕回到巴基斯坦。她2005年离开伊拉克时已感厌倦，遂加入了卡西迪公司（Cassidy & Associates）。这是K街^[48]上一家响当当的游说公司，其客户包括埃及情报部门，有时也涉及巴基斯坦。拉斐尔在卡西迪公司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该公司签下了两份巴基斯坦的订单合同^[49]，使媒体——尤其是印度媒体——将她称为“巴基斯坦说客”。（“20世纪90年代折磨新德里的说客，”《印度时报》尖刻地报道称，“华盛顿中明目张胆亲巴基斯坦的拥趸。”^[50]）拉斐尔对此表示好笑，称自己仅在其中一个项目上工作了“三周”^[51]，而且该项目在巴基斯坦强人佩尔韦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于2007年11月暂停该国宪法后还被取消。

在2009年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拉斐尔遇到了职业外交官同僚、当时正出任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安妮·帕特森（Anne Patterson）。身材矮小但钢铁般强硬的帕特森来自阿肯色州史密斯堡（Fort Smith），操着一口轻柔的美国南方口音，说话直截了当。她是一位经典传统的外交官，从拉丁美洲到中东已服役数十载。在巴基斯坦，她身处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关系中，面对新时代——巴基斯坦对美国而言再次变得重要的时代——的挑战。然而，对巴基斯坦社会有着深入了解的美国人是很难找到的。在当代的美国外交界，像前往巴基斯坦之类国家的外派职位，已成为低级别官员为了积攒履历和拿一两年风险补贴，而进进出出的站点（当时驻伊斯兰堡的薪酬可以较其他地区高出30%^[52]），拉斐尔这种对棘手的巴基斯坦政治有把握的人不可或缺。帕特森问拉斐尔是否还可以再来驻扎一次，帮助其管理对伊斯兰堡的援助。

拉斐尔当时已经61岁。她已经结过三次婚——最近一次嫁给一位英国外交官，但婚姻只持续了几年，已于2004年结束。她基本上独自

抚养了两个正值大学入学年龄的女儿——安娜和亚历山德拉，游说机构的工作让她有机会花更多时间与女儿以及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但是，有人感觉到，她的心思很快就转向重返公职了^[53]。

她告诉安妮·帕特森会考虑一下。

^[1] Leiby, Richard, “Who is Robin Raphel, the State Department Veteran Caught up in Pakistan Intrigue?” *Washington Post*, 16 December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style/who-is-robin-raphel-the-state-department-veteran-caught-up-in-pakistan-intrigue/2014/12/16/cfa4179e-8240-11e4-8882-03cf08410beb_story.html?utm_term=.c44eab67b086.

^[2]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30 June 2016.

^[3]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30 June 2016.

^[4] Crile, George, *Charlie Wilson's War*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7), loc. 352, Kindle.

^[5] “December 26, 1979: Memo to President Carter Gives Pakistan Green Light to Pursue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istory Commons*, 2007, www.historycommons.org/timeline.jsp?timeline=aq_khan_nuclear_network_tm1n&aq_khan_nuclear_network_tm1n_us_intelligence_on_pakistani_nukes=aq_khan_nuclear_network_tm1n_soviet_afghan_war_connections.

^[6] “Reflections on Soviet Intervention in Afghanistan,”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Zbigniew Brzezinski, 26 December 1979, rpt. by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7] Coll, Steve, *Ghost Wars* (London: Penguin, 2004), p. 65, Kindle.

^[8] Coll, Steve, *Ghost Wars* (London: Penguin, 2004), p. 55, p. 58, Kindle.

[9] “Your Meeting with Pakistan President ...” Memo from Shultz to Reagan, November 29, 1982, and “Visit of Zia-ul-Haq, ” from Shultz, Also Dated 29 November 1982, rpt. in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ilson Center.

[10]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orge P. Shultz, 19 January 2018.

[11] Coll, Steve, *Ghost Wars* (London: Penguin, 2004) , p.66, Kindle.

[12] Coll, Steve, *Ghost Wars* (London: Penguin, 2004) , p.64, Kindle.

[13] Hersh, Seymour, “On the Nuclear Edge, ” *New Yorker*, 29 March 1993,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1993/03/29/on-the-nuclear-edge>.

[14] Smith, Hedrick, “A Bomb Ticks in Pakistan, ”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6 March 1988, <http://www.nytimes.com/1988/03/06/magazine/a-bomb-ticks-in-pakistan.html?pagewanted=all>.

[15] Crile, George, *Charlie Wilson’ s War*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7) , loc. 379, Kindle.

[16] Author Interview with Milton Bearden, 28 April 2016.

[17] Coll, Steve, *Ghost Wars* (London: Penguin, 2004) , p.86, p. 153, Kindle.

[18] Coll, Steve, *Ghost Wars* (London: Penguin, 2004) , p.68, Kindle.

[19] Entous, Adam, “The Last Diplomat, ” *Wall Street Journal*, 2 December 20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last-diplomat-1480695454>.

[20] Robert MacFarlane, “The Late Dictator, ” *New York Times*, 15 June 2008, p.BR12.

[21] Epstein, Edward Jay, “Who Killed Zia, ” *Vanity Fair*, September 1989.

[22] Epstein, Edward Jay, “Who Killed Zia, ” *Vanity Fair*, September 1989.

[23] Epstein, Edward Jay, “Who Killed Zia, ” *Vanity Fair*, September 1989.

[24]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30 June 2016.

[25] Crile, George, *Charlie Wilson’ s War*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7) , loc. 110, Kindle.

[26] Fineman, Mark, “She Hails U.S. Support for Pakistani Democracy: Bhutto Wins Ovation in Congress, ” *Los Angeles Times*, 8 June 1989,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89-06-08/news/mn-1927_1_bhutto-pakistani-democracy-pro-democracy.

[27]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American Lobbyist for Pakistan, 17 March 2017.

[28] Windrem, Robert, “Pakistan’ s Nuclear History Worries Insiders, ” NBC News, 6 November 2007, www.nbcnews.com/id/21660667/ns/nbc_nightly_news_with_brian_williams/t/pakistans-nuclear-history-worries-insiders/#.WPj50fnYuU1.

[29] “U.S. Legislation on Pakistan (1990–2004) , ” PBS, 3 October 2006,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taliban/pakistan/uspolicyc hart.html>.

[30] Author Interview with Milton Bearden, 28 April 2016.

[31] Tomsen, Peter, *The Wars of Afghanistan: Messianic Terrorism, Tribal Conflicts, and the Failures of Great Power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 pp. 405–408, Kindle.

[32] Coll, Steve, *Ghost Wars* (London: Penguin, 2004) , p. 263, Kindle.

[33] “U.S.-Pakistan Relations (1954-Present) ,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7,
http://www.cfr.org/interactives/CG_Pakistan/index.html#timeline.

[34] Author Interview with Madeleine Albright, 13 December 2017.

[35] Inderfurth, Karl, “Pushing for Peace in Afghanistan,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abl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5 March 2009,
<http://nsarchive.gwu.edu/NSAEBB/NSAEBB227/33.pdf>.

[36] Entous, Adam, “The Last Diplomat, ” *Wall Street Journal*, 2 December 20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last-diplomat-1480695454>.

[37] State Department Cable, 14 April 1996, rpt. in Coll, Steve, *Ghost Wars* (London: Penguin, 2004) , p. 298, Kindle.

[38] Coll, Steve, *Ghost Wars* (London: Penguin, 2004) , p. 298, Kindle.

[39]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5 January, 2018.

[40] Coll, Steve, *Ghost Wars* (London: Penguin, 2004) , pp. 298–299, Kindle.

[41] Declassified Cable, “A/S Raphel Discusses Afghanistan, ” 22 April 1996, Quoted in Coll, Steve, *Ghost Wars* (London: Penguin, 2004) , p. 329, Kindle.

[42] Transcript of Remarks in Closed-door Session at UN, Obtained by Rashid, Ahmed, rpt. in Rashid, Ahme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p. 178.

[43]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28 May 2015.

[44] 尼安德特人生存于旧石器时代（较普遍认可的考古认证是生存在距今3.3万~3.2万年前），其遗迹首先在德国尼安德河谷被发现，目前按照国际科学分类二名法被归类为人科人属，现在科学界较为认可的论断是非洲以外的现代人都是尼安德特人与非洲智人的混血后裔。尼安德特人在这里被用来形容“不开化”和“文明前”。——译者注

[45]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30 June 2016.

[46]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30 June 2016.

[47] Entous, Adam, “The Last Diplomat,” *Wall Street Journal*, 2 December 20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last-diplomat-1480695454>.

[48] K街（K Street）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条主要干道，东西走向，因为集中了很多智库、游说集团和倡导团体的办公场所，在政治话语中，“K街”已成为华盛顿的游说行业的转喻。——译者注

[49] “Exhibit A to Registration Statement Pursuant to the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of 1938, as amended,”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assidy & Associates, Embass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2005, <https://www.fara.gov/docs/5643-Exhibit-AB-20071004-4.pdf>.

[50] Rajghattal, Chidanand, “Pakistan Lobbyist Robin Raphel under Lens for Alleged Spying,” *Times of India*, 7 November 2014,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world/us/Pakistan-lobbyist-Robin-Raphel-under-lens-for-alleged-spying/articleshow/45073087.cms>.

[51]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30 June 2016.

[52] “Top Hardship Assignments in the Foreign Service,” *Diplopundit*, 14 July 2009, <https://diplopundit.net/2009/07/14/top-hardship-assignments-in-the-foreign-service>.

[53] Leiby, Richard, “Who Is Robin Raphel, the State Department Veteran Caught up in Pakistan Intrigue?” *Washington Post*, 16

December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style/who-is-robin-raphel-the-state-department-veteran-caught-up-in-pakistan-intrigue/2014/12/16/cfa4179e-8240-11e4-8882-03cf08410beb_story.html?utm_term=.59cd5ed4b662.

5 另一个哈卡尼网络

克林顿总统1993年宣布罗宾·拉斐尔被提名为助理国务卿之后的第二天，拉斐尔登上了飞往斯里兰卡的航班，前去参加该国最近被暗杀的总统的葬礼。坐在她附近的是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和一位36岁的巴基斯坦外交官，名叫侯赛因·哈卡尼（Husain Haqqani）^[1]。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哈卡尼成为美巴关系中一个固定出现的人物。批评人士对他的认识，则是后来罗宾·拉斐尔也同样获得过的部分标签：变节者、叛国者、间谍。

哈卡尼举止温文尔雅，样貌迷人，善于奉承人。“如你所熟知，”他经常这样说，脸上还会带点自得的微笑，“像您这么有经验，当然理解。”他在巴基斯坦商业中心城市卡拉奇的下中产阶级社区长大，父母是印度移民：他母亲是一名教师，父亲是一名律师，来到巴基斯坦时手里没什么专业关系网络，于是转而代表穷人和赤贫阶层打官司。哈卡尼一家住在专门为随着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出来而被迫背井离乡的印度人设立的棚户区，小侯赛因14岁之前没住过真正的房子。像霍尔布鲁克一样，他并非出身于精英阶层——他是一路爬上来的^[2]。

他既接受了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又接受了世俗教育，身上清楚地体现着典型的巴基斯坦文明断层线：宗教与国家、新与旧、东西方之间。在卡拉奇大学读书时，他成为与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 Party）有关联的学生领袖，加入了播种该地区变革的新一代人的行列。然而他也感到彷徨。他在位于美国驻卡拉奇领事馆的美国中心（American Center）里度过了很多个小时，一本接一本阅读图书馆里的藏书。他让自己沉浸到西方的视角中^[3]，并对同龄人中不断上升的反美主义情绪感到失望。1979年，被反美情绪鼓动起来的暴民烧毁

美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之后，附近城市卡拉奇的学生领袖们找到哈卡尼，请他领导同样的行动。据他讲述，他发表了戏剧性的演讲，引用《古兰经》^[4]来阻止学生们采取进一步的暴力行为。他有个私心并没告诉愤怒的学生们：他想保护领事馆内他心爱的图书馆，以及书架上那些西方书籍。

像霍尔布鲁克一样，哈卡尼也被新闻和外交所吸引。他为《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撰稿^[5]，后来还在巴基斯坦国营电视台工作过，间或为齐亚的军事政权遗产唱了几句赞歌。30岁出头时，哈卡尼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已经成为小有声望的传播人才，谙熟在西方和巴基斯坦听众间活动的诀窍。

贝娜齐尔·布托1988年在一届改革及世俗政府中出任总理后，保守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兹·谢里夫请哈卡尼来制定他的媒体宣传战略。经哈卡尼自己承认，谢里夫当时想利用仇外心理和反美主义情绪，但哈卡尼觉得谢里夫“在巴基斯坦经历了近十年的军事统治后，或许能为该国带来一些平衡^[6]”。

谢里夫掌权后（也是贝娜齐尔·布托在巴基斯坦政治的传统循环中因腐败指控而被驱逐之后）不久，哈卡尼发现自己与谢里夫之间有了争执。1992年，随着苏联战争的消退，以及美国对巴基斯坦的疑虑愈发不加掩饰，美国国务院请哈卡尼帮忙向谢里夫传了封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正“向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团体提供物质支持”^[7]且就此说谎；它必须停止，否则美国会将巴基斯坦加入其官方的恐怖主义赞助国名单，从而引发严厉制裁。谢里夫召集内阁谈话，席间伊斯兰将军们对哈卡尼这些进步派人士予以反对。当时的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负责人贾伟德·纳西尔（Javed Nasir）中将表达了巴基斯坦的传统世界观：这封信是“印度-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和犹太裔美国大使的

错[实际上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卜励德（Nicholas Platt）是基督教新教徒，这一点倒成了哈卡尼最不担心的事情]。

根据哈卡尼的叙述，他提出了巴基斯坦应该重新考虑使用代理关系并转而更重视使用外交渠道的观点。谢里夫采纳了情报部门和军方的意见后，哈卡尼威胁要辞职。谢里夫让他出任巴基斯坦驻斯里兰卡大使——这是在不制造负面新闻的情况下废弃他的方式，在巴基斯坦，这等同于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哈卡尼辞了职。

然而哈卡尼有着超强的韧性。贝娜齐尔·布托在新选举中获胜并重新掌权后，哈卡尼成了她的发言人。而在贝娜齐尔·布托像被掐着秒表设计好的一般，再次因腐败指控而遭驱逐后，他仍站在她一边，并在文职领导人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的过程中，对巴基斯坦军方牢牢控制政权的邪恶行径，做出愈加公开的批评。

这让他不受欢迎。1999年，巴基斯坦情报人员在一条嘈杂的街道上抓住了他，抛出条毯子蒙住他的头，然后把他推进一辆在旁等候的车里^[8]。他用藏在口袋里的手机给他的朋友拨了电话，他的朋友通知了媒体。他称这通电话挽救了他的生命^[9]，尽管他还是被安上了捏造的腐败指控而被判入狱两个半月。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夺取政权后，哈卡尼意识到，在频繁更迭的军事统治下，他不可能安全地在家乡生活了。“他当时对我的文章表现得并不太友善，”哈卡尼提到穆沙拉夫时说，“我感到非常有压力，因为那又是军事统治。所以我离开了，我来到美国^[10]。”侯赛因·哈卡尼入了美国籍，在波士顿大学获得了副教授职位，在安全距离外继续谴责巴基斯坦的军事领导人。

哈卡尼和贝娜齐尔·布托在后者流亡迪拜期间经常讨论巴基斯坦的未来。贝娜齐尔·布托让哈卡尼起草一份文件，概述她如若重新掌权后，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新愿景。他在论文中论述称，军事关系加

强了巴基斯坦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巴基斯坦已成为一个“寻租国”^[11]：靠从超级大国手里拿钱为生，所倚仗的资本是自身的战略地理位置及情报合作，“而非双方的共同利益；轻而易举从美国手里得来的现金，让巴基斯坦军队和情报机构变本加厉地攫取超常权力，并削弱了改革的潜力”。贝娜齐尔·布托喜欢这篇论文，以及文中提出的“与美国建立新型战略而非战术关系的观点”。^[12]

有一刻，贝娜齐尔·布托似乎有机会将这一愿景变为现实。美国和英国外交施压多年后，穆沙拉夫终于允许贝娜齐尔·布托回国参加选举。有很多人想置她于死地。侥幸逃过一场炸弹袭击后，贝娜齐尔·布托要求得到更多安全保护。穆沙拉夫只部分核准了她的保安增援要求。她在发给自己的说客马克·西格尔（Mark Siegel）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如果有任何事发生，“我认为就是穆沙拉夫干的”。^[13]

2007年12月27日，接近傍晚时分，地上的影子越拖越长。贝娜齐尔·布托做完一场呼吁民主的常规竞选发言后，离开了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距离巴基斯坦军队总部不到两英里的利亚卡特国家公园（Liaquat National Park）。支持者蜂拥着她乘坐的白色丰田兰德酷路泽（Toyota Land Cruiser）越野车^[14]。贝娜齐尔·布托穿着简洁的白色棉质裤子和黑色平底鞋，戴着她标志性的白头巾和紫色克米兹，爬上后座，将头伸出天窗，然后像伊娃·贝隆（Eva Peron）站在阳台上一样挥手。枪声在空中响起，伴随着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引爆后产生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华盖图像公司（Getty Images）的摄影师约翰·摩尔（John Moore）启动了相机的高速连拍装置，捕捉到了脱焦的混乱场景：一个橙色的火球；火花和烟雾涌动下闪现的受惊面孔；幸存者在横在地上的人体中蹒跚而行^[15]。

贝娜齐尔·布托死了。她在遗嘱中，将其政党的领导权交给了她的鳏夫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Asif Ali Zardari），后者由于长

期面对腐败指控^[16]而被评论家们称为“百分之十先生”。悲伤的贝娜齐尔·布托支持者们拥戴他成为总统。

贝娜齐尔·布托流亡期间^[17]，哈卡尼与扎尔达里的关系像跟贝娜齐尔·布托一样近。扎尔达里及其总理优素福·拉扎·吉拉尼（Yousuf Raza Gilani）在大选后寻找新的驻美国大使时，找到了昔日自己政党的发言人侯赛因·哈卡尼。

哈卡尼接受了任命。2008年6月，他前往华盛顿，向乔治·W. 布什递交了国书^[18]。

哈卡尼又重新有了权力，但许多巴基斯坦人对他存有疑虑。他转换阵营，去为自己曾经呼吁反对过的贝娜齐尔·布托工作，是忠诚度有问题的印迹。有些人将他逃亡美国视为跨越了底线。贝娜齐尔·布托被暗杀的几天后，穆沙拉夫剖析了在他看来贝娜齐尔·布托的失败之处。她破坏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则：“不要被视为美国势力的外延。”^[19]刚刚在美国流亡了多年的哈卡尼，恰恰因为这种“不可饶恕”的条件，而被选为了驻美大使。

多年以后，巴基斯坦《论坛快报》（*The Express Tribune*）刊登了一篇介绍哈卡尼的人物报道，以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动物农场》中对“吱嘎”^[20]的描写开头：“一个谈话能手，争论难点时，他能在两边跳来跳去。”

“当然，这一切与受人尊敬的侯赛因·哈卡尼先生都没有可比性，”人物报道接下来写道，“毕竟，‘吱嘎’始终是忠于猪群的。”^[21]

^[1] Public Papers of William J Clinton, 5 May 1993, Available at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

id=MSPhAwAAQBAJ&pg=PA1263&lpg=PA1263&dq=Ranasinghe+Premadasa+funeral&source=bl&ots=WvCzewwlRN&sig=Sn2i7_SLyqKJSktRdC6qDIkCUeQ&hl=en&sa=X&ved=0ahUKEwiOkejcoIrTAhXoiFQKHRMzAjQ4ChDoAQhJMAk#v=onepage&q=raphel&f=false.

[2]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29 March 2017.

[3] Haqqani, Husain, *Pakistan: Between Mosque and Military*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5) , loc. 101, Kindle.

[4] Haqqani, Husain, “The Day I Broke With the Revolution, ”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23 April 1998, p. 7. Haqqani, Husain, *Magnificent Delusions: Pakist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Epic History of Misunderstanding*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3) , p. 3, Kindle.

[5] Fineman, Mark, “Million Mourn at Funeral for Pakistan’ s Zia, ” *Los Angeles Times*, 21 August 1988, articles.latimes.com/1988-08-21/news/mn-1149_1_president-zia/2.

[6]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28 March 2015.

[7] Haqqani, Husain, *Magnificent Delusions: Pakist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Epic History of Misunderstanding*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3) , p. 271, Kindle.

[8] Landler, Mark, “Adroit Envoy States Case for Pakistan, ” *New York Times*, 8 May 2009, www.nytimes.com/2009/05/09/world/asia/09envoy.html.

[9] “Pakistan: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23 February 2000, <https://www.state.gov/j/drl/rls/hrrpt/1999/441.htm>.

[10]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29 March 2017.

[11] Haqqani, Husain, *Magnificent Delusions: Pakist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Epic History of Misunderstanding*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3) , pp. 323–324, Kindle.

[12] Haqqani, Husain, *Magnificent Delusions: Pakist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Epic History of Misunderstanding*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3) , p.324, Kindle.

[13] “Bhutto Said She’ d Blame Musharraf If Killed, ” CNN, 28 December 2007, edition.cnn.com/2007/WORLD/asiapcf/12/27/bhutto.security.

[14] Farwell, James, *The Pakistan Cauldron: Conspiracy, Assassination & Instability* (Lincoln, NE: Potomac Books, 2011) , p. 135.

[15] Rashid, Ahme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S. and the Disaster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Penguin, 2009) , loc. 7980; Schmidle, Nicholas, *To Live or to Perish Forever: Two Tumultuous Years in Pakistan* (New York: St. Martin’ s Griffin, 2010) , p. 207; and Coleman, Isobel, *Paradise Beneath Her Feet: How Women Are Transform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 p. 127.

[16] Walsh, Declan, “Zardari Rejects Claim of al-Qaida Link to Bhutto’ s Murder, ” *Guardian* (Manchester) , 1 January 200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8/jan/01/pakistan.international>.

[17] Haqqani, Husain, *Magnificent Delusions: Pakist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Epic History of Misunderstanding*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3) , p. 323, Kindle.

[18] “Haqqani Presents Credentials to Bush, ” *Dawn*, 7 June 2008, <https://www.dawn.com/news/306395>.

[19] Rashid, Ahme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S. and the Disaster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Penguin, 2009) .

[20] 《动物农场》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用以反对斯大林的小说，1945年首次出版英文版。“吱嘎”（Squealer）又译“声响器”，是《动物农场》中的一个角色，一头年轻的猪，它是另一头猪“拿破仑”的忠实支持者，擅于言辞。——译者注

[21] Khan, Asad Rahim, “The Magnificent Delusions of Husain Haqqani, ” *Express Tribune*, 28 September 2015, <https://tribune.com.pk/story/963896/the-magnificent-delusions-of-husain-haqqani/>.

6 表里不一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卡特政府期间曾是一名极其年轻的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后来在共和党执掌白宫时期，离开国务院去了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重返外交岗位。正如他在工作中的一贯作为，霍尔布鲁克在负责东亚工作期间也与周围的记者关系密切。幸运的是，其中包括了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后者正如在牛津大学时预言的那样，毕业后从事了新闻职业，为《时代周刊》报道外交事务。

霍尔布鲁克在克林顿政府中的关系很薄弱。他在1988年的初选中支持了阿尔·戈尔（Al Gore），完全没有进入克林顿的竞选班子，不过并非因为没努力尝试。他惹恼了与克林顿关系更近的越战时期的朋友——例如安东尼·雷克（Anthony Lake），霍尔布鲁克向雷克发了一份不请自来的备忘录，将波斯尼亚（Bosnia）冲突描述为“美国政策在欧洲面临的重大考验”，并警告说不采取行动就会面临危险。霍尔布鲁克眼看着雷克及其他同行一个个地被安排到了好位置上，很是沮丧。后来经过已被任命为副国务卿的塔尔博特游说，霍尔布鲁克才获得了出任美国驻德国大使的机会。纯粹是靠着顽强的意志力，他才能成为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后来在波黑战争斡旋中出任美方谈判代表，即那个奠定其职业生涯地位的角色。

多年来，南斯拉夫解体所引发的种族屠杀一直是美国利益的末梢区域里难以解决的问题。到1995年，至少有10万人被杀害——根据一些估计，可能多达30万人^[1]。包括吉米·卡特所领导的一次尝试在内，国际上的调停努力全都步履蹒跚，几乎没有打断塞尔维亚军对该地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攻击。直到斯雷布雷尼察镇

（Srebrenica）爆发数千名穆斯林男子和男童被屠杀事件，并引起国

际公愤之后，美国才走出认为暴力只是“欧洲问题”的立场，给更为激进的外交努力开了绿灯。

霍尔布鲁克始终是以更宏大的视角看待这场冲突的——这是对北约的一场考验，结果可能对欧洲的未来，乃至美国的战略利益，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克林顿政府在准备决定由谁来领导新的干预行动时，霍尔布鲁克极为卖力地参加了这一职位的竞争。大家不喜欢他，但有些人认为他特立独行的风格是积极的。“他有时会遭到批评的那些品质——侵略性、与对手间失策的互动、向媒体透风的倾向等——正是这一角色环境所需要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说。冲突中的各方——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克罗地亚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和波斯尼亚人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Alija Izetbegovic）——都是好斗的角色。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是个罕见的人物，可以与这些人针锋相对，短兵相接。多年以后，克林顿向霍尔布鲁克敬酒时不失时机地揶揄了一句：“巴尔干地区每个人都很疯狂，每个人都拥有巨大的自我。除你以外我还能派谁去？”^[2]

在1995年一段为期三个月的时间里，霍尔布鲁克以哄骗和骚扰手段轮番上阵地与冲突各方周旋。有一个月里，他几乎把冲突各方代表监禁在了俄亥俄州代顿（Dayton）的赖特-帕特森（Wright-Patterson）空军基地——这里是他可以精准执导外交大戏的舞台。谈判的开幕晚宴上，他将米洛舍维奇的座位安排在了——名副其实地处于西方威力的阴影下。在谈判的最艰难时刻，他宣布谈判已然结束，并让人把行李放在美方一侧的门外。米洛舍维奇看到了行李，然后要求霍尔布鲁克延长会谈时间。做戏的方法奏效了——冲突各方，其中几个还是死敌，签署了《代顿协议》（Dayton Agreement）。

这是一份不完美的协议，它把将近一半的波斯尼亚疆土割让给了米洛舍维奇及塞尔维亚。有些人认为，让米洛舍维奇继续掌权，是使得协议难以为继^[3]的原因。几年后，米洛舍维奇继续进攻科索沃，最终招致北约空袭，他本人也被赶下了台，在海牙接受审判。北约空袭的前一天晚上，米洛舍维奇与霍尔布鲁克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你没有什么要再对我说的吗？”米洛舍维奇恳求道。霍尔布鲁克回答说：“再见吧，宝贝儿^[4]。”[这句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所饰演人物的口头语已经被用臭了街，被霍尔布鲁克拿来吓唬自己，并不是米洛舍维奇那一周遭受到的最大侮辱。]

但该协议成功结束了长达三年半的血腥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尔布鲁克自见证了美越巴黎谈判分崩离析以来，就一直在为此做准备，他尽了全力避免重蹈覆辙。谈判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从华盛顿获得了广泛授权，没有遭到微观管理，也没受到国内政治上各种怪论的影响。而北约空袭行动的授权^[5]做出后，军队也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支援他的外交努力——不是反过来。这些都是他在自己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中，极力争取却未能落实的因素。

《代顿协议》让霍尔布鲁克成为真正的外交政策名人。第二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时代周刊》杂志的一幅政治漫画将他设计成了电影《碟中谍》里汤姆·克鲁斯饰演的角色，吊在巴尔干地区上空的一根钢丝上^[6]，出的汗都是子弹。然而就在《代顿协议》签署之后仅一年，他就在竞聘国务卿一职的角逐中，输给了玛德琳·奥尔布赖特。霍尔布鲁克备受打击，接受了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职位。“我知道他想成为国务卿，^[7]”奥尔布赖特说，“但我成了国务卿。这对许多人来说有点吃惊，但我认为对他来说（尤其）是。”阿尔·戈尔后来表示，2000年如果他当选总统，那么霍尔布鲁克就将是其内阁中国务卿的“第一人选”^[8]。环境总能把他最想得到的职位抢走。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1995年主持签署《代顿协议》时，美国刚刚开始大幅削减外交支出，距离“9·11”之后出现的政策向以军方和情报机构为主导的转变，还有几年的时间。从波黑战争胜利结束，到霍尔布鲁克再次受命终结另一场战争的时间里，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正处在这些变化的中心地带。

“9·11”恐怖袭击发生前，中央情报局已经在抓捕奥萨马·本·拉登的努力中与巴基斯坦合作^[9]，因此恐袭之后美国采取狭隘战术的方法，借助巴基斯坦军事和情报机构工作，也就不足为奇了。2001年9月12日上午，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哈茂德·艾哈迈德（Mehmood Ahmad）将军进行了会晤，希望锁定巴基斯坦对美国在阿富汗报复行动的支持^[10]。马哈茂德向阿米蒂奇保证将给予美国以支持，并结束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合作。穆沙拉夫也对科林·鲍威尔做出了同样的保证。就这样，巴基斯坦又从敌人变成了朋友。美国围绕巴基斯坦核计划和穆沙拉夫政变所实施的所有制裁都瞬间蒸发。鲍威尔后来表示，“我打电话给穆沙拉夫总统，之前我们已提出建议，认为现在是时候做出战略决策，摆脱”对塔利班的支持了，“而他也逆转了巴基斯坦的行动方向^[11]”，鲍威尔说。

这又是妄想，如果不算是指望天上掉馅饼的话。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在“9·11”之前的多年时间里，一直在向阿富汗提供资金、武器和顾问，支援塔利班并打击自己的敌人，其中包括得到印度支持的军阀联盟“北方联盟”。美国在“9·11”之后提出合作的要求后，穆沙拉夫召集他的作战指挥部开会。指挥部成员全是因为支持塔利班以及其他伊斯兰武装组织而臭名昭著的将军，他们决定“明确接受美国的所有要求，但以后……并不一定同意所有细节^[12]”，一位与会者回忆说。巴基斯坦一如既往地唱起了双簧，美国也像在对苏战争中合作时的情况一样，再次看走了眼。

美国的另一半行动则是武装北方联盟，而支持两个对立派系的后果可谓立竿见影。由于美国支持的北方联盟力量捣毁了塔利班在昆都士（Kunduz）的大本营，穆沙拉夫近乎疯狂地致电小布什总统请求帮助：暂停轰炸^[13]，允许飞机在昆都士降落，以空运巴基斯坦人撤离。多架次航班装载了男性旅客，将他们运送到巴基斯坦，然后这些人迅速在那里消失。该行动一直保密，美国官员为了隐瞒情况，还对外说谎。“无论巴基斯坦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派飞机进入阿富汗撤离过任何人”，当时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坚称^[14]。依据大多数的说法，撤离的人绝不是无辜的旁观者，其中有许多“基地”组织的忠诚分子。当时与北方联盟合作的一位中央情报局特工告诉我这件事时，很肯定地说：“这是一个错误。^[15]”

逃出来的极端分子在巴基斯坦设立了据点，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力量得以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两个避风港中繁衍生息。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在奎达（Quetta）建立了新的塔利班最高委员会，亦称“舒拉”（Shura），并任命指挥官，领导阿富汗南部省份的叛乱活动。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中，贾拉勒丁·哈卡尼（Jalaluddin Haqqani）（与侯赛因大使无关）和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经营着他们各自的塔利班联盟运动——这二人在对苏联战争时期均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人员。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还继续为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提供直接的资金及武器援助。巴基斯坦军事和情报机构领导层允许极端分子公开行动，同时肆无忌惮地向美国人撒谎，否认有任何事情不对头。这是对反恐战争的一大讽刺——美国在为了打击塔利班而越来越重视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同时，却反而实际上确保了塔利班的生存。

在小布什政府任期最后一年里出任驻美大使的侯赛因·哈卡尼说，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部门一再要求他在支持恐怖分子的问题上撒谎。总部设在巴基斯坦，并由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大力赞助的恐怖组

织虔诚军（Lashkar-e-Taiba，或LeT）在印度孟买制造了一系列爆炸和枪击事件，造成164人死亡。之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主任艾哈迈德·舒贾·帕夏（Ahmed Shuja Pasha）让哈卡尼告诉美国人，“巴基斯坦没有人知道”这次袭击，并且没有一名肇事者是巴基斯坦人。“我说‘但你知道，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美国和巴基斯坦之所以存在巨大的不信任，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对他们撒弥天大谎，”哈卡尼说，“外交语言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真话，但也绝不是百分之百的谎言^[16]。我希望它是……”他停顿了一下，似笑非笑地扬了扬嘴角，“叙述得法的真相”。

小布什政府知道巴基斯坦在耍两面派，然而依照常规，公开否认了这一点。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当时甚至表示，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没有比巴基斯坦人更好的伙伴”^[17]。海登是一位退休的四星上将，个子不高，但精力充沛，和蔼可亲。他说话很快，眉毛在椭圆形的无框小眼镜上挑上挑下。我在小布什政府总是美化与巴基斯坦关系的问题上追问他时，他回答得很坦诚。“如果我那样说过巴基斯坦人的话，”他对我表示，“那是为了平衡随之而来的事情。也就是说，这是来自地狱的盟友，因为实际上，他们已经与魔鬼达成了协议^[18]。”他看到过来自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某些部门的强有力合作，但还有其他人，比如臭名昭著的亲“基地”组织的S局^[19]，“这个部门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实际维持我们认定为恐怖组织的那些组织的生命”，海登说。同样，帕夏将军也拥有“两面性”。帕夏拒绝回应。“我不能只说一半的实话，”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同时我不认为我应该说出全部真相！！^[20]。”（帕夏将军在信中彬彬有礼，且使用了许多惊叹号，好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向千禧代少年下达指令。）

多名小布什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即便有的话，他们也很少在支持恐怖分子问题上跟巴基斯坦对质过，因为他们害怕伤害反恐联盟。海

登只记得在小布什政府执政后期有一次这样的直接对话，其中穆沙拉夫“谎称是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退休官员干的，你知道的，就是那些在对苏战争期间支持‘老巴’的人”。在那个时代，美国帮助创建巴基斯坦对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官方赞助”，现在却无法将放出来的老虎再关回到笼子中去了。海登认为，如果美国想把老虎再关回笼子里，就需要突破情报和军事合作的狭隘范围。“你看，我的意思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不可能让巴基斯坦政府根据他在华盛顿或伊斯兰堡所进行的谈话去改变行为，”^[21]他说，“这需要整个政府的长期努力……以及我还没看到证据证明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实施强有力的制裁。”他描述的是对大规模外交努力的迫切需要，然而这恐怕永远都不可能实现。

巴基斯坦说一套做一套，以及美国对此相对容忍的结果是巴阿边境阿富汗一侧陷入剧烈动荡，塔利班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持续复苏。美国和北约定期采取行动予以回击，但塔利班的兵员总能从巴基斯坦境内的避风港补充上来。小布什第二任期内，叛乱强度提高了，开始进行毁灭性的袭击^[22]，有时甚至是在巴基斯坦军方从边境另一侧提供的掩护下，向美军和阿富汗士兵开火。这些战果使塔利班得以在阿富汗南部继而在东部建立起平行政府——州长和法官等建制一应俱全。到奥巴马执政初期，美国眼看着就输了^[23]。

^[1] “Bosnia War Dead Figure Announced,” BBC, 21 June 2007,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6228152.stm> and Tabeau, Ewa and Bijak, Jakub, “Casualties of the 1990s War in Bosnia-Herzegovina: A Critique of Previous Estimates and the Latest Results,” Demographic Unit,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of the Former Yugoslavia, 15 September 2003, <http://archive.iussp.org/members/restricted/publications/0slo03/5-con-tabeau03.pdf>.

[2] Chollet, Derek and Power, Samantha, *The Unquiet American: Richard Holbrooke in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2) , pp. 203–204, Kindle.

[3] “Kosovo, Genocide and the Dayton Agreement, ” *Wall Street Journal*, 1 December 2005.

[4] Chollet, Derek and Power, Samantha, *The Unquiet American: Richard Holbrooke in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2) , p. 164, Kindle.

[5] Chollet, Derek and Power, Samantha, *The Unquiet American: Richard Holbrooke in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2) , p. 2, Kindle.

[6] “Richard Holbrooke Image in TIME Magazine Calling Him Diplomatic Acrobat of the Week, ” *The History Project*, 1 January 1996, <https://www.thehistoryproject.com/media/view/6236>.

[7] Author Interview with Madeleine Albright, 15 December 2017.

[8] Traub, James, “Holbrooke’ s Campaign, ”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6 March 2000, www.nytimes.com/2000/03/26/magazine/holbrooke-s-campaign.html and *The Diplomat*, Dir. David Holbrooke, HBO Documentary Films, 2015, 1: 04: 48: “I Will Say Most People Were Justified in Believing He Was First in Line.”

[9] Woodward, Bob and Ricks, Thomas, “CIA Trained Pakistanis to Nab Terrorist But Military Coup Put an End to 1999 Plot, ” *Washington Post*, 3 October 2001,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11/18/AR2007111800629.html.

[10] Rashid, Ahme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 S. and the Disaster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Penguin, 2009) , pp. 25–30.

[11] Iftikar, Ali, “Powell Defends U.S. Support to Pakistan, ” *Nation*, 9 September 2004, ref. in Rashid, Ahme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S. and the Disaster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Penguin, 2009) .

[12] Rashid, Ahme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S. and the Disaster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Penguin, 2009) , p.28, Quoting Foreign Minister Abdul Sattar.

[13] Filkins, Dexter and Gall, Carlotta, “Pakistanis Again Said to Evacuate Allies of Taliban, ” *New York Times*, 24 November 2001 and Hersh, Seymour, “The Getaway, ” *New Yorker*, 28 January 2002,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2/01/28/the-getaway-2>.

[14] Haider, Masood, “No Pakistani Jets Flew into Afghanistan Says U.S. , ” *Dawn*, 2 December 2001 and Rashid, Ahme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S. and the Disaster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Penguin, 2009) , p. 91, Kindle.

[15]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CIA Source, 19 July 2016.

[16]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29 March 2017.

[17] Warrick, Joby, “CIA Places Blame for Bhutto Assassination, ” *Washington Post*, 18 January 2008,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1/17/AR2008011703252.html and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Michael Hayden, in Person at His Offices in Washington, D.C., 17 May 2017.

[18]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Michael Hayden, in Person at His Offices in Washington, D.C., 17 May 2017.

[19] S局是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内部的一个秘密部门，专门负责“扩大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影响范围”，Steve Coll著《S局：CIA及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隐秘战争》，企鹅出版社，2018年2月6日出版，ISBN-10：1594204586。
——译者注

[20] “Email from Gen, Pasha to Ronan Farrow, ” 22 September 2016.

[21]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Michael Hayden, in Person at His Offices in Washington, D.C., 17 May 2017.

[22] Rashid, Ahme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p. 227.

[23] Rashid, Ahme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p.234, and “Deadliest Month Yet for U.S. in Afghanistan, ” CBS News, 30 August 2011, www.cbsnews.com/news/deadliest-month-yet-for-us-in-afghanistan.

7 兄弟会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关系解体的时期，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仍在追逐他认为自己天生就该承担的角色：国务卿。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04年他再次接近这一职位时，他把赌注压在最终还是没能赢得总统大选的约翰·克里身上。霍尔布鲁克当时是个普通公民，再次回到了投资银行工作，但仍然频繁地出现在联合国和慈善机构的活动上。我当时正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合作，在纽约和几个冲突地区工作。在苏丹时，我开始就那里的种族清洗运动，在《华尔街日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专栏文章。好几年里，霍尔布鲁克虔诚地发给我对文章的点评：“罗南，这是篇精彩生动的文章……你应该尝试让这个问题在国务院和联合国系统内升级。我会四处发送一下。”或者，他也经常说：“下一次，更多一点强调解决方案，以便让文章看起来少些反联合国的味道。”

他对待信件十分认真。国务院2010年发布越南问题历史回顾时，他发表了演讲，其中感叹道：“现在发布的这些文献，恐怕永远都不会再有与之相匹配的后续了……有了电子邮件和视频电话会议，文件留档已经不是以前的方式了。”^[1]到我认识他时，他所实践的就已经是垂死的艺术了。他给克里做竞选顾问时，我在他手下实习。那时的我，对于他所说的这一切来说还太年轻，是个不到20岁的青年。但这似乎从未让他担心。这是有道理的：对于太年轻和太仗义执言这门艺术，他本人已经掌握得炉火纯青。他接纳了我实习，而我也幼稚到对这一点不假思索。

霍尔布鲁克那时还在权力圈外，他所担任的职务还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才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话说到了在2009年1月19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就职典礼前一天的晚上，也是就职典礼前各种派对蜂

拥开场，吸引华盛顿精英们每四年一次趋之若鹜地活动关系寻求入场券的黄金时段。共和党社交名流巴菲·卡夫里茨（Buffy Cafritz）及其丈夫比尔主持的派对是其中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一直都是两党人士联谊的一大场所^[2]。多数年份里，它会吸引250位或300位客人参加。2009年，超过500人把华盛顿使馆区费尔法克斯酒店

（Fairfax Hotel）的宴会厅挤得满满的，兴奋的交谈声让大厅里一片嗡嗡响。电影明星也好，政治家也罢，抑或是记者，摩肩接踵，挤在一起，手上端着鸡尾酒，脖子伸得老长，寻觅新政府阁员名单上的那些大人物。空气中弥漫着“改变”的气息，每个人都希望参与其中。

每当有值得讨好的人进场时，你可以感受到一众政治经营者中的能量发生变化。当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当晚到达时，光线昏暗的宴会厅差点倾斜。希拉里·克林顿在大选中被击败，但又在获得巴拉克·奥巴马提名为新任国务卿后站了起来。她戴着仿佛冻住的满脸笑容，一路点着头，穿过拥挤的人群。胡玛·阿贝丁（Huma Abedin）是长期在希拉里·克林顿身边的贴身女助理，紧跟其后，拇指飞快地在黑莓手机上敲着。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一直不加掩饰地研究着人群，在心不在焉地跟我说着话的同时，眼睛不断地扫过人山人海。他站在宴会厅靠边的地方，穿着一身不大合身的炭灰色西服，配着一条紫色和白色相间的领带。此时的他67岁，超重，头发已经渐白；与湄公河边拍摄的照片中那个身形颀长、从角质镜框后盈盈笑着的年轻外交官相比，俨然已隔了一个宇宙和一代人。

我们简短地叙了一会儿旧，霍尔布鲁克的注意力从未离开过人群。他处在“开机”模式，这是工作。希拉里·克林顿入场时，他简短地丢了句“待会儿再聊”就离开了，大步向她赶去，速度快得引人侧目。希拉里·克林顿的丈夫担任总统以来，霍尔布鲁克和她一直走

得很近，在希拉里·克林顿初登国际舞台的几年里，霍尔布鲁克还多次为她提供指导。在即将到来的奥巴马执政期间，希拉里·克林顿最终也被证明是霍尔布鲁克最坚定的捍卫者。然而在那些年里，霍尔布鲁克的地位似乎从未稳固过，即便是与希拉里·克林顿在一起共事时。每一刻宝贵的会面时间都有用。“哪怕跟他只是相处片刻，大家都能感受到他想成功的愿望有多迫切”，^[3]战地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写道，他在越战期间与霍尔布鲁克混得很熟。那晚，费尔法克斯酒店中展示的只是霍尔布鲁克的一个侧面，权且称作展览A吧。

支持希拉里·克林顿，让霍尔布鲁克再一次赌错了马。但他一如既往地斗志昂扬，希拉里·克林顿刚输掉2008年总统大选的初选，他就即刻启动了加入奥巴马团队的攻势，尽管他基本上是个局外人。他开始打电话^[4]，给任何他能想到的人，直到最后朋友劝他适可而止。有一段时间，他在查理·罗斯（Charlie Rose）主持的美国公共电视网（PBS）采访节目中不断地出现，频率比其他任何人都高，因此创下了纪录。在2008年8月的一次节目中，他疯狂地努力向奥巴马阵营倾斜。

“基于长期而密切的个人关系以及长久的承诺，我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参议员。但是我非常认真地读过奥巴马参议员的立场……他采取的重要立场中，没有哪些是我不同意的……”

“他还召集了由13位外交政策人员组成的小组……而很多人都注意到，你的名字并没有在名单中出现。”罗斯反击道。霍尔布鲁克的脸少见地僵住了，一刻间看起来几近绝望。“而且坦率地说，他们很失望，”罗斯继续说道，“因为他们认为你是民主党一侧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之一，由于你有丰富的经验以及你……”

“我这么经常上你的节目，”霍尔布鲁克笑得有点过头。

“你经常出现在这个节目中。你为什么不在他们那边？” [\[5\]](#)

“我想我正在和你做节目。”

“对我坦诚些，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在那边，以及是什么原因？”

霍尔布鲁克向旁边瞥了一眼，然后，语气好像是宁愿在汽油桶里泡透了再到橡木桌上自焚，也不愿意承认马上要说的内容一般。他说“我没在那里，因为我没被邀请”。他迅速补充说：“我没有任何不舒服，他们可以邀请任何想要的人开会。实际上，那天我在外地，无论如何也不能出席。”

罗斯问他是否会和奥巴马说上话，而霍尔布鲁克却给出一串与他有联系的顾问名字作答。“我们都一起工作过，苏珊·赖斯、为拜登工作的托尼·布林肯、格雷格·克雷格（Greg Craig）。我与奥巴马参议员的现任团队都密切合作过，我跟他们很熟。”

但实际情况是，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与奥巴马团队几乎没什么交情。克林顿执政期间，他确实与苏珊·赖斯一起工作过，但是形容他们之间合不来都未免太轻了。一次会面中，二人之间的争执严重到她当着满屋子工作人员的面，冲他竖起了中指。霍尔布鲁克的盟友反过来在媒体上称她为“怀恨在心”的“无聊小人” [\[6\]](#)。与二人都合作过的官员说，赖斯觉得霍尔布鲁克已经践踏了她的尊严。（“他试图践踏我的尊严，”她澄清道，“我认为他没能成功。”）同样，霍尔布鲁克与布林肯的关系，也不足以阻止布林肯的老板、副总统乔·拜登在奥巴马面前这样形容霍尔布鲁克：“他是我见过的最自负的混蛋。”（不过拜登确实承认，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霍尔布鲁克“或许是正确人选”。）至于霍尔布鲁克还列举出的格雷格·克雷格，他很快就在奥巴马阵营失宠了 [\[7\]](#)。

对于许多奥巴马的支持者来说，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是敌人：他是外交政策精英中保守势力的一员，这些人围绕在克林顿夫妇的周围，视奥巴马及其核心圈子为暴发户，并因此表现出不屑。霍尔布鲁克没有对奥巴马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年轻联邦参议员做出过公开批评，但他还是比较明显地以希拉里的忠实追随者面貌出现，并向其他外交政策专家喊过话，表示支持奥巴马可能意味着放弃克林顿总统任内的就业机会（当然，想必是霍尔布鲁克执掌国务院^[8]的机会）。与大部分民主党外交政策人士一样，他最初也旗帜鲜明地支持伊拉克战争。后来，他开始写下并谈到入侵伊拉克的灾难性后果，包括对阿富汗的忽视。但在新政府团队的许多人眼里，他仍然站在奥巴马的对立面。

文化也存在分歧。奥巴马靠激动人心和变化，而不是历史或经验赢得了总统大选。他后来形容自己“可能是第一位年轻到越南战争在个人成长经历中没有扮演核心角色的总统”。美国在1975年撤出越南时，奥巴马只有13岁，“因此我不是背着越战争议的包袱长大的”。^[9]除了少数例外者，他选用的团队成员大多是有着与自己同样世界观的年轻人。在外交政策领域里，本杰明·罗兹（Ben Rhodes）或许是白宫中最持久且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他是奥巴马任内负责沟通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获得这一为他量身打造的职务时，他才31岁。一个当时反复被人提起的比喻是：白宫好比“兄弟会”^[10]。为了打消这一印象，奥巴马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

在奥巴马任内的白宫，昔日枯燥的建制被认为已然过时。惨烈的选战过后，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愈加不受欢迎，特别是那些超级自我膨胀的人。“我觉得他那种旋风般的做派，嗯，确实让白宫的一些人竖起了眉毛，”^[11]希拉里·克林顿谈到霍尔布鲁克时说，“他们认为他超越了有序政策制定进程的界限，且不符合他们对白宫零戏剧化运行的希望。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

大选结束两天后，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抵达芝加哥，接受当选总统的面试^[12]。这次会面持续了30分钟，从一开始就成了灾难。事后接到霍尔布鲁克电话的朋友透露，奥巴马打招呼时叫他“迪克”——霍尔布鲁克纠正他说，他太太、作家凯蒂·马顿（Kati Marton）更喜欢人们称他为“理查德”。“这是个笑话，对吗？”^[13]霍尔布鲁克的老朋友莱斯·格尔布（Les Gelb）记得当时自己对霍尔布鲁克这样说。格尔布多年前将霍尔布鲁克拉进“五角大楼报告”^[14]项目。

“你没真那么说吧？”相反，他真说了。奥巴马很不高兴^[15]，且后来也对几个人表达了自己的不快。“出于某种原因，奥巴马总统认为他”——就是霍尔布鲁克——“高高在上地对待他”^[16]，亨利·基辛格说，“我不知道那是否属实。但无论如何，霍尔布鲁克肯定比新人有更多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可以简单地描述为：这是一次面试，如其他任何招聘面试一样，奥巴马就是不喜欢这个人。

在费尔法克斯酒店洋溢着汗水的就职典礼前的派对上，霍尔布鲁克的注意力激光般地集中。希拉里·克林顿成为国务卿的结果苦乐参半，但对霍尔布鲁克而言也是缓刑。他将在政府中发挥作用。我看着他，我和希拉里说话。他在她耳边低声说着，他们俩笑了。他确保参加派对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希拉里·克林顿拿出了她最热情洋溢的状态。奥巴马没有来，她是现场人们每一瞥和每一耳语的焦点。她和我曾就读同一所法学院，那里有几位现已作古的教授先后教过我们俩。多年来我们见过很多次面，每次她都对我格外和蔼。希拉里·克林顿对于在社交场合回忆细节有着超自然的诀窍，或者说她至少知道如何巧妙地掩饰她记不得的东西。她自称阅读了我的一些外交政策专栏文章，并询问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说我在考虑是否回到某个夏天我曾经担任过受雇律师的那个律所。她严肃地看着我说：“和霍尔布鲁克谈谈。”

她和霍尔布鲁克已经开始为他创造一个新角色，一个她后来将其描述为“按许多指标”衡量，都是这届政府中最困难的职位^[17]。

“自1968年我以基层成员的身份，在巴黎参加埃夫里尔·哈里曼和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带队的越南停战谈判以来，”霍尔布鲁克曾这样写道，“我始终想在世界上最困难的谈判中考验自己。”^[18]他最终如愿以偿。

^[1] Holbrooke, Richar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1946-1975,” Washington, D.C., 29 September 2010, Keynote Address.

^[2] Roberts, Roxanne, “Don’ t Gloat, Don’ t Pout: The Golden Rule of Elite Washington Inaugural Parties,” *WashingtonPost*, 17 January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style/dont-gloat-dont-pout-the-golden-rule-of-elite-washington-inaugural-parties/2017/01/17/f0c512da-d8f5-11e6-9a36-1d296534b31e_story.html?utm_term=.15242dfb588a.

^[3] Roberts, Roxanne, “Don’ t Gloat, Don’ t Pout: The Golden Rule of Elite Washington Inaugural Parties,” *WashingtonPost*, 17 January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style/dont-gloat-dont-pout-the-golden-rule-of-elite-washington-inaugural-parties/2017/01/17/f0c512da-d8f5-11e6-9a36-1d296534b31e_story.html?utm_term=.15242dfb588a.

^[4] Packer, George, “The Last Mission,” *New Yorker*, 28 September 2009,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9/09/28/the-last-mission>.

^[5] “Richard Holbrooke,” *Charlie Rose*, Published 8 August 2008, <https://charlierose.com/videos/11639>.

^[6] Ioffe, Julia, “Susan Rice Isn’ t Going Quietly,” *New Republic*, 20 December 2012,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11353/susan-rice-isnt-going->

quietly and Milibank, Dana, “Susan Rice’ s Tarnished Resume, ”
Washington Post, 16 November 201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dana-milbank-susan-rices-tarnished-resume/2012/11/16/55ec3382-3012-11e2-a30e-5ca76eeec857_story.html?utm_term=.b42e179a05cc.

[7] Woodward, Bob, *Obama’ s Wa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 p. 377, Kindle.

[8] Allen, Jonathan and Parnes, Amie, *HRC: State Secrets and the Rebirth of Hillary Clinton* (New York: Crown/Archetype, 2014) , p.73, Kindle.

[9] Woodward, Bob, *Obama’ s Wa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 p.377, Kindle.

[10] Mastromonaco, Alyssa, “To Bro or Not to Bro? ” *Lenny Letter*, 22 March 2017, www.lennyletter.com/work/advice/a766/to-bro-or-not-to-bro/ and Leibovich, Mark, “Man’ s World at White House? No Harm, No Foul, Aides Say, ” *New York Times*, 24 October 2009, www.nytimes.com/2009/10/25/us/politics/25vibe.html.

[11] Author Interview with Hillary Clinton, 20 November 2017.

[12] Kurtz, Howard, “Media Notes: Making Nice, ” *Washington Post*, 18 November 2008,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1/18/AR2008111800923_2.html.

[13] *The Diplomat*, Dir. David Holbrooke, HBO Documentary Films, 2015, 1: 05: 44.

[14] 译者注：即《美国-越南关系，1945-1967：国防部的研究》，是美国国防部对1945~1967年美国在越南政治军事卷入评估的秘密报告。

[15] Woodward, Bob, *Obama’ s Wa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 p.211, Kindle (Note: This Anecdote Has Passed into Legend. Woodward Places It Later, Immediately before Holbrooke Accepted His

Job in the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Gelb and Others, It Took Place during That First Meeting in Chicago) .

[16] Author Interview with Henry Kissinger, 4 December 2017.

[17] *The Diplomat*, Dir. David Holbrooke, HBO Documentary Films, 2015, 1: 07: 27.

[18] Holbrooke, Richard, *To End a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 loc. 1101–1102, Kindle.

8 任务：不可达成

当霍尔布鲁克的任命首次泄露时，职务名称被定为“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问题特使”。^[1]这不是没搞清楚状况的草率报道。虽然他的任务最终缩小到只包括后两个国家，但霍尔布鲁克最初设想的是全面负责整个地区内的谈判。“仅凭反叛乱的努力，是无法确保阿富汗的未来的，”他在2008年时写道，“它还需要区域性协议^[2]，使阿富汗的邻国能够从和解中获益，这包括伊朗、中国、印度及俄罗斯。然而最重要的邻国当然是巴基斯坦，它可以随意破坏阿富汗的稳定并且已经这样做了。”在波斯尼亚，霍尔布鲁克就曾与类似的多方武装势力周旋^[3]：不仅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还有俄罗斯、欧洲盟友以及联合国和北约等组织。在阿富汗及南亚地区，他再次看到宏伟战略思维的必要性。

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寻求电影《碟中谍》风格的政治解决办法，是建立在老派外交理念基础上提出的，很快便与新政府治下的现实产生了冲突。就职典礼前夜的派对过后两天，霍尔布鲁克站到了国务院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国宴厅（Benjamin Franklin State Dining Room）内一群现任及前任外交官面前。这个宴厅位于国务院大楼的八层，是国务院举行最盛大仪式的礼堂，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翻新，拥有古典风格，旨在让人产生仿佛置身于欧洲大陆豪华宴会厅的感觉。华丽的科林斯柱裹着布满人造大理石纹理的红色石膏面料，在墙壁上整齐排列。葡萄牙造水晶玻璃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天花板正中嵌有美国国徽图案：一只展开双翅的白头海雕，两爪一只抓着一束箭，另一只抓着橄榄枝。霍尔布鲁克右侧站着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左侧是乔·拜登和该届政府的新任中东和平特使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

“多年前，我作为一名初级外交人员走进了这座大厦。如今再次回来，这对我来说是件异常感动的事”，他开始说道。在阿富汗，他形容战争出了问题；在巴基斯坦，挑战“无限复杂”^[4]。他感谢总统在就职的第二天就向外交官们表示了敬意，而作为回应，奥巴马也强调了自己“对外交重要性的承诺”^[5]，并承认“美国的实力不仅来自我们的武力威慑”。这些理念在其执政的八年中经历了考验。

霍尔布鲁克看着他的妻子凯蒂，他的儿子大卫和安东尼，以及他几十年来所熟识的同事。他看起来有点激动，声音有些颤抖。“我看到我在西贡时的室友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在这里，”^[6]他说，“我们都对那些日子记忆犹新，我希望这次我们能取得更好的结果。”观众笑了，奥巴马面无表情。

虽然新政府宣布的其他地区行动都由“特使”牵头，但霍尔布鲁克坚持要求自己的头衔必须自成一格^[7]——“特别代表”，这也成了他让白宫感到不胜其烦的诸多琐碎事情之一。在霍尔布鲁克看来，这是一个比“特使”更具体的管理术语，是一种表明他正在建立一个庞大运作团队的方式。

1970年，年轻的霍尔布鲁克在刚成立的《外交政策》杂志上撰写了一篇文章^[8]，谴责国务院官僚机构僵硬化，充满孤岛式思维。他本人后来还做过这本杂志的编辑。几十年后，他重新回到国务院，决心要改变这一切。他开始与来自政府各具体部门的官员组建起一支精干的团队，其中有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农业部、财政部、司法部、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代表，还有局外人——来自社会组织、商业和学术界的反文化思维者。伊朗裔美籍中东研究专家瓦里·纳斯尔（Vali Nasr）在12月的一个午夜收到电话短信，其有着典型的戏剧化措辞：“如果你为其他人工作，我会打断你的腿。”然后，短信又以纳斯尔肯定偏爱专注于伊朗的工作为预期写道：“这更重

要。这是总统关注的焦点，也是你想要的。”^[9] 纽约大学教授、阿富汗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权威巴内特·鲁宾（Barnett Rubin）也接到了电话。与联合国以及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合作过的丽娜·阿米里（Rina Amiri）是阿富汗的活动家，她在从华盛顿到纽约的达美航空公司（Delta Air Lines）快线航班上认出了霍尔布鲁克，开始就即将到来的阿富汗选举向他施压。霍尔布鲁克印象深刻，告诉她自己正在组建一个团队。“我知道，”她说，“但我在这里是为了游说你。”

“我非常高效的，”^[10] 他说，“我直接把你的游说变成面试了。”

同样，我自己的面试也很独特。

“我们的做法应该有哪些不同？”霍尔布鲁克隔着嘶嘶水声喊道。面试过程中，他在淋浴间里洗澡。我在隔壁的房间里实在没忍住，笑了起来。

那是一场漫长的谈话，那一刻绝对是高潮。这场历经数小时的谈话从他的办公室进行到国务卿办公室，又到了他在乔治敦

（Georgetown）的联排别墅。我接受了希拉里·克林顿在费尔法克斯酒店总统就职典礼前夜派对上给我的建议，开始与霍尔布鲁克及其幕僚长罗斯玛丽·保利（Rosemarie Pauli）接触。一个多月后的2009年3月，我到国务院与他会面。他从办公室里蹿出来，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政策问题。我将如何重振中亚贸易？我如何使对巴基斯坦援助的影响最大化？不用担心我是个缺乏经验的律师，仅有不多的非洲，而不是阿富汗外交政策经历也没关系。我曾与发展中国家的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霍尔布鲁克希望加强美国对这些团体的重视——改变战区文化。在这些地区，大部分工作的落实都是通过强大的美国承包商实现的。他要找到非传统答案，而不受政府经验的影响。

位于华盛顿特区雾谷街区的国务院大厦是一座板状简约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石灰石的外立面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分期建造。最早建成的部分原本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规模不断扩大的战争部设计的，只是更加雄心勃勃的五角大楼也很快开始了建设，雾谷这座大厦从未真正成为军方的总部。透明的后门一侧仍然被称为战争部——这一点讽刺意味很强，因为这里是美国负责制造和平的职能部门所在地。国务院大厦具有按字排序的等级结构，八层有接待外国政要的豪华厅堂，七层是国务卿办公室，其他办公室也大致按照重要程度逐楼层下降。在霍尔布鲁克30多岁就令人吃惊地出任助理国务卿时，占据了六层的一套大办公室。现在，他降到了一层，在自助餐厅旁边——罗宾·拉斐尔后来待过的地方，对着大厅另一侧的国务院书报架，那里是霍尔布鲁克在会议间歇时吃垃圾食品的地方。

我们边走边谈，从他的办公室开始，进入走廊，然后上到七楼，走进因墙上包着木板而显得华丽的国务卿办公室。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都在快速地移动着脚步，只是偶尔跟我对视一下，助手匆忙地跟在他身后，递给他文件。他多次拦住我的回答，在黑莓手机上接电话。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政府，因为政府机构里的会面是坐下来稳稳当当地进行的。这是阿伦·索金（Aaron Sorkin）[\[11\]](#)编剧作品中的政府。

霍尔布鲁克也在游说，希望将资深中央情报局官员弗兰克·阿奇博尔德（Frank Archibald）招募进团队，在希拉里·克林顿办公室外的前厅短暂地面见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概述了他对我们各自所扮演角色的愿景，听起来着实炫目。在霍尔布鲁克的重新包装和巧妙推销下，每个下属都将掀起一场一个人的革命。阿奇博尔德将单枪匹马地弥合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疑虑；我将重新规划调整美国对非政府组织的援助；而阿米里——我听霍尔布鲁克多次说过——则撰写了阿富汗宪法。（有一次在一个活动上他又吹这个牛皮时，阿米里侧身

在我耳边低声说：“我没写过阿富汗宪法。”）按常规工作程序，我们没有人应该得到国务卿的面试。然而我们很多人确实得到了，完全是霍尔布鲁克靠一己之力得来的结果。霍尔布鲁克一路仰仗不少贵人的提携，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斯科蒂”·雷斯顿，到迪恩·腊斯克和埃夫里尔·哈里曼。他也想成为人们传颂为贵人的人，而且他确实是。

与国务卿会面后，我们回到了一楼霍尔布鲁克的办公室，他拿了自己的行李。他刚结束一次旅行回来，需要在下午去白宫开会前回家换衣服。他把一个行李箱递给我，我们就走出去招手打出租车，没有中断进行中的问答。我是否倾向于让美国国际开发署在该地区提供援助时明确打出美国的旗号？我打算如何调用当地监督组织来确保选举透明度？我因为在苏丹工作期间感染了骨髓炎未得到治疗，而坐了几十年轮椅，这时刚刚康复。霍尔布鲁克知道这一点，但此刻他又很典型地浑然不记得了，我拖着他的行李蹒跚地跟在他后面。到了他在乔治敦的住宅时，他径直上楼——当然是什么都不问，而是自然地继续着谈话。他留下卫生间的门半掩着，撒尿。“跟塔利班谈判怎么样？”他轻声试探地问道。“真的吗？”我说。“怎么了？”他从浴室门后无辜地回答，仿佛这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对他而言，很正常——似乎所有人都有过跟霍尔布鲁克开浴室会议的经历。他把头探出来，解着衬衫纽扣。“我洗个澡。”我站在门外，面试继续进行。

许多霍尔布鲁克追着招募的人都犹豫不决。丽娜·阿米里担心她在人权问题上直言不讳的观点会被封杀，而迟疑了一个月。巴内特·鲁宾开出了他必须获准在纽约大学保留兼职教职的条件。我自己也没被说服。去国务院并不是光鲜亮丽的一个职业生涯变动。“要是我，就会去达维法律事务所（Davis Polk & Wardwell LLP）”，一位法学院同学在给我的信中说，所指的是我已经获得工作机会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这些技术专家职位是干什么的？你真的想花40年时间向上爬

吗？如果你工作着实努力，你可能会最终混到霍尔布鲁克如今的地位，其实也不过是高不成低不就。去他的吧。”^[12]

然而霍尔布鲁克为他所从事的每一份工作都带来了超越实际考虑的远见卓识。他公开谈论改变世界。“如果理查德打电话给你，向你要什么的话，直接说‘是’就好了，”亨利·基辛格说，“如果你说‘不’，最终你还是要说‘是’，但这中间的过程可是会非常痛苦。”^[13]我们都说了“是”。

到了夏天，霍尔布鲁克已经组建起了他的“十一罗汉”^[14]大盗团——我们大约30人，来自不同的学科和机构，有的有政府工作经验，有的没有。巴基斯坦媒体对团队成员之丰富多彩给予了非常密切的关注，总的来说表示了欢迎。其他人采取了模糊立场。“他身边有一帮奇怪的角色。别说这是我说的”，一位高级军方领导对我说^[15]。“他希望把与我们的努力休戚相关，或是对我们的努力有所贡献的所有机构的代表，都纳入国务院，这种努力，我认为是绝对高明的，”^[16]希拉里·克林顿说，“而所有其他人都在激烈争斗。”

直到后来“阿拉伯之春”期间，我在更宽泛的国务院官僚机构中，担任希拉里·克林顿手下的全球青年事务主任时才意识到，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办公室工作的日子是多么非同寻常——这一办公室也像政府机构中其他机构一样，很快就被缩略称为了SRAP。自助餐厅旁边那个单调、低矮的办公空间，与硅谷丰富多彩的开放式办公空间之间，差距要多远有多远，但它同样有初创企业的感觉。办公室很快就因不拘一格且意想不到的客串人物不断出现，显得活色生香。霍尔布鲁克接待了成串的记者，像以往工作中一样，与记者们保持了紧密的关系。显赫的议员们来访过；霍尔布鲁克还在这里会见了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并探讨难民问题；又与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讨论小额信贷问题。霍尔布鲁克知

道他做的这些都是反传统的，他认为这是历史性的。到处都在显示他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甚至他的办公室都像个纪念过去战争的圣殿：墙上镶着镜框的照片中，他在湄公河三角洲微笑着；另一边他和比尔·克林顿一起出现在东帝汶或者萨拉热窝，两侧守护着武装警卫。“你写日记吗？”他问我，“有一天你会想把这些写出来。”

希拉里·克林顿曾告诉霍尔布鲁克，他是直接与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对应的文职官员。彼得雷乌斯当时是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的指挥官，而中央司令部则是国防部负责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的实权部门。“他拥有的飞机比我拥有的电话还多”，霍尔布鲁克后来抱怨道。^[17]彼得雷乌斯是个身体结实的小个子，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锻炼的故事早已成为人物传记作者津津乐道的细节：先跑5英里，接着做20个引体向上——吊杠上双臂悬挂、高抬腿，直到鞋带碰杠的自虐训练——然后做100个俯卧撑。2016年在德累斯顿出席彼尔德伯格集团的非公开会议时，彼得雷乌斯已经60多岁，撞上几个20多岁的记者大叫着提问。将军一溜烟地跑了，年轻记者们努力了半天居然没追上他^[18]。在一次实弹射击训练中，他胸部中了一枪（M-16步枪）^[19]，却居然活着讲述了这个故事。传说他每天吃一顿饭，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20]。我有一次在自助餐取菜排队时不走运地站在了他旁边，他低下眼睛盯着我盘子里的奶酪马克罗尼意面。“我……待会儿就去跑步”，我赶紧给自己打圆场。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真的？你觉得自己跟得上吗？”（我这辈子就从来没主动去跑过步。）

与霍尔布鲁克一样，彼得雷乌斯是一个具有非凡个性的经营者，懂得如何建立公共叙事，并令其为自己服务。他同样与华盛顿的每一位记者都打过交道，与报刊言论版编辑可以直线联系，并倾向于与可以帮他在政府之外传播观点的专家为伍。赞颂他的人物报道指出，他

是一位学者型武将，而这是真的——他是西点军校的高才生，后来又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美国军事与越南的教训：越战后时期军事影响和武力运用的研究》。

霍尔布鲁克和彼得雷乌斯都对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冒险提出了诘问，但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霍尔布鲁克认为反叛乱学说——后来被称为COIN——是泥潭，会导致对当地人口的依赖。彼得雷乌斯则相信这一学说，并在职业生涯中一以贯之地支持这一学说的复兴。在伊拉克，他全面地依靠反叛乱战略。一般而言，这意味着大规模地部署军队，并经过较长的时间融入伊拉克社会，以起到保护当地人民和抓捕坏人的作用。彼得雷乌斯在伊拉克冲突中成为英雄。批评人士认为，他受益于自己控制之外的事件^[21]，如“基地”组织领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宣布单方面停火。其他人认为，彼得雷乌斯的成就在他离开之后就土崩瓦解了，或许这意味着它们一开始就被夸大了（这些批评者中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在2007年一次国会听证会上，还是参议员的希拉里·克林顿指责说，在她寻求更客观地审视伊拉克问题的投票时，彼得雷乌斯提交了对伊拉克增兵过于乐观的评估。“我认为你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报告，的确需要自愿放弃疑虑才能相信”，她说）。但是在彼得雷乌斯看来，反叛乱战略在伊拉克奏效了，而且对于那些热衷支持彼得雷乌斯的五角大楼中人而言，它变成了福音。在阿富汗，彼得雷乌斯打算再次对反叛乱战略进行验证。^[22]

在希拉里·克林顿接受了奥巴马给予的工作机会后不久，她、彼得雷乌斯，还有霍尔布鲁克，在她位于华盛顿使馆区附近的乔治亚式豪宅中的壁炉旁坐了下来，开了瓶葡萄酒，边喝边聊。“我尽了很大努力，想确保理查德与将军们建立关系，”希拉里说，“他和彼得雷

乌斯还没有见过面，我把他俩邀请到我家，讨论他们各自认为需要做的事情。”彼得雷乌斯当时刚刚成为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希拉里知道他会在她自己面对的巨大国际挑战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那天晚上在克林顿家的餐叙，给之后霍尔布鲁克及彼得雷乌斯之间一系列餐叙互动开了头，二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在媒体看来应该算是紧密。“理查德确实在实施积极反叛乱战略上，与彼得雷乌斯一样感兴趣，”^[23]希拉里·克林顿回忆说，“但理查德的关注点是提高喀布尔政府的信誉，并寻求削弱塔利班的号召力。理查德不确定增兵会对此有所帮助，他认为这可能会破坏善意的表达。”

事实是，彼得雷乌斯和霍尔布鲁克彼此都心存警惕。做事有规划且严格自律的彼得雷乌斯（尽管之后数年内爆出的丑闻表明他在某些方面并没有那么严格自律）对霍尔布鲁克随心所欲的即兴行为常常感到不适。《纽约时报》记者马克·兰德勒（Mark Landler）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正采访霍尔布鲁克时，彼得雷乌斯前来开会，霍尔布鲁克干脆建议兰德勒留下来连彼得雷乌斯也一并采访了，结果彼得雷乌斯对霍尔布鲁克的即兴建议，以及后者跷在茶几上没穿鞋的脚，感到相当的不悦。“理查德，你怎么不穿鞋啊？”彼得雷乌斯问道，一脸惊恐。霍尔布鲁克说那样他更舒服^[24]。

我第一次见到彼得雷乌斯，是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位于喀布尔的总部——北约在阿富汗的代表处。我演示了一套有关阿富汗公民社会的演示文稿（军方超级喜欢演示文稿），之后霍尔布鲁克以他典型的提升下属方式，把我介绍给了将军。“所以，你为我的外交僚机工作”，彼得雷乌斯说着，从座位上站起来跟我握手。彼得雷乌斯动不动就称霍尔布鲁克为他的“僚机”，无论在私下还是在媒体上。霍尔布鲁克讨厌这个说法，他可不喜欢成为任何人的僚机。权力不平衡，加上霍尔布鲁克对彼得雷乌斯这样揶揄他的解读，触动了更深层的敏

感神经，这与霍尔布鲁克信奉的军事力量应该被用来支持外交目标的理念相矛盾。“他的工作就应该是告诉我告诉他扔炸弹时，再扔炸弹”，[\[25\]](#)霍尔布鲁克很不耐烦地跟我们团队说。彼得雷乌斯后来告诉我，他使用“僚机”一词的本意是表示尊重，但他也承认这种关系确实有点容易让人误会。“他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是个不好合作的伙伴，我觉得他有注意力缺失症（ADD）和其他一些问题，他很难保持专注，”彼得雷乌斯回忆说，“理查德的想法是，‘我是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而政府的想法是，‘我是巴拉克·奥巴马’[\[26\]](#)。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他们按理说应该做到其他人无法做到的事。”

伴随新政府的组建，奥巴马下令全面评估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角色。这个过程之曲折，让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根据那些对此不满的意见，写出了一本书。总统花了超过25个小时总共10次会议来听取论点和建议，低级别官员更是进行了无数次会议。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时候，部署多少部队。奥巴马任期伊始，军方已经要求增兵3万人；政策评估期间，军方领导人更是激烈争斗，给反叛乱行动争取划拨全额资源，其中包括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增兵，以及维持驻军时间尽可能长。“如果没有更多的军队，我们就无法实现目标。”彼得雷乌斯争辩道。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之后，他表示自己将开始推进待批中的增兵计划。白宫幕僚长——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不得不制止他。“等等，”根据泄露的说法，伊曼纽尔说，“将军，我很感谢你的尽职，但我可没听到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发出过这个命令[\[27\]](#)。”

霍尔布鲁克名义上是这一评审过程的联席主席，与已退休的中央情报局资深人士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并列。而根据里德尔的说法，彼得雷乌斯是“未公开宣布的第三位联席主席”。[\[28\]](#)但是霍尔布鲁克不得不靠边站——排挤他的人包括了有更多机会接近总

统的里德尔、一些将军们以及白宫本身。此次对政策的重新评估尖锐地反映出霍尔布鲁克与奥巴马之间存在的代际和文化鸿沟。在2009年2月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霍尔布鲁克比较了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及其顾问们在越南战争期间所做的政策重审努力。“不应该忘记历史。”他说。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了，奥巴马嘟囔了一声：“阴魂。”^[29]几个月后霍尔布鲁克再次提起越南时，总统可就不那么谦和了。“理查德，”他厉声打断了霍尔布鲁克，“人们真的还会那么说吗？”^[30]霍尔布鲁克已经开始为他的经历做录音日记，为书写这段历史（以及回忆录）做准备。“在部分初期与总统一起开的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我提到了越南，然后希拉里告诉我，总统不希望听到任何提及越南的话”，他在一段录音中说道，声音在磁带的嚓嚓声中听起来很疲惫^[31]。“我对此感到震惊，因为我认为显然存在相关的问题。”“他对自己受到的待遇非常伤心，”^[32]希拉里·克林顿回顾道，“我也一样，因为我认为他说的很多东西真的很有道理，只是不知什么原因，它不符合白宫抱持的世界观。”从此没人觉得应该倾听霍尔布鲁克的意见，而只是容忍他的存在。

但更意味深长的是他与军方的分歧。霍尔布鲁克不是鸽派，他是支持入侵伊拉克的，且在对阿富汗政策进行评估开始时，也赞同在阿富汗选举之前，在那里部署先期部队，以作权宜之计的战略。但他认为军事参与应该围绕实现政治解决这一目标来组织。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事过程中军方掌握的话语权及说服力之大，到了有时让非军方意见都没有表达空间的局面感到震惊。“我对大卫·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33]说过，我们被纯军方思维主导的时间已经太久了，”^[34]他在另一盘磁带中说道，“军方思维及军方势力主导。虽然我非常尊重军队，呃，彼得雷乌斯很出色，从个人来讲我喜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伟大的美国人，但他们不应该主宰政治战略，而这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

在一次会面之后，他疲惫地走了出来，并告诉了瓦里·纳斯尔一些荒唐的事情：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的文件夹更厚，他的地图和图表更加丰富多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办公室的团队已经制作了大量的政策文件，但总统的许多顾问都没阅读这些文件^[35]。“谁能制作图表？”霍尔布鲁克在一次会议上问道。所有人都看着我。“年龄歧视”，我嘟囔着，然后开始把霍尔布鲁克的政策提案做成彩色的演示文稿，整个过程都在他事无巨细的指挥下操作。多数图表聚焦于他认为受到白宫冷落的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一系列同心圆组成的图表，表明了他认为美国应采取更多措施来加强接触的全球参与者，构成有多么复杂——从国际捐助者到北约国家，再到印度和中国等新兴大国。箭头连接起来的三角形显示了巴基斯坦、印度和美国之间的三边关系。一个题为“改变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行为”的流程图概括了霍尔布鲁克对世界上最困难双边关系的处理计划：

1. 通过美国主导的新国际援助和新承诺攻势，聚焦于整个国家……
2. ……构建亲美情绪……
3. ……这有助于促使巴基斯坦政府和巴基斯坦军方更倾向于我们的立场……
4. ……让巴基斯坦军方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采取更多行动。

图表没能给事态带来任何变化。支持全面增兵的一派在人数和接近总统的程度方面都超过反对派。里德尔与总统一起乘坐空军一号，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为总统做简报。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支持他手下的将军们，以及他们所游说的大幅度对阿富汗增兵计划。国家安全顾问、退休上将吉姆·琼斯同样支持增兵，其负责阿富汗问题的副手、退休中将道格拉斯·鲁特也是如此。希拉里·克林顿尽管支持霍尔布鲁克，但她根本上还是个鹰派。“可归咎的太多了”，副国

家安全顾问本杰明·罗兹后来回忆说。霍尔布鲁克“最大的辩护者是希拉里·克林顿，但她在政策讨论中总是支持将军们这一方”。

“我确信理查德认为需要采用庞大外交攻势和增加民间交往的观点是正确的，”[\[36\]](#) 希拉里·克林顿说，“在不需要增加兵力来完成此项工作这一点上，我确实不同意他的看法，因为我认为，考虑到小布什政府如何因为过度关注伊拉克，而丢掉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以至于塔利班已确实在快速崛起，我们有必要采取些行动，展示我们回击的意愿。”

霍尔布鲁克不得不闭嘴，但他知道仅凭武力无法解决阿富汗危机。“我的立场非常明确，”[\[37\]](#)他在一次被鲍勃·伍德沃德录音的餐叙采访时说，“我会支持你，因为你是我的老板，但你需要知道我的实际观点。我非常担心我们的兵力将分散得太薄，而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将进入任务/资源不匹配状态。很多人都认为我被越战影响过度。那对我来说不是问题，至少我在那里有些经验。”

“我总是对霍尔布鲁克的事情感到遗憾，”罗兹说，“回头再看，那确实有问题，而且也感觉非常不必要。”他反省说，那就像“霍尔布鲁克在一场抢座位游戏中，而他就是那个没有座位的人”。

这一时期的荒诞之一就是看似重复的评估泛滥——不仅有白宫里由里德尔领导的一场评估，还有之前彼得雷乌斯领头的一场评估，以及阿富汗事务新任负责人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上将牵头的一场评估。麦克里斯特尔发布其政策建议之前，霍尔布鲁克向我们团队介绍了整个过程将如何展开。我们今面临三种选择。“一个‘高风险’选择，”他手在眼睛的高度比画着说，“他们总是这样叫它，就是需要或许很少的兵力。兵力少，风险高。然后会有一个‘低风险’选择[\[38\]](#)。”他说着，把手向下移，“这将要求双倍于他们实际寻求数字的军力投入。中间才是他们想要的”。

霍尔布鲁克以前看过这部电影。里德尔最终报告中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在阿富汗展开“资源充足”的反叛乱行动。经过数月的犹豫不决，总统最后选择了军方的反叛乱行动计划，向阿富汗增兵3万人。

奥巴马宣布的增兵计划自带有效期：两年后，即2011年中期，将开始撤军^[39]。里德尔的报告和总统声明中都明显缺少的是谈判承诺，即与巴基斯坦就恐怖主义安全庇护所问题的谈判承诺，或是与阿富汗塔利班的谈判承诺，都没有公开出现。“根本没有对外交和政治解决方案的讨论，”^[40]瓦里·纳斯尔回忆说，“霍尔布鲁克希望总统能考虑这个选择，但白宫并没有采纳。军方希望继续主导，反对军方会让总统看起来孱弱。”

[1] Kamen, Al, “Special Envoys Give Career Diplomats Special Heartburn,” *Washington Post*, 15 December 2008,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2/14/AR2008121401898.html.

[2] Holbrooke, Richard, “The Next President: Mastering a Daunting Agenda,”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08-09-01/next-president>.

[3] Chollet, Derek and Power, Samantha, *The Unquiet American: Richard Holbrooke in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2), p. 204, Kindle.

[4] “President Obama Delivers Remarks to State Department Employees,” *Washington Post*, 22 January 2009,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1/22/AR2009012202550.html.

[5] “President Obama Delivers Remarks to State Department Employees,” *Washington Post*, 22 January 2009,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1/22/AR2009012202550.html.

[6] “State Department Personnel Announcement, ” rpt. in CSPAN, 22 January 2009, <https://www.c-span.org/video/transcript/?id=981>.

[7] Packer, George, “The Last Mission, ” *New Yorker*, 28 September 2009,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9/09/28/the-last-mission>.

[8] Holbrooke, Richard, “The Machine That Fails, ” *Foreign Policy*, 14 December 2010, foreignpolicy.com/2010/12/14/the-machine-that-fails/.

[9] Nasr, Vali,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the White House Diplomacy Let Diplomacy Fail in Afghanistan, ” *Foreign Policy*, 4 March 2013, <http://foreignpolicy.com/2013/03/04/the-inside-story-of-how-the-white-house-let-diplomacy-fail-in-afghanistan>.

[10] Packer, George, “The Last Mission, ” *New Yorker*, 28 September 2009,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9/09/28/the-last-mission>.

[11] 阿伦·索金（1961年6月9日～），知名美国编剧，著名电影作品包括《军官与魔鬼》（*A Few Good Men*）及《白宫夜未眠》（*American President*）等；电视剧方面则有《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等；2010年由他编剧的电影《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2015年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获得金球奖最佳剧本奖。——译者注

[12] Google Chat with a Then-recent Yale Law School Graduate Who Requested Anonymity Due to Concerns about His Political Career.

[13] “U.S. Diplomat Holbrooke Dies after Tearing Aorta, ” *NBC News*, 14 December 2010, www.nbcnews.com/id/40649624/ns/politics/t/us-diplomat-holbrooke-dies-after-tearing-aorta/#.WPoYJtLyvIV.

[14] 取自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指导、2001年12月上旬在美国首映的故事片《十一罗汉》（*Ocean's Eleven*）片名。该影片由1960年

的同名作品改编，由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及马特·达蒙（Matt Damon）等主演，讲述江洋大盗为夺回妻子的心，一夜间组织了十一位高手抢劫了情敌的赌场的故事。——译者注

[15] Author Interview with Senior Military Official Who Requested Anonymity Due to the Sensitivity of the Statement.

[16] Author Interview with Hillary Clinton, 20 November 2017.

[17] Packer, George, “The Last Mission,” *New Yorker*, 28 September 2009,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9/09/28/the-last-mission>.

[18] “David Petraeus LITERALLY Runs away From Bilderberg Questions,” YouTube, WeAreChange, 11 June 2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3x0mSdGY9I>.

[19] “Lasting Ties Mark Gen, Petraeus’ Career,” NPR, 6 February 2007, 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7193883.

[20] Ackerman, Spencer, “The Petraeus Workout,” *American Prospect*, 4 September 2007, prospect.org/article/petraeus-workout and McDougall, Christopher, “The Petraeus Workout,” *Daily Beast*, 25 June 2010, 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0/06/25/general-petraeus-workout-routine.html.

[21] Cambanis, Thanassis, “How We Fight: Fred Kaplan’s ‘Insurgents’, on David Petraeus,” *New York Times*, 24 January 2013, www.nytimes.com/2013/01/27/books/review/fred-kaplans-insurgents-on-david-petraeus.html; Taqfeed, Mohammed, “Al-Sadr Extends Mehdi Army Cease-Fire,” CNN, 22 February 2008, www.cnn.com/2008/WORLD/meast/02/22/iraq.main/index.html.

[22] Allen, Jonathan and Parnes, Amie, *HRC: State Secrets and the Rebirth of Hillary Clinton* (New York: Crown/Archetype), p. 72. Kindle.

[23] Author Interview with Hillary Clinton, 20 November 2017.

[24] Landler, Mark, *Alter Egos: Hillary Clinton, Barack Obama, and the Twilight Struggle over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6) , loc. 1680, Kindle.

[25] Chandrasekaran, Rajiv, *Little America: The War within the War for Afghanistan* (New York: Vintage) , loc. 3620, Kindle.

[26] Chandrasekaran, Rajiv, *Little America: The War within the War for Afghanistan* (New York: Vintage) , loc. 3620, Kindle.

[27] Woodward, Bob, *Obama' s Wa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 p. 80, Kindle.

[28] Broadwell, Paula and Loeb, Vernon, *All in: The Education of General David Petraeus* (New York: Penguin, 2012) .

[29] Woodward, Bob, *Obama' s Wa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 p. 97, Kindle.

[30] Landler, Mark, *Alter Egos: Hillary Clinton, Barack Obama, and the Twilight Struggle over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6) , loc. 1488, Kindle.

[31] *The Diplomat*, Dir. David Holbrooke, HBO Documentary Films, 2015, 1: 31: 25.

[32] Author Interview with Hillary Clinton, 20 November 2017.

[33] 大卫·阿克塞尔罗德（1955年2月22日～ ）是美国政治咨询顾问及分析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竞选总统期间担任首席竞选顾问，竞选后被奥巴马任命为美国总统府资政。——译者注

[34] Rosenberg, Matthew, “Richard C. Holbrooke' s Diary of Disagreement with Obama Administration, ” *New York Times*, 22 April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04/23/world/middleeast/richard-c-holbrookes-diary-of-disagreement-with-the-obama-administration.html>.

[35] Nasr, Vali,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the White House Diplomacy Let Diplomacy Fail in Afghanistan, ” *Foreign Policy*, 4 March 2013, <http://foreignpolicy.com/2013/03/04/the-inside-story-of-how-the-white-house-let-diplomacy-fail-in-afghanistan>.

[36] Author Interview with Hillary Clinton, 20 November 2017.

[37] *The Diplomat*, Dir. David Holbrooke, HBO Documentary Films, 2015, 1: 14: 00.

[38] Nasr, Vali,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the White House Diplomacy Let Diplomacy Fail in Afghanistan, ” *Foreign Policy*, 4 March 2013, <http://foreignpolicy.com/2013/03/04/the-inside-story-of-how-the-white-house-let-diplomacy-fail-in-afghanistan>.

[39] Landler, Mark, “At U.S.-Afghan Meetings, Talk of Nuts and Bolts, ” *New York Times*, 13 May 2010, www.nytimes.com/2010/05/14/world/asia/14karzai.html.

[40] Nasr, Vali,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the White House Diplomacy Let Diplomacy Fail in Afghanistan, ” *Foreign Policy*, 4 March 2013, <http://foreignpolicy.com/2013/03/04/the-inside-story-of-how-the-white-house-let-diplomacy-fail-in-afghanistan>.

9 走玻璃

那是2010年的斋月，巴基斯坦记者奥马尔·奇马（Umar Cheema）半夜里醒来，跟朋友们一起等待封斋饭，即穆斯林在封斋月期间黎明前的一餐。他们在半山公园（Daman-e-Koh）闲逛，沐浴在金色的光线中。这里白天可以俯瞰伊斯兰堡的壮丽景色，夜晚变成了浪漫的庭院和花园。朋友们凌晨2：30左右离开公园，挤进奇马的汽车，由奇马挨个送他们回家。送完最后一个朋友后，在回家的路上，奇马注意到有两辆车跟着他。其中一辆白色的丰田卡罗拉在他后边尾随，另一辆黑色切诺基吉普赶到他前边停了下来。

他停下来时，三名身穿警服的男子从吉普车上跳了下来。他们奇怪地说奇马撞了一个人然后逃离现场。奇马为巴基斯坦《新闻报》

（*The News*）撰过稿，拿过为外国记者设置的丹尼尔·珀尔（Daniel Pearl）奖学金，并为《纽约时报》工作过，但在有生之年从未涉及过任何犯罪。不过，他写过一系列很具影响力的揭露权力集团的文章。他曝光过军队的争议，涉及有关军事法庭拒绝给军官公平审判的指控。他挖出了表明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是一系列平民失踪案幕后黑手的证据。他报道过情报人员放走了参与重大恐怖袭击事件的嫌疑人。奇马对三位警察表示一定是搞混了，但还是让警察带他上了他们的车。就在这时，他们蒙上了他的眼睛，拿走了他的手机。

他们撤掉他的眼罩时，奇马坐在一个空房间里，青色墙壁斑驳地露着水泥。房间里只有一个裸露的灯泡照明，一台风扇在一个角落里慢吞吞地转着。他问这是在哪里，绑架者们告诉他闭嘴。昏暗的灯光下，他可以看到三个人，脸上都罩着儿童派对面具。他们撕下奇马的衣服，把他扔在地上，然后用木棒殴打他。他们剃掉了他的头发和眉毛，并拍下了他畏缩的照片。他们在动机上一点都没兜圈子，“你到

了这儿，就是因为你那些报道^[1]，”其中一人说，“这会教你老实点儿。”

“我一直在做失踪人员的报道，因此这让我想到了那些家庭所经历的可怕故事，”奇马告诉我，“我想到了我儿子，他两岁了。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能活着回去，我儿子就要独自一个人长大^[2]。”奇马告诫自己坚强起来，应对痛苦。“我告诉自己：‘我受惩罚是因为做了好事，因为说了实话。’”绑架奇马的人断断续续地打了他近七个小时，然后把他扔在了伊斯兰堡郊外的路边，赤身裸体，浑身是血。奇马的车也被留在了那里，他们给了他100卢比来支付回城的过路费。整个行动就像一部运转良好的恫吓机器；奇马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这不是这些人第一次这样做。他的案子唯一不同以往之处在于恐吓未能奏效：他马上把自己的经历报道了出来。

在奇马的脑海里，这次袭击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是毫无疑问的。经历地狱般的那一夜之前，他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有过一系列的接触——都是他们在他的报道发表前后带着不祥的“建议”找来的，来的军情人员会提醒他，他们的机构有“处理”不听话的人的历史。在巴基斯坦做记者可能是找死的事。记者经常遭到殴打，有时甚至更糟。在奥马尔·奇马被殴打之后一年，一直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和伊斯兰激进组织之间联系的赛义德·萨利姆·沙赫扎德（Syed Saleem Shahzad）被殴打致死，尸体被发现时，漂浮在伊斯兰堡城外的运河里。美国中央情报局随后拦截的电话通话显示^[3]，杀人令是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直接下达的——可能就是来自帕夏将军本人。1992年以来，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记录了60起谋杀记者案件，动机均与他们在巴基斯坦的工作有关。关于人权、阿富汗战争和腐败的报道都是危险的，但占据记者被害案比例高达67%的最致命案例的内容还是政治^[4]：通常是有关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或军方的报道。巴基斯坦在这方面自相矛盾——该国有着成熟

的24小时不间断电视新闻系统，还有斗志昂扬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但军方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仍然以铁腕统治，为数众多的记者甚至为情报机关工作^[5]，靠进行对政府有利的报道领薪水，而作为保险，他们不会写出批评政府的内容。

失踪以及为报道法外杀戮而招来杀身之祸等这些记者所面临的困境，凸显了对话空间在美巴关系中逐步缩小的现实。在国务院里，我发现提出记者失踪和报道被禁等议题是很艰难的过程，是在反恐合作高峰期里另一场不值得展开的战斗。这种道德妥协是国家安全敏感型关系中一大耳熟能详的特征——也可能有人认为是必然结果。然而，美国看来无力提出的议题清单越来越长，这一点实在令人震惊。这就是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开始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工作时所面临的挑战：一种其中没人超出战术范围谈论任何事情的关系。

奇马将他的经历告诉了几位国务院官员，他们表示了同情，但不感兴趣。“（美国政府）对这些侵犯人权行为基本没有说法^[6]，除非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关系紧张起来，”奇马对我说，“华盛顿有自己的利益。只要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与他们合作，他们又为什么要为任何问题而烦恼呢？”人权问题更强烈地凸显了美国政府的权力失衡。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几乎全部在情报机构和军队之间运作，但这些势力中都没有一方认为维护人权是他们的职责范围。

“它从未进入过我（与巴基斯坦人）的谈话，”海登将军谈到记者被谋杀和失踪时说，“我每次去伊斯兰堡，都是带着非常具体的问题去的，我是有目的的。‘我们需要去做这个；我需要你帮助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将提供的；我能指望你的帮助吗？^[7]’”海登叹了口气：“我们已经知道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显然是在杀害记者，好吧？这可能会影响我对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总体看法，但这并不

影响我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合作，争取在瓦纳（Wana）或米尔阿里（Mir Ali）抓获“基地”组织行动人员。”这是美方负责监督巴基斯坦关系的情报及军方领导人中的普遍情绪，他们认为这些更广泛的对话是别人的问题。但由于美国政策进程中权力已严重偏离了文职领导层，因此已很难知道谁可以有效地提出这些问题。

海登的继任者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发现他应对这些问题的努力也屡屡受挫。帕内塔之前也是政客，而且是行政部门的资深人士，但奥巴马总统任命他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他还是情报系统的局外人。帕内塔身材魁梧，戴眼镜，举止和蔼，非常爱笑。他说他知道法律要求停止对从事侵犯人权行为的军事单位提供援助——即所谓的《莱希法案》。“当我们发现他们显然正在实施法外处理方法时，”^[8]他说到这个用法时，轻声笑了一下，“这确实引起了一些担忧。因此，我们决定采用的方法是，与其猛烈抨击它们，不如尝试看看是否有办法改善他们自身的过程。”

巴基斯坦人并不太愿意接受。“他们表情古怪地看着我，好像在说‘你知道你们搞不明白状况吗’”——更多的笑声——“‘你们总是有那么多好的法律和规则，但事实是这些人是凶手，他们杀过人，他们杀过我们，我们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在同一基础上与这些人打交道的历史。’与此同时，你说，‘你看啊，你想要F-16，你想要最新的设备，你是不是希望获得我们可以提供的产品？那么这是你必须注意的事情……’他们会看着你的眼睛说，你知道，‘我们会按照你玩笑中的希望去做，但不要忘记这是个笑话。’”帕内塔又笑了起来。在关于法外杀戮的谈话中，我从未见过有人这么多地笑过。

该地区要紧的反恐需求以及巴基斯坦的核能力共同削弱了美国的实力。“无论你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正在玩的把戏以及两国关系中的困难有多么不满，最重要的是，你正在与一个有核能力的国家打交

道，”帕内塔回忆说，“因此，总是存在你惹恼他们的危险，或者是因为他们自己粗心大意，或者只是因为他们操作的方式……结果在某个时候，让恐怖组织得到这些武器中的某一个。”他补充道，“与巴基斯坦人交往时，你总是在玻璃上行走”。[\[9\]](#)

于是乎，这种关系的态势保持不变，厚颜无耻的谎言是其基石——在反恐合作的范围内，这些谎言是得到容忍甚至鼓励的。用无人机空袭来打掉“基地”组织领导层的整个战略，其前提是对于巴基斯坦人出于政治需要会欺骗其人民的相互理解。这一关系中的欺骗文化有时候感觉已不可能逆转。“这是很难理解之处，”安妮·帕特森大使后来对我说，她的南方口音听起来轻柔克制，“真是太奇怪了，就是非常不正常。”[\[10\]](#)

这种关系的典型套路是这样的：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在巴基斯坦媒体上散播关于美国的负面消息，包括有关美国国会或白宫内有印度特工的阴谋论信息。这些故事激起了狂热的反美情绪。然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回到美国人这边，坚称是公众舆论阻止他们在恐怖分子避风港或是支持伊斯兰民兵问题上改变态度。“实际上这是真的，”[\[11\]](#)帕特森反思道，“但那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公众舆论。”帕特森态度坦诚且直截了当，是少数几个试图正视层层欺骗的外交官之一。在一次会议上，她告诉扎尔达里：“总统先生，我来到这里，与您交谈，然后会有一个新闻稿，其中指称我们从未谈过的事情。”[\[12\]](#)扎尔达里看着帕特森，好像她已经失去了理智一样，然后说：“你真的不会希望我们把这里实际谈到的东西公布出去！”这些循环也在美国同样依靠外国军队的其他热点地区重复着，例如在埃及，而这些热点地区的本国军方也同样难缠。

帕内塔说，在与帕夏将军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代表会面后，同事们经常会说：“你明白他在说谎吧？”帕内塔确实明白。“哦，是

的，不是说我不知道似的……你心里还是比较有数的……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我们的行动保密——保密的原因是巴基斯坦人希望保密，这样他们就永远不必承认发生了什么！”^[13]帕内塔又笑了起来。帕夏将军以他很让人好奇的千禧一代的方式，拒绝对帕内塔的评论做出回应。“对不起罗南，这没我什么事。让利昂行使他的发言权吧！！！”^[14]

接受巴基斯坦的两面派做法按说应该为合作提供了保障，然而即使在战术层面上，这种关系也仍然危机重重——有时对双方而言都是如此。一名现已升任更显赫位置，因此不愿透露姓名的巴基斯坦军队指挥官告诉我，联合行动中因沟通失误而导致死伤的情况相当普遍，他就亲身经历过一次这样的行动。那是在2009年初，他作为一位步兵指挥官，参加史瓦特河谷一系列以失败告终的最初期反恐行动期间，当时还是冬天，山谷里冷得感觉空气都冻住了。他正带着手下一支35人小分队穿越一段艰难地带，去追踪美国人选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恐怖主义目标。（多么重要，他从来不曾获知。“当你在战场上指挥部队时，你是没有能力去弄清楚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高价值目标的，”指挥官说道，“你只关心在他干掉我之前，先把干掉。”）头顶上空，他可以看到美国的无人机如影随形。“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有一支美国技术团队在配合^[15]，而这支团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捕食者’无人机，它就在我们头顶上飞着，”他说，“这当然得到了巴基斯坦的同意。”

一支这样的美国技术小分队就在与史瓦特河谷作战行动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通过无人机监视整个情况。美国人的出现是严格保密的事情，甚至上述指挥官自己队伍里的人也没有被告知具体情况。但这位指挥官与美国军官通过开放无线电通信线路进行了沟通，被告知为了加强火力，他们可以要求“捕食者”无人机从空中进行打击。

据这位指挥官回忆，在行动的第一天晚上，他的部队接近了目标，但只能眼看着目标逃进了部队被明令禁止进入的“敌对区”。指挥官通过无线电通信线路向美国人通报了坐标，无人机在离目标很近的区域盘旋了几个小时，却没有发动攻击^[16]。

第二天晚上，另一支部队在距离目标大约35英里的地方与目标有了类似的遭遇，并且也呼叫了空中打击。这一次，空袭来了——目标不是他们追击的恐怖分子，而是巴基斯坦部队自身。“我们自己的士兵，”这位指挥官对我说着，一拳头敲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我们失去了31个弟兄，而这都归因于操作员的失误……我们再也没有呼叫过无人机空袭。”巴基斯坦人告诉美国技术小分队说他们不会合作。不到两周后，美国人撤了。

这个故事反映了与巴基斯坦军方人员谈话时经常出现的情绪。“没有诚意”，刚刚提到的那位指挥官说，指出这是关系范围狭窄及缺乏沟通的结果。对于他冒着生命危险而付诸的行动，美国人在信息方面分享其总体目标之少，让他感到恼火。“美国从未正式与我们分享过他们在阿富汗的最终状态，”他抱怨道，“这是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战略互动的典型例子。我们一直在解决操作问题。我们还没有谈到两国应该互相谈论的重大战略问题。”说到这里，我们谈话时在场的另一位巴基斯坦军方官员起劲儿地点头。“没有人问一问，到底是什么促使巴基斯坦采取了已有的所作所为”，^[17]这位官员补充说。

对于这种关系中美国所做的妥协是否值得，各方意见莫衷一是。一方面，安妮·帕特森所属的一派认为：“我们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就这些反恐问题进行了非常高度的合作，这在世界上非常独特。”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的许多其他官员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有同样多的人严重存疑。反省起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那段时间，彼得雷乌斯对我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不是最好

的情报来源之一……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是一种高度建立在交易基础上的关系。” [\[18\]](#)

每当巴基斯坦反恐合作的缺陷暴露出来时，这场辩论就会加剧。一名恐怖分子于2010年在纽约时代广场差一点引爆卡车炸弹的事件发生后，联邦调查局获悉，罪魁祸首是一名33岁的巴基斯坦裔美国人，名叫费萨尔·沙扎德（Faisal Shahzad），曾在巴基斯坦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的一个恐怖分子避难所接受过训练。他们很快意识到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向美方预警威胁。愤怒的白宫官员训斥了巴基斯坦人，要求后者分享包括从巴基斯坦出发航班的旅客信息在内的更多情报，并停止拖延签发美国人的签证。作为双方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巴基斯坦人坚称他们已经分享了一切，然后拒绝交出航班的旅客信息 [\[19\]](#)。

签证封锁是一个特殊的难点。我2009年加入国务院时，巴基斯坦人肆无忌惮压缩对美国官员发放旅行许可签证数量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多年。限制行动是对巴基斯坦境内反美情绪的让步，其中包括担心中央情报局特工会大规模地进入巴基斯坦。民事援助工作的代价可观，国务院官员常常根本无法入境。有一次，到了我计划前往伊斯兰堡旅行的前一天，我了解到自己申请了几个月的签证仍在经受“磨难”。与巴基斯坦通常的情况一样，答案不在文职官员手里。于是，我预约了与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武官纳齐尔·艾哈迈德·巴特（Nazir Ahmed Butt）中将面谈。我们在他位于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四楼的大办公室见了面，窗外可以看到街对面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巴特将军穿着整齐的军装，领章上嵌有三颗星；他相貌英俊，唇上留一抹有些花白的小胡子，有着巴基斯坦人中不常见的靛蓝色眼睛。在助手从撒满粉红色花朵的细瓷茶壶中倒茶的同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专注地听我说话。我尽了最大努力，讲述了与巴基斯坦民间社会合作的重要性。一个小时后，我拿着一年期多次往返签证离开了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不是

每个人都这么幸运。在任何一个时点都会有数百份申请待决^[20]，需要巴基斯坦军方或情报人员直接批准。

这种情况最终造成的问题之大，以至于希拉里·克林顿向巴基斯坦总理优素福·拉扎·吉拉尼提出了交涉。正如哈卡尼所说的那样，吉拉尼悄悄地授权侯赛因·哈卡尼开始不经过伊斯兰堡而批准签证——用哈卡尼的话来形容，这让他成了“签证沙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批准了一波美国签证申请，使双边关系不再倾向于产生敌对。在他看来，他“靠批条子而化解了巴基斯坦和美国之间的许多问题”。^[21]哈卡尼知道他的努力会引起巴基斯坦政治机构的怀疑。对于他来说，就像罗宾·拉斐尔的外交努力遭到误解一样，与另外一方交谈即将成为一场危险的游戏。

^[1] Author Interview with Umar Cheema, Via Skype to His Home in Pakistan, 5 September 2016.

^[2] Author Interview with Umar Cheema, Via Skype to His Home in Pakistan, 5 September 2016.

^[3] Mazzetti, Mark, *The Way of the Knife: The CIA, a Secret Army, and a War at the Ends of the Earth* (New York: Penguin, 2014), p. 292.

^[4] “60 Journalists Killed in Pakistan since 1992/Motive Confirmed,”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https://cpj.org/killed/asia/pakistan>.

^[5] Gall, Carlotta, *The Wrong Enemy: America in Afghanistan, 2001-2014*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4), p. xx (Prologue).

^[6] Author Interview with Umar Cheema, Via Skype to His Home in Pakistan, 5 September 2016.

[7]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Michael Hayden, in Person at His Offices in Washington, D.C., 17 May 2017.

[8]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Leon Panetta, 6 May 2016.

[9]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Leon Panetta, 6 May 2016.

[10] Author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Anne Patterson, 12 May 2016.

[11] Author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Anne Patterson, 12 May 2016.

[12] Author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Anne Patterson, 12 May 2016.

[13]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Leon Panetta, 6 May 2016.

[14] Text Message Sent from General Pasha to Author.

[15] Author Interview with Pakistani General, at Pakistani Embassy in Washington, D.C., 6 January 2017.

[16] Author Interview with Pakistani General, at Pakistani Embassy in Washington, D.C., 6 January 2017.

[17] Author Interview with Pakistani General, January 2017.

[18]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avid Petraeus, in Person at His Offices in New York City, 25 May 2016.

[19] Haqqani, Husain, *Magnificent Delusions: Pakist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Epic History of Misunderstanding*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3) , p. 342, Kindle.

[20] Haqqani, Husain, *Magnificent Delusions: Pakist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Epic History of Misunderstanding*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3) , p. 342, Kindle.

[\[21\]](#)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in Person, Hudson Institute Office, Washington, D.C., 6 January 2017.

10 农夫霍尔布鲁克

由于无法将政策重心从他所谓的“军事思维”上移开，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开始利用这种模式的边缘地带迂回工作。他仍然认为，任何成功的希望都取决于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地扩大美国在战术以外的作用。

在边境的阿富汗一侧，他提议了一大批以民生为主导的新援助项目。在他的鼓动下，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09年预算中，援助阿富汗重建的拨款要求较上一年小布什政府的同项预算多了8亿美元[1]。霍尔布鲁克强行控制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项目，坚持要亲自签署许多项目。他能够获得这种控制权，是因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国务院报告。他这种超过自己职权的影响力成为官僚部门之间积怨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当霍尔布鲁克马不停蹄地忙于各种活动，让很多项目历时数月等待审批，他还不愿意放弃控制权的时候。但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必要的。阿富汗到处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耗费巨资援助，但令人尴尬的没多大意义的工程——从会损伤骆驼蹄而让阿富汗人认为毫无用处的鹅卵石道路，到建在地下水太咸而庄稼无法生长的土地上的农垦项目，再到无意中扩大了罂粟种植面积[2]并进而提振了阿富汗毒品经济的免费肥料发放。霍尔布鲁克在越南时，美国国际开发署拥有一支包括农业等领域技术人才在内的强大专家队伍。到了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削减预算数十年的结果缩小了国际开发署的人员规模，也削弱了这些专长。美国国际开发署切实获得的资金经常管理不善和使用不当，项目经常交给运营开支高昂但对实地情况了解甚少的美国大型承包商。这是在霍尔布鲁克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困扰他的失衡症状之一。到现代反恐战争年代，几乎所有的能力和资源都提供给了军方。

霍尔布鲁克确信关键是农业。领导该地区许多缉毒行动的美国军队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用于提炼海洛因的罂粟种植利润丰厚，是维系塔利班生存的重要经济来源，因此小布什政府的重点是铲除农作物，在阿富汗一路砍伐并焚烧田地。霍尔布鲁克对此感到愤怒。他指出，情报评估显示，巴基斯坦和海湾国家的支持对于塔利班的生存来说才更为重要。他认为，铲除农作物会将身无分文的农民推入塔利班的怀抱——那往往是农民庄稼被毁之后的唯一就业来源。

他着手将美国的重点重新调整到支持阿富汗农民上来。“他们需要罗斯福在大萧条期间给予农民的那种从头到尾的农业支持^[3]”，霍尔布鲁克说。他走火入魔了。石榴曾经是阿富汗人获利颇丰的出口产品，如今成了霍尔布鲁克尤其痴迷的对象。在霍尔布鲁克的要求下，我组织了数十次专门讨论水果问题的会议。有时他会在不相干的一句话中间打断我，从遥远的某个角落里说：“石榴的问题，我们说到哪儿了？”到他在特别代表任上工作满一年时，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这个据我所知至此连盆仙人掌都没养活过的人，居然可以解释石榴所需的湿度、适宜的土壤类型以及理想的收获时间。希拉里·克林顿开始称他为“农夫霍尔布鲁克”^[4]。

但是，任凭霍尔布鲁克百般努力，五角大楼在同一时空内的一连串项目规模之巨，仍然使民用重建项目相形见绌。在乔治·W. 布什执政的早期，国务院主导的重建项目支出与五角大楼项目的支出之比有时可以超过10：1^[5]。到霍尔布鲁克来到国务院时，情况几乎已经逆转。趋势难以忽略：从2008年到2010年^[6]，国务院在阿富汗的重建项目支出从22亿美元跃升至42亿美元，而五角大楼的类似项目预算则从34亿美元到104亿美元，增长了两倍多。这包括了海量常规中与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相关的发展项目^[7]，从缉毒项目到教育项目，再到包罗万象、主要用于道路建设和维修的指挥官应急响应计划项目。同

样，陆军工程兵团也参与了阿富汗全国各地的基础设施项目，而对此美国国际开发署有时是最后一个获悉的。

即使对于那些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及国务院最新拨款而承包的项目，霍尔布鲁克也难以把发展目标及军事目标区分开来。反叛乱战略通常可描述为三步——“清除，保持，建立”。意思是进入一个地区后，先清除区域内的敌人，接着用我们的部队控制该区域，然后再开始在当地建立生产能力。奥巴马政府执政的第一年里，随着时间推移，从彼得雷乌斯的反叛乱手册中摘取的措辞开始出现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开发合同中。要想申请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项目，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的慈善机构还必须满足一项要求，“让那些以反叛乱行动为重点且局势不稳定的社区^[8]，能够直接实施小规模在社区一级项目”，并“支持军方……通过帮助‘占据’已清除完毕敌对势力的区域，而支持来自社区的努力”。

战事仍在继续的战区里，安全和发展的目标始终都难以完全割裂开来，但历史上始终存在发展应该靠技术专长和长期目标驱动，而不是受军事战术束缚的认知。明确地将合同语言军事化是前所未有的——结果也显示是词不达意的。申请合同的各非政府组织反感了。一个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告诉我说，因为其工作人员明显的军事身份，他们就成为攻击目标。其他人表示，军事化正在摧毁阿富汗民众对美方的信任，阿富汗人感觉舒适的是美国的重建努力，而不是美国的军事力量。

霍尔布鲁克的另一个判断也是正确的，即小布什政府任内实施多年的军事驱动下窄范围参与政策也使美国与阿富汗公民社会的关系出现萎缩，尤其是在地方层级上。美国大企业获得同样巨额的佣金，然后将项目转包给其他集团，而这些集团有时又会再次转包。结果相当明显：效率严重低下，且缺乏问责机制。

最初的问题之一是：美国根本不知道当地有哪些团体，以及在哪里。霍尔布鲁克的解决办法通常是雄心勃勃的：他让我跟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的每一个非政府组织。我招募了自己认识的唯一一位计算机科学极客——名叫吉莉恩·柯兹拉（Jillian Kozyra）的程序员，之后很快就被谷歌雇走了。我们在我位于U街的地下室单房公寓里通宵达旦，我设计概念架构，她来编程。她使用编程语言Ruby构建了一个抓取应用程序——可以从互联网资源中提取数据的自动化工具——与谷歌地图以及一些基础分析工具结合起来使用，例如可以针对指定区域中不同类型的公民社会活动，生成饼形图的分析工具。这个过程结束时，我们获得了一张记录有超过10万个当地非政府组织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图。我们把它上传到一个我购买的公开非政府网址上。霍尔布鲁克对这项技术成果感到非常高兴，还让我在白宫、五角大楼和美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大使馆做了展示。

但是该项目作为一个缩微实例，也展示了他那种“奔牛闯入瓷器店式”工作方法的弊端。美国承包商们被霍尔布鲁克想要推开他们的意图所激怒，他们开始游说开除他^[9]，并在媒体上抱怨对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关注。而且，与霍尔布鲁克所有努力的情况一样，军方是占有压倒性优势但不总是友好的对等合作单位。非政府组织跟踪技术首次展示后的两年里，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律师都来过我的办公室。他们想知道这个神秘的技术来自哪里？我的数据是从哪里获取的？谁提供的资金？答案当然是：这是一个使用开源数据和工具的临时应急解决方案，代价只是单个域名购买费用。两家机构都声称对此工作产品拥有所有权，但没人采取过任何措施。在我大约四年后离开政府公职时，美国仍然没有霍尔布鲁克所寻求的民间社会团体基础数据库。

后来，我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匿名邮政信箱收到一只大号牛皮纸袋，里边是一份招工面试的申请表，面试将在严格的保密状态下进行。随后是一次定时在线测验，以及一系列在饭店、酒吧中与匿名官

员之间的会面。他们对我在国务院的工作没什么兴趣，而是问我是否愿意以非官方身份担任律师或记者。“来吧，”一位面试官员说，“你们在那里做的是场外表演，这是真正的工作。”

像做绝大多数事情时一样，身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的霍尔布鲁克雄心勃勃，令人兴奋。然而对许多人来说，他不受欢迎。用人时优先考虑外人，而非职业外交官员，使特别代表办公室在国务院官僚机构内部备受憎恨。他自己担任的机构间召集人是白宫的传统领域——而且这时还是一个控制特别严格的白宫。这些都是霍尔布鲁克永远无法完全获得救赎的原罪。从我们开始工作的那一刻起，官僚系统也开始了“驱逐”这一奇特建制的工作，就像肌体排斥一个外来的移植器官一般。这让霍尔布鲁克，以及如后来有些人指出的整个国家，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 Chandrasekaran, Rajiv, *Little America: The War within the War for Afghanistan* (New York: Vintage, 2013), Kindle.

[2] Chandrasekaran, Rajiv, *Little America: The War within the War for Afghanistan* (New York: Vintage, 2013, loc. 1525), Kindle.

[3] Chandrasekaran, Rajiv, *Little America: The War within the War for Afghanistan* (New York: Vintage, 2013, loc. 1646), Kindle.

[4] Landler, Mark, “At U.S.-Afghan Meetings, Talk of Nuts and Bolts,” *New York Times*, 13 May 2010, www.nytimes.com/2010/05/14/world/asia/14karzai.html.

[5] Tarnoff, Curt, “Afghanistan: U.S. Foreign Assistanc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2 August 2010, <https://fas.org/sgp/crs/row/R40699.pdf>.

[6] Tarnoff, Curt, “Afghanistan: U.S. Foreign Assistanc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2 August 2010, <https://fas.org/sgp/crs/row/R40699.pdf>.

[7] “Recipient Profile: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rps, ”
[https://www.usaspending.gov/transparency/Pages/RecipientProfile.aspx? DUNSNumber=186375218&FiscalYear=2012.](https://www.usaspending.gov/transparency/Pages/RecipientProfile.aspx?DUNSNumber=186375218&FiscalYear=2012)

[8] Request for Application RFA 306-09-545, Community Based Stability Grants (CBSGs) Program, USAID, 3 September 2009, p. 4.

[9] Request for Application RFA 306-09-545, Community Based Stability Grants (CBSGs) Program, USAID, 3 September 2009, p. 4.

11 少点对话

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的职务于2009年1月在国务院本杰明·富兰克林国宴厅的仪式上宣布后一周，霍尔布鲁克和侯赛因·哈卡尼在海伊-亚当斯酒店（Hay-Adams Hotel）的拉斐特（Lafayette）餐厅坐了下来——这是一个宽敞、光线充足的大厅，有着奶油色的墙壁和可将白宫尽收眼底的景观。它曾经是职业外交官和国务卿约翰·海伊

（John Hay）的宅邸，他和邻居及政治世家子弟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这里为哥伦比亚特区的知识精英们主持过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沙龙。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的住宅被夷为平地，给哈卡尼和霍尔布鲁克正在享用午餐的这座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优雅建筑让路。在二人职业外交生涯的重叠时间里，霍尔布鲁克与哈卡尼有过一些匆匆而过的打交道机会。2008年，哈卡尼成为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后，两人的关系变得融洽。霍尔布鲁克当时是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主席，正开始增加对该地区的出访，以期建立真正的善意。其新职务正式宣布的那天，他打电话给哈卡尼，建议二人共进午餐——要选在能被人们看到的地方，霍尔布鲁克苦笑着明确表示。海伊-亚当斯酒店很难带来最高的能见度，但是霍尔布鲁克还是选择了此地，完全是出于另一种考虑：身为另一个时代的产物，他相信在显著的地点被看到，能够发出一种信号，尤其是当有一群感兴趣的政客和观察者已准备好接收此种信号的时候。事实是，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霍尔布鲁克摆出了他的目标：他希望结束阿富汗战争，稳定巴基斯坦局势。他想要和解。与往常一样，他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其中许多都是关于促成地区内国家谈判的。“美国可以同时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朋友吗？”他问道。他希望就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进行更坦诚的讨论。如果说哈卡尼从经验中了解了一件事，那就是坦诚很难得。

“记住一件事^[1]，”哈卡尼警告霍尔布鲁克，“这不是南斯拉夫。”他从霍尔布鲁克关于波黑战争的著作《结束战争》（*To End a War*）中引用了一句话：“三方领导人都愿意在自己争论的时候，任由他们的人民死亡。”^[2]

“在次大陆，”哈卡尼接着说，“不仅如此。人们不愿意也不知道妥协意味着什么。这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3]

两人面面相觑——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都是政治机构的局外人，都在着眼解决世界上最艰难的外交政策问题。

霍尔布鲁克观察到，新任美国总统将重点向该地区转移的战略政策可能也使哈卡尼的日子更难过。“更多的关注和审查提出了找不到轻松答案的问题。”他说他并不羡慕哈卡尼的工作。这种感觉是相互的。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两人的关系变得亲密。霍尔布鲁克可以早上7点钟就打电话把哈卡尼从床上震醒，询问他最近的外交方案。他们可以在霍尔布鲁克位于乔治敦的联排别墅附近散步。周末，霍尔布鲁克的妻子不在城里时，他们会去看电影。2010年3月，他们走着去了E街电影院观看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惊悚故事片《影子写手》（*The Ghost Writer*）。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名英国首相在与美国人过于密切合作的过程中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而他的妻子最后证明是中央情报局特工。之后，霍尔布鲁克和哈卡尼去吃了酸奶冰激凌。

霍尔布鲁克希望争取负责整个区域事务的职务^[4]，但其中不少职责在他能拿到手之前，就已经给了别人。伊朗的工作被白宫占据了，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被任命带队与该国进行对话。带来更大打击的是，对于与巴基斯坦之类“邪恶”国家一道，被并入霍尔布鲁克的战区管辖范围这一主意，印度几乎大哭大闹。印度经济迅速崛起，已使该国成为比巴基斯坦更有实力的外交中心。印度成功地游说

了奥巴马过渡团队，取消了任何印度特使的工作角色^[5]，尤其是涉及霍尔布鲁克的角色。

霍尔布鲁克告诉我，他无论如何都打算与大象进屋般谁也无法忽视的印度打交道，然后开始经常性地将这头大象囊括在他的地区外交中。印度不是他唯一的目标。2010年2月，他让包括我在内的手下工作人员给他筹划了一个国际差旅计划。那真是看着都让人筋疲力尽的一份清单，仅在2010年的头两个月，他的穿梭外交之旅就覆盖了20座城市，以及几乎同等数量的国家。伦敦、阿布扎比、伊斯兰堡、喀布尔、新德里、巴黎、慕尼黑、多哈、利雅得、塔什干、第比利斯、柏林……名单一直在延续。在城市名单以外，我们也注意到了他从外国伙伴那里获得的援助阿富汗或巴基斯坦的承诺。新德里承诺继续向阿富汗提供民事援助并加强与阿富汗的贸易，同时承诺避免“在安全领域提供挑衅性的援助”。俄罗斯曾一度答应向巴基斯坦提供“技术性军事训练”和直升机维修服务。这是全球性的威胁，于是霍尔布鲁克打算建立一套全球解决方案。

他的梦想是将巴基斯坦和印度聚到一起，消除巴基斯坦支持恐怖分子的根本原因。他甚至召集了一次由他自己、哈卡尼和前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S. K. 兰巴（S. K. Lamba）出席的秘密会议。“我们曾见过一次，”哈卡尼承认，“霍尔布鲁克鼓励我和印度人交谈。”但哈卡尼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不会积极应对任何有意义的谈判的。“什么会让巴基斯坦人感到满意？”^[6]他思索道，“除了印度停止存在以外？”印巴问题要求谈判各方的姿态发生根本性转变——那种霍尔布鲁克在代顿实现的转变，只有在白宫的强大支持以及他可以实际指挥的军事打击威慑下，才可能达成。在印巴问题上，他几乎没有与印度人谈判的授权，因此经常不得不秘密行事，以避免不仅激怒巴基斯坦人，还同时激怒白宫的窘境。在这个地区，军方在主导政策安排。在这里，他不得不绕开自身职权范围界定中存在的局限。

另一个重大挑战就是与巴基斯坦人对话。在不考虑任何更广泛对话的前提下，情报机构之间存在多年的对话在对苏联战争期间是奏效的。但在对抗苏联的过程中，巴基斯坦人和美国人一直站在同一边。尽管各自出于不同的原因，但双方都需要将入侵的苏军赶出该地区。双边关系已在诸如巴基斯坦的核发展等其他领域里充满了欺骗，但至少还有一个战略结盟关系存在。当时没有更广泛的对话，也没有必要有。

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美国人试图重建同样的关系，但面对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根本性区别：这一次，巴基斯坦站到了另外一边。现在，美国希望将与“基地”组织结盟的武装分子赶出该地区，但巴基斯坦人则按照美国教他们的做法，继续使用这些武装分子作为代理人。巴基斯坦人经常看似接受美国的合作要求，然而，他们也总是有与美国相反的目标。如果巴基斯坦要重新考虑其基础战略重点，就需要进行更广泛、更诚实的对话。要想成功，霍尔布鲁克就必须将代理战争的艰难交易关系，转变成真正的外交联盟或是接近联盟的关系。

霍尔布鲁克知道，哄着巴基斯坦进行更广泛的对话，需要美国在军事援助以外的领域里做出承诺。他需要行动或者至少需要钱。2009年4月，他把自己所拟的一份国际参与名单上的许多国家召集到东京，举行捐助者会议，并游说他们承诺援助巴基斯坦总计50亿美元。“这是一场值得尊敬的首次公开募股（IPO）[\[7\]](#)”，他开玩笑地说。一位记者问：这些钱够吗？“巴基斯坦需要500亿美元，”霍尔布鲁克说，“不是50亿美元。”

在美国本土，他和大卫·彼得雷乌斯一起疯狂地游说。“理查德和我在国会山非常下功夫，”[\[8\]](#)彼得雷乌斯告诉我，“我记得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这一次霍尔布鲁克用黑莓手机，把自己的政治柔术技巧发挥得登峰造极，因为他把每个议员办公室里的每个关系都

联络到了。2009年9月，参议院全票通过了五年内向巴基斯坦提供75亿美元新援助的授权法案，按照三位提出动议的参议员名字命名为《克里-卢格-伯曼法案》（Kerry-Lugar-Berman Act）。这是第一个对巴基斯坦的长期民间援助计划，其目的是寻求扭转美巴关系几乎只有军方对军方性质的现状。“这是一次宏大的战略尝试，旨在解决美国只与巴基斯坦军队打交道而不关心民主或巴基斯坦人民看法的问题[9]”，美国国会图书馆下设的国会研究服务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巴基斯坦援助项目分析师艾伦· Kronstadt（Alan Kronstadt）回忆道。但事实证明，改变这些看法比美国人讨价还价过的任何事务都难。

《克里-卢格-伯曼法案》通过的当天，贝娜齐尔·布托的说客马克·西格尔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个派对。他已经为自己当时所供职的公司美国洛克律师事务所（Locke Lord Bissell & Liddell LLP）签下了巴基斯坦这个大客户，因此一大群律所雇员、巴基斯坦外交官和政客为这一业绩向他祝酒，以示庆贺。不到24小时后，“塌台”就开始了。一位名叫穆赫辛·卡迈勒（Mohsin Kamal）的巴基斯坦年轻说客在派对当天加入了西格尔的公司，他希望能从美巴关系明显解冻中获得点好处。然而相反，他的第一项工作却是让人抓狂的灾害控制。巴基斯坦媒体上开始出现挾伐《克里-卢格-伯曼法案》的言论。这简直是“堕落”，充斥着“对巴基斯坦主权的恶毒设计”，巴基斯坦英文报纸《国家报》的报道里充斥着愤怒。这是“在其人民的眼皮底下对这一国家的侮辱[10]”，外交官马利哈·罗迪（Maleeha Lodhi）在巴基斯坦《新闻报》上发表评论文章称。即使是巴基斯坦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卡亚尼（Kayani）将军也表达了愤怒[11]，并私下谴责了美国官员。

争议出在美国国务卿每年都要拿出认证的一项要求上，内容是必须证明巴基斯坦在保持安全援助物资流动方面达到了行为良好的基本

门槛。这包括在确保核武器不流入恐怖分子手中、停止支持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团体、协助打击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和奎达地区恐怖分子避风港等方面进行合作。这实际上使巴基斯坦较为含蓄地点头接受了问责。认证要求仅适用于安全相关的援助，而且即便如此有限的要求，也可以出于任何国土安全原因而被自由废弃。在实践中，这是一个无附加条件的礼物。美国很少有立法者考虑过焚毁整个关系的可能性。但在巴基斯坦，偏执是一种全民性嗜好。如同其他一切插曲一样，这一争议引发了两种反应：有些人确信这是印度插手的证据，有些人确信这是侯赛因·哈卡尼的错。“侯赛因·哈卡尼做了件非常愚蠢的事[\[12\]](#)，”这是穆赫辛·卡迈勒对此事件直截了当的解读，“他让这些条款写进了法案。”

随着巴基斯坦民众愈加激愤，霍尔布鲁克召集工作人员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应对危机的会议。他穿着袜子不停地来回踱步。霍尔布鲁克选择的回应已散播给任何愿意倾听的记者，那就是坚持强调美国的援助“无条件”——他开玩笑地把“条件”简称为“c开头的那个词儿”[\[13\]](#)。法案命名中姓氏排在头位的参议员约翰·克里被派往伊斯兰堡，尝试安抚巴基斯坦人。“我们整个行程中都在为《克里-卢格-伯曼法案》道歉，我们在那里会见了纳瓦兹[\[14\]](#)及整个领导层。”一位高级官员回忆说。有一次，克里和卡亚尼将军共进晚餐，整整坐了五个小时。“我们想给你们这笔钱，我们想改变我们的关系的本质，”克里告诉卡亚尼，“但是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你们需要对别人如何看待你们继续做以前做过的坏事这一点，有所敏感。”“你看，我也是政治家，”卡亚尼回答道，“我理解你们的政治，我知道这是多么困难。”如往常一样，巴基斯坦领导人依然是在该国人民面前说一套，在美国人面前说另一套。

有一刻，我曾感到好奇，一个外界观察人士会如何看待此等“癫狂”：应该是盟友的接受方对75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愤怒得发抖，而一

个世界强国鞠躬哈腰地否认自己白给对方的救济附带任何责任。这种情况折射出双方关系中的深层问题。霍尔布鲁克试图用援助换取更广泛的对话，但巴基斯坦充当美国军事利益的代名词已经太多年了，尽管间谍头子和将军们之间的对话频繁，但更广泛的关系无人问津，且已成为偏执和怀疑的培养基。这是75亿美元买不回来的。

罗宾·拉斐尔接受了当时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安妮·帕特森提供的工作机会。《克里-卢格-伯曼法案》于2009年9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均获得通过之前的一个月，她打点好行装，再次搬到了伊斯兰堡，在当地舒适的F-6区里安了家，房子是一栋灰泥外墙的两层楼。这一区域紧邻马尔加拉山，绿树成荫。她买了辆翻新的丰田汽车^[15]，自己开车去参加派对和各种活动。我在伊斯兰堡的差旅中，看到过她出席俄罗斯外交官和英国慈善机构负责人举行的家庭聚会，活动现场总是挤满了巴基斯坦人。罗宾·拉斐尔又回到了自己20多岁起就熟知的伊斯兰堡精英当中。把霍尔布鲁克和彼得雷乌斯在国会山上争取来的新援助资金花出去的任务，就落在了她身上。

“我当时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实施《克里-卢格-伯曼法案》是个好主意，是摆出了很漂亮的姿态……帮助提高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而不仅仅是军队的”，她对我表示。但是，花出这笔钱跟宣布这笔援助金时一样令人崩溃。这也反映了双方关系仅限于交易性合作的历史和现实——这种关系在设置上就根本不能承载每年15亿美元的民事援助。授权的援助资金远远超出美国国际开发署可以有效支出的资金额度的现实，很快就明确显现。结果，在许多巴基斯坦人看来，就是又一个承诺无法兑现——被炒作得山响的一个数字，在所有愤怒过后，从未变成现实^[16]。

与阿富汗的情况一样，美国在巴基斯坦问题上也缺乏技术专长。在一些特定领域里，如水利基础设施，美国国际开发署根本就没有任

何合格的人员。我开始拉入外部专业机构，将他们与巴基斯坦政府和美国国际开发署联系起来。但是外部专业机构是没有任何能力推动美国援助机器加速运转，以满足战时立法所规定的期限要求的。“事实是，我们做不了多少事情，”^[17]拉斐尔承认，“因为很多事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启动，所以巨大的期望在不断堆积，我们却无法满足它。”

破坏了霍尔布鲁克在阿富汗努力的同一破败系统，也挫败了拉斐尔希望推动项目更快获得通过的努力。尽管我们在之前的项目中已经确认了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但大部分的《克里-卢格-伯曼法案》援助资金还是通过庞大的美国承包商层层分包出去。“我们把大部分的钱都浪费在了承包商头上”，拉斐尔冷冷地说道。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改正问题。五年在基础设施项目的语境下，就是一眨眼的工夫，而对于霍尔布鲁克试图实现的长期关系变化而言，就显得更短。“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那应该是一个十年计划，而不是五年计划^[18]，”拉斐尔后来告诉我，“因为我们不能很快弄清楚如何更好地花这些钱。”军事紧急情况 and 国内政治压力所决定的时间表，再一次没能契合外交和发展的现实。

然后就是来自负责实施援助的团体的阻力——如同在阿富汗一样，他们不希望被认定为美国的战争努力的一部分。霍尔布鲁克和彼得雷乌斯兜售《克里-卢格-伯曼法案》的逻辑很简单：我们在水坝和学校上花了很多钱；巴基斯坦人会看到所有的美元源源而来，而且巴基斯坦的角色将从暧昧反恐行动中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化身，转变为美国的朋友——变戏法呢，说变就变。商讨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的会议，经常表现为高官们愈加迫不及待地恳请落实能见度高的“标签项目”，以求如憧憬的那样，赢得善意和好评。

霍尔布鲁克跟其他人一样想赢得善意与好评。一张在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难民营拍摄的照片中，他垂肩站在一个留着胡子的巴基斯坦难民旁边，难民盘腿而坐，怀里的小女儿坐在他腿上。霍尔布鲁克摘了墨镜，脸上满是真诚的同情，专注地看着难民。他的花白头发从一个印有“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卡其色帽子下方支棱出来，USAID下方是国际开发署的箴言：“来自美国人民。”他开始经常戴这帽子。“巴基斯坦媒体似乎对RCH”——霍尔布鲁克的姓名缩写——“的棒球帽特别感兴趣”，瓦里·纳斯尔在给霍尔布鲁克及其幕僚长罗斯玛丽·保利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这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吗，弗洛伊德博士？”霍尔布鲁克回信道。“不管显得多么‘权且’，这实际上是显示美国也有民事援助的唯一标志……所有国家的援助都在这儿了，甚至包括伊朗的，人家的标志都比我们做得好^[19]。我们只有直升机是看得见的。中国的野战医院（我在特达曾开车经过）、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我访问了他们的难民营，他们正在那里建一座清真寺）、澳大利亚（野战医院在木尔坦）、瑞士、英国，等等。在我们隐形的同时，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们也拒绝承认我们为他们提供了资金。”

霍尔布鲁克是对的——在巴基斯坦充满暴力反美情绪的敏感地区，非政府组织经常试图尽量减少星条旗的出现，担心它们可能给工作人员招来袭击。在最动荡的地区，美国甚至以豁免的方式允许完全清除美国国旗和USAID徽标。这一直都是一种君子协定。但霍尔布鲁克公开里和私下里都开始鼓动情绪。他将上述邮件转发给了希拉里·克林顿的助手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后者又将其转发给了希拉里。几天后，希拉里公开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经过斗争才能把美国政府的标识贴在我们提供的救援物资上^[20]，因为很多我们的援救工作者和非政府组织伙伴都害怕与美国政府联系在一起。”

突然间，我们与负责大部分救援工作的团体进入开战状态，而这些团体所负责的工作恰恰处于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的核心。“我们正在帮助巴基斯坦。别把我们当靶子^[21]”，这是非政府组织联盟联动会（InterAction）负责人在发表于《华盛顿邮报》的署名专栏文章标题中做出的大声疾呼。“在利比里亚或刚果等国家，从美国政府手里获得资金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经常宣传它们在传递‘来自美国人民’的援助，”山姆·沃辛顿（Sam Worthington）写道，“但在巴基斯坦，援助工作者的生命更加攸关，强制性的品牌推广可能……将美国人及其巴基斯坦同事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我被派去平息风暴，又是将这些组织请进国务院，又是前去出席非政府组织峰会，说服它们不要抵制美国政府^[22]。

双方的攻势都有所加强。曾做过探索电视频道高管、时任希拉里·克林顿手下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朱迪思·麦克海尔（Judith McHale）将那篇署名专栏文章通过电子邮件转发给了希拉里·克林顿，并表示：“如你所知，我热切地相信，继续提供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援助，而不让被救助者知道是谁向他们施以援手，这样做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希拉里·克林顿回答说：“我非常喜欢和你一起工作——我觉得有时我们就像双胞胎一样！”杰克·沙利文在给麦克海尔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当然他们不应该隐瞒援助来源，难道还偷偷摸摸吗？”他又补充了一句，以国务卿这一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来指代希拉里·克林顿：“S相信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情扩大到巴基斯坦以外——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示来自美国人民的援助找到充足理由。”

随着旨在危机管理的电子邮件往来回合越来越多，我被拉进来写一篇专栏文章，以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人拉吉夫·沙阿（Rajiv Shah）的署名发表。

我是唯一积极与那些威胁退出的团体沟通的人，考虑到我的低层官衔，这一点未免荒谬。我突然意识到此处是可以产生一个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的——一场更具体的对话，不是关于是否应该使用美国品牌，而是关于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使用，但基本上就是调整已经存在的豁免政策。其他变化，例如与即使在形势艰难地区也表示愿意使用美国国旗的当地团体合作，与依靠已在巴基斯坦面临争议的强势西方团体比起来，也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给霍尔布鲁克的一系列备忘录和给小组的电子邮件中，我试着含蓄地说出了这个方案。霍尔布鲁克气得七窍生烟。有天晚上，我在回复给整个小组的邮件中，建议公开承认不安全区域内已经给予非政府组织不显示美国标识的豁免操作。之后，霍尔布鲁克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的脸因蒙着汗水而看起来油光光的，看上去很疲惫。那时他已经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白宫的各种不友善。“你的判断力开小差了吗？”他咆哮道。他劈手来扯我带给他的那份备忘录，用力非常大，将它撕成了两半。我看着手中犬牙边的半页纸，然后是霍尔布鲁克额头上暴出的一条青筋。“我知道你认为你很特别，”他继续吼道，“我知道你认为你负有使命，认为你做了不得了的事情，认为你将给国家带来变化。我知道你从小就有这种感觉——”即便在那个时候，也很难避免感受到他在克制自己不去说“因为你去过越南”。一张近处墙上的照片里，年轻的霍尔布鲁克站在湄公河三角洲的阳光下，正从可乐瓶底似的眼镜片后面，充满笑意地盯着我们。“——但你必须知道你的位置，选择性地出击；要意识到如果没人想听的话，哪怕是最好的点子也不是好点子。现在，没有人愿意听到——唐娜？！”他的助手，一位名叫唐娜·德贞（Donna DeJban）、性格柔和的南方祖母级女性，正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外，张着嘴，毫无遮拦地哭了起来。“唐娜，别！哭！了！”他低声吼道。

拉吉夫·沙阿的专栏文章^[23]在《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上发表了，简要提及了豁免一事。实施救援的主要组织没有一个退出，援助继续进行。但在巴基斯坦施行全面的新民事援助议程的梦想从未完全实现。大部分的资金从未得到国会的批准。在某些案例中，上帝出手进行了干预。美国对洪水和难民危机的救助资金也必须从这些授权中划拨。“人道主义援助大量分流了这些资金^[24]”，国会研究员克朗施塔特说。更重要的是，正在发生的变化将极大地改变这种关系的平衡，而且随之而来的是拨款急剧缩水。

2010年3月，希拉里·克林顿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沙阿·马哈茂德·库雷希（Shah Mehmood Qureshi）坐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厅摆成长方形的一圈桌子的一头。在他们身后交替竖立着美国和巴基斯坦国旗：红白蓝星条旗与绿底白色星月旗并列。巴基斯坦代表团坐在库雷希身边，美方人员坐在希拉里·克林顿身边，霍尔布鲁克就在她这一侧的转角处。尽管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民事援助资金激增使得形势对他不利，但霍尔布鲁克依然一往直前地努力促成双方坐下来谈判。他说服了希拉里·克林顿，巴基斯坦与印度和中国这类分量更重的国家一样，每年都应该与美国进行一次“战略对话”：就双边关系中最紧迫的问题进行高级别的仪式性对话。

在第一次会议上讨论的实质性内容很少，库雷希得到的承诺都集中在传统的反恐合作领域。（“在对巴基斯坦输送军事设备问题上，我们已经同意通过快速通道来讨论数月及数年来悬而未决的请求”，他滔滔不绝地对记者们说。^[25]）但是在经历了诸多波折过后，实现这一进展的事实已经算得上一个小小的奇迹了。会谈结束后，希拉里与库雷希并肩站在国务院条约厅（Treaty Room）的蓝色墙壁和科林斯圆柱前，对巴基斯坦的友谊表示了感谢。霍尔布鲁克将此次会议界定为新型关系的开端：“巴基斯坦本身就很重要，我们并不是仅仅将这

个国家视为工具，用以制衡其东部的庞大邻国，或是其西部饱受战争蹂躏的邻国。”这更多是愿望而非现实，但确实是开端。

霍尔布鲁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开端。他主导再与阿富汗进行三边会谈，并分拆出工作小组来解决具体问题。这当中有些对他来说是绝佳的机会，使他能应对超出其职责范围的重大挑战，例如由巴基斯坦及印度之间充满敌意、巴基斯坦经济奄奄一息等造成的贸易限制。他没能说服印度坐到谈判桌前，但他积极推动实现了美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三边会谈，最终签署了开放贸易的协定。对于1965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26]的谈判进程而言，这是首次实现突破。2015年，连印度也开始表示愿意加入贸易协定^[27]。

三边工作小组的另一个工作重点——水域政策^[28]——成为霍尔布鲁克抓着不放的领域。在一个鲜为人知的观点中，他认为，水域主权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并不平稳的和平局面彻底崩溃。印度河流域是这两个国家的粮仓，河流经过印度以及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然后流入巴基斯坦。1960年，世界银行主导谈判的一项条约将印度河及支流的主权从中分开，并分配给了这两个国家。然而气候变化给这种脆弱的安排带来了压力。洪水威胁到边境两侧的农田，增加了发生地盘争夺战争的风险。干旱可能也会引发类似的影响^[29]，并且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一项研究预测，到2050年，冰川缩小^[30]将使印度河的水量减少8%。“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霍尔布鲁克告诉我，“就可能会促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用眼神告诉他这实在不可思议，而他依旧极其严肃地看着我。

霍尔布鲁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区域斗争中的水权问题，希望在更高层的支持下推进这项工作。白宫官员表示怀疑，问他是不是在开玩笑^[31]。如果有任何事情可笑的话，霍尔布鲁

克所提出的一定是最不可笑的那一个——印度人于2016年开始威胁要退出《印度河水域条约》^[32]。

意识到自己正被排挤出局，霍尔布鲁克转而争取另一位官员、副国务卿玛利亚·奥特罗（Maria Otero）来充当水域政策问题的非正式特使。（像往常一样，他从不相信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可以胜任这一工作。“她能行吗？”霍尔布鲁克在与奥特罗的一次简报会后问我，“她是否足够机灵？这很重要。”）他继续推动谈判。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跟着水域问题工作组到世界各地游走，以确保工作组整合了能够帮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潜在危机的外部专家。巴基斯坦政府莫名其妙地给了我一个冰箱贴，上边印着几个美国农业部官员和一名巴基斯坦部长在一台用于测试地下水位的设备旁边竖起大拇指的场景。有一次，我们在多哈市内富丽堂皇的丽思卡尔顿酒店里，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启动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开诚布公的对话。留着胡子的阿富汗人坐在人工潟湖旁，拒绝喝着凤梨奶霜酒^[33]。那感觉有点浪费时间，印度拒绝派遣官方特使。

但霍尔布鲁克并不认为自己是战风车。无论有多少停滞，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对话都在发生——以多年不曾出现过的程度发生着。而且巴基斯坦人在本国境内的反对恐怖主义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在2009年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认为‘这件事确实有效^[34]’，”彼得雷乌斯对我表示，“而那时正是他们在阿富汗的史瓦特河谷、巴基斯坦的巴焦尔特区（Bajaur）、莫赫曼德特区（Mohmand）、开伯尔特区（Khyber）、奥勒格宰（Orakzai）、南瓦济里斯坦特区（South Waziristan）都铺开行动的时期……我们提供了大规模的资金、情报、培训、基础设施和后勤援助，我们觉得进展顺利。”霍尔布鲁克看起来很是振奋。他对我表示，尽管存在障碍，但他正在一步步地达成重要成果。

[1]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29 March 2017.

[2] Holbrooke, Richard, *To End a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 loc. 2930–2931, Kindle.

[3]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29 March 2017.

[4] Kessler, Glen, “Mitchell and Holbrooke to Be Named Envoys, ”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009, www.voices.washingtonpost.com/44/2009/01/mitchell-and-holbrooke-to-be-n.html.

[5] Rozen, Laura, “India’ s Stealth Lobbying against Holbrooke’ s Brief, ” *Foreign Policy*, 24 January 2009, foreignpolicy.com/2009/01/24/indias-stealth-lobbying-against-holbrookes-brief.

[6]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29 March 2017.

[7] Nasr, Vali,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the White House Diplomacy Let Diplomacy Fail in Afghanistan, ” *Foreign Policy*, 4 March 2013, <http://foreignpolicy.com/2013/03/04/the-inside-story-of-how-the-white-house-let-diplomacy-fail-in-afghanistan>.

[8]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avid Petraeus, in Person at His offices in New York City, 25 May 2016.

[9] Author Interview with Alan Kronstadt, 18 August 2016.

[10] “Pakistan Media Reaction: Kerry-Lugar Bill, Terrorism, India-American-Pakistan October 20, 2009, ” Cable Released by Wikileaks, 09ISLAM-ABAD2543, 1 October 2009, www.scoop.co.nz/stories/WL0910/S02256/cablegate-pakistan-media-reaction-kerry-lugar-bill-terrorism.htm/.

[11] Perlez, Jane and Khan, Ismail, “Aid Package from U.S. Jolts Army in Pakistan, ” *New York Times*, 7 October 2009, www.nytimes.com/2009/10/08/world/asia/08pstan.html.

[12]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Mohsin Kamal, 14 November 2016.

[13] Holbrooke, Richard, “Special Briefing on Secretary Clinton’s Recent Trip to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3 November 2009, <https://2009-2017.state.gov/p/sca/rls/rmks/2009/132307.htm>.

[14] 米安·穆罕默德·纳瓦兹·谢里夫 (Mian Muhammad Nawaz Sharif)，时任巴基斯坦总理。他曾在1990年至1993年、1997年至1999年、2013年至2017年三度出任巴基斯坦总理。——译者注

[15] Entous, Adam, “The Last Diplomat,” *Wall Street Journal*, 2 December 20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last-diplomat-1480695454>.

[16]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30 June 2016.

[17]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30 June 2016.

[18]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30 June 2016.

[19] Sullivan, Jake, “Baseball Cap,” Email to Hillary Clinton, 15 September 2010, Released by WikiLeaks, <https://wikileaks.org/clinton-emails/emailid/1751>.

[20] Salmon, Felix, “U.S.A.I.D.’S PR Problem,” Reuters, 13 October 2010, blogs.reuters.com/felix-salmon/2010/10/13/usaid-pr-problem/ and Crilly, Rob, “Pakistan Aid Workers in Row with U.S. over Stars and Stripes ‘Logo’,” *Telegraph* (UK), 11 October 2010, 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pakistan/8056123/Pakistan-aid-workers-in-row-with-US-over-Stars-and-Stripes-logo.html.

[21] Worthington, Samuel, “We’re Aiding Pakistan, Don’t Put a Target on Our Backs,” *Washington Post*, 10 October 201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10/08/AR2010100802665.html>.

[22] Subject: Interaction Op-Edon Brandingin Pakistan, Email Exchange between Judith McHale and Hillary Clinton, 10 October 2010, Obtained Via WikiLeaks, <https://wikileaks.org/clinton-emails/emailid/1476>.

[23] Shah, Rajiv,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 *Huffington Post*, www.huffingtonpost.com/dr-rajiv-shah/from-the-american-people_1_b_772736.html.

[24] Author Interview with Alan Kronstadt, 18 August 2016.

[25] “U.S., Pakistan Seek to Build Trust with Talks, ” NPR, 25 March 2010, 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25153658.

[26] Landler, Mark,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Sign a Trade Deal, Representing a Thaw in Relations, ” *New York Times*, 18 July 2010, www.nytimes.com/2010/07/19/world/asia/19diplo.html.

[27] Raman, Sunil, “Why India Wants to Enter Af-Pak Trade and Transit Agreement, ” *Swarajya*, 7 January 2016, <https://swarajyamag.com/world/why-india-wants-to-enter-af-pak-trade-and-transit-agreement>.

[28] “Agriculture Secretary Vilsack Announces U.S. Members of Three Working Groups Under the U.S.-Afghanistan-Pakistan Trilateral, ” USDA, No. 0529.09, 26 October 2009, 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zX-i80ahGE8J:www.usda.gov/wps/portal/usda/usdamobile%3Fcontentid%3D2009/10/0529.xml+%&cd=1&hl=en&ct=clnk&gl=us.

[29] Qiu, Jane, “Stressed Indus River Threatens Pakistan’s Water Supplies, ” *Nature*, 29 June 2016, www.nature.com/news/stressed-indus-river-threatens-pakistan-s-water-supplies-1.20180.

[30] Mandhana, Niharika, “Water Wars: Why India and Pakistan Are Squaring off over Their Rivers, ” *Time*, 16 April 2012,

content.time.com/time/world/article/0, 8599, 2111601, 00.html.

[31] Woodward, Bob, *Obama's Wars* (Simon & Schuster, 2011), p. 210, Kindle.

[32] Kugelman, Michael, "Why the India-Pakistan War over Water Is So Dangerous," *Foreign Policy*, 30 September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9/30/why-the-india-pakistan-war-over-water-is-so-dangerous-indus-waters-treaty>.

[33] 凤梨奶霜酒 (Pina Colada), 又译“椰林飘香”, 是一种由白朗姆酒、凤梨汁和柠檬汁调制成的鸡尾酒, 诞生于迈阿密, 在美国流行后传入其他国家。——译者注

[34]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avid Petraeus, in Person at His Offices in New York City, 25 May 2016.

12 艾-罗德

2010年，感恩节刚过，一架流线型的猎鹰900EX^[1]三引擎喷气式飞机降落在白雪覆盖的慕尼黑机场。这架公务机属于德国联邦情报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德国的中央情报局，从卡塔尔起飞而来。机上乘客名叫赛义德·塔伊布·阿迦（Syed Tayyab Agha），30多岁，看起来很年轻，留着整洁的黑胡子。他说英语，措辞严谨^[2]，声调和举止冷静而内敛。阿迦长期担任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的助手，曾在塔利班政权驻巴基斯坦的大使馆任职。他参与塔利班四处与外界对话的努力多年，包括2008年与阿富汗人的沟通。他飞到德国，是在霍尔布鲁克的德国同行迈克尔·施泰纳（Michael Steiner）的主导下，谈判了一年所达成的结果。施泰纳身材瘦削，气宇轩昂，脸部线条粗犷，有些驼背，他在解决波斯尼亚问题期间，也是霍尔布鲁克的德国对应角色，在谈判策略强势，以及个性戏剧化遂令人印象深刻方面，有着与霍尔布鲁克相似的声誉（他后来在担任德国驻印度大使期间，与妻子一道录制了一部颇受欢迎的宝莱坞电影中的歌舞片段，而且视频中施泰纳自始至终都与原声配乐保持了口型同步^[3]。这肯定是有史以来由德国外交部上传YouTube的最奇怪的视频之一）。他还与霍尔布鲁克一样地认为，谈判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唯一途径。德国特工只通过中间人间接地与阿迦沟通，而中间人对阿迦的位置绝对保密。阿迦通过在塔利班官方网站^[4]上发布商定的具体信息，向德国人证实自己的身份。

阿迦很快就被带到巴伐利亚乡下某高档村庄内一处德国情报机构的安全屋。这里离市区不远，安全措施非常严密，安全屋周围的区域全部封锁。第二天，两名美国人冒着严寒跋涉到了安全屋。其中一位是白宫职员，名叫杰夫·海耶斯（Jeff Hayes）；另一位是霍尔布鲁克团队的副手弗兰克·鲁杰罗（Frank Ruggiero），他曾在塔利班据

点坎大哈（Kandahar）担任军方文职顾问。他们与施泰纳、阿迦以及一位在阿迦坚持要求下作为安全担保人而参加的卡塔尔王子会合面谈。这是美国10年来第一次与塔利班对话。

对于阿迦来说，赌注很大。他已经上了德国和美国的恐怖分子观察名单，来时只有两国不会逮捕他的承诺。如果“基地”组织或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内亲“基地”组织派系发现了这次谈判，他遭遇的结局可能会更加可怕。对美国人来说也有风险。就在一年前，一名本应向约旦情报机关报告“基地”组织情况的双重间谍，被迎进美军驻阿富汗霍斯特（Khost）的一个基地。结果他是个三重间谍^[5]，引爆炸弹，杀死了7名中央情报局官员。这一记忆对于在阿富汗工作的每个人来说都依然鲜活。德国情报部门向美国人承诺，阿迦已经通过了审查和搜查。

这几个人一起度过了11个小时，其中几个小时用来观光（塔利班官员看到传统的德国城堡^[6]很开心），然后花了6个小时进行谈判。阿迦概述了塔利班的主要担忧：其领导人希望与“基地”组织明确区分，要求将塔利班的名字从联合国制裁名单中删除，并寻求获准在卡塔尔开设政治办公室，而不仅仅是在他们现已开设了办公室的巴基斯坦设点。还有一个几乎痴迷的关注点：他们希望美国释放关押在阿富汗和美军驻关塔那摩基地的塔利班囚犯。美国人概述了自己一方的条件：塔利班放下武器，声明放弃“基地”组织，接受阿富汗宪法及其对妇女的保护。美国有自己的释放囚犯要求：希望释放在鲍·伯格达尔（Bowe Bergdahl），他在一年前从美国陆军脱队后被塔利班俘虏。

阿迦离开后，谈判代表们兴高采烈。霍尔布鲁克一直痴迷地监视着远方的会谈，第二天在鲁杰罗乘坐的返程航班抵达时，他到杜勒斯机场为鲁杰罗接机。在B航站楼的哈里烧烤吧（Harry's Tap Room）

[7]里，霍尔布鲁克点了芝士汉堡，鲁杰罗向他汇报了每一个细节。这场谈判并不紧张——还没紧张起来，但阿迦并没有对美国提出的条件犹豫不决。这是西方为在“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之间造成不和的努力中，截至此时实现的最重要的突破。

“记住这一刻[8]，”霍尔布鲁克一个月以前委任鲁杰罗走这一趟时，对后者这样说，“我们可能很快会创造历史。”那是2010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鲁杰罗接到电话时，正和他七岁的女儿一起驾车驶过费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大桥（Benjamin Franklin Bridge）。如霍尔布鲁克所指示的那样，他永远不会忘记。出于各种原因——避免公众监督；避免一旦证明联络人为假冒人士所带来的后果；为了绕开他与白宫关系紧张所带来的风险——霍尔布鲁克决定自己不参加第一次会议。但他的期望是自己会负责任何进一步的谈判。

霍尔布鲁克首次听说阿迦这个人，还是2009年秋天，当时他在开罗进行一次旋风外交之旅。埃及人告诉他，包括毛拉·奥马尔的助手在内的塔利班领导人已经到访过埃及。曾与这些塔利班领导人接触过的施泰纳和德国外交官也认为阿迦是真实的。而且很有诱惑的一点是，他非常乐意与美国人交谈。最初对高层会谈持怀疑态度的希拉里告诉霍尔布鲁克，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开始探索谈判的可能性。霍尔布鲁克本就是洋基队的球迷[9]，他父亲在他15岁时，不许他翘课去看棒球世界大赛第五回合比赛，而让他错失唐·拉森（Don Larson）创造历史的完全比赛[10]后，这种热爱变得更加坚决。他开始指称阿迦为“艾-罗德[11]”（A-Rod），以防泄密。

截至此时，与塔利班谈判达成解决方案，对霍尔布鲁克而言，就像白鲸之于亚哈船长[12]。巴内特·鲁宾的办公桌离我们团队在国务院内的办公区域不远，他获得聘用的明确原因就是 he 本人是西方世界里处在塔利班研究最前沿的专家。就在霍尔布鲁克2009年初把他挖来

之前，鲁宾还在喀布尔和沙特阿拉伯会见了塔利班的中间人。在这些探索性旅行期间，他探究了想要与塔利班继续进行谈判就必须达到的条件，得出了与艾-罗德后来提出条件中相同的优先事项。鲁宾认为谈判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霍尔布鲁克在宣誓就职的当天，就与鲁宾会面，了解后者的旅行情况以及谈判前景。“如果这件事有效^[13]，”霍尔布鲁克说，“这可能是我们实现突破的唯一途径。”霍尔布鲁克并不认为部署更多军队的决定与政治解决的可能性相冲突。恰恰相反：他经常谈到利用在一段时间内施加最大军事压力所产生的杠杆效应，以使各方坐到谈判桌前。这是他在巴尔干地区使用的策略，效果极好。

在与塔利班谈判的问题上有两派不同的思路。温和的方法是自下而上地剥离和重新整合低级别的战士——那些是为了从中获得谋生的薪资，而并非为意识形态而战的人。霍尔布鲁克和鲁宾讨论的更为雄心勃勃的方法，是促使塔利班领导人坐上谈判桌，尝试和解。布鲁斯·里德尔领导做出的详尽政策审查报告支持重新整合低级别战士，但断然拒绝了和平进程，报告得出结论称，“塔利班领导人不可能和解，我们不能达成包含他们的协议^[14]”。与塔利班谈判的想法违背了小布什时代既已硬化的基本信条：不与恐怖分子谈判。在奥巴马执政头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甚至被禁止在非保密状态下过多引用或提及谈判的想法。瓦里·纳斯尔后来表示，和解是“禁忌词^[15]”。……军方会说，哦，你们正在和塔利班对话，你们已经认输了”。

霍尔布鲁克渴望向总统解释自己的看法，并为获得面见总统的机会而游说。但他一直没有得到这一机会。退而求其次，他又向政府中他能找到的任何人，论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塔利班问题的计划。最难以攻克的是军方，领导层中多数人，包括坐镇中央司令部的彼得雷乌斯在内，都觉得与塔利班谈判会干扰他们要求军事升级的计划。但彼得雷乌斯在喀布尔的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McChrystal）开始接受这一

想法。他和霍尔布鲁克的关系并不融洽，但是我看到他在霍尔布鲁克卖力地解释和分析时，真的仔细听了。在推销自己的想法方面，霍尔布鲁克的风格与彼得雷乌斯不同，后者可能显得更不屑一顾。麦克里斯特尔手下有一名陆军上校，名叫克里斯托弗·科伦达（Christopher Kolenda），其一直在当地从事重新整合地方叛乱分子方面的工作，他开始认为塔利班在某些方面已变得更加温和，并开始抱持与霍尔布鲁克同样的观点，认为谈判是有希望的。麦克里斯特尔感到好奇，于是联系了霍尔布鲁克，两人开始讨论和解的利弊，以及分析谈判如何适应美国的军事攻势。6月初，麦克里斯特尔通知手下的工作人员，称自己已“参与”^[16]对塔利班的谈判，甚至已开始就这个问题为卡尔扎伊（Karzai）准备简报。

几个星期后，霍尔布鲁克被他的黑莓手机铃声叫醒。那时是凌晨2:30，我们全都住在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里，他在一间真正意义上的访客套房里，我在我的“棚屋”内。所谓棚屋，就是一只白色军用集装箱，里边配有一张双层床、一个迷你冰箱和一个袖珍洗手池。“记得洗手！”水槽左侧已然翘起的层压板标志上写道。“导弹袭击应对指南”，贴在水槽右边的通知说。其中一条指令藏在床下，让人感觉不那么有信心。前一天，霍尔布鲁克待在马利亚（Marja），这是一个几个月前从塔利班手里夺回的战术重镇。他接近马利亚上空时，塔利班战士向他乘坐的V-22鱼鹰式倾转旋翼飞机开火——这是一架既可作为直升机，又可作为飞机使用的未来派战斗机，但问题多很多。霍尔布鲁克安全地下降，并拿飞机受到攻击一事，向集结等候他的记者们开玩笑。（“我在其他国家也遭到过火力攻击，”他以惯常的自信满满的腔调说道，“实际上是其他很多国家。”）然而在他短暂的访问期间，枪声仍在继续，并且在他再次起飞后不久，三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附近引爆了自己。这些暴力事件提醒人们，在阿富汗取得的军事胜利是何等转瞬即逝^[17]。我在这期间留在大使馆，除了吃小卖部

提供的油腻食物外，就是开会。霍尔布鲁克回来时显得疲惫至极，到了凌晨2：30时，他已经熟睡了。

吵醒人的电话是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从镇子另一头的驻阿富汗国际维和部队（ISAF）总部打来的。霍尔布鲁克很不高兴，能有什么紧急到非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可的事情？“有篇《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的报道快要发布了，”麦克里斯特尔说，“那里边我说了一些令人尴尬的话。”“斯坦，别担心”，霍尔布鲁克说。麦克里斯特尔的担心是对的，迈克尔·黑斯廷斯（Michael Hastings）的特写《失控的将军》（*The Runaway General*）抓取了麦克里斯特尔及其手下工作人员对政府中几乎每位要员的微词。“老板说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麦克里斯特尔的团队成员之一曾这样谈到过霍尔布鲁克。“霍尔布鲁克一直听到谣言说他会解雇，所以这让他很危险。他是个聪明的家伙，但他进来就直接搬弄操纵杆，或者他能抓到的不管什么东西。可这是反叛乱战略，你不能让随便什么人来了都乱折腾一通。”另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是麦克里斯特尔看着他的黑莓手机，呻吟着：“哦，别又是霍尔布鲁克的电子邮件吧^[18]，我都不愿意打开它。”两天后，奥巴马总统接受了麦克里斯特尔的辞呈，和解问题上的军方支持也随他而去了。

这之后，奥巴马派彼得雷乌斯前往阿富汗，填补麦克里斯特尔留下的空缺。技术上，这对彼得雷乌斯而言是降了级，因为之前是麦克里斯特尔对他汇报。但这一安排使得彼得雷乌斯在制定战争政策方面显然发挥了更加直接的作用。而他在谈判问题上，并不赞同麦克里斯特尔的开放态度。“我就不认为这是可以谈判的”，彼得雷乌斯对我说。“我们当然尝试过，我们的部队也支持了潜在对话者的行动和安全。但对于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合适的塔利班人物坐到谈判桌前，并实现真正的和解，我表示怀疑。他们不容谈判的红线对于阿富汗人和我们来说，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如果你无法找到真正的塔利班领导

人，你肯定也无法找到‘哈卡尼的塔利班’领导人，或者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或‘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彼得雷乌斯说。他所指的是阿富汗边境另一侧更为极端的势力。“所有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都待在避难所里，显然巴基斯坦人当时并不愿意或不能追剿他们。”他认为霍尔布鲁克和国务院方面对于进行谈判的不断要求，是毫无助益的分散注意力的行为。“有种看法认为，如果我们只是稍微努力一点[19]，就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他说，这给军方传递的信息是

“我们只是没有努力；我们才是在鼎力相助；你们是障碍，你们并不那么想要和解”。多年以后，彼得雷乌斯在这一点上仍然在自我辩护：他认为自己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努力”，包括在阿富汗境内“重新整合”成千上万名低级别的塔利班人员。“但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给阿富汗境外组织的领导人带来压力，他们没有谈判的动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需一直等到我们按公布的时间表撤军走人。”2010年10月，霍尔布鲁克在接近实现与艾-罗德会谈时，试图接近彼得雷乌斯。“戴夫，我们需要谈谈和解”，他说。

“理查德，那会是15秒钟的谈话，”彼得雷乌斯一口回绝道，“是的，最终要谈，但不行，不是现在[20]。”

在慕尼黑进行的初期秘密会谈能够发生，本身就给霍尔布鲁克的义无反顾树立了丰碑。他一次又一次地推动这个话题并遭到拒绝，白宫的反对比军方更加激烈——反对谈判的动议，甚至更多地反对由霍尔布鲁克主导这些谈判的想法。2009年7月，沙特方面通知奥巴马总统，其情报部门与塔利班官员建立了联系，他们感觉到会谈的机会出现了。沙特人要求美国派一名代表与他们见面。霍尔布鲁克向白宫提出了要求，但白宫不愿意采取行动。后来，他努力争取将一些塔利班分子的名字从联合国黑名单中删除——事实证明，这是艾-罗德在慕尼黑提出的首批条件之一。这也被白宫、军方和中央情报局断然拒绝了。即使在与阿富汗人的谈话中提出谈判问题也是遭禁止的。霍尔布

鲁克希望将与塔利班谈判的议题列入卡尔扎伊访问美国时的总统议程中，然而他为此所做的游说走进了死胡同^[21]。

但霍尔布鲁克一直在努力施加影响力，他派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办公室成员向希拉里·克林顿解释和解的优点，逐渐改变了她的怀疑态度。白宫甚至也开始过来了解情况。2010年初，奥巴马总统的阿富汗问题顾问鲁特中将开始推动和解计划，不是由霍尔布鲁克领导，而是由阿尔及利亚驻联合国外交官拉赫达尔·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主导。这是瞄准并故意冷落霍尔布鲁克的做法，希拉里·克林顿气炸了。“我们不外包我们的外交政策^[22]”，她告诉我们团队。霍尔布鲁克“会经常说‘你不需要与朋友讲和’，所以我们必须公开讨论和探索（与）塔利班（谈判）”，希拉里·克林顿回忆说。“但这是一场持续艰难的斗争^[23]。”

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在与敌人谈判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裂的产物，它也出于上不了台面的私人矛盾。看不惯霍尔布鲁克行事风格古怪的情绪从靠近奥巴马的小圈子里开始，最初还只是私下小声耳语，但很快就发展成了让人汗颜的大马戏团表演。国家安全顾问吉姆·琼斯将军与鲁特一样，都习惯了战争威胁当头时由军方发号施令，并且都在强势控制其他国家安全敏感性政策制定过程的白宫里工作。琼斯和鲁特都对霍尔布鲁克一直控制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的运作这一点感到愤怒。

每个星期一下午，在国务院七楼一间墙壁包着木板、照明有些昏暗的会议室里，霍尔布鲁克都会召开一次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地区的部门间会议——这一例会也被戏称为“舒拉”，借用的是阿富汗语言里表示磋商的词语。会议是由霍尔布鲁克发明的，但为了在与白宫的持续紧张关系中有所让步，会议名义上也由鲁特主持。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看到这两个人坐在桌子的首位，背后是世界地图，以及显示世界

主要国家首都时间和国务卿当前所在地的时间的数字时钟。两人之间的冷淡足以冷藏牛排了。“我很高兴鲁特将军能在这里与我共同主持会议”，霍尔布鲁克对与会者表示，并以此开启了一次时间上有些提早的会议。鲁特很快就插话进来：“我很高兴霍尔布鲁克大使可以加入，与我一同主持。”

琼斯和鲁特汇编了一套所谓霍尔布鲁克不端行为的材料。他们在总统首次访问阿富汗时，没让霍尔布鲁克上飞机——他甚至到奥巴马都启程了，还全然不知这次出访。在与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紧张讨论中，白宫官员不是支持霍尔布鲁克，而是试图在霍尔布鲁克和阿富汗总统之间制造隔阂，以支持解雇霍尔布鲁克的游说。在卡尔扎伊对美国的一次访问行程中，他们从参加阿富汗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奥巴马会谈的与会者名单中，删除了霍尔布鲁克的名字，并为奥巴马总统起草了专门削弱霍尔布鲁克权威的谈话要点——提示只有当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内的人才拥有总统的信任^[24]。希拉里·克林顿最终出面干涉，并坚持要求霍尔布鲁克出席。

在另一个场合，也是又一个足以被称为国务院传奇的政府闹剧中，琼斯向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退休中将卡尔·艾肯伯里（Karl Eikenberry）发了一封邮件，保证霍尔布鲁克很快就会被解雇。艾肯伯里对霍尔布鲁克的想法同样暗淡，琼斯知道这封信到了他手里将是安全的。不幸的是，琼斯不小心把这封邮件当成白宫官方信函发送了出去，自动抄送给了涉及阿富汗政策的每个机构。琼斯行动迅捷，打电话召霍尔布鲁克到白宫面谈，谈话中他狠狠训斥了霍尔布鲁克，并告诉他应该计划从政府退出了^[25]。希拉里·克林顿再次进行了调解，自己也汇集了介绍霍尔布鲁克成就的档案，并直接上报给了奥巴马总统，阻止了解雇霍尔布鲁克的阴谋。“白宫的助手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赶走理查德^[26]，”她回忆说，“他们说‘你需要解雇他’，我说‘我不会这样做……如果白宫解雇他，他们需要自己告诉他’。”

霍尔布鲁克没遭到解雇，但这也使他陷入了炼狱般的境地：在其中，每个人都想赶他出去。

鲁特“讨厌霍尔布鲁克，实际上恨他”，他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解雇霍尔布鲁克的攻势后来泄露给了媒体。鲁特听起来又很怯生生地说，“我并不是受了对任何人或任何东西的仇恨驱使”，但他承认，“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个人化的体验，我在很大程度上仍在努力放下那些想法，但我认为紧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有点个人化了”。

霍尔布鲁克的贱民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找的，取决于你问的是谁。他在克林顿政府任内获得了“推土机”的绰号是有原因的，而到了奥巴马时代他又采取了强硬手段，包括在与鲁特的关系中。“你知道的，他会自己预约会议；他会走进来，把门关上，一般都会把脚抬起来跷到桌子上”，鲁特后来回忆道，依然对记忆中的情节耿耿于怀。“你知道，他自信得近乎傲慢^[27]，他知道自己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人能挡他的路。”总有一种感觉是霍尔布鲁克与这个时代不合拍。“你知道的，非常坦率地说，”鲁特接着说道，“我认为他在克林顿政府中基本上没怎么受到制约，也许还希望在奥巴马任内也能同样放任自流。”

没有比霍尔布鲁克与新闻界的关系更适合诠释这种紧绷局面的了，他曾经利用媒体而大大强化了他在波黑问题上的谈判策略。琼斯和鲁特对霍尔布鲁克的指控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28]就是认定他是奥巴马执政早期一系列电报内容泄密的来源。这并不属实。负责报道霍尔布鲁克的记者，包括《华盛顿邮报》的拉吉夫·钱德拉塞卡兰（Rajiv Chandrasekaran）和《纽约时报》的马克·兰德勒（Mark Landler）在内，后来都写到过霍尔布鲁克不是一个泄密者^[29]。不过他确实喜欢与他所尊重的记者交谈^[30]，我听到过无数次不公开的背

景谈话中他这一边的谈话内容，他从未泄露过秘密，但提供过蹩脚的评论。令人心碎的是，这些背景谈话涉及政府时都显得刻意政治化了；事实上，随着霍尔布鲁克在政府中的地位变得更加脆弱，他也在表现上矫枉过正，有时听起来像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团队合作者。

但这些谈话使霍尔布鲁克与奥巴马团队之间本已巨大的鸿沟进一步扩大。对于霍尔布鲁克来说，媒体是一个舞台，是戏剧性地讨好对手或挤压对手弱点的场所。对于“不搞噱头的奥巴马”白宫而言，这些策略是万分招人烦的，因为白宫以保持内部争论不见媒体自得，并希望把焦点聚拢到老板身上（或者至少聚拢在总统选定的盟友身上——随着执政时间延续，几乎所有奥巴马的核心团队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寻机扬名立万）。2009年9月，正当霍尔布鲁克开始在国务院任职的时候，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则报道向已经紧张的霍尔布鲁克与白宫关系投下了一枚手榴弹。帕克是一位兼具犀利深刻的思想和叙事天赋的记者，他把霍尔布鲁克渴望实现的对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政策的颂扬，以及他为实现与塔利班谈判而进行的一系列努力，变成了一篇全面的传记作品，还配上霍尔布鲁克越南时期的照片^[31]。随着这篇报道的选题角度明朗化，霍尔布鲁克试图踩刹车阻止文章发表。他拒绝提供拍照机会[《纽约客》最终使用了已有的照片，由著名摄影师布里吉特·拉孔布（Brigitte Lacombe）拍摄的一张霍尔布鲁克神态忧郁且神秘的肖像照]。霍尔布鲁克的妻子凯蒂·马顿打电话给《纽约客》主编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恳求他不要发表这篇特写。“凯蒂，”雷姆尼克说，“你不应该打这个电话^[32]。”

杂志社联系国务院为这篇报道进行事实核查时，警报在行政部门内蔓延开来。“重要性：高”，P. J. 克劳利（P. J. Crowley）写给希拉里助手杰克·沙利文、胡玛·阿贝丁、谢丽尔·米尔斯（Cheryl Mills）和菲利普·莱茵斯（Philippe Reines）的电子邮件如此标

识。“显然，理查德偏离了我们认为应该是讨论我们的战略的主题[33]，报道最终变成了理查德的半个传记。我会提醒白宫。”霍尔布鲁克已经向希拉里做过预警。“如果你想讨论的话，我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希拉里这样回复米尔斯。这一插曲证实了奥巴马白宫里顾问们对霍尔布鲁克的想法：我们其他人只是他故事中的配角。

“这篇《纽约客》的传记报道注定了他在这一任政府中的失败，”马顿说，“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不希望让任何人抢了总统的风头。”她劝丈夫不要担心，他只是团队的一员，奥巴马的核心圈子肯定会把任何积极的新闻都视为好事。“你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回事[34]”，霍尔布鲁克告诉她。她确实不知道。

[1] 猎鹰900是法国达索公司研制的三发涡轮风扇远程公务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航。——译者注

[2] Ahmed, Rashid, *Pakistan on the Brink* (New York: Penguin, 2013), p. 114.

[3] “Steiner Stirbt Den Bollywood-Tod,” *Spiegel TV*, 25 April 2015, www.spiegel.de/video/indien-botschafter-michael-steiner-bollywood-video-video-1572700.html.

[4] Reuter, Christopher, Schmitz, Gregor Peter, and Stark, Holger, “How German Diplomats Opened Channel to Taliban,” *Spiegel*, 10 January 2012, 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talking-to-the-enemy-how-german-diplomats-opened-channel-to-taliban-a-808068-2.html.

[5] “How a Triple Agent Duped the CIA,” *Daily Beast*, 20 June 2011,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1/06/20/cia-base-attack-in-afghanistan-how-a-triple-agent-duped>.

[6] Ahmed, Rashid, *Pakistan on the Brink* (New York: Penguin, 2013), p. 114.

[7] Clinton, Hillary, *Hard Choic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loc 2747, Kindle.

[8] Clinton, Hillary, *Hard Choic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loc.2729, Kindle.

[9] Gordon, Meryl, “Ambassador A-List,” *New York*,
<http://nymag.com/nymetro/news/people/features/1748/index3.html>.

[10] 完全比赛 (Perfect Game) 是棒球比赛的术语之一，按照美国职棒大联盟1991年以后的规定，一场至少9局的球赛里，所有击球手皆不能安全上一垒，才能满足条件。完全比赛普遍被认为是投球手的至佳表现，是棒球运动里最难达到的成就之一。——译者注

[11] 阿莱克斯·罗德里格兹 (Alexander Emmanuel Rodriguez)，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1975年7月27日出生于纽约，常见名字简称“艾-罗德”，是洋基队的先发三垒手，被誉为天才型选手。——译者注

[12] 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发表于1851年的小说《白鲸》 (*Moby-Dick*) 中人物：白色抹香鲸莫比·迪克 (Moby Dick) 和誓死追杀白鲸的捕鲸船长亚哈 (Ahab)。——译者注

[13] Nasr, Vali,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the White House Diplomacy Let Diplomacy Fail in Afghanistan,” *Foreign Policy*, 4 March 2013, <http://foreignpolicy.com/2013/03/04/the-inside-story-of-how-the-white-house-let-diplomacy-fail-in-afghanistan>.

[14] “White Paper of the Interagency Policy Group’s Report on U.S. Policy toward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2009, edocs.nps.edu/govpubs/wh/2009/Afghanistan_Pakistan_White_Paper.pdf.

[15] *The Diplomat*, Dir. David Holbrooke, HBO Documentary Films, 2015, 1: 19: 40.

[16] Chandrasekaran, Rajiv, *Little America: The War within the War for Afghanistan* (New York: Vintage), loc. 3599, Kindle.

[17] Marquez, Miguel, “Holbrooke Gets Very Close Look at Afghan War, ” *ABC News*, 21 June 2010,
<http://abcnews.go.com/WN/Afghanistan/ambassador-holbrookes-plane-attacked-marja-afghanistan/story?id=10973713>.

[18] Hastings, Michael, “The Runaway General, ” *Rolling Stone*, 22 June 2010, <http://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news/the-runaway-general-20100622>.

[19]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avid Petraeus, in Person at His Offices in New York City, 25 May 2016.

[20] Chandrasekaran, Rajiv, *Little America: The War within the War for Afghanistan* (New York: Vintage) , loc. 3610, Kindle.

[21] Chandrasekaran, Rajiv, *Little America: The War within the War for Afghanistan* (New York: Vintage) , loc. 3554, Kindle.

[22] Chandrasekaran, Rajiv, *Little America: The War within the War for Afghanistan* (New York: Vintage) , loc. 3569, Kindle.

[23] *The Diplomat*, Dir. David Holbrooke, HBO Documentary Films, 2015, 1: 20: 00.

[24] Chandrasekaran, Rajiv, *Little America: The War within the War for Afghanistan* (New York: Vintage) , loc. 3515, Kindle.

[25] Chandrasekaran, Rajiv, *Little America: The War within the War for Afghanistan* (New York: Vintage) , loc. 3515, Kindle.

[26] Author Interview with Hillary Clinton, 20 November 2017.

[27] *The Diplomat*, Dir. David Holbrooke, HBO Documentary Films, 2015, 1: 29: 00.

[28] Schulman, Daniel, “State Department Launches Afghanistan Leak Probe, ” *Mother Jones*, 27 January 2010,
<http://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0/01/state-department-launches-afghan-leak-probe>.

[29] Landler, Mark, *Alter Egos: Hillary Clinton, Barack Obama, and the Twilight Struggle over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6) , loc. 1746. Kindle.

[30] “State Department Launches Afghan Leak Probe, ” *Mother Jones*, January 2010, 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0/01/state-department-launches-afghan-leak-probe.

[31] Packer, George, “The Last Mission, ” *New Yorker*, 28 September 2009,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9/09/28/the-last-mission>.

[32] Conversation with Kati Marton, 13 April 2017.

[33] Clinton, Hillary, “Packer Article, ” Message to Cheryl Mills, 16 September 2009, Email Released by WikiLeaks, <https://wikileaks.org/clinton-emails/emailid/15835>.

[34] Hirsch, Michael, “Richard Holbrooke’ s Decline and Fall, as Told in Clinton Emails, ” *Politico*, 1 July 2015, www.politico.com/story/2015/07/richard-holbrookes-hillary-clinton-emails-119649.

13 向我保证你会结束战争

我们到达麦克奈尔堡（Fort McNair）时是上午7点整。那是2010年9月，霍尔布鲁克将与中央司令部彼得雷乌斯的继任者、未来的国防部长詹姆斯·“疯狗”·马蒂斯（James “Mad Dog” Mattis）上将共同主持巴基斯坦政策的民事-军事联合审查。将要参加这次审核的人员超过了225人，包括与霍尔布鲁克对等的英国、德国和法国官员，以及英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嘉宾们陆续进入了国防大学的乔治·C. 马歇尔大厅，这是一座笨重的砖混结构建筑，建造风格好像一座巨型教堂，拥有灰褐色的石雕和一个宽敞的多楼层中庭。它与国防大学校园的其他部分一起，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南一个狭长的半岛上，在波托马克河（Potomac）和阿纳科斯蒂亚河（Anacostia）的交汇处。马蒂斯似乎很容易接受霍尔布鲁克的议程，在我介绍非政府组织跟踪技术时，他专注地倾听，并建议我也到坦帕向他的中央司令部团队介绍情况。霍尔布鲁克有些忧心忡忡。他与白宫的冲突已经公开化，且关系降到了最低点，有持续不断泄露出来的消息显示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然而尽管如此艰难，他还是觉得自己有动力。之前的一个月里，马顿有一次发现霍尔布鲁克脸上显露出一副被她描述为“看起来很遥远”的神态，就询问他在想什么。“我觉得我已经想明白了^[1]，”他告诉她，“我想我可以看到所有部分如何组合在一起了。”马顿和霍尔布鲁克都拥有叙事的天赋，时下的情况在他们看来，是缺少一个答案，一种将这道谜题整合到一起描述出来的方法，而不是一堆永远无法利索地解决、最终只能靠粉碎机而非巧妙解决方案来化解的超乎想象的难题。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开始为希拉里·克林顿撰写一份备忘录，强有力地阐述了美国在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上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他

告诉我，这是一份历史纪录性文件；是他对自己经常被本届政府捂住不许发声的自主观点最充分的阐述。

通过政府官僚机构上报文件是一种独特的地狱流程。给国务卿的备忘录要通过整条“汇报线”，这是一群守门人，他们确保文件送到老板办公桌上之前，已被任何利益相关方的办公室“审阅后放行”；在涉及霍尔布鲁克的案例中，“汇报线”意味着大使馆和白宫那些处心积虑要撤换霍尔布鲁克的官僚对手们。霍尔布鲁克想把自己的想法直接告诉希拉里·克林顿，但又不想留下数码记录。他原来值得信赖的助理已经被换成了新人，而他担心新来的助理对系统的忠诚度超过对他个人的忠诚度。他问我是否愿意帮他整理一份备忘录，并将其传递给希拉里·克林顿——这一举动显示了他在官僚体系里的孤立程度有多深。尽管霍尔布鲁克夜以继日地离不开他的黑莓手机，但我从未见他用过文字处理器。他的办公桌上甚至没有电脑。所以在我们前往麦克奈尔堡之前的一天，他把初稿口述给了我。第二天早上，他在与马蒂斯共同主持活动的间歇里，就在初稿的边缘空白处做了笔记和修正。他说这份文件“仅供某某审阅”，这是要确保只有希拉里·克林顿看到它的文件处理指令——但是，由于霍尔布鲁克自己绕过这个系统的努力，这份备忘录从未被正式加密。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是给一位朋友发了条短信，表达了我带着这文件到处行走时坐立不安的感受。

“收件人：HRC（希拉里·克林顿）；发件人：RCH（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备忘录是这样开头的，“主题：站在十字路口。”在使用泰晤士新罗马字体和单行间距的9页篇幅中，霍尔布鲁克用简单直接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仍然相信，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该地区对于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一如既往^[2]，”他写道，“但我们目前的战略不会成功。”阿富汗政府被军阀把持着，这些人是美国

“9·11”事件之后使用的冷战式代理人，他们在腐败的重压下双腿发

软，几乎看不到与美国战略一致性的迹象。“无论在反叛乱中发生什么，我们的政策都处于危险之中，原因很简单：缺乏一个与我们有共同目标的可信且可靠的合作伙伴……”他继续写道，列出了一连串卡尔扎伊政府的阳奉阴违及腐败案例。“我知道美国对外关系史上不曾有过行为如此异常的战略伙伴。然而，我们容忍了它，为它提供了援助和借口，基本上让它觉得自己几乎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

虽然鲍勃·伍德沃德和其他人对阿富汗政策审议过程的描述，已经广泛介绍了霍尔布鲁克对军力部署的看法，但霍尔布鲁克本人总是一丝不苟地避免在公开场合以及在通过正常渠道传播的文件中表达他的观点。“在去年的辩论中，”他写道，“我只与你和汤姆·多尼隆分享我的建议，多尼隆说他与总统分享了这些建议。这些想法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份备忘录也许是唯一一份他自己对这些建议的坦率总结。“我当时推荐的策略可能会让麦克里斯特尔以显著不同的布局，调用更少一点的部队——2万~2.5万人，‘只由一个作战旅及其保障人员（约1万人）以及1万~1.5万人的培训师、顾问及支持人员组成’。我的观点是，这将降低美军及平民伤亡水平，减少对巴基斯坦人（他们反对增兵）的挑衅，并可能从美国公众那里争取到更多时间。它还可以每年减少150亿~2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他还对奥巴马在2011年7月添加的撤军最后期限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在最后一刻才拿出来的东西，几乎是马后炮，时间上太晚了，以至于我们根本来不及仔细斟酌其全部影响”。他告诉我，影响之一就是浪费了美国在任何与塔利班谈判中的筹码，塔利班现在知道它可以等待美国人撤出了。

为实现美国的反恐目标而使用巴基斯坦作为代理人的做法也走向失败。霍尔布鲁克敦促进行更广泛的外交活动，包括再次努力推动印度坐到谈判桌前。奥巴马原定于一个月之后访问印度，霍尔布鲁克提出了应该经停巴基斯坦的理由。将巴基斯坦纳入总统出访行程一直是

个棘手问题，因为它有可能惹恼印度人——也可能惹恼巴基斯坦人，因为他们接受的来访总是更简短且隆重程度更低。但霍尔布鲁克认为现在是实现飞跃的时刻：

目前是进行这一旅行的明确时机，因为飞越受战火困扰的地区而不做停留的话，可能会招致批评。在这些独特的情况下，我认为长期以来存在的平衡关系以及对两国都进行访问的问题，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的。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最后，总统按计划只访问了印度^[3]。霍尔布鲁克认为，未能将巴基斯坦从以交易为基础的军对军关系转变为更广泛的伙伴关系，使美国几乎没有了永久解决巴阿边境地区恐怖主义避风港问题的可能性。最后，他认为眼前只有一条道路。霍尔布鲁克汲取奥巴马政府似乎不想听到的越南教训，用粗体字写出接下来的段落：

然而，最终，叛乱分子只要不输，就会在游击战中获胜。此外，“反叛乱”中一个恒久存在的现实是：与有安全避难所的敌人作战不可能成功。然而，由于巴基斯坦在印度问题上无法摆脱成见，且在战略政策上由军方主导，我们无法说服该国在战略利益上与我们保持一致。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应该探讨是否有基础在我们的红线内与塔利班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没有什么比与塔利班打交道的想法更让人倒胃口了，但继续忽视这一领域是不负责任的。

他告诉希拉里·克林顿自己会向她汇报即将与艾-罗德接触的努力。除此之外，他还建议美国公开宣布，支持卡尔扎伊政府与任何放弃“基地”组织的力量之间进行低级别会谈。他敦促延续《克里-卢格-伯曼法案》背后的那种思维方式，在“给予印度以适当关注”的前提下，做出“帮助巴基斯坦人民的新的重大努力”。他还全力支持放慢撤军速度，认为应该在3~5年的时间里，将权力移交给阿富汗部队（他对阿富汗军队能力的描述比较悲观），并承诺“只要还需要追捕直接威胁美国的恐怖组织”，就至少保留部分美国的军事存在。

在备忘录中，霍尔布鲁克认为，美国已经错过了关键的外交窗口，并直截了当地指责军方系统性地主导了政策进程。他将这一问题列为所有挑战之首：

一、军事主导审核程序的局面必须结束。尽管每个人嘴上都说“反叛乱”需要民事与军事相结合的综合战略，但去年由军方主导并确定了选择。尽管每个人都赞同战争不会以纯粹的军事结果告终这一看法，但国务院从未能够向整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详细展示民事主导政治进程或寻求政治解决战争问题的必要性。与军方情形不同，我们从来没有与总统单独会面，当然除了你每周都与总统有一次（我还曾参加过一次）重要例会，能就所有问题进行单独讨论之外。在即将到来的辩论中，我们应该设法纠正这种不平衡。

他说，军方一直在“自己给自己评分”，挤掉了“坦诚评估”的实地进展空间。这几乎是他最早时在越南写的备忘录的翻版。与军方认为他们只是需要更多时间和更多兵力的评估相反，霍尔布鲁克认为“反叛乱”在阿富汗基本上是难以维持的，理由与当年在越南难以为继的原因相同。“彼特雷乌斯和麦克里斯特尔在去年的政策审核中反复使用的‘典型反叛乱’说法，是过去的经验总结，它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殖民概念，使用了大量的强制力，”霍尔布鲁克写道，“当叛乱分子拥有安全避难所时，反叛乱无法成功。”在阿富汗问题上，按照受国内政治问题左右的时间表来撤出美国及北约部队，需要阿富汗拥有自给自足的政府及一支自治的安全部队。霍尔布鲁克简单地说，这“不切实际”。

民事部门没有发出声音的空间，包括他自己遭到排挤的现实，导致人们不愿意走出那种军事思维。这也相应地导致美国在尽最大努力施加影响的时刻，未能寻求基础广泛的战略关系。结果是预期效果不佳。“我们在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取得的最好成绩，结果仍显得模糊，当地的暴力事件仍在继续，但水平已大大降低^[4]。”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可以确保巴基斯坦接受达成区域性协议，也仍然觉得与塔利班

达成协议是现实的——甚至是“能保护女性不再回到‘黑暗年代’最糟糕处境的协议”。他很清醒。政府失去了重要的机会，但他没有放弃。

那个秋天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由于与白宫间的敌意达到了高潮，每天似乎都预示着霍尔布鲁克将会走人。霍尔布鲁克11月底召集团队“全员”会议时，几位工作人员透露，他们认为那就是结束了。还有就是霍尔布鲁克本人，他看起来越来越疲惫和憔悴，比往常更频繁地停下来站住不动；他偶尔会沉默，仿佛喘不上气来。在给希拉里·克林顿的备忘录中，他规划了一个残酷的穿梭外交时间表，而不断的旅行似乎正在让他付出代价。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一次全员会议上，霍尔布鲁克一度站了起来，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宣布他将不得不取消一次重大的阿富汗之旅，因为检查结果显示他有心脏疾病，需要紧急治疗。然后奇怪的是，这次旅行后来又恢复了。他说进一步的检查证明他没事。

但我们这些在他周围的人，大多都仍然担心。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是另一位与霍尔布鲁克在越南时建立了友谊的资深外交官，他后来告诉记者，那年秋天一次午餐时，霍尔布鲁克吃蛤蜊割到了鼻子（他不是精细的食客），开始大量流血。“你到底怎么了？”威斯纳问道。霍尔布鲁克说，他为了心脏问题，正在服用大剂量的抗血凝剂可迈丁錠（Coumadin）。“今天是艰难的一天，因为我早上醒来时感到非常不舒服，并意识到我又恢复了心房纤颤”，霍尔布鲁克在他为写回忆录而做的一份夜间录音中说。他用自己的听起来好像一种口音似的独特拖腔，过于清晰地说出“不舒服”一词，每个音节都平展清晰。“周末没做完应该做的工作，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有人可以感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紧张和压力，我当然可以感受到它。”威斯纳是几个开始建议霍尔布鲁克辞职的朋友之一。“没有一个星期是我没有告诉他离开的。”莱斯·格尔布说。

霍尔布鲁克在为毕生的职业生涯而战。就像当年在越南一样，他正在见证另一项使命跑偏，而如今也像当年一样，他觉得他是唯一能够对严酷现实进行诚实评估的人。但在历史的巨幕之下是渺小的人类在挣扎，自我、年龄和恐惧的挣扎。离开等于承认他的命运之星已坠落了多么远。希拉里·克林顿保护了霍尔布鲁克不被解雇，但无法保护他不被边缘化。他也是一个有庇护所的叛乱分子，也许他也可以做到不输就是赢。

“他总是希望明天会有一个奇迹，奥巴马会喜欢他，一切都会好起来。[\[5\]](#)” 格尔布接着说。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霍尔布鲁克和我之间爆发了那场让可怜的唐娜·德贞流下眼泪的激烈冲突。那之后的几周里，我们的沟通一直敷衍了事。对于我们这些年复一年为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工作的人来说，对这种冷淡早已习以为常——我给他最亲密的几个助手做过心理辅导，他们与他的关系同样跌宕起伏，都是在极度低潮时哭着跟我谈的话。在11月的最后几天，与艾-罗德的第一次会谈已然成行时，我在自助餐厅附近的走廊里遇到了霍尔布鲁克。“你不是要离开我们吧？”他问道。我刚刚在纽约获得律师资格，是靠我在国务院的第一年每天晚上学习考过的。“不要执业，那真的没什么意义。”他对我微笑，深蓝色的眼睛周围布满深深的皱纹。“无论如何，你才刚刚热了身。”12月8日，他打电话来让我帮忙。他的朋友詹姆斯·霍格

（James Hoge）在《外交事务》杂志做编辑多年，那天晚上会在一个活动上接受表彰。他打算调侃霍格一番。我能否找到一篇“20世纪70年代某个时间”嘲笑霍格太英俊的文章？他的记忆像往常一样超自然——在国会图书馆麻烦了工作人员几个小时后，我找到了《时尚先生》（*Esquire*）在1979年9月发表的一篇题为《太英俊的危险》的文章。我在霍尔布鲁克登上前往纽约的快线航班前，把文章副本转给了他。“干得太棒了，罗南！”他给我发了电子邮件。“我知道只要有

人能做到，那一定就是你。太感谢了，这正是我要的。”这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

两天后一个寒冷的早晨，霍尔布鲁克和侯赛因·哈卡尼坐在乔治敦的四季酒店里享用早餐。两个人都很沮丧。霍尔布鲁克正准备再一次努力面见总统，向总统解释他已向希拉里解释过的政治解决争端的理由。哈卡尼也越来越多地承受着来自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压力。多年来，他与美国人的亲密关系一直是他出任每个职业角色时都如影随形的争议来源。在签证冻结令消退后，他开始让更多的美国人进入巴基斯坦，这让围绕他的争议达到了新高，有些人甚至低声质疑他放间谍进门，破坏巴基斯坦的利益。

“我在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遇到了所有这些问题，而你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遇到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还要这样做多久呢？”哈卡尼问道。

“侯赛因，”霍尔布鲁克回答道。“只要我们能够发挥作用，我们就会一直这样做下去。”

霍尔布鲁克接下来的一次会议就是在白宫开的，在那里他向奥巴马的亲密顾问大卫·阿克塞尔罗德就寻求争取与总统面谈，做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游说。希拉里已经将关于塔利班谈判的备忘录交给了奥巴马，霍尔布鲁克认为，只要给他机会，他就可以说服总统接受他通过谈判使美国走出阿富汗困局的计划。“希拉里已经向总统提交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备忘录，以寻求谈判走出这一困局的路径，”他在其中一段录音中说道，“总统终于专注于这个问题了^[6]。也许我们未来回头看时，会把它看作我们写的最重要的备忘录之一，但这还有待观察。”阿克塞尔罗德说他会看一下会议能否安排。霍尔布鲁克看上去脸都红了^[7]，好像无法呼吸——阿克塞尔罗德的助手给了他一杯水。

他在白宫的时间拖得有些长，接下来与希拉里·克林顿、杰克·沙利文和弗兰克·鲁杰罗的会议迟到了——这是与艾-罗德秘密会晤后，他们之间就塔利班谈判而举行的首次重要战略会议。她在办公室的外间里等着，这是一个宽敞的房间，墙上镶嵌着白色和镀金的木头，有带流苏的蓝粉两色窗帘，以及一系列色彩缤纷的软垫椅子和沙发。在我稍后向她汇报的时候，我只看到希拉里·克林顿坐在沙发上，而尊贵访客坐在她斜对面的大椅子上。那天她空着那张大椅子留给霍尔布鲁克。“他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希拉里·克林顿后来说道，“而且，你知道，他说‘哦，我很抱歉，我很抱歉’。”他一屁股坐了下来，耸了耸肩脱掉了外套，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刚刚开的几个会议，包括他在白宫的停留。“那是典型的理查德做派，就像‘我正做着一百万件事，我想把所有球留在空中’”，她回忆道。根据希拉里的回忆，霍尔布鲁克正在说话的时候，“猩红色”潮水一样涌上了他的脸。他用双手捂住眼睛，胸口开始起伏。

“理查德，怎么回事？”希拉里·克林顿问。

“出大事了，”他说。

几分钟后，霍尔布鲁克已经上了救护车，被绑在轮床上，救护车朝附近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疾驰，希拉里·克林顿已告诉她自己的内科医生准备急诊室^[8]。霍尔布鲁克依旧以他典型的无礼风格，要求救护车将他送到更远的西布利纪念医院（Sibley Memorial Hospital）。希拉里·克林顿否决了他的要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团队的一名副手丹·费尔德曼（Dan Feldman）在救护车上护送他，握着他的手。费尔德曼没带他的黑莓手机，结果就在用来为在梅瓦餐厅吃的一顿晚餐报账用的国务院报销单上，潦草地记录了霍尔布鲁克口述的信息，以及医生对他的检查评估。这些笔记是霍尔布鲁克不屈不挠个性的非线性表述，间或被真实的医学诊断打断。

“打电话给阿克塞尔罗德办公室的埃里克，”第一条记录如是写道。旁边是：“主动脉A型剥离……手术风险@>50%”——这意味着可能死亡。一连串给他生命中在乎的人的信息，再次被其情况恶化所打断：“S”——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什么总是一起遇到医疗危机？”（前一年希拉里·克林顿在国务院车库摔倒在地并造成肘部骨折时，他就在她左右。）“孩子们——我多爱他们+继儿女们”……“共事过的最好员工永远”……“别让他死在这里”……“血管外科手术”……“没有血流，腿没有感觉”……“血块”……然后，再次出现：“不要让他死在这里，希望死在家里，与家人在一起。”霍尔布鲁克完全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转向工作交接事宜：“告诉弗兰克——鲁杰罗——由他代理。”最后：“我爱那么多人……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的公共服务领域的职业生涯结束了。”

霍尔布鲁克说着俏皮话，直到他们让他接受手术。“给我找到任何你需要的东西，”他要求道，“一颗猪心，丹的心。”

医生们告诉他手术的危险性时，他说：“我感觉好多了。现在我知道你没有糊弄我。”当其中一位医生杰汗·艾尔-巴尤米（Jehan El-Bayoumi）让他保持放松时，他讽刺道：“你必须向我保证，你将结束在阿富汗的战争^[9]。”这句话被引述得五花八门，得到的报道之多，使得国务院发言人P. J. 克劳利不得不在记者会上澄清霍尔布鲁克是在开玩笑^[10]。但真正的笑话是他没有要求其他人去这样做。

三天后的晚上，数百名宾客挤满了国务院本杰明·富兰克林国宴厅，希拉里·克林顿站在讲台前——两年前的她同样站在这里，宣布了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的职务任命。在场的有外国驻美国大使，还有奥巴马政府的六位阁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大使近50年来一直是外交使团的巨人，”希拉里·克林顿开始说道，“本周，他的医生们也了解到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和独裁者们都早已知晓的事实：没有人比理

查德·霍尔布鲁克更加坚强。他是强悍的谈判者。我相信今晚这里有些人依然能感觉到被他扭胳膊的酸疼。”她严肃地对霍尔布鲁克团队的工作人员以及出席活动的贵宾们致以敬意。“现在，马上接下来，”她说，声音欢快地提高了起来，“你将欣赏到一个节庆的欢快节目，马文·哈姆利奇（Marvin Hamlisch）和J. 马克·麦克维伊（J. Mark McVey）无与伦比的音乐演奏！”她走到一边，露出身后闪亮的巨大黑色钢琴。哈姆利奇和麦克维伊开始演奏节奏欢快的圣诞歌曲《装饰大厅》（*Deck the Halls*），世界儿童合唱团（World Children’s Choir）配唱，设在舞台四周的电视演播风格的明亮灯光将表演笼罩在过分整洁而呆板的炫光里。不知是谁的主意，觉得将招待外国大使的国务院年度圣诞晚会与向霍尔布鲁克致敬的活动合并起来^[11]是最合适的做法。站在那里听着圣诞歌曲，我感觉怪怪的。

总统到场了，短暂地随着音乐点头并打了几下节拍，然后讲了几句话。说了句希拉里·克林顿在两党面前的魅力超过他自己（这在当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的笑话之后，他转而说：“我们的朋友和伙伴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以杰出的表现为国服务了近50年……他从未停步，从不退出。因为他总是相信如果我们保持专注，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共同利益行事，那么就可能取得进展；战争可以结束，和平可以实现。”他大声呼唤我们这些散布在大厅各处、处在茫然中的团队成员：“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办公室团队，他们在哪里？理查德招募到他们、指导他们，而我希望你们了解，在我们的会议中，他始终如一地表达了对你们难以置信的赞扬。他一直并依然为你们所做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外国使团的成员们鼓掌，用几种不同的语言嘟囔着表示赞赏，而我们盯着总统。霍尔布鲁克要是知道自己动脉破裂能让总统想起这些美好的回忆，那他一定会主动让自己血管破裂的。

“由于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大使的工作，美国更安全，世界更安全，”奥巴马接着说，“他是个坚强的家伙，所以我们有信心认为，尽管情况严峻，但他会顽强地为生命而战的。”他将话题挪到希拉里·克林顿的旅行计划上，并拿它开了个玩笑，看起来稍微松了一口气。

三个街区之外，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仍处在昏迷中，胸腔仍在打开状态。经历了20个小时的开胸手术后，按照医生模棱的说法，他还“坚持着”。圣诞晚会的前一天，医生们又给他做了一次额外的手术，以恢复其下肢的血液循环。他们发现了他脚上的一记微弱脉动，但他那著名的大脑却处在完全无法判断的状态。

因为医生们将他的胸腔保持在打开状态，所以没人能获准进到房间里守护他，但团队成员在过去的三天里一直守在病房门口。我们将在医院守护的任务分成两小时一次的轮班，每一班由一对成员负责。值班的人要迎接那些开始前来致意的知名人士——真是有不少令人瞩目的名人，我就接待过乔·拜登、约翰·克里及特雷莎·海因茨·克里（Teresa Heinz Kerry）夫妇以及朱迪·伍德拉夫（Judy Woodruff）。未来的财政部长杰克·卢（Jack Lew）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幕僚长谢丽尔·米尔斯看到近处桌子上医生画的动脉撕裂草图，克制着自己不表现出被吓到时，我就坐在他们身边。人们用模糊的语言谈论着所谓霍尔布鲁克“感受”到“正能量”，但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守灵。

我已经无法再忍受那些让人不舒服的圣诞歌曲了，干脆回到了一楼自己的办公桌前。这时丽娜·阿米里跑了进来，抽泣着一头扑到沙发上。他们将撤掉他的呼吸机。我和罗斯玛丽·保利一起又连夜走回了医院。她从波斯尼亚时期开始就一直是霍尔布鲁克的幕僚长，也是个强悍的角色。天气很寒冷，刮起了大风。“阿富汗人，”罗斯玛丽

嘟囔道，裹紧了大衣，倾斜着身子顶风走着，“如此戏剧性。”（的确如此：阿富汗的丧葬致哀与我在任何其他地方遇到过的都不一样，按风俗哀悼时间会持续40天。）路牌嘎嘎作响。我们到了医院，在他们拔掉他的呼吸机时，我们站在大厅里守着他。

希拉里·克林顿接到电话时^[12]，已经在从国务院派对前往白宫出席一场晚餐的路上。她快速调转方向，及时赶到医院，送他最后一程，身上还穿着银色和金色相间条纹的双排扣上衣，搭配的小圆领让她看起来像是个包装好的大礼盒。她站在医院的灯光下，把哭泣的团队成员拉到一起。我给大家递上纸巾。“真是我们负责非政府组织的人，总是在帮忙。”她说。“他对我来说是近乎父亲的人”，我平静地说道，让自己都感到惊讶。她拥抱了我。对于一个刚刚失去多年朋友的女人来说，希拉里·克林顿很仁慈。“好吧，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她对整个小组说，“但我要到最近的酒吧去。”

外面开始下雪时，我们一众人员聚到了附近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大堂酒吧。越来越多的哀悼者加入了我们的行列，金融家和奥巴马顾问史蒂文·拉特纳（Steven Rattner）的妻子莫琳·怀特（Maureen White）为所有人埋单，希拉里·克林顿主持场面，然后每个人都讲述了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各种无人能够效仿的故事。在霍尔布鲁克去世时，美国政府已准备发布首份《四年度外交和发展审议报告》（简称QDDR），这是一项重组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长期计划，旨在提高效率，并更好地与国家安全目标领域里更广泛的变化同步。（例如，第一个过程提升了反恐在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性。）该项目希望达到的目标与霍尔布鲁克年轻时发表在《外交政策》杂志上的文章如出一辙——霍尔布鲁克在文中呼吁重组被他称为“停摆的机器”的国务院官僚机构。另外，这项倡议背后的现实是，霍尔布鲁克多年前谴责的那种笨拙而低效的官僚主义，经历多年的内斗，已带来了大多数相

当微妙的组织变革。“哦，QDDR，”希拉里·克林顿若有所思地说，“他讨厌这份文件，我们应该把它献给他。”她真这么做了。

“我真的相信，如果理查德现在还活着，我们应该已经为政府达成某项和平协议了，”希拉里·克林顿对我说，“我真的这样认为。我不确定他们（政府）是否会接受它，但是有了他做的所有工作，还有弗兰克·鲁杰罗所做的工作，以及当时已经在进行中的那些会谈……我真觉得，有了我们当时行将在里斯本召开的会议，以及北约会议，我们得以在理查德主导的和平努力基础上再接再厉的希望是很大的。显然，由于那年12月发生在他身上的可怕变故，这一切都没能实现^[13]。”或许确实如此。

大约凌晨2点我们离开时，邻桌一位独自喝酒并已醉意朦胧的女人叫住了我。“我知道你是谁。”她口齿不清地说道。此人有着花白头发，身材瘦削。她又眼含秋波地看着我们一众人：“我知道你们都是谁。”

“祝你晚安。”我说着，转身离开。

“不要太往心里去，亲爱的。”她在我背后喊。我回头瞥了一眼。她笑得很开心，露出一排被葡萄酒染成血红色的牙齿。“凡事都有结束之日。”

[1] Hirsch, Michael, “Richard Holbrooke’s Decline and Fall, as Told in Clinton Emails,” *Politico*, 1 July 2015, www.politico.com/story/2015/07/richard-holbrookes-hillary-clinton-emails-119649.

[2] “Subject: At the Cross Roads,” Memo from Richard Holbrooke to Hillary Clinton, 10 September 2010.

[3] Wright, Tom, “No Pakistan on President Obama’ s India Trip, ” *Wall Street Journal*, 21 October 2010, <https://blogs.wsj.com/indiarealtime/2010/10/21/no-pakistan-on-president-obama%E2%80%99s-india-trip>.

[4] “Subject: At the Cross Roads, ” Memo from Richard Holbrooke to Hillary Clinton, 10 September 2010.

[5] *The Diplomat*, Dir. David Holbrooke, HBO Documentary Films, 2015, 1: 33: 00.

[6] *The Diplomat*, Dir. David Holbrooke, HBO Documentary Films, 2015, 1: 34: 00.

[7] Landler, Mark, *Alter Egos: Hillary Clinton, Barack Obama, and the Twilight Struggle over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6) , loc. 1768, Kindle.

[8] *The Diplomat*, Dir. David Holbrooke, HBO Documentary Films, 2015, 1: 35: 00; Clinton, Hillary, *Hard Choic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4) , loc. 2779; Alter, Jonathan, “Richard Holbrooke’ s Lonely Mission, ” *Newsweek*, 16 January 2011, www.newsweek.com/richard-holbrookes-lonely-mission-67057; and Roig-Franzia, Manuel, “Searching for Richard Holbrooke, ” *Washington Post*, 20 October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style/searching-for-richard-holbrooke/2015/10/20/84d62ee4-7747-11e5-b9c1-f03c48c96ac2_story.html?utm_term=.da8936547d62.

[9] Landler, Mark, *Alter Egos: Hillary Clinton, Barack Obama, and the Twilight Struggle over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6) , loc. 1781, Kindle.

[10] Chandrasekaran, Rajiv and DeYoung, Karen, “Holbrooke’ s War Remark Called Banter, Not Entreaty, ” *Washington Post*, 15 December 2010,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12/14/AR2010121407701.html.

[11] “Holiday Reception,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3 December 2010,
[https://video.state.gov/detail/videos/category/video/709543962001/
? autoStart=true.](https://video.state.gov/detail/videos/category/video/709543962001/?autoStart=true)

[12] Mills, Cheryl, “FW: Harper’ s Bazaar: ‘Hillary Clinton: Myth and Reality, ” Message to Hillary Clinton, 17 February 2017, Email Released by WikiLeaks, No. C05777693, 7 January 2016,
[https://wikileaks.org/clinton-
emails/Clinton_Email_January_7_Release/C05777693.pdf.](https://wikileaks.org/clinton-emails/Clinton_Email_January_7_Release/C05777693.pdf)

[13] Author Interview with Hillary Clinton, 20 November 2017.

14 车轮子掉了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去世后的一个月，一辆白色的本田思域（Honda Civic）轿车驶进巴基斯坦拉合尔（Lahore）市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并在红灯处停了下来。这个被称为墨赞钟基（Mozang Chungi）站的路口是费罗泽普尔路（Ferozepur）的起点，这条路是通往印度同名小镇的一条商道。走了一小段车程之后，古老城墙中摇摇欲坠的拱门显示着拉合尔作为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权力中心的历史。但这个十字路口体现了拉合尔更为现代化的一面：拥挤的城市在快速扩张的商业推动下不断蔓延。时间是下午，由不同时代的自行车、人力车和破旧汽车组成的稠密交通网络，笼罩在弥漫着污染的雾霾中。

本田车里坐着的是一个桶胸宽肩的美国人。他头发花白稀疏，面颊上带着一天没刮的胡茬。他在贴身白色T恤外穿着件格子工装衬衫。他在弗吉尼亚州萧条的煤炭城大石峡镇（Big Stone Gap）长大，在鲍威尔山谷高中（Powell Valley High）练过摔跤。在高中里，朋友们记得他的绰号是“肌肉男”和“美国兰博”。他曾在陆军特种部队服役，后来从事的职业是私人保安承包商。“这里没有人记得那个人”，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指挥官后来告诉记者。“你把他放到一群50个人里，是不会一眼看到他的。”^[1]鲍威尔山谷高中一位前足球教练的话呼应了陆军指挥官的说法。几年后，那所高中干脆被卖给了一家银行，之后又被拆除，成为美国梦碎的又一实例^[2]——这场梦让像大石峡镇这样的煤炭城镇早已变得贫穷落后。那时36岁的雷蒙德·戴维斯（Raymond Davis）从未在任何地方留下过多少痕迹，直到拉合尔的那天下午。

戴维斯停下来时，一辆黑色的摩托车载着两名年轻的巴基斯坦男子从相反的方向驶过来，在本田车跟前突然一个回转，后座上的

男子拿着枪。戴维斯拔出一只9毫米的半自动格洛克（Glock），坐在方向盘后瞄准。他开了五枪，在挡风玻璃上打了一簇洞，蜘蛛网般的裂纹立刻布满了前车窗。子弹击中了两名男子中的一人，即19岁的街头犯罪分子穆罕默德·法希姆（Mohammed Faheem），打到腹部和手臂。他摔到地上，死了。另一名男子费赞·海德尔（Faizan Haider），撒腿就跑。他大约跑出去30英尺时，戴维斯从车里出来，在后面开了几次枪，也结果了他。戴维斯用车里的无线电步话机求助，然后用手机给尸体拍了照。“他非常平静和自信^[3]，”一位旁观者说，“我想知道他杀死两个人之后，怎么还可能那样。”

几分钟后^[4]，一辆丰田兰德酷路泽（Land Cruiser）在拥挤的街道上反向横冲直撞而来，撞死一名行人，冲得人群中的其他人四散逃命。丰田车到达十字路口时，戴维斯已经不见了。驾车的美国司机向旁观者挥舞着步枪，命令他们让开路，然后打道回府，向美国领事馆驶去。后来证实，戴维斯已开始逃跑，被巴基斯坦警方拦截到时，大约已跑出去了两英里。

画面粗糙的视频显示戴维斯在拉合尔的考特拉克帕特（KotLakhat）监狱受到审问。“我只是一——我需要告诉大使馆我在哪里。”他用轻微的南方口音告诉警察，从口袋里交出一个对讲机。“你来自美国？”其中一名官员问道。

“是的，”戴维斯说，用一根手指戳了戳挂在他脖子上的身份证，“美国。”他告诉他们，自己在领事馆工作。

“是什么职务……”官员问道。

“呃，我只是在那里担任顾问。”他回答道。

作为顾问的雷蒙德·戴维斯有着明显好的企图，然而十字路口散落的残骸——弹药、刀、手套、眼罩——却透露了其他可能性。戴维斯的电话也一样，里边存满了秘密拍摄的巴基斯坦军事用地的照片。雷蒙德·戴维斯很明显是个间谍——更具体地说，他其实是一个中情报局承包商。巴基斯坦公众意识到这一点的速度几乎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一样快。几乎是从戴维斯在拥挤的十字路口被拿下，随后被投入考特拉克帕特监狱的那一刻起，巴基斯坦举国上下震动了，从街头抗议活动到愤怒的全天候媒体报道，群情激愤。

两周后，盛怒的奥巴马总统将戴维斯描述为“我们的外交官”，并要求巴基斯坦根据《维也纳公约》中“非常简单的原则”放人：

“如果我们的外交官在另一个国家，那么他们就有权不受所在国当地的起诉^[5]。”私下里，利昂·帕内塔向帕夏将军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传递了类似的信息。当帕夏直截了当地询问戴维斯是不是中央情报局特工时，帕内塔说：“不，他不是我们的人^[6]。”帕内塔没有评论那次谈话的细节，但表示，总的来说，“如果为了确保最终我们能保护自己人，而必须与这些家伙耍点两面派的话，那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7]如果巴基斯坦人会骗他，那他显然也在以同样的做法回应。

第二天，穆赫辛·卡迈勒正在游说公司洛克律师事务所位于唐人街区域的办公室里。他是在围绕《克里-卢格-伯曼法案》的错综复杂局面开始时，被说客马克·西格尔招聘进来的。卡迈勒有一间普通的律师办公室，配有不知名的家具，令人沮丧的窗外景观是华盛顿威讯中心（Verizon Center）。11点刚过，电话铃响了，是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武官巴特中将打来的。之前一年我为了拿到签证拍过他的马屁。卡迈勒两年前在军队服役期间与巴特将军相遇，两人关系很容易就达到了融洽状态。“嘿，你在哪儿？”^[8]巴特问道。卡迈勒已经知

道是什么事了——雷蒙德·戴维斯丑闻在过去24小时里在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媒体报道中一直是头条新闻。

一小时后，卡迈勒已经到了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馆四楼的巴特办公室。助理倒茶，卡迈勒给自己的那杯加了奶和糖。“你必须非常清楚地对国会说他没有豁免权，”巴特说，“他是一名承包商，中央情报局的人。”这一事件深深地刺激了巴基斯坦，也触碰到了该国上下对主权存在的不安全感。巴特建议，也许他们可以利用这场混乱，趁机阻击中情局获得更多机密的要求。他告诉卡迈勒，自己担心侯赛因·哈卡尼，因为后者在疏通签证流程时，招致的怀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对于将戴维斯以及其他许多“雷蒙德·戴维斯”放进巴基斯坦，哈卡尼是否负有责任？他会企图帮助美国人夹带间谍吗？

“侯赛因会在这里边扮演什么角色？”巴特问道。

“我们都无法猜出来的角色，”卡迈勒回答道，“他是最难以预测的人^[9]。”

卡迈勒和马克·西格尔在整个华盛顿传播关于巴基斯坦群情激愤的消息，散布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调查中骇人听闻的细节。卡迈勒和西格尔告诉受到震惊的国会工作人员说，戴维斯和其他间谍住在一所安全屋里，美国特工们将其称为“妓院”。他们辩称，中情局正在拿与一个重要盟友的整个关系冒险，必须与巴基斯坦人达成协议。

约翰·克里被派往拉合尔努力达成协议。他启程之前，西格尔将巴基斯坦方面的看法全盘汇总给了克里的一个助手乔纳·布兰克（Jonah Blank）。克里的表现完全像巴基斯坦游说者们所希望的那样，通过他和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卡梅伦·芒特（Cameron Munter）的安抚，终于让帕夏将军同意达成一项协议。正如巴特所预测的那样，侯赛因·哈卡尼帮助美国人设计了解决方案：中央情报局将向戴

维斯事件中遇难者的家属支付230万美元。两名巴基斯坦高级情报官员告诉我，美国人还给了巴基斯坦另一项保证；其中一个从未公开过。美国将永久性地严格限制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活动。穆赫辛·卡迈勒表示，这是巴特向他描述的协议细节，美方没有人会确认做过任何明确承诺^[10]。无论是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还是出于事件对美巴关系所造成压力的自然后果，中央情报局悄悄地开始从巴基斯坦撤出了数十名秘密特工^[11]。

“两国关系的车轮刚好在那个时点上掉了下来^[12]，之前刚有了维基解密风波，以及鲍勃·伍德沃德一本新书对巴基斯坦做出了不友好评估等麻烦”，彼得雷乌斯对我表示。奥巴马政府冻结了所有高层会谈，包括霍尔布鲁克千辛万苦促成的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对话，以及美巴与阿富汗之间的三边工作组。希拉里·克林顿取消了与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的会晤^[13]。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多米诺骨牌接连不断地倒塌。2011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刚过晚上11点，两架配备了全新反雷达探测隐形技术的黑鹰（Black Hawk）直升机从阿富汗东部的贾拉拉巴德（Jalalabad）起飞。两架重型奇努克（Chinook）直升机随后起飞，以备黑鹰执行任务出现问题时做接应。飞机上总共搭载了79名美国突击队员和一条狗（犬名：开罗。品种：比利时玛利诺犬）。剩下的已载入史册：一支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降落在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使用C-4炸弹炸开一座有围墙的宅院大门，然后击中奥萨马·本·拉登的头部和胸部。美国人连夜秘密运走了尸体和骨髓样本备份。最初下降过程中坠毁的一架黑鹰直升机也被就地摧毁，以保证技术不落入巴基斯坦人手中，只留下了还在燃烧的直升机尾翼和许多问题^[14]。

如果雷蒙德·戴维斯事件是把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打跪下了的话，那么本·拉登斩首行动则是将这一关系直接打成了“嘴啃泥”。

全球通缉的头号恐怖分子被发现的地点不是在巴基斯坦边境无法无天的安全港中，而是在伊斯兰堡附近一个遍布着巴基斯坦精英阶层夏季别墅的郊区小镇里。本·拉登藏匿的院落距离卡库尔（Kakul）的军事学院——基本上就是巴基斯坦的西点军校——仅几百码之遥。要么是巴基斯坦人无能^[15]，要么是他们明知道本·拉登就藏在那里。美方发动的袭击未经巴基斯坦人同意，并且事先也没有通知他们，至少没在国家领导层级通知。“我们仍在与巴基斯坦人谈判，试图了解他们知道什么，以及不知道什么^[16]”，国防部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e Flournoy）几天后表示。这是一场持续至今的辩论。在接踵而来的巴基斯坦政治纷乱中，帕夏将军站在该国国会面前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并提出辞职——最终没被接受^[17]。几个月后接管中央情报局的彼得雷乌斯倾向于相信帕夏的说法。“一些低级别的家伙很有可能知道，但我甚至怀疑这一点，”彼得雷乌斯说，“人们根本不了解巴基斯坦，或是那里的高墙，或是那里的人们并不了解所有邻居的情况。在那里藏匿一些人是不可能的。”^[18]然而根据数位参与本·拉登斩首行动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的说法，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是一个多面性的组织，其中像亲“基地”组织的“S局”之类的模糊部门到底知道多少，只能靠猜。

一如既往，巴基斯坦人在私下场合表现出低眉顺眼，但在公开场合剑拔弩张。美国宣布袭击成功后几分钟，帕内塔看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迈克·马伦（Mike Mullen）在白宫战情室（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致电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卡亚尼。“他们对我们最诚实的一刻，”帕内塔告诉我，“是突袭之夜，因为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卡亚尼）将军基本上说的是‘我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你们最好向全世界宣布’。这可能是两国关系最坦诚的时刻。在那之后，政治淹没了一切^[19]，他们尽了一切努力让一切看起来不是他们的过错，他（本·拉登）只是住在他住的地方。”

在公开场合，卡亚尼大声命令美国军队将其在巴基斯坦的存在缩减至“最低限度”，并警告美方未来不要再进行袭击。白宫官员也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对巴基斯坦更加严厉^[20]。巴基斯坦在打击极端主义的更广泛斗争中作用仍然十分重要，但本·拉登具有“图腾”般的意义。没有了他，各方态度出现了转变，即便在国务院都相当明显。我们需要巴基斯坦，但需要到什么程度呢？“人们说，‘天啊，那场袭击本·拉登的行动，真是把你们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关系搞得一团糟’，”海登将军说道，“它根本没有（搞糟关系），只是将面纱拉回到了^[21]这段关系之前的艰难程度而已。”

突袭后的一个月里，奥巴马总统派遣帕内塔和国家安全顾问吉姆·琼斯前往伊斯兰堡，传达对巴基斯坦两面派做法的强烈谴责。帕内塔知道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内的一些分子在美国行动之前就已经将消息传递给了“基地”组织武装力量^[22]——而现在美国已经有政治意愿来挑战这一点了。“这可是大事。当时担任我副手的史蒂夫·卡普斯（Steve Kappes）之前已经将此问题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并且列出了我们掌握的部分（巴基斯坦）两面派做法的情报，以及他们表示要采取行动予以改正却从未做到的事实。所以总统认为有必要直接提到最高层……坐下来把它摆出来。因为我认为总统非常担心美国人会习惯性地忽略他们所参与的许多活动，而且他认为如果美国人的这种状态一旦被世人所知——就是我们干脆忽略或接受那种行为的状态——就会破坏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

“他生气了吗？”我问道。

“是吧，我想你可以说他很生气。”^[23]帕内塔再次笑着答道。

并非只有奥巴马一人生气。海军上将马伦花了多年时间与卡亚尼建立融洽关系，并经常以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身份提供建议和进行调停。帕内塔完成了与帕夏之间的火爆会谈后一个月，坐在一

屋子的国会议员面前，发表了美国截至当时最不加掩饰的公开谴责。武装分子哈卡尼的网络“名副其实地充当了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一个分支^[24]”，马伦说，“支持恐怖主义是他们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打击接连而至。2011年11月26日寒冷的凌晨时分，正在对塔利班采取行动的阿富汗人呼叫美军空中支援，而前来提供支援的美军向驻扎在两国边境上的巴基斯坦军队开了火。接替彼得雷乌斯担任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的约翰·艾伦（John Allen）将军是第一批接到通知的人之一。“我们最终在一夜之间杀死了他们24个孩子，”他回忆说，“现在有很多指责的声音，我不想讨论那个，但最重要的是我的人来自卫，而24名巴基斯坦边防部队人员被杀。”相互指责是猛烈而迅速的^[25]。两天后，巴基斯坦关闭了所有重要的“地面交通路线”或简称为GLOC^[26]，即用来提供驻阿富汗美军所需物资80%的北约路径。

“想象一下，一个15万人的战区，外加10万名文职人员，其80%的供给在一天内被切断了”，艾伦对此记忆犹新。他只剩下60天的供给^[27]，以及一个找不到优雅解决方案的问题。

这一事件首先清楚地提醒人们关注让巴基斯坦成为如此重要代理人的战略现实，但它也说明了美国态度的变化程度。鉴于双边关系已趋冰冷，艾伦干脆绕开巴基斯坦行事。“我不得不将所有东西转移到空运，或从北方进出中亚……或从柏林空运——重新规划空中再补给……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做到了。”这一调动每个月要让美国开支1亿美元，但它确实奏效了^[28]。最终，希拉里·克林顿的道歉让巴基斯坦人平静了下来。与巴基斯坦人达成谅解的那天，希拉里·克林顿在发给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的电子邮件中表示：“你怎么拼写‘解脱’一词^[29]？‘GLOCS’……”希拉里·克林顿从来都不是放着好路线而不加

以充分利用的人，她在20分钟后又发电子邮件给副国务卿比尔·伯恩（Bill Burns）称：“你如何拼出‘解脱’一词？‘GLOCS’……”

艾伦表示，美巴关系的最低点是一次失而永无可能复得的战略机遇。“在那之后，我们有9个月的时间与巴基斯坦没有任何联系……在那段时间里，我的数字也在下降”，他说，所指的是美国在该地区驻军数量也在减少。“我们让巴基斯坦人站在一边，我们站在另一边，在避风港问题上产生真正决定性效果的能力在那9个月里丧失了。回头看看我们原本可以在‘剿灭’避风港方面实现多少作为，坦白地说，真是一大悲哀。”^[30]

突袭本·拉登后，国会对援助巴基斯坦已兴趣不大，拒绝为巴基斯坦军方在地面运输线路关闭的漫长时间里所从事的活动提供补偿。这给霍尔布鲁克雄心勃勃的五年援助计划带来了最大的冲击^[31]。在他入土一年后，他拼命寻求转型的关系也随他而逝了。希拉里·克林顿在她大选年里出版的国务院岁月回忆录中愉快地指出，“关于供给线的谈判及最终协议为美国和巴基斯坦未来能如何合作、追求共同利益提供了经验教训^[32]”。人们可以合理地总结出的教训是，依靠缺乏与美国战略一致性的军政府是危险的。

2011年2月，我看着希拉里·克林顿走上亚洲协会的舞台，正式宣布美国支持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包括与塔利班会谈。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与亚洲协会有着长期的渊源。弗兰克·鲁杰罗被派去与塔利班的秘密联络人艾-罗德进行一系列进一步会谈。作为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美国敦促联合国在其恐怖主义黑名单上将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区分开来处理——这是霍尔布鲁克的另一项提案。但喀布尔的卡尔扎伊政府阻挠了谈判的努力。艾-罗德最初的请求之一——塔利班在卡塔尔政治办公室于2013年开张，但一个月后，因为挂起“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旗帜——这一举动代表着塔利班是一个流亡政府，而不是一

个政治派系——而被关闭。卡尔扎伊再次火冒三丈，会谈被冻结了多年。直到2016年和2017年，才再次断断续续地开始出现起死回生的迹象，有了由阿富汗人带头^[33]，至少一位美国官员参加的会议。未来仍然不确定。

一些同情霍尔布鲁克的奥巴马政府官员表示，他们认为对霍尔布鲁克及其外交活动的反感可能已经使美国白白浪费了在该地区拥有最大潜力的时期。当美国部署在当地军事力量众多时，塔利班和巴基斯坦人都有动力坐到谈判桌前，回应美国的强势谈判。一旦我们开始撤离，他们就没有理由合作了。白宫在霍尔布鲁克对巴基斯坦展开外交攻势的先期阶段不予以支持，同样也浪费了巩固双边关系、避免后来出现彻底崩盘局面的窗口。2012年接任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理查德·奥尔森（Richard Olson）将霍尔布鲁克去世后的一年称为“可怕的一年”。我们输掉了战争，而这就是这一切发生的时间。

^[1] McKelvey, Tara, “The CIA’s Last-Minute Osama Bin Laden Drama, ” *Daily Beast*, 9 May 2011, 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1/05/10/raymond-davis-the-cias-last-minute-osama-bin-laden-drama.html.

^[2] Conrad, Jim, “The Walls Come down at Powell Valley High, ” WCYB, 21 May 2014, www.wcyb.com/news/virginia/the-walls-come-down-at-powell-valley-high_20160524074842261/14089434.

^[3] Walsh, Declan, “AC.I.A. Spy, a Hail of Bullets, Three Killed, and a U.S.-Pakistan Diplomatic Row, ” *Guardian* (Manchester) , 20 February 20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feb/20/cia-agent-lahore-civilian-deaths> and Mazzetti, Mark, *The Way of the Knife: The CIA, a Secret Army, and a War at the Ends of the Earth* (New York: Penguin, 2014) , p. 2.

[4] Yasif, Rana, “Raymond Davis Case: The Forgotten Victim, ” *Express Tribune*, 18 March 2011, <https://tribune.com.pk/story/134313/the-forgotten-victim>.

[5] Tapper, Jake and Ferran, Le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Pakistan Should Honor Immunity for ‘Our Diplomat’ , ” *ABC News*, 15 February 2011, abcnews.go.com/Blotter/raymond-davis-case-president-barack-obama-urges-pakistan/story?id=12922282.

[6] Mazzetti, Mark, *The Way of the Knife: The CIA, a Secret Army, and a War at the Ends of the Earth* (New York: Penguin, 2014) , p. 264.

[7]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Leon Panetta, 6 May 2016.

[8]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Mohsin Kamal, 14 November 2016.

[9]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Mohsin Kamal, 14 November 2016.

[10]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Mohsin Kamal, 14 November 2016.

[11] Mazzetti, Mark, *The Way of the Knife: The CIA, a Secret Army, and a War at the Ends of the Earth* (New York: Penguin, 2014) , p. 276.

[12]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avid Petraeus, in Person at His Offices in New York City, 25 May 2016.

[13] DeYoung, Karen and Brulliard, Karin, “U.S.-Pakistan Relations Strained Further With Case of Jailed Diplomat, ” *Washington Post*, 8 February 2011,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1/02/07/AR2011020705790.html.

[14] Schmidle, Nicholas, “Getting Bin Laden, ” *New Yorker*, 8 August 2011, 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1/08/08/getting-bin-laden and Meyers, Steven Lee and Bumiller, Elisabeth, “Obama Calls World ‘Safer’ after Pakistan Raid, ” *New York Times*, 2 May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5/03/world/asia/osama-bin-laden-dead.html>.

[15] “U.S.-Pakistani Relations after the Bin Laden Raid, ” Stratfor, 2 May 2011, <https://www.stratfor.com/analysis/us-pakistani-relations-after-bin-laden-raid>.

[16] Brulliard, Karin and DeYoung, Karen, “Pakistani Military, Government Warn U.S. against Future Raids, ” *Washington Post*, 6 May 201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pakistan-questions-legality-of-us-operation-that-killed-bin-laden/2011/05/05/AFM210wF_story.html?tid=a_inl&utm_term=.9dce5bb83301.

[17] Brulliard, Karin and Hussain, Shaiq, “Pakistani Spy Chief Offers to Resign, ” *Washington Post*, 13 May 201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11/05/12/AFdoRh1G_story.html?utm_term=.e556f2485d1a.

[18]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avid Petraeus, in Person at His Offices in New York City, 25 May 2016.

[19]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Leon Panetta, 6 May 2016.

[20] Brulliard, Karin and DeYoung, Karen, “Pakistani Military, Government Warn U.S. against Future Raids, ” *Washington Post*, 6 May 201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pakistan-questions-legality-of-us-operation-that-killed-bin-laden/2011/05/05/AFM210wF_story.html?tid=a_inl&utm_term=.9dce5bb83301.

[21]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Michael Hayden, in Person at His Offices in Washington, D.C., 17 May 2017.

[22] Crilly, Rob, “Pakistan Accused of Tipping off al-Qaeda Fighters ahead of Raids, ” *Telegraph* (UK), 12 June 2011, 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l-qaeda/8571134/Pakistan-accused-of-tipping-off-al-Qaeda-fighters-ahead-of-raids.html.

[23]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Leon Panetta, 6 May 2016.

[24] Barnes, Julian, Rosenberg, Matthew, and Entous, Adam, “U.S. Accuses Pakistan of Militant Ties, ” *Wall Street Journal*, 23 September 2011,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3111904563904576586760263338104>.

[25] DeYoung, Karin and Partlow, Joshua, “Afghans Saw Commando Unit Was Attacked before Airstrike Was Called on Pakistan, ” *Washington Post*, 28 November 201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fghans-say-unit-was-attacked-before-airstrike/2011/11/28/gIQAX6ZY5N_story.html?hpid=z1&utm_term=.f70alc3d2b3a.

[26] Coleman, Jasmine, “Pakistan Halts NATO Supplies after Attack Leaves Soldiers Dead, ” *Guardian* (Manchester) , 26 November 20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nov/26/pakistan-halts-nato-supplies-attack>.

[27] Phone Interview with General John Allen, 2 September 2016.

[28] Martinez, Luis, “Afghanistan War: Closed Pakistan Routes Costing U.S. \$100 Million a Month, ” *ABC News*, 13 June 2012, abcnews.go.com/blogs/politics/2012/06/afghanistan-war-closed-pakistan-routes-costing-u-s-100-million-a-month.

[29] Sherman, Wendy, “THANK YOU, ” Email to Hillary Clinton, 2 July 2012, Released by WikiLeaks, <https://wikileaks.org/clinton-emails/emailid/20254> and Clinton, Hillary, “Re; Thanks, ” Email to Bill Burns, 3 July 2012, Released by WikiLeaks, <https://wikileaks.org/clinton-emails/emailid/7553>.

[30]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General John Allen, 2 September 2016.

[31] Author Interview with Alan Kronstadt, 18 August 2016.

[32] Clinton, Hillary, *Hard Choic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 loc. 3457–3458, Kindle.

[33] Yusufzai, Mushtaq, Williams, Abigail, Burton, Brinley,
“Taliban Begins Secret Peace Talks with U.S., Afghan Officials:
Sources, ” *NBC News*, 18 October 2016,
www.nbcnews.com/news/world/taliban-begins-secret-peace-talks-u-s-afghan-officials-sources-n668131.

15 备忘录

侯赛因·哈卡尼试图养成早上睁眼第一件事先不检查手机的习惯，“否则事情就会变糟^[1]”。2011年10月10日，他在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馆的住宅套房中醒来，在晨曦中穿好衣服，然后走进卧室旁边码满了书的书房。哈卡尼有很多书，毕竟他是一名教授。他坐在一张超大的办公椅旁，翻阅着报纸。在翻阅鲑鱼粉色大开页的英国《金融时报》过程中，一篇专栏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是接纳巴基斯坦圣战间谍的时候了”，标题这样写道。作者是他的熟人，名叫曼苏尔·伊贾兹（Mansoor Ijaz）。

“在美国特种部队袭击奥萨马·本·拉登并将其击毙后一周，”专栏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一名巴基斯坦高级外交官打电话给我，提出一个紧急要求。”伊贾兹声称这位外交官想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上将传递一则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的信息——要在不让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发现的情况下。“在巴基斯坦境内发现本·拉登的尴尬使扎尔达里的弱势文官政府受到羞辱，以至于总统担心军事接管迫在眉睫，”伊贾兹写道，“他需要美国在他的军事总长桌子上砸上一拳，来结束任何被误导的政变想法——要够快。”伊贾兹声称他按照外交官在几通电话中给出的明细，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其要求是：希望美国命令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卡亚尼将军“停止巴基斯坦军事情报机构的活动”。更多的要求还包括：扎尔达里总统应该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小组，来掌握权力并消除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内部的强硬分子^[2]。无论其缘由为何，伊贾兹都确实写了一份备忘录，并将其发送给最近刚刚离任的国家安全顾问吉姆·琼斯，后者又将其转给了马伦。

雷蒙德·戴维斯事件和歼灭本·拉登行动重新唤起了巴基斯坦内部对哈卡尼忠诚度的疑虑。之前一年，他负责取消对美签证停发。现在，随着不请自来的间谍和海豹突击队故事搅动巴基斯坦，矛头指向了他。“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指责我的一件事是，那些在本地协助了突袭的人可能是由我签发的签证，而情报局对这些人并不知情，”哈卡尼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是如此擅玩阴谋。”阴谋理论家所青睐的说法是哈卡尼与美国人勾结，将一个秘密的间谍网络放进了巴基斯坦。这种观点在巴基斯坦有着持续的生命力。2017年3月，该国总理办公室一封信函的副本被媒体公开，信中授权哈卡尼在不通知伊斯兰堡的情况下发放签证^[3]，这证明了哈卡尼声称他不是单方面行事的说法。但在此之后又出现了另一次泄密，这次是外交部的一封信，据称信中警告哈卡尼不要批准中央情报局特工的签证^[4]。在巴基斯坦军方一些人看来，哈卡尼是变节分子^[5]，向干涉他人事务者开放巴基斯坦边境的人。

哈卡尼意识到《金融时报》专栏文章会让持此观点者产生何种看法。除他以外，很难想到再有一位“巴基斯坦高级外交官”能如此贴近备忘录中所描述的亲民、亲美意识形态标签了。读到专栏结尾时，哈卡尼那天早上第一次拿起了黑莓手机，用他的伦敦区号打给曼苏尔·伊贾兹。

“出什么事了？”哈卡尼问道。

“你不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巴基斯坦官员”，在两人对这次谈话的回忆中，伊贾兹这样回答道。哈卡尼说伊贾兹当时是笑着回答的。

“这可能引发某种政治危机。”哈卡尼说。他可没心思笑。

“不会啦，我不认为会发生那种情况，”根据哈卡尼的回忆，伊贾兹如此回答道，“文章的其余内容更重要。”

哈卡尼回忆到此摇了摇头，“这家伙根本不明白^[6]”，他告诉我。伊贾兹回忆时，指出谈话中还有另一个细节——哈卡尼在挂断电话前对伊贾兹说：“你已经杀了我。”

据曼苏尔·伊贾兹的说法，他接到侯赛因·哈卡尼的电话时，正在自己的游艇上，然后飞速地行动起来，起草备忘录。伊贾兹有着适合做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小说中配角的履历，说不定他就是这样计划的。他是巴基斯坦裔美国商人，担任对冲基金经理时发了财，常来常往于度假天堂法国地中海沿岸区域。与媒体交谈时，他总是强调自己乞丐变富豪般的成长故事：他生于佛罗里达州，在弗吉尼亚州弗洛伊德县的一个农场中长大，靠举重拿到运动员奖学金，支付了弗吉尼亚大学（UVA）的学费。他也会着重渲染自己的富有。“上帝在这世上给了我这么多，但如果我留给世界的只是停在跑道上的喷气机、港口里的游艇、世界各地的10所住宅，以及我太太的5000双鞋子，我就没有履行自己的使命。”他在丑闻期间对《华盛顿邮报》这样表示。伊贾兹的父亲告诉他：“上帝给了你一个优秀的大脑^[7]，但是糟糕的个性，你需要从政，来教会自己谦卑。”伊贾兹在金融领域发了财后，他开始数以十万美元计地向民主党捐款，尽可能多地建立人脉。他写专栏文章，开始寻求让自己置身于国际冲突中。在20世纪90年代，他找克林顿政府接洽，称他正在与苏丹谈判，以确保逮捕当时正在那里避难的奥萨马·本·拉登。一份报告显示，克林顿政府官员将他视为“沃尔特·米蒂”（Walter Mitty）^[8]型人物，“活在自己的幻想中”。后来，他以福克斯新闻电视频道的评论员身份公开露面，提出了危言耸听的说法，称极端的伊朗毛拉们将化学武器走私到伊拉克。他后来承认这种说法“有误”。无论在电视上还是报纸专栏文章中，他的一连串断言都色彩缤纷^[9]且令人怀疑。

然而之前的种种都没有像最新的说法一样，促成了一场国际事件。《金融时报》专栏文章发布后几天，第一波报道开始在巴基斯坦

媒体上出现。批评人士惊呼：扎尔达里与魔鬼达成了协议；文职政府与美国人同流合污。哈卡尼接到总统扎尔达里的电话。“发生了什么？军方对此态度很是严厉。”哈卡尼在最初的专栏文章中并没有被明确点名，但在政治家伊姆兰·汗（Imran Khan）点名指责他为罪魁祸首^[10]之后，他就成了后续报道中必然出现的人物。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发起了一项调查，其中帕夏将军还在伦敦与伊贾兹会面，并从后者的黑莓手机上下载了证据^[11]。后来在法庭上展示的伊贾兹通话和短信记录显示，两人之间进行了一连串的交流，不过通话内容都很简短，而信息也往往是发自伊贾兹，而不是哈卡尼。哈卡尼说自己是做人客气却反受其害^[12]，结果那种“非常感谢你来信”的敷衍性信息也被当成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专栏文章发表两个月后，扎尔达里再次打来电话，命令哈卡尼返回巴基斯坦。在那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和公众都希望有人祭旗。

哈卡尼接到了美国人打来的一连串警告电话：霍尔布鲁克的继任者马克·格罗斯曼（Marc Grossman）、道格拉斯·鲁特手下一位工作人员、中情局副局长迈克·莫雷尔（Mike Morell）。“不要去，”哈卡尼记得莫雷尔这样说，“他们会把你交给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哈卡尼已经登上飞往多哈的航班，然后转机去伊斯兰堡。“我已经为实现文职政府执政挣扎太久了，不能让它因为一项对我的错误指控而倾覆，”哈卡尼说，“我不会让军队推翻民选政府。”他告诉妻子和孩子，如果他回不来，那就是因为他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最终代价。他乘坐的航班上正在播放一部关于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13]的电影。哈卡尼决定这将是他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最终摊牌的参考情节框架：“他们可以绑住我，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会是胡迪尼^[14]，会逃脱出来。去他的吧，我回去。”

抵达后，哈卡尼的护照被没收，他被快速带到总统宫，在那里扎尔达里保证了他的安全。他随身只带了三天的衣服，但最终在那里待

了两个多月。巴基斯坦军队和情报局大权在握的负责人卡亚尼和帕夏对他发问。

“你对这一切做何解释？”卡亚尼说。

“这都是胡说八道”，哈卡尼回答道。他指出，他都将美国海军上将马伦的电话设置好了快速拨号，为什么还要用一个在法国蔚蓝海岸的商人做中间人？哈卡尼与卡亚尼和帕夏之间的问答，被媒体兴高采烈地写成了多小时的审讯。“真他妈的，我在这儿呢”，哈卡尼看着那些令人生厌的报道，自言自语道。但随着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他变得越来越担心。他的案子没有交给立场亲民的议会，而是交给了受军方控制的最高法院。法院发布了不准他旅行的禁令。其间扎尔达里一度中风，飞往迪拜。保护者不在的情况下，哈卡尼被转移到了由军队守卫的总理府。半夜，他听到靴子踏地的脚步声，在那一瞬间想到或许他们最终决定把他带走。后来证明那只是例行换岗^[15]。

1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五晚上，最高法院突然宣布在下个周一举行听证会，哈卡尼的焦虑达到顶点。听证会从未在晚上宣布过。门口响起了敲门声，一位对哈卡尼及其他有关人员均拒绝透露姓名的商人给了他指示：尽管第二天是周六，但最高法院将在早上短暂开门，哈卡尼要赶紧提交离开巴基斯坦的申请，然后他会在听证会之前立即离开。在哈卡尼不在场的情况下，法庭程序将只有单方面证词，仅根据伊贾兹继续指责哈卡尼的证词发布报告。在巴基斯坦当局后来于2018年重拾起来的一项指控中，哈卡尼还被指控用巴基斯坦的一笔行贿基金付钱给美国人，却没有将其中的细节报告回国。但是，由于哈卡尼不在场，因此没有正式的法律判决。这是巴基斯坦的经典政治大戏。军事和情报部门面子上维护了反对美国傀儡的形象，但没有造成任何后果。

曼苏尔·伊贾兹坚持认为哈卡尼向他发出了备忘录，但拒绝发表评论。“这种改变了的说法中存在一些实质性的失实^[16]，”他谈到哈卡尼对事件的描述时这样说，“恐怕太多了，要花很长时间来修正。”哈卡尼怀疑伊贾兹可能已经在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要求下修改了备忘录，但是他承认，更大的可能性或许是伊贾兹这个连环幻想家又进入想象世界了——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和军方则抓住机会，想消灭敌人。

几年后，在保守派智库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我再度与哈卡尼见面。窄窗外可以俯瞰宾夕法尼亚大道两侧的灰色建筑，墙上挂着哈卡尼与乔治·W. 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握手的照片。有一张照片里，他与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手挽着手。哈卡尼坐在一堆堆满杂乱纸张的桌子旁。那是2017年，他又处在一个熟悉的位置上：被巴基斯坦媒体抨击。他在一篇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中，为唐纳德·特朗普与俄罗斯人所做的接触辩护，将其与他自己当年同奥巴马政府的接触相提并论。他指出自己当年在奥巴马入主白宫的过渡期内主动接触的做法，后来帮助美国实现了突袭本·拉登^[17]。确实如此，间接的。最终是他批准了联合特别行动指挥官、海军上将麦克雷文（McRaven）及其他参与规划突袭行动者的签证。到这篇专栏文章传到巴基斯坦时，它已经被夸大成一份期待已久的证词^[18]，证实侯赛因·哈卡尼在他老板们的鼻子底下建立了一张中央情报局特工网。“对他在整个问题中所扮演角色的怀疑^[19]，其真实性也得到了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在一则推文中惊喜地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卡尼选择了这种平民生活。但他从未停止过希望祖国能理解他主张对话的信念，以及他对建立在军方交易基础上的双边关系所抱持的怀疑。他递给我一份又一份详细记录了“备忘录门”争议的文件，这一事件显然在他的印象中依旧显著而严重。哈卡

尼穿着宽松的灰色西装，带着撒有白色三叉戟点缀的青色领带，看起来很疲惫。“看，（事态）已经改变了，”他沉重地说，“在巴基斯坦很多人看来，我不是爱国者。”

“你一生都在为政府工作，”我说，“那一定很痛苦。”

“是啊，为我的国家，为我国的民主（工作）。所以它伤害了我。”

他仍然在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回国去，但他又总是犹豫。“如果有人真的认为我是叛徒，然后向我开枪，怎么办？”他思索道。流放的生活苦乐参半。哈卡尼得到了性命无忧的生活环境，但他的终生事业——为改变两国关系而斗争，以建立更可持续及更少交易性的关系——已然终结。在华盛顿四季酒店与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进行的最后那次谈话中，两人都承诺各自继续为反对根深蒂固的军事思想而战，直至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为止。霍尔布鲁克的战斗终止一年后^[20]，哈卡尼的战斗也结束了。

^[1]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Hudson Institute Office, Washington, D.C., 6 January 2017.

^[2] Ijaz, Mansoor, “Time to Take on Pakistan’s Jihadi Spies,” *Financial Times*, 10 October 2011, <https://www.ft.com/content/5ea9b804-f351-11e0-b11b-00144feab49a> and “Confidential Memorandum: Briefing for Adm, Mike Mullen, Chairman, Joint Chiefs of Staff,” 9 May 2011, *Washington Post*, 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world/documents/secret-pakistan-memo-to-adm-mike-mullen.html.

^[3] “Gilani Granted Controversial Visa-Issuing Powers to Haqqani, Letter Reveals,” *GeoTV News*, 24 March 2017,

<https://www.geo.tv/latest/135334-Gilani-granted-controversial-visa-issuing-powers-to-Haqqani-letter-reveals>.

[4] “Hussain Haqqani Renewed Visas to 36 C.I.A. Agents in Pakistan Despite Foreign Office Warning, ” *Times* (Islamabad) , 25 March 2017, <https://timesofislamabad.com/hussain-haqqani-renewed-visas-to-36-cia-agents-in-pakistan-despite-foreign-office-warning/2017/03/25>.

[5]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Hudson Institute Office, Washington, D.C. , 6 January 2017.

[6]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Hudson Institute Office, Washington, D.C. , 6 January 2017.

[7] Ignatius, David, “Mansoor Ijaz, Instigator behind Pakistan’ s ‘Memogate’ , ” *Washington Post*, 22 January 201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post-partisan/post/mansoor-ijaz-instigator-behind-pakistans-memogate/2012/01/22/gIQAcrdJJQ_blog.html?utm_term=.a2243babdf37.

[8] 译者注：1939年在《纽约时报》首发的一则短篇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整天白日做梦，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

[9] Ignatius, David, “Mansoor Ijaz, Instigator behind Pakistan’ s ‘Memogate’ , ” *Washington Post*, 22 January 201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post-partisan/post/mansoor-ijaz-instigator-behind-pakistans-memogate/2012/01/22/gIQAcrdJJQ_blog.html?utm_term=.a2243babdf37 and Bergen, Peter, “What’ s behind the Furor in Pakistan? ” CNN, 25 November 2011, www.cnn.com/2011/11/24/opinion/bergen-memogate-pakistan.

[10] Nelson, Dean, “Imran Khan Blame by Pakistan U.S. Envoy for Links to Army Plot, ” *Telegraph* (UK) , 21 November 2011, 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pakistan/8904605/Imran-Khan-blamed-by-Pakistan-US-envoy-for-links-to-army-plot.html.

[11] Kiessling, Hein, *Faith, Unity, Discipline: The Inter-Service-Intelligence (ISI) of Pakistan* (London: Hurst, 2016) , loc. 4277, Kindle.

[12]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Hudson Institute Office, Washington, D.C. , 6 January 2017.

[13] 哈里·胡迪尼（1874年3月24日至1926年10月31日），匈牙利裔美国魔术师，享誉国际的脱逃艺术家。——译者注

[14]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Hudson Institute Office, Washington, D.C. , 6 January 2017.

[15]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Hudson Institute Office, Washington, D.C. , 6 January 2017.

[16] “Email from Mansoor Ijaz to Ronan Farrow, ” 11 March 2018.

[17] Haqqani, Husain, “Yes, the Russian Ambassador Met Trump’ s Team, So? That’ s What We Diplomats Do, ” *Washington Post*, 10 March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steverything/wp/2017/03/10/yes-the-russian-ambassador-met-trumps-team-so-thats-what-we-diplomats-do/>.

[18] “Pakistan Army Reacts to Hussain Haqqani’ s Article, ” *The News* (Pakistan) , 29 March 2017,
<https://www.thenews.com.pk/latest/195267-Pakistan-Army-reacts-to-Hussain-Haqqanis-article>.

[19] Iqbal, Anwar, “Haqqani Claims His ‘Connections’ Led U.S. to Kill Osama, ” *Dawn*, 13 March 2017,
<https://www.dawn.com/news/1320175>.

[20] Author Interview with Husain Haqqani, Hudson Institute Office, Washington, D.C. , 6 January 2017.

16 实实在在的事

2014年那可怕的一天，罗宾·拉斐尔站在她的门廊上，盯着逮捕令，上面赫然列着间谍法。两名年轻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看着她，其中一个问：“你认识外国人吗？”拉斐尔瞪大了眼睛。“上千人，”她说，“我是外交官。”特工问她认识哪些巴基斯坦人，她给出了侯赛因·哈卡尼以及后来接替他成为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的贾利勒·阿巴斯·吉拉尼（Jalil Abbas Jilani）的名字。两名特工对视了一下。

“你家里有没有任何机密材料？”另一位特工进一步追问道。

“没有，”拉斐尔说，“当然没有。”

他们递给她几张标有“机密”字样的国务院电文，这些文件的日期还是在她担任助理国务卿的时候。他们在拉斐尔地下室的档案柜里找到了它们。拉斐尔用手掌拍了额头，想了一下，才记起当时是怎么回事。她在几年前清理办公室时把许多物品带回了家，但忽略了抽出的电报稿。“这些文件不应该出现在那里，”她很快承认道，“但这只是我的问题^[1]，我离开办公室时，没时间去仔细检查一遍所有的东西。”她认识数十位习惯更差的高职位官员，我们都认识这些人。

随着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追问越来越激烈，拉斐尔努力想说服他们这中间存在误会。“我的意思是，我就是这样一个白痴，彻头彻尾的白痴，因为我想‘哦，我可以解释清楚！’”差不多过了两个小时，她才意识到自己需要律师。她打电话给自己认识的一位——她在卡西迪合伙人公司^[2]做游说工作时认识的政府合同专家。

几个小时后，她和她女儿亚历山德拉坐在了附近一家名叫“德卡罗”（DeCarlo's）的意大利餐厅里。这家餐厅桌上摆着面包棒，地

上铺着褪色的绿地毯，拉斐尔的孩子们总是把它称作“黑手党秘密据点”；左邻右舍间的传说还称此地为中情局谍报人员经常接头的地点。与她们一起就座的还有两位律师：她打电话过去的那一位，外加一位刚刚叫了辆优步（Uber）车飞速赶来的年轻律师。矮个并长着一头抢眼红发的亚历山德拉显得极其焦虑。“你怎么可能把文件搁在家里，”她哭着说，“你在想什么？”拉斐尔试图梳理清楚发生的事，她点了一杯酒。“事实是，我惊得休克了过去，”她后来告诉我，“医疗意义上的休克[\[3\]](#)。”

第二天，外交安全局（Bureau of Diplomatic Security）的人来到拉斐尔家，没收了她的黑莓手机和工作证。国务院人力资源部召她过去，告知她的安全许可将被中止，而她本来也该续签的雇佣合约将失效。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在没有工作证的情况下走进国务院大楼。当C街入口处的警卫看到她驾驶执照上的名字时，拉斐尔记得他明显地颤抖了一下。几天后，这个故事出现在了《纽约时报》头版：“联邦调查局正对美国退役外交官展开调查。”国务院发言人只是对记者表示，国务院正在与执法部门合作。“拉斐尔女士的任职到期了，”发言人补充道，“她已不再是国务院雇员[\[4\]](#)。”罗宾·拉斐尔再也没有获准回到过她的办公室。联邦调查局特工搜查了她的办公桌，然后在门上贴了封条。

几个星期前，拉斐尔带着丹·费尔德曼交代的任务抵达了伊斯兰堡。费尔德曼就是霍尔布鲁克曾开玩笑地要他的心的那个人，刚接任霍尔布鲁克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职务不久。巴基斯坦各地发生了街头抗议示威活动，抨击所谓推动纳瓦兹·谢里夫在2013年重新掌权的操纵选举行为。一些评论家认为，一场“软政变”正在进行中，谢里夫正悄悄将主控权拱手让给军方。罗宾·拉斐尔在伊斯兰堡拥有无与伦比的人脉，因此被派去那里搜集谢里夫政府是否可能真的垮台的信息。她立即开始了工作，参加晚宴聚会，记录她听到的八

卦，然后向费尔德曼和伊斯兰堡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理查德·奥尔森汇报。“她在做的，”奥尔森告诉我，“是外交活动^[5]。”自2011年那“可怕的一年”以来的三年时间里，美国及巴基斯坦两国关系冷若冰霜。国务院的同事们视拉斐尔为失去便不可复得的资产：巴基斯坦人仍愿与之交谈。

她无法得知自己在伊斯兰堡出差期间，一举一动都受到联邦调查局监视。拉斐尔这种旧式外交的招牌做法不仅在军事思维主导的外交政策领域里越来越难让人买账，也在“9·11”之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安全监控领域里成为嫌疑。面对面对话已经稳步地被“电信信号情报”或通信拦截所取代。2013年初，窃听巴基斯坦政客电话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分析员开始关注谈话中出现的一个美国人名字：罗宾·拉斐尔。她似乎在讨论敏感问题——无人机空袭、政变。他们向联邦调查局发送了一份“811提示”——提请注意有关机密材料的可疑谈话。拉斐尔后来在自家门廊上遇到的两名特工，就是被选中领导调查联邦调查局辖下“65号工作”或间谍案的。他们开始审查与拉斐尔有联系的人、她在国务院的人事档案以及她的个人生活。几个月后，他们获得了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的许可^[6]，开始监控她的Skype以及她与巴基斯坦官员的通话。

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密事件已经过去了一年，联邦调查局正在寻找内鬼和泄密者。他们希望在拉斐尔身上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她的背景似乎具备所有的特征：几十年的时间基本在国外度过，身份是登了记的说客，对来自所有各方的可疑巴基斯坦人不加掩饰地予以同情。（“哦，绝对的，”当我问她是否觉得她这种同情给调查带来了偏见时，她这样对我说，“每个人都讨厌巴基斯坦^[7]，所以，当然了。”）与她谈话的巴基斯坦人有时会把她称为“消息人士”，并吹捧她知道的信息如何多。进一步挖掘后，还显示了更多的警讯：她被发现有一些与处理机密材料有关的轻微违规行为；将文件

公开放置或忘记给计算机锁屏。然后就是在她住宅地下室的档案柜里发现了文件——这可能在更为严重的间谍诉讼之外，还带来刑事诉讼[8]。

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也是沿着多层次的误解展开的。寻找内鬼的情报和执法机构基本不了解巴基斯坦外交的特殊规则。任何人只要在伊斯兰堡的一场晚餐会上待过五分钟，就会知道拉斐尔讨论的那些名义上的“机密”主题，例如无人机空袭等，都是不可避免的公开辩论问题。同样，吹嘘美国人是信息来源也是典型的巴基斯坦式吹牛皮表达。

拉斐尔也面临更普遍的困惑。她构建自己职业生涯所依靠的老式套近乎和建立私人关系的手法已不再流行，对于在监控时代里长大的一代人来说是很诡异的事情。她所加入的霍尔布鲁克麾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团队尤其与时代的步伐不搭调，团队中从事机构间工作的人员所抱持的目标宗旨是扩大而不是缩减该地区的对话。

“人们不了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办公室，我相信你不会对此感到惊讶，”拉斐尔回忆道，“他们不理解官僚结构。这些人都是谁？他们向谁报告？他们在那里都干什么？他们的工作范围是什么？[9]”所有这些谈话的价值都并非不言而喻。怎么可能不言而喻呢？在诸如巴基斯坦这样的地区，长久以来对话始终是军事将领和间谍们完事之后才有的想法。

2017年，大约在唐纳德·特朗普就职典礼前一周的一个晚上，在华盛顿，罗宾·拉斐尔从冬天冷飕飕的户外进来，脱掉大衣。我们见面的地点在花园咖啡厅（Garden Café），国务院大厦拐角处一个安静的法式小餐馆，桃粉色的墙上装饰着平淡无奇的鲜花主题油画，轻声播放着爵士乐。一如既往，她的着装风格反映出她在巴基斯坦的生活经历。她穿着灰褐色的羊绒衫，灰色外套上银色刺绣披肩搭在一个肩

膀上，金发拢成法式盘发。她点了杯白苏维翁（Sauvignon Blanc）。

“现在回头看看，我觉得这事儿挺滑稽的，”她说道，声音表明她根本没有看到其中的幽默，“但那是……你知道的，无论如何你怎么剖析，那样对待一个人都是完全错误的。”她似乎没有改变：嘴唇紧紧地闭着，下巴高高扬起，同样的傲慢神情。但事实上，罗宾·拉斐尔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随着联邦调查局挖掘得更深入，他们对案子反而失去了动力。严密监视拉斐尔的几个月里，调查人员一直避免与她的国务院同事们交谈，不想因此给她报信儿而失去当场抓现行的机会。与熟悉拉斐尔工作的官员开始交谈之后，他们开始明白拉斐尔被怀疑有罪的行为实际上只是老派、关系驱动的外交活动。2015年初，负责该案件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告诉拉斐尔的律师，它打算放弃以间谍罪起诉。检察官似乎仍然想要榨些东西出来挽回面子，例如在机密材料相关的较轻罪名上认罪之类。拉斐尔不让步——她知道那些违规行为是常见的，不能构成重大刑事诉讼的理由。2016年3月，检察官最终完全放弃了此案。这时，距联邦调查局搜查她的住宅已经过去了17个月，她花费了超过10万美元的律师费。朋友们联合起来帮助她负担了这笔费用，但她依然在经济上元气大伤，且没有工作。

“我已经两年没工作了，”她告诉我，“我对孩子仍然负有重大责任，还有律师的账单，以及类似的事情。”她冷冷地笑道。“简直不可想象，你花了四十年努力工作，而这就是结果。”她一直在寻找工作，但笼罩在她身上的疑云让她很难找到。“联邦调查局都在《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报道中指责你是间谍了，没人会雇用你的[\[10\]](#)。”调查公告写的乱七八糟，也没有引起公众的丝毫关注。后来，她接受一些奇奇怪怪的兼职咨询工作——任何她能找到的帮她应付生活开销的工作。

外面的生活很难适应。在拉斐尔整个的记忆里，工作就是她的生活。“我是一个职业女性^[11]，”她说，“我不是家庭主妇。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做饭和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居家的人。”她竭力保持表面上与过去一样的生活。每天她早早醒来，坐在自家餐厅桌前，打开旧笔记本电脑，伸出触角找工作。她针对在阿富汗的和解问题向非政府组织提出建议，这一项目已再次被美国政府弃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她大量阅读，尤其是关于政治和巴基斯坦的议题。她去参加所有能参加的智库和外交政策活动，尤其是关于南亚任何议题的活动。2016年初，我在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的一个小范围活动上，就一部关于荣誉处决^[12]问题的短纪录片，采访了该片的巴基斯坦制片人沙明·奥贝德-奇诺伊（Sharmeen Obaid-Chinoy）。前排就坐着罗宾·拉斐尔，她还在做笔记。一些与会者好奇地瞥着她，交换着耳语。

她的家人也不得不调整。拉斐尔说，亚历山德拉持续感到“羞愧……这对她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打击”。亚历山德拉已经订婚，马上就要结婚，向她的公婆解释丑闻成了家庭危机。“她害怕人们不会来（参加婚礼），怕每个人都会想到这一令人尴尬的事情……”拉斐尔回忆道。拉斐尔坐大巴前往纽约，面见了新郎的父母，一位成功的投资银行家和他优雅又喜好瑜伽的妻子。“我不是间谍^[13]”，拉斐尔告诉他们。“哦”，他们回答道。

那天晚上，在花园咖啡厅，拉斐尔用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指甲在白色桌布上刮出“嘶嘶”声。“如果有人把这些人放到这上面，”她说，“那他一定是个美国人。”

“一个觉得你太像（间谍）的美国人。”我说。

“是的，而且你知道”，她神秘地倾斜了身体，轻声说，“情报界满是印度裔美国人，他们对巴基斯坦耿耿于怀。他们在那里是因为

他们的语言技能。你看到这些人从INR”——国务院情报研究局“来做简报，可他们不得要领^[14]。他们带着偏见，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她向后靠着身子，一把抄起她的白苏维翁，酒在杯中晃动，差点洒出来。我就调查一事与十几个拉斐尔的同事进行了交谈，没人认为她是间谍，但有几个人对她与一个奸邪政权的关系如此和睦存有质疑。

“偏袒供职所在国病症”这个词时有出现。罗宾·拉斐尔是位忠诚甚至是爱国的美国公务员。但她已经内化了巴基斯坦人的态度——都到了意欲归咎于印度甚至印度裔美国人的地步。

拉斐尔的方法并不完美。她与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不同，霍尔布鲁克使用外交手段改变他所处理关系的战略方向，而她是按规则办事。她利用外交手段维持现状，而几十年来，巴基斯坦一直保持事态基本稳定，足以让军事和情报合作继续下去。有时，她的做法看起来像绥靖。授权外交是霍尔布鲁克曾敦促使用的前线外交工具，其表象可能看起来很不同。

但拉斐尔信奉的是老式外交格言：你永远不要停止对话。早在她为塔利班辩护的时期，就已经极端表现出了她对这一思想的崇尚。如今，当任何形式的外交都已在美国最为敏感的国际关系中遭到边缘化的时代，这种行为就显得已经超越了不寻常范围——它甚至看起来像是犯罪。“她是在努力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做我们都认为重要的事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告诉我，因为调查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仍然如鲠在喉，“而这样做让她看起来像间谍。整件事的危险就在于置外交于非法^[15]。”

《华尔街日报》在详细报道拉斐尔案件时，最终发表的文章采用了“最后的外交官”这一标题。拉斐尔一边从我们就座的桌旁站起来，另一边对这一归纳摇头。“罗南，我们能不能直截了当点儿？有外交政策界的人跑来跟我说，‘你采取的是老派方法，现在流行的是

新的方法’。”她蓝色的眼睛盯住了我，“我没做错事，我也没做过时的事，我做的是实实在在的事”。罗宾·拉斐尔穿上大衣，走出餐厅，回到冬天的寒冷中。

[1]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6 January 2017, Garden Cafe in Washington, D.C.

[2]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6 January 2017, Garden Cafe in Washington, D.C.

[3]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6 January 2017, Garden Cafe in Washington, DC.

[4] Mazzetti, Mark and Apuzzo, Matt, “F.B.I. Is Investigating Retired U.S. Diplomat, a Pakistan Expert, Officials Say, ” *New York Times*, 7 November 2014, https://www.nytimes.com/2014/11/08/us/robin-raphel-fbi-state-department-search.html?_r=0.

[5] Author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Richard Olson, 28 September 2017.

[6] Entous, Adam, “The Last Diplomat, ” *Wall Street Journal*, 2 December 20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last-diplomat-1480695454>.

[7]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6 January 2017, Garden Cafe in Washington, D.C.

[8] Entous, Adam, “The Last Diplomat, ” *Wall Street Journal*, 2 December 20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last-diplomat-1480695454>.

[9]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16 May 2016, at US Institutes of Peace.

[10]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30 June 2016.

[11]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6 January 2017, Garden Cafe in Washington, D.C.

[12] 荣誉处决 (Honor Killing) 是指男性、女性被一个或以上的家族、部族或社群男性、维护家族名声、清理门户等理由杀害, 这类事件往往发生在实行封建制度的地区。——译者注

[13]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6 January 2017, Garden Cafe in Washington, D.C.

[14]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6 January 2017, Garden Cafe in Washington, D.C.

[15]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Senior US Official, 28 September 2016.

第二部 先开枪，别提问

叙利亚，2016年

阿富汗，2002年

索马里，2006年

埃及，2013年

哥伦比亚，2006年

不要被迷惑：结交恶友，败坏善德。

——哥林多前书[\[1\]](#)，15章33节

[\[1\]](#) The Holy Bible,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17 一般规则

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去世七年后，我又路过了曾经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办公室门前。依旧是漆成医院般白色的墙，蜂蜜色的木门。牌子却是新的，上面写着：“派驻全球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联盟总统特使办公室”。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团队以及霍尔布鲁克与塔利班谈判的梦想，在唐纳德·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中悄然破灭，留守到最后的员工也被遣散。2018年初的几天里，特朗普的第一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告诉我，他还没有就这一角色的未来做出最终决定；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对这一机构的评价并不高。他说：“是否需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1]，这一点我们正在考虑，”蒂勒森认为，负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的传统角色——美国派驻这些国家的大使，以及负责南亚及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比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要好得多，好得多”。然而截至2018年初，国务院的南亚和中亚局还没有一个常设助理国务卿角色。即便有人在积极倡导在该地区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也没让人明显地看出来。

霍尔布鲁克在他最后带着绝望色彩的备忘录中表达了对军事化外交理念的恐惧，然而现实是这种理念如今已经以他始料未及的程度与规模变成了现实。特朗普总统将更多权力集中到了五角大楼，在以往由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多方机构协调策划的政策领域里，赋予了国防部几近单方面做出抉择的权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白宫悄悄地将更多的军队部署决策权下放给了军方。在也门和索马里，战地指挥官有权在不经白宫批准的情况下发动袭击^[2]。在阿富汗，特朗普授予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将军全权决定驻军数量的权力。在公开声明中，白宫对此举轻描淡写，称五角大楼仍然必须遵守白宫制定的总体政策基调。但在操作中，在外交领域里，成千上万名身处随时可能发生冲突

地区的美国军人的命运，在近代历史上首次完全掌握在军方的手中。外交官不再输掉阿富汗问题的争论：他们根本就没在争论当中。2018年初，军方开始展开新的增兵举措^[3]：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当地已有的1.4万名驻军之外，还会有近千名军人被派驻到这一地区。

在美国本土，白宫自身充斥着军方的声音。特朗普政府开始执政几个月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25个高级领导职位中，至少有10人是由现任或退役军方官员担任的^[4]。随着人事任命和解聘走马灯似的持续，不断增长的撤换人员队伍中包括了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一职务之前被授予了前武将约翰·凯利。与此同时，白宫终止了“选派”国务院官员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做法^[5]。按照当前设计，在白宫决策过程中，来自外交界的声音将越来越少。

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对外关系也表现出明显的军事味道。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泄露了计划制定中的“买美国货”战略，其中将为国务院派驻全球外交官提出新的任务：为国防承包商对外销售武器造势。美国军售额^[6]在这之前的五年中一直在攀升，但特朗普政府领导任内的一系列新交易表明，武器销售与任何可能为军售提供背景和方向的外交之间，脱节程度越来越高。2017年卡塔尔与其他海湾国家之间发生外交危机期间，在特朗普斥责卡塔尔政府与恐怖分子关系密切的同时，五角大楼宣布将向该国出售价值120亿美元的F-15战斗机。国防部长马蒂斯会见了与他对等的卡塔尔国防大臣，坐实了此项交易。据几位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7]表示，国务院官员几乎没有参与其中。

迫切的军事需求战胜了阻碍前几届政府从事此类交易的担忧。在巴林镇压人权活动的过程中——包括政府军施行谋杀和酷刑——国务院宣布美国将在不附带任何人权条件的情况下，恢复向该国的君主政权出售F-16战斗机^[8]。一位记者于2017年5月下旬在国务院就政府如何解释创纪录的110亿美元对沙特阿拉伯军售与该政权人权纪录糟糕之

间的矛盾，向代理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E. 琼斯（Stuart E. Jones）提问时，琼斯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只是在常任助理国务卿尚未任命时，在岗位上代行其职的职业外交官。“嗯，嗯……”琼斯嘟囔着环顾左右，反复交叉着手指，然后停顿了20秒，目光坠入向无限远处的凝视。他断断续续地讲了几句打击极端主义的话，接着又是一个无休止的停顿，然后就低着头，匆匆离开了讲台，仿佛意识到自己在裸身梦游一般^[9]。

特朗普总统一次又一次地称独裁者为强人，称赞他们。他称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非常棒^[10]”，“我们非常支持（他）”；称菲律宾统治者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正做着“令人难以置信^[11]”和“伟大”的工作。特朗普亲自邀请这两人到白宫，打破了之前政府的惯例。所有仍在世的前国务卿中，只有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一人对这种亲密关系表示完全赞同。“埃及、菲律宾和土耳其历史上都是美国的伙伴，我们与这些领导人打交道是很重要的^[12]，”贝克说，“经常被人们引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一个说法，很适合用来解释眼前这种现象。‘他可能是个王八蛋，’罗斯福总统是这样描述一位拉丁美洲的独裁者的，‘但他是我们的王八蛋。’”约翰·克里道出了一种更典型的观点。“我不明白，”他说，“现任总统这么积极地评价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13]，或是将它们描述得那么‘棒’，他想达到的是什么？从美国总统嘴里说出这种话来，这在无论来自哪个政党的总统当中都是史无前例的。”曾经负责管理这些微妙关系的外交官与所有人一样吃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于事外^[14]。

“如果有人认为外交政策越来越军事化，那肯定是我^[15]”，职业外交官克里斯·拉文（Chris LaVine）说。他曾是霍尔布鲁克任内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办公室团队的特别助理之一，削减预算和裁员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参与制定对叙利亚政策的工作。他参加

了一系列以“伊斯兰国”为重点的任务，目睹了两种力量使美国的叙利亚政策陷入混乱。第一种力量来自国务院内部，霍尔布鲁克曾经使用的办公室门上的新招牌并非偶然。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活动已经成为一大漩涡，把国务院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活动卷入其中。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事务特使布雷特·麦格古克（Brett McGurk）已成为国务院大厦中最有权势的官员之一。第二种力量来自外部，国务院已经向军方出让了越来越多的权力。“我们已经向五角大楼、坦帕 和国务院大楼里那些从事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事务的人割让了太多政策领域，”麦格古克说，他指的是五角大楼麾下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中央司令部总部，“外交的坚实根基部分已绝对被割让了，人权关注、经济以及（与土耳其）双边关系等其他政策问题上的进展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牺牲了。[\[16\]](#)”

由于没有外交官主导的集中对话，白宫又在各种半吊子措施中摇摆不定，美国的叙利亚政策基本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制定的，这种情况从奥巴马政府开始，而到了特朗普政府任期仍在持续。这种局面被证明有问题，因为这两个机构各自着手建立的与当地力量的关系之间，彼此分离甚至有时相互冲突。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武装并训练了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 FSA）中由所谓“温和”反叛分子所组成的松散联盟。而五角大楼成立并开始武装的一个联盟名为叙利亚民主力量（Syrian Democratic Forces），却是由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Yekîneyên Parastina Gel, YPG）主导的。

这两种关系被证明都存在问题。叙利亚自由军的武器[\[17\]](#)最终落入支持阵线（Jabhat al-Nusra）之类的恐怖组织手中，而人民保护部队则与被美国贴上恐怖组织标签[\[18\]](#)的革命组织库尔德斯坦工人党（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ê, PKK）有着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关系。“他们用自己的组织名称玩障眼法[\[19\]](#)，”拉文说，“这些家伙跟库尔德斯坦工人党是一回事。”五角大楼与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

之间不受约束的关系也构成进一步的问题：库尔德人是土耳其人的死敌。“因为过于关注消除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直接威胁，我们加剧了土耳其安全部队与库尔德斯坦工人党之间长达35年的冲突，使之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他继续说道。

在被空袭轰炸得只剩下断壁残垣的阿勒颇市，一位名叫阿卜杜拉·艾尔-穆萨（Abdullah Al-Mousa）的叙利亚自由军指挥官更加直言不讳：“美国对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政策未来将造成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内战……美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20\]](#)。”这个非常大的错误已经在当地显而易见：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已经数次交战[\[21\]](#)，所有各方都拥有美国的武器和空中支持。2016年8月一个炎热的夏日星期六，火箭击中了叙利亚北部的两辆土耳其坦克，杀死了一名土耳其士兵，让美国的脆弱联盟网络开始瓦解。根据土耳其国营媒体的报道，土耳其很快就指责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并强力反击，第二天就杀死了25名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士兵，外加20名平民。叙利亚自由军同日宣布占领了10个库尔德村庄。在线播放的视频显示，美国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士兵残酷地暴打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士兵。

一个月后，叙利亚自由军指挥官阿卜杜拉·艾尔-穆萨在阿勒颇外的一个营地中避难，即便他关着窗户，甚至是在深夜，都能听到炮击声。“真是混乱，”他说，“美国支持那些像库尔德组织之类不抗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而只想自己建国的组织，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错误[\[22\]](#)。”不出所料，他认为自己的叙利亚自由军是更适合的伙伴——尽管他也承认自己的首要关注点是与叙利亚政权作战，其次才是在美国要求下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叙利亚自由军律师奥萨马·阿布·扎伊德（Osama Abu Zaid）表示，美国在叙利亚冲突中的存在引发了混乱，其中中央情报局支持叙

利亚自由军，而五角大楼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其库尔德分支机构。

“五角大楼和叙利亚自由军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阿布·扎伊德说。美国各机构之间的分歧导致联合指挥中心和训练中心内部怪象环生，其中五角大楼官员拒绝与靠中央情报局武装起来的叙利亚自由军指挥官交谈。阿布·扎伊德表示，美国人有时似乎还很享受这种紧张关系。“有时在这里的中情局人员还很高兴，因为五角大楼的计划是错误的^[23]。”这就是在战略缺失的前提下，策略留给人的印象：致命的闹剧。

2017年上半年，特朗普政府选择了支持其中的一方，首先重新授权五角大楼支持库尔德人反对土耳其人，然后停止了中央情报局对反叛分子的秘密支持^[24]。五角大楼掌握控制权，有效地将国务院排除在维持与土耳其关系这一任务之外。土耳其是美国在该地区必要但不好相处的盟友，维持与土耳其关系本应是国务院的一项重要任务。拉文表示，从战略角度看，在该地区取代外交的军事代理战争“绝对有害^[25]”。“我一直在做管理土耳其关系的工作，美国如此公开地武装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已经对双边关系构成了竞争和侵蚀。土耳其对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的看法，就好比他们驻扎在得克萨斯州并武装墨西哥的锡那罗亚贩毒集团（Sinaloa Cartel）时，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一样。”它削弱了美国文职部门在一系列问题上与土耳其人对话的努力。“我们不得不在本应解决的双方共同关心问题上克制自己：土耳其的人权问题，与2016年7月政变企图相关的镇压民间社会及大规模清洗问题，以及在与北约盟友之间的双边关系问题上取得进展等，”拉文补充道，“相反，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合作主导了对话，并限制了我们进行外交活动的能力。”

希拉里·克林顿对于她缺席了叙利亚政策制定过程的说法不屑一顾。她支持军方及情报机构中对等官员所主张的进行更强有力干预的立场。“我认为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支持反对巴沙尔·阿萨德

的合法力量^[26]，”她解释说，“我得到了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的支持^[27]。”但在操作层面上，多位官员表示，国务院已经拱手交出了太多权力，以至于来自文职部门的声音基本无法构成制衡——至少那些未能与五角大楼或兰利^[28]的要求同步的声音没有构成制衡。这时“已多数是军方对军方的接触了”，拉文说，“那基本上就是五角大楼与同行进行对话，国务院感觉倒像是外交政策中排位第四或第五重要的机构了”。在作为国务院中枢的“红木走廊”里，另类视角已然不复存在。该建筑中最强力的声音都是“与 执行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运动的指挥官们保持一致，不惜牺牲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长期目标。对于国务院来说，坦诚地抱有与军方不同的政策观点已成为不可能的事^[29]，否则你就可能被排除在讨论之外”。

拉文是“纽约布鲁克林子弟，目睹了‘9·11’，希望为国家效力”。最初他打算在2010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任务结束后就离开国务院，但由于在霍尔布鲁克去世前不久答应了后者会留下来继续战斗，而没有离开。继续在国务院工作了十多年后，拉文在2017年中期的预算削减和解雇潮期间离开了国务院。“很明显，”他说，“在系统性的犹豫不决和无所作为环境下，我们制造了更多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借着外国势力和强人主导，冷战思维正在蔚然中兴。这一过程从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第一天起，已持续近20年。此类对外关系中，一部分是在乔治·W. 布什的领导下，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紧急时刻建立的，但多数在奥巴马政府的执政期间得以延续和拓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奥巴马的非干涉主义——“别干蠢事”外交政策倾向，促使这些策略变本加厉地发挥作用。奥巴马政府希望以“低足迹”干预的外交政策形象见诸历史，其中的核心要素除了无人机之外，还包括与外国军队和民兵组织的联盟。2014年，他在纽约上州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向一千多名身着传统灰色军服的毕业士官生描

述了他对新时代美国全球参与政策的愿景。这一愿景的核心是代理人战争：他一遍又一遍地使用“伙伴”^[30]一词，指的是那些竞标美国支持的外国军队或民间武装力量。为什么派美国的士兵去做也门和巴基斯坦人可以为我們做的工作呢？虽然每一任政府的动机有所变化，但自2001年以来的三位总统全部都加倍执行了这一原则。

然而这些关系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人权及更广泛战略利益领域里的严重妥协，这也正是拉文在美国的叙利亚政策中所目睹的。我们不必推测这些妥协所带来的影响：美国于世界各地冲突中所走过的轨迹，已证明这种趋势是灾难性的。置外交于边缘化，而选择由美国军方与外国军阀进行直接交易，是美国在阿富汗命运走向衰落的核心原因。类似的选择也加剧了新恐怖主义威胁在非洲之角的出笼速度。而围绕强人打造的政策，也让我们在埃及面临革命来袭的时刻束手无策，在之后暴力盛行时无力制止。当然也有例外：少数几个以更加平衡的方式结合了外交利益的珍贵军对军联盟，还有美国在拉丁美洲可卡因“银三角”地区实施干预的案例。

这一前车之鉴看起来也基本没有引起特朗普政府的重视，因为其外交政策已蓄势向以军事为主导的方向倾斜。许多外交官无法逃避地发现，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被军事联盟所取代——包括在阿富汗工作的外交官。对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这种认识是从一个军阀和一起谋杀悬案开始的。

^[1] Author Interview with Rex Tillerson, 4 January 2018.

^[2] Diamond, Jeremy, “How Trump Is Empowering the Military—and Raising Some Eyebrows,” *CNN Politics*, 26 June 2017, www.cnn.com/2017/06/24/politics/trump-pentagon-shift-war-power-military/index.html.

[3] Jaffe, Greg and Ryan, Missy, “Up to 1, 000 More U.S. Troops Could Be Headed to Afghanistan This Spring, ” *Washington Post*, 21 January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up-to-1000-more-us-troops-could-be-headed-to-afghanistan-this-spring/2018/01/21/153930b6-fd1b-11e7-a46b-a3614530bd87_story.html.

[4] Ryan, Missy and Jaffe, Greg, “Military’ s Clout at White House Could Shift U.S. Foreign Policy, ” *Washington Post*, 28 May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military-officers-lead-the-ranks-across-trumps-national-security-council/2017/05/28/5f10c8ca-421d-11e7-8c25-44d09ff5a4a8_story.html?utm_term=.e50c3e38d779.

[5] Wadhams, Nick, “Tillerson Tightens Limits on Filling State Department Jobs, ” *Bloomberg Politics*, 28 June 2017,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6-28/tillerson-puts-tighter-limits-on-filling-state-department-jobs>; author interviews with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1 June 2017 and 30 July 2017.

[6] Mehta, Aaron, “U.S. on Track for Record Foreign Weapon Sales, ” *Defense News*, 26 December 2016, www.defensenews.com/pentagon/2016/12/26/us-on-track-for-record-foreign-weapon-sales/.

[7] Browne, Ryan, “Amid Diplomatic Crisis Pentagon Agrees \$12 Billion Jet Deal with Qatar, ” *CNN Politics*, 14 June 2017, www.cnn.com/2017/06/14/politics/qatar-f35-trump-pentagon/index.html.

[8] Morello, Carol, “State Department Drops Human Rights as Condition for Fighter Jet Sale to Bahrain, ” *Washington Post*, 27 March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state-department-drops-human-rights-as-condition-for-fighter-jet-sale-to-bahrain/2017/03/29/6762d422-1abf-406e-aaff-fbc5a6a2e0ac_story.html?utm_term=.ba9bb8036665.

[9] Lusher, Adam, “Senior U.S. Official Reduced to Very Awkward Silence When Asked about Saudi Arabia’s Attitude to Democracy, ” *Independent* (UK) , 31 May 2017, 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us-politics/stuart-jones-state-department-saudi-arabia-democracy-iran-awkward-embarrassing-agonising-pause-most-a7764961.html.

[10] Conway, Madeline, “Trump: ‘We Are Very Much behind’ Egypt’s el-Sisi, ” *Politico*, 4 April 2017,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7/04/trump-praises-egypt-abdel-fattah-el-sisi-236829>.

[11] Carter, Brandon, “Trump Praised Philippines’ Duterte for ‘Unbelievable Job’ on Drugs: Reports, ” *The Hill*, 23 May 2017, 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334858-trump-praised-philippines-duterte-for-unbelievable-job-on-drugs-report.

[12] Author Interview with James Baker, 22 January 2018.

[13]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 21 November 2017.

[14] Scahill, Jeremy, Emmons, Alex and Grim, Ryan, “Trump Called Rodrigo Duterte to Congratulate Him on His Murderous Drug War: ‘You Are Doing an Amazing Job’ , ” *Intercept*, 23 May 2017, <https://theintercept.com/2017/05/23/trump-called-rodrigo-duterte-to-congratulate-him-on-his-murderous-drug-war-you-are-doing-an-amazing-job/>.

[15] Author Interview with Chris LaVine, 25 June 2017.

[16] Author Interview with Chris LaVine, 25 June 2017.

[17] “U.S.-Trained Syrian Rebels Gave Equipment to Nusra: U.S. Military, ” Reuters, 26 September 2015, 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usa-equipment-idUSKCN0RP2H020150926.

[18]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Career Officer, 25 June 2017.

[19] Author Interview with Chris LaVine, 25 June 2017.

[20] Author Interview with Abdullah Al-Mousa, 12 September 2016.

[21] Gilbert, Benjamin, “Three U.S. Allies Are Now Fighting Each Other in Northern Syria, ” *Vice News*, 29 August 2016, <https://news.vice.com/article/three-us-allies-are-now-fighting-each-other-in-northern-syria> and Bulos, Nabih, Hennigan, W. J. and Bennett, Brian, “In Syria, Militias Armed by the Pentagon Fight Those Armed by the CIA, ” *Los Angeles Times*, 27 March 2016, www.latimes.com/world/middleeast/la-fg-cia-pentagon-isis-20160327-story.html.

[22] Author Interview with Abdullah Al-Mousa, 12 September 2016.

[23] Author Interview with Osama Abu Zaid, 12 September 2016.

[24] “Trump to Send Arms to Kurdish YPG in Syria, ” Al Jazeera, 10 May 2017, www.aljazeera.com/news/2017/05/trump-send-arms-kurdish-ypg-syria-170509190404689.html and Jaffe, Greg and Entous, Adam, “Trump Ends Covert C.I.A. Program to Arm Anti-Assad Rebels in Syria, a Move Sought by Moscow, ” *Washington Post*, 19 July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trump-ends-covert-cia-program-to-arm-anti-assad-rebels-in-syria-a-move-sought-by-moscow/2017/07/19/b6821a62-6beb-11e7-96ab-5f38140b38cc_story.html?utm_term=.ade66898dd5e.

[25] Author Interview with Chris LaVine, 25 June 2017.

[26] Author Interview with Hillary Clinton, 20 November 2017.

[27] Author Interview with Hillary Clinton, 20 November 2017.

[28] 兰利（Langley）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郡，是中央情报局的所在地，常指代中情局。——译者注

[29] Author Interview with Chris LaVine, 25 June 2017.

[30] “Full Transcript of President Obama’ s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West Point, ” *Washington Post*, 28 May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full-text-of-president-obamas-commencement-address-at-west-point/2014/05/28/cfbcdcaa-e670-11e3-afc6-a1dd9407abcf_story.html.

18 杜斯塔姆：他说真话并劝阻一切谎言

这是个坟场，看到之前，老远就能“闻到”。珍妮弗·利宁（Jennifer Leaning）把她旅行时总带着的黑蓝红三色针织围巾在脖子上裹紧。她穿着的黑色土拨鼠（Marmot）外套对她来说太大了，隐藏了她的瘦削身材，让她从远处看起来会被人误以为是个男子；也算是执行危险任务时的小小安全保障。她还带了一顶帽子，但是她把它给了当地的翻译。他还是个孩子，可能也就18岁，而且有点战战兢兢——部分是因为天冷，部分是因为他对两人要去的地方很恐惧。时间正是中午，天气并没有冷到阿富汗在1月时可以达到的滴水成冰的地步，但风已经刮了起来。一股恶臭源源袭来：身为医生，经历了从科索沃到索马里的地区冲突后，这种死亡垃圾的味道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利宁的意识中。这味道没有具体的来源方向，好像是大地腐烂了。灰茫茫的天空下，利宁显得更加瘦小，她有种光天化日之下的暴露感。这里的沙漠平坦而一望无际，无处藏身。她向前走着，小心翼翼，知道地里可能埋着地雷。场景明白无误：一望无际的沙漠中，新翻起的土堆分外醒目，颜色深且潮湿，其中纵横交错着重型车的轮胎印。翻起的土中还星星点点地夹杂着许多奇怪的东西：一簇簇的黑色、白色和欢快的红色。利宁过了片刻才意识到它们都是什么：头巾、衣服，以及中间夹杂着的人字拖鞋和念珠。她停了下来，感觉浑身发冷：

“有头骨碎片，有肋骨，人的骨头。”^[1]在她身边的另一位调查员约翰·赫弗南（John Heffernan）拍下了一张照片。

这是2002年初，地点在阿富汗偏远的北部。国际监督组织医生促进人权协会（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2]派遣利宁和赫弗南来调查新反恐战争中囚犯的待遇情况。结果他们无意中发现了另外一个更深层、更危险的秘密，其内幕在随后的十多年里始终备受指责，被送上全球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的办公桌，成为他们关注的要事，并让

连续两任政府都试图掩盖。调查人员在脚下看到的正是最早的实例之一，它展示了“9·11”后由军人和间谍，而非外交官主导的外交政策所付出的代价。这个无名坟场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与军阀间关系的产物，这些关系填充了外交官被迫靠边站所造成的空白。其后果不仅仅是人权问题：在阿富汗，美国对省级暴君的支持还将重塑这个国家，为导致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战争创造了条件。

两位调查员动手测量坟场规模时，并不知道这些。训练有素的战争罪专家们懂得不能远距离目测尸体数量，但很显然这是个大坟场：尸体挨着尸体，蔓延了足有美式橄榄球场大小的面积。赫弗南拍照的当口，李宁拿出了笔记本。她带着的是中学生们喜欢用的一种黑白大理石纹路封面的笔记本，硬壳外皮方便在野外时直接以膝盖支撑做记录，而她杂乱的笔迹也能装进比较宽的格子里。她没有太多时间做笔记，他们也就刚到了那里10分钟的时间，就看到地平线上腾起尘烟，并从中驶出黑色的车辆。李宁隔着老远猜测，大概是四五辆带篷吉普，或者丰田兰德酷路泽，它们正朝着调查员们的方向疾驰而来。

李宁和赫弗南急忙跑回自己那辆饱经风霜的丰田车。翻译脸都吓灰了。他们的司机，一个50多岁头发花白的男子，已经发动了汽车；他也很怕沙漠的这一部分——来这里的路上他一直紧张地不断瞄后视镜，扫视身后的地平线。现在，被那些吉普车在背后追着，司机拼命地踩着油门，越过半英里荒芜的沙漠，回到省会城市希比尔甘

（Sheberghan）。这时吉普车仍然追赶着调查员们，于是他们没有停顿，一直到把希比尔甘甩在身后，继续向东，朝更大的区域中心城市马扎里沙里夫（Mazar-i-Sharif）飞奔。一路上，李宁和赫弗南一直紧张地坐着，一言不发。车里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能刚刚躲过了一发或几发子弹。

这座坟场位于军阀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将军麾下要塞的视线范围内。这位骑马舞剑的乌兹别克勇士是阿富汗现代历史上最令人恐惧，因此被神话化了的军阀之一，他在冷战时期曾是所有各方的盟友，后来又背叛了每一方。在“9·11”袭击事件后的几个月里，他是美国在阿富汗新战略的核心。倚仗美国人的武装和特种部队的庇护，杜斯塔姆的骑兵战斗部队推翻了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的所有据点。医生促进人权协会调查员们追踪的囚犯就是在战斗中向杜斯塔姆投降的，而追击调查员的吉普车也是从杜斯塔姆要塞的大门里开出来的。

14年后，我站到了杜斯塔姆将军的殿堂上，盯着他的驯鹿，尽量不表现得太惊讶。驯鹿似乎为自己为什么在那里感到困惑，而我一定看起来在为那里怎么会有驯鹿而感觉困惑。可它就在那里，至少重200磅，断了一只角，扭动着想摆脱箍在它脸上的绳子。我走开了，以免被鹿角刺穿。在一名侍从努力抓住绳子另一头的当口，杜斯塔姆像范娜·怀特（Vanna White）颁发“幸运轮盘”^[3]奖品时一样，双手指向驯鹿。他笑着看看驯鹿，然后看着我——幅度很是“慷慨”，直接传递了“看，我带来了驯鹿”信息的笑容，仿佛这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接受采访的方式。我抿起嘴片刻，他在等待回应。“这是头美丽的动物，将军”，我说。在军阀的殿堂上，你说话得字斟句酌，特别是当其两侧侍卫胸前都挎着M4卡宾枪的时候。更何况还有鹿角。

这是2016年8月，杜斯塔姆将军已从反美军阀变成了美国代理战士，又成为阿富汗副总统。他是美国外交政策军事化的鲜活体现：一个军阀，靠着与美国人合作的背景，已经在自己国家里由美国人建立的新权力结构中蹿升到了最高层。2016年那天晚上，我们见面的地点是喀布尔的副总统府，风格像是007电影中反派人物巢穴与李伯拉斯^[4]更衣室的混搭。杜斯塔姆在整个府邸里都用活的草坪铺地，而且从我见到的情景看，任何可能放置植物的地方，他都给摆上了植物。数

以百计的树和灌木装在并不匹配的陶土花盆里，挤满了整个府邸，每个枝杈上都装饰着大串的圣诞树灯饰，仿佛有人把家得宝（Home Depot）的某处货架直接清空搬了过来一般。有大的灯泡依次闪烁，也有假冰柱亮起来像滴水一样；还有，到处都是动辄好几米长的绳状彩虹灯。你必须推开树叶和彩灯，才能穿行到中间可以就座的区域，那是一个离地并不太高的平台，上边摆着并不匹配的成套藤制露台椅和人造革La-Z-Boy躺椅。路易十四风格的茶几上摆着插了假花的花瓶和古典风格的骑兵小雕像。一个柳条笼里，一只肥硕的石鸡咕噜咕噜地悲伤叫着。当然还有一个装满鲨鱼的巨型鱼缸。军阀范儿的时尚。

这里是一位记者对杜斯塔姆将军的描述：“身高超过6英尺，肱二头肌鼓胀^[5]……一个熊一样的大汉，笑起来低沉粗暴，那声音让一些乌兹别克人发誓说有时能吓死人。”[这位名叫拉希德·艾哈迈德（Rashid Ahmed）的记者称，在他造访杜斯塔姆位于阿富汗北部的据点之前不久，杜斯塔姆把一名因偷窃被抓到的士兵绑在俄罗斯坦克的履带上，然后开着坦克兜圈跑，直到那名士兵的身体被碾成了肉酱^[6]。后来杜斯塔姆否认了这一指控。]但是杜斯塔姆也是位动物爱好者，这一点他经常提醒我。“人们拿来一些鸟或者羊，或一些动物用来屠宰、吃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请把它带走，带走吧。我不想杀死这只鸟、这只羊，或者这只山羊……’”他说，明显地被感动了。杜斯塔姆将军不是像你我这样可能是爱猫或爱狗人士的动物爱好者，他是个只有高权势的乌兹别克军阀才可能成为的动物爱好者，拥有一个养着数百只鹿、马和猎鸟的动物园。在我和他一起度过的每一天中，他都至少有一次提到一匹马或一只鹿受伤，他的眼睛也会盈满泪水，他的下唇会向外突，好像一个刚被告知家里的仓鼠去了极乐世界的孩子一样。

“我是绝少答应接受记者采访的”，杜斯塔姆将军用乌兹别克语，通过一位勉力而为的顾问兼翻译说。乌兹别克语中很多词都是从

喉咙的后端发出的，而杜斯塔姆的发音尤其低沉而嘶哑。他说话时语音懒散，发音略显含糊且带着拖腔，听起来像是半速播放的磁带录音。“我有朋友说要接受采访，但到目前为止，我从未答应过”，他继续说道。他对媒体发表评论，仅限于很少见地通过电话提供过引语。能与他坐下来谈的只有学者和冒险家，这些人用溢美的颂词记录他的传奇故事。“你是来自友好国家的一个不错的家伙^[7]，因此我同意今天在这里接待你”，杜斯塔姆说，他用眼睛对我上下扫了一遍，有些怀疑地打量着我。

但是我来的目的并不是讲述杜斯塔姆将军的故事，或者至少不是像将军看起来笃定相信我会做的那样讲述他的故事。我造访杜斯塔姆位于喀布尔的这座以草坪铺地的宫殿，是为了就地平线尽头一座无名坟场而向他提问。

杜斯塔姆最初名叫阿卜杜勒·拉希德（Abdul Rashid），是全家9个孩子中的一个，出生在阿富汗朱兹詹省（Jowzjan）沙漠平原中的一个乌兹别克农民家庭。假名“杜斯塔姆”在乌兹别克语中意思是“我的朋友”^[8]，是他作为军事指挥官掌握大权时才开始使用的。他家有座简陋的土坯房：三个房间，泥土地面，没有电。在阿富汗北部的荒芜地区中，生存是一项壮举，而杜斯塔姆显示出了特别的韧性。他声称自己还是婴儿时，曾被冰雪融化后形成的一股洪水冲走，因为抱住了一根树枝而活了下来，一个人泡在冰水中；最终一位村民发现了他伸到浪头以上的小手，把他拉了出来。“这是什么？！”杜斯塔姆夸张地学着救援人员的口吻说道，“哦，是只婴儿的手！”^[9]村民把他抱到附近的一座清真寺，倒挂在泥巴墙上，直到他肚子里的水都倒了出来，恢复了知觉。

杜斯塔姆童年时代的其他传说则讲述了他另外一种本性：他随时表现出来的暴力禀赋是从校园斗殴开始的。“我总是和其他孩子打

架，”他承认道，“直到如今，我仍然是同一个人。”他停顿了一下，接下来有片刻时间，口气听起来有点懊悔：“不过，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先发攻击过任何人，都是别人攻击我时，我出手自卫。”

从那个时候起，他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布兹卡兹，也就是抢羊比赛。这是中亚地区的一种古老运动项目，由15名骑手争夺一只挂在场一端竖杆上的无头死山羊，然后想方设法控制住山羊，并把它带到场地另一端画在地上的圆圈里。抢羊比赛是出了名的暴力且混乱，参赛骑手之间极尽鞭抽、拳打甚至踩踏之能事，受惊的马匹也狂奔嘶吼不休。裁判员为了让吵闹的参赛骑手守规则而带着步枪上场^[10]，一点都不少见。抢羊比赛需要“强壮的马配强壮的人”，杜斯塔姆解释说。另外，他说：“我喜欢马，对马有着美好的回忆。”他的眼睛再次湿润了。我说他必须教我玩，他拒绝评估我的潜在竞争力。他那种怀疑地扫我一眼的表情可不是好兆头（正如彼得雷乌斯一样，杜斯塔姆正确地推测出了我的运动能力）。但是他邀请我去希比尔甘观看比赛。他很沉重地警告说，他的团队已成长到有时能胜过他的地步。杜斯塔姆在鼎盛时期是战无不胜的^[11]。

杜斯塔姆还短暂地做过炼油厂工人、水管工和摔跤手，不过战争才是他真正的专长。他少年时被征召入伍，然后一路升迁，毫不费力地掌握了祖先传下来的低技术含量的骑兵战斗技巧。后来，他加入了阿富汗军队，与他们和苏联人保持一致，即便在反苏的圣战者占据优势的时候也依然如此。

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反苏联的力量获得了美国大量的资金及武器供给。罗纳德·里根称他们为“自由战士”，而他们也因为美国人对红色恐怖的畏惧而成名得宠。乔安·赫林（Joanne Herring）是当时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社交名媛，那种永远粘着假睫毛^[12]、头发梳得老高、张嘴《圣经》典故不断的女子，还撺掇她当时的情人、声名不

佳且酗酒的联邦众议员查理·威尔逊（Charlie Wilson）在国会山提案支持这些“自由战士”。支持圣战者热潮的高峰期内，国会向中亚地区圣战者拨款的额度已超越中央情报局想要的水平^[13]。许多反苏圣战者是激进强硬派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个特征，而不是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甚至委托人将《古兰经》翻译成当地语言，并付钱让人成千份地分发到苏联人防线的后方。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米尔特·比尔登作为中间人安排了部分与圣战者的合作关系，多年后他仍为这种想法进行辩护。“我们要明确一件事：温和派从未赢过任何东西，”他对我说道，“温和派，赢不了战争。”中央情报局更关注小规模战术挑战。“你必须把事情做得‘防巴（巴基斯坦）佬儿’，”比尔登回忆起当时他们向圣战者分发一种设备时的情形，“也就是让他无法把粉色的电线接到绿色的电路上，再把电路拧死，然后轰的一声把他自己给炸飞了！”他雷鸣般地大笑起来，“有几个家伙真被炸飞了，但他们可不是自杀”。^[14]无论如何，不是那时候发生的。

这段历史在“9·11”恐怖袭击后不可思议地重演了，这时的美国再次选择依靠敌人的敌人来扭转局面。就连乔安·赫林都再次出现，带着一身的香水和发胶味，在我还在国务院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闯了进来。这时的她已年届80，神情紧绷，举止扭捏，依旧要“挽救”阿富汗，这一次是要为她经营的一个发展组织联盟募款数百万美元。这些组织也被称为“马歇尔计划慈善机构”。她拉着我的手，称我是“上天的馈赠”；她还在开会前让南亚和中亚局的外交官们拉起手来，一同祷告。她闭着眼睛，对主和她希望得到的指挥官应急计划基金，发出一番慷慨激昂的祈祷。在她离开后，霍尔布鲁克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用不适合在这里重复的带颜色的语言称谓了她。我就赫林所起到的扶持圣战者作用而向她提问时，赫林变得有些恼火，称提供给圣战者武装力量的毒刺（Stinger）导弹保质期有限，而她做的也仅限于此了。

好莱坞电影《查理·威尔逊的战争》^[15]讲述的是赫林和威尔逊努力为阿富汗反苏联圣战者集结支持援助的故事。阿伦·索金为这部电影所创作的原始剧本中，结尾是五角大楼在“9·11”恐怖袭击中被击中冒烟的镜头。有报道称，赫林动用律师施加了高压^[16]，直到剧本结尾得以修改。不过影片最后依旧以谨慎的基调收尾：随着苏联人撤出阿富汗，而威尔逊开始庆功，中央情报局特工古斯特·埃弗雷克托斯（Gust Avrakotos）讲述了一个禅宗大师的故事。大师看到一个男孩获赠了一匹马，他所在的整个村子都在欢庆这一祝福。“等着瞧吧”，禅师说。男孩从马上摔下来并摔断了腿后，村民们宣称这匹马是克星；这时禅宗大师只是又说了一句“我们等着瞧吧”。后来，战争爆发，男孩因为腿伤而免受征兵，整个村子又再度将那匹马当作上天的馈赠来庆祝。“等着瞧吧”，禅宗师父再次说。影片中威尔逊在消化这些暗示的同时，观众则听到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

杜斯塔姆并不激进，但是到了冷战结束时，他已经证明自己在其他方面是危险人物。他的信仰就是生存，并通过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背叛和欺骗确保了这一点。即使是在亲苏联的军队中指挥最强大部门的那些年里，他仍然与战场上对立方的圣战者指挥官们保持着联系，并公开考虑改弦更张投靠对方阵营^[17]。实用主义得到了回报——随着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逐步削弱，圣战者中美国最青睐的子弟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ed Shah Massoud）向杜斯塔姆传话说，苏联当局感受到了杜斯塔姆威信日益提高所带来的威胁，打算强迫他出局。杜斯塔姆在莫斯科背叛他之前，先背叛了莫斯科，带着麾下4万名将士归顺了多年来一直在战场上处于敌对方的伊斯兰教圣战者阵营。这一动作后来被证明对打破力量平衡^[18]，最终迫使苏联人撤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苏联撤军后，前自由战士们进驻了喀布尔，并血洗了这座城市。杜斯塔姆首当其冲——据报道，他的民兵武装正是实施大规模烧杀抢

掠^[19]的罪魁祸首。但是新政府初具雏形时，他发现自己被晾在了一边。部长职位一个个地给了其他指挥官，杜斯塔姆退居到了他在北方的领地；然而塔利班的侵犯又使他在北部的权力消失殆尽。他的副手在1997年背叛他并投靠塔利班时，他逃离阿富汗，跑到了土耳其。然而，到了2001年初，杜斯塔姆又回来了，纠集起残破的部队对抗塔利班。他很快就成为美国解决阿富汗最新问题的权宜之计。

“9·11”之后美国在该地区的选择有限，以及由此产生的武装杜斯塔姆及其同盟军阀的决定，都是外交真空的直接后果。出于由意识形态阻力、惯性和疏忽大意等因素构成的组合原因，多年来没有人寻求与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而正是这一中世纪的塔利班政权为本·拉登提供了庇护。美国官员确实在20世纪90年代里与塔利班进行了数次会晤^[20]，但所有人都要么敷衍了事，要么就只专注于希望塔利班交出本·拉登的狭隘要求。尽管罗宾·拉斐尔之类支持对话的人也进行了呼吁倡导，但这些会议从未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谈判。2001年初，随着该地区的威胁变得更加严峻，美国切实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措施，对塔利班实施了武器禁运和资产冻结^[21]。但这些都是大棒，没有胡萝卜。制裁并不是为了把塔利班带上谈判桌，而是为了击破一个残暴的政权。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联合国短暂地推动了有希望的更广泛区域对话。来自阿尔及利亚的联合国派驻阿富汗特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与塔利班的二把手毛拉·穆罕默德·拉巴尼（Mullah Mohammed Rabbani）保持着民事联系，对于塔利班越来越依赖“基地”组织以及与奥萨马·本·拉登的关系越来越深^[22]的情况，毛拉持怀疑态度。塔利班一名官员甚至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美国、俄罗斯及阿富汗六个地区内邻国之间就和平解决阿富汗内战问题^[23]，于1999年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会谈。但是，这些努力很快就被美国选择在该地区与巴基斯坦军事结盟抵消了。就在上述国家在塔什干同意

停止为阿富汗冲突各方提供武器的几天后，巴基斯坦与塔利班联手[\[24\]](#)发动了针对反对势力的重大军事攻势。

“9·11”恐怖袭击之后，谈判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机会都或者遭驳回，或者被破坏了。杜斯塔姆将军与美国人合作包围了塔利班据点昆都士后，有一个为期三天的谈判过程，参与者包括杜斯塔姆以及十几名美国特种部队官员和情报人员。和平投降的塔利班人员都获得了慷慨的处理：除了美国人挑选出来的高情报价值目标外，只要放下武器，他们就都可以安全返回自己的村庄。作为交换，杜斯塔姆承诺对两位塔利班将军——穆罕默德·法兹勒（Mohammad Fazl）和努鲁拉·努里（Nurullah Nuri）施以大赦，并做出了公开宣布，以作为未来更广泛和解的信号。但这两名指挥官很快就进了关塔那摩湾

（Guantánamo Bay）。多年来，对于那些观察阿富汗陷入混乱过程的人来说，这一直都是一个令人困惑和错愕的话题。“法兹勒和努里在你这一边，你承诺给他们大赦，然后他们最终都进了关塔那摩。”我开始向杜斯塔姆提问。他哼了一声。“问简短点儿[\[25\]](#)，我感觉不舒服。”

“美国人是否施压让你把人交给他们？”我追问道。

杜斯塔姆大笑起来。“我没有把他们交给美军。但他们也没有强行把他们带走。他们来带人，然后我告诉他们，‘听着，他们是塔利班，他们是穆斯林，我也是穆斯林，你们不是穆斯林。如果我交出他们，如果我把他们交给你们，我会受到谴责：（杜斯塔姆将军是穆斯林，但是他把塔利班交给了美国人）……’这会损害我的信誉……小布什正在电视上谈论如何对待囚犯……”杜斯塔姆说，他所指的是小布什总统早期做出的关于尊重《日内瓦公约》的评论。“然后军方的人来了，说‘听着，我们必须执行命令，我不在乎小布什说什么。如果我要带走他们，我就会带走他们’。”杜斯塔姆耸了耸肩，膝盖摆

来摆去的，显得不安。“我说‘好吧，你要什么就是什么^[26]’。”在阿富汗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同样的情势也曾反复出现，包括在坎大哈，哈米德·卡尔扎伊尝试和解的努力，被一听到与塔利班打交道就生气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一口回绝。

在刚刚发生过恐怖袭击的情况下，美国回避与塔利班谈判，而愿意采取军事行动，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建议以外交而非军事手段对付为“9·11”恐怖袭击肇事者提供庇护的政权，这在政治上形同在全美的公立学校系统提倡自相残杀教育。然而这种军事反击直到塔利班在战场上土崩瓦解之后很久，都依然在持续。从来没有过将军事成果纳入更大战略背景考虑的通盘努力，多年来，甚至没有承认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的政治空间：完全打败和消灭塔利班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和平只能通过外交来实现。

相反，在恐怖分子驾驶劫持来的飞机撞入美国权力中心及国民意识之后的几周里，关于如何反应的争论几乎完全是在军方和情报界内展开的。有些人，比如当时中央情报局伊斯兰堡站的站长，希望继续完全通过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联盟工作，利用巴基斯坦人向美方多年来一直支持的塔利班政权施加压力，逼迫后者交出奥萨马·本·拉登。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里的其他人则提出更简单的建议：向任何可以打击塔利班的人提供美国军火。还没有任何横跨整个美国政府的连贯性政策得以制定出来之前，持后一派想法者已开始悄悄地执行自己的提案了。而“任何能够打击塔利班的人”则意味着那些属于北方联盟的军阀和强盗^[27]。

曾长期力主与塔利班进行谈判的罗宾·拉斐尔对这一选择感到绝望。“我们不需要（与塔利班）作战……他们意识到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拥有的实力。他们想回家。可我们就理解不了这一点……我们是强

硬派，对吗？”她翻了个白眼，“我们和北方联盟一道骑着驴子进了场……这实在是无稽之谈^[28]。对不起，但确实如此”。

2001年12月，联合国并非全力以赴地主导了一次建立阿富汗新政府的努力，最终的成果就是在德国的波恩举行了会谈。作为被征服的政党，以及任何可持续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塔利班却缺席了会谈。主导会议的反而是美国人在最初的军事攻势中选择依赖的北方联盟武装力量。对于推动对话的外交官来说，这是根本性的失败。“我从一开始就说过，他们”——塔利班——“应该参加波恩会谈，”拉斐尔后来对我表示，“这是我们最大的错误^[29]。”作为联合国团队一员，参与组织了波恩会谈的巴内特·鲁宾经常告诉我，将塔利班排除在会谈之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恩协议》^[30]确实使阿富汗政府以及政治情势更具有包容性，但它无法克服美国已决计排斥塔利班的反恐政策，”鲁宾后来写道。他在霍尔布鲁克于国务院办公厅工作期间，座位离我很近。

会谈结束后，塔利班领导人甚至立即主动联系新任阿富汗临时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提出以停战换取特赦的动议。然而这一提议立即被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美国人推翻了。向阿富汗新中央政府发誓效忠并返回自己家乡的塔利班领导人被追剿和俘获，常常是经北方联盟军之手。

这些新步兵给美国的反恐战争添加了一道令人不快的流氓景观。做过奥萨马·本·拉登导师的阿卜杜勒·萨亚夫（Abdul Sayyaf）曾帮助建立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训练营。这些营地成为现代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基石，并且是冷战结束后争夺阿富汗政权期间，发动对什叶派（Shiite）哈扎拉人（Hazaras）血腥屠杀的大本营。布尔汉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的武装力量与萨亚夫的队伍合作，被指控在围困喀布尔期间屠杀老弱妇孺^[31]，甚至狗。“9·11”恐袭发生

后的几个月里，穆罕默德·莫哈奇克（Mohammad Mohaqiq）及其手下的人员涉嫌谋杀、强奸和大规模抢劫。其手下民兵的标志性恶行是：绑架年轻女孩并强迫她们成婚^[32]。同一时期内，阿塔·穆罕默德·努尔（Atta Mohammed Noor）手下的民兵^[33]则是一波专门针对普什图人（Pushtuns）的掠夺和强奸行动的主谋。当然，还有与阿塔之间发生了无数小规模血腥冲突的竞争对手：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

杜斯塔姆何时以及如何开始与美国人合作的，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中央情报局官员汉克·克兰普顿（Hank Crumpton）作为新成立的中情局特别活动部门负责人，监督了9月11日恐袭后的最初反应。他后来告诉我，中情局在“9·11”前就开始与军阀们建立关系^[34]，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主要通过一位能讲一口流利乌兹别克语、名叫戴夫·泰森（Dave Tyson）的特工操作。杜斯塔姆坚持认为，与泰森只是在袭击发生后才取得联系的。没有争议的是中央情报局的团队来了，然后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第五特种作战群的一个绿扁帽部队，代号“595”。这是个奇怪的联盟。“尘埃算是落定了吧，然后尘埃里出来了沙人，”军士长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回忆说，“你看到拿着AK步枪的男子穿得跟你的敌人一样，然后你必须走到他身边，基本上问候他‘嘿，你咋样？’^[35]而且你不知道他是会伸出手来还是会对你射击。”这些“沙人”中的一个就是杜斯塔姆将军。“杜斯塔姆将军和他先进的安全护卫部队骑着马来了，”上尉马克·努奇（Mark Nutsch）说，“他从马上跳下来，然后——”

“天啊，那马还在跑呢^[36]，他就跳了下来！他就像‘嘿……’”一级准尉鲍勃·彭宁顿（Bob Pennington）插进话来，做出了一个很广大的手势。

“杜斯塔姆将军同意带我的队员和我到他的前沿指挥所去，”努奇继续说，“所以我们会在执行战斗任务时第一次骑马。”

一名负责协调用洛克希德AC-130空中炮艇机（AC-130 Gunships）实施空中打击行动的美国空军空管员几天后才加入，他要求只披露自己的名字巴特（Bart），不透露姓氏。他表示感觉就像坐上了时光机。“你就像……‘我在哪一年？！’你刚刚下了21世纪的直升机，那上边有着精密的航空电子设备和其他一切，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回到过去了^[37]。”巴特和其他美国人骑马，给养由阿富汗人绑在驴背上驮着随行。路上他们睡在一连串冰冻刺骨的山洞里，四处漆黑，远离任何城市的灯光，只有蜡烛和手电筒的一点光亮。“当你骑着马穿山越岭时，星星感觉就在你面前一样，”巴特继续说道，“你骑马走入星河，真是很不同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他记住了杜斯塔姆的高度，无论是按字面理解的身材高度，还是他所拥有的威望。“呃，他是男子汉，”他告诉我，“他是真正的领袖……那些北方联盟的人会给他搭帐篷，在里边他能睡上靠垫床……他们用驴子驮着床随他走……他能躺得很舒服。我们可是躺在沟里^[38]。”

美国人空投来物资，其中最主要的是数以百计的枪支，不是美国人携带的那些先进武器，而是老化了的俄罗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现金到了，但杜斯塔姆嗤之以鼻，因为比他需要的少。他最生气的时候，是美国人为他的马空投来了饲料，可发现袋子里边装的却是谷糠。理论上这些糠是可以喂食牲畜的，可他的马连碰都不碰。“美国是如此伟大的国家^[39]，”杜斯塔姆笑着说道，“这么棒的人民，但让他们给点钱，怎么就这么难呢？”

与军阀合作还产生了更多间接的挑战。巴特和其他美国人轮流放哨，确保他们自己总能保持自我防卫。兰利这边也有些头疼事。“大卫（泰森，中央情报局特工）与杜斯塔姆在一起，但我们还有阿塔

（·穆罕默德·努尔）呢，我们遇到的挑战之一就是防止这些家伙互相残杀，”汉克·克兰普顿疲惫地承认道，“这些家伙都是武夫，在这个星球上最糟糕的地方之一，他们一直在杀人。”尽管如此，大多数美国人对杜斯塔姆产生了好感。“他有种近乎孩子般的魅力，”克兰普顿谈到杜斯塔姆时说，“很有幽默感，之下掩盖着的，我知道是非常无情的能力。但老实说我很享受与他的谈话。”克兰普顿表示，大多数情况下，他自己“对与他的伙伴关系、他的领导才能以及他和阿塔以及其他人在战场上取得的战绩”^[40]心存感激。

他们在战场上取得的成绩，从近期和战术角度衡量，可谓巨大的成功。轰炸从10月开始，在11月期间，北方联盟军阀一路击溃塔利班，先是在阿富汗北部的马扎里沙里夫，然后是喀布尔，接着是东北部的昆都士^[41]。塔利班最终在昆都士被围困了12天之后投降。每次成功都会有更多的战俘。这些战斗人员中，有些是从巴基斯坦和海湾国家前来投奔奥萨马·本·拉登的久经沙场的战斗人员。但其他更多的是普通的阿富汗男子和男孩，他们作为步兵为之卖命的政权抱着中世纪的价值观，但对于自己的保护对象——沙特富家子弟为之狂热的全球圣战，其实兴趣无几。11月下旬，杜斯塔姆将军以及努奇所在的美军部队拿下了昆都士，这是有数千名武装力量镇守的塔利班最后的一个堡垒。根据美军的一项统计，多达3500人和平投降^[42]，有传言称囚犯总数是这一数字的两倍^[43]。

被俘的塔利班人员被拆成不同的组，其中一部分人，根据空军控制员巴特的说法，被带到一个秘密地点，即“另一个我不能谈论的地方”^[44]；绝大多数由杜斯塔姆的部队带着向西走；有一些人从昆都士外沙漠中的投降地点，被直接送到位于杜斯塔姆驻希比尔甘总部的监狱；其他人则被送往另一座监狱，一座名为恰拉疆基（Qala-i-Jangi）的19世纪堡垒，在那里接受美国人的审讯。恰拉疆基堡垒高耸的土墙城垛已经俯瞰过几个世纪以来有占领军——从英国到苏联——

参与的冲突，此时它又将成为美国新反恐战争中第一例美国人伤亡的产生地。

堡垒里的囚犯反抗了，发动了一场壮观的暴动，制服了审讯他们的美国人，并杀死了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45]迈克·斯潘（Mike Spann）。随后是为期三天的血腥围城。暴动发生时人在昆都士的杜斯塔姆与马克·努奇以及595分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回到恰拉疆基堡垒，看到的是世界末日般的场景，到处是扭曲的金属和撕碎的躯体。“那些尸首……^[46]”杜斯塔姆摇着头回忆道，“他们无法辨认出谁是我的士兵，谁是“基地”组织人员，谁是塔利班战斗人员。”美国人和北方联盟的士兵都被死了这么多人震惊了，也对塔利班囚犯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感。“我哭我那些马”，杜斯塔姆接着说，声音沙哑了。后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发现其中一匹马还活着，“我简直高兴得哭了……我命令我的人立刻把它送到医院接受治疗”。他给这匹马起名为“青蓝”，最终在战斗中还自己骑着它。对于美国人来说，新反恐战争出现了首例美国人伤亡，也让人“非常痛苦地意识到，我们为在当地只有很少人员的情况下快速地行动，付出了代价^[47]”，中央情报局官员克兰普顿说，“这一事件也同时提出了谁该对战俘负责的问题”。这个问题几乎马上就受到了考验，因为杜斯塔姆的人将恰拉疆基堡垒的幸存者装上卡车，再度运往西边，与希比尔甘的其他囚犯关押到一起。

到2002年1月，关于这些被囚者命运的问题已越过阿富汗边境，开始成为引起国际关注的新闻。珍妮弗·利宁和约翰·赫弗南于那个月到达阿富汗时，即使是红十字会，看起来也开始发出警告了。为了保持中立和对需要帮助的囚犯的探视权，红十字会通常对任何所见所闻都守口如瓶。“去北边。”一位驻喀布尔的红十字会律师敦促他们。利宁向她追问：“你的意思是来自昆都士的囚犯^[48]？”律师点点头。“这就是我们得到的全部信息，但这已经足够了”，赫弗南回忆

道。调查人员找到了监狱，那是个低矮的堡垒，黏土砖墙上刷着已显得斑驳陆离的白漆，窗户上装着业已生锈的加固用金属条杠。到二人到来时为止，这里是从不欢迎国际访客的。根据李宁和赫弗南听到的多个说法，之前红十字会希望进入这座监狱的努力遭到两名美国军官的阻止^[49]。但是李宁和赫弗南设法与一名看守建立了不错的关系^[50]，后者对自己在监狱饱经风霜的大墙内所看到的一切深感不安，于是悄悄地放他们进了监狱里。

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耳闻的传言得到了证实。通过巴基斯坦人翻译，囚犯们讲述了饥饿、过度拥挤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的痛苦事例。他们祈求获得食物、水和医疗照顾。然而李宁和赫弗南还注意到了另外的情况：数字对不上号。“希比尔甘监狱关押的人数，并不是我们听到的在昆都士被俘的人数，”李宁告诉我，“应该有最多七八千人被俘，我们看到的大概有3000人在押。问题是‘其余的人到哪里去了？’^[51]”正是这个问题驱使调查人员第二天前往大士特雷利（Dasht-i-Leili）沙漠，找到了或许数以千计的那些尸体。

失踪的囚犯遭遇了什么？这些男子和男孩又是怎么到了这样的地方，进了这样的坟场？还有，一个美国政府内部十多年来都没有人想要触及的问题：土被翻起、坟场被一具接一具的尸体填满的过程中，在当地执行任务的美国人知道什么，又看到了什么？我们与杜斯塔姆达成了协议，以换取他们可以为我们的领土，换取他让我们共同的敌人喋血。那么代价是什么？与他握手时，我们放弃的是什么？所有关于更少足迹和伙伴力量的讨论，与从泥土中伸出来的一个股骨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这都是美国国家安全敏感性联盟中所常见的道德窘惑。但是，就像沙漠中的气味一样，它们在这里变得非常难以忽略。

调查人员在沙漠中发现坟场后的几年里，与军阀的联盟重新塑造了阿富汗。由美国人武装起来的反苏圣战者成为美国人武装起来的北方联盟军事指挥官，最后变成了美国人扶持的省长和部长——或者至少是在美国人的默许和最低程度的抱怨下成为的省长或部长。阿塔·穆罕默德·努尔当上巴尔赫省的省长，向其效忠者分发土地，靠从该省的海关收入中抽成而成长为巨富。他手下的民兵涉嫌从事从谋杀到绑架及勒索的各种谋财害命的勾当^[52]。伊斯梅尔·汗（Ismael Khan）成为赫拉特省（Herat）的省长，后来还做了水务及能源部长，被指控骚扰普什图族人^[53]，以及扣留省政府的收入。一位名叫米尔·阿拉姆（Mir Alam）的指挥官成为巴格兰省（Baghlan）的警察局长，以腐败猖獗^[54]和支持毒品走私集团而闻名。一份2006年美国大使馆的电文得出结论称，阿拉姆和另一名指挥官“继续着作为圣战组织指挥官的表现，而不像专业警官……滥用手中的职权，从事广泛的犯罪活动^[55]，包括勒索、贿赂和贩毒”。楠格哈尔省（Nangahar）的省长古勒·阿迦·谢尔扎伊（Gul Agha Sherzai）也同样在当地乡里肆虐^[56]——从谋杀、贩毒到使其部落受益的腐败，无所不为。

然后是杜斯塔姆将军，他先是出任了国防部副部长，最终又成为副总统。在“9·11”恐怖袭击后获任美国驻喀布尔大使的罗伯特·芬恩（Robert Finn）没少与这些军阀斗争，尤其是与杜斯塔姆和阿塔，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这其实是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两个军阀坐拥在苏联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数亿美元收入的石油储备，可以轻易地利用它更好且更快地实现阿富汗重建。“我试图说服杜斯塔姆和阿塔变成富人……”芬恩回忆道，“但他们宁愿为了争夺奶牛而互相残杀^[57]。”于是，重建阿富汗的机会也泡了汤。

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数十年来一直都在接受美国人的资助，一些人靠着毒品交易致富，褪去褴褛的军服而换上了整洁修身的西装，但大多数人的举止仍然一如既往：军阀作风。不同的是，他们如今是借着

美国支持下中央政府的首肯而统治一方的军阀，有着源源不断且利润丰厚的国际合同可以从中揩油。芬恩开始相信，军阀是阿富汗许多更广泛问题的核心所在。“各部委最初被分发给不同的军阀掌管，而他们开始将之当作自己的领地来运营，所以这是个问题。”他告诉我。

然而撼动军阀谈何容易，有些情况下是因为他们牢牢控制着地方权力机构，其他情况下是由于从来没有人认真地做过赋权给替代人选的努力。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给美国人留下的选择是要么让军阀统治，要么就是完全的混乱。例如，阿塔领导下的省份是阿富汗最稳定省份中的一个——把他赶走是美国人心中最后的一个选择。“我认为我们应该让自己远离他们，”芬恩多年后反思道，“我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进入之后说，‘好吧，我们能找到谁来帮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永远用他们。我想我们已经与他们为伍太长时间了。一旦他们在那里，就很难被摆脱掉了[\[58\]](#)。”

美国无法重塑其在阿富汗的关系，或者说无法与或能反制根深蒂固的军阀文化的平民政治家之间建立新纽带关系，这也反映出更深层的痼疾。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已经从征服转向发展，但美国的外交力量业已萎缩。全球范围内大使馆关闭及外交人员团队枯萎所带来的后果，在美国最重要的战争中已然完全显现：外交官数量不足，而现役外交官没有处理阿富汗问题所需的资源或经验。“没有经验背景，”芬恩说，“外交官们都只在那里待了很短的时间，所以他们每年都要重新学习。在那里待了很久的人”——例如杜斯塔姆和其他军阀一样——“他们知道如何利用美国人[\[59\]](#)，确切地知道该说些什么，以及美国人希望他们说些什么。”

军阀在美国支持的权力结构中扮演支柱角色，给建立问责机制的努力造成很大困扰。杜斯塔姆辖下囚犯失踪之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先后两位美国总统都事实上回避了有关此事的问题，小布什政府

至少跨机构地叫停了三次调查坟场的努力。关塔那摩湾的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开始听到其他幸存下来的塔利班囚犯谈及大规模屠杀一事，但被告知别插手此事，而是留给军方处理。结果五角大楼只进行了一次简短的“非正式调查”，向595部队成员询问他们是否看到了什么，然后发布声明做出了全面否认。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后来回忆说：“国防部内有些部门对这件事情兴趣不大[\[60\]](#)。”在国务院，科林·鲍威尔将此调查任务分配给了负责战争罪事务的无任所大使皮埃尔·普罗斯佩尔（Pierre Prosper），而普罗斯佩尔很快就面临来自阿富汗和美国官员的反对。“他们会说‘我们有数十年之众的战争犯罪，你从哪里开始’？[\[61\]](#)”他回忆说。他的办公室后来放弃了调查。

奥巴马总统上任时，人们又有了新希望。奥巴马2009年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他脱离事先准备好的讲话大纲，承诺要进行调查。“看来很明显，小布什政府抗拒了寻求调查一位阿富汗军阀的努力，这位军阀名为杜斯塔姆将军，在中央情报局的薪水册上有名。现在被揭露出来的是，他管辖下的数百名塔利班囚犯被杀……”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勇敢地开始提问。

“对，”奥巴马总统说。库珀提到了无名坟场之谜，问奥巴马是否会要求对可能的战争罪进行调查。

“是啊，”总统说，“我刚刚看到报告，显示此事有未经过适当调查的迹象。所以我已经要求我的国家安全团队为我搜集已知的事实。一旦我们搜集了所有的事实，就可能会就如何处理做出决定。”

“但你不会断然拒绝展开调查吧？”库珀强调道。

“我认为，你知道的，所有国家，即使处在战争中，都肩负责任[\[62\]](#)。如果我们的行为看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违反战争法的行为，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对之有所了解。”

但奥巴马的白宫里没有人愿意触及这个问题。作为负责与非政府组织沟通的国务院官员，我接听了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等组织的一些电话。我一次又一次地敦促白宫工作人员透露一些情况，任何情况；敦促他们允许我就坟场问题召集一次会议，如果不说话的话，至少倾听一下。回答总是一样的：不予置评，不召开会议。“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进行电话沟通，结果他们告诉我搁置我们已经与一众人权组织预约好的会议，因为他们害怕有关大士特雷利大屠杀的问题，而且不愿意承认我们已完全放弃了美国总统给出的调查承诺，”我在2010年3月发给霍尔布鲁克手下传播事务主管阿什利·博默尔（Ashley Bommer）的信中写道。在同一个月内准备的简报文件中，关于我与人权组织进行接触的事项下列着一个要点：大士特雷利与医生促进人权协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合作制定更明确的立场）。在我10个月后提交的另一份备忘录中，这一句话原封不动地包含其中。

各人权组织对行政部门的阻挠倍感沮丧，试图转向国会寻求支持。2010年初，另一名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调查员纳撒尼尔·雷蒙德（Nathaniel Raymond）收到了曾给驻扎昆都士和恰拉疆基堡垒的美军担当翻译，后来到美国寻求庇护的一位男子的证词。这位证人声称自己目睹了囚犯们的遭遇以及美国人是否在场。雷蒙德把这些信息呈交给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时任该委员会首席调查员的前中央情报局特工约翰·基里亚库（John Kiriakou）。后来基里亚库被判入狱30个月^[63]，罪名是披露了另一位中情局特工的身份（基里亚库坚持认为，自己对政府在全球反恐战争中使用酷刑的做法进行举报，是原则性举措）。他认为关于无名坟场的故事具有爆炸性。根据基里亚库的说法，包括委员会主席约翰·克里在内，他的上级的反应也是爆炸性的，并且不是他所期待的。“当时的幕僚主任弗兰克（洛文斯坦）听到传言，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说‘立即停止，并且彻底放手’。”基里亚库很震惊，声称他直接将此事报告给了克里。“克里

随后来到办公室说：‘我听到的阿富汗这事是什么意思？’”基里亚库说。“我告诉了他……然后他说：‘你跟弗兰克谈过了吗？’我说，‘是的，弗兰克把我叫去说毙了它。’他说，‘好吧。’我站起来说，‘那我该怎么办？’他说，‘你毙了它^[64]。’我说，‘好吧，我会毙了它。’这事就这么了结了。”

基里亚库认为从克里和洛文斯坦的角度看，这是务实的做法。“弗兰克全身心投入地保护约翰·克里，而约翰·克里在这世界上的唯一所求就是想当国务卿。所以，我们不能冒任何出现混乱的风险，即使它是历史性的，也不能有任何争议性事件，所以他毙了它。真是太遗憾了，我非常失望^[65]。”克里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有关此事的消息——从来没有”，并坚称他在委员会任职期间“从未对阿富汗人权问题采取过措施^[66]”。弗兰克·洛文斯坦（Frank Lowenstein）起初同样否认对与基里亚库的谈话有任何记忆，后来又暗示“（基里亚库）可能引申了……或者他可能结束谈话时，产生了我不是特别有兴趣调查此事的印象^[67]，但我肯定不会告诉他要毙掉此事”。

在2009年的那次采访中，奥巴马总统已承诺对大屠杀展开新的调查^[68]。四年后，在断断续续地拒绝回答记者提问后，白宫悄悄承认已经完成了一项调查，但结果会持续封存。一位发言人提到了一项调查发现，即没有美方人员牵涉其中。但除此之外白宫拒绝做出更多解释。“这是怯懦的表现，”雷蒙德对我说，“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我接受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问话。可结果不了了之，因为那不是他们想听到的。”

靠着纯粹的坚韧，医生促进人权协会最终落实了与高级官员的一些会议。该组织还跨部门地向政府官员发送了十几封信。两种方法都没能带来清晰的信息，然而后果却是真实而具体的：最初的一系列法

医勘探之后，在其他团队得以返回当地进行全面挖掘之前，坟场就消失了。2008年，一个联合国小组在坟场所在地发现了一系列大坑^[69]——而没有任何一具之前曾记录在案的尸体。这正是人权倡导者们一直竭力防止出现的后果。“从一开始，”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苏珊娜·西尔金（Susannah Sirkin）说，“我们就意识到，如果有任何消息走漏，坟场很可能就会遭到毁灭。”消息确实走漏了，世界大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证据。“现在是第二层的涂炭，”西尔金对我说，“（美国政府）名副其实地阻碍了调查^[70]，且压制了信息。”我本人无法挣脱这种漠不关心的事实始终如巨石压在我心头。多年后，当我出发前往喀布尔时，我决心要找到答案。

在近15年的时间里，杜斯塔姆将军从未就失踪的囚犯和乱坟场问题接受过详细采访。但经过几个月的对话，他开始对接受我采访的想法表现出兴趣。我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才锁定了对杜斯塔姆将军的采访。与其顾问们的对话就进行了一年，这些人代表杜斯塔姆前来纽约和华盛顿进行接触，他们都是忠诚的乌兹别克斯坦族阿富汗人，其中一些是来自杜斯塔姆在希比尔甘的据点、浸润在杜斯塔姆的英雄主义传说中长大的年轻人。我还被介绍给了杜斯塔姆的两个小儿子——被培养从政的巴图尔（Batur）以及在阿富汗空军服役的巴布尔

（Babur）。然后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我是否可以第二天飞到喀布尔，杜斯塔姆将军将见我。我同意了，然后赶紧给一位亲密朋友写了封邮件，告诉他我不得不错过他第二天晚上就要举行的婚礼了，中亚地区外交正在进行中。

我在指定的日子抵达了喀布尔，但杜斯塔姆将军没有见我。杜斯塔姆将军累了。一位顾问很严肃地通知我，杜斯塔姆将军感冒了。我只好等待，像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71]进了夜总会。我在喀布尔尘土飞扬的街道上漫步；开车穿过安全检查哨卡，进入看似碉堡的美国大使馆，与美国官员会面；我顶着8月下旬的闷热暑气，与杜斯

塔姆的顾问们一起在喀布尔塞雷纳（Serena）酒店的花园里喝咖啡。最后，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杜斯塔姆将军与阿富汗各地女权活动人士之间的会面。这对于杜斯塔姆希望与我以及更广泛的西方世界所进行的沟通而言至关重要。与冷战时期的遗老遗少不同，他对女性的看法更为进步。“我可能是阿富汗极少数坚定致力于推进妇女权利[\[72\]](#)、保护妇女的人之一”，杜斯塔姆后来对我说。

这种信念似乎是真诚的，在几天的采访过程中，他也经常重复这一信念。但杜斯塔姆将军并未出席与女性活动人士的会面，而是由一位顾问把我推介给了与会者。这次会议有十几位令人敬畏的女性参加，举行地点是一间宽阔的政府会议厅，与会者头顶上方是一幅刻有《古兰经》经文的壁画：“真主永远不会改变人的状况，直到他们自己将其改变。”与会的每位女性都带来了自身的诉求，从祈求增加薪资的教师，到呼吁提高女性政府官员比例的律师等。副总统将缺席的消息刚一提及，整个房间里还是掠过了一阵惊讶和失望的耳语。一位从洛加尔省（Logar）赶了几个小时路才来到会场的医生走的时候流下了眼泪。

当我终于接到告知杜斯塔姆将军已经准备好了的电话时，已是晚上很晚的时间了。等我穿过层层路障和全副武装的警卫，最终来到了副总统府的金色大门前时，又在那奇怪的以草坪做地毯的客厅里等了一个小时。杜斯塔姆将军进入房间时，已是晚上10点。

这位让人敬畏的勇士这时已经60多岁，头发稀了也白了，肚子鼓得老大。但他依旧威风：魁梧的身材，像台冰箱，外热内冷。他的装束——飘逸的乌兹别克长袍外罩着西装外套，凸显了他身材硕大。他略显笨重地慢步走进房间，重重地跌坐在高背上嵌有木雕、金色面料图案中撒满香根鸢尾花的华丽宝座上。杜斯塔姆的眼睛细长，有着亚洲人特有的厚厚的内眦褶，即眼角内侧上眼睑内向皱襞，反映了他的

血统。杜斯塔姆声称自己的血统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反正蒙古大汗到过的地方也够多。

杜斯塔姆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他那已经被讨论了不少时间的感冒很可能是真的，但包括美国驻阿富汗前大使在内的其他人也认为，这位将军总是晚到恐怕是出于其他原因。“他持续性地脾气极端暴躁，酗酒，无法行使任何职能，[\[73\]](#)”大使说，“他需要离开这个国家，比在这里更有效地去醒醒酒。”在我们几次见面的过程中，杜斯塔姆都不时地从一只有着香奈儿品牌标志的杯子中喝一口不知是什么的饮料。那名牌杯子的设计甚是招摇，香奈儿标志上都盖满了镶金和水钻，以至于我都怀疑杜斯塔姆是不是之前刚会见过卡戴珊（Kardashian）[\[74\]](#)之类的时尚人物。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媒体不表达现实”，杜斯塔姆抱怨道。我在手机上触摸了“录音”键，一位顾问立即要求我停止。接下来我坚持要继续录音时，还发生了点小小的麻烦。杜斯塔姆不高兴地瞥了一眼我的电话，“不幸的是，现如今，有时记者们，《纽约时报》，他们写了那么多东西，”他皱起眉头，脸上掠过同样的受伤表情，

“‘他屠杀过，人权，他杀了塔利班囚犯，他做了这个或那个。’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美国朋友和其他人到我家来，他们说：‘听着，他们在美国把你描绘成这样，但我们知道你是另外一个样子。’[\[75\]](#)”

杜斯塔姆将军对于他在西方媒体描述中的形象认知并没有错。人权组织在拿出翔实记录的情况下，指控杜斯塔姆在20世纪90年代从事了大规模暴行[\[76\]](#)和谋杀活动。新闻报道指责他对政治对手连同家人——甚至有时是忠诚度降低的盟友——实施暴力报复[\[77\]](#)。在我对杜斯塔姆展开访谈的前几天，人权观察组织指控其麾下的阿富汗全国伊斯兰运动（Junbish）民兵[\[78\]](#)以反塔利班行动为幌子谋杀和袭击平民。连希望利用杜斯塔姆在阿富汗境内乌兹别克族人中长盛不衰的声

望及“票仓”地位，而选择杜斯塔姆为竞选伙伴的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也曾经一度称杜斯塔姆为“知名杀手”[\[79\]](#)。美国国务院呼应了加尼的说法，称杜斯塔姆是“典型的军阀”，然后还更进一步拒绝签发杜斯塔姆来美国的签证[\[80\]](#)。

杜斯塔姆坚称这些批评根源上是政治纷争。他说：“我们的反对者……他们编造了很多对我们不利的东西，以给美国公众一个错误的印象。”他说。他还补充说，那些指责他攻击政治对手的说法是“非常不公平的指控，是有政治动机的。原因是，第一，我是从一个非常贫困的族群中崛起的。第二，我来自一个贫穷家庭。第三，我对阿富汗是有愿景的。我想推行正义、去中央集权化的体制、联邦制度，以及让包括我的人民在内的所有阿富汗人民都享有同等权利。所以他们因此开始不公平地责怪我”。他表示，关于其部队野蛮狂暴的说法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去了阿富汗北部，我们与阿富汗安全部队并肩作战，为各省提供安全保障。人们非常高兴，我们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他又皱起了眉头。“但他们非但没有表示赞赏和说声谢谢……反而再次开始这些政治指控……我相信，即使是人权观察组织及其他的人权组织，也不单纯是纯粹的人权组织，它们也是政治性的……它们编造其想要的[\[81\]](#)、对你不利的东西。”

签证被拒似乎在个人层面给杜斯塔姆造成了刺痛，他仍然把那些将他武装起来反塔利班的美国人视为血缘兄弟。“我相信我遭到了美国朋友的背叛……我们曾并肩战斗，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这是背叛。尽管如此，美国还没有另一个像杜斯塔姆一样强大的朋友，他们没有。”杜斯塔姆觉得美国人利用了他，“像用手纸一样”。他愤愤不平地一口气数出一连串仍然与他站在一起的朋友的名字，包括不同的军方官员、一位纽约市警察局局长、阿诺德·施瓦辛格以及希拉里·克林顿，他声称自己与希拉里·克林顿因妇女权益问题而结缘。“克林顿女士，那时她还是参议员，访问了喀布尔，他们邀请了

我……我讲了那位美国女士在昆都士协调空军行动的故事，然后她笑了，说你应该来美国，你应该与那里的女飞行员们分享这个故事，”他停顿下来，再次看着我，“所以她也邀请了我去美国访问。”他又重复了一遍，以防我没有记下那部分内容。（希拉里·克林顿到喀布尔出席哈密德·卡尔扎伊的就职典礼时，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为了防止她与杜斯塔姆握手，几乎是猛地扑将了上去^[82]。）无论如何，一位遇害的中央情报局特工的父亲赠给杜斯塔姆一把亚拉巴马州温菲尔德（Winfield）市的荣誉钥匙。“我不需要任何签证，”杜斯塔姆轻蔑地说，“我有钥匙^[83]，我想去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去！”

尽管如此，杜斯塔姆似乎意识到他的形象需要“装修”了。“这是我们的错，我们无法告诉美国公众，我们对美国来说是怎样的好朋友。”他叹了口气。对杜斯塔姆来说，真实的故事一直很简单。“你有个像‘基地’组织一样强大、邪恶的敌人，他们正在恐吓你的人民，而你也有个像杜斯塔姆这样强大而善良的朋友，他准备好与你的敌人作战，为你那些在美国被无辜杀害的人民以血还血地复仇。”杜斯塔姆就像阿富汗版的鲍勃·多尔（Bob Dole），经常以第三人称自居。“我们是合作伙伴^[84]，”他继续说道，“我们与同一个敌人作战，为了一个良好的目标。”

这是杜斯塔姆将军心目中自己的形象，或者至少是他希望像我这样的记者所看到的形象：一个被误解了的人民卫士。他是能为麋鹿受伤而哭泣的动物爱好者，一个有着金子般心灵的军阀，人民的军阀！他曾经短暂地甚至是位健身大师，倡导了“全民健身”运动——与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的“动起来！”相对等的喀布尔版健康动议。“他需要打仗时，他就那样做了，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和平，他就这样做了，”副总统府的一位保安人员在健康计划推行时对记者说，“当年轻人看到副总统每天早上都在锻炼时，它会鼓励年轻人开始运动。”在他身后，一身休闲运动装的杜斯塔姆将军做着开

合跳^[85]。在杜斯塔姆的脸书网页上，附着达里语（Dari）口号、显示他本人气喘吁吁做着有氧运动的照片获得了成千上万名忠实追随者“点赞”。“锻炼：今天的毅力，明天的活力！”图说之一写道。“运动装是美之装束！”另一则补充道。

“你对军阀这个词感到愤慨吗？”我问杜斯塔姆。

“战争是强加给我的”，他说。“如果有敌人来到你家，你该怎么办？你必须自卫。”他想了一下。

“不是军阀，”他得出结论，“我说是和平领主^[86]。”

说到这里，忠实于杜斯塔姆将军的翻译挑起了眉毛。

我问他有关大士特雷利乱坟场的问题时，杜斯塔姆最初给出了美国人提供了数年的相同答案。“有太多坟墓了，”他摇了摇头说，“那么多尸首。”他发誓说，这些都是其他时期的事——他在土耳其流亡期间，“9·11”之前，而且他的二把手背叛了他。杜斯塔姆表示，那时的指挥官马利克才应该对大多数沙漠中的遗体负责。“但是确切地说，”我追问道，“是那些恰拉疆基堡垒起义之后，来自昆都士的囚犯^[87]。”

杜斯塔姆疲惫地哼了一声。他一直在等待这个。“事实是，他们把昆都士的囚犯装上敞篷卡车，送去了希比尔甘。”杜斯塔姆说他亲眼看着囚犯被装上了卡车，过程丑陋。“他们当中一些人想跑，有些人想躲”，他承认道。但是他在那里的时候，这些人是在敞篷卡车里的。仅就旅程中那特定的一段而言，杜斯塔姆说的很可能是真的。

但根据多名目击者的说法，从昆都士出发的车队没有直接去希比尔甘。相反，车队和恰拉疆基堡垒起义中幸存下来的囚犯停在了一个名为恰拉泽尼（Qala-i-Zeini）的堡垒。一位司机2002年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他被雇去驾驶当时在现场的一辆封闭式集装箱卡车——那种用于货运的可密封金属外壳卡车，一般尺寸大致是40英尺长、8英尺宽。根据这位司机、其他司机以及幸存囚犯的说法，杜斯塔姆的人把尖叫着的囚犯赶进了集装箱。有些囚犯被他们像捆猪一样地捆了，然后扔进集装箱。幸存下来并辗转到了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的10名囚犯对一位联邦调查局官员表示，他们像被“搭积木一样摞在一起^[88]”，数百人一卡车，直到车厢门被用力撞上、锁死。一位村民告诉记者，那些行动不够快的人遭到毒打。他认为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就是杀死这些囚犯。幸存者讲述的恐怖经历是那些年里杜斯塔姆始终无法摆脱的最有力指控。他们的讲述中，有的人尖叫和敲打墙壁，有的人靠舔汗水和尿液来避免脱水致死，甚至还有的人因为饥饿和神志崩溃而相互啃咬肢体。

这是阿富汗沙漠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处决方法——把囚犯们锁在闷罐车里，让他们活活烧死或是闷死，具体取决于季节的不同。那年11月，冷空气决定了杀戮方法是窒息和脱水。杜斯塔姆的人据称执行了整个操作。每辆车都会有最少一名士兵与司机一起坐在驾驶室里，司机们称，只要他们为了给车里透气而试图在密封车厢上打孔，或是悄悄给车里传水瓶，就会遭到杜斯塔姆的士兵暴打。幸存者声称，有几次这些士兵甚至直接向卡车开枪，迫使尖叫声停止。在此议题上开口说话的司机表示车队连续行进了好几天^[89]。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发送的一条绝密电报^[90]得出结论：“我们认为，塔利班人员在被运往希比尔甘监狱途中的死亡数量^[91]可能多于广泛报道中的1000人。”遵照美国《信息自由法》要求公开的电文版本节录中，某家缩写为三个字母的美国情报机关称“（死亡）数字至少有1500人，而实际数字可能接近2000人^[92]”。

听到我提及这些指控时，杜斯塔姆叹了口气。他的一位发言人以前给出的说法是只有之前受伤者意外死亡的情况，杜斯塔姆又给了我

一个不同的说法。“道路，”他解释说，“已经关闭了。奇姆塔尔（Chimtal）的路，还有巴尔赫（Balkh）的路，都关闭了，因为塔利班在那里作乱。”他坚持说，大多数囚犯都待在敞开的车里。“但或许有一辆密封车^[93]里有塔利班人员。”

“一个集装箱？”我问。与最保守的目击者给出的估计密封车数量相比，这大概相当于1/6。

“在一个集装箱里。”杜斯塔姆的翻译自信地说。翻译说话时，杜斯塔姆开始来回歪头，伸出下唇，重新考虑。

“也许是两三个吧。”他承认道。

“谁把他们放进密封车的？”我问道。

“那个指挥官，本该负责转移他们的当地指挥官，也许他们因为恰拉疆基的暴动而害怕了。奇姆塔尔和巴尔赫的路被封锁了，他们认为他们可能还会逃脱，而且他们会攻击他们，于是将他们放进了两三个集装箱。”

我请他提供一个名字。杜斯塔姆不耐烦地再次摇晃膝盖。“那个指挥官，他的名字叫卡迈勒·汗（Kamal Khan），他是其中之一，是的。”杜斯塔姆一只手自上而下地抹了下自己的侧脸。“还有一名指挥官，他的名字叫哈扎拉特·春塔（Hazarat Chunta）^[94]，他可能开过枪。”杜斯塔姆及其助手们并未暗示任何一名上述指挥官因此事件而面临负面影响，他们都表示说，并不确定这二人这么多年后会在哪里。

杜斯塔姆回避了关于发生的这一切当中有多大成分是来自于他的命令这一问题。他表示有囚犯死亡的事实令人意外。根据他提供的事件经过版本，助手来告诉他消息时，他正在昆都士吃午餐。“‘有塔利

班囚犯死在集装箱车里了，’当时助手告诉他”，“我问他们，‘你们有没有让红十字会给他们看看？’他们说‘没有’。然后（我）对他非常生气：你为什么不让红十字会来看？！你这是在破坏我的信誉，我的敌人会利用它来攻击我。我努力在这场战争中做到公平……你必须展示给红十字会。”但根据医生促进人权协会调查员的说法，红十字会直到几周后才开始接触此事，那时杀戮已经完成，秘密也已经掩埋了。我很难想象杜斯塔姆曾经真的告诉过任何人去打电话给红十字会。

无论杜斯塔姆对囚犯死亡一事了解多少，现有证据都表明他参与了事后的掩盖。解密的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电文指出，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正在消失的证人。杜斯塔姆及其手下指挥官之一曾“被暗示参与了虐待大士特雷利无名坟场相关事件中数位证人的行动。一名据称在坟场所在地驾驶过推土机掩埋尸体的目击者已经遇害，尸体在沙漠中被发现。至少有三名参加了坟场问题相关工作的阿富汗人遭到毒打或失踪”。联合国的结论是，还有另一名证人被杜斯塔姆的部队监禁，并遭受酷刑。

我不得不两次就失踪的证人向杜斯塔姆提问。最后，我把一份电文内容的副本递给他，他不动声色地看了一遍，然后将它递给了助手。“证人后来被杀害和遭恐吓的这些指控，”我问道，“有没有可能属实？”

他耸了耸肩^[95]。“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

更棘手的是美国人看到了多少的问题。纳撒尼尔·雷蒙德呈交给约翰·克里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证词来自一位曾在昆都士和恰拉疆基堡垒为美军做翻译的证人，他声称自己在把囚犯移到集装箱的过程中一直在场，并且在现场看到了两位美国人，穿着蓝色牛仔裤，

操着英语，看着现场的活动。“2001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在大士特雷利、说英语并穿蓝色牛仔褲的，是谁？”雷蒙德说^[96]。

“我离开恰拉疆基堡垒时……所有时间里，美国同事都陪着我。”杜斯塔姆对我说。他对这一点极为坚持。在他捍卫与那个曾经利用他取得了胜利、现在又似乎有意背弃他的国家之间摇摇欲坠的关系之时，这一点对他来说关乎自尊。杜斯塔姆表示，特种部队595分队的队长马克·努奇几乎一直都站在他身边，努奇也表示这句话基本上是准确的：“是啊……”他回忆说，“我们几乎每天都（和杜斯塔姆）很密切地合作^[97]”。

“是否有任何美国人被分配到恰拉泽尼（囚犯们被装进密封集装箱车的地方）？”我问杜斯塔姆。

“他们所有人都和我在一起”，他回答说，不耐烦地用脚在地上踢了踢。“他们指控错了，”他补充说，指的是人权组织们关于美国人可能参与了屠杀的暗示，“他们说‘哦，杜斯塔姆杀人了，美国人开的枪。’这不属实。”杜斯塔姆以替美国人开脱之词，来证明他对美国的忠诚。但他确认了美国人在事件发生时就站在他身边的说法，又提出了另一套难题，即美国特种部队和中央情报局人员是否见证了杜斯塔姆与其指挥官之间在杀害囚犯问题上的任何沟通，以及这些美国人未能阻止或事后检举杜斯塔姆等问题。

努奇告诉我，他不知晓虐囚行为。“我的团队在这个问题上已接受了多次调查，”他说，“我们没有目击^[98]，也没有观察到任何事情。”就像杜斯塔姆认为美国特种部队是血缘兄弟一样，这种情谊在努奇这边也表现得很明显。“我认为他是一位有魅力的领导者，身先士卒，照顾下属。”努奇补充道。一部名为《12勇士》（*12 Strong*）的好莱坞电影歌颂式地再现了595分队与杜斯塔姆之间的合作，影片中努奇一角由电影《雷神》（*Thor*）中超级英雄的扮演者克里斯·海姆

斯沃斯（Chris Hemsworth）饰演，并在肌肉紧绷和怒火中烧等细节上有所夸张。我针对此事中更复杂的现实部分提出一系列问题时，努奇开始有些恼怒。“对杜斯塔姆提出这些指控的人是他的敌人”，他说。当我告诉他杜斯塔姆已承认可能发生过有人被杀的情况，并且暗示自己手下的两名指挥官可能参与其中时，努奇停顿下来，然后回答说：“我对此没有回应。”

我再催问杜斯塔姆美国人知道多少或应该知道多少时，他变得焦躁不安。他提醒我，他感冒了。他一度在问题当中打断了我。“听着，每个学校上课一小时后都休息一下”，他瓮声瓮气地嘟囔，并改变了话题。“你应该有一些（关于）女人、孩子（的问题）”，一名助手急忙补台。当我再次转向美国人的问题时，杜斯塔姆眯起眼睛看着我。“你问了这么多问题……我很好奇，你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是为了写书，不是为了设计电影镜头脚本……为什么这么详细，问这个问题？”副总统府内友善的氛围沉重了起来，杜斯塔姆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我总是非常诚实，忠诚于我的朋友，我从未背叛过谁，”他一度说道，他的目光投向了手握M4步枪、以立正姿势站在一旁的儿子巴布尔，“但我希望你不会对我这样做。”我心里在为如何回应这个问题斗争着，然后杜斯塔姆朗声大笑起来。“你要求只增加30分钟的！”他解释道。我笑了，松了一口气。“我超时了！^[99]我背叛了你的日程表！”杜斯塔姆将军深谙如何开好军阀的玩笑。

我们最后一晚的采访结束时，人们开始往副总统府的大厅里摆放体操软垫，为稍后进行的乌兹别克传统搏斗武术——克拉术

（kurash）比赛做准备。过了一会儿，大约50名穿着蓝白色相间阿迪达斯柔道服的男孩和男子走了进来，一对一地错步周旋、连戳带打，直到一个人摔倒在地。杜斯塔姆自豪地说，这完全是部落间的比赛：乌兹别克人对阵普什图人，哈扎拉人对阵塔吉克人。这些人来自九个省份，每局格斗结束后，对阵的双方都会相互亲吻。但很难说这看起

来到底是更像和解，还是更像战争：四肢扭曲发出的啪啪声，深夜里响彻整个大厅，有些男孩是龇牙咧嘴、一瘸一拐地离开的。格斗马上就要开始时，传统突厥乐器冬不拉的弹奏声响起，所有在场的观众一同用乌兹别克语唱响了这首歌曲：

让我们坚强

让我们活得像男人一样

像杜斯塔姆一样，

让我们为国家效力

让我们尊重此与彼

像杜斯塔姆一样

生得像男人一样

活得像男人一样

诚实，忠诚

绝不背叛对方

让我们为友

像杜斯塔姆一样

蚊子在炎热的空气中横冲直撞。杜斯塔姆穿着蓝色真丝亮缎制成的传统乌兹别克长袍，坐在他的宝座上，手里握着香奈儿茶杯。看着表演，眼泪又涌入他的眼眶。

我离开杜斯塔姆的宫殿几个月后，他站在希比尔甘的暴风雪中听了另一首歌。他当时在观看一场抢羊比赛，山羊被屠杀之前，当地音乐家用歌声向与塔利班战争中阵亡的勇士们致敬。这些歌词引起了杜斯塔姆的共鸣：一个月前，塔利班伏击了他的车队^[100]，打伤了他和他手下数位阿富汗全国伊斯兰运动的民兵。比赛录像中可以看到场边的杜斯塔姆闭着眼睛，嘴唇颤抖，默默地抽泣^[101]。大朵的雪花旋转飘落着，他拿出白色手帕擦拭着双眼。

比赛开始，15匹马蜂拥进入混战，抢羊比赛从成吉思汗时代传承下来的得分规则错综复杂，观众如果不专心致志地观看的话，就很难看明白。而随着比赛开始，看台上也爆发了另一场争斗。杜斯塔姆朝自己的政治宿敌艾哈迈德·伊希（Ahmad Ischi）抡起了拳头，然后情势急转直下：副总统摔倒了伊希，并在超过1000名与会者的围观下，一脚踏在伊希的脖子上用力碾压。“我可以现在就杀了你，还没有人会过问。”伊希后来声称杜斯塔姆对他说了这些话。目击者说，他们看到杜斯塔姆的人把满身是血的伊希拖进一辆卡车带走了。伊希后来声称杜斯塔姆及其手下囚禁了他五天，无情地毒打他，并用AK-47步枪强暴他。提供给新闻界的法医鉴定报告显示^[102]伊希遭受了严重的内伤，似乎支持了伊希的说法。杜斯塔姆将军认为这些指控是阴谋，目的是夺他的权。其另一政敌8年前对他提出类似的指控时，杜斯塔姆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回应的。那一次指控中提到的身体虐待^[103]与这一次相似到了诡异的程度。

杜斯塔姆掌控的权力有所松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前，他向我抱怨说，“医生们”——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和首席执行官^[104]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忽视他。之前一年，他在阿富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泪流满面。“没有人回复我的电话！”^[105]他哀号道。新的指控使他陷入政治危机。

“对于阿富汗政府来说，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和问责始于政

府本身，我们承诺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发言人在宣布展开一项刑事调查^[106]时表示。

随后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对峙，再次揭示了扶植军阀担任高级政府职务的危险。士兵和警察一度包围了副总统府，试图逮捕杜斯塔姆及其助手。但杜斯塔姆指挥他自己的独立民兵进行对抗，结果警察因为担心副总统府所在喀布尔市内街区会变成战场，于是空手而归。后来，加尼总统离开阿富汗前去欧洲参加一项安全会议时，杜斯塔姆和一众武装警卫抵达了总统府，单方面宣布加尼不在国内时，杜斯塔姆将代行总统之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恐慌。加尼在杜斯塔姆得以行使总统职权之前赶了回来^[107]。

“9·11”后建立起来的阿富汗政府是美国斡旋的产物，原本就根基不稳。到了2017年，这一政府对抗军阀的努力已在全境内力不从心，失控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塔哈尔（Takhar）省，与某著名伊斯兰政党有关联的军阀巴希尔·卡内特（Bashir Qanet）司令创建了自己的警察国家，向中央政府的支持者开了枪。在马扎里沙里夫，一位名叫阿西夫·莫赫曼德（Asif Mohmand）的省议员与阿塔·穆罕默德·努尔在社交媒体上展开了口水战，在脸书的一则贴文中威胁要“把30发子弹打进你的头，然后自裁”。阿塔派部队去逮捕莫赫曼德时，发现莫赫曼德有自己的民兵保护左右。随后的交火造成2人死亡、17人受伤，使马扎里沙里夫国际机场陷入血腥混乱之中。塔利班势力也在复苏，且其力量正开始与另外一股更令美国人不安的处于崛起中的威胁会合，即一个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附属机构，名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Khorasan Province）。该组织规模小于“基地”组织^[108]，但到2017年时，已在阿富汗山区残酷的损耗战中表现出类似的抗打击能力。

回到美国，唐纳德·特朗普作为候选人时宣扬的是必须撤军。

“我们应该立即离开阿富汗。”他说。这场战争是“浪费我们的钱财[\[109\]](#)”，“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然而上任后，唐纳德·特朗普及其由军事将领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则要求对阿富汗军事升级。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已经对军事将领在奥巴马政府对阿富汗战略审查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感到震惊，但特朗普将这一现象扩大到了几乎恶搞的程度。马蒂斯将军担任国防部长，H. R. 麦克马斯特将军担任国家安全顾问，退休将军约翰·F. 凯利则成为特朗普政府对阿富汗政策审查的灵魂人物。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迈尔堡（Fort Myer）军事基地，以美军各分支机构的旌旗为背景，特朗普面向一屋子的美国现役军人宣布，美国将对阿富汗投入双倍的军事力量。一个月后，马蒂斯将军下令[\[110\]](#)第一批数千名新增美军进驻阿富汗。这是一个早已形成的定局：特朗普上任前一年，军方已经开始悄悄地测试公众信息，告知公众美国将在阿富汗军事存在数十年，而不是数年。公开宣布做出之后，同样的语言再次出现，这次是由特朗普的代理人将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承诺，与美国在韩国、德国和日本的驻军承诺[\[111\]](#)相提并论，而不是将与其他反恐行动混为一谈。“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与你同在，”美军驻阿富汗高级将领小约翰·尼科尔森（John Nicholson, Jr）对一群阿富汗人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会与你们在一起[\[112\]](#)。”

在某些领域里，奥巴马还提议“加强民事”，并且至少做出姿态，表示美国在该地区扩大外交努力依然重要；而特朗普却干脆确认由五角大楼制定政策。他提到了谈判，但更多像是在谈海市蜃楼，而不是现实。“有一天，经过有效的军事努力，也许有可能在阿富汗确定包括塔利班分子在内的政治解决方案，”他在迈尔堡对美军官员们表示，“但没人知道那种情况是否或何时会发生[\[113\]](#)。”鉴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办公室在国务院内已然关闭，且仍然没有一

位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常任助理国务卿^[114]，特朗普所做的概括似乎算是公平。

与此同时，美国历时最长的战争仍持续不断，甚至也看不到结束的希望。我想起了杜斯塔姆将军在那个铺满草坪的大厅里、闪烁的圣诞灯下以及满是鲨鱼的鱼缸前告诉我的一件事。

他说自己小时候极其吵闹，最终让他母亲不得不用绳子捆住他的手。“不要离开”，她警告他。杜斯塔姆却马上就滑脱绳子跑开了。

“你依然很难控制吗？”我问道。

“当然，”他说，“童年就是童年^[115]，但是谈到现实时……如果事情是对的，我会支持。如果它是正确的，且符合逻辑……但如果它是不公正的，没有逻辑，如果它不是真的，没有人可以控制我。”

他双腿分开，向前伸出下巴。“最后，”他带着顽皮的微笑说道，就像我们都在开玩笑一样，“你应该给这本书取名‘杜斯塔姆：他讲真话并劝阻所有谎言’。”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及其传奇确实揭示了一些残酷的真相：关于美国，以及美国如何在地球之角卷入无休止的战争。

[1] Author Interview with Jennifer Leaning, 6 September 2016.

[2]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Heffernan, 25 May 2015.

[3] 幸运轮盘 (Wheel of Fortune) 是美国的一个热门电视游戏节目，其中参赛者一次一个字母地猜字谜。——译者注

[4] 李伯拉斯 (Wladziu Valentino Liberace) (1919年5月16日至1987年2月4日) 是美国著名的艺人和钢琴家，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是全球收入最高的艺人，服装以缀满亮片、荧光闪烁为特点，被誉为“闪耀之王” (The King of Bling)。——译者注

[5] Rashid, Ahme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p. 56, Kindle.

[6] Rashid, Ahme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p. 56, Kindle.

[7]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8] Williams, Brian Glyn, *The Last Warlord: The Life and Legend of Dostum, the Afghan Warrior Who Led U.S. Special Forces to Topple the Taliban Regime* (Chicago: Chicago Review Press, 2013) , p. 80.

[9]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10] Filkins, Dexter, “Taking a Break from War with a Game Anything but Gentle, ” *New York Times*, 2 January 2009, www.nytimes.com/2009/01/03/world/asia/03afghan.html.

[11]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12] Crile, George, *Charlie Wilson’ s War*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7) , loc. 1288-1289, Kindle.

[13] Coll, Steve, *Ghost Wars* (London: Penguin, 2004) , p. 101, Kindle.

[14] Author Interview with Milton Bearden, 28 April 2016.

[15] 香港译名《韦氏风云》，台湾译名《盖世奇才》，是环球影业公司出品的一部历史传记片，由汤姆·汉克斯、朱莉娅·罗伯茨等主演，于2007年12月10日在美国上映，讲述了查理·威尔逊支持阿富汗反苏组织，成功领导了史上一次大规模秘密军事行动的故事。——译者注

[16] “Socialite Joanne Herring Wins ‘War’ , ” *New York Daily News*, 11 December 2007,
<http://www.nydailynews.com/entertainment/gossip/socialite-joanne-herring-wins-war-article-1.276411>.

[17] Williams, Brian Glyn, *The Last Warlord: The Life and Legend of Dostum, the Afghan Warrior Who Led U.S. Special Forces to Topple the Taliban Regime* (Chicago: Chicago Review Press, 2013) , p. 80.

[18] Williams, Brian Glyn, *The Last Warlord: The Life and Legend of Dostum, the Afghan Warrior Who Led U.S. Special Forces to Topple the Taliban Regime* (Chicago: Chicago Review Press, 2013) , p. 146.

[19] Coll, Steve, *Ghost Wars* (London: Penguin, 2004) , p. 262, Kindle.

[20] Rubin, Michael, “Taking Tea with the Taliban, ” *Commentary*, 1 February 2010,
<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s/taking-tea-with-the-taliban>.

[21] Rashid, Ahme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p. 217.

[22] Rashid, Ahme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S. and the Disaster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Penguin, 2009) , p. 73.

[23] “The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curity Council, 21 September 1999,
<https://unama.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21%20September%201999.pdf>.

[24] Rashid, Ahme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S. and the Disaster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Penguin, 2009) , p. 53.

[25]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26]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27] Mazzetti, Mark, *The Way of the Knife: The CIA, a Secret Army, and a War at the Ends of the Earth* (New York: Penguin) , p. 32, Kindle.

[28]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at US Institutes of Peace, 16 May 2016.

[29]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 at US Institutes of Peace, 16 May 2016.

[30] Rubin, Barnett, “What I Saw in Afghanistan, ” *New Yorker*, 1 July 2015,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what-have-we-been-doing-in-afghanistan>.

[31] Coll, Steve, *Ghost Wars* (London: Penguin, 2004) , p. 263, Kindle.

[32] “RICQuery—Afghanistan, ” 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BCIS Resource Information Center, 27 May 2003, <https://www.uscis.gov/tools/asylum-resources/ric-query-afghanistan-27-may-2003>; “UN Opposes Afghanistan Bill Giving Immunity to War Criminals, ” 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of the Women of Afghanistan, 2 February 2007, <http://www.rawa.org/temp/runews/2007/02/02/un-opposes-afghanistan-bill-giving-immunity-to-war-criminals.html>.

[33] Raghavan, Sudarsan, “Afghanistan’ s Defining Fight: Technocrats vs. Strongmen, ” *Washington Post*, 12 April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former-warlords-test-the-rise-of-a-new-afghanistan/2015/04/12/73e052ae-b091-11e4-bf39-5560f3918d4b_story.html?tid=a_inl&utm_term=.6d12c65413a4.

- [34] Author Interview with Hank Crumpton, 19 July 2016.
- [35] *Legion of Brothers*, Dir. Greg Barker, CNN Films 2017, 9:30.
- [36] *Legion of Brothers*, Dir. Greg Barker, CNN Films 2017, 9:30.
- [37] Author Interview with Bart, 5 September 2016.
- [38] *Legion of Brothers*, Dir. Greg Barker, CNN Films 2017, 9:30.
- [39]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 [40] Author Interview with Hank Crumpton, by Phone, 19 July 2016.
- [41] Anderson, Jon Lee, "The Surrender, " *New Yorker*, 10 December 2001,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1/12/10/the-surrender>.
- [42] Stewart, Richard W., "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Afghanistan, October 2001-March 2002: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 United States Army, http://www.history.army.mil/html/books/070/70-83/cmhPub_70-83.pdf.
- [43] Contemporaneous Claims from US Forces, Northern Alliance Leaders, and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All Vary Significantly, See, e.g., "Thousands of Taliban Fighters Surrender in Kunduz, " *Haaretz*, 24 November 2001, <http://www.haaretz.com/news/thousands-of-taliban-fighters-surrender-in-kunduz-1.75571>.
- [44] Author Interview with Bart, 5 September 2016.
- [45] Sennott, Charles M., "The First Battle of the 21st Century: Returning to the Site of America's Earliest Casualty in Afghanistan, " *Atlantic*, 5 May 2015.

[46]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47] Author Interview with Hank Crumpton, 19 July 2016.

[48] Author Interview with Jennifer Leaning, 22 May 2015.

[49] James Risen of the *New York Times* Also Reported that US Military Officials Blocked Initial Red Cross Inquiries,
<http://www.nytimes.com/2009/07/11/world/asia/11afghan.html>.

[50] Author Interview with Jennifer Leaning, 6 September 2016.

[51]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Heffernan, 25 May 2015.

[52] Raghavan, Sudarsan, “Afghanistan’ s Defining Fight: Technocrats vs. Strongmen, ” *Washington Post*, 12 April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former-warlords-test-the-rise-of-a-new-afghanistan/2015/04/12/73e052ae-b091-11e4-bf39-5560f3918d4b_story.html?tid=a_inl&utm_term=.fe112937980d.

[53]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Profiles of Afghan Power Brokers, ” 26 October 2009,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security/news/2009/10/26/6734/profiles-of-afghan-power-brokers/>.

[54] Human Rights Watch, “*Today We Shall All Die,* ” *Afghanistan’ s Strongmen and the Legacy of Impunity*, 2015,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afghanistan0315_4up.pdf.

[55] “Cable: 06KABUL2962_a, ” Released by WikiLeaks,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6KABUL2862_a.html.

[56] Peceny, Mark and Bosin, Yury, “Winning with Warlords in Afghanistan, ”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22: 4, 603–618,
www.unm.edu/~ybosin/documents/winning_with_warlords_2011.pdf.

[57] Partlow, Joshua, “Dostum, a Former Warlord Who Was Once America’s Man in Afghanistan, May Be back, ” *Washington Post*, 23 April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dostum-a-former-warlord-who-was-once-americas-man-in-afghanistan-may-be-back/2014/04/23/9d1a7670-c63d-11e3-8b9a-8e0977a24aeb_story.html?utm_term=.61ff3c408558.

[58]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ert Finn, 2 June 2016.

[59]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ert Finn, 2 June 2016.

[60] Risen, James, “U.S. Inaction Seen after Taliban P.O.W.’ s Died, ” *New York Times*, 10 July 2009, www.nytimes.com/2009/07/11/world/asia/11afghan.html.

[61] Risen, James, “U.S. Inaction Seen after Taliban P.O.W.’ s Died, ” *New York Times*, 10 July 2009, www.nytimes.com/2009/07/11/world/asia/11afghan.html.

[62] CNN Interview Broadcast 12 July 2009, Transcript Available Via *Daily Kos* at <https://www.dailykos.com/stories/2009/7/13/753057/->.

[63] “Ex-CIA Officer Kiriakou ‘Made Peace’ with Leak Decision, ” *BBC News*, 28 February 2013, <http://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21610806>.

[64]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iriakou, 3 June 2016.

[65]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iriakou, 3 June 2016.

[66]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 21 November 2017.

[67] Author Interview with Frank Lowenstein, 5 August 2016, Lowenstein Also Questions Kiriakou’s Credibility, Referencing Criminal Charges Later Brought against Him for Leaking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nd Suggesting That “He’s [Kiriakou’s] Not—Let Me Figure out the Most Polite Way to Say This—Not the World’s Most Reliable Guy” .

[68] Currier, Cora, “White House Closes Inquiry into Afghan Massacre—and Will Release No Details, ” *ProPublica*, 31 July 2013, <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white-house-closes-inquiry-into-afghan-massacre-and-will-release-no-details>.

[69] Lasserter, Tom, “As Possible Afghan War-Crimes Evidence Removed, U.S. Silent, ” *McClatchy*, 11 December 2008, www.mcclatchydc.com/news/nation-world/world/article24514951.html.

[70]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Susannah Sirkin, 22 May 2015.

[71] 盖伊·特立斯（1932年2月7日～ ），美国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曾任职《纽约时报》十年，长期为《纽约客》《时尚先生》等杂志撰稿，是美国非虚构类写作的代表人物，将文学技巧引入纪实书写，并对美国社会做切片般的精准分析，被全球众多特稿记者视为新闻书写的典范。——译者注

[72]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73] Author Interview with Former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Who Spoke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Due to the Sensitivity of the Remarks, 31 August 2016.

[74] 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于1980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名流家庭，自己是演员和服装设计师，更因举动出位而成为当今美国娱乐界的话题人物。——译者注

[75]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76] Nordland, Rod, “Top Afghans Tied to’ 90s Carnage, Researchers Say, ” *New York Times*, 22 July 2012, www.nytimes.com/2012/07/23/world/asia/key-afghans-tied-to-mass-killings-in-90s-civil-war.html.

[77] Wafe, Abdul Waheed, “Former Warlord in Standoff with Police at Kabul Home, ” *New York Times*, 4 February 2008,

www.nytimes.com/2008/02/04/world/asia/04afghan.html; Gall, Carlotta, "Ethnic Uzbek Legislator Beaten, Afghans Confirm, " *New York Times*, 30 June 2006, www.nytimes.com/2006/06/30/world/asia/30afghan.html.

[78] "Afghanistan: Forces Linked to Vice President Terrorize Villagers, " Human Rights Watch, 31 July 2016, <https://www.hrw.org/news/2016/07/31/afghanistan-forces-linked-vice-president-terrorize-villagers>.

[79] Partlow, Joshua, "Dostum, a Former Warlord Who Was Once America's Man in Afghanistan, May Beback, " *Washington Post*, 23 April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dostum-a-former-warlord-who-was-once-americas-man-in-afghanistan-may-be-back/2014/04/23/9d1a7670-c63d-11e3-8b9a-8e0977a24aeb_story.html?utm_term=.353f99b7d698.

[80] Vasilogambros, Matt, "Afghanistan's Barred Vice President, " *Atlantic*, 25 April 2016,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6/04/afghanistan-dostum-barred/479922/>.

[81]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82] Nissenbaum, Dion, "When Hillary (Almost) Met the Warlord, " McClatchy, 22 November 2009, blogs.mcclatchydc.com/jerusalem/2009/11/when-hillary-almost-met-the-warlord.html.

[83]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84]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85] Rahim, Fazul, "Afghanistan's Warlord-Turned-VP Abdul Rashid Dostum Fights for Fitness, " *NBC News*,

<http://www.nbcnews.com/news/world/afghanistans-warlord-turned-vp-abdul-rashid-dostum-fights-fitness-n265451>.

[86]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87]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88] Risen, James, “U.S. Inaction Seen after Taliban P.O.W.’s Died,” *New York Times*, 10 July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7/11/world/asia/11afghan.html/>.

[89] Barry, John, “The Death Convoy of Afghanistan,” *Newsweek*, 25 August 2002, www.newsweek.com/death-convoy-afghanistan-144273 and Risen, James, “U.S. Inaction Seen after Taliban P.O.W.’s Died,” *New York Times*, 10 July 2009, www.nytimes.com/2009/07/11/world/asia/11afghan.html.

[90] US Diplomatic Cable, from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to White House, OP 260221Z, 2008, Accessed Via FOIA Request from Rubenstein, Leonard,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Case No. 200802926, 4 August 2008.

[91] Dasht-i-Leili FOIA’d State and DOD Cables, p. 19 in State Dept pagination, p. 32 in PDF.

[92] Dasht-i-Leili FOIA’d State and DOD Cables, p. 19 in State Dept pagination, p. 32 in PDF.

[93]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94]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95]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96] “A Mass Grave in Afghanistan Raises Questions, ” NPR, 22 July 2009.

[97] Author Interview with Mark Nutsch, 7 February 2018.

[98] Author Interview with Mark Nutsch, 7 February 2018.

[99]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100] “Afghan Vice-President Dostum Injured in Taliban Ambush, ” *Hindustan Times*, 17 October 2016, www.hindustantimes.com/world-news/taliban-militants-ambush-afghanistan-vice-president-s-convoy/story-UQdKiuhxtFoddiT6NUpwiK.html.

[101] Facebook Video Posted by Esmat Salehoghly Azimy, ATVFootage, Uploaded 25 November 2016, <https://www.facebook.com/esmat.azimy/videos/vb.100002358908259/1170150113073608/?type=2&theater>.

[102] Rasmussen, Sune Engel, “Vice-President Leaves Afghanistan amid Torture and Rape Claims, ” *Guardian* (Manchester) , 19 May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may/19/vice-president-leaves-afghanistan-amid-torture-and-claims>; Masha, Mujiib and Abed, Fahim, “Afghan Vice President Seen Abducting Rival, ” *New York Times*, 27 November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11/27/world/asia/afghan-vice-president-is-accused-of-assaulting-rival-and-taking-him-hostage.html?_r=0; Masha, Mujib and Abed, Fahim, “Afghanistan Vice President Accused of Torturing Political Rival, ” *New York Times*, 13 December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12/13/world/asia/political-rival-accuses-afghanistan-vice-president-of-torturing-him.html?rref=collection%2Ftimestopic%2FDostum%2C%20Abdul%20Rashid&action=click&contentCollection=timestopics®ion=stream&module=stream_unit&version=latest&contentPlacement=8&pgtype=collection.

[103] Wafa, Abdul Waheed, “Former Warlord in Standoff with Police at Kabul Home, ” *New York Times*, 4 February 2008, www.nytimes.com/2008/02/04/world/asia/04afghan.html.

[104] 在阿富汗政治组织机构中，首席执行官可以视作政府首脑，相当于总理或首相级别的行政事务最高负责官员，但权力又略低于总理或首相。——译者注

[105] Ahmed, Azam, “Afghan First Vice President, an Ex-Warlord, Fumes on the Sidelines, ” *New York Times*, 18 March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03/19/world/asia/afghan-first-vice-president-an-ex-warlord-fumes-on-the-sidelines.html>.

[106] “Afghan Vice-President Dostum Accused of Sex Assault, ” BBC, 13 December 2016, www.bbc.com/news/world-asia-38311174.

[107] Nordland, Rod and Sukhanyar, Jawad, “Afghanistan Police Surround Vice President’s House, ” *New York Times*, 21 February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1/world/asia/abdul-rashid-dostum-afghanistan.html>.

[108] Bearak, Max, “Behind the Front Lines in the Fight to ‘Annihilate’ ISIS in Afghanistan, ” *Washington Post*, 23 July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behind-the-front-lines-in-the-fight-to-annihilate-isis-in-afghanistan/2017/07/23/0e1f88d2-6bb4-11e7-abbc-a53480672286_story.html?utm_term=.391eec1930b5.

[109] Schwarz, Jon and Mackey, Robert, “All the Times Donald Trump Said the U.S. Should Get out of Afghanistan, ” *Intercept*, 21 August 2017, <https://theintercept.com/2017/08/21/donald-trump-afghanistan-us-get-out/>.

[110] “Full Transcript and Video: Trump’s Speech on Afghanistan, ” *New York Times*, 21 August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8/21/world/asia/trump-speech-afghanistan.html>; and Gordon, Michael, “Mattis Orders First Group of Reinforcements to Afghanistan, ” *New York Times*, 31 August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8/31/us/politics/trump-mattis-troops-afghanistan.html?rref=collection%2Ftimestopic%2FAfghanistan>.

[111] Rucker, Philip and Costa, Robert, “ ‘It’ s a Hard Problem’ : Inside Trump’ s Decision to Send More Troops to Afghanistan, ” *Washington Post*, 21 August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its-a-hard-problem-inside-trumps-decision-to-send-more-troops-to-afghanistan/2017/08/21/14dcb126-868b-11e7-a94f-3139abce39f5_story.html?utm_term=.3255b6d552c7.

[112] Nordland, Rod, “The Empire Stopper, ” *New York Times*, 29 August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8/29/world/asia/afghanistan-graveyard-empires-historical-pictures.html?rref=collection%2Ftimestopic%2FAfghanistan>.

[113] Landay, Jonathan, “Despite Expected U.S. Troop Hike, No End in Sight to Afghan War, ” Reuters, 22 August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ump-afghanistan-diplomacy/despite-expected-u-s-troop-hike-no-end-in-sight-to-afghan-war-idUSKCN1B2009>.

[114] Toosi, Nahal, “State’ s Afghanistan-Pakistan Envoy Leaves, Spurring Confusion about U.S. Diplomacy in Region, ” *Politico*, 23 June 2017, www.politico.com/story/2017/06/23/trump-administration-dissolves-afghanistan-pakistan-unit-239901.

[115]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Dostum, in Person 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29-30 August 2016.

19 白野兽

所有的男子都留着胡子，有的染成了红色，有的是白色或黑色的。他们坐在午后的阳光下，头上包着各种图案的头巾和祈祷帽，在喝茶。这里是位于非洲之角地区的小国厄立特里亚（Eritrea）首都阿斯马拉（Asmara），我看到这些人时，他们正在恩巴索伊拉

（Embasoira）酒店附近一个带围墙的花园里，围坐在一只金属咖啡桌旁。时间是2008年的第一天，非洲之角正深陷于混乱中，阿斯马拉却平静如海市蜃楼。宽阔的林荫大道被低垂的棕榈树及金合欢织成的树荫遮蔽着，两旁成排矗立着保存完好的各种风格精美建筑——罗马式、装饰风、巴洛克式、立体派等，都是数十年意大利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建筑。即便阿斯马拉这个名字都给人造成美丽的错觉——在提格利尼亚语中，意思是“他们使其团结起来”，对于一个充满了战争元素和从附近索马里内战中放逐出来的异见分子的城市来说，这个名字的含义显得名不副实。这些在恩巴索伊拉酒店喝茶的男子就在被放逐之列。我的翻译倾身凑到我耳边低语：“他们就在那里！”

“谁？”我问。

他摇了摇头，然后回答说：“伊斯兰法院联盟（Islamic Courts Union, ICU）的人。”按我力所能及的理解，翻译摇头意味着有麻烦。伊斯兰法院联盟是由一些奉行沙利亚法规（Shari'a Rules）的伊斯兰法院组成的松散联盟，在局势动荡已为常态的索马里，该联盟一度成为唯一的替代政权机构。索马里原政府在1991年被推翻后，当地政局陷入无休止的军阀混战、背叛和欺骗当中。这些法院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有些开倒车，但总的来说没有暴力野心。尽管如此，美国出于对索马里可能成为下一个阿富汗的担心，还是为一系列当地的战斗力量提供了支持，意欲驱逐伊斯兰法院联盟。中央情报局做出武装杜

斯塔姆及其他阿富汗军阀的决定后不久，又开始与索马里的军阀建立类似的联盟。后来，这些联盟引起剧烈反弹，反而激起民众对伊斯兰法院联盟的支持时，五角大楼又转向埃塞俄比亚军队，支持后者入侵索马里，结果将伊斯兰法院的领导人驱散到阿斯马拉等城市，把激进分子留在了索马里本土，加速了恐怖组织青年党（Al-Shabaab）的崛起。过了一年多以后，我在恩巴索伊拉酒店外边看到那些流亡伊斯兰法院联盟官员的那个下午，这种形势转变已然在进行当中。美国人选择了一个地方性的麻烦，然后将其变成了对国际安全构成挑战的恐怖主义新威胁。

在“9·11”后政策形成的年月里，一场争夺美国外交政策控制权的斗争也同样在非洲之角展开，如同在阿富汗一样。在这二者当中，军事和情报解决方案双双胜出。同样在这二者当中，美国都主动地破坏了外交机会。依然是在这二者当中，政策失衡效应双双波及了全球所有地区及国家。

很难想到比伍本格林（Wooburn Green）距离索马里更远的地方了，这是位于英国伦敦郊区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工薪阶层聚居区。也很难想到比萨莉·埃文斯（Sally Evans）更不可能受到非洲之角乱局影响的人了，我第一次见到她，是2016年在伍本格林一栋矮砖房的狭小厨房里。埃文斯当时有58岁，一头花白的头发剪成干练的中长波波头发型，脚蹬一双软底舒适鞋。她在厨房里移动着，递给我一杯速溶咖啡。“我们只是普通人^[1]，”她说，望了眼窗外绿树成荫的街道，“我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没有。”然而萨莉·埃文斯却有着一个秘密，一个她所在的伍本格林街道中所有其他母亲们都无法理解的秘密。

埃文斯的两个儿子托马斯（Thomas）和迈克尔（Michael）从小一起长大。在家庭录像中，两人让人分不清谁是谁：一样的无忧无虑和

瘦削，在一起笑着闹着，有着完全一样蓬乱的棕色头发。“我们差不多任何事情都一块儿做，”迈克尔告诉我，“从小到大我们有的也是同一群朋友。”托马斯19岁时，这一切开始改变。萨莉表示，托马斯皈依伊斯兰教时，她认为是件好事，表明他开始寻求生命中更多的道德存在。但那是在托马斯搬去一座强硬保守派清真寺之前。而在那之后，萨莉回忆说，“小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比如他的外表，他留起了胡须，不再听音乐，不再吃我的东西了，我烧的饭不再适合他了，因为那不是清真食品。他根本把自己与我们隔离了”。有些事情的发展带着荒谬色彩，节日期间，只要家里客厅中摆了圣诞树，托马斯就不会待在客厅。

他开始关着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电脑上。“他总是在楼上卧室里”，萨莉回忆说。“我无法相信他就那么长时间地坐在那儿，浏览脸书或其他什么”，迈克尔补充道。“他就那么待在那儿，尤其专门在看——”他停顿了一下，“看他被告知要看的東西。”

然后托马斯开始试图离开这个国家。2011年2月，他在登上飞往肯尼亚的航班之前，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反恐警察拦下。几个月后，他成功地登上了飞往埃及的航班。最初，他告诉母亲他去那里学习阿拉伯语^[2]。但他一消失就是好几个月，再次出现时已经是2012年1月，他打电话给萨莉，说自己在索马里。他已经加入了青年党。“他告诉我们了，是不是？”她转向迈克尔说。“上了网，查找他们，看他们都是谁，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变成了什么人。”萨莉恳求儿子回家，她告诉他，他所做的“是不对的”。托马斯只是不停地祷告安拉。

“我说‘不，不，不’，”萨莉告诉我，“‘没有上帝会指引你做这个^[3]’。”

在随后的一年里，母亲和儿子陷入了一种奇怪的节奏。托马斯把名字改成了阿卜杜勒·哈基姆（Abdul Hakim），并获得了“白野兽”

的称号。他每隔几周就会打电话回家。关于“白野兽”生活的新消息变得越来越陌生，萨莉感觉这头“白野兽”已经不是自己养育的儿子了。一次通话中，托马斯告诉萨莉，他娶了一个十三四岁不会说英语的女孩。其他通话中，他避而不谈自己新生活中的暴力。萨莉·埃文斯在日记中，对部分母子对话做了记录。“托马斯来电话了^[4]，”她在2012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我问他是否伤害过任何人，他没有回答。”

托马斯离家后一年，我在内罗毕的一条小巷里弯腰捡起了一个空弹壳。在我身后，西门购物中心（Westgate Shopping mall）的石膏外墙立面上仍然残留着最近枪击案中扫射上去的弹孔。我和一个电视新闻制作小组在那里报道当时刚发生不久的袭击事件，这次袭击也为萨莉·埃文斯提出的问题提供了明确答案：如果她的儿子没伤害任何人的话，那么他的同伴绝对伤害了。

好几位在几周前那次武装袭击中幸存的人在这条两侧建筑上布满弹孔的小巷里与我会合，讲述了至今仍然血腥和痛苦的记忆——这次袭击可谓青年党截至当时策划的最为精心的行动。普蕾亚姆·塞西米（Preeyam Sehmi）是位艺术家，她那天吻别了未婚夫不久，去办了点小事之后，来到距离她家不远的这座高档购物中心，与一位朋友碰面喝咖啡。塞西米和这位朋友聊了一个来小时自己作为本地艺术家的工作，然后在12点半左右起身付账。她正在等待找零的当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撼动了整个建筑。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是看到人们飞下了椅子，飞过了桌子”，她回忆说。然后“每个人都到了地上”，有些人爬着寻找安全地带，其他人那时已经一动不动，没有了生命迹象。这些场景慢动作一样在她脑海里回放，“就像在电影中一样”。塞西米就近躲进了一家服装店，等待着，捂着耳朵，不敢去听一波又一波的枪声和尖叫声^[5]。

端着机枪的年轻人大多数穿着便衣，其中一部分人戴着头巾，他们冲进购物中心，投掷手榴弹，朝男女老幼疯狂地扫射。那些在最初袭击中幸存下来的人被劫持为人质，并遭受了可怕的酷刑和残害^[6]。尽管肯尼亚当局想尽办法干预，但袭击者仍然占据了购物中心整整三天。塞西米是得以逃脱的幸运者之一，经过6个小时紧张的躲藏后，被警察悄悄解救了出来。降服袭击者的突袭结束时，共有72人被杀，其中61人是平民^[7]。

青年党很快就声称对此负责，宣称是为了反对外国干涉索马里^[8]的行为。该组织之前曾成功地在索马里境外发动袭击，其中包括2010年在乌干达制造的爆炸事件，造成76人死亡^[9]。内罗毕购物中心枪击案让全世界鲜明地看到了该组织的国际抱负，美国将此事件视为“直接威胁”^[10]，并派遣联邦调查局特工前往事发现场寻找线索。

托马斯·埃文斯对其家人声称自己没有直接参与袭击购物中心，但他从远方对袭击的发生拍手称快。他表示，这正是自己加入青年党的原因。“2013年11月14日与托马斯通了话，不是一次好的谈话，”萨莉·埃文斯事发后不久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我们为肯尼亚购物中心遭挟持一事争吵。他没有参与，我自私地松了口气^[11]，但也对他非常生气，因为他认为谋杀外出购物的无辜男女老幼是可以的。”

萨莉·埃文斯家庭解体，托马斯·埃文斯所在组织及全球各地其他年轻人所制造的暴力事件在那一时期蜂拥出现，均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长周期运作机制相连。事实证明，美国在阿富汗和索马里建立的相似联盟均可追溯到数十年前。多年来，苏联和美国均试图用钱换取索马里强势独裁者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的忠诚，希望得以控制这个具有战略地理位置的国家。巴雷政权被推翻后，索马里陷入混乱，美国以及包括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和邻国埃塞俄比亚在内的其他外国支持者所提供的枪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国际施以人道主义保护的尝试以惨败告终。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索马里”这个词马上激起的联想是“黑鹰坠落”的短语，这是马克·鲍登（Mark Bowden）所著的一本非虚构类畅销书的书名，也是一部好莱坞大片的片名，两部作品均记录了1993年10月的摩加迪沙战役夺走十多位美军士兵生命的过程。西方国家军队最终撤出了索马里，该国陷入了军阀统治状态。

在随后的十年中，军阀统治之外只出现了一种替代权威：伊斯兰法院，它在21世纪初积蓄了实力，并变得越来越正式化。在埃塞俄比亚的地区性对手厄立特里亚资助和武装下，这些法院开始联手，最终12家法院于2004年集结到一起，打出了共同的旗号——伊斯兰法院联盟。

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遭遇爆炸袭击后，而且尤其明显的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伊斯兰法院联盟成为几任美国领导人始终揪住不放的关注点。但有一个问题是：熟知该地区复杂动态的非洲专家们认为，在美国新开始的反恐战争中，几乎不存在将索马里当作焦点的基础。“‘9·11’之后这里有种感觉，就是索马里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阿富汗，成为一个恐怖主义训练场和支持全球恐怖主义的新源头，”在非洲两次出任大使且担任过奥巴马总统派驻苏丹特使的普林斯顿·莱曼（Princeton Lyman）对我表示，“真的，索马里并没有具备这些条件^[12]。”曾在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担任反恐顾问的分析师肯·门克豪斯（Ken Menkhaus）在2002年时曾估计，与“基地”组织有“重要联系”的索马里人不超过十个。“没有必要^[13]急着突进到索马里。”已退休的美国外交官大卫·希恩（David Shinn）对这一估算表示赞同。

伊斯兰法院联盟甚至看起来具有稳定作用，这些法院可能非常保守^[14]，可以判小偷截肢，判通奸者被乱石砸死，甚至宣布体育是违

法的恶魔行为。但是除了在索马里境内维持伊斯兰法律之外，其没有表现出其他极端主义野心，具有更广泛圣战愿望的神职人员只是少数，没有多少影响力。总共97个法院^[15]中，只有9个受青年党控制。根据伊斯兰法院联盟的裁决，港口和机场多年来首次开放^[16]。甚至当时的美国外交系统电报都承认，在伊斯兰法院联盟的统治下，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运作也已经取得了进展^[17]。

但是美国军事和情报界一心想要推翻伊斯兰法院联盟。在黑鹰事件的阴影下，直接干预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因此，另一场秘密代理战争成形了。到200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已开始悄悄地接近被其视为倾向世俗的军阀^[18]，提议以结盟为条件，换取反恐合作。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中情局向索马里各地的部族领导人和军阀提供了财务援助。由中央情报局内罗毕站负责运作的这次行动就是一场小规模代理战争。军阀们的口袋里揣进了美元，作为交换，他们负责与伊斯兰法院联盟以及疑似的武装分子作战——无论这些打击目标是否真的与“基地”组织有关联。这一行动不断扩大，直到“最终大约十个民兵组织的领导人在美国支持下集结到了一起”，马修·布莱登（Matthew Bryden）回忆说。他曾领导一个联合国小组，专门负责监测该地区的武器流动^[19]情况。美国支持的军阀甚至被赋予了一个宣传上叫得好听的头衔：恢复和平与反对恐怖主义联盟（The Allianc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Counter-Terrorism），首字母缩写为ARPCT，其不便记忆程度也足以让任何政府官僚机构引以为自豪了。中情局在索马里的战略与其拥抱阿富汗北方联盟军阀的策略如出一辙：表面上看，这些军阀如果不是好人的话，也是相对更好的人；如果他们不是真的世俗人，也至少比另外那些人更世俗。

说索马里军阀带来难题，都是轻描淡写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1993年时曾在摩加迪沙街头与美军作战^[20]。有些人，例如优素福·穆罕默德·西亚德（Yusuf Mohammed Siad）多年

来一直与“基地”组织紧密结盟。西亚德在战场上的绰号是“白眼”，或者，对于记得此人20世纪90年代在占据索马里大片区域后施行血腥统治的人来说，他还有个绰号叫“屠夫”。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法祖尔·阿卜杜拉·穆罕默德（Fazul Abdullah Mohammed）是1998年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两起恐怖袭击美国大使馆事件的幕后主使之一，他向中央情报局寻求庇护时，是“白眼”为他提供了安全避风港。

“9·11”之后，“白眼”成了一大能言善辩的反美情绪制造者。然而，他在媒体采访中却声称，中央情报局在同一时期主动来找他。

“他们提出给我资金^[21]，他们提议为我控制的地区提供资金。”他2011年时说。当时，他拒绝了。

不过其他进展是成功的。中央情报局人员2002年底接洽了穆罕默德·阿夫拉·甘亚雷（Mohamed Afrah Qanyare），希望能得益于后者位于摩加迪沙附近的私人机场及手下的1500多名民兵。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在2003年完成了这笔交易，开始了一系列定期会议和建立了昂贵友谊——按照甘亚雷的估算，美方使用机场并表面上给予他手下人效忠的费用，每个月为10万～15万美元。或者是按照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要求，或者是出于他们自己心照不宣的理解，甘亚雷以及另外几位军阀开始对所谓的伊斯兰恐怖分子^[22]展开捕杀行动^[23]。有时，军阀追杀的目标被直接处决；其他时候，他们被交给美方拘留，例如苏莱曼·艾赫迈德·哈米德·萨利姆（Suleiman Ahmed Hemed Salim），他从索马里被转移到阿富汗的一连串监狱里关押。

中央情报局与军阀的关系破坏了索马里的稳定。到了21世纪头十年中期，军阀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变得非常不受欢迎。因为经常把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没有明显瓜葛的领拜师和教长作为目标，捕杀行动激怒了伊斯兰主义情绪。“这是一颗定时炸弹，”摩加迪沙市长谈到美国对军阀的支持时说，“他们在等待^[24]，他们要削弱政府，他们在等待政府垮台的时候，以便每个人都能占领一个地区。”为了对抗军

阀，索马里于2004年成立了新一届脆弱的过渡政府，其总统阿卜杜拉希·优素福·艾哈迈德（Abdullahi Yusuf Ahmed）在与美国大使的一次会晤中“大声地质疑为什么美国要在摩加迪沙公然地展开战争[\[25\]](#)。”。

在此后的几年里，军阀联盟成了信天翁。乔治·W. 布什第二总统任期内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杰延达伊·弗雷泽（Jendayi Frazer）告诉我，国务院只是继承了中央情报局的政策，几乎没有参与讨论的机会。她说：“中情局2002～2005年在索马里的行动是在非公开渠道展开的，没有经过机构间的讨论或辩论。”经由理查德·A. 克拉克（Richard A. Clark）的白宫反恐安全小组参与，与索马里军阀的联盟关系终于得以在中情局以外的对话中浮现，但它“对于除了中情局以外的每一个机构间人士来说，都是很大的惊讶”。弗雷泽觉得中央情报局当初是想给通知美国外交官这一选项打个钩的，但实际上并没这样做。“只是对你直言不讳[\[26\]](#)，”她告诉我，“我认为他们确实将事实提交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只不过是以一种确保没人能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的方式。所以他们说我们已经知道了。”

尽管如此，弗雷泽及外交系统中上上下下的人员一旦知晓了美国与军阀之间的联盟，就得开始为这些关系辩护。2006年的外交电报描述了在索马里使用“非传统联络伙伴（如民兵领袖）”以“追踪和消除高价值目标[\[27\]](#)。”的政策。反对使用军阀的外交官很快便被撤换。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的政务官员迈克尔·佐里克（Michael Zorick）就此问题提交了一份表达异议的电报，然后马上就被调任去了乍得[\[28\]](#)，此调任被广泛认为是对他提出太多问题的惩罚。

一个外交解决方案成形了，但被视为一种不便，是需要扼杀在萌芽状态里的东西。2004年，索马里的邻国聚集在一起，展开了一场密集外交活动，以寻求创建可替代军阀或伊斯兰法院的执政机构。索马

里新的过渡政府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但它连摩加迪沙之外几个街区的事情都控制不了，也没有能力抵抗由美国支持的强人们。因此，政府间发展管理局（IGAD）成员国于2004年10月举行会议，一致呼吁非洲国家部队进驻索马里，以确保刚刚起步的政府保持完整。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是非洲的一个区域贸易集团，成员国包括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厄立特里亚、苏丹、肯尼亚和乌干达。两个月后，过渡政府、联合国、非洲联盟、欧盟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肯尼亚开会，讨论为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提议的任务制订计划。到2005年的最初几个月，对于非洲联盟加入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动议，国家元首们通过了一项欢迎“和平支援行动”的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在年底前正式对该决议表示支持。

参与谈判的资深埃塞俄比亚外交官泰克达·阿勒穆（Tekeda Alemu）认为，组建区域维和部队可以避免灾难。“我是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团长，”他告诉我，“我们一致接受了这一提议。”他有些吃惊地注意到，连埃塞俄比亚最充满敌意的区域内竞争对手厄立特里亚都表示了合作态度（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共同签署维和动议，好比以色列与哈马斯协议合作，是非同寻常的进展）。阿勒穆形象不凡，灰白的头发被修剪成短短的平头发型，戴着教授风格的眼镜，还有不多的显示非洲新贵身份的“亮闪闪”：一枚沉甸甸的金戒指，一只镶着施华洛世奇水晶边的超大腕表。我跟他说话时，他正坐在纽约曼哈顿中城埃塞俄比亚代表处旧兮兮的办公室里，与非洲之角有一个世界之隔。我们坐在那种在平价家具零售商雷蒙弗拉尼根（Raymour&Flanigan）店里就能买到的宽大绒面革沙发上，一只塑料垂叶榕在他身后低垂着头。“那个时候，美国一方还没有问题[29]，”他叹了口气告诉我，“问题是后来才出现的。”

“问题”是到了非洲国家开始努力保护过渡政府免受军阀侵害时，美国已经把赌注压在了另一方。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都把

眼睛盯在摧毁无论是感觉中还是实际上的伊斯兰威胁这个单一目标上。该地区出现的更广泛外交动议是让人厌烦的麻烦事，或者说更糟糕的是，这些动议可能带来反对美国合作势力的结果。名义上，弗雷泽之类国务院官员所阐述的美国政策不置可否，但关起门来，美国开始发动外交攻势，破坏对维和人员的部署。

2005年初，经过数月的激烈谈判，国际维和部队基本上已准备就绪。美国悄悄地抗拒——往往是通过国务院官员进行的，但所执行的政策根本上是由情报界所设计的。2005年2月，代表国务院人口、难民与移民事务局（Bureau of Population Refugees and Migration）在美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马克·梅兹纳尔（Marc Meznar）会见了欧盟官员马克·布塞（Mark Boucey），明确表达了美国对维和行动的反对。当时，一个欧盟小组正在内罗毕进行支持该项倡议的事实调查，并计划前往摩加迪沙，以协助国际部队几天后进驻该市。梅兹纳尔与布塞会晤后不久，欧盟团队取消了摩加迪沙之行。五角大楼也动用了自己的关系：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特雷莎·惠兰（Theresa Whelan）会见了一位名叫马修·里斯（Matthew Reece）的欧盟官员，后者随后将欧盟曾经支持过的维和动议宣称为“不靠谱计划”。几周后，欧盟各成员国开始向维和人员提供支持时，正在美国驻罗马大使馆担任公使衔政务参赞的康特里曼被派去与意大利官员会面^[30]，以警告后者不要这样做。

最后，当国际社会对维和行动的支持基本合拢时，唯一剩下的一个条件就是解除1992年开始实施的对索马里的武器禁运，以便维持和平部队能够训练士兵。而到了最后一刻，美国又在议事程序上抛出绊马索，就承诺出兵一事，向所涉及的非洲国家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发送了一份简短声明。“我们不打算资助在索马里部署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部队的行动，并且不准备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有关部署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部队^[31]的命令，”声明写道。后来，美国公

开威胁会否决任何让维和人员进驻索马里的倡议。国际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

当时武官里克·奥思（Rick Orth）上校对美国的反对意见做出了清楚的解释：“我们不想让这一第三方次要行动^[32]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鉴于至少有一些伊斯兰法院联盟的领导人过去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中情局正采取行动有选择地追剿一些人^[33]……这样做不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解决方案，我们只是在追剿更有针对性的目标”。

埃塞俄比亚外交官泰克达·阿勒穆表示，美国对该计划的反对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这很清楚，”他回忆说，“他们甚至不想看看我们的计划是否有效，好还是不好。这一计划连机会都没得到。”一名助手在他面前放了一杯埃塞俄比亚黑咖啡，他端起来，皱起眉头，然后又把杯子放下，继续对那一失败的外交努力反思着。“显然他们有某种计划，”他这样谈论美国人，“（用）跟他们合作的军阀在摩加迪沙捕获一些人，所以他们不希望任何人破坏这个计划……他们有自己的行动计划，并且不想以任何方式受到不利影响。”他再次端起咖啡。“这是超级大国做事的方式^[34]”，阿勒穆喝了口咖啡，笑了笑。

美国官员认为他们的反对是有正当理由的，包括参与派遣维和部队的非洲国家缺乏能力以及费用等。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派遣所谓“前线国家”——索马里的直接邻国，如埃塞俄比亚——将引发地区紧张局势。这种说法并不属实：该计划已经要求从非邻国中出兵。但是美国人认为，即使是埃塞俄比亚的间接支持，在索马里内部也会被视为更强大的国家在攫取权力^[35]，而使暴力进一步加剧。这一立场很快就令人难以忘怀地被证明是虚伪的。

在没有维和部队来反对军阀的情况下，起到平衡作用的就只有伊斯兰法院联盟了。不出所料，法院越来越受欢迎，不断壮大，在2004～2006年控制索马里境内的大部分领土。最后，经过数月的残酷战斗[\[36\]](#)，它从美国支持的民兵手中夺取了对摩加迪沙的控制权。“人们——摩加迪沙人民——开始钦佩这个伊斯兰法院，”泰克达解释道，“他们能够击败一群受到大国支持的人，那些军阀。伊斯兰法院开始受到追捧，这也是他们开始变得自我膨胀，直至完全无法控制[\[37\]](#)的原因。”

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阀失败后不久，五角大楼开始制订另一项驱赶伊斯兰法院联盟的计划。美国人依然忌讳直接干预，于是转向依靠自己的长期盟友——索马里在地区内的对手埃塞俄比亚。美国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金主[\[38\]](#)，而埃塞俄比亚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着美国的支持，成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存在[\[39\]](#)。

在2006年发布的声明中，美国还谨慎地与埃塞俄比亚保持着距离，也刻意地避免给人留下自己在主导战争的印象——人们已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是一场美国的代理人战争。“情况并不是说我们举行了重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说‘嘿，我们为什么不找埃塞俄比亚人来——’不是的，我们没有那么做。是埃塞俄比亚人自己的所为。”我问到美国在入侵索马里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当时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海登将军有些踌躇地说。他耸了耸肩：“他们有理由这样做。”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埃塞俄比亚人的这一举动与美国的目标完全契合。“鉴于当时索马里所处的混乱局面[\[40\]](#)，”他说，“这种现成的缓和疗法当然很受欢迎。”

对于埃塞俄比亚入侵索马里只是正中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下怀的说法，许多人都提出过质疑。肯尼亚前军方官员、反恐专家西米乌·瓦伦加（Simiyu Werunga）认为：“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

助，伊斯兰法院联盟散架^[41]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这是地区内的普遍感受。”两国之间秘密合作的背景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支持：

“9·11”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埃塞俄比亚的秘密监狱里审讯了来自19个国家的恐怖分子嫌疑人^[42]；这些监狱因充斥虐待、酷刑以及囚犯无故死亡而臭名昭彰。

美国在该行动中所扮演角色的证据在2006年中不断显现。美国开始公开强调伊斯兰法院联盟侵犯人权^[43]，并捍卫埃塞俄比亚出兵干预的想法。这一时期的国务院保密备忘录显示支持入侵的决定已然做出，其中一份文件指出，美国有意“与埃塞俄比亚联手，如果‘圣战者’完全掌控政权的话”。这份备忘录还进一步澄清：“埃塞俄比亚人在索马里的任何行动^[44]都将得到华盛顿的祝福。”

在埃塞俄比亚2006年12月当真发动进攻，驱兵数千人入侵索马里时，它所得到的已不仅仅是美国的祝福。美国特种部队还秘密地以顾问和培训人员的身份^[45]，为埃塞俄比亚军队保驾护航。美国海军也集结在沿海地区，提供额外支援，而美军的空袭更是为埃塞俄比亚的空中攻势^[46]提供了补充。“美国的立场是‘从埃塞俄比亚人那里了解他们想要什么，然后我们就提供^[47]’，”一位因为该行动保密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防部高级官员说，“很多都是情报和特殊行动支持……我被告知他们不仅仅是提供咨询，他们基本上是在与埃塞俄比亚特种部队合作。”

从战术角度看，这项行动是成功的。在新年到来之际，埃塞俄比亚军队加上美国支持所产生的联合力量，已将伊斯兰法院联盟打得分崩离析，纷纷逃离摩加迪沙。在2007年1月的一次晚宴上，阿布扎比王储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不经意地对美国中央司令部老板约翰·阿比扎伊德（John Abizaid）表达了称赞：“索马里的活儿干得漂亮^[48]。”

但是，埃塞俄比亚入侵索马里、成功荡平伊斯兰法院联盟正式建制的同时，也成功地给予了伊斯兰主义者新生的契机。抗议埃塞俄比亚部队入侵的活动^[49]几乎立即开始，入侵行动本身轻易地激发了索马里人对埃塞俄比亚的历来仇恨，而极端主义分子也立刻开始对这种情绪加以利用。“（埃塞俄比亚军队）入侵使青年党的诉求合法化，为他们在索马里境内和海外侨民中都赢得了广泛支持，因为他们能够合法地宣布圣战^[50]”来对抗占领军，布莱登解释说。连弗雷泽都承认，“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入侵（对青年党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51]，确实”。

对于青年党有利的另外一点是，埃塞俄比亚入侵导致伊斯兰法院联盟中许多温和多数派领袖逃离索马里，留下来的往往是愿意留守并战斗的强硬派^[52]，包括青年党的领导层。入侵后的一年中，青年党从一个影响有限的边缘团体转变为有战术影响力的组织，其野心超越了索马里的国界——它开始在世界各地招募人员，其血腥的信息也传递到了伦敦郊区，触动了一位心理充满挣扎和愤怒的年轻人，并在他心中激起了其家人永远不得其解的玉石俱焚的冲动。

青年党也很巧妙地利用这种反美情绪，在一份声明中声称，美国的“犹太人”已经指使埃塞俄比亚来“玷污”索马里^[53]。“基地”组织意识到这种措辞的力量，加强了对索马里极端主义组织的支持^[54]。招募人数飙升^[55]。入侵之后的2007～2009年是“青年党成长最快的时期^[56]”，布莱登回忆称，“因为他们是在造反”。

2008年，美国将青年党界定为恐怖组织^[57]。几年后，青年党宣布与“基地”组织正式建立联系，完成了将其诉求从索马里政治到全球圣战^[58]的转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将索马里从青年党的铁钳中解脱出来，美国被迫转而使用了在2004年避开使用的维和解决方案。从2007年开

始，一支国际力量——非洲联盟驻索马里代表处（AMISOM）——成为治疗混乱的唯一潜在解药。弗雷泽回忆说^[59]，随着维和行动越来越活跃，它“创造了空间^[60]……让埃塞俄比亚人可以扮演能见度更低的角色”，并最终“说他们将要离开，而这将实质性地否定青年党做出的反占领宣传”。

美国在随后的几年里又对新的力量给予支持。2012年2月，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61]前往乌干达，训练这时已经配备了从地雷探测器到防弹衣等美军装备的AMISOM作战工程师。美国国防部供应商名单上的私营承包商^[62]也派人提供培训，更加大了支持力度。对这一想法抵制了这么多年之后，美国接受了地区外交所产生的多国维和部队方案，多年来第一次给该地区带来了稳定的初步迹象。在青年党和政府军之间的战斗中遇害或致残的儿童数量^[63]下降，选举重新展开。

然而，正如在阿富汗一样，美国探险失利所留下的伤痕仍然存在，军阀实力也被证明已根深蒂固。如“白眼”之类的部分军阀继续占据着政府部长级高官职务。而即使支持国际维和部队的最佳努力有时也事与愿违：根据一份联合国报告，美国提供给非洲联盟驻索马里部队的武器中，最多可有一半最终落入了青年党手中^[64]。

青年党的威胁被证明难以击退。在某些方面，它有所削弱和平息。但联合国前监察员布莱登认为，该组织更多是变化了，而不是被削弱了。为了应对在索马里的地盘日益减少的趋势，青年党正在“放弃游击战术，而回归其作为秘密恐怖主义组织的本性”，专注于暗杀和简易爆炸装置袭击。“它的能力和战术变得更加复杂^[65]”，布莱登解释道。在我看到流亡的伊斯兰法院领导人在阿斯马拉边喝茶边策划他们下一步行动之后的10年里，青年党造成死亡的名单每年都会增加。2017年9月，一次对港口城镇基斯马尤（Kismayo）附近索马里军事基地的袭击造成了20多名^[66]索马里军事人员死亡。美国与这个在

一定程度上是它自己制造出来的集团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冲突，在那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发动了一连串新的空袭^[67]。

在青年党的国际影响力问题上各方看法不一。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安德斯·福尔克（Anders Folk）曾在一个专注于青年党的工作小组里任职，他认为该组织在美国境内成功发动袭击的前景是“可能的”。他补充说：“他们是否有意愿^[68]对美国境内的无辜者发动暴力恐怖袭击呢？他们的言论告诉我们绝对有。”

在部分人看来，青年党具有国际影响力已经是多年来明摆着的事实。2015年6月14日晚，萨莉·埃文斯独自一人在起居室里，接到了她此生中最糟糕的电话。“那是周日晚上9点35分，”她回忆道，“是名记者，问我对儿子死亡的感受。”她告诉记者儿子并没有死。“我能听见他在试图收回自己的说法，”她说，“他大概在想‘我告诉了她一些她还不知道的事’。”一个小时候，她的另一个儿子迈克尔回到家里。“我从前门进了家。我进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妈妈正坐在客厅的桌子旁。我立刻就感觉到不对头了。”迈克尔登录了推特。起初，他想要查找托马斯·埃文斯，然后他输入了托马斯的新名字，一个他们从未觉得自己真正了解的人的名字——阿卜杜勒·哈基姆。“然后第一个跳出来的信息就是，一张来自肯尼亚军队的照片，里边所有的尸体都摊在街上，铺在泥土里，而且明摆着那就是他。”明摆着，但是，对于萨莉来说，很难相信那与她养大的儿子是同一个人。“看到我的儿子那样躺在地上，我整个人都垮了。而他就那样躺在地上，”她停顿下来，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看起来那么瘦^[69]，一点都不像我的托马斯。”

一段由托马斯拍摄、在他死后由青年党发布出来做宣传的视频，展示了这位来自伦敦郊区的圣战者生命的最后片段。那个月的早些时候，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与其他恐怖分子一道发动了对肯尼亚北部军

事基地的袭击。视频显示，枪声和红色、粉色和蓝色的火花打破了夜晚的平静。最后，埃文斯被击中，相机翻滚到了地上。“我必须承认，是的，我已经看过那段视频了，”萨莉·埃文斯说，“做母亲的不该看到它。那真的太糟糕了，它不是——只是听到——听到最后的时刻，作为一个妈妈，我无能为力。”

托马斯的死对他的家人来说充满了情感矛盾。“我希望上帝能宽恕我，”萨莉·埃文斯说，“但哈基姆走了，又让我感到宽慰，因为他不能再那样做了，不能再给任何人施加痛苦了。”她家里依然到处摆着他的照片。她跟迈克尔一起翻着相册，看着童年时两个男孩身材细长、肤色苍白、露着牙大笑的样子，自己也笑了。“他们99%夺走了他，但还有1%，他还是我儿子，”她说，“我不能放手。”即使他成了阿卜杜勒·哈基姆，“他总是说‘我爱你，妈妈^[70]’”。

萨莉·埃文斯最终不得不赶公共汽车去上班，她陪我走到门口，让我出门走到伍本格林的街道上。我感谢她花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并对她失去儿子表示同情。努力了一下，她笑了。“它永远不会消失的^[71]，”她说，“对吗？”

^[1] Author Interview with Sally and Micheal Evans, 6 October 2016, in Person at Their Home in Wooburn Green, England.

^[2] “Sally Evans Slams UK Anti-Terror ‘Failure’ ,” BBC, 4 February 2015, www.bbc.com/news/uk-england-beds-bucks-herts-31126913.

^[3] Author Interview with Sally and Micheal Evans, 6 October 2016, in Person at Their Home in Wooburn Green, England.

^[4] Author Interview with Sally and Micheal Evans, 6 October 2016, in Person at Their Home in Wooburn Green, England.

[5] Author Interview with Preeyam K. Sehmi, at the Westgate Mall, Nairobi, 13 December 2013.

[6] Strauss, Gary, “Inside Kenya Shopping Mall, a House of Horrors, ” *USA Today*, 27 September 2013, <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2013/09/27/mall-victims-tortured-maimed-in-al-shabab-attacks/2882299/>.

[7] Soi, Nicholas and Dixon, Robyn, “Kenya Says Nairobi Mall Siege Is over, with 72 Dead, ” *Los Angeles Times*, 24 September 2013, <http://www.latimes.com/world/la-fg-kenya-mall-20130925, 0, 3451298.story#ixzz2pz9qglhN>.

[8] Fieldstadt, Elisha, “Somali Terror Groupal-Shabab Claims Responsibility for Kenya Mall Attack, ” *NBC News*. 21 September 2013, <https://www.nbcnews.com/news/other/somali-terror-group-al-shabab-claims-responsibility-kenya-mall-attack-f4B11223876>.

[9] “Hunt for Terrorists Shifts to ‘Dangerous’ North Africa, Panetta Says, ” *NBC News*, 12 December 2011, <https://archive.li/WOplo>.

[10] Kulish, Nicholas and Gettleman, Jeffrey, “U.S. Sees Direct Threat in Attack at Kenya Mall, ” *New York Times*, 25 September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9/26/world/africa/us-sees-direct-threat-in-attack-at-kenya-mall.html?_r=0&pagewanted=all.

[11] *My Son the Jihadi*, Channel 4 Documentary.

[12] Author Interview with Princeton Lyman, 27 February 2017.

[13] Vick, Karl, “Al Qaeda Ally in Somalia Is in Tatters, ” *Washington Post*, 24 February 200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2/02/24/al-qaeda-ally-in-somalia-is-in-tatters/4a0dd409-2bbf-4e76-8131-0a5c9e78e86a/?utm_term=.e6e20c5fc959.

[14] Okeowo, Alexis, “The Fight over Women’ s Basketball in Somalia, ” *New Yorker*, 11 September 2017.

[15] Hansen, Stig Jarle, *Al Shabaab in Somalia: The History and Ideology of a Militant Islamist Group, 2005–201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p. 36, Kindle.

[16] “Mogadishu’ s Port Reopened, ” AlJazeera.com, 23 August 2006.

[17] US Diplomatic Cable 06NAIROBI3441, from Economic Counselor John F. Hoover, US Embassy Nairobi, “Horn of Africa, State– U.S.A.I.D. Humanitarian Cable Update Number 8, ” 8 August 2006, Released by WikiLeaks, <http://wikileaks.org/cable/2006/08/06NAIROBI3441.html>.

[18] Somali Warlord Yusuf Mohammed Siad “Told Me He Was First Approached by the C.I.A. in Dubai in 2004, ” Scahill, Jeremy, *Dirty Wars: The World Is a Battlefield*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13) , p. 191, Kindle.

[19] Author Interview with Matthew Bryden, Conducted by Phone from Somaliland, 11 January 2014.

[20] “We Fought Some of These Warlords in 1993 and Now We Are Dealing with Some of Them Again, ” Ted Dagne, the Leading Africa Analyst for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s Quoted by Wax and DeYoung, *Washington Post*, 24 February 200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2/02/24/al-qaeda-ally-in-somalia-is-in-tatters/4a0dd409-2bbf-4e76-8131-0a5c9e78e86a/?utm_term=.e6e20c5fc959. at 47.

[21] Scahill, Jeremy, “Blowback in Somalia, ” *Nation*, 7 September 2011,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blowback-somalia>.

[22] Scahill, Jeremy, “Blowback in Somalia, ” *Nation*, 7 September 2011,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blowback-somalia>.

[23] Wax, Emily and DeYoung, Karen, “U.S. Secretly Backing Warlords in Somalia, ” *Washington Post*, 17 May 2016,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5/16/AR2006051601625.html.

[24] Scahill, Jeremy, “Blow back in Somalia, ” *Nation*, 7 September 2011,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blowback-somalia>.

[25] US Diplomatic Cable 06NAIROBI1484, from Ambassador William M. Bellamy, US Embassy Nairobi, “Ambassador to Yusuf: Alliance against Terror Not Directed at TFG, ” 4 April 2006, Released by WikiLeaks, <http://wikileaks.org/cable/2006/04/06NAIROBI1484.html>.

[26] Author Interview with Jendayi Frazer, 12 January 2014.

[27] US Diplomatic Cable 06NAIROBI2425 from Ambassador William Bellamy, US Embassy Nairobi, “Somalia: A Strategy for Engagement, ” 2 June 2006, Released by WikiLeaks, <http://wikileaks.org/cable/2006/06/06NAIROBI2425.html>.

[28] Graham, Bradley and DeYoung, Karen, “Official Critical of Somalia Policy is Transferred, ” *Washington Post*, 31 May 2006,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5/30/AR2006053001203.html.

[29] Author Interview with Tekeda Alemu, 10 March 2017.

[30] Oloya, Opiyo, *Black Hawks Rising: The Story of AMISOM's Successful War against Somali Insurgents, 2007-2014* (London: Helion, 2016) , loc. 1175, Kindle.

[31] Oloya, Opiyo, *Black Hawks Rising: The Story of AMISOM's Successful War against Somali Insurgents, 2007-2014* (London: Helion, 2016) , loc. 1175, Kindle.

[32]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lonel Richard Orth, 2 March 2017.

[33]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lonel Richard Orth, 2 March 2017.

[34] Author Interview with Tekeda Alemu, 10 March 2017.

[35] Panapress, “U.S. Opposes Somalia Troops Deployment, Threatens Veto, ” *Panapress*, 17 March 2005, <http://www.panapress.com/>.

[36] Mazzetti, Mark, “U.S. Signals Backing for Ethiopian Incursion Into Somalia, ” *New York Times*, 27 December 2006.

[37] Author Interview with Tekeda Alemu, 10 March 2017.

[38] Staats, Sarah Jane, “What Next for U.S. Aid in Ethiopia, ”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7 August 2012, <http://www.cgdev.org/blog/what-next-us-aid-ethiopia>.

[39] “Ethiopia Has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in the Region, Trained by American Advisors and Funded by American Aid, ” Jeffrey Gettleman, “Ethiopian Warplanes Attack Somalia, ” *New York Times*, 25 December 2006, www.nytimes.com/2006/12/24/world/africa/24cnd-somalia.html.

[40]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Michael Hayden, in Person at His Offices in Washington, D.C., 17 May 2017.

[41] Author Interview with Simiyu Werunga, Conducted in Nairobi, 14 December 2013.

[42] Mitchell, Anthony, “U.S. Agents Visit Ethiopian Secret Jails, ” *Washington Post*, 3 April 2007,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4/03/AR2007040301042_pf.html.

[43] Gettleman, Jeffrey, “Ethiopian Warplanes Attack Somalia, ” *New York Times*, 25 December 2006, www.nytimes.com/2006/12/24/world/africa/24cnd-somalia.html.

[44] Memorandum from Azouz Ennifar, Deputy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Mission in Ethiopia and Eritrea, “Meeting with U.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frican Affairs, ” 26 June 2006, Released by WikiLeaks,

http://wikileaks.org/wiki/US_encouraged_Ethiopian_invasion_of_Somalia:_UN_meeting_memo_with_Jenday_Frazer,_Secretary_of_State_for_African_Affairs,_2006.

[45] Jelinek, Pauline, “U.S. Special Forces in Somalia, ” Associated Press, 10 January 2007,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1/10/AR2007011000438.html>.

[46] Vries, Lloyd, “U.S. Strikes in Somalia Reportedly Kill 31, ” CBS/AP, 8 January 2007, <http://www.cbsnews.com/news/us-strikes-in-somalia-reportedly-kill-31/>.

[47] Author Interview with Senior Defense Official, 2 March 2017.

[48] Classified Memorandum, 7 January 2007, Released by WikiLeaks, <http://wikileaks.org/cable/2007/01/07ABUDHABI145.html>.

[49] Scahill, Jeremy, *Dirty Wars: The World Is a Battlefield*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13) , p. 208, Kindle.

[50] Author Interview with Matthew Bryden, 11 January 2014.

[51] Author Interview with Jendayi Frazer, 12 January 2014.

[52] Author Interview with Matthew Bryden, 11 January 2014.

[53] Remarks by Ahmed Iman Ali, Available at http://www.metacafe.com/watch/7950113/al_kataib_media_lecture_by_ahmad_iman_ali_h.

[54] “Al Qaeda Saw Somalia as an Ideal Front Line for Jihad and Began Increasing Its Support for Al Shabaab, ” Scahill, Jeremy, *Dirty Wars: The World Is a Battlefield*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13) , p. 223, Kindle.

[55] “Ironically, the Rise of Al-Shabaab Was Aided by the Policy Mistak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erhaps the Best

Known Factor Was the Ethiopian Occupation, Which Created a Fertile Environment for Recruitment, ” Hansen, Stig Jarle, *Al Shabaab in Somalia: The History and Ideology of a Militant Islamist Group, 2005-201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p. 49, Kindle.

[56] Author Interview with Matthew Bryden, 11 January 2014.

[57]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Counterterrorism, Designation of al-Shabaab as a 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 26 February 2008, <http://www.state.gov/j/ct/rls/other/des/102446.htm>.

[58] “Al Qaeda’ s Morale Boost as It Formally Joins With Somalia’ s Al Shabaab, ” *Telegraph* (UK) , 10 February 2012,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l-qaeda/9074047/Al-Qaedas-morale-boost-as-it-formally-joins-with-Somalias-al-Shabaab.html>.

[59] Third Parties Have Also Reported that Ethiopia’ s Presence in AMISOM Was Excluded “in the Hope of Preventing Anti-Ethiopian Nationalistic Recruitment to Al-Shabaab, ” Hansen, Stig Jarle, *Al Shabaab in Somalia: The History and Ideology of a Militant Islamist Group, 2005-201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p. 117, Kindle.

[60] Author Interview with Jendayi Frazer, 12 January 2014.

[61] Edwards, Jocelyn, “U.S. Steps Up Training for African Force in Somalia, ” *Chicago Tribune*, 1 May 2012, 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2012-05-01/news/sns-rt-us-somalia-uganda-usabre84011e-20120501_1_shabaab-somalia-siad-barre.

[62] “Several Private Military Corporations, Most Notably Bancroft, Were Involved in the Build up and Had Advisers in the Front Line, ” Hansen, Stig Jarle, *Al Shabaab in Somalia: The History and Ideology of a Militant Islamist Group, 2005-201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p. 118, Kindle.

[63] Nichols, Michelle, “Somalia Cases of Killing, Maiming, Abuse of Children Halved: UN, ” Reuters, 3 June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6/03/us-somalia-un-idUSBRE95216420130603>.

[64] Axe, David, “U.S. Weapons Now in Somali Terrorists’ Hands, ” *Wired*, 2 August 2011, <https://www.wired.com/2011/08/u-s-weapons-now-in-somali-terrorists-hands>.

[65] Author Interview with Matthew Bryden, Conducted by Phone from Somaliland, 11 January 2014.

[66] Roggio, Bill and Weiss, Caleb, “Al-Shabaab Releases Video Showing Deadly Raid on Somali Military Base, ” *Business Insider*, 13 November 2017, [www.businessinsider.com/al-shabaab-attack-somali-military-base-video-2017-11? IR=T](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al-shabaab-attack-somali-military-base-video-2017-11?IR=T).

[67] “U.S. Mounts Air Strike against al Shabaab Militants in Somalia, ” Reuters, 15 November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somalia/u-s-mounts-air-strike-against-al-shabaab-militants-in-somalia-idUSKBN1DF1ZK>.

[68]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ders Folk, 25 November 2013.

[69] Author Interview with Sally and Micheal Evans, 6 October 2016, in Person at Their Home in Wooburn Green, England.

[70] Author Interview with Sally and Micheal Evans, 6 October 2016, in Person at Their Home in Wooburn Green, England.

[71] Author Interview with Sally and Micheal Evans, 6 October 2016, in Person at Their Home in Wooburn Green, England.

20 最短的春天

保安急速倒车往回撤，抗议者紧追不舍，蜂拥包围了装甲悍马。在灰尘和瓦砾横飞的爆炸中，悍马一头撞到开罗“10月6日大桥”边的栏杆上，将一柱路灯连根拔起，连灯带柱翻过桥栏，跌落到50英尺以下的水泥地上，摔了个粉碎。悍马摇晃了几下，然后向桥下扎去，车顶朝下狠狠地砸到地上。血染红了地面。桥下的人群迅速将汽车残骸团团围住，边扔石头边呐喊。时间是2013年8月14日，“10月6日大桥”上聚集了反对埃及军政府的抗议者。对于他们来说，桥栏被豁开的那个洞是希望的象征：给军队及其不断升级的镇压行动造成的一击。

意大利摄影师泰奥·布图里尼（Teo Butturini）那天一大早被另一位记者打电话叫醒，提醒他警方正在开罗的拉比亚阿达维亚广场（Rabaa al-Adawiya Square）镇压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六个星期前，军方推翻了该国民主选举产生、身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引发民众聚集到开罗的拉比亚广场和吉萨市（Giza）的纳赫达广场（al-Nahda Square）抗议示威。这些示威活动逐渐演变为半永久性地在广场安营扎寨，惹得军事政权更加愤怒，招致镇压已在预料之中。政府后来强调，抗议者已事先得到了警告^[1]。

布图里尼随着成千上万的人到达桥上时，警察已经包围了这个区域。他听到悍马砸到桥下地面发出的轰隆声，看到抗议者涌动。这时，埃及治安部队向人群开火了。“军队开始朝我们开枪，”他回忆道，“人们开始在我身旁倒下。”布图里尼躲到桥下，以一座塔门为掩护，直到部队开始投掷催泪瓦斯，他才觉得必须赶紧跑，奔向附近的建筑物去找屏障。他没能跑多远。“我听到五颗子弹擦着我身边飞

过去，并打中了我身体的左侧”，他回忆说。布图里尼流着血，挣扎着穿过街巷，向过往的车辆挥手求救。最后，一辆车停下来，把他送到了医院。

急诊室的医生摘除了布图里尼一大部分被子弹打碎的肾，保住了他的性命。剩下的就是昏迷。他最强烈的记忆是尸体：数以十计地堆在军用卡车的车斗里，还有更多，让医院不堪负荷。“我试图尖叫[2]，”他说，“但我不确定是否有任何声音传出来。”布图里尼是一位一丝不苟的摄影记者，在以往暴力危机中他都是不断地按动快门拍摄照片，但这次他没留下几张那天的照片。他的储存卡在他被送到医院时是藏在靴子里的[3]，但埃及安全人员搜查医院、逮捕幸存的抗议示威者[4]之后，就不见了。

报道称，仅在拉比亚阿达维亚广场就有817人被杀。大多数统计显示，当天在埃及各地的镇压行动中，可能有超过1000人被杀。经过长达一年的详尽调查，人权观察组织得出结论，埃及的“警察和武装部队系统性且故意地使用了过多的致命武力[5]……导致埃及史无前例规模的抗议者被杀害”。房顶上布置了狙击手向抗议者射击，而人们拼命逃跑时，地面执行任务的军人又封锁了出口[6]。

美国知道镇压即将来临。“政府将调重兵介入那里，这不是秘密”，我曾在巴基斯坦遇到的安妮·帕特森说。她后来担任美国驻埃及大使，任期到2013年8月。“在之前的几周，那一直是我们的关注点[7]。”在那几周里，美国方面也急着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从包括帕特森在内的国务院官员到国会领袖，都忙着想办法。国务卿约翰·克里派他的副手比尔·伯恩斯制定了一项限制穆斯林兄弟会抗议活动范围和规模的协议。国会派出了两位头号外交政策鹰派人物——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镇压前一周前去施压，要求恢复平静和进行文职控制。埃及内阁坐

下来就干预问题展开辩论之前，两位参议员向埃及高级将领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临时副总统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临时总理哈齐姆·贝卜拉维（Hazem el-Beblawi）及其他人提出请求。

格雷厄姆后来对媒体表示，这种努力完全没能激发乐观情绪。他说：“你可以感觉到人们已经按捺不住想打一场了，那位总理自己就是一场灾难。”格雷厄姆是这样描述贝卜拉维对于抗议者不断增多情况的态度的：“他一直在向我布道：‘你不能和这些人谈判。他们必须走下街头，尊重法治。’”“那时我们无休止地与军方对话^[8]，”帕特森大使解释说，“他们接到来自华盛顿的电话，来自我的电话，那时看起来也做不了别的。我之前的一天刚和塞西通过电话，他们说会克制。”

甚至五角大楼的领导层最终也介入斡旋，当时的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一次次地打电话给塞西将军，有时甚至每隔一天就打一次，持续数周。多位官员告诉我，长期以来对美埃关系起到稳固作用的双方军对军关系，是化解这次危机的最有力渠道。约翰·克里就是其中之一。他说：“美国几十年来在建立埃及军队方面的投资……在[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刚出现爆发点]穆巴拉克考虑向抗议者开火时，发挥了作用^[9]。”在那种情况下，“通过非公开渠道进行的军对军对话，我敢保证是促成埃及军方做出决定的因素之一。军方告诉穆巴拉克，如果他想让他们杀死广场上的上万个孩子，他们不会听从他的命令”。但是数年后，在塞西政府治下的拉比亚广场事件中，来自美国军方领导人的同样请求则遭到充耳不闻的对待。开罗一点都没听进去。

“镇压开始后，你是否出于愤怒打过电话？”我问帕特森。

“我想没有，”她说，“因为我认为到那时我们已经说了该说的一切^[10]。”

镇压发生的前几天，埃及内阁聚在解放广场旁的一座政府大楼内，讨论如何对抗议者采取措施。美国人的努力对这里的谈话几乎没产生任何影响。“我见了麦凯恩和格雷厄姆，但我觉得他们无法理解……确保他们能够保护人民的安全……（这）对过渡政府来说有多么重要。”临时总理贝卜拉维说。“如果你觉得有人在首都中央强行圈占领土，”他继续道，“人民的安全就是无法接受和确信的。”贝卜拉维告诉我，他接到了帕特森大使的电话并倾听了她的意见，但是，最终“我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11]”。

在华盛顿，贝卜拉维在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办公室里，懒洋洋地坐在仿佛吞没了他瘦小身躯的绿色椅子上，一层头皮屑撒在肩头。拉比亚事件已经过去了3年，“我没有遗憾^[12]，”他说，“对这件事的发生，我感到非常抱歉。我不知道它为何以这种方式结束，但我认为如果情况发生逆转的话，结果可能会更糟。”他的花白眉毛皱了起来。“代价很高，没有人料到它会这么高。此外还有很多夸大，很多数字是从外面带来的。”他怀疑地说道。贝卜拉维的回应与大多数主使镇压行动的官员的说法一样，让人如鲠在喉。失去生命是令人遗憾的，但也没有那么糟糕。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也超出了他们的控制。他后来尖锐地告诉我，警察和军队“任何时候都无法控制”。无论如何，他觉得是抗议者挑起了一切。“当然，他们在挑战当局，用武力挑战，实际上在拉比亚和纳赫达广场，第一颗子弹是穆斯林兄弟会射出的。这是肯定的，使用武器是由他们先开始的。”我向贝卜拉维指出，大多数国际人权组织的评估都对这一说法产生质疑。他耸了耸肩：“他们自找的。”我问他美国人的影响是否起到任何作用时，他简单地说：“没有。”

临时副总统巴拉迪一直领导与穆斯林兄弟会示威者的谈判，并且是与格雷厄姆和麦凯恩沟通的主要联络人之一。据当时在场的数位消息人士透露，巴拉迪反对武装干预，认为与示威者达成协议是可能的。据报道，时任临时外交部长的法赫米（Fahmy）与巴拉迪立场一致，尽管他拒绝向我证实他在此事上采取的立场。“在拉比亚采取行动是内阁的决定^[13]”，法赫米说，他拒绝详细说明最后关键时刻决策官员们之间的观点细节。事后，法赫米和贝卜拉维一样，也采取了防御姿态，将责任归咎到示威者头上。“他们阻塞了所有街道，”他摇摇头告诉我，“这个区域，顺便说一句，是一个人口密度极高的地区。”他暗示基本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的一揽子军事援助达到13亿美元，而这种最强有力的外交干预所买来的影响是：在镇压发生前，在关起门来的场景下，能多说上几句话。

在此之前的一年半，2012年2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六，我看着希拉里·克林顿走入突尼斯一座俯瞰地中海的宫殿，发表关于该地区民主未来的演讲。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去世后，我组建了一个由外交官组成的小团队，集中关注阿富汗、北非及中东地区青年骚乱给全球带来的影响——这些骚乱我之前曾在阿富汗活生生地目睹过，随后它们又在北非和中东地区陆续展开。这年2月在突尼斯，希拉里·克林顿准备宣布我在一项专注于青年外联和公共外交倡议中的角色。

讲台上有一张标语牌，上面印有以中东为中心色彩发光渐变的世界地图，本意是显示民主启蒙浪潮的传播，但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爆炸半径图。希拉里·克林顿演讲的这座蓝白色相间宫殿就像地中海岸上的一颗宝石，名为Nejma Ezzohara（阿拉伯语意为“启明之星”），由法国一位银行业继承人鲁道夫·德朗热（Rodolphe d’Erlanger）男爵于20世纪20年代建造。讲台就设在宫殿中心的拱形厅内，希拉里站在讲台后显得很矮小。

台下一大片仰起的面孔，凝神倾听着希拉里·克林顿宣扬民主的美德——美国大使馆召集来拍照的都是那种乐观、受过良好教育且总的来说不具代表性的年轻人。“你们在革命的前沿无所畏惧，经受住了催泪瓦斯和殴打的考验。成为新民主国家的守护者，需要不同的勇气。”她对年轻人说。“过渡可能会脱轨^[14]，并改道成为新的独裁国家，”她继续说，“革命的胜利者可以成为他们的受害者。抵制煽动者的呼声、建立联盟、保持对制度的信任，这些使命要靠你们来完成，即便你们支持的候选人在民意调查中失利……这意味着不只是谈论宽容和多元化——这还意味着要兑现它。”

在离开的路上，梳着芭蕾盘发、身上黑蓝两色外套下摆随风飘曳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启明之星”一处壮观的露台上停下脚步，眯起眼看着太阳的方向，向蔚蓝的地中海伸出手臂，“世道在改变”，她沉思道。

但事实是，这些变化让美国束手无策，也在希拉里·克林顿演讲的主题上剥夺了美国的可信度。数十年来，美国历任政府都选择与中东的专制强人们并肩作战。当那些独裁者的政权土崩瓦解，使得既往与其形成的结盟成为负担时，美国又慢于顺应。像在中亚一样，美国军事交易超越外交的局面在中东已经持续了太久，我们几乎都不知道如何做其他事情。埃及就是第一个集中展示——权且成为展览A吧。

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埃关系的核心议题是苏联对埃及军方的赞助^[15]以及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持续冲突^[16]。包括收回西奈半岛的努力——10月6日大桥就因此而得名——在内，为争夺领土而爆发的血腥冲突^[17]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18]但埃及当时的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顽固地坚持围绕两个激进的新目标来重新定位埃及战略：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19]，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最

重要的是，他希望西奈半岛回到埃及手中^[20]，并认为和平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21]。

在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吉米·卡特^[22]抓住了这一机会，将埃及和以色列聚集到戴维营^[23]，进行了为期13天的标志性谈判。成果之一是6个月后签署的和平条约，它奠定了以色列、埃及和美国之间的现代关系。以色列同意退出西奈半岛并将其归还给埃及。作为交换，两国之间恢复外交关系，以色列获得自由通行苏伊士运河的保证。这一外交成就是靠军事资金来确保的，这种安排在几十年后也成为破坏关系的隐患。根据条约，美国承诺^[24]为埃及提供资金^[25]。

自1987年起，援助稳定在每年13亿美元^[26]的水平。拉比亚事件期间穿透抗议示威者身体的子弹几乎肯定是用美国援助购买的。美国的军事援助^[27]支付了埃及80%的军火开支^[28]。到2011年，五角大楼的军事合同数据库中，“埃及”一词已出现了1.35万次^[29]。

这种安排反映了外交政策中最古老的假设之一：可以花钱购买安全。埃及对于一代人而言，似乎证明了这种思想成立。该国施行压制性统治的领导人——这些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穆巴拉克政权——帮助确保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权益。但是，从2011年的叛乱到2013年的拉比亚事件，当变革滚滚而来时，这种传统美国智慧的致命缺陷就开始暴露无遗。购买安全已然不够了，多年忽视外交的结果是华盛顿在冲突爆发时缺乏其他必要的说服工具。

裂痕在2011年1月已开始显现。革命开始蔓延^[30]，从邻国突尼斯到亚历山大港，再到开罗。那个月，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在解放广场聚集，对穆巴拉克及其政权治下的一系列问题表达不满和抗议：从大规模失业^[31]到腐败，再到严酷执法，不一而足。

席卷阿拉伯世界的示威者对美国依赖埃及压制性军事政权为代理人的做法表示质疑。但是美国的领悟速度缓慢：暴力事件都开始爆发了，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还宣称埃及政权“稳定^[32]”。她安排在那里的是弗兰克·威斯纳，他是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的老朋友，长期以来对穆巴拉克抱有好感的资深外交官。他对公众表态说“总统必须留任^[33]”，结果国务院不得不否定自己派出的特使的言论。国务院最终呼吁穆巴拉克下台^[34]，但时机已太迟，且收效甚微^[35]。短短的17天里，民间反叛结束了59年的军事统治。穆巴拉克被迫下台，美国与埃及的关系也就此解散。

之后，在埃及筹备历史上第一次自由选举^[36]的过程中，由军事将领组成的最高军事委员会（SCAF）临时政府介入进来，并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措施。在2011年12月的一次事件中，来自10个非政府组织的雇员被禁止出境，其中包括时任美国交通部长雷·拉胡德（Ray LaHood）的儿子山姆·拉胡德（Sam LaHood）^[37]。军事领导层对美国表达了蔑视。

新任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在最高军事委员会刚开始执政的头几个月才刚刚到任，她称这个时期为“非常、非常具有破坏性^[38]……有些美国人困在大使馆里；我们花了好几个星期，也许更长的时间，才把他们送出境。我们基本上只能付钱保释，然后他们弃保潜逃——这是当时的交易。这给这段重新开始的关系打下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基础”。

选举开始后，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大获全胜，其领导人穆罕默德·穆尔西获得总统职位^[39]。这是又一次美国未曾防备的重心转移。很快证明穆斯林兄弟会比最高军事委员会更有问题，其中最糟糕的是，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穆尔西怀疑美埃联盟的核心原则：支持以色列。多年前，这位政治家将犹太复国主义者描述为“吸

血鬼”^[40]和“战争贩子”，并抱怨“徒劳无功的谈判（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谈判）浪费时间和机会”。在埃及国内，兄弟会在诸如妇女权利和酒类消费等问题上所采取的严厉社会政策^[41]，也使他们与这个以世俗人口为主的国家中大部分人格格不入。匆忙搭建且以欺诈性手段通过的新宪法包含了对穆斯林兄弟会有利的条款，进一步激怒了埃及人民。执政刚满一年后，穆尔西就面临了规模不亚于推翻穆巴拉克时的街头抗议示威活动^[42]。

随着抗议活动变得更加激烈，埃及军方在时任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的带领下，罢黜了穆尔西，并将他推上了审判台。塞西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之前的局面，他是一个在以色列问题上坚持既往路线的强人统治者。

“我非常了解塞西，我知道情况不会很好，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帕特森说，“但坦率地说，事实证明他比我预想的要强硬得多^[43]。”人们对民主选举产生的穆斯林兄弟会政府遭到罢黜感到愤怒，于是再次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塞西的安全部队与抗议者发生了冲突。随着静坐和示威活动增加，紧张局势也不断加剧，最终导致2013年8月在拉比亚广场及其他地方爆发了流血事件，而镇压行动在随后的几年里也持续不减。

一名囚犯回忆他被关在与世隔绝的阿祖力（Azouli）军人监狱的经历时所言：“没有文书表明你在那里。如果你死在阿祖力，没有人会知道。”2014年4月，529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判处死刑，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死刑判决之一。被告律师不被准许接触“证据”，对此抗议者还受到了威胁^[44]。

次年，同一法院就穆尔西在2011年暴乱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他进行了判决。这位前总统被判处绞刑公开执行，与他一起被判死刑的还有

100多人。穆尔西的共谋者中有一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狱中，另有两人已经死亡^[45]。

“我会说这是我在交战地区以外^[46]所见到过的最糟糕的地方”，长期给约翰·克里担任顾问的弗兰克·洛文斯坦说。当时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托尼·布林肯预测：“假以时日，而且不可避免地，如果继续压制本国人口中那些显著的少数群体……自由派、世俗主义者、温和派、记者，你能想到的吧，都不再能发声，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投入了监狱，并投入了与真正的激进分子混杂在一起的监狱，那就是让更多人都走向激进的秘诀^[47]。我们不能忘记，‘基地’组织就诞生在埃及的一所监狱里。”

人们对塞西政权及其使用美国武器问题的关注程度日渐提升，至少引发了到底谁该负责的争论。穆尔西被罢黜之后，有关是否应该遵守美国拨款法中所谓“政变条款”^[48]的问题就浮出了台面——该条款要求停止对“任何正式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被军事政变所罢免的国家”提供直接援助，直到民主得到恢复。穆尔西总统虽然造成了美埃不和，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正式当选的”^[49]。其遭罢黜被广泛认为是政变的结果，因为不然的话还能称之为什么呢？塞西的军政府没有摆出任何民主的伪装。

但由于涉及一年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奥巴马政府拒绝使用这个词。奥巴马政府首先采用了美联社所谓的“费力的拐弯抹角”^[50]来避免这一术语。然后，终于派遣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比尔·伯恩斯去向国会通报政府的正式决定：这次政变不会被称为政变^[51]。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军事化的角落也是最受限制的所在，其程度之甚，到了近代历史上最明显的政变之一都绝不能得到如实称谓的地步。这些限制也因为缺乏替代方案而变本加厉：美国都不具备能够按照法律规则来正视此次政权更迭的外交战略。

国会在拨款中增加了一项要求，即国务卿需证明埃及政府正在实行民主改革、举行选举、捍卫妇女权利和维护言论自由。但这些条件并不具备约束力：新的要求中留出了国家安全豁免敞口，口子之大，足以容纳个把甚至数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国政府以西奈半岛的极端主义活动为理由，很快就恢复了对这种直升机的交付^[52]，即使在镇压行动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2013年拉比亚事件后不久，奥巴马政府悄悄地暂时冻结了几个系列的武器转让行动，计划交付的直升机、F-16战斗机、M1A1坦克和鱼叉导弹被暂时搁置了起来^[53]。这都是规模较大的武器装备，而不是在埃及政府镇压城市中抗议示威活动时使用的催泪瓦斯和小型武器。而其他军事支持，例如训练工作以及提供诸多其他种类的武器备件等，则依然延续。2015年3月，奥巴马总统宣布全面恢复对埃及的军事援助。“到那时，”安妮·帕特森回忆道，“西奈半岛的动荡已经爆发^[54]……我们的判断是‘是的，他们需要直升机’。”

美国国会的态度正是如此。事实上，已几乎没有余地改变这种关系。“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援助是已经承诺^[55]了的，”人权观察组织的萨拉·利亚·惠特森（Sarah Leah Whitson）说，“一切都已经预售了。”这是一台无法关停的机器。奥巴马政府悄悄尝试进行更温和的改革，签署了停止“现金流贷款”^[56]——这是美国给予埃及和以色列的一种优惠支付方式，允许他们赊账购买自己选中的军事装备，然后从美国对两国承担的军事援助拨款中划账支付，可以数年才结清。这一变化使“他们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帕特森说，“他们将被迫花钱购买我们认为对他们来说有用的东西。”这一建立问责机制的努力效果并不显著——它并没有对武器装备的实际使用设置任何控制。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于2016年进行的一场严格审计^[57]得出结论，在埃及如何使用美国军火问题上，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没有任何有效的监控体系。

最后，改革的努力走向停顿，毫不留情地提示人们，对重要军事联盟进行变革阻力重重如巴基斯坦一样，埃及在该国自己眼里，也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眼中，都实在重要到不能倒下。

一系列新威胁，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西奈半岛的崛起，增强了埃及的这种影响力。竞争也在使这种关系变得更加稳固。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承诺向埃及提供数十亿美元[\[58\]](#)的经济支持，额度有时超过美国所提供的援助，附带的条件还少。特别是沙特阿拉伯[\[59\]](#)，还与塞西建立了友好关系。俄罗斯也参与了竞争，除了普京与塞西进行会晤之外，还不断增加对埃及的援助[\[60\]](#)。

“我们当然有影响力[\[61\]](#)，”克里反思道，“但我们施加影响力的过程并不像某些人所假设的那样简单。我们远非唯一的演员……杠杆作用是双向的——我们在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以色列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需要埃及的帮助。”也因为如此，弗兰克·洛文斯坦认为：“他们对此的态度是‘你们能真他妈怎么办？你们经不起让我们失败’。这就是塞西的终极影响力[\[62\]](#)：就是他会失败。而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杠杆作用。”

与此同时，多年来依赖军事援助，也使双方都相信武器及装备销售是唯一能够购买影响力的硬通货，外交动议基本上是装饰性的。因此，美国与埃及的关系自拉比亚大屠杀以来几乎没有改变。安全不仅仅是第一要务，还通常是唯一要务。为了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也部分由于他们达成了一些有意义的替代方案，华盛顿政策制定者也恢复了传统的武器和军事融资工具。

在美国给予塞西认可和支持的同时，埃及人遭受了一系列恶果。“他一直……‘无情’已经算是好词了[\[63\]](#)。死刑，大规模逮捕记者，关闭非政府组织。”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海登将军说。他的话反映

了美国官员对塞西的共同思考。但当我问海登，是否应该有个只要越过便该触发减少军事援助的节点时，他神色暗淡了起来。“我没准备这么说”，他说。他两手五指相对，在胸前拱成塔尖形，越过无框眼镜的上沿盯着我。“我们做出了妥协，”他沉思道，“我们可能给未来埋下了一笔债。”

萨曼莎·鲍尔在拉比亚事件期间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她对于美国面对这场危机及其后形势发展的反应持批评态度。“考虑到塞西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这一关系，把它变为纯粹的交易”，她恼怒地解释说。相反，在短暂的停顿之后，美国不可避免地恢复了援助，美埃关系“看起来与拉比亚事件之前基本相同^[64]”。

鲍尔明白，从政治或战略的角度看，切断向埃及提供的13亿美元一揽子援助计划并不切合实际。但包括她在内，确有不少官员认为这些援助资金可以更加谨慎地加以分配。“戴维营时代的基础理论现在已不复存在，因为（以色列的）毕比（·内塔尼亚胡）和塞西已经拥有了他们需要的关系”，因而向埃及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任何设备的逻辑也基本不存在了。鲍尔说：“我主张将这笔钱分一大部分给突尼斯^[65]，我们应该奖励那些努力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前进的国家。”

地缘政治中此类伦理道德上的左右为难并不鲜见，但华盛顿与开罗之间的特殊亲密关系使妥协变得更加轻而易举。唐纳德·特朗普上任后，所有让他着迷的独裁者中，塞西似乎得到了最多的关注和奉承。特朗普还逆转了之前奥巴马政府暂不邀请塞西及其高级官员访问白宫的决定，在白宫接待了塞西。曾目睹奥巴马时代美埃关系的部分埃及人士对这种转变态度乐观。“有了特朗普，”埃及前临时外交部长纳比尔·法赫米说，“你终于看到两位总统交谈了^[66]。”

但无论好坏，即使是过去有过的零星建立问责机制尝试，如今也都从后视镜中消失了。“塞西仍旧得到美国的支持，”意大利摄影师

泰奥·布图里尼摇着头说道，“与此同时，他实际上参与了拉比亚广场事件。他是……制定反抗议示威法律的人，是监禁了很多记者的人。”布图里尼从那个悲惨日子和极度混乱中保留下来的少数几张照片中发现，有一张拍的是一个催泪瓦斯罐。麻木的幸存者从沾满血迹的混凝土地上捡到众多的催泪瓦斯罐，其中有几个看起来是美国制造的。布图里尼照片上的那一个上印有“CTS-综合战术系统”（CTS-Combined Tactical Systems）标志，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詹姆斯敦（Jamestown）的军火制造商。照片中的催泪瓦斯罐上甚至还有一个客服联络电话，其中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区号——可以想见，埃及人想投诉，恐怕要在美国东部工作时间内拨打电话才行。布图里尼永远不会忘记他周围的抗议者挥舞着空催泪瓦斯罐时的叫喊声：“他们向我们射击^[67]，扔催泪瓦斯，催泪瓦斯是美国的。”

[1] “Egypt Police to Break up Sit-in Protests within 24 Hours,” Associated Press, 11 August 2013, <http://www.cbc.ca/news/world/egypt-police-to-break-up-sit-in-protests-within-24-hours-1.1372985>.

[2] Interview with Teo Butturini, 17 January 2014.

[3] Author Interview with Teo Butturini, 18 January 2015.

[4] Interview with Teo Butturini, 17 January 2014.

[5] “All According to Plan: The Rab’ a Massacre and Mass Killings of Protesters in Egypt,” Human Rights Watch, August 2014, <http://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egypt0814web.pdf>.

[6] “The Weeks of Killing, State Violence, Communal Fighting, and Sectarian Attacks in the Summer of 2013,” Egyptian Initiative for Personal Rights, June 2014, eipr.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pdf/weeks_of_killing_en.pdf.

[7] Author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Anne Patterson, 12 May 2016.

[8] Author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Anne Patterson, 12 May 2016.

[9]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 21 November 2017.

[10] Author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Anne Patterson, 12 May 2016.

[11] Author Interview with Hazem Beblawi, IMF Offices, Washington, D.C., 30 June 2017.

[12] Author Interview with Hazem Beblawi, IMF Offices, Washington, D.C., 30 June 2017.

[13] Author Interview with Nabil Fahmy in New York City, 7 April 2017.

[14] “In Tunisia, Clinton Cites Promise of Arab Spring, ” CBS News, 24 September 2012, <https://www.cbsnews.com/news/in-tunisia-clinton-cites-promise-of-arab-spring/>.

[15] Williams, Carol, “Amid U.S.-Egypt Chill, el-Sisi Seeks Military Assistance from Russia, ” *Los Angeles Times*, 13 February 2014,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4/feb/13/world/la-fg-wn-russia-egypt-sisi-putin-20140213>.

[16] Moaz, Zeev, *Defending the Holy Land: A Critical Analysis of Israel's Security &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9) .

[17] Oren, Michael, Speech to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2 July 2002,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he-six-day-war-and-its-enduring-legacy>.

[18] Mo/rk, Hulda Kjeang, “The Jarring Mission, ”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Oslo,

<http://www.duo.uio.no/publ/IAKH/2007/58588/HuldaxMxrkxxMasteropgavexixhistorie.pdf>.

[19] Aloni, Shlomo, *Arab-Israeli Air Wars 1947-1982* (Oxford: Osprey, 2001) .

[20] Pace, Eric, “Anwarel-Sadat, the Daring Arab Pioneer of Peace with Israel, ” *New York Times*, 7 October 1981, <http://www.nytimes.com/learning/general/onthisday/bday/1225.html>.

[21] Pace, Eric, “Anwarel-Sadat, the Daring Arab Pioneer of Peace with Israel, ” *New York Times*, 7 October 1981, <http://www.nytimes.com/learning/general/onthisday/bday/1225.html>.

[22] “Walter Mondale, His Vice President, Was Surprised by the Fact That on Carter’ s First Day in Office He Announced That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Was a Top Priority. That Seemed Wildly Naïve....Carter’ s Closest Advisors Told Him That He Should Wait Until His Second Term to Risk Any of His Fragile Political Capital, ” Wright, Lawrence, *Thirteen Days in September: Carter, Begin, and Sadat at Camp David* (New York: Knopf, 2004) , p. 6.

[23] President Carter Speech on 25th Anniversary of Accords, Washington, D.C., 16 September, 2003, <https://www.cartercenter.org/news/documents/doc1482.html>.

[24]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Wright, “ ‘13 Days In September’ Examines 1978 Camp David Accords, ” NPR, 16 September 2014, <https://www.npr.org/2014/09/16/348903279/-13-days-in-september-examines-1978-camp-david-conference>.

[25] Sharp, Jeremy M. , “Egypt: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5 June 2014, www.fas.org/sgp/crs/mideast/RL33003.pdf.

[26] Sharp, Jeremy M. , “Egypt: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5 June 2014, www.fas.org/sgp/crs/mideast/RL33003.pdf.

[27] Sharp, Jeremy M., "Egypt: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5 June 2014, www.fas.org/sgp/crs/mideast/RL33003.pdf.

[28] Plumer, Brad, "The U.S. Gives Egypt \$1.5 Billion a Year in Aid, Here's What It Does, " *Washington Post*, 9 July 201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3/07/09/the-u-s-gives-egypt-1-5-billion-a-year-in-aid-heres-what-it-does/>.

[29] Thompson, Mark, "U.S. Military Aid to Egypt: An IV Drip, with Side-Effects, " *Time*, 19 August 2016, www.swampland.time.com/2013/08/19/u-s-military-aid-to-egypt-an-iv-drip-with-side-effects/.

[30] "The January 25 Revolution, " in *Arab Spring: A Research and Study Guide*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010) , guides.library.cornell.edu/c.php?g=31688&p=200748%20%20Id.

[31] "The January 25 Revolution, " in *Arab Spring: A Research and Study Guide*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010) , guides.library.cornell.edu/c.php?g=31688&p=200748%20%20Id.

[32] "Our Assessment Is That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Is Stable and Is Looking for Ways to Respond to the Legitimate Needs and Interests of the Egyptian People, " The Following Day She Encouraged "All Parties to Exercise Restraint and Refrain from Violence" ; "Clinton Calls for Calm, Restraint in Egypt, " *CBS News*, 26 January 2011, <https://www.cbsnews.com/news/clinton-calls-for-calm-restraint-in-egypt/>.

[33] Fahim, Kareem, Landler, Mark and Shadid, Anthony, "West Backs Gradual Egyptian Transition, " *New York Times*, 5 February 2011, www.nytimes.com/2011/02/06/world/middleeast/06egypt.html?pagewanted=all&r=0.

[34] Fahim, Kareem, Landler, Mark and Shadid, Anthony, "West Backs Gradual Egyptian Transition, " *New York Times*, 5 February

2011, www.nytimes.com/2011/02/06/world/middleeast/06egypt.html?pagewanted=all&r=0.

[35] “The January 25 Revolution, ” in *Arab Spring: A Research and Study Guide*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010) , [guides.library.cornell.edu/c.php? g=31688&p=200748%20%20Id](http://guides.library.cornell.edu/c.php?g=31688&p=200748%20%20Id).

[36] Childress, Sarah, “The Deep State: How Egypt’ s Shadow State Won out, ” *Frontline*, 17 September 2013,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foreign-affairs-defense/egypt-in-crisis/the-deep-state-how-egypts-shadow-state-won-out/>.

[37] Monteforte, Filippo, “Egypt Cracks Downon NGOs, ” *Newsweek*, 6 February 2012, www.newsweek.com/egypt-cracks-down-ngos-65823.

[38]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Anne Patterson, 12 May 2016.

[39] Carlstom Greg, “Meet the Candidates: Morsi vs Shafiq, ” *Al-Jazeera*, 24 June 2012, www.aljazeera.com/indepth/spotlight/egypt/2012/06/201261482158653237.html.

[40] “Morsi Called Israelis ‘Descendants of Apes and Pigs’ , ” *Haaretz*, 4 January 2013,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morsi-called-israelis-descendants-of-apes-and-pigs-in-2010-video-1.491979>.

[41] Black, Ian, “Egypt’ s Muslim Brotherhood Poised to Prosper in Post-Mubarak New Era, ” *Guardian* (Manchester) ,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may/19/muslim-brotherhood-poised-prosper-egypt>.

[42] Black, Ian, “Egypt’ s Muslim Brotherhood Poised to Prosper in Post-Mubarak New Era, ” *Guardian* (Manchester) ,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may/19/muslim-brotherhood-poised-prosper-egypt>.

[43]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Anne Patterson, 12 May 2016.

[44] Hamid, Shadi, “Rethinking the U.S.-Egypt Relationship: How Repression Is Undermining Egyptian Stability and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Do, ” Brookings, 3 November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testimonies/rethinking-the-u-s-egypt-relationship-how-repression-is-undermining-egyptian-stability-and-what-the-united-states-can-do/>.

[45] Hamid, Shadi, “Rethinking the U.S.-Egypt Relationship: How Repression Is Undermining Egyptian Stability and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Do, ” Brookings, 3 November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testimonies/rethinking-the-u-s-egypt-relationship-how-repression-is-undermining-egyptian-stability-and-what-the-united-states-can-do/>.

[46] Author Interview with Frank Lowenstein, 5 August 2016.

[47]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Tony Blinken, 12 May 2016.

[48] Office of Senator Patrick Leahy, Provisions Relevant to the Situation in Egypt in the FY12 State Department and Foreign Operations Appropriations Law, 3 July 2013, http://www.leahy.senate.gov/press/provisions-relevant-to-the-situation-in-egypt-in-the-fyl2-state-department-and-foreign-operations-appropriations-law_.

[49] Hughes, Dana and Hunter, Molly, “President Morsi Ousted: Firs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Leader under House Arrest, ” *ABC News*, 3 July 2013, <http://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president-morsi-ousted-democratically-elected-leader-house-arrest/story?id=19568447>.

[50] Hudson, John, “Obama Administration Won’ t Call Egypt’ s Coup a Coup, ” *Foreign Policy*, 8 July 2013, foreignpolicy.com/2013/07/08/obama-administration-wont-call-egypts-coup-a-coup.

[51] Ackerman, Spencer and Black, Ian, “U.S. Trims Aid to Egypt as Part of Diplomatic ‘Recalibration’ , ” *Guardian* (Manchester) , 9 October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oct/09/obama-cuts-military-aid-egypt>.

[52] Broder, Jonathan, “The Winter of Egypt’ s Dissent, ” *News-week*, 6 January 2015, <http://www.newsweek.com/2015/01/16/winter-egypts-dissent-296918.html>.

[53] Gordon, Michel R, and Landler, Mark, “In Crackdown Response, U.S. Temporarily Freezes Some Military Aid to Egypt, ” *New York Times*, 9 Octo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3/10/10/world/middleeast/obama-military-aid-to-egypt.html?pagewanted=all&_r=0.

[54]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Anne Patterson, 12 May 2016.

[55] Author Interview with Sarah Leah Whitson, 17 March 2017.

[56]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Anne Patterson, 12 May 2016.

[57] Asher-Schapiro, Avi, “The U.S. Isn’ t Making Sure Its Military Aid to Egypt Stays out of the Wrong Hands, ” *Vice News*, 17 May 2016, <https://news.vice.com/article/the-us-isnt-making-sure-its-military-aid-to-egypt-stays-out-of-the-wrong-hands>.

[58]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ngressman Adam Schiff, 20 January 2015.

[59] “Egypt Signs \$350 Mln in Oil, Power Financing Deals with Saudi, ” Reuters, 1 November 201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USL5N0SR0H520141101>.

[60] “Russia, Egypt Seal Preliminary Arms Deal Worth \$3.5 Billion: Agency, ” Reuters, 17 September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9/17/us-russia-egypt-arms-idUSKBN0HC19T20140917>.

[\[61\]](#)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 21 November 2017.

[\[62\]](#) Author Interview with Frank Lowenstein, 5 August 2016.

[\[63\]](#)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Michael Hayden, in Person at His Offices in Washington, D.C., 17 May 2017.

[\[64\]](#) Author Interview with Samantha Power, 10 July 2017.

[\[65\]](#) Author Interview with Samantha Power, 10 July 2017.

[\[66\]](#) Author Interview with Nabil Fahmy in New York City, 7 April 2017.

[\[67\]](#) Author Interview with Teo Butturini, 17 January 2014.

21 午夜牧场

一辆白色雪佛兰卡车在哥伦比亚中部的沼泽地穿行，弗雷迪·托雷斯（Freddy Torres）在车厢里醒来，开始怀疑自己头天晚上出了大问题。秋季温和的空气换成了冷风；森林覆盖的高地变成了低矮灌木丛生的荒野。旷野上零星地点缀着民居，黎明时分四周一片寂静。最令人担忧的是那些粗麻布袋子，撞着他伸出去的腿和空了的白兰地酒瓶：袋子里装满了步枪。托雷斯20多岁，在昆迪纳马卡省

（Cundinamarca）的卡夫雷拉村（Cabrera）出生并长大，那里位于首都波哥大（Bogota）以南大约一个下午车程的距离。他没打算落到这步田地——宿醉、迷茫、离家几个小时之遥。卡车之旅是连续12个小时狂欢畅饮烈酒的最后一站。现在，三个有着奇怪名字的陌生人把他带到了感觉中的世界尽头——这三个人一个叫派萨（Paisa），麦德林地区人的常用名；一个叫科斯特诺（Costeño），意思是“海岸”；另一个难以置信地也叫弗雷迪。

那是2006年9月17日的凌晨，托雷斯即将亲眼看到美国为其在拉丁美洲最昂贵的军事联盟付出隐性代价。在该地区本身也像嗑了药一样癫狂的反毒品战争中，美国联盟再度陷入曾在阿富汗、索马里和埃及等地出现的尴尬互动模式。哥伦比亚是这个地区让美国付出最大代价的盟国，名为“哥伦比亚计划”（Plan Colombia）的军事和发展一揽子援助耗资数十亿美元，执行过程中也暴露了美国与外国军事力量之间签署的浮士德式协议中一些最严重的缺陷。多年来，与哥伦比亚的联盟一直是主要的发人深省案例，显示美国军事干预拉丁美洲且坚持重视枪支而非谈判的立场，衍生出了侵犯人权、腐败猖獗及毒品泛滥等诸多问题。但哥伦比亚近年来也被美国官员描述为成功故事，一个由双方军事将领对话主导、事关国家安全的敏感关系中，将民事援助放在更受瞩目位置的范例。

对于弗雷迪·托雷斯来说，2006年9月的那个晚上开始得毫无预兆。他经常跟着运输卡车出车到哥伦比亚的各个角落，一走就是好几天。这一天他结束了工作正往家走，在一个村子里的酒馆——又卖酒、又卖杂货和简单吃食的社区小店——碰到了他的堂兄埃尔维尔（Elvir）。埃尔维尔善于交际，喜欢热闹，从来不缺朋友。这一天，他又与一个熟人在一起，名字也叫弗雷迪。于是三个人一起，一轮接一轮地喝起了啤酒。他们开着玩笑，漫不经心地看着附近公园里孩子们踢球，平静地消磨着时间。

夜幕降临时，三个年轻人开始变得有些焦躁不安。又喝了几轮酒之后，他们的新朋友弗雷迪提议，一起到几个小时车程之外稍大点的城市富萨（Fusa），去那里的一家酒吧。在新朋友表示愿意承担这次旅行的费用之后，弗雷迪堂兄弟闹着玩儿地同意了。这位新朋友离开商店去打电话——托雷斯听到了一句：“我带两个人来。”过了一刻钟，另外那位弗雷迪回来了，告诉埃尔维尔去租一辆车。

三人挤进了一辆20世纪80年代早期造的雷诺车，开始往富萨开，途中还接上了另外两人——派萨和科斯特诺。一段通常只需要两三个小时的车程，他们走了一整夜，一个小镇接一个小镇、一个酒吧接一个酒吧地停下来喝酒，酒吧的名字都不记得了。路上他们还换了几次车，不过醉得越来越厉害的托雷斯几乎没留意这个细节。午夜时分，在一个检查站耽搁了一会儿之后，醉醺醺的几个人终于到了富萨。他们又在“曲线”（La Curva）脱衣舞酒吧喝了几个小时，吃了一顿街头小吃——烤牛肉馅饼、玉米饼卷烤肉之后，弗雷迪、派萨和科斯特诺建议托雷斯兄弟俩跟他们一起到附近的一个牧场去睡会儿，然后等酒醒了再回家。这三个人说牧场是一个朋友的，已经弃置了很久。这时已是凌晨接近破晓，托雷斯兄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一爬进雪佛兰的车厢——他们当晚乘坐的第四辆车——托雷斯和埃尔维尔就很快睡着了。

直到醒来，托雷斯才注意到了那些枪。

又经过好长一段令人紧张的行程之后，几个人终于停了车，并且递给托雷斯和他堂兄一人一件黑色运动衫，让他们换上。托雷斯越来越觉得这几个新朋友绝非朋友。他们把兄弟俩带到一座看起来已废弃的孤零零的两居室低矮平房里，告诉他们在卧室里等着，其他人去寻找给养。

托雷斯从房子里溜出来撒尿，这时，他注意到周围泥土地上的新鲜脚印——对于已经说是废弃了的房子来说，这有些奇怪。从到了这里开始，他就一直感到不安，现在这些脚印确认了他的恐惧：他们被骗了，设局的人可能不止跟他们一起喝酒的那几个。托雷斯决定不等着发现自己的直觉是否正确了，他急忙回到屋里，告诉堂哥他们该走了。两人眼看就出门了，这时他们的酒友开了枪。托雷斯躲过致命的扫射，跳出后窗，朝附近的森林跑去。他在那里躲了将近10个小时，其间那些差点杀了他的人搜遍了整座山想找到他。太阳落山时，他走到最近的城镇，打电话报了警，并联系了家人。

托雷斯活了下来。埃尔维尔遇害了。

这只是弗雷迪·托雷斯不寻常经历的开始。令他惊讶的是，军方错误地把埃尔维尔宣布成一名内战中的游击战士，将他的死亡定性为战斗中阵亡。托雷斯发起运动，欲洗刷他堂兄的名誉，却招来了死亡威胁。最终，2007年2月的某天，他在波哥大自家住宅附近，坐在汽车里的当口，一个隐形枪手朝他射击，子弹打穿了挡风玻璃。他逃过一劫，也没有受伤。但遭遇这次暗杀企图之后，托雷斯举家搬走，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流动生活，每隔几个月就更换一次手机号码和住所。他表示，当局对他的保护请求没有回应。（“他们不帮助任何人^[1]，”他告诉我，“因为他们不想跟国家作对。”）托雷斯确信，埃尔维尔遇害，以及随后的恐吓活动，只可能是哥伦比亚军方内部的权力机构

所为。他的怀疑最终得到了证实^[2]，埃尔维尔遇害一案最终受到起诉的是一名鼓励士兵杀害平民的陆军上校，那几个顶着“弗雷迪”“派萨”“科斯特诺”名字的家伙再也没能找到，更不用说被逮捕了。

与托雷斯经历相似的故事在哥伦比亚还有成千上万，都来自该国“胜利的”反恐战争中的旁观者。埃尔维尔是“谎报战绩”现象的牺牲品，即死于哥伦比亚军方从未承认过的长期法外杀戮行为。军方人员迫于上级的压力，需要拿出显示反游击战成功的业绩，于是就诱杀毫无戒备的平民，然后将他们的尸体装扮成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叛乱分子。这些人的死被军方用来夸大军事行动的成功率，而那些谎报战绩者还会获得休假的待遇、晋升的机会和奖章。受害者包括农民、儿童、无家可归者、吸毒者、智障人士和小偷之类的罪犯，他们当中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是带着胸标的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员。

2008年之前，大多数哥伦比亚的政策制定者还可以假装这些虚假战绩只是谣言，但那年9月的所谓“索阿查（Soacha）丑闻”则掀开了遮羞布。检察官得知了波哥大贫民窟中22名贫困年轻男子的遭遇，这些年轻人被许以高薪工作，被运出城市，然后被杀害，并被装扮成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哥伦比亚政府军马里奥·蒙托亚（Mario Montoya）将军于2008年11月4日辞职。检察官又继续调查了超过3000起^[3]2000年以来民兵人员涉嫌谎报战绩的案件。联合国难民署（UNHCR）于2015年发布的报告称，谎报战绩的受害者总数可能高达5000人。

处决平民在哥伦比亚并不陌生，但到了21世纪的头几年，该国历时数十年的内战进入最后阶段，这种做法飙升。政府军再度猛烈地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反叛分子对决，急于向心灰意冷的本国公众及美国金主展示进步。国防部长卡米洛·奥斯皮纳（Camilo Ospina）

于2005年发布了所谓的第29号命令^[4]，实际上认可了谎报战绩的做法——该指令授权“奖励捕获或剿杀非法武装团体头目者”，奖金额度定为每杀一人可获得1500美元，差一点就达到哥伦比亚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第二年，遭处决的平民人数增加了一倍。丑闻规模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尚不得而知，但这种做法在哥伦比亚实属常见，并不局限于某个单位或地区。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对这种做法进行调查后发现，“没有证据表明^[5]这些杀人事件是作为政府官方政策实施的，或者是由总统或历届国防部长下令或在他们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对于华盛顿来说，谎报战绩的杀戮或许只是其他国家历史上一段小小的悲剧，但有一个事实例外：许多最凶恶的犯罪者受过美国的培训和资助。研究人员发现^[6]，获得美国援助越多的哥伦比亚政府军纵队，与其相关的处死平民案件数量也明显越多。华盛顿忙着支持哥伦比亚合作伙伴，以便后者能承担确保该国免受所谓恐怖分子袭击的使命，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军方官员和其他政策制定者往往没能仔细审视一下他们训练和资助的战斗者。在位于本宁堡（Fort Benning）的西半球安全合作研究所（Western Hemispher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7]接受培训的哥伦比亚指挥官中，近一半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或指挥了成员犯有法外杀戮罪的部队。杰米·拉斯普里拉（Jaime Lasprilla）将军^[8]曾在本宁堡担任过教官，他在哥伦比亚领军时批准或鼓励过数百起杀戮案件。像他这样的指挥官，在哥伦比亚政府军中可谓司空见惯。

甚至在索阿查丑闻爆发之前，美国情报、军队和外交部门中已开始对哥伦比亚法外杀戮的报告私下有所议论。美国驻波哥大大使1994年发回的一份电报就已提醒关注“数人头心态”，并解释说：“无法通过可追踪记录来展示自己的反游击队行动（大多数政府军侵犯人权行为发生的领域）前线官兵^[9]，会在晋升时处于劣势。”中央情报局

同年内的一份报告则表述得更为明确，指出哥伦比亚安全部队“在其反叛乱战役中采用了暗杀团战术”，并且“有一连串在游击区内暗杀左翼民众、与参与贩毒的准军事组织合作袭击疑似游击队的同情者的历史，以及杀害被俘战斗人员的历史^[10]”。五角大楼在1997年的一份报告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指出哥伦比亚政府军表现出“数人头综合征”，即“往往助长试图满足配额并取悦上级的善意士兵去侵犯人权”的氛围，以及“在允许准军事组织充当代理人时，采用随便或至少是被动放任的态度……为COLAR（哥伦比亚政府军）增加歼灭游击队的数量^[11]”。然而哥伦比亚——说的更广一些，还包括美国——正在进行一场战争。通常情况下，军方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兴趣去监管他们的士兵。

1998年10月28日，在白宫玫瑰园，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阿朗戈（Andres Pastrana Arango）站在克林顿总统旁边，参与了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奇怪的政治新闻发布会。这次活动的目标是讨论两国之间日益深化的关系，以及最终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新援助方案。“那是哥伦比亚计划的第一阶段^[12]，”帕斯特拉纳告诉我，在这么高的层级上，“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地谈到了哥伦比亚”。

出席发布会的记者还有其他问题要提问。“发布会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帕斯特拉纳回忆说，“是‘你怎么向切尔西解释丑闻？！’”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发布会提问已经到三四轮时才提出来的，但除此之外，他的记忆是正确的。新闻发布会的文字记录看起来像是千层糕——克林顿英勇卓绝地一次次试图将主题拉回到外交政策上来，而记者团一而再、再而三地围绕他与白宫实习生的性丑闻狂轰滥炸般地提问。这一丑闻使克林顿的总统生涯蒙上阴影。

帕斯特拉纳回忆说，克林顿那时压力很大。“他给了我一个健怡可乐。你能看出他很有人情味，第一次看到他人性的一面。”超现实的双主题并进新闻发布会继续着，间隙中，帕斯特拉纳要求在椭圆形办公室单独与克林顿会谈10分钟。在帕斯特拉纳的回忆中，克林顿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拿出一张哥伦比亚地图，两人看了帕斯特拉纳打算变为非军事化的地区。然后，帕斯特拉纳说，“他问我对他就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怎么看”，他指的是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帕斯特拉纳告诉克林顿他做得很好。这段记忆让帕斯特拉纳笑了起来。“挺奇怪的”，他说。这两个国家元首相处得不错，“不错的化学反应”。他们的对话得以持续，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演变成了界定克林顿拉丁美洲政策遗产的哥伦比亚计划。“我提出了我称之为哥伦比亚版马歇尔计划的动议”，帕斯特拉纳说。最终结果是美国向哥伦比亚提供总值100亿美元的救济、开发和军事援助。

为了推销这项昂贵的计划，克林顿也向被毒品时刻困扰着的美国公众发出呼吁。2001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公民对吸毒问题表现出“大量”关注^[13]。由于当时美国90%的可卡因来自哥伦比亚，那么大量的社会关注被导向到这个拉丁美洲国家也是有意义的。克林顿很容易就在这项计划上获得了支持。“哥伦比亚的贩毒者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14]，”他对美国公众表示。哥伦比亚计划“将使哥伦比亚自身的反毒计划得以落实，对游击队或准军事集团控制的地区内迅速扩张的毒品生产造成严重打击”。安妮·帕特森在霍尔布鲁克担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时期是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之后担任美国驻埃及大使，到了援助哥伦比亚新计划执行的头三年里，她刚好又在担任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当时的战略是向哥伦比亚政府提供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的工具，这两项斗争那时已融为一体^[15]，”帕特森对我表示，“为了打击贩毒集团和恐怖主义，有必要同时攻击链条上的所有环节。”

克林顿总统决定豁免对外资助法规中的人权条款^[16]，认为国家安全是第一位的。总统为此项豁免做合理性辩护时解释说：“我们的一揽子援助对于维持我们打击毒品犯罪的努力，以及对于帮助哥伦比亚政府和人民维护哥伦比亚的民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最初，哥伦比亚想按民生占70%、军方占30%的比例分配美国的援助；美国却希望反过来。最终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一位哥伦比亚人之手，他就是杰米·鲁伊斯（Jaime Ruiz）。按照帕斯特拉纳和鲁伊斯两人共同的说法，鲁伊斯是帕斯特拉纳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这一最终计划明显表现出了美国所希望的优先顺序。该计划规定了在10年内每年拨款13亿美元^[17]，用于打击“毒品恐怖主义”。第一年，超过70%的资金被用于援助军队和警察，包括从“黑鹰”到通信设备、培训师、化学战技术等在内所有项目所需的资金。正如美国前大使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所说的那样：“（哥伦比亚）来了，索要面包，你给了他们石头^[18]。”但美国剩余的资金确实被用于经济发展、司法改革和对流离失所者的援助。只有在军事和民生援助之间达到对等平衡，且美国和哥伦比亚的官员都开始认识到重建该国长期遭受践踏的法制有价值时，这项协议才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功。

造成美国在哥伦比亚陷入纠葛的动因，正是推动美国卷入从越南到阿富汗等地区争端的同一种反共热情，对毒品的担忧是之后才出现的。外交贬值且重要性排名下降，同时军事将领在政策制定中崛起，这些趋势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出现爆发性的增长，但种子是在更早的冷战时期军事冒险中埋下的。成千上万名无辜者成为这些干预战略的牺牲品。

对哥伦比亚的干预始于1962年美国陆军特种战争中心（US Army Special Warfare Center）对波哥大的一次访问。该中心指挥官威廉·亚伯勒（William Yarborough）中将是当时的领队，在他的提议

下，才有了那个年代的一大经典代理人战争，即利用当地人“发挥反间谍和反宣传功能^[19]，并在必要时，针对已知的推行共产主义者执行准军事、破坏和/或恐怖活动”。

根据他的研究结果，美国帮助哥伦比亚政府制订了“拉索计划”（Plan Lazo），一项以越南“凤凰计划”（Phoenix Program）^[20]为蓝本的反叛乱战略。这项计划于1962年7月1日正式被哥伦比亚军方所采用，并被当作“心灵与智慧”^[21]战略灌输给哥伦比亚民众。事实上，这是美国人希望在民间告密者的帮助下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哥伦比亚总统颁布的第3398号总统令更加强化了拉索计划，命令指出“所有哥伦比亚人，男人和女人…… 将被政府用在有助于重建秩序的活动和工作中”——这实际上等于允许哥伦比亚当局将普通公民组织成民兵团体^[22]。与美国支持的拉索计划一道，第3398号总统令创建了按指示和授权杀害武装或非武装农民的民间“自卫队”^[23]和“猎杀队”。

美国陆军和中央情报局开始使用越南时期用过的相同技术指导哥伦比亚军队。作为中央情报局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中情局位于洛斯弗雷斯诺斯（Los Fresnos）的“炸弹学校”为哥伦比亚警方提供了培训，课程包括^[24]“恐怖分子装置”、“燃烧弹”和“暗杀武器”等。

美国不仅教授哥伦比亚军队与共产党作战，还承销那场战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哥伦比亚部队就使用美国提供的车辆、通信设备和武器，来摧毁全国各地的反叛社区。1964年5月18日，歼灭共产主义农民——大多数都是农民——的反叛乱战役开始了，哥伦比亚政府军派出了整整1/3的兵力，去摧毁一个只有几十个战士守卫的左翼村庄马克塔利亚（Marquetalia）。该行动是应美国的要求、在美国的协助下

进行的。美国军事顾问在筹划和执行过程中全程在场。第一次袭击之后，哥伦比亚政府还开始了对其他自治左翼农村社区的袭击。

哥伦比亚政府的举措充斥着腐败和管理不善，以及他们鼓励了更多流血事件的出现，这些在美国国务院中都不是秘密。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承认这在道德上自相矛盾^[25]，并在电文中写下了美国资助和鼓励农村暴力以及经济混乱的观点。而美国国务院也很难自圆其说地向外界宣称，左翼分子与美国支持的哥伦比亚政府军之间所进行的长期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多数哥伦比亚人的命运：因为引发冲突的潜在阶级斗争持续存在，没有土地的人仍被剥夺权利，而城市精英则在混乱中变得富裕起来。在此期间，美国的投资和贷款大幅增加，使得哥伦比亚总统阿尔韦托·耶拉斯·卡马戈（Alberto Lleras Camargo）都忍不住冷冷地说：“流血与资本积累携手并行。”^[26]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崛起，直接回应了美国支持的攻击哥伦比亚左翼人士行动。马克塔利亚消失之后，少数来自该地区的左翼分子逃到了山区，在那里他们与其他反叛团体结盟，共同承诺为农村人口争取更好的条件，并保护他们的追随者免受政府军攻击。

他们的组织迅速壮大。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不仅是一支为获得更多土地而斗争的游击队，而且已经成长为一场推动该国进行社会主义重组的政治运动。乡村的农民、土著人口、非洲裔哥伦比亚人、无地劳工、工会会员、教师、知识分子——“这片土地”之子——都加入了战斗。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开始组建学校、医疗中心和社会项目，基本上运行了一个平行的国家。

但该组织骨子里仍然是一支战斗力量。组织建立后不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领导人就开始在农村地区训练民兵，发动袭击。该组织依靠恐怖主义运动，不仅轰炸警察局和军事基地，还袭击医院、教

堂和学校。绑架勒索赎金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提供了收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然而从那时起，该组织开始贩运可卡因。

在里根第一个总统任期内^[27]，进入美国的可卡因和大麻中，几乎80%来自哥伦比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新挖掘的毒品财富，使它吸引该国早已不满于大部分地区极度贫困状态的民众支持。到1980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人数^[28]增加了6倍，在全国范围内拥有3000名左右的战士。收入也一路飙升，最终达到数十亿美元。然而暴力事件更加频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将恐怖统治的矛头对准了神职人员、政治家、军官，甚至著名的右翼民间人士，目的往往只是煽动恐惧。

反过来，社会精英阶层的土地所有者也雇用很多右翼武装力量，而这些组织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很多都源自拉索计划下美国支持的团体。这些右翼武装力量也激进地以任何敌视其雇主者为针对目标。准军事组织到处都是^[29]：巅峰时期达到3万人之众，活动范围占全国的2/3。这些组织中有些是由政府武装起来的，法律上得到了认可。它们也是残酷的^[30]：名为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AUC）的一个组织在其头两年的行动中就杀死了超过1.9万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准军事性的敢死队得到了政府、军方、贩毒者，甚至美国的支持。白宫拒绝支持政府与左派之间的任何和平对话，并谴责左派武装力量为“贩毒游击队”^[31]。在某些情况下，里根政府甚至直接支持给美国充当告密者^[32]或刺客的右翼准军事组织。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跨国打击毒品战争中出现了一批命运多舛的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军队与20个较大的可卡因贩运者联手，建立了由美国情报部门支持的国家反恐训练学校。这一团体也被称为“绑架者死”（MAC），其使命看起来很简单：挫败哥伦比亚革命

武装力量，绑架政客和富人。毒贩被要求先支付3.5万美元的初始费用。政府军聘请以色列和英国的雇佣兵前来提供培训，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情报人员也有所参与。

该集团从致命的角度讲是成功的；最终，它成长为政府军的又一个准军事且从事犯罪行为的延伸组织，在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战争中替政府干脏活，几乎没有或者很少专注于阻止绑架。20世纪80年代，“绑架者死”杀害的以爱国联盟（Unión Patriótica）成员身份参与政治进程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超过700名，进一步阻止了由总统贝坦库尔（Betancur）领导的和平进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准军事组织中的许多人也进入了毒品行业，而援助给哥伦比亚用于打击毒品战争的美元也陆续流入了毒贩的口袋。

结果是各种派系和暴力密集涌现。1999年，哥伦比亚经历了数千起恐怖袭击和绑架事件，杀人案发率^[33]高达每10万人中有60人被杀。近2万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战斗人员隐藏在全国各地，绑架勒索的赎金数以百万计^[34]。哥伦比亚整整一半的领土缺乏安全保障；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基本上统治了整个南方，政府不敢进入^[35]。1995年到2000年，超过70万名哥伦比亚人^[36]离开了这个国家。暴力事件也变得更加可怕：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屠杀起平民来动辄数以十计，并以方法残忍得令人毛骨悚然而闻名，比如用砍下的人头当球踢，以及用电锯将受害者大卸八块等^[37]。

克林顿的缉毒沙皇巴里·麦卡弗里（Barry McCaffrey）将军对当时的暴力仍保留着鲜活的记忆。“你在那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开车都有可能被绑架。那有点像随机抓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检查站会搜索你的名字，找出你的身家财产价值，然后你最终要么被绑架，要么就死在热带丛林里。”这是一种“邪恶可耻的情况^[38]”。

到20世纪末，哥伦比亚人已经决定是该实现永久和平的时候了。1999年10月，这个拥有4000万人口的国家里，有1300万人参加了全国范围内题为“够了”的抗议示威活动^[39]。那个晚些时候，有1000万人在这场象征性的公投中投票支持和平，给哥伦比亚政客们敲了一记警钟。该国没有任何正式的政治选举出现过如此高的投票率。

当时担任总统的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自己就曾经被麦德林贩毒集团（Medellín Cartel）绑架过，他说自己立刻明白了这次投票的后果。“没有任何总统候选人获得过那么多的选票，”他说。因此，在当选总统之后，他“决定我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实现和平^[40]”。帕斯特拉纳尝试使用了从未见过的战术。他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高层领导人会面，甚至到山区去，亲自与叛军指挥官对话。为了表达善意，他专门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划拨了一个非军事区，并在他上任后的头六个月开始了正式的和谈。当然，他与克林顿在白宫玫瑰园那场奇特的记者会之后，还斡旋达成了哥伦比亚计划。

近20年后，哥伦比亚计划被当作一个成功的故事，足以说明当时的形势有多么糟糕。无论是从财务还是人力的角度衡量，这笔交易的代价都是个天文数字。美国花了100亿美元支撑哥伦比亚的安全部队、经济和政治机构，额度仅次于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据报道，2005～2014年，针对左翼分子有记载的政治暗杀活动^[41]超过17万起，谎报业绩类丑闻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夹杂在美国援助当中的侵犯人权行为也经常发生：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美国制造的智能炸弹^[42]经常被用来消灭境外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领导人，然而同时也往往导致平民死亡。

“秘密的国家恐怖主义”^[43]事件很常见，最著名的是2002年2月摧毁圣维森特德尔卡古安（San Vicente del Caguán）镇的行动——

这次袭击与美国和哥伦比亚40年前联手端掉马克塔利亚村的行动如出一辙，在美国的压力下，哥伦比亚政府军袭击了南部卡克塔省

（Caquetá）的圣维森特镇。繁荣且大部分自治的南部地区由于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集中活动的主要区域，也经常被当地人称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地盘”。圣维森特是个成功的社区，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新的高速公路和桥梁、广泛的供电、优质的学校和医疗保健系统。但在一轮和平谈判突然中断之后，帕斯特拉纳命令军队入侵该地。美国提供的A-37和A-47飞机投下炸弹，1.3万名受过美国训练的士兵包围了村庄。政府宣布取得了胜利，告诉媒体他们已经消灭了该地区应该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营地的存在。政府军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也一并消灭了一些平民，其中包括老幼妇孺。

战争的受害者很少见到正义。武装分子在农场和别墅中被“监禁”^[44]，之后他们可以复出，财富和人脉网络丝毫不受影响，且免于被进一步起诉或引渡。美国引渡的准军事组织领导人通常受到较轻的刑罚——只有七年，仅略微超过贩卖一盎司以下可卡因的街头毒贩所获刑期的一半。

哥伦比亚计划启动近20年后，或者说美国开始对哥伦比亚进行干预的近70年后，问题仍然存在：华盛顿坚持实现其军事和安全目标的人道代价是否太高了？而增强文职部门在决策环节的影响力是否可以防止像埃尔维尔这样的人死亡？当我向克林顿政府的缉毒沙皇麦卡弗里将军提出美国是否对哥伦比亚内战中的平民死亡负有任何责任这一问题时，他非常地不屑一顾。把美国看作同谋的想法是“最恶劣且完全不合逻辑的胡说八道，纯粹胡说八道”。

“为什么会是那样？”他问道，指的是显示美国的支持与哥伦比亚部队施虐行为之间存在关联的数据。“美国外交官和军官们所做的监督怎么会……助长法外杀戮和混乱？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更有可能

的是，这些单位只是更多地参与了反叛乱……有些人可能参与了更多或许有侵犯人权内容的行动。但是（指责美国）实在太胡说八道了[\[45\]](#)，完全没有可信性。”

“那是场血腥的战争，发生了一些血腥的事情，”他承认道，“但基本上（哥伦比亚政府军）是哥伦比亚社会中最值得信赖的机构。”确实，政府军往往是为美国进行代理人战争的国家中最受到信赖的机构。美国官员很少正视但令人不安的问题是，美国的支持在多大程度上促使这些军队成为其各自国土上唯一持久的政权结构。

无论成本如何，哥伦比亚计划最终将重心转向了民事援助，并为和平奠定了基础。这一点与后续诸如巴基斯坦之类的其他同类努力有很大不同。在该计划实施的第一个10年内，国家级警察力量扩大到全国所有大城市，有效帮助减少了绑架案件，从每年3000起降到了200多起；杀戮事件的数量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部队规模缩减了一半[\[46\]](#)。到2006年，哥伦比亚实现了3万多名战斗人员自愿复员，结束了大部分准军事暴力，并启动了与联合自卫军指挥者之间的和平谈判[\[47\]](#)，获得了其中许多人同意进入审判程序以换取较轻监禁的意向。

与许多其他类似的联盟比较起来，与哥伦比亚的关系中显著不同的一点在于，有一个围绕武器和人权豁免的整体发展计划。该计划的非军事组成部分和军事组成部分之间互相作用，彼此加强。“我们试图让国会同意与哥伦比亚达成自由贸易协定[\[48\]](#)，我们支持（哥伦比亚总统）乌里韦（Uribe）为在哥伦比亚重建体制所做的民主安全方面的努力，”康多莉扎·赖斯回忆说，“但我们必须打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现在能进行合理的和平谈判的原因，就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不能再像绑架人质一样据守卡特赫纳（Cartagena）和波哥大。”外交和安全战略更加平衡地相互融合，是给陷入困境的国家最

终带来和平的核心原因。麦卡弗里表示，到头来“我们看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最成功的政策干预^[49]”。

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联盟记录中满是悲剧和混乱，但也有经验教训。“如果看一下哥伦比亚计划，”赖斯说，“是由外交主导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特朗普政府恐怕很难将促使美国在哥伦比亚取得非典型性成功的经验，应用到其他地区。由于全面削减预算，当年哥伦比亚计划赖以成功的全面综合性发展援助变得更加稀缺，加之新一轮武器交易和强人政治倾向看起来使美国外交政策更加与人权问题脱钩，现在几乎看不到这些经验教训已经引起注意的任何迹象。

[1] Author Interview with Freddy Torres, 4 November 2016.

[2] “IIR: Cashiered Colonel Talks Freely about the Army He Left behind (Laser Strike),” Information Report, 1787983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to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C., Nsarchive 2. gwu.edu//NSAEBB/NSAEBB266/19971224.pdf.

[3] “On Their Watch: Evidence of Senior Army Officers’ Responsibility for False Positive Killings in Colombia,” Human Rights Watch, 24 June 2015, <https://www.hrw.org/report/2015/06/24/their-watch/evidence-senior-army-officers-responsibility-false-positive-killings>.

[4] “False Positives,” *Colombia Reports*, 14 March 2017, <https://colombiareports.com/false-positives/>.

[5] Statement by Professor Philip Alston,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Mission to Colombia 8-18 June 2009,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on Human Rights, 18 June 2009, <http://newsarchive.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9219&LangID=E>.

[6] “False Positives, ” *Colombia Reports*, 14 March 2017,
<https://colombiareports.com/false-positives/>.

[7] “The Rise and Fall of ‘False Positive’ Killings in Colombia: The Role of U.S. Military Assistance, 2000–2010, ”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and Colombia–Europe–US Human Rights Observatory, May 2014,
<http://archives.forusa.org/sites/default/files/uploads/false-positives-2014-colombia-report.pdf>.

[8] “The Rise and Fall of ‘False Positive’ Killings in Colombia: The Role of U.S. Military Assistance, 2000–2010, ”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and Colombia–Europe–US Human Rights Observatory, May 2014,
<http://archives.forusa.org/sites/default/files/uploads/false-positives-2014-colombia-report.pdf>.

[9] “Unclassified Cable 200202961, ” from American Embassy Bogota to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D.C.,
<http://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266/19941021.pdf>.

[10] “Colombian Counterinsurgency: Step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Office of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Analysis, 26 January 1994,
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266/19940126.pdf.

[11] “IIR: Cashiered Colonel Talks Freely about the Army He Left behind (Laser Strike) , ” Information Report, 1787983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to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C., 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266/19971224.pdf.

[12]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dres Pastrana, 29 September 2016.

[13] “In U.S., 65% Say Drug Problem ‘Extremely’ or ‘Very Serious’ , ” Gallup Polls, 28 October 2016,
news.gallup.com/poll/196826/say-drug-problem-extremely-serious.aspx?g_source=position1&g_medium=related&g_campaign=tiles.

[14] Clinton, Bill, “Remarks at the Council of the Americas 30th Washington Conference, ” 2 May 2000, 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58427.

[15] Author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Anne Patterson, 23 June 2016.

[16] “Clinton Waives Rights Standards, ” *CBS News*, 22 August 2000, <https://www.cbsnews.com/news/clinton-waives-rights-standards/>.

[17] Shifter, Michael, “Plan Colombia: A Retrospective, ” *Americas Quarterly*, Summer 2012, www.americasquarterly.org/node/3787.

[18] Dan Gardner, “Losing the Drug War, ” *Ottawa Citizen*, 6 September, Cited in Villar, Olivier and Cottel, Drew, *Cocaine, Death Squads, and the War on Terror: 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

[19] US Army Special Warfare School, “Subject: Visit to Colombia, February 26, 1962, ”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eries (Arlington, VA: Carrollton Press, 1976) , Cited in Villar, Olivier and Cottel, Drew, *Cocaine, Death Squads, and the War on Terror: 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

[20] 美国在越战期间实施的一种通过渗透和暗杀越共成员的方式，以暴力手段给对手造成实际和心理打击的战术计划，行动初期甚至有规定的猎杀数额，因此有平民被杀害并拿来凑数。——译者注

[21] “The History of the Military-Paramilitary Partnership, ” Human Rights Watch, 1996, <https://www.hrw.org/reports/1996/killer2.htm>.

[22] Dyer, Chelsey, “50 Years of U.S. Intervention in Colombia, ” *Colombia Reports*, 4 October 2013, <https://colombiareports.com/50-years-us-intervention-colombia/>.

[23] 1963 Field Manual on US Army Counterinsurgency Forces (FM 31-22) , 82-84, Cited in Villar, Olivier and Cottel, Drew, *Cocaine, Death Squads, and the War on Terror: 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

[24] Michael McClintock, “Instruments of Statecraft: U.S. Guerrilla Warfare, Counterinsurgency, and Counterterrorism, ” 1992, Cited in Villar, Olivier and Cottel, Drew, *Cocaine, Death Squads, and the War on Terror: 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

[25] Villar, Olivier and Cottel, Drew, *Cocaine, Death Squads, and the War on Terror: 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

[26] Villar, Olivier and Cottel, Drew, *Cocaine, Death Squads, and the War on Terror: 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

[27] Villar, Olivier and Cottel, Drew. *Cocaine, Death Squads, and the War on Terror: 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

[28] Molano, Alfredo, “The Evolution of the FARC: A Guerrilla Group’ s Long History, ” NACLA, <https://nacla.org/article/evolution-farc-guerrilla-groups-long-history>.

[29] “United Self-Defense Forces of Colombia, ” Stanford University, 28 August 2015, web.stanford.edu/group/mappingmilitants/cgi-bin/groups/view/85.

[30] “United Self-Defense Forces of Colombia, ” Stanford University, 28 August 2015, web.stanford.edu/group/mappingmilitants/cgi-bin/groups/view/85.

[31] Villar, Olivier and Cottel, Drew, *Cocaine, Death Squads, and the War on Terror: 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

[32] Smyth, Frank, “Still Seeing Red: The C.I.A. Fosters Death Squads in Colombia, ” *Progressive*, 3 June 1998,
www.franksmyth.com/the-progressive/still-seeing-red-the-cia-fosters-death-squads-in-colombia/.

[33] Shifter, Michael, “Plan Colombia: A Retrospective, ” *Americas Quarterly*, Summer 2012,
www.americasquarterly.org/node/3787.

[34] Marcella, Gabriel et al., “Plan Colombia: Some Differing Perspectives, ” June 2001,
www.dtic.mil/dtic/tr/fulltext/u2/a392198.pdf.

[35] Shifter, Michael, “Plan Colombia: A Retrospective, ” *Americas Quarterly*, Summer 2012,
www.americasquarterly.org/node/3787.

[36] Shifter, Michael, “Plan Colombia: A Retrospective. ” *Americas Quarterly*, Summer 2012,
www.americasquarterly.org/node/3787.

[37] Wilkinson, Daniel, “Death and Drugs in Colombia, ” Human Rights Watch, 2 June 2011, Published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https://www.hrw.org/news/2011/06/02/death-and-drugs-colombia>.

[38]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Barry McCaffrey, 22 June 2016.

[39]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People’ s Army, ” Stanford University, 15 August 2015,
web.stanford.edu/group/mappingmilitants/cgi-bin/groups/view/89.

[40] Author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Andres Pastrana and Chief of Staff Jaime Ruiz, 29 September 2016.

[41] Villar, Olivier and Cattel, Drew, *Cocaine, Death Squads, and the War on Terror: 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

[42] Priest, Dana, “Covert Action in Colombia, ” *Washington Post*, 21 December 2013,
www.washingtonpost.com/sf/investigative/2013/12/21/covert-action-in-colombia/?utm_term=.3c65ec066eb6.

[43] “Colombia: San Vicente del Caguan after the Breakdown of the Peace Talks, ” and Villar, Olivier and Cottel, Drew, *Cocaine, Death Squads, and the War on Terror: 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

[44] Wilkinson, Daniel, “Death and Drugs in Colombia, ” Human Rights Watch, 2 June 2011, Published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https://www.hrw.org/news/2011/06/02/death-and-drugs-colombia>.

[45]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Barry McCaffrey, 22 June 2016.

[46] Shifter, Michael, “Plan Colombia: A Retrospective, ” *Americas Quarterly*, Summer 2012,
www.americasquarterly.org/node/3787.

[47] “Colombia, ” Freedom House, 2007,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07/colombia>.

[48]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 3 August 2017.

[49]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Barry McCaffrey, 22 June 2016.

第三部 毁灭进行时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7年

朝鲜，2007年

与暴徒之间没有停战，没有谈判

试着对话，但其置若罔闻

——图派克，《抢麦克风》

22 国务卿现状

雷克斯·蒂勒森的团队又打起来了。“好吧，谁和他一起进去？”蒂勒森的幕僚长玛格丽特·彼得林说着，带着好像在房间里发现了害虫般的表情，上上下下地打量我。我们站在“红木走廊”尽头通往国务卿办公室的宽阔双开门前。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史蒂文·戈德斯坦（Steven Goldstein）两手抱在胸前，怒目而视地盯着彼得林。“怎么说呢，我想我不会”，戈德斯坦告诉彼得林。“希瑟可以走了”，他向蒂勒森的发言人、前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主播希瑟·诺尔特（Heather Nauert）点了下头。彼得林眯起眼睛看着戈德斯坦。“你确定吗？”她戏剧性的语调表达着不满。戈德斯坦没有回答。蒂勒森大步走到门口，打破了紧绷的氛围。

据争斗不休的蒂勒森内圈中多名成员透露，这种就在一层窗户纸背后燃烧的不和谐，在蒂勒森2018年3月被毫不客气地解雇之前，已然酝酿了几个月。争执通常始于彼得林，她是位难对付的律师和前国会助理，参与起草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出台的《美国爱国者法案》，并指导蒂勒森顺利通过了其国务卿提名的确认程序。她收到说我当天要来的通知后，转手给蒂勒森团队的其他成员发出最后通牒：公关人员里，只有戈德斯坦获准出席采访。戈德斯坦指出，身为发言人的诺尔特需要负责回答随后的公开问题。而彼得林则坚持说地方太小，根本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两位工作人员表示还有另一个动机：彼得林一直在游说，想炒掉诺尔特。这场对峙到我已经进门见蒂勒森时都没平息；实际上到我离开时也没平息，反而第二轮的尴尬已经开始，而这时争执的是谁留下来待在国务卿身边（戈德斯坦再次坚持让诺尔特留下来，显然让彼得林不高兴）。

这种争吵几乎都还达不到戏剧化的程度，但在记者面前如此公开展示，还是不寻常的行为，也与蒂勒森之前大多数国务卿所珍视的那种组织严密、口径一致风格大相径庭。它为人们透视国务院似乎陷入各层级全部混乱的局面提供了一个窗口。随着特朗普政府将政策权力下放给五角大楼和白宫内越来越多的军事将领，这是唯一的平衡：一个衰弱的国务院，由似乎是根据充当外交刽子手意愿选拔出来的国务卿领导——而在蒂勒森的案例中，还因为选拔时他们对候选人意愿的评估错误，而很快被解雇了。

我们在2018年1月见面时，蒂勒森穿着一件炭灰色西装和一条上有马蹄铁组合图案的明黄色领带，跷着二郎腿，放松地坐在国务卿办公室内一把蓝金两色相间的布面椅子上，距离理查德·霍尔布鲁克7年前心血管爆裂时所在的位置仅有几英尺之遥。办公室看起来与那天大致一样，除了摆放的艺术品：蒂勒森一开始布置办公室时，把过世外交官的肖像换成了展现美国西部风光的画作^[1]。蒂勒森经常被比作牛仔，而从办公室的装饰画和领带上的马蹄铁当中，似乎也看出他确实有牛仔的倾向。他的名字也透露出同样的倾向：雷克斯·韦恩·蒂勒森，把两位好莱坞电影史上不可磨灭且器宇轩昂的牛仔形象扮演者的名字都囊括了——雷克斯·艾伦（Rex Allen）和约翰·韦恩（John Wayne）^[2]。

蒂勒森出生于得克萨斯州威奇托福尔斯（Wichita Falls）的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在威奇托福尔斯和隔壁的俄克拉荷马州长大。他的父亲“开着卡车向杂货店出售面包^[3]”，他的母亲在家抚养孩子。蒂勒森的父母是通过童子军相识的^[4]，当时他母亲去蒂勒森父亲工作的那个营地探望自己的兄弟。蒂勒森也很支持这一传统，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积极参与童子军的领导工作。他的简历中有很多超级成就：他是一名鹰级童军^[5]（Eagle Scout），后来还成为他所在高中的乐队成员，演奏定音鼓和爵士鼓，并获得了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

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军乐队奖学金。他在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工作了40多年，其中担任首席执行官超过10年，积累个人财富^[6]超过3亿美元——不包括他离开公司转任政府公职时拿到的1.8亿美元退休金。加入特朗普政府的决定打乱了他的退休计划——原本他应该携妻子伦达（Renda），回归得克萨斯州拥有两匹马和一座牧场的生活。“我并没有想得到这份工作^[7]，”蒂勒森说，“我妻子告诉我应该接受它……我本来是要回归牧场，与我的孙子孙女们在一起的。”当我问到他一年以后是否还会认为接受了这份工作是正确的决定时，他笑了。彼得林警告地看了他一眼。“是的，”他说，“迄今为止”——他皱起眉头，似乎在找词——“有趣。^[8]”

特朗普提名蒂勒森出任国务卿一职时，蒂勒森执掌全球最大跨国企业之一的经历激起了职业外交官们的乐观情绪。几位官员表示，也许蒂勒森能强有力地捍卫国务院的地位，也许他能带来私营部门的管理技巧，促使国务院的机构成长——或者至少是明智而有目标的精简。面对站满了国务院大厦大堂的全体员工，蒂勒森站在楼梯上发表的约10分钟首次讲话受到了好评。“我就是那个新人^[9]”，他慷慨地对人群表示。他提到了大厅两端的大理石墙壁，那上边刻有数百名在执行任务中丧生的外交官员的名字。“舆论还是不错的^[10]”，外交官艾琳·克兰西在蒂勒森的国务卿提名被确认之后不久回忆说。克兰西在国务院大清洗中侥幸躲过了被炒鱿鱼的厄运。“那时情势还是春风和煦，他的从商履历让人看到希望”，一位与特朗普任下白宫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表达了同样的情绪。“这是一个多么不同的选择^[11]，”此人回忆说，这是他首次被征求对蒂勒森意见时的想法，“多么酷的家伙。”

问题快速地累积。到任国务院之后，蒂勒森失踪了，他几乎没有接受任何采访，限制媒体靠近，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上任后首次对亚洲进行访问时，只带了一位来自一个保守派网站的写手，为此惹

恼了新闻界。支持蒂勒森提名的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就是众多对此表示沮丧的人之一。“你必须带着新闻界上飞机随访^[12]，”几位接近她的人回忆她当时这样说道，“这就叫作民主，是我们做国务卿的乘坐政府资助的飞机旅行时，所需要倡导的。他为什么不带上媒体同机随行？”当我询问赖斯她对蒂勒森的看法时，她的话更具有政治色彩。“我无法评估内部发生了什么^[13]，”她说，“我听到了新闻报道，我知道他们不愿意公布一个版本的想法。我只知道雷克斯·蒂勒森是个非常强的人，一个很好的经理人，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但我不能谈论他如何运作这个部门的具体细节。”

蒂勒森和他的助手爽快地承认了资讯传播方面存在问题。“我不掺和部门以外的事^[14]，那不是我做的事情”，蒂勒森说。“这可能是我在私营部门工作了41年半的习惯。我就是被这么训练出来的，这就是我做事的方式，很多人都很沮丧，我明白了，”他笑了，“但我不会改变！”蒂勒森的沉默还是让他付出了代价。接近白宫、最初表达了对蒂勒森乐观态度的那位消息人士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疏远了新闻界。”八卦内容开始在华盛顿流传，将蒂勒森描绘成冷漠之人、在国务院内被孤立绝缘。有些内容被夸大了，例如《华盛顿邮报》报道^[15]说玛格丽特·彼得林告诉职业外交官不要与国务卿进行目光接触。包括一位蒂勒森保安团队成员在内的部分消息人士，对彼得林会实施这样一条规则的说法^[16]提出了异议。但是彼得林确实在守卫蒂勒森时作风非常凶悍，以至于许多国务院官员认同公开报道中称她是“瓶颈”^[17]的说法。即使是像康多莉扎·赖斯这样同等地位的高阶人士，据称不先通过彼得林的话，也无法联系到蒂勒森本人。“我打不通，”据一位与赖斯亲近的人回忆，这位前国务卿曾如此沮丧地说，“玛格丽特筛选了我的电话。”

后果更严重的是国务院内部人员也很难接近蒂勒森。上任第一天发表讲话之后，一直到5月第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之间，蒂勒森居然没有

再对员工讲过话——对于任何一届政府的国务卿而言，5月才召集首次员工大会已经很晚了。讲话中，蒂勒森向国务院的全体人员做了一个全球冲突的基础概述。过程中，其肢体语言内敛克制——微小、自信的手势，胳膊肘以上没有动作。有些人认为他的讲话居高临下。“那就是一次‘我会看地图’^[18]的练习”，一位在现场聆听了蒂勒森讲话的外交官回忆道。当蒂勒森讲到自己参加模拟联合国会议的故事，说到他给一个12岁的参会者讲述外交给了他多少启发时，一位中年外交官开始有些激动地嘟囔：“你不了解我们！”这话说出来的分贝水平足以让大礼堂中坐在此人三排以内^[19]的人听得真切。“事实上，蒂勒森先生并没有做到对国务院内部正在进行的所有事务都有充分的了解^[20]，而如果他只是依靠他周围的政治小圈子的话，那么他也不可能做到悉数了解，”科林·鲍威尔说，“他们似乎把时间都花在确保他不会从国务院了解到任何东西上了。”

几位工作人员表示，就连外国同行也觉得不容易接近蒂勒森。“他不会主动找人谈话或交际”，国务院运营中心的一位官员告诉我，他为蒂勒森当过几个月的接线员。“我在那里时，帮国务卿接通的绝大部分电话都是与政府内部人员的……感觉似乎有很多内部的纸上谈兵^[21]。”国务院运营中心在多位国务卿任内都工作过的数名官员表示，这些内部通话的存在并无异常，但内部和对外谈话的比例有些不同寻常。譬如说，在新任国务卿宣誓就职后，他们通常会接到世界各地外交部长和国家元首打来的大量礼节性电话。运营中心接到了超过60通打给蒂勒森的这类电话，但他每天只接听三个，其余的一律拒绝接听^[22]。

后来，到美国发动对叙利亚的袭击时，政府就完全跳过了通知北约盟国的传统步骤。蒂勒森接到了大量的电话。“当新闻曝光出来时，惊恐的盟友，包括捷克人——他们是在叙利亚的保护力量——都打来电话，说‘我希望与蒂勒森国务卿通话’。”那位运营中

心官员告诉我。那是星期天下午还算早的时间，蒂勒森人在华盛顿，并没有日程安排。“我们被告知国务卿在周末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所以他要回家和妻子共进晚餐，然后就休息了。”不接电话。这位国务院职业外交官忍不住感叹，国务卿真是致力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然而蒂勒森的决定还是让一些人感到困惑。“我们刚刚在没有告知盟友的情况下轰炸了叙利亚^[23]，”这位运营中心官员恼怒地说道，“你恐怕必须得打几个电话，哪怕是从家里打呢。真让我哑口无言。”

蒂勒森似乎不愿意依靠国务院内部的其他人，来填补人们感觉到的领导力真空。相反，有关职业外交专家及其意见靠边站的谣言则越来越多。在助理们的描述中，蒂勒森喜欢做深入研究，会为参加会议做很多准备。但他的无情效率也令人震惊。“我真的会逐一阅读发给我的所有备忘录……”蒂勒森在第一个期待已久的全体员工大会上说过，“我很感谢那些能把内容浓缩到一页纸上的人，因为我的阅读速度不快。”他不是开玩笑，在蒂勒森任内，正式的备忘录写作指南中有一行红色粗体字警告：“内容限制在两页内^[24]。”几位官员表示，非正式场合中强制执行的内容限制是一页。每一位国务卿都对简报长度有自己的要求，且执行了各不相同的指导方针。从理论上讲，防止文书无谓的冗长是理性的目标。但数位高级官员表示，在蒂勒森的要求上，他们觉得无法在要求的篇幅内，将细微差别准确全面地向一位不了解错综复杂关系的背景、要监督管理这些关系的国务卿解释清楚。即使是那些获准送达国务卿办公室的简要文件，也经常被扣押很长一段时间，百般无奈地等待彼得林的审查。据两名官员表示，国务卿办公室的特别助理不得不将一些备忘录的日期向后更改，以降低文件积压带来公共丑闻的风险。

一方面是无与伦比的私营部门管理纪录，另一方面是对国务院的管理方法，这二者之间如何对得上号，对此与蒂勒森一起工作的许多

人感觉挣扎，接近白宫的那位消息人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在埃克森美孚的40年里，从‘上帝的小屋’（God Pod）^[25]中指挥人们跟着油价的涨势上蹿下跳”，这位消息人士说，他还使用了人们称呼蒂勒森在埃克森美孚办公室的外号。“我不是想贬低他，但是你知道，管理那家公司是有套路的。”但是总统以外没人是上帝的政府则是另一回事。“起初我只是想‘呃，这是成长的痛苦；一位私营企业家，正在意识到华盛顿有多难搞’，”接近白宫的这位消息人士继续说道，“只是，我开始看到的是一个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不但没有悟出要领，而且还不进行自我反省。”

关于蒂勒森将让位的谣言^[26]一直在流传，直到他最终在2018年3月被宣布停职。取而代之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被广泛认为是热门的继任人选，特朗普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尼基·黑利（Nikki Haley）是另一人选，其竞争力来自驾驭及推进特朗普麾下白宫激进战略意图的能力。大众眼里蒂勒森与黑利的竞争似乎是造成蒂勒森及其团队特别烦恼的一大根源。我前来与国务卿会面的那一天，他们仍在为黑利发表的一份声明感到震惊。黑利就联合国负责巴勒斯坦难民事务的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预扣资金一事发表声明前，并没有与蒂勒森商量过。在一系列气氛紧张的电子邮件中，黑利的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人员对蒂勒森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经过国务卿，而是直接与白宫进行了核实。几周之后，蒂勒森就叙利亚问题发表了反响不错的强硬讲话，几乎就在同时^[27]，黑利也就同一主题发表了自己的声明，招致蒂勒森团队的抱怨，称黑利公开削弱国务卿的权威^[28]。国务卿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鲜见，但蒂勒森和黑利的关系中敌意似乎更深。“我靠，”那位接近白宫的消息人士说，“我从来没见过他对待她的方式^[29]……实在令人震惊。”多个白宫消息人士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其中一人表示，蒂勒森对黑利的“愤怒”甚至让总统都产生了不悦。蒂勒森团队对这些说法提出了异议。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

卿史蒂文·戈德斯坦称蒂勒森“是一个非常体贴、体面、有原则的人”^[30]，并认为白宫消息人士所说的那些负面看法都出自心怀不满的竞争对手。“每当你做出外交政策决定时，总会有相互竞争的利益，而且有时候人们对做出的决定也不满意，”他说，“但他们所说的是最不属实的。”

蒂勒森自己表示，他的关注点在其他地方。“我唯一需要担心的是美国总统^[31]，”他告诉我，“只要他对我做的事情感到满意，并希望我继续这样做，那就是我要做的。”但也有指称蒂勒森和特朗普之间有过口角的报道。2017年10月，一些出版物兴高采烈地报道说，蒂勒森在一次会议中甚至将总统称为“白痴”。接近白宫的消息人士称，蒂勒森身上那种得克萨斯牛仔的大摇大摆做派让特朗普感觉很恼火。消息人士说：“在特朗普面前，你就不能总是端着一副傲慢的大男子主义做派^[32]，你必须得采取马蒂斯的做法，就是‘总统先生，你是总统，你比我更聪明，你赢了，你的直觉总是正确的，但是请允许我给您提供另外一种看法，长官’，然后你再说你的想法。”他提到蒂勒森的做法是“‘你看，我觉得因为我在石油行业工作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有发言权的。你对这个地区了解不多，所以让我先从这里说起’。老实说，我的意思是他居高临下”。蒂勒森的助理们说，他们的老板与总统在一起的时间比大多数内阁成员都多，而蒂勒森也坚持认为，关于他和总统关系不和的说法被夸大了。“他和我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许多国务卿与他们辅佐的总统之间的关系一样，”他解释说，“因为我们之前彼此根本不了解^[33]，所以他和我之间的一些互动都是在彼此了解对方是谁。我们彼此不了解，而我的管理风格又与他非常不同，有时这些差异在其他人看来也很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一起共事。”碰巧的是，总统的看法不同。

当我提到白宫在蒂勒森让位的谣言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这位前国务卿并没有假装吃惊。“嗯”，他点点头说。他一直在等待这个问

题。“你是如何面对的呢？”我问道。“我无视它”，他冷冷地说，挑起了一边的眉毛。“你说白宫时，指的是谁？”这是个反问句。

“我不是要你透露消息来源，但是你明白我的问题，白宫由多少人组成？”蒂勒森的政策规划主任布莱恩·胡克（Brian Hook）插话进来，表示答案可能是数以千计。蒂勒森挥手制止了他。“但是相关的人，那些可能在我的去留问题上有相关利益的人，应该大约有160人吧……”蒂勒森向前倾了倾身子，我知道被他解雇的感觉一定不会愉悦。“我不会透露我的消息来源，因为我知道那是谁。我知道那是谁，而他们也都知道我知道。”

据听到过蒂勒森关起门来直接谈到此事的三个人说，被提到过的人是后来变成顾问的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根据这些消息人士的说法，蒂勒森确信库什纳与另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合作，想通过运作让黑利坐上国务卿的位子，进而为他自己升任国务卿一职扫清道路。蒂勒森离开以后，接近他的消息人士继续认为，库什纳在蒂勒森遭替换一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经常浮上台面，通常是以公关代理战的形式出现。在黑利寻求停止继续资助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在蒂勒森取得胜利，恢复了美国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部分人道援助资金^[34]后，讨论这一进展可能给库什纳主导的中东和平努力带来负面影响的媒体报道就立刻开始出现。蒂勒森的助理们指责是库什纳授意了这些报道。接近白宫的那位消息人士透露，库什纳试图与蒂勒森合作，但遇到了后者的抵制。“我所看到的是：一位总统选战结束后对（库什纳）说‘你就负责中东和平进程吧’，当场让（库什纳）大吃一惊。此人试图每周都向雷克斯做一次简报，但从来没得到过回复或开会的机会……而且不仅仅是贾里德^[35]，整个政府里的很多人，包括内阁成员，都有此抱怨。”对于将库什纳描述成谦谦君子意外受命的说法，蒂勒森的一名助手极其愤慨，称蒂勒森被迫与库什纳“进行过尖锐的对话”^[36]，提醒后者注意谁是国务卿。

然而，当我问蒂勒森是否因为本该由国务卿领导的核心任务被交给了库什纳而感到沮丧时，他表现出了令人意外的被动态度。“呃，没有，”他说，“这不是令人沮丧的事情[\[37\]](#)，因为我认为，在大多数领域里，一开始就很清晰。很明显，总统一开始就希望他负责中东和平进程，所以我们就照此量身定做。”我又问：“库什纳是否拒绝过呢？”“没有，”蒂勒森说，“这就是总统想要做的事情。”蒂勒森仍然参与其中，库什纳会定期“过来”汇报更新信息。“所以至少在这个议题，以及我们与同一些国家和同一些领导人一道管理的所有其他问题上，我们之间是有着全面联系的。我们会给他们一些意见和建议：‘可能需要考虑这个’，‘那个恐怕行不通……’”蒂勒森似乎很热衷于否定他被赶下台的故事。对于让出推进中东和平业务，蒂勒森的反应是耸了耸肩。政策规划主任胡克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对于该地区的相关方面来说，了解我们中东和平团队拥有总统的全力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知道过去的政府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采取的分工有所不同，但我们的模式是围绕新视角建立的[\[38\]](#)，而且与总统的距离更近。”他认为，拥有总统女婿这块招牌是件好事。

但是，蒂勒森和库什纳之间的混乱分工已经对美国政策产生了切实影响。卡塔尔在反恐战线上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在2017年的一波激烈争端中，该国遭到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数个海湾国家与其断交。蒂勒森开始在这场争端中展开调解时，特朗普脱离以往美国处理中东问题的轨迹，大声疾呼地表达了支持反对卡塔尔的立场。相对于蒂勒森一天前刚在周日采访中所强调的政策陈述，这简直是180度大转弯。据白宫消息人士透露，库什纳站在沙特人一边[\[39\]](#)，因为他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关系密切，库什纳认为王储是个很有前途的改革者。中东政策同时被交给了蒂勒森和库什纳两人，但看起来，具有房地产开发背景且身为总统女婿的库什纳赢得了拔河比赛。

科林·鲍威尔回忆中也有与当时的副总统迪克·切尼之间发生的类似抢地盘大战^[40]，感觉很不舒服。“我也面临过类似情况，就是突然发现我们已经创建了军事委员会。等一下——这是法律问题，而且是由国务院主导的法律问题。”我问鲍威尔对蒂勒森有何建议？

“我无法判断，他也许很喜欢这种局面呢^[41]，”鲍威尔耸了耸肩说道，“我无法判断他是不是反感。”然后，鲍威尔苦笑着说：“或许如果我们在那里有大使的话，他们就会接手这项工作——这本就是他们的工作。”鲍威尔点到的正是特朗普政府对国务院态度的更广泛后果：一座人越来越少、规模越缩越小的建筑物。

2018年3月，蒂勒森自己成为最新收到解雇通知单的外交官。“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将成为我们的新国务卿^[42]，”特朗普发布推文称，“他会工作得非常出色！感谢雷克斯·蒂勒森为国效力！”一如越来越明显的常态，国务院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国务卿有一切意愿留下来……”蒂勒森发言人戈德斯坦的一份声明称，“国务卿还没有与总统通话^[43]，也不清楚原因。”

蓬佩奥是来自堪萨斯州的前共和党籍众议员，几乎没有外交经验，是比蒂勒森更加保守的强硬鹰派。他以发表自身立场同样强硬的声明和推文方式，支持特朗普在退出伊朗核协议问题上的张牙舞爪的立场。而且在如何应对特朗普的自负问题上，他似乎已经充分消化和吸收了白宫官员所提到的一些教训。蓬佩奥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说过，总统“总是提出非常好而且刁钻的问题^[44]，责成我们去确认自己是在以正确的方式完成工作”。同样，特朗普也说他和蓬佩奥“总是能想到一块儿^[45]，彼此关系一直很好，而这正是我需要国务卿做到的”。

在被解雇前的几周里，蒂勒森赞扬了外交系统的价值，试图通过这种沟通，在国务院系统内赢得更多支持。断头刀最终还是落了

来，说明这一沟通并未受到欢迎。美国外交活动的规模将缩小，随之不同意见也会减少。蓬佩奥入主的国务院已执行式微自我的任务多时。

[1] Sanger, David, Harris, Gardiner, Landler, Mark, “Where Trump Zigs, Tillerson Zags, Putting Him at Odds with White House, ” *New York Times*, 25 June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25/world/americas/rex-tillerson-american-diplomacy.html?_r=1.

[2] Filkins, Dexter, “Rex Tillerson at the Breaking Point, ” *New Yorker*, 16 October 2017,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10/16/rex-tillerson-at-the-breaking-point>.

[3] Filkins, Dexter, “Rex Tillerson at the Breaking Point, ” *New Yorker*, 16 October 2017,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10/16/rex-tillerson-at-the-breaking-point>.

[4] Osborne, James, “Exxon Mobil CEO Rex Tillerson Is an Eagle Scout to the Core, ” *Dallas Morning News*, 6 September 2014.

[5] 鹰级童军是美国童军的晋级计划中所能拿到的最高成就或阶层。——译者注

[6] Filkins, Dexter, “Rex Tillerson at the Breaking Point, ” *New Yorker*, 16 October 2017,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10/16/rex-tillerson-at-the-breaking-point>.

[7] McPike, Erin, “Trump’ s Diplomat, ” *Independent Journal Review*, 21 March 2017, <https://ijr.com/2017/03/814687-trumps-diplomat/>.

[8] Author Interview with Rex Tillerson, 4 January 2018.

[9] “Welcome Remarks to Employees, ”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ashington, D.C., 2 February 2017,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02/267401.htm>.

[10] Author Interview with Erin Clancy in Los Angeles, 1 June 2017.

[11] Author Interview with Source Close to the White House, 23 January 2018.

[12] Author Interview with Associate of Condoleezza Rice, 23 January 2018, See Also Stelter, Brian, “Journalists Outraged by Tillerson’ s Plan to Travel without Press, ” *CNN*, 10 March 2017, <http://money.cnn.com/2017/03/10/media/rex-tillerson-state-department-no-press/index.html>.

[13]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 3 August 2017.

[14] Author Interview with Rex Tillerson, 4 January 2018.

[15] Gearan, Anne, and Morello, Carol,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pends His First Weeks Isolated from an Anxious Bureaucracy, ” *Washington Post*, 30 March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secretary-of-state-rex-tillerson-spends-his-first-weeks-isolated-from-an-anxious-bureaucracy/2017/03/30/bdf8ec86-155f-11e7-ada0-1489b735b3a3_story.html?utm_term=.0ea61ef83e7d.

[16] Author Interview with Member of Secretary Tillerson’ s Security Detail, 20 July 2017.

[17] Johnson, Eliana and Crowley, Michael, “The Bottleneck in Rex Tillerson’ s State Department, ” *Politico*, 4 June 2017, www.politico.com/story/2017/06/04/rex-tillerson-state-department-bottleneck-239107.

[18]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25 June 2017.

[19] “Welcome Remarks to Employees, ”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ashington, D.C., 2 February 2017,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02/267401.htm>;
“Remarks to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mployees, ”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Dean Acheson Auditorium, Washington, D.C., 3 May 2017,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05/270620.htm>;
Anecdote about Audience Reaction from Author Interview with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26 June 2017.

[20]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 in Washington, D.C., 29 June 2017.

[21]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28 July 2017.

[22]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28 July 2017.

[23]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28 July 2017.

[24]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Career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25 June 2017.

[25] Author Interview with Source Close to the White House, 23 January 2018.

[26] Parker, Ashley et al., “White House Readies Plan to Replace Tillerson with Pompeo at State, Install Cotton at CIA, ” *Washington Post*, 30 November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17/11/30/white-house-readies-plan-to-replace-tillerson-with-pompeo-install-cotton-at-cia/?utm_term=.5f455d49d416.

[27] Schwirtz, Michael, “US Accuses Syria of New Chemical Weapons Use, ” *New York Times*, 23 January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1/23/world/middleeast/syria-chemical-weapons-ghouta.html>.

[28] Author Interview with Tillerson Aide, 24 January 2017.

[29] Author Interview with Source Close to the White House, 23 January 2018.

[30] Author Interview with Steven Goldstein, 24 January 2018.

[31] Author Interview with Rex Tillerson, 4 January 2018.

[32] Author Interview with Source Close to the White House, 23 January 2018.

[33] Author Interview with Rex Tillerson, 4 January 2018.

[34] Rogin, Josh, “Tillerson Prevails over Haley on Palestinian Funding, ” *Post and Courier*, 16 January 2018, https://www.postandcourier.com/opinion/commentary/tillerson-prevails-over-haley-on-palestinian-funding/article_2b1b2972-fafd-11e7-81e6-7f2974b7274f.html.

[35] Author Interview with Source Close to the White House, 23 January 2018.

[36] Author Interview with Tillerson Aide, 22 December 2017.

[37] Author Interview with Rex Tillerson, 4 January 2018.

[38] Author Interview with Brian Hook, 13 December 2017.

[39] Labott, Elise and Borger, Gloria, “Kushner’ s Foreign Policy Gamble Fuels Tillerson Feud, ” CNN, 4 December 2017, <http://www.cnn.com/2017/12/04/politics/jared-kushner-rex-tillerson-middle-east/index.html>.

[40]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 in Washington, D.C., 29 June 2017.

[41]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 in Washington, D.C., 29 June 2017.

[42] Tweet by Donald J. Trump, 13 March 2018, 5: 44 am.

[43] Parker, Ashley et al., “Trump Ousts Tillerson, Will Replace Him as Secretary of State with CIA Chief Pompeo, ” *Washington Post*, 13 March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ousts-tillerson-will-replace-him-as-secretary-of-state-with-cia-chief-pompeo/2018/03/13/30f34eea-26ba-11e8-b79d-f3d931db7f68_story.html?utm_term=.04ffab6fcaab.

[44] Erickson, Amanda, “The One Interview that Explains Mike Pompeo’ s Foreign Policy Approach, ” *Washington Post*, 13 March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8/03/13/the-one-interview-that-explains-mike-pompeos-foreign-policy-approach/?utm_term=.07fe3e4ee7a4.

[45] Cohen, Zachary, and Merica, Dan, “Unlike Tillerson, Trump Says Pompeo ‘Always on Same Wavelength’ , ” CNN, 13 March 2018,
<https://www.cnn.com/2018/03/13/politics/mike-pompeo-secretary-of-state-trump/index.html>.

23 蚊子与利剑

蒂勒森在大学里学的是工程学，这一事实他提到了不止一次，似乎昭告了他的管理风格何以精明务实。当我问及他认为自己在国务卿任内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时，他在说政策之前，首先谈到了机构改革。“我是一个非常崇尚系统和流程的人^[1]”，他说。也正因为如此，2017年4月，他以一项全面的调查开启了国务院的机构改革，雇用了一家私营管理咨询公司来诊断美国外交机构的健康状况。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咨询顾问对超过3.5万名的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为此国务院总计开支略超100万美元。最开始时，这被认为是个好主意；然后，到了交付调查结果时，已经变得令人沮丧。“它简直让人抓狂，”国务院国际毒品和执法事务局（INL）的一位外交服务人员回忆说，“我开始回答那些问题之前，都不得不离开电脑一小时^[2]。”

“什么是国务院应该停止做的？”问卷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什么是可用六个字概括的外交官使命（以便本公司可以列入关键字云存储）？“这太荒谬了^[3]……从一个公司才会使用的文字中复制和粘贴，即使是那样，几乎对任何公司而言，这都不够量身定制吧，”国际毒品和执法事务局的这位外交官对我说，“搞什么啊？”我采访的那位运营中心人员表达了同样的情绪。“我可以给你的云存储提供一些词^[4]，但它们都四个字母。”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称这项调查“完全是电影《上班一条虫》中的情节^[5]”，并迅速地将其改编成了一篇清单体报道。

但结果是说明问题的。一些官员的投诉是天天发生的。“技术设备很糟糕。”调查得出结论，指出国务院总部位于华盛顿，却出于某

种原因，使用设在迈阿密的服务器。调查报告还引用了一位无奈到发狂的员工的哀叹：“对于某些电脑，你必须将它们倒置着，不然它们就会烧坏^[6]。”我向蒂勒森提问了解他的改革目标时，他的回答都集中在这些实用性问题上。“我们需要对自己进行更新和现代化，”他说，“我确信我们使用的，与你在这里时就在使用的，是同一个IT系统。”好比外交界的日本收纳女王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蒂勒森希望消除“人们工作方式中的混乱”。

但调查也反映出更多的存在性担忧。“人们对于未来的看法不乐观^[7]，”咨询公司总结道，“对未来缺乏清晰的规划，给担心未来可能发生什么的猜测和谣言提供了空间，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进一步融入（国务院）的问题，或是外交政策军事化的担忧。”一位接受采访的官员表示：“我担心预算急剧缩减，加上最高级别人员短缺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不仅会导致我们队伍中一批最优秀人才的流失，而且会削弱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内履行使命的影响力。”Insigniam的报告得出结论，针对特朗普政府和雷克斯·蒂勒森的国务院团队，“人们质疑这两支队伍是否了解国务院在推动美国全球利益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许多人“感受到，缺乏来自政府、国会、新（国务院）领导层和美国人民的支持^[8]”。

凑巧的是，雷克斯·蒂勒森寻求消除杂乱的努力，无益于消除这些担忧。

这届政府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份预算案^[9]中，提议将国务院的资金削减27%，即从国务院的527.8亿美元预算中砍掉约100亿美元。白宫希望取消对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的所有拨款^[10]，以及该机构的使命——指导和平谈判并向政府提供建议；培训警察和宗教领袖；支持反对极端主义的社区团体。白宫还打算削减对艾滋病、疟疾和脊髓灰质炎等相关健康项目^[11]的资助，并

将美国贡献给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资金减半。这届政府希望关闭负责制定战争罪政策的国务院下属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Criminal Justice）。更为根本的是，护照盖章和人质解救^[12]等或许是国务院最易识别的核心职能，但这届政府试图把负责这些业务的难民事务局和领事务务局完全剥离出国务院，而将其并入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甚至美国国务院的使命宣言都做了调整，为部门裁撤留出了空间。本届政府提议将“公正”和“民主”字眼，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鼓励的品质清单中删除。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13]。

很少有人认为削减目标中的这些项目不需要改革，但对于裁撤范围之广以及性质之随意草率，人们也确实感到越来越愤怒。抵触情绪终于在2018年初公开爆发了，从属于国务院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宣布它不会遵循蒂勒森改装国务院及国际开发署两厢办公大楼的意向。“依照决策部门的指示，我们暂停美国国际开发署所有的业务参与^[14]……”一位官员在给高级员工的电子邮件中说，“你们不应参与任何共同的重新设计活动。”这就是哗变。

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两党都在反对蒂勒森的计划。在德克森（Dirksen）参议院办公大楼一个木板包墙且很有装饰性的听证室里，蒂勒森展示的特朗普政府首份预算案让两党议员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不是挑起了眉毛，就是忍不住揶揄讥讽。审视该提案“大约五分钟后”，共和党籍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鲍勃·科克（Bob Corker）据报道回忆说，“我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15]，我不想再这样继续了’。之所以是浪费时间，我想你知道，是因为提交上来的预算案不会是我们处理的预算案。”

“我们会编写自己的预算，但我确实认为这会对国务院产生制冷影响，那里的职业人士都在努力执行他们的任务，”民主党籍委员会

副主席本·卡丹（Ben Cardin）补充道，“七十年前的这个月，你的一位前任乔治·马歇尔发表了一次讲话，帮助奠定了他成为战后国际自由秩序主要设计师的地位。他‘现身于创造中’。我今天关注的是，坦率地说，你们这届政府将载入历史的，是‘现身于破坏’[\[16\]](#)。我们那么努力支持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是如此让我们的安全、繁荣和理想受益。”

德克森大厦是20世纪50年代加建出来的国会办公大厦，其中的听证室是照顾到电视转播需求的首批国会功能厅，在格局上避开了圆桌形式，而采用了可以供人观看的主席台设计。C-SPAN[\[17\]](#)摄像机拍到蒂勒森几乎不知不觉地点头，眉头紧蹙的表情一闪而过。但他在议员们几个小时的拷问中，还是不屈不挠地为大幅削减国务院预算进行了辩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国会基本上都在试图给国务院拨款，可都被蒂勒森拒绝了。他拒绝接受让国务院用来反击俄罗斯宣传攻势的8000万美元国会拨款[\[18\]](#)，令许多官员困惑不解。几乎从未听说过内阁成员拒绝划拨给自己机构款项之事，而且在情报和国防机构确认了俄罗斯一直在利用宣传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之后，蒂勒森的做法尤其让人百思不解。一位助手表示，蒂勒森担心这项拨款可能会激怒俄罗斯。蒂勒森与国会的关系有了很大破损[\[19\]](#)。根据一位白宫消息人士和另一位国会消息人士的透露，一位显赫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打电话给白宫，威胁说如果蒂勒森不合作的话，就会给他发传票。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几位前任国务卿对蒂勒森拒绝国会给国务院的拨款震惊不已。“信任国务院的参议员想要恢复部分拨款，或者不同意大幅削减，”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回忆说，“蒂勒森不想要这些钱[\[20\]](#)。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我在他为预算案所做的辩护上进一步追问时，蒂勒森表现得比较矛盾。他第一次承认，自己在闭门程序中已经对该预算案表示了反

对。“事实上，我周围有人说‘你知道吗，你应该让外界知道你的回信，让人知道你的上诉信内容’。我说‘不，那不是我做事的风格[21]’。”蒂勒森表示，他看了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提议的数字，认为他可以指望“加10%、20%，因为我认为国会会给我们一些东西”。所有还在世的国务卿中，没有第二个人表示自己以这种方式争取过国会对国务院预算的支持，即要求减少预算，而留待国会去替国务院争取。蒂勒森承认他可能只是缺乏经验。“我在这里刚待了一个月，除了与OMB合作，以了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之外，我没有额外再做多少事的真正基础。我得诚实地告诉你：我更多的是努力理解这些数字，而没有同等地把自己搅入数字本身。‘我们在这里想要达到的是什么？’”最终，无论发生了什么，特朗普取代蒂勒森的理由，是抱怨他需要与自己的国务卿在同一个“波段”上看问题。这样说来，即使是关起门来的反对，也显然太过分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支持给国务院拨款的有时候反而是军方：自身机构中有着充足资金的将军们寻求分摊财富。“如果你不给国务院提供充分的资金，那么我最终就需要购买更多军火，”特朗普政府的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2013年担任中央司令部指挥官时，对国会做出这样的表示，“我认为这是一个成本效益比问题[22]，我们对国务院外交工作的投入越多，我们对军事预算的投入就有望越少。”但是到了2017年，即使马蒂斯本人似乎也翻转了这一逻辑，而为增加国防开支的新时代极力辩护：“我们的军队必须确保总统和我们的外交官始终从优势地位进行谈判[23]。”他几乎不用担心，同一项让美国民事外交政策机构元气大伤[24]的政府预算案提议增加国防开支520亿美元。

与预算攻势中的计划内伤亡相比，国务院领导层大换血早已不值一提。超过1300名外交官收到了解雇通知单[25]，新人招聘计划也被

冻结。最初，通告称将不再招收新外交官员——这是指所谓的

“A100”新生，他们在成为正式外交官之前，要先到弗吉尼亚州乡间一个外交官培训学校去接受训练。而来自人数偏少社区的兰格尔和皮克林奖学金（Rangel, Pickering & Payne Fellowship）获得者们，原本已经得到进入外交官培训学校接受训练的承诺，这下突然间就失去了未来。愤怒来得如此迅速和果断^[26]，以至于一些新招学员的机会又再度恢复。国务院还突然停止了对总统管理研究员项目

（Presidential Management Fellows）的参与^[27]——这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培训项目，长期以来吸引人才前来投身外交职业。所有这些措施的效果是显著的：参加外交服务人员入职考试的新招培训生数量比前一年下降了26%，反映了近10年来最低的兴趣水平^[28]。在最好的情况下，国务院在招募优秀人才方面面临来自私营部门的激烈竞争。

“看看当下，特朗普不重视国务院的不祥之兆已经出现^[29]，”约翰·克里说，“想象一下这对最优秀的人才会有什么作用？”

填补未受波及的核心领导岗位的兴趣看起来也同样微乎其微。数以百计的高级职位持续虚位以待。整座大楼几乎全部由提升到“代理”助理国务卿地位的副手们运营，其中许多人的经验与那些被毫不客气地免了职的前任们比较起来，能少几十年。当我问蒂勒森，这些空着的职位会不会也是一大焦虑来源时，他喘了口粗气，假笑了一下。“我没有焦虑”，他说。然而，这个特殊问题“是个关注点……这些职位空着时间太长了，这不是我觉得开心的事”。

蒂勒森表示，他每隔一周就会与负责人事的官员们开一次会，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太容易说服^[30]，”他谈到与白宫就填补空缺职位谈话时说道，“那边的过程并不是最有效的，他们更换了人员，试图加以改善，我的意思是，很多很多次……过程非常慢，非常麻烦，有时令人沮丧，因为你搞不明白‘问题是什么’。似乎有人坐在那里闲着……”蒂勒森叹了口气。“我会告诉他们：‘干脆给

我一个不，至少有了这个不，我回去再换个其他名字来。’ ” 有报道称，蒂勒森曾对白宫人事主管约翰尼·德斯特凡诺（Johnny DeStefano）大发雷霆，因为后者干预了他的人事决定，包括拒绝了他最初让艾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充当其副手的选择。艾布拉姆斯被认为在总统大选期间对特朗普采取了过于批评的态度。那个职位空置^[31]了近5个月。这是贯穿整个国务院的问题。在早期的一次谈话中，蒂勒森的一位助手就国务卿无法回答有关削减预算的详细问题一事，给了我一个特定的理由：“我们的员工人数太少了^[32]，我没有时间准备这个问题。”

即便是最热心支持国务院的人士也常常同意，这个官僚机构绝不是高效的典范。理查德·霍尔布鲁克20世纪70年代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题为《失败的机器》一文中，对该系统“全然超出想象的规模”^[33]及其僵化的程序和协议发出了谴责。乔治·H.W. 布什总统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也持类似的观点，他抱怨“太多的官僚层级^[34]，有时可能导致硬化的决策”。

特朗普政府官员调用了类似的逻辑。他们其中的一位告诉我，目标是削减流动使节和小型项目，恢复地区分局的权力。

“如果总部大楼里都没有地区分局长，你又如何恢复地区分局的权力呢？”我问道，真的感到好奇。

“我不知道你在外交服务部门的经历是什么——”

“比较杂吧。”我承认道。

“确实很杂。有些局里，我可以把东西交给某人，然后百分之百地相信我不必再过问此事。有些局里，我必须从1码线进场，然后向前推进99码^[35]。”

像任何大型组织一样，尤其像所有绩效和薪酬之间没有关系的政府组织一样，外交服务部门中也有做和尚撞钟者，以及闷闷不乐地混了一辈子的人。但这里也有很多优秀、敬业的公务员：那些有能力在别处挣更多钱，但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生命而做出诸多牺牲的男男女女们。说到底，支持这位助理的怀疑论观点的，是自我应验的疑虑。美国领导人不再重视外交官，这导致进一步削减外交官价值的裁撤。周而复始。

几位前国务卿同意大范围削减的大前提，但几乎跨越了几代的所有人都对特朗普政府主张的削减范围和执行方式提出了异议。对显著缩减规模采取最为支持态度的贝克表示，他总的来说相信限制政府支出的紧迫性，并“长期以来认为国务院的预算可以从审查中受益……当然，”他很快补充道，“我不能就国务院最近的裁员规模做出回应，因为我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情况介绍。”

曾在尼克松和里根内阁任职的乔治·舒尔茨说：“我认为这是大幅骤然削减^[36]。毫无疑问，有些东西可以缩减，譬如说特使。但从根本上说……你必须有地区分局，你必须有大使，你必须有懂得布局的人。”舒尔茨和蒂勒森都曾在私营部门工作多年，舒尔茨曾担任美国建筑及土木工程公司贝克特尔集团（Bechtel）总裁。他表示，从一家大公司过渡到一家政府机构，“你不能在自己还不知道一切都是怎么回事之前，就抱着要削减一切的想法开始工作”。蒂勒森迅速展开了削减规模行动，这一点“令人震惊。他是不是被总统告知必须这样做，这会不会是他接受这份工作的一个条件，我不知道。另外，如果总统坚持这样做的话，我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你可以不接受某份工作”。

曾一度担任斯坦福大学预算主管的康多莉扎·赖斯信奉效率。“我不是说30%，”她对我说，“但我也不能说在国务院没有做些紧缩

的空间……一些辅助职位，让局面发展成像大象托普西（Topsy）那样难以控制，没有人会精简它们。”赖斯说话时断断续续的语音节奏，保留了一丝阿拉巴马的乡音痕迹。但是，她表示，特朗普政府做出的其他缩减，例如从美国的外交使命声明中抹去了民主字样，“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37]”。即便是她，也对整个国务院中那么多职位空缺一事提出了质疑：“我不明白什么改革会不需要有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助理国务卿。”

其他前任国务卿则对国务院的现状更加焦虑。“我相信已经造成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38]。”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说。“在我看来，预算提出的那一刻就已经非常明显的是，被削减的事实上不仅是脂肪，而是已经削减到了系统。”希拉里·克林顿把“去除说阿拉伯语、韩语、汉语的人，缩减希望成为外交服务人员的年轻人数量，裁减具有其他语言经验者的数量，或者是愿意花2~3年时间来掌握困难语言的人的数量”描述为“愚蠢的行为”^[39]。

科林·鲍威尔提出了类似的直率评估。新政府正在“对国务院开膛挖心。更糟糕的是，他们并没有填补那些他们计划保留的职位”。对于一位在培育团队领域倾情投入的国务卿来说，招聘计划冻结尤其令人感到刺痛。“任何停止引进新鲜血液的组织，都会在现在和未来伤害自身。这是个错误。当你停止吸收人员进来，或者当你把它变成一个人们不想加入的机构时，你就抵押了你的未来。”他咧嘴笑了。鲍威尔还有一些更为精辟的观察，他要求不用于公开发表。而这一则评论，他说：“你可以用^[40]。”

“这是代价极其高昂的^[41]”，约翰·克里说。他说的也是国务院大楼中许多人对国务院系统及外交职业受到无情打击这一现实的看法。“看吧，几年后，无论来自哪个政党，也许我们能有一个重视外交的总统，让你能设置预算，再次投资国务院，但消除如今的一切所

带来的影响，需要几年的时间，因为获得和培养专业知识和能力是需要许多年时间的。”

对于在基层岗位上工作的人来说，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眼看着自己的职业遭到废弃，这对于士气的影响可谓立竿见影。“没有纪律，也不是基于效率”，职业官员克里斯·拉文（Chris LaVine）说。大削减的消息传来时，这位职业外交官正在国务院里忙着叙利亚政策制定工作。“这好比挥舞宝剑战蚊子^[42]。”

[1] Author Interview with Rex Tillerson, 4 January 2018.

[2]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25 June 2017.

[3]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25 June 2017.

[4]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28 June 2017.

[5] Hudson, John, “This State Department Employee Survey is Straight out of ‘Office Space’ , ” *BuzzFeed News*, 4 May 2017, https://www.buzzfeed.com/johnhudson/leaked-state-department-survey-suggests-diplomacy-work-is-a?utm_term=.wfJm3MEPYL#.gfYwglGevR.

[6] Schwartz, Felicia, “State Department Workers Vent Grievances over Trump, Tillerson, Cite Longer-Term Issues, ” *Wall Street Journal*, 4 July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state-department-workers-vent-grievances-over-trump-tillerson-cite-longer-term-issues-1499194852>.

[7] Insigniam Survey, 2017, p. 43, Leaked by an Anonymous Foreign Service Source.

[8] Insigniam Survey, 2017, p. 43, Leaked by an Anonymous Foreign Service Source.

[9] “America First: A Budget Blueprint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 White Hous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16 March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whitehouse.gov/files/omb/budget/fy2018/2018_blueprint.pdf.

[10] “What We Do,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https://www.usip.org/>.

[11] Konyndyk, Jeremy, “Trump’ s Aid Budget Is Breathtakingly Cruel—Cuts Like These Will Kill People, ” *Guardian* (Manchester) , 31 May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professionals-network/2017/may/31/trumps-aid-budget-is-breathtakingly-cruel-cuts-like-these-will-kill-people>.

[12] Van Schaack, Beth, “Why Is Tillerson Shuttering the State Dept.’ s Global Justice Bureau? ” *Newsweek*, 18 July 2017, www.newsweek.com/why-tillerson-shuttering-state-depts-global-justice-bureau-638246 and Tapper, Jake, “White House Memo Suggests Moving Refugee Bureau from State Department to DHS, ” *CNN Politics*, 30 June 2017, www.cnn.com/2017/06/28/politics/refugee-bureau-state-department-dhs/index.html.

[13] Rogin, Josh, “State Department Considers Scrubbing Democracy Promotion from Its Mission, ” *Washington Post*, 1 August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josh-rogin/wp/2017/08/01/state-department-considers-scrubbing-democracy-promotion-from-its-mission/?utm_term=.28ffdcf307e7.

[14] Wadhams, Nick, “Tillerson’ s State Overhaul Faces Mutiny as USAID Weighs Its Role, ” *Bloomberg*, 24 January 2017,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1-24/tillerson-s-overhaul-at-state-in-doubt-as-usaid-suspends-role>.

[15] Harris, Gardiner, “Will Cuts Hurt Diplomacy? Tillerson Tries to Ease Senate’ s Worries, ” *New York Times*, 13 June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13/world/rex-tillerson-senate-state-department.html>.

[16] “Cardin Challenges Tillerson on Administration’ s State Dept., Foreign Assistance Budget Request, ”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13 June 2017,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press/ranking/release/cardin-challenges-tillerson-on-administrations-state-dept-foreign-assistance-budget-request>.

[17] C-SPAN是美国有线电视频道，全名为“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络”（Cable-Satellite Public Affairs Network），创办于1979年，总部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主要探讨政府及公共事务议题，也会转播国会主要议程，以及国情咨文和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等主要政治议程实况。——译者注

[18] Toosi, Nahal, “Tillerson Spurns \$80 Million to Counter ISIS, Russian Propaganda, ” *Politico*, 2 August 2017, www.politico.com/story/2017/08/02/tillerson-isis-russia-propaganda-241218.

[19] Rubin, Jennifer, “Tillerson Unites D’ s and R’ s—They All Ridicule His Testimony, ” *Washington Post*, 15 June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right-turn/wp/2017/06/15/tillerson-unites-ds-and-rs-they-all-ridicule-his-testimony/>.

[20] Author Interview with Madeleine Albright, 15 December 2017.

[21] Author Interview with Rex Tillerson, 4 January 2018.

[22] Lockie, Alex, “Mattis Once Said If State Department Funding Gets Cut ‘Then I Need to Buy More Ammunition’ , ” *Business Insider*, 27 February 2017,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mattis-state-department-funding-need-to-buy-more-ammunition-2017-2>.

[23] Read, Russ, “Mattis: A Strong Military Is Crucial to Effective Diplomacy, ” *Daily Caller*, 22 March 2017, <http://dailycaller.com/2017/03/22/mattis-a-strong-military-is-crucial-to-effective-diplomacy>.

[24] “America First: A Budget Blueprint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 White Hous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16 March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whitehouse.gov/files/omb/budget/fy2018/2018_blueprint.pdf.

[25] Harris, Gardiner, “State Department to Offer Buyouts in Effort to Cut Staff, ” *New York Times*, 10 November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1/10/us/politics/state-department-buyouts.html>.

[26] Harris, Gardiner, “State Dept. Restores Job Offers to Students after Diplomat Outcry, ” *New York Times*, 30 June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30/us/politics/state-department-students-foreign-service.html>.

[27] Hellman, Joel, “SFS Voices Concern for Suspension of Current Pickering, Rangel Fellows, ” Georgetown University, 21 June 2017, <https://sfs.georgetown.edu/sfs-voices-concern-suspension-current-pickering-rangel-fellows/> and “State Department Withdraws from Top Recruitment Program, Sowing Confusion, ” *Foreign Policy*, 28 July 2017,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7/28/state-department-withdraws-from-top-recruitment-program-sowing-confusion/>.

[28] Lippman, Daniel and Toosi, Nahal, “Interest in U.S. Diplomatic Corps Tumbles in Early Months of Trump, ” *Politico*, 12 August 2017,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7/08/12/trump-state-department-foreign-service-interest-plummets-241551>.

[29]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 21 November 2017.

[30] Author Interview with Rex Tillerson, 4 January 2018.

[31] Dawsey, Josh, Eliana Johnson, and Alex Isenstadt, “Tillerson Blows up at Top White House Aide, ” *Politico*, 28 June 2017, www.politico.com/story/2017/06/28/tillerson-blows-up-at-white-house-aide-240075.

[32]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State Department Aide, 5 July 2017.

[33] Holbrooke, Richard, “The Machine That Fails, ” *Foreign Policy*, 14 December 2010, foreignpolicy.com/2010/12/14/the-machine-that-fails/.

[34] Author Interview with James Baker, 22 January 2018.

[35]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State Department Aide, 5 July 2017.

[36]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orge P. Shultz, 19 January 2018.

[37]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 3 August 2017.

[38] Author Interview with Madeleine Albright, 15 December 2017.

[39] Author Interview with Hillary Clinton, 20 November 2017.

[40]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 in Washington, D.C., 29 June 2017.

[41]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 21 November 2017.

[42] Author Interview with Chris LaVine, 25 June 2017.

24 崩溃

随着国务院的雇员越走越多，美国在全球冲突中的外交立足点也开始松动。2017年7月，雷克斯·蒂勒森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伊朗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遏制伊朗核发展协议是由蒂勒森的前任约翰·克里达成的，协议要求美国政府每隔90天就对国会认证一次伊朗遵守协议的情况。蒂勒森和特朗普二人正是在当时要做最新一次认证之前开的会。“我为什么要证明？[\[1\]](#)”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当时不停地问。特朗普的两名强硬派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塞巴斯蒂安·戈尔卡（Sebastian Gorka）支持总统，坚称这项协议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在外交领域，虽说蒂勒森看似对执行预算削减热情很高，但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他看起来又像是躺在地上用身体阻挡特朗普政府这架推土机一般。对于特朗普持续不断的质疑，蒂勒森的回应是，所有证据都表明，伊朗已经遵守并通过了国际调查人员的检查。这可激怒了总统。知情的消息人士透露，到会议结束时，特朗普已然大发雷霆。蒂勒森的一位发言人后来表示两人之间摊牌的说法被夸大了，总统对蒂勒森的意见表示“感谢”。但是即便如此，他也字斟句酌地承认，“不是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同意国务卿所表达的内容”。之后引述白宫消息来源的公开报道对会议做出了更简单的描述：“崩溃。”特朗普责令他的白宫顾问团队去找出替代理由，以便废除伊朗核协议。如果国务院不给他想要的东西，他就干脆绕过国务院[\[2\]](#)去解决问题。

自参加总统竞选以来，伊朗核协议始终让特朗普感到棘手。竞选过程中，他说过自己的“头号重点”就是“解除与伊朗的灾难性交易[\[3\]](#)”。在一次巡回拉票演说中，他对形成伊朗核协议的多边谈判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你能想象吗？”他问道，夸张地朝麦克风方向点着

头，宝蓝色的领带吊在脖子上晃着，像往常一样，比人们习惯的长度长出4英寸。他把手放到耳边，做了个哑剧打电话的手势。“你打电话给他们：‘我们听说你们正在制造核武器。’‘哦，好吧，让我们检查一下。’他们打来电话说：‘不，我们没在那里制造核武器，你个婊子养的笨蛋[4]。’”到了最后几个字，特朗普摆出口型但没有发声，就像课堂上坐在后排的孩子。迈克·蓬佩奥在获得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提名后不久，发表了推文：“我期待着取消这项与全球最大恐怖主义赞助国之间的灾难性协议[5]。”蓬佩奥先是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之后又接替蒂勒森出任了国务卿。特朗普自己也通过推特对伊朗做出谴责。“伊朗已经正式警告说要发射弹道导弹[6]，”他在一则推文中说，“应该感谢美国与他们达成的可怕协议！”然后他说：“伊朗正在玩火[7]——他们毫不感念奥巴马总统对他们有多么‘仁慈’。我可不会！”

伊朗人宣称，他们发展弹道导弹是为了自卫，与核协议无关。但是，西方列强对该国正在扩大的常规武库——以及以色列之类的近距离目标——也倍加关注[8]。伊朗的人权记录同样没有改善，就在特朗普和蒂勒森2017年7月就伊朗核协议认证一事激烈交锋之时，至少有三名美国公民因捏造的罪名遭到伊朗关押[9]。

尽管如此，伊朗还是在字面意义上遵守了这一协议。负责执行协议中严格核查条款的小组一再报告伊朗没有作弊。除美国之外，支持该协议的许多国家立场是一致的：没有理由开倒车。甚至其他国家当选的与特朗普同类的强硬派领导人也采取这种立场。“与伊朗的核协议存在争议[10]，但它在过去十多年里，也确实中和了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坚持这样认为。她在此议题上的其他言论都比较强硬。

最初，特朗普继续认证伊朗是合规的。但每一次，特朗普政府都更清楚地表明他们很不高兴这样做。伊朗试射弹道导弹之后^[11]，美国政府实施了一轮新的制裁，促使伊朗人声称是美国而非伊朗违反了协议的条款。2017年9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被派到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宣讲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的理由。几周后，特朗普开始公开威胁退出协议。

“我们不会忍受他们对我国的所作所为，”他说，“他们违反了太多的条款，而且他们更违背了这一协议的精神^[12]。”甚至雷克斯·蒂勒森也做到了步调一致，“在我们看来，”他小心地斟酌着词句说，“伊朗显然没有实现这些预期^[13]。”

其他一些过往外交成就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特朗普退出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使得美国成为在叙利亚和尼加拉瓜之后第三个回避该协定的国家；然而叙利亚和尼加拉瓜后来改变方向，重新加入了这一协定。“无论谁认为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来解决，”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谈到特朗普的决定时说，“都是在犯下巨大的错误^[14]。”“这完全是美国领导层令人难以置信地向后倒退了一步，而且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听到它，”约翰·克里后来对我说，“外交部长们想知道总统是否曾费心阅读或理解过让我们最初做出承诺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谈判桌上的席位——尤其是为什么一个商人会这样做？反正超出了我的理解力。这样一来，其他国家就处在领先地位^[15]，他们的行业将获得优势，因此赚取大量财富。这是弄巧成拙的，中国尤其会从我们的退出中受益。”

在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知会中方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消息的任务落在了第二把手、职业外交官阮大卫（David H. Rank）身上。他反而辞职了^[16]，结束了27年的外交服务生涯。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表白”实则是对美国当代外交的哀叹。

“那些为美国人民效力的人，经常出于政治动机，被刻画成某种隔绝又可疑的神秘精英，对此我感到担忧；”他写道，“在复杂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专业技能时，专业技能却遭到贬值，对此我感到担忧。”最后，他写道：“在世界需要美国领导力这一点上，两党共识已受到侵蚀，对此我感到担忧……如果领导力不来自我们，就将来自其他国家^[17]。”

特朗普在迈阿密小哈瓦那社区对古巴裔美国民众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又宣布了另一项外交政策“大掉头”：取消上届政府与古巴签署的完全一边倒协议。这一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将依旧保持开放。但也有之前取得的进展面临逆转倒退的。美国人前往古巴旅行将再次面临更严格的限制，也被禁止一份新清单上与古巴政府有关联的酒店和其他企业做生意。此举旨在严厉打击古巴政府^[18]，但批评人士们认为，受伤最严重的其实是住宿加早餐酒店（bed-and-breakfasts）之类的小企业。一如此类政策掉头时的典型情况，国务院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可怜的王哈，”一位职业外交官说。他所说的WHA是国务院内表面上负责古巴政策的西半球事务局（Bureau of Western Hemisphere Affairs）。该部门本应由一位常设助理国务卿来主管，但该职位一直空缺，无人获得提名；而代理助理国务卿“直到当天才被告知古巴的政策变化^[19]”。新政府似乎热衷于废除前任总统们留下的本已不多的外交成就。

其他案例则显示，特朗普时代由于混乱和失误，浪费了美国的外交领导力。这些案例所带来的影响已超越了国务卿个人以及国务院遭边缘化所产生的效应。这是由美国政治中一个独特的时代以及一位草莽推特狂总统的独特个性所带来的。但它也凸显了拥有强壮外交体系的重要性，以及缺乏这样一个体系所蕴含的危险。

总统的随性言论一再威胁到外交政策的微妙领域。“我们给了委内瑞拉很多选择，顺便说一下，我不会排除军事选择^[20]。”特朗普2017年中表示。当时委内瑞拉正被政治动荡拖入困境。说话时，特朗普正站在新泽西州他自家经营的露天高尔夫球场中，两侧是蒂勒森（紧张地咬着嘴唇）和黑利（皱眉的次数似乎要打破世界纪录）。特朗普的言论引发了外交争议：委内瑞拉国防部长称其为“疯狂的行为”和“超级极端主义”，而白宫则拒绝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电话。这种强硬做法也可能是对委内瑞拉强势外交策略的一部分，但国务院拉丁美洲局的官员们表示，他们缺乏内幕信息或能力，无法在总统冲向外交对峙的时候适当缓和总统的态度。

特朗普在对与欧洲盟友的关系中也表现出类似的模式。特朗普上任后首次访问欧洲时，包括蒂勒森、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和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内的一群官员加班加点地工作，以确保总统对北约领导人发表讲话时提到美国对集体防御的承诺。这项承诺是被杜鲁门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都视为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然而经过助手们数月的仔细筹划，总算把这个概念妥善地安插到准备好的演讲稿当中后，特朗普讲话时一个临时起意^[21]，脱稿发言，就把这句话漏掉了。他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来纠正错误，那段时间对国务院的官员们来说无比紧张，要不断地检伤分类，忙不迭安抚受到惊吓的盟友们。

特朗普在朝鲜试射导弹问题上表现出的谨慎程度还要更低。2017年8月下旬，日本北部数百万人被手机上收到的一条警报信息叫醒，被告知朝鲜刚刚跨越日本上空试射了导弹。在这之后，特朗普发出了令人震惊的最后通牒：“朝鲜最好不要向美国发出更多的威胁。”他再次从自己位于新泽西的高尔夫球场发出警告说，“他们将见识战火与怒火，以及坦率地说，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实力^[22]”。研究总统史的历史学家们表示，这是杜鲁门警告日本迄今，任何美国三军总司令所发出过的最具攻击性的言论。杜鲁门在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和

长崎之前，曾警告日本“一场实际上从未有过的毁灭之雨将从天而降[23]”。当然没人能够弄清这一言论是不是特朗普故意发出的。这也恰恰是国务院区域事务专家们能够很好地帮助驾驭的领域，因为他们太熟悉复杂的美朝关系中都有哪些敏感引爆点了。但是如世人所见，没有任何专家参与提出过建议。“特朗普总统的评论是未经计划和自发的。[24]”一位高级官员这样评论这次风波。平壤立即威胁要进行报复，扬言要打击美国领土关岛。总统又在推特上加倍回击。“军事解决方案现已完全到位，目标锁定且弹药上膛[25]，如果朝鲜采取不明智行动的话，”特朗普写道，“希望金正恩能找到另一条道路！”

一个月后，特朗普第一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出现在联合国大会的绿色大理石讲台上，对朝鲜政权及其领导人做出激烈抨击。在观众中，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John Kelly）将军捂着脸[26]，揉着太阳穴，仿佛正经历生存危机。“美国有伟大的力量和耐心，”特朗普继续说道，“但如果它迫不得已，必须保卫自己或盟友，那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彻底摧毁朝鲜[27]。”

金正恩反唇相讥，称特朗普的演讲是“史无前例且粗鲁的无稽之谈”。并警告说：“我当然也绝对会用炮火来驯服这个精神错乱的美国老糊涂（Dotard）。”英语里Dotard一词特指年龄和神志健全程度，是个追溯到14世纪的古英语词语，金正恩用出来之后，马上就以病毒速度传播，引起轰动。（在朝鲜语里这个词译为“疯老头[28]”。）由于朝鲜继续采取公开言辞攻势，特朗普又发布推文反驳：“刚听到朝鲜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发言，如果他附和金正恩[29]的想法，那他们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雷克斯·蒂勒森表达的论调却截然不同，他宣称美国政府已在与朝鲜政权直接接触。“我们问‘你们想不想谈？’”蒂勒森说，“我们与平壤有沟通渠道。”蒂勒森坚称他和总统在朝鲜问题上步调“完

全一致”^[30]。“总统对朝鲜的政策是在朝鲜半岛实现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而总统希望通过外交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蒂勒森告诉我。然而蒂勒森这一说法很难与特朗普的推文基调一致。特朗普在蒂勒森刚刚宣布完对平壤的外交提议后，又发布推文：“我跟我们出色的国务卿^[31]雷克斯·蒂勒森说过，他试图与金正恩谈判是浪费时间。”总统写道：“留着你的能量雷克斯，我们要做必须做的事！”

朝鲜紧张局势升级也使美国的盟友产生分裂。在德国方面，疲惫不堪的总理安格拉·默克尔^[32]拒绝就德国是否会在与朝鲜的军事对抗中支持美国做出表态，而是一再呼吁谈判。“我反对这种威胁^[33]，”她在联合国演讲后庄严地说道，“我代表自己和政府必须说，我们认为任何类型的军事解决方案都是绝对不合适的，我们要依靠外交努力，这必须得到大力实施。在我看来，制裁和执行这些制裁是正确答案。但我认为在朝鲜问题上任何其他事情都是错误的，这也是我们明显不同意美国总统立场的原因。”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朝鲜越过日本上空试射导弹之后发出警告，观点与特朗普更加接近，并摆出了对朝鲜外交努力连串失败的历史为证。“一次又一次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尝试都徒劳无功，”他说，“我们现在第三次重复同样的失败做法^[34]，成功的希望在哪里？”

两种立场都对。一种外交在朝鲜失败了，但是，在那些最熟悉安倍晋三所指的几十年与朝鲜接触历史的人眼中，另一种外交也是摆脱世界上最危险对峙的唯一出路。

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都在对朝鲜关系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外交进展。1994年，美国实际上成功地促成了一项无核化协议，其中平壤同意冻结和取消整个核项目。朝鲜后来购买了^[35]高浓缩铀开发设备，但一些朝鲜外交方面的资深人士认为，是美国未能履行自己的承诺，

才注定了无核化协议的厄运。在克林顿政府和共和党国会之间的政治斗争中，美国在建造轻水反应堆及向平壤提供燃料这两项承诺上都自食其言。小布什上任后干脆放弃，最终彻底终止了这项协议^[36]。小布什的第一任期内，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更为好战的立场，将朝鲜政权列为可能必须诉诸核武器打击^[37]的对象之一，并恢复了恫吓加谴责以对的局面^[38]。

然而，在乔治·W. 布什的第二任期内，康多莉扎·赖斯做出了新的尝试。她派出名叫克里斯托弗·希尔的职业外交官，去领导朝鲜无核化六方会谈。希尔曾作为团队一员，参与了理查德·霍尔布鲁克领导下的促成巴尔干地区和平谈判工作。“这届政府已经打了两场战争，”赖斯疲惫地告诉希尔，“所以现在我们得找些外交官^[39]。”希尔和一群不知疲倦的外交服务人员投入了应对一场持续多年的挑战，其中就包括10年后在国务院大裁员中退役的副国务卿幕僚长尤丽·金。他们承受了连续数周离家、长时间环球飞行以及马拉松式地谈判12~13个小时的考验。朝鲜人是世界上最棘手的对手。即使在巴尔干半岛，也有过靠个人话题破冰的时候——孩子、孙辈、运动和业余等。可据希尔描述，虽然与朝鲜人^[40]一起度过很多个紧张的夜晚，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几乎不认识他们。

起起伏伏中，希尔尝试着继承和发扬既往外交官们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包括他在巴尔干地区时的老板所传授的。后来，在谈判进行到谷底时，霍尔布鲁克本人也到场^[41]给希尔的团队打气。就像他后来在阿富汗告诉我的一样，霍尔布鲁克告诉希尔及其团队：他们正在书写历史，应该享受这历史的一刻。“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有一次这样的经历^[42]。”

经过几年走钢丝般的外交努力，克里斯·希尔终于在2007年的秋天，身穿连帽白色防护长袍，来到平壤以北大约两小时车程的一座已

经老化的钚工厂，进行核查。厂内的粗管线已被锯成碎片^[43]；美国和国际“拆卸人员”已在场监督；7个月后，朝鲜还将炸毁该厂内的冷却塔。这是历史性的时刻：自2001年以来，朝鲜首次停用了反应堆。

到最后，这还不够。平壤对其核活动进行了明显不完整的核算，然后对敦促他们采取更多行动的要求报以冷淡。但谈判留下了未来还有发展空间的可观遗产。与韩国关系中出现的裂痕也获得了弥合；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得以建立，且达到了之前一度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程度——中国是迄今为止在解决任何朝鲜危机过程中唯一最重要的参与者。

因此，当奥巴马政府重复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犯下的错误，并完全放弃这些年取得的外交进展时，许多职业外交官都感到吃惊不已。“坦率地说，我认为真正发生的是，奥巴马政府看到了所有人在尝试解决朝鲜问题上的投入，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小布什政府，”希尔分析说，“奥巴马政府于是决定，‘我们还有其他优先事项，这件事情会在藤上枯死，是落实不下去的’。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44]。”我问希拉里·克林顿是否后悔放弃朝鲜问题。“没有，我们——”她有些结巴，“我们在任上时，克里斯·希尔依旧继续着他的谈判。”我告诉她希尔感觉自己的努力被边缘化了的时候，她说，“我无法对此发表意见^[45]，我不知道那回事，我对他的观点不会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从未听过她的声音显得这么累。“也许他没感觉到白宫或五角大楼有（支持），”她继续说，“但我们在国务院肯定是尽可能地努力把事情推进下去。”

希尔和主持这项努力的其他外交官在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外交仍然是前进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走出了朝鲜局势^[46]，那可能就是因为它外交。”康多莉扎·赖斯说。在希尔看来，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与朝鲜进行更多的会谈——至少马上不会——但它必须意味着与中国

展开密集会谈。“如果你在直接与朝鲜人合作问题上认真不起来，我完全理解，” 希尔在唐纳德·特朗普于联合国大会讲话期间恳切地说，“至少对中国认真起来……那就是我认为我们需要有更多严肃外交的地方——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只是半夜通过推特发送信息，我们需要真正坐下来，严肃地讨论我们的共同利益。” 中方赞同这一观点。到2017年，他们已开始公开呼吁举行六方会谈。中国一直希望与朝鲜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六方会谈是中国在不承诺切断与朝鲜关系的前提下，看起来负责任的一种做法^[47]——这也是让技术娴熟的美国外交官团队可以进一步采取行动的立场。

这些努力能否成功仍然是个问号：特朗普在它们开花结果之前就强迫蒂勒森出局。相反，特朗普在与韩国代表团的会晤中，当场同意亲自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48]，也震惊了盟友。这一消息在会议结束后被韩国方面几乎随意地宣布了出来。而蒂勒森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还在表示，美国“距离谈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49]”，他在特朗普同意会晤的消息公布后对媒体表示，总统事先没有和他说过此事。蒂勒森的话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惊讶。但据人们所知，特朗普也没有告诉任何其他官员。

白宫和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忙不迭地调整路线。总统这一同意好比一记弧线球，打得大家措手不及。有人希望这能解冻关系，但外交政策机构中的许多人担心^[50]，这一在没有更广泛外交背景支持下做出的突如其来的动作，可能被朝鲜看作对其核大国地位的承认。官员们担心，一开始就善变的特朗普可能不会听任他背后的外交团队指导任何谈判，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职能除了规模缩小之外，已几乎看不到其他作为。在国务院，10年前由尤丽·金领导的那支规模可观的朝鲜事务团队如今已不复存在。特朗普就职一年后，甚至连一位负责东亚事务的常任助理国务卿都没任命。

美国放弃在外交和发展领域中领导地位的同时，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袖手旁观。全球外交力量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化。蒂勒森以国务卿身份首次访华期间，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会晤，二人坐在一模一样的灰褐色皮沙发上，背景是描绘中国优美田园风光的壁画：仙鹤在生机盎然的山谷和森林上空翱翔。他们都穿戴着相配的红色领带和深色西装外套，并且使用了相仿的语言，不免让密切关注美中关系的人士哑然称奇。习主席敦促美国^[51]“扩大合作领域，实现双赢”。蒂勒森表示赞同：“美方愿意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以及双赢合作^[52]的原则下，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非专业的观察人士可能会忽略和错过这些措辞，但国务院及其他部门的亚洲事务专家立刻看到了不同寻常之处。蒂勒森几乎是复制粘贴了习近平先前的声明——就在几个月前，习近平曾表示希望特朗普总统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这是习近平及其他中方官员在公开场合描述全球力量新平衡格局的诸多例子中最新的一个。中方按上述顺序界定的全球力量新平衡主张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即中国与美国处于平等地位，在台湾地区及南海领土争端等争议问题上，美方应顺从中方的意愿来解决。中国国内的媒体立即捕捉到了信号。“蒂勒森表达了美方对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的信守，而这正是北京主张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环球时报》在社评中写道，蒂勒森的语言会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留下承认中国与美国平等的印象。

美国国务院的几位官员告诉我，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中聚集了不少熟悉这些语言区别及含义的中国事务专家，但他们没有在蒂勒森表态前被征求过意见。相反，这次的陈述内容是由白宫起草的——根据数个白宫消息人士透露，是由贾里德·库什纳办公室起草的。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布莱恩·胡克对起草方信息的说法没有提出异议，只是表示亚洲局的一位代

理官员也在蒂勒森访华的随行人员当中。我问：代理官员参与起草了这些陈述吗？

“我不记得了，”胡克说，“你也参加过这类随行，你懂的，它们没那么明晰。”

“蒂勒森是不是想照搬他们的语言？”我问道。

“他没打算照搬他们的语言。”

“但他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他——他会签发自己发表的每个声明。他相信双赢^[53]，他相信中美可以合作。”胡克将蒂勒森对中国的态度描述为“以结果为基础”，并有意愿“反击中国任何伤害我们利益的行为”。但在一些职业外交官看来，由于顽固拒绝利用系统内的专业知识，这些目标已然受到破坏。亚洲局的一位官员表示，看着这次访问逐步展开，而且眼看着蒂勒森与大本营里通常在这些讲话上被咨询到的专家之间不做任何联系，就好像被锁在门外，眼看着狗狗热烈地撕毁家里的座椅面料^[54]。

在美国外交官们面临预算削减的同时，中国的国库则逐年丰盈。北京将大量资金投入开发项目中，其中斥资1.4万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基础设施的动议，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也足以让马歇尔计划相形见绌。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的支出目前仍然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但成长趋势足以引人注目^[55]。

在国际组织中，美国撤退的身后，中国的地位愈加突出。在美国提出削减其对联合国支出的同时，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资助国。如今，中国派遣到世界各冲突地区中的维和人员，已超出其他四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派遣维和人员的总和。此乃务实之举：中

国获得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力^[56]，以及在联合国理事机构中得到了更多更好的任命。

“这是一个完全自残出来的伤口^[57]，”约翰·克里说，“相比多数时间里占据公众讨论时间的许多其他议题来说，这让我担心得远远更多……”中国不是国际英雄，但其发展轨迹是有意义的。对于今天在哈萨克斯坦出生的孩子来说，一个世界大国的领导力是显而易见的，而另一个则不再明显。现实是，从苏丹到巴基斯坦，与我交谈过的年轻人已经是在贴着明显中国商标的基础设施中长大的。如果中国能像其成长为经济大国一样，迅速成长为成熟的外交大国，那么美国就已然放弃了大国得以塑造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

[1] Gearan, Anne, “ ‘Hethrewafit’ : Trump’ s Anger over Iran Deal Forced Aides to Scramble for a Compromise, ” *Washington Post*, 11 October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he-threw-a-fit-trumps-anger-over-iran-deal-forced-aides-to-scramble-for-a-compromise/2017/10/11/6218174c-ae94-11e7-9e58-e6288544af98_story.html?utm_term=.0c4e86e19d9b.

[2] Winter, Jana, Gramer, Robbie and de Luce, Dan, “Trump Assigns White House Team to Target Iran Nuclear Deal, Sidelining State Department, ” *Foreign Policy*, 21 Jul 2017, foreignpolicy.com/2017/07/21/trump-assigns-white-house-team-to-target-iran-nuclear-deal-sidelining-state-department/.

[3] “Full Speech of Donald Trump’ s Speech to AIPAC, ” *Times of Israel*, 22 March 2016, www.timesofisrael.com/donald-trumps-full-speech-to-aipac/.

[4] Diamond, Jeremy, “Trump Suggests U.S. ‘Dumb Son of a Bitch’ on Iran Deal, ” *CNN Politics*, 17 December 2015, www.cnn.com/2015/12/16/politics/donald-trump-iran-deal-rally-arizona/index.html.

[5] Nakamura, David, and Viebeck, Elise, “Trump Chooses SenJeff Session for Attorney General, Rep. Mike Pompeo for C.I.A. Director, ” *Washington Post*, 18 November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chooses-sen-jeff-sessions-for-attorney-general-rep-mike-pompeo-for-cia-director-transition-sources-say/2016/11/18/a0c170ae-ad8e-11e6-a31b-4b6397e625d0_story.html?utm_term=.828961f2e7c8.

[6] Parker, Ashley, “Trump to Iran: Be Thankful for ‘Terrible’ Nuclear Deal, ” *Washington Post*, 2 February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17/02/02/trump-to-iran-be-thankful-for-terrible-nuclear-deal/?utm_term=.8c68545f04cc.

[7] Tweet from Donald J. Trump, 3 February 2017, 3: 28 am.

[8] Parker, Ashley, “Trump to Iran: Be Thankful for ‘Terrible’ Nuclear Deal, ” *Washington Post*, 2 February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17/02/02/trump-to-iran-be-thankful-for-terrible-nuclear-deal/?utm_term=.8c68545f04cc.

[9] Rogin, Josh,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Gives Trump a Chance to Confront Iran on American Hostages, ” *Washington Post*, 18 September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the-un-general-assembly-gives-trump-a-chance-to-confront-iran-on-american-hostages/2017/09/17/571e5884-9a52-11e7-82e4-f1076f6d6152_story.html?utm_term=.2a1ca4033041.

[10] Pasha-Robinson, Lucy, “Theresa May Warns Donald Trump about ‘Iran’ s Malign Influence’ during Speech to Republicans in Philadelphia, ” *Independent* (UK) , 26 January 2017, www.independent.co.uk/news/theresa-may-donald-trump-iran-malign-influence-philadelphia-republican-speech-a7548491.html.

[11] Morello, Carol and Gearan, Anne, “Trump Administration Sanctions Iran over Missile Test, ” *Washington Post*, 3 February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trump-administration-sanctions-iran-on-missile-test/2017/02/03/dfb101ce-4107-409e-ab45-f49449e92c1f_story.html?utm_term=.dc32d5c48c32 and Cunningham, Eric, “Iran Calls New U.S. Sanctions a Violation of Nuclear Deal, ” *Washington Post*, 3 August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east/iran-calls-new-us-sanctions-a-violation-of-nuclear-deal/2017/08/03/f22d9464-7218-11e7-8c17-533c52b2f014_story.html?utm_term=.234b3e17e8d3.

[12] Morello, Carol, “U.S. Extends Waivers on Iran Sanctions but Warns It’s an Interim Move, ” *Washington Post*, 14 September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us-extends-sanctions-against-iran-but-warns-its-an-interim-move/2017/09/14/1d4ba5ee-9953-11e7-b569-3360011663b4_story.html?utm_term=.50c1d20aa10.

[13] Wadhams, Nick, “Tillerson Says Iran ‘Clearly in Default’ of Nuclear Deal’s Terms, ” Bloomberg, 14 September 2017,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9-14/tillerson-says-iran-clearly-in-default-of-iran-deal-s-terms>.

[14] Stanley-Becker, Isaac and Kirchner, Stephanie, “Angela Merkel Predicts Showdown with U.S. over Climate at G-20, ” *Washington Post*, 29 June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ngela-merkel-predicts-showdown-over-climate-at-g-20/2017/06/29/76bf6678-5a84-11e7-aa69-3964a7d55207_story.html?utm_term=.fbc49000547c.

[15]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 21 November 2017.

[16] Morello, Carol, “Senior Diplomat in Beijing Resigns over Trump’s Climate Change Decision, ” *Washington Post*, 5 June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senior-diplomat-in-beijing-embassy-resigns-over-trumps-climate-change-decision/2017/06/05/3537ff8c-4a2e-11e7-a186-60c031eab644_story.html?utm_term=.c89251a58514.

[17] Rank, David, “Why I Resigned from the Foreign Service after 27 Years, ” *Washington Post*, 23 June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why-i-resigned-from-the-foreign-service-after-27-years/2017/06/23/6abee224-55ff-11e7-ba90-f5875b7d1876_story.html?utm_term=.b78438fb1b53.

[18] Kunovic, Martina, “Five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rump’ s Cuba Policy—And Who It Will Hurt, ” *Washington Post*, 22 June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7/06/22/five-things-you-need-to-know-about-trumps-cuba-policy-and-who-it-will-hurt/?utm_term=.af14570d57d0.

[19] Author Interview with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1 June 2017.

[20] Fabian, Jordan and Greenwood, Max, “Trump Does Not Rule out Military Action in Venezuela, ” *The Hill*, 11 August 2017, 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346265-trump-does-not-rule-out-military-action-in-venezuela.

[21] Glasser, Susan, “Trump National Security Team Blind-sided by NATO Speech, ” *Politico*, 5 June 2017, 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7/06/05/trump-nato-speech-national-security-team-215227.

[22] Vitali, Ali, “Trump Vows North Korea Threat Will Be Met with ‘Fire and Fury’ , ” *NBC News*, 9 August 2017, <http://www.nbcnews.com/politics/white-house/trump-vows-north-korea-could-be-met-fire-fury-n790896>.

[23] Davos, Julie Hirschfeld, “Trump’ s Harsh Language on North Korea Has Little Precedent, Experts Say, ” *New York Times*, 8 August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8/08/us/politics/trumps-harsh-language-on-north-korea-has-little-precedent-experts-say.html>.

[24] Walcott, Josh, “Trump’ s ‘Fire and Fury’ North Korea Remark Surprised Aides: Officials, ” *Reuters*, 9 August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northkorea-missiles-usa-idUSKBN1AP26D>.

[25] Berlinger, Joshua et al., “Tillerson Dials back Rhetoric after Trump’s North Korea ‘Fire and Fury’ Threats,” *CNN*, 9 August 2017, www.cnn.com/2017/08/09/politics/north-korea-donald-trump/index.html.

[26] Selk, Avi, “John Kelly’s Face Palm at Trump’s U.N. Speech: Exasperation, Exhaustion or No Big Deal,” *Washington Post*, 20 September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7/09/20/john-kellys-facepalm-at-trumps-u-n-speech-exasperation-exhaustion-or-no-big-deal/?utm_term=.c596752186c4.

[27] Trump, Donald,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 September 2017.

[28] Griffiths, James, “What Is a ‘Dotard’ ?” *CNN*, 22 September 2017, www.cnn.com/2017/09/22/asia/north-korea-dotard/index.html and “Full Text of Kim Jong-un’s Response to President Trump.” *New York Times*, 22 September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9/22/world/asia/kim-jong-un-trump.html?_r=0.

[29] Tweet by Donald J. Trump, 23 September 2017, 8: 08PM.

[30] Author Interview with Rex Tillerson, 4 January 2018.

[31] Tweet by Donald J. Trump, 1 October 2017, 7: 30AM.

[32] Brechenmacher, Victor, “Merkel Takes Swipe at Trump’s Fiery North Korea Comments,” *Politico*, 8 August 2017, www.politico.eu/article/merkel-takes-swipe-at-trumps-fiery-north-korea-comments/.

[33] Thureau, Jens,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There Is a Clear Disagreement with Trump on North Korea,’” *DW*, 20 September

2017, www.dw.com/en/chancellor-angela-merkel-there-is-a-clear-disagreement-with-trump-on-north-korea/a-40608769.

[34] “Full Text of Abe’ s Address at U.N. General Assembly, ” *Japan Times*, 21 September 2017,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7/09/21/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full-text-abes-address-u-n-general-assembly/#.Wchp18iGPIU>.

[35] Hill, Christopher R., *Outpost: A Diplomat at Work*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5) , Kindle.

[36] Lippman, Thomas, “N.Korea-U.S. Nuclear Pact Threatened, ” *Washington Post*, 6 July 1998, 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inatl/longterm/korea/stories/nuke070698.htm and Ryan, Maria, “Why the US’ 1994 Deal with North Korea Failed—And What Trump Can Learn from It, ” *The Conversation*, 19 July 2017, theconversation.com/why-the-uss-1994-deal-with-north-korea-failed-and-what-trump-can-learn-from-it-80578.

[37] “Nuclear Posture Review, ” 8 January 2002, web.stanford.edu/class/polisci211z/2.6/NPR2001leaked.pdf.

[38] Ryan, Maria, “Why the US’ 1994 Deal with North Korea Failed—And What Trump Can Learn from It, ” *The Conversation*, 19 July 2017, theconversation.com/why-the-uss-1994-deal-with-north-korea-failed-and-what-trump-can-learn-from-it-80578.

[39] Hill, Christopher R., *Outpost: A Diplomat at Work*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5) , p. 195, Kindle.

[40] Hill, Christopher R., *Outpost: A Diplomat at Work* (NewYork: Simon & Schuster, 2015) , p. 229, Kindle.

[41] Hill, Christopher R., *Outpost: A Diplomat at Work*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5) , p. 215, p.237, p.253, Kindle.

[42] Hill, Christopher R., *Outpost: A Diplomat at Work*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5), p. 225, Kindle.

[43] Hill, Christopher R., *Outpost: A Diplomat at Work*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5), p. 229, Kindle.

[44]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Christopher Hill, 12 September 2017.

[45] Author Interview with Hillary Clinton, 20 November 2017.

[46]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 3 August 2017.

[47] “China Says Six-Party Talks Resumption Not Easy, But in the Right Direction,” Reuters, 6 August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sean-philippines-china-northkorea-mi/china-says-six-party-talks-resumption-not-easy-but-in-the-right-direction-idUSKBN1AM089>.

[48] Gaouette, Nicole et al., “US Starts to Prep for North Korea Summit Even as Pyongyang Remains Silent,” CNN, 13 March 2018, <https://www.cnn.com/2018/03/13/politics/trump-korea-summit-early-prep/index.html>.

[49] Lauter, David, “Trump’s Risky, But Bold Approach to North Korea,” *Los Angeles Times*, 9 March 2018, <http://www.latimes.com/politics/la-pol-essential-politics-20180309-story.html>.

[50] Lewis, Jeffrey, “Trump Is Walking into Kim Jong Un’s Trap,” *Washington Post*, 13 March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post/wp/2018/03/13/trump-north-korea/?utm_term=.4167c5ee8b24.

[51] “President Xi Meets U.S. Secretary of State,” *Xinhua*, 19 March 2017, 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7-03/19/c_136140432.htm.

[52] Brunnstrom, David, “Tillerson Affirms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ve U.S.-China Ties,” Reuters, 22 February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tillerson/tillerson-affirms-importance-of-constructive-u-s-china-ties-idUSKBN1602TL?il=0>.

[53] Author Interview with Brian Hook, 13 December 2017.

[54]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1 June 2017.

[55] Zhang, Junyi, “Order from Chaos: Chinese Foreign Assistance, Explained, ” *Order from Chaos* (Brookings Blog) , 19 July 2016,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6/07/19/chinese-foreign-assistance-explained/>.

[56] Lynch, Colum, “China Eyes Ending Western Grip on Top U.N. Jobs with Greater Control over Blue Helmets, ” *Foreign Policy*, 2 October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10/02/china-eyes-ending-western-grip-on-top-u-n-jobs-with-greater-control-over-blue-helmets/>.

[57]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 21 November 2017.

结语 首选工具

维也纳，2015年

你有两种类型的军事争端^[1]，一种是通过谈判解决，另一种是以武力解决。由于第一种是人类的特征，而第二种是野兽的特征，我们必须只在不能使用第一种时，才求助于第二种。

——西塞罗，《论责任》

国务院逐渐“溶解”的趋势在特朗普政府任内依旧持续，这看起来似乎是多年外交政策失衡的合理结果，但不是不可避免的。2001年9月11日以来，外交官被边缘化以及士兵和间谍地位提升的趋势并未呈线性发展。在小布什政府任过职的外交官就列举了外交回升的实例，比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在解决朝鲜去核化问题上的外交努力，以及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下的项目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挽救生命的医疗活动等。

此外，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也共同体现了外交的后发功效。经过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对外交官相对轻视且缺乏大规模外交运作的情况后，这两项成果所代表的对比效果也更加明显。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德斯（Ben Rhodes）认为造成这些突破很晚才实现的一部分原因是外交本身所具有的“慢烧”属性，另外一部分则归因于路线修正。“我们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核心项目比第一任期内更具外交性，同时你也看到一种尝试……”他停顿了一下，似

乎在反思霍尔布鲁克时代的失败，“那种超级明星军事将领的动能，彼得雷乌斯、麦克里斯特尔的动能，在第二任期内没有出现。不是说那些将军不是明星，只是他们不是那种能在世界特定地区吸收氧分的巨人型公众人物。我认为有个缓慢、明显但持续的重新确立外交优先地位^[2]的过程”。

两项协议结果也存在争议：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足以证明外交威力的证据；而在其他人看来却是愚蠢的证明。即使特朗普执意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尽管对伊朗核协议及其利弊的激烈争论仍在持续，但是都不能否认这些协议本身是严肃外交政策举措的事实，它们植根于艰苦卓绝的老派外交努力。这些倡议中最具争议性的伊朗核协议将从始至终都充满争吵，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新一轮对吼开始时，已经是夜里了。争吵声在镏金白色镶板装饰的墙壁、洛可可风格的座椅和雕刻着小天使的华丽大理石壁炉之间回荡。叫喊声一半来自伊朗外交部长，在该国同意接受限制核计划的年限上开始反悔；另一半来自美国国务卿和能源部长，用不太多的话告诉伊朗人，见鬼去吧。“我已经听够了，”约翰·克里喊道，“你不可能做你威胁要做的事情。”如果伊朗想重新谈判基本条款，美国会毫不犹豫地扭头走开。

此时是2015年7月，伊朗、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德国和欧盟的谈判代表已经聚集在维也纳，进行最后也最煎熬阶段的外交努力。谈判地点选在了超豪华的科堡宫殿酒店（Palais Coburg），这里在历史上是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Saxe-Coburgand Gotha Dynasty）的一座重要宫殿和居所，见证了这一王朝家族的阴谋、乱伦和香薰沐浴等奢靡享受，直到直系家族的最后一位公主20世纪90年代过世；这座酒店中金碧辉煌的宴会厅还是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曾指挥过演奏的地方。之所以选择这个酒店为谈判地点，部

分是因为这里只有34套客房，容纳不了多少其他客人，以防止他们无意中听到争吵激烈的谈判。尽管如此，那些有能力住在科堡宫殿酒店的客人——间谍和外交官、银行家和贵族们——耳朵也足够灵敏。更何况那时已有600来名记者蜂拥到了维也纳，挖的就是这种八卦。

在隔壁餐厅里的美国人紧张起来。“克里有点失态啊，发脾气了。”约恩·芬纳（Jon Finer）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芬纳是克里的幕僚长，后来出任了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当时我们很多人聚集在用餐区，就在这次会议地点的外边，人们隔着墙都能听到他们的叫喊声[3]。”长期给克里担任警卫的贾森·迈宁格（Jason Meininger）最终开门打断了他们。他语气柔和地告知房间里的美国人和伊朗人，随便哪位客人都能听到全球最敏感外交事件的私密细节。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属实的。第二天吃早餐时，德国外交部长——也是后来的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黑幽默般地为他认为应该是富有成效的谈判向克里表示祝贺，这表明整个酒店都听到了他们的争吵[4]。

最终，全球最有权势的外交官们在金碧辉煌的酒店里整整困了18天，日复一日地谈判到凌晨。熬红了眼的美国谈判团队整整消耗了10磅多滋乐（Twizzlers）草莓味扭扭糖、20磅芝士条、30磅混合坚果和干果以及数百计的“西式米花糕”（Rice Krispies）[5]和浓缩咖啡胶囊。

咆哮比赛式谈判的第二天晚上，更大范围的“五常加一”部长级会议上再次出现对峙局面——五常加一是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Javad Zarif）坚持要获得更宽松的时间表，欧盟的费德里卡·莫格里尼（Federica Mogherini）则表示，她宁愿早点回家而不是考虑这一要求。“永远不要威胁伊朗人！”扎里夫吼道[6]。“或俄罗斯人。”俄罗斯外交部长

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狡黠地接了个茬，打破了紧张氛围。但事实上，俄罗斯已经与美国和欧盟站在了同一战线，拉夫罗夫反复地帮助美国打破僵局——这在乌克兰危机恶化、美俄关系陷入深层冻结的前提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不寻常的外交努力总是有诸多不寻常的特征，而这就是其中的一个：统一战线。甚至中国也加入进来，愿意在帮助改造伊朗核反应堆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个过程也是外交勇气的展示，即便如今已不是重视外交的时代。对于比尔·伯恩斯来说，这是他数十年外交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任务，之前他一路从驻俄罗斯和约旦大使，做到伊朗核谈判时的国务院二把手。伯恩斯就是那种一说起职业外交官，你脑子里马上就想到的样子。他身材颇长，留着花白的胡须，说话声音柔和，给人以异乎寻常的耐心和平和感。《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他退休的新闻标题中，称他是“外交官中的外交官^[7]”。当约翰·克里对我谈到鼓励年轻外交官是个挑战时，他表示，重要的是要“找到下一代有才华的外交服务人员，这么说吧，要找到下一代的比尔·伯恩斯^[8]”。

外交官员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伯恩斯就是鲜活的证明。他参与美国对伊朗外交已30年，最初要追溯到“伊朗门”事件过后，他刚刚成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作为一名相对年轻的外交官，”他说，“对伊朗外交的危险已经一清二楚，因为那一切结果是那么糟糕。”但伊朗如地球引力一样吸引着他。多年以后，他在科林·鲍威尔麾下的国务院担任中东局局长，开始为外交空间不断缩小以及五角大楼制定的政策日益受到重视而感到焦虑。“我目睹了外交和使用武力之间的次序倒挂，这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已经非常典型。”他继续说道。伯恩斯认为，这种倒挂正是美国在早期伊朗核计划还处在起步阶段时，避开与伊朗沟通商谈的原因。直到小布什政府的最后一年，伯恩斯在康多莉扎·赖斯麾下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时，美国政府才开始对采取外交途径感兴趣。也就是在那

个夏天，伯恩斯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全球大国会议上，第一次坐在了伊朗人的对面。“那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9]，”伯恩斯说，“对此，你知道，奥巴马更加雄心勃勃地予以推进。”

2009年夏天，美国在距离圣城库姆（Qom）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处秘密的铀浓缩设施，作为回应，实施了一系列挤压伊朗经济各个方面^[10]的新制裁措施。这要求配以谨慎的外交运作。国务院和财政部官员向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切断与伊朗的关系，形成了统一的经济战前线。影响是毁灭性的。“他们的石油出口下降了50%，”伯恩斯回忆道，“他们的货币贬值了50%。”

这种压力为谈判奠定了基础。2013年3月，在一位军官位于阿曼^[11]的海滨别墅中，伯恩斯及四名同事与伊朗人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谈。阿曼之前的调解促成了伊朗释放几名监禁中的美国徒步旅行者，显示了在伊朗问题上的影响力。在三天的时间里，伯恩斯与伊朗代表团团长一起散步，一起在光线充足、可以看到阿拉伯海宽阔海景的会议室里长时间地商讨。“我认为我们离开时，已经感觉到这件事上可能实现突破了^[12]。”伯恩斯说。伊朗代表团仍然必须严格执行来自德黑兰的旨意，但他们是基层的外交官，不是以往出现在国际会谈场合的国家安全部门里的强硬派。这种区别对于双方而言都很重要。

随后，伊朗在总统大选中推举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上台，给世界带来惊讶。与此同时，与伊朗的核谈判也开始加速。鲁哈尼是候选人中的温和派，主张以务实的政策解冻伊朗经济。他任命了受过西方教育的、《查理·罗斯访谈录》^[13]节目常客贾瓦德·扎里夫担任外交部长。接下来的一年里，伯恩斯在世界各地的首都城市主导了9次或10次的秘密谈判。有一次，“我们在马斯喀特（Muscat）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14]，然后飞往北京，然后又飞回阿曼，然后再回到北京”，约恩·芬纳回忆道，他出席了后来的许多会谈。随着时

间的推移，谈判代表们开始建立起个人友谊。美方外交官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和伊朗谈判团队的外交官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奇（Majid Takht-Ravanchi）在2013年秋季分别成为祖母和祖父，当时他们还分享了照片。克里和扎里夫举行的会议之多之长，以至于《纽约》（*New York*）杂志后来用Photoshop给两人的照片之间做出一团爱心符号，来搭配一篇题为《伊朗核协议谈判最浪漫时刻》^[15]的清单体报道。2013年底，临时协议签署。2015年4月，框架协议达成。之后的3个月里，把前几年里做出的承诺转化为最终协议的斗争在维也纳展开。

伴随秘密谈判的推进，美国在某些方面的立场也逐渐缓和。“奥巴马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政策决定……就是如果伊朗同意接受非常严格的监督和核查，美国可能会考虑允许一个非常有限的铀浓缩计划^[16]。”谢尔曼回忆道。这背后的想法是，无论我们同意与否，伊朗拥有核项目这一前景都会变成现实。谢尔曼、伯恩斯及其他美国谈判团队的成员都开始相信，制裁只能放缓伊朗的速度，谈判为确保监督伊朗的活动提供了唯一的希望。允许一个民用核计划的让步则是一个转折点，是为随后在一系列关键点上达成协议提供可能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这一让步也是反对者迄今为止诟病伊朗核协议的主要纷争点。

谢尔曼把这项协议的谈判比作魔方^[17]，每扭动一次，都会搞乱谈判的另一个方面。（后来，一位美国能源部官员给包括芬纳和谢尔曼在内的40名美国谈判代表每人送了一个魔方，当作插科打诨的礼物，也宽泛地暗示了“堵嘴”的意思^[18]。）会谈确实让团队的几个成员受了伤。温迪·谢尔曼冲向安全专线给克里做简报的途中撞到门上，撞断了鼻梁骨，还在一次赶往团队向参议院做通报、针对政治攻击为谈判进行辩护的途中，失足滚下楼梯，摔断了小手指。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小手指包上冰，照样做完了简报。（“我相当地专注

[19]，那场简报也进行得不错。”她说。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后，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2015年在日内瓦进行的一次激烈谈判中，约翰·克里拍桌子的动作太重了，把一支笔拍得飞了起来，打中了一名伊朗谈判代表。克里慌乱得第二天都没缓过神来，于是跑去法国一侧的阿尔卑斯山骑自行车醒脑——如果你是约翰·克里，又离海岸太远，不能乘风帆冲浪的话，你恐怕也得这么做了。问题是克里被一辆路过的摩托车分散了注意力，骑着车一头撞到了路障上，人飞了出去，摔断了股骨。

从马斯喀特到纽约，从日内瓦到维也纳，他们坚持不懈，并恳求盟友也这样做。2015年7月，经过最后一次持续到早上3点的努力，部长们在联合国位于维也纳的办公地点，在排成一排的各自国旗前一字站立，闪光灯频繁闪烁时，他们看起来一脸疲惫。他们一起宣布了限制伊朗核野心至少10年的协议，傲视了外部世界持续外交努力30年的伊朗终于同意接受严格、侵入性的检查和核查了。

约翰·克里知道，那些反对谈判的人，以及认为美国被诓骗了的人，会在多年内充满愤怒。于是他借此机会为这项协议进行辩护。

“我想与你们分享一段非常个人的经历，多年前我大学毕业时，就去参战了。”他向在场的媒体表示，指的是他参加越南战争的经历。

“我在战争中学习了外交失败所付出的代价。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如果我有幸能够有所作为，我会尝试这样做，”他的声音嘶哑而疲惫，动情之处还有破音，“我知道战争是外交的失败[20]，也是领导人未能做出替代决定的失败。”

这项协议是吸引批评的避雷针。想到达终点，就需要做出部分人认为不可接受的妥协。早在2009年，奥巴马已下令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不要在伊朗绿色革命中支持反政府抗议者，担心伊朗政权更迭会造成秘密外交谈判破裂[21]。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伊

朗核协议的过度追求也助长了美国在叙利亚的不作为，因为伊朗威胁过，如果美国对叙利亚政权进行干预，那么身为叙利亚盟友的伊朗就会退出限核谈判^[22]。另外，协议本身为伊朗提供了不足以生产武器的低水平核浓缩权利，并且有一些限制条件在10年后过期。这在批评人士看来，不是干净利索的胜利。

其他人认为这是与魔鬼做交易。从对强奸受害者施以石刑，到监禁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记者，伊朗在行动上并没有洗心革面。特朗普政府开始游说反对伊朗核协议时，其很多论点正是以这些说法为前提——特朗普政府关于伊朗欺骗的说法^[23]并没有获得多少支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详细讲述了伊朗自1979年以来的历史，敦促世界将伊朗视为包含核问题之外更多内容的“拼图游戏”^[24]。

参与这项协议谈判的代表会第一个承认它并不完美。但他们认为，这就是外交胜利固有的表象。协议重点严格聚焦在伊朗的核野心这个单一、紧迫的挑战上，而它没有在任何地方寻求应对伊朗对叙利亚反美分子的支持，抑或是其非核武器试验。该协议的支持者认为，除了削弱美国解决任何其他问题的能力之外，很难想象取消限核谈判还能给美国带来其他什么好处。“我们承认伊朗的许多其他行为会威胁到我们的利益和朋友的利益，”比尔·伯恩斯对我表示，“但是，能够一枪不放地以一种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式解决核问题^[25]，已经是相当重大的一步了。”

同时其他的选择也不多。克里辩解说，如果没有达成协议，“你就会有近期的军事行动，就这么简单。爆发时间已经降到了几个月，所以，不是在我们任内，就是在（特朗普）总统任职初期，没有（协议）你就会面临冲突^[26]”。奥巴马政府已经审核了军事选项，它们看起来相当惨淡。他们可以暂时废除特定场址，但谁也无法阻止伊朗人重建。“你会进入一锤子买卖的状态，然后外交努力变得完全不可

能，因为你曾经轰炸了人家，”芬纳回忆奥巴马政府对战术选择的看法时说，“他们不太可能坐在桌旁与你谈判，他们会暗地里争分夺秒地开发核弹^[27]，远离监视。然后在未来两年内，你也许就会处在一种你必须找到它并再次炸了它的状态，然后你就永久性地处在这个循环里了。”

“市面上有一种观念认为，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协议，或是完美的协议，可生活不是那样的，”伯恩斯补充说，“你可以提出一个论点，如果10年前，在伊朗人刚安装64台离心机，而且他们的铀浓缩项目还非常原始时，我们就认真地与伊朗人接触，也许我们就可以对他们的核计划做出更严格的限制。事实是，到2013年初，我们认真地开始秘密会谈时，他们已经有将近1.9万台离心机在运转了……而且你无法通过炸弹或是希望来让它们消失。外交的挑战总会产生一些不完美的解决方案^[28]。”这就是谈判解决方案总是看起来烦冗复杂的原因。20年前，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斡旋的《代顿协议》也做出了深度妥协，给所有族群都分派了政治代表权，创建了一个臃肿、笨拙的政府，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包括谢尔曼和芬纳在内，几位参与了伊朗核协议谈判的外交官联手在国会和媒体上为维护伊朗核协议而公开发声。他们认为，撤出伊朗核协议将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中国和俄罗斯将抓住机会，在美国和对这一协议做了大量投入的欧洲盟国之间制造隔阂。最重要的是外交官们担心，全球最重要的与敌对国之间防止核扩散的协议一旦遭到损毁，如果再遇到一场大危机，世界各地会出现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如果我们放弃这一协议^[29]，”芬纳说，“朝鲜人会怎么想？朝鲜人有什么动力哪怕是考虑谈判任何东西？”

无论有多少瑕疵，这只是一个协议，而且是在诸多因素上提供了经验的协议；这些因素交汇在一起，可以使外交在当今时代里依然奏

效。伊朗谈判代表在自身的试验性谈判中取得了成功，部分原因是该国总统在几乎没做微观管理的情况下，提供了全方位支持。每一轮谈判开始之前，奥巴马都会与克里和谢尔曼过一遍他认为不能逾越的

“红线”，然后会提醒他们，如果认为有必要，就停止谈判。持续数年的维也纳谈判之旅接近尾声时，已有数十位国务院官员参与了这一谈判。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交谈过：在他们的回忆中，都一致地提到了得到白宫充分赋权的感受，以及这一点对于他们的工作而言是多么不可或缺。

如果有适用于美国外交之未来的路线图，那么许多职业外交官都表示，它应该是这样的：接受协议中的妥协和不完美，意识到它们可以避免战争、拯救生命；对工作层级的外交官进行投入，并给他们足够的权限去完成工作；在那些特朗普政府看来倾向于废弃的大规模外交举措上，树立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力。实质上，这些建议看起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塑了国务院的一系列改革没有什么不同。

“关于伊朗、古巴和巴黎——坦白地说，我认为只有三个政策，而在这三个领域里，我们之后无论哪届政府都接手了一系列机遇，大机遇，坦率地说，也都有着既往国务卿们会很愿意身处其位去探索的外交空间。”约翰·克里说。尽管特朗普政府开始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开倒车，但克里表示他仍相信，协议本身的最坏情况不过是伊朗拒绝遵守协议，这样会使伊朗而不是美国陷入孤立。但他认为，如果美国单方面撕毁协议，那后果就会严重得多。“特朗普已经在开倒车了，气势汹汹地[\[30\]](#)。他孤立了我们。如果（协议）死了的话，全世界都会责怪我们，而不是伊朗……”克里跟着挖苦了一句：“如果这是交易艺术的话，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此人申请了七次破产了。”这种评论属于另外一个时代，那时你还可以通过指出他人行事方式错误来羞辱他们；那个时代，行事清楚明了，辩论有理有据，还能带来差别。但是，在美国政治中，那个时代已然作古。

最终，逾80名军控专家^[31]联署了一封公开信，为伊朗核协议进行辩护，称其对“国际核不扩散努力的影响利大于弊”，并警告称，如果“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特别是在没有证据支持伊朗作弊的基础上采取行动，那将使美国陷入孤立”。但这样的观点并没有渗透到特朗普政府，后者还在继续公开谴责伊朗。一些职业外交官担心，专家在外交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可能也成了历史。开始执政后没几天，新政府理所当然地解雇了机构内的防止核扩散专家。

所以就有了这个结局。2017年1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康特里曼在国务院忙着清空自己的办公室。漫长的35年职业生涯到此为止了，但他并没有伤感。“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32]，”他耸耸肩说，“我不确定我是否考虑过这些。”大多数星期天里，国务院大楼都空的可怕。但这个星期天，康特里曼在这栋大楼里并不孤单。在外交服务部门服役了44年的副国务卿帕特里克·肯尼迪也在同时清空他的办公桌。两位已经两鬓斑白的外交官在打包文件和家人照片的忙碌中停下手来，休息片刻，忍不住回忆起职业生涯的精彩点滴。肯尼迪在伊拉克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是美英联军临时权力机构（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的幕僚长，而埃及加入海湾战争时，康特里曼一直在埃及。对于这一对高风险职业者来说，结局是这样不可思议的寂静：回忆，空荡荡的办公桌，国务院大楼默然耸立。

自康特里曼在约旦执行任务期间被解雇至此，已经过去了几天，他也已尽了最大努力给他所能做到的事情收尾。在国际安全与防扩散局（Bureau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onproliferation）的260名下属员工中，大多数人还没来得及谈话。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因此也没什么好说的。

接下来的星期二，他有机会最后一次跟大家告别。超过百名职业外交官挤到大楼一层一个铺着带污渍灰色地毯的接待区，端着白色泡

沫塑料杯，看着康特里曼走上讲台。从不到一周前被解雇开始，康特里曼就成了个小名人，一个职业陷入困境的象征。一位同事将其职业生涯的终结，比作《星球大战》（*Star Wars*）中被达斯·维德

（Darth Vader）击倒的欧比旺·肯诺比（Obi-Wan Kenobi），这让康特里曼觉得很感动。[他还顽皮地补充说，另一个比喻是《星球大战》中莉亚公主（Princess Leia）掐死赫特人贾巴（Jabba the Hutt）的场景，“而这个我觉得有点费解”。[\[33\]](#)]

他花了几天的时间思考一个启示、一个教训、一些值得留下的东西。他告诉一众陷入困境的外交官们，他没有感到不满。事实上，他“或许是房间里最感到满意的人”。他对在场的人讲述了外交官职业如何让他对世界和外交历史有了第一手的看法，谈到那些“传奇大使”[\[34\]](#)，以及那些天资聪颖、他确信依然会从外交服务团队中脱颖而出而年轻的年轻外交官们。

但他也提出了警示。“没有专业人士的外交政策[\[35\]](#)，”他说，“根据定义，是业余的外交政策。”

他敦促在场的外交官们：留下来——尽管他承认这一职业已经赶不上时代的脚步。“我们的工作很少被美国同胞理解，这个事实有时被用于政治目的。”他说，只有美国人民才是真正抵御对外政策日益交易化和军事化的堡垒。“我们的驻外使领馆官员是阻止邪恶分子进入美国的众多防线中的第一道。我们希望美国英雄——我们的军人——的家人们了解，他们的亲人不会仅仅因为一次采取非军事解决方案失利，就陷入危险……如果我们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只是商业交易，而不是与盟友和朋友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照样会输掉比赛。”

这些也是幸存于岗位上的外交官们的担忧，他们的记忆中都都有一个不同的时代，一个谈话和倾听能起到作用、国务院是实现美国实力的不可或缺工具的时代。“我们基本上单方面解除了武装，”温迪·

谢尔曼反思说，“如果你没有外交这个工具，你就已经单方面破坏了自己的实力。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36\]](#)”她叹了口气。“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一工具从自己手里夺走，这一点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而且为什么我们要采取军事第一的外交政策，我也想不明白。”

“全球范围内能感受到的美国领导力，以及使这种领导力成为现实的建制，都受到了真实的腐蚀，”比尔·伯恩斯补充说，“你最终会创造的一种情境是，自己15年后醒来说‘那些差一点就能做大使的外交服务人员都在哪里？’而他们不会出现。”他至今仍生动地记得自己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所目睹的外交和军事力量“倒挂”情景。看着当今时代里已然珍稀的外交成就在特朗普政府任内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他忍不住指出这两个时代是多么相像。“外交实在应该成为国际上的首选工具[\[37\]](#)。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对美国人民生活的影响上来衡量，外交有时能以比动用军力低得多的成本实现目标。”伯恩斯说。他承认，军事主导政策制定的倾向性中恐怕有一部分很难消除——但他确信，总会有回归之路可循。他仍然相信，会有高素质的美国人被吸引到外交这一看似乏味但绝对必要的工作中来。

我想起了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曾写过的一段话。那是国务院正经历克林顿执政时代的残酷预算削减时期，他写的一本关于波斯尼亚战争历史和他自己的著作，题为《结束战争》。在这本书序言里，霍尔布鲁克写道：“与约翰·肯尼迪问我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的时代相比，今天的公共服务失去了其大部分光环。在它成为陈词滥调之前听到这一术语，是令人无比激动的……公共服务可以有所作为[\[38\]](#)。如果这本书有助于激励一些年轻的美国人进入政府或其他形式的公共服务领域，那它将兑现自己的使命之一。”霍尔布鲁克是个不可救药的吹牛大王，但他对美国——以及美国制造和平，而非仅有战争——的信念是“痛彻心扉”的认真的。我记得在他去世后，我坐在自己的办公位上，在国务院一层的灰色灯光下，盯着这段文字，心想不管他有

多少缺点，他都已经因为在阿富汗工作中培养出的一批工作人员，而实现了这一目标。多年以后，我又从书架上拿起这本书，翻开到折了角的这一页，然后意识到我用铅笔在空白处写了一句话：“想念你，大使。”

伯恩斯认为，只要人们继续相信民事公共服务，这些机构就能够存活下去。“外交服务部门经常被批得体无完肤”，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起来不那么委婉。它以前存活了下来，这一次，伯恩斯和他几乎所有的同行都一致认为，它也必须存活下去。“在一个权力更加分散的世界里……其中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这实际上使外交变得更加重要，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适用，而完全不是随着信息技术一道兴起的‘谁需要大使馆？’[\[39\]](#)之类的时髦观念。”

康特里曼就是赶不上时髦的人之一。讲话结束后，他收拾好行李，然后去度了个假。也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跟他叙旧。见到他时，他正在自家兄弟位于华盛顿州塔科马（Tacoma）的一栋单层小房子里，吸着电子烟，望着窗外宽阔蔚蓝的普吉特海湾（Puget Sound）。几个月后，我问出任特朗普时代第一任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布莱恩·胡克，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标志性外交使命是什么。胡克想了一会儿，仿佛第一次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对话中，他提到了范围更广泛的一系列重点，包括对抗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但是在刚刚提到的第一次交流中，他最后说：“围绕伊朗和朝鲜等危险国家的防止核扩散[\[40\]](#)。”这个时候，国务院里已经没有人主管这些问题了。接下来的一年里，康特里曼曾经担任过的职位与其他许多职位一样，依旧空缺。

[\[1\]](#) Cicero, *De Officiis*, Translated by P. G. Wal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loc. 1014, Kindle.

[\[2\]](#)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Ben Rhodes, 18 August 2017.

[3]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Jon Finer, 11 September 2017.

[4] Lakshmana, Indira A. R., “If You Can’ t Do This Deal ... Go back to Tehran, ” *Politico Magazine*, 25 September 2015, 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09/iran-deal-inside-story-213187? paginate=false.

[5] Viser, Matt, “Twizzlers, String Cheese, and Mixed Nuts (in Larger Quantities) Fuel Iran Nuclear Negotiations, ” *Boston Globe*, 7 July 2015, <https://www.bostonglobe.com/news/world/2015/07/07/twizzlers-string-cheese-and-mixed-nuts-large-quantities-fuel-iran-nuclear-negotiators/zun8dliHFISaCV8yzrTVNO/story.html>.

[6] Gay, John Allen, “Why Is Iran’ s Foreign Minister So Angry? ” *National Interest*, 9 July 2015, 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why-irans-foreign-minister-so-angry-13303.

[7] Itkowitz, Colby, “Bill Burns, a ‘Diplomat’ s Diplomat’ Retires, ” *Washington Post*, 11 April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in-the-loop/wp/2014/04/11/bill-burns-a-diplomats-diplomat-retires/?utm_term=.4e10e71e949a.

[8]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 21 November 2017.

[9]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Burns, 14 September 2017.

[10] Solomon, Jay, *The Iran Wars: Spy Games, Bank Battles, and the Secret Deals That Reshap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6) , loc. 2385-2386, Kindle.

[11]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Burns, 14 September 2017.

[12]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Burns, 14 September 2017.

[13] 查理·罗斯（1942年1月5日～ ）是美国脱口秀主持人与新闻记者。1991年，他开始主持访谈节目《查理·罗斯访谈录》，其于1993年起通过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在全美播出。——译者注

[14]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Jon Finer, 11 September 2017.

[15] Fuller, Jaime, “The Most Romantic Moments of the Iran-Deal Negotiations,” *New York*, 16 July 2015, 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5/07/most-romantic-moments-of-the-iran-deal.html.

[16] Author Interview with Wendy Sherman, 13 September 2017.

[17] Author Interview with Wendy Sherman, 13 September 2017.

[18] Lakshmana, Indira A. R., “If You Can’ t Do This Deal...Go back to Tehran,” *Politico Magazine*, 25 September 2015, 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09/iran-deal-inside-story-213187?paginate=false.

[19] Author Interview with Wendy Sherman, 13 September 2017.

[20] Kerry, John, “Iran Accord Address and Presser,” Austria Center, Vienna, Austria, 14 July 2015, www.americanrhetoric.com/speeches/johnkerryiranaccord.htm.

[21] Lake, Eli, “Why Obama Let Iran’ s Green Revolution Fail,” *Bloomberg View*, 25 August 2016, <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opinion/2016/08/24/why-obama-let-iran-s-green-revolution-fail>.

[22] Solomon, Jay, *The Iran Wars: Spy Games, Bank Battles, and the Secret Deals That Reshap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6), loc. 219-225, Kindle.

[23] Gladstone, Rick, “Arms Control Experts Urge Trump to Honor Iran Nuclear Deal, ” *New York Times*, 13 September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9/13/world/middleeast/iran-nuclear-deal-trump.html>.

[24] Haley, Nikki, “Nikki Haley Address on Iran and the JCPOA, ”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5 September 2017.

[25]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Burns, 14 September 2017.

[26]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 21 November 2017.

[27]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Jon Finer, 11 September 2017.

[28]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Burns, 14 September 2017.

[29]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Jon Finer, 11 September 2017.

[30]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 21 November 2017.

[31] Gladstone, Rick, “Arms Control Experts Urge Trump to Honor Iran Nuclear Deal, ” *New York Times*, 13 September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9/13/world/middleeast/iran-nuclear-deal-trump.html>.

[32]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 22 June 2017.

[33] “Tom Countryman’ s Farewell: A Diplomat’ s Love Letter to America, ” *Diplopundit*, 2 February 2017, <https://diplopundit.net/2017/02/02/tom-countrymans-farewell-a-diplomats-love-letter-to-america>.

[34] “Tom Countryman’ s Farewell: A Diplomat’ s Love Letter to America, ” *Diplopundit*, 2 February 2017, <https://diplopundit.net/2017/02/02/tom-countrymans-farewell-a-diplomats-love-letter-to-america>.

[35] “Tom Countryman’ s Farewell: A Diplomat’ s Love Letter to America, ” *Diplopundit*, 2 February 2017, <https://diplopundit.net/2017/02/02/tom-countrymans-farewell-a-diplomats-love-letter-to-america>.

[36] Author Interview with Wendy Sherman, 13 September 2017.

[37]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Burns, 14 September 2017.

[38] Holbrooke, Richard, *To End a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 loc. 2930–2931, Kindle.

[39]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Burns, 14 September 2017.

[40] Author Interviews with Brian Hook, 5 July 2017 and 13 December 2017.

致谢

我为《向和平宣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进行了二百多次采访。书能写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被采访者提供的第一手经历、文件和见解，它们才是构成每一页文字的内容源泉。你们当中有些人的名字或许我永远都无法公开。对于每一位接受我采访的人——有时甚至是冒着个人或职业风险接受的采访，我要说：谢谢。对于职业外交官，特别是托马斯·康特里曼、艾琳·克兰西、罗宾·拉斐尔、安妮·帕特森、比尔·伯恩斯、克里斯托弗·希尔、克里斯·拉文以及太多这里无法逐一罗列的人来说，我希望这本书是对你们所从事工作的一次恰如其分的考察。我也希望此书对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复杂而重要的遗产做出了恰当回顾。没有他，就不会有这本书。

我同样感谢那些慷慨同意我公开引用他们谈话内容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乔治·P.舒尔茨、詹姆斯·贝克、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科林·鲍威尔、康多莉扎·赖斯、希拉里·克林顿、约翰·克里和雷克斯·蒂勒森。他们慷慨地给予了我时间和坦诚。我还要同时感谢接受我采访的其他军事和文职领导人：大卫·彼得雷乌斯、迈克尔·海登、利昂·帕内塔、约翰·艾伦、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威廉·考德威尔（William Caldwell）以及其他许多人。

我不知疲倦的研究助理莎娜·曼斯巴克（Shana Mansbach）参与了数百小时的采访、校对和添加注释。她拒绝放弃这个项目，即使在

其运作时间超过预期，以及她还有更好的事情可做的情况下。在她之前的助理阿里·凯珀斯（Arie Kuipers）和内森·科伦贝格（Nathan Kohlenberg）也同样出色，这里一并表示感谢。事实审核员安迪·扬（Andy Young）细致的工作给我们整个团队提供了准确性保障。出于某种原因，扬成为嘎嘎小姐（Lady Gaga）的全职旅伴，而他即便在旅行途中，也依然抽时间审阅书稿。

我的经纪人林恩·奈斯比特（Lynn Nesbit）尽了最大努力为《向和平宣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保驾护航。她是一个作者所能拥有的最佳搭档。她代表各路文字巨匠50载，是我认识的最强悍的谈判高手，并且保持着规律的壶铃健身习惯。我们都该向林恩·奈斯比特看齐。

我还要感谢W.W. 诺顿出版公司（W.W. Norton）团队，他们在1969年出版了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回忆录《创世亲历记》，并从某种意义上把眼前这本书做成了它的暗黑续集。约翰·格拉斯曼（John Glusman）是一位既耐心又富有同情心的编辑，德雷克·麦克菲利（Drake McFeely）在其他人的拿不定主意并放弃我时，仍坚信这个项目。他们的许多同事也付出了努力：路易斯·布洛克特（Louise Brockett）、蕾切尔·萨尔兹曼（Rachel Salzman）、布伦丹·柯里（Brendan Curry）、史蒂文·佩斯（Steven Pace）、梅勒迪斯·麦金尼斯（Meredith McGinnis）、史蒂夫·阿塔尔多（Steve Attardo）、茱莉娅·德鲁斯金（Julia Druskin）、南希·帕姆吉斯特（Nancy Palmquist）和海伦·托梅兹（Helen Thomaides），等等。图书出版如同外交，是一个受时代变迁冲击的建制，需要大量研究做支撑的图书是需要他们这样优秀和认真的人做出巨大承诺的。

我尊重的几位外交政策专家，包括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和萨曼莎·维诺格拉德

（Samantha Vinograd），都看过本书的初稿，并给出了他们本没有时间给予的批注。他们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意见和信息。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大卫·罗德（David Rohde）和我在《纽约客》的其他编辑提供了宝贵的建议，礼貌地容忍了我必须请假来完成此书。

最后，如果没有我的家人，以及因为我写书脾气不好且一下子消失四五年而得罪的朋友们，我也不可能完成这部作品。每接到一通激动人心的电话，每实现一个突破，以及每出现一个失望，甚至整个项目都差点难以为继时，我的母亲都在身旁伴随着我。乔恩·洛维特（Jon Lovett）帮我做了无数的笔记，而他通常对此业务是收费的。珍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对不起，我因为去采访一个军阀，而错过了你的婚礼。我真的排练了那首歌。

索引

Abbottabad, 131

Abdullah, Abdullah, 200

Abe, Shinzo, 286

Abedin, Huma, 47, 110

Abizaid, John, 217

Abrams, Elliott, 274

Abrams tanks, 25

Abu Dhabi, 217

Abu Zaid, Osama, 160

Acheson, Dean, 5

Adams, Henry, 84

Adams, John, 3

Afghan army, 170

training of, 67

Afghanistan, x x vii, x x x ii, x x x iii, 8, 15, 18, 26, 29, 41-42, 46, 50, 53, 54, 59, 62, 63, 91, 92, 96, 101, 113, 135, 155, 156, 163, 167, 208, 210, 227, 238, 245, 293, 309

agriculture in, 79-80

American objectives in, 184

Bonn talks on new government for, 176

counterinsurgency in, 66-67

Dasht-i-Leili massacre in, 164-202

Dostum and, 164-202

drug economy of, 79

insurgency in, 44-45

Jowzjan Province of, 169

mass graves in, 164-66, 185-86

militarization of policy process for, 116-17

mujahedeen in, 170-71

NGOs in, 81-82

Pakistanis airlifted out of, 42

Pakistani troops fired on in, 133

Petraeus' s strategy in, 61, 63

Soviet occupation of, 22-26

trilateral talks with, 96

troop surge in, 64-67

Trump' s troop surge in, 201-2

2018 troop surge in, 156

US covert war in, 23-25

US military spending in, 80

US reconstruction in, 78-82

Vietnam parallels of, 19-20

water policy in, 98

African Union, 212

African Union Mission in Somalia (AMISOM) , 219

Agha, Syed Tayyab (A-Rod) , 99-101, 102, 118-19, 120, 135

Agriculture Department, US, 55

Ahmad, Abdullahi Yusuf, 211

Ahmad, Mehmood, 41

Ahmed, Rashid, 168

Akhtar, General, 25

Alam, Mir, 182

Albright, Madeleine, x x ii, x x iv, x x vi, 28, 40-41, 273, 277

alcohol, 231

Alemu, Tekeda, 212, 214-16

Aleppo, 159, 160

Alexandria, 229

Allen John, 133-34

Alien, Rex, 258-59

Aller, Frank, 13

Allianc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Counter-Terrorism (ARPCT) , 210

Al-Mousa, Abdullah, 159, 160

al-Qaeda, 8, 42, 61, 65, 72-73, 100, 101, 105, 115, 132, 135, 173, 192, 201, 209-10, 214, 218, 232

al-Shabaab, 204, 205–7, 209, 218–20, 221

international reach of, 220

US arms diverted to, 219

Alston, Philip, 241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81

American Revolution, 3

Amiri, Rina, 55, 57, 58, 123

Andropov, Yuri, 22

Animal Farm (Orwell) , 36–37

anti-communism, 245–46

Arab League, x i

Arab Spring, 59

Arango, Andres Pastrana, 243–44

Archibald, Frank, 57

Armitage, Richard, 41

arms control, x–x i , x v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x x ii–x x iii

arms sales, 156–57

Army, US, 246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80

Asia Society, 84, 135

Asmara, Eritrea, 203–4, 220

Assad, Bashar al–, 161

Associated Press, 233

atom bombs, 23

AUC, 248, 249, 252

Australia, 5, 93

Avrakotos, Gust, 171–72

Axelrod, David, 64, 120

Azouli, 232

Baghlan province, 182

Bahrain, 157

Baker, James, x x i, 158, 275–76

Balkh province, 182

Bannon, Steve, 279

Barre, Siad, 208

Bart (Air Force controller) , 178–79, 180

Bearden, Milton, 24, 26, 27–28, 170–71

Beblawi, Hazem el-, 224, 225–26, 227

Bechtel, 277

Beg, General, 26

Beijing, x x ii

Bellamy, William M. , 211

Benghazi, x vi

Benjamin Franklin State Dining Room, 54

Bentancur, President, 249

Bergdahl, Bowe, 101

Bhutto, Benazir, 26, 29, 33, 34, 35–36, 88

assassination of, 35–36

Bhutto, Zulfikar Ali, 23, 26

Biden, Joseph, 50, 54, 123

Big Stone Gap, Va., 126

Bilderberg Group, 60

bin Laden, Osama, 8, 25, 28, 41, 132, 137–38, 140, 143,
173, 175, 179

raid and death of, 131, 134

“Black Hawk Down, ” 208

Black Hawk helicopters, 130–31

Black Hawk incident, 209

black sites, 180

Blair, Dennis, x x vi

Blank, Jonah, 130

Blinken, Tony, x vii, 49–50, 232

“body count syndrome, ” 242

Bogota, 241

Bohlen, Charles, 5

Bommer, Ashley, 185

Bonn, Germany, 176

Bonn Agreement, 176

Bosnia, 38–41, 53, 99, 109

Boston University, 35

Boucey, Mark, 214

Bowden, Mark, 208

Boy Scouts, 259

Brahimi, Lakhdar, 106, 173

briefing papers, 263

Brown, Hank, 29

Brown Daily Herald, 16

Bryden, Matthew, 210, 218, 219

Brzezinski, Zbigniew, 23

Buckinghamshire, England, 204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99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onproliferation,
306

Burns, Bill, 134, 224, 233, 298–99, 300, 303–4, 308, 309

Bush, George H.W., x x i, 27

Bush, George W., x x iv, x x vi, 42, 80, 142, 162, 174, 211, 286, 287

Bush (George W.) administration, x x iii, x x x ii, 43, 44, 66, 78, 79, 184–85, 288, 295, 299

Butt, Nazir Ahmed, 76, 129, 130

Butturini, Teo, 222–23, 236

buzkashi (game) , 169–70, 199

BuzzFeed, 270

Cafritz, Bill, 47

Cafritz, Buffy, 47

Cairo, 102, 229

6th October Bridge in, 222–23

Cairo University, x x vi

Camargo, Alberto Lleras, 247

Cambodia, 6

Cambridge University, 13

Camp David, 228–29, 235

Canada, 4, 5

capture-and-kill operations, 211

Cardin, Ben, 272

Cartel, Medellín, 250

Carter, Ash, x x ix

Carter, Jimmy, 39, 228–29

Carter administration, 22–23, 38

Carville, James, x x ii

“cash flow financing, ” 234

Cassidy & Associates, 30, 145

Central Command (CENTCOM) , 59, 61, 103, 111, 159, 274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 x x vi, 12, 22, 23, 24, 25, 26, 27, 41, 42, 43, 44, 55, 57, 70, 71, 76, 82, 106, 138, 143, 145, 161, 175, 185, 186, 190, 192, 197, 213, 216, 242, 246, 248, 302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of, 175

Raymond Davis and, 128, 129

Khost bombing and, 100

mujahedeen and, 170–71

in Somalia, 204, 209–12

Special Activities Division of, 177

Syrian policy and, 159–60

Chacon, Arnold, x ii, x iii

Chandrasekaran, Rajiv, 109

“Changing Pakistan’ s Behavior Towan the Taliban” (flow chart) , 65

Charlie Wilson’ s War (film) , 171–72

Cheema, Umar, 71

police attack on, 68–69

Cheney, Dick, x x iv, 267

China, x x , 53, 65, 93, 96, 282, 287, 288, 289, 290–94, 298, 304

development programs of, 292

Christopher, Warren, x x ii, 39

Chunta, Hazarat, 195

Churchill, Winston, 4

Clancy, Erin, x vi–x x , 260

Clapper, James, x x vi

Clarke, Richard A., 211

“clientitis, ” 150

Clinton, Bill, x x ii, 13, 15, 28, 32, 39, 47, 59, 243–44, 250, 286

Clinton, Hillary, x x vii, x x viii, x x x ii, 10, 47, 48, 51–52, 54, 57, 59, 61, 64, 80, 94, 95–96, 102, 108, 110, 112, 118, 120, 121–22, 130, 134–35, 230, 277–78, 288–89

on Afghan troop surge, 65–66

Dostum and, 191–92

elbow fractures of, 121

email server of, x vi

Holbrooke and, 15

Holbrooke’ s death and, 124–25

and Pakistan visa blocking, 77

as secretary of state, 52

social recall of, 52

State Department memoir of, 135

on Syria policy, 161

Taliban negotiations and, 106–7

Tunisia speech of, 227–28

Clinton administration, 38, 39, 49, 140, 287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x x iv, 306

cocaine, 244, 247, 248

Cocaine Triangle, 163

Cold War, x x ii, x x iii, 5, 162, 166, 228 245

Colombia, 237–53

extrajudicial killings in, 240–41, 242, 250–52

homicide rate of, 249

paramilitaries in, 248

Soacha scandal in, 240–41, 242

US aid to, 244–45, 246, 250–51

US assistance and training to, 241–42

Combined Tactical Systems (CTS) , 236

Commander’ s Emergency Response Program, x x v , 80, 171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70

Congo, 93

Congress, US, x x ii, 3, 23, 78, 95, 129, 134, 170, 186, 224, 233, 271, 272, 273, 274, 279, 287, 304

Bhutto' s address to, 27

consulates, x x ii

containment, 20

“containment doctrine, ” 5

Cooper, Anderson, 185

Corker, Bob, 272

corruption, 238

Costeño, 237, 239, 240

Coumadin, 118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8

counterinsurgency, 18, 20, 63, 66-67, 115, 116, 242, 245, 246

three steps of, 80-81

counterinsurgency doctrine (COIN) , 60-61, 116

counterterrorism, x x iii, 7-8, 124

Counter-Terrorism Security Group, 211

Countryman, Dubravka, x iii- x iv

Countryman, Thomas, ix- x i, x iii- x iv, x v - x vi, x vii, x viii, x x, 214, 306-7, 309

accent of, x i - x ii

background of, x i - x ii

resignation of, x ii- x iv

on Trump administration, x iv- x v

“coup clause, ” 232-33

Craig, Greg, 49, 50

Crowley, P.J., 110, 121

Crumpton, Hank, 177, 179, 180

Cuba, x x vi, 282-83

cyberterrorism, x x

Daman-e-Koh park, 68

Damascus, American embassy in, x viii

Damavand College, 21

Da Nang, 17

“Dangers of Being Too Good-Looking, The” (*Esquire* article) , 119

Daniel Pearl Fellowship, 68

Darfur, 293

Dasht-i-Leili desert, 181

Dasht-i-Leili massacre, 164-202

Davis, Raymond, 126-28, 129-30, 131, 138

Dayton Agreement, 39-40, 41

death squads, 242, 248-49

DeCarlo’ s restaurant, 145

Decree 3398, 245-46

Defense Department, US, x x iv-x x v , x x x , x x x i ,
18, 55, 59, 82, 156, 161, 184, 202, 204, 213, 214, 216, 225,
234, 242, 258

budget of, x x vi

State Department power ceded to, 158-59

Syrian policy and, 159-60

defense spending, x x iii–x x iv, x x vi, 274

Dejban, Donna, 95, 118

d’ Erlanger, Rodolphe, 227

DeStefano, Johnny, 274

Diplomatic Society, 145

diplomats, diplomacy, x i, x x vii, x x x ii, 3–4, 5,
151, 282, 308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8

destruction of institutions of, x x x i–x x x ii

militarization of by Trump, 156–57, 163

skepticism about, x x

Trump on, x iv

Directive #29, 241

Directorate S, 44, 131–32

Dirksen Senate Office Building, 272

Djibouti, 212

Donilon, Tom, x x vii, x x viii, 113

Dostum, Abdul Rashid, 166–202, 204

alcoholism of, 189–90

army service of, 170

author’ s interview with, 166–69, 188–98

background of, 169–70

charm of, 179

fall from power of, 200

as fitness guru, 192

mujahedeen joined by, 172

press portrayal of, 190–92

Taliban and, 172–73

US arming of, 173, 178–79

violence of, 169–70, 199–200

visa denial and, 191–92

drone strikes, 72–73, 74–75, 147

drought, 97

drugs, 238, 244, 245, 248, 249

Duterte, Rodrigo, 158

East Timor, 59

education, 22

Egypt, x, 73, 102, 157–58, 163, 222–36, 238, 250, 306

crackdown on protests in, 231–32

elections in, 230–31

US aid to, 229, 232–34, 235–36

Eikenberry, Karl, 108

ElBaradei, Mohamed, 224, 226

El-Bayoumi, Jehan, 121

Elvir (Freddy Torres' s cousin) , 238–39, 240

Emanuel, Rahm, 63

Embasoira Hotel, 203–4

Energy Department, US, 301

Eritrea, 208, 212, 213

Esquire, 119

Ethiopia, 208, 212, 213, 215, 216–17

ethnic cleansing, 46

European Union (EU) , 212, 214, 298

Evans, Micheal, 205-6, 220-21

Evans, Paul, 177

Evans, Sally, 204-6, 207, 220-21

Evans, Thomas, *see* Hakim, Abdul executions, 8-9

Express Tribune, 36

extrajudicial killings (EJK) , 8-10, 11, 70-71, 72

in Colombia, 240-41, 242, 250-52

ExxonMobil, 259, 263

F-15 fighters, 157

F-16 fighter jets, 27

Facebook, 205

Faheem, Mohammed, 127

Fahmy, Nabil (interim foreign minister) , 226-27, 236

The Fairfax, preinaugural party at, 47-48, 51, 56

false positives, 240-41, 250

FARC, *see*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33

Fazl, Mohammad, 174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 14, 26, 55, 76,
144, 146–49, 184, 207, 216

Federally Administered Tribal Agencies (FATA) , 42–43

Feldman, 13an, 120–21, 146

Ferozepur Road, 126

5th Special Forces Group, 177–78

Financial Times, 137–39, 140

Finer, Jon, 297, 300, 301, 303, 304

Finn, Robert, 183, 184

floods, 97

Flournoy, Michele, 131

Folk, Anders, 220

Foreign Affairs, 119

foreign aid, x iv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 147

foreign policy, US, x xviii, 4

changes to focus of, x x i – x x ii

militarization of, x x iii– x x iv, x x vi– x x vii,
x x x ii, 17–18, 158–59, 167

Foreign Policy, x x i, 55, 124, 275

Foreign Service, US, ix, x i, x ii, x x v, 5, 17, 21,
22, 82, 184, 227, 260, 270, 274, 276, 277–78, 298, 306, 309

lack of experience at, x x x – x x x i

Mahogany Row in, x vii, x viii, 12, 257

pay of, x viii– x ix

resignation letters at, x iii

vacancies at, x x x

Fort Benning, 242

Fort Bragg, 127

Fort McNair, 111

Fort Myer Army Base, 201–2

Four Powers Summit (1960), 16–17

Fox News, 140

Franklin, Benjamin, 3

Frazer, Jendayi, 211–12, 218, 219

Freddy (acquaintance of Elvir) , 237, 238–39, 240

Free Syrian Army (FSA) , 159–60

Friedman, Thomas, x x iii

Fusa, 238–39

Gaddafi, Muammar, 208

Garden Cafe, 148, 150

Gates, Robert, 64, 65

Gelb, Leslie, 18, 51, 118

Geneva Conventions, 174

Genghis Khan, 189

genocide, 10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Hospital, 120

Germany, 99–101, 286, 297

Ghani, Ashraf, 190, 200

Ghost Writer, The (film) , 85–86

Gilani, Yousaf Raza, 36, 77

glaciers, 97

Glenn, John, 24

Global Times, 291

global warming, 97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x x iii, x x iv–x x v , 87, 186

Goldstein, Steven, 257, 258, 264

Google, 81

Gore, Al, 38, 41

Gorka, Sebastian, 279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34

Graham, Lindsey, 224, 225, 226

Great Britain, x i , 3–4

Great Depression, 4

Green Berets, 177–78

Green Revolution, 302

Grossman, Marc, 140

“Ground Lines of Communication” (GLOCs) , 133–35

Guam, 285

Guantánamo Bay, 101, 174, 184, 193

Gulf War, 306

Hagel, Chuck, 225

Haider, Faizan, 127

Hakim, Abdul (the White Beast) , 205–6, 207, 220–21

Halberstam, David, 48

Haley, Nikki, 263–64, 266, 281, 283, 302

Hamlisch, Marvin, 122

Haqqani, Husain, 4, 32–37, 77, 89, 130, 133, 144

as ambassador to US, 36–37

arrest of, 34–35

background of, 32–33

as Bhutto' s spokesperson, 34

bin Laden killing and, 137–38

Davis scandal and, 129, 130

detention and exile of, 141–43

Holbrooke' s relationship with, 84-87

Ijaz memo and, 137-43

ISI mistrust of, 119

move to US by, 35

Sharif and, 33-34

suspect loyalties of, 138-43

visas issued by, 138

Haqqani, Jalaluddin, 24, 42-43

Harriman, William Averell, 18-19, 52, 57

Harriman, Pamela, 16

Harry' s Tap Room, 101

Hastings, Michael, 104-5

Hay, John, 84

Hay-Adams hotel, 84

Hayden, Michael, 43-44, 71, 132, 216, 235

Hayes, Jeff, 100

Hazaras, 176-77

health programs, 270

Heffernan, John, 165–66, 181

Hekmatyar, Gulbuddin, 24, 25, 28, 42–43

Helms, Jesse, x x i i

Hemsworth, Chris, 197

Herat, 182

heroin, 79

Herring, Joanne, 170, 171

Hill, Christopher, 287–89, 295

Hoge, James, 119

Holbrooke, Anthony, 54

Holbrooke, David, 54

Holbrooke, Richard, x x vii, 5, 6, 15–20, 21, 30, 32, 33, 70, 78–83, 84–87, 91, 92, 95–96, 111–12, 119, 134, 135, 142, 143, 146, 147, 150–51, 155, 156, 158, 162, 171, 191–92, 201, 227, 258, 275, 287, 288, 296, 304, 308–9

Afghan farming supported by, 79–80

Afghan reconstruction and, 78–82

on Afghan troop surge, 64-67

Agha negotiations and, 101-6

ambulance ride notes of, 121

audio diaries of, 64

author' s job interview with, 55-59

author' s relationship with, 46-47, 118-19

background of, 15-17

bathroom meetings of, 58

Bosnian conflict and, 38-41, 53

Charlie Rose interview of, 48-49

Dayton Agreement and, 39-40

death of, 123-25

group waivers and, 94-95

health problems of, 117-18, 120-21

Hillary Clinton and, 48, 50-52

induced coma of, 123

Iraq War supported by, 50, 64

Kerry-Lugar-Berman Act and, 89–90

meeting with Obama of, 51

memo to Clinton by, 112–17

negotiating style of, 16

New Yorker profile on, 110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48–51

Obama administration' s rift with, 109–10, 135–36

at Obama preinaugural party, 47–48

and Obama' s review of Afghan strategy, 63–64

Obama' s treatment of, 63–64

pariah status of, 107–9

passed over as secretary of state, 40–41

Petraeus and, 61–62

press relationship with, 109–10

“shura” meetings of, 107

shuttle diplomacy by, 86

ambition to serve as special envoy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53–59

Susan Rice and, 49

Taliban negotiations and, 120

undermining of, 107–9

USAID hat of, 92–93

USAID projects contracted by, 78–79

Vietnam and, 17–20

water policy and, 96–98

Homeland Security Department, US, 271

honor killings, 149–50

Hook, Brian, 265, 267, 289, 291, 309

Horn of Africa, 163, 203–4

Hudson Institute, 142

Huffington Post, 95

human rights, 71–72, 157–58, 161, 163, 165, 238, 244,
250, 280–81

Human Rights Watch, 8, 9, 190, 191, 223–24, 231, 233–34

Ijaz, Mansoor, 137–39, 142

background of, 139–40

India, 26, 29, 30-31, 32, 42, 43, 53, 65, 85, 86-87, 96,
114, 126, 150

water issues and, 97-98

Indus River, 97

Indus Waters Treaty, 97

Insigniam, 269, 270

InterAction, 81, 93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IGAD) , 212,
214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46

internationalism, x x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5, 226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agency (ISI) , 22, 23, 25,
28, 34, 41-42, 43, 44, 71, 75-76, 100, 119, 128, 129, 131-
32, 133, 140-41, 142

anti-American stories planted by, 73

and Cheema, 69-70

Haqqani and, 138, 140-41

Petraeus on, 76

Iran, x x , x x iii, x x vi, 2, 21, 53, 86, 92, 309

human rights record of, 280–81

nuclear deal with, x , 279–81, 295–99

sanctions on, 299, 300

uranium enrichment facility in, 299

Iran–Contra affair, 298

Iraq, 59, 66, 140, 156

Iraq War, x x iv–x x v , x x x ii, 50, 64, 299, 306, 308

counterinsurgency doctrine in, 60–61

ISAF, 62

Ischi, Ahmad, 199–200

Islam, radical, x x

Islamabad, 10–11, 21, 22, 33, 68

Islamic Courts Union (ICU) , 203–4, 208–9, 214, 215–16,
217–18, 220

stabilizing effect of, 209

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105

Islamic Revolution, 22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ISIL) , x x iii,
158–59, 160, 201, 234, 309

Islamists, 24–25

Islamist terrorism, 176–77

isolationism, 4

Israel, x , 228–29, 231, 234, 250, 280

Izetbegović, Alija, 39

Jamaat-e-Islami party, 33

Japan, x x x i , 5, 284, 286

Jay, John, 3

Jezebel (blog) , x x viii

jihād, 26

Jilani, Jalil Abbas, 144

Johnson, Lyndon, 63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143

Jolie, Angelina, 59

Jones, Jim, x x vi, x x vii, 65, 107–8, 109, 132, 138

Holbrooke firing memo of, 108

Jones, Stuart E. , 157

Jordan, x , x v

American embassy in, ix-x

Junbish militias, 190, 199

Justice Department, US, 55

Kabul, 102, 172, 177, 179, 183, 188

Vic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167-68, 189, 200

Kalimas, 7

Kamal, Mohsin, 88 129, 130

Kandahar, 100, 175

Kappes, Steve, 132

Karachi University, 33

Karzai, Hamid, 104, 106, 108, 113, 135, 175, 176

Kashmir, 97

Katzenbach, Nicholas, 19

Kayani, General, 89, 90, 132, 133, 138, 141

Kazakhstan, 294

Kelly, John F., 156, 201, 285

Kennan, George, 5

Kennedy, John F., 308

Kennedy, Patrick, x vi, 306

Kenney, Kristie, x ix

Kenya, 208, 212, 221

American embassy bombed in, 210

Kerry, John, x x ix, 5, 46, 89–90, 123, 130, 158, 186–87, 196, 224, 225, 232, 234, 274, 278, 279, 282, 293, 296, 297, 298, 300, 301–2, 303, 304, 305

Kerry, Teresa Heinz, 123

Kerry–Lugar–Berman Act, 88–92, 115, 129

KGB, 22

Khan, Imran, 140

Khan, Ismael, 182

Khan, Kamal, 195

Khost, Afghanistan, 100

Khrushchev, Nikita, 16

kidnappings, 247–48, 249, 252

Kim, Yuri, x viii, 287, 290

Kim Jong Un, 285, 290

Kiriakou, John, 186–87

Kissinger, Henry, x x iv, x x x, x x x i – x x x ii, 6,
20, 51, 58

Kolenda, Christopher, 103–4

Kondo, Marie, 270

Korea, x v

Kosovo, 40

Kot Lakhpat jail, 127–28

Kozyra, Jillian, 81–82

Kronstadt, Alan, 88, 95

Kunduz, 42, 174, 179, 181, 186, 193, 196

kurash, 198

Kurdistan Worker’ s Party (PKK) , 159

Kurds, 159

Kushner, Jared, 266–67, 291

Kuwait, x, 234

Kyoto Protocol, x x iv

Lacombe, Brigitte, 110

La Curva strip club, 239

LaHood, Ray, 230

LaHood, Sam, 230

Lahore, Pakistan, 126–28

Lake, Anthony, 17, 38

Lamba, S.K., 86

Landler, Mark, 62, 109

Larsen, Don, 102

Lashkar-e-Taiba (LeT), 43

Lasprilla, Jaime, 242

“Last Diplom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rticle),
151

Latin America, 163, 238

LaVine, Chris, 158, 159, 161–62, 163, 278

Lavrov, Sergei, 298

Leahy Law, 71–72

Leaning, Jennifer, 164–66, 181

Lehman Brothers, 38

Lew, Jack, 123

Lewinsky, Monica, 243

Liberia, 93

Libya, 208

“The Line, ” 112

Locke Lord, 88–89, 129

Lodhi, Maleeha, 89

Los Fresnos, 246

Louisiana Purchase, 3

Lovett, Robert, 5

Lowenstein, Frank, 186–87, 232, 234–35

Lute, Douglas, x x vi, 65, 106, 107–8, 109, 140

Holbrooke disliked by, 108–9

Lyman, Princeton, 208–9

Maduro, Nicolás, 283

Mahogany Row, x vii, x viii, 12, 257

Mahogany Row Massacre, 260, 274, 287

Manusmriti, ix

marijuana, 247

Marine Amphibious Force, 17

Marines, US, 219

Marja, 104

Marquetalia, 246, 247, 250

Marshall, George, 272

Marshall Plan, 5, 292

Marshall Plan Charities, 171

Marton, Kati, 51, 54, 110, 111–12

mass graves, 164–66

Massoud, Ahmed Shah, 172

Mattis, James “Mad Dog, ” 111–12, 157, 201, 265, 274,

284

troop levels set by, 156

May, Theresa, 281

Mazar-e-Sharif, 166, 179, 200–201

McCaffrey, Barry, 249, 251–52, 253

McCain, John, 224, 225, 226

McChrystal, Stanley, 66, 103–4, 113, 116, 296

resignation of, 105

Rolling Stone article and, 104–5

McDonough, Denis, x x viii

McGurk, Brett, 158–59

McHale, Judith, 93–94

McMaster, H. R. , 201, 284

McRaven, Admiral, 143

McVey, J. Mark, 122

Meininger, Jason, 297

Mekong Delta, 59

Menkhaus, Ken, 209

Merkel, Angela, 282, 286

Meznar, Marc, 213–14

microfinance, 59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266–67

Mills, Cheryl, 110, 123

Milošević, Slobodan, 39, 40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akistan, 138

missions, x x ii

Mitchell, George, 54

Mogadishu, 210, 211, 212, 214, 215–16, 217

Mogadishu, Battle of (1993) , 208

Mogherini, Federica, 298

Mohammed, Fazul Abdullah, 210

Mohaqq, Mohammad, 177

Mohmand, Asif, 200–201

Montoya, Mario, 241

Moore, John, 36

Morell, Mike, 140–41

Morsi, Mohamed, 222, 230–31, 232

Mozang Chungi stop, 126

Mubarak, Hosni, 225, 229–30, 231

Muerte a Secuestradores (MAC) , 248–49

Mughal Empire, 126

mujahedeen, 23, 170–71, 172–73, 182–83

Mullen, Mike, 132, 133, 137, 138, 141

Mumbai, India, 43

Munter, Cameron, 130

Musharraf, Pervez, 31, 35, 36, 41, 42, 44

Muslim Brotherhood, 222, 224, 226, 230–31, 232

Nairobi, 206–7, 214

Nangahar province, 182

narco-trafficking, 244

Nasir, Javed, 34

Nasr, Vali, 55, 64, 67, 92, 103

Nation, 89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30, 242

George C. Marshall Hall of, 111

National Islamic Front/National Congress Party, 293

nationalism, 4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 x x iv, x x vii, 63,
64, 97, 156, 187, 298

NATO, x x , 5, 39, 44, 53, 62, 262, 284

Bosnian air strikes of, 40

Nauert, Heather, 257, 258

Navy, US, 217

Navy SEALs, 131, 138

Negroponte, John, 54

Nejma Ezzohara, 227

Netanyahu, Benjamin “Bibi, ” 235

News, The (Pakistani newspaper) , 68, 89

New York (magazine) , 300

New Yorker, The, 110

New York Times, x x viii, 16–17, 62, 68, 109, 145, 149, 190

New York Yankees, 102

Nicaragua, 281

Nicholson, John, Jr., 201

9th Marine Regiment, 17

Nixon, Richard, 19

Nobel Peace Prize, 40

nongovernmental groups, 56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 81-82, 91-95

nonproliferation, x iii, x v , 309

Noor, Atta Mohammed, 177, 179, 182, 183, 200-201

Northern Alliance, 42, 176, 179, 180, 182, 210

North Korea, x , x x , x x iii, 284-90, 295, 309

six-party talks on denuclearizing of, 287-88

NSA, 146

nuclear-free zones, x

nuclear proliferation, x-x i , 24

Nuri, Nurullah, 174

Nutsch, Mark, 177–78, 180, 196, 197

Obaid-Chinoy, Sharmeen, 149–50

Obama, Barack, x x vi, x x ix, 47, 50, 52, 54, 63–64, 67, 105, 108, 118, 120, 128, 132–33, 142, 159, 184–85, 201, 202, 209, 280, 291, 299, 300, 302, 304

Afghanistan trip of, 107–8

arms deal of, x x vi–x x vii

Dasht-i-Leili massacre and, 184–85, 187

Holbrooke tribute of, 122

noninterventionism of, 162–63

Panetta appointed by, 71

Taliban negotiations opposed by, 106

troop withdrawal deadlines of, 114, 116

Obama, Michelle, 192

Obama administration, x x x ii, 6, 78, 79, 130, 135, 162, 236, 293, 295–96

Egypt and, 233–34

Iran deal and, 303

North Korea and, 288–89

power grabs of, x x vii–x x viii

State Department and, x x ii–x x ix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 , 273

Office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SRAP) , 53–59, 82–83, 106, 122, 147–48, 155, 158

policy papers of, 64–65

Olson, Richard, 136, 146

Oman, 299

Omar, Mullah, 42, 99, 102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293

Orth, Rick, 214

Orwell, George, 36–37

Ospina, Camilo, 241

Otero, Maria, 97

Overseas Contingency Operations, x x iii, x x vi

Packer, George, 110

Pact of Paris, 4

Paisa, 237, 239, 240

Pakistan, x v , 6, 12, 15, 26, 30-31, 32-37, 41-42, 46, 53, 54, 59, 63, 65, 67, 78, 85, 96, 105, 113, 114, 151, 155, 175, 234, 252, 293, 294

aid workers targeted in, 93

alleged vote rigging in, 146

anti-Americanism in, 33, 73, 76, 93

assistance to, 134-35

black market arms sales by, 24

civilian aid package to, 88-93

counterterrorism of, 98

danger to reporters in, 69-71

double game played by, 42-44, 132-33

EJKs in, 7-10, 11

India relations with, 86-87

lack of American technical expertise on, 91

military academy of, 131

NGOs in, 81-82, 91-95

nuclear capacity of, 72

nuclear program of, 23, 24, 26, 27

Raphel in, 21-22

reaction to Kerry-Lugar-Berman Act in, 88-92

regional agreement and, 117

as sponsor of terrorism, 35

supply lines cut in, 133-35

Swat valley of, 8-9

Taliban extremists in, 42-43

Taliban funded by, 28, 29, 43-44

Taliban in, 101

Taliban supported by, 41-42, 173-74

terrorist safe havens in, 115, 116, 134

terrorists as proxy force for, 87-88

terrorists supported by, 43-44

US aid to, 9

US arms sales to, 23-24, 25, 29

US relations with, *see* US-Pakistan relationship

visa blocking in, 119, 138-39

water issues and, 97-98

Pakistani Army, 7-8

Palais Coburg, 296-97

Panetta, Leon, 71-72, 73, 128, 132-33

Paris, Treaty of, 3

Paris Agreement, 281-82

Paris Climate Accord, x x vi, 295-96

Paris peace talks, 19, 40

Parliament, Pakistan, 41

Pasha, Ahmed Shuja, 43, 44, 70, 73, 128, 130, 131, 133, 140, 141

Pashtuns, 177, 182

Pastrana Arango, Andres, 243-44, 250, 251

Patriot Act, 257

Patterson, Anne, 31, 73, 75-76, 90, 224, 225, 230, 231, 233, 234, 244

Pauli, Rosemarie, 56, 92, 123

Pennington, Bob, 177

Pentagon, *see* Defense Department, S Pentagon Papers, 18

People' s Protection Unit (YPG) , 159–60, 161

Peterlin, Margaret, xix, 257–58, 259, 261

Petraeus, David, x xvi, 64, 66, 76, 80, 88, 91, 92, 98, 111, 116, 130, 131, 133, 170, 296

Afghan strategy of, 61, 63

author' s first meeting with, 62

Holbrooke and, 61–62

reliance on counterinsurgency doctrine of, 60–61

Taliban negotiations opposed by, 103, 105–6

workout regimen of, 59–60

Philippines, 158

Phoenix Program, 245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165, 166, 185–86, 187, 195

Plan Colombia, 238, 243–45, 250–51, 252–53

Plan Lazo, 245–46, 248

Platt, Nicholas, 34

Polanski, Roman, 85

pomegranates, 79–80

Pompeo, Mike, 263, 268, 280

poppy cultivation, 79

Population Refugees and Migration bureau, 213–14

populism, x x

Portman, Natalie, 59

Pottery Barn rule, x x v

Powell, Colin, x x iii, x x iv–x x v, x x vii, x x x i, 41, 184, 261, 267, 278

Powell Valley High, 126–27

Power, Samantha, x x vii–x x ix, 235–36

Predator drones, 74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Acheson), 5

Presidential Management Fellows program, 274

Pressler Amendment, 24, 27

propaganda, 272–73

Prosper, Pierre, 184

proxy wars, 162–63, 209, 216, 245, 252

Putin, Vladimir, 234

Qala-i-Jangi, 180–81, 186, 193, 195, 196

Qala-i-Zeini, 193, 196

Qanet, Bashir, 200

Qanyare, Mohamed Afrah, 210–11

Qatar, 101, 135, 157, 267

Qom, 299

“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 ” 124–25

Quetta, 42

Quran, 170, 189

Qureshi, Shah Mehmood, 95–96, 130

Rabaa al-Adawiya Square, 222–23, 225, 226–27, 229, 231,
233, 235, 236

Rabbani, Burhanuddin, 24, 177

Rabbani, Mullah Mohammed, 173

Rangel and Pickering fellows, 274

Raphel, Alexandra, 14, 31, 145, 150

Raphel, Anna, 31

Raphel, Arnold, 21-22

death of, 25-26

Raphel, Robin, 10, 11-14, 21-22, 26, 28-29, 32, 56, 77,
90-91, 144-51, 173, 175-76

background of, 12-13

classified documents in home of, 144-45, 147

divorce of, 25

espionage charges dropped against, 148-49

FBI questioning of, 144-45

FBI surveillance of, 146-49

financial ruin of, 149

firing of, 145-46

FISA warrant on, 147

investigation for espionage of, 14

in Islamabad, 146

as lobbyist, 30-31

on talks with Taliban, 29–30

Rattner, Steven, 124

Raymond, Nathaniel, 186, 187, 196

Reagan, Ronald, 23, 24, 170, 247

Red Cross, 180, 181, 195

Reece, Matthew, 214

refugees, 59

Reines, Philippe, 110

Remnick, David, 110

Reston, James “Scotty, ” 16–17, 57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 (FARC) , 240,
241, 247–48, 249–50, 251, 252–53

Rhodes, Ben, 50, 65, 66, 295–96

Rice, Condoleezza, x x iv, x x x–x x x i , 252–53, 260,
261, 277, 287, 289, 299

Rice, Susan, x x vii, x x viii–x x ix, 49

Riedel, Bruce, 63, 65, 66–67, 103

Robinson, David Malcolm, x vi

Rolling Stone, 104–5

Roosevelt, Franklin D. , 4, 79, 158

Rose, Charlie, 48–49

Ross, Dennis, 86

Rouhani, Hassan, 299–300

Rubin, Barnett, 55, 58, 102–3, 176

Ruggiero, Frank, 100, 101, 120, 125, 135

Ruiz, Jaime, 244

Rumsfeld, Donald, x x iv, x x v , 42, 175, 176

“Runaway General, The” (Hastings) , 104–5

Rusk, David H. , 16, 282

Rusk, Dean, 16, 57, 246

Russia, x i , 53, 86, 234, 272–73, 293, 298, 304

Rwanda, 10

Sadat, Anwar, 228

Sadr, Muqtada al–, 61

St. Louis Post-Dispatch, 4

Salim, Suleiman Ahmed Hemed, 211

Salman, Mohammed bin, 267

San Vicente del Caguán, 250–51

Sarajevo, x x ii, 59

Saudi Arabia, x, 93, 102, 157, 234, 267

Saxe-Coburg-Gotha dynasty, 296–97

Sayyaf, Abdul, 24, 25, 176–77

Schwarzenegger, Arnold, 191

security clearances, x v

Sehmi, Preeyam, 206–7

Senate, US, 24

aid to Pakistan authorized by, 88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f, x x ii, 186, 196

September 11, 2001, terrorist attacks of, x x i, x x iii, 12, 41, 162, 166, 171, 174, 175, 177, 208, 257, 295

sequestrations, x x vi

Shah, Rajiv, 94, 95

Shahzad, Faisal, 76

Shahzad, Syed Saleem, 70

Shannon, Tom, x vii– x viii, x i x

Shari ‘a courts, 204, 208–9

Sharif, Nawaz, 32, 33–34, 90, 146

Sheberghan, 166, 170, 180, 181, 188, 193

Sherman, Wendy, 134, 300–301, 304, 307–8

Sherzai, Gul Agha, 182

Shinn, David, 209

Shultz, George P., x x x, 23, 26, 277

Siad, Yusuf Mohammed, 210, 219

Sibley Memorial Hospital, 120

Siegel, Mark, 35, 88–89, 129

signals intelligence, 146

Sinai, 228, 229, 233, 234

Sirkin, Susannah, 187–88

Sisi, Abdel Fattah el-, 157–58, 224–25, 231–32, 234,
235, 236

Snowden, Edward, 147

Soacha scandal, 240–41, 242

Somalia, 156, 203–21, 238

anti-American sentiment in, 218

arms embargo on, 214

Ethiopian invasion of, 216–18

regional peacekeeping force for, 213–15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of, 212–13

US-backed peacekeeping force in, 219

US opposition to peacekeeping force in, 213–15

warlord rule in, 210–12

Sorkin, Aaron, 171

South and Central Asia Bureau, 155, 171

South China Sea, 291

South Korea, 288

South Sudan, x x i x, 293

Soviet Union, x x ii, 5, 16, 22–26, 28, 87, 172, 208, 228

Spann, Mike, 180

special envoys, 277

Special Forces, US, 137, 217

Special Forces Team 595, 196–97

Srebrenica, 39

Sri Lanka, 32, 34

Stanford University, 277

State Department, US, x, xvii, xix, xx–xxi, xxiii, xxvii, xxx–xxxix, xxxiii, 3, 54, 55, 56–57, 78, 80, 82, 110, 124, 148, 155, 156, 171, 184, 190, 195, 209, 213, 224, 230, 234, 246–47, 283, 284, 295, 299, 306, 307

budget of, xxi–xxiv, xxvi

bureaucratic inefficiency of, 275–76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at, 291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and Law Enforcement Affairs, 269

“Buy American” plan of, 156–57

China policy and, 290–94

Christmas party of, 121–23

counter-ISIL activities in, 158–59, 162

decline of, x x x i – x x x ii

Diplomatic Security Service of, 30

domestic responsibilities of, 3

erosion of culture at, x i x

on Ethiopian invasion of Somalia, 217

expert contractors in, x v

funding of, 273–74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and, x x iv – x x v

gutting of staff at, 274–75, 276–77

Haqqani and, 34

hiring freeze at, 278

Historian' s Office of, 19

Iran deal and, 302

lack of Pakistan visas for, 76

Mahogany Row Massacre in, 260, 274, 287

mission statement of, 271

morale at, 278

North Korea unit at, 289–90

and Obama administration, x x ii–x x i x

Office of Global Criminal Justice at, 271

Operations Center of, 262

and Pakistani EJKs, 9–10

and Pakistani reporters' killings, 70–71

Raphel and, 145–46

State Department, US (*continued*)

spending by, 292

Syrian policy and, 161–62

under Tillerson, 257–77

Tillerson' s survey of, 269–71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x x x i

Trump administration' s firings from, x v–x x

Trump administration' s war on, x x–x x i

Trump funding cuts for, 271–73

unfilled posts at, 274–75, 277–78

vacancies at, x x x ii

Wise Men era of, 5-6

in World War II, 4-5

Steiner, Michael, 99-101, 102

Steinmeier, Frank-Walter, 297

Stevenson, Adlai, 246

Stinger missiles, 171

Strauss, Johann, 296

Sudan, 46, 140, 209, 212, 293, 294

Suez Canal, 229

Sullivan, Jake, 93, 94, 110, 120

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 (SCAF) , 230

Supreme Court, Pakistan, 141-42

Supreme Court, US, x x v

Swat valley, 74

Switzerland, 93

Syria, 156, 158-60, 163, 264, 281, 302, 303

US strikes on, 262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SDF) , 159–60

Tahrir Square, Cairo, 225, 229

Taiwan, 291

Takhar province, 200

Takht-Ravanchi, Majid, 300

Talbott, Strobe, 13, 15, 30, 38

Taliban, 8, 28, 29–30, 41–43, 44–45, 65, 66, 67, 79, 99–101, 102, 114, 115, 117, 133, 135, 151, 155, 166, 172–73, 176, 179, 184, 185, 192, 194, 199, 202

approach to Karzai by, 176

Dasht-i-Leili massacre of, 164–202

prisoners held by US, 101

reintegration of low-level, 102–4, 105

resurgence of, 201

talks with, 173–74

UN blacklist of, 106

UN sanctions on, 173

US negotiations with, 99–110

US policy toward, 175–76

US talks with, 120

Tanzania, 208

American embassy bombed in, 210

Tashkent, Uzbekistan, 173–74

Team 595, 180

Tehran, 21

terrorism, 34, 35, 42, 163, 209, 219–20, 242, 244, 247–48, 302

Tillerson, Renda, 259

Tillerson, Rex Wayne, x i x – x x , 257–60, 262–63, 269, 283

author' s meeting with, 257–59, 265

background of, 259

China policy and, 290–94

formal guidelines for memos under, 263

Haley and, 263–64

inaccessibility of, 261–62

Iran deal and, 279–81

Kushner and, 266–67

on North Korea, 285–86

potential firing rumors about, 263–64, 265–66

press relations of, 260–61

on SRAP, 155

State funding refused by, 272–73

Trump and, 264–65

Time (magazine) , 38, 40

Times Square, New York, N.Y. , 76

To End a War (Holbrooke) , 85, 308–9

Tokyo, donor’ s conference in, 88

Torres, Freddy, 237–40

torture, 186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 293

Treasury Department, US, 55, 299

Treaty of Alliance, 3

Truman, Harry, 5, 284

Truman Doctrine, 5

Trump, Donald, x iv, x x vi, x x i x, 148, 155, 159,
202, 245, 253, 259, 267, 269, 274–75, 289, 296

on Afghanistan, 201

authoritarian strongmen praised by, 157–58

Cuba policy of, 282–83

Iran deal and, 279–81, 296

militarization of diplomacy under, 156–57, 163

North Korea and, 284–90

off-the-cuff remarks of, 283–84

Paris Agreement and, 281–82

Russian contacts of, 142

Sisi admired by, 236

Tillerson and, 264–65

Trump administration, x vii, x x i, x x ii, 258, 276,
277, 292–93, 295, 308

Afghanistan review of, 201

ambassadors fired by, x v , x v i – x v ii

first budget of, 271

Iran deal and, 302, 305–6

militarization of, 156–57

State Department and, x x x i

Syria policy of, 160–61

transition team of, x iv–x v , x x

waging war on State Department, x x – x x i

Tudjman, Franjo, 39

Tunisia, 30, 227, 229

Turkey, 93, 158, 159–60, 161

Turkmenistan, 293

12 Strong (film) , 197

Twitter, 283, 285, 289

Tyson, David, 177, 179

U-2 spy planes, 16

Uganda, 207, 212, 219

Ukraine, 298

UNHCR, 241

UNICEF, 46

Unión Patriótica, 249

United Arab Emirates, 234

United Nations, 29, 46, 53, 176, 187, 209, 210, 212,
219, 285, 301

agency for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264, 266

China and, 292

peacekeeping missions of, 271

terrorist blacklist of, 135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dget of, x x ii–
x x iii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 x x ii, x x v, 21, 55, 57, 78–79, 80,
91–92, 93, 94, 124, 246, 269, 270, 271

funding for, 79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x x ii–x x iii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50, 271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162

US-Egypt relationship, 228-29

US-Pakistan relationship, 22, 23-26, 28-29, 34, 41-42,
43-44, 70-71, 87-88, 96, 134, 143, 146

and Bin Laden killing, 131-32

blocking of visas in, 76-77

Davis scandal in, 129-30

lack of sincerity in, 75

lies in, 70-73

miscommunication in joint operations, 74-75

presidential visits and, 114-15

transactional nature of, 91

UNRWA, 264, 266

UN Security Council, 173

US Army Special Warfare Center, 245

US President' 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PEPFAR) , 295

Uzbek language, 168

V-22 Osprey, 104

Vance, Cyrus, 52

Venezuela, 283–84

Verveer, Melanne, 10

Vienna, 296–97, 301

Vienna Convention, 128

Vietnam, 64, 79, 245

Vietnam War, 5, 6, 13, 15, 17–20, 24, 50, 60, 63, 115,
116, 246

Vogue, x x viii

VX nerve gas, 26

Wall Street Journal, 46, 151

Walt, Lewis, 17–18

war crimes, 185, 271

War Department, US, 56

warlords, 113, 163, 165, 166, 167–68, 173, 178–79, 182–
84, 200, 208, 216

Somali, 204, 209–12, 215

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 4

Washington Post, x xviii, 93, 109, 139, 142, 261, 282, 298

Wassom, Herbert M., 25

water policy, 96–98

Wayne, John, 258–59

Waziristan, 76

Webster, William H., 27

Werunga, Simiyu, 216

Western Europe, 5

Western Hemispher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242

Westgate shopping mall, Nairobi, 206–7

Westmoreland, General, 18

West Point, 60

Whelan, Theresa, 214

White, Maureen, 124

White, Robert, 245

White Beast, *see* Hakim, Abdul

White Eyes, *see* Siad, Yusuf Mohammed

Whitson, Sarah Leah, 233–34

WikiLeaks, 130

Wilson, Charlie, 170, 171–72

Winfield, Ala., 192

“Wise Men, ” 5–6

Wisner, Frank, 117–18, 230

women, 22, 28, 117, 188–89

women’ s rights, 231

Wooburn Green, 204–5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60

Woodruff, Judy, 123

Woodward, Bob, 63, 66, 113, 130

World Bank, xx, 4–5, 97

World Children’ s Choir, 122

World War II, 4–5

Worthington, Sam, 93

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39-40

Xi Jinping, 290-91

Yarborough, William, 245

Yemen, 156

youth unrest, 227

Yugoslavia, x x ii, 39

Zardari, Asif Ali, 36, 73, 137-38, 140, 141

possible coup against, 138

Zarif, Javad, 297-98, 300

Zayed al Nahyan, Sheikh Mohammed bin, 217

Zia-ul-Haq, Mohammed, 23, 24, 25-26, 33

Zionists, 231

Zorick, Michael, 2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和平宣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上下/（美）罗南·法罗（Ronan Farrow）著；李茸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0

书名原文：War on Peace: The End of Diplomacy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Influence

ISBN 978-7-5201-4955-6

I. ①向… II. ①罗…②李…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2112号

向和平宣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上下）

著者/〔美〕罗南·法罗（Ronan Farrow）

译者/李茸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王春梅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21.25 插页: 0.5 字数: 295千字

版次/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4955-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4584号

定价/98.00元 (上下)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帝国的十字路口：从哥伦布到今天的加勒比史
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上下）
向和平宣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上下）
中国与世界社会：从 18 世纪到 1949
沿坟墓而行：穿越东欧大地走向伊斯法罕
欧亚大陆的黎明

扫码 GO
索恩微店



忘掉地平线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 / 宋 涛

美国外交何以崩溃？全球领导力何以消失？
美国外交为何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伍迪·艾伦之子罗南·法罗从外交官转变成调查记者，
采访了从亨利·基辛格到希拉里·克林顿、再到雷克斯·蒂勒森在内的
所有在世的美国国务卿。

用亲身经历揭露美国外交内幕，解密美国外交中的战略短视，透析美国历史上
影响最为巨大、最令人不解的转变之一。

法罗凭借在政府中任职的经历以及采访所得的鲜活内容，
对陷入困境的美国外交官们表达了痛惜，也对外交职业濒危何以影响巨大做出了论述。

他写道，“经典的老派外交”令人“沮丧”，且充斥着“大量的时差”。

然而他不失揶揄的语气以及讲故事的叙事方式，
让原本折磨人的乏味内容看起来……生动且富有人情味。

——丹尼尔·库尔茨-费伦 (Daniel Kurtz-Phelan)，《纽约时报》

展现出生动的文笔、敏锐的评论以及大量饱含激情和愤慨的精彩故事……
法罗是天生的讲故事高手，其同理心及想象力甚至为那些无穷无尽又令人尴尬，
却是外交工作组成部分的感恩节晚餐注入了生命力。

——罗莎·布鲁克斯 (Rosa Brooks)，《华盛顿邮报》

坚持不懈的调查研究，外加具有强劲说服力的论证……
法罗在书中展示了惊人的采访范围及内容……（他是）一位不知疲倦且富有想象力的记者。

——戴维·施里布曼 (David Shribman)，《环球邮报》

一部杰作……文采飞扬。

——丹·辛普森 (Dan Simpson)，《匹兹堡邮报》

美国是否已然背弃了其外交及外交官？如果是，代价有多大？
法罗有效地论证出我们已然背弃了外交，且代价会极其高昂的观点……
他异常清楚地勾勒出了外交工作的意义。

——芭芭拉·博丁 (Barbara K. Bodine)，《旧金山纪事报》



忘掉地平线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定价: 98.00 元 (上下)